历史的温度

（套装共5册）





中信出版集团
CITIC Press Group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历史的温度

（套装共5册）





中信出版集团
CITIC Press Group

历史的温度1-5（套装共5册）

张玮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总目录

历史的温度：寻找历史背面的故事、热血和真性情

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历史的温度3：时代扑面而来，转瞬即成历史

历史的温度4：那些执念和信念、理想与梦想

历史的温度5：那些博弈、较量与人性

历史的温度

寻找历史背面的故事、热血和真性情

馒头说历史

张玮 著

历史书上的
某个名字、某段话，
它们的背后
到底隐藏了什么？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推荐序

自序

人物篇 是非留待后人说

大家都称她为“夫人”，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她？

爱因斯坦的三个侧面

爱迪生的侧面

女生的美貌与智慧，真的能够并存吗

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做一个“新时代女性”，真的要拿生命来换？

我认识一个男人，叫刘翔

民国第一个享受国葬的人

他没有军衔，但人人称他“将军”

为什么他没打过一场仗，却是陆军上将？

“汉奸将军”的自我救赎之路

“戴老板”之死

“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一个被低估的“大V”的成长之路

一个63岁的老头，是怎么收复166万平方公里国土的？

珍妃为什么必须死

靠画漫画，28岁就缴400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是怎样一种体验？

逸闻篇 往事并不如烟

45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再回月球？

需要经历时间考验的，除了爱情，可能还有建筑

张衡的地动仪，到底是否存在？

“世纪之骗”背后的兴奋剂黑历史

史上最黑暗的一届奥运会
孙杨为什么会被别人质疑“服药”？
“让球”阴影下的“小山智丽事件”
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
两个大总统，你选哪个？
“一战”，被遗忘的14万中国人
“二战”期间，居然还有这样的一批日本人
一段匪夷所思的“美国往事”

战争篇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场“耻辱海战”的背后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背后
这群四川人，不该被遗忘
抗日战争，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军
一座被死守的仓库
1937，这座城没有不战而降
血战台儿庄
日本投降前后的四个片段
后记
附录 读者评论

版权页

推荐序

张玮请我为他的新书写序，作为他的老师，我很高兴这一天终于来到。

2001年，我给复旦中文系98级文科基地班开设比较文学。文基班当年是复旦在上海以提前录取的方式开办的尖子班，现在已经没有了。文基班的学生们个个眼界开阔，好学上进。张玮就是当时这个精英班的团支部书记。

印象中的这位团支书，高大英俊，沉稳内敛，对学习和工作都很认真负责，话不多，也不是那种喜欢围着老师转的风格。复旦学生素质总体上非常高，校园文化和学习氛围很好，我总结过，就是低调又好学，冷静有温情，务实不功利，宽容不苟且。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学生时代的张玮非常贴切。这与学校的传统有关。复旦的风气，看上去有点散漫，有点像复旦民间的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但其实每个人都很努力，这种努力不是管出来的，而是自然地产生的。在一个宽松而精英荟萃的地方，师生们会自然而然地激活自身的主动性。

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位低调务实的张玮同学的主动性真是让我眼前一亮。他竟然在做完了卷子之后，又在背面用了整整两页来谈他对一个叫《合金装备》的游戏的叙事手法与对文学性的开拓的认识。在今天，年轻一代都玩过这个游戏，但是2001年，《合金装备》刚刚问世，那还是全社会视游戏为毒品，为旁门左道，为洪水猛兽的年代，一名人品端正、老实低调的好学生，竟然在至关重要的期末考试上忍不住倾诉自己对一个全新的文化现象的赞叹。没啥好说的，我果断给了一个A。说真的，16年过去，我已经忘光了当年出的考题，但张玮的那段文字还在我的眼前。什么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就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2014年，我来到澳大利亚工作，这里地广人稀，我举目无亲。有一天，我收到一份快递，打开一看，是张玮从国内寄来的《合金装备》限量纪念版手办。在知音难觅的异国他乡，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慰了。十几年过去，《合金装备》主角斯内克（Snake）已从小生变成了大叔，《合金装备》中的VR（虚拟现实）任务已经发展成今天真正的VR版，

张玮也从一名青涩的学生成为知名的媒体人士。毕业后，他先是做了多年的体育记者，曾任解放日报社的新媒体中心主任。后来又成为解放日报整体转型后的运营、技术中心总监（App叫“上观新闻”）。他自己业余经营一个微信公众号，叫作“馒头说”。这个公众号运行时间不长，有10多万的订阅者，动辄10万＋的阅读量。本书就是“馒头说”上最受读者欢迎的文章的精华版。

在张玮毕业后的十几年中，我们很少见面和联系，但是我确实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纽带。张玮从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我后来曾兼任一份大众科学杂志《新发现》的主编，也非常关注新媒体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与文学的关系。“馒头说”为何倍受读者的欢迎？这个答案，16年前的张玮已经做出解答，那就是他既是复旦最精英的文基班认真负责的班干部，又对新的文化潮流有着敏锐的触觉和激情。白天他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好记者，到了晚上他就变成了上天入地的斯内克，驰骋在激动人心的新媒体世界。作为资深记者，他知道读者关注的是什么，什么题材最受欢迎，热点在哪里。作为中文系的高才生，他知道怎样把文字调配得恰到好处。但这些都还不是关键，在今天的新媒体中，抢眼球，玩文字，搞“震惊体”的人多如牛毛。炒作有术，也有效，但大浪淘沙，最终能不昧良心，赢得读者真正尊敬和认同的新媒体账号又有多少？“馒头说”不算超级大号，但粉丝的质量和认同度却很高，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张玮的真诚、敬业与客观。

比如，《我认识一个男人，叫刘翔》。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看到过的所有写刘翔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最真实的一篇，也是最温情的一篇。唯其真实，所以理解，所以温情。但这样的文章，真不是那些复制粘贴的“震惊党”写得出来的，那需要多少年与刘翔的相交，不光是相交，还要相知。对了，还需要共同的对电子游戏的爱好。再比如关于中国游泳队的故事，背后的内幕，他不回避遮掩，也不渲染夸大，不诿过于人，而是冷静地直面一段历史，完整地写出漫长的前因后果，把一位负责任的职业媒体人的素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的大半生都是在传统媒体的时代度过，也一直在思考新旧媒体的关系。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新媒体中那些最受人尊敬的、最具有可信度的人士，大多由传统媒体中的从业者转型而来。这也让我们在为新媒体鼓劲喝彩的同时，重新思考传统媒体的那些“传统”的规矩、习惯、标准的意义。在一个狂奔的年代，我们有时候也要停一下，看看走过的路，

整理一下自己的行囊，然后再重新出发。张玮把他新媒体中最热门的文章用最传统的方式出版，也有这种冷却与回归的意义。相信张玮在他未来的道路上，一定能继续把这种冷与热的关系处理得很好。

严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序

2016年7月15日，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推送了一篇文章，叫《历史上的今天：奥特曼出生，杨贵妃自缢》。

“馒头说”这个微信公众号，其实我很早就注册了，当初注册的目的，是用来发一些随笔和感想，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地更新着，直到有一天，我想：要不拿一个微信公众号的“原创”标签？

按照微信的规定，要拿“原创”标签，就要持续更新一段时间。于是我想，写什么东西能让我有动力持续更新下去呢？想来想去，想到了“历史上的今天”这样一个题材。

选择这个题材，一是因为我从小就对历史很有兴趣，本科的专业也算与历史有关（是一个提前招生、文史哲都要学的班级），二是选择“历史上的今天”其实有点投机取巧，因为网上有很多“历史上的今天”的资料，每天在历史上都发生那么多事情，我只需要挑几件感兴趣的评说一下就行，完全不会有作为公众号运营者最大的烦恼：每天找选题。

第13天，写完第13篇推送的时候，我在后台得到了微信的通知：我获得了“原创”标签。

但原来打算拿到“原创”标签就休息的我，却发现我停不下来了——我有了一批每天会在固定时刻等我更新的读者。

我自己本来就是搞媒体的，对“读者”的概念并不陌生，但作为传统纸媒的写作者，其实我离所谓的“读者”挺远的——十几年的记者生涯，我除了收到过几十封寄到报社的读者来信之外，并不知道看我文章的读者有多少，他们都是谁，他们对我的文章到底有什么想法。

但我通过“馒头说”，能真真切切感受到读者通过后台消息和留言评论给我的反馈，他们说，喜欢看我写的历史故事，因为客观，同时又有温度。

关于“客观”，我只能说，作为“业余选手”的我一直努力在尝试。

在“馒头说”的一个个历史故事中，我都尽量用一种第三方、不带感情色彩的口吻还原当时的历史事件，而在每篇末尾，我都会写篇“馒头说”的短文，或短或长，抒发自己的感受。我一直想表达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很多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在现在用“上帝视角”去评价当时的人和事，这对当时的人来说，不公平。

关于“有温度”的评价，效果有一点出乎我预料。直到现在，依旧都会有读者给我留言，说不敢在公共场合看“馒头说”，因为会哭。有的说，“在地铁上直接就哭了”；有的说，在“公交车上哭得稀里哗啦”；还有一位告诉我，“在办公室看哭了，领导过来问我，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其实我对“有温度”的理解是，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我们看似由时间、地点和一连串数据组成的历史事件，背后的主角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构成了我们的历史。而既然是人，就一定有人性，一定有故事，一定有温度。

因为希望能做到“客观”和“有温度”这两点，我的“馒头说”开始越写越长。原来我的初衷，是每天花半个小时，把我觉得有兴趣的“历史上的今天”几个故事串一串，简单点评一下。但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后台留言说“不过瘾”“不解渴”，于是，慢慢演变为每天只写一个历史故事，尽量写透。

因为我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馒头说”的写作只能放到睡前。由于读者越来越多，责任也越来越重，大量细节的考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写作时间从最初的半小时，变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直到现在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有时甚至需要更多），甚至要写到凌晨。

曾有其他媒体采访我时问：让你坚持把“馒头说”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我想了想，没有其他原因，只有一个：读者的期待和支持。

在后台，曾经的国民革命军将军的长孙媳妇，留言说谢谢我写了她家长辈誓死抗日的故事；有航天工程师的家属，留言说谢谢我让大家知道航天人的不易和艰辛；我的很多读者，在参观我写过的历史人物的博物馆、故居或经过以他名字命名的路牌时，都会拍照片发给我一起分

享；我的一些女性读者，说自己原来对历史不感兴趣，但现在可以和男友或老公一起探讨一个历史或国际政治问题，甚至对方还要向她请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去台湾大学交流的大陆女生在后台留言，说上历史课，教授提问谁知道“四行仓库”的故事，全班40多个台湾学生没人知道，而她站起来侃侃而谈——她说，因为是看了“馒头说”那篇《一座被死守的仓库》。

正是每天后台成百上千读者的留言和鼓励，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到了后来，每天开始有一群不同的读者发来同样的留言：“出书吧！”

面对读者的留言，我其实是诚惶诚恐的。因为这毕竟是一篇篇发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类似随笔一样的文章，尽管尽量力求客观，但肯定还是带着个人的情感烙印；尽管尽量考证，但因为业余时间仓促，肯定有不少谬误——这些东西如果结集出版，只能当作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个人的一些随笔，是绝不能当作历史书籍来看的。

但内心毕竟还是有一些小憧憬的，希望自己坚持了一年的写作，能有一个小小的交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想法得到了中信出版社的支持。在黄维益编辑的鼓励下，我真的开始把以前写的推送开始筛选，校对，结集——我从没想过，自己的微信推送，最终真的能成为一本书。

在筛选文章时，确实有一点痛苦：截至2017年4月底，“馒头说”已经推送了136篇正式的文章，字数达到了68万字——这肯定是一本书所容纳不了的。经过反复的选择，最终将其中一些文章重新整理和删改，收录到了这本书里。而因为只能收录部分文章，所以不可能以“历史上的今天”这样的时间线作为索引，于是分为“人物篇”、“逸闻篇”和“战争篇”三个部分。

而书名，经过读者的投票，最终就叫《历史的温度》了。

（对不起当初选《历史的真性情》的读者们了。不过编辑和我说，以后可能会出第二本、第三本，以“馒头说历史”为系列名，书名还可以继续变化。）

最后，还是想再次报告的是：这是一本收录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感想的随笔集，还望大家对其中的谬误多宽容，多谅解，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2017年4月27日

写于重庆飞往上海的航班上

人物篇　是非留待后人说

大家都称她为“夫人”，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她？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著名女科学家，我们已经习惯称呼她为“居里夫人”。她的事迹，往往是我们以前写励志作文的素材，但今天我们要讲的，却不是这些故事。

1

1898年12月26日，玛丽·居里提交给法国科学院一份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她称自己和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了一个比铀的放射性要强100万倍的新放射性元素88号。

这个元素，他们命名为“镭”（Radium）。

而就在5个月前，他们刚刚宣布发现了新放射性元素84号——玛丽·居里建议用自己的祖国波兰（Poland）命名为“钋”（Polonium）。

2

以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可能读小学时就知道的故事。



居里夫人

但为了使今天的故事能有相对的完整性，所以还是有必要简单介绍下玛丽·居里的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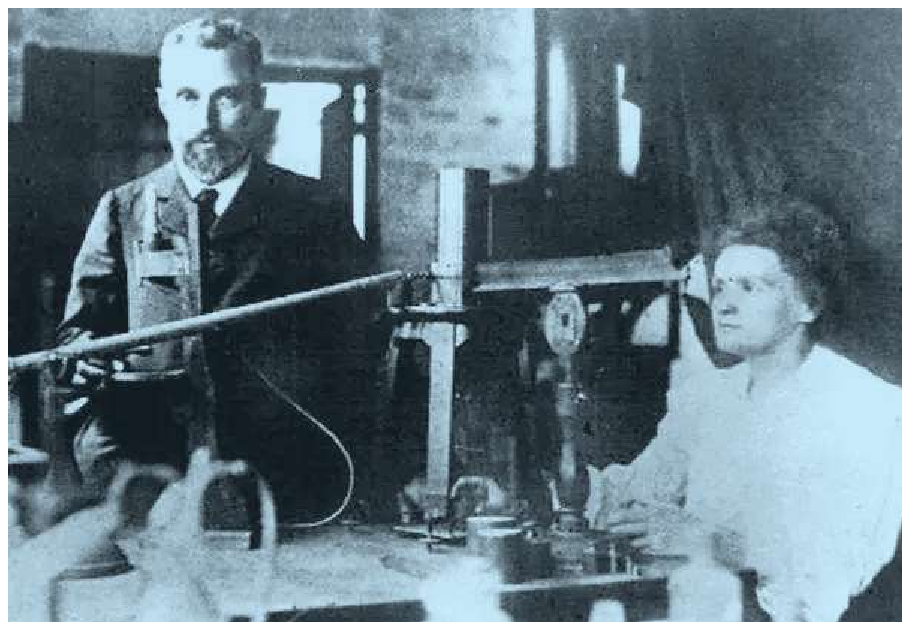
少女时期的玛丽

1867年11月7日，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出生于波兰华沙市一个中学

教师的家庭。1891年，她24岁的时候，到巴黎求学，进入巴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

1894年，因为想得到更好的实验环境，玛丽认识了当时的巴黎理化学校实验室主任皮埃尔·居里。一年之后，两人在巴黎结婚，玛丽从此随了丈夫的姓氏，成为“玛丽·居里”。

1896年8月，玛丽通过了巴黎理化学校的职称考试，在校物理实验室谋得了一份职位，从此开始与自己的丈夫皮埃尔·居里一起工作。



居里夫妇在做实验

1898年，居里夫妇宣布发现了“镭”。这个宣布发布后，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你说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在哪里？你指给我们看啊！

为了提炼纯镭，居里夫妇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搭上自己的所有存款，买了十几吨沥青铀矿渣，开始艰苦的提纯实验，经历45个月几万次的提炼，终于获得了10克氯化镭。

于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1903年，居里夫妇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用来表彰他们对放射性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

而玛丽·居里的坎坷命运，也就此开始。

3

先来说说1903年的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吧。

首先，这个奖并不是由居里夫妇单独获得，而是和别人分享的。分享走一半奖金的，是一个叫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的科学家。

贝克勒尔是法国的知名物理学家，出身科学家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著名科学家，祖父还是皇家学会会员。贝克勒尔在1896年第一个发现了天然放射性（尽管他一开始错误地认为是荧光）。



贝克勒尔

事实上，贝克勒尔对天然放射性的发现固然功不可没，但他之后并没有做出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和理论成果。主要的工作，还是居里夫妇做的。

当然，贝克勒尔获得诺贝尔奖并非不合情理，但让人费解的是，在当时由四名著名科学家提名的获奖者中，一开始并没有玛丽·居里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的是贝克勒尔。

而真正做出重大贡献的居里夫妇呢？皮埃尔·居里被外界形容为“贝克勒尔的助手”，而玛丽·居里，被称为“皮埃尔·居里的助手”。

但事实是，对于放射性的概念和理论，玛丽·居里才是真正的开创者，丈夫皮埃尔是她的助手。1895年4月，法国皇家科学院就宣读了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的论文《铀和钍的化合物之放射性》——当时她还没和皮埃尔·居里结婚（皮埃尔·居里后来是在妻子研究镭两年之后才加入的，帮助改进了试验仪器）。

因为丈夫的坚持，玛丽·居里最终出现在了获奖名单中。但据说贝克勒尔曾这样说过：“居里夫人的贡献是充当了皮埃尔·居里先生的好助手，这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上帝造出女人来，是配合男人的最好助手。”[1]

4

不管怎样，玛丽·居里毕竟还是从1903年的诺贝尔奖中获得了认可。但接下来等待她的，就是更残酷的命运了。

1906年4月19日，在获得诺贝尔奖三年之后，皮埃尔·居里在路上被马车撞到，当场身亡。

夫妇俩一路走来一直相互扶持，现在只剩下了39岁的玛丽·居里孤身一人。

然后，保罗·朗之万闯入了她的生活。

朗之万比玛丽小5岁，是皮埃尔·居里的学生，同时也是一位极有天赋的科学家。皮埃尔·居里去世后，朗之万成了玛丽的好朋友和可以信赖的科研工作者。在玛丽最艰难的时候，是朗之万帮助她一步步走了出来。玛丽·居里谢绝了法国政府的抚恤金，表示凭借在索邦大学任教，可

以养活自己和女儿，而她在索邦大学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朗之万帮忙准备的教材。



居里夫妇度蜜月时的照片，自行车是他们买给自己的新婚礼物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友情慢慢变成了爱情——但朗之万是有妇之夫。

出身贫苦的朗之万，娶了一个小杂货店老板娘的女儿珍妮为妻。你很难去说这桩婚姻的对错，但因为双方学历和见识上的巨大差距，朗之万渐渐和妻子没有了共同语言——妻子不希望他从事任何研究，只希望他能挣更多的钱养家。

这对一个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妻子而言，也不是一个非常过分的要求，妻子要抚养孩子，操持家庭，她也有她的苦衷。只不过朗之万的追求肯定不仅是这个而已。恰恰珍妮的脾气似乎比较泼辣，据说曾打破

过朗之万的头。

玛丽·居里起初是想调解的，她甚至批评朗之万对妻子太不客气了，但渐渐地，她发现他们两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自己又深深爱上了朗之万，所以开始规劝他们离婚。

1910年，朗之万用自己的名字在巴黎索邦大学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那里成了他和玛丽·居里在一起的地方，玛丽称那个房子为“我们的地方”。

不幸的是，朗之万离婚失败了，更糟糕的是，他妻子拿到了玛丽·居里写给他的情书，然后这些信被捅给了法国的媒体。

整个法国轰动了——枯燥的科学研究怎么可能比名人八卦更有意思呢？

法国的《新闻报》《新闻小报》《作品报》等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玛丽·居里与朗之万的“神秘恋情”，并开始大量公布她的信件（但并不拿出原稿），还有媒体开始揣摩，是不是皮埃尔在世的时候，两人就已有了“奸情”。



前排居中的是玛丽·居里和朗之万。1911年，玛丽·居里凭借分离出纯金属镭，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史上唯一一位既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人

玛丽·居里曾愤怒地还击，警告不要侵犯她的隐私，但很快被更大的

民情所淹没——一些法国人开始袭击她的住宅，用石头砸坏她的窗户，有人呼叫“滚出来，外国佬”，或者是“偷夫贼”……

一封无法确定真假的情书被曝光。在那封信里，玛丽·居里流露出了对性的渴望。生性浪漫的法国男人似乎对女性表达出这种渴望怒不可遏，玛丽开始多了一个新的称号：波兰荡妇。

一批原本支持玛丽·居里的法国科学家也开始改变立场了，他们联名写信让玛丽离开法国，其中包括玛丽最忠诚的战友保罗·艾培尔。为此，艾培尔的女儿和父亲大吵了一架（女儿是居里的学生），那位从不顶撞父亲的女儿宣称要和父亲断绝关系，并说了一句话：“如果玛丽·居里是一个男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玛丽·居里在丈夫去世后，独立抚育两个女儿长大。她的大女儿伊蕾娜·居里于1935年，和丈夫一起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事实可能确实如此。

玛丽·居里一生的挚友爱因斯坦，在私生活上也是一团乱麻，却很少有人在意这些。在这件事上，爱因斯坦倒是写过一封信声援玛丽：“如果两个人相爱，那谁也无权干涉。”

那么那位同样要承担责任的男人朗之万呢？

他和居里分开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妻子的身边——条件是妻子允许他公开拥有一个女秘书做情人。多年以后，朗之万还被妻子允许和一个

年轻的女学生在一起。为了养活这个女学生情人，朗之万甚至还请求玛丽·居里在研究所为这学生安排了一个职位。

之后的三年，玛丽·居里住进了一家修女开办的医院逃避一切。

而除了她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没有什么损失。

5

1914年，法国公众对议论玛丽·居里绯闻的兴趣明显减弱了，因为在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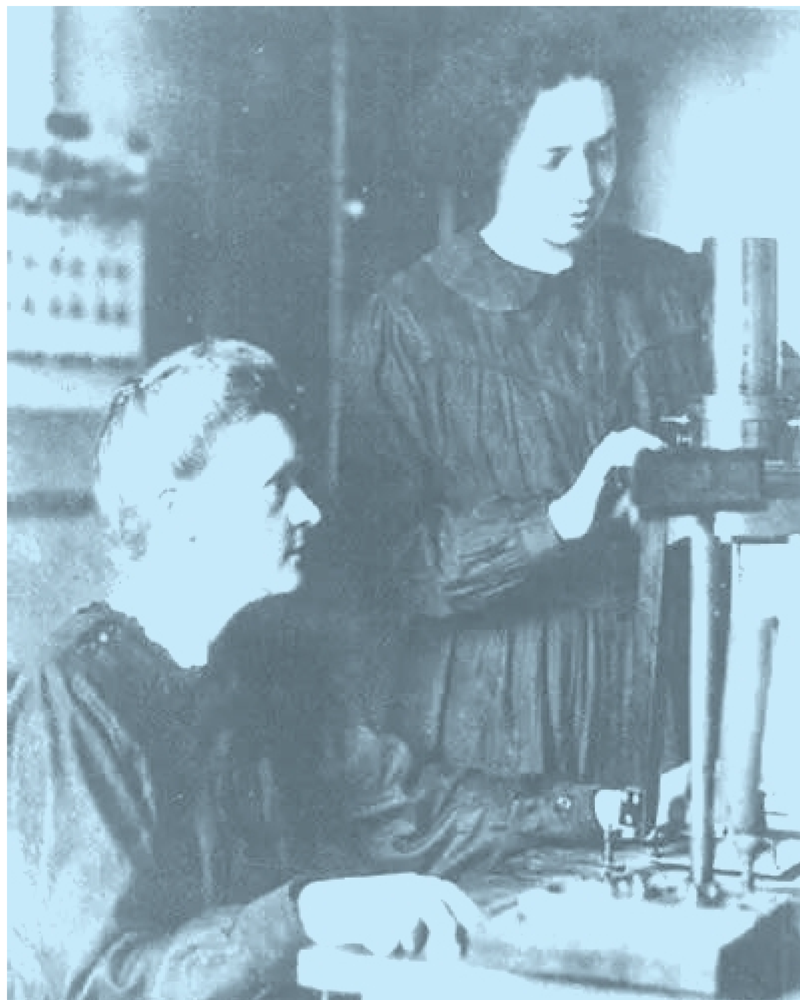
面对拿石头砸她家窗户、称呼她为“荡妇”、要求她离开法国的法国人，玛丽·居里做出了如下行为：

首先，她把诺贝尔奖牌拿到银行，希望能捐给政府帮助打赢战争。当得知银行拒绝熔掉奖牌之后，玛丽·居里拿出了全部诺贝尔奖奖金，购买了法国的战争债券。

然后，玛丽·居里关掉了她刚刚建成的“镭实验室”，开始研究X射线。她的理由是：战争期间，进行镭元素的研究意义不大，X射线却有可能在战场上派上用场。

玛丽·居里先是说服法国政府让自己做了红十字会的放射科医生，然后说服自己的有钱朋友捐献车辆和钱财（居里夫妇本可轻松成为亿万富翁，但他们放弃了镭的相关专利申请，因为玛丽·居里认为这是科学的共同财富）。1914年10月底，玛丽·居里学会了X射线科学和人体解剖学，还考了驾照，掌握了基础的汽车维修技能。

然后，她在一台“雷诺”卡车上组装上一台发电机、一个病床，以及一台移动的X射线仪。



居里夫人和女儿伊蕾娜在实验中。居里后来把女儿也带上了战场

为了说服政府和军人们相信X射线对军队伤员的检查有巨大帮助，47岁的玛丽·居里，冒着生命危险，自己开车上了前线，让负伤的士兵上车检查。

子弹残片、榴弹炮残片，这些原来难以发现的弹片，在X射线的照射下都暴露无遗，大大降低了外科手术的难度。军官和士兵慢慢开始佩服眼前的这个小个子女人，他们把居里夫人开的那辆小卡车，亲昵地称为“小个子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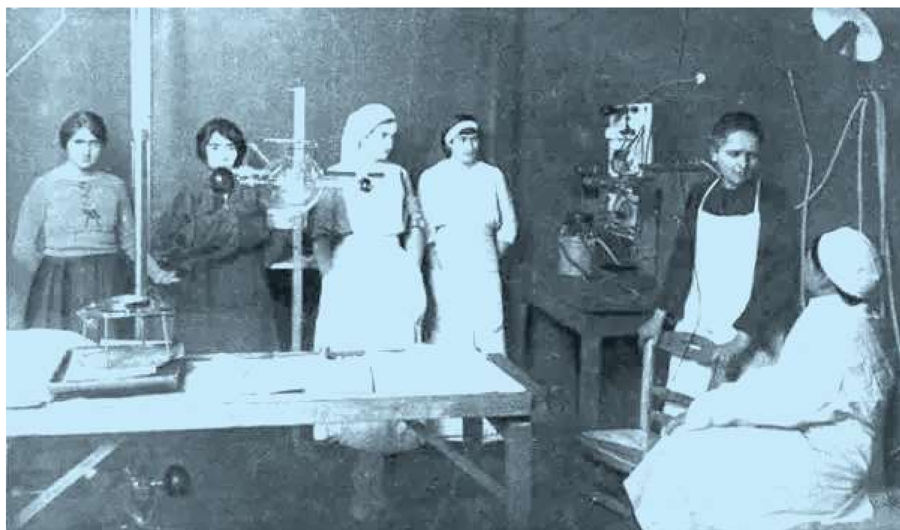
而很多士兵并不知道，亲自为他们检查伤口的这个女人，是两届诺贝尔奖得主。



居里夫人与她的X射线车“小个子居里”

光一个人工作，玛丽·居里发现远远不够。她需要更多的车辆、更多的X射线仪来帮助伤兵。

于是，她为150名妇女开设了X射线学习班，并让女儿伊蕾娜来到战场，继续管理X射线仪。然后她又取回了自己的镭元素，并开始收集放射性气体（氡），制作空心针，用来为感染组织消毒。



居里夫人在教授护士们放射学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宣布停战。

停战消息传来的那一天，玛丽·居里正在实验室收集氡。听到消息后，她立刻在窗户上挂出了法国国旗，然后将“小个子居里”开到街上庆祝。

那一刻，她比很多法国人看上去都更高兴。

6

1934年，67岁的玛丽·居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由于长期暴露在放射性下（尤其是在研究X射线那个时期），玛丽·居里得了恶性白血病。

在她去世后，法国政府才意识到她的X射线研究可能救助了数十万法国士兵，这才给她颁发了奖章。

而玛丽·居里因为长期在放射环境下工作，她的衣服、实验设备、各种笔记本都充满了放射性，人们只能穿上特殊的防护服才敢去接触它们。

在那个时候，终于没有人再去在意她的其他私生活，而是对她献身科学的高尚人格肃然起敬。

爱因斯坦说：“在所有的世界名人当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



1913年7月，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一家在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了两个星期，孩子们走在前面玩耍，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慢慢跟在后面，讨论物理问题。这张照片，被很多人称为物理学界最动人的照片之一

馒头说

曾经有人对“居里夫人”这个称呼有些愤愤不平。

因为玛丽·居里有自己的名字，在丈夫过世后，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很多荣誉，却一直还被称为“居里夫人”。

其实我倒觉得，在中文的这个语境下，“夫人”更多的是一种尊称，而不是代表婚姻的从属。

但从其他的一些方面来看，玛丽·居里确实遭遇过很多不公。

她之所以去巴黎读大学，是因为华沙的大学不收女学生。她虽然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却只能做一个中学女教师。她没资格在法兰西科学院朗读自己的论文。

1911年，她以一票之差落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理由是“科学院没

有女院士”。

皮埃尔·居里去世后，实验室也与妻子没有关系，后来是玛丽多方申请才重新获得研究资格。

还有她的感情。

诚然，哪怕朗之万的婚姻再不幸，也不是她可以在他离婚之前就介入的理由，但她也尝到了各种后果。而朗之万，作为一个男人，出轨的责任似乎完全不存在，只要他最后回归家庭，一切就可以被原谅，留下玛丽一个人承受众人的嘲笑甚至侮辱。

值得一提的是，朗之万的原配珍妮后来允许他养情人，又是怎样的一种无奈和痛苦。

玛丽·居里曾冷静地对自己的女儿说：“在由男性制定规则的世界里，他们认为，女人的功用就是性和生育。”

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看看现在有些自己出轨的男人，舆论反而会先指责起被伤害的女方来：是不是忙于自己事业对丈夫不够温柔？是不是没有体会到丈夫的辛苦？只要他肯浪子回头，还是原谅他吧！女人不能没有家庭！女人有孩子有丈夫才叫人生赢家！

这是男人世界观设定的“赢家”吧！

必须承认的是，今天这个关于玛丽·居里的故事，与其说是在展现她伟大的人格和科学成就，倒不如说是在记录她为女性正名所做的努力和奋斗。

在最崇尚理性和客观的科学界，女性科学家的成功尚且如此艰辛，更何况其他各行各业？

这也是玛丽·居里夫人作为一名女性科学家的伟大之处。

---

[1] 这句话在贝克勒尔获奖发言原文中并没有看到，存疑。

爱因斯坦的三个侧面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故事。这位科学家的名气之大，可以说全世界妇孺皆知，以至他死后，还有人偷偷把他的大脑保存下来，想知道他到底为什么那么聪明。但是，这样一个近乎神的存在，是否真的一点错误都没有犯过？是否真的不食人间烟火？是否真的在万人敬仰中愉快地度过了一生？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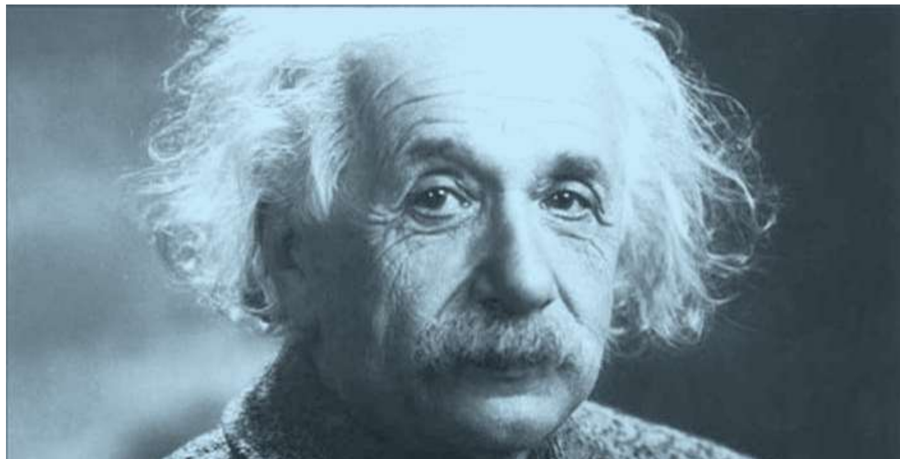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自从1905年提出“光子假设”，解释“光电效应”之后，26岁的爱因斯坦其实就已经站到了世界物理学舞台的正中央。随着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提出，爱因斯坦一步步登上神坛，成为公认的自伽利略和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其实给爱因斯坦任何荣誉，都不过分，但一个问题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会犯错误吗？

答案是肯定的。

有人曾统计过，爱因斯坦在物理理论上曾经犯过大大小小20多个错误。不过总的说起来，比较著名的失误有4次。



第一个错误就是一度被热炒的“引力波”。

“引力波”这个概念，是爱因斯坦率先提出的理论。但在提出这一概念20年后，爱因斯坦却认为“引力波”其实不存在，为此他还专门写了篇论文，表示自己改变主意了。

但事实上，2016年2月，美国科学家宣布探测到了“引力波”的存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最后一块“拼图”被补上。

第二个错误是关于引力透镜。这算个小错误。

什么叫引力透镜？我们戴的近视眼镜，就是一种透镜，光通过它会被改变方向，近视的人就能看清东西了。宇宙学认为，如果天体的质量足够大，它就会产生强大的引力，能把经过它的光扭曲，就像透镜能改变光的线路一样，所以叫引力透镜。

引力透镜依然是爱因斯坦预言的，但他依旧认为人类根本无法观测到，并且认为这个引力透镜根本不重要。

但现在，引力透镜已经成为科学家绘制宇宙图谱的最有用的技术之一。

第三个错误是宇宙常数，这个错误就相对比较大了，爱因斯坦甚至宣称那是他“一生中犯过的最大错误”。

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的时候，所有科学家都认为，宇宙是静止不动的，但用相对论的公式推导，却会得出“宇宙是运动的”这个结论。怎么办？于是爱因斯坦就在公式里自己加了一个可以调节的变量，用来反向排斥宇宙的膨胀，使宇宙保持静止。这个变量，就叫“宇宙常数”。

但是，大家都知道，后来我们发现，宇宙确实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膨胀的。如果爱因斯坦当时相信自己的公式，就不会去加这个宇宙常数了（当然，现在加速膨胀的宇宙又证明，宇宙常数有极大的存在价值，不过爱因斯坦当时没有预料到）。

前三个错误，其实归根结底，都是爱因斯坦的不自信造成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相对论”实在太过宏大和超前，以至发表者本人都

到了不敢相信的地步。

而第四个错误，是抛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涉及他和另一位物理大神玻尔的著名斗争——关于量子力学的争执。

虽然爱因斯坦用光电效应理论（他凭此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奖）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终生反对量子力学（这和他所接受的教育理论体系有关）。为此，他和玻尔（1922年凭借原子化量子模型获得诺贝尔奖）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爱因斯坦穷尽他的智慧，设计出一个又一个实验和模型，试图驳倒玻尔的量子理论，但后来事实证明，他设计的实验，反而都是证明量子力学正确的。

事实上，年少成名的爱因斯坦，在30多岁后就再也没有具体的物理学研究成果问世了（但还是有很多观点和论证对物理学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包括和玻尔的争论），他将晚年时间都用在了建构“统一场”上，但一直一无所获。



这张著名的照片摄于1927年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在这张照片中的29个人中，17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可以看出，当时爱因斯坦的地位已可以保证他坐到前排正中，而玻尔只能坐到第二排最右。也正是在那届会议上，爱因斯坦和玻尔两位物理大神开始围绕“量子力学”展开一系列辩论

好吧，不说枯燥的物理理论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因斯坦的生活。

2014年5月28日，纽约大学斯柯博尔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了表现爱因斯坦感情生活的戏剧《亲爱的阿尔伯特》，导演艾伦·阿尔达表示：“爱因斯坦终其一生都追求简单，但他的私人生活却混乱得不能再混乱了。”

这……大科学家的私生活，能混乱到哪去呢？

爱因斯坦的初恋情人，是自己的同班同学，来自塞尔维亚、后来成为女数学家米列娃。米列娃的聪慧瞬间就征服了爱因斯坦，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数学和物理问题。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相信，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其中有米列娃不小的功劳。1901年，爱因斯坦在写给米列娃的信中说：

“如果要把相对运动课题做成功，只有你能帮助我。我是多么幸福和自豪！”

爱因斯坦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也写到过：“我需要我的妻子，她能为我解开数学上的难题。”

1903年，爱因斯坦不顾家庭的反对，与米列娃正式结婚。婚后，米列娃为了丈夫的事业，完全放弃了个人的发展。她包揽了全部家务活，为了挣钱补贴家用，她还开了一个大学生家庭旅店。

1905年，爱因斯坦开始崭露头角，一连发表了5篇引发全世界轰动的论文。米列娃当时骄傲地告诉朋友们说：“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它能让我丈夫一举成名！”

爱因斯坦确实成名了，但米列娃却没有等来她期待的幸福生活。

从1909年开始，爱因斯坦的桃色绯闻已经开始四处传播。1911年，爱因斯坦动身前往布拉格，开始与他的表姐埃尔莎热恋。

1914年，米列娃劝爱因斯坦不要前往德国柏林工作，两人的婚姻濒临绝境。爱因斯坦书面告知妻子，如果她还想继续保持婚姻，就必须做

到：

A.你应当保证我的衣物和被褥整洁，保证我的一日三餐，保证我的工作间整洁，特别要提醒的是，我的办公桌别人不得使用；

B.放弃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除非出席社交活动，特别不要让我在家里跟你坐在一起，跟你一道外出或旅行；

C.跟我交往要注意以下事项：别希望我对你好、不发火，如果需要，必须立即终止与我的谈话，只要我要求，必须无条件地离开卧室或工作间；

D.你有义务在孩子面前不以语言或动作蔑视我。



爱因斯坦与米列娃



爱因斯坦与埃尔莎

1919年2月14日，米列娃在分居5年后，终于与爱因斯坦离婚。4个月后，爱因斯坦就与表姐埃尔莎结婚了。但是，埃尔莎女儿的信件表明，爱因斯坦当时有一个难以决定的抉择——是娶母亲还是娶女儿。而大度的埃尔莎表示：爱因斯坦可以任选其一。

一旦情人变成妻子，爱因斯坦似乎又恢复了发号施令的本色。不过埃尔莎比米列娃“聪明”的地方在于，她愿意给爱因斯坦最大的自由。比如婚后，爱因斯坦还爱上过一个朋友的侄女——一名已婚少妇。埃尔莎发现后，允许爱因斯坦每周去和情人幽会两次。

爱因斯坦有一个私生女，是米列娃与爱因斯坦热恋时未婚先孕产下的，有精神残疾，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爱因斯坦一生曾见过这个女儿一面。坊间还有一个传说，说爱因斯坦1933年正式移民美国后与一名纽约舞女还生了一个私生女，但这个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爱因斯坦还曾和一名叫玛加丽达·科涅库娃的美女如胶似漆，给她写过很多火辣的情书。但是后来证明，玛加丽达是苏联派来的女间谍，目的是刺探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情报（可惜爱因斯坦没有利用价值，后文会提到）。



玛加丽达

爱因斯坦的两次婚姻最终都失败了，他在1955年逝世前，都是由养女和女秘书照料。

3

说完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也该说说他晚年的境遇了。

众所周知，美国开始制造原子弹，源自爱因斯坦牵头给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正是因为这封信，促成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爱因斯坦从头到尾，一直被排斥在“曼哈顿工程”之外。

作为声望和能力兼备的世界顶级科学家，又是发起人，爱因斯坦为何没有加入“曼哈顿工程”？

因为从1933年爱因斯坦从德国抵达美国开始，到1955年逝世为止，在美国超过20年的时间内，他始终被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列在“首要黑名单”之上。

事实上，“曼哈顿工程”一开始圈定的31名科学家名单中，爱因斯坦的名字赫然在列，但是联邦调查局却以“爱因斯坦有共产主义倾向”为由，圈掉了他的名字。

爱因斯坦对人权、反战、和平主义者甚至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和支持，都是联邦调查局怀疑他的理由。

1983年开始解密的联邦调查局秘密档案显示，对爱因斯坦的监控自“二战”结束后开始变本加厉，他的电话开始被窃听，信件开始被私拆，甚至垃圾桶都会被人翻，还有几次被人闯进私宅搜查。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爱因斯坦的住宅下有一条秘密电缆，爱因斯坦通过这条电缆用电报和莫斯科方面联系。

1950年，“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盛行，美国移民局一度希望和联邦调查局联手，取消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资格。

在1948年7月1日的一次晚宴中，爱因斯坦对波兰驻美国大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意识到，美国再也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我们这段谈话一定有人正在录音。这个大厅装了窃听器，我的住所也受到严密监视。”

1955年，爱因斯坦因病在美国逝世。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悼词中说：“他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于此地找到了自由的气息，为此美国人民深以为傲。”

而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却做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馒头说

以前我是个体育记者。我曾非常反感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只要你体育成绩好，那肯定样样都好。

我记得以前有新闻写丁俊晖，说他虽然辍学，但要是上学的话几何肯定会学得很好，因为“斯诺克要讲究角度计算”。我也记得以前有新闻写姚明，非常惊诧他在上海交大修高数，居然会得不及格。

当然，还有网络上传得颇多的，关于张震敬业的段子。说他演什么学什么，为了演好吴清源，短时间内学会了围棋，已经能压制职业三段——我敢说，就算吴清源本人重生，给他同样的时间学围棋，让他去压制业余三段，老人家也会说“你疯了吧？”。

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奇怪的期待：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登峰造极，于是我们就幻想他在各方面都无可挑剔。

但事实上呢？

爱因斯坦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毫无疑问，是的。

爱因斯坦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完人？毫无疑问，没有必要。

前两天有一个女读者，读了《抗日战争，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军》，很感动，留言说她的理想一直是嫁给战士。我非常理解她的想法。但想了想，还是告诉了她：高志航会打老婆。

爱因斯坦在去世前，把他在普林斯顿默谢雨街112号的房子留给跟他工作了几十年的秘书杜卡斯小姐，只有一个条件：“不许把这房子变成博物馆。”

他不希望把默谢雨街变成一个朝圣地。

爱因斯坦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不举行葬礼。他的遗体火化时，只有12个最亲近的人见证。他的骨灰被撒进不知名的河里，没有坟墓，也没有立碑。人们至今不知道他葬在哪里。

爱因斯坦一生都反对人格化的神。他无疑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人，但只局限于他的专业领域，跳出那个领域，他其实也只是一个普通

的凡人。

于你，于我，于他，于她，世间又哪有什么完美的人？

爱迪生的侧面

这是一个从小就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熟知他的各种小故事，学习他的各种名言名句，他叫爱迪生，是赫赫有名的“发明大王”。但他的有些故事，我们未必知道。

1

我们的故事，就从电灯泡说起。

按照通常历史的记载，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在他的实验室里，用碳化的卷绕棉线作为灯丝，成功制作出世界上第一个电灯泡——这个电灯泡发出了大约10盏煤气灯的光芒，持续了约13个小时。

从那以后，爱迪生的名字就和电灯泡连接在了一起。

但电灯泡真的是爱迪生发明的吗？

很遗憾，并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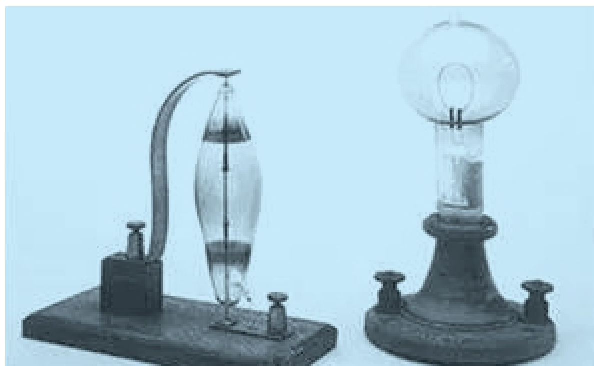
1801年，英国化学家戴维第一次将铂丝通电发光，9年后，他发明了电烛，就是利用两根碳棒之间的电弧照明。

但是，这当然算不上“发明电灯泡”对不对？那么再往下看。



爱迪生

1854年，美国人亨利·戈培尔（Heinrich Göbel）使用一根碳化的竹丝，放在真空的玻璃瓶中通电发光。当时戈培尔试验的灯泡，已可维持照明400小时。



探索时期的电灯泡

这个应该是电灯泡了吧？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戈培尔并没有及时申请设计专利。

1874年，加拿大的两名电气技师发明了一种技术：在玻璃泡之中充入氮气，以通电的碳杆发光。

但是，又一个“但是”，他们没钱了，做不下去了。然后他们做了一件事——在1875年把这项专利卖给了爱迪生。

1878年，在爱迪生“发明”电灯的前一年，英国人约瑟夫·威尔森·斯旺（Joseph Wilson Swan）同样完成了一个“真空下用碳丝通电的灯泡”——这回没有“但是”，斯旺立刻申请了英国的专利，并开始在英国建立公司，在各个家庭安装电灯。

1879年，爱迪生“实验了1600多种材料，做了几千次实验”，终于找到了碳化的棉丝作为最好的灯丝材料——斯旺在1860年就发现了。

1880年，爱迪生又经过数千次实验，发现了碳化的竹丝比棉丝更好——戈培尔在1854年就发现了这一点。

1883年，爱迪生试图把电灯推广到英国，立刻遭到了斯旺的侵权官司控告。爱迪生输掉了官司，被迫让斯旺加入爱迪生在英国的电灯公司担任合伙人。直到后来，爱迪生花钱买下了斯旺的专利。

当然，在美国，爱迪生其实也没有取得电灯泡的专利权，经过了多年官司之后，最终只是取得了“碳丝白炽灯”的专利。

那么问题来了：爱迪生应该只是“改良”了电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愿意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呢？

那是因为，爱迪生是第一个通过建立发电机和发电系统，真正把电灯商业化的人，他和他的团队，让千家万户的普通家庭用上了电灯。

2

于是就要说到爱迪生的团队了。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说，爱迪生拥有1093项发明专利（这个纪录至今无人打破），是名副其实的“发明大王”。

但事实上，应该是爱迪生把这些专利都归为他个人而已。

在当时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叫门罗公园的小镇上，爱迪生拥有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他雇用了一个由工程师、机械师和物理学家等人组成的团队，其中核心成员有14个。他们负责研究和实验，而爱迪生负责想点子，与客户和投资商对接，以及和媒体打交道。

从这个角度上说，爱迪生更像是一个“品牌”，他负责为自己团队发

明的产品提供信任背书和吸引投资。但门罗公园实验室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秘密，为什么长久以来，大家还是愿意只提爱迪生一个人的名字，而鲜有人说他的团队？

戴维·伯克斯（David Burkus）在他的著作《创造力神话》（*The Myths of Creativity*）中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

媒体和大众喜爱“孤独的天才”“快饿死的艺术家”，或者“与全世界作对的智者”这一类故事，即使这些故事并不全是真的。

想象两个画面：一个是，爱迪生的庞大实验室里人流穿梭，各个小组根据分工在实验不同的灯丝，拿本子记录，最后汇总；另一个是，窗外狂风呼啸，屋内孤灯（煤气灯）一盏，爱迪生一个人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孤独地开始了他第1023次灯丝实验。哪个画面更吸引人？

事实的真相，有时候就是索然无味的。

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爱迪生哪来那么多钱买专利，以及养活他的团队？

3

于是又要说到爱迪生背后的大金主了。这个大金主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J.P.摩根（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要说摩根这个人，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的财产也就6000万美元，加上等量的他收集的艺术品，也就1亿美元出头。以他当时控制的资源和财产，这个数字让人无法置信——“他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富人”，这是当时另一个大富豪洛克菲勒对他的评价。

或者换个今天时髦的说法吧——J.P.摩根是个有情怀的人。

所以，在1879年，摩根入股了爱迪生成立的“爱迪生电力公司”（Edison Electric Light Company），因为摩根敏锐地察觉到，爱迪生的这个发明——或发现——能改变整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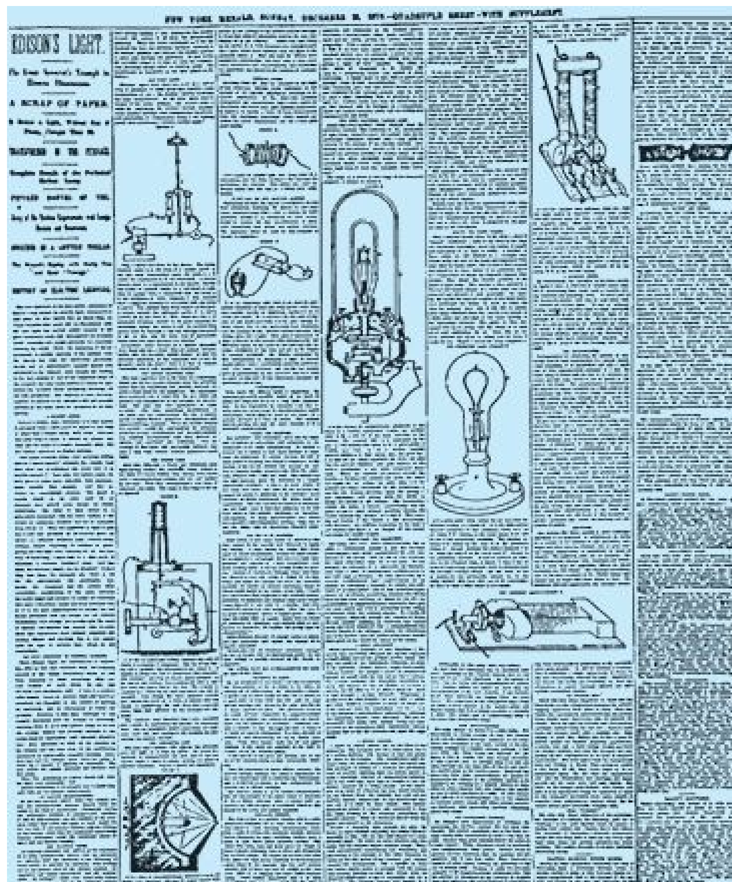
有时候，同样有技术，有想法，有拼劲，但是如果背后没有大资金的支持，等于零——就像1875年，那两个把电灯泡专利卖给爱迪生的加拿大电气工程师。

“砸钱”，是摩根给爱迪生的第一个支持。爱迪生在摩根的支持下，体会到了“有钱就是任性”的感觉：觉得有前途的专利一律买下；看到有才华的工程师，马上雇用！

摩根对爱迪生的第二个支持，就是商业的远见。比如考虑到爱迪生的电力公司要普及电灯，就必须铺设电网，于是摩根立刻组建了一个铜业公司——这是普通发明人根本无法办到的事。

第三个支持，那就是摩根通过自己的各种影响力，让媒体帮爱迪生说话——其中包括声名赫赫的《纽约时报》。比如把爱迪生包装成一个“天才发明家”，比如通过各种负面报道，打击爱迪生的各类竞争对手。

但是，资本家毕竟还是资本家，哪怕是一个有情怀的资本家。当爱迪生出现了一系列判断失误并且固执己见之后，摩根并购了爱迪生的公司，并将“爱迪生”的名字从公司名字中抹去，成立了新的公司，那就是现在的GE（通用电气）。GE是自道·琼斯工业指数1896年设立以来唯一至今仍在指数榜上的公司，但这家公司已经和爱迪生毫无关系（GE神话破灭于2018年）。


EDISON'S LIGHT.

A SCRAP OF PAPER.

爱迪生当时发在报纸上的电灯广告

那么，下一个问题又来了：爱迪生究竟做出了怎样的错误判断，会让有情怀的摩根舍他而去呢？

4

爱迪生一生最大的错误，在于错判了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发展未来。如果要说得再严重点，在这场争斗中，爱迪生留下了堪称一生难以磨灭的污点。

在说爱迪生的错误判断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个爱迪生的一生之敌：尼古拉·特斯拉。

虽然在现在网上的一些帖子中，特斯拉已经被过度拔高乃至神话了，但必须要承认的是，无论如何，尼古拉·特斯拉都堪称是一个旷世天才。甚至可以说，特斯拉在发明天赋方面，是完全碾轧爱迪生的。

有意思的是，比爱迪生小9岁的特斯拉原先是非常崇拜爱迪生的。1882年，特斯拉慕名成为爱迪生公司欧洲分公司的员工，1884年，因为表现优异，被直接推荐去了爱迪生的美国公司本部。

有一次，爱迪生希望特斯拉能改进公司生产的发电机，为此对特斯拉承诺：“如果你能完成任务，我就给你5万美元酬劳。”那个时候的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0万美元左右。

结果，特斯拉真的就把公司的直流发电机给大大改进了。

当特斯拉去问爱迪生要5万美元酬劳的时候，爱迪生的回答是：“那个……可能你还不懂美国人的幽默。”



特斯拉是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2003年发行了100元的纪念币，印上了他的头像

不过，作为“赖账”的补偿，爱迪生同意把特斯拉的周薪上调到25美元。

当然，这不是特斯拉最反感爱迪生的地方。特斯拉一生看不上名利——他多次放弃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在他75岁生日的时候，8位诺贝尔奖得主给他写感谢信），并且放弃了交流电的专利，仅这项专利，就足以使他轻而易举成为百万富翁。

特斯拉反感爱迪生的地方，怎么说呢，简单来说，就是嫌爱迪生“太笨”：“他用的方法的效率非常低，经常做一些事倍功半的事情，整体而言，我是一个很不幸的见证人，他如果知道一些起码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就能省掉90%的力气。他无视初等教育和数学知识，完全相信发明家的直觉和建立在经验上的美国人感觉。”

受过正统数学、物理和机械学训练的特斯拉，当然看不起小学就辍学的爱迪生。但就这点而言，也确实有点不太理解爱迪生——特斯拉觉得，有些实验通过一些数学推演（比如微积分）就可以事先排除很多重复劳动，但爱迪生没学过微积分，他除了反复实验，还能做什么呢？

于是，两人最大的分歧爆发：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认为交流电才是未来，而爱迪生因为把所有赌注押在了直流电上，拒绝改变方向。

结果，特斯拉负气出走，自己成立了公司，围绕交流电和直流电，和爱迪生展开了一场世纪之争。

在这场争斗中，爱迪生用了不少并不光彩的手段：前面提到的利用媒体打击对手，打击的就是特斯拉的交流电。爱迪生通过各种手段在各种场合贬低交流电，并宣扬它的危险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爱迪生以每只25美分的价格，向小学生收购小猫和小狗，并当众用交流电将它们电死。小猫和小狗的分量不够，爱迪生后来当众电死了一头动物园的大象，但当电大象都没什么效果的时候，爱迪生最终想到了，电人。

1890年8月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把“电椅”迎来了它第一个要处决的犯人。而这个“电椅”，就是在爱迪生的推动下发明的，宣称是可以快速无痛苦地处决死刑犯人，但真正的目的，还是想证明交流电是多么危险。

那是一场非常糟糕的处决，犯人受到了比任何刑罚都痛苦的煎熬。

最后这场“世纪之争”的结局，我们自然都知道了——任何学过初中物理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场赌上爱迪生全部身家的争斗——他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直流电输送体系上的。

而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交流电。

5

然而，这并不是爱迪生的公司唯一一次失败。

你不得不佩服爱迪生近乎变态的毅力和执着，他（和他的团队）还发明了另两个影响人类历史的东西——留声机和电影摄影机。

但爱迪生在直流电和交流电那场争斗中表现出的顽固和执着，再一次毁了他。

爱迪生发明电影摄影机后，为了独占“电影”的发明权，聘请了许多律师，起诉其他拍电影的人，只有爱迪生公司旗下的工作室，才有权拍摄影片而不被起诉。

很多电影拍摄公司为了逃避爱迪生的专利“追杀”，不惜远远跑到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去拍电影。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那个地方拍电影的风气渐渐浓了起来，形成了一个聚集地——就是现在的好莱坞。

如果说对电影垄断的追求，只是导致爱迪生电影公司的影片质量急剧下降的话（因为没有竞争），那么爱迪生对未来形势的又一次判断失误，直接葬送了他自己的公司。

对于电影的音效设施，爱迪生一直坚持认为，自己发明的留声机系统——用一个蜡质的圆筒记录声音——是最厉害的。但是，蜡质的圆筒制造成本高、效率低下，而他的竞争对手在那时候已经开始用“录音碟”（后来的黑胶）。黑胶轻便、易量产，迅速地侵占了蜡筒的市场。和执着于直流电一样，爱迪生还是一意孤行地坚守蜡筒市场，逆潮流前行，最终，他的“爱迪生留声机公司”在1929年倒闭。

1931年10月18日，84岁的爱迪生因尿毒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症状，离开人世。好在，他并没有像特斯拉那样在宾馆里穷困潦倒而死，因为他去世前还有一项发明给他带来了财富——铁镍蓄电池。

那又是一个找了上千种材料，用去上百个笔记本才发明出的东西。

馒头说

说了不少爱迪生的“黑历史”。

但最后我还是想表个态：我仍然认为爱迪生是一个伟大的人。

这倒不仅仅在于以他的受教育程度，能达到后来的高度，也不在于他的执着（尽管是把双刃剑），把很多难走的路坚持走到了最后并且走通。

而是在于他对于科学发明与商业之间那种敏锐的嗅觉。

我从不否认科学家的伟大，但伟大科学家的很多发明，如果没有商业力量的推动，是很难普惠到平民百姓，乃至改变人类世界的。比如苹果的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曾透露，苹果的一代和二代电脑都是他独立设计完成的，乔布斯其实根本不懂技术。“他只是一个商人。”沃兹尼亚克说。

是个商人，但这又怎样呢？

如果没有乔布斯，很难保证，现在谁还知道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正如，确实有不止一个人在发明电灯这件事上走在了前面，但真正让它通过商业模式点亮全世界的，还是爱迪生。

我们都希望科学发明是神圣而纯洁的，但有时候，它也需要从高高的雪山顶上走向人间。能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人，其实同样非常可贵。

当然，爱迪生对垄断的执着和对特斯拉的打压，给他的传奇一生减了分，但这也恰恰证明了他食人间烟火，有凡人都有的弱点和缺点，但也能体察到凡人的需求和痛点。

1931年10月21日6点59分，爱迪生逝世三天之后，为了纪念他，美国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全部熄灯一分钟，连纽约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也熄灭了。在这一分钟里，美国仿佛又回到了煤油灯和汽油灯的时代。

是纪念他发明了电灯？还是纪念他普及了电灯？

都没关系，爱迪生配得上这样的纪念。

女生的美貌与智慧，真的能够并存吗

这个故事要说的，是一位大美女。这位美女的名字，可能不少人未必听说过，但之所以要说一说这位美女，是因为她似乎为我们解释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女生的美貌和智慧，能不能够并存？

1

1914年11月9日，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小女孩出生了。

这个小女孩是一名标准的“富二代”——父亲是犹太银行家，母亲是一名钢琴家。女孩被取名叫海德维希·爱娃·玛丽亚·基斯勒（Hedwig Eva Maria Kiesler）——好吧，这个名字实在太长太难记，所以我们还是就叫她之后给自己取的艺名：海蒂·拉玛（Hedy Lamarr）。

拉玛无疑是按照“女儿富养”的模式开启的人生之路：上了瑞典的女子学校，各科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7岁就会跳芭蕾舞和弹钢琴……

在拉玛后来的自传中，她这样写道：“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美的女人，我父亲很爱她，所以我的生活不仅宽裕，而且还时刻沐浴在爱中。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人长得漂亮，就会有男人爱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拉玛应该是慢慢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名媛，嫁给一个上流社会的名流，然后以贵妇人的身份，相夫教子，优雅老去……

但拉玛说：我不要！

那她想做什么呢？她想表演，想做一个演员。

1931年，17岁的拉玛放弃了自己就读的通信专业，跟随当时奥地利著名的戏剧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去德国柏林学习表演。就在当年，她就迎来了自己第一部大银幕作品《街上的钱》。

17岁的拉玛，确实有成为女演员的条件。



海蒂·拉玛


Though surrounded by luxury and sheltered by love, this beautiful child learned early in life to make her own decisions, to stand on her own feet

童年的海蒂·拉玛



17岁时的拉玛在家中



17岁的拉玛扮演茜茜公主

2

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一直是拉玛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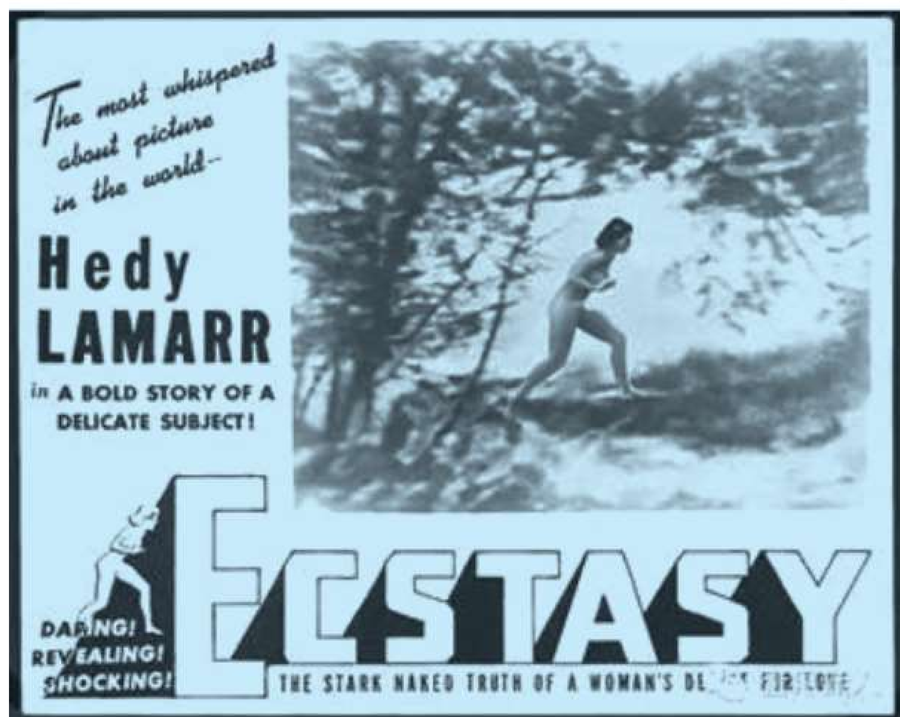
1932年，拉玛主演的《神魂颠倒》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映。这部电影讲的是拉玛扮演的女主角在嫁给一个长者之后，无法忍受婚姻的乏味，随后逃离婚姻，和一个年轻人坠入爱河的故事。

这是部黑白电影，没有什么对白，基本都是音乐背景。但这部电影问世后，整个欧洲都轰动了。

为什么？因为拉玛在里面全裸出镜——这是电影史上第一次有女演员全裸出镜。

不仅如此，拉玛还第一次在电影中完整表现了女性的性高潮（仅限脸部）。

18岁的拉玛就此被写入了世界电影史——第一位在电影中全裸出镜的女演员。



但这部电影在当时保守的欧洲，遭受的抵制是可以想象的：很多国家都宣布禁播这部电影，连教皇都斥责这是一起“丑闻”。

拉玛后来回忆：“《神魂颠倒》的首映我记得很清楚，当看到自己女儿的光屁股在银幕上抖动时，父母坐在那里目瞪口呆。”



而拉玛面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斥责，只用了一句话做回应：“如果运用想象力，你可以看见任何女演员的裸体。”

3

《神魂颠倒》这部电影在很多国家被禁播，所以并未给拉玛带来想象中的名气，但给她带来了人生中第一个丈夫。



《神魂颠倒》部分画面

1933年，也就是这部电影上映后的第二年，一个叫弗里茨·曼德尔的男子开始疯狂地追求拉玛。这个曼德尔不是普通人，是奥地利的第三大军火商，是个有名的富翁。

拉玛的父母非常支持这桩婚事，因为他们本来就害怕女儿因为主演了那部电影而成为一个没有人敢要的女人。总之，拉玛与曼德尔在认识3个月之后就结婚了。

然而，就像自己拍的那部《神魂颠倒》一样，拉玛结婚后就开始后悔了。

曼德尔占有欲非常强，处处监视拉玛的行动，甚至不允许她上街。而且，曼德尔开始四处收购当年的《神魂颠倒》电影拷贝并销毁，因为他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妻子的裸体。

如果这些都还能容忍的话，拉玛对丈夫有一点绝不能容忍——结交纳粹。而曼德尔却偏偏喜欢带拉玛出席与纳粹高官的聚会，不仅仅因为拉玛能满足曼德尔的虚荣心，更因为她的美貌，能给曼德尔带来更多的军火订单。

1937年，结婚4年的拉玛忍无可忍，在一次陪丈夫出席酒宴时，在盥洗室迷晕了随身的侍女，然后翻窗户跳了出去，连夜搭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

你看，这就是拉玛。

4

1938年，逃离婚姻的拉玛辗转来到了美国好莱坞。

拥有惊人美丽的拉玛，在伦敦时就被米高梅的巨头路易·梅耶一眼相中，随即米高梅就与她签订了一份长达7年的合约。拉玛也正是在那时候取艺名海蒂·拉玛，正式开始了演员生涯。

在接下来的岁月，拉玛出演了一系列电影，那段历史，图片比文字更有说服力。

在这一系列电影中，拉玛被米高梅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并让她与好几位影帝搭档出演，其中包括克拉克·盖博。

但实事求是地说，拉玛虽然出演了大量的影片，甚至因为扮演《海角游魂》，打破了好莱坞金发女星一统江湖的格局（她是黑发），但人们始终聚焦的是拉玛的美貌，对于她的演技，关注不多。哪怕一部电影只要贴出她作为主演的海报就一定会大卖，这种情况依旧没有什么改变。



海蒂·拉玛出演过的电影

在试角《卡萨布兰卡》和《乱世佳人》等经典电影失败后，拉玛自

己也开始灰心丧气，留下了一句著名的牢骚："任何女孩都能够变得迷人，你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站在那儿并且看起来很蠢。"（Any girl can be glamorous.All you have to do is stand still and look stupid.）

作为电影演员的海蒂·拉玛的故事，说到这里，其实已经差不多了。但如果她的故事只是一个演员的故事，估计不会入选"馒头说"。

接下来，下半场开始了。

5

还记得拉玛小时候哪门功课最好吗？是数学。

还记得拉玛当初放弃的是哪个专业吗？是通信专业。

还记得拉玛第一任丈夫是做什么的吗？是军火商。

还记得她一直和丈夫做什么吗？和纳粹谈生意。

好，现在，请演员海蒂·拉玛谢幕，请发明家海蒂·拉玛出场。

拉玛的丈夫曼德尔，当时一直在和纳粹讨论无线电信号遥控鱼雷和无线通信干扰技术。虽然当时的无线通信技术属于军事机密，但曼德尔与纳粹武器专家谈论相关技术时，妻子拉玛是被允许在旁边听的，甚至被允许记录。

拉玛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无线电通信干扰技术。

随着拉玛离开丈夫，逃离纳粹，她也把关于这份技术的记录和心得带到了美国。

但当时拉玛还没有往这件事上多想，只是醉心于她的演艺事业。

1939年的一天，拉玛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人体腺体内分泌的文章，作者叫乔治·安太尔（George Anteil）。拉玛很快约见了乔治·安太尔——因为当时的拉玛，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身材比例变得更完美一些。

但安太尔见到拉玛后却直言相告：自己其实是一名钢琴家，为好莱坞的电影配乐，研究腺体什么的只是业余爱好。

这倒也没妨碍拉玛和安太尔成为好朋友，两人天南地北，无所不聊。聊了之后，拉玛才发现，这个安太尔真的是兴趣广泛——他写腺体分泌对犯罪的影响，写爱情专栏，甚至对无线电通信技术也颇有研究。

然后，两个人又聊到了纳粹德国的海军，当时横行大洋的U型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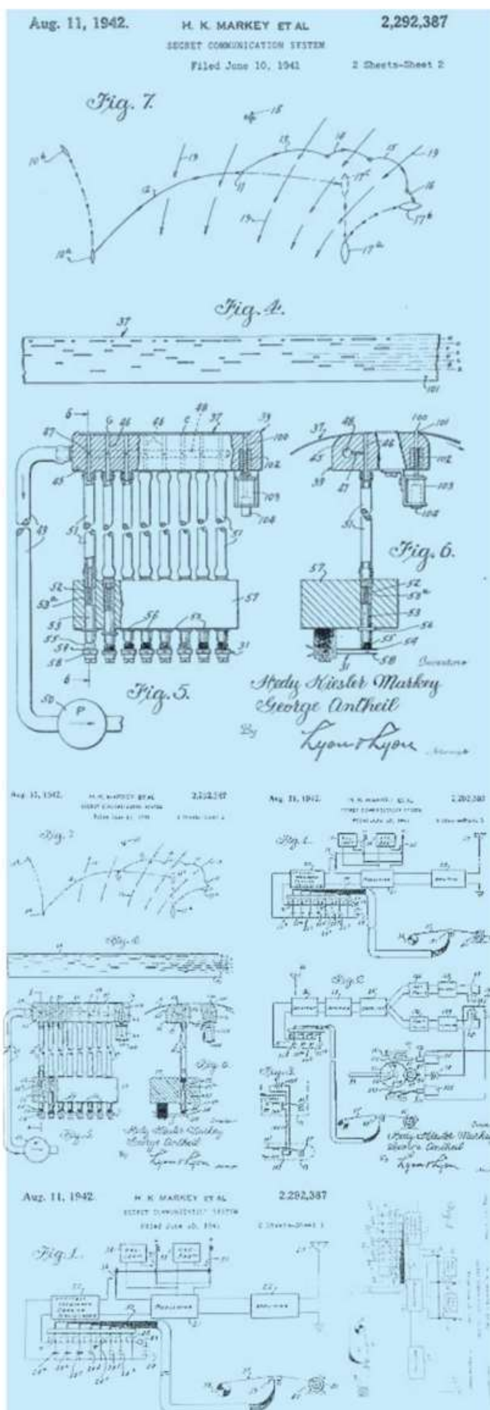
“二战”期间，各个国家都会用无线电信号引导鱼雷命中目标，但有一个问题：敌方也可以通过干扰无线电信号，让鱼雷偏离攻击目标。因为早期的无线电通信，是同时在一个单独的频道上传输，只要对方探测到这个频道，就可以有效地干扰信号。



拉玛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她的设想，简单来说就是变一个频道为多个频道，在鱼雷发射端，一批信号按随机的信道序列通过多个渠道发射出去，接收端则按相同的顺序将离散的信号组合起来。这样一来，对于不知信道序列的接收方来说，接收到的信号就是噪声。但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安太尔说，可以借鉴钢琴的原理。

安太尔对拉玛说，自动钢琴都是通过编好码的打孔纸来控制演奏的，每一个孔只控制一个音，组合起来才是一首曲子。拉玛随即得到启发：鱼雷的无线电控制是否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开拓多个频率而不是单个频率，每一段频率只控制一个信息，被破坏了也可以进行整体修正，进而达到避免被干扰的目的？



当时拉玛和安太尔设计的专利图纸

1940年初，拉玛和安太尔根据这个原理，设计出了一个飞机导航系

统。安太尔设计了一对纸卷，分别安置在飞机和鱼雷里面，来指定变化频率的顺序。

1941年，拉玛和安太尔正式把这项技术定名为“跳频技术”，并申请专利。1942年8月11日，专利正式通过——专利批号：2，292，387，专利拥有人：海蒂·拉玛和乔治·安太尔。

拉玛得知申请专利成功之后，就在与安太尔商量无偿向美国政府捐出这个专利，希望美国用于打击纳粹德国。

但是，拉玛并没有如愿。

6

美国政府其实相当重视拉玛这个发明。

为此，在1942年8月，美国海军与国家发明委员会以及联邦调查局专门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研究拉玛与安太尔这项发明是否能投入军用。

拉玛亲自担任演说。当她向大家解释这个发明原理其实和自动钢琴的原理差不多时，很多在场的军官都笑了出来。随即，拉玛发现了问题：

第一，在场的很多人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军方认为，鱼雷和钢琴实在扯不上关系，一个女演员怎么可能比武器专家更专业呢？

第二，在场的很多人对她这个人本身更感兴趣，包括她的身材、她的容貌、她的打扮。

第三，联邦调查局非常怀疑她的身份——既然她的前夫一直与纳粹做生意，那完全有可能她自己也是纳粹派来的“卧底”，在玩弄美国军方。

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不会将“跳频技术”投入军用，而是将这个专利封存起来，成为一个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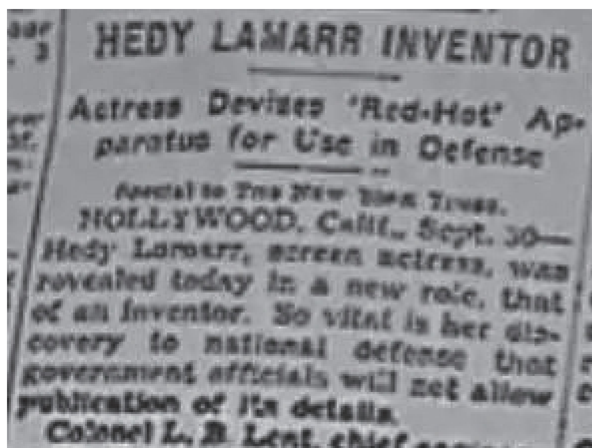
当时，军方还给了拉玛一个“善意”的提醒：你有那么漂亮的脸蛋，应该帮助政府去推销“战争债券”，用于筹集与法西斯战斗的军费。

他们认为，这才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应该干的嘛！

7

拉玛说，那就听你们的吧！

然后她就真的去推销“战争债券”了。当时，拉玛提出了“拍卖海蒂·拉玛的吻”，希望能以17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680个吻来抵抗纳粹。结果，一次巡回演出下来，拉玛募集了2500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3.5亿美元。



HEDY LAMARR INVENTOR

Actress Devises 'Red-Hot' Apparatus for Use in Defense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HOLLYWOOD, Calif., Sept. 30—Hedy Lamarr, screen actress, was revealed today in a new role, that of an inventor. So vital is her discovery to national defense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will not allow publication of its details.

Colonel L. B. Lent, chief

1941年，《纽约时报》曾对拉玛的专利进行报道，但为了保密，一字没提专利内容

然后，拉玛就继续拍电影，甚至当导演去了。而那份专利，也就被美国军方尘封了。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给了当时的霍夫曼无线电公司一份专利，让他们生产声呐浮标和伴随飞机的无线电。在这份专利上，发明者的名字被抹去了。

那就是拉玛和安太尔的那份专利。

霍夫曼无线电公司在这份专利的基础上，完成了“跳频技术”装置的开发，美国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用来封锁古巴海岸的庞大海军船只，就是用这项技术来实现保密通信的。后来美军在越战中开始使用无人驾驶的遥控飞机，也是在这个技术的基础上研发的。

1985年，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美国圣迭戈成立，他们的核心

技术，就是CDMA无线数字通信系统。这家公司，就是现在业界赫赫有名、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世界500强公司之一，高通公司。

尽管高通公司的这项CDMA技术是独立研发的，但这个理论的来源，是拉玛和安太尔。高通的联合创始人安东尼奥也曾评价拉玛：“她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专利，人们通常都想不到电影明星有什么头脑，但她确实有。”

而通信业著名工程师戴夫·莫克（Dave Mock）出版的传记《高通方程式》中也写道：“只要你使用过移动电话，你就有必要了解并感谢她。要知道，这位性感女明星为全球无线通信技术所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CDMA、3G、4G技术的基础都是跳频技术）

1997年，83岁的海蒂·拉玛被授予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的先锋奖，这是她第一次在表演事业之外获得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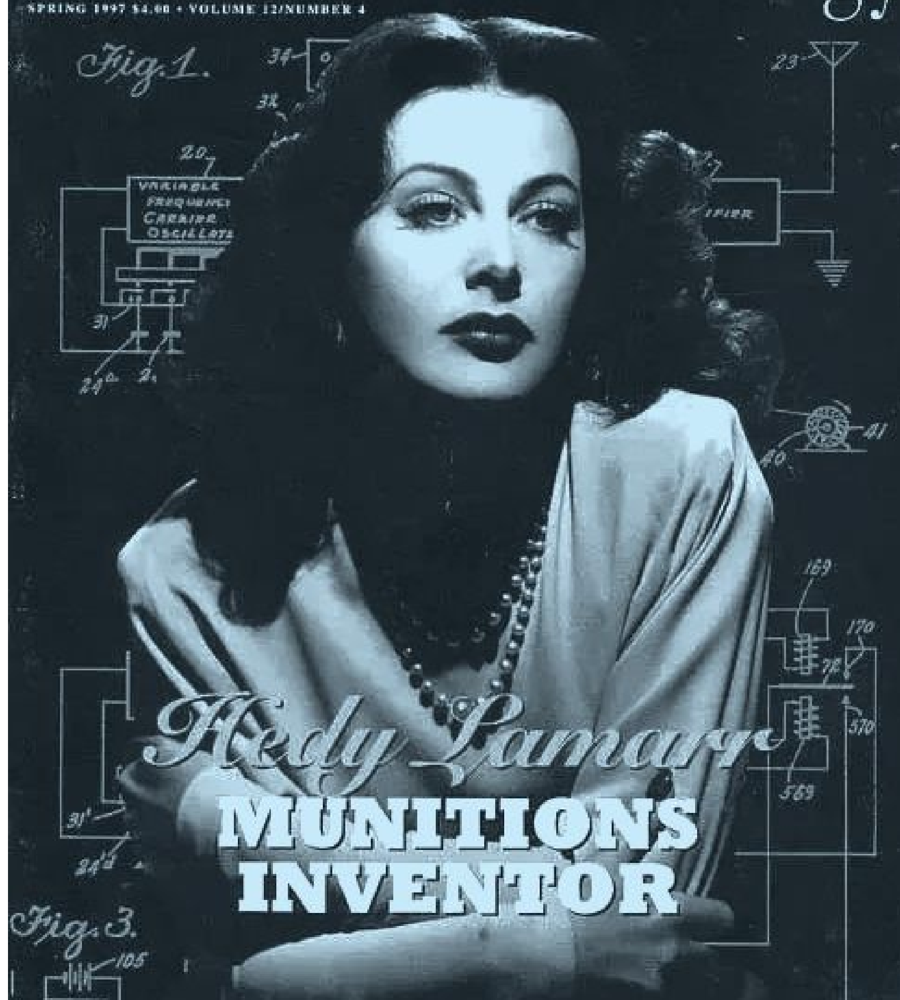
2000年，86岁的拉玛在家中床上安然逝世。

而在她的身后，荣誉还在不断叠加：

2014年，海蒂·拉玛入选美国发明家名人堂，成为历史上唯一入选的女演员。在“发明家名人堂”里和她同列的名字：爱迪生、特斯拉、莱特兄弟、摩斯……

2015年11月9日，谷歌搜索的首页专门上了一个1分16秒的动画视频，纪念海蒂·拉玛诞辰101周年。

同年，海蒂·拉玛年轻时的照片又一次登上了杂志的封面，但不是电影杂志或娱乐八卦杂志，而是《美国发明与技术遗产》杂志。



当期《美国发明与技术遗产》封面

这一切，正如拉玛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电影往往限于某一地区和时代，而技术是永恒的。”

馒头说

实事求是地说，海蒂·拉玛凭借一个为鱼雷设计的专利——尽管其原理是很多现今技术的源头——在今天被称为“手机之母”甚至“Wi-Fi之

母”等，是有些过誉的。

但无论如何，她在这方面做出的探索和贡献，值得被人铭记至今。

在拉玛所处的那个年代，好莱坞其实有很多漂亮的“花瓶”女演员，但时至今日，依旧被人津津乐道，甚至还能登上杂志封面的，恐怕也只有拉玛了。

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貌，更是因为她的智慧——确切地说，其实是她那种保持好奇心，愿意探索研究新事物的精神。

拉玛自己曾抱怨：女孩子只要变得蠢蠢的，就会很迷人。

其实她自己也知道，那只是一句抱怨罢了。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那些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心、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女生，才是真正充满魅力，能让他们为之动心的女生吧。

这固然是个看脸的时代，但能被永远记住的，肯定不仅仅是容颜。

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这是一个颇为冷门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平凡的女性，原本波澜不惊的一生，却因为一场战争，发生了重大转变。

1

1945年9月8日，对29岁的户栗郁子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天。

作为一名在日本的美籍日本人，户栗郁子原本以为，战争结束后她就可以回到美国。但事实证明，一切只是她美好的幻想。

相反，她等来的，是一次逮捕。因为，她是战后到目前为止，唯一承认自己身份的“东京玫瑰”。

2

故事还是得从1916年开始说起。

191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户栗郁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出生。她的父母是第一代日本移民，在当地经营一家杂货店。

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动物学专业本科毕业的户栗郁子，理想职业是做一名医生。1941年，户栗郁子在日本的姨妈病了，同样也在生病的母亲无法前往，所以户栗郁子答应了母亲，前往日本探望姨妈。



户栗郁子

这一去，彻底改变了户栗郁子一生的命运。

户栗郁子在日本一直待到了这一年冬天，准备回国的时候，一桩大事发生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场改变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对户栗郁子这个微小的个体也产生了影响——当最后一艘开往美国的轮船离港后，户栗郁子发现，自己回不了美国了。

3

对当时只有25岁的户栗郁子来说，1941年滞留在日本的这个冬天，格外寒冷。

因为战争，日本国内实行了“配给制”，每个人每个月获得的口粮，都是规定数额的。这份配给，户栗郁子是没资格得到的，因为她是美国国籍，而配给只给日本公民。

那一天，户栗郁子住处来了一位陌生男子，那个男子给了户栗郁子一个建议：只要放弃美国国籍，成为日本公民，就可以获得食物配给卡。

这对户栗郁子而言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但她还是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不放弃美国国籍，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美国人。

后来户栗郁子才知道，那个男子是日本的秘密警察。在得到拒绝的答复后，日本当局把户栗郁子列入了禁止发放配给卡的名单中。

没有食品配给，户栗郁子只能用自己从美国带来的钱，去日本的黑市上买生活必需品。

从1942年到1943年整整一年，户栗郁子都过得相当艰苦，到了1943年初，她发现自己的钱已经全部用完了。

而那一场太平洋战争，虽然美国人已经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开始逆转战场的局面，但当时还没有人能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

接下来的日子，户栗郁子该怎么办？

4

1943年初，已经“弹尽粮绝”的户栗郁子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在东京广播电台担任打字员。因为户栗郁子的英文好，她会修改很多英文播音稿里的错误。

为什么会有英语播音？因为日本非常重视战争时期的心理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京广播电台用了24个频道对国外广播，有汉语、法语等，但最重要的还是英语广播，因为日本希望通过各种心理攻势，瓦解他们的主要对手——美国人。

日本人称这个为“谋略广播”。

现在已经无法证实究竟是什么原因，原本是打字员的户栗郁子，被认为“声音好听”，被推上了播音员的岗位，月薪6美元。

从1943年11月开始，在东京广播电台一档名叫《零点》的广播节目中，开始出现一名女主播的甜美声音。这名女主播在节目中自称“孤儿安”，并称自己是美军“最亲爱的敌人”。而她的真名，就是户栗郁子。

户栗郁子在这档名为《零点》的节目中究竟播放什么呢？

除了播报由日本方面提供的战时新闻外，《零点》节目会播放一些美国的流行音乐和乡村民谣。由于《零点》的节目在深夜播放，而这段时间，正是很多在太平洋驻守的美国士兵停止作战、思乡情绪浓郁的时候。

所以，日本人希望通过这类广播，最大程度放大美国士兵的厌战情绪，瓦解他们的斗志。

然而，结果似乎恰恰相反：户栗郁子纯正的美式发音，幽默的主持风格，精心挑选的美国音乐，让所有收听过这个广播的美国士兵，都疯狂地爱上了这档节目。没有人在意她播报的虚假新闻，大家只是想听到她的声音，然后在她播放的美国音乐中闭眼享受。

一位曾在美军战舰上担任枪炮官的美国士兵战后接受采访时曾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东京玫瑰的广播，特别是听一个女声在广播里说着地道的美国话，真是一份特别的浪漫。"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士兵给了那批包括户栗郁子在内的女播音员一个统一的称号："东京玫瑰"。

而不少美国士兵战后回忆：打到东京，去看一下"东京玫瑰"长什么样，是他们战斗的主要动力之一。

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

但户栗郁子的命运转折才刚刚开始。

当时的美国记者列出了最想采访的两个日本对象：日本天皇，"东京玫瑰"。

1945年9月1日，美国记者克拉克里和哈里布伦奇在东京帝国饭店见到了户栗郁子。在那里，两位记者对户栗郁子进行了将近4小时的采访。在采访结束后，户栗郁子在长达17页的采访记录上签字，并签署文件证明：我就是"东京玫瑰"。

无法考证，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户栗郁子接受这次采访。一方面，肯定有物质的因素——两位美国记者，愿意为这次采访提供2000美元的

采访费（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万美元）。而另一方面，可能是户栗郁子当时认为，承认自己是“东京玫瑰”，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正是这次采访，将户栗郁子推向了命运的深渊。

6

两天后，户栗郁子的采访被登到了报纸上，引起了空前的关注。

因为尽管“东京玫瑰”被认为可能是由12名左右的女性组成的一个播音团队，但肯承认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的，只有户栗郁子。

一开始，在日本的户栗郁子受到了“名人”的待遇——她被邀请到各处去参加活动，所到之处，美国驻日士兵争相请她签名。

但不到一个月，她就被逮捕了。

按照旅日作家萨苏的说法，当时逮捕户栗郁子的，是日本当局，罪名是“叛国罪”——因为她在战时不肯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日本国籍。而另外的一些资料（包括英文维基百科）显示，逮捕户栗郁子的，是当时的美国驻日本当局，理由也是“叛国罪”——因为她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帮助日本人播音来瓦解美国士兵的斗志。



户栗郁子被逮捕

从种种迹象来看，后者的可信度较高。

不管怎样，户栗郁子被关在日本巢鸭监狱一年，于1946年10月25日释放。

被释放的户栗郁子，一出狱就迫不及待地向横滨美国领事馆提出了回美国的申请。但当时她的丈夫多歧野（日葡混血）劝她再等一等。

1948年初，户栗郁子的孩子出生了。但是，这个男婴刚出生就夭折了。巨大的打击让户栗郁子前所未有地希望回到美国。

但户栗郁子可能不知道，“二战”期间甚至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日高潮。在美国的日裔美国人，遭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驱离自己的家园，没收财产，被勒令集中居住在一个指定的偏僻的封闭式营地。户栗郁子的母亲，就是在营地

里病逝的。

所以，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三年，但户栗郁子希望回国的消息传到美国，却把她带入了更大的危机中——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播音员沃尔特·温切尔强烈呼吁：政府应该严厉惩办这名“叛国犯”！

1948年9月，户栗郁子终于达成了回到美国的愿望，但她不是自由回国的，而是再度被逮捕后，乘船引渡回国。

7

1948年9月25日，户栗郁子乘船抵达美国旧金山。一下船，迎接她的不是家人好友，而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户栗郁子又一次被带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户栗郁子坚决不承认自己犯有叛国罪，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电台的播音员而已。她甚至还指出，她尽量播放各种轻松、舒缓的音乐来缓解美军的紧张情绪，并且使用一些“双关语”，鼓励而不是打击自己美国同胞的士气。

户栗郁子的律师韦恩·柯林斯几乎是义务地为她辩护。柯林斯搜集了户栗郁子的广播磁带，在广播中，听不出户栗郁子说过任何叛国的言论，唯一有一句话是在一场海战之后，户栗郁子播音：“太平洋的美军们，你们的船全都沉没了，你们怎么回家呢？”检方指出户栗郁子违反事实。但事实却是，在东京广播电台的户栗郁子只能按提供的稿件念，她怎么可能知道前方的战况呢？



户栗郁子和辩护律师柯林斯



狱中的户栗郁子

户栗郁子的案件审判维持了一年。据说在此期间，有不少美军士兵还呼吁宣判户栗郁子无罪，声称是“东京玫瑰”的声音，伴随他们度过了最孤独和艰苦的岁月。

但不管如何，1949年10月7日，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对户栗郁子的叛国案进行了宣判：户栗郁子被判叛国罪成立，自动丧失美国公民资格，罚金1万美元，并处以10年有期徒刑。

一切之前的辩护后来证明都是徒劳的。时任当时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早就在宣判户栗郁子有罪的空白审判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8

因为表现良好，户栗郁子在狱中服刑了6年零2个月，于1955年被释放。

但厄运还是没有放过她。户栗郁子出狱后，得到的是一张驱逐令，勒令她离开美国。虽然在律师柯林斯的帮助下，户栗郁子成功驳回了驱逐令，但她却始终无法恢复美国公民身份——她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1月。那时候，户栗郁子的辩护律师韦恩·柯林斯已经去世，儿子小韦恩·柯林斯依然坚持不懈地在为她辩护，并且终于取得了成果——美国的杰拉尔德·福特，最终给户栗郁子签发了一

张赦免令。

户栗郁子终于恢复了期盼已久的美国国籍。她说："我永远坚持我的清白———赦免是证明我无辜的一种措施。"

这时，她已经61岁了。

就在户栗郁子获得特赦后，仿佛一夜之间，美国的舆论又变了风向：大家忽然又都承认，当时户栗郁子是用巧妙的双关语来暗示和安慰听众，甚至是以一人之力在抗击日本，用独特的方式在爱国。户栗郁子的形象，似乎又从"叛国者"变成了"爱国英雄"。



老年户栗郁子

美国的退役老兵戴维兹·尼尔·戴尔甚至提议，要为户栗郁子竖立一座纪念碑，碑文是："向户栗郁子的忠诚和勇气致敬，她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过。"

但这些声音，已经不会再改变户栗郁子的命运了。

晚年的户栗郁子，在芝加哥经营一家专门出售东方礼品的礼品店，并在2006年9月26日，以90岁的年纪，安静去世。

馒头说

在写今天（9月8日）的这个故事之前，我曾经犹豫了很久。

因为今天同时也是吴佩孚作为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日子——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吴佩孚曲折的一生，比户栗郁子要精彩多了。

但踌躇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把很想写的吴佩孚先放一放。

没错，相对于吴佩孚，户栗郁子肯定是个小人物。她的故事虽然也很坎坷，但要说有多引人入胜，倒也未必。

但这也是打动我的一个原因。

如果户栗郁子在1941年能搭上返回美国的轮船，那么她的一生，很可能就会以一个医生的身份，波澜不惊地过完。

但她的命运就在那一年，忽然拐了个弯。

为日本人播音，成为美国士兵的梦中情人，被指控叛国，又成为爱国者，失去国籍，再被特赦，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发生在一个女性的身上，而她当初所做的，只是回日本看望姨妈而已。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户栗郁子在播音时，会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从事哪种性质的工作。但作为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姑娘，却又生在美国，战时就想返回美国，无奈却滞留日本……以户栗郁子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下，究竟有多少自主选择的权利？

其实，不光是户栗郁子。

在特定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又有谁，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呢？

做一个“新时代女性”，真的要拿生命来换？

她的名字，当年在上海乃至全国，无人不知。中国电影协会开过关于她的学术研讨会，香港大学专门设立过关于她和中国电影的课程，她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二十五位亚洲演员”之一。她叫阮玲玉，她在25岁就拍了29部电影，她的生命也终止在25岁。

1

1910年4月26日，祖籍广东的阮玲玉，出生在上海。

阮玲玉的父亲叫阮用荣，是上海浦东亚细亚油栈的工人，因为积劳成疾，在44岁那年因为肺痨[1]去世了。

那一年，阮玲玉6岁。一年后，阮玲玉的母亲带着阮玲玉，到上海一家姓张的大户人家里去做女佣。也正是在那里，7岁的阮玲玉，第一次碰到了张家的四少爷，当时可能是14岁左右的张达民（张达民出生日期不详，由他逝世日期推断，可能当时比阮玲玉大7岁左右）。



那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噩梦。因为不能随便走动，阮玲玉童年的生活空间，就被局限在用人聚居的后院里，在孤独与拘束中度过。不过阮玲玉的母亲还是一个有想法的女人，她认为阮玲玉不能作为一个用人[2]的女儿一辈子这样过下去，一定要想办法出人头地。

所以阮玲玉8岁那年，母亲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私塾读书，并有了一个学名叫“阮玉英”。一年后，开明的母亲觉得私塾里那些《三字经》《女儿经》太过时了，就千方百计求了自己服侍的张家大老爷，让阮玲玉以半价的学费，进了当时美籍传教士创办的崇德女校（张家老爷是校董）。

1925年，15岁的阮玲玉已经亭亭玉立。此时，张家的四少爷张达民已经混了一张野鸡大学的文凭，在家待业，白天闲逛，晚上舞厅，成了一个标准的“小开”（上海本地俗语，指没有生存技能、依靠家里的富家公子）。

张达民在一次偶然机会中认识了阮玲玉，并立刻对她一见倾心，发起了热烈追求。张达民的追求手段，无非也就是那几套：尾随阮玲玉去公园，然后装作邂逅。知道阮玲玉喜欢看什么书，买好后故意放在她看得到的地方，说正好自己也在看。还有，就是经常接济阮玲玉的母亲。

但15岁的阮玲玉，从小在一个卑微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哪见识过这些？更何况张达民白白净净，仪表堂堂，很快，就和他坠入了爱河。

张家四少爷和一个用人的女儿谈恋爱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家大太太，也就是张达民母亲的耳朵里。和所有的爱情戏一样，当妈妈的完全不能接受这段恋情，要求立即终止。

张达民选择服从母亲，但也选择“捍卫爱情”，他给阮玲玉提出了建议——搬出去，搬到我给你租的地方去，我们悄悄同居吧。

于是，阮家母女被张达民安排到了上海四川北路的鸿庆坊。16岁的阮玲玉，选择了退学，和张达民同居。

那么张达民究竟能带给阮玲玉些什么呢？除了一些零花钱，其他无非也就是些甜言蜜语。靠甜言蜜语浸泡的爱情，能维持多久？

几个月过去后，张达民又回到以前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去了，给阮玲玉的生活费也越来越少。事实上，如果最后经济上无以为继，张达民抛弃了阮玲玉，对后者来说倒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阮玲玉张达民合影

但就在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改变阮玲玉命运的人，那就是张达民的

大哥张慧冲。



1927年3月13日《申报》在本部增刊（五）上，发表的一张图片新闻（《挂名夫妻》中之女主角阮玲玉）。阮玲玉那年17岁，本来名叫“凤根”或“玉英”，从这一年开始叫“阮玲玉”

张慧冲在民国历史上，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他当时自己有一家小的电影公司，为了帮阮玲玉维持生计，他提议阮玲玉可以试试去面试电影演员。阮玲玉听从了这个建议，参加了明星影业公司的面试。

毫无表演经验的阮玲玉，被导演卜万苍一眼相中，出演《挂名夫妻》的女主角，随后又出演了《北京杨贵妃》《血泪碑》《洛阳桥》《白云塔》等一系列电影，开始慢慢崭露头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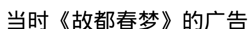
踏上从影之路，可以说是阮玲玉的幸运，但也是她悲剧的开始。

应该说，阮玲玉一开始在明星影业公司接拍的电影，大多是些小成本电影，影响力并不大。因为频繁接一些武侠片，阮玲玉甚至得到了“花瓶”和“妖女”的称号。又因为和电影公司老板闹僵，阮玲玉一度还陷入无戏可接的境地。阮玲玉的电影之路发生转机，是从1929年收到联华公司的拍片邀请开始的。

1929年底，留美归来的电影导演孙瑜，将法国小说《茶花女》改编成影片《故都春梦》，大胆起用阮玲玉和金焰主演此片。影片于1930年8月底上映，一时间万人空巷，好评如潮。

这部电影的成功，使阮玲玉被聘为联华影业公司演员。到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阮玲玉接连拍摄了《野草闲花》（1930）、《恋爱与义务》（1931）、《一剪梅》（1931）、《桃花泣血记》（1931）等6部广受欢迎的影片，以出色的演技一举摆脱了“花瓶”的形象，成为当时的一线女明星。

山西大戲院
一月四日起連映四天
空前巨製國產影片
編劇監製 羅明佑
導演 孫瑜
故都春夢


当时《故都春梦》的广告

阮玲玉的演技究竟怎样？

导演孙瑜这样评价：“与阮玲玉拍电影，是任何导演的最大愉快，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就理解了导演的意图，一试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她在镜头前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著名演员赵丹评价：“阮玲玉穿上尼姑服就成了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

导演郑君里的评价是：“在临场时间，阮玲玉通常是随便而松弛的：有时开开玩笑，有时打打毛线，有时吃吃零食。她表面上似乎不在意地聆听着导演的简单的嘱咐，可等她一站到摄影机之前，在转瞬之间，她的神态、情感、动作都按照角色的需要，自然地、即兴地流露出来。没有强迫和夸张，也没有有意识的设计的痕迹，一切显得纯真、新鲜、恰当。这时候她与角色已合抱为一。可是一待导演发出“停止”的号令，她又毫不费力卸下她的精神化妆，恢复了她愉快轻松的本来面目。”



阮玲玉剧照

郑君里的总结是，阮玲玉之所以能演得那么收放自如，除了她的天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她扮演的角色，总是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弱女，被阔佬玩弄

的风尘女性，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女性……

确实，如果苦难是一种经验，那么新星阮玲玉的“经验”之路，才刚刚开始。

3

阮玲玉遭遇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张达民。张达民没有任何生存技能，一直是靠家里接济。在张家大老爷去世后，他又很快花光了自己分到的那份遗产，然后迷上了赌博，欠下了高利贷。于是，张达民自然而然就打起了阮玲玉的主意。

彼时的阮玲玉，名气已经越来越响，片酬收入自然也是越来越高。一开始，她倒是愿意接济张达民的，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本来想托付终身的男人，其实是个“无赖＋无底洞”。

渐渐地，阮玲玉不愿意再给张达民钱了，而张达民的嘴脸也就慢慢暴露了出来：不给钱？就想尽各种办法要！其中最让阮玲玉接受不了的，是张达民一直扬言要把她16岁就和自己同居的故事捅给小报记者——他甚至会把当时小报报道另一个影星胡蝶打离婚官司的各种花边报道拿给阮玲玉看，作为无声的恐吓。

阮玲玉一直是个爱脸面之人，此时又已是明星，自然害怕张达民的要挟，只能一次又一次满足张达民的伸手要钱。她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比如拜托联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帮张达民谋得光华剧院经理的职位，月薪120元大洋（当时联华电影公司一般的演职人员月薪才40元）。

阮玲玉觉得，男人有了一份正当的职业，应该就能消停了——但她也太低估渣男的战斗力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和当时的不少演员一样，阮玲玉也去香港躲避战火，她还带着张达民。在香港，还没摆脱第一个渣男，阮玲玉又遇见了第二个渣男。

4

第二个渣男，名叫唐季珊。

和张达民相比，唐季珊的形象就要高大太多了：他是在整个东南亚

都有名气的富商，做茶叶生意，同时又是阮玲玉所在的联华电影公司的大股东。

阮玲玉和唐季珊在一次应酬场合相逢，阮玲玉没有放在心上，但唐季珊却被她迷住了，随即展开了热烈的攻势。一开始，阮玲玉是回避的，但唐季珊无论形象、财力、温柔体贴程度都远胜张达民，一直渴望得到一个依靠的阮玲玉，渐渐对唐季珊产生了感情，开始和他交往。

这个时候，阮玲玉收到了一封女人的来信。写信的人叫张织云，曾经也是一名电影明星，和阮玲玉气质很像，而她就是唐季珊的“现任女友”。



唐季珊和阮玲玉

在那封信里，张织云告诉阮玲玉，唐季珊在广东有一个原配夫人，因为唐季珊的发迹全是靠那位原配夫人家里的财力和势力，所以一直不敢离婚。而自己的今天，就是阮玲玉的明天。

已经坠入爱河的阮玲玉并没有把这封信当回事，认为张织云只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她相信唐季珊是真心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

回到上海后，阮玲玉就离开了张达民，搬到了唐季珊在新闸路买的一幢漂亮的三层小洋楼，开始和他同居。

说到张达民，就再交代下这位渣男到香港后的情况。上海战事平息后，阮玲玉要回沪，张达民觉得香港更开放更好玩，不肯回去。他知道

香港的何东爵士认了阮玲玉做干女儿，就通过阮玲玉的关系，去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但他又怎会好好干一份正经工作？很快，他就挪用公款，到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直输到两手空空。

无奈之下，张达民只能返回上海找阮玲玉。阮玲玉又给他谋了一份福建福清县税务所所长的肥差。

1933年4月，张达民回到上海的二人居所，发现阮玲玉已经搬走。再一打听，得知阮玲玉搬到了唐季珊的小洋楼。

对于唐季珊，张达民是不敢动的，想来想去，他找到了阮玲玉，要求阮玲玉补偿他“分手费”。阮玲玉只要能摆脱张达民，愿意接受他的苛刻条件——两人签订了《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其中第二款明确规定：阮玲玉每月给张达民一百元，以二年为期。

阮玲玉觉得，终于可以摆脱张达民，和唐季珊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但她不知道，她被两名渣男轮流虐待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5

首先，每月100元，普通老百姓足够花了，但根本满足不了张达民的胃口。手头拮据的张达民很快就操起了“老本行”：敲诈阮玲玉。而且第一次敲诈就是一个狮子大开口：索要5000元大洋。

阮玲玉还去征求唐季珊的意见，唐季珊自然脸色不好看，表示自己一分钱也不会出，也不建议阮玲玉给他钱，因为张达民是个无赖。

于是，阮玲玉就下了狠心，一分钱不给张达民。

没想到阮玲玉敢反抗的张达民，随即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告什么呢？告阮玲玉当初住在张家的时候，偷走了不少张家的值钱东西，后来把东西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给告了。

唐季珊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马上也向法院递了状子，说张达民诬陷他，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怎么证明呢？他要求阮玲玉自己在报纸上刊登一份启事：她和自己

虽然同居，但经济独立，从来没送过自己东西。

一个男人诬告，另一个男人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抛出的，是同一个女人。

但阮玲玉当时还是爱着唐季珊的，软弱的她最终按照唐季珊的意思，在报纸上刊登了那条关于同居但经济独立的告示。

这一切，阮玲玉还是可以忍受的，她只要唐季珊爱她。

但她这个最后的卑微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很快，她就发现唐季珊有了新的女友，那个女人还是自己同一个圈内的朋友，名叫梁赛珍。从那时候起，唐季珊开始打骂阮玲玉。

阮玲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她又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

6

第三个男人，名叫蔡楚生，嗯，不是渣男。

蔡楚生是一名导演。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你应该知道电影《渔光曲》，那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导演就是蔡楚生。

蔡楚生还没有名气的时候，曾经邀请过阮玲玉拍电影，但被阮玲玉谢绝。蔡楚生成名之后，阮玲玉以为蔡楚生不会再找她，没有想到，蔡楚生又一次请她出演自己导演的电影：《新女性》。

《新女性》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女主角原型韦明是明星公司的女演员艾霞。艾霞是中国首位自杀的电影明星，很有才华，除了拍戏，她还经常发表小说和诗歌，在当年被称为作家明星。然而，艾霞的情感生活却很不顺利，因为反对包办婚姻和家庭决裂，然后又谈了一场让人心碎的恋爱，23岁的艾霞最终服毒自杀。

蔡楚生是艾霞的好友，他发现艾霞去世后，还有一些无良小报在恶意中伤她，于是决定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而女主角，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阮玲玉。

阮玲玉拿到剧本通读一遍之后，眼泪流了下来：因为她觉得这个女

主角就是自己。



阮玲玉（中）在拍摄《新女性》时与蔡楚生（前蹲者）、殷虚（右一）等合影

《新女性》这部电影，可能是阮玲玉拍得最投入的一部电影。在拍女主角韦明自杀的一场戏时，场内工作人员都潸然泪下，而一直结束工作就很容易出戏的阮玲玉，也因为入戏太深，直到拍摄结束后情绪都无法平复。



《新女性》画面

蔡楚生便让工作人员退场，他留下来默默陪伴着阮玲玉。两个人慢慢聊起了天，才发现彼此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和阮玲玉一样，蔡楚生也是从底层慢慢爬上来的——和当时大多海外留学归来的导演不同，蔡楚生是从一个电影片场的义工一点点做起来的。

阮玲玉也向蔡楚生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包括张达民和唐季珊。她对蔡楚生说："我多么想成为一名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但我太软弱。"

蔡楚生也才知道，一个光彩照人的大明星背后，居然有那么悲惨的故事。

那一夜聊天之后，两人的关系明显走近。

《新女性》上映后，由于是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颇受瞩目。但是因为影片中有一个小报记者的反面形象，所以电影受到了当时的"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的抵制和攻击，要求剧组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道歉，一些报纸甚至又开始诋毁阮玲玉。

情感和事业双双受挫，阮玲玉觉得自己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她希

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蔡楚生。她希望蔡楚生能带她远走高飞。

实事求是地说，阮玲玉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了。蔡楚生尽管仰慕她，但要他放弃辛辛苦苦拼搏来的电影事业，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蔡楚生在乡下有一个原配夫人。

刚刚演完《新女性》的阮玲玉，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7

1935年3月7日晚，阮玲玉、唐季珊参加了联华电影公司的聚会。席间，阮玲玉谈笑风生，没有任何异常表现——除了临近席终，起身与在座的各位一一告别，并与所有的女演员热情拥抱。

大家以为这是她有些喝多了，并不以为意。

回到新闸路那幢漂亮的小洋楼，在唐季珊独自回卧室睡觉之后，阮玲玉对自己的母亲说肚子饿了，想吃碗面。

母亲做完面，阮玲玉端起面碗走进了卧室。

子夜一点多，阮玲玉写好两封遗书，将3瓶30粒安眠药都倒进面碗，吃了下去。

据阮玲玉的母亲回忆，阮玲玉服下安眠药后没多久，唐季珊就发现了。当时唐季珊就和阮母商量如何把阮玲玉送到医院去。

当时上海市中心有很多医疗条件很好的教会医院，服用安眠药发现得早，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救活的。但是唐季珊选择了一个郊区的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阮玲玉1928年因为张达民服用安眠药自杀过，就在那家日本医院救活），因为那家日本医院比较偏僻，没有什么人知道。唐季珊怕把阮玲玉送到大医院，到时候闹得沸沸扬扬。

唐季珊一路开车到福民医院，发现福民医院没有值夜班的医生，辗转送到一家德国医院，同样没有值班医生。在清晨5点多，阮玲玉服药已经4个多小时后，唐季珊又请来两个私人医生，私人医生为阮玲玉洗胃后发现没用，再送入蒲石路的中西疗养院继续洗胃，依然没用。

在这个过程中，唐季珊知道可能要出事了，打电话叫来了联华公司的老板黎民伟（香港影星黎姿的爷爷），黎民伟一路上拍下了许多照片。

送到中西疗养院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最佳的抢救时机已经过去了——阮玲玉甚至没有像自己主演的《新女性》女主角韦明那样，服用安眠药后有过求生的机会。

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8

阮玲玉的死讯传来，整个上海乃至全国哗然。

大家首先想知道的是，阮玲玉的遗书到底写了什么。

一开始，唐季珊不肯拿出来，在外界催促了很久之后，他终于拿出了两封遗书。

第一封，是说没有任何对不住张达民的地方，每月给他一百元等等，最后结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句："哎，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另一封是写给唐季珊的，交代了要他赡养老母和代养养女（这两点唐季珊后来都想尽办法守信做到了），并在信中说对不起他，拖累了他。

不过，这两封遗书一直受到质疑，大家怀疑是唐季珊捏造出来的。

不久之后，发行量只有1500份的《思明商学报》又出现了另两封号称是"阮玲玉真正的遗书"，说是唐季珊后来的新欢梁赛珍提供的（梁赛珍和梁赛珊姐妹在提供了遗书后就此人间蒸发）。

在那两封遗书中，阮玲玉的语气明显要激烈很多。

写给张达民的是："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

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写给唐季珊的是：“季珊：没有你迷恋‘×××’，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玲玉绝笔。”

关于这两封遗书也有争论，有不少人认为是真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假的，是用来攻击唐季珊的。

不过，唐季珊司机后来的回忆应该不假：3月7日晚上回家路上，唐季珊和阮玲玉在车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回家后唐季珊不让阮玲玉进家门，阮玲玉一直坐在门口哭。

9

遗书的真伪难辨，但阮玲玉的葬礼还是要举行的。

1935年3月14日，阮玲玉的灵柩从上海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生前的好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300人。

下午1点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12位当时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

那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沿途夹道的影迷和老百姓多达30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在惊奇之余，写下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的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

更让现在人多少有些不解的是，还有不少影迷，随阮玲玉而去。

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闻噩耗，随即吞服了鸦片自杀；绍兴影迷夏陈氏当天吞服毒药自杀；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服毒自尽。

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其他地方的追星成员也有多位自杀——可能因为阮玲玉扮演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一直鼓舞着她们，而阮玲玉的自杀，崩溃了她们的信念，因为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阮玲玉

鲁迅在阮玲玉自杀身亡后，也专门写了一篇《论人言可畏》，其中开头就有一句说阮玲玉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馒头说

关于阮玲玉的死，长久以来，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人言可畏”。

这里不争论遗书的真假，因为我赞同舆论环境的伤人，但我想聊聊阮玲玉的性格。

阮玲玉的遭遇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她的性格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尽管这与她成长的环境和背景有关，并不能全怪她。

延伸开来，正好想说说，有些女性有时候在感情上往往会有三个症状。

第一个症状，叫“爱情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比如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的渣男明明把自己的妻子（女友）折磨得死去活来，你去指责那个男人时，他的女人反而会最先跳出来：“这是我的男人，要你管？！”

第二个症状，叫“山鲁佐德情结”。山鲁佐德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女主角。皇帝每晚都要召一个少女进宫，第二天早上杀掉。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终止杀戮，自愿进宫。她每天晚上给皇帝讲一个故事，一到关键时刻就打住不说，第二天晚上接着讲，一连讲了一千零一夜，最终打动了皇帝，成了他的爱人。

很多女孩心中都有个“山鲁佐德情结”，希望在自己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个坏坏的王子、花心的总裁、校园的恶霸、不羁的浪子，甚至是痞子或坏蛋，而坚信自己会感动他、感化他，成为渣男的最后一个女人、爱情的归宿。

第三个症状，叫“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是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两个家族的极力反对，但越这样，他们俩反而爱得越深，直到殉情。有些女生，当家人和周围朋友都劝她与渣男分手，这反而刺激她更坚定地要与他在一起，到最后，不知道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反抗精神。

相比于80多年前阮玲玉生存的社会环境，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要求要宽容不少，对女性的尊重多了不少，但总体来说——尽管我是一个男性——这个社会对女性依旧是不公平的，甚至存在很多歧视。

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感情和婚姻问题上，社会舆论对男性的宽容度，要远高于对女性。

也正是因此，女生们更应该擦亮眼睛，吸取教训，保护自己，远离渣男。

最后，祝“馒头说”的广大女性读者节日快乐！更自信，更勇敢，更坚强！

---

[1] 肺痨是当时的称谓，现在叫肺结核。——编者注

[2] 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规定使用“用人”。——编者注

我认识一个男人，叫刘翔

一直想写一个我以前的采访对象的故事，他是个运动员，田径运动员，我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和他认识，到现在已经13年了。我曾说，从某种角度，他遭遇的大起大落，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名字，叫刘翔。

1

先把镜头拉回到2008年8月18日，北京鸟巢体育场。

我坐在记者席的第三排，面对男子110米栏预赛的跑道。

刘翔撕下号码贴纸的一刹那，我站了起来。

旁边的人还在问："怎么了？"

另外一个人淡定地回答："没事，上届奥运冠军，可以直接进入决赛。"

我已经没心思去纠正他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刘翔退赛了。

10天前，2008年8月8日，刘翔进驻北京奥运村的那一晚上，搜狐博客约我写了一篇博文。这篇博客，在刘翔退赛那天，被人翻了出来，点击爆棚。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噢！原来刘翔是真的受伤啊！



2008年奥运会，刘翔因伤退出比赛

在鸟巢体育场外面的走廊里，我决定给刘翔的父亲刘学根打一个电话。

手机拨通，响了一下，被掐掉了。

老刘从来不掐我的电话。

过了大概两分钟，他的电话回了过来。

接起电话，我发现我自己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结果是电话那头的老刘先开腔：“没事的，真的，没事的。”

张玮：刘翔的伤，到底有多重？

（本文专供搜狐，请勿转载）

这两天，每天和孙指导通电话，每通一个，心情就沉重一分——刘翔的伤，可能比我想象的要重。

印象里，刘翔这家伙一直是个不会受伤的怪物，即便是2006年那次著名的“受伤”，听上去很严重，但事后却被无数媒体写成是创造12秒88的一种铺垫，那是重生之前必须经过的“浴火”，蜕变之前肯定要完成的“涅槃”。

但没想到，这次却真的伤了。

当时我写的博客

我居然一下子有点哽咽起来。

怎么可能没事呢？

2

现在，回到2004年8月28日，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

作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奥运持证记者，我就在雅典。但根据比赛分工，我不在田径赛场。刘翔的那场比赛，我是在奥运村自己的房间里，通过闭路电视看的直播。

结果自然大家都知道，12秒91，冠军。

这个赛前被我做报道计划列入“可能会登上领奖台”的上海小伙子，居然拿到了金牌！

在那个没有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年代，我开始疯狂刷BBS（电子公告牌系统）。那一夜，有一句话在各大BBS广为传播：“今晚，中国的女人都哭了，中国的男人都醉了。”

那一晚，我的一位在后方的报社男同事，和几个同事一起喝酒到凌晨5点。回到家，不顾妻女已睡，他把床单扯了下来当国旗披在身上，在家中每个房间里乱窜并大喊：“我是刘翔！我是刘翔！”

回国后，我接到了报社的任务：刘翔希望出一本自传，由我来担任主要的采访整理者。

那是2004年9月的一个下午，在上海普陀区的海棠苑小区，刘翔的家，我第一次见到了刘翔本人。

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他从自己的小卧室走了出来，明显没有休息好，眼皮还有些浮肿。

“叫哥哥！”刘翔的父亲在旁边说了一句。

刘翔愣了一下。



刘翔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

我忙不好意思地摆手：“别别别，没比你大多少。”

刘翔笑了笑，伸出了手：“张记者，你好！”

那是我对刘翔的第一次采访，按理，应该为他的自传搜集很多第一手材料。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多时间都花在对电脑游戏的讨论上了。

“《传奇》后来不玩了。《帝国时代》，你懂的呀，那时候造农民都要掐秒表的，到几秒造一个，不然后面死得家都不认识。”刘翔说起这些来眉飞色舞。

那一年，刘翔21岁。

3

现在回想起来，2005年，应该是刘翔最火的一年。



《我是刘翔》封面

其实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结束回国后，刘翔就已经蒙了。奥运归来第一次回家，他发现道路两边，站满了自发来欢迎他回家的市民。

半天，刘翔不敢下车。

车里的老刘拍了拍他的肩膀：“接下来，不是看你成绩，是看你做人了。”

2005年，刘翔的热度达到了巅峰，各种各样的邀请、采访、广告，

让他晕头转向。

那一年，有位朋友带话过来，一位在温州做生意的朋友希望我牵线，能和刘翔吃顿午饭。“人家愿意出20万元。”朋友对我说。

面对热潮，刘翔渐渐选择自我封闭。“我别的不担心，就是担心他太封闭了，会闷掉，整个心态会受影响。”刘翔的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



镁光灯下的刘翔

2005年，深圳观澜湖承办了“全国十佳体育劳伦斯”的颁奖典礼。刘翔是候选人，我是采访记者，都去了。

颁奖典礼前一晚，我到刘翔的房间去玩。那时候，为防止媒体采访，他那一楼层的电梯口，已经开始专门有保安站岗了。如果不是刘翔自己从房间里出来接我，我根本进不去。

主办方给刘翔准备的也是一间标间。闲聊了一会儿，看时间不早，我准备回自己房间，刘翔忽然说了一句：“今晚别回了，睡这吧，我们聊聊天。”

我说算了，怕给他添麻烦。他摆了摆手：“我说可以就可以，你放心！”

那天晚上，我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的“卧谈”，和他聊了很久。话题五花八门，比如他说他以前在少体校，怎么受年纪大的队友欺负：“大冬

天，他一声令下，我们就必须赤膊跑到寝室的阳台上做广播操、俯卧撑，不然就要‘吃生活’（挨揍）。”

他也说到和柔道队的队员打架：“打架这事情，一上来气势绝对不能输人！”

“打不过人家呢？”

“那就逃啊！反正整个基地我跑得最快！”

当然也说各种其他话题，比如变形金刚，比如喜欢的电影、影星。那天他给我讲他欣赏的香港影星，有周润发、成龙、张曼玉，我记得还有刘嘉玲。

那一夜，说到开心处，我们俩会捶各自的床、踢被子。直到第二天一早，“频道”似乎又调了回来。他对着镜子整理衣领：“待会儿我要有个运动员代表发言，我准备说三个方面……你帮我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那一晚的颁奖典礼，刘翔毫无悬念地当选了2005年的“中国最佳男运动员”，给他颁奖的嘉宾，就是刘嘉玲。

4

2006年，刘翔在运动成绩上再一次达到了巅峰：在瑞士洛桑，他以12秒88打破了世界纪录。

那时我在德国报道世界杯，还没回国。那天早上起来一开手机，看到有人和我说刘翔打破世界纪录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假消息，忙起床去查新闻。一看，居然是真的！连忙给刘翔打了个电话。

“真的假的？！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什么感觉？”

“爽！”刘翔在电话那头吼道。

“那回国给我在那件T恤衫上签个名！”



刘翔打破世界纪录

刘翔破纪录后的第一时间，他的赞助商就发布了一款胸前印有“12秒88”字样的T恤衫，那也是我第一次主动要求刘翔为我签名。

打破世界纪录后的刘翔，进一步成为“无差别级”的国民偶像。我的老师、同学、同事，身边的朋友，各种年龄层次和职业的人，纷纷拜托我帮他们弄一个刘翔的签名，当然，最好能看一眼真人刘翔。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广东。那一次是刘翔冬训，我去采访，一起吃了晚饭后，和几位朋友找了家量贩式的卡拉OK唱歌——刘翔喜欢唱歌，但那时候，这样的放松机会不多。

包厢门外忽然一阵骚动，伴有责骂声，然后门就被撞开了。一个黑衬衣、戴着金项链的50岁左右男子，硬是闯了进来。身后试图阻拦的服务员，被这名男子身后跟着的几个穿黑西装的男子挡在了门外。

“刘翔？刘翔真的在？”那个中年男子边走边嚷，明显喷着酒气。

包厢里的人都挺紧张的，刘翔站了起来，但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气氛有点紧张。

那个男子猛地走到刘翔面前，“果然是刘翔！！！”他喊了一声。然后忽然后退一步——双手一抱拳。

刘翔忙抱拳回礼。

“刘翔！英雄！”那个男子就说了这四个字，随即转身，带着他的人离开了。

做英雄，是要有代价的。

2007年，在日本大阪举行世界田径锦标赛，刘翔是男子110米栏最有希望的夺冠候选。日本的媒体，当时送给刘翔一个称号：“黄金升龙”。

刘翔抵达的那天，在大阪的关西机场，挤满了中日媒体，希望能采访他。

刘翔随后从出口出来后，却虎着个脸，没有接受任何采访，包括日本粉丝专门为他拉的横幅，也视而不见。一个人钻进了大巴，而且还背朝车窗，不给人拍照。

我迎上去，希望能和他打个招呼，却不承想，他也没有理我，直接从我面前走了过去。

后来，他的教练孙海平和我解释：“刘翔那天其实高烧还没退，来的飞机上，机舱里的人排队找他合影留念，他好像有点情绪了。”

孙海平后面还跟了一句：“他很想拿这个冠军……”

在此之前，刘翔还没拿过世锦赛冠军。

所以，当刘翔在决赛那晚，身处第九道，却以12秒95夺冠之后，他兴奋得有些异常。

在赛后的混合采访区，我隔着围栏，伸出了手，喊了一句：“刘翔！”他过来和我猛力击了一下掌，居然说了一句上海话粗口：“老卵！”

而他的眼里，明显有泪花。



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夺冠后的刘翔

那让我忽然想到了大赛前不久的一幕。

那次是去北京体育总局看他训练，结束后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吃晚饭。我坐副驾驶，刘翔坐司机身后的那个座位。

“哥们儿，你们是运动员吧？”的哥从训练中心门口接的我们，自然这么认为。

我侧头看了一眼刘翔，刘翔蜷在座位上，低头摆手。

之前已发生过好多次，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结果到目的地后，坚持不肯收钱。

于是我否认。

“可惜了，如果是运动员，我就不收你们车钱。”

“是运动员你就不收钱？”我倒好奇了。

“有条件！你得代表我们国家，在世界大赛里进过前三名，我就不收钱！”的哥非常认真地说，“运动员嘛！为国争光就是英雄！”

“不然呢？”我问。

“不然就是狗熊！”

自始至终，刘翔没说过一句话。

6

时间到了2008年。

在2008年初，我曾问过刘翔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他回答：“我希望明天早上一睁眼，就是奥运会开幕了，我想赶紧赛完。”

然后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刘翔是一瘸一拐走回北京奥运村的。他走在前面，一群志愿者不敢上去搭话，默默跟在后面。忽然，有一个女志愿者喊了一声：“刘翔！加油！”

“刘翔！好好养伤！”“刘翔，我们会继续支持你！”大家都跟着喊了出来，带着哭腔。

晚饭时间，刘翔没有去运动员食堂。房门紧闭。

不知道谁，在他门口留下了一束鲜花。没多久，鲜花堆满了门口。

刘翔父亲，是第二天才进的奥运村，见到了儿子。

那时候，刘翔正趴在理疗床上，做腿部肌肉恢复。

“爸……”刘翔叫了一声，就没再出声。

房间里寂静得出奇。老刘忽然听见水滴到地板上的声音。然后，他看到，刘翔脸朝下的那块地板，开始湿了。

刘翔哭了。

7

更大的挑战，是康复训练。

2009年春节，我去了美国休斯敦。在北京奥运会上伤退的刘翔，在那里做康复治疗。

北京奥运会后的某一天上午，我去他家，当时他正在吃早饭，上海人最传统的早饭：大饼、油条和豆浆。

“我决定动手术了。”那天他对我说。

我知道，之前有不少人劝过他，千万别动手术，不然就废了。“但不动手术，我不可能再继续跑下去。动手术，至少我还有机会。”刘翔说。

其实比起手术短暂的痛苦，更大的挑战是在康复训练。

在休斯敦的得州医疗中心，刘翔曾让我做一组他的康复动作，很简单，提着两个哑铃，上一个台阶，再下来。我做了一组，已气喘吁吁，而这样一个动作，伤口才愈合的刘翔要做10组，每天至少要有5套类似的动作，再加其他各种康复训练。



刘翔在休斯敦莱斯大学的田径跑道上做康复训练

“我想到过放弃的。这是我第一次想到放弃。我每天晚上闭上眼就在想，明天又是一天，我还能坚持得住吗？”

那天在刘翔休斯敦借住的公寓，我们聊了一个下午。刘翔对我说这句话时确实震惊到了我：手术都决定动了，还会挺不过康复训练？

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那时的刘翔已经可以开始室外的康复训练了。有一天午后，在做完一组跨栏动作后，他和我坐在沙坑旁聊天。

“有时候我真的很难相信，我怎么已经26岁了？”他仰头看天，休斯敦的天碧蓝如洗。

然后他忽然说起了2008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灾难”。

印象里，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回忆北京奥运会的比赛。

当时在一旁的，是刘翔的赞助商聘请的一位专门来为他拍视频的老兄。这位老兄回国后，剪辑出了一部记录刘翔康复历程的片子，叫《追》，我个人认为拍得很棒。在那部长度为23分钟的片子里，他忠实记录了一段采访内容，采访对象，还是一位的哥：“大多数客人都这么认为，认为这次他可能觉得跑不过人家了，所以还是退出的好，省得在自己国家面前丢脸。”

（画外音）“那他不是腿受伤了吗？”

“借口！”

（画外音）“那你还会支持他吗？”

“从他退出比赛我就讨厌他了。”

8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整个2010年到2012年，我也没见过几次刘翔。和他的主要交流方式，也只限于偶尔的电话，或者短信，后来是微信。

那两年的刘翔，感觉是憋了口气。谁都知道他想证明什么，但他自己从来不说。

“最近还行吧？侬稳一点。”

“放心，开心最重要。”

和他的微信交流，一般不会超过这个范畴，我从不问他任何关于训练和比赛的问题。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变成了刘翔的父亲刘学根。

“嚯哟，你没看到小家伙身上的腱子肉，比2006年还要厉害得多。”

“小家伙下决心八步改七步了。”



刘翔从自己的宿舍里走出来，出发去2012年伦敦奥运会

“小家伙电话打过来，说这次跑了12秒87，但是是顺风，差点打破罗伯斯的世界纪录，不过没关系，还有机会。”

后来有很多人质疑：奥运会前，刘翔干吗那么拼命跑？

但我知道他。他是怕自己有一天说不定伤又复发了。他想在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把世界纪录给夺回来。[1]

2012年7月初，我在上海莘庄的训练基地，看到了刘翔。他拉了一个行李箱，从寝室楼里走了出来，老远就冲着我喊：“玮哥！你来啦！”

那天，刘翔的父母也来了，因为他们要送儿子踏上前往伦敦奥运会的征程。

整个告别的环节没有特别的仪式感，就是大家一起合了个影。临上大巴，刘翔一个劲地朝父母挥手：“放心，你们放心。”

车窗摇上，我没看到刘翔的表情，但刘学根和吉粉花别过了头，揉了揉眼，好像眼里进了沙子。



刘翔和父母告别，那时候，他的脚伤还没有明显发作

9

2012年，我是坐在伦敦奥运会记者席的第一排，看着刘翔退赛的。

我采访过三届奥运会，现场目睹了他两次退赛；唯一一次夺冠，我不在现场。

伦敦奥运会的男子110米栏第一轮，裁判说："各就各位。"我的心跳和往常一样开始加速。

尽管采访过那么多次刘翔的比赛，但我依然会紧张。尤其是在决赛起跑线上，看到清一色的黑人选手，只有刘翔一个黄种人孤独而坚定地举起双手向观众示意，瞬间就会让你血脉贲张。



刘翔和栏架吻别。伦敦奥运会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在那个时候，我才会觉得往日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有多么了不起。

但那天，刘翔还是倒下了。

"医生之前就告诫过我，说我的跟腱很有可能断裂。"

刘翔后来回到上海，和我聊起那天的情景："我后来上跑道，踏了踏

起跑器，就知道医生没骗我。”

那天在伦敦，我所能做的，只能是第一时间把“刘翔跟腱确认断裂”的消息发到新浪微博。



馒头大师

12-8-7 来自微博 weibo.com

【刘翔跟腱断裂】据最新消息，刘翔的跟腱已经确定为断裂，目前正在紧急联系医院进行手术。

3万　1万　256



馒头大师

12-8-7 来自微博 weibo.com

确诊了，刘翔跟腱断裂，正在联系医院紧急手术。

我当时发的微博

2012年8月8日晚，伦敦奥运会男子110米栏的决赛。

在伦敦市郊的罗姆德小镇，我和刘翔的父亲刘学根，坐在他住所外的露天长椅上。

老刘点燃一根烟，仰望夜空，一语不发。

屋内电视正在直播比赛，但我们俩，谁都没进去。

半晌，老刘幽幽吐出一句：“这一切的一切，和4年前都太像了。”

然后，老刘开始陷入回忆：“他在赛前训练的所有数据都已经超越历史最高水平，那时我想，他应该可以圆梦了。

“以前我叮嘱他回家要戴脚套理疗伤处，他还会笑着说我啰唆，但这两个月，他一回家就自己戴好脚套，我知道他真的要拼了。

“我来伦敦前就知道他的脚又出问题了，但我每天都祈祷，希望奇迹会发生。我一直瞒着他妈妈，我想自己先扛着。

“他伤势一有好转，就会给我发短信，我这一天就会乐得跟什么一样。但他一不发短信，我就知道又糟糕了，这一天就魂不守舍……”

但所有的不甘和郁闷，在老刘赶到医院陪刘翔做跟腱手术的那一天，全部化为乌有。

那是一场一个多小时的手术，刘翔最终被推出了手术室。看到守候在外面的父母，实施全麻的刘翔努力动了动身子，想对父母挤出一个微笑。舌头还不灵活，刘翔的喉咙里发出“嗬嗬”声，费尽全力吐出一个模糊的词：

“没……事……”

那一刻，60岁的刘学根不顾众人在场，眼泪横流。

“那一刻，哪有什么奥运会，哪有什么冠军，眼前的人，就是我的儿子，其他什么也不是！”老刘说。

10

2015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10点多，我手机忽然响了，一看，是刘翔。

“玮哥，没睡吧？”话筒那头刘翔的声音，有点低沉，但非常严肃，“想和你讲一件事……”

我的心忽然“咯噔”了一下，一阵莫名的紧张，随后却是释然——他应该是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了……

一周后，在上海体育场，数万人面前，刘翔宣布自己退役。

我没有去现场，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

我给刘翔发去一条微信：

“哥们儿，你的青春，其实也是我的青春。你的职业生涯，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珍藏的一段回忆。”

“谢谢你！”他回。

“是我该谢谢你！”我回。

馒头说

2016年6月，我们全家去了一次瑞士，住在蒙特勒。

有一天，我对我太太说，我想去一次洛桑。

她也没问为什么，就说，好。

然后我们就驾车去了洛桑。洛桑不大，没费多少工夫，我就找到了那家体育场。

刘翔创造12秒88世界纪录的那个体育场。

我在微信里问刘翔：“你不是说有两块铭牌的吗？”

他回道：“不知道啊，他们可能摘掉了吧。”



洛桑体育场，记录刘翔成绩的两块铭牌

然后我就找到了那两块铭牌。原来我走反了方向。

那两块铭牌，见证了刘翔在这个体育场，一次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我把那两张铭牌的照片又发给了他。

“放心，没摘掉呢！”

看着那两块铭牌，我忽然挺为他欣慰的。

里约奥运会期间，看到不少网友说：“我们欠刘翔一个道歉！”

我倒并不觉得是这样。

其实不管世人怎样，刘翔就在那里，他的成绩也摆在那里，并不会因大家的态度而发生任何改变。

刘翔曾被身不由己地捧上云端，也曾被毫不留情地踹下神坛，他经历了远远超过常人所能承受的成功和失败，也得到了常人所不可能得到的锤炼和磨砺。

无须向他道歉，当然，他也从来无须向任何人道歉。

他是一个中国体育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运动员——不是说他的运动成就，而是他的人生遭遇：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彻大悟。

他就是刘翔。

---

[1] 2008年，罗伯斯以12秒87的成绩打破了刘翔12秒88的世界纪录。——编者注

民国第一个享受国葬的人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民国时期若隐若现的人。他叫蔡锷，你肯定知道他的名字，却又未必知道他具体干了什么。更多人知道他和一位风尘女子的爱情故事，却未必知道，他是民国第一个享受国葬的人。

1

1915年11月18日这一天，是日本客轮“山东丸”号开船的日子。

这艘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客轮，今天将于天津码头起航。这一天，船上多了一名特别的旅客。

说是特别，这位旅客30岁出头的样子，其实和一般人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去日本的目的，也并非惊天动地，也就是去“养病”而已。

但这确实是一位特别的旅客。当他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时候，袁世凯的“首席谋士”杨度就赶紧提醒：“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归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

此人，就是蔡锷。



蔡锷

2

蔡锷，1882年12月18日出生，湖南人。从小聪慧的蔡锷，12岁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在那里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梁启超。很多人知道蔡锷是一名军人，却未必知道他是梁启超的弟子。

蔡锷从上海的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前身）毕业后，17岁赴日本读书。就和那个年代无数的青年学子一样，蔡锷发现，读书改变不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于是在学成回国之后，于1902年二赴日本，就读于一所孕育出一批改变中国国家命运人士的日本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虽然蔡锷和同学蒋百里等名列毕业生前三名的故事无从考证，但他、蒋百里和张孝准被称为“士官三杰”却是公认的。（蒋百里的故事参见《为什么他没打过一场仗，却是陆军上将？》）

蔡锷后来说，自己去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目的，是觉得那时的中国，不缺少知识分子，但缺少优秀的军人。于是，他就要去做一个能拯救中国的优秀军人。

蔡锷这辈子，一共做过两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

1904年，蔡锷从日本学成归国之后，立刻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各省都需要能训练新军的人才，更何况是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

蔡锷先是在广西干了5年，做了不少军校的校长，其中包括广西陆军小学堂。这个学堂第二期有一个学生，在开学报到时迟到了10分钟，蔡锷坚决不允许他入学。这个学生只能来年再考，考上了第三期。



蔡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照

这个学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指挥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的桂系首领李宗仁。李宗仁后来回忆起蔡锷时说：“我们对他敬若神明。”

1911年初的时候，29岁的蔡锷已经做到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蔡锷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一直和同盟会暗中联系，并明确表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参见《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蔡锷随即践行诺言，于10月30日在云南发动起义，推翻了当地政府。不要小看蔡锷当时这个“协统”。武昌起义，其实是一群班长、排长和连长搞起来的，搞成功后，大家请出黎元洪做都督，黎元洪当时也就是个协统。

革命成功后，蔡锷把当初请他到云南做军务的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然后自己就职云南都督，开始大展拳脚。蔡锷上台后，换掉了一批光说不做的人，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

蔡锷在担任云南都督期间，两次带头减薪，月俸由600元减到60元，只相当于一个营长的月薪，当时在全国闻所未闻。蔡锷的弟弟从湖南来投奔他，想谋得一个职位，蔡锷认为这样不好，给了弟弟20元旅费，让他自己回家。

一时间，云南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然后，就惊动了一个人。

4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蔡锷擅长下围棋，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最精彩的博弈，是与袁世凯的真人对决。

根据《蔡锷年谱》，蔡锷和袁世凯认识，是在1906年，也就是蔡锷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但根据蔡锷的老师梁启超透露，蔡锷当年想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湖南的亲戚只出得起2毛钱，蔡锷去汉口的亲戚那里借到了6元钱，直到到了北京，才借到了1000元钱，而给他这个钱的人，就是袁世凯。

梁启超说，这是蔡锷在东京亲口告诉他的，想来应该不假。由此可见，袁世凯应该是蔡锷的“恩公”。

蔡锷一度还是敬佩袁世凯的——这也很正常，放眼当时的中国，无论资源还是能力，无人能出袁世凯之右。1912年1月，蔡锷曾在电文中称赞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而袁世凯也相当看好蔡锷。他曾这样评价当时的几位最杰出人物：“孙氏（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蔡锷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此人之精悍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请注意，袁世凯用的是“精”和“悍”两个字。后来蔡锷对袁世凯的行为也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两个字。袁世凯识人，不可谓不准。

1913年10月，袁世凯调蔡锷赴京。

按照目前的说法，袁世凯不放心蔡锷拥兵远在云南，所以调入北京“软禁”。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袁曾对亲信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这固然是袁世凯调蔡锷到身边的一大目的，但从袁世凯对蔡锷的赏识来看，并非是完全不想用他的。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松坡为蔡锷的字）为最适宜”。

而蔡锷之所以肯离开自己的基地云南赴京，还是怀着一腔热血的——用梁启超后来的话说，蔡锷有点“抱有幻想”。蔡锷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袁世凯的私心，但还是，希望借袁世凯之手，建立起中国现代化的国防。

但是，袁世凯还是让蔡锷失望了。

如果说袁世凯对蔡锷的种种建议置之不理只是让蔡锷失望的话，那么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就超出了蔡锷对袁世凯的认知底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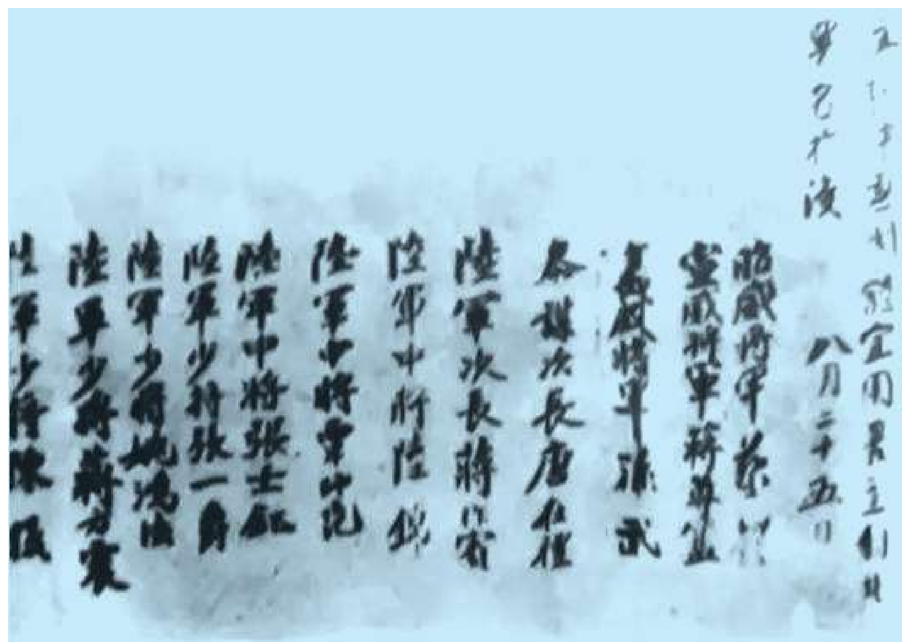
更让蔡锷没想到的是，袁世凯居然准备开历史的倒车——自己当皇帝了。

5

袁世凯称帝时蔡锷的态度，一直是一个争议的热点。

1915年8月，袁世凯称帝之前的准备运动已经到达最高潮，全国各省的督军签名“劝进”，在那份劝进表后面，当时被袁世凯封为“昭威将军”的蔡锷，是第一个签名的。

蔡锷为什么要签名，后来又为什么反对袁世凯称帝呢？



当时的劝进表（部分）

有人曾说，蔡锷出尔反尔，是在“投机”。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拥有全国最高统治权力的北洋系，并没有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声音（虽然段祺瑞、冯国璋等私下里是反对的），而蔡锷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冒有极大风险，而蔡锷反袁时又不是墙倒众人推，有何“机”可投？

那他当时为什么要签名呢？

还是要设身处地去想，从蔡锷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作为袁世凯身边被牢牢看管的人，坚决不在一份明显就是要大家表忠心试态度的表格上签字，后果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劝进表的签字，发生在1915年8月25日，而就在8月24日，蔡锷搭乘火车，从北京前往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密谋了一整夜。



梁启超故居陈列馆，梁启超与蔡锷密谋反袁的蜡像

如果真心准备签名，蔡锷为何要紧急前往天津，去找坚决反对帝制的老师梁启超？梁启超在1922年的《护国之役回顾谈》中，透露了当夜密谈的结果，蔡锷认为："若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

由此可见，在劝进表上签字，应该是蔡锷麻痹袁世凯的第一步。

6

说到蔡锷与袁世凯的周旋，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女性的名字：小凤仙。

在民间传说中，蔡锷与小凤仙的缠绵故事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口口相传。

遗憾的是，蔡锷与小凤仙认识是真，但真说如何要好，恐怕未必。

根据小凤仙1951年拜见京剧大师梅兰芳时做的自我介绍可知，她当年遇见蔡锷时，只有16岁。一个胸怀大志的将军，与一位16岁的少女一起共谋大事，想来也不太现实。

蔡锷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确实开始流连于烟花柳巷，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小凤仙。有人说，蔡锷这样做为的是麻痹袁世凯。但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之人？他会相信素来严于律己的蔡锷，突然开始声色犬马？那样未免也太低估袁世凯了。

所以，蔡锷去青楼不假，但主要是用来表态的：你称帝便是了，我不管，总行了吧？对袁世凯，做戏不能做得太过，这点蔡锷很清楚。所以要说他和小凤仙有真正的灵魂契合，并不见得。

据蔡锷长子蔡端后来回忆，他的母亲潘夫人（蔡锷的小妾）给他讲过，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这个回忆至少说明两点：蔡锷是和家人一起看戏的，以及，蔡锷和小凤仙交往并不背着家人。



小凤仙



蔡锷夫人潘蕙英

至于蔡锷脱离袁世凯的控制，被传是小凤仙鼎力策划协助，这恐怕又高估小凤仙的能耐了。事实上，蔡锷的脱逃是一步步精心计划过的：先是离开北京到天津，然后从天津想办法去日本，然后从日本去上海，取道香港去越南的河内，然后再返回自己的基地云南。

绕这么一个大圈，需要精密的计划和接应，小凤仙恐怕是无能为力的。

1915年11月18日，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是蔡锷逃脱袁世凯控制的最关键一步，那就是离开中国本土，取道日本再回云南。

先是离开北京，然后再离开天津，然后再绕回云南，蔡锷就这样一步步，让袁世凯亲手放走了自己。

说蔡锷“精”，一点不假。

7

然后，就是蔡锷的“悍”了。

1915年12月19日，历尽艰辛，蔡锷终于抵达昆明，开始做他人生中第二件大事：起兵反袁。

现在我们之所以记住“蔡锷”这个名字，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蔡锷是起兵讨伐袁世凯的第一人。

一句简单的话，背后其实是极大的分量。

蔡锷起兵之时，是袁世凯正式称帝的两周后。当时虽然全国骂声一片，但多半都只敢在肚子里骂——袁世凯掌握着全国的军权，手下的北洋系悍将如云。当时的情景，有点像是一群半大不小的少年，围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少年们聒噪：揍他！揍他！可谁也不敢先动手。

蔡锷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的人。

1915年12月22日晚，蔡锷和另外37人歃血为盟，立下誓言：“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12月25日，蔡锷和云南督军、他的学弟唐继尧一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表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誓师之时，蔡锷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而袁世凯根本不敢相信，世间怎会有蔡锷这样的人，不为自己的私利和地盘，居然是“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

于是两军开战。

按照事先计划，1916年1月，蔡锷率领的滇军第一军开始进攻四川。这是蔡锷第一次领兵作战，却也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天赋。在后方唐继尧不发饷、不增援的情况下，面对近10万北洋军，蔡锷不足万人的部队从1月打到3月，基本歼灭了北洋军主力第七师。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一场关键的纳溪战役中，蔡锷护国军麾下的

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勇猛异常，率兵拿下了这场关键战役。那个支队长，叫朱德。

朱德后来回忆当时看到蔡锷时的情景：“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

当时的蔡锷，因为患有肺结核，又加上长期劳累，其实已经病入膏肓。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以当时国内的形势，蔡锷和他的部队其实已经是一面旗帜，只要旗帜不倒，那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人，就敢站出来。

1916年1月27日，在蔡锷的护国军与北洋军鏖战的时候，贵州响应，宣布独立。3月15日，广西响应，宣布独立。蔡锷趁机大举反攻，连战连捷。北洋军最终只能签订停战协议。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去世。

8

早在护国战争期间，蔡锷就表示：一旦战争胜利，自己将辞去一切职务。

他也正是这样做的。袁世凯去世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不久后蔡锷即辞去了所有职务。从这个角度看，说蔡锷反袁是“投机”，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蔡锷没有图谋任何利益。

不过，那个时候，蔡锷的身体也确实承受不住了。1916年9月，蔡锷的肺结核已感染到喉部，话都不能说了，只能东渡日本治疗。只是蔡锷病入膏肓，日本的医生也无能为力。1916年11月8日上午，蔡锷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1917年4月12日，蔡锷遗体荣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

蔡锷，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国葬的人。



1917年，蔡锷将军的灵柩从日本运抵中国上海的码头

馒头说

曾有人说，蔡锷很“善变”。

比如他对袁世凯。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两周之后，因为袁世凯试图召开“国民会议”商讨有无君主体制可能的时候，蔡锷又称他为“袁贼”，准备兴兵讨伐。但等到袁世凯逼退清帝，承认中华民国，蔡锷又发电祝贺他“群望所归”。当然，更不要说他之后的反袁了。

还有对国民党。蔡锷一直拒绝加入同盟会，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坚决支持同盟会，并且自己投身革命，促成云南独立。然而，在袁世凯被怀疑暗杀宋教仁之后，蔡锷却又坚决阻止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用兵，认为应该遵守《临时约法》，由参议院弹劾，而不是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更不要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蔡锷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样只会导致国家支离破碎，生灵涂炭。所以在江西、广东各省宣布独立后，云南都督蔡锷反而宣布中立。

是蔡锷善变吗？恐怕不是。他的种种“变”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不变”，那就是：对这个国家有利的，我都赞成；对这个国家不利的，我都反对。

纵观民国历史，像蔡锷这样不党不群、不要地盘不拉军队的将军，真的找不到第二个。而偏偏就是这个只念国家、不念私人的将军，对中

国的进程产生了影响。

据说，蔡锷在日本医院临终时，看到了窗外日本刚配备的飞机的训练，深受刺激。他对身边的蒋百里说：“我早晚就要和你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

而他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死亡也深感遗憾：“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

据身边人回忆，蔡锷的遗嘱是口述的，全是关于国家大事，没有一句涉及家里。

2016年，是蔡锷逝世100周年。

有时会想：将军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后来又会怎样？

他没有军衔，但人人称他“将军”

他的名字，其实我们都挺熟悉的，但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未必每个人都非常了解。

1

1936年2月20日，在白雪茫茫的东北三省林海雪原，有一群人，发出了这样一个宣言：

全中国同胞们！全东北一切抗日武装军队同志们！

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以“防共自治”为借口，夺我黄河以北五省，更以“日华提携”欺世谰言，想要吞并我全中国，日本寇贼近来要加紧向和平的苏联国屡屡挑战，同时又与意、德两国勾结，作对抗英、美、法的大战准备，把千万同胞生命财产作为大战的牺牲品，完全变成亡国奴。

……

现在顺着全国救国运动之转移，使抗日军队组织越加巩固与行动统一。将我各军军队建制、名称完全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



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部分官兵

我们中国海内外同胞应一致团结起来，铲除穷凶极恶的寄生虫、魔鬼日本强盗，我们从古今中外一切历史事变以及最近阿比西利亚反抗意大利的侵略战争的例子来看，我们深信中国抗日救国，终究必能达到胜利。

东北反日救国总会

1936年，离东北三省沦陷已经过去了5年的时间。这片属于中国的土地，已经被日本人冠上了“满洲国”的伪号。

但是，让日本人相当头疼的是，有这么一支中国部队，哪怕在官方的东北军撤离之后，依然没有放弃过抵抗。日本人把这支部队活动的地带，称为“癌肿地带”，把他们的领导者，称为“东边道社会治安之癌”（东边道，指东北东南部区域，面积大概相当于吉林和辽宁两省的一半）。

这支部队的领导者，就是我们要说的人，他叫杨靖宇。

2

杨靖宇，1905年2月13日出生，身高一米九三，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但他其实不是东北人，他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的李湾村（今驻马店市驿城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的名字，原来也不叫“杨靖宇”，叫“马尚德”。

1923年，18岁的杨靖宇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纺染工业学校（今河南工程学院），和很多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他秘密参加了革命，并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杨靖宇

杨靖宇最初的特长，其实并不是军事指挥，而是发动农民运动。1927年，受中共组织派遣，他回到老家确山县发展农民运动，农民协会的会员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了一万多人。1927年，杨靖宇领导了豫南农民起义，率领数万农民武装占领确山县城，打垮了北洋军第八军的一个旅。

1929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受组织派遣，前往东北。一开始，杨靖宇化名“张贯一”，在抚顺煤矿建立党组织，随后开始慢慢介入军事领导工作中。

在这个过程中，杨靖宇的坚韧性格开始显现：他曾被捕入狱5次，受尽酷刑，但没有一次服过软。

东北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落到了日本人手里。但在整个事变中受命不放一枪的东北军撤出后，却依然涌现出不少有血性的汉子，以马占山为代表，不愿放弃抵抗。黑吉辽大地上活跃着不少正规军、警察

大队和游击队，他们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

缺乏统一指挥的义勇军，各自为战，再加上战术单一，虽然一腔热血，但很容易就被日本人各个击破。到了1933年左右，东北抗日义勇军基本已经化整为零。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担任师长兼政委的，正是杨靖宇。

在这个基础上，1935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合军和游击队为基础，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杨靖宇这个名字，开始成为关东军的一个噩梦。

3

在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着一批牌位，叫“肉弹十勇士”。

“肉弹”在这里的含义，与饮食无关，专被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用来比喻“自杀式冲锋”。“肉弹十勇士”顾名思义，就是发动自杀式冲锋的10个人。

按照日本方面当时的记载，包括东瀬军曹在内的10名关东军士兵，在一场追击中国军队的途中被反包围，绝望之际，他们冲入了对方阵地——严格地说，是“自杀”，但起不到任何“攻击”的作用。

根据旅日作家萨苏考证，当时围歼东瀬他们的中国部队，就是杨靖宇率领的部队。

当时的东北抗联，有“南杨北赵”的说法。“北赵”说的是另一位名将赵尚志，“南杨”说的就是杨靖宇—“杨靖宇”这个名字，是在1932年改的，因为“靖宇”在朝鲜话里有“驱除外敌”的意思。

赵尚志打仗的特点是又猛又狠，而杨靖宇的特点是灵活多变，尤其擅长游击战。面对强大的关东军，抗联一改之前“东北抗日义勇军”以阵地战为主的打法，而是遵循了“敌进我退，敌乱我打”的游击战术，搞得关东军和伪满军队相当头疼。

据当时日伪统计机关统计，仅1935年，东北抗联就在东北三省各地发起大大小小战斗39105次，截至1940年，共发动大小战斗近7万次。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统计数据，日本在东北共损失近27万士兵，其中减去苏联方面宣布歼灭的8万人，剩下的18万，应该就是东北抗联和其他抗日义勇军的功劳。最巅峰时期的1941年，东北抗联在东北三省牵制了76万日军（实事求是地说，日本人的另一大任务是防御苏联）。

渐渐地，关东军把矛头集中指向了东北抗联总指挥杨靖宇。

杨靖宇当时让关东军恨到什么地步，从日本当时的记录可以看出来：从1938年开始，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了6万人的部队和警察大队，专门“剿杀”杨靖宇（东北抗联巅峰时期不过3万人），当时下达的命令是：看到抗联和其他队伍，其他放过，只打抗联；看到抗联队伍里有杨靖宇的队伍，其他放过，只打杨靖宇的队伍。

同时，关东军开始检讨原来的作战思路，做出三点改变：

第一，在抗联出没的地区，进行武装屯田移民和保甲连坐，每二三百户居民就用铁丝网圈起来居住，设岗楼和巡警，老百姓进出不得携带多余食物和衣物，断绝抗联和当地百姓的一切联系。

第二，只要发现抗联队伍，就紧紧咬住跟着打，一刻也不放松，逼迫抗联队伍不断分兵突围，越打越小。

第三，改变以前的滥杀政策，招降和优待抗联的叛变分子。

事实证明，这三点都起到了作用，而最起作用的，就是第三点。

叛徒的杀伤力，永远都是惊人的。

4

1938年7月，杨靖宇麾下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变投敌。这是第一个“重要”叛徒。

程斌是杨靖宇的爱将，有“小杨靖宇”之称，打起仗来又狠又准。关东军抓了程斌的母亲，胁迫他下山投降。

程斌最终选择投降，但他不是一个人，而是拉了手下115个人，带

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包括现金，下山投降。

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为程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宣布成立“程斌警察大队”，岸谷隆一郎还把自己的军刀赠给了程斌。

程斌投敌后立的第一个“大功”，就是带着日本人摧毁了蒙江县（今靖宇县）境内70多个杨靖宇设立的密营。密营是抗联存放粮食、布匹、药品和枪械的秘密营地，在失去当地百姓的后勤支持后，密营是抗联的生命补给线。

一夜之间，杨靖宇的队伍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地。

1939年秋天，关东军开始对杨靖宇部队展开全面扫荡，打先锋的，就是岸谷隆一郎手下的10个伪警察大队——包括程斌在内，10个伪大队长，都是叛徒。

程斌对杨靖宇和东北抗联的战术和路线实在太熟悉了，他甚至只看地形就知道杨靖宇部队接下来会转移到哪里去。在这个过程中，东北抗联蒙受了巨大损失，减员严重。

1940年1月，杨靖宇的部队弹尽粮绝，在零下20多度的冰雪环境下，他们开始用布包着脚在雪地里前行，饿了只能啃树皮。为了解决部队补给，杨靖宇命令大部队北上突围，自己带着贴身的十几个战士，继续与敌人周旋。



抗联的密营

1月22日，第二个“重要”叛徒出现了。杨靖宇的警卫旅参谋丁守龙被伪通化省警察大队捕获，随即变节，杨靖宇的隐蔽位置、兵力情况被日军获知。包围圈大大缩小。

2月1日，第三个“重要”叛徒出现了。杨靖宇警卫员张秀峰携大量经费和一些绝密文件投敌。张秀峰是杨靖宇从小养大的，两人情同父子。张秀峰的叛变大大出乎杨靖宇的意料。更关键的是，张秀峰透露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和意图，致使日军的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几乎已经可以精准定位到杨靖宇。

2月22日，杨靖宇碰上了汉奸，这一次的出卖，是致命的。

这一天的上午，孤身一人，已经5天5夜没吃过东西的杨靖宇（他的两个警卫员下山买粮时牺牲），在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里，终于等到了4个砍柴的“村民”。其中的一个“村民”，是伪军的排长，叫赵廷喜。

杨靖宇恳求他们，能否回去带点食物和棉鞋回来，重金酬谢（杨靖宇身边确实有不少现金，只是苦于买不到粮食）。

赵廷喜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

杨靖宇回答："老乡，我是中国人哪！不能做这样的事。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中国就完了！"

答应给杨靖宇弄点粮食的赵廷喜，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另一个汉奸李正新。因为怕其他三个人先报告看到了杨靖宇，赵廷喜立刻把事情全盘说出。

2月23日下午3点左右，日军赶到，包围了杨靖宇最后的藏身处。

5

日本的《满洲国警察外史》，以及伪满时期的内部档案《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都记录了杨靖宇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离杨靖宇藏身处50米远的时候，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让部队停止前进。

西谷喜代人开始喊话："君是杨司令否？"

整个南满地区，无论日军还是伪军，都已经习惯称杨靖宇为"杨司令"，根本忘记直呼其名。

杨靖宇回答："是的，我就是杨司令。"

西谷喜代人继续喊话："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君之同志的，都归顺了。若是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了，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

杨靖宇回话："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你们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说，开枪吧。"

枪声大作。

杨靖宇手持双枪，不断射击，在右臂被击中后，左手持枪继续还击。

眼看生擒无望，西谷喜代人下令击毙杨靖宇。一颗子弹随即击穿了杨靖宇的胸膛。射击的人叫张奚若，是东北抗联里有名的机枪手，随程

斌一起投降，也曾是杨靖宇的爱将。

据说，杨靖宇在战斗中，背靠一棵树，边打还边喊过一句话："对面哪个是东北抗联投降的？滚出来！我有话说！"

杨靖宇倒在雪地里的时候，日本人还不相信自己真的射杀了大名鼎鼎的"杨司令"。

在确认尸体是杨靖宇之后，按照当时日方的报道："是杨啊，于是所有的讨伐队员都发出了男儿之泣。"

如果说那几名叛徒暗暗流出几滴眼泪，倒也可能可信，但日本人是不会有心情流泪的，他们有的，只是好奇：究竟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存活那么久？他是不是还有"密营"？



伪警察大队展示杨将军遗体，左边两个都是中国人。日军后来还残忍地割下了杨靖宇的首级示众

日本人后来剖开了杨靖宇的胃。

他们失望了，杨靖宇的胃里只有三样东西：棉絮、稻草，还有树皮。

长岸谷隆一郎感叹：“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在杨靖宇的遗物中，日本人除了手枪、子弹、怀表这些东西以外，找到了一个特别的东西：口琴。

日本人无法理解，在冰天雪地，饭都吃不饱，随时可能送命的环境里，杨靖宇为什么还要带着一个口琴。



第一批在现场围捕杨靖宇的那个大队，程斌也在内，但无法确认是哪一个。程斌之后一度逃脱制裁，在1951年被人检举身份，枪毙。赵廷喜1946年被群众抓获，枪毙于杨靖宇坟前。但张奚若、张秀峰等人因为种种原因（缺乏证据、追诉时效等），均逃过了制裁。张奚若晚年坚决否认自己射杀了杨靖宇（其余人都指认是他）

据说在发现口琴的时候，队伍中的叛徒，原抗联一路军参谋长安光勋忍不住痛哭失声——杨靖宇以前每每在队伍休息时，会拿出那个口琴，吹曲子给抗联的战士们听。

1945年8月9日，在中苏边境上，150万苏军如同潮水一般扑向了日本的关东军，发起了总攻。

在百万大军中，有一支1000多人的部队，以空降的方式，降落到了东北关东军身后，实施突袭。

这支部队都是中国人，他们就是当年被迫北上，且打且退，直到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战士。当年东北抗联的老弟兄们，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打回了自己的故乡。

只是在雪花飞舞的白山黑水之间，再也听不到熟悉的悠扬的口琴声了。

馒头说

关于抗战中的国共，之前一直听到过这样的争论：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一共牺牲了206位将军，而共产党军队只牺牲了一位（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言下之意，看得明白。

在此之前，我写过很多可歌可泣的国民党将领，也一直认为过去的教科书，有过分贬低国民党军队抗战作用之嫌。但如果只以牺牲将军数来衡量抗日战场上双方的付出，就是另一种矫枉过正。

第一，国民党军队的200多位将领里，不少是在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摩擦中战死的，中共方面承认的抗战牺牲的国民党将领，只有100多位。

第二，国民党将领中，光追认的少将就有近60位，不少生前军衔只是团长一级。而如果以这个标准算，中共抗战期间牺牲的团以上干部接近200个，连不少县大队长取得的战绩以及指挥的部队，都已经超越了国民党军队的团长甚至旅长。但1955年授衔时，只授衔健在的，对牺牲的同志，只是追认为“烈士”。

第三，国民党军队有完整的授衔体系，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国民党领导，抗战期间只有31人被授过衔，其他都没给军衔，怎么统计呢？

想到写这个，还是因为杨靖宇。

按杨靖宇和赵尚志指挥的部队数量，当时按序列就应该是国民党中将级别，以他们艰苦取得的战绩和做出的牺牲，至少要追认二级上将以上级别，但我写杨靖宇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该写他什么军衔，只能冠以“总指挥”。

没有人给杨靖宇授过衔。

而我想，杨靖宇和他的东北抗联，在漫天飞雪与日寇以命相搏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想到过自己到底是什么军衔。

最后，以一个日本人的故事作为结尾。

还记得那个当时的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吗？因为消灭了杨靖宇，他一路升迁，最后到了伪山西省副省长的位置。因为杨靖宇，他对中国军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后来一直在做研究。

但是，1945年到了，日本投降了。

在日本投降前夕，岸谷写了一封遗书，用氰化钾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剖腹自杀。这件事在日本引起震动。

据说，在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遗言真伪不可考，但道理是没错的：中国的军人在这场持续了14年的捍卫自己民族生死存亡的搏命之战中，前仆后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斗。

杨靖宇直到牺牲，也没有被授过军衔，但我们一直尊称他为“将军”。

希望这样的将军，在过去、现在、将来，中国永远不会只有一个。

为什么他没打过一场仗，却是陆军上将？

这个故事要说的，是一位奇人。这个人的名字，在民国的历史上，一直若隐若现。说他有名，却并非大红大紫，说他无名，民国每一个名人，都对他非常尊敬。他叫蒋百里，是一个从没有带兵打过仗的陆军上将。

1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始终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他从未带过兵，打过仗，但逝世后，被蒋介石追封陆军上将。

他只做过一所陆军学校七个月的校长，但这所学校毕业的将官，都以是他的弟子而自豪。

他曾写过一本书，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后来反过来又请他作序。

他为中国击败日本的侵略殚精竭虑，但自己却娶了一个日本姑娘做妻子。

他有个女婿，名叫钱学森，他还有一个妻侄，名叫查良镛，笔名金庸。

这个人，叫蒋百里。

2

蒋百里1882年出生，浙江海宁人。蒋百里的祖父蒋光煦，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达到10万册。所以说蒋百里也算是“书香世家”。

为什么说“也算”呢？因为蒋百里的父亲蒋学烺生下来有残疾（缺左臂），不被蒋光煦喜欢，送到寺庙里出家做了小沙弥。蒋学烺长大后，还俗学医，娶妻生子，这才有了蒋百里。



蒋百里

蒋百里13岁的时候，父亲亡故。因为父亲之前出家，所以蒋百里不能归入蒋家，也得不到家族遗产。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艰苦。

当时蒋百里的叔父请了一位老秀才给自己的孩子上课，没钱读书的蒋百里只能溜到书房里去“蹭听”。那位老秀才看蒋百里聪慧过人，决定

不收他的学费，免费教他读书。

这一教，不得了，1898年，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

但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无非也就多了一个无名的儒生。还好，蒋百里志不在此。在考秀才前，他就喜欢读《普天忠愤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中国诗文的总集）这类书，读到激动的地方，蒋百里会放声痛哭，悲愤交集，发誓要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

所以，在蒋百里19岁的时候，放弃了做私塾教师，在一个知府、一个县令和一个监院的赞助下（可见当时看好他的人不少），东渡日本，去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青年蒋百里

和当时很多的有志青年一样，蒋百里决定投笔从戎。

3

按照时下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蒋百里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在这个版本中，蒋百里1905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17期毕业时，名列第一，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拿走了天皇御赐的佩刀，让所有日本人颜面扫地，随后陆军士官学校决定将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开计算成绩，以防中国学生再得第一名（这个版本中，第二名是蔡锷，第三名是张孝准，前三名被三个中国人包揽）。

这个版本，在陶菊隐的《蒋百里传》、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后世的叙述，多引用于此。

但有越来越多的考证显示，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从没有天皇赐刀的传统（比这级别高的日本陆军大学倒有），而且无论毕业时间、同学姓名、有案可查的成绩排名，似乎都无法证实蒋百里的这段光荣事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蒋百里这段被人广为传颂的事迹，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不过，和蒋百里前后几乎同期（有的差一期）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日本同学中，那些名字还是非常扎眼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阿南惟几、山下奉文……

16	1904.10	549	永田鉄山	4	岡村寧次
					土肥原賢二
					板垣征四郎
					安藤利吉
17	1905.03	363	篠塚義男	3	東条英機
					後宮　淳
					前田利為
18	1905.11	920	安井藤治	5	山下奉文
					岡部直三郎
					藤江恵輔
					阿南惟幾
					山脇正隆
19	1907.05	1068	柳下重治	5	今村　均
					田中静壱
					河辺正三
					喜多誠一
					塚田　攻
20	1908.05	276	草場辰巳	6	朝香宮鳩彦王
					東久邇宮稔彦王
					下村　定
					吉本貞一
					木村兵太郎
					牛島　満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20期优秀毕业生的名单，里面并没有蒋百里的名字。当然，在毕业生名录里也没有中国学生的名字。可能在那个时候，中日学生的成绩已经分开记录

这些后来在中国战场上肆意横行的日本师团长（东条英机后来成为首相，阿南惟几成为陆军大臣），当时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不过，不管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取得了什么成绩，从他毕业

回国就受到清朝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重用并保荐这一事例来看，蒋百里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应该还是颇有威名的。

只不过，蒋百里其实终生对日本的陆军体系评价不高。1906年，蒋百里被公派到德国学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元帅（后为德国总统，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下面的一个连长。4年后，蒋百里学成回国，立刻成为京都禁卫军管带（二品）。



蒋百里在德国留学时的照片

这一年，蒋百里才28岁，放眼当时的同龄人，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4

28岁之后。蒋百里的各种事迹被人传颂。

比如他的刚烈。1912年底，29岁的蒋百里官拜少将，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这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陆军学校，培育出一大批后来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蒋百里以29岁的年龄担任校长，就足以见他当时的地位。

蒋百里到了保定军校后，首先向全体学生承诺：一定会把他们训练

成最优秀的军官，不然就“自戕以谢天下”。

蒋百里随后做了大量的改革，和学校师生同吃同住，亲自授课。他在日本和德国的留洋经历，注定他有远高于当时国内其他人的视野，从老师到学员都很钦佩他。一座本来已经野草丛生、快要倒闭的保定军校，到了蒋百里手里，焕然一新。

但当时北洋政府的一批旧军人代表（主要是段祺瑞），对这所学校的新式培训方法不是很认同，处处刁难，到后来更是连经费都不拨了。蒋百里上任之初，曾向同学们保证要好好管理这所学校，现在这个样子，让蒋百里觉得自己愧对同学。



1919年，中国赴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的合影（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亮，蒋百里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那天，蒋百里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全副武装，站在石阶上对全体师生说：

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职责，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不要动，记住，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正当师生纳闷校长为何要说这些话时，蒋百里掏出手枪，对着自己胸膛就是一枪。

他自杀了！

幸好当时蒋百里身边的勤务兵眼疾手快，拉了一把，子弹从蒋百里的肋部射入，并没有伤及心脏。

事发后，有人从蒋百里屋中找到前一晚他写的三封遗书，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好友蔡锷（当时任云南督军），一封给学校教育长张耀亭。

后来才知道，前一天，蒋百里又一次催讨学校经费失败，所以决定自杀以谢学生。

5

一次自杀未遂，又让蒋百里多了另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爱情。

当时蒋百里自杀未遂，震惊全国。袁世凯下令找最好的日本医院治疗蒋百里的伤势。在养伤期间，蒋百里与照顾他的护士佐藤屋登互生好感，最后结为夫妻。因为蒋百里喜欢梅花，所以佐藤屋登改名“佐梅”。

一个一生研究对抗日本的中国军人，最终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这在当时也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但蒋百里我行我素。

蒋百里去世后，他的好友冯玉祥曾激动地怀疑，是身为日本人的佐梅夫人下毒。当时这个说法给了佐梅非常大的压力，但佐梅顶住了压力，她不是用日语，而是用标准的北京话教育蒋百里留下的五个女儿，将自己的首饰捐献给中国的抗日事业，自己还曾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

佐梅在1978年病逝，墓碑上刻的名字是“蒋左梅”（碑文如此）。她晚年曾表示，她之所以支持中国与自己祖国战斗，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的战斗，是正义的战斗。

故事还没有完。

蒋百里原来是有一个原配夫人的。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这个原配

夫人，是父母给订的亲，蒋百里本人从来不愿意接受。

蒋百里去留学后，蒋的母亲曾委婉地劝那位原配夫人解除婚约，但那位夫人却表示绝不会另嫁他人。蒋百里1910年回国后勉强和她成婚，之后就两人分开，那位夫人侍奉蒋百里的母亲，直到1938年病逝。



蒋百里和佐梅一家

这位夫人，叫查品珍，她有个侄子，叫查良镛，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作家金庸。

金庸后来专门评论过姑父蒋百里这件事：“都是父亲攀交情、母亲讨媳妇，而不是丈夫讨妻子，所以这是不足以为百里病的。”

故事还是没完。

蒋百里和佐梅的三女儿，名叫蒋英。蒋百里当时在浙江书院读书时，有个同窗好友叫钱均甫。两家世交，后来蒋英就嫁给了钱家的独子、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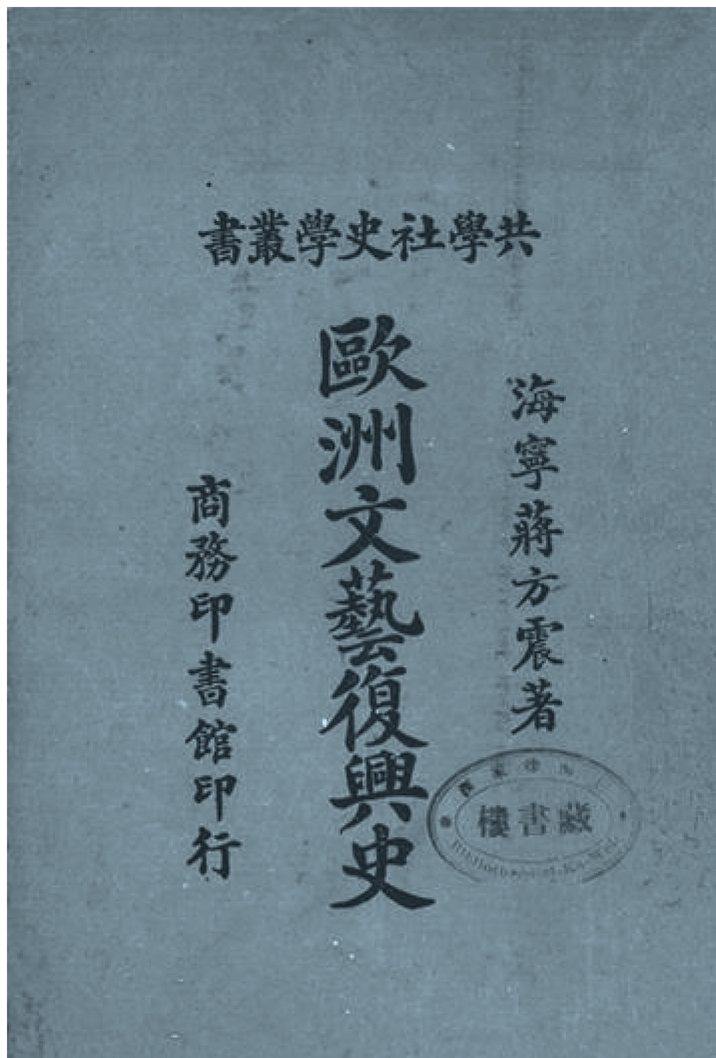
所以，金庸叫蒋英“表姐”，金庸又成了钱学森的表小舅子。

6

说完蒋百里的爱情，再说说他的文学成就。

蒋百里秀才出身，本来就有相当的文化功底。在日本留学时，和同年的蔡锷结为至交。蔡锷是梁启超的弟子，经蔡锷引荐，蒋百里也对梁启超执弟子礼。

1920年，蒋百里从欧洲归来，以一个军事学家的身份，却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他请梁启超来作序，梁启超看了书后，大加赞赏，写序竟有些控制不住——一篇序言，写了5万字，和书的正文差不多了。梁启超觉得这么长的序言闻所未闻，索性另外帮蒋百里写了一篇短序，然后把自己这篇长序言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然后，又反过来请蒋百里写序。



《欧洲文艺复兴史》封面

《欧洲文艺复兴史》出版后大受欢迎，也鼓舞了蒋百里。蒋百里在1920年9月开始主办《改造》杂志。这本全国性的杂志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只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可以超越。而之前他在留日期间主办的杂志《浙江潮》也红极一时，鲁迅、章太炎等人均在上面发稿。

从1920年到1935年，蒋百里倾注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共出版了16套86种图书，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作家的作品，都收录其中。

蒋百里还写过大量文史方面的研究文章，比如《宋之外交》《东方

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

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后人回忆蒋百里时，肯定是冠以“文学家”“史学家”，甚至“报社总编辑”的头衔。

好在，“军人蒋百里”最终战胜了“文人蒋百里”。1925年，蒋百里宣布重新出山，再次投身军事事业。

因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击败日本。

7

一生没有带兵打过仗的蒋百里，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威望？

因为在1937年初，蒋百里把自己多年留学和思考的东西，集结成册，出了一本书，那就是著名的《国防论》。

在这本约10万字的书里，他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军事理念和军事制度，包括制空权的重要性和总体战的概念，同时又结合了中国的国情，给出了中国国防建设的建议和方法。

这本书经当时的《大公报》出版后，轰动一时。

《国防论》封面

当然，蒋百里最熟悉的，还是当时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早就判断中日必有一战的蒋百里，多次谈及对日本的战略，总结下来有三点：

第一，中国不怕日本鲸吞，但怕对方蚕食。所以对日本不能节节败

退，要主动实行全面抗战，不能让日军存在后方，要让其无暇消化占领区。

这一点，后来共产党的部队做到了。

第二，主动攻击在上海的日军，迫使日军不再从北往南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常出现的灭亡一个朝代的打法），而是从上海开始，溯长江而上，从东往西打，从而中国可以利用沿江的山地和湖沼，消解日军在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做到了。蒋介石在1937年发动了惨烈的“淞沪会战”，结果日军的进攻路线真的因此改变了。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时间拖得越久，离胜利越近。

这一点，国民党军队后来也照做了。尤其是蒋百里的保定军校门生薛岳，指挥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会战，牢牢将日军钉死在这条线上。

蒋百里不断强调一点：和日本作战，“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从这三点来看，后来抗日战争的态势，确实是按照蒋百里当初的判断发展的。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自始至终没有和日本有过媾和行为。当然，这也和蒋百里后来成为蒋介石的身边高参有关。

只可惜，蒋百里没有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场战争的胜利。

1938年10月，蒋介石把陆军大学校长的位置交给了蒋百里——在此之前，他自己担任校长。

仅仅一个月之后，1938年11月4日凌晨，蒋百里因心脏病，与世长辞，终年56岁。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作挽联：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改迁后的蒋百里墓，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南山陵园

馒头说

“纸上谈兵”是不是一个贬义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的。

但蒋百里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纸上谈兵”的人。

近年来，舆论有一些把蒋百里“神化”的嫌疑。但抛开那些经不起考证的传说，你仔细看，蒋百里依然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学家——不是军事家，因为他确实没有带过兵，打过仗。

一场庞大的战争，需要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士兵，需要在指挥所里运筹帷幄的将官，也需要一些凭借自己的经历和眼光，远离战火，从战略角度剖析战局的人。

蒋百里就是这种人。而且，当时的中国，也需要这种人。

面对武装到牙齿、猖狂叫嚣的日本军队，其实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军人，心底里是有一种胆怯的。

在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人站出来，告诉大家，日本人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他不是只喊口号，而是用自己的经历和道理，详细剖析给你看。

当时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到军队的将官，都被蒋百里的一句话所鼓舞。

蒋百里把这句话，写在了《国防论》的扉页上：

“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汉奸将军”的自我救赎之路

读过中学历史课本的，应该多少都会知道“张自忠”这个名字。进一步的，知道他是一名国民党将领，牺牲了。大概偶尔也会和“张治中”这个人名混在一起。但张自忠的故事，远不止那么简单。

1

张自忠1891年出生于山东临清的一个官宦之家，没错，他还当过清朝人。关于他的童年，我们一笔略过，只需要知道一点：他最喜欢读《三国演义》和《精忠说岳》。

一般来说，一个人小时候喜欢读的书，会对他的性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一下子把时间跳到1931年。

这一年，清朝早就寿终正寝，中华民国也走过了19个年头。

这一年，张自忠40岁。

他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投奔冯玉祥，从一名排长做起，在1931年，已经成为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一员悍将。这一年，“西北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


张自忠

一个师长，在历史上是很难留下什么痕迹的。

但只过了6年，在1937年，张自忠的名字就被全国熟知了，是以一种非常耻辱的形式：汉奸。

2

事情说起来，也不算太复杂。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逼近北平。

当时平津，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和爱将张自忠据守。二十九军之前打过“长城抗战”，获得了著名的“喜峰口大捷”，是有名的抗日军队。但在占据了华北之后，宋、张二人还是有“军阀思维”，认为平津是自己的地盘，蒋介石的中央军别进，我们自己与日本人周旋。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宋哲元还是张自忠，都对日军全面侵华的决心估计不足，一心以为和日本亲善，可以保住自己的平津地盘。张自忠甚至还代表宋哲元，专门去日本做过访问。

可是日本人一点都没给他们面子。

兵临城下之时，宋哲元以“保留西北军一点底子”为由，带着大部队先撤了。他把那副烂摊子丢给了张自忠。当时，张自忠是天津市市长，在北平治病。

宋哲元走的时候，张自忠说了一句：“我怕要成了汉奸了！”

果然，北平孱弱的兵力，根本无法防守日军。张自忠最终决定，在城里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放日军入城。

那一天，北京的老百姓起床后发现，国民革命军全撤了，到处是安民告示。他们瞬间就明白了——这是投降啊！

日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北平城。

（关于这段故事的详细始末，可以参看本书收录的另一篇文章《“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背后》。）

张自忠不愿真成了汉奸。他先是逃进一家德国医院，然后再通过其他方式，潜逃出城。

但不战而丢北平，这个责任，张自忠确实难辞其咎。

全国的报纸铺天盖地地羞辱张自忠，人们给他个四字评语：“自以为忠！”

3

北平城被破一个月后，张自忠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被撤职查办。不久后，张自忠得到了一个军政部的闲差。

那时候的张自忠，终于彻底醒悟了。

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血书。但直到李宗仁、程潜等人力荐，正处于用人之际的蒋介石，才半推半就，让张自忠回到自己的老部队，代理第五十九军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


日军进入北平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张自忠就想好了自己的归宿。

从1938年2月开始，张自忠带着他的五十九军，开始了他们“自赎式”的拼死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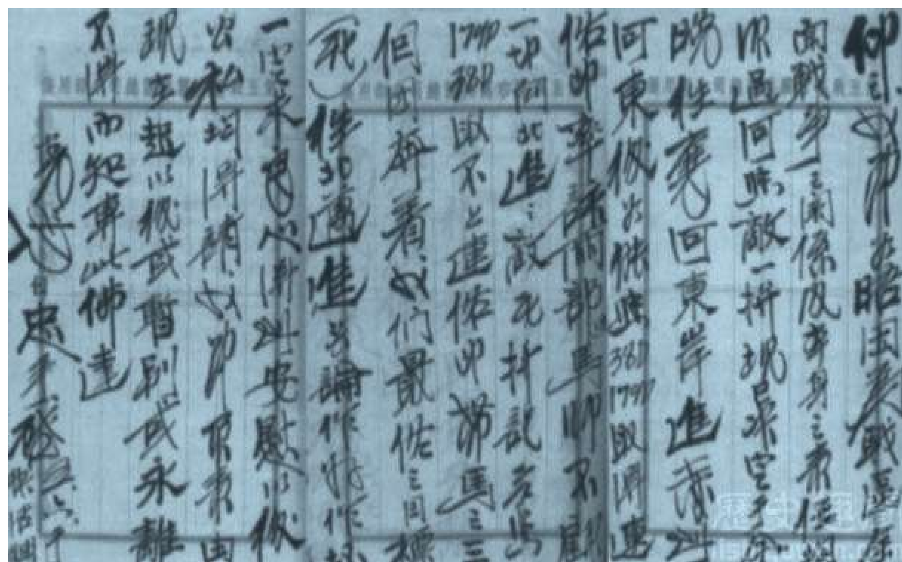
在3月的“临沂战役”中，张自忠不计前嫌，率五十九军急行军支援死守临沂的庞炳勋部（庞炳勋在中原大战时曾差点要了张自忠的命），血战七昼夜，击退日军中号称“铁军”的第五师团。这一战，打得日本人刻骨铭心，同时也让全国都知道，张自忠原来是抗日的！

这一战之后，张自忠的所有处分都被取消，并升任二十七军团军团长。

但这远没有达到张自忠的自我要求，那种迫切要洗刷耻辱的自我要求。

1938年3月至5月的“徐州会战”，张自忠和他的部队杀红了眼，且专挑脏活累活：哪里要增援？我们去！哪里要死守？我们来！哪里要断后？我们上！哪里最苦最危险，张自忠就带着他的部队坚决顶上，而且

一交火就往死里打。在每场战斗前，张自忠都会先留下遗书。活着回来，就销毁。



张自忠的遗书

那一次会战，很多日本人都记住了一个对手的名字：张自忠。

到了1939年，张自忠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那么多次，无一败绩。他的名字，不仅在国民党军中响当当，在日军中，也已经享有威名。这一年，张自忠已经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并且是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专门关照张自忠：“集团军总司令，就不要去一线亲自战斗了！”

但张自忠似乎从来没有听进去过。这使得不断有后人推测：张自忠其实早已经想好以一死来洗刷先前的耻辱了。

4

1940年5月，枣宜会战打响。

张自忠奉命出击枣阳，截击日军。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不用自己亲自出击，但他命令副司令留守，自己又一次奔向了前线。

这是张自忠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

临战前，张自忠给追随他多年的军官们，罕见地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其中有一句写道：“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

5月15日，张自忠率总部和七十四师抵达南瓜店。他们并不知道，由于集团军总部无线电通信频繁，被日军通信部队察觉，并被侦听到电台确切位置。

日军惊喜地发现：面对他们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

5月16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调集5000多人，开始包围张自忠的集团军司令部。当时张自忠身边，也就1500人左右。

如果当时决定突围，还是有机会的。但张自忠再也不愿意临阵脱逃了，他决定死守待援。

5月16日清晨，日军发起总攻。防守阵地上的中国士兵，都知道总司令就在自己的身后，血战不退。但日军的兵力和火力都远胜中国军队，防守高地相继丢失。

张自忠的卫队早就被派到了第一线，张自忠身中数弹浑身是血，依然站在小山包上督战。

张自忠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了。

先是一颗子弹射入了张自忠的腹部，本已倒下的张自忠突然挺立，用手去抓一名冲上来的日本兵的刺刀。这时，另一名日本兵将刺刀刺入了他的身体。

至此，张自忠的部队自他以下，全部殉国。

5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一个人到底在大家心目中是什么地位，不看他生前，而是看他死后。

刺死张自忠的那个日本兵，叫藤冈。他在张自忠的尸体上，翻出了一支钢笔，上面刻着三个字："张自忠。"

藤冈大吃一惊，对方声名赫赫的集团军总司令，居然没跑？藤冈立刻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联队长。联队长不敢怠慢，请来了曾和张自忠有过数面之交的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

确实是张自忠！

专田盛寿是跪着帮张自忠整理仪容的，随后命令士兵用担架把张自忠的尸体抬下山，清洗以后安葬。

清洗后，日军发现，张自忠身上两处炮弹伤，一处刺刀伤，五处子弹伤，一共八处创伤。

在陈家集，日军用柏木做了棺材，把张自忠的遗体用布裹好，下葬。木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竖牌后，在场日军集体敬礼。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张自忠阵亡的消息：

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

6

故事还没有完。

当晚，第三十八师和一七九师的官兵，立即组织了敢死队，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司令总部发起拼死攻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抢回张将军的尸体！

那一夜，中国的士兵不要命地往前死冲，终于找到了张自忠的坟墓。

按照日军的记载："当夜，张自忠的遗体即被数百名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取走。"

张自忠的遗体，被中国官兵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配上将军短剑和领章，装入贵重的楠木棺材，准备送回当时的陪都重庆。



蒋介石亲自登船迎灵柩

途经宜昌，百姓得知运送的是张将军的灵柩，10万人出城哭送。其间日军飞机飞临宜昌上空，防空警报长鸣，但群众无一散去。

日机盘旋多圈，一弹未投而离去。

张自忠的灵柩走水路前往重庆，一路上经过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所经之处，供桌延绵数里，祈愿的香火缭绕不绝，很

多中国百姓在长江两岸长跪不起。

1940年5月28日，张自忠灵柩抵达重庆，重庆百姓倾城而出迎接灵柩。蒋介石臂挽黑纱，亲自上船迎灵。

张自忠殉国时为上将军衔，50岁，是“二战”时期同盟国方面牺牲的最高军阶的将领。

国民党之后追授张自忠二级上将。共产党之后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在今天的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路，叫“张自忠路”。



张自忠墓

馒头说

1986年4月，在香港举行了一个特别的首映式。上映的是一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名字叫《血战台儿庄》。

在这部电影里，有这样一组镜头：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师长王铭章的追悼会，正好日机空袭，场面混乱。但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依旧镇定演讲。

这样一个小镜头，连同这部电影，轰动香港，震动两岸：这是大陆第一次正面承认国民党的抗战功绩！

在台湾的蒋经国听到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刻要来了录影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没多久，蒋经国宣布，准许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戴老板”之死

很多读者都曾在后台留言要求写一写这个人，他确实是个值得一写的人。这个人无师自通，建立了一整套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他被共产党称为“蒋介石的佩剑”，被美国人称为“亚洲最神秘的人”，他留下了“杀人不眨眼”的名声，但即使对手也承认，他是“特工之王”。

1

时间，先回到1936年12月13日。那一天，正在广州扩充广东缉私部队的戴笠，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那是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发来的，电报上赫然写着：

十万火急，南京沈沛霖[1]亲译（绝密）：据确切悉，12日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不明。西安江雄风敬叩。

关键是那个日期：12月13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一天了，戴笠的情报系统才刚刚得到确切消息。

其实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在张学良和杨虎城身边布了不少“眼线”，但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所以虽然向蒋介石汇报过“张学良、杨虎城有异动”，但戴笠自己也不敢确定。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在洛阳与西北军政首脑合影。前排左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

这种模糊的提醒，自然不会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如今，领袖被抓，生死难料，戴笠这个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定难辞其咎。

戴笠立刻坐飞机赶回南京，随即就参与了一场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争辩。

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坚决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不然“党国威望何存？”，而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一批人，坚决主和，“子弹又不长眼睛！”。

戴笠是“戴罪之人”，不敢发言，但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宋子文请他一起陪宋美龄去西安与张学良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张学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去谈判的人确实是要冒风险的（宋美龄在去西安的飞机上曾递给身边人一把手枪，嘱咐如果发生意外就用枪打死自己）。

但戴笠知道，那时候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毅然决然地答应一同前往。

到了西安，一下飞机，戴笠就被张学良派人缴了械，软禁起来。虽然张学良接待戴笠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戴笠其实没怎么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不过，戴笠还是给自己写了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2]地下室。”

这封遗书写得颇为感人，但后来从“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留下的各种记录文字看，戴笠始终和宋子文共同行动，张学良也待之以礼，很难看出有什么“离死不远”的迹象。

不过，这封遗书还是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西安，戴笠面见了被囚禁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看到他走进来，立刻大吼一声：“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听闻此言，戴笠竟然号啕大哭。

据他事后的解释：终于见到了领袖，哪怕是训斥，也觉得心中格外亲切。

而蒋介石骂归骂，但对危难之中敢到西安来谈判的人，他还都是记在心里的——宋美龄是老婆，宋子文是小舅子，而这个戴笠非亲非故，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蒋介石最看重忠心的人。

那一年，戴笠已经39岁了，但等待他的，是人生崭新的一页篇章。

2

戴笠是典型的“大器晚成”。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春风，字雨农——因为小时候他的母亲找人算命，说她儿子宿命不错，但命中缺水。所以，戴笠后来一生用过27个化名，很多都与“水”有关（包括开头的“沈沛霖”）。

戴笠家里原本还算殷实，但父亲戴士富却有个致命的坏习惯：赌博。原本戴家有200亩地，因为赌博，最后输得家徒四壁，母亲蓝月喜只能靠给人缝补补贴家用。



戴笠与母亲合影。戴笠极孝，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并认为是母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戴笠4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格，6岁把他送进了私塾。戴笠从小聪明，博闻强识，在学校里经常是第一名，后来考入当时的浙江一中。

但是，父亲喜欢赌博的恶习，也延续到了戴笠身上。戴笠好赌，且赌技精湛，还善于“出老千”。结果，因为赌博，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投了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去当兵。在军营里，又是因为赌博被长官发现，随后被开除。

戴笠回家，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一个叫毛秀丛的女子为妻，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按照母亲的想法，戴笠师范毕业后，就当一名小学老师，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

但已经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的戴笠，又怎么可能闲得住？在家待了段时间后，他决定还是要出去闯天下。在上海、宁波、湖州这一带“讨生活”的戴笠，随后的那些经历，倒也是挺有意思的。

他去过少林寺习武，当时和他一起习武的弟子里，有一个人叫许世友，后来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他去湖州和一群人结拜兄弟，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胡宗南（国民党一级上将），一个叫王亚樵（著名的“暗杀大王”，最后死在戴笠手里，参见本书收录的《“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24岁时，他回浙江开了家“春风武馆”，然后去上海赌场玩骰子，因为赌技精湛，被赌场老板看中，结拜为兄弟——那个老板，叫杜月笙。

27岁时，他在家乡组织“自卫团”，在苏浙战争中抵抗闽军的入侵。

总之，在30岁前，戴笠是一个到处混的人，虽然留下了一些名声，结识了一些日后的大佬，但如果就一直这样混下去，他也不可能在历史上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直到1925年，戴笠碰到自己的同乡加同学毛人凤，毛人凤赞助了他20块大洋，劝他去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前途会非常辉煌”。

戴笠第一次去考的时候，没有考上，随即求助于当年在上海叫他“叔叔”、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后来当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出钱资助了他，鼓励他再考一次。

1926年，戴笠终于考上了黄埔六期的骑兵科，只是当时已经30岁。和戴笠同一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的也就22岁，年龄小一点的可能才十七八岁，他在同学里可谓是“德高望重”。

在黄埔军校，戴笠开始使用“戴笠”这个名字。曾有人说戴笠用这个名字是想戴皇冠，其实典出晋朝周处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卿当下。”意思是君子之交，贫贱不移。

而且，“戴笠”这个名字，有“隐藏在帽子下”的意思，和他日后的职业倒也颇为契合。

也正是那份成熟和稳重，30岁的戴笠在学校里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那时虽然是黄埔军校校长，但也就比戴笠大10岁而已，两人在上海还见过几次。在学校里的时候，戴笠就开始注意搜集学校里的各种情报（主要是共产党渗透的情况），再通过人交给蒋介石。

1927年4月，戴笠被分配到许振亚手下的国民革命军骑兵营第一连第一排，参加了北伐。骑兵排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不是作战，而是在大部队到达前侦察敌方情报。戴笠将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有些情报是直接交到蒋介石手里的，所以蒋介石对他的印象进一步加深。

在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开始在北伐军内大力清洗共产党员，戴笠写信向蒋介石揭发了骑兵营中20余名共产党员，由此正式走入蒋介石的视线。

从1927年开始，戴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

这是戴笠一生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3

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认为负责情报的“中统”出现了大问题。

那个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几次大“围剿”都遭遇了惨败，其中很多绝密的行动，都有被共产党提前知道的嫌疑，蒋介石开始怀疑“中统”是不是被共产党渗透了。

1931年，中共的特别行动科顾顺章被捕叛变，蒋介石恍然大悟——连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是中共的人，共产党的渗透已十分严重。

随后的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个事件其实是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捣的鬼，而“中统”的情报系统居然事先没有任何情报，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要在“中统”之外，另起炉灶。

谁来做负责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戴笠。

纵观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他有一个明显的优先级：“人才＋奴才”—“奴才”—“人才”。



蒋介石与戴笠。可以注意戴笠看蒋介石的眼神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看来蒋委员长的个人偏向，喜欢任用故旧和他个人认为可靠的老伙伴，以担负重要的职位。至于明知他们腐化贪污有据，或缺少能力等等，他却置之不管。"

而既有能力，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戴笠正是不二人选。

1932年3月1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称之为"蓝衣社"），社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4月1日，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复兴社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核心部门"力行社"特务处处长一职（后来，力行社归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著名的"军统"）。

戴笠的特工生涯，正式开始。

事实证明，蒋介石真的没看错人——戴笠确实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

首先，戴笠善于学。

当时，戴笠手下才100多人，绝大多数没有从事过情报工作。当时“中统”里有很多水平很高的特务，戴笠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拢过来。招降了曾经在苏联专业机构严格训练过的顾顺章之后，戴笠专门让他开培训班，传授手下各种特务技能和知识。

在学习同事和敌人的基础上，戴笠创造了好多套制度和行动方法。仅仅特务自身的技能上，就有完整的行动术（暗杀的部署、准备、执行、善后等过程）、射击术（各种枪械的射击技术和一些特种武器的设计）、擒拿术（还重金邀请中国各地身怀绝技的武功高手来培训成员）、情报术（包括各种获取情报和传递情报的方法，以及潜伏的技能），等等。



军统培训的女特务，不少是担任译电工作

其次，戴笠善于罚。

戴笠始终强调一句话：“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他强调军统是个大家庭，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军统特务是一辈子的事情，一旦进入

军统，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

戴笠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家法”，指挥不力、行动失误、背叛组织、贪污、腐化、赌博，甚至违规结婚，都会受到处罚。

但与此同时，戴笠的“罚”会区别对待，比如因为指挥不力、行动失误造成军统损失的，要看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原因。一般来说，因为客观原因失误的处罚都是象征性的，甚至是口头警告一下；如果是主观故意，处罚就会从严从重。

对于背叛组织的惩罚，戴笠是最严格的，一般就是枪决和暗杀。背叛军统的人一般会改名换姓，四处隐藏，但军统对于内奸的处罚是长期的，也就是追杀到杀死为止。所以，军统的叛徒并不多。

再次，戴笠善于奖。

光有罚没有奖，肯定不行。在抗战中，所有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公务员只拿八成薪饷，但军统人员全部全额发放，执行外勤的特务因为任务比较危险，津贴更是双份发放。

当时，戴笠给部下定的伙食标准是每人一天一块大洋，这个标准放到当时，大米白面随便吃，鸡鸭鱼肉能管饱。

此外，对于不幸牺牲的军统特务，戴笠会给予很好的抚恤。除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以外，还会给遗孤发放生活费、教育费。所以，军统人员的凝聚力很强，即使被捕，往往也会坚持不叛变——就算自己死了，家人也会有很好的待遇。

经过几年的经营，戴笠锻造出了一个遍布全中国的最有实力的特务大军。

5

那么戴笠领导下的军统，都做过些什么呢？

实事求是地说，戴笠的军统，在抗日战争期间确实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大批的伪军高官和汉奸，以及日军的军官，都被戴笠派出的军统特务暗杀。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日本的天皇特使、贵族高月保，在1940年被戴笠派人暗杀于北平。

张敬尧，原湖南督军，1932年与板垣征四郎勾结，参加伪满洲国政府，拟任伪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密谋在北平进行暴动，策应日本关东军进占平津。1933年5月7日，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被戴笠派人刺杀。

黄濬，1937年7月作为行政院会议记录人员，将国民党军队准备炸沉日本舰船的机密消息透露给日本，导致计划落空。戴笠组织人侦破此案，抓获黄濬，施行枪决。

傅筱庵，担任伪上海市市长时，被戴笠派人用刀直接劈死。

上海滩流氓大亨张啸林投降日本，在保镖的重重保卫下，在自己家中照样被戴笠派人暗杀。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伪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程锡庚，这三人均在1939年被戴笠派人暗杀。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针对汪精卫的系列追杀，汪精卫最终殒命，有一种说法就是戴笠最终买通了他身边的女佣下毒。

除了暗杀，戴笠还组织过无数次针对日本人和伪政府的爆炸、绑架、制造假币等各种活动，更是成立“忠义救国军”，直接和日军对战，在“淞沪会战”中配合中国军队作战，战况惨烈。



杜月笙和戴笠。淞沪战役中，在戴笠的鼓动下，杜月笙也派自己的手下组成“别动队”对战日军，伤亡惨重。在得知戴笠死讯后，杜月笙曾一度难过得要跳楼

戴笠还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国外。1941年，戴笠两次亲赴缅甸建立情报网，在东南亚做到了“只要有华人血统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特工”。他培养大量军统破译电码的人员，与美国合作，甚至破译出日军要偷袭珍珠港的电码，通知过美方。

有一份数据显示，军统在抗战期间，共计搜集日军情报1021863件，对日伪进行破坏2219次、突击595次，制裁日伪首要515次，暗杀日伪人员18444人、击伤5510人、俘获562人，破坏日伪机车492辆、车厢1627节、汽车479辆、船舰441艘、炮台及碉堡51座、飞机71架、兵营1578间、桥梁250座、路轨1658米。

在抗战中，军统正式登记在册的特工人员牺牲人数为18000人。

当然，除了抗日锄奸外，戴笠也负责帮蒋介石铲除心腹大患和异己：

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因为和共产党走得太近，被戴笠派人在马路上枪杀。

1934年，因为一直刊文抨击蒋介石，《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戴笠派人暗杀于沪杭公路。

1936年，与戴笠是结拜兄弟的王亚樵，因多次刺杀蒋介石，被戴笠派人暗杀。

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戴笠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美国战略情报局调查认定：戴笠手下有18万便衣特工、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1.5万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有组织的海盗，加起来共计有32万实际或潜在人员，均属戴笠指挥，平均每天有4万人24小时地为戴笠工作。

戴笠被认为是站在蒋介石背后，最有权势和能量的人。军统从上到下，都叫戴笠“戴老板”。

这是喜是悲？

6

在戴笠风头最劲的时候，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恐怕是不

夸张的。

戴笠是极少数能全天候晋见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在办公室忙公务的时候，看到戴笠进来头都不会抬，只说一句："雨农来了？先坐。"

蒋介石发号施令，喜欢用"手令"传达，平均数量每年可以装满10只公文箱。但唯独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从来只是口头传述，很少下手令，以免授人口实。戴笠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只做口头报告，对蒋介石的指示，也只是脑记心记，不做笔录。

也正是因此，戴笠布置工作或下达命令，只用一句"奉谕"，至于是奉谁的谕，戴笠从来不解释，有没有奉谕，也没人知道。



1929年夏，蒋介石（前坐者）登泰山时与戴笠（后排左一）等合影

到了抗战后期，戴笠凭借遍及全国的情报网和特务机构，权力已经非常大。任何人，只要戴笠说他是"汉奸"，就可以立刻抓入监狱；相反，只要戴笠点头，说一名汉奸是军统的"特务"，又可以从监狱中放出来。

关于戴笠好色的故事也开始在街头巷尾疯传，包括他与影后胡蝶的一段故事，更是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外的风评可以一笑置之，但国民党内部对戴笠的评价则让他开始有点担心了。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在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带来的收入就超过亿元。当时的财长孔祥熙一直很恨戴笠，曾经说过“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手下的特工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就是他在唐生智部队里的耳目率先发回来的。而更多的时候，国民党军方的将领认为戴笠是在打小报告。比如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还因为女色问题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指出“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军队内部结下不少梁子。

最重要的是，戴笠的权力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蒋介石虽然对戴笠十分信任，也给予了戴笠很大的权力，但也一直想方设法在防范戴笠。比如戴笠立下那么多功劳，但蒋介石始终只让他担任军统局的副局长，军衔也只给到少将，就是想“给权力但不给高位”，防止戴笠膨胀。

虽然戴笠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但到了1945年抗战进入尾声时，他手下的数十万军统、忠义救国军和各种的武装人员，以及已经可以独立联系美国的能力，足够引起蒋介石的不适。

而且，戴笠并不是一个想功成身退的人，从各种回忆录和资料来看，戴笠当时已经把触角伸到了警务、缉私、交通等各方面，并且有意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

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结束了。日本一投降，同样是蒋介石亲信、时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立刻提出解散忠义救国军。戴笠一听就慌了神，连忙飞到重庆向陈诚当面解释“撤不得”。



1943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成立的文件上签字，正式和美国合作训练特工

但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戴笠手下的那么多特务和武装人员，包括戴笠本人如何安置，确实成了蒋介石面对的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而一架飞机，给出了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案。

7

1946年3月17日下午，南京西郊的江宁县板桥镇的老百姓，看到了一架在大雨中挣扎飞行的飞机。

据目击者回忆，当时是下午1点左右，飞机飞得非常低，摇摇晃晃，一头撞到了岱山上，先是一团火光，然后就是一声巨响，爆炸后的飞机燃起熊熊大火。飞机的机翼和机身均被烧毁，只留下一段机尾，上面有清晰的编号“222”——那是戴笠的专机。

后来赶到现场的军统特务发现，机上11人已全部摔死，尸体个个被烧得焦黑，而且肢体不全。经过大雨冲刷，不少尸体已被冲到山沟里和山脚下的小庙旁。

特务在一具尸体的口腔内，发现了六颗金牙，随后根据残存的破碎衣片，最终确定死者正是戴笠。

这一年，戴笠49岁。

根据事后调查，戴笠当天接蒋介石电报召见，急忙搭乘自己的222号专机（美制C47运输机）由青岛飞往上海（为何飞往上海，有一种说法是他要先见在上海的胡蝶）。当时上海上空雷电交加，飞机不得已迫降南京，但就在南京郊外的江宁县撞山。

因为戴笠姓戴，所以后来一直有“戴笠撞戴山，雨农死雨中”的说法，但其实是“岱山”。不过山上的那条沟，确实叫“困雨沟”。

戴笠飞机失事，震惊国民党朝野上下。他的死因，至今是一个谜。

第一种说法，也是目前传得最多的说法，是关于一把“九龙宝剑”。

“东陵大盗”孙殿英当年盗墓时，偷出一把乾隆皇帝用的九龙宝剑，他希望通过戴笠送给蒋介石，所以先交到了军统天津站站长马汉三手里。马汉三却私自把那把宝剑送给了日本人，随后落到了川岛芳子手里。战后，戴笠通过审讯川岛芳子，知道了那把剑的下落，当面问马汉三要回了那把宝剑。

马汉三知道戴笠绝不肯轻易放过自己，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派人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最终造成坠机。

这个说法，因为1948年9月马汉三等涉案三人被秘密处决而显得比较可信。不过后来马汉三家属否认了这一说法。

第二种说法，说是宋美龄派人下的手，因为戴笠曾组织军统暗杀宋庆龄，并差点得手。这种说法可信度不高。

第三种说法，说是共产党下的手，因为之前共产党的王若飞也是飞机失事，共产党方面认为是军统做的手脚，所以要报复。这种说法可能性也不大。

第四种说法，说是美国中情局做的手脚。但从当时看，美国没有做这件事的动机。

第五种说法来自戴笠生前的一位情人，她认为戴笠生前到她那里时，抱怨过如果“老头子（蒋介石）不要我了，我就去死！”，所以她判断戴笠是开枪射杀飞行员然后自杀。但以戴笠对待同事下属的态度，没

理由拉那么多人陪葬。

第六种说法，也就是通行的说法，根据当时身为调查组成员的沈醉回忆，就是雨天失事，没有特别原因。



戴笠送给当时“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人梅勒斯的照片。美国当时确实认为戴笠的特务暗杀行为与民主精神不符，在戴笠死后曾禁止派人吊唁。梅勒斯是在一年后的戴笠周年祭去扫墓的

当然，还有第七种说法，那就是蒋介石下令将戴笠“做掉”。

从当时的情况看，蒋介石确实开始提防戴笠，但考虑到当时国共开战在即，正是用人之际，以戴笠之忠之能力，蒋介石杀他的可能性不

大。

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场，并流下了眼泪——蒋介石很少在公众场合流泪。两个月后，戴笠被追认为中将。

但是，失去了戴笠的军统，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往了。戴笠死后，他的接班人郑介民和毛人凤完全不具备他的能力，军统很快就四分五裂。而也正是军统的没落，使得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活动的空间更大，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戴笠之死，可以让我们的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而与之相对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一句感叹：“雨农不死，我们今天也不至于会撤到台湾。”

馒头说

成为一名间谍，或者从事情报工作，应该是不少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干这一行的，很少有能善终的。

德国盖世太保的头目希姆莱，最终是畏罪自杀的；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贝利亚，曾让全苏联的人颤抖，最后是被处决的；美国FBI（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曾让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不敢解雇他，最后神秘地死在家里卧室的地板上。

当然也包括戴笠。

戴笠死后，为了不让他的母亲蓝月喜过度伤心，军统里的人统一口径，对老人家说是戴笠被送去美国培训了。而毛人凤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模仿戴笠的口气，给老人家写信，告诉她一切安康。

但其实，蓝月喜没过多久就猜到了真相，只是她也没有显露出来。

1948年，蓝月喜过八十大寿，戴笠生前的同乡、小学同学，包括他的接班人毛人凤齐聚一堂为老人家做寿，蓝月喜还是没有点破真相——就算自己的儿子出国培训，哪有母亲八十大寿不回家的？

在那个时候，不知道蓝月喜是否会想，当初自己这个命中缺水的儿子，为什么不肯留在老家安心做一个小学老师？

[1] 沈沛霖：戴笠的代号。

[2] 张寓：张学良寓所。

“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说起刺客，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想起“荆轲”的名字。荆轲之所以能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试图以一个刺客的身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刺客，他想做的事，和荆轲很像。

1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很多小人物，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命运的。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和“东京玫瑰”户栗郁子（参看《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他也是大时代下一个渺小的个体。不同的是，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甚至是他所处的这个国家的国运做抗争。

他的名字，叫王亚樵。

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有一句话：“人人都害怕魔鬼，但魔鬼害怕王亚樵。”



“暗杀大王”王亚樵

2

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

你很难想象，后人会把“暗杀大王”这个头衔放到王亚樵身上——作为一个清朝出生的人，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名列前十。

王亚樵家境贫寒，祖父和父亲都为地主耕种田地，受到从官吏到地主的各种欺凌，这使得王亚樵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同时，他也特别能体会穷人的疾苦。

191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把清王朝给推翻了。这一

年，王亚樵22岁。他干了件当时看起来石破天惊的事——他集合了一批同乡，在合肥宣布成立“合肥革命军”，撤销清廷一切官吏，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王亚樵自认追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可是，孙先生并没有让他管理合肥，而是派了一个叫孙品骖的同盟会的人来接管合肥。

孙品骖到了合肥后，也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独立。于是，两个“军政府”闹起了矛盾：王亚樵主张立刻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民，但孙品骖主张暂时不要动这个阶级的利益。

两个“军政府”就这样吵了起来，结果，“孙政府”先下手为强，围捕了“王政府”，王亚樵身边的骨干均被枪杀，他本人因为去乡下集合队伍，幸免于难。

这件事对王亚樵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折射出了他的政治主张，还逼得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

3

从1911年到1923年，王亚樵没有安定过。从合肥到安庆，从南京到上海，王亚樵创立过协会，组织过军队，做过不少事情，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

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件事，是1913年在上海期间，王亚樵结识了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进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这段经历，对本来就有独立反抗精神的王亚樵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基本打造了他今后的世界观：什么政府官员、军阀元首，只要你是强权，我就要消灭你。（王亚樵曾因为看不惯段祺瑞独裁，强烈建议孙中山“轰炸北京政府，炸死段祺瑞”。）

第二件事，是1921年，王亚樵又回到上海（因为得罪了人被追杀），从朋友手中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有一次，一名安徽籍工人被资本家拖欠工资，不仅索要不成，还被毒打。

王亚樵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派人去铁匠铺打造了100把斧头，率领100名大汉手提利斧，直接冲到了资本家的家门口。资本家忙道歉赔付

工资。自此以后，王亚樵在上海声名大振，他的帮会，被人称为“斧头帮”。

第三件事，是1923年前后，王亚樵奉军阀卢永祥之命，在湖州招兵买马。在这期间，王亚樵和一个叫戴笠的人义结金兰，成为拜把子兄弟。

这个人，日后决定了王亚樵的生死。

4

王亚樵的斧头帮，当时在上海牛到什么程度？

1932年，王亚樵因为种种原因，得到了上海轮船招商局一艘叫“江安”号的轮船的使用权。但是，“江安”号的原经理张延龄却拒不交船。

张延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和王亚樵作对？因为张延龄是张啸林的侄子。张啸林又是谁？张啸林和杜月笙、黄金荣一起，并称为当时上海滩最大的三个流氓大亨。（杜月笙的故事，参看《“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王亚樵怎么办？他二话没说，晚上派人在张啸林家后院的墙上炸了一个大窟窿。张啸林顿时害怕了。于是，张延龄又找到了另一个大亨——杜月笙。张延龄也是杜月笙的门徒。

杜月笙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毫不犹豫地命令张延龄必须把“江安”号交给王亚樵。据说张延龄还不情不愿，杜月笙开口大骂：“你今天要是不交这个船，就别踏出我家的门槛！”

至于黄金荣，早就警告过自己的门徒和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这人不要命。”

其实何止上海滩三个流氓大亨，王亚樵连当时的“东北少帅”张学良也没有放在眼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带着家人和部属到上海来休养。由于当时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声名已经远扬，有不少国人恨之入骨。到了上海后，为了以防万一，杜月笙直接把张学良接到家里居住。在上海滩，有杜月笙罩着，谁还敢乱动？

王亚樵就敢。张学良入住杜府没多久，杜府门口就被放了一颗拆去引信的炸弹。然后杜月笙就接到了王亚樵的三个条件，要他务必转给张学良：

1.要么立刻回到东北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2.如果不肯战，也请回到东北，自杀以谢天下。

3.如果不肯死，就把财产全部捐出来，购买军火，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王亚樵要求，三个条件张学良至少要满足一条，不然第二颗就是有引信的炸弹。

堂堂东北少帅，30万东北军领袖，思前想后，在杜月笙的规劝下，出国考察去了。

5

如果只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王亚樵还不至于那么有名。让王亚樵成名的，是他的暗杀。而且，他暗杀的，都不是泛泛之辈。

王亚樵第一次有名的暗杀，对象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当时王亚樵投靠的是军阀卢永祥。因为军阀之争的各种利害关系，卢永祥必须杀掉徐国梁。

1923年11月10日，徐国梁被王亚樵派人枪杀于上海“大世界”对面的浴室门口。掌管7000名上海警察的警察局长，王亚樵说杀就杀。

如果说徐国梁被暗杀，王亚樵还是“受命行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暗杀，都是出于王亚樵自己的想法。

纵观王亚樵之后的暗杀对象，只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反蒋，一条是抗日。

我们先把“反蒋”放在一边，说说“抗日”。



王亚樵和他的下属们

王亚樵最有名的一次暗杀，发生在1932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面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和后来的杜月笙一样，王亚樵以一个帮会老大的身份，召集了3000名帮众，在太仓协助正规军作战。

“一·二八”事变最终以日军获胜而告终。4月，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竟然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在中国举行侵略者庆祝胜利的大会，对中国人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在上海找人商量对策，看看是否能捣毁“庆祝大会”。但由于时间紧张，日本人的防范特别严密，会场当天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入场，所以完成任务的难度极高。

但这难不住王亚樵。王亚樵联系到了朝鲜流亡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安昌浩，安昌浩找到了24岁的朝鲜青年尹奉吉。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尹奉吉，在4月29日带着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和装有手榴弹的饭盒，顺利混入了虹口公园会场。

那一天，定时炸弹按时爆炸，尹奉吉怕威力不够，还补扔了一颗手榴弹。“一·二八事变”的日军总指挥，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伤重不治毙命，重光葵失去了一条腿。

这场著名的暗杀，让很多人对王亚樵刮目相看，包括蒋介石。

6

蒋介石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王亚樵。蒋介石和王亚樵当年均追随孙中山，按理说理念是一致的。但是，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让王亚樵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王亚樵认同的是国共合作，北伐打倒军阀。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来内定王亚樵是津浦铁路护路总司令。结果，在奠都仪式上，代表工人发言的王亚樵，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要求大家勿忘总理遗愿，团结一切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最后，他带领众人高呼口号：“打倒军阀！停止屠杀！”

这下惹恼了蒋介石。蒋介石于是密令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可是，无论蒋介石还是温剑刚，都小看了王亚樵——南京警察厅侦缉队的队长张祥率队包围王亚樵居所的时候，发现王亚樵和他的人都全副武装。结果，侦缉队队员被全部缴械，眼睁睁看着王亚樵离开后，才被归还武器。

就从那时起，王亚樵开始积极反蒋。而他的反对，从不仅限于口头抗议。1928年，王亚樵派人暗杀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1930年，他又派人暗杀了向蒋介石告密的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或者说，蒋介石那时候还不知道，幕后主使是王亚樵。

1931年，王亚樵又干了两件大事。他经过周密策划，派人在庐山直接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杀手乱中开枪，没有击中（史称“庐山刺蒋”）。之后，他又安排人在火车站暗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但杀手认错了人，宋的秘书唐腴胪成了替死鬼（史称“北站刺宋”）。

但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蒋介石当时都不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在王亚樵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蒋介石还是想和王亚樵讲和。当时，蒋介石派人给王亚樵送去了4万大洋，并许以陆军中将军衔。但王亚樵拒绝了，并且轻描淡写回了一句话：“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

姓抗日，无须答谢。”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入侵东北一事，调查结果明显偏袒日本，王亚樵大怒，决定派人暗杀李顿。然而，暗杀李顿的计划最终失败了，派去暗杀的人还被抓捕了，最终供出当初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后主使，都是王亚樵。

这一下，蒋介石又惊又怒，冷静之后，他决定给王亚樵最后一次机会。1933年，蒋介石通过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三个人联系上了王亚樵——这三个人，当初在湖州，都和王亚樵拜过把子。

王亚樵给出了与蒋介石和解的条件：一、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跟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

据说，蒋介石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对于当时西南的“反蒋派”，无论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还是陈济棠，王亚樵对其中任何一人开一枪，表示诚意即可。

王亚樵闻之大怒，认为蒋介石是在陷他于不义，断然拒绝。于是，蒋、王二人，失去最后一次和解机会。

7

时间到了1933年。蒋介石悬赏捉拿王亚樵的赏金，已经到了惊人的100万元——两年后，蒋介石为共产党那些领导开出的悬赏价格是：毛泽东、朱德和徐向前，各10万元；林彪8万元；彭德怀6万元；周恩来和博古，各5万元。换句话说，毛泽东等7个人的赏金加在一起，才到王亚樵赏金的一半。

但越是这样，王亚樵就越是不罢手。

1933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按期举行，会后，代表委员们合影留念。获得采访资格的“晨光社”记者孙凤鸣，取出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对着前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有一颗子弹击中汪精卫脊椎骨，一直无法取出，最终成了9年后汪精卫的死因之一。



汪精卫被刺杀现场混乱

策划这起轰动一时的暗杀事件的，正是当时已在香港避难的王亚樵。而汪精卫其实只是王亚樵要杀的“二号对象”，“一号对象”恰恰是先前正好离席的蒋介石。

还没等蒋介石惊魂落定，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因为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被王亚樵派人暗杀。

蒋介石彻底被激怒了，他找来了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当年王亚樵的结义兄弟，对他说了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脑袋！”

8

1936年，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逮捕之后，几乎已经无法可想的戴笠，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王亚樵，在香港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所以去了广西梧州。失去线索的戴笠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王亚樵素以肝胆对下属，那么就从他的下属下手。

戴笠派人从香港把王亚樵的下属余立奎绑到了南京，但没想到余立

奎坚决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戴笠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

在戴笠给了10万元和许诺抓到王亚樵就放余立奎之后，余婉君供出了王亚樵的去向。

余婉君随后来到广西梧州，想方设法找到了王亚樵。她给出的理由是：余立奎被抓起来了，他们母子在香港无处安身，只能拜托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给她找个住处。信以为真的王亚樵当即让人给余婉君安排住处。

1936年10月20日，“暗杀大王”走到了他天马行空人生的终点。

那一晚，因为之前承诺过要让余婉君的用人带字条给监狱里的余立奎，王亚樵独自来到余婉君的家。刚进门，早就躲在门后的特务就往王亚樵脸上撒了一把石灰，然后十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准备活捉王亚樵。

然而，王亚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挣脱众人后，掏出了手枪。特务们见状，决定将王亚樵击毙。王亚樵最后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为了灭口，特务随后又击毙了余婉君。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死于特务的暗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离1936年12月12日还有不到两个月。12月12日，那个当初被王亚樵吓得逃离上海的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

王亚樵一直盼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死后不久，终于正式形成。

馒头说

想了半天，还是很难形容王亚樵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军事家，更没有过一个像样的正经官衔，但在那段中国黑色的时代里，他一直是在以一己之力，对内监督政府官员，对外报仇雪耻。只是他的这些行为，不是靠嘴，不是靠笔，而是靠枪和炸弹。

按照军统后来汇报给蒋介石的材料，就在被刺杀之前，王亚樵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准备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但我个人觉得，以王亚樵的性格，也未必能待得长久。倒不是因为其他，民族大义和是非观念王亚樵自然分得非常清楚，但是对于王亚樵而言，他习惯的是独来独往。向国家和政治展现个体的力量，这是王亚樵赢得掌声的关键，也是他以悲剧收场的原因。

“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这是一个流氓的故事，当然，这不是个普通的流氓，当年的他，名震上海滩，甚至全国。这些年来，关于这个流氓大亨的故事越来越多，出现了不少他的语录，他也成了不少人崇拜的偶像，但无论是哪个人，都会有他的正面和反面。

杜月笙，1888年出生，没错，真要算起来，他也做过清朝人。

他出生于当时江苏省川沙厅高桥镇，这块地方，现在已经属于上海的浦东新区。

杜月笙小时候很苦，4岁时就没了爹娘，是由继母和舅舅养大的。关于他如何发迹，不是今天这个故事要讲的重点，简单来说，“小混混”杜月笙加入了青帮，然后遇到了上海滩另一个流氓大亨黄金荣，自己有天赋，老大又提携，终于成为上海滩一代大亨。

这篇文章想和大家聊的，主要还是杜月笙发家之后的一些故事。

1

比如，先说说他的钱。



杜月笙曾对一文人朋友说："你原来是一条鲤鱼，修行了500年跳了龙门变成龙了，我原来是条泥鳅，先修炼了1000年变成了鲤鱼，然后再修炼500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你还是一条鲤鱼，而我可就变成了泥鳅。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

杜月笙有钱，这点大家都知道。关于他挥金如土的故事，数不胜数。杜月笙家过个年，就得花掉近百万大洋。而且最关键的是，杜月笙花钱的观点是："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多好的一句语录。

不过在喝下这碗鸡汤之前，很多人也很好奇：杜月笙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杜月笙的暴利源头，是他的“三鑫公司”。“三鑫公司”当时一年的利润，甚至要超过整个北洋政府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3。

做什么那么发财？

当然是黄赌毒。而和毒品相比，黄和赌还要靠边站。

心思缜密、手段狠辣的杜月笙，当时联合黄金荣和张啸林，垄断了整个上海的鸦片交易，甚至通过法租界，将鸦片销往全国各地。

1930年杜月笙造的杜家祠堂落成，气势恢宏，但祠堂其实还要派另一个用场——制作吗啡和杜冷丁（哌替啶）。



杜月笙自己拥有9辆汽车，司机加助手一共18人。别人估计，杜宅当年一年的开销，至少200万

大洋（普通上海市民一年开销100块大洋）



黄金荣当初在带杜月笙时，发现他有个特点：给他的赏钱，全都拿去发给下面小弟，自己从不留财。黄金荣感叹：此人以后必成大器！



张学良在上海时，杜月笙把名下一家赌场装修好后给他居住，并每天提供毒品供他吸食和注射。不过最终，杜月笙帮助张学良戒了毒

2

再说说他的朋友们。

杜月笙原名叫杜月生，是个很普通，甚至带点乡土气息的名字。后来，有一个人帮他把名字改为杜镛，号月笙。

帮他改名的这个人可不简单，叫章太炎，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你看，明明是一个黑社会大佬嘛，居然能请到国学大师改名。但当时事实确实如此，除了学者章太炎，还有当时的名士杨度（清朝“预备立宪”的主要参与者）、章士钊等人，都是杜宅的座上宾。黎元洪的秘书曾专门为杜月笙写了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这副对联，挂在杜宅客厅最显眼位置。

当过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落难上海时，是杜月笙盛情款待的。杜月笙曾说：“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杜月笙一生交友无数，在上海号称“上海皇帝”，几乎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平心而论，杜月笙细腻的心思和豪爽的为人，再加上仗义疏财，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真心佩服。

但人到了无权无势的时候，才是考验他朋友的时候。

1945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杜月笙从重庆返回他苦心经营的上海。杜月笙满心以为，他的各界朋友、帮派的徒子徒孙，会在上海北站打满横幅标语欢迎他荣归故里。但一名先到站的徒弟传来的消息是，北站确实全是标语，只是标语是：“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

一时胸闷的杜月笙，提前一站下车。无一人迎接。

后来杜月笙才知道，背后给他这一闷棍的，是他当年的门徒吴绍澍。而回到上海后门庭冷落，更是让杜月笙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杜月笙说，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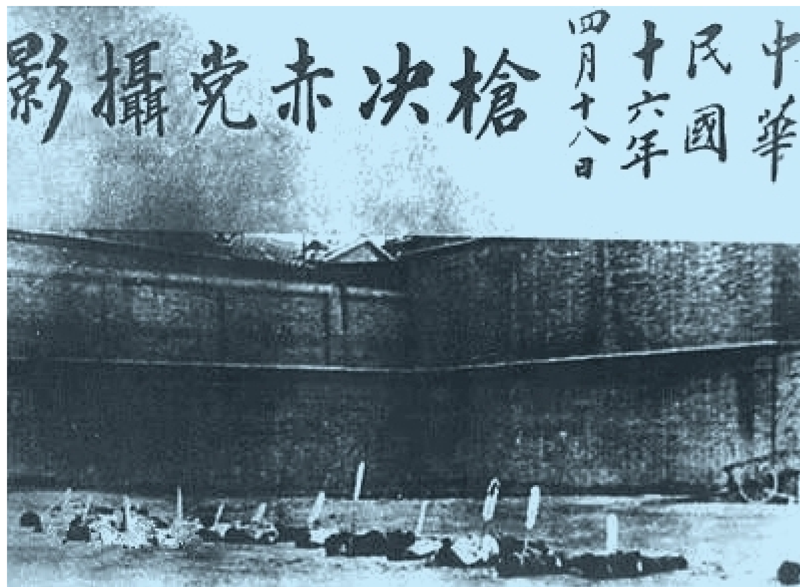
3

再来说说杜月笙和共产党的关系吧。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上海做过一件事：出巨资找人印刷共产党希望传播的书籍《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再印上自己的烫金印字“杜月笙赠”，送给上海各个租界的图书馆，供人借阅。

杜月笙和共产党的交情还不只这些。同样是抗日战争时期，杜月笙给共产党军队买过不少通信器材。因为日本军队卑鄙的毒气战，杜月笙还专门花钱买了1000个荷兰进口的防毒面罩，由潘汉年经手，送给八路军。

但这些举动，更像是杜月笙在为自己1927年的行为洗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国民党枪决的共产党人

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通过流血和暴力的方式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

在这场政变中，杜月笙是蒋介石主要的合作伙伴。

政变前夜的4月11日晚，杜月笙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当时的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中共党员）赴宴，然后让门徒将汪打昏，塞入麻袋，直接活埋于上海的西枫林桥下。

杜月笙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总是穿青布长衫，再热的天，第一粒扣子也不会解开（传说他身上有文身，做了文化人，不愿意让人看见）。

但当年做起这类事，杜先生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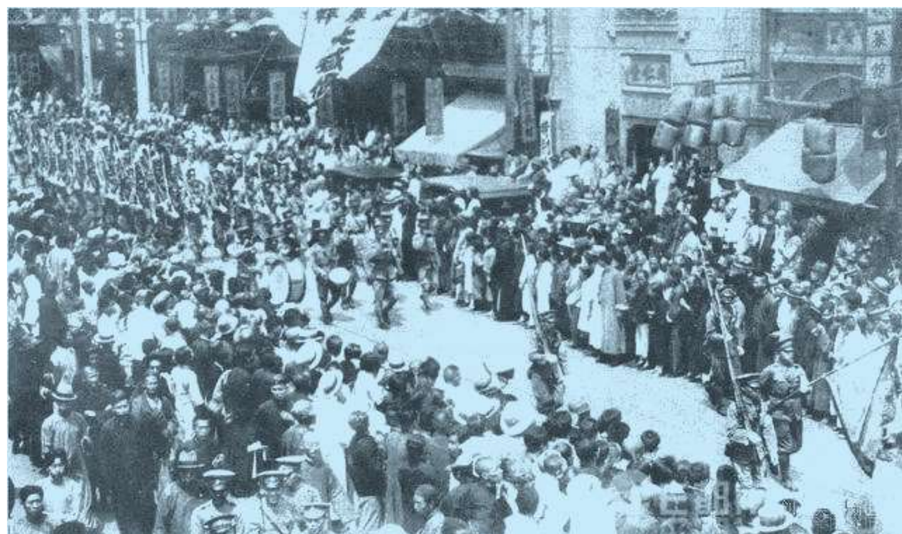
那么杜月笙和国民党的关系呢？

杜月笙其实一直对国民党有求必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对杜月笙也是颇为“尊重”。

在酒桌上，别人来敬酒，蒋介石都是坐着的。但杜月笙来敬酒，蒋

介石是要站起来的，还要说一声："杜先生。"

1931年，杜月笙花50万大洋建的"杜氏祠堂"在浦东高桥落成，万人空巷。但最让杜月笙有面子的，是那天国民党自蒋介石以下，何应钦、胡汉民、孔祥熙，包括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和上海市市长张群，全都送来祝贺匾额。



杜氏祠堂落成时的盛况

只是，"尊重"是有代价的。

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后，已经没有租界存在的上海，也就不再需要黑势力的"斡旋"。对蒋介石来说，杜月笙已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

前面说到的在上海北站打出标语的吴绍澍，并不是小人物，他是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而他之所以敢打出"打倒杜月笙"的标语，是因为他背后站的是蒋介石。

1949年7月，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杜月笙为"时代渣滓"。虽然蒋介石后来专门派人道歉，但杜月笙还是对门徒强调一句话："那些政治大官，其实当我们是夜壶。晚上尿急了，想到用我们。用完了，一脚踢到床下去，嫌我们又脏又臭。"

5

杜月笙有一点，直至今日，历史对他的评判是完全一致的——他懂

民族大义。

抗战期间，杜月笙有一个头衔：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他从没有把这个当作虚衔，而是切实设立了很多医院，救助了很多伤员，钱不够，就动员募捐，募捐不够，就自己贴钱。

谢晋元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各种通路基本都被封锁。杜月笙一声令下，筹集五卡车物资，冒死送到四行仓库。

淞沪抗战，确实是杜月笙体现民族大义的高光时刻。

作为“上海皇帝”，他曾放出一句话：“如果日本人敢利用租界进攻中国军队，我杜月笙在两个小时内毁灭租界！”

话虽然狂妄了，但杜月笙真的愿意去做。

他自己先捐出了5000把“快慢机”（手枪），然后在戴笠的鼓动下，以自己的门徒为主，组成了1500人的别动队，直接就和日本军队干上了。

可以想象，由地痞流氓组成的队伍，和荷枪实弹的日军交火，是怎样的一种狼狈，但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壮！

淞沪抗战后，为了阻碍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的追击，杜月笙率先下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长江江面凿沉。一看杜月笙带头，其他轮船公司也纷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想收买当时的“上海黑帮三巨头”。张啸林直接做了汉奸，黄金荣不肯，但舍不得产业，只能虚与委蛇，只有杜月笙，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上海，避难香港。香港沦陷，日本人再度诱惑，杜月笙直接启程前往重庆。

6

1949年，到了杜月笙必须要抉择命运的时刻。

一方面，蒋介石再三发出邀请，请他去台湾。但1945年后国民党对他的种种冷遇，已让杜月笙心灰意冷。

另一方面，共产党通过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保证既往不咎。但精明的杜月笙，知道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自思很难过关。

最终，杜月笙带着全家，选择了他认为相对自由的香港。

只过了两年。

1951年8月16日，患有严重哮喘的杜月笙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临终之时，他完成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分遗产。偌大杜家产业，最后拿出来的钱，是11万美元——10万美元是杜月笙当初存在宋子文那里的，多出来的1万美元，是宋子文帮他理财的盈余。

当时杜月笙在上海随便卖掉一套名下的宅子，就是60万美元。

但钱就是这么些了。杜月笙的安排是：每个老婆各一万美元，长子一万美元，未出嫁的女儿拿6000美元，出嫁的拿4000美元。

窘迫至此，但杜月笙没有忘记去做第二件事：他让子女把别人给他们家打的所有欠条，全部烧掉。其中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的欠条上面，就写着500根金条。

“我不想我的后代一直追着人家讨债。”这是杜月笙的解释。

而关于杜月笙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

根据他的女儿杜美如回忆，那句话是这样的：

“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馒头说

历史很容易被掩盖住应有的残酷。

以前读书时，教科书上一直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没有什么感觉，但只有看到那些死尸满地的照片，才会感到触目惊心。

就像我们一直说杜月笙儒雅如名士，但如果我们当时就站在活埋汪

寿华的现场，又是怎样一种毛骨悚然？

杜月笙诚然称得上是别人评价的“三百年帮会第一人”，有他的机敏，有他的睿智，更有他的深明大义。但同时，也不能忘了他背后的残酷、贪婪、血腥，以及靠黄赌毒发家的原罪。

这正是杜月笙一生最终以遗憾收场的关键所在。

其实功成名就后的杜月笙，无时无刻不在想“洗白”。为此他褪下黄金大戒指，穿起青布长衫，结交文化名人，讨好两路政党，为国家和民族拼尽全力，尽力想博个好人缘，好名声，好归宿。

但最终，杜月笙发现，自己原先怎么做的，已注定后来人家怎么看他。

就像那句被说烂的台词：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以杜月笙的睿智和格局，最终他以一个黑社会大佬的身份，历经抗战和内战，游走于国共两党，得到善终，已属罕见。

但以杜月笙当时的财富和声望，他最终的遗愿只是：能落葬上海浦东的高桥老家。

而这个愿望，到今天还没有实现。

一个被低估的“大V”的成长之路

这是关于一个“大V”的故事，这个“大V”，生活在清朝，他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里倒是见过，只是相对于其他晚清名臣，历史留给他的笔墨不算太多。

1

关于“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一种说法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还有种说法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

一般来说，史学界比较认同的，是最后一种说法。不过你看，无论哪个版本，曾国藩和左宗棠，总是雷打不动的。

曾国藩，不用多说了。这几年，“曾学”已经成了一门显学，曾国藩俨然已经被摆到了一个“圣人”的位置——当然，我个人觉得是有些过的。

至于左宗棠，尽管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次数，要超过曾国藩（低于李鸿章，不过李鸿章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但你真的要问起他做过什么，恐怕绝大多数人——包括读书时的我——只会回答一句话：收复新疆！



左宗棠

其他呢？其他没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被低估的“大V”——左宗棠。

2

1812年，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县，仅比湖南老乡曾国藩小一岁。

尽管他也受曾国藩举荐之恩，但他从不像其他人一样，对曾国藩自称“门生”或“晚辈”，最多自称一声“弟”。

要知道，在当时权倾朝野的曾国藩面前，只自称一声“弟”，还是要有些胆量的。

这也是左宗棠这位“大V”一生的性格：特立独行。

先抛开“曾左恩怨”不谈吧，先谈谈左宗棠不幸的青年时期。

左宗棠的青年时期，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怀才不遇，屡试不第。

左宗棠20岁乡试及第，但之后三次赴京考进士，均告失败。在三次不中之后，26岁的左宗棠终于大彻大悟：老子不考了！

26岁的人，即便是放到现在，也应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好几年了。左宗棠一没功名，二没家产，该怎么办？

倒也不是太急。因为在左宗棠21岁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倒插门”女婿，娶了湖南一个富家女周诒端为妻。

关于这段“草根逆袭”的故事，后人多有议论。但在我看来，周诒端家祖上做到过户部左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家财政部副部长），而左宗棠家祖上相当一般。如果不是看上左宗棠什么，人家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招“倒插门”女婿？

所以，关于这段婚姻，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左宗棠家早就和人家订了姻亲，但因为越考越穷，娶不起人家了，结果做了“倒插门”。

不过，结婚后，岳父岳母家对左宗棠非常尊敬和客气。这从一个方面，也体现人家看中的是左宗棠的才气。

结婚时，左宗棠写了副对联贴在新房：“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3

我一直对古人的社交传播很感兴趣，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左宗棠。

为什么呢？你看，左宗棠三次京试均不中，但他的名气，居然就在当时已经传遍湖南，甚至全国。

换句话说，左宗棠那个时候，自己并没有加V，但他居然有一个满是“大V”的朋友圈。每次他更新一条朋友圈状态，一帮“大V”会跟在后面疯狂点赞、转发，甚至打赏。

第一个点赞的“大V”，叫贺长龄。贺长龄是道光年间的名臣。1830年，当时已是浙江布政使的贺长龄，在长沙碰到了18岁的左宗棠。当时

也就是个穷书生的左宗棠，居然被省级干部贺长龄大加赞赏，“以国士见待”。左宗棠作为一个求学上进的好青年，一直向贺长龄借书。贺长龄每次都会亲自登梯为他取书，不厌其烦。还书的时候，还要详细问左宗棠的读书心得。

第二个点赞的“大V”，更厉害，叫陶澍。陶澍是谁？晚清有四大幕府：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可以说，晚清的汉臣上台以及幕府建立，始于陶澍。

陶澍培养和发现了一批赫赫有名的人：林则徐、胡林翼、魏源、关天培等，门生遍及天下。但在1836年，已贵为两江总督的陶澍，偏偏就看中了当时24岁，什么都不是的左宗棠。

陶澍欣赏左宗棠到什么程度？以他当时两江总督之尊（相当于现在安徽、江苏和江西三个省的军政一把手），比左宗棠大33岁，居然提出要让自己7岁的儿子陶桄娶左宗棠的长女，和左宗棠结为亲家！

左宗棠当然惶恐不敢接受，陶澍就说了句有名的话：“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之上！”

第三个点赞的“大V”，是最有名的，叫林则徐。

1849年冬，林则徐因病卸云贵总督职，回福建途中经过长沙，专门召见37岁的左宗棠。两人在舟中相见，畅谈一整夜。两人讨论的重点，就是沙俄的野心，以及新疆的问题。

所以就这点来看，如果说李鸿章是曾国藩门生的话，左宗棠应该继承的是林则徐一脉。

相见后不久，林则徐病故。逝世前，他让次子上奏，大力向朝廷举荐左宗棠，因为他对左宗棠的评价是：“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4

名声已经在外，所以左宗棠一点儿都不急。

自从看开科举之后，左宗棠反而想开了，不再攻读儒家经典，而是专心研读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方面的著作，开始学“经世致用”之学。

自古以来，自比谁的都有，但敢自比诸葛亮的不多，左宗棠算一个——他自号“今亮”。

但卧龙也要有出山的时候，如果左宗棠一辈子蛰居，没有发挥的空间，可能也就这样默默无闻一世了。

1852年，左宗棠“加V”的时刻，毕竟还是到来了。

这一切，看来还是要“感谢”太平天国。说实话，没有那场席卷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我们可能现在都不会知道曾国藩的名字，也不会知道左宗棠，更别提李鸿章了。

1852年，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湖南省城告急。左宗棠在好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终于出山。

这一年，左宗棠已经40岁了。

不急，40岁草根的逆袭之路，就此开始。

左宗棠是被人用绳子吊着放进长沙城的。张亮基贵为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居然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左宗棠了。

而左宗棠居然也就揽下了。他“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

左宗棠一战成名。

首秀成功之后，左宗棠的仕途就开始顺了起来。

两年后的1854年，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在太平军驰骋湘北的这段时间里，左宗棠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骆秉章对左宗棠言听计从。所以左宗棠虽为幕府，但其实是等同于行巡抚之职的。当时的他，被世人留下了这样一句评价：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5

这个时候，左宗棠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小V”了，但离成长为一

个“大V”，还差遇见一个人。

这人就是曾国藩。

1860年，才高气盛的左宗棠惹了一桩麻烦，因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因为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左宗棠差点儿把命都丢掉，只能离开骆秉章的幕府。

此时收留他的，是已经权倾一时的曾国藩。

左宗棠和曾国藩是老乡，也是旧识。但左宗棠内心其实是不太看得起曾国藩的，认为他文采和军事能力都不行。

曾国藩虽然入过翰林院，但文采确实一般，虽然创立湘军，但军事也确实很普通，甚至被太平天国打得投江自尽过。但是曾国藩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识人”和“用人”。

换句话说，就是眼光和情商。

左宗棠和曾国藩是旧识，但后来闹过不少不愉快。这些不愉快，本篇不展开。平心而论，曾国藩对左宗棠是有提携之恩的。

当时曾国藩的幕府里，人才济济，左宗棠虽然名声在外，但当时已经是“大V”的曾国藩，要捏死左宗棠，还是轻而易举的。

但曾国藩并没有那么做，反而一再保荐左宗棠。

一开始，曾国藩给左宗棠保荐过一个知府职位，左宗棠嫌官小，不去。1861年，湘军攻克安庆，准备围困太平天国的大本营江宁。朝廷来旨，派左宗棠去四川督办军务。

但曾国藩婉拒了这个谕旨——他觉得左宗棠是个帅才，去四川是寄人篱下，应该独当一面。于是曾国藩放手让左宗棠组建自己的“楚军”，并在第二年保荐左宗棠成为浙江巡抚，把赣浙边境的湘军，全部交给他指挥！

这下真的是蛟龙入海了。

短短4年间，左宗棠大展身手，率军横扫江浙，灭太平军李世贤部，平捻军和回乱，封一等恪靖伯，成了一个真正的“大V”。

“大V”是不是就已经到头了呢？不，还有“超级大V”在等待左宗棠。

1876年至1880年，左宗棠真正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力排众议，亲自率兵出征，讨伐新疆叛乱，并且陈兵新疆威慑沙俄，最终为中国收复伊犁。

关于左宗棠出兵平定新疆叛乱和收复伊犁，详见本书收录的《一个63岁的老头，是怎么收复166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这里就不展开了。

收复新疆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新疆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福克看完后的评价是：“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经此一事，左宗棠终于成了一位堪称名垂青史的“超级大V”。

为何这么讲？因为在左宗棠的坚持和率领下，清朝收复了1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8个湖南省的面积，相当于1/6现在中国国土的陆地面积。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左宗棠是收复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位将军。

至此，从40岁的草根到成为“超级大V”，左宗棠完成了他的逆袭之路。

梁启超对此给过左宗棠一个评价：“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美国的《新闻周刊》在2000年的时候评出了最近一千年全世界的40位智慧名人。中国有三人入选：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成吉思汗，第三位，就是左宗棠。

一个63岁的老头，是怎么收复166万平方公里国土的？

因为篇幅实在过长，上一篇文章中，最后把左宗棠人生的高光时刻一笔带过了，这个高光时刻，就是他收复新疆。本文详细写整个收复的过程，这实在是晚清帝国夕阳中的一抹亮色。

1

1875年5月3日这一天，清政府任命了一位63岁的钦差大臣。

这位钦差大臣，来头不小：他本来就已官拜陕甘总督——清朝九位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之一——督办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军务和政务。

他是名震朝野，堂堂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左宗棠。

但他这次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所要做的事，却绝非常人想的是一桩美差，而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件棘手之事——收复新疆。

但是，这件棘手的事情，是左宗棠自己千求万求求来的。

2

左宗棠为什么会求着收复新疆？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如果再不管新疆，新疆就没了。

先简单说说新疆。

新疆原称西域，从清朝康熙皇帝开始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连续三朝用兵，终于平定了这块地方，定名为“新疆”。到了乾隆中后期，新疆人口稳定，商业稳健发展，形成了古城（新疆古城）—归化（内蒙古呼和浩特）—张家口的西北商业主干道。

但是，“康乾盛世”之后，清朝国力日益衰落，再加上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扶植变少，征税却开始直线上升。最终在1864年，新疆爆发了回民之乱，各路势力在库车（今库车县）、和阗（今和田市）、喀什（今喀什地区）、吐鲁番

（今吐鲁番市）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宣告独立。

在一片乱战之中，占据了喀什旧城的一个地方势力领袖司迪尔引入了一个强援——来自中亚浩罕汗国（以乌兹别克人为主）的贵族阿古柏。当时没有人想到，请来阿古柏其实是“引狼入室”，具备相当军事能力和头脑的阿古柏进入新疆后，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东征西讨，不断兼并各个势力。1867年，阿古柏建立了“洪福汗国”，统一了南疆，到1871年年底，又统一了北疆——阿古柏成了全新疆的霸主。

如果阿古柏只是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哪怕建立所谓的“洪福汗国”，还不算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阿古柏的背后，还有两个国家撑腰。

一个是英国。1868年，一直对新疆地区有野心的英国就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承认“洪福汗国”，并向他们赠送了大批军火，还支援他们成立军工厂。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还亲自写信向阿古柏致以问候，双方互派了大使。

另一个国家就是俄国。1870年，俄国派人前往喀什，承认“洪福汗国”，并在1872年签订了双边条约。

不仅如此，1870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也承认了“洪福汗国”在伊斯兰教教法上的合法地位。

这下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阿古柏的“洪福汗国”俨然已经成了气候，还在国际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眼看着就要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了。

3

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不断要求收复新疆。

1875年1月，光绪帝登基。新皇帝登基，总要有万象更新的气象，左宗棠觉得等来了一举定乾坤的机会，上书要求出兵收复新疆。

按理，左宗棠贵为封疆大吏，提出收复新疆的要求合情合理，哪有那么困难？

但还真的存在阻力。主要是施加阻力的人的官爵、地位、声望和才能，可以说和左宗棠至少是一时瑜亮。

那人就是李鸿章。

光绪帝即位后，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了七大建议：第一开煤矿，第二开铁矿，第三架电线，第四修铁路，第五各海口添设洋学格致书院，第六建海军。

李鸿章不愧为一代名臣，这六条建议可以说都是极具战略眼光。但他的第七条建议，却引起了左宗棠极大的不满：停止西征，暂时抛弃新疆，加强海防。

这就引发了当时著名的“海防”和“塞防”之争。

在李鸿章的眼里，谁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死敌？无疑就是日本。所以当下所有要务，都要围绕海军建设和防范日本进行。他上书：“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而在左宗棠看来，他并不否认日本是中国未来的劲敌，但他认为，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其实是新疆问题。新疆关系到全国六分之一的国土，怎能说丢就丢？

于是他也上书：“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古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都出自曾国藩的湘军幕下，但从师徒关系而言，李鸿章可以说完全是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而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更多的只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左宗棠一辈子其实就没服过曾国藩。从传承关系来看，左宗棠更倾向于林则徐一脉——林则徐一直把沙俄视为中国的心腹大患。

李鸿章当时位高权重，再加上所言并非全没道理，所以当时朝中支持“海防”的占多数。但关键时刻，有一个人还是最后拍了板：新疆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

慈禧为什么要支持左宗棠？第一，左宗棠的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166万平方公里国土，谁丢了都愧对列祖列宗；第二，左宗棠官名清廉，他要求做的事，肯定是为国，不会存私心；第三，清朝就是作为边疆少数民族问鼎中原的，入关后就一直很重视少数民族的问题，新疆一乱，如果波及蒙古等其他少数民族，大清江山危矣。

当时尚未完全掌权的慈禧，经过权衡利弊，最终给左宗棠点了赞：就听你的！放手干吧！

4

但左宗棠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要不要打。

接下来的问题其实更棘手：怎么打？

即便是现在交通工具如此发达，我们去一次新疆都难免舟车劳顿，何况在清朝？而且去新疆不是旅游，而是打仗，粮草辎重、部队后勤如何解决？军饷何来？士气怎样？阿古柏背后还有沙俄和英国撑腰怎么办？

这些都是左宗棠面临的难题，也是当初大多数人不愿意打新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但左宗棠其实从1872年开始就进行了细致的战争准备，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缓进速决。

“缓进”，就是要进行充分准备，不准备好不打。

左宗棠做的第一件事就让人大跌眼镜：大战在即，他不是扩军，而是裁军。

对麾下的军队，左宗棠发出命令：凡是不愿意参加西征的，一律给回家路费。要留下来的，必须是精兵强将。经过一番筛选，左宗棠最后

筛选出了6万精兵。

左宗棠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很明确：远征新疆，山高路远，军队若人数过多，不仅耗粮惊人，而且素质参差不齐，日久容易兵变。

准备充分之后，就是要“速决”。



左宗棠的西征军

“速决”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大清当时国库已经空虚，左宗棠知道，大军一旦开拔，就必须速战速决，越拖越打不动。当时，左宗棠做了详细的测算，从一个士兵、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8万人马（包含后勤杂役等）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一甲，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

经过周密计算，左宗棠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800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左宗棠向朝廷申报1000万两。

当时朝廷也没钱，但咬着牙给了左宗棠一纸诏书：“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于是，左宗棠找到“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向英国汇丰银行借

款。左宗棠自己也知道“借贷打仗”实在是尴尬，但他认定这和西征收复失地相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有了粮，有了钱，左宗棠随即把6万精兵武装到了牙齿。



“红顶商人”胡雪岩，后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被授予布政使衔（清代的布政使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常务副省长），赏穿黄马褂、官帽上可戴二品红色顶戴

1875年7月，知道清政府准备对新疆用兵的沙俄政府，派来了一个所谓的“科学贸易考察队”，这个“考察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清军的实力。

在兰州，左宗棠麾下由刘锦棠率领的西征军的实力，让俄国人大吃一惊：清军拥有大量欧洲最先进的火器及国内的仿造品（比如德国毛瑟步枪M1871型11毫米后膛枪，以及美国制造的“雷明顿一号”步枪）。刘锦棠的这支13000多人的精锐部队，拥有各种来复枪2万支。

考察队的队长立刻得出结论：阿古柏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5

1876年5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左宗棠的西征军骑兵和步兵共25个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对新疆阿古柏势力的总攻正式开

始。

阿古柏的实力在新疆其实也不算弱，军队同样拥有不少火器，骑兵加步兵在一起，总共有4万人左右。但整个战斗却进行得毫无悬念——阿古柏的部队一触即溃，连战连败。



阿古柏的军队

除去左宗棠西征军战斗力颇强的因素之外，阿古柏自己在新疆地区失去人心是一个重要因素。

阿古柏本来就来自外国，在新疆根基不深，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大量使用自己的亲信，造成很多当地贵族的不满。此外，阿古柏的军事能力还算不错，但治理能力却实在不佳，在新疆地区实施重税，当地的老百姓苦不堪言，“东望王师”的大有人在。再加上左宗棠下令一律不许“杀降”，导致整个战争过程中，整城打开城门投降清朝军队的案例有很多。

按照左宗棠制定的“先北后南”的策略，从1876年5月到1877年3月，清军只用了10个月时间，就摧垮了阿古柏苦心经营的“天山防线”，光复北疆，剑指南疆。

1877年5月29日凌晨，陷入绝境的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新疆焉

耆县）——《清史稿》里说他是饮毒酒自杀，但也有其他说法是被人毒死。

1878年1月初，清军攻克南疆所有土地，收复全疆。英国人对此评价，这是“从一个多世纪前的乾隆时代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人所曾取得的最光辉成就”。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收复，那就是被沙俄占去的伊犁。

6

伊犁是被沙俄趁乱占去的。

1871年，阿古柏新疆作乱，沙俄趁机出兵占领了伊犁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不过当时沙俄经历了第九次俄土战争（也称“克里米亚战争”），元气还没恢复，多少有点儿心虚，所以就照会清朝：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要你们能收回乌鲁木齐等新疆重镇，我们就交还。

当时沙俄的算盘是，清朝怎么可能收复新疆？

但左宗棠居然真的带兵收复了。

其实在征讨阿古柏的时候，有人建议左宗棠趁势收复伊犁，但当时左宗棠暂时还不想招惹沙俄，表示“师出无名”，没有采纳。

但左宗棠心里毕竟还是记着伊犁的。1880年，左宗棠上书朝廷，建议在新疆设省，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朝廷同意，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崇厚曾经官拜直隶总督，但外交方面实在是一窍不通，出使俄国，鬼使神差地和俄国人签订了一个《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交收伊犁条约》），得到伊犁一座孤城，大批领土全部丧失，还要赔款给沙俄200多万两白银。

关键这个崇厚还没有禀报朝廷，擅自签完约就回来了。

这个条约一签订，朝中上下一片哗然，名臣张之洞上奏说：“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又万里之实际。”左宗棠更是

怒不可遏，“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



曾纪泽

朝廷一怒之下，把崇厚抓进了监狱，定“斩监候”，准备秋后杀头。

但和约都已经和人家签了，怎么办？左宗棠一拍桌子：重新谈！重新签！

慈禧太后听从了左宗棠的建议，派出了曾纪泽为代表，重新赴沙俄谈判。这个曾纪泽是谁呢？就是曾国藩的长子。

以沙俄之狡诈，白纸黑字落了款，要反悔，谈何容易？左宗棠于是上奏：“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左宗棠的意思是：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自然也别想得到。

1880年，68岁的左宗棠再次率军西征，号称“王师四万”，屯兵哈密，为前方谈判的曾纪泽做军事后盾。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左宗棠下令把自己的棺材从肃州运到了哈

密，这就是著名的“抬棺出征”。

沙俄见状后，一度火速增兵伊犁，并派舰队威胁天津、奉天（今辽宁）和山东等地。但另一方面，鉴于1875年得到的左宗棠部队的实力情报，沙俄也不敢怠慢，四处打探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从各方面汇总的情报显示，左宗棠的军队，真的不是花架子。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新疆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福克看完后的评价是：“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当时，俄国刚刚结束了第十次“俄土战争”，元气未复，自己算了笔账，实在没把握战胜左宗棠。最终，俄国决定退一步，把已经煮熟的鸭子再送回去。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几年之内，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军队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左公柳”

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虽然这个条约依旧还是个不平等条约（沙俄几乎归还伊犁全境，但还是割去了一部分领土，并且赔款增加到了500万两），但相对于之前签订的条约再翻盘，已是大为不易。

在这个过程中，曾纪泽有功，但同样有大功的，是后面抬了口棺材率军威胁沙俄的左宗棠。

1884年，在左宗棠的反复敦促下，清王朝正式设立“新疆省”。

一年之后，左宗棠逝世。

馒头说

在晚清的几大名臣里，左宗棠应该算是比较另类的一个。

如果要选人出演晚清版《人民的名义》主角，李鸿章不行，张之洞也不行，曾国藩早年清廉，晚年也有点糊涂，更何况还放任敛财高手弟弟曾国荃敛财，算来算去，还真的只有左宗棠。

左宗棠一生清廉，后来和胡雪岩关系密切，有人参奏他必然有贪污受贿行为，结果慈禧派人一查，左宗棠清清白白，慈禧大喜之后甚至下谕：三十年不准参奏左宗棠！

左宗棠辞世后，留给家人的钱，也就2万多两银子（大概相当于他一年的俸禄）。而且他再三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老实做人。左宗棠的后人中，几乎没有人从政，不少倒成了医学名家。

而且左宗棠还不是只清廉，不干事。左宗棠一直是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所以在花甲之年，还会抬着一口棺材去打仗。

有人曾说，让左宗棠取代李鸿章，估计晚清的格局会大为改观。

但我觉得不行。

左宗棠外号“左骡子”，以他那个臭脾气，给谁都没有好脸色看（到了晚年还盯着曾国藩骂），根本不可能在当时的政局中如同李鸿章那样为官老到，坐到高位。而且以当时中国面临之内忧外患，已经不能要求李鸿章更多了，左宗棠去做，除了一些事务上态度会更强硬外，未必能比李鸿章做得好多少。

但是任何年代，任何朝代，我们都还是需要几位像左宗棠那样不通人情的硬骨头，不是吗？

珍妃为什么必须死

这个故事要说的这位珍妃，可能未必是中国后宫历史上最有名的妃子，但至少是最受关注的妃子之一。因为她的聪慧，也因为她的悲情。

1

1876年2月27日这一天，是光绪二年的农历二月初三。

原户部右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和农业部的副部长）长叙得了一个女儿，这是他的第五个女儿。

长叙估计不会想到，13年之后，他这个叫“他他拉氏”的女儿，会被选入宫中。当然，和她一起选入宫中的，还有她的姐姐，只是姐姐远没有妹妹的名气大。

因为这个妹妹，被后人称为“珍妃”。而珍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她在24岁的花样年纪，就香消玉殒。

珍妃之死，一直是后人争议的一个话题。



珍妃应该拍过很多照片，但目前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朝照片资料中均不见她的照片，只有在紫禁城东南的皇史宬里保存着一张珍妃的半身肖像照，这也是唯一现存的珍妃照片

2

珍妃是13岁时被选入宫的。

珍妃和她的姐姐（瑾妃）从小在广州随伯父长善长大。长善是广州将军，但却喜欢和文人打交道，给这两个侄女聘请了一位叫文廷式的名士做老师（此人后来中了榜眼），所以这两个女孩从小就知书达理。

更重要的是，广州是当初五口通商里最主要的口岸城市，与西方的接触最早，受到的影响也最大，容易接触到很多开放和先进的思想，这对珍妃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她后来得到光绪的青睐埋下了伏笔。

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小皇帝到了可以成亲的年纪。当然，他是没有选择权的，这一切由他的姨妈（也是伯母）慈禧太后敲定。

慈禧选了自己弟弟的女儿，21岁的叶赫那拉氏作为光绪的正选妻子，也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而长叙的两个女儿被选为妃子——15岁的四女儿被封为“瑾嫔”，13岁的五女儿，被封为“珍嫔”（清宫后妃分八个等级，分别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嫔为第五等）。

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还是一入宫门深似海？13岁的珍妃当时自然不知道，紫禁城内，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3

美貌，有时候未必是能得到皇帝宠幸的必要条件。

不少史料显示，光绪喜欢珍妃，最初是因为她长得漂亮。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说当时18岁的光绪最初看中的其实是瑾妃。但无论如何，光绪最终在自己的“一后两妃”中独爱珍妃，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珍妃的容貌，倒不如说是她的性格。

相比于相对木讷的瑾妃和比自己大三岁的隆裕，天真活泼、思维活跃的珍妃无疑更讨人喜欢。再加上珍妃琴棋书画皆精，又来自当时领风

气之先的广州，时值大清王朝内忧外患之际，身在深宫中的小皇帝本就有师夷长技、发奋图强之意，两个孩子意气相投，自然很容易就走到一起。

更难能可贵的是，连一向挑剔的慈禧，也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

据曾侍奉珍妃的白姓宫女回忆："珍妃貌美而贤，初入宫时，极为慈禧所钟爱。"因为珍妃的字写得不错，所以有一段时间里，慈禧赐群臣的"福""寿""龙""虎"等字，都是由珍妃代笔的。为了提高珍妃的书画水平，慈禧还特地指派才女缪嘉惠做她的书画老师。

在珍妃后辈人唐海沂写的《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文中还提到，珍妃曾经替皇后主持过继嗣典礼——这种级别的典礼，如果没有慈禧点头，珍妃是绝对不可能获得资格的。

1894年，18岁的珍妃和姐姐一起，由"嫔"晋升为"妃"，种种迹象表明，接下来的戏路，应该是按照"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套路往下走的。

但哪有那么简单。

4

后宫之中，没有钩心斗角，是不可能的。

珍妃整天和光绪皇帝腻在一起，谁会最先不开心？当然是皇后隆裕。

《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文中曾转述白姓宫女的回忆："白大姐说，隆裕为了报复，就和李莲英及珍妃宫内的太监勾结起来，把一只男人靴子放在珍妃的宫里，妄图污蔑她有奸情。为了这件事白大姐也受过拷打。

"后来又因珍妃有一件衣服的料子和经常进宫演戏的一个戏子的衣料一样（据说戏子的衣料是光绪送的），隆裕抓着这件事又大做文章，致使珍妃遭受廷杖。"

珍妃身边宫女的回忆，应该是有态度倾向的。但从当时后宫的关系来看，皇帝宠幸妃子而冷落皇后，皇后心中不爽自然是肯定的。即便隆

裕皇后后来以贤惠温和著称，但也不代表她连这个也不会在意。至于平时在慈禧太后面前不会说珍妃什么好话，这是完全可以推断的（当然，珍妃在光绪面前也没说隆裕的好话）。

但得罪皇后，最多也是一出“宫斗戏”。让珍妃命运急转直下的，是她得罪了慈禧太后。

5

慈禧无疑是喜欢珍妃天真活泼的，但超过她的三观范畴，就另当别论了。

当时西洋的照相技术已传入中国，但很多国人认为照相会取人魂魄，导致人损寿。思想开放的珍妃却完全不以为然，她悄悄购置了一套照相机，在自己的寝宫景仁宫反复练习，很快便学会了照相技术，成为清宫后妃中最早拍摄照片的人之一。

学会照相技术后，珍妃给光绪皇帝和宫内的其他人拍照，还教太监学会拍照，让他们给自己照相。而她照相的时候“不拘姿势，任意装束”，甚至还会穿着男装到处走动拍照。至于拍照的地点，不仅在自己的景仁宫，甚至还去了皇帝的养心殿，这无疑就让慈禧大为反感（虽然慈禧本人也非常喜欢拍照）。

据说珍妃还曾暗中指使一个姓戴的太监，在东华门外开设了一个照相馆，此事被慈禧听说后，以“宫嫔不应所为”斥责珍妃。照相馆被关闭，戴姓太监被打死。

如果珍妃的这些事尚且能被认为是“任性胡闹”的话，那么接下来，让慈禧产生“嫉妒”，就有点糟糕了。

根据小德张（清末最后一任太监总管）过继孙子张仲忱写的祖父口述回忆录《我的祖父小德张》记载，宠爱珍妃的光绪曾用库存的珍珠、翡翠为她串制珍珠旗袍一件。有一天二人在御花园散步，正在兴头时，被慈禧撞见。慈禧大怒道：“好哇！连我都没舍得用这么多珍珠串珠袍，你一个妃子竟敢这样做。想当皇后怎么着，谁封的？皇帝也太宠你了！”

光绪和珍妃马上跪在地上叩头请罪。老祖宗立即叫随身的太监二总管崔玉贵把旗袍扒下来。回宫后还打了珍妃30竹竿子。

《我的祖父小德张》的一些记载后来证明有失实之处，但慈禧身边的女侍德龄所著的《瀛台泣血记》中也记录过这一段，说明还是有可信度的。

这件事除了证明慈禧觉得珍妃“有失体统”之外，还传递了另一层意思：慈禧和光绪虽非亲生母子，但无数史料证明，慈禧当初确实是把光绪当亲生儿子养育的，母子之情碰上婆媳关系，大家都懂的。

天真任性，再加上婆媳关系搞僵，还不算什么。让珍妃罪加一等的是她开始触犯大清律例了。

应该说，珍妃在未成年即进宫，又受万千宠爱，尤其是得到皇帝恩宠，渐渐有些不知轻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珍妃选择“卖官受贿”，就有些触碰“高压线”了。

当时后宫的后妃们每月用度，都是配额供给的，比如皇后是每年一千两，外加些绸缎、兽皮、肉食等，然后逐级下降，到“妃”一级是三百两。三百两银子，妃子自己开销自然是够了，但她们花销最多的，是打点和赏赐身边的人。珍妃生性大方，身边又有不少太监顺着她心意吹捧，再加上喜欢照相等各种西洋玩意儿，钱自然是不够花了。



中坐者为慈禧，右一为隆裕，左一为瑾妃，左二为德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光绪最初看上的是瑾妃

据胡思敬所著的《国闻备乘》中记载，凭借和光绪皇帝关系近，能吹“枕边风”，珍妃开始接受一些贿赂，让光绪帝给人封官，有一次更是收取了4万两白银的贿赂，最终东窗事发。（“初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

《国闻备乘》多少有点野史的味道，不过记录这件事情的不止这本书一家，所以倒也不是完全不可信。

这就是破了大清“宫闱不能干政”的律例了。结合之前种种不快，慈禧决定一定要给珍妃来个“下马威”——珍妃连同姐姐瑾妃，被施以“褫衣廷杖”的刑罚（脱去衣服直接对肉体施刑），这一刑罚主要针对朝中大臣，在此之前还没有过对嫔妃施刑的先例。不仅如此，这一年（1894年）的十月二十九，珍妃和瑾妃双双被降为“贵人”。

毫无疑问，瑾妃基本属于无辜，慈禧针对的，就是珍妃。

6

其实话说回来，“卖官鬻爵”这种事情，在清朝后期其实已经非常常见，甚至从康熙年间开始，就是被官方默许的。

所以，这也并非是珍妃命运转向的真正原因。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关键还是珍妃的涉政，而且是深度涉政——影响光绪帝，试图推翻慈禧。

珍妃被“廷杖”和降为“贵人”是在1894年，请注意这个年份，是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这一年。

中日甲午战争一战，很多人以为罪在慈禧，但事实上，慈禧那时候已经“归政”光绪。当然，实权虽然依然掌握在幕后的老佛爷手里，但甲午战争，站在前台指挥的一直是光绪帝自己。

在这场改变中日两个国家国运的战争中，以光绪帝为代表的“帝党”是坚决主战的，而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其实是主和的。当然，不能说当时以大清帝国之威（自我评估），主战有什么不对，但至少当时，“帝党”和“后党”之间的对立已经比较明显。



光绪皇帝像

在这个过程中，珍妃毫无疑问是站在光绪一边的。而且她凭借自己的影响，试图一举逆转皇帝对太后长久以来的劣势。比如，珍妃的启蒙老师文廷式，以及他的堂兄志锐（当时的礼部侍郎），借机参奏李鸿章求和卖国，惹恼了这位晚清第一权臣。李鸿章马上反参“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夺嫡，取代隆裕皇后；反对慈禧听政，支持光绪皇帝自主朝纲”。

结果果然激怒了正愁没把柄的慈禧：文廷式被驱逐出宫，永不录用；志锐被贬，放官边疆（蒙古）。至于珍妃，自然是又打又降——不敢对皇帝怎样，但用你的宠妃震慑一下你，我还不敢吗？

但这个时候，慈禧和珍妃的婆媳关系毕竟还没有恶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二年，珍妃和瑾妃又恢复了“妃”的位分。

真正的问题出在1898年——这一年，发生了“戊戌变法”。

这一针给病入膏肓的大清强行注入的鸡血，彻底让慈禧和光绪这对

母子翻了脸。尤其是“帝党”试图包围颐和园的“围园杀后”行动败露（袁世凯对告密此事亦有贡献），让慈禧彻底寒了心——可以说，自那以后，慈禧对光绪已不再抱希望。

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当妈妈的慈禧肯定也经过无数个辗转反侧之夜，找过很多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自然会归到珍妃头上：我花了20多年让他接受圣贤教育，你分分钟就给他洗脑了？

于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珍妃再次遭罚廷杖，而且这一次，她被打入钟粹宫后的北三所——一个当妈的，儿子都不要了，还会心疼儿媳妇？

据《故宫通览》（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的介绍，珍妃被囚禁的那个小院，位于紫禁城最北，原来是明代宫廷奶妈养老居留的地方。珍妃入住后，正门被牢牢关上，打上内务府的十字封条，珍妃住在北房三间最西头的一间，屋门从外面反锁着，吃饭、洗脸等均由下人从一扇活窗中端进递出。

珍妃每天吃的，就是普通下人的饭。平时不准与人说话。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这些别人高兴的日子，看守她的一名老太监就代表慈禧对她进行训斥。训斥在午饭时进行，老太监指着珍妃的鼻子列数罪状，珍妃得跪着听训。训斥结束，珍妃还必须向上叩头谢恩。

没错，珍妃被打入了冷宫。

7

如果没有1900年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珍妃会不会在冷宫里孤独终老？没有人知道答案，因为珍妃的生命，在这一年走到了尽头。

关于珍妃的死因，一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带光绪西逃，临行前珍妃不肯走，和老佛爷争执起来，赌气跳井，慈禧一个没留神，没拦住，就跳下去了。事后慈禧还表示相当惋惜。

这个说法出自隆裕太后的回忆，源头自然是慈禧自己的叙述。考虑到隆裕太后向来温顺听话，唯老佛爷是从，她的说法存疑。

而另一种说法，见诸各种野史和当时见证者的回忆，那就是珍妃是慈禧让人给扔到井里去的。

持这种说法的回忆很多，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无疑就是在场的当事人——当时奉命将珍妃投井的太监崔玉贵的回忆。

1985—1988年间，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紫禁城》杂志连续20期刊载了由金易、沈义羚合著的《宫女谈往录》。这位“谈往”的宫女，姓赫舍里氏，先后在慈禧身边服侍八年，是负责给慈禧点烟的贴身使女，在宫内慈禧叫她“荣儿”。

书中有一篇《崔玉贵谈珍妃之死》，说的是崔玉贵离开清宫后，有一次来荣宫女家串门，提起了那段往事。而荣宫女本人恰恰在珍妃“落井”那天当值，侍候慈禧。

按照荣宫女的回忆，崔玉贵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

七月二十日那天中午传完膳后，老太后有片刻的漱口吸烟的时间，……就在这时候，老太后吩咐我，说是要在未刻召见珍妃，让她在颐和轩候驾，派我去传旨。

……

我们去的时候，景祺阁北头的东北三所正门关着。我们敲了门，告诉管门的一个太监，请珍小主接旨。珍妃在接旨以前，是不愿意蓬头垢面见我们的，必须给她留下一段梳理工夫。由东北三所出来，经过一段路才能到颐和轩。我在前边引路，王德环在后面伺候，我们伺候主子，向例不许走甬路中间，一前一后在甬路两边走。小主一个人走在甬路中间，一张清水脸儿，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的缎鞋（不许穿莲花底），这是一副戴罪的妃嫔的装束。她始终一言不发，大概也很清楚，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运的事。

到了颐和轩，老太后已经端坐在那里了。我进前请跪安复旨。说，珍小主奉旨到。我用眼一瞧，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很奇怪。

珍小主进前叩头，道吉祥，完了，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训。这

时屋子静得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楚。

老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你应当明白！话说得很坚决。老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静等回话。

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

太后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主持大局。就这几句话戳了老太后的心窝子了，老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呵斥说，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就这样，我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据回忆，还丢了两块大石头）。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多人取信的一个版本。

根据崔玉贵的回忆，珍妃临死前给他留下了印象最深的三句话："我罪不该死！""皇上没让我死！""你们爱逃跑不逃跑，但皇帝不应该逃！"

由此可见，珍妃在临死前，依旧对皇帝抱有期望。

而这，恰恰是珍妃不得不死的最主要原因。

慈禧垂帘听政47年，其实很明白自己的权力终将失去，所以越到后面，她越在乎的是自己身后的权力运转和评价体系。



故宫里投珍妃的那口井

但恰恰她自己选定的光绪，并没有显示出会继续走“慈禧路线”的意思，而他身边的这位珍妃，又有主见，对光绪影响又大，一旦给了珍妃机会，肯定不会给自己什么好脸色，甚至“开棺鞭尸”也未可知。

当时八国联军兵临城下，谁都不知道大清帝国会不会就此覆灭，自己的性命是否还保得住（因为当时是慈禧力主向所有西方列强宣战的。事实证明后来八国联军并没有灭亡清朝，也没想颠覆慈禧，这是让老佛爷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不如事先把能安排的事都安排“妥当”（根据崔玉贵回忆，慈禧那天派人将珍妃投井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

就连光绪本人，都在慈禧驾崩的前一天离奇去世（这又是一桩有争议的悬案），怎么还会怜惜你珍妃的一条性命？

8

1901年，虚惊一场的慈禧带着光绪回京，命人从井里捞出珍妃的尸体。据当时的人回忆，尸体浮肿，面目已不可辨认。

慈禧表示大为惋惜，追封珍妃为“珍贵妃”——毫无疑问，这是安抚

光绪的一个动作。

打捞尸体的那天，光绪并没有来。

但从那之后，光绪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嫔妃。

馒头说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对珍妃之死，甚是惋惜，甚至把她比为“圣女贞德”。

我个人觉得，倒也不至于。

珍妃死得可惜吗？确实挺可惜的。一个妙龄女子，并没有犯什么大错，就这样莫名其妙丢了性命。

但真的要说她有安邦救国之志，辅佐明君之才，却也未必，至少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证据不足。当然，给她证明的时间也不多。

很多后人之所以为珍妃惋惜，其实是在为光绪不平，与其说为光绪不平，倒不如说是在为大清扼腕。

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就算光绪大权在握，亲政临朝，就真救得了大清？就凭一腔热血对日宣战？就凭康有为那套拍脑袋的“维新变法”？或者，就凭珍妃出谋划策？

人家崇祯皇帝刚即位时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结果呢？更何况相对于大明王朝，大清王朝已经被卷入整个世界发展的滚滚洪流，面临千年不遇的大变局。

所以这事情，不怪珍妃，也不怪光绪，甚至怪不得那位殚精竭虑的老佛爷慈禧。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大清王朝其实已经失去了自愈的能力，只能凭借外科手术进行一次彻底的革新。

所以，对珍妃，我只能发出一句最近比较流行的感慨：

来世莫生帝王家。

靠画漫画，28岁就缴400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是怎样一种体验？

这个人是一个漫画家，一个日本漫画家，他的漫画，说是风靡了全世界，应该并不夸张，当然，也深深影响了我，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他的漫画，没关系，就给你看一个农村漫画家成长的故事。

1

某网站的一则图片新闻，在社交媒体里被热转。该图片中，窦靖童穿着一件印有“悟”字的T恤，标题是“随王菲信佛？窦靖童穿T恤‘悟’字当胸充满禅机”。

当然，热转的原因不是因为窦靖童，而是因为编辑给这条新闻起的标题。

几乎所有热转的网民都配上了一句类似评语：“这个编辑显然没看过《龙珠》。”

当然，也有人感慨：“小编可能是个95后吧，现在终于开始有人不知道《龙珠》了……”



《龙珠》主人公孙悟空

那么，作为《龙珠》的作者，曾经被我们这一代人视为“大神”的鸟山明，估计也慢慢被人忘记了吧？

所以，我想再说说他的故事，一个乡村少年逆袭的故事。

2

1955年4月5日，鸟山明出生在日本爱知县的西春日井镇。

“鸟山”这个姓听上去有点奇怪（连日本人都觉得奇怪），但“鸟山明”确实是他真名。

西春日井是农村地区，鸟山明的家庭是普通的农民家庭，后院就是耕地。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就是“鸡犬相闻”的农村——这对鸟山明日后两部最重要的作品《阿拉蕾》和《龙珠》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进入高中后，鸟山明专门学了设计，在学校期间参加了“漫画研究同好会”，一度还当选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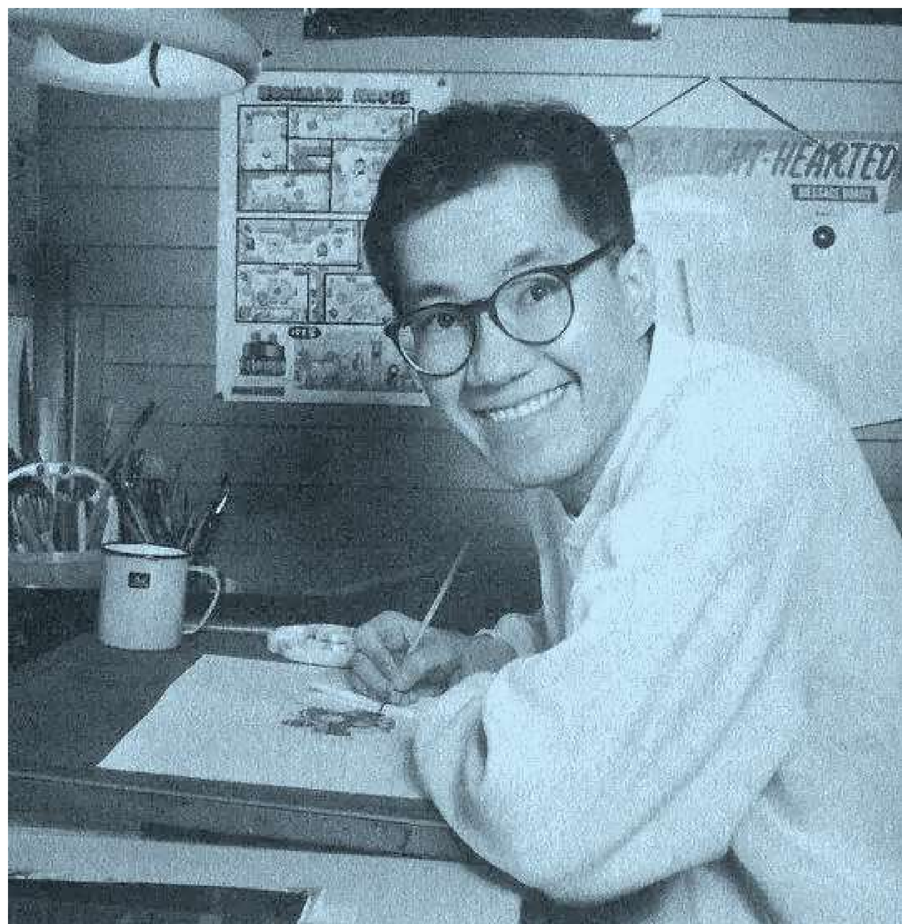
把时间直接跳到鸟山明踏上社会吧。

鸟山明大学毕业后，一开始在设计公司上班，但这个慵懒的家伙上班老是迟到，于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薪水七零八碎加在一起，还不如办公室打杂的女孩子多。

于是，工作了三年之后，23岁的鸟山明决定辞职。

辞职以后做什么呢？他选择做自己梦想中的职业——漫画家。

据说，想当漫画家，是因为鸟山明有一次坐电车，捡到了一位漫画家遗失的漫画手稿——当时日本漫画家的报酬高得离谱，一个普通作家的一页原稿报酬能达到1万日元。鸟山明一看那页手稿就怒了：什么东西，我也能画啊！



漫画家鸟山明

一开始，鸟山明只是接一些传单、插画之类的零工，最终，他根据

当时全世界大热的《星球大战》电影，画了一个翻版的短篇——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第一部正式的、有始有终的漫画。

于是，鸟山明决定投稿。

投给谁呢？在“漫画之国”日本，当时有两家人气最高的漫画杂志社：《少年Magazine》和《少年JUMP》。在日本的电车或地铁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看漫画书，一般都是这两家杂志社出的。

按照鸟山明的初衷，他是想把作品投给《少年Magazine》的，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他们家的“新人奖”奖金是50万日元，这对当时没有固定收入的鸟山明而言是笔不小的收入。

但是，鸟山明一查，《少年Magazine》的截稿日期已经过了，无奈之下，就把漫画投给了《少年JUM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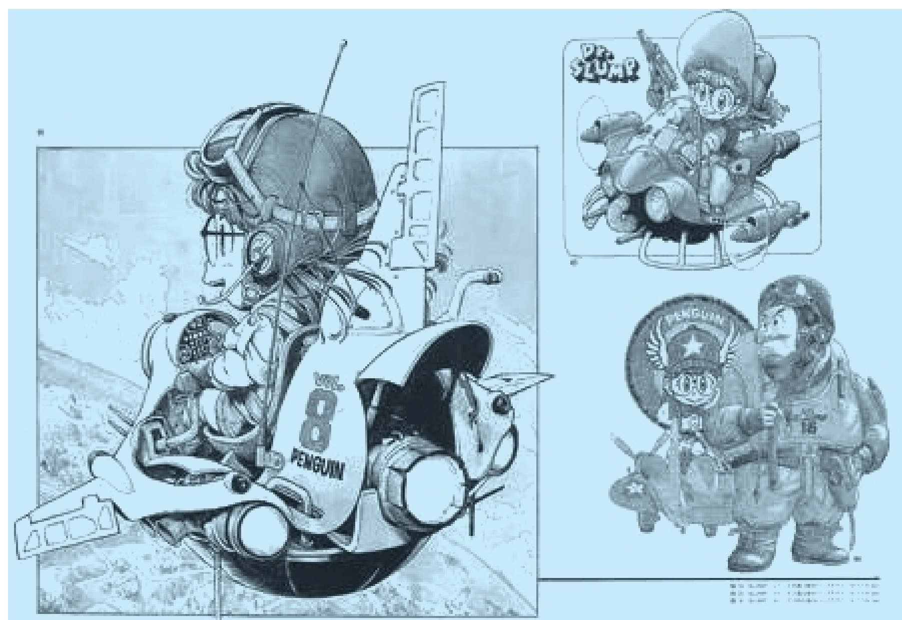


因为每月都接受投稿而幸运获得鸟山明垂青的《少年JUMP》周刊杂志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在当时决定了两个杂志社未来20年的发展轨迹。

鸟山明的第一次投稿，并没有得奖。因为那个是《星球大战》的翻版，不能算原创，所以鸟山明的名字只是被列在了杂志上。

但是，鸟山明依靠扎实的设计功底所表现出的精致漫画设计，引起了《少年JUMP》杂志社一位编辑的注意。



鸟山明的漫画中有很多机器，从车到船到机器人到枪械，无一不绘画精致

就像当初儒勒·凡尔纳被出版商儒勒·赫泽尔赏识一样，千里马最终需要遇到伯乐。

那个编辑叫鸟岛和彦，当时也是个菜鸟编辑（现在已经是集英社的董事了），他一眼就觉得那个姓鸟山的漫画家与众不同——真可谓是“鸟鸟相惜”。



发现天才鸟山明的鸟岛和彦。后来在鸟岛落魄的时候，鸟山明承诺，今后的漫画和衍生作品，都给鸟岛抽成

鸟岛和彦虽然是菜鸟，但以“严格”著称，他前后一共退回了鸟山明不下1000张画稿。但鸟山明始终没有气馁，继续坚持给鸟岛投稿。



为了“报复”鸟岛总是退稿，鸟山明在《阿拉蕾》漫画里给鸟岛设计了一个妄图统治全世界的邪恶形象：马西利特博士

终于，一部鸟山明创作的短篇，获得了鸟岛的赞赏。

那是一部关于一个天才博士和一群生活在企鹅村里的村民发生的各种有趣故事的漫画——很显然，企鹅村就是鸟山明自己当初生活环境的映射，一般的漫画家没有那样的生活经历。

这部漫画让鸟岛和彦眼前一亮，但他随即给鸟山明提了一个建议：天才博士创造的那个机器女娃娃很可爱，让她做主角，漫画肯定会更受欢迎。

鸟山明一开始并不愿意，但最终同意了鸟岛的建议。

1980年1月，《少年JUMP》5、6合并号上开始连载一部由一个叫鸟山明的漫画家画的漫画，叫作《阿拉蕾》。

这部散发着轻松和淳朴气息，并有浓浓“鸟山明式冷幽默”的漫画作品，犹如一颗原子弹一般在日本的漫画界引爆。1981年，《阿拉蕾》动画片制成上映，收视率高达惊人的36.9%，日本漫画界干脆把这一年定义为“阿拉蕾年”。



阿拉蕾著名的“嘿哟哟”台词一度成为全日本的流行语

可以说，一部《阿拉蕾》就奠定了鸟山明在日本漫画界的地位。而一个漫画家，一生能有一部《阿拉蕾》这样的作品，就足以聊慰平生。

但当时才29岁的鸟山明却不这样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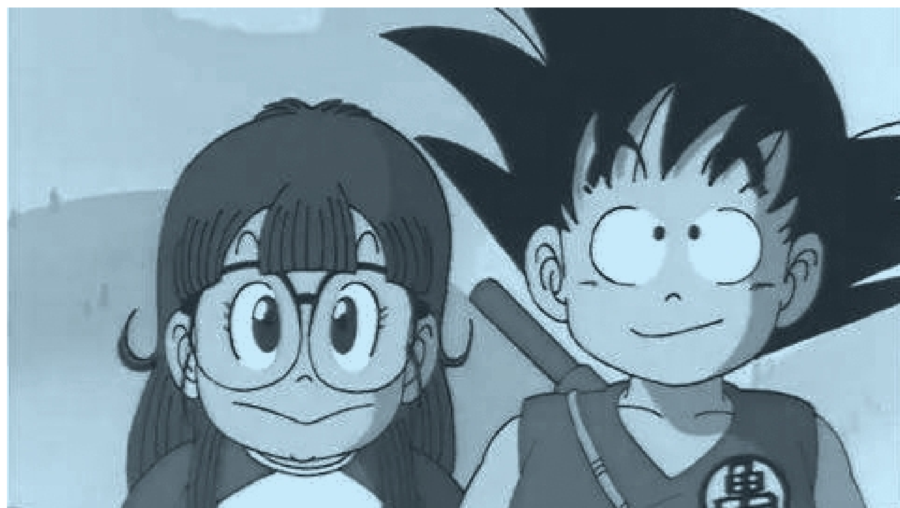
1984年，当大家都对《阿拉蕾》崇敬不已的时候，鸟山明又造了一座日本漫画界的珠穆朗玛峰。

那就是《龙珠》。

4

《龙珠》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鸟山明最初创作《阿拉蕾》时，就想着是画一个短篇。但没想到画出来后如此受欢迎，甚至成了《少年JUMP》的顶梁柱。没办法，鸟山明只能不断往下画。一直到1984年，鸟山明实在忍无可忍，提出必须要终结《阿拉蕾》。于是，《少年JUMP》提出了一个条件：结束连载可以，但在三个月之内，要拿出一部新的漫画！



在《龙珠》小悟空大战黑绸军的故事中，鸟山明还让阿拉蕾出来客串过

那时候，鸟山明毕竟才29岁，远远未到“封笔”的年纪（但他的成就和收入——尤其是收入——已经到了，后面会提到），于是就决定创作一部新的漫画。这部漫画要带有两个明显元素：“中国风”和“功夫”（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日本对中国低息贷款和无偿贷款

的开始，中日两国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中国对日本充满友好，日本对中国也充满好奇）。

于是，一部参照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和日本江户时代作品《南总里见八犬传》的漫画，横空出世。

因为鸟山明最初设定的故事主线，是让那个叫“小悟空”的男主角和小伙伴们一起，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七颗龙珠，所以这部漫画取名叫《龙珠》（大陆第一版翻译叫《七龙珠》）。

在《龙珠》的早期阶段，“中国风”非常明显，但《龙珠》面世后，遭遇了“开门黑”。

哪怕是挟《阿拉蕾》之神勇，但鸟山明的新作《龙珠》当时在日本漫画界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在漫画排行榜的排名一度跌到十名之外——那可是大神鸟山明的心血啊！小悟空带着布尔玛、小八戒寻找龙珠之旅虽然轻松诙谐，但似乎有些太散，读者一开始就有些不太适应（但漫画里的那段时期是我现在非常怀念的）。



小悟空和布尔玛的第一次相遇，是《龙珠》系列经典定格之一

关键时刻，眼光毒辣的鸟岛和彦又站了出来。

鸟岛告诉鸟山明：你要在故事里增加“追求力量”的主题。

鸟山明再一次听从了鸟岛的建议，小悟空在漫画中的使命，从一开始的集齐七颗龙珠，演变成了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成为天下第一的强者。

果然，这一个改动让《龙珠》迅速崛起，俘获了全日本乃至全世界漫画爱好者的心！



“天下第一武道会”初登场，确实让人眼前一亮。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每一届武道会，鸟山明都会为小悟空设置一个最强大的对手：龟仙人、天津饭、短笛大魔王。打败短笛，是小悟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得到冠军

在两年的连载之后，1986年，《龙珠》成了全日本漫画界当之无愧的王者，当时整个日本漫画市场80%的读者都把《龙珠》作为头号支持连载的作品。

要知道，当时的《少年JUMP》杂志正处于鼎盛时期，当时同时在杂志连载的漫画，没有一部不是至今仍如雷贯耳的神作：《圣斗士星矢》《北斗神拳》《灌篮高手》《幽游白书》……但这些漫画在《龙珠》面前都逊色一筹——当时的日本漫画界，分成了两类作品：《龙珠》和其他。

1987年，《龙珠》的动画片上映，真可谓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龙珠》动画片在法国等欧洲国家收视率一度超过85%，在西班牙超过70%，在美国一度挑战传统的美漫的地位，美国人翻拍了诸多真人

版的《龙珠》。

动画再反过来带动漫画的传播。在人口只有550万的丹麦，《龙珠》漫画的销量超过了150万册，在泰国，光盗版《龙珠》的出版社就达到了100家。

在中国呢？别的不用多说，光说一家出版社——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这个名字就足以让同行眼羡不已。当时1.9元一本、9.5元一卷的《七龙珠》，让多少男生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早饭、午饭，拿着皱巴巴的钞票去书报亭换一本最新的《七龙珠》，然后迅速在同学间传阅。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的《七龙珠》，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童年

5

说说鸟山明当时有多么成功吧。

尽管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有多成功，很俗，但有时候确实也是一个参考标准。

2016年，根据《华西都市报》发布的“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显示，排在第一名的作家是《龙族》的作者江南，版税收入是3200万元人民币。

而在1983年，当年才28岁的鸟山明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额，是6亿474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014万元——是在34年以前！《龙珠》以及

所有衍生周边还没有出现之前！而且是个人所得税！

那么抛开金钱，再说另一个一直在日本流传的故事。

当时居住在名古屋的鸟山明，每次都要开车去机场给东京的《少年JUMP》杂志寄稿子，但从家里到机场的路非常不好走，于是，鸟山明就想索性搬家算了。

一个一年纳税6亿多日元的漫画家要搬家了，这不是要了名古屋政府的命吗？不仅是纳税损失，随之损失的还有各种漫画迷的旅游观光收入、城市形象等，名古屋该有多大的损失？

于是，名古屋的政府当即拍板：从鸟山明家那里，专门修一条高速公路通到机场。

6

给鸟山明带来职业生涯最大荣誉的肯定是《龙珠》。

不过，《龙珠》也给鸟山明带来了最甜蜜的烦恼——不许终结！

按照鸟山明原来的计划，《龙珠》写到小悟空天下第一武道会上战胜短笛大魔王，就应该全部终结了。

但是《少年JUMP》绝不答应！

彼时，《少年JUMP》这本杂志的命运早已和《龙珠》紧紧捆绑在了一起：1984年，杂志的平均销量约为350万册，随后每年都不断增长，1989年就已经突破500万册，1991年突破600万册，在日本漫画界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王者地位。



短笛大魔王是鸟山明《龙珠》世界里第一个由邪恶转变为善良的角色（第二个是贝吉塔），他舍身拯救孙悟饭（孙悟空长子）的那幅画面也是《龙珠》的经典画面之一

《龙珠》一旦决定终结，不光是《少年JUMP》这本杂志会受到影响，背后的集英社出版集团，改编动画及周边产品相关的万代公司、富士电视台、东映动画等一批日本动漫的王牌企业都会出现连锁反应，甚至会在整个日本漫画界引起地震——这就是当时《龙珠》的影响力。

那么怎么办？继续画呗！

于是，在小悟空打败短笛大魔王后，鸟山明挠了挠头，又让悟空的哥哥，赛亚人拉蒂兹造访地球，进而把《龙珠》的战场从地球扩大到了整个宇宙。

不得不说，这是鸟山明的一个天才创意，也是我个人认为的整个《龙珠》的最精彩篇章：从贝吉塔、那巴抵达地球开始，整个《龙珠》世界被赛亚人拖入了一场横跨宇宙的大纷争：在那美克星，地球人、弗利萨一伙和孤军奋战的贝吉塔三股势力纠缠在一起，情节跌宕起伏，让人看得荡气回肠。



拉蒂兹的出现，直接告诉读者：孙悟空不是地球人。他还带来了两个全新概念：赛亚人，以及战斗力显示器

但是，当孙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完爆最终变身形态的弗利萨之后，鸟山明发现，全宇宙已经没有什么人能阻挡这个当初带尾巴的淳朴少年了（战斗力显示器都炸成粉末了）。



小林之死促成悟空变身超级赛亚人。孙悟空变身后漫画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让无数人望眼欲穿，直到后面的《重返地球》卷出现

但还是不准终结！只能继续画！

于是，鸟山明只能搬出了“时间旅行”这个概念（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受了当时热映的《终结者2》的影响）。沙鲁主宰的这个故事虽然也不乏亮点，但看得出，鸟山明的创造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一些漏洞也开始出现。

但是，哪怕鸟山明最终安排孙悟空的儿子孙悟饭终结了沙鲁，顺便让孙悟空领了“便当”，还是不能终结漫画！还要继续画！

但是，除了出版社的要求外，遍布全世界的龙珠迷要求鸟山明“不要结束”的呼声，也是让他选择继续的一大原因。

于是，以布欧为终极大Boss[1]的又一段《龙珠》出现了——孙悟空顶着天使光环，也必须要回来！

在这个体系里，虽然鸟山明似乎又回到了《龙珠》最开始那种轻松诙谐的风格，但整个《龙珠》世界，已经实在是寸步难行了。

1995年，《龙珠》终于到了和所有人说再见的日子。

那一年，《少年JUMP》杂志卖到了惊人的653万册，因为所有读者都想和陪伴了他们11年的《龙珠》说一声再见。

《龙珠》完结之后，《少年JUMP》杂志的销量便掉头向下，一路衰退，虽然其间有《浪客剑心》这样的小神作撑场面，但依旧难掩颓势，直到后来另一个大神作《海贼王》的横空出世，局面才稍微好了一点。

但是孙悟空，这次是真的和所有人告别了。





从沙鲁这一系列一开始，鸟山明就在各种暗示悟饭是悟空的接班人，倦怠之心已经显现



鸟山明

在这卷里，孙悟空死了。我也不是很喜欢自己所描述的结局，写了近十年的主角竟然死了，真是太可怜了。其他方法也想过，但还是觉得这样最好，只有尽量注意不弄得太伤感。孙悟空，对不起了，请原谅！

鸟山明把孙悟空写“死”之后，还发表了一段致歉



孙悟空



孙悟空的不同形象

7

《龙珠》虽然终结了，但《龙珠》的影响却一直没有消退，这是日本漫画界的另一个奇迹。

《龙珠》漫画终结了20多年，但在全世界范围内，“龙珠热”却一直没有降温的迹象。在中国，“集齐七个××能不能召唤神龙”“变身超级赛亚人”“战五渣”这类源自《龙珠》的哏，依旧被一代代网民口口相传。



之前爆出东京奥运会用“孙悟空”作为形象大使，其实并不是指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孙悟空”，而这也折射出了日本人对《龙珠》在全世界普及程度的一种自信

迄今为止，《龙珠》在全世界范围内已销售超过2.3亿册。更不要说由此衍生的手办、人偶、服饰、动画、电影和各类周边了。

而鸟山明呢？

终结《龙珠》的时候，鸟山明只有40岁，可以说，依然没有到退休的年龄。

但一部《龙珠》似乎耗尽了鸟山明毕生的热情和功力，在那之后，他只画过一些游戏的人设如《勇者斗恶龙》和一些短篇，再也没有一部长篇漫画问世。

可是，对于一个留下《阿拉蕾》和《龙珠》两部传世神作的漫画家来说，还有什么能苛求他的呢？

2017年，他62岁。

大神应该早就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了吧。



这是鸟山明给自己设定的形象

馒头说

我一直很羡慕现在的孩子们，因为他们比我们那时候要享受太多的时代福利。

但唯有一点，我觉得他们应该羡慕我们，那就是动画片。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的童年，就所能看到的动画片而言，真是幸福得做梦都应该笑出来。

在国产动画片方面，我们没有错过古老经典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而后又有《黑猫警长》《天书奇谭》《邋遢大王奇遇记》（我个人认为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被低估的神作）等各种优秀作品的熏陶（现在回看这些动画片，依旧能感受到幕后那些制作团队的真诚和敬业）。

而在世界观开始慢慢形成的时候，我们有幸能赶上一批外国动画片的涌入，除了迪士尼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日本的动漫。

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完全可以抛开民族情绪，客观地承认——我们邻居日本的动漫，确实比我们的强大太多。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我记得那时候《阿拉蕾》翻到大陆，叫作《天才博士和机器娃娃》。其实那部动画片里有那么点“色色”的情节的，但当时的广电总局一刀未剪，完整播放——看着这部动画长大的我们，至今仍记得企鹅村一个个温馨的镜头和善良互助的人们，并没有成为色情狂魔。

从《聪明的一休》开始，到《龙珠》《圣斗士星矢》《灌篮高手》等，我们这代人有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激情的青春。

《龙珠》为什么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么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小悟空到孙悟空，男主角天真善良的性格、不怕挫折的勇气、永不言败的精神，一直在感染着读者。

一部好的漫画，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的。别的不说，就拿我以前所做的体育记者工作来说吧。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有媒体曾对崛起的日本男足国家队做过一次调查，全队有16个人，是从小看着高桥阳一的《足球小将》长大，立志要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的。

2010年广州亚运会，我曾在日本男篮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直接提问日本男篮10号竹内公辅：“你平时看《灌篮高手》吗？”他笑着回答：“我们全队人手一套，经常会拿出来看！”（日本篮协曾给《灌篮高手》作者井上雄彦颁发过“特别贡献奖”）

日本漫画《光之棋》（国内译为《棋魂》，李世石战胜阿尔法狗的那一手棋被称为“神之一手”，来源就是这部漫画）在日本风靡时，全日本因此增加了400万围棋爱好者。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理解现在有关部门“外国动画片禁播令”的初衷，但并不认为有多大作用，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这种剪纸片或Flash水平的动画片，给中国孩子带来的教育意义，就一定大于《阿拉蕾》或《聪明的一休》？

当然，国内动画的水平在这几年确实进步神速，尤其是技术和视觉效果上（比如《大鱼海棠》《秦时明月》《画江湖之不良人》等），但在背后的精神传递以及叙事结构，包括整体风格把握上，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不扯远了，拉回来。

其实还是想说声感谢吧。感谢有像鸟山明这样的大神塑造了一个“龙珠”的世界，感谢我们曾有一个开明开放包容的童年时代，当然也感谢那些可能并不熟悉《龙珠》或对动漫不感兴趣却看到这里的读者们——

这可能不对你们胃口的故事，但我还是想写。

谢谢你们听我扯了那么多！

---

[1] Boss，指游戏、漫画中实力极强、极难对付的反面角色。——编者注

逸闻篇　往事并不如烟

45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再回月球？

记得刚开号不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47年前，人类究竟有没有登上月球？》。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个问题：人类，确切地说是美国人，当年有没有登上月球？而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为什么45年后，人类再也没有重登月球？

1

1972年12月19日，美属萨摩亚群岛东南约650公里的太平洋。一个奇怪的飞行器，带着三个降落伞，缓缓落到了太平洋洋面。

一批救援船靠近后，飞行器里走出了三名美国宇航员：尤金·赛尔南，罗纳德·埃万斯，哈里森·施密特。

这艘飞行器，就是“阿波罗17号”的返回舱。

而相对于之前的“阿波罗”系列，“阿波罗17号”注定将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它的名字——就在3天前，在月球的表面，本次登月行动的指令长尤金说了下面这段话：



“阿波罗17号”登月

我正站在月球表面，我迈出了人类在此的最后一步并即将返回地球，或许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回来，但我相信不会太久。

是的，“阿波罗17号”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艘曾经登月的载人飞船。

尤金说的那句“不会太久”，已经跨越了45年。从45年前到现在，人类再也没有重返月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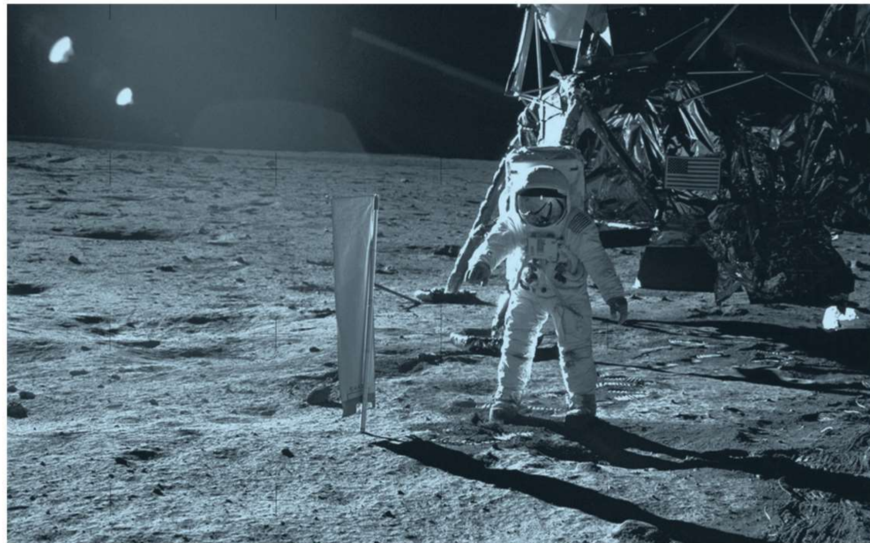
“阿波罗17号”飞行器返回地球

2

于是就要说到大名鼎鼎的美国“阿波罗计划”。

阿波罗计划（Project Apollo），又称“阿波罗工程”，是美国从1961年到1972年组织实施的一系列载人登月飞行任务。目的是实现载人登月飞行和对月球的实地考察，为载人行星飞行和探测进行技术准备。

从1967年1月27日的“阿波罗1号”模拟发射开始（很不幸，发生了事故，三名宇航员遇难），到1972年12月19号为止，“阿波罗工程”一共有17个序列号的宇宙飞船，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波罗11号”——它于1969年7月16日载着阿姆斯特朗在内的三名美国宇航员首次成功登陆月球。



阿姆斯特朗登月

之后，美国还进行了6次载人登月发射，其中5次成功，1次失败（失败的是“阿波罗13号”，但3名宇航员成功返回地球，为此有一部电影就叫《阿波罗13号》，汤姆·汉克斯主演），前后一共有12名美国宇航员登上过月球。

“阿波罗17号”是“阿波罗计划”中第6次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宇宙飞船，1972年12月7日发射，11日登陆月球，19日返回地球，全程历时12天，其中在月亮表面停留了大概75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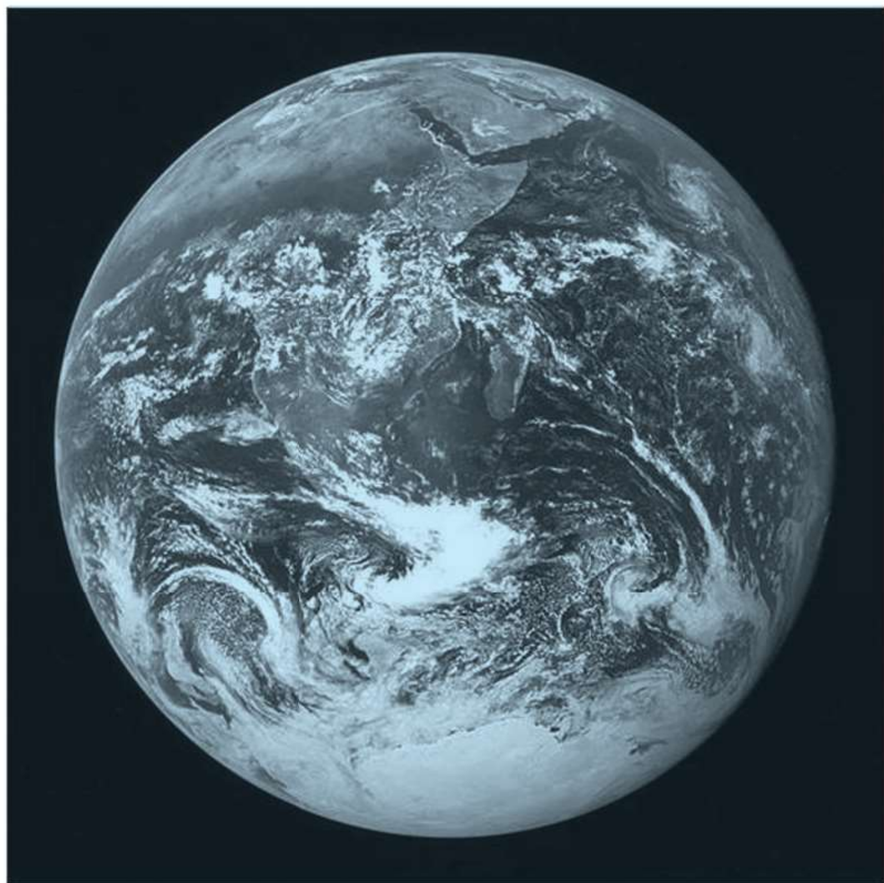
“阿波罗17号”创造了一系列的登月纪录：最长的登月飞行，最长的月表行走时间，收集了最多的月球标本（111千克月球岩石），在月球轨道中航行了最长的时间。

“阿波罗17号”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留下了一整套科学仪器，并留下了一块铭牌：

人类完成了对月球的第一次探索。公元1972年12月。愿我们带来的和平精神与全人类同在。（签名：塞尔南、埃万斯、施密特、理查德·尼克松）



“阿波罗17号”的三名宇航员：哈里森·施密特（左一），尤金·赛尔南（右前），罗纳德·埃万斯（右后）



"阿波罗17号"拍下的那张著名的地球照片，宛如一颗蓝玛瑙

随后，宇航员告别了月球，而尤金·赛尔南也成为迄今为止，最后一个登陆月球的人类。

3

"阿波罗17号"的任务无疑是圆满成功的。

但随着"阿波罗17号"的归来，"阿波罗计划"也随之宣布中止（原来打算一共发射到"阿波罗20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声越来越响：

为什么我们不再重返月球？

这确实是一个大家都关心且充满怀疑的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已经掌握了频繁发射载人飞船登月的技术，却偃旗息鼓。而

且，在之后的40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大踏步前进，美国人却一次也不去月球了。

难道这不可疑吗？

4

各种猜想，纷纷出炉——当然，所有的猜想都是围绕“外星文明”的。

第一个版本是关于“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的。

最经典的一种说法是：阿姆斯特朗在自传里表示，在1969年进行完月球漫步，于月球返回地球的途中时，他真实地感受到有外星文明在注视着自己，并表示自己的队友都看见了在眼前突然消失的不明飞行物。

有人透露，早在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那一刻的前6小时，“阿波罗11号”的登月艇“老鹰号”其实就已经着陆了，同舱的另一名宇航员艾德林曾目击不明光源，他还因此崩溃大喊：“看到突然消失的不明物体！”



“阿波罗11号”与阿姆斯特朗同时登月的另一名宇航员艾德林在接受某部纪录片拍摄时这样说。不过，艾德林在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内部似乎口碑不佳，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一度打算不让他和阿姆斯特朗搭档登月。这部纪录片叫：*“Aliens On The Moon The Truth Exposed”*（《外星人在月球，真相揭露》）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有线电视频道Syfy在2014年推出的。业界反响一般，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辨明真假

关于这个说法，到目前没有任何官方证据证明。

而且，阿姆斯特朗并没有写过自传。

5

第二个版本，是关于“阿波罗18号”的。

阿波罗工程不是到第17号就终止了吗？不，在这个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深深相信——其实“阿波罗17号”之后，美国还进行过一次登月，那就是“阿波罗18号”。

按照他们的说法，1974年12月，美国发射了“阿波罗18号”，不仅发射了，而且还顺利登陆了月球，只是，在月球上遭遇了神秘的外星文明。

“阿波罗18号”甚至还被一个俄罗斯制片人和一个西班牙导演拍成了电影《阿波罗18号》，说的就是三名“阿波罗18号”的宇航员在月球上遭遇了外星文明，全部牺牲（他们的目的据说就是去探索上一张照片上那个神秘区域）。

这部电影大量采用了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拍摄风格，引来观众的大量吐槽，但导演声称：我们并不是拍了这部电影，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这部从NASA流传出来的视频。

当然，关于“阿波罗18号”的说法，NASA给予了大量的驳斥。其中一个例证是，“阿波罗17号”上的科学家哈里森·施密特原来就是计划跟随“阿波罗18号”登月的，但“阿波罗18号”任务被取消，所以他就只能登上“阿波罗17号”了。（事实上，NASA最初的计划是“阿波罗15号”之后就停止探月。）

6

第三个版本，还是来自美国宇航员。

在“阿波罗”探月过程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两名宇航员回到指令舱后，登月舱突然失控坠毁在月球表面，设置在离坠落点72公里处的地震记录仪，记录到了持续15分钟的震荡声，这种声音犹如一口大钟和大锣鼓所发出的声响。而在“阿波罗12号”探月时，碰撞月球所发出的回声还持续了4小时——如果月球是实心的，这种声音只能持续一分钟左右。

此外，科学家在月球上还发现了有类似地震那样的月震。月震的震级很弱，最大的月震也只相当于地震的一二级，但震动持续时间却很长。所有这一切似乎证明了“月球是空心的”。

苏联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瓦西里和晓巴科夫曾在《共青团真理报》上撰文指出：“月球可能是外星人的宇航站。月球是空心的，在它的表层下存在一个极为先进的文明世界。”

月球本身就是一艘太空战舰？这还了得？

但现在已经有不少科学家指出：月震持续时间比地震长，原因在于月球上没有水和表面松散的沉积层，正是由于水和松散沉积层对地震有一定的吸收作用，才使地震波很快衰减。有的科学家还认为，月球的内部结构与地球完全相同，是由月核、月幔及月壳组成，而并非空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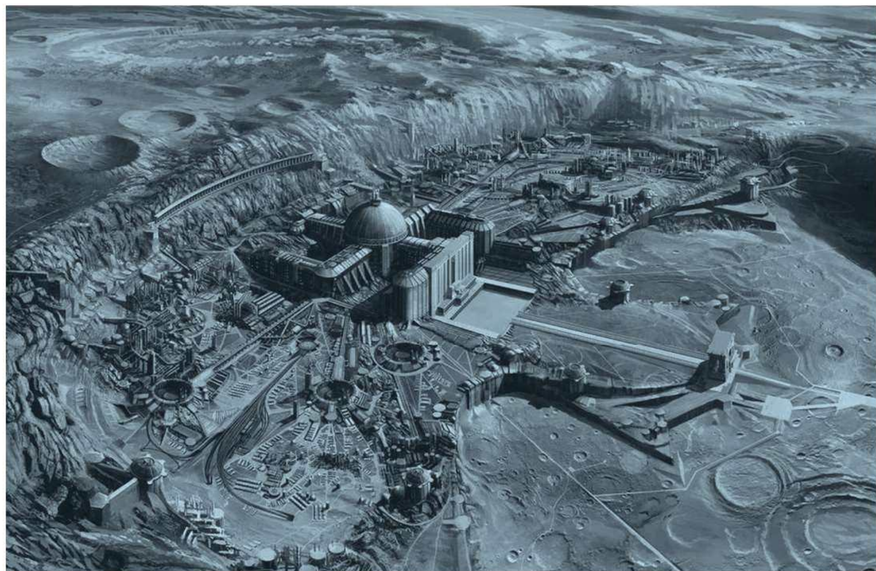
7

第四个版本，来自美国当时最大的竞争对手：苏联。

瑞典曾有科学杂志报道说早在1964年，苏联发射的“月球9号”探测器就在月球背面拍到了“一个飞碟基地和由形状奇特的高大建筑物组成的城市”。

1968年12月25日，当“阿波罗8号”飞船载着指令长弗拉克·鲍曼及两名助手进入月球背面用肉眼探察时，据说也曾发现飞碟降落。

比起苏联的发现，更让人怀疑的是，苏联的探月工程居然几乎和美国同时中止。这两个国家当初你死我活地叫嚷着要进行“太空竞争”，一个率先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和探测器月球着陆，另一个实现了载人登月——然后，两个国家忽然都停止了登月计划。



假想图



太空第一人，苏联的加加林。后离奇死于空中事故，年仅34岁

于是难免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和苏联都受到了外星文明的警告。

不过，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至少苏联方面确实是在后期被美国拖垮了，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上，就是迈不过最后这道载人登月的门槛，和外星文明的警告没有什么关系（苏联用来登月的N1火箭发射了4次，4次全都失败，最终被迫取消）。

8

其他的，无非就是各种图片和猜测了。

比如据说在“阿波罗11号”首次登月时，阿姆斯特朗发现月球表面有23个人类赤足的脚印。

也有人公布过据说是从月球表面发来的照片，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类似金字塔的建筑，以及有明显人工痕迹的环形山。



Amazing satellite photos confirm ..

WORLD WAR 2 BOMBER FOUND ON THE MOON!

Russians:

这张照片的真实性存疑

1987年3月，有一张据说是苏联人造卫星从月球背面发回来的传真照片，照片显示，有一架“二战”时期的美制老式轰炸机，停放在月球的

陨石坑边，机身机翼都有明显的美国空军标志，有人推测可能是外星人掳到月球上去的。

1988年，该位置的飞机失踪了。

还有，每逢碰到无法解答的问题，总有人会把“大神”尼古拉·特斯拉[1]给搬出来。有狂热的特斯拉支持者宣称，美国用来发射登月飞船的“土星五号”火箭推进器的原理图，是特斯拉设计的。特斯拉去世后，这机器没人会修，所以就永远无法登陆了。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这些说法，都从没有得到过官方的认可，也没有可靠的来源和出处。

9

但是你不能怪民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是不是？

因为月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那么近又那么远，那么亲切又那么神秘，探月工程的中止，自然会引起无数人的猜疑和推测。

那么真正让美国停止探月工程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目前比较可信的说法，还是时代的变迁，使得美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先看当时为什么登月，为什么能登月。

首先，是政治环境逼出来的。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是“美苏太空争霸”的高潮时期，苏联人要面子，美国人也要面子。1966年，美国宇航局获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政府预算拨款，这笔拨款占到当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开支总额的4.5%，合计59.33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30亿美元）。有了大把的钱，才能办好登月的事。

其次，政治环境需要美国争气，经济环境也给了美国底气。

1961年，“阿波罗计划”获得了批准。当时，美国正处于西方经济学家公认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从1961年的5000多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000多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

接近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的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0%，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个人。

这样经济的底气，也让美国宇航局有资格获得那么多的预算。

再看为什么现在不登月了。

第一，政治意义大减。“冷战”结束了，对手崩溃了，美国的登月计划意义就减小了许多。据说到了阿波罗15、16、17号的时候，发射直播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看了。

第二，还是经济。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开始后，美国的经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黄金时代”，美国宇航局的预算开始逐年减少，根本无力支撑起登月那么庞大的计划了（1966年的预算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巅峰）。

据统计，当时“土星五号”火箭发射13次，总共花了65亿美元，平均每次5亿美元。总耗费相当于现在的1500亿美元，每次仅发射就耗费115亿美元（可以造一艘超级航母）。

2001年至2014财年，美国在反恐上耗费的预算是1.6万亿美元（美国国会研究所数据），这也是一个侧面原因。

第三，还是要看经济投资回报比。

如果耗费巨大，但有回报，那也可以接受。但从目前来看，登月的耗费成本实在太大，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获得经济回报。

所以曾有人说，如果现在人类具备了月球开发和居住能力，谁先上去就立刻能瓜分月球地盘开始殖民，瞬间就会有10个以上的国家拥有登月能力。

基于此，美国宇航局的重心发生了转变——他们不是不再探索太空了，而是抢在苏联人之前出完风头之后，就换方向了：在有限的预算里，美国宇航局把投入的重点转向了天空实验室、航天飞机研发以及大量的无人探测器和卫星。

总的来说，我们总觉得美国停止登月，总有天大的秘密，但很有可能，原因就是那么简单。

10

那么人类还会重登月球吗？

其实每个人都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正如本文开头，“阿波罗17号”的指挥长尤金·塞尔南那段话的末尾：“我们即将从陶拉斯—利特罗地区离开月球，正如我们从这里踏上月球。上帝保佑，我们将会回到这里，带着所有人类的和平与希望。”

馒头说

又想起了玛丽·尤肯达修女1970年写给NASA的恩斯特·斯图林格博士的那封信，以及博士那封著名的回信。

在信中，修女问：“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你们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

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

那封著名的回信有点长，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搜。

那封信列举了很多太空项目在民生科技上的应用和提升（当时的数据是每年有1000项技术用于民生），其实我们现在熟悉的红外线耳温枪（原来是用来测量星球温度的）、人造假肢、婴儿食品、冷冻脱水蔬菜等，都是因太空探索诞生的发明和应用。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博士回信中的最后一段：“太空探索不仅仅给人类提供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它还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挑战和进取精神，以及面对严峻现实问题时依然乐观自信的心态。”

在那封回信中，博士给修女寄了一张1968年圣诞节时，“阿波罗8号”在环月球轨道上拍摄的地球的照片。

太空探索让人类知道了自己的渺小，知道了地球家园的可贵，以及对未知事物的渴望。

我坚信，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永远不会止步。

---

[1] 尼古拉·特斯拉，发明家、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被认为是电力商业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并因主持设计了现代交流电系统而最为人所知。

需要经历时间考验的，除了爱情，可能还有建筑

有没有一类建筑，一说起一座城市，就立刻会想到它？肯定是有的，而且有不少。埃菲尔铁塔就是这类建筑的代表。看到它，想到的不仅仅是巴黎，甚至还可能是法国，但这座大名鼎鼎的铁塔，并不是与生俱来就享有荣誉的。

1

1885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想干一件大事。

因为四年之后的1889年，法国即将再次举行世界博览会。作为一场主题是“纪念法国大革命胜利100周年”的世界盛会，法国政府想在巴黎战神广场建立一座纪念碑或高塔。

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首届现代世博会上，用新材料玻璃和钢材建造的“水晶宫”让全世界惊叹不已，甚至让人们后来习惯称之为“水晶宫博览会”。一座吸引眼球的建筑，似乎成了成功举办一届世博会的标配。

而就在1884年年底，美国的华盛顿纪念碑刚刚落成（历时51年）。这座高达169米的方尖碑，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建筑，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和赞誉。


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建造的“水晶宫”，由园艺家帕克斯顿设计


华盛顿纪念碑于1833年开工，1884年竣工，当中停工22年

说法国人不羡慕，那是假的。

所以，法国政府想借举办世博会的机会，也搞个“面子工程”。

但是，他们开出的建造条件却很奇怪：第一，必须要能吸引游客参观，卖票赚钱；第二，世博会结束后能轻易拆除。

要有面子，要能赚钱，还是一次性的——法国政府的这个要求倒还

真不容易满足。

所以，它就向全世界发出了招标邀请。

2

在1886年5月18日的最后截止期限之前，法国政府收到了超过100份设计稿。大部分的设计稿，都很传统，但其中也不乏“惊人之作”：

有人提出建造一个巨大的断头台（倒也确实是纪念“法国大革命”）。



古斯塔夫·埃菲尔

第一版的手稿

有人提议竖起一个1000英尺（305米）高的洒水装置，在干旱的季节里可以灌溉整个巴黎（可能是气象学家或农业学家投的稿）。

还有人建议建造一座高塔，在顶上安装一个巨大的电灯，可以把整个巴黎照亮8倍——以便市民阅读报纸（说的好像巴黎市民有夜间外出

阅读报纸习惯一样）。

这时候，一位名叫古斯塔夫·埃菲尔的建筑师的提案，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注意。

埃菲尔说，我就是要建造一座塔，没有任何其他功能，就是一座塔。但这座塔和其他塔都不一样：

第一，它全部由钢结构构成。

第二，它比现在任何世界上的建筑——无论是胡夫金字塔、科隆大教堂、乌尔姆大教堂铁塔或者是华盛顿纪念碑——都至少要高一倍以上。

3

埃菲尔是不是在吹牛？

并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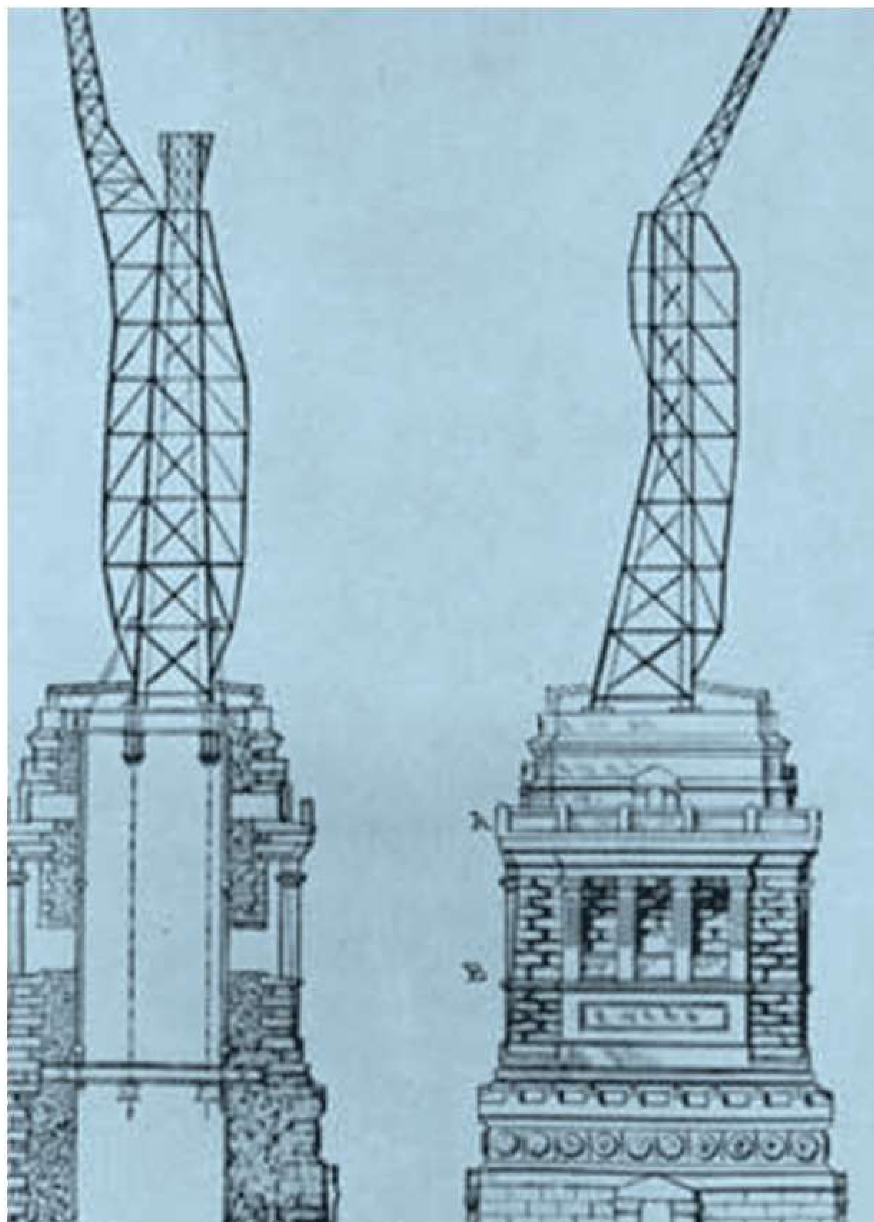
当时54岁的古斯塔夫·埃菲尔，其实已经是一位享誉欧洲的建筑学家了。

在埃菲尔24岁的时候，他主持设计了法国的波尔多加隆河铁道桥，开创了用高压空气驱动桥墩的创新技术，这也是他终身最佳成就的表彰之一。

1860年，28岁的埃菲尔完成了法国著名的波尔多大桥工程，将长达500米的钢铁构件，架设在跨越吉隆河的6个桥墩上。



杜罗河铁路桥也称“玛利亚·皮亚桥”，位于葡萄牙杜罗河上



自由女神像的钢骨架结构

1875年，埃菲尔一手设计了布达佩斯火车总站。第二年，他又设计建造了杜罗河铁路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非悬吊式大桥，这座桥一直使用了114年（1991年退役）。

哦，对了，埃菲尔还设计了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里面的钢骨架结

构。

所以，埃菲尔关于建造一座高度超过300米的铁塔的方案虽然听上去有些吓人，却几乎没有人怀疑他的建造能力。

按照埃菲尔的计算，这座塔的预算是160万美元（按黄金比价，可能相当于现在1.4亿美元左右）。

法国政府说：我可没那么多钱。

埃菲尔说：没事，我来。

根据约定，法国政府会支付30万美元，而埃菲尔倾尽所有，包括把公司全部资产抵押，垫资130万美元。作为交换，埃菲尔将会获得在博览会期间和此后20年的铁塔所有各项收入（这时候政府已经同意在博览会后保留铁塔）。

不少人都觉得埃菲尔可能疯了。

1887年1月，双方签订协议。

4

1887年1月28日，就在协议签订没多久，铁塔开始正式动工——两年后，世博会就要开始了。

然而，这座铁塔的动工，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争议。

1887年2月24日，包括法国著名文学家莫泊桑、小仲马在内的300位著名人士（据说是因为铁塔要造300米高，那么就一人代表一米）签订了《反对修建巴黎铁塔》抗议书，他们说：

我们深爱巴黎之美，珍惜巴黎形象。现在以法国色彩被蔑视、法国历史遭威胁的名义，义正词严地抗议这座修建在我们美丽首都心脏位置的荒谬怪物。

请诸位设想一下，巴黎的美丽建筑怎么能与一个使人头晕目眩、怪异可笑的黑色大烟囱放在一起？黑铁塔一定会用它的野蛮破坏整个巴黎的建筑氛围，令巴黎建筑蒙羞，巴黎之美将在一场噩梦中彻底丧失。

这是滴在纯净白纸上的一滴肮脏的墨水，是魔鬼强涂在巴黎美丽脸庞上的可怕污点。

名人们的抗议，也引发了巴黎市民大规模的请愿，他们认为巴黎铁塔如同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工厂烟囱，耸立在巴黎的上空。这个庞然大物将会掩盖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凯旋门等著名建筑物的光芒。

当然，还有其他的批评声音。

法国一位数学教授预计，当铁塔盖到748英尺（228米）之后，这个建筑会轰然倒塌；有专家称，铁塔的灯光将会杀死塞纳河中所有的鱼；《纽约光驱报》巴黎版声称铁塔正在改变气候；日报《巴黎野玫瑰》则用头条报道铁塔“正在下沉”。

但是埃菲尔丝毫不为所动。

作家吉尔·琼斯在他的著作《埃菲尔的铁塔》中这样写道：“对埃菲尔来说，这个项目的全部就是：法国会建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将是当时最高建筑的两倍，并且他知道如何在技术上实现这一点。”

5

埃菲尔确实有自己的底气。在建造铁塔之前，埃菲尔和他的工程师们就已经绘制了5329张图纸，规划了18038个钢铁构件，把每项工作都想到了最细。

为了保持四个塔墩处在一个水平线上（这将决定铁塔是否会倾斜倒塌），埃菲尔在每个塔墩底部都安装了一台临时水压泵以进行高度的微调。但事实证明埃菲尔多虑了：四个塔墩造到55米高的时候，误差都没有超过7厘米——这个完美的水平高度一直保持到今天。



埃菲尔铁塔的底座施工

埃菲尔铁塔高300米，用掉了12000个各类金属部件，但因为设计严谨，没有一个部件返工过。在建造过程中，埃菲尔设计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技术：

和当时其他的大型建筑工程不同，埃菲尔预先在自己的车间里面制造好所有的部件。部件只要被送往工地，就能够迅速安装完毕。

整个铁塔用去250万个铆钉，铆钉孔预先以1/10毫米的容差制作完毕，这使得20个铆接小组能够每天装配1650个铆钉。

建造铁塔的每个部件都不超过3吨，这使得小型起重机得以普遍应用。

埃菲尔的铁塔，就在争议声中，一天一天慢慢长高。等到铁塔高度超过2/3的时候，批评声音开始渐渐消失，赞美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

6

该说说埃菲尔铁塔造完后的故事了。

埃菲尔铁塔建成后，立刻成了法国至高技术的代表，更是成了法国

的象征，大批原来的批评者，变成了赞美者。就连当时的法国总理蒂拉尔，一开始也反对造埃菲尔铁塔，但等铁塔落成后，他亲自给埃菲尔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

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世界各地的游客，都被埃菲尔铁塔的雄伟壮观所震惊。在整个世博会期间，铁塔的门票和各项收入就达到了140万美元——是的，埃菲尔在世博会期间就已经收回了投资。事实上，到2010年的时候，埃菲尔铁塔能在一年里给法国带来15亿欧元的旅游收入。

虽然是一个纪念碑式的高塔，但埃菲尔铁塔却慢慢展现出了它的实用性：空气动力学实验、材料耐力研究、登山生理学、电信问题、气象观测等都依托于铁塔展开。

尤其是无线电技术的普及，让高高在上的埃菲尔铁塔具有了更大的意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役，法国人就是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向前线的法国军队发射战略信号。

那位曾经激烈反对建造埃菲尔铁塔的作家莫泊桑呢？他开始爱上了在埃菲尔铁塔二层的餐厅吃饭。当人们问他是否还讨厌埃菲尔铁塔时，他的回答让人捉摸不透："这毕竟是全巴黎唯一一个看不见这座铁塔的地方啊！"

7

以一个爱情故事作为这个铁塔故事的结尾吧。

很多人都猜测，当时埃菲尔愿意赌上全部身家去造一座铁塔，除了成就感和经济利益之外，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原因。

可能真的有。

在埃菲尔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伙子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富家小姐。玛格丽特一直鼓励埃菲尔实现自己当建筑师的梦想，并且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



埃菲尔铁塔

那是埃菲尔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直到玛格丽特的生命中止在31岁。悲痛欲绝的埃菲尔一直希望能有一座建筑能够纪念自己对妻子的爱——他后来终生未娶，直至91岁与世长辞。

在埃菲尔晚年的时候，据说他曾登上埃菲尔铁塔的最顶端，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

或许，因为那是当时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吧。

馒头说

去过卢浮宫的人，肯定对门口的玻璃金字塔有印象。

这个由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美术馆大门，借用古埃及金字塔造型，采用现代材料玻璃，既能表现巴黎不断变化的天空，还能为地下设施提供良好的采光。

而当时这个方案公布时，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都会认为这种建筑会毁了这座800年历史的古建筑风格。据说，当时有90%的巴黎人反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玻璃金字塔已经成为卢浮宫的象征。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卢浮宫的时候，站在入口，甚至产生了这样的一

种感觉：这座现代感极强的玻璃金字塔，就是一个时光入口，我们现代人从入口进去，就进入了卢浮宫里的古典世界。



卢浮宫门口的玻璃金字塔

但凡现在成为经典的世界建筑，多少都经历过争议吧。

埃菲尔铁塔是这样，卢浮宫金字塔是这样，悉尼歌剧院也是这样——它的设计者乌松和澳大利亚政府闹翻后，一气之下再也不踏进澳大利亚半步，连建筑建成后都不愿意来看一眼。

所以需要经历时间考验的，除了爱情，可能还有建筑吧。

张衡的地动仪，到底是否存在？

这是我难得的一篇涉及中国古代的文章，但没写军事，也没写政治，写的是一项科技发明，而且归根结底，说的还是现代的事情。

1

汉，永和三年，二月初三。

这一天，都城洛阳的那台奇怪的机器，忽然发出了一声“叮”的声响。

是那台机器上朝着西北方向的那条龙，忽然吐出了含在口里的钢珠，落在下面张口等着的铜蟾蜍嘴里。

张衡走上前去，拿起了钢珠，望向西北方，皱起了眉头。

“有地震了。”他说。

周围的人面面相觑，有人甚至嗤笑了一声。没有人有任何震感。

三天后，陇西的信使快马加鞭赶到洛阳报告：陇西地震，二郡山崩！

京城上下，无不震动。人们奔走相告：“张衡大人的那台地动仪，神了！”



王振铎复原的张衡地动仪

2

这段故事，是对《后汉书·张衡传》中一段记录的扩写。

原文只有35个字，摘录如下："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

"地动仪"这三个字，对于中国人而言，实在是太熟悉的一个名词。

长期以来，本文开头地动仪的这个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电视里、邮票上、博物馆里，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而这台仪器的意义，大家也都已经烂熟于胸：

公元132年，东汉的张衡发明了地动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能测量感知地震的仪器，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是中华民族古代科技文明的结晶。

但是——至少我们所熟悉的那台地动仪，是假的。

3

我们从小看到大的那个地动仪，是根据《后汉书》的那段记载复制的。复制的人，叫王振铎。

1934年，燕京大学读历史专业研究生的王振铎，在认真研究了《后汉书》的相关记载之后，诞生了想复制地动仪的念头——在公元200年前后，张衡的那台地动仪就消失了（据信是毁于战火）。

两年之后，王振铎按照书中所说“形似酒樽”的记载，设计了“地动仪”的外形，但对于内部结构，王振铎却犯了难。因为，整个《后汉书》对于“地动仪”的记载，一共只有这一段：

“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究竟是什么原理，让地动仪能感知地震，而且还能辨明方位，从龙嘴里吐出铜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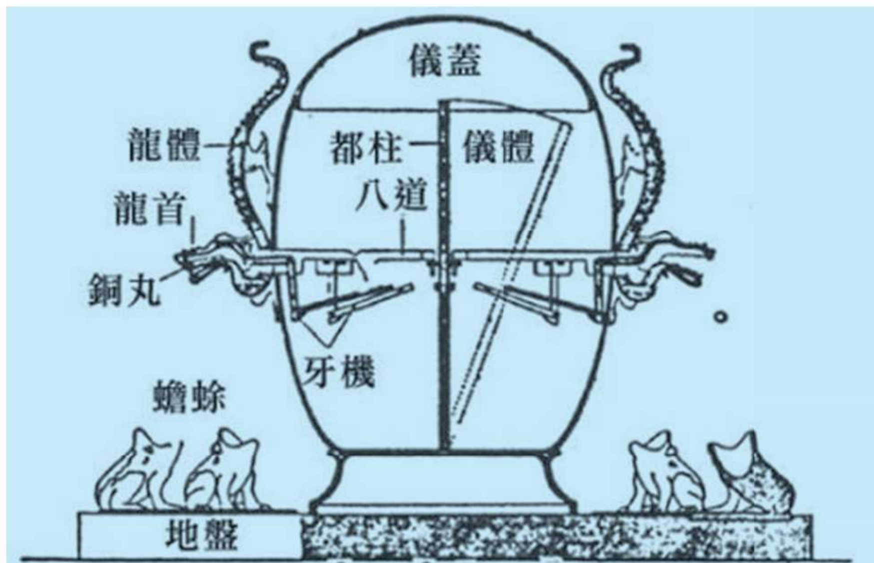
王振铎选择遵从英国地震学家米尔恩1883年《地震和地球的其他运动》一书中阐述的“悬垂摆”的结构原理：从地动仪的上部垂下来一根摆，用以判明地震方向，并控制相应机关。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振铎担任了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为了树立弘扬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国家要求博物馆复制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作为陈列和宣传之用。

王振铎自然而然想到了复制地动仪。

1951年，王振铎放弃了自己1936年想遵从的悬垂摆原理，而是用倒立的直杆原理，复制出了1：10比例的“张衡地动仪”模型。

1952年4月，《人民画报》对这尊复制的模型进行了报道。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王天木，以《伟大的祖国古代科学发明地动仪》为题，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地向读者讲解了地动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请记住，是“直立杆原理”。



王氏“张衡地动仪”内部结构

王振铎复制的这款“张衡地动仪”随即被编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但在之后历次的修订中，却略去了《人民画报》王天木的一段话：“可惜张衡这一重要发明早就失传了，隋朝时科学家临孝恭写有一部《地震铜仪经》，也未能流传下来。……这里介绍的这个模型，是我们在1951年设计完成，主要是根据《后汉书·张衡传》的记载，及考古材料而复制的。”

于是，一代代的教师和学生（包括那时候的我）都认为，课本上的图片，就是张衡当年造的地动仪。

4

这个1951年复制版本的“张衡地动仪”，很快就轰动了世界。

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张衡地动仪”被安排展览，和它并排展出的，是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带回的岩石。

在中国地方性的博物馆里，“1951年版张衡地动仪”也被当作文物来仿制和收藏——不仅进入了教材，就连中国地震局也用这部复原模型做了几十年标志，直到近年才取下。

最关键的是，大家一直认为，王振铎的这个“张衡地动仪”版本是不

可改动的，甚至更多的人以为，张衡的地动仪，就是按照这个原理铸造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质疑声开始响起。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王振铎这个版本的“张衡地动仪”，就开始不断遭受地震学界的质疑。从1969年开始，日、美、荷、奥等国地震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措辞严厉的论文。

1972年，日本学者关野雄用计算否定了“直立杆原理”。1983年，荷兰的斯莱斯维克、美国人赛维也提出王氏模型不能成立，并从根本上否定了直立杆原理。

1984年，美国地震学家博尔特院士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目前最流行的地动仪模型工作原理模糊，模型简陋粗糙，机械摩擦大大降低了灵敏度，对地震的反应低于居民的敏感，其作用应予以质疑，而且利用铜丸的掉落方向来确定震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提出质疑的，还不只外国人。

1976年，作为王振铎的老朋友，中国地震学的奠基人傅承义院士当面向王振铎指出了1951年版本地动仪的原理性错误，并说了一句让人挺尴尬的话：“房梁下吊块肉都比你那个模型强！”

但这种当面批评，还不是最尴尬的。1988年，地动仪在日本奈良展出，中方的解说员无法证明这个仪器的灵敏性，只能手持木棍——木棍捅一下，龙口中的铜丸才会掉到下面蟾蜍的口中。

对地动仪的怀疑开始蔓延开来，甚至扩散到了对张衡，甚至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怀疑。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在他的《张衡，科学与宗教》一书中写道：“对张衡地动仪的迷恋正是华夏科学停滞特点的典型表现。”

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地动仪”，真的是个没用的东西吗？

5

“张衡地动仪”的证明之路，再一次启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叫冯锐的人，成为领军人物。

1966年，邢台发生地震，当时冯锐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二年级研究生。他们这批学生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帮助抗震救灾并印发各种宣传震时逃生的小传单。传单其中一条，是建议老百姓在房间里倒立一个酒瓶子，如果瓶子倒了，就是地震来了，马上出逃。

然后时间就到了2002年。那一天，《防灾博览》杂志的编辑武玉霞（中国地震局的高级工程师）找到冯锐，问他为什么在一篇地震科普文章中写“地震没地震，抬头看吊灯”，而他早年散发的传单却是教人们倒立酒瓶子？

当时的冯锐，已经是中国科学院的教授，但他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了。

武玉霞之所以问冯锐，还有一个更深层原因——冯锐在文章中写到，张衡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的验震器。

而酒瓶子和吊灯，恰恰指向了这个问题的根本所在：按照王振铎仿制的版本，张衡地动仪的原理是“直立杆原理”，就是酒瓶子原理，而吊灯的原理，却是“悬垂摆原理”。

倒立酒瓶子，也就是“倒立杆原理”有两大弊端：一，外界一有震动，哪怕不是地震，也会倒；二，就算倒下，也无法知道地震的方位。

这恰恰和《后汉书》中记录张衡地动仪的描写是完全相悖的。

难道是张衡的地动仪确实错了？

冯锐回忆当时自己的感受：“我作为一个地震学家，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张衡是地震仪器的鼻祖，如果张衡的地动仪错了，我觉得会有很大的精神上的压力的。这个起码我从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

冯锐的感情，其实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情。这也是一代又一代的教科书，始终没有修改的原因。

6

那么作为一个地震学家，难受一下，就过去了？

冯锐选择了重新探索“张衡地动仪”的奥秘。

首先，冯锐根据王振铎的论文来推算当年陇西地震的烈度。推算下来，能够触发在京师洛阳的倒立棍倾倒，地震最低烈度应为5度。但如果是这样的烈度，洛阳肯定地面晃动，人畜惊逃。显然这样的结果大大违反了《后汉书》中记录的“一龙激发，而地不觉动”。

而要达到人没反应而“地动仪”有感应，按照王振铎的设计，那根核心部件“倒立棍”，也就是《后汉书》里记录的“都柱”，要高达2米，但直径只能是1.5毫米。

根本就不可能站得起来。

那么就只能证明一点：王振铎设计的地动仪的核心部件——“都柱”不合理。

这一点给了冯锐非常大的启发。冯锐突然意识到，外界所有对张衡地动仪的质疑，并不是张衡的那台机器错了，很有可能是王振铎的设计错了。



1953年中国发行的“张衡地动仪”邮票

随后，冯锐又读了不少史书，发现那个时候对地震的记载，经常用一个“摇”字，包括皇帝诏书上也写“地摇京师”，说明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地面是摇晃的。那么，地动仪的原理，是否并不是利用“酒瓶子倒下”的原理，而是“悬挂的吊灯晃动”原理？而后者就是现代地震学之父，

英国人米尔恩创立的“悬垂摆理论”。

但问题又来了：米尔恩创立的理论，距今也就100多年，张衡在1800多年前就想到了吗？

从出现这个念头开始，作为自然科学家的冯锐，就一头扎进了完全陌生的考古学领域中，开始查证汉代的物质基础——张衡会不会在那个时代，产生“摇”的灵感？

在大量出土的汉代石刻和文物中，冯锐发现，当时已有大量悬挂物存在，而“地摇京师”时，这些悬挂物肯定都在摇。冯锐认为，那个时代的张衡也许还不能准确描述地震波的性质和惯性原理，因此在《后汉书》中，也就没有详细描述“都柱”的运动方式。但古人却巧妙地用“樽则振龙机发吐丸”这八个字，把地动仪机械联动的先后顺序写得清清楚楚。

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张衡当时认识到“悬垂摆”的理论，是有物质基础的，受启发是可能的。

但这依然只是一个推测，就算理解了“悬垂摆”，1800年前的张衡，做得出“地动仪”吗？或者说，你能按照1800年前的水平和原理，复制得出一个吗？

2003年，缺少科研经费的冯锐无奈停住了前进的脚步，他在当时的论文里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对张衡地动仪的悬垂摆的原理的施关发机，牙机巧制，做出更具体的复原，那么就像我们赞美断臂的维纳斯雕像一样，宁可去欣赏它的超越时代的缺憾美，而把这个古典文化的无穷魅力留给后代。我们不要给它加胳膊了。”

7

但对真相的探索，永远是吸引人的，缺少的只是机会。

一年之后，冯锐的机会来了——河南博物院发来了邀请。

1998年，河南博物院新馆在建设过程中，汉代展厅希望能展示张衡的地动仪，于是请来苏州天文仪器研究所，按王振铎的模型复制了一个木制模型。

博物院提出个合情合理的要求：“能否让地动仪动起来？”

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即使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的那台也不能检测地震。”

对方提出，可以在模型下面人为地安上一个装置，让“地动仪”动起来。这让当时担任陈列部主任的田凯（如今已是院长）心里不是滋味：“我们展出的是科学仪器不是玩具，这样做是对观众的欺骗。”

这个心结，一直在田凯心中存留了6年。2004年，田凯通过各种媒体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谁能真正地复原“地动仪”？经人牵线，田凯找到了冯锐。

2004年8月，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组成了课题小组，共同复原“张衡地动仪”。经费全由河南博物院承担，国家地震局全力支持。

冯锐的团队，力量一下子增强了。冯锐团队在此之后的研究和努力，限于篇幅和观赏性，只罗列下面几条：

第一，文史专家加入了冯锐的团队。在此之前，记载张衡地动仪的只有《后汉书》一家，所谓“孤证不立”，可信度确实存疑。但专家们发现《续汉书》《后汉纪》等七部典籍中，均有对张衡地动仪的记载，196字扩展为238字。（正是《续汉书》中对张衡地动仪的描述，让冯锐确信，下面的“蟾蜍”其实是和本尊连为一体的。）

第二，他了解到，地震仪的发明人，英国地震学权威米尔恩是第一个将《后汉书·张衡传》翻译成英文的人，曾大量实验“悬垂摆”以验证张衡地动仪，并且公开宣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震仪是中国的张衡发明的。”这让冯锐备受鼓舞：张衡的地动仪，肯定启发过米尔恩。

第三，在自己的研究和文史专家的帮助下，冯锐了解到了《后汉书》记载文字中的“方面”其实并不是大家理解的“方位”，而搞懂了这一点，恰恰印证了地动仪的科学性。



冯锐版“张衡地动仪”内部构造

第四，考古领域让冯锐亲临当年汉代放置地动仪的灵台密室，让他对灵台的土质有了直观考察，再一次印证了当年张衡是利用灵台相对疏松的土质，达到放大地震信号的目的。

第五，有关方面调来了陇西历次的地震波形图，让冯锐一一用数据对应。

总而言之，在各方面的全力配合下，“张衡地动仪”的神秘面纱，在冯锐眼前慢慢揭开。

2005年3月，冯锐的课题组拿着复制出来的地动仪，开始接受全面的检测。

经过连续7天168小时的强干扰实验，新复制的地动仪，数据准确，且没有一次误触发。

这个模型，终于得到了考古界和科技界的一致认可。

8

2009年9月20日，中国科技馆新馆开幕，新的地动仪模型与观众见面。

这是一个真正可以“动”的地动仪。观众可以亲自动手按下按钮，观察在不同波型下地动仪的不同反应——只有横波到来它才吐丸，其他来自纵波的震动，都无法使地动仪有任何反应。这就排除了其他的干扰，如很重的关门、汽车过境的震动、巨大的炮声等。

美籍华裔理论物理学家、国际华人物理学会会长杨炳麟，在听了冯锐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做的报告会后，认为张衡应该是最早利用惯性原理验震的人。

这还没有结束。

2010年1月24日，冯锐接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电话。袁贵仁在仔细阅读冯锐修改教科书的建议和相关资料后，原则同意修改“张衡地动仪”这一章节。

2010年秋季教改出台以后，按照教学大纲，“张衡地动仪”已不再是历史课本中的内容，人教版历史课本中已拿掉了这一知识环节。而作为对这一错误的补救措施，人教社今后会将新版地动仪的知识加到教师用书中。

馒头说

冯锐版的“张衡地动仪”，是不是最完美的复原？

我觉得不是。冯锐自己也说过：“可能是目前阶段，最接近的一种复原。”

那么，张衡的地动仪，究竟存在过吗？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史学家，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法回答。

但我也想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甚至已经是一个哲学问题。但一般来说，我们目前公认的“科学”这个定义，是建立在有限观察的基础上，具有客观、逻辑、实证、可重复检验、可证伪这些特性。

我之所以想写这个故事，并不仅仅在于“张衡地动仪”这个仪器的本身，而是在于对这个仪器从探索到制造的整个过程。

在1800多年前，那个叫张衡的中国人，就已经尝试制造一种仪器，去解读当时被所有人视为“天惩”的地震。

在1800多年后，又有王振铎、冯锐以及一大批可能还默默无闻的人（2011年，湖南还有个语文教师黄佑军尝试复原“张衡地动仪”，并申请专利），他们在尝试复原自己祖先留下的“神奇科技”。

尤其是复原的过程，尤其是冯锐，绝没有半点敷衍和马虎，都是在实验和实证的基础上，一步步艰难但又坚实地在迈进。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学探索的过程。

我们应该早已跨过了需要过分夸大一件事或一样东西来满足民族自尊心的时代，那样做，只会映射出自己的自卑。

有，我会证明，没，我会承认。

这才是最大的自信。

“世纪之骗”背后的兴奋剂黑历史

这个故事，和体育有关，但这个话题，却远远不是体育那么简单。就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我们无数国人还为这个话题各自站队争吵过，而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是从一名运动员开始。

1

1988年9月27日，凌晨3点。韩国汉城[1]。

眼里布满血丝的加拿大奥运会代表团官员，最终还是决定连夜召见本·约翰逊。

代表团召见这名本国代表团的运动员，是为了拿回一样东西：奥运会金牌。

然后，交出金牌的本·约翰逊还得到了一个通知：你已被开除出加拿大队。

7个小时后，国际奥委会官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据说那是奥运会史上记者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本届奥运会，男子100米金牌获得者，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在赛后被发现服用兴奋剂，取消冠军资格，禁赛两年。

消息一出，全场震惊，汉城震惊，世界震惊。

就在3天前，本·约翰逊刚刚在汉城奥运会的男子100米决赛中，战胜老对手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以9秒79的破世界纪录成绩夺得金牌。

这场被当时媒体形容为“世纪之战”的比赛，最终演变成了著名的“世纪之骗”。

2

本·约翰逊的对手，美国的田径天才卡尔·刘易斯之后成了英雄。

在赛前，卡尔·刘易斯宣称，一定要拿到这枚金牌，献给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当然，本·约翰逊也宣称，要为自己的母亲而战。

最终，虽然刘易斯只跑出了9秒92的成绩，虽然那已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但相对于本·约翰逊那个作弊的9秒79，这个成绩是干净的，大家都公认，这是配得上奥运金牌的，是对得起自己的妻子和母亲的。

在那以后，卡尔·刘易斯积极投入“反兴奋剂”的宣传活动中。这位参加过4届奥运会、夺得过9枚奥运金牌和8个世界冠军头衔的传奇人物，一直在呼吁要严格药物检查制度，并声称田径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肮脏”的地步。

他的呼吁声一直持续到2003年，戛然而止。

2003年4月，一位名叫维德·埃克森的美国医生，拿出了一份3000字的文件，揭露美国奥委会长期包庇和纵容本国运动员服用禁药提高比赛成绩。在被包庇的运动员的名单里，卡尔·刘易斯的记录赫然在列：“1988年奥运会前的三次检测均呈阳性，体内违禁药物包括麻黄碱等三种。美国奥委会在先做出禁止其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后，随即又接受了刘易斯关于‘是在不知情情况下服药’的申诉，允许他代表美国前往汉城。”

卡尔·刘易斯一开始还狡辩，但在2003年4月24日，他放弃了抵抗：“我想我是做错了。”

这不得不让人们的思绪又回到1988年，在被剥夺金牌之后，本·约翰逊曾愤怒地抗议：大家都服药了！为什么只罚我一个？！

3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个剧情反转得有点快？

那么我们就不妨先顺口气，来简单回顾一下人类使用兴奋剂的历史。

使用兴奋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北欧传说。北欧传说中的神勇战士巴萨卡（Berserker），据说在战斗前一定要服用一种名为“不头疼”（Butotens）的饮料，因为可以大幅提高战斗力。经过后人考证，这种饮料很可能含有毒蘑菇的成分。于是，毒蘑菇据传成了古代奥林匹克

运动员赛前经常使用的“兴奋剂”。

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可能是最早把鸦片应用于体育竞技的国家。在19世纪，英国一直流行一种超长耐力跑的项目。1807年，耐力跑的参赛者亚伯拉罕·伍德公然宣称，大家只有使用鸦片酊，才能在24小时内保持清醒，不断奔跑。

1878年，英国耐力跑的夺冠成绩你知道是多少吗？520英里（837公里）！冠军为此连续奔跑了138个小时！

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并没有“兴奋剂”这个概念，只认为是合理地使用药物。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一篇《兴奋剂黑历史》（2008年第34期）的记载，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上，美籍英国人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过程中，身后一直跟着一个拿着注射器的教练查尔斯·卢卡斯。每当希克斯跑不动的时候，卢卡斯就会在适当的时机给他注射一针“士的宁”（Strychnine），外加一杯威士忌。“士的宁”也叫马钱子碱，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比赛结果是，希克斯获得了冠军。



自行车比赛一直是兴奋剂的“重灾区”。“环法王”阿姆斯特朗也曾承认服药，震惊世界

不只是田径比赛。1930年，著名的环法自行车比赛的参赛手册上明

确指出，组织方不负责各支车队的“药物”费用——意思是药物是合法的，只是要你们自费。

如果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的话，人类的现代奥运会，其实很可能演变为四年一届的“兴奋剂成果博览会”。但是，事情发生了转变。

转变的代价，是有人付出了生命。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选手延森在比赛中猝死，尸检证明，他服用了苯丙胺、酒精和另一种扩张血管的药物。7年后，前奥运铜牌选手、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在环法比赛途中猝死，死时衣袋中还有未吃完的苯丙胺。人们忽然又回想起来，那个一边跑一边打针的马拉松冠军希克斯，在那届奥运会后，再也没有参加过大型比赛……

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美国著名女子短跑运动员，“花蝴蝶”乔伊娜。

就是在1988年的那届汉城奥运会上，乔伊娜在女子100米比赛中以10秒54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到现在依旧是奥运会纪录。而就在当年美国国内的奥运会选拔赛上，乔伊娜还跑出了10秒49的世界纪录。

10秒49是个什么概念？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的夺冠成绩也就是10秒71——那可是过去了整整28年！在塑胶高弹力跑道、高科技气垫跑鞋、减风阻的运动衣都被发明之后，女性人类依旧无法打破，甚至接近乔伊娜当年创造的那个世界纪录。

可是，1998年，乔伊娜在睡梦中悄然逝世，只有38岁。无数人怀疑，是过量服用兴奋剂夺走了她的生命。

无论如何，人类认识到了兴奋剂的危害。

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反兴奋剂的检测出现了。

但回过头来看，也没什么可以特别兴奋的，因为这只是意味着，一场“猫捉老鼠”的好戏，正式拉开了帷幕而已。

在那一届的墨西哥奥运会上，瑞典现代五项选手利延沃尔成为奥运史上兴奋剂违禁第一人，但是，他服用的违禁药物只是过量的酒精。

是那届奥运会特别干净吗？并不是，是那时候的反兴奋剂手段，实在太落后。

简单介绍下兴奋剂的类型吧。

第一类可以概括为“不会累”，其实就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像咖啡因、可卡因、麻黄碱等，前面提到过的耐力跑运动员服用的鸦片酊，也属于这类。这类兴奋剂，是最先能被检验出来的。

第二类可以概括为“特有劲”，就是类固醇。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睾酮。这类吃了之后肌肉力量明显增加，骨骼变粗壮，女性特征渐渐消失。在中国，俗称“大力补”（美雄酮）。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号称是一直服用“中华鳖精”的“马家军”。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类固醇药物很难被检测出来。但就在那一年，检测手段有了极大进步。也就是在那一年，“马家军”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7名队员中，有6名没有参加悉尼奥运会。而中国女子游泳队的一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也被内部规定不许去参加奥运会。

第三类就高级了，称为“EPO”，是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简称，原来用于治疗贫血。运动员吃了之后供氧能力增强，耐力等各方面能力提高。这类兴奋剂在历史上相当长时间根本无法检测出来。

第四类就是各种杂类了。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朝鲜男子射击选手金正洙获得了男子10米气手枪铜牌和50米手枪银牌，但赛后被剥夺了奖牌，因为他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严格意义上，其实是“兴奋剂”的反义词：一种叫“心得安”（普萘洛尔）的镇静剂。

第五类，是最新的高科技，被称为“基因兴奋剂”，通过改造人体基因来增强运动员的各项能力。对不起，这个目前还处于猜测阶段，现在所有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

虽然自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开始，人类已经决心把借助药物提高成绩的运动员踢出去，但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反兴奋剂的检测方法，一直是要等兴奋剂出来后才会被发明和改进。

这就意味着，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兴奋剂方面，“魔”总是比“道”要先行一步。

所以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本·约翰逊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的反兴奋剂成果实在是少得可怜。

5

究竟是什么在推动兴奋剂不断进化和发展？

人们曾经以为，“冷战”期间，讲究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兴奋剂泛滥的最大推动力。

确实，民主德国在里面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从1972年到1988年，民主德国取得了384枚奥运奖牌，还创下了不计其数的世界纪录。按照民主德国人口数，这个金牌比例是美国的10倍。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后，原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被解密，一项名为“Komplex08”的计划被公之于众——在民主德国的各大训练基地中，教练系统性地给运动员们吃一种蓝色的药丸，告诉他们是维生素，但其实就是类固醇。民主德国的女子铅球欧锦赛冠军海蒂·克里格，因为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而变得男性化，她最终做了变性手术。

但真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服用兴奋剂吗？

1954年的男足世界杯决赛，当时堪称“梦之队”的匈牙利队在上半场开场8分钟就攻进联邦德国队两球。然而，上半场0比2落后的联邦德国队下半场判若两队，最终3比2逆转匈牙利队，获得世界冠军。这场比赛被称为“伯尔尼奇迹”。

然而，到了2004年，德国媒体披露，1954年的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时间，联邦德国队的每个队员都注射了一种中枢神经兴奋药物，以增加体力和爆发力。更让人感慨的是，2008年德国内政部科学局联合德国奥委会，委托柏林洪堡大学调查德国的禁药史，结果显示：前联邦德国为追求成绩，系统地组织运动员服用各类禁药，长达30多年。



庆祝获胜的联邦德国队。之后他们队中有8名队员因为得了黄疸性肝炎（注射那种药物的最明显病症）而接受疗养，有两名球员数年后死于肝癌

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就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整个俄罗斯田径队因为兴奋剂问题，被禁止参赛。但就在奥运会闭幕之后没多久，俄罗斯黑客侵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电脑，公布了五波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但依然被允许参赛的各国运动员名单，其中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阵营。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这句看似有理的话，背后又透露出一种怎样的讽刺和无奈。

馒头说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加拿大反滥用药物组织主席、类固醇专家鲍勃·戈德曼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有一种神奇的药物，它能使你们在5年之内，在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比赛中战无不胜。但是，请注意！你们吃了这种药，5年之后就会死去，你们愿意吃吗？”

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198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运动员，而结果

是什么呢？

有103名运动员回答说：我愿意吃！

所以，兴奋剂之所以屡禁不绝，背后的推动力不仅仅是国家的力量。

奥运会带给个人的巨大荣誉和社会声望，以及奥运会商业化之后，带给运动员的巨大经济利益，促使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愿意铤而走险。本·约翰逊当年被剥夺冠军后，一家意大利皮鞋厂立刻和他解除了高达200万美元的赞助合同——但一位100米奥运会冠军的商业价值由此可见。

所以，那一句“查得出的是兴奋剂，查不出的就是高科技”，成为不少运动员愿意去搏一把的最大动力。

和兴奋剂做斗争易，和人性做斗争难。

而这，也可能是反兴奋剂的道路如此艰难的最主要原因。

---

[1] 汉城，韩国首都，2005年改名首尔。——编者注

史上最黑暗的一届奥运会

1972年8月26日开幕的这届奥运会，并不是以“XXX奥运会”被人铭记的，而是“XXX惨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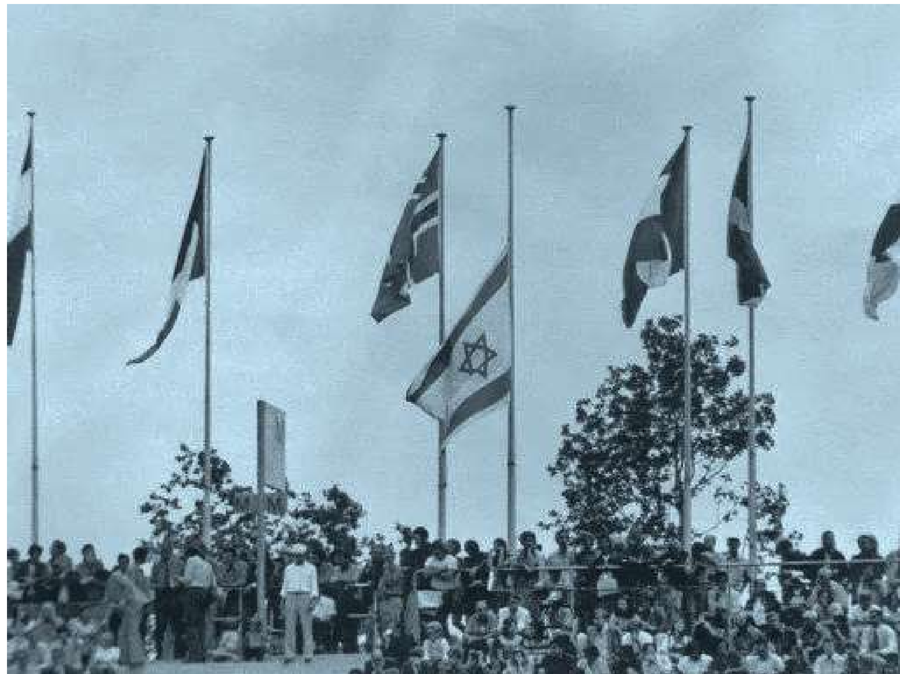
1

1972年的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当时的主办国联邦德国是很想办好的。

联邦德国政府从上到下，都希望通过这届奥运会，抹去1936年柏林奥运会给全世界留下的阴影——那是在希特勒的纳粹浪潮下举办的一届奥运会。

联邦德国希望告诉世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文明富强、安宁祥和的国家。

慕尼黑奥运会，也确实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景象：这是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一届奥运会。参加的国家和运动员数量，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包括以色列，尽管纳粹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伤痕印记还没消退，但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他们也派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运动员代表团。



慕尼黑奥运会



以色列代表团在开幕式入场

如果说这届奥运会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大量的资金被投在了场馆设施和器材上，削弱了安保的预算。

不管怎样，开赛一周，各项赛事顺利进行，一切迹象表明，一届“欢乐祥和成功的盛会”，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直到9月5日凌晨，8个蒙面的黑影，悄悄潜进了奥运村。

2

1972年9月5日的凌晨4点，8个蒙面的男子来到了奥运村25A门旁的一段栅栏前。

这段栅栏有2米高，但这根本拦不住来参加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们，他们在晚上吃喝玩乐之后，经常会翻越这道栅栏进村。

奥运村的保安并不会阻拦他们——都是年轻人嘛，玩过头了很正常。而且保安拿什么阻止他们呢？为了扭转当年柏林奥运会给各国运动员造成的那种恐惧感，保安甚至连枪都没有配。而且，奥运村里没有路障，没有探头，没有探测器，真正体现“欢乐祥和”。

在此之前，没有一届奥运会因此出过什么问题。

更何况，那8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是套着田径运动服翻过栅栏的，动作娴熟。

他们如果是窃贼，倒也算了。但是，翻过栅栏后，他们从包里摸出了冲锋枪和手雷。

3

这8个人，是“黑色九月”（巴勒斯坦的一个秘密恐怖组织）的成员。

而他们这次潜进奥运村，显然是有备而来。一翻过栅栏，他们直接就扑向了31号建筑——那是以色列运动员的宿舍楼。

9月5日凌晨4点25分，恐怖分子来到了31号楼1号房间门前，他们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万能钥匙。

第一个听到异响的，是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英德。他一开始以为，是另外一名外出的室友回来了。但他听到门外的谈话，用的是阿拉伯语。



“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后来在阳台上被拍摄下的镜头

他瞬间反应了过来，一面冲上去用他重达124公斤的身躯顶住房门，一面用希伯来语朝屋内大喊：“有危险！”

尽管8名恐怖分子最终撞开了房门，但约瑟夫的努力没有白费，另一位举重教练破窗而逃——他是第一个逃出的以色列人。

另一个反抗的，是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他挥拳打倒了一名恐怖分子。但他随即被另一名恐怖分子用枪射穿了面颊。

剩下的4位以色列运动员，都被恐怖分子用枪指着头。

之后，3号房间的门随即也被恐怖分子撞开，里面的6名以色列运动员也被带了出来。其中的轻量级摔跤运动员贾德·祖巴理决定赌一把，趁人不注意，他突然发力冲出了房间。恐怖分子连射几枪都没有击中他——贾德幸运地成为第二个逃出的以色列人。

面颊血流如注的摩西没有放弃，在贾德逃跑时，趁着恐怖分子分神，猛地击碎了其中一个的下巴，但随即胸部连中数枪，他还试图拿起一把菜刀，但随后又被一枪命中头部——摩西成为第一个死去的以色列人。

举重运动员鲁马努抄起了另一把菜刀，直接砍向了一名恐怖分子，但之后他被冲锋枪几乎打为两截——第二个死去的以色列人。

至此，13名以色列人，逃走两个，死去两个，还剩下9个，被8名恐怖分子控制了。



以色列运动员的房间现场

恐怖分子曾殴打那9个以色列人，威逼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藏身的房间，但9个人，紧咬牙关，没有一个开口。

另外7名以色列运动员，逃过一劫。

4

这场发生在9月5日凌晨的殊死搏斗，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其间还有枪响，但没有人注意到。

作为一届“欢乐”的盛会，奥运村里夜夜都有狂欢活动，砸碎酒瓶甚至燃放鞭炮的现象经常发生，保安都已经习以为常。警察局曾接到过几个路人打来的电话，但同样认为是运动员的嬉戏打闹，并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逃出来的两位以色列运动员，分别到韩国和意大利代表团下榻的地方打电话报警。



伪装成运动员的警察，试图去营救人质

但其中一名运动员贾德犯了一个错误：他告诉警方，恐怖分子只有5个人。

9月5日凌晨5点，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弗雷德·施赖伯从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他知道出大事了。

5点30分，弗雷德接到了恐怖分子的要求：在9月5日9点以前，释放被以色列政府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然后派3架飞机把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人，都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将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5

到了恐怖分子限定的9点，国际奥委会主席拉基宁和本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道默宣布，从9月5号下午开始，慕尼黑奥运会所有比赛暂停。

同时，联邦德国的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以及警察局长弗雷德，提出愿意进入建筑换回人质，但恐怖分子拒绝了，只是同意把时间延迟到12点，并且放低条件：只需要把他们和人质用飞机送到埃及开罗，再释放他们要求释放的其他人。

在此期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通过电话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磋商了10分钟。比撒切尔夫人成名更早的“铁娘子”梅厄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立场：绝不妥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步！

但在奥运村这边，为了营救人质，联邦德国政府表示，愿意同意恐怖分子的要求，但需要进一步谈判细节，以此拖延时间。

晚上6点35分，联邦德国内政部部长、奥运村村长和弗雷德警长作为谈判代表，进入了31号楼。但他们出来后，带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恐怖分子既疯狂又坚决，取消攻进大楼营救人质的计划。

之后，就像那些警匪片里拍的那样，在包围奥运村的12000名联邦德国警察的注视下，2架直升机腾空而起，载着8名恐怖分子和9名以色列运动员，飞往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

6

机场，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晚上10点35分，两架载有恐怖分子和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降落在一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旁。恐怖分子强迫直升机的驾驶员站在前面，然后4个恐怖分子走出直升机，去检查客机。

此时的机场周围，自然已经安排了联邦德国的狙击手。但机场的灯光造成许多阴影，影响了狙击手的判断。

最要命的是，联邦德国警方听信了贾德关于恐怖分子只有5人的话，还真的不多不少，只安排了5个狙击手。

时间不等人。

当恐怖分子从直升机走向客机的时候，狙击手开火了。

很遗憾，尽管上来就击中了两个恐怖分子，但5个狙击手，不可能瞬间击毙8个恐怖分子。

枪声一响，直升机的驾驶员按照事先的约定，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两人被击中，重伤。

但他们还能跑，而被捆在直升机里的以色列人质，双眼被蒙住，动

弹不得。

恐怖分子立即就近找掩护，开枪还击。解救人质的一场突袭，居然变成双方互射的一场枪战。

因为顾及人质的安全，联邦德国警察不敢火力全开。在几次劝降都被恐怖分子拒绝之后，失去耐心的联邦德国警察，决定不顾一切了——他们出动了六辆装甲车，突击队队员跟在后面冲了上去。

失去逃跑希望的恐怖分子，终于做了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他们往一架载有5名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扔了一颗手榴弹，直升机顿时化为一团烈火。另一架直升机里的4名以色列人质，被直接射杀。



被烧毁的直升机

9月6日凌晨1点30分，警方终于击毙了最后一名不肯投降的恐怖分子，后来经查实，这个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的人，原来作为一名建筑师，参与修筑慕尼黑奥运会的奥运村，所以恐怖分子才会那么熟门熟路。

最终，8名恐怖分子，5人被击毙，3人被抓捕。但9名以色列人质，无一生还。

在检查直升机残骸时，警方发现，那4名被捆绑射杀的以色列人质，绳索上留下了他们的牙痕——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在努力逃跑。

9月6日上午，慕尼黑的奥林匹克主体育场座无虚席，但不是为了观看比赛，而是所有的参赛国运动员和官员，为以色列代表团逝去的11条生命默哀。

著名的巴伐利亚歌剧院管弦乐团，现场演奏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许多在场运动员失声痛哭。

以色列代表团团长拉尔金——本来是这次“黑色九月”要抓的头号目标——发表了讲话：“现在，我要带着我同胞的遗体回国了。但是，奥林匹克的精神不会变。我们保证，四年后的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我们还会回来。”

9月7日，慕尼黑奥运会比赛全面恢复。



遇难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

那一届奥运会，苏联名列第一，带回了50枚金牌。美国名列第二，带回了33枚金牌。

而以色列，带回了11具同胞的尸体。

馒头说

其实，以色列在那届奥运会上的保证，并不仅仅是继续参加奥运会。

11具同胞遗体被送回国后，铁腕女总理梅厄公开表示，以色列必须“以眼还眼”。她当即授权“摩萨德”（著名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必须

为11名以色列运动员复仇。

在“摩萨德”领导人扎米尔将军的策划和实施下，一份名为“上帝之怒”的复仇计划出炉了。

“摩萨德”选出了11名“黑色九月”组织的领导和重要成员，开始了全世界范围的追杀。或爆破，或暗杀上了“复仇名单”的11个人，最终只有1个人侥幸逃脱，其余10人全被“摩萨德”暗杀。关于这段故事，斯皮尔伯格（他自己就是犹太人）专门拍过一部电影，就叫《慕尼黑》。

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以色列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公开自己暗杀行为的国家。但在那之后，曾经批评这种行为的美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甚至开始动用无人机发射导弹“定点清除”目标。

2004年雅典奥运会是我采访的第一届奥运会，当时我就惊讶于每次进入奥运村，都要在荷枪实弹的军人注视下，通过安检门和搜身，甚至随身的笔记本电脑，也要当着他们的面启动一次。

但了解了“慕尼黑惨案”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检查都不是多余的。

只是，用斯皮尔伯格导演完《慕尼黑》之后的话来说：“我喜欢以色列受到严重威胁时做出的强烈反应。但我认为以‘反应’来对抗‘反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只是造成了一种‘永动’的报复机制。”

尤其是放到恐怖主义重新抬头的今天，每个人其实都想知道，这种“怨怨相报”的尽头究竟在哪儿？

孙杨为什么会被别人质疑“服药”？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游泳队的故事。2016年8月10日，里约奥运会期间，法国游泳运动员拉库在游完自己的100米仰泳比赛后，再次攻击孙杨服药。算上之前的澳大利亚人霍顿，孙杨已经是第二次被人指责了，是不是大家都针对孙杨？其实并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杨只是一个“背锅者”，在为中国游泳队过去的一段历史“还债”。中国游泳队过去有段历史，很残酷，很现实，以至我们不愿意面对，很多人都开始选择淡忘，甚至根本不知道。但这是段必须要面对的历史，这个故事，得从24年前说起。

每一届奥运会闭幕，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做回顾。而巴塞罗那奥运会，所有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中国游泳队身上。

在这一届奥运会的游泳比赛上，后来被称为中国游泳“五朵金花”的庄泳、杨文意、林莉、钱红和王晓红，在女子100米蝶泳、50米自由泳、200米混合泳和其他几个项目中，一共拿到了4枚金牌和5枚银牌。

举世震惊！

要知道，4年前的汉城奥运会，同样是这批人，只获得了3银1铜。

从这届奥运会开始，外国游泳选手开始私下提出质疑。

质疑什么？很简单，质疑中国运动员服药。

外媒猜测的一个关键年份，是1986年。

1986年，中国游泳队请来了民主德国教练克劳斯。外界普遍怀疑，就是从那时候，中国游泳队开始和兴奋剂沾边。而民主德国的惯用手法，是通过药物增强女性肌肉，但会让她们变得更男性化。



当年的中国游泳女队：（从左至右）冯晓东、陈运鹏、杨文意、钱红、林莉、庄泳、周明和张雄。令人唏嘘的一张照片

中国女子游泳队真正成为全世界怀疑目光的焦点，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后两年，1994年的罗马游泳世界锦标赛。

在那届游泳锦标赛的所有16个女子项目中，中国游泳队除了800米自由泳没有拿到奖牌，其余15个项目全都进入前三名！

其中12个项目拿到金牌，还有5银1铜，并创造了5项世界纪录！

整个世界泳坛瞠目结舌。



1994年罗马游泳世界锦标赛的泳池，完全被中国女子游泳队主宰

在比赛期间，很多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故意冷落中国运动员，十几个国家的教练，联名上书国际泳联，抗议中国选手是靠药物来夺取胜利的。

最受打击的，就是澳大利亚队。因为游泳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整个国家最引以为傲的体育项目。据说，那一届世锦赛，澳大利亚游泳队的姑娘们在更衣室里抱头痛哭。

中国游泳队和澳大利亚游泳队的梁子，其实在那时候就结下了。

如果说罗马游泳世锦赛，那些选手还只是抱怨中国选手，但苦于没有证据的话，1个月后举行的日本广岛亚运会，成了中国游泳队刻骨铭心的一届运动会。

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中国游泳队一共获得23块游泳金牌，而昔日的亚洲泳坛霸主日本，只得到了7块。

就在比赛期间，日本泳协忽然向国际泳联上诉，要求对中国队进行“飞行药检”。同时，日本泳协提供了证据——中国游泳队队员服药的录像带。据说，在那次亚运会，中国运动员居住的房间内被事先安置了窃听器和针孔摄像机，中国运动员在房间内注射吃药以及随意丢弃的针头，都被认为是服用兴奋剂的铁证。

不管怎样，在检验结果面前，任何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最终，中国队有7名选手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物“诺龙”，这种药物能明显促进肌肉的生长，增加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那7名选手，3男4女，现在我已不想点出名字，但4名女选手都是罗马游泳世锦赛夺金的运动员。

最终，中国队被剥夺12枚金牌，这12枚金牌全记入日本队名下，日本队也借此超越韩国，成为亚运会金牌榜第二。

这次的服药事件，等于在世界体坛丢下了一颗原子弹。因为这次事件，中国游泳队教练陈运鹏辞职，教练王林调离。

原先就憋了一口气的美、澳媒体，立刻宣称：“这是近代运动史上查出的最大药物丑闻！”

在1994年末的各国通讯社评出的世界十大体育事件中，“中国游泳队服药事件”都排在前三位。

1995年，中国游泳队直接被禁止参加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

那两年，是中国游泳的最低谷——中国游泳选手已经和“药罐子”画上了等号。

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美国的一个解说员直接说：“看！一支靠服用兴奋剂获得成绩的队伍正向我们走来！”

这就是当时中国游泳队，乃至被殃及的中国运动员在世界面前的形象。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4年前巴塞罗那奥运会所向披靡的中国女子游泳队，最终只有乐靖宜获得了一枚女子100米自由泳的金牌。

但这枚金牌弥足珍贵：在中国游泳运动员被全世界用放大镜仔细监视的情况下，我们证明了我们依旧有夺金的实力。

但要挽回中国游泳队的形象，依然任重道远。

1998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在澳大利亚珀斯举办。在澳大利亚人的主

场，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个仔细检查的机会？

只能怪我们自己，确实不争气。

中国女子游泳队的队员原媛与教练周哲文，在抵达机场后，被当场查出携带生长激素，直接被警方带走。那一张照片在短时间内就传遍了全世界。

此外，中国游泳队的队员王薇，虽然比赛中名次非常靠后，但组委会依然要求她参加兴奋剂检测，结果果然被查出服用禁药。

1999年初，当时的中国游泳队总教练周明的弟子熊国鸣和王炜，再次被查出服用禁药。熊国鸣被终身禁赛，周明被终身禁教。

中国游泳队终于幡然醒悟。

1999年，体育总局正式出台反兴奋剂规定，态度只有一个："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砸下了几千万，对所有耐力项目的运动员进行了血检。当时女子200米混合泳世界纪录保持者吴艳艳直接被禁赛四年，失去参加奥运会资格。

那一年的悉尼奥运会，中国游泳别说金牌，连一枚奖牌都没拿到。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除了管理者在醒悟，运动员自身也在慢慢觉醒：他们开始变得不愿意参与到一池浑水中去。

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当时创造亚洲纪录的名将罗雪娟直接表态："我身后的这池水不干净。"三年后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她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夺得金牌。


罗雪娟当年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这枚游泳金牌，让外界“中国女泳不吃药就不行”的说法不攻自破

尽管从管理者到游泳队都开始慢慢觉醒，尽管在此期间，国内泳坛还会出现“全运会成绩无敌，奥运会一落千丈”的奇怪现象（因为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严格），但中国游泳队，还是在一步步地洗刷自己。

只是，因为之前的“欠账”太多，中国游泳队的自证清白之路，艰难而坎坷。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叶诗文横空出世，她在女子400米混合泳最后50米自由泳冲刺的时间，居然比该项目男子冠军，美国的罗切特在同样50米里还快了0.17秒。

这无疑又一次撩拨起了欧美媒体记者的神经——但我们确实也很难去控制人家的嘴：因为我们之前有那么多“前科”！

当时我就在叶诗文的赛后新闻发布会现场，面对外国记者毫不客气的提问，我看得出，小叶子心中的委屈和愤怒。

更不用提孙杨了。



叶诗文在伦敦奥运会上一战成名

在运动成就上，孙杨是可以比肩刘翔的中国男子运动员。

在孙杨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男子游泳运动员最好的奥运成绩，是蒋承稷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进入50米自由泳和100米蝶泳的两项第四名，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张琳获得了男子400米自由泳银牌，才打破了中国男子游泳队奥运无牌史。

然后孙杨横空出世了：拿世锦赛金牌，拿奥运会金牌，还要打破世界纪录。全世界媒体自然而然又忙不迭地拿起了放大镜。

孙杨经常在赛后哭，包括这一次。这里面确实有他性格的因素，但不知道有谁还记得他失金后的那句话："按照这个训练强度，应该拿冠军的。"

可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孙杨这三个项目——男子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和1500米自由泳的训练强度。就说一点：韩国的天才朴泰桓，后来放弃了15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理由只有一个：1500米自由泳的训练，实在太苦了。

只是，孙杨确实出过一段"禁药风波"（这事情各种是非曲直，这里先不说了）。孙杨被禁赛后，澳大利亚泳协宣布，禁止孙杨在澳大利亚任何游泳俱乐部训练，可见澳大利亚人（包括霍顿）对孙杨的恨有多深

—如果能禁止孙杨入境，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其实说到这里，你就应该明白了：叶诗文也好，孙杨也好，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服用违禁药物，很多外人都不在乎。因为在外界看来——他们需要为中国游泳队过去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还债，背锅。

泼盆脏水很容易，而自证清白总是很难。

更何况，中国游泳队确实有前科。

馒头说

2013年3月22日，澳大利亚游泳队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

他们宣布，参加了伦敦奥运会游泳比赛男子4×100米接力的澳大利亚队成员公开承认，奥运会前夕，他们集体服用了违禁药物。

伦敦奥运会上，美国的女子800米自由泳冠军、15岁的莱德茨被英国媒体一致攻击服用禁药，而英国一名38岁的医生承认，曾给包括游泳队在内的150名顶级选手开过禁药。另一游泳大国荷兰的四枚奥运金牌获得者德布鲁因，直至退役时还在辩解自己没有服用过禁药。

说这些例子，其实只是想证明：在这个池子里，大家都已经习惯相信——没有人绝对干净。

游泳和田径，历来是奥运会兴奋剂的“重灾区”。

体育圈里都知道有句话：“查得出的是兴奋剂，查不出的就是高科技。”

这句玩笑话，背后透着多少无奈。

但无论如何，对中国游泳队而言，至少有一点还是必须要确认：有些历史必须面对，只有勇敢面对，才能慢慢证明自己的清白——尽管非常艰难。

这是偿还旧债，也是重新出发。

“让球”阴影下的“小山智丽事件”

这篇文章要说的这场比赛，是一场乒乓球比赛，一场曾让无数中国人陷入“愤怒”的比赛。

1

1994年10月13日，广岛亚运会乒乓女单决赛场馆。

场馆液晶屏上的比赛总比分，最后定格在了3比1。

两位参加决赛选手——小山智丽和邓亚萍都哭了。

代表中国队的邓亚萍，泪光闪烁。虽然她当时只有21岁，但已是当时世界女子乒坛排名第一的选手，所向披靡。但在这场比赛中，她却输了。

代表日本队的小山智丽，泪流满面。虽然她是当时日本的头号选手，但已经30岁了，结果赢了比自己小9岁的世界第一。

无数中国观众通过电视屏幕收看了这场决赛，第二天的报纸也铺天盖地地报道了这场比赛。这场女单决赛，成了后面几天国人在茶余饭后的主要议题，愤怒的议题——有些人甚至用上了“卖国贼”和“汉奸”这样的字眼。



邓亚萍和小山智丽在比赛中



赛场上的小山智丽

因为小山智丽在战胜邓亚萍的比赛中，不停地喊日语“哟西”（好）给自己加油。

因为“小山智丽”本名“何智丽”。

因为她本来是一个中国人。

于是很多人问：她怎么和中国队有那么大仇？

2

时间切回到1987年，印度新德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女单半决赛，三名中国选手、一名韩国选手入围。

韩国选手，是当时中国女乒的头号劲敌梁英子。三名中国选手分别是焦丽丽、管建华，还有一个，就是23岁的何智丽。

按照当时的对阵，是焦丽丽对梁英子，何智丽对管建华。

一场队内会，在赛前召开。当时的教练组认为，一旦焦丽丽把梁英子放进决赛，相比较而言，削球手管建华可以消耗梁英子的大量体力，赢面可能更大，所以教练组决定——何智丽在半决赛里“放”给管建华。

何智丽当时没有表示反对。

焦丽丽和梁英子的半决赛提前一小时进行，双方打得异常艰苦，进入到了决胜局。

何智丽与管建华的半决赛晚一小时进行。轻装上阵的管建华，上来却被何智丽打了个2比0。第三局，何智丽打到了18比10（当时的乒乓球比赛，五局三胜，21分制），旁边的中国教练急了。

在频频暗示中，何智丽连放10分，把比分放到了18比20。

正当中方教练组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何智丽又连拿4分，以3比0把管建华淘汰出局。

管建华当场痛哭。

中方教练组拂袖而去。

而另一场地的焦丽丽，在18比12领先的情况下，据说是看到了另一场比赛的结果与之前开会结果不一样，情绪大受影响，被梁英子逆转，也被淘汰出局。

决赛成了何智丽对阵梁英子。

1986年的亚洲乒乓锦标赛女团比赛，梁英子战胜过何智丽（这也是教练组决定放弃何智丽的原因之一），所以在决赛前，中国教练组严令，谁也不准谈论何智丽拒绝让球的事，不许对她有任何打扰。

那一场决赛，何智丽如同打疯了一般，3比0战胜了梁英子。

世界冠军！

3

一个世界冠军，让何智丽收获了国内无数的鲜花和掌声。

何智丽回到故乡上海，受到热烈欢迎。上海市体委举行表彰大会，宣读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她的嘉奖令，团市委、市妇联分别授予她“市新长征突击手”“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但这个世界冠军，也让何智丽在乒乓球队内被孤立起来。

这应该是一直有“让球”传统的中国乒乓球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大赛中有队员公然违反“让球”的安排——哪怕是赢下了比赛。

而让何智丽更受到责备的，还不只是“个人利益”不服从“国家利益”这一点。

根据汉城奥运会乒乓女单冠军陈静回忆，就是那次1987年新德里世乒赛，女单八进四的比赛，自己对阵何智丽：“我在新德里的机会其实很好，和何智丽八进四之战，我们真刀真枪地打了第一局，我赢了，但马上有教练来和我说，叫我让给她，我就让了。”

你不让人，却为什么接受别人让你？

针对陈静的回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乒乓队内的让球，往往只告知要让球的一方，当时何智丽未必知道。而另一种说法是，何智丽在输掉第一局球后，还催促教练组让陈静让球：“不是说好的吗？”

两种说法都没有当事人认定，所以均无法考证。但可以认定的是，何智丽之前并不是没让过球。

1986年9月30日，汉城亚运会，按照何智丽自己的回忆，在她生日

那天，她接到了队里的通知：让球给一起进入半决赛的队友焦志敏。

那一次，何智丽照办了。

而就在之后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焦志敏“回让”了她一次。

至于在新德里世乒赛，何智丽为何敢“揭竿而起”？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她背后的资深教练孙梅英。厌恶“让球”的孙梅英赛前关照何智丽，让她别当面说不肯让球，到了场上放开打，“拿了世界冠军，我去机场接你”。

后来，乒乓球队让何智丽写检查，孙梅英确实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奔走呼吁，让何智丽最终免于遭受处分。

然而，有些无形的“处分”，却是躲不开的。

1988年，乒乓球第一次正式成为奥运会项目。当时憋足了劲要拿第一枚奥运女子乒乓球金牌的何智丽，却遭受当头一棒：当时24岁的她，排名世界第一，却没有入选女乒名单。

尽管之后有各种解释，包括“队内民主投票说”“战绩一般说”等，但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没有入选奥运代表队，在当时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那一年的汉城奥运会女乒比赛，当初让球给何智丽的“小队员”陈静，顶住压力，拿到了女单金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

但同样不应该忘记的一个人，是和何智丽互相让过球的焦志敏。在奥运会女乒单打半决赛中，因为怕焦志敏进入决赛后，可能打不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选手赫拉霍娃，焦志敏再一次“受命”让球给队友李惠芬。

在后来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25岁的焦志敏似乎为了证明教练组的错误选择，咬牙战胜了赫拉霍娃，却在领奖台上痛哭流涕。之后她说了一句：“我再也不想打乒乓球了。”随后远嫁韩国，拒绝了韩国乒乓球队的邀请，真的再也没摸过球拍。

4

1989年，在国内已经打不上球的何智丽，远赴日本，嫁给了日本大

阪的工程师小山英之。

小山英之，是大阪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儿子。所以何智丽的婚礼在大阪举行时，证婚人是大阪府知事（相当于市长），而在上海举行婚礼时，证婚人是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

何智丽，从此改名小山智丽，并在之后获得了日本国籍。



当时何智丽的婚礼相当隆重

1992年，在日本的小山智丽重新拾起了乒乓球拍，并在1993年获得了全日本乒乓球竞标赛女子单打冠军。

1994年广岛亚运会，小山智丽是憋着一股劲的，据说，她每天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一度把男陪练累得尿血。

1994年10月13日那一天，确实是小山智丽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在那天上午，她战胜了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当年的队友陈静（当时已代表中国台北参赛），下午，又战胜了当时中国女单技术最全面的乔红，到了晚上，则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击败了当时几乎没有败绩的邓亚萍。

一天之内，连胜中国女乒三大顶级高手。

这份战绩，足以让任何乒乓球选手激动，以至小山智丽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比我作为中国选手获胜时还要高兴。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在大赛中夺取冠军。来日本后，我有六年时间没有参加大型比赛，但在我丈夫的指导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我明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还将作为日本队的一员，争取为日本夺取新的奖牌，以回报日本观众和新闻界对我的期待和鼓励。”[1]

这段话，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到了当时的中国观众。更糟糕的是，经过一些记者有意无意地“修改”，何智丽的一些话成了：

“我为拥有日本这样的祖国而自豪。”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打败中国人！”

“我终于战胜支那人了。”

这些“语录”，在当时的国内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有人曾说，中国乒乓的“海外兵团”那么多，打败中国选手的人也很多，但为什么当时大家只恨小山智丽？

一种解释是：因为她代表日本，喊着“哟西”，打败了中国人。

若干年后，小山智丽在做客国内一档访谈类节目时表示，她平时一直喊“哟西”，甚至在国内打球时就喊，并不针对谁。

5

事实上，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是当时已30岁的小山智丽的最后巅峰。

在那之后，她除了在1996年拿到过一次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女单冠军，以及连续六年蝉联日本乒乓球女单冠军之外，再也没在世界舞台上拿到过什么成绩，也不可能再对中国女乒造成任何威胁。

但是，就是那个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却让小山智丽成了整个中国乒乓球史，甚至中国体育史上不能忽略的一个人物。因为她让国人一直在审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该如何协调，祖国与入籍国的感情该如何归属，以及，那个一直困扰着中国体育优势项目的名词：让球。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南方人物周刊》曾做过这样一项调查：你心中影响时代的30位中国人都有谁？

在这份30人的名单中，居然出现了一个可能早已不为90后知晓的乒乓球选手的名字——

当然，是她的中文名字：何智丽。

馒头说

想和大家说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05年，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上海举行。当时我作为记者，在一次聚会上，碰到了两个在中国乒乓球历史上足以留名的人。一个是庄则栋，另一个，就是小山智丽。

我和小山智丽没说几句话，就记得她穿的是职业套装，妆容得体（当时她已和丈夫离婚，因为对方出轨）。

一位记者同行告诉我，之前何智丽去上海某小学参加活动，与一位区领导“切磋切磋”，结果何智丽打得非常认真，一个球也没让领导赢。

我听到这个就笑了起来，这可能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然后我就想起了陈静后来回忆何智丽的话：“现在想想，让球确实不应该，尤其当时比赛少，拿冠军的机会多难得啊！这次让掉了，下次就不知道要等到何时了！”

每个运动员，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机器。渴望获胜，应该，也必须是每个职业运动员的本能吧。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决赛，我在现场。

那场球，在一个颇大的体育馆里举行，票价出乎意料的贵——一个球馆角落的位置，票价居然是125英镑。那个位置，根本就看不清场中央的球台，很多细节只能通过球馆的LED大屏幕观看。

关键是，那是一场没有悬念的中国球员的内战——李晓霞对阵丁宁，但场馆依然爆满。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专门采访了一位坐在那个角落位置的英国男子，30多岁，我还记得他叫艾伦。

我问艾伦，你平时打乒乓吗？他回答，有时会打。

我又问他，你认识决赛的两个中国选手吗？他腼腆地摇了摇头，说不太熟悉。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票来看？他说，因为中国的乒乓球是世界最强的，他希望带着家人，到现场来感受一下。

然后艾伦的儿子、女儿、妻子，忽然集体冒了出来，在旁边的座位一起向我打招呼。

当时我在心中默默计算票价的总和。

那场比赛，李晓霞最终4比1获胜，丁宁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比赛结束后，连手都没和李晓霞握。

当时我就想，应该是场真打，不存在让球吧。

因为如果这是一场让球，我实在无法面对艾伦一家热情的加油呼喊和掌声。

第一个小故事说的是运动员，第二个小故事说的是观众，这两个小故事，就是我对“让球”的态度。

---

[1] 《光明日报》，1994年10月14日，特派记者罗京生。

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1911年10月10日无疑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爆发了一场改变整个中国命运的革命，这也是台湾“双十节”的由来，而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貌似是一根香烟点燃的……

1

让我们先回到这个日子的前一天——1911年的10月9日。

上午，武昌小朝街85号（武昌复兴路紫湖村武汉市第九中学附近）。

蒋翊武靠着桌子，正在招呼一群人开会。



孙中山后来称蒋翊武为“开国元勋”，这个称号孙中山只对他一人使用过

蒋翊武是武汉革命组织“文学社”的社长（同时也是同盟会会员）。

不要以为“文学社”是个研究风花雪月的社团，其实是一个革命组织。蒋翊武当时召集开会的，是武汉新军中已成为革命党人的标营代表。



武昌起义的浮雕

按照清朝新军的建制，一个“标”相当于现在一个团，一个“营”即相当于现在一个营。当时，武汉驻扎的所有新军，总共一个“镇”（相当于现在一个师），12000人左右，但其中，立志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军官和士兵已经接近3000人。

按照会议的安排，这批清朝的军人，准备在10月16日搞一场大的起义，而起义的目的，就是占领武汉三镇，进而推翻他们为之效力的清王朝。

大清王朝已经坐在了火药桶上。

蒋翊武要做的，就是要点燃这个“火药桶”。

但就在蒋翊武他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与武昌一江之隔的汉口，一个真正的火药桶，居然先被点燃了。

2

同一天的上午，汉口，宝善里14号。

孙武靠在窗边，正在仔细检查脸盆里的炸药。

孙武是武汉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同盟会会员）。“共进会”和前面提到的蒋翊武的“文学社”一样，都以推翻清朝为大任，所以索性就结成了同盟——蒋翊武是总指挥，孙武是参谋长。

曾留学日本，专门学习新式炸药技术的孙武，当时正在自制一个炸弹。按照计划，这个炸弹做好后，要从武汉总督衙门后围墙的武昌帽店楼上甩进总督的卧室，直接炸死湖广总督瑞澂。



孙武。因为孙中山名为“孙文”，所以不少人以为孙武是孙文的亲兄弟

当时的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血性又不失想象力。

这时候，房间里进来一个人，一个叼着香烟的人。这个人不是外人，是“共进会”另一个负责人刘公的弟弟，叫刘同。当时只有14岁的刘同，想进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制作炸药的。

房间里不可能有“此处禁止吸烟”的标语，而孙武和他的同伴们也完全没意识到这一点。

看得津津有味的刘同，顺手弹了一下烟灰。

“轰！”一声巨响。

孙武满脸是血，呆立当场，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惭愧——炸药的质量实在一般，居然一个人也没炸死。

但伤情严重的他还是立刻被同伴送去了医院，同时，所有人立刻撤离。

巨大的爆炸声，很快引来了租界的巡捕。

宝善里，当时属于俄租界。

3

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让人觉得，这批革命党人的革命经验，基本为零。

孙武他们制作炸药的宝善里14号，居然同时也是“共进会”的机关总部。策划起义用的大量旗帜、标语，都没来得及拿走。

最要命的是，还有一本起义人员名册。当时，这本起义人员名册是锁在保险箱里的，但钥匙在一个叫邓玉麟的人手里，他出门买表去了（起义军需要对时）。

闯进屋子的租界巡捕随后搜到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本名册，大惊失色，立刻全部交给了湖广总督瑞澂。

这还不是革命党人下的最后一步臭棋。

因为怕名册被清政府搜去，“共进会”的负责人刘公，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派自己的弟弟刘同，潜回宝善里14号，拿回名册。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后悔多吸一根烟的刘同，只能硬着头皮再回去。

然后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巡捕一举抓获。

14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刘同一被抓获，立刻就招供了：他们是在准备一场起义……

湖广总督瑞澂大喜过望，立刻决定全城戒严，一个也不准出城，然后拿着花名册，准备一个个抓人。

4

再回到小朝街85号。

1911年10月9日，下午。



武昌小朝街85号

蒋翊武一得知宝善里炸弹爆炸的消息，就知道事情要糟。

是坐以待毙，还是殊死一搏？

当然是后者。

蒋翊武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就在当晚，提前起义。

蒋翊武以“总司令”的名义，下达了“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10月9日晚上12点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这封命令被用复写纸抄写了30份，在下午四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其中最重要的一封，是给南湖炮队的，因为他们将担负“发令枪”的责任。蒋翊武特别关照那位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

接下来，蒋翊武决定死守小朝街85号不走了——革命爆发时需要各方面的联络和指挥，只要南湖炮队炮声一响，这里就不再危险了。

晚上11点，蒋翊武没有等到南湖炮队的炮声，而是等到了拿着花名册抓人的警察。

听到楼下敲门声的时候，蒋翊武就知道事情不对了。他对同伴说了一句：“事已至此，不要慌！”然后抄起一颗炸弹就带头往楼下冲。同为革命党骨干的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拿着炸弹，跟在后面。

面对涌入的大批警察，刘复基抬手就甩过去两个炸弹——革命党人的制作工艺实在太差，炸弹该响的时候，没响。

随即所有人被捕。

如果是在打电子游戏，屏幕上是时候出现如下一行英文了：Game Over（游戏结束）。

或者就像是在“斗地主”时，清政府手里一把王炸三个2，革命党手里一把散牌，还能往下打？

但就是这样的一局牌，都能有反转。

首先，蒋翊武居然逃出来了。

之所以能逃，是因为他没剪辫子。当时他留着长辫，穿着长马褂，一副路人的样子，而且他就是按照路人的台词表演的："我只是路过看热闹的，你们抓我干吗？"

这个时候，革命队伍里没有叛徒的重要性就凸显无遗——敌人没有一个认识蒋翊武的，自己人没有一个出卖蒋翊武的。

警察真的把蒋翊武当成了路人，根本没严加看管。于是，在同伴的帮助下，蒋翊武晚上瞅了个机会，翻过围墙就跑了。

其次，湖广总督瑞澂急于邀功，居然以为已经扑灭了革命之火。

在抓了32个人后，瑞澂通告全城："此次匪巢破获，可以安堵一方。须知破案甚早，悖逆早已消亡。"

然后，又急吼吼地向清廷发电："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但是，一手烂牌的革命党人，厄运还没有结束。

因为已经获悉了革命党人的计划，武昌城全城戒严，所有营房的士兵都不准外出，不能与外界接触。

那位最重要的给南湖炮队送信的人，没能把信息传递过去。

换句话说，蒋翊武原来死守小朝街85号，是毫无意义的。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今晚要起义，但是，没人打发令枪了。

而这时候，蒋翊武觉得起义暂时已无法发动，决定离开武汉，先到附近的监利县避避风头。

武汉革命党人的总指挥差点被抓，外出避难，总参谋长被炸弹炸伤，还在养伤。

这场迫在眉睫的革命，到底是爆发，还是不爆发？

时间到了1911年10月10日，晚上7点。

武汉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

离原来约定的起义时间，已经过去了19个小时。

全城戒严中，二排排长陶启胜开始查房了。在查房的过程中，陶启胜发现正目（相当于班长）金兆龙和士兵程正瀛在擦枪（一说在睡觉，“擦枪说”出自熊秉坤回忆录，可信度高），旁边放着一堆子弹。

在全城紧张的气氛中，陶启胜立刻质问这两个人在干什么。

“以防不测。”金兆龙回答。

“是不是想造反？”陶启胜一把抓住金兆龙。

“造反又怎样！”金兆龙索性豁了出去。

“来人！抓起来！”陶启胜对外面的人大喊，然后脑后就挨了一枪托——一旁的士兵程正瀛动手了。



熊秉坤，因为组织第八营率先起义，被孙中山称为“武昌第一枪”，后又被人称为“熊一枪”

情知不妙的陶启胜转身就跑，程正瀛抬手一枪，正中陶启胜腰部。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是这样打响的。

枪声惊动了营外的工程第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他们闻声奔进营内，结果被程正瀛及其他闻讯赶来的起义士兵全部击毙。

阮荣发临死前还喊了一句："此事做不得！要诛九族！"

枪声同样惊动了营外的另一个班长：熊秉坤。

熊秉坤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班长，而是革命党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就在前一天起义暴露之后，熊秉坤在10日的早餐时间就串联好全营的革命弟兄：名册已经被搜集去了，反正是一死，晚上听枪声，起义。

只是这一枪，不是熊秉坤先打的，而是程正瀛打的。

既然枪声已响，熊秉坤就索性吹起了哨子——全部集合！开干！

7

枪声响起的时候，武昌城内各个军营都已经开始骚动起来。

虽然没有了总指挥，也没有了参谋长，但新军各营的革命士兵，就像昨天孙武脸盆里的那盆火药，只需要一个香烟火星，就能引发剧烈的爆炸。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已很熟悉：起义军占领了军火库，炮轰了总督府，一夜激战，占领武昌全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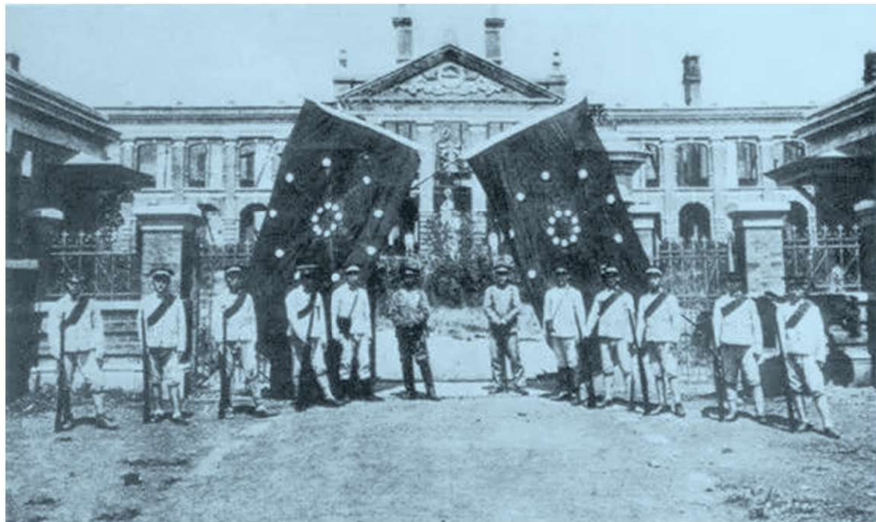
一天后，汉阳起义成功。

两天后，汉口起义成功。

四十八天后，清朝内地十八个省，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

八十一天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百二十四天后，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



武昌起义革命军，背后是革命军旗帜“十八星旗”

馒头说

读完本篇会觉得“武昌起义”完全是一场偶然事件。

其实，历史哪有那么多偶然。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像我在文中提到的那样——中国就像宝善里14号那个堆满火药的房间，只需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点燃。

更何况，“武昌起义”毕竟是事先做过很多准备工作的。虽然起义的前夜还有当天，各种场面都显得有些乱，但历史的大方向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不是1911年10月10日，也会是在未来不远的某个日子，不是蒋翊武这批人，也会是另外一批人。

此外，虽然这篇文章的笔调有些轻松，但那场革命，是真实且惨烈的。比如那一夜一起被捕而没有逃出的蒋翊武同伴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被拷打后坚决不吐露一点情报，在凌晨都被斩首示众。

而在那一夜被人熟知的那些名字：蒋翊武、孙武、程正瀛、金兆龙、熊秉坤、邓玉麟，他们人生的结局都不美妙。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并不是每一段历史，都有那么多的巧合可以说，有那么多包袱可以

抖的。

但也正是因为历史永远是那么冷酷无情，所以，所有理想坚定，并勇于为之奋斗甚至献身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

两个大总统，你选哪个？

这个故事要说的是两个总统。一说起总统，我们总会想起美国，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中国的总统，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总统。

1

1912年2月13日的这一天，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权力更替。

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在这一天，将总统之位让给了北方的袁世凯。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孙中山（左）与袁世凯（右）

对于这件事，从初中到高中的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一般是给人这样的印象：一直领导革命的孙中山不忍国家继续遭受战火，高风亮节，选

择让位，而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所以相信有不少人一直会有这样的不忿：孙中山怎么那么傻？如果换作我，肯定不让！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回到那个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黎明前夜——处在当时的环境——到底谁更适合当大总统？

2

我们首先来看看，保障登上权力最高宝座的第一要素：枪。

“枪”就是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枪响，全国革命形势星火燎原。但有一点必须看到的是，以帮会起家的“同盟会”以及各种革命团体，进行革命乃至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托力量，其实是清朝在各地的新军（除上海、广东和广西是民兵商团起义外，其余各地都是新军起义）。



着1905式清军服的官兵和军乐队

新军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朝政府痛定思痛，决定有别于八旗兵和绿营，按照西式方法操练、装备和建制而建立的，是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而最早体系化操练新军，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就是袁世凯。

凭借当年的“小站练兵”，袁世凯建立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大军队，培养了一批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系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曹锟……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以当初袁世凯编练的新军为基础，全国的新军完整编制达到14镇（一镇基本相当于现在一个师）、8个混成协（相当于旅）、4个标（相当于团），而其中无论是从战斗素质还是武器装备上，遥遥领先的，就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

相比之下，孙中山其实是赤手空拳的，身边除了一批热血沸腾的革命志士外，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兵一卒。



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当时接受清朝官员检阅的照片。北洋军的战斗力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

当时，革命军和北洋军的战斗力差距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我们以清军反攻湖北军政府占领的武汉三镇战役为例。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仔细盘算好了局势，在清廷的催促下，乘坐专车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战北洋军对起义的湖北军政府发动全面进攻。

与袁世凯同时抵达武汉前线的，是被革命党人称为“军神”的黄兴。黄兴抵达时，当时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专门让人做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三个大字，然后派人骑马举旗，在武昌和汉口的街道上来回奔跑，沿途欢声雷动。

然而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实力面前，根本就没什么用——同样是新军对新军，但北洋军只用了两天，就攻克了汉口。

按照当时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埃德温·丁格尔回忆：“革命军中有许多军官，然而看上去全无秩序。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

从黄兴后来组织的一场试图收复汉口的反击战中，多少可以看出当时革命军的实力。



黄兴。1916年积劳成疾，吐血而亡，终年42岁

按黄兴的计划，革命军应该分三路出击汉口，结果第一路的成炳荣部把出击方向搞反了（因为成炳荣喝醉了），官兵们走冤枉路走得筋疲力尽，结果无法出击；第二路杨选青部根本就没行动，因为杨协统（旅长）当天结婚；第三路由黄兴亲自统帅部队，结果手下的甘兴典部带头溃逃，拦都拦不住。

北洋军攻克汉口，在与清廷进行各种讨价还价和恐吓威逼之后，如愿成为“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在11月17日，又命令悍将冯国璋率军进攻汉阳——9天之后，汉阳陷落。

攻克汉阳后，清军完全可以一举拿下武昌，彻底端了湖北军政府的老巢，但袁世凯却下令冯国璋停止攻击。

袁世凯需要湖北军政府的存在，因为那是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

在之后的时间里，袁世凯的军队将炮口对准武昌，一边和革命党议和，一边逼清廷退位。其间不开心时，就下令向武昌城开几炮，震慑下革命党。

在袁世凯的军事实力面前，革命党人完全像是被他捏在手里的小鸟，根本动弹不得。

3

比拳头，比不过，那么再来看看第二个要素：钱。

对于百废待兴的政府来说，钱有时候可能比枪更重要。



1911年5月3日，孙中山（前排右二）在美国芝加哥召集会议，同与会者合影留念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1911年10月12日，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时的孙中山。

按照孙中山自己亲笔写的《革命原起》中记录，那一天，他并不在国内，而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一家旅馆里睡觉。

那天，孙中山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选择立刻回国。

他曾说过，自己最快20天就可以返回国内，亲自参加战斗“以快平生”，但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此时他自己最大的作用，不应是在国内的革命前线，而应是在“樽俎之间”——去和西方列强应酬。

去和西方列强会面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筹钱。

孙中山首先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要求会晤，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随后他就离开了美国，去了英国，当时他希望能得到50万英镑的借款，但是，最终没有拿到一分钱。

随后他又去了法国，他试图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贷款，但又遭到了明确拒绝，他得到的回复是：“四国银行团[1]对此态度完全一致。银行团和它们的政府决定就财政观点方面严格采取中立，在目前情况下既不发行贷款，也不预付款项。”

孙中山无奈之下只能起身回国，在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

在孙中山还没抵达上海之前，就有舆论在说，孙中山这次回来，带回来很多钱，甚至还带回了军舰。而孙中山在抵达后回答《大陆报》采访时说：“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与欢迎者在船上合影

革命当然需要精神，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孙中山曾邀请民族实业家张謇担任财政总长（后出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给孙中山算过一笔账：要维持临时政府的运转，每年至少需要1.2亿元，但临时政府的收入，只有4000万，还有8000万的巨大缺口。

张謇告诫孙中山，要各国承认临时政府，一是看政府有没有统一的军队，二是看政府有没有能力支配财政。

但何止8000万，连计划中的4000万（3000万关税，1000万盐税），都收不上来。

为此，孙中山只能发行军用钞票100万，但因为政府信用不够，很快失败。随后又发行中央公债1亿元，结果只卖出去500万元。

各地财政都不支持中央政府，还反过来要钱。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来要钱，孙中山大笔一挥，批了20万元，专使拿着总统孙中山的批条去财政部领款，得到的答复是：库里只有10块大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只能饮鸩止渴——向日本借款。

孙中山首先想出让的是汉冶萍公司股权。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综

合铁矿、煤矿和炼钢为一体的大型企业，日本早就垂涎已久。孙中山的提议遭遇了各方反对，尤其以当时的实业总长张謇最为激烈：其他项目都可以和外国人合资，唯独铁厂铁矿不行；如果一定要和外国人合资，唯独日本人不行！

张謇没劝住孙中山，最终愤然辞职。但最后在巨大的压力下，孙中山还是放弃了和日本合作。



张謇，清末状元，民族实业家。向孙中山辞职后，他选择了袁世凯政府，后出任农商总长，但在袁世凯称帝前愤然辞职

1912年2月3日，走投无路的孙中山又会见了日本政界和财界的联络人森恪，森恪提出：为防止俄国人南下，临时政府可以将满洲交给日本来保护，以此换取日本1500万元的资助。

面对这样荒唐的要求，孙中山竟然答应了。“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2]。

然而，日本政府的答复更荒唐：钱不借，孙中山必须向袁世凯妥协，委托满洲的问题我们倒是可以继续谈。

之所以孙中山会做出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是因为当时临时政

府的财政已经顶不住了——革命军的部队，每天到陆军部领军饷的都有数十次，武汉前线的部队，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哗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孙中山拿什么来维持临时政府？

4

没有枪，没有钱，那么就比人心吧！

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和领袖，在当时应该是万众归心吧？

真的未必。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西方列强的态度——只取得局部胜利的革命军是否算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列强是否承认他们的政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成立后的第四天，孙中山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表《宣告各友邦书》，希望各国尽快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一个月过去了，各国没有丝毫反应。

2月10日，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邓尼正式回复孙中山：美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和美国持相同态度的，还有俄国和日本。日本的态度，在孙中山借款时其实已表露无遗，他们甚至宣扬要用武力维持中国的君主政体。

列强中，英国和法国没有表态。但法国和俄国是盟友，英国和美国是盟友。早在孙中山去英法借款时，其实已经可以揣摩出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的态度。

那么，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列强希望承认谁？

早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发表了社论，那篇社论里的一句话，其实已经表露了西方列强一致的态度：“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外部势力不支持，那么内部呢？令人遗憾的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又面临袁世凯的压力，孙中山的同盟会已经开始慢慢发生了分裂。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开始追名逐利，拉帮结伙，跑官要官，另一方面，同盟会骨干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已经开始策划成立新的政党，而张謇、伍廷芳等立宪派也成立了一个叫“共和统一会”的政党组织。黎元洪和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之间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

当初同盟会的骨干和各省都督之所以愿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出于现实考虑：可以利用孙中山的声望获得列强的承认，并争取财政的援助。

当这一切都没有实现的时候，开始有人逼迫孙中山让位了。

一天深夜，革命党内一个声望很高又长得很帅的年轻人找到了孙中山，直截了当地希望他让位于袁世凯，并指出：“先生岂欲作洪秀全第二，据南京称帝以自娱，违背驱除鞑虏之誓言乎？”

当时说出这句让孙中山“勃然变色”之话的那个无畏青年，名字叫汪精卫。

而早在1911年的12月9日，汪精卫还接到过另一个人拍给他的电报，其中写道：“项城[3]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拍这封电报的，是声望并不亚于孙中山的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

虽然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始终抱有警惕心理，但在当时内忧外困的形势下，很多人都已经无奈地把信任票投向了他。

5

枪、钱、人心，都已有所交代，最后再来比比“人”。

就是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个人本身。

毫无疑问，孙中山是一名出色的革命家，意志坚定，理想崇高。但他的不足也很明显：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火一般的激情，但缺少必要的治国理政经验。更重要的是，长期在海外漂泊的他（被清政府通缉），除了威望之外，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可靠团队。

而当时的袁世凯恰恰拥有孙中山所缺少的。

袁世凯26岁就领正三品衔代表清廷镇守朝鲜（相当于朝鲜的太上皇了），在朝鲜12年间多次粉碎日本吞并朝鲜的图谋，成绩可圈可点（从日本人多次暗杀袁世凯就可侧面印证他的工作成绩）。



43岁的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能叫出每一个班长的名字，经常和士兵同吃一锅饭，睡一条炕。发饷时，他亲自到场，防止长官克扣。士兵往往泪流满面，感恩戴德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大力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开办新式学堂，包括编练新军，各方面都颇具成效。可以说，从资历、能力、经验、实力、人脉等各个方面，当时全中国要找出一个能和袁世凯比肩的，确实很难。

1912年3月，孙中山和袁世凯有过唯一的一次会面。在那次会面中，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宏伟计划：希望由自己主持，10年内，在全中

国修成20万里（10万公里）长的铁路。后来，他又调整为10万英里（16万公里）。

曾经力挺詹天佑主持建造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京张铁路的袁世凯，听完笑了笑，随即大力表示支持。

结果如何？

在孙中山提出造铁路计划的103年之后——截至2015年底，在近几年我国大力修建铁路的背景下，中国的铁路营业里程才刚刚到达12万公里（中国铁路总公司提供的数据。这个里程仅次于美国，已居世界第二）。

革命需要理想和激情，但治国还是依靠理性和实践。

6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全盘控制下，清廷颁布了退位诏书。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递交辞呈，并同时推举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

2月15日，参议院召开选举大会，17省代表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获得17票。

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但依然充满混沌和迷茫的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袁世凯与各国公使合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曾经明确拒绝孙中山的“五国银行团”（加了日本）随即放款2500万英镑

馒头说

首先要郑重说明一点：写这篇文章，没有半点贬低孙中山先生的意思。

如果你看过孙中山早年从事革命的那些史料，你会真的很佩服他的坚定信念，尤其是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的理念，包括他的行动，都使他无愧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和开拓者的荣誉。

但另一方面，他一生的重要对手袁世凯，长期以来还是有被低估乃至过分贬低的嫌疑。

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呈现袁世凯逼宫清廷的前前后后，可以说，袁世凯在1912年前后逼迫清廷退位，是一场完全值得纪念的“不流血革命”。那真是一幕精彩好戏，袁世凯的城府、手段、胆识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对袁世凯这个人，更多的还是一声叹息。

一个各方面能力和资源都明显高过同时代任何人的枭雄，凭自己的实力开拓了一个大好局面，最后却下出了一着大臭棋。

当然，这和当时袁世凯身边一群劝进的谋士，以及他的熊儿子袁克

定脱离不了关系，但他本人肯定也是难辞其咎，错误估计形势，去开历史的倒车。

一个国父，一个国贼，一念之间，一世英名。

---

[1] 1910年由英、美、德、法四国在华开设的汇丰、花旗、德华、东方汇理四银行组成四国银行团，企图垄断对华贷款。

[2]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

[3]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

“一战”，被遗忘的14万中国人

1998年，法国的巴黎，竖起了一座纪念碑。这应该说是一座战争纪念碑。但纪念的，不是将军和士兵，而是一群来自远方的中国人。

1

如果问你：中国有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无疑会很快回答：当然！而且在这场波及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是牺牲最多的国家之一。

那么如果再问你：中国有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你可能就会有点吃不准了。

事实上，中国参加了，只是没派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了14万劳工，远赴欧洲战场。

整整14万中国劳工。



“一战”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

故事，自然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1914年7月爆发的这场世界大战，虽然开始得有些莫名其妙，但确实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也波及了当时远在亚洲的中国。

彼时的中国，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国内正乱作一团，袁世凯在安抚各方势力的同时，悄悄做着“中华帝国”的黄粱美梦。面对谁都不能得罪的欧洲列强，北洋政府很快表明了自己对于“一战”的态度：中立。

但北洋政府里，有人不同意这样的选择。其中的代表人物，叫梁士诒。

后人对梁士诒评价不高，因为他一是“拥袁称帝”，二是被认为“亲日卖国”。但在那个时期，一直做到内阁总理的梁士诒，见识和能力，在北洋政府内都属于不错的。



梁士诒当时是袁世凯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后来主管过交通和财政

梁士诒并不是一个“战争狂”，但他力主中国应该参加“一战”，而且要明确站队——站在英国和法国的协约国这一边。他之所以这样坚持，是因为就在“一战”爆发一个多月后，他就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两线作战

的德国人必败！

所以，梁士诒认为中国应该尽早参战表态，那么等到战争结束，一来可以从德国手里要回一直被侵占的山东，二来可以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到世界大家庭中。

3

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和财力，怎么可能派兵参加“一战”？

梁士诒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派劳工，不派军队。

1915年，梁士诒开始派人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接触，询问是否可以以派遣劳工的方式，帮助协约国。

但英国人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们也看出了中国的意图。朱尔典在发回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到：“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战后拥有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

英国人知道，只要接受中国的援助，无论是劳工还是军队，都会让中国加入协约国的一方，进而让中国在战后以“战胜国”的姿态和他们一起享受权益。

所以，英国人拒绝的理由，摊开来说就是一句话：你们不配！

但是，战局的发展，却让英国和法国越来越扛不住了。

1916年2月，著名的“凡尔登战役”爆发，法国军队伤亡超过50万，史称“凡尔登绞肉机”。1916年6月，“索姆河战役”爆发，英国军队伤亡超过40万（法国又赔进去20万士兵），史称“索姆河地狱”。



凡尔登战场的炮弹壳

经历了两年多的战争，英国和法国国内的男性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召入伍，奔赴前线。后方劳动力奇缺，工厂里的大量岗位已经是由妇女来承担了。在这场惨烈大战还看不到结束迹象的时候，“人”成了决定胜负的一大砝码。

所以，英国和法国自然想到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

4

1916年5月，天津大经路（今中山路）突然出现了一家叫“惠民公司”的机构。这家公司没有其他的业务，就是专门负责招聘劳工，然后向陷于“一战”泥潭的英国和法国输送劳动力。

之所以设立这家公司，是因为当时的北洋政府还没有向德国宣战，不愿意得罪德国，所以一定坚持要以“公司”的名义运营。

江苏丹阳的农民朱桂生（他是最后一个辞世的华工，活到105岁）曾回忆当初看到的招聘广告：“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

原文肯定与朱桂生的回忆有出入，但大致意思是差不多的。由此可见，当时吸引华工去欧洲的主要诱惑，是钱。

到底有多少钱？

按照当时给出的标准，去欧洲的普通华工，每人每天可以领到1法郎，如果是工头或管理者，还会更多一些。这样算下来，一个普通华工一个月能拿到25法郎左右（当时1块银圆兑5法郎），此外，只要你去了欧洲，每月你在中国的家属，还能领10块银圆。

当时的一块银圆，能买30斤上等的大米，还有近10斤的猪肉。而一般的体力劳动者在国内的报酬，也就每月四五块大洋左右。所以说，这个招工条件，是相当优厚的。

所以，告示一贴，报名者无数。



当时英国设立在威海的简易劳工营。劳工要先在这里培训再去欧洲

当然，对于应征者，法国和英国也有考核。他们会进行严格的体检，只挑那些身强力壮的。为了找到更合适的“工源”，英国后来索性把“招工办”从香港搬到了山东威海。法国人也认为，山东人更能适应他们国家的气候。所以在奔赴欧洲的华工中，绝大部分都是山东人（法国人后来回忆，他们到了法国之后每天都要吃苹果）。

1916年8月，第一批大约1000名华工，搭乘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

很多甚至之前连村子都没出过的淳朴中国农民，来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接触过的世界，以及，惨烈的战场。

在先后抵达欧洲的14万华工中，英国人分走了10万，法国人分走了4万，法国后来还转借给美国人1万名华工，为美国欧洲远征军服务。

按照最初的约定，中国派出的华工是不参加战斗的。但实际上，在战火连天的欧洲战场，怎么可能置身事外？

前面提到的那位朱桂生，编号“27746”，一开始被送到法国拉罗谢尔附近的面粉厂工作，后来人手吃紧，就被安排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

在法国的朱桂生还算是幸运的。英国招收到华工后，直接把他们都投放到了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掩埋尸体，清扫地雷，修路架桥……英国人用华工替代了自己国家的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让他们承担了最艰苦、最繁重，甚至是最危险的工作。



华工在战场上紧急修复被炸毁的铁路

可能你现在很难想象，一群从农业国家走出来的人，进入现代文明国家中，并且直接遭遇最惨烈的战争，会是怎样一幅景象？

有一批华工刚刚抵达英国阵地，恰逢德国的轰炸机前来轰炸。第一

次看到飞机的华工们纷纷走出工事好奇地抬头看天，然后被扫射和轰炸得血肉横飞。

1917年2月，运送华工的法国轮船阿陀斯号遭遇德军潜艇的伏击，船体被一发鱼雷击中，船上的540名中国劳工全部遇难。

一位名叫张邦永的华工后来回忆，他们有些工作的地方，和敌人的战壕也就相距50米左右。华工就站在敌人的面前挖战壕，战壕都挖好后，英国士兵才进来。

还有更悲壮的。

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德军突破了防线，直接冲入了英法联军的阵地，正在挖战壕来不及撤退的华工们，只能用铁锹、镐头与德军展开肉搏。当英法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



搬运炮弹的华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聪明的天性，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工最初都是承担最底层的体力工作，但很快，他们就成为各个工厂中“第一流工人”。在那个时候，在法国后方的港口、车站、仓库等任何地方，只要看到有起重机，在里面操作的基本都是华工。法国海军还

专门声明：外籍劳工，他们只要华工。

存放在威海档案馆里的一份英国陆军1918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

而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6

然而，华工们得到的待遇，却配不上他们的付出。

原本合同上签订的“包吃包住”，到了国外，都被推翻了。华工的伙食费、置装费、医疗费等，都是要在薪金中扣除的。一个普通华工，每个月可能只能拿到原先承诺薪水的一半。

比起克扣薪水，更不能让华工忍受的，是人格上的歧视。

每一个华工手上，都有一个铜镯，上面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编号，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是集中营式的管理，平时不准外出。

法国人对华工要宽松一些，比如允许他们穿着平民服装去酒吧或咖啡馆，但英国人却因此提出抗议，认为法国人这样管理，会加大英国人管理的难度。

英国人对华工的管理非常严格，不仅施行集中营式管理，对不服从命令的华工，动辄鞭打，甚至枪决。在后来被发现的英国人用来和华工交流的语言手册上，都是命令式的语句，其中还有一句：“这是欧洲人用的厕所，中国人不准用。”

1917年，几名华工因为内急使用了英国人的厕所，被捆起来残酷殴打，最终引发了华工的一场暴动。



在法国一家火药厂里工作的华工

有些之前连飞机都没看到过的华工，在天天遭遇轰炸之后，精神失常了。而也有一些华工，因为不想参加自杀性的任务（排雷），最终选择在营地里挖一个坑，躺在坑中自杀——他们相信，这样可以留一个全尸，让灵魂飘回故乡。

1919年，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上有这样一句话："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7

战争，终究会有结束的一天。

谁也没想到，等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华工竟然会成为法国女性眼中的"香饽饽"。

1918年7月，"一战"已经临近尾声。有一天，一位法国姑娘跑进当地华工服务中心，她的诉求只有一个：请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给她保媒，因为她要嫁给华工中的一个"杨先生"。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当时就在那里服务，他接待了那个姑娘。出于好意，蒋先生提醒法国姑娘还是谨慎考虑，因为两国生活习惯相差很大。

但那个法国姑娘非常坚持。她的理由是，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她可能就会嫁给一个莫名其妙的法国男人——挣一点钱就喝酒，喝醉了就回家打老婆。而她和“杨”已经接触一年多了，从没发现他喝酒，而且有很多法国男人没有的优点。

这位“杨先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当时的法国，青壮年男性大多被征召入伍，劳动力奇缺，所以很多女性不得不进入工厂，顶替男子的岗位。这样就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华工。

这些华工，都是从中国挑选过来的18～40岁、身强力壮的劳工，吃苦耐劳，悟性又高。而不少法国女性也发现，华工会把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节省下来，按时寄回家，剩下的生活费也花得非常节省。这种顾家和自制的性格，让她们对华工渐生好感。

1917年，法国勒阿弗尔甚至还发生了当地人的聚众抗议，他们抱怨：“如果法军继续伤亡的话，法国就没有男人了。因此，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什么意义？最终结果只会使中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且迟早瓜分我们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



当时很多法国工厂里，除了华工，就是妇女

而法国内务总长鲍慕司甚至在媒体上发布通告说：“华工多数是家境贫寒的苦力……我们法国的妇女，为什么不嫁给那些凯旋的法国士兵，而偏偏打算与黄皮肤的苦力联姻呢？希望广大法国女子迅速觉醒。”

法国的法律还规定：本国女子若嫁与外国男性，则自动失去法国国籍。

但针对这一点，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也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可以代负相关责任。江苏籍的华工张长松和他的法国妻子露易丝，后来就是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

8

当然，大部分劳工还是回家了。

据统计，大约有3000名华工因与法国妇女结婚，或者得到了新的雇用合同，最终留在了法国——他们也成了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民法国的中国人。

从1918年11月1日开始，到1921年结束，大概有11万左右的华工最后回到了中国。除去留在英国和法国的华工，大约有2万名华工渺无音讯，埋骨他乡。其中，留下名字的，只有1874个。

1925年，当时的旅法华工总会写信给法国政府，希望能开辟一个纪念华工的特别墓地，但遭到了拒绝。

直到1988年，在纪念“一战”胜利70周年之际，法国政府才公布了有关华工的文献，让这段历史大白于天下。

1998年11月2日下午，在巴黎13区唐人街区的布迪古公园内，举行了一个庄严隆重的仪式——法国政府为“一战”中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工竖立纪念碑暨揭幕仪式。



法国北部索姆省华工墓地

纪念碑碑文由法国和中国两国文字刻着：

A LA MEMOIRE DES TRAVAILLEURS ET COMBATTANTS CHINOIS MORTS POUR LA FRANCE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

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

所有的墓碑，都朝向东方。

馒头说

1919年6月27日，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

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包裹。他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是一把手枪，还有一张字条："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

寄出这个包裹的，就是当时留在法国的华工，山东省莱芜县牛泉镇上裕村农民毕粹德，编号97237。

这无疑是让人感慨的一个故事。

当初北洋政府派出14万华工，为的就是能以"战胜国"的身份，在战后向德国讨回山东。但是，众所周知，"一战"结束后，列强并没有把中

国视为“战胜国”，而是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了日本。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宣而不战”。

这句话，真心对不起在异国他乡同样抛头颅洒热血的14万华工。

有人说，华工也是为了挣工钱去的。没错，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但这些华工到了欧洲战场，付出了绝对对得起那份薪水的劳动，乃至生命。他们并没有辱没中国人的形象，正相反，他们让世界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中国人的勤劳、勇敢和聪慧。

在那个风雨飘摇，“弱国无外交”的年代，你还需要他们做到什么呢？

千言万语，不如鲁迅的那句话：

“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二战”期间，居然还有这样的一批日本人

说起“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相信大家恨之入骨。但今天要说的这群日本人，可能和你原来知道的不太一样，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应该是美国人……

1

1941年12月7日，美国夏威夷珍珠港。

作为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赌赢了人生下注最大的一把牌：这一天，日本海军成功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驻扎的珍珠港，以损失29架飞机的微小代价，炸沉美国海军4艘战列舰（另有4艘被炸瘫痪）和其他18艘大型舰船，美军官兵被炸死2403人，炸伤1178人。

“偷袭珍珠港”，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

当偷袭成功的消息传到山本五十六的作战指挥室时，其余人都一片欢腾，只有山本五十六神色冷淡，他说了一句：“我们只是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而已。”



被关押的日裔美国人



日军偷袭珍珠港

应该说，山本五十六那时候可能已经想到了美国人之后残酷的报复，以及日本的军民将陷于无尽的战火之中。

但不知道那时候他是否会想到，有一群特殊的日本人，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命运。

那是生活在美国本土的数十万日本人，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日裔美国公民。

2

珍珠港被袭击的第二天，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靠着太平洋）的日裔，就开始感受到明显压力。

当时的加州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在美国的日本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全部被开除公职。不仅如此，他们的律师资格证和行医证都被吊销，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被禁止出海。

奇怪的是，在加州，日本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人口只占州总人口的1%（大概10万人左右），而在更前线的夏威夷，日裔人口占到当地人口的1/3（15万），却没有遭到什么冲击。

一开始，美国的民众还是对日裔美国人抱有同情心理，《洛杉矶时报》当时发表的评论，将这些日裔公民的性格描述为“从出生接受的教育就是成为品行很好的美国人”。

但一个月过去后，随着日本在东南亚的节节胜利，在本国的太平洋舰队依旧瘫痪的情况下，美国大陆开始恐慌起来。州检察长沃伦致电华盛顿：“本州司法官员一致认为，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比日本侨民更危险。”



“二战”中的日裔美国人

舆论也随即开始转向。

当时西海岸有一家报纸的专栏这样写道：“为什么要对日本佬这么好？他们占了停车位，他们在邮局排队时站在你前面，他们在公交车和电车上有座位。让他们受苦、挨饿吧！谁反抗就让谁死！我憎恨日本人，恨所有日本人！”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保险公司取消了日裔美国人的保单，牛奶工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拒绝卖给他们食物，加油站不给他们加油，银行冻结了他们的资产。

理发店的窗户上写着："日本佬进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概不负责。"饭店窗户上写着："本店会毒死老鼠和日本佬。"有些地方，日裔美国人甚至被拒绝进入公共厕所。

政客也随即加入了反日裔阵营。

爱达荷州州长蔡斯说："日本佬跟老鼠一样生活，像老鼠一样繁殖，像老鼠一样活动。"

阿肯色州州长霍尔姆说："对于日本人的习俗，或者说是怪癖，我们的人民不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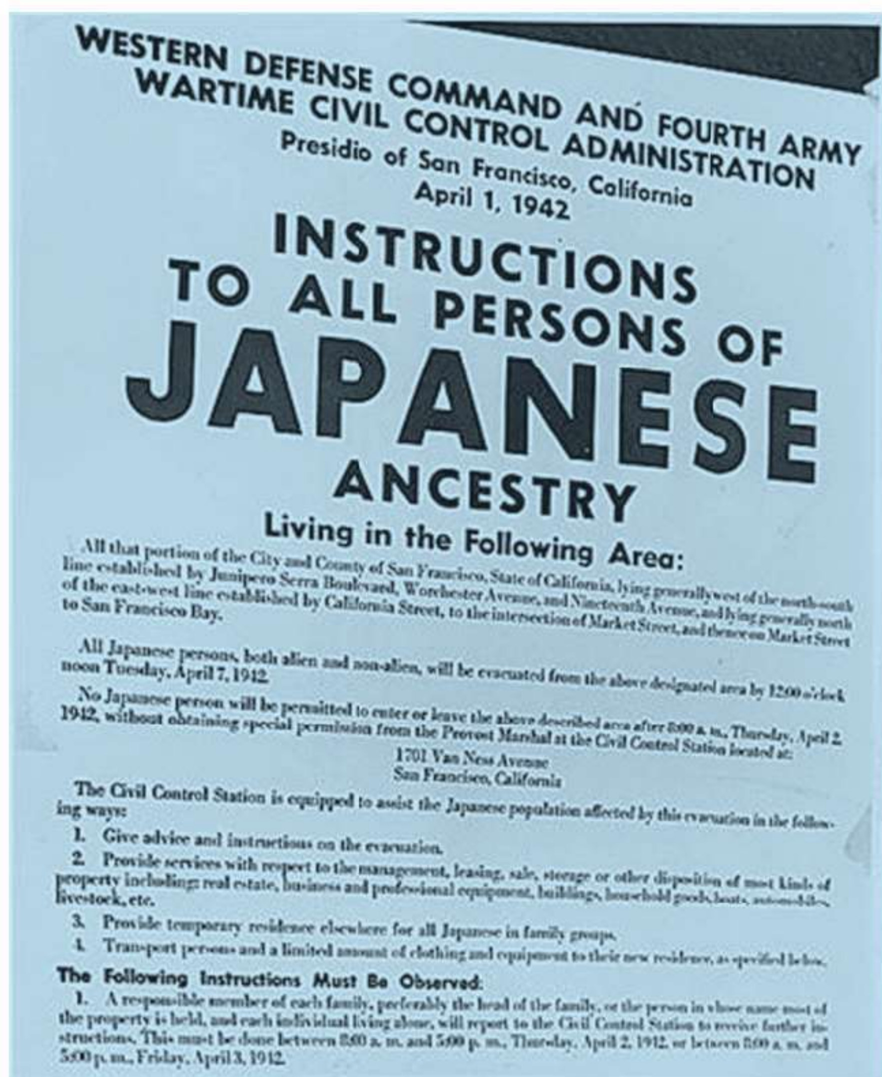
这个杂货店的日裔美国人老板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就贴出了这个标语：我是美国人。但之后他也被抓走关押了

堪萨斯州州长佩恩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佬，不欢迎日本佬。"他甚至让州警察禁止日本人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抵触日裔美国人，他们希望能够将本州的日本人集中管理，而能让这一愿望实现的，只有美国总统。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罗斯福，当时正在被对日作战的各种情况搞得焦头烂额，并没有太多精力去处理国内的反日情绪。

于是，罗斯福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手下人去处理，在层层转包后，美国西部防御司令德威特中将成了实际的决定人。这位将军是坚决主张将日本人集中关押管理的，“在美国，我不想有任何一个日裔人。他们是危险因素。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他们的忠诚”。



WESTERN DEFENSE COMMAND AND FOURTH ARMY
WARTIME CIVIL CONTROL ADMINISTRATION
Presidio of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pril 1, 1942

INSTRUCTIONS
TO ALL PERSONS OF
JAPANESE
ANCESTRY

Living in the Following Area:

All that portion of the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State of California, lying generally west of the north-south line established by Junipero Serra Boulevard, Worchester Avenue, and Nineteenth Avenue, and lying generally north of the east-west line established by California Street, to the intersection of Market Street, and thence on Market Street to San Francisco Bay.

All Japanese persons, both alien and non-alien, will be evacuated from the above designated area by 12:00 o'clock noon Tuesday, April 7, 1942.

No Japanese person will be permitted to enter or leave the above described area after 8:00 a. m., Thursday, April 2, 1942, without obtaining special permission from the Provost Marshal at the Civil Control Station located at:

1701 Van Nes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The Civil Control Station is equipped to assist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affected by this evacuation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Give advice and instructions on the evacuation.
2. Provide services with respect to the management, leasing, sale, storage or other disposition of most kinds of property including: real estat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equipment, buildings, household goods, boats, automobiles, livestock, etc.
3. Provide temporary residence elsewhere for all Japanese in family groups.
4. Transport persons and a limited amount of clothing and equipment to their new residence, as specified below.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Must Be Observed:

1.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each family, preferably the head of the family, or the person in whose name most of the property is held, and each individual living alone, will report to the Civil Control Station to receive further instructions. This must be done between 8:00 a. m. and 5:00 p. m., Thursday, April 2, 1942, or between 8:00 a. m. and 5:00 p. m., Friday, April 3, 1942.

对于日裔公民的转移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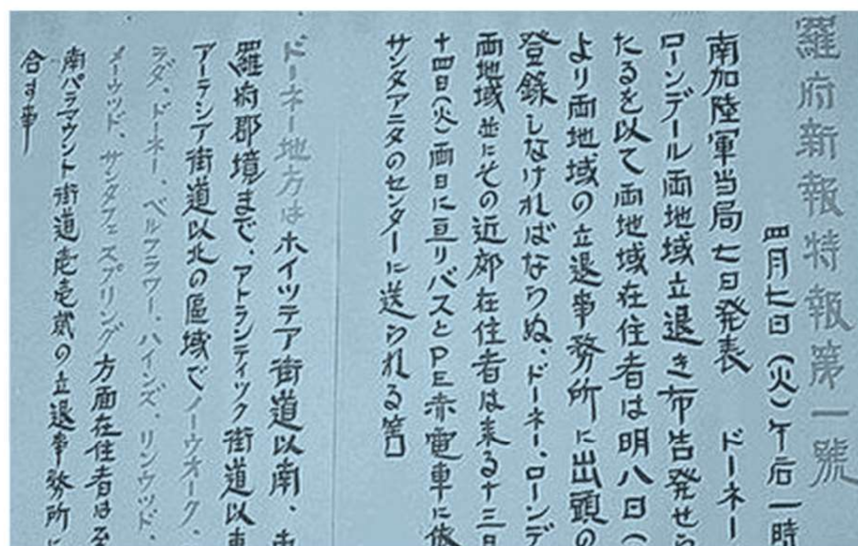
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9066号行政令——作为一个深

受人民爱戴的总统，那绝不是罗斯福的光荣时刻。

按照9066号法令规定，总统授权战争部建立“军事区”，可以命令“任何人或所有人”撤离。

这也就意味着，将日裔美国人驱逐并集中关押管理，成为合法行为。

3月27日，是法令规定“自愿迁移”的最后截止日期。3月30日，从黎明开始，强制撤离的“第20号平民禁令”开始贴到每一个日裔美国人家庭的家门上。被强制撤离的日裔美国人只允许携带个人物品，刀片和白酒全部被没收，投资和银行存款也全部被没收，所有的申诉和抗议全都无效。


羅府新報特報第一號
四月七日（火）午后一時
南加陸軍当局七日発表　ドーネー
ローンデール両地域立退き布告発せら
たるを以て両地域在住者は明八日（
より両地域の立退事務所に出頭の
登録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ドーネー、ローンデ
両地域並にその近郊在住者は来る十三日
十四日（火）両日に亘りバスとPE赤電車に依
サンタアニタのセンターに送られる筈
ドーネー地方はホイッテア街道以南、南
羅府郡境まで、アトランティック街道以東
アーテシア街道以北の區域でノーウオーク、
ラダ、ドーネー、ベルフラワー、ハインズ、リンウッド、
メーウッド、サンタフェスプリング方面在住者は全
南パラマウント街道壱壱弐の立退事務所に
合す事

日本人生活区张贴的“重新安置”命令



等待运送大巴的日本家庭，每个人身上都系着标签防止走散

运输卡车停在日本家庭的门前，士兵在人行道上喊：“出来！日本佬！”这不由让人想起了德国士兵在欧洲的命令：“走！犹太人！快走！”

就这样，日裔美国人拖家带口，上了卡车，被送到了各个州设定的“战时安置中心”，这些中心，全都设在整个国家最荒凉的土地上。



被安置的日本家庭的行李

根据当时的统计，第一代日本移民，损失的农田和设备价值7000万美元，水果蔬菜损失3500万美元（当时加州一半的水果是日裔美国人出产的），年收入减少5亿美元，其他存款、股票、债券不计其数。

4

那些被安置的日本家庭，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

一个六七口人的日本家庭，在安置中心里大约能分到一间4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一个用油毛毡搭起来的小木屋。屋子里有一个炉子（有的地方没有炉子）、一盏吊灯，以及床，其他的家具基本要他们用废木料自己动手做。



一个比较典型的安置中心日本家庭木屋

房间里没有自来水，营房每个区共用一个洗衣房、食堂、厕所和露天淋浴室——妇女们不得不在站在高高岗哨上的看守注视下洗澡。当她们提出反对意见时，看守反问她们：“你们现在是美国人吗？”



食堂吃饭

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安置中心四周拉了铁丝网并通了电，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巡逻，不准他们外出。晚上，强烈的探照灯灯光会照进每户家庭的窗户。

这是安置中心吗？并不是，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词来形容那些地方——集中营。

相比于纳粹集中营，只是食宿条件略好，没有焚尸炉和虐待而已。

在遭受了明显不平等的待遇后，那些日裔美国人是怎样反应的？

他们没有任何的反抗。事实上，所有的营地都没有发生过一起暴动事件。不仅如此，就连营地看守都感到诧异的是，每天早上，日裔美国人都会集合升星条旗，在他们的童子军（每个营地只有一个）打鼓吹号伴奏下，敬礼。



加州安置中心的星条旗

每个星期六晚上，营地里的日裔美国人都会唱《美丽的美利坚》，在营地设置的课程里，最受欢迎的课程是英语和美国历史。

在艰苦的环境里，日裔美国人依然想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和忠诚，而且，他们想做的事还不仅仅是在营地里。

5

1943年，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陷入死战，同时开始在欧洲战场派出登陆部队，兵源严重吃紧。

也就是在这时候，日裔美国人获得了当兵参战的机会。

尽管日裔美国人的二代年轻移民都对自己家庭和父母辈遭遇的不公颇有微词，但面对当兵的机会，还是争先恐后地报名——他们觉得，只要自己在战场上表现得好一点，自己在营地里的亲人就会被照顾得好一点。



1944年2月22日，来自科罗拉多州安置中心的48名日裔美国人在丹佛征兵站报名参军，准备接受体检

一批日裔美国人进入了美军情报系统，负责破译日军的密码。1943年4月14日，美军截获了日军一份机密电报，这份电报使用的是日军当时认为“无法破译”的新密码，但美军的日裔密码专家组熟悉日文的语法习惯，仅仅用了6个小时就破译了密码。

4月18日，发动“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在视察日军基地的飞行途中，被通过破译密码得知他行程的美军战斗机埋伏，最终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击落在原始丛林中，机毁人亡。

1944年7月，日裔情报员破译了之前被标记为“无军事价值”的日军情报资料，找出了“大日本帝国”军火库存清单，使得之后美军的B–29轰炸机有的放矢，一炸一个准，大大缩短了战争进程。

更多的日裔美国人，直接投身到了一线战场，他们被整编成了著名的美国陆军第100营和第442团。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原本在美军中服役的日裔美国人立刻就被隔离了出来。但让美国军方头疼的是，这批训练有素的官兵，既不放心让他们参战，也不放心把他们解除现役恢复平民身份。想来想去，决定把他们组成第100营，投入到欧洲战场（之后又组建了442团）。

日裔美军参加的主要是欧洲战场对意大利的作战（对手主要是纳粹德国）。当时这批部队被美国人看不起，被叫作“土拨鼠部队”[1]，艾森豪威尔甚至拒绝接纳他们。

但抱着为家人必死一战和证明自己忠诚想法的日裔部队，很快就以不怕死的战斗姿态震惊了盟军。面对剽悍的纳粹德国军队，100营和442团的日裔士兵仿佛不要命一般地拼死攻击，打到激烈时，不少日裔美军高喊着口号直接冲向德军阵地做自杀式攻击。

这两支清一色由日裔组成的美军，转战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十场战斗。被称为“土拨鼠营”的100营，后来被称为“紫心营”，因为他们获得了不计其数的紫心勋章。



1945年4月，第442团受命进攻德军防守的“哥特防线”，这条防线盟军足足打了6个月没有攻克，442团抵达后，仅一天攻击就渗透了防线，三周之内把德军赶到了波河流域，把美军高层看得目瞪口呆

442团的战时伤亡率达到314%，阵亡人数达到了刚组建时的3倍，依靠不断继续补充日裔士兵才保持建制完整，成为“二战”期间美军伤亡

率最高的步兵团，但也是整个美国陆军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团级部队。

整个442团（后第100营并入，保留番号）有18143人次获颁各种勋章，荣誉包括7次总统集体嘉奖（美军著名的101空降师只获得2次，陆战1师仅获得3次）、21枚荣誉勋章、52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560枚银星勋章、22枚军团勋章、4000枚铜星勋章和9486枚紫心勋章等。

据说“二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检阅一支战争中最出色的陆军部队，结果一查下来，是442团，考虑到多方面因素（整个“二战”的美军，难道就日裔美国人打得最英勇？），最后换了支部队。

整个“二战”期间，有17600名日裔美国人参军，应该说，他们还是凭借自己的表现赢得了尊重，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却未必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



1945年5月10日，一个西雅图的日本家庭从安置中心返回家里，发现玻璃已全被敲碎，家里被洗劫一空，还到处喷了反日标语

这些日裔美军士兵回到国内后，哪怕身穿制服，却依然被饭店和理发店拒之门外，战争部试图带着日裔美军军官到西海岸巡讲，告诉美国老百姓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但效果不是太理想。

有一次，一个农民问一个日裔美军中尉：“你们连里死了多少日本

佬？”

中尉回答：“到战争结束时，我们排的日裔士兵只活下来两个。”

那个农民回答：“太可惜了！居然还剩下两个！”

当时的会场听众都一言不发，并没有人阻止。

最让这些军人失望的是，他们父母辈当时的农场、家园、产业，大多数被白人占据了，并没有归还。

6

但错误总有被纠正的一天。

从1945年开始，陆续有日裔美国人就“二战”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提起诉讼。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日裔美国人重新安置索赔法》（The Japanese-American Claims Act）。不过，直到1962年，美国不过赔偿了3600万美元。

1980年，迫于日裔美国人的压力，卡特总统开始重新调查此事，并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在美国的日裔公民几乎没有任何不忠诚举动，设置集中营不具备军事必要性。1983年2月24日，美国国会正式承认“二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公民是一个错误，之后的索赔要求骤增。

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了公民权利法案，代表美国政府发表道歉，并向每个集中营幸存者提供2万美元的赔偿，最后总共赔偿了16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3亿美元左右）。

馒头说

看完上面这篇，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否有点复杂。

似乎在这个故事里，美国不是想象中的美国，而日本，也不是想象中的日本。

说实话，我搜集第442团的照片时，看到那些穿着军装的日本人，也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他们穿的是美军的军装，拼死打的，是纳粹德国。

但这却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一段历史。

而也正是这段历史，才会让我们看到，日本极右翼哪怕再疯狂，但在日本国内，总有一批又一批的反战人士，发自内心地抵制战争，祈求和平。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卷入的绝不仅仅是交战的双方军队，还有更多无辜的平民百姓，甚至是你自己预料不到的同胞手足。

那些埋骨欧洲战场的日裔官兵为之奋斗的，是全人类都认可的光明。

永远不要再有战争。

---

[1] 因为日裔美国人身材矮小，且善于偷袭，故有此称。——编者注

一段匪夷所思的“美国往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一道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法令，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1

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刊登在1933年12月5日美国报纸头版的照片。

乍看上去，以为是美国人在庆祝他们的球队获得了世界杯冠军——当然，美国人只爱橄榄球，不爱足球。



美国宣布废除“禁酒令”

或者，看上去像是一个生日派对？但从酒保双手高举的开心劲儿来看，又不像，而且也找不到“寿星”在哪儿。

其实，他们确实是在庆祝一件事，只是庆祝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手里的酒。

这一天，美国人欢天喜地：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喝酒了。

说起来真的是有点匪夷所思：在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自由气息的美国，居然曾经像一个宗教国家一般，通过严格的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禁

酒。而且，这一禁，居然就禁了整整14年。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禁酒时期”。

2

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14年——1920年1月17日。

这一天的午夜零时，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酒法案正式生效。

这条法案规定：

1.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

2.自己在家里喝酒不算违法，但与朋友共饮或举行酒宴则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1000美元及监禁半年。

3.21岁以上的人才能买到酒，并需要出示年龄证明，而且只能到限定的地方购买。

毫无疑问，这是条相当严格的法案。换句话说，从法案颁布的那一天开始，美国其实基本上成了一个禁酒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要分析美国禁酒令出台的背景，可能写一本书都说不完，但总的来说，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



禁酒初期，美国开始大批量销毁葡萄酒

第一个原因，禁酒令的强制推行，来自强大的宗教背景——美国的清教徒。

1620年，一艘载有102名乘客的“五月花”号轮船，来到了美洲普利茅斯建立了殖民地。在102名乘客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欧洲受到迫害的清教徒。

这批人在旅途中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成为美国未来《独立宣言》的蓝本，也成了美国的立国之本，而清教文化，也就成了美国的文化之源。

作为第一批欧洲移民的后代，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都是从小受着清教的文化熏陶长大：反对奢华纵欲，主张勤俭忍耐。而酒，他们认为恰恰是违反这些信条行为的最大推动力：醉酒闹事，饮酒伤身，酒后冲动……

总之，中国人说，“万恶淫为首”，清教徒们可能要改成“百恶酒为先”。



五月花号



波士顿的女性踩碎酒馆用于冰镇啤酒的冰块，欢庆禁酒令开始实施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蓬勃兴起的女权运动。

试问，谁喜欢喝酒？无疑大多是男性。喝了酒后的男性，谁最反

感？无疑大多数是女性。

直到1920年以前，美国的女性是没有投票权的（比欧洲晚）。从教育权、财产权、经商权再到投票权，美国的女性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而禁酒则成为一个有力抓手——妇女们认为男人酗酒会催生家庭暴力，会带坏孩子。所以当时禁酒运动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美国的女性。

就在禁酒令颁布的8个月后，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美国女性获得了投票权。

第三个原因，则来自精英主义的“排外”。

到了20世纪初，美国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综合国力，都大大超越了英国，但架构起这一繁荣的移民文化，却也带来了不少社会冲突和矛盾——传统的美国白人（尤其是清教徒），有道德优越感，有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种族荣誉感，但总觉得有不和谐感。那些在大街小巷开着各种酒馆和娱乐场所的人，包括他们的消费者，都是谁？黑人、犹太人、华人等，他们收入较低，素质较差，行为粗俗，让白人清教徒觉得，必须要做些什么来捍卫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与此同时，经济繁荣带来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外来移民的涌入、道德水准的下降，他们一直有一种改良的愿望——或者概括为“进步主义”。而实现这种主义，一大手段就是通过大量的道德立法，禁酒令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

1920年1月16日，也就是禁酒法案生效的前一天，美国各大城市道路上的运酒车络绎不绝——人们都赶着时间把酒运回家里收藏。到了那天的晚上，街道上空无一人，因为人们都在家里或其他公共场合举行最后一次合法的、有酒精的聚会。

一位参议员在一个晚餐会上举杯祝酒：“今晚，是美国人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

全场热烈鼓掌。

3

那么长达14年的美国禁酒，效果究竟如何？

非常遗憾，有数据统计显示：禁酒期间的美国酒类消费量，比禁酒前提高了50%。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其实至少有一点道理是相通的：禁书往往卖得最热，禁片往往想看的人最多。

而且，美国的“禁酒法案”明显存在一条漏洞：禁止销售含酒精的饮料，却并不禁止贩卖酿酒的原料。

于是，各种各样的“擦边球”就开始出现了。

啤酒厂不能卖啤酒了不是吗？法律没禁止我卖麦芽和啤酒花呀！当时，很多啤酒厂都开始出售麦芽和啤酒花，然后注明这是用于“烹饪”或“烘焙”。

当时开始出现一种叫“NearBeer”的啤酒，酒精度正好控制在0.5%，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啤酒厂会提供详细的说明书，告诉买家：千万不能做以下的一些步骤，不然就会酿出高酒精度的啤酒，后果自负！

可以想象，卖家和买家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然后一种叫“VineGlo”的葡萄酒原料也开始盛行起来，这是一种经过调配的浓缩葡萄汁，30天后，可以自行发酵成葡萄酒。还有一种“葡萄砖”，以葡萄干加酵母的包装形式出售，生产商会在包装上附加“温馨提示”：如果您不小心把这些东西加入到一加仑的水中再密闭保存，那可要千万当心！因为20天后可是会变成葡萄酒啊！

如果说，以上这些“小动作”还算温情脉脉的话，那么对于一些原先嗜酒如命的酒鬼的行为来说，那可就要命了，是真的要命。



著名的“VineGlo”

由于禁酒，美国地下市场上开始出现大批用工业酒精制作的劣质酒，一批一批的酒鬼为了解馋，前仆后继，饮鸩止渴。当时有一个叫牙买加生姜的医疗偏方，使用者称之为“杰克”，它有非常高的酒精含量。有些无良店家便将“杰克”掺入工业用可塑剂，结果导致数以千计的受害者足部和手部瘫痪，最终造成大批人四肢麻痹、大脑不可逆受损甚至直

接中毒死亡。

4

禁酒的效果不佳，这倒也算了，但随之带来的另一些后果，却是当初支持禁酒令的人们没有想到并完全无法接受的。

禁酒令实行了14年，居然让美国的黑社会迅速崛起，并大大滋生了政府各个部门的腐败，尤其是司法系统。

正规市场一旦没有某样急需品出售，随之而兴起的是什么市场？无疑是黑市。美国禁酒期间，走私和地下交易酒类，成了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从而促使大量的黑帮开始从事地下的私酒酿制生意。发展到后来，黑帮从事酿酒、运输（组建卡车公司）、贩卖（大量的地下酒吧），已经形成了“一条龙”产业，黑帮之间为了利益的火并也开始层出不穷。

在禁酒之前，美国的黑社会几乎没有资金来源，而一禁酒，黑帮开始财源滚滚。



禁酒时期的美国警察“搜酒队”

黑社会的迅速扩张，很快影响到了政府系统，首当其冲的是司法系统。警察之中，喜欢饮酒的大有人在，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有什么动

力去搜查贩卖私酒，取缔地下酒吧？这些都打击完了，他们喝什么？不仅如此，因为获得了巨大利益，黑社会开始用金钱逐步侵蚀司法系统，司法队伍中和黑社会沆瀣一气的人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饮酒欲望，而且开始收取保护费，提供保护伞，实现“警黑一家”。

司法系统外的政府官员，也开始加速堕落。

美国当时虽然禁酒，但为了保证宗教活动的用酒，法律允许一些小规模的葡萄酒生产，只是它们的供应必须由政府集中管理——“监守自盗”以及以政府内部为源头的私酒交易，开始源源不断地涌现。

没能幸免的还有医疗体系。在医院，威士忌是可以被医生作为处方开给病人的，这还了得？禁酒期间，需要威士忌作为处方的“病患”大量增加，医院居然成了买酒的好去处，而不少医生也变成了“酒商”。有数据显示，美国的医院当年一年就开出100万加仑的威士忌处方。

即便是表面上支持禁酒的时任美国总统哈定（被很多美国人评为美国史上最差总统），他的私人酒库里也总是摆满了酒，他的内阁班子成员，几乎都和酒贩子有来往。

有美国学者曾经指出：禁酒令颁布之前，美国政府指挥黑社会；禁酒令颁布之后，黑社会通过贿赂，开始指挥美国政府。

5

到了禁酒令的后期，整个美国社会已经呈现出一种荒唐的状态：

本来想通过禁酒提升美国国民的健康水平，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喝了品质低劣的酒甚至假酒，频频被送进医院。

本来是想通过禁酒稳定社会，降低犯罪率，结果却让黑社会茁壮成长，整个社会安全系数大大降低。

本来想通过禁酒提高人的道德水准，降低贪污腐败的概率，结果整个政府体系却迅速堕落，警务系统甚至已被黑社会腐蚀得不堪入目。

当然，禁酒令也对美国的酿酒产业造成了致命打击。禁酒期间，一半的啤酒厂倒闭，解禁后也没有再恢复。美国的啤酒至今仍被人诟病没有个性，只是大众消费的产物。葡萄酒方面，全美的葡萄酒正规产量

（不包括自酿）从禁酒令前的5500万加仑（2.0820亿升），骤降到3.5万加仑（13.2万升）——最关键的是，葡萄酒从一种精致的酒品，开始转为禁酒期间一种粗糙的、可以解馋的低劣产品（都是自酿的），这个状况在禁令解除后很久也没有恢复过来。



人们开始游行示威，反对禁酒令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当初大力支持禁酒法案的美国人，也慢慢开始质疑当初自己的抉择正确与否了。

这时候，压倒禁酒令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经济大萧条开始了。

1929年开始的那场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让整个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举国士气低迷甚至委顿的背景下，谁还去考虑喝酒究竟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从农业来看，酒精的生产，可以扩大粮食的消费，拉动内需。从商业来看，多一种商品的流通，市场的流通性也就随之增加。从经济来看，美国政府禁酒损失的酒类税收，一年就高达5亿美元。

哪怕什么都不管了，单对于哀伤的美国人而言，给他们一点酒精的慰藉，又有什么不妥呢？

于是，1933年，一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总统竞选人，把“废除禁酒令”也放进了竞选纲领，表示如果当选，一定废除这项法案。

然后罗斯福就当选了（当然不仅仅因为这点），然后他就践行了诺言——

1933年12月5日，施行长达14年之久的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也就是禁酒法案被宣布废止。

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废除的宪法修正案。



禁酒令解除后，疯狂“报复”的美国人

馒头说

2003年，我去美国采访女足世界杯，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

其间有几天，是住在洛杉矶附近的小城市卡森。有一天，我去超市里买啤酒。当我拎了一打啤酒到收银台结账的时候，柜台的墨西哥阿姨看了我一眼，向我伸手：“证件或护照。”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买酒要凭护照。

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们这里规定，21岁以下不能买酒。

当时我带着世界杯的采访证，我谄笑着和她解释：阿姨您看啊，我是中国的记者，来这里采访你们女足的，您觉得如果我21岁以下，报社会派我到这么遥远的国家来吗？

阿姨看都不看我一眼，重复两个字：“护照！”

后来，我步行1公里回酒店，拿了护照重新去买的啤酒。

回国后，我经常向人说起这件事——是当作正面案例说的。

我个人不讨厌喝酒，但我比较反感我们的未成年人，在哪里都能轻松买到高度酒，以及香烟。我也希望，我们的有关部门，能够严格执法，分类对待。

从那时候起，我对美国对待酒类贩卖的问题，就产生了一点兴趣。

禁酒令无疑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段尘封旧事，但据了解，美国各个州至今对酒类的销售和运输有着严格和详尽的规定。虽然再不可能全面禁酒，但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饮酒的场所、酒驾的判罚等，都有了更仔细的、更人性化的考量和制约。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禁酒令给美国立法，包括给其他国家立法带来的积极意义，它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在一些情况下，法律以“全有”或“全无”的形式介入，尤其是在一些有人类强烈欲望驱动的领域，往往未必是一种最佳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一系列的调试和分类，最终达到目的？

有些时候，一刀切的政策不是“效率”的体现，而是“懒政”的标签。

战争篇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场“耻辱海战”的背后

这个故事，关于一场海战。这场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算太有名，甚至已经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是中国海军的一场惨败。但仅凭教科书上那一段简短的文字，我们无法了解那场海战背后的故事。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最经常被人提及的，无疑是中日甲午海战。

而“马尾海战”，提到的真的不多。在中学的历史课本里，大致会有这样一小段的描写：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侵入马尾港。8月23日，法舰首先发起进攻，清军主要将领畏战，弃舰而逃，福建水师各舰群龙无首，仓猝应战。福建水师的舰只还没来得及起锚，就被法舰的炮弹击沉两艘，重创多艘。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11艘战舰全部沉没，官兵殉国760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这应该就是我们读书时代对马尾海战的全部记忆。

然而，中国近代海军舰队的第一场海战，又怎么只这100多字？



马尾海战

1

马尾，又称马江，指在闽江的下游，从福州东南乌龙江与南台江汇合处，至入海口的一段。

在“马尾海战”之前，马尾其实已经赫赫有名，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的所在地。

这座由晚清名臣左宗棠建立、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主持的造船厂，为清朝生产了40艘各类船只，并组建了中国的第一支近代海军——福建水师，也就是在马尾海战里，悲壮地全舰队沉没的那支水师。



炮舰上的中国水手群像

2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884年7月12日。

这是中法战争（这是近代史上清政府难得打得还算有点脸面的一次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

这是两个没落帝国之间的战争——清政府被两次鸦片战争折磨得奄奄一息，法国也深陷在普法战争的失利中不能自拔。

这一年，因为在争夺越南控制权的陆战中没讨到什么便宜，法国重新向清政府开出了和谈条件：清政府从越南撤军，赔款8000万法郎。

法国人觉得，他们已经是让步了，因为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初，要求的赔款是2.5亿法郎。



孤拔

但清政府一口拒绝。

如果没有武力做后盾，谈判桌上永远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清政府敢于说“不”，正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没吃亏，而法国人要想得到他们所要的，只能再诉诸武力。

7月14日，在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下，法国军舰以“游历”为名，陆续进入马尾港。

战争的浓雾，开始笼罩马尾。

3



当时，主持福建沿海防务的大臣，名叫张佩纶。

张佩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婿（当时还不是），个人才华也非常出众。虽然他是一介书生，但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有名的“主战派”。这也是他被派到福建的一个原因：你不是说你要打吗？好！那么你来打打看。

总而言之，孤拔领衔的法国舰队兵临城下，当时的张佩纶和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三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商量对策。

客观地说，后来评价三人一味避战，是有些冤枉他们的。

法国舰队到来之时，张佩纶就紧急求援，但只有广东水师派来了两艘船做援军。

此时，这三人就反复请示朝廷：该怎么办？

而清廷的回复非常明确：“彼若不动，我亦不发。”

这时候，张佩纶终于知道在朝廷上做“清流”和到战场上当指挥的区别了。于是，他给福建水师的指令也很明确：“无旨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始准还击，违者虽胜尤斩。”

这条指令，注定了福建水师被动挨打的局面。

4

那么如果当时放开手脚，福建水师有没有机会赢？

很遗憾，基本也是没有的。

当时的福建水师共有11艘军舰，但都是老旧的木壳军舰和炮艇，总吨位只有9800吨。而且，水师装备的火炮基本上都是过时的前膛炮，无论射速还是威力，都比不过新式的后膛炮。

反观法国舰队，虽然只有10艘军舰，但全都配备了后膛炮，并且还配备了当时的新式武器——机关炮和鱼雷。更重要的是，法国舰队的“凯

旋”号是装甲巡洋舰，福建水师任何一艘军舰的火炮，都撼不动“凯旋”号的装甲。

还有一点容易被人忘记的是，整个福州船政局，就是清廷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卑主持建造并担任顾问的，里面几十个工匠也都是法国人。

换句话说，福州船政局造出的每一艘船，法国人其实都了如指掌。

所以可以想象，张佩纶他们当时心中的绝望之情。

5

1884年8月23日上午10点，闽浙总督何璟接到了孤拔派人送来的战书：4个小时后，向中国舰队开战。

这并非是法国人的绅士风度，而是孤拔精确计算了马尾港的潮汐：到了下午退潮时，法国舰队的舰首主力炮，正好可以一起对准中国舰队孱弱的舰尾。

难以想象的是，何璟将这个消息封锁了。直到中午12点之后，他终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佩纶等人。

张佩纶他们大惊失色，唯一想出的办法，是精通法语的福建船政著名工程师魏瀚乘船前往法国舰队，要求延至次日开战（另一说，是魏瀚奉命去英国人那里打听法国舰队的动向）。

可惜的是，为求速度，魏瀚坐的是一艘小火轮。而法国舰队旗舰“窝尔达”号看见中国方面驶来的这艘船，误以为是中国军舰提前来袭。孤拔随即下令：向中国舰队开火！

一声炮响，惊醒了午睡中的张佩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跑。作为最高指挥，他在海战爆发之初，就已临阵脱逃。

6

1884年8月23日下午1时45分，马尾海战正式爆发。

拥有优势装备和火力的法国舰队，早已准备好进行一场“虐杀”，但之后的战斗，却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法国舰队一上来就把所有火力集中，围攻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号。

“扬武”号根本来不及掉转船头，只能一边砍断锚链，一边开炮还击。第一炮，就击中了法军旗舰“窝尔达”号的舰桥，炸死法军5人——虽然福建水师的水兵们屡屡请战被张佩纶拒绝，但他们也早就将炮口瞄准了法国舰队。

但法国人有鱼雷。



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

法军的46号杆雷艇一颗鱼雷击中了“扬武”号的右舷，上层建筑也开始起火。这时候，管带张成弃舰逃走。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扬武”号开始下沉，但全舰官兵很少有率先弃舰的。

有一位水兵，在“扬武”号着火沉入水中的最后一刹那，才跳水逃生。他是清朝第一批留美学童中的一员，后来自主设计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他的名字，叫詹天佑。

福建水师的“福星”舰没有机关炮，近距离时，全舰官兵只能用步枪向敌舰射击。“福星”舰管带陈英喝退让他“暂避锋芒”的随从，下令拔锚起航，掉转船头直接冲入法国舰队阵中——“此吾报国日矣！吾船与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船。”

孤拔指挥3艘军舰围攻“福星”。陈英大喊：“大丈夫食君之禄，当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指挥所有火力猛击法军旗舰，但因炮小未能击中敌军要害，自己却在瞭望台中炮身亡。

“福星”号在法国舰队火炮和鱼雷的围攻下，最终爆炸下沉，全舰官兵95人，仅幸存20余人。



“福星”号（右）和“福胜”号（左）

“福星”不是唯一一艘冲向法国舰队的中国舰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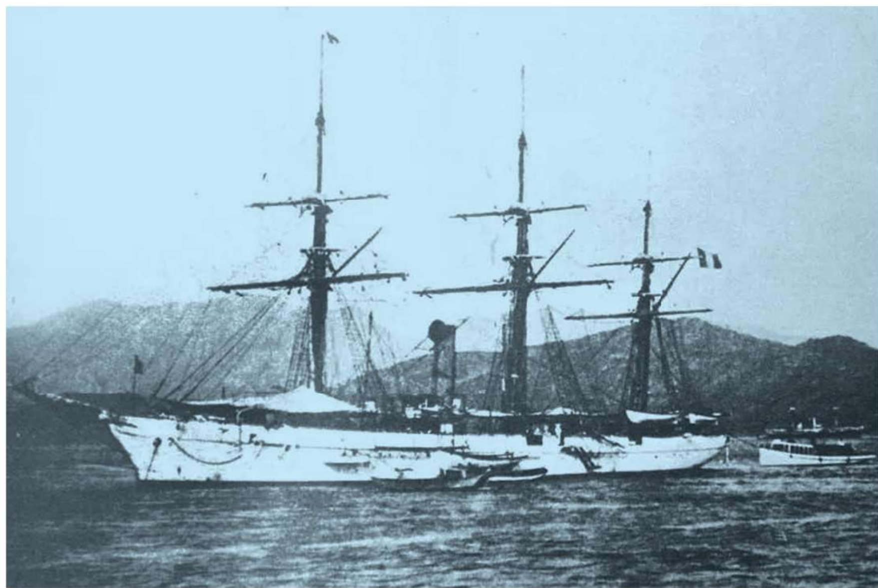
跟在“福星”之后的，是“福胜”“建胜”两艘“蚊子船”。

所谓“蚊子船”，只能称为“水上炮台”，舰船只是在舰首装备有一尊不能转动的前膛阿姆斯特朗16吨大炮，火力很弱，而且马力小、笨重迟缓。但这两艘舰船还是毫不犹豫冲了上去，“建胜”号还命中了孤拔的旗舰“窝尔达”号，只是因为火力实在太弱，没造成多大破坏。

“建胜”号的管带吕瀚，战前就给母亲和妻子写了遗书：“见危授命，绝不苟且！”中炮牺牲时才32岁。“福胜”舰管带叶琛，重伤不下火线，最终以身殉国。

福建水师的“永保”和“琛航”两艘船，是运输船。按理说，炮火一开，它们应该退出战场。

但是它们没有撤退，而是直接冲向法国舰队，试图撞击敌舰。但因为速度慢，最终被相继击沉，舰上官兵全部殉难。



法国舰队的旗舰“窝尔达”号

福建水师的炮舰“飞云”和“济安”还没来得及起锚，就被炮火击沉。但另一艘炮舰“振威”号却是最先做出反应的——法国舰队一开炮，它就立即轰击了附近的法舰“德斯丹”号。

随后，“振威”号管带许寿山下令砍断锚链，迅速迎敌。法军集中三艘军舰猛轰“振威”号，“振威”号全舰多处中弹，眼看不济。此时，许寿

山下令：开足马力！去撞沉“德斯丹”号！

人们知道后来北洋舰队邓世昌的“撞沉吉野”，却很少有人知道之前福建水师许寿山的“撞沉德斯丹”。

不幸的是，在法舰的炮火拦截之下，“振威”号锅炉中炮爆炸，船身终于开始下沉。但这个时候，许寿山并没有弃船，而是站在一尊大炮旁，那尊大炮，还有最后一颗炮弹，是许寿山专门留下的。

在船身下沉的最后时刻，许寿山拉响了引绳，一炮轰中“德斯丹”号。当时有在场的外国人留下现场描述：“这一事件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纪录上均无先例。”



法国舰队的“德斯丹”号



反映马尾海战的铜版画

32岁的许寿山与大副梁祖勋最终被敌舰机关炮击中，壮烈牺牲。

到了下午2点25分，惨烈的马尾海战进入尾声——11艘中国军舰，全部被击沉。

但更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天的晚上。那一夜，沿江的居民自发驾驶渔船、盐船，对法国舰队发起火攻。

那是怎样一幕悲壮的景象：一艘艘民用船只，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扑向法国舰队，然后被军舰的炮火摧毁。

马尾海战之后，清政府退无可退，最终对法宣战。

馒头说

2014年，在马尾海战130周年之际，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称收到103份来自法国国家档案馆的马尾海战史料，其中有一张当年《申报》刊登的“福州地理形图”。



根据当年刊登的内容，福建水师其实和法国舰队鏖战两天，击沉4艘法舰，击毙数百名法军，最后法国舰队是败退的，马尾海战其实是我们获胜的。

有些专家说这将颠覆历史，但说实话，我是不信的。

从当时的信息不畅，以及民众的爱国情怀角度考虑，我个人更愿意把这理解为一种美好的寄托。毕竟，我们的11艘战船悉数被击沉，而法国海军经此一役，完全控制了我国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峡的制海权。

谁胜谁负，大家其实一目了然。

但那一场海战的失败之所以值得铭记，不仅仅是提醒我们要“知耻后勇”，更是要铭记一种精神。

马尾海战，是中国组建近代海军以来，第一场正式的战斗，比让我们刻骨铭心的“甲午海战”，还要早了10年。

在这场我们全军覆没的海战中，中国军人表现出的那种气势和魄力，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后来的各种逆境甚至遭遇灭国危险时，一直坚持到底赢得最后胜利的底气和基石。

在马尾海战中，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在旗舰“扬武”号沉没的最后一刻，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水兵，爬上了主桅杆顶，在漫天炮火中，挂上了一面龙旗。

船虽沉，旗仍在。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

我个人总是觉得，从来没有什么“偶然引发”的历史事件。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一些看似偶然的必然因素在推动。它们来自各个方向、各种人、各种意图，但最终促进这件事件爆发的，往往就是这些背后的故事。

1

1931年，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的脸色，是得意的。

倒不是因为石原莞尔官运亨通——虽然他日后官拜日本陆军中将，但在1931年，他的军衔还只是中佐。

让他得意的，是他的一个观点在日本国内军政界，得到了高度评价。

石原莞尔的观点，是这样的：代表东方的日本和代表西方的美国，未来难免会为争夺世界霸权决一死战。在此之前，日本最需要的就是夺取中国的东北——他们称为满洲——作为日后的扩张和补给基地。

说实话，这种“自己家里没有，就要强占人家”的强盗逻辑，在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的日本，早已不算新鲜。但石原莞尔的老调重弹之所以受到追捧，还是和1931年的日本国情有关。



石原莞尔被有些人称为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第一谋略家”。他坚持日本的“有限侵略论”，即占领满洲即可，日本不应与中国全面开战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无论从哪个方面，这个弹丸之国，在当时确实走在了亚洲的最前面。

但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日本尝到了大苦头——到了1931年，日本显然已经撑不住了：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30%，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近50%，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国内市场严重萎缩，中小企业大批破产，失业人口接近400万。

这时候该怎么办？

美国选择了罗斯福，开始了“罗斯福新政”，而日本选择了另一条道

路：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开始扶植以三菱、川崎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转向军火制造，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谋求高额利润。

当然，军事膨胀之后，是需要有“宣泄口”的。这个“宣泄口”，无疑就是中国。

石原莞尔的观点，只是给原本就下定决心的日本人，再打一针鸡血罢了。

2

1931年的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中尉河本末守的面色有些紧张。

但他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将改变历史。

河本末守隶属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是个队副，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爆破专家。

9月18日的那一天晚上，他带着6名士兵，偷偷埋下了42包黄色炸药。

42包炸药，本来不足以让历史记住河本末守的名字，但他埋炸药的地方，是中国沈阳的北大营西南800米左右的柳条湖——北大营，是当时中国东北军的驻地。

这些炸药，是埋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下面的。

22点30分，42包炸药被准时引爆。

这次爆炸，其实并没有引起什么损失，据说，爆炸之后20分钟，一列列车还安然无恙地开了过去。



日本人在事后拿出的被炸的铁路枕木等所谓“证据”

但这对日本关东军来说，已经足够了。

随着爆炸声，早就在4公里外等候多时的川岛正大尉——河本末守所在中队的中队长——下达了对北大营中国东北军第七旅的攻击命令。

23点46分，爆炸发生的1个多小时后，驻扎在沈阳的土肥原贤二给驻扎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先后发了两封电报。

第一封，说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

第二封，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中。

早已“等候多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立即拍板：迅速集结，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3

那一晚，东北少帅张学良的神情非常轻松。

这位东北军的最高统帅，“九一八事变”的当晚，并不在东北。

张学良5月底因为重感冒，住进了北平的协和医院。因为长期吸毒，少帅的身子骨总是比正常人恢复得要慢一些，到了9月初才痊愈。

那一晚，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北平的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由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其实不光是张学良。9月18日那一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在忙着给自己的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代管黑龙江的是他儿子；另一个副司令长官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奔父丧回了锦州。



少年得志的张学良

那一晚，据梅兰芳后来回忆，在他演到赵女金殿装疯的那一段时，看到有人奔进了包厢，对张学良耳语了几句，然后张学良迅速起身离开了包厢。

少帅看来真的是急了。

他回到自己房间后，了解了一圈情况，然后立刻给参谋长荣臻下了一道命令。

此时的沈阳，在关东军开始攻击后，东北边防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随后，赵镇藩接到了荣臻的电话，在电话里，荣臻传达了张学良刚才从北平发过来的命令——宣称是绝对死命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

牲！”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道命令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九一八”当晚入侵沈阳的日本士兵，手臂上绑着白色毛巾作为标志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有能调动的军队，全部向沈阳进军。驻扎在沈阳各个要塞和机构的东北军全部奉命不战而退，中国军警全部缴械。

9月19日早上7时左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9个小时后，东北军一枪不发，沈阳全城陷落。

下面是一组令中国人痛心的数字：东北军全面撤退后，仅沈阳兵工厂，日军就缴获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和野战炮250余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还有，张学良多年苦心经营，购买来的各种飞机260余架。其他经济损失，高达15亿元以上。

下面还有一组数字，更让人痛心：当时，日本关东军正规军为1万人左右、非正规军1万人、警察3000人，一共23000人。而当时，作为中国最强的军阀派系，东北军一共有30万人。除了10万人被调进关内，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军队有20万人。尤其是当时攻击东北军北大营的关东军一共650人左右，而北大营内有东北军12000人。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周的时间里，区区2万名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东北三省横行，面对不抵抗的东北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30多个城市。

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就此沦陷。

1936年，已经被逼入绝境的张学良不惜搞出“西安事变”来证明自己的抗日决心，但在1931年，手握一把好牌的少帅，就这样毫不心疼地把自己老爸张作霖一辈子辛苦打造的基业，轻松败光。



日本军队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

张学良为什么当时选择不抵抗？后来接受华人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采访时，他给出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1]，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

当然，那时候也有不少人说，“不抵抗”的罪名，不应该张学良一个人来背。

4

那一晚，蒋介石的脸上神色淡定。

因为，他那时候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9月18日的晚上，蒋介石正在开往江西南昌的“永绥号”军舰上。事变的消息，是蒋介石在9月19日军舰抵达湖口后才知道的。

当时，蒋介石立刻给张学良拍去了一封电报：“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从电文可知，蒋介石也不清楚东北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只是希望张学良要辟谣“是中国军队拆毁铁路”的说法。

但是，如果说“九一八”蒋介石并没有下令张学良别抵抗，把“锅”全甩给张学良，却也有失偏颇。

因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蒋介石曾不止一次告诫张学良“不要冲动”。虽然关于蒋介石明确下令张学良“不要抵抗”的“铣电”是否存在，各界还有一定争议，但从蒋介石之前明确表达的种种态度和指示来看，他给张学良传递的主要思想就是：避免冲突，不要给日本人任何把柄。

所以，尽管“九一八”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蒋介石在最初确实一无所知，但从之前阴云密布的形势来看，他对日本人的野心和打算，是完全心里有数的。

所以，蒋介石其实也在这口“锅”付出代价——1931年12月，日军主力开始围攻东北的锦州，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次致电张学良，于公于私，都希望他能积极防守，但张学良最终依旧选择了撤退。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张学良晚年在自己的口述历史中承认：“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这是张学良认为自己应该负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是免责的。

那么，蒋介石当时反复告诫张学良“不要冲动”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除了认识到国力上的差距之外，有一个原因是无法回避的。

9月18日，蒋介石所乘的“永绥号”军舰之所以开往南昌，是因为蒋介石要亲自坐镇江西，“围剿”中共红军。

就在“九一八事变”七个月前，蒋介石刚刚调集30万大军，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在《告全国将士书》中表示：“赤祸是中国最大的祸患！”

所以，即便到了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的内容，不是如何收复东北，而是那句大家后来都知道的“攘外必先安内”。

所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1931年9月18日前后，对日本人采取的态

度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个字：

忍让。

5

1931年，中国人如果不忍让，究竟会怎样？

按照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估计，日本人会就此找到借口，不断增兵，最后全面入侵中国。

那么忍让了，又产生了什么结果呢？

1932年，日本人“请”出了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企图坐实侵吞中国东北的事实。

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省，并攻击长城各个隘口。《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中国军队被规定只能待在长城以南，等于变相承认不会去收复沦陷的热河省和东北三省。

1934年，日本指使伪满洲国成为“满洲帝国”。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宋哲元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月25日，策动殷汝耕等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政府。

1936年，日本和伪冀察政委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驻冀察两省。同年，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反而觉得自己“忍让”了六年的日本，终于开始全面侵华。

面对一头注定要作恶的狼，你的忍让，只是给了它磨牙的时间罢了。

馒头说

在1931之后，自张学良以下，东北军，甚至东北人，似乎都和“不抵抗”三个字扯上了关系。

但事实上，即便是成为沦陷区，东北人也从没有选择放弃，辽宁义勇军、吉林义勇军、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等纷纷成立，最后会合成了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三省是第一片沦陷的中国国土，也是对抗日本入侵时间最长的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值得记住的名字。

有八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女战士，在被关东军包围后，手挽手走向了即将冰封的乌斯浑河，全部牺牲——她们叫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她们的故事，就是后来被人传颂的“八女投江”。

有一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团政委，在被捕后饱受关东军令人发指的酷刑，却坚决一字不吐，最后慷慨就义，她的名字叫赵一曼。

还有一个抗联的总指挥，在被叛徒出卖后誓死不降，牺牲后被关东军解剖胃部，发现里面是一些棉絮、树皮和一些连牛都不吃的草根。他的名字叫杨靖宇（杨靖宇的故事，参见本书收录的《他没有军衔，但人人称他“将军”》）。

还有太多太多的东北抗日志士，无论国共，都没有留下名字。他们被关东军逮捕后，受尽酷刑，英勇就义，头颅被高高悬挂在城市的电线杆上。但第二天，还是会有日本士兵被神秘杀死，尸体直接横在马路上。

《泰晤士报》曾经报道：在东北，对于关东军来说，没有一条街道是安全的。

英国人可能无法理解，已经被中央政府“抛弃”的东北人，哪来的那种前仆后继、无畏死亡的动力？那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看到，在日本士兵的尸体旁边，会有一张写着四个大字的传单：还我河山！

这就是他们的动力所在，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动力所在。

打不过是客观事实，但坚持打是主观态度。

对于1931年的中国而言，东北的沦陷只是一个国家14年苦难的开始，但也是一个民族觉醒的发端。

一寸山河一寸血。

---

[1] 指侵吞整个东北。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背后

你如果没听说过抗战期间的二十九军，那你应该听说过赫赫有名的“大刀队”；如果你没听说过“大刀队”，那你肯定知道有一首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今天，我们就要说说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对不起，可能这个故事，并不像我以前的故事那样，能让你热血沸腾。

1

1933年3月6日这一天，西北军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接到了一纸军令：将部队布防冷口经董家口、喜峰口、罗家峪至马兰关一线的长城关口。

这一刻，二十九军上下都知道：要和小日本真刀真枪干了！

这一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两年。

在占据了东北三省后，野心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早已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将手伸向了华北。

1933年元旦夜，日军炮击山海关，两天后，将刺眼的太阳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两个营全部殉国），后方东北军元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

日军随即向延绵的长城一百多个关口发动全面进攻。

长城，在中华民族心目中有特殊的含义。当长城烽烟燃起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喜峰口大刀队



“长城抗战”的守军

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受命加入的，就是“长城抗战”，而让二十九军一战成名的，就是这场大抗战中的“喜峰口大捷”。

2

关于“喜峰口大捷”，历史教科书上已有不少交代，我们这里只再做一个简要的回顾。

3月6日，二十九军接到军令，3月7日，二十九军接防喜峰口阵地。

3月9日，日军铃木、服部两个旅团进犯喜峰口，并率先抢占高地。从9日夜到11日夜，二十九军与日军展开血战。12日凌晨，二十九军109旅旅长赵登禹身先士卒，率500人大刀队夜袭日军阵地，刀光飞舞，日军鬼哭狼嚎。据战报，共砍死砍伤敌人逾千名，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一架，还有日军御赐军旗、地图、摄像机等。

这就是著名的“大刀队”夜袭。后来，作曲家麦新在上海为此专门谱写一曲，就是现在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大刀进行曲》。

3月16日，日军放弃喜峰口，改向罗家峪进攻。“喜峰口大捷”由此声名远扬，而二十九军和他们的“大刀队”更是名震天下。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方面在一败再败、退无可退的情况下，第一次让气焰嚣张的日军受挫，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场大捷，而是这场大捷背后所体现的三个问题。

3

第一个问题，是这场战役的本身。

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以“喜峰口大捷”一战成名。但整场战役，其实不是二十九军一家在打。

事实上，除了二十九军这支西北军外，在“长城抗战”中浴血奋战的，还有东北军和中央军。

其中，东北军王以哲的一〇七师，以及中央军第十七军的关麟征二十五师，在古北口以及南天门一带的阵地打得尤为惨烈，是整个“长城抗战”中时间最长、过程最激烈的战斗。

但这场各路军队汇集，倚仗长城险关，与日军殊死一战的“长城抗战”，最终其实是失败了。

“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一共投入了约30万人，而作为对手的日本关东军，一共只有8万人（其中包含3万伪军）。中国军队伤亡4万人，而日本军队，根据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是2600人。



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是张学良亲信，也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人和实施人之一。1937年2月，东北军兵变，王以哲遇害

到了1933年5月，中国军队防守的各路长城阵地已呈现崩盘之势，只能全部撤退。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只能和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这无疑是一份耻辱的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不能越过警戒线。日本军队可以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侦察长城以南地区，中国方面还应该提供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

更重要的是，《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国界”。

从此以后，华北门户大开，无险可守，日军可以轻易直取北平和天津。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一行，与日本方面代表冈村宁次一行，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是中国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一次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军队拉开架势打的一次战役，但结局，却和他们想得不太一样。

所以，当全国民众都在庆祝“喜峰口大捷”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在意宋哲元战后的一句感叹：“我以三十万大军，不能抗拒五万敌人，真奇耻大辱！”

人又多，心又齐，怎么会打成个“奇耻大辱”？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问题了，那就是二十九军的“大刀队”。

“大刀队”一战成名，二十九军人人背一口大刀，当时让国人无不啧啧称奇。但是，却很少有人会去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一把大刀？

原因很简单：因为二十九军穷啊！

当时二十九军的装备，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也就比川军稍微强一点：整个军（当时2万多人）只有野炮、山炮十余门，重机枪加在一起不过100挺左右，每个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全军用的步枪，1/3是自己造的土枪，子弹也严重不足。



大刀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冯玉祥只能下令，包括二十九军在内的西北军人人佩一把大刀。之所以是大刀而不是军刺刀，还是因为军刺刀对钢的要求高，规格也严，而大砍刀相对制作工艺要求低，中国普通的铁匠铺都能打造。

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其实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力与日本军力的一个折射。

就以钢产量为例，在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前夕，日本每年的钢产量是8.7万吨，而中国呢？是700吨。

事实上，“大刀队”奇袭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夜色掩护和出其不意。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真的换到白天的白刃战，即便西北军有习武的传统，沉重的大砍刀是否真的能砍瓜切菜一般对付当时日本步兵上了刺刀后的“三八大盖”，还真的不敢下定论（日本步兵对刺刀拼杀有极为严格的训练，抗战时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都承认日本的单兵素质远胜中国）。

还有一点，当时国内媒体没提到——当然，他们也未必知道——“大刀队”夜袭后撤退时，遭到了日本军队的密集火力射击，伤亡大半。

所以，当时有个叫黄绍竑的桂系将领，在参与“长城抗战”后，对当时国内媒体的报道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当时的媒体是怎么报道“大刀队”的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天津的《益世报》，报道称：

我们喜峰口的英雄是光着脚、露着头，使着中古时代的大刀，……抢回了山，夺回了岭，收回了喜峰口，俘虏了几千个日本人，收到了几千枝日本枪，捉住了许多辆日本坦克，抬回来许多架日本开山炮。这个故事，岂不比（法军守卫）凡尔登的故事还威武！还壮烈！还光荣！还灿烂！

黄绍竑在“长城抗战”停战后，在上海对《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吗！

话虽说得刺耳，但也确实引发人们的一个感慨：都已经进入20世纪30年代了，我们的子弟兵竟然还挥舞着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去和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肉搏，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壮！

5

或许你会说，兵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于是，就要说到第三个问题，关于人的问题。



宋哲元。“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是第一批通电要求全国抗战的将领

这个人，就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如果你只凭历史教科书关于宋哲元这个人寥寥几笔的叙述，是很难理解这个人的转变轨迹的——从1933年全国皆知的抗战英雄，慢慢蜕变成优柔寡断、畏首畏尾的官僚，到最后差点与日媾和，做了汉奸（有史料表明他后来已派人和土肥原贤二接触）。

这到底是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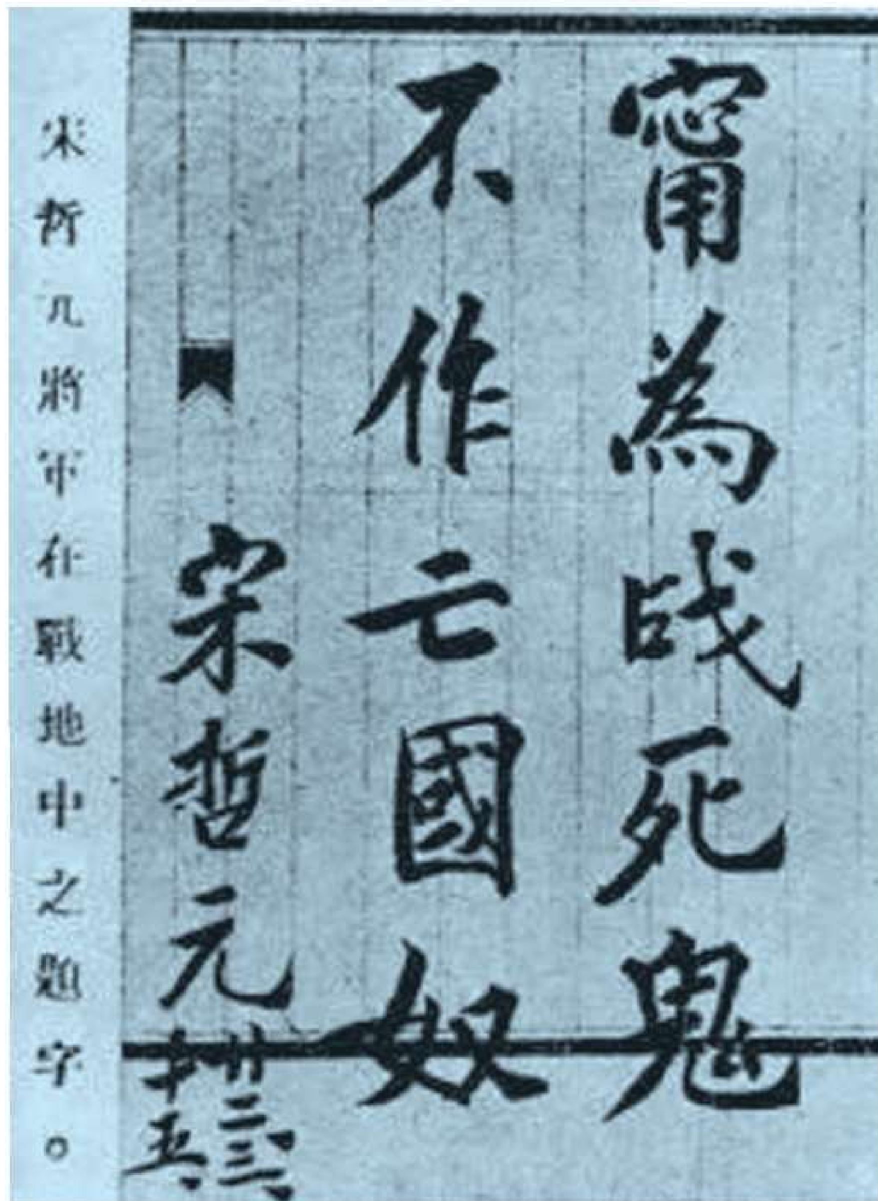
看了1933年“长城抗战”后华北一带的变化，你就不难理解了。

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的部队撤离了长城一带，华北出现了权力真空，宋哲元成了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这样的机遇下，宋哲元大力扩充部队，二十九军从原来的区区2万多人，扩充到了10万人，武器装备也上了一个档次（全军配备的轻机枪比中央军配备的还要多）。

随着势力不断扩大，宋哲元的地盘已经囊括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座大城市，并坐拥领地内的税收。

有枪，有人，有钱，有地盘，然后会滋生什么思想？没错，就是军阀思想。

在握有华北地区统治权后，宋哲元一方面找出百般理由，严格禁止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和日本人周旋，他希望以自己的种种退让，换得日本人对他统治华北的实质认可。



在“长城抗战”期间，宋哲元手书“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感动无数国人

宋哲元无疑是痛恨日本人的，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其他方面，他的思想和一个旧军阀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你理解了宋哲元身上体现的军阀思想，就不难理解抗战期间整个中国的一大难处——当时的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而是一个名义上有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因为要抵抗外力才捏合在一起的军阀共同体。

但宋哲元的算盘还是打得太理想化了——华北是兵家必争之地，哪怕他想在刀尖上跳舞，也是不可能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

就在连蒋介石都已经认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开始部署全面抗战的时候，宋哲元居然还对日本人抱有幻想：“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宋哲元的态度，影响了二十九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张自忠。

“卢沟桥事变”时，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曾专门打电话，训斥与日军发生冲突的旅长何基沣，他训斥的话，可能最能代表二十九军高层当时的心态：“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1]



日军通过卢沟桥

但是，日本人对宋哲元的“抛媚眼”，只是在为自己调动部队争取时间。时机一成熟，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长官香月清司随即给宋哲元发去了最后通牒：限在7月28日中午之前，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北平。

直到那一刻，宋哲元才真正醒悟：日本人是真的要全歼二十九军，大举侵华。

7月28日，宋哲元向二十九军各部队下达了平津地区防御作战的指令，但命令刚下达，部队防线还未展开，早已等待多时的日本军队就排山倒海般地发起了全面攻击。

仓促迎战的二十九军将士立刻被分割包围，陷入苦战。在北平的南苑防线，“喜峰口大捷”中一战成名，升任一三二师师长的赵登禹身先士卒，再次提着大砍刀亲自督战，但被子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

一天之内，北平外围阵地尽失。



赵登禹从冯玉祥贴身卫兵做起，一路做到师长，牺牲时年仅39岁。那一天壮烈牺牲的还有二十九军另一位高级将领——副军长佟麟阁

28日晚，宋哲元决定把烂摊子丢给张自忠，自己率军部撤往保定。临行前，他还交代张自忠："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我们得给他保留着。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

忠心耿耿的张自忠选择服从命令，他说："你们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事后正如张自忠所料，他背负了汉奸之名，被人唾骂“自以为忠”，之后萌发死志，将功赎罪，壮烈殉国。详见《“汉奸将军”的自我救赎之路》。）

28日夜，宋哲元等人撤离北平。29日凌晨，曾经在“长城抗战”中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二十九军官兵，大部分都撤离北平，只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

北平城门洞开，不战而降。

而就在7月28日，当北平城南面响起枪炮声的时候，全城的老百姓还都兴高采烈起来——自己的军队终于和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老百姓们迅速组成了慰问队，在马路两旁摆出西瓜、馒头、酸梅汤等食品，向过往的士兵脱帽致敬。

他们还迅速请来了几十名磨刀人。

他们想为二十九军的官兵磨大刀，杀倭寇。

馒头说

写今天这篇故事的起因，是这个周末，又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传播颇广的“抗日神剧”片段。

在这个片段里，一个八路军战士（看模样可能是炊事班的），在全军比武中发明了一系列神奇食物。

他当着部队首长的面，咬了一口包子，咀嚼几口，把剩下的一半往远处一扔，“轰”，爆炸了。随后，他又摆出了西红柿、黄瓜、萝卜等一批食物，都是咬一口，然后往远处一扔，“轰轰轰”，看那个爆炸效果，比手榴弹要强多了。

这位同志高兴地表示，这是专门“孝敬”鬼子的。八路军战士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一个首长也咬了一口包子，说：“味道还真不错！”另两个首长频频点头。

手撕鬼子、裤裆藏雷、可以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自己就是搞炸药的）的“包子炸弹”……我们似乎已经早已习惯了近乎戏谑的“抗日神

剧”，而渐渐淡忘了那14年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先辈们是以一种怎样的决死信念和千千万万条生命筑起的血肉长城，才抵御住了一次濒临灭国的侵略。

我们总说，中国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小日本，却有多少人知道，当年有多少满腔热血的中国军队进入战壕，连日本兵的影子都看不到，就整班、整排甚至整连地被日军炮火炸死在战壕里。

那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对一个农业化国家的降维打击啊！

写这篇文章，绝没有贬低当年二十九军“大刀队”之意，事实上，大刀队的战绩伴随着《大刀进行曲》，鼓舞着无数中国子弟兵在抗日战场上顽强不倒，死战不退——在台儿庄战役进行到最惨烈的时刻，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将士们，是高唱着《大刀进行曲》，再一次扑向敌人的。

但是，现在一味强调“大刀队”，乃至神话我军的各种“超能力”，展现日军的各种不堪一击，其实是对14年抗战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的最大不公。

落后就是要挨打的。

我们永远需要“大刀精神”，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大刀”的时代。

---

[1] 《民国军事史》第三卷（上），姜克夫编著，重庆出版社。

这群四川人，不该被遗忘

国民党有过几十名陆军一级上将，其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也有一些报上名字，要愣一下的人。刘湘这个名字，介乎两者之间，但他却是值得书上一笔的一级上将。不仅仅是因为他，也因为他身后的300万四川子弟兵。

1



刘湘

用刘湘自己的话来总结，自己49岁之前的经历是四个字：“不甚光

彩。”

1888年出生的刘湘，20岁时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立志从戎。

在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刘湘一直都是站在袁世凯这一边的，并且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1917年，刘湘29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从1918年到1933年的15年，是刘湘在四川沉浮的15年。

在这15年里，刘湘先后和熊克武、刘存厚、杨森、刘文辉等一大批四川的大小军阀恶斗，几进几出，掌权又下野，下野又复出，连年征战，终于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成为公认的“四川王”。

好不容易坐稳了位置，刘湘又开始面临另一个难题：蒋介石下令要他“剿共”。于是，从1933年到1937年的这4年，刘湘又开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作为“川人治川”的积极拥护者，刘湘一方面严格制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另一方面，又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和共产党的军队一边打一边沟通，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总而言之，从1918年到1937年这19年里，川军给全国都留下了一个“差评”的印象：派系林立，频繁内战。连刘湘自己都承认：“一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一声枪响，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三天后，刘湘就做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举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

当时全国那么多大小军阀，刘湘是第一个致电蒋介石要求抗战的人。

7月14日，刘湘通电全国，称“日军侵略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绝”。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在那场会议上，主战派与主和派都有，蒋介石说，你们表决吧——表决不是举手，而是要起立。蒋介石说，同意和日本人打的，站起

来。“呼”的一声，刘湘带头就站了起来。

刘湘做出承诺：“四川愿意出30万军队，500万壮丁，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

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们的民族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人都要说日语了！川军要为民族、为国家尽忠！”

2

刘湘说到做到，回到四川，就开始总动员。

虽然刘湘是“四川王”，但四川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很多军长和师长根本就不愿意出川。刘湘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亲自在报纸上发文，号召四川军民“誓复国仇”，要用日本人的血，洗刷川军内战的耻辱。

远离烽火第一线的四川，迸发出了巨大的抗日激情。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刘湘发表讲话：“四川人一直有吃苦耐劳的、反侵略的光荣传统，我们现在就要发挥这个传统，派到前线去参加抗战，我作为一个川军统帅，我一定不要辜负四川父老的希望，上前线英勇杀敌，就是从尸山火海中爬出来，也要把日军赶出中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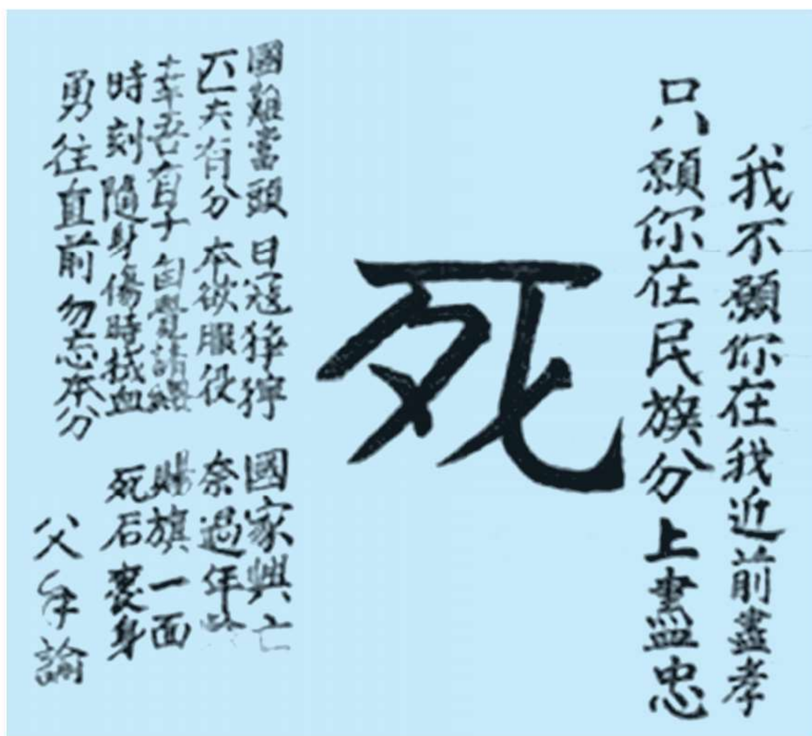
随后，川军的主要将领邓锡侯、唐式遵等都发表了讲话。唐式遵因为常年打内战，被四川人骂为“唐瘟猪”，但那天他推开了话筒，直接念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诗念完，场下很多当初骂他“瘟猪”的老百姓都流下了眼泪，数万人掌声如雷。

那一天的数万人里，有不少是妻子送丈夫或父母送儿子去参军，其中有不少人直接写好了遗书。

有一个叫王者成的50多岁老汉，主动报名要去打日本人，被告知超龄，他就让自己的儿子王建堂去参军。王建堂去集合的时候，王者成送了他一面旗，旁观的人一看都肃然起敬——上面写了斗大的一

个“死”字，旁边还有小字：



死字旗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3

蒋介石是非常希望刘湘出川的。

一方面，中日双方一上手就互丢“王炸”的淞沪会战，消耗了蒋介石大量的部队（包括他的嫡系中央军），急需补充兵源。另一方面，蒋介石早就有把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准备，所以一直希望能分割消灭刘湘的川军势力。所以，刘湘主动请缨出川，蒋介石求之不得。

严格意义上，川军名义上是属于国民革命军，但一直是一支独立的

军队：川军的每一件军装、每一根皮带、每一颗手榴弹、每一颗子弹、每一支枪，都是川军自己制造、自己购买、自己供给的，军官也是自己培训的。

这也带来了一些预料不到的后果。

出川在即，刘湘发现川军根本没有收到国民政府的拨款，他马上给军事委员会发报，第二天接到的复电是："责成本省自筹"。

于是，刘湘只能自己拿出10万大洋做抗战经费。在刘湘的带动下，川军高级将领也纷纷解囊，筹集了近50万元，后由四川省政府拨款40余万，民众募捐50万元，出川抗战的费用才落实下来。事实上，之后川军和其他杂牌军享受的也是一样的待遇：军饷只有中央军的一半，至于弹药装备补充、武器更新，更是往后靠了。



川军出川，川人夹道欢送

以刘湘的精明，何尝不会洞悉蒋介石的心思？但是这位标准的"旧式军阀"，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把川军分为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辖5个军3个独立旅，出川抗日。

刘湘出川前，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出于语言习惯等多方面原因，希望能和龙云的滇军、白崇禧的桂军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方面

军使用。

但本来就有意“边攘外边安内”的蒋介石，怎么可能答应让这三个“刺头”聚在一起？三个方面军后来被安插到了三个战区，不仅如此，刘湘出川前的最低要求——川军必须要放在一起使用——也被蒋介石拒绝了。

川军一出川，就被以军和师甚至团和营为单位，分散到了各个战区，接受各个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

可以说，川军一出川，刘湘就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接下来，全靠四川子弟兵们自己，证明自己了。

4

川军出川的第一仗，就是被称为“绞肉机”的淞沪战场。

1937年9月，川军第二十军在杨森率领下，进入淞沪战场——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部队。

川军当时在全国军界，被称为“中国最糟糕的军队”，或“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因为川军的军事素养一般，装备更是非常差。几十万川军，短裤、草鞋，背着“老套筒”（开几枪可能就哑火了），甚至背着大砍刀，就热血沸腾地出川了。而杨森的第二十军，更是川军中装备最差的一支部队，以二十军第二十六师为例，一个连有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步枪的枪柄是用麻绳系着的，以防脱落。

这支部队，9月1日从贵州出发，没有交通工具，穿着草鞋，每天白天徒步行军100多里，夜里再自己编织新的草鞋，昼夜兼程，到了湖南才坐到了船。坐完船再换火车，经历了40多天的颠簸，10月12日才抵达淞沪战场。

刚刚抵达，二十军就被投入到惨烈绞杀的上海大场一带的阵地。

军长杨森视察阵地时，发现日军的火力装备远在简陋的川军之上——别说川军，就连德械装备的中央军也完全不能匹敌。但他依然做了一番战前训话：“我们二十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所以才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我们这次打的是国际战，是最光荣的！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我们就要亡国，我们要为国牺牲，这是最光荣的！”

面对日军排山倒海的攻势和漫天炮火，还没来得及休整的二十军接替友军防务，迅速进入阵地。

一时之间，很多四川士兵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巨大火力，铺天盖地向自己倾泻而来。日军一轮炮火轰击，川军有时整个排就被炸死在战壕里。伤亡巨大，但二十军死战不退。

二十军第一二四师第八〇五团团部少尉见习官胡忆初后来回忆："深约2米的战壕，在战争开始时，人们还要站在踏脚坑上才看得出去，随后战壕逐渐被战士的血肉填满了，此时死尸堆积竟比战壕还高，活着的人是用先烈的血肉做掩体，继续打击敌人的……全团数千人参战，最后只剩下150人。"

装备最恶劣的二十军第二十六师打到最后，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仅剩下600多人，但最终还是坚守住了阵地。

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师，成了淞沪战役中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5000人，撤离战场时仅剩600多人。



淞沪会战中，川军伤亡惨重

杨森原先也是打内战的"好手"。但在出川前，他曾对着将士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

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二十军没有辱没使命。

5

另一支奉命进入山西的川军，命运更坎坷了。

进入山西的，是川军将领邓锡侯麾下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发前，川军部分旅长和团长，以为会得到中央给的补给，士兵们穿着单衣、带着简陋的武器就出川了。但到了西安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拒绝补充物资，让他们找“山西王”阎锡山。

精明的阎锡山推诿：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没办法补充。结果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十一军整整一个军，仅得到了阎锡山给的山西造轻机枪20挺。

在缺衣少枪的情况下，部分四十一军的士兵砸开了阎锡山的军火库，自己补充军火。这下惹恼了阎锡山，要求将川军赶出自己所辖的战区，因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蒋介石随即让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程潜接收，结果程潜也坚持不要。

满腔热血出川的川军，遭遇了一个尴尬局面：各个战区都不愿意接纳装备低劣的他们。

这时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站出来表态：来，到我这里来！诸葛亮扎个稻草人都能吓退敌兵，川军比稻草人肯定要强吧？

1938年1月，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进入第五战区，开始加入徐州会战。在这场惨烈的会战中，全国都知道了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因为他们死守了滕县城三天，是后来中国军队获得台儿庄大捷的关键前提。

当时负责进攻徐州的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之前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在滕县，日本最强的部队和中国最烂的部队不期而遇。

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四川新都人。在那场著名的“滕县保卫战”中，他身先士卒，在知道援军抵达无望之后，发出电报“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一直坚守到城破的最后一刻。

根据李宗仁后来的回忆和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记录，王铭章在城破之时，坐镇城中心的十字街道继续指挥巷战，最后身中数弹而亡。同时殉难的还有师参谋长赵渭滨及川军一二四师（当时在城外血战）参谋长邹绍孟等人。



王铭章

王铭章牺牲后，守城的川军继续战斗，除少数突围外，全师5000人尽数殉城（有不同说法，说没有那么多）。最后不愿意投降的数百川军，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李宗仁后来留下评语：“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尽管被分散到各个战区独立作战，但川军确实打出了自己的血性。

在整个抗战期间，一共牺牲了24个少将以上军衔的川军将领，占到整个中国军队牺牲将军数量的十分之一。其中，14个川军将领是1938年之前，也就是出川一年间就阵亡的。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这些主要战场，到处都是川军的身影。

在这些将领中，有一位最高将领，是病死的。那就是刘湘。

刘湘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其实当时是坚决反对刘湘出川的，因为他有严重的胃溃疡。

胃溃疡发作的时候，刘湘经常会吐血。出川前，他请了一位德国医生做诊疗，医生关照他必须要开完刀才能走，但刘湘不答应，把德国的那位医生一起带上了。

1937年11月中旬，刘湘抵达南京，此时中国军队已从淞沪会战败退，日军先后攻占嘉定、常熟等地，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兵分两路逼近南京。作为负责该地区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曾向蒋介石请战，将川军两个集团军集结，由他来指挥保卫南京（后来选的是唐生智）。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刘湘立刻通电："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

11月23日，因吃了螃蟹，刘湘病情加重，胃出血不止。次日傍晚，蒋介石亲携张群、钱大均至刘湘处探视，劝其出京治疗，而刘湘则要求继续坐镇指挥。

11月27日，刘湘陷入昏迷。在蒋介石的示意下，刘湘乘船离开南京，入住汉口万国医院。12月上旬，刘湘的病情略有好转，可以由人搀扶走路。那个时候，因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所以刘湘开始考虑四川作为大后方安排大批内迁人员。

1938年元旦，刘湘发表了《长期抗战中的四川》一文，文中提到四川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四川是一致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并深信有四川作为抗战的一个忠实后方，抗战一定能够进行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

但就在这一天，刘湘知道了一个让他难堪的决定：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蒋介石撤销了他第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其实接任者是

刘湘的亲信唐式遵）。没有了职务，他就没有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尽管他作为一个病人，确实难堪指挥重任，但刘湘认为，蒋介石应该事先告知他。

1月13日上午，刘湘的老友冯玉祥来访，据后来门口的卫士回忆，当时刘湘情绪激动，大声说过“今天抗日，我出川军十多万，将来历史上，国人会知道我刘湘是什么人”。

1月17日，刘湘病危，医生马上要求给他输血。从前线赶回来的川军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输了300毫升的血，但当时刘湘的血管已经萎缩，连血都很难输进去了。

刘湘终于决定开始写遗书：

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功赴前线，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

不意宿病发，未竟所愿，今后唯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

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1月20日，刘湘病逝，享年50岁。

1月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恤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

刘湘那段“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遗嘱，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的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都会大声诵读。

在他病逝后，有人在他房间的抽屉找出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他手写的两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四川阵亡将士子女寄托所师生合影

馒头说

一直以来，不少人会有一个疑问：刘湘在大后方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出川抗日？

有一个说法是，刘湘为了避免被蒋介石裁军。

根据当时的情形来看，谋求统一的蒋介石，已经开始了川军的裁撤和渗透工作，刘湘此时率军出川，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周旋手段。

但不管刘湘出川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动机，川军是实打实抗日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两场战役，刘湘就耗光了手里六个精锐主力师。在之后的徐州会战和长沙会战中，川军凭借低劣的装备，用自己的血肉和勇气，打出了自己的军威。说刘湘和川军将士纯粹是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抗日，这对他们不公平。

据统计，全面抗战八年来，一共有40万川军出川抗日，参加了抗战中所有的正面战场战役，其中有26万川军埋骨他乡，再也没有回来。

1937年到1945年，全国征兵总数为1400万，其中四川贡献兵员320万，占全国总兵员1/5强。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不仅仅是出人，还有出钱。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1937年至1945年，中国财政总计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达到了1/3。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四川成都市的人民公园。

这座雕像，展现的就是那时候最典型的一个川军士兵形象：大砍刀，斗笠帽，简陋的步枪，短裤，草鞋。

就是这样一支装备如此简陋的川军，当年浩浩荡荡，满腔热血，出川抗日。

中国的军界，原本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但自抗日战争川军出川之后，多了一种说法，叫“无川不成军”。

后来在汶川大地震后，互联网上又有了一句话：

“川人从未负国，国人绝不负川！”

抗日战争，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军

这是一个中国飞行员的故事，这位飞行员，因为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而被铭记。但今天我们怀念的，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批当时中国的空中精英。

1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

日本的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轰炸机，每架携带着2枚250公斤的炸弹，从台北的日本空军基地起飞，飞向中国大陆。

这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的命令。就在这一天的凌晨，中国的空军出动飞机76架次，轰炸了日本在上海的司令部、码头、仓库和舰船。

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孱弱的中国空军，居然敢在大日本帝国的空军面前主动出击！

所以，这是日军的一次报复行动，报复的目标之一，就是上海附近的杭州笕桥机场。与黄埔军校齐名的笕桥中央航校，可以说是中国空军的摇篮，如果能摧毁笕桥机场，不仅可以缓解在上海作战的日军的压力，更能一举摧毁中国空军的士气。



8月14日下午，9架“九六式”轰炸机飞临笕桥机场上空，日本的飞行员甚至已经可以看到，中国的飞机正在向机场降落。

根据情报，中国空军的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中队，刚刚从河南的周口转场到杭州的笕桥机场，刚降落的飞机肯定燃料已经不足，正是攻击的好时机。

笕桥机场的空袭警报拉响了。

日本飞行员吃惊地发现，刚刚降落的中国飞机，立刻滑出跑道起飞升空，而正在降落的中国飞机随即拉升了机头，转身向自己的编队扑来。

淞沪会战的第一场空战，就在笕桥机场上空拉开。

这是一场遭遇战。按理说，日本空军的轰炸机应该有战斗机护航，但当天因为天气原因，日军航母上的“九六式”舰载机不能起飞。更重要的是，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根本不相信中国有什么像样的空军力量，认为单凭“九六式”轰炸机就够了。

“九六式”轰炸机是日本三菱重工研发的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的单翼战斗机，虽然体型笨重，但每架飞机上配有3挺7.7毫米口径的旋回机枪，完全可以对抗普通战斗机。而中国空军驾驶的，是从美国购买的霍克–3型双翼驱逐机，火力不及“九六式”轰炸机，但飞机性能上却优于对手。



霍克-3型驱逐机

这场不到30分钟的空中绞杀，结局让日本人大吃一惊，甚至让中国人也大吃一惊：日本空军被击落三架飞机（当时战报是击落6架），击伤一架，而中国空军无一损失！

杭州的报纸，两个小时后就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

全国沸腾。连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问消息是否属实，然后询问：击落第一架日本飞机的我方飞行员叫什么名字？

他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高志航。

2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190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县。1920年，13岁的高志航考入了奉天中法学校，后来又进了张作霖父子办的炮科学校（东北军当时以炮兵打天下）。1922年，张学良改组军队，决定大力发展空军，从国外买了120多架飞机（可见当时张氏父子多么有钱），筹建空军学校，并准备从炮科学校中选拔18名学员到法国留学学习飞行技术。

当时高志航非常想去，但因为身高只有167厘米，落选了。他一个人在学校走廊里哭，但没人理睬。后来，他用法语给张学良写了一封

信，并在信中把名字“铭久”改成了“志航”，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张学良最终同意将高志航加入留学生的行列。

1927年1月，19岁的高志航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随后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驾驶员，随即转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高志航（前排右二）与留法同学的合影

在那期间，高志航遭遇了一次事故：他试驾一架刚买进的新型飞机，出了故障，弹出的操纵杆敲断了高志航的腿骨。因为接骨效果不理想，需要敲断重接。为了避免影响飞行员最重要的神经系统，高志航坚决不肯打麻药，在无麻醉状态下敲断腿骨重接。接完骨后，高志航的伤腿短了1厘米，从此人称“高瘸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放一枪，全线退回关内（详见本书收录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这件事给了高志航极大的刺激，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返回关内——作为一名当时中国极度稀缺的优秀飞行员，他希望能有一个报国的机会。

高志航当年的留法同学邢铲非，当时已经做到了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经他的介绍，高志航来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接受了一个高级班的短期培训。但因为他当时东北军的身份，处处受人猜忌和排挤，结业后只得到了一个空军见习少尉的头衔，还没有单独飞行资格。



高志航的座机（第四大队一号机）

但是，高志航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他有过硬的飞行技术。在之后几年，他通过刻苦自修，掌握了“夜间起飞不打灯”“倒飞”“弧形飞”等当时国际一流的飞行技术，并在几次检阅中技惊四座，很快就成为空军教导总队的少校总队副。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50岁生日。那天，南京航委会特别在南京举行了一次有英、德、意等国空军参加的空战技术和飞行特技表演。当时正留守杭州的高志航闻讯后，主动驾机前往参加。当时，他那些拿手好戏让外国飞行员的特技都相形见绌，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高志航声名大振。

1935年，高志航奉命去意大利考察并购买飞机。在意大利，酷爱飞行的墨索里尼对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大为赞赏，甚至希望他能留下，当然遭到了拒绝。意大利的飞机制造厂商出了重金贿赂高志航，试图让他买下一批落后的飞机带回国，高志航坚决不答应，随即向美国购买了100架霍克–3型飞机。

这就是1937年8月14日，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那批飞机。

3

再回到1937年8月14日那一天。

当时笕桥机场上空大雨，由河南飞来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一

中队9架飞机刚刚降落在机场准备加油，第二十二、二十三中队还在飞行途中，准备降落。

已经是第四大队队长的高志航，得到日机来袭的警报后，随即奔了出去。因为通信设施不灵，高志航骑了辆自行车，不停用手势加喊叫："起飞！赶紧起飞！"在命令第二十一中队起飞迎敌后，高志航自己也跳上了一架霍克–3型战斗机，带了两架僚机迎了上去。

当时的日本"九六式"轰炸机编队因为过分轻敌，已经四处分散寻找轰炸目标，放弃了交叉火力掩护，这也给升空后的中国空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高志航率先在云层下发现了一架涂着迷彩色的"九六式"轰炸机，对方同时也发现了他，机枪马上从炮口中伸了出来。

但高志航不可能给予对手任何机会，他先是用机关枪摧毁了那架飞机的尾炮，然后从容跟进瞄准，精准击中了对手飞机的主油箱，日机像一个火球一般，坠落在钱塘江畔。

8月15日，不相信失败事实的日军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了16架轰炸机和29架战斗机，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第四大队起飞迎敌，又打下日机3架（高志航本人击落2架）。那一天，中国空军第四、第五大队一共打下17架日本飞机。8月16日，又击落日机8架。

短短几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竟然在他们本以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面前，损失了一半最新式的"九六式"轰炸机，且对战略目标的打击根本不能完成。

在"大日本帝国巨大的耻辱"面前，木更津航空队联队长石井义大佐，剖腹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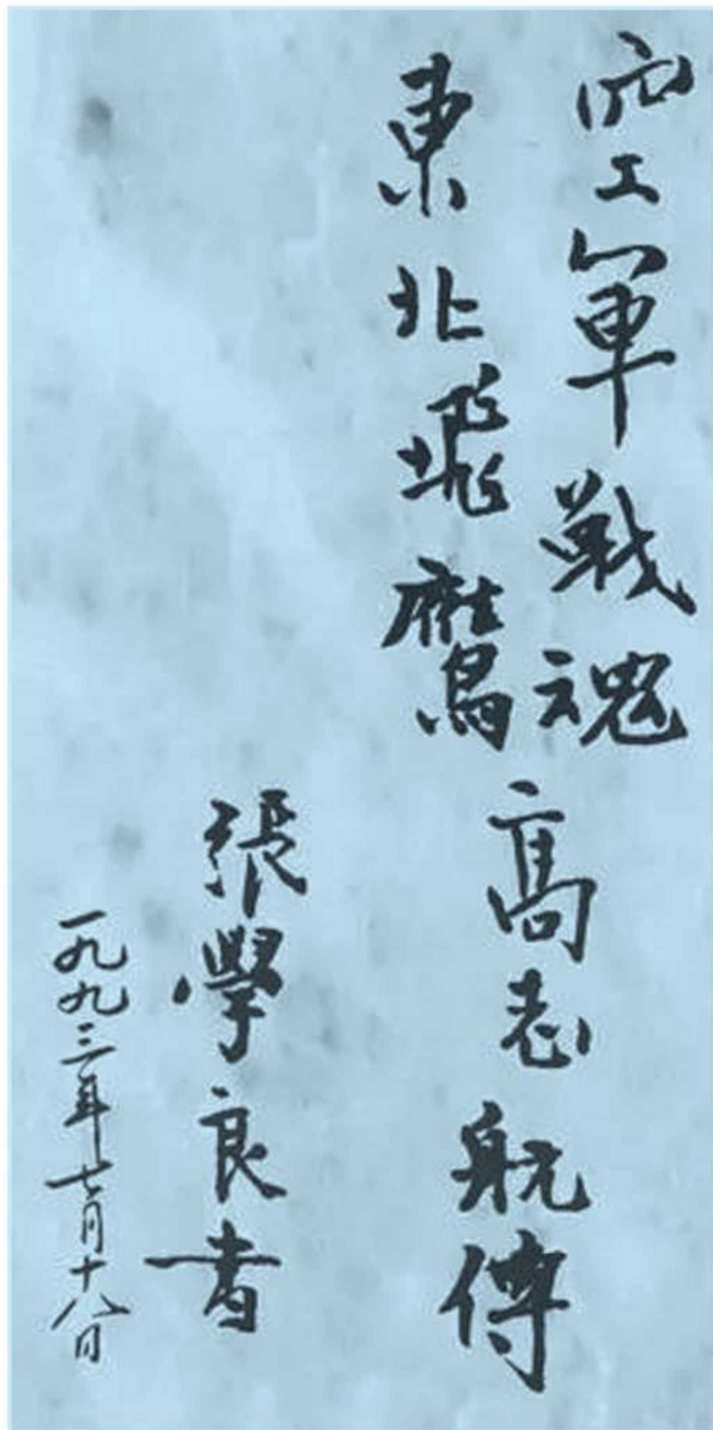
4

但令人扬眉吐气的胜利，毕竟只是暂时的。

1937年，中日两国的空军实力对比是这样的：日本拥有91个飞行中队，各类作战飞机2100架左右，而中国一共只有300架左右的作战飞机，日本作战飞机是中国的7倍。

更关键的是，日本自己拥有飞机制造能力和技术更新能力（1940年后服役的著名"零式战机"，曾给中美空军造成巨大麻烦）。抗日战争时

期，日本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而中国所有的飞机包括零件都从外国采购，本身没有任何制造能力，换句话说，打一架就少一架。在最初的交手之后，中国空军飞行员每一次驾机升空，往往要单挑对方10架甚至20架飞机。



1993年，92岁的张学良为《高志航传》题词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国飞行员都知道自己的必然结局——殉

国。

其中当然也包括高志航。

1937年11月，因为中国的飞机越打越少，只能从苏联秘密购买（美国当时因不愿得罪日本，不再向中国出口飞机）。高志航受命到兰州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11月28日，转场的飞机抵达河南周口机场，随时准备飞赴南京支援前线。

但是，这个情报却被日本人获悉了（一说是汉奸告密）。

11月28日清晨，数十架日军轰炸机飞临周口机场上空，对新到的中国飞机施行轰炸。高志航率先冲进机舱准备升空迎敌，但一连发动两次飞机都失败了。这时，炸弹已经在机场爆炸，身边的军械长劝他先找地方避一避。高志航回答："身为中国空军，怎么能让敌人的飞机飞在头上？"

就在第三次发动的时候，密集的炸弹落在了他的座机周围，高志航连同14架飞机，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殉国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时年30岁。

5

悲壮殉国的，不仅仅是高志航。

当时，包括高志航在内，中国空军有"四大天王"。

乐以琴，曾被称作"空中赵子龙"，一人击落过8架日机。在南京保卫战中，与战友董明德驾驶仅存的两架飞机升空迎战数十架日机，飞机被击中后，跳伞落地身亡。时年23岁。

李桂丹，"八一四空战"中击落第二架日机的王牌飞行员。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以寡敌众，在击落3架敌机后，在空中被日机击中油箱，机毁人亡。时年24岁。

刘粹刚，一人击落过敌机11架。南京保卫战中，日机欺负中国空军已无力量，在南京上空做特技表演，刘粹刚单独驾驶飞机升空，在数万南京市民眼前击落日机一架。1937年10月，在支援山西战场夜航时，为

了保全珍贵的飞机而不肯跳伞，最终飞机撞上高平县魁星楼，机毁人亡，时年24岁。

除了这些英雄，还有一批名字值得铭记。

沈崇诲，在1937年8月19日的淞沪空战中，飞机冒烟起火，与同机的陈锡纯决定放弃跳伞，驾机撞击日军旗舰“出云号”，最终失败，坠机入海殉国。沈崇诲时年26岁，陈锡纯时年22岁。

陈怀民，在1938年武汉“四二九空战”中，飞机中弹起火，但他放弃跳伞，驾机翻转180度，与当时日本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的日机相撞，同归于尽。时年22岁。



上一：高志航，下一排左起：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

还有很多在空战中牺牲的飞行员，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

1944年第5期《中国的空军》上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殉国成仁的烈士群》的文章，其中记载了很多当时中国空军的飞行员，而最多的一句就是："某天，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笕桥中央航校，同学之间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同年入校，同年毕业，同年殉国。

这些飞行员殉国时，风华正茂，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家世和教育背景，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退缩。刘粹刚在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真的，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们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

翻开当年中国空军的飞行员花名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与日本惨烈的空中战斗中，中国的第一批精英飞行员，基本没有一个活过1938年。

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在开战一年之内，全部殉国。

馒头说

最后还想说一个中国飞行员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阎海文。

1937年8月16日，隶属中国空军第五飞行大队的阎海文奉命轰炸日军驻上海司令部。在完成轰炸任务的返航过程中，阎海文的5210号座机被地面高炮击中，他被迫跳伞，却因为风向变化，落入了日军阵地。

大批的日军围了上来，他们希望能活捉一名"支那飞行士"，看看到底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居然能击落"大日本帝国"的飞机。

阎海文身边只有一把手枪，他在日本士兵的"投降"喊话中，举枪击毙了5名日本士兵，然后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

21岁的阎海文在自尽前，喊了一句："中国没有做俘虏的空军！"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木村毅吃惊地目睹了这一幕，并写成了报道发回国内。

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向来做得细致。早在开战之前，中国空军有多少家底，他们早就已经摸得一清二楚。

但是，机器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子弹是冷的，血却是热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拿着低劣甚至原始的武器，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战场。哪怕是在最讲究武器与机械性能的空中战场，中国军人所表现出的魄力和战力，也让日本空军

感到震撼。一位日本空军飞行员曾回忆：中国飞行员根本就不是来空战的，他们不要命一样，就像是来拼刺刀的。

因为他们不理解，一个人在保卫自己家乡国土的时候，能迸发出多大的勇气。一位笕桥中央航校六期的东北籍飞行员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进入笕桥就准备好有朝一日血洒长空，我抱定了舍生取义的信念，只盼在与敌同归于尽之前，打回东北去，驱逐日寇，把我的战机降落在家乡的机场！”

这位东北飞行员后来在江苏句容上空被击落阵亡。但千千万万的中国飞行员，依然义无反顾地投入战场。据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在空中击毁日机568架，在地面击毁日机599架（抗战后期，美国“飞虎队”加入后战局明显好转），日本陆海军航空兵被击毙、俘虏及失踪者，共计2764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空军伤亡14037人，损失飞机1813架。

阎海文自尽后，日本士兵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坟墓，立了块墓碑，上面写了“支那空军勇士之墓”，以示敬意。

那位记者木村，在发回国内的报道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一座被死守的仓库

这个故事，和一座仓库有关，那曾经是一座千疮百孔的仓库，因为一群军人的死守，这座仓库被人永远铭记。

1

1937年10月27日，凌晨2点。上海闸北区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

那是一座六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因为是当时上海四所银行设立的联合营业所的仓库，所以被上海人叫作四行仓库。

此时的仓库里，脚步声声，人声鼎沸。

“一楼所有门窗，用沙包和粮食全部堵死！”

“二楼以上窗口，堵死一半！到时候可以扔手榴弹！”

“电源全部切断！别让鬼子利用电线放火！”

一道道命令被传达下去，一队队士兵在仓库内来回穿梭。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就绪！”士兵向一位长官报告。

“清点人数！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记下来！”长官命令。

之所以下这道命令，是因为长官希望这份名册能传递出去，等全体殉国后，让国家优待烈士家属。



布满弹痕的四行仓库

然后，长官命令全体集合。

“这个仓库，就是我们最后的阵地！”长官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说，“也可能，就是我们的坟墓。”

长官顿了一下。

“但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和敌人拼到底！听清楚没有？！”长官吼道。

“听清楚了！”所有士兵大声回应，呼声在整个仓库间激荡。

在之后的四天，这支残缺不全的部队，将被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知晓：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

团长的名字，叫谢晋元。

2

谢晋元，广东省蕉岭县人，1905年出生。

考进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的谢晋元，原本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发现，空谈理论或上街游行和喊口号，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要改变这个国家，必须自己投入到第一线去。

1925年，谢晋元以广东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考入了黄埔军校四期，投笔从戎。



谢晋元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谢晋元提前毕业，从一名排长做起，一路冲锋陷阵，到了1936年，谢晋元做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的旅部中校参谋。

那一年，中日之间火药味已经四处弥漫。谢晋元的部队，从四川万县调防江苏无锡。谢晋元立刻做了一件事——把住在上海龙华镇的妻子凌维诚和儿子送回广东原籍。

在与妻子告别时，谢晋元说：“我不是好儿子，也不是好丈夫，奉养年老父母，抚育年幼子女的重担，要你承担了。这场和日本的战争，会非常激烈，我们肯定会有很大的牺牲，也会有局部的失利，但我们国家一定会胜利！到时候，我亲自接你们母子回上海！”

1937年8月11日深夜，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奉命从无锡出发开赴上海。

两天后，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

当时日本人喊出的口号是：“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全中国。”为此，日本一共在上海投入了14个半的最精锐师团，并出动了一半以上的海军。



燃烧的上海市政府大楼

而蒋介石也投入了自己的血本。这场在当时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爆发的残酷会战，前后有80万最精锐的中国军队对阵30万最精锐的日军，

从8月打到11月。但打到10月底的时候，中国军队其实已经顶不住了。

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大场防线被突破，全军撤退。

这个时候，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全师留下，死守上海！

第八十八师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师，全德械装备，淞沪会战一开始就顶到了最前线——蒋介石也希望借此让全国各地的军阀看到中央军誓死抗日的决心。

但这个命令被孙元良断然拒绝：这纯粹是白送死！死得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蒋介石讨价还价：留下一个团？

孙元良还是不同意。

最终，决定留下一个营。

当时有很多人都不理解蒋介石这一举动：所有部队都撤退了，为什么还要留一支孤军？

而蒋介石的目的，是希望留下这支坚守的部队，让全世界看到，在上海，中国军队仍在抵抗日本人，他一直希望获得国际的关注，以及随后的干预。

而这支注定有死无生的部队，就是五二四团一营。谢晋元其实是当时的团附，代理团长。

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率五二四团一营进驻四行仓库。当时全营其实只有400人左右，为了迷惑日军，号称“八百人”，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八百壮士守四行”。

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3

10月27日，清晨。

大摇大摆来到苏州河边的日军，被四行仓库里突然射出的子弹打蒙了：中国军队不是全撤了吗？怎么还有部队在这里？

整整一个上午，日军没敢行动。

在摸清了情况之后，当天下午，日军对四行仓库完成了包围，开始大规模进攻。

一时之间，枪林弹雨，弹片横飞。

四行仓库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谢晋元的孤军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仓库三面被日军包围，但南面与英租界相连。

当时的日军，还不敢动租界。



远眺炮火连天的四行仓库

所以，尽管枪声激烈，但日军不敢动用飞机轰炸，也不敢炮轰。在基本相同的武器条件下，视死如归的中国军人又居高临下占据了守势，日本人的头就一下子大了起来。

而两岸的上海市民却沸腾了。

“还有一支中国军队没撤！他们还在打鬼子！”

这个消息，在上海市民中迅速传播。到了27号下午，苏州河岸边，

居然聚集了上万名上海市民。

虽然不远处就是弹片横飞的战场，但隔着苏州河围观的上海市民却没有躲开的意思。他们看到谢晋元的士兵干掉日本士兵或炸毁日本战车，就一起拍手欢呼，齐声叫好。看到日本军队想偷袭，就齐声喊叫提醒中国士兵，还用大黑板写字和画图向仓库里的中国士兵预告。

知道仓库里留守的中国军队可能会缺少食品和药物，上海市民自发组织起来，捐赠食品和药品，第一天就通过租界送进去2万张大饼和各种水果、药品（当时上海的流氓大亨杜月笙也出力颇多，参阅《“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在上海市民里面，有一个22岁的女孩，叫杨惠敏。当时她看到，四行仓库的三面都飘扬着日本的太阳旗，而南面飘的是英国的米字旗。作为当时战地服务队童子军的杨惠敏，就希望能为谢晋元和他的壮士们做些什么。



杨惠敏

27日夜，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爬过当时上海的西藏路，通过四行仓库与英租界相接的烟杂店，送进去一样东西。

10月28日清晨，东方慢慢露出鱼肚白，一大早就来围观的上海市民，发现四行仓库楼顶，居然升起了一面国旗。

那一面国旗，由两根竹竿接在一起当旗杆，在一片日本太阳旗和英国米字旗中间，迎风飘扬，分外显眼。

20个左右的中国军人，在楼顶，面向国旗，肃穆地敬军礼。

对岸的上海市民顿时沸腾了，很多人脱帽致礼，而更多的人瞬间就流下了热泪。

人群忽然爆发出了齐声的呼喊：“打倒日本！”“我们必胜！”“中华民族万岁！”

4

战斗越来越惨烈。

第二天，10月28日，日军对四行仓库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谢晋元自己都拿起枪站到窗口开始狙击日军。

但日本人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找了一块厚钢板，由十几个日本突击队士兵托举在头顶挡住子弹，向四行仓库的底楼突进——他们准备用随身携带的炸药包，炸开四行仓库底楼的墙体，打出一个突破口。

关键时刻，敢死队员陈树生站了出来。他在自己身上绑满手榴弹，拉了导火索，就直接从窗口跳了下去，与那个突击队的十几个日本士兵同归于尽。谢晋元当时就在窗口，泪流满面。

陈树生是四川人，之前他已在一件白汗衫上，给远在家乡的母亲写下了血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像这样的遗书，四行仓库里一共有298封。



一开始，五二四团一营还在仓库外设有阻击阵地，后来全部退进仓库

10月29日，谢晋元给师长孙元良发了一封信：“誓不轻易撤退，亦决不做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前，全营官兵必向倭寇取偿相当代价。”“决不负师座，不负国家！”

10月30日，孤军坚守四行仓库四天之久的谢晋元将士，已经把日本人惹得恼羞成怒——他们终于调集了37毫米口径的平射炮开始猛轰四行仓库，然后开始四处纵火焚烧，甚至完全不顾国际公法，开始向仓库内发射瓦斯弹。



淞沪会战中戴着防毒面具的日本部队，证明他们确实使用了毒气

日军扬言：将不顾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

无论是实际攻势还是口头威胁，都没有对四行仓库内的守军发生任何作用。直到10月30日晚，四行仓库岿然不动。

但有些人毕竟还是被吓到了。

10月30日晚，谢晋元非常意外地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5

对于命令谢晋元撤退的原因，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各国使节向中国政府提出照会，要求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撤回谢晋元的孤军。

另一种说法是，由于日军被激怒，各种火力和攻击手段明显升级，租界怕殃及池鱼，坚持要撤出谢晋元的部队。

从谢晋元后来的遭遇看，后一种说法更可信。

10月30日晚，再三表示“全营将士已准备与仓库共存亡”的谢晋元，

在安排好阻击掩护后、含泪将自己的部队撤进了英租界。

四行仓库坚守四天，消灭日军200余人，摧毁日军坦克两辆，而谢晋元的部队，牺牲9人、伤28人，300多人的部队，安全撤进英租界。

但一进英租界，谢晋元的部队就被缴械了。

按照原先的约定，是谢晋元的部队通过租界，然后与沪西的中国军队会合，继续投入抗日战场中去的。

但日本人给租界发出了威胁：如果你们敢让谢晋元的部队离开，我们就立刻进入租界，搜捕追击！

最终，租界迫于中国民众压力，没有把谢晋元的部队交给日本人，但也不敢放走他们，而是将他们放在租界内一块15亩大的地方，软禁起来。

这一禁，就是4年。在那期间，谢晋元和他的部队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率领一营全体将士，每天准时出操、训练、自办饭食，还自己举办唱歌会、运动会。

在那期间，上海也沦陷了。但上海市民每天都会来到这片“孤军”的营地，给他们带好吃的，告诉他们外面的新闻和战事进展。多的时候，每天有数千人，少的时候，也有数百人。有的上海市民，来了，就远远地朝谢晋元他们鞠一个躬，就转身离去。

在那期间，有无数的日本浪人和特务，试图闯入营地暗杀谢晋元，但都没得逞。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以陆军司令的高官诱降谢晋元，被谢晋元痛斥拒绝。

诱降不成，汪伪的特务只能使出下作的手段了。

1941年4月24日晨5时，谢晋元在照例带兵出早操时，被汪伪收买的四个谢晋元的士兵，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匕首和铁镐等凶器，猛刺猛击谢晋元的胸部和太阳穴。谢晋元重伤后不久就逝世了，年仅37岁。



谢晋元和他的部下

消息传来，举国悲愤，上海市30万市民自发吊唁，几条马路都被堵塞。蒋介石追封谢晋元为少将。

但坏消息并没有结束。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正式对欧美列强宣战。一直试图明哲保身的上海租界，被日军全面接管，而租界营地里的谢晋元孤军，被全部拘禁，然后被发配到各地去做劳工和苦役，更有36个人，被发配到了遥远的新几内亚。

曾经威震敌胆的谢晋元四百壮士，最终落得了这样一个结局。

馒头说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

我们总幻想着英雄们有一个圆满的终场——或者以为至少是一个悲壮的结局，但真实的历史，就是会让你无言以对。

事实上，抗战胜利后，谢晋元留下的这些将士们，也过得不好。谢晋元的遗孀凌维诚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发现依然在世的六七十个原来谢晋元五二四团一营的将士，都处境艰难。自己也非常穷困的凌维诚，为了他们四处奔走，但当时国民党各个部门相互推诿，没有结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无奈的凌维诚写信给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说明了自己的情况。陈毅很重视，上海市政府当时发出第589号指令，指出必须照顾好为国捐躯的谢晋元家属，拨出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和墓地一块给了凌维诚。但是到了“十年浩劫”的时候，谢晋元的墓碑被红卫兵给砸了。直到“文革”结束后，谢晋元的墓移入上海“万国公墓”，对谢晋元的纪念才慢慢多了起来。

历史虽然冷酷无情，但该记住的，还是会被记住。

在那个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的年代，在那个被断定“三个月就可以灭亡”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抱着必死的决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世人传递一个声音，就像抗战初期那首传遍全国的歌曲《歌八百壮士》唱的那样——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

同胞们，起来！

同胞们，起来！

……中国不会亡！

1937，这座城没有不战而降

对不起，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有点憋屈，我一度想放弃，因为自己写着也觉得很憋屈。但是，最终还是想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那一场在一座城市发生的大屠杀。在此之前，我们都觉得是一场一枪未放、束手待毙的溃败，但事实上，并不是。这座城市，并没有不战而降。

1

1937年12月7日，凌晨5点45分。

南京的明故宫机场起飞了一架飞机。在那架名为“美龄号”的飞机上，坐着的是蒋介石。

此时的南京城外，日军已准备正式攻城。

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军舰一直停在江面上，他希望通过这个信号，告诉南京的守军：我一直和你们在一起。

但如今，他要坐飞机先走了。

飞机飞离南京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蒋介石当时的心情。但从南京外围阵地前几日的战况来看，蒋介石可能会有点后悔。



电影《南京！南京！》剧照

因为当初是他力主死守南京的。

2

就在1937年11月20日，日本人得到了一个令他们大为震惊的消息：中国国民政府宣布，将中国的首都从南京迁走，转到重庆。

刚刚取得淞沪会战胜利的日本人，一直憋着股劲，要趁势拿下离上海只有300多公里的中国首都南京，进而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坐下来谈投降的条件。

但现在，中国人却宣布迁都了！这是要“奉陪到底”的意思啊！

那么南京还打不打？当然要打！在淞沪会战中已经杀红了眼的日本人，早已视南京为囊中之物，日军的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和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甚至在没有得到参谋本部允许的前提下，争相向南京进发，企图夺取头功。

11月28日，在一片少壮派军人“南京！南京！”的呼喊声中，本想停止进军开始和中国谈判停战条件的日军参谋本部，最终批准了进攻南京的命令。

日本人决定打南京了，那中国人守不守？



一直力主进攻南京的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后纵容了南京大屠杀。战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蒋介石为此专门召开了一个高级将领的内部会议。

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态度最明确：南京不能守！

李宗仁的理由其实很站得住脚：南京虽然是十朝古都，又是首都，意义非凡，但现在从战术上说已经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南京北临长江，又无路可退。另一方面，南京现在的守军，全是从淞沪战

场上溃退下来的中国军队，兵源不足不说，士气还受到了沉重打击，根本受不住。

李宗仁的建议是：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避免敌人找借口屠杀平民。中国军队主力撤到长江两岸，让日军空得南京一城，没有实际意义。

对于李宗仁的这个提议，时任参谋本部副参谋长，主持制定整个抗日计划的“小诸葛”白崇禧非常赞同。

李宗仁和白崇禧同为桂系，意见自然一致。而蒋介石自己的亲信，刚刚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淞沪会战前敌总指挥陈诚同样也坚决反对守南京，他同样认为南京孤立，要塞设施简陋，军队士气低下，不宜死守。他认为日军在“战略上已经失败”（即放弃从北向南，改由从东向西打），那么中国军队应该迅速撤离战场，开始持久抗战。



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

蒋介石的智囊，时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的刘斐揣摩出蒋介石的意思。刘斐的意见，算是稍微给了蒋介石一点面子：象征性地防守一下。

刘斐认为，南京是孤城，守肯定是守不住的，但南京毕竟是首都所在，又不能不做任何抵抗就放弃，所以他的建议是，用十二个团，最多十八个团，象征性抵抗一下就主动撤退吧。

蒋介石一直不吭声。

这时候，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朗声说：“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面对总理在天之灵？”[1]

蒋介石点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

那个发言的人，叫唐生智。

3

唐生智，湖南东安县人，出生于名门望族，祖父唐本友，官拜清朝广西提督。

因为政见不和，唐生智一生有三次反蒋，其中两次导致蒋介石下野。但最终两人握手言和。不过无论如何，唐生智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唐生智常年信佛，人称“佛教将军”，但他的部队，其实战斗力很强。北伐战争时期，以唐生智的湘军第四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是整个北伐部队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唐生智在会议上力挺死守南京，其实是有些出人意料的。有人后来曾揣摩，当时不如意的唐生智，可能是希望借这次机会，重新掌握军权。

但当时的南京危在旦夕，哪怕是出于私心，又有多少人敢出面主持这样的危局？

蒋介石随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那么唐生智手里有多少牌可打？说实话，实在不多。算上淞沪会战退下来的残兵，有七个军，但因为都是编制不全的部队，所以满打满算，只有十五个师，大约10万人——按照另一种确切的说法，大概8万人左右，还是士气低落的8万人。



淞沪会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但也损失惨重

而日本方面，因为是要攻占敌人的首都，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整个投入的兵力为30万人左右，南京正面战场大约聚集了10万日军，携带大量优势装备。

但唐生智还是决心死守。

为了表示决心，唐生智向交通部长俞飞鹏提了一个要求：把唯一能从南京出逃的长江边的下关码头到对岸浦口码头的轮渡和各类船只全部撤走。唐生智还要求驻防江对岸的中国军队：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和军人个人，都必须制止，必要时“可以开枪射击”。

有一种说法，说唐生智接受了守卫南京的任务，但第二天就把家眷都转移了。但从唐生智儿子的回忆和其他一些史料来看，唐生智和他的家人都留在南京，直到最后一刻。

唐生智曾回忆当时他和蒋介石的一段对话：

唐：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修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

蒋：哪一个守呢？

（唐生智回忆：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

蒋：如果没人守，我自己守。

唐：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

蒋：不行，他们资历太浅。

第二天，蒋介石又找到唐生智。

蒋：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么就是我留下，要么就是你留下。唐：你怎么能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蒋：你看把握怎么样？

唐：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从后面发展的情况看，唐生智应该是做到了后四个字，却没有做到前四个字。

4

1937年12月7日，日军全面攻城的一刻，终于来临。

清晨，在占据绝对优势的炮兵和航空兵的火力掩护下，日军开始向南京城外的第一道防御阵地展开猛烈攻击。

其实从12月1日开始，日军就开始轰炸南京，12月3日，开始对南京周边发动正式攻击，仅仅用了4天，就三面突破，推进到了南京城外的第一道防线。



日军在中国战场投入了240毫米榴弹炮，其1发重达200公斤的炮弹，在中国战场上没有什么工事可以阻挡得住

武器落后、编制不全的中国军队，实在是难以抵挡杀红了眼的日本军队。12月7日，南京东面的汤山阵地首先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部急调三支部队三面围堵夹击突入的日军，但中国军队还未赶到，日军的增援部队就源源不断地涌入。

当时进攻南京的日军，配有2000门以上的大炮，其中150毫米加农炮和240毫米榴弹炮就超过700门。在敌人的优势火炮面前，中国军队搭建的防御工事根本不堪一击，很多优秀勇敢的机枪手，直接就被轰死在机枪掩体里，一枪未发。

5

12月8日，南京保卫战进入第二天。

南京城外围的东面、南面、西南面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

防守南京东南面淳化镇阵地的，是第七十四军。第七十四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所辖的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八师，都是中国陆军的王牌师。

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是山东人，一向敢打敢拼，他指挥的部队和进攻的日军打起了对攻战，激战三昼夜，迫使日军数次增援，依旧不克。

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黄埔一期生，做过蒋介石警卫团的参谋长。在战斗中，他穿着崭新的军装端坐在师指挥部，他说他如果被打死，日军会向他的遗体敬礼，因为他会让日军认识一个死战死拼的师长。

拥有当时中国军队罕见的反坦克炮的五十八师，击毁了日军5辆坦克，毙敌300人。

只是局部的胜利，无法挽回整体的败局。

到了12月8日晚，南京外围阵地已经基本丧失殆尽，卫戍司令部命令：中国守军全部退守南京城郭阵地。日本军队就势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

8万中国军队，失去了最后一个整体突围的机会。

6

12月9日，南京保卫战艰难地进入到第三天。

这一天，日军又出动了飞机，但这次不是轰炸，而是投撒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劝降书”：“……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

唐生智随即下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摇动全军！”

南京守军，誓死不降。

日军真的会对中国的民众和军队仁慈吗？

当时，从东京来到南京前线的新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签署了一道“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

7

12月10日，守城第四天。

从东面到南面，日军向南京的中华门、雨花台、光华门、紫金山等要点发起全面进攻。

在光华门，一股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了中国守军第二五九旅的阵地，突进南京城内100米左右。同样是中央军嫡系的第八十七师被调了上来，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把突入城内的日军消灭，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

这场战斗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突入城内的日军被击退，但第八十七师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和参谋主任倪国鼎双双阵亡。

到了晚上，中国军队发现已经封闭起来的光华门门洞里，居然还藏了一股日军，这伙日军准备届时和冲进来的日军里应外合。教导总队的团长谢承瑞组织士兵，往城门洞里浇汽油，把日军全部烧死。

战斗才进行到第四天，围绕城门的争夺，已经惨烈至此。

8

12月11日，第五天。

南京紫金山一带，一场让日军也近乎疯狂的战斗打响。

守卫这里的中国军队，是蒋介石身边最精锐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这支队伍是精英中的精英，当时堪称是中国所有陆军里最强的部队。蒋介石一般不舍得拿出来用，但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战场，他也只能把王牌甩出来了。

教导总队的火力猛，工事坚固，日军数日不能前进一步。当日军终于弄明白，对面防守的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后，他们在加强飞机大炮火力掩护的同时，开始使用毒气弹。

最后，双方进行了白刃战。中国军队的顽强大大出乎了日军的预料。

与此同时，驻守雨花台阵地的第八十八师在敌人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向中华门退去。而300多名日军竟然跟着撤

退的中国军队攻进了中华门。关键时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亲自到一线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巷战，最后全歼敌人。

但蒋介石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日军的国崎支队当日渡过了长江，开始向浦口方向加速运动——中国南京守军的唯一退路，将被切断。



全德械装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日军用120毫米加农炮发射毒气炮弹。士兵都带着防毒面具。此照片为日本方面的照片，照片上盖着明显的“不许”印戳

这时候，蒋介石慌了。11日的中午，长江北岸的顾祝同给唐生智打来了电话：“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的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

唐生智不肯，说必须要见到蒋介石的亲自命令。

11日晚，蒋介石拍来了电报：“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9

12月12日，南京保卫战的第六天。

这一天的拂晓，南京城郭的所有中方阵地，遭到了日军雨点一般的炮火攻击。在各个阵地上，因为伤亡数实在太大，原先由排长带头的敢死队，开始由连长、营长，甚至由团长带头冲入日军阵地。

基本都是无一生还。

在雨花台阵地，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连工兵营都全部冲了上来，阵地前双方尸体叠在一起，鲜血居然汇成了涓涓小溪。

下午，中华门西面的城墙终于被轰塌，日军蜂拥而入。中华门内的南京老百姓们，慌乱地开始向城北逃去，而残留在城内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此时已经失去了统一指挥，但他们身边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于是，他们向着日军蜂拥而入的缺口，自发地迎了上去……

这一天的黄昏，唐生智召开师以上的军官会议。

唐生智问：大家觉得南京还能守吗？

没有一个人回答。

于是，唐生智拿出了蒋介石那封“可相机撤退”的电报。

随后，唐生智开始布置突围计划。

如果说，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唐生智一个人能够控制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唐生智应该背负他应有的责任：当时的南京，三面城门均已被突破，只有背靠长江的下关码头还在中国军队控制中，那也是北渡长江突围的唯一安全通道。

根据突围计划，能从下关码头撤退的，只有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当时该部队负责防止其他部队逃跑，维持码头秩序）、宪兵部队、司令部直属部队以及负责掩护的第十军。而其他的部队，都应该从自己的阵地往东、南、西正面突围。

但是，唐生智下了一个口头命令：允许第七十四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以及教导总队由下关码头北渡长江。

这些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而这个口头命令，也给其他部队不按照计划突围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借口。

一场大混乱，由此爆发。



日军坦克列队由中华门进入南京。城墙上的四个字是“誓复国仇”

10

12月12日晚，混乱之夜。

唐生智没有践行当初“与南京共存亡”的誓言，坐上早就准备好的船，到达了江对岸的浦口。

司令官先跑了。

而唐生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会议上布置突围计划之后，整个南京守军就陷入了混乱。

有的部队长官，回部队做了布置，就立刻率军撤离了阵地；有的长官只是打了个电话，部队都没回，自己就先走了；还有的长官，甚至没通知自己部队，自己就走了。

没有协同，没有掩护，之前还拼死抵抗的中国军队，瞬间全部放弃了阵地，争相撤退。

被命令固守乌龙山要塞的第十军，在军长徐源泉的带领下，在突围会议一结束就放弃了阵地，北渡长江。而乌龙山要塞俯瞰下关码头，一

旦阵地丢失，日军可以直接用炮火封锁码头和长江江面。

原本是担任掩护南京守军撤退的第十军，居然成了第一支撤退的部队。

下关码头成了逃生的唯一通道，却也成了人间的炼狱。

各路撤退的部队蜂拥通过必经之路——只剩一个门洞的挹江门。部队之间互不相让，吵骂不断，和维持秩序的三十六师几乎发生火并。而前文提到的那个用汽油烧死日军的教导总队团长谢承瑞，竟然在这场拥挤中被活活踩死。

到了码头，成千上万的士兵却发现，江面上空空如也，只有两三条渡船——为了表达破釜沉舟的决心，唐生智在开战前就把所有船只都收缴了。

那些无船可乘的官兵，要么抱着木桶、木板跳入江中，要么索性直接开始游泳。但那个时候，日军的军舰已经赶到了，在江中漂流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成了活靶子，被不断扫射，一时之间，江面上全是浮尸。

而发现已经不可能渡江的官兵们，只能放下武器，一批批地成了日军的俘虏。



被俘虏的国军官兵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南京守军坚持不肯投降的行为说：“不但中国军人，包括所有中国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劣等人。”

于是，日军“拒绝对中国施用国际法”。[2]

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此开始。

馒头说

南京究竟应不应该守，当时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从战略上，毫无疑问应该放弃，但从政治影响上，却又不能轻易放弃。

但是无论战略是否欠缺，战术是否失当，指挥官跑了没跑，那8万死守南京的中国将士，不应该被今天的我们忘记。

他们并没有不战而降，他们也希望能保卫自己的首都，哪怕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

1937年12月7日，日本不顾一切发动了南京战役，随即获得了一个他们认为的巨大胜利。

但是他们错了。他们以为中国会就此屈服，其实绝不可能。正相反，他们进一步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沼，直到战败，再也没能抽身而退。

很巧，四年后的1941年12月7日（美国夏威夷时间），日本人又认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偷袭了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

但是他们又错了。他们以为美国会就此低头谈判，但美国那台超级巨大的战争机器，反而因此开始全力开动，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在战略判断上，日本从来都是输家。

不过，“12月7日”这个日子，应该总是会被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念念不忘的吧？

那么他们是否会知道33年后的一个“12月7日”？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这位总理双膝跪地，诚恳道歉。

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以及亚洲那么多国家，却依然还在等待。

---

[1] 《正面战场·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亲历记》，唐生智、刘斐等著。

[2]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赫伯特·比克斯著。

血战台儿庄

连日本人都很惊讶：在遭遇接连的挫败之后，中国军队是哪里来的勇气和信念，能在台儿庄组织起一场炼狱般的保卫战？

1

1938年3月24日，蒋介石到了徐州。

彼时的中国战局，让蒋介石头疼不已：华北沦陷，淞沪会战失利，南京保卫战失利……尽管蒋介石自认之前对中日战力已有一个比较清晰客观的认识，但战端一开，日军进展之神速，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战后在台儿庄火车站站牌下

而如今，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由华北南下的侵华日军，与由南京北上的侵华日军，正全力打通津浦线会合，以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

为了阻止这种不利局面的形成，以铁路交通枢纽徐州为中心，蒋介石准备布置一场大会战。

在视察结束后，蒋介石把带着一起来的三个人都留了下来，他们是白崇禧、林蔚和刘斐。这是一个绝对豪华的阵容——白崇禧，副参谋总长，人称“小诸葛”；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军令部作战厅厅长，蒋介石身边的智囊。

他们三个人，被命令留下来协助当时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

而这一群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层将领，此时却无暇顾及整个徐州战区的大形势，而是紧紧盯住了一个方圆才2平方公里的小村庄。

这个小村庄，叫台儿庄。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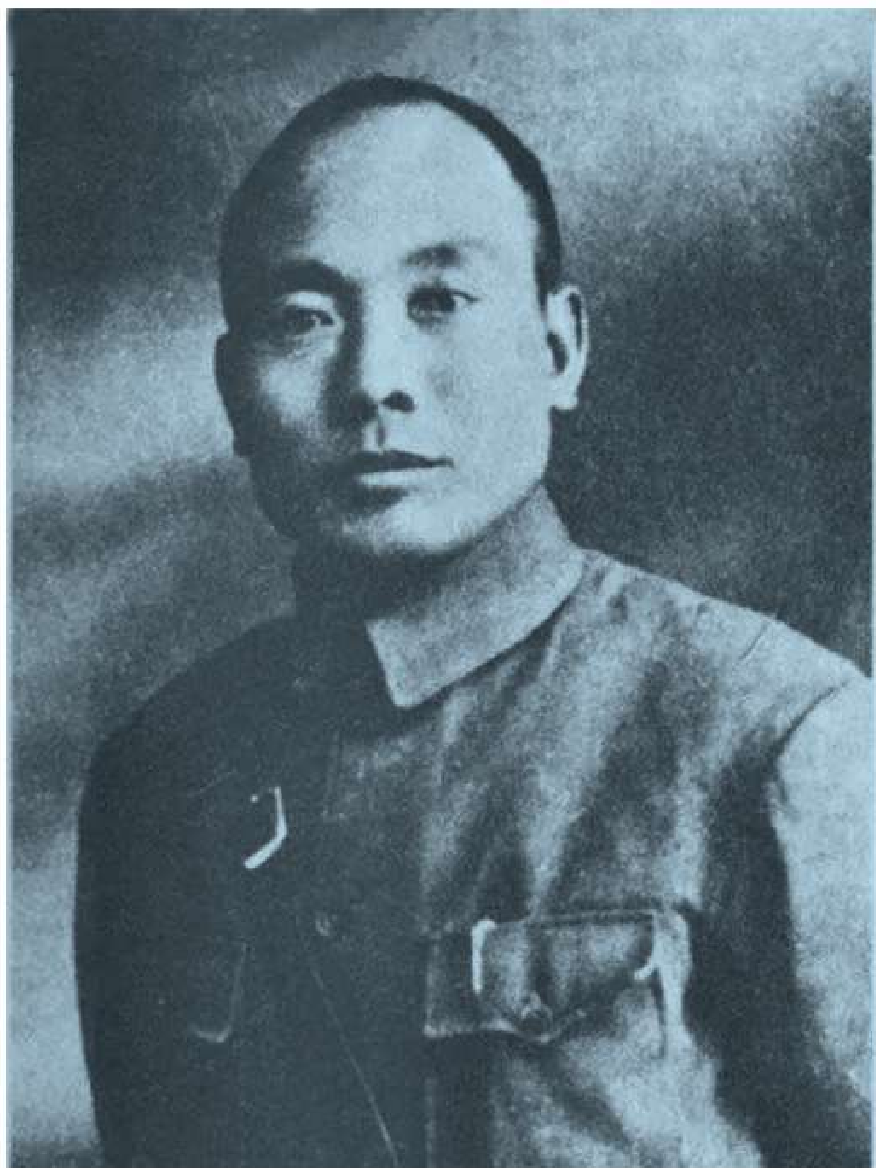
台儿庄，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心点，西南距徐州大约50多公里。虽然叫“庄”，但其实是由砖土结构寨墙环绕的一座市镇。

台儿庄，原本根本就不应该成为焦点的。按照李宗仁原先的计划，台儿庄只是一个“诱饵”——由第二集团军三十一师驻守，负责牵制和引诱日军装备精良的第十师团濑谷支队（“支队”为日军非常设单位，主要是为了完成一项特定任务而组建。当时濑谷支队的总兵力大约为1万人，但为了这次攻坚战配有师团级的重炮），然后由汤恩伯率领的中央军第二十军团从侧后方突然发动攻击，打一场歼灭战。

但是，当时情况发生了两个变化。

第一，汤恩伯军团并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在三十一师与日军接火后“不顾一切，马上抄袭敌之侧背”。

第二，日军的濑谷支队，并不是原先李宗仁估计的试探性进攻，而是一上来就准备全力攻下台儿庄。



汤恩伯一直是蒋介石的嫡系，但晚年失宠

于是，台儿庄从一个“诱饵”，一下子变成了主战场，而驻守台儿庄的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原先得到的承诺是“守住三天就行”。

李宗仁立刻通过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给池峰城下令：必须死守台儿庄！

一场事先谁都没想到的炼狱一般的大血战，就此拉开帷幕。

3月24日凌晨，濑谷支队开始攻击台儿庄外围的孙庄，遭遇了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当晚，支队长少将濑谷启就收到了求援电报。

濑谷最初派往攻击台儿庄的部队，仅仅是一个大队左右的兵力（1000~1500人），而当时台儿庄周边有中国军队大约4个师的兵力。

但日军确实有他们骄狂的理由。日本的陆军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实在是难称一流，但与中国军队相比，已经属于“降维攻击”：除了武器数量和质量远胜大部分中国军队序列外，日军进攻之前，可以派飞机提前轰炸，也可以用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重炮轰击，战斗中，还有坦克加入协同攻击——日军所谓的“坦克”与德国乃至苏联的坦克比，甚至很难称为坦克，但即便如此，仍然让没有坦克也没有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队毫无办法。



侵华日军配备的94式超轻型坦克，非常小，铁皮薄，其实和装甲车差不多

但在与台儿庄守军接火之后，日军很快发现，这一次的中国军队抵抗非常坚决，乃至拼命。在台儿庄外围的村庄，日军每攻下一个小村，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防守的中国军队往往全都战死在战壕里，他们宁可身上绑着炸药跳上日本的坦克同归于尽，也不肯后退一步。

收到求援电报后，濑谷启立刻加派两个中队外加两门重炮支援，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闻讯后，也立刻派出六十三联队的第三大队前往增援。

台儿庄之战，由“战斗”开始往“战役”升级。

虽然中国军队的抵抗很坚决，但凭借优势火力，日军在3月25日还是兵临台儿庄北面的寨墙之下。他们架起大炮，对着砖土结构的寨墙开始猛轰，很快，台儿庄北门及附近的寨墙被轰塌数丈，200多名日军拼死冲进墙内。

负责守卫的三十一师一八六团奋不顾身地冲了出来，开始与日军肉搏，付出巨大代价，把缺口堵上——一部分日军冲入了庄内的城隍庙死守，被中国士兵放火后全部烧死在庙中。



台儿庄战役中的中国军队重机枪阵地

但台儿庄薄薄的寨墙，实在挡不住日军优势炮火的攻击。3月26日清晨，台儿庄北门再次被日军突破，傍晚，东门也被突破。

大量的日军涌入台儿庄，庄内的中国守军开始内外受敌。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坐不住了，他搞不明白为什么兵力占优的

中国军队，居然会在那么短时间内就被日军冲入了台儿庄。他立刻给第二集团军司令长官孙连仲拍去了电报：“……我军兵力数倍于敌，早当解决，乃经几日战斗，台儿庄围子反被敌冲入一部，殊感诧异。……”

面对长官的“诧异”，身在前线的孙连仲只能苦笑。

4



孙连仲

孙连仲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准备拼命的。

孙连仲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西北军的悍将。在台儿庄战役爆发之前，他就下令把第二集团军的总指挥部前推到离台儿庄不足2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

按照规定，集团军的总指挥部距离战场一线20公里就可以了，但孙连仲带着参谋推进到2公里，可见他死守台儿庄的决心。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决策，因为这个村庄已经进入了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只是日军完全没想到对方的集团军总司令部敢那么突前，所以始终没有发现。

让台儿庄守军士气大振的，还不只是集团军司令长官突前指挥。

3月27日，就在台儿庄北面已经炮火连天的时候，在台儿庄南站，出现了一名身材瘦削的人，他就是蒋介石。

李宗仁是坚决反对蒋介石亲临台儿庄前线的，但蒋介石坚持要去。最终，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陪同下，蒋介石在远处已经炮声可闻的南站，见到了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

蒋介石拉着池峰城的手说：“你的长官说你是忠勇、精干兼备之人，今天看来此言不虚。”

对蒋介石出现惊喜交集的池峰城立刻回答：“我师绝对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

蒋介石都亲临前线，孙连仲就在身后2公里的地方，池峰城还有什么理由不拼？



池峰城

就在这一天，日军在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开始猛攻台儿庄西门，在西门防守的一八一团三营几乎全营殉国，300多名日军突入庄内，随即竖起了日本旗。日本媒体甚至已经开始准备“皇军已经占领台儿庄”的通讯报道。

负责守卫庄内的副师长王冠五在电话里向池峰城请求撤退，池峰城对王冠五说："我把工兵营派给你支援！坚决顶住！不能撤退！记住，台儿庄就是我们的坟墓！"

援军抵达后，王冠五亲自率队打反击，用血肉之躯顶着日军的坦克炮火向前冲，最终拔掉了日本旗，插上了中国国旗。

有国旗在，台儿庄就没有丢！

5

但台儿庄之战，毕竟还是陷入了地狱般的死斗。

每天晚上，在台儿庄外围的中国军队就开始向日军的各个据点发起反击——他们认为，不让日军休息，就能缓解困守在台儿庄内的中国守军的压力。

而不管晚上中国军队的反击是否结束，第二天清晨，日军都会集结主力再度向台儿庄猛攻——你们也别想休息。

从3月28日开始，日军决定再一次增加赌注：整个步兵六十三联队被调了过来，外加各种独立机枪大队、野炮兵大队、重炮兵大队、轻装甲车中队，攻击台儿庄的兵力开始超过1万人。

此时台儿庄的态势是：最里圈，是三十一师在死守庄内，但一半的面积已经被日军控制，当中一圈，是日军的部队将台儿庄三面围困，再往外一圈，是正在准备合围的中国军队。

所以，当务之急，是台儿庄不能丢。

满是断壁残垣的台儿庄，成为中日两国士兵绞杀的战场。在庄内，因为两支军队已经混战在了一起，飞机大炮失去了作用，全是巷战乃至肉搏战。

这时候，最能起作用的，是"敢死队"。

早在3月25日，三十一师就出现了第一支敢死队，那是九十三旅三营，他们发现一个猛轰台儿庄的日军炮兵阵地。三营长高鸿立决定把那十几门炮给夺过来，随即把上身的棉军衣和衬衫全都脱了，光着膀子，

右手举起大刀，向手下喊道："敢跟我去夺炮的，跟我一样！"

话没说完，全营官兵全都把上衣脱得精光，步枪全部上刺刀，直扑日军炮兵阵地，日军惊慌得弃炮而逃。

从那以后，台儿庄的中国军队敢死队开始不断涌现。白天日军火力凶猛，夺下据点，晚上中国军队就组织敢死队，趁夜色夺回据点。台儿庄内每一座民居，甚至每一堵墙，都成了血肉搏杀的战场。有时候双方距离甚至近到一堵墙上有两个射击孔，中国军队和日军隔着一堵墙向对方后来扑上来的士兵射击。

一开始，每个敢死队员都会得到大洋作为奖赏，但到了后面，没人要钱了。

在守卫台儿庄的最后关键时刻，孙连仲曾亲自组织过一支敢死队，让身边的军需官把身上仅剩的大洋都分给敢死队员。队员们把大洋都扔在了地上，带头的一个士兵说："我们以死相拼，为的是报效国家，为的是不成为日本鬼子的奴隶，不是为了几块大洋！"

孙连仲放声大哭。

6

时间从3月底到了4月初。

原本日军以为能轻易拿下的台儿庄，满目疮痍，却依然屹立不倒。

台儿庄内三十一师坚持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能挥师杀到——这也是三十一师当初作为"诱饵"的任务。

汤恩伯军团下辖第十三、第五十二与第八十五三个军，一共7万余人，齐装满员，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也是当时鲁南战场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但是，原先承诺"台儿庄枪声一响就立刻挥师杀到"的汤恩伯军团，却一直在台儿庄附近的枣庄与日军纠缠，任凭台儿庄炮火连天，孙连仲电报频频，但汤恩伯的主力一直躲在抱犊崮山区不出来。

这件事，后来有比较大的争议。按照李宗仁后来的回忆，是汤恩伯

不听命令，擅自行动。而汤恩伯自己的解释是，当时日军一直在找机会围歼汤恩伯军团，所以他如果直接突入解台儿庄之围，反而会陷入日军的包围，不如迂回，择机再进入战场。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而且汤恩伯确实部分起到了牵制和阻击的作用。白崇禧晚年在台湾回忆，也承认汤恩伯的用兵是合适的。但考虑到当时白崇禧和李宗仁这对桂系“铁杆”已分道扬镳，一在大陆一在台湾，白崇禧不力挺李宗仁的说法，也是情有可原。

不管怎么说，三十一师的池峰城在台儿庄震天炮火里日日苦盼汤恩伯，日日以失望收场。

4月2日，濑谷启坐不住了。这一天，濑谷启亲自率领第十联队主力抵达台儿庄以东地区，同时，第五师团的坂本支队也从东南方向靠近，两支部队准备发动致命一击，攻下台儿庄。

台儿庄战役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日军主力已经进入台儿庄范围，不存在围歼汤恩伯军团的可能，汤恩伯是时候杀“回马枪”了。

但这一切的前提，还是台儿庄要守得住。

横在濑谷第十联队面前的，是负责台儿庄外围防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师。

原属于西北军的二十七师，是一支没人注意的杂牌军，但就是这支被日军称为“叫花子部队”的军队，从台儿庄战役开打后，就一直在外围打得英勇顽强，不分昼夜地和日军进行拉锯战。

4月2日，第十联队开始向已经筋疲力尽的二十七师所有防御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数十门野山炮将无数炮弹倾泻在二十七师的阵地上。而二十七师的官兵也知道到了关键时刻——决不能放眼前之敌进入台儿庄，不然所有人前功尽弃。他们尽一切可能防守，死战不退。

那一天的日本陆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忠实记录了战斗情况：“研究敌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的气概，无愧于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到最后。宜哉，此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

河，非独日军所特有。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

7

外围拼死阻援，台儿庄的内部也到了关键时刻。

4月3日，在台儿庄内与中国军队缠斗的日军，得到了第十联队和坂本支队已抵达东面地区的消息，开始孤注一掷地疯狂进攻，甚至在冲锋中使用了瓦斯毒气。

而此时苦苦死守了11天的三十一师，只剩下了1000多人，也到了最危急关头。

副师长王冠五原来是池峰城的参议，原本可以不上前线打仗，但台儿庄战役开打之后，将领越打越少，他先是代理一八六团团长，再代理副师长，但他实在撑不下去了，打电话给池峰城，请求弃城撤退。

池峰城打电话给孙连仲，孙连仲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台儿庄失守，军法论处！”



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内与日军巷战

池峰城于是给王冠五打电话：“我们不能当民族罪人！不能对不起死

难的官兵！台儿庄只能死拼不能撤。明天师部就搬到城里，绝不会你们牺牲，我们活着回去！谁再说放弃台儿庄，格杀勿论！”

王冠五在电话里回了一句话：“请师长放心！”

当晚，他就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消灭了西城的一个日军火力支撑点。

而在离台儿庄只有两公里的集团军司令总部，孙连仲虽然拒绝了属下池峰城的撤退请求，但还是把电话打给了李宗仁：“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猛，攻势过猛，但是我们也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但李宗仁的回答是：“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李宗仁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心里也非常难过。

听到李宗仁这样说，孙连仲回话：“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但此时的第二集团军，真的连预备队都打完了。

孙连仲于是再打电话给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填进去！有敢退过河者，杀无赦！”

孙连仲没有食言，当晚，他以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自进入台儿庄督战。

4月3日一大早开始，外围的第十联队在4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开始不顾一切地向台儿庄方向拼死突击。伤亡惨重，兵力已不足千人的第二十七师用尽最后的力气拼死抵抗。

而台儿庄的日军调集三十多门重炮轰击庄内，也发起拼死攻击。守卫的第三十一师一次又一次组建敢死队，夺回失守的据点。打到后面实在没人了，一个姓任的特务连连长，带着炊事班顶了上来，他们捡起牺牲战友的武器，朝日军阵地冲了过去，最终全体殉国。



孙连仲在台儿庄前线

4月4日，准备围歼日军的中国军队陆续抵达攻击位置，在包围台儿庄的日军外围，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反包围圈——但汤恩伯军团的主力依然没有出现。

孙连仲在4日晚下达如同遗书一般的手令：“今是我们创造光荣之良机，也是生死最后之关头……本总司令将以成仁之决心，与台儿庄共存亡。”

4月5日一早，汤恩伯军团离台儿庄仍有20公里。

8

蒋介石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亲自给汤恩伯发了电报：“……即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究竟有无把握？仰具报！”

这种带斥责口气的电报，蒋介石很少对中央军嫡系将领发出。

汤军团终于开始全速开动。

汤恩伯主动给池峰城发去了一封电报：“如果4月6日中午12点第二十军团还没赶到台儿庄，恩伯愿受军法处分！”

而之前汤恩伯答应池峰城的回援时间，是3月25日左右。

4月5日晚，汤恩伯“超额”完成任务，全线进入攻击地域，将台儿庄东北方向的坂本支队后方全部切断。

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终于意识到：在苦战没拿下台儿庄之后，他们将面临被围歼的灭顶之灾。

怎么办？只能逃。

但日军不会使用“逃”这种字眼，连“撤退”都不会用，他们一律使用一个词：“转进”。

4月6日，日军开始转入全面“转进”，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仓猝的“转进”：大量尸体和装备，就被随意遗弃在台儿庄内外；开不走的坦克，被日军焚烧，战马尸体随处可见；原先攻入台儿庄的日军，知道再也不可能等到自己部队的支援，开始大规模自杀和自焚。

4月7日凌晨1时，中国军队吹响了反攻的号角，李宗仁亲临台儿庄前线指挥。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几乎抛弃了一切辎重，夺路而逃，全面溃败——哦不，转进。

至此，台儿庄战役宣告胜利。

9

来看一组数据统计。

算上台儿庄战役前期的临沂保卫战和滕县保卫战，整个“台儿庄会战”，日军5万人参战，自报的伤亡数字是11984人（第五师团和第十师团）。出于日军向来喜欢少报自身伤亡数的传统，根据中国军队当时的估计，日军的伤亡数大约在2万人左右。

而中国军队先后共有29万人参战，最终伤亡数达到了5万人。

从伤亡对比来看，很难说中国军队获得了最终胜利。

但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接连丧土失地之后，第一次在正面战场上粉碎日军的战术意图，并且在战场上硬碰硬地把日军打到溃不成军。“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彻底破灭。

连日本人都很惊讶，在遭遇接连的重大挫败之后，中国军队哪里来的勇气和信念，能在台儿庄组织起一场近乎炼狱一般的反包围战？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匈牙利裔的美籍人罗伯特·卡帕曾组织了一个摄影队去前线拍摄，他忠实记录了一位在前线的中国军官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在这里一战，不然连死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可能就是全部的理由。

馒头说

下面这个故事，我曾在前文提过，这里还想再写一次。

1986年4月，香港举行了一个特别的首映式。

上映的，是一部内地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拍的内容，却是国民党抗日的内容，电影的名字，叫《血战台儿庄》。

这部电影，在当时的香港引起轰动——这是1949年以来，中共第一次正面承认国民党的抗战功绩。

尤其是里面有这样一个镜头：蒋介石亲自主持死守滕县殉国的王铭章师长的追悼会。此时，突然日军轰炸机来袭，空袭警报大响，轰炸声四起。蒋介石身边的一个军官忙对蒋介石说："委员长，是不是马上避一避？"

蒋介石一把推开那个军官说："慌什么！我们身为军人，要以王师长为榜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这组镜头，和大陆以前表现的蒋介石形象完全不同。

当时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蒋经国听后大吃一惊，马上说："给我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经有关部门批准，拷贝很快就被送到了台北。蒋经国和宋美龄立刻就观看了这部电影，并马上决定请国民党中常委全体人员观看。

当时，蒋经国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大陆承认我们抗战了。"

就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不久，蒋经国终于决定，允许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公开互动由此拉开序幕。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会忘记。

日本投降前后的四个片段

1945年8月15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会记得的日子，在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这场举世皆知的投降背后，还有一些小细节值得一说。

1

1945年8月9日上午，日本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在一个东京的防空洞内举行。

参会的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感到空前的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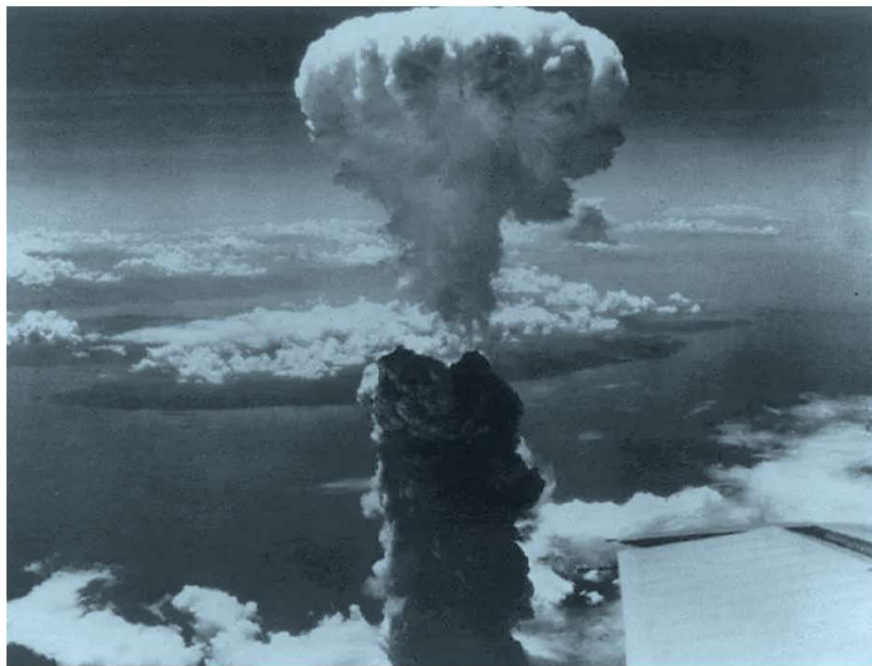
他愤怒的原因，是以首相铃木贯太郎为代表的内阁，提议日本无条件投降。

阿南惟几不是不知道，大日本帝国的命运之烛，此时已到了熄灭的边缘。

在对美国的太平洋战场，日本已经被对手榨干了最后一滴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日本本土已被强大的美国海空军全面包围。而且，就在3天前的8月6日，美国人刚刚在广岛投放了一颗前所未闻的炸弹，一座城市瞬间灰飞烟灭。



描述日本投降仪式的油画



美军在日本广岛投放的原子弹大大加速了战争进程

在对中国的大陆战场，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尽管在1944年末依然出现类似“豫湘桂大溃败”这样的惨败，但八年来的态度始终如一：打不过，但坚决不投降！牢牢把150万日本陆军拖在中国战场。

在对苏联的东北战场，就在8月9日这天凌晨，160万刚刚经过对德国战争洗礼的苏联军队，向驻扎在中国东北的70万日本关东军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早就把精锐抽调入关对付中国军队的关东军，毫无抵抗之力。

但以阿南惟几为代表的军方，从来没想过投降。

军方认为，日本此时尚有一战之力：本土还有52个师团，陆海空军共计370万人（虽然武器严重不足，兵员素质也极度低下），5200架作战飞机（大多数为简陋的自杀攻击机）。但大和民族是团结的！必须“本土决战”！为了天皇和大和民族的荣誉，必须“玉碎”！



日本的自杀式飞机

但以日本首相为代表的内阁，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时候（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如果继续死扛，可能后面连哀求投降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这场争吵一直持续到中午，直到外面有人进来报信：长崎又被扔了一颗原子弹。

整个房间鸦雀无声。

没人再愿意赌，美国是不是还有第三颗，乃至更多的原子弹。“该不该投降”的议题，迅速切换到“该如何投降”。



日本裕仁天皇



阿南惟几。他的第六子阿南惟茂，后来成为日本驻华大使，主张“中日友好”。不过四子阿南惟正作为日本钢铁公司副总裁，依然参拜靖国神社

但争吵还在继续。阿南惟几依旧坚持，必须“有条件投降”，其中包括“日本战犯由日本自己处理”“盟军不能进入日本本土”，等等。

在日本内阁的眼中，军方的这种要求简直是痴人说梦。你们还有什么筹码去讨价还价？

这场争执一直持续到8月10日，也就是第二天的凌晨，最终，双方决定请天皇决定。

裕仁天皇于是被请了出来。

天皇说了一长段所谓不忍看到百姓受苦的话后，明确表态：无条件投降！

当时的房间里，传来一片哭泣之声。

1945年8月15日凌晨1点30分，阿南惟几在自己宅内，面对天皇的皇宫方向，切腹自杀。

2

1945年8月14日，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还有一天。

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内心激动，却也有痛苦。因为就在这一天，国民党政府与苏联达成了一份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份条约除了一些场面上的“互相支持”等空话之外，最核心的内容只有一个：中国允许外蒙古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独立。这其实等于把外蒙古割裂了出去。



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规定，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蒋介石拒绝承认这一条约

1945年10月20日，在外蒙古当局与苏联的监视和控制下，外蒙古进行了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

近15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这一天开始，从中国的疆土中割裂了出去。

当时参与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一度不敢签字——割让

那么大一片国土出去，以后就是历史的罪人。

蒋介石又何尝不是这样想？但斯大林传来的一句提醒，戳到了蒋介石最痛的地方：若不尽快达成协议，共产党的武装，就快进入东北了。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最头痛的问题。

在中国战场的第一线，国民党军队一度是抗战的主力。但在广袤的沦陷区，国民党军队早已撤退，一直都是共产党的武装在扛起抗日的大旗。日本投降，主力都在中国西南部的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到沦陷区去受降。而共产党军队在沦陷区艰苦奋战了那么久，怎么肯原地不动，放弃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力？



准备投降的日本军队

70万外强中干的日本关东军，根本扛不住如狼似虎的160万苏军，苏联事实上已经完全掌控了中国东北。苏联不怕美国，他想把东北给谁，就给谁。

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掐住整个中国的工业乃至经济命脉。

考虑再三，标准民族主义者蒋介石，痛苦地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来换取苏联撤出东北，最重要的，是不支持共产党军队。

然后，后来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蒋介石也知道了。

1953年2月25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然而，外蒙古独立早成既定事实，早已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喊出来的话，又有谁听？

1953年，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蒋介石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我本人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3

1945年8月30日下午2点5分，美国五星上将、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座机“巴丹”号降落在横滨以西的厚木机场。

即便到了跨出机舱门时，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麦克阿瑟，内心依旧有一丝不安——尽管这是他坚持要求飞到这里来的。

早在一周前，麦克阿瑟就应该降落到这里，处理受降事宜了。但日本人警告他说，厚木机场停着数不清的“自杀式”飞机，数不清的“神风特攻队”队员已经表态：渴望与这位“沾满大日本皇军鲜血的刽子手”同归于尽！

于是，在命令厚木机场的所有日本飞机拆除螺旋桨后，麦克阿瑟的座机才敢降落到这里。

从机场到横滨市区，有13公里路程。一路上，麦克阿瑟发现，道路两旁，站立着3万日本士兵。这些士兵，都是背对着道路站立的。

麦克阿瑟更不安了。

虽然他很得意自己这次的冒险行为——在日本本土，尚有300多万日本士兵，他却带着很少的人登陆日本来接受投降。麦克阿瑟一生都喜欢冒险，一直冒险到朝鲜战场上的仁川登陆，之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身边有人向他解释，日本士兵背对道路的这种姿态，是在保卫他们的天皇陛下。

“天皇”，是麦克阿瑟进入日本前，研究最多的词之一。在进入日本

之前，美军给日本人翻译草拟的天皇投降诏书，第一句是："我，天皇裕仁……"麦克阿瑟发现，这句很平常的话，却让在场的日本人都面露愠色。有人悄悄告诉他：天皇从来不用"我"，用"朕"。

麦克阿瑟后来告诫所有部下："不要不尊敬天皇，这样会惹怒疯狂的日本军人。"

但进入日本后，麦克阿瑟做了一个超出军人智慧的决定。他并没有如外界所呼吁那样的，惩戒日本天皇并废除天皇制度，而是保留了天皇制度，只是让天皇发布了一个《人间宣言》：天皇宣布自己也是人，而不是神。

美国人既降低了天皇的威信，又保留了日本人的颜面。



麦克阿瑟和日本裕仁天皇

之后，麦克阿瑟作为一个驻日本盟军最高司令，实际上的日本“太上皇”，做出了一系列让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客都竖起大拇指的治理日本方案：释放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类政治犯（麦克阿瑟是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修订日本的民主宪法，分配给日本农民土地，瓦解财阀的垄断，甚至给日本女性投票权——麦克阿瑟透露过自己这样做的目的：进一步让日本男人的威信扫地。

日本居然在这样一个军人的治理下，迅速摆脱了战后阴霾，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麦克阿瑟在“密苏里”舰上代表盟军签字

在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舰上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后，当时主持仪式的麦克阿瑟，特意安排了一个环节：400架B–29轰炸机在1500架美国海军舰载机的护航下，集体掠过“密苏里”舰上空。

那种整个海洋为之震颤的感觉，是麦克阿瑟希望日本人感受到的：不是要“玉碎”吗？自己掂量下，有机会吗？



麦克阿瑟

但那个时候，麦克阿瑟还是有一些不安的，因为接下来作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长官，他将决定日本未来的发展走向。

所以，在1951年4月，美国承诺将政权归还日本政府的前夕，麦克阿瑟离开日本，看到上百万日本人夹道欢送他，高呼“大元帅”的时候，他心底里的那丝不安，才彻底消除。

那一刻，倔强的五星上将，热泪盈眶。

4

1945年9月9日上午8时52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开始。

面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解下了佩刀，凝视投降书，最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即便在那一刻，冈村宁次都未必解开了心中的那团疑惑。

1945年8月11日，冈村宁次听到欧洲各国电台播放的“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播音时，他是不以为然的。他给大本营拍去的电报是：“而今百万精锐仍在，竟向重庆的残兵败将投降，这是奇耻大辱。”



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

当时，他和他的幕僚做过最坏打算：把所有驻中国部队集结在山东半岛，建立一个独立的“占领区”。

然后，8月15日中午，他亲耳听到了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他下令，要求全体官兵“谨遵圣意”。接下去，就该考虑自己的命运了。



冈村宁次

自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开始，日本军方1名元帅、4名大将、6名中将相继自杀。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7名恶贯满盈的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无论绞刑、无期徒刑还是有期徒刑，数千名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名单里，没有冈村宁次的名字。

冈村宁次1941年担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1944年升任整个侵华日军的总司令，曾在华北占领区残酷杀害抗日军民，以及实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作为侵华日军最高领导者，冈村宁次人间蒸发？并没有。

冈村宁次只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应对本委员长指定之部队投降，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直接予以处置。"

所谓"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就是指共产党的武装。换句话说，日本军队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能向共产党军队投降。

冈村宁次坚决予以执行。他可能不知道，这救了他自己的命。

1945年9月12日至1948年3月底，冈村宁次被"软禁"在中国南京，名义上是软禁，但实际上，是充当国民党的秘密军事顾问，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1948年，冈村宁次终于被正式送进上海战犯监狱，但不久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

1949年1月26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但中华民国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是："无罪"。

共产党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当时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为了能和共产党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坚决不放人（蒋介石那时虽下野，但仍有实权）。当天，冈村宁次乘坐美国轮船返回日本。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台北市阳明山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冈村宁次被聘任到台湾，担任高级顾问，负责训练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到台湾后聘任的日本顾问团

1966年2月，冈村宁次因心脏病，病逝于东京，终年82岁。这名侵华日军最高长官，最终还是逃过了惩罚。

馒头说

日本投降后，作为战胜国，中国原本应该派出一个师，驻扎到日本的名古屋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中国的这个师没有出现，日本是美国独占的。

作为战胜国，中国的东北本来应该正常接收，无论是国民党去，还是共产党去。但为了让苏联撤出，我们居然让出一个外蒙古。

即便是战后，中国的旅顺港依然是被苏联占据的，直到1955年才归还。

即便是战后，外蒙古依然没有回归中国。1961年联合国决议蒙古是否能加入联合国，当时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可以一票否决，但因为美国的游说，最终弃权。蒙古独立终于板上钉钉。

想起一个之前说过的典故。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立刻有人出了个谜语。谜面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因。打一历史人物。

共产党控制的报纸，给出的答案是：苏武。

国民党控制的报纸，给出的答案是：屈原。

但无论苏联的武力出兵，还是美国的原子弹轰炸，这两个答案似乎都忽略了中国自己。

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军队付出了伤亡380万的代价，共歼灭150万日军，拖住了150万日军。在这背后，还有3000万平民的牺牲、1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及一个被打得满目疮痍的国土家园。

无论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还是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他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做的一切，都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还是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问答。

抗战时期，一位中国士兵对一位记者表示：“中国肯定会获胜的，肯定会。”

记者问：“那时候，你准备做什么？”

士兵回答：“那时候，我肯定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愿勿忘国耻。

愿永世和平。

后记

想了想，觉得还是想写一篇简短的后记。

后记有很多功能，但我这篇，主要用来感谢。

第一，感谢我的供职单位，解放日报社。这是家历史悠久、充满活力的媒体（读过我推送的读者知道，这家报社从过去到现在，创造过很多中国的“第一”），给了我一个可以充分学习和施展的舞台，给了我宝贵的经验和开阔的眼界。我一直觉得，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这样的宽容，就不可能有“馒头说”。

第二，是想感谢我的家人。我太太做的微信公众号“石榴婆报告”，比我的“馒头说”可有名多了。但在我更新“馒头说”和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她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包括在自己繁重工作之余，承担起更多照顾宝宝的任务。而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聊起过“馒头说”的内容，但每天早上，她是第一个点开它，并且将它转发到朋友圈的人。

第三，感谢为我写序的严锋老师。他是大学教我比较文学专业课的老师（后来娶了我们班的美女辅导员），是我见过的兴趣最广泛，最聪明的老师。他现在远在澳大利亚，公务繁忙，还抽空为我写了序。

第四，我想感谢“馒头说”的助理程敬涵，这位天津女孩有一次指出了“馒头说”的一个排版样式问题，我问她愿不愿意兼职在线上每次帮我搜集一些资料和图片，她一口答应。后来事实证明，她非常认真且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她即将到英国留学，祝她学业有成，一切顺利。

最重要的，留在最后。最后要感谢的，当然是你们——“馒头说”的读者们。没有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别说这本书，连那个微信公号“馒头说”，也会在更新了13篇之后，偃旗息鼓。

我从没想到过，一个小小的微信公众号记录的一些个人随想，最终能结集成一本书。

谢谢你们！

附录　读者评论

大家都称她为“夫人”，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她？

heidi：本来可以写个很励志的故事，你却换个角度写，让身为女人的我五味杂陈。我从小就听不得女生不如男生的说法，所以数理化碾轧男生，一路成长为工科女。然而现在却没那么偏激了，当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两性之间，心理生理都有很大差异，没必要争强好胜不服输。只是这个世界对男性比较友好又宽容，不是只占一半的人导致的。只有自己不看轻自己，也不看轻别的女性，才能扭转这种局面。

丛丛丛：令人动容的文章，女性成长的道路如此漫长，在职场上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优先级别：男人 > 已婚已育的女人 > 已婚未育的女人 > 未婚未育的女人。男人没有任何的限制条件，而女人却因为婚姻和生育分了三六九等，可叹可气！

刘莹：从小只听过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事迹，对于其感情一无所知，感谢馒头大师讲述她的这一段感情经历。我一直觉得女人首先要保证人格的完整、经济的独立，之后才能追求爱情。把幸福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人身上是不切实际的。人活在世，没有谁可以陪着自己到地老天荒，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来面对孤独并继续前行，居里夫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爱因斯坦的三个侧面

yunnn芸：难得的是爱因斯坦没有神化自己，还有那么点不自信。多少人被推上所谓的神坛后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神。

凤凰de歌声：然后还想补充一下，为什么爱因斯坦会不自信？大家都觉得爱因斯坦被捧上了神坛，那是在后来。当时呢？在当时实验都很难论证他的理论的时候，很多著名物理学家都不接受他的理论，更别提一般民众了。正因为超前太多以至于真的孤独，物理学界战友都不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时候，爱因斯坦当时真的挺难的。

阿四：事实上，年少成名的爱因斯坦，在30多岁后就再也没有具体

的物理学研究成果问世了。人无完人，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更应该理性地分角度分角色分时期地看待任何人，人嘛，本来就复杂……

爱迪生的侧面

Tin,Tin：直流电不是不好，而是在当时工业条件下实施起来太困难，和交流电相比成本太高，从经济角度来看非常不划算，当时电力需求主要是照明，电力问题简单不突出，但随着科技水平提升，大量复杂设备电气化后，交流电效率低电力质量差的弱点就凸显出来了。交流电导致的事故损耗率越来越高后，直流效率高的优势就有了，现在中国电网高压长距离输送全是直流技术。所以有时候历史真会开玩笑，无所谓绝对的好与坏，只能说在当时哪个更好。

周洁：真相也许索然无味，但是看完这篇，我把爱迪生从一个名字，具体到了一个人。也感谢无数默默为人类进步奋斗过的发明家们。

马＋lu：不管是作为发明家还是商人，爱迪生对我们生活做出的重大改变是不可否认的，那些与特斯拉相爱相杀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不至于那么神化，所以好莱坞是不是也要算他一份功劳呢？

阿四：上次留言提到特斯拉，没想到这次就看到了，惊喜。另外想说的是，所谓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少数吧，所以才显得格外可贵，正常的英雄天才应该都是如爱迪生与特斯拉、牛顿与布莱尼茨这般。

女生的美貌与智慧，真的能够并存吗？

悠然吉祥：想知道她最后过得幸福吗？（作者回复：其实不算幸福。她有过6次婚姻，晚年还因为超市偷窃被抓过两次，她不缺钱，但可能心理有了疾病。）

Lucia范璐：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家庭对女孩来说是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SunnyM：这固然是个看脸的时代，但能被永远记住的，肯定不仅仅是容颜。言之有理，言之有物。

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ELYN：这个故事是我关注公众号以来最动人的故事。因为时代的

原因，不由自主地改变了人生的走向，大多数小人物都很难以一己之力抗衡吧。这也是战争带给个人的悲哀。不经意的选择，可能会影响一生，有时候真让人唏嘘不已。我觉得大时代下的普通人故事，更吸引人。

路人贾：《暗恋桃花源》中云之凡说：你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的？

做一个“新时代女性”，真的要拿生命来换？

aven：她那么美，那么有才华，明明可以靠自己活得好好的，偏偏总指望有个男人来救赎她，叹息。其实爱情和婚姻真不是人生的全部，而只是一种经历而已，女性最终还是要想明白怎样活出自己独立的人生。唉，还是想叹息，太感性的女性，挣扎总是这样多。

Chris同学：与阮玲玉相比，胡蝶从小的经历让她面对流言蜚语时有不同的态度，这也是两人最终结局不同的根源吧。（作者回复：阮玲玉去找过胡蝶，胡蝶虽坦然面对流言，但自己也很痛苦。所以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阮玲玉的恐惧。）

王淼：好久没留言了。我知道我是抢不到沙发的，所以认真看故事。故事是个老故事。难得的是馒头叔的总结，让我也联想到最近的小学生两性教育课本。其实，早恋真的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理性的恋爱观，那样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啊。以后，我一定会从小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两性观、恋爱观，而不是当作羞耻的事、不光彩的事，避而不谈。初恋本该是多么美好！

我认识一个男人，叫刘翔

阿阿花：认真看了两遍，有点想哭，我有一个好朋友特别喜欢刘翔，当年刘翔退赛被好多人骂的时候，她边哭边在网上回骂那些说话不好听的人，真心觉得谁在乎什么永远的英雄，都是流血流泪换来的，运动员也是普通人，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Yolanda Mao：我能说我在办公室泪流满面吗！好在，从“刘翔去死”到“孙杨不哭”，这8年已然有变化。只是，反射弧太长了！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奥林匹克，但愿你我都明白，有一天面对伤痛和岁月含泪离场时，会有人鼓掌，而不是那时对彼人之事般对待刘翔之境……

铁梨花：很多人其实都是困惑，为什么脚有伤，要到站在跑道上临发枪了才知道自己不能跑呢？如果刘翔赛前就宣布受伤不能参加比赛，大家可能就不会有这些埋怨。站上赛道又退赛，无疑是将观众的期望值从100突然打到0。（作者回复：准备了4年，每个运动员不到最后时刻，都是想拼一把的。）

LYQ：大多数人对于原本不抱希望的好结果欣喜若狂，但是寄予厚望一旦结果没有达到预期，会导致好多人崩盘。刘翔当年奥运退赛我正读高三，犹记得那个暑假刚补完课抓起书包就往家里跑，就为了看他的比赛，说不失望是假的，爸爸就和很多人一样开始指责刘翔，说爬也得爬到终点啊，我还和爸爸争辩，不过一场比赛而已，哭了一场。这么多年过去了，刘翔依旧是我心中的飞人英雄。

民国第一个享受国葬的人

Evita：不党不群，唯国家耳。值得敬佩！

龚艺：大师对中国近代史的聚焦度很高啊，是因为乱世出枭雄吗？（作者回复：因为那个时代动荡太大，折射出最真实的人性。）

zy：作为蔡将军的老乡，从小听着蔡将军的故事长大，今天看了这篇文章，与有荣焉……每次看历史，看到蔡锷、魏源，都为家乡自豪！在大批湖湘雄杰中，无论是守旧的“后卫”（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维新的“中场”（魏源、郭嵩焘、谭嗣同），还是革命的“前锋”（黄兴、蔡锷、宋教仁），都是世间不可多得的顶尖高手。唯楚有才，于斯为盛！

他没有军衔，但人人称他“将军”

故事家：哈尔滨工作的纯东北人，哈尔滨有靖宇公园和靖宇街，东北人民从没有忘记英雄的付出。如果我没有记错，杨将军和赵尚志将军的遗首就存放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对面的烈士陵园里，2000年左右我入学的时候，我的解剖学老师李亚东教授多年义务为英雄遗首进行防腐保护工作，让人敬佩。最后，向英雄致敬！

余小蛮：其实是否有军衔已经无所谓了，这些民族精神脊梁式的人物，他们存在的意义已经超越任何军衔和勋章！但是仍然要祈祷战争不要再来，英雄本身也是历史的悲剧！最后，特别难揣测的是叛徒的内心

世界。背叛最亲密的人，需要的勇气真的比自杀的勇气少吗？人性太复杂，我们无法臆测毫厘！

寻找无双：看到最后日本人的遗书，我想到蒋百里先生《国防论》扉页上写着：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以中华文化之坚韧之隐忍，我相信我们终会再上巅峰。

为什么他没打过一场仗，却是陆军上将

便当的菜：蒋百里，留日三杰，中国三个半将军中的那半个，可惜除了蔡锷，都没有发挥价值，三杰都死得太早了，可悲可叹。希望大师将三杰都说一说，都是造时势的英雄。不过“纸上谈兵”的典故，希望大师好好分析，其实这个词语本身是个贬义词。

“汉奸将军”的自我救赎之路

NGBogenlicht：有幸去过图片中的“张自忠墓”，当时人不少，我一动不动站那儿看了一分多钟，以至老妈问我怎么了，随后，默默地敬了个军礼。周围的人先是惊讶，后来释然，感觉连周围嘈杂的声音都减弱了不少。

Lok懿劾：想起那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身为武汉土著，小时候就走过张自忠路，历史就摆在那儿，永远不会被忘记。

“戴老板”之死

烟波浩淼：喜欢馒头说最大的原因就是，从来不会单一地判定一个人的好与坏，而是会把所有的事实娓娓道来，摆出来让读者自己来判断这个人到底如何，以前不喜欢读近代史，一是国家积弱，二是不团结，三是论点片面，一个人好就全好，坏则全坏，现在则是兴奋地等待着馒头说的每一篇推送，而且终于能明白以史观今的意思了。

大脸蛋猫儿：看得我惊心动魄，一位对历史了解甚少的工科女技术员，从馒头哥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馒头说已成为我最爱的公众号，每天都在期待，渴望了解冰冷历史中的温情，还有，馒头哥的每一次点评都很性情，很有共鸣，会一直支持！

林恒：今天看到馒头大师写戴笠的故事，让我更加详细地了解了其人其事。过去我读《黄埔恩怨》和《黄埔对决》等书，感觉国民党军中黄埔系的将领都耻于与戴笠为伍，而且戴笠似乎始终处于暗处，军统部下都不太清楚这位“戴老板”的具体长相。不知是否有其事，请馒头大师赐教！（作者回复：是的，谁喜欢与监督自己和打自己小报告的人在一起呢？）

“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悠然吉祥：动荡年代，又与权贵有交集，即使满腔热血，想要全身而退，谈何容易。以前认为斧头帮老大是坏人，读完馒头哥的文章，竟开始佩服这个有胆有识的黑帮老大，手段黑了些，大是大非面前倒是比那些将军将领的价值观高上好几个层次。

Sunny默明其妙：都说功过是非留与后人评说，然而我们这些后人岂是那么容易做出评说的，有大义、不亏心就够了。

“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凡容：据说我外公以前去杜月笙家送过保护费，杜家相当客气。然后他家祠堂落成的时候，发给上海很多人一个蓝色三角形的徽章，外公说戴上这个徽章一路上都是免费，到了那里有吃有喝有戏看，那场面可大了。可惜外公已故去，旧上海的传奇故事越来越模糊了……

宝宝宝宝玉：高中的时候看《南方人物周刊》，写杜月笙和黄金荣那一期是我为数不多的想要一直珍藏心中的其中一期，很喜欢那个年代真正有江湖气概的大佬杜月笙，也被他对“冬皇”的一片痴心所打动。后来也喜欢看一期介绍香港陈惠敏的，同样是很有江湖气。（作者回复：哈哈，别忘了他们黑暗的一面。）

wmj：对杜月笙的名字是很熟悉的，但直到今天才赋予了他血和肉，谢谢馒头大师！今天终于看历史没有流泪，但看到最后的自白却酸了鼻子！很赞成大师对待历史的观点，不管怎样，我们都支持你的！

一个被低估的“大V”的成长之路

黑眼豆豆：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如果说曾国藩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深稳忠厚的权谋之士，那么李鸿章则是“输却玉尘三万斛，天

公不语对枯棋”的悲情化身。或许只有敢做敢当的左宗棠，才能憋着气扛着一口棺材，从沙俄的魔爪下收复伊犁，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时期，写下最有力的中兴之笔。

Heye：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作者回复：这是左宗棠写给曾国藩的挽联。左宗棠最后的挽联，对曾国藩还是认可的。）

余敏：当下“曾学”盛行，我觉得这句话解释得通，“曾国藩会做人，左宗棠会打仗，李鸿章会做官”。现如今，大部分人还是学做人为主，学打仗不实用，学做官用不了。

一个63岁的老头，是怎么收复166万平方公里国土的？

扬扬：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C.sy：看到那句“一年后，左宗棠逝世”很感慨，对于一直想做出一番大事业的他来说，也算是赶上了，哪怕离去，临走前想想已被自己收复的新疆，也不留什么遗憾了吧。

翘哈哈：68岁抬棺出征，真的好感人。想起一句话，湖南人特别信命，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霸蛮点也是我的。

珍妃为什么必须死

钟月：本来还以为珍妃是被慈禧一直憎恨欺压的傻白甜，没想到原来历史是这个样子，慈禧一开始也是喜欢她的，珍妃有时做得太过火，不过道不同，总有一方先下手。

yoo鲨鱼男孩：想起来两千多年前，秦帝国的丞相李斯被腰斩前回头对他的一个儿子说的：“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想起南北朝刘宋（南朝宋）最后一个11岁的小皇帝刘准在被刀剑逼迫退位的时候哭着说：“愿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想起崇祯皇帝对长平公主所叹：“汝何故生我家！”

RubyL：刚看完《苍穹之昴》，所以今天一看珍妃的照片就特别感慨。大时代的洪流卷挟的是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都做着自己认为最理所当然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正是历史的悲剧性和魅力所在。

sunshine：大师说得很对，历史的车轮跑到了那个节点，清朝的覆灭，整个制度、人心，自上而下，制度的腐朽，不是一个维新变法、一个光绪就能挽回的！

靠画漫画，28岁就缴了400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是怎样一种体验？

琴弦上狂奔：我记得小时候《黑猫警长》里面螳螂新婚之夜，公螳螂就离奇死亡，至少也是一个知识点，比现在中国有些动画强多了。

海慧：终于又看到了大师的推送。小时候弟弟特喜欢看《龙珠》，今天终于知道了这部漫画的渊源。读完后记忆最深刻的两点——面对工资低能毅然辞职，果断；伯乐潦倒后承诺分成，感恩。

陈斐：我很理解为何日本人要将《龙珠》中孙悟空的形象作为奥运会的吉祥物，因为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巨大，真的可以代表日本的一个时代。中国人不要有酸葡萄心理，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我们的孙悟空是另一种形象。大家应该宽容地接受多元文化的各自精彩。

过儿：我们还看过《小飞侠》《长腿叔叔》《拳精》。在凤凰卫视还叫卫视中文台的时候，我们看了太多太多精彩的动画片，我们这一代实在是太幸福，怀念童年。（作者回复：是那个“中国拳法，举世闻名，最高荣誉，号称拳精”的动画片吗？）

45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再回月球？

大宁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都对外太空那么感兴趣，看完馒头叔的文字我开始理解了，太空探险让我们知道地球有多渺小，换个高度看世界，能得到的不只是眼前，还有不可预见的意外收获。很多我们都不了解的发明创造已经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此子败矣：刚翻看了《为什么要去南极找死》，感觉重大事件中被遗忘的不会是第二个人，而是被记住的人身边的协助者。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些人只会被历史书记住，而不会被人记住。

需要经历时间考验的，除了爱情，可能还有建筑

樱花树下汪星人：念高中的时候还学过一篇课文，关于华裔设计师贝聿铭的。他的很多建筑都是在建造时备受争议，建成之后却大放异彩、令人称道。从这个意义上看，不想当艺术家的孤胆战士，不是一个

好建筑师。

Hao：请教了耶鲁建筑系的同学，严格来说，埃菲尔铁塔在建筑学界并不算建筑，只能算工程学产品，或者可以说是雕塑，不在建筑学讨论范围内。同样，华盛顿纪念碑、自由女神像其实也都不算建筑。而文中卢浮宫、金字塔等是建筑。

snowflying：不只建筑吧，太多的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在提出前瞻性的想法时，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可能都不能马上理解，太多的天才在当时被人看作疯子。比较欣赏的是埃菲尔的认真与自信，他坚定地走了下去，没有因为压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疯子。认真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单单这一点，就可以称为大师。

张衡的地动仪，到底是否存在？

东游西逛：这么说英国人米尔恩比中国人更早读懂读透了《后汉书·张衡传》中的有关内容？（作者回复：应该说他就是这个专业，求证的思路比王振铎更有效，王振铎毕竟只是历史学家。）

AlexDing：看其他同学的留言，普遍的误解不仅在于把模型当原作，也把地动仪的震后“遥感”功能理解为震前预测功能。遥感功能在通信和交通不方便，信息传递效率低的古代还是很有意义的。

“世纪之骗”背后的兴奋剂黑历史

熊熊牛：如果奥运会最终演变为各国药物科技对决，那么它也将最终失去竞技的魅力而变得无人关注。那样服药的意义又是什么？

蘑菇好美丽：自从里约奥运会你来我往互相披露兴奋剂事件后，我觉得奥运金牌含金量大幅度下降。就我本人而言，现在可能更愿意去关注运动本身而不是运动员本人。看待运动员也逐步发展为看待他的工作和看待他的人。任何一种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总有人前仆后继，更何况越疯狂越吸引目光。

海薇：还真的没想到名利对一个人来说如此重要，超过生命。那103名运动员，有的应该是一时冲动才这么选择。就算战无不胜，5年后，当死亡降临的时候，也会后悔，会用自己的一切去换取生存的权利吧。

史上最黑暗的一届奥运会

翟丹韵：以色列人的勇敢和团结让人印象深刻，不得不佩服！我想这也是这个民族受到如此之多的磨难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吧。

浮生若梦：恐怖分子永远是所有文明的敌人，但是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家园被占领，人民被屠杀，侵略者强大到无法战胜，对于他们来说，每天都是慕尼黑，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作者回复：所以这个结困扰了人类几十年，几代政治家都束手无策。）

M.K：成立暗杀小组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受到了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威胁，他们要求放掉已经被抓住的3名恐怖分子，否则联邦德国就别想安生。而后两国政府秘密商定以一种掩人耳目的方式（外人看起来很合理的方式），把3名恐怖分子放回了巴勒斯坦。以色列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快气炸了，百般阻止联邦德国放人，可是阻止不了啊，以色列人看着当初的杀人魔竟然毫发无伤地回到他们的国家，怒不可遏，随即梅厄夫人便成立了暗杀小组，全世界追杀“黑色九月”的组织成员。有一个“黑色九月”成员侥幸生还，是因为当时被暗杀的时候没打到要害部位，在医院被救活了。当时联邦德国大张旗鼓存放恐怖分子的绝密文件，几十年之后被一个德国档案局的人解密了，因为他要退休了，看到关于慕尼黑惨案的厚厚的绝密档案，他决定把它交给媒体，还世界一个真相。被公布之后，全世界哗然，原来当时是联邦德国政府不想惹祸上身，才编造理由，成功将3名恐怖分子引渡回国。2016年我们住在慕尼黑，美好的城市，但是经历过各种枪击砍人的恐怖新闻，真心希望世界和平！（作者回复：对，这个细节我忘了写进去：那3个捕获的恐怖分子，后来是被放了的。）

孙杨为什么会被别人质疑“服药”？

桑兰：关于澳大利亚禁止孙杨训练的那条你可能写得不是很准确，“由于在伦敦奥运会上成绩惨淡，为了重振雄风，澳大利亚泳协出台了一项名为‘领奖台计划’的新政，包括丹尼斯的俱乐部在内的15家俱乐部不允许接受有禁药阳性历史的外国运动员训练。前往这15家俱乐部训练的外国运动员必须在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机构注册，以进行赛外检测”。孙杨虽然在澳大利亚，但并没有再跟随丹尼斯训练，他是跟着不属于“领奖台计划”的丹尼斯的一名助手训练，这也大大影响了孙杨的成绩。并

且，澳泳协也承认了孙杨的训练合理合法！“澳大利亚泳协在接受《周日电讯报》采访时称，虽然孙杨目前在逍遥湾训练属于合法行为，但澳泳协有义务提醒孙杨，不要去‘领奖台计划’的场馆训练，并且在澳期间要随时准备接受世界泳联的赛外检测。”（作者回复：所以有不少人留言说偷偷摸摸去的，其实不确切。）

无敌小溪：馒头大师是我看到这次奥运会孙杨事件以来，为数不多的态度中立理智的公众号。其实个人对孙杨感情复杂，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可是这几年的负面新闻，实在是让我对他印象好不起来。但是孙杨事件一开始，在看到我们的媒体报道和周围朋友们群情激愤后，我也和大家一样，以为是政治因素在作祟，所有人的爱国情绪都爆发了，澳大利亚游泳队也吃禁药，他们怎么不说自己是drug team（嗑药团队）？可是，吐槽之后冷静下来，也怪不得别人说你，被禁赛和偷偷去澳大利亚训练这事，也是事实。但是，这个时候，国人沉醉于我们这次对于金牌的豁达态度中，无法正视我们曾经黑暗的历史。为我们国家对待体育事业逐渐摆脱功利主义而高兴，也真心心疼那些为中国体育黑历史还债的运动员们，希望他们能获得公正的待遇，更希望大家正视我们曾经的历史，更理智地面对外界的质疑的声音。

十五：国家也好，团队也好，个人也好，无论外界黑不黑，最重要的是正视自己的错误，与其掩盖真相，不如认真去面对，只有不断去学习去纠正、去自我规范，才能真正成长、强大。

“让球”阴影下的“小山智丽事件”

刘浩：让球确实丑陋，当事人也值得同情。只是从个人品行来说，何智丽接受别人让球在先，不给别人让球在后；表面同意让球在先，场上不让球在后，利用队友毫无准备时一举拿下，总是让人感觉不舒服。当然实际真打何智丽未必打不过陈静，管建华也未必打不过何智丽，这些都无法验证了。（作者回复：是的，这也是当年她让人诟病的地方。）

Tin,Tin：虽然现在一边倒地批判让球，但也是用现在的价值观来评断历史，这也不是正确的历史观。20世纪80年代，国力疲弱，国人需要体育赛场的成功振奋人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决策也非私利，在当时个性普遍不鲜明的大环境下，更是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决策。正是有了集体至上、个人服从集体的年代，才有了国力的增长、社会财富的

积聚，大众的个性才会有了进一步的释放，所以我们今天反对压抑人性、损害体育精神的行为，但也不能用今天去否定历史。（作者回复：另一种意见。）

小强：王皓当初输给柳承敏那次我印象特别深，为了看直播，我没坐公交车（因为堵），一路跑回家看的！结果王皓输的时候，我都哭了，心里憋得要命。而且能看出王当时非常难受，眼眶里全是眼泪，记者采访他时，他声音都是颤抖的。而且我记得好像有个细节，当时赛后王皓被一个记者（或者是其他工作人员）撞了一下，对方似乎说了句什么，应该不是好话。王皓当时就愣住了几秒，眼眶立马就红了，说话也开始磕磕巴巴的。我并不了解王皓这个人，但就当时的情况，让运动员一个人背负所有国人的期望，输了就万劫不复，实在是太不公平。

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

Gilmore：前半部分感觉在看一部剧情狗血的烂剧本，最后一段猛然感到这个所谓的烂剧本血淋淋残忍的一面——总在不提防的时候给你一枪，就是历史啊。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海：小时候老师说读史使人明智，当我成为一名历史系学生接触到更多历史事件后，其实内心是很痛苦的，深感历史总在不断地重演，永无休止的一天，无论过去的经历多残酷，只要有人性贪婪和恶，历史就会再上演一次。当我成为一名历史老师的时候，我对我的学生说，我们学历史读文学都是希望你们能成为一个有怜悯之心、知对错明事理的人。我想作为一名老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那么简单。

“一战”，被遗忘的14万中国人

周沫-Captain Alice：最近在看《巨人的陨落》，想引用书里的话评论一下今天的推送：“战争是由我们这样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打赢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并不愚蠢。”

木雨日：世界各地被遗忘的中国人实在太多了。我读这篇文章时的心情跟当时了解到泰国的中国美斯乐村时的心情一样，震惊于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心心念念着中国却被中国人自己遗忘的同胞们。

killuaziyi：看得想要掉眼泪，愿他们安息。想到在新西兰旅游时看到在当地金矿做工的华工居住遗址，狭窄没有窗户，居住环境极差，可

是勤劳朴实的中国人民为了致富，还是十几年如一日地在那里工作，很多人工作了一辈子最后连故乡都无法回去。所以有时觉得我们如今能够富强，都是我们应得的，中国人民真的吃了太多的苦。

两个大总统，你选哪个？

逍遥王：病起六君子，命丧二陈汤。早年袁世凯用人独具慧眼，段祺瑞、赵秉钧均是一时人杰，到了后期利令智昏，错用小人，不仅使自己身败名裂，还导致中国陷入几十年的军阀混战。袁公功过是非，的确值得后人好好评定。

风格：唐德刚先生的著作对此亦有非常精彩的描述。袁氏当国，袁项城雄才大略，又恰逢其世，甲午之后，力挽狂澜的是李鸿章，中兴清廷的是袁世凯，吏治、军事、实业、交通等等无一不是功勋卓著，期间还有清廷满族贵族势力的干扰。随后借大势，发动不流血政变，欺他孤儿和寡母，肇造民国，的确伟人之功。

wsf：第一次听说袁世凯接管天津的事迹的时候大为惊奇，这人真的太聪敏了，本来各国想看笑话结果挨了一巴掌。这不是军队，这是警察。老袁的这句话让我捧腹不已。后来了解其在朝鲜的作为更是佩服。难怪李鸿章感叹无人可用的时候，伊藤博文会专门问起袁世凯。

“二战”期间，居然还有这样的一批日本人

林剑：没有哪场战争是正义的，没有哪场战争是必需的，人类因为趋利而侵略或者反抗。不管日裔美军的动机如何，不管结果胜利或者失败，都很难获得认同感，这才是他们的悲哀，也是读者的心酸。

木雨日：这段历史曾在美国历史教科书里读过，但只有三言两语一带而过，更别说日裔参军的事。除了排斥日裔，类似的，美国还曾在法西斯刚开始时排斥德裔。其实我觉得移民的人真的很悲哀，特别是移民二代。我读的美国高中有中国移民二代学生，他们并没有自己就是中国人的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是美国人，可是美国白人在谈话中又会把他们归类为亚洲人。在大学里，我见到的是拿着美国绿卡的中国父母和有美国国籍的小孩。她的母亲很困惑，说不知道应该教小孩子什么语言。因为她的孩子才上幼儿园，不能真的弄清两种语言的区别，为了让她融入幼儿园的环境，为了让她交到朋友而不至于成为异类，她必须教小孩英语，让小孩以美国人的方式生活着。可是，受到中国家庭的影响，小孩

在许多方面都是与其他人不同的。如此算来，他们到底是谁？这也是我决定要在读完书后回国的原因，我无法想象以后我的孩子是用英语在思考的人。

Michael（J.X）Wang：很早就听过442团的事情，但开始关注是当时听到Linkin Park（林肯公园，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支乐队）里的麦克·信田唱的一首歌，反映日裔美籍在“二战”期间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但直到现在，你在主流媒体上看不到442团的事情，战争的余毒还在发酵，前人的教训依旧不能给后世足够的警示。而文化因为政治的影响起不到该有的宣传作用，只能靠你的文字来传播星点光亮了。

一段匪夷所思的“美国往事”

zd（丹）：美国禁酒时期的黑社会，那不就是《教父》吗？（作者回复：对，美国黑手党就是那时候开始茁壮成长的。有一种说法，说禁酒令解除后，不少黑帮已经沉迷于高利润的走私，所以转向了贩毒。）

维维：作为一个学经济的学生终于可以发言了。宏观经济学老师上课说禁酒最好的办法是控制需求而不是控制供给。通过教育使人知道酒的危害，而不是人为一刀切。禁酒禁烟禁毒的方法都一样。

lg：馒头大师说得太好了，“在一些情况下，法律以‘全有’或‘全无’的形式介入，尤其是在一些有人类强烈欲望驱动的领域，往往未必是一种最佳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一系列的调试和分类，最终达到目的？”不知对色情行业看法如何？在部分国家合法，在部分国家非法，但即使宣布色情非法的国家也并没有铲除干净色情行业，感觉和禁酒令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一场“耻辱海战”的背后

种花的Mm兔：世人只知邓世昌，谁人又知许寿山，怒海血战同船没，英魂何曾惜此身。

南飞：读书时最不愿读中国近代史，感觉各种屈辱，所以后来选了理科。但是回顾这些历史，还是被其中隐藏的民族气节和精神力量深深感动，知耻而后勇，勇敢前行，中华民族才能最终屹立于世界东方！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

一十五：记得第一次看到赵一曼这个名字，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些烽火岁月，出生在新时代的我来说，对赵一曼的态度是尊敬却又多少有些不在乎的，直到我深入进去查阅她的事迹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生活在幸福生活中的我们的确很难意识到当时的英雄是多么伟大，当代青少年很容易被那些所谓的“抗日神剧”影响，认为当一个英雄是很简单的事情。真的希望以后的影视剧还原历史就好，让人们也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英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背后

空空如也ツ：我们永远需要“大刀精神”，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大刀”的时代。

刘磊：前两天看傅莹在回答国外质疑中国军费时不卑不亢的发言，差点把我看哭了。“我想国内的同胞会和我一样，作为中国人，我们对祖国能增强军力自主保卫主权而感到自豪，中国在过去经历了太多，我们需要自己站起来。”

HY：抗战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无数中国人明知敌我的巨大差距，仍然用命去换每一寸土地，“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用人的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钢枪铁炮。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或许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宣扬的。看的书越多，越发明白了这是一场怎样惨烈的战争，也就越发感受到我们先辈的伟大。大家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会唱国歌，其实估计很长时间以来根本不理解其中的含义。现在再听，感觉那种绝望，但是依然要抗争下去的心情是那么悲壮凄凉。估计听国歌都能听哭的没几个人了吧。我现在是一边听歌一边哭一边打字。

这群四川人，不该被遗忘

李二车厘子：若没有樊建川二十年如一日收集史料，川军的英勇就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百万川军出川，回来十之二三，不仅仅如此，14年抗战川军输送800万壮丁，贡献全国一半军饷，自贡是捐献最多一个地区，冯玉祥的题字“还我河山”就是赠给自贡军民的，好多普通贩夫走卒动不动就捐出一天收入，重庆、宜宾各地接收大量学子，保证文化没有中断。可以说没有川人的全省咬牙支持，哪有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pureboi：这几年关于川军抗战的电视剧不断上演，算是给那段历史的一个正面回应。作为中国的大后方，四川在抗战中出的力可以说无出

其右。说起来现在的四川人其实大多是湖南广东的移民后裔，但自清初至今的几百年演变，早已形成自己的性格特征，能吃苦、勤劳是川人的典型特征。不过可惜那个时代国力差距实在太悬殊了，川军到上海用了40天，日军到上海只用了3天，滕县保卫战最差的装备抵挡日本最精锐的两个主力师团，可以说川军让侵略者明白，中国是不会屈服的。（作者回复：不过挡住的是师团下的联队，整个师团是挡不住的。）

许卿：有些人看到的是冰冷的数字，我看到的是冰冷的尸体。他们是母亲的儿子，是孩子的父亲，他们倒下的时候都应该是遥望着回家的路吧，他们应该会看见如今的祖国，美丽的天府吧！如今有那么多川娃子在，安敢犯我强汉？

抗日战争，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军

Helen：读过《一寸山河一寸血》，再在这里读了空军的英勇事迹，依旧非常感动。那时候，空军是最危险的兵种，但是仍然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牺牲生命，保家卫国。大家有空去南京的时候，去凭吊下烈士墓吧，虽然那么冷清，那么不好找。

宁：看到这个题目立刻想到了齐邦媛先生在《巨流河》中所写的空军张大飞，同样也是为国捐躯，他的故事也很让人动容。记得书中说南京有个空军烈士陵园，里面有块石碑刻了所有为国捐躯的空军的名字，向烈士致敬！

一座被死守的仓库

基质帅气的婆婆酱：如今就在原址，建了一个谢晋元四行仓库纪念馆。建议大家去看看，就在大悦城附近，苏州河北岸。

crush：八百壮士中，实际人数400多人，有200多人来自湖北咸宁通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经采访过胡梦生壮士的遗孀尚凤英，听老人口述当年的战火，再看到今天大师的推送，仍会流泪。2015年8月，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开馆，尚凤英老人受邀参加，希望更多的人能记得那段血与泪的历史，希望英雄及家人都能被善待。

徐侠客：我在广东梅州工作，去过蕉岭很多次，对那里很多以晋元命名的地名一直没什么感觉，此刻看了你的文章热泪盈眶，历史需要铭记，更需要有你这样的人提醒我们铭记。

阿离：去上海时，第一站就确定去这儿，一进门是谢将军给妻子的信“我心非铁石，能无眷然乎？然职责所在，为国则不能顾家”，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1937，这座城没有不战而降

烟波浩淼：今天这篇真的不想看，太沉重了，当年和同学看完《南京！南京！》，回来之后我们心情沉重地打了一架，这种无法言说的痛和憋屈，现在的人都承受不住，不知道当时活下来的人是怎么承受的。（作者回复：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看，这段历史总是在那里。）

牛妞：不敢评判，想起高晓松说过的一句话，没有经历过就无法体会，我们永远无法体会先辈们看着别人践踏蹂躏我们的祖国，狼烟烧遍国土的家国情感。

血战台儿庄

董强：《血战台儿庄》真是一部细节非常到位的电影。如当时日军军装的军衔位置是在肩头，而不是在领口，领口军衔出现在1939年后；西北军臃肿的棉衣与马褂，还有像锅盖的英式钢盔；中国军队捷克式轻机枪用的是二十发直弹匣，没有出现经常穿越的布伦特轻机枪和弯弹匣；敢死队用的是仿德式花机关冲锋枪，没有神剧中常见的英式司登卡；日军坦克战车的真实度。大庙白刃战那一段，日军持三八式步枪在拼刺中占尽上风，一个日本兵可以轻松刺倒几个中国兵，因日军重视刺杀训练，技法娴熟，而我军步枪装上最长的刺刀，也要比三八式短上十厘米。最后敢死队抢占制高点挂国旗那一幕，记得有一个队员用大刀砍日军旗杆，砍了几下刀刃豁了一个大口子，这不是艺术加工，而是当时西北军大刀大多由民间作坊打造，钢材质量确实不敢恭维。唯一的瑕疵就是《海军进行曲》用得太多了，抢了日本陆军不少风头。直到现在还深深记得这几个片段：1.面对坦克突袭，老兵在拉响集束手榴弹前对新兵说：“孩子，来年别忘了给我烧点纸钱！”2.敢死队队长：“长官，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啥？留着给兄弟们树块碑吧！”3.片尾，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台儿庄的残垣断壁下，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人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斑驳难辨；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一寸山河一寸血，让人流泪的震撼！（作者回复：那时的电影人确实态度严谨。）

+_+沈废废^_^：历史课本上一个知识点，台儿庄大捷，轻轻松松五个汉字。文字之下是炼狱般的前仆后继，尸山血河，重叠相枕。看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生存是人的本能，是什么样的意志让这些同胞抱着必死的决心决不后退。这大概就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地方。

薄荷喵：战役中一些部队本不是蒋介石嫡系，很多以前还反过蒋。从蒋介石的部署上看，就是打算用这些非嫡系的杂牌军抗日，同时又可以消耗他们的实力。这段历史最感动我的不仅仅是血色漫天的细节，更是这些在军阀时代从不轻易消耗自己队伍的将领、士兵，明知蒋一石二鸟的私心，但在日军面前从未做保存实力的打算。

日本投降前后的四个片段

刘雨萌：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是苏联的武装，是美国的原子弹才使日本投降，唯独不承认中国的努力。那不仅仅是努力，是浴血奋战啊！军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战斗啊，这才是我们能胜利的原因！小战士的话读起来太心酸了，但又确实是那时候军人的真实想法。勿忘国耻，还要勿忘前人。

Yolanda　Mao：日本士兵背对道路的这种姿态，是在保卫他们的天皇陛下吗？还是以这种姿态抵制。不过在麦克阿瑟期满回美国的时候，日本民众排满路边哭喊着夹道欢送……（作者回复：其实是有抵制情绪的。他们感谢麦克阿瑟和背后的美国，是本以为作为战败国，会被肆意凌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温度：寻找历史背面的故事、热血和真性情/张玮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086-7849-8
I.①历…II.①张…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9535号

历史的温度——寻找历史背面的故事、热血和真性情
著者：张玮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86-7849-8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历史的温度 2

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馒头说历史

张玮 著



你真的知道“土肥圆”吗？

尼古拉·特斯拉：到底是神还是人？

《最后一课》究竟有没有骗人？

24年前的那个“北京一夜”，发生了什么？

历史的背后，有血，有肉，有真的性情。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自序

人物 不应让历史睡去

聂耳之死

“土肥圆”和“土肥原”

东条英机之死

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潜伏”

孙殿英的“盗墓笔记”

一张照片引发的自杀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究竟过时了吗？

尼古拉·特斯拉：到底是神还是人？

张灵甫之死

一位孤悬东北的土匪将军

张勋这个人

或许我们长大后，才能读懂他的童话

鲁迅背后的两位女性

他是个医生，却夺走了40万人的生命

逸闻 历史是漫长的征途

《最后一课》到底有没有骗人？

他以500公里时速撞向地球，最后时刻说了什么？

中国人接受“裸体艺术”，到底有多难？

一场轰动中外的大劫案

明明是刻骨铭心的仇恨，但日本战后为什么会感激美国人？

一九四九，百万黄金大挪移

当年，到底有多少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

24年前的今天，人类文明留下了黑暗的一页

55年前，人类差点灭绝

一场神秘的超级大爆炸

信念 道阻且长，而终点可期
只剩两架轰炸机了，但还是要轰炸日本……
1942年，15架美国轰炸机在中国迫降……
有一种撤退，叫敦刻尔克
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英国人干什么去了？
一个公务员给全人类留下的数学难题
直到坐上电椅，这对夫妇依旧表示自己清白……
五环 体育能否超越政治
拳王阿里：体育是否能超越政治？
一个34岁就做到正部级官员的运动员
世界冠军之死
这届奥运会，全世界近一半国家不愿参加……
没错！就是他“承包”了一届奥运会！
24年前的那个“北京一夜”
版权页

自序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第一本《历史的温度》出了才半年，第二本就又要付印了。

记得在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参加了一场活动，主办方在介绍我的时候，在“媒体人”的头衔之后，忽然加了个“作家”——当时在台下的我，一下子没缓过神来。

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叫我“作家”。

但后来想想，大概也应该勉强算是一个作家了吧，因为通过写“馒头说”微信公众号和第一本《历史的温度》，我确实幸运地拥有了一批还算喜欢读我文字的读者。

承蒙大家厚爱，截至我写这篇序的时候，第一本《历史的温度》在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加印了10次。而在微信后台的消息里，读者拍给我的《历史的温度》的封面照片开始渐渐多了起来。

其中，有不少原本就是“馒头说”的读者，他们买到书后，想和我分享。

也有不少，是原本并不知道“馒头说”微信公众号的人，在书店买了《历史的温度》，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又成了“馒头说”的读者。

有的读者，还会给我发来他们在公共场合拍到的有人在读《历史的温度》的照片，我印象中，有好几张照片，是有人在地铁车厢里看《历史的温度》——那一刻我挺不好意思的，因为书很厚也很重。

而一转眼，《历史的温度2》又要来了。

这次的书名，沿用了第一本，倒不是懒得再想新书名了，而是觉得，“温度”这个词，还是挺贴切的。

在收录的文章方面，第二本一共收录了“馒头说”的36篇文章——还是公众号发表过的文章。但我始终觉得，经过装帧、设计和排版，拿在

手里的纸质书阅读体验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说句可能有点不要脸的话，我自己有时在翻《历史的温度》时，也会不知不觉看进去——这可能就是纸质书的魅力吧。

而第二本之所以比第一本少了4篇，是因为这一本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刊登读者评论——没有你们的支持，“馒头说”也不会有今天，所以希望尽可能地让更多读者评论呈现在书中。

当然，即便如此，《历史的温度》这本书应该也是市面上相同类型中比较厚的一本了，以至我和出版社的编辑开玩笑，说若不是你们在第一本坚持要放40篇，现在这些文章数量，其实可以够出三本了（编辑说她舍不得删，宁可提高成本）。

说到厚度，还有一件事要和大家汇报下：第一本书，出版社采取的是“裸脊锁线”的装订方式，成本其实比一般的胶装还要贵些。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因为书太厚，用传统胶装很容易散架；第二，这样装订，可以保证厚的书也可以平摊开阅读，这样可以改善大家的阅读体验。

所以，第二本书还会采用这样的装订方式，并不是“简陋”啊，请大家理解。

在大量的读者留言中，最让我欣慰的，是对我说“受到了启发”这句话。

众所周知，写历史，我并不是“专业选手”，相对于科班出身的学者、作家，我只是一个历史的业余爱好者，所以虽然尽我所能对所引用的材料做了考证和筛选，但谬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大家一直给了我很多包容和体谅，我很感激。

但我还算有点信心的是，我的出发点应该是没错的，那就是我一直希望表达的一个观点：

历史不是冷冰冰的年份和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有正反面，就有优缺点。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辩证的眼光，结合当时客观的环境，设身处地地去看待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带入立场，或者用“上帝视角”来评判一件事或一个人。

如果看完《历史的温度》后，读者能有这样的一点点启发，那就是最让我欣慰的一件事了。我绝不敢说为读者打开一道门，或者是一扇窗，我觉得，如果能稍微给大家拨动一下历史的窗帘，透出一道光，那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了。

最后，还是想和大家道一声感谢。

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少改变，相信你们中不少人，也是如此。

这是一个“只有变化是不变”的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谢谢你们对我的赞赏和鼓励，这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在海莲·汉芙写的《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人类发明了文字，懂得写成并印刷成书籍，我们便不再徒然无策地只受时间的摆弄宰制，我们甚至可以局部地、甚富意义地击败时间。”

愿我们一起，保持对阅读的渴望和热情。

了解历史，适应变化，战胜时间。

是为序。

2017年12月17日

于上海

人物　不应让历史睡去

聂耳之死

长期以来，他给我们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可能只有一句话：“音乐家，国歌的作者”。

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在23岁的年纪就去世了？他的死亡背后有没有什么阴谋？

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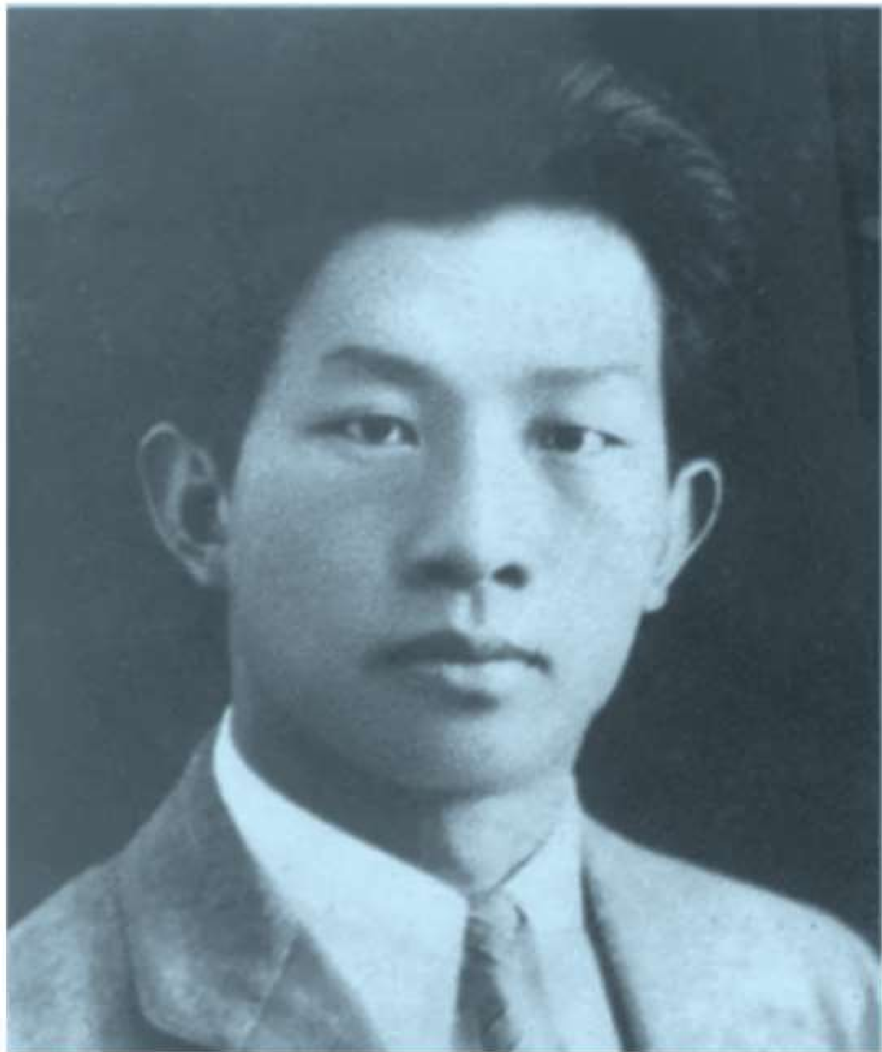
1935年7月17日的傍晚，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海岸监视所，忽然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的是一名叫滨田宏子的日本女性和一名叫李相南的朝鲜男子。他们焦急地告诉警察：一位和他们一起在鹄沼海水浴场游泳的中国人，在海岸边失踪了。

失踪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一点半。滨田宏子和李相南找了3个多小时，依旧没有找到，所以报警。

根据记录，那名失踪的中国人，叫聂守信。

第二天，7月18日的上午，滨田宏子和李相南在又一次去海边寻找无果后，接到了日本警察的通知：那名中国男子找到了，是被打捞上来的，他已经死了。根据法医的检验，死者死于窒息，换句话说，就是游泳时溺亡。



聂耳

不久后，一位名叫张天虚（又名张鹤，长篇小说《铁轮》的作者）的中国男子赶到，打开棺木，确认了死者身份。聂守信，是这名中国男子的学名，他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聂耳。

聂耳当时只有23岁。

这一年，他刚谱写完的一首歌曲，正在中国大江南北被中国人传唱。

歌曲的名字，叫作《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昆明。

聂耳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用“颠沛流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也算贴切。

在聂耳4岁那年，父亲聂鸿仪就去世了，母亲彭寂宽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努力考到了行医资质（聂耳的父亲是一名中医），给人看病开药，维持家庭生计。

不过，母亲的行医并没有影响聂耳未来的职业选择，倒是她另一方面的爱好对聂耳产生了巨大影响——彭寂宽是傣族人，经常喜欢给聂耳哼一些民族小调，并把一些民间故事配成当地流传的小调唱出来。

1919年，聂耳开始进入小学学习。虽然家庭拮据——聂耳连一套童子军服装的钱都交不出，只能转学——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聂耳开始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学竹笛、二胡等乐器，还担任了学校学生音乐团的指挥。

1925年，进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的聂耳，每天晚上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开办的英语学习会，并向他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后来，他又向人学习了小提琴。

1928年，发生了一件对聂耳影响很大的事。

聂耳的老师赵琼仙被当局逮捕（她是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戴着镣铐游街后拖去刑场枪毙。赵琼仙一路喊口号，聂耳就叫着“老师”在后面追。赵琼仙就义后，心被挖了出来，当时有些愚昧的老百姓认为吃了能治病，还去抢这颗心。

这件事对聂耳刺激非常大，他认为光学音乐没用，一定要做点实际的事。

16岁的聂耳随后就瞒着家里，报名了滇西军阀范石生组建的“学生军”，参军了。



17岁的聂耳

几经辗转，一年之后，这支学生军在广州解散，聂耳又回到老家昆明，继续音乐的学习。由于聂耳此时开始参与中共地下党的一些运动，慢慢被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盯上，经家人帮助，聂耳在1930年逃往上海。



照片中最右边的女孩子名叫袁春晖，当时是云南私立东陆大学的学生，能歌善舞，是聂耳的初恋女友，也是聂耳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子

在上海，聂耳打过工，失过业，最终还是如愿走上了音乐之路——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

由于聂耳对音乐特别敏感，很多音乐只要他听到，就能唱出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耳朵”的绰号。

在一次联欢会上，聂耳表演了一项绝技——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结果总经理笑称他为“聂耳博士”。聂耳说：

“我已经有三只耳朵了（“聂”的繁体字为“聶”），你们还要送我一只耳朵，也好！”从此以后，他就索性不叫聂守信，改名叫“聂耳”。

3

聂耳的生活条件虽然得到了一些改善，但真正让他音乐的灵感开始迸发的，是他之前贫苦的生活经历。

聂耳曾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的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

在上海，他自己去走女工的夜路，体会女工的辛苦，写出了“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的《新的女性》；他去码头蹲点，观察码头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写出了“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的《码头工人之歌》；他每天聆听小报童的卖报吆喝，谱曲后和报童一起修改，写出了“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卖报歌》。



《卖报歌》的真实原型——报童“小毛头”杨碧君。聂耳写完《卖报歌》后曾专门请她提意见，她指出要加进一句“七八个铜板就能买两份”

回顾聂耳短暂的一生，他从事音乐创作的时间，大约就是在1933年到1935年这两年。但就在这两年时间里，聂耳的音乐天分似乎集中大爆发，留下了十几首在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



黎锦晖堪称中国流行音乐和儿童歌曲的奠基人，后来在抗战时期也写了不少抗战歌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全境沦陷，华北摇摇欲坠，但一些社会流行歌曲，依旧是《何日君再来》《桃花江是美人窝》。这些歌曲主要来自聂耳当时就职的明月歌舞社，社长就是《桃花江是美人窝》的作者、著名的音乐人黎锦晖先生。

其实黎锦晖也创作过不少抗日歌曲，但因为当时这些流行歌曲能带

来高票房收入，所以是歌舞社主要的曲目。但聂耳就很看不惯，他认为时局危急，不应该再写和演这种歌舞。为此，他还专门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反对这种行为，被明月歌舞社的同事们认为是“端我们的碗，砸我们的锅”，之后没多久，聂耳就离开了歌舞社。

但也正是聂耳发表的那篇批评文章，让一个人注意到了他，那个人就是田汉。一个词作者，一个曲作者，从此走到了一起。当时两个人就商量，能不能写几首提振中国人民士气、呼吁抵抗侵略的歌曲。

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电影说的是知识分子最终放弃彷徨，投身抗日的故事。田汉写好了一首主题歌的歌词，但他那个时候因为“宣传赤化”，被国民党当局抓捕了。在被捕前，田汉把歌词抄在一张香烟的衬纸上，夹在了剧本里。

剧本随后到了夏衍手里，夏衍发现了这首歌词，并把这件事告诉了聂耳。聂耳看了歌词，一拍桌子：“交给我！我来作曲！”



1934年，田汉（右）成了聂耳（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聂耳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写出了曲子的初稿。但正在此时，传来了国民党当局也准备抓捕聂耳的消息。根据组织安排，聂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再由日本去苏联。

1935年4月，聂耳到达日本，随后三易其稿，写好了那首主题曲的曲谱，寄回了国内。［然后聂耳就在好友李相南（真实身份是朝鲜共产党员）的陪同下，到他的朋友滨田宏子家去度假。］

聂耳寄回去的曲谱上，题目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当时百代唱片的投资人朱庆澜在这三个字前又加了“义勇军”三个字，《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

1935年5月，百代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从曲调到歌词，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击中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首歌迅速被传唱大江南北。

两个月后，却传来了聂耳与友人在海边度假，不幸溺亡的消息。

4

关于聂耳的死因，其实有争论。

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请来当时的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来写墓碑文。郭沫若当时写的话里，最后两句是：

“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敌国”，指的是日本，而“未能明焉”，明显透露出一种质疑。

无独有偶，巴西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安德拉德当时写了一篇散文，叫作《杰出的音乐家》，在文中他这样写道：“聂耳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是的，聂耳很清楚，他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敌人很可能暗杀他。……聂耳还是小青年，只有23岁。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死了。在检查了一具流血的尸体后，日本警察正式发表看法说：‘他是溺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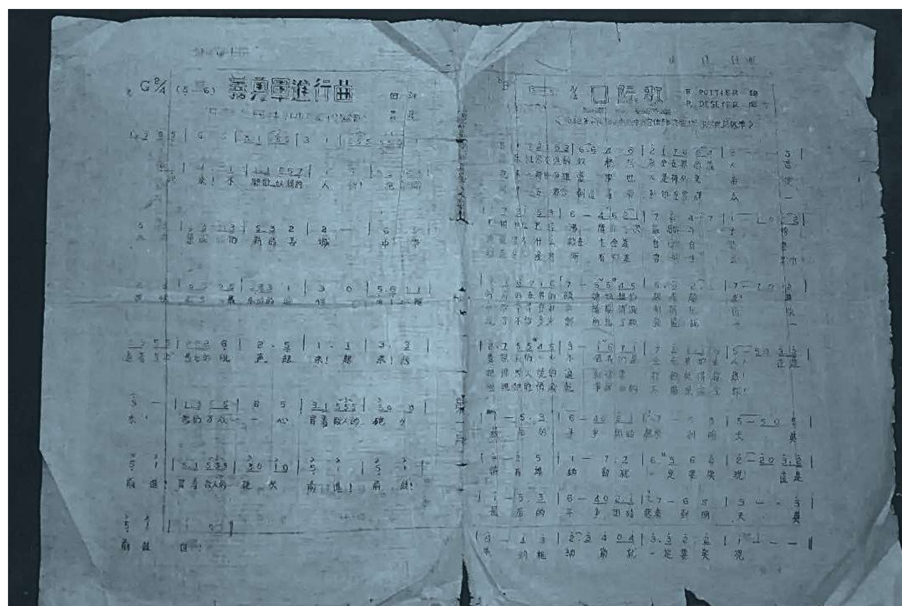
尤其是，聂耳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头部和鼻孔都有轻微出血现象，使得当时国内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聂耳当时是七窍流血，是日本人认为他宣传抗日，派人杀死他后抛尸大海。”

真的是这样吗？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不能支撑这一说法。

第一，聂耳虽然当时写了一批传唱很广的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作曲者是聂耳，聂耳当时作为一个业余作曲家，名气绝没有大到日本特务要派人暗杀的地步。

第二，当时聂耳虽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是秘密加入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党员的身份。他去日本也没用护照，用的是一张学生证，上面写的是“聂守信”这个名字，日本人也很难知道他的身份。即便知道聂耳的真实身份，日本警察也不会轻易暗杀，因为对当时流亡日本、名气最响的郭沫若，日本警察也只是“监视居住”。当时中日也没有全面开战，日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暗杀一个在当时其实不算有名的聂耳。



早期油印的《义勇军进行曲》简谱

第三，聂耳在日本期间的日记后来全部曝光，没有任何表示自己被特务跟踪的记录。

第四，当时聂耳的同乡挚友张天虚从头到尾参与了聂耳的认尸到入殓的全过程，他后来所有的回忆录和文字，都没有提到怀疑聂耳是被日本人暗杀的。

最后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曾多次与聂耳在上海一起游过泳的他的朋友孙瑜、金焰、吴永刚、赵丹、黎锦光等人，都回忆说聂耳的游泳技术不高，不会换气，经常沉底，因此有着“潜水艇”的外号。而根据滨田宏子的回忆，当天她带着儿子在浅水区游泳，而聂耳去了深水区。

根据游泳专业人士的经验，他们救过的一些溺水的人，确实会出现口鼻有轻微出血的现象。

日本著名音乐大师团伊玖磨后来到中国拍摄《聂耳》专题片时，曾提出他自己的猜想：聂耳在那天游泳时可能突发心脏病。

说聂耳是被暗杀，证据确实不足。

5

聂耳的生命，停留在了23岁。

但他留下了一件最珍贵的遗产。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从将军到士兵，从商人到学生，大江南北，所有中国人都饱含热泪，握着拳头口口传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37年的淞沪会战，谢晋元率400余名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每天都要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台儿庄，中国士兵集结在断壁残垣的庄内，高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向日军发起冲锋……

不仅仅是在中国。

“二战”期间，在苏联，在法国，在捷克斯洛伐克，《义勇军进行曲》被翻译为《起来》，灌录成唱片，“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响彻欧亚大陆。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于次年灌录了一套《起来，新中国之歌》（*Cheelai:Song of New China*）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作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也沦落到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义勇军进行曲》开始成为东南亚人民抗日的“战歌”。1944年，《义勇

军进行曲》在马来亚的歌词被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位马来亚游击队员，在被捕后，面对日军，是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就义的。

到了“二战”尾声，盟军推出了一批凯旋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也赫然在列。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征集新中国“国歌”，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人提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刻表示赞成。

之后经历“文革”，《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遭到迫害，国歌的歌词被推翻重写，但这首歌的曲调却无人敢动。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再次确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

而在日本，也有人纪念聂耳。

1954年，在聂耳遇难的日本藤泽市湘南海岸公园，日本人建立起了一座“聂耳纪念碑”，但1958年毁于一场台风。1963年，藤泽市民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1965年，保存会通过民间募集400多万日元，重建“聂耳纪念碑”。

每年的7月17日，藤泽市“聂耳纪念碑保存会”都会和市民在聂耳纪念碑前举办“聂耳纪念祭”，献花，默哀，并由市消防乐团吹奏《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肖像的石材取自他的故乡云南。1981年，因聂耳的生死缘，昆明市和藤泽市成为友好城市

在激昂的歌曲声中，大家会再读一遍聂耳纪念碑上的碑文：

纪念聂耳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终焉之地。

他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来此避暑游泳，淹没在突来波澜中而成为不归之客。

聂耳一九一二年生于云南，师事欧阳予倩。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生涯里，留下了歌颂中国劳动民众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大作，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聂耳作曲的。

倾耳过来，至今可以听到聂耳的亚洲解放之声。

馒头说

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跳水比赛的现场，我曾经和一个在伦敦政经学院读硕士的留学生聊天。

“这人哪，就是怪。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国家毛病太多，一定要出来。”这哥们儿说，“可真一出来，心里想的全是祖国。”

就是这个哥们儿，自己买了票来看比赛（跳水比赛在英国非常热门，门票非常贵）。在吴敏霞拿到女子三米板金牌后的升旗仪式上，国歌一响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哭得跟个傻×似的”。

作为一个曾经采访过三届奥运会和几十项国际比赛的体育记者，我能理解他的感受。

尤其是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国运动员登上冠军领奖台，升起国旗，奏响国歌的时候，看台上用力挥舞国旗，哭着跟着一起唱的，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华人和留学生。

这背后，自然主要是“祖国情结”，但国歌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义勇军进行曲》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没有华丽的乐章，但每个音符都铿锵有力，击中人的内心，让人感受到一种危机感和奋发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那场对新国歌的讨论，其实不是没有对《义勇军进行曲》的质疑：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建国了，还说“最危险的时候”，合适吗？

但最后还是通过了。而且事实证明，在这之后，中华民族确实远没有到可以图安逸的时候，甚至说有濒临“最危险的时候”，也不为过。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时至今日，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过时了吗？

真的过时了吗？

读者评论

李茉莉：如果放到今天，“键盘侠”们又会问，为什么刚写了抗日的歌就去日本？为什么抗日的聂耳还会有日本人给立碑纪念？等等阴谋论……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人性是最真实的。感谢馒头大师再掀开这一章，让我们重读历史，多多见识！

冰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最危险的时候，永不过时！

伟：聂耳先生是我的校友（求实学校）。学校花园有他的塑像，每次经过的时候，我会停下脚步，对着塑像默唱一遍国歌。起来！

阿小♉菁♉依然：袁春晖是我奶奶的堂姐，那时候我奶奶还小，他们会带上我奶奶一起出去玩。他们那一辈的青春岁月，还是挺美好的……如果不是社会动荡他们应该会在一起吧。春晖奶奶的子女现在很好，我们也很好，这样的生活离不开革命先辈的努力（作者回复：有一位让我觉得历史很近的读者）。

“土肥圆”和“土肥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土肥圆”“高富帅”“矮穷挫”这些“新三字经”，成了网络流行词。

“土肥圆”的含义，其实不用解释，看字面意思就知道了。

但后来在一次推送中，我偶然发现，原来不少人并不知道“土肥圆”的出处，或者说，完全不知道，土肥圆原来真的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土肥圆的出处，确实来自一个人的名字：土肥原贤二。

让我想想，怎么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人呢？这么说吧：

这个人，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的第一个日本甲级战犯。

2



土肥原贤二

1883年，土肥原贤二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家庭。

按照一个军人的发展轨迹，他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

大学。1913年，30岁的土肥原也就是混到了一个日本陆军上尉的军衔而已，中规中矩。

但这年7月的一次调遣，彻底改变了土肥原的人生轨迹——他被派进了日本驻北京的“坂西公馆”，担任坂西利八郎的助理。

“坂西公馆”是日本著名的特务机构，坂西利八郎是日本著名的第二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后来被人称为“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

还是回到1913年。

不太清楚土肥原贤二在北京拜了哪位师父，总之，他很快掌握了地道的北京话，甚至能说几地的方言。这为他今后的特务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从1913年到1927年，整整14年，除了短暂的调离外，土肥原贤二可以说是“深深扎进了中国这块土地”，游走于中国各派系军阀和势力，甚至普通民众之间，建立了广泛的人脉。

很多接触过土肥原的人，说他待人和善，能说会道。所以有人说，很多情报是被自动送到土肥原这里来的。

1927年，44岁的土肥原贤二晋升为大佐（相当于上校团长级别）。日本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有一个“十年人事”的说法，就是说一般陆军大学毕业生，10年就可以升到大佐军衔。土肥原贤二比同辈多花了5年时间。但这5年时间，他花得并不冤——他在中国多积累了5年人脉。

1928年，土肥原贤二第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来了。

3

给土肥原贤二机会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

1928年3月，土肥原贤二应聘出任“东北王”张作霖的顾问，负责指导奉军以日军的标准进行训练，顺带大力搜集奉军辖区内的所有情报。

土肥原确实在全力帮助张作霖。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土肥原贤二拼尽自己所有的智慧和人脉，直接搞垮了直系军阀的金融系统，让他们发行的纸币全部成为废币。吴佩

孚败走，直系崩溃，奉系进京掌权北京。

土肥原贤二帮张作霖的远不止这些。奉系将领郭松龄趁奉军主力在关内作战，起兵叛变，在土肥原贤二的强烈建议下，驻朝鲜的日本军队出兵，大败郭松龄部队，再一次帮助了张作霖。

投桃报李，土肥原贤二当然是有期待的。他期待的是，张作霖今后能完全接受日本人的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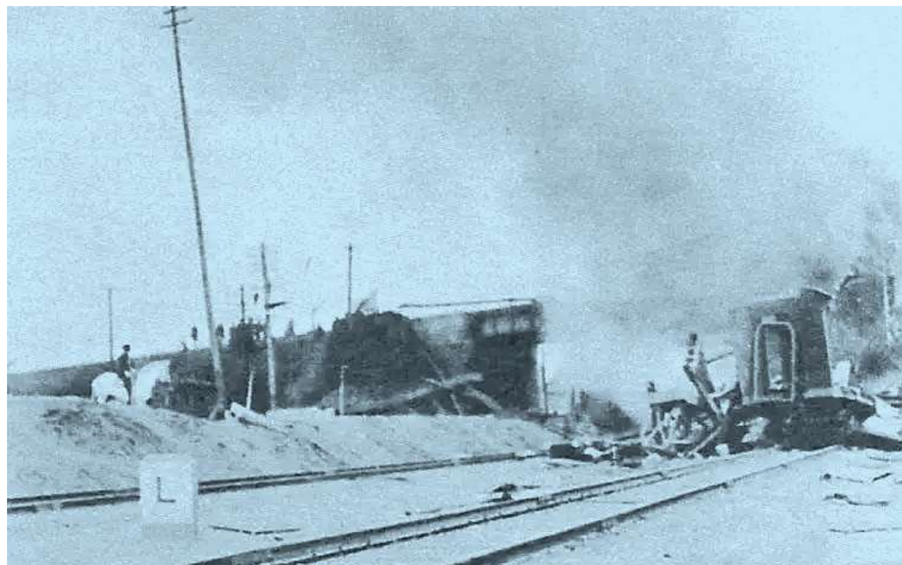
然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可以做一万件糊涂事，但有一件事绝不糊涂：不能做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

当土肥原贤二发现张作霖得到自己那么多帮助，却开始对日本人的要求阳奉阴违的时候，他开始恼羞成怒了。

北伐战争开始，土肥原贤二建议张作霖退回关外搞独立，但张作霖不肯，结果节节败退。眼看北伐军将有可能威胁到日本的“满洲权益”，一直以“慈眉善目”闻名的土肥原贤二，终于露出了他完全不“萌萌哒”的真面目——皇姑屯火车站一声巨响，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当日死去。

我们读教科书时，看到张作霖被炸死，觉得也就是中国的一个军阀被日本人炸死了。但当时，入主北京的张作霖，地位其实已经等同于中国的国家元首。

用炸弹炸死一个大国的国家元首，这事情就是土肥原贤二干的。



皇姑屯车站爆炸现场

4

炸死中国实际意义上的元首，这种行径引起了日本内阁的强烈不满。

而事实也证明，这实在称不上是土肥原贤二下的一步好棋——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怀着“杀父之仇”，宣布“东北易帜”，率东北军归国民政府的蒋介石领导。

一次爆炸，日本人没占到任何便宜。

所以，土肥原贤二被贬到一个步兵联队去做联队长。但是，土肥原贤二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魄力和冷酷，得到了日本军部的赏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土肥原贤二得到了又一次翻身的机会。

在意外轻松地拿下中国东北后，日本又惊喜又惶恐：接下来该怎么治理？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人之一板垣征四郎认为，日本直接建立一个军事政府，像统治台湾一样，把东北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而老辣的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更阴险的计策：在东北建立一个“满

蒙五族共和国”——说穿了，就是一个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

土肥原的这个提议最终获得通过。那么，找谁来做这个傀儡呢？

土肥原贤二早就物色好了人选——祖先就是从东北起家，现在被排挤出宫的“末代皇帝”溥仪。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确实没有比溥仪更好的人选了。

而且，当溥仪如同丧家之犬被赶出皇宫的时候，正是土肥原贤二把他接到了天津的日本使馆——这步棋，土肥原贤二早就布下了。

之后的过程就不展开了，总之，土肥原贤二找到了溥仪，向他明确三点：满洲是你族龙兴之地，你要对得起祖宗，就应该回去从头开始；满洲3000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翘首期盼你回去领导他们；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没下个店了！

三条理由条条击中溥仪要害。

土肥原贤二后来召集了一些地痞流氓，耍了一些恐吓的手段，将溥仪一路从天津“护送”到东北。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建立，溥仪出任执政。

炸死一个“国家元首”不行，再扶植一个“国家元首”。土肥原贤二干得游刃有余。

5

作为一个特务头子，在“诱降”这一方面，土肥原贤二确实堪称一把好手。

伪满洲国建立后，当时东北最有名的抗日英雄、全国抗日旗帜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被土肥原贤二诱降了（后来马占山又重新宣布抗日，但实力大损）。

1933年，面对山西的阎锡山、北平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保定的商震，土肥原贤二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上蹿下跳，居然真的搞出了一个“华北五省自治”，让华北继中国的东北之后，实际上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土肥原贤二的使命应该说是结束了——国家之间一旦正式开战，台面上的间谍特务活动，就要让出聚光灯下的位置了。

但土肥原贤二脱下西装，立刻就能穿起军装。就在1937年3月，土肥原贤二成了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的师团长（中将军衔），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特务头子做了师团长，是不是一个花架子？

1937年8月20日，土肥原贤二率第十四师团在塘沽登陆，沿平汉铁路一线进犯，一路连战连克，直抵黄河渡口。因为第十四师团的效率奇高，土肥原贤二被日本报纸称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被名将薛岳调集12个师围剿，土肥原贤二确实展现了他的军事天赋，最终全身而退。因为这一战，蒋介石最终把黄埔一期毕业的中将师长龙慕韩，判作战不力而军法处决——这是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处决的第一个嫡系将领。

同年5月，国民党军队掘开了黄河花园口的堤岸，这就是惨烈的“花园口决堤”。数十万中国老百姓被淹死，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



走到台前的土肥原贤二

而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要决堤黄河，为的就是阻止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前进。

6

黄河决堤事件之后，土肥原贤二被调回日本参谋本部，继续从事他最拿手的业务——特务。

在被传闻暗杀了不肯投降的中国军阀另一位著名人物吴佩孚之后，土肥原贤二在自己的策反功勋簿上添加了一个最具分量的“勋章”——在他的策划和利诱下，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宣布投日，成立汪伪政府。

但土肥原贤二再怎么努力，依旧无法挽救日本帝国的败亡。

在诱降汪精卫之后，土肥原贤二就渐渐消失了行踪。直到有一天，他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日本第一军总司令杉山元自杀，土肥原贤二宣布接任（当时他的军衔已是大将）。

但那一天，是1945年8月12日，离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3天。

7

就在土肥原贤二接任总司令职位的第二天，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就下令逮捕土肥原贤二。

没有人会放过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被带走

据说，土肥原贤二被列入第一批甲级战犯，是蒋介石的授意。蒋介石一直对土肥原贤二恨之入骨，私下里，称他为“土匪原”。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熟知英美法律的土肥原贤二一言不发，这样就会造成“证据不足”的情况。全程他只说过四个字：“主张无罪。”

所以，对土肥原贤二的审判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最后，在中国的强烈要求并出示证据的情况下，土肥原被判处绞刑。



土肥原贤二受审

1948年12月23日，通过抽签的方式，土肥原贤二在所有甲级战犯中，第一个走向绞刑架。

从被点名，到走上绞刑架，到被绞死，土肥原贤二始终没说一句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馒头说

不妨听听当时那些人对土肥原贤二的描述。

溥仪说：“当时48岁的他给我感觉非常谦卑，而且另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他非常靠得住！”

宋哲元说：“土肥原说话算话。”

马占山说：“土肥原从不骗人！”

铃木贞一（同为甲级战犯）：“土肥原为人大方，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事漫不经心，总是大概差不多，很适合同中国人打交道。”

据说，他就任沈阳市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薪水作为安定老百姓的资金。

据说，他担任师团长的时候，严禁手下士兵烧杀抢掠。

据说，盟军去逮捕他的时候，以为会在他家发现很多中国文物，但事实上，他家只有租住的两间小屋子，非常破败。

怎么样？如果单凭这些描述，土肥原贤二还真像现在“土肥圆”的本意：质朴，肥头肥脑，圆润。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他策划的暗杀和恐吓事件不计其数，他杀死的中国军民不计其数，他给中国带来的分裂的恶果难以估量。他对人说话算话，是因为他对人有所求。他下令不劫掠老百姓，不是因为他真的爱中国老百姓，而是希望自己的部队能尽量少积累仇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已。

可以说，他是一个合格甚至出色的特务乃至将领，但载着他和他同僚疯狂前行的那艘大船，方向是根本错误的。

他的信仰，是靠侵略别的国家支撑的，他的所谓“英名”，是建立在别国人民的痛苦上的。

所以，关于他最后和那艘大船一起倾覆，他的遗言是：主张无罪。

而我们的评价是：罪有应得。

读者评论

Stt：喜欢最后一段话，他和他的国家这艘大船所航行的方向就是错误的，他的所谓“英名”是建立在我们国家人民的水深火热之上的，所以他罪有应得。

NANA：“枭雄”人物，却是累累白骨成就的。

popper紫：史纲老师说过，土肥原贤二是日本决策集团中最清醒的一位，当时他不主张全面侵华，他认为东北三省足够日本消化100年。

□：他确实情商很高，但侵略的本质无法改变！了解了战乱的年

代，才知道和平的重要。

东条英机之死

这个人，被认为是“二战”中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肩的“法西斯三巨头”。

作为“二战”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一路叫嚣，把整个日本捆绑上了疯狂自杀的战车，而在日本战败后，作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却忽然失去了当初所谓的“勇气”……

1

时间先回到1945年9月11日，下午3点左右。

在东京近郊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外，围着一大群早已守候多时的美国和日本记者——他们都在静静地等待一条大新闻的诞生。

就在这一天，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对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逮捕令。

那栋房子，就是东条英机的住宅。

下午4点左右，30多个持枪的美国宪兵开始行动。

宪兵队长保尔·克劳斯中校开始敲门，身后的宪兵都端起了枪。东条英机穿着短袖开襟衬衫，打开客厅窗户问：“你们有逮捕证明吗？”

一个宪兵向他出示了文件证明。

东条英机看完后说：“马上就给你们开门。”

宪兵们在门外等待。

房子里传出了一声枪响。

一位日本记者对克劳斯中校说了一句：“长官，你的猎物好像自杀了……”

宪兵和记者迅速冲入房间，他们看到东条英机坐在客厅沙发上，左

手握着一把手枪，胸口血流如注。

“停止射击！”克劳斯中校大喊。

屋外，宪兵和记者们都没注意到，东条英机隔壁的邻居家，一位戴着草帽假装除草的女子开始合掌祈祷——她是东条英机的妻子东条胜子。此时的她，不是在祈祷丈夫平安无恙，而是在祈祷丈夫能像一名军人那样死去。

但是东条英机并没有咽气。

屋内，美国摄影师开始忙碌了起来。

“把东条的头稍微往右移动一点，就这样，很好。”

“您让开一点好吗？我想拍一张东条拿着手枪的样子，帮我把手枪压紧在他手里好吗？”

“苍蝇又飞过来了，我一定要拍张苍蝇停留在东条额头的照片！”

闪光灯闪烁中，东条英机在痛苦地呻吟，而周围的人都在等他死亡。

作为向导，《朝日新闻》的记者长谷川幸雄是屋内唯一的日本记者（就是他后来撰写了回忆文章《东条自杀目睹记》）。

根据长谷川幸雄的回忆，东条英机在当时说的话是：

但愿一枪就死，可遗憾的是仍需要时间。

大东亚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对国民和大东亚民族却是悲惨的。

我不想在法庭上站在胜利者面前接受审判，宁愿等待历史的正确批判。

天皇陛下万岁。死后也要做个护国之鬼，以尽最后之忠诚。

一些记者在电话前排起了长队。为了抢新闻，有的记者已经给报社传递了“东条英机自杀身亡”的快讯。为了确保新闻的“真实性”，有两名记者甚至开始翻动东条英机的身体，希望能加速他的死亡。

东条英机开始大声呻吟，咯血……



自杀的东条英机

2

东条英机自杀身亡了吗？

当然没有，不然本文到第二个小标题就要宣布结束了。

但别急，我们暂时先不说那一幕自杀的狗血事，掉过头来，先说说东条英机这个人。

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出生于日本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首席毕业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官拜中将。

沿着父亲的轨迹，东条英机开始了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到日本陆军大学的成长历程。但是，东条英机在青年时期并不出类拔萃，考了三次才考进日本陆军大学。等他毕业时，已经31岁。

1933年，49岁的东条英机才到了少将，眼看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即将过去。当时，他的学长，日本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却对东条英机的行动力大加赞赏，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

物。”

这是一句很高的评价。

但当时在日本的军队中，对东条英机不以为然的人，却大有人在。

被称为“日本第一军事家”的石原莞尔（此人主张“有限侵略”，反对全面与中国开战）认为，东条英机无德又无能。他曾说过：“东条只能保管10挺机枪，超过10挺就无能为力了。”



青年时的东条英机

当东条英机已经是陆军中将的时候，石原却当面称他为“东条上等兵”。日本陆军元老一级人物宇垣一成曾在日本战败投降后回忆：“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总理大

臣（内阁总理大臣，即日本首相）。”

1935年，几经周折的东条英机，被安排了一个第十二师团司令部的闲职——甚至没有人关心他是否上班，连办公桌都没给他安排。

但是，1935年9月，当时的陆军部人事局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当年在陆军幼年军校的同学），力荐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长官。

51岁的东条英机，从此咸鱼翻身，开始迎来自己的“巅峰之路”。

后来有人评论：“被踢出东京到关东军，对东条英机来说，就像一个人掉进阴沟却捡到一块金表一样。”



1940年10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正在向天皇行鞠躬礼

1938年5月，54岁的东条英机已经做到日本陆军次长。作为战争狂人，他在11月召开的一次军部会议上，公然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向英、美、法开战”。此言一出，连战争狂人云集

的日本军部也大吃一惊，在日本国内更是引起巨大震动，东京股票市场一泻千里。

东条英机为此被迫辞去了陆军次长的职位，但是他狂热的战争立场，已经成功引起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注意。

1940年7月，已经全面侵华并准备征服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由近卫文麿再次出山组阁。作为强硬派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被起用为陆相。

在东条英机的鼓动下，1941年7月，日本已经决定向英国和美国开战。这时，起用东条英机的近卫文麿反而畏缩了，宣布内阁总辞职。自然而然，强硬派东条英机被天皇任命为大将，奉命组阁——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机器，已经近乎失去控制地疯狂转动起来，需要一个不惜绞进其中的领头者。

组阁后的东条英机，作为首相，还身兼陆相、内相，以后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后来还向天皇要来了“参谋总长”的职位，集各种大权于一身，成为明治宪法下权力最大的一个人，甚至被人称为“幕府将军东条”。

这也是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被称为“二战”的“法西斯三巨头”的原因。

但无论是和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比，东条英机都是不相称的，看似拥有大权的他，只是一个替人打工的傀儡而已。

3

东条英机上台，注定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4年，在中国大陆陷入泥沼的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也开始被美国狠揍。在中国战场，东条英机孤注一掷地命令在华日军发动打通纵贯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8个月的搏杀，国民党军队大败，50多万正规军队被击溃，140多座城市失陷。虽然交通线被打通，但当时的日军却已经无力巩固这条线路——这场战役其实等于白打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在1944年6月开始进攻马里亚纳群岛，东条英

机规定的“绝对国防圈”崩溃在即。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日本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剖腹自杀。7月，塞班岛失守，美国的B–29轰炸机已经可以直接空袭日本本土。

绝望的东条英机，甚至去秘密拜访了已经退役的石原莞尔中将——那个一直嘲笑他的死对头。

石原莞尔甚至懒得和东条英机费话，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具备指挥战争的能力，这样下去日本会亡国的，所以请尽早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

7月18日，已经失去天皇信任的东条英机召开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递交了首相辞职书。之后，陆续辞去了所有职务。

但他欠下的账，不是辞职就能一笔勾销的。

4

从1944年塞班岛失守开始，东条英机家就开始不停接到电话：请自杀谢罪吧！

但东条英机并没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来东条英机家拜访的客人，甚至都会直言不讳地说：“天皇都已经说投降了，您也差不多该选个日子了吧？”东条英机家的电话每天都响起，响了一声，不接；再响一声，东条英机的妻子才接。打电话的人倒也毫不客气：“您丈夫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鄙视东条英机。因为东条英机在担任陆相时，曾颁布《战阵训》，要求日本军人不能被俘，必须自杀。

也有很多日本人开始拿东条英机和日本明治时期的乃木希典相比。乃木希典也是当时的日本陆军大将，指挥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虽然以日本的胜利告终，但旅顺之战，日本伤亡了6万人。在战争结束后，乃木希典和他的太太静子自杀谢罪（虽然对于他们自杀的原因有争论，但确实也有为阵亡将士谢罪的说法）。



担任日本首相时的东条英机

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乃木胜典和乃木保典也在日俄战争中先后阵亡，所以日本人至今仍把乃木希典视为“战神”（日本至今有专门祭奠他的神社）。而东条英机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上战场。有人质疑东条英机：“我的儿子死了，为何你的三个儿子还活着？”

1945年9月初，在三菱公司担任飞机工程师的东条英机次子东条辉雄回到了家里，鼓足勇气对父亲说：“父亲，就让我们一起自杀吧！”东条英机严厉制止了他，表示让他不要管这事：“日本的未来还要靠你们建设！”

不过，东条英机毕竟开始了自己的准备：他找到一名医生，让他用笔在自己胸口标记了心脏的位置。每次洗澡后，东条英机还要求妻子把被洗掉的标记重新画上。

这个圈圈被洗掉，重新涂上；洗掉，重新涂上——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东条英机一直没有自杀。

直到1945年9月11日，美国宪兵找上门来，东条英机终于下定决心，扣动了扳机。

但是，画过圈的地方，东条英机居然还打偏了。

日本女学者崛江珠喜在2006年出版的《纯爱心中》一书中写道："东条英机作为近代军人，整天带着枪，即便不常使用，但射击方法不至于忘记吧。如要自杀，手枪在口腔中发射，这是军队的常识！"

尽管东条英机后来做出的解释是：不希望头被打烂，希望能被人认出。但普通日本民众还是认为，东条英机是贪生怕死。

至于为何在心脏部位画过圈还会射偏，东条英机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胸部皮肤下垂。"

5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文章的第一段了。

在家中面对美国宪兵和记者的东条英机，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没有射中自己心脏，呻吟，咯血。

两位当时翻动东条英机身体的美国记者可能没想到，他们这样做非但没有加速东条英机的死亡，反而救了他的命——他们想加速东条英机的流血，但实际上却帮助他避免了肺部充血。

当意识到东条英机可能死不了的时候，克劳斯中校开始指挥宪兵将东条英机抬上军车，随后紧急送往横滨的美军第九十八医院抢救。东条英机因为失血过多，需要输血，一位B型血的美国士兵挺身而出，两次为他输血。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这名士兵回答："我可不能让他死了，我在新几内亚的战俘营里所受的罪还没找他算！"

东条英机可能没有想到，他处心积虑的自杀，却引来了各方面的嘲笑。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这是东条英机留下战争罪犯形

象的第一个事件，是对战争罪犯的天罚；是已经失去了信用，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耻辱。

许多日本老百姓认为，东条英机居然不敢剖腹自杀，是典型的胆小鬼。

9月12日的《纽约时报》刊文讽刺：“这个杂种连用刀自杀的胆量都没有。”

美联社在东条英机自杀当天发表的报道，名为“日本民众痛恨他，因为他居然连自杀都失败了”。

很快，日本社会以“那个笨蛋”来称呼东条英机。

6

1945年10月初，东条英机的枪伤已基本痊愈。当月7日深夜，他从医院被秘密押送到大森战俘收容所，与其他甲级战犯关押在一起。

大森战俘收容所在战时是日本关押盟军俘虏的地方，盟军战俘曾在此饱受虐待。麦克阿瑟特别嘱咐时任收容所所长的美军上校塞尔维转告东条英机：你必须“享受”盟军战俘同样的待遇，过最低限度、最简单的生活（麦克阿瑟曾试图把东条英机变成“乙级战犯”，那样就可以接受美国的单独审判）。

1945年11月，根据《生活》杂志的报道，被关押在大森战俘收容所里的东条英机已经完全落单，没有其他犯人愿意和他一起散步、下围棋、进餐甚至谈话。《纽约时报》在12月报道，“没用的东条”已经同“巧克力”“香烟”“吉普车”等词一起进入日本人有限的英语词汇中，成为日本社会最流行的英语用词。

12月底，东条英机被转移到巢鸭监狱，5个月后的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了对东条英机的漫长审判。

法庭指控日本甲级战犯犯有55条罪状，东条英机占了其中54条，每个战犯都想与他保持距离，因此在法庭上和私下都没人和他说话。

54条罪状，东条英机全部否认，他做的是“无罪辩护”。1947年12月26日，东条英机被允许做自我辩护。这一天，记者云集，举世关注。

《朝日新闻》东京审判记者团记录道：

不管怎样，这样一个战争的最高责任者、罕见的独裁者，用8000万国民的命运在愚蠢的战争中进行赌博的大赌徒的自白，举世为之瞩目，也是正常的。

东条英机的自我辩护四易其稿，长达20万字、220页，读了整整两天半。在辩护词中，他还是那些陈词滥调：日本没有发动侵略，只是帮助亚洲人民重建秩序；和英美开战是对方诱发的，日本是进行自卫战争。

当时的《朝日新闻》对他辩护的评价是：恬不知耻。



为自己做“无罪辩护”的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改完自己的辩护稿时，曾说过一句：“这下死而无憾了。”有没有遗憾，除了他自己，并没有人知道，但死的愿望，倒是被满足了。

1948年11月12日下午3点52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做了历史性的宣判：

东条英机，65岁，东京人，历任陆军大将、陆相、内相、首相、参谋总长，处绞首刑。

东条英机从同声传译耳机里听到“处绞首刑”时，咧嘴苦笑了一下，

随即卸下耳机，神色惨然地朝旁听席上扫了一眼，似是在找家属。

这次审判，除东条英机外，还有6名战犯被判处绞刑：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战犯松井石根。

宣判后，东条英机等7名死囚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的同一栋牢房里，每人独囚一室，7个单间相连。无论白天黑夜，囚室里光照强烈的电灯一直长亮，室外由一名军官带领着8名美国宪兵负责看守，军官每隔一刻钟就会亲自查看一次所有的犯人。此外，卫生官还要定时为犯人测量呼吸、脉搏和血压等，防止他们生病或自杀。一旦发现他们有病，就会立即治疗，确保他们被执行死刑。

12月21日晚，东条英机接到通知：23日执行死刑。

随后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在最后一天要吃一顿日本料理，二是要与监狱的教诲师见一面。

22日，日本料理送来之后，东条英机只吃了两口，就咽不下去了。他写了两封遗书，一封给家里，一封给世界。在给世界的那封遗书中，他依旧宣称日本发动战争是出于自卫。

12月22日夜，预定执行死刑前20分钟，东条英机及另外3名第一批处死的战犯——武藤章、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被带往监牢里特设的小佛堂听送终经。

执行前5分钟，东条英机把一串念珠和玳瑁边眼镜交给教诲师花山，托他转交家属。

随后，在美国宪兵军官的命令下，东条英机和其他3名第一批战犯一步一顿地跨上了绞刑台的十三级“死亡台阶”。上了台阶，他被喝令向监刑官站定，头部立即被罩上了黑色布套，接着，绞索套在了他的颈项上。

那时的东条英机，双腿在瑟瑟发抖。

一声号令，第一批4名战犯脚下的踏板被抽去，东条英机的身体悬空，开始抽搐。1948年12月23日0点10分30秒，东条英机被法医确认死亡。



即将被执行绞首刑的东条英机

早上8点半，被处决的战犯尸体被投入横滨久保山火葬场的熊熊大火，顷刻间化为一缕黑烟。

馒头说

东条英机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按照东条英机留下的遗书，他对子女的要求就四个字：不语一切。

长子东条英隆，曾担任伪满洲国的警察，但和东条英机关系疏远，甚至曾以姓“东条”为耻。东条英机被关押在巢鸭监狱期间，曾托人传话要长子来见面，东条英隆的回答是：“还有什么可迷恋的！”

次子东条辉雄，就是前面提到过请求和父亲一起自杀的那个儿子，后来担任过三菱集团的副总裁和三菱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每年，东条辉雄都要参拜靖国神社。1986年，板垣征四郎的后人板垣正曾做过其余13名甲级战犯后人的工作，提出是不是把先人牌位从靖国神社里移出来“分祀”，被当时的东条辉雄断然拒绝。

不过，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东条辉雄似乎慢慢改变了主意：“这不是遗属应该做出的判断。如果决定分祀，我们也不会反对。”

东条英隆的女儿，也就是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其实是东条英机后人中最激进的一位。东条英机被绞死时，东条由布子才9岁。长大后，东条由布子借环保之名，在世界各国收集“二战”日军的骸骨，并全盘继承了祖父东条英机的观点：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卫，从没有南京大屠杀等，并且认为每个日本人都应该参拜陈列了他祖父灵位的靖国神社。

2017年45岁的东条英利是东条英机的曾孙，他曾坦言，小时候自己在学校被人称为“恶魔的后代”。现在成为一名商人的他，主张日本应该放下历史包袱，找出一个和周边邻居和解的方法。不过他也曾回忆过一个自己30多岁时的片段：

当时他去爱知县“殉国七士庙”祭拜曾祖父东条英机，发现三根山那个再平常不过的小村子里，停着许多奔驰和街宣车。在登记处填写名字时，对方一看他姓“东条”，就立即把他安排到了最前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东条’这个姓氏的影响力。”

“馒头说”这个段落，一般是表达我自己主观观点的，这可能是第一次全部引用客观的叙述。

我只是想通过交代东条英机后人的生活轨迹和观点，让大家从中自己体会：日本如今对待那场战争的态度，为什么会那样暧昧和模糊？

读者评论

李李：他本身能力不出众，但是却不甘于平凡，所以用出格的话语和行事来引起众人注目。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权力，这些出位言论只会成为笑话。但是很不幸，裕仁将最高权力给予了他。所以大师说得没错，他只是一个傀儡，天皇才是最大的战犯，而且逃过审判。

诗敏：至今仍有史学家认为，东条英机并不是那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只是一个被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推向前台的傀儡。从战后日本各界对他的反应来说，东条英机确实不是最应该为那场战争负责的人。并非鄙视日本人，这个民族确实很喜欢推诿责任，比如大师之前写过的山本五十六主张偷袭美国珍珠港一事，日本全民族的那种鸵鸟心态尽显无疑。作为一名侵略者，东条英机固然该死，但作为一个日本人，东条英机却可悲地成了那场战争的祭品，并反复被日本人消费。无法从自身找到战争爆发内因的日本人，注定要为自己漠视历史的行为付出代价。

Canary：看《血战钢锯岭》的时候，逐渐开始懂为什么日本不承认它的错误。因为犯错的天皇没被处死，犯错的人的后代也一直还在权力的中心，自然要找理由开脱。那些日本士兵的口号都是“为了天皇”。

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潜伏”

对那些长期处于隐蔽战线的人来说，他们每天所遭遇的，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潜伏》。

1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

三封由武汉发来的特急加密电报，被送到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因为是周末，科长徐恩曾去上海度假了，在办公室里独自一人值班的，是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这三封特急密电的信封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这几个字——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这让钱壮飞顿时起了疑心，于是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拆开了第一封密电。

第一封密电就让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被捕并表示归顺党国，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钱壮飞

于是钱壮飞赶紧拆第二封。

第二封说："将用轮船将黎明解送南京。"

再拆第三封："军舰太慢，若有可能改用飞机押送。"

钱壮飞知道，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遭遇过的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2

黎明，一听就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实名字，叫顾顺章。

顾顺章，是当时中央特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是中共的政治保卫和情报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堪称当时整个中共党内最强的特务，他掌握着上海所有地下党的人员名单、机构地址和关系架构。

现在，顾顺章居然被捕叛变了，这意味着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机关面临被"一锅端"的巨大威胁。

但一向骄傲的顾顺章，犯了一个错误。

当时抓捕顾顺章的，是武汉当地的国民党情报负责人蔡孟坚。当时

蔡孟坚要求顾顺章吐露他所知道的情报，但顾顺章一口回绝。

为什么？因为当时顾顺章的身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了，他觉得蔡孟坚职位太低，不配！

谁配？顾顺章要求去南京，直接向蒋介石面对面说——这个天大的功劳，他不愿意给别人拿去。

所以顾顺章千叮嘱万关照蔡孟坚两件事：

第一，把我用飞机送到南京，越快越好。

第二，在我抵达南京前，千万别给南京发电报说我被捕了。

但抓到那么大一条“鱼”的蔡孟坚在狂喜之余，一条也没听顾顺章的：用船送顾顺章去南京；在顾顺章上船之后，立刻给南京拍了三封加密电报。

顾顺章为什么关照蔡孟坚不能发报给南京？因为他知道，哪怕是在南京徐恩曾的眼皮底下，都被安插了共产党的情报人员。

而这个人，就是钱壮飞。

3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省湖州一个商人家庭。

1915年，20岁的钱壮飞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还做过报社编辑，可谓多才多艺。

1925年，钱壮飞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部队欠饷，无奈又带着家人落户上海。



徐恩曾，后任中统局局长

1928年，一直在为生计烦恼的钱壮飞在报上看到了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招收学员的广告，他随即参加了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虽然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构，但因为工作性质和情报密切相关，所以很快就被当时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把徐恩曾安插了进来，担任处长。

钱壮飞沉稳、认真，又才华过人，很快就引起了当时国民党特务负责人徐恩曾的注意。再加上徐恩曾和钱壮飞是同乡，让钱壮飞办了几件事都很让人满意，所以决定调他做自己的机要秘书。

这件事事关重大，钱壮飞立刻通过渠道向共产党中央请示，周恩来

认为机会难得，要好好利用。并且，周恩来还让钱壮飞介绍了另两名同志一起考入了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李克农和胡底。

李克农经过徐恩曾的一段时间考察后，担任了上海方面特务股的股长。胡底也通过了考察，被派往天津筹办长城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并担任社长。

这三人，成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铁三角”（李克农担任负责人），周恩来因为他们三人深入龙潭虎穴，所以把他们称为“龙潭三杰”。

4

回到1931年4月25日，中共面临灭顶之灾的那一夜。

钱壮飞看到了那几封电报，知道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他立刻查阅了火车时刻表——当晚11点还有一趟宁沪特快列车，如乘这趟车，4月26日6时53分就可抵达上海。

但他不能离开南京，不然立刻会引起怀疑。



李克农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因为李克农名字里有“克农”，所以被称专门克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字雨农）

想来想去，钱壮飞赶回了家，找到了女婿刘杞夫，让他坐火车迅速赶往上海，务必在4月27日前给“舅舅”（李克农）传达一条信息：“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刘杞夫受命连夜赶往上海，但没有找到李克农。由于刘杞夫也在徐

恩曾手下任职，所以也要避嫌立刻赶回南京。无奈之下，他只能找到岳母张振华，委托她一定要找到李克农。然后赶回了南京。

李克农得到消息后也是大惊失色，因为当天不是和陈赓约定接头的日子，他只能违反单线联系的规定，找到了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再经过一系列辗转，最终消息到了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立刻做出布置：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联络暗号和接头方法全部作废。

随即，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立刻紧急撤离，所有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地下交通站全部转移。

4月28日清晨，就在顾顺章被捕叛变后的第三天，一场全城大搜捕在上海展开，大批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冲入了几十处中共中央的地下机关。不少屋子里连发报机的天线都还没来得及拆除，焚烧文件的火盆还在冒着青烟，但都是空无一人。

顾顺章抵达南京后，得知蔡孟坚还是发了电报，猛地一拍大腿："唉！抓不到周恩来了！"

但何止是周恩来？经钱壮飞的通报，在第一时间转移走的中共领导人除了周恩来，还有瞿秋白、邓小平、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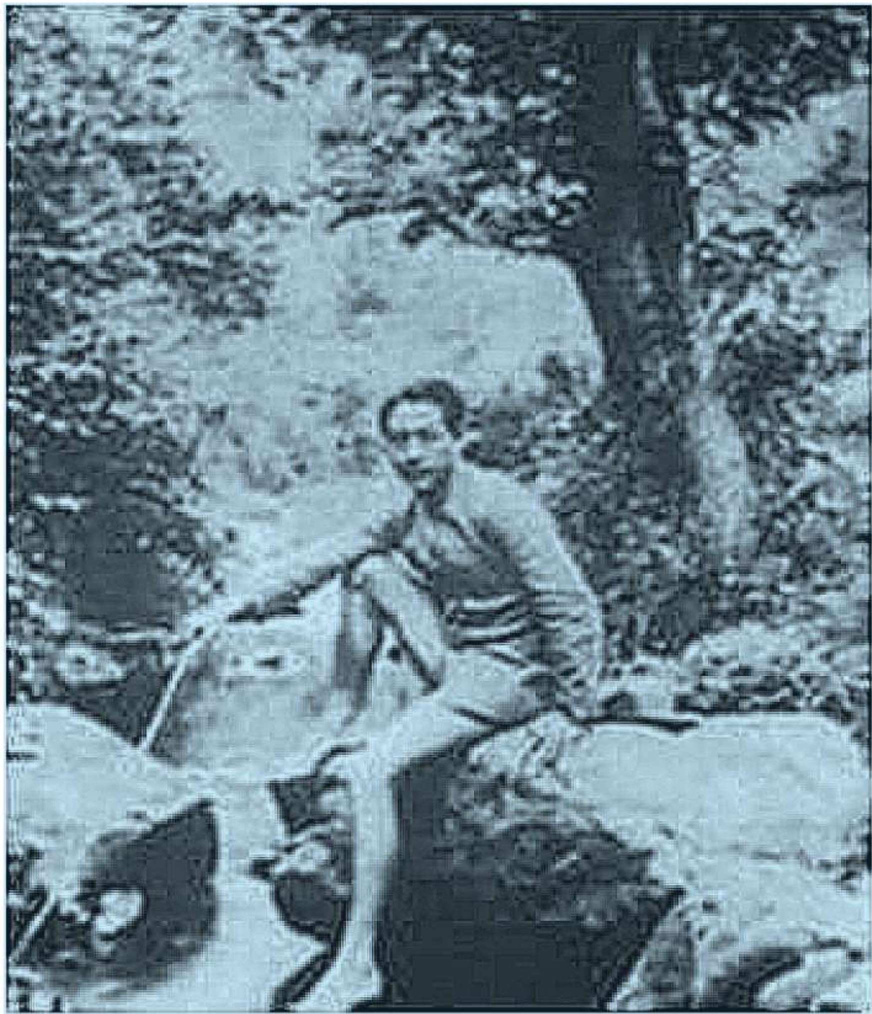
可以说，没有钱壮飞的话，中共的历史，将就此改写。

5

那么钱壮飞自己呢？

在译出三封电报后，钱壮飞又收到了三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其中有一封专门关照，不要告诉任何身边的人。

钱壮飞知道自己肯定暴露了（从钱壮飞后人的回忆叙述看，顾顺章知道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但因为钱壮飞当时是和李克农—陈赓—周恩来这条线单线联系，所以他未必知道就是钱壮飞）。



胡底，“龙潭三杰”之一。1935年长征途中，被张国焘下令杀害

随后，钱壮飞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钱壮飞立刻给“长城通讯社”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潮病重速返。”钱壮飞曾用过一个化名，叫作“钱潮”。胡底一收到电报，就知道出了大变故，立刻就转移了。

第二件事，钱壮飞一大早亲自驾车，去火车站接到了坐七点二十分的列车从上海抵达南京的徐恩曾，然后送他回到办公室。

第三件事，在办公室，钱壮飞告诉徐恩曾，武汉方面来了6封特急绝密电报，然后当着徐恩曾的面，不慌不忙地把六封电报都译了出来，

然后还嘟囔了一句：“电报里说我们这里有共产党！”由于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徐恩曾认为是别的派系栽赃，所以不信。

第四件事，当时陈立夫给徐恩曾打电话，要他去中央党部开会。钱壮飞立刻坐下来，给徐恩曾写了一封信。

第五件事，写完信后，钱壮飞立刻搭乘上了上午10点开往上海的火车。当徐恩曾发现情况有异，派人立刻前往上海北火车站堵截钱壮飞的时候，他早已在上海郊区的真如站下车了。

无奈之下，徐恩曾只能抓捕了钱壮飞的女儿钱椒和女婿刘杞夫。但这一点，钱壮飞早就料到了——他做的第四件事，就是给徐恩曾写了这样一封信：“可均[1]先生大鉴：行色匆匆，未及面辞，尚祈见谅。政见之争，希勿罹及子女。不然，先生之秽行，一旦披露报端，悔之晚矣！”

徐恩曾不仅私生活糜烂，还贪污了大量公款，并参与投机倒把，再加上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想要“整”他的人其实一大堆。如果钱壮飞公布证据，徐恩曾很可能就将结束政治生涯。

更何况，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居然是共产党的大卧底，这个“失察”的罪名怎么承担？

思前想后，徐恩曾只能将此事汇报给了上司陈立夫。陈立夫一算，徐恩曾一倒，很可能也会牵连自己，想来想去，最终默许了徐恩曾将此事瞒报。

三个月后，徐恩曾释放了钱壮飞的家人。

问题是，还有一本密码本。

徐恩曾非常信任钱壮飞，什么文件都是让他先过目的。但唯独有一本与政府高级官员互相通报的密码本，一直是随身携带。

为了获得这个密码本，钱壮飞多次“规劝”徐恩曾：外出不宜携带密码本，以免丢失。徐恩曾觉得有理，外出时就将密码本亲自藏在办公室机要保险柜内。钱壮飞就利用机会打开保险柜，拍摄密码本的照片，并迅速交给李克农。



陈立夫，他创立了中统

破译了密码之后，红军的第一和第二次反围剿，钱壮飞都事先翻译好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告诉红军，让红军处处先走一步。

钱壮飞撤离后，徐恩曾既然隐瞒了自己机要秘书是共产党这件事，自然也不敢擅自更改密码本，怕被追问起来暴露。结果，国民党很长一

段时间都没有更改密码，直到长征时，红军还能继续通过对敌无线电侦听了解敌情。

可以说，钱壮飞虽然撤离了，但他所做的工作，一直到红军长征时还在发挥作用。

但是，他自己没有捱过长征。

6

钱壮飞撤离后，奉命进入了中央苏区。

之后，他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等，仍负责情侦工作。1934年10月，他参加了长征，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了贵州省黔西县第七区（现属金沙县），随后，红军的部队遭到了国民党轰炸机的轰炸。在轰炸过程中，钱壮飞失踪，周恩来派部队专门再折回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最终只能判定为牺牲。

根据钱壮飞的儿子钱江回忆，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春天，周恩来来到钱家，和钱壮飞的遗孀张振华等一家9口人吃饭。

周恩来说了一句：“我没照顾好钱壮飞……没有他，我们这些人现在早就不存在了……”

关于钱壮飞牺牲的时间、地点和原因，后人一直有多种说法：

时间在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之间，牺牲的原因有飞机轰炸，掉队后被当地地主武装“谋财”后灭口等。因为钱壮飞长期处于隐蔽战线，红军里认识他的人不多，所以当时金沙县和息烽县都有人根据当时老百姓立的红军墓，认为当时长眠于此的就是钱壮飞。

最终，在2002年4月，金沙县后山乡作为钱壮飞牺牲地成了定论，后山乡因此修了一条20公里长的出山公路，然后国家有关部门拨专款兴建了钱壮飞烈士陵园及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室。

在2005年至2007年两年间，前往参观钱壮飞烈士陵园的参观人数

就达到了20余万。

馒头说

说实话，这篇文章本来是想把“龙潭三杰”“后龙潭三杰”“台湾三杰”的故事，一口气都写完的。

没想到，只写了钱壮飞，就耗去了大量的篇幅，后面其他人的故事，只能等以后有机会慢慢写了。

不少人其实很纳闷，解放战争开打，蒋介石手握一把好牌，最后为什么稀里糊涂地就这样输了呢？抛开战场决胜和背后经济等重要因素，通过后来解密的档案，我们可以看到一份令人咂舌的名单：

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头子的机要秘书，到集团军总司令的贴身秘书，从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参谋，到绥靖区的副司令，从少校到中将，从科长到处长，各个级别都有，统统都是共产党的“卧底”。别说一个徐恩曾，胡宗南、白崇禧、傅作义、卫立煌……他们的亲信随从人员，都有共产党潜伏的情报人员——这一仗，如何不输？

那么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又来了：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批共产党的隐蔽战线特工，投身于当时明显弱小得多的共产党，冒着随时随地会被严刑拷打乃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坚持在龙潭虎穴里潜伏的？

我想了想，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信仰。

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正参与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一项能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幸福，国家繁荣富强的伟大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们个人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中共一大会址，每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在出口处，有一本留言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参观的游客（很多都是中共党员）的留言——绝大多数都是有感而发，而很多留言都会表达一个意思：肩负使命，勿忘初心！

无论你承认与否，我们确实处在一条前进的道路上，通向当初钱壮飞们希望看到的那个新世界。但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做出了太多

足以让先辈们欣慰的成果，但同时——也必须要承认，有一些人已经完全偏离了当初的轨道，甚至行进在相反的方向。

这不是当初钱壮飞们抛头颅、洒热血所希望换来的结果。

行文至此，点到为止。

衷心希望，我们能勿忘初心！

收笔。

读者评论

飯er：之前看顾顺章的时候就对这个钱壮飞很感兴趣。当时感叹造化弄人，顾顺章背叛党的消息恰好被卧底知道。但细心一想。很多事情都是慢慢累积起来的。在与国民党周旋的过程当中牺牲了多少人才造就那一次地下转移。很多人看野史说红军这般，国民党军那般，我却认为，如果没有那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根本不可能扭转局势乃至获得最后的胜利。事，终在人为。

小汤圆&小丸子：一大早看得好感动！特别是看到周总理说“没有他，我们这些人早就没了……”现世的安稳，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啊！昨天还看到一篇外国人说中国是现在最安全的国家！好傲娇！这就是周总理那个时期的人所愿的吧！

张思思：每次看到结尾英雄不得善终的时候，都希望他们能和电影里一样，多年后在一个小村庄出现，看着夕阳，抹抹汗水，偶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这时候在干什么。

江江：我始终相信，他们付之以生命的理想，是值得我们格外珍惜的。所以，即便是人群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但我们每天为生活所付出的努力，都在推动和改变这个世界的一点点，为了更靠近先辈们的理想。这是我理解的，能量和爱。

沧海一粟：馒头君，“台湾三杰”是不是朱枫、吴石、陈宝仓。有机会写写这篇文章给我们拜读一下啊！（作者回复：是的。）

---

[1] “可均”为徐恩曾的字。

孙殿英的“盗墓笔记”

我其实很不喜欢名片上印很多头衔的人，尤其是还有些人会弄出个三折页名片。

其实在你那么多头衔里，人们真正会记住的，最多也就是一两个而已。

记住你的哪个头衔，取决于你做过哪件事，就像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1

乔治R.R.马丁的《冰与火之歌》书中（或《权力的游戏》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些人名字前的头衔特别长。

比如龙母，每次她出场前，都需要报一长串头衔：“风暴中降生的丹尼莉丝、不焚者、弥林的女王、安达尔人、洛伊拿人以及先民的女王、七国统治者暨全境守护者、多斯拉克海的卡丽熙、奴隶解放者、龙之母……”

没有一定的肺活量，还真的别尝试完整介绍她。

而在民国的那段历史里，其实很多人的名字前都有很多头衔，比如蒋介石，“总司令”“委员长”“主席”等头衔也是一大堆，不过这些头衔都是一脉相承的。



孙殿英

在那个年代，恐怕未必有一个人的头衔有孙殿英那么多，那么杂。他分属过那么多的势力，头衔来回切换，让人目不暇接：

第五师师长（张宗昌给的）、第十二军军长（国民党给的）、第十四师师长（张学良给的）、察北保安司令（宋哲元给的）、安徽省主席（阎锡山给的）、新五军军长（蒋介石给的，抗日战争时期）、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汪精卫给的，伪军）、新编第四路军军长（蒋介石给

的，解放战争时期）。

但“经历丰富”的孙殿英有那么多的头衔，都不如一个头衔给人印象深刻。而这个头衔，对孙殿英的一生起到了盖棺论定的作用：

盗墓者。

2

时间直接定格到1928年。

那一年，孙殿英宣誓效忠的，是直鲁联军的军阀张宗昌。那一年的5月，在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军的打击下，直鲁联军全线溃败。孙殿英带着部队退到蓟县和遵化一带，再也扛不下去了，于是就投降了蒋介石。

军阀混战时期，只要你有人有枪，就有了自保的本钱——因为大家都需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吃败仗没关系，自然会有人把你收编。

蒋介石也不例外，他收编了孙殿英的部队，并给了他一个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头衔。

1928年6月，负责剿匪的孙殿英率领部队驻扎在了蓟县的马伸桥附近，这个地方四周没什么特别之处，就是离一个地方很近——清朝的东陵。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西北约30公里的地方，占地80平方千米。这座陵园从清朝顺治皇帝时开始修建，一共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嫔妃、3位阿哥、两位公主，一共161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墓建筑群。

这时候，孙殿英得到了一个消息：附近一支原来被奉军收编的土匪队伍，在一个叫马福田的人的带领下，准备进东陵盗墓。

堂堂清朝皇家陵墓，居然没人守卫？

其实原来是有的。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大臣，还有八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但随着局势一年乱过一年，清室对自己老祖宗陵墓的掌控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到1928年时，整个护陵的体系，从行

政人员到军队，都已经名存实亡。一些盗陵和倒卖财物的行为，也是时有发生。

几乎无人看护的东陵，让马福田这支土匪队伍动了贪念。

但马福田没想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孙殿英其实早就对东陵有想法了，而马福田正好给了他一个机会。

得知马福田企图盗墓的消息之后，孙殿英当即派出了一个团，轻而易举地击溃了马福田的土匪队伍。然后孙殿英乘势宣布东陵三十里范围内戒严，以军事演习为名，赶走了所有残存的守陵人员，全面封锁东陵。

孙殿英虽然也是土匪出身，但他毕竟一路混过来，经验非一般土匪能比。这时候，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他派自己的师长谭温江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北平。去北平有两个目的：一是拜会自己的上司——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先探探风头，毕竟封锁东陵，外面已经开始有人议论了——打探下来，风平浪静；二是拜访了一些大清遗老和当年的太监，打探清朝的一些丧葬礼制，以及东陵的构造。

第二件事，他通知了遵化县的知事，说他的部队不会就地筹粮、侵扰百姓，而是会到其他地方去运粮，所以请遵化县准备30辆骡马车。

第三件事，他经过周密地盘查之后，决定向两座陵墓动手：一座是慈禧太后的陵墓——老佛爷喜欢各种奢侈的物件，肯定不会空手而归；一座是乾隆皇帝的陵墓——他是大清鼎盛时期的皇帝，陪葬宝物肯定多。

三件事做完，孙殿英等到天黑，就开始动手了。

4

这可能是史上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次“倒斗”（盗墓）。

不用看风水，不用罗盘，不用洛阳铲，只要用一样东西：炸药。

冷兵器时代的所谓浇筑钢筋的“金刚墙”和地宫每扇重达3吨的汉白玉石门，在现代炸药面前，其实是不堪一击的。拿着枪的士兵们，在贪婪欲望的驱动下，根本不需要带什么“黑驴蹄子”，也不顾及会有什么“粽子”，炸药开路，勇往直前。

孙殿英首先进入的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慈禧把持大清朝政40余年，本人在晚年又喜好奢华，陪葬的宝物自然众多。

清朝内务府的《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曾详细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总共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慈禧下葬的地宫

在慈禧死后，按照慈禧宠幸的内廷大总管李莲英口述、其侄子李成武记录的《爱月轩笔记》记载，她的陪葬更是穷极奢华，光是填满她棺材的宝物，就价值200多万两白银。当然，关于《爱月轩笔记》的真假一直有争议，但不管怎么说，一代太后的陵墓，是肯定不会让孙殿英失望的。

根据孙殿英回忆，打开（其实是用斧子野蛮劈开）慈禧的棺木后，他们发现慈禧虽然死了近20年，但尸身不腐，因为她口中含着一颗巨大的夜明珠（关于夜明珠的说法，存疑）。而这颗无价之宝，也成了慈禧的“灾星”——士兵直接扒开她的嘴巴，割开她的喉管，取出了夜明珠。而慈禧尸体上的珠宝，更是被一抢而光。

盗完了慈禧墓，孙殿英还不过瘾，还要盗乾隆墓。

进乾隆裕陵，依旧没有费什么大周折，只是乾隆墓的汉白玉石门有四道，比慈禧墓还多了两道——有炸药，怕什么？

根据孙殿英事后的回忆：“乾隆的墓堂皇极了，棺材内乾隆尸体已化，只留下头发辫子。陪葬宝物不少，其中最宝贵的是颈上的一串朝珠，一百零八颗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色，一柄九龙宝剑，剑鞘面上嵌了九条龙，剑柄上嵌满了宝珠……”



慈禧陵墓被盗后的惨状



被孙殿英破坏的棺木

炸了两座陵，盗了两座墓，孙殿英得到了无数的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画、书签、宝剑。当时他命令谁都不准私藏宝物，集中后统一分配。但面对琳琅满目的宝物，谁又能忍得住？

长官带头抢，士兵悄悄藏，每个进入墓穴的人，都不想空手而归。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外人还未必会那么快知道这次盗墓。

5

1928年8月4日，就在孙殿英盗墓后的一个月，青岛警察厅侦探队抓住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在青岛的大港码头被抓获的。他们是孙殿英部队的三个逃兵，三个参与盗墓的逃兵。

在这三个逃兵身上，青岛警察查出了他们携带的36颗宝珠。据逃兵交代，其实之前他们还在天津卖掉了10颗宝珠，获利1200元（按当时的柴米油盐购买力计算，一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5元）。

这46颗宝珠，是他们三人在慈禧地宫的地上捡到的。

三个士兵就能捡到46颗宝珠，可想而知他们的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孙殿英，拿到了多少宝物。

10天后，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了35箱企图运往法国的文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东陵）。同时，在遵化，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被查出企图运走24尊铜质佛像，以及乾隆用的拓印条幅10块。

在北平，被孙殿英派来销赃的师长谭温江等人，直接被北平卫戍司令部截获。



当时溥仪手绘的《杀孙殿英图》

一路追查，孙殿英盗墓案事发。

东陵大盗，天下哗然。

最受伤的，当然是大清皇室。当时的旗人团体，包括已经居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末代皇帝溥仪，直接找到了蒋介石，要求一定要严惩孙殿英！

这时候的孙殿英却不慌不忙。因为他的上司徐源泉早就已经点拨过他：外面传你这次盗了价值几万万元的宝物，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按照孙殿英后来自己的供述，一场波及面极广的行贿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乾隆墓里一柄镶嵌九条金龙的“九龙宝剑”，孙殿英送给了蒋介石。另外一把宝剑，送给了何应钦。

乾隆脖子上那串108颗的朝珠，其中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送给了戴笠。



慈禧的枕头，一个西瓜碧玺，送给了宋子文。

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夜明珠，据说送给了宋美龄。

两串慈禧朝鞋上的宝珠，送给了宋霭龄和孔祥熙，外带一棵翡翠白菜和若干珍珠。

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此外，徐源泉又上交了一批查封的东陵文物，其中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当然，徐源泉本人也没少拿孙殿英的东西。

1928年12月，审判“东陵盗墓案”的军事法庭终于在各方催促下开庭，审判长是商震将军——当时，他已收了孙殿英送给他的一只青皮黄瓤翡翠甜瓜。

这个案子从1928年12月开审，一直审到1929年6月8日。被指控的谭温江（孙殿英的师长）始终不承认盗墓一事，而孙殿英更是一直都表示“不知情”，根本就没有被逮捕。6月15日，军事法庭决定将此案件呈报中央，等候中央回复。

而那个时候，孙殿英已经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编独立旅第二旅旅长，讨伐自己的“旧东家”张宗昌去了。之后，因为孙殿英手下的人马不断扩大，深得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器重，阎锡山更是让孙殿英当了安徽省主席。孙殿英索性就和阎锡山交涉，关在狱中等待审判的谭温江也被释放。

“东陵盗墓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6

盗墓的故事结束之后，我知道大家都还想知道两个“下落”。

一个是那些宝物最终的下落。

按照孙殿英自己的供述，当时他一人就分到了11箱宝物。这11箱宝

物中，一批被他用来行贿打点了，一批被他送到上海销赃了（还被黄金荣黑了一道），一批被送到天津销赃了，一批被他用来购买军火武装自己的队伍了，一批在被解放军俘虏时缴获了。

但总的数目，还是对不起来。

其中一个去向，他无疑是送给了自己当时的上司徐源泉，不然徐源泉不可能这样为他说话。而徐源泉随蒋介石去台湾时，据说把不能带走的珍宝都埋在了自己在武汉的徐公馆地下。

1994年，武汉相关单位在维修徐公馆（市级民国建筑重点保护单位）时，在徐家后花园的一个墙角掘出了一个地洞，由于事关重大，上级部门没有批准“探宝”，洞口被回填。2005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还曾去探访过，但最后也没有了下文。有学者认为，徐家那个洞只是民国年间常见的家庭防空洞而已。

至于剩下的宝物究竟去哪儿了，现在依旧成谜。

另一个下落，则是孙殿英本人的结局。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孙殿英在之后的十几年，身份不断变化：先是被蒋介石收编，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然后又被蒋介石承认是“曲线救国”，再次将其收编后专门对付共产党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孙殿英被俘虏了。

因为在抗日战争中的热河战场上，孙殿英的四十一军确实和日本人狠狠打过一仗，表现得还算有骨气，也因为孙殿英在河北与日军作战时，和八路军相处还不错（其实他当时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人），所以解放军在俘虏孙殿英后，对他相当宽待，还允许他带一名卫士照顾他的生活。

在狱中，孙殿英情绪时常反复，一会儿说解放军好，一会儿又企图越狱。由于长期吸食鸦片，得了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的“烟后痢”，最终在1947年秋天病重而死。

尽管孙殿英生前曾为自己辩解：我盗清朝皇帝的墓是为了替汉人报仇！尽管也没人当面去质问他：你替汉人报仇，怎么把财宝都塞进了自己腰包？反正他死后，要么没人知道他，要么知道他的人，不会说他曾

担任过什么军长、师长或主席，而只会出奇一致地说一句话：

哦！那个盗墓的。

馒头说

1889年，夺得当时中国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宣布归政于光绪，准备开始享受晚年生活。

也就是在那一年，54岁的慈禧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河南出生的一个叫孙殿英的婴儿，今后会和她的身后命运产生交集。

据说，慈禧墓被孙殿英盗掘的时候，她的尸体被直接扔弃在了地上，以致后来后人想将她重新入棺之时，发现尸体已经长了白毛。

更不要说那生前享受万千赞誉的乾隆皇帝了。

再怎么叱咤风云，再怎么富贵荣华，管得了身前事，算不准身后灾。

所以还是应了曹丕说的那句话：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

读者评论

Lillian：在欧洲生活几年时间里，走遍了大大小小的与中国文物有关的博物馆。法国的枫丹白露宫，最近几年藏起了很多宝贝不再外展，里面有当年火烧圆明园前，被法国军队狂抢的大批珍宝。巴黎集美博物馆里也是很不得了，里面件件都可以说是精品（乾隆玉玺、《清宫狩猎图》，还有好几件都像东陵被盗出的）。当年在集美真的看到哭，伤心的眼泪止不住，这么完整的陈列，国内博物馆都不多见。大英博物馆里就不用说了，英法民间有很多私人性质的博物馆也是卧虎藏龙。日内瓦鲍尔博物馆（内有明成化鸡缸杯、鼻烟壶、酒杯）。苏黎世的Museum Rietberg里的部分官窑瓷器等，还有丹麦、瑞典，整个欧洲好好翻一遍，都不知道多少宝贝了。美国也是流失文物的重要流散区，之前走访的大都会、华盛顿等很多文物数不清。明年等我家娃满周岁，下一个目的地就是日本和俄罗斯，对照敦煌遗失经卷去推测，这两地民间和馆藏应该也是很可观的。另：其实欧洲除了少数的汉学家，当年很多人根本不懂中国文物，日本商人和日本“中国通”当年在走私文物的角色里，应该记上一笔。

老妖：古龙说，一个人的名字也许会错，但外号绝对不会错。

Fighter：孙殿英贿赂别人的那段，出自军统文强的口中。孙本人爱吹牛，当时也是为了给自己脱身，真实性有待确认。溥仪的确因为盗墓事件对民国很失望。孙殿英能在各方势力之间游刃有余，的确有手段，小人里的大人物。（作者回复：其实此文里有一条小暗线：孙殿英其实可以牺牲掉自己的师长，但他始终没放弃，最后还把他救出来了。这人有江湖义气，或可解释为什么一直有人马跟着他。）

一张照片引发的自杀

这是关于一个人在34岁的年纪，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故事。

起因，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这个人，叫凯文·卡特。

如果不是因为一张照片，他可能一辈子也就是一个出生在南非、默默无闻的自由摄影记者而已。

但很可能，他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



凯文·卡特

这事情，要从1993年说起。

1993年，战乱纷繁的苏丹同时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凯文和几个同伴一起到苏丹采访，希望能够拍摄几组照片。

一天，他在一个食品救济中心附近，看到了一个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因为无力再走，她趴到了地上，奄奄一息。而就在不远处，蹲着一只硕大的秃鹫，贪婪地盯着这个小女孩，仿佛在等待一场即

将到口的美餐。

这个时候，凯文选择了按下快门。

于是，那张著名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凯文·卡特《饥饿的苏丹》

单纯从摄影的角度来看，这张照片的构图、光线等元素都不是最佳，但从新闻摄影的角度来看，这张照片传递给人的冲击力是惊人的。

1993年3月2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这张照片，随后被国际媒体竞相转载，轰动一时：女孩的孱弱，秃鹫的威胁，想象中即将发生的残酷一幕……这些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1994年5月，凯文·卡特的这张被命名为《饥饿的苏丹》的照片，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

于是，麻烦就开始来了。

就在普利策颁奖之后不久，一家日本电视机构驻美记者打电话给约翰·卡普兰——评奖的评委之一——进行采访。采访中，记者转述了佛罗里达一位专栏作家针对这张照片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

约翰·卡普兰当时就表示，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评论。他对记者回忆，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以提示评委：

这个小女孩不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后来证明就在救济中心附近）。

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后来证明女孩的妈妈就在旁边）。

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已受到人道保护。

卡普兰表示，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信任这个摄影师——如果这个小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

但是，不幸的是，当这个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约翰·卡普兰的陈述被切掉了。或许这也符合节目制作人的本意——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猛烈抨击。

从那时起，人们的关注度开始由非洲的饥荒转向批评凯文·卡特的见死不救。

据凯文的朋友们回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凯文·卡特开始公开地谈论一件事：自杀。

当然，促成他精神焦虑的还有其他一些事：他的一个非常要好的伙伴，在另一次采访中被枪杀了；他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为此不得不去莫桑比克采访，但他居然又把采访完还没冲洗的胶卷给弄丢了——但人们相信，带给他最大压力的，还是《饥饿的苏丹》这张照片。

时间到了1994年7月27日。

这一天，离普利策奖的颁奖，只过去了两个月。

晚上7点，凯文开着他自己的车，来到一条河边。在那里，他留下了童年的美好回忆，也用汽车尾气完成了自杀。

此后，警察在他的汽车里找到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

“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如果不是因为凯文·卡特的自杀，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否会像现在那么有名。

事实上，在那天的拍摄现场，凯文拍完照片后，就去赶走了那只秃鹫。然后，他点起了一支烟，坐在旁边的树下，开始不停地哭泣。

不管这张照片被指责成什么样的目的，但凯文至少去了苏丹，拍下了这张照片，让人记住了苏丹的饥饿和非洲的贫困。

而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他的人们，又有多少人真正做了些什么呢？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究竟过时了吗？

毫无疑问，这位作家很难跻身史上最伟大作家的行列，但在科幻小说界，他却享有“科幻小说之父”的荣誉。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从小就受到了他的巨大影响。

1

时间回到190年前（1828年）的2月8日。

在法国城市南特的费多岛，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皮埃尔·凡尔纳，迎来了自己儿子的诞生。

他给儿子起名为儒勒·凡尔纳。



儒勒·凡尔纳

南特是法国的重要港口城市（玩过《大航海时代》系列的都知

道），而凡尔纳的母亲阿洛特来自一个航海世家，她的很多亲戚不是船长，就是航海家。



《大航海时代OL》中的地图，左下角即为南特

在幼年时，父亲把凡尔纳送到一个叫桑班夫人的寡妇所办的学堂里学习。桑班夫人的丈夫是一名船长，在一次航海中再也没有回来。桑班夫人总是对她的学生说，她的丈夫在海上漂流，终有一天会回来的（这个想法一直影响着凡尔纳的作品，比如《神秘岛》）。

这样的成长环境，无疑对童年的凡尔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很多男孩子年少时的梦想一样，凡尔纳渴望冒险，渴望远航，渴望探寻一切未知的事物。

不过，在港口生活的凡尔纳，相比那些生活在内陆的孩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也让他做出了其他男孩子不敢做的事：

在他11岁那年，小凡尔纳背着家人，居然溜上了一艘开往印度的大船，因为他想给他的表妹找到一条印度群岛的珊瑚项链，顺带环游世界。这个理想很快被凡尔纳的父亲“扼杀”——这位机智的律师在下一个港口追上了这艘船，把凡尔纳从船上给抓了下来。



当年南特港的风光

这个说法出现在凡尔纳的第一部传记中，被认为有夸大的成分。但如果属实，凡尔纳迷们或许应该感谢那位律师父亲，因为如果他没有带回他的儿子，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多一个出色的水手甚至船长，但也很可能就少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科幻作品。

被抓回来的凡尔纳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只能流着泪保证，今后只会躺在床上做“幻想中的旅行”。事实上，他之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弟弟保罗一起，“驾驶”着一艘经常漏水的小艇，在家附近的卢瓦尔河上“探险”。

凡尔纳还有一件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父亲度假别墅附近的一家机器工厂，看那些机器是怎样运转的，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种种迹象表明，凡尔纳将沿着这条轨迹，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科幻作家，不是吗？

并不是。

2

1847年，19岁的凡尔纳高中毕业后，来到了大都会——巴黎。

到了弥漫着浪漫和文学气息的法国首都，凡尔纳是不是准备投身于文学创作中去呢？不是的，他是带着父亲的殷殷期望，来此攻读法律学位，将来要成为一名律师的。

但是，巴黎的文学气息毕竟还是感染了充满想象力和诗情画意的凡尔纳，所以他表面上是在应付父亲的学业要求，实际上已经立志要改行成为一名——科幻作家？还是不对，他想成为一名剧作家。

在巴黎，凡尔纳遭遇了一场邂逅。

有一次，凡尔纳从巴黎的一场晚会早退，下楼时他突发奇想地沿着楼梯扶手滑了下去，不料正好撞到一位胖胖的男子身上。凡尔纳立刻道歉，由于感到很尴尬，便随口问了一句："您吃饭了吗？"

那名男子说："我刚吃过南特炒鸡蛋。"

这个回答让凡尔纳相当不满："巴黎根本就没有正宗的南特炒鸡蛋！因为我就是南特人，而且这是我的拿手菜！"



大仲马

那名胖胖的男子面露喜色，随即邀请他到自己家里专门做一次南特炒鸡蛋。凡尔纳这才知道，这个男子的名字叫大仲马。

这段典故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不过凡尔纳和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私交不错，这倒是有案可查，后者对凡尔纳的文学创作和戏剧创作都提供过不少帮助和建议。

1850年，凡尔纳创作的戏剧《折断的麦秆》（一说是和大仲马合作）首次上演，这标志着凡尔纳已经准备正式放弃自己父亲的期待——延续家族的法律事业，而是投身文学和戏剧创作的怀抱。

但是，凡尔纳在巴黎的生活费依旧是需要父亲供给的，所以他用写诗的方式向父亲索取生活费，而父亲也用诗歌的形式写了回信，大意如下："汝之诗文令人欣赏，若不花我六十法郎，诗文将会更加漂亮！"

3

1857年，29岁的凡尔纳结婚了。

新娘是他有一次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时认识的一位女子，她是新娘的姐姐，同时也是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名叫奥诺丽娜·德维亚恩。

结婚后，为了改善经济状况，凡尔纳做了证券交易员（还真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呀），但同时也没有放弃剧本的创作，而且开始尝试写小说。

在发表了几篇默默无闻的小说之后，从1860年开始，32岁的凡尔纳就很少去沙龙活动了，也很少去证券交易所，而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开始专心创作小说。关于那部小说，他对妻子说是"和气球有关"。



青年凡尔纳

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于是又产生了。

凡尔纳将那部小说一连投了16家出版社，都没有人愿意出版。一气之下，他将这部小说的手稿投进了火炉，而妻子奥诺丽娜赶紧将手稿抢救了出来，并鼓励他再去找第17家出版社，最终获得了成功。

这个关于“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女人”的故事，到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另外一个故事确实有案可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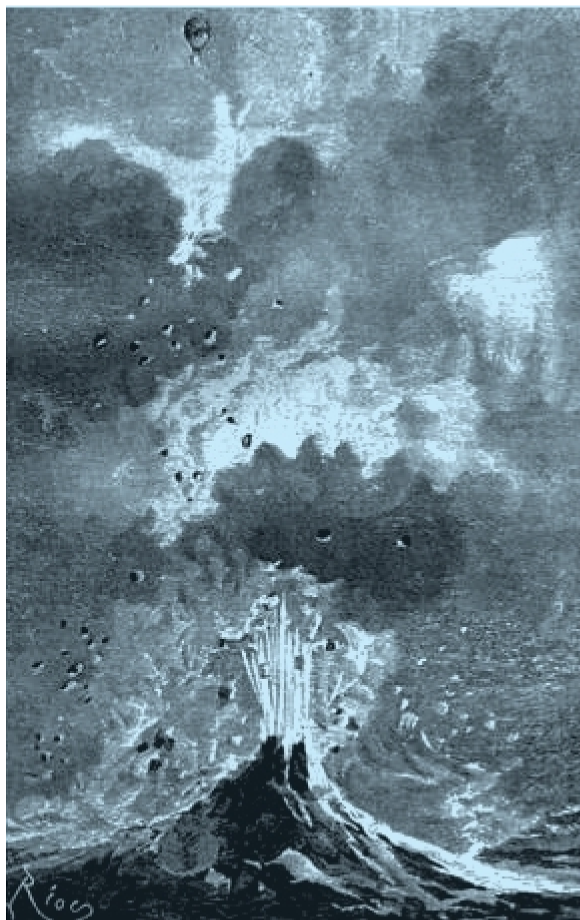


《气球上的五星期》原版封面。这部作品早在1903年便被译介到中国。是年4月27日和5月27日的《江苏》杂志第1、2期上刊载了佚名译的《空中旅行记》

凡尔纳将这部手稿拿给了大仲马，大仲马看了后，觉得很有意思，并为他引见了一位和他同名的巴黎出版商，叫作儒勒·赫泽尔。赫泽尔出版过雨果等大家的作品，眼光卓越，经验丰富。

于是，凡尔纳将那部自己取名叫《空中旅行记》的小说手稿交给了赫泽尔。这部讲述英国弗格森博士乘坐气球在非洲大陆上旅行的小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其中一点让老道的赫泽尔眼前一亮——书中有大量科学知识的描写，配合探险的情节，这是其他类似小说所没有的。

赫泽尔随后给凡尔纳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凡尔纳都虚心接受。1863年初，这部小说终于公开发行，书名也被赫泽尔改了，叫作《气球上的五星期》。



原版《地心游记》的插图。1903年12月8日，这篇小说在《浙江潮》第10期连载刊登，译者就是鲁迅。鲁迅的这个版本也是目前已知《地心游记》的最早中译本

《气球上的五星期》推出后大获成功，凡尔纳对非洲大陆风貌的生动描写，以及对氢气球科学原理的内行分析，让不少读者耳目一新。

首次合作成功后，赫泽尔就和凡尔纳签订了一份合约——每个月，赫泽尔都会给凡尔纳支付一笔固定的薪酬，而凡尔纳要做的，就是一年完成出版两部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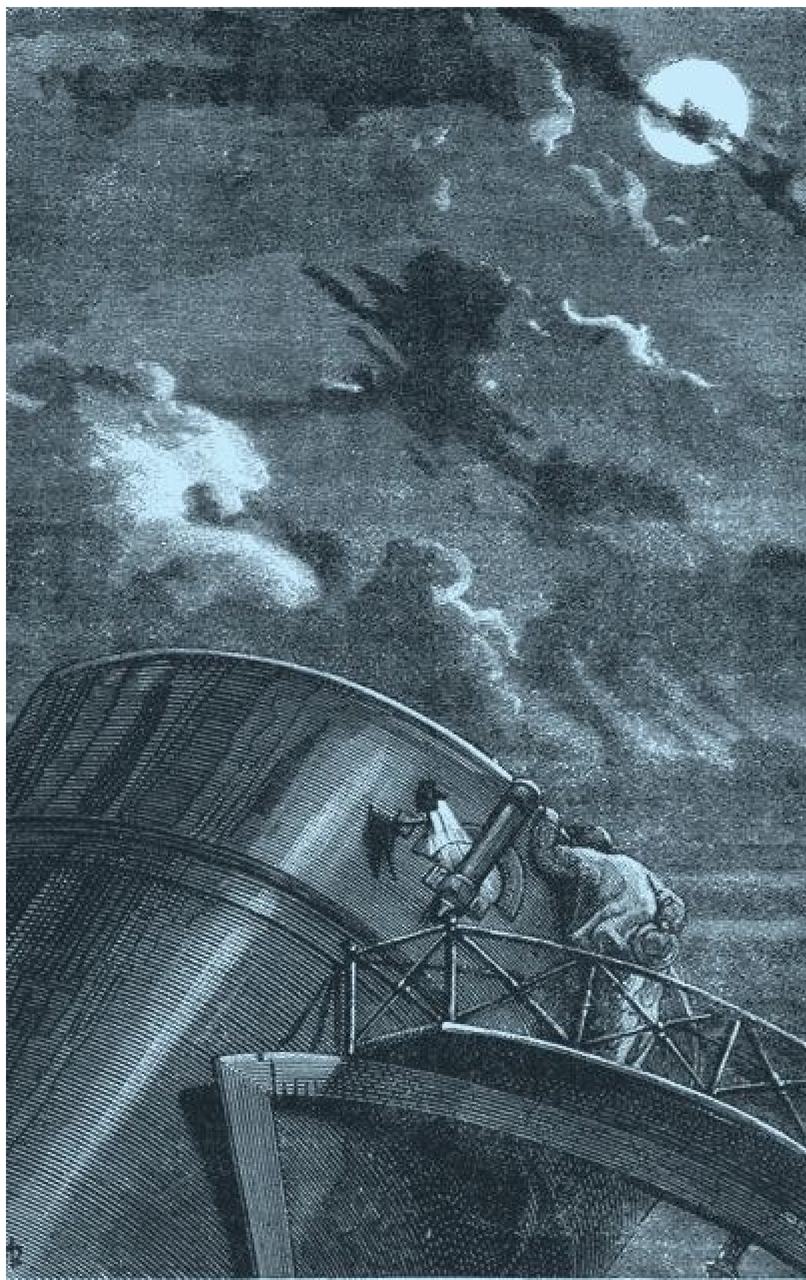
赫泽尔准备将凡尔纳的小说归纳成一个系列，叫作“奇异的旅行”。

凡尔纳于是就沿着这个路子开始了创作。1864年，他这类题材的第二部小说出版了，名字叫作《地心游记》（之间还有一部作品叫《二十世纪的巴黎》，被赫泽尔毙了）。

这部小说把读者从地球表面直接带入了地球内部，讲述了一位叫黎登布洛克的教授，带着自己的侄子和一名向导，从冰岛的斯奈菲尔火山口进入地球内部完成探险的故事。凡尔纳表现出的想象力和严谨的科学考证态度让人惊叹。这部小说后来被多次改编为电影。

从这部小说开始，凡尔纳显露了他有别于其他作家的一点：之前写地心旅行的小说，主人公都是直接被送入地心，然后开始冒险，而凡尔纳笔下的主人公，却是从地面开始探索，如何进入地心，如何选址，如何抵达，有什么道理，遭遇什么波折，等等，都要讲清楚。

这一点，有点像古龙和金庸作品的区别：古龙作品里的男主角，一般是一出场就武功盖世，没人知道他的武功究竟是谁教的，怎么学的，重点是他用绝世武功展开的冒险；而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一出场，要么武艺低微，要么干脆就不会武功，然后一步步向读者展示，他是怎样练成盖世武功的，学武的过程，本身就是惊心动魄的曲折历程。



《从地球到月球》的原版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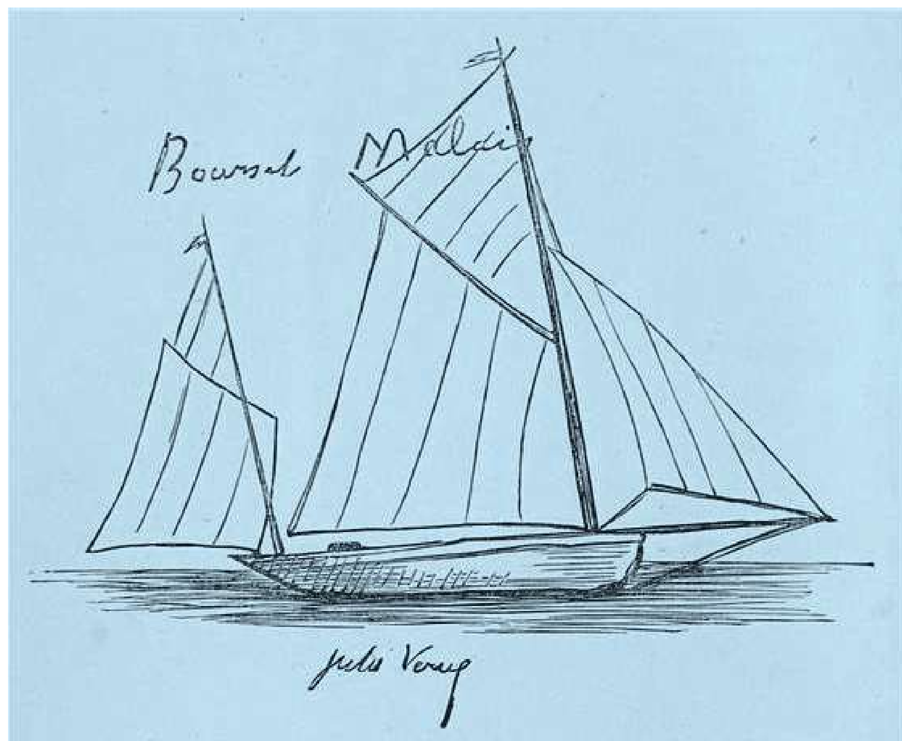
这种风格，被带到了凡尔纳1865年的作品《从地球到月球》中。在带领读者领略了地心风光之后，他又直接把触角伸到了太空。

这部小说描写美国南北战争后，巴尔的摩市大炮俱乐部的主席巴比康带领他的俱乐部成员一起，乘坐一艘由大炮发射的飞船前往月球的故

事。

这部小说把凡尔纳讲究科学考证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坐炮弹被发射去月球这一方式，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非常荒唐的（科学家后来测算，如果要达到那样的发射速度，炮筒要长达20公里），但即便拿1969年美国的“阿波罗11号”登月与这部发生在人类登月104年前的小说比较，还是有些细节让人咂舌：

凡尔纳描写的发射地点，和后来“阿波罗11号”的发射地点，都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凡尔纳描写的登月人数为3人，“阿波罗11号”搭载的也是3人；凡尔纳描写的飞船速度是36000英尺/秒，“阿波罗11号”的速度是35533英尺/秒；凡尔纳描写的抵达月球时间是97小时左右，“阿波罗11号”实际耗时103小时左右，仅多了6小时；“阿波罗11号”返回舱返回地球的溅落点为约翰斯顿环礁以南380公里，与凡尔纳当年书中描写的返回地点只相差十几公里……



凡尔纳给他的小船画的手稿



《海底两万里》的原版插图

4

这几部小说发表之后，儒勒·凡尔纳声名鹊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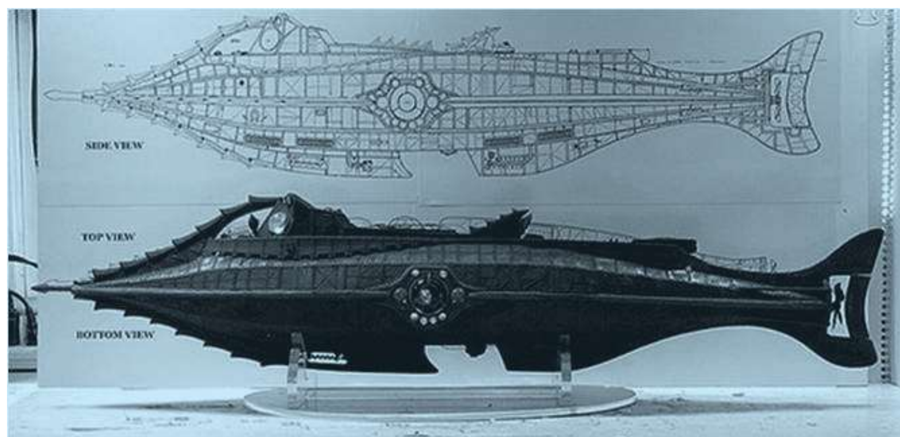
关键他还证明了一件当时大家都无法想象的事：写科幻小说，居然还能赚钱！

有了钱的凡尔纳，日子也开始好过起来。他买了一艘渔船，以自己儿子的名字命名为“圣米歇尔一号”，然后自任船长，驾驶着这艘船去找当年和他一起乘坐小艇的弟弟保罗。

1867年，凡尔纳的弟弟保罗得到了两张当时全世界最大游轮“大东方号”的船票，兄弟两人坐船去美国兜了一圈。这次远洋航行给凡尔纳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家后，他就潜心创作了一个早就在心里酝酿多时的构思。

1869年，凡尔纳将这部小说出版，那就是著名的《海底两万里》（凡尔纳原来给它取名叫《水底旅行》，书名依旧是赫泽尔改的）。

这部小说描述的“鹦鹉螺号”潜艇以及世界各大洋海底的绚丽风光，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要知道，当时最先进的所谓“潜艇”，只能潜到水下10米左右，维持3小时的时间，而凡尔纳描述的“鹦鹉螺号”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能以从海水中提取的钠为动力，永远在海底航行。



根据《海底两万里》描绘而制造的“鹦鹉螺号”模型

1886年，英国开发出了第一艘使用蓄电池做动力的潜水艇；1955年，人类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出现——这两艘潜艇，都被命名为“鹦鹉螺号”。

1873年至1874年，在《海底两万里》的基础上，凡尔纳又推出了一部小说——《神秘岛》（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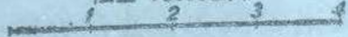


《神秘岛》原版封面

林肯岛

西经 150°30′
南纬 34°57′

法里（4000公尺）





英里（1852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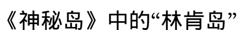
150°30′

34°57′

北颚骨角
南颚骨角
联合湾
安全岛
遗物角
爪角
华盛顿湾
爬虫角
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
富兰克林山
咏木鸟林
花岗石岩
花岗石岩
海港
沙丘
沙滩
沼地

1 花岗石宫
2 石窟
3 眺望岗高地
4 畜栏
5 陶器作场
6 瀑布
7 水闸
8 达卡洞
9 慈悲河桥
10 沙丘洞
11 蛤蜊场
12 甘油河
13 美洲豹山洞
14 煤矿和铁矿区

150°30′


《神秘岛》中的“林肯岛”



《神秘岛》原版插图

《神秘岛》描写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5个被困在南军阵营中的北方人，乘坐热气球逃跑时，掉落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后来被命名为“林肯岛”）。一无所有的他们，从用凹凸镜成功取火开始，一路自力更生，最后造出了玻璃、陶器、庄稼、磨坊，甚至电报机。

在这部作品里，凡尔纳把他的写作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主角们从一无所有到最后丰衣足食，一路不停“升级”，整个过程涉及冶金学、爆破学、工程学、水利学、动植物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各方面的科学知识。读者一路读来，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反而觉得主人公们的“升级”顺

理成章。

《神秘岛》《海底两万里》和凡尔纳之前写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被称为凡尔纳的“三部曲”，连同他后来创作的《八十天环游地球》，这四部作品一同被视为凡尔纳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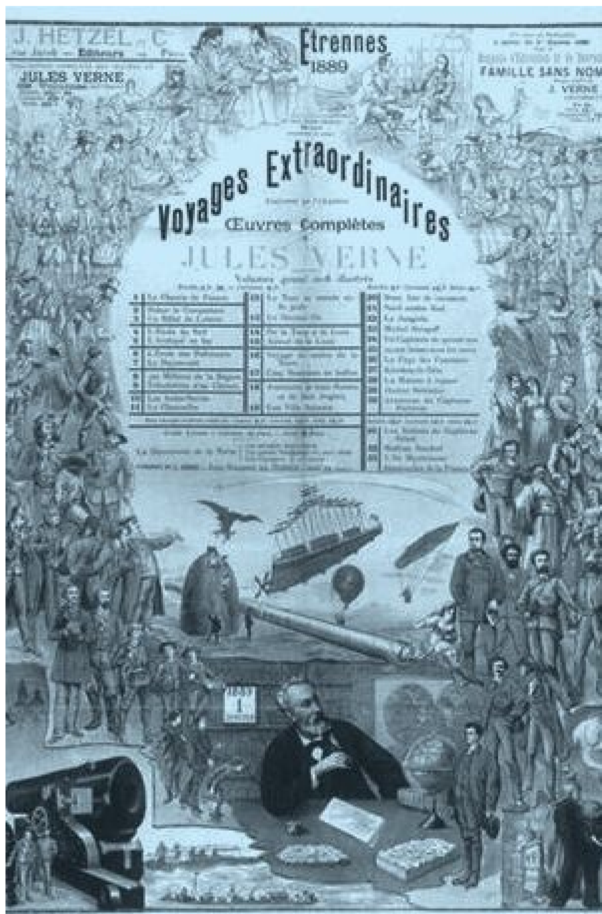
5

1886年3月17日，一个让凡尔纳悲伤的消息传来：他的好朋友和好搭档，出版商赫泽尔去世了。

与此同时，凡尔纳被精神错乱的侄子打了一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脚踝。由于凡尔纳患有糖尿病，医生只得建议他慢慢康复，从此落下了残疾。

这时候的凡尔纳，已经无法再航行了，所以他开始了另一个兴趣爱好：集邮——通过邮票来环游世界。

事实上，凡尔纳最渴望的事，就是成为一名旅行家，所以他的小说，无论是气球、潜艇、航船，其实都是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作为一名科幻小说家，他当时已被认为是“科幻小说之父”，但这绝非他想要的。



1889年，关于凡尔纳的海报

1893年，凡尔纳在接受美国记者罗伯特·谢拉德的采访时表示："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法兰西文学界赢得一席之地。"

尽管小仲马早就提名凡尔纳进入法兰西学院，但一直未能如愿。

更让凡尔纳悲伤的是，不少人认为他是专门为少年儿童写科幻故事的作家。

事实上，凡尔纳不仅一直认为自己是为成年人写作的作家，而且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名科幻小说家，而是一名艺术家——他在采访中说道：

我不渴望金钱，也不渴望得到授勋，我渴望的是人们看到我所做的和尝试做的，而不是把一名艺术家轻视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是一个艺

术家。

但是，也有后人认为，凡尔纳未能在文学界获得一席之地，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纵观凡尔纳的作品，他其实没有塑造出哪怕一个能让后人记住的文学人物形象（我个人认为“尼摩船长”勉强还行）。在凡尔纳的笔下，人物大多是脸谱化的，千人一面。

但另一方面，凡尔纳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诗歌功底，让他在科幻小说界足以居高临下。再加上他严谨的考证态度和钻研精神（凡尔纳其实没有任何科学功底，全靠去图书馆查阅和做各种笔记），他成了“硬科幻”的代表人物（在“科幻三巨匠”中，威尔斯代表的是“软科幻”，而阿西莫夫则以建立制度和探讨道德准则见长）。



1905年，凡尔纳的遗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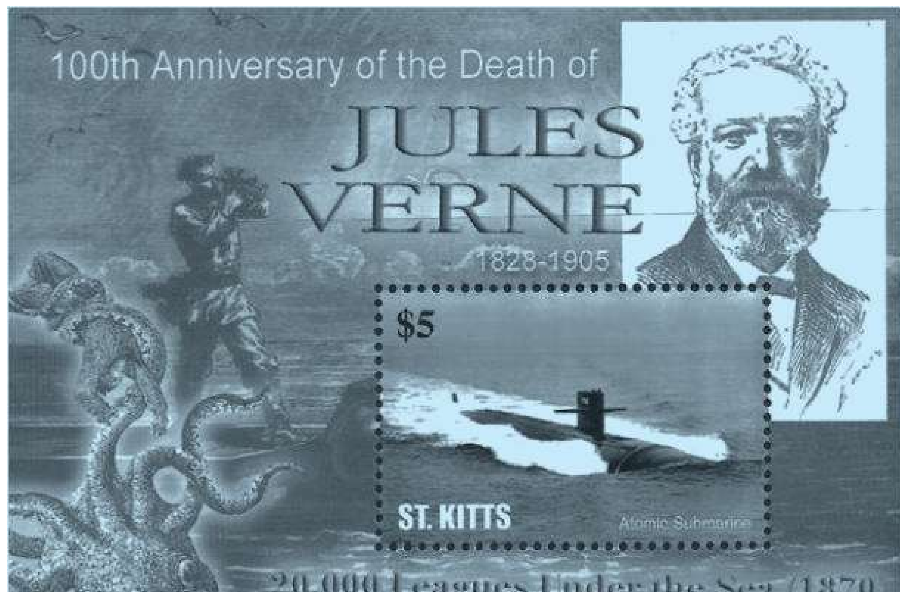
凡尔纳的葬礼

1905年，在发表最后一部小说《大海入侵》之后，饱受糖尿病困扰的凡尔纳陷入昏迷，之后与世长辞，享年77岁。

凡尔纳一生，共创作了104部小说。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凡尔纳的作品译本累计达到了4751种，是世界上被翻译的作品数量居第二位的名家，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位于莎士比亚之上。

发明著名的“亚尔古”潜艇的西蒙·莱克，在自传的第一句话就写道：“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

“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曾说：“凡尔纳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按照他的方向去幻想。”



2005年，法国将这一年命名为“凡尔纳年”，以此纪念他逝世100周年。同时发行了纪念他的邮票

1926年成功飞越北极的美国海军少将伯德说：“凡尔纳是我的领路人。”

文学家中最会写科幻的，科幻作家中最有文学性的——不知道对这个描述，已经长眠的凡尔纳是否会满意？

馒头说

春节期间，给女儿汤圆妹买了一套10本的儿童拼音版“世界名著系列”，让她先选一本自己想读的。

我满心以为，她会选择其中的《绿野仙踪》或《木偶奇遇记》，结果她毫不犹豫地挑出了《海底两万里》。

于是，每天我和她花20分钟，读完了那个故事。看完最后一页，我问她有什么读后感，她想了想回答我：“这个潜艇好厉害呀，还有，大海真大呀！”

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会不会过时？

因为他在100多年前写的那些所谓的“科幻”事物，到今天大多数已

经成了现实，我们现在再读，难免有一种“新鲜感”或“惊奇感”的缺失。

但是，答案是否定的。

凡尔纳的科幻作品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所描绘的“未来时代”，都是基于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缜密的科学原理发展，都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也是他的“预言”大多数都被实现的原因。读者一边看，一边还能获得很多知识。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尽管凡尔纳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略有欠缺，但他所有小说里的主人公，无论是《神秘岛》里的工程师史密斯，还是《从地球到月球》里的大炮俱乐部主席巴比康；无论是《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福克，还是《太阳系历险记》里的上尉塞尔瓦达克，都呈现出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渴望，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一种相信人能胜天的魄力和干劲。

读凡尔纳的小说，能体会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活力和生机。

高晓松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其实凡尔纳毕其一生，试图献身诗歌、戏剧和尝试远方旅行，这两个愿望都没有完全实现，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把所有的热情和幻想付诸笔端，写在纸上，并把那种热情和活力，传递给千千万万的读者。

如今在钢筋水泥都市里忙碌奔波的我们，是否还记得童年在夜里望着灿烂星河时的幻想？是否还保留着对浩瀚大洋深处的好奇？是否还想兑现当年环游世界的诺言？

或许，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确实已被沉重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那么，是否至少，还能保持心中那一份小小的念想？

而这，可能就是读凡尔纳作品给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留下的意义之一。

正如他墓碑上刻着的那句话：

Vers l’ immortalité et l’ éternelle jeunesse！（向着不朽与永恒的青春！）

读者评论

徐侠客：一看你写他，我就拉到最后表达我的激动之情。他的几部小说，我甚至翻到了可以背诵段落的程度。有时我甚至在想，现在流行的穿越小说的主角们，不需要带其他东西，只要带上凡尔纳的书，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从无到有的科技树指南啊。

练习死亡：小时候有段时间我只读凡尔纳和威尔斯的小说，诚然，当稍微长大，我会觉得凡尔纳的小说并不能算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但绝对是教育意义最深的科幻小说。小时候没有“软科幻”“硬科幻”的概念，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所写的东西很接地气，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幻。后来又看到他的读书法，就是各种归类和笔记，说实话我没学会，但是觉得这样的严谨和自律，是不是就是老子说的道，也就是一种不会让人感觉颠簸跛涉、起伏不平的东西。

李芒：所以有人说，科学家有时难以对未来做出准确预计，反而是科幻作家的描述与多年后的事实惊人的一致，那是因为科幻作家有着瑰丽大胆的想象力啊！

尼古拉·特斯拉：到底是神还是人？

有这样一位科学家，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他关注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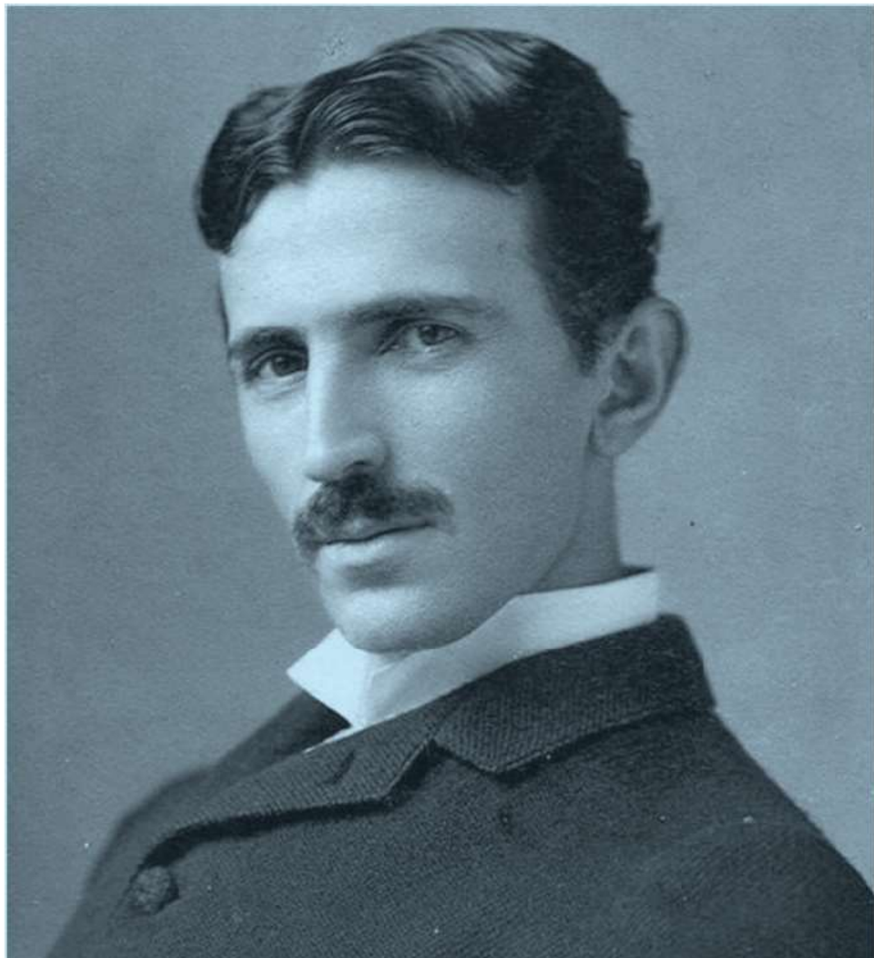
他是现代交流电系统的奠基人，但很多人说他的成就远不止这些，比如：说他智商超过700，乃至1000；说他其实已经实现了无线输电技术；说他制造了“通古斯大爆炸”；说他研究出了“死光武器”；说他其实早就发明了雷达；说他其实早就发现了X射线；说他的研究，促成了美国阿波罗登月；说他指出月球是人造的，人类是被锁在太阳系的；说他曾获得过11次诺贝尔奖，但他都拒绝了；说他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人类的20世纪，乃至21世纪……

毫无疑问，在一些描述里，他已完全是一位神。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1

1856年7月10日，在当时的克罗地亚斯米湾村，一对夫妇的第四个孩子诞生了。



尼古拉·特斯拉

这个孩子，被取名为尼古拉·特斯拉。

特斯拉的父母都是塞尔维亚族人，他们可能不会预想到，“塞尔维亚”后来成了一个国家，而他们更不会预想到，他们的孩子尼古拉·特斯拉的头像后来被印在了国家货币上。

特斯拉的父亲是一名神父，母亲是另一名神父的女儿，所以家族对他的期望是继续在神学的道路上发展。但是，特斯拉对机械物理有着近乎疯狂的痴迷，为此，父亲和他没少吵架。



印有尼古拉·特斯拉头像的塞尔维亚货币

1873年，17岁的特斯拉在一场霍乱传染中受到了感染。在那个医疗技术落后的时代，家里人都以为他要去见上帝了。重病之时，他和含泪的父亲完成了一个“赌约”：如果他能活下来，家里就要允许他去学机械物理，而不是神学。

当然，特斯拉活下来了。



23岁的特斯拉

1875年，19岁的特斯拉进入奥地利的格拉茨理工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机械学。虽然其间因为经济拮据而辍学过一段时间，但他最终还是在布拉格完成了学业。

1882年，26岁的特斯拉终于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是在巴黎的一家电话公司担任工程师。

从此，特斯拉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并且，他遇到了一个纠缠一生的“冤家”。

这家电话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设在欧洲的分公司。

美国总公司的创始人兼CEO，名叫托马斯·爱迪生。

2

以特斯拉的天分和能力，他在爱迪生的欧洲分公司很快就崭露头角。

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是，他被分公司的总经理查尔斯·巴切罗推荐到美国总部，带着雇主那封写给爱迪生的推荐信——“我知道两个伟大的人，一个是你，另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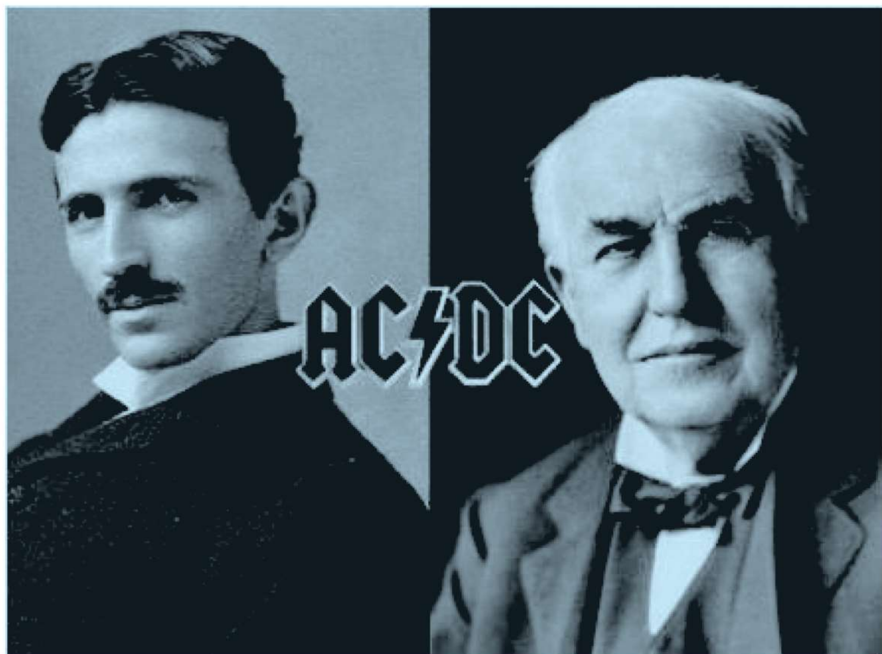
没有什么悬念，特斯拉在美国总部也很快成了主力工程师，那些让别人束手无策的问题，放到特斯拉面前是小菜一碟。直到有一次，爱迪生让他改进和设计公司的一批直流电发电机，由于任务非常艰巨，所以爱迪生许诺他：如果完成任务，就给你5万美元的奖励。

5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呢？放到现在，大概价值100万美元。

然后特斯拉就真的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然后他就去找爱迪生索取奖励，爱迪生想了想，回答：“哦……我想你可能不理解美国式的幽默……”

好吧，5万美元泡汤了，那么特斯拉希望将自己的周薪从18美元调整到25美元，但爱迪生依旧拒绝了（也有说爱迪生同意了的说法）。



特斯拉和爱迪生，一生的冤家

当然，特斯拉和爱迪生的矛盾，并不仅仅因为钱财。

爱迪生虽然顶着“发明家”的头衔，但事实上，他更像一个能将发明直接商业化的企业家（这类人才其实也很珍贵）。而特斯拉却是一个一本正经科班出身的学者，所以他很看不起爱迪生，比如后者居然连微积分都不会！

那些被人们反复称颂的爱迪生的事迹——比如说经过几千次不厌其烦的实验，在特斯拉看起来，恰恰是愚蠢的证明：

他用的方法的效率非常低，经常做一些事倍功半的事情，整体而言，我是一个很不幸的见证人。他如果知道一些起码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就能省掉90%的力气。他无视初等教育和数学知识，完全信任发明家的直觉和建立在经验上的美国人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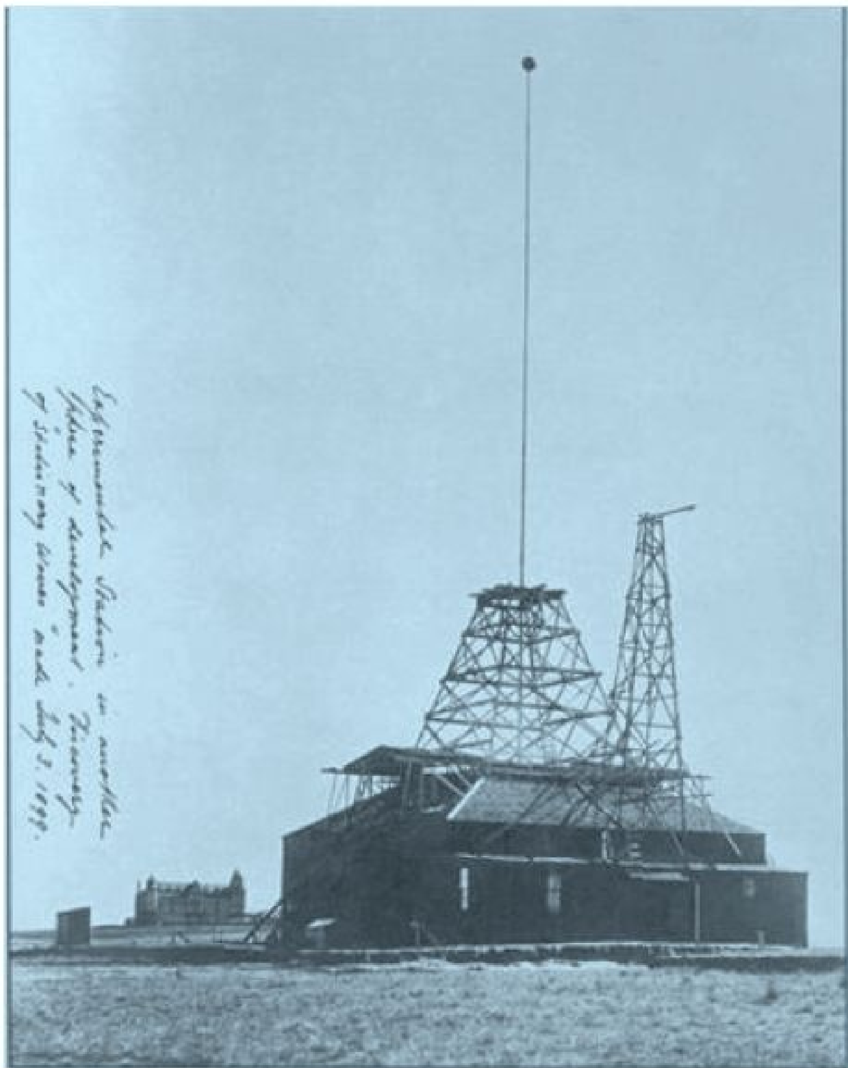
当然，最终促使特斯拉和爱迪生决裂的，还是众所周知的交流电和直流电之争。

简单来说，就是特斯拉坚信只有交流电才是未来的趋势，而爱迪生却坚守着直流电的堡垒（因为他的全部家当都投在了直流电发电和相关

产业上）。在这场“世纪之争”中，爱迪生使用了一些很不光彩的手段，为自己传奇的一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污点。（参见《历史的温度》之“爱迪生的侧面”）



爱迪生的公司



特斯拉单干后，自己的实验室

总而言之，1885年，特斯拉离开了爱迪生，之后又成立了自己的电器公司。

一代极客大神，开始在只有自己才懂的道路上奋力狂奔。

3

特斯拉到底有哪些成就？

其实随便上网一搜，就可以搜到太多太多，其中包括如下领域：交

流电系统、无线电系统、无线电能传输、球状闪电、涡轮机、放大发射机、粒子束武器、太阳能发动机、X光设备、电能仪表、导弹科学、遥感技术、飞行器、宇宙射线、雷达系统、机器人……

确实，如果一个人能在这些领域里都做出卓越的贡献（按网上的说法，特斯拉几乎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奠基人），那真的是可以被视为“神”，或者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人了。

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特斯拉有的确实实至名归——比如对交流电发电机的天才改进，这是一个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伟大成就。而有的，其实和特斯拉关系不大。

我们来试着拿几样出来说一下。

比如，说特斯拉其实早就发明了雷达，但因遭受爱迪生打压，没有宣布。

公认的雷达发明者是英国物理学家瓦特（不是改进蒸汽机的那位），他在1936年架起了第一个雷达站。事实上，从1922年起，包括马可尼在内的诸多英美科学家都提出过“雷达”的设想。特斯拉确实也提出过雷达的设想，但真正做出来的，是瓦特。不能说谁想到过，就是谁发明的，对不对？

比如——既然说到了马可尼——特斯拉比马可尼早很多就发明了无线电。

WIRELESS OF THE FUTURE

(Nikola Tesla in the New York Times)

"It will soon be possible, for instance, for a business man in New York to dictate instructions and have them appear instantly in type in London or elsewhere. He will be able to call up from his desk and talk with any telephone subscriber in the world. It will only be necessary to carry an inexpensive instrument not bigger than a watch, which will enable its bearer to hear anywhere on sea or land for distances of thousands of miles. One may listen or transmit speech or song to the uttermost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same way any kind of picture, drawing, or print can be transferre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t will be possible to operate millions of such instruments from a single station."

这是特斯拉对于未来“手机”的一段论述，其中说道：“只需携带一个造价便宜的，体积又不会超过手表般大小的装备，你就可以在千里之外，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岛上都能和对方对话了。”所以有些人就说是特斯拉最早预言了手机。但事实上，和特斯拉同时代甚至早于他的，提出“手机”概念的科学家有很多，“想到”和“做出来”毕竟是不一样的

但事实上，马可尼与特斯拉各自独立发明了无线电技术，英国承认了前者的专利，美国承认了后者的专利。之后美国又撤销了特斯拉的专利（一个原因据说是马可尼在美国有财团支持，包括爱迪生），但在1943年又恢复了特斯拉的专利（可能是出于避免支付专利费的考虑）。

比如，说特斯拉设计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水利发电站。那座水利发电站就是著名的尼亚加拉水电站，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但不是特斯拉设计建造的，而是当时承接工程的西屋电气公司委派的一个叫乔治·福布斯的苏格兰工程师设计建造的。

不过，福布斯确实使用了特斯拉的交流电发电机和交流电传输的原理。而特斯拉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用交流电发电同时点亮9万只灯泡的"神迹"，是他效力的西屋电气公司拿到尼亚加拉水电站订单的重要原因。

比如，说特斯拉其实早于伦琴发现了X射线。特斯拉确实研究过X射线，但他的包括X射线在内的大部分研究资料，都毁于1895年发生在他实验室的一场大火——这确实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所以至于到底他研究X射线到了什么地步，其实是没法证实的。

比如，说他早就实现了无线电力传输。特斯拉确实是最早系统提出无线电力传输的人之一，也制造出了著名的"特斯拉线圈"（一种制造高压的变压器）。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他完成了可以应用于实践的无线电力传输技术——当然，他提出的设想和为之进行的尝试和努力都让人敬佩，这也是现在埃隆·马斯克把他们公司纯电动汽车命名为"特斯拉"的原因。

顺带提一句的是，关于那个"特斯拉曾制造出1亿伏特电压"的事也没有根据，有证据表明的是，特斯拉曾制造出接近2000万伏特的电压，但从没超过这个数据。



最初建造沃登克里弗塔的一大目的，其实是实现全世界的无线电广播传输。但是在马可尼率先发明了无线电之后，特斯拉背后的摩根财团撤销了资助

至于那个“是特斯拉制造了通古斯大爆炸”，就更没有任何依据了（通古斯大爆炸请参看本书收录的“一场神秘的超级大爆炸”）。

传说是特斯拉利用他建造的“沃登克里弗塔”制造了那次著名的大爆炸，证据之一就是那座塔所在的位置和通古斯地区的纬度相同，但其实相差很远。最关键的是，通古斯大爆炸发生在1908年，而1906年时，沃登克里弗塔的员工已经基本全部撤离，塔处于停用状态。

而阿波罗登月、太阳系之类的，就不用说了吧。

事实上，特斯拉在晚年陷入了关于“宇宙理论”的研究而不能自拔。



晚年特斯拉

1936年，80岁的特斯拉发表了一篇论文，这就是后来被网上传得神乎其神的《引力的动态理论》。在这篇文章里，特斯拉试图建立他基于牛顿“万有引力”的“大统一场”论，而全盘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从人类的科学历史进程来看，任何在当时被视为荒谬的理论或学说，在通过时间的检验后未必是真的荒谬。我们现在不敢说爱因斯坦的理论肯定是对的，特斯拉的研究肯定是荒谬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关于所谓特斯拉在他的理论中提出了“火星登陆”“人造星球”“空间传送”“时间旅行”“引力门系统”“引力墙”“光子墙”“粒子墙”的说法，都没有找到任何依据。

1943年1月8日清晨，在美国纽约的“纽约人旅馆”3327房间，一名叫爱丽丝的女仆发现了一具躺在床上的尸体，那是尼古拉·特斯拉的尸体。

经法医检验，87岁的特斯拉确切死亡的时间应该是1月7日晚上的10点30分左右，死因是心脏衰竭。

在特斯拉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一直住在各种旅馆里，经济拮据。他赚不到钱吗？并不是。按当时的专利权许可使用费标准，使用者每生

产一匹交流电就必须向特斯拉缴纳1美元的专利使用费。

但是，特斯拉放弃了这个专利，让全世界人类免费使用。

特斯拉去世后，他的大脑并没有像网络传言的那样被“摘去研究”，他的遗体是被完整火化的。也没有任何证据和资料证明他曾经做过脑力和智商测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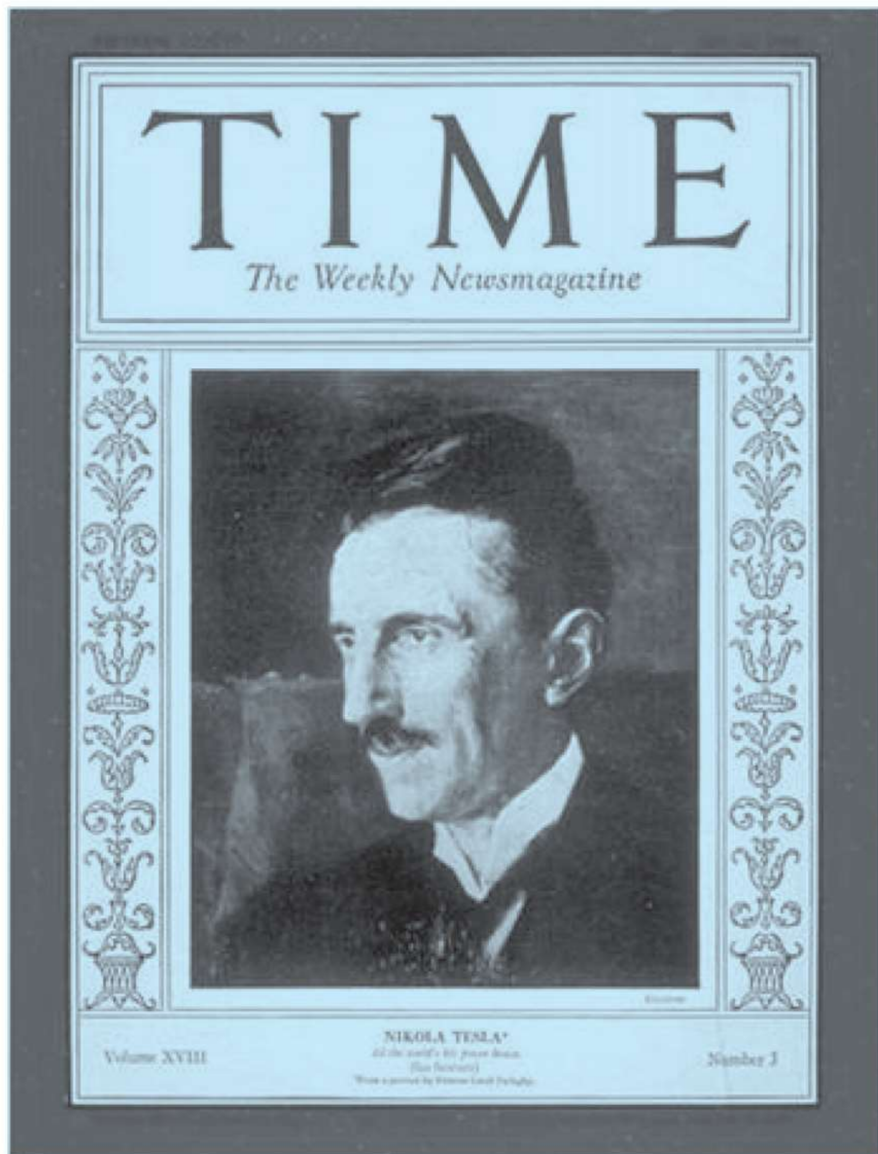
关于他11次拒绝诺贝尔奖，也没有任何资料或证据可以证明。但是，他确实入选了1937年诺贝尔物理奖的提名，诺贝尔奖基金会曾承认过，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首选人物，是特斯拉和爱迪生（后来颁给了对X射线研究做出贡献的布拉格父子）。

“我只是个平凡的人，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这是特斯拉自己说的话。

特斯拉虽然不是伟大的、全能的“神”，但他毕竟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如果再细化，是一位天才的电气工程师——这是无法辩驳的客观事实。

1960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上，为了纪念他的成就，“磁感应强度”的单位从此被命名为“特斯拉”。

这种实实在在的认可，可能比说他的各种“神迹”要靠谱得多吧。



特斯拉在75岁时登上了《时代》封面

馒头说

说句实话，在中国的“特斯拉造神”运动中，央视功劳不小。

2009年6月，央视10套科教频道《人物》栏目曾播出两集纪录片《科学超人尼古拉·特斯拉》。这部纪录片的主要线索来自俄罗斯自由作家兼编导维塔利·普拉夫迪夫切夫拍摄的“纪录片”——《特斯拉：世界之

王》。这位编导还拍摄过下列作品：《通古斯入侵一百年》《第三帝国的飞碟》《月球秘密区》等。

所以，就不多评论什么了。

特斯拉之所以由一名伟大的科学家而被持续“神化”（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是），成为一个“全能的存在”，除了他本人确实有一个天才的大脑，还来自我们自己的两类心理。

一类，是我们的悲情心理。在我们的印象中，科学家似乎都应该是怪才，不食人间烟火，淡泊一切名利，终生艰苦清贫。特斯拉在这三方面确实很符合条件，所以也符合人们的这种心理，进而就会有不顾一切拔高他的冲动。

另一类，逆反心理。你越有名，我就越希望听到你的缺点；你越无名，我就越希望成为发掘你（或知道你）闪光点的那一批人。特斯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确实有被埋没的嫌疑，但这些年来，我又觉得有被过分神化的倾向，以致成了一些人的精神图腾。

其实，我们有时候对待“科学家”的态度挺矛盾的。

一方面，我们对一些真正的科学家的坚守和清贫表示敬佩，对一些影视演员的收入和知名度大大超过科学家拍案怒骂。而另一方面，当有些科学家真的名利双收时，有些人似乎又不乐意了，不管你是研究物理的还是种水稻的，一些人的关注点又开始转到其他点上。

其实，我个人觉得，大部分普通科学家的收入尤其是知名度不如一流的歌星、影星，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知名艺人本身就是市场的稀缺品，他们确实付出了努力，再借助人类的天性和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获得丰厚的回报，毕竟也不是什么令人发指的“罪行”。

对待真正的科学家，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保持一份真正的尊敬，记住他们做出的贡献，我觉得就很可贵了。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理想，是能真正地推动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而不会在意有多少粉丝哭着喊着：“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

而且，科学家就真的没有回报吗？那可能是我们低估了时间的力

量。

特斯拉出生于1856年，160多年过去了，我们绝大多数人依旧在念叨他的名字，我估计再过好几个160年，人类依旧会铭记他。

物理和化学单位、月球环形山、小行星、火箭、卫星，甚至小到我们身边的路名、广场名，其中有多少都是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啊。

能真正为人类的千百年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人类千百年都会铭记他们。

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公平的事。

读者评论

王林峰：特斯拉放弃了这个专利，让全世界人类免费使用。就冲这一点，他就是“神”!和数学大神佩雷尔曼境界一样，值得处于物欲横流中的凡人们膜拜。

Frommm：看到馒头大师后面的评论笑了。好多人鄙夷我们对明星八卦了如指掌却对科学家一类人知之甚少，馒头大师说了句公道话。明星是时代的产物，终究要被时代的洪流带走，就是因为知道明星熬不过时间，才会有大批大批的粉丝出来为他们申诉他们的努力。那些科学家，无须多加证明。全人类都是他们的粉丝，毕竟我们现在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物，都离不开他们。最后，特拉斯长得好清瘦啊！

calla雪：或许是因为我们一直接收到的信息，都是伟大的科学家如何战胜贫穷，如何历经磨难，又做出如何伟大的奉献，而忽略了他们也只是普通人的事实。一生甘于贫穷，甘心牺牲奉献确实值得敬佩，但名利双收的又何尝不可？

张灵甫之死

在国民党军队将领里，张灵甫确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

他阵亡时是中将，军衔不算低，但比起一批国军抗日名将，这个军衔也不算高。

这位中将师长，近年来一直是国军将领系列中的一位明星。喜欢他的人，说他战功卓绝，一身肝胆。讨厌他的人，说他刚愎自用，名不副实。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张灵甫的支持只是源自“颜值即正义”。

张灵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1

张灵甫，字钟麟，原名张钟麟，又张宗灵，后改名为张灵甫。

张灵甫1903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大乡东大村，父亲是村里的一个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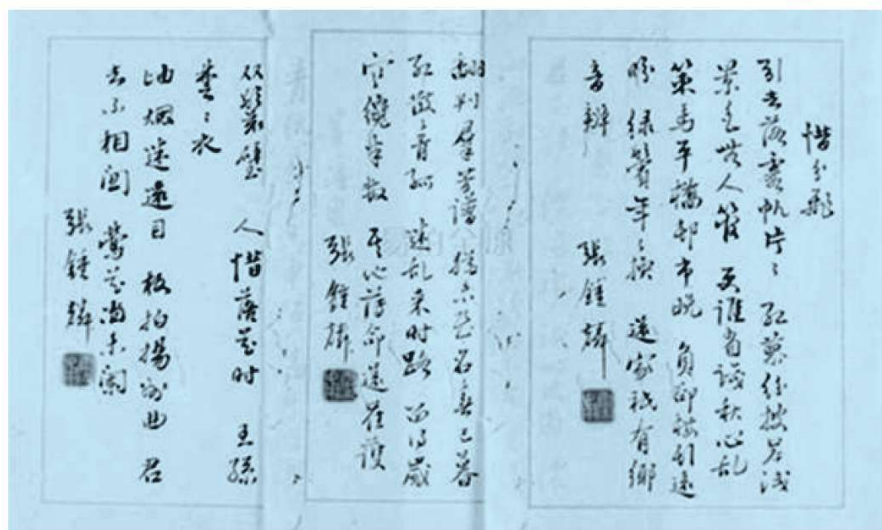
张灵甫

张灵甫幼年好学，熟读经书，喜爱古文，而且特别喜欢书法，经常到西安的孔庙碑林区临摹唐代名家的书法。张灵甫的书法确实不错，连民国时期的书法名家于右任也对张灵甫的字颇加赞赏。

1923年，20岁的张灵甫如愿考入了北大历史系——国民党将领中，张灵甫应该算是学历最高的将领之一。所以说张灵甫是一位“儒将”并不过分。

但是在那个战火连天，国家遭受屈辱的年代，很多学生都是不可能再去读书的。和后来的很多名将一样，1926年，23岁的张灵甫投笔从戎，报考了黄埔军校。

张灵甫当时读的是黄埔四期。黄埔军校除了一期外，四期也是比较有名的一期。在这一期学生中，共产党方面出了林彪和刘志丹，国民党这边出了谢晋元、胡琏和张灵甫。



张灵甫年轻时的手迹

从黄埔四期毕业后，张灵甫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任步兵排见习官，不久升任排长，开始参加北伐。

和很多黄埔同学一样，张灵甫的升迁之路还是比较顺的。1933年，才30岁的张灵甫，已经成了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上校团长，并成为当时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的心腹。

应该说，文武双全的张灵甫生逢其时，又有一颗报国之心，等待他的将是一片广阔天地。

但不久之后，他就被判了死刑。

让张灵甫被判死刑的，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古城杀妻”案。

一身儒雅的张灵甫，正是这起案件的主犯——他将自己的妻子一枪爆头。

张灵甫在北大读书期间，家里给他包办过一门亲事，妻子叫邢凤英。因为是包办婚姻，所以张灵甫对妻子并没有什么感情，邢凤英一直在老家照顾张家的老人。

张灵甫从军后，在四川带兵与红军作战，朋友给他介绍了另一门亲事，女方是四川广元人吴海兰。两人见面后彼此倾心，就于1933年在广元拜堂成亲，第二年，生下了女儿张清芳。

原本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却在1935年发生了大变故。

那一年，张灵甫随胡宗南的第一军进驻陕北与红军作战，军官的家属都安置在古城西安。那一年除夕，张灵甫休假回家，对妻子吴海兰说：“我很久没吃饺子了，你给我包顿饺子吧！”

吴海兰随即到后院给丈夫割韭菜，张灵甫尾随而至，掏出手枪，对着妻子的后脑就是一枪。击毙妻子后，张灵甫也不掩埋尸体，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家门。

张灵甫为什么要如此枪杀自己妻子？一个版本是“通奸说”。

根据张灵甫老上司王耀武曾经的副官吴鸢的说法，张灵甫是怀疑妻子在自己不在时与人通奸，怒火中烧，随即下了杀手。后面的各种“通奸说”杀妻版本，包括妻子是在割韭菜时被枪杀这些细节，基本都缘自吴鸢的说法（《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我所知道的张灵甫》，吴鸢）。

这个版本受到了张灵甫长子张居礼的质疑。他从生母邢凤英那里听来的版本是：当时张灵甫和吴海兰就在后院发生了争吵，随即枪响。张居礼特别强调：“当时是冬天，地里哪来韭菜？”

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通共说”。

张灵甫说发现妻子拿了自己的军事文件，进而怀疑妻子“通共”，所以一枪将她杀死。这个版本出自张灵甫后来的妻子王玉龄之口，但同样存在疑点：张灵甫生性谨慎，且很少回家，妻子是否可能有机会得到军事文件？就算妻子“通共”，在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是否至于将她一枪爆头？

不管原因如何，张灵甫确实公然枪杀了自己的妻子，此事随即引起轰动。

不肯罢休的吴家人，一纸诉状递给了西安妇女协会，妇女协会又将诉状转交给了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于凤至得知后十分气愤，转交给了自己的“闺密”——宋美龄。

当时的宋美龄正和蒋介石一起在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老百姓要有“礼义廉耻”的观念，要有“国民道德”。如今，一名团长在自己家中公然将自己妻子枪杀，这人还是蒋介石自己的黄埔门生，怎能不杀鸡儆猴？

蒋介石一纸命令，将张灵甫解至南京（胡宗南原本还试图保护张灵甫，后来只能让他自己前往南京自首），经军事审判，判处死刑——这也证明了“通共说”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如果妻子吴海兰有确凿证据“通共”，张灵甫绝不会受此重判。

当时张灵甫自己也是万念俱灰，准备等死。但那个时候，他得了疟疾，在治疗期间，一直欣赏张灵甫的典狱长对他百般照顾和鼓励，所以在病愈之后，张灵甫递交了申诉书（“通共说”可能由此而出）。最终，张灵甫的申诉被法庭接受，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被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战争年代，用人之际，一位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人，是不可能一直坐牢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前线吃紧，军事干部一下子紧缺起来。南京国民政府传出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并保留原来军衔（但有说法是1937年初张灵甫即获释）。

原名张钟麟的张灵甫投奔了王耀武的五十一师，自此改名“灵甫”，官复原职，踏上了抗日战场。

张灵甫确实没有辱没使命。

1937年8月，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国民革命军五十一师、五十八师编成第七十四军开赴上海，张灵甫被任命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三旅第三〇五团上校团长。在“淞沪会战”的罗店战役后期，三〇五团这个新组建的团敢打敢拼，一度还和火力占优的日军对攻，让人刮目相看。

在随后的“南京保卫战”中，张灵甫的三〇五团负责防守淳化镇，掩护王耀武的五十一师退入南京城。在这场阻击战中，三〇五团表现英勇，与日军第十八师团血战一昼夜，多次肉搏，张灵甫左臂负伤。

因为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色，张灵甫被升为一五三旅副旅长兼三〇五团团长。

真正让张灵甫声名大振的，是1938年“武汉会战”的“万家岭大捷”。

在这场可以媲美“台儿庄大捷”的战役中，张灵甫作为一五三旅副旅长，力排众议，亲率一支敢死队翻越张古山后山绝壁，取得“德安大捷”，为中国军队最后基本全歼日军一〇六师团做出重要贡献。当时著名文艺界人士田汉，正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三处少将处长，在得知这场战事之后，立刻组织编排了话剧《德安大捷》，为群众和正在长沙开会的军官们演出。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该剧中出现，一时成为全国皆知的抗日英雄。

在此之后，张灵甫随着七十四军，几乎出现在了每个抗日战场的主要战役中。

1941年3月，张灵甫作为代师长，指挥五十八师参加“上高会战”，与兄弟部队取得“上高会战”大捷，这场大捷被何应钦称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张灵甫率五十八师孤守永安，与日军第三师团主力血战，全师伤亡率超过40%；

1941年10月，张灵甫升任第五十八师师长，率军参与“浙赣会战”；1943年6月，“鄂西会战”；1943年11月，“常德会战”；1944年5月，第

四次“长沙会战”……在这些战役中，张灵甫虽然不是最高决策层，但作为师一级干部，坚决执行命令，打仗果敢，身先士卒，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



1998年，日本政府在国立公文书馆之下设立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提供日本明治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涉及日本与亚洲近邻国家的所有官方原始公文资料查询。日军作战文献里提及最多的中国将领是李宗仁，以244件高居首位；张自忠65件，居第二；卫立煌54件，位列第三。王耀武占到了9件，而提到张灵甫的文件数为0——当然，这也不意外，当时张灵甫的军阶确实不高

在这些战役中，张灵甫因为一直在一线指挥作战，曾多次负伤。在“上高会战”中右腿膝盖被日军机枪扫中，军医诊断后要求截肢。张灵甫当时把手枪交给副官，要求自己昏迷时，如果医生要截肢，就一枪毙之。后来在休养期间，又因为战情提前回归部队，从此走路一瘸一拐，人称“跛足将军”。

1945年4月的“雪峰山会战”，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是张灵甫作为抗日将领的谢幕工作。在这场战役中，张灵甫指挥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在铁山与日军主力血战。“雪峰山会战”获胜后，张灵甫获三等宝鼎勋章。

有人曾议论，张灵甫从抗战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只是一个“校”级军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是师长级别，第七十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如此声名显赫，主要是军长王耀武的功绩。张灵甫1945年2月才升的少将，“抗战名将”称号有些名不副实。

但是，也有人指出，张灵甫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可圈可点，谢晋元率400余名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时候（四行仓库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之“一座被死守的仓库”），也不过是一个代团长身份，“抗战名将”不应只以军衔论，“将”也不应该被狭义地理解为“将军”军衔。

无论如何，抗战结束之后，张灵甫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不仅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更是深得蒋介石信任，身兼南京卫戍司令，人称“御林军首领”。

当时的第七十四军，被称为“抗日铁军”，全美械装备，已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首，王牌中的王牌。

张灵甫正是接管了这支王牌军，受命投入了随即而来的国共内战。

4

1947年，在进入胶着状态的内战中，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成了焦点中的焦点。

七十四军为何成了“整编七十四师”？那是抗战后国共双方考虑到当时国内外形势，都开始所谓的“裁军”——不过大家都知道双方必有一战。

以国民党为例。1946年2月的整军会议之后，蒋介石裁去的都是杂牌以及他不放心的部队，嫡系部队反而加强了——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下辖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三个旅（其实就是原来的师）。

第七十四整编师齐装满员32000人，全部美械，火力强劲，远远大于一个师的实力，依旧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王牌。张灵甫也只是军长改师长换了个称呼而已。

1947年，原本拥有绝对优势的蒋介石在吃了几次亏后，开始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方向，一个是延安，另一个就是山东。

在山东战场上，集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胡琏的整编十一师，邱清泉的第五军。其中，以整编七十四师为骨干组建的第一兵团，又是主力中的主力。

在山东战场，国民党的对手是陈毅和粟裕。

无论陈毅还是粟裕，一开始确实有点低估了张灵甫和他的王牌整编七十四师。

陈毅麾下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麾下的华中野战军在淮阴、涟水、鲁南等战役中，与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全面交火，可以说是负多胜少，吃了很多亏。

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的各兵团稳扎稳打，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作为全军团攻击阵型的中间主力，火力强劲，进退有据，让解放军非常头疼。

但一直以来的大小胜仗，毕竟还是让战局双方的心态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连战连捷，全军上下产生了一种乐观情绪，认为歼灭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主力已是板上钉钉。从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到整编七十四师的张灵甫，都对尽快结束这场战役抱有乐观态度。



粟裕和陈毅

另一方面，解放军从军官到士兵，开始对整编七十四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复仇”情绪。华东野战军6纵司令员王必成因为在几次与张灵甫的交手中吃了点亏而承担了责任，他当时只留下一句话：“坚决接受处分，但日后打敌七十四师，绝不要忘了我王必成的六师！”粟裕表示一定记得，并嘱人记录存档。

1947年5月12日，同样乐观的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在山东战场的第一兵团整编七十四师必须拿下坦埠（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辖镇）。

这是一道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命令，却把张灵甫送上了不归路。

因为就在几天之前，刚成立不久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整合）副司令员粟裕，酝酿了一个连他的参谋人员都感到震惊的计划：

把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从第一兵团中“掏”出来，全歼。

5月12日，张灵甫按照军令，率领整编七十四师向坦埠方向攻击。

与此同时，华野九纵的许世友部队开始实行梯次阻击，为兄弟部队争取时间——整个华东野战军都开始了密集调动，目的只有一个：围歼整编七十四师。

尽管整个过程经历了各种阴差阳错，但对张灵甫部队的包围圈还是渐渐形成了——国民党军队一直对此没有察觉，因为他们绝不可能想到，对手居然会有胆子从自己攻击阵形的正中间，把自己的绝对王牌部队“掏”出去全歼。

尽管开战以来一心想抢头功而冲在前面，但身经百战的张灵甫还是嗅出了点味道，尤其是整编七十四师后方的补给点垛庄被解放军攻下后，他立刻感到了不妙。

攻下垛庄的华东野战军部队，是在两昼夜强行军120公里后，攻占垛庄的。这支部队，正是当初受处分但要求参战的王必成的六纵。

5月13日，在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的催促下，张灵甫只能留下一个警卫团，率全军渡过汶河，奔袭坦埠。整编七十四师当时接连攻下了马山、迈逼山、大箭，距离坦埠已只有6公里的距离，但张灵甫发现两翼的友军并没有跟上——自己的部队已经过分突前了。

尽管和友军之间只相距几公里，张灵甫也不相信解放军会胆大包天到吃掉整个整编七十四师，但谨慎的他还是立刻下令放弃新占阵地，留部队警戒，同时向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请求撤退。

但是汤恩伯没有答应，依旧要求整编七十四师在5月14日必须攻占坦埠。

5月13日晚，华东野战军经过大规模的运动穿插，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整编七十四师的包围。5月14日上午，张灵甫正准备向坦埠发动攻击，却得到报告：对面的解放军抢先发动了进攻，且兵力大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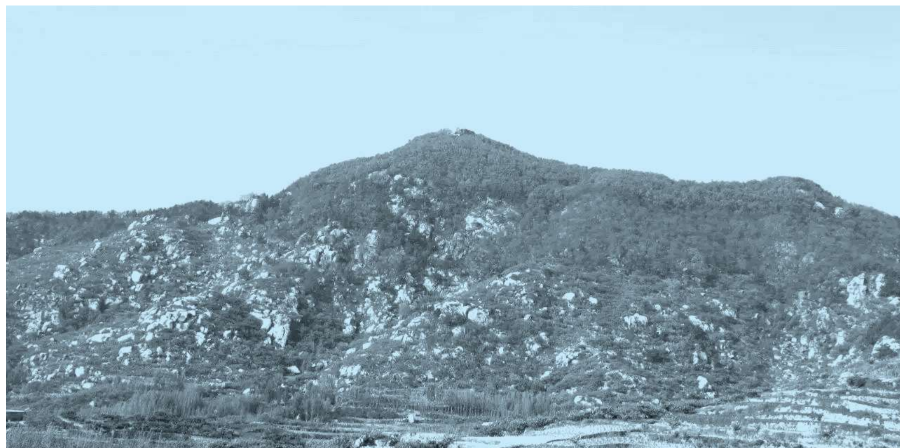
这时候，张灵甫终于完全确认了对手要将自己围歼的意图，他决定违抗军令，立即后撤——不然就是“越塔送人头”了。

但毕竟还是晚了。

眼看与周边友军的联系已经全部被切断，后路又被堵上，张灵甫立刻决定：把全军拉上就近的高点孟良崮，固守待援。

孟良崮，海拔575米，是芦山山区的主峰，山头面积约1.5平方公里，位于蒙阴县垛庄镇境内。山势陡峭，草木稀疏，可以说是难守难攻——守军很难搭建工事以及发挥火炮优势，攻方也无险可避，只能强攻。

后人有解读说，张灵甫选择上孟良崮是一个致命错误，但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作为万不得已的选择，张灵甫的决定未必是错的——以整编七十四师实力之强，守个几天应该是没问题的，一旦周围友军赶来救援，说不定能全歼华东野战军主力。



孟良崮

蒋介石也确实看到了这一战机。

他立即命令整编七十四师死守孟良崮，随后调集张灵甫附近的10个整编师（军）迅速向孟良崮靠拢。

整个华东战局，瞬间就在孟良崮这个小小的山冈附近出现了“生死手”：

在包围圈最里面，是张灵甫整编七十四师约3万人；

外面包围的，是陈毅和粟裕华东野战军5个主力纵队的近15万人；

在这个包围圈外围，还有国民党军10个整编师（军）的近40万人的更大包围圈。

粟裕想“黑虎掏心”，张灵甫不甘示弱，要“中心开花”。

整个局势，忽然就变成生死存亡一线间。

而决定双方生死的，就是张灵甫的友军是否给力。

孟良崮战役经过要图（1947年5月13日至16日）

6

事实证明，华东野战军在之前对张灵甫友军的预料，没有落空。

华东野战军之所以敢啃整编七十四师这块“硬骨头”，除了张灵甫冒进，己方人数占绝对优势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整编七十四师与友军关系不佳。

张灵甫算是军人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个小问题：向来比较清高。而且张灵甫在整个国民党军序列中算是升得很快的了，难免引来各种妒忌和非议，这都导致整编七十四师与友军关系不融洽。

对垒陈粟大军，第一次打涟水时，整编二十八师奉命配合整编七十四师作战，张灵甫的一句话“二十八师还是等我们把涟水打下来后，接防就是了”，没来由地惹恼了整编二十八师师长李良荣。所以整编七十四师从涟水退下来之后，整编二十八师冷言冷语：“我们准备去接防啦！你们怎么没打下来啊？”

张灵甫在孟良崮被围，离他最近的是整编八十三师和整编二十五师。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原来也是整编七十四师师长的竞争者，但最终败给了张灵甫。为了安抚李天霞，王耀武把李天霞提拔为第一纵队司令官，按序列，整编七十四师归第一纵队司令官指挥。

李天霞是黄埔三期生，对学弟张灵甫的评价一直不高，认为他是张飞，有勇无谋，打仗只会冲。又说张灵甫专好附庸风雅，喜骑马、练字、收藏古董字画。室内悬挂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人的画像，俨然要摆出一副儒将的风度。

张灵甫自然对这位学长心存芥蒂。李天霞获得指挥权后，其实并没有对整编七十四师有什么“穿小鞋”的行为，但张灵甫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认为李天霞能力与职权不符，要求归整编二十五师的黄百韬指挥。

结果李天霞得知张灵甫在孟良崮被围，救援行动一直磨磨蹭蹭，不仅不努力靠近，还主动收缩，造成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对此，李天霞的话是：“他张灵甫不是挺有办法吗？”

李天霞消极怠战情绪还影响到了张灵甫的上级——一兵团司令汤恩伯。在蒋介石的严厉催促下，汤恩伯在5月15日率军向孟良崮接近。但是在半路碰到了从孟良崮跑回来的兵团副司令员李延年，李延年说孟良崮局势非常糟糕，陈粟大军很可能会掉头南下。

一听这话，汤恩伯转身就返回了临沂。

整个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就在这种犹豫情绪的主导下，开始救援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华东野战军抱着强烈的复仇决心，在各个阻援战线上死战不退，导致各个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居然误以为自己成了华东野战军的主攻方向，反而向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发出求援呼叫。

另一支最靠近张灵甫的友军是黄百韬的整编二十五师。因为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七十四师是同一攻击纵队，所以黄百韬不敢怠慢，倾尽全力拼死向张灵甫靠拢。但负责阻援的华野一纵即便前线阵地官兵全部死伤殆尽，依旧没有任何崩溃迹象。黄百韬最终打到离张灵甫5公里远的浮山和界牌，但还是和整编七十四师隔了一座天马山。

5月15日黄昏，整编七十四师的数万人马，都被压缩到了孟良崮东

西3公里、南北两公里的一块狭小地带，水源断绝，食物紧缺。

5月16日清晨，张灵甫师部所在的山洞也开始遭到炮击。

上午8点，蒋介石发出急电，严令各部必须拼死救援整编七十四师，否则“严究论罪不贷”！于是，在汤恩伯的电令下，周边的整编二十五师、六十五师外加李天霞的整编八十三师，被迫再次发起猛烈进攻。

但为时已晚。

山洞里的张灵甫，已经开始写遗书。



张灵甫与妻子王玉龄结婚照

第一封写给他的第四任妻子，结婚不到两年的王玉龄：“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加恶化，弹尽粮绝，水粮全无。……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第二封信，写给蒋介石。

在信中，他诉说友军先是贻误战机，然后见死不救，尤其点了李天

霞的名。并在信中将整编七十四师副师长以下、团长以上的军官姓名都列了出来，请求蒋介石给予他们家眷以照顾。

在此之前，张灵甫曾给蒋介石写过这样一段话：“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

这段话，不仅说了国民党的军队，其实也说了蒋介石。

5月16日下午5点，华东野战军六纵特务团一营，冲到了张灵甫师部的洞口。

张灵甫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

7

关于张灵甫阵亡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被解放军战士击毙。

这种说法，见于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陈粟大军征战记》，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孟良崮战役》《孟良崮战役资料选》，以及公开发表的原华野将领回忆录及电影《红日》等。

按这种说法，当时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山洞，向洞内扫射，然后进洞搜索，发现张灵甫已倒在血泊之中。

战后，华野首长联名致中央军委的电报原文如此表述：

军委，刘邓：

一、据最后检查证实，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确于十六号下午二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击毙。当特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

二、另查出五十一旅旅长陈传钧、副旅长皮宣猷、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参谋长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五十八旅副旅长贺翔章、师新闻处副处长赵建功，均被俘，现在野战俘官处生活。

陈粟谭桀

三十日

第二种说法，张灵甫是自杀的。

这是国民党方面历来的版本。主要证据有二：一是两封遗书（也有说法说两封遗书是王耀武伪造的，但张灵甫遗孀王玉龄认为第一封遗书是真的），二是张灵甫的随从参谋杨占春。据他的回忆，是张灵甫强行命令自己的参谋处副处长刘立梓向自己射击。国民党官方的说法是，张灵甫是“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但张灵甫的遗体照片显示，他是前胸中了好几枪，所以不可能是自杀）。



张灵甫

第三种说法最有争议，说张灵甫被俘后，被华野一个负责押解的排长为了报连指导员被杀之仇开枪击毙的。

这种说法的关键证据，源自当时攻击整编七十四师的华野六纵司令员王必成。他在回忆文章《飞兵激战孟良崮》中写道："胜利了，我们的老冤家、死对头，终于被彻底歼灭了。但在庆贺大捷之余，也有点遗憾，那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死心塌地效忠蒋介石的'御林军'师长张灵甫，在被我纵特务团活捉之后，又被一名对他怀有刻骨仇恨的干部给打

死了！”

不管怎么说，张灵甫最终还是死了。

虽然是敌人，但毕竟曾是一个抗日战壕里的战友，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决定将张灵甫的遗体擦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就地掩埋（据王树增的《解放战争》记录，当时解放军花了400块大洋买了上好的楠木棺材，但有当事人回忆，当时用的是楸木棺材）。

被六纵俘虏的整编七十四师军官要求最后与他们的师长告别，经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同意，在副司令员皮定均的陪同下，9名整编七十四师的军官在张灵甫遗体旁跪成一圈，泣不成声。

华野战士在张灵甫的坟前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张灵甫之墓。然后通过新华社广播播报了张灵甫的埋葬地点，希望张灵甫的家属能到该处收尸。不久之后，张灵甫的棺木就被国民党方面挖走，在南京玄武湖边竖起了张灵甫和孟良崮阵亡将士的纪念碑。

8

整编七十四师被全歼后，蒋介石认为这是内战爆发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为此，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撤职留任，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原本被下令“就地枪决”，后来被撤职押送军法处查办。

穿越沂南与蒙阴县界的孟良崮，在两个县的地界内，分别成立了两个景区。

在蒙阴县的景区里的一处石壁上，刻着“击毙张灵甫之地”七个字，石壁下面是不到1米高的缝隙。

按照张灵甫儿子张道宇的说法，“这个景区是假的”，因为那个不到1米高的缝隙，根本藏不进张灵甫的师部以及警卫营。他认为沂南景区那个纵深100多米的山洞才是真的。

但无论如何，当年誓不两立的敌人的毙命处，成了“红色旅游”的景点，应该是张道宇之前没有想到的。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张灵甫的遗孀王玉龄受邀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王玉龄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亲切接见，并获得一枚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馒头说

某次到广州，我一个人专门去了黄埔军校的旧址。

虽然现有建筑都是后来按比例仿建的，但置身其间，还是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英气和热血。

毫无疑问，黄埔军校是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座学校，关于它可以写很多东西。但其中最能打动我的一点是：在那个积贫积弱、饱受屈辱的年代，一批又一批中国的有志男儿怀着报国之心，走进这里。在这些同学中，今后会因为信仰不同分成两派，甚至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但在同一个课堂里学习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一致的：尽快学到本领，然后踏上疆场，保卫中国，改变中国。

事实证明，他们走出黄埔军校后，有的成为传奇，有的成为名将，但也有的成为汉奸，身败名裂。那是因为，他们都只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已。人都会有血性和热情，也会有优点和缺点。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一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因为立场和阵营的问题，被我们从人批判成了“鬼”，哪怕他们在抗日战场上做出过重大贡献，也很难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

这几年来，人们的思想已经改观，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将领的抗日功绩渐渐得到了肯定。但因为之前长时期被压制和贬低，难免会让一些后人产生智商上的受辱感，进而他们需要推举出一个典型，来证明自己所知道的，远比官方想让我们知道的多得多，自己并没有被“洗脑”。

在我个人看来，张灵甫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甚至成了一种寄托。

无论哪个阵营，哪种信仰，哪个党派，从来就没有什么“神”或“鬼”。

有的，都只是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已。

读者评论

逍遥王：在抗战中，王耀武的功劳的确高于张灵甫，过分吹捧张灵甫在抗战中的贡献对王耀武不公平。另外，内部不和是国民党的最大顽疾，从建党初期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甚至在大是大非面前都不能摆正态度。

许先生：一个争议颇多的将领，确有过度宣传之嫌，今天馒头说得细致，一分为二，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我爷爷就是个抗日老兵，后来解放战争中就归属华野，也参加过孟良崮战役。不得不说，粟裕确实棋高一招，分析之准确，判断之精准，哪天单独讲讲粟裕吧……小时侯天天听我爷爷跟我说这场战斗，就记得两件事，被俘虏过来的七十四师士兵一个班最多安排两个人，还有一个就是美械装备之精良。

太2真人：我的外公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当时，是连指导员。解放军也是损失惨重啊，他所在的连队伤亡到仅剩个位数。幸存者半夜里在破庙里为兄弟们收尸，每人用几尺白布包起来，有的都收不到全尸……一卷白布就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战争太残酷，没有赢家。

一位孤悬东北的土匪将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民国史上留下痕迹的那些人，他们的名字本身都透着一种腔调，比如张学良、蒋介石、冯玉祥、吴佩孚……

但有这样一个人，你一看他的名字就会想：这不是一个土匪的名字吗？

没错，这个人本身就是土匪出身，但他做的事情，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1

1931年11月4日，黑龙江省，江桥。

江桥这个地方，准确的称谓，是“嫩江哈尔葛木桥”，800米长，是通向黑龙江省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的必经之路。

这一天的上午，桥面上出现了日本军队。

此时此刻，距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过去才不到两个月——但也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辽宁省和吉林省近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已经沦入日本人之手（参看《历史的温度》中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

所谓的“东三省”，就剩一个黑龙江省了。

这天上午，率先冲上桥面的，是日军第二师团“嫩江支队”第16联队的第七中队和工兵第七中队，大概400人。



马占山

直到踏上桥面，日军仍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这让日军士兵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看来东北军真的放弃了。所以当日军接近江桥北岸，迎面忽然射来密集枪弹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崩溃的。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甚至不敢相信，对面还击的会是中国军队。



江桥抗战遗址

“放鬼子进100米距离，再给我狠狠地打！”这是桥对面中国守军在开战前接到的死命令。

下这道命令的，是当时的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

2

马占山，字秀芳，满族，1885年生人。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马占山的父母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个名字。但从他后来的发展经历来看，这个名字还真的很贴切。

马占山出身贫苦，七八岁的时候，给地主家当了个马倌，从此和马打上了交道，练了一手好骑术。

在马占山18岁那年，他放马把一匹马给弄丢了，结果被地主送进了官府，被打又被关，还赔了钱。那匹马后来自己跑回来了，但地主就是不退钱。马占山一怒之下，跑到附近的山上，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当起了土匪。

你看，以马为生，占山为王，“马占山”这个名字，像是度身定做。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在东北境内的土匪们活动空间也日益狭小。那时已经成为土匪头子的马占山，索性带领兄弟们下了山，接受了朝廷的收编。

被招安后的马占山，从一个哨长做起，跟随吴俊升一路升迁。这个

吴俊升是谁？是奉系军阀中的重要人物，一路跟随张作霖，并在皇姑屯跟着张大帅一起挨了日本人的炸弹，共赴黄泉。

哦，对了，吴俊升的外孙女，叫王薇薇，不过说“Vera Wang”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著名的“婚纱女王”。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马占山已经坐到了黑龙江黑河警备司令的位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在北平（“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自张学良以下，东北的主要首脑都不在东北岗位上，且看起来也没打算回去），张学良考虑再三，在10月决定任命马占山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

张学良起用马占山，确实是有考虑的。一方面，尽管马占山曾面见张学良，坚决反对“不抵抗”，但张学良始终不愿意与日本人正面冲突，甚至认为东北军是自己的“包袱”。但另一方面，老爸留传下来的东三省大好基业，就这么轻易败光，少帅又有点不甘心。

这个时候，让剽悍土匪出身，在东北军里又有根基和威望的马占山来稳一稳阵脚，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马占山这样一个土匪出身的人，就当上了一省主席。

当时，哪怕是东三省以闻所未闻的速度沦落，但从蒋介石到张学良，却一直都在“隐忍”，各方军政大员看两位大佬的眼色，也都是不知所措。只有土匪出身的马占山，根本就不管那么多，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后，他就当众宣称：

“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

3

马占山说到做到。

1931年11月4日在江桥打响的这一枪，不仅仅是有指挥、有系统的武装抗日第一枪，如果追溯的范围大一点，可以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马占山当时一共集结了大约2万人的部队，在江桥北岸设立了三道防线，准备和日本人殊死一搏。两个月来目睹国土家乡不断沦陷却被勒

令不放一枪的东北军汉子们，也早就憋足了一口气，人人不怕死，个个往前冲。

在这场战斗中，马占山确实显露出了军事指挥的天赋，机枪和步枪的配合（他的部队只有几门落后的山炮），骑兵的包抄和反冲锋等等，各种战术都运用得相当不错。更关键的是，马占山自己亲临一线，枪林弹雨，坚持不退。

但日本军队毕竟还是太凶悍了。



马占山当时的部队

在首攻受挫后，日本军队不断增兵，最后聚集在江桥的日本军队达到了3万人，并且配以飞机、大炮以及装甲车。

武器和人数都明显落在下风的马占山部队，从11月4日打到19日，足足坚守了半个月，最终因为伤亡过大，被迫撤出战斗。

但就是这场16天的战斗，让全国都知道了“马占山”这个名字。

当时的中国人，天天从报纸上看到国土不断沦丧的消息，忽然冒出一个敢打敢拼的马占山，顿时全国轰动。当时，国内各地报纸都以大字标题报道“江桥抗战”。全国各地群众自动组织慰问团、后援会，捐钱捐物，支援黑龙江省抗战。曾有一位苦工专门跑来捐献1块洋元给马将军，他表示自己一个月工资总共2元，愿意捐献一半。还有人跑到中国银行，拿出一条金链子，请银行代售捐给马将军。

当时，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组织“援马抗日团”，参加抗日队伍。上海的音乐家协会专门谱写了一首《马家军之歌》。

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陶行知先生特意创作《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4

在全国上下一片称赞马占山的声音中，事情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

一家卷烟厂当时还出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1932年2月，马占山向日本投降了。

关于马占山为什么要投降日本人，至今还有一些争议，但有些客观事实，是很明晰的：

第一，江桥抗战失败后，马占山一路退守，一路抵抗，打得相当艰

苦。而从江桥抗战开始，从蒋介石到张学良，虽然口头嘉勉不断，但从来没支援过马占山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蒋介石始终称马占山是“民族英雄”而不是“抗日英雄”，为的就是避免刺激日本。

第二，到了1932年1月的时候，孤立无援的马占山和他的部队其实已经撑不下去了，马占山当时面临两种结局：要么被日军全歼，要么部队哗变，作鸟兽散。

第三，从江桥抗战开始，以土肥原贤二（他的故事参见本书《“土肥圆”和“土肥原”》一文）为首的日本人就对马占山不断诱降，马占山不断拒绝。直到最后，马占山以“黑龙江省自治”为条件，答应出任伪黑龙江省主席，但拒绝在协议上落下一笔一字，原因是“我不识字”。



当时“江桥抗战”马占山的宣传画

原来大家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居然投降了？举国哗然！但还没等大家酝酿好情绪开始责骂马占山，这位土匪出身的将军，又做了一件让日本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1932年4月1日，马占山以检阅军队为名，带人秘密逃出齐齐哈尔，宣布重新抗日！

从马占山答应降日，到秘密出逃重新抗日，前后也就一个多月时间。

如果那时候有网络用语，估计很多人会大呼一声：这个弯转得太快！爸爸们的腰都闪断了！

马占山是不是“诈降”？

对此，后世也有一些争议，但同样有两个客观事实不容辩驳：

第一，就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神通广大的马占山秘密动用12辆卡车、6辆轿车，将2400万元的伪满洲币（相当于200万银元）、300匹战马及其他军需物资运出城外，成为日后重新抗日的重要物资和军饷来源。这和一些当时反复无常的军人有明显区别（比如石友三）。

第二，马占山重新举起抗日大旗后，确实是真刀真枪再次和日本人陷入苦战。因为遭到欺骗，日本关东军在1932年6月到7月间，对马占山部队先后进行了8次围剿，都被马占山一一化解。更让人惊叹的是，1932年11月，马占山组织四路大军，反攻齐齐哈尔。

在“九一八事变”过去一年多后，一支孤悬东北的义勇军，居然还有胆量、有血性反攻一个省会城市，居然一开始还打了不少胜仗（后来还是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种事情，恐怕只有马占山做得出来。

1932年12月初，弹尽粮绝的马占山，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无论如何，马占山和他的部队，实打实地在东北扛了一年多。

5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诸多实力派军人中，马占山没有因为要保存实力而选择退避，在和日本人拼光了自己的所有家底之后，属于他的时代，其实也已经过去了。

1933年6月，马占山由苏联绕道欧洲回国，抵达上海。48岁的他，依旧壮心不已，回国后就上了庐山，向蒋介石请缨抗日。

没有了自己的部队，他以为自己还能被委以重任。

没有悬念，马占山被蒋介石婉拒了。于是他索性回到天津，做起了寓公。做寓公的日子倒也清闲自在，唯有一件事要费点脑筋——要一直化解日本人对他的暗杀。

1936年，蒋介石忽然电召马占山去西安（其实是准备派他去打内战）。巧的是，马占山到西安的时候，正好发生了“西安事变”。土匪出身的马占山，在这件事的认知上，倒真的超越了他的年轻老上司、受过高等教育的张学良。马占山当时力劝张学良：“国难当头，勿杀害蒋介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52岁的马占山再一次奔赴南京请命。在被拖了一个多月后，蒋介石终于任命他为“东北挺进军”司令。但以当时的战局，华北、华东都在迅速沦丧，马占山这个“东北挺进军”司令有多大权力和多少军队，可想而知。

两年后，马占山被国民政府委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彼时，中部重镇武汉都已陷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给马占山的这个“主席”头衔，可能连“空头支票”都算不上。

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重新起用60岁的马占山，用于和共产党作战。马占山第一次带兵和共产党军队作战，就在平绥路柴沟堡一带被打得大败。不久，就称病避居北平。

1948年底，马占山、邓宝珊和傅作义三人经过多次商议，宣布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11月29日，前半生金戈铁马、后半生壮志未酬的马占山，因肺癌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65岁，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馒头说

我相信，当时的国民党体系里，肯定有很多人看不起马占山。

原因很简单：土匪出身，目不识丁。

但就是这样一个匪气十足的军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却敢站出来，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将来发展，只是毅然履行一个中国军人的职责。

民国时期其实有一些土匪出身的军人或军阀，浑身都是缺点，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是从来不含糊的。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东北王”张作霖。别看他五大三粗，但一直巧妙周旋在俄国与日本之间，不该做的事不做，应该保的国土都保。

是这些土匪更深明大义？更忧国忧民？更热血沸腾？

其实都不是。

他们信奉的道理很简单，往往就一句话：“不能愧对列祖列宗！”

有时候，光这一句话，就够了。

读者评论

明明：目不识丁也只是因为无法选择的出身，但在大是大非上的胸襟、眼界和气节，才是整个人自我的成长和修炼。

乔乔□□□：我爸最爱看《亮剑》，经常是这个台插播广告了，就换那个台看。我也陪爸爸看过一集，印象很深刻，就是双臂尽失的骑兵连连长，还在大喊着骑兵连冲锋，死于马下……泪水就流下来，这种惨烈，这种精神，我辈汗颜。（作者回复：中国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之一。）

刘莹：江桥就在我家门口，小时候经常在嫩江旁玩耍。可能家乡的很多人都说不清这座桥的历史，只是看它突兀地矗立在那里。虽然只是个引子，但还是感谢您提到了它。说到马占山的土匪出身和他的民族大义，不禁想起了《论语》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能做到形式和内容统一的人太少了，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愿意选择前者。

张勋这个人

这个人，总是和两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辫子"和"复辟"。

1

1917年7月5日这一天，北京城外的卢沟桥，有两支军队交上了火。

一方，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下干将曹锟率领的"讨逆军"第三师，另一方，其实也是北洋军，不过他们人人脑后留了一条辫子，统称为"辫子军"。

他们为什么要交火？

因为"辫子军"的统帅张勋，不久前刚在北京城请出了已经退位的清朝皇帝溥仪，宣布"中华民国"下课，"大清王朝"重新上台。

天下震怒。

"张勋复辟"这件事，在民国史上堪称一幕精彩绝伦却又荒诞不经的闹剧。但很多人记住了张勋的荒唐，却未必能回答一些问题：



张勋

为什么张勋有那么大的胆子复辟？

为什么张勋还真的就那么轻易复辟成功了？

为什么真的有这么些人愿意跟着张勋复辟？

为什么张勋好不容易复辟了，却一触即溃？

为什么闯了那么大祸，张勋还得了善终，而且风光下葬？

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很简单——了解张勋这个人就行。

张勋这个人啊，用五个字来形容他，不多不少，正好。

2

第一个字，是“勇”。

张勋，字少轩，江西省奉新县罗塘乡赤田村人，1854年10月25日出生。

张勋的童年并不幸福，早年父母就双双离开人世，他是跟着爷爷一起长大的。从小爷爷给他讲的，都是各种忠烈的故事。

1860年，太平军残部占领奉新县，张勋的爷爷被杀。张勋自此孤苦伶仃，被一许姓退休官员收留，在20岁的时候被推荐入伍。正所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当然，“书生”张勋是算不上的，他也只是陪许家少爷念了几年私塾，而且只是爱看忠烈故事。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张勋跟随湖南巡抚潘鼎新进入越南。张勋阵前不慌，听令到位，颇受潘鼎新赏识（也有人说他照顾潘鼎新也颇为到位），升为六品管带。

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张勋在东北率1000多名骑兵在大沙岭阻击日军，身先士卒，死战不退，激战三天后成功击退日军的进攻，声名鹊起。“张勋的部队战斗力最强”的说法，开始渐渐流传开来。

1895年10月，袁世凯受命组建“新军”，开始小站练兵，想起了有这么一个打仗不要命的张勋，于是将他招至麾下，给了个营长的职位。

自此，张勋进入了中国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北洋军。

张勋到底有多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革命党人群起响应。其他省份的清朝将领大多顺水推舟，宣布独立，但当时身为江南提督的张勋却死守南京，面对士气旺盛的革命军“江浙联军”，居然硬碰硬死扛了整整一个月，导致“南京战役”成了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所以说，有的人说张勋是平步青云，但一没文化，二没背景，三没钱财的张勋后来能爬那么高，哪有那么容易？

没有点拼命三郎的狠劲，张勋冒不出来。

3

但光有一身勇劲，一个人往前冲，早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张勋能一步步被提拔上来，肯定还有他其他的特点。

那就是第二个字：义。

张勋带兵其实未必有什么谋略，但他讲义气。举两个例子。

中法之战的时候，张勋立了战功，广西提督苏元春赏了他两坛好酒。第二天，张勋手下的士兵在一条小溪中洗澡，忽然发现溪水酒香扑鼻，一看，是张勋命人在小溪上游将两坛酒都倒入溪水中，让手下这支部队都在酒香中洗个舒服澡。

甲午之战的时候，张勋亲自率卫队督战，一名士兵左臂动脉血管被打穿，张勋跳下马来，从自己兜里拿出皇上御赐的鼻烟壶，敲碎，将里面放的一些名贵药材敷在士兵伤口上。旁边人惊呼：“这鼻烟壶可是御赐啊！”张勋骂道：“妈的什么御赐！救人要紧！”那名士兵大为感动，立刻挣扎着又要返回前线。

张勋待手下的官兵很好，从不克扣粮饷，所以他的部队非常稳定，甚至出现父子兵同时在他部队服役的情况（但后来发展过头，张勋对部下极为纵容，所以张勋部队日常的军纪非常差，对老百姓奸淫掳掠时常发生）。

张勋对老家也很好。他发迹之后，只要是老家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当时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学子，张勋都会给予奖学金，如果是奉新县出来的大学生，张勋将他们的吃穿用全包。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共产党的方志敏、张国焘、许德珩等都曾受到过张勋的资助。而对当年收养他的许家，张勋一生感恩，许家的人一律安排得很好。

还有就是哥们儿义气了。

张勋不是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而是以“经验丰富的基层军事干部”进入袁世凯的北洋体系的，所以相对于段祺瑞那批核心圈子而言，他并不是嫡系。

虽然没进核心圈子，但张勋为人豪爽，对待诸位兄弟挥金如土，又讲义气，再加上年长几岁，所以那批北洋将领都尊称他一声“老大哥”。

至于他后来真的以为自己是“老大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4

有勇有义，张勋是不是还缺了个什么？

没错，那就是第三个字：“忠”。

这个“忠”字，可以说影响了张勋的一生。

之前就已说过，童年时的那些忠烈故事深深影响了张勋，所以他入伍后又勇又忠，也是他晋升很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他既然进入的是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就应该对袁世凯忠心耿耿，怎么对大清王室如此肝脑涂地呢？

这还是得怪袁世凯。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后来发现洋大人们没打算治她的罪，所以又班师回朝。负责接驾回京的，就是张勋——他是被袁世凯派来执行这个任务的，当时还只是个团长。

能有机会服侍当今圣上和比圣上还“圣上”的太后，那还了得？

张勋一路上鞍前马后，照顾得无微不至，晚上亲自为慈禧站岗，给慈禧留下了良好印象。慈禧是何等人物？国难当头，最难找的就是忠勇之人，所以慈禧也一直对张勋多有奖赏，让张勋受宠若惊，从此以能护卫皇室为荣。

1908年，光绪和慈禧在两日内相继归西，据说张勋长跪痛哭整日，两次流出的眼泪都是血水。

1911年，57岁的张勋被任命为江南提督，虽然这一年大清王朝即将走向终点，此时的一个“提督”与以前的“提督”分量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于平民孤儿出身，能在短短时间内就升任到“提督”一职的张勋而言，那也是万分荣耀的大事。

所以，武昌起义后张勋率部死守南京，固然说明他的勇，也说明了他的忠——他必须要效忠清王朝，因为那是曾给予他一生荣耀的恩主。

南京战败，张勋退入徐州，从此割据一方。作为为数不多的他还能做的效忠行为，他命令自己的部队一律不许剪辫子。

所以，张勋的部队，在那时候被称为“辫子军”，而他自己，被称为“辫帅”。



张勋手下的“辫子军”

5

如果说张勋只有“勇”“义”“忠”三个字，那他这辈子，就在徐州念叨着“皇恩浩荡”，也就过去了。

但他偏偏还有第四个字："妄"。

张勋的这个"妄"，不仅影响了自己，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史。

先来看看当时的背景：1917年，袁世凯死后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握有实权的"北洋之虎"段祺瑞把徒有虚名的"大总统"位置让给了黎元洪，自己占了国务院总理的位置。



黎元洪（左）和段祺瑞

一个占了法统，一个领了实权，著名的民国"府院之争"（总统府和国务院）由此展开。结果为了是否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德国宣战，两股势力彻底闹掰，段祺瑞宣布辞去总理职务（他支持宣战）。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两个人背后都有多股势力在博弈，水深得很。但有一个人就敢大大咧咧地站出来：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的吧！

这个人，就是张勋。

张勋一非北洋嫡系，二非北洋军阀里实力最强的（手下一共只有2.5万人左右），三非北洋军阀里官最大的（也就算是个“安徽督军”），但他就敢当这个“老大哥”，敢在徐州召开四次各省督军会议，最后还敢当上一个“十三省督军总盟主”。

然后，他就以“总盟主”的身份，向北京发出声音：都别吵了！让我来调停吧！

你说张勋是真的傻？他可不这么认为，他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借“调停”之名进到北京，迎出溥仪，恢复大清！

但他还真的是傻：他总觉得他的这点小九九，人家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都是拥护的——皇恩浩荡，谁不念恩？

他把自己的想法，在徐州和自己的那些“生死兄弟”——各省的督军——都交了底，大家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唯唯诺诺，有的笑而不语。其中有一个人，就动了心思。

这个人叫徐树铮，他是段祺瑞的心腹谋士，在民国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他当过国务院秘书长，是外蒙古当时回归中国的关键人物，后被冯玉祥派人枪杀。

在段祺瑞看来，张勋要复辟，简直是痴人说梦。但徐树铮劝住了他：千万别阻止这位“老大哥”！

这就是张勋“妄”的地方——他以为他的忠义大旗一举，天下肯定群起响应！

但他根本料想不到，人家不会响应还罢了，还准备把他当棋子用。

1917年6月30日，张勋率5000名“辫子军”进京“调停”所谓的“府院之争”，屁股还没坐热，7月1日凌晨3点，就进了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对着当时11岁的溥仪三跪九叩，恭请“皇上复位”。溥仪在师傅陈宝琛的教导下，先是推辞了一次，然后“勉为答应”，宣布“共和解体”，自己“亲临朝政”。

随后，被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顺带还被封了

个“忠勇亲王”的张勋通电全国，宣布共和国解体，各地应该重新悬挂黄龙旗。

张勋在复辟前请来了之前在海外流亡的康有为一起造势。复辟之后，康有为满心以为自己会受封“内阁大学士”，结果清朝皇室认为本朝没出过不长长胡子的大学士，据说康有为专门去买了生发胶水涂抹。后来张勋封了康有为一个弼德院（相当于一个顾问机构）副院长，康有为大为不满，痛骂张勋。张勋知道后反骂康有为：他什么事情都没做，就想捞个大官，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这一通电，民众果然如同张勋想象的那样“沸腾”了：当时的北大教授李大钊直接就离开北京去了上海，鲁迅立刻去教育部辞职表示抗议，孙中山开始在南方组建军队准备讨伐，黎元洪死也不肯接受“一等公”的封爵，躲起来了……

当然，段祺瑞可不会躲，他正掐着秒表等着张勋复辟呢。

张勋复辟通电一出，段祺瑞立刻开始行动：7月3日在天津马厂誓师，组成讨伐张勋的“讨逆军”，7月4日发布“讨逆檄文”，7月5日直接开到北京附近与“辫子军”交上了火。

面对全国上下一片反对声，张勋惊了：你们当初不都是默认的吗？尤其是这个段祺瑞，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张勋复辟后的北京城，又挂起了黄龙旗

段祺瑞可不管这些。7月5日两军开始交火，仅仅一周，“辫子军”就全线崩溃，不少张勋的士兵是自己割了辫子去投降了。

张勋一开始还死撑着在自己的宅子里不肯撤，依靠亲卫队做最后抵抗。段祺瑞吩咐人打一排空心炮弹进去，但里面放一颗实弹。

一发炮弹响，张勋决定放弃抵抗，躲进了荷兰使馆。

溥仪皇帝随即又宣布退位。

整个复辟行动，前后加在一起，一共12天。

6

最后就要说说张勋的第五个字：“运”。

“运”就是运气，张勋这人，运气真的不错。

有人可能会说，张勋复辟失败了，还叫运气不错？那是运气太差了啊！

拜托，什么叫运气差？就是做一件事差一点点成功了，最后功败垂成，才叫运气差。张勋的整个复辟行动，从头到尾，就不可能成功，和运气又有何关系？

张勋一生的运气，在于他娶了一个好老婆。

张勋一生好色，纳过10个妾，但始终对“正室”恭恭敬敬，因为那是他落魄时的发妻。他的这位妻子叫曹琴，和张勋共过患难，张勋一直对她言听计从。

但是，在复辟这件事上，张勋和自己老婆闹了别扭。筹划复辟的那段时间，张勋整天与人密谋，而曹琴每天都在反复劝他这件事千万做不得。

据《复辟始末记》（上海文艺编译社出版，1917年）的记载，在被张勋训斥了好几次之后，曹琴就派了自己一个最靠得住的侄子，拿了30万两银票，去广州拜会了孙中山，表示这钱是送给他支持革命的——她在为张勋留后路。

复辟失败后，北洋军阀倒也没拿张勋怎么样——说穿了，大家都知道他只是一个愚忠的妄人，只是对他监视居住。1918年，代总统冯国璋宣布特赦张勋，从此他又恢复了自由，不问政事。

但恢复了自由后，没钱怎么生活？这又要靠他老婆曹琴了。

曹琴极其精明能干，特别会投资理财，她把张勋的那些积蓄盘得风生水起。张勋晚年生活在天津，他名下独资或投资经营的当铺、电影公司、银行、钱庄、金店、工厂、商店等企业有70多家，资产超过5000万元。

在天津的张家，用人不下百余，花匠、木匠、厨子、司机、丫鬟、仆人等分门别类，每天张勋吃的、用的、抽的，无不精细奢华。张勋喜欢看戏，每年三节两寿，张家总要搭台唱戏，各路门客、食客拜访，门庭若市。

1922年，张勋做七十大寿（提前做寿），京剧界数得出的名角，如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在80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的带领下，到天津的张家花园给张勋祝寿。光孙菊仙的出场费，张勋就甩出了600大洋，把孙菊仙感动得老泪横流：“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

1923年9月12日，张勋因病在天津逝世，终年69岁。逊帝溥仪赐谥“忠武”。



张勋晚年抱着小妾给他生的儿子

有意思的是，虽然是“复辟闹剧”的“总导演”，但张勋逝世后，政界闻人和文化名流纷纷致电哀挽，祭文、哀诗和挽联不计其数，无论是黎元洪还是段祺瑞，冯国璋还是张作霖，都对他的“忠”大加赞美。

张勋的葬礼据说耗费10万大洋，灵柩最后被运回老家江西奉新安葬，无数江西百姓自发相送，成为当年在江西地方上最为轰动的大事之一。

当然，张勋还是带着他的那根辫子下葬的。

馒头说

张勋复辟那12天前后的北京城，真是挺有意思的。

先是街头巷尾都在传：“大清朝又回来了！”那些大清遗老都兴奋地走上街，开始庆祝。全城有两类店的货物立刻卖到脱销：一类是卖黄龙旗的，一类是卖假辫子的。

据说假辫子后来能卖到三两银子一条，还买不到。黄龙旗最后卖完了，很多人就拿了纸糊的黄龙旗挂在门口敷衍了事。

然后，12天一过，情况又逆转了。

街头巷尾都在传：“大清的皇帝又退位了！”然后那些大清遗老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满大街的黄龙旗又都被拉了下来，马路上到处是被人踩在脚下、没人肯捡的假辫子。

清末民国的怪儒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但他一直留着辫子不肯剪。

他到北大上课，因为留辫子被不少学生嗤笑，辜鸿铭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但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这句话，不仅当时适用，可能放到今天都适用啊。

读者评论

江南烟雨：张勋“忠”也好，“义”也罢，终是逆潮流而动、违民族之大势。如果活得长些，抗战时代才是真正检验他人品的时候……（作者回复：那他绝对不会做汉奸的，这我相信。）

Grace：“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但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看到这，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小时候被放进课文的鲁迅我读不懂，现在再看，愿我们都成为没有辫子的自己。

Chris同学：张勋简直就是中国传统旧式军人的典范啊！拿中国传统

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衡量他，真是这个标准下的产物啊！

陈建泽：文中提到张勋复辟好像是被人利用，他的复辟对段祺瑞来说有什么好处吗？（作者回复：段祺瑞本来已经辞职离开北京了，张勋攻入北京，赶走了黎元洪，然后段祺瑞打败张勋，以“三造共和”的姿态出现。黎元洪引咎辞职，段祺瑞重新回到权力舞台。）

或许我们长大后，才能读懂他的童话

在我们的印象里，所谓童话，总是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是，他改变了我们的认知。

1

在丹麦哥本哈根的长堤公园，有一座举世闻名的铜像。

这个铜像，不是将军，不是伟人，而是一尊小美人鱼。

这尊小美人鱼，是一位作家笔下的一个虚构形象。很多国家都有自己伟大的作家，但很少有一个国家，能直接被人与一个作家的名字关联在一起——

丹麦，安徒生。

2

1805年，安徒生出生在丹麦欧登塞镇的一个鞋匠家里。



安徒生

和当时欧洲的很多小镇一样，欧登塞镇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那里的居民相信上帝，也相信女巫，更相信各种流传的神秘故事。在长辈们口耳相传的各种神奇鬼怪故事里，安徒生从小就被埋下了一颗对世界充满想象和好奇的种子。

安徒生的家里相当贫困，以至他的鞋匠父亲在1813年参加了军队，努力去多挣几个钱。当时丹麦和法国是盟国，安徒生的父亲成了伟大的拿破仑皇帝——虽然已是强弩之末——的雇佣军中的一员。但是，父亲显然没有享受到神圣法兰西帝国的荣光，两年后，他带着一身疾病回到了家里，很快就去世了。

安徒生的母亲从此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但她没有别的技能，只能帮人家洗衣服。冬天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河水，逼得安徒生的母亲只能靠喝两口酒来御寒。但这在“体面人”的眼里，是一种相当粗俗的行为，镇上的人开始议论纷纷：这是个嗜酒如命的女人。

这段给安徒生童年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成了他后来的童话《她是一个废物》的原型。在童话的结尾，那位喝酒的洗衣妇最后死在了冰冷

的河水中，流着眼泪的儿子问妈妈的朋友："人们说她是一个废物，这是真的吗？""不，她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

生活的巨大压力，使得安徒生11岁就到工厂当起了童工。在工厂里，孱弱的安徒生既没有力气，又没有技能，但在工歇的时候，他的一项天赋让比他大得多的工友们啧啧称奇——他清澈嘹亮的嗓音。

安徒生的歌声使得他在工厂里变得小有名气，也使幼小的他改变了自己的志向——妈妈原来安排他去做一名裁缝，但他立志要成为一名舞台上的歌剧演员。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乃至争吵之后，无奈的母亲最终同意自己14岁的儿子独自前往首都哥本哈根，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1819年，高瘦的安徒生揣着30个银毫子上路了，随身携带的还有他心爱的木偶，那是爸爸在他童年时给他做的。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许下誓言：

那时候，在一些地理书中，在欧登塞的名字下，将会出现这样一行字：一个瘦高的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里出生！

当然，那时候他自己不会知道，何止欧登塞，何止哥本哈根，何止丹麦，全世界后来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建筑物对面，立着安徒生的铜像

如你们所料，安徒生在哥本哈根发展得并不理想。

他想去演歌剧，但没有一个歌剧院的经理愿意要他，他想去学芭蕾，同样吃到了一次次闭门羹。好不容易进入了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希伯尼教授开办的歌唱培训班，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毁了他的声线——他再也不能唱歌了。

于是，安徒生决定开始写作。

虽然安徒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从小熟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感觉。1822年，安徒生的剧本《阿尔芙索尔》引起了哥本哈根评论家们的注意。这部作品粗糙，韵律错误极多，还有不少语法错误，但有很多新奇的构思和想法。

因为这个剧本，17岁的安徒生获得了免费就读教会学校学习拉丁文的机会，并在1828年升入了哥本哈根大学。



《打火匣》的插画。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版本的所有插画（《安徒生童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叶君健译）

真正让安徒生成名的，是他在183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这部小说成了安徒生成人文学的代表作，并为他后来申请到了国家非公职人员津贴。

也正是在那一年，安徒生还出版了一部童话集。

时至今日，没有多少人知道《即兴诗人》到底写了什么，但几乎每个人都熟悉安徒生第一部童话集中收录的四部作品，它们是《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公主》《小意达的花儿》。

这实在是一件让人庆幸的事：一部长篇小说并没有引起安徒生太大的兴趣，而四篇童话让他从此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就在那一年的元旦，30岁的安徒生在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现在要开始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你要知道，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

很好。再见吧，成人文学作家安徒生。

欢迎！童话作家安徒生。

4

安徒生的童话创作经历，明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35年到1845年这10年，也就是安徒生从30岁到40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安徒生的童话，虽然已经有了不一样的东西，但基本还是沿着传统童话的老路子：《打火匣》《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这类童话，明显集合了探险、英雄、幻想、植物和动物的拟人化等各种要素。

当然，安徒生这一阶段的童话，已经让人耳目一新。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些其他童话里很少见的描写，在这一阶段的安徒生作品中开始表现出来。且不说用意明显的《皇帝的新装》《豌豆公主》这类童话，哪怕只是以讲述冒险和奇遇的《打火匣》或《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也不忘来上几句讽刺——有钱就有朋友、没钱就没朋友的士兵，以及背了个装人的袋子准备去沉河，却以为去教堂读了首圣诗就会有好报的大克劳斯。

第二个阶段是1845年到1852年，安徒生的笔法明显开始写实起来。《影子》《母亲的故事》这类作品，浪漫主义的成分开始减少，写实的手法开始增多。代表作之一《卖火柴的小女孩》，虽然是童话，却又如此写实，描述可以如此华美，结局却如此凄凉。

第三个阶段，是1852年之后。到了这个阶段，与其说安徒生在创作童话，倒不如说他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故事。《柳树下的梦》《单身汉的睡帽》这类作品，都是一个个故事。像《她是一个废物》这样的作品，你真的很难称之为“童话”了。



《拇指姑娘》的插画



《豌豆公主》的插画

这当然和安徒生一生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他那绝对称不上幸福的童年、拼搏的青年，以及，他从没有得到过的爱情。

安徒生一度被怀疑在性取向上和普通人不一样，因为他终身未娶。

但事实是，种种迹象表明，安徒生其实一直渴望与异性的爱情。

从25岁到38岁，安徒生其实爱慕过很多女性。这些女性的出身都很不错，有丹麦皇家剧院院长的女儿、著名物理学家的女儿、瑞典伯爵的女儿、瑞典著名女歌唱家等。

那为什么安徒生终身未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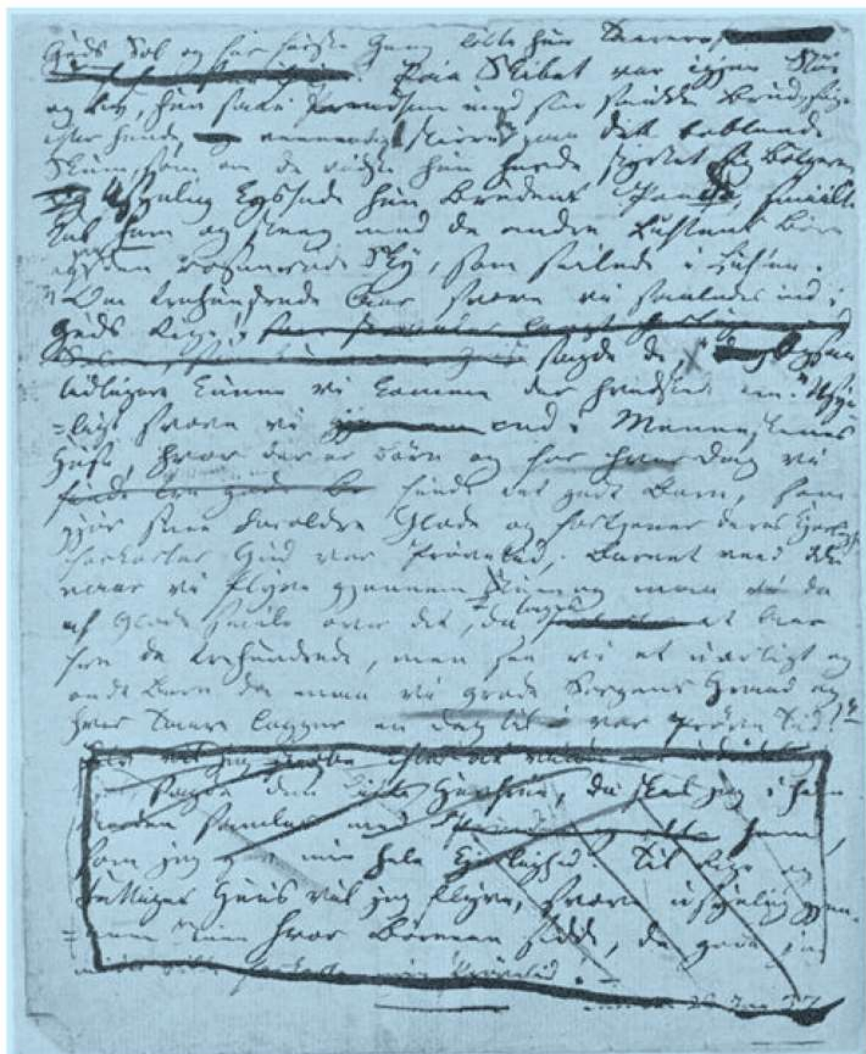
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己“又丑又穷”。



安徒生

关于安徒生的相貌，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人认为他长得确实难看，但也有人认为安徒生并不丑，甚至“越长越漂亮”，比如丹麦画家克里斯蒂安·萨特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安徒生“有一副令人印象深刻的漂亮外表”。而且，安徒生身高186厘米，典型的身高马大。

那么穷呢？30岁起，安徒生就出版了让他成名的小说《即兴诗人》以及第一部童话集，在他享有国家津贴的同时，每年出版的童话的稿费，虽不至于让他大富大贵，但过小康日子是绰绰有余的。



《海的女儿》最初的手稿

也有人猜测，是安徒生的一次童年经历，给他留下了巨大的阴影。童年的安徒生有一次去祖母干活的老人收容所里玩，看到了一个精神失常的裸体女人向他冲过来，把他吓得半死。

在安徒生27岁时写的一部自传里，他提到过“对超过20岁的女孩总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厌恶感，和她们在一起，我真的会发抖”。这也可能是他后来所爱慕的对象，都比他小10岁甚至15岁的原因之一。

安徒生在临终前不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为自己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拒绝了自己的幸福，并且错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那时，无论想象是怎样有力、如何光辉，它还是应该让位给现实的。”

他为何拒绝幸福，拒绝了怎样的幸福，至今人们还是不太清楚。人们只是知道，《海的女儿》这部作品，其实投射了安徒生对爱情的看法和期待，以及他对爱情的惶恐。

在这部作品中，他并不是那位王子，而是那个小小的、不为人知的美人鱼。

6

安徒生的作品，很多都投射了自己的影子。

众所周知的《丑小鸭》便是其中之一。而更完整、更透彻的，是他晚年的作品《幸运的贝儿》。

这是一篇长达183页的童话（原始版本），作为单行本在1870年出版。在这个童话里，主人公贝儿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父亲是仓库看守人，母亲是洗衣工。贝儿通过自己顽强的奋斗和拼搏，最终实现了成为一名歌唱家的梦想。在一次赢得所有人的掌声和认可的演出后，贝儿死在了舞台上。

童话的最后一段描述是这样的：

“死了！”这是一个回音。在胜利的快乐中死了，像索福克勒斯在奥林匹亚竞技的时候一样，像多瓦尔生在剧院里听贝多芬的交响乐的时候一样。

他心里的一根动脉管爆炸了；像闪电似的，他在这儿的日子结束了——在人间的欢乐中，在完成了他对人间的任务以后，没有丝毫苦痛地结束了。他比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幸运！

毫无疑问，这是安徒生自己一生的投射，而贝儿的归宿，是他所认为的最完美的人生结局。

不过事实上，安徒生死得很平静。

1875年8月4日，他在一个商人朋友家喝完了早茶，在床上静静地躺着，去世了（一说是患了肺癌）。

在去世前不久，安徒生对准备为他谱写葬礼进行曲的乐师说：

给我送殡的人，多数都会是小孩子。进行曲的节拍，最好配合细小的脚步。

馒头说

很幸运，妈妈在我刚识字的时候，就给我买了本《安徒生童话》，叶君健先生的译本（叶先生曾被丹麦女王授予“丹麦国旗勋章”，《安徒生童话》有80多种文字译本，叶先生是唯一一个受此奖励的译者）。

但同时也有点“不幸”，我在本该读“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年纪，读到了安徒生的童话。

那个年纪的我，完全不想看第二遍《海的女儿》，因为那太悲伤了，也不喜欢《卖火柴的小女孩》，因为太凄惨了。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个坚定的锡兵，最后要被熔化得只剩一颗心；也不知道那个垫了二十层床垫的公主，为什么就是真正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们啊，你们为什么第二天就真的会变得更加枯萎？

至于《丑小鸭》，我曾得意地认为自己找到了可以嘲笑安徒生的理由：得了吧，和努力有什么关系？你能成为天鹅，那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只天鹅啊！而那篇《红舞鞋》，我的天哪！这是恐怖小说吧？！

是的，那时候，真的不太懂安徒生的童话。

随着渐渐长大，再读安徒生，真的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小美人鱼的憧憬与泡沫，小女孩的幻象与火柴，锡兵的坚定与牺牲，这些在现实的社会中我们都曾遭遇，甚至更伟大、更凄美、更震撼、更残酷。

小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安徒生的真实，甚至“残忍”，但其实，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作品中的浪漫、勇气、顽强、坚定所感染。丑小鸭真的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吗？并不是。“天鹅”只是一种象征和比喻，不是隐喻你爹是谁，而是隐喻你自身的才华和能力、信念和决心。

我自己还是挺感谢安徒生的。

在我们幼小的时候，他用童话，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成人世界的窗。

在我们长大面对真实的社会之后，他又用童话，给我们留下了一道保持初心的门。

读者评论

瑞雪：我小时候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好多童话里皇后都死了，然后小公主的悲剧就开始了。其实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现实也许残酷，但并非不可战胜！安徒生的牺牲在于他以一种近乎刻意拒绝幸福的姿态，写出了这么多引人思考的故事。

Youyl：长大后还会感动，才能看懂的童话！喜欢他故事里淡淡的忧伤和浓郁的爱，最爱《海的女儿》和《沼泽王的女儿》，像我们自己的生活，弥漫着忧伤与无奈，但不能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对处在低谷期的自己喊声加油！

帮主：我的父亲和叶君健爷爷的儿子是好朋友，所以我小时候经常去叶爷爷家玩。那是一位亲切温和而睿智的老人。令人遗憾的是，经历了多次搬家，我竟没有留下一本《安徒生童话集》。

鲁迅背后的两位女性

对于爱情来说，有一个很无奈的结局，叫“有实无名”。

对于婚姻来说，有一个很悲剧的状态，叫“有名无实”。

这两种状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似乎一直都存在。

1

1968年3月8日，中南海钓鱼台。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带队，带着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和秘书冯正午，当着江青的面，打开了4个大箱子。

箱子里，装的是之前离奇“失踪”的全部鲁迅手稿。

经查，这4箱手稿是江青私自让戚本禹从文化部调取过来的。找到这4箱手稿，终于让傅崇碧等人松了一口气（他本人后来因此事被江青打击报复，引出军队体系一场大风波）。

但就在5天前，有一位女士却已经因此事而逝世。

因为在发现鲁迅手稿失踪后，她心急如焚，连夜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彻查真相。在送这封信的过程中，她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70岁。

这位女士，就是鲁迅的伴侣，许广平。

2

故事，还是从1898年说起吧。

这一年的2月12日，许广平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士大夫家庭里。

说许广平“家世显赫”，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其祖父许应骙被慈禧太后认作干儿子，获赐可在宫中骑马，官至浙江巡抚（相当于浙江省省长）。

及至许广平父亲一辈，家道中落，但广州许家，依旧是名门望族，家里英才辈出：反英军入广州城斗争的功臣许祥光、有“许青天”之称的许应镕、廉洁清官许应锵、辛亥革命元老许崇灏、有“铁血将军”之称的东征名将许济、红军名将许卓、著名教育家许崇清等。



许广平

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许崇智。作为民国前半段绕不过去的名人之一，许崇智是黄埔军校的创立人，也是粤军总司令。他是许广平的堂兄。

许广平的父亲许炳枟是庶出，在许家这个大家族中地位不高，一生也没取得功名。不过这反而让许炳枟比较开明，传递到女儿许广平身上，倒成了一件好事——在那个时代，许广平居然被允许像男孩子一样读书、上学，甚至可以不缠足。

这也对许广平的性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18年，许广平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一年后的1919年，许广平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发表了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1922年，在短期担任小学教师之后，许广平考入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4年改名“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也就是在那里，她遇见了鲁迅。

3

1923年7月到1926年8月，鲁迅在该校兼任国文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当时习惯坐在第一排听课的许广平，后来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鲁迅时的情景：

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著，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

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许多补钉，则炫著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遮盖不住了。

……

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

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著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著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一开始，许广平和鲁迅只是师生关系。这样的关系，维持了一年多。

1925年3月11日，女子师范大学发起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寻求理解和支持，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这封信，连同后来的134封两人之间的来信，被编为《两地书》。

通信一个多月之后，在4月10日的一封信中，许广平的署名已经是“小鬼许广平”了。而在4月12日拜访过鲁迅居所之后，在16日的信中，许广平已经用了“‘秘密窝’居然探检过了！”这样的语气。



鲁迅

可以看出，这样的语气和通信氛围，已经慢慢超越了师生之情。

1925年10月20日晚，在鲁迅寓所的工作室里，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许广平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向许广平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

鲁迅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羞涩一笑。

27岁的许广平和44岁的鲁迅终于走到了一起。

4

1927年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了上海，住进了景云里23号。

但是，两个人没有住在一起。

在景云里，鲁迅住二楼，许广平住三楼。而且，鲁迅二楼的住处，放的是一张单人床。对外，鲁迅一直说许广平是帮助自己校对文稿的助手。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助手不仅住进了鲁迅家，而且亲朋好友宴请鲁迅时，都会同时邀请许广平——鲁迅的一些学生，其时已经开始称许广平为“师母”了。

鲁迅为什么还要那样做？

于是，就要说到另一位女性，朱安。

朱安也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做过县令一类的官。但没有许广平那样幸运，朱安的家庭非常守旧，完全是按照一个旧式女子的规范，去培养朱安的——如果还能用“培养”两个字的话。

据朱安自己的回忆，小时候缠足，她疼得大哭，但母亲告诉她：“好人家的女儿都是要缠足的！”等到要读书的年纪，父亲又告诉她：“女子无才便是德，好好的女孩子，读什么书，那些诗词唱曲的，没的把心念野了。”

所以，朱安没有上过一天学，识字也不多，她所需要做的，就是乖乖地学些女红、烹饪等持家的活计，做大家眼里的“好人家的女子”。



朱安

很快，朱安就到了适婚年纪。朱安的和顺恭谨是出了名的，于是周家老太太就将她定为自家的儿媳。周家虽然家道中落，但在当时也算是体面人家，所以朱家也是同意的。

在整个定亲过程中，两家人征询了不少人的意见，但唯独没有问过未来的新郎和新娘的意见——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1906年6月，当时在日本仙台留学的鲁迅，忽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说是病重，让他速速返国。鲁迅一回到家，却发现家里张灯结彩，原来，母亲把他骗了回来，是为他安排娶亲。新娘，就是朱安。

多少有些出乎大家的预料，婚礼时，鲁迅没有半点反抗，他戴上假辫（因留日后他已剪去辫子），带了红缨大帽，按照当地仪式，在新台门的神堂上，与朱安双双拜了堂，然后任由人扶着，去了新房。

只是那个新婚之夜，鲁迅通宵达旦地看书。第二天，就搬到母亲的房里睡了。再过数天，就回日本继续求学去了。

后来，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这是母亲给我的一

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按照鲁迅的解释，他这样做，一是为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二是不忍让朱安做牺牲，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三是他当时有个错觉，在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谁结婚都无所谓。

在许广平进入鲁迅的生活之前，鲁迅就和朱安做了20年“名存实亡”的夫妻。鲁迅一直在外，朱安就一如传统的绍兴太太般地做着家务，奉养着母亲。

5

但是，许广平的出现，不可能不引起朱安的内心波动。

在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朱安租住的砖塔胡同“二房东”之一俞芳，曾这样回忆自己和朱安的一段对话：

俞芳对朱安说：“大先生和许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想不到。”

朱安回答：“我是早想到了的。”

俞芳问：“为什么？”

朱安回答：“你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

俞芳问：“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朱安说了一段这样的话：“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俞芳回忆，朱安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

但让朱安这只“蜗牛”彻底绝望的事随后还是发生了：许广平怀孕了。

在鲁迅与许广平的孩子周海婴诞生后，鲁迅的母亲自然很高兴，但朱安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于是婆婆狠狠地批评了她：有个孩子有什么不

好？

于是，朱安也不敢不高兴了，相反，她慢慢认了命，又高兴起来。她开始把周海婴当作自己的儿子，自我安慰死后好歹有个子嗣祭奠她，不至于让她做孤魂野鬼。

朱安对周海婴的想念，是通过人代笔写信（她识字不多）向许广平表达的：“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听说海婴研究无线电颇有心得，凡人有一技之长，便可立足，也很好的。”



鲁迅、许广平和他们的儿子周海婴合影

等到周海婴十五六岁时，朱安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还问他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

但是，直到朱安去世，她也没有见过周海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

之后，许广平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整理鲁迅作品的事业中。1937年4月，她将鲁迅1934-1936年的杂文13篇编成《夜记》出版。又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及《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书。11月上海沦陷后，为了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许广平留在上海。1938年4月，她又编成了《集外集拾遗》。

留在上海，也给许广平带来了麻烦。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美国宣战。次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12月14日凌晨5时，许广平在寓所被捕，先被关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然后又被转送到汪伪的特务机关“76号魔窟”。

因为许广平是鲁迅的伴侣，了解熟悉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名人，所以日本人希望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将进步的上海文化名人一网打尽。

在狱中，面对打骂、断食、拷打甚至电刑等各种折磨，许广平始终没有屈服，一字不吐。在关押了76天后，无奈的日本人最终让内山书店把许广平保释了。许广平曾说：“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

与此同时，朱安的生活境遇也不好。

独守空房侍奉婆婆的朱安，晚年也陷入了穷苦困境。她甚至准备卖掉鲁迅的遗稿，这一行为引来了各方的反对。温顺的朱安第一次情绪激动地为自己辩护：

“你们总说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难道我不是鲁迅先生的遗产吗？！”



晚年的朱安

这时候，是许广平一封封信写给了她，一笔笔款汇给了她（当时许广平自己也不宽裕）。

在鲁迅去世后，朱安一直拒绝别人的接济，包括周作人的钱（她知道丈夫与周作人关系不睦，且后来周作人在汪伪政府任职），却一直乐于接受许广平汇寄的生活费。朱安也对人说：“许小姐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

1947年6月29日，69岁的朱安孤独去世，临走前身边没有一人。

许广平当时无法赴京，汇钱托朋友为朱安办了丧事。但是，朱安生前希望葬在鲁迅身旁的愿望，没有达成。

7

最后，再回到许广平和朱安。

鲁迅去世后3个月，上海文化界同人拟印一本鲁迅纪念集，大家认为书中应有一份“鲁迅年谱”。当时决定，民国以前由周作人写，南京和北京时期由鲁迅好友许寿裳写，上海部分由许广平写，最后由许寿裳汇总。

许寿裳并不打算回避鲁迅的婚姻和爱情生活的史实，但出于礼貌，他先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谅

察。”

当时，许寿裳的年谱初稿是这样写的：“（民国）前六年，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民国）十六年，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

许广平收到年谱初稿后，马上将自己写的一份初稿，寄给当时在北平的许寿裳，并附了一封信：“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彼此间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要有任何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

她并不同意许寿裳好心在初稿里写下的“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这样的说法。

在接到许广平的回信后，许寿裳按照她给的初稿，把年谱改为：“（民国）十六年，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外还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妇委会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职。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当时的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给国家有关部门。

在许广平自己的笔下，也没有回避朱安。

在朱安去世一年之后，许广平写了一篇散文，里面写道：“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

曾智中的《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许广平写下的这句话：“世事茫茫，人间沧桑，第一个在作品中为朱安留下姓名的，是许广平。”

馒头说

1919年，鲁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自己对包办婚姻的态度：“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他认为，自己为封建礼教做出了牺牲。

不过，胡适对这点倒不这么看。

胡适与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也是母亲包办的，一直没有（也不敢）离婚。但他在回答别人评价他是做出“牺牲”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当然，胡适一直是比较会说话的。

朱安“有名无实”，活了69岁，其中40多年是独守空房，去世后连块墓碑都没有。但她一直尽心侍奉鲁迅家中的老人，也从没有说过鲁迅乃至许广平的半句坏话。

许广平“有实无名”，在鲁迅生命最后的十年，她在生活上对其精心照料，在精神上全力支持。在鲁迅去世后，许广平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整理他的作品，还曾身陷魔窟，遭受刑罚。最终，也是因为鲁迅的作品而意外逝世。

诚然，鲁迅先生铮铮傲骨，妙手文章，洞人心，启民智，俯首甘为孺子牛。从感情方面来讲，他确实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但比起他身后的两位女性，至少在感情方面，牺牲最大的，肯定不是鲁迅。

读者评论

天使：觉得胡适老婆很厉害的，很泼辣，正是她的泼辣保护了她的婚姻，所以我觉得泼辣很好！！！（作者回复：那也是要碰到的是胡适。）

桃子：若牺牲是指有一个保姆式妻子在老家照顾老母、老宅，使他无后顾之忧；还有一个灵魂伴侣常伴左右，照顾其起居饮食，为其生儿育女，还能顺道探讨一下人生的话，那估计所有人都争取去牺牲了。呵呵。

shu：许广平自己把年谱改为“同居”，思想比现在的大多数女性都大胆和先进吧！

他是个医生，却夺走了40万人的生命

我们常常会把医生称为“白衣天使”，因为他们悬壶济世，因为他们救死扶伤。

但如果有一些人，顶着一个“医生”的头衔，做的却是连地狱恶魔都可能做不出来的事呢？

1

1944年，伊娃姐妹和全家人被抓了起来，送进了一座集中营。

那一年，伊娃10岁，她和家人是在罗马尼亚的一处犹太人区被捕的。

她们被送去的集中营的名字，叫奥斯维辛。

每天早上5点，伊娃和她的妹妹米莉亚姆就被叫起床，6点接受点名。在吃完早餐后，她们就开始被用来进行各种人体试验。

令伊娃印象很深的是，每周有三次，她们姐妹的衣服会被脱光，站在一个房间里。在此后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会被一位医生仔细研究——据说，他是要了解双胞胎的不同之处。

也是一周三次，伊娃要被强行抽血。医生从她左臂抽出大量的血，由于失血过量，伊娃经常会晕过去。后来伊娃知道，这正是那名医生的目的——他想知道，一个人在失去多大剂量的血液后还能继续存活。

每周，伊娃会得到一次洗澡的机会。医生会给她一块肥皂，让她和妹妹去淋浴间洗澡。那是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直到后来，伊娃才知道——她所用的肥皂，都是用人体的脂肪做成的。



约瑟夫·门格勒

让伊娃刻骨铭心的那个德国医生，名叫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1985年5月24日，美国、以色列和联邦德国三个国家对门格勒发出联合通缉令，表示一定要将他绳之于法。

因为在“二战”期间，由门格勒亲自动手或由他批准杀死的人，一共有400000人——你没看错，就是40万人。

2

1911年3月16日，约瑟夫·门格勒出生于德国冈兹堡，父亲原来是国家人民党的老一辈党员，后来成为纳粹的忠实拥趸。

门格勒是家族的长子，但他学医还是出于偶然，因为他的弟弟早已表现出了过人的商业天赋，所以他需要去学另一门学科。

1935年，24岁的门格勒在慕尼黑大学拿到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三年后，他又拿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在莱比锡

大学医院儿科进行了4个月的学习——后来有人猜测，那段实习的经历让他养成了微笑的习惯，以及对儿童的“偏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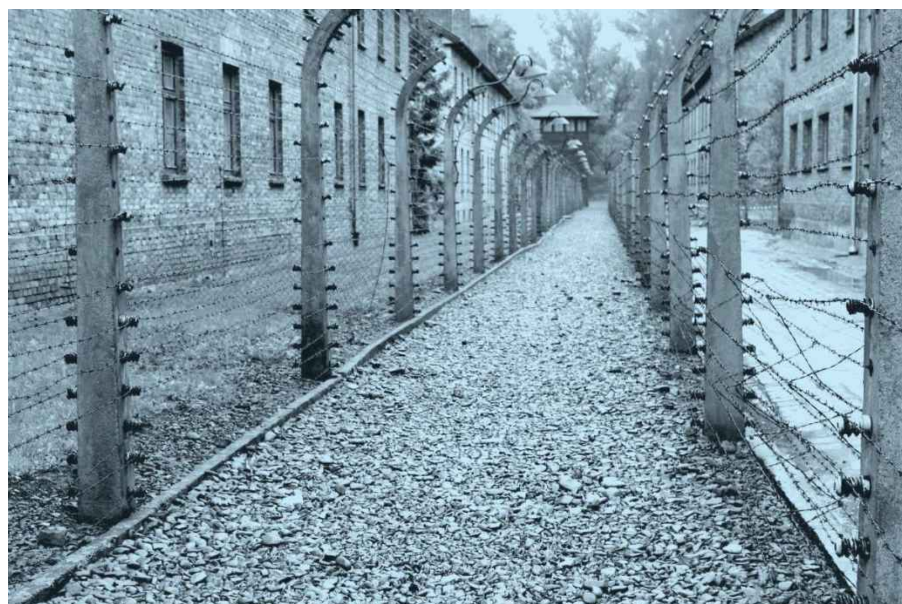
1938年，门格勒被吸收进了纳粹党卫军。党卫军有充足的理由招纳这样一位优秀人才，因为门格勒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人类学的，题目叫作“对于四种种族人类的前下腭部分的种族形态学研究”，第二篇是一篇标准的医学博士论文。

当希特勒正在为怎样证明“雅利安人种是最优秀的人种”而发愁的时候，门格勒的专业知识恰恰是纳粹团队所需要的。

不过，报国心切的门格勒还是先参了军，并随部队一起参加了1941年的苏德战争。在一次战斗中，门格勒负了重伤，随后被评定为“无法参加战斗的人员”，从此他远离了战场。

这对门格勒本人而言可能是一种幸运，但对这个世界上另外几十万人而言，是一个天大的噩耗。

1943年5月，门格勒作为主治医官之一，被派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

门格勒是因为奥斯维辛的吉卜赛人营医生因病退役而“替补”进去的。

但是，他很快就晋升到了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医官的领导层，因为他在短时间内的“功绩”让所有同行刮目相看——他消灭了整个吉卜赛人营。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决定一名囚犯，甚至一批囚犯的生死往往只需要几秒，他们只需要让那些人出列，进入毒气室就行了。但是门格勒并不是这样，他喜欢和自己的“猎物”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世，然后再做出决定。

他总是戴着白手套，踩着擦得锃亮的军靴，穿着烫得非常平整的纳粹制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微笑着，温和地询问犯人问题。幸存的集中营犯人回忆起这一幕时都感觉到毛骨悚然，尤其是对唱片机里播放的音乐感到全身战栗——门格勒喜欢在询问他们问题时，用唱片播放旋律优美的音乐。

然后，门格勒就开始展现自己的优雅和“洁癖”。

比如，只要犯人身上有斑点或小疤痕，就统统被送进毒气室；只要犯人的身高不在他划定的身高区间内，就统统被送进毒气室。

当然，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因为他要挑选出那些“不适合进行劳动的人”，直接消灭。



纳粹女军官们正坐成一排，兴高采烈地吃着草莓；而同一时间——1944年7月22日，150名囚犯被送进了集中营，这150名囚犯除了21名男人和12名女人被挑出来干活以外，其他的人都被直接送进了毒气室

还有，就是为了进行科学实验。

比如，他为了测试飞行员在高空受到空气压强时的承受力，就让集中营的犯人进入真空负压室，然后不断升高气压，直到他们的肺部爆裂，或者看着他们用自己的手指抓脸，用头撞墙，以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为了测试飞行员在高空穿怎样的飞行服耐寒，他把赤身裸体的犯人直接放入冰水里5个小时以上，很多犯人因此被直接冻毙。

这些行为让你联想到了什么？没错，日本的731部队。

4

但这还不是门格勒最令人发指的地方。

门格勒有个外号，叫“死亡天使”。“死亡”不难理解，但为何叫他“天使”？后来有人指出，因为他残害了太多的“天使”。

门格勒对孩子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门格勒，以及集中营里的孩子

门格勒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

为了实现他的科研目的，他让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躺上手术台，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切除他们的器官，或注射各种病毒和细菌做实验。

最让人不能接受的，就是门格勒的"眼球实验"。

门格勒将颜料直接注入孩子们没有经过麻醉的眼球，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很难想象，而孩子大多因此失明。据另一位集中营医生回忆："1943年9月，当我来到吉卜赛营地时，看到一张木桌上摆满了眼球。所有这些眼球都被贴上标签、编上号码。眼球的颜色有淡黄色、淡蓝色、绿色和紫罗兰色。"

他给孩子们面包和糖果，让他们叫他"好叔叔"，目的只是让他们变得温顺和配合，躺上手术台……

门格勒最擅长的研究领域，是"双胞胎"。

在奥斯维辛，门格勒做了很多双胞胎试验，实验之后，这些双胞胎不是被杀就是被肢解。他曾做过一个手术，将两个吉卜赛孩子缝在一起

形成一个连体双胞胎。

每天都有来自各个地方的双胞胎被送到门格勒那里，供他研究。据统计，大概前后一共有1500对双胞胎被送到了门格勒手里，最终幸存下来的只有不到100对。

一位幸存者回忆起他的双胞胎兄弟："门格勒医生对奥利斯基非常感兴趣，他在奥利斯基身上做了几个手术，其中一个脊椎手术令奥利斯基瘫痪了，从此再也没站起来。后来医生切除了他的性器官。第四个手术过后，我便再也没有看到过奥利斯基……"

所以，相比之下，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对双胞胎姐妹，是何等的幸运。



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孩子们

5

1945年1月的一天，伊娃等到了苏联红军。

在苏联红军冲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这座营地只剩下了7600多名"犯人"——先后有110万条生命在这里消失。

伊娃获救了，但门格勒也失踪了。

经过后来的证据倒推，当时门格勒成功躲过了苏联和美国的搜捕，甚至回到了自己在冈兹堡的老家，然后通过假护照，成功偷渡到了南美洲。

1985年5月24日，三国联合宣布将加强对门格勒的通缉后，一系列的线索被慢慢发掘了出来。通过他的一些信件，追捕他的人知道他在南美洲一路辗转，到过阿根廷，也到过巴拉圭，然后被人怀疑在巴西的坎迪杜小镇定居过。

之所以怀疑他在那个小镇待过，是因为这座小镇，现在是全世界有名的“双胞胎小镇”。

在这座小镇上，80户人家拥有38对双胞胎，双胞胎的出生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倍。而且，这些双胞胎基本上都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种（巴西原本就拥有大量德国移民，那个小镇的人口也是德裔为主）。

自20世纪60年代起，有镇上的人回忆，镇上来了一名兽医，宣称可以让母牛多生牛崽，也可以为妇女治疗疾病，解决生育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那个“兽医”，其实就是门格勒，他在晚年真的实现了“制造雅利安人种”的梦想。当然，也有很多人对这种猜测嗤之以鼻，认为缺乏足够的证据（早在20世纪20年代，该小镇就开始出现双胞胎）。

但不管怎样，门格勒逍遥法外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79年，68岁的门格勒生命走到了尽头，他以一种离奇的方式告别了人世——在巴西的一个著名度假胜地，他在游泳时心脏病突发，死了。

这种死法颇似一些特工的暗杀手法，事实上以色列的特工确实在满世界追杀这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但是，除了通过DNA（脱氧核糖核酸）比对认定死者就是门格勒外，关于他是否死于他杀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

6

2005年3月8日，一座雕塑在约瑟夫·门格勒家乡的一座小学校园中落成。

这座雕塑，当然不是为了纪念门格勒，而是为了纪念在他手中死去

的数十万的冤魂。雕塑上面的铭文写道："没有人可以将他自己与其民族的历史切割。一个人不该也不能让历史睡去，否则历史会再次重演，并且成为现实的一部分。"

铭文四周的雕塑，是许多双哭泣和受惊吓的眼睛。

馒头说

中国一直有一群对"二战"时德国军事战术非常崇拜的人。

当然，如果纯粹从军事业务角度去分析，德国人当时在战场上的各种表现，确实有值得研究之处，但仅仅到此为止，多少还能理解。但进而迷恋纳粹的各种事物，乃至思想，尊称希特勒为"元首"（不是戏谑，而是发自肺腑），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乃至不知从何时起，网络上忽然有了种说法：希特勒很敬重中国人。这些帖子现在依旧散布在网络的各个角落，列举各种例证：

希特勒穷困潦倒时，是被一个华人救济的，所以他要报恩（完全没有任何出处）；希特勒其实很讨厌日本人，但很敬重中国人，当初计划和中华民国两分天下（你觉得可能吗？）；希特勒一直在帮助蒋介石政府，直到日本人强烈反对才退出（那是希特勒要求当时中国用各种稀有矿产资源置换）；希特勒赞助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明明是张学良出的钱），等等。

这些说法被"打脸"证据，其实还有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仔细想想，为什么中国有一些人，对日本恨之入骨，但对纳粹德国却没有什么排斥，甚至抱有好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当时离我们还太远，他们强加于犹太人身上的灾难，还没有出现在我们同胞的身上，让我们感同身受而已。

如果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一个个的具体的个体所遭受的悲惨遭遇呈现在你的面前，甚至想象一下那是你的同胞，你真的还会对纳粹抱有强烈的崇拜之心吗？

有的人或许会说：纳粹针对的是犹太人，也许对中国人会不一样。

得了吧！以纳粹的“人种论”，你真的会觉得如果他们当时将中国纳入管辖范围，会善待我们的同胞？

别的不说，就说南京大屠杀吧。

当时德国商人拉贝（就是《拉贝日记》的作者）再三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南京成为人间炼狱的情形，甚至给希特勒专门发过电报，指望“元首”能够干预日本，停止兽行。但这位“元首”是怎么做的呢？

1938年5月，拉贝在德国外交部做了5场关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报告，并在6月8日给希特勒寄去了报告。

之后没几天，拉贝就被盖世太保逮捕，他的6本日记和有关日军暴行的照片被搜走了。拉贝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尤其不允许展示日军暴行照片。

在希特勒的干预下，整个德国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希特勒后来透露了原因：“因为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我喜欢他们。”

希特勒尊重中国人？要和中华民国两分天下？对中国人民有恩？

醒醒吧！

读者评论

阿孔：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最终死于喉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朝香宫鸠彦活到94岁，78岁时还愉快地打高尔夫。双手沾满无数中国人鲜血的两个畜生，就这么简单地死了，细思极恐啊！

Mr.Zhao：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己也是“人种论”的关注者。我曾通过自己亲身接触，总结出一些通过肤色、头发和眼球的颜色、身高和四肢长度、五官分布比例、体毛分布等来总结人种的“规律”，并引以为傲。直到有一次和两个德国女人坐在一起聊天，她俩中，一个是纯种的巴伐利亚人，一个是英格兰父亲和瑞典母亲的混血儿，只不过她出生在德国。我问她们：你们在国内的时候是不是会对不同长相的国人有一个区别和分类？她们立刻同时表现出极度惊讶，巴伐利亚姑娘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你怎么这么问？你好像希特勒啊！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曾经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和邪恶。从那以后，我开始不再谈及人种的区别。其实人种间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不仅外貌，身体的各种机能也是有差异

的，智商、寿命、运动能力等。但所有差异都不能成为某人种对另一人种的攻击理由，因为我们同时降生在了这个地球上，且我们不是野兽，我们是拥有文明的人类。所以，说得严重点儿，我之前的想法其实是反人类的。那么，扪心自问，大家是不是也会因差异而对其他地区或民族的人们投以异样的眼光呢？一视同仁，这是人类向着更高级生物发展的必要道德要求。

*尾巴小姐：电影《佩小姐的奇幻城堡》里面的怪物叫“Hollowgasts”，听起来就像“Holocaust”。他们因为在同类身上做实验而变成了怪物，需要不停地吃奇异小孩子的眼珠才能维持人形。电影里甚至有一对看起来像是被缝补过的双胞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完全是当作爆米花电影来看的，回家后查了背景就又去看了一遍。看着在电影的幻想世界里，小孩子们用自己的各种超能力打败了想吃他们眼珠的怪物，真的让人泪流满面……还好这世上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人性闪光，佩小姐的原型叫艾琳娜·森德勒，是一名护士，她曾经用各种方式偷偷把犹太儿童带出集中营，用这种方式救出过2500多个孩子。

钱宇：《白色巨塔》里，日本医生财前五郎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财前：“我是个医生，救人性命是我的工作，我无法想象杀人犯的心态。”老人：“进行人体实验的也是救人性命的医生。”一把手术刀，一面是救赎，一面是杀戮，一名医生，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魔鬼。实际上，日本人本不必到奥斯维辛去顿悟。

*水景页：我也买了很多关于德军的书。但对纳粹了解越深，就越会从开始的军事崇拜进入深层恐惧。《辛德勒名单》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些。尤其是很多将领以不干预政治为遮羞布，对大屠杀采取鸵鸟政策，更充分暴露了其容克军事集团和地主阶级的本质。辉煌的军事成就无法和纳粹的政治本质分离。

逸闻　历史是漫长的征途

《最后一课》到底有没有骗人？

有这样一个地区，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都说不出具体的方位，但都记得它的名字：阿尔萨斯——洛林。

这都是因为一篇叫《最后一课》的课文。

我们还因此记住了：“法语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但是，这篇脍炙人口的课文记述的故事，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

1

1871年5月10日这一天，曾经在欧洲大陆上不可一世的法国在经历了普法战争的失败后，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耻辱的《法兰克福和约》。

这个和约规定，法国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三年付清。在付清之前，德国在法国驻军，驻军的军费由法国承担。

不仅如此，最让法国心痛的是，法国被迫割让出了重要的工业区阿尔萨斯——洛林。

这也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的历史背景。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还会记得课文的最后那一段：



法国作家都德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几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这段话，感动过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

但是，如果告诉你，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呢？

2

这个故事，还得从阿尔萨斯-洛林的历史说起。

阿尔萨斯-洛林，在17世纪以前，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在这里，就不再费篇幅阐述神圣罗马帝国了，我们只需要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的另两个称呼——“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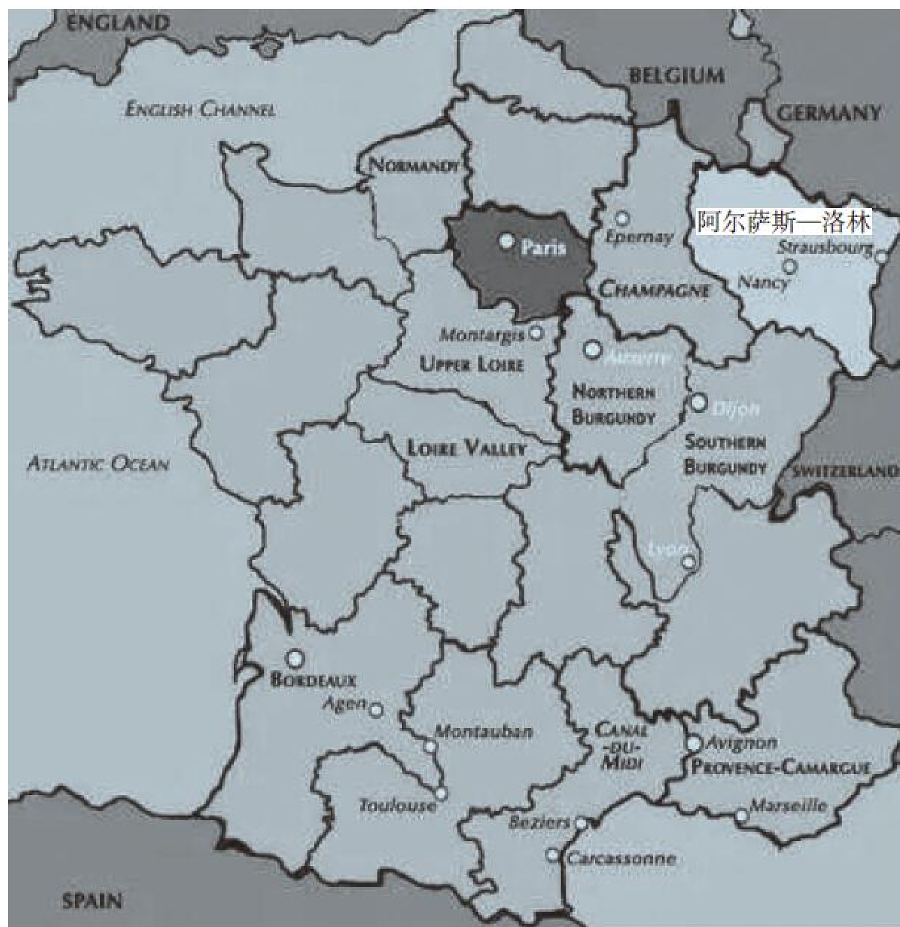
1618年，日渐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内战，进而将欧洲的主要国家全部卷入，一打就是三十年，史称“三十年战争”。

这场“三十年战争”使得神圣罗马帝国旗下的德意志各联邦损失了60%的人口，进而推动了整个欧洲从“铁板一块”迈向民族国家，被认为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

在这场战争中，法国迅速崛起，并且在战争中站在了胜利的一方。作为回报，他们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中，得到了阿尔萨斯的大部分（除首府斯特拉斯堡），以及洛林的部分（梅林、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

这还不算结束。

1688年，法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作为当时欧洲最强国，又和神圣罗马帝国、英国、荷兰打了一架，一打就是九年，史称“九年战争”。1697年，法国与“反法同盟”签订了《里斯维克和约》，宣告战争结束——作为结果，法国吞并了整个阿尔萨斯。



来吧，看看阿尔萨斯—洛林究竟在哪里

又经过了69年，1766年，法国经过了一系列战争和交换，终于在路易十五时期，完全吞并了洛林。

至此，阿尔萨斯-洛林开始被法国收入囊中。

在神圣罗马帝国分裂出的各个德意志联邦中，普鲁士迅速崛起，并一直对阿尔萨斯-洛林耿耿于怀，但当时的法国实在是太强盛，普鲁士也毫无办法。

1806年，年轻火力壮的普鲁士终于忍不住跳了起来，但他们面对的是全欧洲百年一遇的军事天才——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拿破仑。那一年的耶拿战役，法军大破普鲁士，拿破仑甚至准备将普鲁士吞并。后来在俄国的调停下，普鲁士国土面积被缩小一半，而且还要向法国赔款1.2亿法

郎，并支付法军在普鲁士境内驻军费用5350万法郎。

普鲁士的那口怨气，直到64年后的1870年才宣泄出来。

那一年，爆发了都德《最后一课》故事发生的背景：普法战争。

3



拿破仑

普法战争，是崛起的普鲁士和衰落的法国进行的一场大决战。

当时的普鲁士，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治理下咄咄逼人，而法国在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已经是夕阳西下，外强中干。

在这场不到一年的战争中，双方各投入了50万以上的兵力，法国的拿破仑三世更是御驾亲征，最终却只能率领10万法军向普鲁士投降。普鲁士的国王威廉一世最终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加冕，可谓羞辱对手至极。

那场战争使得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推翻，第三共和国成立，而普鲁士借着这场战争完成了对大小联邦的统一，成立了德意志帝国。



普法战争形势图

而作为战争的另一个结果，阿尔萨斯-洛林又被划回了德意志。

然后，就发生了都德《最后一课》中的描写。

如今的质疑者难免提出疑问：首先，阿尔萨斯-洛林本来就不是法国的，也是抢来的；其次，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人，明明是说德语的居多。

作家阎京生在《最后一课骗了你》一文中指出：“按照1900年的调查，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德语为母语者占总人口的86.8%。其中阿尔萨斯地区绝大部分人口使用阿尔萨斯语（高地德语的分支），洛林地区则使用摩泽尔语（中部德语的分支）。以法语为母语者仅占该地区人口的11.5%。”

按照阎京生文中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正好相反：不是德国禁止教法语而强制推行德语，而是法国在统治期间，禁止教阿尔萨斯语，强行把法语作为唯一语言。

那么，《最后一课》是否真的骗了我们？

4

这就要进一步挖一下阿尔萨斯-洛林的历史了。

法国得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之后，在司法、税收、贸易和宗教等领域，其实给了这个地区特别的待遇。在文化方面，虽然1539年，法国曾专门颁布《维莱·科莱特法令》，规定法语为官方文件唯一语言，但执行并不严格。

不过当时阿尔萨斯-洛林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效忠，更多是因为利益的结合——法国给这片地区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真的要说这个地区的居民对自己“法国人”身份的认定，倒是未必。

但是，这个现象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792年，路易十六的波旁王朝在法国大革命冲击下，摇摇欲坠。奥地利和普鲁士趁机组成联军，攻入法国——位于法国东北的阿尔萨斯-洛林自然首当其冲，遭受了战火的摧残。

既然这两个地区的人民要的就是稳定和繁荣，那么他们自然而然会对侵略者拿起武器。在法国革命政府的号召下，阿尔萨斯-洛林的人民也拿起了武器，开始抵抗普奥联军——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说德语。

在战争期间，一首叫《莱茵军团军歌》的歌曲诞生在了阿尔萨斯首府斯特拉斯堡。在这首战歌的歌词里，参加保卫战的人民都是“祖国的孩子”，他们要共同抵抗“欧洲的暴君和佣兵”。

这首诞生于阿尔萨斯的军歌，后来就成为法国国歌《马赛曲》。

1792年9月，法国革命军取得“瓦尔密大捷”，击溃了普奥联军，而这场战役的法军将领，就是阿尔萨斯人凯勒曼。

为什么阿尔萨斯-洛林的人民对法国大革命如此认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法国大革命打破了旧的封建社会的阶层，让高级军职不再由贵族垄断，让无数阿尔萨斯-洛林的平民有了晋升的机会，他们从心底里开始认同法国。



瓦尔密大捷

另一方面，通过政变上台的拿破仑非常重用阿尔萨斯人，阿尔萨斯人口不足法国总数的2%，但阿尔萨斯籍将领却占法军将领总数的5%。在拿破仑1814年前敕封的24名法籍法国元帅（法军军衔最高级别）中，阿尔萨斯人2人，洛林人1人，占总数的八分之一，远高于当地人口所占比例。

再一方面，法国当时在拿破仑治下，确实步入了欧洲的巅峰，作为阿尔萨斯-洛林的人，哪怕是说着德语，也更愿意从各方面认同法国，而不是当时相对落后的普鲁士。

所以，当普法战争爆发后，普鲁士的军队确实在阿尔萨斯遭到了激烈抵抗。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此战描述如下：“他们不敢公然说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被‘德意志的’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城市被焚毁，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被杀害！”

而德国最后也没获得完整的阿尔萨斯。阿尔萨斯最南端的贝尔福尔城死守城池，抵抗普军围城长达104天，直到停战，最终被保留在法国境内。



普法战争中贝尔福尔战役胜利纪念碑“贝尔福尔之狮”，他的设计者巴尔托尔迪是阿尔萨斯人，也是曼哈顿自由女神像的设计者，他本人参加了贝尔福尔保卫战

5

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曲折命运，还没有到此终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联军险胜，法国当然毫不犹豫地又把这片地区划了回来。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绕过“马奇诺防线”闪击法国——恰好也是5月10日——一个月时间，法国就被打趴投降，于是阿尔萨斯—洛林又被划给了德国。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德国，又乖乖向法国交出了这片地区。

在如今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称为阿尔萨斯语的日耳曼方言是当地的通用语。学校里既教法语，也教德语。这里不少人都会说流利的法语，却会过德国的节日，习惯吃德国的名菜（酸菜、肘子、香肠）。

而都德的《最后一课》是否骗了人，每个人大概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吧。

馒头说

是谁把《最后一课》翻译到中国来的？

答案是胡适。

1912年，胡适将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译成中文。随后，从1920年开始，他的这篇译文就被先后选入《白话文范》（商务印书馆，1920年）、《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国文百八课》（商务印书馆，1936年）等教材。新中国成立后，这篇译文也一直入选小学语文课本，被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牢记。

阿尔萨斯-洛林究竟归属谁？他们那里的人究竟更认同谁？这固然是一个值得客观研究的问题，但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最后一课》为什么能打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其实从胡适当初翻译过来拟定的第一个题目，就可以找到原因。

《最后一课》的法文是“La derniere classe”，所以中文直译为“最后一课”没什么问题。但胡适当初的译名，却是“割地”。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课》当初能得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鸣的原因了——从香港到青岛，从东三省到华北，中国人从“韩麦尔先生”的眼泪中，似乎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映射，从“小弗朗士”的情感中，感受到了一个国家国土沦丧的屈辱。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阿尔萨斯-洛林成了一种象征，在哪？归谁？可能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都希望不要上那种“最后一课”。

读者评论

Wing：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这篇文章如同《七子之歌》，是我们国家的文学大师们在大声疾呼、唤醒民族精神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历史学家的角度去剖析这个事件。还是感谢馒头哥，让我们了解历史，增进知识，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尤其最后的“馒头说”，一如既往的三观端正，发人深省。

烟波浩淼：“nous parle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disant que c’était la plus belle langue du monde,la plus claire,la plus solide ; qu’il fallait la garder entre nous et ne jamais l’oublier,parce que,quand un peuple tombe esclave,tant qu’il tient bien sa langue,c’est comme s’il tenait la

clef de sa prison...”我记得我上第一堂法语课的时候，法语老师就背了这一段，说实话，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读原文的原因。胡适先生翻译得再漂亮，还是不如它最初书写的文字能表达的意义深，这也是为什么文字的力量不亚于军队力量的原因，它传播的是思想，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吧。

Mr.Zhao：民族和国家其实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任何人、团体、族群结合在一起的根本纽带是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说到底，国家对某个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是否用心、到位，直接决定该地区的人心所属。将心比心，人与人之间是这样，族群与族群之间是这样，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这样。

他以500公里时速撞向地球，最后时刻说了什么？

如果你知道不久后自己即将死去，会是怎样的感受？

在这段时间里，你又会说些什么？

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在极端环境下自己的表现，因为绝大多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宁祥和的环境里。

但毕竟还是有不少人，从事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职业，就比如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就是从一段“临终遗言”说起的。

1

1967年4月24日早晨6点24分，苏联奥伦堡附近的平原上空，出现了一个急速下坠的物体。

从外形上判断，应该是人类的一艘宇宙飞船。但已经距离地面如此之近，飞船却没有放出任何降落伞——这导致飞船如同一枚炮弹一般，撞向地面。

飞船与地面发生接触的一刹那——没有悬念地——发生了巨大的爆炸，火光吞噬了一切。

这艘飞船里面是否有人？

很遗憾，这是一艘代号为“联盟一号”的载人宇宙飞船。里面搭载着一位苏联宇航员，他叫弗拉迪米尔·科马洛夫。



弗拉迪米尔·科马洛夫

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因载人航天而遇难的宇航员。

2

在2001年人教版初中语文第五册，有一篇课文详细记录了科马洛夫遇难时刻的故事。

在这篇题为《悲壮的两小时》的课文中，科马洛夫在人生最后时刻所做的事，催人泪下。

科马洛夫发现飞船的降落伞不能正常打开，随即向地面报告，于

是，他坠落前的最后两小时，是向全世界直播的，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数以亿万计的观众全程目击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

在这场直播中，出现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话语，节选如下：

科马洛夫眼含热泪："谢谢！谢谢最高苏维埃授予我这个光荣称号！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宇航事业献身是神圣的，我无怨无悔！"

……

"能。看得很清，儿啊，妈妈一切都很好，你放心吧！"此时泪水已经把她的双眼蒙住了。老太太把话筒交给儿媳妇——科马洛夫的妻子。科马洛夫给妻子送了一个调皮而又深情的飞吻。妻子抱着话筒刚说："亲爱的，我好想你！"就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话来。

科马洛夫的女儿接过话筒："爸爸！我的好爸爸！"孩子已泣不成声。看到12岁的女儿，科马洛夫的眼睛里骤然飘过一层阴云："女儿，你不要哭。""我不哭，爸爸。你是苏联英雄。我只想告诉你，英雄的女儿，是会像英雄那样生活的！"

"和爸爸谈谈学习情况。好女儿，爸爸就要走了，告诉爸爸你长大了干什么？"

"像爸爸一样，当宇航员！"

科马洛夫又一次落泪了："你真好，可是我要告诉你，也告诉全国的小朋友，请你们学习时，认真对待每一个小数点，每一个标点符号。'联盟一号'今天发生的一切，就因为地面检查时，忽略了一个小数点，这场悲剧，也可以叫作'对一个小数点的疏忽'。同学们记住它吧！"

……

科马洛夫这时太激动了："谢谢啦！全国全世界的同胞们，我也爱你们！正因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爱，上帝才这样爱我，让我从千万里的高空飞向大地，在火与光的歌声里获得新生。同胞们，请与我一起喊——人民万岁！科学万岁！"

科马洛夫向人们亲切地挥着手："我已经看见大地了，大地很美。如果上帝让我转世投胎，我还要当宇航员，我和女儿一起重上太空。因为

太空很有意思，很好玩。真的，太空很好玩……”轰隆——一声爆炸，整个苏联一片寂静。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向着飞船坠毁的方向默默地哀悼，哀悼……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非常能打动人的课文。

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故事除了科马洛夫遇难这个事实之外，其他情节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甚至可以说是捏造的。



科马洛夫的葬礼于1967年4月26日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举行。图为他的遗孀瓦伦蒂娜·科马洛夫在葬礼上吻别她死去丈夫的照片

3

按照课文提供的索引，这篇文章摘自1995年的《读者》第二期，作者是山东青年文化馆的冯峰鸣。

原文还有一段更戏剧化的文字：

一位青年，发疯一般冲进指挥台，抢过了话筒：“科马洛夫同志，请让我与您说一分钟的话！科马洛夫，我是你的情敌，是你情人的丈夫。一个小时前，我还恨你。想等你回来与你决斗，我发誓要杀死你。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爱你。你是最崇高最伟大的男子汉！就让她爱你吧！我也爱你！全苏联人都爱你！全世界的人都爱你！”

抛开这种充满带有强烈主观臆想的话语不说，也不深究一个青年随随便便就能“发疯”一样冲进指挥台，还能“抢过话筒”，甚至可以不谈课文中那些明显的硬伤（比如宇宙飞船进入大气层下坠后居然有两小时直播时间），就说说那篇课文最大的一个问题：

当时美苏处于“太空争霸”阶段，科马洛夫执行的这项任务，是为苏联载人登月做准备，属于绝密——当时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面向外界的直播，还长达两小时。



20世纪60年代初，代表当时先进水平的苏联“东方号”系列载人火箭

换句话说，这篇课文所有感人肺腑的话，全是作者自己凭空臆想出来的。作家叶永烈曾表示：“无法理解，这篇文章是怎么过五关斩六将，入选到课本里的。”

不过，科马洛夫遇难确实是一件非常悲壮的事，只是这种悲壮，是在“两小时”之外。

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来自于一本叫作《星人：尤里·加加林传奇背后的真相》的书［杰米·多伦（Jamie Doran）和皮尔斯·毕卓尼（Piers Bizony）合著，以下简称《星人》］。

这本书的叙述，主要基于一位叫韦尼亚明·罗萨耶夫（Venyamin Russayev）的克格勃特工（他是当初“照顾”科马洛夫的特工之一）的回忆和谈话，以及一位记者雅罗斯拉夫·戈洛瓦诺夫（Yaroslav Golovanov）当初在《真理报》上的报道。这本书主要是写人类第一个太空宇航员加加林的，但顺带也写到了加加林的挚友：科马洛夫。

1967年，处于和美国“太空争霸”竞争中的苏联，希望向太空发射一艘“联盟一号”太空船，随后在第二天向太空发射另一艘飞船。两艘飞船在太空中相遇并对接，然后“联盟一号”的宇航员爬到第二艘飞船中，和他的另一名同事互换位置，最后乘坐第二艘飞船返回地球。

如果成功，这将是世界上首次实现航天员在太空中的转移。苏联打算在登月飞行中使用这种办法，将航天员转移到单人登月舱中或从登月舱中接回来。



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在最大高度为301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

一周，历时1小时48分钟，于上午10时55分安全返回，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太空人——所以后来有人对《星人》一书提出质疑：加加林作为苏联的太空英雄，属于“国宝”级人物，是不可能再被派上太空冒险的，所以如果是替补，也只是名义上的而已

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希望用这次发射的胜利，向“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献礼。

被选中登上“联盟一号”宇宙飞船的宇航员，就是科马洛夫。当时还为科马洛夫预备了一名替补，那就是加加林。

按照《星人》一书的记载，加加林和一些高级技术人员很仔细地检查了“联盟一号”飞船，然后发现了203个结构性问题——这会让这艘飞船在太空中面临非常危险的问题。加加林建议任务应该推迟，并据称写了一份10页的备忘录。但是，这份备忘录和推迟的建议，没有人敢反馈给勃列日涅夫。（任何公开资料和档案中都没有提到过这10页备忘录，《星人》一书的作者表示他们有自己的消息渠道。但我个人认为，飞船当时肯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隐患，但如果当时加加林真的发现了明显的致命的缺陷，其他人没有理由不报告给勃列日涅夫——毕竟发射失败比推迟发射要丢脸得多。而且科马洛夫也是苏联屈指可数的优秀航天员，苏联不可能要刻意牺牲掉他。）



加加林（左）和科马洛夫在打猎，两人确实私交很好

在距离“联盟一号”发射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位克格勃特工罗萨耶夫回忆，科马洛夫和他见了一次面，当时科马洛夫泪流满面地说：“我不可能再活着回来了。”

罗萨耶夫问：为什么不拒绝这次任务呢？

根据《星人》一书给出的说法，是科马洛夫表示，如果他拒绝任务，当局还是会让替补去的，而那位替补，正是他的好友加加林。

而另一方面，加加林也表现出了希望替朋友去冒险的决心，他甚至在发射当天出现在了现场，并要求穿上宇航服——质疑者对《星人》一书叙述的这段事实再次表示怀疑，因为以当时加加林的身份和有关规定，他不可能在一项没有指派他的航天任务中，去穿上一件宇航服，甚至要求替代科马洛夫上船。

但这些叙述至少还是能证明两件事：第一，在发射前，“联盟一号”的各方面情况并不是万无一失的；第二，科马洛夫最终还是登上了这艘飞船。

5

1967年4月23日凌晨，“联盟一号”顺利发射升空——科马洛夫人生最后一个24小时，由此开始。

在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后，“联盟一号”的故障开始接连发生：

左太阳能电池板无法打开，使得飞船只能用一半电力来操作仪表；

由于一半的太阳能电池板没有打开，遮住了散热器，导致热量不能散发，使得姿态控制系统失灵——飞船开始缓慢地翻转；

通信系统失灵，只有备用的可以使用；

进入轨道第5圈时，飞船的离子感应器失灵，无法进行定位，科马洛夫改用手动控制也无效。

从飞船环绕地球第七圈开始到第十三圈，精疲力竭的科马洛夫睡眠休息，与地面停止了联系（这些故障哪里只会是因为“算错了一个小数点”，而且算错小数点这种低级失误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而这时候，基于飞船出现的各种状况，苏联的地面当局已经把加加林叫到了指挥中心，看看他是否能提供帮助。最终，指挥中心决定取消第二艘飞船的发射——曾有人提议发射第二艘飞船去营救科马洛夫，但当局对第二艘飞船是否能不出故障实在没有信心。



苏联宇航员的合影。后排中为加加林，前右一为科马洛夫，前右二为科马洛夫的妻子瓦伦蒂娜

在“联盟一号”环绕地球到第十七圈的时候，燃料即将耗尽，科马洛夫返回地球的要求被允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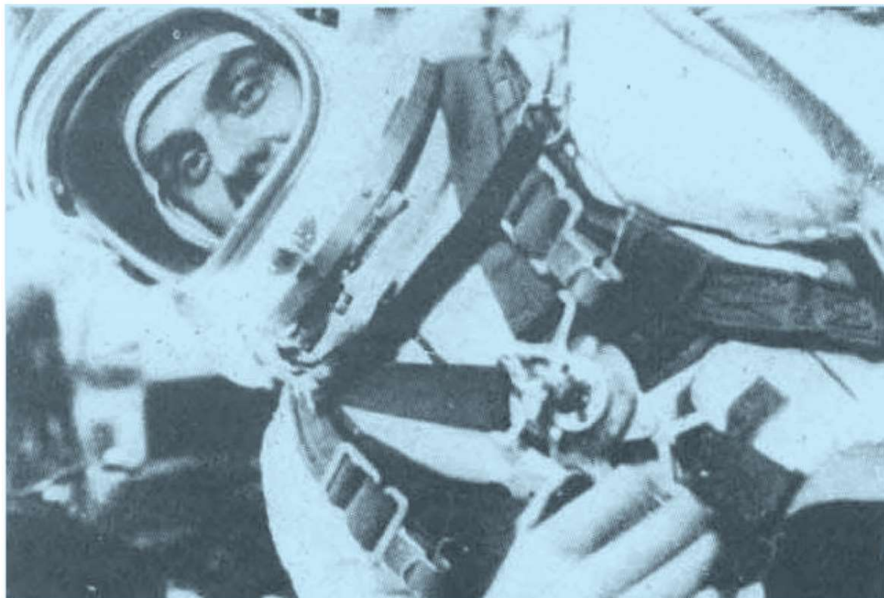
但当时的人心里都隐隐有一种感觉：科马洛夫不可能活着回来了。

此时，科马洛夫操纵着已经出现大规模故障的“联盟一号”，在太空中做着最后挣扎：

由于姿态控制系统失灵，飞船在制动点火的关键时刻不能保持稳定，科马洛夫显然想通过滚动的方式稳住飞船，调整飞船的方位以便点火，但失败了。

到18圈的时候，飞船正确定向，正常旋转，制动火箭点火，飞船准备弹道式重返大气层——科马洛夫曾经因身体素质问题差点落选宇航员，但他的工程师经验带来了加分，让他最后得以飞上太空。

但是，在飞船继续旋转和滚动中降落的时候，科马洛夫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主降落伞因为在打开过程中发生扭曲，打不开了！



身着宇航服的科马洛夫

科马洛夫立刻启动备用伞，但备用伞和主降落伞缠在一起，也打不开了……

精疲力竭的科马洛夫就算有通天的本领，此刻也无能为力了。

“联盟一号”以超过500公里的时速，撞向地面。

6

从发现降落伞无法打开，到撞到地面，整个过程可能只有十几分钟时间。

按照《星人》一书的叙述，在地面控制中心，大家听到了科马洛夫发来的声音，说他知道自己要死了。

同样是《星人》一书的记录，在土耳其负责监听的美国特工，听到了飞船撞击地面前，科马洛夫对建造这艘飞船者的诅咒，以及尖声的惊叫——尽管从网上放出的一段疑似录音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是作为人的本能，即便是发出尖叫这种行为，也比临终前大喊“请和我一起喊：人民万岁，科学万岁”可信度要高。

美国历史学家阿西夫·西迪基曾有一份联盟号飞船里科马洛夫最后时

刻的记录。他是从俄罗斯国家档案中查到这份记录的：

科马洛夫：“激活，激活，不用担心，一切就绪。”

地面：“收到，我们也没担心。你感觉如何，一切如何？Zarya，完毕。”

科马洛夫：“我感觉棒极了，一切就绪。”

地面：“收到，我们的同志们建议你深呼吸。我们在等待着陆。这里是Zarya，完毕。”

科马洛夫：“感谢你转达信息。（分离）确认。（含混不清）”

地面：“Rubin，这里是Zarya。收到，分离确认。通信中断期间加油！（停顿）”

地面：“Rubin，这里是Zarya，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地面：“Rubin，这里是Zarya，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地面：“Rubin，这里是Zarya，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科马洛夫的纪念邮票

1967年4月24日早晨，随着一声轰然巨响，“联盟一号”带着巨大的冲击力撞到了地面上，火光冲天，粉身碎骨。

科马洛夫的遗骸，最终只找到了一小段足骨。

一年之后，加加林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

再过了一年，美国宣布“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

馒头说

就在科马洛夫遇难之前三个月，苏联的对手美国，在“阿波罗一号”的模拟发射中失败，火箭着火，三名美国宇航员全部遇难。

而相对于苏联，因为直播的关系，美国的两次航天悲剧更让人印象深刻：



“挑战者号”升空后爆炸的场面。当时的《解放日报》突破国际新闻不上头版的规定，头版不仅报道，还上了两张照片，在全国引起轰动



“哥伦比亚号”上遇难的7名宇航员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72秒后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升空后于得克萨斯州北部上空解体，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到2003年之前，全世界已经有22名执行任务的宇航员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11人是在返回地球时遇难的）。

人类探索太空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条坦途，且充满艰辛乃至巨大的危险，但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前仆后继地顶了上去。所以，其实根本不需要过多的渲染，更不要刻意去煽情——在这个领域，国籍和国界其实已经变得模糊，他们是全人类共同的英雄。

英雄首先是人，是人都有人性。

并不是一定要喊“人民万岁”，才配得上“英雄”的称号的。

读者评论

阴森铁：航天器是一个系统工程，即使结构上没什么问题，其他方

面也难保证毫无纰漏，甚至是大纰漏。尤其我国在抗震领域做得明显不够（这方面比较著名的是潜艇），但是我们也在实践中一步步完善自己，其中的责任和担当实在令人赞叹。2010年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做过一个航天项目，是关于空间站太阳帆板的，它与之前天宫的电池阵排列和运动方式完全不同，当时还是很震惊于空间站项目的推进速度，因为彼时天宫一号还没上天，有关方面居然就已经筹划到这一步。现在看天宫二号和天舟一号刚刚对接，果然空间站项目还是十年磨一剑，甚至更长。这种慎之又慎的作风应该就是前辈所做牺牲的必然结果吧，早筹划，多论证，稳实行。

我很好奇："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然而，星辰远映，宇宙遥渺，向所有为之奋斗的人致敬！

雯雯：我是航天家属，所以我深知航天人的辛苦。稍微出一点差错，几年以来的好多系统和外协的辛苦准备全部泡汤，甚至是如文中所述危及航天员的性命。或许大家看到的都是发射成功或者航天员的荣誉时刻，但是他们航天人的辛苦真的是只有了解的人才知道，真的是没日没夜地不停归零、验证、实验！就我国航天系统采用的归零制度，目前已经成了国际标准了。

summer夏：今天（4月24日）是第二个航天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作为一名航天人，看到馒头大师的这篇文章，深深地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骄傲，也切实地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太空如此美妙，探索永不停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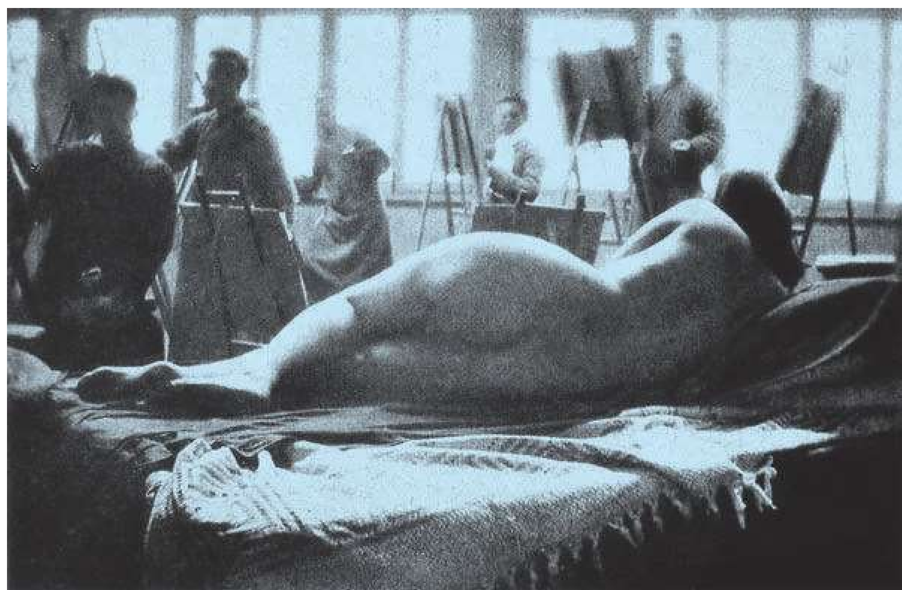
中国人接受“裸体艺术”，到底有多难？

中国人有句话，叫“坦诚相见”。

这句话被用作人与人交往时，一直被鼓励和提倡，但如果用到真正的肉体上，哪怕只是艺术表现，就没那么容易了……

1

1914年3月22日，位于上海乍浦路的中国图画美术学院，走进了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



这个被叫作“和尚”的少年，被领进了西洋画科三年级学生的教室。在诸多哥哥和姐姐的目光注视下，“和尚”多少有些紧张，但根据事先的约定，还是慢慢褪下了全部衣衫。

“和尚”可能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参与了一项历史纪录的诞生——这可能是中国美术学校第一次以集体形式，使用人体模特。［一说李叔同（弘一法师）在1913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也有安排裸体男模特的人体写生课。］

使用人体模特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古希腊。

地中海适宜的气候和开放民主的氛围，也是造就古希腊雕塑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原因之一。根据可查的史料记载，第一个人体模特（或者说第一个著名的人体模特）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她的名字叫芙丽涅。

即便是在相对宽容的古希腊，芙丽涅仍因此被指控“渎神罪”而被传唤上了法庭。当着501位市民陪审团的面，芙丽涅解开了自己的衣裳，展现自然的胴体，最终获得了无罪宣判。



19世纪法国画家热罗姆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幅油画《法庭上的芙丽涅》

你看，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官员和市民已对此释怀，但因为国情和传统，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说起“人体模特”这个词，很多人依旧是讳莫如深，甚至闻所未闻。

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绘画课，当时中国图画美术学院的学生已经破天荒地可以对着一个孩子画画，不过，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需要成年模特”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但哪有成年人愿意做模特？

当时这个美术学院的校长叫乌始光，副校长是刘海粟（1916年乌始光辞职，刘海粟任校长）。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拍出重金，招聘成年男

性模特。

虽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绝大多数男性报名后，等真的走进教室，需要宽衣解带了，却都红着脸逃了出去——一连20多个，莫不如是。其中有一个甚至立下军令状：“如果临阵脱逃，愿意受罚！”但最终走进教室时，他满脸通红说了一句：“你们罚我吧！”然后还是掩面而去。

直到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最终愿意裸体与学生们“坦诚相见”，但他的肌肉非常紧张，表现并不理想。

3

但比中国图画美术学院的学生更不满意的，是外界舆论。

1917年，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的成绩展览会在上海张园安屺府举行，因展品中有在校学生的人体习作，引来舆论大哗。上海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看后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

当时已经是校长的刘海粟索性就以“艺术叛徒”自称，并且撰文反击：现在这样浮躁的社会、浊臭的时代里，就缺少了这种艺术叛徒！我盼望朋友们，别失去了勇气，大家来做一个艺术叛徒！什么主义的成功，都是造成虚幻之偶像，所以我们不要希望成功，能够破坏，能够对抗作战，就是我们的伟大！能够继续不断地多出几个叛徒，就是人类新生命不断的创造……

而让公众更瞠目结舌的事情还在后面——1920年7月20日，刘海粟竟然找来了一名女性人体模特！



青年时期的刘海粟

如果说使用男性人体模特已经让公众觉得无法接受的话，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众目睽睽之下使用女性人体模特，那是一件要让人抓狂的事情。

那一天，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即中国图画美术学院，当时已改名）的画室，窗幔低垂，一道紫红的丝绒帘幕将讲台那面墙遮住。刘海粟走到幕布前说：“我校从1914年开办人体写生课以来，迄今已有五六年历史了。最初我们只聘请到男孩，经我们师生不断努力，以高薪才请到成年男子为模特，却未能觅到愿意献身艺术的勇敢女性。今天，艺术女神终于出现在我们的画室中了！”

说完，刘海粟缓缓拉开了帘幕，一位全身赤裸的年轻少女出现在学生们的面前。

这名女模特名叫陈晓君，是位农村女子，被学校重金聘来。因为受到大家目光的注视，她的身体有些微微发抖。

但她很快就被感动了——所有学生起立，和刘海粟一起，向她深深鞠躬。

在之后的三天里，陈晓君就作为模特，成为学生们的临摹对象。但是到了第四天，学生们来上课时，发现陈晓君原本应该侧卧的卧榻上，空空如也——她没有来。

门卫拿来了一个小男孩传递来的纸条，学生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陈晓君做人体模特的事，被父亲发现了，她被打得遍体鳞伤，锁在屋子里不准出来。无奈之下，陈晓君只能托弟弟来传个纸条。

面对面面相觑的学生，刘海粟脱去了长衫，只穿一条裤衩，坐上了写生台：“我早就想尝尝做人体模特的滋味了，今天终于能如愿了。大家开始吧。”



早期上海美专的大门

4

但刘海粟面临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使用女性人体模特，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一直是多方抨击的对象。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就给刘海粟写过公开信：“先生以金钱势力，役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现形，寸丝不挂，任人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方也……”

面对多方责难，刘海粟一一提笔回信，坚决反驳，决不屈服。结果，1926年，一直不甘心的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致信当时的军阀孙传芳，请他主持公道。当时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全文刊登姜怀素的信：“……欲为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专学校模特儿一科，欲查禁模特儿，则尤须严惩作俑祸首之上海美专学校校长刘海粟……”

上海知事危道丰随后就派人对上海美专发了严禁画裸体的禁令。

刘海粟毫不示弱，也写信给孙传芳，引西欧各国有关裸体模特的例证，指责议员姜怀素信口雌黄，希望孙传芳能支持自己。

孙传芳当时是南方五省联军的总司令，一声令下，谁敢不从？但这位写得一手好字的军阀在“有伤风化”这个认知上，显然是不会站在刘海粟一边的。

不过，孙传芳还是比较客气的。6月10日，《新闻报》刊登了孙传芳写给刘海粟的一封信：

海粟先生文席：

展诵来书，备承雅意。觳饰过情，抚循惭荷。贵校研究美术，称诵泰西古艺，源本洞晰，如数家珍，甚佩博达。

……

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繁劳，而不能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贤者不取也。复颂日祉。

可以想见，以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孙传芳的这封信是颇得人心的，而且他客客气气，用的是一种商量的口吻。

但是，刘海粟并不买账，给孙传芳写了封看似商讨，实则拒绝的回信：

……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人体模特儿，愿吾公垂念学术兴废之钜大，邀集当世学术界宏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恐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先自请处分，刀锯鼎镬，所不敢辞！

这封回信，刘海粟一连找了几家报社，居然没有一家敢刊发，最终史量才大笔一挥，刊发在了《申报》上。

不仅拒绝，还发在媒体上，这不仅是不给孙传芳面子，更是“敬酒不

吃吃罚酒”了。

于是，孙传芳下密令关闭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缉拿刘海粟。因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时地处上海法租界，孙传芳不能派人直接从法租界捉拿刘海粟，就电告上海领事团和交涉员许秋枫，交涉封闭美专、缉拿刘海粟。

在这件事上，法国驻沪领事还专门为上海美专辩论了四次，表示美术学校都使用人体模特，但孙传芳一直不肯放弃。最终，刘海粟只能逃亡日本。



上海美专第十七届毕业生和人体模特合影

5

人体模特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没有因刘海粟的被迫逃亡而停止。

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提倡“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社会上对人体模特使用的态度倒反而有点松动了，有点“姑妄允之”的意思，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1949年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又让人头疼起来。

1964年5月，在“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在《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中批示：“我意应坚决禁止，我绝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

3个月后，文化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

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上书中央，表达了不同意见——“真人（模特）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

关于美术院校是否应该使用人体模特这件事，最终被一路呈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前。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来函的首页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模特，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那句“小有牺牲”，让“人体模特”又活了过来——但不到一年时间，“文革”爆发，再也没有人敢用，也没有人敢当“人体模特”了。

1979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43岁的雕塑家唐大禧被抽调到南京雨花台为烈士群像做雕塑。在通过广播收听了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讲话后，他创造了当年轰动全国的雕塑《猛士》。



《猛士》雕像

在刘海粟使用人体模特过去了65年之后，唐大禧这个以裸女为主题的雕塑参加广东省美术展，依旧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很多观众斥责这个雕塑“下流”、“出格”、“不合国情”。当时的一位文化厅副厅长还用笔名在《羊城晚报》上刊文，称这个雕塑会影响整个社会道德风尚。

最后，还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一锤定音，对省委宣传部干部说：“你们领导文化工作，要抓方针政策，不要管得太具体。”

与《猛士》有类似命运的，还有1979年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幅被放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哪怕是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依旧因为画中有几个裸体少女的形象，一度被用薄板遮挡了起来，直到1990年薄板才拆除。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理念，总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艰难前行。

1985年初，上海戏剧学院公开招聘人体模特，报名者挤破门槛，不到半天工夫，500份报名表已全部发完。

但这并未标志着“人体模特”这个职业在中国彻底被接受。1986年8月，曾瞒着家人在南京艺术学院做人体模特的陈素华因病回江苏乡下休养，正巧电视上播放一部有关刘海粟的片子，里面有画人体模特的情节。家乡父老这才明白当“模特”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天天都有大批人跑到陈素华家中来看热闹，陈素华的奶奶更是责备她“不应该卖身”。最终，19岁的陈素华精神失常，光着身子跑出了家门。

好在，像陈素华那样的悲剧，最终越来越少。

198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陈醉的科研成果《裸体

艺术论》出版，引发轰动。1988年，该书累计印刷20万册，创造了出版史上学术专著成为畅销书的奇迹。

1988年末至1989年初，全部是裸体作品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次史无前例的展览，万人空巷。

自那以后，人体模特，包括裸体艺术，终于开始渐渐为国人所接受。

馒头说

关于刘海粟的业务能力乃至人品，业内一直有争论，这个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不过，他为了使用人体模特而力争，这件事应该是有案可查的。当时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此事评价说：“刘海粟三个字在一班人的脑海里、心头上，已经是一个凹雕很深的名字。在艺术的圈子里，他不但是一个辟荒开道的人，并且已是一个巍巍树立的雕像。”

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有上千年儒家“非礼勿视”的传统，其思路的转变，确实比西方要难不少，也难怪鲁迅先生会吐槽当时的一些“卫道士”：“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好在不管怎样，时代毕竟是在进步，观念也在更新。如今的中国，人们认识到人体也是一种艺术，早已不是问题，但反而出现了新的问题：如何把握真正的艺术和低俗的色情？比如前几年恨不得一丝不挂的某些车展车模，比如一些完全不知所云的“行为艺术”。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何其难！何其难！

读者评论

小冰：真正龌龊的不是裸露的身体，而是见不得光的思想。

Young：记得大学英语老师放美国电影（喜剧），有一段女主洗完澡撞上男主的镜头虽然没有漏点，但老师还是很紧张地跳过这一段，毕

竟传统文化观念觉得不敢看，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

谢幕之后：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艺术和低俗之间一线之差，所以不难看出其中“度”字的重要性。但怎么定这个“度”也是众人讨论最多，最难确定的。头疼。

碧落：8年前读大学的时候画人体模特被其他朋友知道，依旧是两眼放光的窃窃……所以我觉得能接受的自然就能，不接受的不必强求。

一场轰动中外的大劫案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桩劫持案。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劫案，从某种程度上说，堪称“民国第一大劫案”。

1

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正在津浦铁路上疾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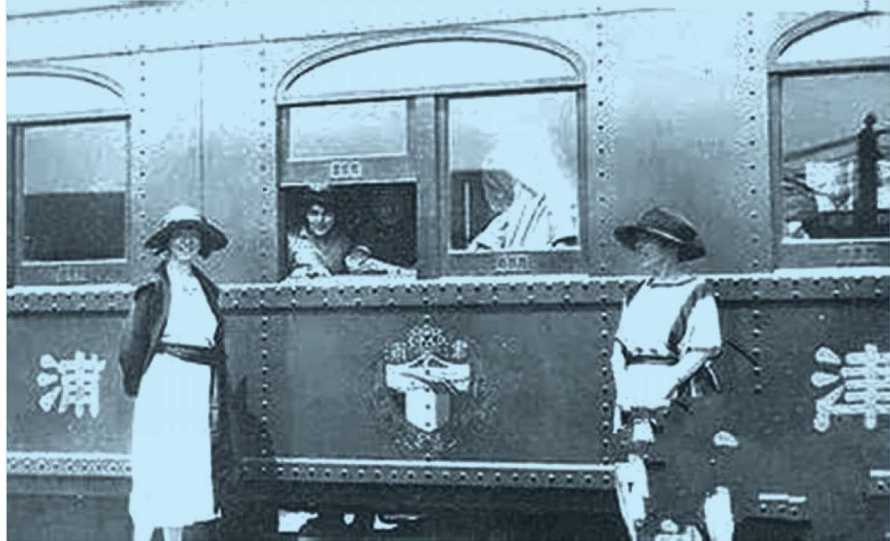
在中华民国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能坐得起这列列车的人，依旧不多。这列列车是时任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订购而来，车厢为全钢打造，外面漆着蓝漆，俗称“蓝钢皮”——在当时整个远东地区，这样的列车只有一列。

车好，自然票贵。

1924年，四川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到上海去看望女儿，曾搭乘过一段津浦线上的这列火车，连火车票在内，一共在火车上花费了49块大洋。

49块大洋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的北京，一块大洋，可以订半个月的牛奶，或买2斤鲜羊肉，或买20斤大米。

由此可见，当时能坐这列火车的，都是些什么人。



“蓝钢皮”列车的另一特征，就是车窗为拱形

回到1923年5月5日晚的这列“蓝钢皮”。

“蓝钢皮”分一、二、三等车厢，一等车厢由一间间的软卧构成。能买得起一等车厢车票的，多半是外国人，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中国生意人。

那一晚，在“蓝钢皮”的一等车厢里，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而另一群外国人，如《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苏里新闻报》驻远东记者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是到山东境内采访的。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在中国已经待了8年，很自然获得了一个称号：“中国通”。作为一位媒体界人士，鲍威尔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到哪里都喜欢记上一笔。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我们后人才能完整知道之后发生的所有故事。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那一夜，鲍威尔在一等车厢里和同车厢的法国人贝吕比闲聊。他告诉法国人，火车现在刚刚进入山东境内，目前处于三省交界处，是土匪的“天堂”。

“我们现在正处在土匪窝里呢！”

在一阵哈哈大笑之后，鲍威尔和贝吕比洗漱完毕，在凌晨2点左右，昏昏睡去。

凌晨2点50分左右，伴随着一阵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整列列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和颠簸，鲍威尔从梦中惊醒，赶紧掏出了手枪。

一群中国人拿着枪闯进了一等车厢，一个罗马尼亚人（一说为英国人）抄起手边的茶壶扔向了对方，换来的是几声枪响——他被当场击毙。

鲍威尔立刻选择交出手枪。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2

在遇劫的外国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

这位小姐，名叫露茜·奥尔达里奇，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后来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A Week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外国人质的意思。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

在遇劫之后，车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队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车票——那张小小的车票，此时成了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凭证：三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2000块大洋的赎金；二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1万块大洋的赎金；头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3万块大洋的赎金。车票丢了怎么办？没关系，就按头等车厢赎金计算。

至于洋人，不分几等车厢，统一价格：一人5万块大洋。

人质们在铁道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土匪们完成了车厢的洗劫工作。一名年轻的土匪下令：上山。

那座“山”名叫“抱犊崮”，在峄县、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交界处，高约800米，是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崮顶平坦，有良田400余亩。当初为了耕种这些田地，需要耕牛。耕牛上不去，农民只能抱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使用，所以得名“抱犊崮”。



抱犊崮如今已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距枣庄市驻地23公里，面积达665.5公顷，为AAAA级景区

这时候，天色已经微亮，露茜小姐这才看清了土匪的人数：大概有1500人左右，很多都拿着旧式的日制枪械。

那个下令上山的年轻土匪，身边大概围着300个左右的随从，露茜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所有土匪的头目，他的名字，叫孙美瑶。

孙美瑶，山东北庄镇（今枣庄市山亭凫城乡）白庄村人，生于1898年。孙美瑶的胞兄孙美珠联合各地方武装力量和各省饥民共七八千人，在抱犊崮“扎寨”，成了土匪。1922年，在一次与官军围剿的交战中，孙美珠被杀，孙美瑶继任为“总司令”。

劫持“蓝钢皮”，是孙美瑶蓄谋已久的行动。他们早早就挖开了临城那段的津浦线铁轨，然后埋伏在铁路两旁，安静地等候远东唯一一列超豪华列车的出轨。

只是，和美国人鲍威尔想的有所不同的是，孙美瑶组织的这次抢劫，还不是一般的抢劫。

孙美瑶的土匪队伍，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山东建国自治军”。

所以，他们抢劫的目的，还不仅仅是钱。



左一为孙美瑶，为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照片

3

“蓝钢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国政府。

一开始，各国政府乱作一团，以为这次劫持事件是又一次“义和团”事件的上演。等到搞清来龙去脉之后，5月7日至8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连续向北洋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提出下列要求：一、列国共同质问临城事件责任；二、限日放回被绑架人员；三、保证今后津浦路安全，至必要时，外国联军得采取应急手段；四、自5月9日起，3日之内责成释放所有人质，不然每过24小时则加赔偿金若干。

在各国使节中，最兴奋的是日本。事件发生的当天，日本的4艘驱逐舰就开到了天津港，日本水兵们登岸游行，抗议人员被劫。

但在这次劫持事件中，其实一个日本人质都没有。

在日本的撺掇下，英国表示已对自己在中国的驻军下达了动员令，美国国防部长也向国务卿建议出兵中国。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北洋政府抛开了其他一切事务，把所有精力放到了这桩大劫案上——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出两万大军，包围了抱犊崮，随时准备剿灭孙美瑶所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

千钧一发之际，田中玉的部队收到了绑匪传出的一封信。

那封信，就是被劫持的鲍威尔写的。信里说：

建国自救军的首领命令我们给你写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

——外国人质代表J.B.鲍威尔

这是土匪得知鲍威尔是记者后，让他写的这封信。而鲍威尔答应写的条件，就是先要将被绑乘客中的妇女和儿童全部释放。

在鲍威尔的信发出后，土匪信守诺言，释放了全部妇女和儿童，包括前面提到的露茜小姐。其实不仅如此，据赵焰《晚清之后是民国》一书考证，当时土匪还释放了另外一些人质：和孙中山的组织有联系的；曾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家里不足四十亩地的；有医务百工技艺的。一家人同时被掳的，只留一个，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

孙美瑶似乎在用行动说明，他们的土匪，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同时，他也在释放“不想鱼死网破”的信号。

在释放一批人质之后，土匪手中总共还有20个“洋票”和30个“本票”。



一位叫李·所罗门（右二）的“洋票”曾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描写到达抱犊崮时的情况：“头12小时内，我们都只穿着衣衫、内衣或睡衣，等到了首座堡垒时，匪徒们才发回给我们自己的衣物。总之，我们与匪徒几乎没有分别，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匪徒的穿着有一部分是他们从火车上偷来的，其余则是他们自己的。有些匪徒有四五件中式外套和一些我们的衣物。他们个个有手表、珠宝等东西，新来这儿的匪兵大多衣衫不整，然而武器装备齐全精良。”

鲍威尔的信引起了各国政府的一致担心，它们纷纷施压北洋政府：为了保证人质安全，不许使用武力！

不能打，怎么办？

那就只能派人开始和谈了。

4

5月15日，政府和土匪的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

官方派出的代表规格很高：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省长熊炳奇，绑匪方面派出的代表叫周天松。

周天松带来了绑匪的条件：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补充军火。

等到这些条件提出，孙美瑶这次劫持的目的才完全浮出水面：1923年，孙美瑶的队伍在官军的连年围剿之下，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所以他们策划了这次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目的绝不仅是为了求财，更是为了自保——求被招安。

除了第三条不可接受外，前两个要求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但双方要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

原来，孙美瑶还是信不过政府。民国八年，有一支土匪也做过一次绑票，政府答应“释放肉票，既往不咎，收编招安”，但释放人质后，17个土匪全部被杀。

政府表示同意，双方签字画押。

眼看谈判成功，在山东“督阵”的交通总长吴毓麟随即往北京发了封电报，表示自己“义愤填膺”，自愿入山当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

A CHINESE TRAIN OUTRAGE: TRAVELLERS CAPTURED BY BRIGANDS.

当时外媒对“临城火车大劫案”的报道

这一“义举”让在北京的政府官员感动不已，时任总统黎元洪立刻发电嘉奖，一干官员接连发电，劝阻吴毓麟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了山东后，每天都在打麻将，没有过问任何事情，就等着谈判达成

后发出那一封电报，然后载誉回京。

但吴毓麟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除包围，并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希望开始释放人质。但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撕碎了“委任令”，表示不承认之前签订的条约，官军先全部撤退，然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再提出正式的条件。

土匪变卦了。

5

孙美瑶之所以会变卦，还是因为他的土匪本性。

一看政府那么轻易就答应了自己的条件，孙美瑶不禁开始后悔起来：条件开低了！

在和山寨里的众人商议之后，孙美瑶重新开出了条件：一、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二、将自己部众改编为两个师；三、将滕县、邹县、峄县作为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一百里外；四、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五、六国提供保证。

这些条件开始变得越来越荒谬，北京的政府火气也开始越来越大。到京述职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力主“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表示支持。不过这个计划被泄露了出去，各国使节也开始不断劝阻中国政府：不许动用武力！继续谈！

为了避免动用武力而使得本国人质遇难，外国使节们找到了当时北洋政府的实力派曹锟，希望他劝说政府不要动用武力。

这场大劫案发展到这一地步，已经成了各方势力达成自己目的的一种工具——曹锟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借助洋人继续扩大和巩固自己势力的机会。在答应美国公使舒尔曼不使用武力之后，曹锟也得到了美国人对于他挤走黎元洪，当选民国大总统之后的一些承诺和约定。

在曹锟的强烈反对下，动用武力的提议被否决了。田中玉只能亲自去找曹锟，汇报自己的想法是“明剿暗抚”：明面上强硬宣称将使用武力，但暗地里还是以安抚为主，等土匪自己“扛不住”。

田中玉的想法还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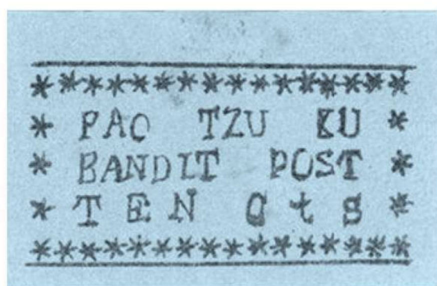
由于官方不肯答应条件，抱犊崮的土匪们开始慢慢慌了起来。思虑再三，孙美瑶在外国人质中找了一名法国人，中文名字叫作裴雨松。裴雨松在“一战”的时候得到过勇士勋章，土匪们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便让他宣誓肯定会回来，然后就让他带着新的条件下山去接洽政府。

裴雨松一下山，就失去了踪影。这种行为让土匪们大吃一惊：原来外国人也会不讲信用！

无奈之下，粮食紧缺的孙美瑶只能先同意，让外界送些粮食进来，不然人质和土匪们就都要饿死了。

红十字会驻华代表克劳立刻答应了孙美瑶的要求，雇了一支苦力队，往抱犊崮送来成箱的青菜罐头、面包和牛肉。“洋票”在抱犊崮的生活条件顿时好了很多。

有意思的是，克劳在送食物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质急于给家人写信，让苦力带下山。有生意头脑的克劳立刻临时设计了两款邮票，要求人质寄出的信，必须购买由他制作的“土匪邮票”。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别为5分和10分。5分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犊崮，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5”后面多加了个“0”，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成为一张错票。10分的邮票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 TZU KU BANDIT POST（抱犊崮土匪邮政）”。

如今这两款“土匪邮票”已成为收藏界的抢手货，一个小小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拍卖，以1万美元成交

尽管山上山下能互通有无，但实质性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到底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比山下官军更急的，其实是山上的土匪。5月25日，在“法国勇

士”裴雨松一去不复返之后，土匪决定让鲍威尔宣誓，带着新的条件下山。

鲍威尔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带着新的三个条件找到了政府：一、发给匪军6个月的军饷；二、收编匪军1万人；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再一次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

鲍威尔遵守自己的诺言，于当天返回了抱犊崮的土匪营地。

5月2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从北京回来了，根据当初和曹锟达成的约定，他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且开始派飞机绕山投放传单。

土匪更慌了，让鲍威尔再次下山，带去了两个让步的条件：一、政府军解围撤退；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田中玉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土匪没有回音，但在5月31日，释放了多病的中老年英国人质斯密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是为了治疗自己的失眠而到中国来旅行的，不过没有人知道他在抱犊崮的那些夜晚究竟睡得好不好。史密斯的中国之行原本还有东北最后一站，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土匪出身之后，毅然决然地提前结束了这次中国之行，返回了英国。

史密斯回国后发表了一篇通讯，叙述了自己在被劫持期间的感想，他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但是哪怕有人花100万美元，他也不愿意再有这种经历了。

人质一个一个被释放，但危机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胶着状态，需要一个解局人。

6

6月1日，解局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陈调元。

陈调元当时的职位是徐海镇守使，属于江苏官员。临城的这桩大劫

案原本和他没有关系。但因为整个案子处理得实在太拖沓，他受命进入山东，协调此事。

陈调元到了山东，很快就发现了僵局的关键所在：官匪互不信任嘛！那该怎么办？就必须要有一个人，愿意深入虎穴，代表政府进入土匪的老巢，表达诚意。

此时，当初那个“义愤填膺”，愿意进山替换人质的交通总长吴毓麟早已不知踪影，陈调元一拍胸脯：我去！

6月1日，陈调元带着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他们说是去接引人质下山，其实就是去做“抵押品”。



陈调元后来官拜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不过被人评价军事才能极其一般，但为人处世圆滑。他的儿子叫陈度，给他生了个孙女，叫章含之。章含之的女儿，叫洪晃。章含之的第二任丈夫，叫乔冠华

陈调元敢进山，还是有一点底气的：去临城的时候，他带了两个旅的兵力。

这两个旅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土匪释放人质，而山东督军田中玉反悔，那么那两个旅为了陈调元的人身安全，就会向山东军队发起进攻；如果土匪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放人质也不放陈调元，那么那两个旅就会全力向土匪发动进攻。

在武力保障之下，原本就和各路土匪熟稔的陈调元上山后，展现了

非凡的手腕：和土匪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像是自家人一样。

他先是要取得孙美瑶的信任。有一次喝酒，孙美瑶双眼红肿，陈调元忙问为何。孙美瑶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熬夜办事，陈调元当即拿出一副名贵墨镜送给孙美瑶，表示作为一寨之主，一定要好好保重。

然后还要让土匪放下戒备。陈调元当时自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贴身卫兵上山，孙美瑶的族叔孙桂枝（此人后来被证明是真正的幕后指使，孙美瑶对他言听计从）对他赔笑："我们这里岗哨众多，绝不会出什么事，也请您带来的几位弟兄最好别出去，以免发生误会……"陈调元心领神会，二话不说，当即命令卫兵将所有武器卸下交给孙桂枝。

陈调元还和一同前来的各方士绅打理好关系。他一进山就拿出一本日记本，请每个人签名，理由是大家一起上山来办这种尴尬事情，可算是患难之交，不妨留个纪念，大家今后都好做朋友。

陈调元上山时，还带来了一件大礼——2000套正规军的军服，这让土匪们心里非常开心。再加上陈调元的一路协调，土匪很快就答应了当初政府提出的两个条件，然后开始分批释放人质。

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8名外国人质被释放，至此，所有的人质均已被释放。孙美瑶随后陪同陈调元检验所有土匪：实数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土匪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一场历时37天，轰动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就此画上了句号。

7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你们不想知道一下孙美瑶的结局吗？

根据当初的约定，6月27日，孙美瑶和他的手下如愿被招安，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任旅长。

25岁的孙美瑶干了一票惊动世界的大案，最终还全身而退，自然是春风得意。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北洋军阀直系和皖系的纷争旋涡中。

临城一案，使得原本属于皖系的山东督军田中玉被迫辞职，直系干将郑士琦接任。而孙美瑶等土匪崇拜的张敬尧，却是皖系的，而且是当时曹锟手下第一干将吴佩孚的死对头。

身处风口浪尖，年轻的孙美瑶还颇为高调，在完成了几次“剿匪”任务后，认为自己已经成功“洗白”，又开始暴露了一些土匪习气，比如剿匪获得的枪支，小部分上缴，大部分自己私存起来。

孙美瑶不知道，从曹锟到吴佩孚，都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923年12月19日，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亲自打电话给孙美瑶，邀请孙美瑶带上旅里的高级军官们，到枣庄中兴煤矿俱乐部玩耍，顺便调解孙部与驻枣庄的吴可璋团之间的矛盾——吴可璋曾举报孙美瑶扣枪不缴，孙美瑶曾说：“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

为了给自己找几棵大树，孙美瑶曾拜张培荣为师。自己老师邀请，自然要去。孙美瑶兴冲冲带上一队护卫，外加几只心爱的鹌鹑（他和张培荣都喜欢斗鹌鹑），前去赴宴。

到了中兴煤矿俱乐部，孙美瑶被张培荣的副官单独带到正厅。一进门，一把石灰粉撒了上来，然后孙美瑶被人按在墙上，剥去军装，推到了俱乐部门口。

一刀斩首。

馒头说

1925年，鲁迅在他的《灯下漫笔》中，还专门提到过孙美瑶和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

鲁迅这篇文章全文和孙美瑶并没有太大关系，但当时孙美瑶的行为，在中国民间还是得到过颇多的赞誉，一度被称为是“义匪”，甚至还被提拔到“与帝国主义做斗争的革命团体”这个高度。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评价？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孙美瑶当时煞了洋

大人们的威风吧。

只是孙美瑶和他的兄弟们的所作所为，和“革命”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劫持人质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己能被“招安”而已。这就是一次彻头彻尾、标准的绑架和抢劫。

唯一和其他绑架不太一样的是，土匪们对人质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但这待遇只是对洋人的，孙美瑶他们对本国人质的态度就要差很多。

从这个道理上说，鲁迅其实也没说错。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向美国宣战。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鲍威尔被日本兵抓捕，投入了提篮桥监狱。在监狱的牢房里，鲍威尔惊奇地发现，同处一屋的英国人，居然也是当年“临城火车大劫案”的人质之一。

鲍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这两位山东土匪的前俘虏，此时此刻重逢于斯，禁不住紧紧拥抱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喊道：“我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

唉，不知已成为游魂的孙美瑶若看到这句评价，会做何感想。

读者评论

Dali　Zhou：按照这个购买力，49块大洋，大概是现在的2000元。在铁路稀缺的年代，已经很良心了吧。（作者回复：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一个普通巡警月薪大概15块大洋，一个卫生局科长月薪大概30块大洋。）

汉韵：我是滕州人，以前家里人时不时提出领我去抱犊崮玩，我都觉得没意思不去。看完这篇，觉得放了暑假一定要去看看。这或许就是历史的一种作用吧，能让原本普通冰冷的景色有了不同的温度。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让每一座普通的山、每一条普通的河，都因为人事而有了自己独特的意味。

凉凉：我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地长大的，洋行旧址还在，但很破旧了。顺便提一下中兴公司，中国近代第一只股票是这个公司发行的。西门子当时先进的采煤设备在这里，张学良、黎元洪，还有一批当时社会

大佬都是这里的股东，股票实物都在。公司还有近代中国最大远洋船队，好像抗战爆发后，公司自己都给炸了，不留给日本人。貌似上海码头也是中兴公司的，新中国成立后让上海港务代理，相关文件还在中兴展馆里，我记得还有周总理的签字。馒头老师有兴趣，这个公司可以单写一篇，很有意思，我觉得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刚说的如有出入，请大伙指正。

明明是刻骨铭心的仇恨，但日本战后为什么会感激美国人？

我们一直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那么，如果在极度仇恨之后，又转变为极度的热爱和崇拜，背后的原因，就更值得探寻了。

1

1945年8月30日，下午2点05分。

一架飞机在日本横滨以西的厚木机场缓缓降落。

整个机场高度戒备，全部戒严。因为，这架名叫“巴丹号”的飞机，是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座机。

麦克阿瑟作为“二战”期间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现在的头衔是“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没错，他是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来接管日本的。

但久经沙场的麦克阿瑟，在迈出机舱门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紧张。



麦克阿瑟走出飞机

麦克阿瑟其实应该提前一周就抵达日本。但是，他得到的情报是，厚木机场停着数不清的日本“自杀式”飞机，而一大批“神风特工队”的队员已经表态：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渴望，与这位沾满大日本皇军鲜血的刽子手同归于尽！

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在中后期把日本人虐得体无完肤，从硫磺岛到关岛，从冲绳岛到东京大轰炸，再加上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日本数十万军民尸骨无存——当然，日本人未必会检讨是他们自己先偷袭珍珠港的。

而麦克阿瑟呢？是他指挥着美国军队，冲破一层又一层日本人用尸体堆积起来的防线和壁垒，一直从澳大利亚打到日本——在很多日本军官和士兵心目中，他就是“罪魁祸首”。

此时此刻，日本的本土还有300万士兵尚未完全缴械，对于孤身前来接受投降的麦克阿瑟来说——他自己是很得意这种“孤胆英雄”行为的——只要有一点点“哗变”，他就可能被愤怒的日本人撕碎。

所以，麦克阿瑟在命令厚木机场的所有日本飞机拆除螺旋桨之后，

才敢降落到这里。

事实证明，麦克阿瑟的担心不无道理。

从机场到横滨市区，有13公里的路程。一路上，麦克阿瑟发现，沿途的道路两旁，站满了日本士兵，可能有3万名之多。

而所有的日本士兵，都背朝他的车队。

旁边有人给麦克阿瑟解释：这是他们拱卫天皇的方式。

但麦克阿瑟没有理由因为这种安慰而平静下来。面对明显有敌对情绪的日本士兵，他的任务非常艰巨：接管这个国家，稳定这个国家，恢复这个国家。

但首先，他决定要震慑这个国家。

2

1945年9月2日，上午9点。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军战列舰“密苏里”



麦克阿瑟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代表盟军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中方受降代表团的团长是徐永昌

号上举行。盟军的代表团，以麦克阿瑟领衔，日本的代表团首席代表，是新任的外相重光葵——就是1932年在上海虹口公园被炸断腿的那

位。

签字仪式只进行了18分钟就结束了，然后，让现场所有人都大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整整400架美国当时最先进的B–29轰炸机列队掠过“密苏里”号战舰的上空，队列旁围绕的，又是整整1500架舰载机。

整个天空都被遮蔽，整个海洋都被震动。

当时的日本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沉默不语——如果能回到1941年，他们估计一定不会发动偷袭，去招惹美国这个拥有超级生产力的怪兽。

而麦克阿瑟安排这一出的用意也很明显：你们之前不是不肯投降吗？不是要“玉碎”吗？“碎”给我看看？

3

第一步是震慑，第二步就是瓦解意志。

瓦解谁的意志？当然是日本国民的意志。日本国民的意志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一个人：日本天皇。

在投降仪式举行之前，美军曾给日本天皇草拟过一份天皇的投降诏书，第一句是：“我，天皇裕仁……”当时麦克阿瑟觉得这句话很正常，但身边在场的日本人都面露愠色。

旁边有人悄悄告诉麦克阿瑟：“天皇从来不用‘我’，用‘朕’。”

麦克阿瑟由此深深体会到了日本民众对天皇那种近乎癫狂的崇拜。于是，他立刻告诫所有部下：“不要不尊敬日本天皇，这样会惹怒日本的军人！”

但尊敬归尊敬，不解决“天皇”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让日本人彻底接受改造的。

于是，麦克阿瑟让日本的裕仁天皇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就是著名的《人间宣言》。

宣言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朕と尔等国民との间の纽带は、终始相互の信頼と敬爱とに依りて结ばれ、単なる神话と伝说とに依りて生ぜるものに非ず。

（朕和诸等国民之间的纽带，是依靠互相信赖互相敬爱所形成，而不是单靠神话传说而生出。）

天皇を以て现御神（あらひとがみ）とし、且つ日本国民を以て他の民族に优越せる民族にして、延いて世界を支配すべき运命を有すとの架空なる観念に基くものにも非ず。

（说朕是神，日本民族有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的素质，拥有能扩张统治世界的命运，这种架空事实的观念，也是无根据的。）

朕の政府は、国民の试炼と苦难とを缓和せんが为、あらゆる施策と経営とに万全の方途を讲ずべし。

（朕的政府是为了缓和国民的苦难和磨炼，为了能够更好地运营国家和发布政策才有如此之说。）



麦克阿瑟与日本裕仁天皇

换句话说，就是天皇通过一份诏书的形式告诉全体日本国民：我不是神，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凡人。

这样一个举动，既保住了日本军人的颜面，但也让天皇的威信在平民老百姓心目中大大降低了。

当然，麦克阿瑟却为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埋下了一颗大地雷：天皇若不被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又怎么可能不招魂？

前两步基础打好以后，麦克阿瑟正式开始了他对日本的改造。

首先，麦克阿瑟要为日本制定一部新宪法。

新宪法的草案被称为“麦克阿瑟草案”，但其实是麦克阿瑟让占领军中那些参战前是律师的军官和士兵经过详细讨论后写出来的。日本的新宪法是美国制度与英国制度的结合，代表着那批年轻律师最大的理想：最大程度保障国民权利。

这部宪法曾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最自由的宪法，也被一些人认为是麦克阿瑟在占领日本期间最大的成就。

1946年4月10日，日本根据新出笼的宪法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在那次选举中，有1300万日本妇女参加了投票——麦克阿瑟坚持一定要给妇女投票权，因为他认为这也将打击处于男权社会的日本男子的自信和尊严。

结果，有一位妓女也被选进了众议院。有很多人反对，麦克阿瑟就问妓女获得了多少选票，得到的回答是“25.6万张”。麦克阿瑟随即向那位妓女发出了贺信，他说：“那么多的选票，绝不会仅仅是依靠她那暧昧的职业得到的。”

政治体制搞定，麦克阿瑟的第二步是搞经济。

在这一方面，麦克阿瑟用的秘诀就是一个字：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大约80%的工业和金融财富都控制在一批大财阀的手里：三菱、三井、住友……这些大垄断公司不仅垄断了国家财富，还左右了国家的政治和决策。“二战”期间，这些大财阀公司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发动机之一。

于是，麦克阿瑟就下令把这些大财阀全都解散——规定财阀们必须交出所控制的股票，一半公开出售，剩下的一半作为财产税上缴。让这些“巨无霸”公司都成了普通公司，既增强了市场的活力，又避免这些公司以后再能影响国家政策。

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当然会引起反抗，但没事，和强迫日本人接受新宪法一样，麦克阿瑟手里有飞机大炮和机枪（但这项改革其实收效不大）。

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同时，麦克阿瑟还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农民问题。

怎么解决？说穿了也是一个套路：搞土改。

在战前，日本的土地高度集中，全国大约有一半的耕地集中在地主手里，他们靠收租就能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贫苦的农民没有地种，这种行为大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麦克阿瑟在1946年6月正式提出自己的土改方案：在村子里的地主，可以保留大约两亩半的土地，多余的全部由国家收购；不在村的地主的土地，全部由国家收购。然后这些土地再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转给佃农。



由于缺乏粮食和物资，黑市一度成为战后日本人的主要物资来源

到1950年，日本大概有3000万亩的土地被国家收购，475万余户的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占日本全国农民总数的75%），日本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除了这三项重要改革，麦克阿瑟还对日本的教育体系和宗教体系（主要是针对神道教，麦克阿瑟曾想一把火烧了靖国神社，但出于冷战

考虑而最终没有进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是教育还是宗教，绝对不能再宣扬对天皇效忠，鼓吹民族狂热情绪。

这些改革的方向都没问题，虽然在过程中肯定会引起很大的反弹，但最终还是被保障施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已经被全部解除武装的日本民众在全副武装的美军面前，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一边是棍棒，一边又是蜜糖（麦克阿瑟为日本争取来了大量粮食援助），所以麦克阿瑟有足够的筹码保证他的改革能得到有效的推行。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赶上了一场对他们极其有利的战争。

5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

这场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不仅打乱了中国原先的步骤，也出乎美国的意料，但对于日本而言，却是一块天上掉下的馅饼。

由于日本离朝鲜战场非常近，又是美军驻扎的主基地，所以日本立刻就变成了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和前沿基地。

由于战争的需求，纤维、金属乃至汽车等行业迅速振兴：生产化学纤维的东洋人丝公司利润率一举超过45%，本来赤字已经高达7600万日元的丰田公司得到大量的美军卡车订单后，公司利润极速攀升，原来的工人罢工和骚乱全部停止。

朝鲜战争期间，日本的出口量明显增加，仅1950年的下半年，就比上半年的出口额增长了55%，日本的外汇储备从1949年底的2亿美元飙升到了1951年底的9.4亿美元。1951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恢复到了1934年的水平。

日本战后的首任首相吉田茂后来回忆：“由于朝鲜战争的军需物资在日本订货，以及海外市场的全面繁荣，日本的商品输出有了飞跃的增加……”

可以说，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各方面改造，如果没有朝鲜战争这个机

遇，不敢说肯定失败，但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也正是因为朝鲜战争和冷战，美国彻底改变了“要彻底惩罚和限制日本”的初衷，转而大力帮助发展日本，使其能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防波堤”。

6

麦克阿瑟在日本坐了六年“太上皇”，直到1951年4月，他被解职。

为什么被解职？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糟糕的表现，以及对美国总统杜鲁门糟糕的态度。

那么如何评价他在日本的六年“垂帘听政”呢？或许，从他离开日本时日本民众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

4月16日清晨，麦克阿瑟悄悄坐上了去机场的汽车。在此之前，他除了告诉少数身边的日本高官外，并没有通知任何人——毕竟，被解职回国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但他坐上汽车后发现，沿途的马路两边，密密麻麻站满了日本的民众，从他的官邸，一直延伸到厚木机场，人数达到了数十万之多。

又有谁能想到，六年之前，多少日本人是恨不得剥麦克阿瑟的皮，喝麦克阿瑟的血的呢？



I.N.S.特約日本版

世界通信

極東政策を明示

—ト大統領放送演説—

極東情勢新局面へ　マ元帥解任　注目される中共の動き

リッジウェイ新総司令官

総司令部を去るマッカーサー元帥

日本媒体报道麦克阿瑟被解职的消息

而此时，他们齐声一致地不断高喊：“大元帅！大元帅！”

戎马一生的五星上将，在那一刻泪流满面。

馒头说

麦克阿瑟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

这位曾经创下西点军校毕业生分数纪录的将才，一生经历过不少大起大落，有仓皇撤退，也有复仇凯旋，有奇袭成功，也有一筹莫展。但人们回顾他戎马一生，一直津津乐道的——包括他自己回忆录里也颇为得意的——却是他改造日本的六年。

平心而论，军人出身的麦克阿瑟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一个满目疮痍的战后日本，在他的治理下，居然有了勃勃生机。

人类历史上诞生过很多伟大的军事家，他们留下一个个经典的战例，但真正能让人耳熟能详的，并不多。

比麦克阿瑟还要伟大得多的拿破仑，如果不是拿破仑迷或欧洲史迷的话，有多少人能说出奥斯特里茨战役和耶拿战役？那可是充分展现拿破仑军事天才的经典战例。

但一说“拿破仑法典”，知道的人肯定比知道那两场战役的人要多很多。

不仅仅是因为“拿破仑法典”对法国，对整个资产阶级国家都产生了延续至今的重大影响，更是因为，“拿破仑法典”是建设和生产，而不是杀戮和破坏。

1951年4月19日，卸任后的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引用了那句著名的话：

“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

是的，花儿之所以不死，是因为它们曾留下过给人希望的芳香。

读者评论

邓鑫：纵观全文，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建设，不是本心和初衷，而是将日本作为对抗中苏的工具，这是历史和美国的抉择，不是他个人的决定。然而，无论本心为何，他也为日本战后恢复做出了贡献，所以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重。另，对于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我更认同的一句话是，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毕竟，所谓春秋无义战，大多数的战争是源于贪欲，基于利益。

SUN："当然，麦克阿瑟却为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埋下了一颗大地雷：天皇若不被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又怎么可能不招魂？"是埋下地雷还是清除了地雷？（作者回复：埋下。天皇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玄同：拿破仑被流放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不是我打了60场胜仗，而是创立了民法典。

霞：战争的杀戮、破坏让人畏惧从而敬畏；而重建家园的修复，建设让人看到希望从而由衷地尊敬。一个因怕而敬，一个因爱而敬，分量却是不同的！

一九四九，百万黄金大挪移

作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承认的贵金属，黄金的作用不仅仅是用来做饰品或显示尊贵。

对一个国家而言，黄金储备就意味着稳定和繁荣，信心和信用。

那么，如果黄金都被运走了呢？

1

1949年5月17日，上海的郊外炮声隆隆，战况激烈。

已经渡过长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5月12日开始对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发起了总攻。

5月17日，国民党军队在杨行和月浦的防御阵地均告失守。

此时，在市区内的国民党守军总指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在全力关心着另一件事。

那一天，汤恩伯调来了国民党的军舰“美朋号”和“中基号”登陆舰，另外又征用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将一只只沉重的木箱，在全副武装的士兵警戒下，全部装上了船。



汤恩伯后期失去蒋介石信任，去台湾后又去日本，在日本治疗胃病时逝世，一说为日本医生毒死。去世时仅54岁，最后军衔为陆军二级上将

这些木箱又大又沉，导致连装两天两夜，“汉民轮”在5月19日才启航。由于当时已有零星的解放军部队攻入上海市区，“汉民轮”连马达也不敢开，趁夜顺着水流悄悄“漂”出了吴淞口。

脱离“险境”重启马达之后，船上甚至有人喜极而泣。但没多久，在船上的负责押运这批木箱的军统上校特工江源，就被“汉民轮”的船长拉到了一边：“江先生，从上海到台湾有好多小岛，我们把这个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这个小岛上去做金银岛主怎么样？”

江源倒吸一口冷气，立刻组织船上所有的秘密押运人员，四人一组，带枪站岗。

江源知道，船长早就已经看穿船上木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了。

连同之前开走的两艘军舰，这三艘船满载的，是蒋介石准备运往台湾的20万两黄金和100万两银元。

2

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往台湾运送黄金了。

1948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的局势朝着对国民党不利的方向迅速发展。11月初，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方面称为“徐蚌会战”），国民党军队的战局迅速恶化。

1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

可见当时蒋已开始考虑放弃大陆。而他所指的“单纯环境”，就是台湾。

但台湾虽然可以退守，却不能空手而去——数十万军队如果到了那里，吃什么？花什么？拿什么稳定军心和民心？

1948年11月30日晚，和本文开头发生的那一幕非常相似，上海的外滩码头全部戒严，一批又一批沉重的木箱被搬运到了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上，一直装到黎明。

天亮后，“海星号”拔锚启航，驶向台湾。船上运载的，是整整200万两黄金。

那是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第一批黄金。



1948年的上海黄浦江岸边

3

国民党哪来的那么多黄金？

抗战胜利之初，已经拼上全部家底的国民政府国库中只剩下不到3万两的黄金，不过随即接收到了汪伪政府国库里的50万两黄金，算是缓过一口气。随后，因为抗战中美国为在中国建机场支付了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出其中的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国库开始充裕。

不得不提的是，1948年8月，蒋介石通过发行“金圆券”，强行用过“金圆券”兑换黄金的方式，又从老百姓手里搜集了184万两黄金。

满打满算，除去后来的花销，到1948年底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国库里大约还有400多万两黄金。

1948年11月，蒋介石一纸密电发到当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办公桌上，要求在一星期内将国库里一半的黄金运往台湾——就是11月30日，“海星号”抢运的那200万两黄金。



1948年8月，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初步成功，市民开始相信国民政府，进入银行兑换“金圆券”

当时为了运走这批黄金，蒋介石确实也费尽了心机：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据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在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处理相关公文的所有程序，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后的一个小房间里独自办理，“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

但即便如此严防死守，当时的《字林西报》还是马上刊登了英国记者乔治·维恩的报道：“中国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维恩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当时《字林西报》的办公楼，就在上海外滩紧邻中国银行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整个运送黄金的过程，乔治都看得一清二楚。联系到国民党当时在淮海战役上的颓势，他立刻就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第三天，《申报》转发了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一公布，整个上海的金融市场立刻陷入了大恐慌。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后，原本被政府寄予厚望的“金圆券”在短短半年里已贬值为原来的五百分之一，政府已经把黄金偷运走了的消息，再一次引发了老百姓的挤兑狂潮。1948年12月24日，上海等待挤进银行的市民情绪失控，引发大规模踩踏事件，最终7死50伤，造成轰动一时的“黄金挤兑惨案”。

于是，在乔治·维恩发布消息后，官方立刻“辟谣”，并对这名英国记者施行逮捕，并且迅速审判判处死刑。还好乔治的夫人通过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使乔治侥幸逃过一死。

但纸包不住火，国民政府偷运黄金去台湾一事，其实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金圆券”由此开始了一路狂泻的行情：1948年8月“金圆券”刚发行时，2元“金圆券”能换1块银元；1949年1月，1000元“金圆券”才能换到1块银元；1949年4月，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元；1949年6月，5亿元“金圆券”才只能兑换1块银元。



政府信用垮台，上海市民开始疯狂挤兑黄金

4

在整个偷运黄金的过程中，有没有人试图阻止？

答案是有的。

黄金是整个国家的财产，蒋介石要运走黄金，也得“合法”才行。为此，蒋介石当时想出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国库剩余黄金。

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徐堪就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是在蒋介石派人施压后，他很快转为默许。

接下来反对的人叫刘攻芸。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人生中的第三次“下野”，央行总裁俞鸿钧也随即去职，接替总裁位置的是刘攻芸。

刘攻芸当时是不赞成运出黄金的，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拖。但蒋介石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和军需署长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再加上俞鸿钧在一旁极力劝说，最终说服了刘攻芸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

但因为刘攻芸在这件事上“拖拖拉拉”，由此失宠于蒋介石，最终只能去了新加坡养老。

付诸实际行动的，是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黄竞武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儿子。当时，黄竞武已被发展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根据安排，黄竞武一方面监视上海国民党密运黄金行动，一边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还与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并策反国民党财政部所属的税警总团“弃暗投明”。

5月12日，因为泄密，黄竞武在自己的办公室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在狱中备受拷打后，于5月17日在监狱内被活埋。



黄竞武

当然，同样希望阻止黄金被偷运的人，还有蒋介石“下野”后的继任者——李宗仁。

但是，“代总统”李宗仁知道这事情时实在太晚了。1949年2月17日，就职代总统位置快一个月的李宗仁突然发现，国库的黄金已经被搬了个底朝天，立刻严令央行总裁刘攻芸不许再运出去一块金子——刘攻芸没有回复。

然后，李宗仁又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把运过去的黄金运回来——陈诚是在病中被蒋介石火速派往台湾担任主席的亲信中的亲信，又怎么会听从李宗仁？陈诚立刻回函：“此事归属央行关系啊，请找央行协调。”

李宗仁再找刘攻芸，刘攻芸这次倒是回复了：“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

李宗仁甚至还抱着一丝幻想，致函给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在自己日记中写道：“李、白[1]运动立委，拟将台厦现金运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这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

被运走的黄金，最终还是没能运回来。

5

那么，蒋介石最终运到台湾多少黄金？

由于蒋介石行事机密，外加分三次运输，所以出现过多个版本，从100万两开始到数百万两不等。

按刘攻芸记录在案的数字，蒋介石当时从大陆运走的纯金大概是294万两左右。

而另一个版本来自吴兴镛，他是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的吴嵩庆的儿子。

吴嵩庆全程参与蒋介石的运金过程，并一度被称为蒋介石的“白手套”（当时核对账本后发现，蒋介石为自己留了个80万两黄金左右的小金库没有入账，用来支付各种军需费用）。吴兴镛在研究了父亲大量的资料和日记后得出的结论是：

大陆当时运台纯金总量在350万两左右，外加7000万美元（按当时市价大概合200万两黄金），外加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又是200万

两黄金），所以总值达到800万两黄金。



1960年，在台湾的吴嵩庆（右）和蒋经国

这么多的黄金运到台湾，确实起到了大作用。

1949年6月15日，俞鸿钧在台湾受蒋介石指示，以80万两黄金为准备金，发行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新台币，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

但台湾民众哪怕听说了“国民党从大陆运来大量黄金”的消息，依旧对这个政府缺乏信心。

为此，陈诚让人在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老百姓发现去了就真的能换到黄金，心开始稳定下来，市场也开始稳定下来。

当然，虽然国民党运走了大量黄金，但整个岛上的各种开销，带过去的60万大军的给养，每个月都在消耗大量黄金。到了1950年6月，台湾库存的黄金只够再用三个月了。

而就在这个月的25日，一件足以让蒋介石大呼“天不亡我”的大事发生：朝鲜战争爆发。

原本已经准备放弃台湾的美国，迅速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

从大陆带过去的黄金终于撑住了局面，台湾由此开始踏入经济的起飞。

馒头说

我还记得读小学时候的那一幕：

语文老师在讲台上愤愤地说：当初国民党反动派把大陆的黄金全都运到台湾去了，我们变得一穷二白，他们的经济却开始腾飞了。

语文老师说得也对也不对。

不对，或者不全面的地方是：

我们当时在没有任何家底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确实很不容易，但后来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也有自己反复折腾的原因；台湾后来经济确实开始腾飞，但也有他们自己卧薪尝胆，突破创新的原因。

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几乎就不可能建立，不等大陆的解放军打过去，他们自己早就从内部垮了。

而更关键的一点是：这批黄金究竟是谁的？

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毛泽东的，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

是属于老百姓的啊！

凤凰卫视的电视制作人丁雯静曾制作纪录片《黄金秘档》来记录这段历史，她发现当时很多台湾健在的当事人，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认为，“把属于全体人民的黄金运到台湾去，他们顾虑留在大陆的亲人会被指责”。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卢秀燕在2008年“视察”国民党金库后说：“黄金运台史，也是那个时代两岸人民的血泪史。”

文章中提到的负责押运黄金的军统特工江源的夫人米绳祖一开始也是拒绝采访，“上海的亲戚们知道先生协助蒋介石运黄金，会不谅解”。

而最直接的参与者之一，曾经在上海主导用“金圆券”兑换老百姓黄金的蒋经国，在他的散文集《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这样写道：“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何况是黄金？”

读者评论

Mr.Zhao：《张灵甫之死》一文谈到，汤恩伯其人在孟良崮一役营救张灵甫不力而被撤职，今天又看到其在运送黄金一事中身居要职。既可见战时人才的稀缺，又侧面反映出国民党统治中的种种缺陷。说到底，蒋介石格局不够“大”，背后依托的利益集团也是人心不齐、各怀鬼胎，更不用说整个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钩心斗角了。

蓝色水晶：《北平无战事》里，后来方步亭带头掏光家底兑换“金圆券”，联想到后来“金圆券”的崩溃，深刻感受到，这真是掠夺老百姓啊！

---

[1] 指白崇禧。

当年，到底有多少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

这篇文章，可能是本书“含金量”最高的一篇文章，因为说的是一个关于一批国宝的故事。

1

1949年1月28日，农历除夕。

整个南京城笼罩在绵绵细雨中。

在下关码头，1700个盖着油布的箱子，已经在那里堆放了好几天。老百姓都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但从箱子周围森严的守备来看，里面装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东西。

下午，码头终于缓缓驶来了一艘军舰——国民党海军的“昆仑号”。

这艘军舰，是专门来接运码头上这1700个箱子的。但是，等到军舰靠港时，码头上的工人们却无动于衷。原来，工人们在闹罢工，已经僵持多日。

经过一番交涉，工人们的要求全部被满足，只要能先把那些货搬上船。

但正当工人们开始搬运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忽然拥进来一大批人，男女老少都有，还带着很多行李。他们都是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人员及家属，在得知这艘船要驶往台湾时，都挤上了船。

谁都看得出来，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南京朝不保夕。

“昆仑号”在1948年被改造成运输舰，有前后两个船舱。那些海军司令部人员和家属，很快就占满了后舱。这也导致1700个箱子，只有500个被装进了船。

这时候，一位高级长官模样的人带人上了船，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服从安排，先下船再说。但是哪有那么容易？没有人肯听他的话，有些孩子和妇女开始哭了起来，有人带着哭腔喊：“桂司令！什么东西能比

我们人命重要？”



桂永清，蒋介石嫡系，当年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指挥，曾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打得异常勇猛，但也在“兰封会战”中逃跑贻误战机，放走了土肥原贤二师团。1954年病逝于台湾，享年54岁

那个被叫作“桂司令”的，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满舱的哭声中，桂永清一言不发，最终只能下令：把所有的寝室、餐厅、医务室，全部用来堆箱子，再放不下，就堆甲板上！

在忙乱的搬运之后，1700个箱子，最后只搬上去972箱，其余的被再送回仓库。正当“昆仑号”终于准备起锚，这时候，又有人送来了四个大箱子，并一再叮嘱：这四个箱子非常重要！

无奈，船上人员再将士官室的桌椅拆掉，放进这四个箱子，然后起航。

严重超载的“昆仑号”一路颠簸，路上又不断停靠，终于在1949年2月22日抵达了台湾的基隆港。

抵达港口下船后，乘船的很多乘客都不知道，那些能让海军总司令亲自上舰查看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价值连城的故宫文物。

2

这早就不是故宫的文物第一次“搬家”了。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短短时间内，东北三省沦陷，而离东北不远的北平，已经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

是否要迁移故宫的国宝文物？怎么迁移？一场争论随即展开。

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将国宝迁往西安，而当时的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到上海。当然，也有不主张迁移的，比如当时的院长助理吴瀛，他主张再观察下形势，并善意提醒易培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

但是易培基反倒生气了：“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你这是推卸责任！”

吴瀛随即不再劝阻。

1933年1月，日军攻入山海关，时局愈加险恶，故宫的文物迁移已经势在必行。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代理院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做出承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最终，故宫文物被决定迁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进入了紫禁城北门的神武门。日落时分，从紫禁城到车站开始全面戒严，夜色降临，早已被精心打包装箱的

19557箱故宫文物正式启运。

当时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排成长列的板车都朝着火车站方向移动。装载着大量故宫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真本（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专列随即缓缓启动。



易培基。吴瀛当年一语成谶，1933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故宫盗宝案”，无辜的易培基和吴瀛均受牵连，被怀疑监守自盗，易培基更是因此抑郁而终

专列被严格防卫：车顶四周架设机枪，车厢内遍布武装押运的士兵，沿途都有地方军队保护，还有张学良的骑兵时而护卫。除了特别快车，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这些专列。

第一次的故宫文物转移，是后来历次转移中条件最好的一次。但这些文物一出故宫，从此关山万里，颠沛流离。

3

1936年，在上海的这些故宫文物都被运送到了南京，但还没过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1937年，国民政府已做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留在南京的这些文物，也随即踏上了二次迁移的征程。

当时的迁移，分成了三路：

第一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第二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第三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

尽管当时政府也调用了一切可调用的资源，但这次的迁移，依旧是最艰苦的一次。途中，文物的护送队伍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土匪骚扰，汽车故障，道路泥泞等，三条线路均遭受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在押运人员一路的严密甚至拼死保护下，文物基本一件也没有丢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运送文物的卡车在老百姓的帮助下艰难前行

参与北路（北路是最艰苦的一路）押运的那志良，在经历了一路上

遭遇轰炸、翻车、翻船后发现文物依旧完好无损，于是开始相信有人和他说过的四个字：

古物有灵。

4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些故宫的文物，又从西南大后方陆陆续续重新运回了南京，并准备运回北京故宫。

但不久之后，解放战争又爆发了。

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那些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再一次面临迁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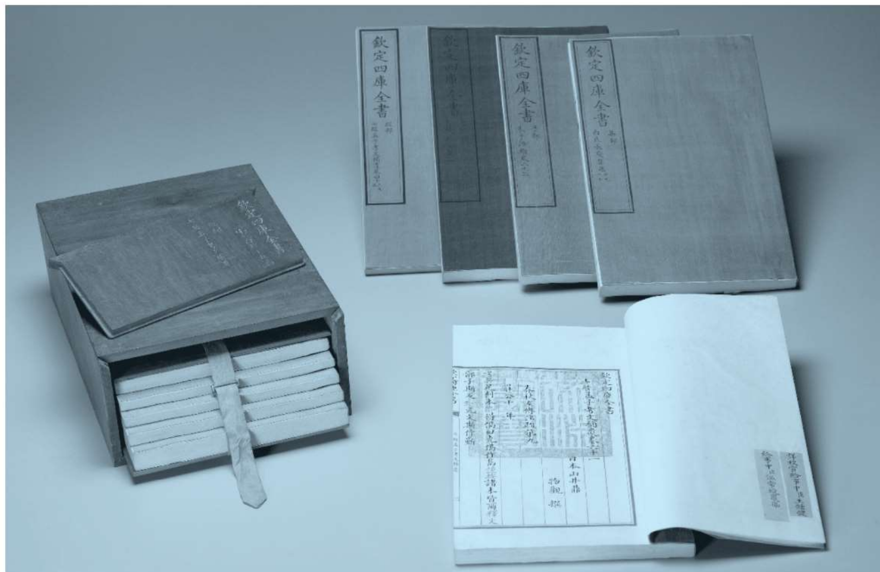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颓势已无法逆转，抢运故宫文物的决定又一次做出。

1948年12月21日，一个萧瑟的冬日，故宫文物的又一次迁徙开始了。

在南京的下关码头，海军司令桂永清手里已经几乎无船可调，只能调来一艘国民党海军“中鼎号”平底运输舰。11年前，从南京运往内陆的故宫文物，也是从下关码头出发的，而这一次，目的地成了台湾基隆港。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一共运走了320箱。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搭乘的是招商局调派的“海沪轮”。



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典籍，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称为“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称为“南三阁”

这一批运载的故宫文物有1680箱，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其中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这批运走的青铜器和瓷器后来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949年1月28日，第三批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这次国民党动用的是“昆仑号”——也就是本文开头描写的那一幕。那一次，一共运走972箱。那天最后送上船的四个箱子里，就有一个故宫稀世珍宝——碧玉屏风。



碧玉屏风在1941年被汪精卫当礼物送给日本天皇，日本投降后又被要求送还了回来

在此之前，解放军合围北平在即，当时的民国教育部次长，转运负责人杭立武着急地想要把故宫的一批精品会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虚与委蛇，不断拖延，最后保证了北平故宫的文物没有被运走一件。

在三批文物被运送之后，当时的李宗仁代总统下令禁止再从故宫运出文物。（1949年10月，国民党从重庆又空运走了当年留在重庆的38箱文物。）

就这样，国民党分三批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总计2972箱，其中古物1434箱，图书1334箱，文献204箱，占当时留在南京的文物的1/4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南京在内的散落在各地的故宫文物，都被陆陆续续运回了北京故宫。



马衡

5

应该说，当初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虽然数量远不及留在北京故宫的文物，但毕竟经过精挑细选，里面还是有很多精品的。

除了我们大陆游客都熟知的翠玉白菜，以及肉形石，还有下面这些门类的精品。

第一大类是青铜器。民国学者重视金石研究，而“鼎”又被视为国家

的象征。国民党一共带走了2382件青铜器——要不是后母戊鼎（即原来的司母戊鼎）太大太重，估计也被带走了。



翠玉白菜

第二大类是书画。国民党当年共带了5424件去台北，其中仅宋画即达943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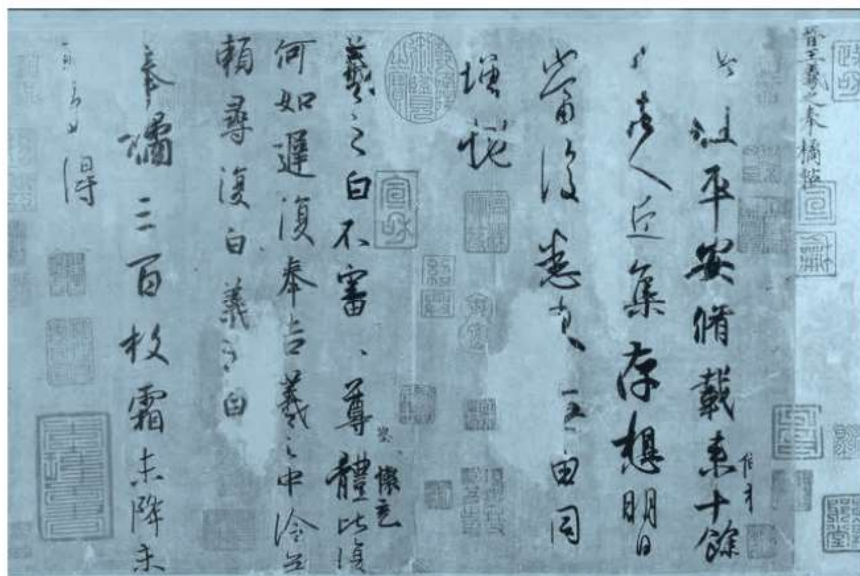
肉形石



毛公鼎



苏轼《寒食帖》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郭熙《早春图》

第三大类是瓷器。国民党通过精心打包，共带走瓷器17934件，件件精品。

第四类是玉器，国民党共计带走了1万多件。

第五类是各类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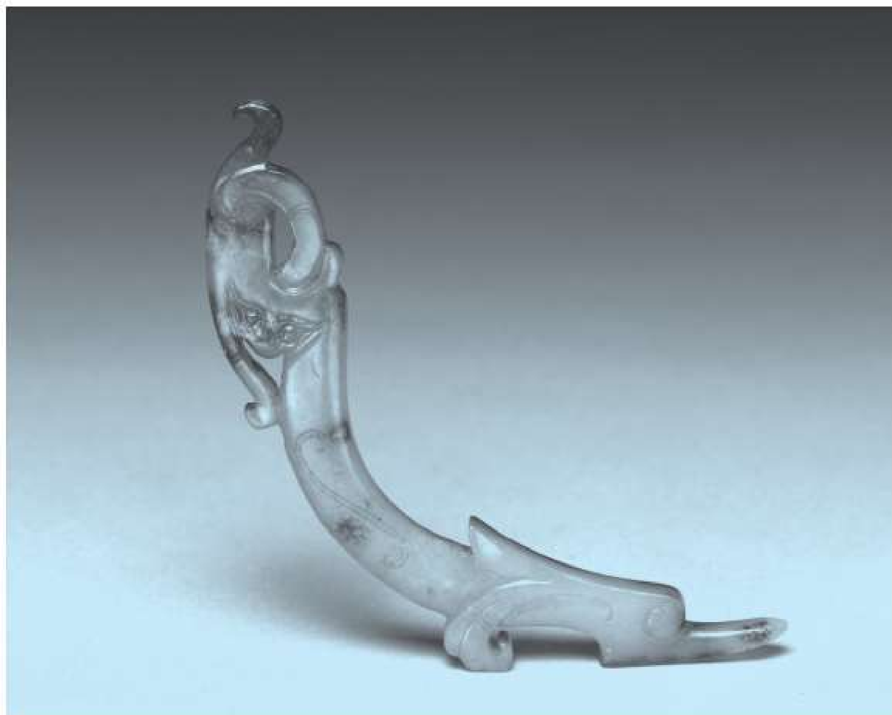
这些珍品，连同69.6万件藏品一起，被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见证历史，供人观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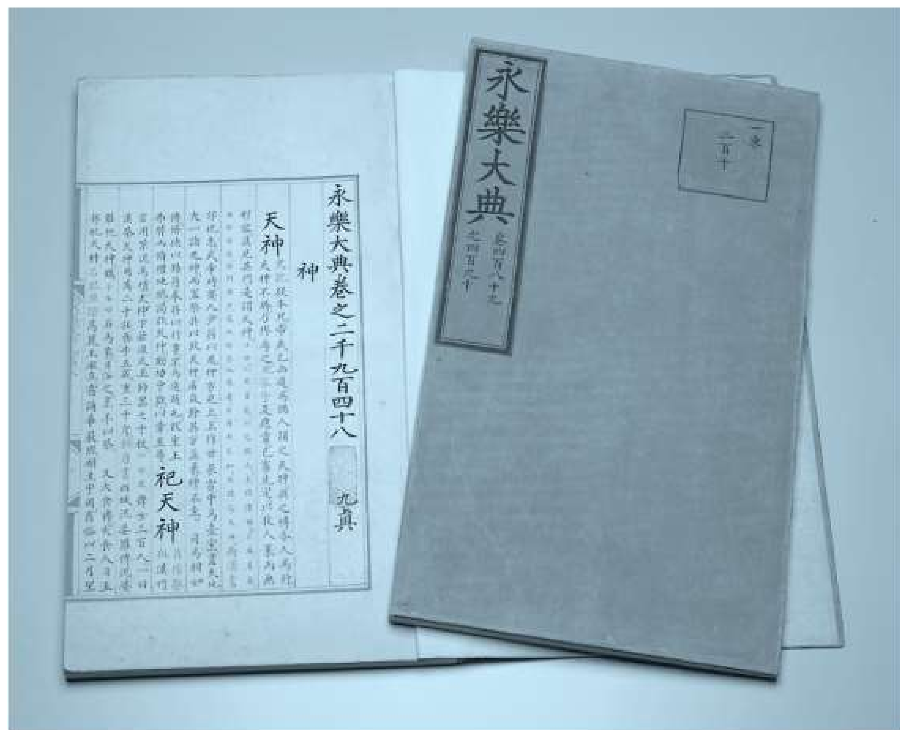
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战国玉螭纹觿



明《永乐大典》

馒头说

先回答一个不少读者心里其实都想问的问题：那些留在大陆的故宫文物，乃至故宫本身，后来安然无恙否？

1966年8月，中国开始刮起“破四旧”风，周恩来随即做出关闭故宫的决定，并派军队驻守。196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的几点意见》，起到了一定扭转作用。

所以，十年浩劫期间，故宫所幸只损失了一些附属物：故宫内城隍庙泥塑神像11个，奉先殿前“焚帛炉”被拆坏。其他都保存无损，甚至连故宫的修复工作，在“文革”期间也没停止。

“文革”后期，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派，互相斗来斗去，但不管怎么斗，两派人都有一个默契：谁也不能损害文物。

再回过头来看故宫文物那16年的颠沛流离。

在整个过程中，我最佩服的，还是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人，无论是押送的工作人员还是士兵，无论是马衡还是杭立武，甚至无论是桂永清还是蒋介石。

尽管意识形态有分歧，甚至兵戎相见，但大家对于中华民族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瑰宝，态度都是一致的。

马衡不肯让文物出北京故宫，当然有他的道理——以当时国民党的溃败之势和当时台湾这样的偏远之地，谁能保证文物运送到那里不会出问题？

而杭立武坚决主张要把文物运往台湾，也没有私心——我只想保存好这批宝贝。事实上，那批随文物去台湾的工作人员，后来很多人都把一生献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献给了文物研究。

所以，大家在保护文物这一出发点上，其实都是一致的。

也正是基于此，我个人以为，既然历史原因造成现在两岸“两个故宫”的局面，那就泰然视之：

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放在哪里，都是被中华儿女妥善保管，都是供世人瞻仰。而且，海峡对岸的那个“故宫”，还能每天提醒那里的同胞，我们的渊源在哪里，根在哪里。

一直研究故宫的日本记者野岛刚，曾向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同时问过一个问题：“两岸统一之前，两个‘故宫’统一的日子是否会先到来？”

对岸的周功鑫院长表示，“故宫”的收藏品对台湾民众来说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的回答是：“让历史来决定。”

我个人更欣赏郑院长的回答。

哪怕分散各地，但真正的故宫永远只有一个。

就让历史来决定吧。

读者评论

Lillian：放台湾也比流失海外强，不论如何，东西还是在自己人手里。这几年在欧美居住期间走访了大大小小近百家博物馆，每每看到流失文物都是泣不成声，那心情真是糟糕透了。知名的博物馆就不说了。给欧洲或要去欧洲旅行的馒头粉推荐：巴黎集美博物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馆藏极其全面，精品程度高于国内大部分馆藏，特别推荐千佛洞、敦煌文物），巴黎的塞努齐博物馆（青铜器全面），巴黎枫丹白露宫（有英法联军侵华时圆明园被抢的七车文物），科隆东亚美术馆（书画），柏林亚洲艺术馆（石像），日内瓦鲍尔博物馆（玉器精妙，特别推荐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已知存世的大概只有20只，2014年香港拍出一只2.8亿元天价），苏黎世利特博格博物馆（魏晋、唐、辽时期文物较出彩），罗马国立东方艺术馆（石窟）……

李想：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派，互相斗来斗去，但不管怎么斗，两派人都有一个默契：谁也不能损害文物。这句话让我想起来之前樊锦诗院长讲当时敦煌的状况，敦煌研究院分成十几个派系，但是在保护文物上是一致的。

24年前的今天，人类文明留下了黑暗的一页

人类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步入了文明社会。

那些残暴的基因是渗透到我们骨髓里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永远保持警醒。

1

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不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如果只以遇难人数来算，发生在卢旺达的这场“种族大屠杀”并不是最多的。

但是，它之所以令人发指，是因为这是一场距今最近的大屠杀。这场屠杀就发生在1994年——这是人类自以为已经摆脱蒙昧，即将迎来新世纪曙光的前夕——距今也就过去了24年而已。

而且，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就有超过100万人被屠杀。卢旺达的全国人口，因此减少了1/8。全世界人口，被抹去1/5000。所以，这已经不叫“种族大屠杀”了，而是“种族灭绝”。

2

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卢旺达这个国家。

卢旺达，位于非洲的中东部，全称为“卢旺达共和国”，是一个内陆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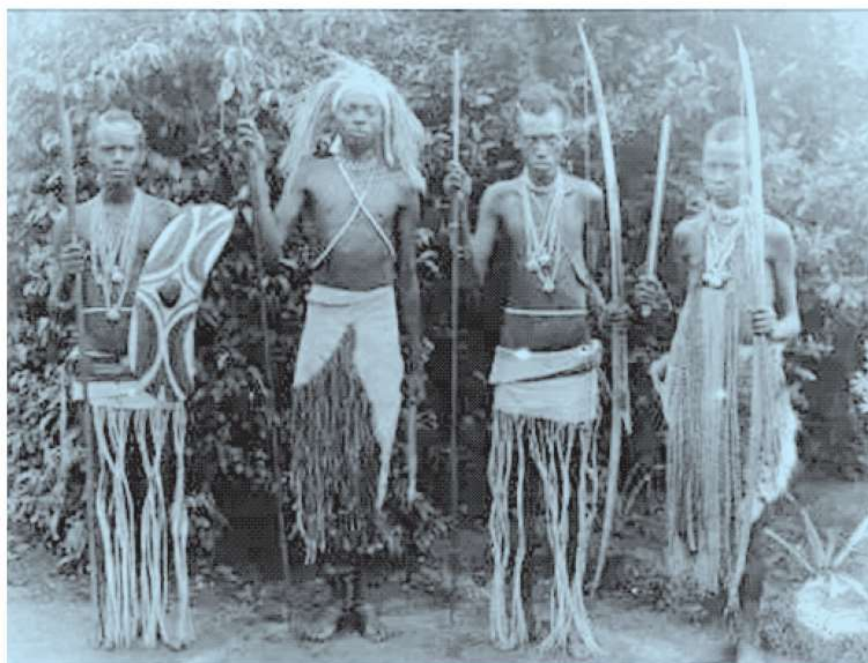
卢旺达的国土面积为26338平方公里，比我国的海南岛小一点吧。卢旺达境内多山，所以有“千丘之国”的称谓。因为它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所以虽然地处非洲，但气候还算宜人。

卢旺达在大屠杀爆发前，全国大约有700万人口，每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00人，是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700万人主要由三个民族组成：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胡图族

是卢旺达第一大种族，要占到全国人口的84%；排在第二位的是图西族，占到人口的15%；特瓦族很小，只占全国人口的1%——正是因为它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后来反而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胡图族是卢旺达的原住民，而图西族早先是游牧民族，但从本质上说，这两个族群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已经长期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有同样的生活习惯，并且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图西族人身材略高）

1884年，卢旺达作为殖民地被划给了德国，但德国并没有太管这个地方，卢旺达还是维持一种酋长部落式的形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卢旺达被划给了比利时。

比利时接过统治权后，一切发生了改变。

3

比利时并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松散式管理，而是深深介入了卢旺达的统治。

但比利时的统治，在卢旺达呈现出了矛盾的两面性。

一方面，比利时延续了胡图族和图西族隔离的政策，并且进一步固化了阶层（原先两个族群的身份是可以流动的，贫穷的图西族会成为胡图族，富裕的胡图族会成为图西族）：

管理者根据身高、肤色，甚至鼻子和瞳孔的大小，明确区分出了胡图族和图西族，而且在1935年，他们用身份证制度，将两个族群乃至阶层牢牢地固定了下来。

阶层怎样分化？那就是人口占少数的图西族明显占据统治阶层，族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基本上被剥夺了资格，沦为了社会底层——1987年，在卢旺达20个政府部长席位中，胡图族人仅占有4个席位；在国民议会的65个席位中胡图族人仅占有7个席位；在中央委员会的65个席位中，胡图族人仅占有两个席位；15个省中，仅有1个省由胡图族人担任省长。

为什么比利时要扶植人口占绝对劣势的图西族，统治人口占绝对优势的胡图族？

古今中外，很多殖民者其实都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因为外来殖民者一旦让人口占多数的族群掌握统治权，自己的地位很可能就会被团结一心的他们推翻，而选择人口占少数的族群去压制人口占多数的族群，那个人口占少数的族群反而会对自己死心塌地。

但比利时进行严格的阶层固化，只是悲剧发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又表现出了矛盾的另一面。

随着比利时传教士大规模进入卢旺达，无论是图西族还是胡图族，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信奉天主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加上时代的发展，一批经济作物的引入使得胡图族农民在生存上对图西族地主的依赖渐渐减少。矛盾则开始渐渐激化，双方长期有小规模相互屠杀和报复的行为。

1988年，卢旺达首次出现了胡图族人担任总统的政府，但这也引起了流亡的图西族人的不满。

1990年，侨居在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RPF）

与胡图族政府军爆发了内战。在周边国家的调停和压力下，1993年8月，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但一纸和平条约根本无法弥合两个族群之间的矛盾，相反，胡图族不少政府高官认为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对图西族人让步太多。

1994年4月，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终于爆发。

4

1994年4月6日，一架飞机突然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火箭炮击落。

那不是一架普通的飞机，上面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

两位总统同时罹难，谁是凶手？

胡图族人反应神速，他们立刻站出来指证：肯定是图西族人干的！

4月7日，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冲进总理府，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和三名部长。

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此拉开帷幕。

在媒体和电台的煽动下，胡图族的士兵、民兵甚至平民，都拿起了枪、砍刀甚至就是一根削尖的木棒，开始有组织地屠杀图西族人（主要是通过查身份证）。

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0万人被杀害（卢旺达公布的数字不到100万，但不少外界数据都显示超过了100万），其中有25万至50万卢旺达妇女和女孩遭到强奸。

在这100万人里，超过90%的都是图西族人，但其中也有不到10%的胡图族人。这些胡图族人有的是因不愿意屠杀图西族人，被当作“叛徒”一起杀掉；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或亲戚是图西族人，也被一起杀掉；还有的，只是因为和别的胡图族人有仇，就被“借势”杀掉。



后来收缴的胡图族人用来屠杀的砍刀

这场杀戮到后来在有些地区已经超出了种族的仇恨，成了赤裸裸的抢劫和谋杀——不少胡图族人仅仅是因为贪图对方的财产，就杀光对方全家，再将财产瓜分。



1994年6月14日，士兵在一个女人的尸体旁走过

“知乎”用户“LU决明子”曾回忆当初自己去卢旺达采访一位妇女的经历：

“我抵达卢旺达的第一天，一位女士通过翻译一句一句地讲述她的故事，在那个氛围下，眼泪就没停下来过。她本有丈夫和孩子，屠杀开始时，她失去了他们，而她自己也被驱赶至万人坑。无数人死去，活下来本是她的运气，但是更残暴的还未结束。到处都是路障和民兵的盘查，她很快又被抓回去，日日夜夜反复遭到强奸蹂躏，屠杀持续了三个月，那么也就是说她被强奸了这么久。后来她活了下来，来到幸存者营地，在那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然而一切没有结束。

“虽然孩子来自痛苦的回忆，但是她仍然把孩子留了下来。而她在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她HIV检测呈阳性。后来孩子生下来了，一出生就携带HIV病毒。这是她的故事，也是千千万卢旺达女人的故事，包括艾滋病的部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胡图族的人，雇用了患有艾滋病的男子，一个一个去强奸女人们，因为他们要让图西族的人世世代代受到痛苦，最后绝种。”

当时，许多图西族难民都想从基伍湖逃难到邻近的扎伊尔，但因为没有船只，大批图西族人在岸边和河中遭到虐杀。在100多公里长、数公里宽的基伍湖上漂满了尸体。

这场大屠杀，直接改变了卢旺达的人口结构——全国人口的40%居然是儿童！大量的妇女成为寡妇，200万难民逃离卢旺达，进入周边国家。

5

于是，一个问题来了。

在卢旺达爆发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其他的文明国家在做什么？

首先遭到质问的，是宗主国比利时。

国际上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发生骚乱，宗主国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但是，骚乱爆发的前一天，比利时在卢旺达的维和士兵，就被胡图族人杀死了10人，不愿意蹚浑水的比利时随即撤走了所有本国的维和部队。

其次被问到的，是历来在全世界维护和平的美国。

但美国刚刚遭受了“索马里之痛”——在索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的美国士兵被索马里人开枪打死了19个人，两架直升机被击落（参看电影《黑鹰坠落》）。美国士兵的尸体被索马里人在地上拖着游街。这一幕通过电视镜头深深刺痛了所有美国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罕见地宣称：这是卢旺达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涉。

和美国一直步调一致的英国在索马里也吃了亏，所以也选择旁观。

如果说“不干涉他国内政”至少也算一个说法的话，但我们不能忘了还有一个重要机构——联合国。

在骚乱爆发之初，当时的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指挥官达莱尔将军就曾表示，只要派出5000名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就可以阻止骚乱。

但他等来的却是联合国的另一纸命令：根据872号决议，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士兵不能在第三国首先开枪——施暴的是卢旺达平民，落难的也是卢旺达平民，不干涉。在这场骚乱中，联合国维和部队当时只留下了象征性的260名士兵，负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一个半月后，联合国才将士兵增加到5500人，进而呼吁各个国家参与进来。

还有一个国家，法国。

在最初的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中，法国是否认卢旺达发生大屠杀的。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法国一直被怀疑在幕后支持了胡图族的这场大屠杀——只是后来大屠杀的失控超出了法国的预料，所以最后是联合国授命法国牵头组成的维和部队干预卢旺达。

2014年4月7日，“卢旺达大屠杀”20周年纪念仪式举行，在各国都派出使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亲自参加的这场仪式上，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拒绝法国大使参加仪式。

6

一场震惊人类世界的大屠杀，是不可能不留下余响的。

首先是审判。

1994年，联合国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成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高级政府官员或军人。卢旺达政府则负责审判较低层级的领导

人或平民。

经过历时十年的审判，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宣布，判处涉及卢旺达大屠杀案件的6名嫌疑犯25年到终身监禁。

在这场涉及数百万人参与的大屠杀中，很多人意料之中地逃脱了法律制裁。

那么，如何让人铭记这场灾难？

2004年，由英国、南非、加拿大和意大利四国合拍的电影《卢旺达饭店》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一位卢旺达胡图族饭店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那（Paul Rusesabagina）在那场大屠杀中，利用饭店设法挽救了1268位图西族及胡图族难民的生命。很多西方人是通过这部电影，才知道卢旺达发生了那样的大惨剧。

这部电影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都被这部电影中表现出的人性打动。

但也有不少批评的声音：这部电影因为渲染了温情，让人们很容易忘记隐藏在感动背后的真实血腥与残酷。

那么，真正的评价应该是什么？

2004年，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仪式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说了一句话：“这场屠杀，是整个人类的耻辱！”

2001年，卢旺达通过了“新国旗法”，宣布用蓝、黄、绿三色代替原来的红、黄、绿三色。

因为红色让人想到了屠杀。

卢旺达不愿意再见到鲜血。

馒头说

在这个星球上，会自相残杀的生物其实不多，人类算是其中之一。

而会有组织地大规模残杀自己同类的生物，整个地球上，应该只有人类。

是不是很难想象：在距今只有24年的1994年，在人类的通信科技已经非常发达，联合国已经成立了近50年的时候，还会爆发一场超过100万人遇难的明目张胆的大屠杀？

100万人哪！

所以这才是全人类的耻辱！

不要以为，似乎经济欠发达、人民欠开化的地方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当年工业产值已跃居全球前列的德国，纳粹们也是彬彬有礼地打开集中营毒气室的大门，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就屠戮了600万犹太人。

真的，不要以为这些事离我们很远。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确实在科技文明进程上又跨越了一大步，但人类内心那些自私、嫉妒、仇恨、嗜血的基因，却不会因此荡然无存——一个平时彬彬有礼、安分守己的人，说不定哪天就会因为一个看上去非常荒谬的原因，在煽动和挑唆之下，瞬间就被裹挟进“集体无意识”的杀戮狂欢中。

不要以为自己离疯狂很远。

人类啊，永远对自己保持警惕吧！

读者评论

尾巴小姐：谢谢馒头大师的文章！我现在就在一个国际刑庭里工作，研究生论文写的就是卢旺达种族灭绝罪中的强奸罪。目前在国际刑法里，种族灭绝罪项下是没有强奸一项的，强奸只能以危害人类罪或者战争罪来起诉。这里面的原因是，很难证明罪犯在实施强奸的时候有“灭绝种族”的特殊故意。但我认为这在卢旺达屠杀中是可以被证明的，就像你举的例子，让携带HIV病毒的人去强奸图西族妇女。还有关于卢旺达刑庭，我补充一点，它的建立本来就是审判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的，以免他们在国内审判中享有豁免权。目前法庭已经结束所有审判工作，起诉了93人，完成了85人的审判程序，还有8人在逃。联合国建立了国际刑庭余留机制，为卢旺达刑庭和前南斯拉夫刑庭做收尾工作。如果在逃犯被抓住，余留机制也会负责审判工作。而且除了这些“高官”在联合国被审，卢旺达自己的法院也有一系列的审判。这并不是最完美的结局，

但法律至少保证了不会有罪不罚。

ww：有一本书叫《就说你和他们一样》（*Say You’re One of Them*），讲的就是一对夫妻分属两个民族，皆被屠杀。妈妈把孩子们藏起来以后告诉他们：如果有人问你们是什么族的，你就说，和你们一样……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偶素公主妈：完全不知道有这事！我们居然是通过公众号才知道，比通过电影知道还落后……真的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陈希：我在卢旺达半年，依然无法直面大屠杀纪念馆的那一摞摞白骨。二十多年了，卢旺达禁止堕胎，那批孩子也已经长大，现在的卢旺达干净整洁，气候宜人，有非洲小巴黎之称。今天是纪念日，全国放假，我也整装出发，准备去爬山看世界上仅存的山地大猩猩。同一片蓝天下，已是不同的天地。愿我们能珍惜当下，有缘也来卢旺达感受这里的风景如画吧。

55年前，人类差点灭绝

这个标题，并不是危言耸听。有些人可能会有些奇怪：真的会有这样的事？

真的会有这样的事。

在55年前，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

1

1962年10月28日，星期日。

那一天，全世界的人从来没有那么渴望听到一个广播电台的播音。

那是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对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回信：

“我非常理解您以及美国人民对于您所称为进攻性武器所感到的忧虑，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武器。

“您和我都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武器。为了尽快地消除这一危及和平事业的冲突，为了给渴望和平的各国人民以保证，苏联政府除了此前已下达的在武器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的命令外，现又下达新命令拆除您所称为进攻性的武器，并将它们包装运回苏联。”

在那一刻，全世界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人类——是的，全人类——终于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2

故事，还是要从1961年说起。

1961年4月17日，1500多名流亡在美国的古巴人，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和武装，在古巴西南海岸的猪湾（Bahía de Cochinos）登陆，企图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



年轻时的卡斯特罗

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猪湾事件”。

“猪湾事件”的结局只证明了一件事：美国人找了一群“猪一般的队友”——仅仅72个小时，这支1500人的雇佣军就被古巴政府军击溃了。90人丧生，1000多人被俘。

虽然“猪湾事件”的规模不大，但造成的后果影响非常大。

首先，肯尼迪政府因此大丢颜面。虽然肯尼迪一直不肯承认美国是幕后指使，但这是个“全世界皆知的秘密”，肯尼迪给人留下了“懵懂无

知，懦弱胆小”的印象。

其次，原先和美国关系不错的古巴，开始转向。原先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卡斯特罗以总理的身份，还去美国访问过，受到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热烈欢迎。古巴本来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但就在“猪湾事件”后，古巴迅速转向了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苏联。

所以，如果没有“猪湾事件”，就很难有之后让全世界惊心动魄的“古巴导弹危机”。

3

古巴的地理位置，对于美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如果说拉美是美国的后院的话，与美国近在咫尺的古巴，就是后院里的一根最不让人放心的刺。

看到古巴倒向了自己的怀抱，苏联觉得机会来了。

当时的苏联，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陆军，但是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在核武器的对比上，苏联拥有的陆基洲际导弹，只相当于美国的1/8——当然，当时双方拥有的核武器，已足以炸平地球了。

1961年，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都部署了导弹基地，再加上在联邦德国的导弹基地和一批轰炸机基地，苏联所有的工业中心，都处于美国的核弹打击范围之内。可以说，只要美国高兴，摧毁苏联也就是喝杯茶的时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一直在寻找扭转劣势的机会。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把古巴用鞭子抽着赶着送进了苏联人的怀抱。

怎么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

赫鲁晓夫通过“猪湾事件”，已认定肯尼迪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异常大胆的决定：

在古巴部署60枚左右的中程核导弹，把毁灭美国也变成喝一口伏特加的事。

4

要在美国的眼皮底下部署核导弹，谈何容易？

所以苏联选择了欺骗。

在所有的公开场合，苏联坚决否认古巴拥有任何进攻武器。赫鲁晓夫亲自给肯尼迪写信：保证在1962年11月的美国国会选举前，不挑起任何事件。

事实上，在7月，苏联就把运往古巴的货物改由苏联船只运送，将几十枚导弹和几十架飞机拆开，装到集装箱里运往古巴。不仅如此，大约3500名军事技术人员，也跟着船陆续抵达古巴。

苏联运往古巴的核导弹威力究竟有多大？每一枚核弹头的威力，都比当初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颗原子弹的威力大至少20倍。

然而，纸毕竟是包不住火的。

1962年10月14日，一个万里无云的星期日早晨，两架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在古巴的西部上空，拍下了大量照片。

第二天，美国的大量专家把每张照片放大，认出了照片里的导弹发射台，发射弹道导弹的建筑物，以及一枚中程弹道导弹。

10月16日，这份情况汇报被摆到了肯尼迪的办公桌上。

肯尼迪又惊又怒！

他知道不能相信苏联人，但绝没想到，苏联人真的敢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部署一支分分钟可以毁灭美国的核导弹力量！

肯尼迪立刻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

在会上，所有的人都认为决不能接受苏联的导弹部署，但对如何移除苏联的导弹而避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家的意见却不统一。

肯尼迪有点倾向于对古巴导弹基地实施一次无预警打击，而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则主张再次入侵古巴。最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建议：能否先封锁古巴？

这个建议让肯尼迪最终决定：先外交，再武力。

5

苏联和美国的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开始了。

10月18日，肯尼迪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约见了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



肯尼迪会见葛罗米柯（左三）

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葛罗米柯始终没有提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而令人奇怪的是，肯尼迪也同样没有提，只是不断强调：美国绝不能容忍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

谈话的时候，U2高空侦察机拍摄的照片证据，就在肯尼迪的右手抽屉里。

后来的史学家都没有搞明白一个问题：肯尼迪既然已经约见了葛罗米柯，为什么不当面质问他呢？

唯一的解释可能是，肯尼迪希望给对方一个机会，一个主动坦白的

机会。

唉！这又不是谈恋爱！

而葛罗米柯根据肯尼迪的态度，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汇报给了克里姆林宫：

情况令人满意！美国不会有什么反应！

6

第一个回合无疾而终，第二个回合拉开序幕。

10月22日中午，美国驻联合国官员交给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一封急电，要求他下午6点，必须赶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腊克斯会面。

多勃雷宁一下子就感到情况不妙。

下午6点，苏联大使见到了美国国务卿。腊克斯告诉多勃雷宁，美国总统肯尼迪将在1个小时后对全美国发表电视演讲，并交给了他总统电视演讲的讲稿，同时还有一封肯尼迪写给赫鲁晓夫的信。

多勃雷宁赶紧赶回大使馆，向莫斯科汇报。克里姆林宫也乱作一团——肯尼迪不是胆小懦弱的吗？难道要动真格的了？

晚上7点，肯尼迪的全国电视讲话如期开始。

在电视讲话中，肯尼迪向美国——等于向全世界——宣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而这一情况是美国绝不能容忍的。肯尼迪表示，将对古巴施行“隔离”（quarantine）。之所以用“隔离”而不是“封锁”（blockade），是肯尼迪政府认为，“封锁”还是带有明显的战争意味，而“隔离”，只是要求所有携带武器进入古巴的船只，调头离开。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The New York Times.

LATE CITY EDITION

NEW YORK, TUESDAY, OCTOBER 23, 1962. FIVE CENTS

U.S. IMPOSES ARMS BLOCKADE ON CUBA ON FINDING OFFENSIVE-MISSILE SITES; KENNEDY READY FOR SOVIET SHOWDOWN

U.S. JUDGES GIVEN POWER TO REQUIRE VOTE FOR NEGROES

High Court Upholds Order Forcing the Registration of 54 in Alabama County

Nehru Warns of Peril to Independence —Reds Attack Near Burmese Border and Press Two Other Drives

SHIPS MUST STOP

Other Action Planned If Big Rockets Are Not Dismantled



PRESIDENT GRAVE

Asserts Russians Lied and Put Hemisphere in Great Danger

《纽约时报》相关报道

电视讲话之后，肯尼迪随即宣布美国进入三级战备状态：183架携带核弹的B–47轰炸机，被疏散到美国国内33个民用和军用机场；66架携带核弹的B–52升空待命；22架携带空空导弹的截击机在佛罗里达海岸上空待命。

这一切，就是为了保证美国在遭受核打击之后，在第一时间能实施“核报复”。

7

10月23日，第三回合。



肯尼迪签署“隔离令”

苏联政府的声明来了：要继续按照协议，使用武器援助古巴，坚决拒绝美国的拦截，如果美国动手，苏联“将进行最激烈的回击”！

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的另一条秘密联系线也在高速运转：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私下里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接触。

小肯尼迪询问：禁行令生效后，苏联的船只打算怎么办？

多勃雷宁回答：一切照旧。

小肯尼迪警告：美国军舰真的会开火的。

多勃雷宁回答：那就是战争。

8

10月24日，第四回合。

一场以整个地球命运为赌注的豪赌，拉开序幕。

美国的战备状态升为了二级：1436架美军轰炸机，145枚洲际弹道

导弹进入警戒状态；25万美国军队在佛罗里达集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全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均进入戒备状态。

与此同时，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包括两艘巡洋舰和118艘驱逐舰在内的183艘美国舰艇，从佛罗里达到波多黎各布成了一个弧形，封锁了古巴海域。

24日上午，苏联的18艘货船，在美国的“隔离圈”外围，汇合了6艘苏联潜艇，开始向“隔离圈”逼近，随后，停泊在了“隔离圈”外。



美国飞机掠过苏联货船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这些苏联的货船上。

在经历了一段令人紧张得窒息的僵持后，几艘苏联的货船，开始调头返航。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对肯尼迪说：“就像两个凝视的人，其中一个眨了下眼。”

9

10月25日，第五回合。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天，有一艘苏联的货船，依

旧闯进了“隔离圈”。

这艘叫“布加勒斯特号”的货船，没有挂苏联国旗，但是是苏联的船只无疑。

当“布加勒斯特号”逼近“隔离圈”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吊到了嗓子眼：三海里，两海里，一海里，进入“隔离圈”……

但那一刻，美军的战舰，并没有开火。

所有人的心，又都放了下来。

但美国军舰还是拦截下了“布加勒斯特号”，宣布要检查船舱内的货物。但有意思的是，说是要“检查”，但美军并没有登上货船，而是听船长承诺没有武器后，就离开了。

后来分析，是肯尼迪希望给苏联一个善意的信号——我其实不想搞大。

这个回合，美国人退了一步。

10

10月26日，第六个回合。

这次，战场移到了联合国。

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斯蒂文森向全世界各国的代表，展示了U2飞机拍摄的放大后的照片，然后咄咄逼人地公开质问苏联代表左林：“先生，我只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承认，苏联在古巴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是，或者不是？”

左林沉默，假装在等耳麦中的翻译。

斯蒂文森继续追问：“不用再等翻译了！你只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左林索性摘下了眼镜，有些尴尬地笑了起来，紧接着，会场上也爆发了笑声。斯蒂文森自己也笑了起来。

当时的气氛，看上去还挺友好的。

11

10月27日，第七个回合，形势急转而下。

那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六”——如果回过头来看，那一天，可能是人类距离灭绝最近的一天。

那天上午，苏联B–59号潜艇正在古巴海域潜航时，忽然遭到了美国“比勒号”驱逐舰的袭击。没有证据表明，“比勒号”驱逐舰是接受了高层授权开始攻击苏联潜艇的，而他们更不知道的是，这艘苏联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鱼雷。

一颗颗深水炸弹扔下去后，B–59号潜艇被气浪掀得东倒西歪，潜艇内的苏联水兵慌作一团，当时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战争已经开始了！

于是，水兵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向“比勒号”驱逐舰发射带有核弹头的鱼雷。

按照当时苏联潜艇上的规定，发射核鱼雷，由三个长官一致同意即可。

如果那枚鱼雷发射出去，一场核战争无可避免地就将爆发。

但是，后来解密的资料表明，当时的三个苏联人里，有一个人说了“NO”。

一场危机过去了，另一场危机接踵而来。

就在B–59号潜艇差点释放出核鱼雷的那天上午，美国的一架U2高空侦察机，在古巴的上空，被地面防空部队发射的导弹击落，飞行员当场死亡。值得一提的是，阵亡的飞行员是安德森少校，当初正是他，发现了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

那一天，上帝似乎在和人类开玩笑——这里一根导火索刚被掐灭，那边一根导火索又被点燃了！

飞机被击落，飞行员死亡，这已经是战争行为。当时的美国民众，顿时开始哄抢超市里的食物和水，而白宫最高层会议室里，也已经吵成

一团：美国军方主张，立即还击，首先用战略轰炸机和导弹轰击古巴的基地。



被击落的U2高空侦察机

但肯尼迪思考了良久，痛苦地说了一句话：“我不关心第一步该怎么做，而是双方升级到第四、第五步的时候，我怕，人类已经没有人去做第六步了。”

肯尼迪决定赌一把：这次的导弹袭击，并没有经过克里姆林宫的授权。于是，美国政府放出风声：击落U2飞机的导弹部队，是古巴军队（其实是苏联人操控的）。

而苏联政府很快接过了这个球，也说是古巴的导弹部队干的——因为这次导弹袭击，确实是一个意外行为。

又一根导火索被扑灭了。

同时，也是在那天，肯尼迪给赫鲁晓夫写来的第一封信，回了一封信。

第一封信，是指在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去的那封长信。在信中，赫鲁晓夫承认在古巴部署了导弹，但“只是防御性的”。同时，他向肯尼迪表示，不要把局势弄得不可收拾，“只要美国做出不入侵古巴，且不允许别人入侵古巴的保证，苏联就撤回导弹”。

但就在10月27日这天，赫鲁晓夫又给肯尼迪发了一封信，表示除非美国撤销在土耳其布置的导弹，苏联才撤回古巴的导弹。

两封前后要求不一致的信，暴露了克里姆林宫也已经陷入了混乱。

最终，肯尼迪决定只回复赫鲁晓夫的第一封信：

愿意接受赫鲁晓夫的提议，只要苏联撤销导弹，美国就解除“隔离”，保证不入侵古巴，也不允许别人入侵。

12

10月28日，最后一个回合。

在这场比谁先眨眼的凝视比赛中，赫鲁晓夫最终闭上了眼睛。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段广播播音。

之后，在美国军队的全程监督下，苏联将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全部拆运回国。

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的四个月，美国悄悄拆除了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这是当初赫鲁晓夫与肯尼迪达成的秘密协定，美国只做，但绝不说。

这场危机，美国赢了面子，苏联其实也没输里子。

而全人类，终于躲过了一场足以让我们灭绝的核战争。

馒头说

两个壮汉，一人拿一个炸弹，在一个满是人的房间里。一个喊：“你瞅啥？”

另一个回：“瞅你咋地？”

一个继续喊：“你再瞅眼试试？”

那一个瞪圆眼：“试试就试试！”

这就是我对当时“古巴导弹危机”的印象。

好在，这两个人最终谁也没拉炸弹的引信，最多肚子里嘀咕一句："下次看我不弄死你！"

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还是挺感激当时的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

其实当时这两个国家的首脑，都在国内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要知道，发射核武器只是按一个按钮的事情，多少人唯恐天下不乱。

但是，这两个人都顶住了压力。

在这场用一颗太阳系行星做赌注的赌局中，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其实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对方——希望对方还是一个冷静理性的人，能够为全人类的福祉做考虑。1963年，肯尼迪发表演讲，表示在避免核毁灭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苏联具有共同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利益。

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华盛顿和莫斯科迅速做了一件事。是互相指责谩骂？不是的，是马上建立了最高领导人热线。

国与国之间有利益，有纠纷，甚至有战争，但上升到整个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时候，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还是头脑清醒的。

希望人类永远能保持这种清醒。

阿弥陀佛。

读者评论

Hao：记得曾经有个"拯救过世界的英雄名单"，阿尔希波夫名列其中，就是那个说了"NO"的苏联潜艇军官。

Lawren：力量带来的威慑下的生存真是讽刺，就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不知道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但是第四次肯定用的是棒子和石头。想起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富饶的、现代化的阿富汗，可悲可叹。

Lola酱：有两个疑惑求解答：1.当时美国和古巴关系相当不错，那肯尼迪为什么会在幕后支持"猪湾事件"呢？2.联合国质问那个回合，笑一笑以后怎么样啦？大家就心照不宣没有继续问了吗？（作者回复：1.后来古巴出台了一系列激进政策，美国一冲动就和古巴断交了；2.这段

我看的是当时的视频。确实哄堂大笑，然后，视频就没有了……）

C.sy：看完后庆幸，国与国之间有纠纷也会有利益，涉及大是大非，最高领导人的冷静理性很重要，一冲动就会坏事，战争一旦开始，就无法控制，也没有那么容易结束，希望世界和平，以后都不要有战争。

两亩田：最近刚看的《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至戈尔巴乔夫》，虽然看不太懂（因为我对书里提到的历史事件缺乏基本的了解，书里说得又不怎么详细）。唯一的印象是，“二战”后，除了斯大林，苏联那边的领导人基本上是希望和平的，至少是不希望跟美国打起来的，最多算是争争小弟，其实没有跟美国正面对抗的国力。苏联一直在穷困的泥淖里挣扎。但是，领导人的意志往往无法顺利传导至国家机器这么庞大又容易失控的破玩意儿的底端，所以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一场神秘的超级大爆炸

这场大爆炸，究竟是陨石撞击地球，还是原子弹试验造成的？抑或是，已经成为“半神之体”的尼古拉·特斯拉的一次交流电的实验而已？

1

1908年6月30日早上7点17分，俄国西伯利亚森林的通古斯河畔，突然爆发出了一声巨响。

这不是一声普通的巨响。

在巨响爆发的一瞬间，天空出现了强烈的白光，气温瞬间急剧升高，现场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据后来的测算，这次爆炸让方圆2153.2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东京那么大）内的8000万棵树木被摧毁，爆炸的当量大约相当于1500万～2000万吨TNT炸药——37年后，人类在广岛投下的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才2万吨TNT炸药当量。

这还不算结束。爆炸发生时，70公里外的居民家中玻璃被震碎，有人被灼伤。英国伦敦的不少电灯骤然熄灭，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天文台都观测到了异动。在之后的一周，不少欧洲国家的天空都呈现出一种暗紫色。



这场骇人听闻的大爆炸，发生的位置是在北纬60度53分，东经101度53分，因为靠近俄国的通古斯河（今属俄罗斯联邦埃文基自治区），所以被称为“通古斯大爆炸”。

2

那么大的一场爆炸，政府不可能不派人来查。

但那个时候的沙皇俄国，刚刚遭受日俄战争的惨败，国内的局势也颇为动荡，并没有查出什么究竟。

但“通古斯大爆炸”的各种奇怪现象实在太让人费解。1921年，俄罗斯科学院的矿物学家库里克（Leonid　Kulik）希望能解开这场大爆炸背后的真正的原因。由于资金匮乏，库里克只能编了一个理由：通古斯地区的陨石上的铁，可以解决当时资源匮乏的苏联的燃眉之急。由此，考察队才获得了政府的资金拨款，成为第一支全面探索“通古斯大爆炸”的考察队。

但关于“陨石”的说法不单单是借口，库里克真的相信，那场大爆炸是由一颗陨石撞击地球所形成的——说实话，那么大的爆炸，在当时确实找不出其他的理由。

但是，抵达通古斯现场的库里克考察队却失望了。

在爆炸地点，库里克他们没有发现支撑这一观点的最基本证据——陨石坑。他们测算了爆炸的面积，考察了爆炸范围内的树木（倾倒的树木以爆炸点为中心呈辐射状），但就是没发现陨石坑，也没有发现陨石。

库里克在爆炸区内发现了一个小沼泽，他怀疑可能是陨石坑，但想尽办法排光其中的水之后，他排除了这个判断。

库里克对通古斯地区的考察持续了10多年，他甚至请人从空中拍下了整个爆炸范围的情况，照片显示，整个爆炸区的树以一只蝴蝶的形状倾倒，但依旧没发现陨石坑。

库里克是一个执着的人，他始终坚信一定能找出这场爆炸背后的原因。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41年，希特勒往地图上一指，550万纳粹大军大举突入苏联境内，苏德战争全面爆发。

库里克迅速上了战场，但在苏军兵败如山倒的苏德战争前期，他很快成了一名战俘，并在1942年死于纳粹的集中营。

对“通古斯大爆炸”的第一次全面尝试探索，就此中断。

3

1945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日本广岛上空升起了一朵蘑菇云。

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于实战的核爆炸，震惊了世界，同时也给“通古斯大爆炸”的探索增添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时苏联的军事工程专家卡萨茨夫在1945年12月拜访了日本的广岛，看到了广岛的各种惨状，他立刻联想起了“通古斯大爆炸”。

他随后指出：通古斯地区爆炸后的树木，都呈现出被辐射的症状；爆炸地区的驯鹿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据目击者称，通古斯爆炸后，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通古斯爆炸地区的树木

卡萨茨夫得出的结论是：通古斯大爆炸并不是由于陨石撞击地球而引起的，而是一场标准的“核爆炸”。

但“核爆炸”的说法也有个明显的问题：1908年的人类世界，怎么可能掌握核技术？

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卡萨茨夫在自己之前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是一艘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坠毁，才引起了通古斯大爆炸。

按照卡萨茨夫的说法，宇宙飞船的外星人是出于不可知的目的（比如飞船发生了故障，但他们不想让地球人知道他们的技术），引爆了宇宙飞船，而核动力发动机引发了这场核爆炸。

虽然“宇宙飞船说”能够解释“通古斯大爆炸”的威力来源，但实在拿不出可信的证据，卡萨茨夫自己也承认是一种猜想而已。

人们只能继续探索这场超级大爆炸的原因。

4

“二战”结束，世界和平，探索“通古斯大爆炸”之谜的科学家也越来越多。

当然，各种推测的想象力也越来越丰富。

1965年，三位美国科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通古斯大爆炸可能是从太空降到地球来的一种“反物质”造成的。他们推测这种“反物质”是“反陨石”。在他们的调查报告里说，1908年6月30日这一天，一个由“反物质”组成的陨石意外地闯入了地球并导致了这场灾难。他们认为：0.5克“反铁”与0.5克铁相撞，产生的威力就足以超过在广岛爆炸的那颗原子弹。

与“反物质说”类似的，1973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两位科学家杰克逊（Jackson）和赖安（Ryan）提出，“通古斯大爆炸”是一个小型的黑洞通过地球引起的。他们甚至测算出了黑洞的重量：约1023千克，还测算出了这个黑洞是从冰岛和纽芬兰岛之间的大西洋某地穿越的。但既然是一次穿越，就会引发两场爆炸，另一场爆炸却根本没有记载。而且，根据霍金的理论，黑洞的质量越小，蒸发越快。一颗1吨左右重的黑洞，在到达地球前就应该蒸发干净了。

相比之下，“彗星说”倒是更让人信服一些。

第一个提出“彗星撞击说”的，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彼得洛夫。他推测这颗彗星来自太阳系，由稀松的雪团组成。它以每小时4万公里的速度冲破大气层，由于摩擦产生过热的气体，所以这种气体一接触地面，就发生了威力巨大的爆炸。而因为彗星很快蒸发完了，所以在地球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这种方法还是面临一个问题：只有推测，没有证据。

5

近年来，一些对“通古斯大爆炸”的研究，还是渐渐回到了最初的第一种推测：陨石撞击说。

苏联科学家测算出，“通古斯大爆炸”是由一个不明物体在距离地面7公里左右的地方爆炸所形成的；意大利核物理学家用重同位素法测试出，1908年被爆炸击毁的冷杉树，其中所含的微量元素远远高于其他年份树木该微量元素的含量，而这些微量元素不可能源于地球；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计算机模拟出了陨石撞击地球产生大爆炸的真空效果，大致和“通古斯大爆炸”后的效果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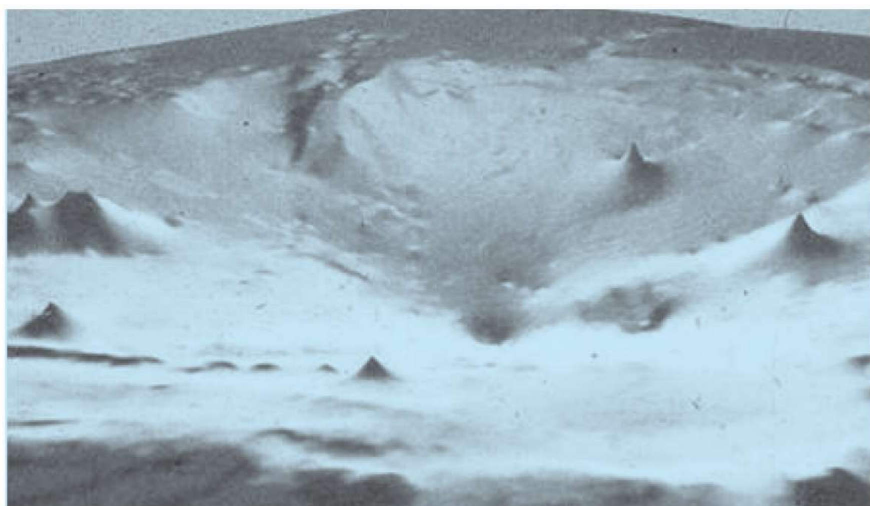
1988年8月的《地学学报》（*Terra Nova*）杂志，刊登了以加斯佩里尼领衔意大利科学小组的考察结果：他们可能找到了一个陨石坑。

加斯佩里尼宣称，他们用3D声呐技术，对距离通古斯大爆炸震中8公里的契科湖进行了扫描，然后吃惊地发现：在湖底有一个大坑。

作为博洛尼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的地质学家，加斯佩里尼认为，契科湖的湖水将撞击通古斯地区的天体之一所形成的大坑给填满了——这也解释了库里尼当初没有发现陨石坑的原因。



契科湖实景照片



契科湖湖底的3D声呐照片

但另一个俄罗斯研究小组表示，经过研究，契科湖可能形成于1908

年以前。

不过在2013年，乌克兰的一个科学小组，宣布从通古斯地区的淤泥里找到了只有陨石才含有的一些细小碎片元素。

这场大爆炸的成因，目前基本被框定在“陨石说”。

6

对于“通古斯大爆炸”的成因，民间还有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

那就是，有一个人凭借一己之力，制造了“通古斯大爆炸”。

这个人，就是已经成为“半神之体”的尼古拉·特斯拉。据说“通古斯大爆炸”只是他进行的一次交流电实验而已。

特斯拉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但经过近几年互联网传播的叠加效应，这位原本应该被客观对待的天才，颇有些被“神化”的倾向——他的“神迹”从交流电开始延伸，到“通古斯大爆炸”，到阿波罗探月，甚至到了人类太阳系的探索。（特斯拉的故事请参看本书收录的“尼古拉·特斯拉：到底是神还是人？”）

但至少，现在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表明，特斯拉与“通古斯大爆炸”有直接关联。

不过，也正是因为连特斯拉都被牵扯进去了，才更突显出了“通古斯大爆炸”的神秘和吸引力吧。

馒头说

说到“通古斯大爆炸”，还有两次和它齐名的爆炸，并称“世界三大神秘爆炸事件”（明朝“王恭厂大爆炸”和印度“死丘事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可能会有人说，费那么大工夫去查这种事情干什么呢？过都过去了，我们不都是还过得好好的吗？

但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如果“陨石说”成立，据测算，击中通古斯地区的那块陨石如果再晚

5小时进入地球大气层，那击中的就是莫斯科。而像“通古斯大爆炸”这样级别的不明物体撞击地球的概率，科学家测算下来，觉得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高得多——大概两三千年就会有一次。

经过46亿年的演变，我们人类貌似已经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掌握着这个星球的生杀予夺。但如果放到茫茫宇宙，我们实在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一粒尘埃——如果换种说法，我们可能就像我们自己眼中的一只蚂蚁，宇宙间稍有个风吹草动，我们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研究地球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和派宇宙飞船去太空探索地球的未来之路同样重要，都是为我们人类的命运着想，都是在规避潜在的威胁和寻找发展的可能。

我一直很讨厌“末日说”，不过，人类还是时刻保持一点危机感比较好吧。

读者评论

宇宙无敌少年晨：这篇文章完美呈现了科学研究的过程：提出假说并不断证伪。

老牛：末日，不是说说而已，是迟早的事。或来自天外，或来自地内，更可能来自“你我”。某些天外、地内的，人类已经可以预测和控制，一定有许多无法预测和控制的会降临。蝴蝶已经扇动翅膀，只不过摧毁地球的风还在路上慢慢地游荡。

记一忘三二：无论何时何处，怀有敬畏之心和危机意识，我们才能和自然更好相处。

信念　道阻且长，而终点可期

只剩两架轰炸机了，但还是要轰炸日本……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提出的口号是“三个月灭亡中国”。

但不久之后，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如何的狂妄。

他们面对的这个国家的人民，能不间断传承5000年的文明，靠的不仅仅是勤劳和智慧，更有勇气和毅力。

还有，那种坚持到最后一刻也决不放弃的信念。

1

1938年5月19日，15点23分。

两架美国的马丁B–10远程轰炸机从中国武汉的汉口机场，轰然起飞。

机场上没有一个送行的人员——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绝密的行动。

在飞行了两个小时后，两架飞机降落在了靠近东海的衢州机场，再一次加满了航空燃油。

当夜23点48分，两架轰炸机再度轰然而起，向东飞去。

升空后，两架飞机中编号1403的长机驾驶员徐焕升发出了第一份电文：

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致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这两架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

在全面抗战第一年中国空军就基本被消耗殆尽的时候，这8名机组人员所乘的两架远程轰炸机，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轰炸”日本。

2

蒋介石其实早就想轰炸日本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就曾表示过要派空军轰炸“敌国首都”夺取制空权的想法，他称之为“爆击敌国的首都”——虽然没有指明“敌国”是哪个，但当时中国的首要敌国，除了日本，实在想不出第二个。

1936年底，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制订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已经明确列入了用重型轰炸机队定点轰炸日本东京、大阪等重要城市和军工港口、工厂。

蒋介石的想法是，在陆军和海军都明显不如对手的情况下，利用空军轰炸，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蒋介石当时还是过于乐观了——日本不仅陆军、海军碾轧中国军队，空军力量也是远超中国军队的，它后来研发出来的“零”式战斗机一度成为美国飞行员的噩梦，更何况当时还孱弱的中国空军？以当时中国空军的力量，即使倾巢出动，也很难对日本城市造成实质性的破坏。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短短一年间，中国空军的精英力量就已经被消耗殆尽。只有不到300架作战飞机的中国空军，在第一年惨烈的空中绞杀中虽然也取得过鼓舞人心的战绩，但终究因为数量太少，又没有后续补充，很快就所剩无几了（参见《历史的温度》“抗日战争，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军”）。

而在中国空军那不到300架的作战飞机中，轰炸机只有96架。其中能执行长距离轰炸任务的飞机更是屈指可数——能飞到日本本土的轰炸机，只有6架意大利萨伏亚S–72和6架美国马丁B–10（生产型号为“马丁–139WC”）轰炸机。



马丁B–10轰炸机

但即便如此，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还是将一批飞行员集中到南昌，为未来可能实施的远程轰炸日本做战前训练。

其间，蒋介石试图从英美购买飞机，但当时英美对日本侵华保持“中立”，为了不激怒日本，它们一开始并没有同意向中国销售武器。蒋介石转而求助于苏联。一开始也保持中立的苏联，迫于西线纳粹德国的强大压力，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从而避免使自己陷入被两面夹击的窘境，所以渐渐开放了对中国的军火销售。

但是，蒋介石提出的向苏联购买100架远程重型轰炸机的要求，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复。苏联只愿意给中国提供中距离飞机，这些飞机只适合保卫中国沿海城市，但无法远距离飞行。当时有人猜测，苏联不愿意出售远程重型轰炸机的原因中有一条，那就是谁都知道中国买远程重型轰炸机想干什么——苏联那时候还不想彻底刺激日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只能从自己空军的“存量”中想办法。

选来选去，选中了当时中国空军仅存的两架美国马丁B–10轰炸机——其实一共有四架，但有两架已经存在严重问题，拆了那两架飞机的零件，凑出了另两架。

3

飞机有了，谁来开？

一开始，蒋介石想委派外籍驾驶员。因为驾驶这两架飞机的，本来

就是外籍志愿人员（说是志愿，但也是支付了高额报酬的，类似雇佣兵）。但一听说是要飞往日本执行轰炸任务，外籍飞行员觉得风险实在太高，开出了一人10万美元报酬的价格。当时一架马丁B–10轰炸机需要4名机组人员，两架飞机就是8人，一共是80万美元。

价格高昂是让国民政府犹豫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外籍飞行员毕竟没有中国人那样的国仇家恨，万一到了日本一碰到情况就折返，甚至跳伞，任务完成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思前想后，蒋介石最终决定用中国自己的飞行员组成远征队，去执行这个很可能“有去无回”的任务。

远征队的队长人选，选定了一个叫徐焕升的人。

徐焕升，江苏崇明人（现上海崇明区），1906年出生，当时32岁。他最初是笕桥中央航校的教官，后来担任蒋介石座机的副驾驶，再后来担任空军第十四大队的大队长——两架马丁B–10轰炸机，正是属于第十四大队。



徐焕升

随后，甄选远征队优秀飞行员的工作开始，中国空军第十九大队副队长佟彦博等一批精英被集中到了一起开始训练并研究马丁B–10轰炸机。一研究，发现出问题了。

4

马丁B–10轰炸机并非完美。

这种类型的飞机最大时速343公里，升限7300米，航程1900公里，可载弹1.25吨，乘员为4人。

如果从航程上算，飞机从武汉起飞，飞到日本目的地上空（当时选

定的是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燃油肯定不够。如果选定飞到宁波的机场加满油再飞，飞到八幡的路程是980公里，一个来回是1960公里，即便做到严丝合缝，燃油也是不够。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按照马丁B–10轰炸机的载弹量，每架飞机只能装两枚炸弹，两架加起来四枚。就算成功飞到目的地上空，炸弹投下去，万一没炸中目标怎么办？岂不是平白让敌人嗤笑？

那么就算炸中了，四枚炸弹能起到多大的效果？

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远征大队，也困扰着蒋介石。

最后，计划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首先，目的地调整为更近的日本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其次，拆掉一个投弹舱，改为油箱，确保万无一失。

那么只投一枚炸弹了吗？并不是，因为国民政府已经决定——不投炸弹，投“纸弹”。

这个建议，是徐焕升的远征队提出的（一说由蒋介石侍从室一处提出）。

因为中国从来没有飞行员飞临过日本的上空，对那里的天气状况、气流等一无所知，也缺乏精确的日本地图，所以投弹命中的概率极低，即便命中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与其这样，不如发动宣传攻势——投放传单，警告日本人。

这个建议经过再三权衡，被蒋介石通过了。

5

时间回到1938年5月19日，23点48分。

经过精心的准备，远征队队长徐焕升驾驶的1403号轰炸机（苏光华任副驾驶、刘荣光任领航、吴积冲任通信员）和副队长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轰炸机（蒋绍禹任副驾驶、雷天眷任领航、陈光斗任通信员）加满燃油，从衢州机场起飞，直扑日本。

为了防止被舟山群岛日军防空警戒哨发现，机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照准日本九州飞行。

20日凌晨0点35分，在发完第一封誓死完成任务的电文之后，徐焕升发了第二封电文：“云太高，看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

20日凌晨2点40分，远征队终于顺利抵达长崎上空。长崎根本没有实行灯火管制。徐焕升发出命令：“目标马路路灯，投弹！”

数十万封传单在投弹舱打开后，飘落下去。

远征队依次飞临久留米、佐贺、佐世保等计划目的地，一共投下了100多万份传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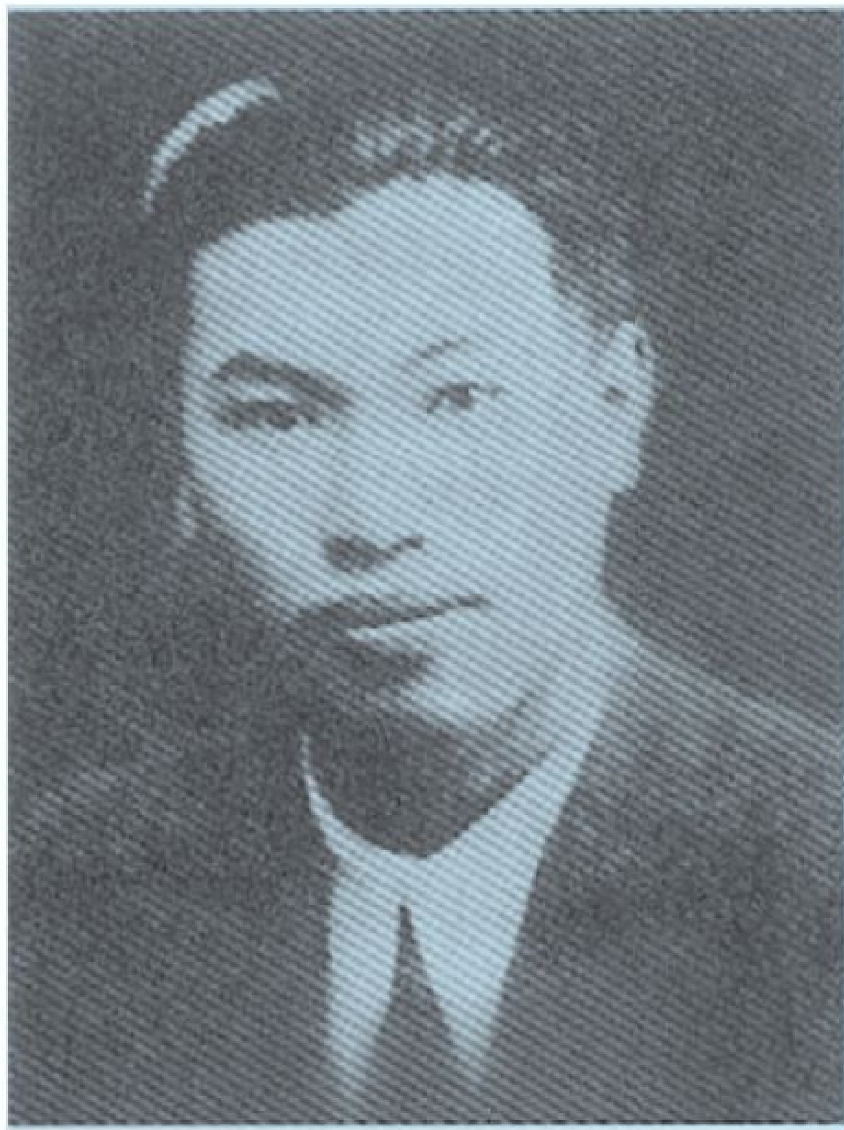
3点45分，飞机飞临最后一个目的地福冈上空。

此时日本地面防空力量已经有所发现，开始发出警报，实行了灯火管制，无数探照灯开始向空中照射，同时，高射炮开始密集发射。

但此时，中国的远征队已经完成了任务，于凌晨4点掉头返航，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拦截，顺利在早晨7点20分飞抵浙江海岸，8点45分降落在南昌机场，加油后于11点返回汉口机场。

据徐焕升后来的回忆：“当时日本的防空哨警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侵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实施灯火管制。乃至天色通明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日本人为什么完全没能做出拦截？



佟彦博。他在1944年1月4日训练学生盲飞时飞机失事，魂归长空，年仅33岁，没有看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

除时间因素等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认为当时自己是亚洲首屈一指也是唯一一个航空强国，根本不可能有哪个国家的空军有能力或敢飞到自己本土的上空。

据说，中国远征队飞越大海时，曾被一艘日本军舰发现，但正是出于“怎么可能有别的国家的飞机敢飞向日本”这个原因，日军以为是自己本国的飞机。

所以，当时日本军方第二天看到传单后，还不相信是中国飞机投的，经过多方确认和检验，才相信真的是前一天晚上有中国飞机来过。

这是有记录以来，日本国土上空第一次有敌国飞机侵入。

6

那么，中国轰炸机投下的传单上究竟写了什么呢？

以下是两段节录：

告日本国民书

（一）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全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请诸位静听：

……

日本兄弟，在诸位之中，有开始时反对战争，理想着正义和平的人，也有为军阀的宣传所欺骗而讴歌战争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想来一定都因贵国的言论被统制，要了解时局的真相是困难的。所以，试作以下的说明，希望诸位详加考虑。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 中日人民亲善同盟

(二)

日本国民诸君：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对人民这样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

可是，占领满洲，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中华民国全国民众

这次的"纸弹轰炸"，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首先来看中国国内。中国各方面当然给这次行动高度评价。

《大公报》报道："空军初次远征日本，在九州各地散发传单，唤醒日本迷梦，发扬中国德威。"

《申报》报道："冲破万里长空，完成神圣使命，神鹰队长征三岛，散发传单不滥杀无辜，以正义人道告诫敌国。"

香港方面的舆论是："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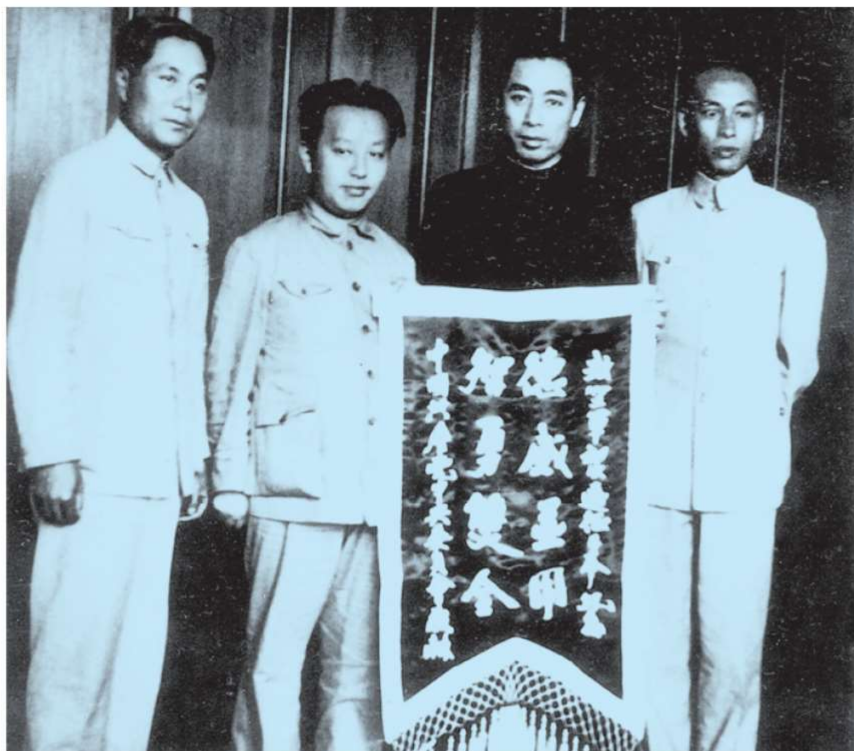
孔祥熙（左一）等亲自到汉口王家墩机场迎接远征机组人员等凯旋

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对这次行动给予高度赞扬。《新华日报》报道："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长崎佐世保传单飞舞惊破敌胆魂，我为维护人道免伤无辜并未投弹，警告残暴敌寇万吨炸弹随时可至。"

"人道"二字，是宋美龄提议的——她称这次轰炸，是"人道远征"。

5月22日，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王明、周恩来、吴玉章、罗炳辉还专门来到空军政治部，热烈祝贺八勇士凯旋，并代表中共中央赠送了锦旗，上书："德威并用，智勇双全。"

那么日本方面反响如何？日本的媒体，当然是竭力消除影响。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勇士送锦旗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5月21日发文《支那的怪飞机在九州出现，散发反战传单后遁走》说：“二十日上午四点左右，在熊本、宫崎两县上空出现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约一小时后消失于太平洋方向。这一飞行之后，球磨郡四浦，多良木，黑肥地，椎叶山奥以及宫崎县富岛附近发现了大量反战传单，县特高课立即与相邻各县及西部防卫司令部防空监视网联络，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应行动。

“根据目击者所谈，此飞机为白色道格拉斯型，发现的传单以《告日本劳动者》等为题，内容为激进的反战宣传。根据采访抛撒传单的现场目击者，发现传单出现地点与该飞机飞行线路基本一致。这次出现的怪飞机究竟为何来历尚不清楚，但从传单的内容看，似为支那飞机。值此徐州攻略战大胜，士气高涨之际，用此战术扰乱我国内不过可充一笑之儿戏，民心自无动摇。”

而作为第三方——主要是英美国家——的反应是：

美联社评论："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成功，证实中国实力甚强，绝非日本所能击败。"

路透社评论："日本一向吹嘘，其本土从未受到外来威胁，其空防咸针对美苏，而视中国空军不足畏，而今恰恰是中国的空军，创袭击日本之最先纪录，可谓一鸣惊人！"

美国有其他媒体评论是："中国飞机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国民，意义极为重大，且饶有趣味。"英国的舆论是："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所谓大日本帝国固若金汤的空防，不过贻笑大方而已。"

当然，这些都是各带立场的评论。但对于执行远征任务的飞行员本身，绝大多数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中国远征队的队长徐焕升。

该杂志定了个调：徐焕升是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馒头说

对于1938年的"纸片轰炸"，一直有两种声音。

一部分人认为，传单的震慑和宣传效果，远胜于丢四颗炸弹。也有另一部分人认为，经历了那么艰苦的飞行，到都到了，哪怕丢一颗炸弹下去，也比100万份传单的效果要好。

我个人比较认同前者。

主要还是因为客观原因：当时如果携带炸弹，无论是飞行还是投弹，或是返航遭遇拦截，会增加很多变数。更重要的是，就算炸弹投下去，炸掉一些建筑，甚至炸死一些人，以当时日本军方的掩盖能力（中途岛海战被日本军方完全渲染成日本联合舰队的一场空前大胜），真的掀不起什么浪花。

并不是说撒宣传单就是最好的策略。无奈吗？当然无奈。但在当时的各种条件限制下，"纸片轰炸"相对是最优选择。

当时两架中国飞机撒下的传单中，还有这样一句告诫日本的话："尔

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中国人可以说没做到，也可以说做到了。

没做到，是因为之后日本加强了警惕，加大了力度，让中国空军再也没有机会远程轰炸日本了。

做到了，是在此之后，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轰炸机自太平洋上的航母起飞，首次实弹轰炸日本东京，之后降落在中国机场；1945年3月和5月，美国出动数万架次的重型轰炸机地毯式轰炸日本东京；1945年8月间，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被先后投下一颗原子弹——那已不是千吨炸弹，而是上万吨炸弹的当量了。

可能有人会说，那是美国人干的事儿，又不是你中国人干的。

但作为让日本陷入战争泥沼十四年的中国，作为当时同一个战壕的盟国，中国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贡献吗？

纸片也好，实弹也好，显示的都是一种信念。

那不是阿Q精神。

那是一种实实在在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坚持到底的必胜信念。

读者评论

杜江涛：一位老飞行员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战斗机飞行员毕业答辩上，最后一个问题是歼5战斗机上共载弹多少发。我认为这个问题太简单，便回答：256发。没想到考核的教员突然表情很严峻地告诉我：是257发，如果最后机炮子弹告罄，而敌人目标对祖国和人民仍有威胁，你和你的座机就是最后一发机炮子弹！

翔宇：美国大片《偷袭珍珠港》中，有一段美国轰炸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飞，去轰炸日本东京，然后降落在中国的沿海地区的情节，也挺悲壮的。因为当时的油容量只够飞过去轰炸日本，然后降落到中国，不能飞回航母了。（作者回复：后面日本对中国血腥的报复电影没拍。）

李可可：说纸片炸弹没有威力的都是“键盘侠”。战争的痛苦老兵们

比谁都清楚，比谁都不愿意再发生战争，难道他们怕死吗？当年太不容易了。今天我们能安安静静地看手机，是国家兴盛了，才有的和平，才有的国民幸福。感谢前辈们，感谢历史的记录者们。

1942年，15架美国轰炸机在中国迫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美国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有很多，从贷款到物资，从“飞虎队”到武器装备。

但其实，中国人也为自己的战友做出很多的帮助。

比如1942年的那次轰炸。

1

1942年9月4日这一天，在中日战场上的“浙赣会战”结束了。

这场会战，在抗日战争史上的历次会战中，规模不算大，也不算小——中国方面，投入了大约30万的兵力，伤亡7万人，而日军伤亡3万余人。

这是一场日本人主动挑起的会战，但关键是，这场会战，原来完全在他们的计划之外。

一切的原因，是16架轰炸机。

2

这件事，还是要从1941年的12月21日说起。

那一天，在白宫召开的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一个要求：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应该尽快针对日本进行一次报复性打击。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回过头去看，当时的日本去招惹美国，无疑是自寻死路，美国慌什么呢？事实上，当时，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刚刚在珍珠港遭受重创，东南亚各个国家的盟军占据的据点又在日军的狂飙突进下纷纷陷落。在整个国家战争机器还没充分运转起来的时候，美国从白宫到民间，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

所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立刻实施一次报复打击，是提升所有人士气的绝好办法。

但是，珍珠港一败，美国已经暂时将太平洋拱手让给了日本的联合舰队，在那个没有导弹的年代，要对日本实施报复性打击，只能派轰炸机去轰炸日本本土。

从美国西海岸到日本本土，远隔万里，当时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型号的轰炸机能飞那么远——关键，还要返航。

这个问题困扰了美国军方整整一个月，直到一个叫弗兰西斯·罗尔的上校提出了一个想法：用海军的航母，将美军的中程轰炸机送到尽可能离日本本土近的地方（当时美国的海军在太平洋上得偷偷摸摸躲着日本海军行动），然后轰炸机起飞去轰炸日本本土——飞机一起飞，航母掉头就走，防止被日本的轰炸机发现并击沉。

那么，飞出去的轰炸机怎么办？

罗尔的建议是：别回来了。

难道是一场自杀式攻击？并不是，罗尔规划了轰炸机的降落地点：中国东南沿海的衢州机场。

3

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首先要选一个带头人。最终被选中的人，叫作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James Harold Doolittle）。

46岁的杜立特在退役前是陆军航空队的一名中校，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他立刻放弃了自己在壳牌公司待遇优厚的工作，重新回到部队。

选中杜立特还有一个原因：他26岁时，曾驾驶着一架DH–4B飞机，用21小时19分钟的时间，创造了一天之内从美国东海岸飞到西海岸的纪录。



青年时期服役于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杜立特

有了带头人，然后就是要选飞机。

这次轰炸任务对飞机的要求非常高：这架飞机必须是双引擎的中型轰炸机，因为要携带910公斤的炸弹；但这架飞机必须要在25米宽、150米长的短距离内起飞（不然就从航母甲板上掉到海里去了）；这架飞机必须能续航飞行4000公里以上（不然也掉到海里去了）。

杜立特最终选择了最新型的B–25轰炸机——这个型号的飞机，还没投入过实战，但一切条件都符合这次轰炸行动的要求。



有了带头人，有了轰炸机，接下来就需要一起跟着干的人了。

杜立特选中了美军第十七飞行大队，因为这个大队的4个中队，全都配备了B–25轰炸机，每个飞行员都有驾驶这个型号飞机的经验。

随后，这个大队的飞行员们被告知“即将被派遣执行一项非常光荣但又非常危险的任务”，自愿报名。

执行任务人员的名额很快就报满了。

但是，当这批经验丰富的小伙子在杜立特的带领下来到航空训练基地，见到他们早就熟悉的B–25轰炸机时，还是吓了一跳——整架飞机已经被改装得认不出来了：

飞机上只要条件允许的部位，都被加了各种油箱，包括飞机腹部的炮塔也被改为副油箱；无线电装置全被拆除；武器系统基本都被拆除，只剩下两挺机枪；安装了除冰器。

杜立特再次向所有参加任务的飞行员强调任务非常危险，很有可能会有去无回，“现在退出的话还来得及”。

没有一人退出。



杜立特（左二）和他的队员们

于是就开始训练。训练的场地，是一块大的平地，上面划了一定的长度和宽度，然后大家就驾驶着满载炸弹的轰炸机，一次又一次地在那块画线的平地上练习起飞。

很快，飞行员全都可以在飞机滑出规定的画线之前起飞了。

除了杜立特，没有人知道这次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肯定是要在航空母舰上起飞。

4

1942年4月2日，揭晓秘密的那一天终于来了。

美国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在一艘重巡洋舰和一艘轻巡洋舰的护卫下，载着16架B–25轰炸机，缓缓驶离旧金山港。在驶离港口后，对任务一无所知的舰长米切尔将军拆开了写有“绝密”字样的信封，终于搞清楚了此行的目标：

舰队将驶向日本本土，舰上的轰炸机将执行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

与此同时，经过秘密训练的B–25轰炸机的飞行员们，也终于知道了自己原来承担着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作为反应，船舱里传来一阵欢呼声。



任务公布后，杜立特在5枚炸弹的尾翼上系上了日本政府当年授予美军官兵的“友好”奖章，用意十分明显——把这些炸弹，带着这些勋章，统统扔到日本的本土上去

当以“大黄蜂号”为首的美国第18机动舰队行进到夏威夷北部海域的时候，以“企业号”航母为首的第16机动舰队加入了队伍，因为“企业号”上的舰载机，要随时准备为“大黄蜂号”护航——虽然“企业号”上的水

手根本不知道“大黄蜂号”上装那么多轰炸机是要运送到哪里——他们觉得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轰炸机能从航母上起飞，更让他们困惑的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已经几乎没有军事基地了。

由两艘航母和一批护航舰组成的“特混舰队”，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默默地向日本本土方向前进。



停在“大黄蜂号”甲板上的B-25轰炸机

4月18日清晨7点38分，意外发生了。当这支美国“特混舰队”行驶到距离日本本土还有1200海里左右的地方时，他们被日本人发现了。

当时发现这支舰队的，是日军巡逻船“日东丸23号”。

日本舰船发现敌船后，第一个行为就是立刻用无线电向国内发回预警。这时候，考验“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的时候到了：如果继续驶往指定海域再起飞轰炸机，很有可能舰队会被闻讯赶来的日本陆基战斗机和轰炸机摧毁——而这是目前美国海军为数不多的存货了。

那怎么办？只能让轰炸机提前起飞，航母提前掉头返航。

但是如果提前起飞的话，杜立特和他的飞行特攻队将比原定计划提前10个小时到达日本上空，由黑夜轰炸改为白天轰炸，轰炸机被日本防空火力击落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同时，因为提前起飞，所有的B–25轰炸机将多飞310公里，油耗将大大增加，这也意味着它们成功抵达中国机场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在起飞前，杜立特和他的敢死队队员们一起在“大黄蜂号”甲板上，留下了这张合影

换句话说，这支飞行别动队将成为真正的“敢死队”，他们生还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杜立特站到了飞行甲板上，眼前是列队站立的所有参加行动的飞行员。杜立特把突发情况告诉了队员，然后告诉他们：可以自愿退出。有替补队员愿意出100美元，换下不去的飞行员。

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出。

4月18日上午8点15分，杜立特身先士卒，驾驶第一架B–25轰炸机在“大黄蜂号”航母的甲板上迎空而起。

1个小时后，全部16架轰炸机起飞升空。所有轰炸机保持无线电静默，贴着海面低空飞行，扑向日本本土。

4月18日下午3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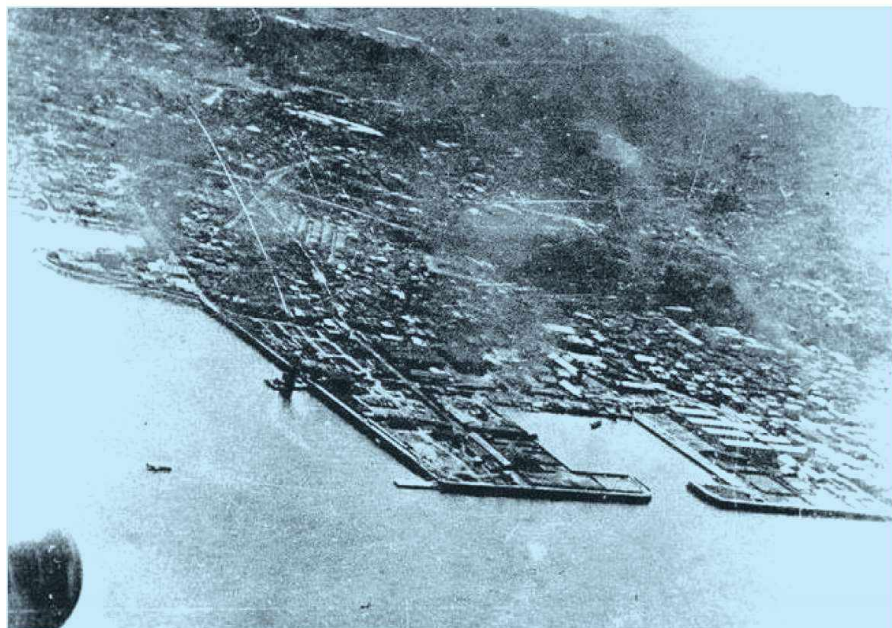
在日本近海捕鱼的日本渔民，看到低空呼啸而来的几架飞机，于是兴奋地向空中挥手——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大日本帝国的空军。

但那正是杜立特率领的16架B–25轰炸机。

那艘发现美国舰队的“日东丸23号”虽然把消息传回了东京，但日本人认为在那个海域，美国人的舰载机是不可能飞到日本本土来进行轰炸的。

所以，他们并没有重视那个情报。

就在飞临东京上空的时候，杜立特的轰炸机中队看到迎面飞来了一架飞机。事后他们才知道，那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座机，当时，他正准备去视察一所航空学校。



杜立特空袭东京时从空中拍下的照片

东条英机的秘书西浦大佐首先发现迎面飞来的飞机样子很奇怪，再仔细一看，他惊恐地发现：居然是美军的飞机！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杜立特率领的16架B–25轰炸机，按照事先制定的目标，将一枚枚重达200多公斤的炸弹和燃烧弹扔了下去，轰炸了东京、横滨、横须贺、名古屋、神户和大阪6个城市的多个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

日本的防空警报，在炸弹落下后才开始响起，而截击的战斗机起飞时，B–25轰炸机的炸弹已经基本扔完了。

这可能也怪不了日本人，这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真正的轰炸。（1938年，中国空军曾对日本实施过一次“纸片轰炸”，详见本书收录的“只剩两架轰炸机了，但还是要轰炸日本……”一文。）

日本官方随即开始了舆论宣传，表示美军的这次轰炸效果很小，甚至拿杜立特的名字来证明（杜立特：Doolittle，日本人说是do little）。



被轰炸后的日本建筑废墟

但是，美军这次轰炸的目的，并不是要造成多大的物理伤害。

从来没有在本土挨过炸弹的日本人，不仅被重重地羞辱，而且日本民众开始出现对战争的恐惧。

而那16架B–25轰炸机，在扔光炸弹后，按照预定计划，朝着中国沿海方向飞去。

预料中的困难，还是发生了。

首先，机队中的8号机因为油耗过大，已经飞不到中国了。

经过考虑，8号机改道飞向了苏联的海参崴。其实杜立特的“敢死队”最初考虑的降落地点就是更近的苏联，但当时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美国派人密谈后被拒绝。

8号机一降落，5名机组人员就被苏联方面扣留了。一年后，5名机组人员被押送到苏联和伊朗边境的一个地方，他们买通了一个走私的阿富汗人逃到了伊朗境内，辗转后回国（后来档案解密，阿富汗人背后的指使者是苏联克格勃。苏联人当时注意力在德国，不想得罪日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放走美国人）。

但其他飞机上的战友们，就不是个个那么好运气了。

由于美国方面要保密，准备在4月18日24点左右通知中国的衢州机场，打开通信系统和机场跑道灯，让美国飞机降落。

但是，杜立特和他的战友因为提前起飞，在晚上10点就到了衢州机场上空。衢州机场因为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按照规定，为了避免日军空袭，所以关闭了一切通信系统和灯光。

找不到降落地点的杜立特和他的队员，只能一圈圈在空中徘徊，看着燃油一点点耗尽。

最终，他们只能选择在浙江西部的山区进行迫降。

伤亡终于出现了：3号机的机枪手法克托尔在迫降过程中不慎翻落坠崖牺牲，成为当日空袭的第一名牺牲者。

6号机因为燃油耗尽，连中国大陆也没有飞到，在象山附近的海面迫降，投弹手迪特尔和机枪手菲茨毛莱斯溺水身亡。三名游上岸的机组成员在被中国当地老百姓护送前往安全区途中，被日本人发现，成为俘虏。

16号机因为迫降地点接近当时日军控制的南昌，在迫降成功后1小时，五名机组人员全被日军俘虏。连同3号机的三名幸存战友一起，这八名美国飞行员被日本法庭开庭审判有罪，罪名是“杀害日本的无辜百

姓”。其中三人被立即枪决，剩下的五人饱受折磨，一人被折磨至死，剩下的四人最终在1945年获救。

所幸，剩下的64名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全部在迫降后获救。

救他们的，都是中国当地的老百姓。



杜立特的1号机组成员和救助他们的中国百姓在浙西行署门前合影

7

其实，当时杜立特和他的战友们根本就无法选择迫降的地点。

所以，他们中有的飞机降落在了中国人控制的地区，有的飞机降落在了日占区和中占区犬牙交错的地区，有的飞机直接降落在了日占区。但无论降落在哪个区域，所有幸存的飞行员，都得到了中国老百姓最大的帮助。

根据杜立特后来的回忆，他们在出发前，每个人特地都学了一句汉语——“我是美国人”。但迫降之后，他们那些糟糕的发音，闻讯赶来的中国老百姓根本听不懂。

不过，在他们让中国老百姓看了降落伞、飞机残骸，或者美国军章等证明物，手脚并用地解释“我们是去轰炸日本东京”之后，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甚至冒着生命

危险为美国飞行员提供帮助。

64名幸存的飞行员，后来被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到了中国安全的大后方。他们后来一致回忆，一路上，中国人有条件的用飞机、火车、汽车、马车，没条件的用毛驴、轿子、滑竿，总之用上了一切可用的交通工具护送他们。沿途的老百姓提供了他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食物、衣服和住宿，有的老百姓拿出家里仅有的鸡蛋塞给美国飞行员，而他们全家还在饿着肚子。

而老百姓的理由只有一个：你们是来帮我们打鬼子的。

被感动的美国飞行员也留下了各种纪念品以感谢帮助过他们的老百姓，包括钢笔、手链和勋章等。

但他们当时不知道，他们的这些好意，最终却给他们的恩人带来了大麻烦。

8

因为本土被轰炸而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最终决定在1942年5月发动“浙赣会战”。

而日本人进攻的一大目的，就是要摧毁浙江沿岸的中国机场，防止类似的轰炸东京事件再度上演。

而另一个目的，就是报复。他们大肆搜查美国飞行员迫降地点周边的中国老百姓家里，凡是发现有美国飞行员留下的任何东西的，这个村庄的所有人就被集体屠杀。

在江西抚州南城县，当地的中国老百姓曾给美国飞行员提供过食物，日本士兵便逼着当地人吃粪便，接着让这些人前胸靠后背地站在一起，然后开枪射击，只为看看一颗子弹究竟能穿过多少个人的身体。最终，这座县城在日本人的奸淫掳掠之后，被烧成灰烬。

加拿大传教士比尔·米切尔当时在教会救济中国委员会任职，他曾统计过日本战机对杜立特他们原定的着陆点——浙江衢州造成的破坏：日军一共进行了1131次轰炸，造成10246人死亡，27456人无家可归。日本军队还摧毁了当地62146间房屋，抢走了7620头牛，焚毁了三分之一的农作物。



这是在中国战区作战的盟军飞行员飞行服后背上的身份标识，他们在敌后迫降后只要向中国百姓展示这个标识，就会得到救助和掩护

日本人还嫌这样的报复速度太慢。

在轰炸之后，日军的731细菌战部队开始在各个村镇中投放炭疽、瘟疫、霍乱和伤寒病毒，据统计，死于日军屠杀和细菌战的中国老百姓，高达25万人。蒋介石曾给美国政府拍去一份电报，称“杜立特空袭”让中国付出了25万条生命的代价，当美国飞行员撤到中国沿海地区

后，日军对那里发动了攻击，“屠杀了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但是，在“杜立特空袭”之后，随着美国“飞虎队”的逐渐活跃，中国大地上各处依旧出现迫降的美国飞机和幸存的美国飞行员。中国老百姓并没有被日本人的血腥屠杀吓倒，所有的美军迫降飞行员，无论落在沦陷区还是半沦陷区，只要附近有中国的老百姓，就立刻能得到他们的冒死帮助。

日本人用各种办法威逼和恐吓过中国老百姓，不准他们帮助美国飞行员，但没有人因为胆怯而退后一步。

1992年4月18日，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在“杜立特空袭”五十周年纪念仪式上说了这样一段话：

“在轰炸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做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安全返回。

“‘杜立特空袭’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这些英雄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做出的伟大功勋，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中国人。”

馒头说

今天的这篇文章，其实说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16架美国轰炸机轰炸日本的故事。

第二个，其实是美国飞行员迫降中国后，得到中国老百姓帮助的故事。其实每一队机组成员受到中国百姓帮助的过程，都是一段故事，有惊险，更有温暖。

战争年代，最无力、最孱弱的，其实就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但也正是在战争年代，普通老百姓的那种坚韧、勇敢和无畏，会更凸显出来，甚至一点儿都不比手里拿着武器的士兵逊色。

当自己的家园面临被侵略的危险时，子弟兵是顶在最前面的那堵墙，而百姓则是墙下坚实的土壤，是士兵们的职责和使命，也是士兵们

的动力和根基。

就像电影《敦刻尔克》里那个触动无数人的镜头：看到海平面上出现了无数普通英国民众驾驶着各类船只跨海而来，指挥官把望远镜放了下来，旁边人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轻轻吐出一个单词：

“Home.”

读者评论

会做软装的食上社社长Luzy：2012年“杜立特空袭”70周年纪念，美国杜立特轰炸者协会特意邀请了浙江衢州江山的村民廖明发前往美国。他的父亲廖诗原，正是当年救下3号机领航员沃朱克（Charles John Ozuk）的人之一。衢州江山是什么地方？是“三毛一戴”（毛人凤、毛万里、毛森、戴笠）的故乡……

烟小火：老百姓真的非常简单，那个年代可能不论你是哪国人，只要说，我也是打鬼子的，老百姓一定倾囊相助，哪怕自己有的也只是那么可怜的一点点……以他们的脑袋，并不会认真地思考分析，我帮了你，将来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折磨。这不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这是民心的本能。

不亦乐乎：专业就是研究太平洋战争，觉得需要补充一点。“杜立特空袭”对战局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日本因此急于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造成许多战略决策的失误。案例之一就是登陆中途岛被美军击退，自此太平洋战场态势转折。当然，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但历史过程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杜立特空袭”促进了战争主动权的转移，历史意义大于实际战果。

有一种撤退，叫敦刻尔克

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让很多人深受感动，也让不少人云里雾里。

明明是一场大撤退，为什么会被人铭记，以至要拍成电影？

说简单，也简单，因为那不仅仅是一场撤退而已。

1

在法国北部的诺尔省，有一座海港城市。

公元4世纪初的时候，这里还只是一个坐落在沙滩上的小渔村。到了1067年，这个地方被正式命名为“敦刻尔克”（Dunkirk）——意为“沙滩上的教堂”。

1662年，敦刻尔克正式归属法国。因为临海的特殊位置，这个地方一直是中世纪欧洲各类战争争夺的焦点，但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役，都没有1940年5月的那场大战来得有名。

说是一场大战，但其实是一场大撤退。

但正是那场堪称“奇迹”的大撤退，让“敦刻尔克”这个名字，名垂青史。

2

时间，还是要回到1939年9月1日。

这一天的凌晨，纳粹德国出动44个师约80万的兵力，直扑波兰，正式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仅仅一个月，波兰宣布投降。

作为波兰的盟友，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在干什么呢？它们倒也是在9月3日迅速做出反应：同一天内对德国宣战。然后呢？然后就迅速陷入

了沉默。除了法国发动过一次象征性的“萨尔攻势”外（战线向前推进了5英里，占领了大约20个无人村庄），所有的努力，就是在外交上谴责德国，口头上要求德国撤军。

英国和法国凭借出色的“表演”，让这一阶段的战争获得了一系列的称号：假战，奇怪的战争，静坐战争……

但嗜血的狼，是不会因为你假模假样吼两嗓子，就会转身离开的。1940年5月10日，法国和英国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养精蓄锐的德国人出动了136个师，在3000多辆坦克的引导下，分A、B两个集团军群直扑比利时、荷兰、法国、卢森堡等国，开始全面进攻西欧国家。

这是一次大大出乎法国人意料的进攻——德国A集团军群竟然绕过了他们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在德国“装甲战天才”海因茨·古德里安的率领下，德国的装甲部队在法国的色当撕开了一道口子，潮水一般地杀入法国腹地。

1940年5月16日，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紧急飞往法国巴黎，在那里与同样是刚刚上任的法国总理雷诺会晤。

丘吉尔后来回忆，在抵达巴黎的时候，法国政府已经在一批一批地烧毁政府文件，准备撤离了。

丘吉尔当时问法军的总司令甘末林将军：“我们的战略后备队在哪里？”

甘末林痛苦地摇头：“我们已经没有战略后备队了。”

而雷诺的回答更直接：“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这离德国军队发动总攻，才过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承认“输掉战争”的，是号称“欧洲第一陆战强国”的法国。

而随着法国军队的崩盘，一起倒霉的，还有渡过英吉利海峡前来并肩作战的英国远征军。

但打不下去了，还能怎么办？

一个字：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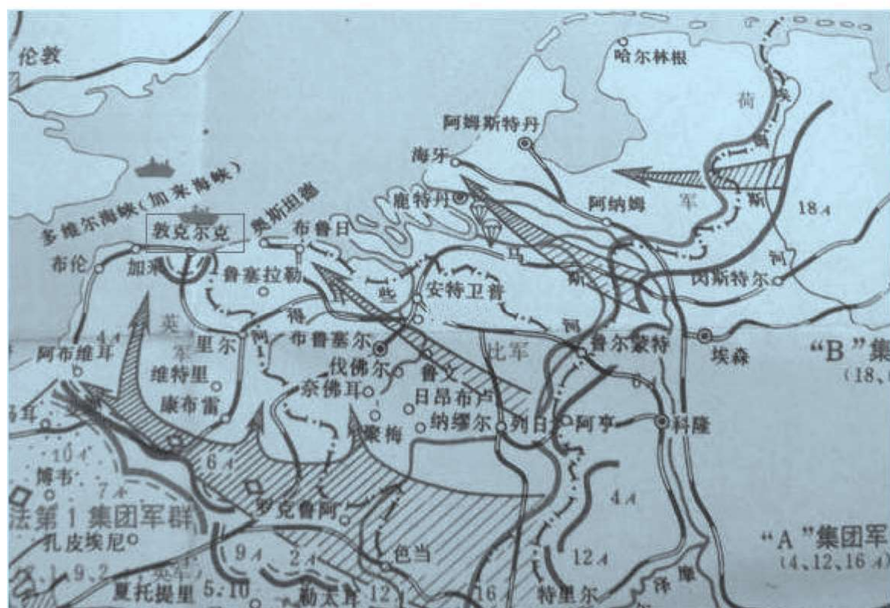
“撤”这个字，说出来简单，但做起来，哪有那么容易？

当时的情况无比严峻：

面对德国狂飙突进的装甲部队，法国全境已经被打穿，40万晕头转向的英法联军被德军压缩到了法国西北部。如果他们要避免被全歼的厄运，就只能指望横渡英吉利海峡，退到对岸的英国。

当时，可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港口有三个，但其中的加来和布伦先后被德军占领。于是，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港口，那就是敦刻尔克。

敦刻尔克在1939年就成为法国吞吐量第三的大港，拥有7个可供大型船只停泊的深水泊位，4个干船坞以及8公里长的码头——如果这些设施全能利用，别说40万军队，连同他们携带的所有重装备，都可以在短短几天里全部运走。



箭头为当时德国A、B两个集团军群的进攻方向

但这是战争时期。

在之前的两个星期，敦刻尔克遭遇了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4个船坞全部被摧毁，8公里长的码头被炸成一片废墟，事实上，整个敦刻尔克的大半个城区也都被炸毁了。

整个敦刻尔克港口，只剩下了一段可供船只停泊的东堤，长约1200米，用木板搭建，非常简陋。

从横渡的路线来看，从敦刻尔克到英国有3条航线：其中Z航线航程最短，只要40海里，但已被德军炮火封锁；X航线55海里，但这条航线上已经布满了英军设置的水雷；最长的Y航线要90海里，德军的炮火无法覆盖，但整整6个小时的航程，船只将完全暴露在德国空军的轰炸范围内。

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时间留给英国人和法国人了。5月19日，英国的战时内阁就责成海军部制订撤走英法联军的计划，由海军中将伯伦特·拉姆齐指挥，代号“发电机行动”。

当时设计的方案，是利用加来、布伦和敦刻尔克三个港口，每天撤走1万人。但没预料到的是，港口只剩下了敦刻尔克一个，而40万英法联军已经被压缩到了狭长的沙滩地带，三面临敌，背后是海——不用多久，德军只需要架起大炮，就可以直接在沙滩上进行一场炼狱般的虐杀。

这个时候，除非出现神迹，谁还能拯救那40万英法联军？

4

神迹，还真的出现了。

1940年5月24日，希特勒突然下令所有前线装甲部队，停止对英法联军的追击。

当时冲在最前面的德国第十九装甲军的坦克部队，离敦刻尔克只有10英里的距离了。统帅第十九装甲军的古德里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如果当初最高统帅部没有制止第十九军的推进，那敦刻尔克早就被攻克，胜利的成果也非现在可比。假使当时我们能够俘虏全部英国远征军兵力，那么未来的战局发展恐怕就很难预言了。很不幸，这个大好机会却被希特勒个人的神经质糟蹋了。”

但在当时，作为军人的古德里安只能从命。按照他的说法：“于是我们在一眼可以望见敦刻尔克的地方停下来了。空军进攻的同时，我们眼看着大船和小船不断地把盟军撤走。”

对于希特勒当时那个谜一般的“停止进攻”命令，后来的历史学家有过很多的猜测。

第一种说法，说是希特勒当时用的作战地图是过时的，地图显示敦刻尔克附近都是沼泽地，所以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但这种错误对于严谨的德国人，尤其是当时蓄谋已久的德国军人而言，是很难想象的。



海因茨·古德里安，被称为德国“装甲兵之父”，又被称为“闪击战之父”。古德里安、曼施坦因和隆美尔被称为“二战”中纳粹的三大名将

第二种说法，说是希特勒想给英国留条活路，放他们点人回去，以便将来议和时他们能还个人情。但其实就在5月24日，希特勒给当时的B集团军群下达的命令是“尽快完成包围，歼灭英法联军”。

第三种说法，说是当时的德国空军元帅戈林向希特勒夸下海口，说仅凭借空军就可以完成对困守敦刻尔克的英法联军的包围和消灭。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轰炸机的炸弹落在沙滩上，造成的杀伤力比落在平地上要小得多。后来事实也证明，戈林的空军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

第四种说法，就是希特勒的“赌徒心理”。当时德军进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希特勒的预估。在全面进攻前，希特勒曾做好思想准备：占领法国北部，然后在和英法联军的长期拉锯中，边打边谈，再谋取利益。

而现在，半个月不到，法国就已经面临全面崩盘，这就像一个在赌桌前的赌徒，忽然赢了一笔超出他想象的筹码，很容易想暂时休息下，先停止投注，观察一下。

而且虽然“作战地图过时”的说法不可考，但当时随着德军装甲部队的深入，确实面临着法国境内河道纵横的各种地形，出于装甲部队突进太快太久——可能也是当时大多数人初次接触装甲作战的缘故——会有损耗乃至有伤亡的考虑，希特勒决定让古德里安的部队先休息调整，以便接下来投入在法国的其他战斗中去。

这一休息，就是整整两天。

除了希特勒本人，我们确实无法知道他当时的真正意图，但无论如何，蜷缩在敦刻尔克沙滩上的数十万英法联军，获得了最宝贵的两天时间。

5

1940年5月26日晚上6点57分，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正式拉开序幕。

被全歼还是安全撤退？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大逃亡随即展开。

在执行“发电机行动”信号发出去两小时后，第一艘英国船只“莫娜小岛号”开往敦刻尔克，并在当晚载着1312名英国士兵返航，他们都是后勤部队。

与此同时，法国的第一兵团在敦刻尔克的周边迅速进入阵地，开始与拼死进攻的德军陷入血战——他们每多坚持一秒钟，在海滩上的弟兄

们就能多一丝生存的希望。

5月27日，德国空军出动了。

那一天，德国空军第二和第三航空队倾巢而出，对敦刻尔克港区和海滩进行了猛烈轰炸，总共投下1.5万枚高爆炸弹和3万枚燃烧弹，敦刻尔克市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英国皇家空军也派出了除保卫本土之外的所有战斗机升空迎敌——他们每多击落一架敌机，就能给地面上的兄弟部队多一份保障。

这一天，英国海军抽调了1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其他大小26艘舰艇前来运人，但由于缺乏小型船舶，无法迅速将人员从海滩接到停在近海的大型船只上，这一天只撤出了7669人。

当天晚上，古德里安得到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恢复进攻！让盟军最胆战心惊的德军装甲部队的发动机，重新开始咆哮！

5月28日，第二天。在前一天感到丢脸的德国空军元帅戈林，不顾敦刻尔克地区大雾弥漫的天气，命令两个轰炸机大队强行起飞，但最终因为能见度实在太低，飞机带弹飞回。

但德国的陆军，却从已经崩溃的比利时军队防线扑了过来（比利时坚持了19天宣告投降，也属不易），敦刻尔克的防线眼看就要被突破。关键时刻，英军第三师乘坐600辆伪装过的军用卡车，关闭大灯后急行军60公里，在28日凌晨赶到德军前面筑起了防御阵地，挡住了德军的进攻。



蒙哥马利在此战中脱颖而出，成长为“二战”中的一代名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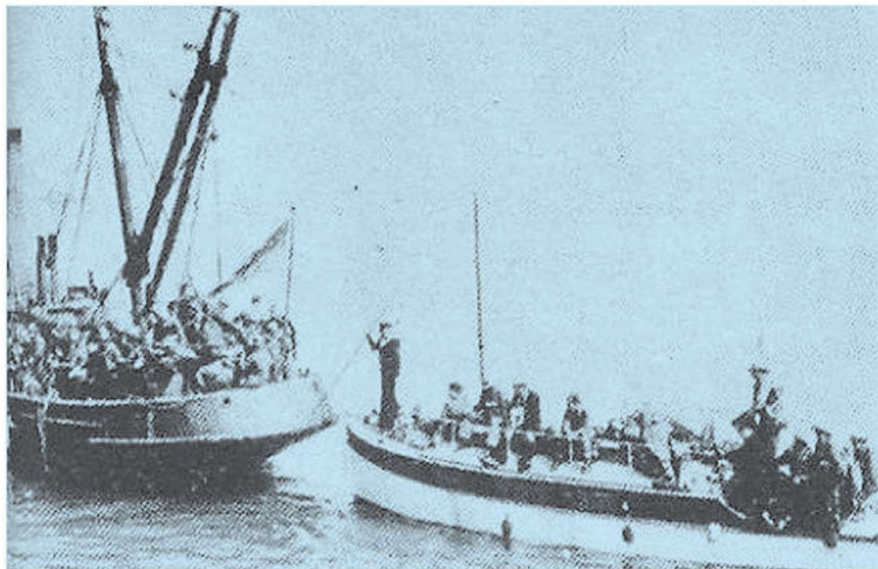
当时这个师的师长，名字叫蒙哥马利。

但最关键的，还是敦刻尔克沙滩上的撤离行动。

在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刻，英国人开始进行全国广播：全英国只要拥有船只的人，都请前往敦刻尔克！帮助在那里的英国海军一起运送联军的士兵！

没有犹豫，没有迟疑，全英国的驳船、拖船、货船、渔船、汽艇乃至私人游艇都被动员了起来，在英国民众的操控下，冒着漫天的炮火出海了！据统计，前后一共有693艘英国船只和168艘法国船只参与了“敦刻尔克大撤退”。

这一天，从敦刻尔克的沙滩上撤走了17804人，比第一天多了整整1万人。



各式各样的船只都被调用参与士兵的运送

5月29日，第三天。德国空军再度出动。这一次他们对盟军的运输船只造成了巨大打击，击沉了三艘巡洋舰和包括5艘大型渡轮在内的21艘船只，重创英国海军7艘驱逐舰。

但也正是在这一天，撤离越来越熟练的英法联军，一共撤走了47310人，创造了一个纪录。

5月30日，第四天。敦刻尔克地区的天气变得非常恶劣，大雾弥漫。但这对盟军却是个好消息——德国空军又无法出动了。而且，这一天被后人称为“神奇的一天”，因为原本应该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忽然风平浪静，海面像镜子一般平静。

英国人倾尽全力，连内河船只都开出了海。

这一天，敦刻尔克撤走了53822名官兵，打破了前一天的纪录。

五天过去了，在德国空军和陆军的压迫下，敦刻尔克已经撤走了大约13万部队，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奇迹了。

但还有20多万人被压制在沙滩上。

难道要舍弃他们？

5月31日，第五天。丘吉尔又一次飞到了巴黎。

丘吉尔带来了盟军撤离敦刻尔克的最新数字：16.5万人。但他并不是来报喜的，因为他必须面对法军新任总司令魏刚的质问："在这些撤离的人中，有多少法国士兵？"

丘吉尔实事求是地回答："1.5万人。"法国总理雷诺在旁边总结了一下："22万英国士兵中，有15万已经撤离了，而法国士兵只被撤走了1.5万人。"

在后人看来，敦刻尔克大撤退无疑是英法两国齐心协力的成果，但回到当时，两个国家从领导人到士兵，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摩擦。

在"发电机行动"计划制订之时，当时决定英法两军是可以共同使用船只的。但英国当时的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却没有接到通知，所以，他下令不准法国人登上英国人的船只。



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

在敦刻尔克的港口和海滩上，英国士兵筑起了路障，只准英国人通过，不准法国人通过。狂怒之下，一些法国的炮兵甚至准备用大炮对准英国的舰船开火。

这也是5月31日丘吉尔再次飞到巴黎的原因。

作为对之前的补偿，丘吉尔告诉法国总理和总司令，5月31日这天被定为“法国日”，原先英国军人优先的规定将被颠倒，法国部队将比英国部队优先撤退，至于断后的任务，由英国的三个师来完成。

这一天，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被召回了国，第一军军长亚历山大接任，他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到敦刻尔克海滩接过指挥权的。

也是在这一天，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海滩又撤走了68014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法国人。

6月1日，第六天。这一天，敦刻尔克地区的天空晴朗，而这对英法联军而言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德国空军倾巢出动。

海峡对岸，英国皇家空军也把自己所有的存货都拿了出来，从喷火式战斗机到飓风式战斗机，从无畏式战斗机到哈德逊轰炸机、鱼雷攻击机，甚至连侦察机都飞上了天空，想尽一切办法阻截德国飞机。

但当时的德国空军确实战斗素质很高，他们的战斗机将英国的战斗机牢牢缠住，而轰炸机则开始狂轰滥炸。那一天，英国海军被炸沉31艘舰船，其中包括4艘满载官兵的驱逐舰，另外11艘舰船被重创。

在漫天的炮火中，新上任的远征军司令亚历山大在海滩上放了张帆布椅，安静地坐在上面看着部队撤离，或者啃着苹果，在海滩散步。在他的感染下，有的军官开始在海滩上刮起了胡子，而有的士兵甚至开始垂钓。

这一天，有64429人撤离。

6月2日，第七天。英国皇家空军扛不住了，他们无力再派出飞机为撤退保驾护航了。为此，英法联军在白天停止撤离行动，改为夜间撤离。

入夜，英国“马尔科姆号”驱逐舰派出水手吹起了苏格兰特有的风笛，召集失散和掉队的士兵，带上驱逐舰。

这天晚上，撤出26256人。

6月3日，第八天。晚上，亚历山大司令官目送最后一批英军撤离，随后和自己的参谋一起登上了舰船。在他们之前撤走的，有26175人，其中大部分是法军。

6月4日，第九天。最后时刻的争分夺秒。

上午9点40分，德国第十九集团军的装甲部队终于冲破了法军的最后防线，冲入了敦刻尔克市区。在海滩上，有26175名法军在最后关头被运走了。

但是，负责最后守卫的法国第一兵团大约4万名法军，他们失去了逃离的机会，在血战之后，全部被俘。

敦刻尔克陷落。

下午2点23分，“发电机行动”宣告结束。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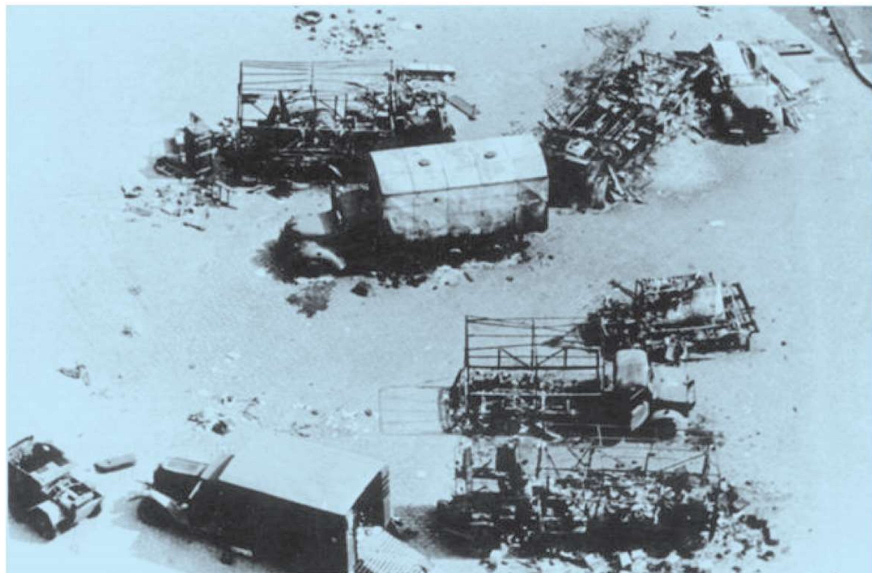
这是一场历时9天的大撤退。

在这场撤退中，英法联军有超过4万人被俘虏，还有2.8万人阵亡（德军大约阵亡1万人），这其中包括随着被德军击沉的舰船而一起葬身大海的人——有一艘豪华游轮被炸弹击中，满载3500名官兵沉入大海。

在撤退中，共有226艘英国舰船和17艘法国舰船被德军击沉。

9天时间里，英国皇家空军共出动2739架次的战斗机进行空中掩护，损失飞机106架。

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英法联军一共丢弃了1200门大炮、750门高射炮、500门反坦克炮、6.3万辆汽车、7.5万辆摩托车、700辆坦克、2.1万挺机枪和50万吨军需物资。



敦刻尔克沙滩上被焚毁的卡车

但是，在这9天里，共有约33.82万人撤回了英国，其中，英军约21.5万人，法军约9万人，比利时军约3.3万人。

这近34万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是为欧洲大陆留下的最后的反抗火种，他们日后都成了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中坚力量。

4年之后，在法国的诺曼底，很多当初乘船而去的士兵，高唱战歌，踏浪而归。

馒头说

时至今日，再回过头来看，“敦刻尔克大撤退”依旧是一个奇迹。

有很多人，总结过很多原因。比如希特勒的指挥失误，比如那几天老天意外地帮忙，比如德国人过分迷信空军的力量，等等。

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是促成“敦刻尔克大撤退”产生奇迹的原因，但所有的这些因素背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

敦刻尔克撤退结束后，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了演讲：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

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

“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用它全部的力量和能力，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所有奇迹的产生，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背后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坚持到底”的信念。

这种信念，支撑着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又从诺曼底反攻回法国；支撑着苏联军人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最后再打到柏林；支撑着美军从珍珠港到中途岛，再到硫黄岛和冲绳岛；支撑着中国军人从东北到上海，从南京到重庆，最后实现那句话：“中国总是有办法的。”

就像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

读者评论

老猫慢慢爬：敦刻尔克海滩上，英军军官和士兵冒着炮火大声喊叫几天，导致很多人嗓子喊破嘶哑，后来被称作“敦刻尔克嗓子”。战后的英国议院，凡是有“敦刻尔克嗓子”的人发言，总是会得到额外的尊重。

陆军：暂停的两天，是德军的高层没有想到马斯河会如此轻易得手，他们不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好运。他们担心自己的侧翼会遭到法军的猛烈反击，于是希特勒停止行军，等待步兵赶上，沿埃纳河形成一条侧面屏障。这一切都出于德国人的严谨，而这一次他们错失了时机。

zhangy4498：1939年9月1日，除了纳粹德国出动44个师约80万的兵力直扑波兰，苏联也同时出兵从东面扑向波兰，“二战”的序幕由此拉开。波兰是在纳粹德国和红色苏联的同时夹击下宣告投降的……

附记

（一）关于《敦刻尔克》电影本身

看完电影《敦刻尔克》后还是颇有些感触，说说个人感受。

第一，陆地、海洋和天空三条线交叉叙述，我觉得这就是诺兰的特

色：哪怕是一个平铺直叙的历史事件，诺兰还是一定要把它拗出个造型来。

第二，开场前5分钟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这是体现诺兰水平的5分钟——让你体会战争的残酷不需要漫天的炮火，连背景音乐都不需要，几个英国士兵的遭遇就会让你印象深刻。

第三，这部《敦刻尔克》其实像是一部资料片，或者说，是主菜上好以后的一道甜点。

对于欧美观众而言，“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他们从小就知道的一次大事件，相关电影也已有不少，所以诺兰的这部作品，只是锦上添花，前人逼着他必须要换一个特别的角度。

就像拍“赤壁之战”，如果外国人来拍，肯定拍成一部战争史诗片，但如果再由我们的中国导演来拍，拍给中国人看，他也得挖空心思换一个特别的切入角度——我们对这个故事实在太熟悉了。

这也就造成了，对于吃过主菜的欧美观众而言，这道精致甜点他们会大加赞赏，但对于相对不是很熟悉敦刻尔克这段历史的观众而言，很可能觉得没吃饱。

我也觉得有点没吃饱——在我的想法里，我觉得如果全片在各处再插入8～10分钟以下镜头，会不会更丰满些：德国人为何放弃进攻；敦刻尔克海滩全景式的漫天炮火；德国战机倾巢出动，英国皇家空军奋力迎敌；法国第一兵团和英军第三师的拼死阻击，血战不退；片尾出现字幕“4年后”（然后镜头切到那个胆怯的男主随着登陆艇，迎着海浪登上诺曼底海滩）；片尾出现一排真实的人物，以及当时出海营救的民用船只船名（电影中给了不少镜头致敬）。

但我知道，这确实是我大片看多了以后的后遗症。

诺兰不这么做，应该有他自己的原因——我也赞同。因为这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场失败战斗撤退，而不是一场胜利，不要渲染成一场大胜。

事实上，丘吉尔在敦刻尔克撤退完成后的下议院演讲中，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不要把这次撤退蒙上胜利的色彩，战

争不是靠撤退来取胜的。”

所以，《敦刻尔克》并没有成为一部战争史诗片，而是一部记录失败和感受战争恐惧的电影：

没有密集的炮火，晃眼的鲜血，呻吟和惨叫，怒吼和拼杀；

整部影片除了片尾出现几个模糊的德国士兵形象外，敌人自始至终没出现过；

主要的场景，是一小群人，一艘船，一架飞机；

一切都很真实：人都会恐惧，也会自私，还会投机取巧，但同时，人也都会无畏，都会无私，还会舍己为人。

看完电影后，直到今天，我的脑海里还会浮现出一些景象，但不是战争场面，而是宁静的大海、安静的排队、飞机的引擎声、民船游艇的马达声、浪花拍打船舷的声音……

然后，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对战争的厌恶。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

（二）关于亚历山大这个人

多次收到读者贴给我的一张贴图：

请正视历史，不是因为它是外国片。这部影片（敦刻尔克）里的救世主，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在缅甸以曼德勒会战作为要挟，让十万中国远征军精锐在乔克巴为英军撤退充当肉盾，在我军完成阻击战任务后，他们却跑到了印度，更不可原谅的是他们在逃跑途中宁愿把罐头，汽油等物资烧掉，也不愿意留给一心求战的中国军人。最后我军在后路被断的情况下，杜聿明不得不带军走入野人山，最后全军从戴安澜将军以下，整整两万铁血男儿没死在日军的枪炮之下，而是死于饿病，屈死在异国丛林之中，亚历山大的赫赫战功是建立在中国远征军的鲜血与累累白骨之上的，现在他们要用艺术的手段来洗白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连整日泡在罗曼蒂克梦境里的法国人都不如吗？抵制它，不是因为别的，就为了那两万屈死的英灵。这个理由，够吗！？我不是愤青，只希望大家了解历史的真相，尊重一下为祖国牺牲的前辈！！

6小时前 · 举报


1575人赞过 › 1575

他们都问我：是真的吗？也有的人说，是真的的话我就不去看了。

那也说两句吧。

第一，基本是真的。亚历山大全名哈罗德·亚历山大，在指挥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他后来确实被派到缅甸，成为驻缅英军总司令，而他去的目的，就是帮助英军撤退。

第二，当时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带着一腔热血，但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不少问题，比如指挥系统的紊乱：当时的指挥者，有蒋介石，有美国军事顾问史迪威，还有这位亚历山大。史迪威和亚历山大之间关系就很一般，当时也没明确该听谁的；蒋介石允诺中国军队都听史迪威的，但事实上杜聿明他们只听蒋介石的。



哈罗德·亚历山大

包括烧仰光的储油罐等等，是为了避免落入日军手里，并非故意不给中国军队用。当时中国远征军在驰援的路上，不知道是否能到达仰光

——当然，这一切主要都因为英军毫无抵抗的意志。

包括退入野人山，现在回过头来看，未必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当时美方和英方提出的建议是，中国远征军退入印度休整，但蒋介石坚决要求远征军退回国内（心情可以理解），坚决服从蒋介石命令的杜聿明只能强行穿越，而有自己想法的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抗命退入印度休整，这支部队整建制地保存了下来，成了日后反攻的中坚力量。

第三，这不是在为亚历山大开脱。缅甸的溃败，亚历山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缅甸和敦刻尔克不一样。

有人说敦刻尔克法军替英军殿后，英军先跑路。但你换个角度想，法军脚下，是自己的祖国，守卫自己的祖国本来就是义务。英军是渡过海峡来和法国人并肩作战的，然后英国人派自己的船来接，你让他们把自己的士兵留下来殿后，让法国士兵先撤离自己的祖国，换你是指挥官，估计你也做不到吧？

但在缅甸战场，情况不一样。缅甸原来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中国远征军是来帮助英国守军的（当然也有守卫滇缅公路，保护自己大后方物资运输的目的）。从私心来说，谁都希望自己国家的子弟兵先撤，别人家的子弟兵殿后，但问题在于，亚历山大在那几场战斗的指挥中，不仅私心暴露得太赤裸裸，而且在情报上有欺骗中国远征军的嫌疑，提供错误的信息，让中国军人全部为英军撤退殿后。

第四，在缅甸战场，英军的表现不仅被中国人耻笑，被美国人耻笑，被全世界耻笑，甚至连对手日本人都看不起。亚历山大退役后写了一本战争回忆录，我没看过，不知道他怎么回忆自己的这段生涯，但我觉得，哪怕之前他有过再多功绩，这段历史是他军人生涯的一个污点，他的良心应该为此感到不安。

第五，我们可以一分为二，客观评价亚历山大这个人，但我实在看不出，这和抵制《敦刻尔克》有什么关系。

《敦刻尔克》是为了歌颂亚历山大这个人而拍的吗？恐怕不少看完电影的观众，都未必清楚电影里哪个人是亚历山大。

如果说这部电影有那么一幕镜头是让人有流泪冲动，让人感到感动的话，我觉得是那一幕：海平面上，出现无数自发前来迎接的民船。

正如我前面所言，我觉得诺兰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刻意歌颂谁，因为他知道这并不是一场胜利。我们看完这部电影，绝不会觉得英国士兵好伟大，法国士兵好伟大，亚历山大好伟大，而是只会觉得普通百姓的伟大，以及战争的残酷。

如果因为这个人去抵制这部电影，我个人觉得不值得。

如果因为这件事，你愿意去了解一下中国远征军，我倒觉得是件好事。如果又不了解敦刻尔克，又不了解中国远征军，就跟着喊“抵制”，那就不值得了。

去不去“贡献”票房其实完全不重要，保持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还是比较重要的。

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英国人干什么去了？

可能诺兰自己都没想到，一部《敦刻尔克》会在中国引起这样的争论。其实只要看过他电影的人，应该能理解他其实只是想展现各种人性，表现在一场大溃败之后的人性。

也有人问：敦刻尔克之后呢？其实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后，随即在一周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

而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

这一次，他们没有任何所谓“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无路可退。

1

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

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地撤走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地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

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



敦刻尔克海滩上留下的英法联军遗弃的物资（德国人拍摄的照片）

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施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

但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面对以海军立国的英国，他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强行登陆英伦三岛。

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

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地希望能诱降英国政府。

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

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Richard Butler）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倘若“条件合适”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

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

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Joseph P.Kennedy）在1940年7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

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Gen.Maxime Weygand）的话更不给面子：“在三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

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没法再打下去了。但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

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认同：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



丘吉尔最著名的一张照片

“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这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坚决不投降。

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

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

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

2

至少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戈林继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

戈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德国空军元帅戈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

戈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的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为三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所有的飞机的数量，还不到德国的一半。

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德国被击落

13架。

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戈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对付。

但戈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德国空军倾巢而出。

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

3

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



英国空军上将休·道丁。他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们必须一个打下他们五个。”

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

但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部的休·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

这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开始显示出来了：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

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他们还拥有BF–110战斗轰炸机和公认的一流战斗机BF–109。



BF–109战斗机是德国在“二战”中赫赫有名的一流战斗机，但在“不列颠空战”中，受限于航程，它飞临伦敦上空后，航空燃油只够战斗10分钟就必须撤退

但德国人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牛×的“喷火”式战斗机。尤其是当时同样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不列颠空战”中的标志。

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戈林宣布当天为“鹰日”。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

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



“喷火”式战斗机

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



德国准备登陆英伦三岛的驳船在法国布洛涅港等待

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

但英国的空军根本没被打垮。

4

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

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德国人改变战术了。

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英国飞机越打越多。

这就是英国人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

一场战争，只要没有速战速决，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五十六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太强了。

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仍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战斗机）。



英国人在“不列颠空战”中的另一大主力：“飓风”式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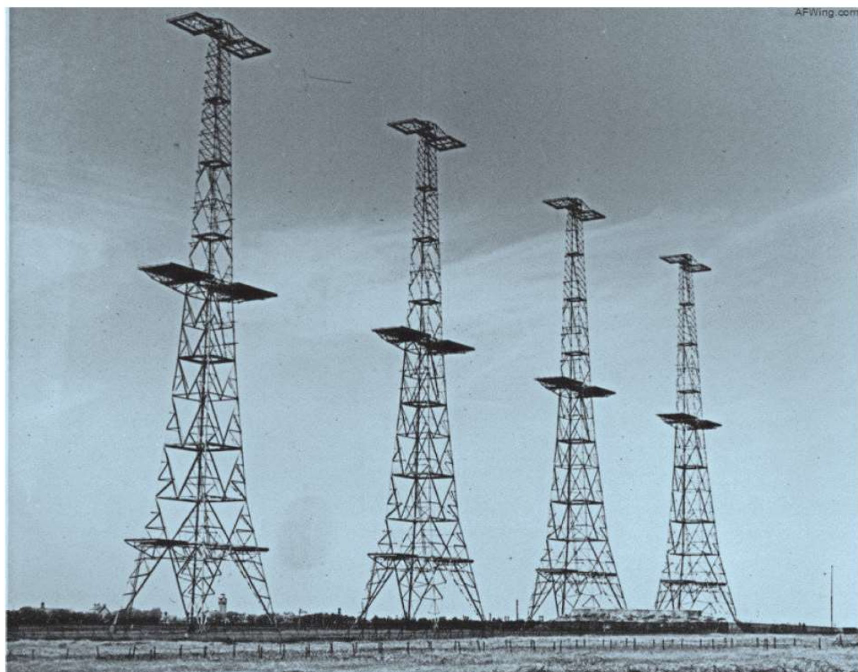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

这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后来很多人分析，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

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

英国从19世纪30年代就着手了能够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直到1943年，它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雷达”。

“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



英国当时的雷达天线铁塔

但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

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晕倒在工作现场。

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算是老牌飞行员了。

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飞机，但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

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

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5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7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6个。

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我们远去。

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它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出来，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

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

5

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

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让炸弹倾泻而下。

那座城市，就是伦敦。

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

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

虽然对柏林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向我们保证过的家园，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

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两次空袭柏林。

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

9月3日，戈林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的轰炸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一吨炸弹，德国空军就要十倍、百倍乃至千倍回报！”

但这道命令就像希特勒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成了一个战略失误。

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保家卫国的意志。

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能让英国人屈服。

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倒，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一家裁缝店在空袭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



伦敦大轰炸中被搜寻到的幸存者



轰炸过后投入灭火的伦敦市消防员

但英国皇家空军也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了狂轰滥炸，但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

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庞大的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8天休养的英军也亮出了全部家底：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

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其中7架是因为伤重而报废），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其中12架在返航或着陆途中坠毁）。

这场战斗，成为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

希特勒和戈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

6

“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力不从心了。

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破译密码。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人

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Enigma）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能提前获悉。

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接受的话，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感觉撑不下去了。

在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



艾伦·麦席森·图灵。他为英国人在“二战”中扛住德国人的攻击做出了卓越贡献，却在战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

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等于宣告失败了。

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

整个“不列颠空战”，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

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失踪（英国阵亡了1956名），这也为他们后来的空军的衰落埋下了一个伏笔。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

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一个重要堡垒。

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议会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法国魏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

“但我们有很多只小鸡仔，”丘吉尔说，“很多脖子。”

馒头说

相信很多读者和我一样，对“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来自小时候看的电影：《伦敦上空的鹰》。

不过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科技，或者说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其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正如文中所提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呈劣势的情况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和科技息息相关：“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雷达、密码破译技术……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

在现代化战争中，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中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

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战死沙场。

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乏善可陈，甚至被人鄙视（比如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

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

比起英国空军，当时中国的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科技研发能力（中国自己根本不能造飞机）上，都远远落后于日本。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飞行员，还是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起飞作战，血洒长空。

他们的故事，请看《历史的温度》中的《抗日战争，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军》。

读者评论

帝伯：本人坦克兵出身，像电影《狂怒》里的描述一样，当年班长问我：坦克就是个铁棺材，很多坦克兵上了战场连收全尸的机会都没有，你怕不怕？后来才知道，我活着就是身后步兵兄弟的壁垒，我死也不会寂寂无声，起码能放朵烟花……向所有“二战”中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致敬！向不知升空能否返航的英雄致敬！向所有拥有不屈意志的无畏民众致敬！

萧七：看到图灵，忍不住想写一点儿什么。去英国专程看了曼彻斯特公园里的图灵像和布莱切利的密码学校，对图灵像前的纪念牌和布莱切利展出的国家道歉信印象深刻。纪念牌上写着：“Alan Mathison Turing，1912—1954,Father of Computer Science,Mathematician,Logician,Wartime Code breaker,Victim of Prejudice.”（艾伦·麦席森·图灵，1912-1954，计算机之父、数学家、逻辑学家、战时密码破解者、偏见的牺牲者）图灵固然伟大，但是人们能够正视曾经犯下的错误，甚至为其立碑纪念，我觉得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地方。真实的历史，永远比口号来得更震撼人心。

Pureboi：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那个时候已经超越英国了，但还没有到碾轧的程度，加之英国本身工业基础雄厚，在某些领域不输给德国

也并不令人吃惊，但那时的中国真的是太弱太弱了，弱到只能靠人肉去填中日之间国力差距的大坑，美国不落后都挨打了，更何况当时落后的中国。

一个公务员给全人类留下的数学难题

这篇文章，想讲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学科，这个学科是我读书时候的死敌，恨不得这门学科从地球上消失。

这门学科就是：数学！



费马

首先，不要因为这图里的人长得像小学教学楼走廊上贴的科学家图，就跳过本文。

让我们先来到17世纪的法国南部图卢兹附近的博蒙·德·洛马涅。1601年的8月17日，本文的主人公，皮埃尔·德·费马就出生在这里。

费马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家大皮革商店的拥有者，同时也是这个地区的第二执政官，换句话说，费马就是一个“官二代 + 富二代”。

费马小时候并没有进学校，父亲给他请了两个家庭教师在家辅导——有钱嘛。虽然说费马小时候并没有表现出一鸣惊人的神童天赋，但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他的文科和理科都很不错。

到了1617年，费马要进大学了。费马遵从父亲的意见，进大学读了法律专业。因为当时17世纪法国男子最体面的职业，是做一名律师——你看，人家在17世纪就讲究“依法治国”了。而且，家人已经花钱帮费马买了一个“律师”和一个“参议员”的职位——好吧，刚讲完法治，就“啪啪”打脸了。

简而言之吧，费马大学毕业后，如愿做了律师，并担任了参议员，虽然政绩平平，但官阶还是一路上升，最后做到了法国议会首席发言人。直到1665年1月12日，64岁的费马安然辞世。

作为公务员，费马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2

那，费马和数学有什么关系？

但事实上，费马确实一辈子只是个公务员，从来没当过数学家。数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那么好吧，一个“业余数学家”，为什么能够名垂青史？因为，这个公务员费马，利用业余时间做的数学研究，对数论、概率论、微积分都做出过不小的贡献。但相比他留下的那个定理，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

奠定费马“业余数学家之王”头衔的，是1637年，在费马36岁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牛的定理，叫作：

费马大定理！

定理就是定理，还要加个“大”，是不是听上去很高级？（其实是区别于费马另一个小定理。）

其实这个定理还有个名称，叫“费马最后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意思是所有定理都证明完了，这肯定是最后一个待解的定理。但中国人还是叫“费马大定理”，不用管了，听上去高级！

那么，“费马大定理”究竟是说什么呢？

很简单，那就是（下面一句话你可以自动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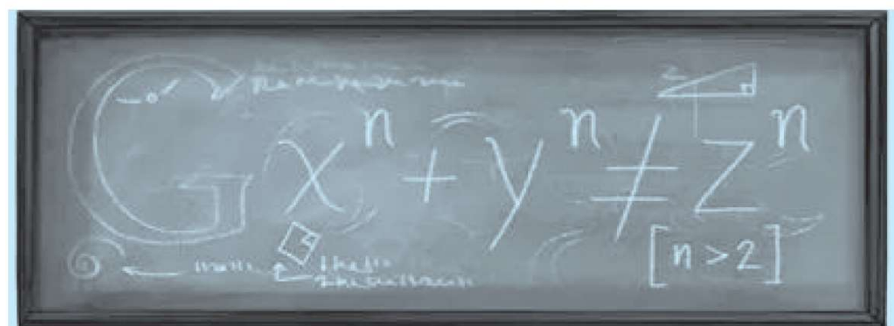
当整数$n>2$时，关于x、y、z的方程$x^n+y^n=z^n$没有正整数解。

很简单不是吗？简单到我都不屑于向你们解释——反正，我们略过这句话，知道它是一个定理就对了。

最可恨的是，当时费马是在阅读丢番图（Diophatus）《算术》的拉丁文译本时，在第11卷第8命题旁随手写下这个定理的。

关键是，他还在旁边加了一句：“关于此，我确信已找到了一个极佳的证明，但书的空白太窄，写不下。”（拉丁文原文：“Cuius rei demonstrationem mirabilem sane detexi.Hanc marginis exiguitas non caperet.”）

这种管杀不管埋、毫不负责任的做法，拉开了之后300多年人类数学史上最艰苦卓绝的一场探索。



2011年，谷歌在费马诞辰410周年时，曾将首页logo（标识）换成了“费马大定理”公式，但在logo里的标签写了句揶揄他的话：“我确信已找到了一个极佳的证明，但这里的空白太窄，写不下。”

3

最先做出挑战的是18世纪瑞士伟大的数学家欧拉，他先是发现费马自己证明了$n=4$的情况，然后在1770年，欧拉给出了$n=3$时的证明。

这时，已经过去了133年。

之后，全世界最优秀的数学家，围绕证明“费马大定理”，开始了惨

烈的竞争和接力。

开头炮的是19世纪初法国自学成才的女数学家热尔曼，在当时法国普遍歧视妇女的情况下，她独立证明出了当n和2n＋1都是素数时，费马大定理的反例x、y、z至少有一个是n整倍数。（知道她达到了这个成就就行，不用去理解。）

然后，1825年德国数学家迪利克雷和法国数学家勒让德分别独立证明“费马大定理”在n＝5时成立。

这时，已经过去了188年。

1847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拉梅和柯西都宣布自己已基本证明“费马大定理”。

然后德国数学家库默尔写来一封信。库默尔证明不了“费马大定理”，但他清晰地证明了这两位数学家的证明都是错误的。

库默尔是著名数学家高斯的学生，他当时还给出了另一个打击全世界数学家的结论：按照现在的数学方法，“费马大定理”是不可能证明的。

证明“费马大定理”的革命浪潮，就此转入低谷。

一低，就是半个世纪。

4

1908年，一位叫沃尔夫斯凯尔的德国人，重新将证明“费马大定理”的热情点燃了：他设立了10万马克的奖金，奖励给最终做出证明的那个人。

沃尔夫斯凯尔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费马大定理”救了他一条命。

沃尔夫斯凯尔其实只是一个数学爱好者，主业是一个实业家。年轻时，沃尔夫斯凯尔追求一个女生被拒绝，绝望的小伙子傻乎乎地决定自杀，而且决定了自杀的时间：午夜钟声一响，就开枪射击自己的头部。

严谨的德国人之前处理好自己的商业事务，写好遗嘱，还给所有亲朋好友写好信。结果一看时间：哎哟喂，提早了一点点，午夜还没到！

为了消磨最后一点时间，他就到图书室翻阅数学书籍，然后就看到了一篇关于“费马大定理”证明的论文。

然后，他就开始拿起笔做起了计算。

然后，天就亮了。

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想自杀了。

为了感谢“费马大定理”救了自己一命（真是莫名其妙），他设立了10万马克的奖金，这笔钱的价值放到现在，超过100万英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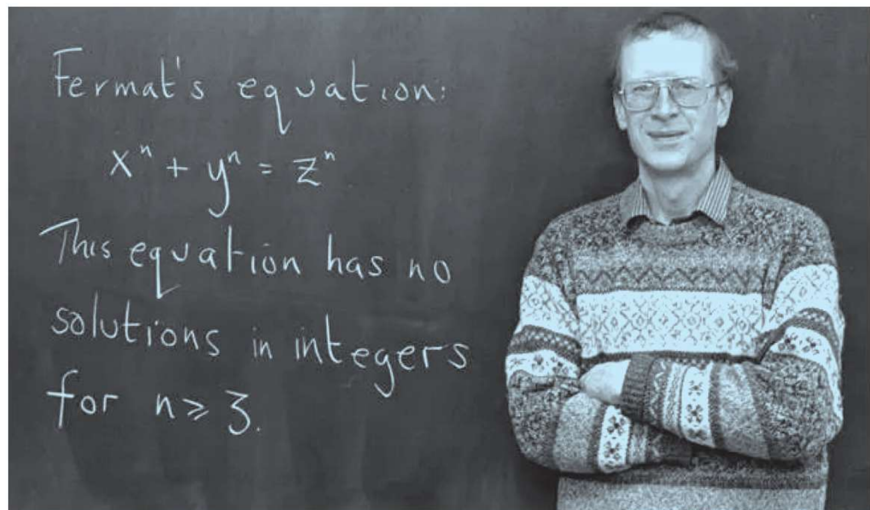
也不能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吧，总之，证明“费马大定理”的热情又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点燃，不计其数的数学家和业余爱好者，又如飞蛾扑火一般地投入证明中去。

另一方面，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之前人类不可能做出的海量计算，现在成了可能。但这又如何呢？即便通过计算机证明$n=1000$万时“费马大定理”成立，也只是无穷接近证明，并不能从数学逻辑上根本证明该定理成立。

5

时间到了1963年，离证明“费马大定理”被提出已经过去了足足326年。无数革命先烈，哦不，数学先烈，倒在了证明这条定理的道路上。

这一年，一个叫安德鲁·怀尔斯的10岁英国孩子，第一次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费马大定理”的故事。



安德鲁·怀尔斯

真命天子，终于出现了。

在怀尔斯之前，越来越多的数学家，已经放弃了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关于“费马大定理”无法证明的论断，也越来越多。

1986年，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怀尔斯，决定放弃一切其他的研究，开始向“费马大定理”发起总冲击——他判断，可能需要10年专心致志的努力。

那一年，他33岁。开始研究“费马大定理”的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他的妻子。

7年，就这样过去了。

1993年6月23日，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一次数学演讲”，在剑桥牛顿研究所拉开序幕。200多名数学家挤在房间里，把目光聚焦在怀尔斯身上。怀尔斯用数学公式写满几块黑板，然后听到他说了一句：“我想，我就在这里结束。”

山呼海啸一般的掌声！大家意识到，困扰了人类300多年的一道数学题，今天似乎真的被解决了！

第二天，全世界报纸的头版，破天荒地出现了一个数学家的名字：安德鲁·怀尔斯！

美国《人物》杂志将怀尔斯与黛安娜王妃、奥普拉一起列为“本年度25位最具魅力者”之一。怀尔斯甚至被一家时装公司请去做男装广告！

但数学是严谨的。怀尔斯长达200页的手稿投交到《数学发明》杂志后，数学家们在数以百计的电子计算机帮助下，开始了庞杂的审稿过程：只要有一个计算或逻辑出差错，怀尔斯的证明将一文不值！

果然，悲剧发生了。在证明的过程中，有一个小环节，无法像怀尔斯说的那样证明得通，他必须拿出更有力的说法。

1993年12月，怀尔斯公开承认证明有问题，但表示很快会补正。

之后，9个月过去了。

怀尔斯一筹莫展。

怀疑的声音越来越响：怀尔斯只是300多年来，无数自以为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数学家中的一个而已。

6

1994年9月19日的早晨，怀尔斯决定最后检视一下自己的证明，然后就宣布自己证明失败。

但是，灵光一现：两个不足以解决整个问题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可以完美补足他的那个证明缺陷。

1994年10月25日11点04分11秒，怀尔斯通过他以前的学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卡尔·鲁宾向世界数学界发了“费马大定理”的完整证明邮件。

这一次，无论是数学家和计算机，再也没有找出证明的漏洞。

困扰了人类长达358年的“费马大定理”，终于被证明了！

1997年，怀尔斯领取了沃尔夫斯凯尔设立的10万马克奖金——再晚5年，“德国马克”这个货币单位都没了（欧元流通）。而整笔奖金，还差10年就领不到了。

沃尔夫斯凯尔设立这个奖金时，规定的截止日期是2007年。

你看，这个狡猾的德国人还设了个时间限制，可能因为他相信，“费马大定理”肯定会被人证明。

馒头说

第一次和“费马大定理”结缘，是在大一期末的“高等数学”考卷上。那张卷子的最后一道题是：试阐述“费马大定理”的公式和证明经过。

当时教我们高等数学的是复旦大学数学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华宣积教授。看得出，他还是很体谅我们这群文科生的。

而这道题，应该就是我们这群文科生，为什么要知道“费马大定理”的意义所在了吧。

“费马大定理”在数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为何如此重要？

我个人觉得，因为证明这个定理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部看了让人热血沸腾的数学史。而这个困扰了人类三个多世纪的定理，凝聚着无数最杰出人类的脑力和智力，展现的是整个人类的智慧结晶。

人类不断挑战自己，超越自己，克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本身就是激动人心的。

这和我们懂不懂数学没关系，不是吗？

（推荐参考书目：《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英］西蒙·辛格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读者评论

薛神医：n＝2时，就是勾股定理。n＞2时无整数解。“费马大定理”之所以名气如此之大，除了传奇性，也与定理本身通俗易懂有关，换作别的定理，大部分人连题目都读不懂。（作者回复：对。可是，微信公号后台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现在连题目都看不懂了。）

旭言1028：如果从小数学老师就像你这么生动地讲数学家的故事，每个人的数学水平都会提高。（作者回复：记得小时候语文老师和我们说过陈景润几麻袋草稿纸证明1＋1为什么等于2的故事……）

小粥小酱：果然看得热血沸腾的，刺激程度不比奥运会差。作为一

个理科很差的理科生，在公式那里还停留了很久，试图回忆理解一下。
复旦大学果然牛，考这道数学题，其实是为了让大家好好学学历史吧。

直到坐上电椅，这对夫妇依旧表示自己清白……

科学离政治究竟有多远？我们都知道，可近可远。

那么科学家呢？我们相信，他们是想离得远远的。

但有时候，总是事与愿违，有人甚至会为之赔上性命。

1

1953年6月的一天夜晚，朱利叶斯·罗森堡被带到了一间单人牢房。

一位法院的代理执行官告诉他，今天晚上，他将被送到新的死囚牢房去。一同将被送去的，还有他的妻子艾瑟尔。

朱利叶斯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恫吓手段，所以他隔着监狱的栏杆对妻子喊：“艾瑟尔！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今晚会被带入死囚牢房，你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的！”

原来做过歌手的艾瑟尔听到丈夫这样喊，在牢房里唱起了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唱段——《他将在晴朗的日子归来》。



朱利叶斯·罗森堡和他的妻子艾瑟尔

牢里的其他犯人听到歌声，都鼓起了掌。

“再唱一首吧！”朱利叶斯对妻子喊。

艾瑟尔又唱了一首《啊！愉快的夜晚》。

这对夫妇认为，针对他们的黑夜终将过去，但事实上，他们没有等到黎明——判决是真的，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被双双送上电椅。

他们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吗？并不是。朱利叶斯是一名物理学家，他的妻子是一家公司的秘书。

如果要对他们被判处死刑的原因追根溯源，那得追溯到1945年8月6

日。

那一天，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2

1945年美国在广岛投下的那颗原子弹，震慑了一大批人，其中也包括斯大林。

如果说当时国家之间飞机、坦克、士兵数量乃至导弹数量，都只是一个量的竞争的话，那么那颗叫“小男孩”的原子弹，引发的是质的突破——世界武力的格局一下子被打破了，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这是苏联绝不能接受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怎么造？在短时间内凭空造出一颗原子弹肯定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办法——通过间谍，得到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是绝密中的绝密，连给总统写信建议制造原子弹的爱因斯坦都被“谢绝入内”，要在美国发展间谍，搞到原子弹的核心机密，谈何容易？（如果你想知道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建议美国研究原子弹，又为什么被排除在外，参看《历史的温度》中“爱因斯坦的三个侧面”。）

为此，苏联在美国铺下了一张广泛而秘密的间谍网，主要目标就是发展能参与到“曼哈顿工程”的各类美国科学家，希望他们能够为苏联提供制造原子弹所需的一些数据和资料。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朱利叶斯·罗森堡进入了苏联间谍网的视野。

但是有一个问题，朱利叶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为什么要帮苏联呢？

3

实事求是地说，“二战”刚刚结束，苏联确实拥有很多优势。

首先，在“冷战”的铁幕尚未落下以及愈演愈烈之前，苏联和美国是

反法西斯战线上的盟友，并不是敌对关系。

其次，在整个“二战”的欧洲战场上，哪怕盟国媒体再三低调处理，但全世界还是都知道，苏联红军是与法西斯德国血战的绝对主力。当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苏联红军还是具有很高的声望，尤其是在很多犹太人的心目中，在英美盟军一开始作战不利的前提下，苏联红军是帮他们“复仇”的英雄——罗森堡夫妇，都是美籍犹太人。

最后，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深深震撼了很多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开始感到恐惧——人类放出了一个可以瞬间毁灭自己的恶魔。所以，相当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美国单一掌握核武器将成为不稳定的根源，世界需要另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来相互制衡。

而且，在很多科学家心目中，原子能的开发利用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不应被一个国家垄断。

通过不断地侦测，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吃惊地认识到：美国当时真的有一批科学家，心甘情愿地为苏联提供原子弹情报。

4

美国彻底认识到一切，是从1944年左右开始的。1944年，“二战”接近尾声，法西斯的败局已定，美国的情报部门把注意力从欧洲移回了国内，开始彻底清查苏联在美国布下的谍报网。

这一行为的起因之一，是苏联驻加拿大领馆的一名叫伊戈尔·古曾科的谍报人员——当时苏联已经警觉到了美国的行为，进而开始全面撤回自己的谍报网，但是古曾科出于种种原因，希望留在西方世界。

要想留下，就要有“投名状”。古曾科供出了他所知道的苏联地下谍报网络，从而牵扯出了一名叫纳恩·梅的英国原子核物理专家——正是通过梅的帮助，苏联人知道“小男孩”是铀–235做的。



古曾科（左一）在加拿大报案

查到这一地步，加拿大就开始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合作了。通过和英国军情五处的合作，美国情报部门又挖出了一个人：英国的原子核物理博士克劳斯·福克斯。和从事原子核物理基础研究的纳恩·梅不一样，福克斯直接参与了“曼哈顿工程”。

通过福克斯这条线，联邦调查局又摸出了一名叫哈利·戈尔德的化学家。1950年5月22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拘捕了戈尔德，随后发现了大量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戈尔德对自己所做的事供认不讳，还进一步透露：除了与福克斯联系外，他还曾奉命与一名25岁的美国士兵联系，和他一起去取一些原子能的材料。

按照戈尔德的描述，联邦调查员最终拘捕了一位叫戴维·格林格拉斯的美国士兵。格林格拉斯是艾瑟尔的弟弟，而艾瑟尔则是朱利叶斯的妻子。

一开始，格林格拉斯只是供认出了朱利叶斯，并没有说他的姐姐也

参与其中（但后来在审判中，格林格拉斯说姐姐也参与了打印文件）。

于是，1950年，7月17日，朱利叶斯·罗森堡被捕；8月11日，艾瑟尔被捕。

但无论如何审问，罗森堡夫妇均宣称自己无罪。

5

1951年3月6日，纽约联邦法庭开庭审理“罗森堡夫妇间谍案”。

检察官指控罗森堡夫妇违反了1917年颁布的“间谍法案”，一般触碰这条法律，最终的处罚是死刑或30年以上有期徒刑。

检察官的指控是：“在战争期间，在我们历史的紧要关头，参与反对我国的密谋活动。他们从事的间谍活动格外严重。我们将证明罗森堡夫妇在苏联国民和在本国的苏联特务的帮助下，煞费苦心地制订并付诸实施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使他们能够通过格林格拉斯窃取关系到我们国家生存和世界和平的武器——原子弹。”



1951年，罗森堡夫妇被拘禁期间，监狱外有苦苦守候的媒体，图中一位记者正用打字机赶稿

4月9日，联邦法官欧文·考夫曼当庭宣布判处罗森堡夫妇死刑：

“我认为你们的罪行比谋杀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一个犯人杀掉的只是他手下的受害者。你们的行为使苏联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预言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

“由于你们的背叛，你们使历史的进程转向不利于我国的方向。每天

在我们周围都有你们的叛国活动带来的影响——因为全国的百姓都在忙于为防止原子弹袭击做准备。”

这件案子，从审判一开始就受到了极大的争议，到了宣判，更是一片哗然。

支持罗森堡夫妇的舆论认为：所有的指控证据，都只来源于朱利叶斯的妻弟格林格拉斯，没有其他可以有力证明罗森堡夫妇从事间谍工作的证据。



接受审判的罗森堡夫妇

其次，法院指控罗森堡夫妇所谓的“间谍行为”主要都发生在1945年前后，当时苏联和美国是盟国关系，哪来的“敌对国家”关系？至于后来扯到朝鲜战争，更是子虚乌有。

第三，比罗森堡夫妇泄露情报要多得多的福克斯，最终只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罗森堡夫妇为什么要被宣判死刑？

为罗森堡夫妇求情的美国各界人士开始越来越多。美国成立了“确保公正审理罗森堡案件全国委员会”，要求重新审理罗森堡案件。与此同时，不断有知名人物加入重审罗森堡案的请愿行列，这里面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曼哈顿工程”原负责人哈罗德·尤里博士，另一位就是爱因斯坦。

最终，在意大利媒体的报道之下，教皇庇护十二世也被惊动，写信向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求情。

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一切请求。

在“冷血”的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美国上下，质疑乃至清洗共产主义的“麦卡锡主义”盛行，很多人已经以阵营为先，而不是以证据为先。

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福克斯之所以会被轻判，是因为他被捕后即选择了认罪，并选择了与美国当局合作。

而罗森堡夫妇，坚决不认罪。

6

1953年6月19日上午，罗森堡夫妇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

在临刑前，执行官问朱利叶斯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他最后招供，就可以免于死刑。但朱利叶斯选择了和自己的妻子深深地吻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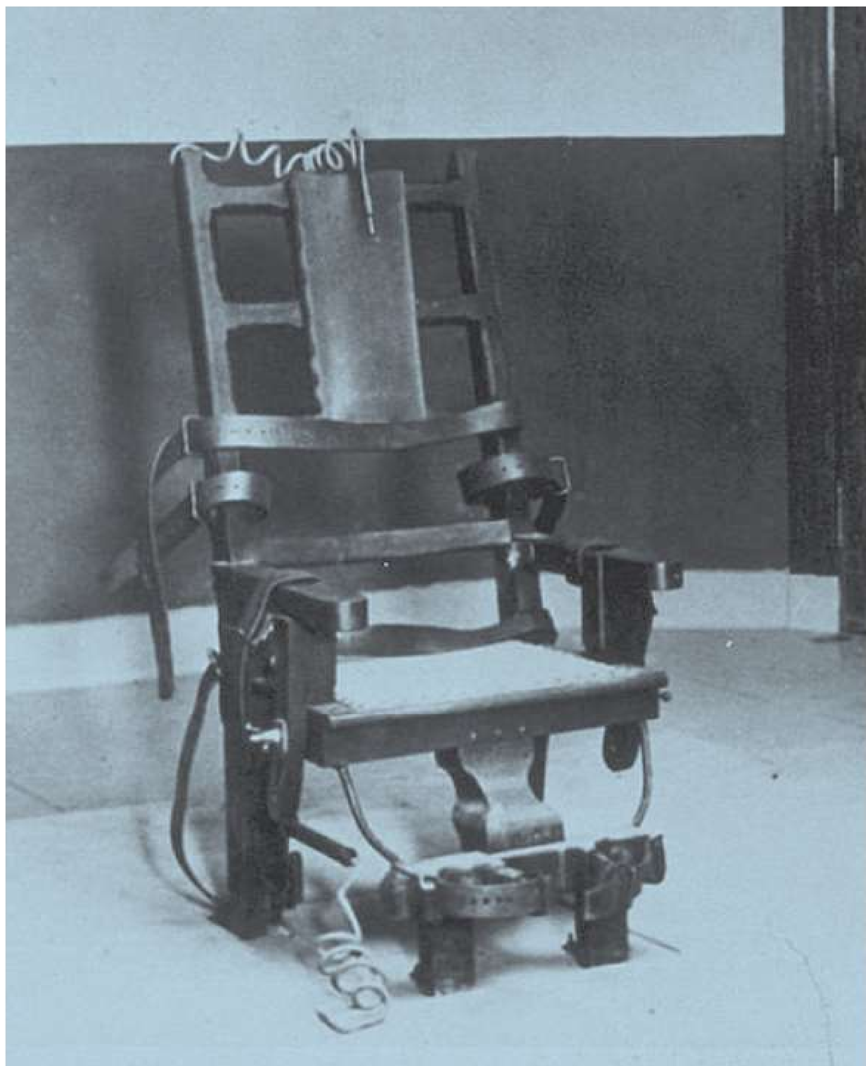
8点06分，朱利叶斯被率先送上了电椅，执行电刑后死亡。

几分钟后，轮到了艾瑟尔。

艾瑟尔在上电椅前，向女看守伸出了双手，把她拉到身边，在她的面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8点16分，艾瑟尔被执行电刑死亡。

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艾瑟尔在第一次电刑后并没有死去，又通了两次电才宣告死亡。



美国用来执行死刑的“电椅”

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罗森堡夫妇“镇定自若地死去了，使得目击者很惊讶”。

7

那么，该回答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罗森堡夫妇究竟是不是间谍？

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依旧存在争议，但根据1995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公开的“薇诺娜计划”（Venona　Project）文件，证明朱利叶斯确实参与

了间谍活动。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的文件中，也显示朱利叶斯确实为苏联提供过一些情报。

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是：各种证据显示，朱利叶斯提供的情报，一直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比福克斯提供给苏联的情报要差了很多等级。

而另一个问题是：朱利叶斯的妻子艾瑟尔究竟是不是间谍？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艾瑟尔参与了间谍活动。2001年末，艾瑟尔的弟弟格林格拉斯，当初在法庭上指控自己姐姐的那个人，公开承认自己当时做了伪证，冤枉了自己的姐姐——他想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因为受到美国审查而在1950年回到英国的科学家西奥多·霍尔在临死前声明：当时是他将核情报泄露给了苏联，“和艾瑟尔·罗森堡这位住在纽约贫民区的家庭主妇没有任何关系”。

但一切已不可挽回。

罗森堡夫妇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罗伯特，一个叫麦克。在罗森堡夫妇被执行死刑后，没有亲戚敢领养这两个孩子，因为他们惧怕遭到美国反共人士的报复。最终，两人被美国音乐创作人安（Ann）和亚伯·米若珀尔（Abel Meeropol）收留。



年幼的罗伯特和麦克，当时在读父母即将被处以死刑的报纸

长大后的罗伯特和麦克，在1975年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我们是你们的孩子：艾瑟尔与朱利叶斯·罗森堡的遗产》（罗伯特在2004年写了另一本书《父母死刑：一个儿子的旅程》）。

1990年，罗伯特建立了非营利组织“罗森堡儿童基金”，这个基金负责在左翼人士卷入法庭纠纷时帮助照看他们的子女。

1991年，美国剧作家东尼·库士纳（Tony Kushner）创作的戏剧《天使在美国》开始上演。剧中对艾瑟尔·罗森堡夫人的鬼魂进行了虚构的想象，讽刺和抨击了当年的“麦卡锡主义”。2003年末，HBO放映了电视版的《天使在美国》，这部剧作横扫金球奖和艾美奖等一切有关奖项，著名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扮演了艾瑟尔。

那可能是艾瑟尔留给后世的最后印象。



《天使在美国》海报

馒头说

在肯·福莱特的“世纪三部曲”第二部《世界的凛冬》中，伏龙芝和爱丽丝这对夫妇的原型，就是罗森堡夫妇。

只是在小说中，爱丽丝被描写成是知情者，但在现实世界中——正如前文所写——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艾瑟尔是个知情者。

这也使得她在最后临行前的决绝变得让人感慨起来。

因为她能这么做，无非出于两个坚定的信念：一个，是她对自己所坚信的信仰的坚定（如果有的话）；另一个，其实是源自她对自己丈夫的爱和坚信。

这个间谍案的故事，其实可以引发出很多那个时代关于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讨论，但通篇故事下来，给我个人印象最深的，竟然就是这个艾瑟尔。

作为一个妻子的艾瑟尔。

读者评论

橡树：如果认罪，就能活；不认罪，就要判死刑。这对夫妇最后还是不认罪，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啊！尤其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Aven：是爱和信念给了她直面死亡的勇气吗？即使无辜枉死，还能如此从容，令人震撼。

NBD（小姬）：丈夫为了自己对真理的信仰而死，妻子为了对爱的信仰而死，艾森豪威尔以及“麦卡锡主义”者们为了对共产主义的惧怕而选择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这两个。有信仰的人直到最后一刻仍然是平静的，内心充满恐惧的人活着也在不停地说服自己这样做是对的、理由是充分的。这两个人的死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永远活在自己和自己的战争里……

五环　体育能否超越政治

拳王阿里：体育是否能超越政治？

拳王阿里，一直是一个我们熟悉但又陌生的名字。

我们知道他是个拳击运动员，而且是个拳王。但世界上曾有那么多的拳王，为何阿里会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

仅在美国总统里，布什给他授过勋，奥巴马给他写悼词，克林顿参加他的追思会；他的葬礼，贝克汉姆等明星全都参加，给他抬棺的，是好莱坞大明星威尔·史密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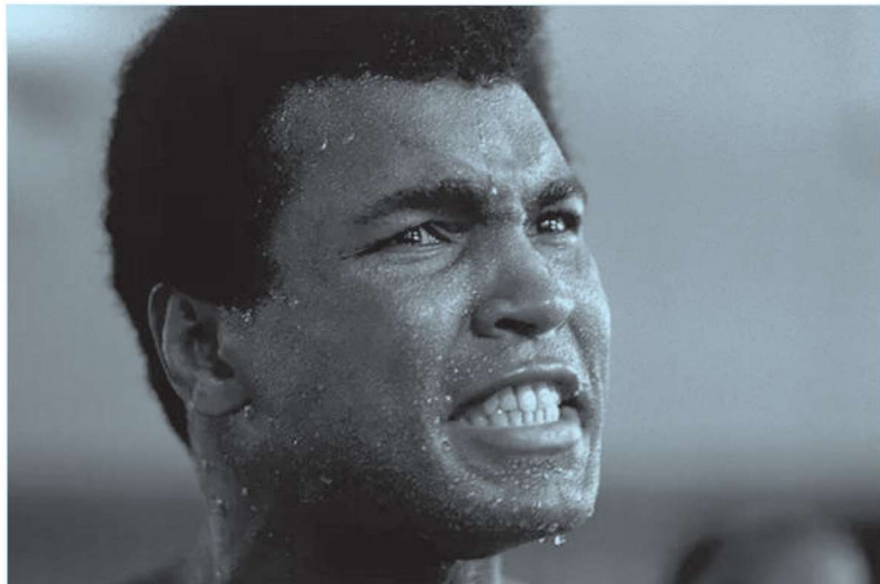
所有的这一切，是因为——他是一个拳王，但又不只是一个拳王。

1

1942年1月17日，阿里诞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

肯塔基州除了以纯种马和威士忌闻名，还有两桩和“种族隔离”制度有关的著名案件——“布坎南案”和“提尔谋杀案”（都是因为歧视黑人引起的）。

到了阿里出生的年代，美国依旧没有摆脱“种族隔离”的阴影，肯塔基州和南方各州一样，对黑人的歧视尤其明显。



拳王阿里

阿里小时候从没有去白人开的餐厅吃过饭，因为按照规定，黑人是不被允许进入的，甚至他进商店讨一杯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黑人。

这样的一种生存环境，赋予了阿里第一种鲜明的性格：倔强。

按照他的启蒙教练乔·马丁的回忆，在阿里12岁那年，他心爱的自行车被人偷了。阿里说，如果抓到小偷，就要拿鞭子抽他。马丁对他说：“你可以来学拳击啊！”

第二天晚上，阿里就来学了。学了没多久，阿里就对自己的母亲奥德萨说：“我要把奥运冠军给拿回来！”

2

1960年初，刚满18岁的阿里开始参加业余拳击比赛。

受过6年训练的阿里，开始展露过人的拳击天赋，以及第二种性格：张扬。

在一场和“金拳套”拳王（全美业余拳击比赛冠军）比赛之前，站在称重的秤台上，阿里转身问自己的教练马丁：“你今天晚上急着去哪里

吗？”

不明所以的教练回答：“没什么特别的安排啊！”

阿里的回答让教练非常意外：“我想如果你急着去哪儿，我就在第一回合把这家伙打倒，这样你就可以早点走了。”

结果，阿里确实是在第一回合就用连续重拳击倒了对手。

凭借夺人眼球的表现，18岁的阿里成了美国代表队的成员，获得了出征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资格。

在81公斤级的比赛中，阿里三战全胜，顺利进入决赛。决赛中他面临的对手，是三届欧洲冠军，波兰人皮埃茨克斯基。但毫无疑问，阿里更年轻，更强壮，技术也更好，所以几乎没有悬念地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那场决赛中，阿里灵活的步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获得了一个专有名称：“蝴蝶步”。



1960年罗马奥运会，阿里（右二）获得了他唯一一枚奥运会金牌

获得奥运冠军的阿里在回国后，从机场就开始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这一切景象让曾经倔强的阿里觉得，他所处的世界可能未必有他想象的那么不公平。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完全就像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阿里回到家乡，决定完成他童年的一个梦想：去一家白人开的餐馆吃一顿饭。

以防万一，他是把奥运金牌挂在脖子上去的。但是在餐馆，他依旧被拒绝了——没有人愿意为他提供服务。

阿里喊道："我是奥运会冠军！冠军！"别人冷漠地回答："我们才不管你是谁。"

那一夜，阿里把自己的奥运会金牌扔进了湍急的俄亥俄河。

3

从那以后，阿里开始经常把一个词挂在嘴边：公平。

在发现为国争光依旧无法为自己换得平等的地位之后，阿里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职业拳赛——这也是他成名之路的开始。

1960年10月29日，阿里取得了自己第一场职业拳赛的胜利。在接下来一年多时间里，阿里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1964年2月25日，他轻松击败了被称为"魔王"的索尼·利斯顿，成为新一代拳王——从此，职业拳击进入了"阿里时代"。

在那场比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阿里的情绪近乎失控，他不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高声质问记者："谁最棒？谁最棒？你看他们都不说吧！不公道，哪儿都没有公道！没有公道！他们不给我公道！谁最棒？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谁最棒？"

就在获得"拳王"称号的第二天，阿里公布了自己的决定：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将舍弃自己原来的名字"卡修斯·克莱"，改名"穆罕默德·阿里"。

阿里是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的忠实追随者，后者曾说过：“黑人的姓氏已经被剥夺，美国黑人的姓氏是不清楚的，在摆脱白人强加的烙印，重新找到自己的‘灵魂姓氏’之前，黑人的姓应该是X。”

此后的阿里一帆风顺，连战连捷。但没多久，阿里就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大一次危机——不是在拳台上，而是在场外。

因为他拒绝服兵役。

4

1955年爆发的越南战争，将美国人拖进了长达20年的泥潭，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在越战期间投入超过50万的地面部队，阵亡超过5.8万人，耗费4000亿美元

1965年，美国的约翰逊政府决定将肯尼迪政府在越南实施的“特种战争”上升到“局部战争”——由美国直接派兵加入战斗。

大批符合兵役条件的美国青年即将或已经被送到了越南战场，其中也包括阿里。

但是就在阿里18岁那年把金牌扔进河里的时候，他就已经发下了誓言：“我再也不会为这个国家去争得荣誉了！”

阿里说到做到：他拒绝为美国服兵役。

他的那段话被广为传颂：

我绝不会跑到万里之外去谋杀那里的穷人，如果我要死，我就死在这里，咱们来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我要死的话，你们才是我的敌人，与中国人、越南人、日本人无关。

我想要自由，你们不给；我想要公正，你们不给；我想要平等，你们也不给。你们却让我去别处替你们作战！在美国你们都没有站出来保护我的权益和信仰，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都做不到这些！

1966年2月，伊利诺伊州运动员委员会召开记者会，要求阿里对自己的反战言行公开道歉。

阿里："我在此不准备像新闻界给我安排好道歉的那样去表示歉意。"

记者："那么你说的那些非爱国的言论怎么办？"

阿里："必要的时候，我会向政府或者有关人士直接说明。"

记者："那么这次你不打算对你的讲话表示歉意吗？"

阿里："这得向政府说清。"

记者："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你说过你是人民的冠军，对吗？"

阿里："是的，先生。"

记者："你认为你的行为符合一个人民的冠军吗？"

阿里："是的，先生。"

之后，美国的许多州吊销了阿里的拳击执照，他只能越来越多地去美国以外的国家打拳，包括拳王卫冕战。

1967年，25岁的阿里依旧陷在"拒绝服兵役"的旋涡中，但此时他迎来了第八次"拳王"卫冕赛的挑战者厄尼·特莱尔。

那是展现阿里愤怒的一场比赛，因为特莱尔在赛前故意一直称呼阿

里以前的名字“克莱”，就是不叫他众所周知的名字“阿里”。在比赛中，阿里不断地向特莱尔怒吼：“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到底叫什么！！！”



激战中的阿里

阿里最终赢得了比赛，他的愤怒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7年3月22日，25岁的阿里在第七回合击倒了挑战者佐拉·弗雷，再次蝉联拳王称号，状态如日中天。

但这一切很快就变得不可重现。

时隔不久，阿里已经“九连冠”的拳王头衔被强制收回，因为“拒绝服兵役”的罪名，他被吊销了全美各州的拳击执照，并且还被没收了护照——他连去国外打拳也不可能了。

但是，阿里没有放弃，他赋闲在家的时候，不断出席各种反战场合并发表演讲，尽自己一切努力宣扬反战的观念。

1970年，在全国越来越高的“反战”呼声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恢复阿里的拳手资格。

但停了三年比赛和正常训练，阿里年纪变大了，体重增加了，步伐也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

他失去了作为职业拳手最宝贵的三年。

5

1971年5月8日，29岁的阿里复出，作为挑战者，他在比赛中两次被当时的拳王乔·弗雷泽击倒。

两年后，31岁的阿里又以点数输给了肯·诺顿，再一次挑战拳王失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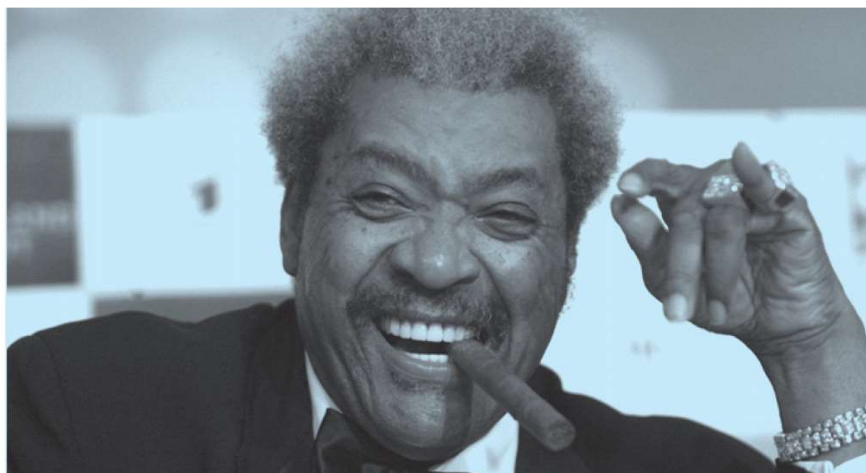
人们有理由开始怀疑：阿里时代，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在1974年10月，阿里打破了所有人的质疑。

那一次，他挑战的拳王是比他年轻7岁的乔治·福尔曼。也是一代传奇的福尔曼，只用两个回合就击倒了曾击败阿里的拳王弗雷泽，其中有6次击倒对手。

那场拳王争霸赛被经纪人安排在了非洲原扎伊尔首都金萨沙。值得一提的是，那名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的年轻经纪人，就是后来呼风唤雨的唐·金。

那一场的大战，阿里无论从年纪还是实力上，其实都处于劣势。但在将他视若神明的非洲，在全场高呼的加油声中，阿里在前七个回合龟缩在拳台一角保存体力，在第八回合忽然发力，将福尔曼击倒在地，时隔7年，重新拿回了世界重量级拳王的金腰带。



唐·金，后来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也是最成功的拳击经纪人

从这场比赛之后，阿里一发不可收拾，又10次蝉联了金腰带，其中包括1975年在菲律宾马尼拉战胜弗雷泽的“世纪之战”。

1978年9月，在点数战胜平克斯之后，阿里最后一次获得拳王金腰带。第二年，37岁的阿里宣布退出职业拳坛。



阿里对决弗雷泽

他留下的，是20年中61次职业比赛56次赢的纪录。

当然，阿里的故事不会随着他的退役而终结。

他作为联合国和平大使，开始走访各个国家，宣传反战，宣传和平，宣传反歧视。很多国家，都是元首亲自出来接见，包括中国。

阿里在1979年和1985年两次到访中国。在第二次访华时，他这样说道："中国很干净，非常热爱和平，社会秩序非常安宁，有纪律。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伟大的传统，普遍尊敬老人，社会道德很好。在美国，所有人都认识我。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早把我访华的消息报出去了，因此人人都等待我回去告诉他们我看见了什么。我将大声地说：我看见了一个美丽、幸福、和平和充满希望的中国！"

1984年，阿里开始发现自己步履艰难，说话声音颤抖——经诊断，他患上了帕金森症。医生表示，阿里的头部在职业生涯中遭受过超过两万次的重击，这不可能不对他的身体造成影响。

对一位曾经步履轻盈、出拳如风的拳手而言，帕金森症无疑是最痛苦的一种折磨。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的点火仪式，给很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由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点火仪式，是由残疾人射箭冠军安东尼奥用射箭的方式点燃火炬，惊艳全世界，所以当时世人都对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点火仪式充满期待。

但那次点火仪式，却出奇的简单——就是由一名运动员出场，点燃火炬。

那个人，就是阿里。



阿里点燃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

如果说与其他人点燃火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饱受帕金森症困扰的阿里拿着火炬的手颤颤巍巍，一度无法对准燃点，用双手才努力点火成功。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全场近10万人掌声雷动，很多人当场落泪。

美国当地时间2016年6月3日，74岁的阿里最终因为帕金森症引起呼吸困难，在医院里与世长辞。

在他入葬的那一天，因饰演《拳王阿里》中阿里的好莱坞明星威尔·史密斯担当了抬棺人，同样曾是拳王的迈克尔·泰森担当了护棺人，阿诺德·施瓦辛格、贝克汉姆、斯派克·李、土耳其总统加尔多安等一批演艺界和政界人士都出席了葬礼或追悼会，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场，时任总统奥巴马发来悼词，沿途自发来送葬的人达到了10万之众。

阿里的落葬地，还是他的故乡，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路易斯维尔市的市长在葬礼上发言："阿里回到了他的家乡，他所喜爱的路易斯维尔市。"

是的，阿里还是回到了那个曾经不允许他进餐馆吃饭，但最终还是以他为荣的家乡。

馒头说

"让体育远离政治。"

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宗旨。

但遗憾的是——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体育从来没能远离过政治。我甚至曾说过，体育如果有真正远离政治的那一天，那就肯定是体育没人关注了。

凯文·凯利曾经说过："注意力在哪里，钱就在哪里。"同理，注意力聚集的地方，政治同样也会无孔不入。

体育有自己的规则和规律，而政治，总是希望以它所习惯的或它所希望的规律，来改变体育。有时候，它会温情脉脉，因势利导，但有时候，它会不问来由，简单粗暴。

而阿里，就是一个反抗者。

阿里之所以在退役后乃至逝世后，都享有盛誉，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体育成绩，更是因为他一直试图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以体育的名义来反抗不公平的政治，至少，他希望体育能让政治变得不那么狰狞和蛮横。

没错，至少现阶段，无论哪个国家，体育都没法远离政治。

但是，体育可以超越政治。

如果没有，那我们就一起继续努力。

读者评论

CC：好不容易看到的美好与血性，不希望因此而消弭，尽管心痛，

还是让我们饱含希望吧。

回头是岸：孙中山说，政治就是公众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竞技体育本身就是政治，要不然升国旗、奏国歌干什么？

与风共舞的心情：体育也许是政治的延伸，但我不希望它只是附庸，而是能够成为改善政治的一种方式。

一个34岁就做到正部级官员的运动员

在中国，乒乓球被称为“国球”，这个项目，早已超越了普通体育项目的意义。

同样具有不同意义的，还有打乒乓球的运动员，尤其是在那个极需树立民族自尊心的年代。

所以，今天要说的这位乒乓球运动员，也不仅仅只是一名运动员了，不知道这是他的喜，还是他的悲。

1



庄则栋

2013年2月10日，新华社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刘威10日晚向记者确认，罹患癌症多年的乒乓球名宿庄则栋于当日下午17时06分在北京佑安医院去世，享年73岁。”

庄则栋这个名字，似乎离开人们视线很久了，久到一些“90后”，甚

至“85后”，都未必知道这个人。

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庄则栋”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如雷贯耳。

事实上，庄则栋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经历的人生，可谓大起大伏，某种程度上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

首先，庄则栋的家世就很传奇。

话说在20世纪初，上海有一个著名的犹太大亨，名叫哈同。哈同曾被称为“远东首富”，他把上海的南京路开创为最繁华的商业街，并拥有这条路上44%的地产。

当时，在哈同创办的上海仓颉中学有一位老师，名叫庄惕深。有一天，庄惕深在上班途中捡到了一张马票，第二天，这张马票居然中了奖。据说一向迷信的哈同知道这件事后，认为此人乃有福之人，将来他的儿子肯定是个人才，于是就将养女罗馥贞许配给了庄惕深（馒头说：其实庄家乃书香门第，哈同应该是了解了庄惕深的为人，想来不会单凭一张马票中奖就许配这门婚事吧）。

哈同为庄惕深夫妇在北京购置了一套前清某王府的旧宅作为嫁妆，大大小小共计330个房间，人称“北京哈同花园”。

不幸的是，庄惕深和罗馥贞此后所生的两女一子，都夭折了。庄惕深为续香火，瞒着妻子，在老家扬州又偷偷娶了一个名叫雷仲如的女子。

1940年8月25日，雷仲如为庄惕深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庄则栋”。



后排右一为庄则栋，右二位庄惕深，前排为庄则栋母亲

3

小时候身体不好的庄则栋，被父亲要求习武。在习武过程中，庄则栋被灌输了一个理念：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这对他之后的乒乓球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少年庄则栋

1945年抗战胜利，5岁的庄则栋被父亲接回了北京。1955年，庄则栋15岁了，就读于北京第22中学。当时学校里的同学都很崇拜能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庄则栋觉得自己个子不够高，当不了篮球运动员，身体不够壮，又当不了足球运动员，想来想去，他想做一个乒乓球运动员。

就这样，15岁的庄则栋踏上了业余乒乓球之路——进入了当时北京市少年宫。

负责教庄则栋的教练叫靳声华，也是一名业余乒乓球爱好者。但他

对学员的基本功要求非常严格，并且有一个特色：强调直拍近台两面快攻。当时，他编了一个口诀，叫“左方斜射，右方斜射”，他的组里，每个学员都会背。这种打法，庄则栋一开始很不习惯，但靳声华坚持要他这么练，慢慢也就融会贯通了。

没想到，“两面快攻”成了庄则栋之后成名的重要武器。

1956年2月，北京举行第一次少年乒乓球比赛，庄则栋荣获冠军，从这以后他一连三次获得北京市少年乒乓赛冠军，当时他只有15岁。

1957年，庄则栋入选北京市队，两年后入选国家青年队。1961年，庄则栋代表国家队参加了第26、27、28、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中，第26、27、28届，庄则栋三次蝉联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个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荣获三连冠的人（第28届获得男子双打冠军）。



青年庄则栋

尽管那三届世锦赛的男单冠军，一直有李富荣“让球”的故事（关于乒乓球的让球，请参看《历史的温度》之“‘让球’阴影下的‘小山智丽事件’”），但李富荣后来自己也承认，当时“确实是庄则栋更厉害一些”。（当然，李老后面还说了一句：“但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庄则栋当时厉害到什么程度？除了国际赛场，在当时的国内赛场，庄则栋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单三连冠，国家队内单打三连冠（其中包

括一百多场的连胜纪录，这也侧面证明他在国内确实是最强，因为国内基本不存在“让球”）；在他当打之年（1961—1971年），他获得的冠军头衔数，超过了其他所有队友所获冠军数的总和。

将庄则栋选入国家队的邱钟惠（中国第一位乒乓球女子世界冠军）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庄则栋是“使劲快打，见球就打。打得很猛，主动进攻，一般都不防守不推挡”。总之，很多人看庄则栋打球，就是一个“爽”字。

由于庄则栋球技出众，形象也出彩，毫无悬念地成了当时的“国民偶像”。从当时国内的情况来看，他的热度肯定超过之后的刘翔或姚明。

4

命运，并没有让庄则栋沿着运动员的轨迹一直走下去。

1971年，因为“文革”而中断两届参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已经31岁的庄则栋，状态已经不如当年（李富荣、张燮林等一批当打之年的顶尖运动员，都因那场浩劫错过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最佳机遇），但依旧作为老将带队出征，并和队友一起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

那一届比赛的最精彩部分，当然不是那个男团冠军。

在比赛开始的第二天，一个名叫科恩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因为匆忙，错登上了中国队的班车——等他发现全车厢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时，班车已经发动，再下车已不可能了。

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虽然已处于“破冰”前夕（尼克松已经上台），但场面还是非常尴尬：

科恩面朝车门，一句话也不敢说。而根据当时中国代表团的规定，碰到美国运动员“不握手，不打招呼，不送礼物”，所以满车中国教练员和运动员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大家都保持沉默。

这时候，庄则栋站出来打破了僵局。

他带着翻译，和科恩开始了交谈，然后考虑再三，从包里拿出了一

个礼物——一条一米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



赠送礼物时的场景

由于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敏感的关系，中国队的班车一抵达目的地，庄则栋和科恩微笑着站在一起的画面，立刻被敏锐的日本记者捕捉到了，消息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甚至是头版头条，成了爆炸性新闻。

后来庄则栋回忆当时为什么要迎上去，说一是他觉得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把人家晾在那里”，二是他想起了不久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的话：“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

据林克、徐涛、吴旭君所著《历史的真实》披露，毛泽东邀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向美国高层传递往来信号。但美国高层并未捕获这一微妙细节。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记述，“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

庄则栋和科恩回到各自队里，也是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庄则栋的行为让整个代表团大为紧张，因为这是明显违反纪律的，所以当时甚至已经准备让他赶紧回国，听候处分。而科恩回团汇报后，经过层层报告，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哈里森提出了“希望带队访问中国”的请求。

4月6日，中国外交部拒绝了这一请求，周恩来圈阅，毛泽东晚上看到了这个文件，也对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表示同意。

4月6日晚上，文件送走后，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打算睡觉。11点多，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为他读“大参考”（供中央高层阅读的“参考资料”）。毛泽东本来已经昏昏欲睡。但在听到外电报道庄则栋在班车上和科恩讲话、送礼物的时候，他突然说起话来。吴旭君听了一会儿才听出，大意是：“打电话……美国队……访华！”

当时毛泽东自己规定：吃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吴旭君想，主席刚刚还圈阅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现在怎么又变卦了？所以她不敢动。

看吴旭君没动静，毛泽东生气了：“小吴，你怎么还不去办？”吴旭君故意说自己没听清。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听清楚了之后，吴旭君还是不放心，问毛泽东吃安眠药后说的话算不算数。毛泽东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就这样，一场大家都知道的“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就此拉开帷幕。

后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熊向晖对庄则栋说：“小庄，你这件事办到毛主席的心坎儿上去了！”

5

毫无疑问，庄则栋在这场改变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外交中，成为一个“符号人物”。

这样一个“符号”，放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中，必然会产生不同寻常的故事。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庄则栋因为属于“保皇派”（反对批斗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而被批斗，在那段三个多月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批

斗的日子里，一批庄则栋的教练和队友，都不堪受辱，选择了自杀，其中就有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但是，那场“乒乓外交”，一下子改变了庄则栋的命运。1971年的“乒乓外交”后，入驻在乒乓球队的军管会领导被撤离，周恩来所调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委从总参回归国务院领导。

1972年，庄则栋任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后，庄则栋成了国家青年队的领队兼总教练，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庄则栋后来回忆：“副书记就是挂个名，还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但他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跨入了政坛。

1973年，庄则栋被派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庄则栋后来回忆，当时这封信对他影响很大，让他认为，听毛主席“亲密爱人”的话总是没错的，“要跟对人”。

在试图拉拢王猛失败后，江青开始指挥庄则栋批斗王猛。在王猛被调离后，作为“奖励”，34岁的庄则栋成了国家体委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正部级）。

就任体委主任后，江青、王洪文接见了庄则栋，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

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庄则栋提出了“不要专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开始大规模调整体委人事，大批地提拔“自己条线”上的人。根据庄则栋后来自己回忆，他当时选人的主要标准就是“可靠”，他也承认，大规模调整人事，得罪了很多人，“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但他也始终坚持一点：“我没打干部，更没整死人。”

庄则栋的儿子庄飙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在那个年代，父亲肯定也参与了“整人”，只是肯定没有“血淋淋整人”。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庄则栋的命运也急转直下。

首先，他被免去了国家体委主任的职位，然后被关到北京卫戍区审查，一审就是四年。审查结束后，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果（据说当时对处理庄则栋有两种意见，一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判刑，另一个是“犯严重错误”，考虑到他曾为国争光，只是一时误入歧途，先进行冷处理，不判刑。持后一种意见的，恰恰是当年庄则栋竭力要打倒的王猛）。

人生大起大伏，庄则栋首先失去的是爱情。

在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庄则栋认识了一位年轻的钢琴演奏家，叫鲍蕙荞，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坠入爱河。

1967年，庄则栋与鲍蕙荞结婚。但“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鲍蕙荞的工程师父亲首先被打为右派，随后庄则栋又因为不肯批斗荣高棠，每天挨批、挨斗、挨揍，鲍蕙荞被流放到干校，那段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随着庄则栋的“翻身”，鲍蕙荞也被江青从干校调到北京，为样板戏伴奏。一开始，鲍蕙荞非常感激江青，但后来发现周围人其实都对江青有意见，于是开始告诫她的丈夫：“她是整人的人，你要和她保持距离。”但庄则栋不以为意。

更让鲍蕙荞伤心的是，随着做了国家干部，庄则栋似乎慢慢变了。鲍蕙荞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

“文革”结束后，庄则栋在被隔离审查期间，鲍蕙荞也受到牵连，不准上台演出。那段时间，鲍蕙荞不仅撑起了那个家，还来回奔走，为丈夫上访。但是，夫妻俩的感情裂痕已无法弥补，1985年2月2日，双方协议离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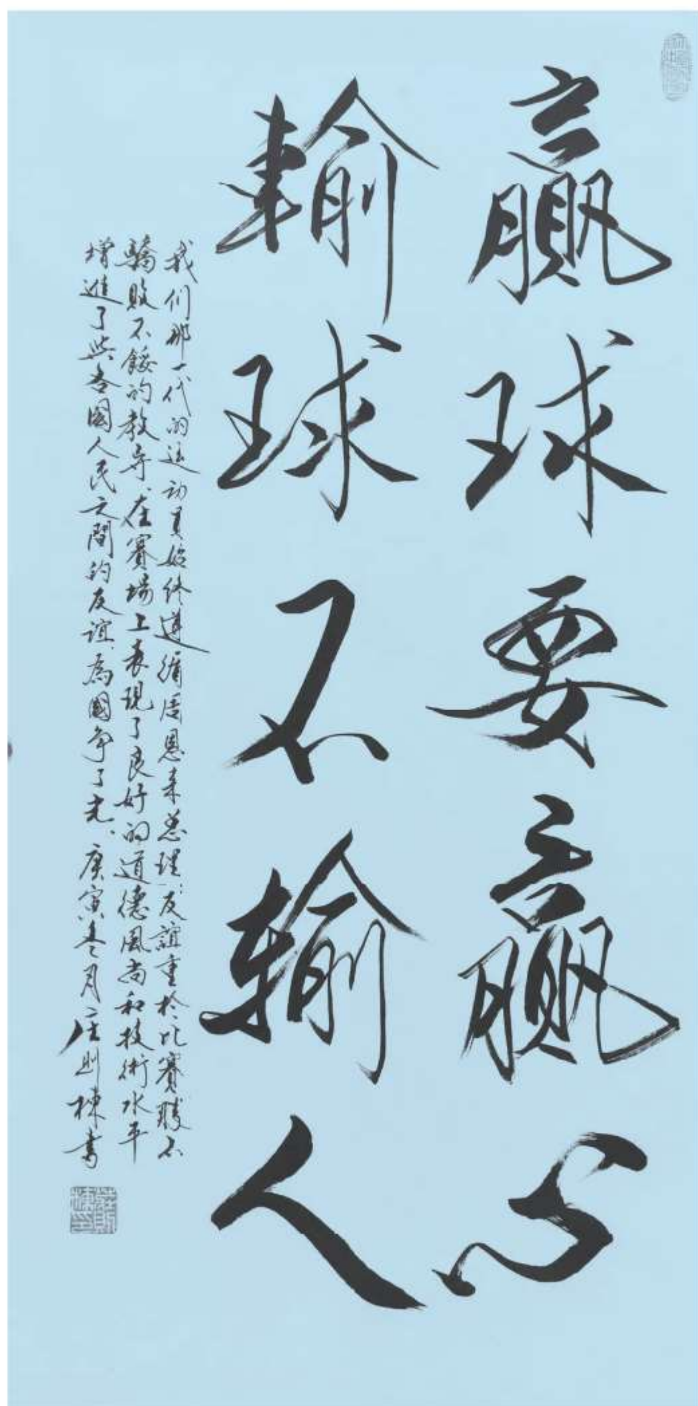


庄则栋与鲍蕙荞在“文革”晚期的合影

受到影响的，还有他的孩子。

1987年，庄则栋的儿子庄飙去考中央音乐学院，之后接到学院电话通知：“你没考上，把自己的档案取回去吧。”他拿着档案突然很想知道：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拆开一看，街道办写了一张条子：

“该生的父亲在‘文革’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望你校在录取时予以认真考虑。”



庄则栋后来一直在练书法

人生低谷时，鼓励和支持庄则栋前行的，还是他的老本行：体育。

1984年，庄则栋得到了调回北京的机会，但他婉转地表示：鉴于以前在体育系统犯过的错误，以及人事关系上的不便，不希望回到体委工作，而愿意去北京少年宫担任青少年教练。

庄则栋没想到，他这个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北京市委还特地关照，给庄则栋安排离家近的少年宫，“让他心情愉快地工作”。

于是，30年后，那个当初在少年宫崭露头角的世界冠军，又回到了起点。

在少年宫担任教练期间，庄则栋遭遇了妻离子散，每月的收入只有100元（其中包含世界冠军津贴，一个冠军10元，他拿过3个），其中30元给老母，40元作为孩子抚养费，自己留30元生活费。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庄则栋开始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真情冷暖。

有一次，食堂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胖老头叫住了庄则栋：“你就是庄则栋？食堂里有规矩，吃完饭不准带走饭盒，知道吗？”

当时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庄则栋唯唯诺诺，立刻留下了自己的饭盒。

第二天吃午饭，庄则栋去拿自己的饭盒，忽然发现饭盒变得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肉和鸡蛋。

那位老头递给庄则栋一支烟，和他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你过去来这儿打比赛，那会儿你刚得了世界冠军，每次吃完饭，人家抹抹嘴都走了，只有你，帮我们收拾碗筷，你还到厨房里跟我握了握手，一点儿没有大冠军的架子。想起当年的你，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1980年，庄则栋在家中与儿子和女儿合影

体会到了人间真情，庄则栋还收获了新的爱情。

1984年，庄则栋正在少年宫带小朋友训练，突然一位日本女球迷来拜访，她的名字叫佐佐木敦子。

出生在中国的佐佐木敦子，一直是庄则栋的球迷，两人在1971年的名古屋世锦赛时就认识了，在过去的13年里，佐佐木敦子一直单身。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准备结婚，却碰到了麻烦：因为个人政治原因，庄则栋不可以和外籍女子结婚。

怎么办？佐佐木敦子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为了嫁给庄则栋，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面对依旧存在的阻力，庄则栋最后决定给邓小平写信，这封信一路上传，最终真的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大笔一挥：同意！



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

1987年，47岁的庄则栋和43岁的佐佐木敦子结为夫妻。佐佐木敦子放弃了在日本公司的优厚待遇，从此陪着庄则栋过起了清贫的生活，成了一位“胡同大妈”。

迟来的收获，还有当年的友情。粉碎“四人帮”后，因为当年的那些事，庄则栋从一些活动中“蒸发”了。有一次，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中国，问庄则栋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是“出差去了”。

1996年，某省主办一场乒乓球比赛，请庄则栋来颁发冠军奖杯。打到决赛，主办方突然想起庄则栋跟体育系统的“文革”宿怨，立刻担心起来：马上要打全运会，万一影响到省体委和国家体委的关系怎么办？结果只好去跟庄则栋说谎：“今天下午停电，没法打决赛了。”他们临时买了一张回京的软卧车票，当天晚上把他送回了北京。

但是，时间毕竟还是能冲淡一切的，何况，大家还是明事理的人。

2002年，庄则栋成立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乒乓球俱乐部，他给过去的队友、同事，现在已经是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们写了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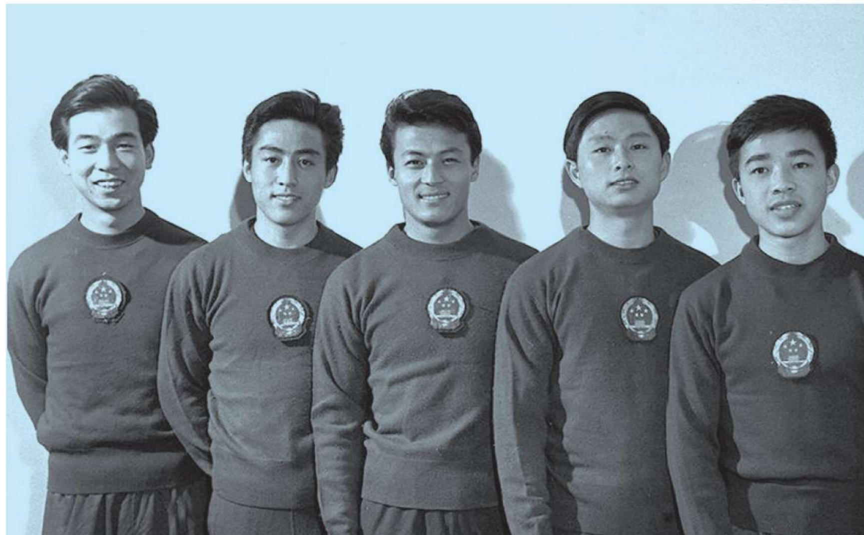
中国乒协徐寅生、李富荣等领导：

借北京庄则栋乒乓球国际俱乐部成立之际，我诚恳地邀请并期待你们的光临……过去我们是战友，在“文革”中由于我犯了错误，造成了隔阂，伤害了我们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我希望把我们的隔阂结束在上一世纪，这样对历史也是积极的交代。

2002年12月20日，庄则栋的俱乐部开张，徐寅生、李富荣都如约出现在开业典礼上。

三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媒体用了那个老掉牙但还算贴切的标题：

“相逢一笑泯恩仇。”



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的中国男子队选手（从左至右）：张燮林、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王家声（黄景达摄，图片选自《庄则栋自述》，庄则栋、佐佐木敦子著，新华出版社2014年5月版）

8

时间能带来很多东西，但也会带走很多东西。

2006年，庄则栋出现血便等症状，一度被误诊为痔疮。2008年，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之后，他得到北京、上海多所医院的全力救治，“走到哪里都是绿色通道”。

在庄则栋患病期间，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那些昔日的队友和同事，包括当时刚刚担任乒协主席的蔡振华，都去看望了他。

2013年2月8日中午，庄则栋病情急转直下，院方通知家属考虑准备后事。

病床前，庄则栋闭着眼睛，紧紧拉着妻子佐佐木敦子的手，同时伸出另一只手，让儿子庄飚握住。

守在身边的人问道：“你拉的是谁的手？”庄则栋回答：“是我前妻。”站在旁边的鲍蕙荞赶紧上去，从庄飚手里接过庄老的手：“我是蕙荞。”

在家人的陪伴下，73岁的庄则栋最终合上了眼睛，走完了自己不平

凡的人生旅途。

馒头说

我和庄则栋老先生，算是有过两次交集。

一次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那年考的，是复旦大学的“文科基地班”，提前招生，提前录取，在预先考完“3＋1”的笔试后，我进入了面试。

面试由复旦大学的文史哲三系选派教授一起面试。满分150分，前50分是抽一道题目，主观陈述15分钟（后100分为三系的教授自由出题，我记得第一个教授上来叫我从蒙古开始，把和中国接壤的国家顺时针说一遍，另一个教授叫我把从明朝建立到灭亡，所有我觉得值得一说的事情说一遍）。

我当时抽到了两个题目（可以二选一），一个是：“试论述秦朝的建立对中国两千年以来的影响”，第二个是：“谈一谈你理解的‘小球推动大球’”。

虽然第二个题目答题范围非常广，但我想了想，还是把“小球推动大球”的那张纸条扔回了抽签箱。

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打乒乓球，也熟悉那段外交历史，但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没选那一道题。

然后就到了2005年，上海，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作为一名记者，参加了大赛开幕前的一个中国乒乓元老的聚会。

那场聚会，云集了几乎所有新中国成立以来还健在的乒乓名宿。我发现，全场有两个人有那么一点尴尬，一个是小山智丽，一个是庄则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则栋的真人。

当时给我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第一，他文质彬彬，给人非常儒雅的感觉；第二，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当时我有个报社给我的任务，带一块乒乓板，请所有的乒坛名宿签字）。

当时的庄则栋和小山智丽，给我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挺想接受采访的，但同时又非常谨慎，怕采访者无法忠实记录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大家都希望，体育能远离政治，但事实上，体育是不可能摆脱政治的，过去不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比如奥运会，如果哪一天，奥运会真的能远离政治，那只有一种可能——奥运会再也没有人关注了。

所以放到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个体身上，我们该怎样评价庄则栋？

很难。我觉得，还是用庄则栋自己的话来作为结尾吧。

那是庄则栋在1980年被安排到山西队时，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去看望他时，他发自肺腑说的一句话：

“打乒乓，我是大学生；搞政治，我是小学生。以后我一辈子再也不会碰政治了。”

读者评论

□3C□：从小就读过“小球推动大球”的历史，但从来没关注过庄则栋后来的人生。谢谢馒头大师，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人，都有喜怒哀乐，旦夕祸福。

A.C.Lee：科恩的命运呢？回团汇报就完了？（作者回复：回国后火过一阵儿，做讲座，做嘉宾，但后来不行了。作为美国嬉皮士文化一代的典型代表，科恩后来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工作上也没有着落，2004年病逝，终年52岁。）

杨雷：当年不知什么原因，国家乒乓球队在中央音乐学院集训，吃、住、培训都在学校，庄先生和蕙荞先生的爱情就是在那时开花的。顺带说一句，由于有这个机缘，那个年代的中央音乐学院老师的乒乓球水平相当高。

啊紫：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时代的大环境左右，人生的对错恐怕不是一句“如果当初如何如何”就能说得清楚的。如果说命运是注定的，庄则栋这一生可谓可叹可敬！

世界冠军之死

“人生能有几回搏”，是激励多少人奋斗的一句格言。

但说出这句话的人，却因为想搏却无法搏，最终选择自己结束了生命。

愿那样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1

1959年3月27日，在原西德的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式拉开帷幕。这一届比赛，有38个国家和地区240多名优秀选手参加，规模空前。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应该铭记这届比赛的理由。

这一届的世乒赛，之所以能在中国体育史乃至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一笔，是因为在这一届比赛上，新中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为国家捧回这座冠军奖杯的人，名叫容国团。

那一年，他才21岁。



容国团

2

1937年8月10日，祖籍珠海的容国团，出生于香港一个贫苦海员之家。

7岁那年，刚刚读书的容国团第一次接触乒乓球，顿时就被迷住了。尽管他身材瘦小，个头勉强超过乒乓球桌，但看过他打球的人都说，他打球有一股灵气。

在容国团13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只能辍学。之后，他成了香港东区一家渔行的童工。每天一大早，容国团就要起床，在一堆腥臭杂乱的鱼虾中进行分拣工作。打乒乓球成了那时候支撑容国团的最大兴趣——他的父亲是香港工联会下属的海员公会的会员，好心的工联会人员安排容国团在康乐馆管理图书、陪顾客打球。



青年时期的容国团

也就是在那里，容国团无师自通，自己钻研，乒乓球水平提高很快。

1957年2月，香港举行全港乒乓球锦标赛，容国团代表工联会，与队友一起夺得了男子团体和单打、双打三项冠军，崭露头角。

但真正让容国团名声大振的，是1957年4月日本乒乓球队访问香港

的一场比赛。在那场比赛中，容国团以21比19和21比13，总比分2比0战胜了日本选手荻村伊智朗。

荻村伊智朗是谁？他是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后来成为第一个担任国际乒联主席的亚洲人）。

经此一战，容国团的名字，妇孺皆知。

3

虽然成名了，但容国团在香港过得并不开心。

因为容国团当时所在的工会，是一个左翼工会，在香港备受歧视。1957年5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在马来西亚举行，容国团是香港男单冠军，又刚刚击败了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但香港乒总会居然没有让他报名参赛。

那件事，让容国团坚定了离开香港的念头。

容国团有一位好友，叫张五常——没错，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那位。张五常和其他几个容国团的好友一起，劝他离开香港，去内地打球。容国团的父亲容勉之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受父亲的影响，容国团从小也一直对内地很向往。

经过一系列的波折之后，在当时贺龙贺老总的亲自邀请下，容国团在1957年接到了广州体育学院的入学通知。

张五常后来回忆了1957年7月31日，他与容国团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第二天，张五常自己也将远赴加拿大。

那天，两个人在容国团任职的工会俱乐部见面，一个要北上广州，一个要远赴北美，两人相对无言。最后，容国团把自己的乒乓球拍送给了张五常，并教他一个发球的技巧。张五常凭借那一招发球，后来拿到了加拿大一个乒乓球大赛的冠军。

而在1957年的11月1日，容国团自己也背起了简单的行囊，在工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迈步走过了深圳罗湖桥。

那天，容国团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

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4

从职业生涯的选择看，容国团并没有选错。

从容国团回来的第一天起，他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容国团每个月的工资是86.5元，这在当时全中国的运动员中都是罕见的。

更重要的，是在技战术打法上的全面提高。容国团到广州没多久，就拿下了全国锦标赛的男单冠军，入选了国家队。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为他配备了多种打法的陪练，没过多久，容国团的技术得到全方位提升，抽、杀、削、吊、拉、搓、推、挡，各种技术样样精通，被称为“八臂哪吒”。



容国团在比赛中

在广州体委一次大会上，容国团许下诺言：“三年夺取世界冠军！”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不少人都觉得他在吹牛，也有好朋友劝他“在心里立下目标就可以了”，但容国团说：“我就是要说出来，这样才有动力去拼，大家也能监督我！”

但事实上，容国团根本没等到三年。经过一年的集训，容国团的状态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而也正是在此时，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了。

在那届世界锦标赛上，容国团连胜三员欧洲大将，然后又淘汰了日本名将星野和美国名将迈尔斯。尤其是对阵迈尔斯那场比赛，容国团在1比2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逆转取胜，闯入决赛。

在决赛中，容国团面对的是有“匈牙利之虎”之称的名将西多——他手上有9个世界冠军头衔。当时西多的队友已经为他准备好了鲜花，藏在挡板后面，就等着西多轻取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选手之后为他庆祝。

但那场比赛，容国团充分发挥了中国人技术好、头脑活的优势，利用多变的发球和近远台的交叉变化，把已经36岁且身材魁梧的西多调动得气喘吁吁，最终以3比1赢下了比赛。

当容国团高高举起男单冠军的圣·勃莱德杯时，他创造了一个历史纪录：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



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中国选手容国团（左二）和亚军匈牙利选手西多（左一）等合影

在那个急需用体育来振奋人心、树立形象的年代，容国团的这个世界冠军，让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乒乓球开始走

上了“国球”的发展道路。

而容国团个人的命运，也就此发生了改变。



容国团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回国后，参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在机场的合影

5

容国团回国的时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亲自到机场迎接。

之后，容国团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接见。1959年，周恩来确定了中国的两件大喜事：十周年国庆，容国团夺得世界冠军。

当时容国团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现在最红的明星。走在路上会被人围住，要签名倒也算了，还会有不少人请他发表感想，自己用小本子在一边记录。容国团去看电影，去晚了没票，就在售票处等退票。来看电影的人发现是容国团，都抢着把自己的票送给容国团。电影院方面知道容国团来了后，还非要请他上台讲话。全国各地写给容国团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以致要专门成立个“拆信小组”……

容国团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当时，全国追求容国团的女孩非常多，但容国团最终选择了自己之前就认识的田径队女孩黄秀珍，两人相识相爱，最终结婚，过起了简单但幸福的生活。

容国团并没有在一片赞誉和舒适的生活中迷失。

1961年，容国团和队友们一起，在第26届世乒赛上以5比3战胜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男队，第一次为中国捧得男团冠军。



1961年4月，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在男团决赛中，容国团说出了那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他战胜了日本名将星野，和全队一起将此前已经蝉联五届世界冠军的日本队拉下了马

不仅如此，容国团还证明，自己并不是只能当好一名运动员。1964年底，容国团临危受命，担任中国女队的主教练。随后，他针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日本女队的情况，制订了详细规划，并大胆起用梁丽珍、李赫男、林慧卿、郑敏之等一批队员。

1965年4月，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上，中国队获得了女子团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三项冠军，震动世界乒坛。

那一年，容国团才28岁，他还有太多的事可以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做。

但是，1966年，悄无声息地来了。

6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容国团从国外比赛归来，发现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变了。在国家队的训练馆，乒乓球桌被竖到了一边，馆内到处堆放着杂物，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四处张贴大字报。

中国乒乓球队成了运动队中的一个反面典型，给出的理由之一简单至极——世乒赛的七座奖杯，都是以资产阶级的人的名字命名的。更有“造反派”喊出了一句逻辑奇怪的口号：“冠军拿得越多越反动！”

在这场运动里，容国团并没有因为“第一个世界冠军”的身份而被幸免，相反，他的香港资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比如，他从小在香港长大，有造反派说他其实是香港派回内地的间谍。又比如，他当年从罗湖桥步行，行李没有接受检查，有造反派说他当时是偷运武器回来的。

当然，容国团平时喜欢美国的“猫王”，喜欢听交响乐，会和人讨论意大利的文学，这些都成了他“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铁证。

在这个过程中，容国团感到非常的迷茫——他曾发自内心想去感受这场运动，参与这场运动，但他发现他不能，他实在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他甚至不断地去问队友：“你觉得我错了吗？”

1968年5月12日，情况变得更糟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一天发出了《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体育界进一步“清理队伍”有了红头文件的保障，而容国团因为之前做了两件事，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

第一件事，是因为他不愿相信自己的“引路人”贺老总会背叛毛主席，所以他被列入了“铁杆保皇派”。

第二件事，就在“五一二命令”颁布之前，容国团代表队友们写了一封“请战书”，希望能参加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这被“造反派”认为是别有居心，要他写检查，交代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容国团知道，自己打球或者带队的希望被彻底断绝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巨大的噩耗传来：和容国团一样从香港过来的傅其芳（国家队主教练）、姜永宁（国家队教练），实在无法忍受被隔离审查后带来的种种羞辱，先后自杀身亡。

自杀的情绪，是会传染的。

尽管容国团是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当时队内并没有贴出针对他的大字报，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7

1968年6月20日的傍晚，容国团走出了北京市崇文区幸福大街9号楼的家门。

这天晚上，乒乓球队内照例是有“批斗会”的。

晚上九点，妻子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她：“容国团今天并没有来啊！”

晚上十一点多，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可能事情不妙了。她喊了一群容国团的朋友一起去龙潭湖附近寻找，但没有找到。

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国家体委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对方在电话里说，“可能是容国团”。

黄秀珍在养鸭场的那棵槐树下，见到了蒙着白布的丈夫的遗体。白布下露出的，是容国团一直穿的一双白球鞋。

容国团的好友郭仲恭走上前去，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但那个扣子系得非常结实，最终只能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做事向来仔细认真，那个扣子，可能是他留给人世间最后的一件“作品”。

公安人员从槐树前一地的“大前门”烟头判断，容国团曾在树下徘徊了至少两三个小时。

在那段时刻，容国团究竟在想些什么？究竟是什么，让吼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世界冠军，最终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一种了断方式？

在容国团上衣的口袋里，人们发现了他的遗书：

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那一年，容国团还没满31岁。

馒头说

1978年，在容国团去世整整十年后，国家体委召开大会为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三人平反。

而在十年前，容国团用死都没换来自己的清白——造反派说他是“畏罪自杀”，不准开追悼会，遗体火化的费用由家属分担。

1987年，国家体委在容国团的老家珠海，给他建了一座雕像。

雕像里的容国团，右手捧着鲜花，左手捧着奖杯，微笑着看着远方。

这座雕像，目的应该是让人记住我们曾有过这样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

但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在警醒所有人，容国团身上发生的悲剧，永远、永远、永远不要再在中国上演。

读者评论

子曰：外婆曾经说过，我要活着，只有活着才能看到结局。她做到了，活得比整她的那些人都长，看到了他们的结局。

Shelley：性格决定命运，一点儿没错。容国团应该是想法比较简单、性格单纯的人，这样的人在找到了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以后，会心无旁骛地投入，立定决心取得成就。可是当环境发生了变化，他的弦绷得很紧，比较容易断，因为执着、单纯，更无法接受当时那些本就荒唐、没有逻辑的种种，也无法相信这样的事情终于会有反转的一天。大清早的，看得好难过，本来这样性格的人，如果有合适的支持，在自己的专业上该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啊！却走得这么委屈。

烟小火：我们常说珍惜生命，不能轻易放弃，但没有经历过当时世界观的崩塌，不会理解那样的日子有多难。31岁年轻、光辉的生命，谁能还给他？

66：馒头用冷静客观的语言，讲述这些客观的历史事件，却总让我热泪盈眶。我们热爱祖国，热爱这片土地，希望这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牛奶巧克力：可怕的不是肉体的摧残，而是精神的崩塌。

坚挺的独苗：看到那句“张五常凭借那招发球在加拿大拿到了乒乓球冠军”，不得不说我国乒乓球实在太厉害了。留学的时候我和中国同学打乒乓球，也没认真打，旁边一个老美大概觉着我们打得挺烂的，要切磋两局，两局球我俩总共让他拿到3分。

这届奥运会，全世界近一半国家不愿参加……

我一直说，体育无法摆脱政治，奥运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而在奥运会的历史上，这届奥运会，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1980年7月19日下午两点，莫斯科列宁中央体育场。

天空中飞过6架飞机——既不是战斗机，也不是客机，而是喷洒药剂的飞机。这6架飞机喷洒药剂的目的，是为了能驱散天空中的乌云。

因为就在飞机的下方，自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开办以来到1980年为止，历史上投资最大的一场奥运会徐徐拉开帷幕。

但不能用“最盛大”来形容。因为这届奥运会，国际奥委会147个成员单位里，有63个抵制参赛，只有81个派运动队参加了比赛——其中还有14个国家不愿意打本国国旗，只愿意使用奥林匹克旗。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这是奥运会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却成了奥运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届。

这就是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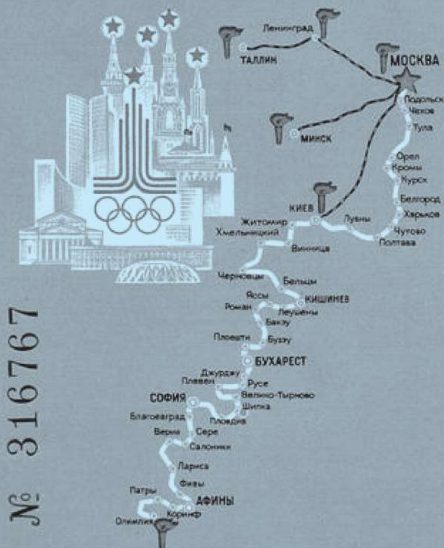
莫斯科是在1974年击败了竞争对手洛杉矶，获得198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

彼时的世界大环境，恰逢美国刚从越战的泥沼中拔腿，士气低落，而苏联进入全球扩张的巅峰期。莫斯科又是苏联的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为了彰显国力，苏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办好这届奥运会。

为了举办这届奥运会，苏联政府大兴土木，把莫斯科的大型体育场从原来的50多个增加到近70个，中小型体育馆从1300多个增加到1600多个，再新修30多个游泳池，外加各种城市建筑、交通运输的改善。据统计，为了这届奥运会，苏联一共砸进去大约90亿美元。90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莫斯科奥运会之前的一届蒙特利尔奥运会，总预算是1.1亿美元，结果大大超标，花了15亿美元左右，创造了奥运会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名词："蒙特利尔陷阱"。巨大的亏空使得加拿大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把债还清。

为了凸显特别的纪念意义，莫斯科奥委会还专门把这届奥运会的举办时期定在1980年的7月19日至8月3日，这恰好是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举办时间。

两届奥运会举办日期完全一致，这在奥运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赫尔辛基奥运会是苏联首次派代表团参加的一届奥运会。





莫斯科奥运会的邮票，吉祥物米莎熊

投入巨大，耗尽心机，苏联人是发自内心地想奉上一届史无前例的奥运盛会。

但是，就在奥运会开幕前夕，阴影袭来。而让这届奥运会蒙上阴影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人自己。

3

1979年12月27日，对阿富汗“忤逆”自己意志已经“忍无可忍”的苏联，终于悍然出兵。

10个师的苏联军队大举入侵阿富汗，很快就占领阿富汗全境。这种公然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让全世界哗然，指责声四起。



阿富汗战争期间，反苏的阿富汗游击队得到了美国的大力资助，让苏军吃了很多苦头

后来的事实证明，阿富汗战争之于苏联，就等于越南战争之于美国，同样成了一个“不断流血的伤口”，导致苏联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但在一开始，苏军进展顺利，苏联当时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是信心满满的，他根本不会预料到这场侵略战争之后会为苏联带来各种苦果。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

而首先成为牺牲品的，就是苏联人精心筹备的莫斯科奥运会。

因为开始有人站出来呼吁，抵制这届奥运会。

第一个站出来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竟然是一个苏联人。但他不是普通的苏联人，他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他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

随后，在1980年1月14日，美国的总统卡特开始响应萨哈罗夫，警告苏联必须撤军阿富汗，否则将会承担一系列后果，包括美国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



《吉尼斯世界纪录》（1991年版）称，勃列日涅夫是“世界获奖章最多的人”，共获得苏联勋章15枚、奖章18枚，外国勋章42枚、奖章29枚。其中，苏联最高军功章“胜利勋章”和波兰“勇士勋章”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被剥夺

1980年1月26日，加拿大总理乔克拉克宣布，他们同美国一样，如果苏联军队不在1980年2月20日撤军阿富汗，就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说实话，勃列日涅夫对这些警告并没有放在心上，美国的反对没有出乎他的意料，而在他的估计里，最多是美国和它几个核心“仆从国”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这在苏联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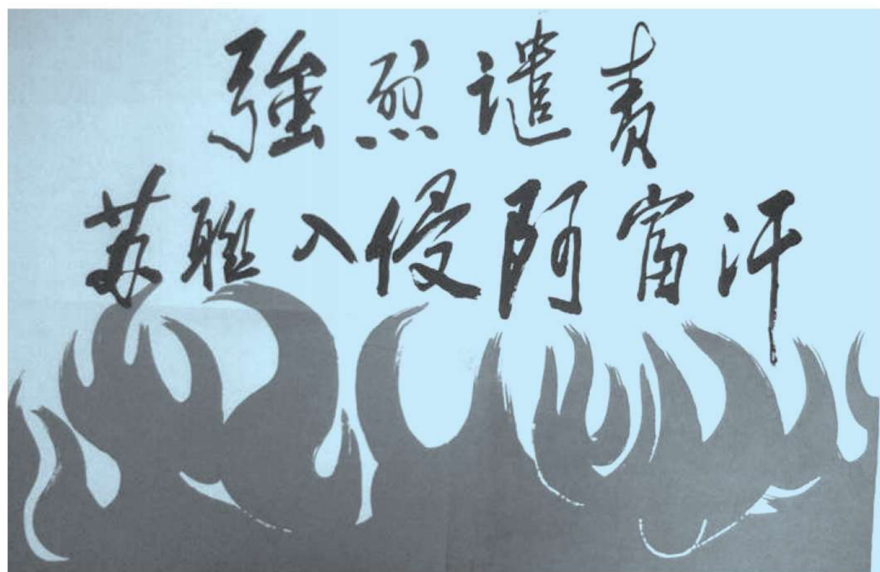
但等拿到莫斯科奥运会参赛代表团的最终名单时，勃列日涅夫还是

大吃一惊：147个国际奥委会成员国和地区，有63个国家和地区宣布不参加本届奥运会，超过全部总数的五分之二。参加国家的数量，居然还没超过20年前的罗马奥运会。

而在那些抵制的国家中，有一个颇让苏联尴尬的国家——中国。

在1979年10月的国际奥委会名古屋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合法席位——这意味着中国可以第一次正式而完整地参加奥运会了。

但是，中国奥委会在1980年4月24日发布公告：放弃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给出的理由是：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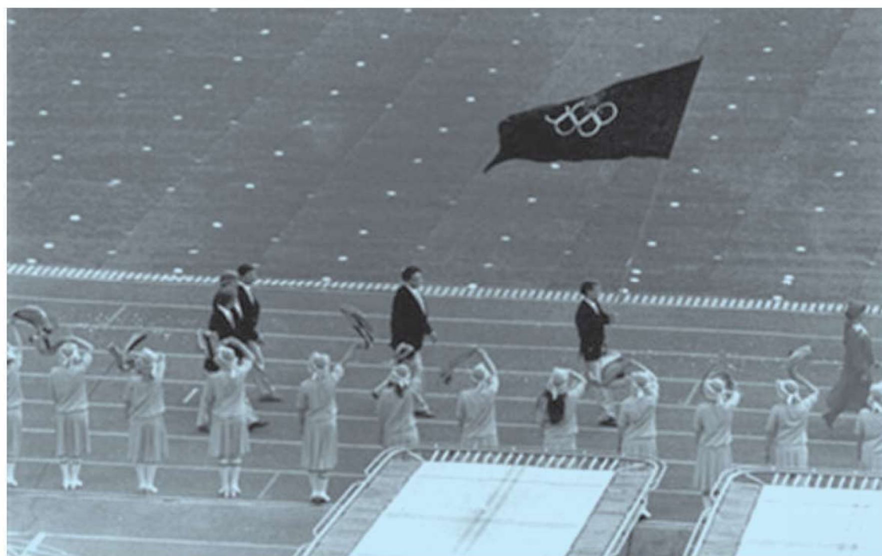
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海报

4

盛大的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式，就在尴尬的气氛中徐徐拉开帷幕。

在开幕式的代表团入场式上，有10个队没有派运动员参加，只有旗手孤零零一人入场。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在内的14个国家，没有打出本国的国旗，而是在奥林匹克旗帜的导引下入场。而新西兰代表团入场时，还打出了一面黑色的奥运五环旗。

在开幕式的奥林匹克会旗交接仪式上，按理应该是上届东道主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市长亲自赶来交接会旗，但因为加拿大也参与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所以蒙特利尔市的市长并没有来，只是派了一名代表。



入场式上，新西兰代表团打出了一面黑色的五环旗

开幕式结束，各项比赛在各个赛场如火如荼展开，但尴尬并没有结束。比如，在自行车4000米个人追逐赛中，瑞士、法国和丹麦三个国家的运动员分获前三名，但为了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三个国家均拒绝在本届奥运会上使用本国国旗和演奏本国国歌，最终只能升起奥林匹克会旗，奏响会歌。

这样的情况，在各个赛场的颁奖仪式上层出不穷。



而比赛成绩呢？

由于体育强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家全都加入了抵制行列，使得莫斯科奥运会的比赛水平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男子游泳13个项目有12项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但在莫斯科奥运会，只有一项世界纪录被打破；马术比赛的各个项目，上届奥运会进入前六名的14个国家，13个没有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曲棍球比赛，上届奥运会的前五名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在体操等一些主观打分项目中，其他国家运动员经常抱怨东道主选手得到“照顾”。罗马尼亚《火花报》在7月25日女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后发表主题为“玷污奥运会精神”的文章，指责“裁判员们粗暴地践踏了体育道德和奥运会精神，在众目睽睽之下夺走了她（指罗马尼亚体操女皇科马内奇）的金牌（苏联运动员获得冠军）”。

到了1980年8月2日奥运会比赛全部结束的时候，奖牌榜的情况是这样的：苏联毫无悬念地排名第一，共获得80枚金牌、69枚银牌、46枚铜牌；民主德国排名第二，获得47枚金牌、37枚银牌和42枚铜牌。



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14岁的科马内奇横空出世，一鸣惊人。在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上，科马内奇获得了两金两银的成绩，但她认为自己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此以后，她一直拒绝在苏联进行任何体操比赛

苏联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所获得的金牌数量，占到了莫斯科奥运会金牌总数的三分之二，以致有人评论：莫斯科奥运会的金牌贬值了50%。

在8月3日的闭幕式上，由于美国抵制了本届奥运会，会场没有按照惯例升起美国的国旗，而是升起了洛杉矶市的市旗。

在闭幕式的文艺表演上，本届莫斯科奥运会吉祥物米莎熊照例出镜，而人们惊奇地发现，米莎熊的左眼，流下了一滴泪水。

那一幕镜头，成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留给人们的最深刻印象。

5

忍不住再说一段后续。

似乎是命运有意地捉弄，1980年是莫斯科举办奥运会，1984年，轮到了美国的洛杉矶。

这回轮到苏联人要出口“恶气”了——苏联借口“安全问题”，宣布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不仅如此，它还四处笼络自己的“小兄弟”，希望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结果却令苏联感到失望，最终，只有18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东欧国家）选择和苏联站在了一起，而有140个国家和地区选择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届。

在参加的国家里，又有一个国家深深刺痛了苏联，这个国家，还是中国。

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洛杉矶机场，是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尤伯罗斯亲自到机场迎接的，据说他还激动地说了一句美国式的夸张的话：“你们拯救了奥运会！”

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为中国代表团射落第一金，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奥运会征程。

馒头说

“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

这是《体育颂》中的一句话，作者是现代奥运会奠基人顾拜旦。顾拜旦终身追求的目标，是让体育远离政治，让奥运呼唤和平。但是，随着现代奥运会关注度的逐步上升，它无可避免地会被政治盯上。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奥运会，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危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发生了以色列运动员被当作人质最后被枪杀的黑暗一幕；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因为种族歧视问题，很多非洲国家抵制了这届奥运会；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是高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遭遇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抵制；1988年汉城奥运会遭遇朝鲜、古巴、埃塞俄比亚和尼加拉瓜的抵制；直到1992年，冷战结束，巴塞罗那奥运会才实现了大团圆。

当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究竟应该怎么办？

很遗憾，直到现在，依旧没有一个圆满的解决答案。

事实上，当一些政治行为发生在奥运舞台上时，背后牺牲的，是为之辛苦四年的运动员的利益。

美国总统卡特宣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之后，就在运动员和教练层面引起了反弹，最终他只能把美国原本打算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邀请到白宫做客，并颁发纪念性的金牌。

当澳大利亚宣布加入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列之后，当时只有16岁的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丽莎·福雷斯特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知道，阿富汗战争是不对的。任何国家都不该入侵他国。但是，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我的理解是，苏联发动入侵后，7个月过去了，整个世界都不理不睬。为什么奥运会突然成了发表意见的舞台？”

是啊，为什么呢？

或许，有时候你只能倒过来想：如果没有奥运会作为一种态度的表达舞台，难道还真的用飞机大炮对抗吗？

体育好歹成了一个窗口和缓冲。

很无奈，不是吗？

读者评论

何家杰：看到丽莎·福雷斯特的话，立刻泪目。我们都这样，面对暴力与不公，没有抗争的勇气，却要以他人的牺牲来成就自己的高尚。说人家战争不对，然后集体沉默，最后牺牲掉运动员的青春和荣誉，表明自己的正义。歹徒作恶，“键盘侠”怒斥社会太冷漠，现实中却是那袖手旁观的一员……

飛：历史上没有一次非正义战争会最终取得胜利，非正义战争始终会遭到全世界人民唾骂，更会激起被侵略国人民的奋起反抗。德国不例外，美国不例外，日本不例外，苏联也没有例外……中国在这两次奥运会上的选择非常明智，不仅给了苏联人一记耳光，也给了美国人一颗糖。

刘小小：是苏联人自己觉得伤心，所以让米莎熊流泪了吗？（作者回复：我觉得苏联人可能当时表达的是“客人要离开了，我们依依不舍”的意思。）

没错！就是他“承包”了一届奥运会！

洛杉矶奥运会，绝对不只是值得中国人铭记的一届奥运会，它在整个奥运会历史上，都称得上一届里程碑式的奥运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说这届奥运会挽救了奥林匹克运动也不为过。

而这一切，可以说，都只是因为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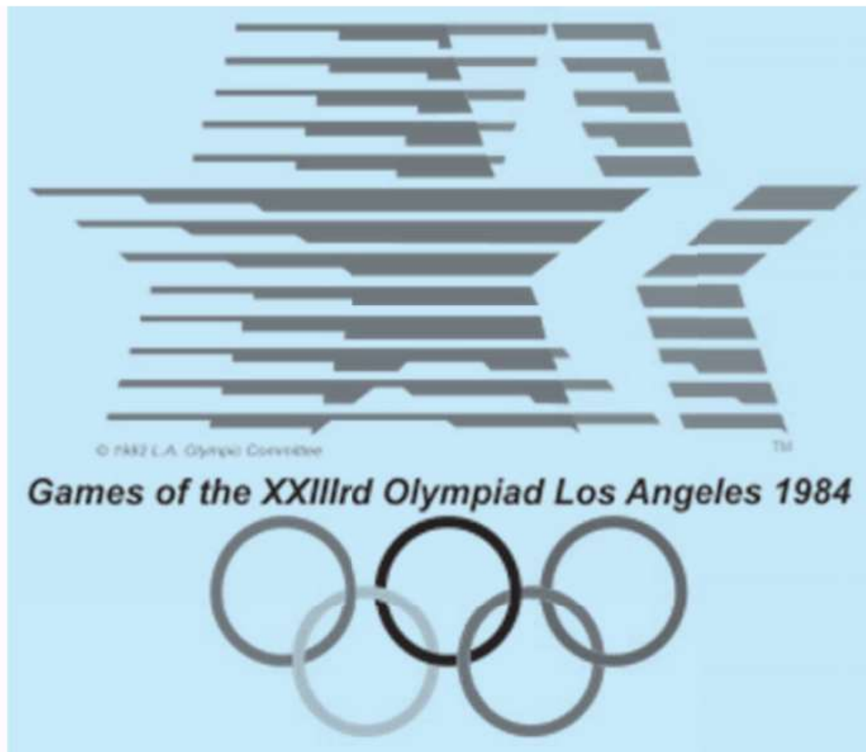
1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有一个观点曾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在20世纪结束之前，“奥运会”这个东西，肯定就消亡了。

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并非危言耸听。

从政治意义上说，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发生了以色列人质被劫持并被杀害的血腥事件；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大批非洲国家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全世界差不多五分之二的国家没有参加。

从经济意义上说，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亏空6亿美元；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亏空10亿美元以上，并贡献专有名词“蒙特利尔陷阱”；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没有公布盈亏数据，但估算投入为史无前例的90亿美元，肯定是巨额亏空。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会徽

一个运动会，办了既有政治风险，又要赔大钱，谁还愿意办？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的国际奥委会上，提出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城市，居然只有一家，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这个城市，就是美国的洛杉矶。



蒙特利尔奥林匹克运动场，是“蒙特利尔陷阱”的见证之一。当时造价高达5亿美元。当然，这座体育场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不过时

2

但洛杉矶奥组委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后，傻眼了。

为什么？因为不知道拿什么来办。

就在洛杉矶获得1984年奥运会主办权之后，洛杉矶爆发了大规模的市民游行，游行的诉求只有一个：不允许动用纳税人的哪怕一分钱，来填奥运会这个“无底洞”。

于是，加州政府在1978年11月通过一项法律：不允许动用公共资金来举办奥运会。

按照以往惯例，举办奥运会的资金，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政府财政支持；第二，发行彩票；第三，慈善募捐；第四，商业赞助。

政府财政支持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

彩票呢？洛杉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加州法律不允许发行彩票。

捐款呢？美国慈善机构不允许奥组委和慈善机构来争抢捐款。

那么，就只剩下第四点商业赞助了。但从历届奥运会举办来看，商

业赞助只是杯水车薪，主要还是靠主办国的财政拨款。

美国奥委会傻眼了，国际奥委会也傻眼了：难道这届奥运会要夭折？

无奈之下，国际奥组委被迫同意：洛杉矶奥运会可以和私营企业结合举办。

但就算同意，哪有这么好办？

美国奥委会最终决定面向全社会，招聘一位洛杉矶奥组委主席，来带领组织完成这届奥运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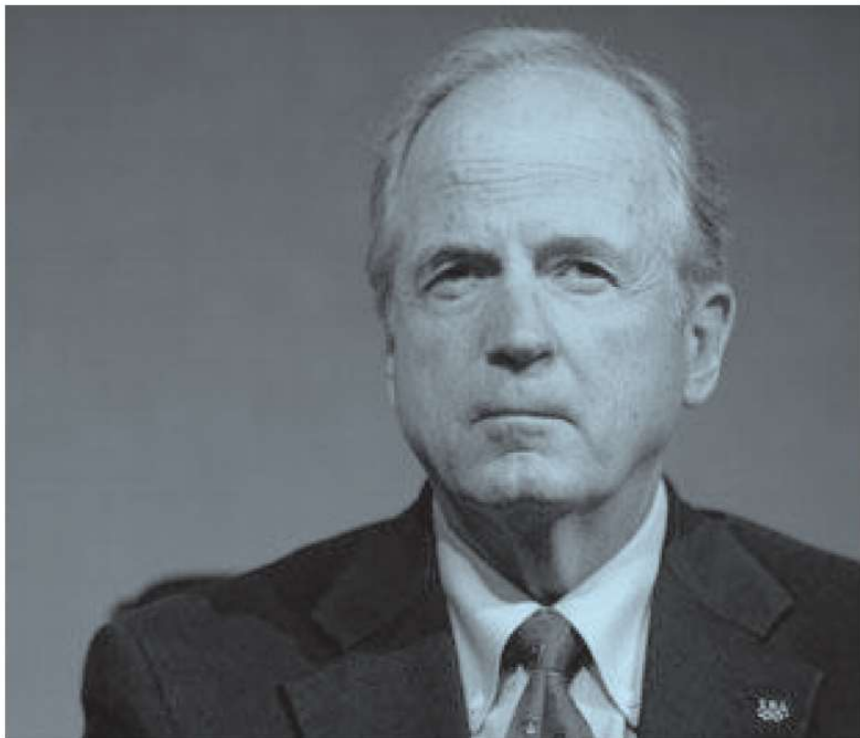
说是“奥组委主席”，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个“背锅侠”。

美国奥委会当时给出了招聘条件：这个人的年龄要在40岁至50岁之间，在洛杉矶地区生活过，爱好体育，具有从经济管理到国际事务等多方面的经验。

真的是有几千人来报名应聘，因为尽管充满挑战，但“洛杉矶奥组委主席”毕竟还是一个诱人的头衔，而领衔举办一届奥运会，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有的经历。

经过层层筛选，美国奥委会最终选出了一个人选，这个人让美国新闻媒体大吃一惊——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啊！

这个人的名字，叫彼得·尤伯罗斯。



彼得·尤伯罗斯

1979年，尤伯罗斯成为洛杉矶奥组委主席的时候，只有42岁。

尤伯罗斯1937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水球比赛的预赛（这也是成为奥组委主席的一个条件：必须有体育运动背景，并喜欢体育）。大学毕业后，尤伯罗斯一直在运输和旅游服务业发展，当时他创办的旅游公司，已经做到了北美第二的位置。所以，如果是经济上的回报，“洛杉矶奥组委主席”这个职位对尤伯罗斯的吸引力并不大，甚至还有风险。

当猎头公司找到尤伯罗斯的时候，他一开始也不是很乐意竞选这个奥组委主席的位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曾亲手投票，反对奥运会动用公共资金。

但是，他作为一个商人，在出于兴趣研究了历届奥运会之后得出了一个观点：除了政治利益，奥运会如果不能获得经济利益，那简直是荒谬的。

所以，除了一份人生经历外，尤伯罗斯更希望进行一次冒险：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但刚一上任，尤伯罗斯就遭遇当头一棒。尤伯罗斯一天早上去上班——组委会在洛杉矶一幢写字楼租的一间小办公室——却和他的同事们一起被锁在了门外。原来，房东听说这间房间租给的是洛杉矶奥组委，立刻就反悔了，哪怕尤伯罗斯提出先付一年的房租，房东都坚决不肯。

为什么？因为之前所有奥运会都是赔本买卖，这届奥运会又得不到美国政府的财政支持，房东认为肯定是巨亏，到时候肯定收不到房租。



洛杉矶奥运会的吉祥物

历经艰辛，最终还是依靠朋友的帮忙，尤伯罗斯和他那个近10人的“洛杉矶奥组委”最终找到了另一间小办公室。

接下来，尤伯罗斯自己花了100美元，在银行开了一个户头，作为奥组委的账户——在那一时刻，一届奥运会组委会的启动资金，只有100美元。

如果这届奥运会筹备工作是一个庞大演出的话，舞台下的评委们应该在这个时候适时伸出手：

尤伯罗斯，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尤伯罗斯第一个想到的筹钱办法，是向赞助商“动刀”。

奥运会很早就有了赞助商，但那种赞助，很多都只是“意思意思”。比如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赞助商，多达几百家，每家甚至只要付几万美元就可以成为奥运会的赞助商。

尤伯罗斯决定用“饥饿营销”改变这个历史。按照尤伯罗斯推出的规定，洛杉矶奥运会只允许拥有30家赞助商，一个行业只有一家赞助商可以入选，加入的门槛价是400万美元——上不封顶，价高者得。



尝到赞助奥运会的甜头后，可口可乐从此成为老客户（图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可口可乐的易拉罐）

这是一个让很多公司都无法拒绝的诱惑，因为这意味着成为奥运会的赞助商，就暗示了自己的品牌是相关行业的“NO.1”。

尤伯罗斯先找到了可口可乐公司，带的筹码是“百事可乐也在和奥组委谈判”这样的消息。为了避免竞争对手取代自己出现在奥运会上，可口可乐最终居然拍出了1260万美元的天价——光这一家赞助商出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莫斯科奥运会所有赞助商付出的总额（可口可乐公司还花费了4000万美元在奥运节目上做广告）。

当然也有不买账的，比如奥运会的老资格赞助商柯达胶卷。柯达公司为洛杉矶奥运会准备了100万美元的赞助款，已经是相当高了，但这只是尤伯罗斯定出的“TOP”级别赞助商赞助金额的四分之一。在谈判中，柯达公司不肯服软，尤伯罗斯转身就找了柯达的竞争对手富士胶卷。结果，富士胶卷以700万美元的代价取代柯达，成了洛杉矶奥运会的赞助商。也正是那届奥运会，让富士胶卷一战成名，柯达后来为此后悔不已。

在“机不可失”的恐慌情绪影响下，赞助商们开始为了“奥运会”这个标识挤破脑袋。不仅如此，尤伯罗斯还以发放许可证的集资手段，向43家公司发放了商品专卖许可证，允许这40家公司的产品在奥运会期间可以标上奥林匹克五环旗标志销售。这又带来了一笔巨大的收入。

在解决赞助商问题的同时，尤伯罗斯又对电视转播权“下手”了。

早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就开了出售电视转播权的先河，但收入并不是很多。到了尤伯罗斯手里，“独家转播权”再次成了一个筹码，让美国三大电视网陷入了不惜成本的竞价中。最终，美国广播公司（ABC）以当时令人咋舌的2.25亿美元中标。通过这个办法，尤伯罗斯还出售了海外独家转播权。

洛杉矶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最终一共卖了2.8亿美元，是蒙特利尔奥运会电视版权收入的10倍。

值得一提的是，在拍卖“电视转播权”之前，尤伯罗斯要求包括美国三大电视网在内的5家竞标电视台，每家先交75万美元的保证金。那375万美元躺在银行里，每天给奥组委产生数量可观的利息，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奥组委的财政困难。

除了开源，还要节流。

尤伯罗斯提出，奥运会不需要兴建大量的全新建筑，而是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建筑和场馆。这个提议一开始遭到国际奥委会不少人的反对，但尤伯罗斯一再坚持，使得这个方式成了后来奥运会的一个传统。

尤伯罗斯的洛杉矶奥组委在整个奥运会筹办工程中，仅仅是用私人筹来的资金兴建了4座体育场和一座在大学校园里的办公楼。而本来每届奥运会都要花大价钱兴建的奥运村，尤伯罗斯直接用加州两个大学的大学生宿舍替代了。

当然，尤伯罗斯能这么做，还是得益于美国的群众体育基础设施堪称全世界最好，洛杉矶的社区和各个大学本来就有不少设施完备的体育场馆。

不过，并不是尤伯罗斯每一个决断都是毫无阻力的。比如，他对被视为“神圣传统”的“奥运会火炬接力”也动起了脑筋。

首先，他要求火炬传递的路线要大大加长，要从欧洲的希腊传到美国东海岸的纽约，然后再横穿1500个城镇，跨越19000公里，最后到达西海岸的洛杉矶。



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杰西·欧文斯的外孙女吉娜·亨普希尔持火炬跑进主会场

为什么要把火炬传递路线拉那么长？因为尤伯罗斯规定：其中在美国境内的火炬传递，向公众开放报名。

你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奥运会火炬手吗？没问题！你无须是名人、官员或影星，是一般老百姓就行。但你要交钱——跑一英里，需要交3000美元。

这个决定无论是在美国奥委会还是国际奥委会，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尤伯罗斯凭借他的口才和观点，说服了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这笔钱我不用，全部用来投资奥运场馆的建设。

最终，萨马兰奇被说服了。而洛杉矶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最终居然筹集到了3000万美元。

这笔钱，确实被完全用到了奥运场馆的建设中去。但如果没这笔钱，就需要尤伯罗斯从其他赞助款中再挪过来，所以其实也是帮洛杉矶奥组委省了一大笔钱。



当年为中国代表团获得首金的许海峰

6

1984年7月28日，洛杉矶奥运会如期开幕。

成功吗？非常成功。

这届奥运会在赛场上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回忆，比如中国第一次组团

参加奥运会；卡尔·刘易斯获得4枚金牌，追平欧文斯的纪录；“跳水王子”洛加尼斯获得两枚金牌；女子马拉松首次进入奥运会，等等。

但对尤伯罗斯而言，大家考核他的是“经济账”。他完成得如何？

那个尤伯罗斯在奥组委建立时开的100美元账户，在洛杉矶奥运会结束后，变成了2.15亿美元——也就是说，尤伯罗斯办了一届奥运会，不仅没给洛杉矶纳税人带来任何经济负担，反而还创造了2.15亿美元的利润（一说是2.5亿美元）。

而间接带来的盈利远不止这些。据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格列格安德罗诺维奇统计：洛杉矶因奥运会获得了96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其中大约有1.4亿美元收归当地政府和加州州政府。

而在那2.15亿美元的直接利润中，有9000万美元流入洛杉矶地区的青少年体育基金组织。20年后，南加州的青少年体育运动仍然从这笔资金中获益。

关键是，在洛杉矶奥运会后，“奥运会申办权”再度成为一个“香饽饽”。1988年的奥运会，申办城市又恢复到了4家，并在此后开始被各个国家抢破头申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赢利4.97亿美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赢利4000万美元，创造26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赢利1000万美元，创造了5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所以，在洛杉矶奥运会后，国际奥组委向尤伯罗斯个人颁发了金质勋章。

曾有这么一句话：

顾拜旦开创了现代奥运会，而尤伯罗斯挽救了奥运会。

7

最后再加一个后续。

尤伯罗斯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成功，是不是因为运气特别好？

卸任洛杉矶奥组委主席之后，美国的职业棒球大联盟（MLB）直接就把尤伯罗斯请去做总管。在五年的任期里，尤伯罗斯又进行了一系列

大刀阔斧、前人想都不敢想的改革。

五年后，职业棒球大联盟的22支球队，全部扭亏为盈。

你看，牛人在哪里，都是牛气冲天。

馒头说

做记者的一大好处，就是能有与那些传奇人物面对面的机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在主新闻中心旁的一家快餐厅里，采访到了尤伯罗斯。

尤伯罗斯是专门赶到北京来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宣布参赛，让尤伯罗斯大大松了一口气（为拍卖赞助权和电视转播权增加了筹码），所以那天他对我开玩笑说："我欠中国一个人情。"

彼时的尤伯罗斯，意气风发，谈笑风生——他确实配得上他所获得的待遇和荣誉。

但是，随着奥运会的不断发展，所谓的"尤伯罗斯模式"其实正在遭遇考验。

以我采访的那届伦敦奥运会为例。从那届奥运会开始，各大赞助商的标志开始出现在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位置，包括运动员接受采访的各种背景——而在以前，那里除了出现奥运五环标志，是不允许出现其他赞助商品牌的。

作为观众，如果你在看比赛期间饿了，在体育场馆里是很难买到薯条的——不是没有，是只能在那家成为奥运会赞助商的快餐店里才能买。其他餐饮店，一律不准出售薯条。在伦敦街头林立的酒吧，你看不到任何奥林匹克、奥运会、五环、2012伦敦等字样，不是店主不想挂，是因为他们不是"赞助商"，一旦挂了就属于侵权，要被刑事处罚。

而另一方面，奥运会赞助商的负担其实也在加大。伦敦奥运会的一家顶级赞助商门槛已经达到了8000万美元，是洛杉矶奥运会时的20倍；美国广播电视公司购买伦敦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一共花了

39.1亿美元，是洛杉矶奥运会时的17倍。

赞助商要收回成本，值回票价，就只能将奥运会一步步变得更加商业化。

有人曾说，国际奥委会正在沦为各大赞助商的“监工”和“执行者”，更有人说，他们其实自己也早就“沦陷”了——盐湖城冬奥会申办丑闻等一系列新闻被曝出，证明了当奥运会成为“摇钱树”后，在国际奥委会内部也开始产生了大量腐败。

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或者说，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奥运会。

就像奥运会摆脱不了政治一样，奥运会同样也是离不开商业的——也没有必要离开。

但是，就像做很多事一样——

当我们已经走得很远的时候，还是不要忘了出发时的心态。

读者评论

王芷汀：奥运会从1984年走上赢利的商业化道路，越来越多的国家申办、越来越蓬勃发展，现在又渐渐开始衰退。2024年最终只有两城申办，国际奥委会不得不决定将2024年和2028年的赛事分别交由这两座城市举办。下一个挽救奥运的人在哪里呢……（作者回复：对。奥运会已经越来越“臃肿”，成本大到谁都负担不起了。下一个挽救奥运的人只能是奥委会主席，方法是“瘦身”。）

生生不息：总有人喜欢在别人成功后，进行各种分析然后得出结论：他运气好、机会好，换谁来也一样行。就像当年的米卢。但是，历史永远最公正，有些人，手握一对王和四个二，一样被打成筛子。

咖喱萌萌酱（∵）：对于自己喜爱的事物，总是有种矛盾的心理，既希望它能多赚钱带来回报，又不希望它赚太多而改变本质。

24年前的那个“北京一夜”

北京申办过奥运会吗？当然，不申办，怎么举办？

但北京申办过两次奥运会，那个第一次申办失败的故事，还有多少人记得呢？

1

1993年9月23日（北京时间24日凌晨两点27分），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路易二世体育场。

在国际奥委会的101次全会上，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了一个信封。

这是一个决定2000年奥运会最后由哪个城市主办的信封。

在最后一轮角逐中，有两座城市，已经将其他竞选城市远远甩在身后——最后的主办城市，将在这两座城市中产生。

一座城市是悉尼，还有一座城市，是北京。

“悉尼！”当这个单词从萨马兰奇口中被读出的时候，现场的中国代表团一阵寂静。



萨马兰奇

在此之前，北京的票数是一路领先的。

在新千年的交汇之际，北京与期盼已久的奥运会就这样擦肩而过。

在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这段历史可能已被不少人忘记，而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已不知道这个故事。

但在当时，这个消息确实震动了中国。

2

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当时中国是志在必得的。

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从综合国力上说，已经具备了承办一届奥运会的条件。而且单从举办体育运动会上看，北京刚刚成功举办了1990年亚运会，无论从体育设施还是赛事承办，也展现了成熟的能力。

1991年2月，北京市向中国奥委会正式提出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随后在1991年12月向国际奥委会和有关的国际体育组织通报了北京

的申请。



1991年5月13日，北京惠侨饭店举行了“北京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挂牌揭幕仪式，标志着北京奥申委正式成立

1992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口号：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同时还有其他辅助的口号："中国的机遇，北京的荣誉"、"历史名城，时代盛会"，以及在2008年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都熟悉的一句口号："北京欢迎你。"

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发自内心地投入到这场申奥的活动中，神州大地，各路人士，各种活动，紧扣的都是一个主题：申奥。

当年的申奥著名歌曲之一，歌名叫《奥林匹克风》。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歌手的着装都好老土，歌曲曲风也显得过时。但当时，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几乎人人会哼（我还是觉得很好听，歌词也很好）。而这首集合了苏芮、解晓东、毛阿敏、齐秦、张雨生、那英等当时大腕（也是实力唱将）的歌，也是最早的"群星版"之一了。



当时的明信片



当时发行的纪念币

可能也因为是信心十足，所以国家的各类媒体也乐于放大大家申奥的热情，以及对举办奥运的期盼——这确实是当时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声音。



1993年夏，10万面宣传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彩旗飘扬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

所有的申奥造势活动，在1993年9月达到了顶峰。然后，就迎来了9月23日决定北京命运的投票之夜。

9月23日的投票，是国际奥委会91名委员，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第一轮投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被淘汰。第二轮投票，德国的柏林被淘汰。第三轮投票，英国的曼彻斯特被淘汰。

还剩下北京和悉尼。

前三轮，北京的票数都是一直领先的。

但最终决定命运的第四轮，悉尼胜出，北京被淘汰。



公布结果那一刹那的澳大利亚申奥代表团



当时失望的中国助威团

3

北京申奥失败。

这个消息传回国内，很多国人都不相信：怎么可能？假消息吧！但这是事实。

关于北京申奥为什么会失败的各种说法，由此开始在街头巷尾流传。

当初最流行的一个版本，是北京最终在第四轮以1票之差输给了悉

尼。

其实在第三轮曼彻斯特被淘汰后，北京的败局已经确定——投给曼彻斯特选票的奥委会委员，在第四轮基本上都会把自己的票投给悉尼。

但最后这一票究竟差在哪里呢？当时很多人相信，是因为朝鲜在最后“背叛”了我们，把自己的那一票投给了悉尼。

事实上，每个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票投给谁，都是全程保密的，所以关于“朝鲜背叛”的说法，只是基于猜测。但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倾向于相信？是因为当时的国际背景，似乎很有说服力。

1992年8月24日，中国和韩国正式建交，这对中国而言是对外交往的重要一步，但对朝鲜而言，却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在中韩建交前，朝鲜采取了各种反对措施，但最终没有阻止中国走出这一步。

随着中韩建交，中朝关系开始迅速变冷。很多人猜测，作为报复，朝鲜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悉尼，而不是和自己曾经有“牢不可破友谊”的中国。

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而且，后面的投票结果显示，北京是以43比45票输给了悉尼，北京其实是输了两票（可以有弃权票），也就是说，就算是朝鲜不投给悉尼投给北京，最多也是打平。

于是，又有不少人猜测，还有哪个应该投给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最终没有投票给北京。

很多人又把目光放在了台湾。

4

持这个观点的代表，是台湾的李敖。

李敖认为，当时台湾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没有把关键的一票投给北京，理由是台湾当局在9月初做出公开声明：“北京申办奥运会，台当局立场认为其所具备的条件并不成熟，可是投票是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个人决定，当局会尊重他的权利与决定。”

真的是吴经国没有投北京一票吗？吴经国在他2005年10月出版的

《奥林匹克中华情》一书中，透露了幕后的故事。

在前往国际奥委会开会投票前，吴经国当时做出的表态是：“我这一票的考量有两大因素，第一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第二是为了奥林匹克发展的利益。”

他对自己当时说这话的解释是：“环顾当时岛内政治环境的敏感、复杂，如果直接道出我所支持的对象，实非明智之举，而客观地提出我投出这一票的前提条件，自认不失为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好办法。”

吴经国还回忆自己在出发前，父母亲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这次投票，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中国人。’他们并未明说要我支持北京，但他们眼中的期待，我了然于胸。”

最后，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吴经国当时把自己所写的选票用照相机拍成了照片。上面写着：“BEI JING”。

5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北京最后以两票之差败北呢？

当时的中国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也是中国申奥代表团副团长的何振梁这样分析：

第一，当时埃及的奥委会委员和中国关系很好，虽然年纪很大，但表示坐着轮椅也要来投票支持中国。但临行前身体实在不允许，最终没有成行。

第二，保加利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的女婿，表示一定要投票给北京。但投票前，保加利亚政局发生了变化，这位委员受到牵连，也没能参加投票。

第三，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翰·考兹在1999年时自己承认，当时作为澳大利亚奥申委的成员，他在9月22日投票选举的前夜，塞给了肯尼亚和乌干达的两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每人3.5万美元现金（据新华社1999年1月22电）。而非洲的这两票，原本被北京认为是“铁票”。

1993年10月1日，邓小平对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说：“申办不成，没有关系，总结经验，但要警惕有人捣鬼。”他说：“西方什么允诺

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没有拿到的就不要信。”

但北京最终没有成功申办，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止这些。

1993年6月10日，在投票表决前3个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决议案，反对在北京或在中国其他地方举办2000年奥运会，要求国际奥委会美国委员投票反对北京。接着，欧洲议会也通过决议，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9月17日，投票表决前5天，几家国际通讯社分别发出消息说，北京奥申委一位领导人（指的是申奥代表团副团长张百发，当时他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在8月31日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使北京申办失败，我国会加以报复，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一时之间，国际舆论大哗。但事实是，张百发当时的原话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美国进行报复，但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一贯支持奥林匹克运动。”

但是，澳大利亚电视台却把后面半段给掐掉了（后来萨马兰奇专门请何振梁开了新闻发布会澄清此事）。

霍英东的儿子霍震霆当时作为北京奥申委代表团的一员奔赴蒙特卡洛，他后来回忆，外国记者向北京奥申委提的问题，多是政治性的，与体育无关，攻击性很强。

这就是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

这也可能是北京当时没有圆梦的最主要原因。

6

何振梁曾回忆起当时那一夜，自己的内心感受。当萨马兰奇宣布获胜城市是悉尼的时候，他看到了台下北京申奥代表团同志们凝固的表情，他说他当时心里特别难受。

但他的第一反应，必须是先向身边的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高斯珀表示祝贺。

大会结束后，他告诉自己绝不能垮，一路上对向他表示安慰的委员们表示感谢。回到代表团驻地，他先向代表团成员介绍了整个投票的经过，然后回到了房间。

回到房间后，他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女儿说她哭着看完了电视转播的全过程，她难以接受这个结果，说爸爸妈妈多保重，我爱你们。那一刻，何振梁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



申办结果公布时的中央电视台转播中心现场

馒头说

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9月24日的那个凌晨。

那一夜，才上初中的我，调好闹钟，准时把自己闹醒，打开电视收看最后的申奥投票结果（可见后来我为何毕业就做了体育记者）。

我当时特地拨开窗帘看了看外面：很多家的窗户都透着亮光。

我也清楚地记得，当萨马兰奇用英语念到“北京”的时候，小区里顿时就响起了鞭炮声——放鞭炮的人肯定以为，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赢了。但其实，萨马兰奇只是先用英语在介绍参加本次申办的城市的名字。

当萨马兰奇说出最后获胜的是“悉尼”的时候，我感觉世界一下子就

凝固了。当时我就愣在了电视机屏幕前。

真的，当时谁都没想到。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真的是太自信了。当时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只要能万众一心干一件事，就不可能干不成！

但1993年的申奥失利，恰恰给国人的那种自信降了温。从这个角度说，当年的申奥失利，也有积极的一面：让我们进一步认清了自己，以及当时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从那时起，如何在国际上展示自身形象，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开始被重视起来。

一方面，我们开始认清一点：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崛起或复兴的道路上，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异样目光乃至不公正的对待，关键是自己如何面对，以后如何避免。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在我们自己的眼里是一个样子，但在别人的眼中却是另一种样子——别人的一些批评固然是有失偏颇乃至无中生有，但有一些批评，也值得我们自己自省和重视。

2008年，北京“鸟巢”上空绽放的漫天烟火，向全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国完全有能力奉献出一届出色的奥运盛会——那一刻在现场的我，脑海中真的浮现出了当年那个在电视机屏幕前呆若木鸡的自己。

24年过去了，时间见证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征程。

这个征程绝非坦途，甚至荆棘重生，但只要正视自己的弊端，坚定自己的信念，多做实事，少走弯路，我们终会迎来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道阻且长，但终点可期。

读者评论

一枚生活：1993年的今天，我大学毕业刚刚去北京工作。家乡的大嫂的预产期就是这一天，爸爸写信给我说，如果申奥成功了，就给孩子取名申奥。小侄子平安降生了，我们的申奥却失败了。听到悉尼获胜那一刻的失望，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小baby今天24岁了。当年给我写信的爸爸，过两周也八十大寿了。老爸当了一辈子的老师，喜欢读历史题材的书，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我，前些天托国内的朋友帮我买了一本

《历史的温度》寄给他。两天前跟家里视频，老爸说很喜欢，准备读完后再读一遍。

LT：我跟大师年纪差不多，至今还记得那一夜。后来工作后参加培训，学习沟通这个词的真正含义，1.我说；2.我说的你懂；3.根据你的反馈不断调整我说的话。当年的我们一直有点自说自话，集中精力我们想干什么就一定能干成，客观地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外国人眼中是什么形象，这个教训无疑是深刻的，当年对全国人民的打击也是巨大的，不过重要的是吸取教训从头来。8年之后我们成功了，这8年国家做了很多marketing promotion（营销推广），在国家层面上，除了展示实力，还有柔性的一面。2008年3月我去法国出差，当时正是火炬传递过程中出了好多不好的新闻的时候，西部的几个省也出了乱子，有法国同事认真地问我关于西藏的问题，可惜当时自己英语不好，真的无法从政治经济历史各方面给他们解释，也深深意识到了，即使拿下主办权，路也还远，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太多，需要很长时间。

ANN：1993年的9月我在重庆，大四刚开学。那天晚上学校的阶梯教室挤满了兴奋的人群，只听到一串英文中夹了一个北京，都以为是我们赢了，欢呼声响彻了偌大的教室。可是过了一会儿周围有同学在说，错了错了，是悉尼赢了，北京没得！我想，那种从云端跌落到深谷的失落感，在场的每一个同学永远都忘不了。如今24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恰同学少年散落在天涯海角，馒头的这一篇文章让我忆起了24年前的青春年华。亲爱的同学，游历半生归来，愿你仍是少年！

Sherry：那一夜我也彻夜无眠，至今还能找到当年的日记里记录的宣布结果的那一瞬间和痛苦难受的一夜。随后几年没想到我竟和澳大利亚结下了不解之缘。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传递的时候，身边的朋友们也都积极地去堪培拉守护我们的火炬传递，与“藏独”分子抗争。时过境迁，不变的是西方对我们的一直以来的敌意，而我们早已一日千里，把它们远远甩在身后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办奥运了，国力的提升，人民素质的提高，不需要用奥运会来证明自己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张玮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
ISBN 978-7-5086-8528-1
I.①历…II.①张…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3054号

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著者：张玮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77千字
版次：2018年2月第1版
印次：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86-8528-1
定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历史的温度/3

时代扑面而来，转瞬即成历史

馒头说历史

张玮 著



严复的人生，

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他当过两届中华民国大总统，

为何我们却并不了解他？

一个符号化偶像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

从宏大的叙事，

走向历史的细节，

寻找时代的真实故事。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自序

上篇 大变局时代

他坚守气节客死他乡，却为何还是背了“千古骂名”？

是非成败丁汝昌

末日孤舰“海圻”号：大清帝国的最后荣光

提督的抉择：是死，是死，还是死？

中国第一个蒙难的新闻记者

一个皇帝的“过山车之旅”

双面张作霖

他当过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你却未必了解他

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名士”于右任

曾拥有诸多“第一”，但她未必被人记得

中篇 以国家之名

上海1937：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7，南京城里的纳粹旗

猎杀山本五十六

丘吉尔的另一面

“偷袭珍珠港”之后……

1944，刺杀希特勒

纳粹德国其实“投降了两次”，你知道吗？

日本为什么会挨第二颗原子弹？

刺杀汪精卫

料得年年断肠处，不敢忆，长津湖

一个传奇女间谍的“七重面纱”

川岛芳子：从格格到间谍

下篇 人性的抉择
达·芬奇真的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吗？
切·格瓦拉：一个符号化偶像背后的真实故事
人神之间吴清源
梵高之死
能称“时尚女王”的人不多，她算一个
一位女明星的神秘死亡
中国人最熟悉的那个欧洲公主，真的幸福吗？
戴安娜之死
俄罗斯方块：一款小游戏背后的隐秘故事
到底是谁发明了电话？
你知道当年在报纸上登广告有多难吗？
老祖宗考试作弊的那点儿事
哈得孙河上的奇迹
人类悲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背后的阴影
巨轮沉没的那一刻……
逃离德黑兰
附录 读者评论
版权页

自序

时隔11个月，《历史的温度3》又和大家见面了。

其实按照我的公众号“馒头说”的存稿量，一口气再出个5本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总觉得，还是细水长流比较好。就像现在这样：每年有一到两本书和大家见面，写序的时候，就像给大家写信一样，聊聊家常，唠唠嗑。

首先有一件事要向大家说声抱歉：在顽强抵抗了两本之后，第三本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书涨价了。

其实早在第一本书出版之前，我和出版社就有过争论，最后他们听从了我的意见，把价格牢牢按在了50元以下。我也知道，以这样的装帧和厚度，这个价格确实不算高，但我个人希望，相对于其他方面的回报而言，能有更多的人愿意读这本书，这是我最看重的。在坚持了第二本同样定价之后，这次我的出版社编辑告诉我：“实在顶不住了……这两年纸张成本上涨实在太夸张，同样装帧的书，页数比我们少的，都卖到68元一本了……”

说实话，我对出版社也感到有点歉疚。所以，经过协商，第三本的价格有所上调，最终定在了58元一本，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这次的第三本书，一共收录了39篇文章。和前两本一样，分类始终是个难题：因为写公众号的时候，是按照“历史上的今天”写的，而不是按照书的模板规划的，写到哪件事就是哪件事，所以一旦归纳成书，还是有点难度。

好在我的编辑还是有水平的，硬是分成了“时代”“国家”“人性”这三大类，然后“排排坐，分果果”，挑了一批文章进去，基本上还是比较贴切的。当然，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题材还是相对集中在中国的近代，当然，本书这次也收录了不少外国的故事。

于是就要说到本书的“上篇”那个名字：“大变局时代”，还是很感慨。

即将过去的2018年，确实是一个多变之年——无论从大环境，还是小环境。尤其是临近岁末年终，一批名人相继离世，其中也包括我尊敬且喜欢的作家。如果你今年在搜索引擎输入“一个时代的终结”，估计能搜出好多条完全不一样的新闻。

其实，哪一年又不是这样呢？时代总是在不断前进，有人登台，有人离场。

对于我个人来说，2018年也是变化很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告别了职场，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其实在第二本的自序里，我已埋了伏笔。）而“馒头说”的公众号也运营到了第三个年头，以365天为一年，我已经完成了“二周目”，正在向自己定下的目标前进——一年中的每天都至少写过一篇“历史上的今天”。（目前可能还差30多天。）

当我在写这篇自序的时候，手机上的微信群图标正在闪烁。

经过长期考虑，今年我还是创建了属于“馒头说”和“历史的温度”系列图书的读者群，大家在里面聊古谈今，热闹非凡。我在建群时说过一句话：

“缘分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大家来自天南地北，之前互不相识，却因为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了一起，然后进了群，感觉就像已经认识多年的朋友。”

是啊，在这个呼啸而来的时代面前，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难免会感到有些无所适从，甚至有些茫然失措。而除了自己内心的坚强之外，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心意相通的人能一起沟通、分享和相互鼓励，也应该是激励我们勇敢前行的一个重要动力吧。

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通过在公众号上写文章，得到了一批不断鼓励我写下去的读者，而通过书的出版，又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读者。

今年读过一本小说，是日本作家石田衣良写的《孤独小说家》，书中那位男主人公第一次去做签售，一方面觉得很忐忑，一方面又觉得毫无必要：为什么要去见读者呢？

但等他真的到了书店，看到了那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专门前来，

甚至从外地赶来的书迷，从老人到孩子，从公司白领到家庭主妇，有的还带着礼物，他顿时觉得原本距离遥远的“读者”顿时一个个都鲜活起来，感觉真正和他们产生了联系，所以愿意满足他们每一个要求，并且心怀感激。

这份对读者的感激之情，也正是我的感受。

这两年多来，我自己也经历了不少事，每天下班之后继续写文章更新公众号，往往要凌晨3点才能入睡。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还坚持得下去吗？但还是一路走了下来，我想，那是因为有你们。

在《历史的温度3》问世之际，再一次感慨自己的幸运——能得到各位读者一直以来的宽容、鼓励和支持。

谢谢你们！

2018年11月17日凌晨

于上海

上篇 大变局时代

他坚守气节客死他乡，却为何还是背了“千古骂名”？

这个人，历史教科书里有，不过在提到他为数不多的几笔中，他给人的印象是“封建迷信，迂腐透顶”，然后是一句著名评语：“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但如果仔细去了解一下他的故事，你会发现教科书说得倒也不错，却似乎又缺了些东西。

1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终于攻破了广州城。

这是英法联军继1856年之后，第二次攻破广州城。而1856年由进攻广州开始的那场战争，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有一个官方的称谓——“第二次鸦片战争”。

只是这第二次攻破广州，是真正地破城了。

城破之后，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先后向英法联军投降。不过，侵略者们知道，这两人并不是当时广州城的最高领导。

几天之后，英法联军在广州城老城的督抚衙门里，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人。



叶名琛像（版画）

那个清朝官员头戴顶戴花翎，身穿正式官服，端坐在朝堂之上，仿佛面对的不是荷枪实弹的英法联军，而是前来击鼓鸣冤的百姓。

英国士兵一拥而上，将那个清朝官员带走了。走的时候，那位官员面不改色，步履从容。

他就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2

说叶名琛年少成名，应该是不错的。

叶名琛出生在1807年，17岁就考取了贡生，获得了进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资格。叶名琛长大后并没有“泯然众人矣”，而是呈火箭式蹿升，在不到40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广东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干

部。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在广东当官是个肥差，但1840年之后，到广东当官，是个尽人皆知的苦差。

为什么？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作为战败求和的结果，广州位列“五口通商”的城市之一——去了那里，就要和洋人打交道啊。

然而叶名琛在这一个岗位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各省巡抚因为与洋人打交道不利而纷纷被降职甚至罢免的年代里，叶名琛却不断立功，不断升迁，堪称那个时代的一个奇迹。

靠什么呢？无非两个手段。

第一个手段，就是对内杀人如麻。别看叶名琛出身书香门第，在教科书上表现得迂腐懦弱，但其实他杀起人来一点都不含糊。

1854年，佛山“三合会”起义，围攻广州不果后撤退。叶名琛在此后开始大肆逮捕屠杀起义人士。

当时，曾带领第一批中国儿童留洋的容闳刚刚回国到广州，他目睹了这一场大屠杀，表示难以置信：“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茁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

容闳的住所离广州刑场很近，所以他印象深刻：“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且因骤觅一辽旷之地，为大圹以容此众尸，一时颇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按容闳的说法，叶名琛杀人，“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入屠肆”。

清朝末年，各地起义不断，广东地区尤为突出。在镇压各路起义中，叶名琛就是凭借这样的强硬手段，深得朝廷赏识。

1852年，在叶名琛45岁时，就做到了两广总督——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广东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再加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广西军区司令员。

3

叶名琛深得赏识的另一个手段是对外的，就是对洋人“拖”字为先。

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大清帝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通了自己5个口岸城市。其中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都陆续在城内开通了领事馆，但在最早接触的广州，洋人却碰到了大阻碍。

广东人在抵制洋人这件事上，非常团结。自“三元里抗英”事件之后，广东人对英国人入城开领事馆一事一直强烈抵制。

“拖”字诀的首倡者，是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1847年，耆英与英国人秘密达成条约：广东人民太剽悍，你们给我点时间，两年之后，必定按照约定让你们进城！

结果英国人眼巴巴地等啊等，等到了1848年，耆英通过在京城活动，得以调离广东，拍拍屁股走人了。接着徐广缙担任两广总督。徐广缙也不触怒英国人，照例用了一个“拖”字诀。不仅如此，徐广缙还秘密召集广州各乡的团练，一度人数超过10万人，他们经常驾小船攻击英国船只，让英国人不敢惹众怒贸然进城。

拖又拖不起，打又不敢打，当时英国人只能不再提入城之事。

消息传回朝廷，咸丰帝龙颜大悦：“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于是封徐广缙为一等子爵，叶名琛为一等男爵。

叶名琛是当时的广东巡抚，也就是地方二把手，在这个“拖”的过程中全程参与，出谋划策，功劳不小。

1852年，徐广缙被调去镇压太平军，叶名琛接任两广总督。听说换了个总督，英国人的心思又活了。当时的香港总督，英国人包令（Bowring）再次向叶名琛提出了入城请求，被叶名琛再次婉拒。

叶名琛的底气也挺足的：我的两任前任都“拖”下来了，我难道不行？但就像击鼓传花，叶名琛当时不会意识到：自己拿到的是最后一棒。

4

1856年，一艘叫“亚罗”号三桅帆船，让叶名琛的命运发生转折。

“亚罗”号是一艘商船，在当时的香港英国当局登记过。在这艘船抵达广州时，当时的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接到举报，率人登船捉拿藏在船上的海盗，后来将船上的12名水手扣押。这个举动引起了“亚罗”号船长、英国人肯尼迪的抗议，说中国人侵犯了英国的主权（他要求按《虎门条约》约定，由英国人自己审问犯人），而且还抗议中国官员撕毁了英国的国旗。



当时英国人画的“亚罗号事件”，上面还特地画了清朝官员撕毁英国国旗的场景

但是，这件事中英国人的做法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第一，“亚罗”号虽然在香港登记过，但其实登记有效期已过了两周了。

第二，就算在香港登记过，但“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英国人肯尼迪只不过是一个被雇用的船长而已，中国人在自己的港口，是有权登船检查的。

第三，当时要逮捕的海盗梁明太和梁建富，确实就是以水手的身份待在船上。

第四，当时船上根本没悬挂英国国旗，只是挂了一幅信号旗。（其实当时清朝也没有所谓“国旗”的概念，参见“馒头说”中《一场斗殴逼出

的国旗》一文。）

但是，当时的英国领事巴夏礼抓住机会，开始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押水手，公开道歉。

经过审讯之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那12人中，确实有梁明太和梁建富两名海盗，中国官府再留下一个叫吴亚作的人做证人，其他9人可以立即送还。至于“亚罗”号，因为是中国人的船，当时船上也没有悬挂英国国旗，所以绝无侮辱国旗这件事。

巴夏礼接到叶名琛回复后表示不满意，要求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且正式道歉。

叶名琛接到英国的最后通牒后，退了一步，表示可以把吴亚作也放还，只留两名海盗。

巴夏礼还是不同意。

最终，叶名琛派南海县县丞亲自送12名水手到英国领事馆，但拒绝道歉。

应该说，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叶名琛还是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马克思曾在1857年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撰写社论，这样评价：“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只想要一个借口的英国人，却拒绝接收水手了。随后，英国军舰开始炮轰广州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5

在战争的爆发点广州，叶名琛其实并不是不少人以为的那样“消极抵抗”。在当时的广东，精锐部队都被调去镇压太平天国了，叶名琛虽为两广总督，但其实面临的是一个无兵可用的局面。

即便如此，英国军舰一开炮，叶名琛就在城内贴出了告示，号召军民同心，共同抵抗侵略者：“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

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另一方面，叶名琛抓紧修复城墙和炮台，和他的前任一样，招募大量乡勇一起守城。白天，他让乡勇对英军采取袭扰战；晚上，他派装满炸药的沙船冲击在岸边休息的英国军队，还派出火筏对英国军舰进行火攻。

值得一提的是，叶名琛还颇具战略眼光：派人袭击英国军队的战略后勤基地香港，并对香港施行禁运，甚至还派人去香港投毒。这一度让香港陷入极大的恐慌，很多英国人都逃到澳门去避祸。

在叶名琛的各种手段之下，英国军队围攻广州4个月不克，香港总督包令甚至因此被英国政府解职。

那么这样看来，叶名琛似乎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民族英雄了？

唉，也不尽然。

在英军围攻广州的过程中，叶名琛始终镇定自若，处乱不惊，是他真的有大气魄？不全是，也是因为他迷信。

叶名琛在总督衙门里，为他和自己的老爹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的是吕洞宾、李太白二位大仙。抵抗英军的一切军令和行动，叶名琛都要先扶乩（中国道教的一种占卜方法）一番。他反复宽慰部下说：“十五日过后即无事。”那就是占卜得来的。

另一方面，让叶名琛颇为自得的是，他在这场战争中率先打起了情报战。他一面大力逮捕广州城内给英国人通风报信的“汉奸”，一面又发动自己安插在香港多年的“情报网”，为他送来英国人的各种情报。叶名琛自豪地说：“我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

可惜的是，他在香港的那些“情报人员”业务能力都不过关，很多人只不过是传递些在当地公开出版的新闻报刊信息给他而已。最关键的是，还经常传递错误的情报——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人明明打赢了，传递来的情报却是英国人输给了俄国人。

基于这种假情报，叶名琛判断英国人必不能坚持多久，自会撤退。

但事实是，1857年10月，暂时退到香港的英国军队，等来了额尔金爵士率领的援军，以及决定一起入伙的法军。当时英法联军有绕过广州的念头，但通过一艘截获的中国官船上的文件得知，叶名琛已经无钱再支付乡勇的酬劳了，换句话说，广州城其实已经基本无兵可守。

12月29日，英法联军终于攻进了广州城。



叶名琛坐在轿子中被送往“无畏”号军舰

6

抓到叶名琛后，英国人并没有虐待他。

叶名琛与其说是被“抓走”的，倒不如说是被“请走”的——他被允许带着自己的仆人和衣物、粮食，坐着轿子上了英国的战舰“无畏”号。

按照英国人的想法，叶名琛在广东经营了十多年，又素有清廉之名，肯定深受百姓爱戴，部下也会想尽办法营救他。于是，英国人决定将叶名琛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远离中国，以防民心难服。

但其实，英国人想多了。叶名琛被捕后，咸丰帝压根儿就没想过救他，反而因为怕英国人拿叶名琛当人质来要挟政府，立刻罢免了叶名琛的一切职务。不仅如此，还通知广东当局：“叶名琛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

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



《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叶名琛被抓获现场的图片

但已经离开中国的叶名琛，并不知道这些。

叶名琛在“无畏”号军舰上被关了48天，然后被送往加尔各答。因为晕船，叶名琛在船上呕吐不止。但每次吐完，身高一米八的他都要整理官帽和服装，因为要保持大清官员在“夷人”面前的形象。英国人对他客气，有人上船看到他会脱帽致敬，他也会脱帽还礼。

只是，叶名琛以为在军舰上会见到额尔金爵士，并想当面斥责他。但事实上，额尔金压根儿就没想过见他。

军舰到了加尔各答，叶名琛依旧还是气宇轩昂地上岸，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形象。

从上岸开始，他就自命为“海上苏武”。

据后来回国的叶名琛仆人回忆，叶名琛原来是有一个美好愿望的：英国人会把他送到英国，然后他就能面见英国女王，并和她当面对质：为何要无故挑起事端？

在加尔各答，叶名琛每天都在打腹稿，做准备，等待与英国女王见面的那一天。同时，他让人每天翻译鸦片战争的战事新闻给他听，听到英法联军获胜，就捶胸顿足，听到清朝军队获胜，就喜笑颜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名琛自己也渐渐认识到：英国人从来没有想过把他送到英国，只是想让他在加尔各答待着，远离广州而已。而他也不太可能像苏武那样回归大汉了。

在自己带来的粮食吃完之后，悲愤的叶名琛决定效法古人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不吃外国人的粮食。

1859年4月9日，绝食一个多星期的叶名琛，含恨逝世，终年52岁。

7

叶名琛死后，英国人将他的尸体收敛入棺，送回了中国。

据他生前的仆人回忆，叶名琛临死前只说了一句话：“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而就在叶名琛被英国人抓去之后，咸丰帝是这样下诏关照清军的：“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

馒头说

还是说说叶名琛那著名的“六不将军”称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拆分出来看，叶名琛确实“不死”“不降”“不走”，但这没什么丢人的。

但他并没有“不战”和“不守”。

至于“不和”，那是皇上不允许他“和”，他就没权力“和”，而皇上需要“和”的时候，他能做的只是“背锅”而已。

也正是因为这六个“不”，让叶名琛成了一个很难下笔的人。

你说他迂腐吧，在“亚罗号事件”的处理上，他做得有理、有利、有节；但你说他有见识吧，被俘后却幻想自己能和英国女王当面对质。

你说他避战吧，他发动乡勇，积极备战，主动迎敌；你说他善战吧，却事事先要占卜，还误信错得离谱的情报。

你说他狠辣吧，对内杀人如麻，对外却一筹莫展；你说他怕死吧，城破之日，巡抚和将军都降了，只有他正襟危坐，不降不走，最终在异乡绝食而死……

令人一言难尽的叶名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晚清一批还算有能力的大臣的缩影。

如果没有洋人，叶名琛可能是晚清的一代名臣（他以清廉闻名，在内政和理财方面也很有天赋，同时又心狠手辣），但把他放到更大的舞台上，身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时代，他的见识却远远不够，他的能力也捉襟见肘，以至要靠占卜寻求力量，凭气节留住底线。

别说叶名琛，会做官如曾国藩，也在“天津教案”中栽了跟头；能力强如李鸿章，最后还是背了个“卖国贼”的恶名，呕血而亡。

曾有人作一联挽叶名琛：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孤愤”估计是有的，但“公道”又如何说起呢？

面对大变局时代，比起“一腔孤愤”，更重要的还是“睁眼看世界”吧。

是非成败丁汝昌

这个人，他的名字总是和一场海战连在一起，因为那场海战是一场耻辱的败局，所以这个人，似乎也总是以一个窝囊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印象中……

1

1895年2月12日，刘公岛，深夜。

丁汝昌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杯葡萄酒。在写完给李鸿章的最后一封信后，丁汝昌拿起了酒杯。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只是催的并不是琵琶声，而是刘公岛港口外，数十艘日本军舰的隆隆炮火声。

而眼前的那杯酒，也并非葡萄美酒，因为里面溶着生鸦片。丁汝昌是准备用它来结束自己生命的。

没有人知道，丁汝昌在举起酒杯的那一刹那，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在酒入口的一刹那，丁汝昌五十九年的人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他麾下那支曾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也就此灰飞烟灭。

2



丁汝昌

1836年，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的石头镇。丁汝昌出身贫苦，父亲丁灿勋务农为生，所以丁汝昌只读了三年私塾，就靠帮人放牛、放鸭、摆渡等，补贴家用。

在19世纪50年代，很多穷苦人家的孩子都去跟着做一件事，那就是参加太平天国的起义——丁汝昌也没有例外。1854年，在太平军占领庐江后，父母双亡的丁汝昌就参加了太平军，成为程学启（后来苏州杀降事件的主角之一）的部下，驻扎在安庆。

1861年，曾国藩的湘军合围安庆，程学启带着丁汝昌等300多人在夜里翻越城墙，投降了清朝。

这也是丁汝昌被后世不少人诟病的第一点：变节。

对于前来投降的程学启部，当时在前线统兵的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并不信任，之后每逢战斗，都将他们放在最前列，胜则最好，败则炮

灰。但程学启和丁汝昌因为熟悉太平军的里里外外，作战又勇敢，所以一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而且毫发无伤。

1861年8月，安庆终于被破，立下大功的程学启升任游击，做了湘军“开”字营的营官（相当于营长），而丁汝昌做了哨官（相当于连长）。程学启确实比较会带兵打仗，李鸿章也比较倚重他。

没多久，曾国藩命李鸿章组建“淮军”，并配了湘军几个营作为“嫁妆”，丁汝昌所在的“开”字营也在其中。他坐着火轮，随着李鸿章浩浩荡荡地开往江南。

自此，丁汝昌的命运开始和李鸿章联系在了一起。

3

丁汝昌到底会不会打仗？当然会。

如果丁汝昌不会打仗，不会在到江南没多久，就被名将刘铭传看中，调入自己的“铭”字营担任哨官。太平天国灭亡后，丁汝昌随刘铭传剿灭捻军，统率骑兵，再度屡立大功。等到东捻军被消灭的时候，丁汝昌已经官拜“总兵”（差不多相当于师长级别），授提督衔。

那一年，丁汝昌也就32岁。应该说，他的顶戴花翎，还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在太平军和捻军等内乱基本被扑灭后，识时务的曾国藩一声令下，湘军开始裁军。1874年，一轮轮的裁军风潮波及刘铭传时，刘铭传让丁汝昌裁撤他的三队王牌骑兵营，丁汝昌修书抗辩，惹恼了刘铭传，丁汝昌怕引来杀身之祸，索性辞职回家了。

在家赋闲了几年后，毕竟还在壮年的丁汝昌想做点事情。1877年秋，丁汝昌奉旨发往甘肃等候差遣。走之前，他拜见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

丁汝昌的到访，让李鸿章眼前一亮。



刘铭传也是洋务名臣，后任台湾第一任巡抚，有“台湾近代化之父”之称

丁汝昌向李鸿章说起自己想做点事，李鸿章是这么回答的：“刘铭传和你闹矛盾，我若用你，肯定会得罪刘铭传。”[“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

那怎么办？李鸿章给丁汝昌指了一条路：我正在创办海军，你现在在我的安排下去学习各种海军知识，我会委你大任。那时候，左宗棠还想调丁汝昌一起去收复新疆，但被李鸿章找了个借口推辞了（由此也可见丁汝昌的战功确实比较有名）。

那个时候，李鸿章其实已经在盘算北洋水师提督的人选了。

4

谁来当北洋水师的提督，确实是一个难题。

朝堂上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支舰队将来肯定是大清帝国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北洋水师提督的位置，不是谁来当都可以的。

李鸿章心里又何尝不明白？他曾为这件事专门请教过当时的两江总督、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始人沈葆桢。当时李鸿章提出，这个提督人选必须“既懂海军，又有资历”。沈葆桢向李鸿章两手一摊：中国之前连海军都没有，难道还有这样的人才？

无奈之下，沈葆桢建议李鸿章先让海军科班出身的年轻人迅速挑大梁，担任骨干军官，加速磨砺，再选一个有资历、打过仗的老将来统领，所谓“一老带群新”，这样搭班子，还是合理的。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也是中国近代造船、航运和海军的奠基人之一。他当时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受命组建南洋水师，但他支持优先组建北洋水师。

“群新”是谁？那就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邓世昌这批人。这些人确实后来被大力提拔，成为北洋舰队上各舰的管带和核心骨干。

那么有资历的“老将”呢？

李鸿章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个提督的位置，首先不能放给外人，不然将来不听指挥，等于为他人作嫁衣；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提拔自己的亲信，因为这会引来其他人的反感。

那么，谁合适呢？

丁汝昌啊！淮军旧将出身，对李鸿章有忠心，但在家赋闲多年，并非李鸿章嫡系。曾经叱咤战场，年纪轻轻，官拜总兵，而且愿意去一个新兴军种当差（当时清朝很多将领不愿去海军，所以北洋水师官兵的薪俸是很高的）。



沈葆桢

所以，后人诟病李鸿章任人唯亲，提拔丁汝昌统帅北洋水师，多少也有那么一点不公平：放眼当时全中国，能找出来的合适人选确实不多。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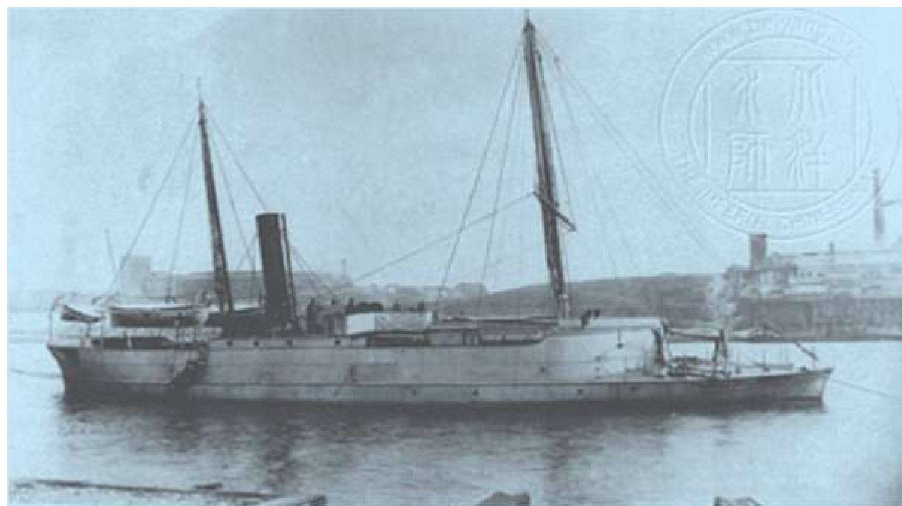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担任提督的，正是丁汝昌。

“一个带骑兵的去管海军，怎能不败？”这是后来很多人对丁汝昌的评价。

丁汝昌确实是陆军出身，虽然也有人曾说，他最初到刘铭传麾下管

的其实就是湘军的水师，但内陆江河的船和海军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点无须洗白。

但是，丁汝昌主观上还是非常努力的。从业务能力上来说，丁汝昌留下的大量亲笔文件和电报可以证明，他其实一直在认真学习现代化海军知识，而且对舰队的日常管理、士兵操练和轮船修理这些细节都非常熟悉。有一次，运到舰队的煤炭少了10吨，丁汝昌不仅明察秋毫，还一直盯到补齐为止。



北洋水师中的“镇边”舰就是一艘“蚊子船”。“蚊子船”即炮船，每艘造价15万两；木质船身外包钢板无装甲，长127英尺[1]，宽29英尺，吃水9.5英尺；排水量440吨。清廷认为这种船性价比高，但其实在海战中用处不大

从职位升迁来说，丁汝昌也不是纯粹的“空降干部”。丁汝昌最初只是被李鸿章派到一艘新买的“蚊子船”上随同学习，职位只是“督操”。1881年，丁汝昌带着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前往英国接收“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回国，一路顺风顺水，处理得当，回来后才被授予“统领”职务。

从部属关系来说，虽然也有刘步蟾等一批青年将官一开始看不起不懂业务的丁汝昌的说法，但总的来说，大家还是能接受丁汝昌领导的。而且从后人的材料来看，丁汝昌“为人随和”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北洋水师的旗舰是“定远”号，也是丁汝昌的居所，但“定远”号的管带（舰长）是刘步蟾。按理一艘军舰上最好的房间只能是留给舰长的，为了避免刘步蟾有心理负担，丁汝昌自己住到了一艘小船上（后来丁汝昌被革职，刘步蟾带头联名为他请愿，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从军中威信来说，丁汝昌也树立得不错。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日本人借机出兵朝鲜，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军舰开赴朝鲜，当机立断，将幕后操纵者、朝鲜太上皇李昊应押往天津软禁，一举打破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丁汝昌因此还被授黄马褂。

1885年，丁汝昌率“定远”和“镇远”两艘当时的超级铁甲舰前往日本长崎港访问（其实是去保养，中国当时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其间中国水兵在岸上与日本警察和民众发生大规模械斗，丁汝昌制止了部下要求“开炮开战”的要求，加以斡旋，最终让日本向中国赔款5.25万元了结。这次事件被认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外交胜利”。



那场械斗被称为“长崎事件”（也有称“镇远骚动”），日方称“长崎清国水兵事件”，其实是因为清朝水兵上岸违纪（因嫖妓发生争执）而引起的一场纠纷，后演变为与日本警察与民众的一场大规模械斗，清朝水兵有10人死亡，44人受伤（日本警察亦有5人被杀）。最终受“定远”舰等巨炮威慑，日方赔偿中方5.25万元（中方亦赔日方1.55万元），宣布到此为止

这件事大大刺激了日本——外国水兵到本国来寻衅滋事，最终却以本国赔款终结。全国上下激发起了赶超清朝海军的雄心，大大促进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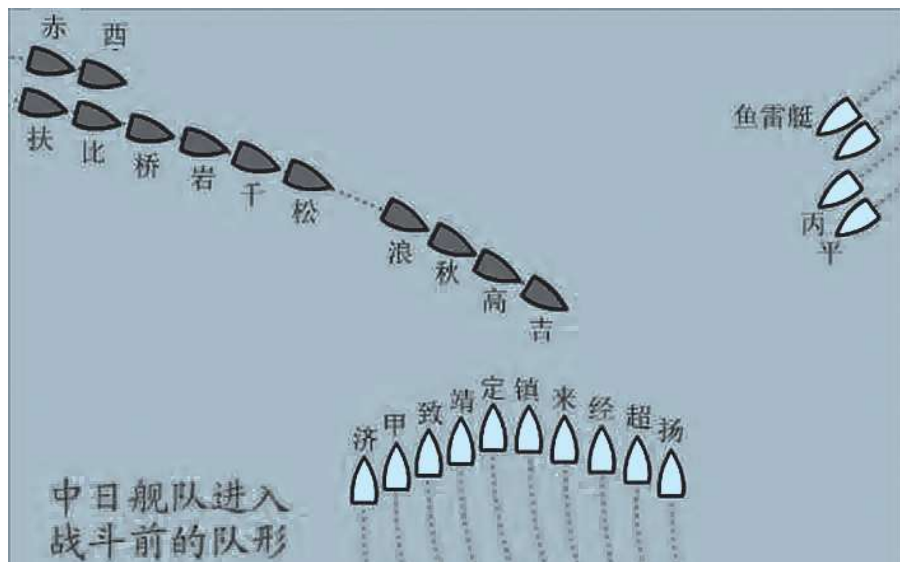
不能说丁汝昌在“北洋水师”是受到全军将士的一致拥戴，但至少，作一个合格的领导，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然，作为一个指挥官，最后是否合格，还是要体现在战场上。

1894年9月17日上午11点半，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甲午海战爆发。

这场海战的经过和结果，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我也不忍心再写一遍），单说说作为中方舰队最高指挥官的丁汝昌在这场海战中的表现。

后世的一大争论，是在两支舰队遭遇时，丁汝昌下令北洋舰队排成“雁行阵”冲向日本联合舰队，而日本联合舰队则采取纵队回应。由于北洋舰队的阵型只能发挥舰首炮的威力，而日本联合舰队则可以发挥侧舷炮数量多的优势，所以最终北洋舰队落败。



甲午海战中日双方舰队的阵型

而事实上，丁汝昌下令采取的阵型，也不是拍脑袋想的，而是按照平时训练，根据北洋舰队军舰的特性决定的—“定远”和“镇远”这批主力舰，当初都是以加强舰首方向火力而制造的。比如“定远”舰装备的4门口径为305毫米的巨炮，如果排成纵队放开侧舷，一侧只有两门炮可以同时开火，而如果舰首对准敌人，4门巨炮都可以开火。

而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有不少都是加强侧舷火炮的。换句话说，在一场遭遇战的情况下，大家都只能率先反应：用自己最擅长的阵型投入战斗。

而且，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至少对得起军人的本分。

这场战斗是以北洋舰队的“定远”号先开炮拉开战幕的。可惜的是，不知道是因为年久失修还是什么缘故（“定远”舰当时已经下水12年了），“定远”巨炮一响，舰桥就开裂了，坐镇指挥的丁汝昌跌了下来，信号旗装置也废了。

但后来的事未必所有人都知道：手下要把满脸是血的丁汝昌抬进内室，但丁汝昌坚持不肯，坐在甲板上指挥作战，直到战斗结束。

至于信号旗系统被毁，确实是天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洋舰队失去指挥，各自为战。

但丁汝昌当时在战前发出过三条训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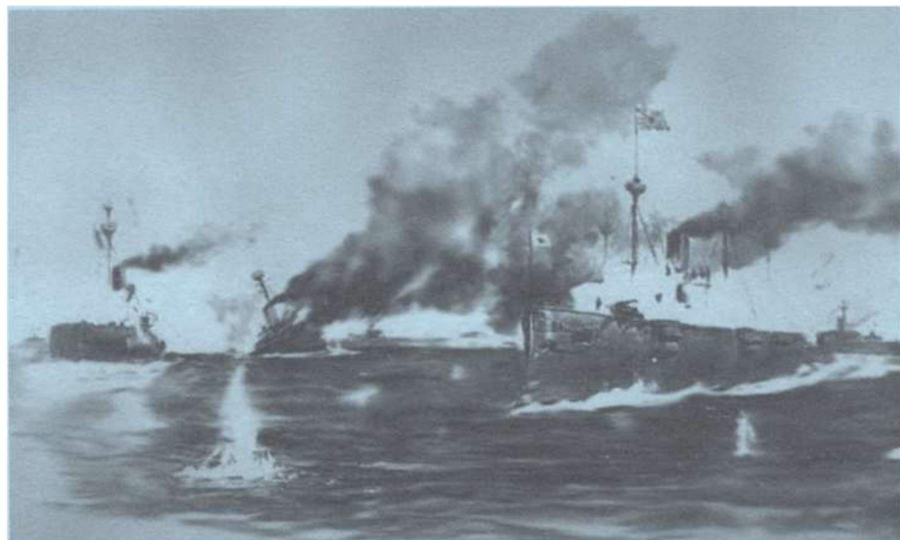
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2.始终以舰艏向敌，即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如果丁汝昌不负伤，信号系统不被摧毁，北洋舰队还是会按照这三条训令进行战斗。

事实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事后日本人复盘，自己舰队的各种操作也是漏洞百出。抛开意外因素不谈，丁汝昌在这一场战斗中当然要负指挥失败的责任，但要说他一无是处，也不至于。



邓世昌的“致远”号在甲午海战中沉没。图中右侧为日舰“吉野”号，中央倾斜的是“致远”号。绘制此图的是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利安德”号上的军官，他对“致远”“经远”号的奋战都给予了极高评价

问题就在于，5个多小时的激烈海战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其实也损失惨重，4艘主力舰基本丧失战斗力，但就是一艘也没沉。

而北洋舰队虽然“定远”“镇远”等主力舰岿然不动，但沉了“超勇”等5艘较弱的军舰（“广甲”号逃离战场，几天后触礁沉没）。

日本即便胜，也是惨胜，所以率先退出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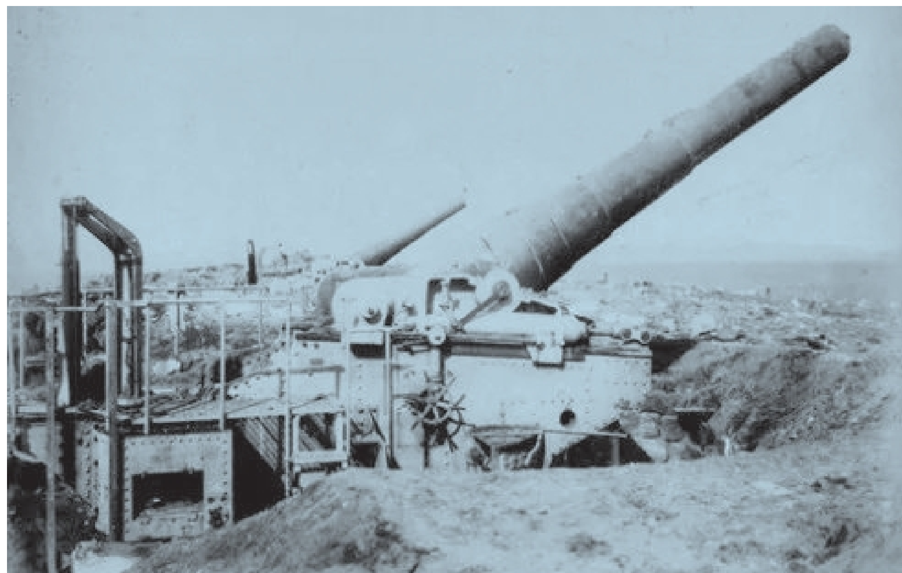
而失去5艘军舰的丁汝昌，注定要接受悲剧的命运了。

7

困守刘公岛后，丁汝昌其实并没有放弃。

那个时候，丁汝昌已经被革去了尚书衔，待旅顺陷落之后，又被革去全部职位。不过，光绪帝很快又收回了谕旨，改为“暂留本任”——丁汝昌走了，谁来接着保卫大清帝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丁汝昌还在坚持抵抗。他看到威海陆路上的炮台防守薄弱，怕被日军攻占后调转炮口倒轰北洋舰队，所以建议先自行炸毁，结果又被当成“通敌卖国”的证据禀报朝廷。“清流派”再度怂恿光绪帝要将丁汝昌革职，在李鸿章力保、刘步蟾等将领请愿的情况下，朝廷才决定“秋后算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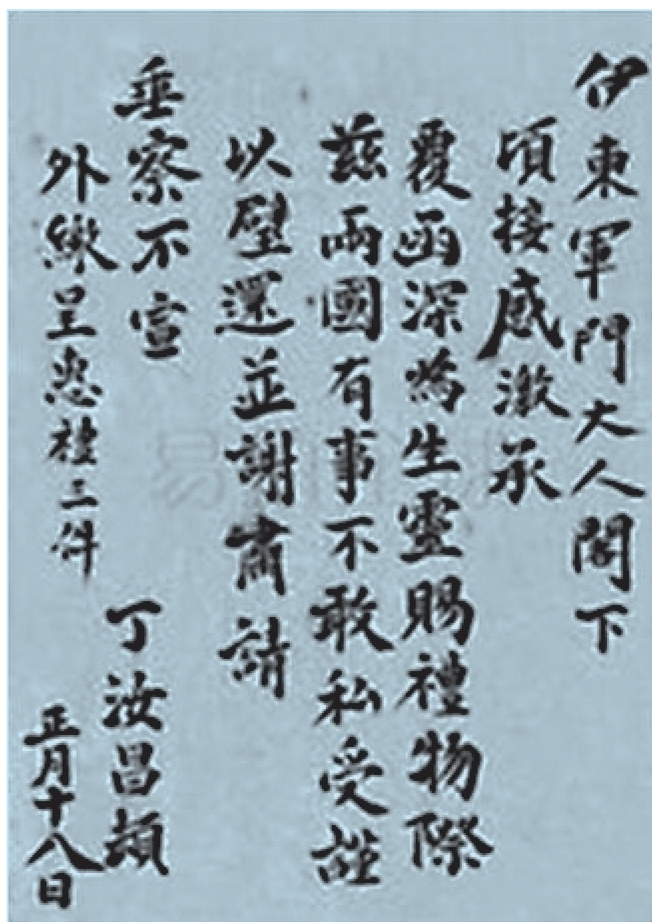
威海南岸的炮台。后来炮台果然被日军攻占，调转炮口，吊打停在港口里的北洋舰队，丁汝昌只能再组织敢死队去炸掉炮台

即便如此，丁汝昌还是率领舰队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并主动用舰炮支援陆地战斗，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为甲午战争中日军被击毙的最高将领）。

丁汝昌在抵抗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开始在“但求一死”了。

1895年2月9日，丁汝昌登“靖远”舰与日本舰队作战，“靖远”舰被陆地炮台上发来的炮弹击中（也是我们自己的炮台，被日军夺去），丁汝昌准备与船同沉，被部下拼死救上小船。

2月12日，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祐亨写来了劝降书，丁汝昌断然拒绝，并把劝降书派人送给李鸿章，以表明心迹。


伊東軍門大人閣下
頃接感激承
覆函深為生靈賜禮物際
茲兩國有事不敢私受謹
以璧還並謝肅請
垂察不宣
丁汝昌頓
外繳呈惠禮三件
正月十八日

丁汝昌给伊东祐亨的信，退回了伊东祐亨的三件礼物

但他知道，手下人中，很多人已有降意了。

2月8日，北洋舰队的“左队一号”管带王平，率13艘鱼雷艇和两艘快艇集体出逃（结果被日军击毁和俘虏14艘，只有1艘逃到了烟台），丁汝昌自己对李鸿章承认：“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

而为了避免被日军俘获后利用，丁汝昌下令舰队炸沉自己的军舰。众人因为怕失去投降的本钱，已经没有人肯执行，只有“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一人服从，在“定远”号打光所有炮弹后，炸沉军舰，然后自杀殉国。

丁汝昌知道，战斗已经持续不下去了，部下都在等着投降，而成为阻碍的，无非就是他还活着。

2月12日深夜，本文开头的一幕发生了。

据身边人回忆，丁汝昌服药后并没有立刻丧命，而是非常痛苦地挣扎到了后半夜才断气。他死后没多久，手下军官牛昶昞就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

俘获北洋舰队所有残存舰只的日本人，将军舰收编，甚至将“镇远”号开到日本展览（后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参加了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

但他们专门用一艘中国商船，郑重地送回了丁汝昌的尸体。



日本人画的丁汝昌

日本海军大尉子爵小笠原长生这样描述丁汝昌：“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皇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

馒头说

大一刚入学时修了“中国近代史”，第一次被要求写论文。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写“甲午海战”——这一直是我觉得最揪心的一段近代

耻辱战史。因为第一次写论文，什么都不懂，还给文章起了个自己觉得很有意境的题目《日落北洋》，没错，像小说一样。

然后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开始寻找各种资料。

看了一个星期的资料后，发现很多自己以前以为是正确的东西，全被颠覆了。

什么“慈禧太后为了庆寿挪用海军军费”，什么“李鸿章当缩头乌龟避战求和”等等，在这些我认为是北洋舰队覆灭的“主要原因”背后，我了解到了很多自己原先并不知道的东西。

比如，那时候的我，第一次知道了“速射炮”的概念。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炮筒口径虽然比北洋舰队的小，但北洋舰队的主力舰打一发炮弹，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能打6发——当时有英国人算过，整个海战过程中，联合舰队的火力其实是北洋舰队的3倍。

又比如，我一直以为北洋舰队的实力当时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但事实上，日本人经过励精图治，在海战开战前，他们联合舰队参战的军舰，无论是在总排水量、平均航速节、火炮数量、鱼雷发射管数量等各方面，都是领先于北洋舰队的——我们哪有资格说什么“痛失好局”啊！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回过头来看丁汝昌，就很让人唏嘘了。

尽管日本人一直很尊敬丁汝昌，认为他是“义死”，但在当时的中国，他无可避免也要“出把力”，一起将整个甲午战争失败的“锅”背起来。尽管他已经自裁以谢天下，但身后依旧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和评价。1910年溥仪当皇帝时，才恢复他生前的官衔（主要是袁世凯力主，他当年在解决朝鲜危机时和丁汝昌搭档愉快），而在后来的活动中，他的墓还被掘开过。

丁汝昌在自杀前可能还希望，自己能以一死，换一了百了。

甲午一战，马关签下耻辱条约。日本的伊藤博文对前来谈判的李鸿章说过这样一句话：“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背后的意思是，你们的失败，不是你一人的失败，是你们整个政治改革太慢的失败。

你看，这个锅，连李鸿章都背不起，更何况丁汝昌呢？

[1]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末日孤舰“海圻”号：大清帝国的最后荣光

对于1911年的大清帝国而言，似乎传来的每一个消息都是坏消息。但唯独有一艘它派出去的军舰，却在一个帝国远去的背影中，留下了一抹亮色。

1

1911年6月20日这一天，英国的朴次茅斯军港响起了21响礼炮声。

朴次茅斯军港是英国皇家海军最古老的军港。而在军港响起礼炮，一般是表示欢迎——因为有别国的军舰要入港了。

事实上，在那些天里，朴次茅斯港需要频繁鸣响礼炮。因为受英国皇室的邀请，全世界有18个国家的200多艘军舰将在这段时间纷纷前来，参加6月22日的英王乔治五世（也就是温莎公爵的父亲）的加冕典礼。

在诸多来访的军舰中，有一艘军舰非常特别。这艘军舰，是英国制造的，却是另一个国家下的订单。而这个国家，在71年前被英国人用军舰和大炮强迫打开了国门。

没错，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这是英国第一次迎接来自遥远中国的军舰来访。

这艘军舰，就是“海圻”号。



“海圻”号巡洋舰

2

先来说说“海圻”号这艘军舰。“圻”这个字有点复杂，读“qí”，也可读“yín”，意思是“地的边长”，也通“京畿”的“畿”字。“海圻”连着“海”字，透露出当时的清廷依旧希望通过海军捍卫大清帝国海上疆土的期望。

清廷在遭遇了甲午战争惨败后依然还有这点认识，颇为不易。

甲午一战，打垮了名动一时的北洋舰队，但也打出了清政府对海军重要性的幡然醒悟——原来有一支舰队来守卫海疆，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虽然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但清政府重建海军的决心倒是上来了。从1895年起，清政府筹措银两，重新开始向英国和德国订购军舰，前前后后，大大小小一共订购了43艘，而其中吨位最大、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就是“海圻”号和它的姐妹舰“海天”号。



“海圻”号是当时清朝向英国订购的，由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在1896年开工建造，总造价超过32万英镑。从船的数据来看，舰长132米，宽14.3米，吃水深度6.1米，最大航速24海里/小时，马力1.7万匹。舰上装备各种口径的舰炮34门，鱼雷发射架7座

“海圻”号的排水量是4300吨，虽然小于当时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和主力舰“镇远”号，但晚造十五年的“海圻”号受益于当时全世界快速发展的军舰技术，所以在不少方面已经实现了对先辈的超越。



“海圻”号和之前北洋水师几艘军舰的对比，它的左边是当年要“撞沉吉野”的“致远”号，管带为邓世昌

“海圻”号1898年竣工下水，1899年自英国返回中国。一回国，“海

圻”号就立了一功。

1899年2月，意大利趁清政府甲午新败，准备趁火打劫，向清政府递交照会，称自己是“欧洲六强”之一，要求和其他五强一样享受在华待遇。他们强行要求租借浙江三门湾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并要求浙江全省不能租借给其他国家。

面对如此牛气哄哄的要求，清政府倒也冷静，迅速摸清了意大利在欧洲属于二流国家的底细。在和欧洲列强暗中交换了意见后，清政府对意大利公使庄严地说出了一个字：“滚！”

意大利政府为此大怒，立刻派出3艘军舰在三门湾海面巡游，试图重现“炮舰政策”对清政府的威逼恐吓。没想到清政府这次一硬到底，要求重新组建的北洋水师全部出动，岸上炮台的守军也做好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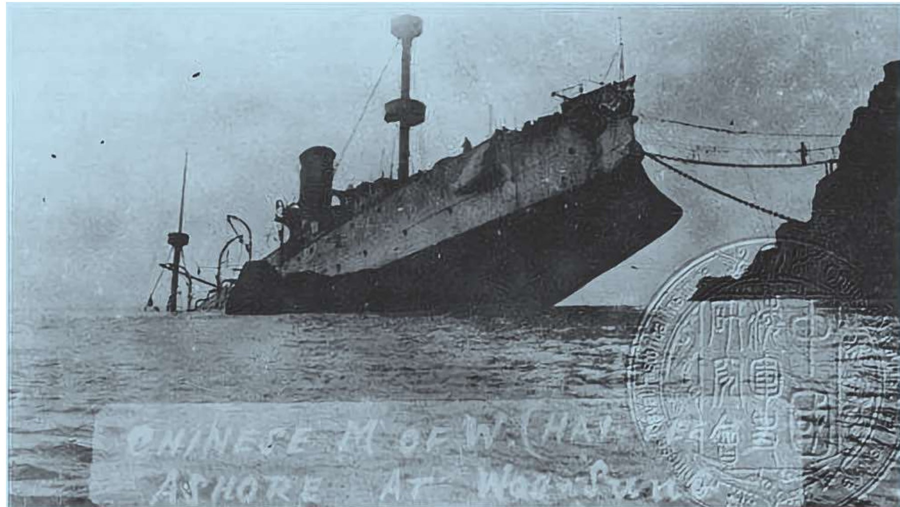
这件事一拖再拖，最后拖到了1899年夏天——新造好的“海圻”号和姐妹舰“海天”号（两艘舰是同型舰）从英国船厂开回来了。

清政府随即命北洋水师统领叶祖珪率包括“海圻”“海天”在内的舰队全体南下，摆出一副和意大利海军决战的架势。

意大利评估了下大清舰队的实力，自知没有把握取胜，最后只能放弃对中国沿海的全部要求，一时沦为笑柄。

在这场著名的“三门湾事件”中，“海圻”号和其余4艘“海”字开头的军舰一战成名（除“海天”号外，其余还有3艘排水量在2950吨的军舰“海容”“海筹”“海琛”）。

而与这次“海上博弈”相比，“海圻”号之后承担的使命，其实更艰巨，但也更光荣。



1904年4月，“海圻”号的姐妹舰“海天”号在运送军火途中，因为浓雾再加上航速过快，在舟山附近的鼎星岛不幸触礁沉没，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3

1910年，清廷接到了英国皇室的一封邀请函：希望派一艘军舰，参加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

决定接受邀请的清政府毫不犹豫地派出了“海圻”号——在“海天”号触礁沉没之后，“海圻”号作为当时大清帝国最拿得出手的一艘军舰，不仅承担着保卫海疆的任务，同时也成了一张“脸面”。



左图为甲午战争时期“致远”舰的全体官兵合影，右图为“海琛”号上全体官兵合影——此时的大清水师已经全部着英式服装，进行英式操练

1911年4月21日，“海圻”号从上海杨树浦码头拔锚起航。

这艘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巡洋舰，在统制（相当于司令）程璧光和管

带（相当于舰长）汤廷光的带领下，载着400多名当时中国海军的精英，经台湾海峡、南海驶出国门，穿过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向英国驶去。

但就在“海圻”号刚刚驶离新加坡港的时候，程璧光在甲板上集中全舰官兵，下达了一个当时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命令：“我国人留发始于明代，但无辫；自清朝发展为辫，已有200余年之历史矣。然长发污衣藏垢，既不卫生，又有碍动作，尤以误害海军军人为甚，故实无保留之价值。为此，本统领下令，自即日起，凡本舰之兵士，一律仿照官生，应予剪短发至颈际为度，以符合世界潮流。”

其实在“海圻”号刚刚要驶出国门，进入公海的时候，程璧光就已经下令让舰上的军官和海校实习生剪去辫子了。不过这也让普通水手感到很不满意——官兵不平等，他们也想剪！所以，程璧光当时下令之后，不到两个小时，全舰400多名水兵就都剪去了辫子。



程璧光，广东香山人，1861年出生。甲午海战中，程璧光任“广丙”号管带，在激战中“广丙”号曾发炮击伤日舰“西京丸”号。北洋水师困守刘公岛后，提督丁汝昌服毒自杀，代表北洋水师递交降书的正是程璧光。所以在他的回忆和履历中，这个情节往往被淡化处理

“海圻”号刚刚踏上征途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预示着它之后的故事，肯定不会平凡。

程璧光在“海圻”号上下令剪辫之前，据记载已上报清廷获批，可见当时清廷的威慑力已大大削弱。不过早在之前，程璧光已秘密加入孙中山的兴中会，可以说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人。

经过两个多月的漫长航行，“海圻”号终于在1911年6月20日抵达了英国朴次茅斯军港。

如果说之前“海圻”号的主要任务是“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它的使命就是“扬我国威”了。



当时参加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庆典的海军阅兵舰队

6月22日下午，为了烘托典礼的气氛，英国皇室专门为来访的各国军舰的水手们举办了一场“万国海军田径运动会”。之前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田径”的中国海军，也派出了几十名体格健壮的水兵参加。在数万名伦敦市民的围观下，中国的水手们虽然不熟悉规则，不懂技巧，没有得到一枚奖牌，但没有一人中途退赛，全都坚持到底。

有一个叫孟广吉的信号兵，参加了跨栏的比赛。由于从来没接触过跨栏，他很快就被栏架绊倒，摔得满腿是血，但他坚持完成了比赛，全场观众掌声如雷，他还受到大赛组委会的专门表扬——当时大家肯定不会想到，93年后，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在欧洲，一个21岁的中国小伙子终于在跨栏这个项目上笑傲世界群雄。

6月24日上午，“海圻”号的统领程璧光与专使载振，陪同英王乔治五世、玛丽王后以及海军大臣丘吉尔，专门检阅了“海圻”号——所有中国水军官兵昂首挺胸列阵甲板，让英王印象深刻。

检阅仪式结束后，“海圻”号专门开到了位于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造船厂，在“娘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维修。



“海圻”号水手列队

等到维修完毕，已经是1911年7月。在“海圻”号完成了贺礼使命之后，却没有选择回国，而是拔锚起航，向遥远的美洲大陆驶去。

还有一系列的任务在等待着它。

5

按照预定计划，“海圻”号在离开英国后，就出发前往美洲大陆，拜访包括美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如此远距离的航行和规格，在大清260多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

毫无疑问，美国对“海圻”号的来访是非常重视的——他们特地派出了万吨级的巡洋舰“北达科他”号作为陪访舰，与“海圻”号一起并舷停泊在港口内。



程璧光陪同纽约市长检阅“海圻”号上的水兵

在抵达美国的次日，美国国务卿和海军部长就分别会见了程璧光等人，纽约区陆军最高司令官小格兰特将军还派夫人陪同“海圻”号官兵拜谒了他的父亲、已故总统格兰特的陵墓。抵达美国的第四天，程璧光等人就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塔夫脱的接见。



“海圻”号水兵列队前往格兰特将军陵墓敬献花圈途中。格兰特和李鸿章私交不错

“海圻”号在美国的风光还不限于此。因为这艘军舰，程璧光被认为是中国未来海军总司令的不二人选，所以准备讨好他的美国人还有很多。

美国铁路公司总干事热情邀请程璧光等人去参观壮观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但实际目的是将中国客人拉到伯利恒钢厂参观。而纽约造船厂老

板罗伊泽更是对程璧光嘘寒问暖，还送给他一只名贵的波斯猫，称这只猫有神奇的力量，在关键时刻能帮程璧光“做出正确的抉择”。这些商人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和程璧光建立良好的关系，在他今后执掌中国海军之后，能从他手里拿到更多的造船订单。

过了8月中旬，程璧光等人终于向热情的美国人辞行了。“海圻”号再度拔锚起航，但这一次目的地依旧不是中国，而是古巴。

6

“海圻”号下两站的目的地，一个是古巴，一个是墨西哥。

但就在“海圻”号准备出访这两个国家的时候，却正好碰上了敏感时期。

1911年5月，在拉美地区掀起了一股“排华”风暴。墨西哥在5月13日爆发了叛乱，反政府武装战胜政府军攻入了墨西哥北部城市托雷翁（在那里华人殷实之户较多，康有为还在那里做过房地产生意），随后开始大肆洗劫城内的华人商区，在10个小时内残暴杀死了300多名华人，震惊一时。

“排华”风暴随即波及拉美，古巴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

也正是因此，“海圻”号在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时候，受到了古巴华侨的热烈欢迎——在危难时刻，有什么力量能比看到祖国的军舰更鼓舞人心的呢？据当时在“海圻”号上的水手后来回忆，在哈瓦那，只要“海圻”号的官兵一上岸，就会被华侨请入家中款待，并赠送各种纪念品。如果是老乡见老乡，那接待就更加隆重了。（也有学者据当时随船人员的回忆和当时的外交文件分析后认为，当时“海圻”号并没有护侨的目的，只是外交礼仪上的访问——但客观上确实对古巴和墨西哥带来了震慑。）

一艘不远万里而来的装甲巡洋舰停泊在自己首都的港口，也让古巴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古巴总统在会见程璧光时明确表示：“古巴军民绝不会歧视华侨，因为古巴对西班牙战争期间，华侨曾与古巴军民共同战斗，为古巴的独立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历史事实，将为古巴人民所永志不忘。”

在拜访完古巴之后，“海圻”号还剩下最后一站——墨西哥。当时清政府已经向墨西哥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而且已有数家墨西哥中文报纸报道了“海圻”号即将来到墨西哥的新闻，并配发了“海圻”号乘风破浪的照片，颇有“王师自远方来”的意味。

但就在“海圻”号准备前往墨西哥访问的时候，墨西哥政府与清政府驻美、古、西特命全权大使张萨棠签订了协议，承诺严惩“排华”事件中的暴民（后斩首数十人），并赔付华人商户的损失。（当时清政府索赔高达3000万墨西哥比索，这个数字相当于墨西哥政府全年收入的1/3，后来降到600万比索，到民国政府谈判时最终为310万比索。但因为墨西哥政局后来发生动荡，这笔赔款最终没有交付。）

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海圻”号没有向墨西哥进发，最终调转船头原路返回，结束了在美洲的访问。

不过，与他们这次不远万里的不凡航程相比，还有一段更奇特的经历在等待着他们。

7

“海圻”号再次跨过重洋，抵达英国巴罗港的时候，已经是1911年9月末了。

之后的10月初，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发生了怎样的一件大事。

武昌起义爆发了。

一直在茫茫大海上决定全舰官兵前进方向的程璧光，这回要决定大家的人生方向了：“海圻”号这艘帝国最拿得出手的军舰，究竟是要站在清政府这边，还是站在革命阵营这一边？

之前，虽然全舰官兵在程璧光的要求下都剪去了辫子，但剪辫子，毕竟可以说是为了海军军容以及海上生活方便，而现在大家要做出的抉择，就绝不是剪一条辫子那么简单了。

在经过与当时清廷驻英大使刘玉麟紧急磋商之后，在“海圻”号三副黄仲煊（中华民国首任海军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的胞侄）率领的骨干分子的请愿之下，程璧光又一次召集全舰官兵站上了甲板。

这一次，他的话也不多："我的命令很简单：你们中的任何人如欲回国参加革命工作，请站到右舷，不赞成的站到左舷。待我数完'一、二、三'，就请各位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行动。"

说完，程璧光给了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略微停顿后高声喊出"一、二、三"！话音一落，所有的官兵都奔向了右舷。

等众人在右舷站稳，传来了一声猫叫。纽约造船厂老板罗伊泽所赠的那只波斯猫，也悠闲地从左舷踱步到了右舷。

8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

而就在这个一年之始的日子，在万里之外的英国巴罗港，一场易帜仪式在"海圻"号上庄严举行。

由40名水兵组成的仪仗队持枪站在全体官兵的最前列，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程璧光一声大喊："换旗！""海圻"号管带汤廷光将一面新制的中华民国五色旗交给了升旗官，升旗官在两名持枪护旗兵的护卫下，昂首走到舰尾旗杆下。

黄色的大清龙旗缓缓降下，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冉冉升起。

在又停留了三个月进行维修和调整之后，1912年3月底，"海圻"号正式踏上归途——沿着出访时的轨迹，在5月底又开回了上海杨树浦码头。

"海圻"号出航历时400多天，到达过8个国家、14个港口，以燃煤蒸汽机提供动力，总航程达到30850海里。

起航时，是大清帝国的荣光；回归时，已是中华民国的希望。

馒头说

说两个后续吧，都不是太美妙。

一个是人，就是程璧光。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确实有意招程璧光回国担任中华民国的海军总长。但等到程璧光回国后，天已变色，担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触礁沉没的"海天"号

舰长），程璧光遂辞去了一切职务赋闲。

等到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在广甲号服役时曾算是程璧光的部下，所以理所当然，任命程璧光为海军总长。但很快黎元洪与段祺瑞又卷入了“府院之争”，程璧光站在黎元洪这一边，率舰队出走。

此后，程璧光率“海圻”号等舰队宣布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成立“护法舰队”，但还没等有所施展，就于1918年2月在广州被人暗杀，时年57岁——暗杀究竟由谁指使，至今仍没有定论（主流观点认为是当时桂系军阀为争权而主使）。

当年出访扬威海外的一代名将，最终竟被暗杀而死。

另一个是舰，就是“海圻”号。相比之下，“海圻”号的命运比程璧光个人的命运似乎更要坎坷。“海圻”号回国后归袁世凯的北洋系控制，在袁世凯称帝后被宣布独立的北洋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归入“护国军”，后在“张勋复辟”后重归程璧光管辖，成为“护法舰队”的主力舰。

但在程璧光遇刺之后，“海圻”号群龙无首，由此开始颠沛流离，不断易主：一会儿归属陈炯明的粤军，一会儿归属孙中山的革命军，在1922年“直奉战争”中又被张作霖归入东北海军的渤海舰队，最终经过不断辗转，划入了蒋介石的中央军。

18年之内，“海圻”号换了6个东家，直到迎来自己的最终命运——1937年9月25日，在悲壮的“江阴保卫战”中，几乎被日军击溃的中国海军为了阻碍日舰前进，“海圻”号和当初清末最强的三艘“海”字头兄弟舰“海琛”号、“海容”号和“海筹”号，拉响了凄厉的汽笛，在江阴拦江自沉。

一代名舰，最后以这样一种方式终结服役，虽也可称死得其所，但终归让人感叹。

回望这段历史，无论是程璧光还是“海圻”号，在充满曲折的晚清和民国史上都曾是万众瞩目的明星，不过最终还是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但是换个角度看，程璧光当时的抉择、“海圻”号的漫长旅程，以及

那400多名中国水手向世界展现的当时中国海军的形象，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笔。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但是，也会铭记每一个闪光点。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史海钩沉：剪掉长辫“海圻”号巡洋舰水兵》（《中国海洋报》，2013年3月6日）

《百年前清廷“海圻”号军舰越洋保护华侨》（《时代周报》，2012年6月12日，作者张子宇）

《敦睦与交际：1911年中国海圻舰远洋访问之研究》（《海洋文化学刊》第4期，2013年6月，作者黄文德）

提督的抉择：是死，是死，还是死？

一部晚清史，我们会记住不少大人物的名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我们也会记住一些奋战在一线的将官名字：关天培、陈化成、邓世昌、刘步蟾……但有一个人，他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只一闪而过，他是一名提督，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却足以让我们掩卷长思。

1

1900年7月9日，凌晨5点；天津，八里台。

5000余名清军士兵的双眼，直直盯着前方。

在黎明前的雾气中，渐渐显露出了敌人的影子——6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八国联军士兵。

空气死一般沉寂。直到一颗炮弹从八国联军的阵地飞来，在清军的阵地炸响。

一场生死决战，终于拉开帷幕。

清军阵营里，走出一位身穿黄马褂的年长高官。这实在是一幅非常诡异的画面——生死大战，作为本方的最高指挥官，是没必要穿得那么正式且醒目的，即便非要穿得如此，那也没必要亲临第一线。

眼看对方的人数和火力都要超过本方不少，考虑到本方士兵已经多日激战，人困马乏，有部下劝那位黄马褂指挥官请求增援。

但那位指挥官拒绝了：“没有增援！打！”



聂士成。看上去像一个肥头大耳的贪官，但看下去，你的印象可能会改观

部下低下了头，他们知道：指挥官是不打算活着回去了。

这位指挥官，叫聂士成。他当时的官衔，是直隶提督。

此时此刻，聂士成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会被逼到这一步。

2

聂士成，1836年生于合肥北乡岗集三十铺村。

说他出生于一个武术世家，倒也不虚，只是练武的不是他父亲，而是他母亲——这位在家乡有名的烈性女子，据说70岁的时候仍能和年轻后生们一起举石锁。母亲给聂士成留下了两句家训：第一，聂家人不能手心朝上（指不能乞讨）；第二，聂家人没有孬种。

26岁时，聂士成在母亲的鼓励下从军。在他戎马生涯的前半阶段，算是跟对了两个人。

一个是他在最早投效的庐州军营里跟的团练大臣袁甲三。袁甲三是谁？他是项城袁氏家族中第一个以进士身份入仕的人，也是第一个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项城袁氏？和袁世凯有什么关系吗？没错，袁甲三就是袁世凯的叔祖。



刘铭传

当然，以聂士成当时的资历，和袁甲三是攀不上什么交情的，他所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本事立军功。

聂士成没有赶上打太平天国，但碰上了镇压捻军。他从军的第一年，就升到了“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营长），但封的是五品顶戴（“把总”一般是七品）。

1863年，袁甲三“退休”，聂士成改跟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是在整个晚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淮军名将：刘铭传。

跟了刘铭传之后，聂士成一路转战南北，主要打捻军。到1868年他32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记名提督了（清朝的“提督”为从一品，从理论上讲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记名”的意思是你的战功到了，但因为你的年龄、资历不够或暂无位置空缺等原因，先给你个待遇），他立下的战功可见一斑。

一个武将要想不断升迁，靠的只能是立军功。对聂士成来说，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两场战争。

一场是中法战争。1884年，法国海军在孤拔的率领下进犯台湾，台湾巡抚刘铭传一面死守台湾，一面向清廷求援。在当时很多人都不愿去的情况下，聂士成主动请缨，率800人租用英舰“威斯利”号从台南登陆，在关键时刻增援了刘铭传，决战基隆，将孤拔舰队赶出了台湾本岛。

另一场是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期间，聂士成随叶志超率军支援朝鲜。在朝鲜，聂士成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率军在摩天岭正面阻击日军。他充分利用地形，设疑兵，搞突袭，杀敌无数，取得甲午战争中清军为数不多的几场胜利。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日军依旧无法攻克摩天岭。

这两场战争之后，聂士成已经名列“后淮军三杰”，官授直隶提督。

1899年，受痛于甲午之败，清廷决定建立新式军队，命名为“武卫军”（董福祥统领“武卫后军”，宋庆统领“武卫左军”，袁世凯统领“武卫右军”，荣禄坐镇“武卫中军”）。聂士成统领的是“武卫前军”，基本上全都配备了近代陆军的火器装备，在“武卫军”分支中，其战斗力仅次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

那一年，聂士成已经63岁了。

但等待他的，不是功成身退，而是一场痛苦折磨，乃至屈辱。

3

1899年，就在聂士成执掌“武卫前军”的这一年，一个由底层贫苦人民发起的社团，在山东开始崛起。

这个社团，就是义和团。义和团的成分比较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兵、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了不少流氓无赖。

聂士成是从心底里反对义和团的。在他看来，这伙“拳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不会帮助抵抗洋人，还会扰乱国家的根基。

不过，当时除了聂士成态度鲜明外，其他手握重兵的权臣对义和团的态度都很暧昧——因为慈禧的态度一直在变。

最典型的，当属袁世凯。袁世凯是最恨义和团的，但他在主政山东期间，却一直在动用各种手段——他曾假模假样地请来义和团的几个“大师兄”，让他们表演“刀枪不入”神功，然后假装不知情，用洋枪将他们全部击毙。最终，他不剿不抚，而是把山东的义和团成员最终都撺掇去了北京城。

但聂士成不愿意。

1899年4月，义和团破坏了保定铁路，聂士成随后奉命保护铁路，被义和团杀伤数十人。性子火暴的他索性率军攻打义和团，杀了义和团的500人。他也请义和团的“大师兄”来表演“刀枪不入”的神功，但与袁世凯不同的是，他当场拆穿“大师兄”先放弹丸后塞火药的把戏，直接将“大师兄”枭首示众。

一时之间，聂士成的军队专杀义和团，而义和团的拳民也专等聂士成的部队士兵落单而群起围杀，双方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武卫军”的总指挥荣禄曾专门把聂士成叫来痛骂了一顿，说他“糊涂”——荣禄的意思是，“你连老佛爷的心意都看不明白？”但聂士成不吃这一套，给荣禄写信：“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

但是，问题最终还是来了：朝廷最终觉得义和团“民心可用”，而义和团也愿意承诺“扶清灭洋”，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杀掉聂士成。

当时得宠的端郡王载漪不断劝慈禧“顺从民意”以获得义和团的效忠，但慈禧在这件事上却不糊涂，始终不肯答应。

因为慈禧自己心里清楚，真正打起仗来，要靠的还是聂士成和他的“武卫前军”。

所以，慈禧给聂士成摆出的态度是：戴罪立功。

为什么是“戴罪立功”？因为八国联军已经打到了天津城下。

对于慈禧向列强宣战，聂士成其实也是很有意见的。聂士成虽然是武将，但在武将中属于比较心细的。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料到中日很可能有一战，所以花了8个月时间，游历东三省以及与俄国和朝鲜的交界，行程1.15万余公里，写了四卷《东游纪程》（所以甲午战争期间他才对地形那么熟）。他喜欢用客观数据说话，所以也深知诸列强的强大，知道以大清之国力，是万万不能与之同时开战的，否则国家将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是，聂士成又是一名军人，他必须服从命令。与当时装傻的袁世凯不同，与立刻签订“东南互保”表态“不掺和”的张之洞、刘坤一也不同，战端一开，聂士成肩负直隶提督之职，守护京畿之责，纵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打。

而且，聂士成手里掌握的“武卫前军”，确实堪称当时京畿地区最强的武装力量了：全军1.3万人，配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枪1万支，各类其他长短枪1.2万支。此外还拥有7.9毫米口径马克沁重机枪2挺，各类口径大炮60余门。这样一支军队，若论武器装备水平，确实已经不亚于八国联军了。

6月11日，八国联军先遣队逼近天津西面的廊坊，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与义和团奉命联合阻击。必须承认，义和团的团民勇敢地冲在了最前面，但因遭遇八国联军机枪的扫射，死伤惨重。聂士成的正规军作为督战队，对逃回来的义和团民众进行了机枪扫射，与义和团的仇怨进一步加深。

随后，聂士成的正规军在义和团死伤殆尽的情况下与八国联军交火，火力配备不亚于对方的清军很快就压制住了对方，最终八国联军只能撤退。

虽然名震一时的廊坊大捷多少有被夸大的成分，但确实是聂士成的清军和义和团成功阻击了八国联军。但是，在论功行赏时，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知道慈禧的心思，把功劳全都划到了义和团的身上，而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没有得到任何封赏。

到了6月下旬，聂士成受命攻打天津租界，强攻近10次，战斗力剽悍。有八国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

军。”

但与此同时，一起配合的义和团由于组成成分复杂，还是暴露出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弱点，在打洋人的同时，也趁机四处劫掠。为此，聂士成一边杀洋人，一边镇压义和团，杀了1000多名义和团民众。

所以，在庚子年的天津战场上，出现了一幅奇怪的场景：人数占劣势的八国联军团结一心，拼死要突破防线，去北京保护自己国家的使馆；而人数占优势的清军和义和团却相互倾轧，往往在打洋人之前，自己先要厮杀一番。

很快，清廷发来了电报，称聂士成“旬日以来并无战绩，且闻有该军溃散情形，实属不知振作”。给他的处分是：革职留任。

这应该是当时朝廷上“主战派”载漪操作下的电报。（载漪为何主战，为何支持义和团，可参看“馒头说”《117年前的今天，中国向全世界“宣战”》）

此时在前线厮杀多日的聂士成，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义和团恨他，朝廷怪他，洋人也要杀他。

他到底是在为谁而战？

而更让聂士成倒抽一口冷气的，是战场上的变化：八国联军中的日军从天津南面占领了纪家庄，而英国和俄国的联军冲破了聂士成部队的左翼。作为大清帝国在京畿地区的唯一也是最后一支精华力量，聂士成的部队被压缩进了狭小的八里台地区——他们被包围了。

此时的军机处来了一封上谕，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考虑到聂士成的处境，而是对他之前的苦战做了一个定论，并下了新的命令：“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

接到上谕后的聂士成，反倒平静了下来。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自己的打算：“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

1900年7月9日清晨，聂士成知道，最后的决战时刻来临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天，慈禧向之前被排斥到广东的76岁的李鸿章发出了一封电报："火速北上，办理外交事务。"

在这个时候把外交经验丰富的李中堂大人再叫回来，目的再明显不过了：老佛爷头脑发热过了没多久，就准备和列强议和了。

当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都在寻找台阶下的时候，为她拱卫大门的提督聂士成，却已经没有退路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聂士成还得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义和团的一部分拳民跑到聂士成家里，去抓他的母亲、妻子及女儿了。聂士成派兵追赶，而他部下有一个营里的很多士兵和义和团有串通，他们大喊"聂士成要造反"，然后开始袭击聂士成的军队。

而在营帐外，正面的八国联军的炮弹已经打了过来——背面，还有500多名日军包抄了上来。

腹背受敌。聂士成骑上自己最心爱的战马，昂首来到了本方阵地最前线旁的一座小桥上，督战。

子弹横飞，炮弹爆炸，但聂士成在小桥上一动不动。

清军看到本方主帅亲临一线督战，顿时血气上涌，无人后退一步，子弹打完了，就与冲上来的洋人肉搏。

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聂士成部队越打人越少，弹药也所剩不多。此时，如果有援军的话，八国联军的几轮攻势被压下去，战况可能会有所改观。

但是，本应该最不缺人力的大清帝国，此时此刻却不会有任何一支部队来支援聂士成——大家都揣摩出了老佛爷心思有变，所以都在按兵不动地观望。

聂士成完全可以撤退的，但他一动不动。

一个时辰之后，清军阵地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此时的聂士成，转身进了营帐，不久之后又走了出来，骑上马，再次站上了小桥。

再一次走出来的聂士成，换上了全套崭新的武官服。尤其醒目亮眼的，是他穿在身上的明黄色的崭新黄马褂——那是在1891年平定热河金丹教叛乱后，皇上亲自赏赐他的。

黎明的雾气已经完全散去，八国联军阵地上德军的指挥官库恩，一眼就认出了对面阵地上的聂士成——他曾在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中担任过骑兵教练。

库恩不希望看到聂士成战死，他让一个士兵过去传话，希望他投降。

没有悬念，士兵带回来的，是聂士成断然拒绝的消息。

新一轮的炮击和射击又开始了。聂士成的明黄色黄马褂，毫无疑问成了战场上最显眼的靶子。很快，聂士成的战马就倒下了，他立刻又换上了一匹，再倒，再换，一共换了4匹战马。

等换到第四匹战马的时候，聂士成的双腿已经被打断了，他勉强骑在马上，双腿在空中摇晃。

这时候，聂士成所在的那座小桥也已经失守了，他试图带队收复小桥。一发炮弹炸开的弹片划开了他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依旧骑在马上指挥冲锋，直到中了三颗子弹——

一颗子弹从他嘴里打了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还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聂士成终于倒了下来。

主帅阵亡，清军全盘崩溃，八里台失守。

6

故事并没有结束。

德国军队冲上来之后，指挥官库恩第一时间找来了一条红毯子。他用红毯子盖在了聂士成已经惨不忍睹的尸体上，包裹起来，送还给清

军。不过，清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返回的途中，遭遇了义和团的伏击——他们要抢聂士成的尸体，戮尸泄愤。

帮清军赶走义和团的，是洋人的士兵。

直隶总督裕禄上奏朝廷，希望能赐聂士成抚恤，但遭到了载漪等人的强烈反对。

最终，慈禧下的诏书是："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

之后调过去补防的清朝守备将领，再也没有一人愿意像聂士成那样拼命。

1900年7月14日，天津城在八国联军的围攻下终于沦陷，通往北京的门户洞开。此时，离慈禧向列国"宣战"，也就过去了21天。

馒头说

我在各地的读者分享会上，经常会举一个人的例子。那个人叫丁汝昌，北洋水师的提督。

每次我拿他举例，其实也会想到聂士成。两个人都是提督，一个是水师提督，一个是陆军提督。虽然一个在海上，一个在陆地，但归根结底，二人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可能都看得清自己的命运，却最终只能眼睁睁地接受。晚清这段历史，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愿意去多看，因为太屈辱。而看的时候，又会很生气：当时的这些人，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去，处在他们所在的位置，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至少我觉得我不能。

在一百多年前，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门一开，我们从泱泱大国，忽然就变成了落后的"蛮夷"，这确实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甚至无法想象的。哪怕是当时最顶尖的政治家和智者们，都难免陷入迷惘。

所以，曾国藩有曾国藩的谋划，林则徐有林则徐的想法，李鸿章有

李鸿章的主张，左宗棠有左宗棠的决断。

而再往下一个级别，很多亲临一线的指挥官，他们腾挪的空间小了很多，有时候就两条路：要么贪生怕死，要么以死殉国。

丁汝昌选择了服毒自杀，而聂士成虽然战死沙场，但他的那种方式，其实也是自杀。

有时候，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之下，一个微小的个体，真的很难改变潮水前进的方向。他所能做的，可能也只是献出自己的生命。

1905年，在当时已当上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的力主之下，清廷决定为聂士成“平反”，追赠“太子少保”，赐谥号“忠节”，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两边有对联：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

如今的天津，还有一处“聂公桥”，终于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901》（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子孙谨守聂公训，至今无人敢出国》（《新安晚报》，2014年7月24日）

《义和团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中国第一个蒙难的新闻记者

关于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记者，已不可考。但对于第一个殉职的记者，基本有个共识。这个共识，未必建立在详细的时间节点考证上，而是建立在这个记者所做的事，以及留下的影响上。

1

1903年7月31日这一天，慈禧太后下令杀了一个人。

慈禧一生中，经她手谕被砍下的人头，不计其数。但这一天她下令杀的这个人，让她后来有点后悔。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荩，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家报社的记者。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2

沈荩，生于1872年，原名沈克诚，湖南长沙人。

中国甲午一战惨败后，沈荩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迫切地希望这个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

身处湖南的沈荩和两个同乡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他的那两个同乡，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谭嗣同和唐才常。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血洒菜市口。一时之间，沈荩觉得国家前途又黑暗一片，于是和唐才常一起远走日本留学。1900年，两人从日本返回上海，成立了革命组织“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正式由改良派转为革命派。

1900年，唐才常谋划的自立军大起义因为走漏了消息，被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派人绞杀，唐才常被捕后被枭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武昌汉阳门城门上。

唐才常死后，沈荩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在1900年

8月末单独发动起义，史称“新堤起义”。但因为寡不敌众，起义也很快失败了。

失败后的沈荩，因为身份没有暴露，索性就潜入了北京城。由于沈荩在日本留过学，会日语，所以他找了一家日本人的报社《天津日日新报》，拿到了记者的身份，然后以此为掩护，开始出入北京的社交圈。

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沈荩会外语，又有记者的身份，所以在北京的洋人圈里很快建立了一个小圈子。而清朝的那些贵族，看到沈荩和各路洋大人的关系处理得不错，也开始和他结交。没多久，沈荩成了北京城里的一个社交小达人，得到的各路消息也远比普通人多很多。

沈荩原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圈里一直舒服地混下去，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尤其是有一次他偶然听到一位清朝贵族透露出的一个消息之后，他觉得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

中国和俄国要签订《中俄密约》。

3

严格意义上说，《中俄密约》其实在1896年就签订了。

1896年，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为借口，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就被称为《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虽然以“共同防御”为出发点，但规定只要中日开战，中国所有港口均允许俄国兵船驶入，而且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允许俄国建造铁路，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俄国都可以通过该铁路运送军队或军需品。

这个条约，其实就是俄国趁火打劫，谋取中国的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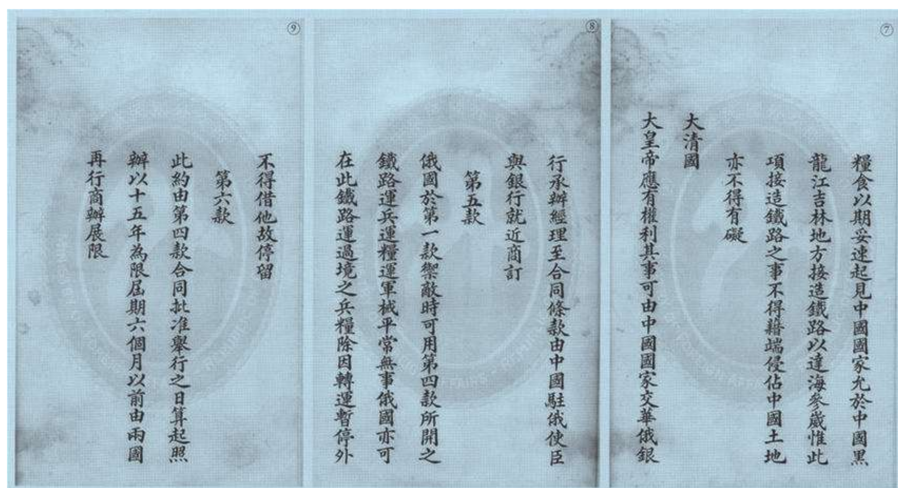
到了1903年，俄国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俄国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这等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要掠走中国的东三省和内蒙古。

迫于俄国强大的压力，清政府准备签字。而签字之前，这个消息让沈荩知道了。

沈荩决定用一切代价阻止这件事发生。凭借自己的人脉圈，沈荩最终通过贿赂，从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那里搞到了最新的《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然后立刻把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收到草稿后，《新闻西报》随即全文刊登。然后，国内的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出了一期“号外”（日本揭露此事的动机自然一想便知）。

全国哗然。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⑦
糧食以期妥速起見中國國家允於中國黑
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惟此
項接造鐵路之事不得藉端侵佔中國土地
亦不得有礙
大清國
大皇帝應有權利其事可由中國國家交華俄銀

⑧
行承辦經理至合同條款由中國駐俄使臣
與銀行就近商訂
第五款
俄國於第一款禦敵時可用第四款所開之
鐵路運兵運糧運軍械平常無事俄國亦可
在此鐵路運過境之兵糧除因轉運暫停外

⑨
不得借他故停留
第六款
此約由第四款合同批准舉行之日算起照
辦以十五年為限屆期六個月以前由兩國
再行商辦展限

《中俄密约》部分内容

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成功被阻止了，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1903年7月19日晚，沈荩在北京寓所里被捕。

4

出卖沈荩的，是一个叫吴士钊的人。

吴士钊举人出身，从翰林院被弹劾下来，当时和沈荩一起寄居在刘鹗府中（就是写《老残游记》的那一位）。沈荩把吴士钊引为知己，把

自己做过的事情，包括带领起义的过去，都说给吴士钊听了。但吴士钊并没把沈荩当知己，而是把他当作了自己官复原职的筹码。

被逮捕后，沈荩自知难逃一死，没有任何掩饰，把自己做过的事一一都说了，并留下了四首绝命诗。

慈禧确实是准备杀沈荩的。但沈荩被捕的那一个月，恰逢农历六月。按清代惯例，一般夏月不执行死刑，要放到秋天。另一方面，那个月正好也是光绪皇帝的生日，皇帝生日的“万寿月”也是要停刑的。

但慈禧认为沈荩“罪大恶极”，必须立即正法。那怎么办？索性就“杖毙”。所谓“杖毙”，就是用棍子打死。

沈荩被行刑的那一天，其实是很血腥的：为了讨好慈禧，刑部专门制作了一块大木板用于“杖毙”。但据《大公报》报道，“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骨已如粉”，沈荩一声不吭，却仍没有咽气。

最后，是沈荩自己开了口：“怎么还不打死我？勒死我吧！”

最后，沈荩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死时只有31岁。

后来有个叫王照的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待的就是一年前沈荩待过的牢房。他后来这样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处死沈荩，慈禧认为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但出乎她意料的是，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来。

5

《大公报》先是详细报道了沈荩受苦刑而死的新闻，随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字林西报》随后跟进，发表《北京政府之暴行》，批评：“北京政府今出现一残酷不可言之政……其狠心残忍，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

《国民日日报》发表《沈荩死刑之暗昧》，哀叹：“生命之至贱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

《万国公报》则评论："凡国不自重其国，而虐待本国人民，以快其一朝之意，此乃野蛮种类之所为，文明之国必羞为之伍者。且其人既安心而行之，则已无可劝戒，惟永远不与之平等而已。"

《大公报》随后还报道了外国公使们对此事的看法："杖毙沈荩一案，驻京西人皆极着意。某国公使近向人云，视中政府近日所为，颇有将兴大狱之景象。又云，中政府既重提旧案，拿办新党，吾西人亦可再将庚子未办之祸首再行严办数名云云。"

《法国新闻报》附和："沈荩之死，西人闻之皆胆寒。"

香港《中国日报》总结："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杀一个小小记者，居然引来"友邦惊诧"，这是慈禧万万没有料到的。所以她后来在接见各国公使夫人的时候，也表示自己挺后悔的，还面谕群臣，要求不能"株连良善，致离人心"。

可惜已经晚了。沈荩被杖毙一案，革命党人在他们自己的媒体上发出了最强烈的怒吼。

章太炎在《浙江潮》上发表诗作《狱中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慈禧原本准备"杀鸡儆猴"，却引起了全国人民对统治者的又一波反弹浪潮，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6

沈荩之死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在国内。一个叫莫理循的英国人，被沈荩之死深深地震动了。莫理循不是一般人，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

彼时的《泰晤士报》，在全球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派驻在一些国家的记者，甚至享有"第二大使"的称号。

莫理循比沈荩大10岁，算是同行。在得知沈荩的死讯后，愤怒异

常，称慈禧为“那个凶狠恶毒的老妇人”。他在《泰晤士报》上撰写了大幅的报道，揭露了“一个中国记者之死”，并呼吁英国不能漠视俄国在中国土地上无节制地扩张，而且，他还通过各种办法，鼓动日本和俄国决战。



在其他照片背面，莫理循留下的注释和记录都是龙飞凤舞的，唯独沈荩这张照片背后，莫理循的手写体异常工整、有力：“沈荩，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

1904年，为了中国东北的权益归属，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当时有国际舆论把这场战争称为“莫理循的战争”。不过，日俄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方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犯下了种种暴行，这又让莫理循非常不满，于

是他转而在媒体上抨击日本。

1912年，莫理循被聘为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但相比这个“顾问”头衔，莫理循此前在中国16年的《泰晤士报》记者生涯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莫理循在中国期间拍摄的大量照片，后来被整理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大型图册，其中就收录了一张他拍的沈荩的清晰照片，正是这张照片才使现在的我们得以知道沈荩长什么样子。

馒头说

其实关于沈荩是不是“因言获罪”，历来还是有争议的。

种种资料显示，慈禧之所以要对沈荩痛下杀手，还是因为他以前组织革命“谋反”（甚至有说法称他准备找李莲英行刺慈禧）。而且，据说沈荩能顺利公布《中俄密约》“新七条”的内容，有日本人在背后的推动作用（日本当然不希望俄国独享中国东北）。更有一种推测，是清政府也有意让媒体曝光（1901年，正是莫理循从李鸿章处拿到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情报，公布在《泰晤士报》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才阻止了俄国的野心）。

不过，沈荩的勇敢和爱国之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沈荩之死所彰显出的新闻媒体的力量，也是没有争议的。

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职业，依旧是神圣的。尽管这些年来，这个称号的光环大大减弱（有外部因素，但必须承认，也有部分同行自己糟蹋的原因），但我还是坚信，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记者。

有人说，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没错，在美食、娱乐、时尚、旅游这些凸显个人品位和观点的领域，在传播渠道垄断被打破的背景下，自媒体确实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涉及社会公共领域和时政的报道以及各种舆论监督，机构媒体的记者还是有不可超越的优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种优势和责任，是任何自媒体，乃至机器人写作都取代不了的。而且我也坚信，总有一批记者，会坚守“铁肩担道义”的初心，成为“时代

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忽然想起了2014年的一则新闻。说是江苏省理科状元吴呈杰的最初志愿是报考北京大学新闻系，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后来被很多“有良心”的记者劝退了，他最终选择了北京大学金融系。我看了关于他的一些后续报道，他现在应该读大四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新闻写作梦想，而且成了校媒的主编。

我不知道他毕业后是否还会选择做记者这个行当——读不读新闻系其实和做不做记者没有那么大关系——但我很欣赏他曾在微博上转发过的一段话：“新闻是一条注定要长跑的路，一朝一夕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要相信新闻依然有助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你会是千万推动者中的一员。”

在中国新闻的历史中，有千千万万名记者奔跑在这条没有终点的路上。

一个皇帝的“过山车之旅”

这个故事，和一位皇帝有关。这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但他既不是秦皇汉武，也不是唐宗宋祖，而是一位末代皇帝。他不仅是一个朝代的末代皇帝，还是整个中国帝制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当然，我们之所以要说他的故事，还因为他是一个经历了命运“过山车”的皇帝。

1

对大清王朝来说，1908年的冬天，可能比往年要更冷一些。

11月14日，郁郁寡欢且不得志的光绪皇帝，终于告别了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国家，驾崩了。

一直与光绪皇帝缠斗，也已经步入风烛残年的慈禧太后，推出了她早就物色好的继位人选，然后只晚了一天，也步光绪后尘，撒手西去。

慈禧推出的人选，就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爱新觉罗·溥仪。

这一年，溥仪还没满3岁。懵懂无知中，就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起”——成了偌大的中国的皇帝。

只是这个皇帝，他只做了三年。



童年时的溥仪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整个大清王朝顿时风雨飘摇。

6岁小皇帝溥仪手中的最后筹码，是52岁的袁世凯。为此，朝廷被迫给了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的头衔，希望他能调动他的北洋军，剿灭革命党，拯救大清朝于危难之中。

可是，当时拥有中国最强资源和实力的袁世凯，选择的合作对象是45岁的孙中山——他们两家手里都有筹码，谁会去理会一个已经完全失去控制力的小皇帝呢？

后来的事情，正是如同袁世凯与孙中山约定的那样发展的：袁世凯逼清朝皇帝退位，换取孙中山支持自己当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以隆裕太后名义颁布的《退位诏书》昭告天下，宣布皇帝退位：“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于是，刚满6岁的溥仪小皇帝，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落”—一夜之间，他就不是皇帝了。

从此以后，他的头上多了一项不怎么好听的头衔：末代皇帝。

2

平心而论，中华民国的政府，一开始对以溥仪为代表的皇族，还是不错的。

当时开出的条件是：溥仪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中，保留“皇帝”的尊号。政府以外国君主的礼仪相待，紫禁城内皇室的财产分毫不动——并且，每年还提供给皇室400万两白银的费用。

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中国的辛亥革命完全有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成为一场不流血的和平革命。而中国可能也有那样的机会，像英国那样，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如果真是那样，说不定现在的我们的媒体，还会铺天盖地八卦皇室爱新觉罗王子，和一个上海幼儿园老师的恋情。

可惜历史当然不会这样拐弯。

首先，是聪明一世，最后老来糊涂的袁世凯想过一把当皇帝的瘾，

然后，又出了一个脑子进水的小军阀张勋。

而这个张勋，促成了溥仪人生中的第二次“起”。

1917年7月1日，在张勋的支持下，溥仪重新登上“帝位”，恢复年号“宣统”，然后开始大封群臣，公侯王爵全部封好之后，一共过了11天。

11天后，在全国的反对声中，在段祺瑞的出兵讨伐下，只有4000名“辫子军”的张勋逃入荷兰大使馆避难。

第12天，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这一年，溥仪还不满12岁。第二次“落”就这样来临了。

3

严格意义上讲，被张勋“顶”上王位12天后退位，也不算什么“落”。因为溥仪本来就已适应了紫禁城“逊清小朝廷”的生活。

真正的第二“落”，是“落”在1924年。

张勋的复辟，与其说是让溥仪的清廷皇室得到了一个上位的机会，倒不如说是给了各大军阀一个借口：哦！原来你们还不老实，那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1924年10月22日，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率军杀回北京，软禁了我们历史书上著名的“贿选总统”曹锟。

这事情，本来和溥仪也没什么关系。但冯大将军不知道怎么就忽然决定，去他的《皇室优待协定》，老子要进紫禁城！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兵进入紫禁城，直接对溥仪下了“逐客令”。

这个事件，史称“北京政变”。

这一年，溥仪18岁。他真正体会到了流离失所的感觉。11月29日，溥仪逃进了日本公使馆。这一次逃离，对溥仪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1925年2月开始，溥仪先后住在天津租界的张园和静园。这时候的溥仪，就有点像金庸《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了，整天满脑子的念头，无非“复国”二字。

为此，溥仪花了大价钱开始打扮自己，从头到尾，全盘西化，开始带着自己的一妻一妾——1922年，溥仪立了婉容为“后”，立了文绣为“妃”——开始频频出入各种社交场所。



溥仪和婉容

从中国国内的军阀吴佩孚、段祺瑞，到各国的公使，对溥仪都很客气，都尊称他为“皇帝”。但过了一段时间，溥仪就渐渐发现有些不对：

大家都对我很客气，但都只是表面的寒暄而已！他们都有自己的目的！客气能当饭吃吗？

客气能复国吗？

这时候，溥仪想起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从他被赶出紫禁城开

始，就不断在自己国内刊发各种报道他的文章，不断表示对他的遭遇的同情。

这个国家，名字叫日本。

5

日本人其实早就盯上溥仪了。为此，他们特地派出了最得力的特务“王牌”——土肥原贤二。（关于他的故事可见《历史的温度2》中《“土肥圆”和“土肥原”》一文）

土肥原贤二找到溥仪，游说他的理由只有一个，但非常有力：你不是想复国吗？我给你一个帝国，你来当皇帝！

对那个时候的溥仪来说，很难再找出比这更有诱惑力的条件了。对于身处租界的他，无权，无势，无兵，也就有点从紫禁城带出的珍宝，凭什么对得起列祖列宗，把丢失的江山再拿回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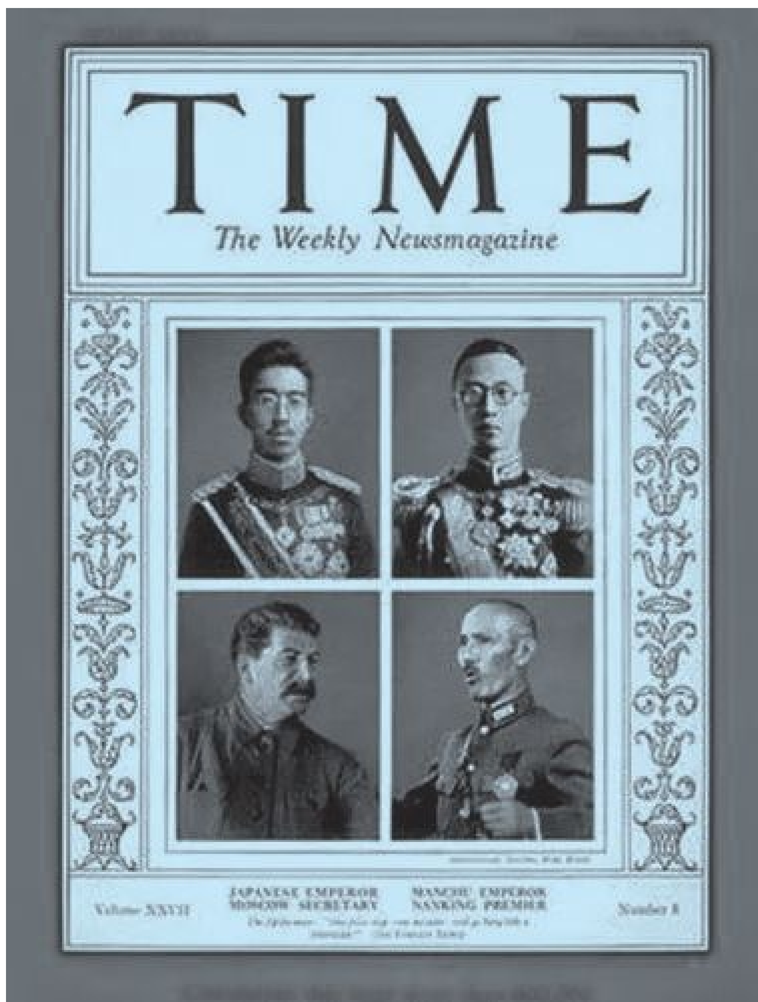
1935年，溥仪以“满洲国”皇帝身份访问日本，与日本天皇同乘阅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沦陷在日本的铁蹄之下，时机终于成熟。

1931年11月，溥仪在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一路潜行至东北。

1932年，“满洲国”建立。两年后的1934年2月28日，溥仪成为“满洲国”的执政。

3月6日，溥仪与日本签订了《汤岗子温泉密约》：“满洲国”的治安和国防靠日本，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靠日本，“满洲国”中央和地方的官署任用日本人。“满洲国”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傀儡国。



自左上顺时针方向依次为：日本裕仁天皇、溥仪、蒋介石、斯大林。这四个人，被《时代》周刊评为当时“最能影响亚洲格局”的四个人

但溥仪不管这些。1934年，“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成为“满洲帝国”的皇帝，兼任陆海空军大元帅。

这一年，溥仪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迎来了人生的第三

次“起”。

6

这个“起”维持了11年，又该轮到“落”了。

转眼就到了1945年，日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1945年8月10日，离日本无条件投降还有5天，溥仪被通知：赶紧从长春紧急转移至中朝边境城市通化。

溥仪开始亲自监督“打包”——那些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珍贵文物，一共装了57只大木箱。

8月17日，溥仪乘飞机抵达沈阳机场，准备飞往日本，但一直耽搁到了8月19日——所以后来有一个说法，说其实是日本人把溥仪“出卖”给了苏联人。

但不管怎么说，8月19日凌晨，苏联的空军“神兵天降”沈阳机场。

在候机厅，苏联士兵发现有20多人坐在那里。候机厅的桌子上，有果汁、啤酒，甚至还有威士忌。看到苏联士兵出现，所有人都紧张地站了起来，除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溥仪。

他是“满洲国”的皇帝嘛。

但最终，溥仪还是站了起来。在苏联士兵的缴械要求下，他从沙发垫下摸出了一把手枪——当时在场的人以为他要自杀，但事实上他并没有。



溥仪被苏军带走时的情景

在确保自己不会被当场枪毙之后，溥仪明显镇定了很多。他向苏联军官介绍了他的“内阁”成员，以及说出了“满洲国”政府文件藏匿的地方。

然后，他人生的第三次“落”又开始了。

7

8月20日，在苏军的押送下，溥仪等9人前往苏联，先后被关押在赤塔的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等处。这一关押，就是五年。

其实，在苏联的“囚禁”生活并不差。莫罗科夫卡收容所甚至专门为溥仪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

在吃的方面，溥仪这些人每天有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配咖啡和茶；午餐至少两菜一汤；下午三四点钟有“下午茶”；晚餐常吃西餐，内容更为丰富，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

当苏联人知道溥仪会弹钢琴后，还特地给他搬来了一架钢琴。

当然，能得到这样的待遇，溥仪不是没付出过代价。溥仪有一块白金外壳的长方形手表。刚到苏联时，一位苏军军官伸出了自己的手腕——上面空空如也——朝溥仪笑了笑。溥仪立刻心领神会，把表摘下，送给了这名军官。

在伯力红河子看守所，必须让苏方代管物品。登记时，看守所所长看到溥仪的一条项链非常漂亮，他说了一句：我如果能送给我妻子这样

一条项链，那该多好啊！

溥仪二话没说，就把这条项链送上了。

当然，溥仪也有自己的诉求："共产党和国民党谁战胜了谁，都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只能留在苏联。"所以，他一直申请留在苏联。

可是，苏联拒绝了他。理由是："如果中国内战国民党战胜了，我们还有理由把你留在这儿。现在共产党赢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了。"

1950年8月1日，溥仪被遣送回国。

8

被遣送回国后，溥仪最担心的，是被直接处决。让他心中石头落地的，是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溥仪这些人，在处理方式上，只能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

这句话，让溥仪一下子放心了。随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安心度过了三年。在这三年里，他写了自己前半生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1959年9月，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这是新中国的首批特赦。对于这次的特赦，溥仪根本没抱任何希望，因为他觉得，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被首批特赦"。而他认为自己属于"罪大恶极"。

因为他是皇帝嘛！

然而，溥仪怎么也不会想到，在1959年12月4日公布的首批特赦名单上，"爱新觉罗·溥仪"居然是特赦的001号。

不仅如此，1964年，溥仪担任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以为人生已经跌到谷底的溥仪，居然迎来了第四次"起"。

哪怕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因为周恩来特地把他列为保护对象之一，所以溥仪没有遭受到任何冲击。否则，以他的身份，没有人敢想象会遭遇怎样的下场。

因为他是皇帝嘛！

只是，溥仪随即遭受了人生第四次“落”，不是因为任何人为因素，而是来自病魔。

1967年，溥仪被诊断患有尿毒症。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指示，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

然而，天命如此。

1967年10月17日，经历了反复和挣扎，61岁的溥仪，以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的身份，告别人世。

馒头说

1988年，由贝托鲁奇导演，尊龙、陈冲、邬君梅、彼得·奥图出演的电影《末代皇帝》，成了第60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最大赢家——囊括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在内的9项大奖。

溥仪的一生之所以能拍成电影，电影能囊括那么多奖项，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末代皇帝”的特殊身份，更在于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世界各国，各朝各代，那么多末代皇帝，为什么溥仪那么受关注？因为他恰恰经历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最风云多变的年代。

说他无辜吗？确实无辜。不到3岁即位，从来就没有过实权，怎么可能掌控偌大的大清帝国？

说他真无辜吗？其实也未必。当成年后有了判断能力，为何又甘心当个“儿皇帝”？

或许，还是用周恩来那句总结比较合适：“你当皇帝的时候才两三岁，那时的事不能让你负责。但在伪满时代，你是要负责的。”

双面张作霖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学良获得的关注度远远超过张作霖，但谁都认可一件事：没有这个老子，就不会有那个儿子，这绝不仅仅是指生理遗传上。张作霖这个人物，从小小土匪做起，最终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掌权者，仅仅用一个“军阀”来形容他，肯定是不够的。

1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他们张家的祖籍是河北大城。

据《大城县志》记载，张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镇冯庄。直奉大战期间，张作霖曾返乡认祖，但族中老人反对。

一个说法是，因为张作霖年轻时当过“胡子”（土匪），有辱门风。另一个说法是，当时正值直奉大战，族中老人担心万一直系失败，吴佩孚会迁怒族人。总而言之，张作霖未能归宗，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其实，张作霖的生活，和河北并无关系。因为生活困苦，张作霖的先祖张永贵从河北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了祖父张发时，已经比较富裕了。但传到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一辈，张有财好赌、吸毒，最终因欠赌债，被债主害死。



张作霖与第五个儿子张学森（左）、第六个儿子张学浚（右）合影

1875年出生的张作霖，那一年13岁，家境破落。

此后的张作霖，流浪过，当过兽医，后来从了军，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再后来做过土匪，被招安后开始从副营长做到营长、旅长、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作为“奉系军阀”首领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

对张作霖这个人，其实存在不少争议。

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这个人身上，确实表现出了两个不同的侧面。

2

我们首先来看看张作霖的匪气——作为土匪的张作霖，以及剿匪的张作霖。

按照张家老一辈的人说法，张学良上一辈的张家人，没有一个是“正经死在床上”的。

这当然也和东北的彪悍民风有关。

张作霖从小就显示出了彪悍的本性。上私塾的时候，一次老师在学堂的一个门后面发现了一杆小扎枪（类似红缨枪），就问是谁的，张作霖说是他的。老师问干什么用，张作霖回答：我昨天看见你拿板子打别人的屁股，今天如果你打我，我就给你两下子。吓得老师去找张作霖的母亲：你这个孩子我不敢教。

甲午战争结束后，原本当兵的张作霖没事干，做起了兽医，经常给马贩子医治他们的马。按照张学良的回忆，当时的东北，凡是有马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指他们是土匪或偷马贼）。经常跟这些人接触，一来二往，张作霖也结交了不少“绿林朋友”。

1900年前后，正赶上闹“义和团”，沙俄趁机染指东北，清朝的盛京将军逃走，东北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地方，无奈之下，很多村庄只能选择自保。

那时的张作霖，凭借自己的岳父、地主赵占元的帮助（赵占元的次女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发妻，也是张学良的生母），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大团”，也就是武装组织，来保障村庄的安全。

保障安全，是要收费的，也就是所谓的“保护费”。而保障安全，也难免要和其他来侵扰的土匪交火，乃至互相争抢地盘，张作霖当“胡子”的经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如何，张作霖把自己的“辖区”保护得相当不错，手下人也很守规矩。在那个乱世，反而有很多村庄主动要求张作霖去“保护”，所以到后来，张作霖负责保卫20多个村庄的安全。

后来张作霖的老奉系一派，张作相（后来当到吉林省主席）、张景惠（后来做到奉军副司令，后降日，出任伪满洲国总理）这些人，都是当时加入队伍的。

1902年，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张作霖机敏地看到，所谓的带“民团”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他经八角台商团会长张紫云引荐，拜新民府（今辽宁省西北部）知府增韫为师，接受了招安，成了一名帮办（副营长），之后又升到了管带（营长）。



张作霖当官后的第一张照片

这是张作霖一生转折的开始。

政府招安你，一是怕你的“民团”散了彻底成为土匪，二是“以夷制夷”，要你去打土匪。

原来就是土匪的张作霖，摇身一变，立刻成了“剿匪专家”。虽然原

来也被叫作“土匪”，但应该说，张作霖对扰乱地方治安的土匪还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在剿匪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再加上他本身就熟悉土匪的套路，所以收获颇丰。尤其是诱杀大土匪杜立三一役，堪称心狠手辣。

1908年，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让他去剿灭被俄国收买的蒙古叛匪。

这可能是张作霖剿匪生涯中最艰难的任务。因为蒙古草原极为干燥，经常有狼出没，而熟悉地形的“蒙匪”又相当彪悍，马术精湛。

但就是这个张作霖，总结经验教训，先是派人去卧底，然后智取强攻结合，他本人也身先士卒，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收拾了“蒙匪”里几股比较大的势力：白音大赉被击毙，牙仟被生擒，陶克陶胡被张作霖追击400公里，逃入外蒙。从这一点看，张作霖解决了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匪患，功不可没。

而打击土匪那么得力，可能也只有土匪出身的彪悍张作霖能做到。

3

应该说，剿匪帮助张作霖完成了人生积累的第一步，但要再进一步，他需要另一个更大的机会。

这时，辛亥革命到来了。

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反革命的张作霖和一个“革命”的张作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参见《历史的温度1》中《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

在各省纷纷响应、准备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的时候，奉天省（1929年张学良将其改为“辽宁省”）的新军也在秘密酝酿。当时新军第二混成旅协同（旅长）是蓝天蔚，他本身就是革命党人，而第二混成旅又是唯一驻扎在奉天省城奉天（沈阳）的一支部队，可谓时机大好。

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知道情况可能不妙，连夜商量对策，甚至做好了跑路的准备。

这时候，远在奉天省西北洮南的张作霖，通过安插在奉天省城的手下，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的张作霖因为剿匪有功，手下的5个营被扩编到了7个营，共拥有3500人，在当时的东北，已经算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听到这个消息，张作霖尽起7个营所有兵力，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向奉天——他知道，自己人生一个大好机会来了。

张作霖赶到奉天的目的是革命吗？不！是去勤王！

风尘仆仆赶到奉天后，张作霖立刻晋见赵尔巽，说："因局势紧张，唯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

赵尔巽这时候哪里还会怪他？表扬还来不及！张作霖随即又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

赵尔巽一听，立刻封张作霖为中路巡防营统领（团长），这下，张作霖手下有了15个营的兵力。

1911年11月12日，奉天召开了保安大会，绅商各界到会的有200多人。赵尔巽带着张作霖参会，在会前，张作霖已经在会场外布置好了自己的人马。



赵尔巽。此人最大的人生成就，恐怕不是提拔了张作霖，而是主编了《清史稿》

会上，革命党人力主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坚决反对，但革命党人群起而攻之，要求他立刻宣布独立。

这时候，一旁的张作霖发话了。

他首先把自己的手枪拍在了桌子上，然后喊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是不交朋友的！”

随着他这个信号，会场四周他布置好的人马全部掏出了枪。



任东三省巡阅使时的张作霖

革命党人偃旗息鼓。最终，会议的成果是，东三省成立了实际上就是保皇性质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担任会长，而张作霖当上了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之后，又因镇压革命党人有功，被小皇帝溥仪赐封“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

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张作霖很快也就随风向变了。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张作霖就任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袁世凯殒命后，他更是做到了奉天督军兼省长。

以张作霖当时的资历，虽然雄霸东北，但做到督军，还是有人不买账的，比如同在奉天且身为张作霖前辈的冯德麟。

这时候，恰恰又冒出个浑人，叫张勋，他要为清王朝复辟。张勋人称“辫帅”，因为辛亥革命后，张勋为表示对清王朝忠心，始终不肯割辫。他手下的军队也都按规定留辫，号称“辫子军”。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十三省军事同盟盟主”身份，在一帮各怀鬼胎的“好兄弟”的注视下，率“辫子军”北上，在7月1日重新拥立溥仪为帝，上演了清王朝复辟的闹剧。

举国大哗，群起而攻之。之前一直举双手赞成复辟，并让冯德麟入京协助的张作霖，此时忽然变成了“骑墙派”，面对张勋发来“速来救驾”的召唤，他选择按兵不动。（当时张勋复辟后，仅封张作霖为奉天巡抚，这也惹恼了“东北王”。）

与此同时，张作霖暗中命令在天津“观望风色”的代表赵锡嘏，去晋见反对复辟的领袖段祺瑞，表示随时“听候总统吩咐”。段祺瑞听了大喜：“不料张雨亭（张作霖的字）还赞成民国！”

因为反对张勋复辟，张作霖摇身一变，又成了“进步人士”，顺手还让冯德麟背了锅。

这其中有一个小插曲。

在得知张作霖赞成张勋复辟之后，曾有三个革命党人带着炸弹去暗杀张作霖，结果炸弹没炸准，两个革命党人自己被炸死了，剩下的一个被张作霖的手下逮捕。

张作霖问：“你们为什么要来暗杀我？”

革命党人说：“因为你支持复辟！”



袁世凯称帝后，身着朝服的张作霖

张作霖说："那这样，我现在放你走。如果到时候我张某人真的支持复辟，你就再来炸我。你看看我是不是支持复辟！"

然而呢？1925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溥仪，在天津遇到了张作霖。其时，张作霖的奉系已经达到鼎盛时期，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乃至威慑全国。

溥仪正发愁应该怎样与张作霖这个大军阀打招呼，身前的张作霖却忽然双膝一弯，直接跪倒在溥仪面前，磕了一个响头，并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皇上好！"

4

评价一个统治者的一大标准，就是是否爱民。

发达后的张作霖，展现出了两个相反的侧面——爱民与扰民。

张作霖的三夫人戴宪玉有个胞弟，在张作霖的奉天大帅府当警卫。这位老兄实在无聊，晚上外出游荡，用手枪射路灯做游戏，结果一条马路的路灯全被击灭。电灯公司发现后，向大帅府禀报，希望张作霖能管一管。结果张作霖管的方式就是——命令卫队长将他的这个小舅子戴某枪毙。

卫队长想，这人是你小舅子，你一时冲动，我可不敢，于是就悄悄把戴某关了起来。等到几天后，戴夫人趁张作霖高兴的时候，为弟弟求情。张作霖知道戴某居然还活着，大为震怒，叫来卫队长说："你不枪毙他，我马上枪毙你！"最终还是把戴某枪毙了。

事后，张作霖对夫人赔罪说："我实在是迫不得已，我不能私亲戚以辜负家乡父老，那还有什么脸面治理政务呢？"

但戴夫人从此与张作霖决裂，削发为尼，离家遁入佛门。

张作霖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张作霖有8个儿子，张学良是长子。

当时张学良是奉军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有一次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听见百姓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火冒三丈，回家就把张学良叫来破口大骂，骂了足足半个小时，整个大帅府都听得见张作霖的怒骂声。张学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最后，张作霖把张学良关了三天禁闭，规定不许任何人探望，且也不许任何人说情，否则一起处罚。

这件事传出去后，整个奉军震动，老百姓拍手称快。

还有一次过年，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给了来拜年的张学良兄弟每人5000元的压岁钱，在一旁的张作霖看了后厉声喝问："给小孩子那么多钱干什么？！"

吴俊升回答："我的钱，还不都是大帅给的。"

张作霖立刻有了脾气："这是你说的？你说的？"

吴俊升一看苗头不对，立刻跪在地上磕头告罪。张作霖这才缓和口气：“钱你留着，给我在黑龙江好好干！别让老百姓骂我张作霖的祖宗！”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东三省的老百姓还是挺拥戴张家的。它倒也不是完全胡说八道。

但是，张作霖是否真的“爱民”？

张作霖支持“武力统一”，自1917年至1926年，先后5次用兵关内，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在5次战争里，关内关外，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满足自己政治野心的过程中，张作霖可是从来没有想过“爱民”两个字。

5

一个军阀，如果能成长为大军阀，用人方面必有过人之处。

张作霖被后人称道的最大用人之术，就是识人有方，用人不疑——但他最后的失败，也与此有关。

比如王永江。张作霖发迹之初，王永江一直不理他，惹得张作霖大为不快，曾发誓一定要“搞死”王永江。但后来听人说王永江能力过人，立刻对其非常谦恭，再三请他出山帮助自己。结果，王永江从奉天警察厅厅长一路做到了奉天省长。

王永江就任省长时曾提出：省内大小官员，都由自己任命，不许张作霖干涉。这种当时看起来是“昏头”的要求，张作霖一口答应。

结果，王永江治下的奉天省，经济迅速复苏，对张作霖走出困境、雄踞关外、问鼎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

奉天集团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有各路土匪、小军阀，还有各路降将、叛军，对此张作霖一律一视同仁，不混编军队，让他们全部继续独立编制，与奉军完全平等。郭松龄反叛后，他与东北军各个将领的来往书信，张作霖一把火全部烧掉，表示既往不咎。此举在当时确实感动了无数将领，纷纷表示以后都愿意为张作霖效死命。

用张作霖的话说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妈了个巴子（他的口头禅），好好给我干，我绝不亏待人！如果吃里爬外，我马上枪毙他！”

但也别以为张作霖真的就是糊涂蛋，或者是个老好人。

张作霖有过一任秘书长，摸透了大帅的脾气，把他伺候得服服帖帖，但最终还是被张作霖撤了职。众将领为这个秘书长求情，张作霖的回答是：“我和他没仇，就是因为他做了我那么多年秘书长，从来没和我抬过一次杠！我可能那么多年没犯过一个错吗？这种秘书长要来何用？”



张作霖创办东北讲武堂，培养了大批东北军军官，包括张学良



张宗昌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条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曾做名诗：“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1932年被韩复榘派人暗杀于济南火车站

同为土匪出身的“狗肉将军”张宗昌落魄时投靠张作霖，张作霖用人不疑，照用不误。凭借战功，张宗昌一跃成为奉系骁将。

有一次，张宗昌从黑龙江驻地前往沈阳谒见张作霖，他大大咧咧地往大帅办公室走，边走边高声喊道：“老爷子，效坤（张宗昌的字）到了……”

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你是军人吗？妈了个巴子的，当在家里呢！”

高出张作霖一整头的张宗昌顿时目瞪口呆，然后马上原地顿足、立定、向后转，迈步而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报告！张宗昌到！"

虽然张作霖会用人，但还是在郭松龄身上看走了眼。

郭松龄外号"郭鬼子"，意思是他打仗鬼点子特别多。郭松龄是张学良的老师，堪称奉军里最能打也最会打的将领。张学良对郭松龄佩服得五体投地，张作霖曾说："我儿子除了不肯给媳妇，其他什么都肯给郭松龄。"

在郭松龄的辅佐下，张学良打了很多大胜仗，也树立了在奉军里的威望。张作霖对这对组合是很满意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在郭松龄的指导下获得了山海关大捷。郭松龄居功至伟，战后想要个"安徽督军"头衔，但张作霖最终把这个头衔给了姜登选。郭松龄立了大功，却最终什么也没得到。

张作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在他看来，东三省早晚是张学良的，而张学良和郭松龄那么好，"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所以早晚东三省什么都是他们俩的，还给什么给？

但他没想到郭松龄什么都不错，就是心胸狭隘，对这一次的分配，他怀恨在心。祸根就此埋下了。后来，郭松龄率7万奉军精锐起兵倒奉，大大挫伤了奉军的实力，也间接造成了后来的张作霖皇姑屯殒命。

6

说到皇姑屯，就要说到日本人。

关于张作霖究竟是"亲日派"还是"抗日派"，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其实从做营长开始，张作霖就一直在刀尖上跳舞——逼着他跳舞的，不仅仅有日本人，还有俄国人。

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张作霖先是帮俄国人打仗，然后被日军俘虏，遂发誓要帮助日本人。所以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原来3个营的部队，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扩充到了5个营。

但从此，张作霖也被日本人这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黏上了。

当时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态度，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张作霖是日本策划“满蒙独立”的最大障碍，一定要除掉他。这一派的代表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最好的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的代表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

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但能让日本人分为这样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可见张作霖的手腕。

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就是：表面答应，实则抗拒。事前承诺，事后反悔。实在不行，就去找俄国人说日本人要扩张势力，请求干预（受俄国压迫时也会去找日本人）。

一方面，张作霖非常希望得到日本的军火和军队协助，所以他确实也出让了不少东三省内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教育子女：“成则王侯败做贼，都没关系，混出名堂就好。但就是有一点：坚决不能做汉奸！那是要死后留骂名的！”

东北老百姓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张作霖有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题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让他出丑。



张作霖发妻赵氏带着张学良，与日本领事夫人们合影

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了落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

那个日本名流一看落款——“张作霖手黑”，顿时笑出声来。张作霖的随从也很尴尬，忙小声提醒他：“大帅，是‘手墨’，不是“手黑”，下面少了个‘土’……”

张作霖瞪眼睛就骂：“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曾劝张作霖不要和南方打仗，因为日本人会抄奉军的后路。

当时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妈了个巴子的！我有30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鬼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13000人，要想收拾他，我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13000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对这段话，当时不少在现场的奉军军官都有印象。这段话显示出张作霖无论是对日本人的军力判断还是应对措施，都明显有心理准备。

但1925年的郭松龄倒奉事变中，张作霖真的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郭松龄虽然早就对张作霖心存不满，但直接的导火索，就是他在日本得知了张作霖准备答应日本人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的条款（其实以张作霖的脾气，多半又是骗日本人），换取日本人军备去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郭松龄起兵倒奉之后，一方面是因为“郭鬼子”确实会打仗，另一方面又是因为他统率的都是奉军精锐，所以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奉天。

日本人当时觉得找到了机会。他们先是去找当时占据优势的郭松龄，承诺关东军出兵相助，但事成后要郭松龄听命日本。郭松龄断然拒绝。

但当时已经准备下野的张作霖，最终接受了日本人的一系列要求，签订了《反郭密约》。

结果，日本关东军一方面严格限制郭松龄部队，给张作霖以喘息之机，集结部队，到最后巨流河大决战的时候，日本人更是直接以炮兵部队介入。郭松龄最后兵败被杀。

郭松龄叛乱被平息，日本人拿着《反郭密约》来找张作霖兑现诺言，张大帅倒也毫不含糊——全部反悔，概不执行！

那一次，是真正惹恼了日本人。

三年后的1928年，军事失利的张作霖退回关外，日本人终于等来了暗杀的机会，旧仇新恨一起算。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身负重伤，送回官邸4小时后身亡。

年仅53岁的“东北王”，就此殒命。

馒头说

民国时期的大军阀，其实个个都很难一言以蔽之，无论段祺瑞、吴佩孚，还是冯玉祥。当然，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张作霖。

从土匪做起，到最后问鼎中原，张作霖的一生绝大部分是辉煌的。但是，依我个人来看，却也觉得他很可怜。

为什么可怜？因为他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一生。虽然贵为“东北

王”，却身处俄国和日本两个穷凶极恶的邻居夹击之下；不想做汉奸，但又不能不做出妥协让步，时时刻刻在刀尖上跳舞。

英籍澳大利亚人加文·麦柯马克（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在他的著作《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说：“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而言，张作霖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又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

这正是张作霖尴尬的地方。

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在张作霖的治下，东三省拥有当时全国罕见的兵工厂、空军部队，并且在俄日两强的夹击下，没有使东北的一寸土地沦丧。

也正是因此，更凸显了他的可怜之处：在他一命归西后才三年，他苦心经营大半辈子的东三省的80万平方千米国土和所有财富，在不到半年之内，就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唉。

他当过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你却未必了解他

这个人，我相信每个人对他的名字都挺熟悉的，但同时，又对他挺陌生的。在整个民国的前半段历史上，他可谓是个知名人物。但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他后来怎么样了？甚至，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民国时期，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1

1914年5月26日这一天，袁世凯决定成立一个叫“参政院”的机构。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机构呢？因为袁世凯在此之前，为了进一步集中自己作为总统的权力，已经解散了国会，在5月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其中规定，国家的立法机关以后叫作“立法院”。立法院还没成立之前，由参政院代行职权。

这个参政院听上去挺厉害，其实没什么大用——直到袁世凯去世，立法院都没成立，在袁去世后，这个机构就被裁撤了。

但是，袁世凯任命的第一任参政院院长，却是大有来头。

他的名字叫黎元洪。

对于这个名字，读过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人都很熟悉——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从床底下找出了当时的新军协统（旅长）黎元洪，拿枪顶着他做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

在整个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中，黎元洪就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窝囊、骑墙、唯唯诺诺、一事无成。

但是，从一开始，这个逻辑链似乎就有点卡：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武汉三镇，为什么要拿枪顶着一个窝囊废去做都督？他们不能推选自己人吗？

这个黎元洪，到底何德何能？

黎元洪出生于1864年10月19日，老家是湖北汉阳府黄陂县木兰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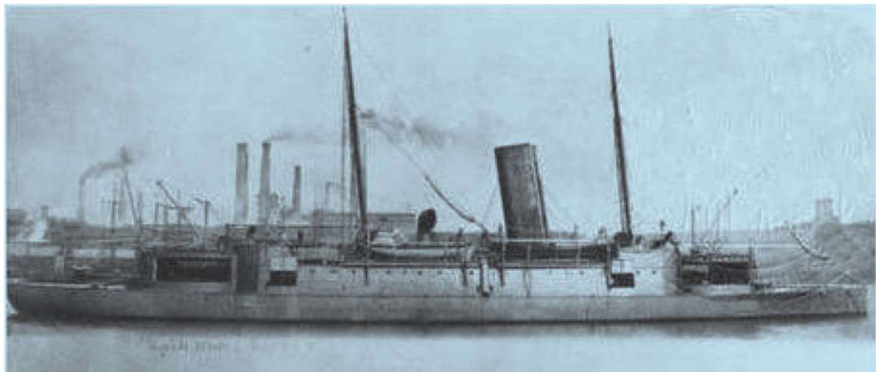
按照后人的记载，说黎元洪“素怀大志，富有革命思想”，但这个恐怕也只是黎元洪成名之后的一种说法而已。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黎元洪幼年贫苦，饿肚子的时候，甚至要到别人家地里偷萝卜吃。不过吃完后，细心的黎元洪和别人不一样——他会把萝卜叶子重新插在地上，做成伪装。

在那个考科举还是唯一成功道路的时代，黎元洪对“考功名”却没什么兴趣。1883年，19岁的黎元洪凭借读过几年私塾的底子，考上了天津水师学堂。

天津水师学堂是李鸿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目的就是给北洋舰队培养人才。1888年，24岁的黎元洪毕业，到北洋舰队的“来远”舰上实习。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觉得，广东作为中国的门户，也应该有一支自己的舰队。于是他就向福州船政局订制了4艘军舰，第一艘下水的军舰叫“广甲”舰。有了船，没人开可不行，张之洞和李鸿章一商量，从天津水师学堂要来一批学员，其中就有黎元洪。



“广甲”舰虽然也号称巡洋舰，却是木头壳子的

1890年，26岁的黎元洪因为学的是轮机管理，于是成了“广甲”舰上的“三管轮”。“广甲”舰原来的任务挺轻松的：负责在天津到广东一带沿

海巡逻。1894年，“广甲”舰受命往北方运送一批物资，到了北方，立刻就被李鸿章以“战事吃紧”而征用。

黎元洪和他的“广甲”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参加了悲壮的甲午海战。

3

“广甲”舰和黎元洪的命运，在甲午海战中甚是离奇。

甲午海战是一场中日铁甲舰之间的较量，作为以木壳为主的“广甲”舰，本来参战就是不合适的，战端一开，“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就未战先怯了。

当和“广甲”舰一起编组行动的“济远”号率先掉头逃跑的时候，“广甲”舰也决定掉头就跑，结果因为太匆忙，居然在大连口那里触礁搁浅了。等日舰追上来的时候，管带吴敬荣决定炸掉舰船后分头逃命，船上的人只能纷纷跳海，各自逃生。

“广甲”舰触礁的地方，离岸边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一般人哪怕是水手，也挺难游过去的。当时和黎元洪一起跳下水的，一共有12个人，结果淹死了8个，黎元洪是4个幸存者之一。

倒不是黎元洪的泳技高超或体力惊人，而是他在此之前就和别人想得不一样——他自费买了一件救生衣。

上岸之后的黎元洪从大连跑回了天津，结果立刻被相关部门关押，隔离审查。

审查了三个月，实在查不出什么，因为不是黎元洪带头逃跑的，他也没做错什么事，而且“广甲”舰本来就是被“拉壮丁”来帮忙的。最终，黎元洪被无罪释放。

但是，北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水师学堂出身的黎元洪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从此就告别了海军。

4

甲午一败，惊醒诸多梦中人。

“自强练兵”的观念，终于开始成为晚清政府各个阶层力量的共识。当时的张之洞决定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发文招纳水师学堂的人才，当时31岁的黎元洪在天津听到这个消息，赶到南京去应聘。

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又有实战经验，做事稳妥，很快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张之洞一开始让黎元洪监工炮台的建设（也算是从海军过渡到陆军），黎元洪完成得非常出色，随后张之洞又任命他为炮台的总教习官。

等到张之洞要回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他当时是接替刘坤一代任两广总督），已经练成了2000名完全按照新式方法训练的新军。张之洞向刘坤一表示，自己要带500名“种子”回到湖北继续编练新军，而作为其中一枚重要的“种子”，黎元洪随着张之洞回到了湖北。



位列晚清名臣之一的张之洞

张之洞确实堪称黎元洪的领路人。他欣赏黎元洪，也一直在着力培养他，表现之一就是从1898年开始，派黎元洪去日本学习、考察。从1898年到1901年，黎元洪曾三次考察日本，其中有一次是专门去日本学习军事。

在考察日本之外的时间里，黎元洪就在不断地编练湖北新军。当时张之洞编练新军其实就靠手下的两个人，一个是张彪，另一个就是黎元

洪。

张彪的业务能力不强，级别虽然比黎元洪高，但整个湖北新军的编练，靠的就是黎元洪。

那么，黎元洪编练出来的湖北新军，水平究竟如何？

1906年，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了一次秋操，派了袁世凯和铁良（当时的兵部侍郎）前来校阅。演习的双方，一方是由河南和湖北新军组成的“南军”，由张彪和黎元洪统领；另一方，是赫赫有名的“北洋军”组成的“北军”，由段祺瑞和张怀芝统领。

这场操练的规模非常大，各省和各国来参观的人员接近500人。演习结束，袁世凯被南军表现出的战斗力折服，向清廷汇报时说，湖北的新军是东南第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1908年还举行过第二次秋操，由黎元洪指挥的南军和由两江地区新军组成的北军演习，三次演习，北军“三战皆北”。

不过黎元洪这人比较低调。1906年，清政府统一全国军队的编制，要求湖北只能保留一个“镇”（相当于一个师），而湖北原来有两“镇”，分别由张彪和黎元洪统领。由于张彪是张之洞家女仆的丈夫，所以担任了第八镇的统制（相当于师长），而黎元洪当了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旅长）。

但其实，黎元洪当时还负责统帅“六楚”舰队（楚材、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六舰）和“四湖”雷艇（湖鹏、湖鹊、湖鹰、湖集四艇），实际上等于掌握了长江舰队，把持了湖北陆军和水师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更何况，张彪基本上是目不识丁，当时训练新军官兵的一些教材都是由黎元洪校定的。新兵的每一本教科书上，都印有黎元洪的名字，这使得他在湖北新军中的名气非常大。

所以说，与张彪相比，黎元洪其实是当时湖北军界的真正实力派。

5

协统黎元洪，就这样来到了1911年的10月10日。

那一天晚上，第八工程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第八工程营是张彪第八镇的部队，黎元洪听到枪声后，知道事情要糟，但他立刻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己麾下的部队将官都召集在一起，唯一的命令就是——谁也不许离开。

黎元洪的意思很明确：我们按兵不动——既不参与起义，也不镇压起义。

这是黎元洪人生中最矛盾的时刻。

黎元洪对士兵一直很好，和公开贪污受贿的张彪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黎元洪的部队里不止一次被发现有革命党人，但黎元洪最后都从轻发落。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黎元洪亲手杀了两个士兵。一个叫邹玉溪，他听到革命党起义，想从营队中溜出去参加革命；另一个叫周荣棠，他是革命党派来联络的共进会会员，想翻墙到黎元洪的部队报信。

远处炮声隆隆，但哪怕就在黎元洪身边的亲近将官，都不知道黎元洪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

很有可能，黎元洪自己也不知道。

直到最后一刻，黎元洪必须要做出决定了——武昌起义的部队在蛇山上架起大炮，炮弹打到了黎元洪的司令部。黎元洪慌了，下令“带兵出外避炮”。他手下的全体官兵一哄而散。到了晚上12点，失去管束的士兵，也开始投身革命。

黎元洪当晚做出的反应是：逃到自己的参谋刘文吉家里躲避。

10月11日清晨，革命军找到了刘文吉的家。根据当年参加武昌起义的“辛亥老人”喻育之（1993年去世，享年104岁）回忆，黎元洪当时没有躲在床底下，而是躲在帐子后面，被人找到后拉了出来。

拉出来干吗呢？革命军把他拉到了当时起义军控制的楚望台军械库，全体革命士兵列队欢迎——大家要请他出来指挥作战。

毫无疑问，当时军阶最高、声望最高，在新军士兵中留下较佳印象的黎元洪，确实是站到前台的最佳人选。

但黎元洪不肯，他只说了三个字：“勿害我！”

当时黎元洪以绝食进行抗争，但同时，他也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革命，是大势所趋，其实一开始他从心底里也没有特别反对，不然不会按兵不动；但是武昌革命成功，并不代表全国革命成功，万一失败了，百分之百是件掉脑袋的事情。

到了最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绝食了两天之后，革命党人甘绩熙对黎元洪说：“黎宋卿先生，我们汉人同志，流血不少，以无数头颅，换得今日成绩，抬举你为都督。你数日以来，太对我们同志不起。我对你说，事不成，你可做个拿破仑；事若成，你可做个华盛顿，你很讨便宜的。你再不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待。”

黎元洪回答：“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已在此两日，并未有什么事对你们不起。”

另一个革命党人陈磊云说：“黎都督很对得我们起的，但是你辫子尚未去，你既为都督，该做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表示决心……现在是民国了，你若尽忠民国，你就是开国元勋；你若尽忠清廷，你就该早天尽节。二者必居其一，何以如此装模作样，我们实在不解。进而言之，你不过在满清做个协统，现在得此机会，你非才智胜人，即你不干，以中国之大，汉人之多，岂无做都督之人耶？望你三思。不然，恐同志等不汝容也。”

黎元洪回答：“你们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去辫子，我早就赞成。我前在营内并下过传知，谓愿剪发者，则听其便。你们明日叫个理发匠来将我的辫子剃去就是。”

黎元洪理发后，其实已经等于表态了。革命党特地买来一挂鞭炮，以示庆贺。接着，士兵们请黎元洪训话。黎元洪说：“元洪不德，受各位抬举，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天上午也未下决心，现在已下决心！无论如何，我总算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生死以之。”

话音刚落，掌声和欢呼声雷动。

1911年10月17日，47岁的黎元洪正式就任军政府都督。

6

事实证明，革命党还真没选错人。

黎元洪懂海军，也懂陆军，在军事上可以服人；他虽然是协统，但其实地位不亚于当统制的张彪一级，声望也可以服人；他作为一省督军，号召其他各省响应起义，也有说服力。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黎元洪不属于革命党中的任何一个党派——既不是共进会成员，也不是文学社成员，更不是同盟会会员，所以他实际上是革命的各路势力的一个平衡点。

但到了南北议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一切矛盾就又都显露了出来。在革命火种源头的武昌，革命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明显分化：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内讧频频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已是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又需要做出一个选择了：在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他必须要站一个队。

各种史料证明，黎元洪一直很尊重孙中山，但他最终选择站在袁世凯一边。

其实何止黎元洪，当时中国但凡能分析双方实力对比的人都清楚：袁世凯在各方面的实力均强于孙中山（参看《历史的温度1》收录的《两个大总统，你选哪个？》）。更何况，当时武昌的革命党人已经将黎元洪视为了“眼中钉”。

于是，不可避免地，革命党人与自己推选的“傀儡督军”黎元洪彻底决裂了。在那场争斗中，黎元洪也没有心慈手软，他杀了很多革命党人，获得了“黎剃头”的称号。而革命党与黎元洪的决裂，也彻底将他送到了袁世凯的那一边。

在后来的“二次革命”期间，黎元洪明确表态支持袁世凯——但还是那句话：那场所谓的“革命”在很多人看来，无异于以卵击石。

黎元洪不会犯那样的错误。

那么，黎元洪是不是真的就此和袁世凯成为铁板一块？

并不是。

1915年末，袁世凯踌躇满志地准备登基，向来对他言听计从的黎元洪却一直消极抵抗，比如一直请辞本文开头交代的那个“参政院院长”，但袁世凯就是不准。

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的头衔是“武义亲王”，当时全国就这么一个“亲王”头衔，但黎元洪坚决不接受。各省的督军、巡按使、镇守使、都统、巡阅使等纷纷以“东厂胡同黎亲王”“武义亲王”“黎亲王”等不同的电头致电向黎元洪表示祝贺，但黎元洪就是不接受。最后被逼急了，只能说：“再逼我，我就一头撞死。”

尽管他选择了和袁世凯分道扬镳，但在袁世凯的临终遗命里，黎元洪仍是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第一顺位人选。

1916年6月7日（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52岁的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但当上大总统之后，黎元洪就没那么顺利了——全国的兵权都握在段祺瑞等一批北洋军阀的手里，他这个总统，处处受制，其实是有名无实的。

但即便如此，黎元洪在任内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比如顶住段祺瑞的压力，在国务院各个部门中引进一批南方革命党的部长，比如坚决抵制通过借外债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在外交方面一直努力取缔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等等。

但是，彼时的中国，已经绝非辛亥革命时那样万众一心只为做成一件事了，各种势力暗流涌动，互相较劲。手无兵权的黎元洪虽然还站在舞台中央，但聚光灯早已不打在他的身上了。

1917年，被黎元洪罢免国务院总理之位的段祺瑞，挑唆徐州督军张勋率五千“辫子军”进京复辟，然后又“马厂誓师”，击溃张勋，成为“三造共和”的功臣。黎元洪在京再无立足之地，遁入天津，做起了实业生意。

1922年，因为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黎元洪在“歇业”五年后，又被请出来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彼时的黎元洪已经58岁，虽然他也清楚自己再一次成了一个“调和矛盾”的需要，但他依旧幻想着能借总统之位，再做点事情。

当然，这一次，黎元洪是真的天真了。

仅仅一年，黎元洪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贿选总统”曹锟上台，黎元洪再度被逼入死角。这一次，他是彻底死心了。

1928年6月3日，64岁的黎元洪因为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临死前，他口述遗嘱，通电全国，其中包括：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黎元洪的葬礼是国葬，场面极为盛大，当时葬在武汉的土公山（现华中师范大学东南门附近）。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再度为黎元洪举行国葬，遗体归葬于武昌的卓刀泉。

武昌，成了黎元洪踏上历史舞台的起点，也成了终点。



黎元洪的葬礼

回过头看看黎元洪这个人的生平，不简单。

当过海军，也当过陆军；做过协统，也做过都督；做过三次中国民国副总统，也做过两次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还成了一名实业家。

孙中山曾评价黎元洪：中华民国第一伟人！

孙中山说这话，应该有他自己的目的，“第一伟人”这个称号，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些夸张了。

但黎元洪真的是一个很难盖棺定论的人。

你说他反革命，他是武昌首义的都督，不管怎样，当时肯做那个都督，还是要有点魄力的；但你说他革命，他又帮袁世凯杀过不少革命党，最终支持的也是袁世凯。

你说他英明果断，他是被人逼着做了都督的；但你若说他优柔寡断，他一旦决定当了都督，还是为辛亥革命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事。

你说他敢作敢为，但他其实每次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你说他明哲保身，但他在任上又是真心真意想做些事，也做了不少事。

你说他共和，他一直紧跟袁世凯；你说他保皇，他又为了共和，不惜和袁世凯翻脸。

所以，与其说黎元洪是一个伟人，倒不如说是一个真实的人。

在那场中国从未遭遇过的千年大变局中，黎元洪和很多人一样，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就被裹挟进去了。在诸多抉择和变化之中，他做出了一个个最真实的，但同时又是有是非观念的人的抉择：有勇敢，有胆怯；有坚强，有退缩；有得意，有消沉；有欲望，有底线……

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在清末，中国涌现出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痛定思痛，最先看到别人先进的地方，检讨自己的不足，提出改革的方案。但是，在那个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舞台上，即便是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人，始终都能把握得住方向吗？

1

1921年10月27日这一天，在福州的郎官巷，一位69岁的老人离世了。

这个老人，生前曾享有盛名。康有为说他是“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说他是“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胡适评价他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但在晚年，他的一个行为却又让不少人不解，乃至非议。



严复

他叫严复，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他翻译了《天演论》。

但其实，他值得我们了解更多。

2

严复本应该成为一名海军军官的。

严复出生于1854年1月8日，福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但在严复13岁那年，父亲因为在抢救一名霍乱病人时被传染，结果不治身亡。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严复家顿时就陷入了困顿。

就在这一年，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对外招生。按严复家里的期望和他自己的意愿，他应该走上一条参加科举考取功名的道路，但和母亲商量了之后，严复毅然选择了这个当时传统家庭都不愿意报考的新式学堂。

有什么理由吗？最大的理由其实就是沈葆桢贴出的招生章程："凡考取者，饭食及医药费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给银四两，还有奖学金；五年毕业后可进入水师领工资。"



福州船政学堂当年的建筑

每月四两银子，已足以养活全家，诱惑实在太大了。

严复是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福建船政学堂的。他的同学都有谁呢？报出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没错，严复的同学们，后来撑起了大半支北洋舰队。

在船政学堂的五年里，严复系统学习了英文、数学、电磁学、光

学、热学、化学、天文学和航海术等课程。1872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航行理论科毕业，然后上舰实习。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严复，字几道。

当然，福建船政学堂的这五年对严复的改变，绝不是一个名字那么简单。可以说，这是严复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从一个一心想学好八股文考科举的学子，转成了一个迫切想了解近代西方科学的青年。

3

1877年，23岁的严复出国了。

他是作为中国海军选拔出的12名最出类拔萃的人员，公费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航海术的。

到了英国后，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直接上舰实习，剩下的9名学生参加了皇家海军学院的考试，其中严复、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此人后来做到清朝海军总司令、民国海军总长）等6人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了这所皇家海军学院创建以来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严复在英国前后待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严复提升的绝不仅仅是在航海术方面的知识，而是对整个西方社会的认识。

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郭嵩焘的提携下，严复和同学们一起去法国巴黎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大受震动。严复还利用休息日去旁听英国法庭的开庭，看到原告和被告坐在一间房间里，有专门的律师为双方辩护，这种闻所未闻的景象，让严复“归邸数日，若有所失”。

严复开始渐渐思考一个问题：西方比我们强，真的只是靠“船坚炮利”？

带着这个问题，他和年长他35岁的驻法公使郭嵩焘成了“忘年交”，因为两个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中国如果只是学习西方列强的海军、陆军，只是买船、造炮、练兵，那只是学了皮毛，是不可能富强起来的。

1878年，一年前考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6名中国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学业，在郭嵩焘的提议下，严复被点名再留下学习一年。

在多出来的这一年里，严复读了大量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书，这些书的作者，是达尔文、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卢梭、孟德斯鸠……



郭嵩焘也是一位奇人。早年是曾国藩幕僚，之后担任驻英公使和驻法公使，也是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之一。他主张中国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而不是军舰和大炮，可惜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

1879年7月，严复再次以“头等”的成绩从皇家海军学院毕业。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应该再到英国的军舰“纽卡斯尔”号上去实习一年。但是，国内来电，召他尽快回国。

原来，福州船政学堂急需人才，需要他回去当老师，传授自己的所学。

于是，严复收拾行囊，启程回国。

这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第二次转变——

从一个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青年，到一个已经对西方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并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

4

严复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北洋水师学堂是一所新式海军学校，严复在校任教期间，培养了一批大牛的人物，比如后来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不过，一场颠覆整个中国命运的战争，打破了严复安心教书育人，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幻想。

这场战争，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对严复而言，有着远超普通人的刺激和伤害：在北洋舰队里有无数他的同学、学生、朋友。尤其是他当年的那批同学，在舰队里都已经担任高级指挥官，但在甲午海战中，殉国的殉国（邓世昌、刘步蟾），自杀的自杀（林泰曾），被处斩的处斩（方伯谦），几乎全军覆没。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不久，还曾随清朝自主设计的第一艘近代巡洋舰“扬威”号访问过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当时日本还在建设海军，在港口，无数日本民众闻讯赶来，用羡慕和崇拜的目光仰视清朝的军舰——才20年，乾坤已经逆转。

当时，严复称自己经常“夜起而大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写道：“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但又能怎么办？这场战争让无数的中国人从睡梦中惊醒，但新的出路，又在哪里？

而严复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手里的那支笔。

他开始了第三次转变——从一个安于育人的教书匠，转变为一个开始不断用文字去唤醒世人的文人。

5

1895年，中国的农历新年刚过，严复就开始出手了。

在天津的《直报》上，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的主旨都只有一个：呼吁改革。

和李鸿章提出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严复也指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国人当初蔑视的“夷狄”，早就不是以前概念中的那种没开化的蛮夷了（“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在这些文章里，严复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后来维新派的很多理论基础，其实多来自严复的理论和文章。而严复本人，也是“维新变法派”的忠实拥趸。

1897年，43岁的严复在与人合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开始连载他翻译的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以《天演论》为代表，严复从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译了8部西方的哲学和社科类名著，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武备，而在于人们的心态和国家的制度。

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那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信、达、雅”。“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信、达、雅”这三字标准，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侯官嚴幾道先生述

赫胥黎天演論

呂增祥署檢



《天演论》封面。这本书扉页上的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只是赫胥黎用来阐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却被严复有意无意影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所以这句话震撼了大江南北无数沉浸在痛苦中的中国人。就连胡适改名为“适”，字“适之”，也是来源于此。（胡适曾说，他的同学里，有取名叫“杨天择”的，还有取名叫“孙竞存”的，可见这本书对当时人的影响之大。）

《天演论》手稿

the support against Yuan through thick and thin then there is nothing to be dreaded. If His Excellency be not certain in this,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he thinks, to let Yuan have the thing which he craved, provided that he will take the whole responsibility and consequences. Let His Excellency employ Yung tsungtang as a bridge to shove this burden over to Yuan peacefully. It will be better for China at least.

Whether the above be a good advice to His Excellency or not I shall say nothing. But it is better to let His Excellency know how the matter stands & provide for all contingencies.

I will be in the Capital on 21st or 22nd this month & will come & see you and His Excellency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kind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illegible]

严复用英文写给伍光建的信

不光是写作和翻译，严复更是亲身投入了教育事业。1905年，严复协同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严复是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严复又成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百废待兴，经费奇缺，严复殚精竭虑，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终于让北京大学顺利开学授课。

经历了三次转变和提升后，严复的人生走到这里，可以说是相当圆满了。年近60的严复当时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都非常好——关键是，严复配得上那样的赞誉。

然而，没多久之后，严复的人生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拐弯。

論北京大學校不可停辦說帖
北京大學創建十有餘年為全國最高教育機關未嘗一
日停輟去年武漢事起學生相率散歸代謝之後國用愈絀
幾至不名一錢此校僅圖看守亦且費無從出前總監督勞
乃宣辭職而去本校受任於危難之際承袁大總統諄切相
託義難固辭勉强接事時與學部度支兩首領再四磋磨商
請用款迄無以應不得已乃陳明總統由華俄銀行暫借銀
數萬兩稍挂目前重行開學此本校長接辦以來之大概情
形也比者頗聞斯校有停辦之議本校長始亦贊同其說而
詳審事實有未可者請為 大部縷晰言之查北京大學者
其程度教法欲與歐美各國大學相提並論固不可同年而語
然在建置之初固亦極當時之人材物力竭蹷經營以免企
其所嚮向之鵠的又積十餘年之久仍遑遑糜財耗時而後
有今日之地位為全國中比較差高之學校今若將其廢棄
是舉十餘年來國家全力所慘淡經營一旦輕心掉之前此所
糜百十萬帑金悉同虛擲且北京為革命後地方完全未經
破壞之區前日大學形式依然存在學生在校肄習蓋有數年
縱不能更照舊章予以出身獎勵將持何理由而一切摧殘遣散
之乎此則停辦大學之未可一也夫各國之有大學亦無法定
之程度取甲國之大學與乙國之大學相比觀之不能一致也

后民国当局曾一度下令停办北京大学，严复四处奔走，并亲笔上书《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自己又跑到比利时银行借贷20万元，才使得北京大学得以继续办学

6

1915年8月14日，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成立了，这个团体，叫作“筹安会”。

这个筹安会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帮袁世凯称帝宣传造势。

“筹安会”的理事长，是袁世凯的亲信杨度，这并不出人意料。副理事长孙毓筠，理事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四个人当初全都是革命党成员，被杨度笼络过来，一起支持袁世凯称帝，倒是有些意外。

但最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由六人发起的“筹安会”名单上，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是严复。

严复名列所谓的“筹安六君子”，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以来，这似乎也成为严复人生的一个“污点”。

首倡“物竞天择”，点醒国人的严复，为什么会开历史的倒车，去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

原因，可能有三点。

第一点，严复和袁世凯是旧识，且关系非同一般。

其实袁世凯在做直隶总督的时候，就试图拉拢严复，但严复那个时候是看不上袁世凯的，袁世凯屡次拉拢，严复屡次拒绝。但后来随着袁世凯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严复重新审视了袁世凯，认为以袁的能力，当时中国确实无人能出其右。

所以，当溥仪登基，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满朝文武没人敢为袁世凯说话的时候，严复却是倒过来同情袁世凯且为袁世凯说话的。所以当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东山再起的时候，自然非常器重严复，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监督、总统府顾问，这个时候，严复也就没再推辞。

第二点，严复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局势，是有点失望的。

其实失望的不仅仅是严复，还包括王国维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严复不反对共和是大势所趋，但他觉得，西方的共和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是建立在民众的民主和平等思想已经完备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时机远未到。

第三点，在英国的留学背景，对严复影响很大。

那么如果不走共和之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严复认为最好的模式，就是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在严复看来，中国暂时还不能给老百姓太多的民主，依旧要有君主，但需要像英国那样，用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

君主选谁？有“强人情结”的严复认为，只有袁世凯是最好的人选。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他“无科学知识，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但在当时的中国，严复选不出别人了。

所以即便袁世凯后来称帝失败当回总统，各省纷纷要求袁世凯退位的时候，严复依然站出来力挺袁世凯：“项城此时去，天下必乱。”

按严复的孙女严停云后来的说法，严复是受到了杨度的蛊惑和袁世凯的胁迫，最终被迫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列名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严复并不热情参与筹安会的活动，这是真的，只列名不做事，也是真的。但至少筹安会要做的“君主立宪”这件事，和严复的观点是不矛盾的。

所以，虽然严复没有为“筹安会”做什么事，但他名列“筹安六君子”之列后，自己并没有提出退出。

至于袁世凯称帝，是不是严复想要的“君主立宪”，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7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劝过严复。

请严复一起创立复旦公学的马相伯，当时就曾劝严复，大意是，杨度、孙毓筠这些人都还年轻，他们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年纪那么大了，干吗还要这样？

严复的老乡，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也曾劝他，无论今后袁世凯称帝成功还是失败，对严复而言都不是好事情。

但严复都没有听。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林纾劝他离京避祸，但严复的回答是：“是祸躲不过，我老了，已不惜什么了，是非终将大白。”

严复当时还是认为，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所以，虽然严复最终在家人劝说下避居天津，最终又回福州老家终老，但他哪怕到离世前，时而摇摆。

对当年名列“筹安会”拥护袁世凯，他曾对人说：“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可见，他是有悔意的。

不过，他最后留给自己的遗嘱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馒头说

今天之所以写严复，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符合“馒头说”一直想和大家分享的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任何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小人，都是人，都是有血

有肉的人。

比如严复。严复以“睁眼看世界”和传播西方先进思想闻名，他提倡革除旧弊，自己却吸食鸦片，始终无法戒除；他呼吁自由平等，但自己却有妻有妾，自己还要调和妻妾矛盾；他传播科学文明，自己却精通周易占卜，且深信此道，对自己墓地的风水严格把关；他呼吁变法革新，最终自己的墓碑却用的是自己生前手书“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而当时大清早已亡了……

所以，他矛盾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既想革新破除专制，又希望不要太暴力，打破传统。

而另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品评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完全跳出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用一个“上帝视角”来评价。

严复当时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一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当时无数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想法，不断摸索让中国重新富强的方法，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严复到蔡元培，时代滚滚向前，每个人的观念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没有一个人是穿越回去的，所以谁又能拍胸脯担保，自己已看清一百年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包括那位杨度，虽然他拥护君主立宪，但后来张勋复辟请他出山，他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制度。杨度最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最危在旦夕的时候加入的，所以他绝不是投机，而是真心想找一种让中国富强的方法。

所以，严复加入“筹安会”的行为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他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他认为“君主立宪”适合当时的中国。后人可以认为他的眼光有问题，但他确实没有私心，他也是希望中国好。

1905年，严复曾在伦敦与孙中山见过一次面，两人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因为严复认为，以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首要任务是搞好教育，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不然就算革命了，依旧还是换汤不换药。

而孙中山认为，如果要按严复的路子走，“人寿几何”？所以，他称

严复是思想家，而自己是实干家。

孙中山是伟人，但我觉得，严复也是伟人。他对当时西方与中国的理解，以及他的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独到且难能可贵的。

正如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参观严复故居时曾这样评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而更可贵的是，“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名士”于右任

在民国史上，总有一批人的名字，似乎随处可见，如雷贯耳，但似乎又总不在舞台的最中央。于右任，就属于这一类人。

1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的保险箱，被人打开了。因为这一天他逝世后，大家都没找到他的遗嘱。

考虑到他可能会把遗嘱放在保险箱里，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便和“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人一起，打开了父亲的保险箱。

保险箱一开，众人都傻眼了：没有钱财宝物，没有股票证券，大部分都是于右任生前的重要日记和信件。剩下的，就是一堆账单——为三儿子于中令出国留学借的学费的账单，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账单等。还有，就是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

于右任是谁？堂堂国民党元老，自1930年至1964年，足足做了34年的国民党“监察院长”。

而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最高监察机关的一把手，他在保险箱里留下的，就是一堆账单而已。

2

于右任，1879年出生，陕西三原人。

于右任原来的名字叫于伯循，字诱人。为何这个字起得如此“诱人”？并非想走歪门邪道，而是典出《论语·子罕》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后来于右任在26岁的时候，在《新民丛报》上发了一篇文章，署名是“于右任”。“右任”与“诱人”谐音，且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称为“左衽”（区别于中原汉族的“右衽”），后来借指异族统治，所以他就开始用“于右任”作为自己名字。

于右任两岁丧母，父亲在外打工，委托于右任的伯母将他抚养成人。不过于右任自幼爱读书，且天赋极佳，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到了21岁——差点儿被砍头。

那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拉着光绪出逃西安，血气方刚的于右任给当时准备恭迎圣驾的陕西巡抚岑春煊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地方父母官的殷切希望：手刃西太后！

结果这封信被他的同学苦苦拦住，没能发出去。一时无处宣泄的于右任把自己剃了个光头，光着膀子，提了把大刀，以一副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那副对联写的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结果，这张半裸照落到了三原县令的手里，再加上后来于右任又印刷发行了自己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里面有一句：“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虽然当时慈禧已经快70岁了，但大家也都知道“香粉”指的是她。于是，于右任被定性为“革命党”，遭到通缉，通缉文上写的是：“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

当时的于右任正在开封参加会试，据说出了一个大巧合：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缉捕公文没到，自己朋友劝他快逃的信先到了。

得知消息后，暂时还没打算“换太平以颈血”的于右任，赶紧逃亡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当时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

当时的震旦学院是法国人赞助的学校，因为法籍神父试图将学校彻底改为教会学校，马相伯愤然离校，诸多学子跟随退学。于右任四处奔走，出钱出关系，和邵力子等人协助马相伯，在1905年一起创办了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复旦”这个名字，就是于右任建议的，典出《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复旦大学原校门

3

1906年，于右任在日本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名叫孙中山。

然后，他加入了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叫同盟会——于右任后来被称为“国民党元老”，即由此而来。

不过，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之后，于右任还是没准备“换太平以颈血”，因为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有比枪和炸弹更拿手也更有效的东西：笔。

1907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平生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报人于右任”由此名闻天下。

《神州日报》上来就“骨骼清奇”：报纸上的纪年方式与别家报纸不同，不用清朝皇帝的年号，而是统一使用公元纪年。这让人耳目一新。而报纸的内容，也多为针砭时弊、立场鲜明的稿件。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不过，《神州日报》才创刊37天，就遭遇了一起离奇火灾，报社从内到外被烧得干干净净。虽然报社上了火险，马上就恢复了生产，但凝聚力受挫，内讧不断，最终，于右任选择拍拍屁股走人——他在《神州日报》前后一共待了80天。

不过，尝到“办报启民智”甜头的于右任，在1909年又创办了《民呼日报》，宣称宗旨是：“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

《民呼日报》延续了于右任在《神州日报》针砭时弊的勇气和态度，文笔尤其辛辣。比如那一年甘肃大旱，陕甘总督升允却三年瞒报灾情，结果造成甘肃省内竟然人人相食。当时《民呼日报》立刻刊登了一篇文章《如是我闻》：“一饥饿老妪，让女儿到野外寻草根回来充饥。女儿抠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来，而母亲已无踪影，唯见地上一摊血。原来被人吃了。该女悲得昏死过去，第二天未出门，乡邻推门探看，只见地上一堆骨节，她又被人吃了。”

《民呼日报》随后还刊发点评：“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

这种报道，这种文笔，读者当然要看，《民呼日报》销量急剧上升，不过，当然也得罪了当局，尤其是升允。

《民呼日报》曾组织过一次赈灾活动，升允随后与上海道台蔡乃煌等勾结，诬陷于右任侵吞赈灾款，将于右任逮捕下狱，一个月审讯7次。为营救老大于右任，《民呼日报》只能在当局的暗示下“自行停刊”——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92天。

于右任虽然没有“颈血换太平”，但确实是把硬骨头。出狱没几天，他又创办了《民吁日报》，名称的来由是：“民不能言（呼）则唯有吁耳！”而且，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吁”，就是“于”右任的“口”在说话。

和《民呼日报》一样，《民吁\0日报》依旧揭露黑暗，而且敢把锋芒直接指向日本——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蚕食中国。

1909年10月26日，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上海数十家报纸大多默不作声，《民吁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并称伊藤博文为“大浑蛋”，是“死有余辜”。

结果日本当局暴跳如雷，指令上海当局立刻查封《民吁日报》——这家报纸只生存了48天。

“过一过二偏偏还要过三”的于右任，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再创

立了《民立报》，请宋教仁做主笔，在报纸上开出《民贼小传》，专写清朝贪官污吏，为辛亥革命的发动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于右任专门教导当时自己报社的新闻记者要有新闻道德，提出：“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民立报》率先发文是袁世凯幕后指使，于右任于是被通缉，逃亡日本，报纸遂停刊——这张报纸活得最长，活了三年。

于右任一手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就是中国报史上赫赫有名的“竖三民”。



当时的著名书画家对于右任有过这样一句评价：“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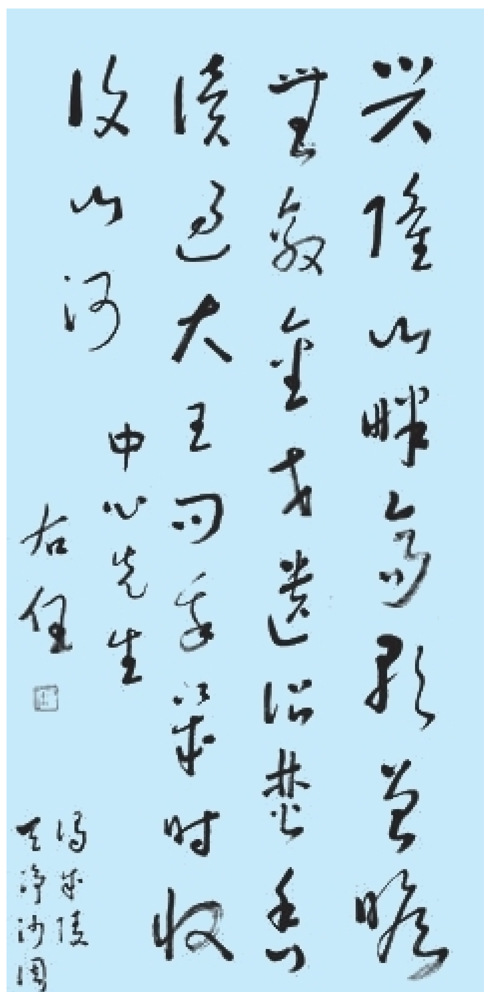
于右任善写诗做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字。

于右任最擅长草书，有“当代草圣”的称号。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将篆、隶、草与行楷融会，打通魏碑，自成一家，每一个字都自有意境。

于右任也爱写字。年轻的时候，他常背着一个褡裢袋子，里面既不装衣物，也不装钱财，就装两个印章。有人来求字，提笔就写，写完盖章，分文不取。

于右任写字不看人，也不分贫富，更不会“惜字如金”，以确保自己

字的价格。贩夫走卒来讨字，只要于右任喜欢，来者不拒。但如果碰到他不喜欢的人，怎么讨也不给。比如他不喜欢宋子文，宋子文曾专门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扇面托人请他题字，他就是不肯写。但他在饭馆吃到一道好吃的菜，提笔就给店家写一块匾额，甚至给女服务员也题字。



于右任书法作品

于右任到了台湾后，很多人都假冒他的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表示要“严惩”，但于右任特地关照“不要为难”他们。一次，他在马路上看到一家商店的牌匾是假冒他名题的字，就走入店内，让店家摘下牌匾，重新写了一幅，且分文未取。

于右任给人题字比较随意，但题的内容却不随意。

他给张大千题的字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为蒋经国（当时在台湾，于右任已看出蒋介石欲让他接班）题的字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他的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主管教育，于右任给他题的字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

他还为南洋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题过楹联，特地用白话文写了“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5

办报，写诗，题字，于右任完全就是一副知识分子的样子，但之所以他有名，因为他还是个政治家，甚至还当过总司令。

于右任一直追随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孙中山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中国的铁路开始夜晚发车，就是在他任上决定的。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右任也随即辞职（回去办《民立报》了），后因反对北洋军阀，于右任担任过陕西靖国军的总司令，也算是书生掌兵了。

从1930年开始，于右任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政府的监察院长，从此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34年。

监察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职权，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非常敏感的部门。也正是因此，“监察院长”这个职位，一直迟迟没有归属，直到最终以正直清廉闻名的于右任出任，大家才都没意见。

但在民国的大官场，于右任自己正直清廉是没有用的。于右任上任之初，也曾踌躇满志，放言“苍蝇老虎一起打”，但真打起来，就发现除了能动几个小小的科长或处长，再往上的就动不了了。于右任曾想法办贪污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和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但这个级别的“小老虎”，就已经有上层人物，乃至蒋介石或汪精卫来打招呼了。

以蒋经国的身份，以国民党当时的决心，在上海“打虎”依旧落得个无疾而终，于右任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这个“监察院长”，于右任做得

很是胸闷，被人讥笑为“监而不查，查而不明”。他也曾提出过辞职，但蒋介石坚决不准。

于右任在官场中表现得最书生气的一次，就是1948年的民国副总统选举。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站了出来，参选副总统。他的竞争对手，是孙科、程潜，以及最有实力的李宗仁。

各个竞选人为了拉票，对各路投票代表使出了各种手段：

李宗仁给每个投票代表都提供了一辆汽车，配司机服务；包下几个大旅社和酒店，只要是代表，免费入住，免费吃喝。



于右任（中）

孙科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程潜是武汉行辕主任，他们也是天天设宴款待各路代表，给吃给喝还给礼物。

于右任呢？啥也没给，在自己屋内摆开文房四宝，只要代表来，就

送一幅字，上书他最爱写的一句话："为万世开太平"。每天上门讨字的代表络绎不绝，最多时每小时有近200人，排起长队。

在投票日前一天，于右任终于给各路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一家饭店里请大家吃饭。在开席前，于右任说："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

到了投票日，结果不出意外，于右任得493票，第一轮就被淘汰。

冯自由替于右任感慨："你的纸弹怎么敌得过人家的银弹？"

但投票第二天，于右任依旧准时出现在会议现场，风度依旧。全场起立鼓掌。

6

和政治走得近，就难免会为政治所累。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大陆已经一溃千里，国共和谈在北京举行。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原本想派一直主和的于右任一起去北京参与和谈，但国民党的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有利于促成南京政府批准和谈。

周恩来当时很希望于右任也到北京，得知他不能来后非常失望，只能托于右任的女婿转告于右任：如果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请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攻破长江，派飞机接先生来北平。

于右任得到口信后，曾说过一句话："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因为他知道，当时他身边已经被安排了监视人员，他不太可能留在大陆了。

于右任没有料错。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一触即溃。4月21日，于右任被人从南京转移到上海，随后辗转到重庆，最终在11月29日离开大陆，飞往台湾。

关于于右任是否是自愿去的台湾，一直有争论。但有一个细节：当

时的国民党高层如果已经决定去台湾，是会事先安排家属赴台的，而且这也是规定。但于右任直到去台湾的时候，他的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依旧留在大陆。

一家人，从此再也无缘相见。

7

1962年，83岁的于右任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他在台湾的日子，一直都过得很清贫。很多人会奇怪，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再不济，钱财也不至于太窘迫。但事实上，于右任基本上把自己的钱财都捐了。

在大陆时，他捐建学校，捐建农场，赈灾，扶贫，钱如流水一般出去，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到台湾后，大家一开始的日子都不好过，很多人也会来找于右任借钱。于右任一般能借都借，也不催账。

于右任曾有一箱欠条，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最后终于由家人一把火烧为灰烬。他的理由是："防止我走了之后，子孙们再去讨债。"

但他欠别人的账单，却是被小心翼翼地锁在保险柜里的。

于右任向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清贫倒也罢了，关键是过得不开心。政治上，他继续成为"监察院"的一个摆设，感情上，他和妻女隔海相望，不能团聚。

1962年的元旦，于右任在台湾"监察院"参加完一次活动后，感到身体不适，便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两年之后的1964年，于右任终于病倒，住进了荣民医院（一开始住不起，是蒋经国来探视后，才安排住进去的）。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去医院看望他，于右任因为喉咙发炎，无法发声，只是向杨亮功伸出了三个手指。

杨亮功不解其意，一连说了几个猜测，于右任都摇头否定。杨亮功于是又拿来了纸和笔，但彼时的一代草圣，此时却连一支笔都握不住了。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点零8分，86岁的于右任与世长辞——因为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所以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关于于右任当初伸出的三个手指，大家又做出了诸多猜测。有人猜是有“三件后事”，有人猜是他放心不下外出留学的三公子，也有人猜是“三民主义”，但结合于右任生前的夙愿，最后一个猜测让大家觉得是最有可能的——

三个手指，是他希望归葬大陆陕西省的故乡三原县。

按照于右任1962年写下的那篇日记的期望，他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人们还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为他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塑铜像的材料，都是台湾登山协会志愿用人力背上去的）。

由于没有遗嘱，于右任在1962年元旦后没几天写的一首诗，就被当作了他的遗嘱。

那首诗，就是著名的《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馒头说

严格来说，于右任应该不能算“名士”。

因为中国传统认知中的“名士”，是出名但不出仕的——于右任做了34年的“监察院长”。

但我又实在找不出适合形容于右任的词：书法家？教育家？政治

家？报人？这些都只能形容出他的一面。对了，于右任喜欢美食，还是著名的美食家。

鉴于他那个“监察院长”基本上也当得有名无实，所以我觉得还是用广义上的“名士”来形容他，似乎更妥帖些。

说起名士，大家自然会想起魏晋风骨。魏晋名士有的，其实于右任都有：诗情、文才、书画、生活趣味、高雅格调、纯洁品性。但和魏晋名士的尚空谈不同，于右任是脚踏实地的，他是“入世”的。

无论是办报还是办学，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人，于右任都是尽心尽力，且竭尽所能。归隐山林，纵酒高歌固然惬意且显风度，但更让人尊敬的，是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尽己之力，为苍生增一份福祉。

这也可能就是于右任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曾拥有诸多“第一”，但她未必被人记得

在我印象里，这篇文中的这位女性，教科书里应该没提到过。有人提到她时，会冠以“民国第一女杀手”的称号。但在我看来，这个称号有点夸张了。与这个称号相比，她有不少其他值得一写的称号：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中国第一位站上法庭的女律师、中国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中国第一位地方法院的女性院长和审验两厅厅长。所以，说她是一位传奇女子，应该是不为过的。

1

应该是从三四年前开始吧，“90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活力的一个群体的代名词。

他们年轻，他们有激情，他们有想法，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有些叛逆。

是不是处于世纪之交那十年的那一代人，都会被赋予一种跨世纪的时代使命？至少倒退一个世纪，回到19世纪的中国，是这样的。



郑毓秀

那是大清帝国进入统治倒计时的年代，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出生的一批人，最终改变了这个国家。1891年3月20日，郑毓秀同样作为那个世纪的一名“90后”，出生在了广东的一个官宦之家。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那个传统的官宦之家为何会给一个女孩带来叛逆的遗传基因，但事实就是，郑毓秀从小就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孩。

在郑毓秀长到五六岁的时候，作为当时传统中国妇女的一项必经的

痛苦修行，一团长长的裹脚布被拿到了她的面前。但是无论家人如何软硬兼施，郑毓秀就是不肯裹脚，最终家人只能放弃。

“大脚女人嫁不出去！”这是当时长辈对郑毓秀的谆谆教导，但郑毓秀连裹脚都不肯，在婚嫁这件事上，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主意？

郑毓秀长到13岁，到了出嫁的年龄。她的祖母早就为她约定了一门亲事。

但13岁的郑毓秀说：“我不！”不仅如此，她还写了封信给人家的儿子，顺利解除了婚约。

这无疑让自己家人陷入极度的难堪之中。为此，郑毓秀选择了自己的处理方式：离家，去天津求学。

2

1905年，14岁的郑毓秀选择接受西式教育，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

两年之后，跟随着当时的留学大潮，16岁的郑毓秀和姐姐一起东渡扶桑。那是一次对郑毓秀人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留学。到日本的第二年，郑毓秀在廖仲恺的介绍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那时候的同盟会，正在低谷中徘徊——孙中山已经领导了数次革命暴动，却没有一次成功，甚至连成功的迹象都看不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界舆论开始对同盟会的存在以及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冷嘲热讽，而同盟会内部也开始出现了质疑孙中山的声音。这个时候，一个25岁的小伙子站了出来，他说他愿意舍命去刺杀一名清朝大官，以提振大家的士气。

这个人叫汪精卫。

1909年，汪精卫和黄复生（此人负责研制炸弹）乘船抵达天津，准备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在天津，已经在京津一带建立了一定社交圈子的郑毓秀负责接待，她已经得到了上级指示：全力配合。

汪精卫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把炸弹带进北京？

由于北京火车站对男性盘查得非常严格，所以汪精卫提出，是否可以请郑毓秀帮忙把炸弹带进去。不过汪精卫还是表达了担心：“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一不小心，炸弹在路上就有可能爆炸。”当时的炸弹是水银炸弹，靠水银杆触发，很容易误爆。

郑毓秀就回了一句话：“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

于是，那枚炸弹随后被郑毓秀动用多方面关系，安全送进了北京城。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刺杀载沣的行动，除了留下汪精卫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言外，并没有留下什么成果。不过，通过那次运送炸弹，郑毓秀开始慢慢介入了“刺杀”的行动中，而且渐渐升级，最终在1912年的元月，她参与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

在那次行刺中，郑毓秀被分在第四组，和另两个组员乘坐一辆马车在东华门和王府井之间巡游，伺机向袁世凯扔炸弹。在准备动手的前一刻，郑毓秀接到了上级的指令——袁世凯不是阻挠南北和议的元凶，真正的阻力来自清朝宗社党的中坚力量良弼。

于是，那次行动被紧急叫停（还是牺牲了一些同志），目标转向良弼。

准备刺杀良弼时，郑毓秀和其他“同盟会”成员决定改变做法——由刺客在刺杀对象面前引爆炸弹，提高成功率。



彭家珍最终和良弼同归于尽。因为良弼是清廷保皇党的最后力量，所以有后人评价，彭家珍才是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24岁的同盟会会员彭家珍决定做这个牺牲者。当时彭家珍的另一个身份，是郑毓秀姐姐的热恋男友。毫无疑问，郑毓秀的心里也不好过，但还是通过周密的安排，帮助彭家珍最终行刺成功。

越来越多的刺杀行动，使得郑毓秀的身份逐渐暴露——新一轮的刺

杀开始了，只是主使人和被刺者颠倒了过来：袁世凯下令消灭她。

1914年，郑毓秀只能前往法国避难。

3

在巴黎，郑毓秀改名“苏梅”，进入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前身）攻读法学专业。

虽然放下了“刺客”身份，但郑毓秀的社交能力一点儿都没搁下。求学期间，郑毓秀加入了法国法律协会，成为这个协会的第一位中国人。凭着流利的法语和翩翩的风度，郑毓秀在法国重新建立了一个社交圈，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佼佼者，也成了不少中国留法学生的“大姐”——帮助他们在法国立足，甚至帮他们申请各种生活补助。在向警予（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的书信里曾多次提到，郑毓秀在巴黎为帮助她们解决困难而四处活动。

1918年，郑毓秀受南方军政府吴玉章（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委托，在法国协助中华民国的外交工作。1919年，广州军政府外交部正式任命郑毓秀为外交调查名誉会员——不要小看这个头衔，这是中国女性参政的一个先例。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女性参政，被认为是一件“招外人之讪笑”的事，所以郑毓秀的这个“第一”有特别的意义。

也就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了。

在那场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果实的大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面对需要签字的和约，北洋政府把皮球踢给了当时的外交总长、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陆外长请求辞职不被批准，签字又不敢，只能躲进巴黎近郊的圣克鲁德医院。

1919年6月27日，中国代表团必须要决定是否签字的前一夜，300多名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了陆徵祥下榻的地方，要求他不能签字。众人推举能言善辩的郑毓秀进去和陆徵祥谈判。

郑毓秀在屋外经过花园时，折了一枝玫瑰藏在衣袖里。进房间后，她用玫瑰枝隔着衣服顶住陆徵祥：“你如果敢签字，我这支枪不会放过你！”

陆徵祥无从得知眼前的这个女学生何以散发出杀手的气场，他又哪

里知道，这个女学生当初可是连袁世凯都敢杀。

但据顾维钧回忆录，当时被郑毓秀恐吓的是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并非陆徵祥。

4

1924年，郑毓秀终于通过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

尽管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对郑毓秀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事颇有不屑和质疑（他对郑毓秀似乎一直有意见），但不管怎样，郑毓秀是有案可查的第一位中国女博士。

不仅仅是学业，郑毓秀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有一种说法，说郑毓秀曾对汪精卫示爱被拒绝（若为真也正常，当时的汪精卫英俊潇洒，又敢于舍生取义，应该是众多少女的梦中情人），也曾和王宠惠（法学大家，担任过民国外交部长、国务院总理，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有传闻说郑毓秀的博士论文是王宠惠代笔，胡适采信的就是这个说法）有过一段渊源，但她最终找到的爱人，叫魏道明。

熟悉民国史的人应该都知道魏道明这个人，他做过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南京市市长，后来还担任过驻美大使和首任台湾省主席。

但和郑毓秀认识的时候，魏道明还只是一个留学生，而且比郑毓秀小10岁。

两人互相欣赏彼此的才华，在法国就关系不错。1926年，双双回国的郑毓秀和魏道明在上海一起开了一家“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

这在当时是件很牛的事情。因为当时的中国律师界，对女性一直排斥。根据1915年民国司法部颁布的章程，律师应为“中华民国之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郑毓秀在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后发现，作为一名取得法国律师牌照的中国人，她可以在法国租界的法庭出现。



魏道明

于是，郑毓秀成了有案可查的中国第一位女律师。

当时的上海，洋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华人和洋人打官司，十打九输，而郑毓秀和魏道明的律师事务所就专门帮助华人，与洋人死磕——魏道明负责刑事诉讼，郑毓秀专攻女性维权。

几个官司一打，两人在上海法律界的名气就起来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甚至还代理过梅兰芳和孟小冬的离婚案。当时，郑毓秀担任孟小冬的辩护律师，最终让梅大师赔了孟小冬4万元——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女性离婚还能得到赔偿费，且有4万元之巨，简直是闻所未闻。（溥仪当时与文绣离婚，也就给了5.5万元赔偿。按大米购买力，4万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百万元以上。）

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一时间门庭若市。当时郑毓秀的诉讼费动辄上万元，连杜月笙都赞叹不已。当时的说法是，“郑毓秀一个案子的收入，就抵得上上海跑马厅一场赛马的头等大奖”。

这个律师事务所为郑毓秀和魏道明带来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感情的升华——1927年，两人在杭州结婚。

其实，回国后郑毓秀所做的，并不止开律师事务所那么简单。

1925年，郑毓秀就担任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她出版了《国际联盟概况》和《中国比较宪法论》等书籍，前者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国际联盟的情况，后者就是她的博士毕业论文。

从1927年开始，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1928年，郑毓秀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出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1929年，郑毓秀作为“五人小组”之一，专门负责起草中华民国的《民法》——在这部新《民法》里，出现了很多对女性权利的保护与提升：

未婚单身女性有权签订或废止婚约；以个人名义持有或让渡其个人资产或地产；可担任其他人的代理人；可以继承人或遗产受赠人的身份享有继承权；已婚女性可与丈夫取得共识，具有保留原本姓氏，不需要冠夫姓的权利……

郑毓秀能够担任这些职务并获得这些成就，以当时中国女性的地位而言，可以说是相当难得。

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郑毓秀成了大使夫人，便渐渐从台前走到了幕后，为丈夫在美国的工作出谋划策，做些幕后安排。魏道明晚年在回忆录中对妻子在美国期间对他的帮助深怀感激，称“我是非常幸运的”。

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蒋夫人那次赢得无数赞誉的访美之行背后，郑毓秀穿针引线，接来送往，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安娜曾称赞她“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

但郑毓秀的风光之路，在1948年走到了尽头。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蒋介石任命魏道明接替原来的行政长官陈仪，担任台湾省第一任省主席，夫妇两人随即返回国内。

魏道明上任后，对陈仪留下的烂摊子，还是做了不少积极的工作。但这对夫妇那时还没意识到，彼时的台湾，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省份。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已经渐渐开始把台湾谋划成

一个最终退守的“终极基地”——对于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老巢，一向只信任自己人的蒋介石，怎么会用外人？

1948年，魏道明从外面结束公务回到家中，就听到了郑毓秀转达：“你知道吗？你已经被调职了。”原来，蒋介石在没有正式通知魏道明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亲信陈诚派到了台湾，接替魏道明主持工作。

这一个举动让夫妇俩顿时感到非常心寒，而郑毓秀更是点出了其中的关键：“蒋介石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他的人。”

随后，郑毓秀夫妇选择辞职，前往香港，观察时局。进入1949年，夫妇俩越发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当时局大幕落定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去台湾，也没有选择返回大陆，而是做了一个让不少人意外的决定：去巴西经商。

他们决定远离政治，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6

但是，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在巴西，一方面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也没有经商的天赋，郑毓秀夫妇没几次折腾就亏了大本。最终，他们选择去美国洛杉矶居住。在他们抵达美国后，当时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夫人，还专门为郑毓秀送去了鲜花表示欢迎，可见郑毓秀当年在美国的人缘。



郑毓秀和魏道明

但居住在美国，郑毓秀夫妇却也未必感到开心，百无聊赖之余，当年顶着各种“部长”头衔的夫妇俩，只能靠打麻将消遣时间。

1954年，郑毓秀又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

她的左臂被发现癌细胞，经过诊断，只能做切除处理。可想而知，

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豪气女侠，失去了自己的一只手，这打击该有多大。

经此病变，郑毓秀一蹶不振，最终于1959年12月16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8岁。

魏道明后来还是回到了台湾，担任“外交部长”，其间，还娶了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但1978年，80岁的魏道明在巴西逝世后，后人还是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运回美国，和郑毓秀合葬。

馒头说

一路看下来，看到郑毓秀的人生收尾，是不是有些唏嘘？

但我们又在期盼什么呢？希望她最终像秋瑾那样，悲壮就义？希望她像林徽因那样，才情逼人？或者像阮玲玉那样，香消玉殒，遗恨人间？

这或许也是她不像那些人那样为人所熟知的原因之一吧。

但一位民国女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能把自己的一生过成这样，也是很不容易了。

并不是每个曾经当过主角的人的人生剧本，都能以大高潮或大圆满收尾，很多人就是这样曾经辉煌，然后慢慢就走向失意，走向平庸，最终慢慢被人遗忘。

在这一点上，郑毓秀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她一生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维护女权，而且应该说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她肯定也明白一个道理：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中篇 以国家之名

上海1937：一寸山河一寸血

“中国人那么多，一人一口唾沫都够淹死小日本了。”这是我们从祖辈口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觉得，要不是当初的不抵抗政策，我们是能轻松战胜日本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1

1937年8月9日傍晚，大山勇夫有点烦躁。

身为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海军中尉，大山勇夫认为眼前阻挡他的中国士兵很无理——他们拦住了他和他手下的一等兵斋藤与藏，不准他们进入上海虹桥机场。

对方说，这是中国的军事重地，不能进入。

以大山勇夫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军队在上海——这座属于中国的城市——做得已经有点过分了。

按照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无权在上海驻扎正规军的，只能部署“保安团”。但这几个月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政府正在运用各种手段增强在上海的军事力量，包括在各个重要建筑和街口修筑工事。据可靠情报，他们甚至已经让中央军的正规部队换上驻上海保安部队的服装，分批渗透进来。



大山勇夫

这也是大山勇夫带着手下来到虹桥机场的目的：和之前的多起侦查一样，他们需要知道中国军队到底打算干什么。尽管日本方面利用《淞沪停战协定》获得的谈判优势不停在上海增强军事力量，也有在上海打一场的准备，但是，中国政府如果也想这么做，无疑是不被允许的！

想到中国人居然还敢暗暗打大日本帝国的算盘，大山勇夫的斗志不禁燃烧了起来。他让斋藤踩下汽车的油门，准备硬闯进去，探个究竟。在这次硬闯中，双方起了冲突，最终二人被中国士兵击毙。

打死他们的，确实不是保安团的普通中国警察，而是隶属于中国正规军第二师独立旅的士兵。他们早就受够了日本人在上海横冲直撞、嚣张跋扈的气焰，今天终于等到了机会。

大山勇夫没有猜错：中国军队的正规军已经进驻了上海。

一场中日双方其实都有预谋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据后来披露的大山勇夫的日记，其实他去虹桥机场前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知道这是一次挑衅，而目的是为日军增加借口。

1937年8月12日清晨，张治中一脸凝重地抵达上海南翔。

作为京沪警备司令，他在这样敏感的时刻抵达上海，并不是来处理日本海军大尉（8月9日当天，大山勇夫死后，日本内阁就追他为大尉）大山勇夫被中国守军击毙一事的——尽管这件事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在第一时间就会见上海市长俞鸿钧，向中国表达了日本“举国震惊”的态度，并要求中国军队立刻拆除在上海的一切军事工事，撤出一切军队。而让日本人震惊的是，之前一直打太极但至少态度谦逊的中国人，这次却非常强硬——俞鸿钧表示是日本人擅闯中国军事禁区，并打死中国军人在先，所以拒绝日本一切要求。

上海政府态度的强硬，与张治中抵达上海大有关系。

因为就在抵达上海的这一天，张治中得到了一个新的任命头衔：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而第九集团军的使命，就是围攻在上海的日军。

蒋介石对张治中说的原话就是：“把在上海的日军，赶到黄浦江里去！”

这让张治中感到非常兴奋——在上海与日本人大打一仗，一直是他主张的。

与张治中主张一致的，还有当时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武昌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等一批在蒋介石身边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从战略上讲，由于日军无论装备还是军官士兵素质，均远胜中国，如果放到华北平原进行大决战，中国军队的主力肯定会被具有机械化优势的日军辗轧，届时再败退到东南沿海，大势已去；

第二，从外交上讲，上海是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欧美列强在上海的利益盘根错节，如果在上海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日军肯定投鼠忌器，且列强很可能干预战争；



张治中，字文白。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曾出任第五军军长与日军作战，一直反对内战，希望共同抗日。一直为蒋介石信任，直到1949年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与中共谈判失败后，接受周恩来劝告留在了北平。电影《开国大典》中蒋介石那句著名的台词——“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说的就是他

第三，从战术上讲，上海高楼众多，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和日军打巷战，对方的重武器优势就很难发挥。就算我方撤退，日军面临的也是江南的水网地形，机械部队很难长驱直入；

第四，从地形上讲，一旦上海开战，将把日本“从北向南”的攻击引入“从东向西”的“仰攻”路线中（中国地形西高东低），这样就算中国一路退守，西南还有大后方。

让这批人感到宽慰的是，蒋介石最终也认同了这种观点。

为此，张治中其实一直在抽调自己能指挥的正规军，填充到上海的“保安团”中——在虹桥机场击毙大山勇夫的正规军，就是张治中调动的。

不过，日本人在大山勇夫被击毙之后，很快也嗅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味道，立刻命令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进入特别戒备状态。日本海军则调动“龙骧”号和“凤翔”号两艘航母，外加原本对苏联实施警戒任务的“加贺”号，逼近离上海130多公里处的马鞍群岛。在上海的原有日军，再加

上第三舰队机动部队2400人，一共达到了4000多人。

按照张治中的估计，如果要全歼在上海的日军，那么只凭他能指挥的几个师是远远不够的。

这一切，就取决于蒋介石到底有多想打这一仗。

3

1937年8月13日中午，孙元良下令，先头部队汇报抵达位置。

孙元良，黄埔一期毕业，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在8月12日率全师搭乘火车抵达上海。他心里知道，如果哪场战争蒋介石一上来就要调用他这支部队，那说明校长一定是下了大决心了。

因为他的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也不是一般的中央军，而是中央军王牌中的王牌。



孙元良。后来他的儿子当了演员，叫秦汉

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蒋介石的算盘是借助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训练60支德式步兵师。但时间紧迫，到卢沟桥枪声响起时，只训练出了20个师。而在这20个师中，由原中央警卫第一师改建的第八十七师、中央警卫第二师改建的第八十八师，以及在这两个师补充旅基础上建立的第三十六师，德国化最彻底。

以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为例，师以下辖两个旅，旅下辖两个团，团以下的营、连、排、班均为三建制。团一级有自己的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通信连，一个特务连，一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和两门迫击炮），而师一级更是拥有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特务营、卫生队。全师配德式钢盔，绝大多数配纯德式毛瑟步枪，轻机枪用的是捷克造，重机枪是二四式仿马克沁水冷机枪。这些配置和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已是顶配。



中央军的德械师

如今，为了在上海大干一场，蒋介石上手就甩出了自己手中的王牌——一方面是体现对这场战争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向全国的各路军阀显示了自己的诚意：你们看，我把自己的家底都拿出来了，诸君看着办。

就这样，在8月12日前后，从苏州、无锡到上海的公路上，全都是载满士兵的卡车，所有通往上海的火车也停止了客运，被辟为运兵的专列。

8月12日那天的清晨，上海市民从睡梦中醒来，忽然发现窗外的马路上，全都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从1932年之后，上海市民就再也没有在自己的城市看到过自己的正规军了。

一时之间，街头巷尾的老百姓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在传播这样一条信息：终于要打小鬼子了！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而等待变成现实的那一根导火索，在1937年8月13日下午3点终于被点燃。

孙元良在8月13日得到的汇报是：五二三团一营营长易瑾，率全营进驻了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规定的中日停火线：八字桥。

随后，易瑾就发现了迎面扑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

双方军队迎面撞了个正着，几乎都没有犹豫，同时开火。

按照张治中原定的计划，全面总攻其实应该是在8月14日，但因为这次遭遇战，历史就被定格在了1937年8月13日。

张治中在这一天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此日吾民族已临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

4

1937年8月14日下午，高志航听到笕桥机场拉响了防空警报。

高志航，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中队的9架飞机刚刚降落，而第二十二中队和第二十三中队正准备降落（关于中国抗战期间空军的故事，参看《历史的温度1》中收录的《抗战期间的中国空中经营》）。

防空警报拉响的原因，是笕桥机场上空出现了9架日本“九六式轰炸机”——它们是来报复的。

8月13日，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五二三团一营在八字桥的遭遇战中与日军交上了火，但陆上战斗还没全面打响。

所以，淞沪会战先正式开打的，其实是中日两国的空军。

8月14日凌晨到上午，中国空军出动飞机76架次，轰炸了日军在上海的司令部、码头、仓库和舰船。这都是完全按照张治中的部署来的。因为在蒋介石问他上海攻略时，他的回答就是：首先出动空军，拔掉对方的重要据点。

尽管日军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对于首先进攻的是中国空军，他们却很意外——在他们眼里，孱弱的中国空军，居然敢主动向大日本帝国的空军挑战？

在1937年，中日两国的空军实力对比是这样的：日本拥有91个飞行中队，各类作战飞机2100架左右，而中国一共只有300架左右的作战飞机，相差7倍。

所以，日本对于中国敢先出动空军感到恼羞成怒。在8月14日下午，日军先后出动两批轰炸机，准备炸平笕桥机场，将中国空军的有生力量摧毁。

在防空警报中，高志航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重新起飞，正准备降落的第二十二中队和第二十三中队也放弃降落，进入战斗队形。

随后，他跳上了自己的“霍克–3”攻击机，带着两架僚机升空，直扑日机编队。

嚣张的日本攻击编队连战斗机护航也没有配备，顿时陷入中国战斗机的围剿之中。高志航作为大队长，率先击落日方一架敌机，成为中日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个击落日军飞机的中国飞行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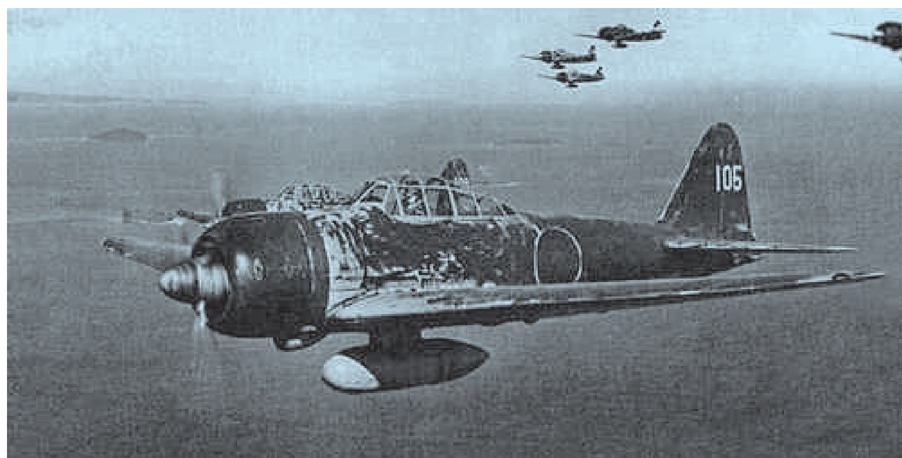
8月15日，不甘心失败的日军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了16架轰炸机和29架战斗机，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第四大队起飞迎敌，又打下日机3架（高志航本人击落两架）。那一天，中国空军第四、第五大队一共打下17架日本飞机。8月16日，又击落日机8架。

淞沪战役开战才几天，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竟然在他们本以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面前，损失了一半最新式的“九六式”轰炸机，且对战略目标的打击根本不能完成。

在“巨大的耻辱”面前，木更津航空队联队长石井义大佐剖腹自杀。

但是，淞沪会战记录的也是中国空军短暂的辉煌。

除了在飞机数量上存在劣势，中国最吃亏的还是工业制造能力——我们根本造不出飞机。在日本不断研发和制造更新式的飞机背景下，中国所有的飞机包括零件都来自国外采购，自身没有任何制造能力。换句话说，打一架就少一架。在最初的交手之后，中国空军飞行员每一次驾机升空，往往要单挑对方10架甚至20架飞机。



由日本三菱重工自主研发，1940年开始服役的“零”式飞机是“二战”中日本著名的战斗机，曾以优越的性能成为中国空军心中的阴影，也给美国空军制造了很多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名中国飞行员可能都知道自己的必然结局——殉国。

1937年11月28日，日军空袭河南周口机场，高志航冒着轰炸奔向自己的座机想升空迎敌，最终被炸死在机舱内。

不仅仅是高志航。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在开战一年内，全部殉国。而中国空军第一批精英，几乎没有一个人活过1938年。

而在淞沪会战中，至少还有一名中国飞行员的名字值得铭记。

他的名字，叫阎海文。

1937年8月16日，淞沪会战开战的第四天，隶属中国空军第五飞行大队的阎海文奉命轰炸日军驻上海司令部。在完成轰炸任务后返航过程中，阎海文的5210号座机被日军地面高炮击中，他被迫跳伞，却因为风向变化，落入了日军阵地。

大批的日军围了上来，他们希望能活捉一名“支那飞行士”，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居然能击落大日本帝国的飞机。

阎海文身边只有一把手枪，他在日本士兵的“投降”喊话中，举枪击毙了5名日本士兵，然后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

21岁的阎海文在自尽前，喊了一句：“中国没有做俘虏的空军！”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木村毅吃惊地目睹了这一幕，并写成了报道发回国内。在报道的最后，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5

1937年8月18日，松井石根稍微松了一口气。

松井石根此时的身份，是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总司令。他之所以能松一口气，是因为接到了消息：日本第三师团已经从热田港搭乘军舰前来上海支援。

“中国已非昔日支那”这个观点，是松井石根一直想让日本军部大本营明白，却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松井石根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武官，在日本军中又游离于“皇道派”和“统制派”之外，所以高层认为他非常适合担任需要协调多个师团的“上海派遣军”司令。但是，松井石根在临行前问上司杉山元讨兵，杉山却只肯给他两个师团。

松井一开始是想拿5个师团的，但军部大本营认为，“打支那，两个师团已经宽裕了”。

直到8月13日之后，在收到上海方面不断发来的求援电报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更让大本营震惊的，是那些从前方发回的电报和随军记者报道，无一不提到中国士兵前仆后继、完全不顾性命地拼死冲锋的各种细节。

日方终于明白过来：对中国人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冲突，而是一次被压制多年的巨大岩浆的总喷发。

于是，从东京到仙台，从熊本到金泽，从京都到名古屋，日本各地开始出现了狂热的出征场面——日本开始全面增援在上海的守军。

那些怀着一颗为天皇尽忠之心的日本士兵，在各个主要城市的港口开始登船，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短暂的迷茫和紧张情绪很快被两旁疯狂挥舞旗帜的日本民众驱散。

那些平日里温和敦厚的日本老百姓，高呼着“万岁！万岁！”，目送自己的丈夫或儿子、父亲和兄弟踏上战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光荣地去为天皇开疆拓土，弘扬大日本帝国的威风。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中不少现在看上去还彬彬有礼的亲人，一踏上邻国领土，很快就会变成他们自己也不认识的人间恶魔。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再回来了。



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1948年被处以绞刑

很快，松井石根就庆幸来自后方的增援是如此及时了。

因为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是，蒋介石政府也正在把手中所有能动用的力量都在向上海集结。

蒋介石也把家底全拼上了。

在中国援军的序列里，有最精锐的中央军：罗卓英的十八军、胡宗南的第一军一师、夏楚中的九十八师、王耀武的五十一师、俞济时的五十八师、李玉堂的第三师……也有原先和蒋介石同床异梦的地方军阀：从四川日夜兼程甚至步行的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从关外退回来，憋着口气想要为自己正名的东北军主力；一向与中央军闹别扭的桂军全部精锐……此外，蒋介石把最不舍得打的两张精锐王牌也派向了上海：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黄杰的税警总团。

一时之间，中华大地的铁道线上，跑的全是运兵的专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上海。

每当列车停靠在站台的时候，自发前往站台的中国老百姓就往车窗扔香烟，扔水果，扔糖果，很多老百姓边扔边流泪："好好打啊！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啊！"

这是中华民族自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如此团结。很多老百姓都信心满满："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团结了，还打不跑小鬼子？"

但是，从上海的战况进展来看，一切并不如他们所愿。

6

1937年8月21日凌晨，胡家骥的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

胡家骥是第三十六师二一六团的团长，黄埔五期毕业生。他率领的这个团，是攻打上海汇山码头的主力团。汇山码头处于日军防线的关键位置，将是他们增援部队上岸的一个重要据点。

但总攻发动一个多小时后，二一六团连汇山码头前的唐山路日军防线都冲不过去。

盛怒之下的胡家骥把二营做预备队，三营做侧翼，自己挥着手枪，亲自率一营冲了上去，最终一鼓作气冲过了火力交织的唐山路，来到了汇山码头的大铁门前。然而，在那里又被码头里面布置的日军火力压制

住了。

“此时不报国，还等什么时候？！”胡家骥大吼一声，第一个带头爬上了铁门，后面的士兵一看团长如此拼命，也争先恐后地踏着战友们的尸体，拼死往里攻击。

然而，身中5枪不下火线的胡家骥在率团冲进大铁门后，却遭到了来自港口的日本军舰的炮轰，在付出了500多名兄弟的生命之后，只能退了出来。

胡家骥最终捡回了一条命。他知道他还算幸运的，多少和他一样甚至比他军衔还高的兄弟，连同千千万万的士兵，已经在总攻开始后的近10天里失去了生命。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所遭遇的挫折，其实折射出了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暴露出的普遍问题，总结来说，还是四个字：技不如人。

“技不如人”首先体现在装备上。

中国军队除了那几支德械师之外，绝大多数部队武器配备和火力输出都远逊于日军，面对据守在钢筋水泥碉堡里的日军，除了人肉冲锋之外，基本拿不出其他办法。

在8月14日战端初开时，张治中就制订过一个“铁拳计划”——按照德军作战样式，组织一个500人的突击敢死队，直扑日军指挥部。但在实际攻击过程中，抱着必死决心的中国士兵却因为没有重武器，始终无法突破日军的碉堡火力封锁，每前进一步都要用战友的尸体铺路。最终，突击队全军覆没，带队的刘宏深营长殉国，阵亡时年仅28岁，结婚还没满百天。

原保安总团的刘仁义这样回忆当初中国士兵是怎么对付日军战车的：“他们的战车我们怎么对付？自告奋勇捆起了炸药，他的战车来了轧我们的单兵，辗轧之下我们的人牺牲一个，他们的战车也牺牲一架，就是那么干。我们又没有炮什么的，我们都是陆军，可怜哪，我们那时候的武器差呀。”



日军用军舰运送来增援的坦克。日军坦克其实铁皮不厚，但在火力孱弱的中国士兵面前，已经算得上一头头怪兽

但是，比武器装备落后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士兵在战斗素质、训练水平和现代化战争的配合演练上的巨大差距。

比如和胡家骥二一六团一起进攻汇山码头的，还有杜聿明的南京装甲团——这是当时中国军队仅有的一支坦克部队。结果参加战斗的坦克战车全部被击毁。

在整个淞沪会战中，中国的步兵基本上不知道怎么和坦克战车进行协同作战。坦克战车手们认为步兵老是躲在自己后面而不懂得火力掩护，而步兵们则认为，你坦克自己有装甲，为什么不让我们躲，还要我们配合掩护？

同样成问题的还有“步炮协同”。为了打上海，蒋介石也派出了自己最好的炮兵团。但是在攻击时，炮兵和步兵却缺乏实战协同演练，最终

往往是步兵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向敌方阵营发起冲锋。

还有就是从指挥官到士兵暴露出的现代化战争经验不足的问题。

桂军是当时地方军中公认的最能打的部队，白崇禧也憋足了劲想让桂军在淞沪会战树一面旗帜，所以，在一次南翔和真如反击战中，他一下子投进去了桂军6个精锐师。

不料，由于事先没有进行火力侦察和压制，冲锋前的烟雾弹又因为风向原因被吹反了方向，步兵在没有炮兵掩护的情况下就勇敢地冲向日军阵地，成了对方交叉火力的活靶子——桂军士兵虽然抱着必死的信念拼命向前冲锋，但绝大多数好男儿都倒在了日军的重机枪火力之下。

只打了一天，桂军6个精锐师就全垮了，光旅长就阵亡了两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中国军队的斗志毋庸置疑，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巨大的伤亡。按照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史说的回忆：“一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两天之后，就留下了几副伙食担子。”

其实何止是一个团。当时中央军的一个师上去，能顶一个星期；杂牌军的一个师上去，可能三天就被打残了。连见多识广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忍不住感叹：“淞沪战场真是一个血与肉的大熔炉。”

淞沪会战开战10天，作为一线总指挥的张治中又急又愧：在上海的中国军队一开始的数量是日军的十倍之多，虽然猛攻猛打，却始终无法实现突破，最终让日军固守待援的战略意图实现。

为此，蒋介石把自己着力培养的亲信陈诚也调了过来，担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实际上就是负责指挥淞沪会战。

但是，战况依旧没有改观。

随着登陆增援的日军大幅度增加，中国军队的处境越发艰难。

7

1937年9月7日凌晨，姚子青最后望了一眼上海宝山县城。

姚子青是九十八师五八三团三营的营长，他得到的任务，是一个只

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任务：死守宝山。

当淞沪会战快打到一个月的时候，中国军队在初期建立起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随着拥有巨大优势的日军大部队源源不断地增援，中国军队的多处防守阵地被突破，日军的登陆地点很快就要连成一线。

而宝山，就是登陆地点中的一个关键枢纽。

自9月5日凌晨开始，日军在舰炮和飞机的协助下，调集大量坦克猛攻宝山城门。姚子青率全营500多人死守不退。久攻不下的日军开始发射大量燃烧弹，宝山县城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姚子青告诉残存的全营士兵："人从生下来就注定要死，但好汉死要死出个样子。今天，三营谁也不许后退一步，谁也不许苟且偷生，让日本人看看咱中国人的骨气！"

每一个士兵都遵从营长的教导，即便在日军攻进县城后，依旧依靠每一个屋顶、每一条街巷、每一堵断墙，与日军展开巷战。子弹打完了，就用砖头、用木棒，甚至用牙齿咬。

最终，除了一个奉命出城报告战况的士兵外，自姚子青以下，三营全体殉国，无一人生还。

宝山的失守，导致上海北部的罗店防线失去了坚守意义——之前这块阵地已经几经易手，中日双方在这块弹丸之地都投入了超乎想象的重兵。

为了守住罗店，蒋介石把自己手里残存的好牌都投了进去，包括在之后让日军最心存忌惮的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后扩编为七十四军），以及他自己的得意门生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第一师。

丢了再抢，抢了再丢，在阵地狭小的罗店，每一天都是地狱般的惨烈景象。在日军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中国士兵连自己战友的尸体都运不下去，最终尸体堆得比战壕还要高，只能把战友的尸体当作沙袋做掩护，子弹打在上面"噗噗"作响。有的士兵打着打着就哭了，因为对方子弹打的，是之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

而他们心里也明白，自己死后，也将成为战友的屏障。所以他们在重新挖战壕的时候都一声不吭——每个挖的士兵都知道，他们就是在为

自己挖坟墓。

在罗店，中国士兵最渴望的其实是拼刺刀，因为那会将双方在火力上的差距缩到最小。所以在罗店阵地上，曾出现过上千人规模的肉搏战——浑身负伤但双眼血红的中国士兵们一听到号声，依旧如同猛虎一般冲出战壕，扑向日军。排长牺牲，连长带头冲，连长牺牲，营长带头冲，营长牺牲，团长装上刺刀冲出战壕。

小小的罗店，中国军队伤亡数万人，而日军也伤亡万人，被公认为淞沪会战中的“血肉磨坊”。

而像在宝山、罗店上演的如此惨烈的战斗景象，在淞沪会战的中期，每天都同样上演在大场、杨行、刘行、吴淞、川沙、蕴藻浜等各个中国军队的战场。当拥有巨大装备和战斗素质优势的日军扑上来的时候，支撑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死守不退的，就是一颗保家卫国的决心。



10月27日，在八十八师撤退的情况下，谢晋元奉命率400孤军死守四行仓库，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形象。（参看《历史的温度1》收录的《一座被死守的仓库》）

但是，当这场会战打到11月初的时候，已经从全面进攻转为全面防守的中国军队，还是迎来了一个最坏的消息：由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为主组建的第十军，在杭州湾强行登陆成功。

中国军队的后路被抄了。

忽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是中国军队指挥层的严重失误，但这时

候，也没空追责了，因为大家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在上海激战近三个月的数十万中国军队，很有可能被日军合围全歼。

8

1937年11月10日上午，彭孟缉面对着布满地雷的大桥，痛哭失声。

彭孟辑，陆军独立炮兵第十团团长。他统率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重炮兵团，配备全中国仅有的德制150毫米口径榴弹炮。而接到撤退命令的他，却在上海以西的一条大河边无法前进——先前过去的兄弟部队的工兵部队，为防止日军追击，已经在桥上布满了地雷。

和彭孟辑一起困在河边的，还有大批从上海市中心撤下来的兄弟部队。没有事先通知，没有统一调控，也没有人管后续部队的死活。

最终，彭孟缉只能下令：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那批重炮推入河中。

望着滔滔河水，彭团长和手下的将士泪水止不住地流。而耳边传来了爆炸声和惨叫声——有兄弟部队的士兵冒险试探过桥，被自己人埋的地雷炸死。

彭孟缉部所呈现的，只是数十万中国军队撤退时混乱画面中的冰山一角。在撤退这件事上，蒋介石难辞其咎。

在手下将官纷纷劝他下达总撤退命令时，蒋介石却总是寄望于国联的调停和干涉。包括在11月6日明明已经听取陈诚建议决定撤退，却因为布鲁塞尔召开国联大会，想看看国联会不会干预，于是又下令全线再坚守三天，直到11月9日才明确下令实施总撤退——三天的宝贵时间，被白白浪费。



中国军队当时拥有的150毫米口径榴弹炮，最终只能在撤退途中推入河中

而比浪费时间更可怕的，是撤退时完全没有秩序和协调。

在上海浴血奋战了三个月的中国官兵，陷入了巨大的混乱：有的部队接到了撤退命令，却不知道往哪里撤；有的部队接到了撤退方向，却不知道撤退时间和撤退序列；还有的部队根本就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但看到负责掩护的友军部队撤了，也只能跟着撤。

一时之间，数十万中国军队在没有掩护、没有断后的情况下，开始往上海周边方向大溃退，到处都出现几万部队拥挤在一条狭窄公路上，成为日军飞机扫射和轰炸活靶子的景象。有的大桥奉命要被炸毁，却因为后续友军部队还没有过桥而发生争执，甚至出现了多起自己部队拔枪相向的场面。

不少满腔热血从全国各地赶到上海杀敌的子弟兵，最终却死在了溃退的路上。

9

1937年11月11日，俞鸿钧脸色凝重。

俞鸿钧，上海市长。他做市长的时候，40岁都不到，可见能力确实非同一般。但在战争时期，他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这一天，俞鸿钧奉命告诉上海市民一个不幸的消息——中国军队已经全部撤离上海市区。

历尽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了。

上海陷落了。

但是，俞鸿钧的使命，是宣读一份《告上海市民书》：“……以酷爱和平之民族，被迫与黩武之强敌抗战，所持者唯此坚忍不拔之志愿，称意敏果之行为，但使尺寸土地之进出，胥有代价可言，则目前之小胜小负，胥无与于最后得失之衡量，此长期抗战之精神意义，所以必须洞彻了解，无所用其彷徨顾瞻也……”

其实，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表的《告上海同胞书》的开头，说得更直白一些：“亲爱的上海同胞们：我军这次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真正的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从这时候才开始！”



俞鸿钧

当然，在日本军部大本营看来，这只不过是失败者一种“体面”的说辞而已。

他们的注意力，已经放到了离上海只有300多公里的南京——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和柳川平助的第十军，都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不断

发出“请战”的诉求。

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日本人未必不知道中国人想借淞沪会战，将他们引入“由东向西”的攻击线路中，而是他们不在乎：

上海一战，虽然日本军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言论变成了“三个月打进上海”，但毕竟也歼灭了蒋介石的大量精英部队。等到再打下南京，坐着等中国人来投降就可以了。

然而，一个星期后的11月20日，中国国民政府发布的一条声明，彻底震惊了日本人。

在这一天，中国国民政府宣布：把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

南京战役还没打响，中国人已经宣布迁都了。

这背后透露出的只有一个信息：在历经三个月炼狱般的淞沪会战之后，日本人只得到了中国人斩钉截铁的三个字答复：

“不投降！”

如果一定要扩充一下，那就是五个字：

“坚决不投降！”

馒头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淞沪会战都堪称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以及最惨烈的会战之一。

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中日双方在上海先后投入了总计100万兵力。蒋介石确实拿出了他能拿出的所有底牌，先后投入100多个师共70万精锐，最后自报伤亡30万（其中10万伤亡于撤退途中）。而日军也被迫前后投入8个师团、两个旅团以及多个联队，接近30万兵力，最终自报伤亡4万（有统计数据最终为7万）。

在淞沪战场这座血与肉的大熔炉里，日本人不得不认识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他们之前认知的“支那”——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依旧是那个只

要有几艘炮舰在大沽口露一下面就会投降谈判的国家。

而在世界各国眼中，中国人也因为在淞沪战场上的表现，改变了他们原先的认知。

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卡尔逊曾说过，淞沪战役足以证明两点：“第一，中国已下决心为她的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作战的能力；第二，日本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被世人视为可怕的军队，经中国一打，降到了第三等的地位。”

当然，日本和列强可能忽略的一点是，淞沪会战其实真正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国民党政府一改“七七事变”之后的犹豫和彷徨，正式认定将和日本全面开战。这场战争不仅仅促成了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军站在一条战壕，更加快了当时中国两个政党的一致对外：淞沪会战开战后9天，蒋介石就宣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2日，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

但是，淞沪会战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让当时的我们，更清楚地审视了自己。

我们的祖辈一直口口相传的一句话是：“小日本如果敢来侵略中国，我们中国人一人一口唾沫就淹死他们了！”

但事实上，通过淞沪会战我们看到，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对依旧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发起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降维打击”——别说是“一人一口唾沫”，千千万万子弟兵抱着必死之心，拼上血肉之躯依旧无法阻挡侵略者的进攻。

在淞沪会战之前，我们总是觉得我们退让是因为我们不想打，不愿打，不敢打，不然小日本怎能如此嚣张？但这场会战打完之后，很多人终于意识到——战场上的事，确实要意志力，但有些时候，真的不是仅靠意志力就能够解决的。

所以，这场发生在80多年前，历经三个月的惨烈会战，从今天回望，依旧有太多的教训和意义。

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从来就不会变。

但当真的挨打乃至处于危亡之际，中华民族从来不会妥协或屈服，哪怕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会挺起胸膛，坚决抵抗。

哪怕战斗到最后一刻，用身躯，用鲜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7，南京城里的纳粹旗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抗日战争期间帮助过我们的外国友人。

1

1937年，12月的某一天，南京。

一对中国的母女，惶恐地低着头赶路，在路过小粉桥路的时候，她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队日本兵从对面走了过来。

彼时的南京，城已陷，人已乱，禽兽横行，如同炼狱。

一名日军士兵很快发现了那对中国母女，他加速走了过来，直接拉着女儿的手，往旁边的一幢小房子里拖。母亲一边哭着哀求，一边拉着日本士兵的手不肯放。然后她被一脚踹倒在地上，旁边的日本士兵端起枪，周围的人都不敢作声了。

就在那个女儿快被日本兵拖入小屋的时候，一个德国人突然冲了过来，用英语大声喊："停止！"

所有日本兵都愣住了，拿在手里的枪，也不敢动。

因为那个德国人，身穿德国军装，头戴德式钢盔，腰里别着一把手枪，最关键的，是他的手臂上佩戴着"卐"字的袖章。

僵持了一会儿，日军士兵吃不准对面这个"盟友"到底是何来路，最终决定放弃，掉头离开。

这一幕，来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汤英的回忆。

那个半路杀出来的德国人，叫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

2

1882年11月23日，约翰·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

拉贝早年丧父，所以只念到初中，就出去做了学徒。因为老板的推荐，他去了一家在非洲莫桑比克的英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1908年，拉贝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一名雇员，他被派往中国工作。1911年，拉贝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后来又在上海另建一个新电讯台（一直到拉贝1938年回国，西门子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在中国，拉贝去过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因为长期在中国经商的关系，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了。



1935年，拉贝与同事在南京办公室前的合影

1931年，拉贝在中国南京定居下来。他的身份之一，是西门子的南京代表处负责人，负责经销通信器材、防空报警系统、电话系统、交通材料等，兼任商人协会会长、校长等职。

同时，他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副部长。

没错，拉贝是一名纳粹党员。

拉贝在南京的家，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那是一幢带院子的独立小楼，也是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办公地。

拉贝当时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小粉桥1号”这栋小楼连同院子，会在六年后成为中国难民心目中最安全的天堂。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陷落。

在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罕见的兽行，在南京这座古都的各个角落里每时每刻发生着。那个以文明和自律而自豪、尊崇所谓“武士道”精神的军队，上至军官，下到士兵，如同地狱里爬出的万千恶鬼，用突破人类想象力和耻辱度的残暴行为，不断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

当然也震惊了约翰·拉贝。

在小粉桥1号那栋小楼里，愤怒的拉贝开始将自己在南京城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

1937年12月14日

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937年12月16日

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937年12月22日

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937年12月24日

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938年1月1日

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

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翻开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的日记，有很多是写给日军指挥官和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信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枪毙”“砍头”“强奸”这些名词几乎充斥了每一页。

但是，日本人又怎会听得进拉贝的意见？表示一声“非常遗憾”，已经是最礼貌的回应了。

拉贝明白，不能只是写日记。

4

首先，拉贝把自己那栋小楼，变成了一个难民收容所。

一开始，只是拉贝家附近的邻居躲了进来，再后来，“躲进拉贝家就没事了”这一消息开始迅速传开，四周的难民开始向拉贝家聚集——只要能有一丁点地方空余，拉贝来者不拒。

最终，拉贝家那不大的院子里，一共收纳了600多名中国难民。那时正值寒冬，拉贝在院子里给他们搭了芦苇棚，铺了稻草。据当年住在拉贝家院子里的丁永庆老人回忆，天冷后地上潮湿，拉贝给难民们每人都发萝卜根，让他们煮着吃祛湿。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拉贝努力给院子里所有的难民每天一人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

“我知道很少，但我已经尽力了。”拉贝对他们说。

每一个在拉贝家院子里出生的中国新生儿，都会得到拉贝的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不少中国父母就把男孩取名叫“拉贝”，女孩取名叫“朵拉”（拉贝的妻子的名字）。

1938年的新年，拉贝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个人的性命。”

而对于难民们来说，能住进拉贝家的院子，不仅仅代表着可以满足温饱，保全家庭，更重要的是能够保住性命和免遭羞辱。

幸存者汤英至今都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晚上，拉贝正

好外出，有三个日本士兵从拉贝家院子的围墙外翻了进来，寻找“花姑娘”。当日本兵用刺刀顶着一个中国女子要推出围墙的时候，拉贝正好回家。“喇叭先生回来了！”所有的难民齐声大喊——他们一直把“拉贝”喊成“喇叭”。拉贝像一头怒不可遏的狮子一样冲了进来，对着日本士兵用英语大吼，叫他们滚出去。日本士兵看着拉贝手臂上的纳粹标志，尴尬地想从大门走出去。但拉贝坚决不允许——他要求日本兵从什么地方爬进来，就从什么地方爬出去。日本士兵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丢脸，坚持要从大门走出去，于是拉贝大声吼叫着，拔出了手枪。三名日本士兵只能乖乖地从围墙上爬了出去。

日本兵翻围墙的事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拉贝让难民们组成巡逻队，一发现有日本人翻墙进来就吹哨子，然后他就奔过来驱赶。每一次，拉贝都不允许日本兵从大门走出去，必须翻墙回去。

随着投奔拉贝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也越发意识到自己这栋小楼对保护难民的重要意义。

在拉贝家的院子里，有一面很大的旗帜，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单做的。当初放这面旗帜是为了让日本飞机看到不要投下炸弹，后来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后能够“绕道而行”，放过里面的难民。

那是一面纳粹的党旗。

5

但拉贝知道，自己的使命不只是要保护院子里的600多名中国难民。

早在南京保卫战开打之前，拉贝就和南京城内20多名外国人，谋划成立“中立区”，保护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大批难民。

在日军攻城前，拉贝的公司、同事包括日本大使馆的官员，都劝拉贝快点离开南京，但拉贝不肯。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而他拒绝离开的原因，还因为他又多了一个头衔：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一开始，拉贝和他的外国同事担心的，其实是中国溃败的军队会带来很多麻烦，在他们看来，“一旦日军接管南京，一切就将变得安全有序”。



南京国际安全区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左三站立者为拉贝

12月15日，拉贝还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宁海路的米铺于12月15日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搜查，他们买走3袋米（3.75担），只支付了5元钱。米市的现行价是每担9元，这样，日本军队共欠国际委员会28.75元。”

在经历了这个日子之后的6周，拉贝如果回看自己当初写的这篇日记，估计也会对自己当初对日本人的期待而感到幼稚可笑。虽然成立了安全区，但在已经失去人性的日本军队面前，拉贝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位于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大学，三天两头被开着卡车前来的日本士兵侵入，他们抓女老师，抓女学生，抓一切女性，有时甚至在现场就对她们实施强奸。哪怕是在安全区内的民宅和商店，日军士兵也是说进就进，说抢就抢，有人反抗，说杀就杀。

有一次，拉贝答应1000多名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入安全区，他以为《国际法》会有效，就通报了日方，说中国有一部分士兵已经放

下了武器，应该得到“战俘”的待遇。结果日军表面答应，随后冲进安全区，当着拉贝的面绑走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随后拖出去全部枪杀。

无奈之下，拉贝一度只能穿上德国军装，戴上纳粹袖章，然后凭借个人的力量在安全区的街头游走，帮助一切可以帮助的中国人。

据幸存者李世珍回忆：“有一个家族里的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

无论如何，安全区的设立，毕竟给当时人间地狱一般的南京保留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拉贝四处奔走，利用纳粹党的身份和多重政治力量向日本方面施压，最终迫使日军打开封锁，允许安全区能运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在拉贝后来写给希特勒的报告中，他这样说：“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我的袖章。”

6

1938年2月，应西门子公司的要求，拉贝还是要回国了。拉贝回国的时候，还将一个中国飞行员乔装成佣人，转道上海送到香港。

而拉贝回国有自己更重要的目的：他想拯救更多的中国人。

回到柏林后没多久，拉贝就开始给希特勒写信，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并在德国放映他拍摄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一些电影胶片和展出照片。

拉贝很快等到了结果——盖世太保登门找到了他，没收了他的纪录片胶卷。

在盖世太保的“教育”下，拉贝只能写信给希特勒做出保证：“我将谨遵此项规定（指不得做报告、出书、放映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坚定地追随和忠实于您！”

原本期待希特勒能对日本做出干预的拉贝，开始被迫陷入了沉默。

但等待他的厄运还没有结束。

1945年，德国战败，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拉贝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甚至被投入了监狱。

1946年，在证实拉贝完全没有参与纳粹的作恶后，同盟国法庭宣布他无罪释放。但是，那个时候西门子公司已经同拉贝解约了（应该和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有关），64岁的拉贝开始衣食无着，生活拮据。

拉贝开始当一个拆卸搬运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生活艰辛。因为缺钱，他甚至开始典卖从中国带回来的瓷器。

7

中国人没有忘记拉贝。曾经被拉贝庇护过的中国难民都站出来为拉贝说话。一位叫伍正禧的人说的话代表了大家的观点：“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星。”

1948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一些南京市民，开始每月给拉贝寄钱和食物，南京国民政府甚至承诺：只要拉贝肯来南京，政府将终身为他提供住房和养老金。拉贝曾回过两封信，表示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得以重新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

但没多久，1950年1月的一个晚上，因为中风，拉贝与世长辞。

拉贝的身后事，也让人感到有些凄凉。拉贝的墓地位于柏林威廉皇帝纪念堂墓地。1985年，由于墓地租用到期，无人续租，管理部门便拆除了拉贝的墓碑。中国方面曾与柏林市政府多次沟通，希望柏林能将拉贝墓地列为历史名人墓地予以免费长期保留，但被婉言拒绝。



南京的拉贝故居

2005年，一群中国留学生自发捐赠，为拉贝塑了一座雕像。后来，拉贝的长孙托马斯·拉贝与中国驻德大使馆联系，希望能在拉贝墓地的原址重修墓碑。为此，南京市政府特批105万元作为专项资金，用于40年墓地租赁和墓碑的制作及运输费用。

2013年12月11日，在柏林西郊，拉贝墓地的落成典礼举行。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在典礼上表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共同缅怀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恩人，是为了共同回忆那场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的空前劫难，是为了共同纪念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捍卫人类尊严和赢得世界和平团结奋战的历史壮举。"

在1937年的南京，拉贝家院子里的中国难民，称他们的恩人为"活菩萨"。而拉贝可能更喜欢后人给他的另一个称号：中国的辛德勒。

馒头说

毫无疑问，拉贝是伟大的。

但同时，他也是矛盾的。矛盾的根源，在于他的纳粹身份。

按照埃尔温·维克特所著的《约翰·拉贝——南京的德国好人》一书中的说法，拉贝在1934年为了在南京给西门子员工的孩子建一所德语学校，为争取经费才加入了德国工人党（即纳粹的前身），但事后的各种

信件表明，他对希特勒还是忠心耿耿的——当然，当时德国像拉贝那样被蛊惑的人成千上万。

但同时，他在1937年南京城中的所作所为，却一点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纳粹。和拉贝一起在安全区工作的美国医生威尔逊甚至感慨："因为拉贝，我居然开始对纳粹有点好感了！"

但也正是因为纳粹的身份，拉贝饱受折磨：一方面，他必须忠于自己的党员身份，将对南京大屠杀的愤怒压抑进心底；而另一方面，在战后清算时，他又因为曾经的纳粹身份而受到牵连。

1946年，宋美龄邀请拉贝出席远东军事法庭，以证人的身份为南京大屠杀作证，考虑再三，拉贝还是拒绝了。

那一刻，拉贝应该是痛苦的：自己希望世人得知的丑恶行径终于得到曝光，但因为党员的身份和对所谓"元首"的承诺，他却不能甚至不愿成为证人。

好在，《拉贝日记》还是完好无损地被他保存了下来。经后人公布，那些翔实客观的记录，成为控诉日本人在南京暴行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这个关于拉贝的故事，感人却又耐人寻味——原本象征邪恶的纳粹党旗，却一度成了无数中国人的庇护，而拉贝一边行着纳粹礼，喊着"嗨！希特勒"，一边救下一个又一个即将遭受屠杀的中国人。

但事实上，也不用如此纠结。无论拉贝是不是纳粹党，无论他内心是否真的认同纳粹的理念，但在1937年，在南京，在那一个个真实的时刻，拉贝放下的是头衔和身份，遵从的是自己的内心——一个善良人的内心。

在南京那段让人不忍回忆的日子里，拉贝和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一样，展现的是普通却又伟大的情怀，展现的是人类面对残忍和血腥而被激起的善良和抵抗之心——在拉贝的身后，还有魏特林、辛德贝格、鲍恩典……还有后来悔过的，当时日本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上等兵东史郎。这些人用文字、口述、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禽兽军团的那些恶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感恩，与身份无关。

铭记，与宽恕无关。

猎杀山本五十六

不少人都认为，当“二战”中日本自不量力地去招惹美国的时候，军部中其实是有一批清醒的人的，他们认为日本这么做是自取灭亡。但是，这批人是真的热爱和平吗？是真的希望结束战争吗？

1

1943年4月18日上午，9点35分。

西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上空，忽然出现了两架“一”式陆攻机，以及呈拱卫态势的6架“零”式战斗机。看这群飞机的态势，是在寻找机场准备降落。

而就在此时，云层中忽然出现了8架美式的P–38“闪电”式战斗机。

在这个空域，美军飞机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一瞬间，6架“零”式战斗机迅速爬升，勇猛地冲向了8架美军战机。

而这时候，下面的云层中忽然又钻出了4架P–38“闪电”式战斗机——它们并没有向“零”式战机扑去，而是开始向那两架“一”式陆攻机俯冲。

这4架“埋伏”的美军战斗机，显然就是冲着那两架陆攻机去的。

6架“零”式战斗机发现另外4架美机后，顿时队形散乱，其中有3架完全不顾会被美机击落的危险，不要命般地掉转机头，向那4架P–38“闪电”式战斗机扑去。

电光石火之间，已经晚了。

虽然其中一架舷号为“T1–323”的日本陆攻机迅速拉低飞行高度，贴着岛上的树林飞行，但还是被紧紧咬住它的P–38“闪电”式战斗机机关炮轻易击中，起火，随后坠落在丛林深处。

从日本“零”式战斗机拼死保护的架势来看，陆攻机上面，肯定坐着

大人物。

只是除了美日双方的一些特定人员外，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当时坐在飞机上的，居然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没错，就是那个一手策划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

2

山本五十六出生于1884年4月4日，是新潟县长冈市一个武士家庭的第六个儿子。他的父亲高野贞吉在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已经56岁了，所以就任性地给他取名为“高野五十六”——“山本”是这个儿子父母双亡后，因为母亲家没有子嗣，在29岁时继任的娘家的姓。

山本出身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武士家庭，他父亲的一言一行，对他的性格养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山本五十六10岁那年的“元服”仪式（日本男子的成人礼），父亲用武士刀划伤他的双腿12次。



1893年，9岁的高野五十六（中）与五哥高野季八（左）和大他18岁的姐姐高野（高桥）嘉寿子（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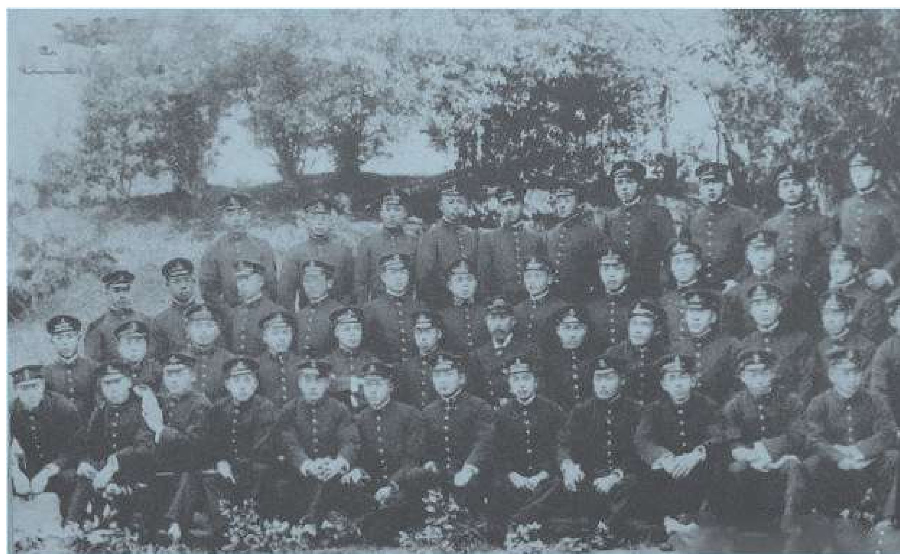
武士家庭出身的山本五十六，“从军”肯定是第一志愿，只是他没有进陆军学校，进的是海军学校。

1901年，17岁的山本五十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江田岛海军学校。

三年后毕业，以少尉军衔上了“日进”号装甲巡洋舰，参与了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

在那场奠定日本海军所谓“荣光”的日俄“对马海战”中，山本五十六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被炸飞，从此留下了一个“八毛钱”的绰号——日本的艺伎会给客人剪指甲，一个指头收费1毛钱。一般人需要付1元，而山本只需要付8毛。没错，就是因为山本五十六经常出没于烟花柳巷，才会让这个绰号在日本海军中传开。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山本五十六后来有过好几段重要的留洋经历，他很可能就走上了和很多其他日本海军军官差不多的轨迹：平时严格训练，闲时狎妓取乐，以身为大日本帝国的海军为荣，但同时也未必知道海军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



1901年11月至1904年11月，山本五十六（二排左六）在江田岛海军学校学习，这是与同学和教官的合影

山本五十六与别人不同的第一个特点，是他开过眼界。

1919年，35岁的山本五十六被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这段留美的经历，包括后来他在美国做日本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的三年，都给山本五十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社会地位方面，美国女性居然也可以读大学；富足程度方面，美国的白砂糖居然不是配给制，可以随便买；工业化程度方面——这是给山本印象最深刻的——从汽车工厂到炼钢厂，从矿山到油田，他深刻领教了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段留美的经历，就没有后来的偷袭珍珠港。因为一般人被震撼，也就震撼了，但山本肯动脑子。

3

肯动脑子，是山本五十六的第二个特点。

当时野心勃勃的日本海军，正受到《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束缚。当时的海军依旧是战列舰称霸大洋的时代，各国战列舰的主炮口径和船的吨位都越造越大，使得建造和维护成本到了大家都难以承受的地步。

为此，1922年在美国华盛顿会议上，当时的世界海军五强——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共同约定：大家造的主炮口径都不能超过16英寸（约合40.64厘米），战列舰吨位不能超过35000吨，而且英、美、日、法、意五国舰队的主力舰（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建造数量比例为10：10：6：3.5：3.5。

就像现在核强国约好大家等比例削减战略核武器一样，当时日本的海军被牢牢框死在“6”上。

别人被框死也就框死了，但当时已经官至海军大校的山本五十六，把眼睛瞄上了海军航空兵——你们没有限制我们发展空军啊。

虽然山本五十六一直是强硬的“舰队派”，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当时全世界第一批注意到飞机在现代海战中作用的人。为此，他还把自己的炮术专业改成了航空兵专业，并在日本的霞浦航空队做教官兼副队长——当时已经40岁的他以身作则，自己每天都做飞行训练，而且水平很高，整个霞浦航空队的战术水平一下子就被提了上来。

1929年，45岁的山本五十六已经升到了少将军衔，并且以海军第一航空队司令官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英国和美国再一次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军五强的战列舰吨位做出限制。

当意大利还在抱怨英国和美国不想让自己发展战列舰的时候，山本五十六已经暗地里向德国购买制造俯冲轰炸机的技术，并且给当时的海军次长末次信正提出明确建议：“被迫接受劣势比例的帝国海军，在同优势的美国海军作战一开始，就只能以空袭的方式给敌人一记痛击。”

到了1934年，第二次伦敦海军军备会议召开预备会议的时候，50岁的山本五十六已经成为海军中将，并成了日方的全权代表。在那场预备会议上，山本态度强硬地宣布日本退出《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

日本可以放手造战列舰了，但山本五十六把重点放在打造航母和海军航空兵上。

这个时候，通过“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整个日本已经被军国主义绑上了正在越开越快的战车，但身为军国主义中坚力量的山本五十六，却被安上了一个“卖国贼”的称号。

为什么？因为山本五十六是当时日本国内少数几个反对向英美开战，并且反对加入轴心国联盟（因为会激怒英美）的高级军官。所以，国内少壮派军人对山本五十六非常不满，甚至扬言要刺杀他——以“二二六兵变”的经验来看，这倒绝非不可能。

为此，当时支持山本的海相米内光政在卸任前，任命山本五十六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兼第一舰队司令官。这个任命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山本五十六到舰上去办公——如果他留在陆地上，很有可能真的就被人刺杀了。

那么，真的是山本五十六爱好和平，才不愿意和英美开战吗？

当然不是。从理念上说，山本五十六和那些希望捍卫天皇，建立不朽帝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没有任何区别，有区别的是山本更会用点脑子，而不是无谓的狂热——他去过美国，而且了解美国。他知道以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日本和它开战无疑是以卵击石。

那么他真的就会放弃吗？当然也不是。

1940年3月，日本联合舰队进行春季演习。当时由小泽治三郎少将（后来成为最后一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率领的两艘航母，以大规模飞机突袭的方式，一举摧毁了山本五十六指挥的两艘战列舰和一艘重型航母组成的舰队。

当同僚都在指责小泽少将不按规矩打仗时，山本五十六却立刻转身问身边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能不能出动飞机，去轰炸夏威夷？”

于是就要说到山本五十六的第三个特点了：好赌。

山本五十六赌性之大，在日本军界可谓少有。从桥牌到扑克，从麻将到骰子，只要能赌的东西，哪怕是赌明天下不下雨，他都乐此不疲。而且他和谁都赌，和同事、幕僚、下属，连艺伎他也不放过。

不仅好赌，山本还赌得认真。1910年的时候，他曾和同事因为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而下了一个非常大的赌注，结果他输了，同事笑笑说不要了，但他坚持要“愿赌服输”，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扣下赌资付给同事，坚持了十几年。

那山本的赌技如何？不仅不差，还非常好。

他曾有一段时间出使欧洲，在那里他每天必去摩纳哥的赌场。因为一直赢钱，以至赌场老板挂出“免战牌”——禁止山本五十六入内。据说他自己也曾放言：“如果天皇陛下给我一年时间专心去赌博，我能为帝国赢来一艘航空母舰！”

所以，1941年1月7日，当山本五十六正式提出“偷袭珍珠港”的设想时，应该是不出人意料的——论刺激，还有什么能比把两个国家的国运放到广袤的太平洋上去豪赌一把更刺激？

但当时，日本军界从上到下，还是被山本五十六这个惊人的计划给吓傻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跨越3500海里去偷袭强大的美国的海军基地，成功不成功且不说，怎么能保证中途不被人发现？

但山本五十六用自己的理论说服了大家：“我军在日美战争中首先应该采取的策略是：一开战就猛击敌主力舰队，置美国海军及美国国民于无可挽救之地，使其士气沮丧。从而才能占据东亚之要障，确保不败之地步，以此来建设东亚共荣圈……一旦击破美主力舰队，菲律宾以南的闲杂兵力必然士气沮丧，很难继续勇敢战斗。”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是肯定打不过美国的，既然你们一定要打，那只能上来就偷袭。先打闷人家，趁机拿到我们想要的最大利益，再逼人家坐下来谈判，最终确保我们的利益。

对于当时已经被美国的“禁运”紧紧掐住咽喉痛苦万分的日本而言，

如果要“南进”，那么除了山本五十六的办法之外，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那么万一失败怎么办？

山本五十六的回答是：“如果日本有天佑，夏威夷作战肯定成功，如果中途失败，也就是说没有了天佑这一条，那么放弃整个作战就行了。”

一副标准的赌徒相。

为了能实现“偷袭珍珠港”计划，山本五十六不惜以辞职要挟。最终，当时的军令部总长山永野修身大将拍了板：“如果山本有这样的自信，就照他说的去做吧！”

1941年12月7日清晨，以6艘航母领衔的日本特混舰队，跨越3500海里，如幽灵一般出现在了美国珍珠港附近的海域。



1941年9月，山本五十六开始制订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作为一个赌徒，山本五十六一生中最大的“荣光时刻”到来了。

5

众所周知，山本五十六因“偷袭珍珠港”一战成名。但恐怕山本自己也很清楚，经此一役，日本被彻底拉进了太平洋战争的泥沼。

在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代价成功偷袭珍珠港之后，山本五十六麾下的海军配合陆军，横扫东南亚，美英军队望风而溃。就好比一个坐在牌桌前的赌徒，山本五十六现在面临一个赌徒必须面对的问题：筹码已经赢了一大把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当时春风得意的日本军部开始有几种不同的声音：进攻印度，进攻澳大利亚，进攻夏威夷甚至进攻美国。

但所有的意见其实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日本的陆军主力都被拖在中国战场，哪还有什么余力去进攻这里进攻那里？



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山本五十六与同僚在“赤城”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合影

山本五十六的想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的意见是哪里都不进攻，而是进攻残存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一举歼灭。

但是，山本真的当美国太平洋舰队是泥捏的吗？

1942年5月4日，为了增援莫尔兹比港的日军，日本联合舰队的航母编队在珊瑚海遭遇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编队，双方爆发了一场遭遇战，史称“珊瑚海海战”。

“珊瑚海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母编队之间的战争——双方的舰队基本都没有看到对方，全是靠大批舰载机对敌方进行攻击。从这一点上看，确实是印证了山本五十六当初对现代海战的预判。

这场海战的战果，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美国重型航母“列克星敦”号被击沉，“约克城”号被重创，一艘驱逐舰沉没，一艘油船沉没，66架飞机被击毁，543人阵亡。但美军阻止了日军增援莫尔兹比港的行动。

日本轻型航母“祥凤”号被击沉，重型航母“翔鹤”号受损，一艘驱逐舰沉没，77架飞机被击毁，1074人阵亡。增援莫尔兹比港的行动被迫中止。



珊瑚海海战中被击沉的美国航母“列克星敦”号

经此一役，山本五十六内心的忧虑更加重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依然在。这也让他更急迫地寻找机会想和美国海军的主力进行一场“一了百了”的大决战。

1942年6月4日，在太平洋上的中途岛，山本五十六盼来了他渴望已久的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战的机会——但决战的结果，绝不是他想要的。

在这场被称为“太平洋战争的逆转点”的战役中，美国只损失了一艘本来就已经受损的“约克城”号航母，另有147架飞机被击毁，307人死亡。而日本联合舰队4艘主力航母被击沉，还赔上了一艘重巡洋舰和332架作战飞机（其中近300架被击毁在航母甲板上）、3500条精英作战人员的生命。

中途岛海战的失利，让作为总指挥的山本五十六身上的光环开始消退（虽然后来也有很多人把责任归结到在一线指挥的南云忠一中将身上）。有人已经开始评论，说山本五十六其实只是一个海军技术官僚，作为海军舰队司令的经验未必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丰富。但对外，由于日本国内的宣传机器充分开动，将中途岛之战渲染成了大日本帝国海军的一次大获全胜，所以对于日本国内民众而言，山本五十六依然是光芒耀眼的“海军之花”。

对日本人不利的消息开始慢慢多了起来，尤其是到了1943年2月，经过半年惨烈血腥的拉锯，日军终于无奈地向美军交出了战略要冲瓜岛瓜达尔卡纳尔岛，这显然标志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转守为攻了。

作为一个赌徒，只要手里还有哪怕一枚筹码，就绝对不可能认输。

更何况，山本五十六手里的联合舰队虽然实力大损，但毕竟还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山本五十六认为，只要及时调整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防御线，还是能和美国周旋上一段时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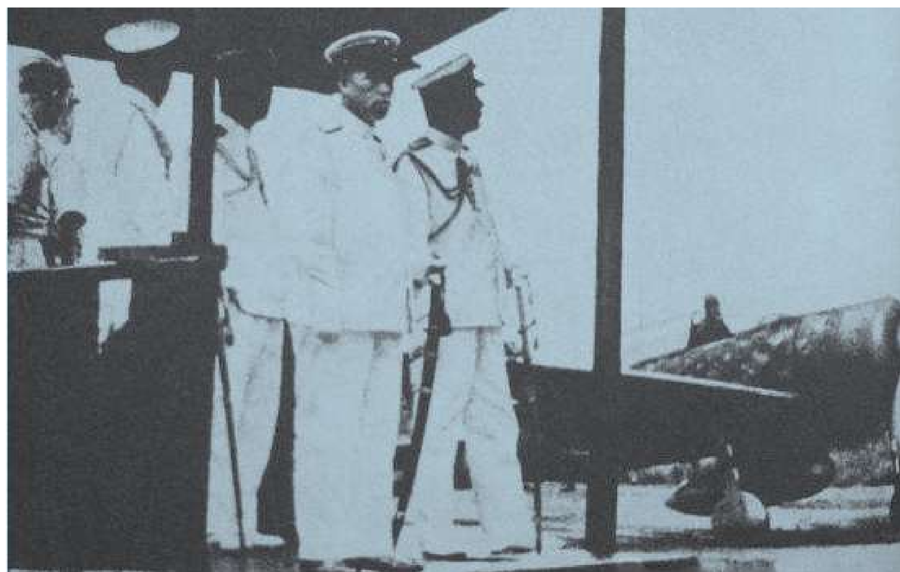
但首先，他觉得要鼓舞大日本帝国官兵的士气。

1943年4月7日清晨，在斯麦群岛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机场，正准备出击去轰炸驻瓜岛美军的日本海军航空兵们，忽然惊喜地看到了自己的最高长官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穿着干净笔挺的白色海军服，向他的士兵们挥手示意，为他们加油打气。

而这只是山本五十六“鼓舞计划”中的一步，接下来，他还打算去布干维尔岛、布因和肯特兰群岛，为驻守在那里的日军打气。

山本五十六肯定不会知道，这是他为自己规划的一条“死亡之路”。



1943年4月11日，山本五十六在拉包尔基地指挥台目送日军轰炸机起飞，此时离他殒命还有一

6

山本五十六亲自拟定的出行计划一出台，他的下属就认为自己的长官发疯了。

按照山本的计划，他将从拉包尔出发，飞行一个半小时左右，到达布干维尔岛，然后再飞行15分钟左右，到达布因。之后从布因出发飞行5分钟左右，到达肖特兰群岛。

部下们劝阻山本千万别这么走，因为肖特兰岛离瓜岛非常近，驻扎在瓜岛的美国战斗机转眼间就能飞过来实施袭击。但山本五十六坚持自己的意见——司令长官越是到危险的地方去，就越是能激励下属们的士气。

山本的副官渡边负责把山本的出行计划告诉即将被视察的部队。按照渡边的本意，是派人亲自送过去，但负责通信的军官认为没必要，发送电报就可以了。渡边认为发送电报很可能被美军截获，但通信官向他拍了胸脯：这套新版的ZN25密码4月1日才刚刚启用，美国人怎么可能破译？

于是，山本的出行计划通过电文很快传到了驻守肖特兰岛的日军司令官城岛高次手中。城岛拿到电文后大惊失色，立刻亲自飞到拉包尔去劝阻山本五十六："您的行程用那么长的电文那么详细地发出来，太危险了！"

而山本五十六依旧坚持，他让城岛回去，准备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晚餐。

城岛高次无奈地踏上返程，而就在他回去后不久，正如他担心的那样——美军已经破译了日军的电报。

事实上，美军破译山本出行的电报，前后没有超过5个小时。因为就在之前不久，美军俘获了日军的一艘潜艇，查到了日本的JN25密码本——根据这套密码本，很容易推断出ZN25密码的规律。

电报的译文很快就传到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的手里。

对于美军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劫杀机会，但当时尼米兹还是有一点犹豫的。因为涉及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因素，一般而言，西方世界里有“不能暗杀敌国君主或统帅”的惯例。

但是，美国人对山本五十六又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如果不是他，就不会有珍珠港那几千名美军士兵的冤魂。为此，尼米兹把情况上报给了美国总统罗斯福。

罗斯福为此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的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很快就通报给了尼米兹：

不惜一切代价，击毙山本五十六。

接到命令后的尼米兹上将，果然将猎杀山本五十六的任务交给了驻扎在瓜岛的美国航空部队。

瓜岛方面连夜拟订了计划，决定用续航里程在3700公里，且战斗性能绝不输日本“零”式战机的P–38“闪电”式战斗机来完成这个任务。经过测算，美国人将猎杀区域锁定在山本座机降落在布干维尔岛机场前10分钟左右的空域，时间大概是4月18日上午9点35分。



P-38“闪电”式战斗机

但是，有一点却难住了美国人：空中猎杀对空域的把握、飞机的速

度、抵达的时间都有严格的要求，不然很可能在电光石火之间就错过了机会。

不过，美国人还是决定实施这个猎杀计划，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山本五十六的一个特点：

这个人性格虽然不羁，但非常守时。

7

果然，4月18日上午9点35分，山本的座机编队如约而至。

当时的美军战斗机分为两组，一组是掩护组，埋伏在6000米高空，负责引诱护航的6架日本“零”式飞机离开山本的座机，另一组为猎杀组，埋伏在3500米高空，专门负责袭击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美军并不知道山本五十六坐在哪架“一”式陆攻机中，但他们看到一架被打得坠入布干维尔岛的丛林，一架被打得坠海，认为任务肯定已经完成，于是就撤离了战场。

从山本五十六的座机编队出现到被击落，全程一共只有3分钟。

而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正是坠入丛林的那一架。

飞机坠毁后，驻守在布干维尔岛上的日军立刻派出了搜索队。在丛林中寻找了很久之后，一个日军士兵忽然闻到了汽油味。于是，他们在一片烧焦的丛林深处，发现了一架摔得粉碎的“一”式陆攻机。

几具尸体四处散落，但只有一具依旧在座位上保持着笔挺的坐姿，头发花白，头微微前倾，仿佛在思考。他手上戴着白手套，左手拄着军刀，胸前佩有绶带，肩章嵌着三枚金质樱花——他就是山本五十六。

据搜救队的日军中尉宾砂回忆：山本五十六被发现时，身上有两处枪伤：一发子弹自身后穿透他的左肩，另一发子弹从他的下颌左后方射入，从右眼上方穿出。

换句话说，山本在坠机之前，其实已经死了。

而山本五十六临终前的坐姿，是日本士兵摆放的，因为他们要维持自己心目中“军神”最后的尊严。

山本五十六被美军埋伏击毙的消息，让日本当局大为震惊，立刻严密封锁了消息。美国人通过电报破译，知道山本五十六已经死了，但他们为了不让日本人发现自己已经破译电报，所以也一直装傻。

1943年5月21日，日本的新闻媒体终于公布了山本五十六的死讯，举国震惊。

日本当局追授了山本五十六海军元帅的勋位，并为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国葬，举国哀悼。

但对于山本五十六本人而言，没活到最后亲眼看见“联合舰队”的覆灭，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馒头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据说当时的山本五十六得到消息后，对自己的知心朋友武井大助说：“陆军中的这些浑蛋，果然挑起了战火，简直把人气疯了。我从此戒烟，直到这次事件结束为止！”

山本五十六喜欢抽烟是在日本海军中有名的，他是认真的吗？

看上去似乎是真的。

山本的另一位好友，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回国后，给山本带来了一些名牌的雪茄，山本当时就拒绝了：“请你替我保管吧，等这次事件过后，我一定抽。这帮浑蛋根本不懂得战争，他们只是想过过战争瘾而已。”

那么，山本五十六真的是对中国人民满怀感情吗？

当然不是！他是觉得陆军中的那些蠢蛋先进攻中国，破坏了他优先对付英美的大计而已。

就像他当初反对与英美开战，不是爱好和平，而是觉得还没有把握一样，他不是不想侵略中国，而是怕中国战场拖住日本的后腿。

直到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展超乎想象，山本五十六才变得积极起来。在淞沪会战中，他指挥日本的海军频频出动舰载轰炸机轰炸中国的军事设施和平民目标。可以说，后来日本海军航空兵偷袭珍珠港的实战经验，很多都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血肉之上的。

进攻上海的时候，曾经立誓的山本五十六，早就开始恢复吸烟了。

所以，千万不要被“二战”中日本那些“不扩大派”蒙蔽了双眼。他们不是爱好和平，而是在等待时机，让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一举最大化——通过侵占别人的国土，掠夺别人的财富。他们和那些最狂热、最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当太平洋战争趋向对日本不利的时候，山本五十六曾不无担忧地对人说：“战争结束后，我不是被送上断头台，就是被送往圣赫勒拿岛。”

圣赫勒拿岛，是拿破仑被流放的地方。

对不起啊，山本君，你还是想得太美了。

丘吉尔的另一面

关于丘吉尔的各种传记和评价汗牛充栋，用一篇文章肯定不可能说尽。

1

每年的12月10日，是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

1953年颁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轰动——获得这个全世界作家都梦寐以求的奖项的人，居然是温斯顿·丘吉尔——大英帝国的在任首相。

这个奖，让颁奖机构瑞典文学院打破了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比如，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从没有颁发给过一个国家在任的政治领导人，但这次破例了。

又比如，诺贝尔奖在揭晓之前，一切都是保密的。但瑞典文学院事先通过渠道咨询了丘吉尔，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项——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丘吉尔获奖的作品是《不需要的战争》（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在1953年获奖之前，丘吉尔其实已经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不过，当初许诺一定会来现场领奖并表达感谢的丘吉尔，因为在百慕大参加一次国际会议而没有到场，代他领奖的是他的女儿。

即便如此，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还是给予了丘吉尔超出规格的评语：“他是具有西塞罗文采的恺撒大帝。”

丘吉尔是唯一一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领袖。不过，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领一个文学家的奖项，只是他“多面”特征中的表现之一。

我们先从一些展现丘吉尔“多面”的小细节入手。

在《至暗时刻》这部电影中，丘吉尔的表现有时显得有些粗鲁，比如对新来的女秘书大吼大骂，光着身子就从浴室里走出来（他是唯一一个在美国白宫曾裸体面对美国总统的人——丘吉尔辩称他当时从浴室出来见到罗斯福时裹了一条浴巾）。

但事实上，丘吉尔出身贵族家庭，受的是非常完善的教育。

丘吉尔的祖上是公爵，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是勋爵，曾担任过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一位富家女，因为丘吉尔的外公是纳德·杰罗姆，美国著名的大富翁，他是纽约音乐学院的创建者，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的股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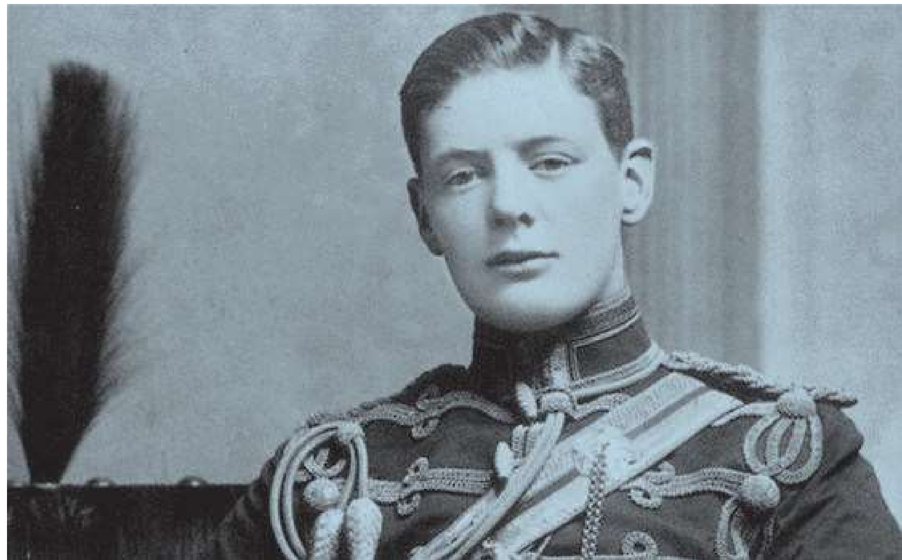
所以，丘吉尔青少年时期就读的学校是英国的哈罗公学——不亚于伊顿公学的英国著名私立学校。

当然，丘吉尔并没有在这所著名的私立学校中表现出一位贵族子弟的应有水准，比如他的数学，每次只考十几分，甚至只有几分。后来丘吉尔去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该校与西点军校等并称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考了三次才考进，让他父亲感觉颜面尽失——丢了家族的脸。

丘吉尔体现出的“多面性”还包括颜值。

在《至暗时刻》中，丘吉尔肥胖、臃肿、口齿不清，有时讲话甚至嘴角边会泛白沫，但那时他毕竟已经66岁了，谁又能想到，年轻时候的丘吉尔，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进入中老年后，丘吉尔的颜值出现了断崖式下滑呢？这和他的生活方式有点关系。



年轻时的丘吉尔

丘吉尔有晚起的习惯，尤其是在“二战”期间，他一般要到中午才起床——因为他喜欢在床上办公。

他嗜酒如命，每天要饮用包括威士忌、白兰地、香槟在内的各种酒精饮料。1931年，丘吉尔在美国遭遇了一次严重车祸（他当时忘了美国和英国不一样，车是靠右行驶的），住院期间，他想尽办法让医生把报告写成：“丘吉尔因为有严重脑震荡，需要饮用烈性酒，尤其是在用餐时。”

他酷爱抽雪茄，烟不离手。有一个没有得到过证实的说法是，他一生抽掉了大约3000公斤的雪茄烟。丘吉尔曾命人专门为他制作了一种特制氧气面罩，前面开了一个洞，方便他在坐飞机时的高空非增压状态下，依旧可以抽雪茄。

但是，作为这些生活方式的一个“对立面”——丘吉尔活了91岁。



丘吉尔和他著名的“V”字形手势

3

丘吉尔的“多面”，当然不仅限于这些生活的小细节。

说说丘吉尔的“坚持”。

丘吉尔以“二战”初期坚决反对前任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而闻名，可以说，他对胜利的渴望和坚持，是英国在整个“二战”期间坚持不屈的最重要动力。

但是，为何当时以张伯伦为代表的“议和派”在英国拥有如此广泛的市场和支持？因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确实被打怕了，惨重的伤亡让很多英国人都不愿意再一次卷入战争。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伤亡惨重的战役中，丘吉尔也要认领属于他的那一份责任——加里波利之战。



加里波利之战是“一战”中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

1914年末，在西欧战场陷入僵持的时候，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凭借英国海军的强大实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然后在加里波利登陆，直取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

应该说，这个战略虽然大胆，但不失可行性。可惜的是，这个作战计划从一开始执行，就是一团乱麻。

英国赖以为豪的皇家海军一开始就出战不利，一上来先被土耳其人埋的水雷干掉了6艘战列舰。在这样的背景下，丘吉尔却毫不退缩，强硬地继续驱动陆军强行登陆，结果遭到了土耳其优势兵力和优势火力的强力阻击。

加里波利之战让土耳其指挥官凯末尔崭露头角，当时他只是一名上校，后来因为缔造了土耳其共和国，被称为“土耳其国父”。

这是一场“一战”中英国少有的屈辱战役：协约国最终败退，伤亡高达25万人，其中主要是英军，伤亡超过20万人。

因为这一战，负主要责任的丘吉尔在国内受到了猛烈抨击，随后丘吉尔主动辞职，以42岁的年纪，去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担任第六营营长，上前线亲自参战。

他也确实是硬气。

于是就要说到丘吉尔的军事才能。

丘吉尔到底是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很遗憾，并没有什么证据能表明他在这一方面有什么过人的才华。

在丘吉尔自己写的有关欧战的作品中，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军事观点：应该躲在战壕中消灭敌人，不要将宝贵的兵力耗费在西线的进攻战之中。

这一观点在“二战”开战之初，就被希特勒的闪电战狠狠抽了一记耳光——当法国人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被德国军队迅速甩到身后的时候，丘吉尔只能抛开自己“军事家”的执念，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为法国政府不断加油鼓劲。

事实上，在整个“二战”中，最适合丘吉尔的角色无疑就是“政治家”——对不少战役，丘吉尔只是简单地下令“不准投降”和“主动出击”。如果英国没有一个敢独立思考的蒙哥马利，以及一个“超级大腿”美国，很难想象就算有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幸运，英国军队后来的命运会怎样。

丘吉尔对蒙哥马利还是非常信任的。蒙哥马利曾对丘吉尔说：“我不喝酒，不抽烟，睡眠充足。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百的状态且捷报频传的原因。”丘吉尔回答说：“我视酒如命，很少睡觉，酷爱雪茄。这就是我保持百分之二百的状态指挥你获胜的原因。”

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另一大争议事件，是在法国投降德国后，法国海军已经宣布保持中立且德国承诺不会使用法国军舰的前提下，派英国海军封锁奥兰港，炮轰一直以来的盟友法国舰队。这次海战造成港内的法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法军死亡1200多名士兵，伤300多名。不少落入海中的法国士兵宁可被淹死，也不愿意接受英军的救援。

除了军事才能，还有其他。

从小数学成绩糟糕，长大后投资美国股市几乎血本无归的丘吉尔，在1925年至1929年期间，担任了英国的财政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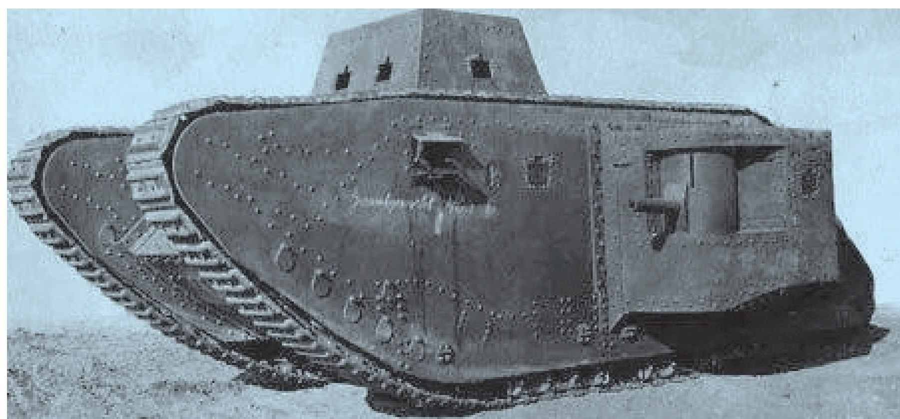
丘吉尔非常珍惜这个当“二把手”（首相之下最重要的职位）的机会，但在他任内恢复的英镑“金本位制”，却为后人诟病至今——虽然大

幅度增加了英国的财政收入，但造成了英镑升值，使得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大萧条和工人失业。

不过，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丘吉尔却也并非全都表现得一塌糊涂。

1917年，43岁的丘吉尔重返政坛，出任内阁军需大臣。正如之前所言，丘吉尔是一个固执的人，在读书时并没有对科学创造展现出什么兴趣，但他在担任军需大臣期间，却敏锐地认识到坦克和飞机在未来的现代战争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提议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当时刚刚在索姆河战役中崭露头角的坦克，据说名字就是丘吉尔起的——很多人也相信，只有担任过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才会把这种东西叫作“Tank”（大水柜）。



“一战”索姆河战役中出现的“怪兽”——坦克。丘吉尔曾不惜动用海军经费扩大坦克生产规模

5

丘吉尔是著名的“反共”人士。

1918年，俄国刚刚爆发“十月革命”后不久，国内陷入内战。在英国内阁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丘吉尔坚决主张英国干预俄国内战，将苏维埃消灭在萌芽之中。

在丘吉尔担任内政大臣期间，最反对的就是社会主义，最痛恨的就是工人罢工和游行。他处理这类事件的方法有时非常简单：对着群众架

起机枪，甚至大炮——结果他直接酿成了1911年伦敦的“塞德奈街杀戮事件”。

在私下乃至各种公开场合，丘吉尔不止一次表达出对苏联以及对斯大林个人的厌恶。但是，到了1941年6月22日这天，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1941年6月22日，德国单方面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190个师约550万兵力，大举入侵苏联——丘吉尔立刻意识到：英国不用再孤身面对德国纳粹了。

就在当天晚上，丘吉尔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的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我们将尽力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们将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样的方针，并且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推行到底。”

丘吉尔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声援苏联的人，并且没有把承诺只停留在口头上。



丘吉尔和斯大林

第二天，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对法国北部的德国军事目标实施轰炸，希望能减轻苏联的压力；一批又一批由英国情报人员破译的德军进攻苏联的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出现在斯大林的桌上；英国海军开始冒着极大风险，在北极圈航线为苏联输送物资。

在整个“二战”期间，美、苏、英三国可谓同一个战壕里的坚定战友。

但是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丘吉尔似乎连和苏联稍微延续一下“蜜月期”的想法都没有。

1946年3月5日，访美的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

这是一场震惊全世界的演说，因为丘吉尔在演说中明确指出：“不久前刚被盟国的胜利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的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

这是“二战”后，西方世界第一次有重要人物公开站出来指责战时的盟友苏联，所以对于丘吉尔的这场演讲，几乎没人记得它的题目叫作《和平砥柱》，大家都习惯用另外一个名词：“铁幕演说”。

不少史家都认为，是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揭开了苏联和西方世界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序幕。

也有人曾感兴趣：丘吉尔为何能翻脸比翻书还快？那还是因为，丘吉尔从内心里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对于当初和苏联结盟，丘吉尔自己是这样说的：“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



丘吉尔正在发表“铁幕演说”

6

当然，丘吉尔的很多行为和观点，都源于他心中一直有的一个梦想。

那就是延续“日不落帝国”永远荣光的理想。

发表“铁幕演说”固然有丘吉尔一直以来反共立场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二战”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丘吉尔知道昔日盟友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摩擦。为了能让英国在战后得以迅速重建乃至恢复昔日荣光，就必须拉拢当时的世界首强美国，共同树立一个叫“苏联”的靶子。

事实上，从青年时期开始，丘吉尔就一直对“大英帝国”有着强烈的感情，为了维护“日不落帝国”的荣光，丘吉尔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甚至牺牲盟友的利益。

比如中国。尽管丘吉尔在欧洲是“绥靖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但在亚洲，为了维护英国殖民地的利益，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丘吉尔的态度却一直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息事宁人”。

从1931年开始，面对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的种种日本侵略行径，英国总是牵头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从不给出公正的评判。1940年，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断绝对中国的援助。因为害怕影响自己在南亚

的殖民地利益，英国没有反对，立刻决定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签字的正是新任首相丘吉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染指东南亚的目的昭然若揭，而英国远东部队在日军攻击下的表现完全可以用“一溃千里”来形容，英国皇家海军的远东舰队更是全军覆没。

在缅甸甚至印度都朝不保夕的背景下，丘吉尔只能向中国求援。

在这件事上，蒋介石确实没有含糊，一声令下，10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历经数场炼狱般的战役，血洒怒江。但在整个过程中，英国表演的角色绝对称不上光彩：

在战略上，英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中国，反而处处防着中国势力进入他们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殖民地”；

在战术上，英军没有任何配合和掩护，甚至一直把中国远征军当“炮灰”使用。英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撤退，并且完全不顾及中国军队的死活。

如果说，要把英军在缅甸战场上的窝囊和背信弃义都归责于英国驻印司令韦维尔或缅甸战役指挥官哈罗德·亚历山大的话，那么真正站在背后的丘吉尔，当然难辞其咎。

不仅如此，丘吉尔在面向全世界的广播中，一直大力赞扬美国和苏联在各个战场上所起的作用，但对中国在抗日战场上的作用，甚至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对英军起到的帮助，只字不提。



1942年至1945年，先后有40万中国远征军两次赴缅抗日，艰苦卓绝

蒋介石曾对此怒斥：“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也正是因此，宋美龄在“二战”期间访问美国后，拒绝了英国发出的访问邀请。在华盛顿时，宋美龄也几次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与当时也在那里的丘吉尔会面。蒋介石对丘吉尔也一直没有好感，丘吉尔当然更藐视蒋介石，英国甚至有过暗杀计划准备将蒋介石干掉。

丘吉尔之所以这样对中国，其实还是出于他对历史上“大英帝国荣光”的执念——在他眼里，很多国家是不配与英国一起领导世界的。

面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丘吉尔是极度反感将中国列为“四大战胜国”的，他曾就此质问罗斯福“是不是脑子烧坏了”，并明确表示：“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是场绝对的滑稽剧。”

种种证据显示，丘吉尔有种族歧视的倾向。

因为甘地领导印度独立，丘吉尔非常憎恨他，把他称为“半裸的骗子”，并在甘地狱中绝食时表示：“不应该因为绝食这个小小的威胁就把

甘地放出去，如果他真饿死了，那么就少了一个坏蛋，我们的帝国也就少了一个敌人。”

1919年，他曾建议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库尔德人和阿富汗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受不了毒气，对待那些野蛮的部落，我强烈推荐使用毒气。”（后来有人解释他指的毒气是类似于催泪弹所用的毒气。）

1937年，丘吉尔曾写道：“我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美国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地方，我之所以这么觉得，因为事实上，就是一个更强的、更高一等的、更聪明、更智慧的种族，来到这些地方，取代了这些人。”

同年他还写过一篇题为《犹太人如何避免被迫害》的文章，此文在他生前没有发表。文中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受的迫害都是自找的，他们经历了许多折磨，可能他们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

罗斯福曾委婉地建议丘吉尔要从旧的殖民帝国思维中跳出来，而丘吉尔的回应是：“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但可惜的是，恰恰是在丘吉尔的任内，他目睹了“日不落帝国”彻底分崩离析的全过程（美国在背后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他再怎样努力或挣扎都是无用的，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事。

7

“二战”临近尾声时，丘吉尔还经历过他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

由于领导英国人民英勇不屈地对抗纳粹德国，丘吉尔不仅在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了极高的声誉——没有人会怀疑他将在战后连任英国首相。

英国1945年的大选，正值著名的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这场会议除公布了《波茨坦公告》，还留下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在会议前半阶段，代表英国来和斯大林与杜鲁门讨论战后世界秩序的，是丘吉尔。会开到一半，丘吉尔满怀信心地回国参加大选去了。

那本来是一个就像孙大圣说一句“俺去去就来”的场景。

但丘吉尔没有回来。因为在那场选举中，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的丘吉尔被英国人民选了下去，工党候选人艾德礼取代了他的位置。

在那场竞选中，丘吉尔在他引以为豪的演讲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竞争对手工党形容为“可能会寻求像盖世太保那样的统治方式”——这种比喻让英国民众听了非常不舒服，他们认为丘吉尔还活在“二战”中。

于是，波茨坦会议的后半段，是艾德礼代表英国来开的。



波茨坦会议前期的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



波茨坦会议后期的艾德礼、杜鲁门和斯大林

英国人民觉得，论强硬和勇气，非丘吉尔莫属，但论战后的重建与和平时期的治国理政，他们对丘吉尔缺乏信心。

对这样的结果，丘吉尔固然失落，倒也表现得很大度，他引用了希腊作家普鲁塔克那句著名的话：“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当然，在1951年，丘吉尔卷土重来，重新夺回了首相之位——没有人能让丘吉尔屈服或放弃。

但是，丘吉尔那时候已经77岁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颐养天年，但丘吉尔不这么认为。有一次，他问一名年轻人：“知道我为什么会从政吗？”年轻人诚惶诚恐地摇头。“虚荣！一切都是为了该死的虚荣心！”丘吉尔直言不讳地说。

在1955年遭遇了第二次中风之后，丘吉尔被迫让出首相之位。事实上，在他这次中风之后，英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安排他的葬礼了。按照英国女王的旨意，丘吉尔的葬礼一定要风风光光。

但谁也没想到，当时已经81岁的丘吉尔又顽强地活了十年，以至有人开玩笑：“丘吉尔一直活着，指定好给他抬棺的人却一个个死去了。”



1965年1月30日，英国为丘吉尔举行国葬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在又一次中风中溘然长逝，享年91岁——

他的父亲也是死于中风，且死于70年前的1月24日。

法国总统戴高乐得知丘吉尔的死讯之后说了一句话：“英国将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

或许，首相丘吉尔就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个目击证人。

馒头说

这并不是一篇“黑”丘吉尔的文章。只是因为大家对丘吉尔的各种英雄事迹都比较熟悉了，所以我就说说他的一些侧面。

其实，那么多的“侧面”结合起来，展现的还是丘吉尔心境最底层的性格：固执，执念，永不服输，理想主义。

这种性格，有些通过他的所言所行展现在了台前——尤其是通过“二战”这个巨大的舞台，他鲜明的性格为世人所熟知，乃至被欣赏和崇拜。

而这种性格的另一些侧面却隐藏在了台后，有些未必为人所知，就像他其实一直在努力克服自己的抑郁躁狂症一样——“心中的抑郁就像条黑狗，一咬住我，就不会放松”。

丘吉尔无疑是值得被尊敬和纪念的，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和勇气、感染和鼓舞，1940年的西欧可能早就全部笼罩在纳粹旗帜之下了。在这一点上，怎样褒扬丘吉尔都不过分。

只是，以“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要投降”为信念的丘吉尔，一生并不仅仅是在抗争希特勒，或者他所痛恨的苏联，其实也是一直在抗争现实的社会与自己心中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冲突。

在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日不落帝国”的世界版图无可避免地分崩离析，但他依旧渴望（哪怕凭借一己之力）再维持帝国的千年荣光——就像一次又一次向风车发起冲锋的唐·吉诃德。

所以，在影片《至暗时刻》中，加里·奥德曼刻画的那个丘吉尔还是挺真实的：既能慷慨激昂地演说，也会自言自语地喃喃；既会歇斯底里地怒斥，也会礼貌绅士地道谢；既会一往无前地挥拳，也会充满纠结地彷徨……

2002年，BBC（英国广播公司）发起了评选“历史上最伟大的100位英国人”的活动，结果丘吉尔超越莎士比亚、牛顿这些人，排在了第一位。

如果丘吉尔参评“世界历史上的伟人”落选，我不意外；入选，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妥。

伟人从来就不是完人，但依旧是伟人。

“偷袭珍珠港”之后……

1941年，美国夏威夷时间12月7日上午7点55分，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2点55分，整个“二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场偷袭战拉开了帷幕——偷袭珍珠港。这个事件的过程，大家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今天，我们来聊聊之后发生的一些事。

1

当“袭击成功”的消息传到山本五十六的耳中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作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很清楚，这场震惊世界的偷袭战果足以让每一个日本人都惊喜若狂：

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8艘主力战列舰中有4艘被炸沉，4艘被重创，另有18艘大型舰艇被炸沉或炸伤，260多架飞机被摧毁，美军伤亡超过4000人——整个太平洋舰队完全瘫痪。

而日本付出的代价是：29架飞机、55名飞行员，以及几艘袖珍潜艇。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场十足的完胜。

作为这场惊天偷袭的全程策划人，在日本本土吴港的“长门”舰上远程指挥的山本五十六却笑不出来。

首先，按照山本五十六的原定计划，日本远征的海军航空兵，应该要炸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航母，但是，美国的3艘航母却恰好都不在港内。

美国3艘航母不在港，被后人认为是“美国提前知道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一大证据。但事实上，那3艘航母中，一艘本来就在大修，一艘按照原计划去运送飞机了，一艘在返港途中遭遇风暴延误，并没有“刻意躲避”的明显证据。

更何况在“二战”初期，按当时人的理解，海军的主力应该还是战列舰，所以如果美国事先知道，应该把战列舰转移走才是——最早一批认识到航母在现代海战中作用要超过战列舰的人中，就有山本五十六。

其次，日军的轰炸机既没有炸毁珍珠港的船坞，也没有炸毁就在不远处的珍珠港油料库。

如果炸毁船坞的话，将进一步严重影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恢复能力，而如果当时哪怕有一架飞机往美军的油库投下一枚炸弹，太平洋舰队很可能将会因为燃料不足而退回美国本土港口——那个油库存有450万吨燃油。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山本五十六知道美国可怕的工业生产能力将被彻底唤醒。

最初，山本五十六是坚决反对向美国开战的。

理由很简单：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过书，并在1925年至1928年间，在美国担任过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

相对于日本军部很多只是单纯头脑发热的日本军官而言，山本五十六在美国期间，深入了解过美国的生活，以及参观过大量的美国工厂。

所以他深深知道：日本要和美国开战，其实就是找死。

因为反对向英美开战，山本五十六有一段时间只能去军舰上居住办公——很多日本少壮派军人准备刺杀这个“卖国贼”。

但是，当美国紧紧扼住日本“石油输送”这个软肋之后，日本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恰在此时，东条英机内阁上台，头也不回地把整个日本都绑上了疯狂战车，山本五十六知道，对英美开战已经不可避免。

既然要打，上来就必须打一把大的——当山本五十六制订出不远万里奔袭美国珍珠港的计划时，日军大本营里最胆大妄为的军官都被惊呆了：派一支特混舰队，横渡太平洋，去美国的家门口把人家的太平洋舰队给炸了？！

但山本五十六就是一名标准的赌徒。在出使欧洲时，山本畅游过欧

洲多个赌场，且胜多负少——摩纳哥的赌场甚至禁止他入内。

在这一把上来就“all　in”（全部投入）的赌局中，山本五十六赌赢了。


被轰炸的珍珠港

但这一把牌，也把美国逼上了牌桌——那可是一个背后不知道堆了多少筹码的对手。

按当时山本五十六的估计，偷袭珍珠港的成功，只是可以让日本获得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在指挥室幕僚纷纷对山本五十六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只是唤醒了一个巨人而已。”

2

同一天的大洋彼岸，“巨人”神经中枢最重要的一个细胞——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一时间就准备好了他的国会演讲。

虽然已有各种证据证明：美国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已经从各个渠道得到了各种“日本准备动手”的消息（包括中国的情报人员也多次截获电报提醒）。但是，至今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罗斯福是在确切掌握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具体情报之后，有意瞒报，故意上演一出苦肉计。

不过，罗斯福此前一直支持美国参战，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在1941年的12月8日，罗斯福在国会的那段演讲，终于可以说得理直气壮：

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蓄意的攻击。

……

我们现在预言，我们不仅要做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背信弃义的形式永远不会再次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Honolulu Star-Bulletin 1st EXTRA

WAR!

SAN FRANCISCO, Dec. 7.—President Roosevelt announced this morning that Japanese planes had attacked Manila and Pearl Harbor.

OAHU BOMBED BY JAPANESE PLANES

SIX KNOWN DEAD, 21 INJURED, AT EMERGENCY HOSPITAL

Attack Made On Island's Defense Areas

Hundreds See City Bombed

美国媒体针对珍珠港被偷袭事件的报道

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毋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相信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将取得必然的胜利！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

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没错，从1940年开始，罗斯福就在使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希望国会能够批准美国参加“二战”——他所需要的，确实就是一个批准而已。

如今，他拿到了。

可以说，“战争机器”开始高速运转后的美国，确实没有辜负山本五十六当初的“信任”。



在国会演讲的罗斯福

先看钢铁产量。在宣布参加“二战”前，美国年钢铁产量是3000万吨左右；到1941年末，产量暴涨到7500万吨；到1944年，达到8132万吨——这一年，苏联、德国、英国、法国、日本这5个国家的钢铁产量加在一起，是5600万吨。

再看石油。1940年，美国石油年产就达到了2亿吨，1945年突破2.3亿吨——当时全球石油总产量为3.6亿吨，美国占到了60%以上。

然后来看武器装备。开战第一年，美国的作战飞机年产量就达到了4.7万架，坦克年产量达到了3万辆。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前后一共造了不到7万架作战飞机，1944年，美国一年就造了近10万架。

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苦心经营，勒紧裤腰带造航母，到了1945年无条件投降时，一共造了29艘航母（含4艘已下水未完工）。

而美国呢？从珍珠港遇袭到战争结束，它一口气造了147艘航母（其中113艘是轻型航母）。

不仅仅是生产能力，还有修复能力。太平洋战争中的珊瑚海海战中，美国“约克城”号航空母舰被日机重创，按日本人的估计，“约克城”号至少要修两个月——事实是，美国人只花了36个小时就让这艘航空母舰重返战场了。

还有后勤能力。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的“跳岛战”中，最艰苦的时候，日军士兵三天可以分到几条小鱼干作为口粮，而每个美国士兵在战地上可以吃到刚做好的冰激凌——为了能现场制作，美国专门改造运输机用来制作冰激凌（美军的后勤能力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也给志愿军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二战”期间，美军有数万架飞机生产出来还没来得及服役，战争就结束了。美国不愿意自己的技术被泄露，最终集中销毁了数万架全新的作战飞机

以生产能力论，太平洋战场只是美国输出的一小部分而已，事实

上，美国当时已经成了全世界整个反法西斯战场的主要生产制造商和军火提供商。

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盟军准备的13700架作战飞机，基本都是美国人造的。面对如乌云蔽日一般的盟军飞机，德军可以起飞的作战飞机只有400架左右。

不知道那个时候，希特勒有没有恨日本把美国拖下水？

3

第二天得知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希特勒的内心也是矛盾的。

曾有一种说法，说希特勒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暴跳如雷”，但从一些传记作品和资料中，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事实上，希特勒没有理由发怒。

首先，希特勒知道，美国是迟早要参战的。

尽管德国之前一直在努力避免激怒美国，但希特勒完全清楚，美国参战其实是早晚的事。即使没有参战，美国向英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军火和物资，为英国商船护航，其实已经等同于参战了——大家只是不想正式宣战，心照不宣而已。

其次，德国当时的处境开始变得不妙了。

1941年底，在寒冷的苏联，已经看见莫斯科城墙的德军却久攻不下，而站稳脚跟的苏联红军已经开始了局部反击——12月6日，希特勒刚刚下令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开始转入战略防御。

而就在11月底，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刚刚代表希特勒向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重申：“一旦日本向美国开战，德国立即向美国宣战。”之所以是“重申”，是因为就在年初，德国刚刚向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根据墨索里尼的女婿皮亚诺后来的日记显示，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是和意大利以及德国通过气的。偷袭珍珠港成功后的12月8日，“里宾特洛甫夜间来电话，他为日本进攻美国高兴不已”——作为希特勒的亲信，

里宾特洛甫的“高兴”应该不只是他本人的态度。

但同时，希特勒也明白，日本向美国开战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日本的行为，尤其是一举打残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很大程度上能把美国拖在太平洋战场，进而给德国在欧洲战场留下更多的时间。

但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宣战，也等同于宣布了一件事：他们不会和德国一起夹击苏联了。

这对德国而言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痛的事，因为原本已经几乎被摧毁的苏联红军，在西伯利亚超强冷空气的帮助下，似乎有站稳脚跟的趋势。

当然，希特勒也担心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但从希特勒身边人后来的回忆录来看，希特勒还是相对倾向于乐观的，他认为自己有把握在美国涉足欧洲战场前解决所有问题。

这也是后来德国在军队内部出现一个“刺杀希特勒”小集团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元首已经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基本判断，显得盲目自信，近乎疯狂。

作为证据之一，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希特勒在1942年还试图谋划与一个亚洲大国达成一项密约——共同突袭印度。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4

1941年12月8日的深夜1点，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里，得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与希特勒没有“暴跳如雷”一样，当时蒋介石也并没有“欣喜若狂”。

当时的中国，在抗日战场上相当吃力。

但从蒋介石当时的日记来看，他对“珍珠港事变”的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后悔”——后悔自己不应该过度敦促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导致日本丧失耐心，对美国展开攻击。

蒋介石为什么会这么想？

首先一个原因是，罗斯福早就通过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转告蒋介石：万一美日战争真的爆发，无论是中国领袖还是中国人民，一定要保持克制的态度，要避免公开的庆祝。

其次，即便从自身情况考虑，蒋介石当时对抗战的结局的判断，更多倾向于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停止进攻”，进而谈判。可以说，蒋介石对中国以一己之力将日本人全部驱逐出境，并没有什么信心。

所以蒋介石也根本就没想到，日本真的会吃了熊心豹子胆，主动去开撩美国——与美日开战相比，蒋介石其实更希望日苏开战。他认为只有苏联与日本开战，才会真正减轻中国战场的压力。

但是，那时候苏联整个国家在纳粹铁蹄下已经命悬一线，日本不夹击已经谢天谢地，它哪来的力量再主动对日开战？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蒋介石在短短的时间里，也需要做出一个判断：是不是要立刻对日本宣战？如果宣战，是只对日本宣战，还是对轴心国所有国家宣战？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目的大家都了然于胸——不是日本真要去攻打美国，而是日本要夺取英美在东南亚的所有资源和利益。

而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作为一个已经单独默默抵抗日本长达五年的国家，中国在1941年已经陷入了最艰苦阶段。在丢失了大陆的东南沿海之后，很多战略物资都需要从东南亚的缅甸等地输送进来。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全面进攻东南亚的速度，万一英美在东南亚全面崩溃，中国就将彻底陷入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困境——到时候，去找谁？

因为苏联和日本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在苏联没有表态的前提下，12月8日那一夜，蒋介石其实也在苦苦思索。

当然，最终他还是做出了抉择。

1941年12月7日之后的那一个星期，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基本都被“宣战”的新闻挤满了：

12月7日，日本对美国和英国同时宣战；

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

12月9日，中国自1931年以来，经过十年的“战而不宣”，终于在这一天，对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同时宣战；

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同日，美国同时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二战”期间，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宣战——因为当时中国存在两个政府：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和南京的汪精卫伪政府。

同盟国只承认蒋介石，所以不会对中国宣战；轴心国只承认汪精卫，所以同样不会对中国宣战。

不过无可避免地，1941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还是全面爆发了。

在整个过程中，唯一没有丝毫犹豫的，恐怕只有英国了。

当时手里几乎已经打不出牌的丘吉尔，在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激动地流下了泪水，然后说了一句：“好了，这下我们赢了。”

馒头说

说一个1941年12月8日，发生在美国国会的小插曲。当罗斯福发表完演说后，国会审议对日宣战唱名表决。投票结果是：联邦参议院82票对0票通过，众议院388票对1票通过。

没错，众议院居然出现了1票反对票。

投出这票反对票的，是女议员珍妮特·兰金。兰金也参加了美国国会决定是否参加“一战”的投票，她当时投的也是反对票。

因为兰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她在决定美国是否参加“二战”时的发

言是："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能去参加战争，也反对把其他任何一个人送上战场，这不是必需的。我投票反对。"

国会现场对她响起了一片嘘声，当她走出众议院时，民众纷纷向她投掷杂物，以至她之后只能在警察的保护下上下班——当然，没多久，她的政治生涯也画上了句号。

现在回过头看，在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反击是理所应当的选择，对已经急红了眼的日本宣战，绝不是兰金所认为的"这不是必须的"行为。

不过，虽然可以给兰金安上"圣母典范"的头衔，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论观点对错，我们还是要捍卫一个人说话的权利。

1973年，美国国会大厦竖起了兰金的铜像——并不只是为了纪念她当年在"二战"中投出的这一反对票，而是她终身对和平运动的贡献。兰金后来还以86岁的高龄积极参加反越战的游行，并留下一笔遗产用作低收入妇女获得教育的基金。

无论如何，兰金对于和平的渴望，还是应该被承认的。

因为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屠杀，而是为了和平。

1944，刺杀希特勒

在诸多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1944年的这一次，应该是最著名的。关于这次刺杀行动，有各种版本的描述。这一次，我们从一个人的视角来感受一下——他就是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

1

源于德国南部的施陶芬伯格家族，可以追溯到13世纪。

1907年11月15日，施陶芬伯格家族又添了一个男丁，他被取名为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没错，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冯”字，那是德国贵族的标识——施陶芬伯格的父亲是一名将军，母亲是伯爵。

和所有的贵族孩子一样，施陶芬伯格到了读书的年纪，就被送入私立学校，接受精英教育。

在施陶芬伯格11岁的时候，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国成立了共和国，帝制时代结束了。

这个变故，对贵族出身的施陶芬伯格打击颇大，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1926年，19岁的施陶芬伯格决定参军，他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新振兴家族和国家。



施陶芬伯格

施陶芬伯格加入的是德国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第十七骑士兵团。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在一年后升任少尉。

在施陶芬伯格的人生进入上升通道的时候，他所热爱的祖国，却境况不佳：

一方面，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和约》的约束下，承受着各种束缚乃至屈辱。但在英法两强同样也只是惨胜的背景下，德国民众认为这不是一种公平的生存状态，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慢慢滋生。

另一方面，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横扫全球，德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大幅度萎缩，大量的工人失业，人们都开始感到迷茫：我们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施陶芬伯格和他身边的很多同胞一样，开始热切地期盼有一位带领德国人民走出泥潭困境的领袖出现——他们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1933年，施陶芬伯格和无数热情乃至近乎疯狂的德国民众，用民主的选票，把他们认为的那位“救世主”选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那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2

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情感，一开始就有点复杂。

一方面，他非常认同希特勒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高度赞扬希特勒在废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不合理条款上做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很反感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宣扬的对犹太人的镇压乃至清洗，同时也对希特勒几乎疯狂的作战计划感到无比担忧。

为此，当时的施陶芬伯格虽然加入了冲锋队，但没有加入纳粹党。不过，作为一名军人，他在1939年被从第六装甲旅调到了德军总参谋部，更进一步接近了整个纳粹军队的神经中枢。

也正是在1939年，希特勒一声令下，德国百万大军闪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序幕。在德国和苏联的两面夹击下，波兰在一个月后沦陷。

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这一举动是感到吃惊的，尤其是之后德国直接和英法开战，更让施陶芬伯格感到心慌——他认为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做好这样的战争准备。

但和当时很多德国民众及军人一样，德军初期超乎想象的巨大“胜利成果”，让很多人都暂时闭住了嘴巴，施陶芬伯格也把质疑埋在了心里。

虽然德国军队胜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但1941年6月22日的那个消息，还是彻底击碎了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所有幻想：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500万大军，全面入侵苏联。



1933年，施陶芬伯格结婚。他坚持在婚礼上穿军装，因为他坚信军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穿军装

在西线还没安定的情况下，德国又在东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炼狱战场，施陶芬伯格终于清楚地认识到：疯子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拖向毁灭的深渊。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施陶芬伯格彻底参与了德军秘密反希特勒的地下组织——这个密谋集团其实从希特勒下令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就已存在，只是施陶芬伯格一直不是核心成员。

在一次德军伤亡惨重的战役之后，施陶芬伯格终于忍不住向自己的一位密友发出了哀叹：“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难道没有一位军官能够用枪杀了那头野兽吗？”

3

事实上，想杀希特勒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一直在失败。

从1938年开始，密谋暗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团体进行了不下10次暗杀行动，但每一次不是发生了意外，就是因希特勒的生性警惕而躲过——希特勒身边不仅戒备森严，而且他经常临时改变自己的行程。

1943年，渴望有人能取希特勒性命的施陶芬伯格，自己差点儿丢了性命。

那是在1943年春天的北非突尼斯战场，几架美国战斗机扫射了一条海岸公路上的一列德军卡车编队，而施陶芬伯格正好就在其中一辆卡车上。

施陶芬伯格从战友的尸体堆中爬了出来，被当时德军的北非军团总指挥隆美尔派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自己的左眼、右手，以及左手的两个手指，并且双腿落下了残疾。

这次的死里逃生彻底改变了施陶芬伯格。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施陶芬伯格拒绝使用任何镇痛剂，他学会了自己穿衣服、洗澡，以及用左手的三个手指写字。1944年春天，他提出要求，希望能返回部队。

施陶芬伯格如此坚毅的表现，在德军后方传开了，也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希特勒随后就把施陶芬伯格调到了本土兵团担任参谋长——在德军东西两线明显已转到下风的情况下，希特勒需要这样的军人表率。

而施陶芬伯格如此急着返回部队，并不是要继续效忠希特勒，而是通过一次生死关口的考验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不想再等别人去终结这个德国的“瘟疫”了，他要亲自动手。

4

调任本土兵团，确实给了施陶芬伯格一次机会。

本土兵团的士兵全部驻扎在德国国内，除了负责警戒工作外，还负责德军的征兵和训练。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国内出现叛乱——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本土军团制订了一个以北欧神话中奥丁战神婢女名字命名的“瓦尔基里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具体来说，就是一旦国内发生叛乱，本土兵团有权控制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包括电台在内

的通信设施、包括火车站在内的交通设施。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帮助本土兵团制止发生叛乱的计划，但关键是，如果叛乱就是本土兵团发起的呢？

施陶芬伯格开始物色同谋者。

本土兵团的副司令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表示愿意一起铲除希特勒，但总司令弗洛姆将军不置可否——他不是支持希特勒，而是担心叛乱失败后，遭到希特勒的报复。而那些一直对希特勒心存不满的德国军官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施陶芬伯格的谋杀集团，而另一方害怕遭到报复，表示拒绝。

为此，施陶芬伯格甚至还去找过在北非共过事的隆美尔。隆美尔和施陶芬伯格是同一天生日，两人算是有缘。但隆美尔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管怎样，德军的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

就在筹划酝酿的时候，1944年的夏天来到了，战局对德国而言越来越糟糕：在东线，苏联红军已经攻入了波兰，逼近德国本土；在西线，盟军通过诺曼底登陆，已经在德国人的后院站稳了脚跟。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整个“二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德军与其仆从国折损150万兵力，苏军由此开

施陶芬伯格知道，不能再等了。

1944年7月11日，施陶芬伯格第一次决定实施暗杀。

当时，他得到了一个和希特勒待在一起的机会，他的身上带了一个炸弹，和希特勒与戈林一起待了半个小时。但是，施陶芬伯格没有拉响炸弹，因为当时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不在场——施陶芬伯格希望一次性将这三个人一起炸死。



从左至右依次是：希姆莱、希特勒、戈林

7月15日，施陶芬伯格决定实施第二次暗杀。

在那场会议中，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施陶芬伯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说不管另外两人是否在场，他都决定要炸死希特勒。但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了。

两次失败后，施陶芬伯格有点心急了。

但好在，他毕竟是暗杀集团中唯一可以近距离接触希特勒的人，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7月19日，施陶芬伯格接到了通知：7月20日下午1点，到希特勒当时藏身的地穴“狼堡”，汇报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



这张照片摄于1944年7月15日，地点就在希特勒总部“狼穴”。由左至右分别为施陶芬伯格、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与希特勒握手者为卡尔·博登沙茨。此时施陶芬伯格的公事包里便放有炸弹，但这次他并未引爆

这一次，施陶芬伯格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下手了。

5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伯格期待改变历史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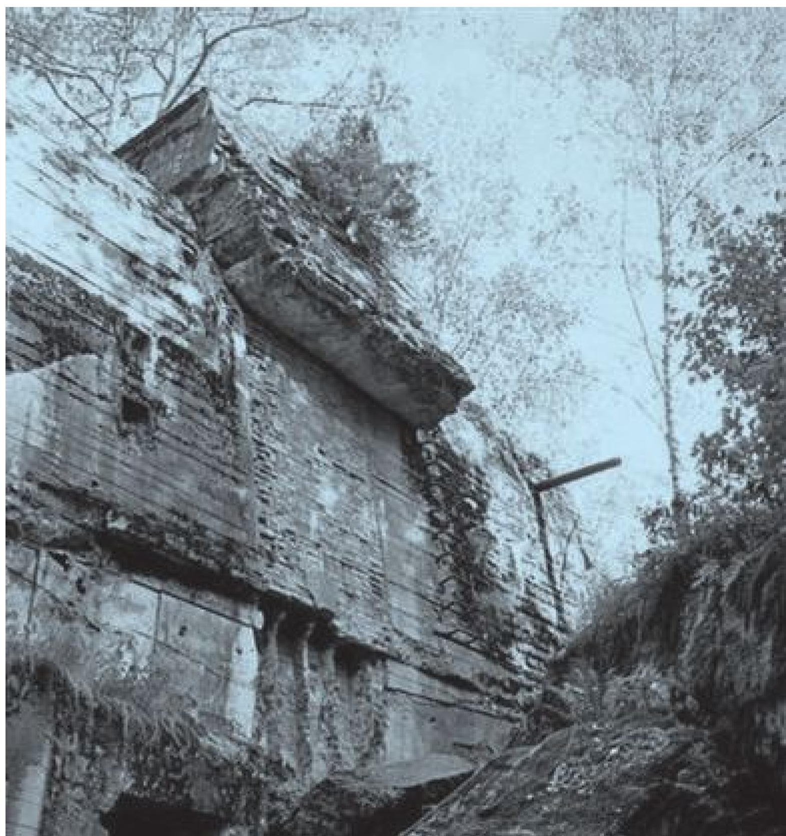
这一天的上午10点15分，施陶芬伯格和副官哈夫登抵达“狼穴”附近的机场，他和副官的公文包里，各藏了一枚定时炸弹。

这是一种英国制造的定时炸弹，大概两磅重，通过溶液腐蚀金属线释放撞针的方式引爆——施陶芬伯格设定的引爆时间，是12分钟。

“狼穴”是希特勒的老巢，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但由于施陶芬伯格已经是希特勒的亲信军官，所以进入没有什么困难。只是一位接待的副官发现施陶芬伯格的皮包很重，对此他的回答是：“我有很多事要向领袖

汇报。”

12点过后，施陶芬伯格首先进入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然后他得知了一个变故：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来访，希特勒将会议时间从1点提前到了12点半。



“狼穴”是希特勒指挥所的称号，位于当时德国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即现在波兰的肯琴约东15公里处的密林中，为1941年的巴巴罗萨计划而修造，由一系列地堡和碉堡组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

时间紧急，施陶芬伯格马上提出需要借用一下凯特尔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施陶芬伯格弄碎了定时炸弹里装有酸溶液的玻璃管——定时炸弹开始倒计时。

但因为凯特尔在门外不断催促开会，只有三个手指的施陶芬伯格没有时间再启动第二枚定时炸弹，所以他决定只带一枚炸弹前往会议室。

在进入会议室前，施陶芬伯格对前厅管理电话总机的一位上士说，他在等候柏林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有最新材料要补充进他对希特勒

的报告，所以电话一来，就立刻叫他出去——“哪怕我和领袖在一起”。

12点35分，施陶芬伯格进入了会议室，当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希特勒站在一张大会议桌前，听取陆军副参谋总长的汇报，围在他身边的，大概有20多名军官。

施陶芬伯格向希特勒问好，然后平静地走到桌子前，把公文包自然地塞到橡木底座的桌子底下——大概离希特勒的腿有2米左右远。

这时候的时间，是12点37分，距离计算中的爆炸，还有5分钟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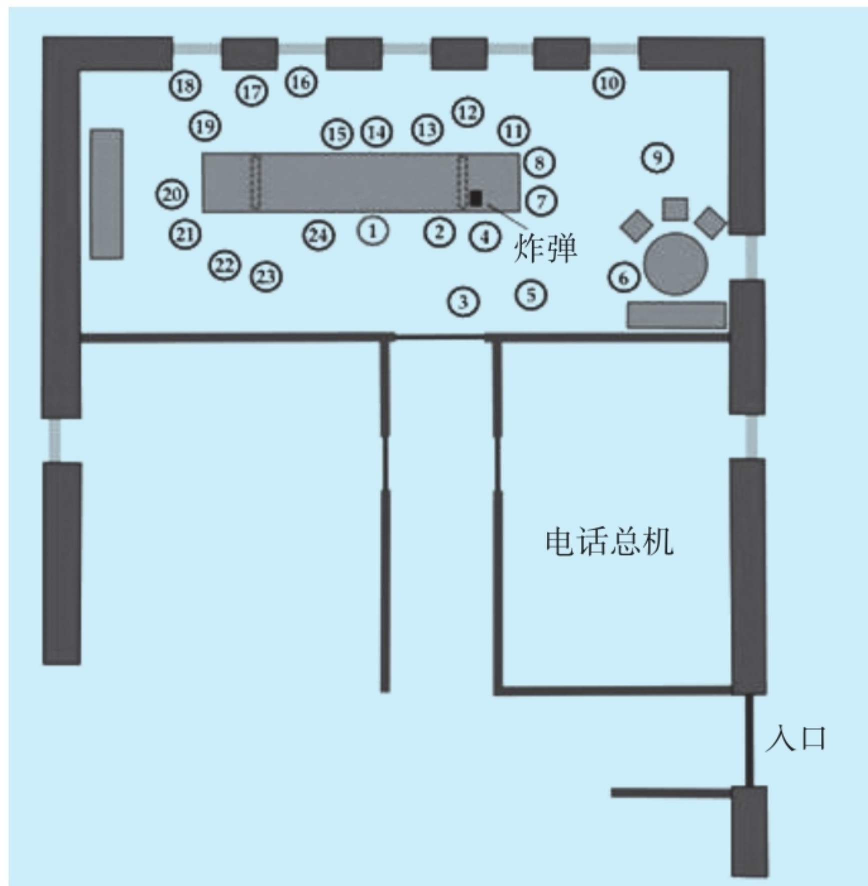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趴在桌子上看地图，施陶芬伯格知道自己该离开了。他借口柏林的电话要来了，起身离开了会议室。但他离开后，会议室里发生了关键的一件事——

一位叫勃兰特的上校俯身上前，想进一步看清楚地图，结果脚碰到了施陶芬伯格放在桌子下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勃兰特并没有打开这个公文包——他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谁也不会质疑这个核心的会议室里会出现背叛者——而是将这个公文包拿起来，放到了桌子底座的另一侧。

这样的话，公文包和希特勒之间，就隔了一层厚厚的橡木板。

这时候，该轮到施陶芬伯格汇报了，但凯特尔发现会议室里并没有他的踪影——他想起来开会前施陶芬伯格等电话的那句话。于是，凯特尔匆匆跑出会议室，希望找到施陶芬伯格，告诉他轮到他向领袖汇报了。



当时会议室的平面图。①的位置是希特勒的位置，黑色小方块为炸弹位置，当中隔了一层木板

但是，管电话总机的上士告诉凯特尔："施陶芬伯格上校不知道去哪里了。"无奈之下，凯特尔只能回到会议室。

这个时候，时间到了12点42分。

会议室里的炸弹准时爆炸了。

站在远处的施陶芬伯格看到会议室冒出浓烟和火光，立刻通知了同谋、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

"暗杀成功了！"

但是，施陶芬伯格错了。

炸弹确实成功引爆，威力也非常大，甚至整个会议室的房顶都被炸塌了。但由于之前那个叫勃兰特的上校挪动了公文包，所以，希特勒并没有被炸死。

当时在会议室的有24个人，有4人当场死亡，3人重伤，但最关键的暗杀对象希特勒，只是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



被炸后的“狼穴”会议厅



一名士兵展示阿道夫·希特勒在炸弹行刺中被烧坏的裤子

这个时候，施陶芬伯格的密谋集团又犯了关键的错误：位于柏林的内应团伙反应迟缓，他们甚至等施陶芬伯格连闯三道关卡，花了3个小时抵达柏林后才开始全面执行“瓦尔基里行动”——其间，他们甚至连电台都没有占领。

时间不等人。

与之相反，希特勒迅速做出了反应。在爆炸发生一个小时后，希特勒就开始部署镇压行动，希姆莱麾下的盖世太保全面出动，开始抓捕各种怀疑对象。

晚上6点，希特勒通过全国广播发表讲话，表示一场针对他的政变已经失败——等到这个时候，密谋集团确实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在这场未遂的政变发生后，希特勒一共下令逮捕了大约7000人，其中5000人在受尽各种折磨之后，被残忍地处决。

甚至连对暗杀不置可否的帝国元帅隆美尔，最终也被希特勒勒令服毒自杀——在一份被搜出的名单中，隆美尔被密谋集团内定为未来帝国的领导人之一（但很可能施陶芬伯格并没有征求隆美尔的意见）。

当然，没有悬念，施陶芬伯格最后也被捕了。

施陶芬伯格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在临死前，施陶芬伯格仍在试图让审判者相信：这件事和其他人没关系，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行为。

在被枪决前，37岁的施陶芬伯格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



德国抵抗力量纪念中心的一面纪念墙，上面贴满了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的德国官员照片，他们都在行动失败后被处决

馒头说

历史没有如果，但肯定还是会有人忍不住问：如果希特勒被刺杀了，结果会如何？

依我看，真的未必会像施陶芬伯格他们想的那样：战争立即结束。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德国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哪怕是在“二战”后，作为忠诚乃至刻板的德国人，仍有不少人认为施陶芬伯格是“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

即便到了1994年，德国联邦参议院议长约翰内斯·劳（后成为德国总统）仍说：“不要把1944年7月20日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

这正是德国人在“二战”前后举国陷入纳粹狂潮的细思极恐之处：它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集团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小集团的专政，而是一个国家几千万人的真心信仰。希特勒如果被刺，还会有大批的后来者顶上，因为整个国家机器都已经被卷入了疯狂的纳粹车轮。

那么，施陶芬伯格的刺杀究竟有意义吗？

当然有。

1944年7月，施陶芬伯格执行刺杀任务前，也曾询问他的好友，同样反对希特勒的原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处处长特雷斯科夫：“战局已经至此，刺杀还有意义吗？”

特雷斯科夫的回答是：“当然有意义！无论刺杀成败，都能向世人证明：德国是有那么一群人，是曾经起来反抗的。”

所以，2004年6月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仪式上，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说：“施陶芬伯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一年，一些德国人已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

回顾历史，很多民族都经历过自己的疯狂时期，尤其是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的时代，让人心有余悸。而在此期间保持头脑清醒，乃至敢挺身而出，甚至做出牺牲的人，都值得尊敬。

纳粹德国其实“投降了两次”，你知道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阵营，其他国家都是提前无条件投降的，只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打到了所谓的“首都保卫战”。这个国家就是纳粹德国。也正是因为这场玉石俱焚的垂死挣扎，出现了一个“投降两次”的故事。

1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2015年5月9日的俄罗斯阅兵。那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一次重要纪念仪式，但俄罗斯在向70个国家发去观礼邀请之后，只收到了18个国家的回应，它们分别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中国、古巴、印度、南非、波黑、委内瑞拉、越南、津巴布韦、马其顿、蒙古、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塞尔维亚。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作为当年“二战”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重要盟友：美国、法国、英国……它们的领导人一个也没有接受邀请。

当然，当时西方国家领导人没有出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惹恼了西方，所以他们集体不给面子。

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历史原因：西方国家不承认1945年5月9日是“二战”欧洲战场的胜利纪念日。

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要从纳粹德国被逼着“投降两次”说起。

2

1945年初，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西线的英美盟军，在美国统帅艾森豪威尔的率领下，已经推进到了德国首都柏林以西100公里的易北河沿岸；东线的苏军，在苏联元帅朱可夫的率领下，也已经推进到了柏林城以东100公里的尼斯河一线。

柏林已被完全包围。

整个盟国阵营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攻克柏林，而是谁先攻占柏林——攻占柏林，自然有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

但就在双方都厉兵秣马的时候，英美盟军的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却发布了一条电文，要求英美盟军改变作战方向，从主攻柏林，改为主攻柏林南方的慕尼黑和莱比锡。

这就意味着，英美盟军准备放弃柏林。

在看到这条电文后，英军的统帅蒙哥马利当时就蒙了。尽管英军在欧洲大陆战场上起到的作用一般，但一直想率先攻占柏林。蒙哥马利麾下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早早就展开了攻击阵型，准备合围柏林。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无法理解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认为他这个决定“缺乏政治头脑”。正如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苏联人一旦进入柏林，就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一切都将使世界产生‘天下是苏联人打下来的’错觉。”

那么，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他仔细算了一笔账。虽然纳粹德国已经濒临绝境，但希特勒为了防守柏林，还是拿出了最后所有的本钱：防守柏林的主力，是名将海因里希上将指挥的“维斯瓦”集团军群，外加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共计80万部队，拥有超过1万门火炮和迫击炮、超过1000辆坦克、3300架作战飞机。

柏林整座城市也被布置成了一个巨型碉堡，里面还布置了200个国民突击营，总数超过2万人，外加8个陆军预备队师，可以说，柏林已经做好了与盟军“玉石俱焚”的准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计算，如果英美盟军要攻占柏林，将至少付出牺牲10万人的代价——从后面交战的情况来看，他的这个估计显然乐观了。事实上，面对困兽犹斗的纳粹德国的强悍战力，英美盟军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打下柏林，谁心里也没数。



德国纳粹党卫军守卫柏林的装甲部队，照片中的坦克正是德国的重型坦克“虎王”

柏林是肯定要打的，但打完之后，极有可能是西方国家和苏联分占这座城市，既然最终还是要分占的，那为什么要费力去打？

更何况，如果要攻打柏林，美军肯定是主力。但从“二战”开始到尾声，比起被打到投降的法国和首都日夜被轰炸的英国而言，美国人和德国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深仇大恨，这种情况下，美军士兵为什么要当炮灰？

相比另一个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可能更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最终决定不要这个他认为的“面子工程”了：还是让给苏联人吧！

3

苏联人当然是要这个“面子”的，因为他们还有血海深仇未报。

从1941年6月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纳粹的铁蹄席卷大半个东欧平原，将数百万经过“大清洗”后素质严重下降的苏联红军分割包围，全歼或劝降，最后打到苏联首都莫斯科城下。

漫天飞雪，斯大林在红场阅兵，以“俄罗斯这个民族将被灭亡”为动员口号发表演说。残存的苏联红军集结列队经过主席台，然后就直接奔赴城外战场投入厮杀。惨烈至此。

整个“二战”，据苏联自己公布的数据，伤亡人数在2700万左右（后来有新数据称超过4000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苏德战争期间。不仅如此，德国在占领苏联国土期间，发生大量的烧杀奸淫事件，很多苏联红军将士的家属都没有幸免于难。所以苏联士兵都是红着眼一定要攻占柏林报仇雪恨。

所以，苏联军队是铁了心要攻占柏林的。

为此，苏联方面调动了一切自己可以调动的军事力量，集结了惊人的250万大军（其中作战部队大概200万人左右），配备了6250辆坦克、42000门火炮、7500架作战飞机。

1945年4月16日，漫天的照明弹将柏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然后是数万发苏军的喀秋莎火箭炮弹呼啸而至，柏林战役的总攻正式开始。

尽管德国纳粹势力有殊死一搏的决心，柏林也被修筑得固若金汤，但在苏军压倒性的人数和火力优势下，一切都成了渣渣。这场惨烈的城市攻坚战打了两个星期，纳粹德国就垮了，苏军攻进了柏林市区。

4月29日夜里1点，希特勒宣布与等了他12年的爱娃·布劳恩举行婚礼。婚礼之后，希特勒口述遗嘱，指定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30日下午3点，希特勒和爱娃双双服毒自杀。

7个小时后，经过惨烈的战斗，苏联红军米哈伊尔·耶果罗夫中士和麦利唐·坎塔里亚下士将苏联的红旗插上了柏林国会大厦主楼的圆顶。

柏林战役进入尾声。德国守军被歼灭了70个步兵师、23个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其中有38万人被俘。

而苏联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伤亡30万人。

屁股还没坐热的新任德国元首邓尼茨，知道该考虑投降的事了。

4

其实早在4月30日深夜，困守柏林的德军就通过广播向苏军提出了临时停火的请求。

领袖都自杀了，还打什么打？

5月1日4点，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莱伯斯将军打着白旗来到苏联近卫第八集团军前线指挥所谈判，请求先停战再谈判。但莫斯科方面发来的电令斩钉截铁：

“德军只能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

知道已经无路可走的柏林残留15万守军，在5月2日上午7点由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上将代表，签署了投降令。

但整个德国向谁投降，似乎还存在变数。

继任的德国新元首、海军元帅邓尼茨，以发明潜艇的“狼群战术”而闻名。这一次，他又试图玩一次深藏在“水下”的战术。

5月4日，邓尼茨派出了自己的专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前往英美盟军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地，同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签订了西线的投降书。邓尼茨此举的目的，是想试探一下：有没有可能和英美盟军单独媾和。

邓尼茨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苏德战争打得实在过于惨烈，从苏军进入德国东部后发生的情况看，大量的报复行为已经发生。如果德国先向苏联投降，那么在东线作战的百万德军都要向苏联投降，从苏联当时的复仇心态来看，后果不堪设想。



邓尼茨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只被判了十年，出狱后一直到1980年逝世，享年89岁，是纳粹德国27名元帅中最后一个去世的

此外，无论如何，德国人认为自己和英国、法国甚至美国人“同源同种”，乃至意识形态不至于对立，而苏联，他们是最不愿意打交道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5月6日，邓尼茨派出德国陆军大将约德尔前往位于法国兰斯的盟军总司令部，希望向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乞降。

艾森豪威尔当然希望以英美盟军为主要受降方，接受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这样也能杀一杀苏联的威风，有利于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新划分。但是作为整个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盟友，苏联在对德作战中的功绩不可抹杀，怎么可能跳过他们？

想来想去，艾森豪威尔想了一个损招——找一个苏联倒霉蛋。

这个倒霉蛋，叫苏斯洛巴洛夫，是苏联派在兰斯盟军总司令部的一名联络官，军衔是少将。

艾森豪威尔找到苏斯洛巴洛夫，告诉他要举行盟军在“二战”欧洲战场的总受降仪式，希望他能代表苏联签字——艾森豪威尔自己也知道，作为总受降仪式的苏联代表，苏斯洛巴洛夫怎么够资格？但如果目的达到，就能降低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参与程度。

接到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和建议后，苏斯洛巴洛夫少将也是蒙的：我怎么够资格？

于是，他赶紧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但是，莫斯科方面没有传来明确的指示——后来的史学家分析，因为苏斯洛巴洛夫的级别实在太低，没有资格直接和克里姆林宫联系，他的请示经过层层转批出现在斯大林办公桌上的时候，时间已经被耽误了。



在兰斯举行的受降仪式

但没等到指示的苏斯洛巴洛夫必须要做出决定：签了，自己其实是

没资格代表的；不签，那极有可能德军就向英美盟军单独投降了，这个风险他更承担不起。

最终，苏斯洛巴洛夫决定：还是签吧！

于是，1945年5月7日，在兰斯的盟军总司令部，一场受降仪式正式举行。

代表英美盟军的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史密斯上将。

而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联络官，炮兵少将苏斯洛巴洛夫。

根据苏斯洛巴洛夫的回忆，他说他签字后曾说了一句话："我虽然签了字，但附加了一个说明，那就是如果任何一个盟国请求，新的投降仪式还可以在别的地方举行。"

但谁会在意他那句话呢？

西方的媒体充分报道和渲染了这次受降仪式，从受降代表的规格和受降的地点来看，看过报道的读者会产生一种印象：苏联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作用有限，主要就是在东线牢牢牵制住了德军。

盟军在兰斯接受德军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斯大林耳中。

斯大林一拍桌子：谁是苏斯洛巴洛夫？

5

苏联当然无法接受这次受降。

在斯大林看来，整个"二战"欧洲战场，受损害最大的是苏联，而打败德国的主力，乃至最后攻占柏林的主力，毫无疑问都是苏联。但现在德国的投降仪式，居然放到盟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兰斯，苏联也只派出一个1944年才授衔炮兵少将军衔的联络官去签字？

在将苏斯洛巴洛夫撤职调回国审查之后，斯大林立刻向西方盟国发出最强烈的抗议：这场胜利，主要是靠苏联人民的流血和牺牲换来的。不在柏林受降，苏联绝不同意！兰斯的那场受降仪式，最多只能作为正式受降仪式的预演！

换句话说：苏联不承认5月7日的那场投降，苏联要求，德国必须再投降一次！

苏联政府经与美英政府商讨之后决定，兰斯投降仪式只是作为投降的预演，正式的投降仪式将在柏林举行，由攻入柏林的苏方代表主持。

1945年5月8日，在柏林郊区卡尔斯霍斯特的德国军事工程学校大楼大厅，前一天刚刚投降过的德国，再一次向盟国投降。

这一次参加仪式的各个国家代表，规格高了很多：



凯特尔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从宣判到执行他都面无表情



“二战”中的苏联如果没有朱可夫，可能亡国

代表德国投降的是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海军上将弗里德堡和空军上将施通普夫；

代表美国受降的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代表英国受降的是英国空军上将泰德，代表法国受降的是法军总司令塔西尼。

这一次代表苏联受降的，是苏联一代名将，元帅朱可夫。

那天夜晚，凯特尔率领的德国代表团进入会议大厅，凯特尔用他的权杖向盟国代表行礼，但盟国方面无人还礼。尴尬的凯特尔坐到了签字桌前，主持仪式的朱可夫问他是否有权代表德国签字，凯特尔说是的，于是9份早已准备好的投降协议放到了他的面前。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凯特尔在9份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朱可夫代表苏联，在协议书上第一个签字。

当时的时间，是5月9日夜里0点15分。



在柏林举行的受降仪式

馒头说

翻开历史上的5月8日这一天，你真的会发现，人类这个物种真的很让人感慨：

1429年5月8日，法国军队在圣女贞德的率领下大破英军，解了奥尔良之围——那是一场历时百年的残酷战争，但500年之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

1895年5月8日，日本在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干涉还辽”的情况下，被迫把在甲午战争中掠得的辽东半岛，作价3000万两白银“还”给了中国——但几十年后，德国和日本就成了轴心国的同盟；

1942年5月8日，刚刚恢复点元气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珊瑚海与日军联合舰队展开惨烈厮杀，双方都伤亡惨重——仅仅十年之后，日本就成了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坚定和最有力的盟友；

1952年5月8日，美军在朝鲜战场对中国志愿军发动了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空袭——而就在十年以前，中国还是他们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的重要盟友和伙伴；

1999年5月8日，我们都应该有深刻的记忆：美国蓄意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就在一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刚力排众议，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这一切，该怎么解释？或许根本不需要解释。

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更多的故事，就像这个纳粹德国两次投降的故事一样。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说得如此冷酷无情，却又如此现实。

日本为什么会挨第二颗原子弹？

这篇文章要说的，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果说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座城市挨了一颗原子弹。而这颗原子弹，原本可以避免。

1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只有两座城市遭受过原子弹的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在这两座城市里，长崎没有广岛那么有名。因为广岛是第一个被原子弹袭击的城市。

你看，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欢乐还是痛苦，人类总是喜欢铭记第一次。

只是，在广岛挨了一颗原子弹之后，长崎其实是可以避免挨第二颗的。



原子弹爆炸后的长崎

这一切，还得从1945年的一场登陆战役说起。

凭借偷袭珍珠港，日本这个小个子跳了起来，狠狠咬了美国巨人一口，正式拉开了“二战”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经过中途岛海战的转折，美军开始在太平洋战场上扭转局势，转守为攻。在“跳岛战术”的指引下，1945年4月，指向日本本土，最惨烈的冲绳岛战役拉开序幕。



日本的“樱花”单人飞机。它升空后的使命只有一个：找到美国军舰，撞向它，和它同归于尽。这就是在“二战”后期给美国海军造成重大伤亡的“神风特攻队”

这场登陆战历时82天，攻方为美军，守方为日军。虽然最后美军全歼守岛的10万日军，但自己也伤亡了近8万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要知道，之前的瓜岛战役和硫磺岛战役，虽然同样激烈，但美军一共伤亡了不到2万人。

这场战役虽然获胜了，但美国人对日本兵那种丧失理智的疯狂和同归于尽的做法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2

就在冲绳岛战役结束后一个月，1945年7月16日，美国倾全国之力进行的“曼哈顿工程”取得了成果——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的沙漠试爆成功。

在纳粹德国已经投降的前提下，美国人开始寻思：是否有另外一种方式能让日本人屈服，不再增加美国军人的牺牲？

这时候，日本避免“被核爆”命运，还剩下一次机会。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的《波茨坦公告》颁布。公告的内容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说起这个波茨坦会议，也很有意思。最早是苏、美、英三个国家参加，中国并不在场。美国那时候非常希望苏联能够尽快出兵日本，以减轻美军的负担。但就在会议召开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到了国内密报：我们已经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

这个时候，美国就没有那么急着让苏联出兵了，因为苏联一旦出兵，将会危及美国战后在远东的影响力。最后的公报出来，是由中、美、英三国签署。

3

接受《波茨坦公告》是日本避免“被核爆”的最后机会，但是，日本拒绝了。

不仅如此，日本更是喊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哪怕用鱼叉和竹竿，也要和登陆日本本土的美军同归于尽。

美国在这时候，就需要估算一个进攻日本本土的性价比了。

估算结果出来后，让美国人看得肝颤：如果要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必须再付出100万士兵伤亡的代价。



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号召：“以必死的精神教育后方的妇女和儿童，令他们拿起竹枪实施训练，使美军认识到日本的战争决心！”

这是美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于是，长崎（包括广岛）避免“被核爆”的第一次机会就消失了。



讀賣報知

アッツ島の我守備部隊二千數百名全員玉碎

皇軍の神髄こゝに發揮

あゝ何んたる崇厳！何んたる壯烈

敵主力に最後の鐵槌

損害六千を下らず

十倍の大軍を邀撃

一兵も増援求めず

莞爾として死に就く

攻撃發起にさきだち

傷病者は悉く自決

日本当时的《读卖新闻》。“玉碎”被认为是日本军人甚至老百姓的最终归宿

4

于是，1945年8月6日，3架美军的B–29重型轰炸机，携带着一颗名叫“小男孩”的5吨重的原子弹，飞到了日本城市广岛的上空。

开舱，投弹，核爆炸。

广岛当天就死了10万人，6万幢建筑灰飞烟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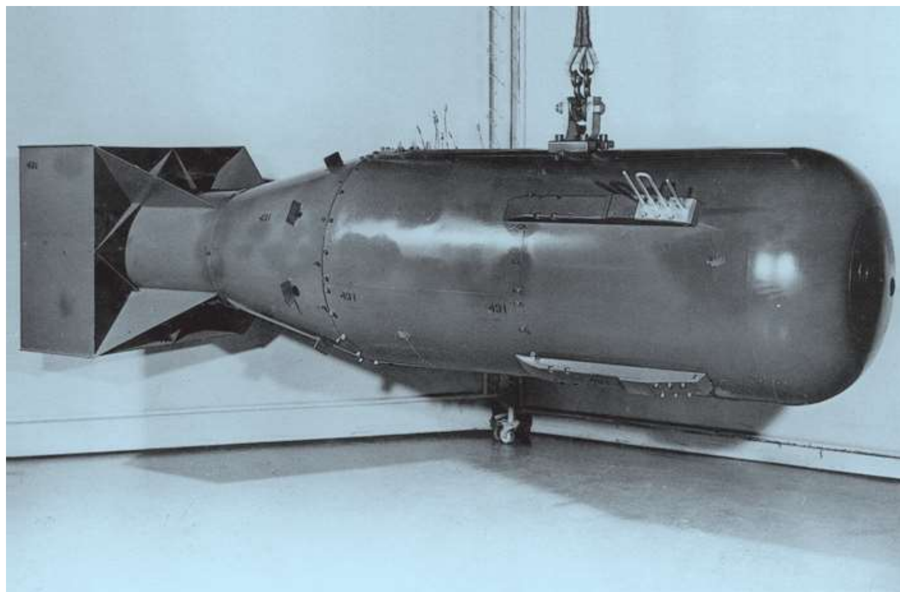
整个世界震惊了：美国人掌握了一种可怕的全新的高科技武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博弈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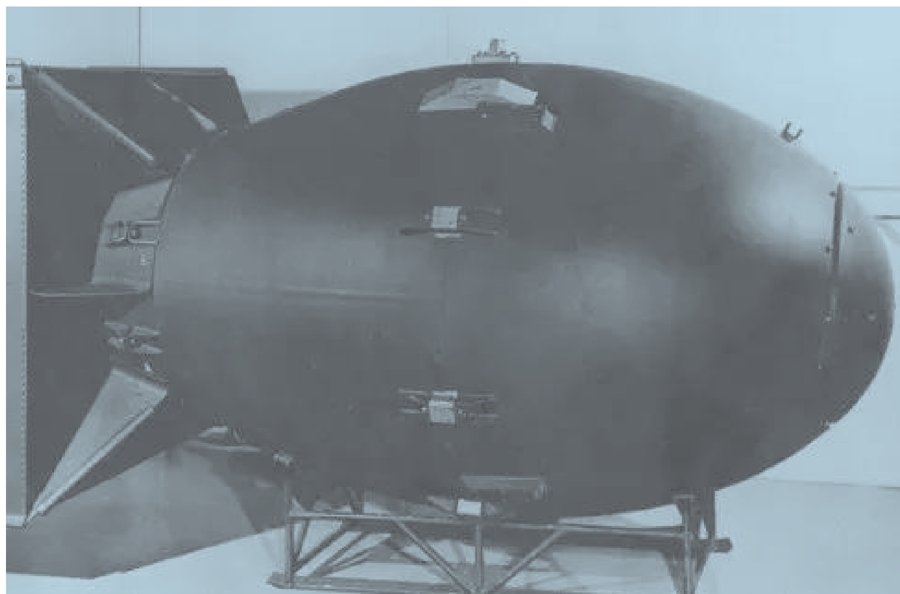
美国希望，一颗原子弹投下去，日本就能接受无条件投降。

而日本也在赌博：美国只有一颗原子弹，只要挺住，让苏联进来调停，我们还能争取些有利条件。

于是，心怀希冀的日本政府对于广岛的核爆炸，他们给出了一个日本漫画情节一般的解释：广岛被一颗陨石击中了！



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小男孩”



人类第二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胖子”

依旧是“一亿玉碎”的计划！依旧是全民皆兵！

长崎避免“被核爆”的第二次机会就这样消失了。

3天后的1945年8月9日，又是B–29重型轰炸机，携带着另一颗名叫“胖子”的原子弹，从美军的空军基地飞向了日本本土。

原定投弹的目标，并不是长崎，而是小仓。

在美军的原子弹轰炸目标序列里，小仓作为日本的兵工厂，排名在长崎之前。

但是，天气救了小仓一命。

当美军的轰炸机飞临小仓上空，发现都是云层，能见度非常低。B–29重型轰炸机在小仓上空盘旋了三周，始终未能找到投弹的机会。

这时候，小仓的地面防空高射炮开始射击，而日本的战斗机也开始起飞拦截。

B–29重型轰炸机掉头飞向了长崎。

长崎避免“被核爆”的第三次机会消失了。

5

1945年8月9日上午10点28分，美军的B–29重型轰炸机飞临长崎上空。那一天，长崎的上空也是云层密布，飞机盘旋了一圈，发现也很难找到投弹目标。

轰炸机上的指挥官斯威尼决定用雷达瞄准投弹。这个时候，长崎上空的两大块云团之间，忽然露出了一个大空隙，整个长崎暴露在了轰炸机的视野之中。

长崎避免“被核爆”的最后一次机会，消失了。

“拨云见日”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对长崎市民来说，成了死亡的征兆。

11点30分，相当于2.2万吨TNT（烈性炸药）当量的“胖子”离开了B–29轰炸机的机身，直奔长崎而去，在城市上空503米处爆炸。

那一天，长崎死亡2.3万人，伤4.3万人，全市60%以上的建筑被摧毁。

一周后的1945年8月15日，不愿意再赌美国是否还有第三颗原子弹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006年8月6日，日本的广岛举行了纪念核爆61周年的仪式。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亲手撞响了“和平钟”。他说：“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不断地告诉国际社会自己的经历。”

而就在同时，日本的不少地方在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修改和平宪法，忘记了日本过去惨痛的教训。

有责任告诉国际社会自己的经历，那么是否也有责任告诉国民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200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东京，一个人去了一次靖国神社。

我想看看，从小到大报纸上提到的靖国神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出了地铁口，在靖国神社旁，我看到一名男子，手里拿了一块写了字的纸板，不断向过往的行人展示。

我不认识日文，但我认得上面写的汉字：“南京大屠杀，中国的谎言！”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感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我们都无法摆脱日本动漫和文化给我们留下的烙印；去了日本之后，也亲身感受了日本人可怕的素质和敬业精神。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美食，可以说，日本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

但另一方面，日本右翼的所作所为，就像一根鞭子，不断地刺激着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在靖国神社里的一家书店，我随手翻了一本漫画。那是一本画风非常柔美的漫画。一名日本男子，“二战”时响应天皇号召，加入了日本空军。他驾驶着“神风特攻队”的飞机，最后一头撞向了美国的一艘巡洋舰。火光爆燃中，这名飞行员微笑着化成了一只仙鹤，飞向了美丽的晚霞。

画风美得让人陶醉，甚至让所有的孩子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妙的

事。

2014年7月28日，美国老兵西奥多·范·柯克逝世，享年93岁。他是“广岛原子弹”投掷机组最后一名逝世的飞行员。

他临终的态度是：不道歉，不后悔。

刺杀汪精卫

一名曾经被全国敬仰的刺客，却在自己的后半生中频频遭遇刺客，这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1

1935年11月1日，南京，湖南路10号。

这一天，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半，在湖南路10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大会的开幕式已经结束了。

按照惯例，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们要离开大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的门前合影留念。由于人比较多，合影需要分五排站立，大家互相谦让，互相换位，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坐在第一排的，是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这些国民党内的大佬，而正中的位置，空着。

那个位置，是属于蒋介石的。

人群站定，但蒋介石一直没有出来。

应该坐在蒋介石身旁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决定进去请蒋介石出来。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走了出来，身旁并没有蒋介石。

人群一阵小声议论。

汪精卫向大家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蒋委员长身体忽然有点不舒服，就不参加合影了，我们自己拍就行了。

镁光灯闪过，摄影很快就完成了。大家纷纷转身，准备进礼堂的时候，一个人突然从记者人群中跳了出来，大喊一声：“严惩卖国贼！”，然后从大衣中掏出手枪，朝拍照的人群连开三枪。

一阵惊呼中，汪精卫倒在了血泊之中。



湖南路10号。该楼民国时期先后为江苏省谘议局、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等机构的所在地，现为江苏省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2

汪精卫倒地，众人才反应过来：有刺客！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当时站在第一排的国民党元老张继。

在众人还在慌乱的时候，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第一个跳了出来，拦腰死死抱住了开枪的刺客。

张继的这个行为让当时在现场的张学良印象深刻。在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回忆录中，他这样说："这个张溥泉（溥泉是张继的字）他怎么这么大胆子，那家伙拿着枪，他那个枪没有子弹了，有子弹他就把张溥泉打死了。"



张继

第二个反应过来的，就是当时站在第三排的张学良。他在回忆录中提到：

“哎哟！这张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帮他忙去了。我从前学过武，学过一点，不是学得很好，我就上去对凶手先给个绊脚，啪！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了他身上。”

第三个反应过来的，是汪精卫的卫士。卫士掏出枪，对着刺客开了两枪。张学良后来对他这个举动充满怀疑：“这是汪精卫的一个卫士干

的，打他一枪，踢他一脚。本来我们要把刺客抓住，因为这个差点儿没把张溥泉给打死，这个家伙过去就给他一枪。我说你怎么回事？张溥泉都抓住他了，你还给他一枪，你把他打死？我非常怀疑这个人，当时我在报告里说我怀疑这个人。要查处这个人，我说都要活捉了，你还打他干什么？”

这时候，偌大个场地，人都跑光了，连警察也跑了，只剩下张学良他们这几个人。

之后，看到刺客被擒，人又陆陆续续跑了回来。听到枪声，蒋介石也在护卫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这时候也冲了过来，抱住在血泊中的汪精卫，哭着对蒋介石说：

“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此时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救活那个刺客！

3

当时负责抢救刺客的，是中医院的院长刘月衡。

按照张学良的回忆，当时刘月衡和刺客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你不要误会，别怀疑我，我是医院的院长，我不是跟你过不去的，是医生，是给你治病的。你现在不能活了，明天你就要死了。”

“死就死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问问你，你死了你家人怎么办？家里有什么人，谁给你收尸？”

“我没有什么人。”

“那你老婆呢？”

“我干这个还要老婆啊？”

“你姓什么？”

“我死了你随便给我扔哪儿，叫狗吃了算了，我家没人。”

这个垂死的刺客，思路清晰，口风很紧。

为了留个活口问出些什么来，蒋介石下令每小时给刺客注射强心剂——这是极其损害身体的，但那时候，蒋介石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过，凭借当时进场的通行证，刺客的身份还是很快被查出来了：他叫孙凤鸣，是南京晨光通讯社的记者。

4

作为一名记者，孙凤鸣为什么要刺杀汪精卫？

这还得从他自己的身世说起。孙凤鸣，原名孙凤海，1905年出生于江苏铜山县一个贫苦农家，16岁随父闯关东。“九一八事变”之后，孙凤鸣参加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



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十九路军后来在1933年公然反蒋，史称“福建事变”，后失败

十九路军在国民革命军序列里是一支比较特殊的军队，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是蔡廷锴——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奋起与日本军队真刀真枪干的，就是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要抗日，二是要反蒋。

孙凤鸣在十九路军一路做到代理连长，以枪法准闻名。后来因为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孙凤鸣不愿意去，就脱下了军装。

在放弃从军之后，孙凤鸣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后来被称为民国“百变刺客”的华克之。华克之原来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后来因为一系列事件，走上了反蒋的道路。

1929年，华克之迁居上海，身边聚集了一群包括孙凤鸣在内对蒋介石不满的人，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庆父不死，鲁难未

已。”——他们下定决心要刺杀蒋介石。

没错，其实他们一直想杀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汪精卫。

但要刺杀蒋介石，谈何容易？

思前想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点子——成立一家通讯社。

1934年11月，晨光通讯社在南京陆家巷23号挂牌。社长为化名胡云卿的华克之，身份是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部主任是张玉华，采访部主任是贺坡光，而孙凤鸣，就成了一名记者。

别小看这家通讯社，经过半年多的运作，居然在南京有了“小中央社”的别号。在大家的帮忙下，孙凤鸣也很快成了一位名记者，可以独立进出国民党各大机关、出席各种招待会——这就是他们成立通讯社的目的。

在有了“通讯社”这块牌子做掩护之后，孙凤鸣他们一共策划过三次针对蒋介石的暗杀。

第一次是在1934年12月，当时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那是孙凤鸣第一次携枪采访，但由于当时人群拥挤，蒋介石等政要匆匆退场，孙凤鸣根本就没机会出手。

第二次是1935年春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华克之前去打探，但发现警戒实在太严，放弃了行动。



华克之

而第三次，就是他们得知国民党要在1935年11月1日召开四届六中全会。

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5

孙凤鸣是自愿要求成为刺客的。

其实孙凤鸣当时已经有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妻子，他的妻子名叫崔正瑶。他把妻子送去了香港躲避，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华克之后来回忆，当时孙凤鸣非常坚决，是以“荆轲”来自比的。

而当时，孙凤鸣也是“铁血锄奸团”的成员。他的这个行为，也得到了锄奸团老大的认可和支持，那个老大，就是“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关于王亚樵的故事参见《历史的温度1》中《“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风萧萧兮易水寒。

1935年10月31日，晨光通讯社的全体同仁在酒楼设宴为孙凤鸣践行。孙凤鸣把一支心爱的“派克”金笔送给了华克之——那是他作为记者的随身之物，把这支笔送人，就代表他没打算活着回来。

第二天，因为通行证的问题，孙凤鸣是在开幕式结束前十几分钟的时候，才匆匆进场的。进入会场后，他就进了厕所，从挖空的相机中掏出事先藏在里面的手枪零件，迅速组装完毕，放进大衣口袋，混进了记者人群。

不过，孙凤鸣没等到蒋介石。

蒋介石的警觉性确实很高。当天他看到现场的场面非常混乱，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也有一种说法，说蒋介石对当天参会人员随便着装和没有纪律的场面很不满），随后就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参加合影。汪精卫进去请的时候，蒋介石还劝他也不要出去合影。

因为抱着必死之心，所以孙凤鸣出发前已经服食了大量鸦片烟泡。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所以最终选择向走出来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开枪。

当时孙凤鸣一共开了三枪。第一枪射进了汪精卫左眼外角下颧骨，但这枪造成的伤害不大。第二枪打穿了汪精卫的左臂，问题也不大。



受伤的汪精卫

第三枪是在汪精卫转身想逃跑的时候射出的，子弹从汪精卫的后背射入，射进了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经过几次手术，医生都无法从汪精卫体内取出这颗子弹，最终只能让子弹留在他的体内。

因为孙凤鸣之前的身世一直无人知晓，而晨光通讯社的背景也无处可寻，所以蒋介石当时承受了来自外界的很大压力——作为和汪精卫一直明争暗斗的人，他确实有作案动机。

但是，蒋介石有一万种暗杀汪精卫的方法，绝不会蠢到要在一个合影的公众场合来暗杀他。

汪精卫在第一时间被送往南京中央医院，一同被送过去的，还有重伤的孙凤鸣。

当时蒋介石固然想抢救汪精卫，但他更想抢救过来的，是孙凤鸣。

蒋介石要申冤。

但是，孙凤鸣救不过来了。

由于服用了大量的鸦片烟泡，再加上枪伤，孙凤鸣本身就已经危在旦夕，最关键的是，按照抢救医生的说法：他“没有任何求生意志”。

11月2日凌晨，孙凤鸣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孙凤鸣去世的同时，一场对他“同党”的大逮捕也全面铺开。

晨光通讯社的贺坡光和张玉华虽然早已撤离，但最终还是被捕。包括给孙凤鸣发通行证的国民党官员，以前与晨光通讯社有过往来的人，也通通被捕，前后一共200多人被抓，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被上了酷刑，还有很多人在上刑后被杀害（贺坡光和张玉华虽然受尽折磨，但并未被处死，随着汪精卫后来投敌，两人先后出狱）。

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虽然之前已去了香港，但为了搭救“刺汪”案被捕的朋友，又潜回上海，最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经历酷刑后不吐一字，最终被杀害。

唯一逃出的，是华克之。华克之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战线上的一把好手。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公安部的一个司长。但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十一年，再监督改造十年。“文革”后，华克之被平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奔走，将孙凤鸣当年刺杀汪精卫一事的很多细节公之于众。

1987年，在华克之的奔走下，孙凤鸣被党中央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的家乡铜山县建起了2400平方米的纪念碑园。1988年，孙凤鸣的碑园开园，86岁的华克之赶到徐州，为当年的战友主持揭碑仪式。

在孙凤鸣夫妇的大理石纪念碑上，有着华克之亲自题写的铭文。

致孙凤鸣的夫人崔正瑶的是：真州多佳丽，首推凤鸣妻。轻金重大义，志同始结褵。反对臣日寇，无惧血染衣。死者并非难，处死者难矣。凌迟无一语，闺中千古奇。

致孙凤鸣的是：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心向知音决，泪为生民挥。言重季布诺，技胜张良锤。精卫非精卫，替死此魑魅。功败于垂成，千古共心摧。

7

最后，说说孙凤鸣当时的第三颗子弹。

那颗子弹，一直留在汪精卫的体内，每逢阴雨天，就隐隐发痛，使得汪精卫非常痛苦。

1943年，受尽折磨的汪精卫终于通过手术将那颗子弹拿出，却因手术压迫脊椎神经，下肢几近瘫痪。1944年1月，61岁的汪精卫病倒，送往日本做脊椎手术失败，最终在高烧昏迷中逝世。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有很多猜测，但目前世人较多采信的，还是他死于“多发性脊骨肿瘤”——就是由那颗长年留在脊柱里的子弹引发的。

馒头说

汪精卫的一生，经历过三次“刺杀”。

第一次刺杀，是1910年，27岁的他舍命刺杀摄政王载沣，那次刺杀使他名动中国，成为那个时代的“头号网红”。

第二次刺杀，是1935年，就是被孙凤鸣刺杀的这一次。这次刺杀，埋下了最终导致他殒命的病根。

第三次刺杀，是1939年，也是被刺。在越南的河内，戴笠派去的军统特务刺杀失手，误杀了汪精卫的政治秘书曾仲鸣。经此一刺，汪精卫恐怒交集，从此一去不回头，奔向汉奸之路。

关于汪精卫这个人，这里就先不多说什么了。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后被关入监狱，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我想稍微改一下其中的两句，权作本文的结尾：恨不引刀成一快，末了终负少年头。

料得年年断肠处，不敢忆，长津湖

在朝鲜战争里，长津湖战役是我最不愿意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太惨烈，太惨烈。

1

1950年11月26日。

奥利弗·史密斯身处朝鲜零下3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心情却有些烦躁。

作为美军王牌陆战一师的师长，史密斯始终无法平息内心的烦躁。这种烦躁，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势如破竹，一路向北，反而显得越来越强烈。

1950年9月15日，就在北朝鲜人民军眼看就要将南朝鲜和驻韩美军逼入大海的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惊天冒险一举成功——美军从仁川成功登陆，将高歌猛进的北朝鲜人民军拦腰一切两段，已经拼到最后一口力气的人民军遭受重创，溃不成军。

9月末，“联合国军”顺利收复了之前被南朝鲜轻易丢掉的首都汉城；10月初，“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攻入北朝鲜境内；10月20日，“联合国军”攻陷北朝鲜的首都平壤，人民军主力基本上全军覆没。

麦克阿瑟向美军士兵们发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指示：

“赶到鸭绿江，全都可以回家。我保证说话算数，你们能够同家人共进圣诞节晚餐！”

但是，一个令美国人担心的消息，被证明渐渐成为了事实：中国人派军队入朝了。



美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

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24日，史密斯的陆战一师进占柳潭里。柳潭里，位于长津湖畔，基本处于美军整个战线的最北端，已经接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了。

史密斯心中那种莫名的烦躁，随后就找到了原因。

驻守柳潭里的陆战一师7团，抓到了三名中国士兵。从中国士兵的口中得知，他们属于第20军——一个完全不在美军掌握中的新部队番号。

但随后中国俘虏带来的口供更让人心惊：

至少有两个中国军级建制以上的部队，要开始进攻美军陆战一师，同时，还有中国军队将攻击下碣隅里——那是陆战一师在南边的退路。

中国军队居然准备围歼陆战一师？！

陆战一师，成立于1941年，是一支海陆两栖部队，一路经历了太平洋战场瓜岛、冲绳岛等炼狱般的血战，齐装满员2.5万人，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堪称王牌中的王牌。

围歼陆战一师？按史密斯估计，中国人至少要准备10万军队才敢这么说。

但这10万军队的调动，需要多少辎重部队？在朝鲜白雪茫茫的大地上，美军的侦察机根本就没发现中国大军团的运动痕迹，难道到时候他们都从地底钻出来？

在捕获了中国军队的俘虏之后，史密斯觉得自己烦躁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会估计错误，应该是中国人疯了。

2

但史密斯确实是估计错了。

当他拿着望远镜观察冰天雪地的平原时，他没有发现，真的有数万中国的士兵，正潜伏在北风呼啸的雪原之中。

第一批进入朝鲜境内的，是志愿军第四十二军。在黄草岭一带，四十二军与韩国的陆战三师交上了火。但自始至终，麦克阿瑟始终不相信中国人会——或者他们敢——派大部队入朝。

麦克阿瑟最初认为，中国最多会派出不超过两个师的志愿军，后来上升到6个师——这已经达到麦克阿瑟想象力的极限了。

但史密斯不知道的是，他的陆战一师此刻面对的，是中国华东野战军中最精锐的九兵团，兵团司令宋时轮，下辖二十、二十六、二十七三个加强军（与一般的“三三制”相比，加强军有4个师，每个师下辖4个团，每个团甚至下辖4个营）共12个师，总共15万人。

按照原先的计划，九兵团一直在福建一带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收复台湾。但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打乱了中国的全盘计划，在苏联不愿出兵的前提下，中国经过激烈的内部争辩，决定暂缓攻台，派志愿军入朝。

由于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进展过于顺利，战线一路拉长，再加上先入朝的四十二军有意且战且退诱敌，围歼美军的时机已经初步出现。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在福建备战的九兵团，在11月10日被紧急通知入朝。

兵贵神速。宋时轮的九兵团在第一时间入朝，但也造成了一个大问题：虽然“满员”，但不“齐装”。



开国上将宋时轮。当时九兵团不少士兵连棉帽也没有配发，戴的是宋时轮这样的大盖帽

由于时间紧迫，久居江南的九兵团战士原定在沈阳换冬装的计划也被压缩，十几万志愿军穿着南方的单薄棉衣，就准备入朝了。

当时经过边境线时，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晋年看到九兵团战士身上的棉衣（并不是纯粹夏装，只是不是北方的御寒的大棉衣，当时南方的棉衣棉花含量非常少），大惊失色："你们这样入朝，别说打仗了，冻都能把你们冻死！"

当时，贺晋年立刻把库存的数万件日军棉大衣和棉鞋拿出来分给九兵团战士，由于时间紧迫，很多东北边防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直接就在车站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棉裤，给九兵团的官兵换上。

但由于时间实在太紧，除了最后一批入朝的二十六军换上了一些冬装，大部分的九兵团士兵，有的分到一件棉衣，有的分到一条棉裤，但更多的就是穿着单薄的衣裤，戴着根本就不能抵御风寒的大盖帽，脚踏单薄的胶底鞋，进入了北风呼啸的朝鲜。

入朝的第一周，九兵团就遭遇了朝鲜50年不遇的寒流——那些刚刚从15摄氏度的南方过来的战士，立刻感受到了零下20摄氏度的冷酷。

与美军每名士兵都有一件大衣和一个鸭绒睡袋不同，九兵团每个班十几个战士，只能分到两三床棉被。一入夜，战士们就把棉被铺在雪地上，然后十几个战士躺在上面，抱团取暖。

入朝第一周，二十军一个师就有700多名士兵因为严重冻伤而失去战斗力——志愿军还不知道，严寒的天气接下来会成为他们最大的噩梦。

即便是这样，十多万人的九兵团夜行晓宿，居然就在美军侦察机的眼皮子底下，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指定位置。美国的著名军事评论家约瑟夫·戈登后来感慨："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军队的强行军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



行军途中的九兵团

但其实美国人也是后来才知道，长津湖战役其实应该是11月25日就发动的——因为天寒地冻，减员过多，宋时轮的九兵团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两天才全部进入长津湖畔的攻击位置。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发源于草鞋岭，位于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最后一路向北，注入鸭绿江。

11月27日，它将因一场炼狱般的血战被载入史册。

3

1950年11月27日，夜，22点。

气温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以下。

几乎每一位后来从柳潭里撤退的美军官兵，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夜的恐怖经历：

一种非常刺耳的军号声忽然响了起来，山谷里面忽然枪声大作，伴随着四面八方传来的“沙沙”声——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中国军队单薄的胶鞋踩在雪地里的声音。

很多美国官兵在那一刻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平原，白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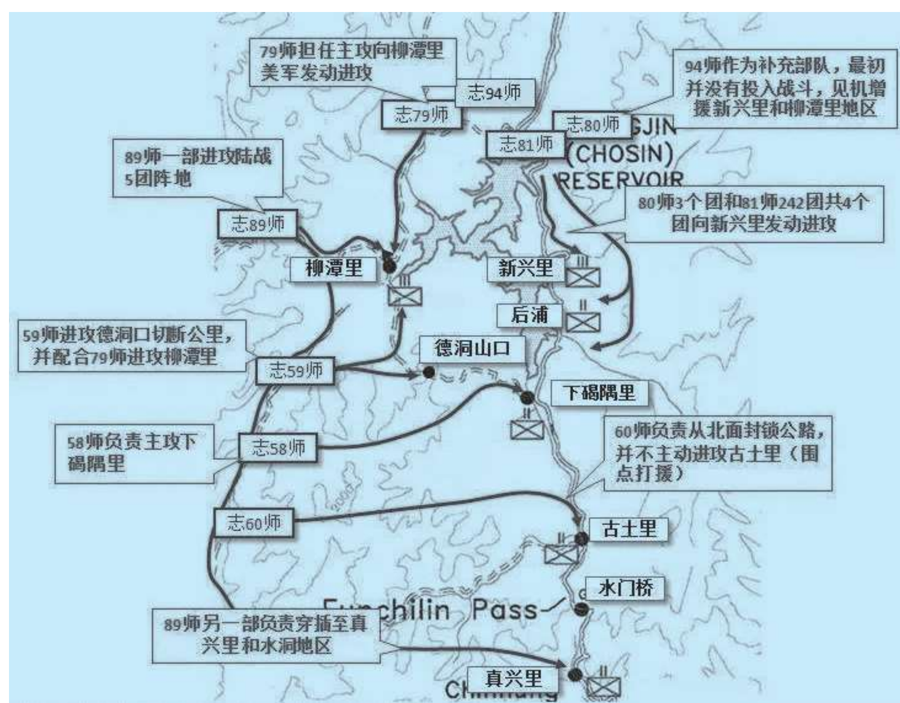
还是白雪茫茫的一片，那些中国士兵听到冲锋号后，忽然穿着单薄的衣裤，从雪地里一跃而起，怒吼着向自己冲来——他们到底是不是和自己一样的人类？

但美军不知道的是，当冲锋号吹响的时候，很多志愿军战士在埋伏处一动不动，再也没有站起来——他们直接都被冻死了。

到了28日早晨，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发现了一个让他惊骇的局面：一个晚上，从地底里冒出来的10多万中国军队，把美军陆战一师和陆战七师，在柳谭里、新兴里、古土里和下碣隅里等地，从北向南，分割包围成了5块！

但在中国志愿军方面，却也没有什么可乐观的——真正交上手，中国军队才发现，美军哪里是“纸老虎”那么简单。

以柳潭里的战场为例。3个志愿军师试图围歼美军陆战一师两个团——这种“包饺子”的打法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是驾轻就熟的。



长津湖战役九兵团攻击态势图（图片来源：铁血社区）

但打了一晚，根本打不下来。

首先，美军陆战一师不愧是王牌部队，从最初的慌乱中恢复过来后，立刻利用坦克组织起3个环形阵地，利用具有绝对优势的火力，用榴弹炮和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网，射杀前仆后继冲锋的志愿军战士。

其次，与美军相比，志愿军的火力就实在差太多了：

美军的一个陆军师，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

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中国军队入朝时从各部队多方抽调器材，才使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备到营，营以下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等。

美军运输全部实现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三十八军拥有汽车100辆，二十七军只有45辆。

单兵火力方面，志愿军每个排只能分到一挺轻机枪，每个班只能分到一把冲锋枪，其他士兵大多拿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正式”步枪和缴获的日本“三八大盖”，甚至还有士兵在用晚清名臣张之洞当年兴办的汉阳兵工厂设计制造的“汉阳造”。

至于重武器方面，志愿军配备最普遍的就是轻型迫击炮——但在朝鲜接近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很多炮弹打出去都成了哑弹。炮兵们看着哑弹就不停地哭，因为他们看到，没有火力掩护，拼命向前冲的步兵战友们只能成为美军的活靶子。

再次，志愿军从来没有和美军交过手，也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强大的火力。很多原先在解放战争中屡试不爽的攻击队形，在美军的严密火力网面前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甚至出现过一整个营呈战斗队形全部阵亡在美军阵地前的情况——短时间内他们就被快速射杀了。

长津湖的黑夜属于志愿军，白天属于美军。

因为美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一到白天，就会出动大量飞机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围攻柳潭里一夜，志愿军虽然成功形成了包围态势，却因伤亡惨重，无力进攻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史密斯终于完全清醒了过来，他咒骂着第十军指挥官阿尔蒙德坚持要求陆战一师“向前进攻”的命令，开始准备撤退。

11月30日，在坚守了两天之后，史密斯终于正式下达了撤退命令——他知道，再不走，就真的要被全歼了。

在撤退时，史密斯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

“见鬼！我们不是在撤退！我们是在换个方向进攻！”



撤退途中的美军

4

面对南撤的美军，志愿军开始了艰苦的阻击战。

从柳潭里经下碣隅里的崎岖公路，成了中美两军绞杀的修罗场。

白天，凭借飞机和坦克的掩护，美军猛打猛冲，拼命向南突围，晚上，志愿军趁着夜色反突击，把白天丢失的高地和阵地再抢回来，然后在天亮后，用血肉之躯阻挡美军的进攻。

战斗最激烈的一天，美军一整天只撤退了500米。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美军的士气也极为低落。战斗间歇，一位美

军记者问一个正在用刺刀从冻硬的罐头里挖蚕豆吃的陆战队士兵："如果上帝能够满足你的一个要求，你最需要什么？"

那个士兵头也没抬地回答："给我明天吧"。



雪地里修整的美军

但是，志愿军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一位叫海洛德·摩尔豪森的美军下士，曾这样回忆撤退途中对志愿军一座阻击山头的进攻："出乎意料，攻山的战斗并不激烈。山上的志愿军没组织什么有力的抵抗。他们的火力分散，而且多是近距离射击，对我们的攻击部队没有多大阻击力和杀伤力。他们的弹着点和手榴弹只落在几个地方。只要你绕着走，就可以完全避开志愿军的火力。他们也没有重武器和火力点，我们团仅以很小的伤亡，就攻到山顶，占领了志愿军的阵地。

"一到山顶，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小小的山头上到处是死亡的中国士兵，大约有一二百具志愿军的尸体。每走一步都会踩到尸体。我从来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的死人。我的上帝，真是恐怖极了！我们攻击时并没有这么激烈的战斗，不会造成中国军队这么大的伤亡。他们好像大多是在空袭和炮击时被炸死的，尸首不全，肢体四散。

"但是班长根据他们铁青的肤色和无血的肢体推断说，很多志愿军士兵在我们的空袭和炮击前已经被冻死了。有些尸体三三两两地抱在一

起，可见他们是想借同志的体温维持生命。他们都是身着薄衣、薄裤、单鞋，没有棉大衣。难道中国志愿军不知道朝鲜的严寒气候？他们有军火供应，却没有过冬准备？要不是冻死、冻伤这么多的志愿军，那一二百具尸体就可能不是中国人的，而是我们美军陆战队的。”

战场上是严寒，战场下，还有严寒之后的严重减员。

由于九兵团的兵大多来自江浙沪地区，没有什么防寒防冻的经验，冻僵的手脚直接放在火边烤着取暖，造成大量的冻伤和截肢。

原志愿军第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六团一营机炮连指导员陈兰风回忆：“当时一连连部和我们连部住一个房子，一连一个通信员，上衣、裤子都冻硬了，那时不懂冻坏了不能烤，反而让他上炕里边，因为坐里边暖和。烤了一阵，他要脱鞋——在上海发的翻毛皮鞋脱不下来，他一使劲，连袜子带腿腕子上的肉皮一起给脱下来了——后来他被锯掉了一条腿。”

原志愿军第二十军五十九师保卫科副科长龚欲民回忆，由于被截肢的志愿军战士实在太多，他曾被派去医疗队“把关”，当时他看到的情景是：

“那里的负责医生听后什么也没说，领我到棚子里看伤员。

“先看了一个：脚穿着翻毛皮鞋，腿是黑的，他把伤员的鞋伸手拿下来——连脚也一起拿了下来，脚就在鞋里。

“又看另一个伤员：鞋子倒是脱掉了，可是他上去握住伤员的脚趾轻轻一掰，那几个脚趾头像是掰红薯一样就给掰了下来。我当时就忍不住流泪了，而那个伤员却感觉不到疼，睁着大眼呆呆地看着我们。

“负责医生没更多解释，只问了一句话：‘你看，要脚还是要命？’”

不仅仅是严寒，还有饥饿。

志愿军入朝时，每人背了一个干粮袋，里面放了六七斤高粱米。等赶到长津湖时，干粮早已吃完，除了吃雪之外，唯一的就是可以啃两个土豆。

但由于不能生火（会被美军飞机当成靶子），志愿军只能生吃土

豆。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里，土豆都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了。战士们只能把土豆夹在腋下捂暖，软一层，啃一层，放到嘴里去抿暖，然后下咽。

长津湖战役打到12月初，对志愿军来说，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有。

好消息是，在长津湖的东线，经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九兵团二十七军八十师终于全歼了有“北极熊团”之称的美七师三十一团——这是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唯一成建制歼灭的美军部队。

坏消息是，九兵团在整个攻击和阻击战斗中损失巨大，虽然已经竭尽全力，但还是眼睁睁看着美陆战一师退回了下碣隅里。

5

下碣隅里，是美陆战一师的师指挥部所在。

下碣隅里是个小镇，地处要冲，是美军撤退路线的必经之处，那里还有一个简易机场。

其实早在11月27日，宋时轮就下达了同时攻击下碣隅里的命令——如果得手，美军陆战一师的后路将完全被切断。

但负责主攻的第二十军五十八师，用了一张从日本人那里拿到的错误地图，迷了路，到28日拂晓才赶到下碣隅里。此时在下碣隅里的美军因为已经得到了中国军队全面进攻的消息，做好了战斗准备。

五十八师还是在冰天雪地的28日夜间，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和柳潭里的战斗一样，虽然志愿军战士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和勇气，但在天气条件以及美军压倒性火力优势的打压下，进攻惨烈，进展缓慢——经过一夜的激战，志愿军只是抢下了下碣隅里东面高地。

但即便如此，这块高地可以俯视下碣隅里防御阵地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天一亮，美军就组织了大批士兵开始反攻。

守卫东面高地的，是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的一个排，亲自带队上阵地的连长，叫杨根思。

每个战士上阵地前，兜里除了塞了三个硬邦邦的冻土豆，其余地方

都塞满了手榴弹。

天亮后，美军开始炮火准备，飞机也开始对高地进行地毯式轰炸。

没有任何防空设施和反击能力的中国士兵，只能蜷缩在一切可以躲藏的地方，忍受炮火的攻击，互相呼喊战友的名字，确保对方还幸存。

炮火和轰炸结束，美军开始向高地冲锋。

奇迹般地，在不可能还有生命生存的高地上，站起了一排颤颤巍巍、摇摇晃晃的中国士兵，他们举起已经拉开引线的手榴弹，雨点般地朝山下扔去。



杨根思。后来三连就一直命名为“杨根思连”

美军一连几次冲锋，都被打退，而高地上，也只剩下3名志愿军战士了——杨根思，一个排长，还有一个负伤的战士。

杨根思强制命令排长带着负伤的伤员撤下高地去向营长报告，自己一个人留在了阵地上。

又一轮美军的冲锋开始了。

当美军发现已经没有枪声响起，可以望见高地山顶的时候，一个中

国士兵忽然从尸体堆中站了起来，他迈着几乎冻僵的腿，抱着一个炸药包，冲向了举着海军陆战队队旗的那群美军士兵。

一阵惊呼，一声巨响，一片片队旗的残片，以及，各种残破的四肢。

12月1日，几乎已经打残的志愿军第五十八师，集结了最后仅剩下的1500名战士，做了最后的决死进攻，但面对牢固的美军环形阵地，很不幸，还是失败了。

同日，在下碣隅里的美军简易机场在短短的时间里搭建完成，通过飞机运输的高效率撤退开始。

长津湖一战，志愿军扎住的口袋，最终还是破了。

6

从下碣隅里到古土里，各路撤退的美军，最终集结到了一起。

考虑到古土里比下碣隅里还要小很多，那么多美军挤在一起是件很危险的事，史密斯下令继续南撤——经真兴里到兴南港，从海上撤退。

从古土里到真兴里，直线距离只有11公里，但海拔高度差有730米。

在陡峭的山麓上，只有一条仅能供一辆车通行的单车道公路，这条公路边上有一个高地，叫1081号高地。

谁都知道，占领1081号高地，就可以封锁美军最后的退路——志愿军早早就派出部队，占领了那个高地。

但轮到美军进攻的时候，却没费什么大力气，只投入了一个营，就攻下了这个高地。

时任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连的指导员邹世勇，回忆起后来部队去公路沿线的高地阵地时看到的情景，说自己一生难忘：

“我上去一看，发现这是二十军的部队，带着大盖帽，拿毛巾把耳朵捂起来，穿着胶鞋和南方的棉衣。

“每一个战士都蹲在那个雪坑里面，枪就这样朝向那条公路。我想去拉一拉，结果发现他们一个个都硬了，他们都活活冻死在那个地方了，一个连。他们不是被打死的，是冻死的，枪都朝着公路。这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严寒的天气，连让志愿军战士拼死阻击的机会，都没有给。

九兵团有史记载的有三个连队，成建制地全员冻死在阵地上，他们分别是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二营六连、二十军六十师一八〇团一营二连和二十七军八十师二四二团二营五连，他们以战斗队形在自己的阵地上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成为悲壮的“冰雕连”。

何止我们的官兵，很多美国士兵，对此都留下了让他们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照明弹下，中国士兵一群一群地从树林里冲出来，他们在树林里不知躲藏了多长时间，树林边有条小河，10多米宽，河水不深，河上的冰已经被我们的炮火炸碎了，河水冒着水汽在缓缓地流淌。

“中国士兵正在蹚水过河，上岸后，他们的两条裤腿很快就被冻住了，他们跑得很慢，因为他们的腿被冻住了不能弯曲。我们的火力很猛，他们的火力很弱，而且没有炮火掩护，枪好像也被冻住了。他们像僵硬的原木在移动……”

7

拿下1081号高地后，陆战一师的全员撤退只剩下最后一道障碍：水门桥。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5.6公里，宽度仅8.8米，底下是万丈深渊。水门桥是美军陆战一师撤退道路上的必经之路，所有的人员、车辆、坦克，都要经过这座大桥。

中国军队当然知道这座桥对于美军撤退的意义，所以在12月1日，就派工兵把桥给炸毁了。

但两天之内，美国的工兵就修出了一座木头桥。

12月4日，志愿军再次派工兵炸毁了刚修好的水门桥。随即，美军

的工兵部队又在最短的时间里架设了钢制的M2车撤桥（由钢制和木制车辙板组合而成，可以架设起30米至50米跨度，可通行40吨的M26坦克）。

志愿军再次派出敢死队，第三次炸毁了水门桥——这一次，连桥的基座都被全部炸毁了。宋时轮认为，美军再无可能通过水门桥了。

但是，美军随即派出了8架C–119运输机，空投了8套每套1.1吨重的架桥钢材和所需木材，在短短的时间里又重新架起了一座新桥。1000多辆车辆、坦克，10000多名士兵，最终都从这座从天而降的桥梁上安全通过。

不是志愿军没有认识到水门桥的巨大战略意义，而是——美军的现代化工业水平，已经超出了当时中国军队的认知极限。

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出兵朝鲜前，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军虽然强大，但我们占有“地利优势”。

所谓“地利”，就是我们和朝鲜只隔了一条鸭绿江，但美军是不远万里来作战。

但一场朝鲜战争打下来，中国军队从上到下，亲身经历了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地利”优势，在现代化军事科技打击下的孱弱：

在制空权方面，美军依靠7艘航母上的500架舰载机，在战争初期牢牢控制了朝鲜战场的天空（后来苏联空军秘密参战，情况有所好转）；

在后勤方面，中国军队虽然背靠东北基地，却因为补给线被美军狂轰滥炸，连一个冻土豆也很难啃上，而美军在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大餐，不仅有火鸡、馅饼、苹果派等各种食物让所有士兵吃撑，军官的席位还都有手写的席卡。他们在撤离下碣隅里时，通过推土机和炸药，销毁了几千吨空投多余的食品物资；

因为天气和美军轰炸的原因，志愿军的伤兵很难送到后方医院得到及时救治，最多的冻伤士兵，就是在战地医院现场截肢。而美军的受伤官兵，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通过飞机送到东京医院的手术台上进行外科手术。



虽然天寒地冻，但美军的防寒装备比志愿军好太多。朝鲜一战，中国军队第一次深刻认识到了“后勤”对现代战争的重要意义

长津湖一战，打出了志愿军的勇气和信念，但也确实让志愿军学到了很多：现代化的战争，除了决死的勇气，决定胜负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多。

8

1950年12月25日，是麦克阿瑟许诺美军士兵结束朝鲜战争的圣诞节。

这一天，志愿军全面进入美军最南面撤退的基地——兴南港，在此之前，突出重围的美军，一共从兴南港用船只运走了超过10万名士兵和10万平民，1.75万辆车辆以及3.5万吨物资。

毫无疑问，志愿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对试图北进的“联合国军”迎头痛击，全面驱逐了号称要“饮马鸭绿江”的美军，让所谓的“圣诞节攻势”成了一个笑话。

但美军也认为自己创造了奇迹：在数倍于己的敌人面前，几乎全身而退，保留下了最大的战斗力。

接下来，就是令人不忍直视的伤亡数字了。

根据美军战后公布的资料，陆战一师从10月26日至12月15日，阵亡604人，伤重死亡114人，失踪192人，伤3508人，战斗伤亡总数为4418人，另有7313名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冻伤和消化不良。如果加上陆战七师和韩国军队，整个伤亡和减员数字大概在14000人左右。

中国方面，根据1988年公布的官方资料，长津湖东线的九兵团战斗死亡7304人，伤员14062人，冻伤伤员30732人（没错，伤亡人数加在一起还没冻伤伤员多），总减员52098人（据《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生勤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1988年3月第1版，第327页）。

而根据《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一书的数据，长津湖一战，光冻死的志愿军战士就有40000多人，战死1.1万人，合计减员56000多人。

9

1952年9月，九兵团奉命从朝鲜回国。

车开到鸭绿江边，兵团司令宋时轮要司机停车。

下车后，宋时轮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弯腰，深深鞠躬。

抬起头来时，头发花白的宋时轮泪流满面，不能自持。

馒头说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双方，都几乎不怎么提“长津湖”。

几年前有消息说，美国方面投资1亿多美元，准备投拍一部讲述长津湖战役的电影《严寒17日》（*17 Days of Winter*），说是2010年开拍，2013年上映。可现在都2018年了，却一点消息都没（我上网搜了一圈，有说法是拍到一半，停拍了）。

中国方面，近几年因为各种原因，“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少了，远一些的，有《英雄儿女》《上甘岭》《奇袭》等，但也都没涉及过“长津湖”。

这确实是一场两边都不愿提起，甚至都不敢回忆的炼狱之战。

美国方面当然可以说自己创造了奇迹。但在陆战一师的战史上，从来没有连续撤退125公里的历史，而且整个美军圣诞节前挺进到鸭绿江边的计划，可以说是被中国人撕得粉碎。

而中国方面，从战略上可以说是胜利者，但总结到战术层面，可以检讨和吸取教训的地方实在太多，尤其是3万多的冻伤减员，实在是值得反思。

所以，网络上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也没必要去拍“长津湖之战”，一来这一战中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便宜，二来对整个朝鲜战争，现在也有各种声音。但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你不能以现在的存在去评判60多年前的事，那个时候，谁知道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

所以，我觉得不拍也没啥，拍了，我肯定也会买票去看。

我希望，如果长津湖之战以后能拍成电影，最好能体现两点：

第一，能让观众认识到战争真正残酷的一面（不是说要用血腥画面），认识到和平的可贵。

第二，能让那些志愿军战士得到我们应有的尊敬和纪念。

6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无论你愿意怎样争论，志愿军战士都绝不应该是轻描淡写的一句“炮灰”，也不是什么为了“一将功成”而枯的“万骨”。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们是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儿子、孩子的爸爸，他们确实是抱着“保家卫国”的信念，踏上异国冰天雪地的战场的。

当年他们为国出征，今日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愿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的在天之灵，都能安息。

附：

如果你对朝鲜战争感兴趣，推荐三本分别从三个视角看朝鲜战争的书：

中国人的视角：《朝鲜战争》（王树增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国人的视角：《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美]大卫·哈伯斯塔姆，重庆出版社）

韩国人的视角：《最寒冷的冬天II——一位韩国上将亲历的朝鲜战争》（[韩]白善烨，重庆出版社）

一个传奇女间谍的“七重面纱”

这是关于一个女间谍的故事，事实上，她到底是不是间谍，到底做了谁的间谍，还没人说得清。但这也是她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的原因。

曾经有一个“世界十大女间谍”的排行榜。

那张榜单里，有9个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名，只有一个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人熟知，这个人就是玛塔·哈丽。

所以，玛塔·哈丽被称为“女间谍鼻祖”。

1876年8月7日，玛塔·哈丽出生在荷兰北部的一个小镇。她原名叫玛嘉蕾莎·吉尔特鲁伊达·泽利，为了方便，我们还是叫她后来被广为人知的名字：玛塔·哈丽。

玛塔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印度尼西亚人，所以她是东西方的混血儿。应该说，玛塔的家境本来还算不错，父亲是个农场主。但后来父亲生意失败，父母离异。之后，15岁的玛塔来到师范寄宿学校，但美貌的她不久就被校长强暴。

玛塔19岁时，无奈开始了一段婚姻，她嫁给了一名41岁的荷兰海军军官。



拥有混血儿气质的玛塔·哈丽

这个酗酒的海军军官给玛塔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他玩弄女佣却不愿意负责，导致女佣把玛塔的儿子毒死了。

如果说丈夫曾给玛塔带来过什么，就是带她去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驻扎，在那里，玛塔学会了一种神秘的“神湿婆舞”。

总而言之，绝望的玛塔最终决定离开家庭。28岁的她孤身一人来到巴黎，除了姣好的面容和傲人的身材之外，一文不名。

但巴黎改变了她的命运。



玛塔和她的唯一一任丈夫

玛塔·哈丽一开始是在一个马戏团做骑师，同时也兼职做艺术模特，艰难维持生活。

为了能够赚更多的钱，有一次，玛塔·哈丽决定在一位巴黎剧院经理的面前，表演一段“神湿婆舞”。

剧院经理立刻被这种散发着神秘东方气息的艳舞吸引了，当即拍

板，决定录用她，并为她起名“玛塔·哈丽”。



穿着舞服的玛塔·哈丽

这个名字，在梵语里意为“神之母”，在印度尼西亚语里，意为“黎明的眼睛”。

1905年3月13日，玛塔·哈丽在巴黎的吉梅博物馆进行了首次演出，那种东方式的神秘诱惑舞蹈，轰动了整个巴黎。当时的《巴黎人报》评价：“只要她一出场，台下的观众就如痴如狂。”

玛塔把“神湿婆舞”重新做了改编，取名“七重面纱”。自那以后，玛塔·哈丽就成了那个时代的“超级网红”。

只是不知是喜是悲。

因为战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为它服务的人。

1914年，改变玛塔·哈丽命运的一年终于到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可参见“馒头说”《一场莫名其妙的世界大战》）。

在战争爆发前夕，德国人就盯上了玛塔·哈丽，因为她结识了很多法国上层的权贵和政治家，可以打听到很多内部消息。当时玛塔·哈丽正在德国巡回表演，德国人找到了她。

据说，德国人先花了两万法郎，说服玛塔·哈丽做他们的间谍。玛塔·哈丽很快展现出了她的社交天赋，开始源源不断地为德国人送去情报。按照法国人后来的说法，让法国军队蒙受了巨大损失。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玛塔成为德国人间谍的事情，被英国的情报工作人员发现了。

作为协约国的同盟，英国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法国情报部门二局的反间谍部门，负责人拉杜上尉做出了一个决定——找到玛塔·哈里，让她成为双面间谍，从德国人那里套取情报。

无法证明，拉杜上尉这种做法是秘密行动还是个人行为。

但是玛塔居然也答应了。随后玛塔展现出了作为一名间谍的惊人天赋，游走于德国的高官之间，开始给法国人提供大量情报，让德国又遭受了巨大损失。



名媛装扮的玛塔·哈丽

1917年，玛塔“玩火”的日子走到了尾声。

在一次西班牙巡演中，法国情报部门截获了德国情报部门发出的一封电报：“通知H21速回巴黎，并支付1.5万法郎费用。”

而巧合的是，玛塔这时就突然中断了在西班牙的演出，匆匆返回了法国。法国情报机关认为，H21就是玛塔·哈丽，他们决定逮捕她。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人用的是一套他们知道法国人早已破译的电码。所以后来史学家推断，很可能是德国人想借刀杀人，借此除掉玛塔·哈丽。

1917年2月13日，玛塔·哈丽刚刚入住巴黎的一家酒店，6名警察就闯入了她的房间。据说，玛塔客气地请他们吃了夹心巧克力，然后化完

妆，平静地跟他们走了。

随后她就被投入了监狱。



玛塔被警察带走时41岁

对玛塔·哈丽的审判，引起了全法国的轰动，因为谁都没想到她会是一名间谍。

在审判庭，拉杜上尉反复强调玛塔为德国人提供的情报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却只字不提玛塔曾为法国人提供过大量情报。

2003年，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考勒斯经考证后指出，哈丽虽然收下了那两万法郎，也曾多次引诱法国高级军官上床，可是从未向德军出卖过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玛塔的辩护律师叫克鲁内，据说也是玛塔的情人之一。克鲁内为玛塔的案子四处奔走，甚至修书给法国总统请求免除死刑，但被法国总统拒绝。荷兰首相也通过专门渠道请求法国免除玛塔的死刑，但法国政府依然拒绝了。当初有无数位高权重的人承诺愿意为玛塔献出生命，但是现在，他们都闭口不言。

一个更令后人信服的理由是：在“一战”的前三年，法国人面对德国人处于劣势，总是吃败仗，政府需要给人民一个军队总是被打败的理由。

玛塔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狱中的最后岁月，有两位修女一直陪伴着她。据修女回忆，玛塔开始不断说梦话，反复说三个名字：一个是她那被毒死的儿子诺曼，一个是已长大的女儿简，还有就是她自己的名字。

1917年10月15日，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的玛塔·哈丽，被行刑队带到了一个刑场。

那天，玛塔·哈丽戴了华贵的黑色礼帽，穿了端庄的黑丝礼服，穿了自己最喜欢的红舞鞋。

行刑队员要给她蒙上黑色眼罩，但她微笑着拒绝了。据后来的《巴黎日报》报道，她临行前，双眼一直凝视着埃菲尔铁塔的方向，直到枪声响起。

她写的临终遗言是：

“谢谢，先生。”

馒头说

有一句话叫作：战争让女人走开。

但很多时候，是战争自己找到的女人。

玛塔·哈丽固然也应该为自己的贪婪和玩火付出代价，但换个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就是英法集团和德奥集团为了争夺殖民地而打的一场大战，没有一方是正义的，大家都是为了争夺利益。

而玛塔是荷兰人，对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本来就没什么感情。在这场利益争夺中，玛塔认为自己用迷人的舞步，在刀尖火海中，获取了自己的利益，或是成就感。

玛塔死后，没人认领的尸体被送到了医学院。她的头颅经特殊处理后，保留了生前的样子。

2000年，这颗头颅被人盗走。据说是她的崇拜者所为。

不知头颅上的那双眼睛，投射出的是怎样的眼神。[1]

---

[1] 1931年，著名影星葛丽泰·嘉宝主演影片《玛塔·哈丽》，再现玛塔生平，引起轰动。

川岛芳子：从格格到间谍

对于国人而言，一提“女间谍”，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川岛芳子。其实，川岛芳子一开始的外号，就是“东方的玛塔·哈丽”。

1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上海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上的三友实业社总厂门前，发生了一场骚动。

那一天，以天崎启升为首的5名日本僧人，在三友实业的工厂大门前敲鼓击钟，并向厂内投掷石块。

三友实业社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大规模机器生产的纺织厂，“九一八事变”后，工人们自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天天上班前操练。看到日本僧人在厂门口挑衅，“救国会”的工人们随即走了出来，进行盘查。

就在此时，十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忽然冲入了队伍，对那几名日本僧人用石块又打又砸，造成一名叫水上秀雄的僧人伤重不治而亡。



当时的三友实业社

1月19日，日本驻沪总领事要求上海市政府惩治凶手并道歉。1月20日，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60多人，在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掩护下，冲入了三友实业社的厂房报复，打砸抢烧，还打死一名闻

讯前来的警察。

1月21日，在日本的日侨随后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中国的“抗日暴行”。日本方面要求中国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并要求中国守军全部撤出闸北。

当时的蒋介石军队主力正在江西“剿共”，所以要求上海方面全盘接受要求，忍辱求全。

但就在蒋介石方面全面接受要求的情况下，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分三路向闸北发动全面进攻。负责沪宁地区防卫的第十九陆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

这场事件，被称为“日本僧人事件”，因此引发的战斗，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二战”后，当时的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自供：那些打死打伤日本僧人的人，是他委派的地痞流氓，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嫁祸三友实业社，然后引发“日华冲突”，在上海制造一场焦点战争，进而缓和当时国际上对日本策划“满蒙独立”的关注。



川岛芳子

根据田中隆吉的供述，那些事情，都是他委托一个“和我很亲近的女

子”办妥的，那个女子的名字，叫川岛芳子。

2

往前倒推26年。1906年，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出生。同年，肃亲王善耆有了自己第十四个女儿——爱新觉罗·显玗。善耆给这个小女儿起名“东珍”，意为“东方的珍宝”。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之后，大清黄龙旗应声落地。落魄的肃亲王善耆作为最坚定的保皇派，一直想恢复故国的荣光，由此想到了自己的结义兄弟，日本人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从甲午战争中的一名日本翻译官起家，因为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紫禁城保护得不错，由此结识了肃亲王善耆，后来做到清政府新设的北京警务厅总监督，负责培训清朝送来的警察，风光一时。



爱新觉罗·善耆。当年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被释放，就是他下的令

善耆自己也清楚，凭借清朝的力量，复国已是天方夜谭，最能借助的，就是日本的力量，所以他评价川岛浪速为“他日能一致支持东亚大局之良友”。

而川岛浪速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日本的间谍，他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促成“满蒙独立”，他知道善耆是一颗重要棋子，所以也称他为“非凡之人”。



童年的川岛芳子

如何显示兄弟间的亲善之情？善耆决定，将自己年幼的女儿爱新觉罗·显玗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作养女。

显玗的哥哥，当年11岁的爱新觉罗·宪立后来这样回忆起6岁的妹妹当年离家时的情景：“她去二楼父亲的房间辞行时，身穿中国衣服，头发上系着一条白色丝带，哭着说：‘我不愿意去日本。’母亲一再地哄着说：‘好孩子不要哭。’”

宪立回忆："我至今还不能忘记生母那一天痛苦的样子。"

自那时起，6岁的显玗改了名字，开始叫那个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川岛芳子。

3

但川岛浪速，并没有只是把川岛芳子当作养女。

1912年，6岁的显玗更名为川岛芳子后，随川岛浪速前往日本，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接受严格的军国主义教育。

川岛浪速完全是按照培养一个间谍的方式培养自己这个养女的。在日本，川岛芳子学会了开枪、射箭、骑马，并接受了军事、政治、情报等各方面训练。加上川岛浪速家里本身就是一个日本法西斯主义聚集的沙龙，所以川岛芳子从小就受到了这方面的熏陶。

对政治的高度热情，甚至体现在了川岛芳子的恋爱中。

1924年，已经18岁的川岛芳子亭亭玉立，身边有了不少追求者，其中她比较倾心的，是一个叫岩田爱之助的男子。

岩田爱之助是典型的日本极右翼分子，他主张日本应该立即发兵占领中国东北，利用中国东北的资源，"振兴大东亚"。川岛芳子和岩田爱之助在一起时，两人之间的谈话很少有风花雪月，而是往往以政治为话题。

但这时，川岛芳子身边闯入了一位奇怪的追求者——养父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曾对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父亲肃亲王是位仁者，我是个勇者。我想如将仁者和勇者的血液结合在一起，所生的孩子必然是仁勇兼备。"他希望宪立同意他娶川岛芳子为妾。

但当时已经59岁的川岛浪速采取的追求手段，近乎无耻——他直接强暴了川岛芳子。

那一夜之后，川岛芳子写下了日记："大正十三年10月6日，我永远清算了女性！"

第二天，川岛芳子头梳日本式发髻，身穿底摆带花和服，拍了张少女诀别照，然后就剪了个男式分头，决定与女性身份彻底“诀别”。



少女时期的川岛芳子

但是还有爱人岩田爱之助呢？

也就是在那一年，岩田爱之助决定向川岛芳子求婚。

但岩田爱之助发现，川岛芳子的情绪忽然变得非常暴躁，甚至多次表示：“我不想活了，我应该了此一生。”

一开始还宽慰芳子的岩田最后也恼了，把一把上膛的手枪放到了川岛芳子面前，示意她若真想死，就去死。

川岛芳子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枪，对着自己胸膛就扣动了扳机，惊得一旁的岩田目瞪口呆。好在子弹只是穿过了川岛芳子的左肋，并没有致

命。

自杀未遂后，川岛芳子没有继续选择沉默，而是把养父奸污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全家人。

但是，她没有得到自己期待的结果。

彼时，肃亲王已经去世，川岛芳子的两个兄弟爱新觉罗·宪开和爱新觉罗·宪东也被寄养在川岛速浪家，所以芳子只能写信给国内她最信任的哥哥爱新觉罗·宪立。

宪开的回信是这样的：“现在决不能和川岛浪速公开决裂，希望妹妹一定鼓起勇气生活下去。川岛浪速会做适当反省，设法解决已经发生的事。”

所谓的“解决”，就是川岛浪速把川岛芳子送到了鹿儿岛休养，两人暂时分离。

在鹿儿岛待了三年之后，21岁的川岛芳子断然拒绝了川岛浪速请求她回到身边的要求，只身来到了中国。

她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恢复故国。

4

川岛芳子原先指望的，是一场政治婚姻。

1927年，21岁的川岛芳子和蒙古独立势力首领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在旅顺结婚，但这是一段并没有太大意义的婚姻。三年之后，川岛芳子就不辞而别了。

事实上，川岛芳子早就认识到了蒙古独立势力难成大气候，她当时看上的，是日本关东军。

要得到日本关东军的赏识，是要有投名状的。

川岛芳子瞄准了一个牛气冲天的大人物——张作霖。

川岛芳子的父亲肃亲王善耆，当时是和蒙古独立势力巴布扎布结成“独立”同盟的，但是张作霖是最大的绊脚石，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军事

冲突。1916年林西一战，巴布扎布毙命，肃亲王的“满蒙独立”梦想破灭，一蹶不振，六年后死去。



川岛芳子与甘珠尔扎布的结婚照

所以，川岛芳子其实是非常恨张作霖的。

恰巧因为张作霖一直对日本要求的权益出尔反尔（参见本书收录的《双面张作霖》），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忌恨，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首的一批人，一直在密谋暗杀张作霖。

川岛芳子找到了可以发挥作用的机会。

首先，川岛芳子有一个前清格格的身份，其次，据说她在与蒙古人结婚前，曾是张学良偏房的候选，所以她能相对隐蔽地打入当时奉军的内部。

在试图约见张学良失败之后，川岛芳子用自己的手腕，轻松征服了

张学良身边一个郑姓副官，将张作霖退回关外的列车时刻表搞到了手。

皇姑屯一声巨响，张作霖归西，川岛芳子从此进入日本关东军的视线。

崭露头角的川岛芳子，之后做了三件更加让日本人刮目相看的事。

第一件，是通过各种手段，摸清了张学良手下东北军的所有家底。正因为川岛芳子的情报，所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关东军心里是有点底气的。

第二件，是在日本关东军偷偷把溥仪从天津送到满洲后，川岛芳子想尽办法，把溥仪的“皇后”婉容装在棺材里，也偷偷运出了天津，促成了所谓的“帝后团圆”，为伪满洲国建立出了大力。

第三件，就是本文一开头叙述的故事，她与田中隆吉一手策划了“日本僧人案件”，引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川岛芳子得到了她期待的嘉奖——在“新京”（长春）被任命为“满洲国女官长”。第二年，川岛芳子正式被任命为“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那时她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金璧辉”），安国军则被宣传为“由满洲公主带领的满洲国义勇军”。



穿军装的川岛芳子

当时26岁的川岛芳子，被日本人称为“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5

梦想中的“满洲独立”终于实现了，但川岛芳子总觉得有点不对头。

伪满洲国建立后的两年时间里，川岛芳子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并不是她期待中独立的“满洲国”，而是一个日本势力扶植下的傀儡政权。

川岛芳子开始对日本方面不满起来，甚至公开批评日本的“大陆政策”。有证据显示，当时的川岛芳子，利用个人的权力释放了一些被逮捕的中国人。

日军对此非常警觉，立刻把她送回了日本，并对其监视居住。

当时28岁的川岛芳子，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另一种生活，可能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

但是，她没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川岛芳子立刻又回到了中国的天津，开了一家饭店，那就是当时著名的东兴楼。

川岛芳子在自己生日那天，在东兴楼大摆筵席，遍请在京朝野名流，其中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官翼贤、原奉军实力派邢士廉、“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等。宴会开始不久，川岛芳子就让人抬来一块匾额，上面刻着——“祝川岛芳子生日快乐！——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多田骏”。

全场震惊。

多田骏是当时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和川岛芳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多田骏的“照顾”下，川岛芳子的这家东兴楼成了当时日军在中国的一大情报集散地。

川岛芳子充分发挥自己的交际手腕，在这里接触三教九流，套取各路情报，甚至还搭上过孙中山之子孙科，得到了不少国民党内部的消息。至于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头子戴笠也和川岛芳子有过联系，并且保持沟通，商谈“中日和谈”的可能。



着男装的川岛芳子

如果说之前川岛芳子的奋斗理想，是为了“复国”的话，那么她之后的行为的目的，却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从后来的大量资料来看，川岛芳子做很多事的动力，是为了“立功”，是为了让日本军部更重视自己。

为了立功，她还曾偷看了多田骏办公桌上的高度机密文件，获悉了日本当时有意和国民党政府“和谈”的意向。为此，她还直接上书当时已经上台掌权的东条英机，表示自己熟悉国民党各个派系，可以立功。

因为这件事，东条英机差点派人把川岛芳子给杀了——他怀疑川岛芳子已经做了重庆方面的间谍。

但即便被日本军部怀疑甚至关押（曾被东条英机关了半年），川岛芳子始终没有放弃在中国的谍报生涯，不知是觥筹交错的社交生活对她有吸引力，还是惊险刺激的间谍生涯让她有成就感。

但是，欠的账，总是要还的。



东兴楼“女老板”川岛芳子

6

1945年，战争结束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1945年10月，川岛芳子在北平东四九条胡同自己的家里，被军统特工逮捕，并以汉奸罪提起公诉。

1947年10月8日，北平高等法院对川岛芳子进行第一次公审，因为听说要公审“东方女魔”，法院拥进3000多人，玻璃窗都被挤碎了，第一次公审被迫延期。

当时能决定川岛芳子生死的，是一个国籍问题。

以川岛芳子在战争期间的身份，既不可能直接屠杀平民，又不可能参与日本军部的方针决策。这就意味着——

如果她是中国人，那么法庭就可以以汉奸罪起诉，但如果她是日本人，根据当时的审判案例，除了高级司令官和直接屠杀平民的日本军官可以获刑外，其他的日本军人和侨民都被释放回国。

此前川岛芳子的好友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被遣返回国。换句话说，只要川岛芳子能证明自己是日本人，同样可以脱罪。

可笑又有点可悲的是，为日本殚精竭虑效力了那么多年的川岛芳子，居然没有日本国籍。

更可悲的是，除了她的亲密好友外，也没人愿意为她张罗这件事。

川岛芳子的一封求助信，曾寄到了她的养父川岛浪速手里。在信里，川岛芳子请求养父为她修改生日，并伪造日本户籍。

当年要娶自己养女为妾的那位川岛浪速，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写了一封信给川岛芳子的辩护律师，说川岛芳子是日本籍，但她的户籍证明弄丢了。后来有人推测，他是怕引火上身，怕自己也被宣判为战犯。

在狱中，川岛芳子曾给自己的秘书小方八郎写过一封长信，里面提到：“宣判死刑那天，我还吃了两大碗面！难友们都同情我而流了眼泪。我觉得欢乐应该大家共享，悲哀却不愿大家分受。”

1948年3月25日清晨，川岛芳子在写完遗书后，在北平第一监狱被执行枪决，终年41岁。

写川岛芳子的时候，忽然想起在《历史的温度》第一本中收录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和那篇文章里的“东京玫瑰”户粟郁子相比，川岛芳子的一生，显然要更“波澜壮阔”一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两者却又有相似之处——作为女性，被卷入了残酷的时代洪流之中。

与户粟郁子相比，川岛芳子的命运似乎更让人感慨一些：童年时被送走，少年时被奸污，恢复故国的梦想破灭，临死时发现自己所效力的国家根本没给自己国籍……

作为个体，川岛芳子或许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放到她置身的那个时代以及她最终做出的选择，她的结局其实也是咎由自取，罪名也是盖棺论定。

我写到后面，脑海里浮现的却不是“女魔”的形象，而是金庸《天龙八部》里的一个男性：慕容复。

翩翩美公子，偏偏被家族安上了一个“复国”的使命，殚精竭虑，忍辱负重，最终却精神失常，发了疯。

川岛芳子的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刹那，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

下篇 人性的抉择

达·芬奇真的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吗？

这篇文章要说的这个人，可能是史上头衔最多的一个人。他是著名的画家，同时他又是雕刻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解剖学家、地质学家、制图师，植物学家、作家……他钻研的领域实在太多，以至后人又给了他两个头衔："外星人"和"穿越者"。那么，他到底有没有那么神？

1

1452年4月23日，瑟·安东尼奥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

"4月15日，星期六，我的一个孙子诞生了。"

安东尼奥所在的地方，是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治下一个叫芬奇的小镇，当时使用的是"儒略历"（恺撒推行的罗马历法），按照现在的公历转换，应该是4月23日。

安东尼奥的这个孙子，被取名为"Li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翻译成中文就是："芬奇镇瑟·皮耶罗之子列奥纳多"。其中，"ser"代表他的父亲是一位绅士，而"da vinci"的意思是"来自芬奇镇"。孩子真正的名字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当时意大利非常常见的男性名字"列奥纳多"。

但是，当这个孩子后来成为流芳百世的大名人之后，没有人再叫他"列奥纳多"了。

大家都只叫他达·芬奇。

2

关于达·芬奇少年时期的记载很少。目前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父亲叫瑟·皮耶罗·达·芬奇，是当地的一名法律公证员（类似于律师这样的

职业），比较富有。

达·芬奇的母亲叫卡泰利娜，应该是他父亲的一个佃农（也有说是酒吧的侍女），父亲抱走了刚出生的达·芬奇，却没有和他的母亲结婚——没错，达·芬奇是一个私生子。

达·芬奇在14岁的时候，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芬奇小镇，来到了大城市佛罗伦萨，成了一名艺术家的学徒。

在那个时代的意大利，如果你想当一名艺术家，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必须先加入当时的一个组织——行会。

行会管辖着各种手工作坊，后者的订单都由前者分配。而你要做画家或者雕塑家，都必须先去相应的手工作坊，拜师傅，从学徒开始做起，一边学手艺，一边帮师傅完成工作。

一般来说，做学徒的时间至少要超过10年。

幸运的是，达·芬奇当时拜的师傅，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大牛艺术家，叫安德烈·德尔·委罗基奥。委罗基奥的弟子有不少成了下一代的大牛，比如达·芬奇，比如波提切里。



波提切里被认为是佛罗伦萨画派的最后一位画家，著名的《维纳斯的诞生》就是他的作品

我们通过课本了解的“画鸡蛋”的故事，就是达·芬奇做了委罗基奥的

学徒后发生的事。当然，达·芬奇跟委罗基奥学习的本领，远不止画鸡蛋。

关于达·芬奇的学徒生涯，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是关于达·芬奇的容貌。我们现在脑海中浮现出的达·芬奇的容貌，基本上是来自他的自画像：

但事实上，达·芬奇年轻时非常俊美，甚至因为相貌而名动全城（由于他终身未婚，关于他的性取向也一直被大家讨论，此文不涉及）。他经常给自己的老师委罗基奥做雕塑的模特，据说委罗基奥的名作青铜像《大卫》的模特就是达·芬奇。



有人认为这幅像虽是达·芬奇画的，但他画的未必是自己



青铜像《大卫》

另一件，是关于达·芬奇所处的时代背景。

当时的艺术家，是一个开销非常大的职业，是需要别人供养的。谁来供养呢？就是“艺术赞赏人”。

从小背景来说，当时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家族，正好是大名鼎鼎的美第奇家族——这个家族对艺术的痴迷和支持是非常有名的。美第奇

家族一直很喜欢委罗基奥，而达·芬奇生活的时代，正好和整个美第奇家族中对艺术支持力度最大的洛伦佐·美第奇同一时代——这对达·芬奇后来的创作有不小的影响。

从大背景而言，从13世纪开始萌芽的欧洲文艺复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酝酿，到了15世纪进入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正好就是达·芬奇所处的时期。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一代大神的神奇之路，就此开始。

3

我们先来看看达·芬奇的绘画成就。

这是达·芬奇最无可争议的领域，也是他流芳百世的最主要原因。

1475年，达·芬奇的老师委罗基奥接受委托，画一幅《基督受洗》的宗教油画。尽管早在三年前，年仅20岁的达·芬奇就被佛罗伦萨画家工会列在了会员名单上，但他的身份毕竟还是老师的学徒，所以就受命和老师一起完成这幅画。

委罗基奥完成了整体构图，而达·芬奇领到的任务是画一些背景和左边的那位小天使（最左边只露侧脸的小天使）。但就是左边的这个惟妙惟肖的小天使，展现出了全画都没有的一种灵性。在达·芬奇创作完这幅画后，委罗基奥就表示再也没办法教他绘画了，而是将他介绍给另一位有名的绘画大师。不仅如此，委罗基奥之后也表示不会再画画了，转攻雕塑。

达·芬奇虽然以画画名闻天下，但他流传到后世的画作并不多，除去真伪存疑的作品以及大量手稿外，连同壁画在内的真正的油画作品，也就20多幅。

但是，每一幅都是传世经典。



《基督受洗》

他最有名的那幅《蒙娜丽莎》，自然不用多说了。达·芬奇画作的经典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技法上，更在于他对背后人性的洞悉和把握。这一点，在他于1494年至1498年间创作的《最后的晚餐》这幅作品中最能体现。

《最后的晚餐》描绘的是耶稣被犹大出卖后，与他的十二圣徒在一起吃最后一顿晚饭的场景。这个著名的故事一直是欧洲各路大神级画家喜欢创作的选题，在达·芬奇之前，有很多名家都以此为题创作过。

但之前的作品，别的不说，都有个很明显的特点——一眼就能从画

面中看出叛徒犹大是谁。[1]



卡普阿的《最后的晚餐》，犹大被画作去伸手拿饼的人，因为耶稣说："正准备去接基督蘸了汤的饼的那个人便是出卖了我的那个人。"



乔托的《最后的晚餐》，犹大就是那个唯一头顶没有光环的人



格列柯的《最后的晚餐》，犹大手里明显拿了钱袋，因为《圣经》里记载他因为收了30个银币而出卖了耶稣



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坦诺的《最后的晚餐》，犹大坐在所有人的对立面

所以一般《最后的晚餐》画作中，犹大要么拿钱袋，要么没光环，要么被孤立。好了，那么我们来看下达·芬奇版本的《最后的晚餐》。



这幅画是达·芬奇画在教堂上的壁画，虽然经过多次修复，但依旧损毁严重——事实上，这幅画能保存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

提供一张修复版，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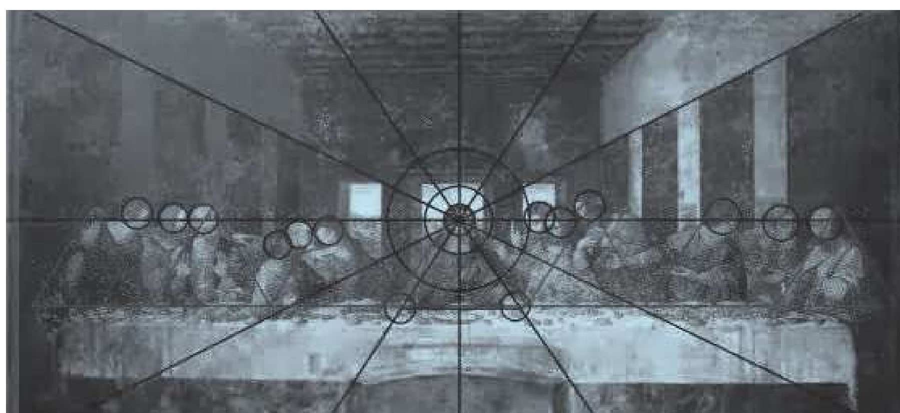
画面上13个人以耶稣为中心，看似杂乱分布（其实是3人一组分了4组），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说明当时每个人的心态都不相同。耶稣在中间，不同于以往作品中总是在说话的样子，他双目低垂，嘴唇紧闭

而作为叛徒的犹大，第一眼根本就认不出是谁——大家都没有光环，没有人被孤立。但只要你仔细辨认，那个身体后仰，一手里拿着不起眼的钱袋，一手微微伸出去拿面包的人，就是他（耶稣左边第二个）。事实上，即便不用道具，犹大的神态也已经出卖了他。



达·芬奇关于《最后的晚餐》的大量习作被藏于温莎图书馆和威尼斯，他给每个人物形象都找了现实中的模特，甚至为每一双手、每一件衣袖都做了很多草稿笔记

而且，这幅看上去有些杂乱的画作，其实是达·芬奇精心构思的。



《最后的晚餐》中的透视比例关系，据说达·芬奇在这幅画中用了三个光源。所以，说达·芬奇的每一幅画都是传世经典，并不夸张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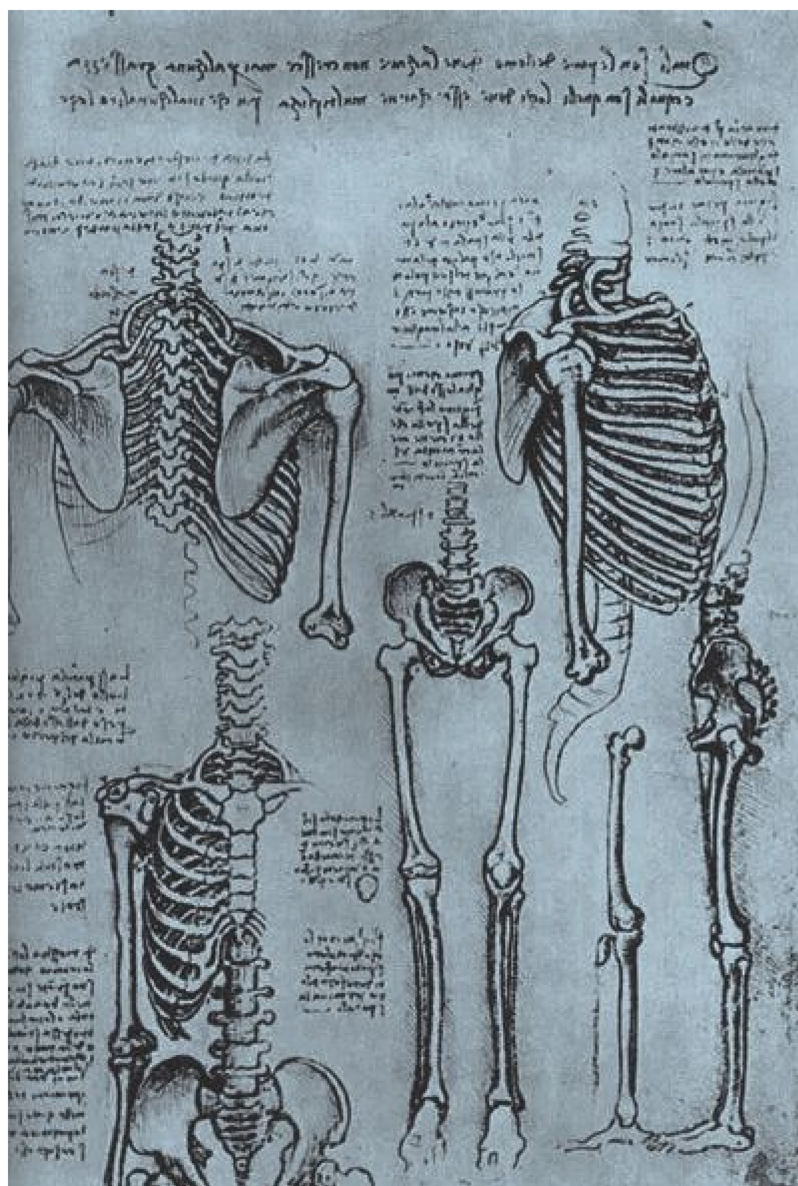
关于达·芬奇绘画的技艺，其实不需要多讨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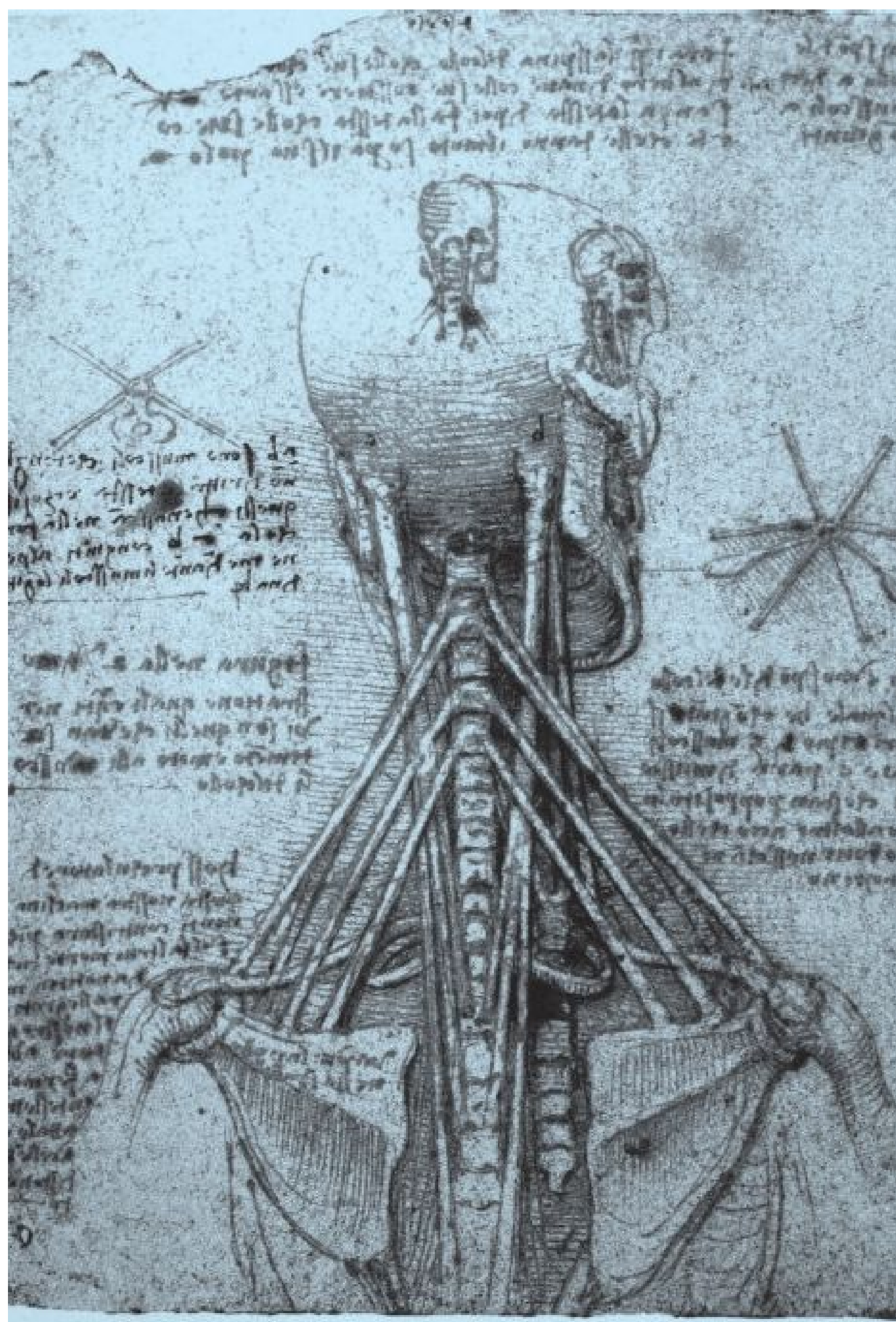
接下来该说说他“不务正业”的一面了。

首先，在绘画之外，达·芬奇另一个比较被大家认可的领域，是他在解剖学和医学上的贡献——当然，这和他的绘画与雕塑事业也是息息相关的。

达·芬奇在委罗基奥手下做学徒的时候，就被要求学习解剖学。为此，达·芬奇在佛罗伦萨的圣玛利亚纽瓦医院得到了解剖人类尸体的许可（也有说法是他没有得到许可，便私自解剖人类尸体和动物）。在30年的时间里，达·芬奇至少解剖过30具人类尸体，并为此绘制了超过200幅的绘画笔记。

因为学会了解剖，达·芬奇对人体构造有了超越常人的认知，进而开始在人体医学和生理学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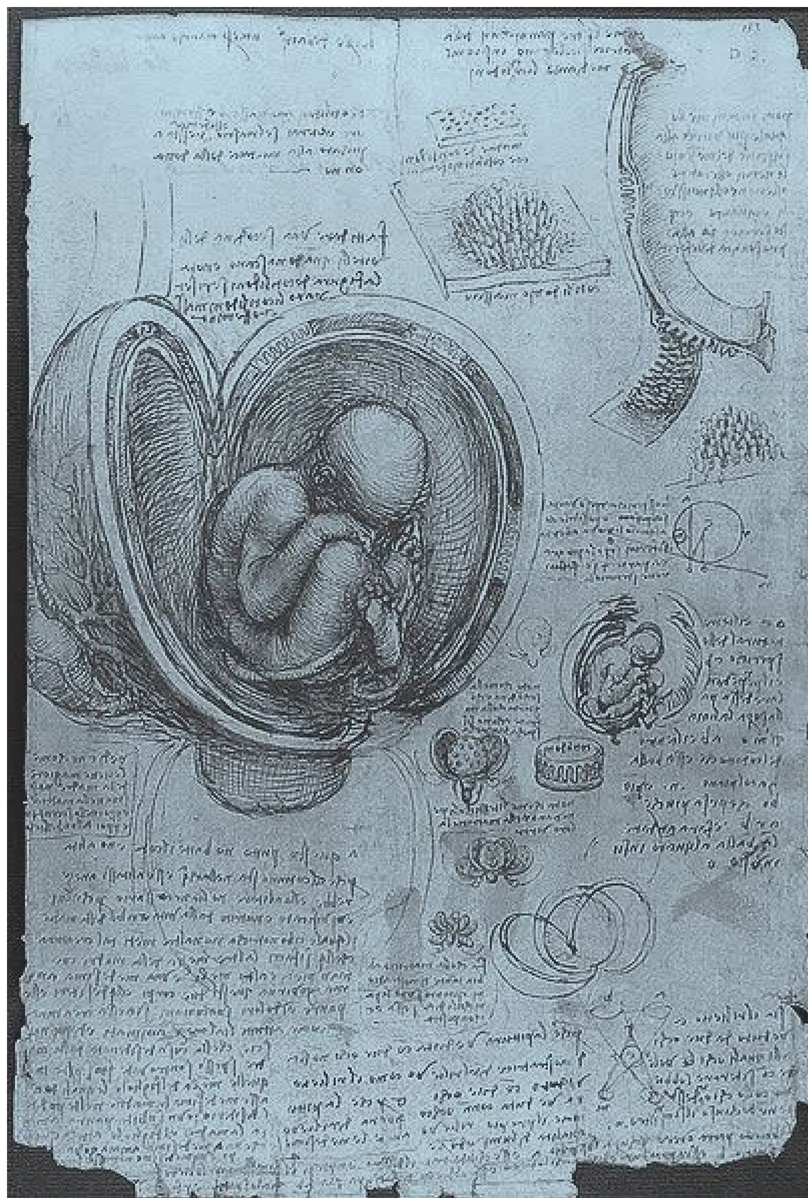




达·芬奇的解剖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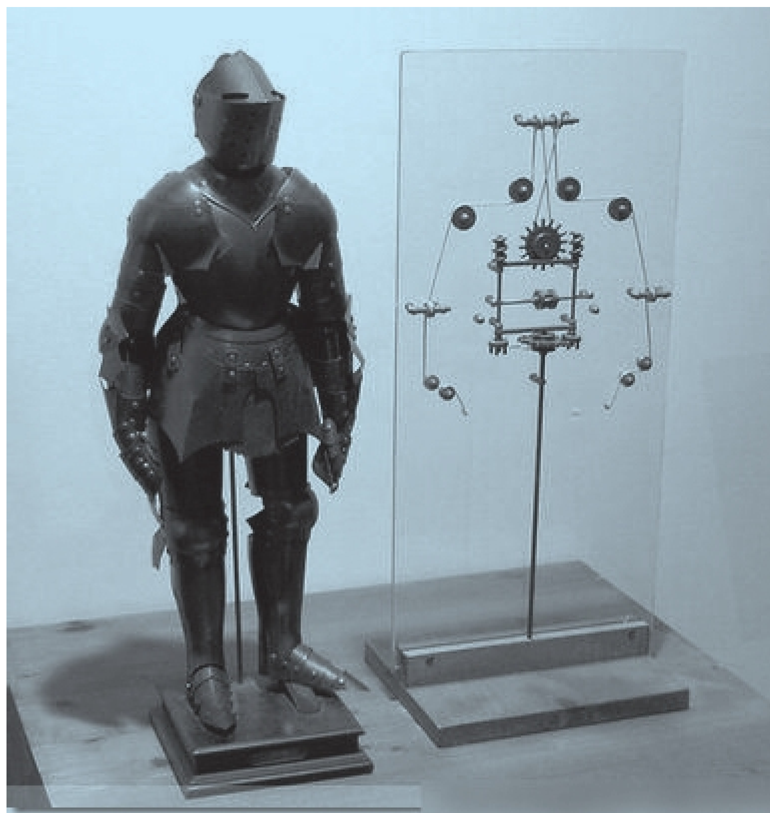
他发现人类的心脏有四个腔，并画出了心脏瓣膜



他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个画出子宫胚胎中的胎儿和腹腔中的阑尾的人

他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个认识到血液对人体新陈代谢起作用的人，并认为血液不断地改造全身，把养料带给身体各个器官，再把垃圾带走。他还认为老年人的死因之一是动脉硬化，而产生动脉硬化的原因是缺乏运动。

达·芬奇还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个想到用玻璃和陶瓷制作心脏和眼睛的人。



后人根据达·芬奇“机器人”手稿仿制的机器人模型

他的这些探索在我们现在看来或许并不太稀奇，但放到15世纪的欧洲，那是惊世骇俗的行为和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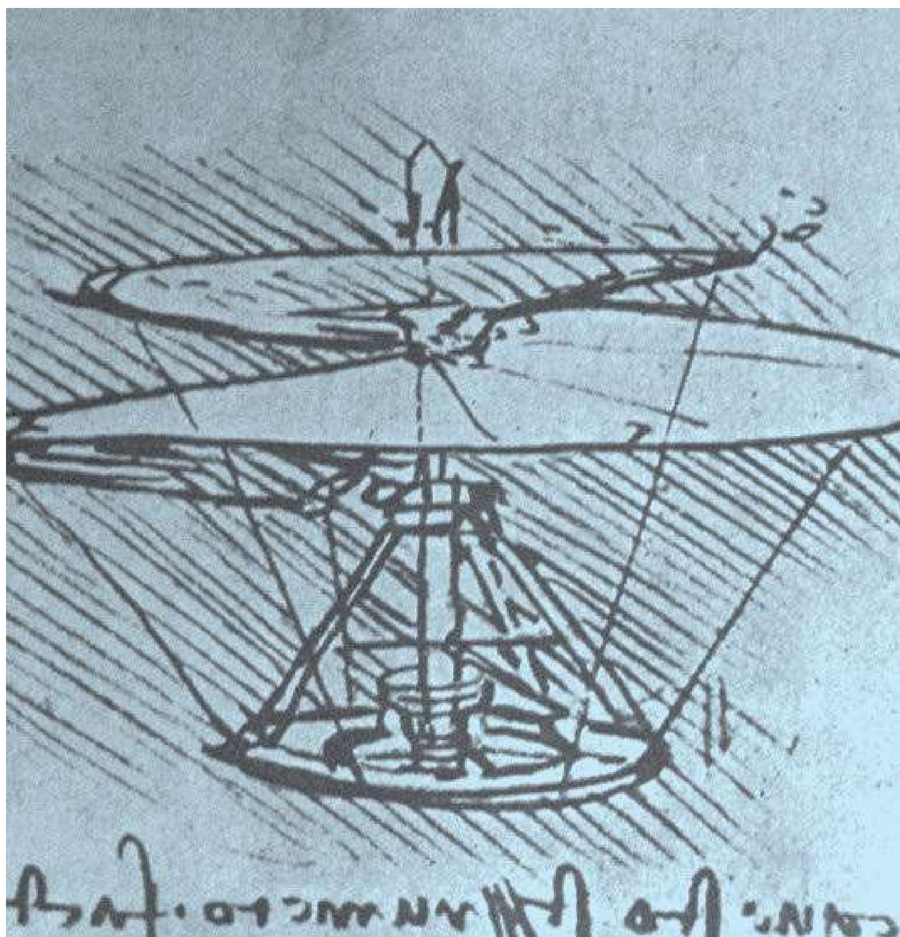
从达·芬奇的笔记中不难看出，他对人类结构构造方面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并能忠实地记录，所以，由生理学，他又将触角延伸到了工程学和物理学。

比如达·芬奇通过解剖获得的人体构造方面的知识，设计出了一个“机器人”的草图：以木头、皮革和金属为外壳，以齿轮做驱动装置，以水动力做动力，让机器人可以坐下和站立，可以挥舞手臂，可以转动头部，甚至可以开合嘴巴并发出声音。

更进一步，达·芬奇试图探索一个千百年来人类都关心的话题：如何能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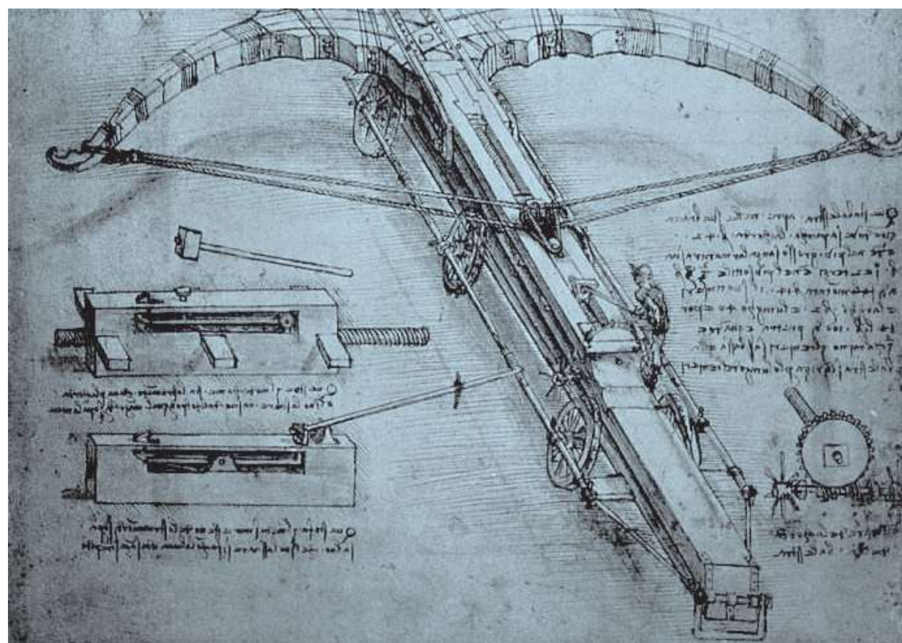


达·芬奇设计的“飞机”手稿。这种飞机主要是靠人力“扑翼”飞行



达·芬奇设计的“直升机”草图

为了在不同宽度的河流上迅速架设桥梁，达·芬奇还设计过专门架桥的机器。



达·芬奇的手稿“移动的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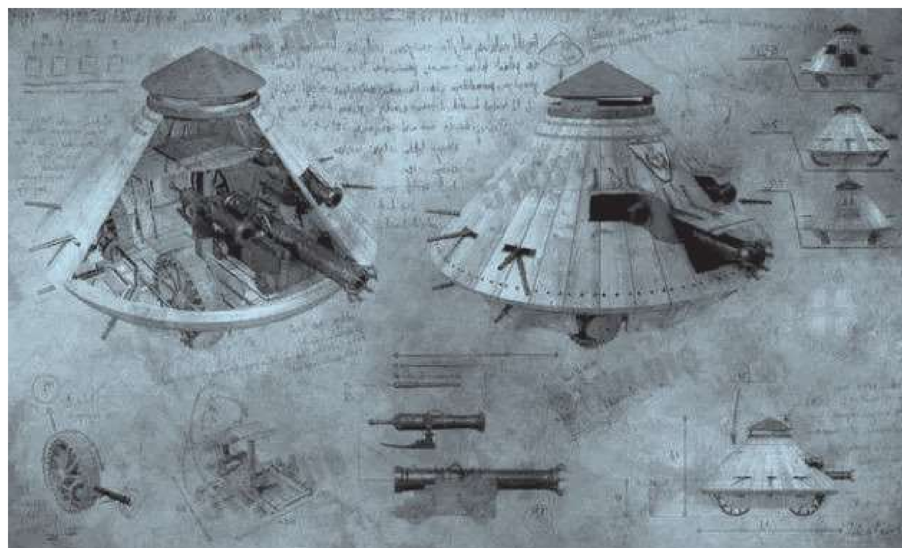
他对军事机械的研究也有超乎寻常的热情。



达·芬奇设计的“剃刀战车”手稿

事实上，只要是和机械设计有关的东西，达·芬奇都非常痴迷。在他被发现的6000多页手稿中，人们看到了他设计的水下呼吸装置、拉动装

置、发条传动装置、滚珠装置、反向螺旋、差动螺旋、风速计、陀螺仪甚至机械车的设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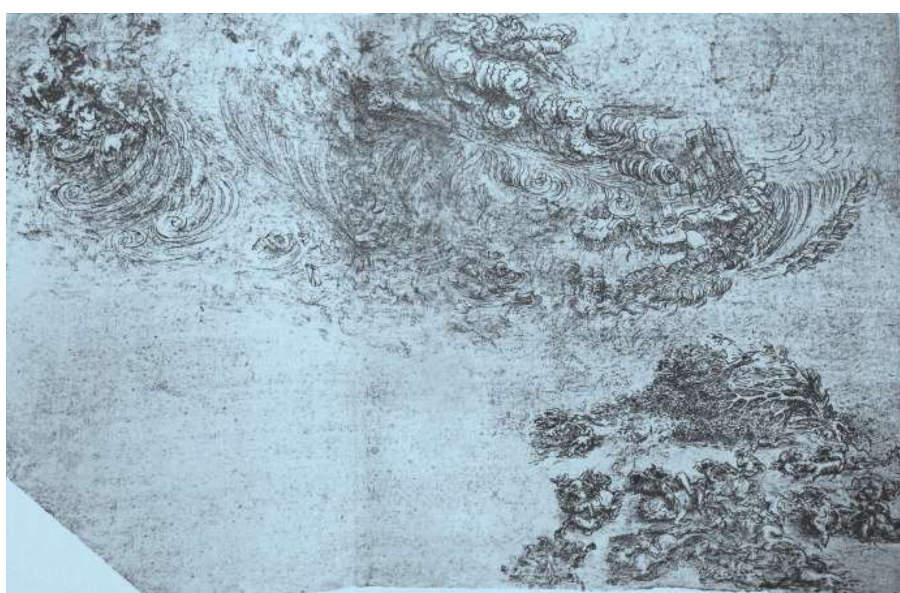
达·芬奇手稿中一个能够移动的奇怪炮塔的设计。这被有些人认为是“坦克”的雏形

5

如果说达·芬奇由解剖到对机械的痴迷让人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他在另外一些领域做出的探索——作为一名艺术家——就不得不让后人啧啧称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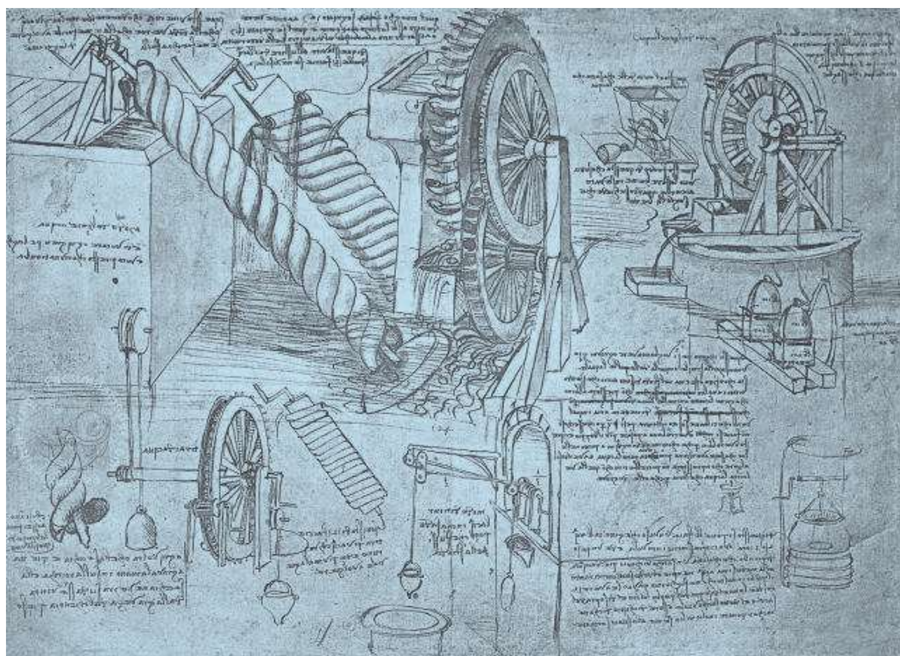
在天文方面，达·芬奇坚持认为“日心说”而否定“地心说”，这个观点的提出甚至早于哥白尼（但实事求是地说，早在古希腊时期阿里斯塔克和赫拉克利特就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在地理方面，达·芬奇在那个时代就能认识到：高山山顶上之所以有海中动物的化石，是地球的地壳运动造成的海陆变迁形成的。这种认知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是相当不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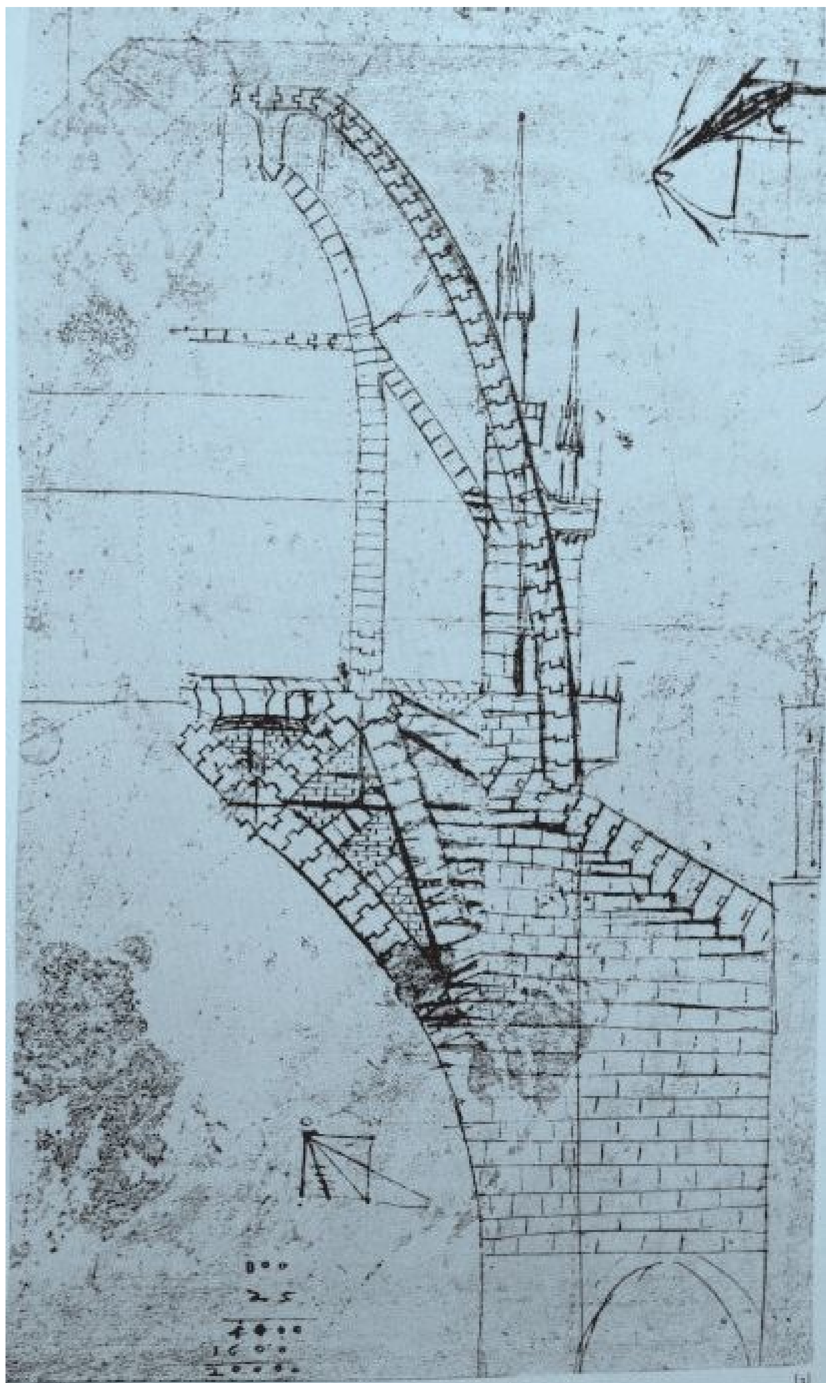


达·芬奇研究水的形态的手稿

在物理方面，达·芬奇发现了液体压力的存在，并提出了连通器原理：在连通器内，同一液体的液面高度是相同的，不同液体的液面高度不同，液体的高度与密度成反比。他还研究过摩擦和重力加速度。



达·芬奇关于水利建设的手稿



达·芬奇关于建筑设计的手稿

在水利建设方面，达·芬奇并没有只是停留在设计方面，他亲自设计并主持修建了米兰至帕维亚运河的灌溉工程，他设计的一些水库、水

闸、拦水坝等，在当时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同样达·芬奇在建筑方面也有建树。他设计过桥梁、教堂、城市街道和城市建筑。在设计中，达·芬奇会把车马道和人行道分开。米兰的护城河就是他设计并监工建造完成的。

哦，对了，达·芬奇有一副好嗓子，能唱非常动听的歌曲，而且他的笛子吹奏得很棒，七弦琴弹得更佳。事实上，当初最早让他在佛罗伦萨声名鹊起的，正是音乐家的身份。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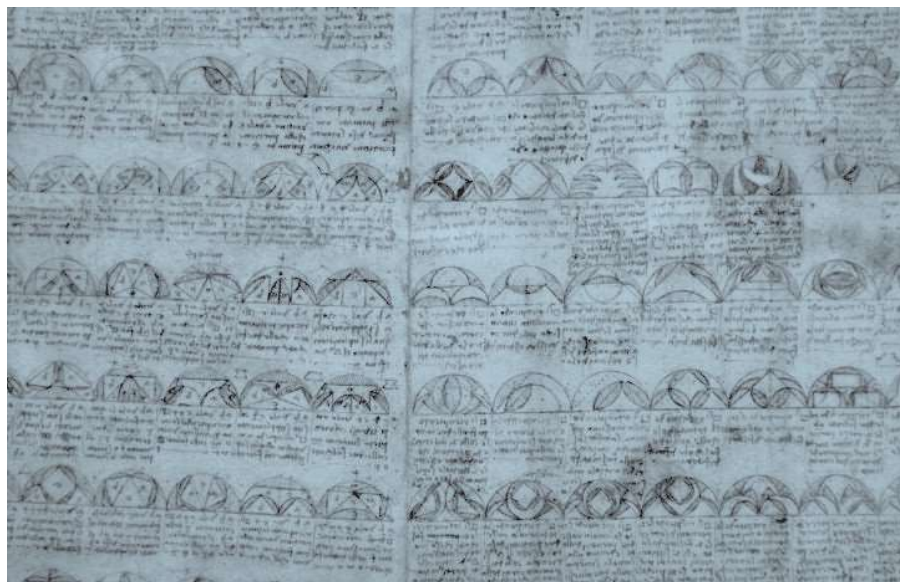
达·芬奇还有一些特别的习惯，让他更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比如他是个左撇子，终其一生，他在笔记本上记录所用的都是“镜像文字”，即像镜子映射一样，和现实生活中是反的。有人曾推测，这是达·芬奇自己在给自己的笔记“加密”，即便有人偷窥，也不知道他那些设计图的真正奥秘。

达·芬奇有那么多的精力来从事那么多领域的研究，背后也有一套他自己的睡眠方法——他把它称为“定时短期睡眠法”。

即通过对睡与不睡的硬性规律性调节来提高时间利用率：每工作4小时睡15分钟。这样，他一昼夜花在睡眠上的时间累计只有不足1.5小时，从而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工作（但如何才能做到迅速入睡倒也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后世景仰的天才，他的一生虽然也获得了认可和赞誉，却未必达到了他自己所设想的那种境界。达·芬奇曾写信给米兰大公鲁多维柯·斯弗查，在信中列举了自己的各种才能，最后他还表示可为大公的父亲塑造一座巨大的骑马像——那时候，受材料和技术限制，在巨大的重量压力下，前蹄腾空的马是非常难雕塑出来的（这尊雕像最终只有土制模型而没有被浇筑成青铜）。



达·芬奇的手稿“等量的变化”。达·芬奇在相同尺寸的半圆和圆中，画出了177个等量变化。这说明他当时对几何学也相当感兴趣并做了研究

但是，大公只有言语的安慰，却鲜有实质的鼓励，甚至连给达·芬奇的薪资都是按最低标准发放的，这让达·芬奇相当失望。

1515年，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占领了米兰，当时的达·芬奇已经享有颇高声誉。法国国王邀请他赴法国定居，成为那里的宫廷画师。当时已经63岁的达·芬奇似乎并没有对故乡表现出太多的依恋，他欣然前往。

最关键的是，他把自己最珍爱的一幅画一起带到了法国。

那幅画就是《蒙娜丽莎》。这也是这幅画至今被收藏在罗浮宫的原因。同样也是这幅画在1911年失窃的一个原因之一（偷画的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宣称要让名画回归祖国）。



卢浮宫里的《蒙娜丽莎》。展厅里永远是人头攒动，作者去过三次，从没能挤到过最前排

1519年，一代大师油灯燃尽。

据说67岁的达·芬奇去世时，是被法国国王抱在怀里的——国王一直不肯松手。

达·芬奇的得意门生弗朗西斯科·梅尔茨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他的恩师的一生：

“达·芬奇的死，对每一个人都是损失，造物主无力再造出一个像他这样的天才了。”

馒头说

达·芬奇到底是不是个天才？

我觉得毫无疑问：肯定是。

那达·芬奇是不是个大神级的天才？

我觉得依旧毫无疑问：肯定是。

那达·芬奇是不是牛到像是从我们的时代穿越回去的，或者干脆是外星人？

我个人觉得不至于。

或许就像我们很愿意传播特斯拉的“神迹”一样，我们需要一些全面碾轧我们智商乃至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大神，来满足我们的英雄崇拜情结。

达·芬奇在绘画领域的成就，以及他在解剖学、建筑学、水利学方面的造诣，毫无疑问都是当时时代的巅峰水平——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完全超越那个时代的。

至于他的其他很多奇思异想的手稿，固然让人啧啧称奇，但我觉得其中有些被夸大的成分。

比如他因为一张直升机的画稿，就被一些人称为“发明了直升机”，我觉得有些夸张了。他关于“机器人”的设计固然精巧，但因此被称为“机器人之父”也未免言过其实——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同时代甚至更早，都有很多设计精巧的机关人或木制傀儡，按这个逻辑，它们也都可以被称为“机器人”了。

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了后人景仰的大神，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达·芬奇非常严谨，且极善于绘画。他把他的很多奇思妙想，都用非常写实的手法画到了手稿上，并且成功流传至今（这点也很重要）。我相信，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的一些理念，同时代的人未必没有，但没有人能像达·芬奇这样用笔让它们在纸上成为“现实”，以及流传下来。

这里也需要指出的是，一张设计稿和真实的设计并成功运转是有区别的。尽管后来有不少人根据他的设计稿做出了实物模型，有的还验证成功了，但用现代人的理念和架构来还原，我相信应该还是有失真的。

但达·芬奇依旧是我无比尊敬的一位大神。

因为除了上述的那些成就之外，我认为他最难能可贵的，是永远对未知或新鲜事物抱有一颗好奇和探索的心。

达·芬奇曾记录下童年时的一次难忘经历：有一次他在野外玩耍，来到一个洞口前。洞里漆黑一片，他非常害怕里面会有野兽乃至鬼怪，但最终好奇心促使他进洞去查看究竟。

其实这样的好奇心，我们在童年时人人都有。但随着年纪渐长，有时候是不是我们会发现：对新鲜事物不仅提不起兴趣，甚至有所排斥了？

我原来是做媒体的，我经常和一些同事分享一个观点：我们做媒体的，面对有些新生事物，哪怕觉得不喜欢，也别排斥，先别忙着去批判或不屑，而是先尝试着去了解它，使用它，熟悉它——不然，我们不仅没有资格记录这个时代，自己也很容易变老。

扯得有点远，拉回来。

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中应该不会有人能比肩达·芬奇的成就。但我们即便没有他那样的天赋和钻研精神，那么至少——

让我们努力保持一颗好奇和探索的心吧。

---

[1] 以下图片选自《史上最全的〈最后的晚餐〉，你知道几个？》作者：艺墟上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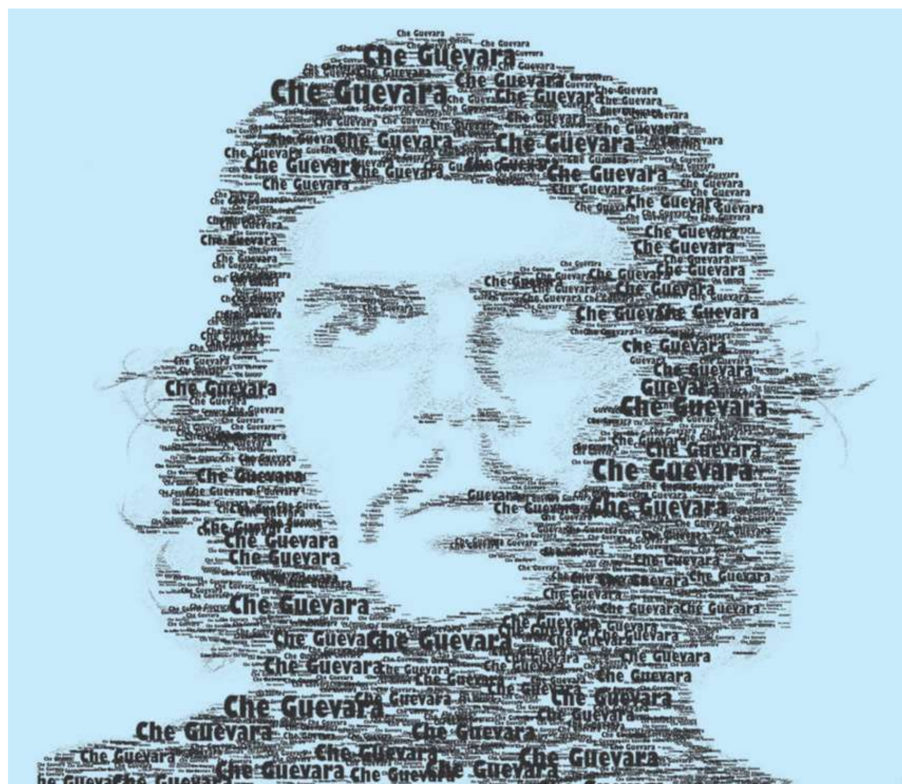
切·格瓦拉：一个符号化偶像背后的真实故事

无论是名字，还是那个形象，关于他的生平故事，可能已无须赘述。叙述这个故事的目的，只是试图讨论一下，为什么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在哪种意识形态的国家里，他都被一部分人视为神一般的存在？

1

按照部分资料的记载，格瓦拉可能是出生在1928年5月14日，但我们还是用目前通行的6月14日。

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父母都是名门望族的后裔——格瓦拉的父系亲族中，有人做过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的母系亲族中，曾有一位秘鲁总督。



切·格瓦拉

所以，和他后来会遇到的革命战友卡斯特罗一样，格瓦拉也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

格瓦拉也确实是按照“富二代”的轨迹被父母培养的。1948年，20岁的格瓦拉进入阿根廷最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主修医学。

如果一直这样顺顺当当地继续下去，格瓦拉毕业后应该能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有着迷人笑容的帅气医生，妙手回春，成为女护士或女病人的梦中情人，然后继承家业，安逸、潇洒地度过一生。



童年时的格瓦拉

但是，在1950年1月的暑假（嗯，别忘了人家是南美洲），格瓦拉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之后，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第二年，格瓦拉选择了休学，和朋友骑上了一辆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从阿根廷到智利，到秘鲁，到哥伦比亚，再到委内瑞拉。在旅途

中，因为摩托车出了故障，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里做了几个月的义工。

这是一次对格瓦拉人生产生关键影响的旅行——作为一名富家子弟，他第一次完整见识了依旧陷于贫穷和困苦的南美洲。

1952年9月，格瓦拉坐飞机回到了阿根廷，随后开始拼命读书，最终在1953年顺利毕业。

但其实在1952年回国之后，格瓦拉在一篇日记里已经写下了一句话：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2

1953年7月，从医学院毕业的格瓦拉没有选择成为一名医生，而是开始了他第二次拉美之旅。

这一次，他来到了危地马拉。

彼时的危地马拉，正在年轻总统阿本斯（Arbenz）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但改革无疑会触痛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尤其是已经将触角伸向南美洲的美国。在著名的美资联合果品公司22.5万英亩[1]土地被没收且被分给无地的农民之后，美国人决定推翻阿本斯政府。

1954年6月，美国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阿玛斯（危地马拉的一名军官）雇佣军入侵危地马拉，阿本斯总统很快就被迫下台——这位当时只有41岁的总统自此流亡海外，至死都没有回国。

在这场为时不长的战争中，格瓦拉毫无疑问地站在危地马拉政府军的一边，在整个过程中，有几件事对格瓦拉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格瓦拉得到了他后来闻名于世界的那个绰号：“切”（Che）。“切”在西班牙语中是一个感叹词，在南美被用来和人打招呼或表示惊讶，类似“喂”或“哦”。

格瓦拉认识了秘鲁的女革命者加德亚，后来她成了格瓦拉的第一任

妻子。

美国中情局注意到了格瓦拉这个人，由此，格瓦拉第一次上了美国人的黑名单。

最关键的是，格瓦拉开始认识到：如果不进行一场革命，自己就无法安心地成为一名医生。

3

1955年，在撤离危地马拉后，格瓦拉来到了墨西哥城。

在那里，27岁的格瓦拉遇到了影响他一生命运的战友：29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



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在一起

毫无疑问，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一见如故，格瓦拉随即就投入了卡斯特罗反对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队伍中。

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率领82名富有冒险精神的古巴战士，从墨西哥出发，乘坐小艇驶向古巴。

那是一次非常糟糕的革命行动：在古巴南部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

登陆后，这支革命队伍遭到了巴蒂斯塔军队的伏击，82人中只有12人活了下来。但也正是那次行动，让幸存的格瓦拉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

作为随军的医生，格瓦拉面对的一个是药箱，一个是子弹箱——他毫不犹豫地扛起了子弹箱。

在格瓦拉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中，他自己把这次转变总结为：从医生彻底转成了战士。

4

成为战士后的格瓦拉，机警、冷静、无情，很快成了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助手。

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批12个战士，开始转入山区打游击。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巴蒂斯塔的政权终于被推翻，卡斯特罗从最初的全国武装司令做到了总理，进而掌握了古巴的一切大权。

作为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格瓦拉理所当然被委以重任，他先后担任过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这两个重要职位，全程参与了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成为政坛高官后，格瓦拉表现出了两面性。

一方面，他依旧保持着简朴的革命本色，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加薪。他没去过夜总会，也没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相反，倒是在周末多次参加甘蔗地或工厂里的义务劳动（不过让别人为难的是，他提倡他的部门所有人都不领薪水，义务劳动）。据说有一次，他到一位苏联官员家中做客，当官员拿着名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他带着讽刺的口吻说：“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那么高级的餐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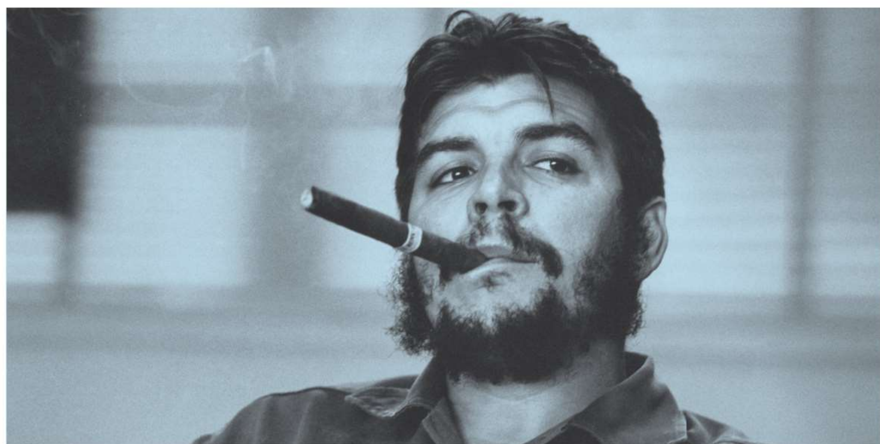
而另一方面，格瓦拉并没有展现出他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天赋。

在经济领域，格瓦拉推翻一切市场规律，推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每个企业都要在政府的安排下进行生产，结果整个国家的生产陷入停滞。1963年的调查显示，有些生产计划需要经过20多个行政部门审批才能进

行。

同时，为了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封锁，格瓦拉想在古巴建设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他用行政命令把一半的甘蔗田（制糖是古巴的命脉产业）烧毁，改建炼油、炼钢、发电、水泥等重工业，但古巴甚至连相关的专业人才都没有。

据《卡斯特罗和古巴》一书，在1959年至1962年这三年中，有30万人逃离古巴，希望离开的人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



雪茄，成为格瓦拉的一个标志

如果这只是说明格瓦拉缺乏能力，那么另一些资料则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古巴革命刚成功时，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

从1959年1月3日到11月26日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卡瓦尼亚堡监狱每天都响起杀人的枪声。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处死了156人，但有人认为，这一人数可能高达600人，其中不乏无辜者，甚至有十几岁的孩子和身怀六甲的妇女。美国裔古巴作家亨伯特·冯托瓦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说，所有他访问过的人都表示，格瓦拉把屠杀作为生活的佐料。他在二楼的办公室里有一部分墙被打掉了，这样他就能在办公室里观赏行刑。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

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格瓦拉也访问了中国，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种种迹象表明，在1965年3月14日格瓦拉回到古巴后，他开始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总的来说，卡斯特罗认为革命已经告一段落，而格瓦拉认为这还只是开始。

这对曾经亲密的战友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4月1日，37岁的格瓦拉乘坐飞机离开古巴，前往非洲的刚果（金），他决定再一次投身革命，或者说，帮助全世界各国的穷苦人民革命。

也正是这一次的抉择，让格瓦拉的人生轨迹开始发光。如果他待在古巴继续担任高官辅佐卡斯特罗，或许可能会在世界革命史上留下小小的一笔，但绝不会像今天那样，被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用一种近乎崇拜的方式铭记。

因为格瓦拉放弃了好不容易奋斗得来的优越生活，为了他自己的理想，再一次主动投身到艰苦的战斗中去。

只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去检视过他理想的可行性？

5

古巴革命的成功，显然不是一个“可复制”的模板。

在刚果（金），格瓦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刚果的游击队根本搞不明白：一个白人，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来吃苦？

格瓦拉告诉他们，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但对于游击队员而言，“帝国主义”是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只要打倒现在由白人组成的政府，过上好日子就行了。

在那里，格瓦拉无法颁布政策和纲领，无法改变农民的生活，自然也无法发动群众。甚至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回归本职，做一名医生——刚果的战士无心训练，闲来就喝酒或嫖妓，格瓦拉需要医治那些染上了性病或酒精中毒的人。



格瓦拉在非洲

在非洲丛林中辗转了7个月后，格瓦拉最终被他的战友们劝离了刚果。尽管格瓦拉曾表示将伤兵送回古巴，而自己要在丛林中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战友们的请求。

不过，格瓦拉没有回到古巴。

在卡斯特罗后来公布的格瓦拉给他的道别信中，格瓦拉宣称将切断

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到世界各个角落的革命中去。

这一次，格瓦拉选择了玻利维亚。

1967年，格瓦拉来到了玻利维亚。之所以选择这个国家，是因为他认为，玻利维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农民和矿工将会声援他领导的游击队，他的游击队也能与当地战士打成一片。

但是，格瓦拉一开始就和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蒙赫闹翻了。

蒙赫的意见是，只要战斗是在玻利维亚境内展开，他就需要取得领导权。而格瓦拉认为，“我绝对不能接受。军事司令应该是我，这个问题上我不允许模棱两可。”

双方谈崩后，蒙赫留下这样一句话：“当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勇地死去，但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

遗憾的是，蒙赫的话没有错。格瓦拉的游击队根本无法赢得玻利维亚当地民众的信任，连走入群众都不可能，更别提发动群众了。在古巴时那种老百姓给他们通风报信，补充给养的事情，在玻利维亚绝不可能发生，相反，由于叛徒的出卖，格瓦拉的游击队最终被政府军包围了。

1967年10月8日，玻利维亚政府军的特种部队包围了格瓦拉的营地。

格瓦拉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了。

6

关于格瓦拉的最后一刻，一直流传着各种版本。

一种版本是说，格瓦拉在腿部中弹后选择投降，他对政府军的士兵高喊：“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对你们来说比死更有价值。”

一位长期为美国中情局效力的流亡古巴人罗德里格斯，后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己是现场的目击人，他当时的使命，是“确保格瓦拉能活着”。

罗德里格斯这样回忆当时见到格瓦拉的场景：

“他访问过莫斯科也拜访过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我是从那时候开始记得他的。但当年那个穿着制服英姿勃发的人，在我亲眼见到他时却落魄得像一个乞丐。他衣衫褴褛，脚上的靴子也不见踪影，一双皮鞋勉强遮住他的光脚。即使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我也会为他感到难过。”



被捕时的格瓦拉

罗德里格斯回忆说，被捕之初，切·格瓦拉表现得很愉快，甚至同意人们在他被带出藏身之地时和他合影。被捕后，切·格瓦拉被关押在附近一个村庄的学校里。

罗德里格斯的使命，是把格瓦拉带到巴拿马做进一步审讯，但玻利维亚的最高当局坚决要求立刻处决格瓦拉。他回忆了当时的过程：

“当我接到电话时，他们给我的密码是‘500、600’。当时我们之间有一套简单的密码。‘500’指的是切·格瓦拉，‘600’意味着死，‘700’意味着活。因为电话里有很多噪音，我又问了一遍，他们证实，命令是‘500、600’。”

多年以后，罗德里格斯依旧记得自己向格瓦拉宣布他将被处死时的情形。

“我走进他的房间，站在他面前对他说‘格瓦拉指挥官，很抱歉，我已经尽力了。但这是玻利维亚最高指挥官下的命令’。

“他完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他的脸变得像一张白纸。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像他当时那么沮丧。但他说‘这样也好，我根本就不该被活捉’。当时是玻利维亚时间下午1点，我们离开了他被关押的房间。

“在1点10分到1点20分之间，我听到了枪声。”

玻利维亚人雷希纳尔多·乌斯塔里·阿尔塞是一名医生兼记者，他曾近距离目睹了格瓦拉被枪杀后的尸体，且因披露格瓦拉被谋杀这一事实而至今流亡巴西。



格瓦拉的遗体。阿尔赛为图中脖子上挂有相机者

40多年来，阿尔赛遍访格瓦拉的同志与战友，查阅玻利维亚军方机密文件，在《切·格瓦拉——一个偶像的人生、毁灭与复活》（刘长申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他披露了他所了解到的格瓦拉生命最后一刻的情形：

马里奥·特兰（枪杀格瓦拉的士兵，据说是抽签抽出来的）走进另一个房屋，切在里面。切几秒钟前听到隔壁枪响，意识到自己大限已到。他原本在墙角处坐着，面朝着门，手脚都被结实的粗绳子捆绑着，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站了起来。

马里奥·特兰仿效贝尔纳迪诺·万卡，一脚将门踢开，走进屋内，用身子将门关上。出现几秒钟的沉默。没有立即开枪，但特兰用他的M1型卡宾枪对准切。

“坐下！可怜的家伙。”

“干什么？你要杀我吗？”

“坐下！可怜的家伙。”

事后，马里奥·特兰向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坦言：“他的眼神几乎让我崩溃，给我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

特兰在犹豫。

切知道他到时候了。开始发泄胸中的怒火。

“开枪吧！您要杀的是个男子汉！杀我啊！杀我啊！”

特兰仍没扣动扳机。

切的火更大了，开始骂他。

“婊子养的，杀我啊！杀我啊！……”

“你才是婊子养的！”这名士兵好像缓过神来了，他的卡宾枪响了。第一枪打中了切的右前臂。

这名游击队员将手放进嘴里咬住，好像是想把血止住。

这枪打伤了他的前臂和里面的肌肉，子弹穿过一根近1厘米粗的血管。

一注血喷出来溅到了特兰的衣服上，当伤在动脉血管时，左心室收缩压力会使血噗噗向外喷。

失血和剧痛使切顿感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倒在地上。尽管没有失去知觉，但摔得很重。马里奥·特兰心想大量失血足以要他的命，于是就从房屋里走了出来，外面是一群士兵和拉伊格拉居民。一个士兵对他说：“笨蛋！回去给他一梭子！”

马里奥·特兰听了他的话又走进屋里。切倒在地上，痛苦地蜷起了身子，看到这位军人进来，说：“痛快点儿！”

第二声、第三声枪响。一枪穿透切的左肋，却没有伤到心脏，另一枪穿透颈项，子弹又飞到墙上，钻了进去，震落一些墙土。



格瓦拉遗体照片，有修女看了说，很像耶稣

因为万卡见他还活着，口朝下，发出临死前的呼噜呼噜声，于是踢他一脚，让他口朝上。随即马上开了一枪，枪口距目标不到1米，直接对准心脏。几个小时后，就是这个子弹孔帮助我判定出了他死亡的原因。

切所中4枪之间相隔多久？虽很难精确计算，但不会超过1分钟，因此切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死去的。而且当脑部没有中弹，因失血造成死亡的情况下，生命的持续时间和失血量成正比。由于最后一枪击中心脏，使血流入脑部，切是在最多不超过4分钟内死亡的。

致命的一枪穿透心脏和肺。几秒钟后，一股鲜血从他嘴角挂落下来，紧接着肺部的气体和血液结合的混杂物不断从口中噗噗喷出。

切就这样死了。

7

格瓦拉的遗体被秘密运送到附近城市的一所医院向外界展示。

为了证明处决的就是格瓦拉，玻利维亚政府切下了他的双手，以便用指纹等相关证据证明他的身份。最后，格瓦拉的遗体和多具尸体被秘密埋葬在一个军用机场里，后来被运回古巴。

1997年10月9日，是格瓦拉遇难30周年的日子，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期，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

11月14日，格瓦拉遗骨被移送圣克拉拉。当天，哈瓦那通往圣克拉拉的公路实行管制，任何闲杂车辆不得通行。圣克拉拉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

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

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了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

馒头说

周恩来同志曾对格瓦拉的游击战术有过这样的评价：[2]

所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就是跑到那里放一把火就走。就像我们的盲动主义似的，脱离群众，没有党的领导。这种思想，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群众中有影响。……古巴的武装斗争成功是带有偶然性的……他们不是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来逐步取得胜利的。自从这个偶然性胜利以后，他们又想在拉丁美洲甚至非洲到处用这种方式推翻亲美政权，必然不会取得成功。

看得出，中国的领导人对格瓦拉的评价并不高。

但这并不妨碍格瓦拉成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最知名的人物

形象之一。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伦敦，在上海还是在东京，在莫斯科还是在开普敦，格瓦拉的肖像早已风靡全球，出现在数以百万计的T恤、海报、马克杯上。他的“波普形象”，早已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和各种阵营，成为全世界不少人共同的精神图腾——哪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了解他。

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个人看来，格瓦拉作为一个符号的风行，固然有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开始萌芽的激进主义思潮以及左派风尚作为背景，但更多触动人内心的，还是他不断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自己的理想事业中去的那种精神。

在这个背景下，格瓦拉的理想是否靠谱，他的能力究竟如何，早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颗血色浪漫的心。

而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做到像格瓦拉那样为自己的理想殉道，但至少背一个印有他头像的包，穿一件印有他头像的T恤，能多少宣告一下：我没有放弃理想，我不想与这个现实妥协。

梁文道当初曾有过一句评价：“切·格瓦拉如果活到今天，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永远年轻。不是因为他死得早，而是因为他死在浪漫的理想之中。”

这或许也是那么多人缅怀他的一个重要理由。

---

[1] 1英亩约合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2] 出自周恩来同志1971年5月31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编者注

人神之间吴清源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如果你要问谁是“一代棋圣”，十有八九，只会说一个人的名字：吴清源。

1

1914年出生在福州的吴清源，应该说还算个望族之后。

吴清源的祖父吴维贞，当时在浙江省做到了道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官员）。从官场上退下来后，获得了盐的专卖权，生意做得很大。在当时的福州，“陈、林、沈、吴”号称四大家族。

吴清源的外祖父叫张元奇，也是做官的，一度做到御史大夫，后来被贬到浙江，随后又投靠了徐世昌，最后的官职是奉天省省长。

吴维贞和张元奇都是福建人，也是好友，于是双方就给儿女订了亲。

吴家儿子叫吴毅，张家女儿叫舒文，他们俩结婚的时候，证婚的是徐世昌（袁世凯的重要谋士，当过中华民国大总统）。

吴毅是吴维贞快70岁时才得到的儿子，在家中排行最小。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一般把长子和次子送到美国和英国留学，三子以下，送到日本留学。

去日本留学的吴毅别的没学到，却学到了一个将来影响自己儿子一生的东西——围棋。

2

吴毅有三个儿子，吴清源排行老三，本名吴泉，“清源”是字。

大概在吴清源7岁的时候，父亲开始让他接触围棋了。

吴毅本身的围棋水平一般，但因为从日本回来，所以受到过当时世界最强的日本围棋的熏陶。吴毅经常会邮购一些日本的围棋棋谱或围棋

杂志，比如幕府时期棋圣秀策的棋谱等。

这些棋谱对吴清源早期棋力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起之前父亲让他一直背的四书五经，吴清源觉得看棋谱和摆棋的日子要快乐得多。

没多久，吴清源的棋力就超过了两个哥哥。

1925年，吴毅病逝，年仅33岁。吴毅去世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把一本练字的字帖给了老大（后来做了官），把一本小说给了老二（后来做了文学家），给吴清源的，是一盒围棋。

其实父亲在世的时候，吴清源家已经家道中落了。搬到北京后，吴家虽然也从祖父的遗产中分到了一处四合院，但是由于吴毅收入一般，很难养活一家人，所以要靠变卖一些家产度日。

父亲去世后，吴清源家变得更加贫困。但当时，吴清源作为“围棋神童”，已经小有名气。当时有一位围棋高手叫顾水如，有意栽培吴清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大官家做“棋客”。

这个大官，就是段祺瑞——时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

段祺瑞一生酷爱围棋，在家中养了一批“棋客”陪自己下棋。他自称水平有“七段”，相当于日本的职业四段。

当11岁的吴清源被带到段祺瑞面前时，稚气未脱。一盘棋下来，“七段”的段祺瑞被11岁的吴清源轻松击败。

按照段祺瑞的习惯，是下完围棋后吃早饭的。输了那盘棋后，他就一个人走进里屋没有出来，连早饭都没吃。

不过，吴清源凭这一局，拿到了段祺瑞开给他每月的“对局费”：100块大洋。

3

吴清源就这样成了段祺瑞府上的“棋客”。

据吴清源的回忆，段祺瑞很喜欢在对方的腹地打入，然后做活一小块，他把这样的方式叫作“在公园里搭小房子”。

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从各方面渗透中国，吴清源回忆，作为亲日的军阀，段祺瑞的态度却很明确："搭建个小房子是可以的，但不能归为己有。"

不过，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很难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势力。1926年，段祺瑞失势，躲到天津当起了"寓公"。

他走倒不要紧，作为他的"棋客"，才12岁的吴清源一下子就失去了"对局费"的巨额经济来源。

无奈之下，吴清源只能去当时北京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参加下棋比赛——那些有钱的人会提供各种奖品。吴清源成了那里的"霸主"，每次都会赢回很多东西，比如花瓶、砚台等。

渐渐在北京围棋圈声名鹊起的"小神童"吴清源，开始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一位姓林的先生，开始带他去一家日本人开的围棋俱乐部下棋。

围棋虽然起源于中国，但当时全世界的围棋中心在日本。把吴清源引荐入段祺瑞府上的顾水如，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一流高手（他有日本留学的经历），但当时他和一个叫喜多文子的日本女职业五段下过一盘棋，受让二子，还是输了。

事实上，当时的乱世中国，如果有一个中国棋手能赢日本的职业棋手一盘棋，哪怕对方只是初段，那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在当时有一个说法：一个日本围棋的五段选手，可以横扫全中国。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日本人的围棋俱乐部，12岁的吴清源得到了一个和一位日本职业初段棋手下棋的机会——吴清源最后以6目的优势取胜。

整个俱乐部都轰动了。



瀬越宪作。如果说山崎有民给吴清源打开了一扇门，那么瀬越宪作就改变了吴清源的一生

那一局棋，旁观人中有一个叫山崎有民的人。看完吴清源下棋，他就给在日本的著名围棋七段、日本棋院的联合创建者瀬越宪作先生写了封信：

“中国有一个天才少年！”

吴清源确实在继续着自己的“天才表演”：1926年，日本的职业棋手岩本薰四段到中国访问，吴清源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让三子的棋，都赢了，输了一盘受让两子的棋（岩本薰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作为职业高手，他后来下出“核爆之局”）。

这个成绩惊动了日本的围棋界人士，于是，“让吴清源赴日留学”这件事，就开始被运作了起来。

吴清源当时被日本人重视到什么程度呢？

一起运作吴清源出国的人士中，有犬养毅（后来的日本首相）、望月圭介（担任过日本的邮政首相和内相）、著名的大仓财阀第二代掌门人大仓喜七郎。

1928年，14岁的吴清源的棋力已经达到了让日本人不敢相信的地步——当时的另一个日本天才棋手桥本宇太郎四段（后来成了本因坊[1]，“核爆之局”的另一位弈对局者），代表日本棋院来给吴清源下最后的测试棋，两盘让吴清源执黑先行，吴清源一盘胜6目，一盘胜4目。

濑越宪作当时看了吴清源的棋局，给出了一个评价：“他是秀策再世。”（秀策，被日本人认为是江户时代最伟大的棋圣。）

4

1928年10月，14岁的吴清源终于赴日本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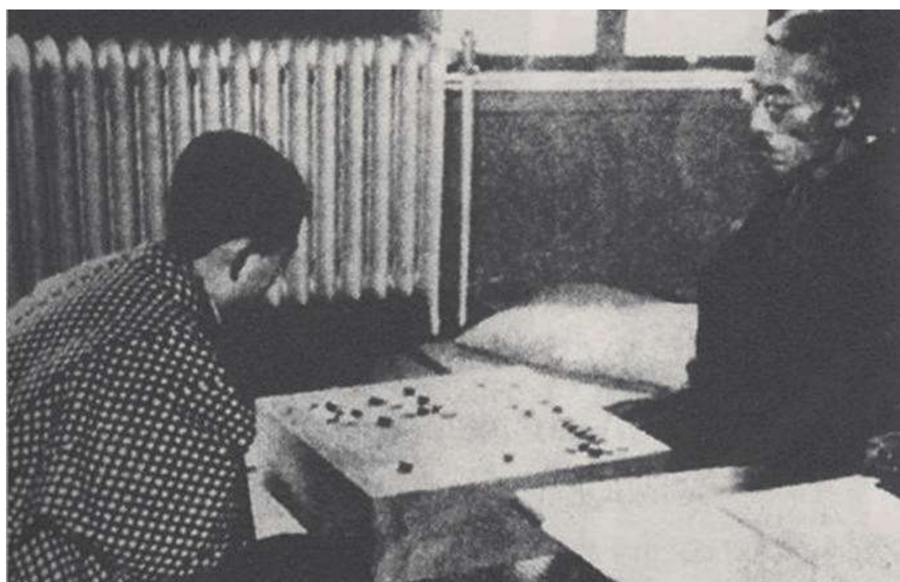
他的老师是濑越宪作，而在财政上支持他的人，是大仓喜七郎。大仓喜七郎给吴清源每月的生活费是200日元——当时，一个刚毕业的日本大学生，月薪是40日元。

但是，大仓喜七郎的资助有一个期限：三年。三年之后，吴清源必须参加日本的“大手合”（段位赛）。

换句话说，三年之后，吴清源如果没有证明自己的实力，对不起，你爱干吗干吗去吧。



1928年，在日本棋院大门口迎接吴清源的日本棋手，中间那个孩子就是吴清源



14岁的吴清源初到日本，本因坊秀哉（右）就和他下了一盘指导棋

吴清源没有让大仓喜七郎失望。

他初到日本，就受让二子赢了当时日本围棋界的大人物——号称“不败名人”的本因坊秀哉。要知道，当时日本很多职业八段的棋手受让两子和秀哉下，也是要输的。

1929年，吴清源被日本棋院授予了“职业三段”的头衔，但因为身体虚弱，休养了一年，到1930年才开始参加“大手合”。



18岁时的吴清源

在春季赛上，吴清源7胜1败，秋季赛8战全胜，由此轻松升为四段。

那一年，吴清源才16岁。

在1930年一整年，16岁的吴清源在日本棋界下出了31胜6败2和的成绩。1931年，他下出了35胜5败1和的成绩。1932年，他更是下出了44胜5败1和的成绩。至此，他的胜率接近90%。

马上就要成年的吴清源，准备开始横扫日本围棋界了。

5

吴清源的成名之旅，是从与本因坊秀哉的对局开始的。

1933年，读卖新闻社主办了一场由五段以上棋手参加的日本围棋锦标赛，吴清源一举夺冠，获得了向本因坊秀哉挑战的机会——就是五年前，还要让吴清源两子的那位“不败名人”。

在那场受人关注的挑战赛中，吴清源下出了惊世骇俗的“三三·星·天

元”的全新开局，举座皆惊，也让秀哉完全陷入了长考。

那场比赛，从1933年10月16日开始，下到1934年1月29日才结束，整整下了三个半月。为什么？因为这盘棋整个过程中一共“打挂”（暂停）13次，秀哉一碰到吴清源下的妙手，就说头疼要“打挂”。有一次，吴清源一招妙手，秀哉长考三个半小时后，说头疼“打挂”，然后就直接回家去了——这是当时日本棋界的奇怪制度，可以回家休息。

而这种中断比赛休息的结果，就是秀哉召集所有弟子一起研究下一步的对策（这也是被允许的）。最终，秀哉因为在第160手下出一招大妙手，逆转局势，最后以2目赢了吴清源。

但后来一个几乎公开的秘密是：第160手妙棋，是秀哉在召集弟子研究对策的时候，他一个叫前田陈尔的弟子想出来的。

换句话说，秀哉是集日本本因坊所有弟子之力，在对付19岁的吴清源。

后来，秀哉的“引退棋”是和当时日本另一位超一流棋手木谷实下的（木谷实也是吴清源的好友）。木谷实提出，“打挂”可以，但必须“封手”，就是你去休息之前，把你要下的下一手写在记录纸上交给裁判再走——木谷实后来赢了5目半。

虽然输给了秀哉，但吴清源的实力进入了明显的上升期。

6

1939年，让吴清源正式封神的“十番棋大战”开始了。

这一年，25岁的吴清源升到了七段，读卖新闻社围绕吴清源，开始策划“升降十番棋”。

所谓“升降十番棋”，是江户时代就有的一种非常刺激的比赛制度：

两名棋手连下10场棋，轮流执黑先行。在十番棋中，如果一人被对方领先了4盘，就会失去平等的对局资格，就是被打“降格”——降一格，叫“先相先”，就是双方对局三盘，你可以两盘执黑先行（那时还没贴目，执黑先行有优势，但等于你承认对方地位比你高，在让你）；降两格叫“定先”，就是你永远执黑。

双方如果是段位相同的棋手，被对方打降格，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情。

吴清源制霸日本围棋界的好戏，大幕徐徐拉开。

吴清源第一个十番棋的对手，是同样拥有天才实力的好友木谷实。

他们俩的对局，就是后来著名的“镰仓十番棋”。

第一阶段6局棋，吴清源5比1领先，直接就把木谷实打降格了（最后以6比4取胜）。

1941年，吴清源第二个十番棋对手是雁金准一八段。

吴清源当时只有七段，按照规矩，他因为级别低，只能被“让先”（让你执黑先行），但雁金准一说：“如果是吴清源的话，可以分先（就是轮流执黑）。”

结果，前5局，吴清源4比1领先，再赢一盘，就可以把雁金准一打降格——七段棋手把八段棋手打降格。结果主办方读卖新闻社宣布比赛提前结束，不下了。



木谷实，同样是日本的天才棋手，与吴清源一起开创“新布局时代”。后创立“木谷道场”，培养出了大竹英雄、石田芳夫、赵治勋、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小林觉等一批围棋一流高手。“木谷道场”的弟子一度垄断了全日本的几乎所有围棋比赛冠军

1946年，吴清源迎来了第三个十番棋对手，也是他同门师兄，在1943年获得“本因坊”头衔（秀哉去世之前，把世袭的“本因坊”捐献，成为日本棋院一项棋赛的头衔）的桥本宇太郎。

下到第八局，吴清源6比2领先，把桥本打降格了。

1948年，吴清源和新晋“本因坊”的岩本薰（当年和吴清源下测试棋的那位）下十番棋，又把对方打降格了。

之后，和当时日本棋院唯一的九段棋手藤泽库之助进行十番棋。当时吴清源还是八段，是经过10盘测试棋获得九段后，才有资格和藤泽库之助下十番棋——7胜2败1和，吴清源毫无悬念地把对手打降格了。

不服输的藤泽库之助随即要求再下一次十番棋，结果再次被吴清源打降格——降两格，以后和吴清源下必须一直执黑先行以示尊敬。后来，藤泽库之助就改名了。

1953年，吴清源在十番棋中把当时风头正劲，拥有“剃刀坂田”的坂田荣男打降格；1955年，把高川格本因坊打降格。

吴清源和高川格的十番棋，是读卖新闻社办的最后一届十番棋比赛。

为什么？因为吴清源一共下了11场十番棋，11场全胜。不仅如此，吴清源凭一己之力，把日本老、中、青三代所有顶尖围棋手全部打降格了——不仅仅是击败，而且是降格。

所以，读卖新闻社尴尬地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全日本都找不出一个和吴清源实力相当的棋手了。

关于吴清源在十番棋比赛中的表现，网络上曾有一批体育迷做过如下比喻：

“相当于有一支英超球队，把所有其他同级别的球队都打到低一级别的英冠联赛去了；

“相当于有一支NBA（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球队，年年杀入总冠军，而且年年都是4比0获胜；

“相当于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有一名选手，自己主动后退30米起跑，最后照样拿冠军。”

在吴清源两胜藤泽库之助之后，日本媒体就称：“吴清源其实拥有十一段的棋力！”

而吴清源当时获得了另一个称号——“昭和棋圣”。

但有一个问题。

吴清源既然已经横扫日本棋界，按理，应该给予他日本围棋界的巅峰称号——“名人”。

但授予吴清源“名人”的话题，日本围棋界从来没提起过。

因为，他们认为吴清源并不是日本人。

在吴清源刚到日本的时候，一个叫西园寺公毅的朋友曾对他说过一句话："来了一个担任将来中日友好使命的人。"

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要承担"中日友好"这个使命，显然超出了吴清源的个人能力。

事实上，吴清源在国家认同感这个问题上，从来就没有太多的倾向性。

所以，无须回避他三次更换国籍的历史。

1936年，吴清源放弃了中国国籍，加入了日本国籍。他在自传中写的理由是："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终归怕有所不便。"

关于变更国籍一事，吴清源曾请教自己的老师濑越宪作，濑越宪作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只是表示沉默。而吴清源的家人都劝他回中国，但吴清源认为，一旦回中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就下不了围棋了，也养不活一家人。

于是，吴清源最终选择加入了日本籍。当年运作吴清源来日本留学的望月圭介希望他用"吴泉"这个名字，因为"吴泉"是半训半音的读法——希望他"不能忘记中国"。

吴清源其实想忘，也忘记不了。

1937年，身体孱弱的吴清源在日本的富士见疗养所疗养，当时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病房里贴着一张中国的大地图，病友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日军在中国国内行进的路线。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沦陷后，疗养所里到处是"万岁"的呼喊声。

吴清源觉得"自己的心情很复杂"。

吴清源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1941年和1942年，吴清源两次作为日本围棋代表团的成员，前往中国"劳军"——也就是慰劳日军中的棋迷官兵。

对此，吴清源也没有多辩解，只是这样说："我深信天意在于中日友好，并始终没有放弃时代的流向必将转变这一希望。但无论我怎样祈

求，这终非我力所能及之事。……我信仰的教义中讲到：‘勿谈政治，世界没有国境。’所以我的心情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不过，棋迷的士兵时常给我来信，我在给他们的回信中总是写道：‘请不要虐待中国人！’”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的一天，忽然有一群日本华侨冲进了吴清源家，并强制拉他去了所住街区的派出所，交给他一本中华民国的临时护照——强迫他放弃了日本国籍。

拿到中华民国国籍的吴清源，此后虽然仍在日本居住，但国籍一直是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直到1979年，吴清源再次加入了日本国籍，理由是为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方便。

但在那个年代，无论是什么国籍，无论想怎样逃避政治和战争，吴清源都是做不到的。

1945年，在盟军对日本东京的大空袭中，大火烧掉了吴清源的家，也烧光了他所有关于围棋的奖品和纪念品，钻出家中的废墟时，吴清源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



1952年，吴清源访问中国台湾。右起：应昌期（当时台湾围棋协会干事）、吴清源、周至柔（台湾围棋协会理事长），最左边那个小孩，就是后来著名的棋手林海峰，当时10岁

1945年8月6日，岩本薰在广岛向桥本宇太郎本因坊挑战，这场棋局就是后来著名的“核爆之局”——棋局进行到一半，美国空投了一枚原子

弹，爆炸气浪把离广岛市中心10公里外的对局室震得支离破碎，但两位棋手简单收拾后，便继续下棋比赛。

那场棋，吴清源不在现场，但他的恩师濑越宪作在。濑越宪作最心爱的一个儿子从市里走回家，被烧得面目全非，在10天后死亡。

围棋再超脱，也无法超脱残酷的现实。

8

1961年8月，47岁的吴清源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变故。

在一次过马路时，吴清源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撞倒，右腿骨接合处错位，腰椎骨两处骨裂。

但比这更严重的是，吴清源发现自己再也无法集中精神下棋了。头痛的症状困扰着吴清源，甚至引起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有一次，吴清源在一间厕所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了。

经过各路专家的诊断，吴清源因为摩托车车祸，精神上受到了惊吓。这一症状迅速导致了吴清源由盛转衰——到了1965年的第四期名人战，51岁的吴清源8战全败，他已经无法好好下完一盘棋了。

从此，吴清源开始慢慢淡出职业棋坛。

1984年，70岁的吴清源也到了正式告别职业棋坛的时候——他也要下“引退棋”了。

吴清源的“引退棋”大会吸引了800多人来现场，全是围棋界的职业高手和相关人士。吴清源的“引退棋”并不是和当年秀哉那样，找一个人来下一盘棋，而是很多棋手上台，每人和吴清源下一手，以作纪念。

第一个上来下的，就是吴清源的师兄桥本宇太郎，当年被吴清源打降格的棋手，已经创立了日本著名的“关西棋院”。

桥本上台后下的第一手，就是“天元”（棋盘中心的一点）。

这是一种尊敬，也是一种纪念——当年吴清源初到日本时，曾试过第一手下在“天元”位置，而他当年的“三三·星·天元”的布局，也曾让整个日本棋界耳目一新。

吴清源在日本的56年围棋生涯，以“天元”开始，以“天元”结束。

9

引退后的吴清源，和中国的情缘慢慢加深。

其实早在1956年，吴清源就通过到日本访问演出的梅兰芳表示，尽快安排中国的天才少年来日本学围棋，他可以负责牵线。当时梅兰芳挑选了两个天才少年，但当时因为日本反华情绪强烈，未能成行。其中一个叫陈锡明（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进入了国家集训队，但未能大展宏图），另一个，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围棋院院长的陈祖德。

1962年，陈祖德作为中日友好围棋访问团成员拜访日本，出发前，周恩来特地关照陈祖德：“到了日本，要亲自登门拜访吴清源。”吴清源听说后非常感动。

后来，吴清源还一度安排好了另两个中国棋手到日本留学的事情，连住宿和经济赞助都谈好了，但最终还是没能成行。那两个棋手，一个是吴淞笙，一个就是聂卫平——当时日本棋院只肯给聂卫平五段资质，这也是未能成行的一个主要原因。

1985年5月，吴清源在战后第一次回到了中国，先到的上海。

当时上海围棋协会的顾问金明去机场接到了吴清源，然后和吴清源下了两盘棋。下完后，金明对吴清源说：“第一盘是算陈毅下的，第二盘是算周总理下的。”

无论吴清源的国籍是哪里，能和他下一盘棋，或者能和他见一面，也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心愿。

后来，吴清源正式收了一名中国女弟子，这个弟子的名字，叫芮乃伟。

芮乃伟在成为吴清源弟子后，十年八夺女子围棋世界锦标赛冠军，并在2000年战胜了当时巅峰时期的“世界围棋第一人”——韩国的李昌镐，震动棋界，还获得了韩国的“国手”头衔。

除了带弟子，吴清源在晚年致力于研究“21世纪的围棋”，他解释为“从棋盘的整体去考虑”，而不是切割成序盘、中盘、官子这些阶段。

吴清源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六合之棋”——他回归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层面。



江铸久和芮乃伟夫妇，被称为“天涯棋客”

2014年11月30日，吴清源在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内的医院病逝，享年100岁。

在70岁引退那年，吴清源说过一句话：

“不用太长寿，就活到100岁吧。”

馒头说

我知道，现在说起围棋，肯定会有人会提“阿尔法狗”和“阿尔法元”。

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吧。

从初中开始，我就特别喜欢看《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体育版上的围棋报道——其实我根本就不懂围棋。

但不懂围棋的我，却可以一字一句，把每篇报道都认真看完，并且对中日韩棋手的名字了然于胸。那时候，尤其能背日本棋手的名字：大

竹英雄、小林光一、武宫正树、加藤正夫……

虽然不懂棋，但在那时候我就觉得，围棋就像武侠，而下棋的人，就像是武侠书里的武林高手，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各人有各人的绝招。

到了大学，隔壁寝室住了个围棋职业三段，自己寝室住了个围棋业余三段，所以也学了点围棋的皮毛。越学，越觉得围棋博大精深。

当然，号称“人类智力的王冠”的围棋，一度被称为人工智能唯一无解的围棋，现在终于还是被拉下了宝座——吴清源先生没能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但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从科技角度来说，这是人工智能一个巨大的台阶式的跨越，是一件可以载入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事。

而从围棋这一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当然可以完全取代人脑的布局，中盘，尤其是官子计算，但它无法拥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故事”。

吴清源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吴清源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人，东渡扶桑，横扫日本，“为日本现代围棋奠定了基石”（《朝日新闻》对吴清源的评价），这样的故事，不会有第二个。

但像木谷实、坂田荣男、桥本宇太郎，像曹薰铉、李昌镐、李世石，像聂卫平、马晓春、钱宇平、常昊、古力、柯洁……每一个棋手，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他们彼此之间，从对局到对话，又会产生很多新的故事。

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人会有失误，会有急躁，会有骄傲，会有沮丧，会有铤而走险，会有缴械投降——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可以避免的，但这些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魅力。

这可能也是围棋依旧有它自己独特魅力的原因吧。

---

[1] “本因坊”是日本江户时代围棋四大家之首，可以理解为日本围棋界最大的一个门

派。“本因坊”实行世袭制，后文提到的秀哉是最后一任本因坊。

梵高之死

在不少人心目中，伟大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当然是要才华横溢，然后最好是生前无人赏识，恐怕还得穷困潦倒。如果最后还是在绝望中自杀，那估计就很符合标准了……

1

1890年7月27日傍晚，文森特·梵高脚步有些踉跄地回到了奥威尔小镇。

他是午后带着他的全套画画的工具，离开自己暂住的拉乌尔旅馆，出去写生的。旅馆和镇上的人都对此习以为常，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孤僻的画家卖出去什么画，但他似乎也不在乎，整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是，梵高这次回来后的样子有点奇怪：在明显已经变得炎热的夏日傍晚，他却将自己的外套纽扣都紧紧扣起，而且手捂着腹部，一瘸一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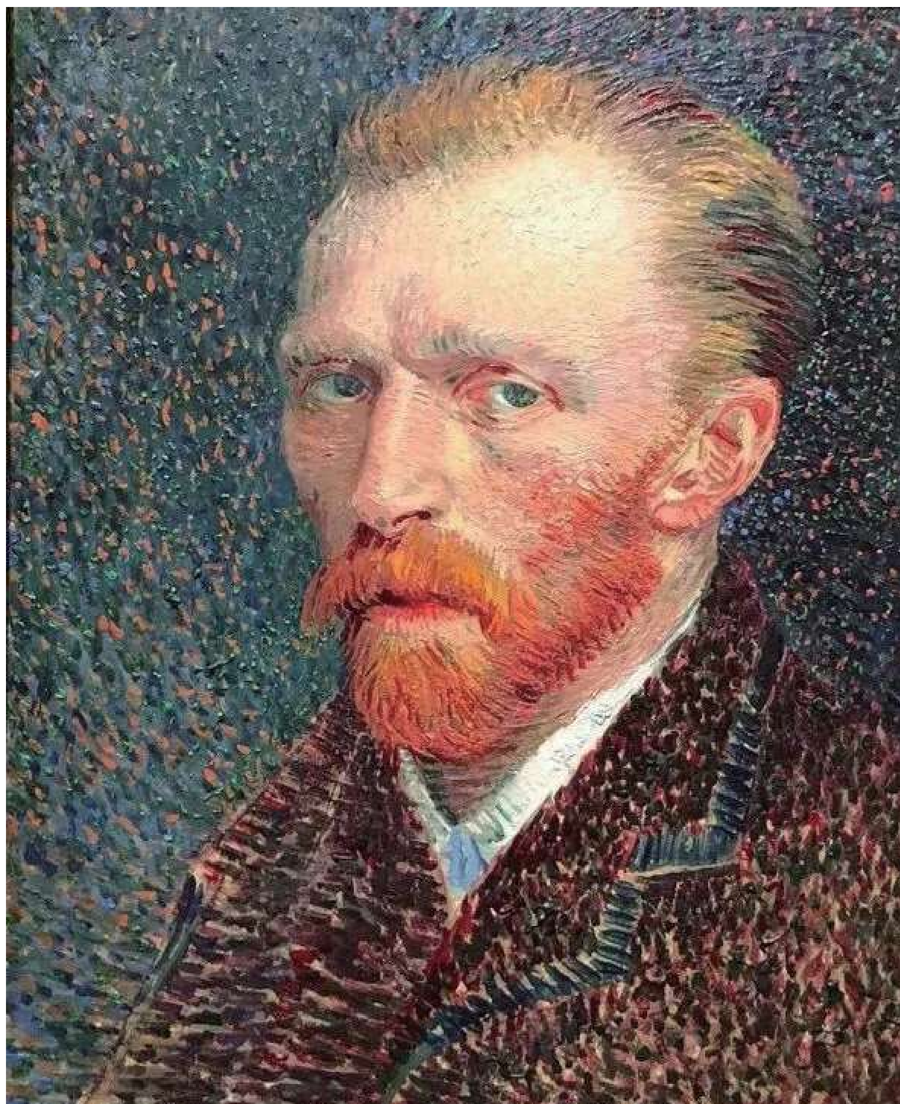
进了拉乌尔旅店，梵高也没和人打招呼，直接上了阁楼，钻进了他自己那间只有7平方米的房间。

出于谨慎，店老板拉乌尔跟上了楼，进了梵高的房间，发现他蜷缩在自己的床上，表情非常痛苦。

看到店老板走进来，梵高掀起了自己的衬衫——在肋骨旁，有一个很小的弹孔。

“我弄伤了自己。”他说。

医生和警察随后都赶到了旅店。医生发现，那颗射入梵高体内的子弹并没有穿透他的身体，而是留在了脊柱附近。



梵高自画像（1887年），摄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而警察则关心这是不是一起谋杀案，所以他问梵高："你是不是想要自杀？"

梵高回答："我想是这样的。"

梵高一生关系最亲密的弟弟提奥得到消息后，很快从巴黎赶了过来。在床前，提奥向哥哥保证一定要救活他。

但梵高对自己挚爱的弟弟说："痛苦便是人生。"

据说那是梵高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7月30日，在痛苦中挣扎了30多个小时之后，梵高离开了人世。

终年37岁。

2

这是梵高之死最流行的一个版本。

事实上，这个版本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梵高从旅店老板拉乌尔那里借了一把左轮手枪，说是要赶走麦田的乌鸦，然后来到了镇外的一片麦田。在麦田里，他放下了随身携带的画具，举枪对着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枪。这一枪没有击中要害，却让他失去了意识。等他再醒来时已是黄昏，在无法找到那把手枪的情况下，他只能自己再蹒跚着回到旅店，寻求援助。

在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那本著名的《渴望生活·梵高传》中，这一幕自杀的场景得到了文学上的升华：“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枪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

再加上1956年好莱坞同名改编影片《渴望生活》的上映，梵高这一悲剧但又震撼人性的人生结局，深深打动了千万人的心。

很多人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结局比这更符合大家的想象了。

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极具天分但孤僻，甚至有精神疾病的梵高。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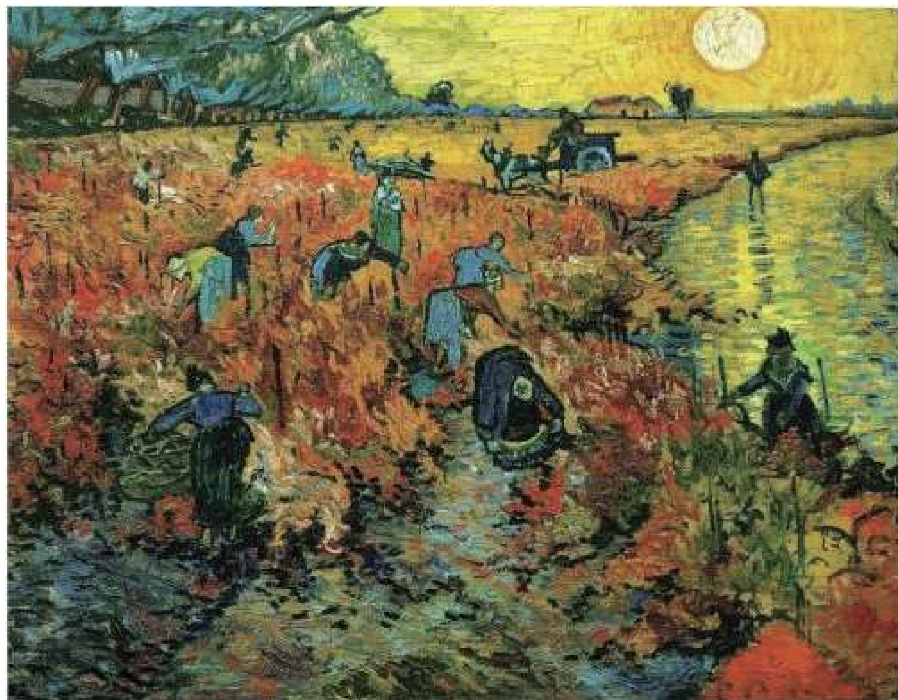
关于梵高的故事，大家当然已经很熟悉了。

梵高并不算漫长的一生，大概有这样几个点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第一个，是他生前贫困潦倒，死后却享尽哀荣。

梵高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牧师，母亲是富家女。但是，长大成人后的梵高似乎辜负了家庭对他的期待，在做过牧师和艺术品经纪

人之后，最终选择做职业画家的他就此陷入贫困。梵高一辈子只卖出过一幅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完全是靠他最亲爱的弟弟接济——梵高给他的弟弟写过600多封信，其中相当一部分只有一个诉求：“请务必再寄些钱来。”



梵高生前卖出的唯一一幅画：《红色的葡萄园》。当时售价是400法郎，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美元

然而，就在梵高去世之后，他遗留下来的画作却大受好评，价格也是一路飙升。梵高的多幅画作进入过世界最名贵的十大画作排行，他的画成了艺术和天价的代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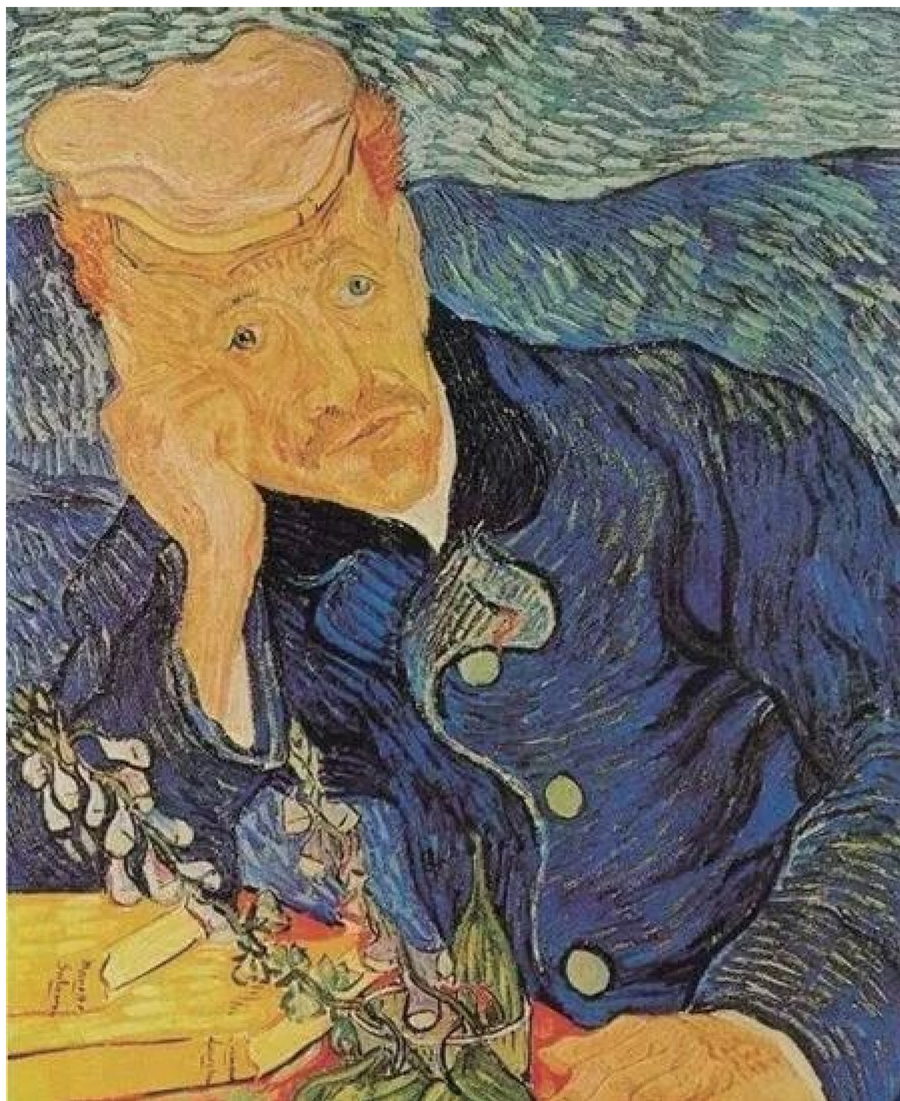
第二点，是他起步虽晚，但天赋异禀。

梵高的绘画天赋并不是从童年就开始展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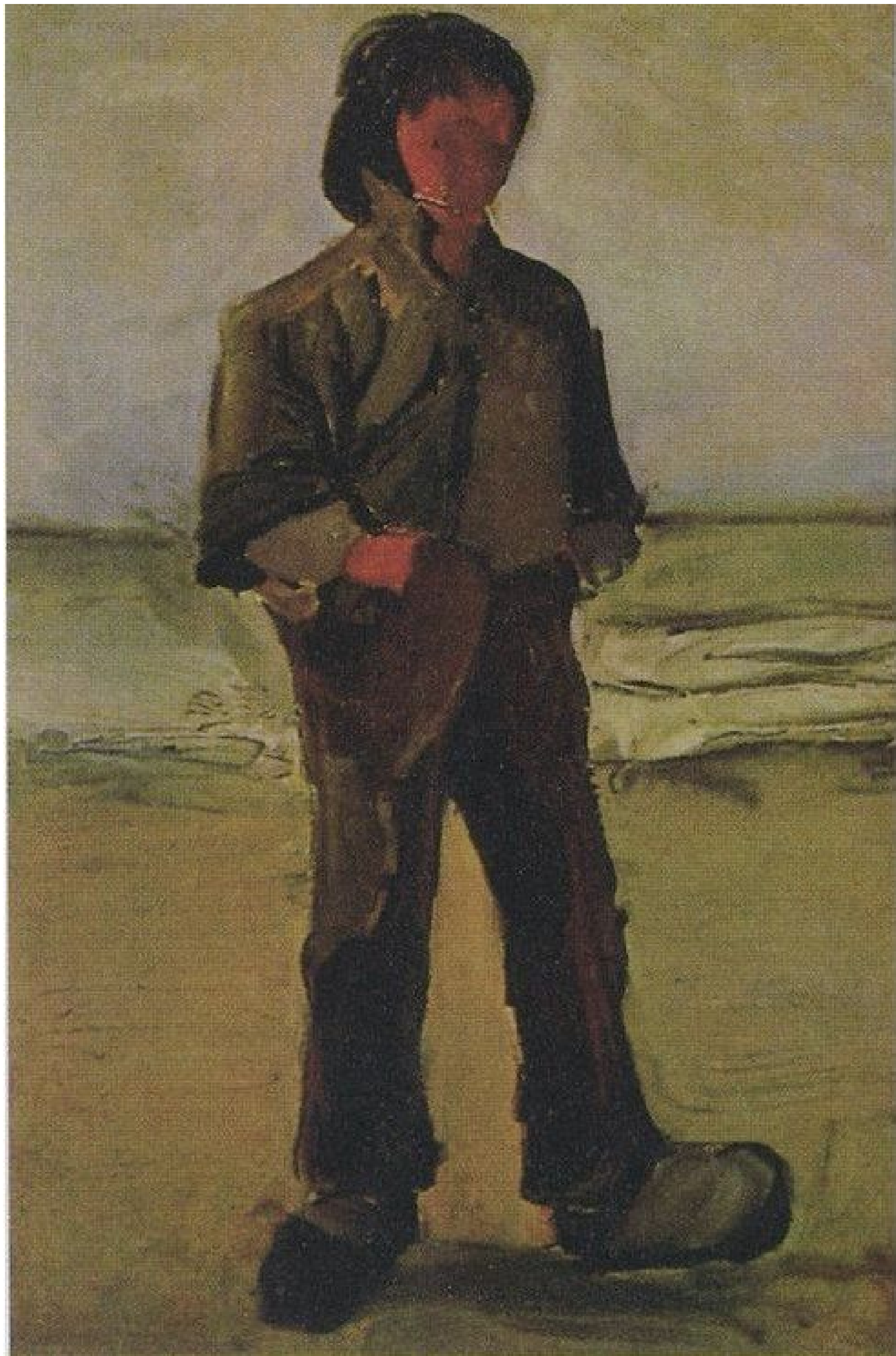
严格说起来，直到去世，梵高正式投身艺术创作的时间大概也就十年，他是一个标准的“半路出家”的画家。

1885年，已有小成的梵高画了一幅《吃土豆的人》。这应该是他早期作品中比较出挑的一幅。画完这幅画后，他自信地将画寄给了弟弟，

而作为艺术商人的弟弟在看了画之后没有太多表示，只是给了哥哥一个建议：“来巴黎吧！”



1890年6月，梵高为自己的治疗医生加歇大夫画了一张肖像画。100年后的1990年，这幅名为《加歇医生》的肖像画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被拍卖，3分钟之内就被日本人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拍走，创下了有史以来最贵艺术品的纪录。这个纪录直到2004年才被打破。当时全世界最贵的10幅名画，5幅都是梵高画的



梵高学画后不久的作品《海边的渔夫》。人脸可能因为画坏了而被抹去了。陈丹青非常喜欢这幅画



《吃土豆的人》

于是，在1886年，34岁的梵高就到了巴黎。

巴黎的各种艺术潮流给从乡下来的梵高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而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印象派”。

还记得梵高在《吃土豆的人》中运用色彩的技法吗？到了巴黎之后，梵高的画就变成了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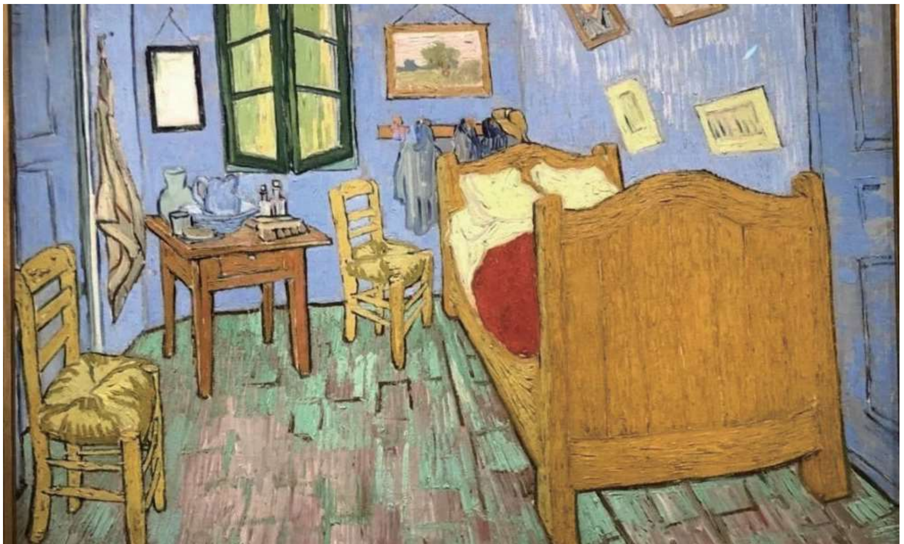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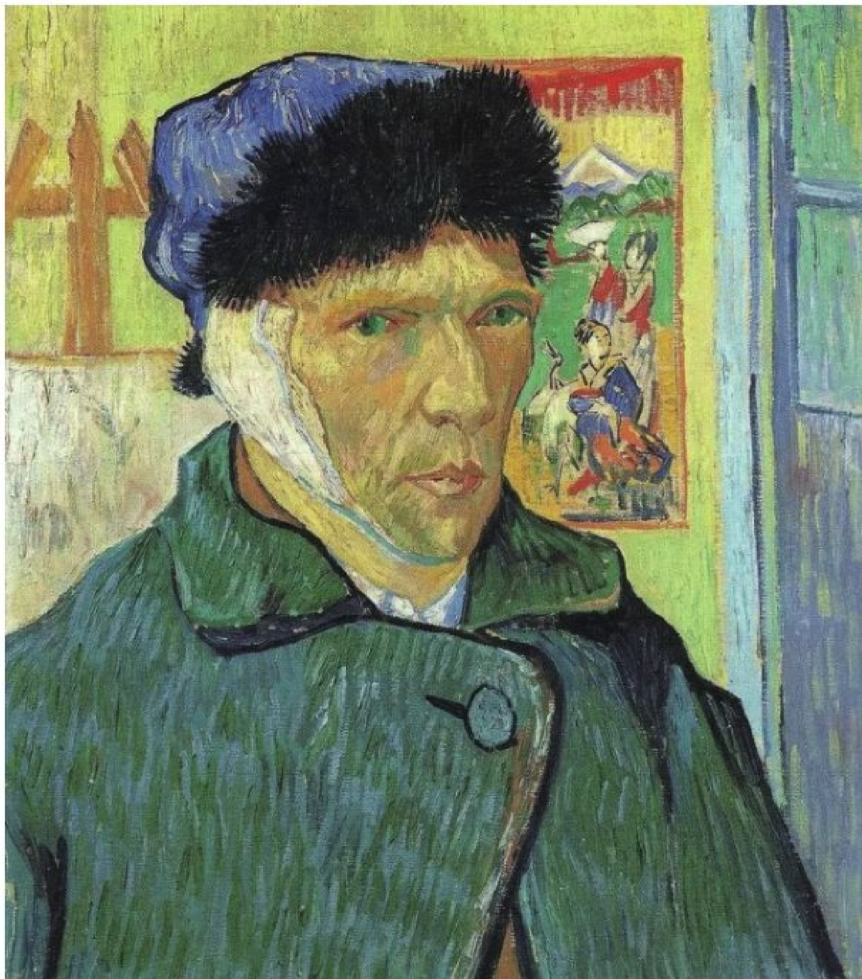
梵高的《播种者》

而在最早，梵高临摹米勒的《播种者》，是这样的画风：



左边是米勒的《播种者》，右边是梵高的临摹作品


梵高自己经常提起的一幅作品《阿尔勒的卧室》。这是他自己的卧室，简单的布置通过色彩的渲染，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摄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梵高《割耳后的自画像》。关于梵高割耳的原因，有几个版本，有说他自画时嫌自己耳朵不好看才割掉的，也有说他接到弟弟提奥要结婚的信之后一气之下割掉的。但无论如何，看到这幅画于割掉耳朵后一个月的自画像，相信梵高自己的心态已经趋于平静



1890年6月，梵高第二次精神崩溃进医院疗养期间，创作了这幅代表作之一《星月夜》。此时离他去世只有一个月时间了

梵高的画风开始大变，色彩明亮，涂抹浓厚，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风范。

第三点，自然就是他性格孤僻，精神异常。

梵高作为家中的长子（哥哥夭折），其实还是颇受宠爱和期待的。但是，梵高的性格却始终无法处理好这样的压力，最终造成了性格上的扭曲乃至精神上的失常（梵高的生平故事限于篇幅，本文不加以展开）。

关于他精神失常最有名的故事，无疑就是他与惺惺相惜的朋友高更争吵之后，一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并将它打包后送给了一个妓女。

梵高曾经两次精神崩溃被送入医院治疗，而对于一名艺术家而言，公众更愿意相信，精神和情绪上的波动，更有利于他们创造出普通人无法企及的作品。

所以，纵观梵高的一生，很多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自杀，可能是他唯一的归宿。

而事实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人们往往会忽视一点，那就是梵高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和传教者，其实是一直反对自杀的——他一直都表示，自杀是“道德上的懦夫行为”和“不诚实的人的行为”。

等等，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梵高真的是自杀的吗？

4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梵高“自杀”的那一天——1890年7月27日。

关于梵高自杀的那个说法，其实存在一系列的疑点：

第一，经医生鉴定，枪是从距离身体较远的地方开的，而不是从很近的地方开的——那梵高是如何做到自杀的？

第二，警察之后去了梵高所说的那片麦田，所有的画具，包括那把手枪，都不见了——如果是自杀，那些东西都应该在。

第三，警察在询问梵高是不是自杀时，他一直含糊其词：“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自己想自杀的。”——他似乎想掩饰什么。

第四，至少有两个目击证人证实，当初梵高去的是夏彭瓦尔村——那与梵高说自己自杀的麦田是截然相反的方向。

第五，梵高没有留下遗书，且就在他“自杀”前不久写给弟弟的信里，还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和规划——他不像是一个要自杀的人。

那么，面对这些疑点，梵高真的是自杀的吗？



梵高的画作《麦田里的乌鸦》。这幅画画于1890年7月，就是在他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个月。整个画面虽然由金黄和蓝色两个主色调构成，却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所以这幅画曾一度被传为他自杀前画的最后一幅画作

5

梵高有可能是死于他杀。



《花瓶中的十五朵向日葵》可能是梵高最早为大众熟知的作品。这幅画在1987年就拍出了3950万美元的价格——还是由日本人收购的，现收藏于东京损保日本东乡青儿美术馆。梵高一生对日本的浮世绘非常痴迷，而日本人也对梵高的画有极强的收藏欲

这是史蒂文·奈菲与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梵高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

1956年，在好莱坞电影《渴望生活》上映的那一年，一位名叫雷内·萨克里顿的82岁的法国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他说，他在16岁的时候，就生活在奥威尔小镇，并且认识一个奇怪的画家——梵高。

雷内是一位富有的药剂师的儿子，衣食无忧。根据他的回忆，他是通过他18岁的哥哥加斯顿认识梵高的——因为加斯顿也喜欢画画，且梵高认为他意识超前。

与哥哥不同，雷内比较喜欢恶作剧。他会将盐放进梵高的咖啡里，会将蛇放进梵高的颜料盒里，还会在梵高的画笔上涂抹红辣椒酱——因为作画时的梵高在沉思时，经常会用舌头去舔笔。

尽管如此，梵高还是和兄弟俩保持着往来。一方面，是梵高喜欢和哥哥加斯顿讨论艺术，另一方面，兄弟俩经常为梵高的酒吧账单买单。

而在雷内的回忆中，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他曾经从旅店老板拉乌尔手里买过一把破旧的点三八口径的手枪，并且一直带在身上。

关于1890年7月27日这一天发生的事，雷内暗示，是梵高从他的包里偷走了那把手枪。这个说法与旅店老板拉乌尔的叙述矛盾，因为老板说是梵高向他借的手枪。而且，这和雷内之后的叙述也有矛盾：他说他与那个装枪的帆布袋形影不离，但又说他后来到了诺曼底，才发现自己的手枪没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梵高中枪的那一天，加斯顿和雷内兄弟就离开了小镇，远走高飞。

为此，《梵高传》一书做出了一种推断假设：在7月27日的那个下午，外出写生的梵高在去夏彭瓦尔村的路上（那条路正好经过他和雷内兄弟经常相聚的酒吧），碰到了雷内和他的小伙伴们。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双方起了争执——也有可能是因为又一次的恶作剧，但这一次似乎玩笑开大了，雷内的那把手枪击中了梵高。惊慌的梵高捂住伤口，一瘸一拐地回到了酒店，而同样惶恐的兄弟俩，收起了梵高的画具，包括那把手枪，就此远走高飞。



梵高的《鸢尾花》，画于1889年，就是他离世的前一年。1988年，该画以5300万美元的价格被拍卖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前面所说的五大“疑点”，都可以完美解释。

除了还有一点似乎说不过去：梵高为什么后来坚持对警察说自己是自杀？

6

最有可能的原因，还是梵高的性格。

一方面，与其说当时梵高是与兄弟俩达成了某项约定，倒不如说梵高是出于自己善良的性格——他希望能够保护着兄弟俩不要遭到麻烦。这也是他当时向警察强调“不要指控任何人”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梵高自己的求死之心。

这和梵高反对自杀的态度并不矛盾。梵高自己曾写过一句话：“我不会特意寻死，不过一旦死亡降临，我也不会逃避。”

对于37岁的梵高来说，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痛苦、事业上的不

顺，以及挚爱的弟弟结婚，多重打击之下，如果忽然有了一个可以不用自杀而获得解脱的机会，梵高是否能真的抗拒？

当然，一切的一切，只是推断。不过就像梵高自杀的说法一样——一切的来源只有他自己的说法，没有任何人证，也没有任何物证。

除非有时光机器，不然很难再弄清梵高当时究竟是怎样遭受那一枪的。

不过有一点还是比较清楚的：对于公众，在梵高留给后世的光环而言，自杀无疑更耀眼。

馒头说

我曾在读者见面会上讲过一个例子，大意是：有时候，一些人心目中伟大的天才科学家应该的样子，首先他应该清贫，如果他坐拥豪宅、游艇，手握价值数亿元的专利，那肯定就失去了很多味道；其次，他最好有些怪癖，比如吃饭只吃单数的米粒，住酒店时的房间号必须能被3整除；再次，如果他能愤世嫉俗，离群索居，最后孤独而死，后人却从他的遗留手稿中发现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大发明，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我们的大众传媒其实早摸透了公众的心理和需求，在报道和塑造典型人物的时候，也会尽可能往这些方面靠拢，哪怕加上一点点想象或渲染。

不光科学家，艺术家其实也是。

梵高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例子：才华横溢，穷困潦倒，孤僻抑郁，自杀而死。

那么多年来，梵高已是一个为艺术赴汤、为梦想蹈火、为真理献身的形象，而在这个形象中，“自杀”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哪怕，这个故事的结局未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在我个人看来，那个可能存在的另一个版本，或许比自杀来得更曲折，更能彰显梵高的性格——当然，这也只能停留在推断的层面上了。

其实，若论贫穷或是生活艰难，梵高都不是历史上最值得一写的那个艺术家，但他在一直遭人白眼和冷遇的情况下，依旧坚持自己的梦

想，这才是最让人动容的。

没错，我们其实都知道，就梵高一生的际遇和他的才华而言，已经不需要再加上一个“自杀”来为自己一生的故事增加砝码了。

在英剧《神秘博士》第5季第10集中，梵高被带着穿越到了2010年的巴黎奥赛美术馆。他被带到了一间展厅，惊讶地发现在里面展出的，全是自己的作品。

然后，他从馆长的口中，听到了后世对自己的评价：“我认为梵高是史上最杰出的画家，没有之一。在任何时期，都绝对是最知名、最伟大、最受景仰的画家。他对色彩的掌控无与伦比，他把在生活中遭受的痛苦磨难，转化成了画布上的激情洋溢的美。痛苦很容易表现，但如何糅合热情与痛苦，来表现人世间的激情、喜悦和壮丽，他前无古人，或许也后无来者。”

那一刻，生前从来没有受到过肯定的梵高，哭得像一个孩子。

那一刻，坐在屏幕前的我，也泪流满面。

能称“时尚女王”的人不多，她算一个

这不是一篇品牌广告。只是不少品牌创始人的经历，本身确实是一个好故事。

1

1883年8月19日，卡布丽尔·香奈儿（Gabrielle Bonheur Chanel）出生在法国的索米尔。

香奈儿应该不能被称为“幸福的孩子”，因为她的爸爸阿尔贝是位商人——这么称呼似乎隆重了一点，他其实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妈妈出身农家，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当女仆。

当然，贫穷并不是香奈儿不幸福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她的爸爸风流成性，从来不管妻子和孩子，而她的妈妈在生下三女二男之后，在32岁时积劳成疾，去世了。

在妻子去世后，香奈儿的爸爸采取了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安排了他们5个兄弟姐妹——把三个女儿送进修道院，把两个儿子送进农场。

然后他就远走高飞了。

于是，香奈儿的童年，就是在修道院和教会学校度过的。

庄严肃穆和崇高和谐的修道院装饰风格，给香奈儿后来的审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黑色、白色，简洁、朴实。香奈儿的童年，就生活在黑白搭配的世界里。

而修道院的生活给香奈儿带来的最大收获，是缝纫。在那里，香奈儿学会了各种缝纫和刺绣的本领。

老天在关上你的很多道门时，总会给你留下一扇窗——尽管你当时可能并不知道。

白天，香奈儿就是读书和缝纫，晚上，她就睡在冰冷的修道院硬板床上，期待爸爸有朝一日能够回来找她。

爸爸再也没有来。

2

1903年，20岁的香奈儿已经亭亭玉立，不再是当初那个怯懦的小姑娘了。

她在修道院里学到的缝纫本领派上了用场——她进入一家纺织厂，当了一名女工。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纺织厂女工平凡的一生的故事，所以，大家都知道，好戏才刚刚开始。

当然，人生逆转的最重要前提，是你不甘于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安排。

香奈儿选择了去音乐厅唱歌。

事实上，香奈儿会唱的歌实在不多，她只是喜欢被人关注和听到掌声的感觉。至于她会唱的歌，就两首，一首叫《公鸡喔喔啼》，另一首叫《谁看见了Coco》。

因为香奈儿长得确实迷人，所以观众还是给她的表演以热烈的掌声，并且开始称她为“Coco”（可可）。

香奈儿索性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可可·香奈儿”，也就是后世广大女性最熟悉的“Coco Chanel”（可可·香奈儿）。

香奈儿在音乐厅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她还俘获了一个男人的心——法国第十轻骑兵团的年轻军官艾蒂安·巴勒松（Etienne Balsan）。

第十轻骑兵团是贵族兵团，里面都是贵族子弟，巴勒松也是其中的一员。他疯狂地爱上了香奈儿，并邀请她去自己在法国北部的城堡居住。

没有悬念，热恋中的香奈儿与心爱的男人一起住进了那座城堡：豪华的宴会厅、巨大的马场、成群的仆人……香奈儿觉得她终于等到了她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

但香奈儿一直没有等到巴勒松的求婚。



1909年，26岁的香奈儿



巴勒松和香奈儿

不仅如此，巴勒松根本就没有带她去见自己的父母。

虽然之前隐隐有过猜测，但香奈儿最终还是必须面对现实：巴勒松根本就没打算娶她，他只是希望把她养起来，做自己的情妇。

那香奈儿有没有反对呢？至少在一开始，她并没有反对。

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到了1909年，26岁的香奈儿终于厌倦了被“圈养”的生活，她决定要做自己的事，哪怕离开荣华富贵的生活。

做什么呢？做帽子。

1910年，香奈儿的帽子店，在巴黎的康鹏街（Rue　Cambon）21号开张了。

香奈儿的帽子卖得还不错，原因在于她看准了时尚潮流。与其说是她看准，倒不如说她自己创造了一种时尚——简洁、耐看。

当时女士戴的帽子，都有一种浮夸的倾向：有各种花巧的饰边，各种华丽的羽毛，甚至有水果、标本鸟……怎么复杂怎么来，戴在头上不仅摇摇欲坠，对女性也是一种折磨。所以香奈儿通过非凡针线技巧缝制的帽子一问世，这种“逆时尚风”很快就在巴黎引发了一股新潮流。

在这个过程中，香奈儿遭遇的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对她的一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男人叫奥瑟·卡佩尔（Author　Capel），在社交圈，他被昵称为“男孩”（Boy）。卡佩尔也是富家子弟，会打马球，会做生意，尽管他的身世和香奈儿一样扑朔迷离——有人说他是大银行家的私生子。

卡佩尔其实是巴勒松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香奈儿和他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巴勒松。但最终，巴勒松还是表示接受。

卡佩尔堪称香奈儿一生最重要也是最钟爱的男人，这不仅仅因为他资助香奈儿开店，为她介绍各种上流社会的名媛购买她的帽子，也不只是因为他深深地爱她，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相信她。

没错，卡佩尔是第一个真心相信香奈儿的男人——相信香奈儿的能力，相信她一定会获得成功。

在卡佩尔的鼓励和支持下，香奈儿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卖帽子了。

卡佩尔给香奈儿介绍了一个英国的裁缝，他们开始一起设计香奈儿脑海中那些代表真正时尚的衣服。

香奈儿把自己的小姨和妹妹都招了过来，开始“创造”一些新概念的服装——

“我把一件旧毛衣从前面剪开，这样就不用套在头上往里钻了。我还在剪开的地方和衣襟缝了一条装饰带，加了个领子，加了个蝴蝶结，大家就看陶醉了。”香奈儿后来这样回忆。



1891年的两位佩戴帽子的欧洲女性


戴着自己设计的帽子的香奈儿


香奈儿、巴勒松和卡佩尔在一起

那件衣服，就是后来香奈儿经典套装的雏形。

必须要提一下那个时代背景——1914年，就在香奈儿正式开出了两家时装店的同时，波及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战争中，法国的大量社会名流和贵族开始离开首都巴黎，跑到外省避难。而香奈儿接受了卡佩尔的建议，适时在远离战场的比亚里茨——法国和西班牙贵族的度假胜地——开出了一家新店，很快，那里的香奈儿店成了贵族妇人们最爱去的地方。

但光有好的选址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吸引人的，还是香奈儿设计的服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欧洲列强的实力对比，也深深改变了社会结构——男人们成批被送往战场，而女人们成批走出家庭。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户外活动机会。

这和香奈儿崇尚的“简约”和“耐用”的时尚理念不谋而合。在这方面，香奈儿展现了惊人的天赋以及果敢的执行力，她将当时欧洲女性的身体从紧身的蕾丝胸衣衬垫、硬领或束腰中解放了出来，让她们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为男性的审美眼光而让自己受罪，而是应该遵从自己的意愿，释放一种舒适、自然的美。

她设计出了经典的海魂衫和休闲裤，第一个将只有工人阶级才穿的针织面料用在时装中，而最著名的，是她推出了女装长裤。

在那个女性只穿裙子的年代，香奈儿的女装长裤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最终，时尚界选择了接受，并引以为风尚。

香奈儿的生意开始做得风生水起，她手下有了300名以上的工人，并且还清了卡佩尔借给她的启动资金。

但是，她却失去了卡佩尔。

1918年，和香奈儿一路携手走来的卡佩尔，因为希望获得父亲的欢心，最终还是与一名贵族女子结婚。这件事严重打击了香奈儿，虽然据说香奈儿在刚开店时拒绝过卡佩尔的求婚，但她的理由是“希望等事业有成时再在一起”。

而在1919年，香奈儿彻底失去了卡佩尔——他在一场车祸中遇难。

36岁的香奈儿曾一度以为自己拥有了爱情，但最终事实证明，一切依旧是一场梦。



香奈儿的服装海报



卡佩尔和香奈儿

4

卡佩尔的去世让香奈儿陷入了悲伤，却也刺激了她的创作灵感。

她开始疯狂地迷恋上黑色，由此设计出了著名的“小黑裙”——很多人说，那是为了纪念卡佩尔。

抛开感情因素，黑色的衣服在当时只有在葬礼上才会用到，但在被香奈儿设计出“小黑裙”之后，却成了女性最新的时尚。



香奈儿和她的“小黑裙”

在这一时期，香奈儿也确立了自己品牌的标志，就是那个著名的“双C”——有人说，那是为了纪念卡佩尔和她，所以用两个“C”字母开头。当然，也有人说，那只是她“Coco”的两个“C”而已。

以香奈儿的性格，她并没有陷入对卡佩尔去世的哀思中不能自拔。不久后，她就找到了新的男伴——有俄国流亡的大公迪米崔，也有英国的维斯敏斯特公爵。

感情生活总是能给香奈儿以无限的灵感。

在与迪米崔相恋时，她了解了俄国宫廷的调香方式，经过自己的实践，最终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推出了后来经久不衰的NO.5香水（香奈儿的5号香水，据统计在全世界每30秒就卖掉一瓶）。

在和维斯敏斯特的交往过程中，她了解到了贵族的生活方式，从公爵的西服材料中得到启发，开发出了第一套斜纹软呢套装。



曾有一种说法，说后来与别人结婚的维斯敏斯特公爵对香奈儿一直念念不忘，在伦敦市的街头灯柱上刻上了“香奈儿”的品牌标志，同时在这个标记的旁边，刻上了一个大写的“W”，代表威斯敏斯特公爵家族，以此纪念这段无疾而终的爱情。但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认为“双C”其实代表的是“City Council”（市议会），并不是什么品牌标识，而旁边的“W”是“Westminster”（维斯敏斯特）的意思，因为只有在Westminster City Council（维斯敏斯特市议会）才有这种路灯

此时的香奈儿依旧拥有美貌，以及渐渐成形的时尚帝国。她已经不需要依赖男性而独立生活了，反而，痴迷于她的男性开始排队。

香奈儿的事业开始走向巅峰，光雇用的员工就达到了4000人。但很快，又一次风暴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5

“二战”一爆发，香奈儿就关闭了自己的时装店。

但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让她远离战争的困扰，恰恰相反，香奈儿在整个“二战”中的表现，成了她一生中最大的一个疑团。





香奈儿在法国康鹏街的公寓，内部一切构造都遵照她生前的装饰

美国著名记者哈尔·沃恩在他的著作《与敌共眠——可可·香奈儿的暗战》（*Sleeping with the Enemy: Coco Chanel's Secret War*）中明确指出："二战"期间，香奈儿扮演了纳粹间谍的角色。

在这段时间，香奈儿与一名小她13岁的德国男爵汉斯·京特·冯·丁克拉格走到了一起，但这位男爵绝非一个普通的“花花公子”，而是一名资深的德国间谍，他直接向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报告。

哈尔在书中指出，香奈儿有“反犹”情结，并曾在1943年受德国之托，两次飞赴西班牙的马德里，试图充当德国与英国调解的“中间人”角色，但遭到了英国人的拒绝。

不过，香奈儿的品牌方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的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反驳，称香奈儿当时有一大批犹太人合作伙伴和朋友，而且她和汉斯男爵的恋情早在战前就存在了。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1944年底法国被从德国纳粹的手里解放出来后，法国当局第一时间就逮捕了香奈儿。香奈儿坚决否认自己的间谍行为，只是承认和一个德国纳粹军官谈过恋爱。

出于各方面的原因（据说香奈儿的好朋友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从中求情），在“二战”结束后很多与德国人恋爱的法国女人被剃头乃至当街羞辱的背景下，香奈儿在被逮捕的几个小时后，就被保释了。

在被保释后不久，香奈儿就和汉斯一起前往瑞士，从此远避人间。

香奈儿的故事到此完结了吗？

并没有。

6

1954年，71岁的香奈儿宣布结束与汉斯的恋情，又回到了法国。

她宣布，要重新回到时尚界。

曾有一种说法，香奈儿选择复出，是因为看到朋友穿了一条裙子。

那是一位男爵夫人，那天她穿了一条非常紧身的迪奥晚宴裙——这个品牌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已经成为香奈儿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香奈儿认为，在她离开法国的时间里，当初她坚决反对的19世纪女式束身衣服似乎又回潮了，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再次回到时尚的战场，捍卫自己的风格和理念。



香奈儿和她自己设计的2.55手袋

当然，这只是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无论怎样，香奈儿希望回到自己创造辉煌的舞台，那才是真的。

不过，不知是不是因为“二战”间谍悬案的原因，法国人对香奈儿的回归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比如对于香奈儿拿出的新款的帽子，法国媒体的评价是“像旧的一样”。

这时候给香奈儿勇气的，是一直很欣赏她设计风格的美国市场。香奈儿的新款设计产品，在欧洲遇冷，在美国却受到一路追捧。

在这样的鼓舞下，1955年2月，香奈儿推出了又一个经典设计：香奈儿2.55手袋。时至今日，能拥有这样的一款“小香包”，依旧是无数年轻女孩的梦想。

香奈儿再一次成为时尚的传奇，不仅仅是品牌，还有品牌的创始人。

人们的目光渐渐聚焦到香奈儿的身上：美丽、倔强、多情、冷酷、

天才、磨难、高贵、工作狂……

香奈儿会定期销毁自己的一些照片，解雇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刻意隐藏自己过去的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香奈儿让自己的身世渐渐蒙上一层迷雾，只给世人留下一句话："我的生活不曾取悦于我，所以我创造了自己的生活。"（My life didn't please me, so I created my life.）

1971年1月10日，香奈儿告别了她创造的生活，留下了一个如今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时尚帝国，在丽兹饭店的豪华套房内安然逝世。

88岁，终身未嫁。

馒头说

有人曾说，香奈儿的人生结局并不完美。

为什么呢？因为她终身未嫁，孤独终老。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衡量女性成为"人生赢家"的标准，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嫁个好男人，生个好孩子，或者，生了两个孩子，于是就摇身一变，成了"人生赢家"了——如果不是那样，评价她的语气总是带着惋惜。

这是什么标准？这是以男人眼光制定的标准吧！

于是想说两句大老爷们可能不太爱听的话，得罪勿怪：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注定会随之一步步提高的，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女性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不会深陷在男性的思维框架里，被指挥，被评判。

那么，女性怎样才能独立呢？

答案有很多，很多人肯定会说：首先思想上要独立。没有问题，思想独立是独立的先决条件，但我觉得，其实有一种很重要的独立，长期以来有被忽视的嫌疑——或者说，很多女性可能不愿意说出口。

那就是经济独立。

香奈儿之所以被后人看作女性解放和独立的一个象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一直是经济独立的。事实上，香奈儿甚至认为，一个女性要在思想或精神上独立，首先要在经济上独立。

这个话题说起来太长，今天不展开，我决定用我老婆前几天发的一条推送里的一段话，先做个收尾——虽然我是男的，且是她的老公，但……我还算是同意的吧。

她的话是送给女生的：

“有了钱才有底气，有更多的选择，

25岁被老板性骚扰一巴掌扇过去，

30岁看到喜欢的包包买起来不犹豫，

35岁不会因为养不起孩子才离不开渣男，

40岁看法令纹不顺眼就去做医美，

45岁让父母晚年有最好的照顾，

50岁提前退休去跳广场舞。”

“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并不是一个羞于启齿的目标，相反，对于女性而言非常重要。

不是人人都能或者想成为香奈儿，但至少，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己。

一位女明星的神秘死亡

今天要说的，是一位女明星的故事。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少完整看过这位女明星的电影。但她的名字，却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如雷贯耳。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只活了36岁。

1962年8月5日的清晨4点25分，洛杉矶警察局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玛丽莲·梦露的私人医生打来的。电话里，医生的声音充满了惊恐：玛丽莲·梦露死了！

警察赶到梦露家里的时候，发现她浑身赤裸地平躺在床上，脸上压着枕头，两条腿伸直，手里握着一个电话筒。床边散放着一些安眠药瓶。

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自杀场景。

但是，验尸官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梦露全身有注射痕迹。

此外，梦露的精神病医生后来说，梦露去世前一天很沮丧。但那天见到过玛里莲·梦露的证人却说，她那天情绪很好，没有什么烦恼的表现。



玛丽莲·梦露自杀的卧室

所以，当官方宣布，玛丽莲·梦露因有抑郁和精神病史而死于自杀的时候，无论是媒体还是老百姓，都不相信。



梦露的童年照

那可是玛丽莲·梦露啊！

1926年出生的玛丽莲·梦露，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作为一个降落伞厂的漂亮女工，因为有一次拍照时被人发现面对镜头一点儿都不怯，在20岁时开始接触电影。

尽管在之前也出演了不少电影角色，但梦露真正开始事业的辉煌期，是在1952年。那年她26岁，第一次成为《生活》（*Life*）杂志的封面女郎，从此逐步开始接到重要电影的主角片约。

也就在那前后几年，梦露开始以“性感女星”的形象，渐渐被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熟悉。

1960年，玛丽莲·梦露凭借在电影《热情似火》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当年金球奖的“最佳女喜剧演员奖”。



玛丽莲·梦露是跻身美国十大历史名人中唯一的女性，并且名字排在猫王和海明威之前

所以，谁都不愿意相信，仅仅两年之后，梦露会在她的黄金年龄，选择告别这个世界。

于是，各种推测风起。

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是因为梦露与肯尼迪家族有染而被灭口。

梦露与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是在1946年认识的。他们的特殊关系一直保持了十年。也有说法，说这段感情是在约翰·肯尼迪还是参议员时就开始了。

彼时已经有过三次失败婚姻的梦露，似乎陷入这段热恋不能自拔，一度产生了希望能取代第一夫人杰奎琳，成为肯尼迪妻子的想法。



梦露在电影《七年之痒》里站在地铁风口的那张著名照片



左图据说是唯一一张梦露（中）与肯尼迪（右）的同框照。右图为私家侦探号称拍到的两人幽会场景

1962年5月29日是肯尼迪的45岁生日，梦露为肯尼迪准备了一块意义深远的劳力士金表，表的背面镌刻着“杰克（肯尼迪的昵称），梦露永远爱你”。而装表的盒子上写着一首诗，诗中这样写道：“让相爱的人呼吸他们的叹息，让玫瑰盛开音乐响起，让激情焚烧我们的嘴唇和眼睛。让我爱你，否则不如死去！”

为了那一晚，梦露专门邀请法国服装设计师让·路易为自己设计晚礼服。让·路易根据梦露的身体特点，设计了一件由金属饰片和珠线装饰的裙子，后面开口，裙摆及地。那件礼服被梦露命名为“肯尼迪装”。

那一晚，肯尼迪看上去也非常高兴，对梦露也举止亲昵。但是第二天，肯尼迪便派人收回了当晚所有他和梦露在一起的照片，而那块镌刻着字的劳力士金表，也被秘密销毁。

种种迹象表明，约翰·肯尼迪已经厌倦了梦露。但随后加入这段复杂关系的，是约翰·肯尼迪的弟弟，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

梦露的精神分析医生格林桑，曾录下梦露与他的一次谈话。梦露曾非常明确地说过，她与罗伯特·肯尼迪发生过关系。而就在梦露死之前不久，她曾做过一次堕胎手术，但没人知道孩子是不是约翰·肯尼迪的，或者是不是属于罗伯特·肯尼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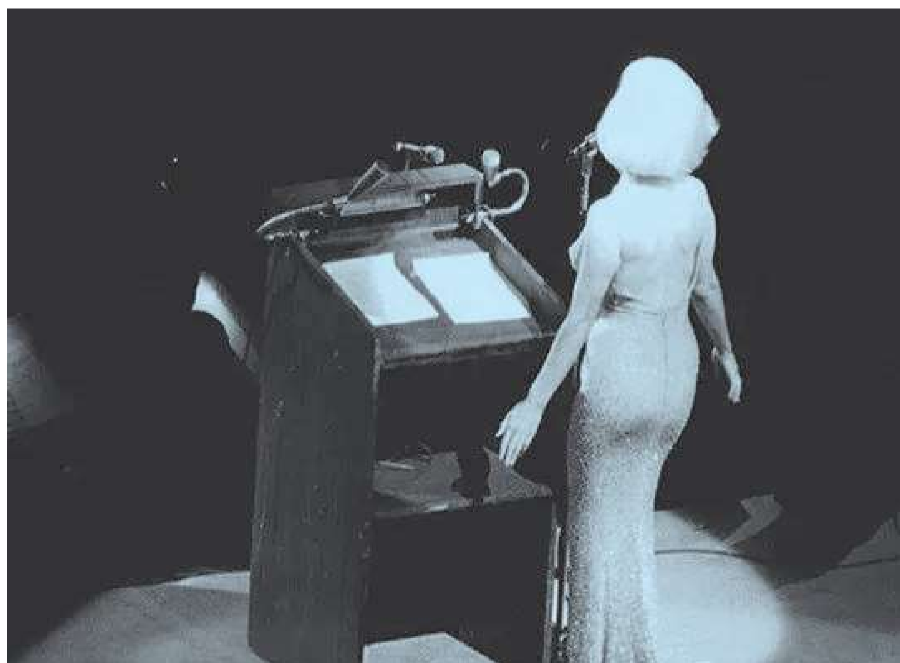
就在肯尼迪45岁生日过去后的两个月，悲剧发生了。

关于肯尼迪兄弟为什么非要梦露死，主要有几种猜测：

一是梦露怀了他们兄弟俩不知道谁的孩子，电话要挟如果不把事情说清楚，她将开新闻发布会。

二是梦露掌握着大量与肯尼迪总统交谈时得来的秘密，包括肯尼迪与黑手党有联系、美国准备怎么干掉古巴的卡斯特罗等。这些秘密，被梦露记在了一个“秘密日记本”上。

三是梦露不仅掌握着“秘密日记本”，还和苏联特工有接触，然后被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知道了。



梦露穿着“肯尼迪装”，在那一晚为肯尼迪演唱了那首著名的《总统，祝你生日快乐》



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哥哥最终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遇刺身亡

总而言之，这些猜测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促使肯尼迪兄弟让梦露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关于梦露是如何被谋杀的，又有几个版本：

一是被她的医生和护士合谋用药物害死的。护士在梦露死后不久，就用肯尼迪家族的运通卡，远走高飞。

二是被5名黑手党成员用氯气毛巾闷死的，这5名黑手党成员的雇佣者，是肯尼迪家族。

而最离奇的一个版本，是英国《每日电讯报》根据FBI解密档案推测的，说梦露之死是一场精心组织的骗局。梦露的好友让梦露相信她只是在表演一场“假自杀”，但最终弄假成真。她的好友、医生、管家、私人助理和公关代言人均参与了此项阴谋，而幕后主使者是罗伯特·肯尼迪。（这条推测我不太信。任何一件事，参与的人越多，泄密的概率越高。）

梦露逝世了54年，据说FBI还有大量的资料并没有解密。2013年，参与玛丽莲·梦露当年解剖工作的日本医生托马斯·野口，在10月31日的《新潮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解剖了梦露——托马斯·野口的最后证词》的文章。野口认为，从种种解剖的证据来看，尽管梦露手握电话筒很奇怪，但“自杀就是自杀”。

只是，又有多少人相信他呢？

馒头说

中国的历史，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就是“成功都是男人的事，失败都是女人的错”。从苏妲己到杨贵妃，从陈圆圆到慈禧，例子举不胜举。

其实外国也没好到哪里去。

外界对玛丽莲·梦露自杀真相的探究和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猎奇的成分偏多。归纳出的幕后原因，无论从哪种猜测看，都有些梦露是“咎由自取”的味道，甚至可以读出这样一些潜台词：谁让你去勾搭总统？谁让你去勾搭总统弟弟？谁让你去写“秘密日记本”？谁让你不做好避孕措施？

但很少有声音，是从梦露这一角度发出的。

搜索一下，留给梦露的评价，往往只有一个词：性感。

很少有人关心她从小在孤儿院和监护人手里辗转造成的影响，关心她对爱情的渴望和期待。诚然，和“高富帅”的总统约会有虚荣心的驱动，但反过来看，能获得全国男人“梦中情人”的青睐，对总统而言何尝不也是一种满足？

更何况，两个肯尼迪，都是有妇之夫。

所以，不如读一句梦露在自传《我的故事》里的那句话：

“男人们宁愿付一千美元获得你的吻，也不愿意花五十美分倾听你的灵魂。”

中国人最熟悉的那个欧洲公主，真的幸福吗？

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她可能是最知名的一位欧洲公主。但通过那部电影所展现的，只是这位公主光鲜的前半生，至于后半生，其实电影并没有拍……

1

1837年12月24日，马克西米连·约瑟夫公爵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女儿。

马克西米连·约瑟夫是当时巴伐利亚王国（后被德意志吞并）王室的一个旁系，他的妻子，是当时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同父异母的妹妹——卢德维卡公主。

一涉及欧洲王室，我们总是会被纷繁复杂的人名和血缘关系搞得晕头转向，那么就来简单点出这两个人身份的意义——他们都算是贵族，也和王室沾一点边，但因为不是直系，所以相对更自由，更不拘礼节。

比如，这位约瑟夫公爵就拥有一个自己的马戏团，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而且他把一家人搬到远离宫廷的波森霍芬城堡，让家人远离宫廷礼仪的束缚。

在那里，约瑟夫公爵夫妇和他们的8个子女都还算过得无拘无束，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四女儿伊丽莎白·阿玛莉亚·欧根妮（Elisabeth Amalie Eugenie）——她后来有了大家都熟悉的另一个称谓：茜茜公主。

茜茜在父母营造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和兄弟姐妹们过着开心的日子，不上课的时候，就在山野间骑马，在溪水边嬉戏，看夕阳落下，数繁星点点。

这种无忧无虑的时光，一直持续到茜茜16岁。

2

1853年，茜茜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一年，23岁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到了需要找一位皇后的年纪。



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约瑟夫在位68年，是欧洲在位时间第三长的皇帝。第二长的是列支敦士登大公约翰二世，71年；第一长的是路易十四，在位72年（也是全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为皇帝操持整件事的，是他的母亲索菲。索菲在奥地利皇室乃至欧洲皇室历史上，也是一位可以留下一笔的女性。这位被称为“哈布斯堡家族中唯一的男人”的女人，先让自己平庸的丈夫继承皇位，然后再把他劝退，让自己的儿子弗兰茨·约瑟夫登基，而自己成了垂帘听政的皇太后。

索菲太后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和世界上的很多婆婆一样，她并不觉得有哪个女性能配得上自己高贵的儿子，所以与其找一个陌生女子，

她宁可“肥水不流外人田”，找自己皇族的亲戚，而且必须是政治联姻。

想来想去，索菲想到了自己的妹妹，有巴伐利亚王室血统的卢德维卡公爵夫人，也就是茜茜公主的母亲。

但当时索菲相中的外甥女，其实是卢德维卡公主的长女海伦女公爵。

按照索菲太后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主意一定，她就立刻邀请自己的妹妹卢德维卡带着自己的外甥女海伦到皇室的夏宫伊舍尔游玩，而此行的实际目的，就是让海伦接受奥地利皇帝的求婚——没错，这对年轻人连面都不需要见一次。

接到“命令”的卢德维卡就匆匆带着海伦从慕尼黑出发了，同行的，还有当时不满16岁的茜茜。但是，因为路上公爵夫人的头疼病又犯了，所以这家人只能在途中做一次休息，耽搁了行程。更糟糕的是，负责装送她们晚会礼服的马车更是不知所踪。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当时卢德维卡一家正在为她们已去世的姑姑哀悼，一家人都穿着黑色的丧服。但觐见皇帝的时间已经一刻也不容耽搁，在抵达目的地后，卢德维卡只能带着两个女儿，穿着黑色的衣裙，第一次出现在了年轻的约瑟夫皇帝面前。

黑色的裙子显然不适合本来就皮肤黝黑的海伦女公爵，却把肤色雪白的茜茜映衬得更加光彩照人。



年轻时的茜茜



茜茜公主的姐姐海伦。虽然经历了一场尴尬，但海伦一生都和妹妹茜茜相处融洽

没有悬念——年轻的皇帝对姐姐并没有表示出兴趣，而是疯狂地爱上了妹妹。

在约瑟夫皇帝生日的前一天，皇帝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在那场舞会上，海伦穿了一件高雅的白色丝绸衣裙，额头戴着常春藤花环。而茜茜穿了一件朴素的浅粉色衣裙。第一支和第二支舞曲响起时，皇帝都没有进入舞池，大家都在屏息等待。最终，皇帝邀请茜茜进入舞池，并且在舞曲结束后送给她一束鲜花——这是一个传统的信号，表明茜茜已被选中为未来的皇后。

当时海伦流下了眼泪，而茜茜不知所措。

索菲太后显然不想改变自己原先的选择，但23岁的儿子这一次公然反抗了她——如果不能和茜茜结婚，那我就终身不娶！

再强势的母亲，最终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开心的。

5天后，奥地利皇帝宣布和茜茜公主订婚。

8个月后，在维也纳的奥古斯丁教堂，一场盛大的婚礼持续了三天三夜，陪着姐姐去出嫁的茜茜公主，就这样成了奥地利皇后。

这是一个似乎只存在于童话书中的爱情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只是刚刚开了个头：公主嫁给了国王，后来幸福吗？

3

正如你们预料的那样，茜茜在经历了最初的甜蜜之后，便开始体会到皇室宫廷的另一面。

因为有一个相对开明的父亲，茜茜从小生活在相对不受礼仪束缚的环境里，甚至有相当长的时间可以在山野之间玩耍，但奥地利皇室的宫廷，一切都有规矩，一切都讲礼仪，这让她非常不适应。

更糟糕的是，即便茜茜想遵守宫廷的规矩，也未必能得到很好的机会，因为她虽然出身贵族，但其实并非皇室正统血脉，这在讲究出身的宫廷里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在其他沟通和交流方面，茜茜虽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当时欧洲的宫廷里普遍流行说法语——从小就说巴伐利亚语的茜茜完全不会，这也阻碍了她和王公大臣以及贵族之间的交流。

茜茜是皇后，这点毫无疑问，但在宫廷，皇后的地位和尊严，很多时候取决于她生出的孩子——或者她能否生出孩子。

和约瑟夫皇帝结婚第一年，茜茜就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为索菲——这个名字不是茜茜起的，是她的婆婆索菲起的。

茜茜不仅没有给自己孩子起名的权利，连陪伴自己孩子的权利也是没有的。按照宫廷的规矩，孩子出生没多久，就被婆婆索菲派人给抱走了。

一年之后，茜茜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依旧是女儿，取名为吉塞拉——和姐姐索菲一样，茜茜不能给孩子取名，更不能和孩子待在一起。

婆婆索菲对此行为的解释是：“茜茜自己还是个孩子，哪里会照看孩子？”



据说索菲皇太后年轻时也是一位大美人，她甚至和拿破仑二世（拿破仑的儿子）传出过绯闻

但茜茜现在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已经不是和婆婆争夺孩子抚养权，而是危及她皇后地位的一件事——她没有生出儿子。

有一天，茜茜在房间的桌子上发现了一本小册子，有些句子下面被画了重点线：

“……王后的职责自然是诞下王位继承人。如果王后幸运地为国王带来了王储，那么她的野心就该终结——她绝不应该干预帝国政府事务，关心这些事不是女性的任务……如果王后没有生下儿子，那么，她在这个国家内只不过是一个外国人，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外国人。因为她永远不希望在这里被亲切地看待，并且一定盼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因此，她总是设法通过非正常手段赢得国王。她将通过钩心斗角和挑拨离间争取地位和权力，危害国王、国家和帝国……”

虽然没有证据，但最可能放这本小册子给茜茜看的，就是她的婆婆索菲。

文中的“干预帝国政府事务”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1857年，20岁的茜茜和丈夫约瑟夫一起访问了当时臣服奥地利的匈牙利。

远离奥地利宫廷生活的旅行让茜茜变得非常开心，她很快爱上了匈牙利和那里的音乐、艺术以及人民，甚至开始自愿学习匈牙利语——但是，茜茜的婆婆索菲以及一班宫中的贵族是非常讨厌匈牙利的。

这次愉快的旅行最终却是以悲剧收场的：茜茜的两个女儿在旅途中腹泻不止，二女儿吉塞拉恢复了过来，而大女儿索菲却没有挺住，最终夭折。

女儿的去世对茜茜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之后困扰她一生的抑郁症的源头，从此她开始变得郁郁寡欢，而对二女儿吉塞拉的爱也大不如前。

一个公主嫁入宫廷的美好爱情故事，眼看就要以悲剧结尾，但此时又出现了一个转折——1857年12月，茜茜再度怀孕，9个月后，生下了鲁道夫。

这个孩子，是整个奥地利宫廷从上到下都盼望的男孩。

4

母凭子贵，在中外宫廷都是一样的。

生下了皇太子鲁道夫，茜茜在奥地利宫廷里的地位渐渐提高了。当索菲太后试图像之前的两个孙女一样抱走鲁道夫的时候，茜茜在忍了几年之后，终于站出来反抗了。

鲁道夫最初显然是被按照奥地利未来皇帝的标准培养的，所以他被安排了大量的军事化教育，被委派的教官甚至将6岁的鲁道夫扔到水里“培养他的勇气”。眼看性格懦弱、敏感的鲁道夫即将被逼疯，茜茜给皇室下了一道最后通牒：

“我要求掌握一切有关孩子问题的决定权，他们所处的环境、居住的地方、受教育的方式，一句话，这一切都由我一人决定，直至他们成年。此外，我还要求，一切涉及我个人的事务，包括对我周围人员的选任、停留的地点、内宫一切部署，全部由我做主。”



1859年，哈布斯堡皇族的家庭合影：第一排左起：茜茜公主（抱着的是皇太子鲁道夫），身边站着的是吉塞拉；索菲皇太后；弗兰茨·卡尔大公（索菲的丈夫，约瑟夫的爸爸）。后排左起依次为：长子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次子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与妻子夏洛特公主、四子路易·维克托大公、三子卡尔·路德维希大公

这一次，茜茜取得了胜利，获得了自己儿子的抚养权。茜茜开始亲自为儿子挑选合适的教师和课程，这让鲁道夫非常感激母亲。但是，茜茜和鲁道夫的母子关系却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一方面，茜茜作为一个母亲对儿子有时恨不得关心得无微不至，但更多的时候，茜茜却不愿意管孩子的任何事，因为她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之前她不被允许涉足的政治。

1866年爆发的“普奥战争”，作为战败方的奥地利帝国元气大伤，不仅失去了对原来大部分德意志邦国的影响力，连原本臣服的匈牙利也开始蠢蠢欲动。

面对随时可能起来造反的匈牙利，约瑟夫皇帝意识到只能和对方坐到谈判桌前，但他之前和匈牙利的领导人安德拉西伯爵已经水火不容，唯一能从中调停的，只有自己的皇后茜茜。

茜茜和安德拉西伯爵一直相互欣赏，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叛逆、坚强，不喜欢被传统束缚。1848年，安德拉西伯爵曾参与反对奥地利对匈牙利过度干涉的革命，被判处“缺席绞刑”（用一个模特代替他上绞刑架）。由于安德拉西长相帅气，从此被称为“英俊的绞刑犯”。

安德拉西伯爵作为匈牙利的代表，和茜茜进行过几次长谈，两人互相欣赏，以至当时欧洲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这两个人发展成了情人关系——但至今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茜茜最终说服了自己的丈夫。

1867年，一个二元的奥匈帝国诞生了——它有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两个首都，拥有各自的内阁和议会。安德拉西伯爵成了奥匈帝国的首任首相，而约瑟夫兼任了匈牙利国王，当然，茜茜也成了匈牙利的王后。

在约瑟夫和茜茜成为匈牙利国王和王后的加冕典礼上，茜茜做了感动匈牙利人民的发言，当她说到“愿全能的上帝给予你们最优厚的赐福”时，在场的很多匈牙利议员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因为茜茜的中间调停，匈牙利的地位实际上是大大提高了，所以匈牙利从上到下都对茜茜充满了热爱，之后约瑟夫皇帝每一次对匈牙利的政策松动，他们都认为是茜茜在里面起了作用。

但事实上，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茜茜之后还能在政治上继续影响自己的丈夫约瑟夫。



安德拉西伯爵

一方面，是约瑟夫不喜欢自己的妻子涉足政治；另一方面，茜茜对政治也并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参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合并，只是她个人对匈牙利特别有好感而已。

可能是为了回报丈夫同意合并，茜茜又一次怀孕了——约瑟夫一直希望她能再生一个儿子，确保奥地利的皇储继承。但是让丈夫失望的是，茜茜最终又生下了一个女孩，他们给她取名为瓦莱丽。



刚刚加冕匈牙利王后的茜茜

1872年，作为茜茜在宫廷里最大的压力来源，她的婆婆索菲终于去世了。

35岁的奥匈帝国皇后茜茜应该可以一扫障碍，大展宏图了。

但茜茜并没有这么做。

她开始尽量远离奥地利宫廷，开始了各种旅行。

于是，有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再回避了：

茜茜和约瑟夫之间，到底有爱情吗？

很遗憾，至少绝不像电影《茜茜公主》里表现得那样感天动地。（1955年，德奥合拍的电影《茜茜公主》首映。这部三部曲的电影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渲染了茜茜公主和约瑟夫之间的爱情，一笔带过了很多背后的东西。不过，这部电影展现的奥地利旖旎风光以及各种华贵的宫廷画面，还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88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将这部电影引入中国，一时在国内引起轰动。）

毫无疑问，在当初的夏宫伊舍尔，15岁的茜茜和23岁的约瑟夫初相识时，那种少男少女之间的爱慕之情肯定是无比真实的，而当时年轻的奥地利皇帝的魅力，也是少女们所无法抗拒的。茜茜曾多次说过一句话：“来自奥地利皇帝的求婚是不可拒绝的。”

但是，进入宫廷后，那些繁文缛节让茜茜感到无比不适，而作为她希望依靠的丈夫，约瑟夫皇帝不仅从小对母亲索菲言听计从，还要担负起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责任。无论是当时的奥地利帝国还是后来的奥匈帝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需要约瑟夫投入全部的精力来维持——约瑟夫是尽责的，他坚持洗冷水澡，睡行军床，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终身穿军服。



茜茜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忧郁

而且，皇后虽然只有一个，但皇帝身边的女人却络绎不绝。

1860年，茜茜陷入一场重病，而宫廷里流传的说法是：约瑟夫皇帝在外拈花惹草，将淋病传染给了皇后。虽然这种说法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事实证明，就是从那以后，茜茜频繁地离开宫廷和自己的家人，开始到处旅行。

茜茜有自己的理由：为了健康。说来也奇怪，她一回到奥地利宫廷，就开始不停地咳嗽，发生水肿和贫血，一旦离开宫廷到别的地方旅游或休养，病情就显著减轻——这些疾病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

但是，逃避与皇帝共处的时光，这还是很明显的一件事。

茜茜近乎疯狂地热爱运动。她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进行体育锻炼——双杠、吊环、哑铃、举重、击剑，练习强度之大，令人惊奇。茜茜

最爱的运动是骑马，她的骑术相当精湛，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好几个重要马术比赛的冠军都是由奥匈帝国皇后获得的——当时她已经40岁出头了。



茜茜身高一米七二，但即便怀孕4个月的时候，她的体重也没有超过50公斤。她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保养近乎苛刻：每天用天然材质敷面膜，甚至用带血的鲜嫩小牛肉——她认为这样能使面部皮肤紧致。她经常使用“禁食疗法”来保持身材，所以她的腰围简直瘦到惊人——巅峰时期只有16英寸（约合40.6厘米，即我们所说的一尺二）

每当狩猎的季节结束，又要回到宫廷的茜茜总会哀叹：“我为什么又要回到牢笼呢？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骨头摔断，让一切都宣告终结？”

茜茜还喜欢长时间暴走，一走就是十几公里，宫女们实在跟不上，只能坐一辆马车紧紧跟随。

当然，茜茜对自己作为妻子的缺位还是有愧疚感的，作为补偿，她甚至鼓励约瑟夫拥有自己的情人——皇帝其实早就习惯这么做了。1883年，53岁的约瑟夫和比他小20岁的皇宫剧院女演员卡塔琳娜·施拉特交往甚密，这段恋情得到了皇后茜茜的大力支持。她以“皇后女友”的名义经常招施拉特进入美泉宫，甚至在皇帝与施拉特发生争吵时，还会出面安抚。

但是，1889年，茜茜和约瑟夫之间最重要的一根维系纽带，突然断裂了。

他们唯一的儿子鲁道夫——也是奥匈帝国唯一的皇储——在他自己的乡间猎屋“梅耶林”里，与比自己小13岁的情妇一起殉情自杀。

鲁道夫其实很像母亲茜茜：倔强，崇尚自由，但他的性格更加内向和懦弱。因为有时行为古怪，所以被很多人认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请求和自己的妻子离婚（鲁道夫的妻子是比利时公主，也是政治联姻）遭到父亲约瑟夫的断然拒绝后，鲁道夫在乡间猎屋里先是向自己的情人玛丽（一位女男爵）头部开枪，然后自杀。



鲁道夫遗容。头部被包扎是因为他是用枪击中自己的脑袋自杀的

鲁道夫之死对于约瑟夫的重大打击，主要在于奥匈帝国失去了直系

的皇位继承人，而对茜茜造成的创痛更巨大，因为她是一位母亲——尽管当初把6岁的儿子要回身边，但是茜茜和他相处的时间其实并不算长。

茜茜开始变得脾气暴躁，她有时会咒骂身边所有人，但身边人也开始悄悄议论：儿子在宫廷忍受各种束缚和煎熬的时候，母亲不是一直在外面打猎和度假吗？

6

自从儿子死后，茜茜性格大变。

1889年底，茜茜将自己所有心爱的名贵珠宝和饰品，以及各种绚丽的礼服都送给了别人。从那一年到她生命终结的十年里，她始终只穿黑色的丧服。

她又开始了旅行，而和以往不同的是，那些旅行是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的——走到哪里算哪里，她甚至到过非洲和亚洲。

根据她身边的侍女回忆，她甚至还要求在雷电交加的大雨中扬帆出海，然后让人把她绑在甲板的椅子上，任凭风吹雨淋，还祈祷上帝让整艘船都沉入海底。

茜茜最小的女儿瓦莱丽曾经写道：“妈妈早已不是以前的妈妈了，她甚至日夜渴望死亡的到来。”

1898年9月10日，茜茜的“愿望”实现了。



身着丧服的茜茜

那一天，已经60岁的茜茜在瑞士的日内瓦湖边和侍女一起散步，一

个年轻人跌跌撞撞地冲了上来，用一把磨尖的锉刀刺入了茜茜的左胸。

行刺者是25岁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卢切尼，他原本刺杀的对象是可能登上法国国王宝座的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但菲利普提前离开了瑞士。卢切尼在报纸上得知，奥匈帝国的皇后正在日内瓦旅行，所以临时改变了目标。

由于刺穿的部位正好在心脏，茜茜不久后就停止了呼吸，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迷惑地看着身边的侍女：“发生了什么事？”

茜茜死后，被安葬在维也纳嘉布遣会教堂的皇家墓穴内——那里一直是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主要安葬地。在她的三层棺椁上面，原来只刻了“奥地利皇后”，在匈牙利人的强烈抗议下，又刻上了“匈牙利王后”。



1898年，茜茜的葬礼，维也纳万人空巷

在得知茜茜去世的消息后，约瑟夫非常悲痛。他剪了茜茜的一束栗色长发，长年放在胸口处。在皇帝的卧室里，挂满了茜茜的画像，并且之后他没有再娶。

约瑟夫在茜茜死后曾说过一句话：

“她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多么爱她。”

作为欧洲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哈布斯堡家族到了19世纪下半叶，真的如同中了诅咒一般。作为奥地利和奥匈帝国的皇后，茜茜可谓全程见证人。

首先，她和丈夫的第一个爱情结晶，女儿索菲夭折了。

然后，她的小叔子，也就是丈夫的弟弟马克西米兰，受到拿破仑三世的蛊惑，远赴重洋，去墨西哥做了皇帝，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三年之后，皇位就被推翻，马克西米兰以墨西哥皇帝的身份被执行枪决。

最大的打击来自他们唯一的儿子。鲁道夫的殉情自杀宣布约瑟夫彻底“断后”，同时也让茜茜对所谓的皇室和宫廷生活彻底厌恶。

当然，其实后面还有更让人感慨的一幕，茜茜没有看到。

因为皇储鲁道夫自杀，约瑟夫皇帝别无选择，最终只能选择自己弟弟的儿子，也就是自己并不喜欢的侄子作为奥匈帝国的皇储。

那个侄子，就是斐迪南大公。

事实证明，哈布斯堡家族的血脉真的是延续不下去了。斐迪南大公最终用自己的生命改变了全世界的历史进程——1914年，他被塞尔维亚狂热分子刺杀于萨拉热窝。84岁的约瑟夫皇帝丧子丧妻丧侄之后，向塞尔维亚宣战，从而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

约瑟夫在战争进行到一半时，就心力憔悴地离开了人世，但至少达成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与妻子茜茜一起合葬于维也纳。

在这场惨烈的世界大战后，哈布斯堡家族就此烟消云散，而曾经如此庞大的奥匈帝国，也彻底土崩瓦解。

作为奥匈帝国曾经的皇后，茜茜并不知道后来发生的这一切。

而她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她应该早就不在乎了。

戴安娜之死

我对写王室爱情故事不是很感兴趣，之前写过温莎公爵、茜茜公主、珍妃等，都因为涉及当时的政治背景，乃至宫廷争斗。但这篇，似乎不涉及任何政治因素，就是单单写一篇所谓的爱情故事，以及这个故事中的那位王妃。

1

1997年8月31日，凌晨0点30分。

如果依旧有巴黎市民逗留在塞纳河畔的话，他们可能会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场好莱坞谍战大片的拍摄现场：

一辆黑色的奔驰280SE轿车，正以150公里的时速飞驰在巴黎市中心的街道上，显然，它是想摆脱后面跟随的尾巴——7辆风驰电掣般的摩托车。

伴随着马达此起彼伏的轰鸣声，奔驰车闪电一般开进了阿尔玛桥下公路的隧道，7辆摩托车随即跟了进去。

然后一声巨响：轿车撞到了隧道中央的一根分界水泥柱上。

很遗憾，这不是在拍电影，而是一幕真实的惨剧：当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奔驰轿车车体已经完全变形，成了一堆扭曲的金属。人们最后只能切割开车顶，救出其中一名的身负重伤的女子。

凌晨4点，那名女子因为胸部大出血，在医院逝世，年仅36岁。

那名女子的名字，叫戴安娜·弗兰西斯·斯宾塞，是英国王子查尔斯的前妻。

大家都习惯叫她“戴安娜王妃”。



戴安娜王妃的座驾

2

时间倒退36年。

1961年7月1日，英格兰第八代斯宾塞伯爵爱德华·约翰·斯宾塞，又迎来了他的一个女儿。

之所以用“又”字，是因为之前斯宾塞伯爵已经有了两个女儿，而他们家虽然没有王位要继承，但至少有“爵位”要继承，所以他迫切希望得到一个儿子。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小女儿在出生后连名字都没有，一周后才得到父亲的赐名：戴安娜·弗兰西斯·斯宾塞。

英国的斯宾塞家族在15世纪是欧洲最富有的羊毛商之一。在查理一世时期，斯宾塞家族靠给国王送礼获得伯爵爵位，随后慢慢走进英国权力中心。几个世纪以来，斯宾塞家族虽然不算豪门望族，但凭借和英国王室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算是延续了贵族一脉。

在戴安娜3岁的时候，求子若渴的父亲终于迎来了他这一代斯宾塞家族的第一个儿子。为此，戴安娜的母亲因为之前生不出儿子，接受了各种奇怪的宗教仪式和各种检查，而且还忍受了丈夫的出轨。就在为斯

宾塞家族续上所谓的“香火”后不久，戴安娜的母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

戴安娜在8岁那年失去了生母的陪伴——母亲没有获得女儿和儿子的抚养权。为此，她只能和弟弟每周一次坐火车去看望自己的母亲。



第八代斯宾塞伯爵，也就是戴安娜的父亲。根据家族规定，如果没有儿子，他死后就要把家族的所有财产遗留给最亲近的一个男性亲属



4岁时的戴安娜

在那个年代，离婚在英国还是一件比较少见的事，戴安娜和弟弟是校内唯一父母离异的学生。在一节午后的图画课上，戴安娜画着画着，忽然哭了起来。不明就里的同学们看到她画的每一幅画上，都写着“献给妈妈和爸爸”。

但让戴安娜更感到寂寞的是，9岁那年，她被父亲送到了一所寄宿制的私立女校。在学校里，戴安娜的体育、艺术等学科成绩都不错，但文化课成绩却不怎么样。尽管她还获得过包括“全校最优女生奖”在内的一系列奖，但她说自己其实非常叛逆：

“其实我对学习完全没有兴趣，我只是想和其他人聚在一起，一块玩。”[1]

3

从小就渴望得到温暖的戴安娜，在17岁那年，遇见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男人。

那个男人有一个非常长的名字：查尔斯·菲利普·亚瑟·乔治·蒙巴顿·温莎，因为他是英格兰王室的王储，威尔士亲王。当然，人们习惯叫他“查尔斯王子”。

戴安娜和查尔斯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在那个时候，查尔斯其实在和戴安娜的姐姐伊丽莎白谈恋爱。尽管查尔斯是很多英国姑娘梦寐以求接近的王子，但戴安娜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这一切到了1979年，忽然发生了巨大改变。

那又是一次聚会，还不到19岁的戴安娜，又一次遇见了当时已经31岁的查尔斯王子。那时候，查尔斯已经结束了和伊丽莎白的恋情，但戴安娜不知道那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那一晚，查尔斯一直跟着戴安娜，找她聊天。而戴安娜似乎也很享受这种朋友之间的亲密，于是和他聊自己的姐姐，聊刚刚被爱尔兰共和军刺杀的蒙巴顿伯爵。然后戴安娜说了一句话：

“你当时一定很孤独吧！在圣保罗大教堂看着蒙巴顿伯爵的棺木……天啊，真应该有一个人来照顾你。”

尽管戴安娜后来回忆起这句话时，声称自己说了一句愚蠢的话，但这句话放到当时的语境，不得不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暗示。

查尔斯王子随即靠了过来，开始亲吻戴安娜。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正式谈过恋爱的戴安娜确实被吓到了，不知所措。

随后，查尔斯就发出了邀请，希望戴安娜第二天和他一起去白金汉宫——如果她不介意的话——坐在他身边看他工作。



年轻时的查尔斯王子



年轻时的戴安娜

这或许是很多姑娘都梦寐以求的机会，但戴安娜拒绝了，她说她介意。

但也可能是因为这次拒绝，大大激发了查尔斯王子的兴趣，随即对戴安娜展开了狂热的追求。

情窦初开的戴安娜并不讨厌查尔斯，所以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又有多少姑娘能拒绝来自一位真正的王子的爱情攻势呢？两个人正式开始交往。

那段时光对戴安娜而言无疑是幸福的，因为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相爱的男人，虽然有时候她会不理解查尔斯的一些举动，比如有时候一个星期每天都给她打电话，但有时候会三个星期都不给她打一个电话。

“我那时候每天都在等他电话，一接到他的电话就非常开心。”

就像每个沉浸在热恋中的少女一样，戴安娜根本不会去往其他方面多想。直到有一次，查尔斯王子带她去王室的专属度假地巴勒莫城堡玩，在那里，查尔斯向戴安娜介绍了他的一位比他大一岁的女性好友。

那位女士笑吟吟地向戴安娜伸出了手：“你好，我叫卡米拉。”

4

1981年7月29日，上百万英国民众走上街头，只求能够亲眼见证一场“世纪婚礼”。

婚礼的新郎和新娘，自然是查尔斯和戴安娜。

尽管戴安娜之前只和查尔斯见过13次面，尽管她曾抱怨一场婚礼为什么要搞那么大的场面，但当她真的穿上洁白的婚纱，带上钻石镶嵌的头冠，被身穿海军制服的查尔斯王子轻轻扶上象征皇室尊贵的黄金马车的时候，她还是被涌来的幸福感包围了。

那一年，才20岁的她，成了英国王室的王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她将是未来的王后。

那一天，在英国广播公司用33种语言向全世界转播的镜头下，伦敦城内所有的教堂钟声在上午9点同时敲响，英国皇家骑兵仪仗队气宇轩昂地护送查尔斯和戴安娜的马车，缓缓驶向教堂。沿途的百万英国民众不断地欢呼、祝福，他们举着查尔斯和戴安娜的照片，甚至还有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伊丽莎白女王也站在教堂的台阶上，满意地注视着自己的儿子和儿

媳。这也是英国皇室非常满意的一桩婚事：尽管戴安娜的家族已不如以往那样显赫，但毕竟是正宗的贵族血脉。而戴安娜年轻、漂亮、纯洁，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恋爱史，不可能被无孔不入的八卦小报抓住把柄。



全世界大约有7亿观众收看了这场“世纪婚礼”的全程转播——童话里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就在眼前，谁不愿意分享其中的幸福和喜悦呢？

而且，她很快会为王室添加子嗣。

戴安娜当然不会去考虑这些。她想到的，只有爱情。因为她在8岁时就对自己的保姆说：“我只有非常爱一个人，才会和他结婚，并且永远也不要离婚。”

然而，即便是在婚礼当天，戴安娜还是无法释怀两件事。

第一件，是在婚礼前，她发现查尔斯有一个她从没见过的金色双“C”袖扣，查尔斯坦白，是卡米拉送给他的。

第二件，是在几个月前的订婚仪式上，有一位记者问了一个戴安娜本来以为是愚蠢无比的问题：“请问你们是真心相爱吗？”

戴安娜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

查尔斯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怎么定义相爱。"

5

王子和公主结婚以后，从此是否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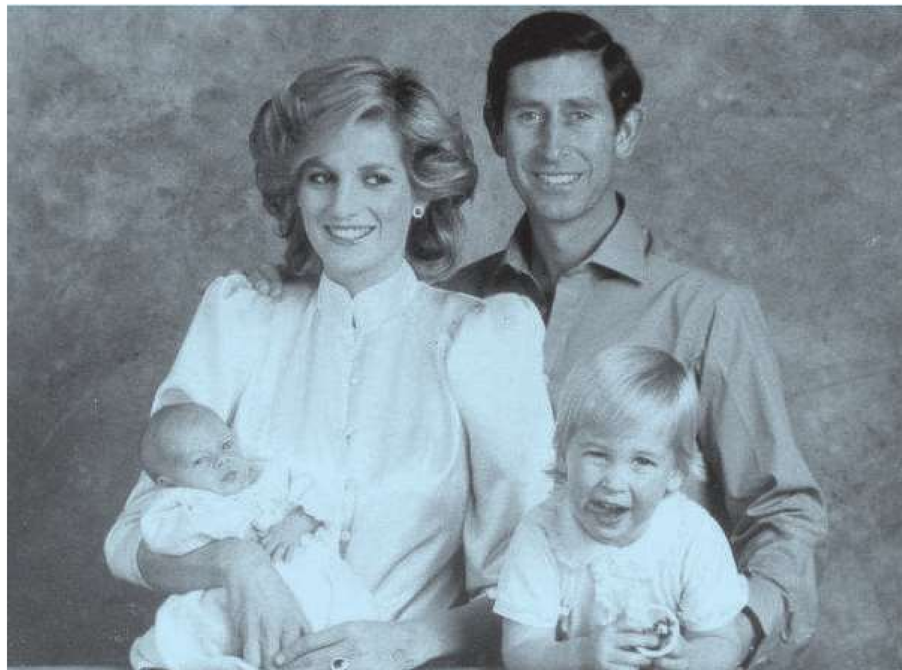
至少在外界民众眼里看来，当然是这样。

结婚后不久，戴安娜就怀上了身孕。在三年时间里，戴安娜生下了两个儿子：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整个王室沉浸在喜悦之中，而英国民众也颇感欣慰——王子公主婚姻幸福，王室后继有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完美的吗？

但在白金汉宫高高的围墙内，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却并非如此。

戴安娜的迷茫，从两人度蜜月的时候就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地中海蜜月之旅，查尔斯带去了8本小说和整套的钓鱼工具。

直到结婚之后，戴安娜才清醒地认识到，两个人在学识、性格和兴趣爱好上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查尔斯是剑桥大学毕业，戴安娜是高中辍学；查尔斯夏天喜欢打马球，冬天喜欢狩猎，每周从不间断，而戴安娜只喜欢打网球；查尔斯喜欢听歌剧，痛恨流行音乐，而后者正是戴安娜喜欢的；查尔斯喜欢安静，速写和钓鱼都是他的爱好，而戴安娜喜欢热闹，希望和朋友们聊天，煲电话粥……



查尔斯、戴安娜、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一家合影

戴安娜认为过错在自己，是她自己配不上王室。所以她鼓励自己“要迅速学会游泳，不然就会淹死”。她努力配合丈夫的各种活动，努力喜欢丈夫的爱好，她觉得只要给她适应的机会和时间，她可以做一名合格的王妃。

但很快，戴安娜发现事情并不是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她的丈夫冷落她，并不仅仅是因为兴趣和性格上的差异，而是有了另外的女人。

那个女人，就是她曾经希望能成为朋友甚至闺密的卡米拉。

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戴安娜简直不知所措，而更让她感到要发疯的是，王室里从管家到保镖，似乎都对这件事心知肚明——只有她不知道。



戴安娜穿着苏格兰特色的高领服装，陪丈夫一起观看苏格兰高地运动会

戴安娜觉得无法接受，她质问过自己的丈夫，而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给了她非常直接的答复：“每一任威尔士亲王都会有自己的情妇，我不想做一个没有情妇的威尔士亲王。”

在人类文明已经进化到20世纪末期的时候，戴安娜觉得自己无法接受这种“一夫多妻”的模式。她直接哭着去找伊丽莎白女王，而婆婆给她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查尔斯就是这样，他没救了。”

虽然在公众场合戴安娜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但回到宫里，她其实已经崩溃了。“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去哪里了，其实他们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

戴安娜开始寻求自己的寄托，她开始和自己的一个40岁的王室保镖“精神恋爱”——戴安娜自己说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关系。这名保镖一直陪着戴安娜购物、聊天，以至让戴安娜开始对他产生强烈的依赖，她说自己“渴望被表扬，非常渴望”。

但是，王妃和保镖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很快被人察觉。那位保镖被调离岗位，三个星期后，死于一场车祸——是的，一场车祸。

保镖的死给戴安娜造成巨大的冲击，她相信他是因自己而死。精神崩溃的她变得抑郁，然后试图借助酒精来麻痹自己。但她怕酗酒会伤害

他人，于是开始暴食。王宫中开始出现了“王妃精神不正常”的传言，因为她在怀了威廉王子4个月的时候，有一次竟然为了能够让查尔斯注意，从台阶上跳了下去。

而了解王妃的人都知道，她只是知道了丈夫出轨而已。

忍耐终于突破了极限。

在一次卡米拉妹妹的生日宴会上，戴安娜终于按捺不住，跑去打开了一间小房间的门——她知道她想找的两个人肯定都在里面。



戴安娜神情忧郁

房间里，查尔斯和卡米拉坐在一张小沙发上，亲密交谈。

戴安娜鼓足勇气，用尽量平静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不要把我当白痴。”

卡米拉的回答是：“你会没事的戴安娜，你有两个那么漂亮的儿子。”

戴安娜后来回忆，就在那一刻，她忽然什么都明白了：这段感情已经无法弥补，她的丈夫永远不会给他一段美好的婚姻。

她决定，要开始走自己的路。

6

1992年12月9日，英国首相梅杰代表皇室，宣布了一个让英国民众震惊却不意外的消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宣布分居。

之所以并不意外，是因为早在之前几年，关于王子和王妃貌合神离的消息早已在英国媒体上铺天盖地。夫妇两人一开始还希望能在公众场合有所掩饰，但渐行渐远的感情却让他们到后来连装都懒得装一下。

分居后的戴安娜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肯辛顿宫居住。如果换成十年前那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戴安娜肯定会感到无比的迷茫和沮丧，但此时的戴安娜，却觉得自己无比充实。在外界看来，她精神焕发的原因可能是找到了自己的情人，但没有人能忽视另一个原因：她找到了自己胜任且觉得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慈善。



戴安娜与艾滋病患者在一起

1991年7月，戴安娜来到一间艾滋病病人的病房，与一位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患者聊天，并且毫不犹豫地伸出手，与病人握手——这一幕被电视镜头记录，传向世界各地。

那位艾滋病人没有想到王妃居然会不顾很多世人所谓的“禁忌”和自己握手，当时就泣不成声，而一旁陪同的时任美国总统夫人芭芭拉·布什也热泪盈眶。

“我觉得他们是被社会遗弃的人，我想尽量多握他们的手，给他们力量和勇气，其实也是给我自己。”

戴安娜后来开始不断地探望艾滋病人、麻风病人、戒毒者，以及无家可归的人和被虐待的儿童。她只要出现，就尽量和他们握手、拥抱。“我发现自己被人需要，我在做很有价值的事，这让我有很强的成就感。”

不仅在英国，戴安娜还多次出访安哥拉、波斯尼亚、埃及、印度等多个国家，每到一地，她都会去当地的慈善医院、慈善机构、学校，甚至还会去波黑等战乱国家，亲自走进雷区，呼吁所有国家参与“反地雷运动”。



戴安娜在安哥拉的雷区步行，呼吁禁止地雷


戴安娜在安哥拉抱着一名因为误踩地雷而受伤截肢的孩子。到21世纪初，全世界有超过135个国家签署禁雷条约。戴安娜作为当初带头呼吁的名人，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她不仅用自己的知名度和形象呼吁大家捐款，自己也参与其中：早在1987年，她就把自己79件服装拍卖所得的350万英镑全部捐给了慈善事业。

曾有记者问戴安娜这样一个问题："你有想过，你会成为一个女王吗？"

那时的戴安娜已经和查尔斯分居，她笑了："肯定不会。我想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女王，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

在一定程度上，戴安娜做到了。尽管戴安娜被大小媒体曝光的情人绯闻让英国王室大为头疼，但英国的民众还是开始称呼戴安娜为"人民的王妃"，因为她一改英国王室高高在上的形象，愿意走到街头和路边，愿意走进医院和学校，发自内心地和普通百姓交流，并身体力行地去做慈善。

但是，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故事，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

1996年7月15日，伦敦高级法院民事第一庭的书记员开始宣读那张长长的离婚申请名单，当他读到第31对申请离婚的夫妇姓名的时候，不禁停顿了一下："威尔士王子殿下和戴安娜公主殿下。"



戴安娜访问德文郡的卡尔顿，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在解释离婚原因的表格内，查尔斯写道："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1993年11月首相宣布我们正式分居。"（查尔斯把1992年12月分居，错写成了1993年11月。）

离婚申请人是查尔斯，所以他缴纳了80英镑的手续费。

夫妇两人均没有到庭。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结束了。

13个月后，戴安娜香消玉殒。

7

8月31日凌晨的那场车祸，毫无疑问引来了很多质疑。

当天晚上，戴安娜并非一个人。她和她当时交往的富二代男友多迪·费伊德一起钻入了奔驰车，同行的还有司机和一名保镖。为了不受到等候在酒店外的"狗仔队"骚扰，之前还有几辆相同的奔驰车相继开出，希望成为"饵车"，但是没有成功。

汽车撞上水泥柱的时候，司机和多迪当场身亡，保镖是车里唯一系着安全带的人，所以他最后幸存（但之后一直保持沉默），戴安娜胸腔

大面积出血，但当时还有气息，如果抢救及时，是有可能挽回生命的。

可惜的是，紧随在后的“狗仔队”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救人，而是举起相机不停地拍照。

各种“阴谋论”随即出炉。

流传最广的，当属戴安娜是英国王室派人“干掉”的，因为传闻当时戴安娜已经怀有身孕，王室不希望看到威廉小王子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或妹妹，尤其是很有可能是穆斯林（多迪·费伊德是穆斯林）。

而其他的版本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有人说是英国特工出手，有人说是爱尔兰共和军出手，甚至还有人说是地雷生产商出手（因为戴安娜宣传禁雷）。

当然，还有寄托美好想法的猜测：戴安娜是诈死，她就此隐居了。

但无论有多少种版本的猜测，最终大家能接受的事实只有一个：戴安娜死了。

1997年9月6日，戴安娜的葬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英国王室所在的白金汉宫降半旗致哀。载着戴安娜灵柩的炮车在皇家护卫队和威尔士卫队的护送下，离开了她生前居住的肯辛顿宫。



英国民众为戴安娜献上的鲜花和哀思卡片

数百万来自伦敦和英国各地的民众沉默肃立，为戴安娜送行。很多民众举着戴安娜生前的照片，泪流满面。

查尔斯去法国接回了戴安娜的灵柩，并在葬礼当天护送，身边是15岁的大儿子威廉——有媒体猜测，这样安排是防止查尔斯沿途受到攻击。但灵柩车队经过詹姆士宫的时候，道路旁送葬的人群中还是传来了一句呼喊：“你配不上她！”

在戴安娜离世八年之后，查尔斯宣布和卡米拉结婚。

一位戴安娜生前的好友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戴安娜活到现在，她肯定会说一句话：“你看，我没有骗你吧！”

馒头说

正如在开篇所写，这个故事不涉及什么大政治背景或小宫廷争斗，其实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确切地说，是一段失败的爱情。

回看戴安娜的一生，确实让人唏嘘：她绝非一个城府深、耍心机的

女子，她希望得到的，也就是一份真正的爱情。

在王室中，她为了得到这份爱，碰得头破血流。而当她离开王室，希望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真正的爱情对她而言，似乎依旧是一件奢侈品。

戴安娜在离开查尔斯后，其实尝试过不少爱情，但很难说有满意的结局，有的甚至让她再一次遍体鳞伤——她曾和自己的马术教练休伊特谈恋爱，而后者以300万英镑的代价出卖了她，写了一本叫《恋爱中的储妃》（*Princess In Love*）的书。而且，他拿着戴安娜给他的46封情书，开价1000万英镑："只要钱到位，我可以告诉你们任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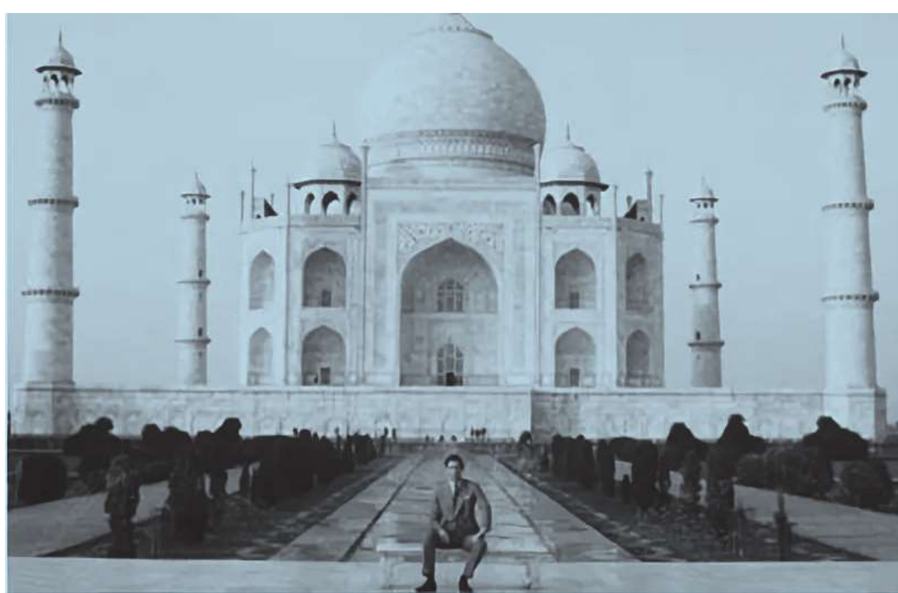
但戴安娜依旧还是相信爱情，并似乎将要得到一份真正的爱情。同样死于车祸的她的男友多迪的父亲透露，就在不久前，多迪去巴黎著名的珠宝店买了两枚戒指，他猜自己的儿子可能会向戴安娜求婚。

可惜，没有人能看到最终的结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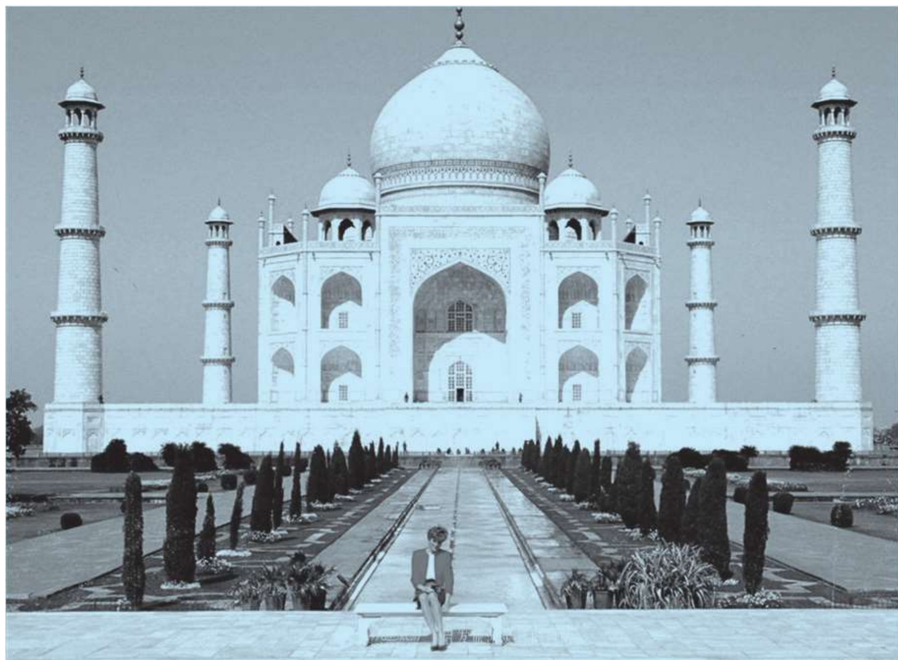
没错，在戴安娜身上，我们可以感慨"一入侯门深似海"，或者"来世莫生帝王家"，但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她对爱情的那份渴望和执着。

我老婆当年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放上过三张照片，我看了后也很感慨。在这里也放一下，作为结尾。

第一张，是在1980年。31岁的查尔斯出访印度，一个人在泰姬陵前留影。在这座举世皆知象征着爱情的世界奇迹建筑面前，他兴奋地说："下一次，我会带着我的新娘一起来！"那时候，他正在和19岁的戴安娜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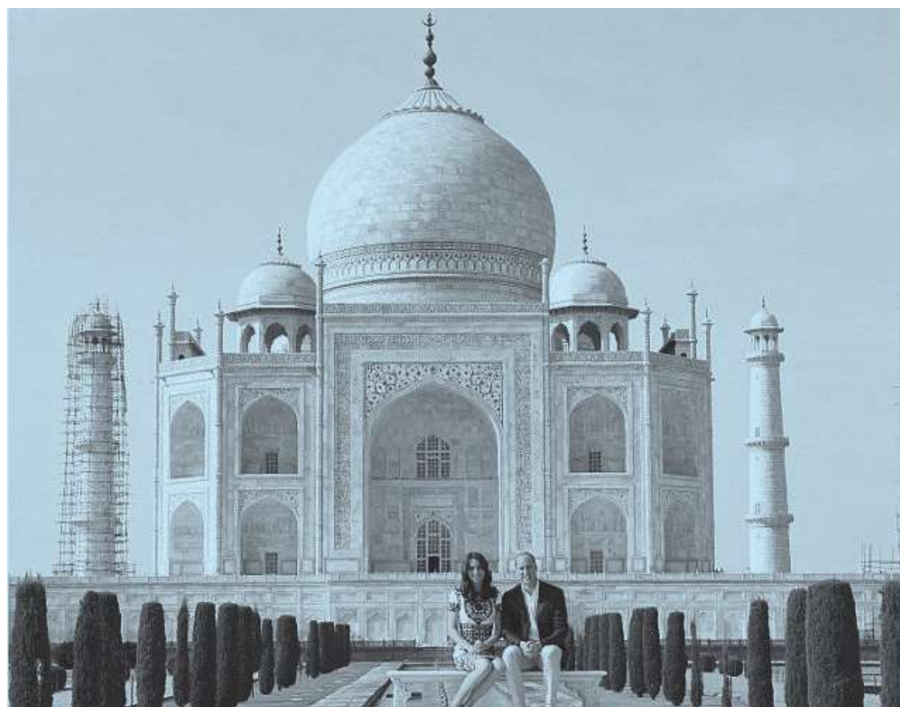


第二张，是在1992年。查尔斯和戴安娜出访印度，前者当时的诺言似乎就要成真了。但是，当时两人已处于分居边缘，几乎已经互不说话。戴安娜自己来到了泰姬陵，一个人在那里留下了一张孤独的照片。



来看第三张照片吧。2016年，威廉王子出访印度，再一次来到了泰

姬陵。他在自己父母当初拍照的地方，留下了同样背景的照片。但与他父母不同的是，他身边坐着自己心爱的妻子凯特王妃。



在拍完照后，威廉流下了眼泪。

但我相信，他那在天堂的母亲，看到这幅画面，应该感到欣慰。

是的，爱情的可贵，就在于它不因人的变迁，不因地的改变，不因时空的转换而恒久存在。

往来纵观千般苦，总有真情在人间。

还是要相信爱情。

---

[1] 本文中单独列出的直接引语，来源均为戴安娜在1991年秘密制作的口述录像和相关视频资料的记录。

俄罗斯方块：一款小游戏背后的隐秘故事

这是一款游戏，但又不仅仅是一款游戏。当一款游戏流行到几乎人人都有接触的程度，那么，背后就肯定有故事。

1

1984年6月6日，对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来说，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帕基特诺夫在苏联科学院的计算机中心工作。具体的工作内容，其实帕基特诺夫自己也不太清楚，就是写AI（人工智能）和声音控制方面的程序，然后不断测试——出于保密的需要，研究员们的工作成果最终被用在哪里，他们并不知道。帕基特诺夫自己听到传闻，他的研究是为苏联飞行员在高重力条件下用声音控制战斗机服务的。

没有资料显示那时候的帕基特诺夫是否看过乔治·奥威尔的《1984》，但他当时所处的1984年，所处的苏联科学院内部，似乎多少有那么点那样的味道：



在科学院的计算机中心，原本配给4个人的办公室，被塞进了15个人。帕基特诺夫每天早上8点左右起床，吃一直不会变的香肠鸡蛋和奶酪，再准备好自带午餐，10点左右走进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深夜。他与另外3名同事共用一张桌子，大家日复一日地写程序，测试程序，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做这些研究的意义和用途。

帕基特诺夫那一年才29岁，在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中，他总是想自己干点什么。比如，用程序写一个电脑游戏。

帕基特诺夫这份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有机会操作当时还属于非常稀罕的一件东西：电脑。尽管那台苏联自主研制的“Electronica 60”电脑的处理性能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简直低得可怜，但帕基特诺夫还是准备用这台电脑写一个自己构思的小游戏。

这个小游戏是帕基特诺夫根据一套现实中的“五格骨牌”游戏而研发的。但是他很快发现，“Electronica 60”的电脑性能根本无法实现他的设想。于是，规则和界面被不断地简化，直到最后帕基特诺夫自己制定了一套玩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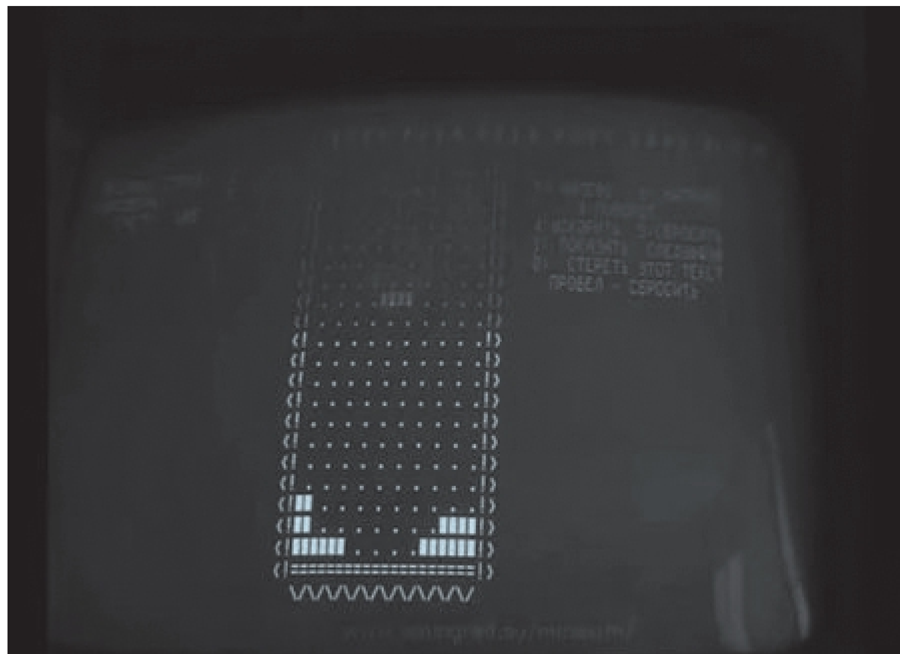
不规则的四格积木组合从上方不断落下，堆积起来。玩家在短时间内要做出判断和选择，让一整行被填满，消失。不然积木会越堆越高，直到到达最高位置，游戏结束。

帕基特诺夫用了6天时间开发了这个游戏，然后花了几周时间来测试——他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会偷偷测试游戏，没有人发现。

1984年6月6日，这个才8.6KB大小的小游戏终于测试完成。

由于“四”这个基本要素构成了帕基特诺夫这款游戏的内核，他就把希腊语中“四”的词语“tetra”和自己喜欢的运动网球“tennis”结合了起来，组合成了一个新的词：Tetris（俄语是Terphc）。

而我们更熟悉它后来的名字：俄罗斯方块。



最早的俄罗斯方块游戏画面

2

那么，一个如此简单的实验室小游戏，是如何走向世界的呢？

最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是“好玩”。但处在现代社会的我们都知道，一款产品要在全世界普及，背后肯定有商业力量的推动。

而俄罗斯方块背后的商业故事，并不像这款游戏本身那样简单。

一开始，俄罗斯方块的流行仅限于帕基特诺夫所在的计算机中心。但这款简单、容易上手又能让人迅速上瘾的游戏，立刻扩散到了苏联科学院，随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区的电脑界开始流行起来。

不过，让俄罗斯方块真正走出苏联国门的，是一群匈牙利电脑专家。

1986年7月，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群电脑专家将俄罗斯方块移植到了刚刚开始兴起的个人电脑“AppleII”和“Commodore　64”（当时的另一个电脑巨头，可惜后来破产了）上，这个游戏的受众面更广了。



在“Electronica 60”电脑上运行的俄罗斯方块

用户量增加的背后，是隐然出现的商机。

这个商机，首先被一个叫罗伯特·斯坦恩（Robert Stein）的英国人嗅到了。

斯坦恩当时是英国一家叫Andromeda的游戏公司的经理。他在玩过游戏之后，立刻找到了匈牙利的电脑专家们以及帕基特诺夫本人，签下协议，收购了俄罗斯方块的版权。为了能完全垄断，斯坦恩在当时的协议条款中强调他购买的俄罗斯方块版权包括“其他任何电脑系统”（An other computer sys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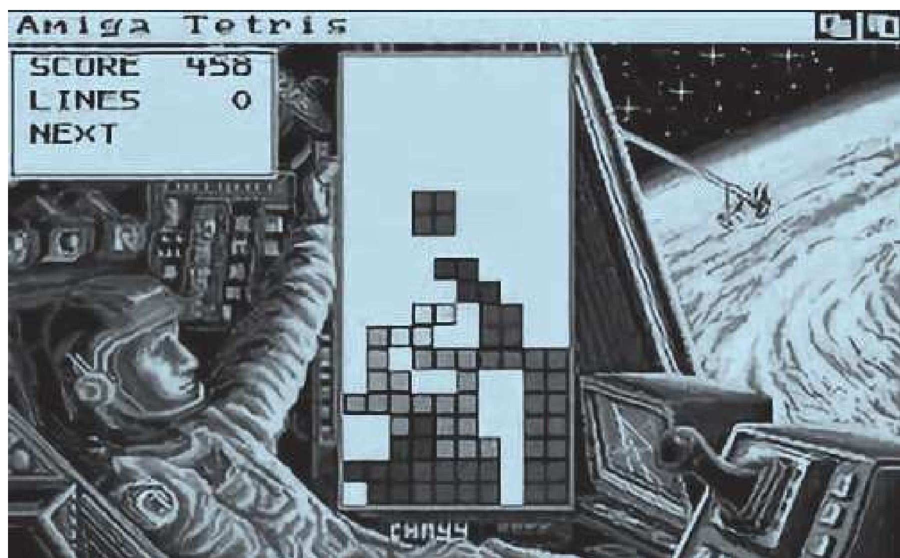
斯坦恩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没有完全搞清这款游戏的真正版权方是谁（或者说他想故意混淆过关）；第二，他没有对“电脑”这个概念精确定义。

这也埋下了后来俄罗斯方块各种纠纷的“地雷”。

其实在正式拿到俄罗斯方块的版权之前（谈判中），斯坦恩就已经把这款游戏的版权卖给了英国的游戏公司Mirrorsoft（不是美国的Microsoft）和美国的游戏公司Spectrum Holobte。

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一款来自“铁幕”那一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游戏，会是什么样的呢？

英国的Mirrorsoft公司很好地抓住了公众的猎奇心理，俄罗斯方块的宣传海报上透出浓浓的冷战色彩和苏联风味，再加上游戏本身简单又充满吸引力，所以这款游戏在英国上市后立刻大卖。



前面提到的Commodore研发了当时全世界第一款多媒体电脑Amiga，在这款电脑上运行的俄罗斯方块，直接采用了苏联宇航员的背景，让玩家觉得高大而又神秘

俄罗斯方块在英国受到如此强烈的欢迎，这让斯坦恩又喜又忧。

喜的，自然是事实证明自己的眼光正确。

忧的，是游戏大卖后，惊动的各方力量会越来越多。

果然，没多久，一家苏联的公司找到了斯坦恩。

这家公司宣称：他们才真正拥有俄罗斯方块的版权。

3

这家公司叫ELORG，全称是“苏联外国贸易协会”。

由于帕基特诺夫当时是在为苏联科学院的计算机中心工作，领国家的薪水，用国家的电脑，所以按照苏联的规定，俄罗斯方块的知识产

权，应该也归属国家。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帕基特诺夫并不拥有俄罗斯方块的版权。

如果这款游戏只是用来自己娱乐无伤大雅，但现在，它能赚大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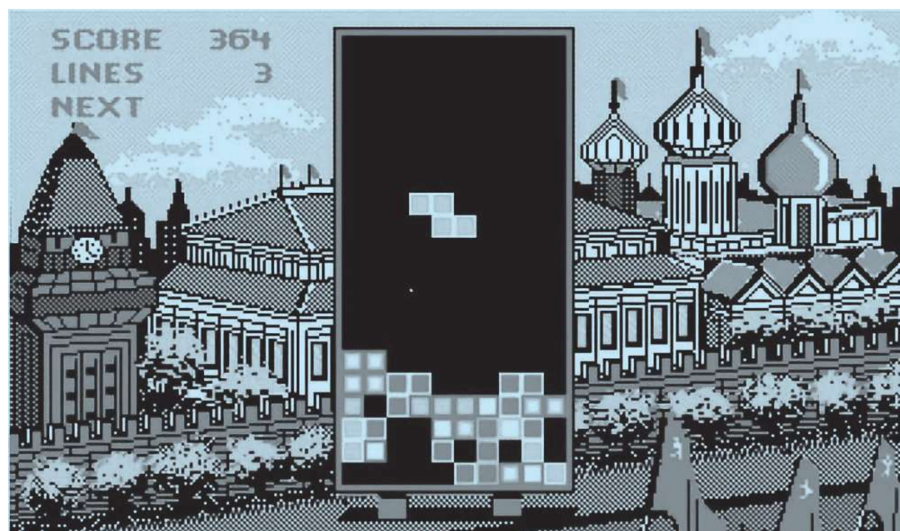
1988年1月，斯坦恩只能再打起精神，和ELORG公司开始谈判俄罗斯方块的版权问题。这场谈判大概持续了小半年的时间，最终，斯坦恩付出了比之前多得多的代价，拿下了俄罗斯方块在电脑上的版权。

请注意，是电脑的版权，并不包含家用游戏机。

还记得之前问斯坦恩买版权的那两家公司吗？一家是英国的Mirrorsoft，这家公司后来把俄罗斯方块在日本和北美的“版权”卖给了美国的Atari（就是大名鼎鼎的雅达利），而Spectrum将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和电脑在日本的“版权”卖给了Bullet-Proof Software（专门为任天堂生产FC游戏和掌机游戏，以下简称BPS）。

这几家公司的名字也不用劳心费神去记，只需要记住：它们当时其实是没有版权的——或者，它们自以为拥有了版权。

1988年1月，在日本拿到版权的BPS公司发行了基于任天堂FC游戏机（就是我们熟悉的“红白机”）的俄罗斯方块一代——别急，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款游戏。



早期的俄罗斯方块都被渲染上了浓浓的苏联风味。这款游戏也是第一款进入美国的苏联电脑游戏，这在之前是不可思议的



天正版俄罗斯方块界面

但即便如此，当年这款游戏在日本就卖掉了200万套。

与此同时，一家叫天正（Tengen）的美国公司在从雅达利那里拿到“版权”后，基于FC游戏机也制作了天正版的俄罗斯方块。

而这款游戏，才是我们童年最熟悉的那款会有俄罗斯小人跳舞的俄罗斯方块。

随着俄罗斯方块在家用游戏机上的风靡，另一个当时游戏界的巨无霸终于被惊动了。

这个巨无霸随后也加入了战局，而它的加入，可以说促成了俄罗斯方块最终风靡全世界。

4

这个巨无霸，就是当时如日中天的任天堂。

1989年，任天堂美国分公司的经理荒川实首先注意到了在家用游戏

机市场上大卖的俄罗斯方块。当时，任天堂正准备推出他们在掌机市场的“大杀器”——Gameboy（也就是当年我们所熟悉的GB）。这台只有黑白两色的掌上游戏机，是俄罗斯方块这种休闲类游戏最好的搭载平台。

这个荒川实不是普通的分公司经理，他是山内溥的女婿。而山内溥，是日本任天堂的掌门人，也是整个日本游戏界乃至世界游戏界教父级的人物。

荒川实立刻把谈判的任务交给了BPS的总裁亨克·罗杰斯（Henk Rogers）。罗杰斯立刻与英国人斯坦恩联系购买版权的事宜，但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其实当时斯坦恩自己也搞不定俄罗斯方块的全部版权了。



Gameboy在2003年停产，在全球最终销售超过两亿台，是很多人童年回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情急之下，罗杰斯决定直飞莫斯科，亲自去和ELORG的负责人谈判。

与此同时，从罗杰斯的诉求中觉察出苗头的斯坦恩也决定飞往苏联，试图拿下俄罗斯方块除了电脑之外的版权。

此外，当初买到一部分版权的Spectrum公司老总也派出了自己的儿

子凯文·麦克斯韦前往莫斯科，争取俄罗斯方块的版权。

为了那个最初才8.6KB大小的小游戏，三路人马在1989年初几乎同时汇聚莫斯科。

这场谈判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其中的各种明争暗斗和纠缠实在一言难尽，仅举一例：连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被牵扯了进来，他也关心起这款游戏的版权归属问题。

最终，实力雄厚且财大气粗的任天堂笑到了最后。据说当时他们给ELORG开出的订金就高达500万美元，光GB版本就可能付出1000万美元——这是其他几方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简单来说，这场谈判的最终结果是这样的：任天堂拿到了俄罗斯方块在家用游戏机和掌机上的版权；斯坦恩拿到了俄罗斯方块在PC上的版权；雅达利公司继续拥有俄罗斯方块街机版的版权；凯文·麦克斯韦拿到了俄罗斯方块在上述领域之外的版权——比如他可以发明一种叫俄罗斯方块的积木或折纸游戏……



山内溥，执掌任天堂52年，把这个当初年销售额不足20亿日元的纸牌小厂发展成了市值200亿美元的世界型企业，并创造了游戏界的传奇。他本人2013年过世，享年85岁

此后，曾经制作出被认为是最佳俄罗斯方块FC游戏的天正公司不甘心失败，与任天堂对簿公堂，互相不承认对方拥有的版权。

1989年6月15日，法院做出最终判决：任天堂胜诉，天正版本的俄

罗斯方块游戏全部下架并销毁。

关于俄罗斯方块的版权之争，最终落下帷幕。

5

那么小的一款游戏，那么多公司参与角逐，到底值吗？

我们用数字说话吧。

截至2009年，俄罗斯方块这款游戏在全球已经发售了1.25亿套，而另一个数据是，迄今为止，这款游戏已经卖出了超过5亿套。

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已经承认俄罗斯方块拥有9项世界纪录，包括运行平台最多（56个平台）、手机下载次数最多等。

在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娱乐媒体IGN（Imagine Games Network）的多次“史上最佳100个游戏”评选中，俄罗斯方块从没掉出过前十，最高拿到过第二名。在2018年最新的评选中，俄罗斯方块作为1984年出品的游戏，依旧排名第七（第一名是超级马里奥：世界，第二名是塞尔达传说：时之笛，我个人最喜欢的荒野大镖客：救赎排在第九，超过了GTA5）。

每年在世界各地，都会有各种级别的俄罗斯方块的比赛，包括世界锦标赛。

如今，俄罗斯方块产生的影响力，早就超过了它作为一款游戏的本身。



为了俄罗斯方块的周年纪念，麻省理工学院的黑客黑掉了学生宿舍楼的灯光管理系统，上演了一次现实版的俄罗斯方块表演

2009年6月6日，谷歌为了纪念俄罗斯方块诞生25周年，将其标志暂时改为由俄罗斯方块砌成的字母。

俄罗斯方块的电影版权也已经被购买。除了拍摄电影之外，相关的

主题乐园也在策划之中。

这款游戏甚至进入了心理学和医学康复领域。英国和瑞典的几位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在车祸之后玩20分钟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在研究中被称为“基于俄罗斯方块的介入”（tetris-based intervention）——可以帮助预防创伤后痛苦、不安记忆的形成。

当初那款只有8.6KB大小的小游戏，时隔30多年后，依旧托举起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6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发明者——帕基特诺夫。

俄罗斯方块成了如此热卖的一款产品，但帕基特诺夫本人却没有因此得到巨大的财富——这款游戏的知识产权是属于苏联的。

不过，与当时自己的同事相比，帕基特诺夫还是因为这款游戏而大大改善了生活：他分到了一套住房，以及一台286电脑——这在当时的苏联可绝对是个稀罕货。

1990年，苏联已经陷入混乱，解体不可避免，帕基特诺夫在BPS总裁罗杰斯的帮助下，拿到了美国的签证，半年之后，全家都移民美国。

一开始，帕基特诺夫和罗杰斯成了同事，后来他在1996年加入了微软。当时微软正准备大举进攻游戏界，所以他进入了当时的游戏部门，成了之后XBOX游戏研发团队的一员。

不过，众所周知，XBOX的游戏主要围绕“车枪球”展开（赛车、射击、球类比赛），帕基特诺夫擅长的那种极其简单但又构思精巧且耐玩的游戏，并不是主流（从这一点上来说，他还是更适合进任天堂）。

所以他离开了微软。好在他在1996年时经过艰难的谈判，取得了俄罗斯方块的个人版权，再加上他一直没有卖掉手上微软的股票，所以基本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如今，帕基特诺夫的一个身份是微软的游戏承包商，负责开发一些他所擅长的益智类游戏。其他时间，他会开着他那辆车牌为“Tetris”的特斯拉去兜风，打打网球，或者看书消磨时间。

他很少玩游戏，要玩也是玩类似宝石消除这样的益智类游戏。

他也不需要去操心俄罗斯方块这款游戏的后续发展了，因为有太多比他熟悉商业规则的聪明人正紧紧盯着这块市场。

2014年12月31日，俄罗斯方块从任天堂的各大平台上下架，引起全世界无数俄罗斯方块迷的感慨。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这款游戏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任天堂之所以下架俄罗斯方块，是因为他们的版权到期了，而另一个游戏业的巨头育碧（UBI Soft）接过了俄罗斯方块这杆大旗。

关于这款看似简单的“消除”游戏，故事还远未结束。

馒头说

写完这篇，顺便简单和大家聊聊“游戏”这个东西。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过腾讯的游戏王者荣耀。那天，后台有不少讨论。讨论的主体主要是各位父母，他们和我探讨一个问题：怎样看待孩子玩游戏？

说实话，我是很赞成孩子玩游戏的。

但是要加个前提：要看是什么游戏。

比如，像俄罗斯方块这种游戏，我觉得是可以启发智力的，只要控制好时间，完全可以放心让孩子们玩——当然，说到“控制时间”，做什么事情不需要有个“度”呢？

事实上，我自己就是一个骨灰级的游戏玩家。

而且，我必须要说，从小玩游戏，对我一生产生了非常大的正面影响。

只是回过头看，我从小痴迷的游戏，其实都是游戏史上的经典，且真的对我产生很大的帮助：“文明”系列、“三国志”系列、“太阁立志传”系列让我对人类的文明和历史着迷；“大航海时代”系列让我的地理成绩始终在班上名列前茅；沙丘II、“C&C”系列、“星际争霸”系列、“帝国

时代”系列让我体会到了战略布局和操作的快感；“巴士帝国”、“模拟医院”、“模拟城市”系列、“大航空时代”让当时还年幼的我对商业世界的各个层面有了最初的认识……

如果要写这些，估计给我三天三夜，我能写10万字。

但必须要承认的是，我推荐孩子玩的这些游戏，都是古典游戏中的绝对经典，而现在的很多游戏，尤其是手游，味道已经变了。

前两天和一个手游大厂的老兄聊起这事，我问他承认不承认，他说承认。

现在的很多手游，其实对智力的启蒙、知识的拓展，哪怕是反应神经的锻炼，都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这些游戏里充斥的无非是无脑砍杀和PK（比拼）、氪金，以及找小哥哥或小姐姐们。

像这类游戏，我也很反对让孩子们玩。

所以回过头来看，像帕基特诺夫这样的游戏开发者，正在变得越来越少。或者说，他们其实都还在，但现在游戏业急功近利的大环境，已经没有了他们生存的土壤。

这里面涉及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几乎摧毁单机经典游戏的盗版问题，也包括从《征途》开始出现的“中国游戏赚钱模式”等。

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展开多说了。

到底是谁发明了电话？

一项伟大发明的诞生从来就是充满艰辛的，包括研究，包括申请专利，包括各种争议。

1

1875年的某一天，沃特森在实验室里忽然听到了一句话："沃特森先生！快来帮助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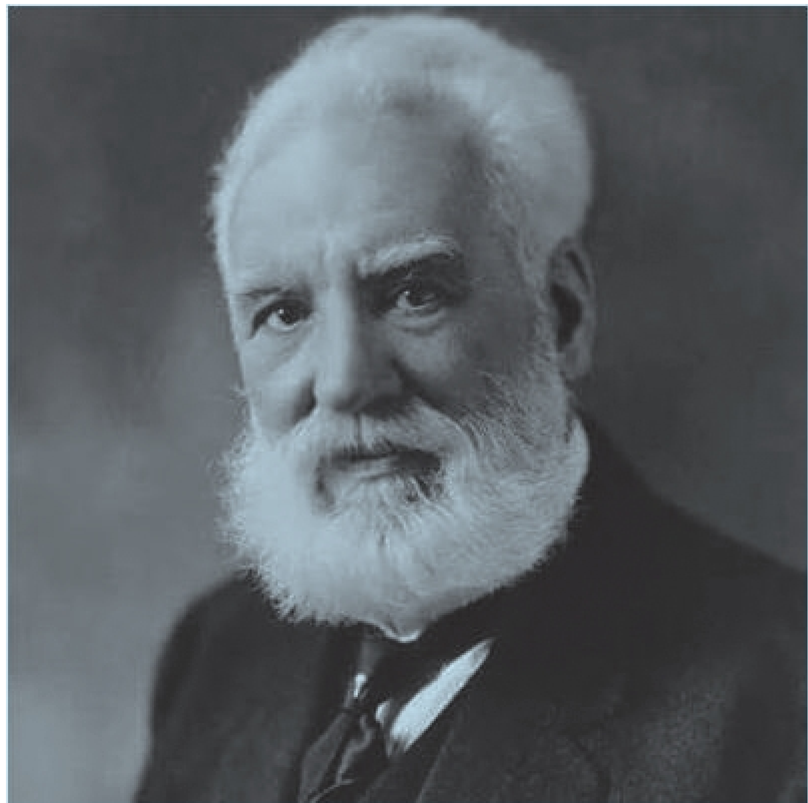
听到这句话后，沃特森发疯一样地冲出了实验室，一边奔跑，一边喊着："我听到贝尔在叫我！我听到贝尔在叫我！"

沃特森是贝尔的助手，贝尔刚才是在另一间房间，通过一根导线连接的"薄膜"呼叫了他。

这件在我们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却让当时的贝尔和沃特森几乎流下激动的眼泪。

当天晚上，贝尔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用激动的笔触写道："朋友们各自留在家里，不用出门也能互相交谈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2



贝尔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847年生于英国苏格兰。他的祖父和父亲毕生都从事聋哑人的教育事业，这一点也影响了贝尔，他从小就对声学和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

贝尔一开始研究的兴趣是在电报上。在有一次实验过程中，贝尔偶然发现了一块铁片在磁铁前振动会发出微弱声音的现象，而且他还发现这种声音能通过导线传向远方。

这个现象给了贝尔很大的启发，他想，如果对着铁片讲话，不也可以引起铁片的振动吗？——这就是贝尔关于电话的最初构想。

贝尔把设想告诉了周边人，但得到的基本都是嘲笑，有人还劝他去看看《电学常识》这本书，然后就会放弃那种“荒唐”的念头了。但他得到了当时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他发明了继电器，电感的单位“亨利”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鼓励。

亨利对贝尔说：“你有一个伟大发明的设想，干吧！”当贝尔说到自己缺乏电学知识时，亨利说：“学吧。”

贝尔发明电话的过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这里也不再赘述。总而言之，经过大量的实验和修正，1876年2月14日，贝尔终于向美国专利局递交了“电话”的专利申请。

各种争议和纠纷，就此而来。

3

首先，对贝尔发明电话表示不服的，是一个叫伊莱沙·格雷的人。

格雷设计的电话，与贝尔的电话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有一点原理不同：格雷是利用送话器内部液体的电阻变化。

而在格雷和贝尔之前，1876年1月14日，还有一个人申请了“会说话的电报”的专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



伊莱沙·格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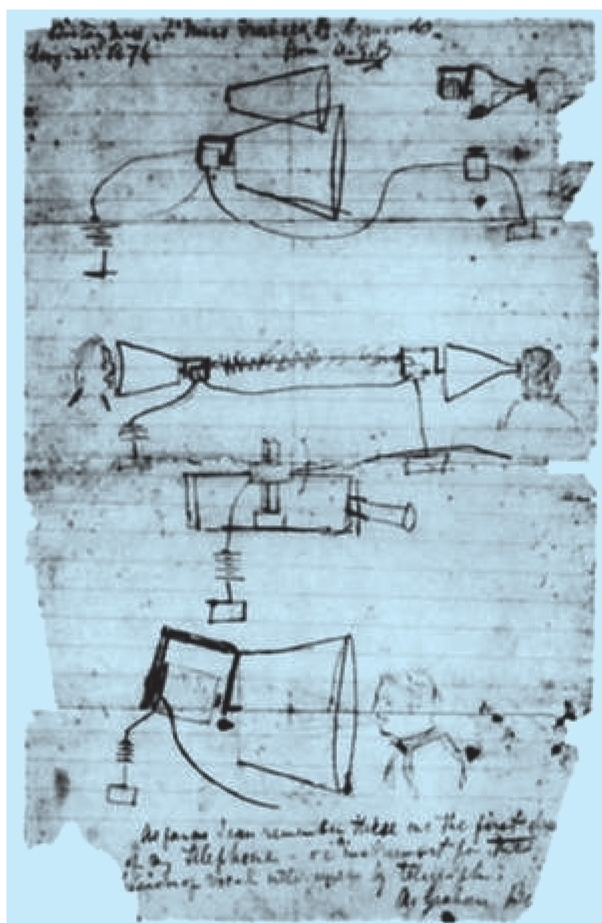
于是，专利局就开始对贝尔、

格雷和爱迪生的三项专利申请进行审定。爱迪生的专利说明远不及其余两人的深入和详细，所以率先出局。而格雷和贝尔的专利审定则让专利局陷入了两难境地。

最后，因为格雷的专利申请比贝尔晚递交了两个小时，并且格雷的液体原理和贝尔的磁石原理不同，最终，“电话”的专利被判给了贝尔。

1886年，当时承办此案的专利审查官威尔伯（Zenas F. Wilber）曾透露，自己长期酗酒而且债台高筑，并且他早在南北战争时期（1861年至1865年）就认识了一名叫贝利的律师（也是自己的债主之一），而贝利也是贝尔雇用的律师。威尔伯还提到过，自己曾给贝尔看过格雷的申请材料。

其实从贝尔拿到电话专利的那一刻起，格雷就开始了对他的起诉。想打官司的还不止格雷一家，1877年，爱迪生又取得了发明碳粒送话器的专利。当时美国最大的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买下了格雷和爱迪生的专利权，与贝尔的电话公司对抗。为电话的专利，贝尔共计打过近600场官司。



1876年，贝尔设计的电话草图

1892年，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与贝尔达成了一项协议：完全承认贝尔的专利权，从此不再染指电话业，交换条件是17年之内分享贝尔电话公司收入的20%。

关于贝尔发明电话的专利官司，这才算稍微平息了一点。

但是，这些官司里，有一桩官司却是贝尔始终无法回避的——那个

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才是电话的真正发明人。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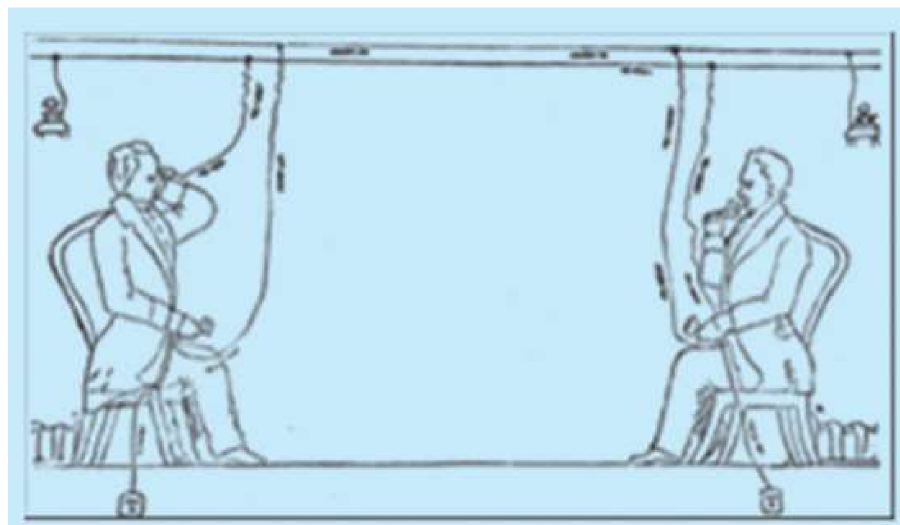
那个人，叫安东尼奥·梅乌奇，是一名意大利人。

梅乌奇1808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比贝尔大39岁。他自幼学习美术，起初在佩戈拉剧院当舞台技工，曾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学习机械工程设计。

1850年，梅乌奇移居美国纽约的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并加入了美国国籍。起初他以生产香肠和腊肠谋生，但生意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景气，后来就转而生产蜡烛。

在移居到美国之前，梅乌奇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古巴。为了增加收入以改善生活环境，他开始对自己很感兴趣的电生理学进行研究。不久，他研究出了一种用电击治疗疾病的方法，这使他在哈瓦那名声大振。没有什么资料显示他那套治疗方法是否真的有用，但有资料显示，在1849年的一天，当梅乌奇准备好一套器械要给在另外一个房间的朋友治疗时（当时他把一块与线圈连接的金属簧片插在朋友的嘴巴里，线圈连接导线，通往另一个房间），通过连接两个房间的一根电线，他清楚地听见了从另外一个房间里传出的朋友的声音。

梅乌奇马上意识到这一现象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并立即着手研究被他称为“远距离传话”的装置。



梅乌奇“远距”传话机离装置示意图

1854年，梅乌奇已制造出第一部像电话机一样运行的样机。第二年，梅乌奇进一步完善他的电话机并将其命名为“远距离传话机”。由于妻子瘫痪在床，梅乌奇就装配了一个通话系统，把妻子的卧室和他的工作室连起来，以方便联系。



梅乌奇

那个时候，贝尔只有两岁。

1860年的时候，梅乌奇向公众展示了这个系统，并在纽约的意大利语报纸上发表了关于这项发明的介绍。但是，英语水平不高的梅乌奇融不进美国主流社会，得不到应有的认可。

1871年，梅乌奇在一次搭乘斯塔滕岛的渡轮时，渡轮的一个锅炉发生了爆炸，导致125名乘客死亡。在这场灾难中，梅乌奇被烧伤了。在养病期间，妻子卖掉了他实验室里包括“远距离传话机”在内的所有东西，而那个凝聚了他心血的模型，才卖了6美元。

也就是在这一年，梅乌奇终于提交了一份“专利预告”文件——这不

是一份完整的专利申请文件，因为那需要花费250美元，梅乌奇付不起。这种“专利预告”文件需要每年付10美元，三年后，梅乌奇连10美元都付不出了（五年后，贝尔递交了专利申请）。

走投无路的梅乌奇，在1873年带着记录有全部实验数据的笔记本和一部新的电话原型机，来到了西联汇款公司，试图毛遂自荐。但这家公司非但没有接见梅乌奇，还在后来宣称，梅乌奇向该公司提供的东西都不慎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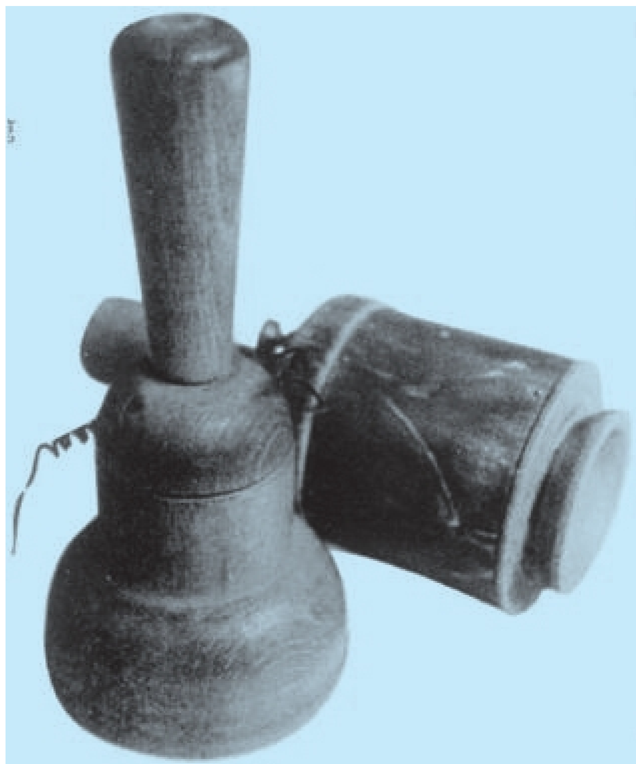
后来证明，这家公司的高管是贝尔的朋友。两年以后，贝尔提交了电话专利申请，并与西联汇款联手建立了一家新的公司。

在贝尔申请到电话的专利并成立公司进行商业化运作之后，梅乌奇终于将一纸诉状递到了法院，表示自己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先发明了电话。

囊中羞涩的梅乌奇无法独立负担庞大的诉讼费用，他依靠着朋友律师的帮助，与贝尔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当民意开始慢慢倒向梅乌奇，最高法院也开始考虑用欺诈罪指控贝尔的时候，梅乌奇的生命却走到了终点。

1889年10月18日，81岁的梅乌奇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官司自然不了了之。



梅乌奇的第一部电话原型机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还没有。

2002年6月11日，在梅乌奇逝世113年之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69号决议——这是一项关于“电话”的决议。

决议称，梅乌奇于1860年在纽约展示的名为“teletrofono”的机械已经具备了电话的功能，而贝尔后来确实有各种渠道和机会拿到梅乌奇的实验资料——

“众议院认为安东尼奥·梅乌奇的一生及其成就应该得到肯定。他在发明电话过程中的工作也应该得到承认。”

决议公布，立刻引来轩然大波。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纷纷欢呼这一迟到一个多世纪的“公正判决”。但加拿大方面却指责美国国会为了政治目的篡改历史（贝尔1870年移民加拿大，1882年又取得美国国籍）。

10天后的6月21日，作为回应，加拿大众议院也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贝尔是电话的发明者。

2004年，在加拿大广播公司举办的“最伟大的加拿大人”评选中，贝尔被电视观众评选“十大杰出加拿大人”。

就目前的绝大多数资料显示，电话的发明人，依旧是贝尔。

有人认为，贝尔对电话的商业化和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的作用类似爱迪生之于电灯泡，所以他对电话做出的贡献更大。

也有人认为，梅乌奇先发明了电话，且贝尔确实有获得梅乌奇资料的嫌疑。

不管怎样，2013年3月16日，美国的专利法终于做出了一项重大改变：从之前的“先发明主义”（First-to-Invent），改为了“发明人先申请主义”（First-Inventor-to-Invent）。

只是关于电话的发明者究竟是谁，专利法已经无法给出答案。

馒头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挺喜欢写科学家的故事的。

因为我个人认为，能从整体上改变人类发展走向的事情，只有两种：战争和科技。

战争，毋庸多言，是向着毁灭人类的方向去的。

而科技的发展，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是为了提高和改善人类的生活（前提是别和战争联姻）。

而作为科技发展的直接推动者——科学家，其实也拥有一个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不是一个个冷冰冰、高高在上的科研机器人，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怒、有好事有糗事的普通人。

比如贝尔，无论他究竟有没有借鉴梅乌奇的成果，其实他一生为聋哑人做了很多贡献，他自己的妻子也是一位聋哑人。

另外一个喜欢写科学家的原因是，我很痴迷那个科学家辈出、人类科技文明大爆炸的时代——你看，一个电话，全世界各地都有科学家在憋足了劲儿捣鼓（其实在贝尔之前，法国人博修和德国人赖斯也有过类

似的发现或发明）。那时候，每一个诺贝尔奖，都足以改变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

从21世纪开始，人类其实已经正式进入崭新的“互联网时代”，很多原来想都想不到的事，都逐步成为现实。

衷心期望并等待，下一个科技大爆发时代的到来。

你知道当年在报纸上登广告有多难吗？

当时代革命扑面而来的时候，很多行业都会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时候，一眨眼，很多事情就只剩下回忆了。

1

1979年3月15日，上海的《文汇报》刊登了一条不寻常的广告。

这是一条引起轰动的广告。

因为这是自“文革”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第一条在中国报纸上刊登的外商广告。值得注意的是，报纸上的三块手表，还不是照片，是手绘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广告上刊登的“雷达表”，要在四年后才进入中国市场——换句话说，是看得到，买不到的。

时任瑞士雷达表中国区副总裁郑世爵后来回忆：“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是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毫无疑问，雷达表相当聪明地运用了营销理论上的“第一品牌”概念——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用较少的资源和时间建立很高的知名度。

广告有效果吗？当然有。

在广告刊出的三天内，上海有700人以上到黄浦区的商场里去询问“雷达表”——其中很多人还不知道，当时一块雷达表的价格，相当于上海一名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收入。



《文汇报》刊登的雷达表广告

当天晚上，上海电视台也播出了雷达表的广告，而且还是英文播出，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

当时很多人都在问：《文汇报》胆子怎么那么大？

于是就要说到另一个故事，就在这一年，就在《文汇报》之前，上海的另一家报纸已经“第一个吃了螃蟹”，给《文汇报》壮了胆。

那就是中国在“文革”后率先恢复商业广告的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

2

报纸刊登广告这样稀松平常的事，对当时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报纸而言，却无异于天方夜谭。

其实报纸刊登广告，在中国本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从鸦片战争之后，中文报刊开始大量涌现，广告自然是报纸营收的最主要渠道。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报纸刊登广告，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1966年8月17日，最后一则商业广告出现在了《解放日报》国际新

闻的下方——用现在的眼光看，那则广告的安排多少也体现了编辑的心血：

这一版的总标题是《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电烘箱广告上面的报道是这样一段导语开头：“墨西哥进步人士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他们热情称颂毛主席每篇著作都是真理和指南针。”然后，下面是“鼓风恒温干燥箱”的广告。

第二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商业广告就此在中国报纸版面上绝迹。

3

一晃13年过去，转眼到了1979年的除夕。

那一天，解放日报社正在开编委会，《文汇报》的一位副总编打电话过来：“春节期间，两报能否出内容相同的单页联合版，这样能让平时很辛苦的夜班编辑部轻松过个年？”

在当时电视还不普及，报纸也没几张的年代，时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的王维，不同意这个建议：“春节是读者看报的好时段，不能出单页！”

但是，会上马上也有人提出要算算“经济账”：《文汇报》出单页，我们出四个版，不是吃亏了？

王维一拍桌子：怕什么？我们不能用商业广告收入来弥补吗？

一句话说得简单，但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觑——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三年，但中国还没有一家报纸敢恢复商业广告。

《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现在的上海市委机关报，居然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后来，有人专门请王维回忆当时的情景：

——“事先有没有请示市委？”

——“没有。”

——“有没有上报宣传部？”

——“没有。”

——“私下里和有关领导打过招呼？”

——“肯定没有！”

王维当时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会决议深入人心。经过那么多年反反复复折腾，中国人终于认准了一个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整个国家，“实事求是”的氛围越来越浓。

于是王维的思路就是：“报纸刊登广告，天经地义。”

解放日报社老总一拍板，乐坏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

4

当时，整个上海只有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叫“上海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下称上广装），这家公司被允许代理国内媒体的广告，别无分店。

但以当时的市场环境，就算只有一家，但依旧是无米下炊。当时，上广装专门出差去北京，游说中央报刊能够接受刊登广告——中央报刊肯刊登，地方报纸才敢动啊！

但是中央报刊没有一家敢先摸石头过河。

时任解放日报社广告部经理的彭寿龙回忆，当时找到了上广装说可以刊登广告，对方激动万分，在最短的时间里就拉来了足够《解放日报》春节假期版面使用的商业广告。

1月28日，《解放日报》的版面上破天荒出现了上海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和上海食品工业公司的拳头产品，舞台刀枪、二胡三弦、佛手味精、幸福可乐、十全大补酒等一批广告。

当时，像这样的广告每条大约收费在700元左右，不久就调价到了每条1280元。这个价钱是什么概念？当时上海的人均工资仅每月40元左右。

但即便如此，在《解放日报》开了头炮之后，其他商家蜂拥而至——刊登广告的那几家商家的商品迅速脱销。

在诸多广告客户里，当时还有一家日本电气公司，连续来找了几次，要求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广告。这让庞寿龙感到非常棘手：党报能不能刊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广告？按什么货币结算？

庞寿龙为此还自掏腰包买来龙井茶叶、广东香蕉，接待日本客户，想先探探虚实。

一犹豫，第一个涉外广告就让《文汇报》做了。

5

《解放日报》作为一家“第一个摸石头过河”的报纸，当时不是没有风险的。

根据王维老总的回忆，在《解放日报》刊登广告后的两个月，在一次宣传部的会议上，出版局有一位副局长毫不客气地发问：《解放日报》带头刊登商业广告，到底是为社会服务，还是为本单位赚钱？

王维还是那条标准：用实践检验。他回到报社后，马上让总编办收集各界对《解放日报》刊登商业广告的真实反映。

解放日报社的资料室里，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当初的读者反馈原件——真的有批评声音：

“凭票供应的电视机、收录机为啥还要做广告？如果登给中国人看，你又买不到；如果登给外国人看，人家根本不稀罕！”

“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只能起到刺激人们不满的作用。”

市总工会举行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联欢茶话会

群英迎春谈壮志　誓当四化排头兵

彭冲等领导同志到会向大家致节日祝贺

新道德　新风尚

老干部关心农业机械化

献巨款购买拖拉机支援家乡生产

曹杨新村的集体婚礼

她们比孩子的妈妈还要亲

"我多流些汗也乐意!"

向辛勤的园丁们致敬

孩子终于有地方托了!

盲人出门遇亲人

热情关怀双职工的困难

开门大"吉"

上海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所属部份工厂产品介绍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上海戏剧刀枪厂

上海印花品厂

1979年1月28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

1979年1月28日的《解放日报》（第三版）

“我花四分钱买一份报纸为了学习、看消息，你们用四分之一的版面介绍日本人的生意经，算啥名堂？”

“广告里画的有些是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女人，对广大

群众到底有啥好处？”

王维让人把这些反馈实事求是地做成简报，上交给宣传部。

上面的领导，并没有批评。

6

由《解放日报》开头，全国报纸广告的“黄金时代”大幕由此拉开。

记得上海《新民晚报》的一位记者讲过一个段子：“那个时候，我们的广告部主任上班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带，只要带把尺子就可以了。一个客户进来，主任告诉他实在没版面了，客户再三拜托，于是主任用尺子给他在版面上量出一个几乘几厘米的‘豆腐块’，问他能接受吗？客户连连点头，出去。然后排队的下一个再进来。那个年代，在报纸上登一个广告，有时候要提前一个月预约。”

当然，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解放日报》，也由此迈开了脚步：1993年，报社全年广告收入首次达到1亿元，1995年又突破了2亿元。

对了，那家上海广告装潢有限公司在之后的八年时间里，营业额一直是同行业全国第一。

馒头说

《解放日报》是一家听上去非常严肃、正经的报纸（实际上也是），但翻开它的历史，除了第一个恢复商业广告外，真的还有不少的全国“第一”，会颠覆你的印象：

1979年8月12日，成为全国第一家刊登“社会新闻”的报纸（其实就是非正面的新闻：上海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造成很多乘客受伤）；

1980年1月，全国第一家创办文摘类报纸《报刊文摘》（巅峰时期的发行量达到380万）；

1989年1月21日，成为全国第一家敢把美国总统（布什）的就职演说作为头版头条的报纸；

1991年1月17日，成为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敢在头版头条刊发《海湾战争可能在24小时内爆发》预测消息的报纸（结果战争确实

就在当天爆发）；

1991年2月4日，成为全国第一家敢用自己的语言透露党的最高领导谈话内容的报纸（业内皆知的“皇甫平”，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

1992年1月4日，成为全国第一家出版彩色版周末刊的报纸；

1993年1月1日，成为全国第一家敢以半个版面刊登股票和期货市场行情的报纸。

……

你问我怎么那么熟悉这张报纸的历史？因为这就是我供职的老东家啊！

必须承认的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蓬勃兴起后，传统的纸媒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当初广告客户踏破报社门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同样应该达成共识的是：纸媒纸媒，成为过去的只是“纸”这个载体，“媒”永远是刚需——《解放日报》已经成为全国第一家“全员转型”的省级党报（全部的记者第一发稿都发到新媒体平台“上观新闻”客户端），又成了第一家摸石头过河的报纸，而这可能也是史上最艰辛、最未知的一次探索。

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初报纸刊登广告的故事，我觉得依旧是很有意义的。

我一直很喜欢那八个字——或许那八个字现在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酷、不潮、不时尚，但真的能够做到，是非常了不起的。不光是做报纸、干媒体，放到任何一个行业，放到任何一个时代，这八个字都值得铭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老祖宗考试作弊的那点儿事

有些门路和行业，从古至今都会一直存在，经久不息。而且技术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和革新。

1

1997年5月5日，在河南开封，中国有一套“奇书”露面。

这套书分上、下两册，印刷于清朝光绪年间。书面纸张为黄褐色，内文用宣纸印刷，墨色精纯，校勘精当，印刷精细，字迹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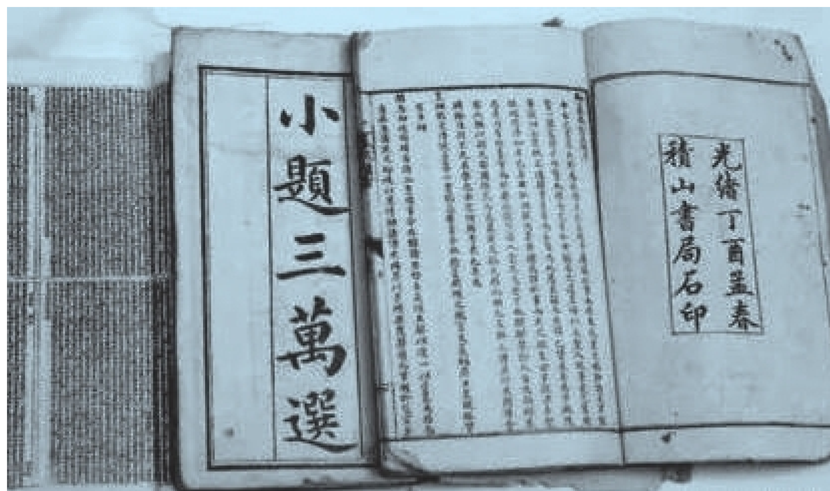
那这套书又“奇”在何处？

这套书只有6.5厘米长，4.8厘米宽，1.5厘米厚，总共也就一个火柴盒大小。

但就在这套火柴盒大小的书里，一共刊载了《易经》《书经》《诗经》《礼经》《春秋》五经，还连带注释和序言，共342页，30万字。

这套书，被称为“世界最微型书”（据说浙江嘉善地区曾发现尺寸更小的版本）；

这套书，先是用手工抄录，然后再经石刻印刷而成。



下那么大功夫干什么用？

按照明面上的说法，那是为了便于读书人携带，让他们在旅途中看的。但哪位读书人出去旅行还要读30万字的“五经”？而且书上每个字比一粒米还要小，那是要让天下读书人都“健步如飞出门，牵着导盲犬回家”吗？

所以，不要解释了。

这就是一套给考生作弊用的书。

2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起于隋，兴于唐，强于宋而盛于明清，历经1300多年，成为广大寒门子弟实现阶级跨越的重要途径。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作弊，几乎是伴随着科举制度同时诞生，同时发展的。

中国古代科举的作弊手段，可以说是门类繁多，让人眼花缭乱，但若以作弊的人群分，无非两类：富人作弊，穷人作弊。

我们就先来看看富人家的子弟是怎么作弊的——这个富人家，当然也包括有财又有势的官人家。



绘画作品中的唐代科举考试现场

如果你有个好爹，那么最好的作弊行为发生在进入考场之前，那就是“请托”。

所谓“请托”，就是通过各方面关系，贿赂考官，开后门。至于开后门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探题”——透露题目给你，比如“关节”——双方约定你在考卷上做的暗号以便相认给高分（唐武则天时期开始要求盲批试卷），甚至是“偷改”——直接贿赂考官和工作人员，在考场就将试卷修改抄录。

能够“请托”的，一般都是大富大贵之家，那么稍微差一点，也有几个小钱，但托不到关系的人家该怎么办呢？

最常见的就是“替考”——找“枪手”（假手）代考。

请枪手代考，也是有讲究的。

一种，就是我们现在也常见的，枪手代替考生入场考试，考生不出现在考场。而另一种则更不易被发觉：枪手和考生同时入场，但枪手在试卷上写考生的名字，考生在试卷上写枪手的名字，神鬼不觉。

话说唐代最著名的枪手，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才子温庭筠。“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这就是他写的。

话说这哥们儿虽然诗名与李商隐并肩，却一生不得志，屡试不中。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他喜欢吃喝嫖，还要把相思缠绵的感受写成诗——“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也是他写的。唐代的科举要附加品德评语，所以他一直被打低分。另一方面，他口无遮拦，得罪不少权贵，所以也一直无法上榜。

屡试不中后，温庭筠就开始疯狂“报复社会”——不是深夜发美食照片，而是充当“枪手”帮人考试。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的会试，由于温庭筠做枪手已经做出了名气，做出了品牌，为了防范温庭筠替考，主考官特地将他的位置安排在自己办公的门口。当时温庭筠就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退场，让考官倒也是心中石头落地。但后来人们才知道，就是在那次考试中，温庭筠竟然帮助8个人完成了考卷（“私占授者已八人”）。



“枪王之王”温庭筠

无法想象温庭筠是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帮助8人作弊的，可谓“一战封神”。

当然，也不是人人像温庭筠那么潇洒。

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虽有才华，但屡考屡败，只能写下一句牢骚诗：“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最后，这哥们儿一气之下，去投了杀人魔王朱温，才算捞到个五代梁朝的翰林学士。

3

穷苦如杜荀鹤，自己有才，不愿作弊，那自是一说。但还有大量普通人家，无法像富贵人家作弊那样走高端路线，那该怎么办？

自然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最常用的手段叫作“夹带”，顾名思义，就是带小抄。但这个小抄放在哪里，学问就大了。

有的考生，把小抄放在食盒的夹层里，有的放在掏空的馒头里带入考场，有的比较恶心，把小抄藏在肛门中带入考场。

冯梦龙的《古今谭概》里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万历年间，某个考生考试携带作弊文稿，用防水的油纸卷紧了，用细线绑着，藏在肛门里。搜查的人拉着线头把它拽了出来。这个考生解释：“这是前一个考生丢弃的。”结果前一个考生被叫来对质，问：“就算是我丢的，难道不上不下，正好丢进你的肛门？那你干吗又高抬你的臀部，等着我来丢呢？”（即我所掷，岂其不上不下，刚中粪门？彼亦何为高耸其臀，以待掷耶？）

当然，有些“夹带”也是有些技术含量的，比如“继烛”。

因为有时候科举考试要考到晚上，所以考生需要自备蜡烛。有些考生就把蜡烛内部沿引线从底往上掏空，然后塞入卷成一条的小抄，然后再用蜡油把底部封平，堂而皇之地带入考场。

比“继烛”更有技术含量的是“飞鸽”。

在赶考之前，考生家里先训练鸽子，在考前晚上将鸽子放入考场。考生进入考场后，把当天的考题写在纸上，让鸽子带回家中。家里早就准备好若干写作高手，按题写作，再让鸽子把文章带回考场——放到如今，只是鸽子换成了手机而已。



密密麻麻写满字的“夹带”上衣

另外一些手段，甚至都有些“高科技”含量了。

有些考生会用墨鱼汁把作弊内容抄写在衣服里，再涂上泥巴，混入考场。进入考场后将泥巴去掉，墨鱼汁写的文字就会显露出来。而且据说用墨鱼汁写成的文字，过一段时间会褪色，这样的话作弊的证据也会消失。

总的来说，使用新颖的“夹带”方式的一些考生可谓生不逢时，如果放到现在，即便落榜，去做个一流魔术师也是绰绰有余。



清科举考试作弊用书

4

那么问题就来了：面对那么多种作弊手段，考官们不管吗？朝廷不管吗？还有王法吗？

管，当然管。而且招数也很多。

第一招是“盲批”。唐武则天的时候，规定考生在考卷上自糊姓名，不让批卷者知道。后来则是姓名、年龄、籍贯等都要用专门的纸条密封，加盖弥封印章，防止被人拆开偷看或偷梁换柱。宋朝沿用此法，称其为“糊名”，而且还加了一道手续——专门请人将考生的试卷统一抄写，防止因为笔迹被辨认出而作弊。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作弊，但并不能完全杜绝前文所说的“关节”和“偷改”。

第二招叫“结保”。这个规矩从唐代就开始了，三人一保，类似连坐。如果三个考生中有一个被发现有作弊行为，三人同时受到处罚。这

逼得他们互相监督，不能因为其中一人作弊而毁了自己前途。到后来考官等人都参与作弊，于是考官和工作人员也开始结保。

第三招是对付“枪手”的。从宋朝开始，科举考试推行“准考证制度”。那时的准考证叫“浮票”，上面除注明应试者姓名外，还有面形、身高、体形等特征。考生进入考场时，监考官拿着准考证一一看过才放行，以此防止冒名替考。但这招对温庭筠这类人不管用——老子也是进考场考试的，你奈我何？



清代科举考试场景还原

光这三招还不够，第四招叫“锁院”。这一招缘起北宋年间。当时的翰林学士杨亿被任命为主考官，在开考前，他同乡中打算应科试的一些人来拜访他——目的明确，希望接受“考前辅导”嘛。这个杨亿一听他们的要求，拍案而起，大骂一声：“丕休哉！”掉头就走进了里屋。

杨亿当真是个清官？并不是。“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有聪明人立刻听出了其中奥妙。那次考试，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语的，都录取了。

为此，宋太宗决定开始“锁院”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都是临时委派的。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

榜前不得离开，也不能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

然而，最简单有效的一招，自然就是“搜身”了。

随着“夹带”招数的越来越多，考生进入考场前的搜身也越来越严，进场要打开他们的发结，脱去衣服，甚至……检查肛门。

在这一点上，被汉人视为“蛮夷”的女真人倒是想出了一个非常文明的办法。金朝也仿效汉人开科举，但金世宗觉得对考生进行搜身很不礼貌，所以他规定：每次进考场前，让考生脱去自己的衣服进入沐池沐浴，浴毕则让考生换上统一的考生礼服——既检查了考生，又让考场环境干净卫生，没有体臭脚臭，一举两得。

当然，光靠“防”是肯定防不尽的，那怎么办？那就还要“罚”。

在清朝，凡是在科场考试中作弊的人，一旦被查出，要立即被带上枷锁在考棚外示众。然后还要判罚取消考试资格多少年，厉害的甚至会“剥夺考试权利终身”。

对于考场官员舞弊的，那惩罚就会更严重些，如果被查出，会被施以杖刑、罢官、流放，甚至砍头。

清朝对于科场舞弊惩罚极严，不少官员为此搭上身家性命。雍正年间，河南学政俞鸿图的小妾与仆人勾搭出卖考题被人举报，俞鸿图虽然不知情，但毕竟治家不严，被雍正判了个“斩立决”。（据野史记载，俞鸿图是被判“腰斩”，斩断身躯后尚未死，用手指在地上写了七个“惨”字才气绝身亡。旁人将惨状禀报雍正，雍正从此取消“腰斩”刑。）

这还不算什么。咸丰年间，做过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军机大臣的正一品大员柏葰，被人举报主考期间舞弊。堂堂一个正国级官员，就被一刀咔嚓了，因此案被牵连的官员达90多人，其中不少都被处斩了。

不过，“头你尽管砍，以后不作弊算我输”。作弊的传统和方式还是在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推陈出新，屡禁不绝。

从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往后再过一千年，如果有人回写现在我们的各种考试，一样可以写出一篇图文并茂的《21世纪考生作弊的历史》吧？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考试和作弊，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从出生开始就形影不离，谁也不能和谁分开。

或许有人会问，手段如此严格，下场如此悲惨，但为什么还有一批又一批的考生愿意铤而走险？

很简单，因为科举是那个时代处于普通阶级的他们突破自身阶层，万里封侯、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很多人都为了那一点点希望，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

是的，由此很容易联想到我们现在的高考。

有不少人曾呼吁取消高考制度。我个人觉得高考迟早会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至少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在当下的中国，高考依旧是一个对普通阶层相对而言最公平的机会，尤其是对广大的农村子弟而言，如果没有高考，他们靠什么越过那道坎，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人生？靠拼爹？靠送礼？还是靠各种才艺秀？难道还要潜规则？

不过，虽然我已远离学生时代，但通过各类新闻还是能了解到，高考现在对学生的重要性，与对当年的我们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我是全国大学扩招前的最后一届）——我个人认为这是个挺好的趋势。

为什么呢？因为考试的机会越来越多了，考试的方式越来越多了，对未来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高考可能还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跃龙门”的渠道，但很难说还是不是当初那座“千军万马挤破头”的独木桥了。

其实当年的科举也是这样。考生们之所以前仆后继花样百出地作弊，是因为那是他们作为读书人唯一的升迁之路。而到了晚清，尤其是1905年取消科举制度前夕，科举的存在感已经越来越低。以前科举找人代考，可能要花个千百两银子，到后来可能只要几两甚至几钱银子就行。

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既然多了，那又何必在一根独木桥上挤

呢？

当然，不是在舞文弄墨的考场上作弊的人少了，就是作弊的人真的少了。

只要有人，有欲望，有功利，“作弊”这种行为，永远会存在。

哈得孙河上的奇迹[1]

有时候，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所能祈求的只能是运气。但有时候，能起作用的又并不只是运气。

1

2009年1月15日下午，在纽约长岛繁忙的拉瓜迪亚机场，一架客机缓缓驶出了停机坪。

这架客机是全美航空的“空客320”型飞机，航班号是1549，执飞的任务是从纽约飞往西雅图，中间经停夏洛特。

连同机组人员在内，这个航班上有155人。

从纽约到夏洛特的第一站航程大概只需要两个小时，所以这班航班机长萨伦伯格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

萨伦伯格（Chesle. B. Sullenberger），那一年58岁，可谓是“科班出身”：1969年从中学毕业后，萨伦伯格进入了美国空军学院，学习驾驶滑翔机（请注意这个点）。1973年到1980年间，萨伦伯格在美国空军驾驶了七年的F4“鬼怪式”战斗机，随后升职为飞行指挥员和飞行教练。退役后，和不少空军飞行员一样，他开始执飞民航班机。



在空军学院学习时的萨伦伯格

1月15日那天，纽约的气温虽然接近0摄氏度，但天气晴朗。在得到塔台允许起飞的命令之后，1549次航班顺利从跑道起飞。机长萨伦伯格让一旁的副驾驶、49岁的杰夫（Jeffrey Skiles）接过了操控权，自己望了一眼舷窗外的纽约哈得孙河，对杰夫说了一句话：“哈得孙河今天看上去真漂亮。”（Uh， What a view of the Hudson today.）

一旁的杰夫回答：“是的。”（Yeah.）

在那一刻，无论是萨伦伯格还是杰夫，都无法预见这两句轻松的对话后会发生什么——直到1分半钟后，飞机突然一阵剧烈晃动，像是在空中撞到了一堵墙。

“鸟群！”（Birds!）萨伦伯格只说了一个单词，虽然语气还是很冷静，但让一旁的杰夫倒吸一口凉气——飞机撞到鸟群了！

2

飞机撞鸟，堪称航空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

只要学过物理的人都应该知道，高速运动中的飞机与一只鸟迎面相撞——哪怕只是一只麻雀——都很有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而飞机撞鸟事件中最糟糕的，无疑就是鸟撞上了飞机的引擎。

这种最糟糕的局面，就让2009年1月15日的1549次航班撞上了——还不是一只鸟，是一群鸟。

在一阵晃动之后，萨伦伯格看了一眼仪表盘，最坏的情况发生了：这架“空客320”客机的两个引擎同时失去了动力。

很显然，鸟群钻进了飞机左右两个引擎，从而让这架几十吨重的庞然大物瞬间失去了动力。

而此时飞机已经爬升到5000英尺的高度（1500米左右），飞行速度为400公里/小时。

这个时候，机长的反应和操作，将决定整架飞机上所有人的生死。

13秒之后，萨伦伯格向副驾驶杰夫下了第一道指令——要回飞机的操控权。



在高速运动中，迎面扑来的鸟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

同时，萨伦伯格要求杰夫赶紧拿出QRH（quick reference handbook，快速检查手册），查阅如何按照上面说的步骤逐步化解危机。

但是，与此同时，萨伦伯格首先启动了辅助动力系统——这个系统虽然不能保证飞机恢复动力，但能让驾驶舱仪表盘的各项数据和电脑暂时恢复正常——如果按照QRH的指示，这项步骤大概要排在第15个步骤之后。

随后，萨伦伯格开始向拉瓜迪亚机场的地面塔台发出呼救："呼救！呼救！呼救！这里是1549次航班。我们撞上了鸟群，两个引擎都失去了动力，我们准备返回拉瓜迪亚机场！"（"Mayday mayday mayday. Uh this is uh Cactus fifteen fortynine hit birds, we've lost thrust （in/on） both engines we're turning back towards LaGuardia."）

"Mayday"起源于法语"m'aidez"，表示"帮帮我，救命"，是航班求救的通用语。

在第一时间，萨伦伯格想到的是把飞机飞回拉瓜迪亚机场。

下午3点27分，拉瓜迪亚机场的塔台收到了萨伦伯格的呼救。

当天负责1594次航班塔台雷达控制的，是一个叫派崔克·哈登的小伙子。当他收到萨伦伯格的求救信号时，顿时呆住了——两个引擎都不能运转，意味着这架飞机失去动力了。

但很快，他调整了情绪，立刻做出了应答："好的……哦……你需要飞回拉瓜迪亚机场吗？向左转，航向220！"（Ok uh, you need to return to LaGuardia? Turn left heading of uh two two zero！）

无线电应答中传来一阵沉默。

哈登继续发出指示："1549次航班，如果我们可以为你安排，你是否可以降落到13号跑道？"（Cactus fifteen fortynine, if we can get it for you do you want to try to land runway one three?）

应答器中传来萨伦伯格简短的回答："我们做不到。"（We are unable.）

哈登没有放弃，继续努力："1549次航班，31号跑道有空！"（Arright Cactus fifteen fortynine it's gonna be left traffic for runway three one.）

萨伦伯格这次的回答更简短："做不到。"（Unable.）

哈登这时可能并不知道，1594次航班此时离地面只有400多米的高度了。

他又安排了4号跑道，但等来的萨伦伯格的回答是："我不敢保证我们能在任何跑道降落，我们右边有什么？新泽西的迪特波罗机场？"（I'm not sure we can make an runway. Uh what's over to our right anything in New Jersey maybe Teterboro?）

哈登在绝望中似乎又抓到了救命稻草——既然萨伦伯格在寻找迫降的机场，说明飞机还能够掌控："你说你想去迪特波罗机场？"（You wanna try and go to Teterboro?）

萨伦伯格回答："是的。"（Yes.）

哈登赶紧回应："你们想降落在迪特波罗哪条跑道？"（Which runway would you like at Teterboro？）

1549次航班却没有应答。

10秒钟的沉默。

随后，萨伦伯格的声音再度响起："我们准备在哈得孙河上迫降。"（We're gonna be in the Hudson.）

哈登怀疑自己听错了，赶紧追问了一句："对不起，你再说一遍？"（I'm sorry, say again Cactus?）

此时的时间，是下午3点29分，离塔台收到1549次航班的呼救，只过去了2分钟。

1549次航班再也没有应答。

4

在听到1549次航班准备迫降哈得孙河的应答后，哈登瘫坐在了椅子上。

为什么？因为在航空史上，飞机迫降在水面上的先例，往往惨不忍睹，因为考虑到水波、水流、水温、下沉等各种因素，水面迫降的难度其实比陆地迫降要高很多（和在水泥地上硬着陆没什么区别），生还率也小很多。

作为一个例子，1996年，埃塞尔比亚961号航班因被劫机而燃油耗尽，最终在印度洋面上迫降，结果机体被撕裂，全机175人有125人遇难。

更何况，1549次航班的下面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纽约，只要出一点闪失，就会造成比机上乘客人数多得多的伤亡。

在收到1549次航班的应答后，按照规定，哈登被请离了操控台，因为他当时的情绪已经不适合再调控航班了。

被安置在一个小房间里的哈登，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因为按照他的经验，1549次航班肯定是机毁人亡了。

但他不知道，就在那一刻，萨伦伯格正在操控着那架飞机，做最后的努力。

5

就在机身剧烈晃动的时候，1549次航班的所有乘客陷入了寂静。

这种寂静，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很淡定，而是在那一刹那，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驾驶舱内的两名驾驶员。

这时候，机舱内的机长广播响了，机长说的，并不是大家都期待的“现在飞机已经恢复平稳”，而是一句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话：“准备撞击姿势！”（Bracing impact!）

随后，同样也绑好了安全带的空姐开始大声喊着要求乘客：“推椅背！弯腰！低头！双手抱头！”

有人哭了起来。

在拉瓜迪亚机场的地面塔台控制室，雷达上已经失去了1549次航班的踪影——飞行高度低于300米，雷达已经捕捉不到了。

而此时此刻，在驾驶舱内，萨伦伯格和杰夫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失去了动力的“空客320”飞机，此时就是一架几十吨重的滑翔机，而萨伦伯格年轻时的滑翔机驾驶经验此刻也派上了用场，他在争取让飞机以一个完美的姿态切入哈得孙河的河面——切入角度要保持在11度左右，同时不能让飞机失速。

30米，20米，10米——轰！

当萨伦伯格和杰夫从巨大的冲击中清醒过来时，看到的是周围的一片水面——他们意识到，迫降成功了。

与此同时，同样劫后余生的机舱内的所有乘客，在空乘人员的指挥

下，开始紧急疏散：妇女和儿童优先被送出紧急出口，随后大家依次撤离。

此时的室外温度接近0摄氏度，而哈得孙河水更是冰冷刺骨，有的乘客跳进了水里，试图自己游到岸边，但游了几下发现很快就会冻死在河里，只能再游回客机。

所有的乘客站在飞机的两翼和几个充气救生梯上等待救援，时间开始变得宝贵起来——如果救援不能及时赶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将被活活冻死。



当时真实的新闻画面

好在，萨伦伯格选择迫降的地方，毕竟是纽约市中心的哈得孙河。

率先赶到救援的，是哈得孙河上的一条轮渡船，随后，越来越多的船只收到救援信号后迅速赶来，官方的救援直升机也随即飞到，潜水员直接跳入水中去帮助体力不支的乘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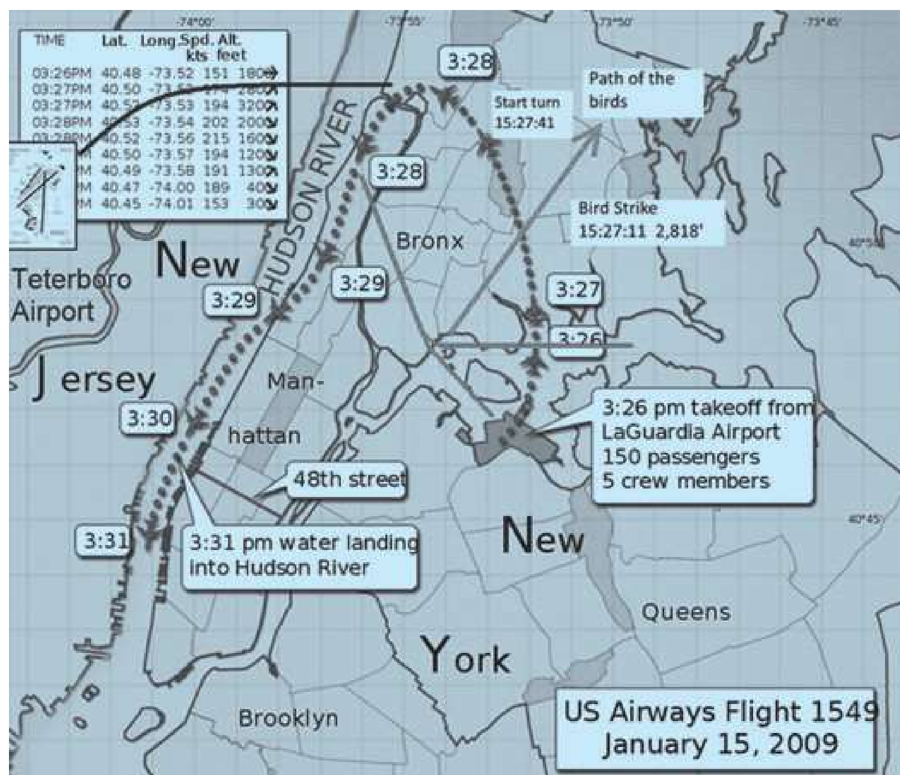
救援船员围绕在1549次航班周围

正当乘客开始登上救援船只的时候，萨伦伯格还在已经涌入冰冷河水的机舱内寻找还没撤离的乘客。作为机长，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确保所有乘客的安全。

在舱外机组人员的催促下，萨伦伯格最后一次检查了机舱，确认没有人留下，随后离开了即将下沉的飞机——他是全机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上岸后不久，萨伦伯格得到了一个让他欣慰的数字：

1549次航班全机155人，全部生还，包括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



1549次航班从起飞到成功迫降的路线，全程一共6分钟

6

毫无疑问，萨伦伯格立刻成了英雄。

媒体开始铺天盖地地报道这次迫降，而当时的纽约州州长戴维·帕特森直接把这次事件称为“哈得孙河奇迹”。

但很多民众所不知道的是，萨伦伯格和杰夫并没有多少时间体会“创造奇迹”的感受，因为他们在第一时间将面临NTSB（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详细调查——这次迫降是不是必须的。

NTSB组成了调查委员会，他们的调查目的主要是要确认两件事。

第一，这次事故是不是因为鸟的撞击产生的。

一般来说，鸟撞上飞机尤其是被吸入引擎后，往往尸骨无存。但好在1549次航班的水上迫降近乎完美，机体几乎没有损伤地被保存了下来。在从哈得孙河底打捞上飞机后，调查人员对飞机的两个引擎进行了详细的检测，最终发现了几十处鸟类撞击留下的痕迹和残骸。

通过分析验证，最终证明撞上1549次航班的鸟群，是正准备迁徙的加拿大黑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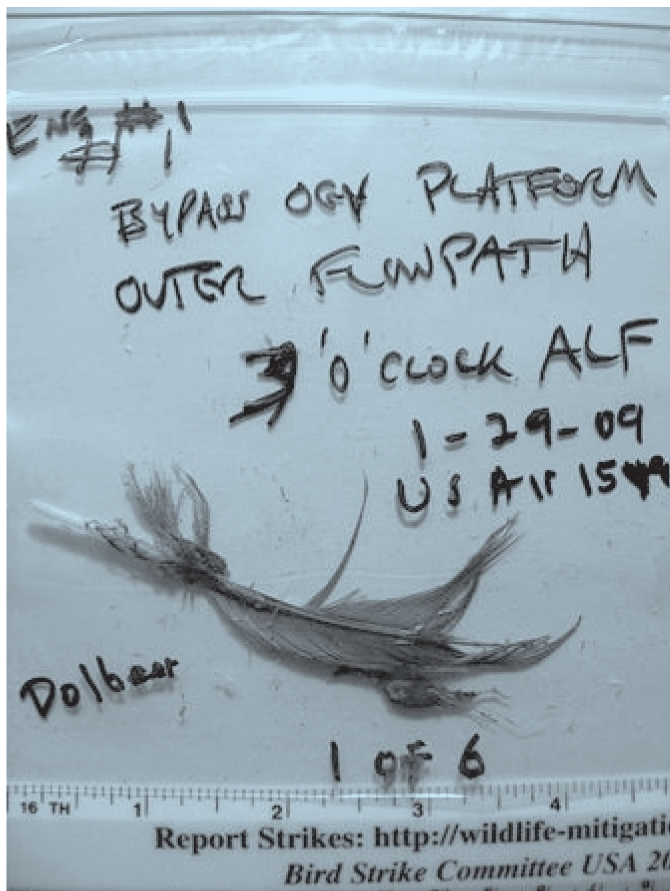
萨伦伯格和杰夫关于“遭遇鸟群撞击”的说法被证实了。

第二件要确认的事，就相对要复杂很多，那就是——是不是1549次航班当时只能迫降哈得孙河，而不能返回机场？

为此，调查委员会最终请法国的空客公司做了电脑模拟和真人驾驶模拟，两次模拟均显示：在遭受鸟群撞击后，飞机均可以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或迪特波罗机场的跑道上。



1549次航班被成功整体打捞



在1号引擎中发现的黑雁羽毛

那么，萨伦伯格冒险降落在哈得孙河上，完全是无意义的行为？

一旦这个结论成立，整个事件将发生戏剧性逆转：萨伦伯格根本不是什么拯救155条生命的英雄机长，而是一个玩忽职守，拿全机乘客生命开玩笑的赌徒。

好在，事实并不是这样。

无论是电脑模拟还是真人模拟，都是建立在飞机受到鸟群撞击后立刻就转向寻找机场降落的前提下——换句话说，等于是事先知道会遭受撞击。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在1月15日3点27分的那一刻，萨伦伯格和杰夫是根本不知道会遭遇鸟群撞击的——任何人在遭遇突发情况后，都需要一个反应时间。

调查委员会最终把这个反应时间设定为35秒。

在扣除35秒的反应时间后，无论是电脑还是真人驾驶模拟，都无法将飞机安全降落到任何一个机场。

迫降哈得孙河，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调查委员会还发现，在仅仅35秒的时间里就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在全程208秒的时间里完成水上迫降，萨伦伯格上演了一个真正的奇迹。

尤其是他没有按照操作步骤，而是率先打开了辅助动力系统，这堪称成功的关键——如果那个开关不开，飞机的仪表盘和电脑将失去电力供应，那么1549次航班不可能以那样完美的姿态切入水面，早就在空中失速坠毁了。

萨伦伯格的应对完全配得上“英雄”的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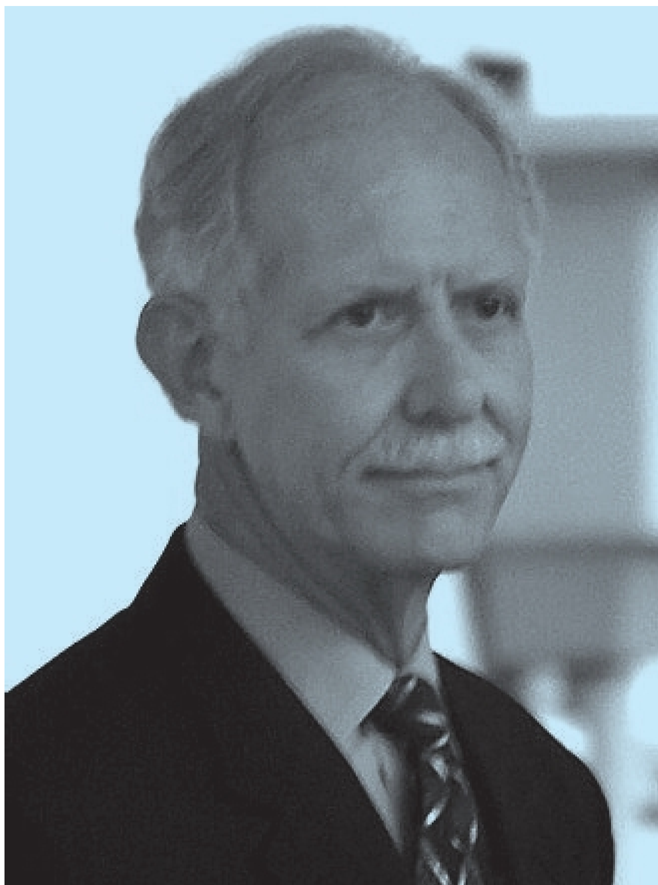
7

因为拍摄影片《萨利机长》，萨伦伯格后来和当初幸存的乘客们有一次聚会。

在那次会面上，每个乘客自我介绍的方式，就是报出当时自己乘坐1549次航班时的座位号。

而萨伦伯格有一段话，大意是：“155，看上去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如果你把这个数字连接上面孔，那就不是155张面孔，而是那背后父亲和母亲的面孔、妻子和儿子的面孔，很多很多的面孔，那样，155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所以，当时无论是飞机上的乘客，还是美国的普通民众，对萨伦伯格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三个字：“谢谢你！”



萨伦伯格

馒头说

2016年9月9日上映的《萨利机长》这部电影，其实是围绕迫降后NTSB调查萨伦伯格的故事展开的。

看完电影的观众可能心里会憋着一股气：凭什么要这么质疑这位机长？

事实上，因为是拍电影，所以难免要做一点艺术加工：影片中NTSB对萨伦伯格似乎怀着“敌意”，一定要证明他当时的选择是错误的。在真实环境中，NTSB是没有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的。

但是，NTSB事后对包括萨伦伯格在内的整个事故的调查，确实是严肃、认真的。

就在《萨利机长》上映期间，上海也发生了惊险的一幕：2016年10月11日，东航MU5643次航班在上海虹桥机场执行航班起飞过程中，由于管制原因，导致另一架A330飞机同时穿越跑道。在两架飞机即将相撞的一刹那，机长何超快速拉升起飞，最终避免了两架飞机相撞。事后，何超获得了300万元奖金，并且还获得了一系列荣誉，被媒体同样赞誉为“英雄机长”。

我曾看到网上有人质疑：美国机长创造了那么大的奇迹，事后还要遭受如此严格的审查，我们中国一个机长事后受到如此夸赞和奖励，却没有人质疑他的行为是不是最佳选择，可悲！

作为我个人的看法，有三点。

第一，且不说两架空客飞机的价值就超过1.3亿美元，机上数百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更是无价的——何超得到这份奖励，绝不过分。

第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除了加速拉升，并没有第二种选择了。

第三，虽然我不是民航业内人士，但我相信，事后有关方面肯定是有详细审查的。因为我知道，事后有一批塔台相关人员被党内警告、严重警告、行政撤职乃至被终身吊销执照。

人命关天的事，我相信谁都不会拿来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既需要像萨伦伯格这样的“英雄机长”，也需要像NTSB这样的严格审查机构，两者缺一不可。

经得起考验和回放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而有严格检验英雄行为的制度和机构，是避免悲剧再一次发生的关键。

---

[1] 本文所有涉及萨伦伯格和杰夫在驾驶舱里的对话，包括后面他们和地面塔台的通话，均为事后公布的打捞出的黑匣子里的真实录音还原。

人类悲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背后的阴影

到目前为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核事故。但在这场事故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悲剧，又岂止是灾难本身……

1

1986年5月14日晚上，苏联每一台打开的电视机屏幕上，都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像。

那是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这个晚上，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讲话，终于公开说出了一件全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

“晚安，各位同志。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也引发全球关注。我们首次面对这样的危险，核能脱离了人类掌控。我们日夜无休地工作。全国的经济、技术与科学团队，都前来抢救这场灾变。……全国都动员起来。官僚作风被摆在一旁，不管需要谁的贡献，我们都会马上要求。此刻我们不会在意成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出来，我们处于前线状态。”

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就切尔诺贝利事故公开发声。

而这个发声的时间，离这场当时全世界唯一的七级核事故（2011年的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来也提升为七级）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8天。

那是地狱般的18天。

2

时间回到1986年4月26日，深夜1点。

在普里皮亚季市，4.3万名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进入甜蜜的梦乡。

这座位于乌克兰基辅州的城市，是一座典型的为一项工程而兴建起来的新兴城市。1970年，为了安置在附近修建电站的建筑工人和工作人

员，普里皮亚季市被建造了起来。随着电站工作人员的逐步增加，家属以及相关人士不断迁入，这座城市渐渐繁荣，并且成为当时苏联的一个模范市镇——它的发展，展现了苏联成功地将核能用于和平建设。

没错，那座离普里皮亚季市只有3公里，撑起该市大多数就业岗位，并为整个乌克兰提供一半电力的电站，是一座核电站。

它的名字，叫作切尔诺贝利。

4月26日夜里1点，当绝大多数普里皮亚季市市民已经入睡的时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176名工作人员还在加班。

这一天，他们要给4号发电机组做一项测试，测试核反应堆的涡轮发电机在电力不足的情形下，能否发出充足的电能供给反应堆的安全系统。

凌晨1点23分，实验开始了。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地狱之门也由此被打开——由于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这是后来苏联官方的解释，但也有人认为该核电站的设计本来就有缺陷），核反应堆出现了温度异常。

几十秒后，操作人员按下了“紧急暂停”的按钮，7秒钟之后，反应

堆内核燃料的温度从330°C瞬间上升到2000°C。

随后就是“轰”的一声巨响——核反应堆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这次爆炸，将反应堆上方重达1200吨的封顶轻而易举地掀开，整个4号机组的厂房瞬间就被炸毁一半。

但更可怕的是，整个燃烧的核反应堆直接暴露在了空气中，大量核燃料溶解后产生的辐射粒子，伴随着蒸汽和火花，开始从裂开的缺口向外喷溅，甚至喷到了几千米的高空，然后四处溅落。

后经测算，当时爆炸产生的辐射量，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辐射量之和的100倍。

有目击者回忆：当时整个夜空色彩缤纷，如同彩虹一般美丽。

那是来自地狱的死亡艳丽。



工程师沃洛多夫·沙希诺克（Volodmr Shashenok）在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一个车站的照片。他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的第二个牺牲者，在事故发生5小时后就死去了。另一位泵站的高级操作员在爆炸时当场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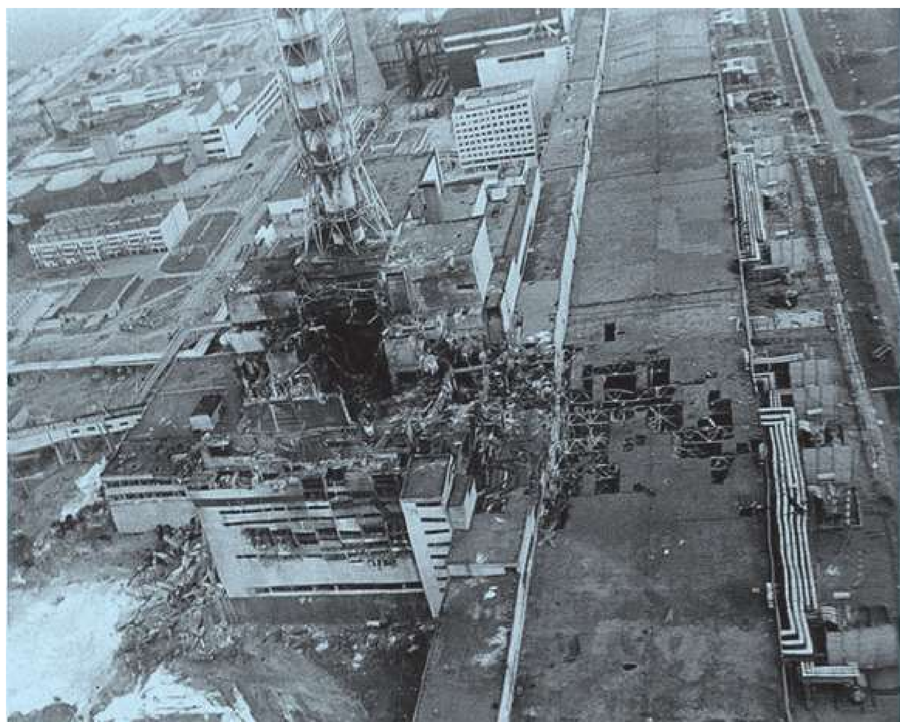
3

爆炸发生3分钟后，核电站的第二消防队接到了火警警报。

以普拉维克中尉为首的14名消防员，在第一时间就乘坐消防车奔赴现场灭火。在路上，普拉维克用无线电向普里皮亚季市的消防队寻求支援，那里的基别诺克中尉随后又率领一批消防队员赶到了切尔诺贝利。

没有人，是的，没有人告诉第一批赶到的28名消防员，他们要扑灭的不是一场普通的大火，而是一场核反应堆的大火。

当时，4号机组厂房上方的辐射强度为2万伦琴，被炸开的反应堆内部的辐射强度是3万伦琴——人类在500伦琴的辐射强度照射下，1个小时之内就会急性死亡。



事故发生后不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厂房

所有的消防员没有穿任何防护设备，就直接来到了火场中心位置。一批勇敢的消防队员冲上了厂房屋顶，开始直接向火堆喷水，而有的消防队员因为好奇，甚至直接用手捡起地上的石墨。

凌晨2点10分左右，4号厂房的大火基本被扑灭——事实证明，这有效阻止了大火向3号厂房里的核反应堆蔓延，避免了第二次核爆炸。

但是，这些消防队员奇怪地发现自己开始头晕，并且剧烈呕吐。一

批消防员被换了下来，另一批又顶了上去。

几个小时之后，第一批赶到火场的消防队员全都因为剧烈呕吐和晕眩被送到了医院。

在之后的3个月内，包括普拉维克和基别诺克两名中尉在内的一批消防员和工作人员，全部去世。

他们去世时非常痛苦，皮肤脱落，全身有灼烧感。

他们全都是因为得了辐射病而去世的。



纪念扑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火的消防员的雕像

消防队员维克多·比库恩是第一批消防队员中少数存活下来的人。他因不断地呕吐被同事送到了医院，医生后来开出的证明显示：他在一小时的救火过程中，受到了260伦琴的辐射照射。

比库恩后来的回忆是：“那时没有人考虑回报，我所想到的是，女儿们在家里，镇上的人都睡着了。”

4

爆炸发生的3个多小时后，消息传到了克里姆林宫。

但戈尔巴乔夫除了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一场火灾”之外，并没有获得太多的信息。他立刻询问了当时苏联的最高科学权威——苏联科学院院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德罗夫院士。

这位年届83岁，早已脱离一线的院士自信地告诉戈尔巴乔夫：“反应炉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过程跟煮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

没有人把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当回事——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爆炸。

4月26日的白天，整个普里皮亚季市一切照常，有人说昨天晚上核电站发生了火灾，但没有人提到爆炸。

但是，一批来调查灾情的军队，已经开到了普里皮亚季市。带队的克伦班克亚上校开始测量市内的辐射指数。

在这一天的中午，克伦班克亚上校测得的辐射指数是0.2伦琴——大气中的正常辐射量是0.000012伦琴。

这座城市的辐射指数已经超过正常值1.5万倍！

到了傍晚时分，普里皮亚季市的辐射值超过了正常的60万倍，这甚至一度让克伦班克亚上校怀疑是不是测量机器出了问题。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3公里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内，反应炉还在燃烧，辐射还在继续加强。

而由于官方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在普里皮亚季市，大人们正常上班、下班、散步、吃饭，而孩子们在广场上欢快地嬉戏。

意识到事态严重的克伦班克亚上校立刻派了一支侦测队，前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去测辐射值。侦测队带回来的测试结果让上校非常后悔让几乎没穿什么防护装备的手下去冒那个险。

测试结果显示：2080伦琴！

测试的数据在第一时间被传回了莫斯科。

这下克里姆林宫才彻底紧张了起来。戈尔巴乔夫立刻下令紧急成立

政府委员会，将全国顶尖的核能专家全都召集了起来。

委员会当晚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立即撤离普里皮亚季市的全部居民。

4月27日上午11点，在事故发生后的33个小时，苏联终于开始采取第一批安全措施——1000辆巴士抵达了普里皮亚季市。

普里皮亚季市的居民被告知，他们只有两小时的时间用来打包，然后一律在自己的家门口等候来接。



普里皮亚季市至今还大致保留着当初人们迁离时的样子。很多家门口都贴上了纸条，写了很多不舍得离开的话，比如："亲爱的好心人，请不要在这里寻找贵重物品，我们没有贵重的东西，想用什么尽管用，但是请不要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会回来。"

下午5点，全城居民开始撤离。很多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以为，只是去外面暂住一段时间，很快就能回到自己的家里。

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遭受了过量的辐射，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各种辐射病乃至死亡，将接踵而至。

4月28日晚上，普里皮亚季市终于成了一座空城，而由著名核子物理专家勒加索夫院士率领的科学团抵达了这座城市，将总部设在普里皮

亚季大饭店。

和他们一起进驻这座城市的，还有大批的苏联红军。

虽然他们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以及决心要解决这个事情，但他们的心态依旧很乐观。

很多人认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概在五六月份就能恢复使用。



俄罗斯新闻社的摄影记者伊戈科斯汀是第一个拍到4号反应堆裂口的记者，他的相机很快就因为辐射而卡壳了，底片也都变成了黑白色，当时他不知道这是因为辐射的关系

5

4月28日晚上9点，苏联国家电视台终于播出了核电厂事故的声明。

此时，据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近70个小时。

事实上，这次的通报，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瑞典逼出来的——核电站爆炸释放出的辐射物质，经风向吹送，飘移一千多公里，来到了波罗的海上空。

瑞典在第一时间就测试了辐射度，随即就向苏联政府求证他们的核电站是否出了问题。在得到消息后，美国和欧洲的间谍卫星也迅速转向苏联，通过热成像，他们发现了出事的切尔诺贝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只能播出官方声明。

但整个声明非常简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意外，当局已经采取行动处理了问题，并为受灾者提供救援，政府亦已成立调查委员会。”

全程只有14秒。

事故的严重性再一次被大大缩水甚至封锁，而戈尔巴乔夫指出，不能让切尔诺贝利事故，成为美国疯狂攻击苏联的工具和借口。



1986年5月3日，在东德边界，人们正在清理一辆由波兰开过来的轿车，它被怀疑已经沾染了辐射粉尘

正是因为官方的刻意隐瞒，带来了更大的悲剧。

三天后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苏联要举国欢庆的节日。在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有100公里的乌克兰基辅，同样也有盛大的游行。

当时，因为风向变化，核电站的辐射粉尘，已经飘向了基辅。

但那一天，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市民，在政府的鼓励下，身着民族盛装的男女老少走上基辅第一街——克列夏季克大街参与游行，庆祝节日。人们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完全不知道自己参加的很可能是一场“死亡游行”。



当时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斯基也带着家人一起参加了游行

1990年，谢尔比斯基去世。

网上有多种说法说到，在此次游行之后不久，谢尔比斯基自杀身亡。我查下来，信源基本都是中央电视台探索频道播出的《拯救切尔诺贝利》。但通过搜索国外大量网站，包括俄语维基百科，我发现苏联官方当时公布的谢尔比斯基的死因是肺炎，时年72岁，并没有说是自杀。所以暂时没找到“自杀”这一说法的根据。

6

不过，在官方尽量隐瞒消息的同时，各种抢救工作确实在不断进行着。

冲在最前面的，只能是军队。

苏联政府一共动员了十几个作战师，并将当时在阿富汗战场的苏军总指挥瓦连尼科夫大将调回国内，统一指挥抢险救灾的部队。

此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的核反应堆还在燃烧，大量放射性物质随着热气被喷向高空。部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扑灭大火和降温。

这是一场“自杀式”的任务。

80架米–6和米–8直升机被调集到了核电站上空200米处，来自苏联

军方最优秀的飞行员们，徒手从直升机上，将80公斤的沙袋和硼酸扔下机舱——沙袋用来灭火，硼酸用来中和辐射。

在200米的高空，直升机内的辐射测试仪最高限度是500伦琴，而指针顶格后仍疯狂跳动，当时估计在那个高度，辐射强度超过1000伦琴。

而飞行员们所谓的“防辐射防护”，也就是戴了口罩，用铅皮垫住了座椅而已。

第一天，苏联军方出动110架次直升机，第二天是300架次，在总共近3000架次的飞行中，5000吨沙包和硼酸被倒入了核电站的爆炸缺口，火势被控制住了，温度也降了下来。

很多飞行员一天要飞30架次，然后回来洗澡、进食，之后就开始不断呕吐，皮肤脱落，然后感染上各种辐射病，然后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

为了彻底封住核电站，部队最后准备用一块重达35吨的混凝土给核电站“上盖”，为此，专门启用了最新的米–26直升机，并调来了苏联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卡拉佩田来执行任务。

由于吊装高度很低，直升机螺旋桨激起的粉尘包围了卡拉佩田，但他凭借高超的技术，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四年后，由于移植骨髓无效，卡拉佩田死于白血病。

7

悲壮的救灾工作，不仅仅发生在空中。

4号核反应堆爆炸中飞起的残片大量散落在3号核反应堆厂房的屋顶上，急需清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但由于充满辐射残片，屋顶上的辐射强度可能超过1万伦琴，怎么办？

一开始，派出的是工作机器人。但无论是苏联国产的，还是德国和日本支援的，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工作机器人在高辐射强度的环境下，电路统统出现问题，全部瘫痪。

机器人不行，怎么办？

换活生生的人再上！

大批20~30岁的苏联后备役军人被调到了事故现场，没有回旋余地，全部穿上30公斤左右的铅服，8人一组，分批上屋顶清扫残片。

他们被称为“生化机器人”。

有人曾回忆自己走上屋顶后的感受：“感觉像是踏上了另一颗行星，一片死寂，你什么声音也听不到。眼睛很痛，嘴里充满了金属味，你磕一下自己的牙齿，根本就感受不到牙齿的存在。”

由于屋顶的辐射太强，上去的每组士兵只能工作40秒左右，就必须换下——这个时间可能只够每个人挥两下铁锹。

即便如此，上去后下来的人依旧表示，“仿佛被吸血鬼吸干了浑身的血一样”。不断有人流鼻血，然后被送往医院。留在现场的士兵，不管原先会不会，只能不停地抽烟——据说香烟的烟粒子能够吸附一些进入肺里的碘同位素，再一起被呼出来，多少能够减少通过空气产生的核沾染。

在那里，一个人平时一小时就可以干完的工作量，需要60个人不停换班来做。

同样的抢险，还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地下。

虽然反应炉在地面上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但带着大量辐射物质的灼热岩浆正在不断地往地下渗透。一旦融穿，将会侵入整个地下水系统，届时，苏联大片地区的水源将全部受到影响。

一支1万人的矿工队伍被集结，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先上。



幸存下来的人回忆："当时我们都觉得是在执行一项光荣使命。"（图片来源：腾讯"图话"）

这支矿工队伍要从3号反应炉那里先下挖12米，然后再向4号反应炉下方挖出一条长达150米的通道，最后再挖一个高2米，宽30米的空间，用来装一套冷却装置。

在温度超过50摄氏度，辐射强度超过每小时1伦琴的地下，1万名矿工开始7×24小时的拼命挖掘。由于下面温度实在太高，工人们根本无法戴呼吸面罩，所以全都脱下了防护设施。有的人只不过喝了一口飘入辐射性沙子的水，没多久就死了。

一个月后，通道完成，但没有安装冷却装置，只是用水泥将4号炉下方完全填充。

苏联官方后来宣称，每名矿工大概吸收了30～60伦琴的辐射，而矿工们宣称自己吸收了超过这个数5倍还不止。

据统计，参加挖掘工作的矿工中的四分之一，最后都在40岁之前死亡。

所有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参与抢险的军人、矿工、护理人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清理人"。

据统计，在这场事故后，苏联政府一共投入了大约50万"清理人"，其中10%都因为受到各种辐射而牺牲——其中还不包括更多数量的终生残疾。

在事故发生的7个月后，事故现场基本被清理完毕。

但一场更严峻的斗争却远未结束。

1986年6月4日，苏联政府召开针对外国媒体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被诊断为辐射病的患者为187人，死亡24人，平民与儿童未见死亡。但事实却是，根据2015年俄罗斯的解密文件，在1986年5月4日，苏共中央“第5号纪要”中就明确指出，仅5月4日苏联医院收治的病人即达1882人，住院总人数升至38000人，其中204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辐射病，64名为儿童，其中18人病情危重。

根据解密的《苏共中央1986年5月8日秘密会议纪要》显示，苏联卫生部拟定了新的苏联居民承受辐射标准。新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10倍。5月9日，苏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谢宾与苏联国家卫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东诺夫签署秘密文件，将辐射新标准以国家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卫生部还提出“将人体正常温度36.6℃上调至38℃，在特殊情况下可继续上调至39℃”的新说法。

根据2015年解禁的苏共中央“第8号纪要”，1986年8月22日，苏共中央批准继续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全面污染地域收购农副产品，其中主要是数十万吨肉类和数百吨牛奶，储存和投放全国，以保障居民生活。有资料显示，一大批放射性污染地区的肉类，以10%的比例混进健康肉类产品中，出现在苏联老百姓的餐桌上。

而对真相的掩盖，还不仅仅发生在苏联政府。

1986年8月底，第一场评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国际会议秘密举行，做报告的是当时带领科学团第一批入驻的核子物理专家勒加索夫。

勒加索夫做了一个长达3小时的发言，最后报出了一个让所有与会人士大吃一惊的数字：

接下来十年里，受辐射地区应该会有4万人死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引发的癌症。

别说苏联，其他受到或可能受到核污染的欧洲国家的代表都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数字——那无法向本国媒体和人民交代，且会引发巨大恐

慌。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不能按照广岛原子弹的标准来换算，比如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量提高10倍，那么受辐射人群的得病率也会提高10倍。

等到会议结束的时候，4万这个数字被缩减成了4000。

1988年4月27日，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两周年到来之际，勒加索夫选择了自杀。

9

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损失，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答案。

从经济上算，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各类损失合计，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



苏军用于救险的飞机、卡车、装甲车，在使用之后全部被舍弃，因为它们都成了一个个“放射源”（图片来源：腾讯“图话”）

从伤亡数字来看，至今没有一份确切的、让人信服的统计报告。各界只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第一批进入事故现场的抢救人员中，大约有4000人已全部牺牲；整个过程中，超过10万人伤亡，而在2006年乌克兰卫生局局长发布的报告中说，发现有约240万的乌克兰人（包括42.8

万名儿童）受到这次事故辐射粉尘的辐射。

核污染区域方圆30公里范围内的数十万居民全部被迁走，之后有数百万居民继续举家搬迁。

更多的统计还在进行过程中。各国科学家认为，从乌克兰到白俄罗斯，从法国到意大利，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辐射粉尘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白血病和各类癌症的发病率有所上升。

事故发生之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并没有停止运行，只是封存了出事的4号反应炉。其他3台反应炉继续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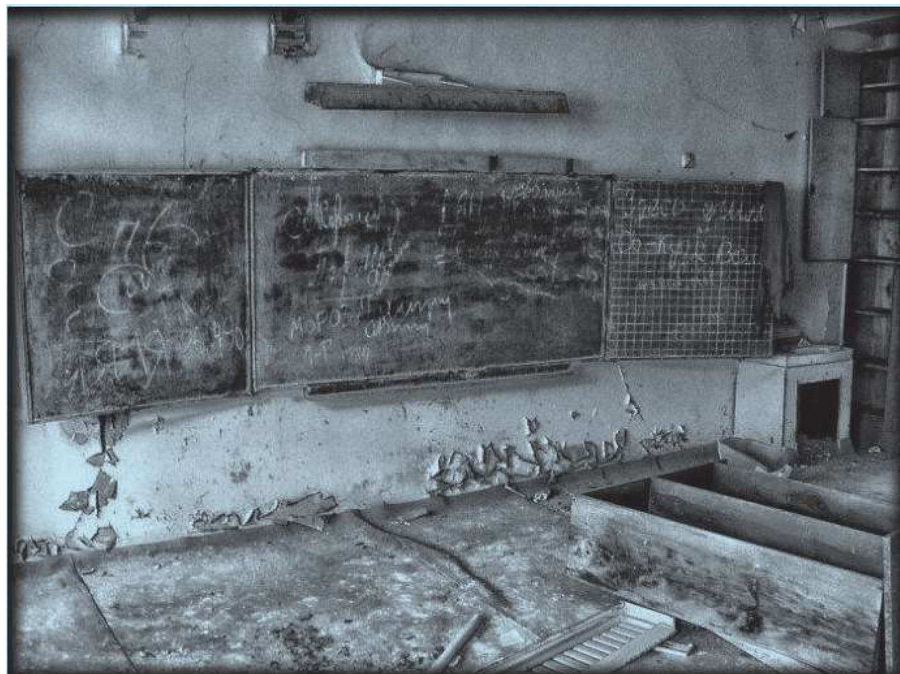
1991年，在2号炉再次出现火灾之后，政府宣布2号炉停机。

1996年11月，1号炉停机。

2000年12月，3号炉停机。

至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才正式停止运营。

2011年之后，乌克兰开始开放切尔诺贝利原址的旅游项目，游客可以身穿防护服，进入仿佛时间停滞的“鬼城”，感受当初的惊心动魄和苍凉。





这个在普里皮亚季市游乐场的荒废摩天轮，已经成为“鬼城”的一个标志建筑，甚至出现在不少电子游戏中

2016年，在世界发展银行的贷款和40多个国家的捐款帮助下，乌克兰耗资超过20亿美元，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炉外，造起了一个巨大的拱形金属建筑，用以替代原先已发生沉降和破损的“石棺”，彻底将4号炉以及里面的核反应堆封存。

然而，再完备的“棺材”，哪怕能封住所有核污染源，也不能封住，也不应该封住人类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铭记和反思。



人们在祭奠为扑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火而牺牲的消防员以及“清理人”，他们在去世后只能被放置进特制的“铅制棺材”。因为他们的尸体也成了一个个“放射源”

馒头说

面对突发性事件，尤其是事故，就我所知，上海媒体业内一直有一个共识：

“快报事实，慎报原因。”

我个人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快报事实”，不难理解。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关注的事情一旦发生，媒体还想像鸵鸟一样撅屁股藏脑袋，以为能“不报”或“瞒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报得慢，谣言就来得快，你的权威性就崩溃得更快。如果想瞒报危害老百姓财产乃至生命的事，你不仅是在践踏公众的知情权，更是在犯罪。

“慎报原因”，需要解释一下。“慎报”不是“不报”，不报原因，简直荒唐至极。“慎报”的意思，是要在充分了解并证实之后，尽可能快地向公众通报。因为如果没查清就报，就很容易误导舆论，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例，实事求是地说，爆炸的原因是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完全调查清楚并公布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对核电站爆

炸的原因，各方还有争论，比如当晚实验到底哪一步出了问题，有各种说法。而自杀的核子物理专家勒加索夫，一直坚持认为核电站本身的设计是有缺陷的。

但是，对核电站发生爆炸的事实本身进行慢报乃至瞒报，简直荒谬至极。面对如此严重的一起事故，政府居然在几十个小时之内都保持静默，他们把老百姓的生命摆在怎样一个位置，细思极恐。

当军队和“清理人”以近乎自杀的方式前仆后继地冲入辐射粉尘弥漫的事故现场时，何其悲壮，又何其痛心。

平心而论，别看我这么说，别说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大事，即便是一些小事，据我所知，我们要做到全部“快报事实，慎报原因”，还是碰到过不少阻力的。

在这一点上，重要的不是媒体想明白，而是各级管理层要想明白。

在重大灾难事故面前，舆情是要关心，恐慌是要避免，但一个基本的原则还是要有的，那就是要有一个公平、透明、及时、有效的发布机制和沟通渠道。

不然，很可能会被更大的舆情反噬。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这场事故发生后紧随的各种故事，可能在某种角度比事故本身更触目惊心。

有人曾分析，切尔诺贝利事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我想，如果真是那样，造成影响的成分中，肯定绝不仅仅是指经济损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巨轮沉没的那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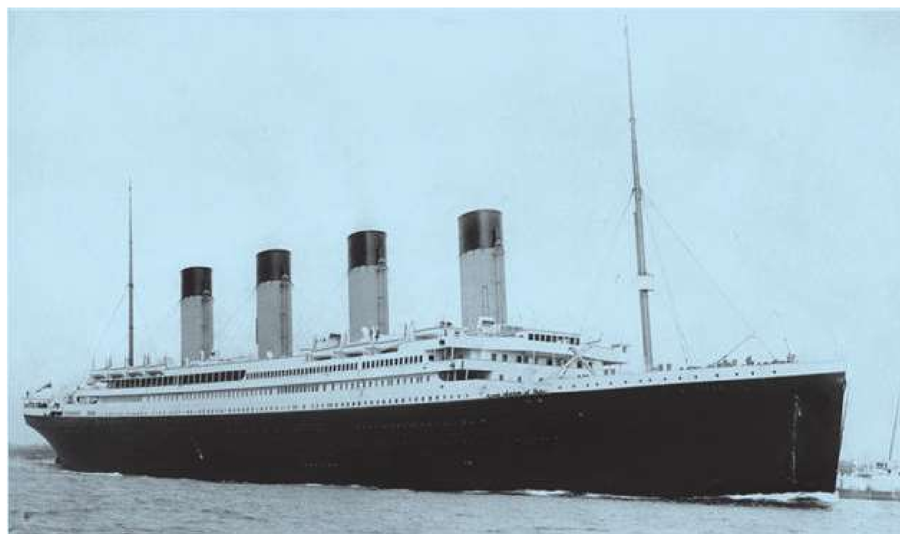
不到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知道自己会迸发出怎样的天性。就像今天故事中要说的那些人，在命运来临之前，他们也从没做过彩排……

1

1912年4月14日，夜，北大西洋。

“泰坦尼克”号以接近23节的时速（每小时40公里左右），安静、平稳地劈波斩浪，迅捷前行。

之所以在深夜还保持这样快的航速，是因为这艘船的拥有者白星公司，希望能创造出一个从英国到美国的最快航行纪录——尽管这艘进行首航的庞然大物已经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全长269.06米，宽28米，可以载客3000人，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载人邮轮，也是最奢华的。



“泰坦尼克”号首航出发时留影

这艘以古希腊神话巨人“泰坦”命名的邮轮，被形容为“永不沉没”的巨轮。但就在当夜11点40分，瞭望员弗雷德里克·弗利特用三声警铃和一声尖叫，惊醒了“巨人”的美梦：

“正前方有冰山！”

弗利特如果有望远镜的话，应该早就发现前方的冰山。但当时这艘奢华的巨轮上唯一的一台望远镜，被二副锁在了柜子里，而握有钥匙的二副并没有上船。所以，弗利特是用肉眼观测到冰山的。

弗利特发出警告后的37秒，庞大的“泰坦尼克”号因为船体过大而舵太小，没有悬念地撞上了冰山——船的右舷和冰山底部碰撞后猛烈摩擦，右舷前部吃水线下铆钉断裂，所有货舱和6号锅炉房开始迅速渗入海水，受影响范围近百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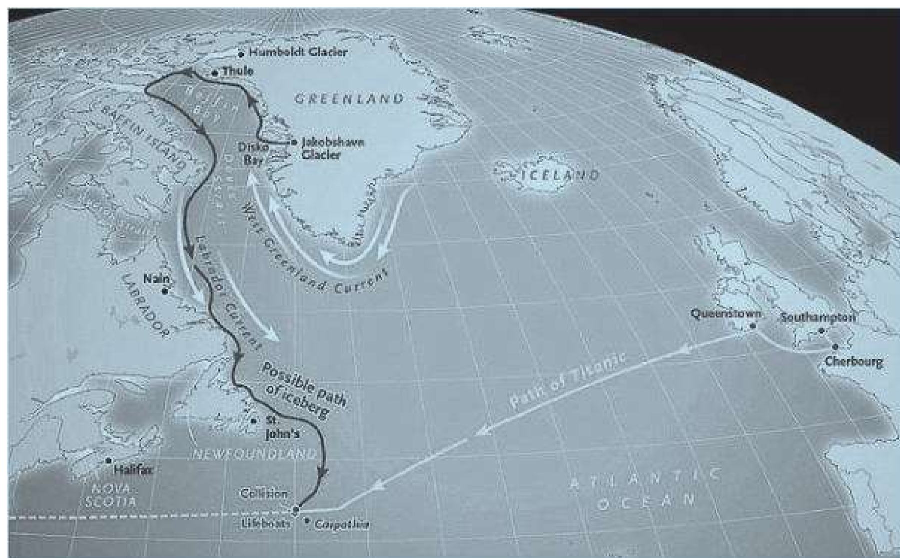


“泰坦尼克”号撞上的那座冰山

“泰坦尼克”号当初被称为“永不沉没”的巨轮，是有道理的：这艘船底部有16个水密隔舱，在任意4个隔舱进水的情况下，它们都能让船保持漂浮状态。

但船上的哈兰沃尔夫公司（“泰坦尼克”号的承建公司）首席造船工程师托马斯·安德鲁在仔细查看了船底的水密隔舱后发现，进水的舱房达到了5间。在确认无误后，安德鲁对史密斯船长平静地说：

“这船没救了。”



"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路线图。当年的那座冰山的漂浮路线确实诡异

2

北大西洋上空繁星闪烁，气温是零下一度。

4月15日凌晨0点5分，"泰坦尼克"号史密斯船长宣布放下救生艇。

甲板上的乘客开始越聚越多，大家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自己搭乘的"永不沉没"的巨轮，即将沉没。

救生艇通过升降机开始被缓缓放下，不少乘客慌乱的心情稍稍平复。但此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所有的救生艇加在一起，只能装进1178人，而船上的乘客加船员，总共有2224人。

0点40分，"泰坦尼克"号出现了第一批遇难者——他们是在底层抢救邮件的船员。海水无情地淹没了他们。

与此同时，救生艇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就绪，7号艇成了第一艘被放下的救生艇。事实上，"泰坦尼克"号上配备的救生艇，一艘能装载65人，但当时船员们认为如果装得太满，救生艇放下去时会倾覆，所以一开始的救生艇都是只装了一半人甚至不到一半，就被放进了海里。

但无论如何，救援工作还是开始了，并且按照严格的命令执行——在船的左舷，只能让妇女和儿童先上救生艇；在船的右舷，在妇孺上完

之后，男士可以登船。

有人安静地等待，有人绝望地呼喊，有人野蛮地推搡，有人悄悄地插队。

一个个在生死面前的人性与道德的故事，就此展开。

3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叫约翰·雅各布·阿斯特。

阿斯特是瑞吉酒店（St. Regis）的创始人，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资产超过了1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可以轻松再造11艘“泰坦尼克”号。

阿斯特当时是陪着已经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玛德琳一起回美国待产的。当时，阿斯特搀扶着玛德琳来到了4号救生艇并让她上了艇，随即礼貌地询问了船员：“因为我的妻子待产，我能否陪她一起？”但船员拒绝了他：“只有妇女和小孩才能先上艇。”



阿斯特

阿斯特没有一句争辩，随即把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默默退回了甲板。后来幸存的船上理发师奥·韦科曼回忆，当时他曾和阿斯特先生在甲板上待了一会儿，他们聊的都是只有在理发椅上才谈的小事情。临别时，韦科曼问阿斯特：“您介不介意和我握个手？”阿斯德说：“我很高兴。”

这是这个亿万富翁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也是一位顶级富翁，他创立的梅西百货，至今仍屹立在纽约曼哈顿的第五大道上。

“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施特劳斯护送自己的夫人艾达上了8号

救生艇。但当艾达几乎就要上艇的一刹那，她又改变了主意，回到了甲板上，她选择与自己的丈夫待在一起，“你在哪里，我也要在哪里”。艾达把自己在艇上的位置留给了自己的一个年轻女佣，还把自己的毛皮大衣也甩给了她：“你留着吧！我再也用不到它了！”

当时8号艇的救生员劝67岁的施特劳斯：“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救生艇的。”但施特劳斯的回答是：“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然后，他挽着63岁的艾达的手臂，在甲板的藤椅上坐下，静静地等到了最后的时刻。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本杰明·古根海姆。

古根海姆是当时的世界管道大亨，也是一名富翁——没有办法，“泰坦尼克”号作为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邮轮，搭载富翁的比例之高，也是可以理解的。



施特劳斯夫妇



古根海姆

在撞船发生之后，古根海姆在甲板上跑前跑后，帮助船员一起维持秩序，让妇女和孩子先上艇。在送妻子和孩子登上救生艇之后，古根海姆换上了一身华丽的燕尾服，他给妻子留下的纸条上写道：

“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要做好准备，像一个绅士一样沉入海中，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有目击者回忆，沉船的那一刻，古根海姆还在甲板上小口喝着白兰地。

他的尸体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4

好的，我们不说富翁了，说说另外三个故事。



华莱士·哈特利

第一个故事，关于华莱士·哈特利。

哈特利不是亿万富翁，他是“泰坦尼克”号乐队的首席指挥。

在“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整个过程中，哈特利和他乐队的其余7名成员，一直在甲板上坚持演奏，目的是安抚乘客们的情绪。他们一直坚持到轮船沉没的最后一刻。

一位后来登上救生艇的乘客还原了哈特利和他的乐队的最后一刻：

当时船头沉入海中时，巨大的海浪涌来，将3名乐队成员冲走了，包括哈特利在内的其余5人拉住了楼梯扶手。那时候，乐队已经无法再演奏，哈特利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句：“先生们，我们永别了！”

第二个故事，关于托马斯·安德鲁。

没错，你应该还记得前文说的，安德鲁是建造“泰坦尼克”号的哈兰沃尔夫公司的首席造船工程师。

他登上“泰坦尼克”号后就没停下来过，一直在各层甲板检查和检验各种船体结构，他也是在撞船后第一时间检查了底层水密舱并告诉船长要弃船的人。

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打算离开轮船。虽然他并不是设计师，沉船本来就不是他的责任。发生沉船事故后，他非常痛苦地拉着一位女服务员的手说：“对不起，我没有给你们造出一艘不会沉没的船……”

在沉船的过程中，安德鲁一直在尝试做最后的努力。后来有人看见安德鲁把自己关进了头等舱的吸烟室，然后就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

第三个故事，自然不能不说史密斯。

史密斯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

史密斯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船长（不然不可能让他做“泰坦尼克”号的船长），曾被称为“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船长”。当时，他是准备完成“泰坦尼克”号首航后退休的。



华莱士的小提琴。这把小提琴是他的未婚妻送给他的订婚礼物。他的未婚妻后来终身未嫁

事故发生后，史密斯始终在第一线疏导人群和指挥逃生，然后有目击者称，在凌晨2点13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最后一刻之前，他独自一人走进了舰桥。



托马斯·安德鲁



史密斯船长

后来很多人都回忆，正是因为史密斯临危不乱，才让很多乘客没有发生大骚乱，更是鼓舞着“泰坦尼克”号上的船员们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船上的消防员卡维尔，本来已经可以离开，但又返回4号锅炉室寻找是否还有人困在那里，最终锅炉室被海水吞没；锅炉工亨明已经被分配到救生艇上做划桨员，但他最终决定把这个机会留给同事；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莱德一直在报务室坚持发报求救，史密斯船长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但他们依旧没走，希望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和他们同样不肯走的还有信号员罗恩，他一直在甲板上摇动摩斯信号灯，坚守到了船沉没的最后一刻；总工程师贝尔和全体工程师一直在机房试图抢救，直到船的底层部分沉入海下10米，他们自己已是在“潜艇”中工作浑然不觉，最终全都被涌入的海水吞没……

在这场灾难事故中，“泰坦尼克”号船员的遇难比例高达78%—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中的女性船员基本都上了救生艇，以及必须要派出一批船员操控救生艇，那么船员的遇难比例还会大大提高。

可以说，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战到了最后一刻。

5

那么，灾难面前，是不是都是感人的故事呢？

对不起——你知道的——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故事，关于约瑟夫·布鲁斯·伊斯梅。

伊斯梅是白星公司的主席兼总经理，没错，他就是“泰坦尼克”号的主人。作为主人，是他要求将“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艇由48艘减为16艘的，因为“这样可以让甲板更开阔”。

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有目击者声称，伊斯梅是第一个登上第一条救生艇的人。

伊斯梅在回国后遭到了巨大的质疑乃至谴责，虽然他辩称自己当时的身份也是一名“乘客”，并且是等救生艇附近没有妇女和孩子后才上去的，但舆论一致认为：“你应该是和船长一起坚持到最后的人！”

尽管也有一些乘客称伊斯梅遵循了“妇孺优先”的原则，比如和伊斯梅一起登上救生艇的头等舱乘客卡特，但卡特的妻子在1914年宣布与卡特离婚，理由是轮船撞击冰山事故发生后，卡特遗弃了她和他们的孩子。

尽管伊斯梅一直声称自己是最后一刻离船的，但苦于无法自证。他后来被伦敦社交圈摒弃，被称为“史上最大的懦夫”，最终辞去了白星公司的主席职务。

第二个故事，关于细野正文。

细野正文，当时是日本的运输大臣，住二等舱。

在灾难发生的时候，细野正文在船舱内给妻子写信：“紧急救难信号响个不停，看到那不断闪着的蓝光，我感到恐怖。”“作为一个日本人保

证不玷污日本人的名誉，平静地迎来最后的时光，但是我又等待寻找那一线希望……”

细野正文后来确实去甲板上寻找机会了，但之后却出现了几个版本，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他男扮女装，混上了一艘救生艇，在上岸后被人认出，舆论大哗。欧洲甚至有国家把这件事写进了教科书，以证明日本人的素质低劣。

另一个版本是一位欧洲乘客事后做证明：细野正文粗暴地推开了其他乘客，冲上了救生艇。但后来证明，那名乘客坐的是13号救生艇，细野正文登上的是10号救生艇。

按照细野正文自己的说法，他当时已经准备与船共沉，但这时候一个船员喊，说10号救生艇还有两个位置，一个头等舱的乘客坐了上去，他住的是二等舱，他认为自己也有资格，于是也坐了进去——他说是得到了船员的许可。

但这个说法，是细野正文自己的说法，没有人能为他证明。

细野正文回国后，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包括日本民众雪花一样飞来的谴责信件。随后，他的工作也丢了。细野正文直到去世，也不愿意再谈有关“泰坦尼克”号的一个字。

第三个故事，不是关于一个人的，而是关于一群人。

尽管伊斯梅和细野正文都没有承认，我们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在那一夜做了不光彩的事，但从后来船员、乘客的各种回忆和证词来看，那一天晚上英雄很多，但懦夫也有很多。

像细野正文那样“男扮女装”的乘客，其实有不少，还有不少男乘客推开女乘客，抢占救生艇位置的。不少船员后来回忆，自己是朝天鸣枪才控制住秩序的。



当时的救生艇

悲伤的故事，还不止这个。

事故发生后，人们对“泰坦尼克”号上乘客的生还率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三等舱中，只有26%的乘客生还，而到了二等舱，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44%，头等舱的生还率是60%。

经过研究发现，头等舱中的男性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的儿童的生还率还要高。

事实也正是如此。包括细野正文在内的一些乘客后来回忆：事故发生时，三等舱的乘客被船员用枪顶着，要让头等舱和二等舱乘客先上救生艇。

为此，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曾这样形容“泰坦尼克”号上的“妇孺优先”规则：

“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

6

1912年4月15日凌晨2点20分，在经过了2个小时40分钟的挣扎之

后，“泰坦尼克”号终于完全消失在了海面上。

这艘“永不沉没”的轮船一共搭载2224人，只有702人生还，1522人遇难。

4月18日，搭救“泰坦尼克”号乘客的“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大雨。

在船经过自由女神像时，上万人在曼哈顿岛的巴特雷海岸观看。在54号码头，大约3万人伫立在雨水中默默地迎接“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



拿着载有“泰坦尼克”号沉没新闻号外的报童

和幸存者一起上岸的，是一个个至今还在流传的故事。

那是一个个折射人性的故事。

关于“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发生的那些感人故事，其实我很早就知道。

毫无疑问，那一个个折射人性光辉的故事确实让人感动，但当初读到的时候我也不免疑惑：那一夜，难道真的就没有发生一些反映人性阴暗面的故事吗？

事实上，不可能没有。

只不过当我们后人进行记载和回忆时，更愿意记住那些令人感动的——我承认，我自己也曾想把这条推送只写成一个感人的故事。

卡梅隆在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一个人坐潜艇，下潜到“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海底，注视着残骸发呆。

他说：“我仿佛可以听见1500人在颠簸的船上哭喊。”

是啊，这是一艘载有2200多人的巨大邮轮——在悲剧发生的那一刻，人类的天性是不可能整齐划一地闪耀出圣洁的光芒的。

有卑微，也有高尚；有自私，也有伟大。

在天灾降临那一刻，才能真正显现我们人类的天性。

逃离德黑兰

一场人质危机的背后，牵涉到的方方面面，其实远不止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1

1981年1月31日这一天，整个美国都进入了一种激动的状态。

从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到纽约的华尔街，美国人用鲜花、掌声还有眼泪，欢迎52名美国人的回归。

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这样评价：“这是我所见的最大事件。”

为何布什会有这样的评价？

因为这52名美国人，在过去的444天里，一直被关在伊朗做人质。

2

故事，要从1979年的伊朗说起。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他统治期间，伊朗被称为“伊朗帝国”

这一年的4月1日，在海外流亡长达15年之久的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终结了伊朗的“君主立宪制”，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本人在不久之后成了伊朗的“最高领袖”。

而霍梅尼推翻的，是巴列维政权。

说起巴列维这个人，也是有点意思。他是伊朗的国王，1941年登基，在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下，赶走了苏联的势力，随后彻底倒向了美国。

巴列维虽然是君主，但因为他年轻时一直在西方留学，所以在伊朗的统治还算开明，伊朗的经济也还算不错，妇女的社会地位也算不错。但问题在于，巴列维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他个人极度奢华腐败，而且搞得尽人皆知；第二，他把伊朗境内的石油权益都交给英国和美国操控，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同样是伊朗贵族出身的议员摩萨台通过全民投票，成为伊朗首相，掌握了大权，而巴列维则被软禁在皇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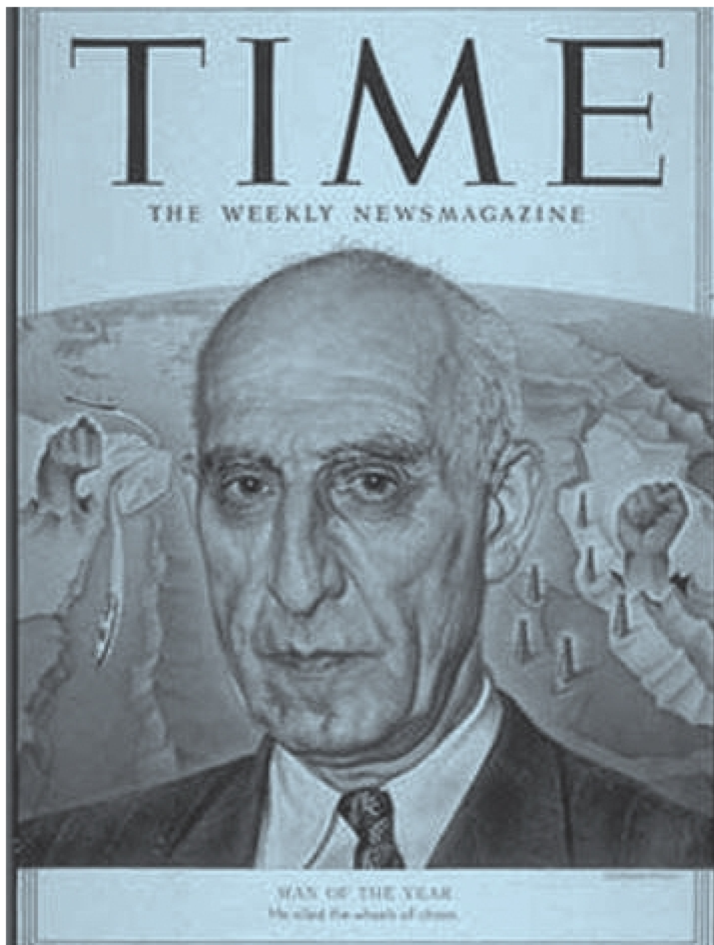
摩萨台在伊朗历史上是一个广受好评的领导人。他上台后，解放佃农，提高社会福利，建立失业补偿金制度等，这一系列渐进式的社会改革，让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

但是，摩萨台在任期间，铁了心要把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这大大触动了英国和美国的利益。

在几经谈判和阻挠不成的背景下，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在1953年策划了一场政变——将摩萨台推翻收监，让巴列维重新上台。（2013年，美国解密文件显示，确实是CIA全程介入和策划。）

而巴列维重新上台后，又开始了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至于石油国有化，自然是不会再提了。

这样的形势，一直维持到了1979年，霍梅尼将巴列维政权推翻。



摩萨台也曾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他被政变搞下台后一直被监禁，直到逝世

3

1979年，确实是个多事之秋。

霍梅尼之所以能获得大家的拥戴而建立政权，一方面是因为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到了后来贪污腐败横行，通货膨胀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巴列维对国家进行的世俗化引发了保守派的不满，他们认为西方势力各种腐朽的文化会玷污伊朗，而巴列维已经成为非穆斯林西方势力的傀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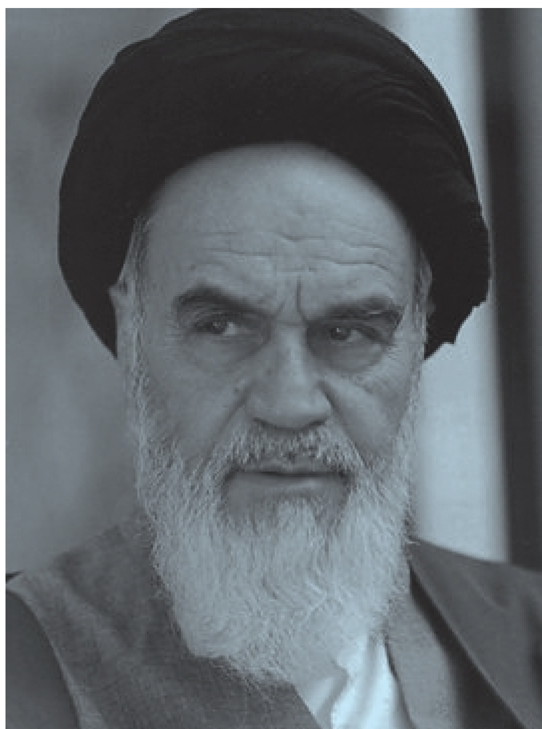
而伊朗人认为领衔“西方势力”的，正是美国。

霍梅尼政权一直认为，美国一直是伊朗政局动荡以及走向腐化的幕

后黑手，所以从上至下，整个伊朗陷入了强烈的仇美情绪中。

而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美国不顾伊朗当局的强烈抗议，允许之前已经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经墨西哥前往美国治病。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伊朗人。



霍梅尼

11月1日，霍梅尼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和以色列示威——他将美国政府称作“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伊朗人开始走上德黑兰的街头进行反美示威游行，而数千名德黑兰的学生将美国大使馆团团围住，每天高呼口号，要他们滚出伊朗。

整个仇恨的情绪一直酝酿到1979年11月4日，终于迎来了一次大爆发。

那一天，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透过玻璃窗惊恐地发现：一直围聚在围墙外示威的伊朗学生，居然爬过了铁栏杆和围墙，直接往大使馆冲了过来。

大使馆的警卫稍作挣扎，就放弃了抵抗。大约400名愤怒的伊朗学生如潮水一般冲进了美国大使馆——很多美国工作人员根本来不及完成机密文件的销毁工作，就成了学生们的“俘虏”。

挂在大使馆的美国国旗被伊朗学生撕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写着“真主伟大”的白旗。

在大使馆内来不及逃出的66名美国官员被扣押起来，学生们提出要求：“拿巴列维来换这66个人！”

整个行动，霍梅尼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干预。

4

整个世界都震惊了。

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公然被冲击，被占领，使馆的工作人员被扣押作为人质，用来作为交换条件的筹码。

这个大使馆，居然还是美国大使馆。

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立刻做出了回应。

11月12日，美国宣布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作为回应，伊朗也在当天宣布：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

11月14日，大约80亿美元的伊朗人在美资产被冻结，一些伊朗人被美国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不少和伊朗人质危机或伊朗新政权并没有关系的人）。

而伊朗也毫无惧色。

虽然伊朗官方一开始坚决否认冲入大使馆的行动是官方指使的，但后来这种声明就再也看不到了。占领美国大使馆的“革命者们”宣称这样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这是对美国之前干涉伊朗以及支持巴列维的一种报复。



两名被扣押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



伊朗人带着一名美国人质游街。因为每天都要报道美国人质的情况，美国新闻开始出现了每日追踪报道的形态



1979年11月20日，大批伊朗人在被占领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外游行抗议美国武力威胁伊朗。此前，美国总统卡特下令海军部队开往印度洋

他们声称：如果要赎回这些人质，美国就必须交回巴列维，以及对之前那些幕后策划政变的行为道歉。

在这期间，一些当时被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用碎纸机处理的秘密文件，被重新拼好后对外展示，以证明美国对伊朗一直从事着各种幕后活动。而一些人质经常会被蒙着眼睛带到电视镜头前或游街，伊朗人警告美国：只要有任何营救行动，他们将立刻处决人质。

1979年12月，这场人质危机似乎出现了一丝缓和的迹象：在霍梅尼的授意下，伊朗革命者释放了被扣押的13名妇女和非裔美国人，以及一名生病需要治疗的人员。

但是，剩余的52名人质，伊朗坚持不放。

1980年4月7日，卡特政府失去了耐心，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一天后，伊朗同样宣布和美国断交。

双方终于走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饱受国内舆论批评的卡特总统，决定武力营救。

5

1980年4月22日，卡特总统下令施行“蓝光计划”。

按照计划，美国派出声名显赫的90名三角洲特种部队成员，搭乘8架RH–53直升机前往距离德黑兰东南300公里处的沙漠地带，在那里，6架C–130载着另外90名突击队员已在等候。突击队员们将在那里等候到第二天深夜，随后乘坐卡车进入德黑兰市区，冲入美国大使馆，救出人质，再坐运输机离开。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4月24日，“蓝光计划”正式开始。8架RH–53直升机中的两架一开始就没有飞到沙漠地区——一架液压系统发生故障后迫降，一架遭遇沙暴迷失方向，最终只能返航。

这次行动一共要有6架直升机参与，现在已经到了最低限度。

然而，就在夜间沙漠加油的时候，第三架直升机也发生了故障，不能操控了。

突击队立刻向卡特总统汇报，建议终止行动。卡特只能无奈批准。

但是，悲剧才刚刚开始。

正当美军准备撤离时，一辆伊朗公共汽车忽然进入了突击队的集结地点。美国人将50名乘客全部扣留后，又有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开了进来。卡车被扣下后，司机趁人不备，钻入小轿车中逃走了。

秘密行动彻底暴露，美军只能加速撤离。

但在慌乱中，一架直升机和一架C–130运输机撞在了一起，在猛烈的爆炸中，8名运输机机组人员当场丧生，4人烧伤。

由于时间紧迫，美军抢救出4名伤员后，来不及撤出另外8具尸体，就只能任其留在熊熊燃烧的飞机上。

4月25日，卡特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营救行动失败。这次堪称拙劣的营救行动让美国上下一片哗然，卡特总统的支持率跌到了谷底。

而另一方面，伊朗将事故的残骸现场曝光，并宣称这是“真主的保佑”。

6

那么，美国人到底有没有成功的营救？

也是有的，那就是2012年美国人拍摄的电影《逃离德黑兰》中描述的那个故事：在1979年11月4日美国大使馆被占领时，6名美国工作人员趁乱躲进了加拿大使馆并一直被藏匿。美国CIA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行动：派情报人员托尼·门德斯伪装成一个拍摄科幻片的导演，前往伊朗，以拍摄电影考察为名，将被困的6名美国人经过伪装身份后，堂而皇之地带回美国。

虽然整个真实的过程并没有电影里表现得那么刺激或有戏剧性，但无论如何，这次营救行动确实是成功了。

只是，这6名美国人的回归只是带回来一时的宽慰，剩下的在伊朗的52名人质依旧生死未卜，而且伊朗政府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

无奈之下，卡特总统只能下令：开始筹备第二次营救行动。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本看上去是死水一潭的僵局，突然发生了松动。

7

1980年7月27日，在美国避难的巴列维忽然去世了。

这个变故有些出乎伊朗人的意料：作为交还美国人质的首要条件，巴列维一直是伊朗扣押人质的最主要理由。

而现在，人死了，你拿这些美国人质去交换什么呢？

而巴列维的去世，还只是一系列意外中的第一环。

1980年9月22日，在强人萨达姆·侯赛因的指挥下，伊拉克出动大批轰炸机，对伊朗首都德黑兰等15座城市和空军基地进行了空袭——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爆发了。

陷入战争局面的伊朗，发现自己已经没空再利用美国人质去做什么了，相反，面对被苏联武装的伊拉克，伊朗却没来由地得罪了美国。

而就在这一年的11月，第三个意外发生了：在这个月举行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异军突起，击败了试图连任的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

在竞选期间就表现得相当强势的里根，一直严厉谴责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的行为。可以想见的是，里根一旦就职总统，对伊朗的政策只会更加强硬——这对已经陷入“两伊战争”中的伊朗来说，无疑将是灾难性的。

1981年1月19日，伊朗和美国经过多次秘密谈判，最终达成了协议：

由阿尔及利亚出面派遣一架飞机，将52名美国人质统统接回美国。

伊朗不做出任何赔偿，一切到此为止。

在被关押了444天之后，52名美国人质，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馒头说

整个“伊朗人质危机”从头到尾捋一遍，似乎有点有惊无险。

但其实还是有些味道可以品的，比如两个时间点。

先看一个大时间点。

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是发生在1979年11月4日，但美国宣布和伊朗断交是发生在1980年的4月7日，之后才决定武力营救——按美国人一贯的暴脾气，居然会拖半年才翻脸？

这就要放到当时的世界大环境中来看。

之所以说“1979年是个多事之秋”，是因为那一年的年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交，随后中国就开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那一年的年尾，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感。

简单点来说，就是中美关系缓和，苏联与伊斯兰世界交恶。在这个节骨眼上，伊朗爆发的反美浪潮就比较微妙——美国如果用力一狠，肯定逼得中东大国伊朗只能倒向苏联，原本的大好形势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美国一直没有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总统卡特甚至因此备受诟病，但在背后，其实也有这样一层的考虑。

再看一个小时间点。

美国总统卡特其实非常希望能在自己的任内结束这场危机，画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但是，伊朗人虽然也早有归还人质之意，但总在各个环节上挑毛病，拖时间，最后在1981年的1月20日才让美国人质正式登上飞机。

1月20日是什么日子呢？是美国新任总统里根宣誓就职的日子。

伊朗人的潜台词其实也很明显：这个礼包，与其送给即将卸任的卡特，不如用来送给新任总统里根。毕竟，陷入“两伊战争”的伊朗，赢得战争胜利是最重要的，它也急需美国解冻80亿美元的在美资产。至于反美，往后排吧。

所以你看，一旦上升到国与国之间的世界舞台上，一味地打打杀杀是没用的，而纯粹的狂热和膨胀也是不现实的，总有一样东西可以巧妙地平衡各种天大的矛盾，这样东西就是利益。

不要看有些人看上去不可理喻乃至丧失理智，在台面上挥舞拳头，甚至喊着要按下核武器按钮，其实在台下都拿着筹码等着和对手交换呢。

台上继续在叫，只是说明台下筹码还没换到位而已。

附录 读者评论

他坚守气节客死他乡，却为何还是背了“千古骂名”？

静水流深：应当说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其人其事可悲、可叹、可悯。作为一方官员，他对清廷已是仁至义尽，但皇帝向来只把臣子当奴才，根本无惧他的生死。在那种生死关头，还暗自筹划当面怒斥异国入侵强盗，未果后绝食而死，也算是有民族气节了。

永无岛：每次看到这样的文章心情都很复杂。这些人论能力，论手段，论气度，论努力，论人品，都不差。可是晚清大厦将倾，又岂是个人努力能够挽回的？！一方面觉得他们迂腐愚蠢，不懂得时代更替是最基本的自然道理，另一方面，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又令人感动。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全都“识时务”“为俊杰”了，到底是好还是坏？人类凭借意志去抗衡命运，到底应该歌颂还是惋惜？

乘风：晚清的事情说来很蹊跷，说是制度的问题，好像不全面；说是人的问题，好像也不对。我认为应该是一套落后的制度遇到了一小撮昏聩的主政者产生的化学反应。纵有曾国藩、左宗棠之类的英才，也难耐上层苟且偷安、不辨是非的混日子式的治国理政。

是非成败丁汝昌

福田：“‘定远’巨炮一响，舰桥就开裂了，坐镇指挥的丁汝昌跌了下来，信号旗装置也废了。”

这段纠正一下，“定远”号自己开第一炮并没有震坏舰桥。威海“定远”舰的复制舰，舰桥很结实，再疏于检修也很难自己开炮就震坏。但是，当时的舰桥（也叫“飞桥”，是露天的）中炮后很容易起火。在“定远”级军舰的飞桥下方，有一个大型的装甲司令塔，起着托举和结构加强作用。丁汝昌当日受的主要是烧伤（“十八日与倭接仗，昌上望台督战，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焚烧，虽为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1894年9月20日，丁汝昌电寄总理衙门报告），飞桥是被日方炮火打坏，而不是被己方火炮发射而震塌。而根据洋员戴乐尔的回

忆，丁汝昌受伤之前，305毫米口径的主炮已经发射了10炮。从战后的照片和旅顺船坞的维修记录来看，“定远”飞桥震塌一说也完全不能成立。在海战后负责调查“定远”伤势的美国人沈威廉（William Sowden Sims）的记录表明，“定远”的伤情在于“前桅上部折断、舰首军医院被洞穿”，并无只言片语的“飞桥坍塌”的记录。

陈伟：不止射速上有巨大差距，当时日本开发的下濑火药，一碰即炸，温度极高，在水中也能燃烧，比（西方）列强都先进。这也导致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世界第四规模的俄国海军惨败于日本。

最会煮面的兰方人：甲午海战的失败是注定的，爆发于海军大发展的时代，十年已拉开代差，各种战术体系随着装备改善快速更新。日舰代表当时先进科技的速射炮、航速都远超北洋，有效火力输出效率远胜射速既慢又打不准、跑得也慢的清军。日军还用上了第一种替代黑火药炸药的苦味酸炸药，这可谓那个时代的“黑科技”，虽然打不动“定远”“镇远”两铁甲巨舰，但这种附带燃烧效应的炸药对北洋水师其他军舰的杀伤力度极大。火力时代，比拼的是有效火力输出效率，面对有黑科技加成的日军，就是神仙来指挥，只要不作弊都得输，丁汝昌的悲剧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悲剧。

末日孤舰“海圻”号：大清帝国的最后荣光

昊子：1959年冬，上海打捞工程局开始打捞“海圻”舰。1960年5月27日，船体被切断成两段打捞出水，后拆解回炉。“海圻”舰的故事至此彻底画上了句号。

Grumman：看到关于清朝水师的文章时总会想起两句话——邓世昌在撞向“吉野”前对全舰说：“吾辈从军卫国，虽死，犹壮声威。”在大东沟海战后光绪帝垂泪为北洋水师阵亡将士写下的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何去何从：谢谢大作！屈辱的主题里不乏悲壮而又奋起的色彩，读文时整个人的感情都沉浸在那段峥嵘历史中。有个小问题：易帜时那位清廷特使载振还在舰上吗？他做了什么？（作者回复：载振一直没坐船，他是坐火车去的英国，然后就先回去了。）

提督的抉择：是死，是死，还是死？

恩来：聂士成有一个手下，是镇守大沽炮台的天津总兵罗荣光，是湖南湘西吉首人，当时67岁，属于湘军中的一员。他同样也因为弹尽援绝在战争中壮烈殉国。他的手下有一个裨将叫沈宗嗣，是湘军中竿军领袖沈宏富的儿子，算是罗荣光的子侄辈。这一仗，沈宗嗣逃过了一劫，回到了湖南凤凰的老家。两年后他的儿子沈岳焕出生，也就是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沈从文！

总有胖卿想害朕：聂公桥就在（天津）八里台立交南首，那里至今有一尊黑色塑像，聂公身披黄马褂，左手牵马，右手扬刀。可惜现在附近修了地铁出站口，周围又迫近市场，塑像位置已不显眼。

戚桉：军人真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是国家的战争机器？还是人民的铜墙铁壁？他们是为国家的荣誉而战？还是在为人民的幸福而战？《百年孤独》里有句话这样说："他们麻木地向前走着，带着军人的荣耀和服从命令的僵硬。"也许军人，注定是一个矛盾的职业。

中国第一个蒙难的新闻记者

Faner.Poon：我曾好奇他为什么会把名字改成"荩"，查了一下，"荩"字可以引申为忠诚，荩臣即为忠臣。套用电影《V字仇杀队》的经典台词：拿起笔写报道的不只是血肉之躯，而是他的思想。思想是不怕死亡的。

婷婷：韩剧《匹诺曹》就是讲记者的故事，虽然是偶像剧，从一个不算大的切入口，讲述了一个简单的记者要如实报道新闻的道理，但是当面对强大的黑暗面和个人的私心时，最简单的道理或者被人蒙蔽，或者忘记了初心，倒是让人印象深刻。

扬扬：记者的笔可抵三千毛瑟枪。——拿破仑

ATOM：只为公心，知不可为而为之，乃真汉子也。

一个皇帝的"过山车之旅"

Jie：在他的内心，任何主张和原则都抵不过生的渴望，在经年累月的颠沛流离中，可能只有活着才是最真实的选择。

Fighter：除了电影，电视剧《非常公民》也拍得很真实。我去过长春的溥仪皇宫，它各个方面虽然享皇帝等级，却也处处受日本人限制。

诗酒年华：看过新凤霞写的《我和溥仪》一书，从他们劳动改造期间的故事中，了解到了一个经历起起落落后变得谨小慎微的溥仪。

双面张作霖

秋刀鱼：儿子到底还是不如父亲！毕竟，在那片必争之地，应对一群虎狼之徒，不是一般人能应付得来的。这也凸显了张作霖绝非等闲之辈！

赵珂：张作霖的作风，其实就是改不了的大土匪作风，和阎锡山一样，得在好几颗鸡蛋上面跳舞。在当时的东北，不当墙头草的太少了。他儿子想学他，但没学到位，作为“官二代”，还是欠缺了点“匪一代”的胆识。

.：民国军阀中手腕最强者当属阎锡山和张作霖，在各方强权中保障自己“王国屹立不倒”，从不强势站边，是他们的政治哲学；不能愧对列祖列宗，是他们的人生原则。细究下来，在俄国、日本两个超级强权之间打太极的张作霖似乎更胜喜欢在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

他当过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你却未必了解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感觉黎元洪就像手里握着操纵杆的轨道员，他做出了一个普通人惯常的选择，就是既不想选左边也不想选右边，他选择的是弃权，然后由别人来做决定。他只负责对别人帮他做决定之后继续向下走。看似矛盾，但是又有几个人能既英明又果决呢？

小鱼**Yuki**：武汉有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黎黄陂路，以前也是租界区，现在被建成了街头博物馆。

Shawn_xiaox：黎元洪也是一个和李鸿章一样“复杂”的历史人物，在很多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具有历史局限性，毕竟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看法也会不同。

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Minor熊宝：严复的矛盾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是新的，但是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却是传统的四书五经，那些传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尽管他后来出国看到了西方制度，但也只是在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审视西方体系，而很难改变其内在的观念性的东西。

王黎璐：**1.**我非常喜欢馒头“对历史之人物要有历史之同情”的观点，他们也是人，我们都一样。2.善始易，善终难。大企业是这样，大人物也是这样。突然明白康熙拜月求减寿以全名的原因了。3.任何人做抉择都不容易，也必将为自己的抉择承担代价，无论是贝当还是严复。4.严复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敢于“拿来主义”，学人家好的方面。

LIU Yao：托尔斯泰怒怼过所谓“顺应了历史”“违逆了历史”“站在历史前端”的说法。真正身处历史之中，没有对错，只有选择。所谓顺应、违逆之说，只是后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罢了。

“名士”于右任

任鑫宇：右任先生是我本科母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学校依然保留着先生当年亲自前往武功（杨凌）查选校址的照片，为了纪念先生，学校创办了右任书院。

沉香：在我的家乡，西安市区向北36公里三原县城，于右任纪念馆免费全年开放。老先生临终伸出三个手指，意思很可能是想魂归故里，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无论身死何方都要埋回故土。

Stammy：看到这篇文章，想起老师讲“中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时，对于先生的赞不绝口。我认识他是作为一位报人，没想到他还有这么多面。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名士”一词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

曾拥有诸多“第一”，但她未必被人记得

小钰：学法律的人应该都知道郑毓秀，当时我们老师也说她是很多个“第一”，但没有说她的结局。再辉煌的人生最后还是会回归平淡。所以人要懂得生活平凡的美，享受平凡，享受生活。

Ling：在那个年代，能挣脱世俗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已经是难得。何况她的一生对革命，对维护女性权利还做出了贡献，值得敬佩。多少个“第一”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普通人追求的也不过如此，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同时能给周边人带来些好处吧。

Olivia Ren：何苦活到世人皆知，但求无愧三尺之躯。

小狗熊：看到馒头大师点评的那段话，有所触动。主角的结局往往

并不像艺术作品表现的那样以圆满结局或悲剧收尾。大多人终将走向平庸，光辉不在，被人遗忘。这大概才是真实的生活吧。

上海1937：一寸山河一寸血

CptLee岩飞：抗战时期，记者采访一位中国士兵：你觉得中国会赢吗？士兵回答：一定会的！记者问：战争胜利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士兵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应该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高大头：原来一直觉着淞沪会战是我们的耻辱，但是现在我有了不一样的态度。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他们是好样的。

程明：从军二十年，在上海脱去白色戎装，自主择业。深知先烈不易，愿朝阳长照吾土，愿山河不再染血，丹心不复成灰。

康文华：再用一段文字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郭汝瑰

David：全面抗战伊始，中国政府就发布战时征用商船，用于自沉大江，以阻止日寇之进攻的命令。先祖父陈顺通先生，在1937年8月12日，自沉“源长”轮（3360吨）于江阴要塞。江阴沉船拉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回想抗战时期，中国航运界的各大轮船公司纷纷响应政府之号召，为阻日寇，自沉货轮。中国航运界为抗战做出的贡献与牺牲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随着战争的扩大，即使有再多的钱也无法从欧洲订购船舶，而整个航运市场异常繁荣，运费与租金节节攀升。中国航运界在抗战中的牺牲与贡献，是整个中华民族奋力抗战的一个缩影。

1937，南京城里的纳粹旗

锦瑟：一次从珠江路地铁站出来，看到拉贝故居里满满的人，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正在悼念这位南京的恩人。

Ivan J.L. Zhang：几乎同样的故事，《辛德勒名单》早已为世人所铭记，而《拉贝日记》现在却很少有人知晓，很惭愧我就是那个不知晓

的人之一。很多时候我都想问：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别人到现在依然能够拍出像《血战钢锯岭》这样注定会成为经典的抗战片，可我们呢？究竟欠缺在哪里？

新颖小丸子：作为一个地道的南京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在那段时期，有亲戚最后走散了，直到几年前才相认。也有亲戚至今没有联系上……每一年的这一天，无论我在哪儿，我都会告诉我周围的人这一天的故事。大学期间我告诉了我的舍友，后来在台湾上学时，在那一天我也把这些事情讲给了身边的台湾同胞们。今天的我，站在一个以黑人为主要人口的国家，我还是会用简单的语言告诉他们这一天的故事……我们不会遗忘，我们会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知道曾经发生过这些事。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同胞……

猎杀山本五十六

蝎子：对于两千多年间一直仅存在于一个岛上的日本而言，他们根本不懂在一个具有巨大纵深的国土上到底该如何作战。他们不明白，以当时的战略战术水平，广袤的国土对战争的影响有多大——称雄世界的蒙古骑兵远征欧洲也只能是劫掠一番。所以，如果日本当时真的如某些人所言，只占据东北而不扩大战争，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最致命的，我们恐将永远失去东三省。（作者回复：日本人奇怪地相信，通过一场决战，对方就会屈服谈判。）

逍遥王：打仗最终打的还是国力，日本和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虽然初期可以依靠偷袭获取一点战果，但是日本并没有直接进攻美国本土的实力，更何况美国人向来讲究睚眦必报。只能说当时的日本，举国上下已经彻底疯狂了。

大海："对于当时已经被美国的'禁运'紧紧掐住咽喉痛苦万分的日本而言，如果要'南进'，那么除了山本五十六的办法之外，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选择。"请问，"南进"为什么要对付美国？（作者回复："南进"就是占领东南亚，那边几乎全是英美的殖民地。英国那时候已经被打残了，主要对手就是和英国穿一条裤子的美国。）

丘吉尔的另一面

BillyChou：看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丘吉尔是维多利亚时代成长起来的，就像鸦片战争时的天朝人接受不了"蛮夷"远胜于己的事

实，更何况是视荣誉超过生命的英国贵族。所以丘吉尔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然而很早就看到了希特勒的狼子野心，又能不拘泥于成见，准确、快速地辨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最艰难的时候也从不放弃，最失意的时候也不曾抱怨，直到生命最后仍然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所以他的伟大真的是伟人的伟大。

碧海晴天：读过一篇和丘吉尔有关的文章——《我的早年生活》，对其中一句话印象挺深，“每个人都是昆虫，但我确信，我是一只萤火虫”。对他的一生来讲，也多少是有所反映。

Sherry：以前读过彼得·德鲁克的《经济人的末日》，出版于黑暗的1939年。书中的说法是如此的惊世骇俗，他说法西斯必将失败，他预测德国和苏联一定会结盟。当时尚未执政的丘吉尔为本书写下第一篇评论，那是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称它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1940年，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及法国沦陷之后，上台不久的丘吉尔曾下令每位英国军官都放一本《经济人的末日》在背包里。之前对丘吉尔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些片段，直到看了这篇文章，他的形象丰满了。

“偷袭珍珠港”之后……

逍遥王：偷袭珍珠港之后，更可怕的事情是，美国迅速打捞并修复了绝大多数被日军炸沉的军舰，然后动员国内海量的热血青年参军，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战斗力。山本五十六苦心计划的战役，在南云一忠那个马鹿的指挥下，从一个战略上的胜利降格为一场局部地区的战术胜利。当然，南云那个马鹿的表演还没有结束，中途岛一役，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被斯特鲁恩斯吊打，几乎葬送了整个日本海军。日本跟美帝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即便是日本能取得短暂的战术上的胜利，长期来看绝对还是会被美帝吊打。

程方兴：山本五十六是位冷静的职业军人。“我们只是唤醒了一个巨人而已。”这句说得非常客观。但是当时的日本，这只被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驾驭的怪兽，已经被血色和暴力蒙住了双眼，只会更加疯狂地冲向战争的深渊。所以说，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

明达：就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日军进入上海英美租界，从此上海结束了孤岛时期；当天早上，正在香港读大学的张爱玲被

炮声惊醒，在这一天日军袭击了香港，香港不再是一块飞地，香港保卫战就此展开。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道：“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幕’，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

1944，刺杀希特勒

Altman林泓釗：关于施陶芬伯格行动的细节和国民对他的看法，还有“二战”中德国普通军人鲜为人知的故事，推荐大家看一下《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一书。

Faner.Poon：很多事冥冥中自有安排，要说希特勒是大魔头，没错，但只不过他也就是当时德国集体意志的具象化而已，英国脱欧、特朗普得选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换成了另一个人，在那个时间点上，可能也会成为希特勒。

张怡娜：中学时曾经有一套书叫“五角丛书”，其中有一本好像就叫《刺杀希特勒》，书中详细讲了这个故事，印象挺深，其中讲到主角施陶芬伯格尽管已经开始反对希特勒的侵略，但是在战场上依然勇敢作战。最后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希特勒始终拒绝军队突围的请求，葬送了几十万德国精锐，这让他们最终下定决心刺杀。（作者回复：施陶芬伯格的观点是：作为军人，职责是为国家赢得战争；但作为国人，必须铲除“瘟疫”希特勒。）

烟小火：乱世中，有人沉默，有人爆发。不能说沉默的人都没有担当，也不能说站出来的人就一定是英雄。只是我们都会钦佩他们的孤勇。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想做的事情付诸实践的。

纳粹德国其实“投降了两次”，你知道吗？

宇：推荐一部电影《狂怒》，它讲述了攻占柏林的故事，讲述了真实的战争与人性。

诗敏：准确地说，如果没有苏联人的牺牲，“二战”的进程与走向，完全无法预知。道理非常简单，看看德国在苏联损失的部队总数，占据了德国最早装备的最精锐的摩步师和装甲集群的绝大部分。经常看到网上有些很搞笑的论调，说打败德国的是严寒，不是苏联红军。说这话的

人大概想象不出当年苏联红军T–34坦克集群冲锋时碾轧一切的威势吧。

阿基拉头：被洋洋洒洒的文字一笔带过的是无数场惨烈的战斗和永远不能醒来的人们，面对一个个数字，我感到的是无比的沉重和震撼。愿战争永不再临。

日本为什么会挨第二颗原子弹？

ZOE：唉，很难说原子弹的研发对全人类到底是不是一种威胁，面对爱因斯坦的后悔、投弹者的不后悔，以及日本民众的死伤，只能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考量。

大黎：读过日本的很多小说，基本上所有的文章都流露出浓浓的哀伤和阴郁。从心理的角度讲，我觉得日本是个追求极致的国家，包括对于文化、艺术、生活，也包括战争和死亡。他们这种对极端的追求，可能源于一种深层次的不安。这种不安和日本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也再次印证了生物进化论。

刺杀汪精卫

认真的雪：如何辩驳陈璧君说的，“汪先生没有一寸土地，何来卖国之说？”（作者回复：此乃偷换概念，卖国不仅是指出卖国土，出卖国家利益、国家气节、国家人民，都是。）

海上生明月：怎么没人为华克之点赞呢？也许他那21年牢狱之灾是因为牺牲的战友而熬下来的。那时候的人，真的是一腔热血，年纪轻轻就不惜丢生命做大事。其实青年汪精卫又何尝不是如此，却不能一以贯之，终从英雄变汉奸，遗臭万年。

栋栋：历史总是这样阴差阳错，感觉好多历史中的1秒，可以决定未来的100年。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这太有意思了。

料得年年断肠处，不敢忆，长津湖

并蒂莲花：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90多岁了，爷爷是云南的，奶奶是河南的，当年他俩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安置在丹东，奶奶耳聋，因为打仗的时候炮弹在身边爆炸震聋了。他俩基本不提那会儿的事，看到战争片就换台，爷爷说：“电视里放的都是假的，打仗惨得很。”只有《新闻联播》他俩每天必须看，看完才睡得着觉。国庆阅兵，

老两口在电视前哭得稀里哗啦，奶奶前年患上脑萎缩，已经记不太清我们了，希望那段她不愿意提起的往事也能忘记。

若依：爷爷当年隶属五十八师，第一批入朝参战。他说，小战士把枪握在手里一夜，结果手指就粘在枪把上整根断掉了。爷爷抚摸着小战士残疾的手号啕大哭。那个场景他一辈子也忘不掉。60年后，我成了一名外交官，踏足爷爷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每当工作遇到挫折，半岛局势紧张，我就在心里坚定地告诉自己：只要有我在，半岛绝不能生战！

昱：外公的腿就是在朝鲜战场冻伤的，那时他十八九岁吧。当时要截肢，他死活不肯，最后把腿保留下来了。平时走路没问题，一到10月开始降温的天气，我们还穿着短袖，他的脚已经冷得没知觉了。现在老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还在想念和寻找以前的战友。

程方兴：我的外公是当年第三批入朝志愿军战士，那时他隶属于坦克部队，说明条件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唉，第一批入朝志愿军战士打得太惨烈太悲壮！愿每一位志愿军战士的在天之灵，都能安息。

Asia：在老家有位二爷爷，是抗战老兵。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至今仍孤身一人。记忆最深的是，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围到他身边缠着让他讲打仗的事，他只给我们讲打老蒋。一提抗美援朝，就摆摆手，说：没法子说，没法子说。接着眼里就是泪了。现在他还健在，五年前我们当地民生院建好后，就被接走了，由政府养老了。

一个传奇女间谍的“七重面纱”

Heidi：玛塔犹如古典壁画里的人物，这个样子跳异国风情的舞蹈的确要迷倒众生。

ZZ猪大王**ZZ**：感觉玛塔好像我国历史上的陈圆圆，虽然陈圆圆不是间谍。

雪婆婆：神湿婆舞不会和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湿婆神有渊源吧？联想到吴哥的精美石雕，被神秘文化和信仰的力量深深地吸引着。

川岛芳子：从格格到间谍

Snowflying：一个亡国了的公主，被寄养在一个激进的日本家庭，还有一个变态的养父，从小寄人篱下，本应保护自己的父兄却懦弱无

能。有能力翻云覆雨有何用？只能抱着一个虚幻的梦。可能川岛芳子到死也不知自己为什么活着，死亡对她似乎是种解脱。哀叹她可悲的一生。

Yuan·W：川岛芳子被送回日本软禁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是个谜，从她在伪满洲国的所作所为和回到国内开始搞情报工作体现了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难道说日本给她许诺等侵华战争结束给她划个独立的“满洲国”？（作者回复：吸引她的应该还有权力和金钱。）

浮生若梦：充分说明童年时期的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的影响之大。川岛芳子的遭遇固然可悲，但是因为她而受害的国人岂不是更无辜？她充当卖国贼的行径需要受到惩罚。要怪就怪她生在末代的帝王家，还有个一心靠卖女复国的爹。

402zhuren：她从内心里应该是把自己当成日本人的吧，或者她寄希望于借日本人的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最终发现自己只是被遗弃的棋子。

达·芬奇真的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吗？

于思：有一年去欧洲旅行，目的地就是法国的卢瓦尔河谷，达·芬奇曾在这里度过晚年。当时去看了他最后设计修建的两座城堡，一座就是有为了解决国王情妇争风吃醋问题的平行旋转楼梯的那座，另一座是昂布瓦斯城堡。昂布瓦斯城堡有个密道通向达·芬奇故居，据说他和国王每晚都秉烛夜谈，两人惺惺相惜。还有曾放过他骨灰的教堂，也是他自己选址和设计的。之前我去意大利时也看过许多他设计的建筑。对我来说，达·芬奇更惊人的地方是建筑和军事才能，因为能比较直观地看出哪里精巧。他是个神人，无可替代。

姜岩：很久以前玩过一款游戏，主角在佛罗伦萨遇到一个人叫列奥纳多，他一直给主角提供各种武器装备，甚至滑翔机。我当时就在想这是谁啊？怎么跟达·芬奇一样厉害？然后查了下发现达·芬奇就叫列奥纳多。另：游戏中的列奥纳多是个美男子。

切·格瓦拉：一个符号化偶像背后的真实故事

ZURE：五月天的阿信写过一首歌叫《摩托车日记》。一开始觉得这歌名字好奇怪，歌词里还有好多“切切切”，现在终于懂了。他是在

唱："谁露宿在街头，谁却住在皇宫，日记里写满了梦想，我决定要用这一生背诵……"

Michael（J.X）Wang：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摄影师。他的儿子曾经举办过格瓦拉的摄影作品展。尽管他的照片大多是黑白的，但我想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也许是红色的吧。

Liou：医生很容易看透生和死，看穿躯体与灵魂，没有鲜活、饱满的灵魂，便如行尸走肉般没有意义。同样作为一名医生，现在的我依然这么认为。

人神之间吴清源

大叔吉他：大神没有亲眼看见机器狗的横空出世，或许就是因为两种神不能并存于宇宙。

景珂：对于吴清源"三改国籍"，我觉得倒很像《三体》里面的数学天才魏成，其他人视若珍宝的国籍对于他来说，都没有围棋重要。半个世纪过去了，何必再去纠结他的国籍，棋力才是传奇本身。

王忠浩：我是一名基层的监狱警察，我所在的监狱积极开展服刑人员学习围棋的活动，之前聂老还来我们监狱指导服刑人员下棋。我亲眼见证了围棋给这些曾经犯过错的服刑人员带来的改变，它真的能帮助人们修身养性。

逍遥：十分赞同本篇的题目。于围棋，吴清源是神；于人，吴清源是普通人。有时替吴清源激动，横扫日本呀！有时替吴清源悲哀，如浮萍漂荡在异国，其间所受之苦也是我等不可想象的。所以，人神先是人，再是神。所以，又更加感慨今日中国之强大。何其庆幸！

陈建泽：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中国与日本围棋水平相差悬殊。从陈祖德被让先战胜日本九段开始，到后来聂卫平力挽狂澜赢了前三届中日擂台赛，再到常昊终结了中日擂台赛，前后用了仅仅30年。聂卫平赢了擂台赛却输了应氏杯，曹熏铉赢了应氏杯后韩国围棋异军突起，后来李昌镐横空出世……关于围棋的故事太多了。

梵高之死

Green："在世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是无名小卒，一个无足轻

重，又讨人厌的样子。这样的人在现在，以及将来，在社会上都难有容身之处。总而言之，我就是最为低贱的下等人。可是，就算这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作品昭示世人，我这个无名小卒，这个区区贱民，心有瑰宝，绚丽璀璨。”（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Wyj：在《三体》中，刘慈欣描写被二向箔二维化后的太阳系时，想到了梵高的名作《星空》，他写道：“天哪，难道当年神经错乱的梵高，穿越几百年的时光看到了太阳系和人类命运的结局？抑或是他看到这结局才神经错乱的？”

Clover王云皓：推荐另外一本独特的传记《亲爱的提奥》。其中收录了梵高写给弟弟和其他人的几乎所有信件，相比于别人笔下的传记，可以通过更直接的方式来理解梵高。“牺牲所有的私欲来成全伟大的事情，使精神变得崇高，超越几乎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庸俗。”这是梵高写给弟弟的话。他本人是否做到不重要，他身上有多少光环也不重要，就和《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一样，我相信在画画和创造艺术的某个瞬间，梵高享有了极致的快乐。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很高兴梵高拥有了艺术，这就够了。

晴耕雨读：“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杜甫形容李白的句子，我想也可以用在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身上。

能称“时尚女王”的人不多，她算一个

铭铭：遗憾的是，很多女性只愿意做金丝雀，很多女孩子的家长也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金丝雀。可怕的是，到后来全都变成了黄脸婆。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从来都是要相辅相成的。

王少博：读完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隐约间感受到一条时尚和政治变迁的线：香奈儿从平民融入贵族圈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崛起，由穷奢极欲的帽子设计中剥离出简洁、耐用的时尚风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逐步由青涩变得成熟，女性也从社会附庸变成了社会劳动力的补充，裤装应运而生；“一战”结束了，自己的男友逝去，而时代所处无数个家庭结构变化，黑色的葬礼装，在日复一日的频繁的葬礼中被人们潜移默化接受，逐渐成为香奈儿眼中新女性风尚的主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金融秩序重新建立，没落的伦敦、巴黎逐步被美国取代，

时代前沿的变化让香奈儿在大洋彼岸获得青睐。香奈儿从帽子—服装—香水—手袋的品牌形象中，反映了女性逐步独立的步伐。

奶油小贵：命运很公平，你受到多少磨难，当你勇敢地走过去，你就会获得相应的回报。

一位女明星的神秘死亡

芥子小姐：一看标题就知道是梦露。这个以性感闻名生前和死后50年的女星很聪明，有独辟蹊径的政见和敏感的政治思想……女人真正的性感来自她的灵魂，而不仅仅是她的肉体。致世界上最性感的女人。

Heidi：看过一部HBO（美国有线电视网）播放的关于梦露的电影，影片中她的心理状态很不稳定，巨大的光环下是更为巨大的阴影。出道早期的梦露其实是个有点土气但清纯的姑娘。

Jennifer Cheng：她的原名是诺玛简贝克，据说为了保持盈盈一握的纤腰还抽掉了几根肋骨。美剧《肯尼迪家族》也拍出了梦露和肯尼迪总统的私情，而且暗示梦露就是这两兄弟安排人干掉的。

中国人最熟悉的那个欧洲公主，真的幸福吗？

一维：约瑟夫是深爱着茜茜的。维也纳茜茜公主博物馆和美泉宫的陈列说明了一切，应有尽有的马车，豪华前卫的浴室，约瑟夫尽全力维护茜茜的娇贵和浪漫。但茜茜并不怎么领情，甚至除生育子嗣之外都不肯与约瑟夫同房。她一生都在反抗宫廷礼节的束缚，却也逃避了很多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很难说对错，只恨生在帝王家。

明明：约瑟夫的一生也好可怜。我觉得其实两个人之间是有爱情的，但因为缺乏内心的交流，结果各自困在各自的世界里孤独终老了。

萝卜：小时候和妈妈一起看电影频道播放的《茜茜公主》，当时觉得她和奥匈帝国的皇帝之间的爱情故事真的好令人羡慕，然后妈妈就给我讲，真实的故事远没有那般美好，茜茜公主结婚以后生活十分压抑。后来慢慢了解欧洲历史，了解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才逐渐明白王子和公主的生活远不如自己想象的那般美好……感觉茜茜公主的不幸福其实是因为这场阴差阳错的婚姻，或许皇帝是真的非常爱她，但是公主从小并没有被作为一个皇后来培养，所以她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而且她

婆婆说得其实也没错，茜茜自己就是个孩子。想想看日本的天皇、皇后及太子妃，感觉和茜茜公主的某些经历还挺相似的。

诸葛：看完想到戴安娜王妃。她们是一样的美丽、倔强、坚强、独立……她们都有轰动的婚礼和一生的抑郁。她们都对身处弱势和绝境的人们，表现出了最大的善意并施以救助。因为这份善良，她们在多年以后仍然被人们怀念和爱戴。

李泰航：推荐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它讲述了茜茜公主传奇的一生。语言不是问题，了解了这段历史的人都能看懂。这是最受欢迎的德语音乐剧之一，首演于1992年，2014年我在德国看的时候还是坐满了人。

戴安娜之死

查戎：我一直非常喜欢戴安娜王妃，她对爱的过高依赖、需求贯穿终生，甚至一度失去自我。这种对爱的敏感最终转化成了她对他人的关怀、同理、同情，这是她最宝贵的品质，也是造成她悲剧的根源，她是为爱而生的。

ZPY：在1987年，一个许多人还相信艾滋病可以通过轻微接触传染的年代，戴安娜王妃坐到了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病床上，握住了他的手。她告诉了全世界，艾滋病患者需要的不是隔离，而是热心和关爱。

破碎的记忆：戴安娜王妃可能是英国皇室里最著名的王妃了吧，人称“英伦玫瑰”。堪称当代灰姑娘的她，热心公益，呼吁和平，可是却逃脱不了皇室王妃的复杂光环。

俄罗斯方块：一款小游戏背后的隐秘故事

一寸进步一寸喜：如果游戏的虚拟世界，不能让你加深或者改变对现实世界的认知，那么就应该与它保持距离，因为那时候游戏就是逃避真实世界的一个蜗牛壳！

Spensersheng：天正从雅达利拿到版权并不是偶然，它是雅达利的关联公司，从名字里就能看出，这两个词来自围棋的日语，Atari是叫吃，“Tengen”是天元。当年天正将这款游戏做了远远超过任天堂自己的亲儿子版，当天正被任天堂告知侵权后，之前流出的卡带成了收藏界的

抢手货。大部分老玩家应该只见识过天正版本的。

还月楼主：有意思。游戏见证着人类成长，俄罗斯方块伴随着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更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无游戏不人生！

到底是谁发明了电话？

Paulina：梅乌奇逝世113年之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69号决议——我觉得美国的这种“翻旧账”的精神很值得肯定，总是会有一帮人自发、自觉地走在探索真相、寻求正义的路上。

彭义：专利申请，从先发明改到先申请，这个制度变更很有意思。先发明是正义层面的，先申请是利益层面的。从正义优先趋向利益优先，用利益带动正义，看起来有失公允，但这也许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趋势吧！

Monica_小猫掉一地：对于听众来说，是对于“谁发明了电话”的讨论，对于当事人来说，则不是“先发明还是先申请”这么一条规定能决定的。不过，如果发明者都心系天下，那到底是谁发明的，就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天下如此多的发明，又有几个发明者被铭记？向时代前列的发明者致敬！

Joserosales：从模型到付诸应用还是有不少的路要走的，而且贝尔在发财后也间接成立了贝尔实验室，为人类科技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你知道当年在报纸上登广告有多难吗？

徐侠客：很佩服那些敢为天下先的人，很多事情今日只道是寻常，回首时惊涛骇浪。

terry1717：补充一下，1979年前，上海共有3家广告代理公司：上海广告公司、上海美术设计公司、上海广告装潢公司。雷达表广告的代理方是上海广告公司。

柯旭波：尽管报纸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低，但我始终认为报纸不会被完全取代，那种打开报纸扑面而来的墨香，远不是手机阅读能够带来的！

老祖宗考试作弊的那点儿事

Tin,Tin：看了科举防作弊的种种方式，就知道影视剧中常出现的女扮男装去赶考的桥段纯属虚构啊。

鱼丸粗面：明弘治十二年（1499）的会试舞弊案，改变了唐寅和徐经的人生轨迹。假如没有此事，唐寅的才华有可能会大放异彩，但中国历史上应该要少一部《徐霞客游记》了。

哈得孙河上的奇迹

Michelle：我先生是一名民航“空客A320”机长。2009年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公司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萨伦伯格写的《最高职责》。电影上映了之后，我陪他去看了，出来之后他说：“看得想哭。这个机长太厉害了，迫降真的是奇迹。”作为他的妻子，除了体谅他工作的辛苦，我也知道起落安妥对于他和整个航班乘客的重要性以及他承受的压力。希望他一生飞行平安。

Grace：《萨利机长》太震撼了，汤姆·汉克斯演得太好了。看完专门去查了这个事件和机长的资料，了解到机长是空军出身，后来他又飞了几年直到退休。这就是现实中真的英雄。

妮妮：民航发展到现在虽然安全系数已经高了很多，但是安全培训还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负责整架飞机安全的机长更是责任重大，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真的很考验机长的能力。我以前一位同事在斐济就遇到过飞机起飞后遇上鸟撞击然后立马返航的事。

海上生明月：从安全的角度讲，飞机的事故率是所有交通工具里最低的，大约超过百万次航空飞行有一次事故，也就是一个人每天坐飞机的话，概率是3000多年遇一次空难。但一旦发生事故，一般影响极大，往往会有数十甚至数百人丧生，这也是空难新闻总能上头条的原因。萨伦伯格无疑是英雄，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令所有人都安然无恙，说是奇迹一点不为过。

巨轮沉没的那一刻……

想躲起来的废废：当年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看到大屏幕上的电影，但

记得同学们讨论露丝和杰克画画的事。一年后，我在父母朋友的家里看到了一本幸存者回忆录。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里面的话，“救生艇上的妻儿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人沉入海里”“绅士的背后，不乏伪装成妇女逃命的男人混迹在妇女儿童的群体中”，整本书和浪漫的爱情邂逅完全无关，讲的只有人间悲剧和亲人间的生离死别。少年是天性，青年讲血性，人到中年想得更多的是人性。人性可以最丑陋，也可以最伟大，有多黑暗就有多光明。求生是生物本性，赴死是因为有爱。仿佛听到主题曲响起，愿仁心永恒。

月落子规啼：当初看电影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船即将沉没，一对年老的夫妇静静地躺在床上的镜头。真的说不出来感觉。不知道这对夫妇是不是就是以施特劳斯夫妇为原型的？（作者回复：是的。）

夏惠芳：再次重温了电影，除了这些或感人或令人气愤的故事，我想到的是古人说的“满招损，谦受益”。如果不是当时的邮轮公司、船长，包括舆论热推的所谓“最大、最快、最强、永不沉没”等，也许悲剧就可以避免。再次为1522位遇难者祈祷，尤其是那些真绅士！（作者回复：是的，当时的炼钢技术条件下炼出的钢，其实不足以支撑那么大的船。那是英国的造船大跃进时代。）

逃离德黑兰

蓝琳：电影《我在伊朗长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段历史，让我们看到政权更替对一个家庭原本很开明的伊朗女孩的成长带来了什么变化。

程方兴：美国政府就是在给自己挖坑：扶持伊朗巴列维政权，从石油上获取巨大利润，最终伊朗人自己起来推翻独裁者，美国和伊朗从此交恶。

＋X÷：推荐大家去看一部韩国的电影《铁雨》。

锦莉：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最终受损失的还是伊朗的人民。曾经的伊朗，开放、富有、文明（相对于当时的世界），而如今却是封闭、贫困、愚昧，虽然政府现在做了一些改革和调整，但过去的时光不可追。相信美国在检讨对伊政策时，也会有后悔。当年如果不是各方面利益都要占全，也不会孕育出一个极端反

美、抗美的伊朗政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温度3：时代扑面而来，转瞬即成历史 / 张玮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086-9815-1
I . ① 历… II . ①张…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第260233号

历史的温度3——时代扑面而来，转瞬即成历史
著者：张玮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字数：340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86–9815–1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馒头说历史

历史的温度4

那些执念和信念、理想与梦想

张玮 著



历史从未远去——

那年，中国为什么

只派一个人参加奥运会？

清末为何那么多留学生扎堆去日本？

那些从月球回来的宇航员，

都怎么样了？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自序

信念

中国海归第一人：见证近代史的“活化石”

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

清末日本留学潮：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一次“简陋”的起义

悲壮黄花岗

棉湖战役：决定黄埔军校存亡的生死一战

日籍八路军：抗战期间的特殊群体

一个人的奥运会

郭永怀：一位不应被历史遗忘的科学家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幕后较量

1991年，那场震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大辩论

残酷太空路：中国“长征三号乙”首次发射失败幕后

执念

徐霞客：一个富二代的理想与实践

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一周，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

海底两万里：不管你是否凝视，深渊总是在那里

“请问，你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加加林之死

那些从月球回来的宇航员

“挑战者号”悲歌

18年前的今天，人类超声速旅行的梦想破碎……

人类能不能扮演“上帝”？

文念

聊聊颜真卿，以及他的《祭侄文稿》

蒲松龄：贫穷从来不会限制你的想象
杀妻自尽的天才诗人：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但是……
一个因写关于中国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
这些著名的日本作家，为何最终都选择自杀？
“文胆”之死
一幅名画背后的谋杀案
人生终会谢幕，侠客永不独行
妄念
陈公博：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一个自认“戴罪立功”的汉奸
一个“慷慨就义”的汉奸
从愤青到首相，这个日本人为何能改变整个东亚格局？
日本政坛最年轻的自杀首相，到底做过些什么？
一场血腥又荒诞的兵变
大庆油田：日本人的“野望”与“残念”
情念
1931年，皇帝陛下离婚了
日本“战国第一美人”，到底有没有得到爱情？
这位日本历史上最美的“平民皇后”，到底幸福吗？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他左手江山，右手美人，最后喜提“公爵”……
附录 读者评论
版权页

自序

中国人有句话，叫“事不过三”，但《历史的温度》系列还是出到了第四本。

两年前，出第一本《历史的温度》的时候，要说我没想过会出第二本、第三本，倒也不是真心话，毕竟微信公众号里有那么多篇文章积淀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80多篇了。

但是真的看到第四本书即将付印，还是有些感慨的。

从开“馒头说”这个微信公众号开始，这三年一路走来，确实甘苦自知。

我曾在第三本书的签售分享会上说过，支撑我一路走过来的，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各位读者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说真的，没有你们，我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第二点，是我妈妈从小对我说的一句话：“一件事要么别做，要做就尽力做到最好。”

第一点，是来自外部的动力；第二点，应该算是我内心的一点坚持吧。

于是就要说到这本书了。

从第四本《历史的温度》开始，出版社的编辑和我一起商量，能不能每本书确定一个大致的主题，再根据这个主题，收录文章。这其实挺难的，因为原来“馒头说”的文章是按照“历史上的今天”这个脉络写的，发生什么写什么，事先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整体框架。

但就算难想，也要想。于是就想出了一个：那些曾经的执念和信念、理想和梦想。

滚滚长江东逝水，历史上从英雄到凡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信念，都有自己的梦想。只是如果把时间轴拉到足够长，大多数人的信念和梦想都随时间湮灭了。留在史书上的那些人，有的是因为历尽艰辛，坚持的信念最终成真，而有些人所谓的“信念”本身就是个妄念，最终不光是撞了南墙，甚至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以，我把这次收录的故事分为了五个“念”：信念，执念，妄念，文念和情念。

翻看历史的长卷，回顾这一个个故事，以及故事中的那些人、那些事，你会发现，这些“念”的转化和定位，很多时候真的就只在“一念之间”。

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的热血，历史的残酷，历史的真实，当然，也是历史的温度。

“时代扑面而来，转瞬即成历史”，这是《历史的温度3》的副标题。恐怕如今身处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比先辈们更能切身感受到这种世界变化的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感。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处在哪个时代，我们还是要有、要保留住自己心中的那份念想。那不必一定要是一个“平天下”的大志或一句“人上人”的誓言，完全可以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理想，一种源自内心的信念，一份愿意付出的坚守。

所幸，这三年，我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沟通和交流，见证了很多读者许下心愿、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全过程，而大家也全程见证了我从一个记者，到一个自媒体人，再到一个所谓的“作家”的转变。

这是一个见证巨变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坚守的时代。

有幸和大家相识，一起走过这三年。

也愿意和大家一起，继续走下去。

感恩。感谢。

2019年8月30日

于北京开往上海的G3高铁

信念

“信念”之所以被称为“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

这种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虽然在当时可能让人觉得看不到希望，但是你相信，你就愿意付诸实践，不断努力。

它会为你的奋斗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并且帮助你把当初的那份相信，变成现实。

中国海归第一人：见证近代史的“活化石”

“海归”这个词，大概是2000年前后成为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名词的。很多时候，“海归”代表的不仅仅是学问、文凭或者资历，而是一种梦想，一种回到祖国、让祖国变得更富强的梦想。而这个“海归”的梦想，恐怕要上溯到160多年前。

1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

在容闳7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到了澳门马礼逊教会学校的预备班——原本属于香山县管辖的澳门，那时已经被葡萄牙实际占据了近300年。

容闳有一个哥哥，之前被父亲送去了传统的私塾。如果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父亲应该比较疼爱作为弟弟的容闳——把他送到了所谓的“国际学校”。但事实恰恰相反：容闳的父亲只能承担一个人的学费，送哥哥去读私塾，是希望他走“正道”考取功名；而送弟弟去读教会学校，只是因为教会学校是免费的，将来毕业能做洋人的生意挣点小钱。

没想到，容闳天资聪慧，在学校里的成绩非常出色，以至到了1846年，当校长布朗牧师因身体原因准备回国，并提出可以带三个学生一起去美国的时候，容闳成了入选的三个孩子之一（另两个分别叫黄胜和黄宽，后来一个在报界，一个在医界，均有所成）。

必须指出的是，布朗先生确实是一个优秀且慈善的教育家，他负担了三个孩子所有的出国费用，并给了三个孩子的父母一笔不菲的赡养费，然后就带着三个勇敢的孩子去了美国。

漂洋过海后的容闳，进的是著名的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Monson Academy）。孟松中学可以资助一部分贫困学生读大学，但条件是学生毕业后必须要做传教士。面对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当时正愁学费没有着落的容闳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他在后来写的《西学东渐记》中是这样回忆的：“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

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好在后来佐治亚州的一所妇女会愿意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地资助容闳，他最终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且考入的是连美国学生都羡慕的大学——耶鲁大学。

当留着辫子、穿着马褂的容闳走进耶鲁大学校园的时候，一度成了美国学生围观的对象。容闳一年以后就剪去了辫子，但他依旧有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用成绩说话——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英文论说”还在第二和第三学期都获得了第一名。



青年容闳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了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当时，以耶鲁大学的文凭，容闳如果留在美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其实是毫不困难的。但容闳却拒绝了友人的建议和挽留，决意回到中

国，因为这是他出国前就立下的志愿：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2

1855年，27岁的耶鲁大学海归容闳，回到了中国。

刚开始，容闳遇到了不小的困惑。

一方面的困惑，来自他自己。

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容闳发现自己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中国反而成了异乡”。在回程路上，别人问容闳用中国话怎么说“暗礁和沙滩”，他竟然半天无法表达，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

另一方面的困惑，来自他的职业。

在回到中国后，容闳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来又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这些职业给容闳带来了颇为丰厚的收入，但这些并不是容闳真正想要的——如果想要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他留在美国就行了。

容闳想做的事情，是改变中国。

而他为此付诸的第一次行动，就石破天惊——1860年，他受两名传教士邀请，去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

按照后来容闳自己的说法，他去天京的目的，是想“考察一下太平天国”。接待容闳的人，是他在香港时就认识的熟人——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玕。洪仁玕为了体现对容闳的重视，特地给他封了一个“义”字头的爵位并附上一封委任状，希望他为太平天国效力。

但容闳经过几天的观察，很快对太平天国大失所望，认为这场革命不会成功，即便成功，也不过是“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于是他退回了委任状，立刻离开了天京。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抱负呢？在又兜兜转转了三年之后，35岁的容闳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他崇拜一生的人。

这个人，叫曾国藩。

1863年，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幕僚介绍，结识了容闳。善于“看相”的曾国藩认为容闳面相很好，有威严又有胆识，一开始提出来让容闳带兵，但容闳却认为这并非自己所长。一直在与太平军苦战的曾国藩随即又交给容闳一个任务：去外国采购机器，回来开工厂，生产枪械。

这是容闳想做并且擅长的，但他立刻给曾国藩提了一个建议：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制造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及其他设备的机器，即所谓的“制器之器”的工厂——机器母厂。容闳甚至在当时就做出预言：“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


当时的江南制造总局

曾国藩欣然听取了容闳的建议，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请赐戴蓝翎，让容闳携专款赴美国购买机器。时值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容闳在购买机器的时候遭遇了不少困难，但他还是不辱使命，花了8个月，将采购的一批机器运抵上海。

这批机器随后成了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不仅让江南制造总局一跃成为当时远东最大最完备的机器制造厂，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正式起步。

经此一事，容闳声名大振。

但在外人眼里肥得流油的所谓“采购”，并不是容闳最希望做的事。

3

容闳一直认为，要改变中国，就要从教育入手。

按照容闳的设想，中国最好能每年固定派一批儿童去先进国家学习，学到本领后，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经过容闳的不断努力和游说，1872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奏请之下，清廷终于答应每年选派30名儿童去美国留学。容闳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自己：“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得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笫间。”

不过，容闳对于“幼童留美”这件事，还是估计得太乐观了。

按照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想法，“幼童留美”之事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派幼童留美已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举动，这样要求也可以理解。但是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这批留美幼童到了美国后，依旧要学习《孝经》《小学》等传统典籍，整个“留美幼童”团的监督是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容闳只是副监督。



第一批留美儿童在出国前合影留念。当时因为消息闭塞，以及普通老百姓视西洋为“蛮夷”等各种原因，第一批留美幼童在广东没招满，去香港后才招满

到了美国后，这批中国儿童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迅速成为各个就读学校中的优秀学生。到了1880年，共有50多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而这些人也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不太愿意穿中式服装，开始和美国女生谈恋爱，有些人甚至剪掉了辫子，信奉起了基督教。

对此，当时的清廷惊慌失措。再加上当时驻美管理游学委员（监督）吴子登的一些夸大其词的报告，清廷终于做出决定：在1881年8月前，撤回全部留美幼童。

对于这件事，别说容闳，连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作家马克·吐温，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都纷纷劝阻，但依旧没有任何作用。

1881年8月，原定留学期为15年的120名中国留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执意不归及病故者外，其余94人分三批被遣送回国。

当时的《申报》在留美幼童回国后做了如下评述：“国家不惜经费之

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据统计，留美幼童中，后来成为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工程师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医生3人，律师1人，报界人士2人，电报局官员16人……

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都留在了民国历史上：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

虽然“留美幼童”计划从后来的结果看，还算宽慰人心，但这个计划的夭折给了容闳极大的打击。

4

容闳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

在“留美幼童”计划夭折后，容闳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两个计划：帮助中国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

这两个计划是如此庞大，以至容闳必须要接触自光绪帝以下大大小小的清朝官员。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容闳终于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庞大帝国的各个阶层已经腐烂到了什么地步：自李鸿章、张之洞以下，荣禄、刘坤一、盛宣怀等，虽然都是“洋务派”的干将，但围绕各自利益集团不择手段地明争暗斗、贪污腐败，使得许多明明利国利民的大事最终都不了了之。容闳更是感慨：“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但是，容闳依旧抱有期待，只是他的期待已经从旧体制的自愈转向了自上而下的改良——戊戌变法。

此时，已经70岁的容闳最欣赏的人，是比他小30岁的康有为。

容闳本来就认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和制度问题，所以他对

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维新主张大加赞赏。容闳不仅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会，而且但凡维新派的活动，他都参加。容闳在北京东华门的寓所是维新派长期聚集开会的场所，很多重要的奏折、建议都是在那里产生的。

1898年6月中旬，光绪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然而，仅仅百日，变法夭折。

在戊戌变法的最后关头，容闳再次成了见证历史的人——谭嗣同与袁世凯密谈“勤王”之后，返回容闳寓所，告诉大家情况已不容乐观的消息。

当时的容闳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出面去请美国驻华公使对清廷进行干预，但因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对慈禧完全造不成压力，这个提议被康有为否决。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四处捕杀维新派人士。容闳在第一时间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请求英国传教士营救梁启超。然而他自己其实也早被清廷视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早就参奏他“与洋人时相往还”，暗示他勾结洋人。

很快，容闳自己也被列为通缉对象，只能潜逃至上海，躲进租界。

至此，容闳对“改良”已经彻底放弃希望。

5

如果改良不行，那该怎么办？

容闳在1900年3月，通过留美幼童中一个族弟容星桥的介绍，知道了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孙中山。

其时，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再度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在义和团进京的背景下，觉得已经“忍无可忍”的慈禧太后决定向列强宣战。

在这场近乎闹剧的宣战过程中，容闳完全支持张之洞提出的“东南互

保”计划。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劝说张之洞拥兵独立，并且积极参与谋划唐才常策划的“自立军”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已经彻底放弃了“改良”，触达“革命”的边缘。

然而，理想主义者容闳最终还是输给了老辣的张之洞。在一开始选择不表态之后，看到慈禧依然能够掌握大权，张之洞选择向朝廷效忠，开始疯狂捕杀自立军，包括唐才常在内的20多个自立军骨干被张之洞杀害，容闳也再次被清政府通缉。

1900年9月1日，容闳化名为“泰西”，搭乘日本客轮“神户丸号”由上海逃往日本，在船上，他终于和化名为“中山樵”的孙中山见面，两人畅谈国家大事。



老年容闳

至此，容闳开始彻底支持革命。

以容闳的做事风格，一旦决定投入，就绝不只是口头上的支持。

1909年2月，81岁的容闳告知孙中山，他已向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家布思提出了一个计划，命名为“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资助孙中山进行武装革命。

在容闳的牵线搭桥下，孙中山在纽约与荷马·李及布思进行了多次商谈，双方敲定了各种贷款、利息、偿还的细节，孙中山也向在国内的黄兴通报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在施行的过程中还是碰到了很多障碍，一度搁浅，但容闳始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牵线搭桥，敦促双方继续推进。

只是，历史的进程比大家预想的都要快——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武昌起义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

此时的容闳已经83岁，染病卧床，但听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他却兴奋异常，连写三封信给兴中会成员谢缵泰，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发表自己对革命的观点，还颇有先见之明地发出警告："要警惕袁世凯。"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第二天就亲笔给容闳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回国担任要职。

84岁的容闳此时虽然有心，但已无力，卧病在床。

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最终逝世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寓所。

我们无法猜测，容闳对于自己最终没有叶落归根是何想法。

但他的墓碑上，专门刻了一个汉字的"容"。

馒头说

说容闳是"中国海归第一人"，可能略有夸张。

在容闳之前，应该还有其他中国人留洋归来。但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资历，以及后来参与的各种大事件，容闳也应该算是第一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容闳的一生其实有点尴尬。

他其实早就入了美国籍，信了基督教，但是在美国，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一个中国人；虽然他依旧是黑头发、黄皮肤，但在中国，大家却把他当作一个外国人。

而容闳提出的一些建议，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确实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事实证明也不可行，比如全部照搬美国的政治和金融制度。

所以，容闳还有一个称号：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缘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一笔。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无论是何国籍、身份，自始至终都是一位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者。

在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容闳从小到大到老，从留洋到洋务，从维新到革命，遭遇了诸多变化，他的认知和观念也一直在变，但有一点始终不变：他希望中国能够变好，能够变强。

因为有这个理想，容闳才愿意放弃别人眼里难得的舒适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份信念，他才自始至终不选择放弃或逃避。

所幸，自容闳始，一代代的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像他这样怀着赤子之心的，大有人在。

当然，像容闳这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可遇不可求。

在自费的前提下，出去，是一种选择，回来，也是一种选择。但无论最终如何选择，身在何方，只要心里有一份挂念，一份回忆，一份坚守，乃至愿意呐一声喊，尽一些心，出一份力，我觉得就是可贵的。

天下虽大，不忘中华，足矣。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走向革命：以容闳为中心》［雷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5期，2012年9月］

2.《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李华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洋务运动中的容闳》（向衡，《同舟共进》，2018年第10期）

4.《“边缘人”的角色尴尬——容闳在晚清中国的人生境遇》（李细珠，《学术论坛》，2000年第5期）

5.《容闳：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李永贤，《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6.《未刊文献中所见之容闳》（吴义雄，《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7.《“近代中国寻梦人”：“留学生之父”容闳》（胡晓青，人民网，2013年9月9日）

8.《中国人留学史话》（吴霓，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11月）

9.《雷颐：当容闳遭遇太平天国》（雷颐，爱思想网站，2010年6月14日）

10.《略论容闳对美国经验的宣传与推广——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孔祥吉，《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

在中国的教育版图上，大家常念叨的是“北清复交”。但还有一个学校的名字，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有不少人听到后会肃然起敬，这个名字，叫“南开”。

1

1904年，44岁的严修想办一所学校。

严修，字范孙，早年入过翰林院，后来当了贵州学政，是著名的书法家，但其实他更是一个教育家。严修一直提倡新式教育理念，主张学以致用，光绪年间科举增设的著名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皇上按他的奏请批准的。

1904年，严修去了一次日本，专门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回国以后感慨万千，觉得一定要在中国也办一所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学校。

10月17日，一所中学就在天津严氏的私宅成立了，最初名叫“私立中学堂”，后来叫“敬业中学堂”，最后因为搬到一个天津乡绅捐出的面积10亩、名叫“南开洼”的地方建校，所以正式更名为“南开中学”。



严修（左）和张伯苓（右）

办学校，就一定要物色一个好校长。严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考察的同伴，认为他是不二之选。

那一年，严修的这个同伴才28岁。

他叫张伯苓。

2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

在张伯苓15岁那年，因为家道中落，没有钱再继续读书，他就去报考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这个学堂的学生学费全免，还能一个月领四两白银。

张伯苓在学堂里一直名列前茅，并且接触了大量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学堂的总教习教给他们的各种闻所未闻的理念和知识，包括那句话：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这位总教习的名字，叫作严复。（关于严复的故事，可以参看《历史的温度3》收录的《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张伯苓的专业是轮船驾驶，毕业那年，他的成绩是全班第一。按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应该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实习一年，但张伯苓发现，整个北洋学堂的学生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以供他们实习——那一年是1895年，北洋舰队在之前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最终，张伯苓等到了一艘“通济号”。这是一艘在甲午海战中幸存下来的练习船。在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上船实习后，张伯苓发现整个清朝海军中都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气息。在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的屈辱时，张伯苓觉得自己悲愤难平，几欲痛哭失声。

但真正让张伯苓做出自己人生第一次抉择的，还是在三年之后。

1898年7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那一天，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张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阳旗被降下，清朝黄龙旗升起，但随即黄龙旗又被降下，换上了英国的米字旗。

让张伯苓深受刺激的还不是这个场景。

前往参加仪式的清朝兵丁，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前胸一个“兵”字，后背一个“勇”字。而服装的尺寸五花八门，有的上装长过腰际，有的长裤露出脚踝。清兵们个个面黄肌瘦，垂头丧气，有的人甚至后腰还别着一杆烟枪。而反观英国士兵，个个身材魁梧，穿戴整齐，步伐一致，神采飞扬，在中国的国土上，骄傲地升起自己国家的国旗。

在那一刻，张伯苓做出了和当时很多人相反的决定：

脱下军装，去做教育。

他觉得自己想通了：“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3

退役不久的张伯苓，很快就遇见了刚刚开始在家开私塾的严修。

这两个人的相遇，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面。

当时严修的私塾只有5名弟子，虽是私塾，但只有半天教四书五经，还有半天教的是西学。严修最早只是想请张伯苓当英语老师，但后来发现，张伯苓擅长的远远不止英语，后来就聘他做教整个西学的老师。

虽然只有5名学生，但张伯苓教得非常认真，让这些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英文、数学、自然科学这样的科目。（在张伯苓最早教的5个孩子中，有一个叫陶孟和，他后来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1949年后，陶孟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由于在孩子中的反响非常好，张伯苓很快出名了，天津一位叫王奎章的绅士，专门来请他兼职做王氏家馆的老师。

学生多起来后，张伯苓就给他们加了一门当时旧私塾根本不可能有的课：体育课。

在体育课上，张伯苓在两把太师椅椅背中间加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们把辫子盘起，长袍撩起，一个个练起了跳高；让一个同学从另一个同学弯下腰的身体上跳过去练跳马；请木匠打造出哑铃，让同学们练肌肉；课余还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

1904年10月17日，严家和王家各出一千两白银，建立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私立中学堂，聘张伯苓为校长。第一年就有70多个学生来报名。而这一批学生中，涌现了很多人才，除了陶孟和之外，还有梅贻琦（后来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儿童，之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喻传鉴（后获得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协助张伯苓创办重庆南开中学）、金邦正（后来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林学硕士，担任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的校长）等等。

到了1917年，在张伯苓的悉心运作下，南开中学已经成了在全中国都有名气的中学，学生超过了1000人，各类学科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堪称国内一流。

但张伯苓想要做的，还不止这些。

4

张伯苓的梦想，是办一所一流的大学。

当时偌大的一个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并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存在。

而张伯苓想办大学，不是说办就办，他是认真想做好这件事的。所以在1917年，他就去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留学——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了。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是一所著名的学府，院长是“心理起源论”的创始人、著名的教育学家孟禄（Paul Monroe），而教授里更是有杜威（John Dewey）、克伯屈（W. H. Kilpatrick）等教育名家。尽管张伯苓已经41岁了，但却非常受欢迎，学院甚至免除了他的学费，并且给了他荣誉奖学金。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并且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1918年年中，张伯苓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而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提出愿意再给他追加奖学金，希望他留下来，张伯苓婉言谢绝。

他要学以致用，回去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的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右为张伯苓）

回国之后，张伯苓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一个“钱”字。为了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甚至会去求一些军阀，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在张伯苓等人的奔走下，连黎元洪等人都纷纷解囊资助，共募得捐款近9万元。1919年，南开中学南面的空地上建起了两幢教学楼，9月初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共招得96名学生。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大学成立之后，张伯苓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师资力量的问题。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师名单是让当时其他所有大学羡慕的：

梅光迪（文学）、竺可桢（气象）、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学）、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物学）、李济（人类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黄钰生（心理学）、何廉（经济学）……

这些人很多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甚至原先就已经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副教授乃至教授。当时的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开出的教师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来任教，一是因为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

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达到了300元。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自己不用，全校老师均可使用。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崛起。

当时，美国罗氏基金团（现称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员前来参观，听了一节邱宗岳先生讲的化学课，对中国大学的化学教学水平大为惊叹，立即决定为南开大学的科学馆捐款12.5万元——当时科学馆还没开建。而南开大学的理科实力当时全国闻名，也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支持。

1922年，黄炎培曾与胡适有过谈话。黄炎培说：“怎么才能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那就是你我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去读书。”胡适回答：“我的子弟，我都叫他们去上南开了。”

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黎元洪到冯玉祥，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送到“南开系”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理念。

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他立下的南开大学校训：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张伯苓要求南开的学生“允公”，指的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说到底，就是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才能，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奉献社会。

而“日新月异”，是要求南开的学生能够打破陈规，积极进取，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共选出81名院士，其中有9人都是南开出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开毕业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57人。

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周恩来、曹禺、吴大猷、陈省身，都是南开大学培养的学生。

6

必须还要提一下的，是张伯苓对体育的态度。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专程从美国购进的最新式的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张伯苓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每周3小时的体育课。无论男女学生，体育课课时没上满，或者测验不及格者，都不能毕业。体育课考试分笔试与术科两种。笔试是考各种运动规则，术科是考核实际运动成绩，其中男子100米的达标成绩是14秒，篮球要求1分钟投中7个球，其他如跳高、跳远、标枪、俯卧撑等项目也都有具体标准。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南开大学的篮球队是最强的，足球队也非常有名。

张伯苓认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竞赛精神，书读得再好也是有欠缺的。

1932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当时离“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不远，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勿忘国耻”四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响起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四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候，体育场里的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跟着呐喊。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日军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怒退席，随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议。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大学，全部炸毁。

张伯苓的体育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支撑：奥运会。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给了张伯苓第一次触动：各国平等，公平竞争。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了《雅典奥运会》演说。他第一次提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还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

1908年，张伯苓有幸观看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奥运会，深受触动，回国后就在校园里向学生们介绍了奥运会的情况和理念。

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南开的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

"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前两问，张伯苓都努力给出了答案。

1932年，在张学良和张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远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而刘长春的报名，就是张伯苓亲自操办的。

四年后，在张伯苓等人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办奥运会。

1949年，张伯苓73岁了。

现在不少关于张伯苓的故事，会或多或少地略去他的晚年生活。

但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这个结尾，是必须要交代的。

1949年11月，陷入大败局的蒋介石专门去了一次张伯苓家，希望他能一起去台湾。但是，出于各方面原因，张伯苓拒绝了。张伯苓的孙女张媛和后来回忆，这里面有张伯苓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想叶落归根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人给张伯苓带来一个口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文科学生，和张伯苓的师生情谊长达数十年。

张伯苓留了下来。

1950年4月，张伯苓由重庆飞回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张伯苓9月回天津后，当时的天津市市长黄敬还受命要关照好老先生。

但很快，风向就变了。

张伯苓之前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还出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虽然他担任职务后没多久就深居简出。此外，南开大学也在1946年被国民政府改为国立大学。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教育家"的身份被忽视了，而作为"国民党高官"的身份却被放大了。

1950年10月16日，也就是南开中学四十六周年校庆的前一晚，南开中学的一位老师专门来到张伯苓家，找到了他的三子张锡祚，婉转地表达了一个意思："请老校长第二天不要去参加校庆了，可能会不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都被收为国有。

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张伯苓起床后，穿起雨衣后就要去南开中学——这所他一手创立的学校。张锡祚这时候说："爸，外面下雨了，您还是别去了。"

聪明如张伯苓者，立刻体会到了儿子话中的含义。

他很快就脱下了雨衣："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了吧。"

神色如常。

没几天，张伯苓的儿媳妇瞿安贵看到自己的公公站在房间内的窗前，长长叹气。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为第二次中风，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5岁。去世时，他口袋中仅有7元4角钱和两张旧戏票——钱，还是坐电车找的零钱。

张伯苓去世之后，只有天津的报纸刊登了他家人的"哀启"，其他媒体都没有做报道。

周恩来在第二天就赶来吊唁，但也没有公开报道。

张伯苓的追悼会也开得很低调，当时很多人在观察风向，连花圈也不敢送。送来花圈的，基本都是他的学生。

张伯苓的学生黄喻生念悼词，当他念到"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这句话时，自己也痛哭失声。

赶来的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哭着发言："张伯苓一切都是为了南开，他当考试院院长也是因为他想把南开搞好，希望蒋介石帮助。如果张校长要做官，早就做了，南开就没有今日了！"

当时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无所顾忌专程赶来，他哭着发言："我们今天追悼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类的教育家！他为新中国准备了各种人才，并且他有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共产党的领导者。……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读书时张校长没要我一分钱，张校长培养了我，是我一生都无以报答的！"



南开大学后来重新立起了张伯苓塑像，并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和夫人的骨灰合葬在塑像之下，让他长眠在自己最爱的这片土地里（图片来源：新浪博客“陈导的博客”）

张伯苓的遗愿，是希望将自己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在当时被拒绝了，理由是“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

但是，没有人会忘记张伯苓。

正如那一年，曾在南开中学教过语文的老舍，和南开的学生曹禺在美国合写的那首诗：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馒头说

1900年，有个人写下了一篇《少年中国说》。

其中有一句，大家如今口口相传：“少年强则国强。”

写下这句话的，是梁启超。

真正去实践这句话，乃至奉献出自己一生的热血和生命的，是张伯苓。

张伯苓的一生，历尽艰辛，先后创办过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先锋楷模。

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难免会有历史局限性，但正如他的追悼会上的悼词所言，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

张伯苓的一生，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而他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升官、发财或者扬名，而是真真切切让这个国家更富裕、更强大，他是在用实际行动让“少年强则国强”。

如今，我们谈起教育和理念，都会说张伯苓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谈起体育和奥运，都会说张伯苓是中国的“奥运第一人”。

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曾走过的一些弯路，对张伯苓曾经有过的不公。

时代当然是在曲折中发展和前进的，人的观念也是。所幸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生活在过去，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应该铭记一些人和事。

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梁吉生，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

2.《严修与张伯苓共同教育事业的开创》（陈鑫，《南开大学报》，第1313期，第3版，2016年10月14日）

3.《我在南开大学的前十年（1926—1936）》（何廉，英文版《何廉回忆录》中的一章，收入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页）

4.《教育家张伯苓》（胡适，1947年）

5.《说不完的张伯苓先生》（“晋绅”，新浪博客，2013年2月4日）

6.《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雨飞，《人民日报》，2008年1月25日）

7.《鲜为人知的张伯苓追悼会》（南开大学校史网，2013年11月2日）

8.《“南开先生”张伯苓晚景凄凉》（百家号“挖历史”，摘自《故人何寂寞II》，叶克飞著，京华出版社）

9.《民国往事之张伯苓不爱风花雪月，只为事业洒热血》（曾雅娴，一点资讯，2018年7月5日）

清末日本留学潮：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的近邻日本，一直是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一道阴影，蔑视者有之，仇恨者有之，但却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甲午战争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该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热血青年，开始成批成批地前往日本留学。这究竟是为什么？

1

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清末到底有多少人去日本留学？

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些后来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大多都有留日的经历，鲁迅、杨度、黄兴、秋瑾、蒋介石、蒋百里、阎锡山、胡汉民、汪精卫……

根据《人民政协报》曾刊登过的一份数据显示：1896年，清政府开始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一共13人——这是“官派”的。到了1900年，留日学生增加到了100多人，1902年为500多人，1903年为1300多人，1904年为2400多人，1905年至1906年因为数据太大而已经没有精确数字，估计在100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为自费）。

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显示，根据日本各学校调查数字汇总统计：1906年清朝的留学生是7283人，1907年是6797人，1908年是5216人，1909年是5266人，1910年是3979人，1911年是3328人。

要知道，这只是日本学校方面的统计，因为当时还有很多所谓的“留学生”并没有找到愿意接收他们的学校，只是在社会上“闲晃”。当然，也存在一个中国留学生会报几个日本学校的情况。

所以，从189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15年时间里，先后从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人数只有一个大致的估计数字，在3万人左右。

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国情，这不算是一个小数字了。

2

于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选择去日本留学？

首先，有个大背景。

大家都觉得，经甲午一战，中日不共戴天，但事实并非如此。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反而进入了奇怪的“蜜月期”。

从清朝角度讲，与自己各方面都比较相近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肯定有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而自己战败后也必须在国内做出一种革新的姿态，所以愿意派留学生去日本学习。

而从日本角度来说，在击败清朝后，它在东亚地区的对手就只剩下了沙俄，此时最好的策略是拉拢清朝共同对付沙俄。日本接受清朝的赴日留学生，一方面可以笼络中国政府，一方面可以培植亲日势力，还能增加外汇，何乐而不为？所以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很重视招收中国留学生。

其次，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在饮食、文字各方面更能让中国留学生适应，地理位置也非常近，有急事可以两地往返。而且，当时去日本是不用签证的——船票在手，说走就走。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宜啊！

根据190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记载，学校专为中国人设的“清国留学生部”每年的学费大约为35日元——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十七两白银。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的缴费情况，至今为早稻田大学史料中心保管

如果留学欧美呢？清朝给官派的欧美留学生发放的津贴标准是每年一千二百两白银，其中学费是每月二十两，其他为住宿费和差旅费。

一年十七两和一个月二十两，再加上吃穿住行方面的费用差距，去日本留学的性价比立刻凸显。

所以，即使考不上“官派”，清朝当时的中产之家基本也都可以负担子女去日本留学的费用，甚至经济状况再差一点的家庭，咬咬牙凑凑钱也能勉强承受，但能将子女送到欧美去留学的家庭，必须是非富即贵的。

当然，由此也衍生出当时“欧美同学会”看不上“日本同学会”的情况。

两个背景问题说完，第三个问题来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得怎么样？

要问他们学得怎么样，先要看他们去日本留学的目的。

应该说，当时绝大多数赴日留学的中国学子，都是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去的。甲午一战，对中国人刺激极大，而日本在吸收了西方文明后立刻实现了富国强兵，这也让广大中国学子抱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决心。这从他们在日本选修的科目就能看出来——绝大部分学生选的是当时中国最缺的方向：军事、政法、师范……

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学生是抱着“镀金”的心态去的，他们在日本学习也不努力，甚至日语都没学好，反而沾染了不少不良风气，终日旷课闲逛，搞同乡会小圈子，饮酒作乐，甚至嫖妓。

值得一提的是，绝大部分中国留日学生初到日本时，是抱着一种回国后要改良政治的态度的。但是到了日本之后，在亲身感受到近代化的日本与腐朽的清朝在各方面的对比之后，很多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不是要改良，而是要推翻清廷，是要革命了。

所以，清末革命的熊熊大火燃起，一个重要的点火点，其实产生于日本的留学生团体中。

4

那么，第四个问题又来了：留学生酝酿造反，清政府不管吗？

管，当然管。

1903年，留日学生群体中的革命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各路线报都回送了清廷。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曾非常支持派学生留日，但他也向清廷写了这样一份奏折：

“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

但问题是，这些学生不在国内，清政府怎么管？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日本政府帮忙立法来管。

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听清政府的呢？

日本方面还是有自己的动机的。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为对抗沙俄，日本政府和清政府的关系在“蜜月期”。而另一方面，那些小部分终日游手好闲的清朝留学生，确实败坏了学校的风气，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日本方面也早就想整治一下了。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方面发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由此被点燃了。

5

第五个问题：为什么管一管留学生，就能“点燃火药桶”？

先来看日本颁布的规则，全文共十五条，简单概括来说有四条激怒了中国留学生。

第一条：清国学生留学日本，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

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

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的房子或住的旅馆，需要所在学校监管。

第十条：如果有清国学生因为“性行不良”而被学校开除，其他学校也不准录取。

规则一出，当时在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立刻刊文批评，指出这四条的问题以及整个条例的大问题：

第一条和第四条，完全侵犯了清国留学生的留学自由权利；

第九条，据调查，在日本只有妓女才会被监管住所；

第十条，怎样定性“性行不良”？如果来自北京的官员一口咬定，留

学生就将无校可上！

此外，《新民丛报》还透露，这个条例本来是叫《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把清朝和日本的附庸国并列在一起（当时韩国已沦为日本附庸），究竟是什么居心？

最激起留学生怒火的是规则中的“取缔”二字：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接受我国的留学生，只有你日本开“取缔”先河，这是赤裸裸地藐视我们的国权！

所以，此规则一出台，所有在东京的清朝留学生顿时沸腾起来，纷纷扔下课本冲上街头，开始进行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和抗议。

当时留学生团体提出的口号是：全体回国！

6

第六个问题来了：日本是真的要取缔清朝留学生吗？

其实，还真不是。

这件事是一个大乌龙。

日本方面颁布的这份规定，其实名字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但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规定的时候，简化了标题，改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但问题是，在日文中的“取缔”有“监管”“监督”的意思，就像日本公司里的“取缔役”其实就是“董事长”的意思。而很多清朝留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机会看到原文，所以导致以讹传讹（不排除个别留学生也没学好日文）。

实事求是地说，日本颁布的这个规定，确实有盛气凌人、欺负清朝留学生的成分，但如果要上升到无限高度，却也有一些勉强。远在越南的孙中山当时就发回电报，希望留日学生不要意气用事，要留在日本完成学业，以防回国后被清朝“一网打尽”。而梁启超也客观地评价过这次事件，称一部分人“决非徒在此规则问题”，俱是“蓄愤甚久，而借此一泄”。

何为“蓄愤甚久”？一方面，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震撼于原本落后的日本突飞猛进，为自己的祖国感到痛心。另一方面，每个中国的有识之士，都把当时日本欺凌朝鲜看在眼里，对长期遭受日本的霸权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恨之情。而在留学的生活和学习中，他们也确实受到过不少日本老师、房东、警察乃至车夫的冷嘲热讽和刁难，长久积累的怨气以这次事件为导火索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

当然，也有一部分纨绔子弟，生怕规则变严后影响自己的留学考勤，也加入了游行队伍。甚至还有一部分留学生纯粹是希望能够结识几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所以也开始罢课游行。

但是，留学生队伍也开始发生分裂。

一方，是以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他们遵从孙中山的意见，组成了一个“维持会”，希望留学生不要回国，完成学业再说。

另一方，以胡瑛、秋瑾为代表，成立了“联合会”，坚决要求留学生全体回国。

两方面的势力开始发生激烈冲突。

7

最后，不说问题，来说一个人。

这个人，也是留日学生，叫陈天华。

1905年12月8日，31岁的陈天华一步步走向大海，最终投海自尽。

按照长期以来的说法，陈天华的投海，就是为了抗议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陈天华的自杀，确实再一次把留学生的抗议活动推向了最高潮。



按永田圭介在《秋瑾——竞雄女侠传》中的说法，在1905年12月9日的陈天华追悼会上，盛怒的秋瑾拔出刀，宣判鲁迅等不愿回国的留学生“死刑”，并大喝：“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后来就被传为著名的“秋瑾刀斩鲁迅”。但又据秋瑾的学生徐双韵后来回忆，当时秋瑾把刀拔出来插在讲台上，说的是：“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她并没有针对任何具体的人。不过，秋瑾在退学回国后，还是写信给留在日本的同学，称爱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大家的精神其实是相同的

但是，陈天华真的是为了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自杀的吗？

很多因为陈天华自杀而愤慨上街的清朝留学生，其实并没有仔细看甚至根本没看过陈天华留下的遗书《绝命辞》：

“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

陈天华根本不是为了“取缔事件”而死。他甚至在仔细研读了条例原文后说：

“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指之前《新民丛报》宣传的）迥乎不同。”

陈天华所恨的，是中国留学生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愚昧、冲动和不团结，而且给了日本人进一步责难的把柄。果然，日本媒体就开始称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

但无论如何，陈天华的死还是刺激了激进的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学生开始组队带刀上街，声称要砍死不愿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也确实发生了殴打乃至捅刺事件。

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下，从1905年12月13日开始，有数千名中国留学生中断学业，回到国内。

清廷原本希望日本规范自己留学生的行为，压制革命浪潮，但这数千名义愤填膺的留学生回国后，一下子分散到各省各地，开始酝酿各种革命活动，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日本原本希望管制留学生讨好清政府，结果却进一步激怒了这批留学生。当初希望能培植“亲日势力”的愿望被证明是一厢情愿。十几年来，日本接收的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都依旧痛恨日本，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坚定地站到了抵抗的最前线。

这场为期十多年的大规模留日活动带来的最终结果，恐怕是清政府和日本当初都没想到的。

馒头说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第一次向大唐派出了遣唐使。

在之后的260多年里，日本一共向中国派出过19次遣唐使（最终成

行16次），总计300多人。

这300多人来到传说中的中土大唐，虔诚地学习文学、音乐、医学、茶道、手工业等各方面的先进知识，再把这些知识带回自己的祖国，希望能够让自己的祖国快速富强。

1200多年后，斗转星移，角色互换。

在那一批批留日的清朝学生中，至少有一半人是带着心中跃动的火焰去的，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但也有一些人，心中只有浑浊的海浪，摇摇晃晃，昏昏度日。

而那批带着火焰的留学生，其实还面临着另一片汪洋：他们一开始大都是希望学成后能回来建设祖国。但眼界一开，格局一大，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1200多年前，日本虽然落后，但离先进的大唐，也不过是隔着一个东海；而1200多年后，清朝和世界强国之间，已经隔着一望无际、无法逾越的大洋。

在那种绝望和痛苦的挣扎中，有的火焰选择献祭给了大海，而更多的火焰因此而坚强，闪耀出更倔强的光芒。

清末的日本留学潮，确实不是一次简单的留学行为，包括发生“取缔事件”，也是因为里面夹杂着万千中国学子太多的憧憬，彷徨，迷茫，绝望，愤怒，悲伤。

还有勇气和决心。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李喜所、李来容，《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2.《清末民初为何扎堆留学日本》（杨早，《北京晚报》，2016年7月5日）

3.《日本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真相》（“水经书屋”，新浪博客，2016年1月31日）

4.《日媒嘲讽国人放纵卑劣 陈天华愤写〈绝命辞〉自杀》（《凤凰

大视野》，凤凰卫视，2013年2月27日）

5.《辛亥革命与留日学生》（王晓秋，《人民政协报》，2010年10月25日）

6.《陈天华的最后一年：共和的殉道者》（罗雪挥，《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7期）

7.《愤青的狂欢——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真相》（冯学荣，中国数字时代网站，2013年6月11日）

8.《秋瑾是怎么“刀斩鲁迅”的》（李思达，腾讯大家，2016年7月4日）

一次“简陋”的起义

清末著名的起义，一般人大概能说出两个：武昌起义，这没任何问题；黄花岗起义，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有点印象的，应该也没问题。可能还会有人说出第三次起义：广州起义（第一次），那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但是这里要说的起义，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它却值得一写——黄冈起义。



黄冈起义爆发

1

首先要注明的是，此“黄冈”非彼“黄冈”，不在湖北，不以高考闻名。

这个黄冈，虽然被称为“黄冈城”，但指的是当时广东省潮州府饶平县黄冈镇——没错，就是一个小镇。

事实上，黄冈起义并不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大起义，只用几段话，就可以交代完整个起义的过程。

1907年5月22日，同盟会在许雪秋的策划下，在潮州的领袖余既

成、陈涌波的直接领导下，聚集了700余人，在黄冈城外誓师，发动起义。

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黄冈镇。

清廷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其时驻扎在汫洲，急忙派三百援兵救援黄冈。起义军遂兵分两路，一路迎击敌人援军，一路奔袭潮州。没多久，攻袭潮州的那路起义军受挫，两路并一路，共同抵抗清廷的援军。在得到省城的增援后，黄金福的清军利用洋枪洋炮，轻松击败了只装备了土枪的起义军。

5月27日，起义军已经被逼入绝境，余既成和陈涌波决定解散队伍，自己则转移至香港。

这场起义，坚持了5天，最终失败。

2

没错，这就是一场只持续了5天，双方参与人数加起来大概不超过1000人的起义。

但它还是有写一写的价值。

比如说，黄冈起义其实在孙中山领导的所有起义中，拥有6个“第一”：

同盟会成立后（1905年）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任命国民革命军干部（许雪秋当时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军东军都督）；

第一次使用“青天白日旗”；

第一次攻克清廷衙署，诛杀清朝官吏；

第一次成立国民军政府；

在历次起义中伤亡最多、最为惨烈，位居第一。

看完这6个“第一”，你或许有点诧异：其他的起义都是怎样的一种

情况，才会让这场起义拥有那么多第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一共领导过10次起义，黄冈起义是其中的第三次。

翻开这10次起义的记录，你会看到这样一些故事：

1895年10月26日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那时候还是兴中会）。事实上，这可能根本算不上是一场起义——还没开始，孙中山就发现，约好的人没到，武器也没到。随即，起义军解散，孙中山开始逃亡。

1900年10月8日的惠州起义，原本计划是起义军攻击广州城，他们却在日本人的指引下，转而攻击厦门——日本希望起义军抢劫厦门的台湾银行，这样他们就有理由出兵厦门，乃至占据福建。结果起义军在赶往厦门的中途就被清军击溃了。

1908年3月28日的马笃山起义，一开始打得相当精彩，革命军连打4次胜仗，伤亡仅4人，从清军手中夺得步枪400余支，人数从200左右扩充到600以上。但打了一个月，枪倒是有，子弹却打完了，起义部队只能解散。

还有1911年4月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因为起义前有消息泄露，总指挥黄兴探明清军防守严密，遣散了之前通过各种方式来广州的300多人。随即又发现清军内部的军官有争取的可能，又发电把人召回来——一来一去，就没多少人愿意回来了。无奈之下，原来的“十路军围攻广州城”，成了黄兴带领120多个敢死队员直扑总督府擒杀两广总督张鸣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总督早就得到消息撤退了，革命党人陷入清军包围之中，伤亡惨重。

辛亥革命前声势最浩大的一场革命，可能是萍浏醴起义（由同盟会发动，但没有证据表明为孙中山领导）。但这场让清廷动用5万军队围剿的革命，也只坚持了半个月左右——抢到了两三千支枪，但没有明确的计划。起义最终被迅速扑灭，死难义军和群众超过万人。

3

值得回味的，还有黄冈起义的那批领导人。

黄冈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但直接策划者，是一个叫许雪秋的人。

许雪秋是一名华侨，而且是一名非常有钱的华侨。他的父亲是新加坡富商，去世后给他留下了非常丰厚的遗产。但许雪秋却没有因此成为一个坐吃山空的“富二代”，而是立志要拉起武装大干一场，推翻清朝。



许雪秋被当时的帮会人士称为“小孟尝”

黄冈起义是许雪秋一手策划的，但爆发的时间却比他预料的要早（和很多起义一样，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提前动手了）。当时许雪秋人在香港，一听起义消息，立刻带人赶到汕头，准备发动周边地区响应——但是，他刚到汕头，起义军就已经解散了。

许雪秋深刻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向孙中山提出要购买外国的新式武器，起义才可能成功。孙中山派人从日本运回了一船武器，由许雪秋负责派船接应。由于交接中出现了失误，那艘军火船最后一枪未卸，又开了回去。自此，一腔热血的许雪秋就开始失去同盟会高层的信任。

辛亥革命成功后，许雪秋重新召集队伍，配合革命军光复广东。但是，在当时已经山头林立的各种“革命队伍”中，许雪秋早已失去了“革命元勋”的光环。1912年5月，广东警卫军总司令陈炯明部下吴祥达将许雪秋逮捕，不加审判，就地枪决。

一个抱着革命理想并付诸行动的革命元勋，富家子弟，竟然在革命成功之后，被“自己人”杀了，死时只有37岁。

而黄冈起义的两个一线领导者呢？

陈涌波，与许雪秋一起被枪杀，年仅40岁。

余既成，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成为潮州光复军司令，之后没多久，被他的卫兵因擦枪不慎走火击中，治疗无效亡故，年仅38岁。

4

是不是觉得有点“无厘头”？

其实回顾一下武昌起义爆发之前的大大小小的起义，你就会发现，不仅起义的过程与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像许雪秋这样的“离奇”牺牲，也不鲜见。

1895年那场“夭折”的广州起义，一同谋划的有孙中山的密友陆皓东。他是上海富商之子，甘冒风险参加革命，却连起义爆发是什么样子都没见到，就被清军抓去处斩了。



陆皓东



史坚如



倪映典

1900年那场偏离攻击路线的惠州起义，参与者里有同样出生于殷实家庭的史坚如。他和哥哥卖掉了万贯家财，全身心投入革命。在惠州起义失败后，各革命党人遁走，他坚持自己一定要做成一件事，于是两次用炸药暗杀两广总督德寿，结果却搞错了德寿卧室的位置，失败后被捕处斩。

1910年初的广州新军起义，新军第一标的总指挥倪映典在阵前与前来劝降的清军将领谈话，被流弹击中落马，随后被清军抢入自己阵中处斩。起义军群龙无首，顿时溃退。

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其他省份的同盟会会员群情激奋，纷纷赶往起义地点，试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清廷早就掌握了他们的行踪，分道守候，绝大多数赶往支援的同盟会会员连战场是什么样子都没见到，就

在路上被清廷逮捕，处斩。

5

写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

一场场甚至有点近乎儿戏的起义，一位位死得如此“冤枉”的仁人志士，怎么就把清朝推翻了呢？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那些志士临刑前的表现。

陆皓东，被捕时只有27岁，被捕后遭受各种酷刑，但没有供出一个同党，只是大骂清朝“狗官”，自白书最后一句写的是“请速行刑”。他被砍头时，只有27岁。

史坚如，入狱后同样受尽酷刑，同样不吐一字，只是怒目圆睁。他被砍头时，只有22岁，是兴中会最年轻的会员。

倪映典，之所以肯出去和清军将领谈判，是因为对方也是同盟会会员。他上去怒喝：“你不是也是加入我党的吗？今义旗已举，何不响应？！”他被斩首时，只有25岁。



杨卓林

试图支援萍浏醴起义的杨卓林在扬州被捕，慨然承认自己就是革命党，在被逼供时怒喝：“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杨卓林耶！”就义时31岁。

即便是黄冈起义中那个被同盟会疏远的许雪秋，也并没有潜回新加坡去舒舒服服地做他的“富二代”，而是又加入了陶成章的光复会，散尽所有的财产，继续搞革命推翻清朝。

翻开辛亥革命前各类起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组织者和策划者很少有活过1912年的。但哪怕这些正值大好年华的革命志士死得有些不明不白，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同伴以及后来者的信心和决心。

一批批赴死，然后又一批批顶上来。

而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一开始近乎“粗糙”的起义，虽然爆发一次就被镇压一次，但被镇压一次就多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用同伴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且又多了一种动力，一分力量，一丝希望。

6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响起了历史性的一枪。

其实像很多次起义一样，这一次的起义也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甚至几乎就全盘皆输（参看《历史的温度》中《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但真的就这样搞成了。

若干年后，孙中山在倾尽自己全部精力写就的《建国方略》中这样评价黄冈起义：

“此次死难的同志都属同盟会干部，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

孙中山的这句话，应该指的不只是这场看上去有些“简陋”的起义，也包括在黄冈起义之前和之后爆发的大大小小各种起义。

没有这些起义，又哪来的辛亥革命？

馒头说

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十月围城》。

这部电影说的是1906年孙中山要到香港开会，香港各界人士，从商人到乞丐，从车夫到学生，都不惜死命保护孙中山的故事。影片结尾，孙中山终于如愿抵达开会地点，与国内各省派来的代表会晤。他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做出安排，然后全国各地革命烽火燃起，最终辛亥革命成功。

电影当然有虚构的成分，比如最后那幕孙中山指点江山的场景。

翻开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史，你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孙中山在全国各处“流窜”，然后发动各种看上去“不靠谱”的起义，又潜逃到全世界各地，之后又潜回来，再组织各种“不靠谱”的起义。

哪有像电影里那样，对一切都胸有成竹，计划周密？

就连武昌起义，孙中山也是在美国，第二天睡醒后才知道有起义这件事的。

这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可贵之处——他确实有一些革命理想主义，但有些人以一句简单又戏谑的“孙大炮”评价他，对他实在有失公平。

试问，虽然那时的大清王朝气数已尽，但有多少人敢，又有多少人懂得如何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大家都在尝试，都在努力，都在屡战屡败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有一个人，他坚定无畏，他信念十足，他不怕失败，一直带领大家继续前进，乃至成为大家的精神领袖。

当时除了孙中山，没有人能担负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从富商到帮派首领，从将领到贩夫走卒，都愿意笃信孙中山，都愿意跟着他矢志不渝地走下去，甚至都愿意牺牲性命去保护他。

因为孙中山确实向大家展示了一个理想的未来，并且身体力行，屡败屡战，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只要遭受一次孙中山遭遇过的挫折，就早早缴械投降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当时孙中山和袁世凯谁更适合当大总统的文章（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两个大总统，你选哪个？》）。无论从治国能力还是军队实力来看，袁世凯当时都有100个理由比孙中山更适合当大总统，但孙中山只凭借一个理由就能秒杀袁世凯，成为名垂千古、众人敬仰的伟人。

这个理由他自己写过，就是那著名的四个字：

天下为公。

悲壮黄花岗

这是一场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记载的著名起义，但同时，这又是一场对我们来说印象模糊的起义：100多人起义，72人牺牲，它为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大的意义？

1

1910年11月上旬，身处南洋的孙中山，可能既失望又激动。

失望在于，自1894年亲自组织第一场起义以来，大大小小的起义，已经发动过10次，无数义士前仆后继，却收效甚微。规模最大的一次萍浏醴起义，也就坚持了半个月，起义军和民众伤亡过万。

但这一年已经44岁的孙中山，也有一件颇为激动人心的事。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主要骨干。

会议决定，以清朝的部分新军为主力，再配合八百革命党人组成“敢死队”，发动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起义——不仅要夺取一城，还要以一城为基地，兵分数路，大举北伐。

所有与会的同盟会会员都心情激动，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这次起义，将吸取之前失败的种种教训，做到筹备最细致、筹款最充裕、武器最完备、规模空前，最终给予清廷致命一击。

起义的地点，被定在了广州。

2

各路筹备活动，随即全面铺开。

孙中山直接奔赴美国，他肩负的使命只有一个，却是一切工作开展的根本：筹款。

这一次的筹款，比以前几次都要艰苦。海外华人的资助一直是孙中

山进行革命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国内的几次起义结果，让海外的华人们也一度感到悲观和迷茫。好在孙中山个人还是拥有强大的魅力和威信，经过多方奔走，反复募集，最终为这次起义募来了大约16万大洋——其中来自美洲和南洋的，基本各占一半。

16万大洋虽然和革命党人之前的预期还有点差距，但这已经是历次起义筹备中，资金最充裕的一次了。

起义的具体组织工作，则交给了36岁的黄兴。

这位与孙中山并称为“孙黄”的著名革命家，也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这次起义当中。



黄兴

黄兴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统筹部，与以往的多次起义不同，黄兴这一次将准备工作做到最细，将起义筹备分了八个“课”：有专门调度新军起义人员的“调度课”，有负责购买和运送武器的“储备课”，有负责起草各种规则章程的“编制课”，有专门负责侦察敌情的“调查课”，还有专门负责各种文件的，专门负责掌管财政出纳的，连各路革命党人抵达广州的事务也有专人负责。

按黄兴的规划，届时这场在广州发起的起义，革命党人将兵分十

路，一举拿下广州，然后一路人马出击湖南和湖北，一路人马出击江西到南京，然后会师，开始大举北伐。

无论从哪一点看，这应该是同盟会自成立以来策划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起义。

起义的时间也定了下来：1911年4月13日。

但就在起义日子渐渐临近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3

打乱计划的，是一个名叫温生才的人。

温生才，广东梅县人，家境贫苦，参军退役后，到南洋打工生活。在1907年听了孙中山的一场演讲之后，他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温生才已经41岁了，但他依然血性十足。在目睹同盟会一次次起义失败后，温生才对清廷的愤怒与日俱增。尤其是同盟会在1910年3月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更是让他大受触动。

那个去行刺的同盟会的27岁英俊青年，舍一己之命，试图用炸弹炸死摄政王载沣，事败后被捕，自知必死，但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在狱中写下万人传诵的诗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没错，这个青年，就是汪精卫。汪精卫当时的义举感动了天下无数志士，其中也包括温生才——他决定以汪精卫为榜样，以一己之性命，换千万国人之觉醒。

1911年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在广州城外观看飞行师冯如（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的表演后起轿返城，有一人从人群中飞奔而出，投三枚炸弹，欺近孚琦轿前，连开四枪，一枪中孚琦额，一枪中头，两枪中腹，孚琦当场毙命。

这个人就是温生才。

其实温生才想杀的，是屡屡挫败同盟会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当杀了孚琦之后，他才发现杀错了人，但他并不后悔，当场被捕。

温生才被捕入狱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提审，问他为什么要暗杀大清官员。

温生才淡然回答：“不是暗杀，是明杀。”

问他什么叫“明杀”，他回答：“满清无道，日召外侮，皆此辈官吏阶之厉耳！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民族起见，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

严刑拷打之下，温生才一字不吐，官府最终决定将他在孚琦遇袭处处斩。

赴刑途中，温生才大笑不止，高声告诉周边围观百姓：“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许多事归我一身担当，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温生才随后被斩首、肢解、挖心以祭孚琦。

但让人们震撼的不是温生才被处斩，而是他临刑前的言语。这些人中包括被暗杀的对象，水师提督李准——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广东率先起义，直接推动和平光复广东全省。

但是，温生才的暗杀行为，之前没有和同盟会的任何人打招呼，属于自己临时起意。

这样的义举虽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也起到了负面作用——让清廷顿生警觉，广州全城戒严。

原定于4月13日举行的起义，被迫推迟到26日。



张鸣岐，辛亥革命成功后携款逃往日本，随后拥立袁世凯称帝，被封一等伯爵，卢沟桥事变后投靠了日本人，1945年9月15日病逝

起义军接到的坏消息，其实还不止这一件事。

4月25日，就在起义发动的前一天，坏消息再度传来：作为起义的重要力量，广州新军的机枪全被收缴，步枪虽然没上缴，但大部分子弹被收去。不仅如此，清军开始大量向广州增兵，城外的巡防营也开始调入城内。

做出这一切调动的，是两广总督张鸣岐。此人曾镇压过多次同盟会起义，可谓经验丰富。他的这些举动不仅釜底抽薪，更明显释放出一个信号：

和之前的多次起义一样，这次的广州起义，恐怕又提前被泄密了。

而且，因为广州城戒严，很多原先计划运入城内的枪支弹药都已经

进不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兴只能下令：暂缓起义。

一时间，分布于广州城内的各个机关迅速隐蔽，原先已经聚集到广州城的不少革命党人开始秘密分批出城。

但在这时候，却又传来了一个有利的消息：在顺德的巡防三营即将被调入广州城。

这个三营里的官兵，从上到下，十有七八都是革命党人或同情革命的人。此外，原本在城中说好准备配合起义的新军第二标的官兵将在5月3日之前退伍。

这时，作为起义前敌总指挥的黄兴，就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到底要不要继续将起义进行下去？

起义筹备总部此时也陷入了争执之中：有人表示一定要暂缓，忍耐为先，而有人表示机不可失，这个时机如果错过，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最终拍板的，只能还是黄兴。而他考虑的，可能比别人还要更深一层：

这次起义，一方面筹备如此之久，大家都满怀期待；另一方面，又向海外华人筹集了那么多钱款，如果一枪不发就偃旗息鼓，不仅对革命党人的士气是一个巨大打击，今后孙先生在海外筹款也将困难重重。

但如果真的发动起义，以眼下的局势，有多大的把握成功？

可想而知，当时的黄兴，面临怎样的煎熬。

最终，在4月27日的清晨，思考良久的黄兴，留下了一封书信：

“……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这是一封遗书。

知不可为而为之，黄兴准备拼死一战。

4月27日下午5点30分，一声凄厉的螺号在广州总督府附近响起。

100多个臂缠白色方巾，腰挂炸弹，手持长枪短枪的人出现在了大道上，呐喊着，向总督府狂奔而来。

只有这100多人？对，只有这100多人。

原先计划的十路起义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被减为四路，而四路中的三路，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发动——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路，要去广州城接应即将进城的起义新军和巡防营的。

当然，即便有人当时开城门接应，也会看到一场乌龙——大部分新军和巡防营的士兵手里只有没装子弹的步枪，而且，很多人根本就没接到起义的通知。

这时候，再把镜头摇回向总督府扑去的那100多个人，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空前的悲壮感——

他们勇往直前，他们孤立无援，他们，其实是去送死的。

起义军奔到总督府门前，遭遇了总督府卫队。起义者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有赞成的请举手！”

卫队以开枪作为回答。

双方顿时陷入枪战。

起义军一鼓作气攻占了总督府，却发现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往广东水师提督府。在将总督府点火后，起义军随即扑向水师提督府，随后与水师提督的亲卫队遭遇。



林文的祖父林鸿年是清朝道光年间的状元，做过出使琉球的大使。整个清朝在福建一共出过三个状元，林鸿年就是其中之一。林文的父亲林聂是举人，也做过官。所以，林文其实是标准的“官三代”

由于之前听闻这支亲卫队中有自己人，所以一个起义者站了出来，大喊：“我们都是汉人！应该一起同心！不要打了！”结果，被一枪命中头部，当场牺牲。

这个年轻人，才24岁，名叫林文。他家是官宦世家，本来根本就没

必要出来抛头颅洒热血。

枪声大作之后，起义军伤亡惨重，其中也包括黄兴。

黄兴是整个起义的领导者，也是可以和孙中山比肩的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但他在整场起义中根本没有打算坐镇指挥，留下遗书后，他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林文中枪倒地后，黄兴随即也被子弹打断了右手中指和食指。忍住疼痛的黄兴随即改变战略，让本来就人数不多的起义队伍兵分三路：一路攻督练公所；一路攻小北门；黄兴亲率一路，攻南大门，接应计划中要来支援的顺德巡防营——把城外的巡防营接进来，成了起义成功的唯一希望。

攻击督练公所和小北门的两路起义军，因为人数上的劣势，虽然奋战到天黑，但最终还是都失败了，除牺牲者外，悉数被俘。

而黄兴带队去南大门接应的起义军，还真的接到了少数闻讯赶来支援的巡防营官兵。

但是，却也上演了一出让人扼腕的悲剧。

可能因为时间仓促，巡防营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件事——臂缠白巾。黄兴手下的方声洞见对方没有白巾，率先开枪击毙了对方哨官温带雄，而温带雄恰恰是带队来支援起义军的。愤怒的巡防营立刻反击，一枪命中方声洞，后者当场身亡。

两队自己人，就这样激烈地交上了火。

乱战之中，双方伤亡惨重，最终竟只有黄兴一人脱离战场，逃入了一家洋货店，在店伙计的帮助下，乔装改扮后逃出城去。他在城外遇见了副指挥赵声，两人抱头痛哭。

一场同盟会有史以来策划最严密的起义，最终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方声洞之前在日本留学，给妻子写下诀别信后，运送武器到广州，随后坚决留下要求参加起义，结果却死在自己同志手里



黄花岗起义后被捕的部分革命志士，均殉难

起义失败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到了4月27日晚间，起义队伍已经完全被打散了，但很多人都没有屈服，有的人坚持巷战，有的人选择自杀，而有31个人，最终被清政府抓获。

这些人，都值得留下一笔。



陈可钧

陈可钧，24岁，被捕后清朝官吏问他：“你一个白面书生，何苦要造反自己作践自己？”

陈可钧回答：“起义没能成功，只能说是天意。但只要能唤醒同胞，继续奋斗，我也十分满足了，你们这种利欲熏心的冷血动物，怎么会懂得这些？”

临刑前，陈可钧慨然大笑，只求速死。

李德山，43岁，临刑前对清廷官员说的话是：“大丈夫为国捐躯，是分内事。我不是不能荣华富贵，是不能像你们这样认贼作父，不知羞耻！”

李雁南，31岁，临刑前说的话是：“可恨的是我身受两处重伤，不能再打了。你们不过数年，必亡国。不要再说了！枪杀我的话，记得从我嘴里射击！”



林觉民

陈更新，21岁，与清军激战三昼夜才被俘。清官员问他，年纪那么轻，为什么参与造反，他慨然回答：“同胞们都在做梦，我们是在叫醒他

们！怎么叫造反？杀身成仁，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你们这些鼠辈懂什么？求速死！”

喻培伦，精于研制炸弹，在汪精卫刺杀载沣时就参与提供炸弹。这次起义，他不带枪，只扔炸弹，最后伤重被俘，临刑前高喊：“学术杀不了！革命更杀不了！”

在这些人中，还有一个是林觉民，他因一篇《与妻书》而被我们所熟知：“……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被捕的革命党人，全都被处以死刑。

7

众义士死后，连同之前起义牺牲的同志，被暴尸街头，清廷明令不许收殓。

当时有个《平民日报》的记者，叫潘达微，也是同盟会会员。他组织了100多个收尸人，不顾当局禁令，将广州街头那些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全部收殓，一共72具。因为潘达微的钱不够买棺木，只能把几具尸体放到一个棺材里合葬。



后共统计遇难烈士为86人，但仍取“七十二烈士”之名。潘达微1929年去世。1951年，中国政府遵其遗愿，将他的墓地移葬至黄花岗旁

随后，潘达微抵押了自己的房产，在广州城外郊区的红花岗买了一块地，作为烈士的安葬之地。

他觉得“红花”二字过艳，将此地改名为“黄花岗”。

黄花，即菊花，有节烈之意，亦取“黄花晚节”，比喻人到了晚年，依旧气节高尚。

只是，那座墓碑下埋的烈士，莫说晚年，大多正值青壮之年。

“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

馒头说

看黄花岗起义全程，有时候会有扼腕之叹。

比如温生才突如其来的刺杀，比如因不缠白毛巾造成的自相残杀，在整个起义的筹备过程中，其实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失误，最后，功败垂成。

但再看整个起义的过程，有时又会血脉偾张，尤其是在不利的情况下，黄兴带着那100多人还是准备冒死起义。

要知道，那100多个人，不少是同盟会来自各省的精良骨干，若放到日后，很可能都是一军之帅，一省之长。而且很多人都家世良好，完全有理由不去送死。

但他们义无反顾。

可能也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举动好傻——没把握，就等下一次嘛，急什么？

说实话，以前我也这样觉得。但每多读一次那个时代的历史，就多理解黄兴他们一分：

火山的内部已经炙热难当，熔浆滚动，可能只要再有一颗火星，就能引发一场最猛烈的喷发，引爆黑暗时代，迎来新的世纪。

但是，谁来当火星？当一颗火星被扑灭后，谁来接力当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

在1911年4月26日的那个夜晚，对黄兴而言，最容易的一件事，莫过于说一句：

“先撤，再等下次机会！”

但难就难在，依旧下令出击。

谁都知道，漫漫长夜即将迎来黎明，但黎明前的那一刻是最黑暗的。那声划破夜空的鸡鸣，背后是无数志士仁人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孙中山对这场起义的评价是：

“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

确实，黄花岗起义之后不到半年，武昌再度爆发起义，终于完成了之前所有起义者的夙愿。

前仆后继，星火燎原。

英雄不朽。

棉湖战役：决定黄埔军校存亡的生死一战

可能会有人觉得，“信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但很多时候，“信念”确实是一个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即便是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也不例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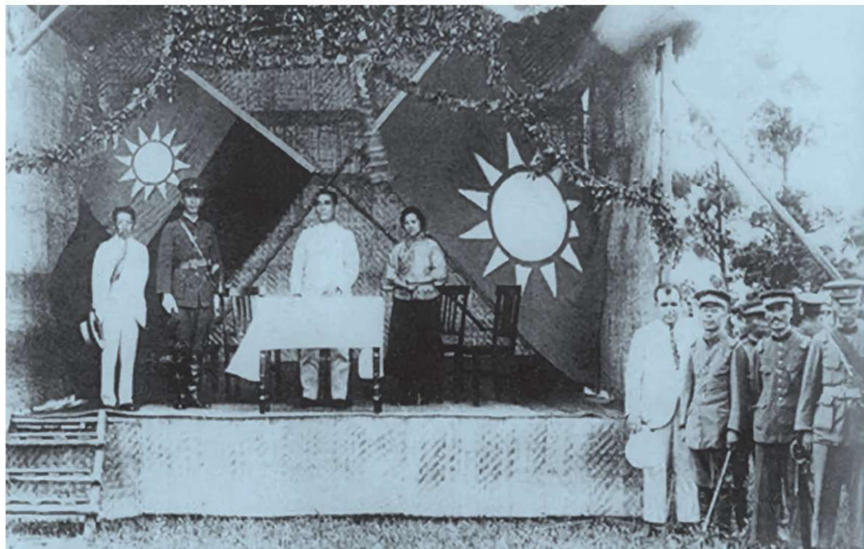
先回到1922年的广东。

这一年，孙中山实在有点郁闷。

尽管广东因他已俨然成了当时很多追求革命和进步人士心目中的圣地，但是，由于广东各路军阀盘根错节，手中没枪的孙中山一度四处碰壁，有时甚至寸步难行。

1922年6月16日，和孙中山一路“相爱相杀”的广东军阀陈炯明终于选择和他公开决裂，炮轰总统府。之后孙中山用尽各种办法，说服滇、桂、粤联军组成西路讨伐军击退陈炯明，这才重新回到广州。

痛定思痛的孙中山终于认清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下定决心要拥有自己的军队。1924年6月16日——他特地选择了这个日子，孙中山宣布他一手缔造的军校正式开学。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主席台上还有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左一）、校长蒋介石（左二）

那所学校，就是黄埔军校。

按照原先的计划，黄埔军校的学生应该至少学满一年，但由于革命的形势实在紧迫，黄埔一期的学生1924年5月入学，半年之后就毕业入伍了。而在一期生毕业的时候，黄埔三期的学生也已经进校学习了。

也就是在1924年，从北京到广东，整个中国的局势一下子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在北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兵不血刃地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但因为自身实力不够，他只能不断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顺带掣肘各怀心事的段祺瑞和张作霖。

在广东，当时已经有恙在身的孙中山，思虑再三后毅然决定抱病北上。而孙中山前脚刚走，一直蛰伏在东江的陈炯明后脚就组织起“救粤军”，以他的手下悍将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为副总指挥，率领7个军和5个独立师共6万人分三路直扑广州，试图收复失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革命政府在1925年1月15日联合滇、桂、粤各军成立“东征军”，准备和陈炯明的“救粤军”决一死战，即广州革命政府的第一次东征。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作为国民党自己的嫡系，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却不满意了。

2

1924年底，何应钦将一封学生军的联名请愿书交了上去。

那一年，何应钦34岁，是黄埔军校的副总教官。

何应钦上交的那份请愿书，是表达全体黄埔军校师生不满的。按照“东征军”的部署，分成左、中、右三路迎击陈炯明的军队：左路军是杨希闵的滇军，中路军是刘震寰的桂军，右路军是许崇智的粤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因为几乎没有战斗经验，只是被安排为“预备队”。

其时，黄埔军校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正规军队：黄埔教导团一团和二团——何应钦就是教导一团的团长。说他们没什么战斗经验，也确实没错，因为这支学生军之前只参与了“广州商团事变”，与广州商团的雇佣武装交过火，这和真正上战场打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而从军队的构成来看，他们也确实可以称为“学生军”：军校的教官担任团长和营长；刚刚毕业才几个月的一期生担任连长和排长，以及营、连一级的党代表；二期生是步兵总队、炮兵营、兵工队、辎重队的组成主体；三期生编入教导一团第一营。

但是，就是这支学生军，战斗积极性却空前高涨，因为绝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们进校学习和毕业之后的使命——打倒军阀，完成革命，振兴中华。

在这批学生军的坚持请愿之下，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也开始极力争取，最终，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被编入了许崇智的右路军，随正规军一起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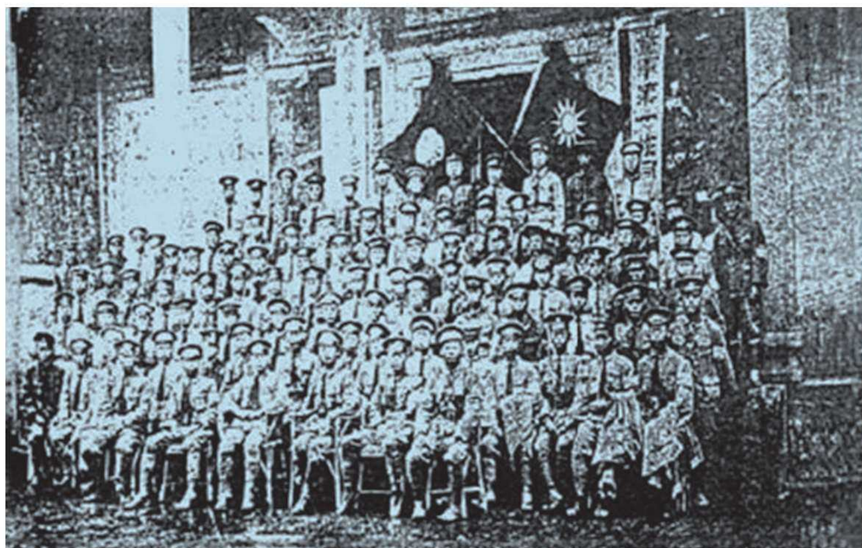
虽然成军，但那些滇军或桂军的“老兵”是看不起这些黄埔学生军的：在课堂上讲讲道理，去操场走个正步还行，真上战场，还不吓得屁滚尿流？

但谁也没想到，这支学生军上来就让所有人大吃一惊：1925年2月15日，担任主攻的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攻下了陈炯明老巢东江的门户淡水。

这场战斗让陈炯明部和滇、桂、粤各部，都第一次认真审视起这支学生军。

首先，黄埔学生军的武器装备精良。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黄埔学生军配备的步枪、机枪、手榴弹都很充足，大炮的火力也明显强于其他各军。

其次，他们军纪严明。黄埔军校教导团编制为“三三制”（团辖三个营，营辖三个连，连辖三个排），分工明确，指挥灵活，可聚可散。且全军实行“连坐法”：一团人若全溃退，必须枪毙团长；若团长带头不退但全团退，必须枪毙三个营长，以此类推。



黄埔军校教导一团在第一次东征时的合影

最后，他们用“党”来“武装”全军。黄埔教导团从团到排，各级都设“党代表”。虽然这种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后来创立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有很大区别，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士兵的凝聚力高，战斗力强。以攻打淡水城为例，黄埔教导团上来就组织一个100人的敢死队冲锋，但冲在最前面的是10个营、连党代表（其中国民党2人，共产党8人）。长官带头，士兵立刻奋勇争先，瞬间夺城。

但是，正当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主力的右路军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东征军”的左路和中路却出了问题。

左路的滇军和中路的桂军其实本来就是碍于孙中山的压力，再加上有各自的目的才加入“东征军”的。当“东征军”高歌猛进的时候，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尤其是后勤补给路线当时拉得实在太长，存在一定风险。

于是，在1925年3月初，“东征军”的进攻路线图上出现了奇怪的一幕：

左路的滇军和中路的桂军，开始向广州方向撤退，虽然有保护补给线的战略意图，但也导致之前一路势如破竹的右路军顿时失去了侧翼保护，成了深入敌后的孤军。

老辣的林虎立刻调集之前被“东征军”左路和中路压制的部队，全方位向黄埔教导团扑来，准备全歼这支学生军。

3

1925年3月12日，蒋介石夜不能寐。

那一年，蒋介石38岁，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也是此次东征右路军的总参谋长。

就在这一天，黄埔教导团和林虎大军要决一死战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林虎军的左路前队已经抵达棉湖，右路前队驻扎到不远的鲤湖，两路军加起来超过1万人，还有1万多的增援部队在陆续赶来。

而“东征军”的右路军驻扎在棉湖正面战线的，只有黄埔教导一团的1000多学生军，粤军的第七旅正在赶来途中，而黄埔教导二团在棉湖东南一带。

按能在短时间内直接投入战场的兵力来计算，黄埔军和林虎军的人数比例差不多是1：10，是典型的“以少打多”。

但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因为如果此战一退，东征一个多月来的成果将全部化为泡影，陈炯明的部队将重新获得喘息机会，然后继续威胁广州大本营的安全。

但是，如果要打，以黄埔两个教导团3000学生军的兵力，若被打败乃至被歼灭，那么黄埔军校苦心培育的精英将毁于一旦，“黄埔军校”这四个字很有可能也将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手里只有这两个教导团的兵力，如果失败，广州的各方势力都会重新抬头，整个根基也将全盘动摇。

在和同样亲临一线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随军苏联顾问加仑将军商议之后，蒋介石还是决定要打。他专门下令给何应钦：“此战事关大局，必须要决死一战，后退者一律杀无赦！”

而就在前线的黄埔子弟兵枕戈待旦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孙中山在这一天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这位黄埔军校的缔造者，在自己的子弟兵即将进行决定命运的生死大战之前，闭上了双眼。

临阵失去领袖，对士气的打击可想而知。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不把孙中山去世的消息告诉正在棉湖一线准备决战的黄埔子弟。

大战在即，秘不发丧。

4

3月13日上午8点30分，棉湖战役正式拉开战幕。

首先发起冲锋的，恰恰是人数占绝对劣势的黄埔教导一团。在团长何应钦的命令下，一营营长顾祝同率军向敌军正面防线发起冲锋。

林虎军确实经验老到，在稳住阵脚之后，开始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发起了反冲锋。双方部队交织在一起，开始血战。

由于黄埔教导团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所以在每一个战斗阵地上都面对着数倍于己的敌人，伤亡数字直线上升。但黄埔学生军在高涨的士气鼓舞下，战斗力也是惊人的，从营到连到排，都是长官带头冲锋，一营在顾祝同的带领下甚至已经和敌人拼起了刺刀。

在胶着的战况中，林虎军发现了教导一团的指挥部驻扎地——曾圹村。于是，潮水一般的敌军开始向村子方向猛攻。

负责拱卫曾圹村的一营一连拼死抵抗，连长余海滨（共产党员）当场阵亡，副连长刘赤忱负伤，排长、副排长都负伤或阵亡，全连军官只剩下党代表李奇中和司务长阎国福，其余死伤殆尽。

何应钦急忙调二营营长刘峙率六连增援，但林虎也摸清了团指挥部在村里的具体位置，派重兵冒死突击。何应钦把最后的预备队四连也顶了上去，却依旧抵挡不住敌人的冲击，林虎军已经逼近离团指挥部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蒋介石本人甚至听到了敌军士兵“活捉蒋介石”的呐喊。

在团指挥部里不仅有蒋介石，还有廖仲恺、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团，一旦这个指挥部被端掉，整个中国历史就会被改写。

关键时刻，蒋介石对何应钦说：“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将遭受重大挫折！”

何应钦于是下令吹起冲锋号，自己带头第一个冲了上去，而包括勤务兵、炊事班伙夫在内的所有人，都拿上武器冲了出去。

在指挥室里的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也掏出手枪跟了出去。



棉湖战役指挥部旧址，如今成为棉湖战役展览室

5

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有两个人必须一提。

一个人是共产党员，叫曹石泉，是当时黄埔军校学兵连的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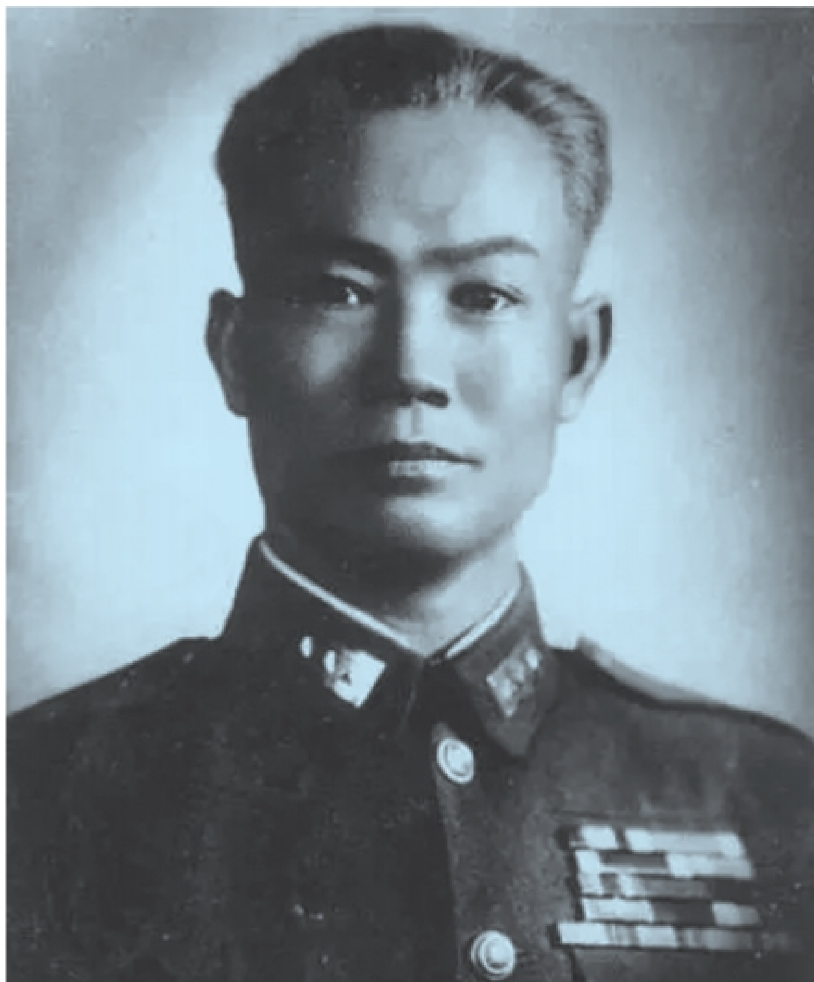
就在林虎军冲进村子要“活捉蒋介石”的时候，曹石泉的学兵连正好从其他地方调回。看到战况危急，曹石泉带着60多名学兵连士兵立刻加入战斗，拼死阻击，大大缓解了危急局势。事后，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都大大肯定了曹石泉的表现。

另一个人，是国民党员，叫陈诚，是当时教导一团的炮兵连连长。

大炮原来是黄埔学生军的优势所在，但在这场棉湖战役中，由于大炮使用次数过多，撞针过热而发软，通通成了哑炮。陈诚将炮兵连撤到团部指挥所附近后，遭遇了敌军冲锋。



曹石泉，中国共产党党员。曹石泉在1925年6月23日，带领黄埔军校参加广州各界援助五卅运动的集会游行，被推选为军界总领队。当日，他率游行队伍进至沙基路时，遭英、法海军陆战队扫射，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



陈诚，棉湖一战后深得蒋介石信任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斥责陈诚：“你不是炮兵连长吗？炮都打不响！”

陈诚闻言，冲上前去亲自点炮。由于大炮经过了一段时间冷却，撞针已经变硬，所以陈诚一点火，一发炮弹呼啸而出，直接落在了冲入村子的敌人中间。陈诚又连发两炮，全部命中。

蒋介石一拍大腿：“好！”当场就将陈诚提升为炮兵营长。

冲入村子的林虎军忽然遭遇持续炮击，阵形大乱，再加上教导一团的拼死反击，只能向后溃退。

这场从早上8点开始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4点。

黄埔军校教导一团经过8小时鏖战，伤亡惨重：副营长阵亡一人；9个连长，6人阵亡，3人负伤；三营的9个排长阵亡7个，一个385人的营只剩下111人。全团伤亡过半。

就在黄埔教导一团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粤军第七旅和教导二团相继赶到并加入战斗，开始全面反攻。林虎军虽然在兵力上依旧占据优势，但士气已经被完全摧垮，打到下午6点，开始掉头撤退。

至此，棉湖血战以黄埔学生军的获胜而告终。

6

棉湖之役，让黄埔学生军一战成名。

从东征的态势上看，棉湖一战击溃林虎部，让陈炯明最后反扑的希望破灭，在之后的战斗中几乎再也没有形成有力的反抗。



林虎，同盟会会员，曾响应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起兵讨袁，后因孙陈不和而跟随陈炯明；棉湖兵败后，再被“二次东征”彻底打败，就此淡出军政两界，之后与蒋介石也划清界限；1956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0年逝世

从军校本身的角度看，黄埔军校的学生军通过这一战不仅大大磨砺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当然，损失也非常惨重），更是一举打出军威，巩固了威信，对之后的北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场战役后的总结会上，党代表廖仲恺兴奋地说：“我们队伍的光

彩出来了。”

而情绪最激动的，是苏联顾问加仑将军。

加仑将军在5分钟的发言中，高度赞扬了黄埔军校教导一团，称“只有非常优秀的苏联红军部队才打得出这样的战役”，“不独在中国少见，即使在欧洲世界大战中亦难见，是近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战例。”

为此，加仑将军在发言结尾高喊“何应钦团长万岁！”，并将自己的佩剑赠给了何应钦。

何应钦也因在此战中冒死冲锋，和蒋介石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尽管后来两人闹过不少矛盾，但始终没有彻底翻脸。而何应钦本人也很看重这次战斗经历，这可能是他戎马生涯中最后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在战场上面临生死。在之后的几十年岁月中，每年的3月13日，何应钦都要召集经历此战的黄埔师生共同纪念。

而那些参与过此战的不少中低级黄埔军官乃至列兵，都在之后数十年官拜上将、中将：刘峙、陈诚、蒋鼎文（当时是连长）、宋希濂（当时是排长）、郑洞国（当时是排长）……



加仑将军，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是一名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苏联红军将领，被委派到中国做军事顾问，经常身先士卒。他在回到苏联后成为第一批元帅，但后来在斯大林的“大肃反”中被杀

至于蒋介石，他曾经评价过自己一生中的几十场重要战役，把棉湖战役放在了第一位。这场战役对黄埔学生军，对黄埔军校，对他本人，都有无法替代的意义。

他在战役获胜后，由衷发出过一句感慨：

“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论规模，棉湖战役并不是多大的一场战役，加仑将军的夸赞也多有溢美之词。

但是，如果从意义上来说，棉湖战役对于中国革命而言，确实意义非凡。

而这场战役最让我个人动容的，是整支黄埔学生军展现出的那股子“精气神”。

总结这支学生军获胜的原因，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条：这支军队是有信仰的。

孙中山在建立黄埔军校之初，就把一副对联挂到了门口：“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加上国共合作建校，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黄埔军校读书、毕业、从军的学生们，无论出身、地位、党派，都是以统一广东、统一全国、振兴中华为目标的，所以打起仗来能够勇往直前，以一当百。而这是当时绝大部分偏安一隅，只想着抢占地盘的军阀部队望尘莫及的。

在东征的途中，黄埔军校官兵师生纪律严明，精神抖擞。沿途两旁的老百姓自发送水，送鸡蛋，送烤红薯——天下苦军阀久矣。老百姓会自发为黄埔学生军运送物资，刺探情报。

这一幕幕画面，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

所以，当何应钦和当初的黄埔子弟们在海峡对岸纪念“棉湖战役”时，是否也会有过几分唏嘘：当年同样都是满腔热血，雄姿英发，深受人民爱戴，但后来为何差距越来越大？

回望棉湖战役，它不仅关乎初生的黄埔军校的生死，也留下很多别样的回味与思考——对他们，也对我们自己：

本是同根。

勿忘初心。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棉湖战役》（张媛，《黄埔》，2016年第4期）

2.《孙中山先生与黄埔军校第一期生》（陈予欢，新浪历史，2014年6月9日）

3.《1924年11月20日，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成立》（《黄埔》，2010年第5期）

4.《蒋介石与黄埔军校第一期生》（陈予欢，《黄埔》，2012年第6期）

5.《两次东征中的“黄埔军”》（张建安，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1年5月25日）

6.《何应钦与棉湖大捷》（陈予欢，新浪历史，2014年7月1日）

7.《在第一、二次东征中牺牲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卜穗文，《广东史志》，1995年第21期）

8.《棉湖战役——国共精英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聂凌、丁鹏，海峡之声网，2014年5月4日）

日籍八路军：抗战期间的特殊群体

在我们熟悉的各种电视剧和电影中，“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永远是一对势同水火的存在。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我们的八路军中间，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1

1939年1月2日，位于山西省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元旦迎新集会”。

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迎新集会的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日本人。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八路军刚刚成立不久的前方总指挥部集会上出现三个日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

这三名日本人不仅登上了舞台，其中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人还站到话筒前发了言。

前田光繁的发言时间不长，但内容却让人意外，主要就是三点：

第一，八路军让我们获得了新生；

第二，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三，要求参加八路军。

前田光繁发言完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了讲台，与三名日本人一一握手。面对台下所有八路军官兵，朱总司令说：

“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

话音未落，台下掌声一片。

前田光繁和他身后的小林武夫、冈田义雄齐刷刷立正，敬了一个标

准的中国军人军礼。

这三个人，由此成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批日籍八路军。

2

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期间都有一点共识：日军俘虏不好抓。



时任115师343旅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他曾回忆：“我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个鬼子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被敌人打伤了。”

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算是国军抓获日军俘虏比较多的一次，但也只抓到了700多个；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八路军更是一个日军俘虏也

没抓到，让指挥作战的林彪大感意外。

那么，为什么有日本人不仅做了俘虏，还志愿加入八路军，为中国人作战呢？

首先，尽管日本当时举国陷入了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心甘情愿踏上陌生国土作战的，甚至有些人并不是作战人员。

比如发言的前田光繁，他就是1937年作为“满铁”员工被派到中国的。1938年，在河北邢台双庙车站监工的他，在睡梦中就被八路军俘虏了。

其次，即便是当初抱着“为天皇而战”的信念加入部队，有些人实际参军后也发现现实与想象有巨大差距。

比如后来成为俘虏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小林宽澄，在新兵入伍第一天就因为戴眼镜被长官无缘无故用皮鞋抽了一顿耳光，理由仅仅是“看上去有文化，肯定很傲慢”。这种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当时在日军中很普遍，有一些日军新兵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而切腹自杀。

此外，日军的底层士兵待遇也很差。据后来被俘的大阪师团的小林清回忆，当时他作为上等兵，一个月薪饷也就10.24日元，其中3元是必须扣除的储蓄金，5元是必须要买的公债，剩下的钱买几包香烟后就所剩无几了。而长官还要克扣下级士兵的薪饷，甚至冒用下级士兵的名字将他家乡寄过来的钱款贪污下来。

再次，踏入中国战场后，不少日本士兵目睹自己的战友在别国土地上奸淫烧杀，感到无法接受。

小林宽澄回忆，有一次他和班长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4个中国男人，班长随即下令小林上去练刺刀。

“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人踢倒在地，然后将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这么被刺死了。”

小林一直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叫“桐林村”，称那一幕给他巨大的震

撼。



1939年，小林宽澄（前排右一）入伍前夕。他在入伍前是一名僧人，继承了家族传下来的一座寺庙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厌战和思乡情绪。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军方给官兵们宣传的是“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士兵的心气也很高，所以很少有投降的人。但历经淞沪会战等一系列血战之后，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进展超出预期，但却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反而陷入战争泥淖。

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那些本来就没有被彻底“洗脑”的日本士兵开始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产生怀疑，信念开始动摇，对自己未来的生死感到担忧，战斗意志开始逐步瓦解。

3

那么，就因为这些因素，那些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去阻止乃至抵抗自己的同胞了吗？

必须承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事实上，无论是前田光繁还是小林宽澄，那些后来成为八路军的日

本人在一开始被俘虏时想到的都是两个字：自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更因为日军一直向他们灌输的是“中国军队虐杀俘虏”。一想到自己的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恶，他们也觉得自己肯定凶多吉少。

但恰恰是之前的宣传，让他们被俘后在心理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

前田光繁在被俘时，也就挨过一个耳光——因为俘虏他的八路军战士太恨日本人。之后他被安排与曾留学日本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个窑洞。每天他吃的伙食是馒头加有肉的炒菜，而一般的八路军战士只能吃小米饭加野菜汤。

张香山每天都会和前田光繁讲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日军侵华的本质。并对他说：

“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好不容易来了，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话说‘舍命最愚蠢’吗？不要急，可以多用些时间慢慢考虑，如果你想回去，就让你回去！”

被俘虏的日军士兵一个共同的回忆，就是八路军非常尊重俘虏的人格，不虐待他们，也不会动他们的随身财物。这和抗战初期八路军就颁布的俘虏政策有很大关系：

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

二、不取俘虏财物，唯军用品没收之；



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前田光繁（后改名杉本一夫）

三、医治敌军伤兵；

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

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

六、不干涉俘虏宗教信仰。

这些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被切实执行，这也使得日本俘虏在长时间和八路军相处之后，不仅在情感上被打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改变。

原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被八路军129师俘虏一年半，一直在策划逃跑计划。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一年半的时间里，心中一直隐蔽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

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三天三夜，在八路军医生的悉心照料下脱离危险。当他醒来后，守候在他身旁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手里还拎着一桶当时在八路军中很珍贵的酱菜。

山田一郎在日记中写道：

“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上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

当然，鉴于日军对本方被俘虏士兵的严酷态度和审查制度，不少日本被俘士兵也不愿意再回去。当时也确实曾有过一例：一名被俘日军士兵坚决要求回去，八路军放行。但归队后的他被长官严酷虐待，并要交军法处判刑，最终他又逃出来重新向八路军投诚。

前田光繁就说过一句话：“八路军是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不可思议的军队。一到八路军的部队，就会被他们的优良作风吸引住，再也不想离开这支队伍。”

4

那么，那些成为八路军的日本籍战士，主要做什么呢？

首先，是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

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不少，所以不少有技术特长的

日军俘虏，最后成了八路军中的技术骨干。

比如小林清在日军部队中是机枪手，也会操作掷弹筒。当时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来说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缴获来了却不会用。小林清就成了教授使用这些武器的教员。

前田光繁本身就有技术底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奉命来到解放军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担任日工科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当时航空学校的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间接帮助航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

其次，就是利用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做最有说服力的反战宣传。

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等7名日本人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觉醒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觉醒》。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消息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解放同盟”等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觉醒联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军士兵编写、印刷、散发了100多种宣传品，促进他们的觉醒。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成员正在分发自己编印的反战宣传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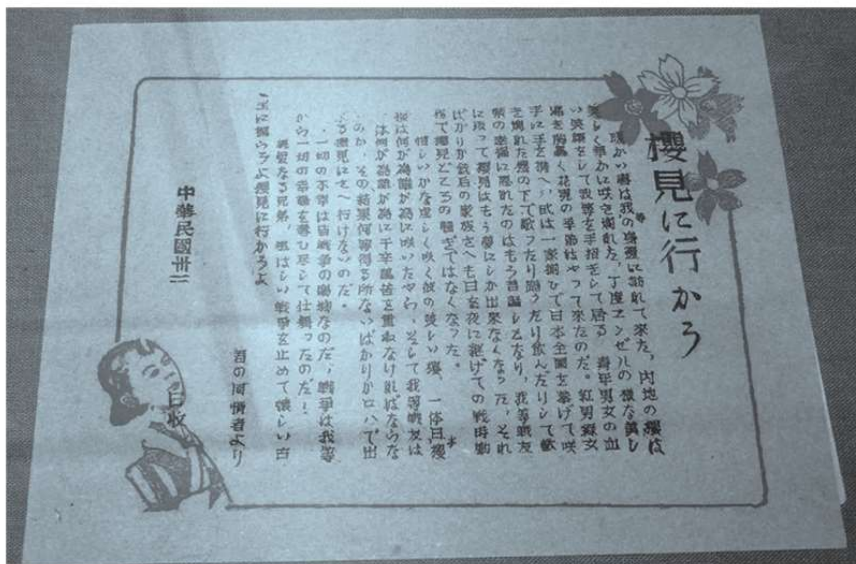
然后，就是亲自上前线送慰问袋和对日军喊话。



日籍八路军正在制作装有传单和食品的慰问袋

给前线官兵送慰问袋是日本的风俗。在侵华战争发动初期，日本的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8~12只慰问袋，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高级。但是，随着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慰问袋的数量和质量直线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开始给日军制作慰问袋——里面有烟、酒，但主要是各种反战标语和宣传画。在日籍八路军的建议下，慰问袋里的宣传画专门针对日军士兵的"痛点"——穿和服的女子、富士山风景等等，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离开家乡侵略他国是多么不明智。每年4月左右，给日军的慰问袋中甚至还会放进几枝樱花。

一开始，八路军也会在日军据守的碉堡前喊话，但内容大多是"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举行兵变！到八路军中来！"。这些比较生硬的口号效果不佳，甚至还会引起日军士兵的反感。日籍八路军加入喊话队伍后，情况立刻发生改观。



櫻見に行かう

暖かい春は我々の陣営に訪れて來た、內地の櫻は美しく華かに咲き亂れた、丁度エンゼルの様な美しい笑顔をして我等を手招きして居る 青年男女の血湧き胸躍る花見の季節はやつて來たのだ。紅男綠女手に手を携へ、或は一家揃ひて日本全國を擧げて咲き亂れた櫻の下で歌つたり踊つたり飲んだりして歡樂の幸福に惑れたのはもう昔話となり、我等戰友に取つて櫻見はもう夢にしか出來なくなつた、そればかりか銃后の家族さへも日夜に擧げての戰時動員で櫻見どころの騷ぎではなくなつた。

惜しいかな空しく咲く彼の美しい櫻、一体日本櫻は何が為に咲いたやら、そして我等戰友は一体何が為に千辛萬苦を重ね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か、その結果何等得る所ないばかりか口ハで出來る櫻見にさへ行けないのだ。

一切の不幸は皆戰爭の賜物なのだ、戰爭は我等から一切の幸福を奪ひ去つて仕舞つたのだ！

親愛なる兄弟、我はしい戰爭を止めて懷しい古里に歸らうよ櫻見に行かうよ

君の同情者より

中華民國卅二

日本

日籍八路军写的传单《回家看樱花去吧》

1943年深秋，日籍八路军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石田雄上来并不喊口号，而是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歌曲：“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伤……”

歌声随风飘进碉堡，原本还在开炮射击的碉堡变得寂静无声，日本士兵和军官都在静静听歌。

同为日籍八路军的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创始盟员，文章写得很好，还能画一手好画。秋山经常和日军通信，他收到的来自日军士兵的信摞在一起超过30厘米，后来有其他日籍八路军去日军碉堡喊话，对方还会有人问：“秋山君在哪里？他还好吧？”由于秋山的“攻心力”太强，日军还专门下令通缉他，悬赏是连升两级和奖励1万元。

在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中，有一半人表示见到过八路军发送的慰问袋，有20%的人听过喊话，很多人都表示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以及“八路军中有不少日本人”。

在整个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日籍八路军为阻止自己同胞的侵略行为

而献出了生命。

1941年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人宫川英男，一度担任“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宫川英男随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官庄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重兵包围。眼看突围无望，为了不当俘虏，宫川英男举枪自尽，时年27岁。当时宫川英男的中国战友冒了极大的风险，突破日军的封锁，最终抢回宫川英男的遗体，安葬在根据地内，后移入烈士公墓。

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

原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田中实原，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八路军俘虏，经感化教育后成为日籍八路军。1943年5月，田中实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专门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实原不吐一字，最终就义。

日籍八路军今野博，在1941年7月7日（“七七事变”四周年）宣誓加入八路军，一直和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今野博在日照县傅疃一带被捕，受到酷刑，被要求说出他开展工作时联络的各种关系。但他一字不吐，并表示“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军去”，最终被杀害。

今野博宁死不屈的一个证据是，他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事后没有一户暴露受害，而他秘密接过头的敌伪军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人受到牵连。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自1937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等俘虏日军6213人，接受投诚日军746人。

而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日籍八路军、新四军有36人。

6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原先那些日籍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面临自己的人生抉择。

一部分日籍八路军选择直接回国，八路军方面给出了优厚的路费和安家费——按小林宽澄的回忆，当时共产党给的安家费，够他在东京买一栋房子。一部分日籍八路军因为工作需要，转战东北，变成了“日籍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之后的抗美援朝，1954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陆陆续续回国。

只是，这批日籍八路军，包括后来的日籍解放军，回国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

除了被自己的同胞嘲讽为“叛徒”，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也非常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类似烧锅炉那样的劳苦低薪工作。而且，他们还因为有“赤化”嫌疑而受到监视——小林宽澄在70多岁退休后，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跑来对小林宽澄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宽澄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受监视的。

不过，尽管生活拮据，前田光繁、小林宽澄他们却一直组织各种集会，并到日本全国去发表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本质，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追求和平。小林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团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把这个团体取名为“椰子会”——在日文发音中，“椰子”的发音（不是片假名发音）有“八”和“四”的意思，寓意八路军和新四军。

而他们一刻都没有忘记中国。曾担任115师团政治处干事的符浩，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还有当年的日籍八路军托人来问，他是不是当年的“符科长”。符浩惊喜地请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问他们想吃什么，而那批日籍八路军就提出一个要求：“包顿饺子！”

而中国也没有忘记他们。

小林宽澄后来运气不错，受聘于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担任翻译。当时由于装卸手段落后，日本的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经常要等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宽澄有什么办法，小林宽澄就去中国找了自己的老战友。后来，目的地的港务局收到一份通知：小林宽澄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优先卸货。

2015年9月，小林宽澄作为代表，受邀来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作为一名八路军老战士，他还被授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9年1月16日，小林宽澄在日本去世，享年99岁。他是参加过抗战的日籍八路军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馒头说

记得第一次了解到有关“日籍八路军”的事迹时，我自己也觉得很新鲜。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侵华的日军士兵都是被彻底“洗脑”的，让他们做俘虏已经是千难万难了，怎么还能打动他们来投诚，甚至让他们反过去劝说自己当初的战友？

但是，这确实是有理由的，而且很充分。

小林宽澄加入八路军后，在山东日照的一个日军碉堡前喊过话，他是这么喊的：

“我真正认识到，日本是侵略者，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掠夺中国资源、抓中国劳工。你们想一想，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去侵略，他们为什么跟日军打仗，因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呀！”

什么是理由？这就是理由。你再灌输什么“为天皇而战”，再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侵略就是侵略，这是毋庸辩驳的事实。而同样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从心底里还是知道《礼记》中“师出有名”这句话的含义的。

事实上，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术素养，日军确实在很多方面都要比中国军队高一筹，所以日军士兵在心理上还是有一定优越感的。如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胶着战乃至日方处于劣势，在中国军队的心理攻势下，投诚的日军官兵很可能会呈几何倍数增长。

但越是如此，越显示出前田光繁、小林宽澄这批人的可贵。

他们不仅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作用，回到自己的祖国后，还在不断努力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真相和战争的残酷。

在参加完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后，已经年近百岁的小林宽澄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爱护，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

希望小林君的愿望能够实现，或者，能够传递下去。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日籍八路军老战士：参加中国抗战是我一生的骄傲》（《人民日报》，2015年8月13日）

2.《日本籍八路军小林宽澄：我收到了最好的生日礼物"抗战胜利纪念章"》（新华网，2015年9月3日）

3.《日籍八路军老战士小林宽澄的传奇人生》（徐静波，《环球人物》，2015年第19期）

4.《忆山东战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符浩，《人民日报》，1995年8月28日）

5.《冀南、冀中根据地的"日本八路"》（邓沛，《党史文汇》，2016年第2期）

6.《档案解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杨晓玲、张文友，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2015年）

7.《"日本八路"被俘由冈村宁次审讯　英勇不屈就义》（钟正，《解放军报》，2016年6月7日）

8.《抗战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焦璐，《中国档案报》，2015年8月28日）

9.《前田光繁：最早的"日本八路"》（小林光吉，《光明日报》，2015年8月25日）

10.《日本士兵小林清的新生》（刘旭，《党史文汇》，2018年第10期）

11.《日籍八路军慰问日军士官》（王光荣，《党史文苑》，2004

年第5期）

一个人的奥运会

小时候看奥运会开幕式直播，最喜欢看运动员入场式。有时候看到一些来自小国的运动员代表团，会觉得很新奇：这个国家是哪里的？他们为什么只派这几个运动员来？他们国家是不是很小？而就在80多年前，我们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被别人这样打量的。

1

这个故事，可以从1922年说起。

在那一年“关东州”（今属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当时属于日本租借地）的中日小学田径对抗赛上，出现了一个“短跑神童”。

那是个中国小学生，他在那一年的田径比赛上，100米居然跑出了11秒8（已经接近目前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400米跑出了59秒，以巨大的优势夺冠。

那个少年，那年13岁。

这让那次对抗赛的日方组织者多少感到有些尴尬：按照他们宣扬的理论，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尤其是在体育方面，是不可能输给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人的。

而那场比赛后，很多在现场观看比赛的中国观众都兴奋异常，到处打听那个孩子是谁。有知道情况的人告诉大家，那个孩子在沙河口公学堂读书，名字叫刘长春。

刘长春，1909年出生于大连，从小就跑得飞快，在同学里是有名的“兔子腿”。

在“关东州”那次对抗赛上一战成名后，刘长春进入了中学读书，但很快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去做了一名学徒工。不过虽然辍学，刘长春却始终没有放弃短跑和足球，经常自己一个人跑到体育场去训练。

1927年的大连中华青年春季运动会上，刘长春在男子100米比赛中

跑出了11秒。那一年，他18岁。

也就是在那一年，因为在一场足球比赛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和灵活的协调能力，刘长春被当时的东北大学足球队领队看中，推荐他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预科班，专攻田径。

东北大学由当时的“东北王”张作霖在1923年10月24日正式建立，投入巨大，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好的大学之一，全校共有3000多名学生，当时北大也只有2000多名学生。

就在刘长春进入东北大学练田径的第三年，学校在校运动场承办了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在那次北方八省100多所学校共2000多名运动员参加的比赛中，刘长春再次让所有人见识到了“兔腿子”的威力——在男子100米决赛中，他轻松拿到冠军，成绩是10秒8。

192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上，男子100米的夺冠成绩，也就是10秒8。

刘长春不知道的是，他的命运因这场比赛而开始改变。

2

在那天的赛场看台上，有一个人对刘长春的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个人，名叫张学良。

彼时的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青春年少，兴趣广泛，其中一个爱好，就是体育。

张学良不仅仅是自己喜欢，而且确实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做了些事。比如在1928年，他专门邀请法国田径队（后因故未来）和日本田径队，在当时沈阳的小河沿运动场举行一场对抗赛，并且让摄影师将日本撑竿跳运动员以及其他项目运动员的一些比赛动作全部都拍下来，供中国的运动员学习。对于张家一手建立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张学良更是特别重视。

所以可以想象，张学良在看到刘长春的表现后那种兴奋之情。

至少在体育训练方面，张学良当时的思想还是很先进的：多办比

赛，多让中国的运动员感受世界最高水平，这样就会进步更快。本着这样的想法，1929年10月，张学良又将德国田径队和日本田径队都邀请到了东北，搞了一场“中德日三国田径对抗赛”。



代表东北大学出战的刘长春

在这次比赛上，刘长春再一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男子100米和200米比赛中，刘长春虽然以微弱劣势输给德国名将彦鲁特拉比尔，获得了亚军，但战胜了当时日本著名的“短跑怪杰”吉冈隆德和“飞毛腿”冈健次郎，还赢了另外一名德国短跑名将。

当时刘长春的100米成绩是10秒8，200米成绩是21秒6，不仅是全国第一，而且是当时的远东第一。

张学良立刻就做出决定：重点培养刘长春。

在张学良的力邀之下，来访的德国田径队队长步起（当时的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留下来做了东北大学田径队的主教练。张学良为步起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每月800块大洋（当时东北大学一名教授的月薪是360块大洋左右，已是全国罕见），配两匹马、一辆小轿车。

而对于刘长春，张学良专门关照要给他开运动员小灶，另外每月发30块大洋的特别补助（作为参照，毛泽东1918年在北大做图书馆管理员时月薪是8块大洋）。

在步起的专业指导下，刘长春的竞技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起跑姿势到摆臂方式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在1930年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一人轻松包揽男子100米、200米、400米三项冠军，创造三项全国纪录，名震大江南北——杭州市政府当时甚至把一条路专门命名为“长春路”。

当时才21岁的刘长春，100米成绩已经可以达到10秒6，不仅在亚洲位列第一，在世界范围内看，也具有进入前十名的实力。

中国出了这样一个短跑天才，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不少有识之士其实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憧憬：

让刘长春代表中国，去参加1932年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

然而，个人的命运，很多时候和国家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3

1931年9月18日晚，睡梦中的刘长春被不远处北大营传来的爆炸声惊醒。

那一夜，枪声大作，爆炸连连，很多东北大学的学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第二天看到街上出现了很多日本巡逻兵，才知道一夜之

间，沈阳已经沦陷。

9月1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大学迁校到北平。

也恰恰是在这一年，中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民国的全国体育性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委员会。

很快，洛杉矶奥组委就给中国发来了参加奥运会的邀请。

然而，国民政府不久就以“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为由，宣布中国不会参加本届奥运会，只会派遣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总干事沈嗣良前往观礼。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4年8月正式成立，名誉会长为张伯苓，名誉副会长为被称为“中国奥运之父”的王正廷。这张照片为部分董事合影。前排左起：冯少山、卢炜昌、沈嗣良；后排左起：陈时、张伯苓、王正廷

消息一出，全国体育界哗然。沈嗣良尽管接受派遣，但公开向记者宣布：“余之赴美，未受国民政府丝毫津贴，旅费由协进会任之，数约五千。”

随后他忍不住又加了一句：“其实堂堂中国政府，岂有不早知此次世界运动大会在美举行，恐不过亦有惜于拿出钱耳！”

然而，事态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1932年5月，已经被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泰东日报》登出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

"'满洲国'已经决定派刘长春参加世界运动会，并已通过国际奥委会认可，并按要求准备递交'满洲国'国旗与国歌，以备届时应用。"

随后，日本《朝日新闻》立刻转载了这条消息。

消息一出，全国哗然：刘长春真的要代表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参加奥运会？一时之间，"汉奸""卖国贼"等骂声四起。

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刘长春就从沈阳回到了大连。当时就有日本当局人士找到刘长春，问他"将来的打算"。刘长春客客气气地表示"没什么打算"，随即先去了北平，然后又躲到了旅顺。

在1932年的春天，日本人再次找到了刘长春，索性直接摊牌：请他代表"满洲国"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只要他肯去，回来就在"满洲国"的体育部或教育部给他安排一个高官位置。当时被日本方面要求一起去参加奥运会的，还有冯庸大学的中长跑名将于希渭。

日本人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借奥运会的舞台，宣扬"满洲国"的形象，进而将"满洲国"建国一事坐实。

经过日本人的两次登门拜访，刘长春又悄悄把全家搬到了河口。

于是，在刘长春和于希渭并没有答应的情况下，日本人单方面通过媒体宣布了这件事，希望直接将"生米煮成熟饭"。

不过，日本人很快得到了刘长春的回应——同样是1932年5月，刘长春先是通过北平的《体育周报》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

随后又通过《大公报》做出了更明确的表态：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4

声明是发了，但接下来该怎么办？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不去，自然很简单。但如果中国没有运动员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那就等于把舞台让给了“满洲国”。

那么，有没有可能让刘长春真的代表中国去参加奥运会？

大家萌发这个念头的时候，离奥运会开幕也就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但各方真的立刻行动了起来：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开始牵头联系国内各方面的资源；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开始与国际奥委会联系，希望能够破例为中国运动员报名；整个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都开始施展出全部能量，为参赛报名运作。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一切手续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国际奥委会也一路开绿灯，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了来自中国的申请。

接下来，就只有一个问题了：路费从哪来？

这时候，站出来的还是张学良：个人出资8000块大洋，资助中国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

1932年7月1日，已经迁校至北平的东北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张学良在典礼上亲自宣布：

“刘长春和于希渭作为运动员，宋君复作为教练员，将代表中国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居然要派出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了！

这个消息瞬间轰动大江南北。

7月3日，刘长春和宋君复离开北京抵达上海，准备从上海出发去美国参加奥运会。整个上海为之轰动。7月4日，刘长春在中华体育场训

练，看台上挤满了慕名来围观的上海市民。7月7日，上海体育界和新闻界为刘长春践行，东亚饭店居然涌进了2000多人，水泄不通。

国破山河在，奥运赤子心。

到了7月8日，刘长春要出发的日子，他们却没能等来于希渭——由于日本方面的监视，于希渭最终没能来成上海。但他表示自己“身体有病”，拒绝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这也就意味着，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只剩下刘长春一人了。

7月8日上午9点半，在上海的新关码头，数千名各界人士到场，为刘长春和宋君复送行——他们将搭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横跨太平洋去美国参加奥运会。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王正廷亲自到场，为刘长春授旗壮行：“我国此次派君参加奥运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余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之中，使我之国旗，飘舞于世界各国之前，是乃无上光荣也。”

刘长春肃立接旗，回答：“我此次出席奥运会，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深知责任重大，当尽我本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

掌声雷动中，“威尔逊总统号”缓缓离港。

当天，上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

做关云长打扮的刘长春手握青龙偃月刀，立于一小舟上，望向远方。

孤帆远影，单刀赴会。

5

从上海到洛杉矶，“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足足开了22天。

在这漫长的行程中，不发生点小插曲是不可能的。

“威尔逊总统号”开到日本神户靠港之后，有日本记者登船采访刘长春，问了他一个问题：

“二位这次去参加奥运会，代表的是中国，还是‘满洲国’？”

刘长春当即回答：“我二人只代表中华民国！”

随后，船上又送来了一封日本当地体育组织发来的电报，信封上写的是“致奥林匹克选手刘长春”，刘长春签收后拆开一看，电报中写的是“祝‘满洲国’奥林匹克选手刘长春创造佳绩”云云。刘长春当即将电报退回，表示“船上并无‘满洲国’奥林匹克选手”。

有些事情可以避免，有些事情却无法避免，比如晕船，比如无法训练。

刘长春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长途的远洋航行，好在他的晕船反应并不明显。但奥运赛前的20多天备战训练的黄金时间，刘长春却只能在邮轮上度过。

为此，刘长春只能趁人少时，在甲板上做一些简单的训练。邮轮上有很多娱乐设施，但刘长春除了用一日三餐外，从来不进这些场所，除了做简单训练，就待在自己的房间。

7月29日，“威尔逊总统号”终于在洛杉矶缓缓靠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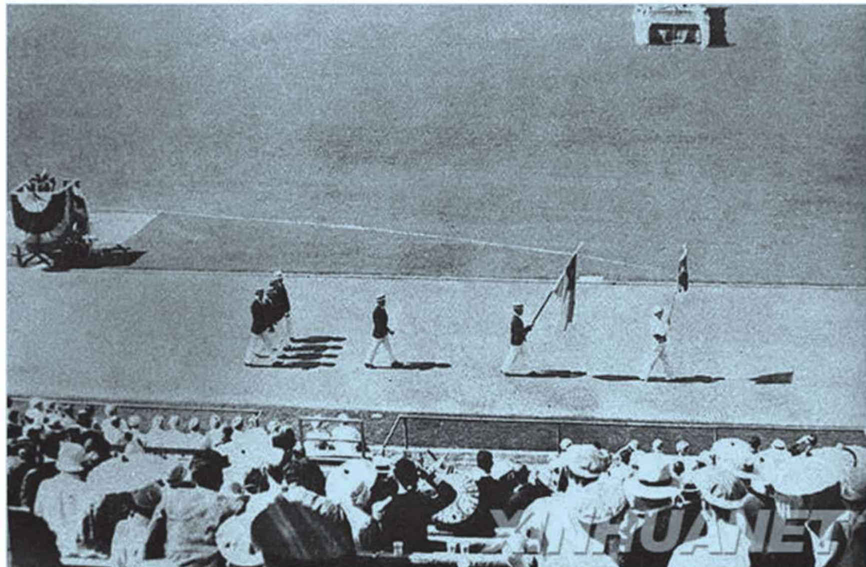
当地数百名华侨早就等在港口迎接刘长春一行，然后直接把他们接去了唐人街。在那里，更多早已翘首以盼的华侨像迎来大明星一样围住刘长春，签名合影者络绎不绝。

尽管华侨们对刘长春过去的经历知道得并不多，但他们只知道一点：中国这次派选手来参加奥运会了！

7月30日下午2点半，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正式开幕。

可以容纳10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在运动员入场式上，当第八个入场代表团进入运动场的时候，全场所有的华侨都站了起来，脱帽，挥手，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中国代表团入场了。



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的情景

那真的是一个很小的队伍，小到只有6个人：教练员宋君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理事长沈嗣良，留美学生代表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上海西青体育主任托平（美国人），而刘长春走在最前面，是旗手。

事实上，刘雪松、申国权、托平三人是被拉来撑场面的，不然中国代表团的人实在太少了。

那确实是一幅让人五味杂陈的画面：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却只派出了人数如此之少的一个代表团。

但另一方面，在很多现场热泪盈眶的华侨眼里——毕竟是来了！

这是自奥运会诞生以来，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赛场上的刘长春

1932年7月31日下午3点，洛杉矶奥运会男子100米预赛，第二组。

刘长春穿着白上衣、黑短裤出现在了跑道上——他把这套衣服命名为“白山黑水”，借此提醒大家沦陷的东北。

“啪！”发令枪响。

刘长春像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

10米，20米，30米，40米，50米……刘长春一马当先。

现场的华侨观众全都起立欢呼，准备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

然而，奇迹却没有发生。

到第60米的时候，开始有第一个选手超过了刘长春，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到第80米的时候，刘长春已经落到了第五位。

最后冲刺时，刘长春在所有六名选手中名列第五。

奥运会的舞台，就是这样现实和残酷。

而海上航行22天，从上岸到比赛一共只隔了40多个小时，刘长春的体力也实在支撑不住了。

当晚，刘长春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第一名为星卜森，胜余有4码，成绩10秒9，余居第5，当在11秒左右。起码时头五六十米在先，约至80米后，被后来者超过，原因毕业考试一个月，航行劳顿，缺少练习所致。”

刘长春的最终成绩是11秒1。虽然和小组第一相差不多，但这是电光石火间就是一个身位的男子100米比赛——刘长春在小组赛被淘汰。



刘长春在奥运会上参加200米预赛时的情景，赛道上跑在第四位的即是刘长春

1932年8月2日，男子200米预赛，刘长春再一次站到了跑道上。

发令枪响，刘长春又一次占到了领先位置，并且在前170米都保持

在第二名。然而，在最后30米，依旧因体力出现了问题，被另一个对手超过，最终排在第四。

刘长春200米的成绩是22秒1，虽然基本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但因为是在全世界最高水平的舞台比赛，他再次遭到淘汰。

虽然刘长春在比赛中表现出的斗志得到了包括裁判员在内的很多人的认可，但对他自己来说，两场预赛被淘汰，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且，他已经耗尽了几乎所有的体力。

男子200米预赛结束的那天晚上，刘长春的教练宋君复给组委会打了一个电话，表示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因为两腿酸胀，实在无法比赛，申请男子400米比赛弃权。

宋君复打电话的时候，刘长春就在旁边，一言不发。

那是他们两个一起商量下来的决定，刘长春深知自己的体能储备已经完全耗尽，如果真的再去比400米，很可能场面会非常难看。

那天晚上，刘长春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在之后没有比赛的日子里，刘长春天天去比赛现场看外国高水平运动员的比赛，并写下了很多心得，包括外国运动员的热身方式、热身时间等，并认识到“最难者，指导、管理、运动常识是否合理化、组织化”。

他希望能将自己在奥运会上得到的宝贵经验教训带回国，让中国运动员在下次有更好的表现机会。

然而，他还是想得简单了。

7

回到国内的刘长春，命运坎坷。

他在1933年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以10秒7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男子100米全国纪录（这个纪录直到1958年才被解放军选手梁启勋打破），还在1936年再次代表中国去参加了柏林奥运会（那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处境更加尴尬），但是，此时的他已经饱受伤病困扰。

1937年，刘长春的大腿又一次拉伤，由于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保健和康复的概念，这次受伤让他彻底告别了运动生涯。

那一年，刘长春只有28岁。

退役后的刘长春，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生活陷入了贫困。他辗转于北平和南京两地，靠打工养家糊口，还曾因“反满抗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坐过牢。而他当年参加奥运会的证件、照片等所有纪念品，都在抗战期间的长沙大火中被烧得一干二净，潦倒的生活让刘长春一度沉迷烟酒不能自拔。后来在北京和沈阳的大学里谋得一份教职，刘长春的窘迫生活才好转一些。

这样的生活，直到1949年之后发生了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的名字重新被人提起，他很快被聘为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的田径教练、教授，并出现在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酒宴上，作为中国体育界代表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酒。

“文革”结束后，刘长春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中国奥委会和中国田径协会的副主席。

1983年，已经74岁的刘长春一直和家人念叨要去上海看看。

那时候，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已确定在上海举办。而在他的儿子刘鸿图看来，父亲想去上海，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年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就是从上海出发的。

而当时中国已经决定参加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那是新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第一次派团参加奥运会。

可惜，1983年3月25日，刘长春因病去世，享年74岁。

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国代表团重返奥运会。

7月29日，就是当年刘长春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到达洛杉矶港口的日子，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摘得了中国代表团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后来人们得知，刘长春的名字，其实当初已被列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观摩团的名单。



71岁的刘长春

馒头说

记得刘翔曾经和我说过一个故事。

那是2000年，那年他才17岁，去智利参加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他第一次出国去参加如此高规格的赛事。

“看到全场那么多观众，一方面感到很自豪，但另一方面却又很紧张。”他对我说，“站到起跑线上，看到旁边的外国运动员都那么壮，我明显感觉自己的腿肚子都在抖。”

那次比赛，他跑了13秒87，排在第四名，没登上领奖台。

每次看刘长春的故事，我都会莫名想到刘翔的这段往事。那时候刘翔出国比赛，就他和教练孙海平师徒两个人，就像68年前的刘长春和宋君复。

而刘长春那时面临的压力，远比当时年轻的刘翔还要大得多。

在刘翔刚出道的时候，虽然黄种人在讲究爆发力的田径直道项目上总是最默默无闻的角色，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国家整体实力还是体育综合实力，都已经崛起。

而在刘长春那个时代，不仅仅是田径，对整个奥运会乃至世界舞台而言，中国都是一个渺小乃至陌生的角色，不仅仅是体育，还有体育背后代表的各种东西。

所以可想而知，刘长春面临的压力——他一个人，肩负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期望。

如今，国人看待奥运会的视角已经多元化，在金牌和冠军之外，我们还可以欣赏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个人当然很赞赏这种转变，因为这代表了一种自信，一种已经不需要用奥运金牌去证明什么的自信。

但同时我又非常理解之前我们对一块奥运金牌的那种渴望。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除去竞技运动本身，我们是多么想摘掉“积贫积弱”的帽子，想向世界展现我们自强的形象，想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颁奖仪式上最高的位置飘扬。

所以，每次想象那一刻，我都有点好奇：

当全场安静下来，刘长春站在起跑线前等待发令枪响的那几秒，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很有可能，他什么都不会想。

在那一刻，他来了，他站到了跑道上，他起跑，他冲刺，这本身就是一种足以载入史册的成功。

无关成绩，无关金牌。

谨以此文，献给奥运先驱刘长春先生，以及所有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奋斗和牺牲的人。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刘长春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始末》（朱元宝，《大连近代

史研究》，2018年12月31日）

2.《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始末》（刘长春，《文史资料精选集》第十七辑，1980年7月）

3.《刘长春：奥运赛场的中国第一人》（鲍京北，《文史博览》，2008年第2期）

4.《孤帆远影——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写照》（李润波，《北京档案》，2007第11期）

5.《刘长春：一个人的奥运会》（刘鸿图口述，江菲记录，《先锋国家历史》，2007年第20期）

6.《“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奥运参赛始末》（高永健，《北京日报》，2008年8月2日）

7.《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搜狐网，2008年7月14日）

8.《浅析奥运会传入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张博，《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

9.《回顾1932奥运男子100米：刘长春参赛》（腾讯体育，2017年12月17日）

郭永怀：一位不应被历史遗忘的科学家

说起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我们应该能报出一系列科学家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有些陌生，但不应该忘记。

1

1968年12月5日，中南海怀仁堂。

一位秘书匆匆走了进来，来到正在接待外宾的周恩来身旁，对他耳语了几句。

一向处变不惊的周恩来脸色一变，站了起来。

秘书向总理汇报的，是刚刚发生的一场空难——一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着陆时坠毁，机上13人遇难。

而让总理尤为震动的是，他听到了一个遇难者的名字：郭永怀。

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后来痛哭失声。

2

1909年，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滕家镇郭家村，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

郭永怀的家并非书香门第。郭家世代务农，父亲郭文吉也只是粗通文墨。所以尽管郭永怀从小就聪颖好学，但直到他9岁那年，才有机会到本家三叔郭文秀开办的学堂里去读书识字。

但一旦给了读书的机会，郭永怀就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1922年，13岁的郭永怀因为勤奋好学，被送到石岛镇的明德小学读高小。

1926年，17岁的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成为家乡的第一个公费中学生；1929年，郭永怀又如愿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

理工班，成为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1931年，郭永怀转入本科，选择了物理学专业，成了当时国内知名教授顾静薇的学生；两年后，顾静薇推荐郭永怀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深造。

1938年夏天，改变郭永怀命运的一场考试来临。

当时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举办了第七届留英学生招生考试，拟录取名额20人，但报名人数超过3000人。郭永怀报考的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专业只招一人，但有50人报名。

郭永怀考试发挥出色，5门功课总分超过了350分，名列第一——但是，居然还有两个考生和他考的分数一模一样，并列第一。

三人同分，只招一人，怎么办？结果经过董事会讨论，破格将这三人全部录取。

和郭永怀同分的那两个人，一个叫钱伟长（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一个叫林家翘（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

1940年1月，郭永怀和当初几十个被选中的学子在上海集合，准备前往海外留学——当时因为二战爆发，英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只能将这些学子送到各个英联邦国家去学习。

在辞别亲人上船之后，郭永怀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护照居然是由日本政府签发的，而且上面还写着：“允许在横滨停留三日，上岸游玩。”当时中国正在日本的侵略下陷入苦战，这群学生立刻向英国代办人员提出抗议，要求更改护照。英国人表示绝不更改，要么你们就不要去留学了。

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人陷入了沉默。这时候，平时沉默寡言的郭永怀站了出来：

“不出国就不出国。中国人要有自己的骨气。”

于是，一群学子拿着行李走下了即将起锚的轮船。

幸好，又经历了多番波折之后，郭永怀他们还是踏上了留学的旅途。



1940年8月，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在俄国“皇后号”邮轮上。后排右三为郭永怀，前排左一为林家翘，前排左五为钱伟长（来源：“纪念郭永怀先生”官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3

事实证明，这批留学的中国学子，确实是当时精英中的精英。

郭永怀、钱伟长和林家翘三个天才一起被送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三人都只花半年时间就拿到了硕士学位。



冯·卡门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

1941年，郭永怀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学习。当时该研究中心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是全世界顶级的研究中心，因为主持人是世界气体力学的大神级人物：冯·卡门。郭永怀遇见了一个好老师，同时也认识了一个成为一生知己的师兄——钱学森。

在学习期间，郭永怀主动提出要进行“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研究，这是当时空气动力学领域最前沿的课题。结果凭借这方面的研究，郭永怀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1946年，冯·卡门的学生威廉姆·希尔斯准备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研究院，冯·卡门立即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弟子郭永怀。当时准备去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钱学森一路开车将师弟郭永怀送到了康奈尔大学。

去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郭永怀一头扎进了飞机突破声障的研究中。当时，刚刚实现超声速飞行的飞机普遍面临一个巨大困难：一旦飞机速度接近声速，阻力剧增，操作失灵，往往会机毁人亡。很多人甚至认为，突破声障其实是不可能的。

但是，郭永怀凭借自己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引起业界轰动的论文，开创了一套全新的计算方法，为人类实现声障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钱学森曾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将此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其中“K”就是“郭”的第一个字母发音。

由于在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方面的卓越表现和贡献，郭永怀在美国业界声名鹊起，很多大学纷纷邀请他前去任教或做讲座，相关企业开出高薪挖他去工作。当时郭永怀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而且是航空工程研究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在美国有车有房，完全可以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但他心中有一个念头却自始至终没有打消过，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这个念头更加强烈：回国。



1946年5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和郭永怀向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NAC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前身提交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论文，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理论和计算问题，大大促进了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

此照片摄于1947年2月，题为《与美国宇航精英同列的中国科学家》。第一排左起第三位是钱学森，第一排右起第四位是冯·卡门，第二排左起第一位是林家翘，第二排左起第三位是郭永怀

当时有朋友劝他：你在这里什么都有了，将来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什么还要回到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呢？

郭永怀的回答是：“家贫国穷，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1946年10月，创建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学院的五员大将。左一为郭永怀

4

但是，回国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在刚到康奈尔大学时，郭永怀就做出一个声明：“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在适当的时候会离开。”而由于从事航空工程研究会接触不少机密资料，当时放到郭永怀面前的有一张表格，其中有一项是：“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郭永怀毫不犹豫填写了“不”。此后，他就失去了进一步查阅机密资料的权利。

当郭永怀提出回国的想法后，他的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郭永怀作为美国数学学会会员、航空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著名专家，想要回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可谓困难重重。

1950年，郭永怀的师兄钱学森因为提出要回国而遭到关押，并且被抄家检查。同时，郭永怀的出国自由也开始受到限制，连去英国讲学也无法获批。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55年，中国和美国在日内瓦大使级

会谈中达成一致，允许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和科学家回国，钱学森终于率先回国。

在钱学森回国后，郭永怀的归国之心更加迫切，天天和自己的妻子李佩商量回国的事情。其间，康奈尔大学开出了非常高的薪酬待遇想留住郭永怀，而台湾当局也派人来许以优厚待遇让他去台湾，但郭永怀从来没有改变过主意。

终于，定好的回国日期越来越近。为此，郭永怀做了一个特殊的准备：他将自己十多年来积累的大批科研资料和讲义手稿，统统付之一炬。

郭永怀的妻子李佩回忆，她知道这些手稿都是丈夫多年来的心血，所以忍不住阻止郭永怀，但郭永怀边流泪边继续烧："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都装进我脑子里了。"

郭永怀这么做，很大原因是师兄钱学森回国时，所带的800千克书籍和笔记本全都被美国海关没收了。

就在烧掉手稿的第二天，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的院长为郭永怀夫妇践行，举办了一个大型的野餐会。在野餐会上，郭永怀又当众烧掉了他一部即将完成的书稿。

在场的师生都看着闪闪的火光，默然不语。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夫妇终于和几位归国的中国科学家一起，登上了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但就在轮船即将启航的那一刻，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忽然登船，要求搜查所有回国的中国科学家的行李。李佩后来回忆，她那时候才知道丈夫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



郭永怀（左）和夫人李佩（中）在回国的船上

在延迟了2小时之后，“克利夫兰总统号”终于拉响了启航的汽笛。

那一年，47岁的郭永怀，终于回国了。

5

郭永怀回国后，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接见。

当周恩来问郭永怀有什么要求，郭永怀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1956年底，中国力学研究中心成立，钱学森担任所长，郭永怀担任常务副所长。第二年，力学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合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郭永怀担任班主任和主讲人。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在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翻译出版了大量力学学术名著，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与教学研究工作相比，郭永怀之后参与的工程更艰巨，但也更重要——制造中国自己的核武器。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所有相关技术专家和技术设备、资料，中国的"两弹"工程陷入困境。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郭永怀临危受命，和王淦昌、彭桓武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当时九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其中郭永怀领导的是场外实验委员会，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一方面迅速建立实验室，研究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数据，同时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研究工作。尤其是在爆轰物理实验中，郭永怀带领团队反复实验，克服了各种困难，提出"两路并举，最后择优"的方法，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整个中国第一代核武器一直沿用。



在试验基地查看爆炸成型实验结果，右一为郭永怀，右二为钱学森

1963年，郭永怀随核武器科研团队一起迁到了核武器研制基地。已经年过半百的郭永怀和中国第一代研发核武器的科研工作者们一起，忍受最低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和寸草不生的荒凉，以及各种高原反应带来的心悸、胸闷、浮肿，夜以继日地反复计算、研究、实验、爆破，一步一步顽强地把中国原子弹实验推向成功的那一天。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的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道蘑菇云——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在欢呼的人群中，郭永怀流着眼泪，累得瘫软在了地上。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郭永怀的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参与氢弹和导弹研制的相关工作之外，1965年9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重新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

长时间高强度高密度的工作，让郭永怀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业余时间。他喜欢听音乐，曾从美国带回来两箱唱片，结果连封都没拆，最终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爱好集邮，曾收集了三大本，结果后来全送给了邮政总局。他还喜欢摄影，结果忙得连镜头都没空摸一下。



20世纪60年代初，郭永怀、李佩和女儿郭芹在北京家门口。郭芹是夫妇俩的掌上明珠，但从小和父母聚少离多，后又去内蒙古插队落户，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父亲离世和母亲被隔离审查的打击，身体状况一直欠佳，于1996年病逝

由于要经常往返试验基地和北京，为了节约时间，郭永怀一直选择坐飞机。当时中央为了确保安全，不鼓励郭永怀这批科学家坐飞机，周恩来也专门为此事叮嘱过。但郭永怀为了追时间赶进度，还是乘飞机，且喜欢选择夜航飞机，因为他认为在飞机上打个盹儿，第二天抵达了还不影响白天工作。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再一次选择了乘坐一架夜航的飞机。

6

12月4日那天，郭永怀本来不需要那么急着走的。

在10月初，郭永怀去核试验基地参与中国第一颗热核弹头的发射试验准备工作，一待就待到了12月初。

12月4日这天下午，郭永怀在实验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数据线索，当即就表示要飞回北京汇报。他打听到当晚有一架飞机飞往北京，就要坐车去赶飞机。

当时就有同事劝他别坐夜航飞机，第二天早上再走。但郭永怀还是那句话：“晚上飞省时间，打个盹儿就到了。第二天不耽误。”

在赶到机场等飞机的间隙，郭永怀还专门听取了课题组成员的汇报，然后就登上了飞机。

5日凌晨，郭永怀搭乘的那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但在距离地面只有400米的时候却忽然失去了平衡，挣扎了几下之后，坠毁在了离机场只有1公里的玉米地里。

机上搭乘的乘客和机组人员一共14人，只有1人重伤生还。他在回忆当时坠机前的场景时说，就记得郭永怀大叫了一声：“我的材料！”

救援人员来到坠机现场的时候，13具遇难尸体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散落一地。

但是，有两具尸体却紧紧抱在一起。

当救援人员费尽力气将两具已经烧得焦黑的尸体使劲分开的时候，发现在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几乎完好无损的公文包。

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的，就是郭永怀说要到北京汇报的那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

经辨认，这两具尸体，一具是郭永怀，另一具是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在场的救援人员，当场下跪痛哭。

7

郭永怀遇难，震动四方。

周恩来当时下令彻查失事原因，结果查下来是飞机导航系统在最后关头出了故障。

钱学森听到消息后也痛哭失声，后来写道：“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研究专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

遇难消息传来，郭永怀的妻子李佩没有落泪，却一个人走到了阳台上，望着远方，长时间不说一句话。这位随丈夫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到冲击，受了6年的隔离审查。平反后，李佩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2007年，李佩将自己的毕生积蓄60万元通过电汇的方式，分两笔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设立的“郭永怀奖学金”。当有人问李佩是否要搞个仪式时，她回答：“要什么仪式，捐了就捐了。”）

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两日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离郭永怀遇难只过去了22天。

1999年9月18日，23名为“两弹一星”工程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科学家，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个在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三方面都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一名烈士。

馒头说

在《历史的温度》系列签售会上，我曾和读者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看待所谓的“科学家不如戏子”？

我当时给出的建议是：心平气和一些。

乍一看，有些演技尚有提升空间的艺人（我并不赞成用“戏子”这样的称呼）出场费动辄百万元，拍一部电视剧收入动辄千万乃至上亿元，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科学家堪称清贫，这确实是件让人有些愤愤不平的事。

但仔细想一想，这其实是两回事。

首先，艺人的出场费和片酬是市场机制决定的。就我国目前的演艺圈人才含量来看，真正有实力的演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这样一个卖方市场环境下，能自带流量的艺人（无论采取怎样的营销手段）还是有不可否认的稀缺性，所以很容易导致出场费和片酬的无节制飙升。其实，一旦有“金主”发现一些所谓的“流量明星”其实带不动什么货，价格自然就会下来。

其次，限制艺人的超高收入或许可以规范演艺市场，但减下来的钱

也不可能到科学家们的账户上。事实上，尽管提起“艺人暴富”这个话题不少人都会咬牙切齿，但该吃瓜时还是吃瓜，该看秀时还是看秀，让他们花钱进电影院看一部屠呦呦团队的纪录片，依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再次，还是要把时间轴拉长，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问题。我曾在签售会现场报了三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明星的名字，在场的“90后”乃至“80后”，很多人都一脸茫然。但事实上，他们都是80年前红遍中国大江南北、家喻户晓的超级大明星，但如今，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乃至根本不知道他们了。

然而，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哪怕历经千年，我们却都一直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贡献。在各类书籍上、电影中，给道路、纪念馆乃至宇宙中的小行星命名……我们有各种各样纪念和缅怀他们的方式。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向国际社会发布公告：编号为212796和212797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

活在尘世间，我们当然需要各种喜闻乐见的娱乐和消遣。

但是，每当我们抬头仰望，指引我们前进方向的，永远是那片璀璨的星空。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共和国“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追记》（金志涛、王士波、许运江、孙宗勇、田宏耀、卢杰，《科学新闻》，2000年第49期）

2.《科学家“烈士”郭永怀》（王志学，《春秋》，2017年第1期）

3.《“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姜宗怀，《联合日报》，2018年8月25日第001版）

4.《一张照片发现两颗小行星 郭永怀李佩夫妇成为“夜空中的星”》（屈畅，《北京青年报》，2018年7月21日）

5.《感动中国2017候选人物——李佩 郭永怀》（央视网，2017年

12月21日）

6.《被遗忘的一代人——写在郭芹去世20周年之际》（王丹红，财新网，2016年12月20日）

7.《记“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先生：创新者永远年轻》（王丹红、吕庆其、顾迈男、刘志峰、张苏，科学网，2015年9月10日）

8.《郭永怀：“两弹一星”元勋中的烈士》（观察者网，2016年5月10日）

9.《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钱学森，1980年1月16日）

10.《两弹元勋郭永怀和夫人李佩的世纪传奇》（侯朝阳，《世纪风采》，2018年第5期）

11.《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王丹红，知识分子网站）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幕后较量

现在哪怕去问一个小学生，他都能明确地告诉你：联合国有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就是其中一个。但就在40多年前，对中国而言，别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连重回联合国，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1

说到中国和联合国的故事，必须先从罗斯福说起。

1943年，尽管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还处于胶着状态，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心里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了同盟国。

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开始为二战后的格局操心了。

按照罗斯福的想法：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保持团结一致，决心维持世界和平，就不会再发生世界大战。

这就是他的“四警察”构想，也是后来“联合国”的雏形。

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想法。

斯大林认为，孱弱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资格，世界的格局，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控制就可以了。

在这一点上，丘吉尔倒是罕见地与斯大林保持一致：他也完全不理解为何中国要掺和进来，世界的格局由英美苏共管就行了。

但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却非常坚定，甚至对斯大林表示：要么让中国进来，要么索性就别搞什么联合国了。

罗斯福的理由是，中国现在确实很弱，但它毕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未来肯定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重要稳定力量，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

而另一个可以推断的理由是，当时的中国处在依靠美援的蒋介石统

治之下，把中国加进来，在四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家里，美国可以多一个自己的可靠盟友。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加上后来吸收进来的法国，联合国最终拥有了美、苏、英、法、中五个常任理事国。

虽然1945年，共产党派出董必武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但那时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自然是中华民国。

而罗斯福当时坚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两个理由，也成了日后联合国因为“谁代表中国”这个问题产生无数幕后较量的背景：

第一，美国需要一个作为盟友的中国；

第二，那么大一个中国，联合国不可能忽视。

2

然后，出场人物轮到了乔治·H.W.布什。

又是一位美国总统，以及另一位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爹。

不过，1970年的乔治·H.W.布什，刚刚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H.W.布什

布什上任之前，自然要翻一翻之前美国在联合国的表现记录，于是他很快就发现，为了阻止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真的挺辛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后不久，就向联合国提出：驱逐台湾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首先采用了一个办法：拖。

从1951年第六届联合国大会到1960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整整10届，因美国在幕后操纵，每年大会都“暂缓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

美国制造阻力的原因，无非就是之前说到的罗斯福的其中一个理由：虽然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代表，但不是美国的盟友，正相反，还是苏联的盟友。

但是到了1960年，美国有些扛不住了。

因为1945年联合国成立，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只有4个席位，而随着非洲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1960年时，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席位达到了26个。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

1960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虽然“暂缓讨论”的提案又一次得到了通过，但出现了22张弃权票和34张反对票，赞成票下降到了42张。

这个时候，罗斯福当年的另一个理由就显现出来了：没有人能忽视几亿人口的中国。

更何况，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勒紧裤腰带支援非洲兄弟。

受中国支持最多的阿尔巴尼亚和坦桑尼亚，一直是发起“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提案的主力军。

怎么办？美国人想出了第二个办法：转。

1961年11月15日，美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发起了1668号方案，把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升为“重要问题”——一旦成为“重要问题”，就必须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国家同意才能生效。

但这一招，也没能持续多久。

1965年的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在表决中国的“重要问题”提案时，居然出现了47票赞成和47票反对的平局——多数非洲国家都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让美国一下子感受到了失去主导权的威胁。

于是，美国只能想到第三个办法：分。

“分”这个办法，就由布什来执行了。

1971年8月，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封书信及备忘录，强调“双重代表权”。

按照布什的解释，美国主张“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拥有代表权，即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有一票。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两张选票”。

这个方案遭到北京的反对，布什早有预料。

但出乎布什意料的是，台湾居然也反对。

3

反对这个方案的人，是宋美龄。

当时的台湾，其实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窘境：从1949年到1971年，和台湾“中华民国”维持“邦交”的国家越来越少，相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却越来越多。

20世纪60年代，台湾还通过农业技术输出，专门去帮助非洲国家，以求能“以援助换选票”，但效果一年比一年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还是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双重代表权”传达到台湾“外交部”，“外交部”其实是默认的。

但就在台湾当局的最高层会议上，一直是“亲美派”代表的宋美龄却拍案而起，坚决反对这个方案。

宋美龄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接受这个方案，那就等于承认“一中一台”，也就是承认了“两个中国”。

当时宋美龄说了这样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当时的蒋介石就坐在宋美龄的身边，一言不发。

4

镜头给到毛泽东。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其实一直很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重返联合国。1971年，毛泽东还专门为此询问了当时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有没有把握重返联合国。

章文晋就开始帮毛泽东算投票。他把截至197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算了一遍，一共61个，换句话说，就算它们全部投票给中国，也只有61张选票，无法达到“重要问题”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

听到这个答案，毛泽东倒也不急。他对罗斯福当初的第二个理由，同样抱有信心——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如果不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存在的意义何在？

所以，毛泽东的重点主要放在拒绝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上，指出总之就是不能上美国人“两个中国”的贼船：“不管乌鸦叫还是喜鹊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当时的毛泽东，低估了乐观的“革命形势”，但是北京对于进联合国“无所谓”的态度，却急坏了一个印度尼西亚人。

5

这个印度尼西亚人，叫马立克。

马立克当时的身份，是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

最关键的是，他非常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进入联合国。

为此，他还专门委托自己的中国朋友打听，北京对于在1971年——自己的主席任期内——恢复联合国席位有何想法。马立克觉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会可能就在1971年。因为就在197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赞成票第一次达到了51票，超过了反对票的47票，只是没有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而已。

黎明的曙光，就在眼前。

可惜，直到1971年9月，北京方面迟迟没有消息过来，马立克等到的，是印尼当时的总统苏哈托的指示：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投赞成票。

无法违抗总统命令的马立克，决定在投票当天，做一个“技术上的处理”。

6

1971年10月25日，历史性的一天终于来临。

在此之前，除了场外，联合国内部也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幕后较量：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很多国家代表写信，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常驻代表布什分别找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话沟通，希望届时大家能够投票赞成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而另一方，很多亚非拉国家的代表也在为北京拉票。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萨利姆甚至把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声明印成了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文件发给各个代表，让他们明确知道北京的态度后，再投票给“两阿提案”——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一共23个国家提出，立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席位，并取代“中华民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所以，1971年10月25日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就是“双重代表权提案”和“两阿提案”的大决战。

但大决战还没开始，似乎就已经分出了胜负。

美国和日本等22个国家每年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居然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和15票弃权的结果被否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提案，变成只需要超过半数赞成即可通过，不需要超过三分之二多数了。

这一结果，让整个会议大厅沸腾起来，谁都明白其中的含义。坦桑尼亚的代表萨利姆居然离开席位，带头跳起了非洲舞。

然后，该表决“两阿提案”了。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表示需要发言。他快步走上讲台，提出了美国代表团的要求：“两阿提案”里要删除“立即将台湾代表团驱逐出联合国”的内容。

布什话音未落，非洲国家代表团的座席那里，传来了一片又一片的“NO”（不）。

而之前受到美国鼓动的沙特阿拉伯代表巴罗迪又提出，对“两阿提案”提出修正，建议表决推迟到10月26日——这样可以再给美国多一点拉票时间。



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周书楷（右），“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刘锴（左）及“驻墨西哥大使”陈质平（后）

又是一片的“NO”。

联合国大会的主席马立克宣布：布什和巴罗迪的提议不被采纳。

这时候，现场的“中华民国”首席代表周书楷顿时脸色铁青，奔上讲台，宣布“中华民国”将不再参加之后联合国大会的任何程序，退出联合国大会。

终于轮到表决“两阿提案”了。

在表决前，马立克宣布了他的那个“技术处理”：和以往不一样，这次的投票，将进行公开唱票——哪个国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都会被大声朗读出来。

后来有人分析，大声念出来，对一些国家代表的投票心理，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

结果出来，没有悬念：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通过了！

“两阿提案”通过，“双重代表权”提案就已无表决的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刻取代了“中华民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全场支持中国的代表，长时间起立鼓掌。



乔冠华后来率团代表中国回归联合国，这张他大笑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7

最后还想说说基辛格。

1971年10月25日，基辛格代表总统尼克松，正在北京和周恩来接触。

其实，这段时间中美关系的急剧升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获得多数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国家吃不准美国的态度，索性就投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事实上，尼克松是想在1972年再考虑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至少要等自己访华之后。在此之前的解决方案，就是“双重代表

权”。

10月26日，基辛格准备返回美国。因为信息传递的问题，那个时候，基辛格还没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消息，但北京方面已经知道了。

在钓鱼台开往首都机场的红旗轿车里，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故意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合国大会，我们能恢复席位吗？”

基辛格的回答秉承尼克松的意图：“今年恐怕不行，明年有可能，等我们总统访华后。”

乔冠华没有点破。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起飞后，他便立刻收到了一份电讯稿，得知了消息。

后来，基辛格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的话应验了，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对此连我自己也认识不足。”

馒头说

今天不想说什么感想或什么道理，只想静静地列出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是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对“两阿提案”的最终投票表决统计结果。

今天，再回过头去看这份名单，依旧觉得很感慨。

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形势吧。

76张赞成票

亚洲19国：阿富汗、不丹、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新加坡、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非洲26国：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勒窝内（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

欧洲23国：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芬兰、法国、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乌克兰、苏联、英国、南斯拉夫

美洲8国：加拿大、智利、古巴、厄瓜多尔、圭亚那、墨西哥、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5张反对票

非洲15国：中非、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加蓬、利比里亚、马尔加什（马达加斯加）、南非、马拉维、斯威士兰、冈比亚、达荷美（贝宁）、尼日尔、乍得、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象牙海岸（科特迪瓦）

美洲13国：美国、巴西、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委内瑞拉、多米尼加、海地、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亚洲4国：日本、沙特阿拉伯、菲律宾、柬埔寨

大洋洲2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欧洲1国：马耳他

17张弃权票

美洲5国：阿根廷、巴巴多斯、哥伦比亚、牙买加、巴拿马

亚洲7国：巴林、黎巴嫩、约旦、卡塔尔、泰国、印度尼西亚、塞浦路斯

欧洲3国：西班牙、希腊、卢森堡

非洲1国：毛里求斯

大洋洲1国：斐济

1991年，那场震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大辩论

有时候，一件大家看起来理所应当、毋庸置疑的事，背后却有令人意料不到的博弈，以及暗流涌动。

1

1991年2月13日，是农历的除夕前夜。

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把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凌河请到了一起，说是要开个小会。

按照惯例，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周瑞金都会在《解放日报》的“新世说”栏目上写一篇小的言论文章。但是，如果只是要写一篇小言论的话，是没必要把施芝鸿和凌河请到一起开会的。

果然，三人碰面后，周瑞金提出，要三个人一起，写几篇大的署名文章。

解放日报
JIEFANG RIBAO

15

国家一级企业
上海广播器材厂
恭贺各界朋友、广大上海牌电视机用户、客户
羊年吉祥如意 新春愉快

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同志与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春节

江泽民委托杨尚昆向上海人民拜年

由朱镕基同志等陪同

深入热浪腾腾的钢厂 来到狭街小巷的危房

江泽民李鹏向首都人民拜年

代表中央祝全国人民春节愉快合家欢乐

本市房改方案下月起在廿个单位模拟运行

大吉羊图

本报和上无七厂联合举办

羊年送“吉羊”活动

敬告读者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1991年2月15日的《解放日报》

周瑞金提了一个总的大方向和写这个系列文章的初衷：新的一年，是辛未羊年，按照中国人“十二年一轮回”的观念，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交替点上——12年前的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当然，在这个时间点，周瑞金要亲自牵头组织写这样一系列署名文

章，肯定是有更深层的思考的。

经过两天的紧张撰写、推敲、修改、编辑，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报》读者拿到手里的报纸头版是这样的：

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出现了一篇大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这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亲爱的读者，当我们称颂‘三羊开泰’之际，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您是否想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

文章的作者署名，是“皇甫平”。

2

接下来，我们把这篇文章放一放，来看看“意味深长”的1991年。

1991年的国际形势，用“风云变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太夸张。在这一年，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旗帜被缓缓降下，让很多中国人在震惊中无法缓过神来。

在“苏联”变成历史名词之前，东欧也发生了剧变：两德统一，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更是被枪决。

再把目光放到1991年的中国国内。

1991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号统计报告表示，1990年经济形势有严峻的一面，主要问题是“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到了年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

再把目光缩小一些，放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1991年，美国《财富》杂志副总编小理查德·科克伦来到上海，说了自己对这里的印象：“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100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而另一个刚刚从东京来到上海的美国人的

言论似乎更扎心："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50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

在《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写的《变化》一书中，第一部是记录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国历史，他给这部分取名叫作"谷底"。

而就在这个"谷底"之年，87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

邓小平是来过春节的，但他又不像是来过春节的。一到上海，他就去了很多企业和工厂考察。那一天，邓小平在锦江饭店旋转餐厅——上海那时候为数不多还算拿得出手的地方——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还回顾了自己当初制定"经济特区"时的考量："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说完上海，邓小平似乎自己做了总结："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

……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朱镕基听的时候，不断点头。因为就在不久前，朱镕基在向全市干部传达第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上，曾修改了曹操的《短歌行》，提出了八个字：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3

有时候，一件事要反复强调，那多半是因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领导把周瑞金叫到自己在康平路的家里。他拿出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他看。

看了邓小平的那些讲话，周瑞金回忆自己当初的感觉是“深受触动”：“实际上他（邓小平同志）已经感到，在当时国际大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下，如果不坚决推动改革开放，不加快经济发展，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民是没有福祉可言的。”

周瑞金理解邓小平的担心，因为身处1991年，不要说在党报担任领导工作的他，恐怕普通读者对当时的舆论氛围也都有所感受。

在当时的国内媒体报道中，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比喻：

“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经济”，而“引进外资”更是被称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在1991年，如何“预防和平演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但不知为何，“改革开放”被悄悄腾挪到了对立面。

周瑞金回去后，自己决定：作为当初延安时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应该发声！

“愿辛未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

这是周瑞金的三人小组在那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中，用来收尾的那句话。

至于为什么要用“皇甫平”作为笔名，周瑞金多年后的解释是：“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那时候，周瑞金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以及后续文章，会引起一场大风波。

按照当时评论部副主任凌河的回忆："第一篇文章出去，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反响。"

这背后其实也有一定的原因：恰逢春节大年初一，看报的人并不多。凌河还记得，这篇稿子连当天本报评报的"好稿"称号都没获得。

可能凌河不知道的是，其实这篇稿件登报后，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包括每天都要读报的邓小平。

暴风雨来临之前，有时会有短暂的平静。

解放日报

JIEFANG RIBAO

上海市农工商实业总公司聘请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鲍培伦律师、叶志林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

国务院批准 建设沪宁高速公路

江泽民等同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 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融洽 共商繁荣文艺事业大计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京成立

朱镕基会见伊瓦什科一行

全国政协四次会议23日召开

本市表彰新闻文艺工作者

本市投放农资逾亿元

上海26家企业荣获机电产品出口先进

流行色应用展评会在沪开幕

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1991年3月2日的《解放日报》

1991年3月2日，第一篇文章刊登之后两周，以“皇甫平”为笔名的第二篇评论文章又在《解放日报》出现了。这一次的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中提出：

“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与第一篇文章相比，进入“深水区”的第二篇文章直接触碰到了当时最敏感的一个话题：

“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

第二篇文章一出来，各界的关注一下子就来了，但很多人还摸不准路子：《解放日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人？

还没等大家有所反应，3月22日，第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又出现在了《解放日报》的头版——《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强调：“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4月12日，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也见报了。

至此，《解放日报》以两周一篇的速度，在头版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

各方关注迅速升温。

三天以后，第一篇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的一本叫《当代思潮》的杂志上发表了，题目是《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文章里有一句话，看得周瑞金出了一身冷汗，他又觉得应该不是在说他自己：

“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原本已经定下来要调任香港《大公报》总编辑、已经买好机票的周瑞金发现，他的调动被卡住了。

5

一开始开炮的，都只是些小杂志。

6月，《高校理论战线》杂志发表了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

但是到了8月，《求是》杂志也加入进来，发表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在这些文章里，有的是理性讨论，有的则颇有火药味：

“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

“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

“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这让周瑞金他们感到有些冤枉：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还是姓“资”了？

按照周瑞金的回忆，当时新华社的《半月谈》是唯一支持“皇甫平”的中央媒体，他们公开提出，对“改革开放”，不能任意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然，《半月谈》也受到了其他中央媒体的批判。

周瑞金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当时的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纷纷报道了“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引发了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辩论；台湾的《联合报》直接发文，说是“上海在向北京叫板”。而当时尚未解散的苏联塔斯社干脆派人来问：“这系列文章是不是邓小平在背后授意的？”

重重压力之下，当时中宣部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到上海来调查“皇甫平”系列文章成文的背景。

当时上海有一位老干部，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逐字逐句批驳了“皇甫平”的文章。他把文章寄给市委领导，市委领导转给了周瑞金，但没有批示什么意见。对此，周瑞金干脆没有理睬。

但有些事，他却没办法不理睬。当时上海市离退休老干部有一个读报小组，有一天他们开读报会，指定要周瑞金去参加。按照周瑞金的回忆，他去了后，他们的批评是：

“你无非是听了邓小平谈的话，邓小平现在算什么，他现在退休了，是一般党员，难道他说的都正确吗？你都要跟着宣传吗？”

按照周瑞金的回忆，理论界当时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他：“说是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

周瑞金实在无法认同里面的一些论述，就让驻京办记者告诉作者：“删掉那些话，不然《解放日报》绝不刊登。”

当时，还有一位中央大报的社长，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以私人身份来到解放日报社，进门就问：“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周瑞金的回答是：“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做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

不过，周瑞金还是以个人名义，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写了一封信，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在此之前，上海的市委领导一直都没有给周瑞金施加任何压力，只是希望《解放日报》不要撰文反驳，淡化处理。

周瑞金在信中说：“按照历年的惯例，党报的社论、重要的评论员文章应该送审，但并没有规定署名文章、署名评论也要送审，皇甫平评论按惯例是可以不送审的。更重要的是，我担心送审会让你们为难和被动，如果由此产生什么问题的话，我愿意个人承担责任。”

对周瑞金的那封信，书记和市长都圈阅了，但没有表示意见；市委副书记做了批示，但批示没有讲文章该不该写、写得对不对，只批了一句话：“像类似这样的文章今后还是要送审。”

对此，周瑞金做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但另一方面，他心里也更有底了。

6

周瑞金的底气，更多的是来自其他渠道的反馈。

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就一直在给周瑞金打气：

“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你们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看到第二篇文章的时候就大感兴奋，他后来对周瑞金说：“一看‘皇甫平’就是大有来头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话了！”

当然，吴敬琏是猜错了，在这件事情上，邓小平始终没有介入过。在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召开的“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上，吴敬琏和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一起，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吴敬琏的观点是：

“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

除了专家的意见，让周瑞金受到鼓舞的，还有普通读者的心声。他回忆：“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接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在各省市之间当然也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互联网还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年代里，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上海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

时任《新闻记者》杂志主编的魏永征，是“皇甫平”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仅自己撰文，还拒绝刊登一位老干部写的批判文章。他回忆，当时上海有四位局级干部前往某省办公事，省委书记接见他们时开口便问关于“皇甫平”的文章。没等上海的干部回答，这位省委书记已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列举“皇甫平”种种观点。

最后，省委书记总结：“都是我的心里话！”

7

在这场由“皇甫平”文章引发的大讨论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表意见。

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在历时近一年的关于“改革开放”和“姓社姓资”的大讨论中，邓小平一直在安静观察。不过，当时不发声音，并不代表从此就不发声音了。

1992年元旦，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忽然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要来了。”

1992年1月17日，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在党的十四大即将召开的前夕，载着88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从北京开出，向南方驶去。

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南方视察。

在视察南方的过程中，邓小平终于在等待了一年之后，公开、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特别强调指出：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参观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总公司时，邓小平说：“特区发展了十几年才有今天的样子，垮起来是一夜之间哪！……只要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也让上海《解放日报》遭受的压力顿时消失。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

不久之后，周瑞金调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在很多年后，回忆当年的“皇甫平”系列文章经历的风风雨雨，周瑞金用了一句话来总结：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我与皇甫平——写在〈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周瑞金，《新闻记者》，2009年第9期）

3.《1991年的皇甫平到底是谁》（李月刚、周筱赟，南方新闻网，2008年12月）

4.《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皇甫平”的“四论改革”》（吴光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5.《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陈雷，中央党史出版社，2014年）

残酷太空路：中国“长征三号乙”首次发射失败幕后

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国航天”一直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名词，但任何成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说的，是迄今为止在世界航天史上排名第五的一场事故。而这场事故，也是中国航天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说起“2·15”，每个中国航天人都刻骨铭心。

1

1996年，是中国农历的丙子年，也就是鼠年。

那一年的2月，当中国大地上已经开始弥漫浓浓的年味时，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却进入了临战状态。

按照计划，在2月15日的凌晨，中国将首次发射“长征三号乙”（CZ–3B）运载火箭。

这是一次意义极其重大的发射。

从火箭本身来说，“长征三号乙”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长征三号甲”的基础上，首次推出的新型运载火箭，是当时中国将卫星发射到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这是它的第一次亮相。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是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CZ-3A和CZ-2E火箭的基础上研制的大型三级液体捆绑火箭，以长征三号甲火箭作为芯级，在其一子级上捆绑四枚直径2.25米的液体助推器而构成，主要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卫星，亦可进行一箭多星发射或其他轨道卫星的发射，也是中国用于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主力火箭

从运载任务来说，“长征三号乙”首次亮相就负责运载一颗外国卫星上天——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委托发射的“国际通信708”卫星。

从传播范围来说，这次“长征三号乙”的“处女秀”将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进行实况转播。

“长征三号乙”在整个测试过程中虽然发生了一些意外，但总体非常

顺利。整个卫星基地的相关工作人员虽然进入了紧张的临战状态，但心情还是相对放松的，当时基地里大家见面时都会说上一句："打完这颗星，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长征三号乙"火箭的总设计师和总指挥龙乐豪院士，事后回忆这场发射时说了一句话："当时我们的胆子也够大了，首飞就承担发射一颗国际卫星，还全世界公开转播，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2

1996年2月15日凌晨3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2号发射台，一切准备就绪。

崭新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高高矗立，仿佛在接受检阅。

"10，9，8，7，6，5，4，3，2，1，0，点火！"

火箭顺利点火，升空。

但就在点火升空后的第二秒，在指挥室的专家立刻发现情况不对：火箭的箭体明显发生了倾斜！

当时正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和同事散步的火箭发动机专家王之任，特地拉住同事停下脚步，准备目睹火箭升空的壮美景象。

她回忆当时的情况：

"看着看着，怎么没往上去，忽然就拐着，横着过来了。我一看，哎哟，这是什么轨迹啊！一拐弯，火箭就往下扎，我一看就说，出问题了！"

当时在现场发生的情况，确实如王之任所见：

"长征三号乙"在发射升空两秒后，整个箭体就发生了明显倾斜，随着高度的上升，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横着飞了出去，像一枚巨大的导弹，掠过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天空，径直撞向了离基地大约1.8公里外的山头，整个过程只有22秒。

由于火箭刚升空不久，几乎装满了燃料，所以在撞击山头后，立刻引起了剧烈的爆炸，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整个"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连同搭载的“国际通信708”卫星，瞬间箭星俱毁。

整个控制室的专家和工作人员望着监控大屏幕，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由于进入紧急状态，整个发射场随即断电，指挥室瞬间陷入黑暗，人们的脑海中只有爆炸的火球的画面。

当时在家中收看电视转播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运载处处长倪海龙，盯着电视屏幕目瞪口呆，下意识反复念叨一句话：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这场事故的严重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出现了人员伤亡。

从爆炸本身来说，失控火箭爆炸的地点正好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航天工程技术人员临时住宿的协作楼和宾馆附近，强烈的气浪瞬间冲垮了钢筋水泥建筑，造成了严重破坏。

根据规定，每次火箭发射，基地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在发射前进入地下掩体。但是，在那次发射前，有少数科研人员并没有按照规定进入掩体，而是待在宿舍内。根据《人民日报》当时的报道，事故造成6人死亡，57人受伤。

不幸中的万幸是，耸立的山头挡住了失控火箭的行进路线，不然当时火箭将径直飞向发射指挥部，在那里有大批的专家和工程师。

但是，谣言还是开始慢慢传播：



被爆炸冲击波摧毁的协作楼

“中国的‘长征三号乙’首飞爆炸，火箭直接坠入发射基地家属区，家属区荡然无存，至少500人死亡……”这个谣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互联网的传播逐渐升级，到了2016年左右，已经成了“坠落在附近村庄，至少造成1000人死亡”。

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发射基地都不会把家属区建在发射场附近。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周边的村落，向来就遵守“发射前2小时提前撤离”的规定。离发射基地最近（1公里）的麻叶村全村加在一起也没有1000人，且早已撤离。当时发射基地方圆2.5公里范围内已经基本没有村民。

伤亡人数是可以用数据来辟谣的，但有些事情带来的影响却是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

4

很多时候，一枚火箭的发射不仅仅关系着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更关系到民族感情。

在发射前的动员会上，总设计师和总指挥龙乐豪曾当众说过一句话：

“这次发射如果成功，是了不得；如果发射失败，是不得了。”

火箭爆炸的那一刹那，有人看见龙乐豪院士低下了头，独自一人离开了人群，在旁边的一个木箱上无力地坐了下来。

三天之内，当时58岁，原本只有一些灰白头发的龙乐豪，已是满头白发。

更无法平息的，是公众的情绪。

《风雨长征号》一书的作者李鸣生曾描述过这样一件事。“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爆炸发生后一周，一位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高级工程师去小镇上买鸡。挑好了鸡准备过秤的时候，女小贩一把夺过鸡，说不卖了。工程师搞不明白：“前面几个人不都买走了吗？怎么轮到我就不卖？”女小贩满面怒容回答：“你们在这里几十年，拿着高薪高奖金，连西瓜大的美国卫星都打不上去，还有脸吃鸡？”工程师无言以对，默默转身离开。

一位从北京到西昌来分析事故原因的航天技术专家，在参加完会议后准备返回北京。基地的工作人员去火车站给他买软卧票，他的身份证和介绍信被递进售票窗口之后，被售票员直接扔了出来：“你们这些人，把中国的脸都丢尽了，还想坐软卧？”

憋足了一口气的中国航天人想立刻打个翻身仗，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又一次沉重打击。

1996年8月18日，又一枚“长征三号甲”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点火升空，任务是把运载的“中星7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一次，火箭顺利升空，但三级发动机在二次点火时发生故障，未能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再次失败。

半年之内失败两次，这让“中国航天”的声誉在国际社会蒙上了巨大阴影。一时之间，“长征”系列火箭在国际发射市场上几乎成了“失败”的代名词。

中国的航天人在那段时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低谷——多家国际公司取消了之前与“长征”火箭签订的发射合同，而国际保险公司居然已经不愿意为中国的火箭发射承担保险。

中国火箭发射一度在国际商业发射领域面临被踢出局的窘境。

“中国的航天技术到底行不行？”

这是当时中国航天人面临的国际舆论提出最多的质疑。但事故摆在那里，需要反思的，只能是自己。

首先是彻查原因。

根据多方专家和独立调查团队长达半年的深入调查分析，“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失败原因终于确定：是由于随动框架伺服回路里电压输出模块中的一个金–铝焊接点失效，阻碍了回路电流的输出，导致控制整个火箭的惯性平台失效，火箭按错误的姿态信号进行姿态矫正，最终坠毁。

这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焊接点失效造成的。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焊接点，几乎给整个中国航天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原因查出来之后，立刻改进。

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2·15”成了中国航天人心中一碰就痛的数字，却也为他们重踏征程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从那之后，44项共256条严厉乃至苛刻的改进措施被提了出来，从仓库保管员到火箭设计总工程师，小到一颗螺丝钉、一根电线，每个人都再一次明确了自己的责任。

据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透露：“在实施新规章制度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总共处理了500多人。”

科学实验和太空探索当然允许失败，但为失败付出代价，是为了今后避免再一次失败。

1997年5月12日凌晨，又一枚“长征三号甲”火箭不屈地矗立在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0时17分，火箭点火，24分钟后顺利将搭载的中国新一代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送入预定轨道。

当发射成功的消息传来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指挥室的工作人员都自发起立鼓掌，不少人甚至热泪盈眶——这一年多时间，过得太不容易了。

而就在此时，总经理刘纪原宣布所有人到二楼会议厅开会。当兴高采烈的大家以为这是一场表彰大会的时候，刘纪原却毫不客气地又点名批评了一些他认为“绝不是技术上失误，而是工作态度马虎”的事，比如有一个伺服器漏气，送去检修后盖了个戳子，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

不少等着被表扬的人被骂蒙了，但也有不少人发自内心地理解：

火箭发射不是一场喊口号人多心齐就可以完成的运动，而是一项需要将每一个细节都精确到一丝一毫的系统工程。

中国航天再也经不起“2·15”这样的惨痛失败了。

6

1997年8月下旬，由美国劳拉公司为菲律宾制造的“马布海1号”通信卫星运抵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担任这颗卫星发射升空任务的，是第二次出场亮相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在这次发射之前，中国航天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派出代表团经过多轮激烈谈判，说服国际公司再次信任中国的航天技术，尤其是要让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国际保险公司愿意再次承保。

而所有的承诺，必须要有事实来兑现。

1997年8月20日凌晨1点50分，改进后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所有中国航天人的注视下点火升空，30分钟后，成功将“马布海1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发射终于成功。

两个月后的10月17日，还是“长征三号乙”，再次将劳拉公司制造的“亚太二号R”通信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两次成功之后，中国航天技术的公信力，在国际市场上重新建立起来。

截至2019年1月11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一共进行了54次发射，其中成功51次，部分成功2次，失败1次，发射成功率达到94.44%（其中在2015年发射19箭45星，达到100%成功率）。

唯一的一次失败，就是1996年2月15日首飞时的那场失败。

那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失败，也是一个再次出发的起点。

馒头说

2017年6月19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又出了一次问题。

在执行运载“中星9A”广播电视直播卫星的任务中，火箭三级工作异常，卫星没能被送入预定轨道。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官方网站和中央电视台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个消息，而诸多中国网友的留言多少让人有些出乎意料：

“难得可以看到一次失败。真实！透明！”

“没事，失败了再总结教训，再接再厉！”

“难得失败一次，不过失败意味着未来的成功！加油！”

相对于当年遭遇“不卖鸡”和“不卖软卧票”的前辈们，现在的中国航天人无疑是幸福的，因为有了更充裕的资金、更自信的实力，关键是，还有了一个更宽松的舆论环境。

不过，我们也很难去苛责当年那些老百姓，并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他们，渴望祖国腾飞的心情其实和航天人是一样的，也正是这种巨大的期待，成为航天人跌倒再爬起的巨大动力之一。

科学实验总是会有失败的，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宽容，这对中国航天人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相信这并不会成为他们可以放松懈怠哪怕一丝一毫的理由，因为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还有太多太多的挑战需要严谨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去面对。

从无到有，砥砺前行。

中国航天人，请继续加油！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撼天记》第12集《太空没有梦（上）》（优酷网）

2.《长征三号乙火箭事故原因查明》（《中国航天》，1996年第10期）

3.《网传“长三乙首发失败死500人”是谣言　不存在“瞒报”》（孝金波、实习生刘婧婷，人民网，2016年2月18日）

4.《萨沙谈：1996年长征火箭发射失败，炸死1000人？》（萨沙，东方头条，2016年6月17日）

5.《中国航天科技澄清“长三乙火箭事故”：造成6人死亡》（张素，中国新闻网，2016年2月18日）

6.《长三乙火箭首飞失败画面曝光》（央视网，2016年11月24日）

7.《中国火箭发射失败画面曝光 揭秘背后故事》（央视新闻，2016年11月24日）

8.《那年春节长三乙首飞却遭失败，22年后中国航天早已今非昔比》（腾讯网，2018年2月16日）

执念

“执念”首先是“执”，就是执着，不可动摇。

可能在不少外人眼里，虽然你想做的事并不能说是错的，但这种执着是不能理解的。但“执念”之所以为“执念”，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人类不断寻找内心真实想法的一个过程，和外人无关。

这未必是一场能看到结果的斗争，但这关乎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内心的那种冲动、渴望和梦想。

所以执着，哪怕失败。

徐霞客：一个富二代的理想与实践

这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而他在我们的脑海里，往往是这样一个形象：手持拐杖，身背行囊，风尘仆仆，餐风饮露。这些也对，也有些不对。徐霞客，值得我们了解的还有更多。

1

1587年1月5日，也就是明朝的万历十四年，家住江阴的徐有勉迎来了自己第二个儿子。

用周围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儿子一定是上辈子积了德，才能投这样一个好胎。

因为江阴的徐家，是当地有名的巨富。

徐家当时富到什么地步呢？徐有勉的爷爷徐洽当时从家里分家析产，光田产就分到了12597亩——你没看错，是五位数。据说他们家的田产，从南到北，绵延二十几公里。

到了徐有勉的父亲徐衍芳这一代，出现了家道中落的迹象，但好在徐有勉还比较有头脑，在他和妻子王孺人的共同操持下，徐家又开始兴旺起来。



徐霞客

徐有勉得到自己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已经42岁了，而他的妻子王孺人也已经41岁了。要知道，那时候的女子在41岁产子，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所以，不少人认为这个孩子肯定是一个奇人。

徐有勉显然也对这个孩子抱有期待，所以给他取名为“弘祖”，字“振之”。

没错，这个徐弘祖，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徐霞客。

2

尽管徐有勉对自己这个儿子的期待从取名上就可以看出，但是，那份期待并不是通常人们以为的“升官发财”。

江阴徐家是个很有意思的家族。

徐弘祖的高祖名叫徐经，当初在江南也算是一个又有钱又有文化的小才子。徐经在乡试考取第一后，结交了几个朋友一起去京城赶考。结果考试高中，却被人传出行贿考官，提前知道考题，这就是弘治年间著名的“会试舞弊案”。这起案件是否冤屈至今仍有争议，但在当时，徐经不仅被剥夺了功名和今后考试的资格，还牵连了一个和他一起赶考的铁哥们儿——唐伯虎，间接促成了之后一代江南风流才子的诞生。

徐经经此一变，35岁就英年早逝。自此，江阴徐家对科考一途似乎心灰意冷，到了徐有勉这代，更是不愿意做官了。有人劝他捐钱买一个官，他听了掉头就走。平日里，徐有勉最喜欢的就是带着几个家童游山玩水，饱览风光。

父亲的这个爱好很快就感染了儿子。徐弘祖从小就对外面的山山水水很感兴趣，上课时别人在读《孟子》《中庸》，他在偷偷看《水经注》，放学后就喜欢去外面“野”，有山就爬，有水就下。

面对这样一个游手好闲的“野孩子”，徐有勉非但不责骂，反而还表扬，他曾对人说：

“次子弘祖眉宇之间有烟霞之气，读书好客，看来可以继承我的志趣，我并不愿意他富贵。”

有了父亲撑腰，徐弘祖更是理直气壮了。他在15岁时象征性地去参加了一次“童子试”，在科考仕途的第一场战斗中，徐弘祖愉快地名落孙山，然后就宣布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而是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

当时的名儒陈继儒因为徐弘祖眉宇间的烟霞气，以及总是朝霞出，晚霞归，于是在给客人介绍徐弘祖时称他为“霞客”。徐弘祖索性就以此

为号，从此自称为“徐霞客”。

在徐霞客19岁的时候，父亲病故。守孝三年之后，22岁的徐霞客决定出门去实现自己“朝碧海而暮苍梧”的理想。

但是，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母亲王孺人还健在。

老祖宗早就教导：“父母在，不远游。”

不过，徐霞客的母亲主动帮儿子接了下半句：“游必有方。”

王孺人是一个非常通达的女性。尽管儿子出游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去处，但她知道儿子的总目标是清晰的：游遍大好河山。为此，她还特地为徐霞客做了一顶“远游冠”，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于是，徐霞客和母亲约定每年春天出去，秋天回来，然后就开始踏上征程。

3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徐霞客的旅行是“孤身一人，万里远征”。

“万里”不假，却不“孤身”。

徐霞客在旅行的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般来说，他出行最少会带一个仆人，多的时候会有两三个，此外，有时还有他的朋友和族人相伴而行。

关于徐霞客的游历生活，曾经有过一段关于“污点”的争议，争论出自他《徐霞客游记》的《粤西游日记三》。徐霞客在这篇游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广西旅行时因为雇用的仆人逃跑，征用了当地的“妇人”和“童子”抬肩舆，还因为丢失了自己带的鸡，绑了村民索讨（文中用了“絷”字），显得霸道又扰民。

后人有对“妇人”“童子”的定义做探讨，也对“絷”是否解释为“捆绑”有争论，但姑且撇开这段争论不说，单从这段记载，至少可以看出几点：

第一，徐霞客确实不是孤身一人进行游历的；

第二，徐霞客每次游历其实准备都很充分，带的东西很齐全；

第三，他的旅程肯定很艰苦，在《徐霞客游记》中曾不止一次记载仆人逃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仆人吃不了这个苦，或是徐霞客要去的地方太危险。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即便有人相伴，有钱支撑，以当时的条件来看，徐霞客的游历还是非常艰苦与危险的。他常常一天就要走近百里路，在荒郊野地扎营过夜，碰到高山要爬，遇见怪洞要钻，可以想象，陪伴他的人的心理阴影有多大。

而且，虽然徐霞客不是“穷游”，但以当时他们家的财力，要支撑他进行持续三十多年的长途游历，还是有点吃力的（家里还有母亲、妻子和孩子）。尤其是到了徐霞客人生后期的“西南远征”时，徐家的财力已经大不如前，徐霞客基本上体会到了“穷游”的滋味，很多时候需要靠借钱、地方官员资助和当地村民免费接待来维持旅行。甚至有段时间还依靠政府官员发给他的“马牌”，免费享受明朝的驿站体系（其实徐霞客当时这样做是违法的，但明朝后期“驿站”系统确实已经处于一种脱管状态）。

但无论是“富游”还是“穷游”，徐霞客始终没有选择放弃。

这其实也让当时不少人感到奇怪：花费自己的所有去游山玩水，到底值得吗？

但事实上，徐霞客并不仅仅是在游山玩水。

4

说徐霞客是在用一种科学的精神进行考察，恐怕并不为过。

比如“游山”。

徐霞客在1616年和1618年两次到过黄山。那时候的黄山还人迹罕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光明顶”“鲫鱼背”这些景点，都是他第一个发现并记录的。在攀爬天都峰之后，他觉得莲花峰更高（“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于是再登上莲花峰，证明它才是黄山第一高峰。现代科技检测手段得出，莲花峰的海拔确实比天都峰要高54米，但两者相距1.1公里。在徐霞客那个时代，用目力测出，再用最原始的脚力去验证，

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再比如“玩水”。

徐霞客到过很多江河，但都是带着思考去的，纠正了很多史书上记载的河道错误。战国时期的地理书《禹贡》记载有“岷江导江”的说法，长期以来，大家都相信岷江是长江的源头。但徐霞客只信自己走到的和看到的，他“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最终勘察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还要长一千多里，所以他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源头。1978年，中国政府派出考察队，确认长江的正源是唐古拉山的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

还有“钻洞”。

徐霞客考察过一百多个石灰岩洞，在没有任何仪器，全凭目测的情况下，他的很多记录如今都被证实基本不差。他还指出岩洞是因为流水的侵蚀造成的，石钟乳则是因为石灰岩溶于水，由石灰岩滴下的水蒸发后凝聚而成的。在徐霞客去世后一百多年，欧洲人才开始考察石灰岩地貌，法国的洞穴联盟专家巴赫巴瑞曾表示：“徐霞客是早期真正的洞穴专家。”

在徐霞客游历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进行了四次长距离的跋涉，按现在的行政区划算，他到过江苏、浙江、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19个省、市、自治区，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而更与普通游客不同的是，在游历的过程中，徐霞客把自己的经历、观察、考证和感悟都记录下来，经后人整理，形成了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

这本被后人称为“奇书”的《徐霞客游记》，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不仅在地理学上有很高的价值，在文学性上也独树一帜，为人称道。

英国的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这样评价：

“《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徐霞客的游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他22岁到28岁这六年。这六年，他主要是在“开眼界”，游历了太湖、泰山等地方，并没有开始进行文字记录。

第二阶段，是他28岁到48岁这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徐霞客精力最旺盛，也是走的地方最多的一个阶段。他游历了浙江和福建的很多地方，并且攀爬了黄山、嵩山、华山、恒山、五台山等诸多名山。在这个阶段，他开始把自己的一些经历、观察、考证和感悟记录下来。

第三阶段，是50岁到53岁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徐霞客完成了自己心心念念的“西南远征”，深入云贵一带。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他遭遇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的朋友静闻之死。

之前说过，徐霞客每次游历，身边总会有朋友，僧人就是其中一类。静闻是一名虔诚的僧人，他用自己的血抄写了7万多字的《法华经》，想供奉到迦叶菩萨的道场——云南大理的鸡足山。听闻徐霞客要去云贵一带，静闻主动提出希望同行。



民国时期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大观》。徐霞客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静闻之死

结果行至湘江，徐霞客一行遭遇了强盗，静闻为了保护徐霞客的书籍和行李，挨了强盗两刀。一路带伤行至南宁（今广西）崇善寺，静闻一病不起，最终客死异乡。徐霞客在大悲之下，跋涉千里，亲自把静闻的遗骨送上鸡足山，完成朋友的夙愿。这件事对他打击颇大。

第二件事，就是徐霞客也感受到了岁月不饶人。

在抵达云南后不久，徐霞客的脚就不行了，甚至无法下地走路。在云南拖了一阵子后，当地的土司派了几个精壮的小伙，用滑竿把徐霞客一路抬行四千里，从云南送回了江阴老家。

他再也无法旅行了。

6

回到家乡的徐霞客，已经53岁了。

一回到家，徐霞客的身体很快就不行了。

1641年3月8日，徐霞客在家中病逝，享年54岁。

就在病卧床头时，他说了一句话：

“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死不恨矣。”

言下之意是，张骞、玄奘都是受国家资助出行，也就这样了。我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去了那么多地方，这辈子值了，死而无憾。

2011年3月30日，中国国务院通过决议，自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

那是《徐霞客游记》第一篇开篇的日子。

馒头说

2018年，埃隆·马斯克的私人太空公司Space X公布已签下第一个太空私人旅客，该公司将带着他环绕月球。

那是个日本人，叫前泽友作。这个人在日本也不算顶级富豪，他的

资产大概也就20多亿美元，而这次太空旅行应该至少要花费1亿美元。

前泽友作还说，他准备带6到8名艺术家一起上去。

我和老婆热烈地讨论了这个话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值！

当然，我们也不是超级富豪，只能站在我们的立场瞎想。但至少从我们的角度看：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吃喝玩？买买买？但这最终又有什么意义呢？反正我们如果有那么多钱，肯定也会毫不犹豫签合同的。

300多年前的徐霞客，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吧。

以徐霞客的智商和才学，再加上家族的财富和人脉，如果认真考个功名，问题应该不大。退而求其次，做一个富甲一方的财主，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如果他真的做出了那样的选择，估计我们现在根本不会知道“徐霞客”的名字，当然也不会有《徐霞客游记》这样一本巨著传世。留在世上的，可能是崇祯年间的某一位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进士，或者是江阴一些老者夏天纳凉给儿孙们讲故事时，说起的某个当年富甲一方的土财主。

可能也有人会说：这是富人们考虑的事，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得也对。但我总觉得，有些事情，和钱多钱少是没关系的。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自己留下最好的回忆。

如果还有余力，就给身边人，其他人，更多的人，留下有意义的回忆。

那是最好的事了。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徐霞客旅行考察生活小考》（夏明亮、侯甬坚，《三峡论坛》，2012年第1期）

2.《驳所谓徐霞客的“污点”“劣迹”》（陈锡良，《徐霞客研究（第18辑）》，2009年4月1日）

3.《白银、性别与晚明社会变迁——以徐霞客家族为个案》［万明，《北京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科学版）》，第55卷第4期2018年7月］

4.《徐霞客：科学主义的奇人》（朱亚宗，《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3期）

5.《那个孤独而伟岸的身影》（刘岸俊，《贵州日报》，2017年5月26日）

6.《徐霞客是个什么样的人：徐霞客的家族及家庭》（“马核–霞客行”，新浪博客，2015年12月6日）

7.《作为科学家的徐霞客：他的旅行和你想的不一样》（刘汉俊，《人民日报》，2017年5月25日）

8.《徐霞客——做一个真正的“驴友”究竟有多难？》（搜狐网，2016年10月19日）

9.《徐霞客：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中国历史网，2016年7月11日）

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一周，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

一个人要完成自己的梦想，尤其是那些看上去遥不可及的梦想，是需要强大和持久的动力的。有时候，这种动力未必来自什么崇高的理想，而是简单直白的人类欲望。

1

1522年9月6日，西班牙的圣罗卡港。

港口的水手们看到，在远处的海平面，慢慢出现了一艘船的桅杆。



智利麦哲伦海峡畔的蓬塔阿雷纳斯，有一座“维多利亚号”博物馆，里面有一艘“维多利亚号”的仿制品

一些刚到港口来工作的码头工人，完全不认识这艘慢慢驶向港口的船，但一些有资历的人很快就发出了惊叹：

天哪！居然是“维多利亚号”！

他们中有不少人清楚地记得，三年前，正是这艘“维多利亚号”，率

领了其余的四艘帆船，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圣罗卡港，但从此杳无音讯。

三年后，“维多利亚号”居然又出现了。

不同的是，回来的，只有“维多利亚号”一艘船。

而这艘船，刚刚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艘船——它完整绕了地球一圈。

2

当初率领那支船队出发的人，叫作费迪南·麦哲伦。

麦哲伦1480年出生在葡萄牙的波尔图，他的父亲在他10岁的时候把他送进了宫廷，担任王后的侍童。1496年，16岁的麦哲伦进入国家航海事务所工作，从此注定和海洋结缘。

麦哲伦应该是幸运的，因为他正好出生在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那个时代，被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而它有个更让人热血偾张的名称，叫作“大航海时代”。



在那个时代，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率先崛起，凭借航海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强国。在成为强国后，它们开始踏出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征服、殖民和贸易。

但在15世纪中叶，欧洲人碰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那就是盘踞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

当时西方与东方做生意的商路，一般是三条：

第一条是陆路，就是我们熟悉的“丝绸之路”，船只从君士坦丁堡登陆，经小亚细亚、黑海和里海南岸到中亚，再翻过帕米尔高原到中国；

第二条是海路，从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抵达波斯湾；

第三条也是海路，从埃及经过红海到亚丁湾，再换船到印度或中国。

奥斯曼帝国在中亚崛起之后，将这三条传统的商路都捏在了自己的手里，对来往的货物都课以重税，大大削薄了西欧贵族和商人的贸易利润。

怎么办？无非两条途径。

一条途径，就是打。但当时的阿拉伯人拥有绝不逊于欧洲人的航海术以及剽悍的军队，欧洲军队很难讨到便宜。

另一条途径，就是躲。躲开三条传统的商路，从海上开辟新的航路。

1505年和1511年，麦哲伦随同葡萄牙的军队两次前往印度作战。在1511年之后，葡萄牙人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到了位置关键的马六甲海峡，东方的宝石和香料通过马六甲海峡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葡萄牙因此国力大增。

1513年，随葡军攻打摩洛哥要塞受伤而落得终身跛脚的麦哲伦，不甘寂寞地回到了葡萄牙。

那一年，麦哲伦33岁。对于他来说，个人的野心和目标还远没有达

成，因为他有一个叫法力罗的朋友，是一名占星学家，他测算出了“香料群岛”的大致位置。

“香料群岛”是当时的欧洲人对出产香料的东印度群岛的称呼，对于渴求香料的欧洲人来说，那里简直就是遍地黄金的天堂——如果能开辟一条新的航线直达香料群岛，那肯定能发一笔横财。

怎么去呢？麦哲伦有他自己的想法。

麦哲伦一直是坚定的“地圆说”支持者，他推测，在“香料群岛”的东面，肯定还有一片大洋，再过去，就是哥伦布发现的美洲大陆。

在他之前，一批航海家几乎已经证明了“地圆说”的理论：哥伦布、迪亚士、达·伽马……现在，只需要有人去补上最后一个角。

于是，麦哲伦决定进行一次环球航行。

3

几乎一无所有的麦哲伦，开始为他“环球航行”的创业项目寻找投资人。

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葡萄牙国王。

麦哲伦向当时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得到资助，组建一支环球航行的船队。

葡萄牙国王听完后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他。

对于葡萄牙国王而言，他确实没有资助麦哲伦的动力：我都已经控制了从东方到欧洲的航线了，我干吗还要开拓新的航线呢？

麦哲伦想了想，也对，于是就来到了西班牙。

为什么呢？

1494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早期的航海强国，在西班牙小镇托尔德西利亚斯签订了著名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这个条约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国家各自豪迈地发出宣言：

我的征途，是半个星辰大海——它们两家约定，将全世界一分为二，一人一半。

这个约定以西经46°37‘为界限，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

虽然那个时候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对整个世界的大陆和海洋轮廓还不是非常清楚，但它们却雄心壮志地订立了这个约定，而且，双方还基本都遵守这个约定。

麦哲伦的想法就是：要打破葡萄牙对现有贸易航路的垄断，西班牙就有足够的动力去开辟一条新的航线，绕过葡萄牙的势力范围。

麦哲伦首先来到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在那里，麦哲伦的运气非常不错，他的想法和才能打动了塞维利亚的要塞司令，这位司令不仅很欣赏麦哲伦，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在要塞司令的引荐下，麦哲伦见到了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麦哲伦送给国王一个自制的精美地球仪，然后当着国王的面，向他分析为什么说地球是圆的，以及自己愿意绕地球航行一周，为西班牙开拓疆土，开辟新航线。

西班牙国王确实很难拒绝麦哲伦提出的宏伟计划。

1519年8月10日，宣布放弃葡萄牙国籍，加入西班牙国籍的麦哲伦，坐镇旗舰“特立尼达号”，率领着“圣安东尼奥号”、“康塞普逊号”、“维多利亚号”和“圣地亚哥号”五艘舰船，浩浩荡荡离开了西班牙的圣罗卡港。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就这样开始了。

4

11月29日，在大西洋上航行了70天后，麦哲伦船队抵达了巴西海岸。

在休整了一个月后，麦哲伦船队继续起航，来到了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湾。当时船员们都很兴奋，以为已经到了南美洲的尽头，可以绕过去进入一个全新的大洋了。但是他们后来发现自己搞错了，那只是一个河口而已。

玩过《大航海时代》系列游戏的人都会有一种相同的感受，那就是发现未知地理和新事物的新奇感和成就感，前进的每一步，哪怕是误打误撞，都会颠覆自己原有的认知。

但长期的航海，除了有新发现带来的刺激感外，更多的是各种潜伏的危险。

3月底，南美洲进入了隆冬季节，麦哲伦为了避寒，率领船队进入了圣胡利安港（在今阿根廷的圣克鲁斯省）。

圣胡利安港虽然被称为“港口”，但那时候还是一片荒凉之地。这时候，远洋航行中一个常见的危险爆发了——船员叛乱了。

因为天气非常寒冷，而船队的粮食补给又出现了困难，所以几艘船的船员都开始后悔跟随麦哲伦进行这次未知的远航。五艘船里有三艘船的船长联合起来开始反对麦哲伦。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斗，麦哲伦这一边的人杀死了叛乱的船长和船员，乱局暂时平复了下来。当然，最关键的是，麦哲伦他们在圣胡利安港发现了大量的淡水和海鸟，由于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以船员们的情绪又恢复了平静。

在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季后，1520年8月，麦哲伦的船队又一次拔锚起航。

但出发的船队，只剩下四艘船了，而这时，离从西班牙出发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年。

10月，麦哲伦船队接近了南美洲的最南端。在那里，麦哲伦苦苦寻觅可以穿越美洲大陆，到达他们认为的“南海”的航道。经过两天两夜与滔天巨浪和风暴的搏斗，麦哲伦船队付出了又损失一条船的代价，终于穿越了一条狭长的海峡，顺利进入了“南海”。

那条海峡，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

麦哲伦海峡全长592公里，最宽处有33公里，最窄处只有3公里，最深处超过1公里，最浅处只有20米。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前，麦哲伦海峡是全世界船队经过南美洲的重要航道。

麦哲伦他们认为的“南海”，是一片真正一望无际的大海。

船队在这片海洋中一共航行了100多天，居然一次风暴也没有遇到过，激动的麦哲伦于是就给这片大海起了一个名字：太平洋。

但是，尽管没有风暴，在没有任何岛屿和陆地的大洋中航行100多天后，远航的又一个致命危险悄然来袭——他们断粮了。

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因为没有任何陆地和岛屿可以停靠，所以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没有吃到过任何一点新鲜的食物，只能用面包干充饥。然后面包干也吃完了，他们开始吃面包屑——面包屑生了虫，散发出一种像老鼠尿一般的臭气。等面包屑吃完，用作船上遮盖物的牛皮也充当了食物。被风吹雨淋过的牛皮硬得像石头一样，需要在海里浸泡四五天，放在炭火上烤很久才能食用。最后，水手们还吃木头的锯末粉充饥。

与食物一样短缺的还有淡水。淡水越喝越少，最后大家只能喝带着臭味的浑浊黄水。

在最后的生死关头，站在桅杆瞭望台上的水手终于用嘶哑的嗓音发出了大家久违的呼喊：

前方发现陆地！

麦哲伦船队看到的，是马里亚纳群岛。

他们真的穿越了太平洋。

5

1521年3月，在历经了一年半的航行之后，麦哲伦船队到达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几个小岛。

在那里，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终于显露出了他们的另一面：殖民者。在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之后，麦哲伦带了一队武装人员登上海岸，开枪打死了7个当地居民，放火烧毁了几十间茅屋和几十条小船。

再往西行，麦哲伦的船队终于抵达了菲律宾群岛。当麦哲伦发现他重新回到说马来语的人群中时，他知道，自己的环球航行真的已经接近

成功了——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地球确实是圆的。

但麦哲伦的死期却也渐渐临近了。

麦哲伦的船队被当地人带到了当时的菲律宾大港口宿务，麦哲伦向宿务的首领展示了自己的火枪和刺刀之后，首领表示愿意成为西班牙国王的属臣，并接受洗礼。

但麦哲伦还想得到更多——他开始插手附近几个小岛首领之间的矛盾。

1521年4月27日晚，麦哲伦带领60多个船员分乘三艘小船前去攻打一座小岛，但遭到了岛上居民的激烈反抗。在战斗中，麦哲伦的舰队司令身份暴露了，引来了愤怒的岛民的集体围攻，在漫天的标枪中，麦哲伦被人用大斧砍死了。

就差一步，麦哲伦就完成他的环球航行创举了。

6

领头人就这样死了，怎么办？

船员们推举麦哲伦的内弟哈尔迪担任指挥，继续完成环球航行。但随后，船队内部又发生了叛乱，船员们互相射杀，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当初的五艘船最后只剩下了两艘，而且其中的“特立尼达号”受损严重，需要大修。

最终，一位叫埃尔萨诺的舵手被选为“维多利亚号”的船长，留下需要维修的“特立尼阿达号”，孤独地踏上了返回的旅程。

为了躲避葡萄牙的船队，“维多利亚号”决定横渡印度洋，经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返回西班牙。

在航行中，因为船员患上维生素C缺乏病，整艘“维多利亚号”船上只剩下了35名船员，他们在登陆非洲西海岸的佛得角换食物时，又被统治那里的葡萄牙人捉走13个。22名船员驾驶着破旧的“维多利亚号”艰难航行，最终望到欧洲海岸线的时候，全船只剩下了18个人——他们出发的时候，整个船队一共有270名船员。

1522年9月6日，破旧的“维多利亚号”终于接近了圣罗卡港，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实际上是埃尔萨诺完成了最后一段的环球航行

极度疲劳的船员们走下了船，连当初熟悉他们的人都已经完全不认识他们了。但他们认得船舱里堆得满满的宝物：各种香料。

整个远征船队的所有损失都弥补了回来——随手抓一把新鲜的丁香，就可以换取一把金币。除了丰厚的回报，这支船队横穿太平洋，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壮举，更是被载入了史册。

只是，麦哲伦本人却看不到了。

馒头说

你知道这二十多年来，全世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其中一个推动力是什么吗？

答案可能出乎你意料：色情网站。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各类技术，其实不少是色情网站为了满足用户需求而慢慢推动发展起来的：

为了满足人们观看色情视频的需求，视频播放技术被大力发展；为了满足人们储存色情电影需要，硬盘产业发展神速；为了保证观看影片的质量，宽带速度日新月异；为了能让人看完之后即时交流，在线聊天技术开始完善；为了让人们在冲动时更方便做出消费行为，在线支付技术因此茁壮成长……

下一个会被色情产业推动着往前发展的，是智能硬件，对，比如VR（虚拟现实）设备。

写下这段话，并不是想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而是想讨论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背后的一个源动力是什么。

没错，就是欲望。

有人曾说，麦哲伦算什么航海家呀，他不就是一个殖民者吗？他航行那么远，不就是为了获得黄金和香料，地位和声望吗？

说得没错，但问题是，这正是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的动力源泉所在呀。

在面对滔天巨浪的时候，在饥渴难耐的时候，在孤立无援的时候，麦哲伦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并不是依靠什么伟大崇高的精神，而是那些非常物质的欲望。就连麦哲伦想实现环球航行的伟大梦想背后，也可以归结为欲望：开创第一，青史留名。

所以，关于麦哲伦这个人，其实也没什么好争的：他确实是一名出色的航海家，也确实是一个贪婪的殖民者。

法律从没规定，一个航海家必须是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无私奉献，才能历经艰辛完成环球航行的壮举。他就是有自己的目的和私心，因为他也是人——你可以评判他的行为是否正确，但却无法无视他

有自己的欲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这个世界，就是因为人类欲望的驱动而不断向前发展的。

只是，有节制和有规划的欲望释放，大可造福世界，小可成就自己。

反之，就不一一举例了。

海底两万里：不管你是否凝视，深渊总是在那里

毛主席曾写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不过从人类科技发展史来看，上九天难，下五洋，也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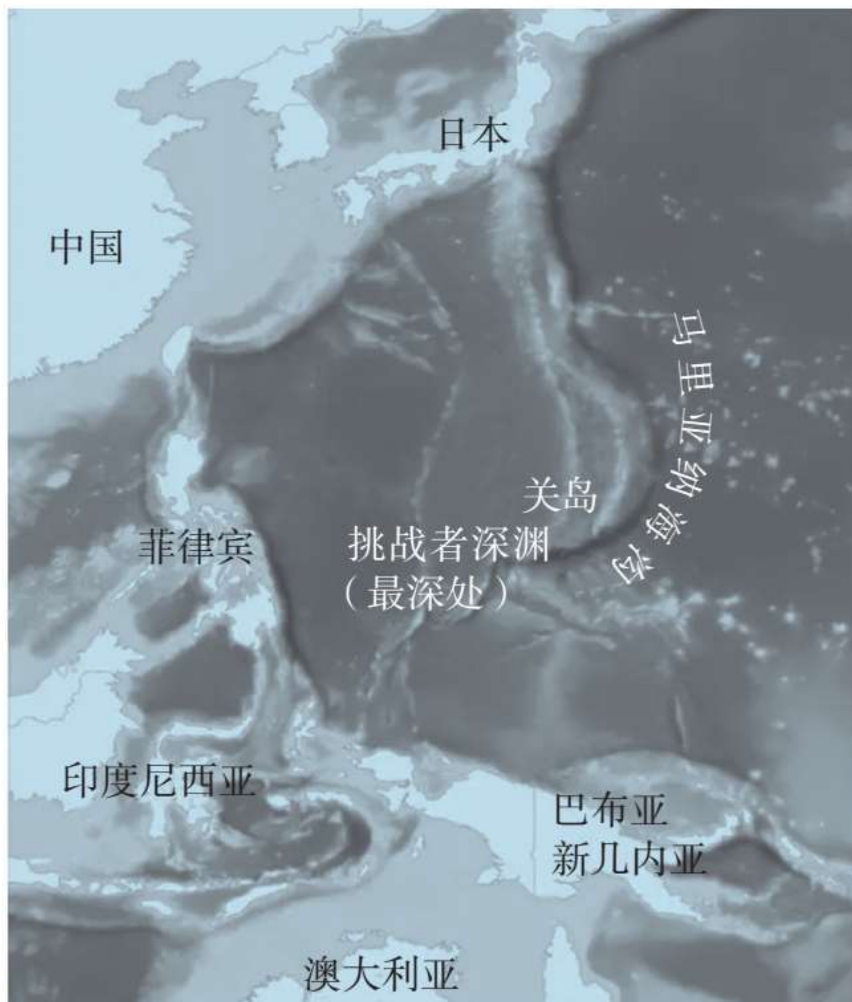
在人类的探险史上，1960年1月23日是值得记录的一笔。

在这一天，瑞士探险家雅克·皮卡德和他的搭档唐纳德·沃尔什，搭乘由皮卡德与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皮卡德设计的潜水器“的里雅斯特2号”，下潜到距离海平面约11000米的深渊。

那是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

作为地球海洋的最深点，马里亚纳海沟被认为形成于6000万年前，最深深度为10911米。这个深度是日本探测艇“海沟号”（Kaiko）于1995年3月24日测得的，是目前公认的最精确深度。

10911米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就是如果把陆地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整体填进去，峰顶离海平面还有2000多米的距离。



马里亚纳海沟位于北太平洋西部马里亚纳群岛以东，为一条洋底弧形洼地，延伸2550公里，平均宽69公里

考虑到深海的各种不可测因素和令人恐惧的压强（可能相当于在一个指甲盖上压一辆坦克），再加上人类下潜工具的落后，马里亚纳海沟的沟底一直是一片未知区域。

那个未知世界，直到1960年1月23日才被人类触达。

2

先来说说人类探索海底的历史吧。

人类早期进行的专业化潜水，不是为了探险，也不是为了看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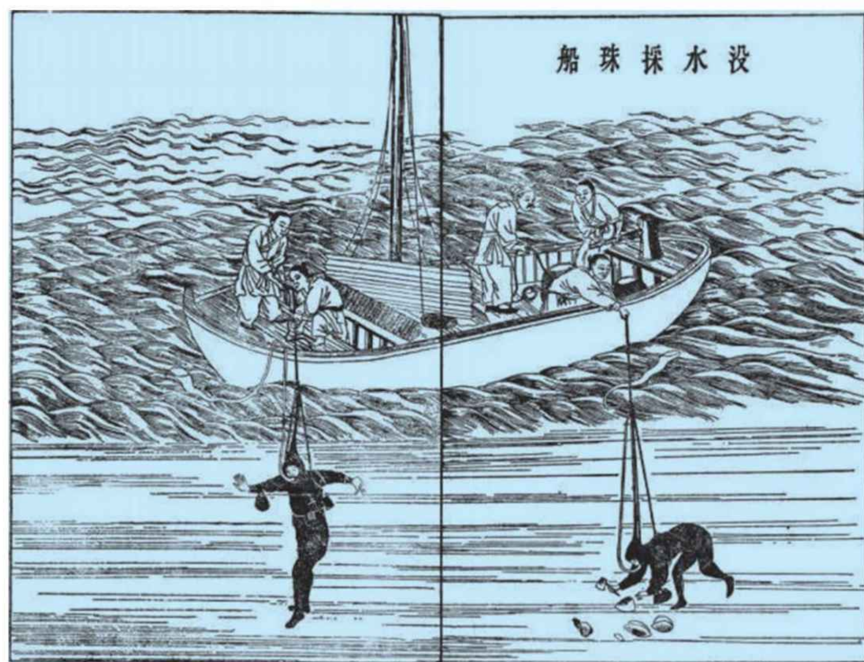
是为了寻宝和谋生，比如说采集珍珠。在明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就有关于当时潜水技术比较详细的图文记载。

当然，这种潜水方式基本上等于徒手潜水，潜水的深度完全受到人类自身肺活量和对水底压强承受能力的限制。

人类目前徒手潜水的最深深度是吉翁·奈瑞于2015年创造的129米，可惜因为他在上浮途中失去意识，纪录未能获得主办单位正式确认，但仍被公认为自由潜水比赛史上最深的下潜距离。

那么，如果人类带上装备呢？

这里就必须提到全世界潜水界殿堂级人物：雅克–伊夫·库斯托，他对人类潜水之路的一个里程碑式贡献，就是在1943年发明了“水肺”。这套可以让潜水员自动调整及提供压缩空气的吸气器，使得人类的潜水深度大大拓展。



按《天工开物》记载，当时的潜水员腰系长绳，鼻子上套着锡做的空管用于呼吸。如果感到有什么不舒服，潜水员就可以拉动绳子让船上的人将他提上水面

目前世界公认的人类带装备潜水的纪录是332米，这是由埃及男子阿梅德·加布尔在2014年创造的。阿梅德·加布尔当时41岁。他之前曾在

埃及特种部队服役，同时是一个拥有17年潜水经验的教练。为了创造这项纪录，他足足准备了4年。当时他花了12分钟潜到这个深度，并花15小时重新浮出海面（上浮过快会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

应该说，无论是徒手还是带装备，人类潜水的深度，是不太可能超过水下400米了。

那么，如果是搭载人的潜水装置呢？

从达·芬奇设计所谓的“可以在水底航行”的船开始，人类就一直在这条路上摸索。1620年，荷兰裔英国物理学家克尼利厄斯·雅布斯纵·戴博尔应该算是“潜艇之父”，他成功地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潜水船——木质结构，外面覆盖涂油脂的牛皮，船内装有作为压水舱使用的羊皮囊，可载12名船员，人力划桨驱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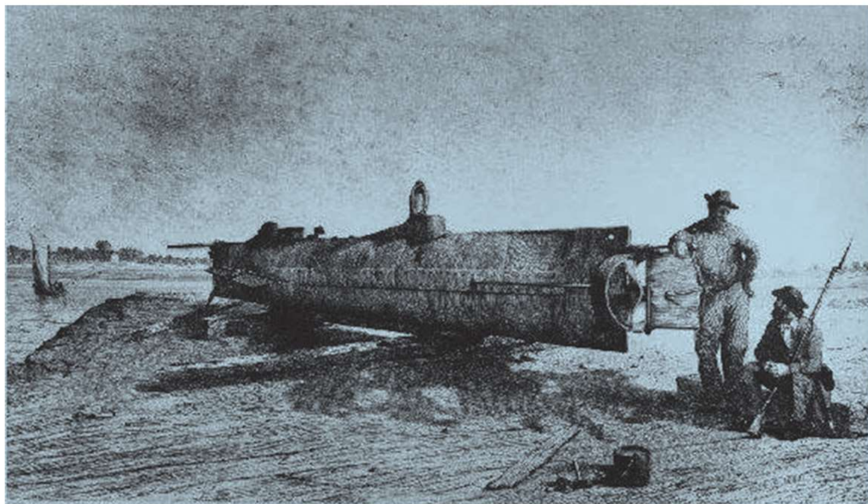
那么，这艘木质潜水船能下潜到什么深度呢？

3~5米。没错，还没有徒手下潜的深度深。

随后，出于战争的需要，人类的潜艇技术发展得相当快。但考虑到潜艇对机动性、武器携带性的需求，所以下潜深度并不是被主要考虑的。

真正要进行深海科研性探索，还是需要专门制作的深海探测器。

这时候，就轮到皮卡德父子登场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艘成功炸沉敌舰的潜艇，是出现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军“亨莱号”。它于1864年2月在水下成功炸沉了北军的一艘护卫舰，但同时也被卷入军舰沉没产生的漩涡中，最终二者同归于尽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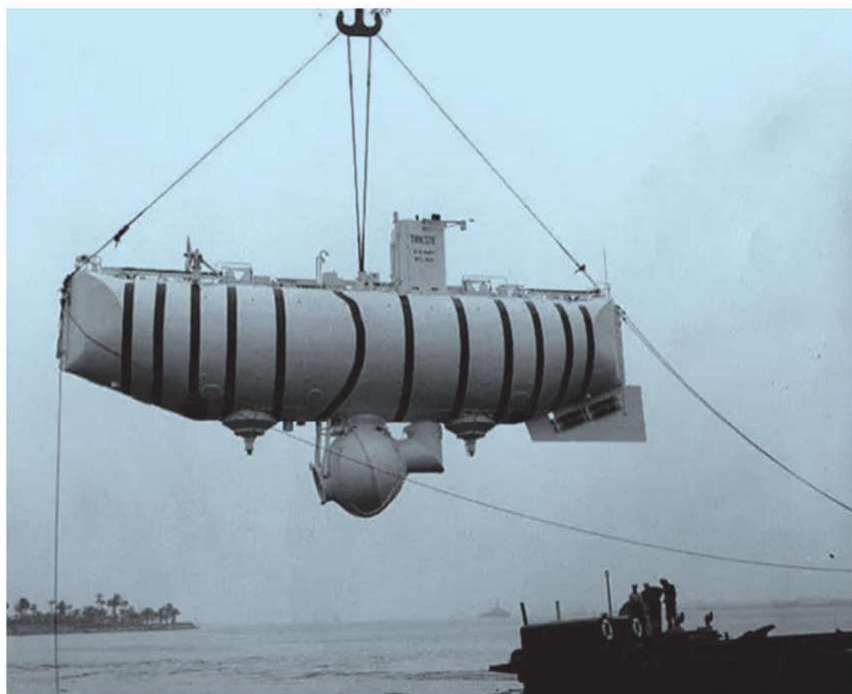
居住在瑞士的皮卡德一家，可谓是真正的“探险之家”。

皮卡德的父亲奥古斯特·皮卡德，其实是一个高空气球探险家——他是全世界第一个乘坐热气球达到15000米高度的人。而皮卡德的儿子伯朗特·皮卡德是全世界第一个乘坐热气球不间断环游世界的人。

至于皮卡德本人，则成了全世界第一批到达最深海底的人之一。

皮卡德的父亲无疑是一个设计潜水器的天才。早在1948年，他就制造出了一个名叫“弗恩斯2号”的载人可操控潜水器，下潜深度约为137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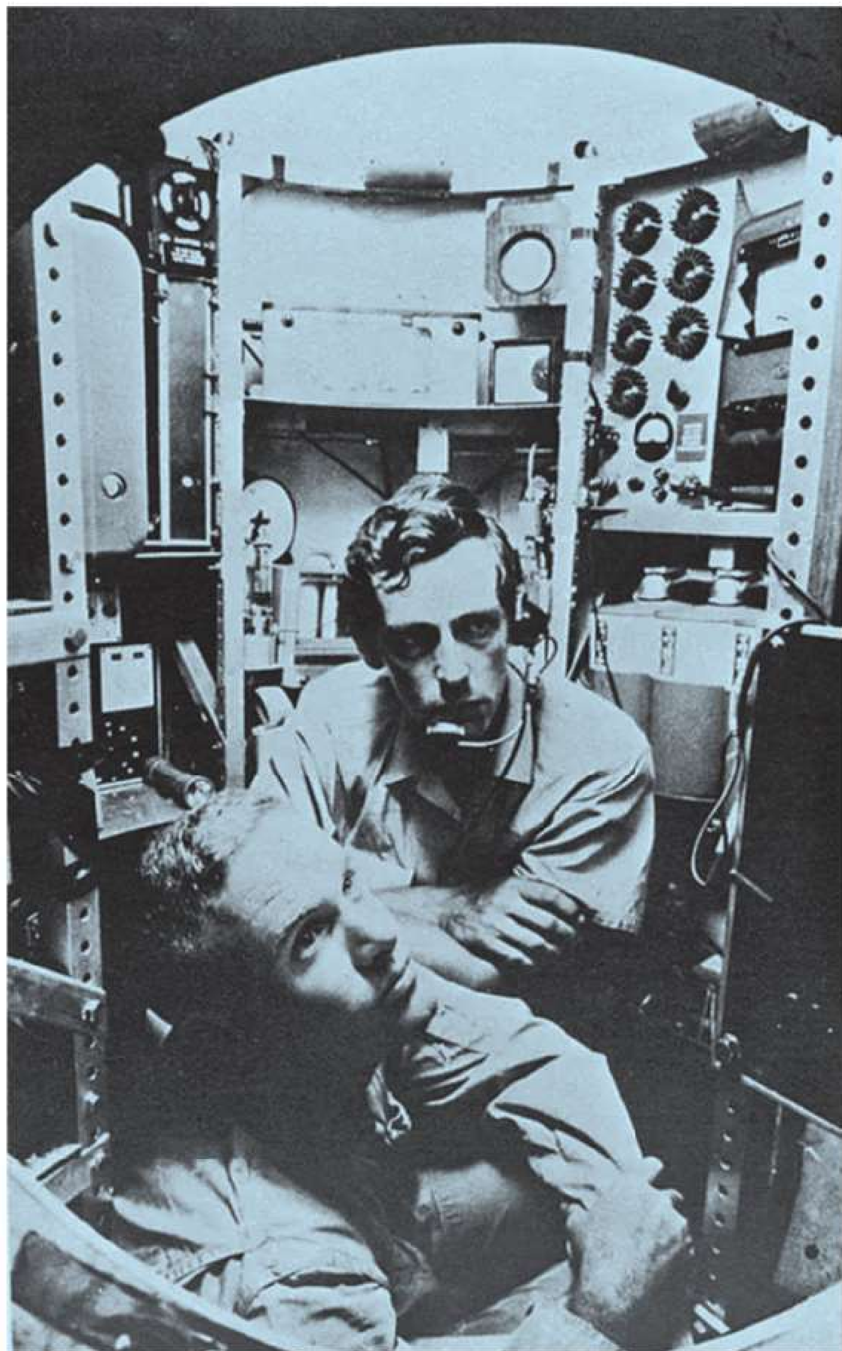
仅仅三年之后，皮卡德父子来到了意大利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制造了另一艘15米长的潜水器“的里雅斯特号”，头三次下潜就分别达到了1088米、3048米、3150米——每一次都打破了人类潜水器的下潜纪录。



“的里雅斯特号”



皮卡德和沃尔什在“的里雅斯特2号”上


沃尔什（下）与皮卡德（上）在潜水器内

在“的里雅斯特号”成功的基础上，1958年，皮卡德又设计了“的里雅斯特2号”潜水器，第一次下潜就创造了5600米的世界纪录。

而这绝非皮卡德的目标。对他而言，“的里雅斯特2号”的使命，就是到达人类从未到达过的马里亚纳海沟沟底。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看，“的里雅斯特2号”潜水器都堪称天才之作：

这艘深海潜艇长16米多，看上去像是一艘普通潜艇，但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铝制外壳制成的长筒状容器，里面充满了比水轻的汽油——油比水轻，这是潜艇上浮的动力，也不会被压强挤爆。另一部分是一个重达14吨的钢球载人舱室，有一个观察窗。整个球体直径只有2米，可以容纳两人。钢球附近系了重达9吨的钢珠，返航时通过扔掉钢珠上浮。

1960年1月23日，到达菲律宾海域的皮卡德和沃尔什钻进了这个钢球，开始下潜。

他们的目的地，正是马里亚纳海沟沟底。

这绝非一次轻松的旅程。

在整个下潜的过程中，潜艇内的温度越来越低，最后只有2摄氏度左右，冻得发抖的皮卡德和沃尔什只能靠吃巧克力棒补充热量。比这更糟糕的是，当潜水器下降到海底9000多米处时，钢质球体外的那个树脂玻璃观察窗被海水压裂，雷鸣般的破裂声在寂静的海底响起时，两位探险家的魂都被吓飞了——如果这时候他们直接暴露在海底，巨大的压强会在2毫秒之内将他们压扁。好在观察窗是双层的，内层的塑料窗没有破裂。

在下潜了近5个小时之后，潜水器终于在10911米处的海底缓缓着陆（当时潜水器显示的深度是11521米，后来校正）。

在人类之前没有抵达过的深海海底，皮卡德和沃尔什做了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做，静静待了20分钟。

4

于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来了：

在海沟的底部，皮卡德和沃尔什看见了什么？

事实上，他们两人什么都没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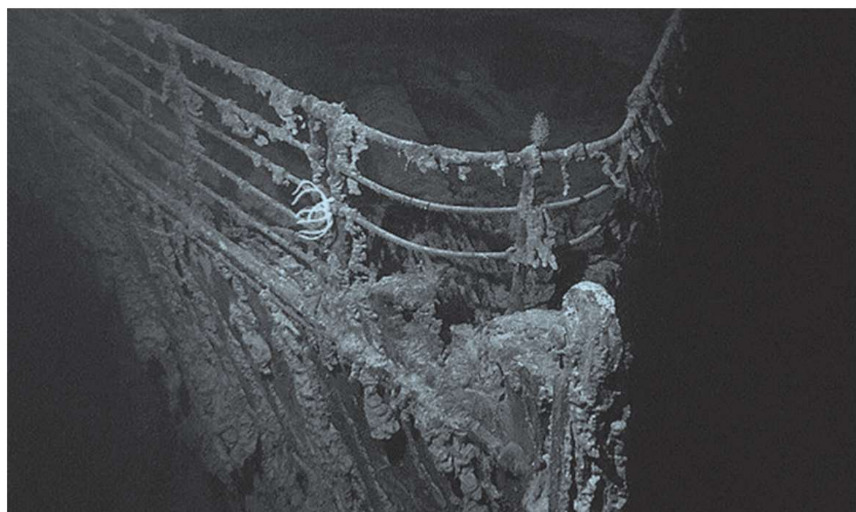
在宁静的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皮卡德和沃尔什肉眼看到的只有黑暗，以及透过微弱探照灯灯光照出的平静海底。

不过，在整个下潜过程中，两个人还是惊讶地看到了一些从舷窗外游过的鱼——原先人类认为，在那个深度是不可能有鱼类生存的。

所以，皮卡德和沃尔什的这次下潜，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人类对深海的认知。

一般来说，深海分为中层带、深层带、深渊带与超深渊带。

中层带指的是200～1000米深的水层。在这个层面，虽有些微光线透入，但也不足以进行光合作用，只能供生物辨识。此层也是深海生物密度较大和种类较多的一层。代表生物是磷虾。



在深层带还有不少沉船遗骸，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坦尼克号”，它长眠于纽芬兰东南偏南600公里的3800米深的海底

“深层带”指的是1000～4000米深的水层。这一层因为完全没有阳光，所以一般认为这里的生物不是眼睛退化，就是演化出“照明设备”。但是，就在1960年的那次下潜中，皮卡德和沃尔什发现在这个深度的一些鱼类依旧长有眼睛，这令他们大为惊奇。

深渊带指的是4000～6000米深的水层。在这一层，生物种类已经大

为稀少，由于温度大大降低，生物高度集中在海底热泉附近。

超深渊带指的是6000米以下的水层。在这一层，人类发现有海蜇、蝰鱼、管虫与海参等生物生存。但由于这一层的生存环境已经类似于外星球，所以即便有生物，也和我们所知的种类长相大为不同——也就是所谓的“反正没人看，可以随便长”。

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最底层，当初皮卡德和沃尔什没有发现有生物存在的迹象，但那是因为肉眼无法观察到。

由于皮卡德和沃尔什的那次下潜纯粹是为了检测是否能下潜到那个深度，所以没有带任何科学实验器材。按照他们的想法：既然这次实验成功，那么下次人类可以频繁探测这一区域。



2011年7月，美国的一台深海探测器在马里亚纳海沟内水深10641米的赛琳娜海渊中，发现了直径达10厘米的球状动物。科学家分析后发现，这种奇特的动物居然是阿米巴原虫类的单细胞动物，它被确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单细胞动物。巨型阿米巴原虫不但能适应漆黑、高压和冰冷的海水，而且对有毒的重金属有很强的耐受能力。令人感到恐怖的是，它们还主动“吸毒”，体内富集了高浓度的铅、铀、汞等重金属元素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自他们那次下潜后整整52年，人类就再也没有去过。

5

这个纪录，一直维持到2012年。

2012年，终于有一个人又一次到达了当年两位探险家下潜到的那个深度：10911米。

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卡梅隆在12岁的时候写了一部科幻小说《深渊》（后来他将它拍成了电影），之后潜水就成了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和爱好。他曾下潜过30多次，就为了能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泰坦尼克号沉船旁边。在卡梅隆成名之后，他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有时甚至一天工作16小时）和金钱（最多时每天砸下去4万美元），打造了一艘叫“深海挑战者号”的单人潜水器。

2012年3月26日，卡梅隆带着他童年的梦想，独自一人钻进了“深海挑战者号”，向马里亚纳海沟的沟底下潜。

这一次，卡梅隆只花了2小时36分钟就到达了海底——那个52年前卡尔德和沃尔什到达过的地方。

卡梅隆在出发前曾表示，希望能在海底看到奇怪的生物甚至是怪物，但他和他的前辈们一样，还是失望了：那里什么都没有，除了黑暗，就是沉寂。

而值得一提的是，卡梅隆的这次下潜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单人下潜到海底最深处。这个纪录的获得，也让卡梅隆体会到皮卡德和沃尔什在52年前没能体会到的感觉：孤独。

“当时我停了下来，思考了下，我到这了。我到了海底了，地球上最深的地方。这意味着什么。那真是与世隔绝的感觉，让你意识到在这片黑暗又未知的巨大领域里自己有多渺小。”

按照原计划，卡梅隆应该可以在海底停留6个小时。但由于潜水器发生了漏油故障，他只待了3个小时就开始上浮。

但这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了。

他成了三个人中的一个。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12个人曾经到达过月球，但到达过马里亚纳海沟的人，只有3个。

我曾写过不少探险类的故事。

从南极，到珠峰，到月球，到海底。

每次写这类文章的时候，内心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

这是一种建立在一对矛盾基础上的激动：一方面，在各种探险中，人类会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卑微，在整个宇宙中是多么渺小；但另一方面，在意识到这一点的过程中，人类的那种顽强、进取、永不放弃的精神又让人动容。

对我们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了解得还是太少了。中国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而就我们目前的认知和科技水平而言，别说月球、火星、太阳，就连我们自己生存的家园地球，都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和现象。

当然，这也给我们未来的探索留下了太大的想象空间。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人类的科技发展总是呼啸向前的。当可控核聚变、人工智能、新材料等真正成为现实的时候，人类肯定能发现之前很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或闻所未闻的现象和领域，探索到更多前人从未触达过的地点和空间。

每每想到此，我就会感叹自己的寿命太短。

目睹人类文明究竟会发展到怎样一种程度（或者毁灭），对我而言，应该是此生的最大诱惑了吧。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记者手记：在马里亚纳海沟探索海洋最深处的科学奥秘》（张建松，新华网，2018年12月16日）

2.《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深度11034米（地球最深处）》（探秘志网站，2017年12月25日）

3.《解密：专家究竟在马里亚纳海沟发现了什么？引27国密切关注？》（腾讯网，2018年11月28日）

4.《五分钟带你读完人类潜水简史》（潜途网络，搜狐网，转载自知乎号“SME情报员”，2018年1月22日）

5.《全球唯一探秘万米深海的两个人——皮卡德和沃什》（“wangernest”，百度贴吧“伪阿鲁纳恰尔邦吧”，2013年6月25日）

6.《探秘马里亚纳海沟》（周颖，《地理教育》，2017年第10期）

7.《人类第一次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搜狐网，2018年1月14日）

8.《卡梅隆的深海神器：90分钟潜入世界最深海沟》（邓琦，《新京报》，2013年6月23日）

9.《世界上潜水最深潜艇失踪是深海研究重大损失》（孙玉庆，中国日报网站，2003年7月1日）

10.《没人看就可以随便长了？深海生物的生存法则》（Raychelle Burks，探索发现，2017年7月10日）

“请问，你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人类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按照现在的记录，应该是1953年。但是，在登山界还有一个小小的“争论”，不过，这其实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争论”。因为，一部分人相信——或者希望：有人在1924年就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1

1912年7月，一条消息让乔治·马洛里陷入了悲痛之中。

那是一条关于英国著名探险家斯科特的消息：他带着一队人马前往南极，试图代表英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抵达南极点的人。但是，当他们在1912年1月千辛万苦抵达南极点时，却发现那里留下了一面挪威的国旗——挪威探险家阿蒙森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到达了南极点。

更令人感到悲伤的是，斯科特的探险队在回归途中遭遇了强暴风雪，五人探险队最终无一生还。6个月后，斯科特的尸体被人发现，距最近的补给点只有20公里。

斯科特遇难的消息震动了英国，也震撼了乔治·马洛里的内心。

在20世纪初，人类对自己居住星球的各个角落的探险，正进入一个黄金时期。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对地球两个极点的探索。

1909年4月6日，美国海军中校皮尔里率探险队第一个抵达北极点，宣布人类征服北极点。

1911年12月14日，挪威人阿蒙森乘着狗拉雪橇抵达南极点，创造了人类第一次征服南极的纪录。

虽然这两次征服纪录的背后，都是无数探险家的殉难，但那种征服和突破极限后的成就感，依旧让许多探险家接踵而至。

在两个极点都被征服之后，全世界探险家的目光，都落在了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地方——海拔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

从来没有人能够登上这个地球上的最高峰，甚至连接近都基本不可能。

乔治·马洛里同样也心动了。

那一年，他25岁。

2

乔治·马洛里，1886年6月18日出生在英格兰北部柴郡的一个牧师家庭。

马洛里从小就显露出了一种特别的天赋：攀爬。他在7岁的时候就爬上了自己父亲供职的教堂的屋顶。马洛里的攀爬姿势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是四肢并用，带有滑行的姿态，像波浪一样起伏。

马洛里在19岁的时候进入了剑桥大学，成了众人眼中标准的“校草”：颜值高，功课好，是校赛艇队的一员，处处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是他的同窗好友。）

但是，马洛里的关注点却和别的同学不一样，他特别关注世界各地关于探险的新闻。而且，与当时在全世界流行的极地探险不一样，马洛里更关注向高处的探险——登山。



年轻时的马洛里

1909年，马洛里从剑桥大学毕业，在法国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回到英国，在著名的查特豪斯公学任教。任教期间，马洛里开始频繁登山。他几乎征服了欧洲所有的高山，包括最高的勃朗峰。

也正是在这期间，他遇到了自己的挚爱露丝·特纳，两个人很快就举行了婚礼。就在婚礼之后的第三天，马洛里就应征入伍，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露丝·特纳

年轻的马洛里不仅参加了一战，他所在的部队还被投入到了一战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索姆河战役。索姆河战役是一战中英国打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战斗第一天就伤亡6万人，总共伤亡58万人。在那里，马洛里近距离目睹了人世间最残酷的生死。他在给妻子露丝写的信中这样说：

“每天死的人不计其数，活着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

一战结束后，马洛里奇迹般地生还归来。

原本大家以为，马洛里经过战争的洗礼，会更珍惜平静的生活。但马洛里在目睹近在咫尺的亲密战友被德军的机关枪杀死之后，却产生了另一种感悟：人的生命实在太脆弱，人生一定要过得充实，不能留下遗憾。

他的目光，瞄向了此前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的珠穆朗玛峰。

恰巧，在一战结束后，满目疮痍的英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振奋国民信心的事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准备开始对珠穆朗玛峰展开史无前例的探险。他们很快相中了具有丰富登山经验的马洛里。

而需要支持的马洛里，也欣然答应。

3

1921年，35岁的马洛里，带着一支12个人的探险队伍，正式向珠穆朗玛峰进发。

他们花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终于来到了珠穆朗玛峰的山脚之下。

马洛里是从北面的西藏地区进入珠穆朗玛峰山区的。现在的人们都知道，珠穆朗玛峰的攀登路线是从尼泊尔境内的南面上去容易，北面上去困难。但在当时，尼泊尔完全不对西方人开放南面路线，所以马洛里的队伍只能尝试从北面登顶。

马洛里是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看见珠峰时的感受的：

“就像是梦中最狂野的杰作！珠穆朗玛！一个崎岖的巨人，一个白色的巨大獠牙，一个被雪覆盖着的巨大石头！在登山者的眼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挑战了！”

马洛里他们随即开始寻找登山的线路，为此花了整整一个月，因为马洛里他们是试图攀登这座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批人类——没有前人留下的路线，没有任何一张地图。

终于，在8月底的时候，马洛里发现了一条巨大的冰川峡谷，顺着这条峡谷走到尽头，再爬上一堵高达300多米的冰墙，就可以从最近的地方开始攀登传说中的珠穆朗玛峰。

马洛里兴奋地给妻子露丝写信：“我亲爱的露丝，我们找到了登上这座山峰的路……我们为那些热爱冒险的人确定了登上珠峰的路线！”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珠峰地区的季风季来临了。漫天的暴风雪宣告他们不可能再进行任何登山活动，马洛里只能宣布撤退。

第一次尝试，无功而返。

但只过了6个月，马洛里带着队伍又回来了。

这一次，马洛里他们还带了摄像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珠峰风貌的画面。当然，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登顶。

这一次，马洛里的队伍正式开始了登山，而且进展顺利。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在登山过程中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暴风雪，为了躲避暴风雪，马洛里让队伍躲到了冰坡下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就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雪崩。

在这场雪崩中，7名队员遇难。

这也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批在征服珠峰过程中遇难的人类。

因为这次雪崩，第二次登顶努力也宣告失败了。

这次雪崩，也给马洛里留下了巨大阴影，他在给妻子露丝的信中说：“我亲爱的露丝，7位勇士遇难了，我应该为此负责。事已发生，我的任何举动都于事无补。”

在回到欧洲的一年多时间里，马洛里似乎真的决定远离登山，忘记关于雪崩的一切。他开始陪伴家人，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但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关于攀登珠峰的探险计划却没有停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洛里内心似乎越来越烦躁。

终于，他和妻子露丝吵架了。

露丝的观点很简单：

“我爱你，你也爱我，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事了。但我真的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生活在一起，一起分担欢笑和苦难，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分开。”

而马洛里的想法也很直白：

“我进退维谷，很痛苦。选择远走而离开将是一个残酷的决定，但更残酷的是，眼看着别人征服那座巅峰，而不是我。”

1923年3月，马洛里被一件事触动了。

他应邀去美国纽约做一次关于珠峰冒险的演讲。在场的观众都被他描述的珠峰风貌和艰苦环境所震撼。

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随后向马洛里提了一个问题：“请问，你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马洛里想了一下，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也就是那句流传后世的著名回答：

“因为，它就在那里。”

4

1924年，马洛里最终做出了决定：第三次挑战珠峰。

那一年，他已经38岁了。

这一次，他为了能够一次性成功，还精心挑选了一个助手——来自牛津大学化学系的安德鲁·欧文。

欧文没有尝试过登山，但他是一名出色的赛艇选手。在牛津与剑桥一年一度的著名赛艇对抗赛中，他的体魄和技巧给马洛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欧文的专业知识可以保证氧气瓶在高海拔地区的正常使用。

欧文对能够得到当时最顶尖的登山家的邀请而感到荣幸：

“我们全都要到达山顶！如果真的要死的话，没有什么比征服珠穆朗玛峰更好的死法了。”

1924年2月29日，马洛里带着助手欧文以及其他成员，从利物浦登上了开往印度的轮船。

他对妻子露丝发誓：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分离，今后将永远在一起。”



安德鲁·欧文

4月29日，马洛里和他70人的探险队到达了珠峰脚下，开始搭建大本营。在那里的一座喇嘛庙里，马洛里他们接受了喇嘛们的祝福。但一位喇嘛警告他：

“灾难降临，你们会成为珠穆朗玛峰的祭品。”

马洛里不迷信，他不会将警告放在心上。但他确实为攀登珠峰做了充足的准备，包括决定在登山路线上建立一系列营地，作为一个个据点——如果体力透支，就回到营地休息，等适应海拔高度后再重新攀爬。



第三次出征，马洛里（后排左二）和他的队员们



马洛里发明的登山方式

马洛里发明的这种登山方式，到现在依旧被攀登珠峰的人们沿用。

没多久，马洛里的队伍顺利来到了二号营地——这里的海拔已经超过了5300米。这时，天气突然变得极其恶劣，暴风雪肆虐。无奈之下，马洛里只能让队伍撤回大本营，但是，两位队员已经因为恶劣的气候引发身体机能失调，不幸去世。

马洛里给女儿写了一封信，隐瞒了自己遭遇的困难：

“亲爱的：今天风不大，天气很好很温暖。现在茶来了，都不记得有多久了，现在又吃到了蛋糕。8月我们举行一个小小的茶聚吧，只需要一块味道淡淡的热蛋糕就够了。你爸爸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由于时间的耽搁，离6月的季风季节已经越来越近，危险也越来越大。但马洛里坚持必须继续攀登。经过艰苦的前进，马洛里的队伍终于扎下了四号营地——大概在海拔7000米的地方。

没有现代的羽绒服，只有夹克和裹上的七层衣服，这支登山队的情况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马洛里开始严重咳嗽，而欧文则腹泻不止。

5月22日，马洛里冻伤了一根手指，但他随即在笔记本里写道：“为了能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一根手指又算得了什么？”

暴风雪停不下来，马洛里自己也知道，气候已经越来越不适合最后的冲顶。但是对他来说，已经没有退路——他已经38岁了，这次撤回去，就不会再有机会来了。

之前所有的前进路线，都是他和他的队伍一手开拓的。作为一个登山家，他在这一点上确实无法做到不自私——他不希望看到别人遵循着他开拓出来的路线，取代他成为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

他给妻子露丝又写了一封信：

“这段时间很糟糕……可能又是愚蠢在作怪吧，可我怎么能又放弃呢？我们小队离登顶还有6天的时间，大概是五十分之一的机会，但我们会抓住机会，让我们自豪！

“爱你！永远爱你！”

最后的冲顶需要用到氧气瓶，马洛里的助手欧文顶着严重的高原反应，给他们两人各制作了两个氧气瓶。

6月5日，欧文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如果我临时制作的装备能将我们带到顶峰，这将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我为明天早上的出发准备了两个吸氧器。”

这是欧文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话。

5

6月6日清晨，马洛里和欧文两个人从北山坳出发了。

在此之前，马洛里曾派出两个队员冲顶（这等于把首次登顶的机会让给了队友），但因为天气原因，那两个人被逼了回来。虽然所有的人都认为该回家了，但马洛里决定最后一搏，而欧文表示马洛里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6月7日，马洛里和欧文终于扎下了最后一个营地，此时，他们离珠峰的山顶只有600米的距离了。

一切都触手可及。



马洛里和欧文最后出发前

那一夜，肆虐的风雪和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两个人几乎一宿没合眼。第二天醒来，他们头痛欲裂，且全身脱水——这样的状态，其实是绝对不适合登山的。

但谁又能抗拒离世界之巅只有600米的诱惑？

马洛里在收拾行囊时，郑重藏好了一张照片——那是他妻子露丝的照片。临行前，他向妻子保证，要将她的照片放在珠峰的山顶。

两个全靠精神信念支撑的登山者，在1924年6月8日的清晨，拖着疲惫的身躯，开始向地球之巅发起最后的总攻。

6月8日12点50分，探险队的摄影师诺尔在下边的营地全神贯注眺望时，发现了远处山上马洛里和欧文攀爬的身影。但就在这时，天空忽然飘来了一阵云雾。

然后，两个人就都不见了。

诺尔回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小黑点，他已经离主峰很近了，这时另一个人也过去了。他们的速度很快，好像要补回失去的时间。然后这迷人的景象瞬间消失了，被厚厚的云层所取代。"



马洛里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两个人就此失踪。

营地里的其他队员在焦灼地等待了几天之后，只能做出这样的结

论：两个人已经死亡。

因为在海拔8000米左右的山上，人类不可能在失去保护的情况下待上几天。

失踪，是和死亡画等号的。

一直在家中焦急等待消息的露丝，没有等回丈夫，而是等到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来的通知书：

“很遗憾得知这个噩耗，在这次的珠峰探险行动中，您丈夫在最后的攀登过程中失去了生命。学会对您和您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惋惜。”

6

马洛里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英国。

整个英国陷入了悲痛之中，全国各地都敲响了大钟，而马洛里的追悼会是在英国第一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里举行的。

马洛里成了英国人乃至全世界登山爱好者心目中的英雄，但同时有一个问题又引得大家争论不休：

他和欧文最终到底有没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山顶？

1999年，在马洛里失踪75年之后，一支由BBC（英国广播公司）赞助的美国攀登队，在珠穆朗玛峰北坡海拔大约8170米处发现了一具英国人的尸体。

尸体外套内衬的铭牌证明：他就是75年前失踪的马洛里。

马洛里的尸体被发现时，是趴在一个山坡上，右脚踝骨处已经骨折，可见是摔下来的。但从他尸体的位置上看，似乎是在下山的路线上。

马洛里和欧文究竟最终有没有登顶，还是无法证明。因为当时拿着柯达相机的是欧文，只有从相机胶卷中才能看到马洛里有没有登顶——欧文的尸体，至今依旧没有被发现。

但大多数的登山者还是客观地指出，当时马洛里到达山顶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首先，用现在的眼光看，马洛里在1924年的登山装备近乎原始，包括他所带的人工氧气最多也只能维持8～10个小时，仅够攻顶全程所需时间的一半。

其次，在最后登顶前，有一道著名的天险——“第二台阶”。在那里并没有发现绳索等人工遗物，而徒手攀爬“第二台阶”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考虑到当时马洛里和欧文的身体状况。

但是，也有一个观点，认为马洛里最终是到达了山顶的。

因为美国登山队在马洛里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他妻子露丝的照片。

还记得马洛里的那个誓言吗？

他要把妻子的照片留在珠峰的山顶上。

而这个细节，也成为马洛里的缅怀者们一个美好的信念。

他们相信，人类第一次到达珠峰山顶，是在1924年。

那个人，就是把妻子照片留在山顶的乔治·马洛里。



“中国梯”是中国登山队于1975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在“第二台阶”的岩壁上架起的一座高近6米的金属梯。之后，每一位从北坡登顶的登山者都要用到这部梯，所以就把它称为“中国梯”。2008年5月27日，“中国梯”被撤下，收藏于珠峰登山博物馆

我没爬过珠峰，但我上过海拔5200米的地方。

那是在2008年，我坐越野车从日喀则（海拔4000米）去定日县（海拔4300米）采访，途中要翻越两座海拔5200米的山头。

那是我进藏的第二天。由于第一天晚上喝了不少酒，半夜里头痛欲裂，一个人靠在床上拿着氧气瓶吸氧。路上经过一处景点，陪同的上海援藏干部问，要不要下来拍几张照片？

我当时几乎是趴在车后座上，用尽全身力气摆了摆手，话都说不出。然后顺眼瞄到了自己的手指甲——我印象深刻——全是暗紫色的。

说这些，是想说明，在海拔5200米这个高度，一般人已经是怎样一种身体感受。

然后可以想象一下，在海拔8000米以上，宿营，负重，攀爬，前行，又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在攀登珠峰的沿途，有很多登山遇难者的尸体。因为海拔太高，很少有人有能力为他们殓尸，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一个个“路标”。

看文字觉得没什么，但真的看到照片，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可能也会有人说：好好地热爱生命不好吗？

我虽然无法体会探险家们的心境，但还是多少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他们热爱生命的最好方式吧。

毕竟，山就在那里。

附录：珠峰攀登简史

·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在冲击珠峰峰顶时遇难。

·1953年5月29日，来自新西兰的34岁英国登山队队员埃德蒙·希拉里与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尔盖一起沿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人类有纪录以来第一支登顶成功的登山队伍。

·1960年5月25日，中国人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他们是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此次攀登也是人类首次从北坡攀登成功。

·1975年5月16日，日本人田部井淳子成为世界上首位从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9名队员登顶，其中藏族队员潘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成功的女性。

·1978年，奥地利人彼得·哈贝尔和意大利人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首次未带氧气瓶登顶成功。

·1980年，波兰登山家克日什托夫·维里克斯基第一次在冬天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

·1988年，中国、日本、尼泊尔三国联合登山队首次从南北两侧双跨珠穆朗玛峰成功。

·1996年，发生1996年珠穆朗玛峰事故，15名登山者在登顶过程中牺牲，这是史上攀登珠穆朗玛峰牺牲人数第三多的一年。

·1998年，美国人汤姆·惠特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登顶的残障人士。

·1998年，狄斯特法努·阿森提夫成为第一个不用供氧装置登顶的美国女性。她在回程时因无力移动而冻死，她的丈夫谢尔盖·阿森提夫在试图救她时失足摔死。

·2000年，尼泊尔著名登山家巴布·奇里从大本营出发由北坡攀登，耗时16小时56分登顶成功，创造了登顶珠峰的最快纪录。

·2001年，美国人维亨迈尔成为世界上首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盲人。

·2008年5月8日，北京奥运圣火珠峰登山队的队员抵达珠穆朗玛峰峰顶，并点燃祥云火炬，进行了约200米的火炬传送。

·2010年5月22日，英国人普伊在珠穆朗玛峰上的冰湖里游了1000米，用时22分51秒，成为珠峰长泳的第一人。

·2010年5月22日，来自美国加州的13岁少年乔丹·罗麦罗从北侧成功

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最年轻的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

·2012年5月19日，来自日本山梨县的73岁女登山家渡边玉枝于当地时间上午7时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年龄最大的女性登顶者。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BBC纪录片《最狂野的梦》（腾讯视频、爱奇艺均可观看）

加加林之死

我们常说一句话："英雄迟暮。"但是如果英雄正当壮年，就因意外去世了呢？

1

1968年3月27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莫斯科郊外的弗拉基米尔新村附近，发出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惊恐的村民循着爆炸声去寻找，却发现爆炸现场周围几公里范围内，没多久就被政府的军队给封锁了起来。



加加林

由于弗拉基米尔新村的旁边就是契卡洛夫斯基航天场，有稍微了解情况的村民做出了猜测：是不是有飞机坠毁了？

没错，确实有一架飞机坠毁了，而且是一架米格–15战斗机。

但是，不仅仅是村民不会想到，全世界的人都不会想到——随同坠

毁飞机一起遇难的是谁。

是加加林。

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那一年，加加林34岁。

2

1934年3月9日，加加林出生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州的一个小村庄。

由于家境原因，加加林在15岁就停止了学业，进入工厂工作，帮家里减轻经济负担。加加林先是去翻砂车间做工人，然后又受训成了冶金工人。繁重的工厂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磨炼了他的体格和意志。

但加加林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做一名工人，而是成为一名飞行员。

为此，他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先是去了萨拉托夫工业技术学校，利用业余时间在·这所学校的航空俱乐部学习飞行，随后又去了奥伦堡航空军事学院，并在1957年如愿加入了苏联空军，成了苏联北海舰队航空军团的一名歼击机飞行员。

1957年，是人类航天史上很重要的一年。

在这一年的10月4日，苏联成功将一颗重达83千克的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开创了人类向太空发射卫星的纪录；就在一个月后的11月3日，苏联又成功将一只叫“莱卡”的流浪犬送上了太空，成了第一个有能力将地球生物送上太空的国家。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加加林曾对他的同学说过一句话：

“接下来就该送人上去了吧？”

加加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但他知道的是，苏联和美国的“太空争霸”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状态，这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都在投入全部的研发力量做一件事——

成为第一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为此，苏联的天才火箭设计师科罗廖夫，在创造性地发明出捆绑式火箭的基础上，于1959年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宇航员选拔工作。

科罗廖夫认为——或者苏联当时的领导人认为——苏联已经具备了送人上天的能力。

作为全国3400名志愿者中的一员，25岁的加加林因为身高只有1.57米但体格健壮灵活（因为太空舱很小，需要宇航员身材小巧），成为最后20名入选成员之一，并且凭借过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入选最终的“契卡六人小组”。

负责挑选宇航员的苏联官员卡尔波夫对着最后入选的6个人说了一句让加加林激动万分的话：

“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宇航员。”

3

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宇航员，哪有这么简单。

加加林和他的同伴被送入了当时位于莫斯科东北的契卡洛夫斯基航天场，开始接受严酷的训练和测试。

加加林曾回忆：“医生用锤子敲击每根骨头，检查所有器官的体征状态，从心脏到前庭都需检查。”

在检查合格之后，就是跳伞、失重、体力等各方面的苛刻训练，光以离心机实验为例，加加林和他的同伴们就一共经历了95次之多。

而比起严酷的训练，宇航员必须冒生命危险才是最关键的。

在20世纪60年代，太空技术远没有现在先进和成熟，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的专家都认为，以当时掌握的技术，要送活人进太空并安全返回要冒极大的风险——基本上等于是在故意杀人。

以当时苏联掌握的太空技术，他们其实无法让宇航员乘坐着陆舱返回地面进行“软着陆”，但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命令：苏联的宇航员返回时必须落在苏联的领土。为此，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只能想出一种取巧的方法——在离地面7000米左右时，将宇航员从着陆舱中弹射出来，

用降落伞进行着陆。



苏联的天才火箭设计师科罗廖夫。根据后来揭秘的档案，苏联曾在1960年10月24日进行过一次载人火箭实验（没有宇航员），当时科罗廖夫表示时机还不成熟，但苏联当局要求必须发射。结果发射当天出现重大事故，火箭在发射台发生爆炸，包括陆军元帅米特鲁番·尼德林在内的54名苏联国防航天精英统统葬身火海，这被认为是人类航天历史上最大的事故

但宇航员刚刚经历过失重和极速下坠，然后又要被弹射并完成高空跳伞，这对宇航员的身体素质是个极大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任何一

个细微闪失，宇航员就会送命。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高空弹射跳伞实验中，就有测试跳伞员因此牺牲。

而之前苏联为载人航天所做的7次实验结果，也令人担忧：

7次中有一次是飞船停留在太空轨道上无法回来，一次是飞船在返回途中被烧毁，乘坐在里面的宇航员也壮烈牺牲（苏联方面一直否认这个说法）。剩余5次实验取得成功，但真正意义上完全成功的，只有3次。

按照国际惯例，只有成功实验8次才能算是完全做好准备，苏联连失败的实验算进去也就只有7次（不过最后两次确实完全成功了）。

但是，在1960年年末，美国人忽然宣布：美国将在明年的春季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这个消息急坏了苏联人。赫鲁晓夫随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抢在美国人之前登上太空。

1961年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立刻进行载人飞行。

4月9日，加加林忽然接到通知：他被选定为上太空的宇航员。

此时，离发射日期4月12日只有三天时间了。

曾有一种说法，说当时加加林并不是第一候选，甚至只是第三候选。但第一候选宇航员邦达连科在训练时，随手将一块擦拭传感器的酒精棉扔到了一个电路板上，纯氧环境的实验舱顿时燃起熊熊大火，邦达连科重伤后不治身亡。在讨论谁来接任时，科罗廖夫选中了加加林，因为他曾观察到，在所有选中的志愿者第一次进入太空舱时，只有加加林一个人脱掉了靴子，只穿袜子进入了舱室。当然，也有说法是科罗廖夫其实早就看中了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上佳的加加林。

在接到通知后，加加林给妻子和孩子写了一封家书，那是一封类似“遗嘱”的家书，他关照友人“只有发射失败后才能交给家人”。后来人们打开这封家书看到的内容是，加加林嘱托妻子把两个女儿好好抚养长大，并且“根据你的意愿选择是否改嫁”。

4月12日清晨，加加林在睡梦中被叫醒，被通知立刻准备登舱发

射。

来到发射场，总设计师科罗廖夫早就站在那里迎接，他对加加林说：“你真幸运，你将从无与伦比的高处观看我们的地球。但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经受各种考验。”

当加加林坐进飞行舱后，发现舱门无法密闭，然后舱门再一次被打开，检修人员又重新检视了一遍电路。

科罗廖夫告诉加加林：“飞船有一个接点接触不良，你不要担心，一切都会正常。”

30分钟准备，10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10秒倒计时。

1961年4月12日上午9点07分，搭载加加林的人类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1号”由火箭推送，正式点火升空。

监控显示，加加林早上起床时心跳为每分钟64下，在点火时的心跳骤然上升到了每分钟150下。

通过麦克风，大家听到加加林激动地大喊：

“我出发了！”

4

曾有人问太空归来后的加加林：“你看见上帝了吗？”

加加林的回答是：“我差点自己去见上帝了。”

当加加林乘坐的“东方1号”飞船进入离地面312公里的轨道之后，他开始体会到了失重的感觉。此时的他被眼前的迷人景象所震撼。由于没有带相机，他只能通过通信系统，向地面中心激动地描述他在太空看到的地球、森林、大海——加加林激动地喊道：“这一切实在是太漂亮了！”

地球孕育的人类，终于第一次在太空中看到了自己的母体。

在以每小时2.8万公里的速度环绕地球78分钟后，处于非洲上空的加加林开始准备降落。

然而这个时候，麻烦来了。

苏联的地面控制中心发现：加加林乘坐的返回舱和仪器舱无法分离了。

按原定计划，返回舱和仪器舱分离只需要10秒钟时间，但显然是连接两个舱体的一根导线出了问题。两舱如果无法分离，将导致加加林在穿越大气层时被活活烧死。

此时，加加林乘坐的飞船已经开始旋转，每12秒旋转一圈，他在通信系统里说："我从头到脚都在旋转，像一个完整的芭蕾舞团。"

地面控制中心紧张地观测着加加林的返回速度，并推测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飞船通过大气层时，那根失灵的导线会因为温度过高发生热熔化而脱离。

所幸，结局正是地面中心所预料的——在延误了10分钟之后，返回舱和仪器舱终于分离了。

在离地面7000米的时候，加加林又发现了问题：原本给宇航员准备的气筏、医药包、自卫武器、联络工具等救生工具全都不翼而飞了，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他落入陌生区域（比如深山或原始森林），他将没有任何求生能力。

但时间已经容不得他多想。在离地面4000米时，舱门"砰"的一声弹开，加加林连同座椅一起被弹射了出去，刚刚经历一个多小时失重和极速下坠状态的加加林，被抛射到空中，随后降落伞包打开。

在空中，并没有失去意识的加加林欣慰地看到，脚下并不是山区或原始丛林，而是他熟悉的伏尔加河。



“东方1号”的返回舱

最终，加加林缓缓地降落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城西南的一片耕地上。

落地后，加加林甚至不相信自己还能够站起来。

军用直升机随即呼啸而来，将加加林接上了飞机。

当天，苏联塔斯社发布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

“苏联空军少校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绕地球一周后安全返回，完成了人类第一次宇宙航行。”

那个“少校”军衔，还是加加林在环游太空时被晋升的。

当时，苏联方面事先准备了三份消息，只有一份是宣布成功的。

5

加加林当然一举成名。

作为人类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加加林在苏联被视为伟大的英雄，他被授予了包括“列宁勋章”在内的大大小小许多勋章，还有“苏联英

雄”称号。苏联各地请他去演讲的邀请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夜之间，全国很多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不仅是苏联，全世界也都出现了一股“加加林热”，加加林一共受邀出访了27个国家，成为22个城市的“荣誉市民”。

加加林得到了他所能想象到的一切，但有一点，他却似乎永远得不到了——再次进入太空。

由于加加林已经成了苏联的“国家形象”，所以他再也不被允许进入太空，以防发生任何不测。



莫斯科欢迎加加林回来时的景象

这在外人眼里看起来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什么事也不用做了，享受政府给予的高额津贴和各种福利，只要出席一些充满鲜花和掌声的社会活动就可以了。



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加加林

但是，这却让加加林陷入了无比的痛苦——他发现自己“失业”了。

事实上，随着后来人类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越来越多，人们才渐渐意识到，这一人群在返回地球后会产生巨大的空虚感和落寞感，是需要及时进行特殊的心理治疗的。但由于加加林是全人类第一个上太空的人，之前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只能由他自己去承受那种失落和痛苦。

加加林开始酗酒，试图从酒精的麻痹中忘记暂时的苦闷。他的精神也开始恍惚，甚至有一次从疗养院的阳台上跳下，造成头骨和面部骨折。由于加加林要经常代表苏联出席各种活动，国家还出钱帮他做了整容手术。

最后，终于有一件事让加加林觉得似乎找回了自己，让他觉得自己好像还有点用。

那就是驾驶飞机。

自从获准驾驶飞机后，加加林几乎每天都会去契卡洛夫斯基航天场，和那里受训的宇航员一起做飞行训练。尽管他那时候已经身居高位，但似乎只有飞行才能让他找回当初的自己。

加加林还不断提出希望重返太空，甚至一度被列入苏联某次太空飞行的替补宇航员。（加加林作为替补的那次太空飞行，后来也成了一场悲壮的太空灾难，这个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2》收录的《他以500公里时速撞向地球，最后时刻说了什么？》）

但所有的一切，都终结于1968年3月27日。

6

关于加加林遇难的经过和原因，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那天清晨，已经出门的加加林在半路上想起自己的基地通行证忘在了家里——他从来没有忘带过证件。虽然同行的人劝他不用回家拿了，因为基地的门卫都认识大名鼎鼎的他，但加加林认为不能破坏制度，还是执意回家拿。

这个“半途而返”被后人认为是不祥之兆。而也有不少人觉得，当时是天意暗示加加林已经不需要带证件了。

上午10点19分，加加林驾驶米格–15冲上云霄，同机的还有他的飞行教练谢寥金。10点30分，加加林和地面塔台取得联系，请求准许以航向320°返航。

就在这时，无线电通信忽然中断。

1分钟后，本文开头的一幕发生：加加林驾驶的米格–15一头栽向地面，随即发生剧烈爆炸。

一开始，搜救队员集中搜索白色的降落伞——他们相信，加加林和谢寥金肯定已经弹射跳伞。



1968年，加加林在米格-15战斗机上的照片

但是，搜救队随后惊恐地发现：两个飞行员根本就没有跳伞。

根据后来的调查显示，当时那架米格–15在离地面300米左右时，倾斜角已经达到了70°～90°，几乎是垂直俯冲坠毁的——全程只有2秒钟不到。

苏联政府在3月28日就成立了事故调查组，但最后只有一份简单的官方讣告：

“加加林死于训练飞行中的一次灾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猜测接踵而来。

第一种猜测是加加林喝醉了才上天的。但这个说法很快被否认：加加林和谢寥金当天都没有饮酒。

第二种猜测是同机的谢寥金突发心脏病，拖累了加加林。但这种猜

测并不被谢寥金之前的体检报告支持。

第三种猜测是飞机出现了技术故障。但专家通过对包括飞机残骸在内的各种证据进行分析，发现飞机在坠毁前一切设备正常（当时还没有能记录声音的黑匣子）。

第四种猜测是飞机撞上了飞鸟，但这种猜测从飞机残骸中又无法找到证据。

第五种猜测比较玄，称当时上台的勃列日涅夫认为加加林是赫鲁晓夫时代的英雄，过于出风头，所以指使克格勃在飞机上动了手脚。但这种说法纯粹出于想象，得不到任何证据支撑。

目前相对主流的是三种说法：一是加加林的战斗机有部件脱落；二是加加林的飞机遭遇了高空气流；三是当时他们遇到了风切变[1]。

但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已无法改变：

人类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在34岁的年纪就英年早逝。

在加加林坠机砸出的那个大坑周围，很快就摆满了各地赶来悼念的人送上的鲜花。

7

加加林并没有被人遗忘。

加加林的骨灰，被安葬在了克里姆林宫宫墙壁龛里；他的故乡格扎茨克市，被命名为“加加林市”；他训练时的宇航员训练中心，也被命名为“加加林宇航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月球上有一座环形火山，也是以加加林的名字命名的。

苏联人在整个“太空争霸”中每一个环节都取得了领先，但在最后的登月环节，却一败涂地。而加加林，曾经也梦想自己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类宇航员。

2011年4月7日，第六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将每年的4月12日定为“载人空间飞行国际日”。

因为1961年4月12日，是加加林代表人类第一次成功进入太空的日子。

馒头说

位于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乐园Epcot（未来社区的实验原型）主题公园的项目“Mission　：Space”（太空任务），就是通过真实的离心机模拟，让游客体会宇航员发射和着陆时所要承受的2.5倍重力。每个舱内都放有呕吐袋，很多游客经历过一次后都会有剧烈呕吐现象，这个项目开始营业至今已有两名游客死亡，均在体验时死于突发心脏病。我也亲身去体验过。

我记得当时我还不屑地拒绝了“地球探险”的那个分支通道（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死了人，所以加了一个“温柔版”项目），选择了最刺激的“火星探险”。但当我坐进模拟舱，发现旁边放着呕吐袋的时候，就意识到有点不妙了。

随着倒计时点火的指令结束，我那种体验宇航员的兴奋感很快就被急速上升的不适感所取代，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形容，好像整个身体都在膨胀，马上就要爆炸一样。后来我去网上搜资料，看了结构图才知道，这个项目在2003年建成，当时投资1亿美元，是真的造了两个一般用于太空实验的离心机。

在模拟太空飞行的过程中，系统会提示你去按一些按钮。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些按钮其实不按也没关系，但设计者就是希望你体会一下人类在2.5倍重力下的那种感觉——我连抬胳膊都很费力。

所以加加林曾回忆，当时在太空舱里讲话都很困难，因为成倍放大的重力不断往下扯着他的面部肌肉。

当我强忍住呕吐的感觉走出模拟舱时，立刻就想到了加加林——他和他的队友在训练中至少做了95次比这强度大得多的离心机实验。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宇航员真的风光无限，走到哪里都是鲜花和掌声，但这些荣誉，其实是他们用血与汗，乃至生命换来的。更不用说，他们代表的是人类探索太空的努力。

加加林太空归来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国

家的卡罗维发利市，有一座加加林的纪念碑。

1992年，这座加加林的纪念碑被缠上了钢丝绳，卡罗维发利市市长的意思是要拆除这个“苏联的象征”。但很多人随后就提出了抗议——加加林代表的并不是苏联，而是全人类。

于是，加加林的纪念碑被搬到了卡罗维发利市国际机场的大楼面前，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就像当初大家认为的那样：当宇航员进入太空的那一刹那，其实他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家，而是整个人类文明。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伟大而落寞：英雄加加林的后太空生活》（扬·申克曼，《透视俄罗斯》，2014年4月12日）

2.《故人追忆加加林：揭露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羊城晚报》，2011年4月11日）

3.《我的朋友加加林》（阿卜杜勒–拉赫曼·韦济罗夫，《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11期）

4.《加加林的印象与随想》（俞邃、施蕴陵，《世界知识》，1999年第8期）

5.《加加林遇难的那一天》（秦德岐，《大众科技》，1999年第3期》）

6.《人类首航太空历险记——写在加加林漫游太空四十周年》（刘登锐，《质量与可靠性》，2001年第2期）

7.《加加林太空探险的一面旗帜——纪念世界载人航天40周年》（庞之浩，《中国科技月报》，2001年第4期》）

8.《解密加加林空难原因》（徐仁吉，《科技日报》，2013年3月26日）

9.《永远的加加林》（汪嘉波，《光明日报》，2001年4月20日）

[1] 风切变指风向和风速在空中水平和（或）垂直距离上忽然发生变化，是飞机起飞和着陆的大敌。

那些从月球回来的宇航员

人类的太空梦，一直在克服种种困难和险阻，艰难地延续。而作为冲在第一线的最直接个体——宇航员，他们遭受的各种挑战和压力，我们一般人可能真的未必能体会。

1

1971年2月5日，“阿波罗14号”的登月舱顺利降落到了月球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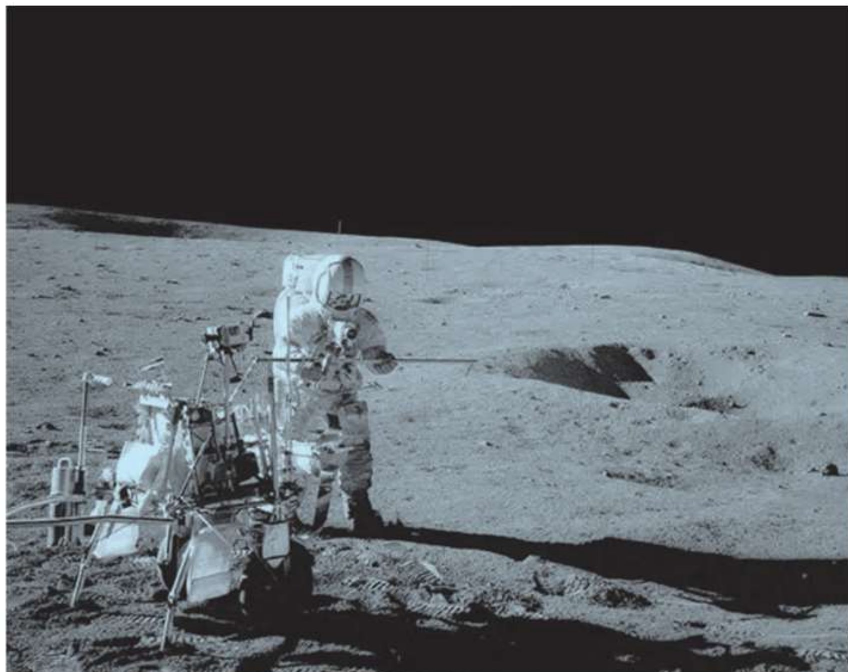
这是美国继“阿波罗11号”和“阿波罗12号”之后的第三次载人登月任务。

为什么跳过了“阿波罗13号”？

因为1970年，“阿波罗13号”在前往月球的过程中发生了服务舱爆炸，多个设备受损，只能中途放弃登月。虽然“阿波罗13号”的安全返回堪称人类航天史上的一个奇迹，但这也让“阿波罗14号”的登月行动背负了不小的压力——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幸运的是，“阿波罗14号”的登月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执行“阿波罗14号”登月任务的三名美国宇航员，分别是指令长艾伦·谢泼德、指令舱驾驶员斯图尔特·罗萨和登月舱驾驶员埃德加·米切尔。



1971年2月6日，谢泼德在月球表面的照片，来自NASA

为了完成那次登月的任务之一，埃德加和谢泼德前往一个叫“火山锥坑”的地方进行考察——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认为那里肯定有1亿年前留下的珍贵岩石。

“火山锥坑”是月球的制高点，虽然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但这段旅途对来自地球的宇航员而言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埃德加和他的伙伴创造了9小时17分钟的人类在月球表面行走的最长纪录，但最终还是选择放弃到达目的地——那里实在太远了。

尽管如此，“阿波罗14号”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相对于之前实验性质的“阿波罗11号”和“阿波罗12号”，“阿波罗14号”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纪录，包括在月球停留了33个小时，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过夜的团队。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2

关于“阿波罗14号”的争议，是在登陆36年后出现的。

争议的爆发点，其实只来自一人——当年完成9小时17分月球表面行走的登月舱驾驶员埃德加·米切尔。

2007年，作为全世界第六个登上月球的人，埃德加在接受美国广播电台节目“Kerrang！”采访时表示：“我碰到了外星人！”



“阿波罗14号”的三名宇航员，从左到右分别是斯图尔特·洛萨、艾伦·谢泼德和埃德加·米切尔

按照埃德加的说法，当时他“有一种被某种东西注视的奇怪感觉，仿佛和宇宙中的智能生命产生了一种心灵的接触”。

埃德加的这番话当时把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尼克惊得目瞪口呆：“我一直以为这是米切尔的玩笑，但是我发现他在这件事上确实是认真的。”而埃德加的回答是：“这只是个开始，以后外星人到访地球的消息会越来越多。”

埃德加抛出的“炸弹”不止这一个。他进一步指出，因为他在NASA工作，所以能接触到大量绝密的“X档案”，里面记录有很多UFO（不明飞行物）到访过地球。他信誓旦旦地表示，1947年7月发生在美国的“罗斯威尔事件”是真的，而美国政府一边不断调查外星人事件，一边向公众隐瞒。

他表示，自己作为一名曾经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又在军事和情报部门工作过，他掌握很多公众不了解事实——人类其实经常被外星人拜访。

对于埃德加的说法，NASA立刻给予了回应：



埃德加对“外星人”的描述与不少科幻电影相似：“这些外星人体形非常小，但长有大大的眼睛和脑袋，相貌非常怪异。”

“NASA从来没有跟踪过不明飞行物，也从来没有掩盖过在地球上发现外星生命或者在宇宙中发现外星人的事实。米切尔博士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苟同他的观点。我们的任务是探索更多的真相，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此加以隐瞒。”

而美国UFO调查基金会主席唐·勃林格也对此表示怀疑：“我对此抱怀疑态度，除非他能提供证据或其他证人。”

埃德加认为他有“证人”，而且不是别人，恰恰是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

尼尔·奥尔登·阿姆斯特朗。

关于阿姆斯特朗说看到过外星人的说法，早已不鲜见。

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当美国“阿波罗11号”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乘坐“鹰号”登月舱踏足月球表面后，曾遭遇过3个直径15~30米的UFO。阿姆斯特朗震惊地向休斯敦地面控制中心汇报看到的一切时，NASA专家将和阿姆斯特朗进行通信的频道迅速切换掉。人们听到的阿姆斯特朗的最后一句话是：

“那儿有许多大东西！老天，它们真的非常大！它们正待在陨石坑的另一头！它们正在月球上看着我们到来！”



“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

但是，这个说法从来没有被证实过，NASA的登月录音中也没有这段话——当然，有人认为NASA肯定将这段话剪去了。

而另一种说法是，阿姆斯特朗在自己的自传中透露，美国终止登月，就是因为受到了外星人的警告。

然而，阿姆斯特朗并没有出过自传，也从没有过出自传的念头。

毫无疑问，每年世界各地都可能有数以万计的“目击UFO”的报告，

但之所以美国这批登月宇航员说出的话震撼力强，是因为他们确实是一群实打实进入过太空、踏上过另一个星球的人。

但是，要证明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要拿出证据，哪怕你是登月的宇航员。

迄今为止，除了埃德加外，其余登陆过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都没有提到过外星人。

不过，相对于没有证据的“外星人”探讨，那一批登月归来后的宇航员的境遇和生活，可能更值得关注。

4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秘的“12人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无论是大国政要还是超级富豪，都无法加入，因为这个俱乐部只有一个入会条件——你登陆过月球。

迄今为止，只有12个人真正登陆过月球，全部来自美国。

英国作家安德鲁·史密斯曾采访过12名登月宇航员中的9名，写成了一本书，叫作《月亮之尘：登月档案揭秘》。书中披露的那些登月宇航员回到地球后的境遇，出乎很多人意料。



“阿波罗15号”登月舱驾驶员詹姆斯·欧文

那位站出来声称自己看到过外星人的“阿波罗14号”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在回到地球后就创办了一个“抽象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专门研究各种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当然也包括外星人。

“阿波罗15号”的登月舱驾驶员詹姆斯·欧文在月球的亚平宁山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块有着数十亿年历史、被称为“起源石”的水晶，他表示自己当时就感到这块“起源石”仿佛正在那儿等待他的到来。回到地球后，詹姆斯就建立了一个叫作“高飞”（High Flight）的宗教组织，然后

开始不断率团队去土耳其亚拉拉特山寻找“诺亚方舟”的遗骸——他经常说，在太空中的经历使他觉得离上帝前所未有地近。

“阿波罗16号”的登月舱驾驶员查尔斯·杜克，在返回地球后就开始严重酗酒，并且经常虐待自己的孩子。后来，他也皈依了宗教，在回忆自己的登月经历时，他的评价是“我生命中的灰尘”。

和查尔斯·杜克一样，作为阿姆斯特朗的搭档，当年执行“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的巴兹·奥尔德林在回到地球后也陷入长期的抑郁和酗酒状态。

作为第四个登上月球的人，“阿波罗12号”的指令长艾伦·宾在回到地球后成了一名画家。但他的画永远只有一个主题：用混合着月球尘土的油彩，描绘他看到过的月球表面的场景。



艾伦·宾



艾伦·宾的画

要知道，这批宇航员之前绝大多数都是美国空军的试飞员，无论身体素质还是心理素质，都要比平常人高出很多。

那么，这是否暗示——他们遭受了巨大的刺激？

5

受到刺激是肯定的，但原因，却未必来自所谓的“外星人”。

首先，是宇航员回到地球后，对公众的狂热崇拜难以适应。

“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的境遇可能最有代表性。

阿姆斯特朗返回地球后，发现来自四面八方的赞扬和崇拜简直让他无法抵御，以至慢慢产生了抵触情绪。阿姆斯特朗的故乡俄亥俄州沃帕科内塔是一个只有1万居民的小镇，但居民们却自己捐款造起了一座“尼尔·阿姆斯特朗航空航天博物馆”，只是，阿姆斯特朗本人几乎从不去那里。

因为频繁到各地演讲和做活动，无暇顾及家庭，1989年，阿姆斯特朗的妻子珍妮特提出了离婚。阿姆斯特朗后来曾回忆：“我很爱我的妻

子，离婚成了我成功的最大代价。”

而后来有人问起阿姆斯特朗如何看待自己的脚印将永远留在月球，他的回答是：

“我希望未来有人上去把我的脚印擦掉。”

阿姆斯特朗后来甚至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买了一个小农庄，开始过半隐居的生活，他曾感慨：“到底要多久，人们才不会把我当一个宇航员看待？”

6

与周围人的狂热相比，宇航员自己内心深处的失落感，也是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

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陷入了狂热的“太空争霸”，从1969年到1972年，美国开始频繁进行登月计划，从总统到NASA，从宇航员到普通百姓，美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亢奋情绪中。

然而，在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成功登月后，美国的“探月计划”却偃旗息鼓了，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导致包括宇航员在内的很多探月计划参与者心中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困惑：那我们的人生，接下来该干些什么？

阿姆斯特朗的登月搭档，巴兹·奥尔德林后来写自传回忆了当初自己的心态：“30多岁的时候，仿佛就完成了自己人生全部的使命，接下来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于是奥尔德林开始酗酒，然后和自己的妻子离婚；然后再结婚，一年之后再次离婚，之后继续酗酒。从空军退役后，他因为没有人生目标，甚至靠推销汽车谋生。

2002年，在洛杉矶一家酒店的门口，72岁的奥尔德林被一个年轻人缠住，不停地被质问：“你敢对着《圣经》发誓说你登上了月球吗？”“你因为你没有真正做过的事收了钱。”“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懦夫！”奥尔德林在和年轻人争辩之后被激怒了，最终一拳挥向了对方——这一幕被全程拍了下来。

阿姆斯特朗在过半隐居生活时，曾有朋友劝他多出去走走，而阿姆斯特朗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连月球都去过了，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吸引我呢？”

7



这张著名的“地出”照片，由“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威廉·安德斯在月球轨道上拍摄

还有一个原因，和公众及宇航员本人都无关，而是和宇宙有关。

虽然我们都知道宇宙无边无际，但只有当宇航员真的身处其中，才能感受到那种浩瀚带来的强大冲击力。

“阿波罗14号”的航天员埃德加坚信存在外星人，与其说是因为他发现了证据，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信仰发生了改变。

埃德加在回忆自己的登月过程时说：“忽然从月球边缘缓缓升起了一

个蓝白相间的星球，我一时呆住了，当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我们的家园——地球。”

埃德加承认自己的信仰发生了改变：“在返回家园的途中，透过24000英里[1]的天空，看到了我们的星球，我忽然想到了智慧、爱与和谐。30年前，我认为人是宇宙间唯一的生物，现在我不这么看了。”

而成立宗教组织的“阿波罗15号”宇航员詹姆斯·欧文也感慨：“每当晚上，你抬起头就能看见月球，我在月球上看地球也差不多，它活像一个脆弱的蓝色皮球挂在黑暗的宇宙内，你几乎可以伸手就握着它，这种感觉可说无法想象得到。”

8

2017年1月16日，NASA宣布，尤金·塞尔南去世，享年82岁。

尤金·塞尔南，“阿波罗17号”的指令长。“阿波罗17号”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实现登月的飞船，而尤金作为最后一个返回登月舱的宇航员，也成了人类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在月球上行走过的人。

尤金去世时，在月球上行走过的宇航员，在世的只剩下了6位。

他曾用手指在月球上写下了当时9岁女儿的名字首字母“TDC”，并称这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而以尤金为代表，所有曾经登上过月球的宇航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能重返月球。（阿波罗计划的故事可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45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再回月球？》）

馒头说

为《历史的温度》写序的老师严锋，也是《三体》第三部的序言作者。我至今对他《三体》序言的第一段印象深刻：

“多年以后，我还会记得看完《三体》的那个秋夜，我走出家门，在小区里盘桓。铅灰色的上海夜空几乎看不到几颗星星，但是我的心中却仿佛有无限的星光在涌动。这是一种奇异的感受，我的视觉、听觉和思维都好像被放大、重组和牵引，指向一个浩瀚的所在。”

这完全说出了当时我自己看完《三体》后的心境。

有不少人曾说，登月宇航员的后半生大多有异于常人，多半和他们看到过外星人有关。

我虽然是“外星人存在”的支持者，但我反对任何没有证据的“外星人”推断，而对于这批登月宇航员，我认为仅仅用“遭遇过外星人”来概括他们后半生的心境变化，太草率了。

我们总说，人类在宇宙中真的不算什么，但有多少人能像他们一样，在外太空，真真切切感受到宇宙的浩瀚，地球的卑微，生命的渺小？

不一定要登月。法国的首位女宇航员克洛迪·艾涅尔，后来曾做到过法国的科技部部长，但依旧无法摆脱抑郁症的困扰，自杀未遂，震动法国。

但越是这样，其实越能体现这批宇航员的伟大，他们就是我们，就是体现了人类面对超出想象力的新世界的心态，而他们背后折射的，是整个人类探索和征服未知领域的天性和雄心。

确实，无论是霍金还是《三体》，都通过各种方式提出警告：不要去主动探索地外文明，否则很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但我认为人类的探索之路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人类探索未知、克服孤独感、证明自己存在的这些天性，是人类一路演化而来成为万物之灵长的强大驱动力，是不可能被改变的。

就用恩斯特·施图林格那封著名的回复赞比亚修女的信的最后一段话作为结尾吧——1970年，赞比亚修女曾给施图林格写信，询问他地球上有那么多吃不饱饭的儿童，而人类为什么还要探索太空：

“太空探索不仅仅给人类提供了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它还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挑战和进取精神，以及面对严峻现实问题时依然乐观自信的心态。我相信，人类从宇宙中学到的，充分印证了阿尔贝特·施韦泽那句名言：‘我忧心忡忡地看待未来，但仍满怀美好的希望。’”

---

[1] 1英里约为1.61千米。——编者注

“挑战者号”悲歌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探索成就的背后，是默默无闻的牺牲，但当这一幕赤裸裸展现在你面前时，带来的震撼是怎样的？

1

1986年1月28日上午，19岁的杰弗里·奥尔特一直心情激动。

作为一个“太空迷”，奥尔特这一天专门赶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发射中心附近。在这一天，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将搭载七名宇航员升空。为此，奥尔特还专门购买了一台柯达Super 8手持摄像机，准备将这一幕激动人心的场景全部记录下来。

事实上，心情激动的人远不止奥尔特一人。

在离发射现场6.4公里的看台上，1000多名观众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人类又一次挑战太空的壮举。在这1000多名观众中，还有19名准备到时起立欢呼的中学生——他们的老师麦考利夫在全国应征报名的11000名教师中被选拔出来，将成为七名宇航员中的一位，在太空给全国的中小学生上两节科普课。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瞬间

而这场发射，还将通过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电视台向全国直播。

上午11点39分，激动人心的倒计时开始了：“10，9，8……3，2，1，发射！”

随着承载“挑战者号”的助推火箭点火升空，看台上的观众纷纷起立欢呼。在远处，奥尔特拿摄像机的手甚至有些发抖，他看到取景框中的航天飞机缓缓升空，不断加速，很快就会突破天际……

然后，摄像机画面里就出现了奇怪的一幕——

在升空过程中，助推火箭和“挑战者号”忽然爆出了巨大的火焰，瞬间就四分五裂了。

那是它升空后的第73秒。

看台上的1000多名观众被突如其来的变化震惊了，很多人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位观众甚至对着那团烟花赞叹：“天，太美了！”

然而很快，大家都意识到一幕悲剧刚刚发生——

“挑战者号”爆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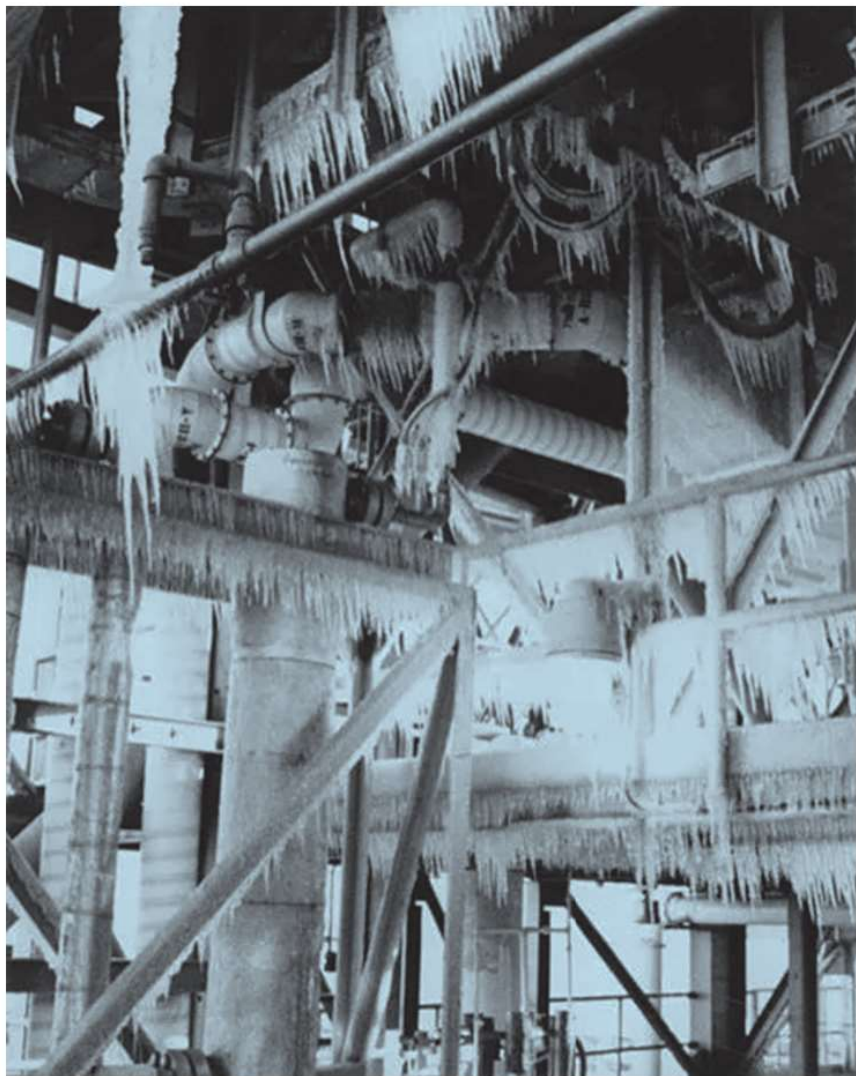
“挑战者号”爆炸时的场景。航天飞机此前已有24次的任务成功经验，并宣告美国已脱离使用火箭的年代

2

“挑战者号”爆炸的场面震惊了所有人，但其中可能未必包括博伊斯乔利。

罗杰·博伊斯乔利是塞奥科公司的高级工程师，而塞奥科是负责为NASA制造航天飞机SRB部件的承包商——SRB是“solid rocket booster”的缩写，也就是“固体火箭推进器”，是决定航天飞机发射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环节之一。

作为SRB部件的主要工程师之一，博伊斯乔利到最后一刻，都不同意“挑战者号”发射。


发射前一天，肯尼迪发射中心的发射台其实已经出现了结冰现象

这不仅仅是因为“挑战者号”的发射一直都非常不顺：按照计划，“挑战者号”应该是在美国东部时间1月22日下午2点43分发射的。但是，由于上一次发射其他飞行器的任务有延迟，发射时间推迟到了23日，随后又推迟到了24日。因为恶劣的天气，发射时间再一次推迟到了25日。之后又是糟糕的天气，时间改到了27日。最后，由于外部舱门通道的问题，发射时间最终被定在了1月28日。

但是，1月28日依旧不是一个发射的好天气。

根据天气预报，当天的气温降到了0摄氏度以下（–0.5摄氏度）。虽然这没有超过发射所允许的最低温度，但这样寒冷的气温让博伊斯乔利非常担心一个关键部件：O形环。

O形环，简单来说，就是避免火箭膨胀爆炸的一个重要部件。在火箭点火升空的过程中，火箭助推器会因遭受巨大的内部压力而膨胀，而此时O形环也要瞬间随着钢壁迅速膨胀，防止高温气体泄露进而接触燃料箱。只要O形环膨胀稍慢，哪怕是0.1秒，就会造成热气外泄，进而引发不堪设想的后果。

博伊斯乔利和几个工程师都担心：低温会使O形环变得僵硬，进而在火箭发射时不能及时膨胀，随后引发灾难。

为此，以博伊斯乔利为首的几个工程师联名向公司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也面临另一个问题：无法拿出数据方面的证据和解决办法。怎么才能确定O形环出问题的概率呢？

而发射的时间因为一拖再拖，已经迫在眉睫。

所以，当NASA再一次询问塞奥科公司究竟能否发射时，公司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乃至争论，最终决定忽略博伊斯乔利他们担心的问题，给出了回复：可以发射。

在发射那天，远在犹他州的塞奥科公司职员都在会议室收看电视直播，但博伊斯乔利却在会议室门外来回踱步，他表示自己太紧张了，不想看直播。

在“挑战者号”成功点火升空后的最初几十秒，博伊斯乔利兴奋地握住同事的手，说：“我们刚刚躲过了一颗子弹！”

但是，就在第73秒，会议室里传来了一阵惊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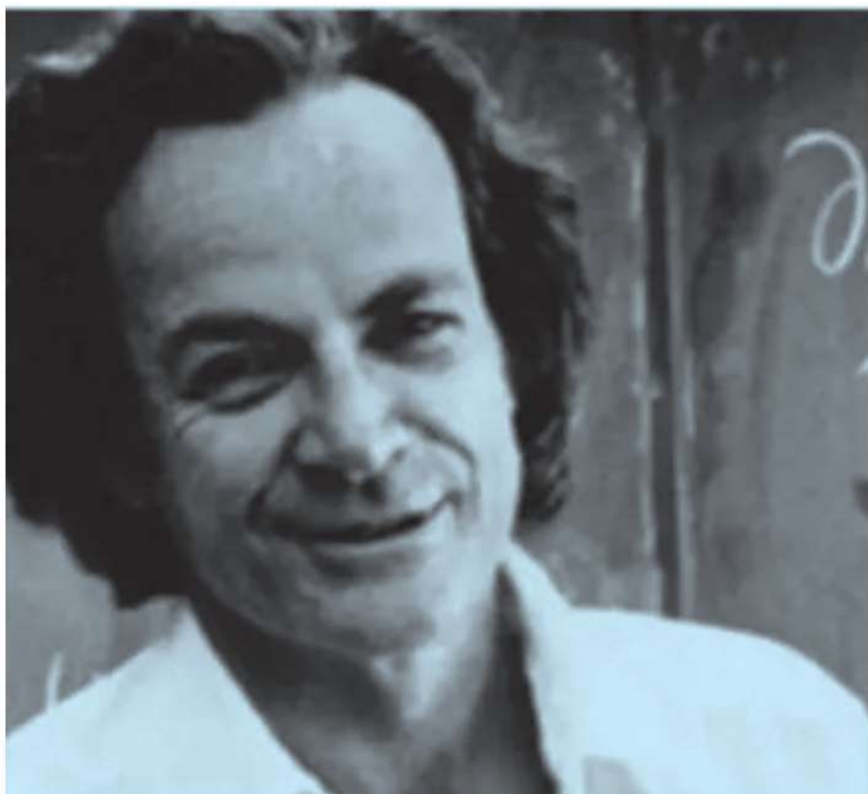
看到电视屏幕上“挑战者号”在爆炸中碎裂成了数千片，尽管博伊斯乔利之前有心理准备，但那一刻，他还是感觉自己的心跳几乎停止了。

3

“挑战者号”究竟为何爆炸？这个问题困扰着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也包括费曼教授。

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他在“挑战者号”爆炸三天后，被邀请加入由前国务卿罗杰斯领衔的失事原因调查委员会。

费曼一开始是拒绝这个邀请的，因为秉性正直的他认为政府里充满谎言和欺骗，不想和他们进行任何协作。但由于“挑战者号”爆炸事件影响实在太大，他确实也希望能帮忙找出事故原因，所以最终接受了邀请。



费曼教授，犹太裔

在排除了多项可能的原因之后，费曼把目光聚焦在了O形环上。

按照费曼自己的说法，他当时接到了同样参与调查工作的库提纳将军的一个电话：“今天早上修汽车的喷嘴时想到，航天飞机起飞的那天，佛罗里达的气温只有零下二三摄氏度，而以往发射时，最冷的一天也有12摄氏度。请问费曼教授，冷冻对O形环有什么影响？”

费曼立刻想到了温度对O形环的影响。

但他后来才知道，其实当时是NASA的一名宇航员向库提纳将军提起的O形环问题，而库提纳将军为了保护这名宇航员（他还要在NASA工作），才谎称是自己修车时想到的。

事实上，无论是制造部件的塞奥科公司的部分工程师，还是NASA的部分工作人员，当时都已经意识到了O形环可能是这次灾难的主因。但是，如何证明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

而这个任务，最终由费曼完成了。

在一次有媒体在场的事故原因调查会上，费曼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当着媒体的面，拿出了自己事先组装的O形环模型，用钳子压扁，浸到了冰水中，然后取出，松开钳子——O形环没有恢复原状。（腾讯视频可以搜到当时的视频。）

这一幕通过媒体传播，在当晚轰动全美——这意味着“挑战者号”升空爆炸的主要原因被找到了。

而打捞上来的残骸碎片和一系列的验证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发射时气温过低，发射台已经结冰，火箭推进器固定右副燃料舱的O形环硬化。在点火时，O形环未能及时膨胀，火焰外冒。好在添加在燃料中的铝形成了铝渣，临时堵住了裂缝，起到了密封作用。

但是，就在升空58秒左右时，飞船遭遇一股威力相当于“卡特里娜飓风”的风切变，随之而来的震动让铝渣脱落，缝隙再次暴露，于是火焰直接喷射在了主燃料舱上……

在4万升燃料爆炸的冲击下，“挑战者号”被气流撕成了碎片。

而这个原因的公布，也证明了一点：NASA和承包公司在这次灾难中有不可推卸的管理和沟通上的责任。

由于这事关NASA的公众形象和研究经费，所以费曼在整个调查报告的公布过程中受到了很大压力，但他坚持两句话：

“大自然是不可欺骗的！”

“公关不能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4

但是，“挑战者号”上的七名宇航员已经为“欺骗”付出了生命代价。

这七名宇航员分别是：

机长弗朗西斯·斯科比，曾是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驾驶员迈克尔·史密斯，也曾担任过战斗机飞行员；宇航员朱蒂丝·雷斯尼克，在闲暇时喜欢弹钢琴；宇航员罗纳德·麦克奈尔，曾是加州南部的农民；宇航员格里高利·杰维斯，他还随身带着母校送给他的一面旗子，希望能带入太空；埃里森·奥尼佐卡（鬼冢承二）日裔美国人，最大的梦想是去月球。

还有就是中学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她算是七人中唯一一名“业余宇航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她通过层层选拔最终入选七人名单。按计划，她将在太空通过电视为美国和加拿大250万中小学生讲授两节太空课和一些太空科学表演。



“挑战者号”上的七名宇航员



麦考利夫在她成功入选后的一个庆祝仪式上给大家签名

当时，她的学生全都停课，希望通过电视直播亲眼看到自己的老师进入太空。

事实上，在升空后，舱内的七名宇航员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到了升空后68秒，地面的太空舱通信员和舱内的宇航员还有对话：

“执行加速！”

机长斯科比回答：

“收到，执行加速！”

这是“挑战者号”宇航员和地面的最后一次通话。

5秒后，飞机解体。

而更令公众伤心的，是另一份调查报告：

在“挑战者号”解体时，至少有三名以上的宇航员并没有死亡，他们甚至还有自主意识，打开了航天飞机上的应急供氧设备。然而，他们随

后在低温和缺氧的环境下，死于坠落时舱体和海面的重击——当时的下坠速度超过334公里每小时。

于是又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难道不给宇航员配备用于逃生的弹射座椅吗？

很遗憾，在“挑战者号”的实验中，确实给每位宇航员配备了弹射座椅，但到了正式任务时却被拆除了。事故原因调查委员会给出的原因是：作用有限，技术复杂，花费过多金钱，重量原因，日程拖延。

5

“挑战者号”失事的余波，当然还不止于此。

由于“挑战者号”的发射过程是通过CNN全程直播的，所以很多美国人通过直播画面目睹了灾难的发生（其中还有不少是停课看直播的孩子），而即便没有看直播的人，也在事故发生一小时内通过各种渠道迅速知道了这个新闻。

在这样的高关注度下，NASA面临巨大压力。

在调查组出具最后报告时，前国务卿罗杰斯曾要求加上第十条建议：“我们强烈建议NASA应该继续受到政府和全国的支持，因为它在开发太空的工作中起了关键作用……祝贺NASA以往的成就，并预祝新的业绩更辉煌！”

但作为专家的费曼坚决不同意加上这一条。

费曼并不是不赞成太空探索或否定NASA以往的工作成绩，而是他认为，这次事故，NASA在管理和沟通上就是应该负很大责任。他甚至认为这个组织已经背离了当初探月工程时的精简有效原则，成了一个臃肿低效且会逃避责任的机构——作为一份事故调查报告，这种政策性的鼓励根本就不是什么建议，显得不伦不类。

所以，费曼做出的答复是：如果要加上第十条，那么他不会在调查报告的最终结论上签名。

事实上，NASA因为这次事故也确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发射计划因此被冻结了32个月，直到1988年9月29日才重新恢复。

但是，教训需要吸取，脚步却并不停止。

尽管NASA的发射计划被暂时终止，但谁都知道会有重开的一天。因为从当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演讲中，大家已经得到了答案。

1月28日原本是里根要发表国情咨文的日子，但因为“挑战者号”失事这场灾难过于巨大，里根宣布推迟到一周后再发表国情咨文，取而代之的是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发表了一篇演讲。

在这篇演讲中，里根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并着重强调：

“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太空探索。我们会有更多的航天飞机、更多的航天机组，并且，是的，更多的平民、更多的教师飞向太空。

“一切都不会在此时此地停止——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探索之旅正在继续。”

馒头说

还是想说说我的老东家《解放日报》在当年是如何处理这个新闻的。

当“挑战者号”事故发生后，当时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不仅将事故新闻放到了头版的醒目位置，而且还配了两张照片，这在全国引起轰动——自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全国报纸从来没有让国际新闻上过头版（当天《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右下角放了两条消息）。

后来我和我的领导、当时经历此事的陈振平老师（后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文汇报》总编辑、党委书记）聊及此事，他说过一句话：

“这和国家无关，是全人类的事。”

没错，这也是“挑战者号”失事当时、现在乃至未来依旧能够让人铭记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我在之前的《海底两万里：不管你是否凝视，深渊总是在那里》中表达过的一个观点：

人类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才能明白自己的渺小和卑微，但同时，我们不怕牺牲，永不言弃。

从加加林到麦考利夫，从阿姆斯特朗到杨利伟，他们有的人成功，有的人牺牲，但所有人都付出了让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国籍，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无国界的——代表的是全人类。

在“挑战者号”失事之前，NASA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是“阿波罗1号”在测试时指令舱发生大火，三名宇航员遇难。遇难者之一、指令长维吉尔·格里森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要是我们死亡，大家要把它当作一件寻常的事情，我们从事的是一种冒险的事业。万一发生意外，不要耽搁计划的进展。征服太空是值得冒险的。”

虽然不愿意看到，但我相信，人类探索太空的过程中还会继续出现牺牲。

但我们的脚步不会停止。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美太空迷拍摄1986年挑战者号失事新视频曝光》（新浪科技，2012年3月13日）

2.《纪念“挑战者号”失事10周年》（潘厚任，《自然杂志》，1996年第1期）

3.《挑战者号的失事真相以及你不知道的费曼冰水实验》（巴特，知社学术圈，雷锋网转载，2016年5月12日）

4.《“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原因》（郑学文，《上海航天》，1986年第3期）

5.《碎片背后的伤逝与梦想》（高珮莙，《青年参考》，2016年2月17日）

6.《30年过去了，“挑战者”号工程师仍在自责》（霍华德·伯克斯，

美国公共电台，2016年1月28日）

18年前的今天，人类超声速旅行的梦想破碎……

一说起20世纪，我们总会有一种很遥远的感觉，尤其是在科技方面，更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但事实上，当时的一些科技应用，其实很超前，反而会让现在的我们产生一种“科幻感”，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1

2000年7月25日，下午4点40分。

法国巴黎的戴高乐机场第26号跑道，法航4590号航班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准备起飞。

当这架客机以超过300公里的时速滑行了1200米的时候，飞机左翼忽然冒出了一团烈火。

地面塔台立刻通知4590号航班的机长，但机长已经没有办法——前方跑道只剩下2000米，已经无法安全停下，只能强行起飞。

3分钟后，客机拖着长长的火焰强行升空，几秒后，起火的机翼就开始解体，飞机开始向左倾斜。



当时起火后强行起飞的“协和号”

2分钟后，挣扎的客机一头栽进了机场旁一个小镇的一家酒店。

机上100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酒店里的4名住客也因“天降之灾”而罹难。

这起空难立刻震惊了全世界。

不仅仅是因为空难本身，更因为这架客机不是普通的客机。

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于商业飞行的超声速客机——“协和号”。

2

人类首次研制出超过声速的飞行器，是在二战时期。

1943年，美国人研制的X–1试验机第一次飞出了1.06马赫的速度——人类飞行器首次突破了声障（1马赫大约相当于340.3米/秒，大约等于1225公里/小时。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340米/秒）。

超声速的飞机最先肯定是用于军事领域，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开始动起了脑筋：能否让大型商用客机也实现超声速飞行？



X-1是人类历史上一架划时代的飞机，不仅仅因为它首次实现了超声速，也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架纯粹为了实验而研制的飞机

当时世界上的四个军工强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都相继开始了超声速客机的研发。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最重视，且在一开始是走在最前面的。

1956年，英国就成立了“超声速运输飞机委员会”（Supersonic Transport Aircraft Committee，STAC），这个委员会联合了英国皇家飞机研究院和布里斯托尔飞机公司，开始全力研发超声速客机。

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发之后，英国人喜忧参半：喜的是，经过多次实验和论证，制造能实现百人载客规模的超声速客机是可行的；忧的是，整个研发和制造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政府实在吃不消。

怎么办？只能找合作伙伴。当时美国出于种种原因，退出了这一领域的探索，而苏联因为“冷战”的影响，隔着“铁幕”自己闷头研发，英国找来找去，只能找到法国。

好在，法国对研发超声速飞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过二战的摧残，百废待兴，整个民航客机市场几乎被美国的波音和道格拉斯占据。要强的法国总统戴高乐非常希望有欧洲国家自己的客机，打破美国的垄断，所以对与英国合作研发一事非常支持。

1962年11月28日，在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推动下，法英两国签订了共同研发超声速客机的协议。英国人还特地加了一个条款：谁中途退出，谁就要支付巨额赔款。

我们可以想一下：在50多年前，人类就开始研发超声速客机了，这是一件多厉害的事。

正因为如此，所以整个过程也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3

研发计划才进行了两年，英国人就后悔了。

1964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胜出，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面对财政赤字，提出想退出超声速客机的研发计划。但法国警告说：一旦退出就要付巨额罚款。犹豫再三的英国最终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开发。

1967年12月11日，经过两国不懈的努力，第一架超声速客机终于出厂。然而，在飞机的命名问题上，两国又产生了分歧。

早在四年前，戴高乐就将这架飞机命名为“Concorde”——这个单词在法语中代表“合作”“和谐”。但是，一开始表示同意的英国，在之后认为这个名字忽视了英国的作用，所以决定将“Concorde”改为“Concord”——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是英语单词。

到了飞机出厂的时候，英国科技部部长宾特表示英国愿意使用最初的法语单词。这个行为引起英国国内很多人的不满，认为研制超声速飞机的计划是英国先提的，应该用英文单词。

为此，宾特部长绞尽脑汁做出了解释：多出来的那个字母“e”可以代表“卓越”（excellence）、“英格兰”（England）、“欧洲”（Europe）和“挚诚协定”（entente cordiale）。

好不容易搞定了英格兰人，宾特部长又收到了一个苏格兰人寄来的信：“你说‘e’代表英格兰，但这架飞机的一部分是在苏格兰组装生产的！”宾特只能再回信：“‘e’也可以代表‘Ecosse’（法语中苏格兰的名称）。”

经历了各种波折，这架飞机终于在1969年进行了成功试飞。再经历测试、检验、办牌照等诸多流程和手续，1976年，该飞机终于进行了首次商业飞行。

人类乘坐超声速客机进行飞行的梦想终于实现。

而这个型号的飞机，最终被定名为“协和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法两国还在纠缠的时候，闷头研发的苏联其实已经走在了前面：他们研发的图–144超声速客机在1968年首飞成功，1975年12月26日正式服役。但因为这架飞机的故障率实在太高，经常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连图–144的主任设计师都在事故中遇难），所以在1978年就停止了客用飞行。

4

那个时候还没有“知乎”，不然很多人都会问一个“知乎体”的问题：“乘坐‘协和号’，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

坐过的人肯定会告诉你：很爽。

“协和号”一共有100个座位，没有设头等舱，因为每位乘客都享受头等舱待遇——有豪华大餐、免费香槟，餐具是名贵的陶器和银质刀叉。

当然，这些东西都不是乘坐“协和号”客人所首要追求的，他们买机票的最大原因其实就一个字：快。

“协和号”在空中飞行的巡航高度为18000米（普通客机巡航高度一般为9000米左右），巡航速度为2150公里/小时（普通客机一般为900公里/小时），最高速度能超过2马赫（两倍声速）——每当飞行途中机舱内的液晶屏显示当前速度超过2马赫的时候，机舱内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超过两倍声速的客机，飞行速度已经超过了地球自转的速度，这会给旅途带来怎样的体验？

从用时来看，从巴黎到纽约的航程，普通客机要飞8个小时，而“协和号”只需要飞3个小时多一点。由于巴黎和纽约的时差为6个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能追上“晨昏线”的“协和号”，可以让客人在比出发时更早的时间就到达目的地——事实上，这也一直是“协和号”喊出的宣传口号：

“未出发，就到达”（Arrive before you leave）。

这显然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和谈资，所以当时很多欧洲人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够坐一次“协和号”。



“协和号”飞机

5

那么，“协和号”就没什么缺点吗？

当然是有的。

首先，“协和号”充分体现了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

1982年，一张巴黎往返纽约的“协和号”机票，价格为3900美元，到了2000年，价格提升为了8148美元。所以有人津津乐道“协和号”的乘客素质都很高，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能搭乘这架飞机的客人都非富即贵，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法国总统希拉克都经常搭乘“协和号”。

其次，由于毕竟是超声速飞机，又飞行在18000米的高空，所以机舱内再怎样进行消音处理，依旧会有很大的噪声。有人做过形容，在“协和号”上基本和处在一个嘈杂酒吧里类似，说话需要贴着对方耳朵大声说。

当然，与这些比起来，“协和号”飞机最大的隐患是两个字：安全。

因为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都是普通客机的2倍，所以“协和号”上每一个小故障都会被放大无数倍。与一些零星的小事故相比，“协和号”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爆胎”。从1975年的一次试航爆胎开始，“协和号”几乎每年都有爆胎事故发生，所幸每次都化险为夷。

不过，总的来说，“协和号”在各方面还是比较安全的，从1976年到1999年，“协和号”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事故，由此还获得了“全世界最安全航班”的称号。

然而，这个光荣纪录，在2000年7月25日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

也就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6

2000年7月25日的那架出事的“协和号”，是满载的。

在那100名乘客中，有96名是德国人，他们都是通过一家旅游公司包机前往纽约，然后要乘坐“加勒比海号”游轮度假的。值得一提的是，另有33名乘客因为飞机满座，只能搭乘普通客机先行前往纽约——由此可见当时“协和号”受欢迎的程度。

坠机消息传来后，整个德国陷入巨大的悲痛中，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惊愕地表示：“德国不知所措！”

而飞机失事的主要原因也很快被找到——还是“爆胎”！

官方调查结果显示：当时跑道上有一条由美国大陆航空的麦道DC–10客机（编号N13067，飞往纽瓦克）一号发动机掉落的长条形金属零件。不幸的是，在“协和号”起飞之前，这根金属零件并没有被清理——当轮胎碾过这根铁条时，发生了爆裂。更不幸的是，轮胎爆裂的碎片高速射向位于机翼的满载油箱，造成的震荡波导致油箱盖受压打开，大量燃油泄漏；而另一块较小的轮胎碎片割断起落架的电缆线，导致火花引燃漏油。

当飞机起火后，得到塔台通知的机长发现停止起飞已经不可能，所以试图强行起飞后降落到5公里外的巴黎–勒布尔热机场。但由于火势太大，引起飞机机翼解体，两个发动机相继出了问题，各个部件也开始熔毁，起落架也无法回收。

最终，机毁人亡。

7

这一次空难事故，对整个超声速客机行业而言是致命一击。

之前还荣膺“世界上最安全航班”的“协和号”，很快就因为每100万次航班的丧生旅客数为12.5人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客机”之一——当然，因为“协和号”载客量比一般客机低，所以一出事就很容易导致丧生人数比例上升。

但更大的震慑，是在公众的心理上。

由于“协和号”的事故就发生在起飞过程中，所以被大量的机场乘客所目睹，人们拍摄的照片甚至视频被广为流传，“协和号”拖着长长火焰坠毁的形象通过媒体传播，震撼了全世界，给很多人都造成了心理上的阴影——超声速飞机还是不可靠啊！

尽管这次事故后，“协和”飞机的制造厂商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包括使用新型的特制轮胎，使用防弹衣的材料来包裹油箱等，但公众的信心一旦被击垮，就很难再重新建立了——“协和号”航班的生意一落千丈。

一旦机票收入大幅下降，立刻暴露了“协和号”运营的最大命门——成本高昂。

单燃油费一项，就让英国航空和法国航空两家公司撑不住了。

与波音747相比，“协和号”的每小时耗油量接近它的两倍，而乘客运载能力却只有它的1/4，这就导致每位乘客每100公里的耗油量接近它的8倍——这也是当初美国放弃研制的原因之一。

而油费的高昂也直接影响了英法两国飞机制造公司的命运。“协和号”在研发的时候，国际原油价格才3美元一桶，当时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航空公司给“协和号”开出了订单。但之后全世界经历了三次“石油危机”，原油价格上升到了三四十美元一桶，这些订单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作为制造商的英法两国继续采购。事实上，凭借着高昂的票价，英国航空公司的“协和号”航线一直是赢利的，但乘客人数一旦断崖式下跌，公司很快就陷入了巨额亏损。

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和挣扎，但“协和号”在2003年还是走到了自己的命运终点。

2003年10月24日，英国航空公司的最后一架“协和号”客机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法国航空公司的“协和号”已经在6月27日完成了告别），宣布正式退役。

“协和号”客机在1976年开始商用，一共服役27年，出过一次重大事故，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人类的第一次超声速旅行之梦，到此终结。

馒头说

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真是进入了一个“打了鸡血”的时代。

1957年的第一颗人造卫星，1961年的第一次载人宇宙飞行，1969年的载人登月，包括超声速客机的问世。有些事情，即便过去了四五十年，但我们到现在都还没能重现，比如登月，比如乘坐超声速客机旅行。

毫无疑问，这背后有“冷战”催化的因素，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肯定还是觉得非常兴奋吧——感觉人类的征途，真的是星辰大海。

那么，是我们的科技水平在倒退吗？显然不是。

就我个人看来，是因为现在的人更冷静、更理智了。一旦政治挂帅的模式改变，在科技账之外，大家算得更多的其实是一本经济账：要造，肯定没问题，但造出来后谁来用，怎么用，怎么能够一直用下去，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协和号”退役当然有出事故的因素，但真正压垮它的，还是背后的运营成本高居不下。同理，“阿波罗登月”计划之所以没能继续，不是因为所谓的美国人在月球受到了外星人的警告，而是投入太大，在完成之前的探索之后，就目前阶段而言，回报还不足以支撑投入。

当然，现在高铁的进一步普及，其实给航空业造成不小的压力，尤其是基于磁悬浮和真空技术的“超级高铁”一旦成为现实，航空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样的压力下，可能航空业提升客机速度的动力会大大增加。

波音公司和NASA都提出了要重新研发超声速客机的计划，而攻关的重点一个是加速（超过4倍声速，即时速超过5000公里），一个是静音（达到普通客机水平）。

我们这代人坐上超声速客机，可能还是有希望的吧。

人类能不能扮演“上帝”？

就人类科技文明今天所能达到的水平，能不能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世界”。25年前的今天，有这么一群人，也想探寻这样一个答案。

1

1987年，美国的《发现》（*Discover*）杂志曾刊载过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美国继肯尼迪总统启动登月计划后，最激动人心的科学工程”。

这个工程，就叫“生物圈2号”（Biospher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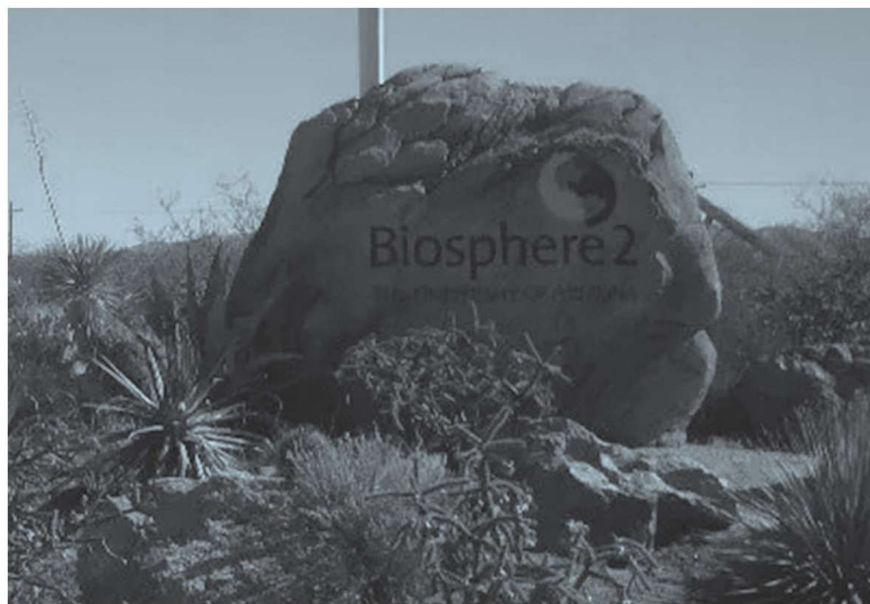


生物圈2号

“生物圈2号”这个想法，最初来自一个环保组织。1982年，一场在法国乡间举行的会议上，他们和一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进行一个实验——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封闭型的结构空间，作为未来以下一些行为的实验基地：

人类移民火星之后的栖息地，世界爆发核大战后的庇护所，当然，也可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最大规模的研究室。

这也是“生物圈2号”名字的由来——“生物圈1号”，就是我们人类栖息的地球本身。



“生物圈2号”实验室的入口，有没有点科幻片的感觉？

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构思：地球哺育了人类，而人类现在要脱离地球，自行建造一个可以供他们栖息的“地球”。

换句话说，人类希望自己可以开始当“上帝”了。

2

当“上帝”，是要很多钱的。

按照设计，“生物圈2号”需要占地1.3万平方米，里面要有5种地形形态：热带雨林、热带草原、沼泽、沙漠和海洋——是的，你没看错，还需要有海洋，不仅“海水”是用外面的海水和淡水按比例配置，而且要通过人工机械制造波浪。此外，要有两个人工生物群落：集约农业区和居住区。

此外，为了充分模拟地球真实生态，需要在“生物圈2号”内投放

3000种动植物以及1000种微生物。

最关键的是，“生物圈2号”是由8000根白漆钢梁和6000块玻璃构成的一个封闭环境，但由于温度会造成内外压力的不同，进而破坏玻璃板，所以在“生物圈2号”里，还装了两个被称为“肺”的体积可变室，用来调节封闭结构内的气压。

不过，面临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金主”还是不难找的。最终，来自美国得克萨斯的艾德·巴斯成了主要投资人。

尽管“生物圈2号”最终建成的费用达到了2亿美元左右（是预算的6倍），但还是完全竣工了。

1991年9月26日，四男四女共八名科研人员，如同宇航英雄一般，在公众和媒体的欢呼下，进入了建立在亚利桑那州海拔1200米沙漠上的“生物圈2号”。

人类，终于开始尝试扮演一回“上帝”了。

3

自“生物圈2号”的封闭舱门被关上的那一刹那，一切不顺利就开始了。

按照原先的规定，在舱门关闭之后，两年之内，“生物圈2号”不允许有任何东西进出。换句话说，“生物圈2号”里所有的生命（包括人类）必须坚持两年——八个人必须吃自己耕种的食物，喝循环的水，呼吸循环的氧气。

但问题是，生存下去成了唯一的目标。走进“生物圈2号”的八名科研人员，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系统的计划。

舱门关闭的第十天，意外就发生了。

“生物圈人”——这样听起来有点酷——简·波因英特，把手伸进了一台打谷机，然后被削掉了一截中指。

尽管这八名科研人员在进入“生物圈2号”之前，都受过大量专门的训练，但可能他们并未预料到这类事件的发生。事实上，如果处在任何

一个真实的野外环境，发生这类事件后也只有一种选择："顺其自然"。但毕竟这是一次"实验"，所以简·波因特被送出"生物圈2号"几个小时处理伤口。

"两年内不得进出"的规定，一开始就被打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八位科研人员发现，"中指被截断"这类事件，其实只是小事一桩——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第一批进入的八名科研人员



“生物圈2号”内的热带雨林

造成这一威胁的，是“生物圈2号”内的氧气含量开始下降。

这一现象首先造成“生物圈2号”内海水变酸，然后很多动物死去，其中大部分是脊椎动物。然后，所有的传粉昆虫开始死亡，进而造成靠花粉传播繁殖的植物也全部死亡。当然，也有“野蛮生长”的，科研人员发现，建筑物里随处可见两种黑乎乎的生物——蟑螂和蚂蚁。

科研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生物圈2号”内的二氧化碳–氧气循环是经过多次验证和设计的。但他们最终发现，原来种植庄稼的肥料里的微生物，以及建造建筑的混凝土，会对大气成分产生严重的影响。而这些，大家之前根本连想都没想到。

当然，氧气含量减少带来的最大威胁，是人类的生存。

如果“生物圈2号”真的是一个建立在火星上的基地，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只能以缅怀的方式来纪念那八位勇士了。但好在它毕竟只是一个实验基地。

1993年1月，“生物圈2号”里的氧气含量已经从当初的21%，下降到了14%。八个“生物圈人”都饱受缺氧的痛苦，最终，外界决定开始向圈内输入氧气。

尽管在圈内的八名科研人员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就是都瘦了好多），但从科学实验的角度来说，氧气是一切生存的基础——如果是外界输氧，那实验的数据就变得不精确了。

1993年6月26日，在顽强生存了一年零九个月后，最初进去的八名科研人员，有七名选择了走出“生物圈2号”，哪怕离当初约定的两年时间只差三个月。



“生物圈2号”里科研人员的生活区

1994年3月6日，由五男两女组成的“第二批居民”再次进入了“生物圈2号”。但这一次，大气里的二氧化氮浓度又失控了，十个月之后，第二批“居民”全部撤离。

至此，“生物圈2号”就再也没有人住进去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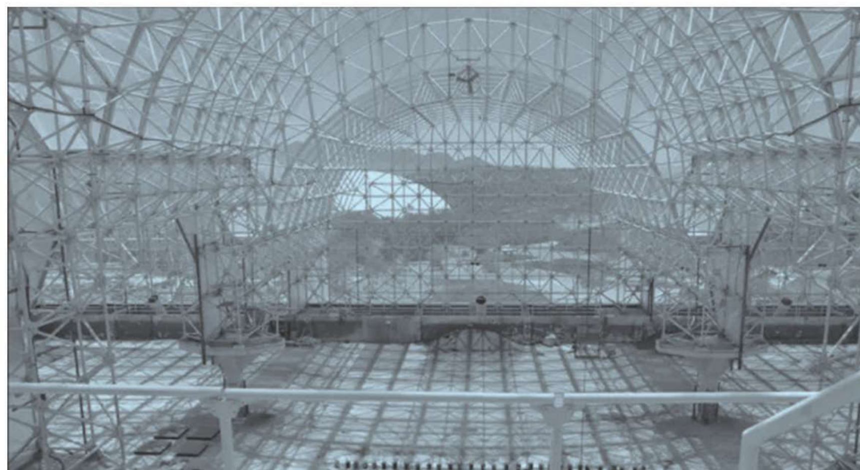
4

从“人类的壮举”到“奢侈的科学”，其实当时媒体的风向转变是很快的。

很多人开始反思：这样一个昂贵的实验室，究竟给我们带来了想要的什么？

有吗？应该还是有的。

比如圈内大气中氧气与二氧化碳比例失调的具体原因，就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此外，一个封闭生态里，多少物种的存在才能适合人类的生存，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科学家后来发现，尽管只有八个人，但“生物圈2号”里投放的动物和植物种类还是太少了，他们想象中的“生态链”并没有运行起来。



“生物圈2号”内部

当然，得到启发的除了纯粹的科学研究，还有人类社会学研究甚至心理学研究。

比如在各种恶劣情况下（缺氧和农作物歉收等），因为意见不合，哪怕只是八个科研人员的一个人类小团体，也分成了各四个人的两个帮派——两个帮派之间几乎不沟通交流。

但另一方面，先后进入“生物圈2号”的两批科研人员中，各有一对男女在出来后结成了夫妻。

你觉得这很适合做什么？没错，很适合拍电视真人秀对不对？事实上，源自美国，红遍全球的电视真人秀《老大哥》，据说就是受此启发。



“生物圈2”内的人造海洋

还是说点正经的吧。

在不再进行科学实验后，“生物圈2号”向游客开放，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不过当初的投资人巴斯并不希望看到这样，所以在1996年，他把这座巨大的实验室交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并追加了4000万美元投资。

1998年，一篇有关“生物圈2号”内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对人造海洋影响的论文，发表在了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人们开始认识到，原来“生物圈2号”真的可以在研究人类与地球环境相互作用的领域做出贡献。

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雄心勃勃，希望将“生物圈2号”打造成地球生态研究、科研、交流的首选基地，并自己追加了数千万美元投资。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2011年，亚利桑那大学从哥伦比亚大学手中接过了“生物圈2号”。不过，不管怎么变，当年的那个投资人巴斯却一直初心不改，从来没有间断过资助——光维持“生物圈2号”的电力供应，就需要每年花费100万美元。

如今，“生物圈2号”依旧对游客开放，但同时也已经开始了几个关于地球生态研究的科研项目。

投资这个毫无利润回报可能的投资，巴斯可能真的是被某种情怀驱

动吧。

馒头说

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在一本《少年科学画报》上看到了一篇“生物圈2号”的报道。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震撼。我瞬时感到，人类真的很伟大。

等长大了才知道，这个给我少年时期造成极大震撼的“生物圈2号”，其实最后失败了。

但仔细想想，这场实验，是否可以用“失败”来形容？

建造“生物圈2号”并开始实验，本身就是为了证明，人类是否可以通过一个闭环的生态系统生存下去。生存下来了，自然可以证明很多东西，生存不下来，难道就不能证明另一些东西了吗？

比如影响大气各成分比例的新原因，比如温室效应对海洋的影响，比如物种类型和人类生存的比例问题，甚至人与人之间在极端环境下的社交模式……这些难道不都是通过“生物圈2号”探索得到的吗？

“生物圈2号”用客观事实证明，地球通过几十亿年的进化，孕育了生命，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是有万千内在联系和原因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系统就能模拟的。

而这，恰恰说明“生物圈2号”实验不能被简单归为失败。因为它让我们认识到了地球家园的唯一和可贵，同时也告诉我们，寻找人类新家园的道路，漫长而又充满坎坷。

而这，也是我认为“生物圈2号”值得被大家知道的原因。

文念

“文念”算是一个生造词，“文人之念”。

说文人，很容易联想到“书生”，随即难免会联想到“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文人没有剑，却有笔。他们可以用一支笔营造一整个世界。这个倾注了他们所有情感的世界，有时能触动千万人，有时却也会反噬，让别人对他们产生怀疑和指责，让他们自己陷入焦虑、急躁，乃至癫狂。

文人之念，可歌可泣，可悲可叹。

聊聊颜真卿，以及他的《祭侄文稿》

但凡小时候练过一些毛笔字的，基本上都知道“颜真卿”的名字，因为我们每个习字之人的启蒙字帖，大多都是颜真卿的字。不过颜真卿这个人留下的，还真的不仅仅是他的字。

1

颜真卿出生的年代，是公元709年，正是盛唐到来前的黎明。

颜真卿的祖籍是山东临沂，出生在长安（今西安）。不过让颜真卿引以为豪的并不是首都户口，而是他的家世渊源：颜真卿一脉的始祖，是大名鼎鼎的颜回，孔门七十二贤之首；五世祖是南北朝时的颜之推，有《颜氏家训》流传于世；曾伯祖是颜师古，初唐著名儒学家、经学家。

公元734年，25岁的颜真卿登进士第，开始步入官场，做了监察御史。这个官级别不高，才正八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纪委监察部门巡视组的一个科级干部，但权限不小——看到有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都可以参一本。



颜真卿

按《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三·列传第七十八）记载，颜真卿在监察御史这个职位上，做过两件还算比较有名的事。

第一件事，是颜真卿到五原巡查，了结了当地一场很有名的冤案。当时五原大旱，但在颜真卿平反冤案之后，天降大雨，所以当地百姓把这场雨称为“御史雨”。

第二件事，是颜真卿在巡查河东时，发现朔方县县令郑延祚在母亲死后三十年不将其下葬，他一封报告直接写给了当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李隆基立刻做出回应：郑延祚终身不能录用。

后来，颜真卿升职到七品的殿中侍御史。不过，颜真卿如果真的在这条业务线上一直干下去的话，我们现在是几乎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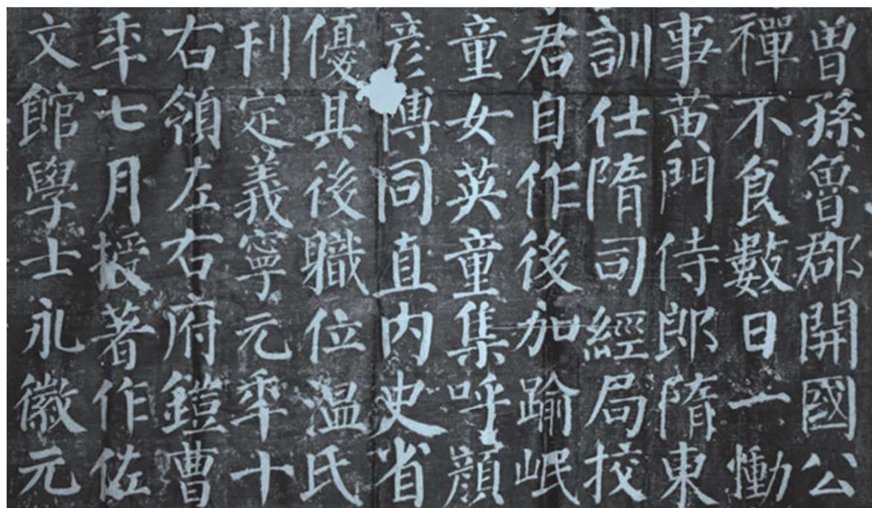
能青史留名的人，总是因为有一些普通人不具备的东西。

2

让颜真卿流芳百世的，首先当然是他的字。

颜真卿练字，最初学的是褚遂良的楷书。褚遂良位列“初唐四大家”，他的字对颜真卿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不过让颜真卿更上一层楼的，是“草圣”张旭。

当然，颜真卿向张旭学的是楷书，他甚至弃官投到张旭门下，潜心学习。最后，颜真卿集两大家之长，融会贯通，开创了一代书法名体——颜体。



《颜勤礼碑》局部

宋朝的范仲淹在他的《祭石学士文》写道：“曼卿之笔，颜筋柳骨。”所谓“颜筋柳骨”之名，由此传世。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给的评价很高：“初唐的欧、虞、褚、薛，只是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书体的继承人，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

颜真卿的书法，自然不用多加评述。但有意思的是，颜真卿的书法

在唐朝时期虽然已有名声，但在同时期的书法家中却并不是最突出的。颜真卿真正声名鹊起乃至奠定地位，其实是在北宋时期。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在书法之外，颜真卿给后人留下了别的东西。

3

公元755年，繁华一时的大唐帝国其实已经进入了崩盘的前夜。

那一年，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终于撕下了恭顺的面具，起兵造反。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已经有好几代没看见过大规模战争的大唐各地官员惊慌失措，叛军所经州县，大多望风而降。尽享太平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一开始根本不相信安禄山会造反，但待到叛军席卷河北，他听到诸城尽降的消息后，也只能叹息："河北二十四个郡，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

直到臣下来报：平原郡死守不降，且平原太守派司兵参军李平专门赶到长安，说太守已尽起全郡之兵，效忠勤王。

这时的唐玄宗还不知道平原太守是谁，经人提醒，才知道那人叫颜真卿。

那一年，颜真卿46岁，因为一直为宰相杨国忠所讨厌，被找了个借口调出京师，担任平原太守。

玄宗闻讯后大喜："我平时真不了解颜真卿的为人，原来他做的事竟这样出色！"

其实唐玄宗如果了解当时颜真卿的处境，可能会更加感动。

颜真卿镇守的平原郡，属于安禄山的势力范围。安禄山其实早就注意到了颜真卿，想知道他会不会成为自己起兵后的绊脚石。颜真卿心知肚明，于是每天和各路宾客驾船饮酒，吟诗写字。安禄山通过线报了解到情况后放下了戒备，认为颜太守毕竟只是一个读书人，不足为虑。

但事实上，颜真卿一直在暗暗招募兵丁，储备粮草。并且借口阴雨

不断，要防止山洪暴发，所以开始加高城墙，疏通护城河——当时全天下人都看得出安禄山要造反，除了唐玄宗。

等到安禄山起兵后，颜真卿立刻宣布平原全郡戒严，严阵以待。在原有的三千精兵基础上，颜真卿又招募了一万士兵，宣布讨伐安禄山。

颜真卿的这支部队，等于是在安禄山的后方“中心开花”。更重要的是，在大唐军队望风而降的时候，颜真卿勇敢竖起“勤王”大旗，等于是给其他惶恐不安的太守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不久之后，饶阳太守卢全诚、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邺郡太守王焘等纷纷领军前来。

在颜真卿的率领下，17个郡在同一天宣布效忠朝廷，起兵勤王。勤王军队很快聚集了二十万兵马，并奉颜真卿为总盟主。

原本只是一介书生的颜真卿，瞬间就完成了角色转换。在接下来与叛军的各场战斗中，颜真卿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统帅力和果敢力，配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屡立战功。

而同为颜氏一族，颜家的子孙在这场关乎大唐国运的平叛战中，都表现得可圈可点。

4

安史之乱爆发时，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是常山太守。

和自己的堂弟一样，颜杲卿也立刻举兵勤王，与颜真卿结为同盟，誓死抵抗叛军。但是，就在抵抗的第二年，颜杲卿在关键的土门一战中被叛军击败，颜杲卿一家三十余口被俘。

叛军先是把刀架在颜杲卿年仅十几岁的儿子颜季明脖子上，要求他立刻投降。颜杲卿不从，叛军手起刀落，当即将颜季明斩首。颜杲卿随后被叛军押送到洛阳交安禄山亲自审问。当着安禄山的面，颜杲卿痛斥叛贼，安禄山大怒，下令将颜杲卿“节解”——一种将人四肢骨骼肢解的酷刑。

随后，颜杲卿一家被抄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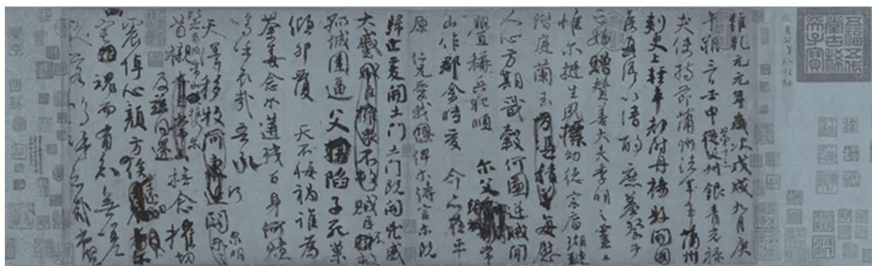
两年之后，战事稍缓，颜真卿托人寻找自己亲戚的遗骸，最终颜杲卿一家三十余口，只寻到了颜季明的一颗头颅。

面对自己侄子的头颅，颜真卿悲愤难已，研墨铺纸，奋笔疾书，写了一篇不到300字的祭文。

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祭侄文稿》。

全文如下：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辰，第十三（“从父”涂去）叔银青光禄（脱“大”字）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方凭积善”涂去）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闲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制”涂去，改“被胁”再涂去），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恐”涂去）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拥众不救”涂去）。贼臣不（“拥”涂去）救，孤城围逼，父（“擒”涂去）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河东近”涂去）。泉明（“尔之”涂去）比者，再陷常山。（“提”涂去）携尔首榇，及兹同还（“亦自常山”涂去）。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涂去二字不辨），卜（再涂一字亦不辨）尔幽宅（“相”涂去），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祭侄文稿》

颜真卿写《祭侄文稿》时，完全没有把它当作一部书法作品来写。而且因为心情极度悲愤，情难自已，全文有很多错误之处，涂涂抹抹，甚至连用墨都不讲究，全文仅蘸墨7次，第一笔蘸墨后连写53字，一气呵成，这也导致全文多处枯笔，让人更感苍凉。

但恰恰是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这部作品成了千古名作——大开大合，笔锋圆转，恣意灵动，浑然天成。尤其是那种悲愤苍凉之意，被融

入笔法之中，力透纸背。

如果说王羲之醉酒写《兰亭集序》之后自己也无法复制，那么颜真卿悲愤之下写的《祭侄文稿》，同样无法再写一篇。

而这篇《祭侄文稿》也成为如今书法界公认的“天下三大行书”之一，列于《兰亭集序》之后，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三大行书”中的另一篇为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由于《兰亭集序》真本已经失传，所以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祭侄文稿》真本堪称无价之宝。

5

成了一代书法家和一代名臣，但颜真卿的故事还没结束。

安史之乱平定，颜真卿勤王有功，自然获得升迁，一度做到刑部尚书和吏部尚书。但由于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在朝廷中也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得罪了三任宰相：元载、杨炎和卢杞。

得罪元载，颜真卿从朝廷中被贬到地方做了刺史；得罪杨炎，被分配做了太子少师；而得罪卢杞，却给颜真卿带来了杀身之祸。

卢杞的父亲叫卢奕，玄宗时官拜御史中丞，在安禄山叛军攻打洛阳时遇害，被割下头颅送到颜真卿处劝降。颜真卿怕动摇军心，对外谎称这是假的，但偷偷将首级接于草人身躯后安葬，设灵堂哭拜。

当得知卢杞排挤自己时，颜真卿曾当面去找过他，对他说：“你父卢中丞的头颅被送到平原郡，脸上满是血，我不忍心用衣服擦，亲自用舌头舔净，您忍心不容忍我吗？”

当时的卢杞惶恐地拜服在地，但内心却起了杀机。

恰好在这时，又一场叛乱爆发——公元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叛。由于孱弱的大唐尚未恢复元气，叛军又一次攻城略地。

而就在此时，宰相卢杞说服了当时的唐德宗李适：派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去劝说李希烈投降。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当然指的是三朝元老颜真卿。

李希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派人督促民工修路，一旦工期不能如

约完成，就命人直接把民工推进壕沟，用人肉来填；在上阵之前，他必定要杀人，而且当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大吃大喝。

就这样杀人不眨眼的一个魔头，打出了要自立为帝的旗号，这是能够劝服的吗？

那一年，颜真卿已经73岁了。

很多与他交好的官员都让他不要去，但颜真卿还是坚决要去，他的理由只有一个：

“这是圣旨，要我去，我就去。”

6

一代书法名家，就这样来到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阵营中。

到了李希烈那里，颜真卿刚准备开始宣读圣旨，李希烈安排好的1000多个部将和养子们就包围了上来，用手里的尖刀对着颜真卿谩骂和威胁。颜真卿面不改色，照样宣读圣旨，李希烈一看场面难看，自己护住了颜真卿，然后把他安排到了驿馆。

颜真卿毕竟德高望重，李希烈一时不敢动他。但也正是因为颜真卿名声在外，所以李希烈希望能让他投降，增添自己的声望。

一代名家和名臣颜真卿，就这样被软禁起来。

为了迫降颜真卿，李希烈用了很多手段，比如软的——让人去劝降颜真卿并许以“开国宰相”之位，结果被颜真卿怒斥：

“你们听说颜常山（即颜杲卿）没有？那是我的兄长！安禄山反叛时，首先起义兵抵抗，后来即使被俘了，也不住口地骂叛贼。我将近八十岁了，官做到太师，我至死保持我的名节，怎么会屈服于你们的胁迫！”

李希烈后来决定登基称帝，为表示对颜真卿的敬重，派人去请教他关于登帝位的仪式，被颜真卿一句话就呛了回来：

“老夫年近八十，曾掌管国家礼仪，只记得诸侯朝见皇帝的礼仪！”

卢杞其实一点都没料错：刚正不阿的颜真卿，根本就不是能劝降的人，他去李希烈阵营中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随着军队的败退，李希烈本人也慢慢失去了耐心，开始对颜真卿用上一些硬手段——派人将颜真卿逮捕，在庭院中挖一个一丈见方的坑，说准备将他活埋，颜真卿淡然地说："生死有命，何必搞这些鬼把戏。"

李希烈还派人在颜真卿住所升起过一堆火，说再不投降就烧死他。颜真卿闻言就起身往火里跳，最终被旁边人拉住。

到了公元784年8月，李希烈的部队已经掌控不了局势，而这也意味着颜真卿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8月23日这一天，李希烈派来了自己的宦官，对颜真卿说"有诏书"。

颜真卿闻言对诏书拜了两拜，准备听诏。

宦官说："赐死。"

颜真卿面不改色："老臣没有完成使命，确实罪该万死，但请问使者是哪一天从长安来的？"

宦官回答："从大梁（李希烈称帝的首都）来！"

颜真卿当即起身，痛斥使者："原来是叛贼！凭你也敢称'诏'？！"

随即，颜真卿被强行缢死。

一代书法名家、名臣，就此辞世，终年76岁。

一年后，走投无路的李希烈被部将毒死，叛乱平定。

颜真卿灵柩被恭迎回朝，当初的宰相卢杞早已被贬，客死他乡。

当初同意颜真卿去劝降的唐德宗此时似乎大为悲伤，宣布废朝五日，追赠颜真卿为司徒，谥号"文忠"。

馒头说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件事吧：台北"故宫博物院"把《祭侄文

稿》借给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览。

我曾经和几个同学朋友聊了聊这件事，大家都是文史专业的，其中一位还是见过无数出土文物的专家学者。

大家有三点想法还是比较一致的。

首先，虽说“纸寿千年”，但比《祭侄文稿》更老的《平复帖》也正常展览，再老的马王堆帛书也展览。文物的损耗当然是存在的，尤其是那么珍贵的文物。不过“展出一次就少一次”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因为文物在保存过程中也存在损耗。

其次，运输和展览期间的安全保障当然是重中之重。所幸现在的文物保存技术已经大为进步，而且必须要承认的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在文物保存技术方面还是在世界上处于前列的——只要他们愿意认真保护，是可以把损耗减到最低的。据“澎湃新闻”的前方记者报道，这次的展览，《祭侄文稿》是放在单独展室里展出的（这在东京博物馆历史上比较罕见），除了指定媒体外，参观者不能拍照。

最后，既然出境展览已成既成事实，我们就只能往积极的方面看——日本可能是全世界除中国外，对中国书法最推崇的国家。《祭侄文稿》是书法界的无价瑰宝，也正因如此，它能够最大程度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书法的魅力。这次的书法展览其实是一个关于“唐代书法演变”的系列展，包括颜真卿、褚遂良、怀素在内的一批名家作品都会参展，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对传播中国的书法艺术有不小的益处。

说完这三点，接着想说三个“但是”——没错，是有“但是”的。

首先，《祭侄文稿》这个级别的文物是够资格禁止出境展览的——出境展览确实对传播书法艺术有帮助，但并不意味着对这一级别的文物我们就应该随便允许出境展览。《蒙娜丽莎》真迹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展览都会引起轰动，但法国现在是绝不会允许她出境的。

其次，尽管日本保存文物的技术是世界一流，但并不能排除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损失。之前国宝《西泠八家印存》在日本展览期间居然被借展人声称弄丢，赔200万日元了事，这样的事确实让人心有余悸。令人遗憾的是，《蒙娜丽莎》最后一次出国展览是在1974年，展出地就是

东京国立博物馆，在展览期间差点被日本游客泼油漆毁容。自那以后，法国再也没允许《蒙娜丽莎》出过国。

所以，保存技术是客观的，人为破坏乃至做出其他行为是主观的，这是必须要提高警惕的。

最后，是我个人质疑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次将国宝——没错，这是两岸共同的国宝——展出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尽管台湾方面声称这是合规的，但从岛内民众的各种质疑和反对声音来看，这次的流程有很大的问题，以至于连借出展览的消息还是公众从日本方面得到的，至少说明台湾当局是心虚的（具体报道请自行查阅）。

艺术当然是没有国界的，但艺术一旦被夹杂上政治的因素，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希望台湾当局这次的心虚，并不是因为如此。

其实在这件事中比较令人尴尬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送去外国展览的都是凝结着中国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宝，但包括《祭侄文稿》在内的所有馆藏文物，却从来没有一次到大陆的博物馆进行交流展览过。据我所知，大陆的博物馆一直还是敞开胸怀的，但对岸的博物馆似乎一直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抱有执念。

所以，这次的事情还有一个好处是，让我们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国宝又多了一份认识，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颜真卿，去了解《祭侄文稿》，进而对我们的国宝更充满好奇和期待。

衷心希望，两岸的民众能亲身感受到更多出自我们中华文明共同的国宝。

这一天，应该不远。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三·列传第七十八》

蒲松龄：贫穷从来不会限制你的想象

说起《聊斋志异》，我们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总是那些狐仙鬼怪。但是在这部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奇书背后，是作者坎坷一生的故事。

1

如果要形容蒲松龄出生的时代，四个字就够了：生逢乱世。

蒲松龄出生在1640年。那一年，离大明王朝的覆灭还有四年。神州大地，灾荒连年，刀兵四起，大明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而从大时代跳转到小背景，蒲松龄的家境用四个字形容也够了：家境一般。

蒲松龄的家乡是现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如今早已成为名人故居、风景名胜，但在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而已。

蒲松龄一家从父亲蒲槃开始，就没过上什么好日子。蒲槃也算是个读书人，一直想考取功名，却回回落榜，无奈只能做些小生意，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不过，蒲槃虽然自己考试技能一般，倒也算教子有方，四个儿子被他从小要求熟读诗书，勤修功课，学习成绩都还不错。



蒲家庄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蒲松龄。

不过与兄弟几个不同，蒲松龄虽然也读《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些科考必学书目，但他更大的兴趣是读“闲书”，尤其是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

应该说，他是几个兄弟中最被寄予厚望的一个——考取功名，出人头地，为蒲家增光添彩。

2

蒲松龄倒还真的算是一鸣惊人。

18岁的他第一次出征淄川县的县试，轻松获得第一名；然后出征济南府的府试，再获第一名。考得两场第一名之后，蒲松龄已经在全县闻名，然后他踌躇满志地去参加院试——相当于省一级的考试。

顺治十五年（1658年），18岁就已获得“童生”资格的蒲松龄踌躇满志地坐到了院试的考桌前，摊开了主考官出的试卷，题目是“蚤起”。

“蚤”通“早”，“蚤起”即为“早起”，语出《孟子》名篇《齐人有一妻

一妾》中的“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

这个故事说的是当初齐国人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妾（也是成语“齐人之福”的出处），他每天都很早出去，然后吃得酒足饭饱回来，和妻子、小妾说自己和达官贵人们天天在一起吃饭。但妻子因从不见他带贵人回家吃饭而起了疑心。一天早上，妻子跟踪丈夫出去，发现他只不过是去坟地里偷吃人家祭奠的酒食，然后回家。妻子回家后和小妾抱头痛哭，随后大声斥责回来试图继续装下去的丈夫。

按照已经成型的八股文写法，应该按“破题”“承题”“起讲”等顺序写文章，模仿孔子或孟子的口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理解。对于《齐人有一妻一妾》这个故事，一般是围绕孟子最后一句“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从君子的角度看，能用不使他的妻妾羞愧而相拥哭泣的手段升官发财的人，是多么少啊！）展开论述。

但蒲松龄偏不。

他上手第一句“破题”是：

“起而早也，瞷之计决矣”。

“瞷”，也是出自《孟子·离娄下》，是“窥视”的意思。而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妻子）起得那么早，是因为决定要去跟踪窥视了”。

虽然严格地按照了八股文的“破题”格式，但这句话一上来就设置了一个悬念，堪称侦探小说式的开头——试想一下，即便是放到现在，如果有一部小说的开头第一句是“我今天起得很早，因为我决定去跟踪我的老公”，是不是让人有一种很想读下去的感觉？

而整篇文章蒲松龄完全就是按照小说套路来写的，通篇写的是这个妻子为何要去跟踪丈夫，她剧烈的内心斗争，担心晚起错过跟踪丈夫机会的紧张心情，最后结尾“束股”的一句话是妻子对小妾的一句交代：

“姑掩关以相待矣，我去矣。”

就此收尾，却又留下了一个更大的悬念。最关键的是，整篇文章体例完全符合“八股文”格式，但基本上就是一篇小说。

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现在的高考作文要求针对一件事发表议论，你写了一篇微型小说就交上去了。

换作其他的主考官，不当场把卷子撕了就不错了。但蒲松龄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施闰章。施闰章的名声很好，文才也佳，关键还能以宽广的心胸来看待人才。

施闰章看完蒲松龄的答卷，拍案叫绝，给的评语是：

“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

说看蒲松龄的文章，感觉有一种甩着手臂，参加游行的轻松乐趣。

放榜结果：蒲松龄院试还是第一名！

按照规定，如果院试及第，那就是“秀才”了。不要看这个“秀才”在很多电视剧或小说里似乎很常见，往往和“落魄”画等号，但其实大概只有5%的童生可以被录取为秀才。成为秀才后是可以享受免除徭役、见知县不跪、不被用刑这些特权的。洪秀全考了三次，直到25岁还是没能考取秀才，结果心性大变，回金田村造反去了。

年纪轻轻就当了秀才，且是县、府、院三试头名，蒲松龄的仕途一片光明。

但这却是他考场生涯的顶峰了。

3

后人曾有一种说法：施闰章害了蒲松龄。

为何有此说？因为不少人认为蒲松龄独辟蹊径的写法获得了施闰章的首肯，可能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考场文章如果这么写，反而容易拿高分。

但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蒲松龄从20岁开始参加乡试（每三年一次，考中即为“举人”，是参加会试和殿试的必要途径），就此开始了“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征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年年交战，垂翅而归”。

那么真的是施闰章害了蒲松龄吗？很难这么说。因为从蒲松龄流传

后世的八股文文章来看，大多数都写得中规中矩。事实上蒲松龄终其一生，是非常想取得功名的，所以他不会傻到每次考试都像押宝一样去写篇侦探小说。

但是，施闰章确实也影响了蒲松龄，因为他让蒲松龄认识到很珍贵的一点：这样的文字，也是能受到赏识的。

落榜后的蒲松龄，和几个朋友一起结伴苦读。但与此同时，蒲松龄也开始做一件自己觉得更感兴趣的事——一件在他很多朋友看来是不务正业的事。好友孙蕙（也是个才子，后来中了进士，做了知县）就写信劝他：“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耶？”

蒲松龄几次落榜之后，他的一个好友张笃庆（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才子）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写信劝了他一句：“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

这里面提到的“聊斋”，就是朋友们认为蒲松龄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还在干的那件“不务正业”的事——收集和编写一个“聊斋”系列。

这个系列里，有俚语、曲子、诗集等五花八门的分类，但蒲松龄花心思最多，自己也最感兴趣的，是他听别人讲述和自己查阅后撰写的一系列神鬼狐仙的故事。

他给这个系列起名为《聊斋志异》。

4

在蒲松龄编写《聊斋志异》的那段时间里，他的生活已经陷入了窘迫状态。

在蒲松龄22岁那年，家里起了矛盾，他只能和哥哥嫂嫂们分家，带着自己的媳妇刘氏分到了几间破屋，二十多亩贫瘠的田地。

蒲松龄的贫苦生活，从他自己写的诗中就看得出来。

“午饭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日中饭》）

而到菜市场看到卖青鱼的，也只能咽一口口水：

“虽然烹饪不尽致，俭吻一见流清涎。二月初来价腾贵，妄意馋嚼非所暨。”（《青鱼行》）

唯一一篇写得行云流水，一看就精于此道的文章，是《煎饼赋》。

后来有说法是蒲松龄备一桌茶水，请往来客人歇息，只要贡献鬼怪故事一个，就可以免去茶钱（清人笔记《三借庐笔谈》）。这个说法受到了鲁迅的质疑，理由只有一个：蒲松龄实在太穷，连茶水钱其实也是出不起的。

那么蒲松龄靠什么为生呢？终其一生，他主要的职业，和不少落魄的秀才一样：给人教书。

蒲松龄给不少人家做过私塾先生，也给其他村子的塾馆做过老师，但是“乡村教师”那一年几两银子的菲薄收入，实在不够他养家糊口，所以他还给做了宝应县知县的好友孙蕙做过幕僚，但由于思家心切，之后还是回到了故乡。

真正让蒲松龄安定下来的，是在他40岁那年接受毕际有的招聘，到离自己家乡30多公里的毕家去做孩子们的老师。毕家是个实力雄厚的大家族，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做到过明末的户部尚书，毕际有自己也做过县官，家境丰厚。

而且，蒲松龄在毕家得到了普遍的尊敬，毕际有不仅让他教自己孩子读书，还让他帮自己代写一些应答信件，甚至去接待一些宾客，所以蒲松龄在一定程度上是毕家的幕僚。

而最让蒲松龄心动的，是毕家那有几万册藏书的藏书馆是对他完全开放的。

在那样的安定环境下，蒲松龄在白天忙完事务之后，夜深人静时，点上一盏烛灯，铺开案纸，就开始进入自己的神鬼世界。

也正是在那段时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已基本成型。

5

曾有人说，《聊斋志异》其实就是蒲松龄一个穷秀才的意淫之作，满足很多失意之人的幻想。

其实并不是这样。

《聊斋志异》全书40余万字，收录近500篇短篇故事，之所以能传世，绝不仅仅是因为它记录的是鬼怪故事，而是因为蒲松龄所体现出来的写作手法、文字功力、丰富想象，以及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和精神。

限于篇幅，不展开讨论。如果用一句比较贴切的话形容，应该是老舍先生的评语：

“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当然，蒲松龄肯定在《聊斋志异》中寄托了不少自己的理想和感情。

比如科举考试给蒲松龄留下一生的阴影，在《聊斋志异》中就有大量关于科举的故事（《考城隍》《续黄粱》《叶生》《王子安》等等），这些故事明显体现了蒲松龄自己的感受和他对科举制度的看法。

又比如《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悍妇形象，其中一些就是蒲松龄当初在分家那次财产分配中对自己嫂子们印象的折射。

还比如被蒲松龄视为恩师的施闰章，被蒲松龄在《胭脂》中直接把他写了进去，并在末尾用不小的篇幅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方见之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

这几百个短小精悍、嬉笑怒骂的故事初成规模时，就在蒲松龄的老东家毕家引起了关注。

毕家的亲戚，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祯（王渔阳）曾专门为《聊斋志异》赋诗一首：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而蒲松龄侄女的舅父高珩（官至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就是他推荐蒲松龄去的毕家）亲自为《聊斋志异》作序，并将这本“奇书”广为传播。

当然，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好评，但蒲松龄那时并未想到这本书会在日后获得如此地位。

他当时心心念的，还是科考。

6

其实在蒲松龄47岁那年，差点达成人生理想。

在那一年的乡试中，据说主考官久闻蒲松龄大名，本已有意给他头名，但蒲松龄不知是文思泉涌，还是过于激动，居然在答题中“越幅”了——答卷翻页时多翻了一页，导致当中有空白页。这在规定非常严格的科考中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低级失误，结果他就此被取消了考试资格。

最终，屡败屡战的蒲松龄在71岁高龄的时候，终于成了一个“贡生”。

所谓“贡生”，是对秀才中的优异者的一种褒奖，可以获得去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资格。不过，“贡生”相当于举人的“副榜”，理论上是不能做官的。而以蒲松龄当时的年龄，一不可能再做官，二是不可能去读书了，这完全是一种安慰性质的褒奖。

而且，这个“贡生”资格还是蒲松龄去青州（今属潍坊）拿的——当时本地应该已经没有了名额。

此时的蒲松龄，已经辞去了在毕家的职务，告老还乡。在回到家乡之后，蒲松龄似乎已经看开了一切：“世事年来方阅尽，眼中总觉海天宽。”

两年之后，辛苦照顾蒲松龄一生的结发妻刘氏去世，73岁的蒲松龄悲伤不已，感叹：“尔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

又过了两年，当又一个春天刚刚到来之时，蒲松龄在他的书房“聊斋”里“倚窗危坐而卒”，享年75岁。去世后，他与夫人刘氏合葬在村东墓园。

在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幅后世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对联：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在蒲松龄去世约50年后，《聊斋志异》初刻，洛阳纸贵，轰动全国。

馒头说

说些延伸出来的感想。

我记得大概几年前吧，我太太有一天在电脑前写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因为盯着屏幕时间太久了，眼泪都流了出来。

那时候应该是凌晨2点，她转头眼泪汪汪地对我说："我的眼睛真是酸死了，也困死了，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这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完全能理解她的感受。

记得2016年7月我决定连续更新"馒头说"的时候，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内心有一股冲动，那种想写作的冲动。那个时候，离开记者的一线岗位也有三四年了，总觉得手非常痒，有一种想写点东西的强烈欲望。

于是后来写了，也坚持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我所效力的东家进行新媒体转型的关键时刻，我冲在第一线，白天的工作几乎让我筋疲力尽，但等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打开电脑，点开微信公众号的编辑后台，写下"今日由头"这行字后，就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白天的疲惫、焦虑、委屈都被抛在脑后，开始和古人们进行一种奇妙的交流和对话，感觉神清气爽。

所以当我看到蒲松龄坚持写《聊斋志异》的时候，心里是有一种共鸣的。

当然，我和我太太那个时候虽然没什么钱，但也不至于贫困，这点也没什么好矫情的。只是我俩直到现在其实消费欲望都非常低，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无须从物质消费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写作。

我相信每一个喜欢写点文字的人，多少都会有这种感受：当你拿起

笔（现在是敲击键盘），就会进入一个忘我的全新世界。在那个空间里，你其实可以摆脱一切束缚，尽情享受你自己的世界。

我相信蒲松龄也是这样：哪怕现实再骨感，生活再残酷，但只要有写作的欲望在，写作的动力在，写作的能力在，那么一切都是可以微笑面对的。

所以，至少在写作这一点上，限制想象力的从来不是贫穷，或是平淡，而是行动力和毅力。

每一个愿意写作的人，其实都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笔下的无限精彩的世界。

它只是等着我们去发掘而已。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施闰章与蒲松龄的交往及其影响》（邹莹，《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蒲松龄与高考满分作文》（马伯庸）

3.《痛苦——蒲松龄创作的动力》（黄荣志，《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4期）

4.《一腔悲愤，一生倾诉——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高虎，《河南图书馆学刊》，2003年第1期）

5.《〈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与科举》（阳达、徐彦杰，《蒲松龄研究》，2017年第1期》）

6.《蒲松龄的简朴生活》（戴永夏，《齐鲁晚报》，2013年12月5日）

杀妻自尽的天才诗人：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但是……

一段爱情，如果爱到极致会是怎样？可能是童话，但也可能是悲剧，凄美，乃至残酷。

1

1993年10月8日下午，新西兰奥克兰市的激流岛。

顾乡看到弟弟忽然走进了屋子，走到盥洗台旁洗手。

顾乡忽然觉得不太对劲。

弟弟洗完手后，转身又向门口走去，随后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去死，你别拦着我。”

顾乡大吃一惊，连忙问弟弟怎么了。

弟弟回答：“我把谢烨给打了。”

顾乡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她奔出屋子，很快在屋外的草丛里找到了躺在那里的谢烨，满脸是血。而当她想起去找弟弟时，发现他已经上吊自杀了——用的是晾衣服的铜芯塑皮绳子。

谢烨，是顾乡弟弟的妻子。而她弟弟的名字，在今天可能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但在20多年前的中国文坛，却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即便不知道他的名字，至少很多人都知道那首著名的诗《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诗写于1979年，作者就是顾乡的弟弟。

他的名字，叫顾城。

1956年9月24日，顾城出生在北京。

其实按籍贯算，顾城应该是一个上海人，因为他的父亲顾工就是一个上海人。

1945年参加新四军的顾工，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他曾担任过新四军政治部文工团团员、三野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创作过不少小说、剧本，还有诗歌。

1968年，顾工从北京被下放到山东的一个部队农场。顾工是带着全家去的，其中包括那一年才12岁的儿子顾城。

在农场里，顾城每天和父亲一起拌猪饲料，喂猪，以及无所事事。这些在成年人眼里看起来无法接受的生活，在顾城看来却是非常有趣和新鲜的体验——可以不和人打交道。

顾城从小就不喜欢和人说话，家里如果来了什么客人，他就会立刻逃开。而当别的孩子和同龄小朋友玩耍的时候，他宁可一个人躲到树下看蚂蚁。自从跟着父亲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后，顾城显得更加孤僻。当地人说的方言他们听不懂，他们也不愿意接触当地人。



顾城的全家福。小女孩是顾城的姐姐顾乡。小时候，顾城只愿意和姐姐说话

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其实成了顾城人生的重要引路人。

一方面，也算是诗人的顾工，抓住一切机会培养自己儿子的文学兴趣。在农闲时，父子俩对着田园风光，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赋诗。

而另一方面，顾工又决定不让儿子和当地的孩子一起去上学，认为自己有一套教育方法能把顾城教育得更好。所以，当别的同龄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初步感受群体和社交时，小顾城却待在自己构建的孤独城堡里——他非常乐意。

1969年，13岁的顾城第一次正式发表了自己的诗歌——虽然在此之前，他其实已经写过好多首颇具灵气的诗，最早一首甚至写于6岁，是姐姐顾乡代笔的。

13岁顾城写的那首诗，叫《我的幻想》：

我在幻想着，

幻想在破灭着；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

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时至今日，这首诗仍能引发很多人共鸣，而如果考虑到这是出自一个13岁孩子之手，更是让人惊诧。

惊诧的人中，就包括顾城的父亲顾工。

一方面，顾城在写了自己的第一首诗歌之后，就开始在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在1974年全家返回北京后，顾工发现儿子顾城确实堪称诗歌方面的天才。随着顾城的诗作发表得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任何父亲都有理由为儿子感到骄傲。

但另一方面，在欣喜的同时，顾工却也有了隐忧。因为他发现，儿子虽然已经成年，但诗歌里却依旧透露出浓烈的孩子气，以及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想法，而且就诗歌本身而言，他觉得也不算正统。

为此，革命出身的顾工曾专门带着顾城去了重庆的渣滓洞和白公馆，希望这些革命旧址能给顾城带来一些触动，让他的诗歌向更积极的

方向发展。

但是，顾城流着泪写出的诗歌是《结束》：

一瞬间——

崩坍停止了，

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

戴孝的帆船，

缓缓走过，

展开了暗黄的尸布。

多少秀美的绿树，

被痛苦扭曲了身躯，

在把勇士哭抚。

砍缺的月亮，

被上帝藏进浓雾，

一切都已经结束。

顾工尝试着劝儿子："把'头颅'换成'鹅卵石'不好吗？太恐怖压抑了。"

顾城回答："不，我不能这么写，我不允许我这么写！"

顾工知道，自己无法再影响儿子了。

但他相信，肯定有人能影响自己的儿子。

3

1979年，在一列火车上，23岁的顾城遇见了一位姑娘。

那个姑娘，叫谢烨。

和顾城正好相反，谢烨出生在北京，却在上海居住。

顾城在后来给谢烨的情书中，这样回忆当初两人在火车上的邂逅：

买票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见你，按理说我们应该离得很近，因为我们的座位紧挨着。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你了吗？我和别人说话，好像在回避一个空间、一片清凉的树。

…………

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你在我旁边没有睡，我们是怎么开始谈话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你用清楚的北京话回答，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梦幻的鱼群，鼻线和嘴角有一种金属的光辉，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给你念起诗来，又说起电影，又说起遥远的小时候的事。

你看着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完全忘记了刚刚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很陌生，甚至连一个礼貌的招呼都不能打。现在却能听着你的声音，穿过薄薄的世界走进你的声音，你的目光，走着却又不断回到此刻，我还在看你颈后的最淡的头发。

那天在火车上，顾城看到谢烨准备下车，就立刻把自己的地址写在了一张纸条上，鲁莽地走上前去，一把塞到了谢烨的手里。

那么谢烨的感想如何呢？从她后来写给顾城的情书，也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个怪人，照我爸爸的说法也许是个骗子。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为了能去找你，我想了好多理由，我沿着长长的长着白杨树的道路走，轻轻敲了你的门，开门的是你母亲，她好像已经知道了我，就那么注意地看我。你走出来，好像还没睡醒，黑钢笔直接放在口袋里。你不该同我谈哲学，因为衣服上的墨迹惹人发笑，我想提醒你，又发现别的口袋同样有许多墨水的颜色，才知道这是你的习惯。

我给你留下地址，还挺傻地告诉你我走的日子，离开那天你去送我，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你会给我写信吗？你说会的。写多少呢？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



顾城和谢烨

毫无疑问，字里行间，两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但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没有固定工作”的顾城，是很让谢烨父母担心的。为了追求谢烨，顾城特地搬去了上海，在谢烨居住地附近的武夷路上买了一套简陋的民居。他甚至愿意接受谢烨父母的要求，去医院检查了精神疾病——那时，谢烨的父母已经开始怀疑他在精神方面可能有些障碍。据顾城的上海友人毅伟回忆，那次检查，顾城和医生聊了很多关于弗洛伊德的问题，医生给他开具的证明是：没有疾病。



谢烨和顾城初结婚时，日子过得非常清苦，但两人却非常快乐

当然，在这段感情中，拥有决定权的还是谢烨。

作为一个同样爱好文学和诗歌的女性，谢烨无法掩饰自己对顾城的

仰慕和爱意，在顾城追求了谢烨四年之后，两人在1983年终于结婚。在顾城的父亲顾工看来，谢烨是上天赐给顾城的礼物，两人婚后的感情好得简直无法形容，“每天连买菜都是手牵手一起去的”。

而诗人舒婷也曾这样回忆顾城夫妇婚后的生活：“他们连一毛钱都没有。有一次有人给他寄了一笔稿费，很多，一百五十块。他就很开心，和谢烨两个人手拉手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手拉手去存在银行里。可到下午就发现了，必须领十块钱买白菜。然后又手拉手去领了十块钱。第二天早晨，又发现他们的自行车胎破了，就跟谢烨手拉手，又去领了十块钱。然后那个银行的小姐就打趣他：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也一起领了。我觉得太好玩了！一百五十块钱对他们就是巨款。然后我就开玩笑说他们：你们一直走路鞋破了，再去领十块钱买双鞋子。”

而谢烨本人，也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

这对夫妇的共同好友文昕回忆起当时的谢烨：“那时的谢烨是一个无比幸福快乐的妻子，她对人生充满感激，因为她拥有一份令她沉醉的爱。她常说她和顾城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她一直不停地向我们周围的人讲述她的快乐。她的感情真诚自然，感染了周围的每一个人，也深深感染了我，我那时把她和顾城的婚姻看成是崇高的理想。”

这是一段值得所有人羡慕的爱情，如果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话。

可惜，没有如果。

4

顾城和谢烨的爱情无疑是纯粹的，但纯粹到极点，也带来了很多意外。

首先，顾城对谢烨体现出了无尽的依赖——远远超乎爱情，是那种婴儿对于母亲的依赖。

顾城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差，或者说，他认为做这些事是毫无必要的。所以顾城的衣食住行和生活起居，都由谢烨打理照顾。

但与此同时，因为依赖，所以顾城又对谢烨有极强的控制欲。

比如尽管一日三餐都由谢烨负责，但顾城不希望谢烨把饭菜分开

做，要实行“一锅煮”，因为这能节约火。甚至在顾城写作的时候，他都要求谢烨不能离开他的视线范围，因为他希望“一抬头就能看见她的笑脸”。

对于这一切，谢烨都接受，因为她也深爱并且仰慕顾城。她服从顾城的要求，辞去了工作，也不再进修，慢慢从一个同样有追求、有想法的文学青年，变成了顾城背后的那个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保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顾城的大量诗歌发表，他的名气越来越响，而中国文坛以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一派也开始迅速崛起。1982年，顾城成为北京市作家协会成员，1985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成员，开始受到正式的认可。



顾城和谢烨在激流岛上的故居

1988年，是顾城和谢烨夫妇命运发生改变的一年。在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进行文化交流和讲学之后，他们来到了新西兰的激流岛，获得了新西兰的技术移民资格，决定在此定居。

这是一个面积达9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只有几千人的岛。但顾城

第一眼就看上了这里："这是我12岁以来一直寻找的地方"。于是，他们在这个岛上买下了一栋虽然颇大但很破旧的房子，养了几百只鸡，开始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田园式生活。

顾城说他不想影响母语写作的水平，所以拒绝学习英语。而谢烨只能一个人学英语、学开车，在外面打工，在家里养鸡、洗衣、烧饭，以便能让顾城专心画画和写作。尽管顾城始终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但谢烨除了有时感到疲惫之外，并没有过什么其他想法。

直到他们俩的孩子来到这个世间，谢烨才开始感到，两人之间可能真的存在裂痕。



顾城、谢烨和儿子

两人爱情的结晶是一个儿子，谢烨把他叫作"小木耳"。但是，作为父亲的顾城却非常不喜欢这个孩子。一方面，他并不想要孩子，如果一定要有孩子，他希望是一个女儿。顾城似乎一直有一个"女儿国"的幻想，而儿子的到来打破了他的幻想。另一方面，他认为孩子晚上的啼哭吵闹打扰了他写作，弄得他心神不宁。

诗歌评论家钟文作为夫妇两人的朋友，回忆有一次聚餐时听谢烨说

了这样一件事。



顾城的著名形象，就是带着“一截”帽子。他对这顶“帽子”有很多解释，心情不好时就简单说为了“保暖”，心情好时，会说是“避雷针”或者用来发泄怒气的“烟囱”。事实上，这是他用一条旧牛仔裤裁剪出的一段，但确实成了他独具一格的标志

谢烨在外面打工，准备好了奶糕让顾城在饭点时喂儿子吃。结果有一次谢烨下班晚了，回家发现顾城饿了就把奶糕吃掉了，也不管儿子。

当时钟文劝谢烨：“你当初嫁给他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他是个孩子，生理会长大，但心理永远不会，所以才能写诗。”

但在谢烨看来，顾城这样不仅仅是“不成熟”，而且是对家庭不负责任。

在顾城的再三要求下，谢烨最终只能把小木耳托付给当地的一家毛利人家庭寄养。每次她去看望自己的儿子，那位毛利人老太太都会责备

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每当这个时候，谢烨就心如刀割。

但真正导致顾城和谢烨出现巨大裂痕乃至引发悲剧的，不是这个孩子，而是另一个女人。

5

那个女人，叫李英。

1986年夏，北京作协在昌平举行了一个关于新诗的研讨会，顾城夫妇应邀参加。在那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李英——作为参加社会实践的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大四学生，被指导老师谢冕带到了会议上。

当时，谢烨、李英还有另一位女作家文昕被分到了一个宿舍，谢烨经常向两位室友讲自己和顾城的传奇恋爱经历和顾城的各种故事。据文昕回忆，李英当时听到感动时，会把自己蒙进被子悄悄流泪。

在那次会议上，有人批评顾城的新诗，谢烨反驳后愤然离场，而李英则哭着发言，为顾城辩护。经过那四天的会议，顾城夫妇和李英成了好友。

仰慕终成爱慕，很快超出了“好友”的界限。

1987年5月，顾城和谢烨收到了德国明斯特“国际诗歌节”的邀请，准备去欧洲做一次巡访。在夫妇俩要离开的前一晚，李英当着谢烨的面，哭着向顾城表白，倾诉自己对他的爱慕。



左起依次为：顾城，谢烨，李英，文昕

当时的顾城很受震动，以至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和我天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谢烨不一样，她是我造就的。"

当时谢烨就在一边翻着杂志，不知心里做何感想。

顾城夫妇在新西兰定居期间，依旧和李英保持着通信来往，尤其是顾城。在小木耳出生之后，苦于在丈夫和儿子之间进行抉择的谢烨，做出了一个外人完全看不懂的决定——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为李英办好一切手续，买好机票，请她来新西兰和他们一起居住。

顾城的姐姐顾乡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后非常震惊："怎么可以这样？！"而谢烨的回答是："他也没怎么样啊。"而顾城的态度，当然是求之不得——李英的到来，进一步完善了他对"女儿国"的追求。

这种至今让人无法理解的生活方式，谢烨一开始却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在家里，李英洗澡时，指定要顾城送毛巾，顾城不好意思，谢烨还说："人家叫你去，你就去呀！"

在这个三人世界里，李英自比林黛玉，谢烨则是薛宝钗，而顾城，自然是贾宝玉。

谢烨原本还算可以接受这种局面，直到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她发

现不对了：从灵魂到肉体，顾城都开始真正痴迷李英了。

她这才发现：自己的丈夫可能要被人抢走了。

1992年初，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给顾城批了一笔经费，邀请他和谢烨去德国访问交流。谢烨决定抓紧这次机会和李英摊牌："如果我们回新西兰后你还在，我就认命，承认这是天注定。"

李英接受了谢烨的提议。

当顾城夫妇回到新西兰时，发现李英走了。

谢烨以为，他们终于可以回归到正常的夫妇生活，但出乎她意料的是，她的丈夫却精神崩溃了。

中國大陸唯一合法版本

魂断激流岛

麦琪（英儿）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英后来出了《魂断激流岛》一书（麦琪是她笔名）。在这本书里，李英的倾向比较明显：她只是出于纯粹的仰慕，而一切都是顾城主动。她甚至暗示两人在新西兰第一次发生关系是顾城“强迫”的。之后文昕和顾乡都曾公开表示李英说的很多话显示出她的“人品问题”

顾城开始四处打听李英的消息，后来终于打听到了，却给他带来更大的折磨——李英嫁给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英国移民。

这是让顾城完全无法接受的现实。

在丈夫精神萎靡的时候，谢烨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建议顾城写一本回忆录似的小说，记录他、李英和自己的故事。

谢烨的初衷，是希望顾城能够从萎靡中振作起来，并且通过这本小说的写作，体会到她作为妻子一路走来的辛苦，以及认识到李英只是一个后来的“第三者”。

但这本后来取名为《英儿》的小说，却成了顾城怀念李英的最大寄托，他花了很大的笔墨来回忆对李英的感情，对那些缠绵的场景也毫不避讳。

顾城不会用电脑，整本小说，是谢烨帮忙用电脑打出来的——那些丈夫疯狂依恋另外一名女子的文字，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在键盘上，也敲打在谢烨的心里。

《英儿》的作者署名“雷米”，是顾城给谢烨起的笔名，因为顾城说：“雷为神，诗为灵”，而谢烨就是他的“诗歌之神”。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精神崩溃之后，顾城慢慢走了出来，他发现自己生命中唯一不可缺少的女性，还是谢烨。没有人知道顾城当时是否真的就此决定和谢烨好好过日子，但至少他开始做出一些努力，比如想过把小木耳接回家。

但是已经晚了。

谢烨也遇见了自己的追求者。

6

追求谢烨的男士，被称为“大鱼”（也有说叫“大渝”）。

大鱼是谢烨随顾城在德国访问期间认识的，是已经获得德国国籍的中国流体力学博士。

在大鱼身上，谢烨感受到了顾城不具备的东西：懂生活，有情趣。并且两人在一起时，总是大鱼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不需要谢烨操心。

在一段疲惫的爱情长跑中，一方始终没有下定决心离开，往往可能

是因为之前没有（或没打算）遇见更好的人。

毫无疑问，谢烨的情感世界起了波澜。

很快，谢烨的异常被顾城发现了。痴迷于李英的顾城却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暴跳如雷，并且第一次打了谢烨——用手死死掐住了谢烨的脖子。

夫妇两人的争吵惊动了邻居，邻居选择了报警。警方赶到后觉得顾城有暴力倾向，要将他送进精神病院，为期三个月（一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德国）。事实上，顾城所在的社区居民都认为他有暴力倾向，因为有一次社区居民投诉顾城家养鸡干扰邻居生活，结果顾城愤怒地把自己的鸡全都砍死，收集了几百只鸡头装在一个麻袋里扔给了社区官员，后者被吓得半死。

但是，谢烨站了出来，作为受害者，但同时也是妻子，她拒绝签字。

不过，经过这件事情，谢烨的决心却更坚定了——她决定带着儿子，离开顾城。

这一次，顾城真的慌了。

他曾给好友文昕写信：

“文昕，醒了才知道人心有多冷，我爱是因为我渴望，也是因为我恐惧。我怕世界把她们拿走，我是不值得被爱的，所以我不会爱人。……谢烨只要离开我，死就到我面前来了，她的生命力真强，你看见过她多好看，在花园里，我因离光太近已经瞎了。”

1993年10月初，谢烨和顾城其实已经开始进行离婚谈判，而这时候传来了消息：大鱼要来新西兰接谢烨。

尽管早已知道结局，但顾城觉得这一切还是来得太快了，他其实还想再努力一下。事实上，顾城不仅仅在生活起居上完全依赖谢烨，不会英语的他平时和人交流也要依靠谢烨，可以说，他已经完全离不开谢烨了。

所以，他认为谢烨在把自己逼入绝境。

10月8日那天，大鱼登上飞往新西兰的飞机时，还和谢烨有过沟通，等他下飞机的时候，却已经无法联系谢烨了。

7

按照顾乡的回忆，10月8日下午她发现谢烨的时候，她还有呼吸。

谢烨的伤在右边额角，不清楚是怎样受的伤。当时谢烨的身边有一把斧子，所以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通行说法是“顾城用斧子劈死了自己的妻子”。但根据后来新西兰警方公布的结果，斧子与谢烨的死亡无关。

当医生赶来的时候，顾乡回忆自己对医生的要求是快先救谢烨，医生提出去看看顾城，而顾乡的回答是：

“别管他！先救她！她不能死！”

而当得知顾城已经死了之后，作为姐姐的顾乡的第一反应却是：

“我心里在暗暗地凶狠地恨他，想着他罪有应得；又无可奈何地隐隐作痛。”

谢烨在被直升机送去医院不久后重伤不治。警方在现场发现了顾城留下的四封遗书，字迹潦草，一看就是临时匆忙写就。

第一封推测是原本写给父母的家信，但后来临时加了个“姐”字，成了遗书。信中声明房子归儿子小木耳，稿费和《英儿》书稿拍卖的钱给父母，其他书稿都归姐姐。

第二封单独写给母亲，开头就是一句：“今天我过不得了，烨要跟别人走，木耳我也得不到。妈妈，我没法忍了，对不起。”

第三封单独写给姐姐顾乡，叮嘱姐姐要帮妈妈把自己的后事办好，并指出“我是受不了了，他们得寸进尺”。

第四封，顾城选择写给自己当初并不欢迎来到世间的儿子小木耳，也叫“三木”（Sam），在信中的最后一句，顾城写道：

“三木，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爸爸顾城。”

馒头说

顾城曾给谢烨写过一首诗，在他们热恋的时候。

今天，

我和你，

要跨过这古老的门槛。

不要祝福，

不要再见，

那些都像表演。

最好是沉默，

隐藏总不算欺骗，

把回想留给未来吧。

就像把梦留给夜，

泪留给大海，

风留给帆。

现在回过头来看，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毫无疑问，顾城当然是天才诗人。但也正是他的天分，成了这出悲剧的最主要根源。

天才诗人都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触完全超出我们凡夫俗子。只是，痛苦可以往自己内心深处挖掘，感情可以找到各种渠道宣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不能给别人带来痛苦，更不能剥夺别人的生命。

顾城的好友舒婷后来回忆起顾城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这块伤疤挖掘起来还是疼痛不已。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也对，也不对。

对的是，只有谢烨有权宽恕。

不对的是，我们都不是谢烨，舒婷也不是。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我面对顾城的最后十四天》（顾乡，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2.《顾城：从迷恋到迷失》（央视网，《家事》，2013年4月27日）

3.《伟大的诗人在生活中一败涂地》（沈祎，《东方早报》，2013年10月8日）

4.《一个本真的诗人无法逃避的悲剧》（沈祎，《东方早报》，2013年10月8日）

5.《顾城辞世20周年 舒婷深情回忆与其相识之初》（罗皓菱，《北京青年报》，2013年10月8日）

6.《唐晓渡：我们这代人都有病，顾城在撤退时出了问题》（徐鹏远、吕美静，凤凰网文化专题，2013年10月）

7.《“诗意化”顾城出轨、杀妻行为的人，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微信公众号“晏凌羊”，2017年10月7日）

8.《顾城与谢烨：精神成了灵魂的殉葬品，此为人类孤独的症结所在》（李丹，微信公众号“佳人”，2015年10月9日）

一个因写关于中国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

曾经有人说，她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也有人说，她的获奖拉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平。她是美国人，但加入过中国国籍，她因写中国而成名，却在美国引起很多争议。而在晚年，她也一直无法回到中国。

1

1892年6月26日，40岁的赛兆祥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迎来了自己的女儿。

赛兆祥虽然有一个中国名字，但实际上他是美国人，本名是阿布萨隆·赛登斯特里克（Absalom Sydenstricker）。至于他为什么会起一个中文名字，那是因为他是美南长老会的著名传教士，长期在中国传教。

这个女儿得到了赛兆祥和妻子卡洛琳无上的宠爱——他们之前在中国生了三个孩子，但都不幸患了热病，不治身亡。为此，卡洛琳专门返回美国生下了这个孩子。



赛珍珠（左一）和她的父母、妹妹以及家里的用人王[1]妈在一起

或许是把这个女儿视为中国人传统说法中的“掌上明珠”，赛兆祥给女儿起名“Pearl”——中文“珍珠”的意思。

在女儿只有三个月大的时候，赛兆祥夫妇就带着她启程返回中国，来到了江南名城镇江。

那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女儿，就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生活。

她的父母根据她的英文名，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叫“赛珍珠”。

赛珍珠是美国人，但父母在她10岁那年，给她请了一位中国的私塾先生。

那位被赛珍珠称为“孔先生”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的秀才，负责教赛珍珠汉语和一些中华元典。同时，母亲卡洛琳又希望她别“忘本”，亲自教她英语和拉丁语。

所以，赛珍珠其实从小就掌握了双语听说读写的能力。

和很多传教士的子女一样，赛珍珠虽然生活在中国，但读的都是教会学校，直到考大学才返回美国。在美国读大学期间，赛珍珠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大四的时候包揽了学校的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和“最佳诗歌奖”。



青年时期的赛珍珠

由于母亲患病，赛珍珠在大学毕业后就返回了中国的镇江，一面照顾母亲，一面接替了母亲的教会工作。在这段时期，她结识了美国的青年农学家约翰·洛辛·布克，之后和他结婚。

丈夫的职业对赛珍珠其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她因此有了大量接触中国最基层农村和农民的机会，这也使得她比其他在中国的外国人对当时中国的农村生活有更深刻的了解。

对于赛珍珠而言，尽管她从小生长在中国，但美国家庭出身和在美

国大学求学的生涯，使得她能以一个既不同于中国人又不同于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这从她在美国拿到文学硕士的毕业论文题目就可以看出来——《论西方对中国生活与文明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她之前还参加过学校历史系的一个匿名论文竞赛，她的长篇论文获得了第一名并赢得了200美元奖金，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与西方》。

1926年，34岁的赛珍珠结束硕士学业再次回到了中国，开始在国立东南大学教书。同时，她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1930年正式出版）。

这是赛珍珠第一次尝试用自己的理解来把她观察到的中国生活和文化——那些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缠脚”“三从四德”“传宗接代”——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东风·西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这对赛珍珠本人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告诉西方人中国的故事，并且她觉得自己很擅长这一点。

1931年，赛珍珠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

她原先想用这部小说男主人公的名字作为整部小说的题目，起名《王龙》。但出版商在看了她的书后，认为将她全书表达中国农民最深的执念的一个名词作为书名更好。

那本小说，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大地》（*The Good Ea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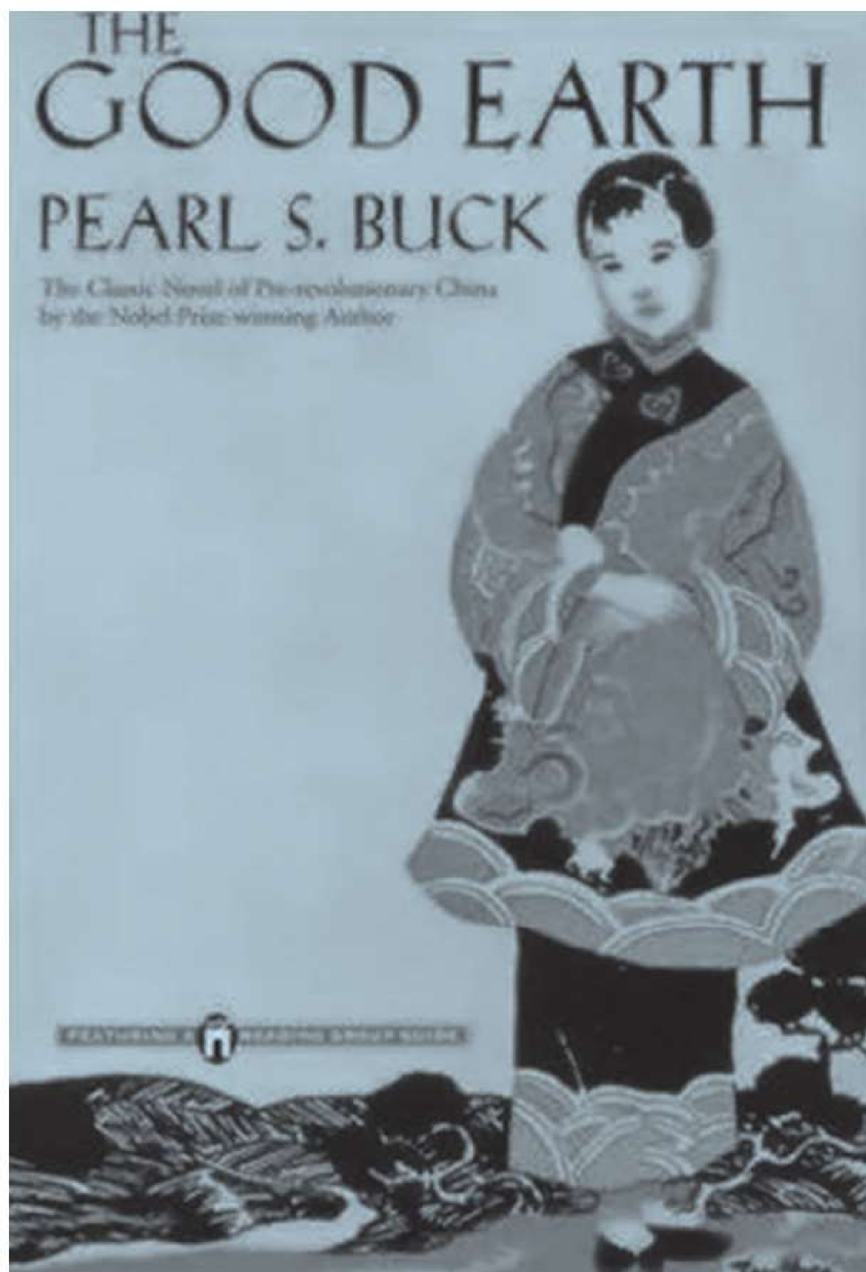
3

其实《大地》的出版一开始并不顺利。

当赛珍珠拿着这本书的原稿去找一家伦敦出版商的时候，对方嗤之以鼻：“谁会关注一个中国农民和他的乡下女人的故事？你为什么不写那些古老的中国传说？或者紫禁城里的皇帝和他那几百个女人的故事？”

赛珍珠没有放弃，又找到了一家美国的出版公司。那家已经濒临倒闭的出版公司的老板沃尔什看了这部作品后，立刻拍板决定出版，只是提出了那个改名的建议。

1931年春天，装帧精美的《大地》出版，随即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好评，连续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据头名宝座长达21个月。《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威尔·罗杰斯甚至给出了这样的评语：



《大地》英文版

“它不仅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最伟大著作，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

的著作。”

《大地》写的是一个名叫王龙的中国贫农，娶了一个富户的女佣阿兰做妻子后发生的故事。阿兰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吃苦耐劳，沉默寡言，默默地为家庭付出一切，却一直不知道争取自己的地位。而王龙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性的局限：在通过一次偶然机会发财之后，他在阿兰的帮助下慢慢富了起来，却嫌弃妻子相貌平庸，另外娶了一个妓女。在王龙年老之后，他终于慢慢又回归了本心，临终前告诫子孙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卖地”，因为土地才是他们最珍贵的财富。

在这部17万字的小说中，赛珍珠展示了自己不动声色却又非常传神的写作手法，开篇第一章第一句非常简单，却把读者深深抓住了：

“今天是王龙结婚的日子。”

在接下来的短短1万多字里，赛珍珠通过简单的白描，栩栩如生地向读者展现了当时中国最基层农村的各种元素和传统：纸糊窗、灶台、几个月洗一次澡、喝茶、辫子，以及孝道、面都没见过就可以结婚的亲事、妻子像用人一样服侍丈夫、传宗接代……

《大地》在美国受到热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此前一直停留在很多美国人的想象之中：异教徒；开餐馆和洗衣店的；贼眉鼠眼长辫子，奸猾狡诈贪便宜。通过阅读《大地》，他们第一次认识到中国人是和他们一样有传统、有生活、有奋斗、有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另一方面，美国当时正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地》中那些一直生活在艰苦环境但一直坚持努力活下去的农民，深深感染了同样感受到生活艰辛的美国人。

随着《大地》的畅销，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很快出现。就在出版的第二年，《大地》获得了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

但更大的荣誉还等待着赛珍珠。

1938年，经评委会一致认定，写出以《大地》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的赛珍珠，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瑞典国王为赛珍珠颁奖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第一次有美国女作家获奖。事实上，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女作家（第一位是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她的代表作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赛珍珠和她的《大地》就此轰动世界。

但是，《大地》给赛珍珠带来巨大声望和财富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不少争议。

不同的声音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文学界。

首先，美国的很多作家并不认为赛珍珠的写作技巧有多高超。著名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曾公开不客气地说："如果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问题。"

在美国的作家们看来，赛珍珠只会用简单的白描叙事，但在西方重视的心理刻画这方面却乏善可陈。更重要的是，《大地》成了一部超级畅销书——在他们看来，纯粹的文学和畅销书绝对是矛盾的。

其次，是因为赛珍珠长期生活在中国，几乎和美国的文学圈子形同陌路，很多作家都不认识她。她写的题材又发生在遥远的中国，而且还是中国的农民而非精英阶层，这更显得她和美国的主流文学圈格格不入。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就曾说过："我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珍珠为伍。"（福克纳后来在1949年开心地去领了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是《喧哗与骚动》。）

第三个原因就比较隐晦了。在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美国有两名作家获奖：辛克莱·刘易斯（1930年）和尤金·奥尼尔（1936年），都是男性。在诸多"嗷嗷待奖"的美国男作家群体中，忽然天外飞仙般空降来一个他们闻所未闻的女作家，很多人在心理上或情感上接受不了。



赛珍珠。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截至1970年，赛珍珠的《大地》系列英文本就已经印行了70多个版次，印刷数量达到数百万册

由于赛珍珠的传教士家庭背景和身份，她的这部《大地》还在宗教问题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大地》这部小说的世界里，基督教和上帝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人按照他们传统的信念敬天地、祭鬼神，所有的祈福活动都是对自己信仰的神灵进行。即便在小说中偶尔出现的传教士，也并非是正面形象。

考虑到作家是一位传教士，美国教会中的保守派深感“震惊和愤怒”，很多教徒都写信指责赛珍珠，甚至发出威胁。而从小就在定居中国的传教士家庭长大的赛珍珠，认为自己比任何没去过中国的美国教徒更有发言权。

1932年，赛珍珠接受长老会女教徒的邀请，在美国的阿斯塔饭店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面对近2000名听众，赛珍珠的演讲题目是《海外传教，真的有用吗？》

这场大胆的演讲震惊了美国宗教界，赛珍珠做出的否定回答更是让她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教会教徒的人身攻击甚至侮辱，但赛珍珠完全没有退缩，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正统的传教士，对他们所谓要拯救的人民如此缺乏同情；对除他们自己国家的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如此不屑一顾；对一个高度文明、十分敏感的人民，竟如此粗暴鲁莽，我直感到自己的内心因羞愧而在滴血。”

最终，赛珍珠辞去了自己传教士的职务。

5

如果说赛珍珠在美国引起了争议，那么在她所热爱的中国呢？

在如何评价赛珍珠和她以《大地》为代表的小说这一问题上，中国的文学界也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不少中国人是感谢赛珍珠的，因为尽管可能在有些地方有些夸张，但赛珍珠毕竟把一个相对客观和真实的中国呈现在了世界面前，中国不再是以前那样除了“留辫子”就是“缠小脚”的形象。

而另一方面，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赛珍珠选择王龙这样一个贫穷且有些愚昧的中国农民来展现中国，感到很大的不满。

著名的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在肯定赛珍珠的一些真实描写之外，指出以王龙这样的落后农民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眼中，只会加深他们对中国人的歧视。而《大地》的畅销，很大原因是因为符合西方人“居高临下”的审美口味。

而文艺理论家胡风在承认赛珍珠对中国农民“满怀同情”的同时，也认为她“并不懂得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

当然，赵家璧和胡风这一批知识分子还算是客气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毫不留情地对赛珍珠提出了批评。

著名的翻译家伍蠡甫是《大地》的译者之一，但他在自己的“译者序”（长达28页）中指出，《大地》中的中国男人只知道土地，中国女人只知道服从，整个中国看上去兵荒马乱，愚昧落后，“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而且，伍蠡甫还指出，中国农村的现状，恰恰就是因为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造成的，而赛珍珠根本没有指出或者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

当时在美国大学执教的文化学者江亢虎（后来投靠汪精卫成为汉奸），用英文在《纽约时报》上发文批评赛珍珠的《大地》“太过夸张”，尤其指出赛珍珠凭借年幼时与身边苦力和女佣王妈的接触，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失之偏颇的，因为这些底层人“可以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不能代表中国”。

赛珍珠对此进行了反击，她提出的其中一个观点是：“倘若在任何国家内，居大多数者不能为代表，则谁复能代表？然而我晓得江教授及其他类似江教授者，颇愿以极少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来代表全部中国人民……对此，我是永难赞同的。”

而在诸多批评中，鲁迅的声音是最引人注目的。

鲁迅在1933年11月15日写给著名翻译家和剧作家姚克的信中说：

“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指赛珍珠，她跟随夫姓），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一个真相。”

鲁迅的这段评价，后人有过很多解读。从这段话看，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一般，但态度还算温和。如果从鲁迅向来警惕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夸赞以及他对中国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了解程度，这个评价也是符合他观点的。

不过，鲁迅当时读的《大地》译本似乎一般，他在1936年9月15日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若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

在写完这封信后一个月，鲁迅就病逝了。没有人知道如果鲁迅读过

其他译本，是否会对赛珍珠和《大地》做出新的评价。

6

事实上，中国怎么看待自己，成了赛珍珠一生最牵记的事之一。

赛珍珠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并没有停止写作，反而成了一个高产作家，甚至接受了丈夫的建议（她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后，嫁给了当初为她出书的出版商沃尔什），为了避免让读者觉得自己粗制滥造，用笔名发表其他小说（其中有一本书又成了畅销书）。但所有的作品里，她最着力的还是和中国有关的作品，包括又写了《儿子》和《分家》，构成“大地三部曲”，还包括剧本《光明飞到中国》、散文集《中国的小说》等等。

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之后，赛珍珠通过各种渠道为中国发声，在报刊上撰文，去集会上发表演讲，宣传中国，呼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为援助中国集资。她曾在一次公开广播中这样说：

“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此外，她在文化领域也和包括老舍、巴金在内的很多中国作家有交流，还帮助老舍翻译了几部他的代表作，并帮助林语堂在美国出版后来大为畅销的《吾国与吾民》（事实上《水浒传》也是赛珍珠第一个翻译成《皆兄弟也》带入西方的）。

但作为一个跨越东西方文化、曾经加入过中国国籍（同时没有放弃美国国籍）的女性作家，赛珍珠却一直在感受一种特殊的尴尬。

《大地》在1937年曾被改拍为电影，需要到中国取景。但当时的国民党相关部门却提出，剧中的中国农民不能穿破破烂烂的衣裳，必须穿新衣。当电影需要拍摄水牛耕田的场景时，相关部门又要求必须用拖拉机取代水牛。在摄制组即将离开中国之际，他们发现储藏胶片的箱子被人泼了硫酸，导致很多镜头都只能重拍。



《大地》这部电影由米高梅电影公司于1937年出品。出品方最终拒绝了当时国民政府“由中国人出演”的建议，由美国人出任男女主角，整个过程接受了中国方面多达16次的审查。整个电影的主场景是在加州搭棚拍摄完成的。1938年，《大地》在第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两大奖项：“最佳女主角”（饰演阿兰的路易斯·赖纳）和“最佳摄影”

在新中国成立后，赛珍珠的地位有时让她自己也感到迷茫。

在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她被认为是“亲中”和“亲共”分子，受到冷落和不公。而在中国，她因为不满当时中国政府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公待遇和一些错误的政策，写过不少批评的文章和书籍，又被中国列为“不受欢迎的作家”。

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到1971年“乒乓外交”中美破冰，尼克松总统准备访华，赛珍珠成了最高兴的人之一——她自1934年离开中国后，做梦

都想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

为此，已经80岁的赛珍珠同意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希望重新访华的愿望，甚至希望担任尼克松代表团中的一名记者。

不过，赛珍珠的愿望很快破碎——一位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官给她发来一封拒绝信，表示鉴于她之前在文章和书里对新中国的一些“歪曲、攻击和谩骂”，她无法获得进入中国的准许。

这对赛珍珠而言，是最大的打击。

7

在得知自己重返中国梦碎之后，赛珍珠迅速衰老了下去。

1973年3月6日，81岁的赛珍珠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在美国的佛蒙特州丹比市逝世。她一生共收养了8个来自亚洲的孩子，用自己的基金会资助了1万多名儿童。

按照她的愿望，她是穿着中国的旗袍被火化的。



赛珍珠墓碑

她的骨灰，被埋葬在宾夕法尼亚州。同样是按照她的愿望，她的墓碑没有任何墓志铭，上面只有三个字：

“赛珍珠。”

是汉字。

馒头说

记得当初张艺谋刚刚成名那会儿，也一直被一些人诟病。

被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那一系列的电影，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等，被认为是“迎合西方人猎奇的审美趣味，把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展现出来”。

是否有点似曾相识？

张艺谋拍那一系列电影的时代，正好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十多年改革开放，正铆足了劲准备加速发展，而国家的各方面都日新月异。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人们对未来的期望都是美好的，希望自己的祖国以一个文明而进步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目光中。

而赛珍珠写《大地》的那个时代，正好也是处于当时中华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整个国家虽然还处于战火和各种灾难之中，贪腐问题也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在教育、交通、工业等领域，还是开始慢慢有了一些起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所以，那些批评家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放在这里，我们一直在努力，为什么你偏偏要展现最丑陋的？”

但是，从拍摄者或写作者的角度出发呢？他们的动机是故意抹黑吗？恐怕也并非如此。他们所描绘的那些事物，是真实存在过，甚至是正在发生的。他们不拍不写，这些东西并不会就此随风消散，没人记得。

有时候，爱得深切，才会说得深刻。

就好比相亲看外貌，我这张脸就摆在这里了：眉毛好，眼睛好，嘴

巴好，但就是鼻子长得太大。但这就是真实的我，有美有丑，你要接受我，就要了解我的整体，接受我的整体。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乃至交融，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我不避讳我的短处，但也请你多看我的长处，或者我的努力。

如今，你可以说张艺谋的《英雄》剧本太天真，《长城》故事编得烂，《影》拍得太理想化，这些从业务角度都可以探讨，正如可以探讨张艺谋当初的那个系列，但很少会有人再谈起“展现中国人丑陋的一面”。

同样，赛珍珠在中国的纪念馆、故居如今都建了起来，她的书也一版再版，大家可以讨论她的写作手法，讨论她当时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刻或不足，但不太会有人说她“故意要塑造王龙这样一个农民丑化中国人”了。

观念的进步固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已经比当初强大了很多。

强大的体现不只在于财富，在于科技，在于武力，更在于内心。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赛珍珠与中国》（刘海平，《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2.《赛珍珠生平及著述大事年表》［刘龙，《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3.《赛珍珠生平事迹补遗》（廖康，《国外文学》，1992年第4期）

4.《如何理解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顾均，《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

5.《鲁迅的赛珍珠简评所引发的讨论：一个回顾》［姚望，《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6.《赛珍珠与后殖民主义》［朱坤领，《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6年第3期］

---

[1] 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规定使用“用人”——编者注

这些著名的日本作家，为何最终都选择自杀？

在日本，有不少特别的忌日，比如“河童忌”“樱桃忌”“康成忌”。这些忌日，不是用来祭奠樱桃或河童的，而是祭奠一个个著名作家的，而这些著名作家，都是选择自杀结束生命的……

1

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先说第一位作家。

这位作家，叫芥川龙之介。

中国不少读者对他的了解，可能主要来自日本导演黑泽明的那部著名的电影《罗生门》——这部堪称神作的电影，剧本就是来自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很短，推荐一读）。

1892年3月1日，芥川龙之介出生于东京。他原来不姓“芥川”而姓“新原”，而这个改姓的过程，可能也是影响他后来性格的一个重要原因。

芥川出生那年，母亲已经32岁了，父亲42岁。在芥川8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就疯了——发疯的母亲对芥川的童年影响非常大。他曾在自己的作品《点鬼簿》中这样写：

“我一次也没有从我的母亲那里感受过母爱。”

而作为“疯子的小孩”，那种自卑和恐惧，其实也伴随了芥川的一生。在他的作品《河童》中，一个河童的胎儿因为害怕遗传父亲的精神病，因此不想出生，这很可能就是芥川自己的心声。



芥川龙之介

在母亲发疯后，芥川被送到了母亲的娘家，过继给了舅舅芥川道章，由此改姓“芥川”。芥川家是一个颇为富有的大家族，且重视文学和艺术，这给芥川龙之介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培养土壤，他从小就立志做一名作家。

不过，芥川的父母辈实在是有点乱——他的生父后来又娶了生母的

妹妹为妻，芥川多了一个继母。但真正无微不至照顾他的，是生母的姐姐，也可称为他的养母。

所以，芥川其实有生父、养父、养母、继母四个亲人长辈，但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却一直透露出缺少关爱的气息。

关于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解读有许多，这里就不展开了。总的来说，芥川在他的小说里用笔非常简洁，叙述的口吻也似乎很冷峻与轻松，但表达的主题却往往是阴郁和对人性的失望——这在《罗生门》这篇小说中就很明显，文中他描写的老妇人在死人堆里拔头发的画面，让人不寒而栗。

总之，到了1927年，才35岁的芥川龙之介其实已经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那一年，他饱受胃病、神经衰弱、痔疮等各种疾病的困扰。同时，他的姐姐家失火，姐夫欠下高利贷卧轨自杀，姐姐举家来投奔他，生活压力大增。

7月24日，芥川龙之介在卧室里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前，他在自己枕头边放了一部《圣经》（基督教在他的小说中也占有很重要位置），并给家人留下多封遗书，还写下一篇《给老朋友的信》，其中有一句：

“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

芥川龙之介的忌日，现在被称为“河童忌”。他去世后，他的好友菊池宽提议设立了“芥川奖”，专门用来奖励文坛新人。这个奖后来成为日本文坛的重要奖项。

芥川在35岁的年龄就选择了自杀，其实给当时很多日本作家以极大的震撼，并深深影响了他们。

其中，就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位作家。

第二位作家，叫太宰治。

太宰治这个名字，近几年为不少中国读者所熟悉，因为他的成名作品连续几年高居图书畅销榜前几名，那就是《人间失格》。（关于《人间失格》这几年的大火，说实话我还是有点看不大懂。我至今仍记得大概十多年前我看完这部作品后在当时的百度贴吧里看到两个帖子，大为惊奇。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发帖说自己看完《人间失格》后不是太明白，然后一个初二学生回帖："别说你才四年级，我今年初二了，我也不敢说我完全看懂了《人间失格》，但我深深被感动了……"当时我非常惭愧。）

与芥川龙之介出生于平民家不同，太宰治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1909年，太宰治出生在青森县中西部的津轻地区。他原名津岛修治，是家中的第六子——津岛家是津轻地区的首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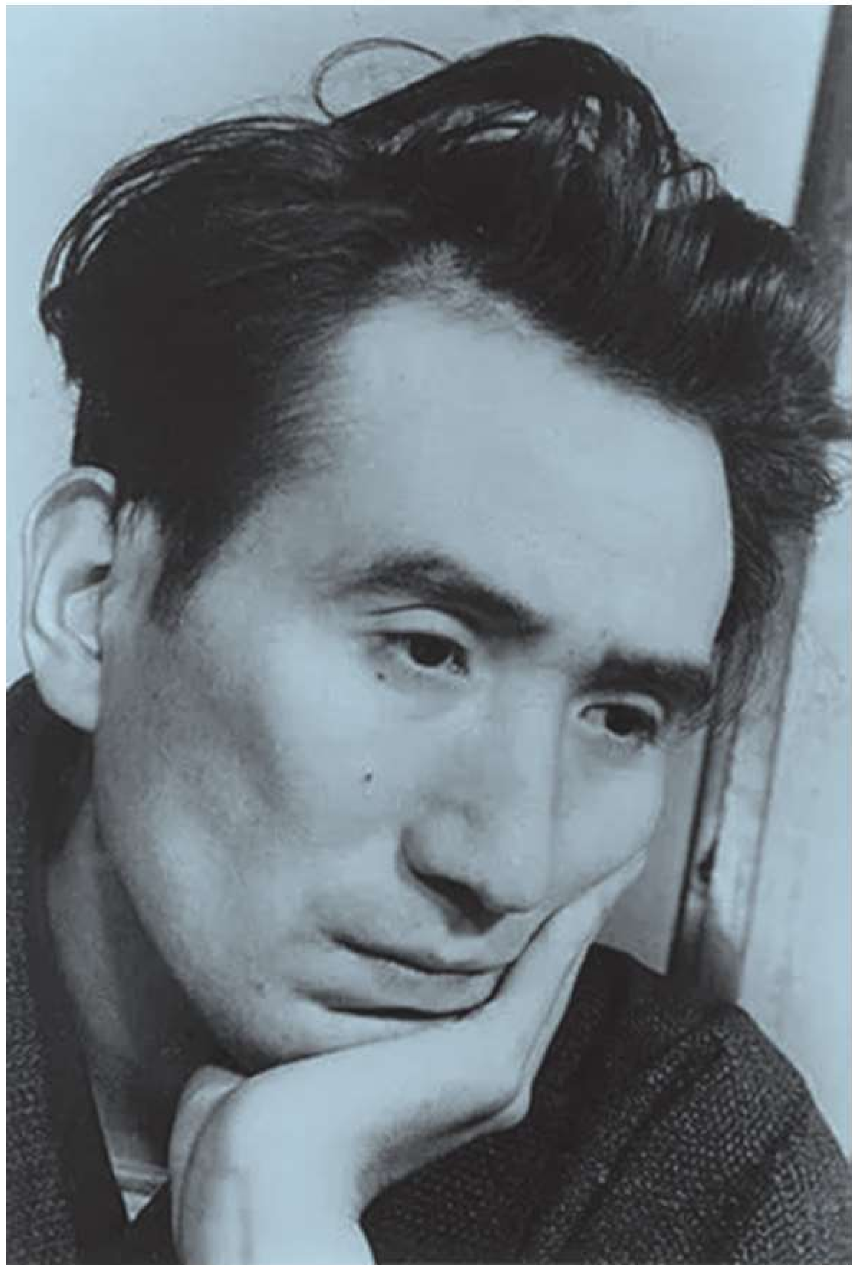
太宰治是个富二代，但他也是个学霸。他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就是全校第一，大学更是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法文科。

1927年，一个消息让热爱文学创作的太宰治备受冲击——芥川龙之介自杀了。

太宰治一直对芥川龙之介非常推崇，并一直以获得"芥川奖"为目标。26岁时，太宰治凭借自己的作品《逆行》入围"芥川奖"的候选。那时候，太宰治已经从帝国大学退学，因为治疗腹膜炎而欠了一屁股债，所以非常渴望用"芥川奖"来填补自己遇挫的心情——尽管奖品只是一块怀表和500日元奖金。

但是，他最终落选了。

到了第二届"芥川奖"评选时，太宰治的获奖诉求已经几近狂热，这在他给评委之一佐藤春夫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看出：



太宰治

“我一定能成为一名好作家。您的恩情，永志不忘。第二届芥川奖，请颁发给我吧……佐藤先生，请您不要忘记我。请不要见死不救啊……现在，我是在以命相托。”

而原本欣赏太宰治才华的佐藤（第一届就是他提名太宰治的），却

从太宰治的信中读出了他在精神方面的隐患。

佐藤春夫的猜测可能并没有错。

如果说芥川龙之介是因为各种病痛折磨、生存压力的诱发才生出自杀求完美的想法，那么太宰治似乎生来就对整个世界抱着一种阴郁和悲观的看法。这在他的多部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达。

事实上，太宰治一生一共尝试过五次自杀，有约情人一起跳海自杀（结果情人死了他没死，还因此被起诉“协助自杀”），有吃安眠药自杀，有上吊自杀，都未遂，直到第五次。

1948年，太宰治创作完《人间失格》后，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因为肺结核，甚至到了经常咯血的地步。

6月13日深夜，太宰治与崇拜他的女粉丝山崎富荣一起投水自尽——这一次，他成功了。

6月19日，他的尸体被人发现，而这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生死同一天，他的忌日，就是“樱桃忌”（出自其作品《樱桃》）。虽然他是和女粉丝一起投河的，但他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的却是：“我最爱的就是你。”

太宰治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在《人间失格》中多次出现的一句话：

“生而为人，对不起。”

3

轮到说第三位作家了，他叫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曾获得过三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而他的自杀方式也最离谱。

三岛由纪夫曾被人安排见过太宰治一次。虽然三岛由纪夫承认太宰治有文学才华，但当着太宰治的面，他只说了一句话就告辞了：“我不喜欢太宰治先生的作品。”

这简直太符合三岛由纪夫的性格了。

三岛由纪夫1925年出生在东京。如果说太宰治的出身是“富”，那三岛由纪夫就是“贵”——他的祖母夏子家算是德川幕府时代的贵族。到了三岛由纪夫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但祖母还是对这个孙子寄予了厚望，从小就把他送到只有皇族和贵族才能读的学校去读书。



少年三岛由纪夫，放到现在也是“小鲜肉”级别了

三岛由纪夫从小就表现出了超高的文学天赋，15岁就能发表诗集。而且他也是个学霸，从学习院（日本著名的贵族私立学校）高中部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为此还拿到了天皇奖励的一

块银表。

但和芥川龙之介与太宰治柔弱阴郁的性格不同，三岛由纪夫尚武，而这种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最躁狂懵懂的青年时期，正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峰。

1944年，在日本在二战中已经陷入困境的局面下，三岛由纪夫成了一名等待征召的预备役士兵（就是他高中毕业那一年）。1945年，三岛被征召，但在出发准备参战前，他的感冒被军医误诊为肺病，他被遣送回乡——他原本要去的部队后来前往菲律宾，基本上全军覆没。

但三岛由纪夫却并不因此感到幸运，而是感到遗憾。尤其是当他17岁的好友莲田善明参军后，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于马来西亚自杀，给三岛非常强烈的冲击——他认为他也应该为国牺牲，而不是苟且偷活。

不过，无缘在战场上显身手的三岛由纪夫，由此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进而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禁色》、《夏子的冒险》以及《潮骚》等一系列作品，让他在日本文坛的声望越来越高。

不过，真正让三岛由纪夫奠定地位的，是他的代表作《金阁寺》。这部作品的主角是一个外表猥琐但内心却崇尚极致美的少年。似乎是在与自己的小说呼应，1955年，30岁的三岛由纪夫开始疯狂健身，希望练就一副展现阳刚之美的身材。

健身成功后的三岛由纪夫表示：“终于将这个身体弄到手之后，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兴奋，想到处去卖弄，到处去炫耀，到处去操作给所有的人看。我的身体就像我的新车一样。”

已经声名鹊起的三岛由纪夫在1963年、1965年和1968年一共获得过三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却一次都没有最终折桂，这其实也是让三岛非常失望的一件事。

尤其是1965年那次，三岛由纪夫得知自己被提名后，他带着夫人周游欧美、东南亚多国，在回国抵达机场前联系了很多媒体，满心以为届时可以发表获奖感言，但最终却事与愿违。在机场，尴尬的三岛面对记者们只说了一句“大家辛苦了！”就走了。

但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是让三岛由纪夫觉得最痛苦的事，他自己认为最不能接受的，是日本战后天皇权威的衰落、武士道精神的消失和所谓的“世风日下”。没错，他就是一个军国主义者。

为此，他在1970年上演了一幕电影剧本也不敢这么写的自杀。

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带着他自己的私人武装“盾会”的四名成员，来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直接将师团长给绑架了。

在把师团长绑架为人质后，三岛由纪夫站在总监部的阳台上，对着下面800多名自卫队官兵发表演说，要求大家随着他一起发动兵变，推翻现有宪法，让自卫队重新成为“真的武士”，恢复保卫天皇的传统。

没错，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初的日本“二二六兵变”。

但在三岛由纪夫发表演说时，800多个自卫队官兵根本没人理会他的话，有的甚至还发出嗤笑。

沮丧的三岛由纪夫随后从阳台退回了室内，按照原计划，决定切腹自杀。

额头上绑着“七生报国”字样头巾的三岛由纪夫，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自杀过程：

他先用短刀把自己的腹部切出了一个很大的伤口，肠子直接就流了出来。随后，他一旁的“盾会”成员森田必胜用刀为三岛进行“介错”（切腹仪式中帮助自杀者砍下头颅，目的是让他更快死亡）。但森田连砍三次，都没能砍下三岛的头颅。

疼痛难忍的三岛由纪夫试图咬舌自尽，还是失败了。最终另一名“盾会”成员古贺浩靖进行第四次“介错”终于成功。

三岛由纪夫的葬礼，有8200人参加，创造了迄今为止日本作家葬礼参加人数之最。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在多部作品中的愿望：用完美的男性肉体死亡，去实现美的极致。

但正如他自己在《金阁寺》中说的一句话：

“人这东西，一旦钻在美里不出来，势必不知不觉撞进世间最为黑暗的思路。”

4

终于轮到了第四位作家：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是这四名日本著名作家中活得最久的一个——芥川龙之介活了35岁，太宰治活了39岁，三岛由纪夫活了45岁，而他活了73岁。



18岁时的川端康成

而且，他是四个作家中得到荣誉最高的——他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他还是自杀了。

川端康成1899年6月14日出生在日本的大阪，与前三位作家相比，他的家庭算是中产之家——父亲是个医生。

但川端康城童年的不幸，却与前几位作家类似：2岁的时候，父亲因肺结核去世；3岁的时候，母亲也因肺结核去世；10岁的时候，相依为命的姐姐芳子也因为热病去世。

川端康成也是很早就显示出了文学天赋，他的作文一直是全班第一。从成名的时间看，川端康成比芥川龙之介晚——芥川自杀的1927年，川端康成刚刚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品《伊豆的舞女》。但他比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成名要早不少。

所以，他与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都有过交集，而且对他们俩的影响还不小。

之前说到过，太宰治在26岁时凭借一篇《逆行》获得评委佐藤春夫的青睐，入围“芥川奖”候选。但是，他却并没有获得当时另一位评委的欢心——那位评委，就是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当时对太宰治作品的评价是：“据一己的私见，作者目下的生活，罩着一重讨厌的阴云，有种才能无法正常发挥之憾。”

应该说，川端康成的眼光还是比较准的，但也因此惹恼了太宰治——他认为自己落选就是川端康成造成的。

太宰治写了一封题为《致川端康成》的公开信，发表在《文艺通信》杂志的1935年10月号上：

“我愤怒地燃烧着，几夜难成眠。养小鸟、观舞踏，难道就是如此了不起的生活吗？真想捅了他。大坏蛋一个。……我只感到遗憾。对川端康成若无其事地装着，而装又装不像的扯谎，我感到除了遗憾，还是遗憾。”

这件事当时在日本文坛闹得很大。

相比太宰治，川端康成对三岛由纪夫的影响更大。

1946年1月，47岁的川端康成接受了21岁的三岛由纪夫的拜访，之后，川端就开始推荐三岛的作品。

川端康成对三岛由纪夫非常欣赏，不断给他推荐机会，而后者也对前者非常尊敬。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人不仅是好友，也有师生之谊。

前面说到，三岛由纪夫在1963年、1965年和1968年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最终都功亏一篑，而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颁给了川端康成（获奖作品是《雪国》、《古都》和《千只鹤》）。

川端康成在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谦虚地表示：“托三岛由纪夫君的福，他前年便进入候选人，因为太年轻不行，所以才让我碰上了。”



川端康城（中）和三岛由纪夫（右）

三岛当然表示了祝贺，但后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三岛由纪夫冲击很大——其实和川端康成本人无关，主要是因为三岛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人。

在三岛由纪夫那场轰动一时的劫持和自杀事件中，很多日本作家都赶到了现场，想劝三岛由纪夫。但被允许进入的，只有川端康成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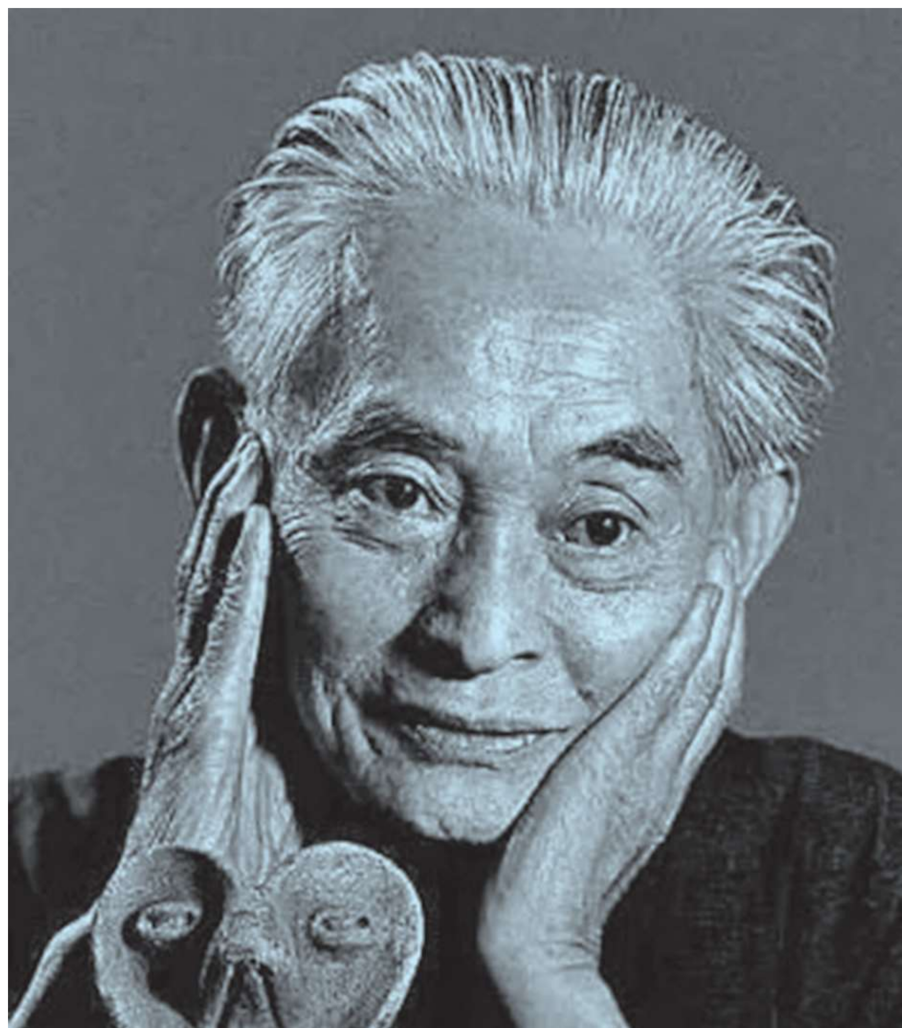
虽然川端康成并没有见到三岛由纪夫的尸体，但这件事给他造成了

巨大的冲击，他后来对自己的一名弟子表示：“该被砍下脑袋的是我！”

其实，功成名就的川端康成，虽然曾指出太宰治的阴郁，但他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摆脱死亡的气息。尤其是中年以后，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

在他的名篇《雪国》中有这样的句子：“一个人如果死得快乐，如果认为死是一种恒久的解脱，世人就不应为他叹息，因为快乐的死亡总好过灵魂里面最深层次的疼痛，有朝一日，对生命也心不在焉了。死亡是极致的美丽，死亡等于拒绝一切理解。”

而他最终也真的这样做了。



1972年4月16日下午2点45分，73岁的川端康成对家人说“我去散步”，就独自一人离开了。

家人没有任何怀疑，直到晚上久等川端康成不归，才让他的助手岛守敏慧去川端康成的工作室寻找。

晚上9点45分，助手在工作室的盥洗室发现了川端康成——躺在自己铺好的棉被上，身边有打开瓶盖的威士忌和酒杯，嘴里含着煤气管。

死了。

与其他三位作家不同的是，川端康成没有留下任何遗书。

他最后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曾说过的一句话：

“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馒头说

我并不赞成自杀，本文也无意围绕“自杀”做一探讨。

只是因为写这篇文章时是川端康成的忌日，顺带想起了一系列自杀的日本作家。

其实日本自杀的作家还有不少，他们四个是最有名的——就自杀的概率而言，日本作家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对于这些自杀的作家，后人已有太多的分析和讨论：

从日本人的“自杀情结”，到日本社会结构和阶层的特点——尤其是二战前后；从这些作家在青少年时期各种不幸的遭遇，到他们追求“美”的极致的哲学意义，甚至将“自杀”作为自己最后一次的人生作品……

（所以，我不禁为村上春树捏一把汗——还好他爱上了长跑，可以经常分泌多巴胺，不然以他在诺贝尔奖这件事上的经历……）

不过，我觉得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作家”这个人

群本身。

我们有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感觉：

这个作家好厉害！把我想说但说不出来的话都说出来了！

那个作家好细腻！这种细节他都观察到了，还描写得这样生动！

没错，这就是真正厉害的作家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

但是，就像和魔鬼做交易一样，他们其实也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感性，敏感，易悲伤，会绝望。因为他们能感受到一般人所感受不到的细节和情感，他们也注定要承受一般人所不必承受的情绪波动。

给你多一个天赋，总是要你在另一点上付出回报，上帝总是公平的。

最后再说个题外话。

1899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三个不同地方，诞生了三个一流的作家。

一个是日本的川端康成。

一个是美国的海明威。

一个是中国的老舍。

他们三人最终都选择了同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人生旅途：自杀。

但老舍先生与另两人自杀的原因，并不相同。

优秀的作家能更深刻地感知这个时代，但有时候，却无法把控自己的命运。

“文胆”之死

“文胆”一词，是褒义词，一般指给国家领导人撰写各种文告和讲稿的；也指为人刚正，文采斐然。但熟悉国民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一般说起国民党的“文胆”，是特指一人的。

1

1948年11月13日的早晨，秋高气爽。

蒋君章早上起床，先是打了一套太极拳，然后坐在办公桌前看报纸。

大概9点半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打来的，催陈布雷先生快点去开会。

作为陈布雷的机要秘书，蒋君章想了想，替陈布雷请了个假。

蒋君章在后来的口述回忆录里说：布雷先生在两天前就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连11月12日的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他也没有参加。

但到了上午10点，陈布雷依然没有从房间里出来。

蒋君章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陈布雷一般是早上8点就起床的。



陈布雷

于是，蒋君章找来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一起想方设法弄开了陈布雷房间的门——然后，就看到了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陈布雷：

“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吧，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拉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温暖……”

蒋君章急忙喊来包括蒋介石专用医生在内的三位大夫。几针强心剂打下去，陈布雷依然没有任何复苏迹象。在场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

实：

蒋介石最信任的“文胆”陈布雷自杀了。

2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浙江慈溪人——没错，是蒋介石的老乡。

1911年，也就是中国天翻地覆的那一年，21岁的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随后实现了他的夙愿——进入上海的《天铎报》，成了一名记者。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陈布雷连写10篇《谭鄂》，按天发表，在当时上海很多报纸称武昌起义军为“逆军”的背景下，对起义进行大力的颂扬。他在文章中指出：

“鄂事成败之问题，关系吾四万万同胞之生死；鄂事万一无幸，期吾同胞无万劫回复之日。”

在那几年里，无论是在《天铎报》还是后来去《商报》担任主编，陈布雷凭借自己充满激情和预见性的评论，大力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在上海乃至全国报界声名鹊起。



天鐸報

THE BELL

《天铎报》

陈布雷当时对国内局势的评述和对革命的理解，得到各方面的高度欣赏：国民党方面，孙中山称他写的文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宣传革命更有成绩；共产党方面，当时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专门致函《商报》，

称主笔（即陈布雷）具有“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曾在《生活》周刊上评价陈布雷：“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

那个时期，陈布雷的文字，立论客观，分析透彻，但同时又充满着热血激情，气势如虹。比如他在揭露袁世凯欲称帝时写过这样的句子：

“今生今世休再作此妄想，倘不死心归顺，愿提刀勒马一战耳！”

也正是因为如此，“陈布雷”这个笔名在当时名闻遐迩，人们称他为“布雷先生”乃至“布公”，清末著名的诗僧八指头陀曾赠诗曰：“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3

1926年，盛名之下的陈布雷，被一个人看中了。

其实从1926年初开始，因为一直撰文赞扬当时代表先进力量的国民党，陈布雷就已经进入有关人士视线。那一年的11月，陈布雷的堂兄陈屺怀向陈布雷转达了一个信息：有一个人想见你。

这个人，就是当时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

蒋介石为什么要见陈布雷？因为出于形势的需要，蒋介石越来越希望自己身边能有个得力的新闻秘书。

蒋介石原来的秘书是邵力子，但邵力子已多次流露出亲共的思想，蒋介石不想用。他本来想起用当时的《商报》社长陈屺怀，但陈屺怀觉得自己比蒋介石大了一轮，做秘书不合适，于是就推荐了自己的堂弟陈布雷。

在国民党方面的再三邀请之下，陈布雷启程前往南昌，面见蒋介石——后来他才知道，那其实是一场“面试”。

那次和陈布雷一起参加“面试”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潘公展（时任《申报》总编辑）。

面对当时已颇有威严的蒋介石，潘公展的神态举止比较拘谨，且目光闪烁。而陈布雷瘪嘴，头发蓬乱，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一点给蒋介石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随后蒋介石问了两个人一个问题："怎么应对上海的工人运动？"

潘公展的回答是："总司令自有妙策。"这句话答了等于没答。

而陈布雷提出的建议是：先派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然后再利用上海的帮会势力打头阵。

那次谈话之后，蒋介石单独留下了陈布雷，希望他在总司令部暂住一段时间。

然后，陈布雷接到了蒋介石的下一轮"面试题"：帮蒋介石起草一篇给黄埔军校学生的文章。

没多久，陈布雷就拿出了一篇《告黄埔同学书》。

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无论是文风、气势，还是文字里流露出的情感，完全符合蒋介石的要求。于是，蒋介石当即提出：希望陈布雷留下来为自己工作。

但陈布雷拒绝了——他说他的志趣不在官场，还是想回上海当记者。

蒋介石当时很不高兴，但没有强求。

1927年，蒋介石率北伐军攻克南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国民党都已具有"正统"的气象，这对陈布雷这样的传统文人来说，还是有影响的。

这一年，在蒋介石的再三邀请之下，陈布雷终于决定出仕——担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但刚刚出仕的陈布雷，随即遭遇了蒋介石人生的第一次下野。为了表示与蒋介石同进退，陈布雷也同时辞去了职务。

掌握实际军权的蒋介石，在重新出山后，第一时间就邀请陈布雷再度出仕。

陈布雷在推辞了好几次后，向蒋介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的初愿，是以新闻工作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对公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非我所能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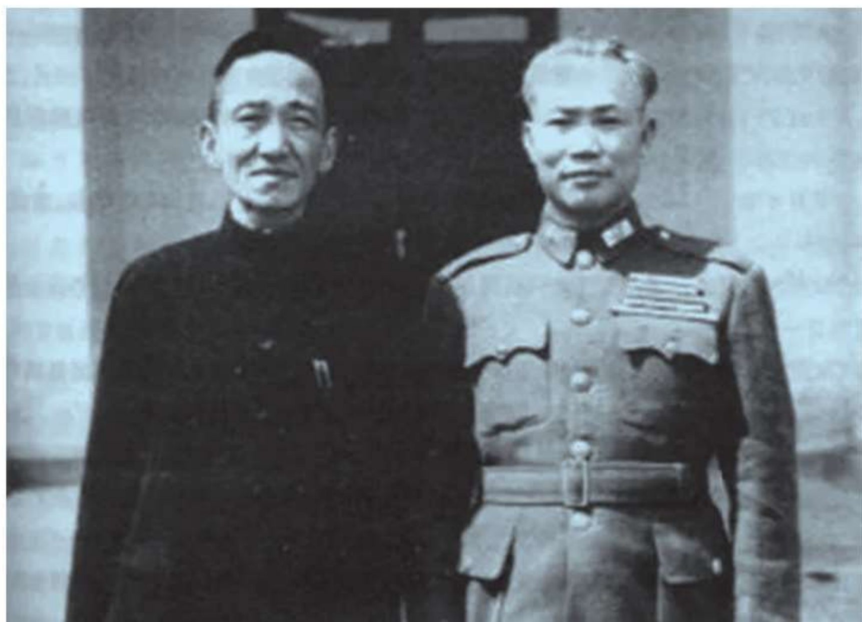
于是，陈布雷最终出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他的命运，终于和蒋介石，和国民党捆绑在了一起。

4

1933年，陈布雷的政治生涯迈出了关键一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觉得身边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在1933年设立了“侍从室”。



陈布雷和陈诚，堪称蒋介石一文一武两大亲信

“侍从室”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机构，地位相当于清代的军机处。“侍从室”下辖三个处，一处主管军事和情报，三处主管人事考察，二处主管党务和政治业务——出任二处主任的，就是陈布雷。

可以说，陈布雷经此一步，成了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幕僚长”。

但他的矛盾与痛苦，也由此开始。

在这个时期，最让陈布雷纠结的，就是抗日的问题。

从个人意愿来说，陈布雷当然是主张积极抗日的，但从他所处的职位而言，却必须服从蒋介石的意志：隐忍，退让，攘外先安内。

而且，陈布雷的身份特殊——他是蒋介石的笔，他必须将蒋介石的这个思路充分阐述出来，动之以情，说服众人。

1935年11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的外交报告交由陈布雷起草。

这是一份要表明蒋介石“暂缓抗日”意图的报告，却和陈布雷的本意相悖，几度修改之后，终于成文。

11月1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公开朗读了这篇当时著名的对日政策演说，其中那段文字，似乎能让人咀嚼出主笔人内心的艰涩：

“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

但让陈布雷感到痛苦的事，还远没有结束。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陈布雷本来是要跟随蒋介石去西安的，却因为在洛阳时生病没能同行。“西安事变”爆发后，陈布雷当时的心情不是感到庆幸，而是感到后悔——当时没能和蒋介石在一起。

但是，被张学良护送回来的蒋介石，很快给陈布雷出了一道难题：要他写一部记录“西安事变”经过的《西安半月记》。

蒋介石对陈布雷下达的要求很明确：

第一，要让世人知道张杨二人犯上作乱的狼子野心；

第二，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感化张杨二人的；

第三，要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怎么化险为夷的。

这就让陈布雷非常为难，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犯上”的目的并不是要“篡位谋反”，而是要“逼蒋抗日”。而且，在整个记录中，只字不能提周恩来代表的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斡旋作用。

陈布雷一开始以“不熟悉事变经过”为由推辞，但蒋介石再三表示只能由他写才放心。结果这篇文章耗费了陈布雷的大量心血，却迟迟不能完稿。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陈布雷交出第一稿，蒋介石不满意，回去改了再交，蒋介石仍不满意，再改——这在陈布雷的“作文”生涯中是很罕见的。

而陈布雷的家人也罕有地见到了陈布雷发火的一幕——他枯坐在书桌前，许久不能写下一字，拿着笔在纸上乱涂一气，最终愤怒地把自己心爱的毛笔给戳断了。

两个月后，《西安半月记》附加了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终于问世，重印30余次，成为畅销书。

蒋介石本人非常满意，但不知他是否知道陈布雷所经受的折磨。陈布雷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5

真正让陈布雷“解脱”的，其实是“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最终逼尽了蒋介石所有的后退余地。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而这篇讲话中最有名的那句，就是：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篇讲话的起草人，就是陈布雷。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抗日，这让陈布雷精神大振，斗志昂扬。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年那支“惊雷之笔”又复活了，陈布雷写了大量激励国人坚持到底、抵抗日寇的文章，如名篇《告入缅将士电稿》《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告空军将士书》《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等。

1944年9月，蒋介石在重庆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那一句流传至今的话：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个讲话文稿是出自陈布雷之手（但可能性极大），但陈布雷自己立刻做出表率：鼓励自己的一个侄儿和两个儿子报名参军，奔赴前线。

陈布雷的文笔，确实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认可。1941年，周恩来托人给陈布雷带话：

“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有加，但同时希望你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陈布雷并没有正面回答这句传话，而是说：

“恩来先生我也衷心敬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对决，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很快就到来了。

陈布雷重新陷入了痛苦之中。

6

按蒋介石的规划，抗战结束后的半年之内，就可以彻底消灭八路军和共产党。

作为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也是对此深信不疑的。但事实的发展过程，却出乎每一个人的意料——战争开场才打了两年多，国民党军队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国民党从上风一步步落到下风，位于神经中枢的陈布雷，全程经历，所以他所能感知到的痛苦，更甚于外人。

第一，陈布雷是切身感受到国民党的腐败的。

陈布雷做的官，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要巴结他的人成千上万。但他一直衣着朴素，自己从不搞特权，家中会客室只有三张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来不准家人使用。

但国民党从上到下的腐败之风，早已一发不可收拾。1943年，还在抗战时期，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悄悄塞给陈布雷一个信封，陈布雷满面通红地退还给了孔祥熙。后来有人告诉他，信封里塞的居然是一张100万元的银行本票。陈布雷当场就大叹：“腐败！腐败！”

第二，陈布雷自己心里也知道，国民党从士气上已经垮了。

1947年，陈布雷曾向自己的浙江同乡毛翼虎分析过他自己所认为的“势力”二字：

“‘势力’这个词要分开来看，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力量。按照力量来说，国民党无论是陆军，无论是空军，都远远超过共产党。但是形势的话，那很难说了，形势越来越不对了，形势变化了。”

陈布雷自己也知道，当时的人心，已经不在国民党那里了。

第三，对陈布雷打击更大的，是蒋介石对他的信心。

随着战局的恶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各方面工作越来越不满，其中也包括宣传工作。陈布雷曾向蒋介石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国民党的很多实际问题需要尽快改善，宣传才能取信于民，否则问题不解决，怪到宣传头上，是不公平的。

1948年初，毛泽东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摆到了蒋介石的案头上。蒋介石自己都感到，中共提出的各种策略和政策，都恰好戳到国民党的痛处。蒋介石遂召见陈布雷，表示为什么中共能有这样的文章，而国民党所谓人才一堆，却没人能写出直击共产党要害的文章？

据说那天陈布雷情绪激动，脱口而出一句话：“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

蒋介石当时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第四，陈布雷更是从自己的身上，感受到了国民党不可挽回的崩溃。

1948年7月，为了挽回已如脱缰之野马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新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新任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人，开会商定币制改革，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

陈布雷当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以及总统国策顾问。他虽然不懂经济，一言没发，却在会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坚持把当时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元法币经费存入了银行——当时有人劝他换成黄金避免贬值。

第二件事，他会后从庐山回南京途经上海时，回到家里，让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银器都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并表示“我们要带头遵纪守法”。

于公于私，陈布雷都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最后一搏”。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陈布雷用自己家的家当兑换的金圆券，最终成了一堆废纸。而当初存在银行的100亿元法币，最后只值几千元金圆券。

这两件事也给了陈布雷很大的触动：

“国家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被牺牲了，却便宜了金融家。”

面对这些困局，陈布雷也做过挣扎，也试图劝谏蒋介石，一是争取和共产党和谈，二是拿出些具体的办法来拯救党国。

蒋介石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他说曾有人劝他，要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和宋美龄一起拿出5亿美元来充入国库。蒋介石当时大光其火：“宋子文有什么钱，嗯！孔祥熙有什么钱，嗯！至于夫人，那就更没有钱了。所以，这个，散布这个言论，不管怎么说，只会给党国带来危害，有利于共产党！”

当时与会人士一致猜测：敢对蒋介石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只可能是陈布雷。

7

1948年11月11日，早已精神衰弱，长期失眠的陈布雷受到了“最后

一击”。

那天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宣布经济政策失败，他表示将取消“限价政策”，转而大量发行钞票，发行总额将不以20亿金圆为限。

陈布雷再没有经济知识，也知道国民党政府准备“滥印钞票”了，而这显然是一条加速灭亡的绝路。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还话中有话地说：

“各单位互不接洽，互不配合，互相拆台；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人对党国前途丧失信心，未能集中精力以纾危艰；有人公开散布失败情绪，在总统府的门口竟问别人‘你有没有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后路还是准备投共？甚至有个别党国中坚，在此多事之秋，以国家委以的重任持敷衍、推诿的态度……”

其实，蒋介石怎会说他？但陈布雷总是在想，蒋介石是不是在针对自己。

1948年11月12日晚上，陈布雷忽然变得非常健谈，与几位秘书聊了很久，从辛亥革命一直谈到眼前局势，说完便径直上楼。

上楼前，他关照秘书：“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我想安静一下。”

“我想安静一下”，就是陈布雷留下的最后遗言。

8

在陈布雷的房间里，人们后来发现了他写的多封遗书。

他自己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之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

……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太不相应了！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话说。

而他在给蒋介石的《上总统书》中写的是：

……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

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陈布雷还写了多封遗书，给朋友，给夫人，给秘书。他还特地叮嘱，自己遗留下来700元金圆券，其中拿300元给自己的副官陶永标——那个时候，300元金圆券只能买一石米了。

9

陈布雷的自杀，给蒋介石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1948年11月14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在第二版以三栏长题这样报道陈布雷的死讯：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

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

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国民党当时给出的陈布雷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

但是，深知内情的邵力子却发火了："宣传，宣传，一生从事宣传，到后来连老命都赔了进去，还要讲宣传！"

邵力子力主将全部事实向社会公布，"警惕党人"，"警惕社会"。随后，在11月18日的《中央日报》上，国民党官方承认了陈布雷的自杀："……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陈布雷自杀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给蒋介石，给家人，给同事写好了遗嘱，交代后事。



蒋介石率众祭拜陈布雷。后排左起第一人为李宗仁，中为何应钦，最右者为于右任

陈布雷被发现自杀后，蒋介石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虽然一言不发，但他取消了当天要参加的所有会议。

后来他曾对人说起，陈布雷给他的遗书，他“不忍卒读”，实在太伤感，说陈布雷的死，“等于砍了我的手和脚”。

11月15日，陈布雷的遗体在南京的中国殡仪馆崇敬堂进行了大殓。在大堂的正中央，高悬着蒋介石为陈布雷亲笔写的匾额：“当代完人”。

而陈布雷大殓的这一天，正是他自己的生日。

馒头说

其实，放在我面前的有三个题材供选——都和“死亡”有关。

一个是一代军阀孙传芳，他最后被自己下令斩首的人的女儿刺杀。

一个是报业大亨史量才，他最后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在路上。

这两个人一生的故事，包括最后的归宿，都有很多可写的地方。

但我却几乎没有犹豫地选择了陈布雷之死。

其实，写陈布雷的故事，挺痛苦的。因为必须从中体会一个知识分子从充满自信到迷茫彷徨，从气势如虹到悲观失望的全过程。

陈布雷的悲剧，甚至还延续到了他的子女一辈。

陈布雷有8个子女，他曾明令子女一个都不允许参与政治，所以陈布雷虽然是国民党高官，但8个子女竟然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党员。

但是，没有一个政党是从来没有走过弯路的。陈布雷心爱的女儿陈琏在抗战时期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在1967年的“文革”风暴中因家庭出身受到冲击，含冤跳楼自尽（后被平反）；最小的儿子陈砾也是共产党员，同样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后做到《中国日报》总编辑，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而陈布雷的嫡亲长孙陈师孟，在台湾又成了当年陈水扁的得力干将，脱离了国民党，加入了民进党，大力鼓吹“台独”……

陈布雷说自己不想当官，最想做记者，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之下，每个人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更何况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

在陈布雷的葬礼上，他的好友，国民党的另一个理论家和“笔杆子”戴季陶号啕大哭，说不理解陈布雷为何要选择走轻生这一条路。

三个月后，戴季陶于广州服安眠药自杀。

唉，百无一用是书生。

一幅名画背后的谋杀案

有这么一幅名画，我们只要学过历史，就都有印象，那是关于一个英雄被谋杀的故事。但如同“馒头说”的很多故事一样，故事的背后，还有故事。

1

1793年7月13日，夏日炎炎。

让–保尔·马拉正将全身浸在家里的浴缸中，忙碌地工作——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浑身瘙痒难忍，只能长时间浸泡在放有药草和矿物质的浴缸中。

而作为雅各宾派的主要领袖之一，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大革命时期，他又实在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处理，所以只能在浴缸中批阅文件。

门外似乎又一次响起了一阵争吵的声音。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之前的两次，似乎有人要进来拜访马拉，但马拉的情人西蒙妮将来客挡在了门外。但这位访客似乎非常坚决，不见到马拉就誓不甘休。

到第三次的时候，西蒙妮推门走了进来，她告诉马拉：门外这个第三次求见的女子，是来报告有关吉伦特派的阴谋的。

这无疑引起了马拉的兴趣。他让西蒙妮把那个女子请进来。

出现在马拉浴室中的，是一位看上去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很文静。

她自我介绍，叫夏绿蒂·科黛，从康恩赶来。

康恩正是被放逐的吉伦特派的聚集地。马拉开始对眼前这个女子产生了信任，他很快就问到了他期待的情报——科黛说：“支持吉伦特派的议员们正在密谋，他们四处煽动群众，准备造反。”

马拉问这些准备造反的议员共有几个人？科黛回答，有18个人。

科黛开始一一报出这18个人的名字，而马拉用笔在浴缸搁板的纸上开始记录，然后用一种轻松的口吻告诉他眼前这位姑娘："请放心，这些人不久后都会出现在断头台上。"

但马拉并没有看到姑娘对他回报轻松的微笑，而是看到她从披肩下掏出了一把刀。

那一刻，除浴缸里散发的药水味道之外，马拉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2

没错，这是我们熟悉的"马拉之死"的场景。

但是，长久以来，似乎总有不少细节显得很模糊：夏绿蒂·科黛是谁？一个女孩为什么要刺杀马拉？马拉究竟做了什么而遭人恨？女刺客后来怎么样了？

要搞清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很有必要简单捋一捋"法国大革命"的——显然，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做学生的时候，一听到这个名词，脑袋就会"嗡"的一声。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在1789年——从天灾上讲，法国因为气候原因连年歉收导致农民已经没有活路；从人祸上讲，那位带着自己王后骄淫奢侈的路易十六，坚持还要从第三等级（法国当时第一等级为天主教高级教士和国王，第二等级为贵族，第三等级为普通市民和农民）身上征税。最关键的是，当时法国的中下阶层不仅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的初步财富积累，而且早已经历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启蒙运动"的洗礼和熏陶，民智已开。

于是，一场可以预见的大革命终于爆发了。

在这场试图以"共和体制"替代"君主专政"的大革命中，以路易十六为代表的波旁王朝首先被推翻，天下大乱，而第一个登上执政舞台的，是吉伦特派。

吉伦特派也有过一些其他的名称，但因为其主要的几个成员来自法国的吉伦特省，故得此名。这个派别的成员大多来自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阶层，所以一般被历史教科书打上“软弱的资产阶级”标签。

但事实上，这个标签也对也不对。

说不对，是因为吉伦特派上台执政后，对内坚决反对君主专制，要求废除王权，在大方向上并没有含糊，并因此干了一件当时也有不少反对声音的事——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路易十六是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处决的国王，他生前还参与了断头台的设计）；对外，吉伦特派并没有屈服于欧洲干涉势力的入侵（因为波旁王朝被颠覆，欧洲的各国势力开始组成联军干涉法国内政）。



位于法国波尔多市梅花广场的“吉伦特纪念碑”



马拉的肖像画，和那幅名作中的形象有比较大的差别

说对，是因为吉伦特派虽然上台后做出过不少积极的措施，但总体来说，当时法国所处的革命环境用“狂风暴雨”来形容也不为过，而吉伦特派因为主要由工商阶层组成，所以没有能力在特殊时期拿出特殊的手段和办法：对外，他们对后来一拨又一拨的外国军队干涉显得疲于应付；对内，由于社会动荡，法国市场上的各种投机商闻风而动，囤货牟利，而崇尚自由主义的吉伦特派却又始终不肯施行限价政策，结果搞得民怨沸腾，失去了普通市民阶层，尤其是法国工人阶层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另一个派别迅速崛起，在1793年5月底接连发起三次起义，彻底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

新上台的这个派别，就是雅各宾派。

雅各宾派在政治主张上与吉伦特派并非没有相同之处：强调推翻王权，建立共和，但他们与吉伦特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他们信奉“乱世需用重典”，简单来说，就是对持不同政见者，基本只给出三个字的处理意见：杀！杀！杀！

在雅各宾派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领袖罗伯斯庇尔，但其实他们还有一员重要干将。

他就是马拉。

3

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马拉。

直到40岁之前，马拉还只是一名医生。作为一个从小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马拉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文，能说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对化学、物理和医学颇有研究，翻译过《牛顿光学原理》，出版过《光学基础知识》，还因为写《关于电的特性研究》而受到过里昂科学院的奖励。

1783年，原本就写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政论文章的马拉决定和很多伟大的革命家一样——弃医从文。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马拉很快就成为法国历史舞台中央的那一批人。

几乎由马拉一人担任撰稿、编辑、出版工作的报纸《人民之友》成了当时法兰西最有名的报纸。为了出版这份报纸而免受当局干扰和迫害，马拉长期在地下室工作和生活（这也是他患有严重皮肤病的重要原因）。在这张报纸上，马拉猛烈抨击专制的王权和温和的君主立宪派，强烈主张共和制，并发问：“穷人和富人都是国民，为什么穷人要遭受虐待？”

马拉的诸多观点得到了法国底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直接称马拉为“人民之友”。而马拉也作为“国民公会”的主席，成为雅各宾派的重要领袖之一。

但马拉在作为“人民之友”的同时，也被很多人反对，那也是他能成

为雅各宾派主要领导的重要原因——主张必须用专政和暴力的手段维护革命的成果。

于是就要说到马拉的另一面。

马拉坚决主张一切法律须经人民批准，但与此同时，他又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专政乃至独裁政府，才能保全革命的胜利果实。为此，一切暴力都是合理的——何止是暴力，他认为各种酷刑乃至肢解敌人，都是合理的。

为此，马拉曾在1792年的《人民之友》上呼吁必须要砍下敌人们的头颅，并且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目标：27万颗。

值得一提的是，马拉还是一个复仇心很强的人。

马拉曾经想在科学上有所作为，为此他曾写了一本关于“燃素”理论的《火焰论》。但这本立论就错误的书受到了当时法兰西科学院一位院士的批评。于是，在大革命风暴初起时，马拉首先喊出了口号：“埋葬这个人民公敌的伪学者！”这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那名院士后来被投入监狱，最终被送上断头台。

那位院士，就是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化学家”的“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

在马拉的推动下，一批又一批的政敌被送上了断头台，尤其是吉伦特派——马拉和很多雅各宾派的人一样，特别痛恨吉伦特派，认为他们是王室的帮凶、共和的敌人。



拉瓦锡是贵族出身，当时被处决的罪名是他是一名“包税官”，剥削了人民。他给“氧”和“氢”命名，预测了硅，提出了燃烧的本质是氧化。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在拉瓦锡被斩首后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

1793年底的那场起义，让雅各宾派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而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防止敌对势力的反扑，以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为首的雅各宾派人将一批又一批吉伦特派人送上断头台，并将一批非常具有名望的吉伦特派人逮捕入狱，准备送上断头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罗兰夫人。

雅各宾派的残酷镇压开始渐渐让人产生恐惧和反感，就连温和的吉伦特派也在康恩酝酿如何反攻——尽管应者寥寥。

而一个有同情心和赞成吉伦特派的年轻女子，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杀掉马拉。

没错，这个女子，就是夏绿蒂·科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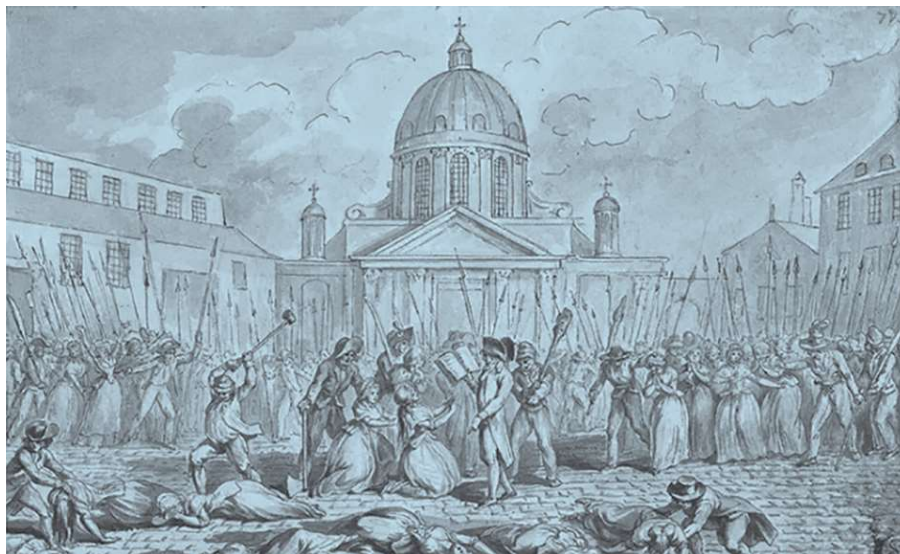
科黛1767年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她的祖辈可以追溯到法国著名的悲剧戏剧家高乃依。科黛自幼丧母，她和妹妹被父亲送到了修道院。在修道院里，科黛读了很多书，包括大量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和世界观。

在一次亲戚朋友的聚会中，大家提议为国王干一杯，只有科黛一人拒绝举杯，因为她认为路易十六是一位懦弱无能的国王，他没能让他的人民脱离不幸和苦难。科黛早就不对婚姻抱有期望，她已确定了自己唯一的“情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法兰西。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科黛充分阅读和了解了各个党派的主张和政策，认为诸多党派中，吉伦特派是最可信赖的。几乎每一场吉伦特派的公众演讲，她都会去旁听，她相信他们能够拯救法国。

所以，当雅各宾派上台执政，尤其是开始大肆逮捕和处决吉伦特派人的时候，科黛觉得心中的怒火被点燃了，她认为自己可以为吉伦特派，不，应该说是为自己的法国做一件事——杀掉雅各宾派的主要发动机：马拉。

在科黛看来，马拉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他会毁掉整个法兰西。



这幅画描绘的是发生在1792年的法国“九月屠杀”。当时干涉的普鲁士军队兵临巴黎，有传闻说外国军队进入巴黎后就会释放监狱里的政治犯，包括王室成员。马拉当时在媒体上呼吁：“在外国侵略者进入之前，就把监狱里的犯人全部杀掉！”于是，巴黎监狱里无论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大批人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屠杀，很多犯人甚至被肢解，而大量女囚犯死前遭受了各种羞辱和强奸，其中包括王室公主。有超过1200人在这场屠杀中丧命，当时震惊世界——科黛认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件背后，马拉起了很大作用

直到现在，依旧有很多人无法相信，这个当时才26岁的女子为何会如此果敢——拿定主意后就立刻只身一人前往巴黎，决定将自己的计划实施。

到了巴黎后，科黛很快打听到了马拉的住处。她待在旅馆里平静写完了《致法律和和平之友的法国人书》，交代了要杀死马拉的动机。在7月13日这天，科黛给自己进行了精心的打扮，出门，到刀具店买了一把刀，藏在了披肩之下，来到了马拉的住所门口。

以科黛的身份，马拉是不可能亲自接待她的，所以她在前两次求见被拒绝之后，很快找到了马拉最感兴趣的一个点——提供一份准备造反的吉伦特派的人员名单。

果然，她被获准进入马拉的浴室。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5

当马拉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的时候，科黛的刀已经刺进了他的胸

膛。



法国画家让-约瑟夫·韦特笔下的“马拉之死”

一刀戳穿了马拉的肺部，一刀砍断了他的颈动脉，马拉发出的哀号响彻整间屋子，转眼间就死在了浴缸里。

科黛随即走到隔壁房间，静静地等待被逮捕。在警察到来之前，一位正好来马拉家送文件的议员抡起一把椅子砸倒了科黛。当科黛被捆绑起来之后，包括警察在内的众人都无法相信，眼前这个文静的女子和这场血案有关。

他们开始搜科黛的身，试图找出她和吉伦特派有关联的证据，但是只搜出了旅行证、出生证、手表和一些钱款，另外，就是一包针线——显然，科黛怕逮捕后衣服被扯坏，所以准备带针线到牢房里去缝补。

7月17日，被关押的科黛等来了预料中的审判。

马拉被刺杀轰动了法国，无数人在那一天挤到了庭审现场，希望看一看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到底长什么模样。

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却是一个看上去很瘦弱的女子，而且面对法

官的询问，她显得相当平静。

“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

“为了法国的和平。”

“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



据说这幅画画的就是夏绿蒂·科黛，但真伪待考

“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但法官的一个问题让科黛的回答陡然高亢起来：

“你的杀人技术很高明，以前也干过同样的事情吧？”

“您太侮辱人了！您以为我是杀人犯吗？”

接着，科黛就在法庭上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一句话：“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死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我无所畏惧。”

但是，这个年轻的女子真的对这个世界无所留恋了吗？

似乎也不是。

审判结束得很快，结局并没有悬念——死刑，立即执行，上断头台。

在听到宣判结果之后，科黛向法官提出了一个小要求：希望有一位画家，为自己留下一幅肖像画。

法官满足了她的这个要求。

从宣判到行刑，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几个小时里，科黛就静静地坐着，让画家画肖像。

在画家接近完工的时候，一位名叫桑松的刽子手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件红色衣服——死刑犯必须要剪去长发，而红色代表犯人的罪行是杀人。

科黛的声音毕竟还是起了一些颤抖：“已经到时间了？”

但她还是平静了下来。当她的一头金发被剪落后，科黛从地上拾起了一束递给了画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感谢您的东西，就请收下这束头发吧。”

随后，她就跟着刽子手走出了房间。

关于科黛上断头台的过程，留下了不少细节。

当时在前往断头台的道路两边，挤满了围观的法国老百姓，他们愤怒地叱骂杀人凶手，或者对她起哄嘲笑，而科黛始终面朝前方，面带微笑。

科黛在路上就问过桑松一个问题：“马拉真的会被葬入先贤祠吗？”

先贤祠，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

桑松当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能做的，只是在临近断头台时，取出一块黑布给科黛蒙上双眼。但科黛却拒绝了：“我也是个有好奇心的人，难道我不能亲眼看看断头台的样子吗？”

说完，科黛就把头探了出去。当她看到那架著名的断头台时，脸上忽然失去了血色，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随后，她拒绝任何人的帮助，自己爬上了断头台。桑松为她披上了一条披肩，免得当她被斩首时，俯卧下来会被围观的群众看到胸部。

科黛自己将头放到了断头台的平台上，一言不发，静静等候。

铡刀高高吊起，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陡然落下。

全场围观的观众发出兴奋的呼喊和口哨声。

就在科黛人头落地的那一刹那，刽子手桑松的助手、一个崇拜马拉的木匠冲上前去，拿起科黛的头颅拼命抽打她的耳光。哪怕是再想看热闹的围观群众，都被这个粗鲁的动作激怒了。

但更著名的传说还在后面——现场有不止一个目击者在事后表示：他们看到科黛的脸颊泛起了红潮，并出现了愤怒的表情。

但哪怕这个传说是真的，科黛也只可能再保留短暂的意识，她是不可能知道后面所发生的事的：

马拉的心脏被雅各宾派放在了俱乐部的墙上当作“美德的圣物”，进一步激发他们专政的决心和斗志；

那些吉伦特派的灵魂人物，包括罗兰夫人在内，在几个月后都被“雅各宾派”一一处决；

马拉真的被葬入了先贤祠，与之前在那里的伟人卢梭、伏尔泰等比肩。

失去马拉的“雅各宾派”并没有停止专制的步伐，却也陷入了内斗：领袖罗伯斯庇尔把另一个领袖丹东也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最终在“热月政变”中被推翻，把无数人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一倒台，马拉的棺木又立刻被移出了先贤祠。

这一切，科黛都无法见证，能一一记录的，只有历史。

馒头说

最后来说说关于《马拉之死》这幅画。

这幅画的作者是法国的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他是马拉的好友。就在马拉被刺之前两天，他还在马拉的浴室里和他见过面。马拉被刺之后，大卫立刻就赶到了刺杀现场。在看到现场之后，他就产生了要把这一幕画下来的念头。

三个月之后，著名的《马拉之死》就诞生了。



雅克·路易·大卫画的《马拉之死》

在这幅画作里，马拉的形象无疑被美化了，不仅仅是他的“疱疹性皮炎”被掩饰，而且从构图、光线处理和技法上，让马拉拥有了“圣徒”一般的形象。为此，大卫还不惜凭借自己的想象，在画中的一张便条上写上了马拉的遗嘱：“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大卫后来做的，其实还不止画一幅《马拉之死》那么简单。

他当时还提出一个建议：为了让人民瞻仰，马拉的遗体应该保持倒在敌人刀下那一刻的姿势。

在巴黎炎热的夏天里，这个建议被雅各宾派采纳了。死后的马拉满身溃疡，尸体很快腐烂发臭，脸部因痛苦而变形，舌头伸出口外，怎么也塞不回去，不得已只好割掉。大卫想的办法是把马拉的全身遮住，只留出脸部和一只手，而这只手还是从其他死人身上切下来接在马拉肩上的，因为马拉的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据说由于亲吻这只手的民众实在太多，最后它竟从身体上掉落下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拉在大卫心目中是原来那个马拉，还是已经升华为他心中理想的化身呢？

这幅《马拉之死》的画作完成后，被挂在当时巴黎“国民公会”的墙壁上，雅各宾派的成员们做出承诺：永不移动，警示后人！但在第二年的“热月政变”后，这幅画就被取下来还给了作者，并就此被打入冷宫，直到100年后才重见天日，被布鲁塞尔博物馆收藏。



保罗·波德里画的《马拉之死》

之所以说这些，不是想讨论《马拉之死》这幅画本身，而讨论马拉和科黛谁究竟更正义，完全可以另写一篇文章。

在这里只是想引出另一幅画，画的也是“马拉之死”，但作者是另一名法国画家保罗·波德里。他画这幅画的时间，是在1860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71年。

我们再看这幅画，无论是构图，还是画中两个人的神态、表情，画家的倾向性其实已经非常明显。

看完各种类型的《马拉之死》画作，尤其是这两幅画的对比，不知各位读者有何感想？

所谓的“有图有真相”，在某些特定背景下，真的存在吗？

有时候我们所要呈现或想要承认的，是不是只是我们心底里希望的那副模样。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残酷的处刑史》【（日）桐生操著，转引自百度百科】

2.《〈马拉之死〉塑造的“圣徒”形象》（吴洪，“凤凰艺术”网站，2017年7月14日）

人生终会谢幕，侠客永不独行

这是我在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仙逝的当晚，写的一篇悼念文字。很乱，也不系统，但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收录于此书，算是一种纪念和致敬。

1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好在校对第二天的公众号推送文章。

改的时候还有点得意：今天完成得比较早，估计待会儿能有点时间去玩会儿《荒野大镖客2》。

然后就扫了一眼手机微信群，看到一个人发了一条消息：

“肯定又是假新闻！”

什么假新闻？

往上一翻，心跳仿佛停了一拍。

金庸去世了。

虽然之前就有所耳闻：金庸老先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经卧床不起，近乎昏迷状态，但消息真的传来，却还是觉得无法接受。

在查阅了一系列信息源后，确认消息是真的。

然后大概有一个小时，就瘫坐在沙发上，痴痴地发呆。

“总得写点什么。”我自己想。

却又不知道写什么。

像以往的“馒头说”那样写一篇人物故事？点开微信后台，确实有不少读者已经发来了诉求。但我觉得我写不出来。不是因为信息太少，而是因为信息太多了。金庸的生平故事和传记汗牛充栋，根本不缺我这一篇。

写一篇分析或评述？有六神磊磊在那里，我也就没必要贻笑大方了。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收到了六神磊磊的推送：我再也没有后台了。

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写一篇自己读金庸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没有什么曲折，也不会有什么文采，但我觉得还是要写，这是写给自己的回忆。

打开文档，将原来那篇推送复制保存，说一声“明年见”。

开始回忆。

2

那应该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那天晚上，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的父母要值夜班，他邀请我们几个平时玩得好的人去他家一起过夜。那种兴奋的心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甚至提前一周就开始憧憬大家一起打游戏，看电视，吃零食。

结果那一整个晚上，我都没参与玩耍。

因为我在他父母的书橱里，发现了一套书，叫《射雕英雄传》。

我至今仍记得当时那种感受：就好像一个穷困潦倒的海盗忽然登上了传说中的金银岛，被闪耀着金光的各种珠宝几乎亮瞎了眼：

竟然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世界？！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通宵，从晚上7点半看到早上6点50分，一口气把这套书全看完了。之后顺带查了下同学家的《辞海》——我的天哪！历史上居然真的有王重阳和丘处机！

那一天到学校上课，我虽然一夜没睡，却精神抖擞，感觉自己浑身闪着光，在课堂上任由思绪神游远方，满脑子都是“九阴真经”和“降龙十八掌”。

从那一天起，我疯狂地向我认识的人推荐一个叫“金庸”的人写的武侠小说。我的父母和语文老师都很开明，从不限制我看书，所以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完了金庸所有的书。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金庸已

经封笔了，所以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他下一部新作问世。

当然，和很多人一样，在这个等待过程中，我认识了“全庸”“金庸巨”“金庸新”等一干作家。

我想，那时候金庸最吸引我的，应该是他笔下的故事。

3

写故事是有一条金线的。

我看过很多作家，有的辞藻华丽，但叙事能力很差，一写长篇小说就露出了马脚。而有的作家，埋包袱技巧一流，逻辑性也强，但一部长篇小说写下来，故事性极强，却毫无文采。

而金庸就是那种超越金线的人——论文采和叙事能力兼备，他在华语文坛属于超一流的行列。

金庸的故事，绝对不会上来就制造一个惊天悬念，就是那么平平淡淡，像一幅画卷，徐徐展开。在他的一些小说中，甚至最初着墨颇多的几个角色，根本就不是主角。

这种笔力的背后，透着的是一种功力和自信——只要你看下去，嗯，你肯定会看下去。

我那时候也看古龙，觉得也很好看，让人欲罢不能，但又总觉得他似乎比金庸差了一口气。现在想来，应该是因为两人讲故事的方法不同。

在古龙笔下，如果有一座长安城，这座城就只有一条街，街上只有一个酒馆，酒馆里只有一个人，一个要杀你的人，或者你要杀的人。

而换到金庸笔下，同样是一座长安城，这座城有十横十纵二十条大街，每条大街上商家鳞次栉比，有饭店，有酒馆，有药房，有镖局，有妓院，三教九流、贩夫走卒络绎不绝。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可能有要杀你或你要杀的人，但更可能的，是你要保护或要保护你的人。

那时候，在夏日的蚊帐里，我盘坐在席子上，也会试试体内有没有一口真气能够冲破“膻中穴”，或者在冬日的夜晚点一根蜡烛，用手指戳

半天，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六脉神剑”。

从初中到高中，我每年寒暑假都会通读一遍金庸，直到进了大学，慢慢发现自己看金庸武侠的关注点有了变化。

从故事，转到了情感。

4

金庸笔下的爱情，不露声色，却又浓烈至极。

在主舞台的聚光灯下，从“靖哥哥”和“蓉儿”到“过儿”和“姑姑”，从“无忌”和“敏敏”到“段公子”和“神仙姐姐”，每一个爱情故事的归宿其实都是相同的，但每一段过程却都有各自不同的百转千回，让人过目不忘。

而金庸的功力，更体现在那些配角的爱情上。随口可以报出一串名字：李莫愁，阿朱，阿紫，岳灵珊，公孙绿萼，郭襄……熟悉金庸武侠的人一听到这几个人的名字，脑海中就会立刻浮现出一段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有些甚至比主角的故事更让人刻骨铭心。

我曾和六神磊磊开玩笑说：知道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女性读者吗？其实她们未必都看过所有的金庸故事，甚至未必熟悉金庸，但你举的那些金庸爱情故事的例子，古往今来，全都适用，全都动人心扉，全都让人辗转反侧。

我还记得我读大学时写过不少关于金庸的评论文章（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也是金庸），戏谑地提到过一句：金庸对中国年轻男性祸害不浅。

为什么？

君不见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一个个出身平凡，但都红运当头，大难不死不说，还会学到天降武学。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读者会渐渐认同一个观念：只要你够单纯，够天真，够善良，甚至略带点傻气，那么美女们就会对你青眼有加，甚至投怀送抱——女孩子，是不用去追的。

那么，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有几段感人的爱情，这是否就是金庸武

侠的精髓了呢？

5

直到工作后，我才领悟到，金庸武侠一直吸引我反复读却不厌的，是贯穿他所有故事的一个字：侠。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渐渐从年少时的仰视金庸，过渡到了平视他（当然，在写作才华上还是膜拜式仰视），包括他对婚姻的一些态度，包括他之后反复修改自己作品的做法，我都持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每次整理书橱，翻到金庸的书，我只想顺手翻两页，但翻着翻着，半天就过去了。

论故事，每个故事的结局都了然于胸。论爱情，每段爱情的结局都心知肚明。

但就是会控制不住地看下去。因为我发现，金庸武侠真正吸引我的，还是激荡在文字间的那股“侠气”。

我一直觉得金庸是写不好浪子的。

古龙几笔勾勒，从书页上就能闻出一股浓浓的酒气，但金庸好不容易写个令狐冲，哪怕豪饮的时候，都略微透着一种“尬”。

但古龙也根本写不了侠。

因为他和金庸相比，没有后者心中的那种责任感，那种责任感不是口号式或作秀式的，而是真正体现在主角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的。

从小了看，是“锄强扶弱”，往大了说，是“家国天下”。

也就是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6

所以后来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受金庸最大的影响，还是那个“侠”字。

“侠”究竟是什么？说实话，虚无缥缈，至少我说不清楚。

但我知道“侠”是一种理想，一种可以坚持一生的理想。

当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金庸的我们，都已经从校园走上了社会。其实我们都已经明白，世间不存在什么可以一跃三丈高的轻功，也不存在什么可以开山裂石的内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现实而残酷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都看到过很多不公，也会遭受不少挫折，年少时憧憬的对酒当歌成为一种奢侈，而仗剑天涯更成了一种幻想——你不可能像令狐冲那样率群雄围攻少林寺，也做不到像乔峰那样杯酒断情快意聚贤庄。

但我相信，很多人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放弃。

我们并不会“独孤九剑”或“九阴真经”，但该站出来的时候，绝不会退缩；我们并不是家财万贯或能挥金如土，但能提供帮助时，绝不会吝啬。

因为，我们心中的那团火从没熄灭过。

武侠武侠，现实世界中可以没有“武”，但总是会有“侠”。

我想，这也是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7

之前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一段对话。

写在这里，权作本文的结尾。

“来啦？”

“是，来了。”

“好久不见啦，来，喝口酒？”

“不了，谢谢，之前就戒了。”

“换了个世界啦，不妨重新开始喽？”

“还是不了，你是写过李寻欢的人，你随意。”

“哈哈，你也写过令狐冲啊，大侠，来一口嘛！”

“呵……还是不了吧。”

“你这家伙，洒脱些，其实世间哪有什么武侠，还不都是写来换酒钱的。”

“不，世间或许没有武，但肯定有侠。侠，我相信在每个人心间。”

“好一个‘侠在心间’！那就但愿吧！来！干！”

“嗯，但愿。干！”

谨以此文，纪念金庸老先生。

谢谢您的文字。

侠客永不独行。

妄念

“妄念”从字面上看就很容易理解：不正当的虚妄之念，甚至是邪念。

“妄念”和“信念”不同，和“执念”也不同。虽然它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即便在当时，从客观来看也是错误的，是注定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为了这种不切实际乃至荒诞的想法，坚持走下去，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

但是古往今来，为妄念飞蛾扑火的人，绵绵不绝。

陈公博：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不忘初心”，这句话只有四个字。但真的要做到，却又何其难，何其难。

1

1892年10月19日，广州北门的陈府张灯结彩，鞭炮连天。

陈府的主人叫陈志美。他可不是一般人，是清朝的广西提督，堂堂从一品的大官。

而陈志美之所以要庆祝，是因为这一天，他以60岁的高龄喜得贵子。

他给这个宝贝儿子起名叫“陈公博”。

虽然是老年得子，又家境富裕，但陈志美对这个儿子倒也不娇惯，从小就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而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这个儿子对读书也有极大的兴趣。

事实上，除了必读的“四书五经”之外，陈公博童年最钟情的是小说。不过陈公博看小说，会在看完之后举一反三，再去找正史看。比如他迷上《三国演义》，就会再去看《三国志》印证；看完《隋唐演义》，就会去看《新唐书》《旧唐书》；看完《说岳全传》，就会再去翻《宋史》。



陈公博

应该说，陈公博从小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国学和文学底子，这也使得他之后以“一支笔”而闻名。

而作为父亲的陈志美，除了在读书方面对儿子进行刻意培养之外，还有一点也对陈公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革命。

陈志美是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才官拜广西提督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无能。在晚年，陈志美是非常同情甚至倾向“造反”的。他甚至将原来的部下化作“会党”，真刀真枪谋划过一次“起义”，但最终起义失败，陈志美自首揽下全部责任，最后凭借各种关系保下了脑袋，被判终身监禁，但家产充公，陈家家道从此中落。

在父亲的影响下，年幼的陈公博也在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而且，他的理想比父亲更进一步：不是换个皇帝，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

2

年轻有才的陈公博，可谓生逢其时。

1917年，25岁的陈公博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彼时的北大校长是蔡元培，学校风气开放，名师云集，各种先进的学术思想交汇，让陈公博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毕业后的陈公博回到老家广州担任法政学校的教授，此时更是觉得风云激荡：从清末开始，广州就一直是革命的中心地带，而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又回到广州主政，再次让广州成为革命中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刚刚结束，各种民主思潮波涛汹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被一部分中国人熟悉并接受——其中就包括陈公博。

当时的陈公博感觉广东的报纸文字粗鄙，思想平庸，于是大笔一挥，自任总编辑，办了一张《广东群报》。陈公博才华横溢，写的文章又针砭时弊，贴近社会，再加上宣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让人耳目一新，所以《广东群报》当时轰动广东，一时洛阳纸贵。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公博被陈独秀看中，被任命为中共广州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书记是谭平山）。担任宣传委员后的陈公博开辟了多个专栏，在《广东群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开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了大批年轻革命骨干。

因为工作出色，1921年7月23日，陈公博作为广州支部的代表，带上自己的新婚妻子李励庄，以“度蜜月”之名，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了当时出席会议的13个人之一。

在这次大会上，因为政党初建，从各地来的代表互相交流乃至互有争论。这本属正常的场景却让陈公博感到颇为失望（他后来回忆说，觉得张国焘太盛气凌人），再加上他极力反对大会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去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做官或成为议员”的规定，所以在会上他就似乎觉得有点“心灰意冷”。

7月30日晚，大家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闯入了一个法租界的密探，会议顿时中止，大家四处分散。而陈公博是留在屋子里的，受到了后来闻讯赶来的法租界警察的盘问，心中更是惊恐。

当晚回到旅馆，陈公博就和妻子商议，准备打退堂鼓。巧合的是，当晚陈公博下榻的旅馆房间隔壁，正好发生了一起枪杀案。虽然事后证明这是一起情杀，但又把陈公博吓得不轻，他与妻子将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在房间内焚毁，然后匆匆退房。

当中共一大代表决定转移到嘉兴继续开会的时候，陈公博告诉大家，他和妻子要去杭州，就不再去嘉兴开会了。

原本在各代表心目中是一个新起点的中共一大，却成了陈公博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自从中共一大之后，他对共产主义就失去了兴趣。

回到广州后，他与党组织渐行渐远。在后来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后，陈公博在党组织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孙中山的前提下，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更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1922年底，陈公博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去美国留学。

而在去留学前，他发表了声明，决定进行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转弯：脱离中国共产党。

3

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倒也真的是想好好读书的。

陈公博读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第一年，他依旧埋首研究马克思主义元典，第二年，开始攻读美国的经济。在勤工俭学的过程中，陈公博接触了美国的底层社会，进而对英美的社会制度也产生了反感。

他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也不认同英美的经济理论，当时的他相信，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5年初，陈公博顺利读完硕士，想继续读博士，无奈囊中羞涩，就向自己的故友，当时已担任广东省省长的廖仲恺求助。但廖仲恺的回复是：给钱读书，不干！给钱回国，可以！因为现在国内革命正是用人之际。

陈公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他还把中共一大的纲领写到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中。他在论文里面否定了共产主义，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无奈之下，陈公博只能放弃学业回国。

回到广东后不久，廖仲恺就找他面谈，劝他从政。于是，陈公博在脱离共产党三年后，加入了国民党，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次转弯。

刚刚入党，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书记。如此年轻、如此资历就能坐到如此高位，陈公博认为这是廖仲恺对他的赏识。但1925年8月20日，身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廖仲恺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公然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举国哗然。

廖仲恺去世后，陈公博本以为自己失去了靠山。但是，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公博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跃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如此迅速高升的背后，是陈公博找到了一直在背后真正“撑”他的人。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4

汪精卫其实在1919年就注意到了当时27岁的陈公博。

那一年，陈公博写了一篇叫《督军问题》的文章，全文两万多字，痛斥当时“督军”制度的危害，并提出了一系列整改措施，让当时的汪精卫和廖仲恺眼前一亮。

汪精卫很欣赏陈公博的才华，所以对加入国民党后的陈公博一路提拔，一直试图让他成为“自己人”。而从小爱看各种忠君和侠义小说的陈公博，也一直将汪精卫的“知遇之恩”铭记在心——“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从”，陈公博已经将汪精卫视为自己的“明主”。

当然，陈公博当时明面上要“效忠”的人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

蒋介石一度也很欣赏陈公博的才华。北伐战争期间，陈公博是作为重要随员跟着蒋介石北上的。在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往南昌后，他还把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的重要位置交给了陈公博。在“迁都南昌”的问题上，蒋介石也采取了陈公博“韬光养晦”的策略，服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并委任陈公博为组织部代理部长，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

但是，1927年4月的“宁汉分裂”一发生，陈公博就迅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跟随汪精卫到了武汉。虽然不久后“宁汉合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是陈公博已经完全表明了态度，自此成为汪精卫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后来的“国民党改组”等事件中，陈公博在很多事情上都惹恼了蒋介石。

但蒋介石自己也知道，他已无力争取陈公博，因为他已经完全是汪精卫的人了。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了1931年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的各个党派斗争暂时都平息了下来，而两股最大势力的代表，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开始了至少是表面上的合作。

日本人的入侵改变了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也改变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人的命运。

当然，也改变了陈公博。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陈公博和汪精卫其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抗战”，陈公博和汪精卫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坚决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在“一·二八抗战”期间，陈公博还和李济深一起，带着刚造好的10万颗手榴弹到上海，鼓舞十九路军一定要抵抗到底。

但到了1933年的“长城抗战”期间，汪陈两人的思想都开始发生变化。

当时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派陈公博为代表，前往古北口抗战一线慰问部队。陈公博在前线碰到了一个幸存的伤兵，伤兵告诉他，他所在的连队有100多个人，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我们很多弟兄根本没见到日本鬼子的影子，直接就被他们的飞机给炸死了。”

日军强悍的战斗力给陈公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汪精卫也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了中日当时在国力和军力上的差距，两个人在这一点上相互认同、相互影响：中国肯定打不过日本，要找一条“和平”的道路。

自那以后，陈公博和汪精卫一起，从当初的“主战派”转为了“主和派”，认为“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

但是，汪精卫最终走出的那一步，大大出乎陈公博的意料。

1938年11月，陈公博正在成都训练党员，忽然接到了汪精卫的电报，要他到重庆去一次，“有要事相商”。陈公博赶到重庆的汪公馆后，汪精卫直截了当告诉他：已经和日本和谈，即将离开重庆。

陈公博大惊失色，继而大力反对。

据陈公博后来自己的回忆，当时他的意见是：第一，国民党好不容易统一，不能再分裂；第二，对外问题应该保持一致，即便要求和，也要保持一致；第三，日本人出尔反尔，是没有诚意的。

两人从早上辩论到中午，吃过午饭再辩，整整一天下来，陈公博也无法说服汪精卫。

到了12月，汪精卫的心意更决，再次电召陈公博面谈，称“中国已

经无力再战”，并提出已与日本的近卫内阁达成五点一致：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果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陈公博对前三条都不同意，认为这等于是把满洲、内蒙古和华北都丢了。但他还是无法说服汪精卫，两人又争辩了起来。这时，坐在一边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对陈公博说了一句：“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

这句话戳中了陈公博的痛处。他回家后反复思考，认为汪精卫若真走，自己留在重庆也将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甚至被认为是留下来的“眼线”。

1938年12月中旬，陈公博最终随着汪精卫来到了越南河内，但他临走前给蒋介石留了口信，说自己将竭尽所能阻止汪精卫投敌。

但汪精卫已经在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不回头，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公开发表声明投敌。在这个过程中，陈公博表现出了非常矛盾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称自己要照顾病重老母，一概不参加汪精卫和日本的任何谈判，并且还和汪的另两个亲信高宗武和陶希圣一起去做过最后努力，试图劝阻汪精卫。

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脱离汪精卫。1940年1月，高宗武和陶希圣在最后时刻“反水”，通过《大公报》公布了汪日密约的条款，举国哗然，骂声一片。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公博依然无法做出最后的决断。

最终，在汪精卫的不断劝说下，陈公博进行了影响自己人生的最大一个转弯：加入汪伪政府。

陈璧君在得知陈公博终于愿意出山后，赞道：“公博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

这“忠臣”二字，不知从何说起。

6

毫无疑问，陈公博立刻就成了汪精卫最看重的“二号人物”。

在汪伪政权里，陈公博担任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参与了汪伪政权的每一项重要决策，在1940年10月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后，他还接过了这个职务。

根据当时打入汪伪政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时雨后来回忆，陈公博做事很认真，事无巨细都会过问，能拍板当场就拍板，绝不拖拉，而且一干活就是从早上干到大半夜。他对下属也出手阔绰，给手下处长一级的重要官员，都是7到10根金条，配别墅和汽车。



陈公博陪汪精卫出访日本，和东条英机在一起

陈公博总是和下属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在上海搞一个廉洁政府，日本人现在说蒋介石是贪污政府，我们一定要让日本人看清，我们不是蒋介石那一套！"

但是，陈公博首先自己就做不到。

他把自己的秘书和亲信莫国康（其实为他的情妇）的弟弟莫雅德安排做委员会的封锁管理处处长，管禁运毒品，收税收粮，贪污腐败；把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委派为上海禁烟局局长，面禁暗卖，敛财无数。

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里的人其实已经魂不守舍

了——他们绝非蠢人，不然不会两面骑墙；也正是因为他们绝非蠢人，所以心里都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这一点，陈公博自己又何尝不清楚？



前呼后拥的陈公博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一时之间，汪伪政府上下人心惶惶。

1945年1月，陈公博作为“二把手”，接替汪精卫，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这个“代”字，是陈公博坚持要求加上去的。此时此刻，陈公博开始整顿整个汪伪政府的财政和军队，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准备继承汪精卫的“遗志”，而是制订了一个“K计划”，试图以保证上海和南京完整交给重庆政府而不交给共产党为条件，开始和蒋介石联络。但是，早已和周佛海取得联系的蒋介石，根本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就在陈公博怀着矛盾的心情继续主持汪伪政府工作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25日清晨，陈公博带着妻子等人飞往日本。

在此之前，陈公博曾通过杜月笙联系蒋介石，希望得到宽恕，但没有任何回音。知道情况不妙的陈公博随即收拾好家当，带着家人前往日本京都——陈公博化名为“东山公子”，妻子化名为“东山文子”，最终住到了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日本政府的打算是让陈公博这样长期隐居日本。但是蒋介石政府坚持向日本要人。情急之下，日本方面甚至通过小报炮制过假新闻：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但中国方面态度坚决：如果自杀，需要由中国方面开棺验尸。

无奈之下，连自己战犯都保不住的日本政府，只能将陈公博引渡回中国。

陈公博被引渡回国后，先是被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临时看守所，独自一间。吃饭有人送，但马桶要自己倒，且是和其他犯人一起。没多久，陈公博向卫兵司令请求，说好歹自己担任过国民政府代主席，还是希望能给点面子。于是，他被获准每天可以提前或拖后单独倒马桶。

在被关押期间，陈公博要来纸笔，写了长达3万字的《八年来的回顾》，里面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同时竭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但是，陈公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徒劳的。他很快与陈璧君等人一起，被转到了苏州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看守所——陈公博知道自己活下来的机会不大了，因为这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地方。

1946年4月5日下午，公审陈公博。

尽管他与法官当庭抗辩了很久，试图证明自己无罪，但法官在一周后的宣判却简单有力：

“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1946年6月3日早晨，陈公博的单人牢房里忽然走进了几名法警。陈公博顿时知道，他的最后期限到了。



陈公博在法庭上

陈公博要求去和关押在隔壁房间的陈璧君告别。见到陈璧君，他拿出一把小茶壶递给她："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他还要求给蒋介石再写一封信，信中再三叮嘱一定要对付共产党，不过写到一半，自觉无用，又搁笔不写了。

临行前，陈公博走在前，执行法警走在后。陈公博还再三叮嘱："麻烦待会打好一点，不要太破相。"到了行刑地点，他问："站到哪里？"话音未落，法警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从陈公博后脑入，右颊出，当场毙命。

家人于一天后取回遗体，先在苏州匆匆安葬，后移到上海某公墓，连墓碑都没敢立。

馒头说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个题目，其实适合不少汉奸。

汪精卫难道不适合吗？当年可是因"引刀成一快"而名满天下的英雄。褚民谊不适合吗？当初与蔡元培等人在法国支持中国爱国留学生，

堂堂医学博士。周佛海不适合吗？当年也是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

但最终，他们都晚节不保。

分析他们思想转变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性格问题，汪精卫优柔寡断，陈公博愚昧忠心。比如判断能力，汪精卫和陈公博都只看到了日本人当时强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人坚韧的一面。

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的欲望。

汪精卫一直以孙中山正统传人自居，但在国民党内却始终被蒋介石压一头，长期郁郁不得志，动不动就撂挑子不干。他最终投靠日本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能力，用权力来证明。

陈公博虽然当初力劝汪精卫，但陈璧君一句“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还是触动了他。汪精卫一走，他有什么官可当？要当官，只能跟着汪精卫。

据传，法警最后去陈公博牢房带人的时候，陈公博正在写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这句后来经人考证是模仿林则徐等前人的话，意思是希望当局能以一种宽容的气度来对待他们这些并非“民族罪人”的人。

然而，这些人一直挂在嘴边的“君行其易，我行其难”或者“我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为中国保留更多的种子和希望”，是真的出于无私的爱国心吗？

呵呵，他们自己心里恐怕是最清楚的。

所以，对于这批汉奸，我们可以感慨他们的一生，反思他们的转变，但这地，不能洗，也没法洗。

汉奸，就是汉奸。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沉浮录》（苗体君、窦春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7年3月14日）

2.《汪伪巨奸印象》（李时雨口述，张德旺整理，《百年潮》，2005年第3期）

3.《汉奸陈公博被枪决前写给蒋介石的自白书》（凤凰网，2009年4月16日）

4.《“乱世能臣”陈公博》（石源华，团结出版社，2008年12月）

5.《陈公博的诡谲人生》（王海龙，《羊城晚报》，2011年6月11日）

6.《陈公博：最不应是汉奸的汉奸》（球圆字方，搜狐历史，2017年12月26日）

7.《信仰路上的忠诚与背叛——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路》（张鹏、鲍华东，微信公众号“国防参考”，2016年7月25日）

一个自认“戴罪立功”的汉奸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身份有点复杂。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他作为一名国民党员，做到过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作为汪伪政权的要员，做到过伪财政部长。他是一个汉奸，但他又说自己其实是潜伏的“特务”。一生多变如此，民国时期真的找不出几个人了。

1

1948年2月28日这天，南京首都监狱里死了一个人。

南京首都监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狱，里面关过很多人，死一个人，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但这一天死的这个人，却有点特别。

他的死去，让很多老百姓拍手称快，也让一些人长吁一口气，比如蒋介石。

他叫周佛海。

他“适时”死去，无论对谁来说，包括对他自己，可能都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2

1897年，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的凉水井乡。

在周佛海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周佛海从小由母亲抚养。少年周佛海还算好学，且有才情，考入了沅陵县高等小学，然后又升入了当地的中学。

周佛海在青少年时期就展现出超越同龄人的雄心壮志，他曾在一座寺庙的墙壁上，题写过这样一首诗：

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

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

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专门提到了它：

“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周佛海，《往矣集》之《苦学记》）

真的是没有上进发展的机会了吗？

1917年，周佛海等到了一个机会——在老师和同学的资助下，他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和当时很多和他同时代的留日青年一样，日本的留学经历促使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期间，不断向国内的杂志投稿，内容主要是对国际时局的分析，介绍海外新思潮，尤其是介绍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因为他思路清晰，文笔出众，渐渐声名鹊起。

但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三年后他回国的一次省亲。

那一年，他23岁，遇到了一个41岁的大叔。

那个大叔，名叫陈独秀。


青年周佛海

经过多次推心置腹的交流，

他们决定和其他有志之士一起，一同发起成立一个新的党。这个党，叫作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晚，那场改变未来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在上海的法租界召开。

从全国各地一共赶来了13名代表，加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构成了中共一大的全部参会人员。

周佛海是作为旅日小组的留学生代表出席这场会议的。但在发生惊心动魄搜捕的7月30日夜里，周佛海并没有参加会议——他因为腹泻请了假，还是毛泽东回来后告诉他出了大事。

但是，后来转移到南湖蓬船上的会，周佛海是坚持抱病参加的。在船上的会议中，大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虽然与会人士后来对周佛海担任的具体职务记忆有出入（周说自己是副委员长，包惠僧和陈潭秋说他只是候补中央委员），但有一点大家还是公认的：陈独秀在没回上海之前，中央局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



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多次寻找中共一大的会址，结果提供线索并在最后成功找到的，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

可见当时周佛海的地位。

为什么要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周佛海自己坦承，当初是想成

为“中国的列宁”。按照他的回忆：

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

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性，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

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政治抱负）。在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

……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推翻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为国家争荣光”……这些应该都是周佛海的初心。

那么，他的初心保持得如何呢？

4

1924年的春天，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周佛海，准备回国找工作了。

他当时的理想，是去北京大学当教授，或去商务印书馆做一个编辑，月薪能有150块大洋便“心满意足”了。按照他的想法：“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

但恰恰在这一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了，而国民党早就看中了周佛海这个当时“老资格的马列主义专家”。



周佛海

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戴季陶向周佛海发出了邀约：来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与此同时，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周佛海担任广东大学兼职教授，月薪240块大洋——还是拿出毛泽东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月薪做参照：8块大洋，足以让他养活自己。

事实上，周佛海在开完中共一大回日本留学期间，就基本和中共的党组织没有什么联系了，在思想上，也渐渐开始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之后没多久，周佛海就给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明确无误地要求脱离共产党。

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谈话，试

图挽留他，但周佛海态度坚决。最终，中共党组织批准周佛海退党。

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周佛海很快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还是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周佛海面临一个问题：对共产党，他已经与之决裂了；对于国民党而言，他是“半路出家”，人家吃不准他的路数，一直有戒心。

怎么办？还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给他指了一条路：要抱就抱一条大腿。

谁是当时国内发育最快的“大腿”？自然就是蒋介石。

“宁汉分裂”之后，周佛海从武汉逃出，彻底倒向了蒋介石，为表明自己的忠诚，这位原来写“马列主义”得心应手的笔杆子，开始转而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

但实事求是地说，周佛海还是有才的，所以他很快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被任命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凭借自己出色的笔头，周佛海在蒋介石的提拔下，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第二侍从室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是和陈布雷齐名的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不可谓不红。



戴季陶，国民党元老，蒋介石智囊，在1949年2月11日，继陈布雷自杀后，服安眠药自杀

但这种“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并非周佛海向往的最高境界。他认为自己是要“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的人。

这时候，又一个大变故发生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全面侵略

中国。

5

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的西流湾8号花园洋房里，造了一个大地下室。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经常到这个地下室来躲避空袭。在那里，他们讨论战局，大多对中日战争持悲观态度，认为“战必败，和未必大乱”。

为了表示对当时主战派的不满，胡适把这个群体起名为“低调俱乐部”。

虽然后来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人渐渐看清了方向，认为“和比战要难百倍”，但周佛海却依旧坚定自己的观点：“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这个观点，和一个虽不参加“低调俱乐部”，但实为这个俱乐部精神领袖的人的意见不谋而合。

这个人，就是他曾经与之对骂的汪精卫。

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后，曾声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这种言论，连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汪精卫也看不下去，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1927年，周佛海逃出武汉，出了一本小册子叫《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其中有一段话对汪进行了反击：“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在相同理念的推动下，两人越走越近。周佛海从蒋介石的亲信，变成了汪精卫的铁杆，乃至成为后者与日本方面接触的最大推动力——是周佛海最先派出高宗武和陶希圣与日方接洽的，也是周佛海一直埋怨汪

精卫“优柔寡断”，“不抓住最好时机”的。

1938年底，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汪精卫终于决定出逃，宣布所谓的“曲线救国”。

那么周佛海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

据他的儿子周幼海后来回忆，父亲曾对他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周幼海，《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

这“另外一条道”，恐怕是周佛海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

那么他成为汉奸后有没有实现自我价值呢？还是有的：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周佛海有了一串“显赫”的头衔：“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后来还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警政部长”“上海特别市市长”等——汪伪政府的外交、财政、警察、特工、军事等各种实权，都捏在了周佛海手里，可谓是“当红辣子鸡”。

对此，周佛海自己也是颇为得意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只是，这“一世”的时间，未必也太短了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6

抗战一结束，国民党当局当即逮捕了大批汉奸。

但历数汉奸的名字，陈璧君、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外界发现，少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人。

那个至少能在汪伪政权里坐第三把交椅的周佛海呢？

那时的周佛海，既没有逍遥法外，但也没有被捕伏法，而是被戴笠软禁在重庆，等候蒋介石的指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根据台湾方面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大约在1943年，周佛海被戴笠策反，又成了潜伏在汪伪政权里的国民党“地下党员”——他在家中设立了电台，直接和重庆方面联系。

换句话说，在上了汪精卫的船后，周佛海又将一只脚伸回了蒋介石的船。

那么，周佛海成为“间谍”后，又做了些什么呢？

做得倒确实不少：对于被汪伪特务逮捕的国民党党员和军统人员，周佛海尽量保护，甚至出面保释；将汪伪政权里的人员安排、财政情况都透露给了戴笠；将能得到的日本情报悉数都传给戴笠。

周佛海最得意的是为蒋介石和戴笠做了两件事：第一，在他的策划下，汪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原来也是中共党员）被毒死；第二，在日本投降后，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他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进入，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了国民党”。



李士群，组建汪伪特务机构“76号”，杀人如麻

有了这些功劳，周佛海还是很笃定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和陈公博、陈璧君他们不一样，他是对“党国”有贡献的人。

但是，一件出乎周佛海意料的事发生了：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了。

因为戴笠发展比较重要的特务时，都是和他单线联系，戴笠一死，

周佛海的很多“功劳”就没人知道了。

7

1946年10月21日，迫于各界压力，周佛海终于被公审。

超过1万名群众把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创下了战后汉奸审判史上的最高纪录。

周佛海在法庭上列举了自己的各种“功劳”，说他在整个汪伪时期，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而后半段则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总而言之，他要么是在“曲线救国”，要么是在“舍身救国”。

为周佛海辩护的，是当时著名的律师章士钊，他抓住这些点，包括展示当初戴笠给周佛海的信，不断给法官施压。再加上周佛海的口才本来就很好，他为自己辩护时说得头头是道，当时不少围观的群众还真的觉得，这个人可能确实为了国家“忍辱负重”。

当时周佛海的信心还是挺足的，在被审完回到牢房后，他还颇有雅兴，写了首诗：

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

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但是，法院在11月7日给出的判决却出乎周佛海意料：“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

这个判决一下来，周佛海就有些慌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救他，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在关键时刻，为周佛海跑腿的，还是他的妻子杨淑慧。

在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杨淑慧当即上诉，但马上被最高法院驳回。杨淑慧随后直接闯入了蒋介石机要秘书陈方的家，告诉对方：“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佛海，我就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看谁以后还敢为蒋先生卖命。”

那是周佛海的最后一个“护身符”——蒋介石当初曾给周佛海写过信，鼓励他在汪伪政权里“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写了“知名不具”。

1947年的农历大年初五，杨淑慧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一见蒋介石，杨淑慧就跪倒在地，一句话不说，只是抽泣。

蒋介石给杨淑慧的回答是："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周佛海的一条命，算是保住了。

听闻死罪得免，周佛海在狱中大为兴奋，又作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世成隔世，竟于绝处逢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他还自认是"铁肩"，还觉得能为党国再"负重"。

8

感觉自己未来仍大有可为的周佛海，其时已经病入膏肓了。

杨淑慧曾请章士钊写信，要求将周佛海"保外就医"，但得到的答复是："周佛海的案子太特殊，谁也没这个胆子。"

蒋介石当初答应杨淑慧的是"等个一两年"，后来变成"等个两三年"，但事实上周佛海在狱中连一年都挨不过去了。

据知情人后来透露，周佛海在1947年底，已经连睡也不能睡，坐也不能坐了，只能将被褥高高叠起，趴在上面喘息。有时候哀号阵阵，连狱卒听了都有些毛骨悚然。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忽然口鼻流血不止，心脏病突发，油尽灯灭，时年51岁。

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周佛海的尸体没人去管，最后还是妻子杨淑慧用一口珍藏多年的楠木棺材为周佛海装殓，运到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找了一个空穴，草草埋葬。

馒头说

周佛海到底是一个潜伏的“特务”，还是一个汉奸？

当然是汉奸。

按照档案披露，周佛海是自1941年开始试图与重庆方面接触的。1941年是什么时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宣战，大家都知道胜负天平将怎样倾斜的时候。

说到底，周佛海只不过是再一次选择了“换船”而已。

这也是周佛海让人唏嘘的地方：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尔后投身国民党，最后成了汉奸。

在中共一大的13个与会代表中，与周佛海经历非常相似的，还有前面提到的陈公博，而其中的不少人，后来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我一直相信，在最初兴业路76号那些开会的日日夜夜里，与会的13个人，确实都是抱着发愤图强、改变中国的雄心壮志的。也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建党近100年以来，所走的道路是多么坎坷崎岖，有多少人在途中迷路、掉队，甚至走了相反的方向。

能坚持一路走来的先辈们，是多么艰辛。

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是多么不易。

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一个“慷慨就义”的汉奸

“解释就是掩饰”是一句曾在网上流行的话，不过对于某些人而言，倒也确实适用。解释之所以苍白，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早就摆在那里了，就像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一样，永远是擦不掉的。

1

1946年8月23日清晨，苏州狮子口监狱。

一位60多岁，穿着囚服的老人，正在带领许多囚犯一起打太极拳。

这时候，几名法警走了过来。

他似乎知道了什么，于是和囚徒们告别：“不好意思，要先走一步了。”

这一天，他特地换上了新衣：深灰色毛质单长衫，白底细青条府绸短衫裤，黑袜黑缎鞋，左手还捏了一串佛珠。

经过女监的门口，他看到里面的陈璧君在哭，向她挥了挥手，说了一句：“再会。”



在临时法庭的最后过堂上，他坚持自己没有犯任何罪。检察官问他有何遗言，他表示“没有遗言”，只是强调，自己愿意捐献出遗体，供医学研究用。

面对记者们照相机的闪光灯，他居然还露出了笑容，挥了挥手：“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希望照得好一点啊！”

随后，他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向刑场。按照以往的惯例，为了减少犯人的痛苦，负责行刑的警察走在他的后面，出其不意地向他后脑勺开了一枪。

应声倒地，气绝身亡。

他的名字，叫作褚民谊。

如果不知道他生前所作所为，单看他人生谢幕的最后几个镜头，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位革命志士，奔赴刑场，从容就义。

但事实上，他是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

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汉奸。

2

褚民谊，1884年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殷实之家，父亲是一位名医。

有一说法，褚民谊原名“明遗”，取“反清复明”之意。此举虽然颇有侠士风范，但考虑到当时仍在清朝统治之下，虽然清廷的统治力与过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要说有人敢公开给自己的孩子取这样的名字，还是让人有些怀疑。

不过，1903年就东渡日本留学的褚民谊，还是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一个有为青年应有的姿态：在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的褚民谊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结识了同乡，之后的国民党大佬张静江（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晚年淡出政坛）。

1906年，褚民谊随张静江一起奔赴法国。在新加坡的时候，他们俩一起加入了同盟会。所以后来褚民谊也被称为“国民党元老”，倒也不

假。

抵达法国巴黎后，褚民谊与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创办了“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以笔为枪，宣传推翻清朝统治。

1911年，就在中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前夕，褚民谊从巴黎回到了上海。经同盟会元老黄兴介绍，褚民谊认识了一个对他一生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汪精卫。

不仅如此，因为频繁出入汪家，褚民谊还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的堂妹陈舜贞（一说为陈璧君家的丫鬟）好上了。在陈璧君的主持下，褚民谊和陈舜贞结为夫妇，成了汪精卫的连襟。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北议和，在各方面比拼中均落下风的孙中山，最终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和当时很多同盟会会员一样，褚民谊选择退出政坛。他去了欧洲，在比利时的自由大学继续深造。

27岁的褚民谊的人生之路行进至此，其实势头还是相当不错的。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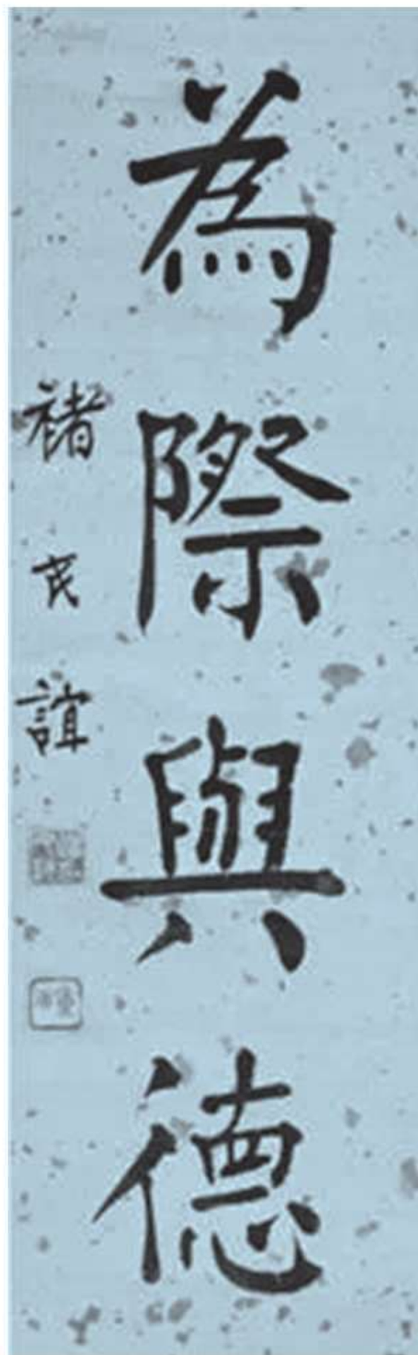
应该说，褚民谊算得上“多才多艺”。

他首先算得上是一个教育家。

1920年，褚民谊和吴敬恒、李石曾一起创建里昂中法大学，任副校长，后来还历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然后，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医学家。1924年，褚民谊获得了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不过他后来也被一些人讥称为“兔阴博士”，因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兔子的性欲、月经等兔子性方面的各种问题。





褚民谊的颜体字当时也颇为有名

褚民谊还可以算半个武术家。他曾担任过全国武术协会的会长。他在1925年师从吴鉴泉，应该也算是吴氏太极拳的传人。他曾将师父吴鉴

泉的太极拳图谱印刷成书，成为业内研究吴氏太极的重要资料。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大力推广“国术”，发明创造了太极操和太极球。他曾提出“科学化之国术在于合于力学与心理学，讲究生理与卫生”。应该说，这个理念在当时还是十分先进的。

此外，褚民谊在戏曲方面也有一定研究和造诣，尤其是昆曲。褚民谊编纂过《昆曲集净》，撰写“自序”“绪论”“例言”等章节，影印出版。

总而言之，不管褚民谊自己是否有意为之，他的整个调调，是有点向“魏晋风度”靠拢的。这样一个人，做一个时代的“名士”，倒也未尝不可。

可惜的是，他却最终从了政。

4

1926年1月，褚民谊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从政生涯。

一开始，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升任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褚民谊出任了行政院秘书长。

秘书长汇报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一个文化人出任一个相当于一个国家国务院秘书长的职位，结果怎样呢？

首先，自然是业务能力堪忧。据说褚民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连“公文”与“公函”的格式也没搞清，被汪精卫痛斥“滚出去”。不过老褚的心态还是不错的，主动对人说，汪精卫之所以会痛骂他，是把他当自己人。

其次，一个行政院秘书长不是不可以有业余爱好，但如果不注意分寸，就有点问题了。

褚民谊做秘书长的时候，提倡“弘扬国术”，鼓励大家踢毽子、放风筝、练武术。这并非是个坏主意，但由一个行业主管部门的长官来提倡就可以了。褚民谊一直热衷于在公众场合表演踢毽子和放风筝，还总是客串一些昆曲的角色。结果有人称他是“三子秘书长”（踢毽子、放鹞

子、做戏子），还有人如此评价他："一笔颜字，两脚花毽，三出昆曲，四路查拳，五体投地，六神无主。"

1930年，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运动会期间，许多女性跑步运动员在出赛之前，都要在大腿上擦一些松节油以舒筋络，而褚民谊以当时中央委员的身份，热衷于亲自为女运动员擦油，被新闻记者争相拍照登报。

为了弘扬"国术"，褚民谊并不支持足球、游泳这些从西洋传过来的运动，称之为"为礼教不能容"。但1933年的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时，褚民谊却对当时有"美人鱼"之称的游泳女将杨秀琼青睐有加。有一天，褚民谊亲自驾驭一辆马车，载着杨秀琼游览南京中山陵。一时间，南京全城轰动，最后褚民谊被检察院以"有辱官声"而弹劾。

做风流名士可以，当糊涂官员已经走错了一步，而褚民谊接着又走错了一大步。

5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褚民谊并未像很多人那样西撤。

当时的他，担任了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在上海逗留了两年，褚民谊逍遥自在，没等来国军的光复，却等到了秘密前来的汪精卫。

汪精卫在1939年找到了褚民谊，就一件事：跟着自己一起干！当时对外宣布"绝对不从政"的褚民谊，并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而那个时候，汪精卫已经发表了"艳电"，公开主张对日妥协。

在组建汪伪政府的过程中，汪精卫一开始想让褚民谊担任伪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但遭到一致反对。汪精卫胆子倒也不小，居然准备任命一介文人褚民谊担任伪政府的海军部长。为此，褚民谊还一本正经地自己找裁缝先做了一套海军将领的制服，穿上后常常对着镜子自我欣赏。

结果，汪精卫手下的另外两大干将陈公博和周佛海极力反对。周佛海反对的理由写在了他自己的日记里："让'兔阴博士'做海军大将未免过于荒唐，只怕海军变成走私总部他也不知道。"

无奈之下，汪精卫决定让褚民谊担任汪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结果周佛海依旧反对，褚民谊只能辞去副院长之职，最终担任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

一个伪政权的外交部长，能有多少外交事务可做？所以褚民谊的职责，主要是与日本打交道，签订一些汪精卫都不好意思出面签的对日和约（他曾获得日本颁发给他的“一级旭日大勋章”），另外就是帮汪精卫跑腿。

当时人们的说法是“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褚民谊堪称汪伪政府的第四号人物。

不过，出来混，总归是要还的。

一眨眼，就到了1945年。

6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

汪伪政权顿时呈树倒猢狲散之势，几大干将吵作一团。陈公博和褚民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褚民谊在1945年7月，被派到广东省担任“省长”兼“保安司令”。

一个月后，陈公博告诉褚民谊：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在这个时候，褚民谊才如梦初醒，开始给蒋介石发电，称：“谨率所属，力保治安，严防异党乘机而入，以效忠党国，效忠蒋委员长。”但他不知道，早在很久以前，他的同事周佛海等人，就和重庆的国民党联系上了，踏上了第二条船，表示要“潜伏敌后”，效忠党国了。

没多久，褚民谊就接到了军统头子戴笠的一封回电，称：“褚民谊兄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转志，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

褚民谊看到电文后大喜过望，立刻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表示“荷蒙矜全”。

1945年9月12日，褚民谊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带了一个随员，搭

乘飞机奔赴重庆“商量善后事宜”。在去广州机场的途中，他被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派人按计划逮捕，成为汪伪政权第一个被捕的高官。

褚民谊被人押到看守所，迎面碰到了看守所所长徐文祺——当初徐是伪行政院的科长，是褚民谊的下属。褚民谊以为徐也是被抓进来的，非常诧异，问道：“老徐，你怎么先进来了？”

他感到诧异的原因是，按照行政级别，“科长”怎么可能比自己这个“外交部长”和“省长”先进来呢？

7

毫无疑问，等待着褚民谊的，是一场审判。

在法庭上，褚民谊确实也是泰然自若，认为自己完全无罪——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汪精卫，说一切都是汪精卫的意思，自己只是一个跑腿办事的。而且，他还表示自己“外交部长”的职位在汪伪政府里只能排到第12位，绝非法庭称的“高官”。

褚民谊的儿子褚幼义曾回忆，1963年，他在家中发现了一张当时褚民谊委托妻子陈舜贞代转蒋介石但陈最终未转的纸条，大意是请委员长不要为难，不要为自己减刑。

但从当时的种种迹象来看，褚民谊的表现与纸条上所呈现的内容并不是太相符。一方面，他在法庭上进行各种自辩；另一方面，他委托妻子多方奔走，找人为自己求情。

在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后，褚民谊抛出了他最后一个“法宝”：我有一个珍藏多年的宝藏，愿意献出来，将功赎罪。



法庭上的褚民谊“坚贞不屈”

军统特务沈醉奉命前往褚民谊交代的亲戚家中，取回“宝藏”。在沈醉所著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他回忆了“取宝”的过程：“带着万分好奇心急忙赶回，下车后什么也不干，便先去取这件宝物。”当沈醉拿出所谓的“宝物”一看，原来是一副泡在福尔马林中的肝脏。

谁的肝脏？孙中山先生的肝脏（孙中山去世后尸体被解剖）。

为什么会在褚民谊的手里？原来，褚民谊并不是完全没有为自己的后路做过准备，而且还独辟蹊径：

就在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前，当时兼任汪伪政府“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褚民谊，利用职权，趁乱将存放于灵前的孙中山的肝脏偷了出来，存放在南京的一个亲戚家。他觉得，这副国父的肝脏，可能会成为他的“保命符”。

因为交出了国父的肝脏，江苏高等法院居然真的同意将褚民谊的案子复审。但此时舆论大哗，许多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更是对这种盗窃国父“灵脏”的行为相当愤慨。

结果，迫于外界的压力，法院维持原判，褚民谊最终被执行枪决。

至于他声称要捐献的遗体，他的家属最后并没有捐出，而是埋在了

上海虹桥公墓。

馒头说

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一般对自己的行为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褚民谊当时在法庭上抗辩的理由之一，他说他是为了“保民”。

但从法庭出示的各种证据中，很少看到褚民谊真心保民的事迹，倒是有他当时对时局判断留下的文字：

“大东亚只有重庆一隅还在从事盲目的抗战，但是因为英美的外御完全丧失，所以重庆已成为瓮中之鳖，溃败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以为吾人处此，实不能不有退一步之自全办法。”

所以说，哪里有什么“保国”或者“保民”，说穿了，都是“保己”。

褚民谊算得上颇有“名士风范”，如果不从政，他倒真有可能以一个教育家甚至一个医学家的身份留下名字。但从政的道路，说到底也是他自己选的，投敌卖国的行为，更不是汪精卫拿枪指着他的脑袋干的。

没有什么借口和理由，更没有什么“君行其易，我行其难”的说法。近年来有些文章开始为汪精卫洗地了，在我个人看来，还真的有点无法理解。

褚民谊所谓的“风骨”，比起当年那个愿意舍命去炸摄政王的汪精卫，还是差了很多的。但汪精卫又如何呢？你可以分析他的性格，可以设想他的处境，可以体会他的彷徨，但，汉奸，终归还是汉奸。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有些盖棺定论的东西，真的是翻不过来的。

从愤青到首相，这个日本人为何能改变整个东亚格局？

在东亚近代史上，有一个名字是无论如何抹不去的。他不仅深深影响了日本，也影响了中国和朝鲜，进而改变了整个东亚的格局。

1

1909年10月26日上午9点，一列专列驶入中国哈尔滨火车站。

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登上了列车，和在列车上的伊藤博文握上了手。对于这位日本前首相的到访，俄国方面非常重视，科科夫佐夫在寒暄后发出了邀请："稍后有宴席款待公爵。如蒙阁下能检阅我的仪仗队，我将十分荣幸。"

伊藤博文回答："能在哈尔滨一睹贵国军队的威仪，非常高兴。"

伊藤博文随即下车。此时车外的俄国仪仗队已经奏响了乐曲，在科科夫佐夫的陪同下，伊藤博文按顺序检阅了俄国军乐队、仪仗队、各国领事团、中国仪仗队。

9点30分，整个检阅进入尾声，伊藤博文开始折返。此时，他们经过了专门赶到车站的日本欢迎队伍，那些日本民众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太阳旗，喊着欢迎的口号。

伊藤博文微笑着向他们挥手，点头。

然后他就看到一个30岁左右、蓄着胡须的青年忽然从队伍中闪了出来。

他是日本人吗？他想干什么？伊藤博文脑海中闪过的疑问，很快被这个青年的下一步行为解答了：

他掏出了手枪，对准了伊藤博文——砰！砰！砰！



刚刚走下火车的伊藤博文

2

1841年10月16日，伊藤博文出生在日本的长州藩（今日本山口县）。

伊藤博文的父亲叫林十藏，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后来被一个叫伊藤武兵卫的下级武士收为义子，所以也跟着改姓为“伊藤”。

伊藤博文从小贫苦，但非常调皮捣蛋，且能言善辩，张口就来，所以在当时的小伙伴中有“胡说利助”的绰号（他幼年名为伊藤利助）。有一个事例颇能看出他的性格：一次两队孩子玩军事游戏，伊藤担任首领的那一队眼看就要落败，结果伊藤把对方引入一堆枯草堆，然后就在上风口直接放火。差点被烧死的孩子们到伊藤家告状，伊藤的家长只能带着他挨家挨户去道歉。

彼时的日本，其实和中国一样，正陷入痛苦和迷茫之中。

1853年，日本经历了“黑船事件”——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强行闯进江户湾，用大炮轰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列强的入侵，给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所有日本人都造成了强烈的震撼。伊藤博文在17岁的年纪就去了炮术传习所学习军事，但他对纯粹的军事并不是

非常感兴趣——与“术”相比，他对“道”更感兴趣。



青年时期的伊藤博文

所以，他对自己的私塾老师吉田松阴的理论非常尊崇。吉田松阴这个以思想影响日本近代一代人的理论家，主张“尊王攘夷”，主张“天皇至上”，以及主张“海外扩张补偿论”（即日本打不过欧美的话，就从中国和

朝鲜身上得到补偿），这些思想后来都被伊藤博文贯彻始终。

当然，当时年少气盛的伊藤博文还是会经常陷入一种狂热的情绪中。在21岁那年，他和十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锯断了英国公使馆四周的木栅栏，潜入使馆区域后扔了一堆自制燃烧弹，然后逃回自己住处，彻夜饮酒狂欢，庆祝“攘夷”成功。

不过，伊藤博文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愤青”行为其实非常幼稚。

因为他之后就真正明白，日本究竟有多落后。

3

1863年，伊藤博文前往英国留学一年，彻底改变了想法。

在英国，伊藤博文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在多方面比东方文明都领先。他开始认识到，凭借一股冲动和热情的“攘夷”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有虚心向西方学习，韬光养晦，才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

1864年，伊藤博文回国，思想已经完全转变。当时正值日本著名的“下关事件”（英法等四国舰队攻击日本下关海峡两岸的炮台，准备用武力让坚持“攘夷”的长州藩屈服）爆发前夕，伊藤博文力劝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与其浪费力量去打一场不可能获胜的仗，不如把“尊王”先放在首位，先完成日本的统一，再慢慢富强。

虽然毛利敬亲没有听伊藤博文的劝告而强行开战，最终只能赔款道歉，但“尊王”这件事最终还是在三年后做成了。1867年10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提出了“大政奉还”，而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日本开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而明治维新也就此开始。

此时的伊藤博文才26岁，但已经开始在明治政府里崭露头角，担任了“外国事务交涉员”，后来又担任过大阪府判事（相当于首席法官）、兵库县知事（相当于省长），而他跟随的上司，是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他们都是明治维新的标杆性人物。

在这个过程中，伊藤博文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向木户孝允提出了废除诸藩，建立“府县制度”，进一步加强日本的中央集权。为此，伊藤博文草拟了“国是纲要”，详细规划了日本

如何建立府县制度，统一兵力、财力，大力发展教育。

第二，顶住方方面面的极大压力，全权代表政府向英国东阳银行贷款100万英镑，在1872年9月修成了日本的第一条铁路（东京—横滨）。在此基础上，日本的铁路开始大发展，由此迈入交通近代化。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东京大学的大学生在举办音乐会，可见当时日本的“西化”程度

第三，在赴美国进行细致考察的基础上，于1871年主导了日本新货币制度的建立和发行。

第四，历时两年访问欧美十多个国家，充分了解西方工业发展后，回国领导工部省，开始大力发展日本的工业。在他主事期间，包括三菱会社、长崎造船厂等一大批工厂和企业开始崛起，甚至开始与美国、英国等的轮船公司开展国际航运竞争。这些措施为后来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了扎实基础。

从治国到交通到经济到工业，伊藤博文可以说是全程参与并主导了很多改革和创新，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还没有到来。

1881年，“明治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相继过世，年仅40岁的伊藤博文年富力强，已然成了日本政坛当仁不让的元老和中流砥柱。

他决定进一步改造日本。

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可以说是“有实无名”。

所谓“实”，就是经过“明治维新”，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所谓“名”，就是它的国际地位依旧不高，当初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而欧美列强拒绝修改条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日本法律不完备，时机不到。

于是，伊藤博文有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让日本拥有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

为此，伊藤博文专门考察了英国、法国和德国。日本一开始全面对标的是英国，伊藤博文却发现这个国家的宪法不适合日本，因为英国的国王或王后虽然有地位，但对国家根本没有统治权，“与本国国情不符”。而德国的宪法是最受伊藤博文青睐的，因为“君主亲掌立法行政大权，不经君主许可，一切法律不得实行”，“邦国即君主，君主即是邦国”。

1889年2月11日，伊藤博文一手主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颁布。这部宪法以1850年《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分7个章节，共76条。宪法的第一句就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

事实上，这部《明治宪法》最鲜明的特色，就是突出天皇的“皇权”，把天皇构架为不可侵犯的“神”。根据宪法规定，日本由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之统治权。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陆海军的统帅、宣战的公布、条约的缔结等，都属于天皇的大权。

在这部宪法中，“皇权”是“明线”，伊藤博文还埋了一条“暗线”，那就是“军权”。



老年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本身就是一个军国主义者，他在这部宪法中大大强化了军权，并且让“军权”与“皇权”直接画了等号，即“天皇统率陆海军”和“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在这些条文的规定之下，宪法规定的所谓“内阁”和“议会”其实都是摆设，军权代表天皇的意志，只要天皇愿意，军部就可以把连同政府在内的一切职能机构一脚踢开，将整个国家变为“战争机器”。

在宪法出台后，伊藤博文成了日本的第一任首相（内阁总理大

臣）。

而他主导的这部《明治宪法》的出台，让日本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与此同时，也为接下来的武力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凶恶的豺狼，终于要露出獠牙了。

5

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伊藤博文是幕后全程策划者。

伊藤博文想动中国很久了，但一直迫于羽翼未丰，不敢贸然动手。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日本试图由此挑战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但被当时在朝鲜的袁世凯以霹雳手段迅速化解。

那次事件之后，伊藤博文第一次在中国遇见了比自己年长18岁的大清头号权臣李鸿章。李鸿章在和伊藤博文会晤后回报朝廷，对伊藤大加赞赏：“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而伊藤博文回国后也总结了中国当时进行的“洋务运动”，观点有两个：第一，“三年后中国必强”；第二，日本“对此事直可不必虑”。因为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改革会从内部遭到巨大阻力，几年之后，中国会“又睡觉矣”。

所以，伊藤博文当初给出的策略是：“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

十年之后的1894年，日本终于等到了时机，在那场对赌国运的甲午战争中，日本人笑到了最后。



康有为当时不仅提出过“中日合邦”，甚至提出过“中日美英合邦”，共同选出百余人作为内阁代表

虽然蓄谋已久，但伊藤博文在甲午战争中却是“克制派”，他反对一路打到北京。当然，这并非因为他爱好和平，而是他担心如果日军进攻北京，会引来西方列强的干涉。所以按照伊藤博文的策略，日军一方面派兵占领台湾，一方面攻打威海卫，全歼北洋舰队，随后就迫使清廷投降——后来事态的发展，确实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争之后没多久，中日关系反而进入了“蜜月期”。清朝被“打服帖”之后，迫切希望能学习日本崛起的经验，事事以日本为师。而日本出于共同对抗沙俄等各种目的，也乐于和清廷礼尚往来，甚至愿意“传授”一些改革经验。伊藤博文成了其中代表。

1898年，内阁刚刚被解散的伊藤博文到访中国，受到了隆重接待。时值“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甚至提出请伊藤博文担任中国的“首相”，

至少也要入阁担任“顾问”。而当时热情高涨的康有为还向光绪提出过一个更加疯狂的计划：中日合邦！

伊藤博文当时在中国和亚洲的地位，可见一斑。

但当时伊藤博文已经看出了“维新派”只是口号叫得响，并没有实力，所以一直与康有为等虚与委蛇。

事实上，他当时的目光已经放到了一个更有可操作性的东亚国家身上。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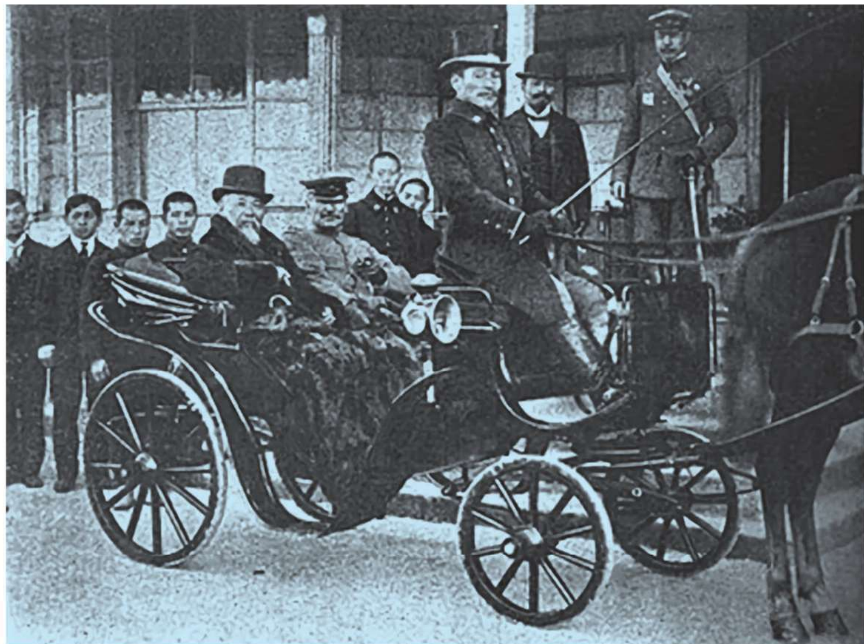
这个国家，就是朝鲜。

相对如同大象一般的中国而言，精致可口的朝鲜一直是日本更想率先得到的美食。

甲午一战，清朝彻底失去了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叫板的能力，而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又把一直阻碍自己染指东北亚利益的俄国一举打趴。

事实上，当时在亚洲已经没有国家有能力阻止日本吞并朝鲜了。

1906年，伊藤博文来到朝鲜，身份是朝鲜的第一任“统监”——日本在朝鲜设立了“统监府”。这个机构名义上是指挥在朝鲜的日本官吏的活动，但事实上它还接管了朝鲜的外交权，所以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总督府”，而伊藤博文就是朝鲜的第一任“总督”。



伊藤博文（左）与长谷川好道（右）一同坐上马车准备前往“统监府”



伊藤博文和当时朝鲜太子李垠在一起。李垠的父亲是高宗，在位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伊藤博文在到朝鲜前，就策划了对朝鲜明成皇后的暗杀（其实是直接派人追到宫里去砍死的，因为这位皇后一开始亲中，之后亲俄，一直

反对日本殖民），在到任一年后，又抓住机会迫使朝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剥夺了朝鲜政府的政权并解散了朝鲜的军队，使朝鲜彻底被日本控制。

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国内要求直接吞并朝鲜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伊藤博文却站在反对一方，他认为“吞并”这件事千万急不得，要从长计议。

但是，他对朝鲜的各种控制和手段，已经激发了千千万万谋求朝鲜独立的革命志士的万丈怒火。

其中的一个，就叫作安重根。

7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对伊藤博文连开三枪的，正是朝鲜人安重根。



安重根，1910年3月26日被判处绞刑

安重根出生于1879年，长期以来一直是谋求朝鲜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革命党骨干。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安重根最终决定牺牲自己，刺杀伊藤博文——在很多朝鲜人看来，伊藤博文就是导致朝鲜沦陷的罪魁祸首。

在经过周密的安排之后，安重根混入了当天在哈尔滨火车站欢迎伊藤博文的队伍，并在适当的时机站了出来，举起了手枪。

当时安重根怕打错人，还向伊藤博文身边陪同的几个日本人也开了

枪，但那几枪都没有致命，真正造成致命伤的，只有在伊藤博文身上的三枪：

一枪击中左肺，一枪击中左腰，一枪击中腹部。

枪击案发生后，医生随即对伊藤博文进行了抢救。但由于伊藤博文内脏出血太多，再加上已经68岁，所以回天乏术，在上午10点因医治无效而死去。

当了解到刺客是朝鲜人后，这位一生堪称叱咤风云的伊藤博文，说出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马鹿（笨蛋）！"

馒头说

可能会有人问，伊藤博文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为什么是"马鹿"？

因为当时伊藤博文在日本国内是力阻吞并朝鲜的，当他得知自己是被一个朝鲜人暗杀时，难免会觉得对方是"笨蛋"。而事实是，伊藤博文被刺后一年，日本果然吞并了朝鲜。所以后世也有一些人，据此说安重根才是真正导致朝鲜被吞并的罪魁祸首。

但真的是这样吗？

伊藤博文在朝鲜时，已经把一个主权国家完全肢解了：外交、军事、政府职能全部废除，这和实际上的吞并有什么区别吗？伊藤反对吞并，只是不想太急而已，难道还指望他"大政奉还"？

由此说两句伊藤博文这个人。

毫无疑问，在亚洲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伊藤博文都是一个可以留下名字的政治强人。作为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他曾三次组阁），伊藤博文和日本的迅速崛起是分不开的。如果从"兴国"的角度来看，他确实堪称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应该敬佩的人。

但换个角度来看，伊藤博文的"兴国"，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侵略别国的基础上的。在他的眼里，日本的利益至上无可厚非，但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其实是不存在的。而且他奠定的日本第一部宪法和他的一些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日本后来举国被绑上军国主义的疯狂战车，最终冲向悬崖。

这些毫无疑问给他的一生功绩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不仅仅是折扣，他还因此送了性命。

所以，一国之相，尤其是像日本这样国家的首相，不仅仅有义务带领人民让本国振兴和进步，也承担着与周边国家和睦关系的责任，对历史和未来都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伊藤博文分析中国改革：将遭到内部巨大的阻力》（雪珥，《中国经营报》，2015年2月10日）

2.《逆淘汰：中国历史上的毁人游戏》（程万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

3.《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人安崇根刺杀身亡》（张燕，《法制晚报》，2004年12月28日）

4.《他一手把日本变成亚洲霸主为何死后拿不出来区区10万元》（“勇哥读史”，百度百科“TA说”，2017年10月13日）

5.《伊藤博文政体思想剖析》［杨爱芹，《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1909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 值伊藤与俄臣谈侵略》（《济南时报》，2014年1月20日）

日本政坛最年轻的自杀首相，到底做过些什么？

说起日本侵华的首相，我们一般会想起一个名字：东条英机。但其实东条是1941年才上台组阁的，在他之前，有一个人更应该负责任，而且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日本人侵华的心路历程。

1

说近卫文麿（mǒ）是含着超白金汤匙出生的，可能并不夸张。

自镰仓时代以来，日本存在五大家族——近卫，九条，鹰司，二条和一条，因为只有这五大家族的人才有资格出任日本的摄政和关白（相当于丞相），所以被称为“五摄家”。

在这五摄家里，近卫家是最高贵的一支，可以说仅次于皇家。而1891年出生的近卫文麿，是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他的父亲近卫笃麿是明治时期的著名人物，曾担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院议长等要职。

所以，用“含着金汤匙”出生，已经不足以显示近卫文麿的出身。可以想象，近卫文麿从小是如何被全家重视的，他的父亲甚至在他腰间拴了根绳子，生怕他走路时跌跤。

在近卫文麿3岁的时候，就由祖母带着进宫参见了明治天皇，而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须效忠天皇，拱卫天皇以及皇族的荣誉——“忠君”思想，是之后所有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的根本支撑。

在近卫文麿12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

父亲近卫笃麿给近卫文麿留下了除了财产（事实上还有不少欠债）之外的两笔遗产。

第一个是思想。近卫笃麿在世时，非常反感英美对清朝乃至对亚洲的侵略和殖民（只是出于日本得不到什么利益的原因），他主张日清联盟，赶走白人，组建亚洲新秩序。

第二个是头衔。父亲去世后，近卫文麿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以12岁的年龄成了一位公爵。

2

1916年，从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近卫文麿进入贵族院，成为一名公爵议员。

此时的近卫文麿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这样评价英美所推行的“和平主义”：

“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们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在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像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


近卫文麿

而他在1919年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巴黎和会之后，心中的愤懑更是强烈。因为他看到在会议上，美、英、法等大国可以完全无视小国的利益，肆意瓜分别国的权利——当然，他感到愤怒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同为“战胜国”的日本居然拿不到什么满意的利益（或者他并不满意日本只是在中国接管德国的权益）。所以，他开始公然主张“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生存，要求发展之地”。

1933年，42岁的近卫文麿成为贵族院议长，开始进入日本的权力中枢。但身边人都知道，对于这个身材高大、长相端正的贵族之子而言，议长只是他的第一步而已。唯一为近卫文麿感到担心的，是他的老师西园寺公望，这个被称为“帝国最后的元老”的老人一直在劝诫自己的这个学生，不要离政治太近，尤其不要被军部的那些狂热分子所左右。



西园寺公望历经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大正时期的首相全都是他一手推荐的

然而，近卫文麿已经身不由己了，并且，他的思想也开始进一步转变。

从1930年开始，日本也被卷入了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和德国一样，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日本没有把重新振兴的焦点放在国内，而是放在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上。而也就是在这几年，近卫文麿身边的朋友中，少壮派军人和军部人员开始越来越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近卫文麿是完全支持这一行动的，因为他认为这是“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此外，他也开始支持军部，称“军人发怒是难免的”。

1932年，日本发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二二六兵变”，日本的政坛开始陷入混乱，军国主义的气焰开始总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治时代开始的“议会式”民主已经捉襟见肘，广田弘毅和林铣十郎两届内阁都无法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先后狼狈下台。

此时，作为众望所归的人选，近卫文麿终于走上了前台，被天皇任命为首相，组成新一届内阁。

由于他当时才46岁，所以被日本民众期待地称为“青年宰相”。

近卫内阁组阁的时间，是1937年6月4日。

一个月之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3

“七七事变”的爆发可能也是出乎近卫文麿预料的。

最初，近卫文麿主张的是“不扩大政策”，所以这也是他把这次事件限制为“北支事件”（北支指华北）的原因。但是，在军部强硬派的推动下，内阁还是同意向华北再增派两个师团，导致蒋介石也被迫态度转硬。



当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在被近卫文麿询问是否会进攻南京时，他一开始的回答是“不会，只会打到芜湖附近”

事实上，近卫文麿本身对这件事也处于一种矛盾心理：既怕事态扩大后无法收场，又对可能到手的大片中国领土抱有期待。

“七七事变”迅速扩大后，在上海爆发了惨烈的“淞沪会战”。此时此刻，近卫文麿也早已把“不扩大”抛到了脑后，直接开始国民“精神总动员”，并且将“北支事件”上升为“支那事件”。

等到日军攻克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日本国内上上下下都因为轻易到手的战果而变得狂热起来，而头脑发热的近卫文麿也由一开始希望和蒋介石和谈，转变为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于是，由近卫内阁发出的著名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就这样诞生了：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

这则声明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第一段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逻辑，而是第二段的超级自信——就算蒋介石想投降，日本人也不允许了。这份声明一出台，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近卫文麿为此也气急败坏地做出过解释，称这是外务省决定的声明，也不是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但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很快，因为这份声明，原先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和谈接触的蒋介石也开始迅速强硬起来，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抗战到底。

事实证明，这份声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是失败的。

而失败的原因，其实是包括近卫文麿和军部在内的所有人，对自己的武力估计太高，对中国人的抗战信心估计太低了。

4

但是，在第一次声明发出后，近卫文麿和他的内阁还是充满自信的。

尽管近卫文麿一直在尝试恢复内阁对军部的控制，但军部的扩大侵略从总体上并不违背近卫文麿的初衷。所以，在1938年3月，近卫内阁颁布了《全国动员法》，开始将侵华战争上升为“总体战”。

而此时无论近卫内阁还是军部，都寄望于即将在中国开始的“武汉会战”。一方面，他们认为，占领武汉对占领全中国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发出号召，动用全部兵力进行“武汉保卫战”，寻找并歼灭重庆军的主力，一直是日军苦苦追求的目标。

然而，蒋介石此时毕竟还是开了窍，在动用了110万兵力投入“武汉会战”后，发现固守无望，在最后阶段还是基本有序地将中国军队的主力撤出了战场，把武汉让了出来，开始“用空间换时间”——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却依旧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反而将这场战争拖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人终于开始有些惶恐地发现：不管怎么打，怎么赢，中国人就是不投降。

也就是在这时候，第二份“近卫声明”出台了：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

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

与第一份声明相比，这份声明口气明显软了不少，抛出了一个“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幌子，然后给予国民政府“共同防共”的“橄榄枝”，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能在短时间内诱降蒋介石政府。

但是，重庆方面的蒋介石没有动静。

迫不及待的近卫内阁又在一个多月后抛出了第三次声明，由此组成了“近卫三次声明”：

日本政府，昭和十三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

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又抛出了“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但这份看似甜蜜的声明，其实是有明确发布对象的——不再是蒋介石，而是“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

日本政府指的这人是谁？自然是汪精卫。

就在近卫内阁发出第三次“近卫声明”的一周后，已经逃到越南的汪精卫发出了著名的“艳电”，响应这次声明。

但是，近卫文麿没等到汪精卫前来投奔效忠，就宣布辞职了。

近卫给出的辞职理由是“事态进入新阶段”，而事实上，周围人对他已经越来越不满，而他自己也已经感到无力控制这样的疯狂局面了。

5

但是，近卫文麿其实是不甘心的。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突然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全面爆发。在最初的一年，德国惊人的战果不仅震慑了英美诸强，也让日本非常眼红——就好比自己的强盗伙伴轻松打劫了好几家银行，自己的手也开始痒了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接替近卫上台组阁的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都不能让狂热的军部好战分子满意，军部想来想去，还是更愿意选择还算有“共同语言”的近卫文麿。

于是，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第二次上台组阁。

而他这次组阁后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在1941年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进而组成了“轴心国同盟”。此外，他还在1941

年4月和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

从表面看，与德意结盟对日本很有好处：德国横扫欧洲，又不会来动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但近卫内阁的前任米内内阁之所以强烈反对和德意联盟，就是因为这样就等于把日本公然绑在了与英美对立的战车上。此外，德国正在对苏联磨刀霍霍是尽人皆知的事，日本和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也无疑表明这个“轴心国联盟”本来就是“同床异梦”。



当时“三国同盟”的宣传画

之所以要和苏联互相保持中立，是因为近卫文麿骨子里是支持“南进”的。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得他在这件事上始终在摇摆：一边在御前会议上确立“全力南进”的政策；一边又不断加紧和美国谈判，争取

能够避免在短时间内开战——不是不开战，而是希望给日本以准备时间。

但是，已经决定要与美国速战速决的军部是不能容忍近卫这样磨蹭的，虽然近卫文麿为此还闹过一次总辞职（两天后就再次上台第三次组阁），但他内阁中的陆相东条英机还是步步紧逼：必须在1941年10月之前向美国拿到一个谈判结果，不然就辞去首相职位。

在当时的情况下，美日双方其实都是不可能接受对方开出的条件的。所以，在10月期限过后，近卫文麿的内阁只能进行第三次辞职——直到这时候，东条英机才得到机会上台组阁。

那么，是近卫文麿在努力阻止“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吗？并不是，他想做的，只是延缓一下爆发的时间而已。事实上，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机器全都是由近卫文麿发动并预热好的，东条英机只是上台按动了“开始”按钮而已。

一个证据是，近卫文麿在辞职后，给东条英机送了一份上任礼物——一把日本军刀。

6

1945年初，日本的前途命运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此时，在诸多已经近乎癫狂的军部将领面前，不再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倒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他已经认识到日本必将失败，唯有早点投降，才有可能保住天皇制度。

为此，近卫文麿还专门去请求裕仁天皇早点退位。只是裕仁天皇当时还坚信“稳住，我们能赢”，寄望于“一亿玉碎，本土决战”，直到最后希望破灭，宣布无条件投降。



盟军验尸官在对近卫文麿进行尸检

在日本投降之后，近卫文麿反而对政治又积极了起来。他先是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组成的内阁中担任了国务大臣，然后又在币原喜重郎的内阁中担任管理宫廷内务的“内大臣府御用挂”。他两次跑去面见麦克阿瑟，居然把发动战争的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军部乃至日本左翼分子身上。麦克阿瑟一度非常信任他，甚至准备起用他牵头进行修改宪法的调查。

而这时候，日本政坛高层也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代表日本去“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文件的外相重光葵就直接指出了近卫文麿的算盘：“想把挑起战争和虐待俘虏的责任说成与自己无关，坏事都是东条大

将等‘统制派’军阀干的。”

而当得知近卫文麿将带头调研修改宪法后，日本的舆论也不干了，纷纷指责近卫不应该逃脱作为战犯的惩罚。此时，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敌情报调查科科长诺曼拿出了一大堆调查证据，证明近卫文麿的最大战争责任，是“加快日本侵略亚洲国土的速度；继续进行对中国的战争；使日本加入轴心国；在日本国内强化警察的镇压，促进法西斯统治的形成”。

在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面压力下，盟军总部终于将近卫文麿列为甲级战犯，签发逮捕令，并在1945年12月6日对近卫文麿发出通知：在12月16日之前到东京巢鸭监狱报到。

收到通知的近卫文麿知道，自己无法再躲避了。

12月15日晚，近卫文麿在自己的私宅举行了一场晚宴。席间，他和宾客们谈笑风生，饮酒也恰到好处，宾主尽欢。

16日早晨6点，近卫文麿的妻子发现丈夫房间的灯还亮着，走进去一看，丈夫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身上裹着白布，眼圈发紫，气绝身亡——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瓶打开的氰化钾胶囊药瓶。

由此，近卫文麿也获得了日本政坛历史上的两个“年轻”纪录：

最年轻的首相。

最年轻的自杀首相。

馒头说

之所以想写近卫文麿，是觉得他的一生颇能折射整个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群体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效忠天皇。

这一点以近卫文麿最能代表，因为他一直自认近卫家的血脉与天皇家是共通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皇——至少他表面上宣称的都是这样。这种畸形的愚忠贯穿二战时的日本政坛和军界，并且因为二战后天皇并没有受到清算，到现在都对右翼分子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是明目张胆。

自己家太小，东西太少怎么办？那就去占邻居的地方，去抢邻居的东西。最好让外村的人全出去，这个村子由自己牵头来统一管理，生杀予夺，都由自己决定。这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思维，从近卫文麿以下，很多日本人居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第三是战略混乱。

为了抢夺，日本人制订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但这种看上去似乎逻辑清晰的战略规划，因为完全缺乏实践的可能，其实等于是思维混乱的一纸空谈。

表现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在贪念的驱动下，胃口越来越大：那么轻松拿下东北？那就试探下华北；华北好像也能得手，就再试试看往下打。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打到怎样一个程度，日本人自己的想法也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野心，任凭野心不断膨胀，最后滑向灭亡。

第四是自我矛盾。

在没有规划的背景下，日本的不少方针都是前后矛盾的，得意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顺手时喊着“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等到受挫了，又希望能够“共建东亚新秩序”，最后自己被逼得进退维谷，硬着头皮去和美国正面相抗。

而在对中国政策和对美作战过程中的自我矛盾，并不是说明近卫文麿这批人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更像是无赖和流氓，总想以更小的赌注来换回更大的成果。

第五是推卸责任。

这些人在战争中都叫嚣着“一亿玉碎”或“尽忠天皇”，但真到了战后清算时，却一个个开始推卸责任，能逃就逃。从近卫文麿到土肥原贤二，包括东条英机，一到检讨战争责任时，他们就仿佛从没参与过一样，一切都是别人的责任。

讽刺的是，近卫文麿认为自己苦心孤诣地维护日本利益，日本人却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印象。200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收集上万人评价后编辑出版的《总理大臣得分表》一书中，近卫文麿因“软弱、无责任感”，

在历任日本首相中得分倒数第一。

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曾评价近卫文麿“像是一座富士山”——这并非溢美之词。原田熊雄的意思是，他像富士山一样，“远看很雄伟壮美，近看，全是粗糙不堪的花岗岩石”。

从某种意义上说，侵华战争中那批看上去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其实也是如此。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生平简历》（凤凰资讯，2009年4月16日）

2.《为和平而努力——近卫文麿笔记》（翻译：老狼是也）

3.《东方大审判》（郭晓晔，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8月）

4.《新华侨报：日本史上最差评首相的难堪》（蒋丰，中国新闻网，2015年5月8日）

5.《近卫文麿在侵华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邹身城，《历史教学》1987年第10期）

6.《中日战争初期日本的政治变革与权力之争（1937—1938年）》（萧李居，《国史馆学术集刊》2016年第9期）

7.《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一场血腥又荒诞的兵变

这篇文章要说的，是一场发生在日本的兵变：血腥，残酷，又有点荒诞。但你读过后，多少能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背后那种奇怪的逻辑思维，以及为什么他们要侵略中国。

1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凌晨5点。

漫天大雪。

在东京天皇皇宫西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忽然响起了枪声——那里是日本大藏（财政）大臣高桥是清的居所。

高桥的居所冲进了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确切地说，他们是日本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第七中队的士兵。

他们直接冲到了高桥家二楼的卧室，在卧室里，已经82岁的高桥是清还在沉睡，发出均匀的鼾声。

带头的中桥明基中尉高喊一声：“天诛！”随即掀开了高桥的被子。

高桥惊醒了过来，看到面前的士兵，骂了一句：“白痴！”

一旁的一个士兵冲上去，一刀就砍下了高桥的右臂，与此同时，另一名军官对着他连开三枪，其他士兵也冲上去用刺刀在他的身体上一阵乱捅。

高桥当场毙命，站在一旁的高桥的家属哭声连天，瑟瑟发抖。



高桥是清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的保护神”，曾担任过日本第20届首相。他因怕引起通货膨胀而缩减了军队经费，被军国激进主义者仇恨。但事实上，高桥的财政政策也是为日本侵略扩张服务的

以中桥明基为首的官兵们在确定高桥已经气绝之后，收起刀枪，统一向一旁的家属彬彬有礼地敬礼并鞠躬：

“真是打扰了！”

随后集体离去。

日本人杀日本人？

没错。而且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凌晨，高桥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刺杀的日本高级官员。事实上，在这次事变中被杀和受伤的高级官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日本历史上堪称罕见，乃至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历史进程。

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六兵变”。

要了解这次震惊日本的兵变，就需要先暂时放下那个“血腥之夜”，把时间轴往回调——我们要先了解一个人。



北一辉

这个人，名叫北一辉。

北一辉生于1883年，是个“很有意思”的日本人。

之所以说他“有意思”，是因为他和中国颇有渊源。

早在1906年，他就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并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将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上。他和宋教仁是知交，在宋教仁被暗杀后，他甚至独立组成调查团，发誓要查出

事件的真相。

北一辉是一个值得单独写一篇的人，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简单总结一下北一辉的几个观点：

第一，与侵略中国相比，他更主张联合中国，进攻苏联，征服亚洲，进而称霸世界（建立“世界联邦”）。

第二，他站在日本底层人民这一边，认为日本已经失去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气象，国内财阀横行，阶级固化，剥削严重。

第三，他在自己的专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提出了保障言论自由、保障人权、土地改革、普及教育等一系列主张。

这样看来，北一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且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了？

并不是。

恰恰相反，北一辉被认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教父。现在很多研究都认为，他的观点和著作影响了一批日本军国主义者，最终将日本拖入了二战的无底深渊。

因为北一辉还有两个重要观点，简单来说就是：

第一，日本现在堕落了，所有的问题都是那些资本家和贵族搞出来的。日本不能像西方那样搞什么议会民主，而要将权力归还于天皇，保证天皇的威严和权力高于一切。

第二，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的，也是正义的。日本要想发展壮大，必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尤其是要对已经获得既得利益的英美开战——战争能解决一切问题。

在北一辉思想的影响下，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的陆军开始渐渐分裂出了两个派别。

一个派别，叫作“皇道派”。

皇道派是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他们的主张就是相信精神的力量，提倡以暴力进行革命。对内，他们希望实现“清君侧”，打倒贵族和大资本家，要求日本天皇“亲政”，依靠军部实现日本富强；对外，他们以苏联为第一目标。



荒木贞夫精于演讲，崇尚精神高于一切，他的名言是：“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列强不在话下！”

皇道派在陆军中有自己的“领袖”：时任日本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

以及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但除了几个还算高层的人物之外，皇道派的组织还是松散的，且以日本陆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为主。



真崎甚三郎堪称皇道派的核心，虽然反对暴力革命，但鼓吹对天皇无条件效忠，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军官

而与皇道派相对应的派别，被称为“统制派”。

统制派的领袖，是被称为“日本军中第一大脑”的陆军中将永田铁山。与皇道派不同的是，统制派虽然也组织松散，但多半都由日本陆军的中上级军官构成。他们的主张，对内是维持现在的政治体制不变，尤其要维持军部的统治地位，放弃暴力革命，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对外则是以英美为第一假想敌，但前提是解决“中国问题”。

简单来说，两个派别的区别就是——皇道派：普天之下，天皇最大，但天皇要支持军人！要改革，只有革命！逆我者？杀光！

统制派：普天之下，军部最大，连天皇也要尊重军部！要改革，得靠制度！逆我者？调离！

彼时的日本，已经陷入了“昭和危机”，经济疲软，再加上关东大地震等天灾，底层人民的生活其实已经相当困苦，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下级官兵为主的皇道派的很多亲人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进一步认为，那些统制派的官老爷根本就不了解日本现在的真实状况，他们甚至和那些宣称“民主”的内阁大臣，以及资本家、财阀、军阀一起，成了阻挡日本前进的障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派别的摩擦乃至决裂，在所难免。

4

到了1935年，皇道派和统制派在军中的明争暗斗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荒木贞夫辞任陆军大臣后，统制派在陆军系统内开始压倒皇道派。一批皇道派军官从现役被转入预备役，或调离枢要部门、转任战地军官。其中，皇道派的象征人物之一真崎甚三郎被罢免了重要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引起大波动。



永田铁山当时被公认是日本陆军中罕见的有能力的人，也是裕仁天皇自太子时期就看中的人才。他的殒命，被一些人认为是“昭和军阀”后来一片混乱的一大原因

这个举动再一次引起了皇道派的极大不满，他们决定对统制派实施报复——目标就锁定在他们的领袖：永田铁山。

怎么报复的呢？

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的军官相泽三郎中佐走入了时任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抽出军刀，直接将他钉在了门板上。



犬养毅也是当初吴清源留日学棋的资助人之一，他当时的亲华倾向引起日本军界的极大不满

这种在其他国家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方式，在秉承“下克上”传统的日本，居然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一个中佐刀劈一个少将就骇人听闻了？日本下级士兵杀一个首相也是如探囊取物一般——1932年5月15日，11个年轻的日本海军官兵堂而皇之地走进日本首相办公室，将当时的首相犬养毅当场射杀。

这样一种在别国看起来大逆不道的举动，事后日本全国居然有35万民众写血书联名要求对这11人从轻发落——认为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有这样的“光荣传统”，不仅相泽三郎并不认为砍杀一个将军是一件多大的事，皇道派也认为，公众乃至天皇，肯定也是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为他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1935年12月，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第一师团师团长柳川平助接到了调令，将去台湾驻屯军担任司令官，而驻守东京长达30年的第一师团，将被调往满洲。

第一师团，是皇道派军官的大本营。皇道派认为，肯定是统制派在背后搞鬼。

1936年1月，日本政局开始动荡。与此同时，关于相泽三郎的审判也即将开始。鉴于3月第一师团就将开赴满洲，皇道派的年轻军官综合各方形势，决定在2月底之前发动一次革命。

他们下定决心：这次革命要比之前所有的“小打小闹”彻底得多——彻底铲除天皇身边的“奸臣”，打击统制派的气焰，最终实现他们期待已久的“昭和维新”。

1936年2月25日深夜，东京飘起了罕见的鹅毛大雪。

第一师团以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9名核心军官为主，带领1500余名官兵，按计划兵分六路，开始去诛杀“天皇身边的坏人”。

令人瞠目结舌的“二二六兵变”开始了。

5

正如先前所说，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并不是当夜唯一的牺牲品。



斋藤实是海军大将，同时担任过第30届日本首相

按照计划，第一中队的坂井直中尉带着100多名士兵冲入了内大臣斋藤实的府邸。斋藤实认为日本应该遵守《华盛顿条约》，控制海军发展的规模，这被皇道派的青年军官们认为是“卖国”。

77岁的海军大将斋藤实在叛军冲进来的时候已经穿好了睡衣，他的妻子勇敢地挡在了他的前面。但叛军还是对她身后的斋藤实进行开枪射杀，妻子哭泣着扑在倒地的斋藤实身上，军官们冲上前去，将枪伸到他妻子的身下，继续射击。斋藤实一共身中47枪，当场毙命。叛军在房间

里三呼“天皇万岁！”然后离去。

步兵第三连队第一中队的小队长高桥太郎带着30多人冲入了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的宅邸——渡边是永田铁山提拔起来接替真崎甚三郎的人，属于统制派的中坚力量。



渡边锭太郎是在“二二六兵变”中唯一被杀的陆军大将，其他大多数都是海军出身，所以也体现了日本历来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



铃木贯太郎后担任首相，在任内敦促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助推战争的结束

62岁的渡边在叛军冲进屋内后，勇敢地举起手枪还击，但随后被叛军携带的机枪打成了马蜂窝。愤怒的高桥太郎甚至还拔出军刀，砍下渡边的头颅后才离去。

但叛军的刺杀计划也并没有全部得手。

由安藤辉三大尉率领的一队人马领到的任务是刺杀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皇道派认为他和英美势力勾结在一起。

铃木贯太郎和冲入家中的叛军谈了10分钟之后，发现已无话可说，

于是就问："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回答："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就开枪吧！"

铃木一共中了两枪，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心脏而过。安藤平时比较敬重铃木的为人，所以不忍心再补一枪，就率人离去。几天后，重伤的铃木被抢救了过来。

针对两位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和牧野伸显伯爵的刺杀，也因为叛军最终实在下不了手而宣告失败。

但最关键的一个失败，是叛军没有杀掉首相冈田启介。



松尾传藏（左）和冈田启介

负责刺杀首相的是步兵第一联队机关枪中队，在击毙守卫首相府的四名警察之后，大约300名叛军包围了首相府。但是，他们错把冈田启

介的妹夫松尾传藏当成了首相，在枪杀了他之后就离开了。



集结在东京街头的叛军士兵，旗帜上写的是“尊皇讨奸”

但不管怎样，在2月26日天亮之后，1500人组成的“叛军”已经基本达成了自己的目标，不仅杀了一批“天皇身边的坏人”，而且还控制了东京的主要报社（砸了一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朝日新闻社）、警视厅等。接下来，这场“革命”最终成功与否，就取决于一个人的态度了。

6

这个人，就是裕仁天皇。

政变爆发后40分钟，那年35岁的裕仁天皇就在睡梦中被叫醒，被告知东京发生了骇人的兵变。

在听取了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的汇报之后，裕仁的反应是：“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恢复正常。”

皇道派虽然打出了“尊皇”称号，但天皇并不买账。



裕仁天皇

上午9点，被叛军扣押进行谈判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获准觐见天皇，并且带来了叛变军人开出的条件：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一干大臣和将领；让荒木贞夫出任关东军司令；等等。



川岛义之还有一个原因不方便和天皇明讲：他的女婿也作为一名军官参与了这次兵变

作为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其实是同情叛军的，他给天皇的建议是：这些叛军虽然鲁莽，但都是为国尽忠，可以体谅。

但裕仁天皇却震怒了："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之所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校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

裕仁的态度如此坚决，不仅仅是因为这次叛军的所作所为超出了底线，也不仅仅是因为杀的都是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老臣，更重要的是，他得知消息：他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搭乘火车前往东京。



秩父宫雍仁抵达东京后，第一时间就被警察送入皇居，与叛军隔离

秩父宫雍仁一直和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皇道派甚至已有人宣称“秩父宫雍仁是我们的首领”——这也就意味着，一场兵变很可能会带来一场政变。在日本历史上，天皇弟弟杀掉哥哥后继位的事，并不是没有。

正是基于此，天皇要求陆军迅速派兵镇压叛军。

陆军还在拖拉的时候，海军坐不住了。由于被刺杀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都是海军的大将，海军在第一时间就坚决要求镇压叛军。26日中午，联合舰队司令高桥三吉下令第一舰队进入东京湾，第二

舰队进入大阪湾，舰炮全都对准了叛军的阵地。

一场内战眼看在所难免。

关键时刻，裕仁拍了桌子："如果陆军还不派兵镇压，朕亲自带近卫师团前往！"

2月28日，陆军终于组成了大约24000人的镇压部队，准备武力进攻叛军阵地。

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还试图为陆军的这些青年官兵做最后努力——他们前往戒严司令部交涉，希望不要动用武力，但一个参谋直接把他们两人赶出了司令部（这个参谋就是石原莞尔）。

但事实上，荒木和真崎多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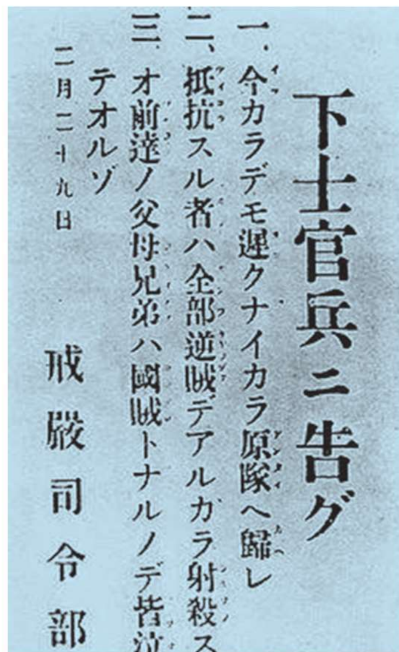
7

没有得到天皇的支持，1500人的叛军部队其实在精神上已经垮了。

在东京的街头，出现了装了高音喇叭的坦克，开始不断广播NHK（日本放送协会）的著名播音员中村宣读的《告军官士兵书》，提醒叛军士兵："现在归复原队，为时不晚；如果抵抗，按逆贼处，一律射杀；你们的父母兄弟在为你们成为国贼而哭泣。"

在风雪中坚持了三天的叛军士兵，本来就饥饿难耐，在听到广播和拾到传单后，意志已经垮了，开始纷纷脱离部队，返回自己的营房。而叛军的组织者们也没有阻拦，在放走士兵后，他们通过电台宣布投降，随后被戒严部队拘捕。

叛乱被彻底镇压。



下士官兵ニ告グ

一、今カラデモ遲クナイカラ原隊ヘ歸レ

二、抵抗スル者ハ全部逆賊デアルカラ射殺ス

三、オ前達ノ父母兄弟ハ國賊トナルノデ皆泣

テオルゾ

二月二十九日

戒嚴司令部

镇压叛军的“戒严司令部”签发的传单



空中飘舞的劝降条幅

荒木贞夫的意思是，希望给这些青年军官保留最后的荣光——提议他们切腹自尽。为此，负责关押他们的军官冈村宁次（对，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准备了大量的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

但绝大多数的叛乱军官并没有选择切腹，他们希望通过法庭受审，最后一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指望“能够唤醒日本”。

只有一个叫野中四郎的大尉最终选择切腹，他在遗书中称，自己所在的师团30年来没有进行过战斗，而其他部队却在流血牺牲，所以他感到特别遗憾。

但是，叛乱军官们期待的“公审”，后来却并没有出现。

8

秋后算账。

对“二二六兵变”的处理，比很多人预料的要严厉得多。据说，这是裕仁天皇的意思。

对于叛军的主谋，军部决定实施“军法审判”，审判过程不公开，也

不设辩护律师，一审即终判——那些叛乱军官期待在法庭上影响更多人的目的，完全无法实现。

1936年7月5日，在整个兵变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香田等17名军官全部被判处死刑，严厉程度远超之前历次事件的处理。

原先砍杀永田的相泽三郎的审判也被继续——毫无疑问，也是死刑。

这些还不算，没有参加兵变，但提供思想指导的北一辉，以及在幕后策划的他的学生西田税也被判处死刑。

审判之后，是清洗。

日本陆军12名大将中有9人在1936年4月底之前退出了现役，其中包括皇道派的领袖人物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其他一些皇道派的核心军官也被调离核心岗位。

经此一役，皇道派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统制派全面接管大权，并成功将军部凌驾于内阁之上。



“二二六兵变”中的第一师团叛军士兵们，左边站立者为兵变的骨干人物丹生诚忠，兵变失败后被处以死刑

1937年7月15日，参与“二二六兵变”的军官在涩谷被枪决。

而就在一周前，驶上军国主义快车道的日本，已经开始全面侵略中国。

馒头说

可能有人会有一个疑问：如果“二二六兵变”成功，日本的命运是否会改变？

很遗憾，并不会。

因为你仔细看皇道派和统制派各自的观点就不难发现，这两派的核心观点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对内要求军人独裁，对外要求发动侵略。

只不过，统制派相对于皇道派，反对暴力改革，希望循序渐进罢了。

所以讽刺的是，皇道派虽然被镇压了，但他们关于“军部独裁”“战争万能”“天皇万岁”的核心理念，反而都在后来实现了。而再看看当时负责镇压皇道派的戒严司令部构成：总指挥杉山元，副总指挥东条英机、谷寿夫，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哪个不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法西斯战争罪犯？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皇道派胜利，就会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了啊！

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皇道派的核心诉求是对外扩张，一旦在苏联碰壁（参看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掉过头来，还是会拿中国开刀的。更何况，皇道派对中国的政策是“拿下满洲，培养亲日，缓图华北”。

说穿了，两派对于中国这块“肥肉”，争论的只不过就是拿筷子文雅地吃还是直接野蛮地用手撕的问题。

这可能也是日本当时最可悲的地方：国家无论选择哪条路，都被一群以“爱国”为名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绑架，最终殊途同归——“昭和”成了“招核”。

而比可悲更值得警惕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国内对“二二六兵变”的认知依旧没能统一，甚至可以说是暧昧不清。

1970年，一直崇尚北一辉思想的日本著名文学家三岛由纪夫，独身上演了一场类似“二二六兵变”的闹剧后，切腹自杀。

1989年，五社英雄导演的《二二六》电影上映，整部电影渲染的是一种爱国的悲怆与血性，到影片末尾，更是集中展现叛乱军官的“大爱”与“大义”，最终以一句“天皇万岁”结尾。

确实，“二二六兵变”展现出了当时一批日本中下级军官要求改变不公平现状的诉求，以及背后的勇气和血性，但他们的做法和手段是否合情，是否合理，是否真的是爱国？是否能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

这是决定兵变的军官们在起事前发出的心声：“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向前奔驰！”

很燃，不是吗？

但却也值得警惕和反思。

大庆油田：日本人的“野望”与“残念”

“野望”和“残念”是两个日语词，前者的意思是“不合身份、离谱的愿望，野心，奢望”，后者的意思是“可惜、遗憾，懊悔，遗恨”。这两个词，我觉得形容当时日本对大庆油田的感情，倒也还算贴切。

1

1959年9月26日下午4点，黑龙江省安达县高台子镇永跃村旁。

一大群人在一个井口默默等待，整个现场的空气像凝固一样，鸦雀无声。

忽然，井口传来了液体的涌动声。然后，一股浊黑色的液体就这样喷了出来。

霎时间，周围等待的人群发出了巨大欢呼，很多人泪流满面地鼓掌，挥拳，拥抱。

这群人中，有科学家，有工人，也有自发赶来围观的当地群众。

因为那股浊黑色的液体，不是别的，是石油。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所以这个油田就被命名为“大庆油田”。

2

中国人苦石油久矣。

按照传统的石油地质理论，石油仅仅由海洋生物生成，这也就是“海相生油”理论。

1913年，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曾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的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河北、东北和内蒙古部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调查，一无所获。据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埃蒙斯教授在1921年下了结论：“所有的产油层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海相地层或与海相地层密切相关的淡水地层。”而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学教授勃拉克韦尔德也强调：“中国没有中、新生代海相沉积。”

换句话说，因为中国的地质地貌构成多为“陆相”，大家都认为是产不出石油的。



李四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媒体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全都归功于李四光，但随着资料的逐步公开，在大庆油田的发现乃至中国石油储量的论证、勘探和开采的过程中，还有黄汲清、谢家荣等一批中国科学家和石油一线开采工人的功劳，甚至还有匈牙利地震队的贡献

但是，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地质学家和石油勘探专家，就是不信这个邪。

1958年，在经过详细论证和勘探的前提下，中国人把目光瞄准了希望最大的松辽平原（东北平原）。4月，“松辽石油勘探大队”成立，5月升格为“松辽石油勘探处”，6月再升格为“松辽石油勘探局”——三个月连升三级，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1958年7月，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在黑龙江安达县任民镇以东16公里处打下了第一钻，这就是“松基一井”。一个月后，32115钻井队的第二钻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吐乡咚勒赫村北打下，这就是“松基二井”。

“松基一井”打了9个月，钻到了地下1879米，钻穿了白垩纪地层，但没有发现任何油气。

“松基二井”打了13个月，打到了地下2887.63米，虽然没有发现工业性油气流，但在打钻过程中发现了大量油沙和油花气泡。

1959年4月，还是打“松基一井”的32118钻井队，在离“松基一井”130多公里远的地方再度开钻，这就是著名的“松基三井”。

“松基三井”打到地下1050米深处的时候，就已经连续在6个井段取出的粉砂岩和细砂岩岩芯中，发现了油浸和含油现象。



“松基三井”纪念碑。碑上由原中顾委常委康世恩题写碑文：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

所以，1959年9月26日的那次喷油，其实并没有太出人意料。不过，在那一个足以载入历史的时刻，大家的欢欣心情还是可以想象的。

大庆油田的发现，标志着当时的中国已经可以开始实现石油基本自给自足，用当时人们的一句话说就是：“把‘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了！”

当然，大庆油田的发现，不会让所有人都陷入狂欢之中。

比如日本人。

3

日本人苦石油之久，犹胜中国。

受限于本土的地质条件，日本37.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几乎滴油不产。虽然在二战爆发前，石油在日本的能源总耗量中占比不高，但几乎全部集中于军事战略用途——对于已经被绑上军国主义疯狂战车的日本而言，石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二战爆发前，日本的石油来源只有四个途径：

第一，从美国进口，这个渠道占到了日本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80%；

第二，从当时的荷属东印度进口，这个渠道大概占到了日本全部石油消费总量的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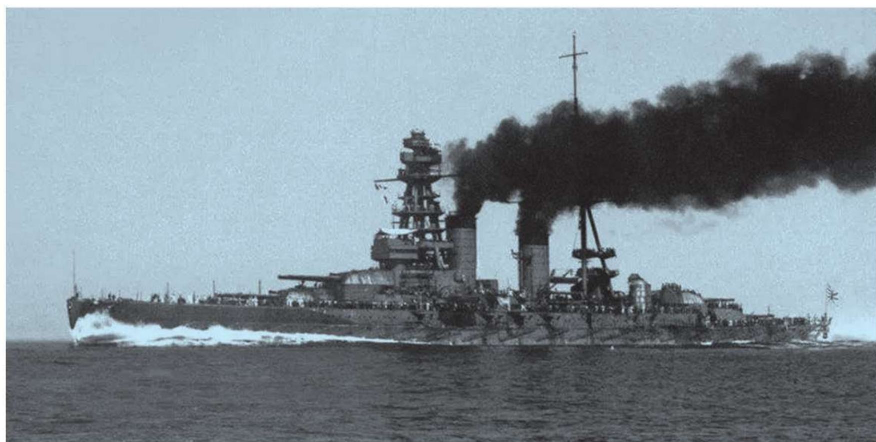
第三，从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的萨哈林油田生产，产量大概占到了日本石油消耗量的8%；

第四，日本从占领的中国抚顺油页岩等资源中人工制油，但产量非常小。

所以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日本发动战争的命脉——石油，是一直捏在美国人手里的。这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对美国一直忍气吞声的重要原因。在此之前，作为缺乏资源的岛国日本，其实一直在拼命囤积石油，但即便如此，日本也只储备了500万吨的石油，这在庞大的战争消耗中很可能撑不过半年。

随着二战欧洲战场的扩大，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人开始渐渐对日本人提高了警惕，更何况，他们本来在道义上就有亏——他们卖给日本

人的石油，大多都被用到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尤其是那些肆无忌惮地在中国不设防城市上空狂轰滥炸的日本轰炸机，用的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石油。



日本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在“大和号”服役之前）。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当时威风凛凛，但一旦失去石油供给就会立刻瘫痪

1941年6月，牵涉到美国人自己利益的底线终于被打破——日本放弃对抗苏联，而是全力开始进攻东南亚攫取资源。在美国人的牵头下，英国、荷兰等国家终于开始对日本施行全面石油禁运。

日本在侵略战场上手舞足蹈的陆军和早就蠢蠢欲动的海军，顿时就陷入断油恐慌。

于是，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们终于有了孤注一掷的最好借口：与其忍辱偷生，吐出之前所有的侵略成果，不如冒死一战，打出一个今后永远不会缺资源的“大东亚共荣圈”。

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夏威夷的珍珠港烟火冲天，陷入癫狂的日本人终于和美国人开战，与此同时，大批枕戈待旦的日本部队开始突袭东南亚抢夺资源，尤其是石油资源。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日本人对石油如此渴求，他们强占中国东北那么多年，为什么没发现大庆油田？

日本人怎么可能没尝试着在中国找石油？

早在1926年，日本人就开始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

到了1928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的心情愈加迫切。时任满铁地质调查所参事的日本地质专家新带国太郎就曾在1929年春天带着人，沿东清铁路到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带寻找石油，但经过两个多月的探察却一无所获。不死心的他在1930年4月又在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进行过第二次勘探，再次失败。

不止这一路人马。为了在东北找到石油，日本当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也用尽了当时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勘探和采矿设备，但始终没有发现一滴油。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所有日本在中国勘探石油的队伍都被征调到了东南亚，参与那里的油田恢复和开采（英军和荷军在撤离时摧毁了油田），“在中国东北找到石油”这个目标最终被放弃。

是日本人真的无能吗？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当时还是很凶险的。

2010年，时任大庆市副市长的栾莹曾告诉旅日学者徐静波，当时日本人打的其中一口井，离后来喷油的“松基三井”只有2公里远——当时日本人打的井深度是1000米，而“松基三井”是打到1300米深时喷油的。

就差300米。

而根据黑龙江省安达市档案局局长、安达市志办主任李生的回忆，大庆油田的主力产油区有一口井叫“萨一井”，这口井当年下钻到680米的时候就遇到了油层。

而这口井与当年日本人打的井距离更近——相距仅1公里。如果当时日本人把打井的方位再多挪一公里，或者多打几口井，那么就很有可能率先发现大庆油田。

日本人当初之所以没发现大庆油田，除了所谓的“运气”和“技术”之外，按照李生的说法，还和当年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和地下抗日武装有很大关系。

在打出“萨一井”的那个杏树岗，当年就是当地抗日游击队的大本营。在频繁的骚扰和袭击下，日本人其实很难大张旗鼓地拉开架势打井钻油，换句话说，其实当年日本人也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能大摇大

摆地在中国东北随意勘探。

所以，当中国在1964年决定将之前属于高度机密的大庆油田进行公开报道宣传时，日本人还是大吃一惊的：

大庆？大庆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东北突然冒出来一个56.7亿吨原油储量的超级大油田？

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

5

196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篇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

这是大庆油田在一直被冠以“农垦”名义的保密状态下，第一次被中国公开披露。

4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前一天播报的通讯。之后，《人民画报》又刊登了著名石油工人、劳模、“铁人”王进喜的照片。

而之后的争议，就出现在这张照片上——这张照片，后来被不少媒体称为“中国最著名的泄密案”。

按照流传的版本，日本人在看到这张照片之后，迅速进行一系列的情报分析，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第一，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46°～48°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此推断大庆油田位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

第二，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势，推断出油井的直径；


王进喜的那张照片

第三，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

按照之前流行的说法，“基于这些情报，日本人迅速设计出适合大庆

油田开采用的石油设备。当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征求开采大庆油田的设备方案时，日本人一举中标”。

这个说法流传非常广，见诸互联网的各个网站和论坛，甚至一度成为一些单位的经典教学案例。

但事实上，这件事在各个环节上有不少疑点。

第一，这个故事最早的出处和来源，至今没有找到。

第二，这张照片的来源就有多种说法相互矛盾，从《人民画报》1964年第1期到1966年第1期，各种说法都有。

第三，单凭一张照片推断出那么多情报，是否真有可能？事实上，自1964年后，中国多家媒体曾多次报道王进喜，各种材料透露出的细节远胜这张照片。如果说日本的所谓“情报机构”真能获得大量准确情报，那更可能是建立在对多篇报道和多个信源综合整理的基础上，再辅以日本本身对东北熟悉的老底子。


人民日报

REN MIN RI BAO

20

学习大庆经验，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大庆精神　大庆人

根据“果壳问答”网友“万物包容恒河水”的质疑，大庆油田开发初期用的钻机是苏联Бу-40柴改电，葡萄花小炼油厂由石油部兰州设计院设计，大庆炼油厂由石油部北京设计院设计，全国第一条大口径长距离输油管道由大庆油田建设设计研究院等单位设计，基本是苏式和国产，里面没有一套日本设备。此外，中国第一次进行国际招投标的工程项目是1984年7月14日的鲁布革水电站引水隧洞施工项目，20世纪60年代为何会出现“中标”的说法？

第四，既然已经“公开报道”，那就很难用“泄密”来形容。事实上，以当时大庆之大，参与人数之多，要得到一些情报并非登天难事，最后归结为一张小小照片“泄密”，倒反而有些小看日本人的情报能力了。

第五，日本当时中标了什么设备？何时中的标？都应该有相应记录，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说法。

6

当然，抛开“王进喜照片泄密”一事的真假不论，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日本对石油的渴望。

最新的一个数据颇引人注目：

目前，日本的石油战略储备是全世界第一，在切断所有石油供应的情况下，他们能支撑158天，而美国排在第二，为139天。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报道的数据，中国目前的石油储备大概能维持50天左右。

馒头说

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讨论，大致意思是：如果日本在二战期间就发现了大庆油田，那么历史的走向会不会改变？

结果，参与讨论的人的答案基本是一致的：不会改变。

高赞回答者“荀子曰”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总结下来是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20年的时间差毕竟存在巨大的技术鸿沟。日本当时的开采能力相当有限。当时打下东南亚原本就存在的婆罗洲油田，日本调集了4000名石油工人前往修复和开采，花了一年时间也就恢复到原来产能的75%——而4000名石油工人已经占了当时日本全国石油工人的70%。

第二，不光是日本，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炼油能力都普遍不高——以大庆油田当时出产的石油品质，日本人完全没有能力把它提炼到能支撑战争的石油标准。

第三，当时全球范围内原油价格长期没有超过1美元一桶，所以开采原油再加工提炼，远没有购买成品石油合算，即便考虑到后来美国禁运，但去抢一块油田也比自己从头开始开发一块油田要合算得多。

第四，当时日本糟糕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们完整开采一块油田。

所以，综合来看，即便日本在二战期间发现了大庆油田，对历史走向也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毕竟，一个立志作死的人多穿一只袜子少戴一副手套，不会有太大差别。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松基三井：将“大庆”二字写进历史》（网易新闻，2017年6月8日）2.《石油绞杀：二战美国对日禁运政策》（中国石油·百科，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7年8月11日）

3.《石油风云》（丹尼尔·耶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2月）

4.《日本人当年为啥发现不了大庆油田》（徐静波，博客中国“徐静波专栏”，2010年12月21日）

5.《日本鬼子差一点发现大庆油田》（李生，新浪博客“平生”，2015年8月12日）

6.《“是谁发现了大庆油田”之争：好不滑稽》（孟可，新浪博客“孟可的博客”，2014年10月9日）

7.《聆听大庆油田13口“功勋井”的岁月故事！》（“对酒当歌6hipiv”，原文出处不详，引自“360图书馆”，2017年6月20日）

8.《日本本土不产石油，二战时日本的石油是从哪里来的》（寂寞的红酒，腾讯网，2018年1月17日）

9.《如果二战期间，“大庆油田”被日本人勘察到，历史会如何改写？》（知乎）

10.《关于所谓“我国最著名的‘照片泄密案’：王进喜照片泄大庆机

密”，这是一条假新闻吗？》（果壳问答，2014年5月16日）

情念

“情念”，很纠缠，有情有念。

从某种角度上说，“情念”很公平，因为每个人都有情念，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帝王将相。从太平盛世到兵荒马乱，“情念”始终存在。

问世间，情为何物。

1931年，皇帝陛下离婚了

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里，“皇帝”，是“只有他不想做，没有他不能做”的代名词。所以，当他们知道一个曾经的皇帝居然会“离婚”，而且是“被离婚”，该是多么意外和惊诧？

1

1931年10月23日，一桩离婚案轰动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国老百姓的观念已经逐渐开放，对原来被看作石破天惊的“离婚”，已经渐渐司空见惯。

但这一桩离婚案，还是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谈资。

因为离婚的两个主角，一个叫文绣，一个叫溥仪。

一个是当年皇上的妃子，一个就是当年的皇上。

而且，这场离婚，还是妃子主动向皇上提出的。

尽管清廷早已退位，但妃子和皇帝闹离婚，对当时的所有中国老百姓来说，还是太劲爆了。

2

要说这个故事，还是要先说说妃子文绣。

文绣出生于1909年12月20日，其家族在清朝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父亲做到过内务府（掌管皇家事务，下设50多处，管3000多人，正二品机构）的主事。

文绣8岁的时候被送入私立小学读书，受到良好的教育，各个学科成绩都很优异。

1922年的春天，虽然已经退位，但依旧居住在紫禁城以及保留清室帝号的“末代皇帝”溥仪，已经16岁了——按照规矩，应该要结婚了。在

一大堆“选妃”的照片中，文绣的五叔悄悄把文绣的照片也塞了进去，送给了“选后委员会”。最后，这张照片连同一批照片一起，被送到了溥仪面前。

按照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他当时觉得照片里每个人长得都差不多，不过还是圈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文绣。

不过，身边的“皇亲国戚”们立刻发表了不同意见，大意就是文绣家中贫寒（当时文绣的家族已经没落），长得也不好看，要选个富户的女儿。最终争论的结果，就是选了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婉容。

但因为文绣也是被“皇上”圈定过的人，就不适合再嫁给平民了，所以一起选入宫。

于是，16岁的婉容成了“皇后”，13岁的文绣成了“皇妃”，封号“淑妃”。

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初入宫的文绣和溥仪的感情还是不错的。因为被选入宫中，文绣中断了学业，溥仪还让人请了汉文和英文的老师帮文绣补习。溥仪带着“一后一妃”在宫内骑自行车、学拍照，去宫外爬景山、放风筝，气氛还算融洽。

虽然文绣的家境不如婉容，但脾气也是很倔强的，在相处中，渐渐感受到了“皇后”与“妃子”之间的地位差距，比如入宫，她就要比婉容早一天，以便第二天能“跪迎”皇后。



左图为婉容，右图为文绣

不过，那时按照当年和袁世凯的约定，清室保留在紫禁城居住的权利，每年还有400万银圆的津贴，所以溥仪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一后一妃”的矛盾也暂时没有爆发出来。

只是，好日子哪会一直过下去？

3

1924年10月23日（也是10月23日），一场政变发生了。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本应该在前线“讨逆”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杀了个回马枪，直扑北京，监禁了当时的总统曹锟，一举获得了北京的控制权，史称“北京政变”。

深居紫禁城的清室，随之大难临头。

一直痛恨封建帝制的冯玉祥，授意当时临时成立的“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当初袁世凯答应的，我冯玉祥不答应了，皇上您赶紧收拾收拾，滚出紫禁城！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绣，拿着匆匆收拾的细软，搬

离了紫禁城，暂时住到了自己父亲的居所醇王府。

北京的政局变化很快：冯玉祥怕自己压不住场面，请出了“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当总统，而势力开始膨胀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开始打起了“进京”的主意，段祺瑞借着张作霖打压冯玉祥，又安抚着冯玉祥对抗张作霖。

而在溥仪这边，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早就被日本人盯上了。经过一番周折，11月29日，溥仪经过日本人的运作，躲进了在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

对于投靠日本人势力，文绣是一直持反对意见的，并曾指出这是“引狼入室”。但当时确实走投无路的溥仪，实在难以拒绝日本人开出的各种诱惑条件，最终还是把婉容和文绣都从醇王府接了出来。

1925年2月，溥仪一家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静园，由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天津生活。

也正是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文绣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4

在天津，文绣过得一点也不开心。

溥仪在静园的居所，是一幢小楼。溥仪和婉容住在二楼，而文绣作为“妃子”，是没有资格和他们住同一层的，只能住在另一层的偏屋。

虽然失去了“皇帝”的尊号和象征权威的紫禁城，但溥仪还是处处要维持作为“皇帝”的规矩——人越是缺少了什么，就越是需要通过一些有仪式感的东西找回尊严。抛开感情不论，“后妃有别”也是溥仪找回“皇帝”仪式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在居住、饮食和话语上，连每个月给婉容和文绣的零花钱也是不同的。



天津的静园



住进租界的溥仪和婉容，从精神到行头，已经西化了

和内向的文绣不同，婉容还是比较外向的，性格也很刚强。皇后和妃子的明争暗斗，本来就是“宫斗”的重头戏。虽然现在连“宫”都没了，“斗”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弱，但要让婉容对文绣“同病相怜”乃至“情同姐妹”，也是不可能的。

在天津的这段时间，溥仪明显和婉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文绣几乎到了不管不问的地步。

如果这些只是让文绣感到不开心的话，那么还有些事，就让文绣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有一次，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在回英国前，来向从小教到大的溥仪告别。庄士敦提议临别前，大家一起照张相。

兴奋的文绣赶紧回屋子里去换衣服，但等换完衣服出来，发现他们三个人已经照完了——没人等她一起来照。

还有一次，文绣路过婉容房间的院子前时，吐了一口痰（也不排除是故意的），婉容气得立刻向溥仪告状，溥仪叫了个老太监来当面训斥文绣“失礼”，关照她一定要“尊重皇后”。

真正的导火索，发生在有一年的除夕。

那个时候，文绣因为和婉容赌气，经常不上楼和他们俩一起吃饭——但她万万没想到，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居然也没人叫她上去一起吃。

耳朵里听着楼上的觥筹交错、欢声笑语，文绣抄起身边的一把剪刀，朝着喉咙就戳。

还好文绣身旁正好站着一位太监，眼疾手快，夺走了剪刀。

事后，太监把“淑妃”除夕夜要自杀的消息告诉了溥仪，而让文绣真正心寒的，是溥仪听到后的反应：“谁知道是真想死假想死？让她死死看，死了也就死了。”

就在心如死灰的文绣走投无路的时候，两个女人出场了。

5

这两个女人，一个叫文珊，一个叫玉芬。

文珊是文绣唯一的亲妹妹，嫁给了当时一个叫载振的王爷的儿子，也居住在天津。清末的八旗子弟，多不务正业，流连烟花柳巷，文珊的日子也过得非常苦恼。两姐妹一聊，同病相怜，暗自垂泪。

文珊还给文绣介绍了另一个女人，叫作玉芬，是文绣一个远房表姐的女儿。玉芬是民国代总统冯国璋的孙媳妇，见过世面，也颇有心计。因为遇见了玉芬，文绣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

在了解到文绣的处境之后，玉芬提了一个当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建议：你为什么不和他离婚？

这是文绣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

但玉芬给出的理由却很让文绣心动：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是民国！溥仪在静园里你们当他是个皇帝，走出来就是个普通的中华民国国民！上了法庭，也是普通老百姓，你为什么不能离婚？

玉芬的话，给文绣内心打开了一道从没打开过的门。

几次交谈之后，文绣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了1000银圆交给了文珊和玉芬。

那是拜托她们请律师的钱。

6

一场由三名女子精心策划的行动，由此展开。

那一天，文珊找到了溥仪，说姐姐心情不好，想带她出去走走，散散心。那个时候，溥仪和文绣基本上连话都不说了，也没多想，就同意了，只是派了个老太监跟随。

文绣和文珊上车后，直奔天津的国民饭店，到了饭店就径直走向37号房间，在那里，除了等候的玉芬外，还有三个男人。

那三个男人是张士骏、张绍曾、李洪岳，是玉芬和文珊为文绣找来的三名大律师。

跟随的太监一看就知道苗头不对，忙问文绣是怎么回事。文绣告诉太监，回去告诉溥仪——这时候连“皇上”都不叫了——我不回去了，还要和他在法庭上见。

太监双膝一软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文绣随他一起回去。文绣随即避而不见，三名律师交给太监三封信函，里面是给溥仪的信以及离婚协

议，表示不日将和溥仪打离婚官司。

太监无奈回去告诉了溥仪，可想而知溥仪的震惊程度——一个妃子，居然敢和皇帝闹离婚？！

溥仪当即就派人寻找文绣，但文绣早就离开了国民饭店，找了一个隐秘处躲起来了。无奈之下，溥仪只能请律师去和文绣的律师谈判，表示“与淑妃伉俪情深，绝无虐待之事，请不要误会”。

但这时候，文绣早已没有回头之意了，而新闻媒体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天天爆炒，全国轰动。在文绣的离婚主张里，还有一句“侍帝九年，未蒙一幸”，这更让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们兴奋起来，开始对皇上的“龙体”议论纷纷。

这些，都是溥仪最不愿意发生的事。



溥儀之妃革命

保障人權要求離異

妃致其族兄文綺之一封書

妃子自覺・溥儀

一方力求大事化爲

預料結果不外脫

当时的报纸对溥仪离婚事件的报道

7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的时候，有人写了一封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这个人叫文绮，是文绣的一个族兄，不过，他的那封信并不是声援自己族妹的：

惠心二妹鉴：

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是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

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德。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

……

今竟出此，汝清夜扪心自问，他日有何颜面见祖宗于地下……

若听兄之劝，请即回溥府，向逊帝面前叩首请罪……吾妹思之。吾妹再三思之。

很快，文绣就写了一封回信，同样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文绮族兄大鉴：

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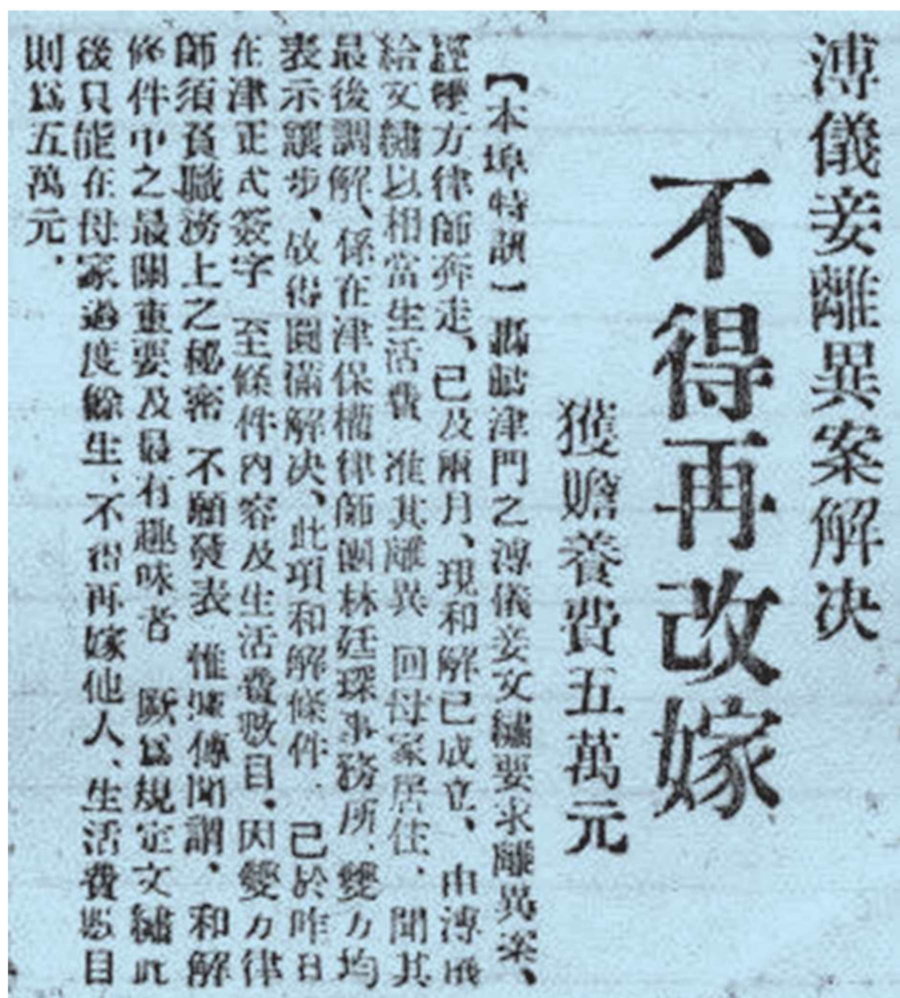
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这封回信一出，全国轰动，称这场离婚为“刀妃革命”（大家都知道了文绣试图用剪刀自杀）。这封回信也体现了文绣的才华和观念，舆论纷纷一边倒，支持她离婚。

溥仪非常关心报纸上的报道，文绣的回信他也仔细看过，看过后才知道，无法挽回了。

1931年10月23日，溥仪的律师和文绣的律师最终达成了协议：

第一，双方解除婚约；



溥儀妾離異案解決

不得再改嫁

獲贍養費五萬元

【本埠特訊】轟動津門之溥儀妾文繡要求離異案、經雙方律師奔走、已及兩月、現和解已成立、由溥儀給文繡以相當生活費 准其離異 回母家居住、聞其最後調解、係在津保權律師團林廷琛事務所，雙方均表示讓步、故得圓滿解決、此項和解條件，已於昨日在津正式簽字 至條件內容及生活費數目，因雙方律師須負職務上之秘密 不願發表 惟據傳聞謂，和解條件中之最關重要及最有趣味者 厥爲規定文繡此後只能在母家過度餘生，不得再嫁他人，生活費數目則爲五萬元，

溥仪离婚案的报道

第二，溥仪一次性付给文绣5.5万银圆生活费（文绣律师当时开出的价码是50万银圆。不过即便是5.5万银圆，按大米购买力，也相当于现在的100万银圆以上）；

第三，允许文绣带走日常衣物和物品；

第四，文绣回娘家居住，永不再嫁；

第五，双方不能做出有损对方声誉的事。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皇帝离婚案”，就此落下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离婚协议达成后不久，溥仪通过报纸又发了一条通告，称是“上谕”，大意是文绣怎么怎么不好，所以“贬为庶人”。

这条“皇帝的谕旨”，不是发在报纸的头版，也不是发在二版，是发在广告栏里的。

8

最后，再说说文绣后来的生活吧。

文绣离婚的时候，只有22岁。离婚后，她确实搬回了母亲家。但那时候母亲已经过世，家里的老宅又被人卖掉了，无奈之下，文绣只能去外面租了一套房子居住。

至于离婚分到的那笔钱，文绣支付了律师费用，又答谢了几个帮助过她的人（赠送文珊和玉芬各5000银圆），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后来玉芬说要做生意，又找文绣借了5000银圆，直到玉芬去世都没有归还，成了一笔烂账。

无奈之下，文绣只能出去找工作。她恢复了自己小时候的名字“傅玉华”，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当了一名老师，教授国文和图画。文绣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才华的，学生很喜欢她的课，她自己也做得挺开心。

但纸包不住火，文绣曾经的“皇妃”身份很快被传开了，各路媒体纷纷赶来，而她的小学门口每天也开始车水马龙，好事的老百姓和各路人等，都想来一睹那个和皇帝打离婚官司的“皇妃”。甚至还有人在校门口专门贴了一首打油诗：

“宣统皇帝小妃子，就在本校教国文。欲睹花颜甭买票，上班时刻守此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绣无奈在1933年底辞去了教师职务，用所剩不多的积蓄在刘海胡同买了一处宅子，和妹妹文珊一起隐居起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文绣的日子过得越发艰难起来。文珊改嫁

后搬出去了，而一些日伪警察、保长开始不断登门，要么调戏吃豆腐，要么就是敲诈勒索——他们认为皇妃肯定有很多宫中的奇珍异宝，要她拿出来为“大东亚圣战”做贡献。

文绣又只能搬出了刘海胡同。那个时候，文绣身上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了，无奈之下，她只能干起了体力劳动。她在家糊过纸盒，去瓦工队做过苦工，还去街上叫卖过香烟——文绣是唯一做过老师的皇妃，也是唯一上街卖过香烟的皇妃。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经朋友介绍，已经36岁的文绣进了国民党的报纸《华北日报》，做了一个校对员。文绣工作认真，文字功底又好，深得当时的社长张明炜的器重。在张明炜的牵线搭桥下，文绣嫁给了一位年过四十的国民党退役少校。

那名少校叫刘振东，人非常正派，且性格善良。文绣漂泊半生，终于找到了一个好人家，从此安定生活。

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文绣的生活再次发生改变。

因为做过国民党少校，刘振东被判为“反革命”，不过政府没有让他入刑，也没有处罚，只是对他进行监督管制。1951年，刘振东因为表现良好，就被解除了管制，分配到北京市西城区清洁队当了一名清洁工人。

重新恢复平静的生活，文绣也没享受多久。1953年9月17日，文绣因为心肌梗死发作，猝然离世。

刘振东所在的清洁队帮忙打造了一口薄木棺材，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文绣的遗体就被拉到北京安定门外的公义墓地埋葬了。

“末代皇妃”一生未育子女，终年44岁。

馒头说

据说，有8个词，最能体现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那种宽容。

这8个词分别是：“大过年的”“人都死了”“来都来了”“都不容易”“还是孩子”“给个面子”“为了你好”“习惯就好”。

必须承认，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几千年总结下来的一种心平气和过日子的传统和方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有些原则性的事情，确实未必适用。

比如文绣离婚。仔细想来，她离婚这件事，也基本上没跳出这些词，只不过，她没选择宽容。

她之所以要自杀，就是因为“大过年的”触动的；她的族兄劝她，自认为出发点就是“为了你好”，溥仪作为逊帝被赶出紫禁城，其实也“都不容易”，但她没有“给个面子”，而是奋起抗争，因为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避免“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有时候是个很可怕的词。

文绣的一生，不能说是幸福的一生，但她至少做了自己能力所及的最大抗争，最后的归宿不能说肯定是她想要的，但至少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她应该比婉容要幸运。

我曾写过一句“愿天下眷属永是有情人”，但你我心里都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如果每一份爱情都是以甜蜜开场，以幸福收尾，那人类哪里还会有那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甚至又哪里会出现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爱情需要宽容和忍让，但同样有原则和底线。

敢爱敢恨，敢失去，敢重新开始。

日本“战国第一美人”，到底有没有得到爱情？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没有爱情？肯定是有的。但相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朴素爱情来说，背负太多目的和使命的政治联姻里，到底有没有爱情，却一直是个谜。

1

先给不太了解日本战国时代的读者，做一个简单的预热。

日本的“战国时代”，一般认为是从1467年到1615年这148年的时间，自室町幕府后期，到德川幕府成立——这个时间跨度，在中国是处在明朝的成化年间到万历年间。

虽然有日本文学家和战国迷的包装成分在内，但日本的这段战国史确实将星云集，精彩纷呈，可以说和中国的三国时期颇为相似。

而我们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但我们不说男人，说女人。

故事的女主角，叫作阿市。

她有一个特别的名号：日本战国第一美人。

2

1573年8月28日这一天，阿市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走到了尽头。

城外，喊杀震天，城池已被敌军团团围住，被攻破只在旦夕之间。城内，小谷城的城主浅井长政已经做好了各种安排，准备切腹自杀。

按照规矩，丈夫自杀，妻子是应该一起赴死的。



游戏《太阁立志传5》中的阿市形象

浅井长政正是阿市的丈夫，所以阿市也做好了自杀的准备——尽管这一年，她才26岁。

但是丈夫阻止了她。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但浅井长政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他要把阿市送给城外的敌军。

他并不是要献出自己的妻子，而是因为围城的敌军是被称为“第六天魔王”的织田信长的部队。

而阿市，全名叫织田市，是织田信长的亲妹妹。

时间回到1564年。

那一年，阿市17岁了，他的哥哥织田信长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

在那时，曾经只是尾张国（位于今日本爱知县西部）一个小大名（大名，相当于中国古时的一方诸侯）的织田信长，已经开始慢慢崛起了。但那时的织田信长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横扫一切的地步，所以他需要缔结一些盟友。

织田信长看中的，是北近江（位于今日本中部地区）的一个大名，叫浅井长政。

浅井长政那一年其实也就19岁，但已经是浅井家雄才大略的少主。在他的手里，浅井家从原先的孱弱一路崛起，成为北近江的豪强。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联盟和契约有一个重要的途径：联姻。

织田信长有一个最疼爱的妹妹，因为美貌，早就引得远近的武将争先恐后地来求婚。

这个妹妹，就是阿市。

但哥哥有自己的安排。于是，17岁的阿市，就嫁给了19岁的浅井长政。

4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包办”婚姻。

但这场婚姻，对双方来说却并不是一个痛苦的选择。

浅井长政年轻，有谋略，英武过人，当时有“第一美男”的称号。他非常崇拜织田信长，他原来名叫浅井贤政，为了表达对自己偶像的敬意，取织田信长的“长”字，改名浅井长政。

尽管有人说浅井长政娶阿市也有政治目的，但有一个证据应该能证明浅井长政还是很爱阿市的：原本浅井长政已经有了原配夫人，阿市只是一名侧室，但浅井长政娶了阿市之后，再也没有纳过妾——这在日本战国时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如果说那时候有“郎才女貌”的话，浅井长政和阿市应该算是一对。阿市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应该说是有了幸福的生活。

但在战乱的年代，哪有长久的安稳幸福？尤其是对一名女性而言。

5



任天堂3DS版《信长的野望》游戏中的浅井长政形象

浅井长政和他的浅井家，很快就到了抉择命运的十字路口。

1570年，羽翼初成的织田信长开始“天下布武”，四处讨伐诸侯，而这一年，他决定进攻一直不服自己的大名朝仓义景。

这一举动，触动了浅井长政的底线。

在浅井家还非常弱小的时候，朝仓家一直是他们最大的支持力量，可以说，没有朝仓家，就没有浅井家，两家世代为盟。

当浅井长政迎娶阿市，与织田家结为盟友的时候，浅井长政对自己的偶像只提出过一个条件：永远不能进攻朝仓家。

但显然，把目标定为“天下一统”的织田信长违背了当初的约定。织田信长联合自己的盟友德川家康，一路势如破竹，不断攻下朝仓家的城池，最后打到了一座叫金崎的城池下。

这就把浅井长政推到了悬崖边。

浅井长政的一边，是自己的政治盟友，也是自己最崇拜的大舅子；而另一边，是世代对自己家族有恩的朝仓家。

当时的态势是：朝仓家早就今不如昔，衰败不已，而织田家如日中天，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那个曾经被称为“尾张的傻瓜”的人（指织田信长），将来真的能一统天下。



浅井长政的亲笔手书。他的“兵戈无用”理念和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理念，形成鲜明对比

站在谁那边，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但浅井长政却最终选择了一个字：义。他明知对抗织田家是死路一条，但他实在逃不过一个“义”字的折磨，又在父亲浅井久政和一干重臣的影响下，他决定背弃和织田家的盟约，冒死从背后向织田信长的军队发起突袭。

这一个举动，又把浅井长政的妻子阿市，推到了一个分岔路口。

6

对于阿市来说，她的抉择和丈夫一样艰难。

一边，是深爱自己的丈夫；而另一边，是一直疼爱自己的哥哥。

阿市知道，自己的抉择可能会决定两大势力的存亡——不通风报信，哥哥必然会因为后路被抄而兵败；通风报信，丈夫肯定就和哥哥撕破脸皮了，而和织田家作对，等于是自寻死路。

最终，阿市还是做出了自己的抉择：她秘密派人，给自己的哥哥织田信长送了一袋豆子。

当时正在围攻朝仓家的织田信长，是非常自信的，而且他满心以为浅井家会接受自己的请求，一起夹击朝仓家——他知道浅井家和朝仓家有盟约，但谁会傻到背弃和织田家的盟约，去帮一个毫无前途的大名？

但织田信长收到了妹妹寄来的那袋豆子，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当时日本人用袋子装豆子，是豆子在中间，两边用绳子扎紧。

织田信长一看这袋豆子，立刻就明白了妹妹试图传递过来的信息：

织田军就是中间的那袋豆子，前面扎紧的是朝仓家，后面扎紧的，是浅井家——浅井长政倒戈了！



《太阁立志传5》中的木下藤吉郎。当时他已被赐名叫“木下秀吉”，后来改名为“羽柴秀吉”，再后来改名叫“丰臣秀吉”——对，就是那个最终统一全日本，大名鼎鼎的丰臣秀吉（其实木下藤吉郎远没游戏中画的那么机灵，他长相猥琐，被称为“猴子”）

织田信长当机立断，留下一个叫木下藤吉郎的部将死守金崎，自己全速撤退。

当织田信长逃回京都的时候，据说身边只剩下了10个人。

是的，织田信长在那一仗败得非常狼狈，他视其为自己一生中的奇耻大辱。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浅井长政成了织田信长恨不得生啖其肉的一个

人。

7

时间到了三年后的1573年8月。

霸业初成的织田信长在灭了多路诸侯之后，派出三万大军，来找朝仓家和浅井家报仇了。

其实，就在浅井背叛织田后不久，织田军就在姊川合战中大败浅井和朝仓的联军，浅井和朝仓两家已经一蹶不振了。

经过三年，织田家越来越强，浅井和朝仓家越来越弱，这次的报仇，谁都看得到结局。

很快，织田的大军就包围了浅井家的主城小谷城，浅井长政四面楚歌。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浅井长政没有料错，他拒绝阿市殉难的要求而把她送回给织田家，确实救了心爱的妻子一命——织田信长再狠辣，也不舍得杀了自己的亲妹妹。

随后，浅井长政和父亲浅井久政一起选择了切腹自杀。

这场战斗后，织田信长带着切腹的朝仓义景、浅井久政和浅井长政三人的头颅回到了自己的都城。

在庆功宴上，织田信长展示了用三个人的头盖骨制成的酒杯。

那是用他妹夫的头盖骨制成的酒杯。

一年之后，织田信长派木下秀吉（即木下藤吉郎）找到了之前浅井长政秘密送走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斩草除根。

那是他的两个外甥，也是阿市的儿子。

8

关于阿市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失去丈夫和儿子的阿市（三个女儿被送还），被哥哥织田信长送到了自己的弟弟那里，一待就是9年。

那是落寞的9年。

如果不是发生另一个大变故，“战国第一美女”很可能就会这样落寞地过完一生。

1582年，一件震惊整个日本战国时代的大事发生了。

当时统一日本只是时间问题的织田信长，在京都本能寺遭到了亲信部将明智光秀的背叛围攻，在少数随从力战不敌的情况下，负伤后的织田信长退入本能寺，纵火自杀，时年48岁。

织田信长一死，他手下各个实力派的将领顿时鼓噪起来，除了争夺位置和地盘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希望能够娶阿市为妻，然后保护她和她的女儿。

那一年，阿市已经35岁了，但依旧倾国倾城。

其中争夺最激烈的，是织田家的两大实力大将：羽柴秀吉（就是最初那个木下藤吉郎）和柴田胜家。

羽柴秀吉爱慕阿市已经很久了，但阿市痛恨他亲手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于是，她选择了柴田胜家。

那一年，柴田胜家已经60岁了。

但比“形同父女”更糟糕的，是之后柴田家的命运。

当时织田家的家臣中，羽柴秀吉毫无疑问是最具实力的接班人，他灭掉了背叛织田信长的明智光秀之后，兵锋直指他统一织田家的最后堡垒——柴田胜家。

贱岳一战，羽柴秀吉大破柴田胜家，把柴田的主城北之庄城团团围住。

那是1583年的事情，阿市嫁给柴田胜家还不满一年。

和当初浅井长政的小谷城被围时一样，柴田胜家叫新婚妻子阿市带

着三个女儿出城投降。

但这一次，阿市选择拒绝——她只同意将三个女儿送出城。

于是，柴田胜家在城内与家臣和阿市举行了最后一次酒宴，然后带着她登上了城中的天守阁。

在天守阁上，柴田胜家选择了面对羽柴军的方向，切腹自杀，对着敌军剖出了自己的肠子。他的家臣一见此状，立刻引爆了天守阁——他们不希望羽柴秀吉得到柴田胜家的首级。

而阿市呢？

在切腹自杀前，柴田胜家选择先杀死了阿市。

那一年，“战国第一美人”阿市，36岁。

馒头说

关于阿市一生是否真的得到了爱情，一直有争论。

嫁给浅井长政，很多人都说阿市得到了真正的爱情，但也有人说，她只不过是一个政治联姻的牺牲品，而在关键时刻选择向哥哥通风报信，这算对丈夫的真爱吗？

嫁给柴田胜家，有人说阿市选择殉情是出于真爱，但面对可以做自己父亲的柴田胜家，才相处不到一年，真的可以生出真爱吗？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在男权盛行的日本战国时代，以阿市的身份和身世，能得到真爱是运气，得不到真爱，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然后插个题外话。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这次文章中插的图片，大多是游戏图片？

那是因为我之所以喜欢和了解日本战国史，就是从玩游戏开始的。在初中的时候，我偶尔拷贝了一套叫《太阁立志传》的游戏（这个系列我至今都认为是光荣公司的三大神作之一，另两个是《三国志》系列和《大航海》系列），立刻沉迷其中。这个游戏就是以木下藤吉郎为主角

（后来几代可以任意扮演角色），从平民玩起，最后统一日本。

从一代一直玩到五代，其中我记得《太阁立志传2》还是全日文的，我是边猜边通关游戏的——但没问题，我那时候对这段日本战国史已经烂熟于胸了。然后再加上玩《信长的野望》系列（光荣公司出的另一个以织田信长为主角的游戏系列），我真的对日本战国史产生了兴趣，从高中起，不断开始找相关方面的资料和书籍看，还在兴趣课上选修了日本史。

讲这些是想说什么呢？是想说，适当玩游戏，真的可以激发学习兴趣。

当然，现在像《太阁立志传》系列、《大航海》系列这种可以启智的单机游戏已经销声匿迹，纯粹打怪升级充值的游戏大行其道，那又是另一个讨论话题了。

这位日本历史上最美的“平民皇后”，到底幸福吗？

关于皇室的爱情，我们熟悉两句话，一句叫“一入侯门深似海”，一句叫“来世莫生帝王家”。皇室婚姻有没有爱情？或者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他们没有爱情？

1

1951年7月末，日本的媒体忽然热闹了起来。

起因是最大的两份报纸《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都开始关注一个全日本老百姓都关心的话题：

这一年的12月23日，是皇太子明仁殿下的18岁成年之日，这也就意味着皇室要开始考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那就是——太子选妃。

日本皇室的选妃，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946年，虽然昭和天皇裕仁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走下神坛成为凡人，但日本皇室的很多习俗还是沿袭了下来，其中一项，就是皇太子选妃。

皇太子明仁是昭和天皇裕仁的长子，他选的妃子，将来就是日本的皇后，所以选妃工作当然不是一件小事。

按照皇室的习俗，皇太子的妃子，是只能从“皇族”和“华族”中甄选的。皇族不难理解，华族指的就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贵族阶层。虽然1947年后，所谓的皇族和华族都已经被废除了，但皇太子选妃的对象，依旧被“选妃委员会”圈定在原皇族和原华族之间。

于是，北白川家、久迩家等11家原皇族和五摄家、清华家等原华族家的女儿们，开始被纳入考察范围。

但考察下来，“选妃委员会”傻眼了：

二战之后，整个日本从废墟上重建，很多观念礼教的根基也随之动摇。很多原皇族和原华族家的适婚女子，都纷纷打破原来家族通婚观念

的束缚，与平民谈恋爱了！

比如久迩家的久迩通子，作为皇后的侄女，不顾家庭反对，毅然和一个工薪阶层的大学同学结婚了；另一个合适人选伏见章子，也和学习院大学（倒也是顶级贵族学校）的棒球明星结婚了。至于其他一些适龄女子的家族，并没有觉得女儿成为“太子妃”是一个多好的机会。

没人肯当未来天皇的老婆，这件事也是非常让人头疼的啊！

无奈之下，“选妃委员会”只能把选妃的范围，从原皇族和原华族，扩大到一些贵族学校，给那些学校发去了推荐委托书。

结果，日本著名的贵族学校圣心女子大学发来了一份推荐人名单，“选妃委员会”成员一下子注意到了排在第一位的一个女生的名字：

正田美智子。

2

正田美智子，1934年10月20日出生。日本皇室开始选妃的那一年，她17岁。



幼年美智子

说美智子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恐怕并不夸张。

美智子的祖父叫正田贞一郎，是大名鼎鼎的日本面粉企业“日清制粉”的创始者，外公副岛纲雄也是一个大财阀。父亲正田英三郎接过了“日清制粉”这个家族企业，一步步做大做强。

正田英三郎有三个兄弟，也就是美智子的叔叔和伯伯，一个是大阪学校的校长，一个是东京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另一个是东京大学医学部

的教授。

所以，美智子不仅仅是一个“富二代”，还是一个标准的“精英二代”。

正田家也确实是按照“打造一个新的上流阶层名媛”的标准，来培养这颗掌上明珠的——美智子进的圣心女子大学，就是日本最有名的培养名媛的贵族学校。

在学校，美智子从班级委员做到年级委员长，在四年级的时候做到了校委员长；她从小就学钢琴和绘画，四年级的时候在校友会杂志《虹》上发表了题为《亨利·卢梭的画》的8页美术论文；1956年，美智子以一篇名叫《并非虫蛀的苹果》的文章，在一次全国性征文比赛中获得第二名（4850篇文章参选）。

在家里，美智子每天下午3点回家，吃点心，做功课，练琴。吃完晚饭后，一家人就会聚在客厅，听母亲演奏肖邦的古典钢琴曲，有时候，孩子们会让母亲伴奏而一起唱歌。

一路被精心呵护成长的美智子，就像一颗没有任何杂质的宝石，无论是外貌还是才华，都是当时年轻女性中的上上之选，以至她的一位老师曾这样评价她：“你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女孩，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

所以，美智子进入“选妃”名单，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只是在“选妃委员会”眼中，美智子虽然近乎完美，但还是有一个致命缺点：

她的出身是平民。

3

但灰姑娘和王子的爱情，真的能因为阶层而隔断吗？

1957年8月，日本的上流阶层豪华避暑地轻井泽镇，举办了一场网球比赛。美智子一家夏天经常去那里度假，美智子也是那里网球场的注册会员，所以也参加了比赛。

而那次比赛，其实是“选妃委员会”精心为皇太子准备的，目的就是让皇太子在休息室里与美智子见上一面，找找感觉。

没想到，这两个人居然在第三轮淘汰赛中相遇了。

那是一场混双比赛，23岁的美智子和自己的男性搭档，以7：5、6：3的比分直落两局，战胜了24岁的皇太子和他的女性搭档。

那场球，皇太子明仁输得心服口服，输得心旌荡漾。

这一年10月，皇太子在东京又举办了一场网球比赛，而这场网球比赛邀请的参赛选手，仅限于8月在轻井泽镇参加比赛的那些人——毫无疑问，皇太子知道自己想邀请的是谁。

在那次比赛中，皇太子给美智子悄悄照了一张相，还在之后的一个内部文化节上展出了这张照片。皇室成员都在问：这是谁家的姑娘？皇太子的侍从介绍：这是一个实业家的千金。

当时谁都没想到，皇太子会真的喜欢美智子，因为大家都觉得：皇太子怎么会把自己喜欢的人的照片公开挂出来？

但皇太子真的就爱上美智子了。

自从那次网球赛之后，皇太子就开始不断地通过电话和书信，对美智子发起了追求，虽然说美智子对皇太子的感觉也不算差，但似乎总是处于被动的一方，有些不置可否。

美智子的态度，还是和她的家庭有关。

美智子的父亲正田英三郎和母亲富美子好好培养女儿的目的，只是希望未来女儿能嫁到财界或学界门户相当的人家去，过平凡但幸福的一生，从来没想过要让女儿进入皇室——对身为平民的女儿来说，那未必是一个好归宿。

所以在1958年，正田夫妇一度想出一招：以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世界圣心女子大学国际同学会”为名，让美智子去欧洲旅行，让双方都彼此冷静思考一下。

但是，日本皇室的相关机构一而再再而三发来了信函，并派出正式

代表，表达了皇太子的态度——非美智子小姐不娶！（有未经证实的说法：皇室还一度有威胁正田家企业的暗示。）



网球是美智子和明仁的共同爱好



看看明仁太子看着自己心爱人的眼神

美智子对皇太子本来也就不反感，而明仁太子更是在电话中对她说过这样的话：

“只要你能坚定信心，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在如此的攻势之下，正田家经过几次家庭会议之后，终于同意两人正式交往了。

4

皇太子和一个平民出身的女孩交往，这种事当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人间宣言》发出后，日本皇室的权威已大不如昔，但皇太子打破常规去找平民女子交往乃至要结婚，还是让很多传统势力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音。

有皇族成员说："堂堂大日本帝国的皇太子，哪能随随便便从球场上乱拉一个打球的便当皇太子妃。"

也有议员在国会上公开说："虽说新宪法规定恋爱自由，但这是不是说，作为国民的象征，也可以去逛银座的茶馆呢？我行我素，国民会尊敬他吗？皇太子在轻井泽与美智子初次见面，就自己说可以，这和我们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呢？"

最终压下各方声音的，是皇太子的老爸，昭和天皇裕仁。



美智子和明仁的一举一动，确实受到媒体的极度关注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慎重考虑之后，这位第一个从"神"降为"人"的天皇，最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要皇太子喜欢，平民也无妨。"

后来曾有人分析，天皇裕仁同意这桩婚事，有向日本民众示好（二

战后他最应该赔礼道歉乃至谢罪受罚），顺带拉拢资产阶级的目的。但无论如何，天皇都表态了，其他人自然也不能再反对了。

不过，这并不妨碍有些人继续挑刺。

在皇太子与美智子发布婚约的当天，美智子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在回答“对皇太子的印象”时，美智子的回答是：“我觉得他非常整洁诚实，有气派，令人由衷地信赖尊敬。这些都让我感觉到了他的魅力。”

她还说：“今后无论何事，都要同殿下商量。生活要过得明朗，自然，愉快。还有，承蒙大家的帮助，我还要努力加强修养，尽可能把自己培养得更好一些。”

但是，很多原皇族和原华族的人并不关注美智子这些得体的回答，而是关注她的手套。



美智子出嫁时的照片，有人说从她父母的脸上没有看到喜色。美智子的嫁妆当时装了满满三大卡车

那天，美智子穿了一件象牙色的礼服，头戴白色圆帽，而那些人关注的焦点是：美智子戴的手套太短了！没有遮住手肘！

“看看吧，到底是从下面来的呀。”

“真是！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事后，正田家还专门派人去向皇室道了歉。

但不管怎样，皇太子对美智子的感情是真挚且坚定的，再没有什么能阻挡两个人的结合了。

1959年4月10日，皇太子明仁与正田美智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当时的日本媒体调查显示，87%的日本民众支持这桩婚姻。

“灰姑娘”终于嫁给了王子，故事的下半场开始了。

5

刚进皇室，美智子就面临一大考验：婆媳关系。

美智子的婆婆，也就是裕仁天皇的妻子良子皇后，本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当年裕仁天皇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同样也面临着“选妃”的问题。当时的“选妃委员会”给裕仁选的是日本元帅梨本宫守正的女儿梨本宫方子，而裕仁自己喜欢的对象，是自己的表妹久迩宫良子。（所以裕仁在同意自己儿子婚事的时候，也有点感同身受的味道。）

一场充满悬疑气息的“宫斗”出现在那次的“选妃”过程中：先是良子被查出有色盲，怕遗传给后代（良子的父亲差点为此切腹自杀），所以方子入选。但方子随后又被御医检查出“不能生育”，立刻被淘汰出局，嫁给当时的朝鲜王子李垠（日本人希望借此让朝鲜皇室绝后）。

结果，方子一嫁给李垠，立刻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那位出诊断结果的御医随即切腹自杀），而良子嫁给裕仁后，却迟迟生不出儿子。

历经磨难13年后，良子终于顶住压力，在皇室已纷纷劝裕仁纳妃生子的恶劣环境下，生出了一个儿子——就是明仁皇太子。

30岁的良子皇后得到儿子不容易，所以也格外珍惜。当初她其实也是反对儿子明仁迎娶美智子的，但碍于裕仁天皇同意了，她也没办法。虽然美智子作为太子妃，结婚一年后就为明仁太子生下了长子德仁，但婆婆依旧还是要给媳妇立规矩的。



成为皇后的久迩宫良子



美智子和儿子德仁

良子不亲自出马，而是派出了宫内厅女官长牧野纯子。

“宫内厅”是负责处理日本皇室成员一切事务的一个政府机关，而同样出身名门望族的牧野纯子的目的，就是要“管教”身为平民的美智子。

牧野纯子碰到美智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为平民的妃子而来任职的。”

在“日本容嬷嬷”牧野纯子的严格监督下，大到参加国事活动说什么话露什么笑容，小到买一件衣服，都需要得到批准。美智子如果陪同明仁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多说几句话，便会遭到女官的呵斥：“目下没有殿下，太爱管闲事了！”而在皇后面前，如果美智子多问几句话，女官长就提醒：“在皇后面前，少充内行。”

美智子后来曾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回忆那段过去：“既有艰难，也有委屈，总希望能习惯又非常难以适应，有时甚至感到周围的空气都要凝固了”。

面对牧野纯子的管教，美智子只能暗暗落泪，而明仁皇太子更是怒火中烧。结果在1969年，已经与明仁水火不容的牧野纯子引火烧身，“日本容嬷嬷”最终只能辞职。

但一个“容嬷嬷”走了，皇后手下还有好多“容嬷嬷”，更何况，皇后本人还健朗着呢。

1975年，天皇裕仁偕皇后良子访美，皇太子明仁和太子妃美智子前往机场送行，良子皇后向机场的每一位送行者点头打招呼，但看到儿媳妇美智子时，却把脸转了过去，然后直接和下一个送行者打招呼。

那时候已经有了电视，这一幕通过电视新闻呈现在日本民众面前时，全国哗然——原来之前一直有传闻说太子妃在宫中受气，都是真的啊！

从1959年美智子与明仁结婚，到1969年的10年时间里，原本体态丰盈的美智子迅速消瘦，甚至变得骨瘦如柴。有一段时间，美智子被传得了抑郁症，一度失语，只和丈夫在一起时才说话，在其他场合一句话也说不出，像个哑巴一样。

但日本民间反而对这位“平民太子妃”好感大增。

6

美智子也不是一味忍气吞声的。

虽然面临各方面的约束和管制，但婚后的美智子还是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在日本的皇宫里做出了一点改变：



美智子成为日本皇室历史上第一个拥有自己厨房的皇后

在日本皇室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乳母制”就是美智子倡导废除的，她坚持要求自己为孩子哺乳，以及孩子不能和父母分开抚养，而是要由

父母自己来教育。此外，在她的坚持下，她在皇宫内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厨房，她想亲手煮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吃。

当然，站在美智子这一边的，还有时间。

1989年1月7日，88岁的昭和天皇裕仁病逝，皇太子明仁继位成为天皇，而美智子的身份，也从太子妃，变成了皇后。

2000年6月16日，97岁的良子皇后（应该是太后了）病逝，美智子的儿媳妇身份也终于被摘掉了，她不再有婆婆了。

美智子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次数越来越多，笑容也越来越自信。她陪同明仁数十次出访外国，并在199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也是日本天皇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访问中国。

美智子所到之处，她的容姿、谈吐、举止，以及流利的英语（她当年是以圣心女子大学英语专业第一名毕业的）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两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了，当年那个年轻美丽的皇后，慢慢地变老了。



Bai百科

美智子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不过，上了年纪的“平民皇后”美智子，依旧做了很多出乎大家意料的事。

2013年11月14日，日本宫内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79岁的美智子皇后的一项声明：拒绝死后与天皇明仁合葬。

这个声明一出，舆论大哗，因为外界都知道，明仁一直希望能和妻子美智子合葬，但美智子为何会拒绝这一要求？

美智子给出的理由是：“我是平民出身，自然死后也是平民。我从来没觉得做天皇天后有多么荣耀，也没想过嫁入皇室后会和普通人不一样。我始终不过只是明仁的妻子，能与明仁相守到老已经是最大的福分。”

而宫内厅人士给出的解释是：



明仁和美智子

日本天皇有个惯例，在世时绝不建造皇陵。美智子皇后是怕自己走在天皇前面，因为如果要合葬的话，那么就势必要开始兴建皇陵——这是历任天皇都没有做过的事。

而这对天皇夫妇给大家带来的意外，还没有结束。

2016年8月8日，天皇明仁通过NHK电视台发表电视谈话，正式向

日本国民表示：

自己将选择生前退位！

自明治维新以来，在近200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天皇是生前就退位的。（2017年6月2日，明仁的退位申请被日本众议院批准；2019年4月30日，明仁正式退位。）

而外界猜测的目光，瞬间就聚焦到了一点上：



德仁和雅子

明仁退位，是为了调和自己两个儿子德仁和秋筱宫文仁亲王之间关于皇位继承的矛盾——德仁是嫡长子，但膝下只有一女，而秋筱宫却生了一个儿子，可以保证天皇再传香火。

要再详细剖析这背后的种种故事，就又是一段宫廷剧了。

而且，也就不得不提到德仁皇太子和他的妻子——哈佛大学毕业的平民女子小和田雅子。

这又是一段“明仁与美智子”那样的故事。

馒头说

看完美智子的婚姻故事，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感叹：“一入侯门深似海”，或者，“来世莫生帝王家”。

美智子和明仁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

明仁无疑是爱着美智子的——贵为皇太子，他是冲破重重阻力，才最终和平民女子结婚的。

那么美智子爱明仁吗？

据说，美智子75岁的时候，曾在公众面前说：“我和陛下没有恋爱过。”不过，这句话我一直没找到确切的出处。

如果依我自己的观点，我相信，两人年轻时，应该还是有爱情的。至于进入宫廷后，美智子被那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礼节和规矩，责难和束缚消磨掉了多少感情，那我真的不敢说。

美智子有损失——以她的家境和才华，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嫁了，这一辈子肯定活得雍容又开心。

但美智子也并非没有所得——毕竟成为太子妃乃至皇后，还是很多女孩的梦想，即便要付出代价，还是有很多女孩愿意付出所有搏一下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吃瓜群众，也没必要去争论明仁和美智子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情，究竟幸不幸福。不管怎样，这对夫妇还是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无论王室还是平头老百姓都适用的道理：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固然可贵，但更可贵的是，“天下眷属永是有情人”。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如果你生于20世纪60年代，你或许深深迷恋过她；如果你出生于70年代，你或许深深被她感动过；如果你生于80年代、90年代及以后，或许你也知道她的名字。那么，她背后的故事呢？

1

1913年11月5日，刚结婚一年的欧内斯特·哈特利在印度迎来了自己的女儿。

欧内斯特原籍美国，是英国驻印度军队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位业余戏剧爱好者。他的妻子叫格特鲁德，身世一直成谜——她一直宣称自己是爱尔兰人，但又有人说她是法国和爱尔兰混血，事实上，她似乎还有印度帕西人的血统。

可能是因为血缘复杂的关系，他们的这个女儿一出生就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美丽。他们给她取名为费雯·玛丽·哈特利。



童年时的费雯·丽



少女时期的费雯·丽和母亲在一起

但世人记住的，只是这个孩子后来的艺名：费雯·丽（Vivien Leigh）。

费雯·丽在印度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初6年。在她3岁的时候，母亲就让她在自己供职的业余剧团上台表演牧羊女，并进行了诗歌朗诵。母亲对费雯·丽的影响很大，她从小就在母亲的指导下阅读安徒生、吉卜林等人的作品，以及古希腊神话故事，所以她从小就对文学和戏剧有浓厚的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6岁的费雯·丽被母亲送到伦敦附近的圣心女修道院寄宿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教育。在学校里，费雯·丽学习了各种科目，但最感兴趣的是音乐、戏剧训练和芭蕾舞课程，并熟练掌握了钢琴、小提琴等乐器。母亲满足了她的兴趣，将她送到了伦敦西区的一

所戏剧学校，费雯·丽在那里掌握了戏剧表演基础，以及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

当很多和她同龄的孩子还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的时候，费雯·丽已经向自己的闺密表达了自己唯一的梦想：

“我要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

2

不过，费雯·丽在等到自己的导演之前，先等来了自己的爱情。

1931年，18岁的费雯·丽在一场街区的舞会上认识了31岁的律师赫伯特·利·霍尔曼。对于从修道院长大的费雯·丽而言，剑桥大学毕业的霍尔曼成熟、优雅、有风度，这些无不打动她情窦初开的内心。而从来对戏剧界人士不屑一顾的霍尔曼，也对眼前这位如同古典油画中走出来的女子大为倾心。

两人随即坠入爱河。

1932年，费雯·丽考上了伦敦皇家戏剧院，而霍尔曼在伦敦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所以每天都在费雯·丽下课的时候在学院门口等她。真的很少有人能抵挡这样猛烈但又不失温柔的呵护，费雯·丽很快就答应了霍尔曼的求婚——尽管她的母亲曾规劝她：钦佩一个人，不等于爱一个人。

1932年12月20日，还是一个学生的费雯·丽和霍尔曼律师走进了圣詹姆斯教堂，19岁的她戴上了象征爱情的绿宝石戒指，中止了学业，成了霍尔曼家的女主人。

结婚后一年，费雯·丽就生下了女儿苏珊娜。

丈夫事业有成，女儿聪明漂亮，家庭美满幸福，20岁的费雯·丽似乎在很小的年纪就成了不少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但很快，她发现自己想要的并不是这些。



费雯·丽19岁在婚礼上的照片



费雯·丽和女儿苏珊娜。苏珊娜是她一生唯一的孩子

费雯·丽渴望回到皇家戏剧学院继续学习，因为她从来不曾忘记自己“成为一个伟大演员”的梦想。但丈夫霍尔曼尽管温柔体贴，却对戏剧表演不屑一顾，他对妻子的期待是成为一个传统英国淑女式的家庭主妇，而不是去舞台上抛头露面。

这个时候，费雯·丽才想起母亲当时规劝她背后的苦心：当妈妈的深知女儿平静背后蕴藏着的巨大激情，而霍尔曼虽然能给女儿平静安定的生活，却绝难满足费雯·丽希望成就一番表演事业的雄心。

为了演好一个仅有两句台词的角色，费雯·丽甚至愿意放弃和丈夫去

度假而潜心准备。而霍尔曼在见识了妻子的决心后，也试图帮过她，比如让朋友帮助费雯·丽获得过一次在英国皇宫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机会，费雯·丽通过这次表演，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当一名伟大演员的决心。

1934年，21岁的费雯·丽被朋友推荐参演了一部叫《渐有起色》的电影，第一次登上荧幕。第二年，费雯·丽迎来了自己第一部崭露头角的电影《道德的面具》，评论界对她的表演大加赞扬，甚至有人称她演出了“英国少女的本性”。

费雯·丽聘请了自己的经纪人，希望开始正式踏上演员之路。经纪人认为她的名字“费雯·霍尔曼”不适合成为艺名，所以费雯·丽就取了自己丈夫中间的一个名字“Leigh”，由此成了“费雯·丽”。

根据费雯·丽后来的回忆，当时就开始有人评论她为“伟大的演员”。

3

然而，“伟大的演员”在等来伟大的作品之前，却遇到了自己的第二段爱情。

1935年，费雯·丽去观看了戏剧《皇家剧场》。这部戏剧她反复看了14遍，并不是因为戏本身多么诱人，而是因为她深深迷恋上了这部戏的男主演，当时被称为“莎剧王子”的劳伦斯·奥利弗。

在看完这部戏的时候，费雯·丽就忍不住对女伴说：“总有一天，我要嫁给这个人！”

同在英国，同在演艺圈，费雯·丽和奥利弗不可能没有交集，但很多时候只是礼节性的交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费雯·丽接到了一部片约，是拍摄电影《英伦战火》。那不是费雯·丽喜欢的电影类型，但她在看了演员名单后立刻就答应了下来——男主角是劳伦斯·奥利弗。

在片场，两个即将第一次搭档的人遇到了。费雯·丽非常礼貌地说了一句：“很荣幸能和您一起拍片。”而奥利弗的回答却是：“希望我们在片子拍完之后，不要互相讨厌。”因为奥利弗经常对电影拍摄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得罪导演和搭档是家常便饭。他之前曾赴好莱坞发展并签约米高梅公司，但之后却被米高梅开除——他在一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与米高梅的大明星葛丽泰·嘉宝意见不合，闹得很不愉快。

然而，当《英伦战火》拍完后，奥利弗却几乎每天出现在霍尔曼律师家做客，因为他发现自己不能忍受与费雯·丽的分离。



费雯·丽和奥利弗在《英伦战火》中的剧照

费雯·丽和奥利弗搭档合作的机会开始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剧中扮演浪漫情侣，更是使得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感情越来越亲密。两人发现已经完全离不开对方：他们一起散步，谈心，去广场喂鸽子，去美术馆参观……他们的朋友直到费雯·丽去世后依然对当时两人热恋的场景印象深刻："我从未见过这么相爱的一对，那时的费雯·丽简直美得不可思议。"

但与此同时，两人却都有深深的道德负疚感——费雯·丽有自己的丈夫霍尔曼和女儿，而奥利弗也有自己的演员妻子吉尔·埃斯蒙德，并有了自己的儿子。

两人在经历过痛苦的折磨后，各自向自己的伴侣提出了离婚，但是，都遭到了拒绝。

1938年，在谴责、自责、痛苦、迷恋和憧憬之中，奥利弗得到了去美国好莱坞担任《呼啸山庄》男主角的机会，他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所以决定再次去美国闯荡。

而费雯·丽不想和奥利弗分开，所以提出一起去美国。

奥利弗随即向费雯·丽介绍了好莱坞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后者正在为一部电影的女主角选角工作大伤脑筋——居然有1400多名女演员报名角逐这个角色。

而这部电影，就是《乱世佳人》。

4

26岁的费雯·丽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伟大作品。

当然，至少在选角的时候，费雯·丽完全不知道结局是怎样的。

由于《乱世佳人》小说的轰动性，再加上当时米高梅宣布的惊世骇俗的300万美元拍摄投资，好莱坞大大小小的女演员都知道出演“斯嘉丽”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和留下什么，整个选角竞争可以说是近乎白热化——制片人塞尔兹尼克每天至少要收到10个以上的午餐邀请以及无数的打招呼、递纸条乃至投怀送抱。但选角工作直到1938年底都没有任何头绪，塞尔兹尼克依旧无法找到自己心目中的“斯嘉丽”人选，以至于女主角缺位的情况下，电影的外景镜头只能先行开拍。

直到那一刻——费雯·丽走到了塞尔兹尼克眼前。



费雯·丽在《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形象

当时，塞尔兹尼克正在指挥亚特兰大影视基地里那场大火的拍摄，他的弟弟米伦·塞尔兹尼克把刚抵达美国没多久的费雯·丽带了过来。塞尔兹尼克后来这样回忆：“我在指挥拍摄火景的时候，突然看到米伦领着一个女人走过来，他对我笑着说：‘天才，来见见你的斯嘉丽·奥哈拉！’于是在漫天火光的映衬下，我看到了自己寻觅已久的，活生生从书里走出来的斯嘉丽！”

高贵，美丽，平静中蕴含着可瞬间爆发的惊人力量，柔媚中混杂着桀骜不驯的野性——完全就是塞尔兹尼克想象中的“猫一样的女人”。

四天之后，漫长的女主角选角工作结束了，“斯嘉丽”的扮演者横空出世——费雯·丽。

电影开拍，各种麻烦事也就来了。由于《乱世佳人》投资巨大，观众期待值很高，而从导演到演员不乏大牌角色，所以电影的整个拍摄过程相当曲折，中途换导演、换编剧、换摄像、改剧本、演员罢演、导演

辞职等状况不断出现，而饱受质疑的费雯·丽只能用自己的职业态度来证明自己就是“斯嘉丽”的最佳人选。

费雯·丽确实为拍摄《乱世佳人》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她后来曾这样回忆拍摄这部电影时的经历：“差不多有6个月的时间，我天天从早到晚只想着斯嘉丽。我希望我的每一个举止、每一个手势都纯粹是斯嘉丽的。我应该感到，甚至斯嘉丽那些令人鄙视的行为也都是我干的。”



《乱世佳人》男主角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的经典剧照。费雯·丽当时的片酬是2.5万美元，她每天几乎在片场干满18个小时，而克拉克·盖博每天只在片场待7小时，片酬是12万美元。克拉克·盖博以风流著名，几乎和每一个合作的女主角都会传出绯闻，但在拍摄《乱世佳人》期间，盖博却对费雯·丽尊敬有加，一方面是因为费雯·丽当时心中只有奥利弗，另一方面，虽然两人也闹过矛盾，但盖博对费雯·丽的演技和敬业精神大为赞赏

据同在片场的人回忆，费雯·丽经常独自一人揣摩片中的形象直到深夜，以至经常魔怔般地自言自语，大哭大笑。而美国西部飞扬的红土和干燥的气候让费雯·丽的身体也迅速变差，在拍摄期间，她被查出患上了肺结核。而因为巨大的压力，费雯·丽染上了抽烟的习惯，最多的时候，每天要抽掉四包烟。她的精神状况也开始变差。

但是，影片上映之后，证明了一切都是值得的——全美国的观众陷入了癫狂，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斯嘉丽”。

1940年，《乱世佳人》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在内的10个奖项，而费雯·丽无可争议地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当时《乱世佳人》在全球公映的票房达到了惊人的1.8亿美元，加上后来陆续所得，达到3.5亿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乱世佳人》的票房总计放到现在可能要达到十几亿美元——而且凭借的不是高科技特效，而是真正的电影表演和叙事方式。一个可以证明这部电影历史地位的例子是：在此之后，好莱坞再也没有翻拍过《乱世佳人》。

当时的奥斯卡评委乔治·库克对费雯·丽给出了这样一句评价：

“她有如此的美貌，根本不必有如此的演技；她有如此的演技，根本不必有如此的美貌。”

凭借着“斯嘉丽”一举成名，费雯·丽被蜂拥而来的高额片酬邀约包围，并很快主演了《魂断蓝桥》并且再获成功。

但最让她高兴的却不是这些事，而是她的丈夫霍尔曼意识到自己的妻子真的成了一名世界级的大明星，自己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再牵绊她前进的步伐，所以同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霍尔曼后来依旧是费雯·丽一生的朋友，费雯·丽也会在碰到问题时征询霍尔曼的意见。）

而奥利弗的离婚提议也得到了妻子的同意。

就在费雯·丽得到离婚同意后的第二天，1940年8月29日凌晨0点过1分，她就与奥利弗在圣巴巴拉举行了婚礼。同样是奥斯卡影后的凯瑟琳·赫本在睡梦中被叫醒成为伴娘，一共只有两个好友参加了费雯·丽和奥利弗的低调婚礼。

但是费雯·丽毫不在乎，与获得奥斯卡奖相比，她觉得此时的她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5

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一开始确实是照着两人想象的那样发展的。





费雯·丽在《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中的形象

费雯·丽和奥利弗在结婚不久后就合演了影片《汉密尔顿夫人》，这部电影获得了成功。之后两人又合演了十多部电影，虽然也有失败之作，但总体来说，两人在感情和事业上都处于丰收状态。

费雯·丽是发自内心地爱着奥利弗，而且这种爱夹杂着崇拜。由于当

年奥利弗主演《呼啸山庄》只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提名，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费雯·丽都把自己得的那个奥斯卡奖杯藏起来，直到1948年奥利弗凭借自导自演的《哈姆雷特》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后，费雯·丽才把自己的奖杯也拿出来放到柜子上。

但是，费雯·丽对工作的巨大投入和执着，使她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疾病的冲击。1944年，已经怀孕的她在拍摄《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时因为过度劳累而流产。



《欲望号街车》中和马龙·白兰度合作的费雯·丽。在拍摄完这部电影后，她直接被送进了医院，她称为了演好这部电影，自己整个精神都垮了

这件事对费雯·丽的打击非常大，以至她的精神开始出现了大问题，主要表现为抑郁和躁狂的双相情感障碍，时而非常低落，时而却又会大叫大嚷，甚至会对奥利弗动手——事后自己却又什么都不记得了。

1951年，费雯·丽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又一个高峰：凭借在《欲望号街车》中饰演的“布兰奇”一角，费雯·丽捧得了人生中的第二座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杯。但是，拍完这部电影后，费雯·丽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差了，《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似乎与现实生活中的她互为印证，分

不清真假：渴望爱情，脆弱无助，容易瞬间崩溃——而“布兰奇”在电影中最后的结局，是被送进疯人院。

1953年，费雯·丽在印度拍摄电影《象宫鸳劫》期间，精神再次出了问题，被送进了医院。这一次严重到她的角色只能被伊丽莎白·泰勒顶替。心情糟糕的费雯·丽开始尝试用酒精减轻痛苦，但由此又陷入了另一个恶性循环。

最糟糕的是，和费雯·丽的身体一起渐渐虚弱下去的，是丈夫奥利弗对她的感情。

那段曾经让无数人羡慕的婚姻，慢慢走到了尽头。奥利弗开始无法忍受妻子的脾气，躲避和费雯·丽相处的机会，甚至彻夜不归。费雯·丽曾想尽一切办法挽留，甚至写过很多封长信，但于事无补。

奥利弗在那个时候似乎也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他72岁拍摄《情定落日桥》时曾对记者说：“就好比一条救生筏已经不能再上人了，你打掉了抓住它的手，你见死不救，因为这会搞得同归于尽，死一双而不是死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担心再这样下去，我会杀了她……”

1960年11月5日，费雯·丽在自己生日这天，接到了在外地的丈夫奥利弗寄来的一封长信。

奥利弗在信中说，他和一位一起演戏的女演员琼·普莱怀特已经深深相爱，琼已经向自己的丈夫提出了离婚，现在他也提出离婚，希望费雯·丽能够成全——完全就是当初他们各自摆脱自己家庭的场景。

同样也已经精疲力竭的费雯·丽之后发表了公开声明：“奥利弗爵士提出离婚，以便和琼·普莱怀特女士结婚，作为奥利弗夫人，当然应该满足他的要求。”

20年的婚姻，各奔东西。



费雯·丽和梅里韦尔

离婚后的费雯·丽还是无法忘记奥利弗。

事实上，费雯·丽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伴——戏剧演员约翰·梅里韦尔。梅里韦尔比费雯·丽小十几岁，是她长期以来的崇拜者，两人之前就熟识，也合作出演过《复仇天使》。在费雯·丽感情破裂，精神陷入崩溃边缘的时候，梅里韦尔出现在了她的身旁，给她莫大的支持，并且不离不弃。

费雯·丽在梅里韦尔的悉心照顾下精神渐渐恢复过来，但肺结核的老毛病却久治不愈，咳嗽时甚至会咳出大量的血，以至她向梅里韦尔抱怨：“为什么我不能得一种体面的病呢？”

与顽固的身体疾病相比，费雯·丽还是无法放下心病——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奥利弗。她不断写信给奥利弗请求再见一面，而奥利弗最终只答应了一次，但附上了条件：必须在公开场合，他必须带妻子琼一起。



离婚后搬到乡下居住的费雯·丽

梅里韦尔深深理解费雯·丽的感情，甚至愿意应费雯·丽的要求，朗读奥利弗当初写给她的情书，即便费雯·丽在写给梅里韦尔的信的末尾，落款是“费雯·丽·奥利弗爵士夫人”。但梅里韦尔真的不介意，他还陪费雯·丽参加澳大利亚、拉丁美洲的巡演，一路悉心照顾。

1967年7月7日，在外地演出的梅里韦尔与费雯·丽通电话，在电话中感到她虚弱无力，于是连夜赶回。回到家，他看到费雯·丽已经静静睡去，于是去厨房给自己弄点吃的。但他半小时后回到卧室时，却看到54岁的费雯·丽摔到了地板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梅里韦尔悲痛欲绝，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通知奥利弗。奥利弗立刻赶来，请求在前妻的遗体前单独待一会。

他那时候看到了费雯·丽放在床头柜上的相框，里面依旧是他的照片。

而奥利弗可能不知道的是，费雯·丽在两人离婚后说了一句话：“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有两件事我是确信不疑的。一是我一定会成为一名演员，二是我会嫁给劳伦斯·奥利弗。必要的话，我会向他求婚。”

馒头说

有一句挺流行的话：“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

当然，一般说这话也只是出于戏谑，我相信大家其实心里多少也都明白：世间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只靠颜值”吃饭的事。

放到真的要“靠脸吃饭”的演艺圈，其实也是如此。

凭借一张好看的脸蛋就红的演员有吗？有，可能还不少。但只凭一张好看的脸蛋就能一直红下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尊称一声“表演艺术家”，这样的演员有吗？在我的印象里，没有。

上帝无疑给了费雯·丽一张绝美的脸庞，这种美有时甚至让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但好莱坞历史上的“花瓶”演员多如牛毛，为何费雯·丽能拿下两座奥斯卡奖杯并被那么多人铭记至今？靠的不是她的脸，而是她的才华，或者说，是才华背后近乎忘记生死的拼命和努力。

然而费雯·丽也是不幸的。

前面曾说过作家。我说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敏感，更能捕捉到普通人捕捉不到的情绪，去感受，去体会，然后再呈现给读者，这也注定他们要比普通人承受更多的痛苦。

其实伟大的演员也是。他们为了表现出一个好的角色，只能逼着自己的情感翻江倒海，不断地被塑造成各种形状，重塑，打散，再重塑，所以他们的感情世界其实往往更脆弱，更迷茫，更容易崩溃。

而在这个群体里，女性演员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明显要大很多。

所以，看费雯·丽的故事，人们往往都在感叹她不幸的婚姻和对爱情的执着，但希望不要忽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

费雯·丽一生都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并且实现了它——

她当之无愧是一位伟大的演员。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世界历代名人情感揭秘》（李子迟，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6月）

2.《荧幕幕后的细节》（“三三”，豆瓣电影“乱世佳人”词条，2010年10月29日）

3.《费雯丽：盛世美颜也留不住一生至爱》（界面，2017年11月1日）

他左手江山，右手美人，最后喜提“公爵”……

小时候有首歌，是个声音很低的女声唱的，叫《爱江山更爱美人》，感觉挺有腔调的。后来读书，知道有个国王更干脆，是只爱美人，不爱江山，觉得更有腔调。再后来，渐渐知道，所有的腔调，背后都有故事。

1

1972年5月28日，78岁的爱德华告别了他曾经留恋（或者憎恨）的人世。

三天后，他的遗体被空运回了英国的牛津郡，在温莎的圣乔治教堂停放两天，接受公众瞻仰。

之后，在一个简单的私人仪式之后，他被安葬在了温莎公园的墓地。

爱德华是有国葬资格的，但是根据他的遗愿，人们并没有这么做。

事实上，他何止有享受国葬的资格——他原本可以拥有的，是整个帝国。



温莎公爵

他叫爱德华，但完整地说，应该是“爱德华八世”。

没错，他曾经是英国的国王。

但是，现在世人更熟悉的头衔，却是“温莎公爵”。

而且，人们只要谈论起他，都会附加上一句评价：

爱美人，不爱江山。

1894年6月23日，爱德华以英国国王长子的身份来到人间。

他的全名是爱德华·阿尔伯特·克里斯蒂安·乔治·安德鲁·帕特里克·大卫——没办法，作为王室长子，他的责任和压力从名字中就显现了出来：包含了祖父爱德华七世、外祖父（丹麦国王）、父亲的名字，以及英格兰（圣乔治）、苏格兰（圣安德鲁）、爱尔兰（圣帕特里克）、威尔士（圣大卫）的守护圣者的名字。

后来的史学家一直希望从爱德华的童年生活去寻找他后来惊世骇俗行为的成因，让他们欣慰的是，他们可能确实找到了一些答案：爱德华的父亲乔治五世从小就对爱德华非常严厉，而他的母亲玛丽王后不仅同样严厉，而且似乎更喜欢爱德华的弟弟。所以，爱德华从小就在一种“父教严厉但又缺乏母爱”的环境下成长。

毫无疑问，爱德华是被当作王室继承人来培养的——他在出生时就获封“爱德华王子殿下”。

他沿着王室教育的路线，在14岁进入了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就读。作为一个海军一流强国，英国无论是贵族还是王室成员，一直有送孩子进海军学校的习俗。但从小慑于父威又缺乏母爱的小爱德华，似乎并没有在海军学院里磨砺出坚强的性格。相反，有一次一位军官看见小爱德华在墙角哭泣，百般追问之后小亲王才说出原因：“在学校经常有学生踢我。”而军官在盘问了爱德华的同学之后，只得到了一个理由——他们认为等以后毕业进了皇家海军，就可以向别人夸耀：“嘿，伙计！我可是踢过国王的屁股！”



穿上戎装的爱德华

当爱德华达到服役年龄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况正激烈。爱德华并没有拒绝走上战场，但由于他的王室继承人身份，爱德华只是探望性地去了前线，并受到了严格的保护。

在严格的教育和保护下，爱德华王子以一种不可捉摸的姿态慢慢长大。1928年，父亲乔治五世给了爱德华一套独立的住宅，毕竟儿子已经34岁了。

独立居住后的爱德华，立刻展现出了对自由的渴望——主要表现在恋爱上。事实上，早在他成年后，他在这方面就颇具名声了。

成年后的爱德华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再加上英国皇储的身份，自然博得万千宠爱。但让人尴尬的是，爱德华的恋爱对象有不少是风尘女子，而其余的，无论是纺织业大亨的女继承人，还是美国外交官的女儿，大多数都是有夫之妇，其中不少都是比他年龄大的女子——后来的史学家只能再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这是爱德华从小缺乏母爱、缺少安全感的表现。



眼神忧郁，打扮时髦，风度翩翩，再加上王子身份，爱德华自然走到哪里都会获得万千芳心，但他却拒绝了很多年轻女子的求爱，包括母亲安排的婚事

爱德华王子不仅仅因为总是和有夫之妇幽会而变得声名狼藉，更因为口无遮拦而频频惹祸。比如他曾称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是“我所见过的生物中最恶心的一种，他们是人类的最低种类，就是猴子”，以及发表过不少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言论。

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尴尬和痛苦的，其实是爱德华的父母。

乔治五世曾说过一句话：“我死后的12个月内，这个孩子便会毁了自己。”

而母亲玛丽王后的话更直白：“我常常祈祷爱德华不要结婚，不要有小孩，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乔治和伊丽莎白的王冠了。”

但是，国王夫妇完全不会想到，他们的长子之后给他们带来的震撼，将远远超出他们想象。

3

1936年11月16日，爱德华八世召见了自己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

10个月前，爱德华刚刚从去世的父亲乔治五世那里继承了皇位，他现在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英属海外各自治领的国王和印度皇帝。

而现在，尊贵的国王和皇帝陛下，告诉他的首相：我要结婚了。

国王已经42岁了，他愿意收起自己放荡不羁的心选择婚姻，应该是一件大好事才是——但是，他选择的结婚对象，却让英国首相震撼不已。

爱德华爱上的女子，叫沃利斯·辛普森。

沃利斯·辛普森是个美国人，比爱德华小2岁——这不是问题。

她并没有倾国倾城的容颜——这也不是问题。

她是一个平民——这个有点小问题。

她在20岁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美国空军中尉，随后离异——这对英国王室而言就不是小问题了。

离异后的她又嫁给了一个叫厄内斯特·辛普森的美国富商（所以她被称为“辛普森夫人”）——这就是让英国王室很头疼的大问题了。

她在和爱德华幽会的时候，还和丈夫处于婚姻状态，即便在爱德华宣布要和她结婚的当口，她也还没有和丈夫办离婚手续！

英国王室、内阁首相、大主教异口同声：我的天哪！

这是英国王室、内阁以及大主教代表的宗教力量都绝对无法容忍的事。

但是，爱德华却对沃利斯非常着迷。尽管两人1933年才在一场舞会上经人介绍认识，但他已经到了非她不娶的地步。

国王作为一方，英国王室、内阁和主教作为另一方，双方相持不下。

王室和主教认为，沃利斯有一次离异，现在还在婚内，这种情况是英格兰国教会（英格兰的国家宗教）所坚决不允许的。而内阁更是说出了王室还想说的话：对于这样一个风流成性的女子，没人知道她爱上国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如果结婚，英联邦成员国不答应，英国民众也不答应！

而爱德华国王的回复简单到一句话就能概括："我不管，我就要结婚！"

不过，爱德华还是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允许他和沃利斯结婚，但她在婚后不拥有王后头衔，他们未来的孩子也不继承王位。

这个方案被通报给了英联邦各自治领政府：新西兰表示要考虑，爱尔兰表示无所谓，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三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而爱德华此时又开了嘴炮："澳大利亚才多少人口？没人关心他们的观点。"

但是，这个意见最终被英国内阁否定了。

作为回应，英国首相鲍德温给国王开出了三个选择：

第一，你放弃迎娶沃利斯；

第二，你迎娶沃利斯，但英国内阁总辞职；

第三，你退位，随便你干什么。

当时大家都认为，爱德华会在第一和第二个选择中认真考虑一下，但爱德华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个——他在给沃利斯的信中写道："放

心，我绝不会放弃！”



INSTRUMENT OF ABDICATION

I, Edward the Eighth, of Great Britain, Ireland, and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 King, Emperor of India, do hereby declare My irrevocable determination to renounce the Throne for Myself and for My descendants, and My desire that effect should be given to this Instrument of Abdication immediately.

In token whereof I have hereunto set My hand this tenth day of December, nineteen hundred and thirty six, in the presence of the witnesses whose signatures are subscribed.

SIGNED AT
FORT BELVEDERE
IN THE PRESENCE
OF

Edward R.I.

Albert

Henry.

George.

爱德华八世签署的文件

1936年12月10日，爱德华八世在三位兄弟约克公爵、格洛斯特公

爵和肯特公爵的见证下在贝尔维德城堡签署了15份给各个自治领的退位文件。

12月11日，他以“爱德华王子”的名义，向大英帝国的子民们进行了一次广播：

“终于我可以发表一些心里想说的话了。我从来就不愿意隐藏任何事情，但直到现在，在宪法允许下，终于可以说出心里的话了……我发现无论我有多么愿意履行国王的责任，在得不到我所爱的女人的帮助和支持之下去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是不可能的事。”

爱德华把自己的王位交给了弟弟乔治六世。

而弟弟给哥哥创造了一个新的封号：温莎公爵。

于是，“爱德华八世”成了“温莎公爵”。

他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动退位的国王。

从当上国王到退位，一共只有325天。

4

故事并没有结束。

1937年6月，爱德华终于如愿，在法国与沃利斯举行了一场低调的私人婚礼。

这场婚礼只有很少的人参加——作为爱德华的娘家人，英国王室没有一人前来。

但温莎公爵和自己的“温莎公爵夫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对于温莎公爵而言，他得到了自己用“退位”换来的回报——心爱的女人，以及自由。



婚礼时的温莎公爵夫妇

但事实很快证明，从爱德华退位到沃利斯的身份，一切都没有外界想的那么简单。

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在胡佛局长的亲自牵头下，调查和记录了一份长达227页的秘密档案。档案显示，温莎公爵夫妇一直和德国纳粹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英国的情报系统也早就侦查到了这一点。

调查最初是英国情报部门在沃利斯身上发起的——对国王未来要选择的妻子，他们当然要尽心尽责。

而调查的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沃利斯一直是纳粹政权的支持者！不仅在理念上，沃利斯在行动上也表现了出来。英国情报人员经过侦查后发现，在伦敦时，沃利斯一直和德国驻英国大使往来密切，密切到那位大使每天都要给沃利斯送17朵粉红色的康乃馨——这一切还是发生在沃利斯与爱德华热恋期间。

那位德国驻英大使后来成了德国的外交部长，他就是著名的希特勒的亲信：里宾特洛甫。

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当时欧洲阴云密布，谁都知道英国和德国已经处于开战边缘，而如果英国的国王娶了一个明显亲纳粹的女子为妻，后果会怎样？

所以，后世有一个观点认为：当初英国内阁必须逼爱德华退位。

而且问题还不仅在此，因为爱德华本人也对纳粹的理念非常支持。

爱德华曾经说过：“希特勒是正确而合乎逻辑的德国人，如果他被推翻，将是整个世界的悲剧。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人。”而1936年3月，当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进军莱茵河军事区的时候，当时还是国王的爱德华曾要求首相鲍德温不要干涉。

1937年10月，温莎公爵夫妇不顾多方面的反对，访问了德国，并去了希特勒的私人庄园，与希特勒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私密谈话”——在那个时候，欧洲已经成了一个火药桶，就差希特勒来点燃了。

其实，历史上英国王室一直和德国王室关系密切，且英国王室本姓里有“科堡”——那是德国人的姓氏，这在欧洲王室普遍有联姻的情况下并不奇怪。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普遍仇恨德国人，所以正是爱德华的父亲乔治五世在1917年将英国王室的姓改为“温莎”，取自英国最古老的王宫之一。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法国的温莎公爵夫妇似乎和纳粹的接触有增无减，英国更得到相关情报：此前温莎公爵在法国期间，曾向德国传递了一系列关于法国军事防备的机密情报。

此时的英国首相，已经换成了铁腕无情的丘吉尔。丘吉尔在一开始倒是和温莎公爵无话不谈，但后来随着收到情报的增多，渐渐发现自己在做一件危险的事。

于是，丘吉尔在1940年8月毫不留情地开出一纸调令：

请温莎公爵偕夫人去加勒比海上的巴哈马群岛担任殖民地总督。

在法国享受舒适生活的温莎公爵夫妇怎么会想去远在万里之外的荒岛呢？他们想尽各种方法拖延行程，直到一个消息传来：丘吉尔准备动用手段除去他们两人。



爱德华检阅纳粹党卫队

仓皇之中，温莎公爵夫妇连忙打包行李，踏上旅程。

事实证明，丘吉尔就算再胆大包天，也不敢派人谋杀王室宗亲。但他确实从英国情报部门得到了消息：

希特勒一直在派人接触温莎公爵，准备在登陆英伦三岛后帮助他复

位，让英国和德国从此走到一起。

5

1945年，二战结束了，温莎公爵夫妇得以重新回到了法国。

其间，他们还被派去百慕大群岛当了一年总督，最终还是回到了有人间烟火的地方。但是，人虽然回来了，公爵与英国王室的亲情却已跌至冰点。



爱德华的弟弟乔治六世，他有严重的口吃，2010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国王的演讲》就是以他克服口吃的故事为主线拍摄的

1946年，温莎公爵似乎等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他那51岁的弟弟乔治六世——也就是在位的英国国王——因为长期吸烟，被查出得了肺癌，生命似乎将要走到尽头。

在退位后的9年时间里，温莎公爵虽然爱美人，但也并非不爱江山。

他其实曾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国王宝座的回忆和留恋。温莎公爵夫人沃利斯对英国王后宝座的向往，可能比她丈夫渴望回归的念头更甚。



伊丽莎白二世不仅仅站稳了脚跟，更从此开启了“超长待机”模式

如果乔治六世去世，他当时那年仅20岁的女儿伊丽莎白无论资历和根基都还太浅，无法承担起“英国女王”的头衔，那么最有竞争力的，就是曾经做过国王的温莎公爵。

在那段时间里，温莎公爵夫妇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人都透露过回归英国的渴望和信心。

但是，温莎公爵的弟弟乔治六世似乎不答应——他顽强地又活了整整6年。

6年之后，已经26岁的伊丽莎白已经根基牢固，温莎公爵已经失去了机会。

1952年乔治六世的葬礼，温莎公爵是独自一人回国参加的。因为他的弟妹，也就是乔治六世的妻子伊丽莎白王后一直痛恨这个大伯哥，认为他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一走了之，把重担丢给了弟弟，导致弟弟压力大增，最后生病早亡。因为温莎公爵是丈夫的亲哥哥，所以伊丽莎白王后无法阻止他参加葬礼，但是她坚决不允许温莎公爵夫人沃利斯出现在葬礼上。

1953年，温莎公爵的母亲玛丽王后过世，依旧是他一个人出席的葬礼，他的妻子依然不被王室承认。同一年，他的侄女伊丽莎白二世加冕，这一次，连他自己也没受邀参加加冕典礼，只能收看电视直播——这件事，伊丽莎白王后终于能做主了。

进入晚年的温莎公爵夫妇，只能在法国自己的圈子里，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温莎公爵在穿衣打扮上一直引领当时男士时尚的风潮。他对男士时尚界的著名贡献至少有两个：格纹外套和“温莎结”。皮尔·卡丹曾评价：“20世纪在男性时尚领域内，只有一位真正的大人物，那就是温莎公爵。”



温莎公爵夫妇

6

1972年5月28日，温莎公爵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他得的是喉癌，一切已无力回天。在他去世之前的10天，他的亲妹妹以及侄女伊丽莎白二世终于来探望了他。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温莎公爵居然颤颤巍巍站了起来，向自己的侄女鞠躬致礼——这是英国王室和他的第一次和解。

但是，这份与亲情有关的和解，却不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温莎公爵夫人沃利斯。



在温莎公爵的葬礼上，伊丽莎白二世走在前，沃利斯走在后

温莎公爵的葬礼，作为遗孀的沃利斯当然参加了，但英国王室成员与她只有非常冷淡的寒暄，她自己一个人来，葬礼结束后自己一个人去机场，没有人送行或陪伴。

沃利斯之后也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她一直活到了1986年。但据她身边看护的人回忆，在最后的5年，她的生活质量非常糟糕，甚至已不能说话。因为怕她情绪激动，医生也严格控制探访她的客人人数，这似乎更显得她晚景凄凉。

1986年，沃利斯去世，享年90岁。

让她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她在世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答应她，去世后可以入葬英国王室墓地，与温莎公爵合葬。

但是，由于伊丽莎白二世母亲生前的再三关照，沃利斯墓碑上的头衔只是刻着“温莎公爵夫人”。

馒头说

人们总是憧憬那种石破天惊、冲破一切束缚的爱情。

所以，温莎公爵一直承担着大家对追求爱情勇气的最大向往——你看，江山都可以不要！

只是，当你更多地了解温莎公爵夫妇的故事之后，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些失望。

而且，我在正文中没有写到的还有：

沃利斯在与爱德华结婚前，还在给前夫写信，表示不想嫁给“无趣的英国人”，还表达了对前夫的思念之情。

而爱德华其实一直有放弃王位甚至自杀的念头，很多人后来推测，娶妻只是一个导火索。而且，据沃利斯婚后透露，其实“两人都有过后悔的念头”。

哎呀呀，童话里到底都是骗人的呢。

但问题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真的能长久存在吗？

爱情应该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不爱江山爱美人”，这只是爱情中“激情”这一部分，而爱情应该还包括关爱、承诺、依恋，以及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烟火气。

我是不相信有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的。

爱德华和沃利斯，因为一方的身份特殊，所以感情备受关注。但剖开来看，也不过是一段正常普通的爱情：有爱慕，有依赖，有虚荣，有

缠绵，有后悔，有不甘……

以这两个人的性格，如果他们在晚年分道扬镳，其实也不令人意外——我相信当初不看好他们能白头到老的人肯定比另一阵营的人要多很多。

但最终他们没有。

分与不分，我觉得其实都是爱情。

生活需要童话，但别照着童话生活。

或许，温莎公爵夫妇不是你想象中爱情的样子。那你想象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呢？

附录 读者评论

中国海归第一人：见证近代史的“活化石”

兔大爷：想起林则徐的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那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每一个有识之士都想为凋敝的大清（或民国）做点事情吧。因为，那里，是故乡。它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

Rea：央视纪录片《幼童》就讲述了他的贡献，可称大师。

孙大大：推荐大家一部纪录片《幼童》。留美幼童的命运，离奇曲折；他们的故事，美丽而忧伤。

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

苏瑞：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田小洽：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张磊：南开人看得热泪盈眶。曾经的南开在张先生的带领下享誉中外，而今却似乎在众人眼中日渐没落。但南开人骨子里的热血与激情从未退却。昔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今有千千万万南开人为国家之强大而奋进！恰逢南开百年之际，祝福母校！

坚果爸爸：怎么才能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那就是你我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去读书。国家亦然。

清末日本留学潮：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咖喱萌萌酱：看完就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那段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格物致知：清末民初，去西洋的大多是科学家，去东洋的大多都致力于革命，下南洋的大多是穷苦人家找活路。

Naomi：从秋瑾在留学生回国事件中的处理态度来看，她日后选择慷慨赴死也是必然的，性格决定命运，无论枭雄还是布衣，皆如是……

一次“简陋”的起义

董奇（千里草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林觉民《与妻书》。

若水∮若冰：孙先生固然身上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缺憾和污点，但就凭先生矢志不渝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永不放弃的勇气，就足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万世敬仰的伟人，指引我们中华民族的灯塔。大哉，中山先生！大哉，天下为公！

SEAN：之所以戏称他“孙大炮”，是因为铁路建设的事。但就像麦哲伦首次环球航行一样，一条路开出来，后人走得是如此顺畅，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破开迷雾的艰辛。那只是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坦途，而同一条路，开创者们走的则是步步荆棘。

悲壮黄花岗

福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要是被刺杀了，可就太冤了。李准收复东沙，视察西沙，划界定疆，为解决领土争端，维护中国领土完整提供了翔实的证据。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法国侵占西沙群岛，李准在报上发表过当年任广东水师提督期间，几次视察南海岛屿的报告书，重申西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以铁的事实证明西沙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并提及李准勘察西沙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1980年1月30日发布的《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等文件内还曾引用他著的《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

明涛：很多人相信历史只会记住第一个先行者。但黄花岗起义是个例外，打响第一枪、第二枪，甚至第三枪的人我都记得。言归正传，黄

花岗起义是在清王朝最后的统治铁幕下发生的，可以说黄花岗的烈士们是真正为革命为民族牺牲的，是真正的先驱！

胖虎：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在广州工作的那几年去过几次黄花岗。巍巍的三角形石碑深深触动我的内心。我当时就在想，到底是什么能够让和我一样年龄的人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干革命。而我如果回到那个年代，会不会像他们那样做？……嘴上的爱国人人会说，真正的英雄才是无声地勇往直前！

棉湖战役：决定黄埔军校存亡的生死一战

178：可惜屠龙勇士最后都变成了恶龙。

A雅戈尔江上孟洋：任何队伍在最初的时候，信念都是最纯粹的，为了信仰可以抛头颅洒热血。

蝎子：刚刚看完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看到顾祝同、蒋鼎文、陈诚等一批名字，心中十分感慨——针对井冈山的五次围剿，这些人都是领兵的。棉湖战役一战成名的何应钦也是在围剿井冈山的过程中一败再败，威名不再。值得一提的是加仑将军，他之前是反对把蒋介石推出来的，但最后在苏联被下狱之后，蒋介石还曾向斯大林求情，想把加仑带回中国。唉，往事不胜唏嘘。

日籍八路军：抗战期间的特殊群体

帆：中日友好确实来之不易，但是让中国人民能完全忘记仇恨真的很难，尤其是日本右翼的一些言论，当然也包括国内一些期望“光复日本”的键盘侠，时常挑动着我们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我们都没有亲历过那场战争，它是多么残酷我们也没法真切体会。静下心来想想，和平才是最重要的。不忘国耻，壮大自我。愿两国之间永不兵戎相见。

落雪流云：所以，不能对某个群体的所有人都贴上统一的标签。国家歧视如此，地区歧视如此，各类工种、不同学历等亦是如此。

小**LUO**：和平是需要希望和传承的，但更需要吾辈的自省和自强。

一个人的奥运会

阿拉新天地：刘长春是我母校的骄傲！白山黑水是我母校校徽的背

景。是的，我们都是东大人！

PEGASUS：我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在校生，我们学校的体育馆名为刘长春体育馆，建筑艺术馆门前还有一尊刘长春先生踩着起跑器冲出跑道的极具动感的塑像。

方。晨.**FANG.H**：无关成绩，无关金牌，中国奥运第一人，即使没能站上决赛赛场，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中国不会亡，中国有希望。

柠檬：借用白岩松先生的一句话，“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当他站上起跑线时，他和命运的抗争就已经开始了，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国家太需要这样的人了，所以他与国家以至整个民族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时刻值得被铭记，与结果无关，但如果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更完美了。

郭永怀：一位不应被历史遗忘的科学家

方周王：活在尘世间，我们当然需要各种喜闻乐见的娱乐和消遣。但是，每当我们抬头仰望，指引我们前进方向的，永远是那片璀璨的星空。豁然开朗。

张文军：有温度，点赞。历史有温度，有巧合，对“两弹一星”来说，今天应该算是个大日子。除了郭永怀的壮烈，还有任新民和屠守锷的生，1915年12月5日，任新民出生，1917年12月5日，屠守锷出生，多年后的1998年9月18日，二人又同一天成了“两弹一星”元勋，他们和黄纬禄、梁守槃还并称为“航天四老”。我们可能达不到他们这样的高度，但可以选择记住他们。致敬前辈，叩问初心，不断前进。

？？：现在中科院的研究生英语学习用的教材还是李佩先生主编的，雁栖湖畔也竖起了李佩先生的雕像，目光温柔坚定，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学子。郭永怀先生千古，李佩先生千古！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幕后较量

言午之言：柬埔寨当时居然投反对票？怎么个情况？（作者回复：柬埔寨当时是亲美政府当权，而不是西哈努克亲王掌权。）

夏离央：很想知道白俄罗斯、乌克兰、苏联都有投票权是怎么回

事？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那时候不应该是苏联的一部分吗？（作者回复：这是当时联合国创立时，苏联坚持的，因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在二战中付出巨大牺牲。）

戴戴：看得眼睛都湿润了！其中有着太多的艰辛和博弈。至于名单，时过境迁，太多的国家分分合合，只是有的国家还真是自始至终啊。

1991年，那场震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大辩论

Wyj：读历史常常使人感到，许多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当初是经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和争取才得来的。

Simon Ho in Shanghai：每次看到邓小平的文章都会真诚留言“多谢邓公”，他的历史地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老**A**：重温历史，总能为前行提供些许指导。改革开放四十年，进入深水区，更需要勇往直前的气魄。

残酷太空路：中国“长征三号乙”首次发射失败幕后

开芯豆：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艰，做则必成。

叶圣娟：作为航天人员家属，看到这篇文章，也是泪两行。航天工作者承担了强大的精神压力和工作强度，一年365天都要随时待命。

王璐：“火箭发射不是一场喊口号人多心齐就可以完成的运动，而是需要每一个细节都精确到一丝一毫的系统工程。”大师说得很中肯，搞科研真的不是说说口号就了得的，需要工作者前仆后继，甚至有的项目要多代。虽有“长征三号乙”的失败，总结了教训，继续以航天人的精神不懈钻研，后面才有了神舟，天宫，玉兔……更多更多的胜利。

尤里卡：航天不仅是发射成功那么简单，卫星进入轨道后还要进行长期的管控。分布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站点的同志365天全年无休，有多少人多少年都没有回过家，海南发射基地当初建场的一位干部瞎了一只眼，兄弟站的高工因为心梗倒在了操作台上，再也没有回来。中国航天，有多少人为她落下了残疾，有多少人为她付出了生命。特别是在艰苦偏远的地方，能吃上一碗泡面、吃到水果和绿叶菜就是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了。

徐霞客：一个富二代的理想与实践

宇飞：2003年，江阴把璜塘镇、马镇镇、峭岐镇合并，组建霞客镇。2007年更名为徐霞客镇。

诺宝爸比：我给别人介绍江阴，就是一城一人一村。一城指明末江阴抵抗清军八十余日，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做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江阴刚性精神。一人就是徐霞客。一村就是华西村。

公益自习教室：中国旅游日的5月19日，出自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游天台山日记》，5月19日也就是徐霞客出发赴天台山的日子。值得注意的是，从徐霞客游记中的日期看，《游天台山日记》并不是徐霞客的第一篇日记，但是徐霞客却把这篇游记作为整本游记的开篇，非常有意思。实际上，徐霞客一生登过三次天台山，写下两篇游记，这在徐霞客游记里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徐霞客对这座名山的推崇跟喜爱。

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一周，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

Mike Ma：欲望，绝非一个贬义词。人之所以为人，欲望乃基本的原始驱动力。中国社会，从历史的经验大体上讲，一向对“人欲”采取优容的态度。遥想圣人孔子，曾侃侃言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了人生的基本欲望。

默络经年：以前看吴军博士的《文明之光》中介绍西班牙、葡萄牙绕开教皇和世界上其他所有和他们一样的人，一厢情愿自作主张瓜分世界时，感觉特别可笑。是不是欧洲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突然阔气了一把，整个社会被巨大的利益弄得心灵扭曲呢。满满的西方霸权主义。

Killuaziyi：想要详细了解的同学可以去看茨威格的《麦哲伦航海纪》，记得副标题是“探险史上最寂寞的壮举”……

海底两万里：不管你是否凝视，深渊总是在那里

罗瑞龙：一直关注“馒头说”的文章，很高兴这次的主题是深渊探险，这也是我们单位研究的领域，特别开心，毕竟深渊是个很小众的话题。欢迎阅读《深海探险简史》（The Eternal Darkness），作者是美国深海探险家罗伯特·巴拉德。

芊延：“花了12分钟潜到这个深度，并花15小时重新浮出海面”，知

道上浮不能太快，不知道要这么慢。另外想起一部日剧里的一句话：“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是孤身一人，即使有伴侣有亲人，很多事情也只能自己承受。不存在完全的感同身受。”想来卡梅伦在深海底的3小时，该是孤独却幸福的吧。

牙牙：考过AOW（开放水域初级潜水员）潜水证的解释一下上浮慢的原因：在大深度身体组织会融入许多氮气，必须留出足够的时间做减压停留，否则直接升水会得减压病。

“请问，你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虚行之：实话说我一直觉得什么“征服”之类的字眼特别可笑，爬一下山就说征服了山，过一下海就说征服了海，上一下太空就说征服了星辰大海。可是那山那海那片宇宙星辰就在那里，亘古不变，无论你来不来，它不用管你，不用看你，你的来去对它而言连过客的意义都没有。当然，对于人本身来说意义非凡，但我个人认为，也只能说，你征服了自己……

沙海一舟：现在的初中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登上地球之巅》，介绍的就是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的事迹，登上珠峰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固然值得人们铭记，但托举他们登上顶峰、毅然把自己的氧气瓶留给登顶队友的刘连满更让人难忘和敬佩，套用现在的词语：在他身上才更好地体现出了中国精神，国人精神，国家精神！

邓鑫：马洛里死于攀登现实中的山，更多的人却死于攀登心中的山。山高人为峰。毕竟，山就在那里。毕竟，个人的信念和理想就在心里。如果没有现实和心中的奇峰迭起，个人的生命和人类的历史将会多么平庸无趣。

加加林之死

晓风：曾经专门去克里姆林宫看了加加林从太空带回的树种栽种长大后的树，一是明显比旁边同时栽种的同品种树大，二是枝干呈黑色，树前面有铜板显示牌，刻着尤里·加加林太空之树的说明和日期，看着上面的俄文，想到第一个上太空的人类，这么年轻就以这种方式辞世，令人唏嘘，默默凭吊良久……

老老虎：记得在很多年前的《航空知识》杂志上有过一篇比较详细

的分析文章，最后分析加加林飞机失事的原因是对飞行高度判断失误，导致以为要穿过一片云层，但是直接撞到了地面。文章里说当时加加林的飞机是在两层云的中间飞行，类似于在一个三明治的中间。下面那层云的高度离地面很低。但是对高度的误判导致飞行员以为在两层云的上面。所以做了俯冲穿云的动作，直接穿过了下层，再想拉起已经来不急了，导致事故的发生。

Cyborg：在看《登月第一人》时，记得阿姆斯特朗在执行双子星任务时的一个惊险的场景。在遇到意外情况之后，他把飞船与被对接的飞船分离，自己的飞船在不断翻滚，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还能够稳定好飞船的姿态，或许这就是宇航员的过人之处吧。

那些从月球回来的宇航员

团团：每次站在海边，我就感觉豁然开朗，面对大自然，自己的那点鸡毛蒜皮真的不算什么。但是，回到现实，又继续陷入那些鸡毛蒜皮当中。也许，回到地球的宇航员们也跟我一样吧：震撼，放下，再面对，失望……

左林右李：我觉得，了解了世界上99.99%的人都不了解的真实，却要一生隐瞒，可能对于再强大的人类都确实是一种煎熬。

ZHE就是我：看到那张从月球看地球的图片，我一下震惊了。换个角度审视自己习以为常的，不是自己，不是家庭，不是国家，而是赖以生存的地球，看到自己的地球在空中冉冉升起，这个触动太具颠覆性了。这是个哲学意义上的冲击，这样的精神错乱不是一般人能开解的。越探索到最后，越无人能共鸣，孤独，在常人眼里就是疯魔了。向这些伟大的探索者致敬！

“挑战者号”悲歌

洛洛特马希：2003年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了“哥伦比亚号”返回大气层时解体成流星雨的震撼画面。10年后看到一个NASA内部调查报告，得知“哥伦比亚号”发射后两个底层工程师就已发现隔热板可能被冰块砸掉的重大风险，但在向上层层汇报的过程中被忽略了，且没有提醒“哥伦比亚号”上的宇航员……最后也没有人被问责。

回头是岸：我在航天系统工作过十年，细节决定成败已经是共识。

每次事故调查结束，都会发现主要原因就是忽视细节。

许静：前两天回顾了那篇关于马洛里攀登珠穆朗玛峰遇难的文章《请问，你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其中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居然是，宇宙高山即使征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会改变什么。即便如此，大师依然写了这篇，而且我没记错的话，这早已不是大师第一次写人类探索宇宙大事件中的悲剧，为什么？因为会有更多人，心中还是向往那些星辰那些极限，即使危及生命，即使前路迷茫，因为那最吸引人心的，是你我梦想的方向呀。

18年前的今天，人类超声速旅行的梦想破碎……

Leo.华维立：剩下2000米刹车会怎样？已经达到了起飞速度，首先不能打反推，不然左右受力不一致，飞机可能立刻就打转翻滚解体，而只靠主轮的刹车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距离停下或减速到安全速度（民航机降落时减速的主要手段是反推和襟副翼，高速时刹车起的作用不是特别大），那么飞机会冲出跑道，一旦高速出跑道，结果也是打转翻滚解体，所以飞行员过点起飞是对的，先爬升，看看高风速是否会压住火势，然后再按飞行手册执行迫降。

天狐狸：经济决定面子，所以它下马了。假如面子决定经济，我想它还能存在好久。

好女孩就该早睡早起：推荐大家看一看纪录片《空中浩劫》。B站有，上百集。了解一下航空业充满坎坷的发展历程。看过这个之后就能知道，当今民航业一些看似奇葩的设计或者奇怪的规章制度，其实背后都是血的教训。

人类能不能扮演“上帝”？

朱译峄：觉得人类真是有种令人动容的热情、执着与天真啊。如果真的有上帝，看到这样不完美的可爱的造物，应该会很愉快吧。

GREATGO：看了最后的巴甫洛夫的狗，突然想起来这段：薛定谔的猫、巴甫洛夫的狗、斯金纳的鸽子、桑代克的猫、科勒的猩猩、托尔曼的老鼠、布里当的驴、童第周的鲫鱼、芝诺的乌龟、坎德尔的海兔、摩尔根的果蝇、威尔逊的蚂蚁、洛伦兹的蝴蝶、爱德华科普和奥斯内尔马什的蛇颈龙、内格尔的蝙蝠、庄周的蝴蝶……果然大牛们都有自己的

宠物啊。

Tin，Tin：刚开始轰动一时，主要是计算机技术不够发达，现在被放弃也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放在今天做的话，肯定是大数据的运算模拟，搭建实景更多的是研究人类特定状态下的行为心理及生理状况了。

聊聊颜真卿，以及他的《祭侄文稿》

大扬：千古名臣，满门忠烈。颜骨书法，风骨垂范。

Jimmy：看了这篇文章最深的感触是，一个人通过一幅作品，折射出一个民族应有的一种气节，忠诚。也正由于颜真卿是大书法家，忠义之士，所以他的这幅文稿所涵盖的信息量和精神远超过其他的书法作品。

苏：前年季春，我曾经请托永州的长辈带我观摩了两处古迹，一处是柳子庙，一处是浯溪碑林。浯溪观碑当日，正逢春雨绵延，我在雨声中于《大唐中兴颂并有序》前独立了一个小时，反复揣摩颜鲁公书“边将骋兵，毒乱国经，愔群生失宁”的心境，以及颜常山及季明身死，不见“自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一景的心酸无地。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便是因为儿时祖辈曾向我提起过那篇泣血而成的《祭侄文稿》。真正细读《祭侄文稿》，已经是大学时候，开蒙祖辈早已故去，但文卷中的心酸此时却越发清晰。鲁公一代大家，想在文稿中痛骂王承业拥众不救的无耻行径，但出于被祭祀的斯文体面，抹去“拥众”和“拥”字凡二次，渴笔枯墨中，国仇家恨的切肤之痛与文人的理智恍惚交集，跃然纸上，竟惹得我这个年轻人无状潸然。

蒲松龄：贫穷从来不会限制你的想象

从一而终：如果蒲松龄出生在当代，可能聊斋志异成了畅销书，蒲松龄成了亿万富翁，被各种采访，书本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足可见，信息时代的重要性和蒲松龄的生不逢时。

球：前段时间在飞机上，看了《见字如面》的第三季，里面就读了一封蒲松龄写给穷神的信，他自己又模拟穷神给自己回信。以前对蒲松龄的了解是写鬼故事的，通过这两封信发现他和我从小说了解的他还是不一样的。

五福：每次看见这样的故事，就觉得天纵奇才不一定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如凡·高，如蒲松龄等。他们为后世留下的财富如此深远巨大，在活着的时候却未必得到百分之一的回报或者赞赏。芸芸众生有不知的快乐，先行者有早知的痛苦。所以《奇异博士》里当博士把凡·高带回当代，简直令人无与伦比地感动。

杀妻自尽的天才诗人：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但是……

Stanley：自私与偏执，使得顾城最后活得脆弱、卑微，以致他的全部生命，包括精神的以及物质的生命，都系在了一条细细的蛛丝——谢烨身上。一旦这蛛丝断绝，他脚下就是不敢正视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在他精神世界里是最体面的结局，死前也要拉妻子垫背。唉，最可怜的是谢烨，顾城对她的爱，全然只是田园梦幻式的自爱。小时候就很喜欢顾城的文字，随着年龄增长愈发对其抵触，大概天才和疯子是邻居，而我这种俗人难以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吧。

ZHUO：最喜欢的是那首：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勇敢的心：在精神学界，大家一般认为顾城是有明确的精神疾病症状的，其实不能简单地把他归类为渣男，他的认知能力是一步步在受损的。认知能力包括我们常说的思维、情感与行为能力。据他的朋友和亲人回忆，他的幻听幻觉后期很明显，他的好多行为都是病态的。遗憾的是他没能接受正规的治疗，最后酿成悲剧。当然，好多艺术家和诗人，之所以有超乎常人的敏感和想象，也可能和他们的思维认知能力异于常人有关，也就意味着他们在我们常人眼里或者说是评价体系里，被认定为精神障碍。

一个因写关于中国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

琉璃：就凭在墓上只刻“赛珍珠”三个字，就可以看出她对中国的感情多深。

Cathy：有一部舞台剧《春江花月夜》是关于赛珍珠的。剧中运用了很多抽象隐喻的手法，每一阶段都有现实中的她和精神世界中的她互相映衬，其中两处最动人：一是她第一次婚姻失败时挣脱束缚，思想的，身体的，婚姻的；另一处是她老年时，挥弦奏响春江花月夜，弦一根根相继崩裂，那相应弦的红色舞者应声倒地，那是代表着她的生命逐

渐走向终点。剧中表现中西文化的冲突方式，她的作品小舞台，以及晚年的她深切地想念童年时代的内心小女孩，都有着不同于文字和语言的表现力。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愿报之以歌。这就是赛珍珠。

千渡：我是镇江人，早些年镇江建起了赛珍珠故居和赛珍珠纪念馆，有的学校还成立了赛珍珠班。之前我只了解赛珍珠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对于赛珍珠所经历的一系列东西方尴尬境遇却不甚了解，感谢馒头大师的讲解和剖析。

这些著名的日本作家，为何最终都选择自杀？

骑鹤：这个时候需要苏东坡先生来示范文人正确的存活方式。

逍遥王：看完这些人的故事，突然觉得村上春树真是坚强，诺贝尔文学奖陪跑多年，一直无缘折桂，还是活得那么乐观积极。

3c：之前林少华在讲座里提到，日本文学不能无节制地读，因为格局偏小，我理解是太向内求了，久读容易拔不出来。他还提到要多读俄国和中国文学，因为格局比较大。

“文胆”之死

子曰：一个知识分子从充满自信到迷茫彷徨，从气势如虹到悲观失望的全过程。

程方兴：“据说三个月后，在广州一个天气阴冷的日子，已经上了战犯名单的戴季陶立于窗边突然悲从中来，原本不屑于自杀的党国元老，最终还是选择了服药自尽。”可惜啊，民国文人政治家空有报国理念却最终是纸上谈兵，意志只能愈发消沉。

林恒：陈布雷先生的一生，简单而言就是“事与愿违，生不如死”。

明明小明：大概大二的时候，和同学去九溪徒步，看见有一条小路，就走了上去，结果发现是陈布雷之墓，有点荒凉。很惊讶他的墓竟然在这里，如果不是我一定要走小路去“探险”，估计都不会发现……

一幅名画背后的谋杀案

兔样兔森破：初中化学课学到拉瓦锡时，查了相关的资料，才知道

他的死原来和马拉有莫大的关系，实在是心痛和遗憾。暴力是革命的手段，但革命者往往会沉浸于暴力，因而违背了革命的初衷。

老兵：雅各宾派专政的出现是当时历史环境的产物。雅各宾派是在吉伦特派统治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内外交困，革命出现严重危机时，巴黎人民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下，被人民推上革命的领导位置的。雅各宾派的贡献在它的彻底反封建上。对雅各宾派争议最大的是“恐怖政策”。对此应该明确两个基本观念：①恶劣的环境迫使雅各宾派采取了非常措施，恐怖政策是客观条件催生出来的，它的实践结果是积极的；②在革命危机消失之后继续维持恐怖政策，不去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严重的错误。

海风：《血色浪漫》那本书里，作者借郑桐之口，对马拉做出了自己的评价。法兰西的人民，那时候真的民智已开了吗？如果真是这样，后来的拿破仑还有机会席卷欧洲吗？

人生终会谢幕，侠客永不独行

可乐：我走过山时，山不说话，我路过海时，海不说话，小毛驴嘀嘀嗒嗒，倚天剑伴我走天涯。世人都说我因为爱着杨大侠，才在峨眉山上出了家，其实我只是爱上了峨眉山上的云和霞，像极了十六岁那年的烟花。“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掌门一路走好。

赵振宇：作为1982年出生的我，与其说是在缅怀金庸老师，不如说是在缅怀我们逝去的青春。

博宇：读金庸，其实是中国人找寻根性、继承传统的快捷方式。很多人不看《论语》也不看《道德经》，不读佛经也不读笔记体小说，但儒道释的很多三观，中国知识分子延续的骨气与情操，金庸都提纯了给你，你也读着故事，很轻松就消化了。他就是你的老师和先生。中国几代人的老师和先生。先生，您一路走好！（想说的太多，用sir的一段话结尾。）

陈公博：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Steven闫：民族大义，不容洗地，汉奸就是汉奸。

Do（n）g：他的经历更凸显了当初坚持下来的人有多难。

小蔓：虽然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但当一个人的选择关乎国家民族大义时，就不能只做一个被利益驱动的傀儡了。失势后还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就更显得卑微无耻了。

一个自认“戴罪立功”的汉奸

笨松树：周佛海没有顶着刺刀做事的铮铮铁骨，所以他不断选择投机，他是一个地道的机会主义者。可惜历史在他的一次次选择后不再留给他任何机会！

Dulalala：周佛海，汪精卫，写出的诗倒是气势磅礴。铮铮铁骨，想想今天也一样，常常做慷慨激昂状的，未必是能坚守信念持之以恒的人。

小毛：正邪自古道必殊，何须推敲费工夫。蛟龙若无腾渊志，长出鳞角不如无。

一个“慷慨就义”的汉奸

明涛：我不认同他有魏晋风骨。阮籍宁可饿死而不仕，保留人格之完全。此人不仅热衷官场，还出仕汪伪政权，一不如也。嵇康临刑，一曲《广陵散》，三千太学生送行。此人毙命，虽昂首阔步，终被人所弃。如果说他有魏晋风度，我觉得太过侮辱先贤了。学其皮毛，少其风骨。

肖萍：一念错，步步错。自私无错，卖国大错！

？_？：想到了韩国电影《暗杀》里面，李政宰扮演的汉奸最后说：“如果我早知道最后会胜利，我就不会这么做了啊。”这让我觉得那些不知道会不会胜利但依旧坚持抗日的人更加可敬。

从愤青到首相，这个日本人为何能改变整个东亚格局？

佳亮：时至今日，在哈尔滨火车站的第一站台上，有两块地砖的颜色与其他的地砖明显不同，这两块地砖的位置，一个是当年伊藤博文的位置，一个是安重根射击的位置！我亲自去火车站看过！

宋涛：引用某篇文章的一段话，“1914年，奥匈帝国皇太子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一名塞尔维亚族的波斯尼亚人普林西普枪杀，这

次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普林西普1918年死于狱中，1920年，他的遗体被送回南斯拉夫首都萨拉热窝，被称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献身’的爱国青年。但是到了1995年波黑战争结束时，他被称为‘恐怖分子’，纪念馆被关闭，名字也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和南斯拉夫官方所讲述的英雄事迹不一样，民间版本描述的刺杀现场是，见到大公夫妇被枪杀，波斯尼亚人充满了愤怒和哀伤，这个年轻人并不是他们眼中的民族英雄。普林西普到底是爱国者还是一个罪犯，或者恐怖分子？在南斯拉夫立国、解体和内战的每一个阶段，会看到一个个不同标签选择”。

日本政坛最年轻的自杀首相，到底做过些什么？

小范：日本在二战上可以说是非常膨胀，战线过长，没有战略。但是这个民族在18世纪末能从亚洲国家中脱颖而出，主动向西方学习，二战后也能迅速崛起，至今在科技领域领先世界，拿了那么多诺贝尔奖，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Master：大师说得好，我在日本公司工作这些年的感觉就是，一个个推卸责任，能逃就逃，好事都跟着参与，一到检讨责任时，都躲得远远的，一切都是别人的责任，好事他们去报告，坏事都求着你去解释.....

Cathy：日本人有很多两面性，统治阶层的自负和下层员工的谦卑，年轻人的叛逆和上班后的循规蹈矩，生活中的一丝不苟和面对游戏和女优时的放纵。奇特的民族。

一场血腥又荒诞的兵变

嘉修：明治养士，大正养国，昭和养鬼，平成养豚。

Pureboi：关于这段历史，看了不少的资料，光《二二六》这部电影就起码看了五遍。其实兵变的问题根源在于下层军官不满足于现状，想再次发动类似明治维新的变革，而且对于下层军官来说，不上战场想要晋升是非常难的。比如二战中的很多大将，都是当年参加过日俄战争进而得以加官晋爵的。日本军队讲究绝对服从，但“下克上”的现象又大量出现，因为只要打着“お国のために、天皇陛下のために”（为了国家，为了天皇陛下）的旗号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日本人的想法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插一句，高桥是清、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等在明治时代就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了，对于昭和天皇来说更是重臣，所以他们被杀，天

皇震怒是可以理解的。再插一句，有没有人注意到昭和天皇的侍卫长是谁？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关东军司令官。（作者回复：本庄繁）

挽澜：小泽开作有两个他十分崇拜的好朋友，一个是板垣征四郎，一个是石原莞尔，为了表达他的崇拜，他给儿子的名字里各取了这两个人名字的一个字，没错，他的儿子就是小泽征尔……石原莞尔、濑岛龙三以及辻政信被誉为日本陆军的三大参谋，辻政信更是有“豺狼参谋”的绰号。这三个人的崛起，都离不开一个词，那就是“下克上”……最后，日本的近现代史，是真的血腥……

大庆油田：日本人的“野望”与“残念”

小范：忍不住在上班时间读完，前不久读到一篇推送，说大家对油价还是要多一点宽容，毕竟石油是战略物资，任凭外资进入，中石油、中石化难以抗衡。当年好不容易勘测开采到石油，油田质量不好，开采成本高，价格没有优势，但是工业血液不能捏在外资手中。再次致敬东北抗联，真的是艰苦卓绝，孤悬敌后，没有援助，冰天雪地的，要不是意志坚定无法坚持！

代睿：在武汉的大庆人前来报到，姥姥和姥爷作为第一批参加石油会战的人从甘肃玉门油田和王进喜一同来开发大庆油田。小时候我问妈妈“大庆”名字的由来，妈妈说因为中国开发出了自己的大油田，举国欢庆，所以叫“大庆”。因为石油，我们“油二代”“油三代”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也因为资源型城市不可避免地遭遇减产而越来越落寞，同学们能出去的都走出去了，但作为石油人我还是很自豪自己的家乡为国家作出了这么多的贡献。

肯泰罗：我就是兰州人，兰炼、兰化就是当年苏联援建的，主要为了支持玉门油田。王进喜就是从玉门石油走出去的，后来去了大庆。真心佩服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真心实意地为国家付出所有。

1931年，皇帝陛下离婚了

Holly：人越是缺少了什么，就越是需要通过一些仪式感的东西找回尊严。

小米粒：以前看历史书图片，只觉得她长得不好看，以貌取人了。实际现在长大了想想，她真的是很有勇气也很有思想的女性。

北纬**43°**：文绣的结局其实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幸福的了，如果没有战争，她会过得非常不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至少她的人生要比婉容精彩得多，结局也好得多。

日本“战国第一美人”，到底有没有得到爱情？

加强版宅女：我想她选择死亡，只是因为厌倦了被当作战利品分配来分配去吧。

杨帆：女人的命运和她的男人捆绑在一起，尤其是乱世中的美人，被政治和利益的洪流裹挟，无奈地看着丈夫、儿子，一个个死在眼前。不管她是不是得到过爱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的人生已是一片荒凉。

猫里扬诺夫：有些人嘲笑日本战国时期不过是几个村几百人相互械斗，就夸大成什么什么大战。殊不知，历史事件意义之衡量，绝不是依据其规模大小，而是看其对历史之影响大小。即使这几个县城的作战，也对近代和今日日本影响非常之深。

悦**yue**：有本书叫《织田信长家的公主们》，说的应该就是阿市的故事。

这位日本历史上最美的“平民皇后”，到底幸福吗？

SW：这位皇后拒绝合葬，给出的理由，我觉得很震撼。她说她本就是平民，即使和皇室贵族结婚，她还是平民。这世界上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还是把人类画出界限，给人群分高低贵贱，她这一番话，是打心底里不卑不亢，并不觉得她平民出身有什么配不上皇室，甚至不愿意把自己归为“皇室”一员，即使她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皇后。“认识自己”“承认自己”，这是最“高贵”的自信心。回到博主的问题，平民皇后，到底幸福吗？我不知道她是否幸福，但是我觉得，在经历这动荡不安的一生后，她仍然敢于这样说话，我喜欢她。

Cecilia_JunJun：这所谓平民也是一般人难以到达的高度吧，学霸＋美貌＋实业家庭富二代出身。两代平民出身的太子妃英语就可以秒掉多数日本人了吧。

KP0904荔枝：雅子真是可惜了，三大名校出身的精英女性啊，30

岁之前的人生是令人歆羡的官二代。她印证了“人生无常”这句话，原来命运真的是可以被一个人改变的。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无言：费雯·丽真的是靠着才华拼出自己的天下的，而她后期的精神崩溃是不是因为在影片中投入过多情感，无法抽离，交错的情感击垮了理智，爱人的背叛是致命一击？

奔跑的瘦子还是胖子吧：很多时候女人爱上的男人并不是这个男人本身，而是蒙上了她对他的美好想象和光环。我想，费雯·丽作为一个演员，这么会揣摩角色、理解人物，在现实中碰到爱情，也免不了对对方怀有裹了蜜糖的想象吧。

Suri：想起一句话，在人性面前，爱情往往不堪一击。

他左手江山，右手美人，最后喜提“公爵”……

潇潇暮雨：《国王的演讲》里对这段历史有不错的解读，爱德华确实不是一个适合做国王的人，他也非常自知地交出了王位。《国王的演讲》真是一部好电影，强烈推荐。

沙の漏：记得谁说过的一句话：孔雀开屏是美的，但转过来是屁股。可能所有的锦绣繁华之下难免不是千疮百孔和不能明说的哀愁。是以，简单生活也许是最好的愿望。

Jennifer：人性，有时是经不起推敲的。大家对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传颂，多半也基于自己的梦想——总希望有那么一些爱情是能够超越世俗和权力的。

历史的温度

寻找历史背面的故事、热血和真性情

张玮 著

历史的温度

寻找历史背面的故事、热血和真性情

馒头说历史

张玮 著

历史书上的
某个名字、某段话，
它们的背后
到底隐藏了什么？

中信出版集团

从宏大的叙事，走向历史的细节，寻找时代的真实故事。当历史风起云涌，风云人物又如何改变时代，或被时代改变？

一个个历史小故事，讲述课本之外的过去时光，读完多了解一些典故，涨一些知识，变成有趣、有见识的人。

亦庄亦谐的文字，丰富的历史知识，活色生香的历史故事，有血有肉、有人性、有故事、有真性情，还原历史应有的温度。

馒头大师曾是一个优秀的体育记者，但聊起历史来也很吸引人。他有一支独特的“新闻笔”，不论多么久远的事情，说来总像是当下的故事，还带着温度。读着他的文字，会让人想到唐诗里的意境，天晚欲雪，围坐火炉，他手持一盏，眉飞色舞，正向你娓娓道来。

——六神磊磊

没有温度，历史不过是教科书，即便已被雨打风吹去，故纸堆里终有冷暖几许。《历史的温度》赠人暖意。

——徐达内（新榜创始人）

历史的温度2

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张玮 著

历史的温度 2

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馒头说历史

张玮 著



你真的知道“土肥圆”吗？

尼古拉·特斯拉：到底是神还是人？

《最后一课》究竟有没有骗人？

24年前的那个“北京一夜”，发生了什么？

历史的背后，有血，有肉，有真的性情。

你真的知道“土肥圆”吗？尼古拉·特斯拉，到底是神还是人？抗战期间，整个国家只剩两架轰炸机了，为什么还是要轰炸日本？《最后一课》究竟有没有骗人？真实的潜伏，究竟是什么样？……

史书上的一段话、一个名字，甚至一张图，在张玮的笔下，呈现出一张张意想不到的面孔。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年份和数字，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历史上也有很多人遇到过。所以我们读历史，不仅仅只是看他们的故事。张玮抓住历史上一个事件、一个名字背后的东西，分析为什么当时的人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把文字的东西场景化，把乏味的东西有趣化，让你不仅得到知识，还得到见识。

——罗振宇（罗辑思维创始人）

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对他们的评价和分析，脱离了当时的环境，就会想当然。张玮尽量客观地还原当时的情形，无论是对人物的分析，还是事件的细节描述，都力求公正中立。更可贵的是，他赋予了这些历史以情感，历史不再是教科书里冷冰冰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的温度3

时代扑面而来，转瞬即成历史

张玮 著

馒头说历史

历史的温度3

时代扑面而来，转瞬即成历史

张玮 著



严复的人生，

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他当过两届中华民国大总统，

为何我们却并不了解他？

一个符号化偶像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

从宏大的叙事，

走向历史的细节，

寻找时代的真实故事。

坚守气节、自诩为“海上苏武”的叶名琛，为何最终还是背了“千古骂名”？严复的人生，因何最终拐了个弯？达·芬奇，真的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吗？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他又有着怎样的另一面？

叶名琛、丁汝昌、沈葆、张作霖、黎元洪、严复、拉贝、丘吉尔、达·芬奇、格瓦拉……这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他们的故事又折射了什么样的时代？

在一个狂奔的年代，我们有时候也要停一下，看看走过的路，整理

一下自己的行囊，然后重新出发。张玮把他在新媒体中最热门的文章用传统的方式出版，也有这种冷却与回归的意义。

——严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对一个男人的评价，我推崇“深厚温柔”，这其实也是人们对深海的印象。用这句话评价馒头大师和他的“馒头说”很恰当：他展现了对历史的精通，以及基于历史对时代和人情世故的了然；同时他不挑拨不炫耀，展现出巨大的温柔力。

——张伟（新世相创始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温度4：那些执念和信念、理想与梦想／张玮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217-1005-2
I．① 历… II．①张… III．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9087号

历史的温度4——那些执念和信念、理想与梦想
著者：张玮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9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1005-2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历史的温度 5

那些博弈、较量与人性

张玮 著

馒头说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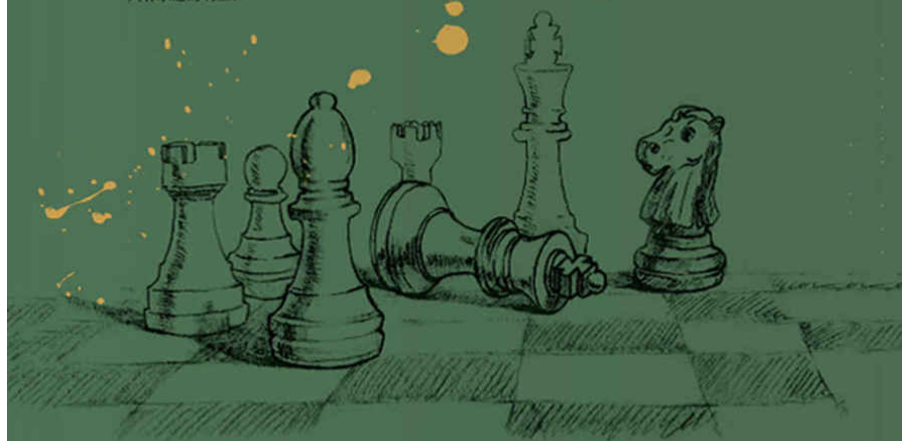
从个人，到集团，到国家，

从筹码博弈，到生死搏杀，

面对抉择，如何决断？

是否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自序

筹码的较量

1930年，美国发动的那场贸易战

开罗会议：“四大强国”的幕后博弈

再聚德黑兰：“三巨头”的台前与幕后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背后的四个人

1973年，人类世界重新认识石油

三个东亚国家，三天，一场政变

长崎事件：大清对日外交的最后荣光

《排华法案》：一部应让美国人至今羞愧的法案

麦卡锡主义：一个从未远去的幽灵

1971年，“乒乓外交”背后的六个人

那一年，中国在联合国连投16轮反对票

炮火的怒吼

帝国的覆灭：600万人为何会被168个侵略者摧垮？

日俄战争：一场中国土地上的权力游戏

美墨战争：一场“老大”对“老二”发动的掠食战

弩炮悲歌：昔日盟友之间的残忍对杀

帝国斜阳：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战争

争霸亚洲：400多年前那场中日之战

1598年，中朝日决战露梁海

决战料罗湾：中西文明的海上大搏杀

1949年，炮轰“紫石英”

科威特战争：“敝国虽小，硬骨头还是有两根的”

个人的抉择

县令之死

中国最后一个状元
朝鲜最后一个国王
“民国第一奇人”和他的“朋友圈”
山高水长，勿忘陈嘉庚
“国士”邓稼先
那个叫余纯顺的上海人
拉瓦锡之死
贝当：62岁的“民族英雄”，84岁的“卖国贼”
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的成功与悲剧
奥黛丽·赫本：天使的侧面
自然的抗争
1910年，那场在东北暴发的鼠疫
死神狂欢：1918年大流感
天花的灭绝之路
他不是药神，但他的发现改变了世界
附录 读者评论
版权页

自序

一转眼，居然已经是2020年的年末了。

过去这一年，感觉过得太快了，但转念一想，似乎又过得太慢了。

我想这背后的一大原因，是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变化，那些变化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乃至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所以，当出版社和我一起商量这一册书的主题时，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词：博弈。

博弈和较量，其实是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

在谈判桌上，是筹码的较量；在谈判桌外，很可能就是炮火的怒吼。国家与国家之间有较量，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有博弈。即便是归结到某一个具体的人，包括你、我、他，也有“天人交战”：和自己的私欲，和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理想。

而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又一次清醒地认识到：

在这个星球上，所谓的“较量”和“博弈”，并不是只存在于人类彼此之间。虽然我们自封为“万物之灵长”，但在这个星球营造的自然生态中，还有大量我们已知和未知的生物，可以随时向我们发起挑战——有时候它们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可能会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残酷的战争。

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可能我们越需要读一些历史。

我曾经在不少线下签售的场合，和读者分享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的一条读者留言。

那是一位读理工科的大学生，很喜欢读历史，但寝室里其他同学都对历史没什么兴趣，甚至还揶揄他：“你看的这些东西，起因、经过、结果都已经讲得明明白白，读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什么用吗？”

他问我，我也想了很久。本来想回答他很多，但后来想了想，还是

只回答了他一句话：

“如果能够多读懂一些过去的故事，现在就可能会更积极地面对生活，然后会有一种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未来。”

不管回答得对不对，但这确实是我自己读历史的真实感受。

我们正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环境，有时难免迷茫、彷徨乃至焦虑，或者，在喧嚣之中，感觉无法静心。而在这样的时候，多读一些历史，恐怕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四年了，这是第五本《历史的温度》，有幸依旧有你们，有幸我们依旧为“历史”之缘而聚。

“为什么要读一些历史？”我把当初说给那位男生的话，归纳总结为十二个字：

“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感恩。

共勉。

一起前行。

2020年11月3日

于上海书房

筹码的较量

一般来说，筹码有多种含义：在赌场，可以指博彩中计算数目的道具；在股市，可以指投资人手里的股票；再引申一步，也可以比喻人与人之间谈判的本钱。

当然，何止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和较量，也需要筹码。

1930年，美国发动的那场贸易战

“地球村”已经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了。然而，当问题和困难降临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考虑别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1

1930年6月17日，美国两个议员的名字被载入了史册。

他们一个是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里德·斯姆特，另一个是来自俄勒冈州的众议员威利斯·霍利。

就在这一天，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签署了这两个人共同发起的一项法案，史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这项法案的简单描述就是：将进口到美国的数千种商品的平均关税，一口气提高50%以上。



1929年4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前不久的威利斯·霍利（左）和里德·斯姆特

这项法案至今仍被认为是20世纪影响全世界的著名法案之一。

不过这两位议员先生，估计不会因这项法案引用自己的名字而感到自豪，因为这项法案有一个公认的评价："一个愚蠢的经济行为"（an economic stupidity）。

2

先来说说签署这项法案的倒霉蛋——胡佛总统。

那一年，可怜的胡佛总统实在是被逼到了悬崖边。

作为斯坦福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和出色的商业家，胡佛是在众人的赞美声和期待中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的。

《华尔街日报》在胡佛就职时发表的评论是："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商业打成一片。毫无疑问，胡佛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他将是美国第一个商业总统。"

胡佛当选的那年，是1929年。

那一年，美国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本国带来空前繁荣的巅峰，连胡佛自己都表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



赫伯特·胡佛

但胡佛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其实接的是从“柯立芝繁荣”传过来的一朵外表美丽的空心花，最关键的是，传到他手里的时候，鼓声停了。

1929年10月24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盘就大跌，当天的换手达到了1289.5万股，指数如决堤一般不断下滑，史称“黑色星期四”。

10月28日，道琼斯指数又狂跌13%，于是又有了“黑色星期一”的说法。

但真正雪崩到来的那天，是10月29日。

那一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开盘，铺天盖地的抛单就呼啸而来，抛售的价格全是不计成本的。到那天收市，美国股市创造了1641万股成交的历史最高纪录。那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二”——没错，一周开市也就五天，称号都快发完了。

但“黑色星期×”的称号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一轮股市暴跌，触发了美国人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到心有余悸的一个名词：

“大萧条时代”。

3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就是在美国“大萧条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被提出来的。

其实从20世纪的10年代到20年代，美国一直饱受一个困扰——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但消费能力却没能相应增加，这就导致了国内产能过剩。

这个现象在农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各种农产品产量大幅提升，但产量提升伴随的却是价格下跌。收成越来越好，收入却保持不变，美国农民的怨气越来越大。他们认为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过低的关税让外国货冲击了本国农产品，导致农民全都白忙活了。

那么怎么办？提高农产品关税呗！

1929年华尔街的大崩盘，更是让美国的经济雪上加霜。不仅仅是农产品，钢铁制造、纺织品等行业都出现了危机。虽然那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困扰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大萧条时代”的开始，但也感到了深深的压力。



美国“大萧条时代”，失业的美国人排队领取救济。《光荣与梦想》一书中这样写道：“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姆特和霍利这两位议员共同的提案，似乎正当其时。

其实，这项关税法案最初涉及的只是进口农产品关税，这也并不违反胡佛的初衷——在1928年竞选时，他就答应过他的广大农民选民，要提高农产品进口关税，以挽救不断下滑的本国农产品价格。

但是，在推行的过程中，事情渐渐变了味儿。

眼看着以农产品为主的州将在提高关税中获益，以制造业为主的州就坐不住了，它们提出总统也应该提高制造业产品的关税以保护本国产品。

于是，一场在议员中的“利益交换”开始了：你想要我对你们州盛产的钢铁产品提高关税投赞成票？没问题，大家日子都难过，那你也要保证我们州盛产的纺织产品也提高关税。

经过一轮轮博弈和交换，最后胡佛拿到的提高进口关税的清单上，商品超过了2000种。

而这个时候，胡佛已经骑虎难下了。

美国的宪法第一条规定，修改关税的权利属于国会。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为了使这项法案通过，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光证明材料就写了11000多页。

1930年4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获得国会两院的通过，被放到了胡佛总统办公室的案头上。

接下来，只等总统签字了。

4

一场反对总统签字的运动，随即开始。

1930年5月4日，一份由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的请愿书被送交胡佛总统，这些签字的人中有欧文·费雪（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美国诸多经济教科书的编撰者）等当时最著名、最权威的经济学家，而他们请愿的内容只有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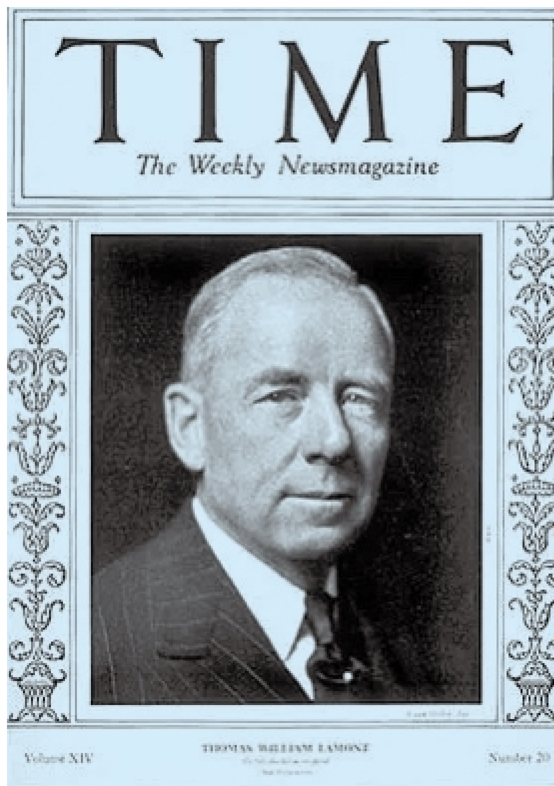
请千万不要签署这项法案！

美国的一些行业巨头也开始行动起来。著名的汽车业大亨亨利·福特直接赶到白宫，花了整整一个晚上，试图说服胡佛否决这项法案，他直接称这项法案是“愚蠢的”。

J.P.摩根的首席执行官托马斯·W.拉蒙特后来回忆：“我几乎要给胡佛跪下去请求他禁止那愚蠢的关税法……他让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都燃烧起来了。”



欧文·费雪。他在请愿书上表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债权国，如果其他国家不能出售给美国商品，那么它们怎么偿还债务？



1929年11月11日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托马斯·拉蒙特。拉蒙特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总统身边很有影响力的经济专家，但那一次却不是了。胡佛在法案上签字后，拉蒙特表示，“一个悲剧又荒唐的结局”，“可谓是世界关税历史上最让人震惊的一页了……世界上所有的贸易保守主义狂热分子可真应该好好学学”

作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他们当然也愿意美国的经济重新恢复繁荣，但他们竭力劝阻总统的原因也很简单：美国有自己的理由，但别国也都不是木头人啊！

其实，就在法案提交胡佛总统签字期间，前后就一共有38个国家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的抗议，声称一旦法案生效，它们将立刻采取报复措施。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阻碍胡佛签字了。

1930年6月17日，总统签字，《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正式生效。

5

一场意料中的报复随即到来——事实上，在胡佛签字之前，一些国

家已经开始报复了。

率先做出反应的，是当时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

加拿大立即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16种产品征收3倍关税，这个数量占到了美国出口加拿大商品总额的30%。

法国、英国和德国在抗议之后，也开始宣布报复措施，提高部分从美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开始发展新的贸易渠道——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基本上把所有的美国进口商品都拒之门外了。

在这些国家的带领下，其他国家也开始迅速行动。

意大利宣布因为美国对意大利的草帽、羊毡帽、橄榄油等产品增加关税，所以将从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翻倍，美国对意大利的汽车出口量立刻锐减90%。

瑞士宣布因为美国对瑞士的手表、鞋、刺绣的关税提高，所以提高美国部分进口产品的关税。

西班牙因为美国提高了葡萄、橘子、玉米和洋葱的关税，也开始采取反制措施——将美国汽车的进口税调高到一个标准：保证美国汽车在西班牙一辆也卖不出去。

跟在后面的，还有古巴、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等一系列国家。

超过40个国家在第一时间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一场波及全世界的贸易战就此打响。

Duty bound

American tariff rates

Article	Tariff Acts of: 1913	1922	1930
Raw sugar full duty	1.26¢/lb	2.21¢/lb	2.50¢/lb
Raw sugar Cuban duty	1.005¢/lb	1.76¢/lb	2.00¢/lb
Cattle under 700lb	Free	1.50¢/lb	2.50¢/lb
Cattle over 700lb	Free	1.50¢/lb	3.00¢/lb
Milk	Free	2.50¢/lb	6.5¢/lb
Butter	2.5¢/lb	8¢/lb	14¢/lb
Pig-iron	Free	75¢/ton	$1.125/ton
Hides	Free	Free	10%
Shoes & boots	Free	Free	20%
Matches, ≤100 to a box	3¢/gross	8¢/gross	20¢/gross

Source: Abraham Berglund, "The Tariff Act of 193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30

美国关税对比图，提高幅度一目了然

6

先来看看美国获得了什么结果。

1930年6月，就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公布之后，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就从250点下跌到230点，跌幅达到8%，然后就此一路掉头向下（1932年7月8日，降到历史最低点41点）——在此之前，经历了诸多“黑色星期×”之后，美国股市其实一直在回升。

从进出口额来看，1929年，美国从欧洲的进口商品总额为13.34亿美元，而到了1932年，这个数字是3.9亿美元，降幅达到70%；美国出口至欧洲的商品总额，在1929年为23.41亿美元，1932年为7.84亿美元，降幅达到了67%。

进出口额全面衰退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大幅度

上升。



大萧条时代，美国的失业者排队领取5美分一个的苹果

1930年，也就是《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的那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8%，1931年上升到了16.3%，1932年为24.9%，1933年达到了惊人的25.1%。

美国开始正式进入“大萧条时代”，但受到影响的，其实并不只是美国。

由于世界各国都被迫提高了贸易壁垒，导致各国之间的贸易活跃度迅速降低。统计数据显示，1933年的世界贸易水平只有1929年的1/3，自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缩水了66%。

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就此开始。

这次大萧条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正式登上了舞台，之后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尽管很少有经济学家将“大萧条”的产生简单归咎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不少人还是都认同一个观点：

这次关税法案摧毁了国与国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和合作机制，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大萧条的形成。可以说它“扣动了扳机”。

美国统计概要的数据显示，美国当年似乎有一点“冤枉”。

在1929年，美国进口商品总额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2%，而出口商品总额只占5%。换句话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通过，无论对美国国民经济，还是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影响应该没有那么大。

但其实，美国真的冤枉吗？

在当时那种经济环境下，作为全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虽然美国认为自己提高一些产品的关税无伤大雅，但这种行为本身传递的信号却是非常让人失望乃至恐怖的：我要保护我自己，至于什么自由贸易，我不管了。

经济不全是靠数字来衡量的，姿态、信任和信心有时会起到不可想象的作用。

小小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完全会引起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全球风暴。

在历史上的3月26日，其实还发生过两件事。

一件是1991年3月26日，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总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了《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目的是通过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加强经济互补，促进成员国科技进步，最终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

时至今日，在先后接受了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各成员国后，“南方共同市场”已经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另一件是1995年3月26日，当初由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共同发起签署的《关于逐步取消共同边界检查协定》正式施行。这个协定的宗旨是取消各成员国之间的边境，五国公民可在签字国范围内自由通行，无限期居住。

这个协定还有个中国人更熟悉的名字——以签署地的小镇名字命名的《申根协定》。

目前，宣布加入《申根协定》的欧洲国家已经达到了26个，这个协定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不用赘述了。

斗争，合作，斗争，再合作……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

但道理其实大家都应该懂：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开罗会议：“四大强国”的幕后博弈

学过历史的我们都知道，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同盟几大巨头开过四次重要的会议，第一个会议就是开罗会议，这场会议因为有中国的参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是，这场看似各方团结一致的会议幕后，其实还是有点故事的。

1

1943年11月，埃及开罗郊区的米娜宫酒店忽然戒备森严。

在这个远离欧洲战场、由英国控制的地区，驻扎了至少一个旅的英军，同时周边被安排了500门高射炮和密致的雷达网，还有8个24小时警戒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中队。

任何稍微有点嗅觉的人都知道，米娜宫酒店肯定要召开重要会议了。而且，以这样的排场来看，这很可能是一场有国家元首参加的会议。而在1943年这个时代背景下，和国家元首有关的会议，就是和二战有关的会议。

那么，1943年有怎样的时代背景呢？

这一年，在欧洲战场，经历了人间炼狱一般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红军终于让德国遭遇到了自二战开始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失败。苏联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彻底站稳了脚跟，开始吹响反攻号角。而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则再一次习惯性崩盘，墨索里尼被捕，政府宣告投降。



斯大林格勒战役堪称人类近代史上最血腥的战役，苏德双方先后投入数百万兵力，双方伤亡人数合计也达到了200万（轴心国部队大约损失85万，苏联损失115万）

在北非战场，以英国为首的盟军在屡战屡败之后，终于在蒙哥马利的率领下一改颓势，开始让“沙漠之狐”隆美尔尝到失败的滋味。

在太平洋战场，凭借中途岛和瓜岛两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美国人也从日本的最初打击中恢复了过来，凭借国内近乎“开挂”的生产能力，开始在辽阔的太平洋海面上推进战略反攻。

在中国战场，尽管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还是处于劣势，但毕竟“用空间换时间”的战术已经显出成效，日军的大部分陆军主力被牢牢拖住，被迫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开始在华北战场频频发起进攻，导致侵华日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都很难拥有一个所谓的“稳固后方”。

总的来说，1943年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言，是一个已见曙光的年份。在经历了法西斯阵营几个疯子国家前几年疾风骤雨般的一顿乱棍之后，反法西斯同盟扛住了打，并且已经越来越坚定一个判断：这场战争打到这个地步，取胜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了。

既然如此，一件迫在眉睫的事就被提上了案头：该坐下来开个会了。

埃及开罗的米娜宫酒店就是这场会议的召开地点。虽然来参加会议的主要只有三个人，但之所以戒备森严，是因为这三个人是：

美国的总统罗斯福，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中国的委员长蒋介石。



开罗的米娜宫酒店，离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都很近

2

先来说说一个没来参加会议的国家：苏联。

按照会议发起者罗斯福的初衷，应该是美、英、苏、中四个国家一起在开罗碰面会谈的。而苏联作为欧洲战场对抗德国的头等主力，也完全有资格来参加这场会议。

但是斯大林不愿意。

斯大林不愿意的原因，分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有个《苏日中立条约》没有撕破。在西边被德国一顿暴捶之后，斯大林无法承受东边再和日本翻脸进行两线作战的局面。所以如果去开罗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有引起日本反感的可能，那斯大林肯定不愿冒这个风险——“我们和中国没有共同的敌人”。

而从主观方面来说，斯大林也不喜欢蒋介石。事实上，在英美最初对日本妥协的背景下，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早期是实打实地支援

中国抗日的，提供了大量的军备和贷款。但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苏联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变得敏感。自1942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开始频频出现反苏的行为，尤其是在新疆地区，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

当然，斯大林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其实也讨厌斯大林。

早在1943年6月，当罗斯福把四国元首会面的构想告诉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就让宋子文当面向罗斯福提出："苏联和日本在未公开决裂以前，蒋介石参加会晤是否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蒋介石这是说的客气话，说自己不便参加，但其实是不希望见到斯大林。

蒋介石讨厌斯大林的主要原因，也是由《苏日中立条约》而起。因为在这个条约里，苏联是承认"伪满洲国"的，对换条件是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这都是拿中国的利益在做交易。再加上苏联在抗战期间频频抗议国民党军队攻击共产党军队，这也让蒋介石非常不爽。

当然，斯大林的内心也存在一条"鄙视链"：他从心底不认同中国是一个可以和苏联、美国平起平坐的"强国"——其实他认为已经被打残的英国也就凭着祖上的基业勉强够资格而已。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发表《莫斯科宣言》，在罗斯福的强烈要求下，斯大林勉强同意把中国政府也列入，但内心对中国列席"四大强国"还是很抵触的。

所以，尽管罗斯福几次劝说，但斯大林始终不愿意来参加开罗会议。一开始他还同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列席会议，后来干脆人都不派了，提出苏、美、英三国要再单独开一个会议，且不允许中国派人参加。

所以，这才有了两天之后的另一场著名会议——德黑兰会议。

3

再来说说一个颇有怨气的国家：英国。

作为一个需要美国输血才能战斗下去的国家，丘吉尔是迫切希望能与罗斯福进行会面的，为此他愿意接受中国也来参加会议——他虽然无比讨厌斯大林，但在"中国不配称强国"这一点上两人观点完全一致。

所以，在英方提供的开罗会议日程上，一开始完全没有关于中国提案的内容。

但在开罗会议开幕后，丘吉尔却开始抱怨这场会议似乎成了“美中会晤”。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中国的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长们的会谈。……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不是最后，而是最先得到了讨论。”

虽然此时英国的国力已经不能让丘吉尔喊出“英国优先”的口号，但“让英国重新伟大”这个信念还是一直萦绕在倔强的丘吉尔心头。为此，在整个开罗会议期间，丘吉尔其实一直在和蒋介石“暗撕”。

双方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香港问题。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开罗会议是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时机，因为香港本来就是英国用不平等条约掳过去的，现在被日军占领，等打败日军之后理应回归中国。

蒋介石为此求助罗斯福，希望他主持公道。深知丘吉尔性格的罗斯福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中国政府先收回香港和九龙，随后宣布其为全球自由港。蒋介石对此方案表示同意。

但罗斯福将这个想法告诉丘吉尔之后，却遭到断然拒绝。丘吉尔不仅不肯放弃香港，还不想放弃在西藏的利益，他明确告诉罗斯福：“如果不通过战争，就别想从大英帝国手中夺走任何东西！”

结果这就导致蒋介石和丘吉尔在11月26日的会议上发生了分歧：丘吉尔声称香港是英国按照条约拿来的，日军从英国人手中夺走，理应归还英国。而蒋介石坚称那个条约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两边都不愿得罪的罗斯福只能打圆场，最终香港问题不了了之，在开罗会议上再也没被提起。

双方撕的第二个问题是反攻缅甸的问题。

缅甸一直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势力范围，虽然落入日军之手，但丘吉尔从心底反感中国尤其美国插手，以免战后英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受损。更何况，丘吉尔此时的最大诉求是美军能够配合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远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靠后的。



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英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只能率部突围，在突围过程中中弹殉国

但蒋介石非常希望能够反攻缅北，因为中国有恢复大陆交通补给线的需求。不过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的过程中，英军各种堪称耻辱的“甩锅式配合”造成中国军队伤亡惨重，蒋介石不愿意中国军队在没有英美海陆空配合的情况下孤军奋战。

但丘吉尔一直死不松口，甚至提出：“如果中国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够资格的强国，就应该独立出兵收复缅北。”

为此，罗斯福只能再打圆场，私下承诺蒋介石：愿意在1944年3月从孟加拉湾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帮助中国军队南北夹击，收复缅甸。

但这个承诺后来在丘吉尔的扯皮和阻挠下，最后也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4

现在轮到说说不断打圆场的美国了。

作为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阵营最大的“输血基地”，美国确实有资格来召开并主持这次开罗会议。而罗斯福作为美国总统，一方面在消灭法西斯阵营这一共同目标上与英、苏、中有共同诉求，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巧妙平衡关系，稳固美国的利益。

这也体现在他对中国的态度上。

事实上，中国能被提升到“四大强国”的高度，美国确实功劳不小。但罗斯福这么做，也有自己的道理。

首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对于美国而言意义重大。

在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全世界只有中国自己独力抵抗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年，中国战场一直死死拖住日本80%以上的陆军，1938年时这个比例高达94%。即便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中国还拖住了69%的日本陆军。当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上展开血腥的夺岛战时，日本始终有110万左右的陆军陷于中国战场，这一数目超过了当时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兵力总和——可想而知，如果这批陆军完全到太平洋诸岛增援，罗斯福该有多头疼。



瓜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第一场艰苦的夺岛战，日军伤亡2.5万人，但美军也付出了伤亡6000人的代价

其次，在苏联已经对德国转入战略反攻的时候，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就比以前更加重要了。

尽管出于抗击共同敌人的需要，美国和苏联结成了联盟，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双方都知道彼此做的只是“露水夫妻”。当时亚洲堪称“强国”的只有两个：日本和中国。在日本已经成为对手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希望在亚洲对抗苏联的势力影响，能倚靠的只有中国。所以，美国在各种场合都极力抬高中国的地位，因为只有自己的盟友地位提高了，才能更好地在今后帮助自己对抗苏联。

对于美国的这点用心，聪明如丘吉尔和斯大林，当然也了然于胸。英国人有求于美国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所以只要保证他们在亚洲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苏联人虽然看不上中国，但中国拖住日军也等于间接帮他们在对德战场上减轻压力，且当时苏联也依靠美国的援助，故斯大林也基本尊重罗斯福的意见。

所以，罗斯福其实是开罗会议上最忙的人：一方面要安抚暴躁的丘吉尔，一方面也要鼓励郁闷的蒋介石。

由于中国和美国面临的是同一个敌人，所以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事实上更倾向于拉拢蒋介石，可谓说尽好话，处处鼓励。

5

最后，来说说中国。

尽管开罗会议实际上把中国上升到了和美英并肩的“强国”地位，但蒋介石一开始是不愿去参加的。

蒋介石不去参加的原因，首先是对自己的外交能力没有什么信心。他认为自己不善外交，所以一直尽量减少和欧美外交人员的接触，怕多说多错。

其次，蒋介石对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几大强国的认识也被写到了日记中：“英国对华之遗弃、俄国对华之嫉妒……美国对我之藐视与强制……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

当然，蒋介石那“不为他人作嫁衣”的想法最终改变，还是因为罗斯福。

一方面，罗斯福几次三番在国际场合抬高中国的地位，让蒋介石觉得美国确实没有在“耍”自己。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与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将军在入缅作战指挥的各种问题上闹得水火不容，他怕彻底得罪罗斯福，所以也需要给双方一个台阶。

所以，蒋介石最终还是带了包括妻子宋美龄在内的随行16人，在1943年11月18日坐飞机到达了开罗。

蒋介石对于自己出席开罗会议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确定在缅北对日作战的计划，确定日本投降后中国应该收回的领土，确定美国的军备和经济援助。

在这三点上，蒋介石与罗斯福没有什么矛盾，却与丘吉尔在前两点上产生了很大分歧。

对于缅北作战计划，丘吉尔一开始就支支吾吾、扭扭捏捏，最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对收回香港和九龙，丘吉尔一口回绝，蒋介石满腔怒气也无处发泄，只能忍耐。

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关于收回满洲、台湾和澎湖这些板上钉钉的事，英国最后也要搞点幺蛾子。

当时，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在三国首脑会谈的基础上起草了《开罗宣言》草案。关于日本归还台湾给中国的问题，初稿写的是：“被日本人背信弃义地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和台湾，应理所当然地归还中国。”

但到了11月26日要定稿时，英国代表贾德干表示：《开罗宣言》草案对日本占领的其他地区都提出“应予剥夺”，唯独对满洲、台湾和澎湖写的是应该“归还中国”，建议统一改成“必须由日本放弃”。



王宠惠，著名法学专家，后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

对此，中方表示了强烈不满，中方代表王宠惠表示：全世界都知道满洲、台湾和澎湖是日本人抢过去的，为什么不能说明归还给哪个国家？

贾德干还不肯松口，说草案中满洲、台湾、澎湖等字样前已冠有“日本夺自中国的土地”的修饰语，日本放弃之后，归还中国是不言而喻的。王宠惠反驳：外国人对于满洲、台湾和澎湖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和主张，如果《开罗宣言》不明确宣布这些土地应归还中国而使用含糊的措辞，那这个会议的意义何在？

最终，美国站在了中国这一边，英国放弃修改建议。

不过，蒋介石当时出于种种考虑，也拒绝了一些提议。比如，罗斯福曾建议将越南交给中国管理，蒋介石拒绝了。又比如，罗斯福当初向蒋介石建议：既然把台湾还给你们了，那么把琉球群岛也还给你们吧。而蒋介石提出的方案却是希望“中美共同管理”。

对后一个提议的拒绝，为后来埋下无穷争议。

6

1943年12月1日，经过斯大林的确认，开罗会议的成果——《开罗宣言》正式公布：

罗斯福总统、蒋委员长、丘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业已完毕，兹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相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应该说，这份宣言较为平等地体现了当时美、苏、英、中四个国家共同的目标和诉求。

但是，由于当时整个战局还没有到一锤定音的时候，再加上后面局势的微妙转变，导致更多变化、承诺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其实是发生在之后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的。

而中国，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后两场会议。

馒头说

蒋介石在参加完开罗会议回国后，对这次会议曾有过一句话的总

结："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

应该说，蒋介石这一次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中国参加开罗会议的最大意义，在于自鸦片战争100多年之后，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参加会议，明确了自己"四强"之一的地位，提升了国际威望，为后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中国参与发布的《开罗宣言》，为战后收回被日本侵占的领土提供了依据。自1895年就被日本窃取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后名正言顺地回归中国。"台湾属于中国"是至今世界各国不能违背的基本原则。

但是，正如有句话说的那样：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

比如反攻缅北，最终中国还是被迫单独出兵。因为罗斯福在丘吉尔的游说下，最终背弃了自己对中国的承诺，以"欧洲登陆作战需要大量登陆艇"为由，放弃了孟加拉湾登陆作战计划。

又比如，在开罗会议结束后的几个月，日本就策划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都进入势如破竹的反攻局面时，中国军队却出现了全面溃败：在8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军队折损60万人，丧失4个省会、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都是美军用来对日作战的基地和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0万。

这让斯大林和丘吉尔乐得在一旁冷眼旁观，也让一直鼓吹中国为"强国"的罗斯福面上无光。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美国最终更改作战计划，放弃从中国大陆反攻日本，而是从太平洋上直接攻击。这更导致了在开罗会议之后的德黑兰会议尤其是雅尔塔会议上，堂堂参与《开罗宣言》发表的中国，其利益居然成了其余列强背地里交易的筹码。

回望开罗会议，我们固然应该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登上舞台而感到欣慰，但反过来看，也再一次说明了一个道理：

决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不是某一场会议，而是背后的实力。

其实，永远都是实力。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蒋介石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的争执》（王天庆，《民国春秋》，1994年第1期）

2.《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内幕》（官互进，《湖北档案》，2000年第12期）

3.《冷战的预兆：蒋介石与开罗会议中的琉球问题——〈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补正》（汪晖，《开放时代》，2009年第5期）

4.《中国代表团出席开罗会议》（任庆海、李权兴、王兴业，《人民政协报》，2013年12月12日）

5.《开罗会议：二战时期中美关系分水岭》（陈永祥、朱锐、庞嘉咏，《世界知识》，2014年第6期）

6.《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四大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章骞，《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6期）

再聚德黑兰："三巨头"的台前与幕后

有时候，团结一致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心往一处使，而是有强大的外力，让大家意识到必须抱团而已。

外力在，大家合，外力无，大家分，谁也别和谁客气。

1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丘吉尔马不停蹄，启程前往德黑兰。

蒋介石则启程回国——没办法，斯大林不希望中国派代表参加德黑兰会议。

德黑兰这个开会地点的确定，其实也费了很大一番周折。

丘吉尔最初提议的会议地点，是英国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但斯大林没有立刻给出回复。相比之下，罗斯福的心思就更细致些，他提议的会议地点是阿斯特拉罕或阿尔汉格尔斯克——这两座城市都是苏联的地盘。不过斯大林还是不置可否。

到了1943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经过商议，共同提出了一个新的选择：到阿拉斯加去开。斯大林这次给出了明确的回复：不行。因为苏联红军正在与"希特勒主力展开极为紧张的战斗"，他不能去阿拉斯加那么远的地方。罗斯福于是又提议：要么还是接着开罗会议，在北非开算了？斯大林还是不同意，但这次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地点：在三个国家都设有代表处的伊朗德黑兰开会。

这次轮到罗斯福不同意了。他反对在伊朗开会，要求去位于东非的城市阿斯马拉，甚至提议可以在一艘停泊在港口的军舰上会晤，但斯大林坚持要去伊朗。直到10月底的时候，罗斯福还在要求，请斯大林选择阿斯马拉、安卡拉、巴士拉之中的任意一个城市会晤，但不去伊朗。

这时斯大林甩出了底牌：我只去德黑兰，其他地方我就派代表来参加吧。

丘吉尔和罗斯福面面相觑，放弃抵抗——那就德黑兰吧。

从这次会议地点的选择过程，就可以看出当时三个国家谁说话的底气比较硬了。

2

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下午3点，斯大林穿着苏联大元帅服，专程前来拜访罗斯福。做出这个举动倒未必是因为斯大林要显得多谦卑，而是因为罗斯福得过小儿麻痹症，由于日夜操劳，已经只能坐在轮椅上行动。

这是两国元首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寒暄，互相表示：很早就想见到您了！

下午4点，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始，罗斯福是主持人。他在致辞中表示："俄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第一次作为家庭的成员相聚一堂。我们所抱的唯一目标，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希望大家自由讨论，畅所欲言。"

丘吉尔也表态："这次会议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整个世界力量空前的大聚会，人类的幸福及命运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斯大林附和："美英苏三大国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在第一次会议结束、第二次会议开始之前，丘吉尔向斯大林转赠了一把宝剑——那是他奉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之命赠予斯大林的，为的是向苏联军民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光荣战斗表示敬意。



斯大林接受赠剑的场面

斯大林非常给英国面子，他将宝剑举到唇边，并轻吻剑鞘，随后把宝剑交给身边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再由伏罗希洛夫交给苏联的仪仗队，一路护送出去。

整个德黑兰会议似乎将在这种友好信任的气氛中进行下去。

但事实上，所有的相互点赞行为，只会发生在探讨实质问题之前。

3

德黑兰会议的第一个议题，就让三巨头争论起来。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尽快打败三个国家面临的共同敌人——纳粹德国。对于斯大林来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尽早实施“霸王行动”——在法国南部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样能够大大减轻苏联红军在苏德战场上的压力。

对于斯大林的这一诉求，罗斯福完全同意，但持不同意见的是丘吉尔。

其实早在1941年，正在遭受德国猛烈打击的斯大林就提出过希望英国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但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直到罗斯福后来也希望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才认真起来。但是，丘吉尔抛出的却是“巴尔干方案”——由地中海从意大利南部登陆，在巴尔干半岛对德国发起进攻。

丘吉尔的目的很明显：苏联红军现在是由东往西在反攻，一旦打到德国，那么所经的东欧诸国将全部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而那本来是大英帝国的势力所在。如果盟军从巴尔干半岛切入，就可以把苏联红军阻隔在外。

三国刚刚开始商量联合反攻，内部阵营就已经有人打起了小九九。

斯大林立刻强烈反对这个方案，理由也正当：巴尔干半岛山区众多，一旦登陆很快会和轴心国部队陷入拉锯战。且巴尔干远离德国心脏地区，不如从法国南部地区登陆直切德国要害，这样才能达到让希特勒崩盘的目的。

罗斯福同意斯大林的意见。美国的首要诉求是尽快结束这场人类浩劫，如果在巴尔干半岛登陆，对希特勒而言不痛不痒，根本无助于战局向对盟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而美国其实也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势力再次染指巴尔干半岛。对于丘吉尔的用意，罗斯福心知肚明：

“每当首相为穿越巴尔干攻入欧洲的战略辩护时，房间里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大家都明白，他是想切入中欧，使红军不能进入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如有可能，甚至不让红军进入匈牙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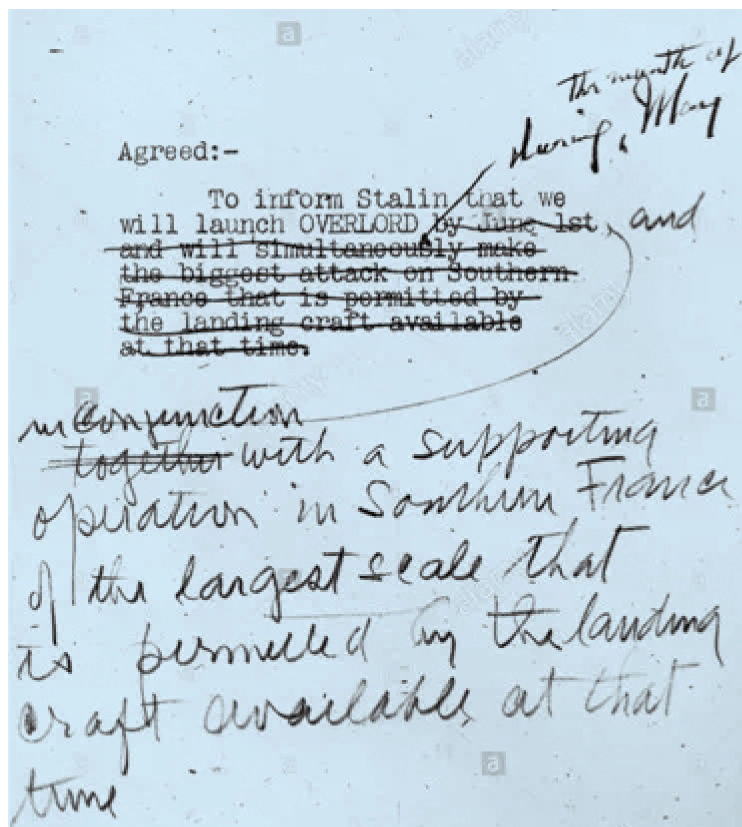
尽管美苏两国首脑都反对“巴尔干方案”，但丘吉尔还是努力在为早已失去相应实力的大英帝国做最后挣扎——迟迟不肯确定“霸王行动”的最终实施日期。

斯大林此时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必须立刻确定登陆时间，并且确定负责的指挥官。他承诺，一旦登陆战役发动，苏联红军将立刻在东线发动进攻配合。而罗斯福也坚持必须放弃所谓的“巴尔干方案”。

见两位盟友态度如此坚决，丘吉尔最终只能放弃自己的主张。

最终，从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被敲定。虽然因为英国阻挠等各种原因，此计划被推迟，但在1944年6月6日盟军还是从法国北部发动了人类

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登陆行动——诺曼底登陆。



Agreed:-

To inform Stalin that we will launch OVERLORD ~~by June 1st~~ during the month of May and ~~and will simultaneously make the biggest attack on Southern France that is permitted by the landing craft available at that time.~~

in conjunction ~~together~~ with a supporting operation in Southern France of the largest scale that is permitted by the landing craft available at that time

德黑兰会议期间手写的开展“霸王行动”的协议

4

登陆问题争完了，接下来是争领土问题。

领土问题其实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波兰。

1939年9月，在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的同时，苏联也从另一边发起了对波兰的进攻，基本上夺取了1795年俄普奥三国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沙俄政府获取的版图，还附加了东加利西亚和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的意见就是：对不起，那是你们非正当所得，请吐出来。

斯大林摇摇头：我就不！

按照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想法，在1939年9月之后的波兰领土变更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斯大林的坚持是，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之前的苏联领土，他不会吐出一平方米。

在这场争论中，态度坚决的是罗斯福，立场动摇的倒是丘吉尔。

丘吉尔思考的出发点还是基于苏联红军的进攻路线——既然苏联人已经打出了国境线，向西挺进势如破竹，那么占领波兰全境其实是早晚的事。让苏联人把到手的东西让出来难上加难，倒不如趁他们还没把波兰都吞下去，先给他们划一道分水岭。

所以，丘吉尔提议波兰的东部边界向西移动到“寇松线”（即基本承认1939年苏联进攻波兰时获得的领土），然后再从德国那里挖一块补偿给波兰——不管这个交易是否公平，波兰根本是不在场的。

斯大林当然同意这个方案，关键还是要看罗斯福。

罗斯福考虑再三，决定同意这个方案，但只提出一个条件：在美国大选前不能泄露这个消息——一旦泄露，在美国的六七百万美籍波兰人就肯定不会再投票给他了。

于是，关于波兰领土的处置，就在波兰人完全没参与的情况下被愉快地决定了。

5

被分配了权益的不在场当事国，其实并不止波兰一个。

还有中国。

德黑兰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商量苏联何时出兵对日作战。对于这个问题，斯大林答应得很爽快：没问题。

但是，苏联也提出了条件：在远东能够为苏联做些什么？……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不冻的港口。

丘吉尔明确领会斯大林的意思——想要中国的大连港。对于中国的利益，丘吉尔基本视若无睹，所以他立刻表示赞成：“将来应该在世界上一切海域看到俄国的舰队和商船队。”

有点担心的倒是斯大林："我不认为中国人会喜欢这样的计划。"

丘吉尔这次倒是立场坚定："重要的是俄国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应当使战后管理世界的国家和战后受托指导世界的国家得到满足，使它们没有领土和别的野心。"

那么罗斯福的意见呢？

如果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将大大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所以罗斯福也认为斯大林的要求"合情合理"。事实上，将大连港拿出来还是罗斯福的建议，不过他的说法是将大连设为自由港。为此，他也安慰有些担心的斯大林："中国人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之下的自由港主张。"

于是，不管中国人是不是喜欢，反正三巨头是喜欢的，事情也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1945年8月23日，苏军从日军手里接管了大连港。大连港名义上是"自由港"，但其实由苏军控制，被无偿租用，进出口货物免税。直到1951年，处于中苏关系"蜜月期"的苏联将大连港还给了中国。

当然，一个大连港是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胃口的，他顺带还要了库页岛的全部。

6

场内"三巨头"争得热火朝天，场外其实也不太平。

罗斯福刚抵达德黑兰时，入住的是美国大使馆，房间狭窄，临近马路，安保系数很低。没多久，罗斯福就接到了斯大林的口信：苏联特工获悉，德国已派人准备在会议期间刺杀三国首脑。斯大林邀请罗斯福来安保系数最高的苏联大使馆暂住。

罗斯福第二天就搬到了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堂堂美国总统去开会，住进了苏联大使馆，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美国记者当场就提问："总统先生，这件事听上去就像斯大林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劫持了您。"

而流言也开始风传：根本就没有什么刺杀威胁，斯大林是想借此恐

吓罗斯福住进苏联大使馆，达到把他和丘吉尔隔离的目的。

但事实上，刺杀行动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希特勒派出的负责人，就是那个曾经神话般解救了被囚禁的墨索里尼、被称为“欧洲最可怕的男人”的奥拓·斯科尔兹内。

纳粹德国的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舒伦堡，当时是纳粹德国保安局第六处国外政治情报处处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不仅当时下令批准了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刺杀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计划，还亲自给计划起名为“远跳”。这次行动不仅有斯科尔兹内的特种部队参加，还有德国空降兵部队配合。



奥拓·斯科尔兹内

不过，这次刺杀计划最终失败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开始——斯科尔兹内碰上了严阵以待的苏联特工。

按照计划，斯科尔兹内先派出一个先遣小队去德黑兰做刺杀的准备工作。该小队由6名间谍组成，其中两人为无线电报务员。这6名间谍通过跳伞的方式降落到了距德黑兰70公里的库姆地区，结果一落地，就被

守候多时的苏联特工全部抓获。

原来，斯科尔兹内的全盘计划早已被苏联情报人员截获，他们的地面接应人员也早就被发现了。作为苏联当时驻外的主要情报站，德黑兰情报站实力非常强，拥有100多名训练有素的特工。

在得知先遣小队全军覆没之后，斯科尔兹内意识到行动计划已经败露，经验老到的他随即再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7

德黑兰会议有惊无险地在1943年12月1日闭幕了。

算上可以公开的和必须保密的，三国领导人主要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1）1944年5月在法国南部开辟第二战场；

（2）重新确定波兰边界；

（3）苏联在欧战结束后对日本出兵，但有相应条件；

（4）用联合国取代国际联盟；

（5）拆分德国（有方案，未达成一致）。

当然，三国领导人按照惯例还是发布了《德黑兰宣言》。



德黑兰会议上的三巨头

三国领导人发布的声明中专门提到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

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真忱”这些话。

至于后来能否完全做到，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馒头说

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德黑兰会议还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会议。

尽管三国首脑在台上有一些意见分歧，在台下也有一些掰手腕的动作，但总的来说，这是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三强第一次抛开不同的意识形态坐到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

当然，也真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它们才不得不抱团。

在德国人掀桌之前，苏联曾多次低声下气地希望和英国、法国签订攻守同盟，但英国和法国都翘着二郎腿，喝着茶、嗑着瓜子用各种理由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最终相当程度上逼着苏联转身去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结果法国被德国打得跪着叫“爸爸”，英国被打得叫“美哥你去哪儿了”。

当然，苏联也有搭架子的时候。在太平洋和日本血拼的时候，美国也赔着笑脸求苏联快点出兵，但斯大林总是不紧不慢，遮遮掩掩。等到美国完全包围日本本土，在广岛将原子弹一扔，150万苏联红军立刻一个鲤鱼打挺就扑向中国东北，满脸写着“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美国人不打小算盘吗？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美国一会儿“严重关切”，一会儿“强烈谴责”，但转身还是把石油和军火卖给日本。直到自己在珍珠港被打疼了，才把中国看作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眨眼就能把中国捧到“世界四强”之一的位置。

所以，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谁也别和谁客气。

曾有人憧憬，世界会进入没有国家划分的时代吗？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但这是不是永远也不会发生呢？我觉得倒也还是有可能的：

比如，当外星人来的时候？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德黑兰风云录》（孙越，财新网，2017年5月5日）

2.《论德黑兰会议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李怀顺，《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德黑兰会议”期间，希特勒曾拟暗杀苏美英三巨头》（张克俊，《环球时报》，2011年11月7日）

4.《德黑兰会议：斯大林为何捡丘吉尔丢的纸团？》（新华网，2013年10月17日）

5.《德黑兰会议的经过》（历史趣闻网，2017年1月29日）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背后的四个人

在人类科技进步史上，每一个“第一次”都让人振奋不已。

但这个“第一次”，却同时让人充满忐忑，乃至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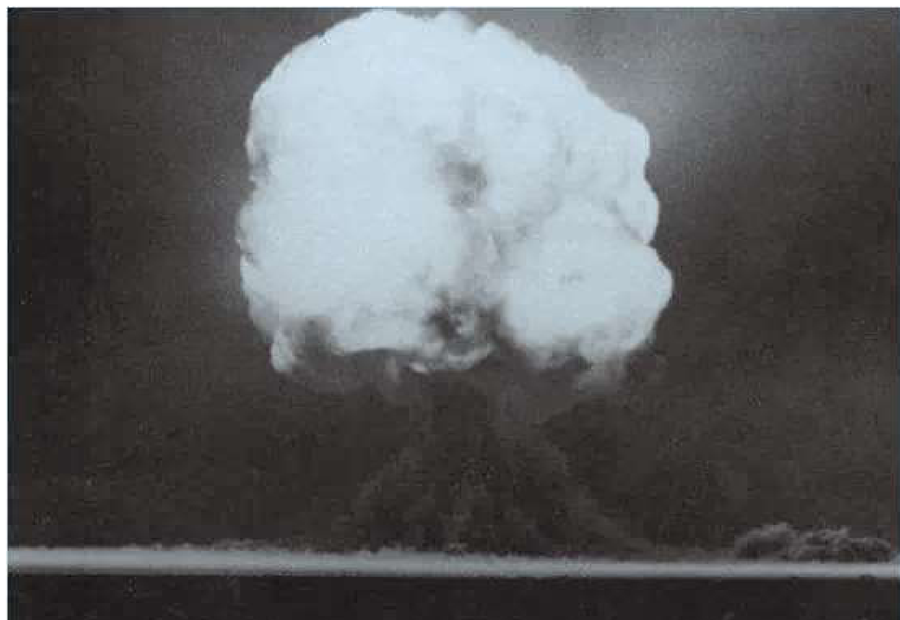
1

1945年7月16日，凌晨5点30分。

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附近的沙漠地区，忽然出现了一道强烈的闪光。

这道闪光在照亮了方圆6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之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下来，这个火球又变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瞬间就上升到了3000米的高空。

在出现闪光的中心位置，一座30多米高的铁塔，瞬间被高温蒸发。而当时得到的数据是，这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2000吨TNT炸药。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此时此刻，在14公里以外的观察哨所里，400多名军事家和科学家在看到这场爆炸之后，心里五味杂陈。

大家当然有喜悦之情，因为这场耗资巨大、投入无数人力和物力的实验，终于成功了。

但在场的很多科学家心里更多的是忐忑：这次爆炸产生的威力，比他们预计的结果还要大10倍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在战场上，这样一颗炸弹杀死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根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这颗实验成功的炸弹，就是全世界第一颗原子弹。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骇人武器，原子弹从无到有的过程，充满了各种曲折离奇乃至惊心动魄的故事。

限于篇幅，我们只讲与此有关的四个人。

2

第一个人，叫沃纳·海森堡。



沃纳·海森堡

他是一个拥有纯正日耳曼血统的德国超级天才。

海森堡24岁就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量子力学的论文，随后提出了著名的“不确定性”，奠定了整个量子力学的发展研究方向。31岁的时候，海森堡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他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德国秘密研制原子弹的“铀俱乐部”总负责人。

事实上，从任何角度看，德国都是当时最有可能研制出全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国家。

1939年初，全世界第一篇发现铀原子裂变现象的论文，就是德国化学家哈恩（他后来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和物理化学家斯特拉斯曼发表的。“铀裂变可以用来制造威力巨大的炸弹”这一想法，很快就得到了希特勒的认可。1939年，德国就开始了原子弹的研究——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全世界只有德国一个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付诸实施。

当时的德国确实拥有太大的优势了。

第一，德国当时的化工与重工业实力在全世界处于一流行列；第二，德国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占领着世界上最大的铀矿；第三，德国当时在挪威拥有最先进的重水生产系统。

而除此之外，最关键的是，德国拥有当时最稀缺的条件：人才。

从1901年到1932年的31年时间里，德国有33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英国只有18人，美国更是只有6人。

当然，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排犹政策使得大量科学家离开了德国，在纳粹上台的第一年，就有2600名科学家被迫离开，其中包括2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即便如此，德国依旧能依靠所谓“纯日耳曼血统”的超一流科学家团队来对抗全世界的精英。

看看参与“铀俱乐部”的那些德国科学家吧：劳厄（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博特（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革（盖革计数器的发明者）、魏扎克、巴格、迪布纳、格拉赫、沃兹等等，还包括当时属于“大神”级别的海森堡。

但是，德国却最终没有研制出原子弹，甚至连门径都没摸到，这是为什么？

原因自然有很多，包括乐观的希特勒当时认为凭借常规武器就能征服全世界，进而对原子弹的研制并没有给予太大的支持，也有后来美国几乎倾举国之力，集全世界科研精英拼命迎头赶上的原因。但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一个人还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海森堡。

应该说，海森堡对原子弹研究前期工作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但在进入关键部分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数据：如果要造出德国人想要的原子弹，必须从天然铀矿中分离出至少几吨最关键的铀235，但是天然铀中同位素铀235的丰度仅为0.72%，如果要分离出几吨的话，那投入的资源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海森堡如实将这个情况通过别人汇报给了希特勒，沉迷于速战速决的希特勒对这项研究工作顿时意兴阑珊。直到1942年，德国研制原子弹的进展还和盟国大致相当，但在此之后，失去元首支持的德国科学家们就几乎停止了研发。

直到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后，当时已经被捕的海森堡大吃一惊，甚至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骗局。

但是，事实的真相很快促成德国人找到了海森堡当初的错误所在：由于他没有将中子扩散率计算在内，导致他认为需要的铀235被提高了好几个数量级——事实上，只需要十几公斤铀235就足够了。

之后，海森堡还发表过一份声明，暗示德国科学家其实早就意识到了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进而陷入了道德上的困境，所以有意识地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

但是，这份声明引起了包括美国科学家在内的很多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他在撒谎。

海森堡到底是不是不希望纳粹制造出原子弹，所以故意点错了“科技树”？这个争论其实直接关系到海森堡在二战期间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但

是，现在依旧没有明确的答案，所以这被称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的“海森堡之谜”。

战后，有一次海森堡有机会和当初那批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会面，而那些科学家居然无人愿意与海森堡握手，因为他是帮纳粹制造原子弹的人。而海森堡自己却觉得很冤枉——造出杀人武器的不是我，是你们啊！

无论如何，海森堡是当初最有可能领导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的人，但他失败了。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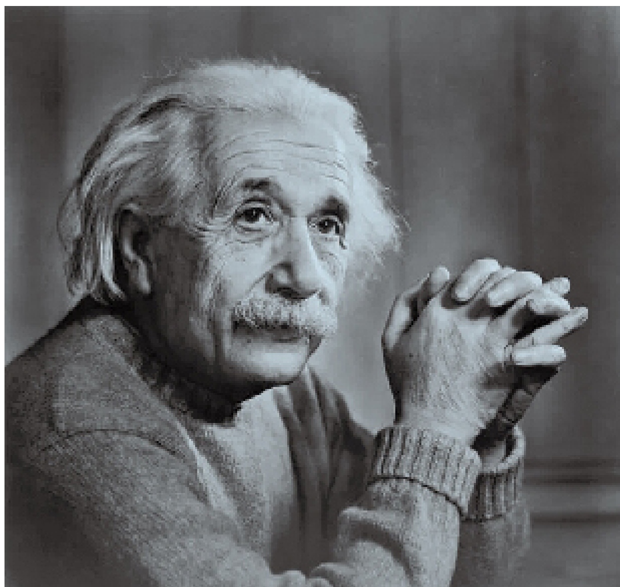
接下来说第二个人，他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是一个出生在德国乌尔姆市的犹太人。

应该说，原子能应用和开发的理论基础，就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奠定的，所以在这一点上称他为原子弹研究奠基人之一，也不为过。

不过，爱因斯坦对第一颗原子弹问世最大的功劳——尽管他后来非常后悔——是牵头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

1939年初，丹麦的“大神级”科学家波尔通过某种渠道，得知德国已经开始研制原子弹的确切消息。忧心忡忡的他立刻就赶到了美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流亡在美国的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和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等人。大家一致认为：一旦纳粹抢先造出原子弹，那对整个人类文明而言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为此，齐拉德开始向美国政府官员游说，希望美国能抢在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但由于这方面的理论在当时实在过于超前，而齐拉德的“咖位”又不够，所以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德国人抢先研制出一个炸弹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那么如果请一位“大咖”去说呢？齐拉德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好友，也就是“超级大咖”爱因斯坦。

齐拉德他们的观点得到了爱因斯坦的支持，于是，在1939年8月2日，齐拉德起草了一封信，然后爱因斯坦用自己的名义直接写给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尊敬的总统阁下：

我读了费米和齐拉德近来的研究工作手稿。这使我预计到，元素铀在最近的将来，将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能源。考虑到这一形势，人们应当提高警惕。必要时，还要求政府方面迅速采取行动。因此，我的义务是提请你注意下列事实：在不远的将来，人们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

……

为此，我建议，请授权一位你所信任的人士，使他可以非正式地和各政府机关联络，经常报告全部研究情况，并向它们提供建议，特别是要努力保证美国的铀矿供应。同时，和有关人士及企业界实验室接触，来促使实验工作加速进行。

您真诚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Old Grove Rd.
Nassau Point
Peconic, Long Island

August 2nd, 1939

F.D. Roosevel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Sir:

Some recent work by E.Fermi and L. Szilard, which has been communicated to me in manuscript, leads me to expect that the element uranium may be turned into a new and important source of energy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Certain aspects of the situation which has arisen seem to call for watchfulness and, if necessary, quick a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on. I believe therefore that it is my duty to bring to your attention the following fact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last four months it has been made probable - through the work of Joliot in France as well as Fermi and Szilard in America - that it may become possible to set up a nuclear chain reaction in a large mass of uranium,by which vast amounts of power and large quantities of new radium-like elements would be generated. Now it appears almost certain that this could be achieved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This new phenomenon would also lea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ombs, and it is conceivable - though much less certain - that extremely powerful bombs of a new type may thus be constructed. A single bomb of this type, carried by boat and exploded in a port, might very well destroy the whole port together with some of the surrounding territory. However, such bombs might very well prove to be too heavy for transportation by air.

a64a01

爱因斯坦那封著名的信件

但是，罗斯福一开始也没当回事——制造一颗闻所未闻的所谓“原子弹”，听上去太遥远，也太困难。

就在爱因斯坦发出第一封信之后的一个月，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的大幕正式拉开。

眼看德国在西欧势如破竹，心急如焚的爱因斯坦在1940年3月又给罗斯福写了第二封信，劝他一定要抓紧。

这一次，罗斯福当真了。

1941年12月6日，在罗斯福的推动下，美国正式制订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计划，罗斯福赋予这项计划以“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不惜一切代价，抢在德国之前，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

但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发生了：作为当时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研制原子弹的倡议者，爱因斯坦却被完全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

其实，在“曼哈顿计划”一开始圈定的31名科学家名单中，爱因斯坦的名字赫然在列。但后来，他的名字却被删掉了。因为，他没有通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政审”——他们怀疑爱因斯坦有共产主义倾向。

早在1932年爱因斯坦准备移民美国时，对爱因斯坦“与很多共产主义者有联系”的指控材料就被交到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案头上。爱因斯坦差一点因此连移民美国的资格都被取消。而爱因斯坦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的用意也很明显——怕他将绝密情报泄露给苏联。

那么爱因斯坦自己想加入“曼哈顿计划”吗？其实也未必。不仅如此，爱因斯坦，包括当初最积极的齐拉德，后来都成为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最坚决反对者。



当时进入“曼哈顿计划”的厂区，都要接受严格盘查

1945年4月初，当二战结局几乎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办公桌上又出现了一封爱因斯坦的信，以及随信附上的齐拉德写的备忘录。但这次来信不是为了催促原子弹的研制，而是请求总统下令，立刻停止原子弹研究的所有工作。

爱因斯坦的理由是：从1945年的世界局势来看，德国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当初要求研制原子弹的理由也不存在了。正相反，美国如果继续研制下去，很可能会引发全世界的核武器竞赛，进而有毁灭整个人类的风险。

科学家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他们已经撩拨起了一个国家想掌握一门独家核心武器的野心，而让一项已经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的工程说停就停，怎么可能？

爱因斯坦觉得自己的担心在1945年8月6日成为现实。

当广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遭受“核爆”的城市后，爱因斯坦从《纽约时报》一位记者那里知道了惨状。他极度震惊：“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将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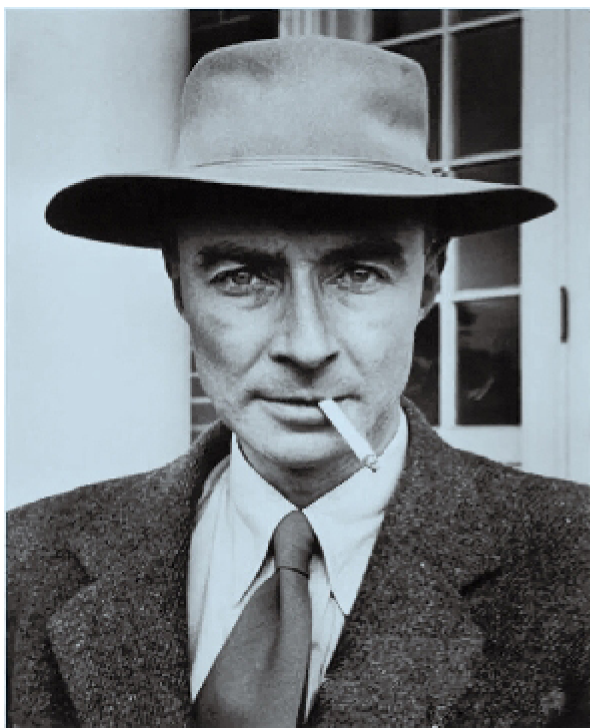
于是，爱因斯坦成了当初倡议研制原子弹，但后来被排除在研究工作之外，最后又极度后悔的一个人。

4

该说说第三个人了，他叫罗伯特·奥本海默。

他是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德裔犹太人——和前两人一样，也是一个超级天才。

奥本海默的父亲是一位纺织富商，母亲是一位画家。他从小就接触文学和艺术，尤其爱好诗歌。但他考入的却是哈佛大学化学系，并只花了三年时间就以“荣誉学生”的身份毕业了。然后，作为一个对文学和艺术着迷，本科读化学的人，他又到了剑桥大学攻读理论物理，最后以量子力学论文获得了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据说在论文答辩当天，在座的评审教授没有一人敢发言反驳他。



罗伯特·奥本海默

当爱因斯坦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后，军方主持该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第一个想到的技术负责人，就是奥本海默。当时奥本海

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因为喜欢读梵文的《薄伽梵歌》，正在自学梵文。

奥本海默接受了邀请，成为“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和技术总顾问。他愿意参与的理由与爱因斯坦他们一样，希望能早日结束战争。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想亲眼见证原子能会被利用到何种程度的好奇心也是巨大推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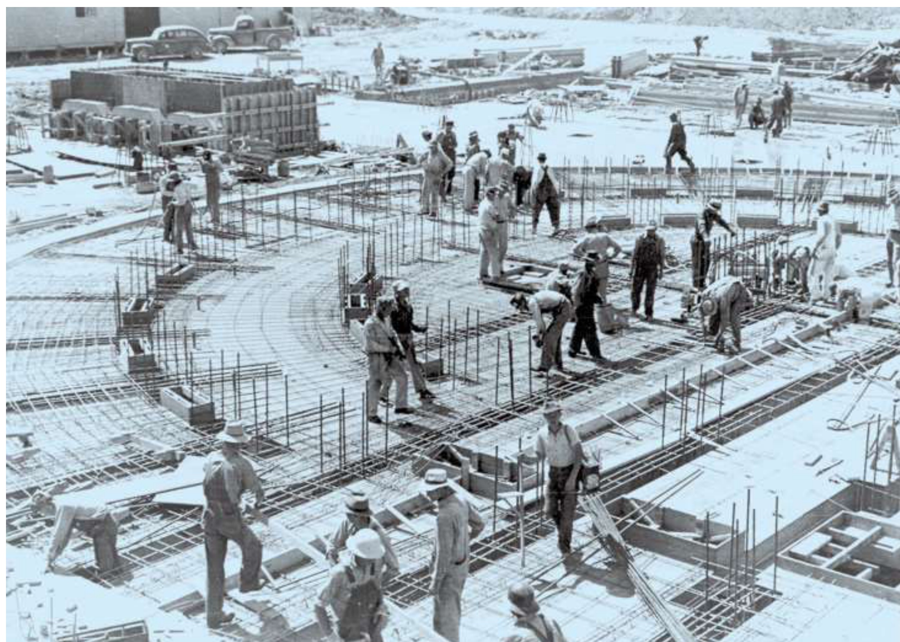
不过，奥本海默一开始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只要6名物理学家和1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就足够了。

但事实上，“曼哈顿计划”在巅峰时期共有53.9万人参与，常年维持10万人以上的规模，美国为此投入了25亿美元，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了。就拿分离铀235来说，尽管海森堡错估了一颗原子弹需要的铀235的数量，但即便只分离出十几公斤纯铀，美国也为此建立了电磁分离厂，光这笔开销就有3亿美元以上。



橡树岭的电磁分离设施代号为Y-12，这是第一期工程施工时的情景

当然，由于“曼哈顿计划”的绝密性，当时只有12个人知道全盘计划。绝大多数参与这项计划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造原子弹——事实上，即便当时和他们解释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也无法理解。



田纳西地区一个“曼哈顿计划”的厂区正在兴建，但没人知道自己在造原子弹

1945年，当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之后，作为主持人的奥本海默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却陷入了惊慌失措。对他而言，他无法承受那种印度梵文诗里描写的感觉：“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

等到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广岛投下之后，奥本海默心中的内疚感越来越强烈。别人称他为“原子弹之父”，但他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宣称：“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尽管投下原子弹的并不是奥本海默本人，但面对记者，他说：“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摆脱本能的内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知识本来不应当拿出来使用。”

然而，奥本海默面临的麻烦，远不止心里愧疚那么简单。

在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时，美国的情报部门就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奥本海默在1936年追求过一位叫泰特洛克的女学生，而对方是一名共产党员。奥本海默后来的妻子凯瑟琳也是左翼分子，所以他本人和共产党渊源很深。

从1950年开始，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奥本海默毫无悬念地被盯上了。没多久，他就被指控与共产党人合作，罪名包括包庇苏联间谍、

反对制造氢弹等。1953年12月，奥本海默被怀疑是苏联的代理人，以“他早年的左倾活动和延误政府发展氢弹的战略决策”为罪状被起诉，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奥本海默案件”。

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150多名科学家联名抗议对奥本海默的审讯，爱因斯坦还多次在《纽约时报》上抗议，但奥本海默最终还是被剥夺了参与原子能研究的“安全特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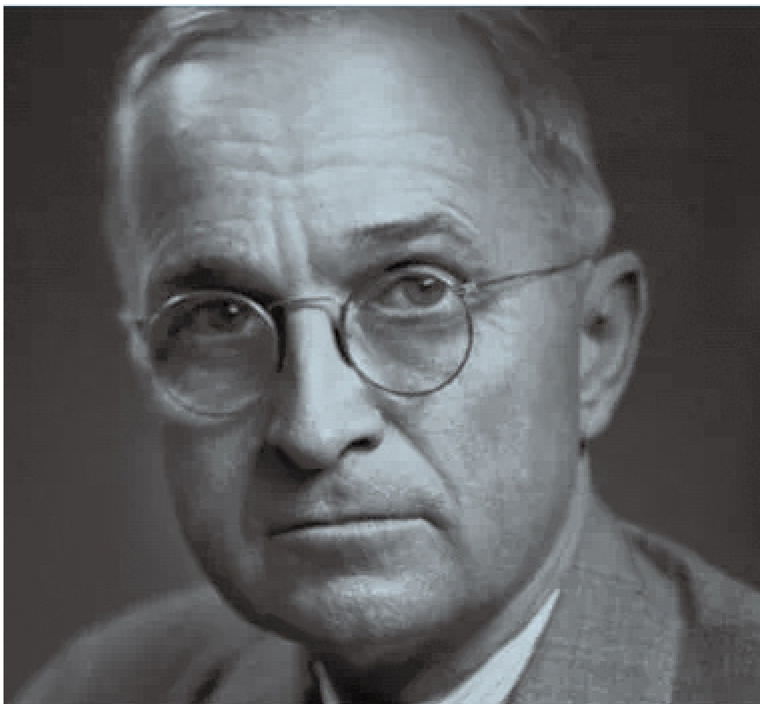
1963年，肯尼迪总统决定为奥本海默平反——授予他原子能方面的最高奖项“费米奖”（就在颁奖前10天，肯尼迪被刺杀，奖是由继任总统约翰逊颁发的）。尽管名誉恢复，但直到生命终结，奥本海默都没有被恢复参与美国原子能研究的权限——他本想研究核能以推动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

所以，奥本海默是一个主持并完成制造原子弹，但最终却被排除在进一步研究工作外的人。

（奥本海默的悲剧，请参看后文《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的成功与悲剧》。）

5

终于轮到最后一个人了，他叫哈里·S.杜鲁门。



哈里·S.杜鲁门

和前三个人不同，杜鲁门是个纯正的美国人。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不是科学家，他是一位总统。

1945年4月12日，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做了四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病逝在第四任的任期上，作为副总统的杜鲁门在一片质疑的目光中宣誓成为总统。

新上任的总统万事缠身，所以直到4月24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曼哈顿计划”工程区司令格罗夫斯将军才来到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向杜鲁门通报了已经接近尾声的“曼哈顿计划”。

虽然之前是副总统，但这是杜鲁门第一次完整了解这样一个令人咋舌的计划——听完汇报之后，他直接瘫坐在了椅子上。

事实上，留给杜鲁门品味的时间并不多，因为这项工程完全是他的前任罗斯福留下的“遗产”。当他还没怎么搞懂核裂变为什么可以用来造“超级炸弹”的时候，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试爆成功了。

科学家只是负责制造原子弹，而政治家，接下来将决定如何使用它。

为了等候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杜鲁门有意推迟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时间——在那个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参加的峰会上，还有什么比原子弹爆炸成功更能体现美国的国力，震慑其他对手呢？

所以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是有点忐忑的。尤其是7月16日这天，他显得非常焦虑，直到收到了来自国内的两封秘密文件。

第一封文件是格罗夫斯将军发来的："手术上午完成，后续诊断仍在继续，但结果非常理想，甚至超过了预期。"

第二封是史汀生发来的，就一句话："婴儿圆满诞生了。"

于是，杜鲁门就成了那个事先完全不知道原子弹存在，然后忽然就拥有了原子弹的人。

成竹在胸的杜鲁门随即在斯大林面前有了更多的底气，他向那位指挥红军一路向西攻克柏林、正准备东征日本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有意无意地透露："我们刚刚实验成功了一个威力巨大的武器。"

杜鲁门说得含糊，固然有保密的需要，但也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所以只能含糊其词。

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斯大林面部没有任何表情，只说了一句话："是吗，那就好好用来打击日本人吧。"

杜鲁门以为斯大林没有领悟到他的意思。但他不知道的是，斯大林之前通过苏联情报网掌握的关于原子弹的各方面情报，包括"曼哈顿计划"在内，可能要比他这个美国总统还多。

白天不动声色的斯大林，晚上回到住处就打电话问责苏联原子弹研发工作的负责人，要求尽快造出苏联自己的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人类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

1945年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在日本长崎爆炸。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1952年10月3日，英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如爱因斯坦等人所料，人类世界开始进入核竞赛。

馒头说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内，有一个特别的时钟。

这个时钟只有钟摆，没有任何机械结构，全靠人力拨动。而整个表盘上，也只有左上方15分钟的区域有刻度——也就是接近12点的地方。

这个简单的时钟，却有一个让人心头一凛的名字——“世界末日钟”（Doomsday Clock）。

在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那些参与研制的美国科学家，加上17位诺贝尔奖得主，共同创办了《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用来推动核能为世界和平服务。1947年，这本杂志的创办者们设立了这样一个时钟，并将初始指针放在了11点53分的位置——一旦指针指向12点，那就意味着核战爆发，人类毁灭。

在过去的70多年里，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世界末日钟”曾多次被拨动。由于美国与俄罗斯签订的《中程导弹条约》失效，美国启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进程，以及激化了和伊朗的矛盾，人类面临着不断增加的核战争威胁和气候变化问题，2020年1月23日，“世界末日钟”的指针被拨到了离午夜只有100秒的位置——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人类毁灭”的时刻。

这其实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人类自己亲手发明了核武器，然后又心惊胆战地时刻提醒自己，这个东西将随时毁灭人类文明。

但是，最让人担心的是，这种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根据2017年瑞典公布的统计数据，虽然经历了多轮销毁，当今世界依旧存在14935枚核弹头。按数量排列，第一名俄罗斯拥有7000枚，第二名美国拥有6800枚，法国以300枚排名第三，中国以270枚的数量排

名第四，之后依次是英国215枚、巴基斯坦140枚。

但又何须千枚核弹头？只需要几十枚，爆炸以及由此引来的包括核子冬天在内的一系列反应，就足以毁灭全人类。

在整个“世界末日钟”的历史上，指针被调拨到离12点最远的一次，是1991年的11点43分。那是因为在那一年，美苏两国签订了首轮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

但即便如此，距离人类毁灭也只有17分钟而已。

愿世界和平。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叙事史》（威廉·曼彻斯特著，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

2.《海森堡和德国原子弹计划》（北欧志愿兵，铁血网）

1973年，人类世界重新认识石油

一种资源，当它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需求并且有了稀缺性后，就可以被摆上谈判桌，成为一种筹码了。

1

1973年10月6日，这一天是穆斯林的“斋月节”。从日出至日落，除了一些特殊人群外，所有穆斯林在这一天必须严格把斋，不吃不喝。

这一天，同时也是以色列的“赎罪日”，以色列人全天都要不吃不喝，祈祷悔过。这一天，也是以色列全国的绝对休息日。

但就在这一天下午的2点，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色列防御工事忽然响起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埃及“蛙人”部队事先埋藏的两个炸药包被引爆了。

与此同时，准备已久的埃及军队从西奈半岛方向，叙利亚军队从戈兰高地方向，数十万大军分两线向以色列发动了全面进攻。

于是，被称为“斋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的大战全面爆发。

而这场战争的官方名称是：第四次中东战争。

2

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是一场先胜后败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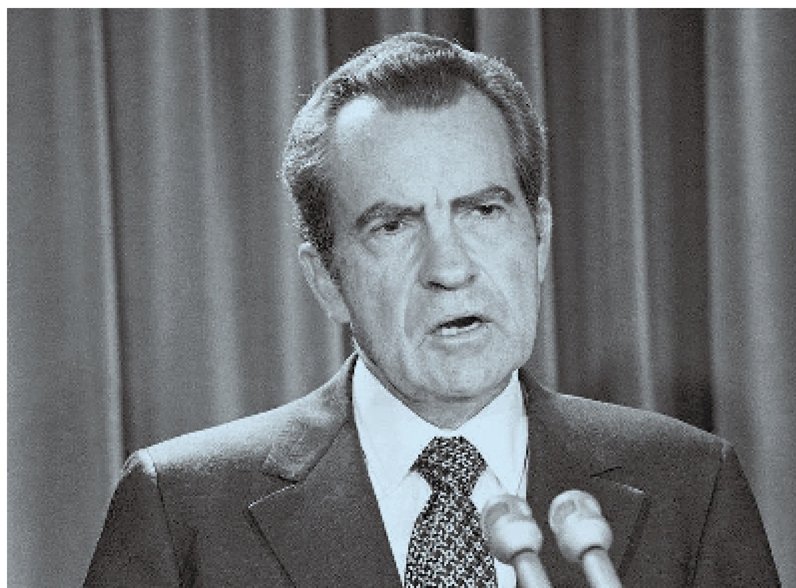
在战争初期，因为准备已久，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打了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尤其是进攻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一路势如破竹，4天后就完成了战前几乎所有的战略目标。

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的军队都被以色列打得灰头土脸，这一次的战斗开端，是他们打得最光彩的一次。但是，埃及军队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在赢得一系列胜利之后，他们开始固守据点，不再乘胜追击。

这让以色列获得了极为宝贵的喘息机会。一方面，他们迅速进行全国总动员，本来就全民皆兵的以色列瞬时将军队人数动员到了40万；另一方面，他们得到了最关键的帮助——站在他们背后的美国开始出手援助了。

尽管埃及和叙利亚背后也有苏联在源源不断地输血，但在这场战争中后期，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效率要远远高于苏联。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收到以色列著名的“铁娘子”梅厄总理的秘密求援信后（当时梅厄表示以色列面临全线崩溃），开始推动著名的“五分钱救援行动”，下令美国空军“把所有能飞的玩意儿都飞往以色列”。

在濒临崩溃的时候，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援，再加上本来就剽悍善战，所以在战争爆发一周之后，稳住阵脚的以色列就开始进入了战略反攻，埃及军队开始节节败退。（叙利亚的军队虽然也打得很惨烈，但从一开始就没占到什么便宜。）



尼克松当时深陷“水门事件”，但援助以色列没有半点含糊

但美国这次拼尽全力的“拉偏架”，也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世界。

要知道，这场战争，站在台前的是埃及和叙利亚，但在背后支持这两个国家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伊拉克、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苏丹、科威特、突尼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都派出了部队或飞机参战；此外，像沙特、科威特、利比亚这类当时家底还算丰厚的国家，还提供了大量金融援助。

真可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阿拉伯世界的兄弟们是不愿意接受的。而且，战场上打不赢，他们把怨气都渐渐集聚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断在背后支持以色列这个问题上——这种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就已经开始积累的宿怨，开始临近爆发点。

连以色列都打不过，还敢和美国叫板？

这一次，中东的阿拉伯兄弟们决定不用枪炮说话，而是用自己手里最强大的武器实施报复。

那就是石油。

3

这场常规战场之外的“石油战争”，中东国家早就想打了。

自从在地底发现了被称为“魔鬼的汗珠”的石油之后，中东等一批阿拉伯国家确实立刻脱贫致富，但石油产生的相当一部分利润，却一直不属于它们。

属于谁？属于“石油七姐妹”（Seven Sisters）。

“石油七姐妹”是当时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7家石油公司的称号，包括埃克森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莫比尔公司、德士古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

这些公司利用当时很多石油资源国还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状态，以很小的代价取得大面积租借地，所有在租借地开采出来的石油都是它们的，资源国拿到的只是矿区使用费和所得税。

“石油七姐妹”作为一个“卡特尔”（cartel，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所构成的组织），当时把控了全世界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以外资本主义世界90%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它们就像集齐了七颗龙珠的冒险家，向石油世界的神龙提出一个愿

望：我要全世界石油的定价权！

它们确实拥有了定价权。

从1950年到1973年，“石油七姐妹”把原油的平均价格牢牢压在1.8美元/桶的水平——这个价格，只是同时期煤炭价格的一半。

为了针对“石油七姐妹”，中东的主要产油国在1960年成立了另一个“卡特尔”，叫作“石油输出国组织”，这就是著名的“欧佩克”（OPEC）。

但是，由于内耗等各种原因，欧佩克在成立后的13年里，始终斗不过“石油七姐妹”。经过艰苦的努力，欧佩克在1973年1月好不容易把原油价格调高到了2.95美元/桶。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属于欧佩克的机会终于来了。

4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时，正是“石油七姐妹”和欧佩克进行新一轮石油定价的时候。

在谈判地点奥地利维也纳，作为对战争爆发的额外担忧和体谅，“石油七姐妹”当时提出的方案是，每桶原油价格提高15%，即45美分。

欧佩克的谈判代表直接拒绝。

10月16日，已经预感到不妙的“石油七姐妹”代表们，等到了欧佩克开出的涨价方案：以伊朗为首的海湾6个主要阿拉伯产油国，决定单方面把每桶原油的标价提高到5.11美元，上涨幅度达到70%。

面对抱团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次，“石油七姐妹”完全没有办法。

但这还只是开始。

10月17日，阿拉伯产油国石油部长又聚到一起开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只有一个：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正在前线与以色列苦战的埃及和叙利亚。

当时伊拉克提出的方案是直接反击——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但其他国家拒绝了这一激进行为，而是拿出了一个“慢慢磨”的方案：以1973年9月的石油产量为基准，欧佩克成员国之后每月的供应量削减5%。

这场“石油战争”貌似到这里应该慢慢降下帷幕了？

但是并没有。

这个每月削减5%供油量的方案似乎并没有对美国造成所谓的“震慑”作用，恰恰相反，在10月19日，美国宣布对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个火上浇油的行为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产油国。

利比亚当天就宣布向美国禁运石油，第二天，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迅速跟进：对美国和欧共体禁运石油。

这个“禁运”措施带来的后果就是，全世界每天的石油供应量一下子就减少了500万桶。

这就结束了？

还有最后一击：1973年12月下旬，欧佩克宣布把原油价格提高到11.65美元一桶，是1973年1月价格的近4倍。

5

自从人类将石油作为重要能源使用以来，全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终于爆发了。

习惯开大排量汽车的美国人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少加点油的问题，而是无油可加。

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因此下降了14%，197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75%。



加油站外竖起了“无油可售”的告示牌

紧跟美国步调，本身石油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更是陷入了困境，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20%以上，197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25%。但让日本人还算欣慰的是，由于“石油危机”，很多美国人改变了开大排量车的习惯，丰田等一批小排量日系轿车迅速打入美国市场并站稳了脚跟。



石油危机期间，“马拉汽车”出现了

在这样的前提下，西方阵营也出现了分裂。

1973年11月，欧共体表态，在中东问题上支持阿拉伯国家，于是阿拉伯产油国把欧共体（除荷兰外）从被禁运“黑名单”中删除。与此同

时，1973年11月22日，日本也支撑不住了，宣布站到阿拉伯国家一边。

但石油禁运和涨价引发的连锁反应已经不可避免。从北美到欧洲，从美国到英国，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长达10年的“滞胀期”。



人们举着“需要工作”的牌子，西方多个国家开始陷入滞胀期

阿拉伯产油国因为减产和禁运，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但欧佩克经此一战，将大量石油租借地收归国有，并夺回了石油的定价权。从石油提价的结果来看，它们是大大的赢家。

以沙特阿拉伯为例，1971年，沙特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4亿美元，但在石油危机爆发后，收入超过了1000亿美元。因为石油提价带来的滚滚财富，让一批中东国家一夜暴富，从此开始发展提速。

6

第一次石油危机产生的后续影响，还不只表现在经济上。

首先，美国意识到，再这样“拉偏架”支持以色列点爆中东火药桶，一点好处也没有，于是开始大力推进双方和解。1978年，美国终于促成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暂时和解，签署《戴维营协议》。

其次，美国和西方世界终于清醒认识到自己能主宰石油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美国的协调和策划下，1974年2月，世界各个主要石油消费国成立了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就是今天的“国际能源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加强各国的石油自给能力，在发生石油危机时可以共享石油，节约能源——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再被欧佩克牵着鼻子走。

用这一招，美国算是有了先见之明。

1978年，因为产油大国伊朗的政局发生大变动，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



第四次中东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经历这场战争后终于发现通过军事行动无法使以色列屈服，于是接受美国的《戴维营协议》。他在1977年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领袖，并在1979年与以色列议和



萨达特的行为也激起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愤怒。1981年10月，在埃及的一次阅兵式上，主席台上的萨达特被阅兵队伍中四名叛变的埃及士兵直接扫射身亡

1990年，因为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受到制裁，第三次石油危机爆发。

毫无疑问，在可以完全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出现以前，围绕石油的明争暗斗仍将继续下去。

馒头说

我忽然想起了1980年那个著名的“十年赌局”。

那一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埃利希（Paul R.Ehrlich）作为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朱利安·西蒙（Julian L.Simon）立了一个著名的赌约：

鉴于地球上的很多自然资源都不可再生，双方以1000美元为赌注，以铜、铬、钨、镍、锡这五种金属商品为标的，进行一场十年之赌——埃利希赌十年后这五种金属商品全部会涨价，而西蒙赌这五种金属商品全部会降价。

按理，这五种金属资源都是开采一分就少一分，照“物以稀为贵”的说法，十年之后，哪有不涨价的道理？更不要考虑货币贬值的因素了。

结果呢？

1990年9月29日，是“十年赌约”的到期日。这五种金属资源的价格

和十年前相比，全部下跌。

十年前，埃利希用1000美元购买的五种金属，在十年后跌到了423.93美元——总价下跌了近60%。

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西蒙的观点，自然资源看似有限，其实是“无限”的——一旦资源供应紧张，短时间内产品价格会上涨（从1980年到1990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五种金属资源价格确实是上涨的），但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和人类求生欲望的动力，自然资源开采的效率会大幅度提升，而随着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人们一定会找出可替代的新资源和新能源，随即导致原有资源价格下降。

这个赌约，很容易让人想到石油。

我很支持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但我应该也算是一个谨慎的资源乐观主义者。在石油问题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石油资源是不会被我们人类开采殆尽的——在开采完之前（假设石油资源真的会枯竭），人类早就使用新能源了。

之所以现在石油还被普遍使用，我觉得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它太便宜，它的价格还在我们的承受范围内（这是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石油的可开采量其实远比我们估计的要多得多）。我甚至还曾“阴谋论”地觉得，新能源汽车之所以在近十年还没有按很多人预想的那样迅速普及，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背后牵涉到太多人的利益，包括石油资源国，包括大的汽车制造厂商。一旦形势所迫或下定决心，我觉得新能源汽车的完全普及，只是一眨眼的事情。

电能、氢能、太阳能……包括页岩气，无论哪种新能源，我都觉得正在或已经为石油能源的使命终结做好了准备。

石油哪天会淡出人类文明的进程，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大概也取决于背后的政治博弈和利益分配吧。

石器时代终结，并不是因为石头用完了。

三个东亚国家，三天，一场政变

纵观近代史，中国和日本的各种纠葛，很难离开一个地区，那就是朝鲜半岛。

1

关于这个政变的故事，要先从朝鲜的一个条约、一位王妃和一次兵变说起。

一个条约，指的是《江华条约》。

1875年，以日本“云扬”号为首的三艘军舰侵入朝鲜的釜山、江华岛一带，引起朝鲜士兵的反抗。最终日军获胜，签下了打开朝鲜门户的《江华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帝国在这次事件上态度暧昧，这无疑给早就觊觎朝鲜半岛的日本增强了信心。

一位王妃，指的是当时掌握权力的朝鲜闵王妃，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皇后。

1864年，朝鲜国王李昪去世，由于没有子嗣，身为王室旁支的李熙继承了王位。当时李熙才12岁，所以就由他的父亲大院君[1]李是应摄政。大院君摄政10年，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在自己儿子22岁的时候也不愿交出权力了。但这时候，性格懦弱的李熙其实已经完全听妻子闵妃的指挥了——朝鲜政坛最高权力的角逐，成了大院君和闵妃的角力。（闵妃其实是大院君自己选给儿子的。）

一场兵变，指的是1882年的“壬午兵变”。

大院君和闵妃两派的权力斗争，其实在1873年就分出了结果——闵妃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取得了权力，大院君被迫交出了权力。相对来说，大院君一方非常传统，不愿做任何变革，倾向清朝一些，而闵妃一方因为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摆出了愿意改革的开明姿态，当时和已经进入“明治维新”的日本走得比较近。但是，整个闵妃集团在执政期间其实并无改革之意，且贪污腐败，民愤四起，大院君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朝鲜高宗李熙画像

终于，1882年7月，因为大院君负责发饷的“旧军”与闵妃发饷的“日式新军”（日本人担任教官）待遇差别过大，再加上一直积压的“仇日”情绪，“旧军”的部队发生哗变，聚事的士兵和民众焚毁了日本公使馆，并杀了一批日本人。

当时闵妃的手下逮捕了一批闹事的士兵，大院君抓住这个机会，传出风声说是闵妃背地里勾结日本人，开始鼓动朝鲜民众“排日”，进而派兵捕杀以闵妃为代表的“后党”，闵妃化装成宫女才逃了出来。

消息一出，立刻给了日本机会。日本决定向朝鲜派兵，签订新的条约以扩大在朝鲜的权益。但这一次，清廷也反应神速，同样立刻派兵进入了朝鲜。由于闵妃在逃亡途中指示在天津的亲信向清廷求救输诚，所以清廷在权衡了两边利弊之后，决定扶植本来就是正统，且手里还有朝鲜国王李熙的闵妃集团。



闵妃画像

“壬午兵变”的最终结果是，带兵入朝平乱的清朝提督吴长庆在宴请大院君时将他一举擒获，送到中国国内软禁，清政府全面支持闵妃集团。

经此一变，闵妃集团自然大大感激中国，而作为宗主国，中国的势力在朝鲜得到了全面加强，基本上控制了朝鲜的外交和海关等各方面重要事务。

但是，故事讲到这里，还只是一个交代背景的开头。

（关于李熙和闵妃的故事，可参看后文《朝鲜最后一个国王》。）

2

现在，轮到这场政变的主角之一，朝鲜的“开化党”登场了。

朝鲜的开化党大致形成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化党”这个称呼其实是日本人给的，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状态”之意。

彼时，朝鲜国门被迫打开，虽然相对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来说，朝鲜人“睁眼看世界”已经晚了，但还是涌现了一批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改变国运的人。这批人主要是由朝鲜的青年贵族子弟组成，他们的家庭有足够的财力送他们东渡日本进行参观考察。这批贵族子弟到了日本后，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气象和新发展，感触颇深。再比较也在进行“洋务运动”的中国，这批贵族子弟觉得学习日本是正确的方向。

这批人慢慢聚集在了一起，就有了统一的称谓——开化党。他们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对内进行社会改革，对外脱离清朝的宗主统治，依靠日本的力量，让朝鲜成为“亚洲的法兰西”。

事实上，闵妃集团一开始也被日本人统一称为“开化党”。由于“壬午兵变”驱逐了大院君的极端保守势力，开化党一度以为到了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但他们很快发现，闵妃集团只是打着“开化”的名义，其实根本不愿意进行任何变革。时间一长，开化党也分裂了：以闵妃集团为代表的人成了“事大党”（来自中国儒学观点，指实力悬殊的时候，小国应该侍奉大国以保安全，就是要效忠中国），而以金玉均为首的一批人为“激进开化党”，要求通过强烈变革乃至暴力革命，从中国倒向日本。还有一派中间派称为“稳健开化党”，他们认为应该改革，但不要破坏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激进开化党代表人物金玉均

于是，朝鲜政坛就在这样内忧外患、暗流涌动的环境下进入1884年。

这一年，是甲申年。

激进开化党觉得自己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

3

1884年，中法战争全面爆发。

这一年的8月，法国舰队突袭马尾港，大清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南方战事吃紧，原来以6个营3000人驻守朝鲜的吴长庆率一半部队回国增援，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兵力削弱。

另一方面，由于慈禧太后在这一年发动了“甲申易枢”，换下了一直主张软禁大院君的恭亲王奕□，使得在朝鲜掌权的闵妃心中存疑，觉得清廷可能要放回大院君，朝中双方发生了猜疑。

在这个当口，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人为首的开化党人，决定趁此机会动手，铲除清朝在朝鲜的势力，推动朝鲜改革。

首先，金玉均带人频繁拜访高宗李熙，告诉他中法之战中国必败无疑，此时机千载难逢。权力不是捏在父亲就是捏在妻子手里的高宗被说动了，给了金玉均一封密函，类似“衣带诏”，授予金玉均带人起事的权力，希望借此机会亲政。

随后，开化党人就做了一系列安排，包括成立“忠义契”敢死队，准备刺杀事大党的大臣等。万事俱备之后，金玉均知道还有最关键的一环没有去做。



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

那就是日本人的帮助。

开化党人试图清除在朝鲜的中国势力，当然正中日本下怀。但鉴于当时日本自视国力还不能与中国抗衡，所以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做了两份方案汇报国内：甲方案为开化党起事后日军出动配合，击退清军；乙方案为袖手旁观。

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本政坛高层认为时机未到，先不要招惹中国，所以下令竹添不要让日方参与此事。但由于来往信函需要时间，在等待命令的过程中，怀着一个“帝国梦”的竹添进一郎和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擅自决定选择了甲方案。

按照计划，开化党人将在12月4日晚上借汉城邮政局落成典礼之机，由开化党成员、邮政局总办洪英植出面邀请一批事大党骨干和清朝驻朝鲜官员，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去别处放火吸引客人注意力，然后将他们全部围捕猎杀；另一路去王宫告诉国王和王妃是清军作乱，将他们挟持到易守难攻的景佑宫，逼迫国王宣布改革。

开化党人全程都算计得颇好，但他们低估了这起事件的另一个主角——中国的能力。

确切地说，是低估了一个中国人的能力。

4

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的伯父袁保庆和吴长庆关系非常好，所以袁世凯也被托付给了吴长庆，随吴入朝。在朝鲜期间，当时才20岁出头的袁世凯精明干练，遇事果敢，给吴长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初在要软禁大院君的宴席上，吴长庆一度不忍心下手，还是袁世凯敦促动手，把大院君推入轿子带走的。

在吴长庆率一半兵力回国增援之后，袁世凯就留在了朝鲜。他其实当时已经从种种蛛丝马迹中嗅到了开化党要动手的苗头，甚至还写信给国内的李鸿章汇报，说如果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回到朝鲜，短期内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12月4日的邮政局晚宴，开化党人的请柬也送到了袁世凯这里，但袁世凯一打听，听说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不去，当即也决定找借口不去。

袁世凯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当天晚上，政变果然发生了。

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是开化党人基本上还是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放了火，杀伤了几个事大党的大臣，然后连哄带骗把高宗和闵妃等人拉到了景佑宫，汇合了竹添进一郎率领的200名增援日军，将宫殿守卫得严严实实。随后金玉均假借高宗之名召集一批事大党的核心大臣入宫，派埋伏的刺客来一个杀一个。

一开始高宗和闵妃还有一些怀疑和犹豫，但金玉均在关键时刻当着

大家的面手刃了几个声称“外面并无变故”的事大党重要大臣，其中包括高宗最宠幸的大臣柳在贤，宫内已经无人敢反抗开化党人。

这时候，唯一能改变局势的，就只有驻朝的清军了。

12月4日那天晚上，代表中方去赴邮政局“鸿门宴”的是清朝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他从邮政局逃出后回到公署，立刻将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袁世凯当即就带了200名士兵前往邮政局，发现无人。随后找到了在事变中被砍伤的事大党大臣闵泳翊（闵妃的侄子），这才知道果然发生了政变。

当时袁世凯考虑到宫内有日军驻扎，为避免引起冲突，于是同驻防营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一起联名致书高宗，请求允许派清军入宫护卫。但信都被交到了挟持高宗的金玉均手里，他都以高宗的名义一口回绝。

此时，宫内的局势正在按照开化党人的计划顺利进行。

1884年12月6日，开化党公布了清洗事大党后的新政府官员名单，并颁发了14条政纲，宣布进行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要求清政府释放大院君回国，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等等。

应该说，这套施政纲领还是反映出朝鲜迫切需要与世界强国接轨的愿望。但问题在于，由于开化党长期形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并没有群众基础，朝鲜的普通百姓很少有人理解并拥护这些改革，而这些限制王权和收拢财权的措施，本质上也是为高宗和闵妃所反对的。

不过，由于当时高宗自己被控制在开化党手中，所以还是在这一天接受了来自日本、英国、德国和美国公使的觐见，表示改革总是需要发生一些大事才能成功。

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开化党的“甲申政变”已经大功告成。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清朝军队出动了。

12月5日整整一天，袁世凯其实都在做准备。

当时，中朝之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水师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朝鲜发生如此大事，如果按常规请示到北京的清廷最高层，至少要几天时间——如果等北京的回复再到朝鲜，肯定大局已定。

这时候，驻扎在朝鲜的清军将领内部发生了分歧。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能轻举妄动。陈树棠也转达了美、英、德三国公使的意见：劝清军不要行动。朝鲜的大臣金允植也发来劝告：高宗在开化党人和日本人手里，不要弄伤了他。

唯一坚持速战速决的人，只有袁世凯。



金允植是当时朝鲜“稳健开化派”的代表之一，赞成改革，但主张“东道西器”，和中国的“中体西用”类似。“激进开化派”没有得到“稳健开化派”的支持，是一大失策

虽然袁世凯当时在驻朝清军中只是一个后勤主管，但他一直深受吴长庆信任，见识也确实比吴张二人更高，再加上他在汉城一直广结人脉，所以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经过一番争论，清军将领会谈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派人向在国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紧急汇报。

但是，从下午开始，袁世凯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袁世凯先要解决部队问题，于是联络了由他自己编练的朝鲜亲卫军的左营和右营，向他们发放了600两上等成色的黄金，秘密约定准备进宫护驾。

然后，他要解决“师出有名”的问题。他又联络了朝鲜右议政沈舜泽，要他写封信过来。沈舜泽立刻以朝鲜政府的名义写了一封给清军的信，请求他们出兵镇压开化党，解救国王。

这时候，在景佑宫的开化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当时开化党人漏杀了一个事大党的大臣沈相薰，他将开化党人杀害闵台镐、闵泳穆等六名大臣的事写成一封密信，放在御膳的底部，送到了被软禁的闵妃手里。闵台镐、闵泳穆都是闵妃的族人亲信，闵妃顿时怒火中烧，立刻怂恿高宗搬回不易防守的昌德宫，并利用宫女出宫带信，让自己的亲信迅速与清军取得联系，让他们杀进宫来救驾。

收到消息的袁世凯更加坚定了决心，通报了吴兆有和张光前，表示自己将带兵入宫，并且做出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绝不牵连诸位。

众人点头之后，袁世凯立刻率一营清军官兵和之前约定好的朝鲜亲卫军左、右营赶赴昌德宫。

6

12月6日下午3点，袁世凯率清军和朝鲜亲卫军共2000余人抵达昌德宫敦化门。

刚入宫门，开化党“忠义契”和日军就开始猛烈射击，清军随即还击，袁世凯主攻中路，吴兆有从左门带兵包抄，双方立刻展开激战。守军方面除了开化党和日军之外，还有一批朝鲜士兵。但之前这批士兵都是袁世凯督导训练的，所以一看到袁世凯，很多人立刻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由于“忠义契”人数较少，清军的战斗对象主要就是日军。

在战斗中，袁世凯身先士卒，毫无惧色地踏尸前进。日军在气势上首先就输了一筹，再加上人数处于劣势，渐渐落入下风，越战越退，最后陷入溃败。

此时的闵妃一行已经逃入城北的关帝庙躲藏，而金玉均要求高宗一

起前往仁川搭船去日本，高宗坚决不肯。在劝说期间，驻日公使竹添进一郎打起了退堂鼓，准备自己带日军先行撤退。事实上，竹添进一郎在这一天也收到了国内发来的不要招惹中国的指令，是金玉均承诺向日本借款300万元，以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为条件，他才勉强答应留下的。如今日军已经溃败，竹添当然要撤回日本使馆。临行前，竹添安慰金玉均：清廷无理出兵，侮辱我们两国，我国肯定会以武相待！

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苦求无果之后，思虑再三，决定让高宗也去关帝庙，而自己随竹添去日本使馆避难——这也就等于承认政变失败了。

12月7日一早，已经被袁世凯接到军营的高宗再一次召见各国使节，推翻了之前自己说的话，说他受金玉均等开化党人的挟持，这次事件是一次“叛乱”，所幸在清军的帮助下，叛乱已经被平定了。

这时候，汉城的大街小巷也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场面：得胜回营的清军一路上受到了朝鲜百姓载歌载舞的欢迎和拥戴；而另一方面，在城中的日本人则被朝鲜人追杀，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各有死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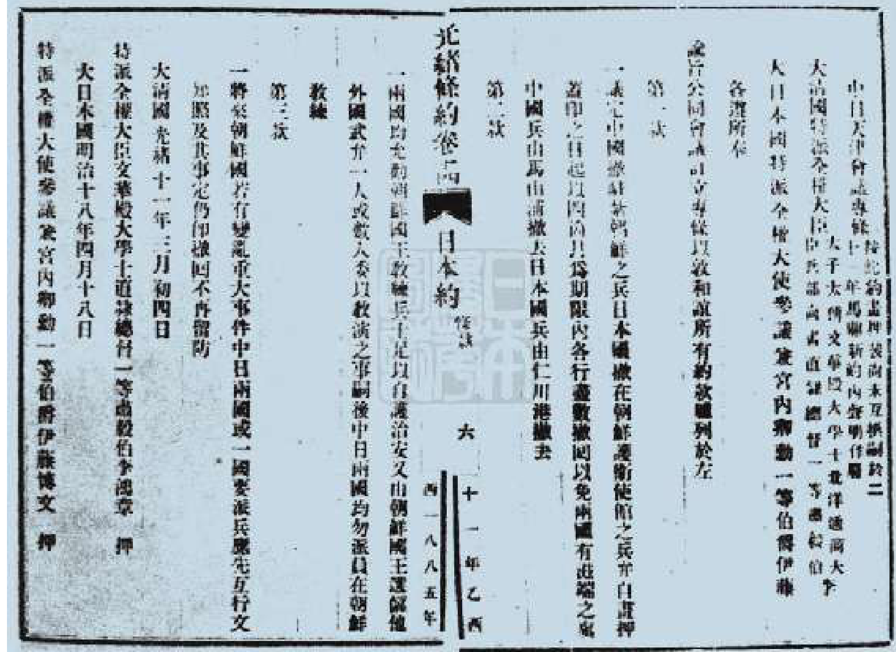
开化党人金玉均的宅邸被老百姓焚毁，日本使馆被朝鲜人围攻，导致竹添进一郎只能焚毁使馆，带着金玉均等9名开化党人易服逃往仁川日本使馆，最终坐船再逃回日本。

7

一场维持三日的政变就此落幕，但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12月10日，高宗一行返回宫中，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开化党人身上，并开始大清洗，将朝廷内外的开化党人拘捕并杀害，连亲属中的妇女孩子也不放过。朝鲜的政权再一次落入闵妃集团手中，开化党从此烟消云散。

在政变中吃了暗亏的日本不敢招惹中国，只能再度勒索朝鲜，在1885年同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要朝鲜谢罪、赔款、逞凶，并向朝鲜增兵。1885年4月，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订立《中日天津条约》，凭借强硬的外交手腕规定中日两国如果出兵朝鲜必须互相通知，这等于提高了日本在朝鲜的地位。



中日天津會議專條 按此約畫押後尚未互換迨於二十一年馬關新約內聲明作廢

大清國特派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書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

大日本國特派全權大使參議兼宮內卿勳一等伯爵伊藤

各遵所奉

諭旨公同會議訂立專條以敦和誼所有約款臚列於左

第一款

一議定中國撤駐紮朝鮮之兵日本國撤在朝鮮護衛使館之兵弁自畫押

蓋印之日起以四個月為期限內各行盡數撤回以免兩國有滋端之虞

中國兵由馬山浦撤去日本國兵由仁川港撤去

第二款

一兩國均允勸朝鮮國王教練兵士足以自護治安又由朝鮮國王選僱他

外國武弁一人或數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後中日兩國均勿派員在朝鮮

教練

第三款

一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

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大清國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特派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書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李鴻章 押

大日本國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特派全權大使參議兼宮內卿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 押

光緒條約卷六十四 日本約 條議 六

十一年乙酉 西一八八五年

《中日天津条约》

清朝看似是这次政变的最大受益方，在朝鲜作为宗主国的权益大大增强，但因为不敢进一步招惹日本，在外交上其实输了一筹。不过作为个人，在平定政变过程中立下大功的袁世凯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进入清廷高层尤其是李鸿章的视线。袁世凯在政变后被封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可以随意出入王宫，俨然成了朝鲜的“太上皇”。

这次政变虽然只持续了三天，但对三个国家而言，影响绝不止于此。

对朝鲜来说，虽然开化党的政策在当时不被民众理解，但毕竟折射出朝鲜的民族独立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愿望已经萌芽。

而对中日两国来说，双方再一次认识到朝鲜半岛必然会是两国之间起摩擦的导火索。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弱和日本的迅速崛起，两个国家不可避免还会在这个半岛上再起冲突。

果然，十年之后，又起风波。

只是那一次，胜负逆转。

馒头说

先说说文中两个人的命运结局。

一个是闵妃。

闵妃在“甲申政变”平息后重新获得大权，但在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中，因清朝落败，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利而再度失势。非常仇恨日本势力的闵妃随后又尝试与俄国势力结盟以赶走日本人，最终引发了日本人的杀意。在1895年的“乙未事变”中，日本人公然杀入朝鲜王宫，抓出闵妃后肆意凌辱，最后杀人焚尸，将其骨灰倒入池塘。一代王妃，最终尸骨无存。

另一个是金玉均。

金玉均流亡日本后改名岩田周作，靠日本政府资助生活。但随着日本在朝鲜地位的提高，他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再加上金玉均一直在酝酿反攻朝鲜，日本政府渐渐把金玉均看成了一个包袱，一度将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群岛，后又安置到北海道的札幌，每个月只给几十元的生活费。对日本彻底失望的金玉均又转而希望联络清朝的李鸿章，商量“中日朝联合抵抗欧美”，结果在1894年3月抵达上海欲会晤李鸿章儿子时，被朝鲜派来的刺客暗杀于旅社，尸体被引渡回朝鲜，遭受凌迟，并被斩首示众。

这两个人的命运，折射出的其实是朝鲜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的无奈。

从历史上来看，朝鲜因为自己的地理位置，确实一直过得不容易。身处中日两个强国之间，北面还有一个强邻俄国，朝鲜一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从这一点上来说，事大党也有他们的无奈之处。

反观开化党人，虽然他们的“甲申政变”有种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内，也只维持了三日就失败了，但无论是他们的施政纲领还是改革诉求，都是希望朝鲜能够走上独立自主的富强之路，出发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他们找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1910年，朝鲜被早已急不可耐的日本正式吞并。

但是回过头来看，朝鲜希望自强，难道依靠清朝就可以？依靠俄国就可以？或者说，真的存在一个可以依靠的正确对象吗？

大变局中，哪个国家不想自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强之路，可能确实需要别人的援手和合作，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指望完全依靠别人让自己强大起来，最终只能是背靠冰山，与虎谋皮。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日朝三方关系视野下的甲申政变（1882—1884）》（赵玉敏，《兰台世界》，2017年第4期）

2.《从〈袁世凯全集〉看朝鲜的“甲申政变”》（胡春惠，《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6年）

3.《袁世凯一战成名：朝鲜甲申兵变始末》（吕峥，《文史参考》，2010年第22期）

4.《日本学术界有关朝鲜开化派金玉均的研究》（郭海燕，《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

5.《先图朝鲜，意在中国：日本武力进犯，逐步控制朝鲜》［张宪文，《日本侵华图志（第2卷）：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

---

[1] 大院君是朝鲜王朝时，入继其他国王大统即位的国王给自己生父的封爵，近代国际历史上所说的大院君一般指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他是唯一一个生前获此爵位的人。——编者注

长崎事件：大清对日外交的最后荣光

2019年9月，沉没了124年的北洋舰队“定远”号的沉船遗址终于确定。提到“定远”号，必让人想起甲午海战，总能勾起国人一段屈辱的回忆。但是，这艘曾经的“不沉”铁甲舰，也见证过一段晚清对日本的最后强硬。

1

1886年8月1日，日本的长崎港。

港口的码头上，聚集了不少日本民众，熙熙攘攘，指指点点。

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正在酝酿。

因为在他们眼前出现了四艘巨大无比的战舰——并不是日本海军的军舰，而是到访的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四艘战舰：

排水量为7340吨的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

排水量为7340吨的铁甲舰“镇远”号；

排水量为2440吨的防护巡洋舰“济远”号；

排水量为1280吨的炮舰“威远”号。



图为“定远”号。“定远”号和“镇远”号为清政府委托德国建造的7000吨级的一等铁甲舰，是“姐妹舰”。两艘军舰于1881年开工建造，1884年完成，定远舰花费约140万两白银，镇远舰花费约142万两白银。这两艘军舰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巨舰”，为北洋舰队主力舰

日本民众从没看到过像“定远”号和“镇远”号那样巨大的铁甲舰，因为当时日本海军最强大的三艘主力舰，都只是3000吨级的。

所以，在那些难以名状的情绪中，有惊奇，有叹服，有担忧，有恐惧，有嫉妒，甚至还有愤怒。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迅速崛起，国力大大增强，俨然已成为东亚唯一能与传统“一哥”中国争锋的强国。虽然在1884年试图挑战中国权威的“甲申政变”受挫（参看本书收录的《三个东亚国家，三天，一场政变》一文），但到了1885年，福泽谕吉在他那篇著名短文《脱亚论》中已经明确指出，要和中国乃至亚洲划清界限——日本应该放弃曾经尊崇的中国思想和儒家精神，大力吸收学习西方文明。

当时间进入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日本从上到下，其实早已把中国视为自己崛起道路上的头号假想敌。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忽然派了四艘军舰到访日本，不能不引起日本民间的情绪反弹。



长期以来，日本一万元纸币上印的头像一直是福泽谕吉。他当时的思想在日本影响深远，被称为日本“近代第一教育家”，他曾主张与东亚落后的“恶邻”绝交，并且赞同战争是日本崛起的机会。据最新消息，日本的一万元纸币将在2024年启用新人物头像涩泽荣一（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取代福泽谕吉

坊间甚至开始有传言：中国这次派军舰来，就是准备开战的，目的是要讨回之前被日本吞并的附属国琉球。

那么，这真的是北洋舰队到访日本的目的吗？

并不是。

2

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访日，有原因，也有苦衷。

原因，确实是出于国际形势的需要。

这件事的起因，要追溯到1885年英国出兵占据朝鲜南部海域的巨文岛，与俄国争霸东北亚。当时这起引起国际关注的“巨文岛事件”，将英国、俄国、朝鲜、日本和中国五国统统搅入了旋涡——英俄要争霸亚洲，朝鲜欲借俄抗英顺带敲打中日两国，而中国和日本不允许别国染指朝鲜。

1886年7月，李鸿章得在朝鲜的袁世凯密报：俄国有意占下朝鲜的永兴湾。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鸿章决定把手里的那张“王牌”打出去震慑一下俄国。

而这张“王牌”，就是羽翼渐成的北洋舰队。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随即就接到了李鸿章的命令：立刻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随后前往海参崴接当时参加中俄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吴大澂。

用强大海军震慑俄国的意图，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北洋舰队之所以要在任务结束后停靠在日本长崎港，也是有苦衷的。

像“定远”“镇远”这样的一级铁甲舰，在进行远程巡航后，是需要进入船坞涂油和整修的。但当时清朝的大沽口、上海、福州等地船坞，只能接纳吃水在15尺以下的军舰，“定远”和“镇远”因为吨位庞大，吃水在20尺左右，无法停入船坞。

一般来说，各国要造大型铁甲舰，必要先造可以修整的船坞。中国没有经验，等领悟过来，船坞还没造好，船倒造好了。（可以匹配的船坞在1888年才在旅顺造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舰队只能去符合条件的日本长崎港造船所修整。

军舰访日，李鸿章有没有要敲打一下日本的意图？相信也是有的，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实际需要。

考虑到中日关系处于敏感时期，且是军舰访问，所以李鸿章嘱提督丁汝昌，一定要严明纪律，以防意外。

所以，当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停靠长崎港后，舰上的水兵并没有被允许下船。

但是，长期远洋航行，陆地近在咫尺却不让下船，对水兵而言也是很难熬的一件事。再加上长崎方面也向北洋舰队发出了邀请：欢迎水兵们下船观光购物。

8月13日，丁汝昌终于下令：允许水师官兵下船购物观光。

正是这道命令，成了“长崎事件”的导火索。

3

8月13日晚上8点多，丁汝昌接到手下禀报：出事了。

关于事情的起因，由于中日报道不同，存在不同版本：有说北洋水师的水兵违反军纪去嫖妓引发冲突的，有说水兵买水果语言不通起了纠纷的。总之，就是起了争执。

由于当地人普遍对中国人持仇视态度，中国的水兵也自然对日本人没有好感，双方起了争执后，很快就酿成了斗殴。在斗殴中，北洋舰队一名水兵受轻伤，而日本的一名警察被刺成重伤。

在日本人看来，外国的水兵在本国寻衅滋事，还刺伤了我们的警察，这不是摆明了欺负我们吗？但是，北洋水师的大批水兵当时从舰上冲出来，把陷入冲突的同伴救了回去，同时，“定远”“镇远”的巨炮就在那里摆着，日本人也毫无办法。

这场意外的风波，暂时被压了下去。

8月15日是周日，丁汝昌宣布船上放假，再一次允许数百名水兵上岸观光购物。

为了预防前天的意外冲突再次发生，丁汝昌下令所有官兵不准带武器上岸，并且还派了12名巡查在岸上巡逻监督。

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

北洋水师的官兵上岸后不久，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沿街的很多日本商铺，都早早关门了。

正当他们疑惑之际，数十名日本警察举着砍刀从四周街巷的各个角落冲了出来，追着他们开始砍杀。而数百名日本民众也围了上来，用木棍、石块乃至滚水袭击北洋水师的水兵。猝不及防的中国水兵们四下逃散，却发现通路都已被事先堵塞。

情急之下，手无寸铁的北洋水师官兵和对方扭打在一起，夺下对方的武器开始反击。

这场大规模的械斗最终造成北洋水师官兵5人死亡（一说8人），6

人重伤，38人轻伤，5人失踪。而日本方面也有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收藏于中国山东威海甲午战争纪念馆的“长崎事件”相关画作

消息传到船上，丁汝昌等一干人都震惊了。

如果说8月13日是一场意外摩擦的话，那么8月15日这场械斗，毫无疑问是日本长崎警方有所预谋的。

时任北洋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琅威理，直接要求“定远”“镇远”的主炮转向长崎市区方向，向日本开战，顺带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

当时，北洋舰队的7艘主力舰总吨位为27470吨，而日本海军的五艘主力舰吨位为14783吨，前者几乎超过后者一倍，实力遥遥领先。



琅威理和邓世昌（双手相握垂于胸前）在“致远”号上。琅威理治军严明，办事勤勉，他任职期间的北洋水师军纪最好，丁汝昌也承认：“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而北洋水师的官兵中也流传着一句话：“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

如果当时真的不顾一切对日本开战，日本海军确实不是北洋舰队的对手，很可能就被消灭在萌芽之中。

但是，李鸿章拒绝了琅威理的建议。

清政府决定和日本谈判。

4

在这场谈判中，有两个中国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个人，叫伍廷芳。

伍廷芳从英国留学归来，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伍廷芳也是参与处理“长崎事件”的主要人物。

作为法学专家，伍廷芳一上来就先把“长崎事件”定性为一般刑事案件，避免上升到国家纠纷。

其次，既然是刑事案件，伍廷芳就提出一切以“事实为依据，公正为准绳”。他通过询问双方人证、伤口验伤等各种方式，指出中国水兵的伤口多为刀伤，而日本人的伤口多为钝器（木棒）伤害，这些都可以证明日本人是蓄意挑起争端，有备而来。



伍廷芳后来在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辛亥革命后曾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

此外，伍廷芳为显示公正，请英国律师担任中方的律师，参与一系列取证、辩论程序。

经过大量证人的证词和证物取证，“长崎事件”的来龙去脉不难厘清：8月13日那场小摩擦是双方在无意中引发的，而8月15日那场造成多人死亡的械斗，长崎警方有备而来，蓄意报复，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是，日本方面却绝不肯承认这个事实，认为8月15日的械斗是中国水兵蓄意报复日本警察。日本方面也高价聘请了英国和美国的律师，与中国进行诉讼。“长崎事件”的调查审理从8月拖到了11月，双方谈判超过了30次，却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这也是日本方面的策略：他们通过不断要求调取新证人和提供新证物的手段，开始拖延时间。而中方因为要提供人证，有100多名北洋水师的水兵留在长崎不能回国，每天的律师聘请费用高达300两白银，所以时间拖得越久对中国越不利。

11月20日，中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中国不再要求日本道歉，双方按照各自的损失，向对方进行补偿。

其实这个方案中国已经在原则问题上退了一步，但日方依旧拒绝了这个提议。

于是，第二个人就出场了。这个人，叫徐承祖。

徐承祖是当时清朝的驻日公使。“长崎事件”发生后，徐承祖也在第一时间参与了处理，和日本外相井上馨进行了多次交涉。

如果说伍廷芳唱的是“文戏”的话，那么徐承祖配合上演的就是“武戏”。

早在9月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徐承祖就向李鸿章提议“用武力作为后盾”——不是真要全面开战，而是让中方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彼时，日本虽然开始高速发展，但在人口、经济、军队数量等各方面，还无法与清朝匹敌，所以徐承祖提出的建议是具备一定可行性的。

但是，当时由于中法战争刚刚结束，顾虑重重的李鸿章并没有同意徐承祖这个建议。尽管他曾在“长崎事件”发生后召见过日本驻天津公使，提出“……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威吓。

11月20日中方的“折中方案”，其实就是徐承祖提出来的。再次被日方拒绝后，徐承祖立刻上书李鸿章：“非绝交无别法”——立刻撤回公使，与日本断交。

这个提议也得到了伍廷芳的认可。

国与国之间如果一旦撤使和断交，尤其是邻国，那么离开战也不远了。

李鸿章充分考虑了徐承祖的提议后，觉得断交引发的连锁反应还是太大，选择了轻一个程度的措施：停审。

停审，意味着中方代表将全部撤出关于“长崎事件”的调查和审理，潜台词就是：这事儿就这么悬着吧，接下来我们走着瞧！

中方一停审，日方慌了。

5

“长崎事件”就这样“烂尾”，并不是日方想看到的。

从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来说，因为日本国内媒体之前一直宣传的是中国水兵欺负日本警察，如果这件事不了了之，会让日本民众觉得外国水兵到我们这里闹事后，我们的政府居然就让人家扬长而去了，肯定会引发不满情绪。

但从对中国的交涉来看，让中方赔礼道歉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日方就存在过错，更因为清朝的各方面实力是压倒日本的，日本并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

如今，中方宣布停审“长崎事件”，一下子就把日方顶到了杠头上：若不谈下去，无法向国内民众交代；若谈下去，中方又绝不肯低头。

而且，“停审”很可能只是中方走的第一步棋，若接下来“撤使断交”乃至开战，这不是现在的日本所能承受的。

更何况，英俄暗斗的“巨文岛事件”还没平息，在东北亚这盘棋上，日本独自得罪中国没有任何好处。而日本还准备近期修改一系列条约，提高关税，这也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思来想去，日本方面还是决定要把这件事做个了断。

1887年1月28日，在“长崎事件”发生快半年之后，日本方面突然宣布，接受德国驻日公使提出的调解方案，即“伤多恤重”——各自赔偿对方损失，谁损失大，得到的赔偿就多。

这个方案，其实就是当时徐承祖提出的那个方案。

但是日本人要面子，不说是我们接受你中国人提出的方案，而一定要说我们接受的是德国人的方案。

中方听到这个方案后，也表示可以接受。

于是，1887年2月4日凌晨，在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双方谈判之后，“长崎事件”的处理结果终于出来了：

日方赔偿中方52500日元；

中方赔偿日方15500日元；

中国水兵在长崎医院治疗期间的费用，由日方承担；

双方政府各自决定是否要惩办己方凶手，互不干涉。

双方签字画押，这件事就此结束。

6

但是，“长崎事件”对中日两国造成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最终以中方获得赔偿较多而结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相对“体面”的。也正是因此，清廷从上至下，对日本开始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认为以目前北洋舰队的实力，已足以“震慑”对方。

这种心理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海军升级的速度开始大大放缓：从1887年到1888年的两年时间里，北洋舰队虽然又购置了10艘巡洋舰和鱼雷艇，但已经放弃购买“定远”级的铁甲舰。

自1885年起，慈禧太后修缮颐和园的费用，就开始从海军费用中挪用。从1885年到1895年的10年间，总计挪用1300万两白银——足以再购买9艘“定远”级别的铁甲舰。

而这10年，恰恰是全世界海军技术大飞跃的10年，整个军舰技术水平完全升级换代。丁汝昌曾在1893年提出要为“定远”等三舰购置新式克虏伯快炮18门，李鸿章因为经费捉襟见肘，最终只批准先在“定远”号和“镇远”号上各配6门——但后来一门也没有配备。

事实上，从1888年到1894年的6年间，北洋舰队再未添置一舰一炮。



北洋舰队由邓世昌统率的“致远”号是整支舰队里航速最快的，但最高设计航速也只有18.5节，且是1887年完工。即便如此，在甲午海战爆发前，“致远”号也是北洋水师中最新的一艘军舰了

而“长崎事件”带给日本的影响，却恰恰相反。

外国水兵到本国国土上“撒野”，最后反而本国赔款要远多于对方，这被日本朝野上下视为“奇耻大辱”。那为什么要被迫接受这种“耻辱”？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的看法是：“日本当时没有一支敌得住北洋舰队的舰队，被它的威力压倒了。”

与慈禧太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长崎事件”结束一个月之后，日本明治天皇从宫廷费用中拨出30万元，带头表态支持日本海军建设。首相伊藤博文借此机会，在日本达官贵人的社交场所鹿鸣馆发表演说，呼吁大家为日本海军建设捐款，半年就获得献金203万元。

日本政府不顾国家财政困难，开始逐年增加海军经费，同时开始发行海军公债。受“长崎事件”刺激，日本民众竞相购买，公债仅1886年一年就发行1700万元，超过预期目标4倍。当时日本民间孩子们玩军事游戏，喊的口号都是“击沉定远”，“摧毁镇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海军以“超越北洋舰队”为目标，开始迅速崛起。



在甲午海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日本“吉野”号，1893年9月刚刚完工，排水量为4150吨，最高航速高达23节。所以当时最高航速只有18.5节（还不算折损）的“致远”号想要“撞沉吉野”，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888年到1894年，在北洋舰队“不购一舰一炮”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共添置12艘最新式的军舰，其中“松岛”“桥立”“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自造铁甲舰，完全以击沉“定远”和“镇远”两艘军舰为目标，虽然吨位不及对手，但主炮口径已经超越。此外，日本趁着世界海军技术大发展，大量购置了中小口径的速射炮，数量达到了北洋舰队配备的7倍之多。

截至1894年，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总吨位已经达到了37222吨，大大超过了北洋舰队主力舰总吨位的27470吨（整个舰队的总吨位也已超越）。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大东沟一战，北洋舰队虽重创日本海军五舰，但被击沉五舰，损失惨重。

北洋舰队退守刘公岛后，四面楚歌。

提督丁汝昌最终服毒自杀。

7

当年访日的四艘北洋舰队军舰，命运如下：

“威远”号炮舰，在刘公岛被日军击沉。

“济远”号巡洋舰，在刘公岛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海军，参加了日俄战争，于1904年触礁沉没。

“定远”号旗舰，被日军鱼雷艇偷袭后搁浅，弹尽粮绝，自炸沉没，管带刘步蟾随后自杀殉国。

“镇远”号在入刘公岛时触礁，管带林泰曾引咎自杀。该舰后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海军服役，同样参加了日俄战争，1911年被用作海上靶船，1912年出售解体。

自“长崎事件”至中日甲午战争，只有8年。



被日军俘虏、挂上日本国旗的“镇远”号

馒头说

伍廷芳作为中方代表，其实参与过两次重要的对日谈判。

一次，就是关于“长崎事件”的谈判。

另一次，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关于《马关条约》的谈判。

前一次，伍廷芳从容不迫，进退有度，可以充分利用他崇尚的“法治精神”，一步步将日本人逼到尴尬境地。

而后一次，伍廷芳却如坐针毡，备感无力，对方所有的要求只能全盘接受，他自己也感叹如砧板之肉，任人宰割。

法还是那个法，理还是那个理，为何区别如此之大？

很简单：在这短短的8年时间里，法未变，理未变，但背后的国家实力，已经逆转。

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怎么可能得到？

如今，随着“定远”号位置的确认，相关的打捞工作也会逐步提上日程。

一艘沉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打上“耻辱”烙印的沉船，为什么还需要去发现、定位，甚至考虑去打捞？

因为，那段历史不管你是否承认，它就牢牢钉在那里，无法回避，无法忘记。

发现“定远”号，记住“定远”号，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

是为了让历史不要重演。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张兆敏，《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2.《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张礼恒，《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3.《福泽谕吉与中日长崎事件》［董顺擘，《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4.《1886年长崎事件述论》［刘景瑜，《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5.《中日长崎事件及其交涉》（李忠兴，《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3期）

6.《甲午前夜的中日“海战”：炫“富”赛军备》（戴旭，人民网，2014年10月8日）

7.《北洋舰队两次访日：激起日本海军极速发展》（网易新闻，2009年12月28日）

《排华法案》：一部应让美国人至今羞愧的法案

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出台过无数法案。但其中有这么一个，至今都令美国感到羞愧，以至现在不少美国人还根本不敢相信：什么？我们国家曾经出台过这么一个法案？

1

这个故事，要先从“金子”说起。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兴起的“西进运动”，在进行到19世纪40年代末时被点燃了一个兴奋点——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大量金矿。

一时间，不光是美国人，全世界对黄金有着执着欲望的冒险者们开始纷纷聚集到了美国的西部，有法国人，有英国人，或单枪匹马，或三五成群，在踏上加州那块土地后，立刻加入浩浩荡荡的淘金大潮之中。

在那前后数以十万计的淘金者中，也开始出现了华人的身影。

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市附近的萨克拉门托河流域，是最先发现金矿的地方。大量的华人涌入后，区别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新金山”，这里被人称为“旧金山”，这个称号延续至今，也称“三藩市”。

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一个人口生育的高峰，到了1830年（道光年间），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4亿。而同一时期内，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直接导致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后，中国的贫困人口直线上升，对外劳务输出成了一个解决多余人口的渠道。

1849年，在旧金山登记在案的华人数量只有54人，到了1850年，就变成了4000人左右，到了1852年，直接飙升到了2万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的广东沿海地区。尽管当时清政府并不准许国民出海，但这个规定的效力在沿海地区已经大大削弱，而那时候去美国也不需要任何护照和签证——上船，过海，下船，登陆，开始干活。

这些去美国西部淘金的华人，一方面自然有追寻“黄金”的发财梦

想，而另一方面，当时国内的“太平天国”也已经开始崛起，战乱四起，去海外谋生、糊口乃至赚钱，当然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随着中国劳工数量在加州逐渐增多，中国的商人也嗅到了商机。他们同样来到了加州，却并不直接从事淘金的工作，而只是为中国人提供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便利。

到了1852年，旧金山已经出现了大约20家华人商店。

在一些地方，华人聚居的“唐人街”雏形已经开始出现。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华人的麻烦也慢慢到来了。

2

初来乍到的华人，一开始是很受欢迎的。

廉价，勤劳，聪明，守序，不惹是生非，能在艰苦乃至苛刻的环境中生存……华工的这些优点让雇用他们的淘金雇主觉得非常划算。1849年，旧金山市市长约翰·吉尔里（John Geary）还特别为华工举办过欢迎仪式。但是，性价比极高的华工却得罪了其他的白人雇工，因为白人雇工失去了和老板讨价还价的本钱——你们去看看那群只拿那么一点钱的中国人，你们还敢提要求？

而从淘金这件事本身来说，独立的华人淘金小团体也开始出现。尽管他们被白人禁止进入金矿丰富的地区，只能去白人遗弃的矿区“捡垃圾”，但凭借良好的技术和勤奋的劳动，华人在废弃的矿区甚至能淘到更多的黄金，这也引起了白人淘金公司的反感和警惕。

到了1852年，由于金矿已经日渐稀少，美国人的淘金公司开始抱团排挤华人，提出“所有的黄金都是我们的”。与此同时，由于水力淘金方式的出现，大批依靠劳力进行最原始淘金的白人个体户也都破产了，但他们并不把原因归结于水力方式的出现或者淘金公司的剥削，却把矛头都集中指向了华人——是这批黄皮肤的人抢走了我们的饭碗。



淘金华工的漫画

一开始，政府层面还试图通过法律来“合理”限制华工——对所有参与淘金的外国人每月征4美元的税。但发现这样依旧无法赶走华人后，各种针对华工的民间暴乱开始被纵容：殴打，抢劫，甚至将华工赶出他们自己的营地。

在这一年，47岁的美国律师约翰·比格勒当选了加州州长。作为一个反感华人进入加州的州长，他对公众做出了这样的描述：“有500个中国劳工刚刚到达我们的港口，还有1000个人在来的船上，此外，还有2万个人在他们国家的港口排队上船。”

比格勒试图营造出这样一种危机感：中国人正在源源不断地向美国涌来，他们将抢走美国人的饭碗，拉低美国人的素质，甚至将来取代美国人的主人翁地位。

比格勒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担忧很快得到了很多白人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试图在加州立法，从法理上排斥华人进入。

但是，比格勒的努力在美国联邦层面被驳回——移民政策属于国家事务，一个州没有资格制定。

但是，华工的危机并没有因此解除。

19世纪50年代末，更大的危机袭来——金矿基本上都空了。大量的白人工人面临下岗，按照习惯性思维，他们很快就会将怒火发泄到华工身上。

一件大事的发生，再度延缓了这场危机。

3

1861年4月12日，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在这场至少从媒体宣传上是围绕“废奴”引发的战争中，“歧视华人”和“歧视黑人”其实同处一个逻辑，所以华人的境遇略有好转。但更重要的是，为战争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肯总统，于1862年签署了一个对美国影响重大的法案——《太平洋铁路法案》。

按照这个法案，美国将修筑一条东西横贯全国、长达3000公里的州际铁路，将纽约到旧金山的旅程从惊人的6个月缩短到短短7天。

由于铁路的修建需要大量的劳力，从衰落的淘金行业中解脱出来的华工被大量招募进来。不仅如此，由于华工聪明、勤奋、仔细、自我约束力强，在铁路修建中的优势远胜其他白人劳工，大量的华工缺口开始出现。

在这个背景下，1862年，作为林肯的亲密战友，美国人安森·伯林盖姆（Anson Burlingame）以美国第一任驻中国公使的身份访问中国，除了表达美国与中国平等交往的意愿外，还和清政府签订了著名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由于伯林盖姆更为中国人熟知的中文名字是“蒲安臣”，所以这个条约又被称为《蒲安臣条约》。



蒲安臣，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堪称实施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过代表清政府访美的中国使节

《蒲安臣条约》堪称孱弱的清朝政府在1840年被强行轰开国门后，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其中的规定包括：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可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管理……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国民可以自由流动，美国对中国的劳工敞开了大门。

统计数据显示，从1860年到1870年，大概有3万名中国劳工来到美国，他们中至少有一半投入到了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中。到了太平洋铁路工程的后期，华工比例至少占到80%。



太平洋铁路的内华达山脉段，是最危险和最难造的路段。著名的唐纳隘口以及附近的花岗岩绝壁合恩角（今加州科尔法克斯附近）一带，几乎平均每铺设一条枕木，都会有一名华工牺牲。单是在合恩角，华工的营地就前后至少三次被雪崩冲毁，至少有300名华工长眠于这座冰冷而坚硬的花岗岩悬崖下。1970年，从内华达沙漠中挖出的当年华工的尸骨，重量接近1吨。据当地人说，现在去合恩角附近登山和攀岩的驴友们，还能偶尔发现当年华工留下的遗物



修建铁路的华工。华工承受着更多的工作量，担任更危险的工作，却拿更少的薪水。当时一名白人劳工能拿到35美元的月薪，包食宿；但华工却只能拿26美元，还不包食宿

但是，即便华工在整个太平洋铁路修建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得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美国白人工人的敌视乃至怨恨。

早在1862年2月6日，美国西部的报纸《工人倡导报》（*The Workingman’s Advocate*）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倡导”：

“我们警告工人，一个危险的敌人在西部扎根。我们的太平洋同胞已经遇到，在太平洋铁路建成后，这些中国人开始成群飞离洛基山脉，像吞噬一切的蝗虫，散布到全国各地。日薪只要1美元的人，在我们国家是个危险因素，敌人来袭时，我们不能入睡。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对付他，以我们共同国家工人的名义。我们要求我们的政府，禁止再有中国人入境。”

事实上，太平洋铁路修筑完成后，华工确实开始向美国四处散布，但大多数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急迫意愿——各地的美国资本家都抢着要“价廉物美”的华工。



在太平洋铁路的通车典礼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华工没有一人被邀请到场

由于黑奴制度被废除，大批美国资本家失去了廉价劳动力，而他们随即惊喜地发现，华工不仅同样廉价，而且拥有更强的技能和组织性。一时间，南方的各大棉田、各个制鞋厂、雪茄厂，都大量招募华工，有的资本家甚至一次性就招募100名华工，用以对抗白人工会的罢工行为。

这确实再一次激化了白人工人和华工之间的矛盾——而资本家乐见矛盾转移——白人工人认为华工是工贼，破坏罢工，成为资本家走狗。而当时华工的淳朴愿望，只是谁也不得罪，努力工作，多赚点钱回家光宗耀祖。

情况开始进一步恶化。

4

1871年10月24日晚，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洛杉矶唐人街。

数百名愤怒的美国白人和墨西哥人冲进唐人街，声称两名华人在枪战中击毙了一名白人。随后，大规模的“报复”展开：很多华人从家里被拖出来殴打，甚至被施以“私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觉得找到发泄渠道的白人之后将唐人街的房子付之一炬。在这场骚乱中，18名华人被杀。

尽管第二天的《加利福尼亚日报》称这种发生在大城市的丑恶行为是“我们城市的耻辱”，但由于从1870年开始，美国的经济开始陷入萧条，越来越多下岗失业的白人工人开始将怒火发泄到华人身上，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1870年到1880年，全美有大约2800名华人被杀害，但因此被逮捕判罪的白人凶手只有25人。

那么，美国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层面是怎样面对这个局面的呢？

以自认“华人问题最严重”的加州为例，州政府出台了一项规定：不准有人挑着扁担在人行道行走。这条规定显然就是针对华人的——他们都习惯用扁担挑货物。

187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佩吉法案》（Page Act）。这个法案巧妙规避了《蒲安臣条约》，提出禁止中国妓女来美国——他们认为中国妓女将自身可以免疫的梅毒带到了美国，造成没有免疫力的白种人人口大量减少。怎么禁止呢？就是所有从中国来的女性，入关时都要接受严格的盘问：以前有没有当过妓女？现在是不是妓女？将来有没有可能当妓女？

如果说现在和过去还有办法证明的话，那这个“将来”如何证明？大量中国女性无法接受进关时近乎羞辱的提问，最终放弃进入美国。而这

个法案的背后还有句潜台词：你们中国女性来美国，就是来做妓女的。

当然，《佩吉法案》的公布并非针对所谓的“中国妓女”，针对的就是中国女性：因为当时华人在美国的形象已经被刻意丑化——麻木、吃老鼠、不死（因为华人讲究叶落归根，死后棺木都运回故土，在美国不举办葬礼），降低进入美国的华人女性人数，就会让华人在美国无法繁衍后代，最终消亡。

1876年7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成立一个联合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美国西海岸的移民情况。结果综合100多名所谓“美国上流阶层”证人的证词递交上来的报告，“种族歧视”的味道扑面而来：“每有一个中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



侮辱华人的漫画

“中国人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他们比上帝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中国人脑容量太小，是无法建立文明的自由政体的劣等民族。”

到了1879年，另一个让人觉得脑洞大开的“15名旅客提案”被提了出来：任何开往美国的船只，里面不能有超过15名具备中国背景的旅客，否则，船必须掉头离开美国，船长也要被罚款。

在美国国会针对这个提案进行辩论的时候，缅因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给出了一个让人费解却能代表很多人想法的逻辑：“中国人在宗教信仰、饮食、穿着等各方面无法被美国同化，他们来美国后肯定会形成

一个独立且固定的下层阶级，这样就不可能完全享受‘美国梦’的成果，进而会充满怨恨，造成阶级冲突，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必须坚决拒绝他们来到美国。”

这个“15名旅客提案”最终在美国总统海斯那里被拒绝签字，理由是与《蒲安臣条约》冲突，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海斯总统考虑到了对华贸易关系。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蒲安臣条约》成了美国阻止“排华”的最后一道脆弱防线。但是，这道防线在不久之后也崩溃了。

海斯总统在否决“15名旅客提案”后不久，就派人去中国要求修改《蒲安臣条约》，尽管清政府一开始极力反对，但在美国的坚持下，《蒲安臣条约》的相关条款就变成了：美国拥有限制或禁止华工入境的权利。

这道闸门一开，就再也收不住了。

1882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在20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的提案。在这份提案的背后，其实也有美国政治博弈的鲜明烙印：很多南方州根本不存在“华工问题”，甚至州内都没有中国人，但这些州的议员还是投了赞成票，因为这看上去能迎合西部州的利益，而通过这样的“交换”，西部州的议员们可能会在南方州针对黑人问题的提案中“帮一个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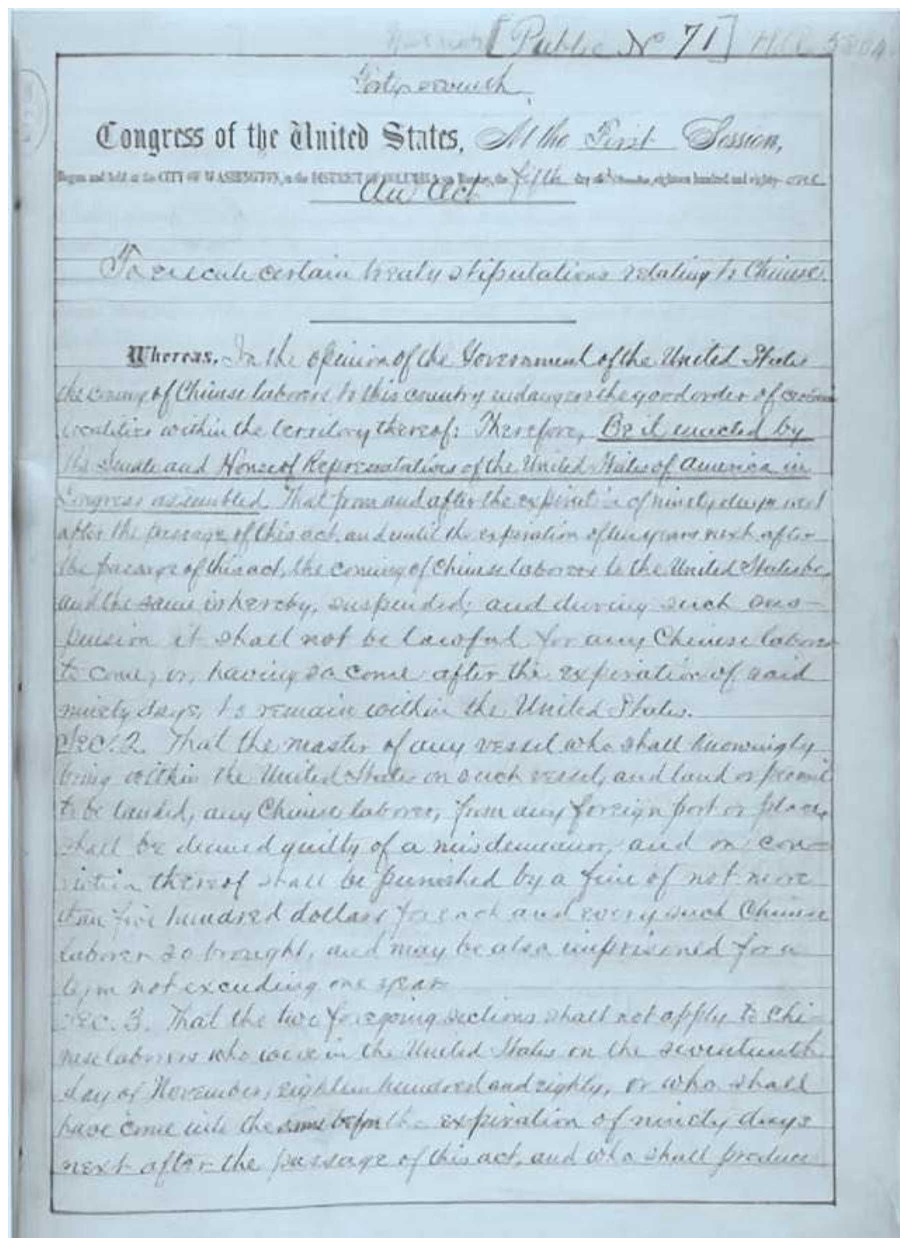
这份提案最终交到了时任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的办公桌上，阿瑟总统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把“20年”减为“10年”，随后签字。

1882年5月6日，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排斥整整一个族群的《排华法案》正式出台：10年之内，华工不能来美国，已经在美国的不能获得公民身份，不能结婚和拥有家庭。

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

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汉尼巴尔·哈姆林（林肯的首任副总统）认为《排华法案》完全违反美国“所有人生来自由平等”的宪法精神，他对自己投下反对票感到自豪：

“我的投票将成为遗产留给子孙，他们将会把这看成是我一生最辉煌的举动。”



[Public No 71]

Forty-seventh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First Session,

Begun and held at the CITY OF WASHINGTON,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n Monday, the fifth day of … eighteen hundred and eighty-one

An Act

To execute certain treaty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Chinese.

Whereas, In the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ming of Chinese laborers to this country endangers the good order of certain localities within the territory thereof: Therefore, Be it enacted by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Congress assembled, That from and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ninety days next after the passage of this act, and until the expiration of ten years next after the passage of this act, the coming of Chinese labor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be, and the same is hereby, suspended; and during such suspension it shall not be lawful for any Chinese laborer to come, or, having so come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said ninety days, to remai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Sec. 2. That the master of any vessel who shall knowingly bring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n such vessel, and land or permit to be landed, any Chinese laborer, from any foreign port or place,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misdemeanor,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a fine of not more than five hundred dollars for each and every such Chinese laborer so brought, and may be also imprisoned for a term not exceeding one year.

Sec. 3. That the two foregoing sections shall not apply to Chinese laborers who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seventeenth day of November, eighteen hundred and eighty, or who shall have come into the same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ninety days next after the passage of this act, and who shall produce

美国的《排华法案》

5

《排华法案》出台，美国的华人并非没有反抗。

但出于天性和文化传统，华人的反抗并没有选择暴力的形式，而是完全遵循了美国的方式：在报纸上发文章呼吁，通过法院诉讼，甚至写信给总统。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

从1882年到1905年，在美国的华人向美国各级联邦法院起诉的案件达到1万多起，其中有20起打到最高法院。当时在美国的华人总人口只有11万左右，诉讼率已经占到了10%。但是，法院的判决几乎没有支持过华人，而华人也只能选择去法院而无法动用更厉害的武器——他们不是公民，没有投票权，没有政客会真正重视他们。

而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华人在美国的境况越来越糟糕。

起初，《排华法案》只针对中国劳工，不包括中国商人和留学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商人”和“留学生”的定义越来越苛刻，而对“劳工”的定义越来越宽泛。

对于居住在美国的华人而言，他们的生活范围被慢慢限制在了唐人街，只要不住在唐人街，就会受到白人的攻击。事实上，在美国各地都出现了攻击华人、抢夺华人固定资产的恶性事件。1850年到1900年间美国暴力排华事件的惨案发生地，无一例外都是在美西地区。

1895年9月2日，美国怀俄明州甘霖县石泉城公然发生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当地的白人矿工在暴乱中杀死18名华人矿工，并导致另外15名华工受伤。这件事因为清政府的强烈抗议，最终有16名白人被逮捕，但都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他们回来后受到当地数百名白人居民英雄般的欢迎。美国政府赔偿清政府14.9万美元，但规定只能用作留学生基金。

1887年，7名白人盗马贼在地狱峡谷的蛇河靠近俄勒冈州一侧，伏击和枪杀了34名华人淘金工人，并将残尸抛入河中，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蛇河大屠杀”。

与公然的暴力迫害相比，一条条针对华人的法案“软刀子割肉”，更让美国华人感到不平。

1886年，旧金山颁布了一条规定：不准在木屋里开洗衣店，已经开业的，需要取得执照才能继续经营。当时木屋洗衣店大部分都是华人开

的。规定一出，立刻有280家洗衣店提出申请执照，结果有80家获得了批准，全部是白人洗衣店，而200家洗衣店的申请被拒绝——毫无悬念，全是华人的。



19世纪旧金山的华人洗衣店

1892年，国会的《吉里法案》（Geary Act）又提出：在美国的华人，必须随身携带带有照片的身份卡——这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且只针对华人。这一次，华人群起抗争，华人社区到处都张贴海报，呼吁华人不要去领这张卡，有评论说："需要照片鉴定身份的是罪犯，需要佩戴标签的是狗。"结果有超过10万华人拒绝领取身份卡，并向法院起诉——最终还是败诉。

1894年，一位在美国本土出生，叫黄金德的华人返回中国后回到美国，被海关拒绝入境，理由是他的父母是华人，所以他不算美国人。这个案件在当时引起轰动，最终最高法院判定必须让黄金德入境——因为这是《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出生在美国，就是美国人。

当然，也并非没有华人乃至其他白人总结过《排华法案》出台背后的另一些原因：第一，相当一部分华人的卫生习惯（比如随地吐痰）和文明程度确实被人诟病，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第二，华人有自己传承千年的宗教信仰、饮食文化、道德标准，确实很难被同化；第三，华人不追求享乐，不讲究休假，勤俭节约不消费，这与西方价值观确实有出入；第四，华人从事的主要是采矿、修路、卖菜、洗衣、餐饮等低技术

门槛工种，在美国产业结构已经完善升级的背景下，这些工种变得可有可无，所以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WHERE there ain't no ten commandments and a man can raise a thirst, there's an ancient science extant that looks like the very first. We think we're the only ones who know smelting and hydraulics and ceramics and printing and electricity. But old John Chinaman had a civilized working knowledge of them all so long ago that our ancestors appear to have been dumbells at the time. They were living in total ignorance of a civilization so advanced and so fundamental that even to this day John Chinaman is ahead of us in the application of many things mechanical he has known since Noah built the ark.

Here's the parade of a few, taken in order:

Why Holes in Chinese Rudders?

Chinese junks have holes in their rudders to make them steer better. Just a hundred years ago we learned that water pressure in front of a hole through which water was flowing was greater than would be pressure on an equivalent non-open area. Chinese rudders, full of hol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re more effective per foot of area than ours. In the air this phenomenon of fluid flow has only recently been taken advantage of through the use of the slotted wing for aircraft.

Lee boards and centerboards are distinctly Chinese in origin. This fact is checked against history—as a matter of fact all the observations here are a result of research and have been checked against any possible tendency to ascribe the origin of any or everything to Old Johnnie Chinaman.

The waterwheel, or Noria, was used in 1500 B. C. for raising water from one level to another, and as far as can be determined was the earliest form of machine to make water lift itself.

The Discovery of the Piston

The piston was a Chinese method of blowing air. James Watt made use of it in the first steam engine, reversing, as he put it at the time, "the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air pump."

The Chinese determined equinoxes and solstices as early as 2300 B. C.; they recorded the first eclipse in 2136 B. C. and modern astronomers with their mathematics and years of observation have been able to show that an eclipse really did occur then. History has thus been able to check itself through the rhythmic movements of the sun and moon.

Printing from clay blocks and wooden tablets was used as early as 50 B. C. This antedates the European invention of Guten-

These pictures tell their own story. All of these devices, so important to our present civilization, were discovered by the Chinese thousands of years ago.

84 Modern Mechanix and

19世纪一家美国报纸介绍中国人的科技，大字标题为《中国佬约翰》，文中惊呼“中国佬怎么会如此聪明呢？这简直不可思议”。“中国佬约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代言：聪明，狡诈，甚至邪恶

但无论如何，没有一条可以为《排华法案》的出台提供哪怕一点点支撑。

而这个原本定期“10年”的《排华法案》，后来不断延长，直到另一场战争爆发。

6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美国自己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泥潭的时候，终于开始清醒认识到中国盟友的重要性。在开始大力援华的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意识到中美作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彼此之间隔着一个伤害感情的法案。

那就是已经延续了60多年的《排华法案》。

美国人意识到，这个法案不仅仅伤害了自己盟友的感情，更让日本人有了一个很好的宣传抓手：我们的目的是赶走西方侵略者，他们会真心帮助你们吗？看看，《排华法案》就是最好的答案！放弃幻想吧！加入我们的“大东亚共荣圈”！



当时日本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画。他们强调，既然西方人看不起亚洲人，奴役和剥削亚洲人，那我们自己就建立起“亚洲人的亚洲”。美国的《排华法案》恰恰为日本的歪曲宣传提供了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一度固若金汤的《排华法案》根基开始动摇。1943年12月17日，在罗斯福的推动下，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麦诺森法案》（Magnuson Act），这条法案又被称为《排华法案废除案》。

这条法案规定，原本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可以获得公民资格，不会再被驱逐出境，而且，每年允许105名中国人移民美国——尽管这个数字非常小，但至少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不过，即便是美国人，心里也清楚，废除《排华法案》的最大动力并非道德上的愧疚或人性上的纠错，而是在战争年代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

这也造成了《排华法案》虽然被废止，但很多细节条款却在原来巨大的惯性下依旧没有刹车，比如加州直到1948年才废除“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的禁令。

但是，一项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法令出台后，只要废除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吗？

7

2011年5月26日，美国国会华裔女议员赵美心等向国会参众两院提交议案：希望国会对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等一系列迫害华人的法律正式道歉。

在诸多华人的支持和推动下，2012年6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表决通过，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道歉”。

然而，这个“道歉”之所以要打一个引号，是因为当时用的单词是“regret”（遗憾），而不是“apology”（道歉），这两个单词的语义差别其实很大。

这个“道歉”，在国会众议院通过时用的是“无记名口头表决”，而不是“书面表决”。按照赵美心的说法，用“遗憾”字眼和采取“无记名口头表决”，都是为了使两党一致通过而做出的妥协。

还有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道歉”之后的几天，中国媒体纷纷做了大量报道，而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都没有做出“新闻性报道”。

可以进行比较的参照是：

1988年，美国政府就二战时将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进行道歉，并对每人赔偿2万美元；

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武力支持推翻夏威夷王国正式道歉；

2006年，美国政府对曾经的黑奴制向非裔美国人再次正式道歉；

2010年，美国政府再次向对印第安人的不公平待遇正式道歉。

表示“遗憾”确实是一种认错的态度，是一种进步，但对于诸多华人而言，他们还在等待。



2012年6月22日，华人在“地狱峡谷”当年华工遇害之地设立的纪念碑

馒头说

毫无疑问，《排华法案》是一项明显含有“种族歧视”倾向的法案。

不过，“种族歧视”的背后，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

比如，如果拿我们的邻居日本来比较，就颇有些让人感慨。

从人种上说，日本人和我们并无二致；从文化习惯上说，大家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从内向保守上说，日本人甚至比我们更难被同化。

然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国人并没有对日本人有过任何特别刁难，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在1906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像对待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那样公正对待日本人”，还关照国会要为希望入籍的日本人提供便利。相对于华人人数的不断减少，从1900年到1930年，在美国的日本人数量一直在快速上涨，30年里涨了5倍。

是日本人比我们更勤奋、更守规矩？不见得。是日本人比我们更团

结？可能有，但未必是主要因素。是日本的驻美官员更会为本国国民争取权利？也不能概而论之：当时清朝的第三任驻美公使张荫桓就为华工权益做出过不少努力，第六任驻美公使伍廷芳更可谓费尽心血。

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也不难看出：因为双方背后站着的祖国，国力不同。

“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当时在国力上确实已经做到了“脱亚入欧”，可以在世界舞台上与列强一争短长。这也让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敢在巴黎和会上抗议：“不取消种族歧视，日本就退出国联！”也能让1924年美国限制全部亚裔移民的政策出台后，日本全国联合抵制美货，并要求对美“宣战”（中国在1905年也有过类似的“抵制美货”行动，但清政府怕触怒美国而镇压下来）。

时至今日，中美关系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两个国家——尤其是中国——也已绝非当年可比。但一部《排华法案》不应被历史忘记，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出台有值得美国人反思和羞愧的地方，对我们中国人而言，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无论是移民、定居，还是旅游、求学、贸易往来，要在异国他乡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接纳，一方面需要自己在自立自强的同时，更开放、更积极地融入对方的文化氛围，遵守对方的法律法规，而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自己身后那个祖国的发展与实力。

哪怕你已远在异乡，哪怕你已更换国籍，但你远方的那个祖国，你先辈的那个故乡，她的强盛与否，总是和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为，血脉相连，荣辱相关。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纪录片《排华法案》（美国公共电视台制作，2017年3月19日在美国上映）

2.《美国〈排华法案〉的兴废与中美外交关系》（黄智虎，《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13年第3期）

3.《宗教信仰冲突与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周龙，2015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2015年12月30日）

4.《中美浮梦录丨1882年〈排华法案〉之前世今生》（王元崇，澎湃新闻，2019年4月3日）

5.《美国国会的第六次道歉——因〈排华法案〉曾给在美华人造成巨大伤害》（叶雨，《看世界》，2011年第21期）

6.《路上的美国史丨太平洋铁路：华工用汗水和鲜血浇灌的奇迹》（叶山，澎湃新闻，2018年10月13日）

7.《排华法案：美国唯一写入法律的种族歧视条款》（凤凰网，2017年4月29日）

8.《一部纪录片回顾美国〈排华法案〉，导演希望它是一面镜子》（盛海涛，“好奇心日报”网站，2018年6月3日）

9.《美国排华法案道歉案的始末与思考》（刘文正，《侨务工作研究》，2012年第4期）

10.《美国〈排华法案〉道歉案：合上“排华”那一页》（中国新闻网，2012年7月16日）

麦卡锡主义：一个从未远去的幽灵

麦卡锡主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词。曾经我们以为，这已是个历史名词，但现在看来，它的阴影似乎从未散去。

1

当时间进入1950年的时候，一种隐隐的担忧笼罩了美国。

按道理，美国人是不应该有这种担忧的——在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了这个星球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这个国家拥有可能自人类有确切统计能力以来，最强大的数据：

GDP（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6%，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40%，黄金储备占全世界的75%，每年生产全世界64%的钢铁和70%的石油。

但美国人依然觉得很不踏实，这种不踏实如果具体来说，就是“红色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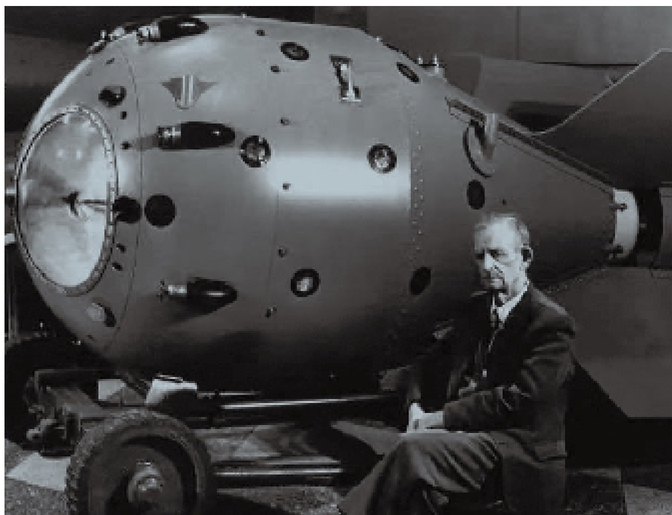
美国的“恐红”，最早能追溯到1917年。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让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随后越来越多的工会组织和各国共产党相继成立，这让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适。



二战后美国的一处飞机“坟场”——大量生产出来的飞机和坦克还没投入战争，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不过，如果说第一次的“红色恐慌”更多是源于对一种有悖于自己标准的新生事物的不满，以及希望能扼杀它于萌芽状态的焦虑，那么在1946年“冷战”铁幕落下后的第二次“红色恐慌”，似乎就更“实打实”了：

二战虽然打出了一个第一强国美国，但也打出了一个第二强国苏联，尤其在军事力量方面，苏联并不怵美国。而到了1949年，更是发生了两件大事：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丢掉了中国，以及苏联成功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南瓜”于1949年8月29日试爆成功，比美国人预计的研发时间大大缩短

这两件事对美国的打击不可谓不大。如果说第一件事多少也有美国自己的选择因素在内的话（放弃支持蒋介石），那么第二件事就让美国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了：苏联人究竟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

美国人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1945年，苏联驻加拿大的情报人员伊戈尔·古曾科叛逃，同年，另一位苏联的女情报人员伊丽莎白·柏特丽向联邦调查局自首，两人均供出苏联在美国已经搭建了情报网。

尽管美国人自己也在苏联乃至全世界布置了庞大的谍报网，但他们对自己国家居然也被“渗透”还是感到大吃一惊——尤其是他们得知其中有一些人还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心甘情愿甚至不取报酬地为苏联工作。



克劳斯·福克斯，德国科学家，英国国籍，参与过“曼哈顿计划”，被查出为苏联人提供美国原子弹的情报。罗森堡夫妇也曾因同样的理由被捕，并在1952年被执行死刑（罗森堡夫妇的故事参看《历史的温度2》收录的《直到坐上电椅，这对夫妇依旧表示自己清白……》）

随着在国际上与苏联抗衡的加剧，美国人觉得有必要开始在自己国家内部搞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1947年3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即著名的“忠诚调查令”：凡参加或同情所谓“颠覆组织”的都将作为对国家“不忠诚”的主要根据，作为政府部门职员，可以立即被解雇。

但问题是，如果说“参加”作为一种行为尚有证据界定的话，那么“同情”如何界定？

在这项法令颁布后，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接受了调查，范围囊括国家机关、学校、科研机构乃至军队、私人企业等的人员，并出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

三岁的女孩也需要签署“忠诚宣誓书”；老师和教授如果不在课堂上抨击苏联和共产主义就有被解雇的危险；参加“美国小姐”角逐的候选人必须要谈一下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连著名的棒球队辛辛那提红人队也被要求改名，因为他们的队名中有“红色”……

1950年前后，美国已经陷入了一种尴尬而又矛盾的氛围当中：

一方面，这种捕风捉影的调查方式似乎有升级的趋势，让越来越多

的美国民众感到愤怒和恐慌；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红色恐惧”依旧在不断升温，却缺乏相应的解决手段，这也让他们感到越来越恐惧。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一个人站到了舞台正中央。

这个人，就是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

2

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1908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

家中排行第五的麦卡锡曾因为要给家里农场帮忙而辍学过一段时间，但还是在20岁的时候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马凯特大学。在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后，麦卡锡竞选成为地方检察官，并在1939年成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

麦卡锡在那次竞选过程中展现出了一些特别“天赋”，比如他的竞选对手是66岁的维尔纳，麦卡锡在竞选过程中一直宣称对方是73岁，“老而不堪用”，成功让对方失去了不少选民的选票。

麦卡锡在法官任期中，亮点并不多。但时间很快到了1942年，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麦卡锡作为法官原本是可以不用上战场的，但他志愿报名参加了海军陆战队，而且原本可以担任轰炸机中队情报官的他，又主动报名成了一名轰炸机尾部的机枪手，直接上了前线。



身着军装的麦卡锡

麦卡锡的这一选择确实展现了自己的勇气和对祖国的热爱。但之后的一些行为却又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有记录的飞行作战任务是12次，但他自称接受过32次作战任务，并受到过当时海军上将尼米兹亲笔签署的嘉奖信——随后被曝出那封信是他自己写的。他还表示自己曾经在战斗中负伤，但很快被证实那是他在开派对时自己弄伤的。

1945年，服役两年半的麦卡锡退役，回到了巡回法官的岗位，但他显然有更高的追求：在1946年参选威斯康星州参议员。

在这场竞选中，麦卡锡的竞选对手是老牌政客、曾经担任过三届参议员的拉福利特。麦卡锡火力全开，从各个角度对拉福利特展开进攻：称对方缩在后方不去前线参军（而这正是他自己的优势），但拉福利特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已经46岁了，确实可以不用去服兵役；称对方在战争期间缩在后方利用投资赚得了47000美元，但其实麦卡锡自己在参军期间也在炒股，并获利42000美元。

经过激烈的搏杀，麦卡锡最终以5000票的微弱优势竞选成功，成为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

但麦卡锡头三年的参议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尽管他口才出众，经常参加各种鸡尾酒会进行社交，但给人留下的影响是严重酗酒、脾气暴躁。一件标志性的事是，他在1950年4月参加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的生日宴时，居然醉酒后在厕所里暴打这位专栏作家，并在事后醉酒驾车扬长而去。

美国参议院当时的一份调查曾显示，很多人认为麦卡锡是现任最差的一个参议员。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麦卡锡曾尝试为一批屠杀美国战俘的德国党卫队成员减刑，称他们是被屈打成招的，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这一切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眼看将一直默默无闻下去的麦卡锡，突然间爆发了。

这位曾经宣称“国会需要一名机尾火炮手”的参议员，在2月的西弗吉尼亚惠灵共和党妇女团体集会上做了一个演讲，开出了石破天惊的一炮：“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205个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在美国的政府核心部门，居然有200多个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士，这在美国民众看来岂不骇人听闻？

尽管几天后在盐湖城的演讲中，麦卡锡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把“205”这个数字缩减到了“57”，但依旧一石激起千层浪。

麦卡锡瞬间就出名了。

3

麦卡锡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就在麦卡锡发表“美国政府里存在大量共产党间谍”的演讲之后没多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战争初期通过“仁川登陆”获得奇胜之后，很快就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参战而陷入泥潭，甚至在多个战场被迫大范围撤退——这恰恰为麦卡锡这名曾经的“尾炮手”提供了大量的“炮弹”。

首先，麦卡锡称杜鲁门政府出兵朝鲜是“不想在国内与共产主义斗争”，至于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连吃败仗，是因为政府中有不少人“暗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

作为共和党人，麦卡锡直接给民主党的20年执政打了一个标

签："叛国的20年"。

麦卡锡的火力之猛，胆子之大，让人惊叹——他一上来不仅攻击国务卿艾奇逊"保护共产党人"，还敢把矛头对向当时在美国和欧洲都声望正隆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按照麦卡锡的说法，马歇尔将军一直是"居心叵测"的"美国叛徒"，因为：他在二战中曾极力反对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结果让苏联红军先打进了东欧；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欺骗罗斯福，让苏联在领土方面获利；等等。当然，麦卡锡其实也没放过罗斯福，称他"把中国和波兰出卖给了共产党俄国"。

尤其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麦卡锡对马歇尔更是火力全开：他谴责马歇尔作为当初美国派去调停国共两党冲突的特使，其实一直暗中支持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他还专门让助手一起编印了一本手册广为散发，题目叫《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



乔治·马歇尔曾先后担任过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出台帮助欧洲振兴的"马歇尔计划"而闻名，在195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这种谩骂和攻击下，马歇尔愤然从国防部长的任上辞职，回到弗吉尼亚州的农场养老。

麦卡锡当然也没有放过其他当时和中国打过交道的人。

曾经随美国代表团到中国延安访问考察过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Service），因为曾预言“中共肯定会取得政权”以及建议美国政府和中国接触，被怀疑为共产党间谍，最终被开除出政府部门。

曾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为谢伟思鸣过不平的著名学者费正清，也被指责是“共产党员”，不断被叫去问询，且被剥夺了很多出国访问交流的机会。

曾长期采访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打上了“亲共”标签，连他妻子也受到了牵连，最终只能举家迁居瑞士避难。

著名汉学家、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同样被指责为“共产党间谍”，要为“丢了中国”而负责任，最终在63岁的年纪不堪羞辱离开美国，流亡英国，直到85岁才回来。

而且，这股“批斗”风一旦展开，很快就不能只控制在政府部门了。

4

从1950年到1954年，在麦卡锡团队的推动下，美国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共”运动。

政治运动跳出政治圈，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引以为傲的科技领域。

“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以及总实验室主任奥本海默，因为年轻时曾支持和同情共产主义，身边人中有不少左翼分子，再加上他曾反对氢弹的研发，于是被扣上了一顶“通共”的帽子。在没有任何证据成立的情况下，这位“原子弹之父”被剥夺一切安全特许和权限，被全面禁止与一切美国原子能项目产生接触。（奥本海默的悲剧，请参看后文《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的成功与悲剧》。）

连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也不能幸免。爱因斯坦因为反战以及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一直被怀疑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他不仅仅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是他带头写信请罗斯福研发原子弹的），还被长期监听和监视。1950年，美国移民局一度希望和联邦调查局联手，取消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资格。

这股势头很快又蔓延到了娱乐圈，尤其是好莱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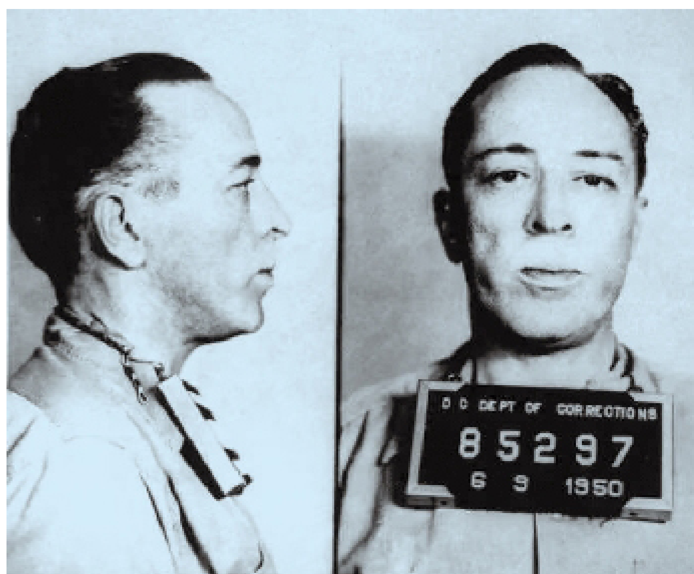
查理·卓别林尽管已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象征，但他在《摩登时代》里对贫穷工人的描绘以及在《大独裁者》中对民族主义的批评，加上《凡杜先生》中对资本主义的讽刺，让他很早就被列入了“黑名单”。对卓别林的打压在麦卡锡时代达到了顶峰，最终迫使他避居瑞士。

当时还有一批好莱坞的编剧、演员和导演因为同情共产主义或和共产主义者有接触而被列入了“黑名单”，他们被不断问询，出席听证会，要求说出认识的共产主义分子。其中有不少人不堪压力吐露名字，但也有一批电影人坚持不吐一字，著名的有“好莱坞十君子”。

达尔顿·特朗勃就是当年“好莱坞十君子”中的一员。他因此被捕入狱两次，没有电影公司敢雇用他，他只能用假名来写剧本投稿，其中有两个剧本都获得了奥斯卡奖：《罗马假日》和《勇敢的人》。

特朗勃曾说过：“这份黑名单总有一天会完蛋，因为它是不正直、不道德、不合法的。”

当然，美国文化界也无法幸免。



特朗勃入狱的照片。2011年，美国编剧工会将《罗马假日》的完整编剧署名权归还给特朗勃

麦卡锡和他的追随者们对国务院设在欧洲的图书馆进行了“摸底排查”，他们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3万种书是共产党人或同情共产党人的作者写的——其中还包括马克·吐温的作品。

美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禁书和焚书事件。在1953年圣安东尼奥市开列出的“应焚毁书目”名单中，不仅包括雕塑、酒类、建筑类图书乃至侦探小说，就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未能幸免。不过也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只需要在这些“嫌疑书籍”的封面内页打上醒目的红色标记就行，并且一定要附上这位“亲共”作者“被传讯的次数”。

在印第安纳州，一位教科书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甚至指出：关于“侠盗罗宾汉”的相关作品也需要被禁止，因为这些作品宣传的是共产党喜欢的“劫富济贫”，“这简直玷污了法律和秩序”。

而那些被鼓励出版甚至流行的书籍则出现了让人担忧的趋势，尤其是一些连环画，大量描绘共产党人“被冰锥刺进眼里”，被绳子吊死，被手枪砸死，被活埋，被喂鲨鱼，被吊在汽车保险杠上拖行而死——“就连斯大林都认不出这摊肉”。

更让很多美国人心寒的是，在这场运动里，很多人们熟悉的相处方式都变了，变得相互猜疑、提防，乃至互相举报。

费正清就曾这样回忆当时美国知识分子的胆战心惊：“在每篇文章的开头用一些词或短语来表明反共的立场，变成了一种保证自身安全的习惯。”

而人与人间的相互“举报”更让人心寒。

曾导演过《欲望号街车》等一系列名作的好莱坞著名导演伊利亚·卡赞，在此期间就曾不遗余力地举报了一批他认为和共产主义者“有染”的电影人。1999年，卡赞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在颁奖典礼上，现场很多电影人都拒绝为他起立和鼓掌，认为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一生无法抹去的污点。

令人意外的是，麦卡锡的调查还针对了当时的同性恋者，他认为同性恋者是“性反常”，也会危及国家安全，所以当时有相当多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同性恋者被迫承认了自己的性取向，随后就被解雇。这场风暴也被称为“薰衣草恐怖”。



“麦卡锡主义”漫画

1950年3月29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幅由漫画家赫布洛克·布洛克（Herbert Block）画的漫画：四位共和党人强推一头大象（象征共和党），试图让它站到一堆叠得颤颤巍巍的桶上，最上面的那个桶上写着“麦卡锡主义”，而大象的台词是：“你的意思是我要站在那个上面？”

这是“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第一次正式出现。

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麦卡锡主义”并不单指麦卡锡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推动的一次运动——这场运动其实在麦卡锡登台之前就有了，在麦卡锡登台后达到了最高潮。

《韦氏英语词典》中对“麦卡锡主义”的解释是：“一种20世纪中期的政治态度，以反对那些被认定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因素为目标，使用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尤其在未对提出的指控进行证实的情况下，四处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断和结论。”

然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麦卡锡本人肯定“居功至伟”。

但问题是，他怎么能做到这些呢？

5

这是一个颇值得讨论的问题。

麦卡锡既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国务卿，只是一名普通的参议员，他哪儿来那么大力量？

最基本的前提，自然是美国原先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氛围，政府也有这样的诉求——在麦卡锡出现之前，“麦卡锡主义”已经开始了，只是表现最活跃且影响力最大的麦卡锡用自己的名字将这种主义“认领”了。

其次，麦卡锡充分利用了美国法律中一个特殊的权利：国会调查权。

国会调查权，一般指国会为了立法或监督政府，通过检查有关记录、传唤证人、召开听证会等手段来查明真相的权利。

“国会调查”并非司法调查，所以反而可以不受司法调查的局限——《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证人在接受司法调查时，“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这项权利保证证人可以不回答司法机关的询问，却无法规避“国会调查”的询问。而这种询问权一旦被滥用，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再次，麦卡锡有很强的“询问”能力，以及对媒体的“蛊惑力”。

麦卡锡在询问时会保持强大的压力，比如会连珠炮式地提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以前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有没有加入过共青团？”“你有没有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你是否同情共产主义运动？”这会让证人陷入惶恐之中。

“偷换概念”也是麦卡锡的拿手好戏。在审理一位纽约女教师时，这位女教师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麦卡锡的理论是，“你如果不是共产党员，说出来肯定对你是有利的，你现在选择不说，说明你肯定是共产党员。”

还有就是麦卡锡对媒体的掌控能力。由于记者接触不到证人，所以麦卡锡说什么，就是什么。一位工程师在作证时因为自己母亲刚刚过世

而流下眼泪，但麦卡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痛哭流涕”。

麦卡锡深知媒体的威力。在一次攻击政治对手的行动中，他让人伪造了这位政治对手和曾经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握手的照片，然后四处散发，最终让那位政治对手失去了4万张选票。

当然，除去这些，麦卡锡能够风光一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的选票政治。

从罗斯福到杜鲁门，当时美国的民主党已经上台执政了17年，长期在野的共和党一直在寻找扳倒民主党的机会。而共和党人麦卡锡的横空出世，让党内大佬们眼前一亮。

麦卡锡指责政府部门中存在大量共产党人，尽管没有证据，但极大程度上使美国民众对民主党政府产生了质疑。麦卡锡的炮开得越多、越猛，对执政的民主党就越不利。

而作为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一开始并没有把麦卡锡毫无根据的话放在眼里。麦卡锡1950年2月在惠灵发表石破天惊的讲话后，曾要求杜鲁门对此做出回应，杜鲁门当时写下一句话准备让秘书答复：“我确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极其遗憾，他们的代表竟是像你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但是，杜鲁门犹豫再三，最终没有回复。因为“反共”在美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能对此表现出一丝犹豫或踌躇。

所以，尽管民主党人明知麦卡锡是共和党推出的一挺威力巨大的马克沁机枪，却也只能配合做出全力“反共”的姿态。他们明知麦卡锡很多时候是在信口开河，不讲证据，却又不敢反应太大，不然万一落了把柄，会真被人认为“包庇共产党人”，这样的罪名也是民主党不敢承受的——无疑会丢失大量选票。

至于共和党方面，当然是乐于让麦卡锡当马前卒的。

在麦卡锡的各种努力下，共和党确实在全国各地收获了不少选票，所以尽管不少共和党人对麦卡锡的做法也有所不满，但表面上依旧做出

非常迎合的姿态，这一点在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竞选美国总统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

被麦卡锡气得提前退休的乔治·马歇尔，其实对艾森豪威尔有知遇之恩，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导师”，所以可想而知，艾森豪威尔对麦卡锡是怎样一个态度。

在去威斯康星州巡游争取选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原本在演讲草稿中坚决捍卫自己的导师马歇尔，抨击了麦卡锡，但竞选团队提醒他，这样做很可能得罪威斯康星州麦卡锡的拥趸，进而流失大量选票——艾森豪威尔最终只能将那些话删去。艾森豪威尔所能做的最明确表态，也只是“我认同麦卡锡的目标，但我不同意他的一些做事方式”。



艾森豪威尔

1952年，艾森豪威尔赢得了总统大选，共和党一战翻身。在这个过程中，麦卡锡利用个人的影响力确实出了很多力，所以在1953年初也得到了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还兼任了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方便他进一步开展范围极广的调查和听证活动。

1953年到1954年初，麦卡锡的个人职业生涯达到了巅峰：1954年1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受调查的美国人中，有50%支持麦卡锡，不赞成他的只有29%，没意见的占21%。

在华盛顿甚至有一种说法：麦卡锡现在是美国的第二号权力人物。

有可能是因为自信心膨胀，也有可能是出于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更有可能是麦卡锡认为自己必须永远保持战斗，所以他开始调转枪口了：在他认为“反共不力”的民主党下台后，他开始攻击共和党“反共不力”了。

但这一次，麦卡锡打错了算盘。

6

1953年，麦卡锡的调查小组对艾森豪威尔的政府机构发起了602次调查和问询。

仅4月到8月，就有1400名公务员被传讯，一年内有8000人被定义为“国家的危险分子”，其中至少有5000人被迫辞职。

对于麦卡锡，艾森豪威尔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处理方式，虽然他对身边的人明确表示过反对麦卡锡，但在公开场合，他从来没有表达过类似声音，这也让媒体和民众产生一种认知：总统也敬畏麦卡锡三分。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卡锡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没有顾忌，不仅开始评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人事安排，甚至还试图干预总统对驻苏联大使的任命人选——这明显超越了他的职能范围。

最终，麦卡锡公开把原先对民主党政府的评价“叛国20年”又加上了一年，称美国的政府“叛国21年”——把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执政的一年也算上了。

不过，与得罪共和党政府相比，真正让麦卡锡碰上大麻烦的，是他试图开始攻击美国陆军部。

事情其实很简单：美国陆军有一位叫欧文·佩雷斯的牙医，1952年入伍，1953年晋升为少校，随后被发现他原来参加过美国劳工党——这在当时被认为几乎等同于参加共产党。他在1954年接受询问时援引《美国

宪法第五修正案》表示沉默，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氛围下，他三天后就被解职了。

照理说，这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但麦卡锡却抓住这件事不放，认为佩雷斯应该上军事法庭，并且质问：“是谁晋升了佩雷斯？”

按照麦卡锡的观点，陆军部没有尽早发现佩雷斯的“共产主义倾向”，反而将他晋升为少校，说明陆军内部已经被共产主义者渗透了。

但事实上，佩雷斯的晋升是根据美国的《医生法（草案）》自动获得的，其中明确规定，这是为了保证军队收入与公民收入相平衡——这部法案通过，麦卡锡自己当初也是投赞成票的。

但麦卡锡不管这些，坚持要美国陆军部拿出一个说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陆军部知道麦卡锡不好纠缠，曾经几次试图和解，但麦卡锡一直不依不饶。最终陆军部也怒了，反过来指责麦卡锡试图通过个人影响力帮助他的一个私人助理晋升为军官——这位叫沙因的年轻人才刚入伍服役不久。

双方开始互相攻击，最终只能通过开听证会解决。

艾森豪威尔总统并没有参与这件事，但得知要举行听证会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这场听证会必须电视直播。

1954年4月22日，麦卡锡团队和美国陆军部的听证会开始了——这场听证会持续了36天，由电视台实况转播，全美大概有2000万观众收看。

根据被传唤的32位证人的证词，没有证据表明麦卡锡因为沙因一事对陆军部施加过压力——虽然他的另一名助理科恩一直因此事给陆军部打电话。但这个结果对麦卡锡而言完全不够，他需要的是在全国观众面前扳倒陆军部。



麦卡锡团队与美国陆军部的听证会

但这场麦卡锡认为应该堪比“奥斯特里茨战役”[1]的听证会，最终却成了他的“滑铁卢”。

在电视屏幕前，很多美国观众第一次不是通过报纸而是通过自己的双眼看到了真实的麦卡锡：

他的话语充满人身攻击，随意打断别人讲话，任意嘲弄证人，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妄下定论，比如“那些引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共产主义分子”，而听证会上麦卡锡出示的一些伪造证据被揭穿，也被大家看在眼里。

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这场听证会的第30天。

那一天，陆军部聘请的律师韦尔奇直接向麦卡锡摊牌：“如果你已掌握证据，认为陆军部有大量共产党人和颠覆分子，请在今天太阳下山之前，把这份名单拿出来。”

麦卡锡避过了这个问题，笑着对韦尔奇说：“我倒是可以给出你身边一个人的名字。他就在你的律师事务所里，他的名字叫费舍尔。”

费舍尔是一个年轻人，在加入韦尔奇的律师事务所之前，曾加入国家律师协会——那被认为是一个左翼律师组织。

韦尔奇明显很愤怒，他在短暂的暂停后，当着全国电视观众和听证会众人的面，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费舍尔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之后曾短暂加入国家律师协会，但很快就退出了。韦尔奇本来也想带他来到听证会做助理，但考虑到他有这段经历就放弃了，不过他专门向麦卡锡团队沟通过这件事，麦卡锡曾答应在听证会上不提费舍尔——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人在全国观众面前被指认为“颠覆分子”，那么他的一生很可能就毁了。作为交换，韦尔奇答应不提麦卡锡另一个助理科恩不服兵役的事。

所以，当麦卡锡提出费舍尔的事时，连他旁边的助理科恩都憋红了脸，向他轻轻摇头。

韦尔奇随后用很大的声音向麦卡锡发出了质问：“我一点也没想到你会对这位年轻人做出这么残忍无情的事，他将要承受你强加给他的不必要的精神烙印。……我们不要再中伤那位年轻人了，参议员阁下！你已经做得很过分了！难道你没有道德观吗？！真的没有吗？！”

说完这句话，听证会现场的人都站起来为韦尔奇鼓掌，连身为共和党参议员的听证会主席也没有敲小木槌要求安静。听证会原本配备了六名警察，除了维持秩序外，他们还需要禁止听众鼓掌——但在那一刻，他们无动于衷。

麦卡锡当时脸色铁青，半晌之后说了一句：“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这场听证会结束后，没有人理睬麦卡锡。

麦卡锡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但他可能也隐隐约约感觉出：

属于他的时代，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句号。

7

有时候，一些事情就是在悄无声息间发生了转折。

就在这场听证会后，又一期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公布了：只有34%的美国人喜欢麦卡锡了，而讨厌他的人的比例上升到了45%。

这才过去了5个月。

而对麦卡锡而言，致命的打击其实来自共和党内部——在发现他已经失去民意基础后，党内也准备舍弃他了。

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本德直接给“麦卡锡主义”下了定义：麦卡锡主义已是政治迫害、独断专行、剥夺民权的同义词。

奇怪的是，之前共和党内并没有这样的声音——至少公开场合没有。而现在大家的声音却出奇一致，或许是因为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到了共和党拒绝麦卡锡的时候，不然他会拖垮共和党的。

1954年6月30日，参议院以68票对22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免去麦卡锡在参议院的全部主席席位。

而就在一个月前，在一个任命麦卡锡为某个委员会主席的投票过程中，只有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一个人敢投反对票。

麦卡锡依旧是参议员，但他所感受到的境遇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参议院，同事们都避免和他接触；他的演讲，听众寥寥无几，也没人邀请他去演讲了；以前喜欢围绕他的媒体，一夜之间都消失无踪；至于鸡尾酒会等社交宴请，他几乎收不到邀请函了。

原本就酗酒的麦卡锡再一次沉迷于酒精中，每次醉酒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醒来，有时甚至就醉倒在参议院里。

1957年5月2日，麦卡锡在海军医院去世，年仅48岁。官方的诊断结果是急性肝炎，但媒体预测的一致原因，是酗酒。

在生前最后几年被人敬而远之的麦卡锡，死后却享受到了国葬的待遇。他的葬礼有70名参议员参加，近2万人去瞻仰了他的安葬之地——威斯康星州苹果顿圣玛丽教区公墓。

然而，在一些人的怀念和尊重之外，麦卡锡留下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空位之争，却又让人寻味。

在1957年夏天的初选中，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科勒获胜，他主张的观点是“要与麦卡锡方式划清界限”，而他击败的对手戴维斯的观点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共产主义太软弱”。

在最后的决战中，胜出的是民主党人普罗克斯迈，他的观点更鲜明：“麦卡锡是威斯康星州、参议院和美国之耻。”

馒头说

如今提起“麦卡锡主义”，我们觉得大家都应该达成了一种共识：这是一种应该被时代抛弃的错误主义。

但真的是这样吗？恐怕未必。尤其是对于麦卡锡这个人本身，在美国，想为他“翻案”的作家和学者依旧不少，更有美国右翼团体认为他是“了不起的勇敢的灵魂，伟大的爱国者”。

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论据，那就是“维诺那计划”（Venona Project）的解密。

这是一个在二战期间由美国和英国合作的苏联情报搜集计划，最初的目的是防止苏联再度单独向德国媾和。但在搜集情报的过程中，美英两国发现：苏联向美国不断渗透，已经布置了一张情报网。

麦卡锡的支持者认为：你们看，麦卡锡当初并没有错！

但真的是这样吗？从解密的所谓159个“间谍”名单来看，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可能与共产主义者有过接触或抱以同情态度，真正坐实“间谍”身份的，也就9个人，这与当初麦卡锡拉出的“黑名单”其实有很大出入——有人统计过，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美国大约有12000人被迫辞职或遭受其他惩罚。更何况，麦卡锡当初疯狂攻击的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已被证明和共产主义完全没有关系。

这其实才是美国人至今依旧要反思和警惕“麦卡锡主义”的真正原因：那是一种不讲证据、不讲程序、无端指责、随意攻击的政治迫害和政治妄想。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美国对此确实进行过纠偏和改正，但时至今日，“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依旧没有散去。

这首先和美国本身的历史有关。

作为一个建国时间相对不长，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大国，美国缺乏历史、文明乃至宗教、礼仪或生活习惯这一类强力的民族性纽带，那么凝聚共同意志的最好办法，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动员，寻找共同的敌人——比如说“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反共”永远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一个绝对“政治正确”、

可以动员起全国民众力量的最有效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永远有生存的土壤。

而另一方面，也和美国的判断力有关。

如今的世界，早已和“冷战”时代大不相同。在互联网技术奠定的基础上，“全球化”早已成为一种趋势。世界不是当初的世界，而中国也不是当初的苏联。

这不仅仅是指中国不同于当初的苏联，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已和全世界的经济和文明密不可分，更是指中国的目标和当初苏联“全球争霸”的目标完全不同：中国人只是想完成自己国家的繁荣和稳定，绝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颠覆”乃至成为世界领袖的诉求和想法——这是由中国延续五千年的文化和思想决定的。

因为“麦卡锡主义”，当年美国政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没有人敢和中国有接触——因为谁都怕“背锅”。尽管谁都知道两个大国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对抗，但那座冰山还是在两国之间矗立了20多年才慢慢消融。

如今，这座冰山眼看又要被美国的一些政客重新一块块垒起来了。

但作为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强国，美国其实并没有必要再一次陷入焦虑和臆想之中——中国暂时没有能力，也没有想法要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

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其实给美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伤害。而如今，如果这种已经完全脱离时代的主义死灰复燃，损害的其实是全世界的利益。

这其中包括中国，当然也包括美国。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叙事史》（威廉·曼彻斯特著，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

2.《麦卡锡主义的兴衰》（张红路，《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

3.《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林达，《东方早报》，2009年连载）

4.《美国史学界关于麦卡锡主义的争论》［孙超，《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麦卡锡及其主义的终结》（杨忠民，《书屋》，2002年第3期）

6.《“麦卡锡主义”秘密档案公开　罪恶昭然》（李永敬，《检察日报》，2003年5月8日）

7.《麦卡锡主义——美国人经历过的“文革”？》（赵信宇，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2015年8月31日）

---

[1]　奥斯特里茨战役：1805年，拿破仑率法国军队打败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率领的俄奥联军，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终结，拿破仑成为欧洲霸主。——编者注

1971年，“乒乓外交”背后的六个人

说起“乒乓外交”，这已经是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历史了，但这桩改变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的大事件，如果还原到一个个具体的参与者身上，还是挺有意思的。

1

1971年1月下旬的时候，住在北京饭店的后藤钾二有点急了。

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的会长，本来也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会长，但因为支持中国申请亚乒联、取消台湾会员资格未果，刚刚愤然辞职。此时的他，已经在北京待了好几天了，但一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复。

后藤钾二是作为“特使”专程赶到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邀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当时，中国已经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年头，受此影响，作为世界乒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缺席了两届世界锦标赛。而第31届世乒赛就在日本举办，所以组委会非常希望能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

后藤钾二来中国，其实也是顶着不小压力的。

其时，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右翼当道的日本执政内阁对中国的态度相对敌视。后藤钾二的中国之行，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甚至还有威胁和恐吓。但后藤钾二还是克服了种种阻力，带着当时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村冈平和日本乒协理事森武等人来到了中国。



1971年2月，中国乒乓球协会负责人宋中（左）、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右）在中日体育交流会谈纪要签字仪式上握手

到了北京后，后藤钾二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并给出了一份草案，希望双方能出一个“会谈纪要”。但中方在详细研究后给予他的回复却让他有点懵了。

中方提出，出“会谈纪要”可以，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将“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在纪要的第一条；第二，必须再加一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这就让后藤钾二进退两难了。

所谓“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是1958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的，三点内容其实也很简单：

（1）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2）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3）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

为了体现出自己的诚意，后藤钾二到中国后主动提出，可以把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在“会谈纪要”的第二条。但是，中国方面提出要放到第一条，并且要加上那句话，他感到无能为力：我只是一个日本民间搞乒乓球的代表，我有什么权力决定这些东西呢？

后藤钾二坚持不肯这样写，而中方人员坚持必须写，谈判就此陷入僵局。

眼看时间就将进入2月，而第31届世乒赛即将在3月底举行，后藤钾二自己也感到希望渺茫，准备收拾行李回国。

然而，就在1月30日，后藤钾二得到了中方通知：第一，不再坚持当初要求添加的条款；第二，中国将派出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并坚决支持后藤先生办好这届世乒赛。

喜从天降。

后藤钾二后来才知道，中方态度的突然转变，主要是因为一个人。

2

1971年1月29日午夜，周恩来紧急召开了一次协调会。

参会的，有外交部的，有国家体委的，也有对外友好协会的，周恩来直接开门见山：凡事要看实质，不要搞形式上的争论。

周恩来明确指出，既然后藤钾二已经同意把“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放入纪要，为何还一定要他写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呢？最后，周恩来似乎发了点小火：他又不是日本外相，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

周恩来的眼光，确实要比很多人长远一些。

当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整个国际局势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苏联已经完全对中国撕破了脸皮，在“珍宝岛冲突”之后，昔日的“老大哥”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力乃至核武器的恐吓。

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锋芒已经大不如前。从之前种种不同场合的蛛丝马迹来判断，美国其实在不断释放或明或暗的信号：我们愿意同中国接触。

而中国此时也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之中，几乎关闭了一切对外交流的渠道。面对明显将发生变化的国际局势，中国其实也到了需要寻

求突破的时候。

但是，就在周恩来做出同意中国代表团出征的决定之后，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又给中国出了一个难题：1971年3月上旬，柬埔寨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将军和副首相施里玛达殿下趁柬埔寨最高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苏联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

当时西哈努克亲王正在北京逗留，中国政府立刻表态支持西哈努克政权。不过，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随即提出，希望中国和朝鲜能够更有力地表达支持——比如放弃参加第31届世乒赛，因为有朗诺集团的运动员参加。

周恩来决定先听取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意见。

在那场连夜召开的讨论会上，乒乓球代表团也有两种意见：一方认为政治最大，不能去；而另一方认为，既然答应了日本，就要守信，且参赛对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对整个国家也有利。还有人提出：要去，但不比赛，去现场开展斗争。

周恩来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一直等到凌晨3点，直到听到乒乓球代表团的意见总结汇报后，他拍了板：遵守诺言，参加比赛！

同时，他也做出了指示：如果碰到朗诺集团或南越集团的选手，我们就弃权。

当然，心思缜密的周恩来，随即自己亲自动笔，熬了个通宵，写了一份逻辑清晰的情况报告，请示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后，在报告上写下了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注：当时日本右翼宣称将要暗杀中国代表团）。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国乒乓球队，就此出征名古屋。



徐寅生，后担任中国乒协主席。按照他的回忆，在那个晚上，他是主张去的，而庄则栋是主张不去的

3

1971年3月21日晚，东京羽田机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震惊了。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刚下飞机，就受到了日本方面的热烈欢迎，光是赶到机场的日本各界代表，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很多日本人手执中日两国国旗、欢迎标语和鲜花，将机场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宋中后来才知道，因为中国代表团的参赛，名古屋世乒赛的规格一下子就升级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乒乓球在世界处于一流水平，更是因为这是“文革”以来，中国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大规模的代表团。

第31届世乒赛如期开幕，久违世界舞台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如猛虎下山，给整个世界乒坛重新注入一股“中国旋风”，一举拿下了男团、女单、女双、混双的冠军。在男单比赛中，连续三届世锦赛冠军庄则栋在第二轮遭遇了朗诺集团的选手柯武，按照赛前制定的策略，庄则栋选择弃权，对手不战而胜。虽然庄则栋当时已经过了巅峰时期，但依旧是中国男队的一号主力，他的弃权对最后中国男队丢掉男单金牌应该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与赛场内的拼杀相比，宋中对一些场外细节更加留意。

在世乒赛举行期间，国际乒联曾专门举行过会议。在这场会议上，宋中公开指责当时的南越提出让台湾加入国际乒联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并表示朗诺集团是“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傀儡”。但宋中发现，一起参会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并不在意，反而在会后主动找宋中寒暄。



庄则栋与斯廷霍文切磋球技。斯廷霍文后来回忆说，他理解当时中国人的抗议，并说：“换作我，我也会这么说。”

让宋中意外的是，斯廷霍文的寒暄内容不仅仅有“中国运动员乒乓球打得很好”这类客套之辞，还有一句颇有所指的“玩笑话”：“听说你们邀请了五个国家的球队到你们国家去访问，不知什么时候会邀请我们？”

在这届世乒赛上，中国代表团确实向英国、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尼日利亚五个国家的代表团发出了访问邀请，但美国当时和中国依旧处于“敌对”状态，所以斯廷霍文这句话怎么听都应该是句玩笑话。

不过，宋中却因为这句话，立刻想起了在世乒赛举行前不久，美国乒乓球协会驻国际乒联代表拉福德·哈里森对他说的话：“美国的年轻队员们真的想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已经取消了美国公民去中国旅游的禁令。如果你们给我们签证，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中国访问。”

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就成立了以团长赵正洪、秘书长宋中组成的七人临时党委，专门讨论斯廷霍文的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弦外之音”，讨论的结果是，立刻向国内报告。

而就在向国内报告和听取指示的过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4

1971年4月4日下午，在中国代表团的班车上，庄则栋一下子蒙了。

当时，中国队的球员都已经上了班车，司机正准备开动，忽然车门一开，上来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运动员。那个运动员一上车，发现整车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运动员，他自己也愣住了，忙想转身下车，但这时候，班车已经开动了。

这名明显上错车的外国运动员只能面朝车门站立，而他这一转身，运动服背后的国家字母也露了出来：U.S.A。

一个美国运动员，莫名其妙上了中国队的班车。

美国运动员面朝车门，一动也不敢动。中国队的所有队员也面面相觑，面对来自“美帝”的运动员，也没人敢搭腔。

整整10分钟，车厢内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

整个班车行程一共大约15分钟，还有5分钟就抵达目的地了。

这时候，庄则栋在队友惊异的目光中，走向了那位美国运动员。当时有队友轻轻拉他的衣服：“小庄，别去，别理他，别惹事。”

庄则栋的回答是：“没事，他也就是个运动员。”

庄则栋拉着翻译走到了那位美国运动员面前，先是自我介绍，然后知道了美国运动员的名字叫科恩。科恩自然认识三届世锦赛冠军庄则栋，情绪一下子变得很激动。

而且，庄则栋不光上去打了招呼，还从包里拿出一段一米多长的杭州织锦，作为礼物送给了科恩。

按照庄则栋后来自己的回忆，他当时这么做是出于两个理由。



庄则栋和科恩。林克、徐涛、吴旭君所著《历史的真实》披露，毛泽东邀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向美国高层传递往来信号。但美国高层并未捕获这一微妙细节。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记述，“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

一是他觉得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把人家晾在那里”。二是他想起不久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老朋友斯诺说的话：“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

班车到站，一直跟踪中国队每一个行程的日本媒体记者惊异地发现：一个中国运动员居然和一个美国运动员微笑着站在一起。

整个媒体队伍当时就炸了——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都刊登了这条新闻。

而此时，中国代表团内部却陷入了分歧：庄则栋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外事纪律？是不是要回国听候处分？

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在接到了科恩的汇报后，由代表团的副领队哈里森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正式请求：“美国乒乓球队希望能访问中国。”

要不要邀请美国队？这种“天大的事”，自然不是庄则栋能决定的，

也不是代表团能决定的。

一纸报告，很快就放到了中南海的一个人案前。

5

4月6日晚，中南海。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准备早早睡觉。

就在睡前不久，毛泽东刚刚圈阅了周恩来递上来的“关于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

这份报告，其实在毛泽东这里已经被压三天了。

美国乒乓球队提出希望访华的请求，在中南海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当时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得出的建议是，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美国一直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表现出诚意，并且还在侵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威胁中国安全。从访问方式上来看，也应该是美国先派高级官员前来，而不是派一个乒乓球队。

周恩来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的报告上做了圈阅，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压了三天之后，最终在4月6日晚上也做了圈阅——拒绝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文件送走后，已经是晚上11点多。毛泽东在吃了安眠药后，让他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为他读“大参考”（供中央高层阅读的“参考资料”）。毛泽东本来已经昏昏欲睡，但在听到外电对庄则栋与科恩在班车上互动的评价时，他突然说起话来。

吴旭君听了一会儿，才听出大意：“打电话……美国队……访华！”

当时毛泽东自己规定：吃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吴旭君知道毛泽东刚刚还圈阅了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所以她不敢动。

看吴旭君没动静，毛泽东的语气有些生气：“小吴，你怎么还不去办？”

吴旭君表示自己没听清。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

听清楚了之后，吴旭君还是不放心，再追问了一句：“主席，您吃过安眠药后说的话算不算数？”

毛泽东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6

1971年4月10日上午，深圳罗湖口岸，格伦·科恩兴奋得四处眺望。

中国代表团邀请访华的通知在4月7日传到了美国队那里，全队上下一片沸腾。当时团长不在，副团长哈里森立刻致电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告知受邀消息，并要求把护照上会引起纠纷的“大陆中国”字样消掉。当时美国驻日大使正好也不在，值班的一等秘书威廉·卡宁汉得到消息后，考虑到美国队本来4月8日就要返回国内，立刻“越级”上报了美国白宫，并大力支持美国队访华。

美国队访华的路线也很快被确定下来：从日本飞香港，由香港到深圳坐火车到广州，由广州飞北京。作为让美国队得到访华邀请的“功臣”，科恩当然被选入访华的代表团名单。

科恩当时19岁，是洛杉矶圣莫妮卡市立学院政治系的二年级学生，从小喜欢打乒乓球。不过，他和很多队友一样，其实是自费来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美国乒协只进行选拔，不提供差旅费。

但这已足以让科恩满意了，因为他自己的理想就是能去世界各国开眼界，没想到这次还能去神秘的中国。所以科恩当时很不能理解，美国队中居然还有不愿意去中国的人——一位当时南朝鲜裔的队员就明确表示不愿意去（后来这位队员公开表示这是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美国队抵达北京后，下榻在新侨饭店。科恩不知道的是，他和他的队友们在中国的每一个行程，都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亲自安排过问的。到北京第一天，美国队被安排参观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随后访问清华大学，游览万里长城，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中国的新奇景象给科恩留下了深刻印象：干净整洁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洪流，几乎不讲究款式的男女着装，到处都竖立着的毛泽东画像……

4月13日，在首都体育馆，一场中美乒乓球友谊赛拉开帷幕。考虑到美国选手的水平还比较低，中方特地安排了中美混合配对双打，以保证双方水平接近。

4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其他国家的代表团虽然也受到了一样的接待，但谁心里都明白：美国队是这次的主角。

周恩来在与美国队谈话时，引用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好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中美双方进行友谊赛

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斯廷霍文其实来之前很担心科恩，因为科恩受当时美国国内文化影响，是一个标准的“嬉皮士”：留长发，穿喇叭裤。就连和中国选手打球时也不太安分：用红绳扎起头发，把脚跷到桌子上系鞋带，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时，还会以迪斯科的姿势跟着一起跳舞。

结果，让斯廷霍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科恩忽然向周恩来提问：“请问您怎么看待嬉皮士？”

周恩来的回答是：“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些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

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周恩来的讲话和接见美国队的照片，都刊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最惊讶的人，其实是科恩的母亲。为此，她特地托人给周恩来送去一束花。

7

当然，无论是科恩，还是庄则栋、宋中、后藤钾二，都不会想到这场“乒乓外交”的后续会如何发酵。

就在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现场，斯廷霍文发出了对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邀请，周恩来当场就答应了。

就在会见之后还不到10个小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从货币、石油、货物运输进出口等各方面对中国解禁。

就在会见之后3个月，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就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秘密从伊斯兰堡飞抵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

就在会见之后的10个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之间几十年的坚冰，一朝打破。

馒头说

对20世纪的整个世界格局来说，中美关系的突破，绝对是一个大事件。

而促成这个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中美双方领导人对未来形势的判断和把握，“乒乓外交”可以算是一个“抓手”。

在这个大事件中，后藤钾二、宋中、科恩、庄则栋，包括斯廷霍文、卡宁汉，都是参与其中的人物，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或多或少可能都意识到，自己在参与一件不平凡的事，但未必能预料到这件事的影响会如此深远。不要说他们，即便

是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这一层面的人物，也未必能对当时事情的走向完全了然于胸。

所以有时候历史真的很有意思：一个历史事件，由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构成，从头到尾看一遍，是一种感受，而如果你站到这个事件中的每一个人的角度重新看一遍，又是一种新的感受。

历史确实是由一个个年份、一个个数字、一个个事件构成的，但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作为个体，就像每个人拿着一块拼图，一块块组合在一起，最终凑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

当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前人的成败得失，一目了然。但当时的他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将怎样选择，也未必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会对事件未来的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然也不知道，有一批人在同时参与这一事件，大家相互作用，交叉影响。

在现在，看过去，鉴未来，这可能就是读历史的魅力吧。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高粱，《炎黄春秋》，1998年第12期）

2.《我所亲历的中美“乒乓外交”》（徐寅生口述，金大陆采写，吴维整理，《世纪》，2017年第1期）

3.《非常时期的战略抉择——见证“乒乓外交”（上）》（王鼎华，《秘书工作》，2008年第7期）

4.《历史性的五分钟——庄则栋回忆中美乒乓外交》（杨桂凤、平丽，《瞭望》，1998年第52期）

5.《美方人员关于乒乓外交的回忆》（顾宁，《百年潮》，2001年第7期）

6.《美国国务院对乒乓外交的评估报告》（侯新竹，《冷战国际史研究》，2018年第2期）

7.《中美乒乓外交背后的毛泽东》（周溢潢，《北京档案》，2004

年第12期）

那一年，中国在联合国连投16轮反对票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似乎一直在联合国决议中投“弃权票”。但事实上，中国还投过很多反对票，其中，以1981年那一次最为著名。

1

当1981年到来的时候，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

此时的瓦尔德海姆，是在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而1981年，正是他第二个五年任期结束的日子。

这位出生在奥地利的著名外交家，在自己十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任上做得相当不错。他在1972年上任之后，首先解决了联合国6500万美元的财政危机，随后在“慕尼黑奥运惨案”“第四次中东战争”“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中表现得可圈可点，获得了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可。

也正是因此，瓦尔德海姆经过再三考虑，在1981年9月10宣布：将参加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争取再一次连任——如果连任成功，他将成为联合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秘书长。

瓦尔德海姆参加连任竞选是有底气的：第一，他才63岁，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第二，他在任内确实口碑不错，不少成员国也支持他连任；最重要的是第三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也都对他的连任表示同意——这是最关键的。

联合国秘书长的产生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的投票中至少获得9票；第二，5个常任理事国不能出现一票反对，不然就要重新推选。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从以往的经验看，只要美国和苏联都同意的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还从来没有被否决过。

但是，瓦尔德海姆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连任计划遭到了另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坚决反对。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2

按理说，瓦尔德海姆其实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当瓦尔德海姆以“黑马”的姿态出现在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行列中时，与芬兰代表雅克布森最终对决的关键一票，是中国投给他的。当时中国才刚刚重返联合国没多久，瓦尔德海姆对此也心存感激。他原先就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奥地利当时投的也是赞成票）：“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可思议了：一个仅控制了1600万人口、位于中国大陆边缘的岛上政府，竟试图代表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10亿中国人讲话。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的争论已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而在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当时作为奥地利常驻联合国的代表，瓦尔德海姆也做过欢迎致辞：“我们相信，中国参加联合国的生活将加强这个组织，并且大大改进它促进和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目的的能力。……我曾在这个讲坛上说过，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充分参加联合国的各项活动，我们就不可能期望这个组织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取得显著进展，这些问题是同联合国的基本目标即保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有关的。”

瓦尔德海姆当选后不久就访问了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与周恩来总理会面。1977年他连任之后，再度访问中国，当时和他会面的是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当然，关于瓦尔德海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也出现过一些段子。

最著名的是在周恩来总理逝世时，瓦尔德海姆下令“破例”在联合国总部降半旗哀悼，并且发表“著名演说”，大致意思是如果谁能够像周总理那样做到没有存款、没有孩子，也可以享受降半旗待遇！然后“全场外交官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掌声”。

虽然瓦尔德海姆确实很尊敬周恩来，但1947年联合国就颁布了一个条例：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都要降半旗致哀一天，所以为周总理降半旗并非“破例”。至于那段发言，很多当时在联合国的中外外交官都表示从没听到过。

所以，似乎中国并没有反对瓦尔德海姆连任的动机。

但是，中国也确实有自己的理由，无关瓦尔德海姆个人——联合国秘书长不能总是由来自发达国家的欧洲人担任。

从联合国成立开始，第一任秘书长是挪威的特里格韦·赖伊，第二任是瑞典的达格·哈马舍尔德，第三任好不容易是来自缅甸的吴丹，还是因为达格·哈马舍尔德在刚果出差飞机失事后，作为副秘书长转正的（后连任一届）。到了第四任瓦尔德海姆，做了两任之后还要再做一任的话，联合国的四任秘书长中三任都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

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呢？

有。这个人，就是来自坦桑尼亚的代表萨利姆。

萨利姆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过驻中国兼朝鲜大使，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有一个非洲代表在投票结果公布后，在现场激动地当场跳舞，这个人就是萨利姆。萨利姆担任过近十年的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当时是坦桑尼亚的外交部长。在1981年6月，由50多个国家组成的非洲统一组织一致同意，推举萨利姆代表非洲大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而中国也希望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推举萨利姆担任新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



萨利姆当时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时才39岁

毫无疑问，新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之争，最终将在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之间展开。

而这两人背后站的最大国家，分别是美国和中国。

3

1981年10月27日，较量正式展开。

在安理会的一个小会议厅，代表们都拿到了选票，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几乎都没什么犹豫，迅速勾上了候选人的名字。

第一轮投票结果：萨利姆11票，瓦尔德海姆10票。

两人都过了“至少9票”这个第一要求，但都没达到第二个要求——因为各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

虽然投票采用的是无记名方式，但常任理事国投出的票会被特别标记，所以大家都知道萨利姆和瓦尔德海姆各自遭到了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而且这两个国家都非常明显：

中国对瓦尔德海姆投了反对票，而美国对萨利姆投了反对票。

于是，投票只能宣布无效，重新开始第二轮投票。

由于美国代表开始在各个代表间运作，第二、三、四轮中，萨利姆的得票数直线下降，第四轮仅仅得到了6票，已经不符合“最低投票数”的规定。而瓦尔德海姆的票数一直稳定在10票。

但是，瓦尔德海姆却始终无法当选，因为中国在这四轮投票里每轮都投出反对票。

在这样的情况下，投票只能暂停。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进行了两轮投票，萨利姆两轮都得了8票，瓦尔德海姆两轮都得了11票。

虽然瓦尔德海姆依旧领先萨利姆3票，但还是没用——中国又在两轮投票中投出了反对票。

投票再次暂停。

11月4日，在经过6天的磋商、呼吁和各种幕后沟通之后，安理会再次进行了第七轮和第八轮投票，但结果还是一样：萨利姆先后获得9票和8票，瓦尔德海姆两轮都获得10票，但依旧没人能当选——中国和美国在总共8轮的投票中，每轮都互相投了对方推举的候选人的反对票。

在1981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过程中，由于号称“非洲国家天然盟友”的苏联一直投的是弃权票，所以坚持投反对票的中国在非洲人气急剧上升。尤其是坦桑尼亚的工作人员，在看到中国的工作人员时，都要用斯瓦希里语说一句：“萨利姆！其纳（中国）！拉菲克（朋友）！”

这时候，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受到的压力明显增大，有部分国

家开始指责中国在“故意制造麻烦”，而一种说法开始在联合国各个角落流传开来：中国只是做做样子，在投了8轮反对票之后，已经在非洲兄弟们面前做足姿态，接下来就会妥协。

这样的传言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之前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中国就是在前两轮都投了反对票，但在看到自己支持的非洲国家候选人竞选无望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妥协了——拿到中国选票的那个人，就是瓦尔德海姆。

但是，中国很快再次表明立场。联合国的成员国已达157个，其中不结盟国家几乎占2/3，非洲国家占1/3。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担任过秘书长的四人当中，仅有一人来自亚洲，其他三人都来自欧洲。这同联合国的组成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所起的作用相比，极不相称。

投票还将继续。

也就是在这时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接到了国内邓小平发来的指示，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

一否到底。

4

11月17日，在投票暂停了近两周之后，战幕再度拉开。

在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一口气再次进行了8轮投票。结果是：第一轮，瓦尔德海姆得11票，萨利姆得10票；第二轮，瓦尔德海姆得10票，萨利姆得9票；最后六轮，瓦尔德海姆都得9票，萨利姆都得8票。



20世纪的联合国大会会场

虽然各轮票数略有差别，但有一个情况一直没变：中国和美国又连续8轮各自投出了8张反对票。

整整21天，16轮投票，在其他三个常任理事国都弃权的情况下，中国直接和美国“正面交锋”——连投16轮反对票。

这种情况在联合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该怎么收场？

此时，两个备选方案被提了出来：第一，瓦尔德海姆连任一年或两年后再次进行选举；第二，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分享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五年任期。

随即，又有一种说法传出：中国准备接受第二种方案。

中国代表迅速发表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候选人的立场都不会改变。中国不能容忍的是一两个超级大国对联合国事务的控制和操纵。”

1981年11月20日，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在结束对尼日利亚的正式访问时，专门向尼日利亚电台记者强调：“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选！”

这等于中国向非洲国家再一次做出承诺。

但是，照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哪怕再投16轮，依旧无法选出新的秘书长。

怎么办？

5

最终首先做出改变的，是瓦尔德海姆。

瓦尔德海姆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一直非常好，所以他直接找到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希望了解中国接下来究竟准备怎么做。

凌青对瓦尔德海姆也交了底：“中国坚持的是原则，中国的态度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联合国成立只有36年，你一人就担任了10年秘书长，这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秘书长候选人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

在听完中国的态度之后，瓦尔德海姆表示完全理解，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1981年12月3日，瓦尔德海姆写信给安理会主席，要求安理会在之后推选新秘书长的投票中，不要再把他的名字写进去——等于放弃参加竞选。



凌青

5天以后，考虑到美国肯定不会改投赞成票，所以萨利姆同样也宣布退出竞选。

一场僵持了16轮的选举，就此出现转机。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12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宣布了另外9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他们分别来自阿根廷、伊朗、秘鲁、圭亚那、巴拿马、菲律宾、毛里求斯、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统统是第三世界国家。

1981年12月11日，经过新一轮的选举，来自南美洲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成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这一次，中国投的是赞成票，而美国没有投反对票。

61岁的德奎利亚尔就此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二位来自第三世界的秘书长。

在宣誓就职时，德奎利亚尔特别强调：我不会忘记自己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

6

1982年8月21日，德奎利亚尔访问中国。

在中南海，邓小平会见了这位新任联合国秘书长，他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邓小平还向德奎利亚尔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德奎利亚尔之后也在联合国连任了一届。在连任的投票中，中国再次投出了赞成票。

馒头说

事实上，1981年中国连投16轮反对票，还有个时代背景。

当时罗纳德·里根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不久，他在竞选过程中对中国表现出了很高的敌意，在就任之初，更表示要支持台湾，并向台湾出售武器。当时中国和美国在售台武器谈判中陷入了僵局。

就在1981年的1月，邓小平通过与陈香梅[1]的谈话表达了中国的态度，概括来说就是：首先，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但是，如果认为中国是一个无足轻重、不值得重视的国家，那美国就错了；其次，如果认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而美国无求于中国，那也错了；最后，哪怕中美关系倒退，我们也绝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

所以9个月后的那次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博弈，背后也有中国"敲山震虎"的目的。

就在瓦尔德海姆宣布退出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第二天，中美双方开始在北京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谈判。8个月后，经过反复艰苦的谈判，中美双方发布《八一七公报》，美方做出较大让步。这个公报和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一起，成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基石。而里根总统任内8年，也被认为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

当然，后面发生的那些事，并不能说完全是因为中国在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这件事上的强硬态度引发的，但肯定有一定的作用。

在外交这个大舞台上，何时强硬，何时妥协，尺度如何把握，实在是有太大的学问。

当然，一切的手段背后，关键还是自身要先有实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美上世纪80年代初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上的对峙》（苏振兰，《党史纵横》，2015年第11期）

2.《1981年，中国在联合国16次断然否决瓦尔德海姆之谜》（宁道一、宋礼盈、傅铮铮，《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10期）

3.《中美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上的对峙邓小平传话“一否到底”》（夏明星，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0月13日）

4.《前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我一刻也没后悔过》（央视国际，2006年10月17日）

5.《新闻背景：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过程》（王龙琴，新华网，2016年10月6日）

---

[1] 陈香梅（1925—2018），世界著名华人华侨领袖、社会活动家、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早期在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工作，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指挥官陈纳德的太太，二战后一直活跃在美国政坛。——编者注

炮火的怒吼

有这么一句话：“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

但换个角度来看，战场厮杀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

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无理性的冲动和战争狂的疯癫，战争，其实也是博弈的一种手段。

帝国的覆灭：600万人为何会被168个侵略者摧垮？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让人感慨：一个人，在前半生默默无闻，但只要凭一件事，居然就可以在整个历史上留下名字。本文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1

从任何角度来看，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都不应该是一个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

作为一个西班牙贵族和女佣的私生子，皮萨罗甚至没留下准确的出生年月。一般认为，他出生在1475年前后。

当哥伦布代表西班牙第一次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皮萨罗17岁。

前半生庸庸碌碌的皮萨罗，根本就没留下什么值得一书的事迹。唯一值得记下一笔的大概有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不识字，是一个文盲；第二件事，他非常崇拜和他同时代的西班牙冒险家、军事家埃尔南·科尔特斯。

科尔特斯的事迹，当时在整个西班牙乃至欧洲世界流传——他率领数千西班牙殖民者，远征中美洲，通过各种手段，居然征服了拥有20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3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

在那个充满冒险与野心的大航海时代，为自己国家开疆拓土的同时，实现自己的野心和欲望，可能是最吸引人的一件事。

所以，皮萨罗就沿着科尔特斯的足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踏上了去美洲的征途，希望能在那里扬名立万，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是直到1522年，已经47岁的皮萨罗也只是在西班牙征服巴拿马的战争中立了点功劳，获得了一个种植园。

但是，也就是在那一年，皮萨罗从另一个西班牙探险家的嘴里，听

说了一个位于南美洲秘鲁附近的神奇国家——据说那是一个满地都是黄金和珠宝的神秘帝国。

2

就好比迷茫的人生有了一盏指路明灯，皮萨罗从此有了追求的方向。

首先，他找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在经过几番沟通和说服之后，他与同样愿意为寻找黄金付出生命的阿尔马格罗以及神甫卢克组成了一个三人小团体。

其次，他要保证自己的权益。他找到了当时的巴拿马督军佩德里亚斯，获得了他的允许，得到了可以获得大部分战利品的许诺。

1524年，49岁的皮萨罗带着他的两个合伙人，外加112名西班牙冒险者以及少量的印第安俘虏，前往秘鲁探寻那个神秘帝国，但是很快失败，只获得了少量的黄金。

1526年，51岁的皮萨罗重新组织了160人的探险队伍，结果在厄瓜多尔登陆后，遭遇了大量的印第安人，在发生激战之后，只能固守等待巴拿马援军。

但是，此时的巴拿马督军已经换成了里奥斯。这位新来的督军根本就不相信皮萨罗“百人征服大帝国”的计划，要求他立刻回来，放弃探险。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在那一刻，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皮萨罗上演了让后来很多西方冒险家为之心驰神往的一幕——他拔出腰中的佩剑，在海滩上画了一条线，大声对自己的同伴说：

“朋友们！那边是苦役、饥饿、赤身裸体、倾盆如注的暴雨、荒芜和死亡，这边是安逸和欢乐！那边是秘鲁和它的财宝，这边是巴拿马和它的穷困！

“选择吧！诸位！什么是最适合一个勇敢的卡斯提尔人去做的！

“至于我的选择，我上南方去！”

随后，皮萨罗用佩剑向南方的秘鲁一指：“愿意去秘鲁发财的到这边来！”又向北方的巴拿马一指：“愿意回巴拿马受穷的到那边去！”

他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说，终于说服了13个愿意追随他的同伴一起去南方冒险。而在历史上，这13个人被称为“加略岛十三勇士”——当然，是殖民者按照他们的思维给予的称号。

但是，皮萨罗也没有傻到只带着这13人就开始他的征途。

他先是回到了西班牙，说服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授权。对这笔“无本万利”的买卖，西班牙国王当然乐意表达自己的支持——反正皮萨罗如果死在美洲，西班牙也毫无损失。

1529年，皮萨罗被封为“瓜亚基尔湾以南殖民地的督军、行政长官和终身先遣官”——那里本来就不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只要皮萨罗能获得新的殖民地，就可以合法拥有该殖民地80%的财富。而皮萨罗的两个队友，阿尔马格罗为秘鲁城市通贝斯城的司令，神甫卢克为通贝斯城的主教。

听上去名头很响，但其实皮萨罗手底下几乎没有什么人。唯一算得上主力的，是当初跟随他的所谓“加略岛十三勇士”，他们全部被授予世袭的骑士称号，每人分到1000个印第安人奴隶和大量的庄园土地。

1531年，已经56岁的皮萨罗终于组织起了一支不到200人的队伍。

他带着这支不到200人的队伍从巴拿马起航，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征服那个让他魂牵梦萦多年的黄金帝国。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探明了情况：那是一个国土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600万的庞大帝国。

那就是当时南美洲的霸主：印加帝国。

3

印加帝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

这个古老帝国源自10世纪一个叫“印加”的小部落，从15世纪开始快速崛起和扩张，最盛时国土面积涵盖今天的厄瓜多尔和秘鲁山区、玻利维亚高原、智利北半部和阿根廷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国家就展现出矛盾的两面。

一方面，印加人很聪明，能制作精美的纺织品和陶艺，能在山上开出梯田，能修水渠和水道，能在全国那么大的范围内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能测算精准的历法（其中阳历能精确到一年365天6小时），据说还

能做包括开颅在内的复杂手术，普遍使用麻药。



印加帝国遗址

另一方面，虽然印加人凭借丰收的粮食和无数的财宝供养出一支多达数十万人的军队，但他们的军事科技却只停留在了青铜器水平，在16世纪火器早在全世界流行时，他们军队用的武器还是弓箭、长矛、石锤、木棍……

他们在全国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却没有发明轮子，导致行军和运输的效率非常低下。

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马”，作为整块大陆最先进的文明，他们只成功驯养了羊驼（没错，就是草泥马），用来进行效率极低的负重。

他们拥有数百万人口和一套行政体系，却没有发明文字，而只是用一种打结的绳子来传递和记录简单的信息。

他们繁衍了那么多代，王室却严格遵守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规定：国王只能娶自己的亲姐姐或亲妹妹，生下的孩子才能保证血统纯正，继承王位。

在这片千百年来外来人不曾发现的大陆上，印加人默默攀爬着他们几乎已经触碰到天花板的科技树，繁衍出了数百万的人口，开拓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土，看上去盛极一时，却犹如一个倒立的金字塔——稍微有人去捅一下他们薄弱的根基，就很容易引发一场大崩溃。

而对于这一切，印加人是浑然不知的，他们正热衷于每一个庞大帝国都喜欢做的事：内战。

16世纪20年代，印加帝国的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去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他和自己亲姐妹生下的数十个儿子。

由于印加王室从来没有什么“嫡长子继承”制度，全靠皇帝兴之所至指派继承人，所以每次父子更替，内战是非常容易爆发的，这一次也不例外：瓦伊纳卡帕克指定的继承人叫瓦斯卡尔，但问题是瓦斯卡尔的母亲虽然也是老皇帝的亲姐妹，却没有正式办过仪式（为此，瓦斯卡尔还命令自己的母亲和已经成为干尸的父亲补办了一场“冥婚”）。这时候，原先被立为皇子后又被废黜的阿塔瓦尔帕站了出来，声称自己才是正统。

一场内战无可避免地在这两股势力之间爆发，一打就是好几年。

最终，阿塔瓦尔帕战胜并俘虏了自己的兄弟瓦斯卡尔，当着瓦斯卡尔的面把他诸多妻子和亲属一一杀死，然后送他上路。

此时的阿塔瓦尔帕统一了整个印加帝国，成了正式的皇帝，正准备一展宏图，忽然属下来报：

有一小群奇怪的人，说要见一见印加的皇帝。

4

那群人，当然就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冒险队。

那是1532年的11月，打听到印加帝国正处于内战消息的皮萨罗觉得机不可失，立刻带着他的队伍深入南美大陆腹地，第一次真正进入了印加帝国。

皮萨罗的所有家当，是168个人，其中106人是步兵，还有62人是骑兵。

而他面对的，是一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印加帝国。

但皮萨罗做出的决定是，以“合作”和“贸易”之名，邀请印加皇帝来见一面。

直到现在，依旧有不少历史研究者没有想明白一件事：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为什么会答应以皇帝的身份，亲自去见皮萨罗的殖民小分队。

一个最有可能的原因，应该是皇帝的好奇心。

对于古老而封闭的印加帝国而言，任何外来的闯入者都是让人觉得新鲜的。更何况，根据手下的禀报，那群闯入者骑着他们从没见过的高大动物（马），浑身包裹着不知是什么材料做成的皮（盔甲），拿着可以发出巨大声响和烟雾的棍子（火枪），还有可以迅速切割一头羊的武器（钢制的剑），这一切都太让人感到新奇了——阿塔瓦尔帕很可能也想验证一下，他们是不是“神派来的使者”。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加皇帝并不觉得此行有什么风险。

作为印加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阿塔瓦尔帕此时拥有8万精锐战士，还有连绵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数百万的人口，怎么可能被一支100多人的探险队伍摧垮？

所以，阿塔瓦尔帕决定，将与西班牙人会面的地点定在一个叫“卡哈马卡”的地方。

而此时的皮萨罗，也处在一种兴奋与惶恐之中。

从科技和军事上来看，西班牙人与印加人简直不是同一个时代的，真要打起来，属于“降维打击”；但从人数上来看，168个西班牙人将面临整个印加帝国超过8万的精锐部队——如果要硬干，即便最胆大的科幻小说家都不敢这样编故事。皮萨罗骗自己的同伴说印加帝国只有4万军队，但即便是这个数字，也足以把他们所有人吓得心惊胆战，夜不能寐。

但是，他们对财富、土地和名望的欲念，最终战胜了他们的恐惧。

皮萨罗决定赌一把。

5

1532年11月16日，这是一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会留下印记的一天。

这一天的早上，前一天才抵达卡哈马卡的皮萨罗托信使给印加皇帝带去了一个口信：“请转告贵国君主，欢迎他大驾光临。至于何时来和怎样来，都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办。不管他以什么方式来，我都会把他当朋友和兄弟接待。我求他快来，因为我渴望和他见面。他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或侮辱。”

中午，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就真的来到了卡哈马卡广场。

任何一个在现场的西班牙人，都会被印加皇帝到来的场面震撼。

走在最前面的，是2000名身穿五颜六色棋盘花纹衣服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捡起路上的石头和小草，让皇帝即将经过的道路变得整洁。

在这2000人身后，是三群身着不同颜色服装、载歌载舞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任务，是让皇帝的队伍显得欢欣鼓舞。

再往后，是大批的印加武士，他们虽然只拿着原始的棍棒武器，但雄武有力，毫无疑问，他们的责任是护卫。并且，他们还抬着巨大的金属盘子和许多金银制品，让皇帝的队伍显得珠光宝气。

最终，在众人的簇拥下，坐在轿子上的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出现了。轿子的木支架用银皮包裹，四周插满五颜六色的鹦鹉羽毛，并用金银饰品装饰。这顶轿子由整整80名印加领主扛在肩上——有资格抬轿子的，也必须是身份高贵的人。

阿塔瓦尔帕本人头戴皇冠，身着锦绣，脖子上套着用绿宝石穿成的巨大项链，坐在轿子中装饰华丽的鞍形小凳子上。同时，主轿两边还有大量轿子和吊床，里面坐着大批穿金戴银的高级领主。他们的身后，又都是抬着金银制品的印加武士。

在进入广场时，数千名印加武士唱起了嘹亮的战歌，这让有些等候多时的西班牙人直接吓得尿了裤子。



阿塔瓦尔帕的画像

接触正式开始。

原本只说要进行“贸易和合作”的皮萨罗派出了一名叫德巴尔维德的修士，手捧《圣经》走到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面前，宣称“以上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要求阿塔瓦尔帕皈依基督教。

阿塔瓦尔帕很好奇地把《圣经》拿了过去，想看看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东西——印加人不会造纸，更不会印刷书籍。他翻开这本书后，发现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为了确保万一，他还放到耳边听了听，以为里面会有什么神灵在说话。

当发现这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东西之后，阿塔瓦尔帕愤怒地将《圣经》丢到了一边，喊道：“我们只相信太阳，不相信上帝和基督！”

而这个举动无疑成了一个导火索——或者说成了皮萨罗的一个借口——有人亵渎了《圣经》。

德巴尔维德回到了皮萨罗身边，开始高喊：“出来吧！出来吧！基督徒们！向这些拒绝上帝福音的敌人冲过去吧！那个暴君竟敢把《圣经》扔在地上！……向他们冲过去，我会宽恕你们的罪孽的！”

与此同时，皮萨罗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一时间，皮萨罗事先安排好的大炮响了起来，而那60多个骑兵也从四周埋伏好的位置冲了出来。为了震慑印加军队，皮萨罗专门埋伏了人吹喇叭，还在战马身上系了很多可以发出巨大声响的东西。至于他们的那十几支前膛枪，虽然杀伤力有限，但还是能发出巨大的声响。

印加帝国的武士们确实是被这些从没见过的东西惊呆了。

虽然他们反应了过来，开始用石斧和木制棍棒向西班牙人还击，但这种孱弱的武器根本不能破坏西班牙人的全身盔甲。而西班牙人的钢制佩剑可以轻而易举把没有任何盔甲防身的印加武士砍成两段。

在混战中，皮萨罗一马当先，一手拿剑，一手拿匕首冲向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他清楚地知道，在这种人数占有极大劣势的情况下，必须擒贼先擒王。

簇拥在印加皇帝身边的印加领主开始反抗，但奇怪的是，他们拼死要做的事，是确保皇帝的轿子不能翻下来——被砍死几个，就有几个人从旁边拼死冲过来，再抬住轿子。



描绘当时场景的油画

最终，七八名西班牙骑兵冲了过来，直接撞翻了皇帝的轿子，而阿塔瓦尔帕基本没有什么反抗，束手就擒。

皇帝被俘，印加人的队伍一下子就垮了，之后就演变成了一场残忍的大屠杀。

在这场屠杀中，很多印加人是死于己方的人互相践踏。在如同“天神”一般的西班牙人面前，他们四处逃散，最终靠推倒广场旁的一段围墙才逃了出去，而几十名西班牙骑兵追了上去，肆意砍杀。

最后的战况令人难以想象：印加人伤亡了数千人，而西班牙人的伤亡人数只是个位数。

而且，印加皇帝还被俘了。

6

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故事还在继续。

被俘虏的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并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性命危险，因为他完全无法想象，凭眼前这100多个西班牙人，就能接管他的印加帝国。

在牢房中，阿塔瓦尔帕依旧可以向他的臣民发号施令——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愿意这么做，因为可以借他的名义实现自己很多目标。

比如说黄金。

尽管黄金在欧洲让每个人垂涎欲滴，但在印加皇帝眼里，并非特别珍贵之物。

阿塔瓦尔帕向皮萨罗表示，他愿意用黄金填满自己被关押的房间——那个房间长约6.7米，宽约5.2米——以此来换回自己的自由。皮萨罗同意了。

于是，从1532年12月到1533年5月，在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的命令下，大量的黄金、精美珠宝和工艺品，从印加帝国各处源源不断运往卡哈马卡。

很快，那个关押皇帝的房间就被黄金填满，作为附送，阿塔瓦尔帕又装了两个同样房间大小体积的白银。皮萨罗将这些都熔铸成了金锭和银锭，用船运回了西班牙。

皇帝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西班牙人非常感动，然后还是决定处死他。

事实上，阿塔瓦尔帕在被囚禁期间已经开始主动向西方文明靠拢，一个标志就是他居然学会了国际象棋，并且主动皈依了基督教——在绞索套上他的脖子之前。

但他依旧被西班牙人毫不留情地处死了。

一个600万人帝国的中枢核心，就这样被一个160多人的小队给摧毁了。

7

之后，皮萨罗先后扶植了三个傀儡皇帝，但渐渐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印加人，开始学会了反抗。

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近40年，直到1572年前后，西班牙人才完成了对印加帝国的完全征服。在这期间，西班牙人凭借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以及南美大陆人完全缺乏免疫力的天花等病毒，将整个印加帝国的人口直接消灭了近90%。

不过，皮萨罗自己并没有得到一个好归宿。

由于获得了太多的金银珠宝，皮萨罗和手下出现了分赃不均的问题，他原来的忠实追随者阿尔马格罗就是起兵反叛者之一，在进攻皮萨罗失败后被处死。

但是，皮萨罗也没有就此高枕无忧，1541年6月26日，一群阿尔马格罗原来的追随者再度起义，冲入了皮萨罗高高在上的宫殿，杀死了这位66岁的冒险家。

据说，在临死之前，皮萨罗在地上画了个十字。

馒头说

有两款游戏，曾经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一款是微软的《帝国时代》系列，一款是席德·梅尔的《文明》系列。

在玩这两款游戏时，你都会有一种非常震撼的体验。当你拼命加速发展文明之后，去征服一个比你落后得多的文明，就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在《帝国时代》中，你只用一个“铁器时代”的枪兵，就可以横扫一群“青铜时代”的武士；而在《文明》里，真的可以只派出一队坦克，就把对方处于农耕文明时代的骑兵步兵全部扫平，顺带享受摧毁他们投石车的快感。

不要以为这只存在于游戏中，现实生活中真的发生过，比如皮萨罗的100多名西班牙殖民者，居然屠杀了几千名印加武士，顺带摧垮了数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

我上初中时写作文，写到一半自己会义愤填膺、双手握拳：“堂堂拥有100多万军队的天朝大国，居然会被区区几千侵略者堂而皇之地登陆上岸，烧杀掳掠……”

很多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背后是有道理的。

历史的解读因解读者的立场不同而不同，有人看到的是皮萨罗的勇敢和决心，有人看到的是西方殖民者的贪婪和残酷。

但有一点，恐怕是所有人都深以为然的，那就是：

落后，真的，真的，真的是要挨打啊！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印加帝国覆灭记》（陶短房，搜狐网，2018年8月24日）

2.《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查尔斯·曼恩著，胡亦南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3.《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的文盲殖民者》（蒋美晴，参考网，2017年7月8日）

4.《印加帝国的末日》（金·麦夸里著，冯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5.《人类简史》（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6.《皮萨罗血洗秘鲁——印加帝国的覆灭》（代彭康，《文化译丛》，1989年第1期）

7.《试论美洲印第安人沦为被奴役地位的历史教训》（朱世广，《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6期）

日俄战争：一场中国土地上的权力游戏

这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一场战争，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涉及较少，因为交战国不是中国。但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且是一个反映当时中国地位的绝好案例。

1

如果把日俄战争比作一局大棋的话，那么第一颗棋子的落下，要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说起。

甲午一战之后，清政府除了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之外，还答应了一系列附加条件：承认朝鲜归日本控制，并割让辽东半岛。

然后，俄国就拍桌子跳了起来。

按理说，这是只涉及中日双方的事，俄国人急什么呢？那是因为俄国不仅觊觎辽东，还早就把中国的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可以说准备将其纳入自己国家的版图，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为此，俄国拉来了自己在欧洲的两个盟友德国和法国，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这就是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

由于日本在甲午一战中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所以在清点了自己的筹码之后，只能再向清政府敲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被迫归还了辽东半岛。

虽然半岛是还了，但日本人的梁子却结下了——他们不恨中国人，恨俄国人。

然后就到了1900年，第二颗棋子又被埋下：“义和团”运动爆发了。

因为“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组成了近2万人的军队直扑天津和北京。有意思的是，其他国家的军队打着“解救本国大使馆和侨民”的旗号，好歹去的是直隶方向，而俄国却立刻发动15万军队大举进攻根本没有什么“义和团”的东北，随后占领东北全境。在其他国家军队都撤出北

京之后，俄国没有一点要撤军的意思——就是准备赖着不走了。

眼看俄国就要实现它所谓的“黄俄国计划”，独占中国的东北全境，这回轮到日本坐不住了（清政府把消息透露给了日本）。日本拉着英国和美国开始干涉，要求俄国必须撤军。这回轮到俄国清点自己的筹码，算下来觉得和列强作对不值得，最终签署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被迫承诺在一年半之内全部撤兵。



八国联军侵华时的俄国军队。在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俄国还索要了最多的“庚子赔款”份额

于是，东三省算是还了，但俄国人的梁子也结下了——他们也不恨中国人，恨日本人。

其实这两个国家互相仇恨本来就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因为它们对领土和利益的诉求高度重合——虽然领土和利益都是属于它们的邻居的。

一个是老牌帝国主义，一个是新兴帝国主义，围绕着邻居家的那块好地，开始摩拳擦掌。

其实它们都知道，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了。之所以还不打，只是因为双方都要盘算一下自己背后的盟友和手上的筹码。

日俄战争在台面上是一场单挑，但在台面下，其实是一场群架。

以日本当时的情况，虽然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家实力迅速膨胀，但要单挑堪称“巨无霸”的俄国，它心里也是没底的。好在，它的身后站着英国和美国。

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俄国视为自己在中国的利益竞争对手，尤其担心侵占中国的东北以后，俄国会继续渗透到长江以南——那是英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区域。再加上同为岛国的惺惺相惜感，英国于1902年1月30日与日本在伦敦签订了同盟条约，主要目的就是共同对付俄国。

而美国因为进入中国比较晚，利益基本都已被列强分光，在试图插足东北时，好几次都被俄国拒之门外，所以也希望借助日本来对抗俄国。

俄国的背后也站着欧洲两强，那就是法国和德国。



清末被列强瓜分的中国蛋糕

法国和俄国在1902年同样缔结了同盟。法国对俄国的主要诉求倒不是在华利益，而是希望俄国能够对德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让德国始终保持一种两线作战的状态。

德国和俄国并没有盟约，但德国支持俄国在远东扩张。除了和日本的势力范围有冲突外，其实德国的主要目的是对抗法国。德国最希望的就是俄国在远东大干一场，甚至直接和英国爆发矛盾，因为这样的话俄国就会把西线的兵力调到东线，从而大大减轻德国的压力。

台面下各自啦啦队的基本实力相当，那么台面上的两个拳击手实力究竟如何呢？

3

应该说，如果以举国之力来衡量的话，日本当时绝不是俄国的对手。

俄国当时的人口达到了1.4亿，拥有陆军常备军104万，后备役军人375万——这个数字别说日本，连欧洲列强看了，都心里发毛。在海军方面，俄国海军拥有200多艘战舰，日本海军主力舰还要向英国购买，而俄国的战列舰都已经实现自己建造（法国人设计）。

但俄国当时也面临三个巨大的问题。

第一，军队主力都部署在西线，在东线的远东地区只有10万左右的兵力，海军在远东也只有60多艘作战舰只。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贝加尔湖段并没有完全开通，从欧洲运兵到亚洲的远东，火车需要开6个星期的时间，每昼夜只能开两至三列军车。

第二，俄国军队的数量虽然庞大，但技术和指挥水平普遍落后。有线电报电话只配备到集团军和军，师以下部队还是靠骑马甚至徒步通信。在全世界已普遍进入火药时代时，俄军不少将领还是崇尚当年库图佐夫击败拿破仑远征军的刺刀白刃战战术。

第三，俄国人非常轻视日本人，或者说轻视黄种人，称日本人为“猴子”。当时他们做出的判断是，一个俄国士兵能打三个日本士兵，在远东根本不需要打大仗，只需要做一次“餐后散步”，就可以“教训一下日本人”。

相比之下，日本虽然国力逊色，但备战比俄国要认真得多。

当时日本的总人口大约为4400万，陆军大约37.5万人，战时可动员后备役为200万出头。海军是当时日本的骄傲，大约有作战舰只80艘，绝大多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新型军舰。

虽然国力和军力不如俄国，但日本当时也有三个优势。

第一，日本对俄作战蓄谋已久。从中国清政府手里拿来的2.3亿两白银赔款，日本把相当一部分投入了军备。从国家开支看，日本在1893年到1894年的开支是8400万日元，而到了1897年就增加到了2.4亿日元，其中军费增长是最大头。

第二，日本在中国东北战场能一下子投入超过25万兵力，鉴于俄国糟糕的后勤运输能力，在俄国把主力部队运来之前，日本在东北战场能形成绝对优势。

第三，日本陆军中的很多军官留学德国，部队里也有很多德国教官，整体的战术思想和战斗素质要高于俄军。日本的军舰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精，舰队的高级军官都留学过英国，指挥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都很强。



俄国装甲巡洋舰“佩列斯韦特”号停泊于旅顺港。这艘军舰建造于1898年，其引擎能提供14500马力的动力，使它能轻易达到每小时18节的航速。军舰上装备有大炮70多门，多数为速射炮，并有6个鱼雷发射管。这些大炮的射程超过3英里（约4.82千米）。日俄战争期间，这艘军舰给日本海军带来了极大压力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双方都知道一场战争在所难免，而俄国希望能够拖得越晚越好，便于自己再做一些准备，而日本希望越快开战越好，在俄国尚未调集主力以及防御工事还没修好之前，一举歼敌。

于是，1904年2月8日，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终于由日本率先打响。

4

如果要把日俄战争概括一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三场陆战、一场海战。

第一场战役是辽阳会战，这是场颇有戏剧性的惨烈会战。

辽阳会战是从1904年8月正式打响的。日军投入了13.5万人和近500门大炮，开始强攻俄军的重要据点辽阳。而守卫辽阳的俄军有16万人、近600门大炮（开战后俄国开始往远东疯狂运兵）。从双方兵力对比来说，俄军处于优势，且是防守方，物资也非常充足，所以俄国远东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下达的命令是“誓死守住辽阳”。

但问题是，俄军在整个日俄战争中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保守：每次战斗往往要留50%以上的部队做预备队，有的战线甚至要留到70%以上。与之相反的是，日军在进攻中完全不留预备队，全军出击，这样反而在局部阵地上形成了兵力优势。

即便如此，俄军确实也进行了殊死抵抗，导致日军的进攻进展缓慢，死伤惨重。战斗打到9月3日清晨，日军其实已经撑不住了，计划在早晨将投入进攻的第一军撤回。但就在日军决定撤退前2小时，不了解敌情的俄军也撑不住了，决定先行撤退回奉天（今沈阳）。这也使得战场上出现了滑稽的场面：两方都要撤，守方先撤了，进攻方也无力前进——直到9月4日，日军才将信将疑地进占空无一人的辽阳。

这场战役，俄军伤亡2.7万人，日军伤亡1.4万人。

第二场战役，是旅顺争夺战，这是整个日俄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战

役。

日俄战争的开端，就是从日本联合舰队突袭旅顺港开始的——当时旅顺港内的俄国海军明明已经知道日俄谈判破裂，却还在庆祝司令史塔克夫人的命名日。



当时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大山岩，他是日俄战争中日军的总指挥

旅顺港是俄国1898年强行从清政府手里租来的，是他们在远东梦寐以求的“不冻港”，所以要拼尽全力死守。而这个港口的存在严重威胁日军的海上运输线，所以日军也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

在甲午战争中，日军只花两个小时就拿下了旅顺要塞，考虑到俄军的战斗力比清军强悍，他们的预估时间是一周。但没想到这场残酷的争夺战从1904年的2月一直打到12月，一共打了10个月。日军前后投入了近10万兵力，而俄国的守军也超过了4万。



乃木希典在旅顺的攻击方式后来被称为“肉弹”攻势，当时日本国内有不少母亲痛哭着去乃木家的房子外扔石头，要他为自己的儿子偿命。乃木希典在回国后的庆典上自己也痛哭流涕，希望能够剖腹谢罪。1912年明治天皇病逝后，乃木希典和夫人为了追随天皇，双双剖腹自杀。因为所谓的“忠诚”，在大正和昭和年间，乃木希典被奉为日本的“军神”

日军在进攻旅顺战役中的总指挥是日本著名的将领乃木希典，这位带着自己和儿子的三口棺材上战场的“军神”虽然毫不惧死（两个儿子先后在战场上阵亡）且意志坚定，却对近代化的攻防体系并无研究，还是一味信奉步兵成集团的敢死冲锋。结果，漫山遍野头缠白布的日本兵毅然决然地冲向俄军阵地，全部成了坚守在加固工事内的俄军机枪的活靶子。

日本军部原本想撤换乃木希典，但当时的明治天皇深知，一旦撤换，看重荣誉的乃木希典肯定会剖腹自杀，所以坚持不肯撤换。军部最终派去了一个深谙炮兵战术的儿玉源太郎任总参谋长，替代乃木希典指挥第四次总攻旅顺的战役。儿玉源太郎动用调配过的炮兵狂轰后发动总攻，只打了8天，就一举拿下了之前几个月都没拿下的203高地。

失去203高地的庇护后，旅顺要塞内的俄军军心溃散，在1905年1月2日向日军投降。当时要塞内俄军还有3.2万人，火炮610门，炮弹20.3万发。

这场旅顺攻防战，日军损失了6万人以上。

第三场战役就是“奉天会战”，是日俄双方在陆地上的最后总决战。

这场会战也是整个日俄战争中最大的一场会战，日军集结25万人总攻困守在奉天的37万俄军。与之前一样，兵力占优势的俄军因为一系列的指挥错误，最终只能被迫撤出奉天。

这一战，俄军损失12万人，而日军也付出了7万人的代价。

奉天会战之后，日本人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在整个东北战场上已经奠定了绝对优势。而俄国沙皇政府还不甘心失败，继续向远东增兵。

在整个增援过程中，让沙皇抱最大希望的，是从欧洲赶来增援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

经典的“对马海战”即将拉开帷幕。

5

抛开立场等问题不看，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足以成为世界海战史上的经典战例。

事实上，俄国的舰队当时能够抵达战场，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了。

当时的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被日本联合舰队打残，龟缩在海参崴港口里不敢出来，完全丢掉了制海权。沙皇震怒之下，决定将波罗的海舰队改名为“第二太平洋舰队”赶来增援。

当时俄国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哪里呢？既然原来叫“波罗的海舰队”，自然在波罗的海港。波罗的海港在哪？在欧洲。那怎么过来？绕半个地球过来。

增援的命令在1904年4月传达，但由于俄国政府程序复杂和官僚习气严重，经过长达半年的各种文件传达和准备，第二太平洋舰队大大小小数十艘军舰才从基地拔锚起航，准备远赴亚洲增援。

第二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舰吨位都超过了1万吨，所以无法抄苏伊士运河的近道，只能沿着非洲海岸线南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后再到亚洲的远东。当时的军舰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燃料，但由于受中立法规影响，俄国舰队不能沿途靠港补给，没有海外基地的俄国只能从德国那里租借了70条煤船一路跟随，沿途补给。好在德国和法国还算是俄国背后的盟友，后来开放了一批海外殖民地港口给俄国舰队补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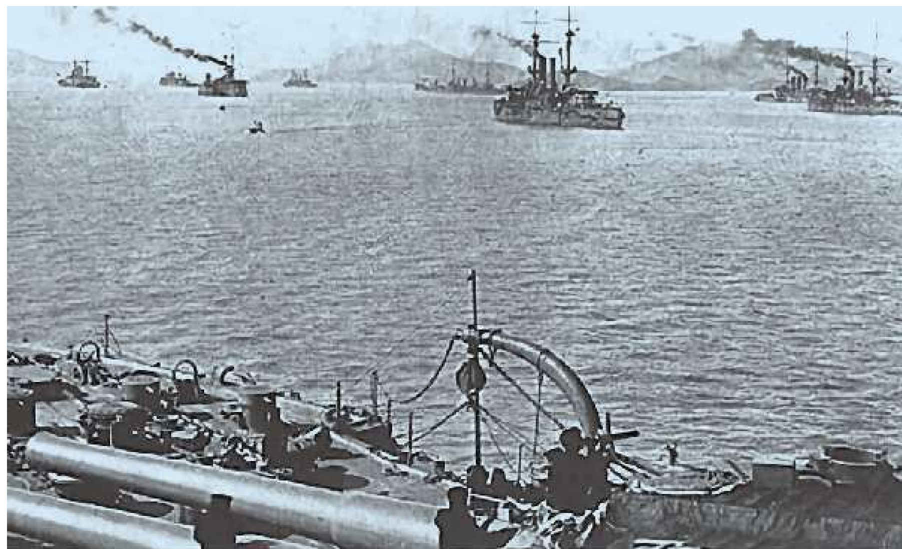
但即便如此，整个舰队的行进路线也已经非常吓人——全程超过3万公里。而且一路上为了减少补给，俄国军舰上都尽量多堆煤，从甲板到厨房甚至军官的卧室里都堆了煤，整个舰队上下又脏又乱，再加上天气炎热，人心思归，一路航行，士气一路跌落。

1905年5月27日，在经历了整整7个多月的航行后，俄国这支风尘仆仆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中途集结“第三舰队”，大大小小38艘舰艇终于赶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州之间的对马海峡——离进入海参崴军港也就一步之遥了。

而在那里等候他们的，是由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早已严阵以待的日本联合舰队全部主力。

1905年5月27日下午2点，两支舰队狭路相逢，对马海战正式拉开战幕。

在开战之初，东乡平八郎率领的联合舰队行进在俄国舰队的前方，他忽然下令进行一个U形大转弯——这也是被后来日本人津津乐道的“敌前大回头”。这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因为在转弯的过程中，日本舰队是无法开炮的，等于成了俄国舰队的活靶子。



出战前的日本联合舰队

但是当时海面上起了一层薄雾，双方都估远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如果当时知道距离那么近，东乡平八郎不会下这道命令；而俄国舰队如果意识到距离如此之近，早就下令开炮了。

在短短的黄金5分钟之后，日本舰队已经取得了有利的进攻位置，俄国舰队瞬间陷入猛烈的炮火攻击之中。

长途远征的俄国海军在战斗中还是显露出了剽悍的战斗民族本色，不少舰艇在沉没过程中还不断炮击日舰并造成伤亡。但整场海战中，日本海军表现出了更高的战斗素养，水兵配合娴熟，炮击点位准确，经过改良的“下濑火药”也杀伤力巨大。

这场海战历时两天，当中经过追击和迂回，直到5月29日清晨才宣告正式落幕，而结果让西方国家大吃一惊。

强大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38艘战舰，被击沉16艘，自沉6艘，被俘7艘，逃往中立国6艘，回港3艘，损失舰艇共27万吨，阵亡4830人，被俘6106人，堪称全军覆没。

而日军仅仅损失了3艘鱼雷艇，不到300吨，亡117人，伤583人。

对马海战摧毁了俄国人最后一丝信心，1905年9月5日，俄国被迫和日本签订合约，做出了一系列让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将辽东半

岛、旅顺口、大连湾的租借特权都转让给日本；将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线，以及附属的权利、财产和煤矿，都转让给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日俄双方签订《朴次茅斯和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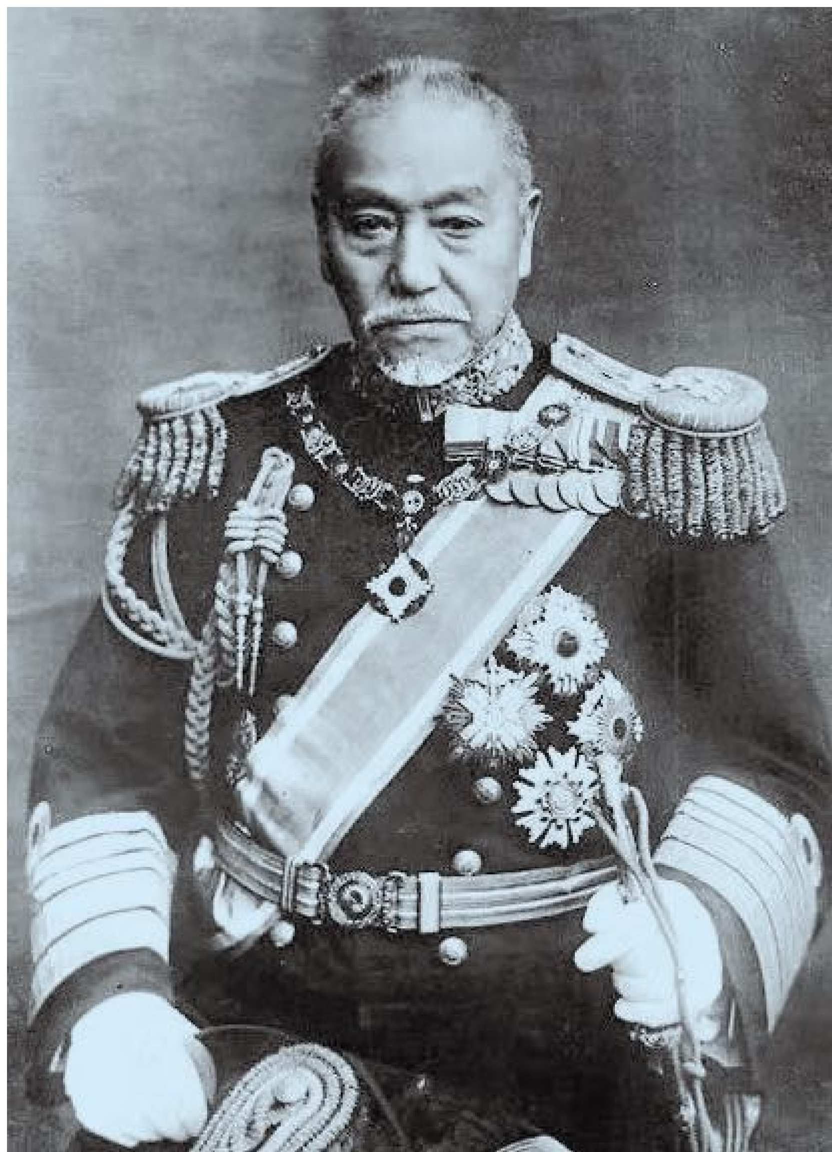
6

但日俄战争所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俄国让出几个岛那么简单。

从俄国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显然失败了，并且大大动摇了沙皇的威信和执政根基，为后来的国内革命埋下了引线。但对于疆域辽阔的俄罗斯帝国而言，发生在远东的这场战争只是“局部战争”，整个帝国的国力和筋骨还没有被伤到。

而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他们拼上了全部的国力，是“举国之战”。在对马海战开战前，东乡平八郎曾对将士说：“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各员一层奋励努力！”这倒也不是一句纯粹激励的话，因为如果联合舰队失败，陆军再失利的话，等待日本的命运就是亡国。

为了这场战争，日本花费了近20亿日元，还借了近10亿日元的外债（英美两国不断在给日本输血，没有它们的资助，日本半年也撑不了）。所以，在和谈中，日本向俄国另外开出了30亿日元的天价索赔款。但是俄国沙皇就回了一句话：一分钱不赔，不服的话就继续打。



在对马海战中立下大功的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东乡平八郎，在战后也被日本视为“军神”，并成了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山本五十六的偶像

日本最终只能放弃赔款。它有什么办法吗？一点办法都没有，一是自己已经打不动了，二是即便打得动，如果俄国把西线的主力调过来，日本自恃打得过吗？

而换个角度来看，日俄战争也改变了西欧列强对俄国和日本的看法——它们本来就是这场战争背后的重要角色。

列强对俄国的看法无疑是失望的，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岛国打败，大家随即重新调整了对俄国的评估。尤其是德国，经此一战看出了俄国的孱弱，这也给它增添了不少信心，以至后来敢冒着两线作战的风险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英美也开始对日本的实力刮目相看。经过日俄战争，尤其是对马海战，日本海军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次于英国和法国的第三强舰队，这也进一步让英美对日本有所忌惮，在亚洲采取与日本交好的政策——只要不涉及我的利益，随你怎么弄。这也为之后二战期间英美的远东绥靖政策埋下祸根。



192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规定当时五大海军强国英、美、日、法、意建造的军舰吨位比例是5：5：3：1.75：1.75。可见日本当时超越法国和意大利传统两强，依旧位居世界第三海军强国

当然，日俄战争也大大影响了日本对自己实力的评估。

经过这场战争，日本虽然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对自己实力的信心空前暴涨。如果之前击败大清帝国还只是让他们高兴的话，那么这次世界上第一次“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战争，给日本全民注入了一股谜之自信，自认大和民族确实受到天照大神的眷顾，不管敌人看上去有多强大，只要万众一心，肯定能够战而胜之。

曾有很多人怎么也想不通：二战期间日本怎么会去招惹比自己强大

得多的美国？那种自信与疯狂，相当一部分就源自日俄战争的胜利。

馒头说

在整个日俄战争中，最痛苦的国家，可能就是中国。

在这场发生在自己国家土地上的战争中，中国扮演的角色，是“中立”。

这无疑是相当屈辱的。别人在你的家里面打得稀里哗啦，把你家的锅碗瓢盆砸得稀巴烂，但你还只能站在一边：打可以，注意时间，注意影响，别打到我们家卧室。

但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当时如果不保持中立，又能怎样？

帮俄国？俄国侵占了我们整个东北，我们帮了它，东北什么时候能还回来？而且就算胜利，因此激怒日本的话，今后日本人不在东北闹了，却来东南沿海一直骚扰怎么办？

帮日本？日本对我们一直野心勃勃，它又不是在为我们打架，而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如果日本胜利，也会因此激怒俄国，俄国在东北退却了，却骚扰中国的西北，漫长的边境线何时能够安宁？

那两边都不帮，叫它们滚出中国？得了吧！如果能做这个选择，人家也不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来了。

所以，“中立”只能是最屈辱也最无奈的选择。

当然，说是中立，但在整个日俄战争中，清政府还是暗中支持日本的，在炸药、情报甚至人力上都给日本很多帮助。为什么？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总的格局看，俄国若胜，肯定侵吞整个东北，而日本若胜，最多把给俄国的几个岛和港口转交给它，再付一点酬劳而已。

最后的结果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但是否应该因此感谢日本人帮我们赶跑了俄国人，保住了东北？那也完全没必要。日本经此一战，接管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借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的租借地，开始慢慢向中国东北渗透、生根、发芽，愈演愈烈，最终在1931年9月18日露出了等待已久的獠牙。

所以，所谓的“以夷制夷”，只能是在自己孱弱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最终结果必然是与虎谋皮。

还是那个观点：把自己搞强大，才是最正经的道理。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1904年度事件：日俄战争》（腾讯历史“转型中国1864—1949”专题，责编谌旭彬）

2.《在日俄战争期间，为什么很多中国人支持日本获胜？》（搜狐历史，“鬼说天下”，2016年10月3日）

3.《日本为日俄战争付出的代价有多惨重？》（微信公众号“非常历史”，2018年2月21日）

4.《略论日俄战争对远东与世界国际关系的影响》［沈传旺，《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2014年第16期］

美墨战争：一场“老大”对“老二”发动的掠食战

从世界战争史上看，美墨战争并不是一场规模很大的战争。但这场战争却给两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实想想也是：一场造成2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易主的战争，影响怎么可能不大？

1

当时间进入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确实有些按捺不住自己驿动的心了。

这个1787年正式确立联邦制的国家，在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后，北部的工业化和南部的农业化齐头并进，已经俨然成了北美洲的第一强国。尤其是18世纪末在美国开始的工业化革命，以交通运输业的茁壮发展为标志，公路、运河、铁路的大规模开建，辅以美国人率先发明的蒸汽机车、蒸汽轮船，将东北部工业和西南部的农业迅速联结。（当时美国南部的棉花产量已经达到了全世界的2/3。）

到了1840年的时候，昔日一穷二白、靠农业立国的美国的GDP已经达到了16亿美元左右，开始超过“老大哥”英国GDP的一半了（12年后首次超越英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开始不再满足于自己狭小的国土了，一种叫“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的理论开始在全美弥漫开来。

“天定命运论”总结下来，主要是三点。

第一是“立国”的天意——北美洲建立自由、联合、自治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天定的命运。

第二是“扩张”的天意——“上帝早就做了决定，西半球是美国人的，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或许从北极到南极。”

第三是“民主”的天意——“民主制度是如此尽善尽美，以至不会受到任何国界的限制”，“它不是帝国主义，是强行拯救”。



这幅名为《美利坚向前行》（*American Progress*）的画作大约在1872年绘成，作者是约翰·贾斯特（John Gast）。这幅画是“天定命运论”的一种寓言式表现手法：在图中，一个天使般的女人（有时被视为哥伦比亚，美国19世纪时的拟人化象征）带着“文明”之光与拓荒者一同西行，在路程中串起电报线，印第安人以及野生动物窜逃入前方的黑暗中

总的来说，美国的精英阶层认为：在上帝的庇护下，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自由与优越的共和制度，美国人既是“上帝的选民”也是“自由的人”。所以，他们的国土注定要横贯北美洲，直达太平洋。

在“理论正确”的前提下，美国开始了大张旗鼓的领土扩张。

1803年，美国以1500万美元的代价（差不多每亩土地3美分），从法国手里购买了大约215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这块土地基本上和美国当时自己的国土面积相当，占目前美国国土的22.3%。

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到了佛罗里达。这块土地面积是15万平方公里左右。

经过这两次扩张，美国的国土面积已经多了一倍不止，向西扎到了北美洲中部，向南触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再加上本身就东临大西洋，美国成了一个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国家。

但是，这样的局面还不能让美国满意——他们的西面还没有接通太平洋。

想来想去，美国人的眼光，就落在了当时北美洲的“老二”身上。

2

在加拿大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墨西哥应该算是北美洲的“老二”了。

事实上，无论是从历史积淀还是领土面积上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墨西哥才是北美洲的“老大”。

墨西哥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的奥尔梅克文明，而阿兹特克帝国雄霸北美洲大陆的时候，美国在哪里都还不知道。但是，当西班牙殖民者带着先进的武器和北美大陆从没经历过的瘟疫、传染病到来后，昔日的北美洲霸主就此一蹶不振。

墨西哥的独立战争从1810年开始，打了整整11年才赶走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者，于1821年独立建国，成立了共和国。

独立后的墨西哥，几乎拥有整个北美大陆西面靠近太平洋近2/3的绵长海岸线，如果只从领土面积计算，墨西哥当之无愧是当时北美洲的第一大国。

但是，有这么大的国土面积和那么良好的开局，墨西哥人却有些暴殄天物。

墨西哥独立之后，政局一直长期处于动荡中，各种政治派别的互相斗争，导致从1821年到1850年的短短29年间，墨西哥居然出现过50个政府。而从1824年到1848年的24年时间里，墨西哥发生过250次军事政变，更换过31个总统——其中1841年到1847年的短短7年间，就换掉了21个总统。

长期的政坛混乱，导致墨西哥的经济从来就没踏上过正轨，整个国家在农业化程度上都非常落后，遑论工业化。

当一片大陆或一个大洲出现两强格局，而其中的一强明显开始孱弱露出破绽的时候，另一强就会开始变得心痒难耐。

3

美国人最初是从得克萨斯州下手的。

得克萨斯原先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西班牙殖民者被墨西哥人赶跑以后，成为墨西哥科阿韦拉—特哈斯州的一部分。由于当时的得克萨斯地广人稀，所以墨西哥政府欢迎大量外来移民，恰逢美国的“西进运动”兴起，得克萨斯这片土地上的美国人就开始越来越多。

到了1830年的时候，墨西哥政府自己也意识到了危机，于是下令“禁止美国移民再度进入得克萨斯”——当然，以当时墨西哥的实力，也无法去修筑一道“边境墙”。

1835年，定居到得克萨斯的美国移民人数已经达到了35000人，相当于原住民的9倍，新移民和墨西哥政府的矛盾开始越来越尖锐——墨西哥人希望在得克萨斯的美国移民说西班牙语，信奉罗马天主教，但这是不现实的。终于，在1835年的时候，得克萨斯的美国人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宣布独立，进行了一场起义。

墨西哥政府随即派出大军征讨。战事之初，力量薄弱的所谓“得克萨斯军”并不是对手，也正是因此，自我感觉良好的墨西哥时任总统桑塔·安纳决定“御驾亲征”。然而，就是因为他的轻敌和麻痹大意，在著名的圣哈辛托战役中，骁勇的得克萨斯人发动奇袭，一举生擒了他。被俘后的墨西哥总统只能被迫承认得克萨斯独立。

随后，得克萨斯在1836年宣布独立建国，国名为“得克萨斯共和国”，以格兰德河为边境。因为国旗上有一颗星，又被称为“孤星共和国”。

此时的墨西哥心里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墨西哥国会表示这个协议是总统在被胁迫之时做出的，一直不承认得克萨斯共和国的合法性。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了9年，在这期间，处于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得克萨斯共和国”因为受到挤压，不断向美国“抛橄榄枝”，希望能够加入联邦。但由于当时北方和南方的意见不统一（北方拒绝，希望避免和墨西哥开战；南方同意，因为需要奴隶州增加奴隶数量），美国几次拒绝了这个请求。

等时间到了1845年，国力大大加强且眼看时机成熟，美国南北双方关于“必须得到得克萨斯”的意见也趋向统一——南方的奴隶主希望得到土地，北方的工商界希望得到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沿岸港口。再加上新上

任的波尔克总统是一个标准的“大陆扩张主义”者，所以美国终于公开宣布：如果得克萨斯共和国愿意加入美国，那么美国将承认格兰德河是它的边境。

得克萨斯共和国随即宣布加入美利坚合众国，成了美国的第28个州。

墨西哥遭受这般奇耻大辱，一直怀恨在心，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一点是——

美国并没有因此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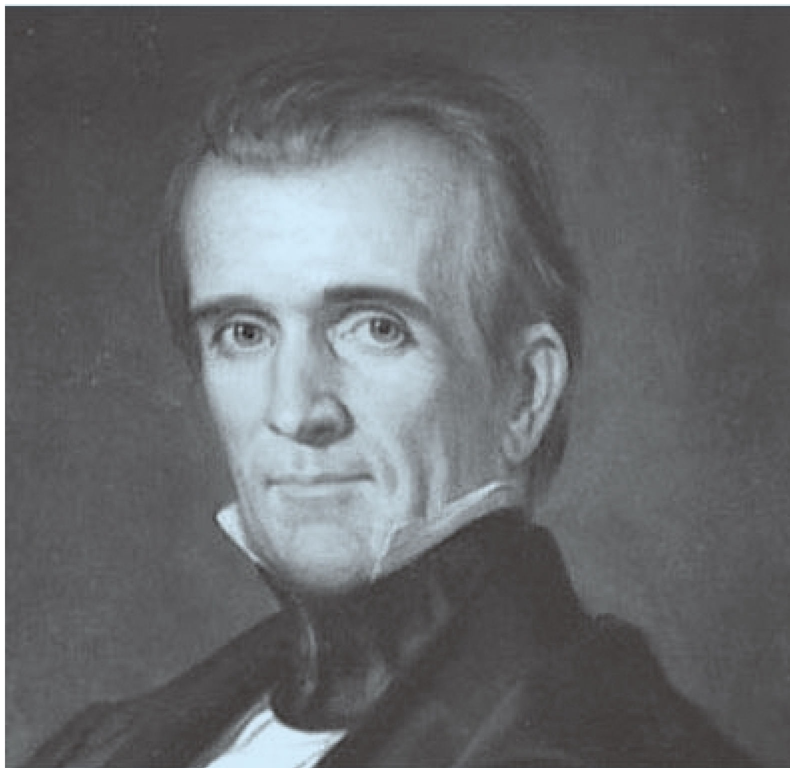
4

美国最眼馋的，是当时属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

美国最初的想法是用金钱购买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早在1835年，时任美国总统杰克逊就提出了一个方案：以55万美元的代价，从墨西哥手里购买旧金山港口及其以北地区。这个提议被墨西哥政府断然拒绝。

到了1845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波尔克又提出了新的方案：以1500万～4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加利福尼亚以及新墨西哥的所有土地。这个提议再次被墨西哥政府拒绝。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是美国第十一任总统，在1845年就任，任期只有一届。但在他的这一届任期里，美国国土扩大了一倍。据说波尔克一天要工作18个小时，这也导致他的健康大受影响，在卸任离开白宫后三个月就离世，终年54岁

在两次出价均被拒绝后，美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不通过武力，是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再拿到什么了。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其实也并不怎么新鲜：我们被墨西哥侵略了。

1846年1月13日，波尔克总统命令泰勒将军率领美军占领了在历史上从来不属于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左岸。墨西哥军队进行了反击，双方都有士兵阵亡。不过，波尔克总统对国会的说法是：“墨西哥在反复进行威胁之后，终于越过我国领土的边界，已经侵入我国领土，使我国公民的鲜血流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1846年5月11日，波尔克总统在致国会的战争咨文中声称：“我们的忍耐已达到极点！……实际上战争已经存在，我们的领土已遭入侵！”

就在当天，美国众议院以174票比14票通过了宣战决议。次日，参议院又以40票比2票批准了宣战决议。

1846年5月13日，美国正式向墨西哥宣战。

5

虽然这是一场一个大洲“老大”和“老二”的战争，但形势几乎是一边倒的。

墨西哥当时拥有一支3.2万人的军队，数量其实是超过美国的。但墨西哥当时还只能算是一个农业国家，在军工、科技和装备方面明显不如美国。外加墨西哥政局连年动荡，军队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军官指挥水平糟糕，士兵缺乏训练，纪律涣散，战斗力非常低下。

反观美军，虽然与现在的美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在北美大陆基本也是可以横着走的。当时美军的常备军不到9000人，但通过义务募兵制，再加上海军陆战队，部队接近10万人，且拥有更先进的来复枪和大炮，以及墨西哥没有的海军，所以无论是在装备还是在训练素质上都远胜对手。

于是，这场战争就成了美国吊打墨西哥。

战端一开，美国就水陆并进，兵分三路侵入墨西哥，三个月内，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洛杉矶、旧金山、圣迭戈等重要城市全部被美军占领。

得手后的美军为了迫使墨西哥无力抵抗，继续增兵，开始向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进军，一路上攻克了墨西哥诸多传统大城市和要塞，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激烈抵抗。一路上，墨西哥军队由于在装备和部队素质上与美军有着巨大差距，几乎溃不成军，到后来只能依靠游击战术来拖延美军进军的步伐。



美墨战争时期美国方面的宣传画

战争进行到1847年8月的时候，美军终于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团团围住。

在这场保卫首都的战役中，墨西哥人终于拿出了最后的血性。当美军向墨西哥城发动总攻的时候，当时墨西哥军事学院的学生兵们也都拿着武器冲了出来，战斗到最后一人。9月13日墨西哥政府撤退，美军于次日穿着崭新军服进入墨西哥城的时候，四处埋伏的墨西哥狙击手们突然同时开火，双方再度陷入惨烈的巷战，光那一天美军就伤亡近900人，几乎相当于之前伤亡人数的总和。

事实上，即便美军占领了墨西哥城，墨西哥全境的抵抗也都没有停止，很多墨西哥人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继续和美军打游击。不过，墨西哥政府似乎并没有继续抵抗下去的意图，在1848年1月向美军投降议和。

在这场战争中，墨西哥大约阵亡了2.5万名官兵，而美国也阵亡了1.3万人，只是美军直接在战场阵亡的只有1700人，其他人受制于美军当时糟糕的后勤补给，大多死于疾病和伤口细菌感染。



美军占领墨西哥城

但对于墨西哥人而言，最大的失败不在战场上，而是在谈判桌上——当然，在战场上输掉的，在谈判桌上本来就拿不回来，只会赔得更多。

根据双方在1848年2月2日签订的《瓜达卢佩—希得尔戈条约》，墨西哥向美国割让了加利福尼亚（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仍属墨西哥）、内华达、犹他的全部地区，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怀俄明的部分地区。

墨西哥割出去的国土面积达到230万平方公里，如果再加上之前丢掉的得克萨斯，墨西哥等于失去了自己国土面积的一半。

作为一个补偿面子的“台阶”，美国付出了1500万美元的“购买款”，并免除了墨西哥325万美元的债务，总共代价是1825万美元。

6

这场战争，无疑给墨西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是领土。墨西哥失去的2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原来是本国最肥沃的土地，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铜矿、锡矿、硫黄、钾盐等，而加利福尼亚绵长的太平洋海岸线还有许多优良的港口。

其次是经济。墨西哥在19世纪后期开始正式启动现代化，而那时欧

美国家已经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石油和矿产成了重要资源，墨西哥恰恰失去了大量的优势资源，导致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最后是社会影响。由于大片的土地被划归了美国，那片土地上原有的墨西哥人也成了美国公民，其中有的人选择就此定居，也有很多人选择返回墨西哥。这两批人的后裔子孙的流动问题，给美墨边境的管理留下了很多隐患，其中一些问题延留至今。

反观美国，无疑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了太多东西。

首先自然也是领土。1848年12月5日，波尔克总统在第四个国会年度咨文中承认，从墨西哥那里拿到的领土比以前美国全部土地的半数还多，全国面积增加了60%。

而相对于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加利福尼亚沿岸的优良港口让美国人更看重，因为这等于为美国打开了东方贸易的通道。当然，这也让美国就此成为一个两面临洋的超级大国，正式加冕“北美霸主”。

不过，作为一口气吃进那么多的代价，美国北方的资产阶级和南方的奴隶主也对新并进来的几个州究竟是施行“废奴主义”还是“蓄奴主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双方矛盾因此进一步激化，这也成了十多年后爆发的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引线。

但无论如何，美国通过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得到了一个大大的便宜，就此正式踏上了“超级大国”之路。

只是，这场战争也让一些美国人心中多少怀着一点愧疚。曾经参加这场战争，并在之后南北战争中大出风头，进而成为总统的格兰特，在自己晚年的回忆录中就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这是一场最不公正的强国对弱国的战争。”

馒头说

不少时候，中外名谚表达不同，意思却很相像。

比如中国有句古语，叫“一山不容二虎”，而古希腊哲学家修昔底德也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述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慌，指出

新崛起的势力和老霸主之间大多会爆发战争，这被后世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崛起也是“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种体现，只不过未必像教科书那样一板一眼：美国的独立，是靠与当时的世界“老大”英国的战争实现的；拿走佛罗里达以及之后争得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的利益，是靠与昔日世界霸主西班牙的战争实现的。

至于和墨西哥的一战，看上去墨西哥才是“老二”，但它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美国当时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挑战者”，挑战的是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北美大陆留下的旧框架和旧体系。美国人有迫切的动力和实力，打破这个桎梏，实现自己的崛起。

换个角度看，美国的运气也确实非常不错。与英国火并时，自己的体量离“老二”还差很远，远到英国觉得没必要拼尽全力与之一战；在北美大陆扩张谋求路易斯安那时，欧洲正被拿破仑搅得天翻地覆，拿破仑有意让美国掣肘英国，让美国在遥远的北美捡了个大便宜；攻打墨西哥时，自己羽翼已成，看上去又不对欧洲构成威胁；等到1894年美国GDP跃居世界第一、欧洲列强觉醒过来的时候，欧洲率先掉进了自己大陆的“修昔底德陷阱”——德国掀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欧洲传统强国满目疮痍，而美国因此一骑绝尘，直接成了超级大国。

所以，从一方面看，美国的崛起确实也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修昔底德陷阱”，但另一方面，它的运气又足够好，基本上避开了“修昔底德陷阱”的两败俱伤。与之相反的例子，是德国与日本。

那么，“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必然存在？我个人认为，这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的心态和战略判断。

当一个大国崛起，另一个原先占据优势的大国必然会感到恐慌和警惕，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崛起的大国用历史证明一贯走的是和平之路，在崛起的道路上更多扮演的是参与者、合作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或者索性退一万步，只从利益角度来看，双方的利益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原先处于“霸主”地位的大国，就应该仔细考量一下了。

当然，纸上谈兵，说道理是很简单的，现实中的博弈却很残酷。一念之差，千变万化。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要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两败俱伤，光靠一方努力，是肯定不够的。这是一个双方都需要拿出大智慧、大勇气、大胸襟和大眼界的博弈。

时代总是滚滚向前，国与国之间的未来，肯定是合作大于对抗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道理肯定大家都懂，重要的还是行动。

期待真正的相向而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美墨战争简述》（黄安年，《军事历史》，1993年第5期）

2.《美墨战争和“天定命运”思潮的泛滥》（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3.《1846—1848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方幼封、曹珺，《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天定命运”论与19世纪中期美国的国家身份观念》（滕凯炜，《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

5.《美墨战争：帝国扩张的侵略之战》（唐廊，知乎，2017年5月23日）

6.《美墨战争｜美国如何通过战争成为美洲主宰者》（张晓莉，澎湃新闻，2016年4月25日）

7.《美墨战争：土地的魅力与海洋的诱惑》（刘国柱，《河北学刊》，1995年第3期）

8.《建国史话（62）：得克萨斯从墨西哥独立》（《美国之音》，2009年5月1日）

9.《美墨战争——美国历史上地域的扩张》（吴开胜，《环球时报》，2005年3月9日）

弩炮悲歌：昔日盟友之间的残忍对杀

在二战的历史上，有过很多悲壮和残酷的战役，但对战双方面对的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像本文讲述的这场战役这样的，恐怕并不多见。

1

1940年7月3日凌晨，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

意大利“马可尼”号潜艇的值班观察员惊呆了——通过潜望镜，他看到远处海面上驶来了一支庞大的舰队。

从潜望镜里看到，这支舰队显然是一支英国舰队，因为观察员轻易分辨出了英国皇家海军赫赫有名的“胡德”号战列巡洋舰。

作为交战国，“马可尼”号潜艇立刻全员进入战斗状态，快速向那支英国舰队靠拢，同时，鱼雷也已经做好了发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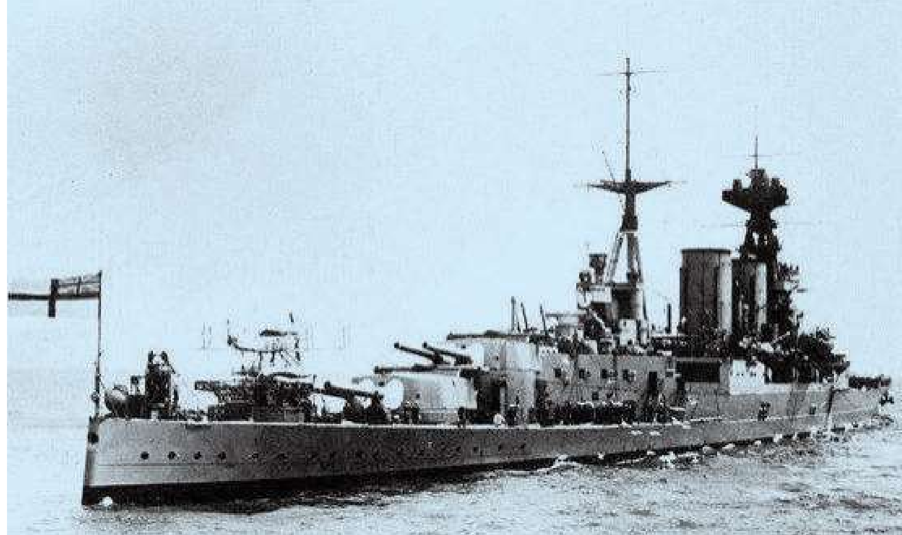
然而，这支英国舰队的航速极快，迅速把“马可尼”号甩到了后面。“马可尼”号只来得及发射几枚完全偏离目标的鱼雷，就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支庞大的英国舰队劈波斩浪地消失在远方。

如此庞大的一支舰队，如此急速地航行，“马可尼”号上不少艇员认为：他们肯定是去执行一次针对德国海军的重大任务。

然而，他们只猜对了一半。

这支由“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作为旗舰，“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同行的庞大舰队，确实是去完成一项重大任务的。

但这项任务的目标并非交战国德国，而是英国曾经的铁杆盟友——法国。



H舰队的旗舰“胡德”号，是英国建造的最后一艘战列巡洋舰，标准排水量达到41758吨，长期作为到各国展示英国海军“帝国威严”的礼仪舰，于1920年服役，到1940年已服役20年

2

这件让人困惑的事情，还要从1940年的5月10日说起。

就在这一天，在入侵波兰后获得充分时间休整和准备的纳粹德国——因为英法盟军“宣而不战”等了德国大半年——出动了136个师，在3000多辆坦克的引导下，分A、B、C三个集团军，潮水般扑向比利时、荷兰、法国、卢森堡等西欧国家，全面点燃了欧陆战火。他们的主要进攻对象，是号称“欧洲第一陆战强国”的法国。

但是战端一开，严阵以待的法国人惊恐地发现，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通行的“高筑堡垒，死守阵地”战术，遭遇了德国人以飞机、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先导的全新“闪电战”打法。在这种“降维打击”下，很多防线的法国守军还没反应过来，德国人已经跑到自己后面去了。尤其是德国A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在“装甲天才”海因茨·古德里安的率领下，直接绕过了法国人认为“万年不破”的马奇诺防线，在色当撕开了一条口子，潮水般地杀入法国腹地。

从5月10日到6月10日，才一个月时间，法国全境就已经被德国打穿，首都巴黎只能宣布为“不设防城市”——12天后，法国被迫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



纳粹德国与法国签订所谓的“停战协定”，堪称希特勒导演的一场超级“行为艺术秀”：他命人将福煦车厢搬了过来，要求法国代表在这节车厢里签字投降——福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著名元帅，以他名字命名的这节车厢曾是一战时德国与英法两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场所

在战前动员了600万战斗人员，在北部驻防200万军队，号称“欧洲第一陆战强国”的法国，才打了一个多月，就被迫投降了。

法国的“闪电投降”，让海峡对岸的英国立刻陷入恐慌。

英国完全没有想到，法国这个在一战时和自己浴血奋战四年最后惨胜的坚定盟友，居然在二战中只坚持了一个多月。

尽管在经历了奇迹般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国把自己的有生力量大多成功撤回了本土，但还是丢失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和物资，能否扛得住此时如日中天的纳粹德国，英国自己心里也完全没有底。

而在英国看来，法国还留下了一颗“大地雷”。

根据法国和德国签订的“停战协议”，法国领土的60%被德国占据，南部40%的领土成立法国元帅贝当领衔的傀儡“维希政府”，法国投降后残存的军事力量都由“维希政府”管辖。

法国残留下来的陆军对英国而言意义不大，因为英国本身就没有能力登陆欧洲大陆去对抗德国；法国的空军在抵抗德军进攻的时候，已经基本被打残，也失去了威胁。

真正让英国担心的，是几乎毫发未伤的法国海军。

当时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以至英国完全没有信心能够抵御德国空军48小时的空中进攻。

3

法国的海军，曾经长期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早在殖民时期，法国的海军就是仅次于英国海军的世界第二强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国力衰退和“先陆后海”思想的影响，法国的海军力量渐渐被美国和日本超过，但依旧还能排到世界第四。

1940年，法国海军拥有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12艘、各型驱逐舰50余艘、各型潜艇共101艘——这个实力超过了德国和意大利两国海军的总和。而且法国海军的大多数主力舰，都是刚刚建造的，战斗力很强。

但是，由于法国在陆战中的脆败，海军还没能有用武之地，就等来了政府宣布投降的消息。

此时的法国海军就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到底听谁的？

听德国的？这超出了法国海军的荣誉底线。听法国政府的？眼前的这个政府已经投降了德国。那么，听英国的？英国倒是在法国投降的第一时间就发来了请求：请法国海军第一时间编入英国海军序列，共同抗击德国。但这个请求，又有违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并且，法国人相信战争结束后英国不会归还一艘法国军舰，还很有可能趁机掠夺法国的海外殖民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法国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最终做出了决定和承诺：法国海军听命于维希政府，保持中立——既不会攻击德国，也不会攻击英国。

对于这个决定，希特勒当然是欢迎的：当时的法国海军的主力舰队驻扎在北非的海军基地米尔斯克比尔，这是法国海军的传统军港，扼守直布罗陀海峡咽喉。希特勒当时并没有剿灭法国海军的精力和实力，那么他们自己宣布中立，肯定是希特勒希望看到的，他也为此表态：尊重

法国海军的中立，不会让他们编入德国海军。



弗朗索瓦·达尔朗，法国海军总司令。他在二战期间是法国“维希政府”仅次于贝当的二号人物，充满争议，在1942年被暗杀

但是，法国和德国这样一表态，英国慌了。

以法国海军的实力，一旦他们为德国所用，欧洲战场上双方海军的实力对比会立刻逆转，在德国准备全面入侵英伦三岛的背景下，大英帝国唯一还能对德国保持优势的就只有海军了——这种逆转是英国绝对不能接受的。

英国其实在法国投降之前，就知道自己的盟友大势已去了，为此他们早就三番五次地提出让法国舰队“入编”的请求，但不断被拒绝。英国首相丘吉尔并不信任达尔朗的承诺，这背后的关键是他完全不相信希特勒。

1940年6月25日，丘吉尔在下院演讲时几乎拍着桌子说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德国政府庄重地保证在战争期间不打算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他们（指法国海军），这有什么价值？可以去找半打国家问一问，这种庄严的保证有什么价值？有头脑的人谁会相信希特勒的话？”

在经过再三思考之后，英国海军部出台了一个专门针对法国海军的“弩炮计划”：以“胡德”号战列舰为旗舰，编组一支“H舰队”，即刻开

赴法国海军驻扎的北非阿尔及利亚奥兰湾的米尔斯克比尔军港。

H舰队的首要使命，是说服在那里的法国海军投降英国。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次要使命——如果首要使命被法国海军拒绝的话。

4

1940年7月3日清晨，一路疾行的英国H舰队抵达了距离米尔斯克比尔军港10海里的位置，静候命令。

直到此时此刻，H舰队的司令萨默维尔中将的心情依旧是矛盾的。

在来的路上，萨默维尔和自己的幕僚不断开会，认为要用尽一切手段避免和法国海军冲突，尽量使用和平的方式。但是，就在7月2日晚上10点55分，一封首相丘吉尔亲自发来的电报，打破了萨默维尔的希望："你所负担的任务，是历来英国舰队司令部所遇到的最不愉快和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但是我们对你完全信任，相信你会毫不留情地执行这一任务。"

丘吉尔使用了"毫不留情"这样的字眼。

7月3日清晨，萨默维尔试图做出最后的努力：他派出幕僚霍兰上校和法国舰队交涉。霍兰上校是那支驻扎在米尔斯克比尔军港里的法国海军分舰队司令让·苏尔的私人密友。

然而，让·苏尔表示，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有令：不能和英国人私下接触。

无奈之下，霍兰上校只能托人送去了一封以英国海军部名义写的信函，信函上再次对法国海军提出了要求：

（1）希望法国海军加入英国海军的队列；

（2）如果不愿加入，那么裁减船员后，将军舰开入英国港口；

（3）如果以上两点都不愿意，那么在裁减船员后，在英国军舰监督下开往西印度群岛的一个法国港口，解除船只武装，或交给美国保管，战争结束后归还；

（4）如果以上三点都不同意，必须在6小时内自己把港口内的船只全部凿沉；

（5）如果以上四点都不同意，我们会“使用一切必要的力量”。

一直到下午4点，港内的法国海军都没有给出任何回应。4点之后，让·苏尔同意与霍兰上校碰面，但态度冷淡：“我以个人荣誉担保，如果德国人来抢夺舰队，我就把舰队带去西印度群岛，但是如果你们要硬来，我们会以武力回敬武力。”

而与此同时，位于伦敦的英国海军部收到了秘密电报：6艘法国轻巡洋舰正火速赶往米尔斯克比尔港，其他法国在地中海的军舰也在向该港口迅速靠拢。

丘吉尔知道，法国人肯定不肯“投降”了。

下午4点46分，丘吉尔给萨默维尔发去了最后一封电报：“尽快解决问题，不然你将面对整个法国海军。”

此时，在米尔斯克比尔港口内，法国海军的军舰也都将炮口对准了英国舰队——法国这支舰队拥有2艘战列舰、2艘战列巡洋舰、6艘超级驱逐舰，实力并不逊于英国的H舰队。



遭遇炮击的法国舰队

这个时候，谁先发制人，谁就能掌握先机。

下午5点56分，英国最终决定率先动手。

英国H舰队的旗舰“胡德”号打响了第一炮——一枚330毫米的炮弹径直飞向了港口内的法国战列舰“布列塔尼”号。

上一次英国向法国开炮，还是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

5

一场昔日盟友之间的血战，就此拉开帷幕。

尽管法国舰队并非没有战斗准备，但由于英国舰队有备而来，并且抢先开炮，所以一开战就占了先机。

最先遭受重创的是停泊在港口内的法国战列舰“布列塔尼”号，这艘老式的战列舰率先中弹后，又遭到了从英国“皇家方舟”号起飞的鱼雷机的密集攻击，开战仅十几分钟就中弹无数，开始倾覆——它的舰尾炮直到沉没的最后一刻依旧努力在向英国舰队开炮。

随后遭受攻击的是法军的旗舰“敦刻尔克”号战列巡洋舰和“普罗旺斯”号战列舰。由于英国海军一开始就处于战斗阵型，而法国舰队停泊在港口内，做战术机动的空间不足，所以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敦刻尔克”号和“普罗旺斯”号在饱受炮火之后，为了避免船只下沉，只能选择冲上港口的沙滩搁浅——尽管舰体已经伤痕累累，但幸存的法国水手依旧聚集在几门还能运转的大炮前，用绳子和铁索拉动炮管还击。

此时的变数出现在法国的另一艘战列巡洋舰“斯特拉斯堡”号上。

早已发动的“斯特拉斯堡”号趁着浓烟掩护和有利位置，冲破了英国舰队在港口布下的水雷，全速向法国的另一个港口土伦港方向逃去。由于事出意外且担心撞上自己布下的水雷，英国舰队在追击一阵之后就放弃了。“斯特拉斯堡”号最终成了幸运者，当它在7月4日晚上驶入土伦港时，得到了所有驻守法军的欢呼。

但其他军舰就没有“斯特拉斯堡”号那么好的运气了。在开战后的短短十几分钟内，“布列塔尼”号沉没，“敦刻尔克”号和“普罗旺斯”号搁浅，其余舰只都受到了重创。

“布列塔尼”号倾覆时，舰上的1000多名水手掉进了海里，一艘最近的英国驱逐舰试图捞救落水者，但一些愤怒的法国水兵宁可被淹死，也不愿意登上英国人的船。

基本达到目的的英国舰队，在晚上6点12分全面停火。



被轰沉的“布列塔尼”号

整个米尔斯克比尔港内浓烟弥漫，海面上到处漂浮着着火的燃油，以及不断哀号和挣扎的法国水兵。

在这场不到20分钟的战斗中，停泊在港口内的法国舰队主力被重创，基本丧失作战能力，另外还有1297名法国水兵阵亡，341人受伤。

而英国舰队除了两名水兵轻伤外（被法国军舰上冒险起飞的水上飞机自杀式扫射），没有损失。

6

但其实，英国的这支H舰队也并非全身而退。

7月5日，他们通过舰载机再度攻击了之前搁浅的法国旗舰“敦刻尔克”号，在炸死了军舰上154名水手后，彻底让这艘军舰丧失了战斗力。

7月11日，圆满完成任务的H舰队胜利返航，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又遭遇了那艘意大利潜艇“马可尼”号。

这一次，“马可尼”号终于取得了战果——它发射的鱼雷击沉了英国舰队中的一艘驱逐舰“护卫”号。

这是英国舰队在这场海战中唯一一艘沉没的军舰，还是被意大利人炸沉的。

一场离奇的海战，从这艘意大利潜艇开始，也从这艘潜艇结束。

一来一去间，法国海军的重要力量，灰飞烟灭。

馒头说

平心而论，关于道德伦理上虐心的抉择，二战期间的英国人还真没少碰上。

比如说德军轰炸考文垂（此事的真假还有争论），比如“弩炮计划”歼灭法国海军主力。

这件事情如果站在英国的角度，还真有点道理可以讲：首先，盟友的武器如果不能归我所用而被敌人利用，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威胁——何况英国已经给出了几条退路但法国不选；其次，在英伦三岛岌岌可危的

时候，连丘吉尔“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的宣言都有不少人认为是在作秀，但炮轰法国舰队之后，全世界都相信英国人是要真的抵抗到底了；最后，英国这一轰，等于也向美国输诚，美国明白了英国的决心后，立刻就给予了英国大量的军事援助。

所以，在海战第二天，丘吉尔准备怀着“沉痛的心情”去议院报告整个海战的经过，他走进大厅时却惊讶地发现，迎接他的，是全体议员起立，以及暴风雨般的掌声。

但是，站在法国的立场上，这简直是奇耻大辱：首先，我们刚刚在敦刻尔克战场用几万法国士兵的浴血阻击，换来你们英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然后你们回报的礼物，就是血洗我们“敦刻尔克”号领衔的法国舰队？其次，连德国都能允许我们保持海军中立，你作为盟友倒要将我们斩草除根？

所以，英国也为自己这一举动付出了沉重代价——法国海军就此与英国海军不共戴天。

1942年，美英联军制定了“火炬行动”，在法属北非登陆，结果遭到了法国海军的拼死阻击，法国海军付出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7艘鱼雷艇、10艘潜艇沉没和3000水兵伤亡的代价，也坚决不让英国舰队登陆，最终还是达尔朗下令全线停止抵抗。

但法国海军停止抵抗又激怒了纳粹德国，希特勒下令全面接管在土伦港的法国舰队。面对英国舰队伸出的援手，法国舰队却断然拒绝，最终选择了最悲壮的一种方式：包括3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16艘鱼雷艇、16艘潜水艇、7艘通信舰、3艘侦察舰，以及60多艘运输舰、油船、挖泥船和拖船在内的法国舰队全部自沉海底。

曾经排名世界第四的法国海军，至此彻底消失。

有悲壮，有残酷，有荣耀，有耻辱，有两难，有狗血，这就是战争。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弩炮行动”——米尔斯克比尔之战纪实》（吴洪海，《国际展望》，2007年第20期）

2.《“弩炮计划”的缘起——1940年法国单独停战与英国对策研究》［梁占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3.《海军见证法兰西兴衰》（倪海宁、李剑、董使礽，《解放军报》，2015年7月3日）

4.《试论米尔斯克比尔事件及其影响》（宋永成，《历史教学》，2001年第5期）

5.《法国为什么赖在米尔斯克比尔？》（贺起，《世界知识》，1961年第17期）

帝国斜阳：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战争

在世界足坛，有几对著名的生死冤家，就是“一见面就杀得分外眼红”的那种，比如英格兰队和德国队，巴西队和阿根廷队，中国队和日本队或许也算。但在这些“冤家”中，仇恨最深的，是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这两支球队虽然远隔重洋，却是生死之敌，这一切的起因，是1982年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那场二战后规模最大的海战。

1

1982年4月2日，凌晨。

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属马尔维纳斯群岛首府斯坦利港附近，出现了大量荷枪实弹的阿根廷士兵。

在夜色的掩护下，阿根廷士兵直扑位于斯坦利港的英国总督府——在那里，英国全部的守军加在一起，也不到200人。

面对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英国的总督很快无条件投降。

天色放亮之后，一面5米长、3米宽的阿根廷国旗在斯坦利港徐徐升起，而被降下的英国米字旗，被送到了英国驻阿根廷大使馆。

阿根廷宣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行使主权。

阿根廷国内一片欢腾。

英国举国震惊。

刚刚上任没多久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急忙四处奔走，呼吁双方坐下来谈判，不要诉诸武力。

但一切都是徒劳。

一场二战后全世界最大的海战，就此拉开帷幕。

2

先来说说这岛——马尔维纳斯群岛。

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位于南大西洋，由700多个小岛组成，总面积12200平方公里。

马岛被发现和占有的历史，一直存在争议。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都声称是他们当年先发现了马岛，然而法国人在1764年先在马岛上建立了居民点，但在一年后率先定居的却是英国人。而且麻烦的是，西班牙人在1767年向法国人买下了全部居民点，并在1770年将所有外国人都驱逐了出去，不过，英国人一直不承认西班牙的占领。

1816年，阿根廷人也加入了进来——这一年，他们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独立，所以宣布应该“继承”西班牙的领地。

但英国人根本不买账。1833年，英国人用武力驱逐了在马岛上的所有阿根廷人，宣布正式对马岛进行殖民统治。事实上，英国人从来不使用“马岛”这个称谓，他们一直称之为“福克兰群岛”——至今在他们的历史书和官方文件中仍这么称呼（在下文中我们还是统称“马岛”）。

在漫长的纠纷中，其他国家都陆续退出了，只剩下英国和阿根廷对马岛争执不下，并在二战后将这个问题交给了联合国。

阿根廷除了强调“继承于西班牙”之外，最理直气壮的理由是，马岛离阿根廷只有500公里，但离英国有13000多公里，它到底属于谁，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而英国也有自己的理由：我们自1833年开始，就对马岛进行了“公开、持续、实际的拥有、占领和管理”。

简单来说，阿根廷的理由就是“离我家近”，而英国的理由是“自古就是我家的领土”。

这笔账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算到80年代初，依旧算不清。

时间到了1982年的时候，阿根廷先等不及了。

3

于是就要来说说阿根廷了。

阿根廷实在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国家——其祖上曾经的“阔绰”程度，令人咋舌。

阿根廷的国土面积为美国的1/3不到，人口只有4000万出头，但人均可耕地面积是美国的2倍。上帝给了阿根廷太多的馈赠，绵长的海岸线、优质的草原、丰富的淡水，以及大量的矿藏资源，所以阿根廷又被称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

20世纪之初，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经济总量排在全世界第八。那时候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比欧洲的老牌帝国主义德国和法国还要高，且贫富差距很小——欧洲人当时形容一个人富有，用的比喻是“像阿根廷人一样有钱”。

这从当时的两个称号就可以看出来：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洲的巴黎”，而这个国家被称为“南美洲的美国”。

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阿根廷的经济就开始疲软了，到了40年代，更彻底进入了南美洲诸国特有的“军人独裁”模式，贝隆将军的统治在短时间内给阿根廷带来一阵复兴，但随即还是掉头向下。

几经沉浮之后，到了1981年，阿根廷的国内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一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为600%以上，GDP下降达11.4%，制造业产量下降22.9%，薪资增长却只有19.2%。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上下反对声音四起，要求本来就实行残酷独裁统治的军人政府下台。当时的独裁总统加尔铁里绞尽脑汁之后，只能想出一个办法来转移视线。



贝隆将军和他的妻子贝隆夫人。那首著名的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即为她而写

什么办法？对外发动一场战争。

加尔铁里的目光，很快就落在了一直存在争议的马岛上。

阿根廷自认还是有点底气的。

因为祖上曾经阔过，所以阿根廷当时的军事实力，在南美洲仅次于巴西，人称“南美小霸王”：陆军大概有近20万的正规军，空军拥有从法国进口的“幻影”战斗机以及“超级军旗”战斗机；海军除了各类舰艇外，还有一艘配备弹射器的正规航空母舰“五月二十五日”号（以阿根廷国庆日命名）——当时拥有航母的国家，屈指可数。

再加上马岛在地理位置上是对阿根廷如此有利，所以加尔铁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收复马岛”作为挽回国内形势的最大筹码。

就在阿根廷部队顺利占领马岛之后，事情的进展正如当初加尔铁里所预料的那样：阿根廷的国内一片欢腾，所有的反对党都宣布支持加尔铁里政府，连当初反对独裁的政党也高呼“加尔铁里万岁”；全国上下的男性青壮年在征兵处排起了长队，誓死要为国出征，保卫马岛；总统府外一直有人集会游行，高呼爱国口号，表态全力支持。



阿根廷时任总统加尔铁里，在当总统前是阿根廷陆军总司令

所以，加尔铁里的计划离成功只差最后一环：远在13000公里外的那个已经垂暮的大英帝国，不会反击。

4

该轮到英国出场了。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英帝国，早就没有了当年领土占到地球陆地总面积25%的“日不落帝国”的风采。一战和二战巨大的创伤让英国一蹶不振，由当年是美国的“老大哥”转而成为“小跟班”。英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很不乐观，国防实力更是衰退严重。

但是，英国有一个上任三年不到的首相，还是位女性。她就是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

当阿根廷派部队攻占马岛的消息传到国内时，英国举国震惊。有一种说法是，在撒切尔夫人上任之前，英国政府已经有意把马岛归还给阿根廷了——毕竟离英国本土太遥远了，鞭长莫及。

但是，阿根廷不宣而战，却把“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给惹毛了。

当时撒切尔夫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她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很多党派和势力都给惹火了，民众对她这一届政府的支持率长期走低，而英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日渐衰落，雄风不再。

如果说阿根廷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转移国内注意力，那么撒切尔夫人同样有这样迫切的需求。

在最短的时间里，撒切尔夫人就做出了决断：坚决还击！

撒切尔夫人做这个决断，也是顶着巨大压力的。

昔日威震全球、纵横四海的英国皇家海军，在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了两艘航空母舰。其中一艘老迈的“竞技神”号是二战后建造的，已经服役快40年，准备卖给印度了；另一艘是刚刚服役的“无敌”号轻型航母，准备卖给澳大利亚海军做旗舰。这两艘航母没有一艘吨位超过2万吨，并且连弹射器都没有，只能垂直起降作战半径不大的亚声速鹞式战机。



撒切尔夫人接受英国媒体采访，努力让英国人觉得丢失马岛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但即便只有两艘根本不适合远洋作战的轻型航母，撒切尔夫人仍然力排众议，说服各方反对势力，坚决出兵。

而英国国内的爱国热情同样被激发了出来，年轻人同样走上街头，强烈支持撒切尔政府出兵收复马岛，一些商业邮轮甚至立刻终止与乘客的合同并赔付，然后清空舱房用来运送英国士兵。



在出征的部队里，有一个飞行员的身份只有海军司令和军事当局才知道，他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第二个儿子安德鲁王子。英国王室曾对安德鲁参战大为震惊，试图施加压力让海军司令阻止他成行，但安德鲁还是不顾反对，成了海王直升机上的一名战斗人员，并且在战争中表现不俗。让英国王室欣慰的是，安德鲁最终毫发无伤地返回国内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军事强国的底蕴，在这个时候就显露了出来。

在短短48小时之内，英国就完成了战争动员和集结，各种战时方案全部有条不紊地施行。4月3日撒切尔夫人决定出兵，4月4日以“竞技神”号和“无敌”号两艘航母为主的特混编队，就载着数十架作战飞机和数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驶离了英国本土，直扑万里之外的马岛。

当时英国人的参战热情可见一斑。

由111艘各类舰船组成的特混舰队，是当时英国皇家海军几乎全部的家底——其中还有46艘被征调来的商船。

英国特混舰队出征时，美国的《新闻周刊》杂志封面引用电影《星球大战》的最新一集名字作为醒目标题：《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



参加马岛战争的英国舰队

5

1982年4月26日，英国远征军首先收复南乔治亚岛，宣布200海里以内为军事禁区。

马岛战争战幕正式拉开。

按照阿根廷的计划，只要能够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不败，拖住英国军队，基本上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对于劳师远征的英国部队来说，拖一天，补给线就危险一天。

但阿根廷作为一个只购买了一些工业国武器和装备的农业国，还是低估了英国这个老牌工业强国的军事力量。

阿根廷的劣势首先体现在海军方面。

面对几乎倾巢出动的全世界最老牌的海军，阿根廷海军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在一开始就采取了“避战”的策略。但英国海军却一直在寻找战机，希望击沉对方的一艘主力舰以鼓舞士气，打击对手的信心。

机会在5月2日到来了。

英国派出参战的两艘核潜艇之一“征服者”号，在他们划定的200海里禁区之外，发现了阿根廷海军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征服者”号随即向这艘排水量达到1万吨的巡洋舰发射了3枚二战时期的鱼雷，其中2枚命中。

曾经做过麦克阿瑟座舰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在二战中曾毫发无伤地从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中逃出（后来以100万美元的价格被美国卖给了阿根廷），却最终没有逃过这一次的厄运——两枚鱼雷引发的大爆炸造成舰上323名阿根廷士兵死亡或失踪，巡洋舰也在45分钟后沉没。

“贝尔格拉诺将军”号的沉没给了阿根廷政府很大的触动，虽然他们立刻强硬地回应将战斗到底，但包括“五月二十五日”号航母在内的海军由此开始龟缩在港口里再也不敢出动，拱手让出了制海权。后来有人评说：英国人用一艘潜艇就牵制了整个阿根廷海军。


THE Sun

QE2 IS SET TO SAIL FOR WAR

We told you first

GOTCHA

Our lads sink gunboat and hole cruiser

SUNK

CRIPPLED

UNION BOYCOTTS WAR

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后，英国媒体用的醒目标题。“Gotcha”为“Got you”的连读，意为“逮到你了！”

相较之下，阿根廷的空军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可圈可点。

在失去海军支援的背景下，阿根廷空军独自出动，冒着极大的风险突入英国舰队的防空圈，强行展开空袭。

5月4日，两架阿根廷空军的“超级军旗”战斗机升空，它们发射的“飞鱼”导弹准确地命中了英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谢菲尔德”号。

“谢菲尔德”号是当时英国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全舰造价高达2亿美元，而击中它的“飞鱼”导弹才30万美元一枚。在被“飞鱼”导弹击中后，“谢菲尔德”号在几小时内爆炸起火，然后沉没。

“谢菲尔德”号的沉没同样也给以英国很大的震撼，而更让他们震撼的是，此后的阿根廷空军如同飞蛾扑火一般冒死扑向英国舰队，其中不乏如同日本“神风特攻队”那样中弹后连人带机撞向军舰的情况。

虽然英国的鹞式战机在这场空战中占尽优势，但阿根廷空军凭借近乎不要命的空袭，又先后击沉了英国舰队的“考文垂”号驱逐舰和“羚羊”号、“热心”号护卫舰，还有2艘驱逐舰（“格拉斯哥”号、“安特里姆”号）以及5艘护卫舰（“大刀”号、“阿尔戈水手”号、“普利茅斯”号、“箭”号、“敏捷”号）被击伤，沉没和负伤的军舰超过了英军特混编队主力作战舰艇的半数以上。



被击中的“谢菲尔德”号

在整场空战中，阿根廷空军损失了107架作战飞机，是英国空军损失的3倍以上，但他们毕竟还是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阿根廷空军的努力基本都白费了，因为除了有阿根廷海军这个猪队友之外，还有更糟糕的陆军。

虽然阿根廷国内青年的求战热情高涨，但事实上阿根廷陆军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英国真的会跨越半个地球追杀过来。



法国的“超级军旗”战斗机经马岛一战后声名大振

后来的资料显示，阿根廷原本是想在1982年的9月中旬发动对马岛的进攻。事实上，这个时间选得不错——那个时候，不仅阿根廷购买的各类武器将到位，英国的两艘参战航母也很可能已经向别国交货了。而没有航母，英国根本不可能远赴重洋来收复马岛。

但有可能是迫于国内形势，也有可能是为5月25日的国庆献礼，阿根廷提前发动了攻势。

阿根廷其实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现代化的残酷战争，极其缺乏经验。他们实行的是为期一年的“义务兵制”，大批才训练了几个月的阿根廷新兵被临时征召，送上了马岛。虽然马岛上的阿根廷驻军接近1万人，但基本上都是毫无战斗经验的士兵，防线松垮，部署混乱，后勤短缺，连抵御南太平洋寒带的装备都不齐全，晚上只能聚在一起烤篝火，甚至连哨位都没安排。

反观英军，都是有两年、三四年甚至更多经验的职业军人，每年因

为和北约同盟国举行联合军演，都会进行大量特训，经验丰富，且纪律严明，补给充足——这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战争打到后来，英军士兵每天能吃上三顿热饭，而老家近在咫尺的阿根廷守军补给短缺，一天甚至两天才能吃上一份野战粮。



英国海军的鹞式战斗机

如果说阿根廷的海军是一筹莫展，空军是浴血奋战的话，陆军就是一触即溃。他们既没有阻止英军轻松登陆马岛（英军乘坐橡皮艇就轻松登陆了），也没有给英军顽强的阻击。以马岛的重镇鹅原一战为例，英军击毙阿军250人，俘虏1300人，而自己只伤亡不到60人。

不过，马岛战争真正的结局，是战场外就已经注定了的。

6

在现代国际局势中，幕后的站队和博弈，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台前掰手腕的胜负。

在阿根廷占领马岛后的第二天，联合国就在英国代表的推动下，通过了502号决议：要求阿根廷立刻全面撤军——这也表示联合国认定英国是“受害者”。

随后，撒切尔夫人又将这个行为定性：世界上有很多领土争端，如果都像阿根廷那样动用武力而不是谈判解决，那将是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样一说，当时很多有领土争端的国家，都表态支持英国。

随后，就是国家之间的站队。

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又是西方世界曾经的“带头大哥”，所以强大的西方世界一边倒都支持英国，而支持阿根廷的，主要是一些有心无力的南美洲国家。

关键是，西方世界的支持，并不是口头上的。

在马岛战争开始之前，阿根廷其实一共向法国订购了14枚“飞鱼”导弹，法国先交付了5枚。马岛战端一开，“飞鱼”导弹大显神威，英国立刻给法国施加压力，法国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拖延交付剩余的9枚“飞鱼”导弹。阿根廷打听到邻国秘鲁也曾向法国订购了8枚“飞鱼”导弹，于是想高价向秘鲁购买，法国得知消息后，顺带连原本应该给秘鲁的8枚“飞鱼”导弹也一并拖延交货。

无法生产先进武器的阿根廷转而向其他国家购买，而在英国的推动下，北约集体对阿根廷禁售军火。

不仅如此，阿根廷空军的“超级军旗”和“幻影”战斗机其实也是向法国买的。马岛战事一起，法国立刻向英国提供了这两个型号战斗机的各项数据，甚至让英国的鹞式战斗机和“幻影”“超级军旗”战斗机一起演习。

在马岛战争幕后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美国。

阿根廷加尔铁里政府的背后撑腰者其实就是美国，所以马岛危机爆发后，美国一开始扮演的是“调停者”的中立角色。但随着战事逐步展开，美国随即倒向了自己更重要的盟友英国——以阿根廷拒绝“调停”为名，宣布制裁。

从1982年4月30日开始，美国政府中止向阿根廷出口一切军事物资，暂停所有出口银行向阿根廷提供贷款和担保。

另一方面，美国向英国提供了离马岛5000公里的阿松森岛上的军事设施，让英国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站。此外，美国动用了全球47个监听站以及多枚高性能侦察卫星，持续向英国提供情报。据英国媒体战后透露，英国在马岛战争中取得的关于阿根廷方面的情报，98%来自美国，阿根廷被击沉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的位置，就是美国卫星

发现并提供给英国的。



英国海军第45突击小队在向斯坦利港进军。马岛在地理位置上已经接近南极圈，气候寒冷。阿根廷军方因为内部派系林立，派到马岛上的守军居然还有来自亚热带的驻军。而英国的士兵经常在格陵兰岛进行演习，抗寒能力反而远胜阿根廷士兵

英国驻美大使亨德森曾表示：“正是美国帮助英国打赢了战争。美国提供的帮助无论怎样夸大都不过分。”而加尔铁里则对美国咬牙切齿：“阿根廷人和我都认为这是一种背叛。”

所以，从表面上看，马岛战争是阿根廷和英国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实际上，是阿根廷以一国之力，在单挑整个西方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根廷无可奈何地看着战局一天天恶化。

1982年6月13日，英军无线电监听小组截获了马岛上的阿根廷守军发给总统加尔铁里的电报，知道对方已经弹尽粮绝。

随即，英军投入全部预备队，向马岛阿根廷军队的最后据点斯坦利港发起总攻，只付出伤亡不到20人的代价，就攻破了阿根廷人当初引以

为傲的“加尔铁里防线”。

6月14日下午2点，困守在斯坦利港市区的阿根廷军队挂出了白旗——大约12000名阿根廷士兵向8000名登上岛的英军无条件投降。

第二天，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宣布战争结束。



投降的阿根廷官兵

7

历时74天的马岛战争结束了。

回过头来复盘，这场战争很容易就能找到输家，却很难找到赢家。

阿根廷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阵亡1000多名士兵，伤1300人左右，被俘约12000人；损失舰船11艘（沉没5艘，受损6艘），飞机107架；总耗资10亿美元以上，间接经济损失20亿美元以上。

英国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阵亡250余人，伤770余人，被俘200余人，耗资12亿美元以上。

阿根廷的加尔铁里政府因为战争失败，在第二年就迅速垮台；英国因为这场胜利，第二年撒切尔夫人代表的保守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撒切尔夫人获得连任。

但是，英国因为这场跨越半个地球的战争，也洒尽余晖，耗光心

力。关键是，阿根廷并没有因为这场战争的失败而承认英国对马岛的主权，依旧态度强硬。

时至今日，英国和阿根廷在马岛问题上依旧各执一词。

在马岛附近发现600亿桶石油储量的背景下，马岛的主权争夺，远未画上句号。

馒头说

如果把二战之后的局部战争规模排个榜，马岛战争未必能进前五，还有朝鲜战争、两伊战争、中东战争、海湾战争、越南战争等等。

但这场历时74天的战争，值得玩味的东西却不少。

战场上，有对古典战争中“天时地利”概念的颠覆，海陆空协同的现代化立体战争的进化，武器装备和士兵素质对战争胜负的影响，等等；在战场外，有政府对发动战争时机的把控和运用，西方世界在战事爆发后的协作，一个国家军工实力的强弱对军事实力的影响，等等。

而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民族情绪的激发以及对局势的冷静思考。

在残酷而现实的当今世界，一腔热血固然难得，但真正管用的，还是一个国家的科技、经济和军事实力。有时候，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手到擒来的事，结局未必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而在当今的环境下，无论如何，动用武力都是最后一步棋，任何可以用谈判解决的问题，都不应该头脑发热地诉诸武力。其实，在谈判桌上可以打的牌太多了，真到了动用武力的那一步，已经是个双输局面了。

当然，这并不代表需要承诺放弃武力。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武力当然也是一个最终选择。只是，一旦决定要动武，需要的不是激情的口号，而是冷静的谋划和筹备。

善战者不言战，战则必胜。

争霸亚洲：400多年前那场中日之战

对于中日两国，我们经常用“一衣带水”这个词来形容。但两国之间的战争，却发生过不止一次。

1

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1598年9月18日这一天的天气，但对于在朝鲜前线的日本远征军高级将领而言，心情肯定是充满阴霾的。

因为就在这一天，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丰臣秀吉逝世了。

丰臣秀吉的死讯在最初被严密封锁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这个消息就开始扩散开来。

军心动摇。

其实日本军人的心里都很清楚：这场仗，是打不下去了。

这场仗，发生在朝鲜的国土上，但主要交战的双方，却是日本和中国。

日本当时处于文禄至庆长年间，所以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

中国处于明朝的万历年间，所以中国称之为“万历朝鲜战争”。



丰臣秀吉

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及“丁酉再乱”。

这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之间爆发的最大的一场战争。

2

时间倒退7年，这个故事，要从1591年说起。

这一年，刚刚结束战国纷乱时代统一全日本的丰臣秀吉，有点坐不住了。

一方面，由于土地的分配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原先各地的“大名”（诸侯）都有不同程度的怨言，丰臣秀吉不希望看到一个火药桶从内部爆炸，需要找到一个外部的宣泄口。

另一方面，从一个低级武士一跃成为全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丰臣秀吉经历了一个华丽的蜕变，可以说是谱写了一段日本战国传奇。而这一年，他才54岁，他觉得他的征途不能止于日本列岛，而是星辰大海。

于是，这一年的4月，丰臣秀吉派人给朝鲜的国王，宣祖李昖（yán）送去了一封信：“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

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简单翻译过来就是，我丰臣秀吉，已经统一了日本，下一个目标，是征服中国的明朝，但打中国要经过你们国家，所以问你们借条道。

以当时很多人的眼光来看，丰臣秀吉的这个口气可能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什么？敢打明朝？

宣祖李昖立刻召集群臣商议，得出的结论是，你敢不敢打明朝，会不会打明朝，我们不管，但你问我们借道，其实是想打我们，这肯定是真的。

所以，朝鲜给日本的答复是两个字：不借。

丰臣秀吉到底想不想打朝鲜？当然想。历史上，日本对朝鲜觊觎已久。

那他想不想以朝鲜为跳板，攻打明朝？也是想的，但把握不大，准备打一步看一步。

其实中国当时还不是丰臣秀吉的最终目标，他的最终目标是打下中国后，再征服印度。

这应该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狂妄的战争设想。

但当时日本为什么敢那么想？因为日本当时的军事实力确实很强。

当时日本全国拥有40万人左右的军队——这个数字放到当时的欧洲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了。其中，装备火器的部队高达6万人。同时，日本还有相当一部分重装甲骑兵，以及1000艘作战舰只。

当时日本的军事实力，不仅在亚洲，放到全世界，也可以说是一流的。

所以，在得到朝鲜意料之中的拒绝答复之后，丰臣秀吉立刻就开始调兵遣将。到了1592年的3月，丰臣秀吉总共调集了40万水陆大军（其中10万为预备队，以当时日本的国力，确实是倾国一战了）。

1592年4月14日，日本的先头部队在朝鲜的釜山登陆，开始攻击朝鲜。

一场涉及中、日、朝三个国家的大战，由此拉开帷幕。

3

战争才刚开始，朝鲜就垮了。

朝鲜宣祖李昖重文轻武，朝廷上下互相钩心斗角，人浮于事。朝鲜当时的八道（“道”相当于我国“省”的概念）300多个郡县，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守备部队的。

刚刚经过战国时代大小战争残酷洗礼的日本武士，在朝鲜如入无人之境。日本的9个兵团在日本战国名将加藤清正、福岛正则、黑田长政、小西行长等人的率领下，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只花了19天就攻克了朝鲜的“王京”汉城，43天后又攻下了平壤。

除了一些民兵在自发抵抗外，朝鲜正规军大面积溃败。朝鲜八道，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就全部沦陷。

仓皇出逃的李昖一直逃到了当时的中朝边境义州，和群臣一商议，觉得依靠自己的力量赶走日本人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抱大腿”。

抱谁的大腿？当然是明朝的大腿。当时的明朝，是朝鲜的宗主国。

于是，李昖开始连续不断地派出使臣向明朝求救，希望明朝尽快发兵，“抗日援朝”。

收到朝鲜的求援后，明朝朝廷上下也大吃一惊：朝鲜怎么垮得这么快？

因为朝鲜的溃败太过迅速，反而让明朝生疑：你是不是和日本勾结在一起，引诱明军主力入朝，然后一举歼灭，顺势入侵中国？

得知明朝的这个怀疑之后，朝鲜人也哭笑不得。李昖只能继续不断派人去明朝求援，不仅递交正式国书，还让人分别游说明朝的尚书、侍郎、御史甚至太监，希望明朝能尽快发兵。

不仅如此，朝鲜还把日本发来的威胁书信原封不动地转交给明朝。

另一方面，明朝也没少做情报工作，比如派人确认朝鲜国王的真假，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求援。

经过反复调查和沟通，明朝终于明确了一点："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明神宗——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万历皇帝，已经不再接见朝臣，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但他还是密切关注着外界的局势，通过谕旨的方式下达命令。

当时的明朝，处于张居正改革之后，虽然万历皇帝已经开始自我封闭，但整个国家的国力还是有底子在的——这也是当时的日本只能排到亚洲第二，绝排不到亚洲第一的原因。

于是，在万历皇帝的亲自点头下，明朝通知朝鲜国王李昖：我们愿意派兵过鸭绿江，帮你们打日本人。

1592年6月15日，明朝的参将戴朝弁与游击史儒率领1000多人的明朝部队，开始渡过鸭绿江。

中国人出手了。

4

但是，中国军队加入战场后，也遭遇了一个"开门黑"。

1592年7月17日黎明，明朝辽东副总兵祖承训（他的儿子就是后来抗清又降清的祖大寿）率数千明朝士兵开始攻击平壤城，结果天降大雨，明军的火枪统统失灵，再加上日军确实强悍，结果明军大败而归，祖承训率军退回鸭绿江。

第一场大仗就打得有点下不来台，作为宗主国，明朝也有点脸上无光。

不过，这场败仗也没白打，祖承训回国后，总结了一系列经验教训，主要有三点。

第一，没有粮草。朝鲜根本无法提供给明朝军队粮草——事实上，

朝鲜当时已经崩盘，根本找不到地方官员筹措粮草。

第二，朝鲜谎报军情。可能是出于让明朝尽快出兵的目的，朝鲜大大低报了日军的人数，比如他们说平壤只有1000多名日军守卫，但交战后，祖承训发现对方至少有上万人。

第三，争夺指挥权。朝鲜一直希望明军由朝鲜将领指挥，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这和300多年后中国人又一次入朝援助作战，颇有相似之处。

虽然明军首战失利，但朝鲜的使臣们还是没有放弃努力，他们生怕明朝就此撒手不管，所以还是频频游说明朝朝廷上下，希望明朝能够继续派兵，即便派个几百人过去壮壮声势也行。

这个时候，明朝却派出了一个会讲日语的商人，名叫沈惟敬（他是这场战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后面还会登台亮相），去和日本人议和了。

这无疑把朝鲜人给吓了个半死：你们议和了，我们的国家可就没了啊！

但明朝的议和，其实是假的。

在了解到日本派的军队绝非朝鲜人口中的“几千人”，而是数十万人，准备对朝鲜发动“灭国战”之后，明朝知道不能那么轻易地派几千人应付了事了。

与日本人“议和”，其实就是在拖延时间。明朝一方面筹措粮草（明军认识到只能自带干粮入朝作战了），一方面调集兵力，最重要的，是在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明朝名将李如松。

1592年9月，明朝的各方面准备都差不多了，沈惟敬也得到了消息：差不多得了，回来吧，我们要动手了。



当时的李如松，正率领辽东的精锐铁骑在宁夏平叛，需要平叛之后再率军入朝

这一次，明朝集结了7万大军（号称10万），粮草齐备，于1592年年底开始横渡鸭绿江。

中国的精锐力量终于出动了。

5

明军入朝的第一场大仗，就是围攻平壤。

当时占据平壤的是日本战国悍将小西行长，他率领日军第一军团18000人严阵以待。李如松在那一场战斗中尽遣主力，亲自坐镇，明军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全力进攻——东面留出来给日军撤退（撤退路上有伏兵）。

那一仗确实是明军打得相当漂亮的一仗，一方面也得益于当时明军的武器还比较先进，配备的佛朗机炮、虎蹲炮、灭虏炮等数百门火炮，一起向平壤城轰击。按当时朝鲜人的记录："在距城五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天崩地裂，犯之无不焦烂……"

在朝鲜人的记录里，他们一直称明军为"天兵"。

按记载，那一战，日军损失超过1万人，而明军只损失了1000人左右。

收复平壤后，李如松想顺势进攻汉城，随后中日双方在一个叫碧蹄馆的地方又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日军毕竟还是相当强悍的，从后来各方的记录来看，碧蹄馆之战明军没有讨到任何便宜，甚至死伤人数超过日军。

碧蹄馆之战的结果就是，日军发现明军确实强大，而明军也发现"倭寇"绝对不是他们想象中那样可以轻松战胜。双方之后又断断续续互有攻守，总的来说明军还是占有一定优势，但却无法一举将日军赶出朝鲜。

一直打到1593年6月，战争陷入僵局，双方都已经没了战意。

先前提到的那位沈惟敬，又要粉墨登场了。

6

其实，早在1593年5月8日，丰臣秀吉就会见了到达日本的明朝使团。

代表明朝的，就是那个精通日语的沈惟敬。

丰臣秀吉提出了七个停战条件，通过小西行长转达给了沈惟敬：

一、迎大明公主为日本天皇后；

二、发展勘合贸易；

三、中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

四、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

五、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

六、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

七、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丰臣秀吉的这七条是在痴心妄想——但明眼人虽多，懂日语的却只有沈惟敬一个。

沈惟敬当时做了一个相当厉害的决定：他一口答应了丰臣秀吉的这七条要求，然后对同行的明朝官员说，丰臣秀吉决定向明朝俯首称臣，并请求封贡。

而另一头，小西行长也向丰臣秀吉汇报，说明朝已经同意了七点要求，只需要日本派使臣一起去北京请万历皇帝批准。

于是，1594年10月，日本的议和使团又和沈惟敬他们来到了北京。日本的代表叫小西如安（小西行长的属下），他来之前，已经和沈惟敬对好了口供。

到了北京之后，明朝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了中国真正期待的三点要求：

一、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朝鲜和对马海峡；

二、只册封而不准求贡；

三、与朝鲜修好，不得侵犯。

和当时沈惟敬在日本时一样，小西如安也假装一口答应。

然后，沈惟敬献上了日本的降表——这份降表是他自己伪造的。

明朝从皇帝到大臣都非常满意，万历皇帝立刻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然后再派沈惟敬把册封书带往日本。



册封书里写道："封尔平秀吉为日本国王，锡以金印，加以冠服。……一切免行，俾绝后衅，遵守朕命，勿得有违。"

1595年1月，沈惟敬带着万历皇帝的册封书来到了日本。这本册封书，如今就保存在大阪的博物馆，通篇是上级对下级、皇帝对番王的口气。

丰臣秀吉看到这封册封书，当场就掀了桌子：我本来就是日本的王，还需要你来封？（"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

据说他当时想将明朝使者全部处斩，结果被人劝住。

但当时丰臣秀吉并没有发作，据说还身穿明朝的冠服，在大阪城接待了明朝的使者。不过，整个议和其实完全失败了——丰臣秀吉已经在酝酿再次攻打朝鲜了。

沈惟敬一看纸包不住火，就在回国途中留在朝鲜不肯走了，还伪造了一封丰臣秀吉的谢恩表让其他人带回朝廷。

这一次，这封假的谢恩表被识破了。参与欺骗的兵部尚书石星等人立刻被革职下狱。

但明朝还是不想再进行战争，到了1596年5月，万历皇帝仍想通过册封丰臣秀吉的方式换来和平。于是，明朝的都督佥事杨方亨和沈惟敬（没办法，他会日语）再次领命到了日本。

但是，丰臣秀吉很快就找了个借口发怒了：朝鲜的王子为什么不肯来？然后拒不接受册封。

脆弱的和平没有维持多久，1597年1月，丰臣秀吉再次调动兵马，第二次入侵朝鲜。

听闻日本再伐朝鲜，万历皇帝震怒之下，先把那个沈惟敬投入了大

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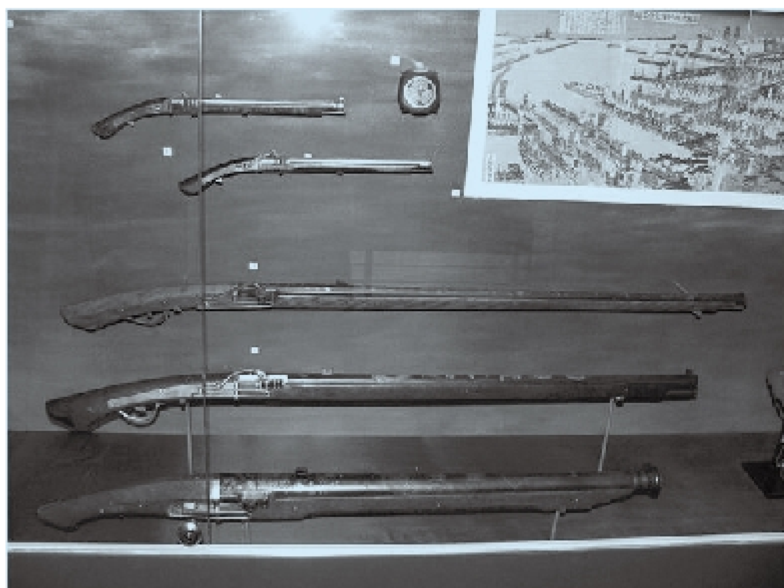
然后，明朝再度派遣援军进入朝鲜。

7

第二次侵朝，丰臣秀吉发动了14万人马。

而作为应对，明朝先后入朝的军队又达到了7万。

相对于第一次战争，中日第二次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更为惨烈。明朝军队取得过稷山大捷，但在第一次蔚山攻城战中也遭遇了不小的损失。总的来说，明朝军队的人数少于日本，但火炮、战术和骑兵都强于日本，日本在火枪和战斗经验方面则占有一定优势。



日军用以狙击明军骑兵的鸟铳（火绳枪）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取得突破的，是海战。

朝鲜的陆军毫无疑问是相当糟糕的，基本早就被日军打残了，但他们的海军还是非常有战斗力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代名将李舜臣。

1597年10月，退无可退的李舜臣率领12艘朝鲜战船及100余艘改装过的民用船，在鸣梁海峡决战日本水师。凭借鸣梁海峡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李舜臣发明的“龟船”，朝鲜水师在鸣梁海峡大破日本水师。这就是

著名的“鸣梁海战”（韩国专门为此拍过一部电影）。

双方就这样一直纠缠到了1598年9月，其间各有胜负，然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丰臣秀吉在久攻朝鲜不下，国内开始怨声四起的时候，“驾崩”了。

丰臣秀吉一死，日本的侵朝军队立刻军心大乱。这时候，明朝和朝鲜的联合水军又发动了“露梁海战”，截击日本撤退的军队。

露梁一战，日本被摧毁200艘战船（一说400艘），伤亡万余人，大败而归，但明朝的名将邓子龙和朝鲜的李舜臣也在这场战役中殉国。

经此一败，日本在朝鲜再也无力组织起像样的攻势，最终在1598年全军撤出朝鲜。（关于露梁海战，参见后文《1598年，中朝日决战露梁海》。）

这场历时7年之久的万历朝鲜战争，最终以中朝获胜而落下帷幕。

和后来的朝鲜战争一样，中国的援军在现在韩国人的叙述中，已被提起得不多，但史料中还是记载着后来朝鲜肃宗李焞说的一句话：“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

对了，1599年，万历皇帝想起了关在大牢里的那个沈惟敬，提审，一刀斩首。

馒头说

毫无疑问，万历朝鲜战争，对日本人而言是一场大败。

因为这场战争，刚刚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抑郁而终，而丰臣家也开始发生分裂。就在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三年，“关原合战”爆发，丰臣家的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火并，丰臣家权威尽失，开始四分五裂。15年后，惨烈的大阪战役爆发，德川家全歼丰臣家，丰臣一族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大家去大阪旅游的话，可去天守阁顶层看这段历史。）可以说，入侵朝鲜是丰臣家败落的最大诱因，也是丰臣秀吉一生最大的败笔。

而朝鲜呢？朝鲜虽然赶走了侵略者，但其实也是个输家。朝鲜首都

汉城的户数从战前的八九万户减到战末三四万户（还被日本人掳走了不少陶瓷工匠）。战后朝鲜全国人口只有战前的1/6，从此一蹶不振。

那么明朝胜了吗？从表面上看，明朝教训了日本，帮助了小弟，维护了宗主国的尊严，但事实上，七年的朝鲜战争，也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因为要支持朝鲜战争，明朝国库开始入不敷出。更重要的是，明朝精锐的辽东军经此一役，也元气大伤，从原来的近10万兵额，下降到1600年的4万，下降幅度达到了60%。

辽东防守力量的削弱，直接让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势力抬头，其中最大的一支，就是努尔哈赤的后金。经历朝鲜战争后，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在剿灭努尔哈赤这件事上一直力不从心，内部又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最终战后不到50年，大明帝国崩溃，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

所以，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回顾历史，如果不把元朝出兵日本算上的话（那场战争因为气候原因，双方几乎没有大规模作战，蒙古海军是被“神风”给吹没的），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近邻国家一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战争，其中中国获胜三次（唐朝的白江口之战、万历朝鲜战争和抗日战争），日本获胜一次（甲午战争）。

中国为这三次胜利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尤其是第三次，代价可以说是惨痛的。日本为三次败仗付出的代价自不用提，而甲午一胜，从短期看自然是让日本国力大进，但从长期看，也滋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最终在二战中遭遇了最惨痛的失败。

我们经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关系，但历史却证明，我们两个国家往往是“一衣带血”的关系。

特别希望日本能够再多回顾一下历史，借鉴一下历史，正视一下历史。

也希望我们的一些同胞，不要再在键盘上体会“踏平东京”乃至“东京大屠杀”带来的快感，更不要让这种行为沾染上自己国人的鲜血。

愿警钟长鸣。

1598年，中朝日决战露梁海

上一篇讲了万历朝鲜战争，不过主要讲的是陆战，但其实有一场重要的海战，与似乎更有名的鸣梁海战相比，这一战才是真正影响深远的一战。

1

公元1598年9月，历时7年，前后打过两次的万历朝鲜战争，似乎出现了结束的迹象。

这场由日本倾全国之力、动员40万水陆大军发起的战争，以日军势如破竹在朝鲜攻城略地为开始，以明朝出动7万大军进入朝鲜境内“抗日援朝”为中盘，中间插进过一次堪称搞笑的“和谈”，最终经过7年断断续续的拉锯战，总算进入了尾声。

标志性的触发诱因就是，1598年9月18日，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关白”丰臣秀吉死了。

丰臣家从白手起家到统一全日本，也就用了二三十年而已，根基并不算稳固。这场打了7年，被日本人称为“文禄庆长之役”的战争，早已使国内厌战声音四起。

而在朝鲜半岛的战场上，日本人本来就早已被中国明朝的军队压制在半岛南部的沿海一带，一筹莫展。

如今，“顶梁柱”倒了，群龙无首，谁都知道，日本人要撤了。

当时，除了先期已经撤退的日军外，留在朝鲜境内的大概还有5万人左右。按照计划，驻扎在东部的日军在釜山集结后上船回国，中部的日军就地上船，而西部的侵朝日军殿后，在济州岛集结后乘船回国。

如果这个计划可以实施，这5万侵朝的日军大致可以“体面”地撤回国内。

但是，有人并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

这个人，名叫陈璘。他是援朝明军的水路总指挥。

陈璘，广东人，以英勇善战闻名，长期奋战在东南沿海的抗倭第一线，屡立战功，官职一路飙升。

但另一方面，他又充满争议，曾多次被免官，原因各种各样——大兴土木、役使部下、勒索部下、贿赂上级等等，但却因为实在太能打仗，每次又被起用。

《明史》对陈璘的评价是“有谋略，善将兵”，却也记录了他“然所至贪黩，复被劾褫官。废久之，朝士多惜其才，不敢荐”。（关于陈璘“污点”的记载也有后人质疑为清人写史作传时有所偏颇，存争议。）



陈璘像

陈璘统领水军的经验和才能，确实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在他率领的大明水师震慑下，以海战为傲的日本水师，居然一度不敢接近陈璘的船队。

当然，陈璘的水师能如此威武，也因为他有一群好帮手，比如他的副手，邓子龙。



邓子龙雕像

邓子龙，江西人，踏上朝鲜战场的时候，已经年近七十了。

有意思的是，邓子龙和他的上司陈璘颇有相似之处：一方面，邓子龙也是以勇武闻名，多次剿匪平叛，屡立军功；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也有一些缺点，比如包庇和纵容自己的亲信等，以至他的一个亲信因为军饷问题竟然起兵造反，邓子龙受牵连后被捕入狱。

但因为战名显赫，所以邓子龙即便以七旬之龄，依旧被朝廷起用，编入大明援朝的水师，出任陈璘的副手。

陈璘和邓子龙，两个颇有点“戴罪立功”意味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在丰臣秀吉去世后不久，陈璘就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谁都知道，“大统领”去世，原本就无力再战的日本人，肯定要总撤退了。

但是陈璘绝不愿意日本人走得那么轻松和体面，他要集结重兵，围追和堵截日军的主力。

在和邓子龙等人商议之后，陈璘把截击的目标，放到了驻扎在朝鲜南部顺天的日军第二军团身上。

第二军团的总司令官，是日本的战国名将小西行长。

按照小西行长的计划，他的第二军团应该从顺天出发，由曳桥上船，往东航行回国。

而陈璘就是要堵住小西行长撤退的道路。

当然，要完成这一点，陈璘还需要一个人配合。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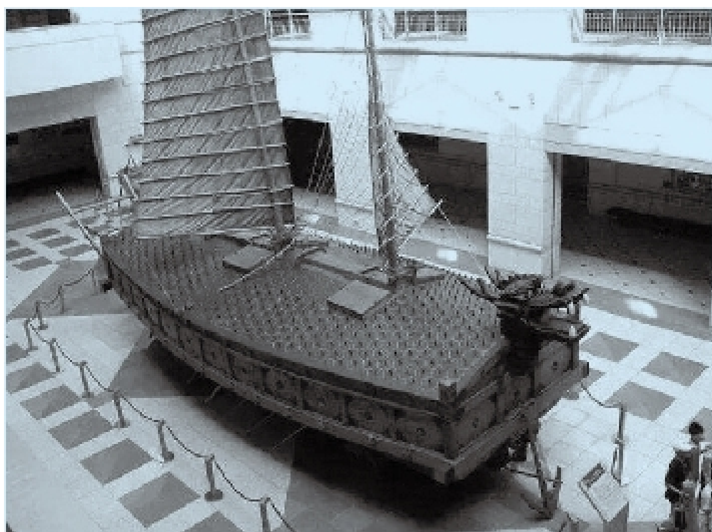
这个人，名叫李舜臣。

李舜臣是朝鲜人，生于汉城，从小就展现出“文武全才”的天赋，但他最后参加的是武举考试，并且考中了。

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后，经宰相柳成龙举荐，当时已经47岁的李舜臣被破格擢升为全罗左道水师节度使，统领水军，抵御日军。

在任上，李舜臣充分发挥自己的经验和才智，经过研究和改进，造出了在当时世界海军史上赫赫有名的战船——龟船。

龟船并非李舜臣发明，但他进行了大量有效的改造。改进后的龟船长10余丈，宽1丈多，船身及上面的“龟壳”用硬木制作，包上铁板，敌人的炮火很难对其造成伤害。铁板上还装有密集的铁钉，使敌人在接舷战时无法攀登。船头有一个大龙头，上设两个炮眼，在行进中船内可焚烧硫黄等物，烟从龙口喷出，可以起到隐蔽自己、迷惑敌人的作用。船身四周凿有很多炮眼枪眼，便于士兵在船内向敌人发射火力。同时，船的两侧各有10面船桨，战斗时一齐划动，航行飞快，进退自如。



韩国首尔军事博物馆展出的龟船仿制品

日军入侵朝鲜后，朝鲜军纪废弛，一路脆败，首都汉城19天就被攻克，平壤43天沦陷，一个多月，朝鲜八道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但在海面上，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军几次击败日本水军，虽然无法挽回大局，却让人眼前一亮。李舜臣因此升任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统制使，可以说成了朝鲜水师的总司令。

然而，日本人在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前使用了反间计，功高震主的李舜臣被诬告后革职，锒铛入狱。

失去李舜臣后的朝鲜水军顿时不堪一击，漆川梁一战，朝鲜水军在庸将元均的率领下几乎全军覆没，近200艘战舰沉没。

无奈之下，李舜臣被再度起用，但他手里当时就只有12艘残存的“板屋船”了。

李舜臣毕竟是李舜臣。

1597年10月，李舜臣用12艘战船，再加上100余艘改装过的民用船，在水路复杂的鸣梁海峡设伏，一举击沉日军先锋部队的30余艘战船，是为著名的鸣梁海战。

不过鸣梁海战存在一定的争议。按照朝鲜以及后来韩国方面的说法，李舜臣的部队凭借12艘战船在这场战役中击沉日军130多艘战船和

200多艘后勤船，杀死日军7300多人。

但事实上，整支入侵朝鲜的日本水军一共只有7200人。当时日军进入鸣梁海峡的是30多艘船的先锋部队，李舜臣自己的《乱中日记》也写的是“贼船有三十只撞破”。

按照日方的记载，日本损失了几艘船，十几个人。

事实上，鸣梁海战并没有阻止日军的战略意图，所以李舜臣也一直在寻找与日本水军大干一场的机会，只是手里的朝鲜水师太过孱弱。

所以可以想象，李舜臣收到陈璘的“邀约”后，有多兴奋。

一个约定很快就达成了：中朝联军，伏击日军。

4

1598年12月8日，明朝和朝鲜的联合水军抵达猫岛。

猫岛，位于朝鲜南部的南海岛西侧，扼守光阳湾的要冲。日军如果要从猫岛西面的顺天走水路出海，无论往北还是往南，都无法避开猫岛。

12月9日，日军第二团军由小西行长率领，果然开到了猫岛附近。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师立刻全军出击，给了日军迎头痛击。

在之后几天里，小西行长几次试图冲破朝鲜水师的防线，但都无功而返——李舜臣率军拼尽全力，将小西行长的一万多人死死堵在了光阳湾里。

12月11日，几艘小船忽然快速驶向猫岛，在经过明朝水师的防线时，防线忽然出现了一个小豁口，几艘小船顿时就冲了出去。

那是小西行长派出去讨救兵的信使。

关于陈璘的这个“谜之行为”，曾有过两种说法：一种，说是陈璘收受了小西行长的贿赂，放了这道口子；另一种说法是，陈璘是故意放小西行长去报信的，为的就是让他引来更多的日军援兵，再一举歼灭。

如果按第一种的逻辑，陈璘也不是傻瓜，既然不会放小西行长全军

通过，那自然也知道放他这几条船出去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第二种可能性相对大一些——当然，陈璘也有可能想两头通吃。



小西行长画像。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得力干将，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先后两次都担任先锋官的角色



岛津义弘，日本战国时代九州萨摩大名。曾率领萨摩军团辅佐父亲岛津贵久及兄长岛津义久统一整个九州，时人称之为“鬼岛津”“鬼石曼子”

那么，小西行长去向谁讨救兵呢？

他是去向驻扎在泗川的日军第五军团司令官岛津义弘请求救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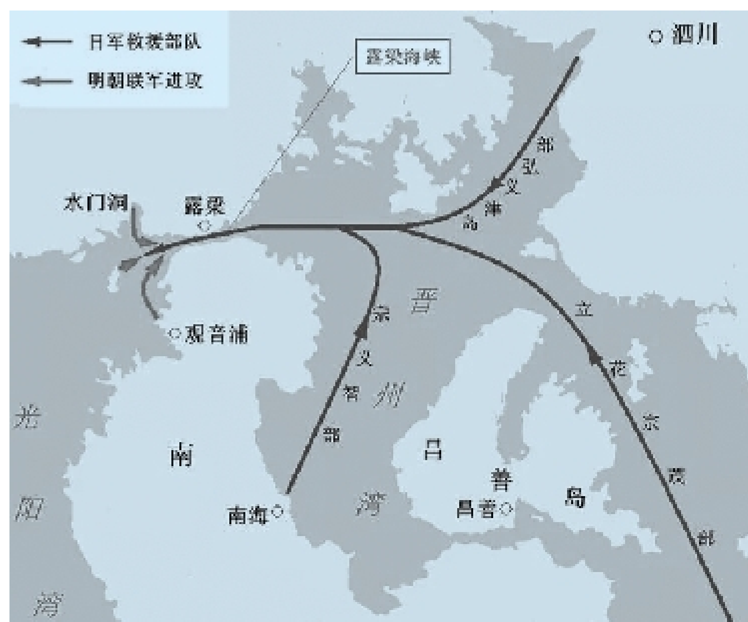
岛津义弘倒确实很讲义气，在接到小西行长的信之后，亲自率领得力干将前往救援。在救援的路上，他还遇到了从固城赶来的立花宗茂和从南海赶来的宗义智——小西行长给他俩也都发了求援信。

三支日军合兵一处，决心拼死也要救出被困在海湾里的小西行长。

这三支日军兵力合在一起，也是颇为惊人的：一共1.7万余人，大约500艘战舰。

而此时，明朝水师的陈璘和朝鲜水师的李舜臣也集结了重兵：明朝水师大约2万人，600艘战舰；朝鲜水师大概7000人，100艘战舰。

按照陈璘和李舜臣事先规划好的，这将是一场“等君入瓮”的伏击战。而伏击战的地点，陈璘和李舜臣也早就选择好了：



伏击的地理位置

岛津义弘的援军有一条必经之路，那就是要通过南海岛与朝鲜半岛之间一段狭窄的海峡，那段海峡最窄处不足1000米，非常适合伏击。

这个海峡的名字，叫作“露梁海峡”。

一场当时亚洲最强的三支舰队的大战，即将在此拉开帷幕。

5

1598年12月16日凌晨1点刚过，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了露梁海峡。那就是岛津义弘率领的三家联合的救援舰队。

而此时的中朝联军，一支埋伏在左侧，一支埋伏在右侧，静静等候敌人的到来。

正当日军500多艘战舰全部进入露梁海峡，先锋部队已经驶出海峡的时候，忽然之间，上百门大炮的轰鸣声响起。

但这炮，不是中朝联军打的。

在一片黑暗中，日军的舰队忽然向前方无目标齐射了。

这也让中朝联军大吃一惊。

原来，久经战阵的岛津义弘也知道露梁海峡是一个绝佳的伏击位置，预料到自己绝不会轻轻松松通过这个海峡。但是，由于这是救援小西行长最便捷的道路，他也只能仗着自己的舰队还算庞大，又趁着夜色，打算硬闯。

至于为何要冒着暴露位置的风险先行开炮，是因为岛津义弘知道前方肯定有伏兵，舰队已经全进入海峡了，与其等对方开炮，不如先下手为强。

一看到对方发炮，陈璘和李舜臣知道对方已经洞悉己方的埋伏计划，索性也就发出号令：全军出击。

一时间，从两个方向冲出的中朝水师，向着被挤在露梁海峡中的日本水师冲了过去。

上千条战舰在狭窄的露梁海峡顿时战成一团。

炮声、枪声、呐喊声、登船肉搏的怒喝声响彻海峡，而火药发出的闪光和火把发出的光亮，更是把整个海面照耀得一片红光。

朝鲜的宰相柳成龙曾在他用汉语写的朝鲜半岛史书《惩毖录》中这

样记录当时的场面："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入水中者如雨。"

两军对接之后，立刻就分出了高下。论船只的先进程度、火炮的威力、水兵的作战技巧、士气的高涨程度，中朝联军都明显要压日军一筹。明军还配备了一种喷火筒，一条条火舌直接喷向日本战船，喷一艘烧一艘。所以当战役开始几个小时后，日军舰队就明显落了下风。



当时明军已经配备了从葡萄牙学来的"佛朗机"大炮

到了天色将亮未亮之时，日军已经稳不住阵脚了。岛津义弘只能下令收拢船只，退入西南方向的观音浦港湾。

跟随而来的中朝联军，随即将港湾口封得严严实实。

眼看没有退路的日军，只能重新集结阵型，返身再度向中朝联军扑来——这一次，是真正的决死攻击了。

原本就打算全歼这支舰队的中朝联军，立刻做好迎战准备。

这时候，中朝联军其实已经胜券在握了。

但狭小的港湾限制了中朝联军占优势的火炮，倒给善于贴身肉搏的日本水兵有了发挥的机会。

就是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最先出意外的，是明军的副总指挥邓子龙。

邓子龙率领的部队是明军攻击的主力，甫一开战，他就率领三艘巨大的楼船冲入了日军阵营，左冲右突。观音浦港里双方短兵相接后，邓子龙更是将座船交给副手指挥，亲率200多名亲兵，直接加入了肉搏战团。

虽然已经70岁，但邓子龙的勇武完全不减当年，他带领亲兵直接跳上日本的战船贴身肉搏，左挥右砍，杀敌无数。有时他也会跳上朝鲜战船，帮助友军斩杀扑上来的日军。

然而，当邓子龙率人又跳上一艘朝鲜战船帮忙杀敌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由于现场太过混乱，周围的明军和朝鲜士兵误将这艘战船给点燃了。一时之间，邓子龙登上的战船燃起熊熊大火，并且发生了倾斜。日军见到朝鲜战船着火倾斜，顿时不要命般从各个方向爬了上来。

四周都是大火，深陷重围的邓子龙无路可退。他只能整合周围亲兵，死守一角，苦等救援——但是，没人知道他在那艘船上。

日军发现这股明军特别顽强，直接调来鸟铳队排射。

邓子龙胸口中了数弹，最终倒下。

日军蜂拥而上，割下了邓子龙的首级。

然而，乱军之中，意外还没有结束。

李舜臣的座船也遭遇了危险。

和邓子龙一样，李舜臣打起仗来讲究的也是身先士卒。开战之初，李舜臣的座船就率先冲入了敌阵。在短兵相接后，他的座船也被日本战船包围。

陈璘是认得李舜臣座船的。他一见李舜臣座船被围，立刻率船来救——两人在数次战斗合作中，确实已经结下了友谊。

然而，日军又是认得陈璘座船的，一看敌军主帅出现，便如同群蜂一样围了上去，向陈璘的座船发动拼死攻击。

陈璘的座船虽然非常高大，但也挡不住日军的拼死攻击，有好几次，日军已经爬上了座船，陈璘的亲兵在甲板上与日军展开肉搏。最危险的一次，日军的士兵差点就砍到了陈璘，是陈璘的儿子陈九经扑上来挡了一刀。

但陈璘毕竟久经沙场，在杀光爬上甲板的日军之后，他下令座船索性停锚，所有士兵伏到船舷以下，等日军靠近后集体开火射杀，再集体伏下等待下一次机会。

用这样的战法，陈璘稳住了阵脚。

正在这时候，一支朝鲜船队杀入了重围——是李舜臣率人来救了。

李舜臣也认得陈璘的座船，看到他因来救自己而身陷重围，于是奋力杀出一条血路，反过来救陈璘。

两支船队会合后，周围的明军和朝鲜战船也渐渐靠拢了过来，战局一下子扭转。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意外发生了。

在枪林弹雨中，站立在船头的李舜臣忽然被一颗日军鸟铳发射的流弹击中了。子弹从腋下钻入了李舜臣的身体，中弹之后，李舜臣就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当即对身边的侄子李莞嘱咐了一句：“敌方急，勿言我死。”

言毕，身亡。

侄子含泪遵照李舜臣的关照，秘不发丧，代叔父继续指挥战斗。

此时，中朝联军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7

这场从凌晨开始的战役，一直打到了正午时分。

海面上到处都是漂浮的战船残破木板，还有数不清的浮尸——大多数都是日军的。

岛津义弘的舰队垮了。

在最后时刻，岛津义弘组织了200多艘残存的战船试图突围，但被中朝联军围堵，最终，只有50多艘船逃了出去。

500多艘战船，最终只幸存了50多艘。近两万日军，最终只有3000人左右生还，绝大多数葬身大海，还有一部分逃到岛上，被追上来的明军一一捕杀。光中朝联军斩杀并上缴的日军首级就有1100多颗。

不过，对中朝联军来说，还是有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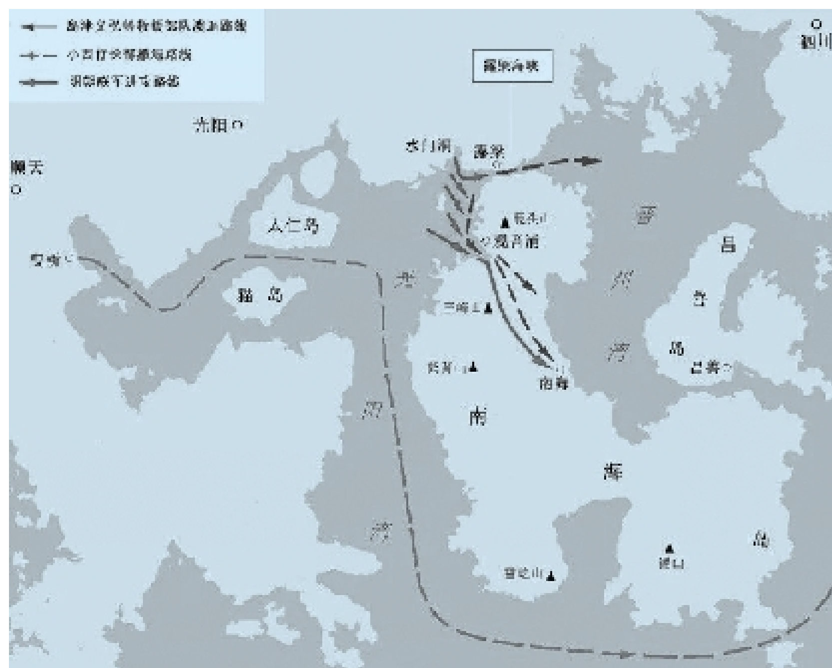
一个遗憾是，中方损失了70岁的老将邓子龙，而朝方“国宝级”统帅李舜臣也阵亡了。

在清理战场的时候，陈璘不知道李舜臣已经阵亡，还准备登船答谢李舜臣赶来解围之恩。他听到李舜臣在战斗中已经阵亡的消息后，从椅子上跌落下来，失声痛哭。

另一个遗憾是，小西行长的第二军团还是跑了。

陈璘原来是安排了船只监视小西行长舰队动向的。然而，老谋深算的小西行长知道当时中朝联军的主力全在猫岛北面的露梁海峡与岛津义弘的舰队作战，所以他在此时率领船队一路偏南航行，绕着南海岛南端悄悄走了。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小西行长同样全军出击，开赴露梁海峡，从西面夹击中朝联军，陈璘还是有点吃力的（当然，小西行长的部队以陆军为主），所以陈璘也没有选择去追击小西行长的舰队。



小西行长的逃跑路线

生气的是岛津义弘。

在逃离战场后，他还想着派几艘船漂泊在大海上寻找小西行长舰队的踪迹，结果一艘日本商船告诉他们：小西行长的舰队早跑了。

8

露梁一战，日军最后的士气和底气也被打垮了。

而明朝和朝鲜虽然是战争的获胜者，也元气大伤。

不过，就这场战争而言，中朝之间的联合作战还是值得记上一笔，尤其是在海战中的表现。朝鲜在战后还专门为陈璘和邓子龙立宗庙祭祀。

而且，这场战争虽然导致三国都国力大伤，但日本尤甚。他们第一次因扩张领土的野心碰得头破血流，由此，东亚也得到了200多年的和平。

如今，400多年过去了，但历史依旧没有忘记。

2016年，露梁海战的遗址观音浦的海边，建起了占地9万平方米的“殉国公园”。公园里立了邓子龙和李舜臣的铜像，并建有纪念馆，通过各种视频、图绘和文字资料，介绍了当年中朝联军的这场惨烈海战。

在此之前的2015年，韩国庆尚南道南海郡守（相当于县长）朴英还访问过邓子龙的故乡——江西省丰城市邓家村。在邓子龙的墓地前，朴英率领的访问团献花、焚香，并举行祭礼仪式。

在朴英致的悼词中，有这样一句话：

“希望中韩两国能够传承邓子龙将军与李舜臣将军誓死守护信义的精神，和谐共处，实现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

馒头说

电视剧《亮剑》中，已经当上师长的李云龙和自己的参谋长张大彪回忆抗战时期，说：“想当年，我缴获了一门日本92式步兵炮，乐得是一宿都睡不着觉！”

二战期间日本陆军的装备，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绝难称一流的，比如薄铁皮的95式和97式坦克，以及92式步兵炮。（当然，以小巧和隐蔽为设计宗旨的92式步兵炮，至少在机动性和多用途方面占了点优势。）

但就是这样的装备，在中国军队面前已堪称“豪华”。92式步兵炮在解放战争期间还是解放军攻城克坚的主力武器。

而就在400多年前，那场露梁大海战中，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其实是碾轧日本的。

从双方水军的战舰来说，明朝的水师拥有甲板上是四层楼、配备大量火器的福船，还有楼船、栢槽、沙船、苍船、铜绞艄、海舫、八喇虎等各类船只，朝鲜水师有李舜臣的龟船。而日本水师的主力舰只有福船的1/5大小，且数量极少，绝大多数都是小型和超小型船只。

从火力配备上来说，明军很早就配备了从葡萄牙人那里学来的“佛郎机”炮，最远射程可达3000米，而中距离则大量配备射程为500米左右的“虎蹲炮”，近距离则除了传统的弓箭外，大量配备由火绳枪改造的鸟铳。此外，明军还有自己发明的各种“黑科技”，比如他们配备的一种可

以喷出数十丈高火焰的“飞天喷筒”，可以看作最早的“火焰喷射器”雏形，还有叫“火龙出水”的多级火箭发射系统。

而日军方面，在鸟铳的改进和使用上比较出色，但战船大多数都不配备有威力的大炮，鸟铳根本无法给明军的福船、楼船造成任何损害。

所以，露梁一战，中朝联军完胜日军，这固然有战略筹备、将士英勇和高效联合指挥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但武器装备的优势也是绝不能忽视的。

可惜的是，经此一役，形势却开始慢慢发生了逆转。

296年后，在黄海的北部海域，中日两国最强的海军再次列开阵势——那时的朝鲜海军，早已烟消云散。

那一次，日本舰队在舰队的总吨位、新军舰的数量、航行的平均速度、火炮的射速等各方面都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北洋舰队。

至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都知道，战争的胜负并不是单单由武器装备的优劣决定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武器确实是一大影响因素。而这种优劣之所以产生，其实取决于交战双方背后的各种比拼：从制度到经济，从科技到人文，从思想到精神。

愿我们从领先到落后的历史，不会重新上演。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明史·卷二百四十七·列传第一百三十五》（清·张廷玉、徐元文、万斯同等）

2.《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援朝鲜》（清·谷应泰，中华书局，1977年）

3.《韩国庆尚南道南海郡守访问抗倭名将邓子龙墓地（组图）》（裴埈基，人民网，2015年1月23日）

4.《史海：410年前的今天明军取得露梁海大捷》（人民网，2008年12月16日）

5.《明代援朝抗日：震惊海外的露梁海战》（“梦回三峡”，新浪博客，2017年10月15日）

6.《帝国最后的荣耀》（马伯庸、汗青，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7.《露梁海战中武器装备使用对新时代我国国防科技建设的启示》（严兴文、梁碧锜、刘文霞、易湫铭，《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年第15期）

8.《万历抗日援朝战争之露梁海战》（白晨光，《文史天地》，2018年第11期）

决战料罗湾：中西文明的海上大搏杀

一个是冉冉升起的西方海上霸主，一个是日落西山的东方大陆帝国，这两个国家的精锐海军主力，打一场海战，结果会是怎样的？

1

1633年，大明王朝的第一场雪，比平常来得还要早一些。

这一年，是崇祯皇帝即位后的第六年。按照后世一些科学家的观点，明朝此时已经进入了“小冰河期”。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北方常年干旱，奇寒无比，很多地方庄稼颗粒无收。而南方的气候也异常，江苏、福建，甚至广东地区的河水都出现了结冰现象，且地震频繁。

对于发誓要成就一番伟业的崇祯皇帝而言，天象并不是唯一让他头疼的地方，还有人祸——天灾导致饥民遍野，盗贼四起。

还是在这一年，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这批造反者，率领十多万农民起义军突破了官军的重重包围，进入了明军力量薄弱的湖北北部地区，开始游击作战，让崇祯之前推行的“以抚代剿”政策彻底宣告破产。

除了应对国内的农民起义之外，更让崇祯睡不着的，是关外的后金铁骑。

这一年，实力已经越来越强的后金一鼓作气拿下了北方的重镇旅顺，明朝总兵黄龙兵败自杀。而不久之后，原毛文龙麾下的悍将尚可喜也宣布投降后金。

遗憾的是，崇祯的烦恼还没有到此为止。

如果说陆地上的“内忧外患”目前还暂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的话，一股威胁大明东南沿海的海上势力，又让这位年轻的皇帝寝食难安。

因为那股海上的势力并非寻常的倭寇或海盗，而是来自遥远西方的一个强大国家。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迅速崛起，事实上已经成为西

方世界的海上霸主。

没错，那就是荷兰。

在这一年，崇祯皇帝觉得，有必要和这个纠缠大明十几年的对手做一个了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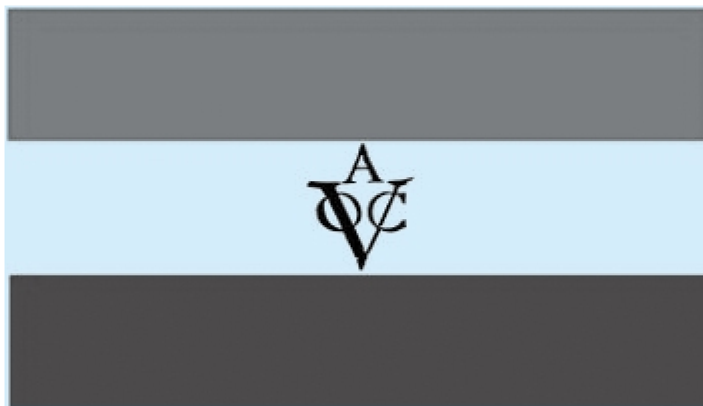
2

1633年，荷兰对明朝的忍耐其实也到了极限。

这个在17世纪初开始迅速崛起的国家，以惊人的造船数量、出色的造船技术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贸易能力获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称号。一个令人咋舌的数据是——当时全世界一共有2万艘左右的商船，其中1.5万艘属于荷兰。

而在荷兰的崛起过程中，又诞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一个体现国家力量的奇怪产物。

说它是一个“公司”，是因为它确实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建立并运行的：私人性质，有股东，有董事会，每年还会派发股息。但另一方面，这家公司是可以自己发行货币的，还可以自己组建佣兵，打造战舰，与其他国家可以签订正式条约，并且可以代表荷兰对海外殖民地施行殖民统治。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标志。荷文原文为Vereenig de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中文全文应译为“联合东印度公司”。公司的标志以V串联O和C，上方的A为“阿姆斯特丹”的缩写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

达）建立了总部，正式成立。随后，这家实力强大的公司便开始将触角伸向了东南亚所有值得做贸易的国家。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占有的地区范围包括了印度洋与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到1669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私人公司了，拥有1万雇佣军、5万员工、140艘战舰，每年派发的股息高达40%。

在东南亚沿海做贸易，有一个巨大的帝国是不可能回避的，那就是中国。

从荷兰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巴不得和中国人做生意的，地大物博的中国有太多珍贵商品可以让他们带回遥远的欧洲卖取高价。但是，荷兰人很快就发现自己迎面撞上了明朝那条从朱元璋就开始传下的遗训：海禁。

荷兰人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打开明朝自由贸易之门的努力，并不断试探明朝的“底线”。1622年，长期只能通过近乎“走私”的方式来满足自己贸易需求的荷兰，一举占领澎湖并建立了碉堡。大怒之下的明朝在1624年倾尽东南海军进行围剿，一场血战后荷兰人被包围，最终只能选择投降，并在明军的监督下拆掉了碉堡。

吃过一亏的荷兰人虽然之后有所收敛，但依旧无法咽下这口气。作为堂堂西方的“海上霸主”，他们无法接受由中国人制定并主导的贸易规则。

终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33年做出了自己的最后决策：开始劫掠中国沿海地区，准备最终向明朝宣战——以战迫商。

一场当时东西方最强大两股势力的大对决即将拉开帷幕。

而这场大对决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

3

1633年，郑芝龙才29岁。

因为他的儿子郑成功太过出名，所以作为父亲的郑芝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被忽略了。事实上，比起他的儿子，郑芝龙的传奇故事一点

都不逊色。

郑芝龙生于福建泉州，17岁时开始投奔舅父做起了海上贸易，因为被当时东亚海域的第一大海盗商人李旦认为义子，人生之路开始发生改变。经历了一系列的拓展和拼斗，到了1633年，29岁的郑芝龙俨然已经是当时东亚沿海最大的海盗商人。

之所以说他是“海盗商人”，是因为郑芝龙的身份其实一直在变：他不被明朝官府承认并遭围剿时，身份就是“海盗”；被明朝官府承认并招安时，身份就是“海商”。

在1633年的时候，郑芝龙的身份是“海商”。因为在五年前，他就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安——其实是明朝政府发现再也无力剿灭郑芝龙了——官授“五虎游击将军”。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游击”虽然带着一个“将军”衔，但其实职位不高。游击将军上面还有参将、副总兵、总兵，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团长或略高一点的职位。但郑芝龙这个“团长”，其实手里掌握着3万剽悍的私人“郑家军”和近千艘战船。

不过郑芝龙也不是很在乎官衔，他要的只是朝廷给他一个“名分”，能够让他安心打理郑氏家族的生意。当然，那时候要在东南沿海做生意，光搞定明朝官府这一头还不行，还得搞定另一头——荷兰东印度公司。

郑芝龙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渊源是很深的，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受义父李旦的推荐，郑芝龙一直就是荷兰人的翻译。也正是在担任翻译期间，郑芝龙展现出了良好的经商天赋（可能还有做海盗的天赋），荷兰人甚至让他也出任一艘船的船长，在东亚海域经商兼劫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赚取利润。

所以，郑芝龙、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明朝政府之间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

明政府一方面想剿灭郑芝龙，但在发现无力剿灭后，又需要仰仗郑芝龙维护东南沿海的安定，甚至利用他来打击其他的海盗。

荷兰东印度公司想讨好郑芝龙。一方面，郑芝龙在1624年自立门户

之后，势力越来越大，实力也越来越强，甚至开始劫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而且几次交锋下来，荷兰人负多胜少。另一方面，郑芝龙还有一个明朝的官方身份，荷兰人希望通过郑芝龙影响中国官方，完成“打开自由贸易之门”的心愿。



郑芝龙

由此可见，郑芝龙是这段“三角关系”中的核心人物。

而作为“核心人物”的郑芝龙，一直在明朝政府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夹缝中翩翩起舞：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存在巩固自己在明朝官员眼中的“棋子”地位；以明朝可能会开放贸易为诱饵，接二连三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帮他剿灭海上竞争对手。

明朝政府本来就奈何不了郑芝龙，更何况他打击的竞争对手也是海盗，所以乐见其成。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却有迫切的通商需求，在几次帮助了郑芝龙之后不见回报，他们就决定先拿郑芝龙开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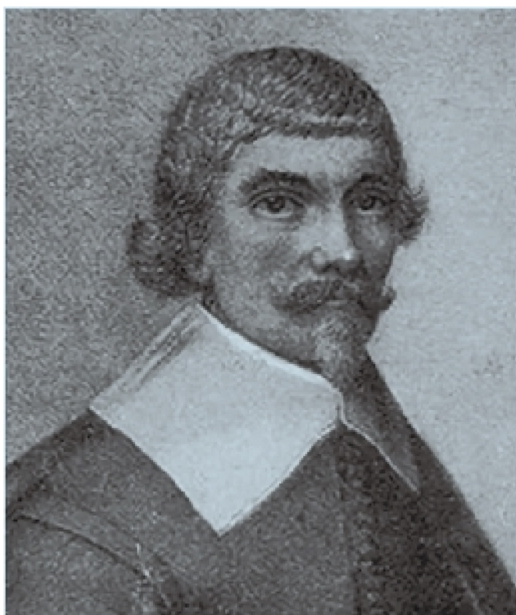
从某种意义上说，荷兰海军要对决的不是大明水师，而是郑芝龙的“郑家军”。

双方交恶，郑芝龙一上来就吃了一记大亏。

1633年7月12日清晨，五艘荷兰快艇忽然开到厦门港。其实之前在南澳，荷兰舰队已经和明朝水师发生了交火，但这个消息还没传回厦门，郑芝龙正率“郑家军”主力在福建剿匪，大家都不知道荷兰事实上已经对明朝开战。

当时厦门港里停泊的，是郑芝龙正在打造的数十艘新式战舰（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荷兰军舰建造的），对到来的五艘荷兰快艇完全不设防。五艘荷兰军舰一直开到郑氏舰队的中间，下锚，忽然升起了红色战旗，宣布开战。突如其来的密集炮火给还在建造中的最新式舰船带来了灭顶之灾——数十艘战舰全部被击沉。

率军突袭的荷兰舰队司令普特曼斯当天记录下了对这次偷袭成功有多满意：“有些中国船的大炮比我们快艇中任何一艘都要多……有人诚实地说，从未想过在这个国家会看到像这舰队那么漂亮壮观、雄伟巨大、武器精良的戎克船。……我们不难想象，这支舰队被毁，将使中国这个国家，尤其是郑芝龙受到何等巨大的痛苦。”



汉斯·普特曼斯，后来成为荷兰殖民台湾时期的第四任台湾长官

郑芝龙痛苦吗？当然痛苦。那些被摧毁的战舰是他谋划的未来舰队主力。

但29岁的郑芝龙之所以能成为一方枭雄，还是有原因的——他完全没有在大怒之下率军报仇，而是开始耐心地给荷兰人写信。

郑芝龙先是礼貌地询问荷兰人攻击厦门的原因，随后又开始不断地写信，称荷兰人通商的诉求明朝其实一直在考虑，是很有希望同意的，但荷兰人不能操之过急，兵戎相见。

他的信给荷兰人的整体感觉是，经此一役，明朝水师被打怕了，准备求和了。

但事实上，郑芝龙是在拖延时间。

一方面，是因为郑芝龙清楚地知道双方舰队的实力。荷兰舰队的主力战舰是都是“盖伦船”。这种拥有两层甚至多层甲板的大帆船是当时最先进的战舰之一。而且荷兰的战舰一般都配备至少10门当时被中国人称为“红衣（夷）大炮”的加农炮，一尊3000斤的红衣大炮能轻松将炮弹打出七八里远，而与之相对的明军自制铁火铳只能打到三里远——荷兰舰队完全可以在明朝水师战舰的射程之外吊打对手。



荷兰盖伦帆船“毛里求斯”号

而当时明朝水师虽然立国之后就未遭一败，但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与荷兰这样强大的对手相比，当时明朝水师装备的都是被称为“戎克船”的小个头战船，每艘船只能配两门炮，无论是载员数量还是火炮数量，都无法和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时威武的“宝船”相提并论。

所以，郑芝龙知道在战舰质量上其实明朝水师是落下风的，要想打，只能靠数量和战术，但这需要时间。



西方人描绘的16世纪航行于亚洲海域的中国“戎克船”

另一方面，郑芝龙知道7月后是台风季，不是一个开战的好时候。

在偷袭了郑芝龙舰队后，荷兰方面向明朝发来了他们所谓的“停战条件”：在漳州河、安海、大员（台湾）、巴达维亚有自由贸易的权利；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可派遣代表至中国沿海城市收购商品；船只能在福建沿海自由停泊；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

而且，按他们之前提出的要求，明朝不能和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做生意，只能和荷兰人有生意往来。

这种盛气凌人且要求垄断的诉求，明朝是肯定不可能答应的，但是郑芝龙的回信却始终态度暧昧：不明确答应，也不明确拒绝。

1633年10月6日，秋季的最后一场大风暴降临，荷兰舰队受到了一些损失，但舰队司令普特曼斯得到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郑芝龙的舰队受损更加严重，他因此被福建巡抚撤销了兵权。

而事实上，这是郑芝龙故意放给荷兰人的一个假消息，这个时候，他的舰队集结已经进入了尾声。

10月19日，普特曼斯忽然收到了来自明朝的一封战书，有别于之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封战书的态度非常决绝——还附有21名明朝水师将领的签名："御枕岂容一犬蹋卧？尔等怎敢盘踞吾处？你若急盼开战，且于厦门湾这边来！"

普特曼斯不知道的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大明水师以郑芝龙舰队为主力，已经集结了超过150艘战舰、3万名官兵。

中国人准备动手了。

5

1633年10月22日，凌晨4点，料罗湾。

料罗湾是金门岛东南部面向台湾海峡的一个海湾，此时是荷兰舰队的停泊之地。荷兰舰队停泊在料罗湾的共有58艘大小军舰，其中8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力战舰，剩下的50艘是中国海盗船——荷兰人为了对抗郑芝龙，找来了另一个海盗头子刘香的舰队组成了联军。

而在荷兰舰队的东南方向，150艘大明水师的战舰悄悄散开了阵型。

很快，负责瞭望警戒的荷兰水手发现了明朝的水师，发出了警报——双方同时进入战斗状态。

东西方两大最强势力的海军，终于在料罗湾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

甫一开战，荷兰舰队的司令普特曼斯就下令让8艘荷兰主力战舰居中，刘香的50艘海盗船分散拱卫策应。按照普特曼斯的想法，用中国的海盗船挡住明朝水师的去路，然后8艘火力超强的荷兰战舰就可以进行"打靶训练"了。

但是，郑芝龙的战术完全出乎普特曼斯的预料。

在郑芝龙率领的150艘战舰里，50艘是郑芝龙自己的主力炮舰，他让这50艘船与对方进行硬对硬的炮战，而大部队——100只小而坚固的

戎克船，充分发挥机动性强的特点，义无反顾地径直冲向了8艘荷兰主力战舰。那100艘戎克船，统统都点上了火，成了100艘熊熊燃烧的“火船”。

荷兰军舰上的官兵顿时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还从没见过这种战法：对方居然会将自己的主力战舰统统点火燃烧！而每艘“火船”上都配有钩子，只要“火船”一和荷兰战舰接触，船上的中国士兵就会用钩子牢牢钩住战舰，然后不要命一般冲上甲板来肉搏。

中国人怎么那么拼命？荷兰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这次决战，郑芝龙动用了自己私人的金库，为这次参战的“郑家军”开出了赏格：参战者，每人赏白银2两，如果战事延长，给“加班费”5两；每艘“火船”配备16人，如果能成功烧掉一艘荷兰战舰，一艘“火船”额外赏白银200两；每砍下一个荷兰人的人头，奖赏白银50两！

当时明朝的一个七品县令，一个月的俸禄大概是5两白银。

在明朝水师震天的喊杀声和100条船的火攻中，荷兰人完全迷失了方向。短短时间内，荷兰的一艘主力战舰被完全烧毁，一艘被击沉，一艘连同船上的100名官兵一起被明朝水师俘获。剩下的几艘荷兰战舰掉头就跑（据明方战报共焚毁5艘），拱卫在周围的50艘刘香的海盗船全军覆没。

逃出战场的普特曼斯随后这样记录：“鉴于曾经受到强烈暴风的损害，现在又遭到这场败战，我们的力量已经衰弱到本季在中国沿海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

6

但是，料罗湾海战产生的影响，其实远远超过普特曼斯自己的估算。

首先，当然是荷兰舰队经此一战，认识到自己哪怕动用整个远东地区的所有主力，也无法战胜已经在没落中的明朝，最终只能放弃“自由（垄断）贸易”的主张，还是回到“你们给什么我们就买什么”的原有贸易模式。

其次，明朝虽然获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但本质上这只是一次“边疆

维稳”而已。他们要的只是安宁，而不是拓展或开启新的贸易模式。所以在打败荷兰人后，明朝要求的战争赔款最终也不了了之，对荷兰人的贸易尺度反而比以前略有放宽，为的就是避免他们再来骚扰。

再次，在整个料罗湾海战中，最得益的还是郑芝龙。经此一战，他不仅大大巩固了自己在明朝官方心目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彻底摧毁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信心，进而垄断了整个远东的海域。从此之后，每一艘在这个海域通行的商船，都必须给郑家上交“保护费”——每年3000两白银，买一面“郑”字令旗。如果哪艘商船没有插上“郑”字令旗而做生意，十有八九会在海上被“郑家军”洗劫。到后来，连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都要给郑芝龙上交“保护费”才能保安宁，而且荷兰人后来遵循的不是明朝的贸易规则，而是郑家制定的“贸易规则”。

年轻的郑芝龙由此年入千万，开始经营起他庞大的“郑氏帝国”——鼎盛时期船只超过3000艘，人马超过20万，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明朝灭亡。没有父亲留下的这份基业，他的儿子郑成功后来也不可能收复台湾。

最后还有一点，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西方列强经此一战，也看到了中国的实力——虽然明朝本身也已经处于垂死挣扎中。由此，无论西班牙还是葡萄牙，都吸取了荷兰的教训，不敢用武力进逼中国沿海。

只是，不思进取不会带来长久的优势。

两百年后，相似的一幕再次发生。

那一次，胜负易主。

馒头说

我曾和一个朋友讨论“闭关锁国”的问题。

他的观点是，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其实不是为了“防守”，而是为了“进攻”。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华文明与周边国家相比是先进的。那么作为先进国家将自己的先进科技封锁，再强力遏制贸易，就可以对周边落后国家实现一种“绞杀”。按照他的观点，古往今来，任何先进的国家，都会采用这种策略，只是表现形式、实施力度或叫法不同而已。

我部分同意这个观点，但也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承认先进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会不自觉地采用“贸易保护”手段，包括我们以“开放”闻名的唐朝，对外贸易也是由官方垄断的，平民是不允许对外进行自由贸易的。

这种“自我保护”看上去似乎理所应当，但带来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你根本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如自己想象的那般强大。

以明末这场料罗湾海战为例吧。荷兰人要求自由贸易可以理解，但要求垄断、建立据点乃至攻击明朝城市和港口，这些行为就完全暴露了殖民者本色，明朝的反击完全出于自卫，没有任何问题。

但换个角度看，明朝“片甲不准下海”的“海禁”政策还是建立在文明自信上的——我大明朝自给自足，和你们这些蛮夷做生意是赏赐，你们已经在占我便宜了，还要什么自由贸易？

但隐忧就在这里。如果说在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时代，大明的文明发展进度条还能领先世界的话，那么到了明末，西方文明早就迎头赶上了。就以料罗湾海战为例，郑芝龙的舰队其实也损失了100多艘战船，获胜也只能说是场“险胜”。而当时荷兰人的造船技术、军工水平，以及对贸易、制度的理解程度，其实已经领先于明朝了。至少，双方已经有很多可以互补短长的地方了。

这就是“自我封闭”的可怕之处——一旦失去了对外界的接触和感知，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个时间点已经被世界抛在身后了。而更可悲的是，可能自我封闭者那时候还在沾沾自喜。

从世界历史的进度条看，明末的中国已经很难说遥遥领先西方文明，到了清朝，事实上我们连东亚的传统势力范围都罩不住了——日本已经迅速崛起了。但问题是我们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自信中，乾隆皇帝对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带来的大量先进西方技术视而不见，而即便如“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当时也相信外国人如果失去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而死”。

所以，古往今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实现长久繁荣的基本条件，封闭和自大永远都是定时炸弹：可能一时看不出弊端，但一旦时间轴拉长，结果还是有目共睹的。

相对于几百年前的世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更是如此，包括互联

网在内的各项科技正在进一步将人类文明融合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背景下，长久的封锁或贸易保护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代价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历史留给人类很多经验教训，就看我们自己是否吸取了。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从料罗湾海战看17世纪中西方海军实力的差距》（任志宏，《国家航海》，2011年第1期）

2.《诡谲的闽海（1628—1630）——由“李魁奇叛抚事件”看明政府、荷兰人、海盗李魁奇和郑芝龙的四角关系》（何孟兴，台湾《兴大历史学报》，2011年）

3.《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江树生译注，台南市政府）

4.《郑成功父亲曾在海上亦盗亦商　料罗湾海战大败荷兰》（卜松竹，《广州日报》，2014年3月8日）

5.《晋江发现沉船 或见证中国大败西方海军首战》（张素萍，东南网，2016年8月16日）

6.《何新共济会史料：明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共济会）的海战》（何新，搜狐网，2018年5月3日）

7.《料罗湾海战打得荷兰人赔款求饶是真的吗？》（“慎由戎”，新浪博客，2018年8月23日）

1949年，炮轰“紫石英”

在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大半年，这两个国家曾经有过一场“炮战”。按大英帝国老早的脾气，如果挨了那几炮，该向中国开战才对。

1

1949年4月20日，上午9点30分，扬州三江营附近水域。

三江营，因位于扬子江（长江从南京以下至入海口的下游河段的旧称）、小夹江和太平江这三江汇入长江口处而闻名，历来为江防重地。

此时的三江营沿岸，战云密布。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共计120万人，在长江北岸严阵以待，准备发起“渡江战役”。

大家在等的，是国民党方面的最后答复。

194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展开谈判，经过激烈的争辩和博弈，4月13日至15日，双方代表团终于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而4月20日，是共产党方面给国民党的最后签字期限。



如今的三江营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被江苏省建设成了国家级湿地公园

尽管国民党尚未给出最终答复，但外界判断和预测，国民党拒绝签字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4月20日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长江沿岸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的味道，一触即发。

而就在此时，三江营的江面上，忽然出现了一艘军舰。

“是不是美国人的军舰？”长江北岸的解放军阵地上，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对于援助蒋介石的美国可能会干涉渡江战役，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是有思想准备的。

在渡江战役之前，美国在南京下关江面停泊着一艘驱逐舰，在上海的黄浦江上有一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和若干配合舰只。

不过，就在渡江战役准备发动之前，解放军总前委发布公告称，禁止一切无关人员进入解放军渡江时的交战区域。

公告一出，美国就从南京撤走了军舰。

那么，如今在三江营江面上出现的那艘大摇大摆的军舰，会是美国

的吗？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他们为什么要进入明显的军事戒严区？

很快，沿岸的解放军部队发现，那不是美国的军舰，是一艘英国军舰。

2

这艘英国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紫石英”号护卫舰。

“紫石英”号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闯入长江水域，可以说有点“阴差阳错”，也可以说是“有意为之”。

1948年末，鉴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会打到长江流域的判断，在这块区域已经营多年的英国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英国皇家海军需要长江南京段到上海段的航行权，用以派遣军舰保护英国在中国的财产和公民安全。

要求一个主权国家出让内河通行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看来都是对对方的侮辱，但英国方面认为这并无过分之处：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早已规定，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中国的长江上通行无阻。

虽然在1943年的《中英新约》中，国民政府已经废除了英国在中国内河通航的权利，但到了1948年末，在辽沈战役中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府，迫切需要一切来自外部的支援——哪怕只是放几艘军舰做个样子。

所以，国民党政府立刻批准了英国政府的这个请求，只是要求英国军舰每次进入长江之前必须进行细节通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3月22日，英国驱逐舰“伴侣”号开到了南京进行“驻防”。按照计划，一个月后，澳大利亚的护卫舰“渔港”号将来接班“站岗”。

但是，“渔港”号换岗的时间，恰恰在国民党要对《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做出最后答复的敏感时段内。出于对国民党的了解，时任英国驻南京大使史蒂文森做出判断：国民党很有可能拒绝签字。如果和谈破裂，就只有一个结局：打。

那么，在这样的敏感时刻，一艘英国军舰如果出现在共产党军队要大举渡江的攻击线路上，不是自寻死路吗？

所以，史蒂文森连发两封电报，要求当时的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暂时不要派任何军舰去替换“伙伴”号，以免引起任何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梅登做出的回应，只是将本来应该去换岗的澳大利亚护卫舰“渔港”号换成英国自己的军舰。这艘军舰，就是当时停泊在香港的“紫石英”号。



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排水量1475吨，航速20节，配备102毫米口径双联炮

4月19日，“紫石英”号抵达上海。

就在“紫石英”号抵达上海前后，史蒂文森和英国驻南京大使馆海军武官魏伦先后各发出一份电报，意思基本相同：国共和谈很有可能破裂，中共将毫不犹豫立刻发动“渡江作战”。

但这些都没引起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的重视，在他的命令下，“紫石英”号按照原定计划，大摇大摆地向南京进发。

在梅登看来，“紫石英”号的航行是经过国民政府同意的。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是不敢向英国军舰开炮的。

但他可能忘记了一点：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承认蒋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明确表示自1946年1月10日以后，所有由国民党政府单独签署的条约和协议，“本党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负担任何义务”。

3

1949年4月20日上午9点，“紫石英”号出现在了扬州东南方向的江面上。

那块区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预定渡江区域。

关于是谁先发现的“紫石英”号，有多种说法——在解放军沿江的阵地上，多个地点同时观测到一艘军舰出现，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按照第三野战军炮兵3团政委康矛召后来递交的报告，是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兵3团7连观察所先发现的，时间是4月20日上午9点30分左右。

此时，解放军阵地上的大炮响了。

根据后来英国方面提供的“紫石英”号船员的回忆，第一轮由解放军阵地上射来的炮弹，不是太近掉到了水里，就是越过军舰掉进了远处的江面。

很显然，这是解放军在鸣炮警告。

此时，“紫石英”号舰长斯金勒做出了一个他后来应该后悔了的决定：将所有舰炮瞄准解放军的长江北岸阵地。

按照通行做法，如果你没有发起武装冲突的意图，应该将炮口归零，即上扬45度。

与此同时，斯金勒下令“紫石英”号全速前进，试图冲出这块危险区域——按通行做法，应该立即停船表示自己没有敌意。

很快，解放军阵地上的大炮再次响起。这一次，不再是警告了。

第三野战军的炮兵3团和6团，都留下了开炮记录。在记录中，第三野战军第26军炮兵团6连的连长赵成斋的回忆比较详细：“当英舰已进入我连有效射程（4000米左右）之内时，我马上命令测量员测定目标的方位、距离和航速，命令全连各就各位，准备战斗。但这时尚未接到团部的指令，战机稍纵即逝。我立即命令全连注意口令：‘榴弹瞬发信管距离3000米，方向250度，一号炮试炮！’随着我的命令，第一发炮弹呼啸着

飞落在英舰的甲板上。英舰上的水兵立即乱作一团，有的爬上炮位，转动炮筒寻找目标，有的在甲板上乱跑乱窜。随即我又命令：‘原方向递减50米，全速齐射！’三发炮弹又同时向英舰飞去，其中一颗炮弹击中了驾驶舱。”



弹痕累累的“紫石英”号

短短几分钟内，“紫石英”号连中30多发炮弹，满目疮痍。虽然舰上的102毫米舰炮也开炮还击，但收效甚微。没多久，“紫石英”号开始方向失控，向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南岸挣扎漂移，最终搁浅。

这轮炮战后，“紫石英”号上阵亡19名英国官兵，伤27人，其中舰长斯金勒少校和副舰长均重伤（前者在几天后伤重而亡）。

解放军炮兵阵地上仅6人受伤。

搁浅后，“紫石英”号挂起了一面白旗。

4

4月20日下午，1点30分，三江营附近江面。

就在第一轮炮战过去之后4个小时，江面上又出现了一艘英国军舰。这艘军舰，就是“紫石英”号原本去准备换岗的“伴侣”号驱逐舰。在接到“紫石英”号的求援电报后，“伴侣”号迅速从南京出发，准备营救自己的友军。

等待它的，是驻防在三江营附近的第三野战军炮兵3团3营7连的野战炮。



“伴侣”号驱逐舰，1946年建成，排水量2530吨，主炮为4座单管114毫米炮，舰员180名

不过，与护卫舰“紫石英”号相比，“伴侣”号是驱逐舰，配备6门114毫米口径的舰炮，火力上比7连的75毫米口径野战炮要厉害很多。

在这一轮炮火交锋中，7连吃了亏，被摧毁了两门野战炮，伤亡10余人。

有优势火力压制对方，“伴侣”号准备用缆绳牵拉搁浅的“紫石英”号。

此时，炮兵3团1连的105毫米口径榴弹炮拉上来了。

榴弹炮的威力非野战炮能比，一阵炮战之后，“伴侣”号的两个炮塔被摧毁，舰桥也被击中。

失去战斗能力的“伴侣”号丢下“紫石英”号，将航速开到29节，迅速逃离——据说这个航速创造了长江上舰船航行的最高速度纪录。

第二轮炮战，解放军伤亡40余人，“伴侣”号上有10人死亡，12人受伤。

“紫石英”号依旧孤零零地搁浅在那里。而围绕它的炮战，也没有结束。

4月20日晚，国民党方面果然不出所料，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

上签字。4月21日，渡江战役全面发动，百万人民解放军开始在长江各段发动总攻，强渡长江。

而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还在想着怎么“捞”回搁浅的“紫石英”号。

4月21日，英国远东舰队的旗舰、重型巡洋舰“伦敦”号带着“黑天鹅”号护卫舰出现在了江苏泰兴县附近的江面，试图救出“紫石英”号。

而负责那块江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他们已经发动渡江战役了。



“伦敦”号重巡洋舰，排水量达到1万吨，主炮口径204毫米

但此时的双方，经过前面两轮炮战，都开始比较谨慎了。

由于英国海军的旗语解放军无法看懂，于是就在岸上燃起了三堆大火——之前对国民党来投诚的军舰，就是采用这个方式，代表不会开火。

而“伦敦”号发现无法传递“和平”信号，索性让官兵在甲板上跳起了爵士舞，希望用这种方式告诉解放军：我们也不想打。

负责驻防那段江面的第10兵团司令叶飞和第23军军长陶勇决定发射三发黄色信号弹表示最后警告。在看到信号弹后，信心不足的“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开始拔锚起航。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可能是由于“伦敦”号的铁锚起锚时碰到了船体，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声响。

当时炮兵6团1营3连2排炮长梁学成本来就已严阵以待，一听到巨响，以为英舰已经开炮，随即也下令开炮——梁学成后来得到个绰号叫“梁前委”，因为对英舰开炮必须得到解放军总前委的命令。

一看解放军开炮，刚才还在甲板上跳爵士舞的“伦敦”号官兵立刻奔赴炮位，开炮还击。

双方再度陷入炮战。

比起先前的护卫舰和驱逐舰，“伦敦”号重巡洋舰配备的主炮口径达到204毫米，火力非常凶猛。虽然英国人没有发现解放军隐蔽的炮兵阵地，但一阵乱射之后，却击中了江堤背后已经集结准备渡江的第23军202团阵地。



“伦敦”号同样弹痕累累

当时的202团团部正好在一个小村子里开会制订渡江计划，一发炮弹打来，正中团指挥所，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保哲当场阵亡，村中的百姓也多有伤亡。

不过，在炮兵6团榴弹炮的轮番轰击中，“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也遭受重创，“伦敦”号舰长卡扎勒重伤，英国阵亡15人，受伤20人。没多久，“伦敦”号放弃了营救“紫石英”号的计划，带着“黑天鹅”号再次离开。

不过，这轮炮战，解放军因为集结阵地被炮火轰中，共伤亡252人。

三轮炮战之后，英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凭武力解救“紫石英”号，是不可能了。接下来，就只能靠谈判了。

5

“紫石英”号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对于中英双方而言，都是有些震惊的。

英国方面，时任首相艾德礼表示愤愤不平，理由是“紫石英”号的航行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认可，而前任首相丘吉尔再次展现了他好斗的本色，在下院发言时要求英国派航空母舰到远东实行“武力报复”。

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4月21日发行的伦敦自由党《新时报》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紫石英”号偏偏要在这个时间段在长江上航行呢？也有议员认为：如果有一艘亲纳粹的军舰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驶入英吉利海峡，我们难道不会把它打得粉碎吗？

中国方面，4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社论《抗议英舰暴行》，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专文，都指出英舰进入中国内河是“挑衅行为”。



人民日報

雄師百萬勇猛渡江前進

南下江陰要塞北克安慶

接連解放揚中繁昌銅陵貴池四城

南京偽政府四處逃命

李宗仁何應欽等作鳥獸散

長江下游圖

我軍戰勝阻撓奮勇渡江

成立華北軍管委會

1949年4月24日的《人民日报》

4月30日，针对艾德礼的“得到认可”说和丘吉尔的“航母报复”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将军发表公开声明：“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

针对这一声明，英国驻南京大使史蒂文森立刻回应：英国政府将不会再向解放军控制的区域派遣任何军舰，并将立刻撤离停泊在上海的军

舰。

虽然英方表明了一定的缓和态度，但双方接下来从5月24开始的多达11次的谈判却艰难异常——在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下，各自的诉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中方代表、炮兵3团政委康矛召坚持的中方立场是，英方必须就闯入解放军防区的行为认错并赔偿损失。

而接任“紫石英”号军舰舰长职位的英国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克仁斯少校坚持的英方意见是，“紫石英”号可以遵从解放军要求，放弃移动，但英方没有过错，所以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

双方的激烈交锋甚至细到每一个措辞上：英方形容这次行为是“过失”（fault），但中方坚持要用“罪行”（guilt）；中方要求使用“侵入”（invade），英方拒绝，最多同意使用“贸然”（indiscreetly）或“不谨慎地”（imprudently），但中方认为上述只有副词没有动词，所以拒绝。

这场“拉锯式”谈判一谈就是2个多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军队已经渡过长江，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已陆续解放，各种事情千头万绪，“紫石英”号军舰的处理并不在中共工作的重点序列。

在谈判桌上虽然双方互不让步，但在谈判桌外，围绕那艘依旧孤零零搁浅的“紫石英”号，双方倒也没之前那样剑拔弩张了。中方为“紫石英”号上的伙食和生活用品补给、伤兵救治提供了各种便利，甚至同意“紫石英”号补充了燃油，这也显示出中方无意长期扣留“紫石英”号的态度，毕竟中方也判断出，英舰并非是有意闯入阻挠渡江战役的。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毛泽东出于解放战争的大局和之后的中英关系角度考虑，其实一度有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紫石英”号自己溜走的想法，中央军委对长江前线指挥部也有过“如‘紫石英’号逃走，不做拦截”的指示。

但进入7月后，长江口的英国军舰活动日益频繁。中共中央的态度又恢复强硬：绝不能因为你的武力威胁而屈服，或者让你不打招呼擅自溜走。随后，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之前“不做拦截”的命令作废。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紫石英"号真的逃跑了。

6

1949年7月30日，晚9点。

一场台风刚过，江水大涨。

已经修复损伤，下锚停泊的"紫石英"号，一直在等这个机会。正当一艘从镇江方向开往上海的"江陵解放"号客轮驶来的时候，"紫石英"号的代理舰长克仁斯立刻下令全舰灯火管制，砍断锚链（起锚会发出巨大声响），迅速跟上"江陵解放"号，向长江下游驶去。

当晚没有月光，长江上也没有照明设备，但"紫石英"号一移动，还是立刻被北岸的解放军哨位发现，位于镇江东南大港附近的解放军炮兵接到命令，立刻开炮。

遭到炮击的"紫石英"号，此时做出了一个不光彩的举动——它加速开到了"江陵解放"号客轮的南侧，与客轮保持同速前进。这也就意味着，"紫石英"号把"江陵解放"号当作了"人质"，挡住解放军的炮火。

而此时的"江陵解放"号船长也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它没有立刻向岸边的解放军表明身份，或停止前进，反而关闭了灯光，试图进行躲避。

由于解放军当时并没有夜间照明设备，无法辨识具体船只，"江陵解放"号被炮火击中，开始下沉。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岸的解放军炮兵阵地停止了炮击，开始救人，而"紫石英"号趁乱闯过了这片江面。

事后，开炮的解放军阵地向上汇报，称"江陵解放"号是被"紫石英"号撞沉的，第三野战军就据此上报中央军委。后来调查"江陵解放"号上被救起的乘客，发现客轮是被解放军炮火误伤击沉的。但新华社已于8月1日宣布是"紫石英"号撞沉了"江陵解放"号。为此，周恩来严肃批评了第三野战军。

晚上10点，"紫石英"号到达江阴要塞附近，随即关闭了轮机，静悄悄地顺流而下。江阴要塞当时刚刚宣布起义，再加上驻防官兵也缺乏必

要照明设备，当发现“紫石英”号并开炮时，为时已晚。

晚上12点，驻防在长江南岸上海的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部队接到拦截命令，严阵以待，但直到天亮都没在崇明岛以南的主航道发现“紫石英”号的踪迹——这艘军舰在撞翻撞沉多艘民船后，于凌晨由崇明岛北侧副航道驶出了长江口，与接应的英国皇家海军“和谐”号驱逐舰会合，逃出生天。

“紫石英”号逃跑后，一切关于它的谈判也就此中止。

7

“紫石英”号事件之后，国际舆论都猜测，英国和中共将会陷入长期冷战。

但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大跌眼镜的事，在“紫石英”号事件结束后不到半年就发生了：1950年1月6日，英国率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表态的国家。

虽然英国和中国正式建交要推迟到1971年，率先承认中国的背后也有香港问题、在华资产等多种原因，但是英国在“紫石英”号事件发生之后仅半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出乎不少人意料的。

关于英国为何要做出这个决策，当时国内外也有很多猜测和观点，有的也和“紫石英”号挂上了钩——中共方面在这件事上态度强硬，但又并非不可通融，让英国人感到“硬来”实在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无论如何，抛开“承认”这件事不说，“紫石英”号事件确实是向当时的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

外国军舰凭借大炮在中国内河航道上游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馒头说

70余年过去了，再回过头来看看“紫石英”号事件，还是颇值得玩味。

在这件事情上，别看英方一开始态度很强硬，但其实后期也保持了

克制。按照原本大英帝国的脾气，本国四艘军舰被重创，已经是可以“宣战”的理由了，再怎么样也要把这个面子给挣回来。但是，英国从头到尾连“抗议”也没有提过一次。

中方在最初的强硬后，其实也保持了冷静。不仅提供生活用品和伤员救助，还允许“紫石英”号补给燃油——这其实就是允许它开走的一种暗示。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可回旋的余地。据外交部解密档案，当时“紫石英”号上一名叫班纳斯特的受伤水兵，还曾给解放军方面写过一封感谢信。

不过，在整个事件中，双方其实也都有值得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英国方面尽管已经获得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当时国民党政府确实是可以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在如此敏感的时刻闯入如此敏感的区域，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内河航道，无论如何是理亏的一方，而且自我感觉太好了。

而解放军方面在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在一些细节方面也做到了不卑不亢，还反过来让西方感受了他们信奉的“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都是值得称道的。不过有些环节还是值得吸取教训，比如和“伦敦”号那场造成最大伤亡的炮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以及当初解放军曾派一个班登上“紫石英”号监视，但因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并没有将英国人俘虏并集中看管，连电台等通信工具都没有接管，最终“紫石英”号是将那个班的战士全缴械后逃跑的。

最后来说一下那艘“紫石英”号的最终命运吧。

按照英国的宣传，“紫石英”号最终逃出生天，是一场堪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奇迹，所以舰上的官兵都受到了表彰。为了纪念这一“天佑我王”的光荣事件，英国在1956年特地为此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扬子江事件》。

在那部电影中，“紫石英”号本色出演，成了道具舰。结果在拍摄爆炸场面时因为炸药安置过多，“紫石英”号在爆炸中整个舰体严重受损。

这艘当初被认为是“好运”象征的军舰，最终在1957年被英国人自己拆分解体。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炮击英舰“紫石英”号回忆》（赵成斋口述，臧护德、沈洪玲、罗光洲整理，《春秋》，2001年第1期）

2.《追溯紫石英号军舰炮击事件》（上海纪实频道《往事》，爱奇艺）

3.《揭秘中英长江炮战　百万雄师跨江前的一场恶战》（人民网，2015年7月20日）

4.《炮击“紫石英”》（艾米尼，《北京日报》，2019年8月13日）

5.《“紫石英号”事件中的外交谈判》（吴化、张素林，《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3期）

6.《“紫石英号事件”中谁先开炮》（白杰，《航海》，1995年第6期）

7.《“紫石英”号事件前后》（宋凤英，《南方周末》，2004年1月8日）

科威特战争："敝国虽小，硬骨头还是有两根的"

1991年爆发的那场海湾战争，不少人都有印象，而引发海湾战争的那一场战争，不少人未必了解，因为那场战争规模实在太小。不过，它也值得说一说。

1

每年的2月27日，对科威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个国土面积不到1.8万平方公里，仅比中国的北京市稍大一点的中东小国，于1961年6月19日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至今也就59年的历史。

它的国庆日是2月25日（系1950年第十一任埃米尔登基日，埃米尔是阿拉伯语中统帅的称号，现为阿拉伯世界某些君主世袭制国家元首的称谓），但8月2日和2月27日，却是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无法忘记的两个日子。

1990年8月2日，邻国伊拉克悍然入侵，攻占科威特全境。

1991年2月27日，科威特宣布恢复独立主权。

那场国家被入侵的战争，史称"科威特战争"。

2

时间还是要回到1990年。

在那一年，一直梦想成为中东霸主的伊拉克，日子越过越难受。原本堪称富庶之国的伊拉克经历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名堂没打出一个，本国经济却被打得千疮百孔，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还欠了近800亿美元的外债。



从1980年打到1988年的两伊战争导致伊朗战死35万人，伊拉克战死18万人，两国经济损失合计超过6000亿美元

就在此时，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又开始大幅度下跌，从每桶40美元直接跌到14美元，伊拉克在1990年上半年蒙受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40亿美元。而那笔巨大的外债光在1989年就产生了35亿美元的利息，伊拉克当时全国一年经常项目的盈余才20亿美元，一进一出，这就意味着伊拉克只能靠借贷还钱，越还越借，越借越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而与糟糕的经济情况相比，伊拉克在两伊战争后军事实力迅速崛起，全国原有的常备军从20万人一下子膨胀到了120万人，并且拥有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号称“中东第一军事强国”。

可以想象，当一个村子里唯一一个自己折腾得家徒四壁的穷光蛋拥有了最大口径的猎枪，那么和他相邻的手无寸铁的富人们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伊拉克手握雄兵百万，囊中分文不名，不由得开始打量起那些富得流油的海湾邻居们。选来选去，伊拉克选中了一个最对胃口的对象：科威特。

3

科威特国土面积虽小，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得流油”的国家。

根据已经探查出的数据，科威特以区区1.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占据全世界10.8%的石油资源，排全世界第四。

早在1986年，科威特光国家投资局用于国外投资的两个“储备金”（“后代人储备金”和“国家储备金”）就分别高达547亿美元和372亿美元，仅这两项投资每年就能获利45亿至50亿美元。1988年，科威特的国际储备就已经达到了192.3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黄金。科威特的人均国民收入很早就超过了1.4万美元，可谓“国富民富”。

而这样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军事力量却弱得可怜，全国连警察加在一起的常备军队人数还不到2万人，这在北边的强邻伊拉克眼里简直不值一哂。

关键是，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为了维持战争物资供应四处举债，其中科威特就是一个大债主，战争期间一共借给伊拉克的钱有150亿美元之巨。

可想而知，当自己家藏万贯的邻居每天大门敞开，家里连狼狗都没养一条，关键还借给自己一大笔已经无力偿还的债务，伊拉克的心是如何蠢蠢欲动。



科威特的标志景观——贮水塔

4

1990年7月，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授意下，一系列针对科威特的“找碴”行为开始了。

首先，伊拉克搬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两伊战争不是我们

伊拉克在为自己打，而是在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打，所以你们应该无偿赞助我们。秉持这样的理由，伊拉克单方面宣布不会偿还科威特（还包括沙特等一些国家）的债务。

沙特等国家断然拒绝，而科威特对此的反应是，对伊拉克这种单方面做出的决定无法接受。其实这话还留了一点余地：你吃相不要那么难看，我们可以先谈谈看，你或许可以少还一点。

但伊拉克根本不打算留缓和的余地，随即又提出一条：科威特违反了欧佩克的产油规定，在1990年上半年日产石油超标50万桶，导致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伊拉克因此损失了140亿美元。

事实上，欧佩克成员国都有过超产行为，伊拉克自己也经常超产。一般这种情况下，成员国都相互协商，进行一些调整和沟通。但伊拉克完全没有沟通的意向。

第三点最致命，伊拉克搬出了领土说：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应该是独立的。



春风得意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这个说法就有点滑稽了。从历史上看，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都是英国的“保护国”，之后相继独立。科威特在1961年独立后，伊拉克确实不承认，但到了1963年，科威特向伊拉克付了一笔

3000万英镑的巨款，换得了伊拉克承认“科威特是一个独立国家，放弃对科威特的领土要求”。

之后，两国虽然在边界问题上一直有纠纷，但还算可以维持。两伊战争期间，因为科威特提供资金支持，伊拉克一直没有发什么声音。两伊战争一结束，伊拉克又开始提出领土争端问题，说科威特长年来一直在“蚕食伊拉克的领土”。

这个说法，即便不知内情的人看了也心知肚明：一个连警察加在一起军队都没有2万人的国家，怎么敢去“长期蚕食”一个拥有120万常备军的“中东第一军事强国”。

事实上，伊拉克对科威特要求的“争议领土”，都是一些石油矿藏丰富的地区。

1990年7月31日到8月1日，经过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调解，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伊扎·易卜拉欣和科威特王储兼首相萨阿德·萨利姆·萨巴赫在沙特的吉达市举行了会晤。

这不是一场成功的会晤。在会上，伊拉克在石油开采、领土争议和债务偿还等问题上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甚至直接提出要科威特让出两个资源丰富的岛屿，科威特表示无法接受。但双方表示后续会谈会在两国首都巴格达和科威特城继续进行。

尽管这次会谈不成功，但海湾国家乃至全世界都认为，双方会进一步沟通，缩小分歧。

但谁也没想到，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伊拉克竟然动武了。

5

1990年8月2日凌晨1点，伊拉克突然向科威特边境发动了全面进攻。

在350辆坦克的引导下，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三个精锐师在空军、海军和两栖特种部队的配合下，如同潮水一般扑向了几乎手无寸铁的科威特。尽管并非没有心理准备，但孱弱的科威特军队实在无法抵挡眼前这群刚刚经历过两伊战争，配备先进武器的虎狼之师。

伊拉克的部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杀入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包围了王宫。在那里，伊军遭到了科威特王室亲卫队的激烈抵抗，而带领亲卫队的，就是国王贾比德的八弟法赫德亲王。



伊拉克军队入侵时的战争场面

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传来后，科威特的王室立刻做出了去沙特避难的决定，但法赫德亲王拒绝了这个要求，理由是“当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必须有王室成员带头站出来抵抗！”

法赫德亲王不顾家人的劝阻，驱车从王宫附近的家中赶向王宫，指挥亲卫队抵抗伊军的进攻，而他的两个儿子也放弃了逃跑，和父亲一起投入了战斗。

由于出行匆忙，法赫德亲王只带了一把随身的手枪和五发子弹，他和王宫亲卫队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在射完最后一颗子弹后，被伊军射中，倒在了王宫的楼梯扶手旁，据说临死前还保持着射击姿势。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在战斗中阵亡。

法赫德亲王牺牲时只有45岁。他同时还有一个职务：亚奥理事会主席。他在任期间曾力主让中国举办1990年亚运会。由于当时国际舆论认为北京不安全，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专门到访北京作为表态，鼓励北京办好这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办的最大的国际体育运动会。

为了支持北京亚运会，法赫德亲王准备到开幕式现场致辞，并为此

专门学习了中文。但就在亚运会开幕前一个多月，他为保卫自己的祖国献出了生命。后来在亚运会开幕式现场，亚奥理事会副主席代他读完了当初写好的发言词。

伊拉克前后一共只花了14个小时就占领了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第二天占领了科威特全境。萨达姆·侯赛因宣布，科威特从此并入伊拉克，成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

但是，战争其实并没有结束。

6

法赫德亲王虽然倒下了，但整个科威特的反抗从没有停止过。

按照伊拉克在入侵后给出的说法，他们是应一批“要推翻国王的科威特青年革命者的要求”而派兵进入科威特的。事实上，伊拉克在入侵前也确实联络过科威特的反对派。

但是，当伊拉克准备邀请科威特的反对派出面“组阁”的时候，却没有一名反对派同意接受委任。最终，伊拉克只能推出所谓的“9名科威特军人内阁”。但内阁刚一推出，媒体就指出其中没有一个是科威特人，其中被推为“科威特首相”的人更是萨达姆的女婿。而另有消息称，有一名不愿意加入内阁的原科威特议员被伊拉克军队投入了监狱。

到了8月3日，尽管伊拉克已经宣布占领了科威特全境，但科威特境内还是可以听到零星的爆炸声和枪声，那是忠于国家和王室的科威特军队在坚持抵抗。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科威特海军中有一艘小炮艇毅然决然地冲出港口，向伊拉克海军的军舰发起决死攻击，很快就被淹没在军舰猛烈的炮火和伊拉克空军战机扫射的烟幕之下。

科威特的公共电视台和电台在伊拉克入侵的第一时间就被占领，失去了声音。但在入侵24小时后，一家名为“科威特之声”的地下电台却在一个伊拉克军队找不到的地方持续播音，号召“我们伟大的人民”起来抵抗，并希望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支持科威特，给他们以帮助。



伊拉克的坦克进入科威特

8月5日，逃入沙特境内的科威特国王贾比尔发表电视讲话：“伊拉克绝不会征服我们的意志，我们决不会向侵略者投降！”

7

科威特人并没有等待太长的时间。

1990年8月2日当天，联合国先后通过了11个谴责和制裁伊拉克的决议，并在第678号决议中规定，伊拉克最晚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必须无条件撤离科威特。同日，美国宣布冻结伊拉克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发动“沙漠盾牌”行动，两支航母编队进入战斗地区。

1990年8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61号决议，对伊拉克施加经济制裁。

1991年1月9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和伊拉克外交部长阿齐兹在日内瓦举行战前最后一次会晤，伊拉克拒绝让步，谈判破裂。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轰炸巴格达，海湾战争正式爆发。

1991年2月15日，已经根本无力打下去的伊拉克宣布接受安理会第660号决议，有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但之后的“撤军方案”被多国部队

拒绝。

1991年2月24日，多国部队发起地面进攻，分五个方向攻入伊拉克，围歼伊拉克“共和国卫队”。



美国的F15-E轰炸机在沙特的空军基地集结



开战当天，被空袭的巴格达夜空被防空炮火点亮

1991年2月26日，在地面战斗仅仅持续了100个小时之后，伊拉克军队彻底崩溃，萨达姆宣布无条件接受停火。

1991年2月27日，科威特宣布恢复独立主权。

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式上，当科威特运动员代表入场时，很多中国观众都起立鼓掌。

彼时彼刻，他们的“国”其实已经被完全占领，但没有人认为他们是“亡国之人”，相反，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尊敬。

这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如意算盘打错的地方。

萨达姆原先的乐观估计，一是全世界（尤其是之前扶植自己的美国）不会管这件事，二是即便管了，也未必管得了（战争耗上几年，又可以谈筹码了）。

但是，他确实低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这是二战之后第一次有国家公然用武力侵吞另一主权国家，这是挑战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底线。（当然，包括萨达姆在内的全世界很多国家领导人，也都低估了现代化高科技战争的威力。）

1990年8月2日那场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结果，是14：0——没有一个国家对制裁伊拉克投反对票（也门缺席）。其中包括处处与美国唱对台戏的苏联，立刻宣布和美国在“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这件事上达成共识。（苏联后来在联合国授权美国动武的议案中还投了赞成票。）

其中也包括中国。尽管中国一向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和“用谈判解决问题”，但当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也在发言中指出，“伊拉克军队必须退回到出发位置”。（在后来动武的议案中，一向反对动武的中国投了弃权票。）

由此可见，萨达姆在这个问题上是惹了众怒，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湾爆发过两次大规模战争，每次失败的主角都是伊拉克。

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至今仍众说纷纭，充满争议。这场战争首先就没有得到过联合国授权，当时受到了包括中国、俄罗斯、法国、阿拉伯联盟的谴责。这场战争的目的也不明，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并没有被找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

价也远比第一次海湾战争时要高，而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成了至今很多问题的根源。

但第一次海湾战争并没有什么争议，因为任何侵略行为都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错误行为，侵略者所遭受的失败都是咎由自取。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背景》（肖翠英，《国际研究参考》，1990年第9期）

2.《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后》（唐继赞，《瞭望》，1990年第33期）

3.《伊科之战——外刊报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背景》（方舟，《国际展望》，1990年第16期）

4.《和平使者血洒王宫——法赫德亲王其人其事》（马年华，《南风窗》，1990年第11期）

5.《我对中国很放心——记两访已故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刘元培，《阿拉伯世界》，1991年第3期）

个人的抉择

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存在博弈。

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与自己也在不停地较量：和自己的私欲，和自己信念，和自己的理想。

天人交战，何尝不是一场博弈？

县令之死

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舞台的中心往往是那些帝王将相，但总有一些小人物，能留下自己独特的故事。

1

1907年7月的一天，绍兴山阴县县令李钟岳接到了一道加急命令。

命令是绍兴知府贵福发来的，简单但严厉——让他查封一所办在山阴县内的学校，以及抓捕一批人。

按理说，这并非一件难事，却立刻让刚刚到任才半年的李钟岳陷入了两难境地。

山阴的士绅们从其他渠道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聚集到了县衙，希望李钟岳能够高抬贵手。李钟岳的回答是：“即使你们不来，我也决不能鲁莽从事。”

随后，他自己跑到了知府衙门，向贵福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所学校并没有什么越轨的行动，如果用武力查封，反而会在地方上引起不安。不如让我先暗中调查一下，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再抓不迟。”



秋瑾

贵福碍于李钟岳的情面，勉强答应。

李钟岳回到县府衙门，告诉了士绅们这样一个结果，并表示自己也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只能拖一天是一天，希望学校里的人赶紧逃走。

为何李钟岳要如此“包庇”这所学校？因为他奉命查封的学校，叫“大通学堂”。他奉命要去抓捕的人，正是大通学堂当时的实际负责人。

这个负责人是个女子，名叫秋瑾。

2

这件事，需要倒退几天，从1907年7月6日说起。

这一天，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安庆起事，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捕，第二天被斩首处决。

按照原先的计划，徐锡麟先在安徽发动起义，而同为光复会成员的

秋瑾在浙江同时响应。如今，徐锡麟起义事败，更糟糕的是，他的手下在刑讯中招出了徐锡麟在山阴县创立的大通学堂与此事也有牵连。

听闻此讯，当时的浙江巡抚张曾敭（张之洞族侄曾孙）立刻电令绍兴知府贵福：立刻查封大通学堂，逮捕一切和学堂有关之人。也就是在此时，大通学堂的实际负责人秋瑾开始浮出水面——她和徐锡麟是表亲，也去日本留过学，平时行为也颇“出格”，所以嫌疑最大。更何况，当时还有个别乡绅为了撇清关系，举报秋瑾和徐锡麟有牵连。

绍兴知府贵福和恩铭有远亲关系，立刻命令山阴县令李钟岳带人去查封学堂，逮捕秋瑾。所以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李钟岳矛盾犹豫的一幕。

李钟岳为何要“袒护”秋瑾？因为他一直非常欣赏秋瑾。秋瑾曾写过一句诗叫“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李钟岳经常拿来教育自己的儿子：“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所以，事发之后，李钟岳想尽办法保全秋瑾。



徐锡麟。其实他和同伴在起事之前已经暴露，所以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赴死之意。徐锡麟被处斩后心脏被人挖出炒菜分食

但是，李钟岳区区一个县令，想要阻止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的。7月13日中午一过，知府贵福将李钟岳喊到了府衙，把浙江巡抚张曾敭发来的第二封催促电报扔给了李钟岳，厉声呵斥：“这是上级的命令，你故意拖延不执行，到底是什么居心？我现在命令你立刻率兵去学堂，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不然我就马上向上级报告你和这个学校有勾结，你自己想想吧！”

话说到这个地步，李钟岳只能执行命令。

下午4点，李钟岳带着三百新军，前往大通学堂缉拿“乱党”。

3

李钟岳带人赶到大通学堂的时候，他是失望的。

失望的原因，就是之前自己拖了那么久的时间，秋瑾居然没有逃走。

但秋瑾也有她的理由。事实上，徐锡麟牺牲的消息一传出，就有人劝秋瑾离开绍兴，甚至有人已经为她在上海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居所，希望她先去避一避。但秋瑾在听闻徐锡麟死讯后失声痛哭，坚决不走。

秋瑾不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和大通学堂牵涉到了徐锡麟在安庆的起事，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秋瑾已经有了赴死的念头，因为她曾对同伴说过一句和谭嗣同差不多的话：“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果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年。”

当然，秋瑾利用李钟岳争取的那几天时间，还是疏散了很多大通学堂的师生，但还有最后一小部分人不愿意走，要和秋瑾一起用武力保卫大通学堂。

不久，李钟岳带兵赶到，一场奇怪的“拘捕行动”开始。

李钟岳上来就下了命令：“不许乱射，只准捕人。”为了防止清兵胡乱射击，李钟岳下令让自己的轿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样后面的手下就不敢乱开枪了。

最终，秋瑾和其余七名学生被逮捕。

就在抓到秋瑾的第二天上午，李钟岳被贵福逼着去查抄秋瑾的家。李钟岳到了秋瑾家，先问秋瑾住哪里。在得知秋瑾住的是一幢小楼后，他当即吩咐手下："那幢楼就不用去搜了。"

1936年，秋瑾的弟弟秋宗章遇见了李钟岳的儿子李江秋，秋宗章告诉李江秋："先姊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农历）大通被查抄时，全家均逃难，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

所以，李钟岳的这个举动，也是在救秋瑾的全家。

但他最想救的，还是秋瑾本人。

4

7月14日下午，李钟岳奉命提审秋瑾。

在稍稍审讯了几句之后，李钟岳就让人将其余七人带到公堂审讯，独留秋瑾一人，破例给她设了一个座位。

李钟岳问："你到底是不是革命党？"

秋瑾回答："是！"

李钟岳问："为什么要革命？"

秋瑾回答："我主张的只是男女革命、家庭革命，并没有犯法，不知道为什么要抓我。"

李钟岳闻言默然，拿出纸笔，请秋瑾写下口供。

秋瑾提笔后就只写下了七个字，这七个字后来流传百年：

"秋风秋雨愁煞人。"

李钟岳忍不住夸秋瑾笔迹工整，秋瑾回答："未见过帖，字实不能写，文章还是能做几篇的，只是毛笔用不惯了。"

李钟岳随即让人拿来墨水和钢笔。秋瑾随即写下了千字文，主要陈述自己的生平，还有申诉自己这次被捕之冤。

李钟岳马上拿着秋瑾的申诉去找贵福，早已通过密探得知李钟岳待秋瑾如上宾的贵福，对着李钟岳破口大骂：“你不用刑讯，待人如上宾，人家怎么肯招？！”李钟岳回答：“大家都是读书人，她还是一个女子，证据又不足，实在难以用刑。”



贵福。贵福最初是支持办大通学堂的，他还去学堂视察，甚至题写了“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八个字，与学堂师生合影留念。所以有人怀疑当时贵福是怕自己受到大通学堂和秋瑾的牵连，所以必须痛下杀手，也表明态度

贵福知道李钟岳审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通报浙江巡抚张曾敭，称秋瑾已经招供，张曾敭表示：“就地正法。”贵福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钟岳，后者大惊：“供证两无，安能杀人？”贵福怒斥：“这是巡抚的命令！你好自为之！”

李钟岳知道无法再违命，只能返回县衙，提审秋瑾。

当着秋瑾的面，李钟岳掉下了眼泪：“我位卑言轻，实在没有办法了，杀你并非我本意，请你体谅。”

秋瑾面色镇定，对李钟岳表示感谢，并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请让我与家人见面诀别；

第二，我是女子，死后请不要剥衣；

第三，请不要将我的首级示众。

李钟岳答应了后两个请求。

5

7月15日，秋瑾被押往绍兴轩亭口赴刑。

秋瑾那天穿着白色汗衫，外套玄色生纱衫裤，戴铁镣，反绑双手。临刑前，秋瑾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扫视了两边围观的人，然后从容俯首就刑。

据现场的人说，刽子手第一刀并没有将秋瑾的首级砍下，第二刀才完成了斩首。现场围观的百姓有惋惜，也有哄笑，很多人都未必知道这位女子为何要被斩首。

这一幕，后来就被鲁迅写成了小说《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夏瑜”，其实就是秋瑾——“夏”对“秋”，“瑜”对“瑾”。而华老栓家和夏家的姓合在一起，就是“华夏”。

秋瑾就义后，果然引起了舆论上的滔天巨浪。

首先，官府根本就没有杀秋瑾的确凿证据，只有一张“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口供。

其次，当时大清律例已经规定，即便是“连坐”和“株连”，除知情者治罪外，其他人一律宽免，但秋瑾依旧被杀头。

最后，按历史学家、绍兴人范文澜回忆，绍兴的轩亭口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秋瑾只是一个女子，不应该到那里行刑。且当时妇女只有绞刑和剐刑，不应该用斩刑。当时即便不认同秋瑾观点的人都认为，不应该使用这样一种血腥的方式对待一个女子。

当时，上海包括《申报》《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在内的大大小小媒体，都为秋瑾申冤，称之为“千古奇冤”，并开始对主张杀秋瑾的清廷官员施加舆论压力。

主杀的浙江巡抚张曾敭迫于压力，在一个多月后调任江苏巡抚，但这个消息见报后立刻遭到江苏当地士绅的联名反对，并发电报给都察

院。结果张曾敭没能到任，转调山西巡抚，没多久就托病辞官回籍，1920年去世。



鲁迅其实比秋瑾还要小6岁，两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他们都反对帝制，鲁迅也非常佩服秋瑾的性格和果断作风。但两人因为在1905年日本出台关于严格管束清朝留学生的条例时意见不同，产生过分歧：秋瑾表示要所有中国留学生立刻回国表示抗议，但鲁迅等人表示不必如此激进。不过，鲁迅后来在很多文章中还是表达了对秋瑾的钦佩和怀念。当然，他在小说《药》中也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种疑惑：激进而不被民众理解的牺牲意义何在？



1908年建成的秋瑾墓

绍兴知府贵福，也迫于压力调任浙江衢州，后来又想调任安徽宁国府，也被拒。他只能改名赵景琪，隐姓埋名，最后投靠了“伪满洲国”，1936年去世，死因不详。

那么，那个县令李钟岳呢？

6

在秋瑾就义后三天，李钟岳就被撤职了。

当时贵福对李钟岳袒护秋瑾十分不满，在张曾敭面前参了李钟岳一本，所以李钟岳就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

李钟岳离任时，有绍兴的士绅和民众百人，乘船数十条，送他到距城三十里的河桥，依依不舍。李钟岳在离开县衙大堂时，砸碎了陈列在大堂上的一具天平。

辞任后的李钟岳住在自己的杭州家里，终日闷闷不乐。据他的家人回忆，他反复念叨一句话：“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而那幅秋瑾的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也被李钟岳带了回来，他经常注视默诵，泪流满面。

没过多久，李钟岳就开始试图自杀。先一次是跳井被家人救了上来，又一次是在一棵树上上吊被家人发现。几次下来，家人开始严加防范。

但是，10月29日上午，李钟岳还是找到了机会，趁家人不备，在自己房间里悬梁自尽，时年53岁。

他自缢之时，是在秋瑾就义三个多月后。

馒头说

放到历史的洪流中，李钟岳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小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帝国大厦将倾时的基层小干部，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吗？并没有。他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不是职务上的本分，而是遵从内心，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的本分。

当然，在特定环境下，要尽到这样的本分，其实是需要莫大勇气的。

古往今来，滔滔历史长河，站在舞台聚光灯底下的，或者是帝王将相，或者是志士仁人，他们毫无疑问都是主角。但在这个舞台上，光有主角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很多配角，他们和主角一起，才构成了整部丰满完整的历史。

无论在哪个时代，每一个角色来到舞台上都不是偶然，每一个角色行为其实都会影响历史。一部历史剧，不可能人人都是主角，你我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个龙套而已。但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龙套，我们也都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角色，认真聆听自己的内心，认真做好自己的事。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正在时代的宏大历史画卷中留下或浓或淡的笔痕。

每一笔，历史都会记住。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秋瑾被杀为何引全国公愤》（傅国涌，《中外文摘》，2013年

第5期）

2.《李钟岳其人其事》（静仁，《柯桥日报》，2012年4月8日）

3.《秋瑾的最后三年：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庞清辉、王一凡，中国新闻网，2011年9月30日）

4.《秋瑾女士被捕及就义过程中，县令李钟岳都做过哪些善事与义举？》（张再坤，搜狐网，2018年10月12日）

5.《回肠荡气才能冲击心灵：县官李钟岳与女侠秋瑾》［陈正宽，《大学》（阅读独唱团），2016年第7期］

6.《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敭与秋瑾案为例》（李细珠，《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7.《秋瑾就义的背后》（“史客儿”，搜狐历史，2017年9月13日）

中国最后一个状元

历史上，有两个词容易被人记住。一个是“开创”，一个是“终结”，但担任主角的，不一定都是皇帝。

1

公元1904年7月4日。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这应该是可以留下一笔的一天。

这一天的清晨，273名表情肃穆且略显紧张的男子，由专人带领，从紫禁城的中左门进入保和殿，然后经过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一系列仪式礼节之后，屏气凝神，蓄势待发地准备参加一场考试。

这273个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号，叫“贡士”。

自隋唐开科举以来，及至清朝，中国的读书人要出人头地，必须要闯过“六关”，分别是：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各朝代略有不同）

闯过县试和府试，可称“童生”（明代以后）；过院试，可称“秀才”；过乡试，称“举人”，可择优放官；过了会试，便可称“贡士”；而过了最后一关殿试，即可称“进士”。由此可见，一旦成了贡士，离成功就只剩一步之遥了。



保和殿，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到清朝时，每年除夕、正月十五，皇帝会在此赐宴外藩、王公及一品、二品大臣，场面十分壮观。此外，每科的殿试也在这里举行

而这273个人参加的这场考试，正是殿试。

殿试历来应由皇帝主考，按名次分三甲：一甲三名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

一甲是第一等的，前三名分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状元、榜眼和探花。而那名状元，就是那一年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在1904年7月4日那一天，那273名贡士谁都不知道，究竟状元这顶桂冠会花落谁家。而他们更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参加的这一次殿试，是大清帝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一年之后的1905年9月，清廷正式下诏，废除科举，推广学堂。

所以，这一届科举，就成了“末代科举”；这一届的状元，便成了“末代状元”。

或者有个更意味深长的称呼，“第一人中的最后一人”。

2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天的殿试。

上午10点，273名考生落座，试卷发下，一共有四道题：

一、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

二、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

三、古之理财，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四、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着，其道何之从？

这四道题，与当初的八股文题目已有很大不同。

事实上，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后，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诟病延续千年却与时代脱节的科举制度，而清廷迫于压力，做出改革：废除八股文，考题与时事密切相关。

以这一年殿试前的会试题目为例。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题，虽然都考中国历史，但已有“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这样和时事能够结合的题目。

第二场考外国政治艺学五道题，既有“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这样的比较，也有“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这样的问策——如果考生平日还是埋首于“之乎者也”，可能会一个字都答不出来。

清朝的殿试一直到乾隆帝的时候，皇帝还多有亲临考场巡视，但从道光帝开始就已经开始缺席了，更别提早已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了。

273名考生在保和殿从上午写到傍晚，终于交卷，答卷收到了读卷官手里。

那一届殿试的读卷官一共八人：大学士王文韶、鹿传霖，尚书陆润庠、张英麟、葛宝华、陈璧，侍郎李殿林、绵文。这八名读卷官第二天会在文华殿将所有考生的考卷阅毕，分出高下。

转眼到了两天之后的7月7日。

那一天的黎明，所有参加考试的贡士在乾清门外的台阶上集结，恭听最终名次的宣读——这一天的这件事，被称为“小传胪”。

读卷大臣立于台阶之上，捧着一张写满名字的黄纸，开始高声宣读名次。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第一个被报出的名字——那就是这一科的状元郎。

读卷大臣高声喊出了第一名的名字，声音刺破了黎明的寂静：

“刘春霖！”

3

刘春霖得这个状元，背后一直有一些传说。

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那个“状元”原来并不是刘春霖的。

按照殿试的规则，在宣布名次之前，还有一个必须要经过的步骤——面呈钦定。

谁钦定？自然是皇上钦定。但考虑到光绪当时的处境，在面呈他之前，是要先给慈禧太后看的。这个版本的传说就是由此而来。

按照排列顺序，第一名的卷子放在最上面，而当时的那张卷子，是一个叫“朱汝珍”的考生的。

但慈禧一看这个考生的名字，不禁眉头一皱。

首先，“朱汝珍”这个名字，犯了一个“珍”的忌讳——慈禧对光绪当年的宠妃珍妃可谓心怀怨恨，以至在庚子年逃难前，还要让人将她投入井中溺毙。（珍妃的故事请参考《历史的温度》收录的《珍妃为什么必须死》）

其次，朱汝珍来自广东。慈禧对广东籍的人更是恨之入骨——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从那里来的。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广东才子梁士诒高中榜首，但据说就是因为慈禧看这个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又来自广东，就硬把这个名字划掉了。

慈禧拿掉了朱汝珍的卷子，看了第二张卷子，顿时眼前一亮：这个考生的字写得相当好看，有名家风范，而且名字起得也好，刘春霖，“久旱逢甘霖”。再一看籍贯，直隶省河间府肃宁人——肃静安宁。



梁士诒，后来做到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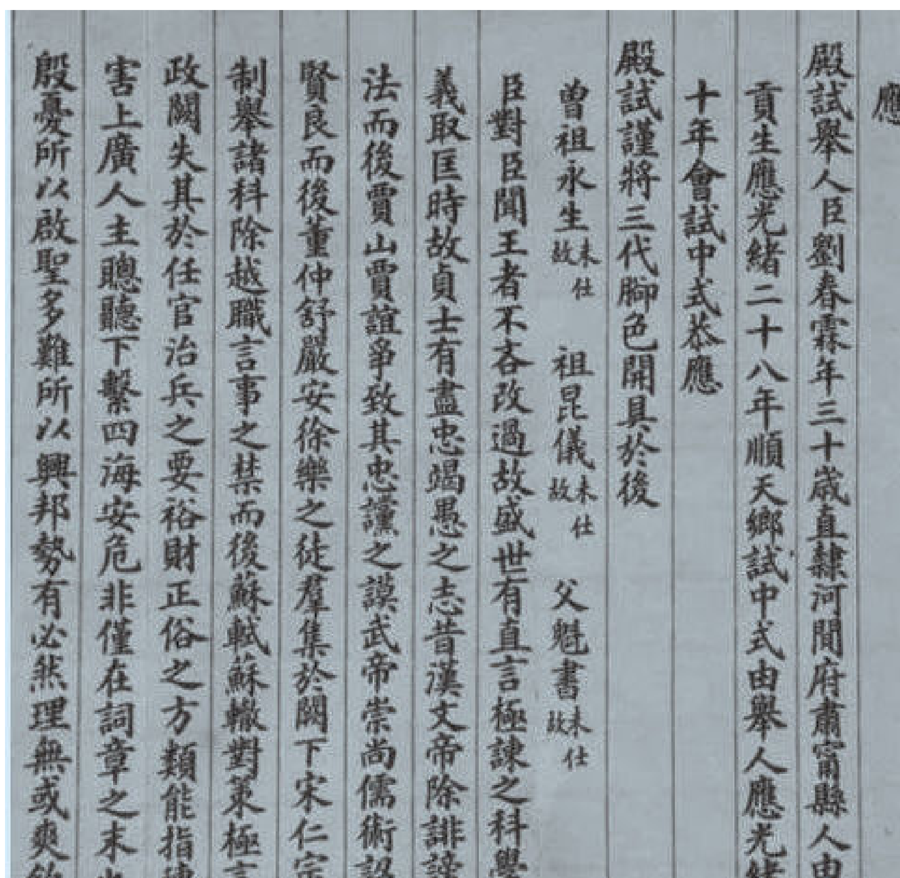
于是，慈禧把两张试卷换了一换：原来的榜眼刘春霖成了状元，而原来的状元朱汝珍成了榜眼。

这个版本流传很广，散见于多种资料，但似乎有不少漏洞，一时也难辨真假。

比如按照规矩，前十名的考生试卷递进去，名字都应该被遮掉，慈禧如何能看到考生名字？但想到放到那个时代环境下，慈禧真要看，料来也是没人敢阻拦的。

又比如室内换名次这种事情，应该是相对机密的，又是如何传得人尽皆知的？但那一次考试的第三名商衍鎏撰写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就

说自己原来是第四名，后来被钦定改为第三名的（“我卷即是进呈时为第四，而钦定改为第三的”），可见这事情似乎又不是什么高度机密。


應
殿試舉人臣劉春霖年三十歲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由
貢生應光緒二十八年順天鄉試中式由舉人應光緒
十年會試中式恭應
殿試謹將三代脚色開具於後
曾祖永生 故未仕 祖昆儀 故未仕 父魁書 故未仕
臣對臣聞王者不吝改過故盛世有直言極諫之科舉
義取匡時故貞士有盡忠竭愚之志昔漢文帝除誹謗
法而後賈山賈誼爭致其忠讜之謨武帝崇尚儒術詔
賢良而後董仲舒嚴安徐樂之徒羣集於闕下宋仁宗
制舉諸科除越職言事之禁而後蘇軾蘇轍對策極言
政闕失其於任官治兵之要裕財正俗之方類能指陳
害上廣人主聰聽下繫四海安危非僅在詞章之末也
殷憂所以啟聖多難所以興邦勢有必然理無或爽欲

刘春霖的答卷

其他还有一些版本，比如刘春霖的卷子是光绪皇帝提为第一的，因为他并不喜欢朱汝珍写的文章。（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就很可能慈禧并没有改顺序，因为如果是慈禧定的顺序，以当时光绪的地位，可能未必敢动。）

种种说法，给刘春霖这个“状元”的头衔加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但无论如何，客观结果是不变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位状元，就是刘春霖。

刘春霖，字润琴，1872年出生，直隶省河间府肃宁县人。

刘春霖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一个标准的“苦出身”。他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保定府的一个皂役（衙门里的普通当差），母亲为了补贴家用，还要给别人家做女仆。

按照清朝的规定，皂役之后是不能参加科举的，所以刘春霖被寄养到了大伯家里，送入保定著名的莲池书院读书，师从当时书院的总教习吴汝纶。

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主持下，莲池书院虽为中式书院，却引入大量的“西学”，如《万国史要》《西国哲学史》《世界文明史》《海上权力史》等，这让刘春霖受益匪浅。

刘春霖本身也是有读书天分的，且非常肯吃苦，他曾自刻一枚印章，上刻“平生志不在温饱”。而“苦心人，天不负”，刘春霖的读书之路最终还是相当平坦的：18岁中秀才，30岁中举人，32岁金殿夺魁，获“状元”之名。《神童诗》有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刘春霖这样的人了。



刘春霖

然而，时处“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风云激荡时代，即便高中状元，又哪有什么时间和机会让刘春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呢？

在被授予翰林修撰之后，刘春霖并没有按照惯例被派官，而是很快就被派往日本的法政大学留学了——同行的包括他这一科的其他进士。其时，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面对民间呼吁的“预备立宪”，清廷知道无法回避，在这个时候，管你是状元还是榜眼或探花，全都要去“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当时的日本，虽然也有不少纨绔子弟混在留学的中国学生中，但毕竟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刘春霖以“状元”的履历，也认真刻苦学习，只是在“共和”和“君主立宪”这两派观点中，他渐渐倾向于后者。

其实当时无论哪种观点，相对于腐朽的清朝统治而言，都是进步的。而刘春霖的选择应该还有另外一层因素——毕竟他是皇帝钦点的状元郎。

等到刘春霖学成回国的时候，他已是“君主立宪”方面的专家和活跃分子。1909年，他被选为直隶咨议局议员，1910年担任资政院议员。[1]虽然资政院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幌子下毫无实权，只是一个受制于皇帝的御用机构，但刘春霖却一直努力在里面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1910年11月，湖南巡抚杨文鼎不经省咨议局决议就发行国债，刘春霖坚决反对，其间军机处建议“不必追究”，刘春霖又杠上军机处。到后来摄政王载沣也要求资政院不要“多管闲事”，刘春霖直接又杠上了摄政王：“于立宪精神很相背驰，将来立宪政体很不牢固，恐要变成专制。”

论国学修养，刘春霖是堂堂状元；论西学知识，他又是日本法政大学的海归，所以那段时间是刘春霖在政坛最活跃的时候，也是他离政治中心最近的时候。

然而，没多久之后，武昌一声炮响，天翻地覆。原本还属于“进步”和“革新”一派的刘春霖，忽然发现自己多了一顶帽子：

前清遗老。

5

辛亥革命对刘春霖的打击，还是相当大的。

那一年，刘春霖才39岁，正值壮年，恰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时候。

但刘春霖却在自己北京的寓所里隐居了起来，终日读书吟诗，品茶下棋，似乎已决定“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但熟悉刘春霖的人，可能知道他这样做的矛盾和苦衷：他是皇帝钦点的状元。

当初在乾清门外的台阶上，当读卷大臣第一个报到“刘春霖”的名字后，立刻就有人将一条白色绸带给刘春霖缠到了腰上——寓意他入仕后就要效忠朝廷了。可如今，皇帝没了，朝廷没了，他堂堂状元郎，又该向谁效忠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刘春霖至少两年时间。到了1914年的时候，他终于出仕了。

出仕的对象，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力和实力的一个人：袁世凯。

袁世凯对刘春霖算是有“知遇之恩”。当初在清廷，是袁世凯提议让刘春霖参与君主立宪方面的工作，而刘春霖的老师杨士骧在世时和袁世凯是好友，刘对袁也执弟子礼。

刘春霖担任的职位，是大总统府的内史（相当于秘书长），但在他做的诸多事情中，唯独只有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且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各地组织“劝进”，刘春霖作为直隶省的“请愿团”代表，也加入了“劝进”的行列。



1913年12月23日，冬至，刚刚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在北京天坛举行祭天仪式

如果说这件事是因为刘春霖和袁世凯有各种难以言清的关系，那么另外两件事，似乎也可以成为刘春霖渐渐与“进步”和“革新”形象有所距离的佐证。

一件事，是1917年的张勋复辟（张勋的故事请参考《历史的温度2》收录的《张勋这个人》）。刘春霖作为“前朝遗老”的一分子，在张勋拥立溥仪登基之时，是穿着清朝的四品官服，去太和殿磕了头的。

另一件事，是1931年淑妃文秀提出和溥仪离婚，轰动全国（溥仪离婚的事情参看《历史的温度4》收录的《1931年，皇帝陛下离婚了》）。在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了近20年的时代背景下，59岁的刘春霖愤怒地发出指责：“实属大逆不道，于情于理均不合清祖宗法制。”

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立志投身改革的状元郎，似乎已经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中迷失了方向。

其实在那个时候，刘春霖自己未必没有这样的感受。

在袁世凯去世后，刘春霖还担任过一系列职务：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总统府秘书帮办兼秘书厅厅长（徐世昌、曹锟当大总统期间）、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直隶自治筹备处处长等。

看上去似乎颇有些名堂，但实际上呢？刘春霖曾自嘲过自己在政府任职，不过是个“执戟郎官”——就是一个空摆设。

1928年，刘春霖看不惯北洋政府的种种钩心斗角、互相倾轧，辞职赋闲在家了。赋闲在家后的刘春霖反倒过得舒心了，除了读书写字之外，还尽己所能兴办教育、捐建学堂、捐赠图书、为灾民募捐等，做了很多好事。

中国的末代状元，是否就能如此安然平凡地终老呢？

还不行。这不是他能决定的，而是他所处的那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还要给他一个考验：

这一次，不光朝廷没了，国家也要没了。

1934年，郑孝胥来找刘春霖了。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中日《塘沽协定》已经签订，在东北沦陷后，整个华北也有落入日本人之手的趋势。而郑孝胥当时的身份，是“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刘春霖当年支持的那个溥仪皇帝，已经以一个傀儡的身份，在满洲“建国”了。

郑孝胥来找刘春霖，是想请他出任“伪满洲国”教育厅厅长一职。

郑孝胥是充满信心的。

从私人交情上来说，郑孝胥和刘春霖都是清末立宪派的代表，两人的很多意见是一致的，当初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从“君臣道义”上说，无论是张勋复辟还是文秀离婚，刘春霖都是坚定站在溥仪这一边的。现在溥仪都建立新的国家了，他难道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辅佐他吗？



郑孝胥，也以书法著称，死于1938年，传被毒杀

然而，刘春霖的态度令郑孝胥大吃一惊。他不仅对这个“诱惑”嗤之以鼻，更是宣称要和溥仪决裂：“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

郑孝胥悻悻而归，但刘春霖毕竟顶着一个“末代状元”的头衔，日本

人还是不会轻易放过他。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王揖唐又来到了刘春霖的家。这一次，王揖唐许给刘春霖的官也不小：北平市市长。

王揖唐同样也是有信心的：他和刘春霖同为1904年那一年的进士，一起在保和殿答的卷，在乾清门听的宣，然后又一起去日本法政大学留的学。



王揖唐，1904年那一科进士二甲第五名。曾先后担任内务总长、吉林巡按使、众议院议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公开投敌，官至伪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会议议长。1948年9月10日，以汉奸罪被处以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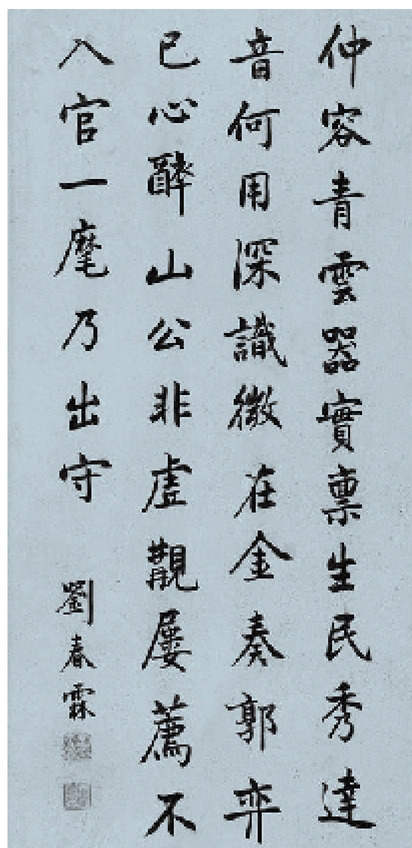
然而，王揖唐却直接被刘春霖当面怒斥：“筋骨软的东西！”

不知是不是狼狈离开的王揖唐的授意，日伪军在第二天就找上了刘春霖的家，用刺刀逼着刘氏一家人离开，然后将他家的书法藏书文物一抄而空。刘春霖后来动用多层关系并花了重金，才把抄去的物品给赎了回来。

这件事对刘春霖打击颇大，但原则上的事情，他还是丝毫没有动摇：

汉奸，是绝对不能做的。

7



刘春霖的字。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的说法

刘春霖晚年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卖字。好在他一是字写得确实好，二是毕竟有个“状元”的头衔，所以前来求字的人络绎不绝，维持生计倒也不成问题。

只是，置身事外，还是不能抵御病魔的袭击。

1944年，刘春霖因为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享年72岁。

他并没有等到他希望看到的那一天。

先来说两个人的故事吧。

第一个人，叫朱汝珍，是1904年那一科的榜眼。他后来和刘春霖一起，被公派到了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学成归来后，他参与拟定中国第一部“商业法”，前往各地商埠调查现代商业操作习惯，之后提交了长达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后来他在“逊帝”溥仪的小朝廷里做了13年“南书房行走”（可以视为溥仪的老师之一），后移居香港。溥仪建立“伪满州国”之后，曾邀请朱汝珍去助一臂之力，但他婉言谢绝。香港沦陷后，朱汝珍移居北平，曾多次资助抗日义士。1943年，朱汝珍因中风去世，享年73岁。

第二个人，叫商衍鎏，是1904年那一科的探花。他同样也被派往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又前往德国任教，正好与辛亥革命擦肩而过。从德国回国后，他担任过一些诸如顾问、秘书、咨议这样的虚职，日本侵华后，曾多次怒斥日本人的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衍鎏于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所副所长，1963年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商衍鎏的后人和弟子中出了不少著名学者，而他自己也根据回忆写了一本23万字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为后世了解清朝科举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看完了这两个人的故事，加上刘春霖的，似乎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哪怕贵为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的一生似乎也没有太多显赫的事迹。如果在太平盛世，他们的境遇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我曾接受一本杂志的采访，采访的记者告诉我，她对我写的那篇《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印象颇深，她问我：“你怎么看待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

我觉得，刘春霖他们的境遇，或许给出了一个答案：在滚滚的时代洪流面前，个体的抉择确实显得微不足道，哪怕你贵为状元，也只是一朵被推着前行的小浪花。

但是，真的聚焦到每一个个体，难道连一点抉择空间都没有吗？

1904年的那一科进士，出了王揖唐那样的汉奸，但也出了沈钧儒、谭延闿这样颇为著名的政治人物，哪怕像刘春霖、朱汝珍和商衍鎏，看

似平凡，也至少都有一个共同点：守住了自己的气节。

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下，刘春霖他们的脚步只要稍微放慢一些，可能就会显得有些“落伍”（朱汝珍也说过“绝不吃民国饭”），但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恰恰是时代才能检验出个体的本色。

时下流行一句话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确实，有时在不能控制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无力感。

然而，即便是一座山压下来，怎样来面对这座山，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坚强、乐观、麻木、逃避、投降，都是选择。

更何况，当每一粒灰的共同选择凝聚在一起，放到时代面前的时候，难道，不也是一座山吗？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末科举考试亲历记》（商衍鎏，《岭南文史》，1983年第1期）

2.《刘春霖生平事迹考》（刘超，《兰台世界》，2018年第1期）

3.《试析末科状元刘春霖的政治观》（杨猛，《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4.《刘春霖〈甲辰科状元策〉探源》（于素敏，《保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5.《科举史上“第一人中最后人”》（刘继兴，《江淮文史》，2013年第3期）

6.《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刘春霖》（邹典飞，《艺术品》，2018年第6期）

---

[1] 资政院为清末立宪运动的议会准备机构，各省的地方议会机构为咨议局。——编者注

朝鲜最后一个国王

说朝鲜的近代史，这位国王是无法绕开的一个人。事实上，今天要说的这位国王，也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但是，这位国王兼皇帝，却未必像大家想的那样活得顺心。

1

公元1864年1月，朝鲜半岛阴云密布，暗流涌动。

一场有关王位继承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33岁的朝鲜哲宗在这一年初忽然去世，然而，他却没有子嗣。

事实上，进入19世纪之后，朝鲜的李氏王朝在王族的后代繁衍问题上已经力不从心有一段时间了。

第23代国王纯祖李玜只活到44岁，而他立的嫡长子李旲却在他驾崩四年之前就死了（只活到21岁），导致王位继承发生了问题。最终，李旲的儿子，也就是李玜的孙子李奂即位，是为第24代国王宪宗。

宪宗7岁即位，22岁就去世了，依旧没有子嗣。经过一番权力斗争，王室找到了朝鲜第21代国王英祖的玄孙李昪，是为第25代国王哲宗。

哲宗也只活到33岁。1864年，哲宗薨，所生六子五女，只留得一女，朝鲜王室再度陷入继嗣危机。

此时朝鲜中央政府的权力，把持在两大外戚家族手里的：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

这两大家族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但对外却在一点上保持步调一致：对稍有才能的李氏王朝潜在继承者，不是流放，就是诬杀，导致李氏王族人才凋零，几乎没有可能再出现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干扰外戚的执政。

不过，在这些倒霉的王族中，有一个例外。他的名字，叫李昰应。



李熙（左）和儿子李坧在一起。李熙初名载晃，字明夫，乳名命福，即位后改名“熙”（正写为“□”）

李昰应，按血统应该是朝鲜第16代国王仁祖的八世孙，但因为在他出生前就被过继，所以从宗法上说，又是朝鲜第19代国王肃宗的五世孙。在哲宗去世后，由于王族宗亲被逐的被逐，被杀的被杀，李昰应居然成了王室宗亲最嫡系的那一脉。

那么，是他成为国王吗？并不是，是他的儿子。

那一年，李昰应12岁的儿子被推上了朝鲜第26代国王的宝座。他的名字叫李熙，庙号为“高宗”。

高宗，是朝鲜的最后一任国王。

如果说李熙是一个短命的国王，那这篇故事就没有展开的意义了。

事实上，可以说李熙以一个国王的身份，经历了近代朝鲜的种种大事。换句话说，要追溯朝鲜当年的那一段历史，李熙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旁观者视角。

且慢，旁观者视角？李熙可是堂堂的朝鲜第26代国王啊。

很遗憾，确实如此。李熙虽然贵为国王，但他的一生，从来没有被加持过“主角光环”。如果要做一个简单总结的话，李熙的一生，始终没脱离过两个人和三个国家的影响。

第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亲生父亲，李昰应。

如果没有李昰应，李熙是不可能坐上国王宝座的。

1864年朝鲜王朝发生王位继承危机的时候，李昰应43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年富力强，是断无可能被两大外戚集团找去做国王的。但他同样清楚地知道，根据宗法继承之道，他的12岁儿子李熙，是很可能被推上王座的。

其实李昰应已经准备了很久。

李昰应的“放浪形骸”在王族中是非常有名的：他一天到晚在市井和一些流氓无赖称兄道弟，大白天就经常去妓院鬼混，常常酒气熏天，胡言乱语，吃喝嫖赌无所不精。他这样做有自己的目的：让两大外戚集团认为自己不会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既能免杀身之祸，也能为后来留一点翻身之机。



李昰应。李熙登基后，按照惯例，李昰应受封“大院君”——这是历代朝鲜国王给自己生父所封的一个爵位。而李昰应是朝鲜王朝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世时就受封的“大院君”

而另一方面，他充分利用了当时自己在宫内包括宫女在内的关系，说服当时在宫廷中最有发言权的丰壤赵氏的赵大妃，并承诺让李熙成为她的养子，最终成功上位。

李熙登基时才12岁，而他有这样一个年富力强又韬光养晦那么多年的父亲，请问，李熙可能自己掌握实权吗？

当然不可能。

自李昰应之后，朝鲜近代史上凡是提起“大院君”，指的就是他一人——可见他后来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李昰应上位后不久，就架空了赵大妃的权力，虽然没有“摄政”之名，但开始行“摄政”之实：谁让国王是他的儿子呢？

从1864年到1873年的十年，朝鲜名义上的国王是李熙，但实际统

治者却是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李昰应确实怀着一番雄心壮志，他重用了一批人才，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重建景福宫、设置三军府、实行社仓制与户布制、裁撤书院等。

总的来说，这十年的“大院君改革”在充实国家财政、振兴国家军队、整顿吏治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就连朝鲜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与大院君不和的金允植，也承认他的改革“十年之间，令行禁止，内外肃然奉公”。

但另一方面，大院君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在他的规定下，朝鲜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闭关锁国”政策。有五百年历史的朝鲜王朝在19世纪中叶其实已经步履维艰，大院君的改革最多是缝缝补补，并没有把朝鲜推向近代化，而是在原来那个茧房里越陷越深。

而在这十年里，高宗李熙在做什么呢？

很遗憾，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是个傀儡，他终日饮酒作乐。他的父亲李昰应逼着他读一些中国的儒家经典，尽管他照做，却心情复杂。有一次，李熙读《孟子》，看到一句“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指商汤和文王起家时地盘都很小），他说了一句：“七十里、百里，犹可以为政于天下，况我国三千里乎！”

这一刻，高宗的内心可能颇有些豪情，但是，是否也会有一丝失落：这三千里疆土，我说了算吗？

当然，这时候的高宗，毕竟还是一个少年，执政的是他亲生父亲，也不是外人。终有一天，他应该能自己掌握权力。

那么，他等到了吗？

并没有。

3

于是，就该说说第二个影响李熙人生的人了。

她是一位女性，史称“明成皇后”，但她有个更著名的名号：闵妃。

闵妃是李熙的妻子，但两人的结婚和爱情无关，完全是因为大院君李昰应——为了巩固李家王朝的权力，李昰应必须要找一个自己能完全拿捏得住的儿媳妇。

闵妃可以说条件完美：她来自李昰应妻子骊兴闵氏一族，这个家族原先也是朝鲜王朝的名门望族，但家道中落，需要依靠李氏；她聪明乖巧，善解人意，关键还幼年丧父，可以说完全能被李昰应一手掌控，成为自己阵营的一名重要成员。

对这位完全不由自己选定的妻子，高宗李熙一开始是很冷漠的。他钟情的，是一位叫李顺娥的尚宫，两人感情非常好，还生下了一个儿子，叫李墡。

整整三年，高宗李熙对闵妃都爱理不理，再加上有了一个庶长子，一切情况都对闵妃非常不利。

但闵妃确实有一套本领。

一方面，她学公公大院君那样，开始韬光养晦——把大量被冷落的时间花在阅读中国古代经典书籍上。据她身边的人回忆，当时闵妃爱读的书主要是《春秋左氏传》《资治通鉴》《周易》《唐宋八大家文钞》。

另一方面，她花了大心思搞好和赵大妃以及婆婆闵氏的关系，甚至连李顺娥分娩（生下的儿子其实将大大动摇闵妃的地位）都亲自去看望并带上礼物。这也使得宫廷内从上到下包括高宗在内，都对闵妃刮目相看，认为她孝顺通达，贤淑温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院君也愿意提拔一些闵妃的亲戚入朝做官。

三年之后，高宗李熙对李顺娥渐渐有些厌倦了，而此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温柔可人的闵妃。

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直至如胶似漆。

而地位稳固的闵妃随后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掌握权力。

此时的闵妃，不仅在朝中有了自己初步的关系网，而且已对中国历朝历代那些宫廷权术了然于胸。而挡在她通向权力宝座之路上的障碍，并不是她的丈夫李熙——她自信已能完全掌控丈夫了——而是自己的公

公大院君李昰应。

闵妃是大院君招进来的，是作为本方棋子用的。然而在闵妃入宫的几年时间里，翁媳之间的矛盾却在不断加深——主要是闵妃对自己公公有所怨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李昰应很喜欢李熙和李顺娥的那个庶长子李墡，颇有把这个孩子立为世子的想法（藩属国不能称“太子”，只能称“世子”）。

当时的闵妃怀孕多次，但孩子不是流产就是夭折，如果李墡被选为王位继承人，会触动闵妃的根本利益。

而闵妃也不是没有看到翻盘的希望，因为大院君“摄政”的十年，经济搞得并不尽如人意：朝廷上，反对大院君的情绪在酝酿；国内，多地开始爆发农民起义；国外，由于大院君的“闭关锁国”政策，与日本的关系降至冰点（当时朝鲜只承认清朝是宗主国，只和清朝通商），日本一直在宣扬出兵朝鲜。

公元1873年，闵妃终于等到了机会。

一个叫崔益铉的儒臣上奏抨击大院君的政策，被大院君驳回。但在闵妃的鼓动下，高宗李熙反而嘉奖了崔益铉。“儿子不给老子面子”，这让大院君非常光火，鼓动人上奏要求严惩崔益铉，但李熙反而罢免和流放了上奏的人。

借此机会，21岁的高宗李熙一反往日懦弱之态，在闵妃的鼓励下忽然宣布要“亲政”——这在年龄和礼法上都没有任何问题。理亏的大院君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招数”，但都被自己儿子背后的那个儿媳妇轻松化解。最终，辛苦培育了十年势力的大院君只能落荒而逃，离开汉城，大院君的势力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这一年，21岁的高宗李熙终于得到了“亲政”的机会。

然而，他手中依旧没有权力。权力都在他的媳妇闵妃手里。

史书记载，闵妃当时“百官奏章常自阅之”。

朝鲜王朝在“大院君时代”之后，并没有过渡到“高宗时代”，而是进入了“闵妃时代”。

4

从“听爹的”到“听媳妇的”，李熙依旧没能尝到权力的滋味。

不过，以当时朝鲜所处的环境来看，如果李熙真的亲政，恐怕也一个头要变成两个大。因为偌大的一个朝鲜半岛，始终笼罩在三个国家的阴影之下。

第一个国家，就是大清帝国。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虽然在明朝灭亡后，朝鲜一度“人心思明”，但最终还是承认了大清帝国的宗主国地位。

在大院君集团执政时期，朝鲜的国策“一边倒”倾向清帝国，但这个政策在闵妃集团上台后发生了改变。她力主与日本发展关系，并在“云扬号事件”之后，顶住全国上下的压力，与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并派使团出使日本，还请日本教官训练了朝鲜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别技军。



日本描绘“云扬号事件”的画。1875年5月，“云扬”号等日本军舰入侵朝鲜釜山，进行武力示威；9月入侵江华岛一带并与当地朝鲜守军发生冲突，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随着《江华条约》的签订，朝鲜的国门被打开

应该说，闵妃的这一举措有“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想法，也有借助日本的力量对抗“亲华派”大院君集团的诉求。而从历史进程来看，就是自闵妃执政开始，日本势力开始大举进入朝鲜，形成与大清帝国势力角逐的格局。

而另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闵妃集团上任后其实非常贪污腐败，宫廷

内夜夜笙歌，地方上层层盘剥，朝廷甚至对外卖官鬻爵，这让朝鲜百姓怨声载道，而大院君执政时期积累的国库也被迅速耗空。

内有国力衰退，外有两派势力角逐，从1882年到1884年，短短两年之内，一向国内还算平和的朝鲜，接连发生两次震动东北亚格局的“事变”——都和大清帝国有关。

第一场事变，是发生在1882年的“壬午兵变”。

这一年，朝鲜大旱，民怨四起，而京城的军队也发生异动：日本教官训练的“别技队”待遇优厚，而其他朝鲜老式军队已经13个月没发过军饷了，都被闵妃的亲信克扣。在大院君的暗中煽动下，数千名朝鲜军人揭竿而起，连同自愿加入的大量汉城老百姓，竟然长驱直入，直接冲入宫中，杀死了一大批闵妃的亲信，并扬言要取闵妃项上人头。

在危急时刻，闵妃化妆成宫女逃出京城，并迅速展现出了自己的政治手腕：派人向大清帝国求援。

按理说，重新掌权的大院君才是“亲华派”，而闵妃集团是“亲日派”，为何闵妃会向清朝求援？

因为闵妃自知虽然引入过日本势力，但与大清帝国的关系并没有搞僵。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人也趁机向朝鲜派兵，试图借此染指朝鲜。闵妃集团掌握朝政已经十年，她又是高宗的王后，有把握清廷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借帮助自己之机，巩固清帝国在朝鲜的势力，驱逐日本。

果然，已经丢了琉球的清政府在收到闵妃的求援后，权衡利弊，下决心力保这最后一个藩属国，所以很快决定放弃重新上台的大院君，继续扶植闵妃集团。

决定出兵的清政府随后派出淮军6个营共3000人，在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后来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当时北洋水师还未正式建军，但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随行）的带领下奔赴朝鲜，抢在日本人动手之前，诱使大院君到清军大本营后一举扣押，直接送往天津软禁。

“壬午兵变”历经一个多月，最终闵妃集团重新掌权，并且由原先的“亲日派”转向“亲华派”。

而在这个过程中，李熙惊慌失措，先是宣布自己“归政”给父亲大院君来收拾残局，然后被迫同意宣布自己的妻子闵妃“已死在乱军中”；然而在闵妃卷土重来后，又与妻子重归于好，把自己的父亲丢到了脑后。



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也展示了能力，自此走上历史舞台

但李熙还没有高枕无忧多久，两年后，更严重的“甲申政变”爆发。

“甲申政变”在本书第一部分《三个东亚国家，三天，一场政变》一文中已经详述，不再展开，政变的结果就是大清帝国再一次大获全胜，全面巩固了在朝鲜的势力。

但是，另一个国家也因此加入了朝鲜半岛的角力。

5

这个国家，就是俄国。

闵妃在“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两次利用清帝国的势力扫除政敌，一方面巩固了自己在朝鲜的权势和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让清朝的势力在朝鲜根深蒂固。清政府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派出袁世凯以“三品道员”的身份坐镇朝鲜，开始主掌朝鲜外交、通商等事务（原先清政府对朝

鲜的这类事务并不太插手），俨然已成为凌驾于李熙和闵妃之上的“朝鲜太上皇”。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熙和闵妃的忧虑开始加重了。

让清朝势力全面控制朝鲜？这是李熙和闵妃不愿意看到的；引入日本势力牵制清朝？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想来想去，李熙和闵妃想起了俄国。

在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战争”结束后，一直有扩张欲望的俄国最终惨胜，但受到了西欧列强的遏制，只能把眼光瞄向亚洲。中国太大，日本太远，与自己国土接壤的朝鲜成了最佳选择。

恰好，朝鲜方面也有引入俄国势力牵制清朝和日本的想法，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插进过一个觉得自己来晚了，所以要四处掺和一把的美国，以及不甘心俄国入局的英国，但东北亚总体的格局，还是中、俄、日三国争霸。

“甲申政变”后，受到中国压制的日本恼羞成怒，开始不断叫嚣要入侵朝鲜。而朝鲜国内的大臣韩圭稷恰在此时提出了对俄国的观点：“据天下形胜，为天下最强，为天下最畏。”

这个“引俄自卫”的观点颇得李熙和闵妃的认同，一向话不多的李熙甚至说出了“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的话，于是，朝鲜开始慢慢谋求与俄国接近。

在闵妃的主导下，朝鲜先后两次和俄国签订“朝俄密约”，但两次都被宗主国清朝发现而叫停，其中尤以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更为严重，当时坐镇朝鲜的袁世凯已经密谋废黜高宗李熙，重新搬回大院君执政。

最终，面对清朝的严厉问责，朝鲜方面一口咬定“从无此事”，“不敢有异志”。而当初以“臣服于华为耻”的李熙，则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毫不知情，把责任都推给了妻子和属下。

虽然朝鲜两次都受迫于清朝的压力而暂时断绝了与俄国人联通的意向，但人算不如天算，时代终究会变。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大清帝国惨败，朝鲜朝中的亲华势力瞬间烟消云散。面对一战而咄咄逼人的日本，“引俄自卫”的声音再度响起。

然而在这个时候，第三个国家——日本早就已经急不可耐了。

6

日本对朝鲜的“野望”[1]，正式起步于《江华条约》签订之后。但他们一直面临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朝鲜的李氏王朝，而是原来东亚地区的老大清帝国。围绕“如何清肃清朝在朝鲜的势力”，日本人也可谓动足了脑筋。“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的背后，都有日本人的影子。

甲午一战，日本完成了自己的逆袭，朝鲜朝中的亲华势力也不复存在，清朝更是在《马关条约》中明确声明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

然而，正当日本以为可以一家独大控制朝鲜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面前还有一块绊脚石——闵妃。

闵妃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已经被日本人重新扶植起来的大院君剥夺了实权，但她根基仍在。看到清朝战败，闵妃首先放弃了“亲华”，然后她又看到俄国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压制住了日本，更坚定了“引俄拒日”的决心。

经过一系列的暗中运作，闵妃集团在1895年再度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一举粉碎了朝廷中“亲日派”的势力，重新掌握了实权。

眼看甲午战争的“胜利果实”被一举粉碎，朝鲜从中国羽翼下脱出后又要求庇护于俄国，日本人彻底动了杀心。

1895年10月8日拂晓，在新上任的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的策划下，一批日本士兵和浪人挟持大院君冲入朝鲜王宫，在四处搜索之后，直接在乾清宫用乱刀砍死了闵妃，并浇上煤油点火焚尸，而后将骨灰抛撒于池塘中。

是为震惊东北亚的“乙未事件”——影响整个朝鲜近代史的闵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当时，朝鲜已经在名义上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藩属国而是一个主权国家了——一个主权国家的王后居然被一帮外国人冲入王宫乱刀砍死，

这在世界上是闻所未闻的。而作为王后的丈夫，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却无法做出任何举动。



描绘“乙未事件”的画

尽管王后被杀是一件奇耻大辱，但李熙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闵妃身死，大院君年老力衰，至少在朝鲜宫廷之内，再也没有能够阻止他“亲政”的障碍了。那一年，李熙43岁，可谓年富力强，正当其时。

那么，他如愿了吗？

7

很遗憾，两人虽不在，三国却不会消失，李熙面临的，还是一个“傀儡局”。

闵妃被砍死后，日本人迅速在朝鲜建立了“亲日”政权。但由于入宫砍杀一国王后的行为被当时在场的两个外国人记录并公布于世（日本方面原先栽赃大院君发动政变），不仅举世哗然，更在朝鲜引发众怒。

在“亲俄派”的鼓动下，朝鲜国内爆发了“乙未兵变”，高宗趁机和王太子一起坐轿子转移进了驻俄公馆，结果在里面一住就是整整一年。

堂堂一国之君，一整年是住在外国领馆里的，他的权威可想而知。

然而，就在1897年回到自己的宫殿之后，高宗却看准了身边没有掣肘，俄日两国势力基本在朝鲜达到均衡的契机，做了一件大事：1897年10月12日，李熙在庆运宫的圜丘坛祭天，宣布即皇帝位，封已去世的王后闵氏为皇后（谥号为“明成皇后”），王太子李坧为皇太子。次日颁诏书，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但沿袭中国明朝的典章制度。

前半生都受制于人的高宗，在朝鲜历史上留下了标志性的一笔：他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称帝的君王。

当然，作为藩属国的终结，他也是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国王。

称帝后的李熙，确实是想做一番事业的。



1884年的李熙

然而，以他的认知和能力做出的改革政策，还是局限于旧时代：加强君主专制，扼杀民主独立，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回到旧时代，李熙有可能成为一代明君。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在风起云涌的19世纪末期，世界各国都处于“大变局”中，而身陷列强旋涡中的朝鲜，想要“在鸡蛋上跳舞”，实属机会渺茫。

1904年，一场间接影响大韩帝国国运的大事件爆发了：日本和俄国正式开战。

看似强大的俄国在这场战争中被日本重创，震惊世界，也震动了李熙——这意味着，朝鲜倚仗的“平衡外交”格局被彻底打破了。

李熙的预料是正确的。

1905年11月17日夜晚，日本的重臣伊藤博文在大批日军的簇拥下进入韩国皇宫，强迫李熙签署《乙巳条约》（《日韩保护条约》）。

在李熙称病不出的情况下，外部大臣朴齐纯被迫签署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日本在韩国设立“统监”（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韩国撤销外交机构，不再设“外务大臣”职务——一个没有外交权的国家，实际上就不是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了。

摆脱了大院君，摆脱了闵妃，摆脱了清国，摆脱了俄国，但最终，李熙和他的朝鲜还是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8

此时的李熙，已经53岁了。

但步入“知天命”的年纪之后，一生受制于人的李熙，反而展现了他最后的倔强。

1907年，《大韩每日申报》发表了李熙的声明，称自己从未批准缔结《乙巳条约》，从没有放弃外交权，也从未同意日本“统监”常驻韩国。

同年，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李熙秘密派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乙巳条约》无效。

这两件事最终都没有结果，却大大惹怒了日本。

这一年的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对着李熙下榻的庆云宫架起了6门大炮，在大批日军的包围和监视下，庆运宫的中和殿举行了“禅位仪式”：李熙将皇位让给自己33岁的儿子李坧。

李熙和儿子都没有出席这场仪式。

被日本人强行称为“太皇帝”的李熙并没有认输，他始终不承认“退位”，而是在文书中使用“皇太子代理”这样的字眼。

在李熙“退位”四天后，李坧就在日本人的逼迫下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宣布解散大韩帝国的军队。



李坧被立为纯宗，他也是大韩帝国最后一任皇帝

三年之后，日本又强迫李坧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建立仅13年的“大韩帝国”就此灭亡。韩国“皇帝”李坧、“太皇帝”李熙和“皇太子”李垠被授予日本皇族的身份，李熙的封号降为“德寿宫李太王”。

那段时间，据李熙的身边人回忆，李熙经常晚上失眠，长吁短叹。

然而，正当日本人以为这位朝鲜“末代国王”和大韩帝国“开国皇帝”已经失去斗志的时候，李熙却在酝酿最后的反击。

9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

在这场会议中，美国总统威尔逊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提出

了“十四点准则”，其中有倡议让一些弱小国家的民族进行民族自决，成为独立国家。

消息传出，在朝鲜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按照当时的一种说法，李熙准备再一次效仿当年海牙万国会议的做法：派遣密使去巴黎，向世界各国请求维护韩国的独立。

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因为李熙很快就走到了他自己的人生终点：1919年1月19日凌晨，李熙在宫中因突发脑溢血身亡。

不过，“脑溢血”是日本方面的说法，且事后并没有给出病理报告。所以一直有一种说法在坊间流传：为了防止李熙再次派密使去捣乱，日本人在当天晚上将他毒杀。

事实的真相已经无从知晓。

68岁的李熙，终于以朝鲜“末代国王”和大韩帝国“开国皇帝”的身份，走完了他的一生。

馒头说

但凡玩过策略游戏或即时战略游戏的玩家，都知道一点：开局的“出生地”，其实非常重要。

而如果将东北亚的地图放到游戏中，我们不难发现，朝鲜的“出生地”其实并不太妙：北面，是疆域辽阔且一直致力于扩张的俄国；西边，是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东边，是迅速崛起，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军国主义”上脑的日本。

朝鲜半岛以2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面积，夹在三大强国之间，处境可想而知。

自近代以来，东北亚一直是几个世界大国力量角逐的一个交汇点，从甲午前后，到二战，到冷战，到抗美援朝，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出生地”并不是自己能选择的。身处“强邻”包夹，朝鲜半岛历经千年，在几个大国的博弈之间几经沉浮，至今依旧保持独立，并且成为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一支绝不能忽视的力量，这很不容易。

曾经看到有一位网友的观点：不要把朝鲜半岛看得那么重要，在如今发达的军事科技下，昔日所谓的“战略缓冲地带”已经不存在了。

我个人并不是很赞同。

在军事科技突飞猛进的现代，从空降的距离、导弹飞行的速度或机械化部队奔袭需要的时间这些要素上看，“战略缓冲地带”的意义确实在下降。但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体系下，“战略缓冲地带”应该更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尤其是在当今和平的大环境下，在东北亚的每一个国家、每一股力量，其实都需要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博弈，而在军事意义之外，各方其实都需要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战略缓冲带”。

在东北亚，抛开别的不说，有一点是我们都无法改变的：大家都是一个楼道的邻居。

和平不易，稳定不易。努力，并珍惜。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大韩帝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1897—1910）》（蔡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2.《袁世凯在朝鲜的活动与近代中朝日关系》（聂金凯，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3.《清廷援助朝鲜开化运动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影响（1879—1884）》（黄震宇，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4.《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石少颖，《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

[1] “野望”为日本词语，指不合身份、离谱的愿望，野心、奢望。——编者注

“民国第一奇人”和他的“朋友圈”

在民国的历史上，是颇有些“奇人”的。他们或许并不是站在舞台的最中央，但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重要的“推手”位置。比如这个故事里这位，如今知道他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但当初，说他“无人不知”也不夸张。有人把他称为“民国第一奇人”，而他经历之复杂、结交之广、转变之多，也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1

杨度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其实发生在他10岁的时候。

那一年是1885年，他的父亲杨懿生去世，他被过继到自己的伯父杨瑞生家。如果那时候有“微信”的话，就是他的“家族群”发生了变化。

杨家祖籍湖南湘潭，世代务农，到了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带着长子杨瑞生入湘军李续宾部，一路做到正四品都司。1858年11月，湘军与太平军对阵三河镇，湘军大败，李续宾被杀，杨礼堂也在战中阵亡。（“三河之战”发生在今天安徽省肥西县的三河镇，是太平天国晚期取得的一场重要胜利。湘军在此战中受挫甚大，李续宾阵亡消息传来，胡林翼吐血，曾国藩茶饭不思。）儿子杨瑞生死里逃生拣回一条命，继续留在湘军。因朝廷抚恤杨礼堂家属，杨瑞生之后被一路提拔，最后官至总兵。

杨度被过继到杨瑞生家的时候，就是杨瑞生做总兵的时候。此时的杨家家境富裕，而这位伯父又对自己这个过继来的侄子照顾有加，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

杨家这一辈几个兄妹，学问都相当不错，杨度的弟弟杨均和妹妹杨庄都是诗、书、画俱佳，而最出挑的，还是杨度。杨度从小天资聪慧，能诗能文，很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了。

1892年，17岁的杨度考取了秀才，并在第二年中了顺天府乡试的举人。但他的仕途之路远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在之后的两年，他在两届会试中均落榜。不过，第二年的会试恰逢1895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对中国读书人而言堪称大事的事件——公车上书。当康有为和梁启超率京师

数千举人联名上书的时候，杨度也是那些举人中的一分子。

虽然最终落榜，但杨度通过这次“串联”，在自己的“朋友圈”新加了一批好友，这批人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名字：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

当然，这批好友当时还只是“点赞之交”。

21岁的杨度回到了湖南，拜了个老师，叫王闿运。事实上，是王闿运知道杨度的才气，亲自登门到杨家将他招入门下的——也就等于主动要求加“微信”。



王闿运，做过曾国藩的幕僚，相传曾劝曾国藩起兵反清，自己称帝。他门下有一批颇有名声的徒弟，包括齐白石

王闿运也算一代名儒，在经学、史学和文学方面都颇有造诣，不过对杨度影响最大的，是王闿运的另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可以说影响了杨度的一生。

那就是“帝王术”。

2

1902年，27岁的杨度命运再一次发生改变。

那一年，感觉在国内已经学不到什么新东西的杨度，迫切希望能在时代的大变局中一展身手。于是，他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强烈反对，自费留学日本，入了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在那里，杨度的“朋友圈”又多了一个很重要的同学，他的名字叫黄兴。

杨度的第一次日本留学之旅，在大半年后就结束了。回到湖南后，受王闿运的推荐，他的“朋友圈”里第一次多了一个重量级“大佬”——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对杨度的才学十分欣赏，推荐他去报考当时清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

在这场考试中，杨度一举考取了一等第二名，取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广东的梁士诒，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华民国财政部次长。杨度眼看着自己的从政愿望即将成真，却又横生枝节：有人对慈禧太后说，梁士诒不仅来自广东，而且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一直恨不得生啖梁启超和康有为之肉的慈禧太后立刻决定将梁士诒除名。但第二名的杨度非但没有因此占了便宜，反而还受了牵连：有人举报杨度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有攻击朝廷的言论（发朋友圈从来不注意屏蔽，或者在微信群发言被人截图带来的后果），又来自湖南，很可能是之前造反的“自立军”唐才常的同党。

于是，杨度的第二名也被除名，他还被通缉。

长叹一声的杨度只能再度留学日本。



年轻时的杨度

第二次留学日本，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让杨度挖到了成名的“第一桶金”。

首先，杨度的才气开始为天下所知。

去日本留学后不久，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两人谈起国事，唏嘘不已。杨度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有感之后，作了一首《湖南少年歌》，经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全文发表，轰动一时，成为当时“朋友圈”的千万级刷屏爆文。其中的一句更是至今仍被不少人提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杨度还创作过另一首诗歌《黄河》，由沈心工谱曲，也是当时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歌曲：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

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这首歌当时与李叔同的《送别》齐名，更因为歌词里有家国情怀，排名还在《送别》之前。

其次，杨度的“朋友圈”一下子深化和拓展了。

杨度和梁启超原来只是“微信”好友，最多是个“点赞之交”。但在日本却开始惺惺相惜，一度被称为“天下至好”，而梁启超更是曾称杨度为“国士”。

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又加了两个同学好友，一个叫汪精卫，一个叫胡汉民。此外，当时另外有一个留日学生与杨度的关系最好，每个休息日都要到杨度家吃饭聊天，两人经常在“朋友圈”互相点赞，这个学生的名字叫蔡锷。

当然，在杨度的这批日本“朋友圈”里，名气最大的还是孙中山。



黄兴在整个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可谓不可或缺

在东京，杨度和孙中山曾就中国革命的问题讨论过无数次，有时候通宵达旦。杨度并不赞成孙中山“暴力革命”的观点，但非常尊重孙中山，所以把自己在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的同学黄兴引荐给了孙中山。

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当时和孙中山约定：“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最后，杨度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威望。

杨度满腹才气，热心国事，对各路同学又关爱有加，很快在中国留日学生群体中树立了威望，被推举为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长。1905年，杨度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长兼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回国拜见张之洞，提出“官绅筹款自办”的方法，最终助力清政府收回粤汉铁路自办。经此一事，杨度在留学生圈中的声望更加如日中天。

已到而立之年的杨度，其实已经具备了一切条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从政的机会。

3

1906年，这个机会来了。

那一年，清政府派出去欧、美、日考察“宪政”的五位大臣回国。既然是考察，回来肯定要交报告，但有意思的是，五位大臣写不出报告，反而派人找来根本没有去考察过的“枪手”捉刀。

杨度和梁启超两个当时的大才子，就这样被选中了。

梁启超当时写的是《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而杨度写了两篇，一篇是《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一篇是《实行宪政程序》。基于这几篇文章出台的“宪政考察报告”最终定下了清廷的调子：预备立宪。

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了《中国新报》（相当于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自任总编辑。此时的杨度，已经完全代表留日学生中的“君主立宪派”，表示“不谈革命，只谈宪政”，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同时，湖南成立了宪政工会，杨度担任会长。

1908年，33岁的杨度终于等来了他的功名：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这个官位看上去不高不低，但他由此有机会出入颐和园，从“线上”转到“线下”，亲自给那些皇族亲贵讲解什么叫“立宪”，什

么叫“法治”。

1911年5月，清廷推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内阁”，而杨度在“内阁属官”中出任统计局局长——36岁的他已经当上了中央干部。

然而，这个内阁名单一出台就被舆论嘲讽为“皇族内阁”，因为内阁中只有6名汉人，清廷根本不想认真“立宪”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也使得一批原本还倒向立宪的人开始转而支持革命。

于是，杨度这个“统计局局长”的位置还没坐热，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革命爆发后，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清廷顿时土崩瓦解。但杨度却并没有太惊慌，因为聪明如他，本来也对清廷的“君主立宪”并不抱太大希望，他寄望能够让他施展“帝王术”的人，根本就不是乳臭未干的宣统皇帝，更不是那帮昏昏庸庸的亲王贵族。

杨度的老师王闿运早就告诉过他，“帝王术”的施行，是有诸多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有“帝王相”的可托付之人。

杨度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个“天选之人”。

那就是袁世凯。

4

杨度和袁世凯，早就是一个“朋友圈”的了。

杨度当初进京当四品官，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合保荐的，而他能进颐和园给皇亲贵族们讲课，也是袁世凯从中协调的。所以，杨度也一直认为袁世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在光绪和慈禧相继归西之后，袁世凯在朝廷上受到排挤，被载沣赐了个“回乡养病”。当时袁世凯的势力颇有“树倒猢狲散”的架势，朝中权贵都吃不准风向，开始和袁世凯保持距离，连平时“点赞”都不敢给一个。袁世凯离开北京时，竟然没什么人去送他，但杨度不管不顾，跑到火车站月台去送行。

袁世凯回到老家后，敢去看望他的少数人中，就有杨度。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索性连京城的官也不做了，直接跑到袁世凯老家，做了他的幕僚。不久之后，清廷被迫重新重用袁世凯，希望他派兵攻打武昌的起义军，袁世凯的北洋军打打停停，不断向清廷索要筹码，这背后很多时候都是杨度在出主意。



志得意满的袁世凯

等到孙中山的革命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南北对峙的时候，因为杨度和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这批人在日本时都是一个“朋友圈”的，所以他成了袁世凯当时派出的代表之一，进行“南北调停”。

而“南北调停”的最终结果，就是孙中山低头和让权，袁世凯最终如愿以偿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按理说，杨度此时也应该功成名就了。但这并非他希望看到的终点，因为他的“帝王术”需要辅佐的，是一个真正的“帝王”。而且最关键的是，杨度通过各种细节体察出，袁世凯的内心也是有这方面渴望的。

当时，一切形势的变化似乎都在助推：1913年3月，最有可能挑战

袁世凯权力的宋教仁被暗杀；7月，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被镇压，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地区大多被北洋军攻陷，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流亡海外；1914年，国会被解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废止，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袁世凯手上……

杨度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1915年4月，杨度抛出了他精心准备的一篇文章——《君宪救国论》，认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这篇文章一出来，果然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

袁世凯立刻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称这篇文章为“至理名言”，还专门给杨度送了块亲笔题字的匾额——“旷代逸才”。

得到鼓励的杨度再接再厉，索性就自己“拉群”了：他在同一年成立了著名的“筹安会”，自任理事长，拉了刘师培、严复等一干人打出了“筹安六君子”的名号，开始各种运作，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做准备。没多久，从“线上到线下”的“闭环”就形成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出现了各种请愿变更国体的“请愿团”，其中包括“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以及“妓女请愿团”。

人一旦陷入周围人有意构成的“信息茧房”，失去了清醒的判断和有效的制衡，对权力的欲望就会如决堤之水喷泻而出。聪明如袁世凯者，因为“朋友圈”里的好友都是杨度这样的人，所以在他们营造的“全国劝进”画面前开始变得自信满满，最终走上了“称帝”的蠢路。

1915年年末，“洪宪帝制”出台，袁世凯的人设一夜之间崩塌，顺带带上了杨度。

一帮“朋友圈”的旧友首先就和杨度决裂，互相“拉黑”。



蔡锷（左）和杨度（右）是当初留学时最好的朋友，最终反目。但蔡锷在临终时还是专门为杨度开脱："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当年最好的朋友蔡锷立刻成立"护国军"，宣布独立；当年以"国士"相称的梁启超，直接在"朋友圈"公开说杨度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甚至在杨度的家乡湖南，他也成了人人唾骂的对象。

而且，杨度发现即便袁世凯称帝，他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帝师"梦想，袁世凯仅仅只是给了他一个"少卿"的职位，一帮他认为功劳远没他大的人都封了"中卿"乃至"上卿"。所以，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发表了一条"朋友圈状态"："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意思是杨度什么好处也没捞着，白白被全国人民骂了一顿。

当然，杨度也没想到，袁世凯经此一难，那么快就一命呜呼了。而且让他伤心的是，据袁世凯的儿子回忆，袁世凯在临终前还发了一条"朋友圈"——呼喊的是"杨度误我！"（另有说是"他误了我！"）

对此，其实杨度心里也是有想法的。所以，他给袁世凯写的挽联是：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意思是，究竟中华民国适合不适合搞共和，我们千年之后再来看；

究竟袁世凯是不是扭曲了“君主立宪”的本意，建议他九泉之下再仔细想一想。

由此可见，到了此时，杨度还是认为自己主张的“君主立宪”并没有错。

5

如果杨度的一生就到这里结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他无非就是个身败名裂的“帝制党”领头人而已。但是，如果就这样结束，他的人生又怎称得上“百转千回”呢？

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一上台就弄出了一张通缉“帝制党”的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杨度。

据说杨度当时还义愤填膺，准备去自首，和黎元洪讲讲道理。他曾说：“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



黎元洪

不过在身边人的规劝下，杨度还是没有进京去“讨说法”，最终避居青岛。

在避居青岛的时候，杨度似乎看穿一切，开始钻研佛法，并给自己取号“虎禅师”，重新思考人生和反思过去。他钻研佛法后觉得，“禅”的精髓就是无我，所以他提出了“无我主义”的新理论。

换句话说，他把自己的“朋友圈”设置为了“不可见”。

1917年，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在北京复辟，他和康有为派人专门来请当年“帝制党”的领袖杨度重新出山，而杨度却给两人发了信息：“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那么，杨度是真的看破一切，遁入空门了吗？

并没有。这从他给自己取的号“虎禅师”就可以看出来。1918年，杨度被宣布特赦，才43岁的他心思又开始活了起来。只是，经过几年的反复反省和思考，他的思想已经由立宪转向了共和。所以，他这次找到的人，是当年在东京和他通宵达旦激辩的孙中山。

孙中山当年并没有拉黑杨度，而杨度找孙中山，也是为了帮他。他凭借自己在方方面面的人脉关系，帮孙中山渡过了不少难关。比如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他作为孙中山的特使，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帮助陈炯明，帮了孙中山一个大忙。而军阀张宗昌策应北伐，背后也是杨度在帮忙牵线。

孙中山特别感慨，曾说过：“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这个“诺言”，就是指当初杨度在东京对他立下的誓言：如果我失败了，就来帮你。

1922年，杨度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为此，孙中山特地在整个国民党的“大群”里发话，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不过，还没等杨度怎么施展手脚，孙中山就在三年后病故了。

在国民党陷入内斗的时候，杨度也有了自己新的方向。

6



杜月笙

1928年，53岁的杨度移居上海，成了一个人的门客。

这个人，就是当年号称“上海皇帝”的杜月笙（杜月笙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当时上海有报纸说杨度拜杜月笙为师，入了青帮。杨度很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为杜先生，他称我为皙子兄。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清客’而已。”

换句话说，他和杜月笙只是互加好友，互相仰慕而已。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杜月笙对杨度非常尊敬，专门给了他一幢宅子，每月给500大洋花销，而他求杨度做的，就是写一些文章和字而已。杜月笙的人生达到顶峰的一件事是他的“杜家祠堂”落成，而杨度是他的筹办委员会秘书长，还专门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

但是，杜月笙并不是杨度新的方向，甚至可以说只是他的一个幌子而已。因为，他的“朋友圈”又加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李大钊。



李大钊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杨度就对李大钊的文章有深刻印象。在上海，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一番谈话下来，杨度深受触动。之后又和李大钊多次交谈，他深深记住了李大钊的一句话：

“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认为，自己蹉跎半生，终于还是找到了光的方向。于是，他开始为共产党人做了很多事。事实上，他后来之所以到杜月笙家去做门客，也是经过共产党组织批准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个身份，结识三教九流的人物，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提供各种有效的情报。

但是，在此之前，他“朋友圈”中的李大钊头像，永远变灰了。

1927年4月，张作霖在北京东交民巷逮捕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数十人。事实上，杨度在前一天通过自己的渠道已经知道张作霖要抓人，急忙找人通知了李大钊。但当时李大钊不信张作霖真的敢冲进俄国使馆抓人，最终没有转移。



杨度的字

李大钊被捕后，杨度把所有精力乃至身家都扑在了营救他出狱的工作中。他找到包括当时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内的各界社会名流，一起为释放李大钊奔走游说。为此，杨度还把自己在北京的宅子“悦庐”公馆作价4500元大洋卖掉，把经费全部投入运作之中，甚至还策划过劫狱。

但是，各路营救最终都没有成功，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派人

绞杀。李大钊牺牲后，杨度非常悲痛，与妻子商量后，又把自己在青岛的宅子卖掉，把换来的钱全部用来接济李大钊以及其他被害人员的家属。所以他后来到上海确实手头窘迫，也确实一度要靠卖字为生。

1931年，56岁的杨度其实身体已经很差了，但他还是在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他根据孙中山的建议，想写一部《中国通史》。为此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并且写好了大纲。

另一件事，就是帮助杜月笙完成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这场典礼虽然最终办得颇为圆满，但也彻底摧垮了杨度的身体。典礼落成后的两个多月，杨度就倒下了。

9月17日，之前就有肺病和胃病的杨度没有挺过去，在上海租界病故。



杨度去世后，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7

但杨度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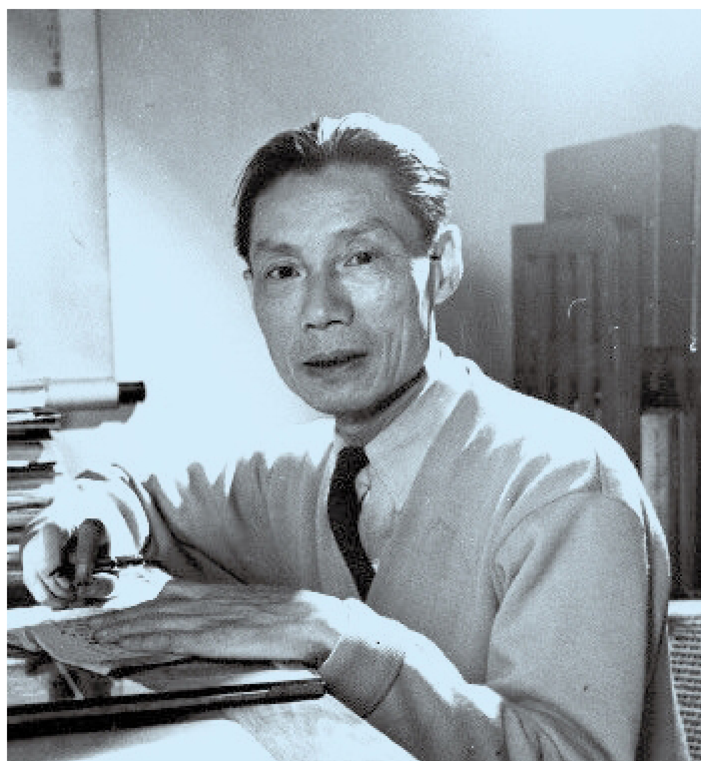
在杨度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以一个“帝制党”的形象出现。直到1975年，有一个人说出了杨度晚年的那些故事。

这个人，也是杨度当年“朋友圈”的好友。

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1975年冬天，饱受病魔折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交代一些后事。当他知道《辞海》正在筹备正式版的时候，专门让秘书转告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当时大吃一惊，一面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一面向很多还健在的老同志打听，结果没有人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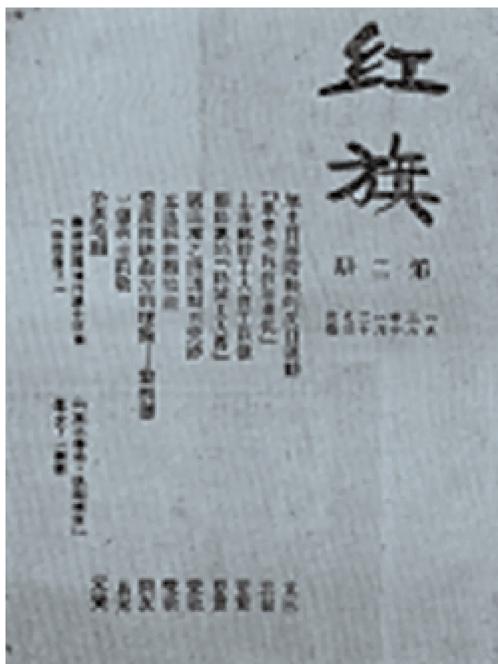
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回忆，当时潘汉年给他介绍过一个老者，说是自己的同志。过了很久夏衍才知道，这个老者居然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杨度

但是，周恩来说的并没有错。

杨度是在192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就是周恩来。由于

杨度从事的工作有特殊性和危险性，所以杨度只和潘汉年单线联系。除了潘汉年和周恩来，其他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由于潘汉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遭遇冤狱，所以这段历史就沉没了。

1978年7月30日，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将杨度在晚年加入共产党的内情第一次披露。随后，夏衍、李一氓等遵从周恩来生前的嘱告，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将杨度晚年入党以及所做之事公之于众：杨度在晚年不仅为共产党提供大量准确的情报，甚至还利用自己杜月笙门客的身份，掩护过很多地下党的同志。


红旗

第二期

192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第二期，“红旗”这两个字就是杨度写的

在王冶秋、夏衍这批人的回忆文章出来后，很多人又都回想起了杨度当年在弥留之际，给自己写的一副挽联。

那副自挽联，是杨度人生最后一次的“朋友圈”状态更新：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馒头说

说“朋友圈”只是开个玩笑，但杨度的社会关系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杨度的寿命并不算长，但在整个民国史上，有他这样丰富经历的人，着实不多。从这个角度，说他为“民国第一奇人”，也无不可。

有人曾说，杨度一生投机。这点我倒真的不太认同。

当然，不能否认他有成就自己事业的想法，然而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他大半生所坚持的“君主立宪”，主要还是基于他自己真心觉得这样的方式更适合当时的中国。后来转向共和，也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至于因他晚年加入共产党，就给他套一个“投机”的帽子，逻辑就更说不通了。

1929年是“白色恐怖”的高潮时期，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很多人躲避“共产党”三个字都来不及，但杨度却在此时选择入党，并把母亲送到长沙乡下，妻子送到苏州，坦言自己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他曾对和他接头的共产党人说过：

“别人说我一生投机，我这次是投杀头的机，投灭族的机。”所以，他也是发自内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多少理解加入“筹安会”的严复——他可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批中国人之一，是《天演论》的翻译者，怎么会昏头到去“拥立帝制”呢？（关于严复的故事，可以参看《历史的温度3》收录的《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但实事求是地说，当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即便是有识之士，头脑也是蒙的。我们用现在的视角回过去看，会轻松得出结论：“哎呀，怎么那么傻？这都看不明白？”那是因为我们开了“上帝视角”。

而那时候的这批中国人，就是在不停地摸索，尝试，彷徨，挣扎。有的人展现了气节，有的人露出了丑态，有的人找到了道路，有的人撞到了南墙——当然，如果撞到南墙后肯回头，也是完全值得认可的。

所以，由这批人勾勒出的中国近代史，才如此悲怆，如此曲折，如此富有张力，如此引人入胜。

这也是我当年从讨厌读近代史，到喜欢读近代史的原因。

本文参考来源：

1.《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左玉河，《党史博览》，2013年第2期）

2.《帝师毕竟是书生》（陈曦，《中国企业家》，2014年第12期）

3.《杨度：清末民初第一奇人》（“寻匠之美”，搜狐网，2018年1月14日）

4.《帝王术的最后传人——杨度的故事》（中国历史网，2015年11月20日）

山高水长，勿忘陈嘉庚

“赤子”一词，原指“婴儿”，后引申为“纯洁善良的百姓”，故古代封建王朝有“海内赤子”之说。但后来又引申出一个新的说法，叫“海外赤子”，而这个称号，专指“海外侨胞”。他们想借此表达，自己根在华夏，是中华儿女。

1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厦门市集美区）。

中国近代史上有几次著名的人口迁徙，其中有“走西口”“闯关东”，还有一个就是“下南洋”。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明至清，有不少老百姓迫于生计或有经商需求，成规模地前往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地在内的“南洋”一带。在“下南洋”的人中，广东和福建沿海的老百姓占到了绝大多数。

陈嘉庚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下南洋”的商人家庭里。

陈家从曾祖一代就开始“下南洋”，陈嘉庚的父亲陈杞佰早年也去南洋闯荡，在新加坡经营大米生意。不过陈嘉庚直到17岁那年，才去新加坡投奔了父亲，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国内的私塾里读书。

1893年，19岁的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成亲，却发现自己的族弟成了一个纨绔子弟，终日赌钱作乐，疯疯癫癫。陈嘉庚气愤地将弟弟绑在一棵树上鞭打了一顿，然后做出了一个在当时乡里看起来惊世骇俗的举动——说服母亲和新婚妻子拿出了2000银圆。在那个时候，2000银圆不是一笔小数目，是陈嘉庚父亲给他成家的钱，以及平时家里省下的家用。

但陈嘉庚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做一件事：办一所名为“惕斋学塾”的私塾。陈嘉庚认为，人一定要接受好的教育，才能够好好为人处事。

现在回过来看，陈嘉庚一生的基调，可能在他19岁那年就定下了。

2

1904年，30岁的陈嘉庚遭遇了人生第一场大变故。

由于经营不善，陈嘉庚的父亲陈杞佰在新加坡经营的生意宣告失败，不久后抑郁而终。陈嘉庚不仅遭受丧父之痛，还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父亲欠下一大笔债务。

按照当时新加坡的法律，只要公司宣布破产即可，并没有“父债子偿”这一种说法。但陈嘉庚却选择把父亲的生意做下去，并且承诺：“只要我陈嘉庚在人世一日，所有欠债一定会偿还！”

其时，父亲留给陈嘉庚的，就只有一家亏损的米店了。而陈嘉庚就是从这一家米店开始，全身心地投入经营中。在短时间内把米店扭亏为盈后，他又看中了罐头生意，盘下了一家罐头厂，开始做菠萝罐头的买卖。

陈嘉庚很有生意头脑，且肯吃苦，心思细密，事必躬亲，所以大米和菠萝这两个生意很快被他做得风生水起。在父亲逝世四年之后，陈嘉庚已经开了四家菠萝罐头厂，连同原来的大米生意，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并还清了父亲的所有债务。

对陈嘉庚而言，“还债”是他对自己“守信”的一种自我要求，而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却让整个南洋商界见识了他的诚信和品德，以至大家都非常愿意和陈嘉庚做生意。



陈嘉庚当时被称为“橡胶大王”

陈嘉庚也并没有满足于米店和菠萝罐头厂的生意，眼光敏锐的他很快发现东南亚的橡胶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前景。从最初的加工橡胶开始，陈嘉庚逐步从下游做到上游，卖胶鞋，制造轮胎和其他日用品，买下橡胶制品厂，买下橡胶种植园……

1925年，51岁的陈嘉庚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家业：名下的橡胶种植园面积达到了1.5万英亩（约60平方千米），拥有菠萝厂、米厂、冰糖厂、橡胶厂、木材厂、饼干厂、皮革厂、肥皂厂等30多家工厂，有150多家商店，雇用员工超过3万人，资产超过1200万元。陈嘉庚成为公认的“南洋首富”。

已到“知天命”年纪的陈嘉庚，就此平稳地走完人生下半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锦衣玉食，子孙绕膝，安享晚年。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如今记在史册上的陈嘉庚——如果还有可能被记录下来的话——最多只是一个“南洋巨富”而已。

陈嘉庚当然不是这样的陈嘉庚。

从19岁倾囊2000银圆兴办私塾开始，陈嘉庚就认准了一个方向：办教育。

陈嘉庚的观点是："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

1913年，陈嘉庚在南洋的事业刚刚有了一点起色，他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集美社，开始兴办集美小学。

而陈嘉庚的雄心绝不是仅仅兴办一所小学那么简单。

自1913年兴办第一所小学开始，陈嘉庚在此之后不断投入资金，相继创办了女子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幼稚园、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国学专门学校、幼稚师范学校等，统称集美学校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

1923年，孙中山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著名的"集美学村"之名，由此而来。



集美学校的科学馆和军乐亭（摄于1933年）。时至今日，像集美学校这样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学校"，全国没有第二个

1921年，陈嘉庚准备创办厦门大学。当时因为经费短缺，连蔡元培

也劝陈嘉庚“暂缓”。但陈嘉庚心意已决，带头个人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并承诺出资维持费用300万元（分12年付款），总共出资4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这恰好是当时陈嘉庚的资产总和。厦门大学当时设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17个系，是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由个人独资创办的大学。

在学校的成立大会上，陈嘉庚做出保证：“不管遇上多大苦难，我都会尽全力将教育事业办好！”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承诺。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袭来，陈嘉庚的企业也受到很大冲击。到了1930年，陈嘉庚旗下的企业整体经营状况恶化。但即便如此，陈嘉庚依旧每月按时足额给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汇去经费。

当时有身边人劝陈嘉庚先以挺过企业难关为重，减少对学校的经费支持，陈嘉庚断然拒绝：“我吃稀粥，佐以花生仁就能过日，何必为我担心！”

从1926年到1934年，陈嘉庚的实业亏损超过1000万元。但在这8年里，他依旧想方设法给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汇去了378万元经费，这都是他以厂房、地产、货物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的钱。

当时陈嘉庚说了一句话：“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陈嘉庚以一己之力，维持厦门大学的运营长达16年，直到1937年，为了全力支持集美学校，陈嘉庚将厦门大学无偿献给了政府，厦门大学由私立变为国立。



当时的陈嘉庚



厦门大学“群贤楼”的老照片

4

在陈嘉庚心目中，比教育更重要的，是国家。身处那个年代，富甲一方的陈嘉庚，是不可能回避参与政治的。

早在1910年，陈嘉庚就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及道南学堂总理。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福建光复，陈嘉庚被推举

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筹款20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

当时陈嘉庚还另外筹款5万元，专门用来接济孙中山。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庆祝蒋介石的五十大寿，请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祝寿。当时政府的期待，是华侨能捐款10万元，买1架飞机。但在陈嘉庚的策动下，当时的马来西亚华侨居然筹款130多万元，买了10架飞机。

当然，陈嘉庚虽然以“祝寿”为名，但目的是想加强中国的空军力量——当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一触即发。

果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身在海外的陈嘉庚，迅速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组织海外华侨募捐。仅1938年和1939年，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募捐额就达到了1.5亿元，加上1937年和1940年两年的捐款，总数近3亿元。

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显示：1939年中国全年军费为18亿元，而同年华侨汇回祖国的款项就达到11亿元，其中捐款约占10%，而在这10%的捐款中，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

陈嘉庚四处演讲，号召南洋华侨支持抗日。抗战期间，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汽车500辆、救护车上千辆、坦克27辆、大米1万包、寒衣30万件、奎宁丸5000万粒，还赠送了军需医疗器械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保证运输抗日战略物资的滇缅公路畅通，陈嘉庚动员了3000多名具有熟练驾驶技术的华侨回国效力，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富家子弟，许多人最终牺牲，抗战胜利后只剩下1000多人。

不仅如此，作为南洋华侨的领袖，陈嘉庚还因为一个提案而名垂青史。

1938年11月2日，就在汪精卫准备投敌的前夕，原来和汪精卫私交不错的陈嘉庚（他曾邀请汪精卫担任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了解到汪精卫的立场已经极度动摇，于是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一项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

国贼论。

根据邹韬奋的《抗战以来》一书记载，在当时举行的国民党参政会上，“当汪精卫议长高声朗读‘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时，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

汪精卫叛逃后，在报纸上痛斥并要求开除汪精卫党籍的也是陈嘉庚。

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太平洋海军瘫痪，日本趁此机会席卷整个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很快沦陷。早已在日军黑名单上的陈嘉庚被定为“南洋抗日巨头”，日本方面认为他为中国抗战不断“输血”，开出重金悬赏，要将其追拿归案。

已经68岁的陈嘉庚在来不及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离开新加坡避难，辗转多处，好几次险些被日军捕获。

后来，身边人在陈嘉庚身上发现了一小包氰化钾，陈嘉庚对此的解释是：

“如果我不幸被捕，日本人肯定要强迫我做傀儡，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5

抗战结束，原以为天下太平的陈嘉庚，又面临了一个更重要的抉择。

从最初的感情上来说，早年就与孙中山结识的陈嘉庚，是支持国民党的。如果当初不支持蒋介石政府，陈嘉庚也不会在1936年号召捐赠10架飞机。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虽然陈嘉庚一直都强烈支持国共合作抗日，但他坚决反对动摇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多次通电请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但是，随着抗战的深入，陈嘉庚的心态却渐渐发生了转变。

1940年3月，“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视察团”回国慰问抗战军民，陈嘉庚也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既有号召力又有巨额财富，还在抗战中为捐款出力最多，蒋介石自然要

隆重接待这位“财神爷”，为此特批了8万元的接待费，准备在重庆等地为他举行一系列接待宴会。

但一直生活简朴的陈嘉庚对此却极为反感，他认为在抗战艰苦之际，前方将士正在生死战斗，沦陷区民众还在水火之中，后方完全不应该如此铺张浪费。于是他特地在回国前于重庆各报刊登一则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问团，余实深感谢。然慰问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收到信号的蒋介石遂在重庆嘉陵新村设私宴宴请陈嘉庚一行，特别关照只上了四五样菜，外加一些面包，力求朴素。但由于之前的耳闻目见，陈嘉庚已经对重庆大后方达官贵人们的花天酒地和挥金如土记在心里，他看到国民党高级官员如吴铁城、朱家骅等都大肆兴建自己的私宅，更对富丽堂皇的嘉陵宾馆为孔祥熙私人所有而大为吃惊。尤其让陈嘉庚痛心的是，他在街上看到了新加坡华侨捐赠的面粉等抗战物资被堂而皇之地放进黑市售卖。



陈嘉庚回国时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一切，都让陈嘉庚深感不安。

就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举行的一场欢迎陈嘉庚的宴会上，朱家骅当场宣布：“我们欢迎陈嘉庚先生来共同领导国民党！”

陈嘉庚沉默不语，并不接话，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一旁的戴季陶赶忙圆场："陈先生热忱为国家社会服务，入不入党是一样的。"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陈嘉庚收到了另一份正式邀请函——毛泽东邀请他去延安访问。

陈嘉庚原来对共产党是非常反感的。他曾经严令厦门大学的学生不许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运动，更认为共产党根本没资格和国民党政府谈判，应该无条件被收编。但是，他在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对共产党的印象发生了改变，更想自己去实地考察一下。

对于陈嘉庚要去延安考察，蒋介石当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但陈嘉庚以"我是代表华侨回国来考察各个重要地方的，要如实回去向他们汇报"为由，坚持要去。蒋介石也怕得罪这个"财神"，最终勉强应允，但临行前特地关照："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经过一路辗转之后，陈嘉庚终于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当时不在延安）。

与重庆的排场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给陈嘉庚安排的"接风宴"设在窑洞门口的露天院子里，一桌土菜加起来不超过1元钱的花费，鸡蛋还是邻居大嫂执意送来的。

但这些细节却打动了陈嘉庚。他发现在延安并没有所谓的"共产共妻"，而且共产党内部上下很平等，毛泽东在窑洞里摆几张长凳，谁想进来谈，随时可以进来。

在接下来的8天时间里，陈嘉庚在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延安各地，他后来在自己的《南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屡有风闻而未知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黑白……直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庆祝也。"



陈嘉庚在延安也受到了热烈欢迎

等离开延安到了昆明，陈嘉庚给蒋介石传了话：“……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

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财神爷”。

果然，在继续游历了西安、福建等地进一步看到国民党当时内部的腐败之后，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在向南洋华侨汇报这次回国考察的心得时，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当时还只是1940年。

蒋介石后来得知陈嘉庚回南洋后四处说共产党好话，感到非常生气，派人竭力阻止陈嘉庚连任南侨总会的主席。结果在连任选举中，一共152个代表参加投票，陈嘉庚获得了151票。

没投的那一票是陈嘉庚自己的，他不好意思投。

6

1949年的开国大典，陈嘉庚作为嘉宾，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陈嘉庚还被一件事感动：叶飞率领的第三野战

军第10兵团解放厦门，在攻打集美的战役中，冒着多牺牲解放军战士的风险而没有使用重炮，就是为了尽可能保全集美学村。

由于周恩来等人极力相劝，陈嘉庚决定参加新组建的政协，并就任华侨界首席代表。

陈嘉庚的性格决定了他一旦承诺了一件事，就不会只挂一个空名。之后没多久，陈嘉庚将新加坡的遗留事务一一交代后，举家迁回中国定居。



1949年，陈嘉庚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

当时周恩来在北京给陈嘉庚安排了三套宽敞舒适的四合院，便于他在北京参政议政。但陈嘉庚谢绝了周恩来的好意，执意返回福建居住——因为他心里还记挂着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恢复和扩建。

为了完成心愿，陈嘉庚除了自己出钱外，还出面找到了自己的女婿，同为新加坡实业家的李光前，开口就要了600万港元的赞助费——这在当时是一个天价。李光前一口应允，如数支付。

截至1954年，厦门大学共建大楼31栋，总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相当于1949年前校舍的两倍，花的费用恰好为600万港元。集美学校新修校舍总建筑面积为16万平方米，相当于1949年前的3倍半，总投资为1097万元（陈嘉庚本来委托族亲陈六使出这笔费用，但陈的橡胶园遭遇大火损失惨重，最后国家拨款800多万元，这对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政

府而言也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陈嘉庚与女婿李光前。李光前生前为华人十大富商之一，一生热衷公益，为中国和新马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是陈嘉庚之后东南亚地区公认的华侨领袖之一

然而，随便一出手就是百万元级别的陈嘉庚，自己的生活却过得极为清贫。

陈嘉庚的一件破棉背心从抗战时期穿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双皮鞋补过三次。每次出差或长途旅行，他自己都会随身携带针线，以便缝补袜子或纽扣。

陈嘉庚滴酒不沾，给自己定的每日伙食费不超过5角钱，一个月不超过15元。有一次接待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下属在茶几瓷盘上放了一斤糖，结果陈嘉庚事后批评下属："首长最多只吃一两颗，下次买2角钱的足够了！"有一次去南安梅山国光中学处理校务，陈嘉庚在半路上坐在路边，吃完自带的咸稀饭配油条再到学校，坚决不要学校招待吃饭。

陈嘉庚在新加坡的住所"怡利轩"很简陋，回国后住在集美学校校董会一栋简朴的两层小楼，办公和起居都在那里。



陈嘉庚在视察厦门大学建设

陈嘉庚在暮年岁月，一般除了天气恶劣的情况外，不乘汽车，靠一根手杖步行。

陈嘉庚的雨伞破了都是补了再用，瓷杯的手柄断了倒过来当蜡烛台用，在厦门办公室的一对沙发还不是配套的，因为一个是新修的。

陈嘉庚对此的态度是：

“事业上该花的钱千万元都要花，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7

1961年3月，陈嘉庚因眼疾和脑溢血等多种症状，病情加重。在弥留之际，陈嘉庚提出了自己的三个遗愿：

第一，死后希望安葬在厦门集美；

第二，希望能尽早统一台湾；

第三，集美学校一定要办下去。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安详离世，享年87岁。

在陈嘉庚的追悼会上，主祭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扶灵人为周恩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追悼会结束后，陈嘉庚的灵柩由专列运往厦门，安葬在厦门集美鳌园。



陈嘉庚追悼会

陈嘉庚自己当时在国内银行的存款大概还有300余万元，留遗嘱全部捐献，250多万元用作集美学校建筑费和集美学村的福利基金，50万元捐为北京华侨博物馆建筑费。

陈嘉庚一生共捐建100多所学校，合计捐款折合现价，超过1亿美元。

而即便在陈嘉庚去世后，他的捐赠也还在延续。从1991年到2005年，香港集友银行付给集美学校的红利与股息已超过11.4亿港元——这家银行是1947年陈嘉庚命次子陈厥祥筹办的，规定银行每年股息和20%的盈利用于厦门集美的办学。

1990年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1964年发现的第2963号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

2019年6月10日，为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首次推出20新元纪念钞，8名已故杰出人士的头像被印上了纪念钞，陈嘉庚赫然在列。

陈嘉庚曾说：“金钱如化肥，散播出去才有意义。”

馒头说

2019年国庆期间去新西兰旅游，负责全程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金的导游。

金先生是2002年从国内出来的，来新西兰已经17年了，一直从事旅游业。现在他全家包括父母已经定居在了奥克兰，他自己拥有一家有30多辆车的旅游公司，并且已经成为新西兰华人导游协会的主席。

在每天开车的途中，我们都会聊天，聊的都是国内的各种发展和变化。他说他送走我们后，第一时间就要赶去看在奥克兰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我爸已经自己先去看了，老人家怕万一档期短，看不到了。”

我并没有问金先生拿的是新西兰的“绿卡”还是加入了新西兰国籍，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意义不大。站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关心中国，发自内心希望中国越来越好的华夏子孙。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华侨和华人是有区别的。华侨指的是定居在海外，但依旧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而华人是指已经加入居住国国籍的中国人。但是，这只是法理上的区分。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一句“海外侨胞”，已经把这两类人群都囊括了进去。而且，后面还要加一句总结：中华儿女。

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采访过三届奥运会。在奥运场馆里，每每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听到国歌响起就泪流满面的华人，很多都早已在国外居住多年。他们激动地唱着国歌，挥舞着五星红旗，热泪盈眶。在那一刻，去询问他们究竟是华侨还是华人，毫无意义。在那一刻，他们的心就是和祖国相通的。

要求每一个海外华侨或华人都能做到陈嘉庚那样，是绝对不现实的。但是，海外侨胞们心里有一份情，念一个根，却是非常普遍的情

况。

我曾经在写容闳的文章末尾（参看《历史的温度4》收录的《中国海归第一人：见证近代史的“活化石”》一文），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放到这里一样适用：

“在自费的前提下，出去，是一种选择，回来，也是一种选择。但无论最终如何选择，身在何方，只要心里有一份挂念，一份回忆，一份坚守，乃至愿意呐一声喊，尽一些心，出一份力，我觉得就是可贵的。”

天下虽大，同为中华儿女，不忘华夏之根，足矣。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一诺千金——华侨领袖陈嘉庚轶事》（沙平，《炎黄纵横》，2012年第6期）

2.《传统文化视野下陈嘉庚的思想境界论》［杨中启，《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周恩来与陈嘉庚的忘年交》（曹晋杰，《文史春秋》，2019年第3期）

4.《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与蒋介石决裂内情》（樊斌，《文史春秋》，2010年第9期）

5.《陈嘉庚与蒋介石、毛泽东》（杨颖奇，《炎黄春秋》，1994年第12期）

6.《陈嘉庚：“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王文、徐焰、东南网，2015年4月20日）

7.《陈嘉庚的慈善事业》（《合肥晚报》，2018年2月12日）

8.《陈嘉庚大事记》（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

9.《陈嘉庚生平》（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福建侨网）

“国士”邓稼先

我们常有一句感叹：“那时候的这批中国科学家……”说的是他们的艰辛、他们的不易，而如果要在其中找一个代表，我们总能想到他的名字。

1

1924年6月25日，安徽省怀宁县的“铁砚山房”诞生了一个男婴。



邓以蛰与当时的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

铁砚山房是怀宁县邓家的祖宅，占地接近2000平方米。之所以有这么大一份基业，是因为怀宁邓家在清朝乾隆年间出了一位大书法家和大篆刻家——被称为“四体书皆国朝第一”的邓石如。

邓家传到第五代，有子邓以蛰，早年东渡日本求学，后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和美学，归国后在北大、清华、厦大等多所高校任

教，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之一。

邓以蛰与妻子王淑蠲先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取名叫邓仲先，一个取名叫邓茂先，然后就在1924年的6月25日，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邓以蛰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邓稼先。

2

邓稼先出生8个月后，全家就来到了北京。

出身书香门第，邓稼先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3岁时，邓稼先就已经认识很多字，并能背诵不少古文名篇。5岁时，邓稼先入读北平武定侯小学，随后又考入了崇德中学。

在小学的时候，邓稼先被父亲要求在学习之余，还要自学“四书五经”，所以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而到了中学，邓稼先又被家人鼓励一定要学好英语和数理化，因为必须要了解和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那时候的邓稼先，不仅自己热爱学习，还由于家族和父亲的关系，经常见到到家里来串门的学问大家。

比如常到邓家来拜访的人中有一位姓许的教授，年少的邓稼先只知道他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学生领袖，后来还知道他曾是国外一个很有名的女科学家的学生，邓稼先花了些心思才会写他的名字——许德珩。



许德珩，著名爱国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九三学社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曾是居里夫人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水产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又比如父亲的好朋友杨武之教授，邓稼先只知道他是一位很有名的数学家。因为邓稼先和杨教授的儿子年龄相仿，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杨家的儿子也在崇德中学读书，比邓稼先高两级，名字叫杨振宁。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邓稼先的人生轨迹就会一直这样平稳地走下去，有很大的概率子承父业，成为一名高校教授。

但是，在邓稼先13岁那年，一件足以影响他一生价值观和奋斗目标的事情发生了：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

全面侵华的日军，很快就攻入了北平。

3

还是初中生的邓稼先，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国难家仇”。

当时的北大和清华都撤往了后方，但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因为恰好身患肺病，咳血不止，所以全家都留在了北平。

邓稼先每次在街上看到耀武扬威的日本兵，心里都不是滋味。

有一次，父亲的一位老友到家中拜访，邓稼先看到一向儒雅的父亲

怒发冲冠，叫那位老友滚出去。那是邓稼先第一次看到父亲发那么大的火，之后他才知道，原来那位老友代表的是伪政府，来请父亲出山为伪政府教书。

但不久后，父亲邓以蛰却要为儿子担心了。

已经读高一的邓稼先，有一次在操场上当众将一面日本国旗扯碎，踩在了脚底下。

中学当时的校长悄悄找到了邓以蛰，出于好心劝他：“以你儿子这个脾气，早晚会有汉奸告到日本人那里，肯定要出事。不如让他早点出去避一下。”邓以蛰闻言后觉得有理，决定让邓稼先先随姐姐到大后方昆明去读书。

1940年5月，还没读完高二的邓稼先随姐姐经上海、香港和越南，抵达了昆明。临行前，父亲的一句话让邓稼先印象深刻：“你以后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祖国有用！”

带着父亲的嘱托，邓稼先来到昆明后，先是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考进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师从王竹溪（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郑华炽（著名光谱学家）等著名物理学家。



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

当邓稼先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他先去一所中学做了数学老师，由于教学口碑非常好，经人推荐，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

此时的邓稼先才22岁，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上了北大的助教，可谓前程似锦。但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去美国留学——因为更先进的科学在那里，要去那里学。

曾有身边人劝他："天就要亮了，你先别走。"

邓稼先的回答是："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1947年，邓稼先顺利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并在第二年选择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留学——这所大学是先他一步赴美留学的好友杨振宁帮他选的，因为这里学费相对便宜，但学术能力很强。

在美国，邓稼先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学业上，只用了23个月，就以本科学历通过了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此时的邓稼先才26岁，所以被称为"娃娃博士"。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洋彼岸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和当时诸多在美国留学的学子一样，邓稼先立刻就开始准备回国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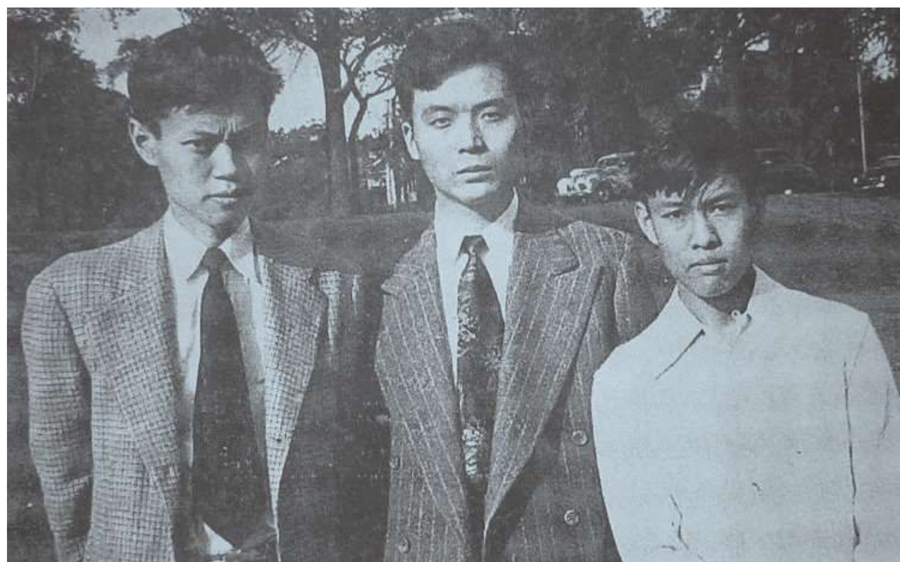
平心而论，刚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邓稼先，选择回国并不会遭受钱学森那样的巨大阻力，但导师和同学对他的挽留肯定还是有的。而以邓稼先的学历和聪慧，在美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也绝非难事。

但是邓稼先还是决定放弃一切，在1950年8月28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就像当初他承诺的那样。



邓稼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时的照片

回国后，曾有朋友开玩笑问邓稼先带回来了什么礼物。邓稼先笑着回答：“带了几双尼龙袜子给我爸爸，因为这个东西国内还生产不出来。”然后他又接了下半句：“还有，就是我一脑子的核物理知识。”



1949年，杨振宁兄弟（左、右）和邓稼先合影于芝加哥大学

回国之后，邓稼先不仅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

1952年，28岁的邓稼先晋升为中科院的副研究员。一年之后，他和自己恋爱多年的女友许鹿希结婚——许鹿希，就是当年那位“许教授”许德珩的长女。邓许两家本就是世交，邓稼先和许鹿希也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受教育程度相仿、脾气相投，所以这是一段近乎完美的姻缘。

那可能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下班后，邓稼先经常和许鹿希一起去戏院听京戏，或一起去看芭蕾舞演出。每到周末，小夫妻俩会去颐和园观湖，去万寿山徒步。邓稼先是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小花样”逗许鹿希开心：会在菊园闭园后央求看门人放他们进去参观一下，也会带着许鹿希在戏院外等便宜的退票进去看戏。邓稼先还抖得一手好空竹，经常在公园露一手，引来一群孩子围观，许鹿希就在一旁安静微笑地看着。



邓稼先与许鹿希

有一次，邓稼先和许鹿希手牵手在散步赏月，邓稼先忽然对许鹿希说了一句：“如果我们俩能永远这样，该多好？”许鹿希后来回忆，当时有一种非常甜蜜的幸福感涌上心头。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就如同拍电影一样，一般主角说出这种台词后，剧情就会发生转折。

1958年，转折就这样发生了。

当时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34岁的邓稼先，和他说了一句话：“国家准备要搞一个大炮仗。”

那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里，许鹿希觉得他和往常有点不太一样。

邓稼先对许鹿希说：“我的工作要有调动。”

许鹿希问：“调到哪去？”

邓稼先回答：“这不能说。”

许鹿希又问：“那做什么工作？”



邓稼先、许鹿希和自己的两个孩子

邓稼先回答：“这也不能说。”

许鹿希说：“那你给我一个信箱号码，我和你通信。”

邓稼先回答：“这也不行。”

许鹿希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你是要去做什么呀？做什么事情要下那么大的决心？”

邓稼先回答："家里的事我都管不了了，从此就托付给你了！"

那天晚上，夫妻两人躺在床上，彻夜无眠。

许鹿希隐隐约约觉得，丈夫被委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但她当时又怎会想到，那个任务有多重要，又有多隐秘。

5

邓稼先的新职位，是新筹建的中国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

成立这个研究所的最核心任务，在内部大家都心知肚明——尽快造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而新中国面对原子弹研究一片茫然，先建立起原子弹研究的理论体系，是重中之重。

最初，中国依靠的是苏联。但是，苏联专家在核武器方面提供的帮助其实非常有限。邓稼先只能从高校选拔组织一批大学生成立理论研究小组，自己学习外国相关书籍，边学边译边讨论。当他们整理出一堆问题去提问的时候，却发现苏联专家漫不经心，给出的不少数值都是随口一说，一经验证是错的。

1959年6月，中苏之间的矛盾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苏联单方面对《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毁约，撤走了233名核工业系统的苏联专家。

但是，面对一片未知的未来，中国却定下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时间表：8年之内，一定要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

大家甚至拟定了将来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那是苏联撤走专家的时间。

而这自信的背后，源于邓稼先牵头的原子弹理论研究的突破：他经过苦苦思索和无数次实验计算，终于决定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作为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

事后证明，这三个主攻方向完全正确，有人甚至称邓稼先是率先"扼住了原子弹的咽喉"。

"咽喉"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扼住的，是邓稼先和各路团队（包括被邓稼先尊称为"三大菩萨"的郭永怀、王淦昌和彭桓武三位顶尖物理学家）

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投入换来的。在一没经验、二没图纸的情况下，他们依靠当时的电动手摇计算器和一台苏制计算机，再辅以计算尺、算盘以及纸和笔，夜以继日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演算。算累了，倒地就睡；睡醒了，吃点干粮喝口水再继续干。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填满了好几个仓库。

当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国家科研人员的基本供给还能维持，但因为高强度的工作让人饥肠辘辘，一些科研人员甚至已经饿得身体浮肿了。邓稼先就拿来自己家的粮票换成食品分给大家，粮票没了，他就把自己省下来的瓜子放到办公桌上请大家吃。那时候，在邓稼先的办公室会出现一幕奇特的景象：谈工作的人，每人倒一杯白开水，滴两滴酱油，然后嗑几颗瓜子，就着“酱油汤”聊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邓稼先的团队通过“九次运算”，彻底推翻了苏联专家提出的数值，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称，完成这个复杂而艰难的运算是“数学上的奇迹”。

根据许鹿希的回忆，当时邓稼先的回家时间开始变得非常不固定，要么很晚回来，要么早回来，但是凌晨3点忽然就出门了，也不说去哪儿（其实是进中南海汇报）。即便在家，很多时候他也是将被子叠得老高，靠在被子上，双眼望向前方，不知在思考什么问题，问他话也魂不守舍。

许鹿希信任自己的丈夫，知道他在参与一项重要的机密工作。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很快丈夫就连这样所谓的“回家”，也做不到了。

6

1962年9月，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形成，一切终于将转向实战。

1963年，邓稼先和一大批中国科学家一起，义无反顾地奔向了青海金银滩——这个地方随即从中国的地图上神秘消失了。不过对于邓稼先他们来说，这种“隐姓埋名”算不了什么，比如“邓稼先”这个名字，已经从中国的所有理论刊物和公开报道中消失好几年了。

在无法通信的那些岁月里，妻子许鹿希并不知道邓稼先的生活环境有多艰苦。

在海拔3000多米的戈壁滩上，馒头一捏就是死疙瘩，米饭像沙子一样根本煮不熟，荒无人烟，连一棵树都种不活。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邓稼先和千千万万名同事一起，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着。他们把“发奋图强”改了一个字，叫“发愤图强”。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离计划设定的试爆时间越来越近。

在戈壁滩的基地上，每一名工作人员的神经都绷到了最紧，作为方案的主要设计人，邓稼先的压力更是大到了极点。每一次实验，他都要面临无数人的提问和征询：“怎么样？”“有把握吗？”“还存在什么风险？”

而令邓稼先最紧张的事，是每次都要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实验结果。越到临近正式实验，邓稼先的压力就越大，在向周恩来汇报的时候，双手都会忍不住发抖。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稼先同志啊！如果你都这么紧张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要心脏病发作啦！你要负责的啊！”



在戈壁滩上奋斗的中国科研人员

邓稼先自己也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

所有的努力，在1964年10月16日收到了回报。

这一天的下午3点，戈壁滩上升起了一朵蘑菇云——中国成功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从无到有，中国人只花了5年的时间。



人民日报 号外

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及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

就在举国一片欢腾的时候，邓稼先却悄悄坐专机赶到了医院——他的母亲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书。邓稼先跪在病床前，拉着母亲的手痛哭失声。他无法告诉母亲，这几年自己都去干了什么——因为不能给家里的亲戚一一回信，邓稼先甚至已经被有些亲戚骂“眼睛长到天上去了”。

已经无法说话的母亲，轻轻捏了一下邓稼先的手。

同样无法知道丈夫究竟去干什么的，还有妻子许鹿希。直到原子弹爆炸后的某一天，时任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来到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家中做客（两人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好友），许德珩拿着一份报道“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对严济慈说：“谁有本事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严济慈回答：“你去问问你的女婿！”

在两人的哈哈大笑声中，许鹿希才隐隐证明了自己的猜测：丈夫应该是去搞原子弹了。

但邓稼先还远没有到休息的时候。

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邓稼先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氢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

当时，全中国只有两台每秒运算可以达到5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中科院，一台在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邓稼先留守北京，派于敏坐镇上海。随后于敏在上海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一举解决了氢弹原理的重要问题。

随后，邓稼先也赶赴上海，和于敏以及团队一起通宵达旦地推演和计算，最终奠定了氢弹的理论研究基础。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



邓稼先和于敏（右）在一起。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研究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为中国氢弹研制成功起了关键作用，所以他也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而中国这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不容易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在“文革”开始后，周恩来第一时间请示毛泽东，随后中央做出决定：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员不能受到冲击。

但是，当时间到了1971年的时候，情况已经变得失控。邓稼先所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开始出现了“大字报”，出现了“造反派”，出现了批斗院领导和科学家的情况。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作为北京医学院教授也被批斗，他的二姐因为被无休止批斗，含恨自杀。

而邓稼先也自身难保，他和于敏、胡斯得等人被押到了青海基地接受批斗。有的“造反派”怀疑科学家是外国间谍，要求他们把中国核试验的关键数据都“如实交出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稼先和一批科学家顽强反抗，一字不吐。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邓稼先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科研工作正常进行，也用了很多“小手段”。比如当时院里分成两派互斗，邓稼先就先把一派叫到办公室说“有机密传达”，另一派立刻闻讯赶来。邓稼先就当着大家面说：“法国马上就要研制出氢弹了！我们很可能要落在他们后面了！”于是两派人马都挥舞手臂高喊口号：“坚决超过法国！”然后就携手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

就在邓稼先也深陷“被批斗”泥潭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971年，当时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受中国政府邀请，在离开中国赴美留学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杨振宁下飞机后，中方接待人员问他想见什么人。杨振宁开了一份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杨振宁不知道，自己这份怀念友情之举，无意中救了邓稼先。

周恩来接到杨振宁的要求后，立刻拍板，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速招邓稼先来北京，就此将邓稼先从“造反派”的批斗中救了出来。邓稼先作为“主要批斗对象”一离开，于敏、胡斯得等一批科学家也就“得救”了。

杨振宁与邓稼先见面后，两人都无比激动，几乎无话不说——之所以用“几乎”，是因为杨振宁知道，有一个领域的话，是不能多问的。



1971年在北京友谊宾馆前的合影。左起邓稼先、王承书（核物理学家）、杨振宁、张文裕（高能物理学家）

在杨振宁回国前，邓稼先送他上飞机，都走上舷梯了，杨振宁实在忍不住，转身轻声问邓稼先："稼先，我还是实在忍不住想问，你可以不回答。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有美国科学家的帮忙，是不是真的？"

邓稼先一愣，想了一下，回答："你先上飞机，我以后告诉你。"

随后，邓稼先立刻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的回复是："可以说，如实说。"

于是，邓稼先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杨振宁。由于杨振宁是从北京转上海再回美国，那封信在杨振宁离开上海回美国之前，就由民航专门送到了。

当时杨振宁正在参加一个饯别宴会，他拆开了专门送到的这封信，看到邓稼先在里面写着："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当场泪流满面。

8

1979年，邓稼先出了一件事。

当时中国做了一次氢弹的空投试验，但是降落伞发生了故障，氢弹直接摔在了地上，没有爆炸。基地立刻派出了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最终终于找到了残骸——弹体都已经碎裂了。邓稼先坐不住了，自己穿上防护服立刻赶往爆炸核心区——他当时已经是九院院长，是领导，完全可以不用去。但是邓稼先不听旁人劝阻，一定要去。不仅去了，他还直接进入了弹坑，把那颗已经破裂的氢弹捧在了手里，仔细研究了原因，最终确认是降落伞包的设计有问题，氢弹的设计并没有出错。

虽然邓稼先当时穿着防护服，但是学医的许鹿希知道这件事后，立刻让邓稼先去做了一次全身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邓稼先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性物质。

许鹿希后来在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家里发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一直没带回过家里——照片里，邓稼先和赵敬璞穿着防护服，一起合影。而那张照片，就是邓稼先检查破裂的氢弹那次拍的。

许鹿希知道，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但那次他忽然破例主动要求拍一张照，很可能是知道这次经历将会对他之后的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

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邓稼先健康受损与此事有关联，但邓稼先的身体状况确实从此之后每况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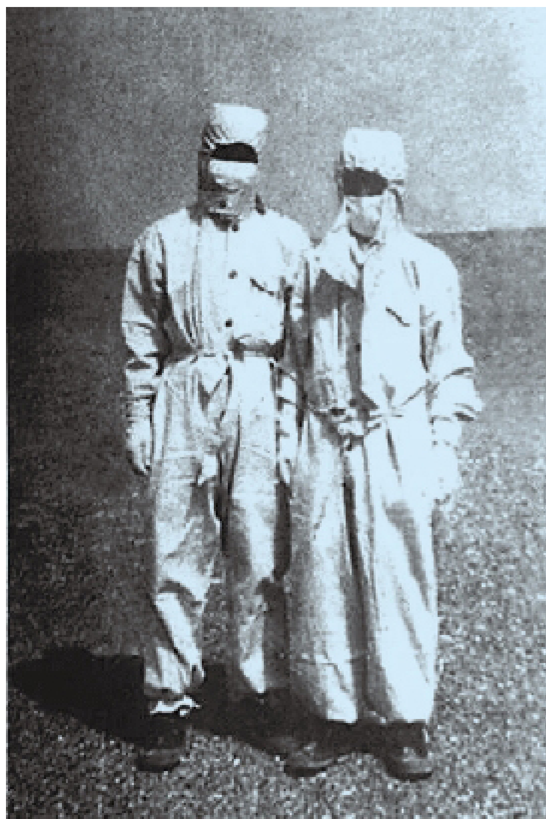
但是，邓稼先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就连那次被辐射后的疗休养都不愿去，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很多场实验，他不拿到最后结果坚决不走。当时邓稼先预感到，已经掌握实验室模拟核爆炸能力的美国和苏联，很快就会宣布全面停止核试验，以此限制中国核试验——中国尚没有这样的实验室能力。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时间不多了！要抓紧！要抓紧啊！”

1984年，中国第二代核武器终于实验成功。

邓稼先在兴奋之余，却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撑不住了。

那一年有一次开会，当着全体参会者的面，邓稼先说了一句：“我现在是强弩之末了。”

全场听了以后一片笑声。



邓稼先（左）与赵敬璞的合影

笑声中，邓稼先纠正了自己的说法：“不好意思，我不应该自称‘强弩’的……”

9

1985年，还想坚持工作的邓稼先被“勒令”进医院。那是他最后一次进医院，因为，他再也没有出来过。

检查的结果，是直肠癌。其实，当时直肠癌已并非绝症，但由于邓稼先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所以一做化疗，他的白细胞和血小板马上就跌到零，然后就引发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挽救也近乎不可能。

在住院后的近一年时间里，邓稼先后做了三次大手术，都非常痛苦。给他止痛用的杜冷丁，从一开始的一天一支，到后来要一小时一支。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85年的国庆节，邓稼先还是提出想去看一

看天安门。在得到批准之后，邓稼先如愿成行。看着天安门，他对自己年轻的警卫员说："到了2049年，我们国家建国100年了，肯定非常强盛了，到时候你可要多来看看我。"



1986年6月，杨振宁探望病重的邓稼先，邓稼先和他合影留念，面容保持微笑——但嘴角边还有一丝血迹没有擦干

1986年4月，邓稼先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还是强忍病痛，和于敏一起合作完成了对中国核武器工程将来规划的建议书。

在建议书上交之后，"邓稼先"这个隐姓埋名28年的名字，也终于开始解密。世人通过媒体的报道，终于知道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背后，有这样一个人。

1986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文件，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同月，邓稼先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是在病床上得到这份奖状的。

一个多月后的7月29日，邓稼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三句话。

第一句是对妻子说的："苦了你了。"

第二句是对自己说的："永不后悔，死而无憾。"

第三句是对后人的嘱托："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去世时，只有62岁。

10

1996年7月29日，中国进行了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

随后，中国郑重向全世界宣布：自此之后，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这一天，正是邓稼先逝世十周年忌日。

馒头说

其实，邓稼先有着很多人未必知道的一面。

我在文中提了一句"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这不是随口一说，事实真的如此。

邓稼先喜欢艺术，从芭蕾到京剧，他都很爱看。以他的职位，完全可以通过关系弄到一些门票，但他从不这样做，也不提前买，而是专门去剧院门口等退票。他等退票还特别有经验，有时候带几名学生一起去看，还能帮他们都等到退票。看完演出他也从来不要专车送，都是自己坐公交车或步行回家。

邓稼先讲究吃。他在自己收入范围内，总是力所能及吃到最好，而且喜欢请客，一直请同事和学生吃好吃的。在北京的时候，他每周末要到岳父许德珩家吃晚饭。在去的路上，他总会找一家好馆子先吃个半饱，既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去岳父家也显得礼貌。而且堂堂核物理科学家，每次挤在饭店大堂里，瞅人家快吃完的一桌，乖乖等在旁边，有时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邓稼先好喝酒。只要不影响工作，每餐必饮酒。但每次以二两为限，从不贪杯。

邓稼先也好抽烟。在他的办公桌上，一直有拆开请大家抽的烟。很多人找他谈事情，进办公室头一句话就是："老邓，来一根。"研制氢弹期间，邓稼先第一次去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上海的同事们都知道邓稼先有好烟，"规定"他必须每人发一根中华香烟，才告诉他计算结果。

邓稼先哈哈大笑，给每人点上一根，还带他们去吃好吃的。

我曾经说过，不少人心目中喜欢的“科学家”形象可能是这样的：绝顶聪明但穷困潦倒，离群索居且满身怪癖，愤世嫉俗但热爱人类……

以这样一个标准来看，如此一个鲜活的邓稼先，似乎还不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但事实上，恰恰是这样一个知道生活情趣的邓稼先，愿意义无反顾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而投身到一项事业中去，才真正让人震撼。

那整整一代的中国科研工作者，都是这样让人震撼的。

张爱萍曾给邓稼先写过一首挽诗，其中有两句：

“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国士，当如是！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共藏多少意，不说两相知！”——许鹿希怀念邓稼先》（叶娟，《中国核工业》，2014年第12期）

2.《邓稼先院士：许身国威壮河山》（童璟，《今日科苑》，2017年第1期）

3.《共和国脊梁之邓稼先：隐姓埋名三十年的两弹元勋》［完颜亮，《党史博采》（纪实版），2012年第8期］

4.《邓稼先：永恒的骄傲》（天津电视台《中国人》栏目组，《中国电视》，2009年第6期）

5.《老翻译回忆：邓稼先好喝酒爱抽烟　保密意识强》（任传勤口述，侯艺兵、吴明静整理，中国网，2017年5月23日）

6.《大音希声邓稼先》（陈光，《人民公仆》，2015年第7期）

7.《邓稼先轶事》（许良廷，《党史纵览》，2004年第7期）

8.《惊心动魄！邓稼先经历的一次失败空投核试验》（陈瑜、吴明

静、沈晏平、王燕，《科技日报》，2018年7月26日）

那个叫余纯顺的上海人

在一些小品里，“上海男人”的形象一度被演绎得走样。有人曾说，姚明、刘翔等一批上海籍运动员改变了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印象。其实，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让全国人都记住的上海人的名字。

1

1996年6月6日下午1点30分，新疆库尔勒的楼兰宾馆大楼前，一场欢送仪式正在举行。

当地旅游局、人寿保险公司、宾馆的诸位领导，依次在一批人的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随后，几位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姑娘，为他们敬献了“上马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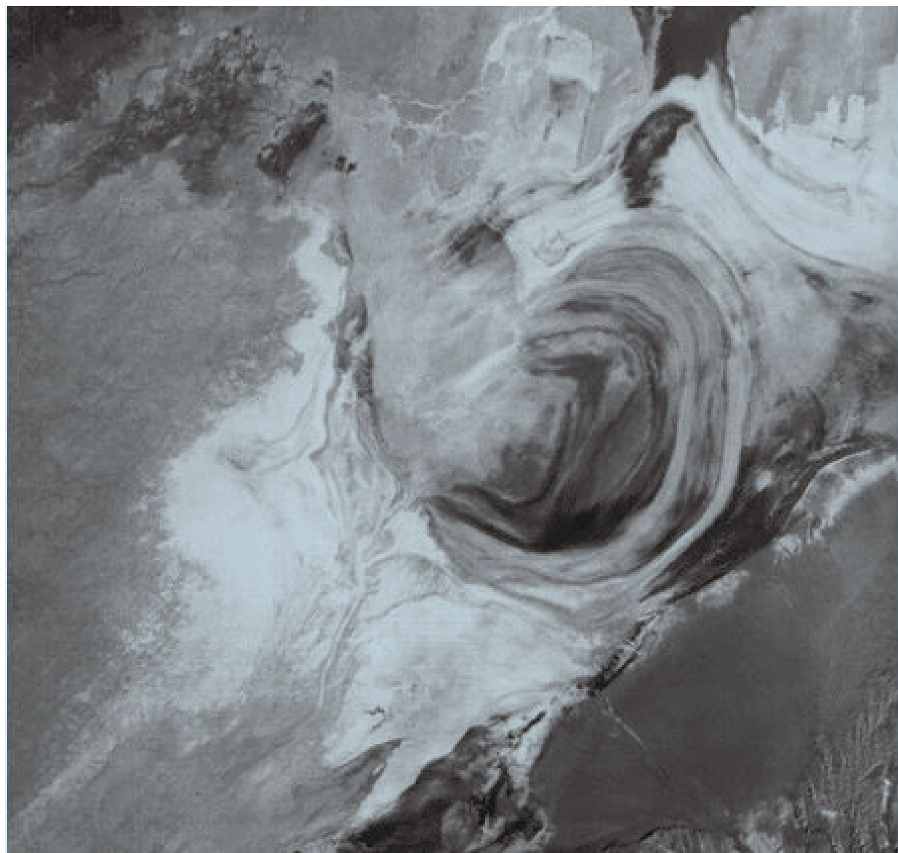
“上马酒”是给即将出发的人壮行饮用的。

而那位第一个被佩戴大红花、一口饮下“上马酒”的人，是大家今天送行的主要对象——他即将在6月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孤身徒步穿越罗布泊。

罗布泊，位于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在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缘，常年干旱，夏季平均温度超过40℃，在6月的极端温度逼近60℃。

而那位即将出征的汉子，在喝下几碗“上马酒”之后，情绪明显有些激动，泪水夹杂着汗水从脸上滴下：“请大家放心，我一定能实现穿越，打破6月不能进罗布泊的神话！”

话音刚落，现场百余位送行者掌声一片。


罗布泊原为湖泊，因为地形和气候变化的原因，干枯成荒漠。因为形状像耳朵，所以被称为“地球之耳”，但它有个更著名的名字，叫作“死亡之海”——千百年来吞噬了楼兰文明和无数探险者。当年上海著名科考专家彭佳木就于1980年6月17日在罗布泊失踪，尸体至今未被找到

这人是个上海人，名字叫余纯顺。

2

余纯顺，1951年12月出生于上海。

童年留给余纯顺的记忆，是苦涩的。余纯顺一家有七口人，但他的母亲、姐姐、弟弟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在余纯顺6岁那年，母亲被确诊患上了精神疾病，住进了医院。而他从小就被人叫“神经病女人的儿子”，在学校里还会被同学嘲笑，甚至羞辱。

余纯顺的出生年份，也注定了他一生坎坷——他是“老三届”[1]中的“老初二”，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去了安徽的军垦农场插队落户。

回到上海后，余纯顺先是在一些厂里做临时工，后来顶替了父亲，

进入上海电器成套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在工厂里，余纯顺吃苦耐劳，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他始终还是想圆一个自己的梦想：读书。

当初余纯顺在上海教育学院（现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成人夜校的同学郑则忠回忆，余纯顺是他见过最刻苦的学生。他每天从遥远的上海东边骑一辆自行车过来，从不迟到早退。他上课认真，笔记记得很详细，书包里每次都放个冷馒头，也没有菜，也不就水，一个人坐在礼堂外啃完。每天晚上下课后，余纯顺骑车回自己的家，整理笔记，做完作业再上床睡觉，一般都要超过凌晨1点。第二天一早，他再去厂里上班。

经过苦读，只有初中生底子的余纯顺顺利拿到了中文系本科学位。而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和了解，他确定了自己崇拜的人：张骞、玄奘、徐霞客……

但余纯顺命运坎坷：儿子不幸夭折，妻子因为他长期读书冷落自己，决定和他离婚。年近40岁的余纯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方向。一连串打击，让余纯顺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

1988年7月1日，余纯顺决定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徒步走遍中国。

这一天，他告别了自己的家人，开始向江苏进发。按照他自己设定的计划，先走完海拔较低的华东平原、华北平原、东北林区、内蒙古草原，然后开始徒步走完海拔高的云贵高原、青藏高原，以及气候恶劣的戈壁滩……

这一出发，就是8年。

从1988年到1996年，余纯顺11次过长江，7次渡黄河，徒步走完全国24个省份，访问了全国33个少数民族。他徒步走过川藏、青藏、新藏和滇藏这四条“天险”公路，成为第一个徒步彻底走完青藏高原的人。在8年的时间里，他的行程超过4万公里，穿破了57双鞋，撰写了50多万字的游记，拍摄了6000多张照片，沿途还做了142场主题为“壮心献给父母之邦”的演讲。



青年余纯顺



徒步过程中的余纯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中国都开始知道有一个要徒步走遍全国的人，名字叫余纯顺。

各种采访也纷至沓来，其中，上海电视台专门派出摄制组，希望全程跟拍余纯顺徒步穿越罗布泊。在此前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时，余纯顺曾说：“我要一鼓作气把六个沙漠走完，包括‘死亡之海’罗布泊，所以今年是我的沙漠年。”他还表示第二年（1997年）要完成长江源头和黄河源头的徒步。

在一年中最炎热的6月，徒步穿越罗布泊，余纯顺希望挑战自己的

极限。

在6月6日离开楼兰宾馆前，余纯顺给自己的好友尚昌平打了一个电话：“昌平！我走完罗布泊和古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全程后，找个山清水秀、与世无争的地方，写感动自己的文章度过后半生……我做好了回归平淡的准备。”然后，余纯顺再次强调了一句：

“我要打破6月不能穿越罗布泊的神话！”

3

1996年6月10日，晚上8点，罗布泊北岸的土垠——曾经的楼兰古城门户。

这是余纯顺准备徒步穿越罗布泊的出发点。6月6日出发后，余纯顺和上海电视台跟拍的摄制组一路经过了龙城、楼兰古城，还到过“老开屏”。在“老开屏”，他们曾发现上千间部队遗弃的营房，这才知道自己可能闯入了曾经的原子弹试验核爆区。当时曾有一位在场的西北石油地质局员工劝告他们不要再往里走，因为里面很可能会进行核试验。但所有人经过商量后，决定不走回头路，继续前行。



余纯顺（左二）和摄制组一起，每晚雷打不动写日记

在龙城，在楼兰古城，余纯顺和摄制组都被壮美的地貌和历史的沧桑震撼，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戈壁滩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在接近50℃的高温环境下，人只能待在汽车的阴影里喘气，不敢移动分毫，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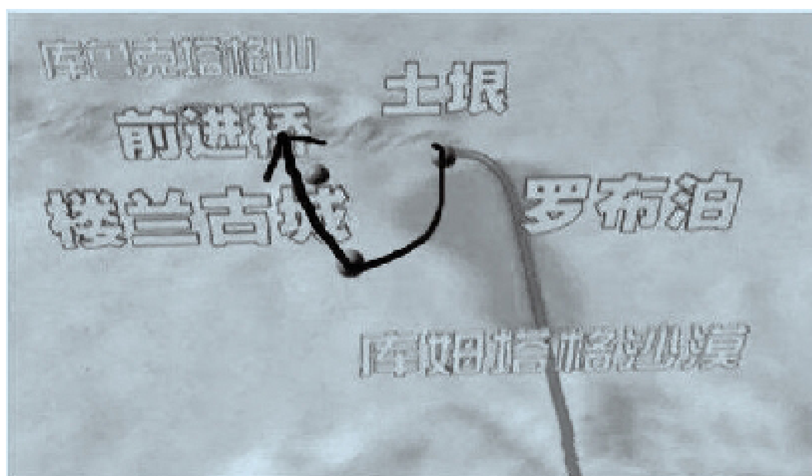
有户外行动都要等到傍晚5点之后才能开始。

6月10日的晚上，就在土垠的露天帐篷外，随行的摄制组为余纯顺开了一个简单的“壮行会”，用随车带来的12瓶楼兰干白葡萄酒，就着几听罐头，大家围坐一圈，依次向余纯顺敬酒，祝福他穿越成功。

根据随行的导游、探险者彭戈侠回忆，那天晚上，平时很健谈的余纯顺似乎有一些心事，话并不是很多。在喝酒的时候，摄制组的人提出，6月的天气实在太热，“老余，是不是换个季节再来？”还有人提到了“彭佳木”的名字。

当时余纯顺端起一杯酒，仰脖喝下，说了一句话：“这次创造的条件这么好，如果这次穿越不成功，那是天亡我也！”

余纯顺制定的穿越线路是一条“U”形线路：从土垠出发，徒步穿越罗布泊，再到前进桥与大部队会合，全程大约107公里。对这条路线，余纯顺的评价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走了8年了。从土垠过来到前进桥这段路，我两天半就可以干掉！”



余纯顺的路线用黑色标出

4

1996年6月11日，上午9点，土垠。

终于到了出发的时刻。摄制组的人和余纯顺一一握手告别，在和队里的向导、地质工程师，人称“沙漠王”的赵子允道别时，余纯顺再次强

调了一句：“我一定会成功穿越罗布泊！”

随后，余纯顺背着他装着帐篷、防潮垫、笔记本、睡袋以及一盒西洋参切片的大背包，大步流星地向土垠以南的罗布泊方向走去，身影渐渐融入灰褐色的湖盆之中。

按照计划，摄制组在送走余纯顺之后，就应该前往位于前进桥的大本营接应点，等待余纯顺顺利走出罗布泊。

但是，随行的上海电视台编导宋继昌那几天一直有些担心余纯顺的身体状况，临时改变了决定：“去前进桥时间推后，下午3点以后追余纯顺。只要他感到身体不适，就把他拽上车，就是拖，也要拖回来！”

中午过后，气温开始直线上升，逼近摄氏50℃。据记载，在中午时分，罗布泊湖心的地表温度最高甚至逼近过75℃。

下午3点之后，温度稍降，摄制组登车，开始追赶余纯顺。

在行驶了大约8公里之后，摄制组发现了之前在余纯顺行进路上事先埋好的第一个埋水点——之前放置的6瓶矿泉水原封不动。由于余纯顺在早上出发时左右裤兜各放了一瓶水，所以大家判断他应该并不渴。

随后，行进中的摄制组发现了第二个埋水点。在这个埋水点，他们发现了两个空的矿泉水瓶子，还有几只烟蒂，附近还有凌乱的军用胶鞋脚印和一处坐痕。

到了下午4点25分，摄制组的汽车终于在湖盆中追上了余纯顺。离早上余纯顺出发已经过去了7个半小时，而汽车的里程表显示开了33公里——余纯顺用7个半小时在高温下孤身徒步了33公里，平均每小时4.4公里。

此时，离余纯顺徒步计划中第一个宿营补给点还有3公里左右。余纯顺满头大汗，汗水已经浸透了衣服和背包。

宋继昌问余纯顺：“身体吃得消吗？”

余纯顺握紧双拳上下挥动：“我没事的！身体这么结实，绝对没有问题。从出发后，我一次没休息，一口气走到这里的。我这不是走过来了吗？我就要打破6月不能进入罗布泊的神话。再走两三公里就到第一个

营地了，到了以后我就扎帐篷休息。今天早点睡觉，明天赶早走，你们赶快回吧！”

摄制组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和余纯顺再次告别。在临上车时，余纯顺对彭戈侠说了一句：“老彭，剩下的路我一天半就可以干掉。”众人要离开的时候，看见余纯顺在那里挥手，大声喊道：“咱们前进桥见！”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那是余纯顺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摄制组和余纯顺的合影

5

1996年6月12日，傍晚。

已经抵达前进桥大本营的上海电视台摄制组和后勤保障队伍，在汽车的阴影里蜷缩了整整一个白天，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停喝水。

罗布泊地区年降水量不足1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在这里，光补充水分没有用，还需要补充少许碘盐和钾盐，否则浑身就像棉花一样绵软，没有力气。

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时分，众人开始扎营。当大家扎好帐篷，做好晚饭准备分食的时候，忽然平地刮来了一阵狂风。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果然，刚才还透亮的天空，突然之间就昏暗起来。随后，狂风卷起的阵阵沙尘，慢慢形成了一堵厚重的“土墙”。

沙尘暴来了。

按照彭戈侠的回忆，那场沙尘暴的场面让人触目惊心：

“刹那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风声呼啸，飞沙走石。汽车很快被沙尘雾吞没，沙粒打在车身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一晚我始终在帐篷里缩守，其余6人早已飞身钻进了汽车，他们的帐篷全被狂风吹倒并埋入沙中，只好同两位司机在车上过了一夜。”

这场沙尘暴从6月12日晚上9点45分开始，一直到6月13日的早晨依旧没有停歇的迹象。而6月13日，是大部队约定和余纯顺会师的日子。

6月13日早晨8点30分，彭戈侠、赵子允等三人决定出发去5公里外的13号标记点，迎候余纯顺。

然而，三个人在标记点轮流用望远镜寻找余纯顺的身影，却一无所获。此时，沙尘暴仍在肆虐，能见度不到10米，大风将漫天的黄沙刮到人的身上，就像针扎一样。三个人一直守候到了晚上7点，依旧没能等到余纯顺，只能失望地回到营地。

回到营地后，他们碰到了愁眉不展的宋继昌——他去了另一个为余纯顺指明方向的11号标记点等候，也一无所获。

晚上8点，沙尘暴终于停了下来。四周一片宁静，气温也下降了一些。但所有人都阴沉着脸，饭菜做好，没有一个人吃得下一口。

余纯顺失约了。

6

1996年6月14日，早上7点。

彭戈侠和上海电视台摄制组的孙鹭，每人背了12瓶矿泉水、4听八宝粥、4听鱼罐头、4只馕饼和两大包饼干，外加望远镜和GPS（全球定位系统）设备，开始前往楼兰方向——余纯顺过来的必经之路——去寻找余纯顺。

中午12点，两人抵达楼兰，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失望而归。

与此同时，赵子允等两人再一次到前进桥的接应点去等待余纯顺——依旧没有人影。他们在那里为余纯顺放置了矿泉水、罐头和一顶太阳帽后，同样失望而归。

晚上8点，大家聚集到了大本营。

大家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谁也不想开口先说出来。宋继昌在营地里双手背后，不停地踱步，一边踱步一边念叨："余纯顺呀！余纯顺！你到哪里去了？"

6月15日上午，摄制组和后勤保障队伍知道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于是开通电台，向库尔勒报告了余纯顺失踪的情况，请求派出部队或直升机帮忙寻找。

当天下午，巴州党委、政府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紧急报告，争取飞机出动。

这一天，大本营派出了三支搜寻小组，分三个方向再一次做了搜寻。在搜寻过程中，焦急的队员们甚至在高温下出现了幻觉：看到树影都觉得是余纯顺的背影。

搜寻再一次一无所获。

6月16日，由于大本营只剩10箱矿泉水，已经快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只能等待政府承诺的17日即将到来的救援团队。

6月17日下午1点30分左右，新疆军区陆航某团的一架直升机从乌鲁木齐飞了过来，由团副参谋长、机长孙刚领衔，加入了搜救队伍。

直升机第一个飞往的地点就是楼兰古城。在绕楼兰上空一圈后，机上人员没有发现余纯顺的踪迹，倒是碰到了一早上大本营自己派出去的四人步行搜救队。

而这四人搜救队带来了一个让人心头一沉的消息：楼兰埋水点里的水一瓶未动，这说明，余纯顺根本就没抵达楼兰。

由于燃料不够，直升机只能返回前进桥大本营。

此时，离余纯顺失踪已经过去6天了。

7

1996年6月18日，上午9点45分。

搜救队员再一次登上了直升机，开始了第二天的搜救行动。这次飞机搜寻的范围更大，覆盖了龙城、土垠等地点。荒漠戈壁寸草不生，倒是给搜救行动带来了视觉上的便利。

上午10点15分，一位直升机上的解放军战士忽然指着下方不远处湖盆里的一个小蓝点，问："那是什么？"直升机上的彭戈侠看了之后，失声惊叫："那是余纯顺的帐篷！"

10点20分，直升机在离"小蓝点"20米远的地方降落——那真的是一顶蓝色的帐篷。搜救队员一下直升机，立刻冲向了帐篷，有人边跑边喊："余老师！余老师！"然而，帐篷里没有一声回应。

走近帐篷，他们发现一把脱鞘的藏刀扔在帐篷门口，而帐篷已经塌落了一角。

掀开帐篷，一股尸体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余纯顺头东脚西仰面躺着，头部肿胀得连五官也失去了比例。他的头发像洗过一样，长而浓密的胡须也湿漉漉的。裸露的上身布满水泡，右胸部的一个大小如乒乓球，尤其醒目。他的右臂朝上略微弯曲，肘下压着草帽，捆扎成一卷的蓝色睡垫放在胯部。"（来自彭戈侠的回忆）



余纯顺的帐篷

余纯顺遇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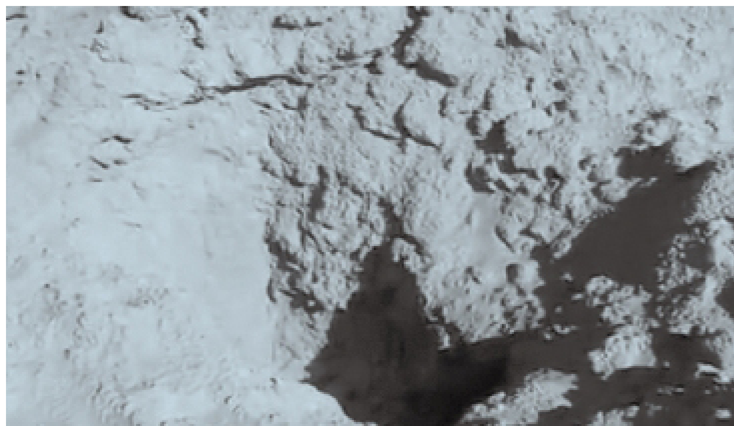
余纯顺遇难的地方，距罗布泊的湖心只有50多米。而就在帐篷不远处，有两个深达1米的土坑——他应该是想掘地取水的。

那一刻，所有人在余纯顺的帐篷外肃立，没有人说一句话。

中午11点，消息已经传到了前进桥大本营，整个大本营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

晚上6点，直升机再一次飞往余纯顺的遇难地，飞机上除了搭载搜救队员外，还有两位法医，以及花圈、墓碑、掘土工具。

在法医为余纯顺的尸体进行解剖及化验的时候，其他队员开始挖掘墓地。



余纯顺生前挖的水坑



余纯顺曾经说过："我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他还说过："只要我死之前有意识，就一定要头朝东方死，因为那里是我家乡上海的方向。"

墓地选在了余纯顺遇难地西北角的一处背风点。墓穴长2米，宽1米，深1米。余纯顺的遗体被放在一条雪白的被单上，上面盖着他那条绿色的睡袋，他被轻轻放入墓穴中。他穿了一路的白底红条T恤、背包、草帽、红色太阳镜、睡垫、胶鞋和那把藏刀，一起被放入墓穴。

在坟墓堆起来后，一块墓碑也被竖了起来。墓碑上的字，是彭戈侠写的：

余纯顺壮士遇难地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立



余纯顺的墓

8

余纯顺遇难，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他为什么没能抵达会合地点？

余纯顺遇难的地点，坐标为东经90°19'09"，北纬40°33'90"。经过专业人员的认证核对和比较，发现余纯顺未能抵达会合地点的原因为：余纯顺在行进到罗布泊的一个T字路口（东经90°18'44"，北纬40°34'34"）时，应该向右拐西行。但他走过了这个T字路口，往南偏东方向去了。

换句话说，是余纯顺迷路了。

迷路的原因，众人有很多猜测，也有可能和6月12日那场沙尘暴有关。由于罗布泊没有任何参照物，常规的辨向手段基本不起作用。在出发徒步穿越罗布泊之前，有人曾劝余纯顺带一台GPS，当时上海电视台摄制组带了3台GPS。但由于时间紧迫，余纯顺只能选择放弃："我走了8年，从来没有用过这玩意儿。现在又有这么多事，哪有工夫摆弄？如果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学会用它！"

第二个疑问，他的死因是什么？

根据法医出具的《关于对余纯顺尸体检验报告》，官方给出的结论是："胃内未见食物残留及胃液，胃黏膜有小片状褐色出血。……余纯顺的死因，系在高温环境下缺水而引起急性脱水，全身衰竭而死亡。"

这说明，余纯顺在6月11日出发后，除了补充水外，没有补充任何食物。而很可能是因为迷路，余纯顺在高温之下得不到能量和水分补充，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

事实上，如果余纯顺能按照预定路线走向T字路口，再往西行3公里，那里有满满一箱矿泉水和一箱食物，完全可以供他饮用和食用。

但是，已经没有如果了。

1997年10月，上海电视台的宋继昌编导，再次带着一群人，重新返回了罗布泊。

他们带了水泥、红砖、木料来给余纯顺重新修墓。

重新修好的余纯顺墓前，竖起了一块大理石墓碑，正中书写了“余纯顺之墓”五个大字，嵌有余纯顺的铜质头像，墓碑左下角是一双旅游鞋的雕塑。

余纯顺的红颜知己徐金玉也去到墓碑前，流着泪用自己的口红将墓碑上刻的字一一描红。摄制组在一年后试图寻找徐金玉，却再也联系不上了。



余纯顺墓碑

之后的20多年，一批又一批的探险者经过余纯顺的墓碑，都会下车凭吊。

余纯顺的墓碑前，被来往的旅人们放了很多鲜花和酒。

而最多的，是水，一瓶瓶满满的矿泉水。

馒头说

有一次，我和上海滩记者圈的“老法师”强荧老师喝酒。喝到酣畅处，强老师就聊起了他的挚友余纯顺，还说了自己对余纯顺死因的不同看法。不过，那次强老师的叙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件事。

那是在2005年，强老师随一个探险团重走罗布泊，来到当年余纯顺的遇难地，发现余纯顺的墓碑被人砸了。当然，原先最早的那一块墓碑还在，被砸的是后来“缅怀者”竖立起来的近十块大理石或木制的墓碑。

都是谁干的呢？都是余纯顺的“缅怀者”们干的。

余纯顺的事迹传遍全国后，“认亲”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个人说自己是余纯顺当年最好的朋友，那个人说自己曾经和余纯顺一起出生入死，而显示友情的最好方式，就是去余纯顺的遇难处再竖一块碑，写上自己的名字。

也不能说这样的行为完全不好，但由于竖碑的人越来越多，竟也引发了攀比之风。你用木头做，我就用石头做；你花3000元，我就花3万元，最终导致相互之间的“敌视”：你前脚立好碑，我后脚就给你砸掉，烧掉。

强老师曾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文末的一句话是：“罗布泊在无声地哭泣。”我想，如果余纯顺在天有灵，目睹这一幕，哭大概不会，哭笑不得倒很有可能。

余纯顺当年曾去上海广播电台做过一期节目，叫《人到中年》。节目中，有听众打进热线电话询问，大意是：“你的朋友们很多都去做生意了，做大老板了，你后悔吗？”余纯顺的回答是：“我一点都不后悔。他们尽可以去做他们的老板，我尽可以完成我自己的追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并不是说人的一辈子要像余纯顺那样度过才算“无悔”，但余纯顺心底里一直有一种信念、一种理想，并且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和实现。

这，才应该是余纯顺给人最大的震撼。

我觉得那些竖碑的人，未尝不是真的想缅怀余纯顺，但比起某些形式上的东西，让自己内心有真正的追求，并有所敬畏，才是最好的铭记方式。

在这一点上，余纯顺倒是自己用过句泰戈尔的诗：

“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

值得回味。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余纯顺在罗布泊最后的日子》（彭戈侠）

2.纪录片《生死罗布泊——余纯顺之死》（上海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摄制，爱奇艺）

3.《余纯顺，你永不能赴约》（尚昌平，《中国商界》，1997年第9期）

4.《罗布泊：余纯顺勇士墓碑被砸》（强荧，《文汇报》，2005年10月11日）

5.《探险家余纯顺抱恨殒大漠，纪录片编辑室有幸留遗容——上海电视台〈壮行罗布泊〉拍摄纪实》（杨申庆，《新闻记者》，1996年第8期）

6.《余纯顺在自学中成才》（钱汉东，《上海成人教育》，1996年第10期）

7.《站在壮士的丰碑下》（郑则忠，《人才开发》，1997年第3期）

8.《余纯顺：当代徐霞客》（王东鸿，《民族团结》，1994年第6期）

---

[1] “老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没有机会再深造下去。

拉瓦锡之死

科学家，尤其是为人类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应该是受尊敬的群体。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

1

1794年5月8日的早晨，法国巴黎的路易十五广场上，人头攒动。

群情激昂的法国老百姓们，早早就聚集到了这里，交头接耳，颇为期待地看着广场中央高高耸立的一台机器——一架由国王路易十六亲自参与设计的“断头台”。

这一天早晨，这架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就超负荷运转的断头台，又将执行28个人的死刑。那是28个与税务公司有关的税务官和相关负责人，也是被老百姓痛恨且唾骂的一群人。

死刑开始了。

随着一颗颗人头落地，围观百姓的情绪也慢慢被调动了起来。

第四位走上断头台的死刑犯，是一个50岁左右的人。与前面的几个死刑犯不同的是，他的神情很镇定。几乎没有什么言语，他自己安静地跪了下来，将脖子放到了铡刀切口。



法国巴黎的协和广场，原先被称为“路易十五广场”，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安放断头台，又被称为“断头台广场”

铡刀被缓缓拉起，轰然落下，人头落地，众人欢呼。

在场的不少老百姓并不知道，那颗掉下来的脑袋，究竟属于谁。

而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拉格朗日点”即因他的推算而命名）一句痛心疾首的话，似乎可以代表当时整个科学界的心情：

“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头砍下来，但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

这个第四个登上断头台的人，名字叫安托万·洛朗·拉瓦锡。

他在人类化学史上的地位，堪比达尔文之于自然科学，牛顿之于物理学。

他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

2

拉瓦锡，1743年8月26日出生于巴黎。

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在他5岁时过世，但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按照父亲的愿望，拉瓦锡18岁考进了巴黎大学的法律系，并在之后获得了律师资格。但是拉瓦锡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不在法律，而在自然科学。

1764年，明明已经拥有律师资格，可以去赚大钱的拉瓦锡，却去做了法国著名地质学家盖塔的助手，采集法国矿产，绘制第一份法国地图。在这个过程中，拉瓦锡研究了生石膏与熟石膏之间的转变，还参加了法兰西科学院关于城市照明问题的征文活动并获奖。



拉瓦锡

拉瓦锡的助手生涯持续了三年，也正是因为在这三年里的突出成绩和贡献，他成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那一年，他才25岁。

年轻的拉瓦锡能够成为院士，自然要有拿得出手的东西。经历了多年地质勘测的工作，拉瓦锡已经明确了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化学。事实上，当时的“化学”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基本上是和“炼金术”结合在一起的。拉瓦锡很快证明，自己在这个领域拥有过人的天赋。

比如长期以来，欧洲人都信奉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四元素说”——世界是由风、火、水、土四种元素构成的。这种说法虽然早已被英国天才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驳斥，但依旧拥有大量信徒，很多科学界人士依旧无法完全走出这个怪圈。有一派学者就坚持认为：水如果长时间加热，

就会变成土类物质。

拉瓦锡站了出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为有科学素养的人，拉瓦锡不会只动嘴皮子，而是直接拿实验说话。他将蒸馏水密封加热了整整101天，结果发现在瓶底确实出现了微量固体。

这难道不是证明水长时间加热确实会变成土吗？拉瓦锡却不这么认为，他继续使用实验的手段——用精密的天平称容器质量，发现容器减少的质量正好等于瓶底固体的质量，而水的质量完全不变——这就说明固体来自瓶子，和水完全无关。

这个实验将“水加热变土”的说法一举粉碎。

那一年，拉瓦锡27岁。

3

让拉瓦锡在人类化学史上奠定里程碑地位的，是他颠覆了“燃素说”，发现了“氧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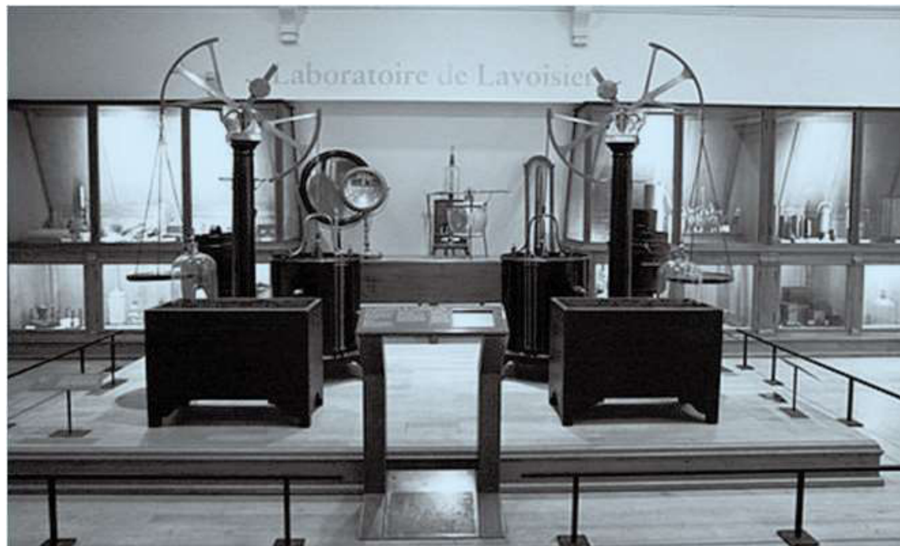
关于“燃烧”这一常见的现象，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信奉德国哈勒大学医学和化学教授斯塔尔提出的“燃素”说——世界上能燃烧的物质都含有“燃素”，当物质燃烧时“燃素”就分离出来，燃烧时产生的热、光、火焰都是“燃素”逸出时发生的剧烈现象。

“燃素说”确实能解释当时一系列不能解释的燃烧现象，所以尽管它明显不能解释为什么金属燃烧后会变重（说好的“燃素”脱离呢？）之类的现象，还是几乎成了一条公理。

站出来用实验表示质疑的，还是拉瓦锡。

1772年，29岁的拉瓦锡开始系统地针对“燃素说”进行研究，拥有高超实验技巧的他这次设计了著名的“钟罩实验”，用来测量反应前后参与燃烧的气体的体积变化。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拉瓦锡发现物质的燃烧，其实是可燃物与空气中某种物质结合产生的结果，这也能完美解释金属燃烧后质量会变重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确认“究竟是和空气中哪一部分结合导致燃烧”这个问题，拉瓦锡在1773年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终于发现了那个可以“帮助燃烧”的气体是一种元素，他在1777年正式将这种元素命名为“Oxygen”，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氧”。



拉瓦锡的实验室，收藏于法国工艺博物馆

1777年，才34岁的拉瓦锡在一系列精确实验的基础上，拿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燃烧概论》，彻底否定了“燃素”说，提出了全新的“氧化”说：

（1）物质燃烧时会放出光和热。

（2）只有在氧存在时，物质才会燃烧。

（3）空气是由两种成分组成的，物质在空气中燃烧时，吸收了空气中的氧，因此重量增加，物质所增加的重量恰恰就是它所吸收的氧的重量。

（4）一般的可燃物质（非金属）燃烧后通常变为酸，氧是酸的本原，一切酸中都含有氧。金属煅烧后变为煅灰，它们是金属的氧化物。

“氧化说”的提出对当时的人类化学进程有重要意义，使得当时的科学家们能走出“燃素”的迷雾，将人类化学研究的路线重新拨到正确方向，进而快速发展。

而拉瓦锡对人类化学发展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

他在证明“氧化”的实验过程中，顺带再一次证实了物质虽然在一系列化学反应中改变了状态，但参与反应的物质的总量在反应前后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其实在1756年已被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发现，但当时莫斯科不处于欧洲核心科学圈，此发现未得到欧洲的重视）。

他推出了《化学命名法》，正式提出化学的命名系统，使不同语言背景的化学家可以彼此交流。其中的很多原则加上后来贝采里乌斯（瑞典化学家）的符号系统，形成了至今沿用的化学命名体系。

他定义了“元素”的概念，并对当时常见的化学物质进行了分类，总结出33种元素（尽管其中一些实际上是化合物）和常见化合物，使当时零碎的化学知识逐渐清晰化，进而完全和“炼金术”分离。

他牵头统一了法国的“度量衡”——主张采取地球极点到赤道的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为标准（约等于1米）建立“米”制系统，定密度最大时的1立方分米水的质量为1千克。这套系统如今已被世界通用。

他写的《化学基本论述》在欧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加印几十次，与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称为世界自然科学史上的“三大名著”。

到了1789年前后，拉瓦锡已经成了法国显赫一时的人物，不仅在科学界，在政界也备受瞩目，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尽管拉瓦锡多次表示自己不想参与过多政治事务，只想回到实验室去做一名化学家，但此时时代洪流已经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

随后，一个滔天巨浪迎面打来——

法国大革命开始了。

4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众对法国的税收制度不满，而拉瓦锡恰恰踩入了这个坑。

1769年，拉瓦锡在向国王缴纳了50万法郎保证金之后，成了一

名“包税官”，掌握了食盐和烟草的征税权。

根据当时法国法律的规定，包税官每年在向国王缴纳了约定的税款之后，多余的部分是可以进入自己腰包的，这种缺乏制约和监督的制度无疑会导致一个极端局面——包税官为了获得更多的“多余部分”，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对老百姓多征税、严征税。

拉瓦锡是富家子弟，对财富其实没有太大的渴望，他当包税官的一大原因，是做化学实验的各种仪器实在太贵，需要更多的钱来购买和制造。事实上，拉瓦锡确实把税收盈余的大部分用在了仪器上，且进行了盐税改革，打击走私，在自己的农场进行农业化学实验，希望以提高产量来抵消高税收的影响。

但是，由于当时法国规定贵族和僧侣不用缴税，所以沉重的税收负担都落在了最底层的老百姓和刚刚兴起的城市中产阶级身上。数量众多的中下层民众的怒火越来越高涨，矛盾越来越集中到法国的税收制度，而作为老百姓接触到的代表，“包税官”很快就成了所有矛盾中的焦点。

而且，拉瓦锡在1771年还和自己同事的14岁女儿结了婚，这位同事也是皇家税收公司的负责人之一。通过这场婚姻，拉瓦锡的包税官位置更加稳固，但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形象也进一步和“横征暴敛”捆绑在了一起。



这幅著名的《拉瓦锡和夫人》的肖像画出自当时的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之手。拉瓦锡的夫人玛丽·波尔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事实上，她在拉瓦锡的很多实验中都担任助手和记录者的角色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终于爆发，愤怒的民众很快把焦点对准了法国的税收制度。而作为包税官的拉瓦锡却比较泰然。一方面，他认为“包税”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不是他制定的，他只是遵守而已。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税收利润主要用来从事科学研究，自己为法国乃至全人类的科学事业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不至于被逮捕。

但是，拉瓦锡还是想得天真了。

尽管拉瓦锡本人对法国大革命并不报敌视态度，但他不知道的是，敌视他的人却不少。

5

拉瓦锡被一步步带入绝境，和两个人有关。

第一个人，是因为一幅入选历史教科书的画作而被广大中国人熟悉

的让·保尔·马拉（马拉的故事可以参看《历史的温度4》收录的《一幅名画背后的谋杀案》。著名的画作《马拉之死》的作者，就是给拉瓦锡夫妇画肖像画的雅克·路易·大卫）。

直到40岁之前，马拉还只是一名医生。不过，作为一个从小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马拉学习过希腊语和拉丁文，能说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对化学、物理和医学颇有研究，翻译过《牛顿光学原理》，出版过《光学基础知识》，还因为写《关于电的特性研究》而受到过里昂科学院的奖励。

马拉当初是很想走科学家的道路的，为此，他写了一本《火焰论》送到当时的法兰西科学院。《火焰论》的观点全部都是建立在“燃素”理论基础上的，于是受到了一名科学院院士的无情批驳，认为其“毫无科学价值”。

这个人，就是推翻“燃素说”的拉瓦锡。

1783年，马拉找到了自己更擅长的领域：成为一名激进革命家。几乎由马拉一人担任撰稿、编辑、出版工作的报纸《人民之友》成了当时法兰西最有名的报纸。马拉的诸多观点得到了法国底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直接称马拉为“人民之友”。而马拉也作为“国民公会”的主席，成为“雅各宾派”的重要领袖之一。

而马拉从来没有忘记拉瓦锡给他的羞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马拉率先将人民对税收制度的怒火引向了拉瓦锡，发出了号召：“埋葬这个是人民公敌的伪学者！”由此掀起了对拉瓦锡的批判。当时马拉指责拉瓦锡在烟草上洒水增加分量坑害百姓，并写了这样一段话：

“法兰西公民们，我向你们揭露大骗子拉瓦锡先生，土地掠夺者的儿子，化学学徒，股票跑腿，收税员，火药会长，银行头子，国王的书记，法国院士，瓦维叶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员会的渎职官，当代最大的阴谋家。这个年进4万磅白银的绅士为了收税，竟然耗用我们贫苦人民的3300万磅白银修建城墙，把巴黎变成空气不通的牢城。他在7月12日和13日的夜晚，把国家火药库搬进了巴士底狱。他还要使用恶毒的伎俩妄图进入巴黎市管会！”

事实上，拉瓦锡筑城墙是为了打击盐走私，筑墙和“空气不通”也没有任何关系。他让人在烟草上洒水是为了防止火灾，洒水是在称重之后

才进行的。但是，民众的情绪却被马拉轻易调动起来。

不过，马拉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死在了拉瓦锡的前面——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女刺客科黛刺死在自己的浴缸里。

另一个人，叫佛克罗伊。此人也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还长期和拉瓦锡做过同事。但在拉瓦锡被指控期间，佛克洛伊做了很多背后“挖墙脚”的事，典型的落井下石。

在一些人的运作下，在民众高涨的怒意中，拉瓦锡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推向了死路。

6

1793年11月28日，拉瓦锡被捕入狱。

和他一起被关进去的，还有皇家税收公司的其他27名人员，其中也包括他的岳父。

拉瓦锡入狱的消息震惊了法国学术界，各个学会纷纷向法国国会提出申请，希望能够赦免拉瓦锡，甚至准予他恢复职位。但是，当时在国会掌权的是最激进的雅各宾派，对于一系列希望赦免拉瓦锡的请求，全部回绝。

1794年5月7日，在被关押了半年之后，拉瓦锡等人被押到了法庭上。在这半年里，拉瓦锡其实一直试图恢复科学研究，还提出过愿意被罚没所有，只要让他回去当个药剂师，但这个提议也被拒绝。

在法庭上，这28人全部被判处死刑，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且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必须在24小时内执行完毕。

1794年5月8日，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出现了。



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

据说，拉瓦锡在临死前还想做一个实验，他和负责行刑的刽子手约定：当自己的脑袋滚落下来后，会快速眨眼睛，请刽子手统计下一共能眨几次，以此判定人的大脑与躯体分离后大概还能保留多久的意识。刽子手最后数了数，拉瓦锡一共眨了11次眼。

不过，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记载。有白纸黑字记录的，是拉瓦锡在临死前写给自己妻子的最后一封诀别信：

“我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一生。我想，人们会带着一些惋惜的心情记住我，也许在我的身后还会留下一些名誉。我还需要什么呢？”

馒头说

其实，拉瓦锡很快就平反了。

1794年7月，杀人如麻的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雅各宾派倒台，之前被处决的拉瓦锡很快恢复名誉，人们为他举办了盛大而庄重的追悼会。

但是，他那颗被拉格朗日称为“一百年也长不出来的聪明脑袋”，却再也回不来了。

拉瓦锡被推上断头台，不是平白无故的，因为当时法国的税收制度确实造成了极大的不公，而他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民众痛恨的税收制度的代言人。

但是，正如拉瓦锡自己所言，他并非制定这条法律的人。无论他将税收用在何处，一定程度上还是成了“恶法”的帮凶，但是，应该也不至于到上断头台的地步——即便完全抛开他伟大科学成就不论的话。

这无疑就会让人审视将拉瓦锡推上断头台的这场“大革命”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对法国大革命有这样一句评价：“法国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怖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

确实，这场大革命在体现法国民众意识觉醒和革命精神的同时，演变到后来也释放出了大量的暴力和恐惧，甚至展现了各种人性的疯狂、残暴和卑劣。

马拉曾为法国穷人不断呼喊发声，因此被称为“人民之友”，但他在1792年的《人民之友》刊物上，却公然提出要砍下敌人的头颅，并且给出了精确的数字目标：27万颗。

罗伯斯庇尔一开始极力宣扬人权，甚至提议取消死刑。但是他上台后，却嗜杀成性，凡是反对他的人，不能辩护，不能请律师，一律被推上断头台，其中包括他的亲密战友丹东——这位战友之前也曾带人闯入监狱，无甄别屠杀了里面的1000名犯人。

在那段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报纸上形容罪犯的用词只有“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法庭上审判的罪名只有一个“叛国罪”，惩罚方式只有一个“死刑”。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为了自保而开始违心举报、告密、背叛，甚至落井下石地陷害别人，但同时又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尽虚伪之能事——在拉瓦锡的追悼会上，曾经落井下石的佛克罗伊还专门做了演讲，表达了对拉瓦锡的崇敬之心。

所以，在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别说拉瓦锡是一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谁都不知道明天的命运是什么，荣辱生死，有时只在一线间。

人类一旦陷入运动式的疯狂，很容易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自己也无法相信自己的行为。

无论中外，都有现成的例子。

这也是我们要读一些历史，记一些历史的意义所在。

为的，就是坚决不要让一些历史重演。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油画中的科学家：〈拉瓦锡和夫人〉解读》（张九庆，《科学》，2017年第5期）

2.《做税务官的化学家被推上了断头台——于拉瓦锡忌日谈法国大革命》（叶克飞，腾讯网，2014年5月8日）

3.《〈革命狂潮与化学家〉：拉瓦锡之死》（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2009年7月9日）

4.《法国大革命中的著名死刑案件》（杨宇冠、杨益航、王静，《中国案例法评论》，2016年第1期）

5.《拉瓦锡“罪有应得”吗？》（程映虹，《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17期）

6.《死在断头台上的“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尹传红，搜狐网，2017年4月4日）

贝当：62岁的“民族英雄”，84岁的“卖国贼”

一个人，从万众拥戴的“民族英雄”，到万众唾骂的“卖国贼”，究竟需要多久？究竟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

1

1856年4月29日，亨利·菲利浦·贝当出生在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的一个小镇。

贝当的母亲早逝，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以这样的家庭背景，贝当最大的可能，就是像其他镇上的农民孩子一样，平凡地度过一生。

但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给14岁的贝当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貌似强大的法国近乎耻辱一般地输给了快速崛起的普鲁士，这让年少的贝当决定要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他立志要做一个军人。

1875年，18岁的贝当从中学毕业后，如愿考入圣西尔军事军校。

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告诉贝当：“你将来会决定整个法兰西的命运！”他肯定会觉得你疯了——虽然后来确实如此。

进入军界后的贝当，不要说一鸣惊人，就连一名普通军人的晋升速度也达不到：他做了5年少尉，7年中尉，10年上尉，直到44岁才晋升成少校。

贝当的从军之路如此艰难，不仅仅因为他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和他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性格耿直，心直口快，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这种性格让他得罪过很多人，也错过了不少晋升的机会。



贝当

贝当还非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一套战术理论。当时的欧洲，无论英法还是德国，都非常崇尚进攻，认为进攻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事实上，“强调进攻”在军事上永远是一个不会丢分的观点，但贝当却愿意说出很多人不爱听的话：如果敌人的防御没有决定性减弱，那么一味强调进攻，就是让士兵去送死。

当时很少有人赞同贝当的理论，但有一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学生却对贝当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主动报名到贝当的麾下当兵。

这个人的名字，叫戴高乐。

1914年8月，贝当终于晋升成了上校。此时的他，已经58岁了。放到和平年代，此时的贝当其实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等退休。

但“和平”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成了不可求的奢侈品——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了。

58岁的老上校贝当，在几乎可以平凡普通地走完自己一生的时候，被卷入了时代的旋涡。

2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才一年，贝当就已经晋升为集团军司令。这一切，都是贝当用自己的表现挣来的：先是因对自己的部队指挥得当晋升为旅长，然后因在“马恩河战役”中表现出色被晋升为第6师师长，再然后是第33军军长，最后是第2集团军司令。

但这与贝当在之后的成就相比，都只是垫场的序章。

真正让贝当一战封神的，是被后世称为“绞肉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役——凡尔登战役。

1917年2月21日，已经打了两年多消耗战的德国人决定拼力一击，在法国的战略要地凡尔登要塞让法国人彻底“放血”。当天，德国人用超过1000门大炮向法国阵地倾泻了100万发炮弹，枕戈待旦的27个德国师如潮水一般冲入法军阵地。由于当时的法军总司令霞飞判断失误，凡尔登要塞只有少量的法军驻守，短短几天之内，大量阵地被突破，凡尔登陷落几乎只是时间问题。

凡尔登是通向巴黎的战略要地，凡尔登一旦失守，法国基本上就可以宣布退出战争了。

在凡尔登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烂摊子的局面下，法军总司令霞飞把第2集团军司令贝当调到了凡尔登担任要塞司令，希望他能够力挽狂澜。

那一年，贝当已经61岁了。但贝当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廉颇虽老，不仅能饭，而且食量惊人！

贝当当时刚到阵地，就患了严重的肺炎，一度只能躺在病床上。但他还是立刻就做了三件事。

第一，拖着病体去前线，去战壕，在德军的炮火之下去慰问最基层的士兵，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司令官和他们一直在一起。

第二，提出著名的口号："他们不会通过。"在法军防守的阵地上划出一条红线：谁如果退过这条红线，无论军官还是士兵，一律射杀。

第三，力保后方与凡尔登的唯一一条还能通行的公路"巴勒迪克——凡尔登公路"，拼死向凡尔登"输血"——在一周之内运过来19万法军士兵和2.5万吨物资。

在贝当冷酷又坚决的调度和指挥之下，原本离全盘崩溃只有一步之遥的法军渐渐在凡尔登站稳了脚跟。在贝当"车轮战"的调配下，各支法国部队轮番开赴凡尔登，开始和德军打起了拉锯战，这也导致凡尔登战役成了一个用双方士兵血肉堆积起来的人间炼狱——法军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伤亡高达65万人，德军的伤亡也高达45万人。

但历经10个月的艰苦拉锯，凡尔登毕竟守住了。

在凡尔登战役之后，贝当已经声名鹊起。1917年4月，因为霞飞的继任者尼韦尔要求盲目进攻，法军在一次战役中折损了12万人，这彻底引发了整个法国军队的哗变——他们只愿意待在堡垒里防守，不愿意再无意义地送死进攻。



凡尔登战役中的炮弹壳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还是贝当。

接任法军总司令的贝当一上任就提出了“多用钢铁，少流鲜血”的口号，和以往一样，他亲自去炮火连天的战壕里探望最一线的士兵，改善他们的伙食和休假制度，然后带领他们去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将面临崩溃的法军再一次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到了1918年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62岁的贝当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法军总司令，他在所有部队里都拥有崇高的威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贝当只是一个上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贝当成了法国元帅。

但当时的法国民众不愿意称呼贝当为“元帅”，他们更愿意叫另一个他们送给他的称号：法兰西救星。

3

成为“法兰西救星”的贝当，享受了当时他能想到的最高规格的待遇。

在国内，贝当成了“军神”一般的人物，在军中唯一比他资格更老的福煦元帅退休后，他成了当之无愧的法国军界头号人物。

在国外，尤其是在协约国体系内，贝当的个人荣誉也达到了最高峰，在很多国际场合，贝当甚至成了法兰西的象征。

1920年，贝当被任命为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22年，兼任法国陆军总监；1931年，担任法国防空总监和陆军部长。贝当人生前58年被耽搁的“官运”，在6年之内得到了惊人的释放。

即便“官运亨通”，贝当倒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他对当时最先进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的运用，都有自己的独到看法，甚至也意识到了“闪电战”的可能性。但是，出于一生对“稳固防守”的信任，他大力支持修筑著名的“马奇诺防线”。

马奇诺防线的内部构造，如同一座小城市。事实上，贝当虽然支持修筑马奇诺防线，但一直强调要保证一支精锐机动的部队部署在防线后侧。不过，他当时的出发点是，敌人即便攻克防线也会伤亡巨大，可以给予对方毁灭性打击

另一个让人注意到的变化是，可能因为地位的提高和资历的增长，贝当开始渐渐不再刻意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他讨厌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对独裁统治表现出了超乎一般的好感。

但是，大家并不担心一个已经80多岁的昔日“国家英雄”能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大家要做的，就是给贝当应有的荣誉，然后让他安享晚年。

1939年，83岁的贝当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他和西班牙的独裁统治者佛朗哥私交甚笃。

现在，贝当再次回到了1914年他58岁时的那个状况，同样准备安享晚年了。

然而，这一次的希望再一次落空。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

4

按理说，作为一个已经80多岁的老人，二战对贝当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德国死磕4年的法国，在这一次战争中兵败如山倒，从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发动全线进攻开始，法国人只抵抗

了一个月就全线崩盘。崩盘的开端和著名标志，就是德国的A集团军以全新的“闪电战”打法，绕过了贝当和很多法国将帅引以为豪的“马奇诺防线”，从阿登地区突入法国，直插法国腹地，一个月打穿法国全境。

此时的法国，已经满目疮痍。更糟糕的是，面对德国数十万陷入亢奋状态的虎狼之师，法国本土那些被击穿防线后的陆军已经七零八落，毫无斗志——很多人都不想打下去了，但是没人敢说出来。

这时候，他们想到了“法兰西救星”——已经84岁高龄的贝当元帅。

贝当是在1940年5月从西班牙被召回国的，当时他被任命为内阁副总理，统领法国的所有军队。有一些法国民众盼望他能和一战时一样，面对德国纳粹，再一次喊出：“他们不会通过！”

然而，这一次的贝当，却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贝当被召回的一个主要目的，并不是领导法国继续战斗。贝当显然也清楚自己的使命，他回国后就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能再打了，停战吧。

谁都知道，此时法国单方面请求“停战”，其实就等于宣布投降。

从6月13日到16日，以贝当为领袖的“主和派”在法国内阁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希望法国能坚持战斗下去的总理雷诺最终无奈宣布辞职，贝当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并组阁。

贝当随即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我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

6月17日，贝当下令法国境内的部队全线停火。

这对法国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命令，因为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法国在接下来的谈判桌上拿不到任何有利的筹码。但是，贝当政府似乎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即便希特勒要求法国的停战协定签字地点必须是贡比涅森林的“福煦车厢”，贝当也答应了——这在很多法国人看来，是十足的羞辱。



贝当与希特勒见面

6月22日，经贝当同意，《法德停战协定》在那节标志着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火车厢内签订，法国接受了一系列屈辱的让步：法国被分割成了两部分，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3/5北方国土归德军占领，而占领的军费由法国负担；2/5的南方国土为“自由区”，由法国政府管理；法国的空军、陆军裁到10万人；法国政府要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与德国进行全方位合作。

1940年7月10日，迁到南部小镇维希的法国“维希政府”进行了参众两院的投票，以569票对8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制宪法令，赋予政府首脑贝当全权起草新宪法。

“维希政府”正式开始运转。

5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维希政府”都是一个傀儡政府。

但是，这个服从德国纳粹主义，在各方面为纳粹德国提供便利乃至提供港口、机场、劳动力的傀儡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受到法国民众欢迎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牺牲避免了法国被轴心国瓜分。

事实上，当时全世界除了英国之外，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承认“维希政府”是法国的合法政府。

英国为何不承认呢？因为贝当当年的那个学生戴高乐流亡在英国，成立了“自由法国”，发誓要一直与纳粹德国战斗下去。

为此，维希政府缺席审判戴高乐死刑。不过，面对昔日的得意门生，贝当在戴高乐的死刑宣判书上附加了一个批示：无须执行。

不过，那个时候的贝当，已经基本上以一个“独裁者”的形象出现了。

1940年7月11日之后，贝当成了“法兰西国家元首”，在之后的短短几天时间里，法国原来的参众两院，以及总统、总理职位全都被废除，国会的活动也被停止，所有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都掌握到了贝当一个人手上。

维希政府的一切文件的抬头都是：“本人，菲利普·贝当，以法国元帅、法兰西国家元首名义宣布……”

然而，贝当的“独裁者”位置并不会，也不可能坐得太久。

纳粹德国之所以放着2/5的法国国土不占领而扶植一个傀儡政府，是因为当时德国没有精力也没有实力去接管法国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体系，也怕把法国逼急引发所有海外殖民地倒戈，所以选择了一个听话的政府代管。

但是，随着二战的战况渐渐不利于德国，维希政府的利用价值也越来越小。从1940年开始，就断断续续有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宣布倒向盟国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1942年，盟军的“火炬行动”更是一举解放了北非的所有法国殖民地，这让维希政府的地位瞬间就变得尴尬起来。

为防止盟军利用北非的法属殖民地作为登陆跳板，德军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南部法国。1943年意大利倒戈后，德国迅速占领了法国全境。

从头到尾，维希政府就只是一个摆设。

就在德军占领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时候，有人劝贝当离开法国，但他不肯，他认为“要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

1944年6月，盟军登陆诺曼底，8月，戴高乐带着“自由法国”的军队解放了巴黎。此时的贝当才意识到大势已去，开始烧毁自己的私人文件，并派人联络戴高乐，准备和平交接——戴高乐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无奈之下，贝当只能带着身边人在德国的安排下开始逃亡，从德国到瑞士，最终在德国投降前，自己向戴高乐的法国临时政府自首。

89岁的贝当，面临人生的最大一场审判。



戴高乐进入巴黎

6

1945年7月23日，万众瞩目的“贝当审判”在法国最高法院开庭。贝当被指控犯有五条罪状：

第一，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违背了法英同盟条约；

第二，配合德国，对英国和其他盟国采取敌对行为；

第三，动员全国工业部门支持纳粹德国进行侵略战争，并向德国输出大批法国劳工；

第四，建立独裁政权；

第五，私自允许德国控制本国领土。

审判长达20多天，贝当在整个过程中一言不发。

尽管还颇有一些人为贝当喊冤，但最终审判结果却不出人意料：贝当被判处死刑，没收一切财产，并被宣布为“民族败类”。

这时，站出来的是贝当的那位学生戴高乐。作为当时法国临时政府的最高领袖，戴高乐签署了“特赦令”——改判贝当终身监禁。

贝当于是被囚禁在大西洋一座小岛上的监狱里。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也慢慢变差。

1951年7月23日，95岁的贝当走到了人生尽头，在监狱中逝世。

在贝当58岁担任上校职位并等着退休的时候，他会想到自己暮年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吗？

如此跌宕起伏，如此大喜大悲。

馒头说

可能有不少人会拿贝当和汪精卫比，但两人还是有区别的，主要是两点。

第一，当时的法国已经被打到瘫痪，又没有什么战略纵深，至少在本土确实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但中国不一样。在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的情况下，中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谁都看得出日本没办法一口吞掉中国，而中国还有几百万军队可以用于战斗，并且在坚持战斗。

第二，不管怎样，贝当当时的抉择背后，其实是法国很多人的默认和许可，他只是一个代表，而他代表的确实是法国政府，这也是维希政府成立后受到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的原因。但中国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坚决抵抗”，汪精卫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私自决定出逃并投降，是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政府的，更何况重庆的国民政府依旧存在。

当然，说这两点，不是在为贝当辩护。

诚然，贝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整个法国的民族英雄，做出过很多的贡献，但二战期间作为维希政府的首脑，无论他出发点如何，是

否“背锅”，如何“自我牺牲”，投降就是投降，这没什么好说的。

更何况，维希政府在贝当的治下，虽然对纳粹德国的不少政策都阳奉阴违，也竭尽全力保持中立，但也为纳粹德国提供青壮年劳力，甚至很多亲纳粹分子志愿加入德军，包括向纳粹德国上缴战争资源，为纳粹军队生产各种武器装备，这些都是间接的“助纣为虐”行为，这不是什么“保全了法国国土不受战争蹂躏”或“让法国在二战期间伤亡人数减到最低”这种理由可以解释的。

所以，功是功，过是过。我个人确实很感慨贝当一生的跌宕起伏、大喜大悲，但有些原则性的问题，确实是没得辩的。

有时候想想，“急流勇退”也不是没有道理。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戴高乐与贝当》（蓝沙，《书城》，1999年第2期）

2.《挽救国家危亡的一战老将，二十多年后却沦为卖国贼》（“我方团队张嵚”，腾讯网，2017年12月19日）

3.《从“民族救星”到“叛国贼子”——亨利·菲利浦·贝当元帅充满争议的一生》（魏文刚、李亮、朴虹，《环球军事》，2009年第22期）

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的成功与悲剧

关于奥本海默，我在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背后的四个人》中提到过。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为他单写一篇，为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他背后折射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1

当二战进入1942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政府终于下定了决心：投入全部力量，全力研制一种闻所未闻的超级炸弹——原子弹。

这个起因如今很多人都已经知道：1939年8月2日，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科学家们给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总统下令全力研制核武器——德国人已经在海森堡的主持下率先开始了工作，如果这种超级炸弹掌握在泯灭人性的纳粹手里，那谁也不敢想象结局。

尽管之前从没有人做过这项工作，但可以想象，那将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于是问题也就来了：谁来领导这个工程？

是带头写信的爱因斯坦吗？他的能力、资历和威望自然是够了，但因为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这位天才科学家是最先被排除的。

那么，是不是应该在当时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美国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挑选一个呢？按理说，负责如此高端和机密的工程，"得过诺贝尔奖"应该是一个最低门槛。

但是，最终"曼哈顿计划"项目负责人名字被公布的时候，还是多少有些出人意料——那是一个并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

2

如果把智商和学历作为一个门槛的话，那么奥本海默无疑是够格的。

1904年4月22日，奥本海默出生在纽约一个富有的德裔犹太人家

庭，父亲是纺织行业的企业家，母亲是画家。放到现在，奥本海默足以让周围人羡慕——他是个富二代，又是个超级天才。

看看奥本海默的成长经历吧：在幼年时就受母亲影响涉猎艺术、文学、哲学、历史、科学和语言等各个领域，11岁因为在矿物研究方面的成绩成为纽约矿物俱乐部年纪最小的会员，18岁从纽约菲尔德斯顿文理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美国很多政商和文化界名人都出自这个学校），后考入哈佛大学化学系。

在哈佛大学，别的同学一般只选4门课程，他选了7门，但还是抱怨“作业太少”。他只花三年时间就以“优秀”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了，在他的毕业照片上有一句特别注明：“他只做了三年大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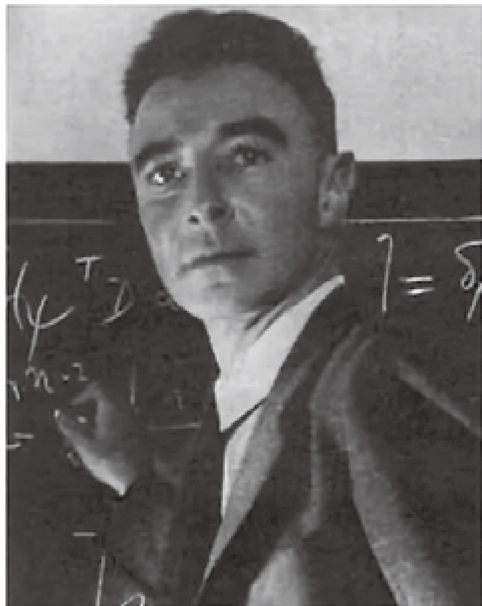
大学毕业后，奥本海默来到了欧洲，觉得自己当初的化学专业有些无聊，深深迷上了物理。

彼时的人类物理世界，正在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1924年，德布罗意提出“物质波”假说；1925年，海森堡提出“矩阵力学”，泡利提出“不相容原理”；1926年，薛定谔提出“薛定谔方程”，玻恩对波函数做出概率解释……

在一个崭新而宏大的物理世界面前，奥本海默立刻被深深吸引。

他先是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师从物理大神卢瑟福（被称为法拉第后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但卢瑟福认为这名天才弟子更适合研究理论物理，于是奥本海默受玻恩（量子力学奠基人，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引荐去了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在那里，奥本海默遇到了当时全世界物理学界的顶尖天才们：玻尔、狄拉克、海森堡、泡利等等。这段学习生涯对奥本海默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让他的天赋得到了充分发挥。

玻恩曾回忆奥本海默在他手下做研究生时，经常打断别人（包括老师在内）的演讲而走上黑板拿起粉笔开始写方程式：“这样会更好。”后来很多学生联合起来给玻恩写了一封抗议信，玻恩将这封信悄悄放在奥本海默很容易看见的地方，于是奥本海默后来参加讨论时就明显收敛了很多。



年轻时的奥本海默

1927年，奥本海默因在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而获得博士学位，没多久后决定回到美国。当时美国诸多名校竞相向奥本海默发出任教邀请，但他最终选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据说一个原因是那里图书馆的古典文学书籍收藏不错。

毫无疑问，从智商、学历和资历上，奥本海默是够格的。但是，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哪个不是“天才＋学霸”？从二楼向这些科学家丢块砖头，很难不砸中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是，奥本海默能够成为领导，恰恰也是因为这点。

3

最坚定推荐奥本海默的，是欧内斯特·劳伦斯。

欧内斯特·劳伦斯是高能粒子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也是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同时，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教授。

最初，负责“曼哈顿计划”的美国军方主持人格罗夫斯将军内定的主持人是劳伦斯，但劳伦斯和另一名卓越的实验物理学家康普顿却坚持推荐以理论物理见长的奥本海默。

劳伦斯的推荐理由简单却有说服力：“曼哈顿计划”是一个要凝聚全世界最顶尖大脑的“超级工程”，但越是一流的科学家，就越有些“恃才傲物”，必须要有一个既懂科学又懂管理的人才来把这批人管理起来，有效运转，最快达成目标。

谁最合适？奥本海默最合适。

奥本海默似乎天生就是一个管理型人才，他演讲有说服力，待人有亲和力，与整个美国物理学界的顶尖科学家都关系良好，同时，他自己在业务能力上又不会被同行看低。

在淘汰了一批“忠诚度可疑”（比如移民到美国）的顶尖科学家之后，格罗夫斯和军方人员再三审核了奥本海默的家庭成分和忠诚度（出生在美国成了当时奥本海默的加分项），在要求劳伦斯写下保证书后，终于任命奥本海默为整个“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和总实验室主任。

奥本海默不辱使命。

作为耗资25亿美元、最多时参与人数超过50万的“曼哈顿计划”的总指挥，奥本海默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科学素养和管理才能。在他的游说和鼓动下，玻尔、费米、查德威克等当时世界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加入了该计划。在奥本海默的领导下，他们全身心投入，高速运转。

奥本海默把原本分散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各地从事原子弹相关工作的实验室全部集中到了一起，亲自选定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作为总实验基地，统一领导工作。

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一度聚集了超过6000名世界顶尖的科研工作者。奥本海默从科学实验到医疗卫生，到地区交通，甚至到科学家孩子上学的问题都管了起来。他自己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上7点由他吹响第一声起床哨，敦促大家开始一天的工作。

奥本海默的付出得到了美国军方和科学家们的一致认同，连一向挑剔、与奥本海默不和的核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后来他发明了氢弹，被称为“氢弹之父”）在参与“曼哈顿计划”后也感慨：“我不知道奥本海默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但是没有他的话，这项工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功。”

1945年7月16日清晨5点30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阿拉莫戈多沙漠爆炸成功。

在爆炸的一瞬间，现场受邀观看的1000多名观众欢呼雀跃，而作为总设计师的奥本海默，望着那片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却从心底里感到了恐惧。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经常读的印度梵文诗选段（奥本海默会包括梵文在内的8种语言）：

漫天奇光异彩，有如圣灵逞威。

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

……

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

4

事实上，在原子弹研发进入尾声时，奥本海默的信念就已经产生了动摇。

在那段时间，从欧洲传来了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的消息。而在美军鏖战的太平洋战场，日军也已经节节败退，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这让那些夜以继日研发原子弹的科学家们失去最大的动力——早日研制出原子弹，是为了不让纳粹德国抢先，如今这个威胁已经消除了。

在盟军已经完全可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科学家们陷入了良心的自责：这种超级杀人武器的问世，还有必要吗？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天真的建议：能不能只选择一块无人区，做一个示威性轰炸？

这个建议很快被美国政府否决了——“曼哈顿计划”历时三年，耗费数十亿美元，如果不用于实战，不产生结果，怎么向国会交代？怎么向纳税人交代？怎么向那些反对人士交代？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被投下一颗原子弹，十多万人在白光一闪间灰飞烟灭。

当年10月，奥本海默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职务，重新

回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此时的他早已声名鹊起，受到全世界瞩目。两年后，奥本海默当选为美国最权威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并出任美国政府能源决策机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下属的一般顾问委员会主席。

这是当时一个科学家能在美国得到的最高政治地位，奥本海默用他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开了科学家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先河。

只是，因研发核武器登上这个台阶的奥本海默，却转而说服美国政府停止和限制核武器研究。因为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认为他和他领导的团队并没有增加全人类的福祉，而是给整个文明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杜鲁门传》中专门记录了这样一个情节。

奥本海默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他激动地说了一句话："总统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杜鲁门的回答比奥本海默还要激动："沾满鲜血的是我！你手上的血还没有我一半多呢！这件事你就留给我来操心吧！"在奥本海默离开后，杜鲁门对身边的人表示今后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而奥本海默依旧没有认识到美国政府对发展核武器的决心。1946年7月1日，美国在比基尼岛试爆第四颗原子弹，奥本海默拒绝出席参观，事先还写信给杜鲁门请求放弃这次爆炸试验。杜鲁门对奥本海默再一次做出评价：爱哭的科学家。

作为阻止核武器发展的另一个举措，奥本海默明确拒绝了当时找他寻求支持的科学家爱德华·泰勒，表示自己"不会出力，也不愿出力"——泰勒当时希望能得到奥本海默的支持，继续研究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

然而，奥本海默作为一名科学家，确实没有明确意识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风云突变。

二战结束，一道"铁幕"在昔日的盟友苏联和欧美之间缓缓落下。1949年8月29日，苏联宣布成功试爆本国第一颗原子弹，美国人苦心建立起来的"核垄断"在短短四年之间就被打破；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战争"，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就在中国建立了不可撼动的优势；在朝鲜战

场，武器和后勤明显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居然把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死死钉在了“三八线”……

现在美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在核武器上建立起对共产主义世界的优势，怎么会听从奥本海默的劝阻？

1952年11月1日，代号为“迈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珊瑚岛被引爆，产生的爆炸当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500倍。

领导氢弹计划的，正是当初被奥本海默拒绝，但之后获得美国政府支持的爱德华·泰勒。



人类历史上第一颗氢弹爆炸的场面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奥本海默的人生开始急转直下。

5

1952年，二战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

如果说是因为罗斯福起用奥本海默，继任者杜鲁门多少还有些忌惮和敬畏的话，那么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对一直和美国政策唱反调的奥本海默并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更糟糕的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恰恰是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可参看本书收录的《麦卡锡

主义：一个从未远去的幽灵》一文）。

和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一样，即便功成名就如奥本海默，在这场被一些人称为“美国文革”的运动中也没能幸免。

1953年12月初，奥本海默去英国做一场科普讲座。在此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终于让总统艾森豪威尔相信：奥本海默是一个危险的共产主义分子，并且很可能是苏联在美国核领域方面的“代理人”。

为此，当奥本海默在12月21日回到国内时被告知：要么主动辞去他在美国政府的行政职务，要么就出席一场指控他的听证会。

尽管奥本海默知道自己在主持研究原子弹期间就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和监听，依旧感到极大震撼。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辞职，决定出席听证会。

12月23日，针对奥本海默长达4周的听证会拉开帷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奥本海默事件”。

在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给奥本海默罗列了24条罪状，但主要归纳起来是两点。

第一，奥本海默年轻时与大量左翼组织接触并保持往来（奥本海默年轻时确实非常同情并支持共产主义，曾动用父亲的30万美元遗产中的一部分资助当时志愿去西班牙保卫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并且他的学生中有大量左翼分子甚至共产主义者，妻子哈里森是左翼分子，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加入过美国共产党（奥本海默的这位弟弟同样是一位天才核物理学家，但后因为“麦卡锡法案”被剥夺教职，只能去做牧民放牛）。



爱德华·泰勒。他在奥本海默听证会上的表现激怒了整个美国科学界，虽然他是“氢弹之父”，但在美国科学界几乎被完全孤立。在公共场合，很多科学家都拒绝和泰勒握手

第二，奥本海默一直对美国研制氢弹进行“重重阻挠”以及抱“消极态度”，这是明显为苏联讲话，是对美国的不忠诚。

为此，当初在奥本海默那里碰壁的爱德华·泰勒还出庭作证，言语含糊却又指向明确地表示“美国的这项事业（指原子弹事业）如果不放在奥本海默手里，会更安全”。

整个美国科学界也因此震动。

除了泰勒之外，绝大多数在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科学家都表示因一个人的“核政策”与政府不符就要受审是对“民主精神的践踏”；当初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158名科学家联名反对对奥本海默的审讯；爱因斯坦甚至不止一次在《纽约时报》等报刊上抗议，称“美国政府迫害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



1954年，奥本海默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奥本海默本人在听证会上否认了一切指控，但似乎政府并没有想听取他的辩解以及公众的呼声。

最终，听证会的审判委员会出具了判决结果：没有发现奥本海默对国家有过不忠诚的行为。

但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做了这个判决之后，美国政府还是决定剥夺奥本海默的一切安全特许和权限，全面禁止他与一切原子能项目产生接触。

这对奥本海默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因为他一直希望今后能用他的政治身份，促成原子能在国际范围内的和平利用。



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

在奥本海默即将迎来自己的50岁生日之际，他的人生从巅峰跌落到了低谷。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奥本海默迅速衰老。

6

奥本海默最终用了9年时间等来了自己的“平反”。

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总统。那时，麦卡锡主义带来的疯狂浪潮已经褪去，肯尼迪在当选总统之后不久就向自己身边的幕僚透露，想给以奥本海默为首的一批当初受到迫害的人补偿（其中也包括卓别林）。肯尼迪为奥本海默选择的方式是颁予他1963年度美国原子能方面的最高奖项——费米奖，并颁发5万美元的奖金（相当于当时美国国务卿的年薪）。

但是，就在颁奖前的10天，肯尼迪遇刺身亡。

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成了1963年12月23日颁奖典礼上的嘉宾。在授奖仪式上，59岁的奥本海默走向主席台时不小心绊了一下，约翰逊总统赶忙伸手扶他。但奥本海默推开了约翰逊的手，说：“总统先生，当一个人行将衰老时，你去扶他是没有用处的，只有那些年轻人才需要你去扶持。”

奥本海默在答谢词中说：“我想，今天的仪式是需要您的胆量和宽容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光明前景的预兆。”

说这话的时候，奥本海默已经知道，政府虽然用这种方式给他恢复了名誉，但依旧禁止他接触一切关于原子能的机密。

奥本海默在1966年终于退休，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患上了喉癌。

1967年2月18日，奥本海默因喉癌逝世，终年63岁。

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到了维尔京群岛。

馒头说

其实，奥本海默自己也有“出卖”过别人的历史。

在获准主持“曼哈顿计划”之前，奥本海默接受了美国军方严格的调查和盘问，迫于种种压力，他在盘问中交代了他的一个同情苏联的好友——加州大学拉丁语系教授恰瓦列埃，这导致恰瓦列埃后来受到当局审查，被剥夺教职。

后来，奥本海默自己也感到了深深的自责，称自己当初做出的证词是“完全荒谬”的（奥本海默的作证后来在他的听证会上被联邦调查局公布，之前没人知道）。这也成了奥本海默一生当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说这个插曲并不仅仅是想证明“人无完人”，更是想说明，再是天才，再孤傲的科学家一旦遭遇政治，往往都会有深深的无力感。奥本海默无疑是一个天才，他对哲学和历史领域的广泛涉猎更使他成了一个超出民族主义、关注全人类共同命运的科学家。但这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他的悲剧人生。

一方面，他需要依靠政治的力量来完成一个或几个科学家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曼哈顿计划”），也希望借助政治的力量来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推广原子能在国际范围的和平利用）。

但另一方面，他和很多科学家认为的理所当然的道理，在政治人士眼里看起来却是近乎天真和幼稚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这些人所谓的“抗争”，在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而且，他们有时候对自己身陷多方政治力量的角力之中也一无所知——奥本海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当时美国陆军和空军较量的牺牲品。

值得一提的是，奥本海默一生获得过三次诺贝尔奖提名，但一次都

没有获奖（他当时最有可能获奖的是关于“引力坍缩”的研究，但他没有持续研究下去）。事实上，他在牵涉到政治之后，就基本没有拿得出手的论文面世了。

当然，这绝非说奥本海默后来都是在浪费时间，恰恰相反，奥本海默的所作所为从某种意义上对科学研究和发展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本人其实也不只是一个埋首实验室和课堂的学者，而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只是，奥本海默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如今回过头看，其实谁都无法从类似的政治风暴中幸免。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当初举荐他的劳伦斯曾劝奥本海默去欧洲暂避风暴，但奥本海默拒绝了，理由是：“我不去，因为我就是爱这个国家！”

就像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说的那句话：“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科学和政治都很难完全割裂。在这样的前提下，科学和政治需要的不是一种对抗乃至两败俱伤的状态，而是一种博弈，一种双方求得各自最大利益的博弈。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一点上，奥本海默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奥本海默——天才的灵魂深处》（弗里曼·戴森著，陈难先译，《物理》，2017年第1期）

2.《奥本海默与原子弹》（胡新和，《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

3.《奥本海默的成功和衰落》（徐波、金尚年，《物理》，1988年第4期）

4.《原子弹之父的悲剧人生》（王波，《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1日）

5.《奥本海默的胜利和悲剧》（吴生，《今日科苑》，2006年第11期）

6.《奥本海默传略》（初迅，《华东石油学院学报》，1982年增刊）

7.《重审“奥本海默事件”》（方在庆，《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6期）

8.《两位“火神”——奥本海默和特勒》[曾晓萱，《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9.《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研究》（王曙跃，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10.《奥本海默案件：美国的科学与政治》（王德禄，《世界科学》，1988年第4期）

11.《奥本海默访谈》（“曼哈顿计划之声”网站，https://www.manhattanprojectvoices.org/oral.histories/j-robert-oppenheimers-interview）

奥黛丽·赫本：天使的侧面

2004年，时尚杂志*Elle*做了一项评选：“谁是历史上最美丽的女人？”奥黛丽·赫本以76%的选票获得冠军。

即便考虑到东西方审美差异，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和优雅，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人否认。但是，除了“美丽和优雅”之外呢？

1

1929年5月4日一大早，女男爵艾拉感到一阵腹痛，随即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婴。

这是艾拉男爵生下的第三个孩子。作为荷兰贵族的后裔，拥有“男爵”头衔的艾拉之前有过一次婚姻，生下了两个儿子，之后又不顾家族的反对，与英国银行家拉斯顿结婚，然后生下了这个女儿。虽然这个女儿的出生地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但依旧跟随爸爸的英国国籍。

父母为这个女婴取名为奥黛丽·凯瑟琳·赫本·拉斯顿（Audrey Kathleen Hepburn Ruston），但后人只记住了这个名字的简单版本：

奥黛丽·赫本。

2

很难说赫本的童年是幸福的。

在赫本6岁的时候，有纳粹倾向的银行家父亲拉斯顿就抛下她和她的母亲走了。这对一直渴望家庭温暖的赫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在英国继续待了4年之后，1939年，10岁的赫本随母亲回到荷兰，进入了荷兰安恒音乐学院（Arnhem Conservatory）学习芭蕾舞——这是影响她一生的一个兴趣爱好。

不过，留给赫本安心跳舞的时间并不多。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已经全面爆发。1940年5月15日，面对德国纳粹压倒性的军事打击，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荷兰宣布投降。此时，赫本母亲的贵族血统

惹上了麻烦，因为据说她的家族带有犹太血统。结果赫本家里的所有财产都被德军没收，而她的舅舅更被送进集中营后处决。

从小还算养尊处优的赫本开始过上了拮据的生活，“吃饱肚子”成了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她只能吃由郁金香球根和野草混合的“绿色面包”，以及大量喝水——童年的营养不良使得赫本后来终生身材瘦削。

在最艰难的战争时期，赫本做了两件值得骄傲的事：第一，她一直没有放弃芭蕾舞，哪怕条件再困难也在继续练习；第二，她一直通过芭蕾舞的表演为荷兰的游击队秘密募捐，甚至亲自参与情报传递。



童年的奥黛丽·赫本与母亲在一起

1945年，战争终于结束了。16岁的赫本由于贫穷和饥饿，身高1.7米，体重却只有80斤，而且还身染贫血、哮喘、黄疸等多种疾病。

好在战争后不久，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援十字会来到了荷兰，为孩子们提供食物、药品和必要的服装。而赫本当时和她的同龄人一样，成了受益者。这不仅让她渡过了难关，还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赫本随着母亲一起从荷兰来到了英国的伦敦，当时她们的全部财产就只有省吃俭用存下来的100英镑。赫本一开始想进入芭蕾舞学校继续深造，但在几个月的训练之后，她被告知因为童年时的营养不良影响了身体发育，所以她已不适合再做一个芭蕾舞舞者了。

怎么办呢？

并没有因此被击倒的赫本，开始转职做兼职模特补贴家用，并开始参与歌舞团的演出，同时参加一些电影的演出。

那一年，奥黛丽·赫本19岁。

一条她从未想过的道路，正在前方不远处等着她。



练习芭蕾舞的赫本

3

最初，赫本当然是以“跑龙套”的角色登台的。

从负责讲解的空姐到瑜伽女学生，从女店员到电话接线员，赫本在电影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直到1951年，22岁的她接到了犯罪电影

《双艳姝》的拍摄邀请——那是她第一次以女主角的身份出演电影。这部电影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对奥黛丽·赫本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过往的点滴，都是成功的序章。

因为主演《双艳姝》，有了一定知名度的赫本随后接演了电影《蒙特卡洛宝贝》，在赴法国拍摄取景的时候，她意外被看中成了音乐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这部剧在美国百老汇连演了219场，赫本更是因为自己的表演才能获得了托尼奖（美国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但这并不是全部。



赫本正在帮自己的舞台剧张贴广告牌

因为主演《双艳姝》，赫本被这部电影的导演狄金森推荐给了著名

导演威廉·惠勒。惠勒在看了赫本的试镜表演之后，觉得她非常适合主演自己即将开拍的那部浪漫轻喜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叫《罗马假日》。

《罗马假日》的故事结构其实非常简单：即将继承王位的欧洲某国公主安妮（赫本饰）出访各大城市，受到热烈欢迎。在最后一站城市罗马，觉得受到束缚的公主悄悄在晚上溜了出来，结果遇到了一位美国记者乔（格里高利·派克饰）。乔试图用偷拍曝光一个关于公主的大新闻，但两人却阴差阳错地在罗马度过了开心而又浪漫的一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最终，必须要回到王室的公主和良心发现的记者在众目睽睽之下假装互相不认识，握手告别。



奥黛丽·赫本在《罗马假日》中饰演的安妮公主形象



《罗马假日》让罗马的这个景点成为热门的游客打卡地，把手伸进去假装被咬成了拍照的标准姿势

在这部电影中，安妮公主这个角色似乎是为奥黛丽·赫本度身定做——美丽、优雅、天真、善良、活泼，赫本几乎只要本色出演，就将一个高贵雍容又美丽率真的公主呈现在了公众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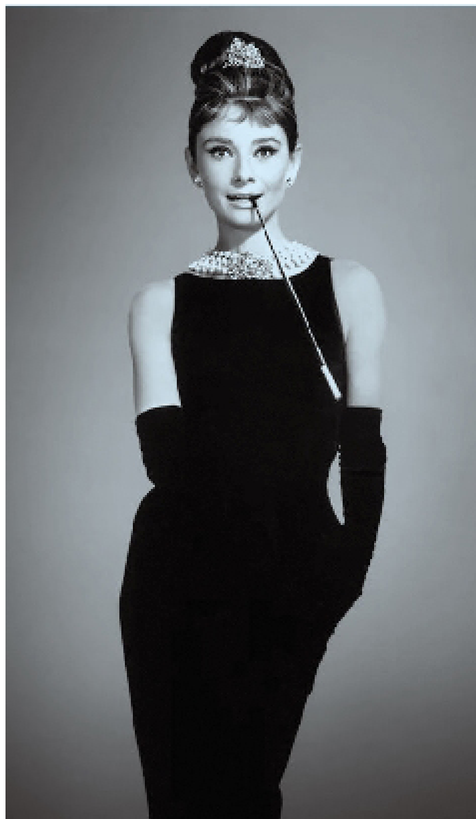
结果当然是一炮而红。在1954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罗马假日》获得7项提名和3项大奖，其中，赫本摘取了分量最重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那一年，赫本才23岁。

成为奥斯卡影后的赫本自此开始片约不断，她陆续接演了《龙凤配》（第27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黄昏之恋》、《翠谷香魂》、《修女传》（第32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等一系列电影，知名度大大提高，片酬也一路看涨。但真正让赫本继《罗马假日》之后在电影史上奠定地位的，是她在1961年主演的电影《蒂凡尼的早餐》。

赫本在这部电影中一举打破了自己以往塑造的清纯美丽形象，扮演一个渴望通过钓到“金龟婿”而跻身上层社会的应召女郎霍莉。

这部电影的原作小说作者楚门·卡波特其实一开始并不认为奥黛丽·赫本是最佳选择，他心目中的女主角位置是留给玛丽莲·梦露的，因为他觉得赫本并不具备那种“特质”。



赫本在《蒂凡尼的早餐》中的形象

然而，赫本的演出却让人眼前一亮，重新赋予了那个一门心思钻营甚至偷窃的“霍莉”一个全新的内涵，也让影片男主角保罗无法抵御霍莉的魅力变得真实可信——谁能抵御这种让人窒息的美丽呢？

而《蒂凡尼的早餐》对赫本而言，还有另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她成了时尚界的一个标杆。在这部电影中，奥黛丽·赫本穿的那条纪梵希小黑裙成了经久不衰的经典。

事实上，赫本和纪梵希的合作从《龙凤配》就开始了。当时由于纪梵希并没有时间接待赫本，她自己去纪梵希的仓库中挑选了三件上一季的衣服作为戏服。那三件衣服其实并不符合当时时尚搭配的主流审美，但经赫本穿上身后，却大放异彩，不仅让这部电影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服饰设计奖，而且成了万千女性选择搭配的标杆。



时尚界后来多了一个名称：赫本裙

《蒂凡尼的早餐》帮助奥黛丽·赫本获得了第34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她的声誉和成就在好莱坞乃至整个欧美影坛已经毋庸置疑。

然而，一些质疑也随之而来。

4

对赫本来说，她那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典雅魅力，有时成了一把“双刃剑”。

《罗马假日》上映的20世纪50年代，恰逢二战结束，美国刚刚开始进入一个物质和精神都变得富足的时代：人们对未来充满憧憬，彼此之间相互尊重，讲究礼节，追求优雅。所以奥黛丽·赫本的清新典雅形象非常符合当时人们的期待，被认为这就是“女性应有的样子”。

但在经历了超过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美国人的审美开始出现了转弯，在“嬉皮士运动”的助力下，涉及暴力、凶杀、色情等内容的电影开始受到欢迎，而对电影女主角的评价也开始变得多元化——如果你只会展现“美丽”或“优雅”的一面，会被不少人认为“演技单一”，甚至是“花瓶”。

但这并不能说是奥黛丽·赫本的错。尽管她演的任何角色，都会有“赫本的影子”，但她的那种优雅和魅力确实是由内向外散发出来的，是出于本性，而不是矫揉造作故意演出来的。

其实赫本也一直在尝试做突破和探索。

1967年，奥黛丽·赫本主演的惊悚电影《盲女惊魂记》上映。这部电影叙述的是盲女苏茜（赫本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到了一个装有毒品的玩具熊，在她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前来寻找的毒贩冒充她丈夫的朋友闯入家中，不断套取玩具熊藏在哪里，孤身一人的苏茜与匪徒不断周旋，经历无数次凶险之后最终化险为夷。



凯瑟琳·赫本是和奥黛丽·赫本几乎同时代的伟大女演员，因为有同样的姓氏，所以她们两人一直被拿来做比较。当时舆论认为凯瑟琳·赫本“演啥像啥”，所以她才是演技派的代表

赫本在这部惊悚电影中展现了精湛的演技，她为了能扮演好盲人这个角色，在拍摄中甚至可以保持全程不眨眼。而这部电影也为她带来了第五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盲女惊魂记》的剧照

但是，又一个颇为尴尬的现象发生了：尽管赫本在角色定位上做了大胆的突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却对此印象并不深刻甚至视而不见，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赫本就应该是《罗马假日》中那个样子，那个永远光彩照人，甚至令人不敢正视的清新典雅女神。

在《盲女惊魂记》上映的这一年，奥黛丽·赫本38岁。那是一个作为成熟女演员转型的关键时期，而赫本似乎也证明了她有能力做到。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赫本宣布息影了。

5

赫本之所以选择告别影坛，是因为爱情和婚姻。

赫本的第一段感情发生在她21岁的时候，当时她的男友叫詹姆斯·汉森。在赫本主演的《金粉世界》音乐剧巡演进行到第四场的时候，她宣布将在巡演结束后和汉斯结婚。然而之后由于《罗马假日》大获成功，赫本开始片约不断，两人聚少离多，再加上赫本的母亲极力反对这门亲事，最终，赫本宣布与汉森解除婚约。

赫本的第二段感情发生在1953年，对象是《罗马假日》中男主角格里高利·派克介绍的美国剧作家梅尔·费勒。当时赫本24岁，而费勒已经

36岁了，之前还有两段婚史。但可能是因为从小缺乏父爱，赫本迷上了具有成熟男人气质的费勒。一年多之后，两人在瑞士结婚。

赫本一生渴望家庭生活和亲情，所以她为这段婚姻注入了所有感情。由于童年时营养不良造成的体弱多病，赫本经历了两次流产，终于在1960年生下了儿子西恩。

然而，由于两人在事业上存在巨大的差距，相对默默无闻的费勒开始从“慈父”角色向“严父”角色转变，过问赫本在演艺事业上的各个环节，这渐渐让赫本难以接受。尽管《盲女惊魂记》是费勒担任的制片人，但就在这部影片结束拍摄之际，两人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在生下儿子后，赫本与费勒的合影

为了处理家庭、爱情和事业中的矛盾，也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赫本选择放弃事业——宣布息影。但这一切努力并没有换来回报，1967年9月1日，赫本与费勒正式宣布分道扬镳。

1968年秋天，剪去一头长发的赫本独自到希腊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她认识了一位叫安德烈·多蒂的意大利心理医生。多蒂彬彬有礼，风

趣幽默，一路上对赫本展开了热烈的追求。赫本当时可能不知道，多蒂在14岁时第一次看《罗马假日》后就对自己的妈妈说：“我长大要娶这个女人为妻。”



赫本与丈夫多蒂一起送孩子上学

可能是对家庭生活太过渴望，刚刚从一段失败婚姻中走出来的赫本，在1969年1月，再次穿着纪梵希设计的粉红色针织连衣裙，与多蒂出现在了教堂之中。

已经息影的赫本这一次更全身心地投入婚姻中，她陪丈夫逛街，送孩子上学，并且生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卢卡。有一次，在一位伯爵夫人家中，赫本发自内心地说：“我又在爱中，又幸福了。……我已嫁给了一个我爱的人，愿意按他的日程表生活了。为什么还要重新去工作？去过那种我不想过的生活呢？”

然而，赫本又一次失望了。

在婚后规矩一段时间后，多蒂最终还是露出了花花公子的本色。他与各类女演员、女模特甚至应召女郎在夜总会、脱衣舞俱乐部中被拍下的照片，经常被登在报纸的醒目位置——因为他是“女神”赫本的老公。赫本后来才知道，丈夫在自己待产期间就已经开始恢复猎艳生活了。

这对一直希望从家庭获得安全感的赫本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她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能付出的一切，但最终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赫本曾经试图挽救这段婚姻，她尝试自己隐忍，将注意力都放到孩子身上，甚至和丈夫去了一次夏威夷度二次蜜月，但最终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两人开始分居。1981年，赫本与多蒂低调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一生渴望家庭但无法获得的赫本，终于还是对婚姻感到失望了。在此之后，赫本遇见了荷兰演员罗伯特·沃德斯，两人彼此找到了心灵的慰藉，最终住到了一起。此后10余年，两人相濡以沫，互相扶持，彼此珍惜，赫本称沃德斯是自己的“灵魂伴侣”。

只是，赫本最终没有再选择结婚。



赫本与沃德斯在一起

6

1975年，46岁的奥黛丽·赫本宣布复出影坛。

8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电影界已经天翻地覆。很多赫本熟悉的拍摄流程、导演要求、演员技巧都已经跨越了一个时代，整个电影制造产业变得更紧凑，也更趋向流水线化。赫本还是很快适应了这一切，她主演的《罗宾汉与玛丽安》《血统》《哄堂大笑》等电影，都获得了不俗的口碑。

但晚年的赫本，已经找到了一件她认为更有意义的事。

1988年，59岁的奥黛丽·赫本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童年受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的事情，她一直记得。对于赫本来说，那绝对不是一个虚荣的头衔，她真的为此付出。她开始不定期地举行一些音乐会和募捐会，为全世界贫困地区的儿童捐款募资。

而赫本更愿意亲身到贫困地区去。没有专机，没有车队，没有浩浩荡荡的随从，赫本曾坐在货运飞机里的米袋上，辗转十几个小时，飞到充斥着战火与传染病的埃塞俄比亚，去看望那里的孩子，真心地拥抱和亲吻每一个孩子。她曾说过："当你长大时，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别人。"

有些明星去贫困地区慰问时，都要特地关照摄影师精心修剪那些拍摄的照片，而赫本却让助理关照摄影师："告诉他们别动我的脸（上的那些皱纹），那些都是我的收获。"

1992年，赫本去了兵荒马乱的索马里。当她看到大批因传染病和饥饿死去的儿童像牲畜一样被装在卡车上运走时，她实在忍不住了，不顾被传染的风险，爬上卡车去查看会不会还有幸存的儿童。

其实那个时候，赫本自己也在忍受病痛的煎熬。而且她自己也没有想到，1992年的索马里之行，是她的最后一次慈善行程。



1992年，奥黛丽·赫本在索马里

1992年11月，长期忍受腹痛煎熬的赫本去做了一次检查，她的腹腔内被检查出了癌细胞。经过几个月的化疗之后，癌细胞还是扩散了。

7

1993年1月10日，赫本最后一次走进自己家的花园。

在自己的灵魂伴侣罗伯特·沃德斯的搀扶下，赫本依依不舍地抚摸着花园里的每一株植物，仔细告诉沃德斯不同的养护要求。因为赫本自己也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她无法亲自完成这个任务了。

在最后几天躺在床上的时候，守候在床边的儿子问赫本：是否还有什么遗憾？

赫本说："没有，没有什么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

1993年1月20日，奥黛丽·赫本因为结肠癌病逝，享年64岁。

在她的葬礼上，和赫本结下一生友谊的纪梵希成了抬棺人，而当时已经77岁的格里高利·派克也专程赶来，与当年的女搭档含泪告别。

赫本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全世界各地的影迷都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之中，他们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悼念活动，哀悼他们心目中永远的“天使”离开了人间。

而有一座城市，更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自发来到了河边，点上了蜡烛，放上了鲜花。

那一座城市，是罗马。



奥黛丽·赫本的葬礼

馒头说

我相信，赫本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且是“完美女神”。确实，无论是从东方审美还是西方审美的角度，赫本留下的一系列荧幕和平面形象，都是那么光彩耀眼，可能再挑剔的人都很难找出毛病。

然而，世间又哪有“完美”二字？

以“美丽”和“优雅”著称的赫本在初入演艺圈的时候，被人评价“脸大，腮长，腰太细，腿太短”，并不是一个“美人胚子”。

很多人很羡慕赫本永远能保持一副瘦削的身材，但大家未必知道那是因为她从小经历战争而造成营养不良，落下了一身的疾病。

一向“本色出演”的赫本，最初曾因为无法在电影中流泪而被导演批评，在《罗马假日》的那场流泪戏中，最后被导演狂骂“浪费胶卷”，才紧张委屈地掉下了眼泪。

赫本相信爱情，渴望亲情，愿意为家庭付出一切，甚至付出息影的代价，但两次婚姻都让她伤痕累累。

大家总是觉得赫本是“美丽优雅”和“雍容华贵”的代名词，但其实她一直在尝试突破和创新，就连《罗马假日》，她其实演绎的也是“落跑公主”的角色，只是因为她的形象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以至她的转型一直艰难无比。

其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会选择性地忽略，因为我们只需要一个“完美”的奥黛丽·赫本，那是大家心目中一个人应该有的完美样子。然而，加上这些细节和血肉之后，奥黛丽·赫本其实从平面走向了立体，并且无损她的形象。

更何况，她最终把自己的小爱升华成了大爱，让世界认识到了一个美丽的人应该具有的魅力——当然不只是容颜。

经历过战乱，体会过饥荒，为了家庭而甘愿牺牲事业，受过伤害却依旧相信感情，最终愿意为世界奉献爱，这很可能就是奥黛丽·赫本至今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完美形象的重要原因。

在经历了生活的痛苦之后，依旧相信生活，热爱生活，这是最宝贵的。

曾经沧海仍为水，天使依旧在人间。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奥黛丽·赫本的生平简介》（人民网，2019年8月1日）

2.《奥黛丽·赫本：高雅女神的另一面》（李夏至，《北京日报》，2015年4月7日）

3.《奥黛丽·赫本父母经常争吵　父亲对其冷漠》（《武汉晚报》，2014年6月5日）

4.《天使睡去15年》（《竞报》，2008年1月21日）

自然的抗争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被视为万物之灵长。

然而，我们真的是这个星球的主宰了吗？真的是不可击败的吗？

在地球这个大自然生态环境中，有些生物灭绝人类的手段，其实比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还要高明得多。

在如今这个大环境下，尤其值得我们感慨和反思。

1910年，那场在东北暴发的鼠疫

当人类面对突如其来的看不见的杀手时，最需要做的，究竟是什么？

1

这是1910年9月。

每年的这个季节，大量猎人涌入位于中国东北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满洲里，开始大规模捕猎一种被称为“旱獭”的动物。

旱獭，是松鼠科中体型最大的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它的另一个称呼——“土拨鼠”。

旱獭的肉是可食的，脂肪可以入药，但最珍贵的，还是它身上的毛皮。

旱獭的毛皮皮质好，坚实耐磨，经过加工后可以和貂皮媲美，所以在20世纪初的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宣统二年（1910），一张旱獭皮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2卢布——大致相当于当时的一两白银。仅1910年，从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就达到了250万张。



旱獭

由于每年的9月前后是土拨鼠皮毛生长最好的季节，所以人手短缺的俄国人就雇用了大量华工，一起捕捉旱獭。那些从直隶和山东被招募过来的中国苦力，最初并没有什么捕捉旱獭的经验，但好在这个季节的旱獭相对便于捕捉，聪明勤劳的华工很快学会了捕捉的方法。

尤其是他们发现，运气好的话，会遇到一种“呆笨”的旱獭：这类旱獭步履踉跄，碰到猎人时既不能跑，也不会叫，而是傻傻地待在原地，只需要一棒子打死就行。猎人们发现，这类旱獭的眼睛中有乳白色的云状物体，而且会被同类抛弃，不被允许与其他旱獭同居一穴。

每每遇到这类旱獭，猎人们就会庆幸自己运气不错。他们也知道，这是一只生病的旱獭，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捕捉到。他们像对待其他旱獭一样，将它们的皮徒手用刀剥下，至于肉，就做成一顿改善伙食的大餐。

至于这只旱獭究竟生了什么病，大家并不关心。

事实上，以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旱獭究竟得了什么病。

旱獭得的是由耶尔森菌属中的一种细菌引发的烈性传染病。这种传染病，曾在14世纪中期的短短6年时间里导致近3000万欧洲人死亡。

它曾被称为“黑死病”，但更官方的叫法是鼠疫。

2

那一年，究竟是谁先感染了鼠疫，有多种说法。

按照《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的记载，是这样的：“工人张万寿者，向在俄境大乌拉站以招工为业。宣统二年九月初，工棚内暴毙七人。俄人闻之知为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并将工人所有衣服行李等件尽行烧毁，以为断绝疫根之计。

“大乌拉站距满洲里百三十里，有业木工者二人被逐，于九月十七日由乌拉站来满，寓居铁路界内二道街张姓木铺，二十三日疫发相继死亡。同院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郭连印二人遂亦传染于二十三日身死，是为满洲里疫症发现之起源。”

若按这份记载为准，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鼠疫的初发时间，是在1910年9月中上旬；

第二，初发的地点，是在俄国境内；

第三，最初感染鼠疫的，是华工；

第四，俄国人已经知道是疫情，而不是一般的传染病，但他们只是做了简单粗暴的驱逐；

第五，在驱逐后，鼠疫被华工带回了满洲里。

当然，在当时的第一时间，很多人未必知道感染的是鼠疫——事实上，致命的细菌还在最先接触旱獭的猎人们身上潜伏，倒是通过交叉感染在木匠们身上暴发了。

20世纪初的那个秋天，广袤的东北大地提供了鼠疫传播的理想环境：

天气渐凉，一个旅店的大炕上往往要躺十几乃至几十个人，大家互相抱团取暖，房间密闭，空气极不流通。

在寒冷的天气洗澡和洗头，对于当时的东北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不佳的卫生状况加速了细菌的传播。

当时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防疫”意识几乎等于零，各地也没有必要的防疫设施和机构，对现代医学的概念也毫无认识，老百姓生病后甚至会求助于“跳大神”这类封建迷信来治病。

尤其关键的是，东北当时拥有中国最完善的铁路系统。在俄国和日本控制下的铁路体系，一开始也没有对疫情有足够的认识，大量已经被细菌感染的旅客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将鼠疫传播向四面八方。



20世纪初东北大车店的内部

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一场惨剧开始上演。

3

灾难最先爆发的地点，是哈尔滨的傅家甸。

从1910年12月10日开始，一直到1911年1月7日，傅家甸每天都有超过100人死亡。感染此病的人往往在两三天后就胸闷，头痛，呼吸困难，浑身青紫，最后痛苦而死。

关键是，这种疫病的致死率极高——在疫情暴发阶段，傅家甸确认染疫人数为1535人，死亡1535人。

吉林省也未能幸免。1910年12月14日，长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每天因疫病死亡的人数超过50人。

在奉天省的奉天市（今辽宁省沈阳市），1911年1月2日出现首个病例，随后迅速蔓延到城市和乡村。有一个男人从市内回到村里，染病而亡。全家7口人在照传统习俗为他举办葬礼后，几天后相继染病而死，只留下一个婴儿。邻居们帮忙埋葬了这一家，拿走了这家人在屋内的各种物件，随后接连死去，最终除了一名70多岁的老妇人和3名婴儿外，全村150人全部死亡。

一时之间，东三省风声鹤唳，棺材脱销，道路边甚至随处可以看到横躺着的尸体。



当时的东三省，四处可见横尸街头的景象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的中央政府一开始也没有足够重视。直到1月12日北京、1月14日天津分别出现首例病例后，意识到疫病已经威胁到京畿安全的清政府，终于发布上谕：“东三省鼠疫流行，著预于山海关一带设局严防，认证经理，毋任传染内地，以为民生。”

但为时已晚。

所幸即便是临时抱佛脚，清政府还是拿出了一定的办事效率：立刻开始筹措防疫资金，设立“东北防疫总局”，聘请国内外的防疫专家到东北帮助防疫。

这三项措施的前两项，都是投入钱和精力就可以做到的，但第三项，却没有那么简单。

当时，在东北拥有各自势力地盘的俄国和日本，都站出来指责清政府防疫工作指挥不力，进而提出要独揽东三省防疫工作。

防疫需要调动从军队到警察到各个部门，所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防疫，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年仅31岁的华人被推到了时代舞台的正中央。

1911年1月，这位华人被正式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他的名字，叫伍连德。

4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



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但按1909年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规定，父亲出生在中国，即拥有中国国籍，所以伍连德也是中国人

1896年，17岁的伍连德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曼纽尔学院，毕业后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随后又到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医院进行实习和研究，最终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

1907年，28岁的伍连德接受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邀请，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院长），其个人命运开始与祖国发生关联。

1910年的东北鼠疫暴发后，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洞悉日俄欲借“治疫”之机行统治东北之实，所以力荐由本国人担任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就是在施肇基的极力推举之下走马上任

的。

伍连德上任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先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次疫情——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是鼠疫。

为此，伍连德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成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医学意义上解剖人体的人。

12月26日晚上，傅家甸有一名嫁给中国人的日籍客栈老板娘染疫暴卒。第二天一早，伍连德和助手就赶到事发地，在贫民区的一栋小楼里开始解剖尸体。

伍连德从死者的右心房抽取了血液样本进行细菌培植和涂片观察，同时通过切开死者的肺脏与脾脏表面提取组织块放入盛有福尔马林液体的容器里。在完成这一切后，伍连德将死者器官复位，缝合好表皮，为之穿戴整齐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棺材中——这一切都是瞒着外界进行的。

之后的四天时间里，伍连德在实验室里进行了紧张的分析和研究。在高倍显微镜下，伍连德看到所有切片中都出现了成群的鼠疫杆菌，而且是特有的两头着色的卵圆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伍连德提出了这次东北疫情的源头，是一种之前并没有见过的肺鼠疫——不同于之前通过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肺鼠疫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尤其是飞沫传播，所以杀伤力极大。

在搞清楚了疫情的起因之后，伍连德立刻开始防疫工作。



伍连德在实验室

但是，困难比他想象的要大很多。

5

伍连德首先遭遇的，是民众的信任问题。

在现代医学尚未普及的那个年代，广大中国人只信中医，认为西医都是“洋人的玩意儿”。疫情暴发之初，东北各地不少中医给出的判断是“疠气致疫”或“干燥致疫”，各种中医“偏方”也开始频频出现，很少有老百姓愿意去西医诊所。而中医们也确实相信自己能够对抗这场疫情，都勇敢地冲到了第一线。

结果，在长春某个10万人口的地区，登记备案的31个中医，有17个染疫而亡，这个结果让老百姓开始涌入伍连德在各地开设的鼠疫医院寻求帮助。

第二个是卫生习惯问题，比如戴口罩。

由于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播，所以戴口罩是一项简易却非常有效的预防办法，但当时中国人几乎没有戴口罩的习惯，甚至那些中医在接待病人的时候也不佩戴，这也是造成中医人员大量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火车上被隔离的妇女和儿童

为此，伍连德和他的助手们大力提倡每个人都要佩戴一种他发明的简易口罩：用外科手术用的洁白纱布制作，被称为“伍氏口罩”。随着疫情的加重，街上戴口罩的中国人开始多了起来。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戴口罩的正确方法，有的套在脖子上，有的挂在耳朵上，但随着正确佩戴口罩的人慢慢增多，疫情的交叉传播得到了有效遏制。

第三个是习俗问题，比如过年走亲访友。

1911年的除夕是1月29日，正值疫情的高发阶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春节要回老家，还要走亲访友，这给疫情的传播提供了最可怕的人传人渠道。

为此，伍连德上奏清政府，并请俄国和日本政府配合，严格管控东三省铁路，派人沿途巡查，不允许携带细菌的人群继续流动。

此外，伍连德奏请调来了1160名职业军人和600余名警察，进行防疫专业训练后投入戒严和检查工作。他将这场鼠疫的源头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都委派军队、警察和高级医官分工合作，设立隔离区、消毒区、办公区和医务人员宿舍，密切监控街道上一切流动人员，所有参与防疫工作的人员每天都要进行严格消毒。当然，警察的另一项工作是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弹压部分不肯理解或合作的群众——他们认为

政府不让他们走亲访友乃至隔离是“违背人性”和“伤天害理”的。



当时设立的“疑似病院”

第四个问题，是社会舆论问题，比如谣言。

疫情一发，谣言四起。其中一类谣言，就是这次疫情是来自“邪恶敌人的攻击”，比如说是俄国人或日本人干的。当时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这次的疫情是日本人在东北水井里投毒引发的，目的是“毒死全部中国人”。



当时设立的临时消毒所

尽管日本当时对中国的东北确实存有狼子野心，也确实在背后搞过不少小动作，但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细菌攻击，有一条逻辑是说不通的：当时在东北有大量日本侨民，他们没必要进行如此“无差别攻击”。

当时的《盛京时报》在1月27日的文章中也指出了这条逻辑问题：“夫疫症为害最烈，中外莫不畏惧，日人亦居奉天，岂独不怕传染乎？是以谣传不辨自明。”

事实上，恰恰是因为俄国和日本在当时的中国东北有大量利益，所以它们反而是最积极的防疫合作者。伍连德也深深认识到了这一点，和俄国与日本援助的医疗力量密切合作。在防疫过程中，甚至出现日本的医官及其妻子在照顾中国病人时双双染疫而亡留下三个孤儿的事。

截至1911年3月3日，日本投入东北的防疫经费是1427万日元，俄国是24万卢布。

应该说，至少就防疫这件事而言，中日俄三国是密切合作的。

另外一类谣言，自然就是夸大疫情，制造恐慌。伍连德深知，杜绝谣言的最佳办法，就是透明公开。在他的主导下，很多地方沿路开始张贴“疫情形势表”，奉天防疫事务所自1911年1月20日开始，每天发布从前一天晚上6点到当天晚上6点的“疫病患者表”，表格里，从“本日新患

疫”到“疫死者”到“患疫者总数”，每一条都非常详细。

在这样的举措下，谣言开始明显减少。

第五个问题，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比如土葬。

伍连德经过研究发现，鼠疫细菌在人的尸体上能存活长达6个月，而中国人讲究土葬，疫情高发时，很多尸体甚至就裸露在外摆放，而坟场则成了一个巨大的传染源，这无疑大大增加了鼠疫的传播概率。

但要求尸体一律火葬的提议，又遭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这和中国老百姓崇尚“入土为安”的观念相抵。

关键时刻，伍连德得到了施肇基的大力支持，由施肇基不断上奏，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最终拍板：疫区的尸体一律统一火化。



当时连同患疫者使用过的物件一律焚毁

事实证明，伍连德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都是非常有效的。

6

1911年1月31日，是令当时东北疫区的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日子。

在这一天，东北疫区的死亡人数第一次出现了下降。

在这之后的2个月里，这个数字一直在持续下降，并没有出现过反复——这意味着疫情指数已经越过了拐点，开始掉头向下了。

3月1日，伍连德记录了东北疫区最后一个鼠疫病例。到了这时，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疫情终于完全控制住了。

但这场疫情，对当时东北地区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从1910年10月25日至1911年4月18日，仅在东三省，这场鼠疫就夺去了近6万人的生命，其中情况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有5693人死亡，占到该地全部人口的1/3——即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染疫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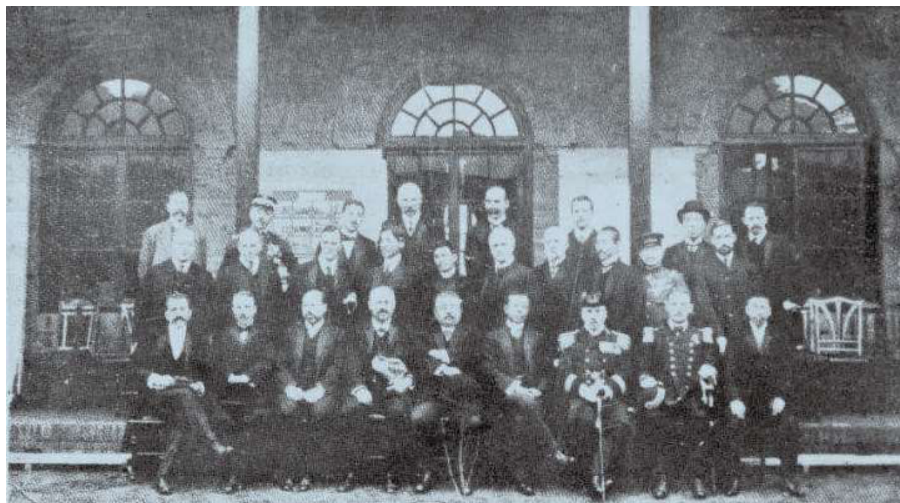
但换个角度来看，从疫情暴发到疫情结束，满打满算也就5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当时清政府的能力、东北地区的卫生条件状况和人们对疫情的认知，这场疫情能及时控制住并且没有造成更大扩散，已经是一个奇迹。

而这场鼠疫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让中国民众初步普及了现代卫生知识，让国家初步确立了防疫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伍连德确实功不可没。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大会的主席是伍连德，来自英、法、美、俄、日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专家出席了这场会议——这是近代在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学术会议。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开了1901年到1950年之间的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在1935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中，人们找到了一位获得提名的中国人。



“万国鼠疫研究会”部分参会人员合影，第一排右四为伍连德

他是那50年中，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提名的中国人。他叫“Lien-Teh Wu”。

没错，就是伍连德。

馒头说

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说过一句话：“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

很多人当初听到这句话时，觉得很诧异，但仔细回想一下，其实不无道理。

回顾人类历史，造成最多生命消失的其实不是战争，是细菌和病毒造成的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战，算上平民一共死亡1600万人，而一次黑死病仅在欧洲就夺走近3000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约有7000万人死去，而天花病毒在18世纪大约夺走了1亿以上人的生命。

远的就不说了，就说2020年这场我们与病毒之间的战争，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其蔓延之快，影响之大，让人心悸。

在这个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闪光点，很多动人事迹和感人画面，但也看到了很多值得反思、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种影响整个人类的危机面前，我们不能每次都把希望

寄托在具体的某一个人上面，无论是伍连德还是钟南山，而是应该有一套能立刻高效运转，每一个环节都不应该出现纰漏的成熟机制和体制——在这一方面，我们依旧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而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上升到整个人类层面的话，我们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时至今日，人类科技文明的发达程度已远非我们的先辈们所能想象，上天入海，似乎无所不能。但在未知细菌和病毒面前，人类文明却又像一棵随时可以被掐断的小草一般孱弱——我们的这份自信，又是从何而来？

我曾看到某卫视新闻采访一名医务工作者，连夜操劳的他在镜头面前依旧保持昂扬的斗志，他不无悲壮地说：“只要精准防控，精心医治，在人类面前，任何疾病都是微不足道的！”（大意）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也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但总觉得他的话有些地方好像不太对。

半小时后，当地的本地新闻再一次播放这条消息，电视编辑把“在人类面前，任何疾病都是微不足道的”这句话给删掉了。

我个人觉得，这位编辑做得对。作为这个星球的万物之灵长，我们人类还是要时刻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敬畏，不等于选择放弃。正相反，有了敬畏之心，我们才会在事前防微杜渐，即便是灾难发生后，我们也会在退无可退之际，迸发出昂扬的斗志和巨大的能量。

人类和细菌、病毒之间的博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我们要学会有敬畏之心，那是对大自然应有的尊敬。

但面对威胁到人类生命的敌人，我们绝不会放弃投降。

加油！加油！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上）、（下）（王道瑞，《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第2期）

2.《庚辛鼠疫与清末东北社会变迁》（李皓，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清末宣统年间东三省鼠疫研究》（李银涛，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4.《清末东北政府防疫措施述评——以〈盛京时报〉报道的1910—1911年鼠疫为例》（任金玲，《商》，2014年第5期）

5.《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伍连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6.《鼠疫斗士伍连德：华人世界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刘玉峰，《三湘都市报》，2013年1月20日）

7.《110年前，中国人战胜鼠疫》（《凤凰周刊》，2020年第3期）

8.《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于永敏、刘进、王忠云，《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4期）

死神狂欢：1918年大流感

这是人类历史上排名前三的传染病，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杀死几千万人。

如今，100余年过去了。

当我们面临新一轮的危机和挑战时，再回过头去看看那场大传染，能够得到什么经验和教训？

1

1918年3月11日，美国堪萨斯州，芬斯顿军营。

列兵阿尔伯特·吉特切尔来到了军医91号大楼。这位连队的厨师向护士说自己感冒了，并抱怨“发冷，咽喉肿痛，头疼且肌肉酸痛”。

护士给阿尔伯特量了体温：39.4℃。

这确实是感冒的症状，护士随后按照规定，将阿尔伯特转入隔离病房进行隔离。

此时，离原本宣布中立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11个月了，大批美国士兵已远赴欧洲参战，而国内的各个军营也进入了战备状态——一个士兵的感冒发烧，并没有引起重视。

但情况似乎很快就发生了变化：3天之内，芬斯顿军营内感冒的士兵就增加到了500多人，3周内增长到了1100人——这还只是到医务所来求助的人的统计数字。最终，其中有230名士兵发展成了肺炎，38人死亡。

不过，考虑到驻扎在芬斯顿军营的军人接近4万人，相对于在炮火连天的欧洲出生入死的同胞们，再参考季节性流感的死亡率，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相关方面的重视。

有资料显示，其实在1918年1月到2月的农闲时节，位于堪萨斯州西南部的哈斯克尔就已经出现了“感冒流行”的情况，并且有过一天之内18

人感染、3人死亡的记录。但后来人们追根溯源，还是更愿意把确切的时间定为1918年的3月11日，而地点则锁定在芬斯顿军营。

那位以为自己只是得了普通感冒的列兵阿尔伯特，并不知道这种“感冒”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一种致命传染病。

在1918年至1920年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这种传染病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据最保守估计，至少有4000万人，最多有1亿人被夺去生命——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才17亿。

这场灾难性的传染病，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

而在目前已知的记录中，1918年3月11日的美国芬斯顿军营，其实是能确定的这场传染病的最早发生地。

2

当致命的流感在美国蔓延之后，欧洲很快也被卷入。

至今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当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欧洲是从何时何地开始被病毒攻陷的，但如果以有据可查的第一例美国病例来看，不排除是由增援欧洲的美军参战官兵把病毒带过了大西洋。

后来西方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才是这场致命传染病的发源地，欧洲的大面积暴发是因为一战期间14万到欧洲支援的华工将病毒带过去的。（他们认为之前在美国出现的病例也是由华人带去的）。

考虑到一些西方人始终带有优越感地认为中国人是“肮脏、不讲卫生的低等民族”，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论调倒也并不令人意外。但从时间上来看：第一批大约1000名华工在1916年8月就抵达了法国马赛港，1917年华工就达到了人数巅峰，而一直都岁月静好的欧洲直到1918年春季，也就是美国出现病例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暴发流感，病毒由中国人带入的推断似乎很难成立。



一战期间，在一家法国火药厂工作的华工（关于一战华工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一战”，被遗忘的14万中国人》）

不过，流感病毒并没有闲情雅致等待人类去追根溯源。从1918年4月开始，流感病毒如同被点燃的野火一般，瞬间席卷欧洲大陆，从英国到法国，从德国到意大利，疫情首先在各国军队的军营中暴发——拥挤、闷热、潮湿、空气不流通是病毒传播的理想温床——随后开始蔓延到普通平民。

这一波感冒的流行，虽然波及面很广，但杀伤力却不强：得感冒的人一般三天后症状就消失了，虽然有人因此死亡，但致死率和普通的季节性流感相差得并不太多，所以各国政府并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什么媒体进行报道。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战的炮火声依旧在欧洲大陆隆隆作响。

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的政府，虽然不断接到关于军队发生流行性感冒的报告，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秘而不宣”——战争时期，比控制感冒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对手知道自己的弱点。

但有一个国家，却因为在一战期间属于中立国，所以并没有媒体方面的管制。

这个国家，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也是这一波流感的重灾区，虽然一开始死亡率不高，但受感染人数极多，连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在5月的马德里年度庆典后宣布被感染。而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并没有战时的新闻管制，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媒体，都开始大规模报道这场在西班牙发生的“奇怪的流行性感冒”。

然而，这也造成了一个客观事实：整个欧洲大陆都缄默不言，只有西班牙“流感盛行”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西班牙人其实称这场流感为“法国流感”，因为当时在法国也已经暴发。）

于是，一个西班牙人自己也没想到的结果发生了：这场后来肆虐人间的流行性感冒，就此被很多人称为“西班牙流感”。



阿方索十三世

而西班牙的媒体报道预警，并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当然，这也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1918年夏天开始，经过变异的流感病毒向人类发起了第二波攻击。

在第一波攻击中，死神只是背着双手闲庭信步。

第二波攻击，他终于挥舞起了寒光凛凛的死亡镰刀。

3

关于第二波大流感病毒侵袭的起源地，现在还有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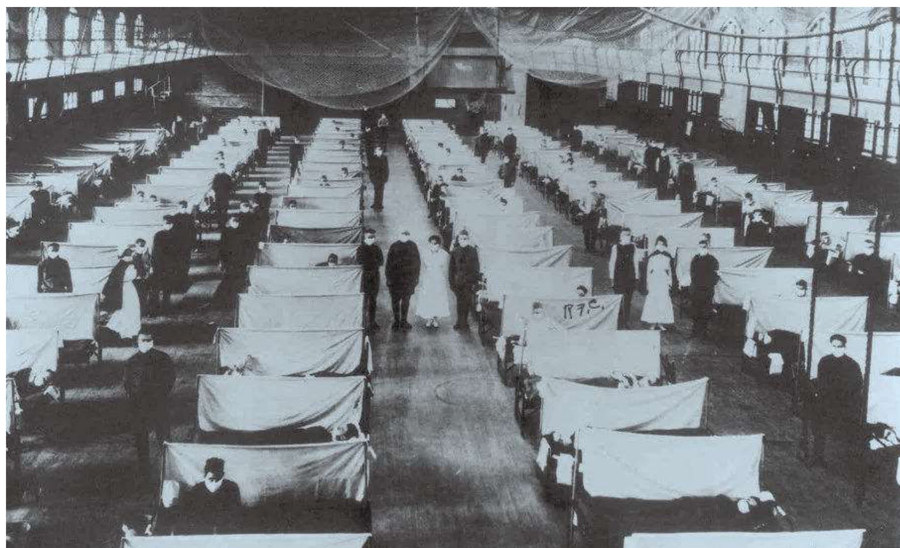
一种说法是英国。1918年8月，一艘从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离港的英国船上发生了致命的流感，在这艘船抵达英国之前，船上75%的船员被感染，其中7%的船员死亡。而另一份资料显示，在更早之前，驻扎在法国埃塔普勒港的一个英军军营内，就已经暴发了不知名的流感疫情。

另一种说法是，疫情源头是当时苏俄的阿什哈巴德（今属土库曼斯坦），但由于当时苏俄处于内战时期，缺乏有效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确定。

虽然源头无法确定，但第二波流感病毒的巨大杀伤力，却是各个国家一致公认乃至心有余悸的：在西班牙，至少有800万人感染了这种流感病毒，有些省份甚至有10%的人口病死，报纸的前四五页往往都是密密麻麻的讣告；在法国，每周因流感死去的人超过了1200人；在英国的英格兰地区，每周因流感死亡的人数超过4000人；在德国，流感夺去了超过40万人的生命。

先是发烧、咽痛，然后浑身疼痛，速度快的话当天症状暴发，当天就死去——这样的场面出现在欧洲各国的各个城市。

到了此时，这场降临到人间的瘟疫开始显示出它狰狞的真面目：从欧洲到亚洲，从英国到印度，全人类都陷入了这场浩劫之中——在短短6个月之内，居然有至少2400万人被这场所谓的“感冒”夺去了生命。事实上，限于当时各国各地区统计能力的不同，实际死亡人数很可能比统计的要多得多，比如在亚洲的重灾区印度，至少就有1200万人死于这场流感。



流感暴发时，收治感染病人的“方舱医院”

如果要比“杀人效率”，这场大流感在短时间内的致死率已经超过了曾经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场席卷欧陆的战争也打不下去了。

到了1918年秋季的时候，尽管各参战国都高度保密自己军队的“染病”情况，但因感冒造成的“非战斗性减员”已经成了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往往是一整个团一整个团地因感冒而完全失去战斗力，英国至少有20万士兵因为这场流感而丧失了战斗力；美军在9月与法军协同对德军发动“马斯河——阿尔贡战役”，在一个半月的战斗中，美军有近10万人的伤亡，但流感造成的伤亡是7万；德军的统帅鲁登道夫天天接到麾下各个军团因流感而减员的报告，德军的步兵师在6月后的平均患病人数达到了2000人，某些师有近一半的人丧失了战斗力。

在各国都已经打到油尽灯枯的时候，这场突如其来的流感，成了压垮各国，尤其是德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流感暴发时期，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

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浩劫，一共造成1000万人左右的死亡。

而这个数字，还不到1918年大流感造成人类死亡数字的一半——而流感只花了半年的时间。

更糟糕的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各国军人带着病毒，欢天喜地地回到了各自的国家、城市、乡村、家庭。

一场更大范围的疫情随即暴发。

4

接下来，我们从欧洲暂时抽身而出，聚焦两个非欧洲的国家。

一个国家，是亚洲的中国。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可能在这场病毒狂欢中幸免。中国的首个大规模感冒流行报告，可以追溯到1918年5月，地点是浙江温州，当时的情况是有超过1万人感染了“奇怪的感冒”。

在此之前，江苏镇江和山西都有过疫情报告，但因为死亡率很低，所以并没有成气候。更早的一份报告曾追溯到1918年的1月，绥远第一

师的辎重兵在由绥远返回丰镇时带来疫病，导致30余名士兵病死。曾经经历过清末鼠疫的中国人很有经验，这部分士兵立刻被检验隔离，并与其他部队断绝交通。

不过，美国《传染病杂志》主编乔丹（他受美国医学会赞助来审查1918年大流感的证据）经过考察，认为当时在绥远一带暴发的是“肺鼠疫”。

和欧洲一样，这场流感在中国开始造成巨大杀伤力，也是从1918年秋季的第二波开始的。

1918年10月，大流感的第二波已经向中国发起全面攻击，全国各地的疫情不断上报，光上海就有400多人染病去世的记录。

10月19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封署名“屠子香、裴丽生”的读者从浙江绍兴的来信，信中称当地人都感染上一种奇怪的感冒，表现类似“伤风”，称如果伴有咳嗽症状，还可能有活命机会，“否则一经腹泻，旋即毙命”。这封读者来信，描绘了当时中国流感肆虐的情况：“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中，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盖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已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灾区延袤，刻已渐度余姚，西达甬界。”

10月26日，在上海的河南人金策澄的信再次出现在了《申报》上，河南当时的情况也被记录了下来：“鄙人等近接家信，均言豫南七属，因秋旱过久，瘟病大作，轻则寒热，重则死亡。家家如此，莫能幸免。无棺殓尸者遍地皆是，诚数十年来未有之大疫也。”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中国也是这场大流感的受害者之一，但除了一些报载记录外，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关系，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政府和媒体甚至主流医界对流感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定性。

不过，按照乔丹的观点，虽然中国也深受1918年大流感之害，但在1918年3月之前，在中国暴发的流感规模很小，所以都不应该看作“欧洲流感暴发的真正预兆”。

那么，有案可查的第一例流感案例发生的国家，又是怎样的呢？

现在我们把眼光放到另一个国家：美国。

事实上，在堪萨斯的芬斯顿军营暴发流感之后，“得益”于军营宽松的休假制度，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全美36座军营中就有24座报告发现了流感暴发的迹象。

但真正的悲剧是在第二波流感到来的时候发生的，首次暴发地还是在军营。

波士顿以西约30英里（约48千米）的德文斯军营被认为是流感发动第二波“死神攻击”的首发地。这个实际驻扎了4.5万名士兵的营地，在9月初出现了第一例受感染的士兵，随后病毒迅速蔓延，平均每天有100人到营地医务室就医，几天后，这个数字增加到了500名，然后是1000名，直到平均每天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人。

也正是在9月初，拥有170万人口的费城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感染。惶恐的人们传言是德国装载细菌的潜艇带来了瘟疫，但经过排查，拥有4.5万名船员的费城海军造船厂可能才是病毒的传染源——9月7日，这个基地接待了300名来自波士顿的换乘水手。两周后，船厂近1000名船员染病。



美国军营内收治病人的场景

然而，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收尾的阶段，美国作为决定这场

战争走向的关键国家，全国上下需要的是一种欢庆的气氛，而不是疫情带来的惶恐和焦虑。

1918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反煽动叛乱法》，法案规定，凡“散布、印刷、撰写或出版任何对政府、宪法、美国国旗或军服不忠的、亵渎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视的、丑化的或者辱骂的言论”，均构成犯罪，最高处罚金2万美元及最长20年刑期。

这项法案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举报者打了一针“强心剂”。比如一位来自蒙大拿的地产商人，只是因为没有买战争公债和没有扛美国国旗，就被人辱骂为“德国鬼子”，并被捕入狱。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对流感的预警都有被举报成“散播消极论调”和“破坏战争胜利气氛”的风险，所以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或多或少隐瞒流感暴发的真相。

1918年9月28日，费城举行了“自由债券”的大型销售游行，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摩肩接踵，拥挤前行。事实上，费城的医生们事先曾试图说服该市的卫生主管威尔默·克鲁森（Wilmer Krusen）取消这次集会，但克鲁森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宣称已经“将这种疾病限制在目前的范围内，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成功。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记录。不要关心有什么感觉”。



1918年的费城大游行

大游行过后三天，流感开始在费城大面积暴发。此时的克鲁森下令

关闭所有学校，禁止所有公共集会，但为时已晚：费城的疫情导致一天内有759人死亡，在之后的6周时间里，病魔夺走了1.2万费城人的生命。

根据事后的估计，从9月第二波流感侵袭开始，美国光在9月就有超过10万人死亡，10月翻了一倍，整个疫情期间有近70万美国人因此死亡。

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直接降低了12岁。

事后，曾有无数美国学者和专家对这场肆虐全美的大流感进行反思，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就是：

在疫情到来之际，一定要说真话。

6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场大流感本身。这场大流感是何时终结的？是怎样被终结的？

这是一个困扰无数科学家的问题，也是一个让自诩“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感到无比尴尬的问题：人类自始至终没有找到解决这种病毒的疫苗或方法，这场流感在192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场流感杀死几千万人，然后就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事实上，从1919年的冬季开始，流感还进行了第三波攻击，这次甚至扩展到了美国阿拉斯加的因纽特部落。不过就致死率而言，第三波高于第一波，但低于第二波。

这也是让人类感到尴尬的地方：病毒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去自如。

事实上，当时人类对“病毒”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医学界普遍认为，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一种细菌造成的传染病。直到1933年，英国科学家史密斯·安德伍斯（Smith　Andenwes）第一次从人身上分离出这种病毒，并命名为“H1N1”。

1997年，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陶贝格尔（J.Taubenberger）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与同事利用遗传学技术得出的研究成果，认为1918年的流感病毒与“猪流感病毒”十分相似，是一种与甲型（A型）流感病毒（H1N1）密切相关的病毒。

1998年2月，美国国防病理中心（AFIP）辖下的分子病理部门，通过一具被冰封近80年的因纽特女子尸体，得到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一些基因物质。

2002年10月，美国国防病理中心在一次试验中成功制造出了有两个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的病毒。

2004年2月6日，英国国家医学研究院和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院，重建了1918流感的红细胞凝集素。

2005年，科研人员宣布1918年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已被重组。

如今，100余年过去了，人类科学家依旧在探索这场百年前的流感的奥秘。

而新的挑战，正接踵而来。

馒头说

2019年上线的“馒头说论语”课，其中有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向孩子们解释《论语》中的一个精髓词——“仁”。（这门课已经精编并出版成纸质书《写给孩子的论语课》。）

《论语》中有100多次提到“仁”，古往今来，大家对“仁”的解释也有很多种，可以说见仁见智。我选择了我认为的“仁”的一个重要表现来向孩子解释：对其他人要有“同理心”，要能“换位思考”，要学会“感同身受”。其实也就是孔子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之所以想到这句话，也是因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这场波及全世界的疫情中，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拿出来多回味一下。

从对待小区的隔离住户，到看待所谓“重点省份”的人，从接纳境外

归国的华侨，到评价回到祖国的海外留学生，在严格做好防疫措施和严格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一份同理心，做一些换位思考，毕竟，我们都是同胞。

再把格局放大一点，不妨跳出“同胞”这个圈子。

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每个国家在抗疫的过程中肯定也有疏忽和不足，都有值得检讨和吸取教训的地方。如果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对我们冷嘲热讽让我们觉得可笑、不适乃至愤怒，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对别人幸灾乐祸。

当然，需要有同理心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自己。

如果能换位思考的话，我相信美国人肯定也不愿意听到“1918年流感病毒”被称为“堪萨斯病毒”乃至“美国病毒”，正如西班牙莫名其妙背了一个叫“西班牙流感”的锅一样。所以自特朗普以下的一些美国人一口一个“中国病毒”，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光彩的行为——且不说科学研究的结果尚未证实，即便证实了，以地名和国名命名一种“病毒”，本身就是一种缺乏同理心的表现。

没错，西方人未必能够明白东方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但同理心、换位思考这些概念，相信他们应该还是明白的——“同理心”（empathy）这个词，原本就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率先提出的。

无论你是否承认，这次疫情其实正在从各方面——科技、政治、商业、个人隐私等等——改写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和架构，并且再一次向人类昭示了一个道理：迄今为止，所谓“统治地球”的人类文明，在一些超级病毒或细菌面前，其实很可能没有还手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把整个人类看成“命运共同体”，如果还在纠结如何把“锅”甩给别的国家或别的种族，如果还不能拥有一份全人类共同的“同理心”，如果还不能感同身受，那么，人类的结局最终会是怎样的呢？

《人类简史》三部曲的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

“人类需要做出选择。是在不团结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选择一条团结的道路？”

我相信，好吧，我希望，是后者。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凯瑟琳·阿诺德著，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

2.《致命流感》（杰瑞米·布朗著，王晨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3.《反思1918年流感：最重要教训是“对公众说真话”》（“网易科学人”，网易，2017年12月14日）

4.《1918—1919，被一场流感击中的中国》（《经济观察报》，2019年5月13日）

5.《1918年，大流感在中国》（胡一峰，《科技日报》，2013年8月3日）

6.《美国〈反煽动叛乱法〉的兴与衰》（宋石男，《中国经济报告》，2013年第10期）

7.《神秘的世纪杀手：西班牙流感》（丁一，《文史春秋》，2003年第8期）

8.《西班牙流感：环绕在人类头顶的噩梦》（邓国庆，《科技日报》，2004年8月16日）

天花的灭绝之路

病毒，个体微小，结构简单。然而，它们和人类的缠斗，却从未停止。

1

1979年10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做了一个决定：从这一年开始，以后每年的10月25日，都是一个纪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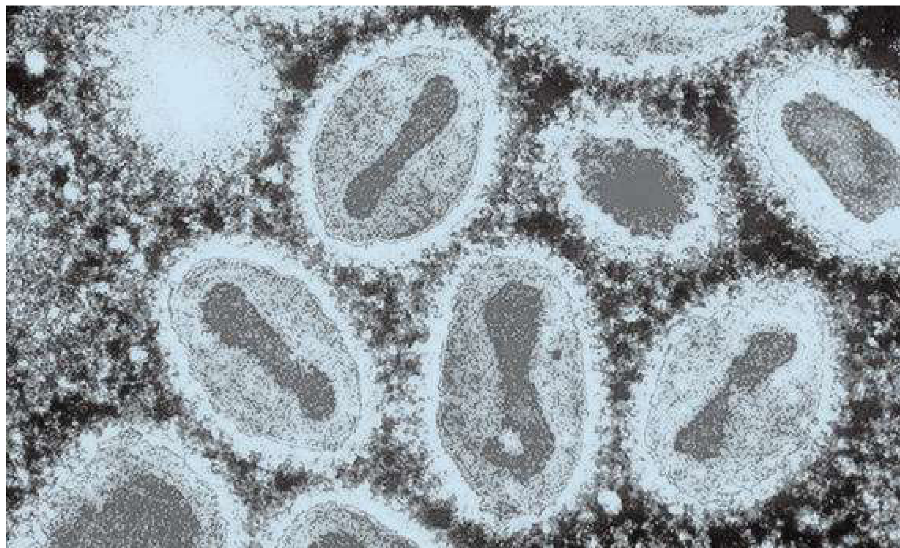
这个纪念日的名称叫作“人类天花绝迹日”。

“绝迹”这个词，听上去好像有点残忍？其实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天花作为一种烈性病毒，终于完全消亡了。

但是，我相信有不少人，哪怕他手臂上有一个痘状瘢痕，也还是会迷茫地问上一句：什么是天花？

2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天花。



这不是凡·高的画，是显微镜下的天花病毒

没有确切资料能证明天花究竟是何时诞生的。一般推测，天花刚开始可能只是家畜身上一种相对无害的痘病毒，但动物和人相处后，尤其是在人类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人畜共居之后，这种病毒传染给了人，发生了变异。

一旦人类感染了天花病毒，大概会有平均12天的潜伏期。感染后的初期症状是发热、头痛和背痛，大概2~3天后，典型的天花红疹就开始密密麻麻地在患者的脸部、四肢、躯干上出现，然后开始化脓。之后的3~4周，疹子开始结痂，然后慢慢剥落。

如果是良性的天花，一般只有1%的患者会有生命危险，但结痂剥落后的部位，痕迹并不会消失，所以患者全身都会出现斑点，这也是以前中国人叫人“麻子”的一个由来。

而恶性的天花，会造成患者全身大出血，大概在两周之内就会导致死亡。

得天花的死亡率在30%左右。

觉得30%不够高？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3

如果要排一下人类历史上的前几大瘟疫杀手，天花绝对能入选。

3000多年前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56年去世）的木乃伊上，就被发现有疑似天花导致的皮疹。

公元前6世纪，印度有了天花流行的记载。不过，天花造成的最大杀伤力，是在中世纪的欧洲。

无论平民还是贵族，甚至是国王，都逃不过天花的魔爪：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俄国沙皇彼得二世、荷兰执政威廉二世，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都是死于天花。

说起欧洲的瘟疫大流行，大家可能会第一个联想到黑死病，确实，这场由鼠疫引起的瘟疫，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夺取了7500万人的生命，光欧洲就死了近3000万人。

但和影响人类更久的天花比呢？天花曾累计夺走全世界至少3亿以上人的生命，仅18世纪，欧洲因为天花就死去了超过1亿人，即便存活下来的人，也留下了满脸疤痕。

给天花增加死亡数字的，还有美洲大陆的居民。

15世纪末，在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之前，那里居住着3000万左右的印第安居民。欧洲殖民者没用枪炮作为征服工具，而是将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送给毫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约100年后，印第安人只剩下了不到100万。

当然，当时由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瘟疫还有腮腺炎、麻疹、霍乱等等，但其中的“杀人主力”，是天花。

有着看似美丽名字的“天花”，其实是按照灭绝人类的节奏在发展的。

但是，最终它却失败了。

4

第一个让“天花灭绝人类计划”受阻的，其实是中国人。

据记载，天花病毒大概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东晋的炼丹术士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此已经有了记载。

根据最早的考证，中国在唐朝就研究出了对付天花的办法——以毒攻毒。

这种方法被称为“人痘接种术”，简单来说，就是从患者脓包里取一些脓液，用棉花蘸取后包裹，塞入要预防的患者的鼻腔中（也有研磨成粉，吹入患者鼻孔的），通过引发轻微天花症状，达到对天花免疫的目的。

这种方法至少证明了古代的中国人已经了解到天花的一个特性：只要得过天花，就能获得免疫力。

学术界对中国的“人痘接种术”究竟出现在哪个朝代还有争论，有“唐朝说”，也有“宋朝说”，还有“明朝说”，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到了清朝，

中国人对通过“种人痘”来预防天花，已经轻车熟路了。

在清朝，康熙皇帝大力提倡“人痘接种术”，并要求在皇族内率先施行。1742年，清政府还专门命人编写大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其中有详细介绍幼儿接种“人痘”免疫天花的四种方法。有一种说法是，康熙之所以能继承皇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小时候得过天花，所以皇族认为他对此有免疫力，可以健康长寿。

1688年，俄国派人到中国，专门学痘医，这是有文献记载的最先派人到中国学习“种痘”的国家。

1704年，法国传教士把中国的“神奇方法”带回了欧洲。

1722年，威尔士公主用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医治好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这种方法开始在英国流传开来。

1744年，中国医生李仁山到达日本长崎，将中国的“人痘接种术”首次带到日本。

1790年，朝鲜派使者朴斋家、朴凌洋到中国京城，回国时带走《医宗金鉴》，也将“人痘接种术”带回了朝鲜。

但是，当中国的“人痘接种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还是让人不能回避：接受过“人痘接种术”的人，依旧有2%～3%的死亡率。

这怎么办？

5

终于轮到爱德华·琴纳出场了。

琴纳1749年生于英国，是一名医生。当时中国的“人痘接种术”已经传入英国，引起了琴纳的极大兴趣。

在琴纳开诊所的家乡伯克利，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得过天花的“麻脸”涉及各个阶层和各种职业，但有一个职业却从来没有过一个“麻脸”，这个职业就是奶牛挤奶工。那些挤牛奶的姑娘在当地一个个都是“美人儿”——在天花肆虐的时代，脸上没有麻子，就已经可以跨

入“美女”行列了。



爱德华·琴纳

对“人痘接种术”本来就有研究的琴纳，随后和一个挤牛奶的女工做了一次深聊，女工的话果然和他想象的一样：牛其实也会得天花，症状也和人一样，全身出“痘”，长满脓包。挤牛奶女工在挤奶的时候，难免会沾染到牛的脓液，然后就会感染“牛天花”，但一般症状是发几天烧，然后就会痊愈——从此一生对天花免疫。



琴纳给男孩接种

这个发现给了琴纳极大的启发：原来，困扰人类的天花病毒有个“猪队友”，那就是作为近亲的“牛天花”。而且，“牛天花”的杀伤力比“人天花”要小很多，最关键的是，“牛天花”和“人天花”交叉免疫——人一旦得过“牛天花”，对“人天花”也会终身免疫。

1796年5月17日，那天正是琴纳的47岁生日，他找到了一个8岁男孩，当着围观众人的面，给孩子接种了从一名挤奶姑娘手上取出的牛痘疮疹的浆液。两个月后，他再次给这名儿童接种了真正的天花浆液（用一根刺破过天花脓包的针，划破了孩子的皮肤）。

结果，这名孩子完全没事。

为了不使这例实验成为孤例，琴纳之后又重复了一次实验，再次获得成功。

琴纳于是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接种过牛痘的人，会对天花终身免疫。

毫无疑问，这个研究成果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欧洲的医学权威对这种方法都嗤之以鼻，甚至认为接种了牛痘的人，会染上“牛狂症”，最后会长出牛角和牛尾巴。

但是，老百姓只认一个硬道理：能不能治好天花。

事实证明，琴纳赢了。在大家渐渐接受“牛痘接种”法之后，欧洲感染天花病毒的人数出现了悬崖式下跌。英国政府为琴纳发放了奖金，并为他竖立了雕像，德国、美国等国家在19世纪初开始强制国民接种牛痘。



当时的一幅漫画，讽刺接种牛痘的人会长出各种牛的器官

琴纳当时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他开启了人类医学的一个全新学科：免疫学。

6

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到中国澳门等地，之后又传到了内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率先用“牛痘接种”替代了“人痘接种”，然后，这种方法慢慢在全中国普及。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天花在中国还存在。1950年的数据显示，天花患者有44211例，其中因此死亡的人为7765人。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签发《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在全国各地推行种牛痘。1960年，在云南和缅甸接壤的一个小村中发现最后一例天花病人，之后中国再未出现天花患者。

从世界范围来看，1970年，包括美国在内的20个西方国家宣布彻底

消灭了天花。1977年10月26日，在非洲的索马里发现了一例天花病人，从那以后，各国的卫生组织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一例天花病人。

1978年，美国一名女摄影师被查出患了天花，但她是在大学医学部的病毒实验室里感染的。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如果连续2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发现一例天花病人，就可以宣告人类的天花病毒绝迹。

所以，1979年10月25日，就成了“人类天花绝迹日”。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发过一个悬赏：谁能再发现一个天花病人，就奖励1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00美元左右）。

直到现在，这笔奖金都无人申领。

馒头说

有一部比较老的美剧，叫《末日孤舰》。看过这部剧的人都知道，它讲的是人类如何防止病毒毁灭全世界的故事——当然，我们都懂，“人类”的希望和未来，总归是握在美国人手里的。

我个人觉得这部美剧总体上一般，其中对“美国式主旋律”的宣扬有些露骨（国内外电影，我都不反感主旋律，但我欣赏构思巧妙的，比如像《吸血鬼猎人林肯》这种），但我还是追完了第一季。

和不少病毒末日片一样，《末日孤舰》不仅讲病毒，也讲人心。

在剧中，毁灭人类的病毒之所以能肆虐，起因是一位人类科学家改变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使病毒一下子变得超强。而就我目前看到的第一季结尾，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病毒，而是人心，是自己。

天花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完全绝迹了吗？其实并没有。

根据当年的约定，全世界还剩下两份天花病毒的样本，被保留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另一个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国家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世界卫生组织曾召开过6次会议，试图彻底销毁天花病毒的样本，但因为各种原因，一再推迟，比如美国反对的一个理由就是需要研究新

型天花疫苗——但问题是，天花已经在人类世界消失了。

20世纪80年代，曾有消息传出，俄罗斯实验室的天花病毒样本失窃。

而就在2014年，美国华盛顿一家政府机构的实验室搬家，发现6管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样本，一查，是天花病毒的样本。

唉！科学家和医生能努力防止病毒杀人，但防不了人杀人啊！

他不是药神，但他的发现改变了世界

在我们的印象里，很多伟大的发明或发现，可能就出现在灵光一闪间。但是，也有一些发明和发现的问世过程，可谓历尽艰辛，好事多磨。

1

1955年3月11日，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去世。

这个人的名字，其实很多人未必熟悉。但是在1999年12月31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的“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0人中”，“亚历山大·弗莱明”这个名字赫然在列，和他并列的，是爱因斯坦、图灵、莱特兄弟等等。



被印上邮票的亚历山大·弗莱明

这位英国人究竟做了什么，让他能排进这个百人名单？

因为他发现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迄今可能挽救了亿万人的生命。

这个东西，就是“青霉素”。

当然，青霉素问世的整个过程，不能全归功于弗莱明一人，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2

1881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出生于苏格兰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

关于弗莱明，网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一个英国农户曾救过一个落水贵族，贵族为了报答，将农户的儿子送去学校接受教育，之后那个农户的儿子发明了青霉素，治好了贵族那染上肺炎的儿子——农户的儿子就是弗莱明，贵族的儿子叫丘吉尔。

这段鸡汤听上去让人感觉颇为温暖，但遗憾的是，丘吉尔和弗莱明后来都公开表示：这完全是瞎扯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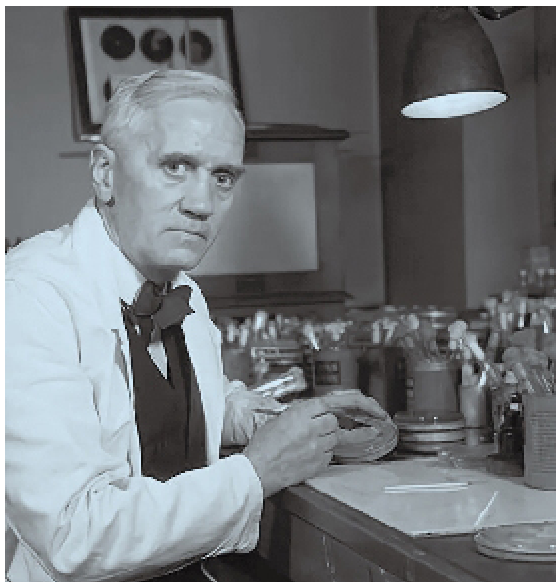
弗莱明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20岁时确实出人意料地进入了伦敦圣玛丽医院的附属医学院学习，但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哥哥以及他的舅舅——作为眼科专家的哥哥劝他学医，而他那终身未婚的舅舅给他留下了一笔小小的、可以作为学费的遗产：250英镑。

在弗莱明所处的时代，做医生可能会经常体会一种挫败感：人类的医学发展到20世纪初，依旧对细菌感染束手无策，人一旦染上肺炎、脑膜炎、霍乱、猩红热、淋病、梅毒这些细菌性疾病，死亡率就提高，甚至有时候一个小伤口没有处理好引发感染，也只能等死。

在这样的背景下，弗莱明虽然获得了外科医生的从业资格，却没有投入临床诊断和医疗中去，而是做了一个从事细菌和微生物研究的学术专家，主要从事免疫方面的研究。

其实倒也不是弗莱明不想做外科医生，而是他的老师莱特需要自己的学生做助手，而一丝不苟的弗莱明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在弗莱明担任莱特助手的时候，莱特带着包括他在内的医疗小组奔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尝试使用疫苗来防止受伤士兵的伤口受到细菌感染。但遗憾的是，以那时候人类对免疫知识的掌握，面对细菌感染还是感到无能为力。弗莱明亲眼看到很多只是受轻伤的士兵，因为伤口被细菌感染而最终失去生命。



弗莱明在实验室

但这个经历也让弗莱明积累了很多经验，而且他至少完成了青霉素诞生之路上的第一环：没有成为一名外科大夫而选择从事研究。

如果他选择成为一名临床大夫，或许他一生能挽救数百乃至上千人的生命，但数千万人乃至上亿人的生命之火，可能就会提前熄灭。

3

弗莱明确实适合做一个研究型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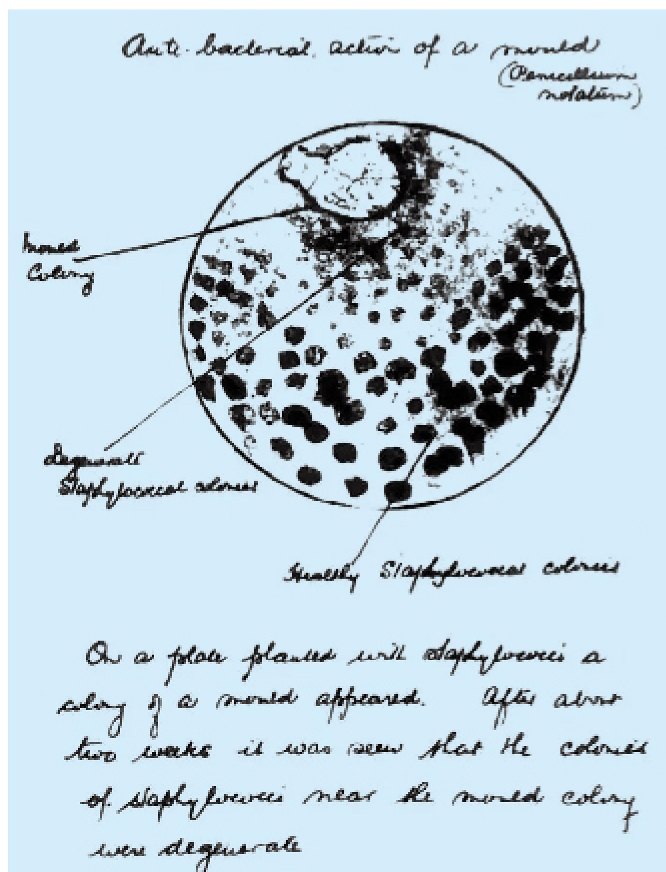
他显然不是一个天才型人物，但他拥有所有优秀科学家都具备的特点：敢于探索，善于观察，坚持不懈。

比如1921年弗莱明发现溶菌酶的过程就有点传奇。当时他在培养一种黄色球菌，恰逢感冒，他异想天开地将自己的鼻涕取了一点样放进培养皿，结果发现了细菌溶解的现象。他进一步发现人体包括眼泪在内的大多数体液也含有这种所谓的“抗菌素”（但汗液和尿液中没有），然后他坚持不懈地试验——一直让人吃柠檬酸然后收集对方眼泪，结果人家看到他就落荒而逃。

这是弗莱明第一次认识到自然界存在细菌的“超级杀手”，虽然在之后的7年研究中，弗莱明和他的助手发现溶菌酶对很多原生病菌几乎没

用，但他累积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然后时间就到了1928年。



弗莱明在培养皿观察到霉菌杀死细菌时所做的原始记录。事实上，也有人对弗莱明这个“发现青霉菌”的回忆有所怀疑，因为一切都太巧了：正好去休假，正好忘记放进恒温箱，正好忘关窗，正好温度适宜，正好有青霉菌飘落，正好被发现……但也有人认为，科学家都希望是通过有序研究做出伟大的发现而不是凑巧，如果有更“严肃”的发现过程，弗莱明肯定就说了。如果说这个“巧合”是编的，那么只能说，弗莱明真正的发现过程可能更是“无心插柳”

弗莱明因为要做关于葡萄球菌的研究，在实验室做了几十个葡萄球菌的培养皿观察。但在7月末的一天，他到外地去度假，忘记将那些培养皿放进恒温箱，并且忘了关实验室的一扇窗——那扇窗不常开，正好对着那几十个培养皿。

结果，当弗莱明在9月3日回到实验室时，发现窗台上的一个培养皿里出现了一块惨白色霉斑——显然空气中的什么霉菌飘进了打开的窗户，落在了培养皿上，然后形成了这样一块霉斑。

一般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将这个已经失去意义的培养皿拿去清洗掉，但弗莱明没有，而是马上将这块培养皿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令他大为吃惊：在那块霉斑附近，所有的葡萄球菌都被杀死了，形成了一个“空白”环状地带。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块霉斑肯定分泌了什么物质，抑制了葡萄球菌的生长。

弗莱明立刻深入研究这块霉斑，发现这是青霉菌在起作用。在进一步试验后，弗莱明发现青霉菌对杀死葡萄球菌、链球菌都有奇效，并且对非细菌细胞无害——这就意味着，它可以成为一种对人体副作用非常小，但疗效非常好的抗生素。

于是，弗莱明就把他发现的这种物质命名为“盘尼西林”（penicillin），也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青霉素”。

1929年6月，弗莱明将他所有关于青霉素的研究成果写成了论文《关于霉菌培养的杀菌作用》，这标志着青霉素正式进入人类文明史，也意味着在细菌感染阴影笼罩下的人类，再熬一段时间，就将跨入一个全新的纪元。

为什么要再熬一段时间呢？

因为弗莱明关于青霉素的论文发表后，根本无人问津。

4

弗莱明那篇关于青霉素的论文，在发表后的整整8年里，被引用数为“0”。

无人问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弗莱明根本无法从青霉菌中提纯出青霉素。一个东西如果无法被提纯，就谈不上被应用，就像当初居里夫妇宣称发现了“镭”，还必须倾家荡产去提炼出纯镭一样。再加上弗莱明在试验青霉素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挫折（包括发现葡萄球菌会产生抗性等），所以他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但这也怪不了弗莱明，因为他只是免疫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要提纯青霉素，必须有化学家加入才行。

直到1937年，有一批人接过了“接力棒”。

第一个值得一提的人，是霍华德·弗洛里。这位澳大利亚人23岁就成了医学博士，而且还获得过号称“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奖学金”——罗德奖学金。他在1935年成为牛津大学威廉·邓恩病理学院的主任。



霍华德·弗洛里

按照弗洛里的说法，他在1937年注意到了弗莱明的那篇论文，并且意识到这可能是人类征服细菌感染的重要一步。所以，以弗洛里为首，邓恩病理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开始大力研究青霉素的提纯和应用——这个小组，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牛津小组”。

当然，弗洛里自己也只是一个病理学家，要提纯青霉素，就必须引进化学家。



恩斯特·钱恩

于是第二个值得一提的人出场了：来自德国的天才化学家恩斯特·钱恩。这位24岁就取得化学博士头衔的天才后来表示，其实是他第一个注意到了弗莱明关于青霉素的论文并告诉了弗洛里，后者才开始研究的。无论如何，钱恩加入牛津小组后，用他的天才大脑和出色的实验技巧大大加快了青霉素的提纯进程。

必须提到的是第三位人物，是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博士诺曼·希特利，他的特长不仅仅是在生物化学方面，更在于各种工具的巧妙制作，他在实验器具制作和青霉菌的培养、检测方法上完成了很多创新。

但是，这三人组成的团队并非外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互相欣赏的完美“三剑客”，正相反，团队内矛盾重重：弗洛里待人接物简单粗暴，不讲情理；钱恩自视甚高，看不起任何人；希特利一开始向钱恩汇报，但两人大吵几次后，希特利宁可向弗洛里汇报。

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三人在性格上并不合拍，但对于共同做的这件事，却都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并且锲而不舍。

1940年5月25日，又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在弗洛里的要求下，团队用化脓性链球菌感染了8只小白鼠，然后其中有4只小白鼠被注射了钱恩主导提纯出来的10~20毫克不等的青霉素（粗品）。到了5月26日凌晨3点28分，希特利的值班记录显示：没有注射青霉素的4只小白鼠全部死亡，而注射青霉素的4只小白鼠全部存活。

这个实验彻底坚定了牛津小组的信心：青霉素将改变人类世界。

5

时间来到了1941年，青霉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

一方面，青霉素已经成功治愈了第一个病人。一个叫阿尔伯特·亚历山大的英国警察在花园劳动时被花刺划破脸引发细菌感染——肺部发炎，全身流脓，高烧不退。牛津小组用初步提纯出的青霉素给他注射，一天之后就高烧全退，脸部消肿，甚至可以开始进食。

但在另一方面，第一例“青霉素治愈”的病人虽然出现，但牛津小组惊恐地发现，这名警察一天所需要的青霉素注射量，必须整个实验室满负荷运转几天才能提纯出来。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把青霉素的生产规模化和产业化。

然而，当时的欧洲大陆已经笼罩在纳粹的阴影之下，牛津小组做研究时还要时刻提防德军的空袭，无论是物资供应、科研力量，还是产业化生产，英国都已经捉襟见肘。



早期的青霉素提纯装置

此时此刻，牛津小组的领头人弗洛里做了一个决定：去美国！

美国凭借地理优势，一直远离战火之外，而且从资源到科技到产业链，全都符合要求。但问题是，美国人会愿意做这件事吗？

就在这时，另一个巨大推力又出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

战争的到来让美国政府立刻意识到：在战火中负伤的美国大兵需要大量的青霉素来抵抗伤口感染，这种看上去玄之又玄的东西，能大大降低美国士兵的死亡率。

于是，之前弗洛里还只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些机构的赞助下缓慢地推进与美国科研机构的相关合作，但战争一爆发，美国政府直接出面，从175家制药公司中挑选出17家，马力全开，全力研发和生产青霉素。



1944年《生活》杂志上刊登的青霉素广告，上面写着："谢谢盘尼西林，他能回家了。"

其实之前弗洛里和美国伊利诺利州的北方地区研究实验室在合作中已经获得了不小进步，通过一个发霉的哈密瓜和玉米浆加糖培育霉菌，让青霉菌的产量提高了1000倍。

而实力雄厚的制药公司的加入更是大大加速了青霉素的研发和生产。当时那些公司也都挤破头想成为政府批准的青霉素生产企业，因为谁都看得出来那是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

在战争压力和巨大商业利润的推动下，青霉素在美国迅速实现了产业化。到了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已经可以配备3000亿单位、10万剂的青霉素了，这些青霉素也确实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

按照很多人的说法，整个二战期间，盟军有过三个影响战争结局的划时代发明：原子弹，雷达，青霉素。

1945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个月后。

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王亲自将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三位获奖者：亚历山大·弗莱明，恩斯特·钱恩，霍华德·弗洛里。

一个发现，一个提纯，一个产业化。

当然，在这个奖项的幕后，其实还有更多的人应该被历史记住，比如同样起到关键作用的希特利。

最后回到亚历山大·弗莱明。

因为最先发现了青霉素的存在，弗莱明后来被授予了很多荣誉，包括被封为爵士。

但是，几乎在所有场合，弗莱明都表示功劳不属于自己，应该属于牛津小组，自己只是偶然有了一个发现。



弗莱明接受诺贝尔奖

当然，弗莱明是谦虚了，但是，这也恰恰体现了青霉素发现和普及过程的典型性。这是一个长达十多年的“接力”过程：从研究到发现，从提纯到生产，从产业到普及，不同国籍和不同岗位的人分工协作，薪火传承，才最终促成了青霉素的真正普及。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药神。

馒头说

青霉素的问世，在抗生素的发展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青霉素诞生之后，人类才真正进入“抗生素时代”（青霉素之前有磺胺），之后四环素、氯霉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相继问世。统计显示，抗生素的问世，将人类平均寿命提高了10年以上。

但是，有时候真的觉得，大自然背后有一双在操控一切的手。

抗生素的问世和普及，让当初可以操控人类生死的细菌大大衰落，但同时一批耐药性强的细菌又通过包括基因交换在内的各种原因出现了，甚至出现了能抵抗多种抗生素的“超级细菌”。

就以青霉素为例。它刚刚问世的时候，重症病人一天注射100或200单位，病情就能很快得到缓解。如今，一个普通的呼吸道炎症，一袋注射用的生理盐水（250毫升）中需要加入的青霉素剂量为上百万单位。

人类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不是抗生素不够用，而是抗生素滥用。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情况尤为严重，很多人连普通的感冒发烧也要吃抗生素，且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抗生素很容易买到。

2018年，时任欧盟驻华代表团卫生与食品安全事务公使衔参赞华杰鸿指出，目前在欧洲由于滥用抗生素或者抗生素的耐药性，每年大概有2.5万人死亡，从而每年带来的经济损失大概是15亿欧元，而亚洲的死亡人数达473万。到了2050年，这可能会超过癌症成为人类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根据欧盟相关组织的预测，2050年由于抗生素耐药性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大概有1000万，经济损失预估是100万亿。

长此以往，届时人类又将面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之前的窘境：面对“超级细菌”，普通抗生素已经无能为力，就像当初面对普通细菌，人类没有抗生素一样。

到那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超级抗生素”吗？还是人类的平均寿命曲线开始掉头向下？

不寒而栗。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青霉素传奇》《青霉素传奇续：人类死亡率转变的重大拐点》（微信公号“知识分子”，2018年5月1日、2018年5月5日）

2.《亚历山大·弗莱明》（Gwyn Macfarlane著，陈炜、晓林译，《世界科学》，1985年第1期）

3.《青霉素的故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网站，2010年10月9日）

4.《青霉素历史发展》（医学教育网，2012年6月18日）

5.《青霉素的发明与历史功勋》（邹新元，《中华医史杂志》，2005年第4期）

6.《话说青霉素》（孙万儒，中国科学院网络化科学传播平台，2011年9月19日）

7.《抗生素的辉煌与困惑》（苏西，《观察与思考》，2011年第3期）

8.《2050年千万人将死于抗生素滥用 死亡人数超癌症！》（杨丽萍，健康时报网，2018年8月21日）

附录 读者评论

1930年，美国发动的那场贸易战

Enji 陳遠之：我看到这篇文章后，感觉比较心惊的内容是，产能过剩导致的失业大潮。如今的中国，遍地微商，以及所谓的大众创业，是否也是另一种失业大潮呢？

Olivia Ren：然而政客们并不在乎长久影响，他们只希望对自己的连任负责，哪怕我走后洪水滔天。虚假的物质主义，严重不均衡的经济，族群和阶级之间的割裂……后人不自哀，又使人哀后人也。

Pro排骨：从商人变成总统，从全球化变成保护主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开罗会议："四大强国"的幕后博弈

Cathy：实力，永远都是实力。中国远征军的血泪不能被遗忘。

扬：寄希望于他人，远不如增实力于己身。

尹乐多："如果不通过战争，就别想从大英帝国手中夺走任何东西！"丘吉尔的老牌帝国主义嘴脸从这句话中表露无遗。大英博物馆里面从全世界各地劫掠搜刮而来的琳琅满目的稀世珍品，印证了弱肉强食的不破真理。

再聚德黑兰："三巨头"的台前与幕后

花的**Mm**兔：弱国无外交，不管是瓜分波兰还是划分中国领土，这种没有当事人在场的会议，与强盗何异？经过无数先辈的努力，中国重新立于世界强国之列，吾辈何幸！

治先生："当外星人来的时候"，真是说到位了，举例：龙珠。悟空和天津饭生死打斗，短笛出现，两人和短笛打得你死我活，贝吉塔来了，三人联合起来，和贝吉塔斗个不死不休，弗利萨出现……

格物致知：德黑兰会议，波兰领土向西移了一半，德国甚至失去了

原普鲁士的领土。最可贵的还是德国在宪法中规定，德国所有领土都已收回，从而避免了争端！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背后的四个人

华楼宇：制止核战争的办法是自身拥有核武器，同时避免更多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个悖论也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困境。

杨犁庭：对于原子弹投向日本之后带来的结果，科学家们表现出了种种后悔，奥本海默说自己“手上沾满鲜血”，但是军人恰恰相反，投下原子弹的机组成员表示一点都不后悔。只能说立场不同，态度不同，毕竟军人需要直接面对那些凶残的敌人。

OctRain：爱因斯坦曾经预言，他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会用石头当武器。愿世界和平，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要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再让地狱之火灼烧人类文明。

1973年，人类世界重新认识石油

程方兴：我觉得通过第四次海湾战争，美国其实看清了哪些阿拉伯国家是外强中干，哪些是硬碴。以后的一二十年里，它通过一种类似连横的外交策略，拉拢相对温和的国家，比如沙特和阿联酋，跟它们搞好关系的同时，用利益分化穆斯林阵营；对待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这些硬骨头，就采用经济制裁甚至直接军事打击的方式，使这些国家彻底失去活力。现在看来，美国处心积虑的做法达到了它的目的，沙特成了美国的忠实盟友，伊拉克、叙利亚内乱四起，再也无力翻身！太阴险了，所以我们中国要时刻警惕美国的狼子野心。

子渔：新能源的瓶颈在电池储电技术，以及系统稳定性上，一旦电池有了突破，新能源的发展将是暴发性的。

Grace：作为一个石油行业从业者，这几年真的危机感十足啊。但是也慢慢想通了，在这个世界上，不进步就会被淘汰，时刻提醒自己要向前。

三个东亚国家，三天，一场政变

刘鲲：“袁大头”真是一代人杰，就是末了称帝毁了所有名声。

MR.DENGSH：2001年的韩国电视剧《明成皇后》讲述的就是闵妃的故事，当然里面的闵妃形象非常正面。袁世凯确实是少有的遇大事、急事不糊涂的人。《清帝退位诏书》有句特别重要的话：“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就确保民国法统完整、正当，所以边疆历次叛乱，都占据不了道德制高点。比如达赖是清帝册封的，要叛乱就必须抛弃这个身份。怎么样，袁世凯是不是干了一件好事？

cancan814：袁世凯果然不像课本中写的那样只有负面影响，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他还是一个充满争议、血肉丰满的人物。我认为观史最重要的还是客观，一味抬高或者贬低某些人、某些事都不能客观明了地进行总结和学习，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就会跑偏。

长崎事件：大清对日外交的最后荣光

兔大爷：把它打捞起来，是想让它看今日之中国。把它打捞起来，是想让国人反思旧日之中国。“知耻后勇”，我们任重道远！

翰旭：现在来看，甲午战争也是日本透支荣光的开始，膨胀到最后见到两朵蘑菇云，从灵魂到国体都被美国征服。

李李：近代史，无论是怎样的主题，都让我看了就心里发堵，脑子发麻。诚然事后诸葛亮不可取，做另一个选择也许带来的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天朝上国之梦不可取，让百姓省吃俭用为当权者营造富裕繁华更不可取！

《排华法案》：一部应让美国人至今羞愧的法案

知名不具：我问过每一个美国同学，没人知道这个法案。我也问过我周围的中国同学，同样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法案。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初知道这个法案的时候非常震惊。为什么这样一个法案会被中国人遗忘？

星河问夜：其实对比一下有的人对黑人的排斥，就知道这种傲慢是生在人类骨子里的。当我们有资本去歧视别人的时候，未必能比美国人好到哪儿去。每个人警惕自身的傲慢才是正道。

能吹善打的比尔牛：加拿大留学党表示，不只有美国，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等地的华人都在那个时期遭遇过几乎完全一样的事，包括修铁路、排华法案等。感觉作为华人都应该了解一下这一段历史。时至今日，华人在海外哪怕是温哥华这种华人很多的地方，在一些大事上的话语权还是不够（对比其他族群例如印度裔的话）。

麦卡锡主义：一个从未远去的幽灵

拙木：最后的没有能力说得对，虽然我们发展迅速，但真的发展不均衡，我甚至亲眼看到过小山村里的希望小学，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小啊。但现在很多营销号各种鼓吹，弄得大家都盲目自信了。我们现在应该认清自己，韬光养晦，才是复兴之路。

郑新力：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似乎民众的认知没有太大的改变。信息量的多与少，改变不了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

Lǚ Zhōu：民众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正是信息的互通互联，才让人“放心”地确认自己的认知是充分的。这就是“睁眼瞎”的形成过程吧。

1971年，“乒乓外交”背后的六个人

Numb：周总理对科恩的一番话，说出了总理对青年人的认识。家境富裕的总理年轻时代投身革命，在当时部分人眼里未必不比嬉皮士更难以接受。但总理的叛逆与不满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大多数人的幸福。如今的社会都在强调个体，强调个人得利益。但请不要忘了，有一群人舍弃了自己的利益，换来了如今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发挥个性的时代。

烟小火：看个乒乓外交也看得我热泪盈眶是什么情况？我想我应该相信，在我的手里，也握着一块小小的拼图吧。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木纸**Muzi**：时至今日，周总理对科恩说的话依然适用，年轻人应当通过实践来认识自己，改造世界。大浪淘沙，优秀的文化必会存留，大众也应当以更包容的态度来对待新时代的年轻人。

那一年，中国在联合国连投**16**轮反对票

风走云上：看到“一否到底”这四个字的时候真的心里一震，那是怎样的魄力啊！

苏曼祺：“打铁还需自身硬”，无论个人、小家还是大国，无一不适用！锻炼身体，提高自己！为国为家，和实验死磕到底！

闫世成：不简单。国家从来是一个群体，很多时候被看成个人。所以，国家从来没好坏。但是很多时候一个群体的利益，需要领袖来把握，可见其任务之艰巨。

帝国的覆灭：**600**万人为何会被**168**个侵略者摧垮？

Cathy：20世纪初英军入侵西藏也是同样的翻版。谈判者卑劣的谎言，一边倒的屠杀……而说到《圣经》，引用毛姆的一句话：“魔鬼要行凶，总会引用《圣经》。”

大扬：这样的事例不止一次证明，谁选择愚昧和封闭，谁就将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轧。

物与：说选择愚昧的朋友是不是有点用上帝视角看待了。美洲本来就有很多局限性，没有车轮，没有可以驯化的大型牲畜供驱使，多纬度窄经度的地形也让交流受到很大限制，本身就是两个发展程度极不同步的文明的碰撞，从很大程度上说，他们没得选。

日俄战争：一场中国土地上的权力游戏

蝎子：一流国家当棋手，二流国家当棋子，三流国家当棋盘……

阿**Q**：这场战争的影响还有很多，比如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看了日俄战争纪录片，果断弃医从文，之后就影响了几代中国学生……

John　ko：对马海战中，日本“日进”号装甲巡洋舰前主炮炮管被俄舰命中炸断，飞溅的碎片割断了在舰桥上做战斗记录的海军少尉候补生高野五十六的食中二指（断三指必须退役），他就是日后的海军元帅山本五十六（过继给母亲山本家，在红灯区绰号“八毛钱”）。对马海战后，一群观战的年轻美国军官登上“三笠”号，向胜利者和他们的崇拜者东乡平八郎表示祝贺。其中一人是切斯特·尼米兹上尉，日后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

美墨战争：一场“老大”对“老二”发动的掠食战

笑熬浆糊：墨西哥历史上国家发生“悲剧”的原因：一、离上帝太

远；二、离美国太近。

沙海一舟：让人不自觉地就联想到如今的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做惯了世界霸主座位的美国，对于迅速崛起的中国，自然充满了担心与恐惧，因为它认为中国对它说一不二的地位构成了威胁，所以要拼命打压。殊不知，今天的世界，当然也包括中美两国，早已不是原来的东西方世界那么界限分明，而是在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双方都是在试探中斗争，谈判。当然，作为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我们，并不是要像美国一样称霸世界，但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任人宰割、随意被蒙蔽的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暖男老爹："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现在的霸主更信奉丛林法则，所以"大兔子"的崛起有更多的困难。关键还是发掘自身潜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秉承和平崛起的初心，一路向前！

弩炮悲歌：昔日盟友之间的残忍对杀

大扬：法国人骨子里的荣耀和现实中的悲怆，英国人内心里的狐疑和战略上的辣手，化为海面上漂浮的大块油污和深海里悲鸣的残舰……

许卓煌：英军在缅甸坑中国远征军时可没有这般纠结。

Alin：这种来自盟友的反戈一击，肯定让人久久无法释怀。

帝国斜阳：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战争

Niki：铁娘子的由来！不过仅仅几个月后，铁娘子便在谈判场遇到了更厉害的对手，香港回归并未因马岛有任何改变。

李叶：不知道馒头上没上过学校里那门课"中国与世界"，我上那一年有一节课请来了阿根廷驻沪总领事，领事当时直言阿根廷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是因为中国承认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然而英国并没有因为这个就不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相反，英国是欧洲主要国家中对华合作最积极的。作为老牌世界帝国的英国在外交中显然更务实，也更有大国气度。当然，归根到底马岛就在英国手上，对英国而言，中国承认与否都无所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显然没有这么硬气。中国人也应该感激英国的这种务实和豁达，否则如果英国也矫情地硬要中国选边站，中国

领导人就非常为难了……

Ren 常温仪器：第一，20世纪80年代，鹞式战机就能完成垂直起降。我作为材料研究人员，现在还在为此进行攻关突破。我们要正视这个差距。目前国内材料加工领域希望通过3D打印弯道超车，但愿可以。这个差距太大了。第二，英军日常的训练和协作，才让他们有备无患。现代化的战争，不知道我们能否适应。忘战必危。

争霸亚洲：**400**多年前那场中日之战

Daybreak：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豆妈小晶晶：第一，多学一门语言很重要。第二，不要以为多学一门语言就能瞒天过海。

DH：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馒头兄讲的范围，明朝后期火器的技术和使用已经超过了日本，和欧洲的差距也不大。但运气糟糕的是，那时恰恰处于火器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在此之后冷兵器已经无法再和热兵器交锋，明朝如果能抗过这一阶段，也许就没有清朝什么事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内部机制和治理永远是第一位的成败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在朝鲜土地上的两场战争，对当朝政府命运的影响差异如此巨大吧。

1598年，中朝日决战露梁海

John ko：万历援朝一战后，丰臣氏倚重的西国大名们损失惨重，德川家康在关东坐大，加之秀吉已死，为德川代丰臣奠定基础。日本势力退回四岛300年。然而明辽东边军、浙军等精锐也元气大伤，三大征耗去了张居正改革的家底，朝鲜更是被打了个稀烂，东北出现了权力真空，建州女真坐大，真乃骨牌效应。然而，鉴于中华历来在朝鲜半岛上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此战万历皇帝是必打的。历史上，大同江流域（平壤）属于中华势力范围（不一定是领土），这是中华的底线。1598年的胜利、1895年的失败和1953年的胜利，两胜一败，都是这个地缘政治规律的注脚。

Tomorrow：纵观历史，唐朝的白村江水战、明朝的露梁海战、清

朝的甲午海战，中日之间摩擦不断，远算不得睦邻……还会不会有下一次？恐怕更多取决于我们国家自身是否强大，是否落后而有可乘之机。

决战料罗湾：中西文明的海上大搏杀

小吴：百年后，我们仍然需要睁眼看世界。又或许几百年后，我们需要睁眼看宇宙了。

徐湘豫：《三体》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重复错误而又不吸取教训的历史，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思想品德第一名：明朝时其实我们已经不领先，开始落后了。因为那时别人在进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我们却在闭关锁国。从精神和国民素质上反超，继之在工业革命上爆发，蕞尔小国也能击溃古老文明。

1949年，炮轰“紫石英”

LeePoker：“据说这个航速创造了长江上舰船航行的最高速度纪录。”这句话平淡无奇，却又有无尽嘲讽。

Object_Arkhangelsk：英国人拍电影的时候“紫石英”号的动力系统已经损坏了，其航行的镜头是由其同级姊妹舰“喜鹊”（HMS Magpie U82）完成的，电影拍摄结束后不久，“紫石英”被拆解。另外，文章中提到的“黑天鹅”号也是“紫石英”的姊妹舰。

仇佳俊 **James**：在伦敦塔桥附近的泰晤士河上，停着一艘现在作为博物馆的“贝尔法斯特”巡洋舰，我参观时看到有一段话介绍说，该舰在“紫石英”号事件时作为英军处理该事件的总部和旗舰。

科威特战争：“敝国虽小，硬骨头还是有两根的”

陈纳德：海湾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高科技战争，也使国家高层狠下决心大力发展部队的科技力量。

大王叫我来巡山：伊拉克引以为豪的以T72坦克为主的装甲部队，在一个月之内被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几乎不接触的情况下全部歼灭，震撼了世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高科技战争，也促成中国的军队加速现代化、科技化进程。

你若晴天，我便安好：第一次知道科威特亡国还是在《赌神》中牵条狗的那个外国人临走的时候说他的国家被伊拉克入侵了，他要回国参加战斗，保卫国家。当时我还纳闷，怎么还有国家会被入侵占领，现在才算彻底明白这其中的缘由。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我觉得美国这也算入侵，还为萨达姆感到悲哀。如今一看，两者都是一个面目，吃相都难看，不论有何种目的，手段都是一样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受苦受难的都是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

县令之死

LYP：当年误以为这个县令是清廷的帮凶，最后发现二人去世时间相近，以为是现世报，结果百度后瞬间热泪盈眶。这就是文人吧。

南云：一个体制内的人，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再念秋风秋雨愁煞人，感慨万千啊。

逍遥扬扬：想起德国判决卫兵开枪打死翻越柏林墙的人，卫兵认为他只是服从命令，法官说但你可以抬高枪口。此事有可能不真实，但极有意义。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坚守住底线，坚守住做人的底线，其实也是很伟大的。

中国最后一个状元

心越：看了馒头大师最后的那段话，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王纯生怪老师：想到沙俄流亡将领邓尼金在希特勒入侵苏联时期还破口大骂希特勒，号召白俄流亡者不要和纳粹合作，这其中可能和刘春霖也有异曲同工之感。政见可以不一，但国家只有一个。

小百姓：三个人的轨迹大同小异。古代读书人确实都很迂腐固执，但是深受古代思想影响，读书人的风骨是有的。虽然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还有局限性，但是在外敌面前，都不约而同地挺起一杆硬脊梁。

朝鲜最后一个国王

驭风牧云：每一个弱皇帝背后都有一个曹操，每一个强势的慈禧都会选择同治和光绪，并在他成年之前搞掉他。

三百个玉米蒸饺与豆豆神：想起了崇祯“何苦生于帝王家”，也想起了“溥仪到死都没有和这个世界接轨”，他们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例子。

庄稼汉：他的死引起了著名的“三一运动”，是朝鲜近代史的转折点，跟中国的五四运动一样。

“民国第一奇人”和他的“朋友圈”

Helen：最近刚开始读中国近代史，平心而论，清末确实更适合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共和，民智未开，何以共和。只能说杨度被批判得如此激烈，是当时的大众将君主立宪和帝制的概念混淆了。而袁世凯也不是华盛顿将军，袁的人生观、伦理观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对西方现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现代人文理想，谈不上对宪法、对契约精神的敬畏。传统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色彩，不知不觉地造就了追逐权力的借口和动力；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决定了袁世凯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只能是一个清末版的“曹操”。

王子豪：长袖善舞，千般变化真佯渡（杨度）；丹心不改，一腔热血报恩来。

Mr.嘉：比杨度早一些的洋务派封建士大夫，只有华山一条路可供选择。比杨度晚一些的革命仁人志士，已经能很清楚地知道选择哪条道路。所以，最难做出选择的，还是杨度这一代人，因而才有了种种的反复与徘徊。开启上帝视角的后人，不能盲目苛责杨度。

山高水长，勿忘陈嘉庚

刘刘刘刘刘大大：我现在在厦大读研，对于大部分在厦门或者集美读书的学生来说，校长有很多，但是校祖只意味着一个名字。诚毅和自强，以及说不完的校园设计，还有办学理念，一直影响着我们，从学习，到工作和做人。

Lynn Hu：我外公就是滇缅公路上幸存者中的一员。当然，如果他当年没有幸存下来，也就不会有我。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外公，对他的儿女和孙子辈，几乎不提在滇缅公路上的事。当年他是到了雅加达码头才给家人打电话说他去抗日了。船开的时候，他看到他弟弟追到码头，对着远去的轮船失声痛哭。这一别，就是一辈子。他去世多年后，我们在南侨机工纪念馆里看到挂着外公在滇缅公路上坐在汽车上的大幅

照片，泪如泉涌。

阿花：有一部电视剧叫《南侨机工传》，说的就是南洋华侨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踊跃归国，为了滇缅公路战争物资能够正常运输而牺牲的故事。

“国士”邓稼先

牙签：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Rou Rou：每次一跟人家说我是普渡大学毕业的，国内的长辈都觉得这是什么美国野鸡大学，从来没听说过，但是一搬出邓稼先是我校友，大家立刻服气了。

红脸书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老一辈科学家，是真正的民族脊梁，他们的生平事迹激励着我们内地广大青年永葆一颗对祖国热忱的真心。回想香港那些无知无耻之徒胆敢侮辱我圣洁国徽，那可是无数英雄先烈、民族精英用无限鲜血与付出保卫和铸造的啊！气愤之情无以言表，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该深入了解和学习这些老科学家的模范事迹，都应该团结起来，热爱祖国，努力奋斗，让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光辉灿烂！

那个叫余纯顺的上海人

逆水行舟：前段时间刚看了HBO的电视剧《切尔诺贝利》，那些第一时间冲进去灭火的消防员的死状，跟大师写的“他的头发像洗过一样，长而浓密的胡须也湿漉漉的。裸露的上身布满水泡，右胸部的一个大小如乒乓球”很类似，而且他也穿越过核试验场，我怀疑是接触了过多放射性物质。

麻军锋：迷茫中的中年男人，看了余纯顺，执着、粗犷、奋不顾身……人得有理想和信念！他选择了自己的路和方式去奋斗，个人感觉他对这最关键的一次风险考虑稍显欠缺……GPS和呼救设备都没有准备。（作者回复：所以我说，还是要有敬畏之心。）

王磊（脂肪猫）：1995年，他经过新疆石河子，曾到我们学校座谈，离开的那天一早，我们很多同学都去送过他，那年我上高二。不到一年，我们高考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很难受。在我心中，他才是真的

去追求了诗和远方的人。

拉瓦锡之死

宋涛：历史没有新鲜事！都梁曾在《血色浪漫》中，对法国大革命有过不同角度的阐述，让我们在历史教材之外又接触到了不同的真相！《乌合之众》也提到，民众被发动起来产生的暴力往往更可怕，更不理智！作为数学老师，我顺便说一句，提到拉格朗日时，用拉格朗日点不如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更能让大家理解。

Pro：一个混乱又疯狂的时代，科学与民主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绿野：也许做一个冷静的思想者，有时的确会给自己带来猝不及防的灾难，那也不要在疯狂的群体中随波逐流。

贝当：**62**岁的“民族英雄”，**84**岁的“卖国贼”

耒中：戴高乐和贝当这样做可能是两人的密谋，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个维希法国，一个自由法国，不管最后是轴心国获胜还是同盟国获胜，法国都有作为战胜国的理由，以此维护自己殖民地的利益。

暖男老爹：想起白居易的一首诗，正好可以印证贝当和汪的一生：“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生很长，每个抉择都要经得起自己良心和良知的考验。

佳：法理上，老贝是受命组阁，获有授权，维希政府一定程度上于法有据；汪系擅自出逃与敌媾和，自无法统，谓之以“伪”。

Diegezhang：刚看了部电影《巴黎血色围城》，犹太人被助纣为虐的维希政府围捕、驱赶、关押，甚至杀戮，与此文对应一下，真是感慨万千。

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的成功与悲剧

萝卜：奥本海默的师傅是玻恩，得了诺贝尔奖，他还有个很厉害的学生前一段去世了，就是我们的“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

頳：看完的感受：一、当时的曼哈顿计划就像一个巨大的面壁计

划；二、奥本海默真是智商、情商都高的人类代表；三、想想能和那么多大佬共事是什么样的体验；四、科学是把利刃，关键看谁在把握它；五、大概只有人类都毁灭时才能知道存在的意义。

卡卡**2020**：大师再一次抛出这个问题，就像体育一样，科学也无法和政治分离——这是一个中性的说法，政治可以推动科学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体育的普及，但有时又会左右其发展。

奥黛丽·赫本：天使的侧面

蓝鲸鱼：在索马里，赫本爬上卡车去找可能存活的孩子。我想到一个故事：父亲带孩子去海边玩耍，岸边有很多搁浅的小鱼，孩子说要把它们重新送回海里。父亲说你这么做谁会在乎呢。孩子拾起一条鱼放回海里，说这条鱼在乎，然后又拾起另一条鱼放回海里，说这条鱼也在乎，然后继续拾起更多的鱼……

Joanna婧：2015年秋，趁着周末来到奥黛丽·赫本最后隐居的小镇。小镇位于洛桑和日内瓦之间，不被世人所知，也没有大批量到处打卡的游客。奥黛丽·赫本的墓地只有一个十字架石碑，简单而质朴，上面摆放着一些影迷带来的鲜花、照片和小天使雕塑。♥#人淡如菊的奥黛丽赫本。

Obension：历史上每一位光彩亮丽成功的女性都有着一段悲惨的经历。时代在女性身上留下了太多考验。

1910年，那场在东北暴发的鼠疫

耀：大师好，我是搞病毒研究的学生，和大师交流一下。鼠疫是由细菌引起的。2003年的“非典”和目前的新冠肺炎都是由病毒引起，所以鼠疫病毒的说法并不准确。某些病毒也可以感染细菌。细菌、放线菌、真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是不同的微生物，引起不同的疾病，治疗和预防也不尽相同。当然微生物不全是有害的，比如很多肠道微生物有益于身体健康。另外，科技的进步也会更好地利用微生物造福人类。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早日战胜疫情。

暖玉：我喜欢的作家迟子建，有一部长篇小说《白雪乌鸦》，描写了瘟疫下的小人物。那是她的故乡。

DrHouse：老祖宗的手段其实已经基本遵循现代医学传染病的控制原理了，在那么短时间内抑制住那么严重的疫情，真的厉害，难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以史为鉴，你细品，细细品。

半夏烟雨：前段时间刚看完了加缪的《鼠疫》，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

邓见华：纵然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疫情之下依然谣言四起，民众恐慌。向伍连德、钟南山、医护工作者及所有参与防控阻击战的人致敬！

死神狂欢：**1918**年大流感

林嘉豪：看了馒头大师最后写的话，真的很感动，因为终于有一个声音是在谴责那些对其他国家的报复性言语了，这病毒真的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丑恶。之前我在网上劝网友不要对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结果就被骂是"叛国贼""废青""跪久了站不起来了"……在全球性灾难面前，人类就是一个整体，没有国籍的区分，没有肤色的区分。诚然，此前外国确实有很多对中国的不恰当言论，但我们反击回去也于事无补，只是增加了自己的坏心情。真正有用的是团结一心，以一个人类的身份声援自己的同胞。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阵营不是中国，是人类，我们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毒！

沙语：面对疫情，只有真话才能减少更大的伤亡。

半糖：不自觉想到董卿女神说的，"枪响之后无赢家"，病毒与人类也一样吧。

希胖：百年前就得到经验教训"在疫情到来之际，一定要说真话"，但现在依然有好多人在当鸵鸟。

尘砂：唯有天灾，才能让人类真正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花的灭绝之路

程方兴：琴纳医生的第一次人体临床医学试验，其实是在他儿子身上进行的。因为当时有大量的人对他的研究成果持严重怀疑态度，为了科学地广而告之，他让自己的儿子冒着极大的危险接种牛痘，获得成功后，才再次给另一个八岁男孩儿接种。所以说，科学的成功真是来之不

易，琴纳医生的贡献值得所有地球人铭记！

卷毛书生：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不接种天花疫苗“牛痘”了，若干年后，如果病毒实验室的天花病毒样本被“意外”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铁院怪蜀黍：人类发展进程的伟大成就，不经意已经改变了历史。我们应该对医护人员多一分包容。

他不是药神，但他的发现改变了世界

Jean Philippe：所以在1942年之前的抗战电视剧里是应该没有盘尼西林的。

苏曼祺：“他主要从事免疫方面的研究。”“他一直让人吃柠檬酸然后收集对方眼泪。”“他正好忘记把培养皿放进孵育箱”“他没有洗掉，而是认真地观察了起来。”……并不互相欣赏的三个人提取出了青霉素，命运的推手又在最需要程序化和量产的时候丢出了“偷袭珍珠港”的强力。一切皆政治，一切又都是命运。在向前走的道路上，一个扛旗的人，加上一批主动或者随波逐流的追随者，总会制造出奇迹，青史留名。感谢这些黑白照片上的老爷爷们。

老歌吉他：近代文明的几乎所有发明创造都来自西方国家。祖上有灿烂文明的中国人心有不甘，但必须直面落后的真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温度5：那些博弈、较量与人性/张玮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11
ISBN 978-7-5217-2372-4
I.①历… II.①张… III.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06326号

历史的温度5——那些博弈、较量与人性
著者：张玮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20年11月第1版
印次：202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2372-4
定价：6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温度1-5（套装共5册）/张玮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

出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本：电子书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